

革命四十年 (1949-1989)

— 台湾的“国民党弟弟”回来了

第一卷

海天血色

陆伟国/著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
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时代出版社

版 权 声 明

书名：革命四十年（一、二、三、四卷）

作者：陆伟国

责任编辑：刘 洁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社

地址：香港九龙旺角道33号凯图发展大厦

版次：2015年8月 第1版

书号：ISBN 978-988-13562-6-0

定价：128.00元（人民币）（全四册）

luweiguo1900@sina.com

目 录

第一卷 海天血色

1.	第一章 不敢思念的思念	1949年1月1日
2.	第二章 恶战在即	1949年1月2日
3.	第三章 血肉拼杀	1949年1月3日
4.	第四章 全村总动员	1949年1月4日
5.	第五章 燃烧的大海	1949年1月5日
6.	第六章 舍生忘死	1949年1月6日
7.	第七章 “这是国民党吗？”	1949年1月7日
8.	第八章 故土难离	1949年1月8日
9.	第九章 转移大河北	1949年1月9日
10.	第十章 今夜无眠	1949年1月10日
11.	第十一章 地富还乡	1949年1月11日
12.	第十二章 集思广益	1949年1月12日
13.	第十三章 陷落之后	1949年1月13日
14.	第十四章 闲情逸致	1949年1月14日
15.	第十五章 生离死别	1949年1月15日
16.	第十六章 还乡团	1949年1月16日
17.	第十七章 侦察失手	1949年1月17日
18.	第十八章 有口难辩	1949年1月18日
19.	第十九章 血溅望海山	1949年1月19日
20.	第二十章 黄港之行	1949年1月20日

21.	第二十一章 回光返照	1949年1月21日
22.	第二十二章 姜雪花殉难	1949年1月22日
23.	第二十三章 穷途末路	1949年1月23日
24.	第二十四章 大反攻	1949年1月24日
25.	第二十五章 李芹之死	1949年1月25日
26.	第二十六章 风卷落叶	1949年1月26日
27.	第二十七章 将星陨落	1949年1月27日
28.	第二十八章 亲人在何方	1949年1月28日
29.	第二十九章 仓惶逃窜	1949年1月29日
30.	第三十章 庆祝胜利	1949年1月30日
31.	第三十一章 千万里兮，不归路	1949年1月31日

第二卷 春去冬来

1.	第一章 葬礼	1949年6月1日
2.	第二章 恢复家园	1949年6月2日
3.	第三章 支前回家	1949年6月3日
4.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	1949年6月4日
5.	第五章 新春新气象	1949年6月5日
6.	第六章 抗美援朝	1949年6月6日
7.	第七章 惊魂未定	1949年6月7日
8.	第八章 对岸的烈士	1949年6月8日
9.	第九章 潜回大陆	1949年6月9日
10.	第十章 春风微漪	1949年6月10日
11.	第十一章 批判《武训传》	1949年6月11日
12.	第十二章 “三反五反”	1949年6月12日
13.	第十三章 老黄牛啊到我家	1949年6月13日

14.	第十四章 二次土改	1949年6月14日
15.	第十五章 两个太阳	1949年6月15日
16.	第十六章 互助组	1949年6月16日
17.	第十七章 统购统销	1949年6月17日
18.	第十八章 新疆在哪里	1949年6月18日
19.	第十九章 淮北灾民	1949年6月19日
20.	第二十章 合作社	1949年6月20日
21.	第二十一章 经老太去上海	1949年6月21日
22.	第二十二章 高级社	1949年6月22日
23.	第二十三章 春天的落叶	1949年6月23日
24.	第二十四章 反右	1949年6月24日
25.	第二十五章 一定要解放台湾	1949年6月25日
26.	第二十六章 “八·二三”金门炮战	1949年6月26日
27.	第二十七章 人民公社	1949年6月27日
28.	第二十八章 吃饭不要钱	1949年6月28日
29.	第二十九章 窝心事	1949年6月29日
30.	第三十章 大跃进——高温发烧的日子	1949年6月30日
31.	第三十一章 大炼钢铁	1949年7月1日
32.	第三十二章 反右倾	1949年7月2日
33.	第三十三章 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1949年7月3日
34.	第三十四章 大饥荒	1949年7月4日
35.	第三十五章 非正常死亡	1949年7月5日
36.	第三十六章 李辰获释	1949年7月6日
37.	第三十七章 长天当哭	1949年7月7日
38.	第三十八章 救命粮	1949年7月8日

39.	第三十九章 调整时期	1949年7月9日
40.	第四十章 右派摘帽	1949年7月10日
41.	第四十一章 以阶级斗争为纲	1949年7月11日
42.	第四十二章 学雷锋	1949年7月12日
43.	第四十三章 天上掉下个蒋介石	1949年7月13日
44.	第四十四章 去了台湾的那些人	1949年7月14日
45.	第四十五章 派遣特务	1949年7月15日
46.	第四十六章 “反共救国军”	1949年7月16日
47.	第四十七章 全民皆兵	1949年7月17日
48.	第四十八章 有来无回	1949年7月18日

第三卷 噩梦

1.	第一章 西去南疆	1960年1月1日
2.	第二章 劳改农场	1960年1月2日
3.	第三章 荒漠绿洲	1960年1月3日
4.	第四章 社教运动	1960年1月4日
5.	第五章 攻坚阶段	1960年1月5日
6.	第六章 脱裤子	1960年1月6日
7.	第七章 清经济	1960年1月7日
8.	第八章 清组织	1960年1月8日
9.	第九章 背后一刀	1960年1月9日
10.	第十章 难以收场	1960年1月10日
11.	第十一章 山雨欲来	1960年1月11日
12.	第十二章 大字报	1960年1月12日
13.	第十三章 反干扰，抓游鱼	1960年1月13日
14.	第十四章 红卫兵	1960年1月14日

15.	第十五章 大串联	1960年1月15日
16.	第十六章 红色恐怖	1960年1月16日
17.	第十七章 乱杀人	1960年1月17日
18.	第十八章 大漠芳魂	1960年1月18日
19.	第十九章 夺权	1960年1月19日
20.	第二十章 群雄蜂起	1960年1月20日
21.	第二十一章 反夺权	1960年1月21日
22.	第二十二章 再夺权	1960年1月22日
23.	第二十三章 黑云压城	1960年1月23日
24.	第二十四章 龙头易手	1960年1月24日
25.	第二十五章 长途奔袭	1960年1月25日
26.	第二十六章 一心向党	1960年1月26日
27.	第二十七章 “三支两军”	1960年1月27日
28.	第二十八章 腥风血雨武斗场	1960年1月28日
29.	第二十九章 残害	1960年1月29日
30.	第三十章 清算“八一八”	1960年1月30日
31.	第三十一章 大联合	1960年1月31日
32.	第三十二章 “一打三反”	1960年2月1日
33.	第三十三章 海秀被捕	1960年2月2日
34.	第三十四章 知识青年	1960年2月3日
35.	第三十五章 苏修特务	1960年2月4日
36.	第三十六章 活摘器官	1960年2月5日
37.	第三十七章 工农兵上大学	1960年2月6日
38.	第三十八章 赤脚医生	1960年2月7日
39.	第三十九章 只生一个好	1960年2月8日

40.	第四十章 文革花絮	1960年2月9日
41.	第四十一章 种个毛主席像	1960年2月10日
42.	第四十二章 治理整顿	1960年2月11日
43.	第四十三章 成家	1960年2月12日
44.	第四十四章 反击“右倾翻案风”	1960年2月13日
45.	第四十五章 农业学大寨	1960年2月14日
46.	第四十六章 粉碎“四人帮”	1960年2月15日

第四卷 乍暖还寒

1.	第一章 解放思想	1978年1月1日
2.	第二章 魂归故里	1978年1月2日
3.	第三章 春天又来了	1978年1月3日
4.	第四章 安息吧，海秀	1978年1月4日
5.	第五章 阳光的折射	1978年1月5日
6.	第六章 联产承包	1978年1月6日
7.	第七章 地富摘帽	1978年1月7日
8.	第八章 抛妻回城	1978年1月8日
9.	第九章 平步青云	1978年1月9日
10.	第十章 貂场	1978年1月10日
11.	第十一章 新的生活	1978年1月11日
12.	第十二章 农民工	1978年1月12日
13.	第十三章 此怨此恨永无期	1978年1月13日
14.	第十四章 海外来客	1978年1月14日
15.	第十五章 惊魂湘南	1978年1月15日
16.	第十六章 旧情新缘	1978年1月16日
17.	第十七章 “精神污染”	1978年1月17日

18.	第十八章 婚外情	1978年1月18日
19.	第十九章 两个孩子	1978年1月19日
20.	第二十章 环境污染与GDP	1978年1月20日
21.	第二十一章 外资企业	1978年1月21日
22.	第二十二章 教师节	1978年1月22日
23.	第二十三章 另一种牵挂	1978年1月23日
24.	第二十四章 胡耀邦视察	1978年1月24日
25.	第二十五章 台湾的“国民党弟弟”回来了	1978年1月25日
26.	第二十六章 野男人	1978年1月26日
27.	第二十七章 造纸厂出事了	1978年1月27日
28.	第二十八章 征地冲突	1978年1月28日
29.	第二十九章 付局长来了	1978年1月29日
30.	第三十章 婚变	1978年1月30日
31.	第三十一章 私营企业与共产主义	1978年1月31日
32.	第三十二章 王溪疯了	1978年2月1日
33.	第三十三章 新型合作组织	1978年2月2日
34.	第三十四章 现代民主政治	1978年2月3日
35.	第三十五章 新“左派”	1978年2月4日
36.	第三十六章 官倒	1978年2月5日
37.	第三十七章 海上走私	1978年2月6日
38.	第三十八章 官场震动	1978年2月7日
39.	第三十九章 二奶	1978年2月8日
40.	第四十章 新兴权贵	1978年2月9日
41.	第四十一章 反腐举报	1978年2月10日
42.	第四十二章 命案	1978年2月11日

43.	第四十三章 台商	1978年2月12日
44.	第四十五章 扬帆远航	1978年2月14日

第一卷 海天血色

第一章 不敢思念的思念

1949年1月1日

1.1 台湾的“国民党弟弟”来信了

1987年，春天，真的是春天，难得的春天。

中国北方沿海，一个低山丘陵地区。南面是蓝色的大海，波涛汹涌而来。到了陆地，海岸线以北，大地也像海浪似地一波一波地高低起伏，逐渐隆起。放眼看去，层层叠叠的山峦，一层高过一层，那绿色也一层浓于一层，由翠绿渐渐地变成墨绿，最远处，那就是深邃无比的蓝天了。

眼前，在海边第一层的丘地上，一位六十开外的老农王老汉正坐在地边。他家的几块地在这垠顶上，背后一垄垄的花生地锄了一半。望着快到头顶的太阳，“哎，快晌了，也好歇息了。”王老汉自己心里想着，身子又往后靠了靠，顺势就半躺在山坡的田埂上。老汉黝黑的皮肤，布满了皱纹，指甲盖长的灰白头发钹在头顶上，破旧的蓝中山装浸满了汗渍，落满了尘土。他没有带水，也没有带干粮，摸了摸烟袋也是瘪瘪的，只好用同样是浸满了汗渍、落满了尘土的手巾擦了擦脸上沁出的汗水。虽然能看得出老汉的生活并不宽裕，但他觉得挺满足了。“这年头真好，没有什么心事了。”虽然老母亲病体缠身、躺在炕上已经几年了，虽然日子过得挺紧巴、常常捉襟见肘，但是可以不用挨骂，不用挨打，不用随时随地被拉出来批斗了，可以这样肆意地躺在地上。春天就是这样的好，和煦的风拂面而过，温暖的阳光照在身上，老汉又惬意地伸了伸腿，松弛的嘴角还似乎咧了一下，露着几颗仅剩的牙，眯着的眼睛睁开了一条缝。

前面，山丘缓缓地低了下去，居然一直顽强地伸进了海里，成了一片礁石，泛起阵阵白色的浪花。当地人管这片礁石群，叫海角。海角的两边都是宽阔的沙滩，绵延不断，连结到天边的山峦。大海，辽阔的大海，就展现在眼前。虽然是海边人，其实王老汉也没有多看过几眼。今天，海上很平静，海面上跳动着闪耀的光点。往远去，蔚蓝的大海漂渺无际。再往远去，海天一色，迷迷蒙蒙……穿过海的尽头，又是哪儿呢？那儿不就是……三十八年前，就在这海边，国民党反攻解放区在此登陆，结果失败。仅仅盘踞了十几天，又是在枪炮声中，在哭喊声中，国民党兵带上在他们手里的一些百姓，爬上军舰逃走了，逃到了大海那边叫做台湾的地方。其中就有他十六岁的以后再也没有见过，生死未卜的兄弟——王立。然而却从此开始了他家一场场想不到的噩梦……原本是被国民党害苦的一个家，却因为跟国民党有了这种牵连而遭了更大的罪，遭了一辈子也说不完的罪……

“嘿！你往哪儿想啦？你敢往那儿想！”老汉猛地一拍脑门，痛苦地闭上了眼。就是那个遥远的从来没有见过，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那儿，像块巨大的石头一直压得他喘不上气、翻不过身，害得他家破人亡，几度生不如死……他又使劲地拍了几下脑袋，眼睛闭得更紧了。“才过了几天好日子，怎么又想到那

儿去了呢。”他哪会去想，他哪敢去想，可满心的痛楚向谁诉。“解放军为什么不早点打过去呢，为什么不早点消灭了这些狗娘养的呢……”他在心里狠狠地骂着，重重地捶了几下地，双手抓着身边的泥土和青草，拽出了细细的草根……

“叮铃叮铃”，一辆自行车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发出颠簸的铃声。“王大爷，王大爷！”一个女孩子清脆的嗓音钻进了老汉的耳朵。老汉一下子惊醒了，“嗯，嗯”，他四下一看，没有别人啊，“是叫我啊。”再抬起头来，一位健康端庄的年轻女子，齐耳的短发，浅红的花格两用衫，笑盈盈地推着自行车站在自己面前，着实叫老汉不知所措。“我才往那儿看了下，肚子里才这么想了点，怎么就被人知道了呢，就有人来找我了，他们太厉害啦。”他不知道又有什么灾难要临头了，但又觉得要真有什么坏事情，也不大会跟眼前的这位好闺女连在一起吧，于是，愣在那儿不知说什么了。

“王大爷，你就是王山大爷吧？”

“嗯，嗯”，老汉急忙爬起来，头低着，身子尽量想站直点，却还是晃荡，嘴里只知道嗯嗯。

“大爷，别紧张。我是镇政府台办的小林，我见过你。我们秦主任有事找你，叫你快过去。”

“啊！”怎么就这一会儿连镇里的主任都知道我往那边想的事了，老汉真的傻了，直直地站着。

“我这是二六的车，要不就带你走了。你收拾一下就过去哦，也不用走太急了。我有事得先走了。”小林调过车头，又“叮铃叮铃”地走了。

老汉望着小林骑着车颠簸的身影，渐渐地回过神来。“又有什么事呢？怎么办呢？”但他知道这没有什么怎么办，上面要找你的事是躲不过的，硬着头皮也得去啊。更何况是这样的一个年轻的闺女这么老远地来喊他，想想还从来没有一个女孩子来喊过他呢，该不会是坏事吧。他来不及想，也想不出来，便拿起锄头，小跑着，随着铃声和闺女的身影下坡了。

这镇政府的所在地叫龙头镇，在王老汉锄地的小山丘的东北面，也就有五六里地。这镇早先还有城墙，和东南西北四个城门。站在老汉锄地的山坡上，远远地就能看到西门外那棵高大的有着一二百年生命的银杏树（白果树）。因为这儿以前是旧政权的县城，当地老乡还是习惯把它叫做城里。1946年解放后，县政府机关设在了北面的海源，这儿就渐渐冷清了，成了个只有两三个商店的小镇。三、四十年来，镇里的布局基本上还是老县城的样子，只是那城墙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拆掉了。两条大道十字交叉，在镇中心形成市口。镇里就此划为四个行政村，每个村大约二三百户人家。这四个村的名称，就按方位分别叫做东北村、西北村、西南村、东南村。新政府成立后，分别以和平、民主、团结、胜利作为四个村的村名。习惯上，这两套名称都通用，除了文革期间，连民主这个词也不能说了，只能叫西北村。老汉家就住在民主村（西北村），是本书主要场景的所在地。镇政府坐落在十字路口的西北角，也属于西北村的地面。

好在老汉身板子还可以，刚过晌，就走进了西门，已经到了镇政府的大院。大院还是当初公社的院子，几排红瓦白墙的平房。虽然镇政府也是响当当的一级政府，但和老汉毕竟在一条街上，里面的人，叫不上名也常照个面。大门口的传达室，并没人出来盘问，老汉也就走了进来。

“可是，秦主任……秦主任是哪一个呢？”他拄着锄头，停下来，来回张望。

“老头，找哪个？”边上经过的人问了一下。

“秦，秦主任。”

“哪个秦主任？……哦，哦，哦，知道了。最后一排……连他也是主任了……”

老汉往后排走去。有个门推开了，闪出齐耳的短发和浅红的身影。

“哟，不是王大爷吗？这么快就过来啦。快上里面来。我们秦主任正等着你呢。”到底是小林年轻，眼明手快，把老汉请了进去。小林是东门外中学教地理的李老师的闺女，叫林李。小林的母亲林海秀在十年浩劫中因为反对文革的极左错误而被冤杀，是个张志新式的烈士。她的父亲为了永久的纪念，让她姓了母亲的林姓。这也是本书里的一件大事，以后再细说。她是两年前从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回来的，现在是镇政府台办（全称是对台关系办公室，简称对台办或台办）的办事员。镇台办，是为了加强这项工作，根据县里要求，前不久才成立。跟镇外办（全称是对外关系办公室）、侨办（华侨事务办公室）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办公室里，除了小林，还有一位刚提拔的秦副主任。

“秦主任，王大爷来了。”小李指着办公桌后面的中年人对老汉说：“大爷，这就是我们秦主任。”

老汉抬眼望去，那中年人敦实矮胖，穿着当时乡镇干部还很少有人穿的西服。本县生产的西服，不太合身，坐在靠背椅上，后面的衣片都高过了衣领。虽然，刚从阳光下走进屋子，眼神还不太好使，尽管还罩着一件老汉不太见过的西服，但老汉还是一眼认出来，这不就是那个秦干部么，不就是那个当初上来一把揪住自己衣领，像狗一样把自己拖出去游街的红卫兵、本公社造反派“八一八”司令部秦副司令的儿子秦红卫么。老汉不知道的是秦主任已经把名字改回秦有理了。很巧的是，秦有理也是烈士子弟。他母亲姜雪花1949年被地主还乡团活活钉死在龙头镇的十字路口。但这个秦有理却和他父亲秦德才一样不是个东西。王老汉见了，一阵头皮发麻，腿都快站不住了，但嘴里却还知道连忙轻声地问：“秦，秦干部，有什么事么？”

“大爷，老秦现在是我们的主任了。”小林依旧笑盈盈地说，顺手递上一杯水，“坐坐，先喝点茶，歇口气。”

“我还是站着吧，习惯了。”老汉把手使劲地往衣襟上搓了搓，犹豫了下，还是接过了茶，微微地点了下头。

“哎，”秦主任手一挥，“怎么叫，那都无所谓。老王啊，有段时间没见面了吧？还好吧？”老汉只是嗯着，等着下文。秦主任见没有回应，便停顿了下，往前伸了伸头，压着嗓子说：“这几年，你那边的那个兄弟还没有一点消息？”

老汉一下子像触了电似地颤动起来，杯里的水都晃了出来，手还烫了一下，没顾上擦，急忙说：“没……没有，真没有啊。这你是知道的。”稍有停顿，又轻声地补充说：“政府可以调查么。”

“我说你呀，什么都不懂。现在早已经不是先前阶级斗争的年月啦。”秦主任替老汉遗憾地摇了摇头，“早就改革开放啦，你们怎么就跟不上形势呢。过去有海外关系，那可是要命的事。现在不同啦，现在说不定就有出息啦。”秦主任偷眼看了看老汉，老汉依然颤巍巍地站着。小林有点看不过去，拿来一把椅子，“大爷，你坐吧。”老汉这才弯腰坐下，脸上依然是一片疑虑，不做声。秦主任喝了口水，慢慢说道：“当然，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见面。前些年，你遭了些罪，吃了些苦。我也……这个么，要想开些，要往前看。啊……过去的事，都是有历史原因的，不能怪哪一个人。你也知道，那个时候，我也对你讲了些伤感情的话。但那也是听毛主席的话，闹革命么，主观愿望还是好的么。认识到了，也就行了么。现在，党不是还是很信任我么。想开点，啊……这几年，你日子不是也过得不错么，你全家三口，不，你全家六口，不，不……我都算不清了。”这位秦主任怎么连王老汉家几口人也算不清了呢，这又说来话长，暂且不表。“就算是三个人吧，一年也能分到百来斤小麦了吧？多好啊！以前能想得到吗？不要老是纠缠一些历史问题，不要老钻在里面。那还要让人沉重多久啊？从个人恩怨里跳出来，那就海阔天空，一片光明啦。哈，哈。”秦主任自己都觉得这番话讲得很有水平，看了看小林，摇了摇头微微地笑了。

老汉还是茫然，不做声，只是拿眼看着秦主任，心想今天眼前的这位秦干部，不，叫秦主任，怎么和过去的吹胡子瞪眼不一样了呢。

“那我就直说了吧，”秦主任似乎有点不耐烦了，“你那失散多年的兄弟，从台湾来信了。”

老汉真是吓得不敢，蹭地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两眼直愣，嘴巴张着，却没有声音。

“看把你吓的，还至于么。刚才不跟你讲了，现在的政策不一样了么。”秦主任几乎有点鄙视起来。

“大爷，你坐。这是好事情啊。”小林又转过来跟秦主任说：“这些政策，还真需要多宣传呢。”

“多宣传？就算跟他们开十个会，也没用。”秦主任好像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跟老汉宣传了，又喝了口水，接着说：“我就都跟你讲了吧。你兄弟王立，是叫王立吧？”

老汉这回反应很快，连连点头，“是，是，是叫王立。”

“他给我们县政府写了封信，问家里还有人吗，现在是什么情况。县政府把信转来，我们一查，就是你家兄弟。小林，你把那封信给老王看一下。”

“好的。”小林很快就从档案盒里拿出一个档案袋，又从档案袋里拿出用回文针别着的几张纸，双手递给老汉。老汉颤抖地接过来，一张张地翻着，最上面是县政府信访办和县台办的转发意见，下面是镇台办的调查报告，镇领导签署的处理意见等等，最后是一个信封和一张信纸，信上也没有几个字。但是，老汉一个字也不认识，双手颤抖地捧着信，眼泪顺着皱纹下来了，喉咙哽噎着，抽泣着……

“大爷，我帮你念一下吧。”小林拿过信纸，念道：“我叫王立，是贵县龙头镇西北村人。原是普通村民，与共产党并无过节，也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民国三十八年跟着国民党来了台湾，谁知竟成了生离死别。家乡和亲人，几十年来，杳无音信，一无所知。愚民王立日思夜想，每每泪下。特恳请政府查访一下，我家里还有人在吗？情况怎么样？如果还在，千方百计，千难万险，我也要回来看望和孝敬父母，

这是我今生唯一的心愿。我父名叫王建悟，如若健在，今年八十七。母亲王张氏，今年八十二。我哥王山，今年六十二了……”

老汉听到这儿，一下从椅子上滑了下来，蹲在地上，锄头也摔到了一旁，抱着头大哭起来。秦主任和小林都没想到这一手，惊了一下。小林很快反应过来，忙拉起老汉，却怎么也拉不动。门外路过的人，都从门缝和窗口伸进疑惑的脸。老汉越哭越厉害，浑身都抖动着。三十八年，三十八年了，三十八年的苦难和酸楚，今天，终于有了结果。

“你让他哭一会儿吧。我知道这些年，他们过得挺不易。”秦主任似乎也有点触动。

“兄弟啊，兄弟啊！可有了你的消息啊！”老汉已是一把鼻涕一把泪，泣不成声了。

小林过来把老汉扶上了椅子。她也没有了往常的笑容，轻轻地叹了口气。

“别难过啦，老王。这是喜事啊。”秦主任脸上漾起了几分喜色。他指了指小林手中的信，说：“你兄弟这回可是一个粮食公司的经理了，成了资本家啦。”老汉又是一愣，他知道资本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也是有钱的坏人，比地主、国民党好不到哪儿去。

小林看出了老汉的心思，忙说：“现在叫企业家啦。”

“对，对，叫企业家啦。哈，哈。”秦主任也附和着。

老汉喘喘气，歇了歇，“噢，噢。”了两声，抬起头，对秦主任说：“怎么没叫他媳妇来？她可是苦等了三十八年啊！”

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时，一批临沂老区群众退到海源。王立这媳妇就是那时跟着她自己家过来的，年岁才十五，不料和家人走散了。王立他娘见她可怜，人也实在，言语不多，干活勤快，便留下了她，想给老二王立当媳妇。因为姓丁，大家都叫她丁妹。可才刚过一年多时间，王立就被国民党带走了。可怜丁妹活守寡了几十年。

“哦，忘了还有这个事，你回去讲一下就行了。我们欢迎你兄弟早点回来。你要协助政府做好工作，欢迎他回来投资建设家乡。”老汉显然没听懂秦主任的这番话，一脸懵懂。秦主任只好换个话题：“老王，你今天可算是翻身了。你要感谢我们党啊，”秦主任特地把“我们”两字重重地强调了，还拖了一下腔，“要感谢我们政府啊……好吧，今天就这样吧，你先回去吧，赶紧告诉家里人，让他们都高兴高兴。啊……你兄弟那儿，我们会去信把你们的情况告诉他。他会跟你们联系的。”

小林把老汉扶起来，老汉直了直腰，好不容易，挪了两步。

“要不，我送你回去吧。”小林说。

“不了，不了，我能行。谢谢你，谢谢你们，谢谢秦主任。”老汉还恭恭敬敬地朝他们俩鞠了两个躬。秦主任往背后靠了靠，疏缓地吐了口气，他知道他已经完成了今天的任务。

小林倒有点局促，扶着老汉，刚要到门口，只听得一阵妇女的高亢而又刺耳的声音刮进了门。“秦主任啊，秦主任呀。”一个人高马大的妇女已经跟着声音跨了进来，睁着铜铃大的眼睛，径直往秦主任走去：“你说我二哥在那儿开了个多大的公司啊？”显然她对这儿已经是熟门熟路了，不知从哪儿听到了消息，就跑了过来，刚要往下说，发现了边上的小林和老汉，“哦，林同志啊，哥啊，你们都在啊。”这是老汉他娘在后来互助组那会儿，又从西面逃荒过来的人群里，看着可怜，领了个没名没姓的小丫头，当时才四、五岁的模样。因是从西面来的，所以取名叫王溪，当作女儿养。那是1949年以后的事了，跟去了台湾的王立没照过面。前些年嫁给了镇上一个远在青海工作的人，现在，家住街那头的胜利村（东南村），可是个不一般的女人。

小林忙嗯嗯了两声，老汉都没嗯嗯，低着头，继续往外走。小林送到门外，还不停地叮咛着：“大爷，能行么？走好喔。”屋里传来那女人的声音：“我二哥能带回来多少钱啊，秦主任啊，可得有我的一份啊，到时候你可得为我说话噢。”

“你的事，不还是一句话么。”秦主任爽快地答应着。

老汉都不知怎么出了门。明晃晃的阳光照花了他那还挂着泪的眼睛。自己也觉得两腿打晃悠，一脚高一脚低，要说不听使唤吧，却也在往家走着。街上的熟人见了，以为老头今天在镇里又挨了什么训，倒了什么霉，也不敢和他打招呼。拐过街角，老汉在闭着眼也能走回家的胡同里居然走过了头，多走了一个巷口。便在一个井台边的草垛旁蹲了下来，闭上眼，眼前又是黑呼呼，又是金光四射，心里也说不出是高兴，还是悲苦。这时，他的心情已经远不是用高兴和悲苦所能说得清的了，心里都不知道这将是旧苦难的结束，还是一个什么新的开始。

台湾，国民党，是个多么可怕的字眼，是令多少海源人几十年来心惊胆战、闻之色变而又死死缠绕、挥之不去的恶梦。

谁家要是和这几个字有关系，哪怕是被说成是和这几个字有关系，不是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起码也要脱掉几层皮，连儿子、孙子也永无抬头之日。

而如今，台湾的“国民党弟弟”，突然间却来信了，要回来了！真的是要回来了……

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年代里，龙头镇，西北村，还真发生过不少深深刻进人们脑海、跟台湾相关连的事。此时，对于王老汉来说，也正是：多少事，数不尽，涌上心；多少事，一幕幕，历历在眼前。

1.2回忆一：残害老王头

1967年的冬天，正是那个“文化大革命”血雨腥风的年月。

龙头镇西北村场院，正召开着一场气氛肃杀的大会。

主席台的横杆上挂着“海源县八一八红色造反司令部龙头公社分部批斗阶级敌人大会”。喇叭播放着震耳欲聋的革命歌曲：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四周有穿着黄军装、戴着“八一八”红袖章、肩上扛着长矛的人，在来回巡视。社员们不安地坐在中间，争辩着，争吵着，紧张地向四周张望着，不知今天又要发生什么。

主席台上坐着几个造反派头目，在一番交头接耳之后，一个敦实矮胖、皮肤粗糙的人站了起来，裹着一身过紧的黄军装，领子、袖口、下摆都露出脏兮兮的蓝套装，胳膊上套着显眼的红袖章。他，就是前面讲的那位秦主任的父亲，当时的八一八造反司令部龙头分部副司令秦德才。他站起来，精神十足，面相不善，拍了拍麦克风：“喂，喂！安静啦！”威风凛凛地扫视了一下会场，“现在我宣布，八一八红色造反司令部龙头分部批斗阶级敌人、批斗国民党地主大会现在开始！”他又停顿一回，扫视了下前方，会场的嘈杂有所收敛。他知道，他也能显示出某种权威了，嘴角露出得意的狞笑，便咳嗽一声，大声道：“首先宣布大会纪律。第一条，全体与会人员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条，全体与会人员必须遵守革命纪律，保持革命热情，提高革命警惕，高唱革命歌曲！现在让我们高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歌。放歌曲，预备，唱！”会场又播放起振耳欲聋的毛主席语录歌，秦德才忘形地挥舞着双臂，哇哇地大唱起来：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不是做文章，

不是绘画绣花，

不能那样雅致，

那样从容不迫，

那样温良恭俭让。

革命是暴动，

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今天的大会，主要是批斗我们西北村的地主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派。过去，旧社会，他们欺压我们贫下中农。今天，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千方百计地妄图变天复辟，想要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是可忍，孰不可忍！”

台边有人高举拳头，带领大家高呼口号，声浪一阵高过一阵：“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但是，西北村的国民党分子王建悟胆敢跑到反动保皇组织那儿去，污蔑我八一八红色造反司令部，挑动群众斗群众，是可忍，孰不可忍！”

秦德才一声吼叫：“现在，把国民党他爹王建悟和他的王八蛋国民党一家押上来示众！”

王山和他的爹妈，还有王立的媳妇丁妹，早已押在了台下，每人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写着“国民党他爹”、他妈之类的话，名字上照例划上大大的红叉，身边都有两个身穿黄军装的造反派站着。此时，随着秦德才的一吼，便被反扭胳膊，像小鸡似的提遛到了台上，一字排开，低头弯腰。场下于是一阵骚动，虽然都是一个村的，再熟悉不过了，但也还是纷纷伸出脑袋看着台上将会延续怎样的情节。

“为了彻底批判国民党分子、老狗王建悟，我们欢迎王老狗的女儿王溪上来揭发、批判王老狗的反革命罪行。”当时的王溪，已中学毕业在家，也是村里的风云人物，一身红卫兵的打扮，头顶的军帽没压住头发，脑后的小辫还高翘着，手中高举红宝书（即当时最流行的《毛主席语录》小本本），风风火火地跳上了台，一把抓住麦克风，激动地流着眼泪喊着：“首先让我们敬祝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敬爱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她激动地呛了口水，连连咳嗽，“我要揭露这个王老狗，他看上去可怜，实际上完全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他披着贫下中农的外衣，骨子里完全向着国民党反动派。是他指使他的二儿子在国民党反攻进来的时候留下来投靠敌人，参加国民党，并且死心踏地的跑到了台湾。他把我留在他家里，也完全是出于反革命目的，想为国民党反动派增添一个接班人。”已是白发稀疏的王山他爹，邻居都称老王头，虽然神色凄惨，听到这话，也仰起脖子想看看这养了十三年的女儿怎么能说出这个话。却被秦德才一眼看见，猛地一拍桌子，“你敢不服吗？跪下！”他们四人的小腿，马上被人踢上一脚，“砰”的一响，膝盖碰上了事先铺在地上的碎砖，随之惨叫一声，都跪到了地下。

王溪的激动还没有平息，“我宣布，我要脱离这个反革命家庭，断绝和这帮国民党的一切关系。我要参加革命队伍，参加八一八红色造反司令部，这个革命的大家庭。”秦德才马上站起来鼓掌：“王溪同志是可教育子女的先进典型。我代表八一八红色造反司令部，热烈欢迎王溪同志成为我们革命队伍的一员。”

“我还要宣布，为了表示我彻底脱离这个反动家庭、加入革命队伍的十二万分的坚定决心，我决定抛弃王溪这个名字，叫王红啦！王老狗给我取王溪这个名字也是有着极为卑劣的反革命目的，妄图叫我向西方资产阶级学习，走西方资产阶级的路。呸！”王溪转过头就朝他爹猛地吐了口痰，又接着说：“那是做梦！我，这个革命的王红从今天起，就和过去那个不革命的王溪彻底地决裂啦！”台上台下欢呼声四起，又有领头的带着呼口号：“热烈欢迎王红同志，参加我八一八革命造反派！”“革命不分早晚，造反不分先后！”

王溪似乎觉得这一切还不能完全表达她的革命决心，突然转过身去，朝着她爹老王头“啪啪”左右两下打去极响的耳光，又飞起一脚踢向老王头的心口。全场都为之一愣。老王头没吭一声，晃了一下，倒向后面，被两边的造反派一把提了起来。这位王姑娘还不过隐，又大步走过来，对她的娘和哥、嫂，“咚咚”，“咚咚”，每人两个耳光，而后昂首挺胸，脸上挂着最革命的神情，傲视一切地阔步走下台去。

“现在，大会进行下一项内容，这可是不一般的内容。”秦德才一下又变成脸色铁青，声色俱厉：“那个反动保皇组织，所谓的‘革命联合指挥部’，为了进行不可告人的反革命活动，把这个老国民党窝藏了起来，反而诬陷我‘八一八’包庇国民党。是可忍，孰不可忍！”秦德才像是真的发了怒，猛地挥拳砸向桌子，连桌上的茶杯都跳起来翻倒了地下。“我‘八一八’昨天对‘革联指’进行了坚决反击，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

把那个老国民党又抓了回来。我们有两个‘八一八’战士为此还负了重伤。为了明确表示我们的革命立场，我‘八一八’对阶级敌人，从不宽恕，决不手软。今天，我‘八一八’决定对老反革命、老国民党执行‘钉板’！”

此言一出，全场骚动，“吓死啦，吓死人啦！”人们都慌乱起来，有的妇女连忙拖着孩子往外走，四周造反派模样的人赶紧大声吆喝：“不许走！不许走！谁让你们走的！”手里的长矛横在了出口，把人们挡了回去。

“钉板”是前清衙门的一种刑具，就是在两三尺宽的板上钉上铁钉，一面露出钉尖。钉的长度不一样，一种是露出半寸余长，这是往死里打的，不消几分钟便皮开肉绽，辗转哀号，悲惨而死。一种是刚露出钉尖，专为刑讯逼供而用。打法也很有讲究，打下去就抬起来，还是横里一扫，其伤害程度大不一样。但落到造反派手里，这些都只有天知道了。

果然，一个造反派拿了个足有一人高的木板，前面歪歪扭扭地钉了两排铮亮的铁钉，上了台来。此人就是镇东面孙家芥的孙武胜，外号孙二赖，全公社有名的困难户，一年的救济款一个月就花完了。前些年是“社教”运动积极分子，眼下是秦德才的铁杆。已经年过六十的老王头，望着孙二赖扛的这钉板，脸无人色，浑身打颤，站不住了，被两边的造反派硬生生地提着。王山他妈和弟媳妇，那两个女的都瘫在那儿了。

“打！给我狠狠地打！”秦德才面目狰狞地又向桌子重重地砸了一拳。孙二赖二话不说，挥起板子打向老王头。老王头一声惨叫，身体抽搐着蹦了一下，划开口子的破衣服上立刻渗出鲜红的血印。大喇叭里变了调地呼叫着：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革命的红色恐怖万岁！”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啪！”又一下，“啊，啊……”王老头惨叫不已。他老伴见此惨状，虽然被两个大汉强摁着，却还拼命地嚎啕着，挣扎着。“啪！”再一下，王老头“啊”了一声，却已经蹦不起来了。有人走过去，跟秦德才耳语了下。哪知秦德才再次拍了桌子，“打！接着打！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啪！”“啪！”拷打持续着，王老头已经昏死过去了，没有了声息，破衣衫已完全被血染红了，被两边的造反派拽着肩膀硬支着。边上两个女的也都昏了过去……

秦德才瞥了一眼，从鼻孔里哼了一声，说：“今天的大会，再一次彻底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让万恶的阶级敌人在我们面前发抖吧！现在，大会进行第三项，把王八蛋国民党一家拉出去游街示众！”于是，在嘹亮的革命歌曲声中，王山一家四口，被造反派押着向街上走去。实际上，老王头和婆媳俩都已昏死过去，是被一路架着、拖着。会场上的人一下就都走散了，街上的人看着这样的血腥残忍，都吓得唯恐避之不及，躲得远远的。秦德才一帮看着没趣，没游到半条街

也就散了。王山一家被押回了看管他们的住处——镇外西北方的三队饲养棚。但是，他爹没有回来，被直接带到了“八一八”的队部。

第二天傍晚，孙二赖走进饲养棚，两手叉着腰，一嘴酒气，通知他们，“国民党老狗王建悟已经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不得丧葬，尸体我们已经处理了！并且警告你们，不许哭，不许掉眼泪！这是反革命份子的应有下场。”

他们没敢再问，伤痛和恐惧已经盖过了悲伤，只是蜷缩在炕角，默默地流泪，挨过这难挨的又一个黑夜……

1.3 回忆二：枪毙高增光

1965年。

海源人民又一段难忘的往事。

龙头镇东门外的中学操场，正召开着县人民法院宣判大会，对反革命杀人犯高增光执行死刑。

这个高增光，解放前原是北山的一个地主少爷，1949年国民党反攻登陆龙头镇时，从北山逃过来，投靠国民党军，还充当了还乡团长、县警察局长，进行疯狂报复。解放军为解决这股来犯的国民党军，派出侦察兵了解情况，但未能成功。一个班的八名侦察兵，被国民党军俘获后集体活埋。正在这时，西北村的妇女主任，年仅二十四岁的姜雪花，自告奋勇，潜入镇内，不幸被还乡团抓住。最后，竟被高增光活活钉死在龙头镇十字路口旧县政府的大墙上！事后，高增光跟随国民党逃到了台湾。其后竟然两次返回大陆。最后的那次，1965年的夏天，他作为“反共救国军第十三支队中校队副”，带着十一、二个人，在龙头镇西侧的大河口武装登陆。结果被一举歼灭，高增光自己被活捉。因血债累累，民愤极大，新仇旧恨一起算，被判处死刑，今天公开执行。

会场已黑压压地站满了人群，不但四乡五里的人不断地集队而来，就连北山的社员们也是天不亮就开始步行五六十里地赶过来。龙头镇的大街小巷满是走来走去的人，人们往往就此顺便串门探亲，甚至比一些节日还热闹，生产队也会因此而放上一一年当中也难得有的一天假。那年头，枪毙人倒成了让人兴奋的一件事。

会场四周，插着许多红旗，在风中飘扬。很多公安干警和解放军战士，或立正站岗，或四处巡查，表情十分严肃。场外的大门口，停着许多军用卡车、警车、机关的吉普车，这在县里就意味着一个重大事件。

王山一家，连同几家类似的内控对象被安排在会场的后侧，蹲在地富分子之前，几个武装民兵持枪站在左右。所谓内控对象，就是不戴帽子，不公开作为阶级敌人对待，但由基层组织内部控制，不得参加某些工作和活动，离开居住地必须经过批准。他们已经接到通知，这次大会之后，全家将被强制迁徙到北山安置。

……大会已经开始，大喇叭的声音传得很远。在县委书记讲完话之后，由受害人家属、姜雪花和秦德才的儿子秦有理，也就是后来的秦红卫、秦主任，当时镇中学高二（1）班的团支书，上台讲话。他以一种标准的学生普通话，充满感情地念着讲稿：“高增光这伙反动派能够杀得了我的母亲，但绝对杀灭不了伟大的中国革命。我的母亲、姜雪花烈士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而高增光这种国民党反动派只能像臭虫一样地死去！”全场掌声四起，激越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坚决镇压反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大会最后由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以高亢的声音宣布终审结果：“反革命杀人犯高增光，一贯坚持反动立场，追随国民党反动派，坚持与人民为敌，血债累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决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五花大绑的高增光，立即在颈后被插上高高的亡命牌，“高增光”三个字划上了刺眼的红圈，在一大群公安人员的簇拥下，推上了卡车，押在车厢前排的正中央。满车厢是执行这项特别任务、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说明：那时武装警察部队尚未组建，但对驻县看守所的配备武装的警察，作为特殊警种也习惯叫武警）。卡车发动了，启动了，缓缓地开动了。人们挤上来，争相观看。前面警用摩托在“呜呜”地低速开道，公安干警在更前面大声吆喝着，推开人群。

卡车开上了大路。人们在前后左右兴奋地奔跑着，一遍一遍地想看看这即将被枪毙的人此时是个什么模样。套在高增光脖子上的一条大绳索，被身后的武警紧紧地勒着，脑门上青筋突暴，嘴里塞进了一个大木球，穿过木球的粗绳深深嵌进了脸腮，浑身一点动弹不得，连眼皮也眨不动。阳光依然明媚，高增光似乎想最后看一眼这世界，满脸使劲抽搐，那翻上去的眼珠却始终翻不下来，眼睛里全是吓人的眼白和血丝。

听说要在姜雪花牺牲的大墙前公开枪决高犯，十字路口已挤满了人群，几乎水泄不通。押着死囚的卡车，在镇东面停了下来开不进去了。指挥部商量了下，只好临时改变原定方案，又从镇北绕了一大圈，再折向南面，直往海角而去。

海边的一块沙土地。高增光十六年前逃往台湾的海边，十六年后又重新登陆回来的海边，今天终于成了他的终结之地。当然，这时候，谁也不会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而且谁也不会去理会他在想什么。现场按照预定方案很快就准备好了，四周有严密的警戒，只有不多的人在那儿，一块大大的帆布摊在地上。卡车过来，准确地停在了帆布边上。高增光被左右两名武警押下卡车，胸前的大牌子和背后的亡命牌扔在了车上。几位公检法走过来，说了几句，写着什么（这个步骤叫“验明正身”）。有个人一扬手，驾驶室下来一位压低帽沿、戴着大口罩的武警，只露出一动也不动的黑眼珠，提着枪，紧跟在高的后

面，一起往前。没走几步，高身旁的左右俩人一松手，高的身躯晃了两下，还没等倾倒，他的脑勺后便随之响起枪声，前脑门爆裂的血污刚溅开，“嘭”地就倒在了帆布上。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帆布就被卷了起来，抬进了紧随其后的一辆医院的救护车。救护车和另一辆警车，拉着“呜呜”的警笛，亮起闪烁的红蓝警灯，卷着尘土，飞快地走了。

阳光依然明媚，沙土地几乎没留下任何痕迹，连从脚印上，也看不出刚才发生过的事情……

1.4逮捕董平章

1964年。龙头镇民主村人怎么也意想不到的一件事。

那天早晨，公社来人召开大队干部紧急会议，而后又立即召开生产队干部紧急会议。散会后，干部们神色紧张，全部出动，四处大声喊话：“今天上午九点，所有社员，必须到大队部院子开会，不得缺席！”有人问，什么事呀，干部们一律回答说，“到时就知道，到时就知道”，语气极其严肃沉重，一句话也不肯多说。大家也不敢多问，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事。

人们走出家门，街上已站上了武警，村口停着一辆大卡车、三辆吉普。会场门口和大队部办公室门口，更是站着好几个武警，警惕地看着人们。社员们也从没见过这种阵势，悄悄地进去，赶紧找个边上坐下，整个院子没有一个说话的。最前面主席台的地方，放着一排长长的桌子，还空着。

王山一家在老王头的带领下，很早就来到了会场。虽然，老王头在1959年“大跃进”搞浮夸那年，因为不会吹一亩地能打几千斤、几万斤粮食，在“插红旗，拔白旗”的时候，丢了生产队长的“官”，但无论干什么事都还是非常地认真。

跟平常村里开会拖拖拉拉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不到九点，各家各户社员基本都已到齐。不一会儿，办公室里出来一大帮人，好几个还穿着白色的警服，坐到了那排长桌的后面，人们认识的有公社的宗书记，连大队书记也只能站在边上。宗书记站起来，神色凝重，说：“今天，在你们民主村开个什么会呢？想不到吧？你们民主村真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1949年，你们村有好几个跟着国民党反动派跑到台湾去了，这已经是我们公社的污点了。今天，其中的一个，居然还敢当上国民党特务，回来搞破坏活动，被我们抓到了！这个人！”这三个字，宗书记拉高音量后又突然停了下来。这一招效果果然奇好，满场的人都瞪大眼、甚至张着嘴在等他。而后，他才一个字一个字地顿开着说：“这个人，就是-董-平-章！今天这个会，就是公开逮捕美蒋特务董平章大会！”

此话一落，就像一块巨石扔进了波澜不惊的水塘，浪花四溅。原本平静的大院，一下子轰动了起来。民主村年纪稍大点的人，谁不知道董平章呢。他是中农董老头的独子，家里就这么一个儿子，这在那时是很少有的。董老头中年丧妻，对董平章更是宠爱有加，一直未再续弦。1948年，村里动员组建民工大军，南下支援解放军的淮海战役，董老头尽管已年过四十，也不舍得让儿子去，自己顶了这个名额，背上铺盖卷踏上南下的征程，就再也没有回来。董平章小时还读过两年私塾，这在当时的农家孩子也是很少有的。人也长得斯文，在村里，算是个知书达理的好少年。十九岁那年，娶了远近闻名的一朵花、西面赵村的赵玫。婚后夫妻恩爱，四邻都羡慕。谁知，才一年多，刚有了个三个月大的孩子，董平

章就被国民党带去了台湾，从此，妻离子别，天各一方。董平章就在这时也并不知道，他的三个月大的婴儿，在他还没爬上国民党军舰的时候，就已经死在国民党的炮弹之下。

就在人们紧张而又惊讶、议论纷纷的时候，县公安局卞局长站起来，大声宣布：“海源县公安局决定，正式逮捕国民党派遣特务董平章！”话音刚落，从主席台旁的平房里，突然有几个民警押着一个人推到台上。大家定睛一看，这不就是十五年没见的董平章吗？真的就是他吗？真的就是他哎！当初几十个去了台湾的海源人，大家见到的第一个，竟然就这样地回来了，就这样地回来了！此时的董平章，苍白而又憔悴，无神而又无力，满脸胡子拉碴，下巴在颤抖着，眼睛在不停地四处张望，显然在急切地寻找着什么。两边的公安迅速地掏出手铐，“卡嚓”一声拷上。

就在这时，会场的侧面，一个妇女挣开左右几个妇女的手脚，想冲上前去，拼尽全力呼喊着：“平章！平章！”董平章转过头来，眼睛瞪得大大的，下巴颤抖着。这就是他的妻子，日思夜想的妻子，千里万里赶回来要寻找的妻子——赵玫呀！赵玫想拼命地冲过去，“他不会是国民党，他是好人，他是来看我的呀！我知道，他是来看我的呀！”会场一片叹息，几位妇女甚至还在低泣。公安局长怒向大队书记：“怎么连会场都没管好！”指向赵玫那边：“拉下去！”赵玫挣扎着、喊叫着：“平章啊！平章！”被几个男的和女的七拽八拽地拖了下去。那撕心裂肺的呼叫，久久地回荡在民主村大队部院子的上空，深深地刺进人们的心里。可怜花也似的赵玫，在两年后的文革中，竟在南疆荒漠，惨死在狼群的尖齿利爪之下，那是后话了。

局长又转过来，指向董平章：“带走！”董平章立即被几个人拖走，他还想跳得高点，想从人群中再看一眼他的妻子，却被人摁着几乎横躺着拖了出去。他没说一句，因为在看守所出来之前，已经被下了下巴，只能颤抖着，痛苦地发出两步以外便听不见的丝丝声。

老王头坐在下面，看着上头，心里像打翻了油盐酱醋，五味陈杂，说不清了。文人们用的词汇：兔死狐悲、同病相怜，等等，都表达不了老王头此时的心情。自己的儿子呢，想都不敢想，可又怎么能不想。老王头不知道的是，从这天以后，他们家，也被划进了内控对象的名单……

1.5民主村概述

……

王山老汉睁了睁眼，思绪回了过来。

王立要回来了？

王立要回来了！

几十年杳无音讯的王山的“国民党弟弟”王立要回来了！

被称之为“国民党”的、给家里带来无尽灾难的弟弟，要从海的那一头——台湾回来了！

按说王立跟国民党毫无关系，但因为是跟国民党走的，这几十年来，王立也就毫无疑义地被说成是“国民党”。所以龙头镇上，几乎谁都知道王山有个“国民党弟弟”，至于那弟弟的名字，反而没几个知道。

就凭着这“国民党”三个字，王山要从台湾回来，那也是不得了的消息。

王老汉从乡政府刚出来不多久，短短的十几分钟里，这消息就像炸弹爆炸一样，震动了整个民主村，震动了整个龙头镇，传遍了大街小巷的每个角落。

人们纷纷围了过来，用各种异样的复杂的眼光看着王老汉，揣摩着王老汉和他的一家又会有怎样的悲喜和变化，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啊呀，快四十年了，现在怎么又有消息了？”

“唉，这几十年，他家为这事，遭了多少罪。”

“这回不知道又会怎样？”

“现在开放啦，这是好事情啊。”

“唉，丁妹总算是盼到了这一天啊，老天开了眼，真是不容易啊。”

“他爹就没等上啊。”

……

王老汉还靠在井台边的草垛上，迷着眼睛喃喃自语着，还没有从这晴天霹雳似的震荡中返过神来，甚至对站在四周叽叽喳喳、议论纷纷的乡亲们都没有反应。

阳光暖暖地晒着，王老汉无尽地思索着。

王老汉黝黑粗糙、布满皱纹的脸上，深深地刻着历史的沧桑。从王老汉一家的命运，可以看到民主村的变迁；从民主村的变迁，可以看到整个中国农村的革命历程。虽然它们有着各自的特性，更多的却是历史的共性。

海源，民主村，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农村共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缩影。这儿是革命老区，早在抗战期间就有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这名字还特地写上了“民主”两个字，可见“民主”还是挺吃香的。后来这个县还被称之为“地雷战的故乡”）。1946年以后，国民党反攻解放区，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在这儿反复绞杀。解放区迅速开展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毫不留情地夺取地主富农的土地和财产，分给贫雇农，以鼓动他们踊跃参加革命。并且对地主富农进行大批屠杀，直接从肉体上加以消灭，让农民群众更深更直接地卷入血腥的阶级斗争。反过来，在国民党军反攻时，地富还乡团则随之进行血腥报复，上演了一场场的生死搏斗。在保卫胜利果实的号召下，分到土地的农民则义无反顾地追随革命与国民党拼杀，在这块土地上涌现出了许多像姜雪花一样悲壮的事迹。最终国民党在这儿从海上败退，还带走了民主村的一些乡亲，为日后演绎种种进一步的人间悲剧留下了伏笔。

解放后，没多久，新民主主义的旗帜就换成了社会主义。民主村和海源人民一起，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搞起了互助组、合作社，土地实际上又一步步地到了国家手里。在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一场狂热得令人瞠目结舌的大跃进席卷而来，顷刻之间又马上掉进困难时期的万丈冰窟。而在海峡对岸

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政权借机搞起了动作，先后用U-2侦察机飞越海源上空，直至派遣武装特务在海源登陆，结果被一举歼灭，成了这一边强化阶级斗争的活教材。随着大陆政治领域中左倾思潮的不断发展，阶级斗争被进一步人为扩大，社会主义被不同程度地异化。左倾错误一次次地发飙，政治运动一次次地接踵而来，海源和民主村也都是首当其冲。海源被选中作为华东地区的社教运动试点单位，运动中死亡人数达三百人以上，严重伤害了、撕裂了基层干部群众，积下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使得海源在随后的十年“文革”浩劫中，两派的争斗比周边地区更为惨烈。

所幸的是，海源在改革开放中也是成绩斐然，走在前列。往日血染的沙滩，辟为旅游胜地，胡耀邦总书记来此视察时亲笔题写的“万米黄金海滩”镌刻在海边的大牌坊上；招商引资也被省政府树为典型。如今一座新兴的旅游城市耸立在黄海之滨，成了亚洲沙滩运动会、亚洲沙雕会的举办之地。当然，原有的矛盾并没有完全消除，新的问题又在滋生蔓延。

当今天阳光温暖地洒向王老汉和他身边的草垛，洒向民主村，洒向海源大地的时候，让我们从头说起。本书将要讲述的，就是民主村、龙头镇这四十年风霜雨雪和惊涛骇浪，就是中国农村这四十年潮起潮落和风云变幻。现在就让我们把时光拉回到1949年国共双方拼死血战的年代吧。

第二章 恶战在即

1949年1月2日

2.1孤注一掷

1949年5月的一天。

北中国海。

天色微明，海天之间一片黑暗混沌，海面上翻动着汹涌的波涛。东面的天际，渐渐泛出灰白色。在雾气蒙蒙中，一队舰船遮闭了所有的灯光，黑黑呼呼，影影绰绰，顶着风浪，朝北艰难地驶去。

这时，中国国内战争，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解放军已经跨过长江，占领南京，赶走了国民党政权，正向着江南广大地区快速挺进。国民党方面，兵败如山倒，一溃千里。为了扭转这个败亡的局面，国民党在北方沿海最后一个据点——黄港战区司令部，仗着黄港有美军驻扎，料想共军奈何不得，居然敢孤注一掷，向海源县解放区登陆反扑，试图转移解放军注意力，干扰其战略决策，延缓其前进步伐，还想着最好是把美军也拖进来，让它出面干预。

这队舰船，连兵舰、连征招的民船，共约六、七艘。为首的是“济成”号，号称是轻型巡洋舰，实际是改装过的稍大点的驱逐舰，六、七千吨的排水量。是英国政府在战后从退役军舰中稍加修理改装后送给国民政府的，1948年刚从朴茨茅斯港接回。主炮是刚换上的130舰炮，动力用的还是平流蒸汽机，这在国民党海军里算得上是一流的。

“济成”号狭窄的会议室里，挤满了人。长条会议桌的一头，墙上孙中山像之下悬挂着大大的一幅北方沿海地图，桌前站着一个穿着橄榄绿薄呢军装的军官，身材修长，神色严峻。这位就是此次行动的现场总指挥，青年军211师一团上校团长章汉林。

章团长也曾是个热血青年，从抗战以来还真有过一番不平常的表现。他原本是湘西山区的一个小学教师，从日寇入侵就满腔仇恨、一心报国。1938年底，恰逢国军第二军第9师来湘南集训，他得知这个部队先后参加过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前不久刚打了场赫赫有名的田家镇保卫战、英名远扬，就毅然决然投笔从戎，加入了这支部队。之后，便随部队参加了著名的昆仑关战役、两次宜昌战役。1943年，该师划入赴缅远征军编制，参加了滇西反击战。章汉林本人也是有勇有谋、奋勇杀敌，被升为营长。应该说，这期间，他为国家、为民族立下了汗马功劳。

抗战结束后，他自然也被卷进了内战，成了国共争斗中的一个卒子，内心是十二分地难言。他所在的第二军改为整编第9师，来到山东战场。可是打得并不顺，自从内战以来，就越打越窝囊。刚到山东就被命令急驰孟良崮援救新编74师，却在差一、二十里的地方，眼看着张灵甫被围歼。此时，第二批组建

的青年军211师在1948年来到胶东。为加强力量，章汉林和他的这个营，被整个地调入该师，他还当了个团长。前不久，211师被打散，章汉林所部退入黄港划归警备司令部管辖。这次又被任命为总指挥，不管内心是在怎么想，看着面前这么多的下属，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话还是要讲。

他整了整军帽，笔挺地站立，语气沉重地说：“先前，为了保密，不让共军探听到，我一直没讲。现在共军的活动，几乎是无孔不入啊。此次行动的计划，在座有的恐怕还不一定知道。这次行动就是趁共军不备之际，在海源县登陆，开辟一块新的三民主义实验区。”坐在后面的一些人，显然是才听说这事，十分愕然，纷纷议论起来。

章汉林没有让大家继续议论，冷冷地说：“我知道各位会奇怪，国军在各地纷纷溃退，我们怎么还向外出击呢？这，就是我们的高明之处，共军绝对想不到。我们就是要在想不到的时候，想不到的地方，来这一下子。诸位，此次行动可是非同一般，党国存亡维系在我等肩上。尤其是，据最新情报，共军的大批军火就是从东北苏占区，经海上运到荣成，再由民工用小车经过海源北部山区运到徐淮前线各处。这条运输线，是共军的生命线，反过来也是我们的生命线。如果这一仗打赢了，把这条运输线掐断了，共军南下的步伐将被拖住，国军还有在华南重整旗鼓的机会。如果失败，大至党国，小至我等，都将死无葬身之地。正因为如此，蒋总裁在这大厦将倾之际，上星期还风尘仆仆飞来黄港，亲自出马作了部署，想力挽狂澜于既倒。我想，各位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章团长的语调越发沉重起来：“我不想隐瞒各位，共军拿下南京后，几乎是昼夜兼程、日行百里，已经完成了对大上海的包围，淞沪大都会岌岌可危。真没想到，中山先生倡导的国民革命竟落到了今天这种地步，痛心啊！我们跟共军打了几十年，这是我们实践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最后机会，也是我们自己求生存的最后机会了。”

章汉林讲到这儿，自己也觉得讲得有些过于伤感，便停了下，提了提精神，拉高了点嗓门：“当然，这次行动，我们也有很多有利条件。北方共军已倾巢而出，后方空虚，此其一。我们行动突然，出其不意，共军绝无防备，此其二。美军有海军陆战队驻守黄港，共军必投鼠忌器，不敢有所动作，此其三。尤其是，我们罗副总指挥，与共军周旋了几十年，打共军，打鬼子，都有一套。现在，请罗上校讲话。”

几声稀落的掌声之后，一个粗壮的大汉，满脸落腮胡，土黄色的棉布军装，虽有上校之尊，却还是穿得皱皱巴巴，国民党334团团长罗自成在座位上晃了晃，算是跟大家打了招呼了。罗团长原是山东军阀韩复榘手下的连长。日军入侵山东、韩复榘被蒋介石以抗日不力为名枪毙后，他一时无主又不想当汉奸，便在沂蒙山区落草为王，打着“救国军”的旗号，四处转悠，鬼子碰不上却常常碰上八路军。好不容易熬到国军回来，又被共产党打得到处乱窜，好在还能几次绝处逢生，混到了现在。所以，虽然情势危急，罗团长居然还有点不在乎。“我跟共军打了十几年了，我可以说，我们这次行动有绝对的把握。他们以为我们肯定已经吓破了胆，哪会料到我们会来这一手。我们绕到了他们的背后，剩下的都是一些土八路，绝不是我们的对手。呵，呵，”罗团长阴笑了两下，忽然，又一下子变了脸，露出几份杀气：“当然，章兄讲得对，这次的行动十分的重要。是共产党逼得我们无路可走了。过去，小鬼子那会儿，我们东躲西藏，还有地方躲。可现在，躲都没地方躲，共产党非要把我们斩尽杀绝。我们无路可退了，再退就真

的退到大海里喂王八了。”他又瞪大了眼睛，猛地拍了下桌子，发吼地说：“334团的弟兄们，真的要拼一下了。这个时候，谁敢往后躲，我就宰了谁！妈妈的，决不客气！”

一个戴瓜皮帽的老头，想接着说。章团长对他摆了摆手，指向一位穿着笔挺的海军呢制服的海军军官：“方舰长，请讲。”那位舰长的制服，非常的精致，雪白的衣领，黑色的领带，帽沿、肩章、授带的佩饰，金光闪闪，胸前是金链坠挂的十字架，衬在深蓝色的呢制服上，倒是十分的显眼。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虽说是军人，却显得文质彬彬，透着几分儒雅，但在满屋激战之前一片紧张肃杀的气氛中，有点像请来参加一场饭局的客人。

“哈，哈。”方舰长微微笑着，戴着白手套的右手，向大家挥了挥：“我们海军历来很敬佩陆军弟兄们出生入死、为国效力。过去，我们也使不上劲，这次很荣幸能和诸位并肩作战。你们要运什么，运多少，只要船装得下，都行。你们要炮火支援，只要弹舱里还有，就往外打。海上支援，敬请诸位放心。”言毕，方舰长微微点头，白手套又在胸前划了个漂亮的弧线，神态十分地客气和潇洒。

这时，戴瓜皮帽的老头已急不可待，不等章团长发话，自己先说了起来：“我……我要说。”章团长只好伸手示意了下，说：“请即将上任的海源县代县长陶富贵先生讲话”。“我……我要说的是，我们和共产党是不共戴天的仇敌。”陶县长讲话很急切，心里更急切。他家是龙头镇上的大地主，陶富贵是长房长子，自认为是肩负着家族重担。1946年这一带解放，1947年第一次土改时，他全家就被扫地出门，土地、房产、浮财，全被没收，人被赶进牲口圈。第二年冬天，陶家兄弟俩偷偷逃出来，想去投靠黄港的国民党。结果，他跑了出来，他兄弟被民兵抓回去，开大会，当场被“镇压”。还连累那些被关着的所有家人，一个不剩地都被拉到地里，大半截埋进泥土，剩个肩膀脑袋在上面，再用牲口拖着铁耙拉过去，一片惨叫声中，那迸裂的脑瓜上喷出血能有几尺高。难怪陶富贵满心的怒火在燃烧。

此时，尽管黄港国民党当局封他为代县长，但也还是个沦落之人，身边不过三五个随从。穿的虽然是长袍马褂的老装束，质地却已大不如前，绝不是先前印度绸那样阔绰的料子，胸前空挂着一条细细的镀铜链条，袋里却并没有怀表拽着，只是脖子上比前几年多了串佛珠。连这个代县长，也只有有在登陆上岸，进了老县政府大院后，才能算数。所以，这位代县长的心情不能不急。“我家原本一百三十四亩地、二百亩山峦啊！可共产党来了，我家的地被他们分了，我家的房被他们占了，我家的人被他们杀了……此仇不报，我，我……我愧对祖宗，死不瞑目啊！”陶老头说到伤心之处，竟捶胸顿足、涕泪俱下，其他人等也面面相觑、一时无语。“卑职在此拜托各位国军兄长了。”陶老头站起，连连向四周鞠躬，甚是虔诚，其他人等也连连摆手，示意不必了。“国军收复县城之后，卑职将尽全力犒劳各位兄长。”陶某的脸色渐渐阴沉起来：“我要拿回分去的房，夺回分去的地，抢回分去的财产。”说着，又猛地取下了脖子上的佛珠，往桌上一摔，“我虽是拜佛之人，也不信这一套了。佛爷救不了我。我要杀，杀人……杀尽共产党，解我心头之恨。”话语至此，又连连咳嗽不止。

章团长似有感触，稍作沉思，抬头说：“陶县长心绪，我等可以理解。古人有言，国将不国，何以家为。真的是这样啊。但是，”他又转了一下语气：“我们光复海源，还要注意争取人心啊。过去三年来，我们只知道争地盘，不知道争人心。结果是既丢了人心，又丢了地盘，教训深刻啊。我们这次进去，对共党首恶，必办无疑。但对乡间农民动作不要太大，他们已经得了共产党的好处，我们不要再把他们往共

产党那边赶了。根据省党部的意见，乡镇士绅被共党清算的损失，暂由政府酌情补助，不要直接去向农民讨回。那样只会徒然增加我们与民众的矛盾，替共产党为渊驱鱼。”

“这怎么能行？”陶县长屁股都跳了起来，“就这样让那些穷小子沾了共产党土改的便宜？我的地，我的房，就这样丢了，那我们还来干什么？”

“我们来，不是为哪一家、为哪个人争地争房子。如果是那样的话，就犯不着我们弟兄们为这个来流血拼命。”章团长冷冷地缓缓地说着：“不要忘了我们国民党的使命，是要完成国父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实现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遗愿。我们流血流汗，唯此心愿，没有别的。”说完长长地叹了口气。

“没有别的话了，我们就按原定方案进行。”章团长指了下地图，“登陆地点：海源县龙头镇正前方的海角。”他抬了下手臂，看了下手表，面无表情地说：“现在还有半小时，各舰船之间立即联络，投入行动。首先是要争取成功，别的话以后再说。主炮一响，登陆艇、小划子就一起出动，不得迟疑！”

大家也都站了起来，无言地走了出去。

“李副官！”章团长朝门口喊了一声。

“有！”早已等在那儿的一位还显得年少稚气的海军少尉立即应声答到。

“立刻向司令部发报，已按时到达预定海域，攻击即将开始。”

“是！”李副官应答后，马上挤向人群。走廊上，站满了背着大小行囊、东歪西倒、神情疲惫、等待登陆的334团的士兵。好不容易挤过走廊，跨进电报室，没顾上与另一位报务员打招呼，就赶忙坐到发报机前，频率早已调好，急促地用按照莫尔斯编码改制的密码“滴滴达达”地向外发报。

这位李副官，是“济成”号的报务主任，眼下兼章总指挥的联络副官。李副官名叫李策，正巧也是龙头镇人，家中父母年岁已大，还有一个妹妹。在黄港开了个店铺的叔叔，因为没有儿子，所以两家合着供李策上学。李策也挺争气，从小书念得不错。抗战胜利后，他叔叔说，中国所以受日本人的气，是因为中国的海军不行，于是到南京上了海军学校。去年，还没毕业，就到英国朴茨茅斯，在“济成”号上实习训练，而后跟着船回来了。可出外求学之后，却因为家乡已被解放，李策穿着国民党的军装，这些年也再没能回过龙头镇。后来由于家里没有男劳力，李策他爹雇了个短工，结果，1947年土改时因为算是有剥削行为而划成了富农，从此便成了革命对象，被管制起来，跟外面断了联系。李策因此还一直没有家里的音讯。

天已微明。黑色的天幕下乱滚着飞云。海面上各艘舰船的轮廓，已逐渐清晰。

为首的“济成”号，舰首在波浪中起伏向前，桅杆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顶着风呼啦啦地飘，指挥舱顶上的信号灯正不断地打着忽闪忽闪的亮光。

甲板上，舷梯旁，过道边，很多的人影在上下前后奔忙。

前甲板的主炮正卸去炮衣，炮管在渐渐地抬起，炮口指向天空。

向北望去，海平线后的陆地，在灰暗中也已隐约可见。

李策发完电报，靠近舷窗，一语不发，定睛地向外张望，眼睛一眨也不眨。隐现在波涛后面的陆地，已越来越近，层层叠叠的山峦，越升越高。那儿就是他的家乡，那儿就是他的家。三年没回来，就这样回来了，怎么也想不到啊。炮响之后，将会怎样？自己将会怎样走进家门，家又将会是怎样的家？父母和妹妹又会是怎样？是房倒屋塌，还是血肉横飞，不敢想，不敢想啊……李策低下头，闭上眼，攥紧拳，心里只有焦虑，只有紧张，只有不安，不知道命运在谁手上……

2.2发现敌情

龙头镇前面的海边，还非常地安静。

先把龙头镇一带的地形地貌大体介绍一下：

龙头镇正前方的海岸，是一片礁石，当地人称那地方叫海角。海角的两边则是平直的海岸线，宽达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沙滩，向两侧的远方延伸。海角西侧七八里，是本县南北流向的一条大河的入海口，叫大河口，有一片泥沼。往东二十几里，则是一条小河的入海口，叫小河口。那条大河，当地老乡习惯就叫大河，我们也就不另取名了。它长达百余里，深入内陆山区，流域两侧便是海源县的主要辖区。从海边沙滩往里，便是第一波高地，二三十米高，当地把这种不甚高的山丘，叫做堦（读：jiang）。在龙头镇正南方的，叫前堦，西南方一个更大的，叫南堦。龙头镇，坐落在堦后的一片平地。镇后，又是第二波高地。紧挨着镇后面的一座石山，高约百米，叫望海山。镇东北更远处有一座还要高一点的，叫矛山。望海山与矛山之间，是一长排低山，叫后堦。大河从北向南流来，撞上矛山，转而向西，在望海山北麓再折向西南，在入海口形成了一片从地理学来说是袖珍的冲积平原。大河北岸有二三个村庄，而后又是一排山。山的后面，则是更大的平地，现在的海源县城就在那儿。再后面，便是更高的海拔三四百米的山岭了。

那年，解放军全力南下挺进全中国，后方的兵力确实并不十分充余，海源留了守备师的一个团。龙头沿海放了一个营，营部和一连，在龙头镇的南门外，二连在小河口东面的浮山卫，三连在大河口西的新河镇。守备师除了守护当地外，还有训练新兵、补充野战军的任务，所以兵员还比较充足。

龙头镇的前海沿，这一夜有两个哨兵在巡逻。高个大郑，浓眉大眼，是个老兵，其实入伍也就两年。是前两年，国民党进攻临沂时，离开老家随大军后撤，就参了军。矮个小钱，刚从本县的儿童团上来，也就十五六吧，还是个娃娃脸，留着几分的稚气。

两个哨兵负责这十几里的海岸线，一晚上就要来回走上几十里。这一阵，又刚好走回到海角的岩石礁群。礁石参差不齐，有的几米高，有的躲不下一个人，有的几个连成一片，有的孤零零地从沙地里冒出，在晨曦的朦胧中十分地不好走。

“来，小兄弟，坐下歇会儿吧。”大郑走到一块面朝大海又背风的大礁石前面，跟小钱说。

“站岗巡逻，还能坐吗？”小钱有点惊诧地问。

“嗨，打仗不能死背教条，这站岗巡逻也不能死背教条。咱们在这儿，看海上，不是更清楚吗。”到底是老兵了，大郑敢说这个话。他已经横下枪靠着礁石坐下了。

大海就在脚跟前，浪花卷着泡沫几乎能飞到身上。按时辰，大潮已过，潮水开始退下，坐在地上还有点湿，但是视野极其开阔。黑沉沉的天，黑沉沉的海，都已经淡了许多。翻滚的云，翻滚的浪，都有了些蓝色。海天之间的晨曦，蒙着一层薄雾，更显得模糊。

小钱看了下海上，也抱着枪靠着老郑坐下了。“郑大哥，你都是老兵了，怎么没跟着大军打过长江去呢？听说正面打南京城的，就是咱们军区的六纵、七纵，那多带劲啊！打进总统府的是吴化文的35军。连他们都能往南打。咱俩呢，天天看着海，从小就看着海，一直看到现在，多没劲呀。”（说明：吴化文曾投靠日寇，后为国民党96军军长，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起义，所部改编为解放军35军，参加渡江战役，攻入南京总统府。此事连小钱这样的解放军士兵都有点不舒服。35军仅存在一年便被撤销。）

“谁不想上前线啊，谁不想打国民党啊。”大郑忿忿地说。

“那怎么不叫你去呢？”小钱还在问。

“你虽然穿了军装，可还没打过仗，不知道打仗的残酷啊。我参军算起来才满两年，可已经负了三次伤。去年那次，子弹穿过了肚子，在后方医院躺了四个月。出院时，就不让我回24军了，叫我回老家，我不愿意，就到守备师来了。”

“那为什么不回家呢？”小钱又看了看海上。

“回家？回什么家？我爹是村里农会的小组长。那年，国民党打过来，还没到我村，还乡团就已经暴动起来，把我爹妈都杀了，房都烧了。我和我哥，那时都跟着部队在外县支前，一听说这样，干脆就都参军了。我这条命，从那时起就不是自己的了，就准备在战场上跟国民党拼了，从参军那天起，就没想到要回家。”大郑的脸都发青了。

小钱听了，望着大郑，颇有感动：“我什么时候才能轮得上打国民党呢。”

“是啊，大军一天天地往南了，说不定，真的轮不上了。”老郑似乎有点遗憾。“不过，那也好。那样，我们就可以早点建设新中国了。”大郑的脸色，又舒展开了。

“新中国，会是啥样呢？”小钱也兴奋地侧过了脸，看着大郑。

“新中国，什么样呢。”大郑颇有几分得意，像对小学生似地对小钱说，“那就是过上好生活，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地种，人人有活干，没有国民党，不用受地主老财的气。”

“那我们解放区不就早已经没有地主、国民党了吗？可日子还是挺紧巴的。”看来小钱是个爱深究的人。

“那是因为还没有完全消灭国民党。等到彻底消灭了国民党，成立了新中国，那就要比解放区好得多，干活有机噐，人人穿新衣，家家住新房。从地主老财那儿分来的那些旧衣服，还是长袍马褂的，也

穿不出去，算个什么呀？比地主穿得还要好，比地主吃得还要好，那才算行。能天天吃上连地主也吃不上的大馒头，气死他们国民党。”大郑的眼光里出现了难得一见的期盼和向往。

“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我们老师说，还要反对封建，实行民主，人人平等。”小钱刚从小学毕业出来。

“民主？民主是什么呀？明里煮，还有暗里煮么？什么意思呀？”大郑在使劲地回忆着，好像在哪儿听说过，可又记不起来，十分地茫然。

“我们的政府还叫民主政府呢，那民主一定是个好东西哎。”

“呵，呵，这东西我可说不上来。”大郑撑不起老兵的面子，只好尴尬地说着。

大概小钱对这个也说不上来，于是，谈话停了一会儿。

“郑大哥，你说，渔船还有隔了一夜，清早才回来的么？”小钱望着海上又开口说了。

“这，我就知道了。”大郑不在意地说。“你自己就是海源人，这事，你得比我明白。”

还是小钱眼睛好，他已经看到了昏黑天际下，在灰白色的天边，薄雾后面的模糊船影。“我是北山的，对海上的事也不清楚。我看着，好像有渔船过来。奇怪，怎么会是这个时候回来呢？”当时这儿的渔船，都是很小的，比舢板大不了多少，一般早出晚归，不会在海上过夜，除非是出了意外。尤其这两年，黄港有国民党兵舰，敢出海打鱼的就更少了。

“让我看看，在哪儿？”大郑认真了起来。

“在那儿，在那儿。”小钱掂起脚，使劲地指向远方。

大郑朝远处看了下，便着急地说：“这不就是军舰吗。”尽管大郑也没见过军舰，但长长的船身，隐约的炮塔，也可以肯定无疑了。“咱们怎么现在才发现呢？”大郑拍了下大腿，颇有几分自责。

“我早就看见了。”

“那你怎么不早说呢？”

“我……我怕看得不准。”小钱嘟囔着。

“有几个？你能看清吗？”

“我也看不清，大概四、五个吧。”

今晨的薄雾虽然不算大，但远处还只是晃荡的黑影，确实也还是看不清。

大郑望着天边，想了一下，说：“我得赶紧去报告连部，你在这儿看着。”

“我，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害怕，别国民党上来，把我给抓走了。”

“嗨！你还真是孩子，尽说些小孩话。这些船，没半小时上不来，而且这么大的船，还靠不上岸。这样吧，你回去报告，我留这儿看着。”

小钱急忙拿起枪，翻过礁石，走了。没过一会儿，却听见“扑通”，接着又“啊哟”的一声。

“怎么啦？”大郑喊了一声。

“我没看清，摔了一跤。”

“嗨！还真是个孩子，慌什么，这么毛糙。回去别忘了怎么讲。就说，‘报告班长，有情况，敌人的军舰来了’。”大郑连连嘱咐着。

“这个，我知道。”小钱忙端起枪，爬起来，一脚高一脚低地往前走。

2.3 部队出击

营房在龙头镇的南门外。

那时的龙头镇，老县城的城墙还在，不高，五、六米的样子，很破旧了。坑坑洼洼的泥坯墙，长了不少枯黄衰败的蓬草，除了贪玩的半大小子，没人会爬上去。南门还有个城门洞，早年上面还有个门楼，被日本鬼子当成碉堡用，八路军来了，就拆了。东西北三面，名字还叫“门”，其实，只是一个豁口。

部队的营房，在南门外的一片空地上，临时搭的三排平房。泥坯墙，麦秸顶，连窗户也没有，更不用说床，地上铺着厚厚的玉米秸，倒也不冷。营部和一连连部在最后一排。

小钱急急忙忙跑到营房前，满头冒着热汗，脚步还没停下，只听得暗处一声大吼：“站住，口令！”

小钱一愣，一时竟答不上来，“我，我，我不知道口令。”

黑影中走出来一个扛枪的哨兵。小钱一看，是三班的小宗，宗发奋。小宗是本省西面平原上的人，比小钱早参军一年，个儿不高却挺精神，看起来办事很认真，其实很有心计。小钱以为大家都认识，不是很在意，随口说道：“小宗，我是一班的小钱哎。海边有情况，我回来赶紧报告。”

“这儿没有小宗小钱，只有革命军人。”谁知小宗不吃这套。

“我昨晚吃过晚饭就跟大郑出去巡逻，没人告诉我口令呀。”小钱说的也是实话，是大郑忘了还有这码子事。

“进营房必须要有口令。”小宗一脸认真地说。

“我有重要事情啊！”小钱着急地说。

“不行！”小宗斩钉截铁地说。他今天就是要做个遵守规矩的模范。

小钱急得跳了起来，想往里挤，被小宗一把挡住，便不顾一切地喊了起来：“班长！班长！”

“你再喊，没了规矩。”小宗一下把肩上的枪横了下来。

“班长！班长！”小钱喊得更响了。

小宗“哗啦”一下拉了枪栓，把子弹顶了上去。

“怎么回事啊，吵吵成这样啦？”第一排最右边的门“咿呀”地开了，一个很健壮的人披着上衣走了过来，这就是一排长纪海洋。纪排长是典型的从翻身农民走上革命道路的。老家在海源西南面的鲁南山区，八路军一过来，就带头在村里搞起来，当了农会小组长，斗地主，分田地，样样走在前面。上级号召年轻人参军支援前线，便二话没说就报了名，为了保卫家乡，保卫胜利果实，戴上大红花高高兴兴地上了部队。这几年东征西战，练成一个军人模样了。

纪排长过来一看，小宗把枪都上了膛，对着小钱，忙问了情况。两人把前后事情一讲，纪排长顿时觉得情况严重，便对小钱小宗说，“事情都到这份上了，还在瞎吵吵。你们都已经参加革命队伍了，都要注意提高水平、改进工作方法啊。”纪排长语重心长地教育了他们俩，又对小钱说：“赶紧跟我来，向营长、连长报告。”

纪排长领着小钱，急忙来到最后一排房前，“砰砰”地拍着门板，喊着：“营长！营长！有情况！”又回头对小钱说，“你快去叫连长、指导员过来。”

营长已经把门拉开，“我听见外面响声啦，快进来，有什么情况？坐着说。”营长姓令，令锦绣，三十出头，在当时的部队里，已算是老革命了。他是抗战初期罗荣桓带领八路军125师一部从太行山区跃过黄河开辟鲁西根据地时过来的。后来部队撤回黄河北，留下了一批人，成了以后山东军区的骨干，令营长就是那时的一个班长。当初从黄土高原的窑洞里走出来的放羊娃，如今已是很成熟的一位指挥员了。

营部的房间里也就是多了一张从地主家搬来的方桌和三条长板凳。

“我站着说吧。”纪排长把情况大体说了下。

这时，连长、指导员也急急地赶了过来。四人在屋里站了一圈，小钱持枪等在外面。

“我在想，敌人是耀武扬威地转一趟呢，还是真的要上来？”令营长先问大家。

“他还敢上？敌人已经是朝不保夕、日薄西山了，只剩了喘气的份。”指导员姓胡，先开了口。胡指导个儿不高，皮肤白白的，眼睛很精神。他是浙江人，因为讲着一口浙江官话，有人笑话他和蒋介石是老乡，其实，那倒不是。抗战时期，浙江四明山区有个浙东支队，1946年，按照重庆“双十”协定，共产党的军队都要撤出江南，于是就转移到了海源一带。第二年，这支队伍又要开拔到东北。胡指导对北方的生活不习惯，听说在这儿已经吃不惯的窝窝头，到了东北，连这也成了稀罕，加上身体也不算强，便要求留下来。那时，很少有人自己提要求，考虑到他也有点文化，地方部队也需要这样的人才，就分到了守备师，当连队指导员。胡指导还在说着：“我军攻无不克，所向披靡，大军压境，气势如虹，已经把那个黄港小小的弹丸之地围得水泄不通。他们眼看着要死无葬身之地，想保住黄港还顾不上来呢。我敢说，他们绝没这个豹子胆，异想天开。”胡指导讲话，还真有些词汇。

潘连长，是个东北人，心直口快，他不等指导员讲完就开了口：“可不能这么想。”潘连长原籍胶东，祖辈上闯了关东。“九·一八”鬼子占了东三省，家园被毁，一路流浪回到胶东。可老家也已荡然无存，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便上了昆俞山，参加了抗日义勇军，这正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武装队伍。从此，一个关东莽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既然敌人来了，管他娘的上不上来，我就一句话，打！我看，兔子急了也能跳墙，这回敌人可是急红了眼，想找上门来拼了。咱们就叫他想跑也跑不了。他想跑，我还要追到船上去揍他呢。瞧那小样。”眼神里充满了对国民党军的极大蔑视。

令营长倒不忙说，对着纪排长问：“你看是怎么回事呢？”

“我觉得……”因为连长和指导员俩人说法不一样，排长稍为迟疑了下。

“时间不多了，快说吧。”营长催促着。

“我说，要有两种准备。要防备他上来，准备打。要是不上来，那更好。”

“对！我也是这个意思。常言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首先是要防备他上来，要准备打。”营长对这位排长还是挺器重的，经常会来听听他的意见。“先派一个排，全副武装，去海角进行戒备。其他两个排，也都集合，做好准备。哪个排去？”令营长问。

“那当然是我们排去。我已经有这个准备了。”纪排长对于领任务，那历来是毫不迟疑的。

“好，就这样！我们千万不能大意啊。对付敌人从海上登陆，我们还没有这样的准备，也没有过这方面的训练。纪排长，要多想到一些困难啊。要利用礁石，分散，隐蔽。”

“是！请营长放心！”

就在此时，纪排长的话还没讲完，海角方向传来“啪”的一声枪响。虽然很轻微，但大家都听见了。显然，大郑那儿有了紧急情况，这是发来的警报。

“快！全体紧急集合！一排，跑步到海角！进入战斗！三排到南港，二排到东滩。”令营长大声而又准确地说着。

“滴滴滴，打滴打。滴滴滴，打滴打……”紧急集合的号声马上响彻营房上空。刚才还寂静的营房就立即像翻了锅似的，嘈杂的人声，急切脚步，房前屋后都是扛着枪奔忙着的战士。

纪排长对小钱说：“你赶紧先去海角跟大郑说，我们马上就过来。”小钱一溜烟地跑了。

纪排长便向最前面的一排屋子跑去。

指导员还跟在后面喊：“出发之前，别忘了还要开个战前思想动员会啊！要鼓动战士的革命情绪，打仗靠的是革命精神啊！”

令营长对指导员说：“他们排的事，他会处理好的。你赶紧去乡政府，跟经乡长通报情况，叫他们也赶紧做好准备。”

“那老百姓要不要疏散？”

“这个，由乡政府来定。再有，用电话向团里汇报情况。”

“是不是需要团里派增援？”

“目前还不用。”

“是！”

指导员向城门跑去。

纪排长跑到那排平房前往常集合的地方。一排的战士们正提着枪，背着子弹袋，扣着扣子，纷纷从屋里跑出来，挤在一堆，都兴奋地望着他们的排长，看看带来了什么样的光荣任务。

“各班列队！立正……报数！”纪排长边喊，边看着战士们的装束是否符合要求。

“1，2，3，4，5，6……”不一会儿，报数完毕。

“一班报告：全到！”

“二班报告：全到！”

“三班报告：全到！”

“这次集合很快，很好！我看有个别同志，鞋带没系紧。我讲话的时候，赶紧系好了。”纪排长从不挖苦别人。“刚才，你们听到枪声了吗？今天的集合，不是科目排练，不是打演习。国民党打到我们头上来了，国民党的军舰已经开到我们前面的海边了。我们绝不能让蒋匪军上岸来糟蹋我们解放区。同志们，我们立功的机会到了！端起枪，跑步走！”

天蓝蓝的，已经亮了，空气非常的清新。“蓬蓬”，“蓬蓬”，砂土路上响起了整齐而节奏强烈的跑步声，尘土在裤腿间扬起，三十来人的队伍，端起枪，向着海边出发了。

他们没想到的是，迎接他们的，将是一场何等惨烈的战斗啊。

2.4准备登陆

停泊在龙头镇外海的国民党海军舰船。

这是一次典型的舰对岸两栖登陆作战，国民党军几乎还没搞过，要弄好了，说不定还能在军史上写上一笔。按说，这样的行动，要有完整的舰艇编队，比如，要有专门的指挥舰、火力支援舰、登陆舰、运输舰等等，各司其职。“济成”号轻型巡洋舰，这回担当了多方面的职能，既是指挥舰，又承担主要的炮火攻击任务，还搭载了二百余名等待登陆的士兵。

“济成”号已经停速漂泊在海面上。由于多了这么多人，甲板上，船舱里，乱成一片。炮手要启动炮位，水手要收放缆绳，待在甲板上的334团的士兵们被四处撵过来、撵过去，在哪儿呆着也碍手碍脚。舰上满是驱赶声、抱怨声、责骂声。

在舰桥顶层的指挥舱里，还能稍微安静些。

章团长、罗团长、方舰长，三人都在，各自都拿着望远镜，望着窗外。窗外，早晨最初的阳光已照上了陆地，翠绿的山岗夹杂着少许土黄色的山丘，就展现在几层波涛之后，似乎近在咫尺，唾手可得，只是隔了层玻璃而已。那望海山，那龙头镇，在望远镜里看得十分真切，而且十分地安宁，静静地，没有任何的异样，就好像在等着他们去似的。

章团长问罗团长：“罗兄对这次行动有几分把握？”

“把握？”罗团长反倒有几分惊讶，指着窗外安静的陆地好像是一块已经到手了的肉，“这不是明摆的嘛，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

“不可轻敌呀，罗兄。这些年，我们跟共军打，什么时候赚过便宜呢？”章团长提醒道。

“你怕我不卖力吗？你放心，我知道我的处境。你们俩是正统国军，打不好，还有退路。可我一个杂牌军还往哪儿跑？这海源也就是我最后的落脚之地了。这个地方拿不下，站不住，我还能上哪儿去？我是个粗人，说句粗话，拿不下海源，打散了334团，就好像丢了老婆又丢了床。别人的床，谁会让你去上？”

“不，不，你误会啦，罗兄。”章团长忙解释道：“我可能是多虑了，但我总想共军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

“不至于吧，就算是扔骰子，也该轮上一回了。”

“但愿如此吧。”章团长苦笑了一下，也不想多说了。

这时，334团的常参谋推门进来，门外传进一片嘈杂之声。

“外面吵什么？”罗团长颇有点不耐烦。

“团长，舰上的人把我们二连的弟兄们赶来赶去的，太过分了，差点都打起来了。”常参谋说。

“二连长呢？”罗团长问。

“二连长在那个‘隆庆’号上呢，二连副在船尾，过不来。一连长的话，两边都没人听。这么搞，都有点乱了。”常参谋答。“济成”号的甲板和船舱已经装了一个连，还想多塞点，但再装一个连实在塞不下了，就塞了二连的半个连，结果指挥上肯定就乱套了。

罗团长看了一眼方舰长，忍了一下，没发作。

章团长忙说：“334团二连，赶紧上小筏子，发起第一波攻击。小筏子下海后，空出甲板，炮手马上进行操作，朝原定目标轰击。”

方舰长向身后的副官嘱咐了几句，副官点头说是，转身向门外走去。

“报告团长，”常参谋继续说道：“刚才龙头方向的岸上，传来一声枪响。”

“就一声枪响，没别的情况？”章团长也有点警觉地问。

“没别的情况。目前岸上还很安静，没有别的动静。”

“不能让共军察觉我们的意图。请罗团长务必抓紧安排334团的弟兄们上艇，赶紧出发。”

“好，我出去看看。”罗团长说着也出去了。

章、方两人沉默了一会儿，章团长先说了话：“你不必在意334团的事，罗团长这回算是很克制了。”

“是啊，是啊，我知道。我听说过罗团长这个人的。”方舰长忙应声答道。

“哎，罗团长对这次行动，心态也是很复杂。开始叫他来，他还不想来，怕吃了亏，打掉了他的334团，以后没了吃饭的本钱。我跟他谈，这次你不来，以后还有你的机会吗，你还能上哪儿去呢。他一下子像开了窍，急呼呼地要过来。”

“那你何必要拉上这种人合伙呢？”方舰长不以为然地说。

“这年头，你又能去找谁呢？黄港的那些人，还不如他呢，他说不定还真能拼两下。”

“章兄，我俩交情不错，跟你说句心里话，国民党都到了这份上了，还用得着再去拼吗。这次行动要用舰船，我是海军，没办法，只能来。你又何苦来趟这个浑水呢？”说起来，方舰长更年长些，可说话很谦逊。方舰长，大概是江苏海门人，家境不错，自小念书。因为也是海边的人，学的都是轮机、船务一类，学校出来就进了海军。1937年，鬼子来了，为抵挡日寇舰队沿江上行，所在的舰艇自沉于九江江面，心中积郁。后来，退到四川峨眉，在兵工厂当了个所谓的驻厂军方代表，也是无所事事。抗战胜利后，派去英国学习最新的海军技术。在英国，又信了基督教。以外人看来，方舰长，与其是个军人，不如当个工程师更合其秉性。

“方兄，谢谢你能跟我讲这样的交心底的话。真是谢谢了。”章团长感激地看着方舰长，“其实，我何尝又看不出来呢。可是黄港警备司令，那个汪司令硬是盯着我不放，叫我挑这个头。我也是骑虎难下，不得不发。”

“汪司令也是看准了你好说话，知道你不会推。这种鬼差事，叫谁也脚底抹油，早就溜了。”

“怎么说呢，我也是看在党国份上，经国主任待我也不薄。眼下，又是党国危难之际，山河破碎，风雨飘摇，最后出把力吧，尽个军人之责而已。”章团长拍了两下方舰长的袖口，脸色似有凄然之感。

“济成”号的左舷侧。穿海军服的、穿陆军服的，乱轰轰地挤成一团。

“过去点，再过去点！”左舷舰炮的炮手们还在推搡着挤在炮塔边上的334团二连的人。

“推什么，推什么。是司令叫我们上来的，凭什么撵我们啊！”有个班长在带头争。

“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心人。这全是为你们好啊。待会儿炮一响，那声音，那热浪，能把你们打趴下了。”

“二连的，二连的，听好了。”二层的铁梯上，一个高个军官在叫喊：“命令下来了，准备出发。一班、二班，排好队，上筏子。”讲话的是他们的排长，姓支。

先头还在和炮兵争讲的那个班长，姓余，顿时闭了嘴，一声不响地钻到一边去了。

“余班长，余班长，在哪儿呢？”支排长朝下四处张望。

余班长此时恨不得能钻入地下，躲在最旁边的他们班杨定神的后面，还紧贴着钢板死命地再往里挤。

“你往哪儿躲？我都看见你啦。余班长，往前来。”支排长站在铁梯上咋呼了一下。结果，也在边上的二班长被挤烦了，一下把余班长拱了出来，叫支排长看见了。支排长忙指着那位余班长直喊，“一班的，赶紧过去，到余班长那儿集合。二班跟在后面。”

余班长忿忿地瞪着二班长，也无奈，摇摇头，不吭声地站着。一班的几个兵，渐渐地凑了过来。

被当作登陆艇用的救生艇，已从舰楼顶端的支架上用钢缆慢慢地放了下来，靠近了船舷的旁边。

支排长也挤了过来，站在救生艇旁，看着士兵们都慢慢吞吞不想动，便骂了起来：“真他妈的，不识抬举。”又一把将余班长拉了过来。“姓余的，第一个上。”

余班长哭丧着脸，爬了进去，拣了个艇尾紧靠发动机操纵杆的位置坐着。

“下一个！还用我一个一个拉吗？别怪我火气大，咱们早打完仗，早回家。”支排长又指着杨定神吼着：“过来！”

杨定神还想要骨头，说：“我在甲板上，怕掉到海里去，一晚上抱着铁管，蜷在这角落，又呕又吐，腿也麻了，头也昏了，我等下一批去吧……”

支排长没等他说完，便一脚踢了过去，“在我面前来这一套，做梦去吧！我可怜你，谁可怜我呀。”

杨定神没料到有这一下，被踢了一个趔趄，连晃了几下，差点翻出栏杆掉下海去。他连忙抓住栏杆，正巧一个海浪打来，飞起的浪花，把他浑身浇了个透湿。其实，这些北方兵，谁也没坐过船，经过一夜颠簸，都是晕得不得了。

杨定神抹着泪，也爬进了救生艇。杨定神是应该伤心得流泪。他家在黄港西面百多里路，鬼子在时，经常下来扫荡。杨定神不堪其扰，上山里去找队伍打鬼子。那时，周围几百里，就有好几支救国军，他哪知道谁是谁呀，只要是打鬼子就行。结果，错上了船，进了那个罗团长的队伍，不是躲鬼子，就是和八路干上了，平时挨打挨骂更是家常便饭。想跑还跑不掉，那次，和他一起来的同村的伙伴，跑了回去，已经到家半个多月了，还是给抓了回来，硬按了个罪名，说是想去投靠鬼子，在队伍前枪毙了。

一班的士兵，渐渐地都爬进了救生艇。

“二班的，上那一个艇！”支排长还在指挥着。

“你自己干吗呢？”不知什么时候，罗团长站在了铁梯上，以更响的喉咙嚷了起来：“你就是支排长吧？就是说你呢。”

支排长也只好转过身来，立正，敬礼，大声说：“是！”

“你上第一个艇，你担任这第一批的指挥，指挥五个艇。”

支排长一听，他担任指挥啦，顿时来精神了。一面对罗团长又敬了个礼：“感谢团长栽培！”一面又对士兵喊：“快上，快上！”又对余班长说：“你们这儿让个地方给我。”

余班长的艇上，已经有十一、二个人，分坐在两侧，没一个人吭声。支排长自己就挤了上去，把杨定神拱到了最前面。

“好了，往下放，往下放。”支排长对舰上说着。

缆绳又吱吱地往下放，碰到水面了。那个浪，往上一涌，能把艇抬起一、两米，又“哗”地一下落到了浪底，海水和浪花在小艇四周腾空而起，就像掉进了万丈深渊。人坐在里面，一下子往上像飞起来，要被摔出小艇似的，一下子又往下跌落，屁股重重地砸在船板上。那个心也是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一下子又像掉进了冰凉的海水里。其实今天的风浪并不大，但这些兵，都是些旱鸭子，哪经过这番折腾，个个脸色苍白，东倒西歪，爹呀妈呀地大呼小叫，真的像要去送死一样。

舰上的水兵在喊：“解缆绳，快解开缆绳。”

艇上的老兄们还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费了半天牛劲，才知道是解开缆绳的夹子。这下小艇更是在大海上任其飘摇，那些人也更是嗷嗷地直叫。

只有支排长在喊着：“坚持住，坚持住，抓住船帮！”

2.5一石激起千层浪

胡指导员，挎着盒子枪，沿着南街急急忙忙地朝十字路口的乡政府赶来。

街里还沉浸在清晨的静谧之中，虽是解放区的后方小镇，却仍能看出革命战争不断胜利的几分喜庆气氛。几面红旗插在路边，在晨风中飘扬。街两边的墙上贴着不少彩纸写的标语：“庆祝南京解放！”“解放全中国！”“中国共产党万岁！”

街上扫得很干净，院落内外参差不齐的树枝上长满了嫩绿的新叶，显得很有生气。有的烟囱已经冒起了炊烟，只有从农家院子里不时传出“呼吡呼吡”拉风箱做早饭的声音，和少许的鸡鸣狗叫，才打破了一点早晨的宁静。

路上已能看到有些早起勤快人的身影，有背着粪篓子，出镇去捡羊屎豆、驴屎蛋的，也有扛着锄头上山去收拾庄稼的。有认识胡指导员的，还在跟他打招呼：“胡指导，这么早就过来啦？今天队伍吹集合号，怎么这么早？”

胡指导员顾不上搭话，朝他们挥挥手，继续往前走。看来，老乡们是听见了营房里的集合号，但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这也难怪，海源是老解放区，1946年就基本解放了，离打垮国民党1947年的反攻也已

经两年了。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战线越来越往南，战争似乎也越来越遥远，人们怎么也想不到残酷的战斗又一次迫在眉睫，已经到了眼前。

乡政府在十字路口的西北角，占了大地主陶家的房子。陶家是三进两院，乡政府用的是前半个院子。解放区后方的基层政权，倾其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几乎顾不上自身建设。当年的大院，房顶的瓦当破损，已长了不少茅草，东面临街是堵高墙，墙皮斑驳脱落，朝南的门楼陈旧暗淡，门前的一对小石狮早就没了影，全然没有了先前大户人家的威严。

胡指导员敲响了乡政府那早就没了红漆、变成了深灰色的大门，连喊：“经乡长，经乡长！”

大门顺势被推开了，没拴。

由于革命战争的推进、不断开辟新区的需要，大量的老区干部开赴前方，海源乡村基层干部的配备已相当紧缺。按当地的说法，是“一老一少加伤残”，就是：或是年长一些，不适于上前方的；或是刚从儿童团上来，年轻热情有前途，还需要进一步锻炼的；或是受伤的部队干部，回乡安置的。经乡长是属于年长的一类，四十出头了。现在说起来，四十来岁，应该是年富力强正当年的好时候。但那时候条件十分艰苦，经乡长已是颇有些老相了，黝黑粗糙的皮肤，灰白拉碴的胡子，满脸的风霜。可别看是一副老农的模样，却是参加过十多年前天福山起义的老革命了。但这样一位老革命，却因为脾气不那么火暴、工作不那么激进，有时还有些自己的小观点，在土改时曾被批评过，说是走“富农路线”、温情主义。连乡长的职务都给抹了，更不用说南下了。这不，今年初，上面精神有所调整，才从北山调到龙头来当乡长。

乡政府的设置，非常简单。除了乡长，还有就是财粮干事兼文书、武装干事、民政干事，是吃公粮的。后院是民兵的，每天由各村派两人来值班，顺便给乡里跑个腿、打个杂。

经乡长是北山人，就是本县北面山区里的人。出村参加工作，那时是没有工资的，一月发一些小米、玉米面，和几两烟叶，一年里说不准还给个几件衣服。但这些，都没有个准数，可能多，可能少，甚至几个月发不下来，也得糠菜代。可谁也对这些不会有意见，都是乐呵呵的，工作得很带劲。村干部们还都很羡慕，那已经是干革命熬出了头，成了公家的人了。连经乡长的老伴，都能出来跟经乡长一起过，住在后院的一间小厢房里。这是公家人，或者叫工作人的最大的一项待遇。虽然经乡长的老伴也常做一些群众工作，但并没有另外的生活补贴。所以，生活上还是挺苦，不一定能赶上在家里，甚至还赶不上民主村里的一些平常人家。

尽管如此，经乡长的工作，还是很认真的，整天忙忙碌碌。这不，他和往常一样，早早就起来了。听到敲门的声音，他已经走到前院来了。

“哟，胡指导，这么早来，一定是有重要任务吧。”经乡长热情地打着招呼。

“不要这么客气啦，你是我的领导，你给我布置任务还差不多吧。”

“进来坐，进来坐。”

“不啦，有个情况我要讲一下。”

“快说，快说。”

“前面海上发现有四、五个国民党的军舰。”

“哟！”经乡长神情马上严肃起来。

“哦，哦，也不用紧张。”胡指导劝慰道：“我看他们不一定敢上来，就算上来，也没有什么可怕，我们一连挡着呢。”

“我们要做些什么准备呢？”

“你们地方政府自己拿决定吧。”

“群众要不要后撤？”

“现在看，还没有这个必要吧。”

“噢，那我知道了。”经乡长回头朝屋里喊着：“大程，大程。”大程是财粮员，一直在经乡长的身边。

“来了。有什么事？”大程很快就出来了。大程是个大块头，走起路来爱摇摇晃晃的。

“有情况，海上发现了国民党军舰。你马上叫上后院的那两人，赶紧把镇上四个村的村长都喊来，就说有要紧事。”

“这些狗娘养的，还敢过来啊？坚决消灭它！”大程说话也像他的块头一样，嗓门大得很。

“你先赶快去通知吧。”经乡长不耐烦地说。

“好！”大程转身就走了。

“我进去打个电话，跟团里讲一下。”

“好。”经乡长点头答应着，又若有所思地低头想着什么。

胡指导进屋摇起了电话。电话在那时，可是个稀罕物。因为龙头镇是海防前线，所以，县里特地拉了这条线。营里跟团里的联系，也是用的这个电话。

“喂，喂，请接团部……团部吗？我是龙头一营的胡自豪呀。团里有谁在？我找团里的领导……哦，哦……谁也行。我有重要情况要汇报！”

稍等了一会儿，电话里又有声音了。“喂，喂，是政委啊……我是一营的胡自豪哎。是的，是的……有个重要情报向您报告。”胡指导不由自主地打了个立正，“海上发现了四、五只国民党军舰……不大，目前还没有新的动向，他们不一定敢上，我们正在密切注视情况的发展……”

胡指导员屏着气，耳朵紧贴着话机，听着政委在电话那一头的讲话，嘴里连连说着：“是……是……”又听了一会儿，说道：“请政委放心，我代表全营干部战士表示决心，如果敌人胆敢上来，我们一定会干

脆利落地把他打回去，人在阵地在，守住海防第一线！……对老百姓的安排，我正在这儿，和乡政府商量呢……现在看还不需要增援，我们一营有这个能力打垮敌人的任何进攻。在团首长的领导之下，我们一营一定会立新功，显出我们的英雄本色来，为我们团争光！”

“营长？营长……营长跟着连队上第一线了……等营长回来，我叫他跟您直接汇报……好的，好的，我也立即上第一线……是的，是的，再见。”

胡指导放下了话筒，有些不悦。听刚才讲话的意思，好像是政委在问，为什么不是营长来汇报。一营的教导员受伤住院已经快一年，能否回来，也难说。胡指导也常常有意识地在营长旁边忙东忙西，连里站队时，也是靠营长比靠连长更近一些，让人觉得他正在承担、或者能够承担那个不用言明的角色。连胡指导自己也觉得，应该差不多了吧，怎么一直还没有公布呢。今天，自己也是特地过来打这个电话，想在团领导面前多一个表现的机会，可政委的话里，却一点暗示和鼓励也没有。

胡指导的思绪还没收回来，民主村的于村长已经进了院子。

于村长，高个儿，白单褂，黑长裤，腰里拴了根长长的黑腰带，再插着一根旱烟袋，典型的北方农民的打扮。刚四十开外，这样的年龄，在当时的村干部里还真不好找，要经验有经验，要水平有水平，要精力有精力，工作比较平稳，但也就因为是这一点，同样没能被选拔上出去工作。不过，民主村也因此有了个好的当家人。

“有什么急事，一早就叫过来啦？”于村长先见到的是站在院子里的经乡长，所以就先问起乡长来。

“有情况啦，国民党的军舰开过来啦。”

“是嘛，还有这等事，从哪儿知道的？别听错了，信了谣言。”

“这种事还能瞎说吗？有几个脑袋啊？你没听见兵营里一早就吹起了集合号了吗。胡指导还在这儿呢，待一会儿，你们几个来齐了，他来跟你们讲。”

两人还在说着呢，毕竟是一个镇的，那三个村长也前后脚到了。

“胡指导，胡指导！”经乡长朝屋里喊着：“他们人都来了，你跟他们讲一下吧！”

“嗨，你讲下就行啦，情况就是这样。”胡指导跨出了屋子，还有点没转过神来。

“这样的军情大事，当然得你们部队的同志来讲。”

“好吧，我来讲一下。同志们，”尽管前面人不多，可胡指导习惯了开会做报告的语调和神情：“今天早晨，海边巡逻的同志回来报告，海上发现了几艘国民党的军舰，这是严重的敌情。同志们，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解放区的猖狂挑衅！我们要提高警惕，坚决回击！”

言毕，胡指导看着这几位，想着他们一定会有非常激烈的反应，胡指导带来了多么重要的消息。他们几位却也在看着胡指导，在等着下面再布置什么任务。

五秒钟以后，于村长先开了口，问：“敌人只是在海上吓唬我们一下呢，还是要上来和我们干一场？”

“你提这个问题很对，我们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想，敌人的胆子不一定会那么大。当然啰，也要做好两手准备么。”

“那我们怎么做呢？”于村长又问。

胡指导没想到还真地问那么多，便含糊了一句：“你们和乡长一起商量吧。”

四位村长又一起望着经乡长，还没等乡长张嘴发话，只听得南门外惊天动地的一声爆炸，房顶瓦片上的浮灰唰唰地往下落，脚底下都感到了震动。连西门外大银杏树上的乌鸦，也都惊得“呱呱”地拍着翅膀满天乱飞。

这一响，正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搅翻了天，搅翻了地，什么也不用说了。

“敌人打炮了！”于村长朝天大叫一声。

“乡长快说话！”村长们齐说。

“这时候还说什么？”经乡长倒也干脆：“1947年国民党反攻，我们都经过，就按那时候的办！”

村长们一下全都撒鸭子，往各自的村子跑去了。

胡指导说了声：“我也得赶紧回去了。”没等经乡长回话，也一路小跑地走了。

第三章 血肉拼杀

1949年1月3日

3.1 不畏强敌

这一炮，是“济成”号前甲板主炮轰击南门外的营房。国民党军的进攻开始了！

小钱早就跑到了海角，和大郑一起躲在一块大礁石后面，观测着海面，焦急地等待着队伍的到来。

望着海上，晴空万里，蓝天碧海之间，通红的太阳跃出了水面，万顷波涛衬托在蓝天之下。浩瀚无际的海面，在阳光的反射下，跳跃着无数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五彩光芒。这是多少人向往着能欣赏到的海上日出的美景，真的是气象万千，壮丽无比。

可两人早已无心顾及，两眼紧盯着前方。远处的海面上，已经能看到从国民党军舰上放下来的小艇，翻卷着白色的浪花，正在开过来。

小钱不时地在回头张望，急得用手直拍岩石，嘴里不停地嘟囔：“怎么还不来呀，怎么还不来呀！”又对大郑说：“我们两个能顶得住吗？”

“顶不住，还不能顶一阵子。”大郑毕竟是在部队多待了两年的老兵，沉着多了。

“要是国民党上来了，把我们抓走了，怎么办？”小钱人小，心里老装着这事，又盛不住，照直往外说了。

“嗨，你怎么净讲这晦气话，真是不吉利！”大郑有点不高兴小钱的幼稚，或者叫无知，或者叫胆小了。“打仗之前，不许讲这种话。要叫连长听见了，少说要揍你一顿，还要关禁闭。要是扣上扰乱军心的帽子，枪毙都有份。听见啦？！”

“听见了，听见了。”小钱的脸上有点苦悲悲的，不知道真的打起仗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敌人要真的上来了，那就只有拼刺刀，没有别的退路啦！拼一个够本，拼两个赚一个。革命军人，只当烈士，不当俘虏。听见啦？！”

“听见了，听见了。”小钱的眼睛里有点光亮了起来。

“叭，叭……”小艇上的人开始朝岸上射击，子弹嗖嗖地从小钱的头顶上飞过。

小钱又神色紧张起来，紧皱着眉头，身体紧紧地贴在地上，只有眼睛刚刚露出礁石。

“轰！”身后几十米又一声爆炸的巨响。这回的着弹点更近了，震得贴在地上的肚子直翻搅，鼻子和眼睛都感受到了硝烟的呛人和刺激，崩起的石子像雨点似地“劈里叭啦”落下，打得身上生疼。

海上的小艇掀起了更大的浪花，像是在浪尖飞掠而过，越来越近了，不到一千米了，不到一里地了！已经能看出艇上的士兵那土黄色的衣帽，眼看他们就要靠岸了！

小钱趴在礁石后，更紧张了，双手直拍着地，紧皱的眉头上，沁出了汗珠。大郑也顾不上教育小钱了，他紧闭着双唇，咬紧牙关，一言不发，两眼紧盯着海上。

这怎么办呀？！

忽然小钱好像听见了什么，转过了头来，看了看后面，高兴得一下子从岩石后面蹦了起来：“排长过来了！他们过来了！”

果然，纪排长带领一排翻过高低不平的礁石，在最紧急的时刻，急匆匆地赶到了。

大郑和小钱在那块大礁石后面高兴得几乎要跳了起来。“我们在这儿呢，我们在这儿呢！”

“叭，叭……”对面的子弹又飞过来。

“注意隐蔽！快趴下！”纪排长对他俩大喊着，自己也就势蹲下，对后面的战士们大声说：“二班向东，三班向西，一班跟我向前过来。注意分散，各人找好有利位置。”

“叭，叭，叭……”飞来的子弹更密集了。

“轰！轰！”炮弹在礁石群中不断地炸开，海角渐渐地弥漫在一片硝烟之中。

纪排长一边在紧张地观测着前方，一边又注意着左右两边战士们的位置和动作，“准备射击。瞄准好了再放，不要轻易浪费子弹。”

“机枪手，机枪手！”纪排长继续指挥着，对左前方的机枪手说：“你的位置不太好，左侧的石头太大，影响你的射击面。”机枪手到了更前面的礁石，这是连里唯一的机枪，潘连长把它给了一排。“对，对，再往前一点。好，好，小伙子，今天这一仗，要看你的了。你要瞄准最前面的第一个小船，狠狠地打！”

3.2第一波冲击

国军334团（说明：国军、国民党军、国民革命军，这些词在本书中通用）的支排长半躺在小艇里，一边喊着：“打呀，打呀！”分坐在两边的士兵们朝前胡乱地开着枪。

小艇在海浪里颠簸，浪花在四处飞溅，打在身上，衣服湿漉漉的，在清晨海风的吹拂下，身上冷得直打颤。

忽然，右面的一个士兵，烦躁不安，浑身扭动起来。

支排长忙吼了他一声：“干什么？毛病！”

那人小声地哼哼，用的是山西话：“俺憋尿咧。”

“你他妈的，早干什么来？”支排长骂着。

“哎呀，你这么厉害干嘛地？实在憋不住咧。”

“你自己想办法吧。”支排长也无奈。要说支排长对下属怎么这么大的脾气，他心里也有气哎。再说，他不厉害一点，这种时候，谁会上前面去送死啊。

那山西兵背负着鼓鼓囊囊的行李包，站也站不稳，好不容易扶着船帮颤颤巍巍地伸起了腰，在小艇的起伏晃悠中，腾出一只手来去解裤带。只听得“砰”的一声，都没听出来是从哪个方向来的子弹，就见那山西兵，一声也没吭，连同身后的背包，整个人一头就栽进了海里。溅起的浪花一闪而过，依旧是翻腾的碧绿波涛，没有留下关于那个人的任何痕迹。

艇上的士兵们惊讶得相视无言。如果不是艇边的长条凳上还留着他的空隙，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曾经有过这个人。他们连他的名字都叫不上，只喊他“小山西”，因为是临上船前，才从别的团补充到他们排的，讲的是山西话，应该是山西人，所以叫“小山西”。至于家住何方，从何而来，姓甚名谁，便一概不得而知了，只有他远方的父母才会知道。但他远方那苦苦等待、无一日不在翘首期盼的父母，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的儿子魂散何处。在这烽火连天的岁月，没有人，也没有办法去通知他的父母。或许，或许……他的父母也早已坟头长满了枯草……

“愣着干什么？”停了一回，支排长又开始吼了起来：“赶紧射击！只有把共军打得抬不起头来，咱们才能抬起头来。咱们的子弹比共军多，使劲打。”

趴在艇里的士兵们，艰难地蜷缩着，尽可能低地埋着脑袋，猫着腰，高高地撅着屁股，也顾不上瞄准，“叭叭”地扣着板机。

子弹在头顶“嗖嗖”地飞着。

“叭，叭，叭，叭……”一阵机枪子弹扫了过来，打得船帮上的木屑直飞，吓得支排长蹦了起来。

“你他妈的，怎么开的船？”支排长又骂起余班长来：“你是死人啊？就会直着开？明摆着叫共军瞄着打。不会绕着弯开啊！”

余班长只好转动操纵杆，小艇“S”形地往前行进，颠簸得更厉害了。

3.3 坚守阵地

一排据守的滩头阵地正面临着真正的考验。

炮弹接连不断地在前后左右炸开，碎裂的石片四处飞崩，烟雾弥漫在礁石之间。

大郑虎着脸，使劲地瞄准着，“叭”的第一枪就撂倒了刚刚从小艇里伸出腰的国民党兵，叫他翻进了大海。望着翻倒的敌兵，大郑的嘴角微微地咧着，露出了别人难以察觉的微笑。

“打得好！”在他右边的小钱，看了直叫好。

机枪手，一梭子弹出去，就叫跑在最前面的小艇向左拐了弯走。

“同志们！激战还在后面。沉住气，狠狠打，决不让他们上岸！”纪排长不断地鼓励着大家。

“咣！”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就像在头顶炸开，身下的土地都震动了起来，小钱被震得弹了起来。一颗炮弹就落在小钱右侧十来米处，腾空飞起的沙石，灰黄的一片，几乎遮住了天，不一会儿，又劈头盖脑像雨点似地砸下来。

小钱眼睛迷糊了，耳朵也听不见了，肚子疼得像断了肠。他揉了揉眼睛，“啊”地大叫一声。

他看见了一只血淋淋的粘满了沙土的断臂，就在他的面前。

难道是自己的手断了吗？他赶紧活动活动了自己的两手，翻动了一下手掌，都还在，于是又慢慢地抬起了头。

满脸泥污的大郑，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正瞪着眼看着他呢：“怎么啦？”

小钱都说不出话了，用眼神看了看前面半截埋在沙土中、还在渗着血的手臂。

大郑也难过地低下了头。因为大郑刚才看见，在他们右侧的两位战士被炮弹击中，人被炸得四分五裂、抛上了半空。

一排在礁石群里防守，好处是有很多的隐蔽点，能很好地抵挡前方子弹的威胁，炮弹即使落在不远处，也没有多少弹片会飞过来。但要是就落在战士隐蔽的石礮里，则由于无处躲避，加之大量碎石的崩裂，其杀伤力是毁灭性的。

大郑还在关心地问：“没事吧？”

“肚子疼。”小钱咧着嘴，痛苦地说。

“那你是肚子紧贴着地上吧？以后注意了，肚子不能紧贴在地上，要抬起来点，还要张大嘴。不然，会震坏肚子，震聋耳朵。知道啦？”

他们的班长，许成才，还在刚才的弹坑里四周张望，寻找着什么。弹坑里，一片焦黑，浓烟和着血腥味在翻滚，焦黑的岩石上粘着撕裂的肌肉碎片，有的甚至还在抽搐跳动。

许班长哑着嗓子对着纪排长低沉地说：“没有了，都牺牲了。”

纪排长愤怒了：“同志们！我们的小庄、小童已经壮烈牺牲了！他们为了保卫解放区，英勇地牺牲了！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为他们报仇啊！”

“向烈士们学习！”

“为烈士们报仇！”

滩头阵地上，战士们满含热泪，一片呐喊。激越的吼声，一浪高过一浪。

“叭叭！”“叭叭！”仇恨的枪声，响彻了海滩。

战斗更加残酷了。

3.4支排长毙命

支排长的小艇，又拐了一个弯。

前方一个炮弹在水中炸起，涌起的巨浪，把小艇高高地托起。掀起的水柱像一面巨大的水幕朝天空升起。当水幕落下时，小艇又像钻进了瀑布，天上脚下全是明亮急促的水流，轰然而下，赛过倾盆大雨，浑身湿透。小艇被大浪摔得失去了重心，几乎竖了起来，差点侧翻了过去。一个士兵没抓住船帮，“啊”地大叫一声，一下被摔出了小艇。又一个人消失在翻腾着的白色浪沫里。

驶出浪涛，小艇里灌满了水，东倒西歪。每个人脸上、眼睛里、嘴里，都是苦涩的海水。

“注意拐弯，躲避大浪。”支排长还能撑得住些。

可是命运多舛，穿过了大浪，子弹还不饶人。滩头阵地上的子弹“嗖嗖”地更密集地射来。离岸边越来越近，岸上的射击越来越准，艇上的人也越来越难以躲避。

“叭叭！”

“啊……啊”一个士兵惨叫着，显然中弹了。他的右侧肩膀，衣服被前后穿出了两个黑洞，“咕咕”地冒出了血。他右臂颤抖，脸部在痛苦地痉挛，咧着大嘴哀号着。别人也都是面面相觑，一脸悲苦，揪紧了心，不知下一个会是谁。

“叭叭！”子弹不停地从四周、从头顶飞过。士兵们趴得越来越低。

“他妈的！还击！还击！”支排长又吼上了：“你们这样真的是在去送死。”

士兵们只好探出枪，射击着。

“叭！”又一个士兵，脑袋被击中，瘫倒在船帮。迸裂的脑浆，都喷到了别人的脸上。

“啊！啊！”满船的人惊呼起来。

“推下去，把他推下去！”支排长命令道，可谁也没有动。

支排长挤过来，冷峻着脸，一把就将那人推下了海，又冷冷地看着剩下的几位。

那个肩部受伤的人，被看得竖起了汗毛，吓得连连大叫：“别推我啊，别推我啊，我还能动啊。”

支排长连理也没理，只是对大家说：“看着前面，快到了。把身上的背包先放下来，放在艇上，轻松一点。一到岸边，大家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下跳，找个石头块躲起来，等着后续部队上来。听明白了吗？后面的事，就看各人自己的命了。”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大家吱唔着，也并不敢去看那已经快要到了的岸边。

支排长朝后面看了看，很不满意：“第二梯队还隔这么远，这个仗怎么打？”深深地叹了口气。

这个支排长，这一阵火气大，不只是因为又要送死来打仗。支排长是湖北人，老父在家是早年的私塾教师。因为没有靠山，自己也照样被抽壮丁出来当了国民党的兵。好在支排长身体强壮，头脑也算灵活，几年下来，居然还混了个排长。虽战乱频频，自己提着个脑袋，却还有了些幻想，似乎有了点出人头地的奔头。但千里之外的家乡却是遇到灾年，家中境况实在叫人惦念，老父年迈，娇儿尚小，全靠妻子，难以支撑。他更知道在家乡，大户骄横，地痞猖獗，怎不叫人牵挂。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五个月前，收到了家父的一封来信，见了后夜夜不安。本想能混个一官半职，回家好撑个门面，却不知自己和家人能不能挨到那时。

望着后面是毫无退路的大海，前面是更加毫不留情的子弹，支排长也只能是拼一步算一步了。

纪排长手提长枪，打量着海面，大声地说：“大家还要注意跑动，别死蹲在一个地方，我们的人手少。敌人的小船要在哪儿登陆，我们就往哪儿打。”

纪排长注意到了最前面的小艇，在拐了两个急转弯、差点儿翻了船之后，正向西面的礁石靠过来。

“妈的，他想抢头功，有他好瞧的。”纪排长低低地骂了一声，正要回头发话，又一声巨响发生在眼前。

一颗炮弹就落在右侧的浅海里，溅起了遮天蔽日的巨大水幕，虽然崩起的海底沙石还打不到岸上，可也遮挡了纪排长他们的视线。

当冲天的水幕落下，又几经上下翻腾，那只小艇居然靠上了无人正面防守的海滩。

支排长也算是个老兵了。当他看见由爆炸涌起的水幕升起的时候，知道天不该绝，机会来了。他不顾可能飞来的碎石，亮起了眼睛，大声对余班长呼喊：“向右拐，加大油门，冲上去！”他要趁对方在水幕后看不清的时候，抢先靠岸。

果然，在水幕落下之时，猛地一个碰撞，小艇居然冲上了几块小礁石之上。

“赶紧往下跳！”支排长率先从艇右侧往下跳，又回头大喊：“往下跳！”

看见余班长还想磨蹭，支排长对着他的脑袋上方，举手就是一枪。

余班长一惊，知道躲不过去，也只好翻了出来。

纪排长此时真急了，不顾一切地跳起来直叫：“朝小船打！打呀！不能让他们站住脚！”回头往两边一看，有大郑和小钱在，忙说：“大郑，你带上小钱，赶紧冲过去！那边没人。”又看见机枪手边上的小宗，“小宗！你也过去！”因为右侧的巨石挡着，小艇那边是机枪的死角，所以纪排长喊了他们过去。

大郑大吼一声：“小钱，小宗，跟我来！”便跃出礁石，向那边冲去。小钱、小宗紧紧跟上。

守备部队的武器，还都是清一色的单发大盖枪，与国民党军的美式半自动卡宾枪不能比，射速很慢。但他们一边填弹射击，一边冒着危险往前冲。

从艇上下来的最前面的两个国民党兵，在海水里蹚着往前走，还没等碰到岩石，就先后被击中倒下，泡在了水里。支排长换了手枪拼命回击，在刚碰到岩石之前也中弹了，倒在一块小礁石上。

在左侧下艇的杨定神，有小艇挡着，运气稍微好一些，没有被弹击中。扶着小艇刚跨了两步，后面的大浪涌来，一股巨大的力量从背后推来，两脚都离开了水底，根本站不住，一下子倒在水里，接着又被浪潮顺势冲上了岸去，人也晕厥了，那枪更不知上哪儿去了。

在最后面的余班长，早就留了一手，一直靠在艇边上，一看不妙，便又翻身爬进了艇里。

支排长艰难地撑了起来，看见了在艇里的余班长，吃力地朝他招着手：“等一下，老弟，看在兄弟一场的份上，拉老哥一把。我家里，妻儿老小，还都在等着我回去呢。”

余班长何等地滑头，哪会管这等事，更何况头顶上还有“嗖嗖”的子弹，眼见着解放军的士兵正往这儿跑过来。余班长把那个右臂受伤、已经半死不活、不再会哼哼的同伴掀到了海里，挂上倒挡，“呜呜”地加足油门，趁着这波大浪回撤时，退了出来。

“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余老弟！”小艇依然扬长而去。支排长面朝茫茫大海，摇动的手掉落下来，绝望地一屁股瘫软在水中的礁石上，涌起的海浪把他下半身都浸泡在海水里。

小宗跑在了最前面，看见海里支排长的半个人影无力地靠在礁石上，回头兴奋地喊起来：“看！还有个当官的！”提着枪，大叫着跑去：“抓活的！缴枪不杀，缴枪不杀！”

瘫倒的支排长举起了手，摇着，嘴里还含糊地叫着：“我，我……”

小宗兴奋地跑着，“抓到了，抓到了！”

突然支排长后面的海上响起了枪声，小宗卒不及防，应声倒下。

“小宗！小宗！”大郑和小钱一边呼唤着战友的名字，复仇的枪声也随之响起，朝着海上，朝着敌人。小艇像受惊的老鼠东窜西突地逃走了，支排长也结结实实地倒了下去。

那是小艇上的余班长看小宗单个人在前跑向海边，怕自己逃不脱，便开起了枪。

大郑忙过去扶起小宗。小钱尽管半小时前刚和小宗拌过嘴，可这时也红了眼睛。小宗腿上受了伤，神智还很清楚，瞪着眼骂着：“狗娘养的国民党，看下回再碰上我。”

“别动了，我们拖你到礁石后面去。”大郑说。

纪排长也赶了过来，问：“怎么啦？还行吗？”

“没事，没事，我自己能走。”小宗说着，却并不动。

大郑和小钱把小宗抬到了边上的礁石旁。

纪排长转过来再看那支排长。

浪潮又向后回撤，支排长被夹在石缝里，手枪早不知上哪儿了，身上冒出殷红的鲜血混杂在碧绿的海水里，向下流去。他还没有死，看见纪排长朝他走来，艰难地抬起手，好像是对着胸前指了指，嘴唇动了动。还没等纪排长走近，他的手一下就垂了下来，脑袋一歪闭上眼死过去了。

“他妈的，还装死，让我亲手毙了他。”刚返身过来的大郑要举起枪。

纪排长一抬手，挡住了他。

“哎，这国民党还不让打啊？我打死个国民党的官，起码得记个三等功吧？”大郑还在说。

“你没看人都已经死了么。”纪排长难得的没有好气地说。

纪排长蹲下来，看着这个敌人的排长，潮湿而零乱的头发紧贴在额上，苍白的嘴唇，深陷的眼窝，毫无血色的因痛苦而扭曲的脸上粘满了血污。他想着这个人临死时那个最后的动作的含义。他试着解开支排长胸前的钮扣，在里层的口袋里，找出了两张印上了水渍和血迹的信纸。打开一看，第一行就是：“吾儿如面……”

纪排长明白了这是老父给儿郎的家信，明白了这位死去的国民党排长的最后的牵挂。他叹了口气。心中掠过一闪念，是憎恶？是怜悯？根本来不及去想，他收起那两张信纸，装进了自己的口袋。然而，这一个闪念，却使这眼前的一幕无意中永远地定格在他的脑海中。三十七年之后，没想到这一幕又再次浮现，竟使他去了湖北，探望这位支排长的老家。

余班长的小艇，在翻滚的白浪中，溜走了。

海面上的枪声渐渐地稀疏起来，那些小艇也都跑到了离岸更远的地方，国民党军的第一次进攻失败了。

“沿海滩再仔细搜索一下，应该还会有。不管死的活的，注意看一下。我在这儿陪着小宗。”纪排长对大郑和小钱说。

小钱嗯了下。

小宗说：“我没事的，纪排长，你还是跟他们一起去吧。我自己在这儿等卫生员，没事的。”

纪排长说：“我还是在这儿吧，这一段海滩也需要人看。”

小钱和大郑继续向西面的海边走去。这回，小钱可谨慎多了，端着枪，朝四处仔细地看。

“啊哟！”小钱突然跳起来，大叫一声：“不许动！再动，我就开枪啦！”

一个国民党兵倒卧在海水里，随着海浪在起伏。

他俩看了一会儿，还是没动。

大郑走过去，踢了一脚，那国民党兵被踢翻了过来。

“呸！死的。”大郑不屑地朝地下吐了口痰。

走了几步，小钱又“啊哟！”起来。

“又看见什么了，一惊一乍的。”

“又有一个，又有一个。”小钱指着前方的礁石吆喝着。

大郑朝前看去，果然又是一个，一个随着波涛晃荡的尸体。

“咱们打得不错哎。”大郑又微微地咧着嘴笑了，“你人小眼力真好使，再看看，还有没有？”

小钱回了一句：“眼力好使，跟人小有什么关系。”又往前走，好像又发现了什么，可这回没放声，只是放慢了脚步，悄悄地往前。

大郑看出了小钱的道道，也顺着小钱的眼光往前看。果然，前面碎石滩上，躺着一个国民党兵，手还在微微地动，但旁边并没有枪。

大郑停了会儿，抬起枪，仔细地又看了看，确定对方并没有枪，这才招呼小钱一起过去。

“又是咱立功的机会了。”大郑总是先想到这一点。

仰面躺在碎石滩上的，正是杨定神，被大郑狠狠地踢了一脚之后，睁开了眼。映入眼帘的是两个站着的解放军，躺在地上往上看，高大的身影似乎碰着了天。他惊得想喊，可嘴唇却动不了，只是身上颤动了一下。

“你被俘虏了！站起来！”大郑用枪比划着。

杨定神想站，又颤动了下，却站不起来。

大郑一把将他提了起来，手一松，他又瘫了下去。

杨定神被窝囊地俘虏了，却从此改变了命运。

第四章 全村总动员

1949年1月4日

4.1 干部会

于村长在往回跑。接连的炮弹声，已不由他多想，也不用他多说了。

村民们都惊恐地涌出了自家的院子，挤在街巷里。看到村长跑过来，忙不迭地问：“怎么啦？怎么啦？”

于村长也顾不得多解释，直喊：“蒋匪军到海边啦！各家赶紧清理一下！村干部到老地方开会！”

这里讲的村干部，有明确范围，包括正副村长、农会主任、民兵队长、妇救会主任、会计和各农会小组长，大家都知道，不会搞错的。那时，党组织还没公开，党员个人也没有公开身份，尽管大家都知道。所以，开会还是以开干部会的名义。

于村长跑到巷口时，看见民兵小队长秦德才牵着一條大黄狗在自家门口逗着玩呢。

“你还有这闲心，你家媳妇呢？”于村长没有好气地说：“快叫她过去开会。”

这位秦德才，便是二十年后的造反司令，现在可是土改积极分子，他媳妇就是妇救会主任姜雪花。

“她比你还要积极呢，已经去找妇女同志们了。”秦德才答道。

“你去跑个腿，把鲁队长他们叫到老地方开会。”鲁队长就是村民兵队长鲁来福。老地方，大家也都知道是哪个地方。

秦德才，对有活干还是很积极的，牵了大黄狗，就去通知了。

就这样，一个叫几个，几个再叫几个，等于村长来到村公所的院子，人们也来得差不多了。

尽管解放区的基层政权，早已到了共产党的手里，可能是为了尽量减少社会震荡，名称还都是沿用老的叫法。西北村的村公所用的是以前一家小地主的院子，大小跟一般农户差不多，只是瓦房盖顶，和多了个门楼。当然，这几年也没有修缮，显得很破旧。

院门口已经站了几个人，看见于村长过来，忙喊着：“村长来了，村长来了。”

于村长头一眼先看到的是姜雪花。

姜雪花身材并不高，但很健壮、丰满，齐耳的短发，显得精明干练。她以前是大地主陶家的一个丫头，受了不少苦，连自己的身世来历都不清楚，只知道是早年西面逃荒来的难民卖给陶家的。共产党来

了，她真的是彻底翻身解了放。革命使她离开了陶家，分到了地，分到了房，结识了同样是积极分子的秦德才。虽然觉得秦德才这人不是很理想，但想想凑合过算了，她在这方面没有更高的要求，毕竟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已经三岁的可爱的小宝宝。所以，她对革命是一万个感谢，对政府的号召是一万个拥护，样样事情总是走在最前面。

“村长，我把妇救会的几个都已经喊上了。你看，怎么做？”不等村长开口，姜雪花先说上了。

“好，我就说。”于村长看了一下院子里的人，来了不少，大家都是一脸的焦急，就说：“同志们，不管是不是干部，我们一起说一下吧。”

又一声爆炸从南门外传来，大家更是焦急地抬头看着南面的天空，一股浓烟冲起，乌鸦们还没等停下，再一次“呱呱”地乱飞起来。

“不知又落在哪儿了？”有人在议论着。

“王八蛋！还敢来。这次，准叫他有来无回，打他个稀巴烂！”有人愤愤地说。

“同志们，事情很清楚了，敌人来进攻了！但我们老解放区的人民是经受过战争锻炼的。现在，我们就按照往常的分工，各人分头去做。”

于村长看了下大家，怕还有什么疑惑，又接着讲：“鲁队长带着基干民兵，跑步到海角，帮解放军守阵地、搬弹药。秦德才，你带上你那个组去看管好地主富农，把他们都赶到一个屋里。儿童团，到街口放哨。姜雪花，你的任务也很重。你带几个年青力壮的，去海边救护伤员，往后抬；年纪大点的，烙饼做干粮，往前线送。彭会计把村公所的东西清点整理好。各农会小组，通知各家各户，整理好东西，保管好粮食，缸里挑满水。如果，敌人真的从海边上来的话，我们还要依靠这个城墙，守住龙头镇，准备打几天呢。”

“还有什么别的吗？”于村长最后问。

“没有了。”大家齐声说。

“那就分头行动吧。有什么事，就说。有什么困难，大家就互相帮衬点。面对国民党，我们就都是一家人。”

“是啊，是啊。为了打垮国民党，没有二话可说。”大家并没有多少的惊慌，而是高声响应着，相互招呼着，找各自的人，纷纷走出院外。

民主村在几分钟之内就激愤了，振奋了，高速运转了。

4.2赵玫

鲁队长第一个冲出院子，一路小跑，拿着哨子使劲地吹上了，边吹边喊：“基干民兵到西门外白果树下紧急集合！”

紧接着就是姜雪花走出了门外。

院子门口外，已经有一群年青妇女等在一边。

“赵玫，赵玫！”姜雪花刚跨出门口，就喊上了。

赵玫，年龄与姜雪花相仿，肤色白皙，身材适中，娘家是西面十里的赵村。自嫁到这儿的董家来，家里家外都称得上是百里挑一的好媳妇，颇受四周邻里的称道。不但人俊，而且聪明能干，是村妇联的副主任，姜雪花的好搭档。

赵玫“哎！”地答应着，从人群里笑盈盈地走出来。

“小玫啊，”姜雪花和她的姐妹之间的感情，还是很亲热的，“你带着王大妈她们上场院烙饼吧。”

“别，别，我要上第一线去抢救伤员。”

“上第一线，我会带她们去。你孩子还小，还要喂奶，离不开你，就留在村里吧。”

“嗨，你的孩子也不大，你在村里指挥全局，还是我到前面去。”

“小玫呀，别争了，为部队烙干粮，责任也很重大。那些大婶大娘们也都听你的，你领她们更合适些。好吗？”

“那行，我听你的。”赵玫也很爽快地答应了，回头就对彭会计说：“彭会计，我先跟你到库里去，你看能称两袋棒子面出来给我吗？”（说明：棒子面，就是玉米面。）

彭会计稍沉思了一下，说：“行。”

那时候，尽管已经推翻了旧政权，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已经调动了起来，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困难的。大批的青壮年参军、支前、上了前线，地里严重缺少劳动力；打了粮食，都不舍得吃，要交公粮、支援部队。这春天，正是粮食最紧的时候，老乡们只能吃些麸皮野菜地瓜蔓榆树叶。至于养鸡喂狗，那是很少有的奢侈事了。

所以，对库房里仅有的几袋棒子面，彭会计不能不心里盘算一番。当然，支援解放军是优先考虑，彭会计只沉思了一下，就答应了。

“我替解放军谢谢你了。”赵玫俏皮地说。

“你倒挺能说。”彭会计回应道。

于是赵玫转过来又对王大妈说：“大妈，你再喊上几个大婶大妈，到场院那边等我。”

这位王大妈，就是农会小组长王建悟的妻子，也是妇救会的干部。虽然比起赵玫她们年纪不小了，好些事本来可以不出来，可总觉得自己男人好歹也是个组长，怕别人说不积极，但凡要有公家的事，也都是出来跑前跑后的，肯出力。

只听王大妈也是一声爽朗的答应，快步走了。

赵玫跟着彭会计往村里的库房去。

彭会计平时是个话不多的人，可是跟着赵玫这样的俊媳妇走，不由得也有些话来了：“赵玫啊，你真行。孩子还这么小，就出来跑里跑外的。”

赵玫谦逊地一笑：“这没什么，大家都这样。敌人都打到门上来了，你说还能怎么办？”

“是啊，等什么时候彻底打败国民党，我们大家都能过上安生日子。”

“快了，快了。这就是最后一仗了。”赵玫的眼里充满了希望。

很快到了库房，赵玫帮着开门、搬面袋、上称、记帐，最后还没忘签上字，把两袋棒子面拽到了手里。

把彭会计直看得羡慕得不得了，一个平常就在家围着锅台转的农家女，怎么会把这些事想得这么周全、做得这么利落，直说：“我家要是有这样一个好儿媳，那我就有福啦。”

赵玫的脸稍有点红，没想到连彭会计这样的老实人也在这样夸她，就说：“你家小宾还早呢。你现在就忙活开啦？”

是啊，彭会计的儿子才十四呢。彭会计自己也不好意思地咧嘴一笑。

“你怎么拿呀？”彭会计想起了还有别的话。还没等说完，彭会计抬头一看，那袋面已经上了赵玫的肩膀，另一袋提在了她的手里。

“哎哟，哎哟，”又把彭会计惊讶得不得了，没想到这花容月貌似的小媳妇竟也能出这样的力，“别使坏了膀子，那一袋，我来帮你提吧。”说着，便过来提袋子。

赵玫也不便推辞，两人就一前一后，扛着两袋棒子面往北面的场院走来。

老实的彭会计死于十六年后社教运动的棍棒之下，这当然是那时的人们绝对想不到的事。

场院在村的西北面，城墙里的地面并没有都盖满房子，还留了一块空地，正好成了村里有什么事活动的地方。场院上，有几个碾盘，支了几口锅，搭了个大凉棚。

王大妈几个也已经来了，看见赵玫，赶紧接了面袋下来。

“快歇息，快歇息，女人家怎么能扛这么重的袋子。”王大妈心疼地说。

“还有好多事呢。”赵玫用衣袖擦了下脸，顾不得停下，说：“那柴火呢？”话没停，便又接着说：“大妈，你们上我家，先把我家的柴火搬过来吧。”

“这怎么使得？”王大妈说。

“现在这时候，就得这个样了。敌人都打上来了，怎么还能顾上自己的家呢？”赵玫说着就拿起放在锅边的水桶和扁担，挑上了肩膀。

“你还要去挑水啊？快回家看看吧，别叫孩子从炕上掉下来，你还要去喂奶呢。”王大妈着急地说。

赵玫笑盈盈地说：“没事的，我用被子什么的把孩子都围住了，不会掉下来的。喂奶还可以再等会儿。挑水可是要紧的事，没有水，下面的活都得停在那儿。”

说着，就挑起了扁担，闪着明亮的大眼睛，轻盈地往城墙外的井台走去，嘴角露着笑容，额头沁着汗珠。

4.3姜雪花

这一头，姜雪花对着几位年青姑娘，一挥手，说：“走，上我家，去拆门板。拆下来当担架，我们扛着上前线。”

“好！”姑娘们齐声应着，跟着姜雪花，大步往前走了。

姜雪花的家，在西街后的第一条巷子，原先一个大地主家，砖瓦到顶，三进两院，分给了五户贫雇农。最后一进，也就是最后一排屋，是五间房。海源的农舍，五间的话，从院子往屋里走，都是走中间的堂屋，堂屋里两边都是灶台。东西各两间，南面靠窗有炕，通常外间住人，里间堆杂物。姜雪花住在最后面那五间西侧的两间，与另一家合用中间的堂屋。

姜雪花带着姑娘们匆匆地进来。两岁多的孩子，听见动静，从里间出来，高兴地叫着：“妈妈，妈妈！”孩子长得健康壮实、虎头虎脑，真的是很可爱。

姜雪花爱怜地拍了拍他的脑袋，问：“宝宝，你爸呢？”

“走了。”宝宝已经能简单地答话了：“还带着大狗。”

“宝宝好好待在家里，别出去。妈妈要去打坏蛋，等一会儿再回来。要不，你到对面齐阿姨家玩吧。”说着，就动手要卸门板了。

“哎哟，你不卸外面的街门，怎么卸起自己的房门了？你不怕俩口子上炕被别人看见啊？”还是贫农林齐心的闺女小林姑娘心直口快，先张嘴说了，引得大家笑了一阵。

小林，名叫林海秀，年方十六，个儿不高，忽闪着一双大眼睛，还是个小姑娘，却是聪明伶俐、活跃得很，村里的一个积极分子。

“你这个小丫头，不害臊。这个话，是你能说的啊？”姜雪花也不让腔，“街门木板厚，太重，还是房门轻便，好抬。”

对门的齐阿姨听见了声音，也走了过来，问：“是什么事呀，还要卸门板啊？”

小林跟她一讲，齐阿姨忙说：“那先下我家的门板吧。我们是老俩口了，上炕也不怕人了。”大家又是一阵哄笑。

“不用了，齐姐，把我这儿的里外两副门板拆下来，也就够了。”雪花真诚地说。

“这样吧，就拆我们两家里屋的门板吧。这样我们谁家的炕，别人也看不到了。”

“齐姐讲的对，就这样吧。”小林忙说。

大家又是一阵嘻笑。姑娘们充满阳光的笑声，把战争的阴霾赶到了一边。七手八脚，没用一会儿，就把四块门板卸了下来。大家争着往肩上扛，又大步地往外走了。

“宝宝，乖啊。”雪花回头向宝宝招手。

齐阿姨拉着小宝的手，带着自己差不多大小的一双小儿女，一直送到街上，不停地向着雪花她们招手。

雪花迈开大步，跨出街门，赶上了她的队伍，说：“别走南门，南门有炮火。咱们走西门，出了西门，再往南走。”

雪花和她年青的姑娘们，尽管穿得都很朴素，甚至陈旧，花布也已洗得泛白，补丁打着补丁，脸上却个个充满了青春的激情。扛着门板的队伍，行进在街上，由小林姑娘领着，还唱起了在这儿已经唱响了许久的歌曲：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解放区的太阳永远不会落，

解放区的歌儿唱也唱不完。”

解放区很注重宣传鼓动，包括出了一大批这样的后来被称之为红歌的革命歌曲，在当时应该说是起到了一定的鼓动作用。听着这荡漾在笼罩着炮声、飘散着硝烟的龙头镇大街上的歌声，谁能想到这批昂首向前的女孩子是一支即将冒着枪林弹雨、要去与死神争夺生命的队伍！

4.4老王头

王建悟是本村农会第八小组的组长，在刚才开干部会的那批人里是年长者，虽还远不到能称得上老头的年龄，但大家已习惯叫他老王头。尽管被叫做老王头，可散会后的步履倒一点也不比那些年轻人慢。因为他要去的地方，比别人更多。他们组里的几户，他都要去看一看。国民党要打过来了，可不是件打哈哈的事，来不得半点马虎。好多人家的男人都在外面支前，家里就剩下妇女、老人和孩子，有些事不去帮上一手还真不行。他觉得他的责任很大，谁家出了事，他都担当不起，心里沉甸甸的，不像那些女孩子还能唱得起歌来。

他组里的这几户，住的虽没挨在一起，倒也靠得比较近。当初说是自愿组合，但也有些人脾气大，不好相处，可总得放在哪个组吧。老王头这种时候往往好说话一些，松了些口，“不行，就过来两个到我这个组吧。”现在他有时就碰到这些矛盾。

他先到了伤残军人靳喜悦的家。靳喜悦是在1947年反击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时负的伤，被截了半条腿，抬回了家，已经两年了。这几年，大家的生活都不易，他们家就更难了。所以靳喜悦常对他

媳妇发个脾气，可他媳妇又往哪儿发去呢，弄得夫妻关系挺紧张。妇救会也来过几次，劝说他媳妇，但也没能完全解决问题。所以，老王头怎么也要先过来看看。

“喜悦啊，听见炮声啦？”老王头跨进门就先问上了。

“怎么没听见？是国民党打过来啦？”喜悦紧张地问。

“是啊，所以我赶紧过来看看。”又回头对喜悦媳妇说：“喜悦不方便，你要多辛苦了。”

喜悦媳妇点了下头，也没多言语。

“谢谢你来看我。我正在着急，仗都要打过来了，怎么没人管我了，把我撂在炕上，到时可怎么办呀？”

“喜悦，别着急，有我就有你。我还要再跑几家，要真有事，我还会过来的。我先走了。”

“你先走吧。有你，这我就放心了。”

临走，老王头还对喜悦媳妇说：“有什么事，你就来找我，你放开心。”

喜悦媳妇这才抬起头来，客气地说：“谢谢王大伯了。”

“嗨，乡里乡亲的，客气啥呀。”

老王头急忙拐过来，又进了杜家骏的家。杜家骏支前出去一年了，听说都已经走到了淮河，是支前走得最远的一批了。家里只有他媳妇和十二岁的儿子。家骏媳妇大名叫唐玉珍，跟老王头有点亲戚关系。所以，老王头喊声：“玉珍啊。”就进了门。

“哟，大伯来啦。”唐玉珍爽朗地应声走出了里屋。

玉珍是个通情达理、大面上能过得去、家里也能撑得起来的人，加上又有这层亲戚关系，老王头对玉珍是挺放心的。

“听到炮声啦？”

“听到啦，刚才街坊也都说啦。”

“怕不怕？”

“怕有什么用？怕能躲得过去吗？”

“家里把最要紧的东西收拾一下，万一要后撤，也好有个准备。”

“国民党会打进城来吗？”

“有准备，总比没准备要好。”

“对，我马上就收拾。”

“长贵呢？”

长贵是唐玉珍十二岁的儿子。

“他呀，跟他爹一样积极，一早就跟着小宾到村口站岗去了。现在大概在书坊了吧。”小宾是彭会计的儿子，村里儿童团团长。

“好，那我走了。”

老王头往前走过迟得法的门口，喊了声：“得法！”

迟得法种地是把好手，肯出力也有技术，自己的几亩地拾掇得漂漂亮亮，没有多少事要去求别人，在村里就不愿多出头露面。老王头知道这码事，也就没进去，在门口喊一下。

“哎，”得法在院子里答应着，“大哥，有什么事？”他俩年纪差不多，得法出于客气，喊一声大哥。

“听见炮声啦？家里准备一下啊！”同样的问话，只是简化了一下。

“噢，噢，知道了。”

老王头又到了后街祖责成的家，这是他最头疼的一家。祖责成可是有点来历的人。早年间，闹义和拳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小坛主，烧教堂，杀教民，欢腾得很。轻易就要了人家的命，也不拿自己的命当回事。敢冲敢杀，好一阵畅快淋漓。义和拳失败后，他憋了几十年的气。到老了，正好赶上前些年的抗租抗税，又燃起了他骨子里的激情。杀土豪，分田地，又有了他的用武之地。讲这些，秦德才当初只能算是他的徒弟，跟在他后面瞎起哄。地主们，哪个都对他恨之入骨。他大儿子，不知被谁暗算，抛尸野外。到如今，更不把生死当回事。不但年纪大，辈份高，有点倚老卖老，加上二儿子在外是解放军的干部，家里是军属，更有点傲气，在村里没几个人他能看得上。这倒还是其次，尤其是这人火气忒大、脾气暴躁。跟他说不明，讲不通，什么话也听不进。两句话没顺着他就跳起来，往往还会把好事给理解反了，结果好心赚个驴肝肺。

“祖大叔，祖大叔。”老王头小心翼翼地叫着，慢慢地向院子里探进了头。

“谁啊？”祖老汉在明知故问，他还没到耳背的时候。

“祖大叔，是我呀，建悟呀。”

“噢，建悟呀，进来吧。”

老王头推开房门，进了里屋，见同村的皮安己也在炕上，先点了下头，便问：“大叔忙什么呀？”尽管时间紧迫，得一分一秒地算，老王头还得耐着性子先问点别的。

“忙什么？有什么忙？外面在忙什么？”

“你没听见外面炮响了。”

“听见了，炮响了，又怎么？”

“国民党要打过来了。”

“打过来？他敢打过来？他有能耐打过来？”祖老汉对国民党似乎不屑一顾。

“大叔，还是要准备一下，家里要紧的东西收拾好，万一要后撤，就不会忙乱了。”

“啪！”祖老汉突然一拍桌子，瞪起眼睛，大声说：“你说国民党会进城来，谁告诉你的？这是造谣！你再讲，我就要告到乡政府去。”

“大叔，大叔，别这么说。你这话，谁也担当不起啊。我这也是传达村里开会的意思。”老王头没料到祖老汉会来这么一下，也紧张了。

“国民党来了，我们就要后撤啊？见他妈的鬼去吧！我亲手杀过的地主国民党，不知有多少。他还敢来？我才不走呢，一巴掌就把他打出去，看谁狠过谁！”老汉的精神，真叫人折服。

皮安己也顺着劝说：“你杀过那么多人。国民党来了，不得先抓你啊？”

祖老汉眼一撇，鼻子里哼的一声，极藐视地说：“抓我？那么容易？还不知道谁抓谁呢？大不了一个死。我站起来是条汉，躺下去也是条汉。这条命早就够本了，无所谓了。早死早投胎，早点再去杀国民党，还能多杀几个。”这说法也不知是从哪来的，却支撑着祖老汉的脖子良良的。

正在老王头左右为难，不知怎么来说服祖老汉，南门外又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国民党的第二次进攻开始了。

老王头一下跳了起来，望着窗外，说：“大叔，我要走了，还有很多事要去安排。你还是做一些准备，比较好。我要走了。”

“我也要回去准备准备。”皮安己一看，气氛不对，赶紧走了。

只有祖老汉在炕上，正襟危坐，岿然不动，还不服气地哼了两下，很有一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样子。

倒是祖大妈在老王头耳边说了句：“别听他的，就这么个人，叫人讨厌。”

老王头也顺势赶紧走了。

4.5最后一课

龙头镇的东门外有一个学校。早先是县中所在地，当地解放后把县政府搬到了海源，县中也随之北迁，这儿就成了龙头小学。那时叫国民完全小学，就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校园里四排灰色的瓦房，是周围几个县最好的小学校舍了。

跟中国社会的传统习惯一样，龙头的农民都很重视孩童的读书学习。哪怕日子多么艰难，自己勒紧裤带，只要稍有可能，都是尽其全力把孩子送进学堂。尤其是在当地解放以后，有两大新气象：一是妇女翻了身，你看，本书里有很多新女性的形象；二是出现了学习文化的高潮，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进了学校。所以尽管还是战争和动荡的年代，龙头小学的学生依然不少。

当然学校的条件，十分有限，也就是桌椅板凳。这在当时，能做到这一点已经是不易了。好在，孩子们也很懂事，学习都很认真、很刻苦。每天，咬上几口干粮，早早就来到学校晨读。

今天，当南面的海角响起炮声的时候，已经有不少学生到了学校。

五年级的教室里有好几个民主村的孩子，都是十三、四岁的样子。

“轰——”远处传来了炮声。

“这是什么声音，怎么这么响？”皮家的大闺女皮珊珊挺警觉，一听见声音就抬起头，朝四处张望。

“好像是打炮吧？”唐玉贞的儿子杜长贵，年纪不大，却挺沉着，不急不忙地说：“前两年不是听到过这声音吗？”

“不会吧？国民党不是被我们打到长江南面了吗？”经乡长的儿子经学文也在这儿上学，是个学习很认真的孩子。

正当这时，平家的小女儿平近芳急急忙忙地跑进来，脑袋后的小辫子直蹦达，还没喘上气，就说开了：“不好了，不好了。国民党要打过来了！”

杜长贵马上就说：“听谁说的？别瞎讲噢。”

“街上人都这么说。胡同里好多人在跑来跑去呢。”平近芳说。

“哎呀，那快跑吧。”皮珊珊收起桌上的书，用包袱布卷起，站起来就要走。那时候没有书包，课本作业就是用布裹起来。

“嗨，怕什么呀，有解放军在。国民党还没到这儿，就会被消灭了。”杜长贵说着，还拍了一下大腿。

经学文也说了：“别走呀，书还没学完呢。走了，不上课了，怎么考试呀？”这个时候，小经还在惦记着考试呢。

“都别说了。李老师来了，听老师的吧。”平近芳看见李老师正从外面走过来。

来的是李辰老师，也才二十刚出头，皮肤白皙，面目清秀，身材略瘦，还戴着一副在乡间极少有的近视眼镜。他是龙头北面李家泊的人，家境尚可，所以一直念到了初中，毕业后就留在了学校教书。后来中学搬去了海源镇，他没走，还在龙头小学，成了学校里数一数二的教学骨干。这回还是他们五年纪的班主任呢。

“李老师啊，李老师啊。是国民党打过来了吗？怎么办啊？”往常孩子们就很喜欢李老师，这时就更围上来了，七嘴八舌地问。

“同学们，先不用慌。虽然国民党想要进攻我们解放区，但前方还有解放军在。学校还没有下通知，我去问问校长，马上就回来，你们稍微等个三分钟。”

李辰赶紧跑到最后一排的校长办公室。

龙头小学的余校长，已经五十多了，一个瘦小又谨慎的老头。家在东面邻县，是个大户人家，他自己一直在外念到中学。可能是生性比较懦弱，所以也没在外面做事，而是回来教了书。在这动荡的年代里，像他这样的知识人，或去参加革命，当了干部；或者成了革命的对象，被打得落花流水。还留在乡间的，实在是很少了。也正因为是埋头教了几十年的书，老家的人土改时受到了打击，而他还能“独善其身”，没有波及，不过是离开了家乡，到了龙头。他没有妻室，也很少跟人往来，除了上课和实在必要的活动外，就整天默默地坐在办公室兼宿舍的屋子里。

李辰跨进余校长那狭小而又杂乱的屋子，忙不迭地问：“校长啊，外面都打炮了，咱们这么多学生怎么办啊？”

余校长很敬业，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坐到了办公桌后。他听到李辰的问话，慢慢地抬起头，说：“啊，听见了，可上面还没有来通知。”

“这个时候还等通知啊，县教育局就算有通知，也得等中午才能送到，能等到那时候啊？”

“那你说呢？”余校长并非是不负责任，而是他的内心大概已经被岁月的风云冲刷成了空壳。对什么，反应也都很迟钝。连炮声也引不起他的肾上腺的分泌。

“马上停课，让学生们赶紧回家。”

“好吧，走吧，都走吧。”余校长说。

“还得组织一下。本镇的，可以让他们自己回家；出北门的，我来领他们走。往东往西的，都要派一位老师领队。等第一节下课时，集合起来往外走。”

“好。”余校长点了一下头，木讷地说。

李辰又问：“校长，那你呢？”

“我？我都没想到过我。我这个样子，在哪儿都一个样吧。”

“没有地方去的话，就上我家吧。”

“你先走吧。我再看看，情况不一定会那么严重。”

李辰快步回到教室，站在讲台上，对焦急等待的学生说：“同学们，今天我们不能继续上课了。但是，在走之前，我们还要上完这最后一堂课。

是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了我们宁静的生活，是国民党反动派使我们不能继续再上课。”

说这些话既是习惯，也是李辰的心里话。同学们瞪大了眼睛，静静地听着。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平近芳涨红了小脸，举着小手喊着。

“轰，轰——”又是两声炮响，声音更大了，距离似乎更近了。

“同学们，”李辰这时反倒很镇静，“我们回村以后，要听从村里的安排，听家里大人的安排。参加儿童团的活动，帮助大人，帮助解放军，做好后方的工作，支援前线。好吗？”

“好！”同学们一致高声地说。

“我也要去帮解放军，到海边去打仗。”杜长贵说。

“前线打仗的事，不用去了。有解放军在，有民兵在，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既要积极主动，又不要给大人添乱。”

“好！”

“龙头镇的同学，你们自己回家。外村的同学到校门口集合。往北走的同学，由我领队。往东往西走的，都有老师带领。

现在，我们就下课，相信我们很快会回来再上课的。”

“轰！”又一声爆炸，地面都有了震撼。

“老师，再见！”在这枪炮声中，同学们在离开教室时，依然没有忘了这一句。

龙头小学五年级就这样在炮声中结束了它的最后一课。

4.6 秦德才

秦德才是第一个到自己工作地点的人，积极吧？他牵着大黄狗，穿着一件不知从哪来的旧军装，胳膊上戴着红袖章，腰间束了根皮带，倒有点像十七年后的红卫兵的那种架势。也不知还是十七年后的红卫兵像了那秦德才早就有了的架势。不过，此时的秦德才行头要多了点。他右肩斜挎了支长铕枪，但那枪已经不好使，只能装个样子，所以左肩后还插了把短柄大刀，柄上系着块红布带，走起路来，喜欢左右甩开膀子，到哪儿都神气得很。

也难怪秦德才自我感觉良好。他也是从西面流浪过来，靠着给别人打工勉强度日，真的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一个彻彻底底的无产者。因为长期流浪惯了，农活并不精通，在哪儿也干不长，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艰难日子。他一无所有，有的只是一双拳头，和天不怕、地不怕彻底的大无畏精神。按照某种革命理论的说法，这种人的革命性、战斗性是最强的了。革命了，他是急先锋。斗地主、分田地，那是没话说，都是冲在最前面。因为在斗争中，他不会有任何的失去，他也没有什么可失去，而只会有收获，至少会有那种精神上的从未有过的满足。遇到有什么对抗的、迟疑的、想要个花招的，在他的拳头面前，三下五除二，不费吹灰之力，立马就解决。虽然也有过分的时候，但那也是斗争的需要，上级也不能说什么，所以，就越发地张狂起来。村里几次想把他推荐到部队上去当兵，送走算了，可部队上的人一了解，都不要，怕管不住，愣是送不出去。村里反过来再一想，有时候还真用得着这样的人，也就不去多说了。实在太出格的时候，只能让姜雪花来说说他。

为了动员农民积极参加革命，四十年代的中国革命采取了彻底摧毁地主富农的办法，彻底收缴地主的土地财产，彻底打击地主的家庭和个人，甚至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下手之狠，史所罕见。海源县在

1947-1948年间的土改中，斗争了地主801户、富农866户，没收土地24万余亩、房屋7060间，斗死男性464人、女性224人。这样使农民，尤其是积极分子，不但分到了难得有的财富，特别是分到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而且还沾上了敌对阶级的血迹，不得不卷入革命洪流，去夺取和保卫胜利果实，去和敌对阶级面对面地拼杀，而没有后退的余地。

民主村也不例外。村里的地主富农，被集中在村西北角的一个小场院，跟牲口棚连在一起，临时搭起的窝棚，一家一个单间。他们，人已经剩下不多。经过解放、土改、国民党反攻、再解放，几次大的斗争，或批斗、或镇压、或自杀、或饥病不支，大都已死去，或逃亡在外，只剩下些鳏寡孤独、破碎的家庭残片。民主村被集中管制的，还有五户家庭的九个人。其中就有“济成号”报务员李策的一家，他的父母和他十九岁的妹妹李芹，还算完整些。

秦德才一到，马上一声大吼：“都给我滚出来！”

立时，从窝棚里乖乖地、悄悄地、迟缓地低着头走出来一群人。这些人，衣衫烂缕、蓬头垢面、神情呆滞，每个人胸前背后都缝了块白布，上面写着地主或富农某某某。还有个抱着的两三岁的孩子，身上也挂着“地主某某某”的布条。

“都站在这儿，站好了！”秦德才随手往地下划了个圈，那些人也就老老实实在那儿。

“你们听见炮声啦？”

他们当然也听见了，当然也知道这是国民党又要打过来了。他们的外表是沉默的，他们的内心是颤抖的。他们知道，这对于他们不是福音，而是催命鬼。他们知道，他们活着是不可能再见到国民党的，尽管在这之前，他们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国民党究竟是什么东西，更不用说有什么联系。他们只知道，他们是被掰去了肢腿、扔在了别人脚底下、早晚要被踩死的蚂蚁，那炮声只会催促脚底更快地落下。

“你们高兴啦？哈哈哈哈哈……”秦德才突然狂笑不止起来，而后又突然变色：“告诉你们吧，你们的死期到啦！”

“别看你们穿过好的，吃过好的，住过好的，一天到晚神气过。今天也有落到我手下时候，哈哈哈哈哈……”又是一阵狂笑，大黄狗也跟着直叫。

而后再一次变脸：“都给我跪下，跪下！”

他们依然低着头，默默地跪下。

“给我一直跪着，跪到天黑，跪到国民党被打败！”

秦德才围着这些人，转了一圈，仔细地盯着每一个人。

“都给我跪好了。你他妈的，还想要滑头。跪直了！”说着朝一个瘦弱的老头踢去。

被踢的就是李策的爹，李老头。他晃了一下，好不容易挺直了。低着的头，早已麻木了，脸上看不出任何的表情。

“啊，我看出来了，就是你儿子跑出去当了国民党的兵，而且还是海军。说不定，那海上的几个龟孙子船里，就有你的儿子哎，在等着你去哎。看把你美的。”

“啪！”秦德才重重地向老李头扇去一个嘴巴。老李头往左一晃，还没等晃过来，这左面又是一个重重的嘴巴。

“我叫你高兴，我叫你高兴，我叫你高兴……哈哈哈哈哈……”秦德才边打边叫着，想着这革命真是叫人无比地高兴。

李老头十九岁的女儿，李芹，稍微抬了下头，散乱的头发遮掩着脸庞。

秦德才看见了，又跳了起来：“你这婊子，想不服啊，找打啊。”过来，举手就一耳光。

秦德才对李芹并非初次交往。土改那阵，分完土地财产，对地主的老婆闺女怎么处置时，已经和姜雪花好上了的秦德才忽然看上了更年轻的李芹，可李芹宁死不从。秦德才正不知怎么发作时，老王头在他耳边说，德才啊，别犯糊涂了，你要了李芹，可就成了地主女婿了，以后再怎么干革命啊。秦德才这才快快作罢了。

此时，秦德才双手团拢着，“哟，哎哟哟，真滑哎。”脸上浮起了淫意，连蹦带跳地朝着李芹啪啪地抽起了耳光，抽一下，就跳一下，怪叫一声：“真滑哎，真滑哎！”

场院里没有别的声息，只有噼叭的耳光和秦德才与狗的嚎叫。

第五章 燃烧的大海

1949年1月5日

5.1一封家书

前港，南门外的小山岗。

前面就是硝烟弥漫的海角礁石群，海面上飘荡着几艘小艇，和更远处的舰船。国民党军的第二次进攻，这时还没有开始。

山岗上的小松树下。令营长正领着干部们开会。

“纪排长，先把情况讲一下。”

“这样的，我方牺牲了四名战士，还有四名重伤，需要撤下来。”纪排长沉重冷静地说着：“敌人，有一艘小艇靠了岸，被我们抓了一个俘虏，发现三具尸体，其中有一个是军官。从海面交火情况看，敌人伤亡应当在二十人以上。”

“哦，还有个军官？”令营长问。

“是个排长，也是个炮灰可怜虫。我们在他身上还搜到一封他老爹来的信呢，写得蛮可怜的。这样的军队怎么会有战斗力？”

“我看看。”令营长倒是蛮有兴趣的。

纪排长从口袋里把那张浸泡过海水和血渍的纸递上，模模糊糊的几段字迹还能辨认：

“吾儿如面：

已有数月没有音讯了，上月曾寄出一封，不知收到否。

……去年遇涝，今年又偏旱，小户人家，日趋艰难。官府又逼税催捐，上门抄砸，如虎似狼。我家虽为国军家属，亦不能免。怎不叫佃雇之农，起而争抗……

……已是家徒四壁，无有隔夜之粮。本月以来已数次断炊，孙儿啼哭，儿媳悲泣。儿啊，此情此景，为父我只能心如刀绞，老泪纵横。三亩薄地，全靠儿媳独力支撑，烈日炎炎，劳作艰辛，昨日竟至晕厥于田埂……

……夫当今之眼目下，百业凋零，民不聊生，乱象四起，国已不国。

吾儿尽早解甲归田吧，与妻儿老小相守一起，共渡此国难家难之日。家中已实在过不下去了。

……学堂早已关闭，父亦无以为生。且为父已大不如前，心常绞痛，眼神恍惚。梦中常见儿在战场负伤，呼儿不应，乃捶胸顿足，坐待天明。儿啊，实在难忍、实在难熬啊。儿再晚归一月，恐难见你父老朽了。

再三再四，盼儿早归！

切切，切切！

父泣”

令营长看过后，沉思了一会儿，说：“唉，可怜啊。要说起来，都是军人家属，我心里也会有感触，可我的父母不会是这种感受。我们是敲锣打鼓、戴着大红花参军，他们是拉壮丁被逼着来，父母、家属没有起码的保障、安抚，这种军队还怎么能打仗呢？”

“咱们继续讨论。纪排长，你觉得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令营长问纪排长。

“我觉得，敌人小艇上的火力，不是很强。主要的威胁，来自于敌人的炮火。我们的伤亡，主要是炮弹落在我们隐蔽的石礮里引起的。”

“从正面的海上看，敌人的小艇，有马达，速度快，是我们防御的主要对象。那些小划子，速度慢，不可怕。”纪排长继续说：“我的体会是，哪个小船最靠前，就集中火力打哪个，不能让他上岸。万一上了岸，就要立即组织反冲锋，坚决把他打下去。如果让他上了岸，我们的大盖枪，很难和他的卡宾枪对抗，那就被动了。”

令营长听了，连连点头：“说得好，说得好。我们的同志，都要这样。打一仗，要有一仗的体会，这样才能积累经验，不断有所提高。”

“这样吧，”令营长思考了一下，对三排长说：“一排已经有了减员，先撤下来，机枪留下。你们三排上，怎样？”

“坚决服从命令！”三排长，顾其金，马上瞪起了眼、挺起了腰，“太好了，想打还打不上呢。我这次来，就是想争取任务的。”

“有这个劲头就好。”令营长非常赞赏，接着又转向大家说，“看敌人这个架势，非要上来不可。我估计，敌人的第二次进攻，炮火一定会更猛烈，我们的伤亡会更大，我们要有思想准备啊，准备打一场恶仗。”

“对，”潘连长接着说：“三排上去以后，先派一个班到最前面的海沿，那两个班先放在这前港的下面。等敌人的炮火延伸过后，再冲上去，减少炮火的伤亡。一排撤下来以后，就去南港待命，也防备敌人可能在西滩行动。”

“很好，可以这样安排。”令营长肯定了连长的部署，又接着说：“二连、三连，很主动，都已经来人了，情况你们都看见了。你们赶紧回去，你们两个连各留一个排原地驻守，其余分别向龙头镇靠拢，既扩大正面的防御线，也随时准备增援海角的战斗。”

“同志们，我们正面临着严重的局势，真正的战斗来临了，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胡指导也说开了，说得激动得站了起来，“党和人民在看着我们，龙头镇的老百姓在看着我们，我们要用我们的行动来证明我们是一支当之无愧的钢铁队伍。”

胡指导停了一会，以为大家会踊跃发言，结果没多少反应，只好自言自语地说了句，“让我们用行动来表示吧。”

令营长微微点了点头，“思想教育，战前动员，也是需要的。”

“要不要向团里请求增援？”潘连长问。

“我看不需要，我们一营能顶得住。”胡指导员提出了不同意见，“就算我们一天损失一个班，至少能顶他四五天，到那时敌人也就会损失惨重、知难而退。”

“噢，这件事，那我还要进镇里，跟团里汇报下情况。是不是要派增援，由团里定吧。但是，对这场战斗，我们不能仅仅从我们一个连、从我们一个营来看，它实际上是和全国战场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要看得远一些。”

5.2军民团结

在那个战争岁月里，解放区老百姓带着对旧社会黑暗与贫富悬殊的仇视、对自身处境的不满、对国民党统治的厌倦和失望，对胜利果实的珍惜、尤其是对未来新生活的向往，选择了追随革命。这也许是宣传鼓动的结果，也许是刚分来的土地的份量，也许是极为严格的组织与控制，不管其原因何在，但解放区在动员群众方面无疑是成功的、有效的，对推动战争的胜利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应该说，比起国统区那时的分崩离析完全是天壤之别。

这时，鲁队长带着六、七个民兵赶过来了。

潘连长认识，所以先站起来，走过来跟鲁队长握手：“你们也过来啦，欢迎，欢迎。”

“营长，连长，指导员，喔，还有纪排长，你们都在啊。分配我们任务吧，最好能和你们一起在第一线，一起守战壕。”

“那倒不用了，”令营长站起来说，“鲁队长，这次战斗会非常激烈，非常残酷，在最前线保卫解放区，是我们人民军队的职责。你们能来，我们就已经很感谢了，谢谢你们啊。这样吧，你们就在后方站岗放哨，维持秩序，怎样？”

“这些，我们都已经安排了。到这儿来的，都是些基干民兵，是来准备战斗的。”

令营长显然有些感动了，拉着鲁队长的手，摇了两下，没接上话来。

潘连长马上说：“这样吧，你们留一半在这儿，去一半到南港。一是作预备队，一是帮助搬运个弹药什么。好吗？”

“行！”鲁队长爽快地答应着，又对身后一起来的几个人说：“连二娃，你们四个去南堽。连二娃，你负责一下。”

“好，”一个年青的小伙说：“那我们几个去吧。”

他们几个一商量，回头对鲁队长说：“那我们走了。”便又下了堽，继续往西去了。

这队刚走，姜雪花、林海秀她们又扛着门板过来了。

“啊呀，你们还都能找到这儿来。”令营长又佩服起来了，“连工具都准备好啦。”

“你们在前线流血流汗，我们当然应该为你们做一些事情。”姜雪花说。

“那我也不客气了，就分配任务了。你们担架队现在就跟纪排长去海角，把伤员撤下来。”

“好，纪排长，那我们就跟你走了。姐妹们，走啰！”姜雪花又是一挥手，姑娘们扛着门板，挂着汗珠，兴奋地跟着走了。

令营长又对三排长说：“你赶紧回去，把队伍跑步拉到海角，进入阵地。一排，你们等三排到位后，再开始转移去南堽。”

“是，是！”两位排长行军礼应答。

“我还有句话。”纪排长说。

“请讲。”

“请营长考虑，把指挥所转移到南堽的后面。现在这个位置，我估计，敌人的望远镜能看到，说不定第一阵炮弹就能打这儿。”

“说得对，我们一起转移。你们一排到南堽后，也要注意隐蔽，趴在地上，不要让敌人发现。”营长把手在空中使劲一挥：“同志们，赶紧出发，抓紧时间，分头行动。敌人的第二波进攻很快就会开始。”

营连干部跟着三排长往西走了，鲁队长、姜雪花跟着纪排长往南走了，小山岗上只剩下粗矮的松树在风中摇动。

枪声已经基本停息。

姜雪花领着姑娘们迎着滚滚浓烟急急地往海角走去。

越往南，烟更浓、更呛人。越往南，心情更急迫。

“战士们怎么样了？”是每一个姑娘心中的牵挂。

迎面走来了第一批战士。大郑背着小宗在往回走。

姜雪花大步上去，叫了声：“同志，快上担架吧。”

大郑停下了脚步一看，哪是担架，分明是一块门板。他看着年轻的女孩子们说：“抬个人，可不容易。你们抬不动的，还是我来吧。”说完便把背上的小宗往上抬了抬，要继续往前走。

小林把大郑挡住了，“你们又要打敌人，又要抬伤员，那怎么能行？救护伤员，是我们民兵的职责，就让我们来吧。”

大郑背上的小宗说了：“让我自己走吧，我能坚持。”

姜雪花二话没说，把门板放在大郑的脚下，伸手就把小宗扶到了门板上。

姜雪花在前，林海秀在后，就把小宗抬了起来来回走。

大郑敬佩地说：“你们这些女孩子呀，真行。”

两个女同志要抬副担架，本来就不易。这门板不比担架，没有肩绳，没有抓手，就靠手臂、手腕，尤其是手指。不但用不上劲，就靠十个手指抠在门板边上，抬起来那是十分地吃力，走起来脚还跟不上。小林，毕竟还只是十六岁的小姑娘，走了一段路之后，就很累了。她脸腮发红，汗珠挂在前额。

姜雪花在前面问：“小林啊，还行啊？”

“行！”小林坚定地说着。

又走了一段路，小林的手酸了，汗珠在往下淌，她也顾不上去擦，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姜雪花知道小林毕竟还年纪小，又关心地问：“小林啊，还行啊。不行就停下，歇会儿。”

小林喘了口气，说：“行。”

上坎了。虽然只是小山坡，走得却更难了。小林的手都发直了，脸都发白了。她咬着牙，用鼻子喘着气，心里想着腿要跟上，脚却不听使唤，靠着身体的前压，在往前挪。

“还行啊，小林？”

“……”小林已经说不出话了。

姜雪花一听没有回应，就停下脚步回头看，只见小林一下就跪下了，脸色苍白，张着大嘴喘气。姜雪花放下门板，赶紧过来扶住小林。

小林突然喘了口大气，晕倒在姜雪花的怀里。

“海秀，海秀！”姜雪花拍着小林的后背，呼唤。

小宗在门板上闭着眼，轻轻地哼哼着。

正巧，三排的战士们过来增援海角。三排的顾排长认识姜雪花，走到这儿问了情况，就叫两个战士把小宗抬回去，将姜雪花两个人替下来。

小宗一听有部队的人来，便坐了起来，说：“我能走，我要回去参加战斗。”

顾排长是个实在人，直言直语，手一挥，对小宗说：“不要多说了，你躺下，听从组织的安排。”又对姜雪花说：“救护站在北门外，还远呢，你们坚持不到那儿的。还是由我们的战士去吧。”

姜雪花直表示歉意，没再坚持。

顾排长说：“嗨，军民一家人。你们是在支援帮助我们，怎么反过来对我们客气呢。”

两个战士抬着小宗要走了。

小林缓过神来，急得想撑起身子，“我，我来抬，你们去前线打敌人。”还没撑起来，又瘫倒在姜雪花的身上。

姜雪花劝她说：“海秀啊，别急。先歇会儿，让他们先走。我们一会儿还要去海角的。”

海秀撑着身子，喘着气，抬头看着担架上的小宗，脸上是深深的歉意。

小宗躺在门板上，脸朝着天，又闭上了眼，嘴里轻轻地哼着，三排的战士抬起来走了。

海秀看着抬走的伤员，忽然站了起来，对雪花说：“雪花姐，我总觉得好像没有完成任务。我要跟伤员一起走，才能放下心。”

“好吧，我知道你对工作很有责任心。你去救护站看看，我回海角。”

海秀一腔热情，急急地跟上了抬着小宗的担架，往北门外走去。她的十指从此有了一些僵硬，不太好使。然而，林海秀在战火中对小宗奋力的相救，换来的却是几年以后宗发奋对她的恩将仇报，直到在文革中最终把海秀推上了断头台。

5.3章方时局谈

“济成”号上，也是一片忙乱。

会议室里，烟雾腾腾，在刺鼻呛人的烟雾中，军官们正在七嘴八舌地讨论。

“你们少抽点烟不行啊？”章团长厌烦地摔了下手。“余班长，你讲讲。你是上了岸、又能回来的唯一的一个人，不简单啊。讲讲。”

余班长是特地被请到会议室的，团长亲自要他讲话，真是有点受宠若惊了。

“共军的火力太强，我们小艇目标太大，距离又长，尽挨打，所以伤亡很大，很难靠得上去。我们靠上去了，人数又太少，顶不住，后面的船没有一起跟上来。”余班长的话，除了对解放军的火力有所夸大、想减轻责任外，不是没有道理。

“你们支排长在到岸后，是怎么指挥的？”罗团长颇有点不甘心。

一提到支排长，余班长心里还记着恨，就说：“支排长赶着我们下去。那个湖南兵就是下去慢了些，被他一枪打死在船里。”

“这种时候，就得这样啊！”二连副插了句。

“上岸以后呢？”罗团长还在问。

余班长一看，还没达到损毁支排长的目的，于是就编造说：“他下去以后，也没指挥，只顾躲在石头后面，几个弟兄不知道该怎么办，愣头愣脑，结果都给共军打死了。他自己一看不好，掉头就往回跑，结果也给打死了。”

余班长讲完，偷偷地看了下四周。

罗团长好像找到了失败的原因，忿忿地拍了下桌子：“这种人，临阵脱逃，应该革去军职。”

“那你怎么回来的呢？”章团长问。

余班长不由紧张起来：“因为我是管发动机的，在后面掌舵，往下跳的时候，也在最后面。我看不行了，一想，这救生艇，有动力，登陆最好使，下回还得靠它。所以，怎么地，拼死拼活，也要把它开回来。”

余班长边讲边诌，居然也讲下来了。

章团长还点了点头。

“这次登陆虽然没成功，但我觉得334团打得还是不错的，至少比我原来想象得要好。我们不能要求什么事都一次成功。这位余班长讲的，我听着，还是蛮有道理的。支排长的空缺，我看余班长可以顶上。”章团长看了罗团长一眼。

“这个么，章团长那当然一句话了。”罗团长听着，是讲他的好话，心里挺高兴，也就乐得顺水推舟了。

余班长一听马上就站了起来，立正敬礼，“感谢长官栽培！”嗓门大得不得了。这回是轮到余班长，不，是余排长偷着乐了。

罗团长觉得来劲了，就大咧咧地说起来：“共军这么几个鸟人，我开始没怎么注意就是了。这回，我要亲自出马，到甲板上，看你们怎么冲锋，怎么打。就得像刚才章团长说的那样，有功者赏，后退者斩。334团的弟兄们，这回要给我拼命地上，不管死多少人，要给我上。只有上去以后，才有我们说话的地方。听见了没有？！”

罗团长最后都吼了起来，那些334团的几个人连连点头称是。

章团长赶紧接着说：“当然，战略战术还是要注意的。我看有这么两点，我说一下，你们看，有什么不妥。第一点，炮火要猛烈。主炮就不用打南门外的营房了，共军肯定不会还呆在里面等我们打。集中火力，炮轰海角。舰身调整下角度，把尾炮也用上。我就不信，打不烂它。还有，我们的炮打得也太不准了，我看了下，炮弹放了不少，可落在共军阵地上的，却没几个。”

这回，章团长也不客气地看了方舰长一眼。

方舰长很不好意思：“是的，是的，我也看见了。弟兄们平常训练不够，再者，舰船离岸太远，没能抛锚固定，晃得厉害，影响了命中。”

正在兴头上的罗团长也没放过这机会：“前两年，美国军舰在太平洋上打日本联合舰队，难道还是停了船、抛了锚打的？”

334团的几个军官也跟着哈哈地大笑起来。

另几个穿海军制服的军官们，则脸色不悦。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咱们把舰艇再靠近些，不就解决了吗。共军连山炮也没有，对我们舰艇不构成任何威胁。”章团长说。

“但我们没有这儿的海图，不清楚海底的情况，不敢贸然靠前，万一触礁，可不是闹着玩的。请总指挥见谅。”方舰长这回也有点不卑不亢了。

“靠前一二百米，不行吗？”章团长小声地问道。

“试试看吧。”

“第二点，”章团长接着说：“小艇不能这么分散，把所有的小艇都集中一起，一起出动，扩大正面的攻击面，叫共军防不胜防。我看了下，他们的人并不多。当然，也要有重点，重点放在海角的西侧。”

陶富贵出来插话了：“老夫说一句外行话，咱们不能在海角两边的沙滩登陆吗？那样，共军也就没有礁石可隐蔽了。”

“陶县长有所不知啊，”章团长还是挺耐心地解释：“在沙滩登陆，共军是缺少了隐蔽之处。但沙滩水浅，连我们的小船也靠不了岸，士兵要提前下船涉水上岸，在海水里行进速度会很慢，更没有任何遮挡。等上了岸边，要穿过沙滩这一段，也没有任何遮挡。这两段，加起来要有两三百米，要硬冲过去，那伤亡会很大。除非有其他条件，一般情况下不会考虑。”

陶富贵点点头，也就不再言语了。

章团长再看了下大家，好像没什么异议，于是站起来说：“第二次的进攻，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先集中炮火轰击，小划子同时出发。等到小划子离岸大约五百米时，炮火向后延伸，机动救生艇再出发，这样一来，小划子、小艇，大体能在同时靠岸，这就能大大提高我们到岸的机率。”

“一定要加强各部分的联系、协同。专门拿出一个艇，作为指挥艇。设定专门的信号，统一指挥，一起进，一起退。请罗团长安排一个营长，上艇指挥。”

“行。二营的滕营长，你去吧。”罗团长说。

一位军官起立敬礼：“是！”

章团长最后说：“我们几个总指挥，都到上面指挥舱里。准备半个小时，到点准时攻击。谁出问题，拿谁是问。走吧。”

章团长出了会议室，走进报务舱，对李策招了下手，说：“给我汪司令的电话。我要跟汪司令直接通话。”

李策稍有一惊，当然没有说出来，在机器旁忙了一阵，对着机器大声吆喝着：“接汪司令的座机，请接汪司令的座机。”等了一会，李策恭敬地把话机交给章团长。“团长，请讲。”

章团长接过电话，端正了下身子，很认真地说：“汪司令吗，汪司令。我是章汉林啊。我把情况向你报告……是的……是学生无能，第一次攻击未能奏效……”

“共军守备部队还是有一定作战能力的……主要还是334团的战斗力不够……”

“我想把我的一团全部拉过来……是的，我也想过，我也不舍得把一团拉过来……但我再三考虑，如果，我们还真的想要打赢这一仗，这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办法。”

“司令，这点请放心，他们是有准备的……走之前，我跟一团都讲过，不但讲过，而且都布置过。现在，他们都已经准备好出发了……是呀……谁叫他们是我的部下呢……”

“这方面，我也考虑过，黄港的防御力量应该说，是足够了。关键是，战斗力。战斗力不行，再有几个师，也不行。现在的情况反而是，人太多了，那么多从各方面退下来的部队，都收缩在黄港，都挤不开了，伸展不开了……”

“司令，容我说一句多余的话，如果讲得不对，权当我没说……现在黄港的存亡安危，已不在国军的作战力量，而在于，一是看，华府是否还支持国府，美军是否还留驻黄港，二是看，黄港的民心和社会秩序能否稳住……啊，你也赞同啊……谢谢了，没想到还能在你这儿听到知音的话……”

“请司令放心，我知道我是党国军人，学生决不辱没军人称号，不成功便成仁，对我来说是没有二话的……”

“我知道，我会注意安全的……我的女儿才十一……”

“请司令直接向一团下命令，叫他们即刻上船。这样，下午三四点钟，即可发起进攻，傍晚前进驻老县城，这原来就是我们的第二方案。最要紧的一件事，一定要把我那两件宝贝带上，就是那两个装甲车，我就靠它了。我估计，等明天，大批共军援军就会抵达，到那时，我们取胜的可能，就微乎其微了，而且伤亡还要大得多。”

“……好的，好的……”

“谢谢，再次谢谢司令。”

章团长放下电话，胸脯起伏，沉思良久。

忽而，抬起头，对李策说：“刚才的话，不要对别人说。”

李策马上回应道：“这是卑职最起码的工作守则，您尽管放心。”

章团长端量了一下李策，有些兴趣来了，便问：“听说，你就是海源人？”

“是的，而且就是龙头镇上的人。”

“那你和陶县长是同乡了？以前都认识？”

“我们是小户人家，哪能攀得上陶县长。连现在也不认识。”

“那一会儿，我给你们俩介绍介绍，啊。你是怎么出来的？现在，家里情况怎样？”

“我是靠我叔，出来念的书。我叔说，中国因为没有海军，所以受了日本鬼子的气，我就学了海军。”

“嗯，有志气。”

“出来后，再没回家去过。不知道家里现在究竟是什么情况。只知道，因为我出来念书，家里没有劳力，我爹请了个短工，土改时划了个富农，被管制起来了。肯定是遭了不少罪，说不定，已经被灭门了。”说着说着，李策这样的小伙竟也唏嘘起来。

“唉……中国的土地问题是需要解决，中山先生早就提出要平均地权。但何至于要搞成这样呢？”章团长也不由长叹起来：“改变社会结构需要革命，革命有时也需要暴力。中山先生发起的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也都采用了暴力方式，非如此不能推翻满清皇朝。但暴力革命，也有它的局限性。如果不认识这一点，不限制这一点，甚至有意识放任不管，则会有很大的负面效应。不但给对手，也会给自己、给整个社会，带来莫大的冲击和伤害。法兰西大革命，给世人的教训还不够吗？欧人对此有不少总结，可我们中国人对此却很少关注，还在不断地重复。”

“章团长，您是先生吧？”李策听了这番只有在学堂里才能听到的高论，非常惊诧。

“是的，我当过先生。”

“难怪，难怪。先生这番话，瞧，我都叫您先生了。”

“挺好，叫先生挺好。多少年来，头回儿听到叫我先生的呢。其实，我还真愿意回去还当我的先生。”

“先生这番话，真叫人深思不已啊。”

“唉，社会大潮掀起来了，我们各色人等，也是各为其主、身不由己啊……把话拉回来吧，登陆成功以后，赶紧回去看看。也代我问老伯他们好。我们拼死拼活，不也是为普天下众人有个安生日子么。”

“谢谢团长了。就怕没时间吧？”李策还会试探地问。

“没时间，也要有时间。到时候，我来安排。”

“是。”李策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章团长又到了最上面的指挥舱，见只有方舰长在，便问：“他们呢？”

“罗团长，真的到甲板上去了。”

“是要去看看。”

“陶县长嘛，散会后就没见着人。”

“他是不关心打仗的，他只关心别人打完仗后，他去当县长。”

“你看人倒是入木三分啊。”

“嗨，这只不过是混出来的。刚才，我说你们炮打不准，没想到罗团长还跟着起哄，你可别在意啊。”

“我还不至于就这点心胸吧。章兄，我倒是在想，这个打法，能靠得住吗？”

“这个仗，不但陶县长是靠不上，罗团长也是靠不住的。”

“哦，此话怎讲？你不是还要靠他拼一下的吗？”

“唉，我是知道的。罗团长这种人，一看能打赢，跳得比谁还要高；一看要打输，逃得比谁还要快。”

“那怎么办？”

“用我的第一团。我刚才跟汪司令通了电话，请他下令，叫一团出动，投入登陆行动。”

方舰长听着，瞪大了眼睛：“你舍得吗？这可是你的老本啊。”

“什么本不本啊，没有别的办法啦。一直败下去，连个立脚的地方都没有了，还谈什么本啊？”章团长十分无奈地说。

“唉，”方舰长也叹了口气，“你看这大局会怎样？”

“现在还谈什么大局啊，早已经无可挽回啦。国民政府这口气，不是按年算，而是在按月算，按天算了。”

“那我们黄港呢？还能撑多长时间？”方舰长还真把章团长当成长者请教呢。

“黄港也已是困兽犹斗，退无可退了。至于还能撑多久，那要看两个方面。一是看，美国政府是否愿意继续支持老蒋，美国海军陆战队还能在黄港呆几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军撤走的那天，也就是黄港完蛋的一天。二是看，黄港的民心，黄港的社会秩序，能不能稳住。这方面，如果稳不住，市面乱了套，黄港则不战自乱、不攻自破。”

“国民党怎么会混到这种地步呢？”方舰长尽管是个军人，可基本上还是个知识分子，对这种政治上的事远不及章团长来得明白。

章团长看来是个愿意思考的人，对这些事情还是有所思索的：“老蒋，不是汪精卫，对中国是出了力的。但是，他没有抓住历史机遇，没有看到二战结束以后，世界性的历史大潮已经转向。美国国内要求民主和社会进步的呼声日益高涨，可老蒋对此还是没有认识、置若罔闻，坚持用专制和暴力来解决中国问题。你看，三十年代，对党内的不同意见，像邓演达、胡汉民这样的人，都能下手，更不用说对共产党了。结果，在国际上，失去了同情和支持，加上他对美国政局、对美国的大选又发表了不恰当的言论，偏向了胡佛。连任后的杜鲁门对老蒋当然心存芥蒂、没了兴趣，不再提供新的援助。这对于我们无

疑是釜底抽薪，就像房子被抽掉了柱子，一下子人心散尽，根本无力也无心再去对抗共军。于是就出现了像现在这样千里溃败，毫无还手之力。应该说，这是国民党失败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杜先生这样做也是意气用事、举措失当，不但坏了中国的大事，也坏了美国人自己的大事，这就不去说了。相反，苏俄却抓住机会，大力援助中共，给了多少武器军火啊。辽西会战中，共军打一个锦州就用了上千门大炮，谁能顶得住？不管是范汉杰、廖耀湘，还是卫立煌、杜聿明，换了谁也是不行的。到了今天，还说什么呢？有办法的，各人自找出路，没办法的，人心思变，已经是树倒猢猻散，无可救药了。”

“近来不是有个说法，卫立煌有通共嫌疑，该撤的不撤，该守的不守，才使我们几度落入共军圈套，在东北一败涂地，以致整个大局都翻盘。老蒋也是瞎了眼，一直都没看出来。时已至此，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回答不了。”

“那么，共军来了，怎么办？”

“没想过，不敢想。”

“我们是海军，可以名正言顺地跟着船走。可你呢？没想过投共？连傅作义都那个样了。”没想到方舰长来了这么一句，又赶快说，“我这是随便说一句哦，别当真。”

“不会的，决不会的。我很清楚，我手上也有共产党的血。进攻，是我下的命令。开炮，也是我下的命令。我也是共产党所讲的决不饶恕的战犯。我和共产党，彼此之间，虽然没有直接的个人恩怨，但都是对方不共戴天的仇敌。”

“四年前还在一起打鬼子呢，没想到，现在成仇敌了。”

“唉，此一时彼一时吧。其实，我们拼死拼活打鬼子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他们是钻了个大空子，捡了个大便宜。”

“那，最后呢？”方舰长还在问。

“没有最后。”章团长苦笑着，“只有打上去，站住脚，看局势还有什么变化。”

5.4浴血奋战

海角前线。

一排和三排已经换防。姜雪花她们也已把伤员们撤了下来。七班到了最前沿的礁石后，八班、九班在前堦待命。

“轰！轰！轰！”

国民党军的炮火又一次响了起来。这一次，果然，炮弹密集多了，集中倾泻在海角的礁石群上。

“轰！轰！轰！”

前一批炮弹刚炸开，被炸起的满天沙石还没落下，后一批炮弹又呼啸而至。大地在剧烈地颤抖，天空在烟雾中翻滚，礁石群已完全笼罩在硝烟浓雾之中。震耳的巨响就像在头顶上炸开，身体随着爆炸声上下震动，五脏六腑被翻搅着，睁不开眼，喘不上气，鼻子里、气管里、一直到肺里，都灌满了令人窒息的炸药气味。烈焰在燃烧，礁石在发烫，滚滚的灼热气浪，扑面而来，像要把焦裂的皮肤一层层撕去。被炸起抛向半空的砂石又雨点般地砸下，能埋住半个身体。更要命的是，弹片和碎石四处乱飞，随时都能穿透人的躯体。七班的士兵们，就这样坚持在最前沿的礁石旁。

在炮火的一片呼啸声中，334团的士兵们，多少壮了些胆，开始下小船。

除了“济成”号上配有柴油机的救生艇六艘外，还有临时为此次行动制作的手划小船十一只，全部回来，重新装人，大约总共能装一百二十人样子。

余排长，照例是在艇尾的发动机的操纵杆边上。正在神气地招呼别人：“快点，快点！别磨磨蹭蹭的。”

二班长也悄悄地下来了，自己知道上次把人家余班长给挤了出来，这次可没有好果子吃了，所以连眼睛都没敢看。

余排长当然看见，只是当面不说，心里可想，你这小子，也有落到我手里的时候，等着瞧好的吧。

士兵们下船，还是不适，在风浪的晃荡中，手足无措。

余排长还能提醒一下：“要抓住船帮，眼睛往前看。弟兄们，我们能到一条船上，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前世有缘啊。我们的命可是都拴到一起啦。到时，可得听我的，一起进，一起退，我不会把谁落下的。听见啦？”

士兵们应声喏喏。

“坐好了啊，解开缆绳。”又抬头对舰上说：“行啦，起绳吧。”动作可是熟练多了。

“走了！”余排长一声喊，小艇“呜呜”地翻腾着白色浪花，第一个冲出去了。

余排长觉得自己又露脸了，高兴得不得了。心想，这回，又争得头功啦。上回死了排长，自己就当排长；这回要是死了连长，自己不就是连长啦，要是连那个滕营长也死了呢，这不就……想着，想着，差点笑出了声。

没想到，舰上的喇叭响了：“余排长，余排长，你的小艇先别走，等小划子先走，等小划子先走。”

余排长这才想起来，还有这码事，自己一时兴起，竟给忘了。

小划子陆续离开了舰船，向着海岸划去。

滕营长的小艇，在海面上来回奔驰，不停地吆喝着。

余排长也在寻思着，不断地拐着弯，不想在最前面，等到最后再往前冲，说不定，还能再捡个便宜。

小划子，渐渐地靠近岸边了，只有三四百米了，土黄色的人影，已经很清晰了。

“打！”顾排长大吼一声，射出了第一颗子弹。远处的一个人影，翻进了大海。

顾排长的左右，也响起了几声枪响。

顾排长一听，不对头，发出的枪声怎么少了。爆炸声还在隆隆地响着，沙石还在倾泻着、飞舞着，他都不知道战士们的伤亡怎样。

他急得大喊：“班大虎！简贵阳！……”

不远处，战士郝森林在答应着：“排长，别喊了，能战斗的，都在战斗。”

卯足劲过来的国民党小划子也开始射击，子弹尖叫着飞来。

顾排长还在喊着：“同志们！打最前面的！狠狠地打！”

舰上的炮火向后延伸了。

等待在前港的八班、九班的战士们，望着在炮火中浓烟翻滚的海沿，心里早就焦急万分。一看炮弹向着自己的隐蔽地飞来，随着副排长的一吼，二十多位战士，一起跳了起来，冒着炮火，奋不顾身，朝着滚滚硝烟，飞奔而去。

“轰！轰！”冲过炮火区，陆续有战士不幸倒下。

冲进浓烟，满地是崩裂的碎石，燃烧着的火苗，衣服的碎片，甚至战友被撕裂的遗体。

“排长，排长，顾排长！我们来了！”战士们喊着，不顾一切地跑着，一直冲到海沿。

“太好了！来得真及时！把我给急死了！”顾排长听到呼喊，不禁欢呼了起来。

刚来的战士们也赶紧各自找好隐蔽地，朝着海上的小船射击起来。

那个余排长，看着小划子们渐渐靠前，快到岸了，也催促起来：“射击，射击！别趴着、躲着！枪不要停！”

突然，岸上还击的火力增强了，四周小划子上不断有人发出被击中的惨叫声。

“呜呜”，滕营长的小艇赶了过来，他也感觉不对，靠过来，问：“岸上过来的枪声，怎么好像密了？”

“可能是共军第二梯队，躲过炮火，上来了。”

“喂！”滕营长操起步话机，就喊起来：“罗团长，共军第二梯队上来了，请求炮火支援……还是打前海沿……已经有小划子靠近岸边了？不管了，我吹下号，能撤几个撤几个。撤多了，共军一旦发现，他也会往后跑……好的……开始！”

“嘀嘀嘀……嘀嘀嘀……。”滕营长吹起了哨子，小艇像撒腿一样往后跑。余排长一见，也把操纵杆一转，扭头就跑。

那密集的炮弹又砸向了最前沿的礁石群，有几个快到岸边的小划子，没听见哨子，也来不及后撤，就一起砸在了里面。

余排长他们看见，岸边的海水，冲起了一团团的巨大水柱，炸碎了的小船，成了七零八落的木板，连同士兵的肢体，都抛上了天。

在更远一点的南港上的纪排长他们，趴在地上，眼睛一直在紧盯着海角的那片硝烟弥漫的礁石群，一眨都不眨。

当看到滚滚浓烟随着隆隆炮声升起，三排的战友们承受着怎样的压力和危险时，他们的心里也被揪得紧紧的。

当看到海上的小船，被打得东倒西歪时，他们高兴得直拍着地上的石头，叫啊，喊啊。

他们也看到八班、九班的战士们冲向了海边。可炮火也砸向了海边，海角的前沿又是一片火海。

“不好，三排的力量都已经用上了。他们这次的伤亡一定很大。如果，敌人的小船再上来，这可怎么办？”纪排长在跟边上的同志们商量着。

大郑先着急了：“我们赶紧上去，不能再等了。”

“对！同志们！”纪排长觉得需要作决定了：“虽然，上级还没有下命令。但是，战斗就是命令。现在的情况很明显，三排的伤亡肯定很大。不能眼看他们丢了阵地以后，我们再去支援。现在，我决定，一、二班跟我去支援海边，三班留驻原地。如果，上级以后要怪罪下来，由我一个人承担全部责任。怎么样？”

“没意见！”“听排长的！”

“出发！”

“我们也要去！”鲁队长、姜雪花也都开了口。

“不行！”纪排长斩钉截铁地说：“你们就在这儿待命，这儿就是你们的阵地。这也是命令。”

纪排长指着西南方开阔的海滩，说：“我感觉，敌人如果在海角还拿不下来，很可能会转移到这一带进攻，而且我们在这儿的防备力量很弱，到时候还真需要你们在这儿顶一阵。

鲁队长，还麻烦你派一个同志去营部，汇报一下。”

“是。”

“一、二班，跟我上！”纪排长一挥手，十几个战士，跃出堙顶，像猛虎扑食一样，向山下狂奔而去。

舰上的炮火再一次向前延伸。

余排长听到耳边突然一静，知道“立功”的时间到了，嘴里又吵吵起来：“快，快！操起枪，向前射击！”

“噼叭，噼叭。”士兵们开起枪来。

余排长“呼”地加大了油门，向岸上冲去，看上去真是想争这“头功”了。他低着头，瞅着一个低礁，“砰”地又撞上了岩底。这可是余排长第二次靠岸了。

“赶紧跳！不管死活往下跳！”这回，他也学着支排长那些办法了：“赶紧找石头躲起来，放枪不能停。”

士兵们噼哩叭啦往外爬，只听子弹“嗖嗖”地飞来，艇外不断发出“啊啊”的惨叫，也不知死了几个，剩了几个。

余排长一看，只有二班长还在艇里面磨蹭，拔出枪就对着他：“身为班长，你就该第一个往外冲，怎么还躲在后面，不知道军法吗？”

二班长回了个恶狠狠的眼神，翻身出了小艇。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二班长在翻出小艇的瞬间，举枪向余排长开了一枪。余排长绝没防备，虽眼快手疾，往左一倒，右手同时枪响。可既没有打到对方，左臂却中了他一枪，又不敢伸头出去看看。

外面的枪声更密了。只听得“啊”的一声，像是二班长的声音，接着又是“哗”的一声摔倒在水里的响声。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竟然天无绝人之路，是共军的子弹帮他解决了问题。他跪在艇里，连连磕头，尽管他连该向谁磕头都搞不清楚。

“老天爷啊，你真开眼啊，千万保佑我啊，等这回我能活过来，我给你烧香啊。”

余排长想想，真是觉得后怕，刚才还在想着哪个死了，自己就能补上，可差一点儿，自己就先死了，还不知叫哪个人补上呢。“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呐。”余排长在悄悄地想着。

好在这一幕，在枪林弹雨之中，别人谁也没在意到。

一排的战士们，一口气，跑步四、五里之多，赶到了海角，见到了比半小时前八班、九班战士们看到的更惨烈得多的景象。那滚滚的硝烟，弥漫着更加浓烈的焦糊的血腥味，直叫人恶心呕吐，更多的尸块迸得到处都是。而国民党的船，有的已经靠岸，烟雾中已经有了他们的身影。一排的战士们，都顾不上寻找战友，瞪着血红的眼睛，端起刺刀，嗷嗷地杀向对方。

三排的战士们伤亡已经很重。

副排长虽然冲了过来，却已经牺牲，血肉模糊，躺倒在血泊中。

战士简贵阳，双目失明，在地上爬滚，还伸着满是血污的手，叫着：“我的枪？我的枪在哪儿？”

一个国民党兵过来，朝着地下的简贵阳的胸廓刺去。

简贵阳连一声都没喊，浑身抽搐几下，就不动了。

正好被刚赶来的大郑看到。大郑愤恨至极，大叫一声，一跳老高，举枪刺去。

不料，又一个国民党兵跑来，两人对刺大郑，情况十分危急。

正在这时，又从地下响起了枪声。刚从昏厥中醒来的班大虎，艰难地抬起枪，真还撂倒了一个。但这一枪之后，手又无力地倒下，枪从手中滑出。

大郑和剩下的高个国民党兵对刺。那兵的枪刺被大郑从下面高高挑起，那兵呀呀地叫着，拼命地往下压。这是两人的生死对峙。如果大郑体力不支，自己的刺刀被压下，对方就可直接刺向大郑的头胸部位；反之，大郑能把那兵的枪刺挑起，就能刺向他全身的任何部位。

大郑，脸上写满仇恨，眼睛瞪得血红，胳膊上肌肉凸起，额头青筋突暴，拼尽全力，啊啊地往上挑，却不见起色。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小钱端着枪过来了。

小钱见状，突然愣了一下，他还没见过这种场面，一时竟然反应不过来。

“快！快！给他一枪！”大郑大叫着。

小钱睁大了眼，涨红了脸，端着枪使劲地比划了两下，也没有把刺刀伸出去。

这时，那兵也知道他的命已到了最后时刻，“哇”地一声大叫，竟把刺刀压了下来，猛地向前一推，大郑的军帽都飞了出去，差点刺进了大郑的脑袋。

大郑猛吼一声：“杀！”楞把那兵的刺刀，挡在了头顶上。

这时，小钱一身冷汗，猛地惊醒，用尽全身力气，向着高个对方的腋下刺去。只听那兵“啊”的一声，手里的枪支，便被大郑挑到半空中。

大郑又在瞬间，毫不留情地刺向那兵的胸膛。

那兵结结实实地倒了下去。

大郑喘了口气，对小钱说：“这就是战斗，这就是你死我活的战斗，来不得半点的手软和犹豫。或许，他不是个坏人；或许，他也是穷人家出身；说不定，还可能是被地主老财抓壮丁强迫来的。但是，只要是穿着这身国民党军服，那就是敌人。你不杀他，他就杀你，没有第三种结果。你这是第一次杀人吧？经过这生死考验，这回，你这才算是真正的革命战士了。”

小钱还在愣愣地看着刺刀尖上往下流的血滴，没回过神来。

这边，纪排长喊着：“机枪呢？机枪呢？”

机枪手已经倒在那一边了。纪排长冲过去，端起机枪，向前猛地一个横扫，好几个国民党兵被打倒在地。

在战士们的浴血奋战之下，国民党兵终于被压下去了。

剩余的国民党兵又退到了海上。

那位余排长，照例又是自己一个人，驾着船，在海上飘悠。

滕营长还在跟罗团长说：“开炮！再向海沿开炮啊！刚才效果很好啊！”

罗团长在电话里冷冷地说：“再开炮？小划子都炸没了，我们再怎么办？游过去啊？”

滕营长无言。

顾排长，浑身鲜血，靠在礁石上。纪排长蹲在他身旁，握着他的手，靠近他耳边。

顾排长，勉强睁开眼睛，虚弱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增援。”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顾排长！顾排长！”战士们喊叫着，忘了伤痛，忘了还在飞舞着的子弹，心中只有仇恨，朝着海上，朝着敌方，一排排的子弹飞射过去。

第六章 舍生忘死

1949年1月6日

6.1 救护站

海角的枪炮声，传到镇上，已成了隆隆的一片。

乡亲们听着枪炮声，紧揪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三两成群地站在巷口，望着南面不断升起的烟云，紧张地小声地说着。

几个大胆的村民还爬上城墙，趴着，用手遮着眼眉，看着南面，只是一片滚滚的浓烟。

出了龙头镇北，便是逐步隆起的后港。后港上，有座惠民寺。原是早年间，义和拳毁了更北面的望海教堂以后，乡绅们修的，三进两院。虽然年代并不久远，却也无法考证此庙属何宗何派，香火并不兴盛。至日本人来，便断了烟火。再到八路军时候，寺里的菩萨都给拆了。至于和尚，曾经有过，也不知是在何时没了的。

乡里安排和平村（东北村）的民兵、妇女，在这庙里搭起了临时救护站，倒是个挺合适的地方。

第一批的伤员小宗他们已经在这儿了。

第二批伤员更多，被搀着、扶着、抬着陆续地过来了。

小庙里都塞满了。搭满了床铺，躺满了伤员，人们在床铺的缝间，挤来挤去。

和平村的年青妇女们在忙前忙后，营、连卫生员在指导着、安排着。

领头的是和平村的妇救会副主任哈妹。在那个翻天覆地的革命年代，翻身最彻底的要数妇女们了。各个村都涌现了一批热情、能干、活跃的妇女积极分子，哈妹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经乡长的老伴也在这儿，做临时负责人。龙头镇的人习惯叫她经老太。其实，也就是四十来岁。但海源人习惯把这样稍为大了点年纪的妇女，称之为老太，有点戏谑和亲昵的意思。经老太，毕竟多年跟着经乡长在外工作，经验丰富，作风干练。不时有人找她说着什么，她也四处在看、嘱咐着。

没有大声的吆喝，只有妇女们的轻声细语，和伤员们听着叫人心疼的呻吟。

乡亲们也都端着水，捧着鸡蛋，轻声地围了过来，擦着眼泪，心疼地看着伤员。

财粮干事大程也在这儿忙来忙去，一会儿命令这个说，你打盆水到这边来；一会儿教训那个说，你干活怎么一点也不利索。那个腔调，跟这儿的气氛很不协调。

经老太听了挺反感，就说：“大程啊，你有什么事，就忙去吧。这儿人手也挺多。”

大程听了，一扭头就走。

老王头的老伴王大妈虽不是和平村的，在烙完饼子后，也闻声跑了过来，抚摸着一个小伤员：“好孩子，好孩子啊。疼吧？会好的。”抬头又跟和平村的村长说：“要这儿挤不下，就上我家吧，”

“先都在这儿吧，好治疗、好安排些。你放心，王大妈。要是搁不下，会来麻烦你的。”村长安慰王大妈说。

有个伤员疼得嗷嗷直叫。

王大妈轻轻走过去，安慰到：“孩子，忍着点儿，忍着点儿……”

那伤员张开颤抖的嘴唇，说：“大妈，忍不住啊，实在忍不住啊……”

望着这些皮肤焦黑、肢体断裂、血肉模糊的伤员们，除了包扎，几乎又没有任何别的治疗手段，乡亲们只有悄然落泪。

小林还在救护站，看看有没有能插得上手、帮得上忙的地方。

宗发奋正躺在靠里面一排的床板上，局促不安，紧攥着拳头，嘴里还哼哼着。

“怎么啦？疼得厉害？”东北村的一个小媳妇过去，轻轻地问道。

小宗摇摇头，脸上还是痛苦着。

“那怎么啦？”小媳妇还是不解地问。

小宗憋得脸通红，张开嘴，朝天急促地哼了两声，见那小媳妇还是不明白，又用劲地“啊啊”了两声，头上都出了汗。平常挺有心计的小宗，这回可不是装就（“装就”，海源话，做作、假装的意思），真是憋急了。

小媳妇明白了，“是要撒尿吧？我扶你出去。”

小媳妇托着小宗的后背，想扶他起来。哪扶得起来，小宗疼得“唉哟”一声。正走到旁边的小林说：“他是腿受了伤，还没检查过呢，下不了床。”便递了个葫芦瓢过去。小媳妇拿着瓢，看着小宗染血的裤子，忽然刷地一脸通红，手僵在那儿，不知怎么做了。

小林看出了小媳妇的想法，毫不迟疑地走到跟前，又拿过葫芦瓢，解开小宗的裤带，把瓢塞了进去。

随着一阵浓烈的腥臊，一阵猛烈的喷射，尿液四溅，弄得小林身上都是，那一阵“哗哗”声，满屋子的人都听到了，小宗真是憋急了。

小宗僵硬的四肢又瘫软地贴到了门板上，脸上感动得淌下了泪，他知道这是刚才抬过他的那位姑娘。

经老太见状，忙赶过来：“小林啊，你真不容易啊。”

小林没有回话，大概是也不能再张嘴了，脸上却是冷俊得苍白。

这一幕深深地印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上。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二十二年后，海秀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押上刑场处决，临死还被铁针缝嘴、活活地剖腹挖肾。在这过程中，宗发奋是昧着良心，天良丧尽。

考虑到战斗会更激烈，乡政府决定把救护站后撤，重伤员继续往后转移，往大河以北、靠近县城的周格庄一带安置，并请求县、团的医疗队同时赶往周格庄。

6.2一切为了前线

民主村的乡亲们，凭着对胜利的向往、对革命的热忱，凭着多年来的斗争经验，紧张而有序地工作着。

赵玫领着大妈们，已经烙好了一袋面的饼，说：“你们先回家打理一下吧，出来快一个时辰了，回去看看吧。我把这些饼子，挑到前沿。等我回来后，再烙那一些。”

“你可得先回家看看宝宝怎么样了，可不能大意啊。”

住赵玫前屋的邬大妈说：“你先回去看看，给孩子喂口奶，自己喝口水，也花不了多少时间。我在这儿看着，等着你。这样行吧？”

大家也都说着。

赵玫这才脚步匆匆，回家去看看。

没进家门，就听见孩子“哇哇”的哭声。

赵玫一步就到了炕前，“是妈妈不好，是妈妈不好，是妈妈回来晚了。”抱起孩子，眼泪唰唰地下来了，赶紧解开衣襟，把奶头塞给了孩子。

赵玫这才把屋里看了一下，自己的丈夫董平章也还没有回来。他是一早就挑着桶、扛着锄，出门上山干活去了。

董平章，是个好丈夫。西门外的十亩地，是从来不用她操心的。他说，今年的年景不好，天旱，他要多下点力，有了宝宝，难免要多花销了。他勤恳、顾家、从不惹事生非，赵玫想到这些，心里泛起了一些甜意。眼下就是这该死的国民党，等打败了国民党，他们家、他们龙头镇都会好起来的。

赵玫望着才三个月大的可爱的宝宝，心里真有点舍不得放下。可想着前方流血打仗的战士们恐怕还没吃上饭，赵玫还是狠狠心，从孩子嘴里拔出了奶头。

“宝宝啊，等妈妈去给解放军送上饭，打死国民党大坏蛋，再来给你喂奶啊。”

“别哭啊，别哭啊。你哭，妈妈也放不下心啊。”

赵玫又把孩子放下，掖好被，再把箱子、抽屉这些所有能用上的东西都围在宝宝的四周，这才一步三回头地走出房门。到了街上，赵玫擦了擦眼睛，理了理头发，又甩开大步去场院了。

老王头把他组里的几户，都转了一圈看了下。最后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不大的院落，两排屋。三间朝南的正房在后排，老两口和大儿王山各一间。如今，王山正在淮河一带支前，听说快回来了。二儿王立俩口住前面一排朝北的两间倒屋。倒屋的东侧，是街门。好一点的人家，就修上了门楼和过道，还有的，在门楼后建个照壁，遮挡一下院子。老王头家也没有这些，跨过门槛，就是院子。

老王头踏进院子，小媳妇正把院里的杂物塞进几个袋子，扫着地上的尘土。小媳妇姓丁，谁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连老王头都搞不清了，大家都叫她丁妹，老王头也跟着这么叫，都叫顺了。

“丁妹，收拾得差不多了吧？”

“嗯。”丁妹一直只知道干活，而没有言语。

她是1947年国民党从西向东进攻解放区时随家人逃难而来，不料又走散了。在这兵荒马乱之时，着实把小丁吓得不轻。就在这时，王大妈觉得这孩子不错，挺实在，就留下了她。王大妈还有个想法，想给自己二十二岁的大儿子王山，寻思个踏实、勤快、能干活的媳妇。王大妈还真找对了人，丁妹就是这样的人。但在这层纸捅破之前，王大妈看出来，丁妹似乎更喜欢小兄弟王立一些。王大妈就成全了丁妹的意思，今年给他们俩合了房。可能是因为时局紧张，或是经济拮据，还是王大妈多少有点疏忽，觉得丁妹是捡来的、又早已是自己家的人了，也没办个仪式，就是把王立的铺盖扛到了丁妹住的倒屋里。这却给王立和丁妹之间，蒙上了一层难以名状的特别的关系。王立呢，生性好玩一些，似乎还没到成熟的年龄，没这方面的意识，没把这当成一回事，对丁妹不是很热情，觉得丁妹就像是自己的小姐姐，有时还无意无意地避着，甚至自己睡在外间的地上，完全不是俩口子的样子。而王大妈呢完全不知道这些，还乐呵呵地以为给儿子、给丁妹、给王家做了件大好事。丁妹倒是很感激王家的人，觉得王家老两口真的是完全接纳她了，真的是成了一家人了。丁妹觉得虽然王立不冷不热、不像个持家当男人的样，可能是因为年纪太小了吧，长大了就好了。丁妹本来就没有什么话，加上感激，还有自卑，以及这份两面的尴尬，就更没有话了，只是默默地勤奋地干活。但是王大妈这份可能是不经意的疏漏，成了日后一场悲剧的因素之一。

尽管有这些复杂的关系，可全家人过得很平和，从没有什么拌嘴。头年，王山为了照顾弟弟王立，替下了王立要出去支前的差事，由他作为家里的名额，离家南下去支前。

“你妈呢？”老王头问丁妹。

“去烙饼了，没回来。”

“哦，王立也没回来？”

“没有。”

老王头也没多少话，但在家里却很有威信。背着手，在小院里转了两圈，看着没什么可另外吩咐的，心里还牵挂着外面，又出门了。

秦德才呢，早已回家上炕睡大觉了。小场院里的地富交给了一个小青年储小二去看管。

6.3生死之交

海角前沿。

枪声慢慢平息，浓烟渐渐消散。

鲁队长和姜雪花他们迫不及待地冲向礁石群。

等他们冲进还在燃烧着的、弥漫着硝烟、充满着血腥和火药气味、熏得焦黑的礁石群时，他们都惊愕了。他们也经历过战争，不但见过不少战争场面，他们自己也曾曾在枪林弹雨中穿越过。可现在，面对这样的场景，他们全身的神经都被震惊了。到处都是残缺的尸体、哀号的伤员，满地的碎石里混杂着断肢残臂和碎肉，甚至都分不清哪是自己的战友，哪是敌人的尸体。

他们哭着、叫着、捧着战友的遗体跪在地上喊着……

“看到有伤员的先抬走。”有人提醒道。

“班大虎！班大虎！”

班大虎的手指还在颤抖。

“还活着呢，还有救！快抬上吧！”

班大虎马上被抬上门板，拴上绳，四个人过来抬走了。民兵们有了刚才抬小宗的经验，现在顺利多了。

“顾排长，顾排长！”姜雪花一下看到了躺在一边、满身血污的顾排长，马上扑了过去，跪在他的身边，摇晃着他的肩膀，呼喊着他的名字。两三年来，在多次的生死斗争中，这些村干部和当地驻军，都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姜大姐，排长已经牺牲了。”旁边有人提醒。

“不，不，他没死，他不会死！”往日刚强的姜雪花，此时满脸泪水，嘶哑地叫喊着，拍打着还在渗血的顾排长的躯体。姜雪花不相信，刚才还在关心着她们、把她们替下来的顾排长怎么一下子就离开她们了呢。

“把他抬上去，我要把他抬回去！”姜雪花直直地站起来，不容置疑地说着，把顾排长放上门板，两头拴上绳圈，穿过一根木棒，和另一个男民兵，含着泪水，紧咬嘴唇，只两个人，抬着门板，就走了。

一个瘦小的国民党兵，腿部受了伤，爬在地上，嚎叫着，哀求着，两手直向在边上奔忙着解放军战士作揖：“救救我啊，救救我啊，长官，求求你们啦。我也是穷苦人啊，我是没办法，只能穿着国民党

的衣服，来找你们的啊！”

小钱听了，问大郑：“这，怎么办？”

大郑听了，哼的一声，“谁知怎么办。”便回头对那小个国民党兵说：“吵什么？烦死了！我们自己的战友还没有救下来呢。等最后，要是你们国民党不再打炮过来，就过来看你。”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我不是国民党，我是叫国民党害成这样的。你们可要回来啊……”

大郑和小钱，跨过岩石继续向前寻找伤员。小钱回过头来，又看了看那个国民党伤员，还在绝望地哀求着，用鲜血淋漓的双手在沙石地上爬滚着。

潘连长也赶到了海边，看小钱一边往前走还一边回头看，便问：“小钱啊，看什么呢？”

小钱、大郑闻声忙回头，一看是连长，高兴地招呼着：“连长！你也来啦！”

“我过来，不是很正常嘛。小钱，你在回头看什么？”

“那儿有个国民党伤员，求我不要扔下他。我说我们自己的伤员也还没有抢救下去呢。不过，那人看上去也挺可怜的。”

“那过一会儿，你也把他弄回去吧。其实那些国民党兵也都是穷苦人、可怜人，能帮一把的，就帮一把。”

“好。连长跟我们一起走？”大郑问。

“你们还是按原方向搜索。我往海角去。”连长答。

潘连长冒着硝烟往东南方的海角前沿走去。

阵阵烟雾中，潘连长发现赵玫背着个包袱，也在往前走，大为惊奇，叫道：“赵玫啊，你怎么过来啦？”他们俩是很熟悉的。

“我怎么不能来？我来给你们送干粮。”赵玫轻松地答道。

“嗨，这儿多危险啊。送干粮送到营房就行啦。”

“你们这儿也有战士啊，而且打得最艰苦，最需要补充粮食啊。”

“这儿随时会有子弹、炮弹打过来的。快走，快走。”

“那你们就不危险啦。潘连长，你午饭也还没吃吧。来，快填填肚子。”赵玫说着放下背上的包袱，伸手拿出一卷煎饼。

突然，一个尖锐的呼啸声从天而降。

潘连长大叫一声：“快卧倒！”一把就推向赵玫。哪知赵玫却想都没想，反而扑向潘连长，要把潘连长护在自己的身下。两人一起倒下。在最危急的生死关头，他们俩都想把生的机会留给对方。

一声巨响，一颗炮弹就在他俩的身边不远炸开。赵玫只觉得一瞬间的巨响、震颤、灼热之后，自己被摔到了一个远方，眼前一刹那的黑暗之后，脑海闪亮一片，自己好像从被撕裂的皮肤里飞了出来。就这么一闪，自己就像不存在了，消失了。

“嗨，嗨，醒醒！”

也不知是过了多长还是多短的一段时间，赵玫觉得有人在推她，这才睁开了眼。自己正躺在潘连长的身下，而他们两人几乎完全被埋在爆炸掀起的沙石堆里。

潘连长在她身上，看来也是刚醒，正使劲地摇着她，张着嘴，好像是喊她。

赵玫听不见喊什么，但是看着一个男人就在自己的身上，靠得那么近，胡子都碰到了自己的脸颊。本能的反应，使她想坐起来，手臂却不好使，只是往上抬了抬。她一下子明白了，刚才是炮弹的爆炸。她往上看着潘连长一脸黑乎乎的灰烟，便伸手抚去他脸上的沙土，问：“没有受伤吧？”

潘连长两手往脸上一抹，笑着说：“没事，没事。你呢？”

赵玫的反应迟疑了一下，她的耳朵听不见了。

潘连长知道赵玫是被震聋了，就摆了摆手，赶紧坐了起来。赵玫使劲撑起双臂也想坐起来，但却起不来。潘连长伸手去扶，赵玫浑身无力，任潘连长把她抱着坐起来。潘连长这才觉得刚才赵玫的身体是那么柔软、那么地有弹性，才觉得鼻子里除了呛人的硝烟之外，还有一种女性的气息，那种从没有过的美好感觉在心灵深处一闪而过。

两人坐了起来，各自拍打着头上的、脸上的、身上的沙土。

赵玫深情地对潘连长说：“谢谢你救了我，我会感谢你一辈子的。”

潘连长怕她听不清，就凑在她耳朵大声地说着：“谢什么呀？打仗的时候，这种事多啦。”

这时赵玫能听见这句话了，便笑着说：“我能听见啦。那也得谢谢你啊，都说救命之恩终生不忘。潘连长，你们真是为我们老百姓拼死拼活啊。”

潘连长看着赵玫白俊的脸上被沙土和硝烟弄得点点黑污，笑了，“看你这脸上。”

赵玫用手一抹，脸上更成了一个大花脸。

两人相视而笑。那笑声那么地爽朗，那么地大声，在硝烟弥漫的海角上飘荡。

潘连长把赵玫拉了起来，说：“我们俩真是命大啊，都没事。你快回去吧，这儿真的是危险。”

赵玫看了看潘连长，点点头，走了，迈过两块礁石，回头看，潘连长也在看着她。

他们俩就此结下了生死之交，二十年后延续到了南疆荒漠，延续到了他们的一生。

在前港的东南坡，平放着二十多具比较完整的战士的遗体。

战士和民兵们顺着地势挖着坑。

令营长、潘连长他们都在，沉痛地站在一边。

“暂时先安葬在这儿吧。等战斗胜利了，要为你们建一座烈士陵园。”令营长缓缓地说。

6.4战地小结

南门外的营房。

击中了几发炮弹，这时火苗已被扑灭，坍塌的屋顶还在冒着烟。

营连排干部，又选在这儿碰头，气氛是凝重的。

“请潘连长先把情况汇报一下。”令营长说。

“这一仗，我们打得很艰苦。牺牲的和失去作战能力的重伤员，有三十多。尤其是，三排，已经无法形成战斗编制。但我们打得也是很成功的，我们以不到一个连的兵力，顶住了敌人一个舰队的进攻，敌人的伤亡应当在百人以上。我们的干部、战士作战都很英勇顽强，涌现出了许多英雄事迹。”

令营长接过话说：“这次作战，我们真的是以一挡十。团部、师部，对我们，都作了充分肯定。我们的作战方案，是正确的；作战行动，是勇猛的；对敌人的打击，是沉重的。我估计，一个小时之内，敌人不会再有新的动作。尤其是，我想特别指出的是，纪排长能在危急时刻，勇于承担责任，敢于主动出击，起到了关键作用。战斗结束后将予以表彰。”

“我们从来没有进行过反登陆作战，这将为我军积累极其宝贵的战斗经验，对我军今后在东南沿海的作战有着重要作用。”

“当然，这一仗也明显暴露了我们的不足。比如，我们对敌人的登陆，准备不足；对敌人的攻击强度，估计不足；尤其是对防备敌人的炮火，缺少必要应对。我们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

说着，令营长沉默了一阵。

“下一步，你们看，我们怎么打？”

“敌人再上来，我们打就是了。继续发扬我们英勇善战的作风，再给他以迎头痛击！”潘连长说。

“对！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无论什么样的敌人，都不在话下。只要他敢来，就坚决消灭它！”胡指导员说。

令营长吐了口气，缓缓地说：“我的意思，不仅仅在这些。我们还要具体研究，敌人下一步会怎样，我们再怎么去准备。既要打赢仗，又要减少损失。”

“对，对，对。”胡指导员连连称是。

“那你说一下。”

“我，我……我还是那句话，狗改不了吃屎。是吧？”

令营长有点无奈，说：“我是说，我们要具体分析敌人的攻击意图、攻击方向和攻击能力。”

“我说下我的看法。”纪排长举手发言了，“我觉得，敌人的攻击意图还是很明显的。目前看，没有撤退的迹象，所有的船只都没动。而且，他们的炮火没有打向镇里的民房，说明他们还是想进占龙头镇的。”

令营长轻轻点头。

“他们的攻击方向，基本上还是海角，因为，他们在这儿已经下了功夫。但是，一而再的失败，也使他们有可能转移方向，比如，从东滩或西滩登陆。”

现在，我们搞不清楚的是，敌人还有多大的攻击能力，他那些船上到底装了多少东西？。”

“纪排长刚才讲的很对。”令营长稍作思考了一会，说：“下一步，我想这样。一是，兵力要集中，二连、三连继续向龙头两侧靠拢。二连两个排上南港，三连两个排进龙头东。一连，集中在海角和前港，三排在补充兵员之前，暂由一排长统一指挥。”

“设想形成三道防线。海角，第一道；前港和南港，第二道；龙头城墙，第三道。后方，由增援部队进驻。团里刚才通知了，增援一个营，已经出发，估计下午能到王村、李家泊一带，我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有个具体问题，敌人炮击对我们伤亡太大，这个问题，怎么对付？”营长问大家。

连长说：“还真不好办。海角岩石多，战士难以跳跃转移，崩起的弹片和碎石又特别多。而且，我们部队新战士多，缺少实战经验，不会从炮弹的声音来分辨它的着弹点，不会躲避。更何况舰炮的声音与野战炮的声音还不一样，连我都听不出远近来。”

“其实，我们现在采用分批出击的方式，还是成功的。只是，我们战士的位置还要再分散些，更灵活些，不要固定在一个地方，要跑动起来。哪儿有敌船来，就上哪儿去堵。小船的速度慢，我们来回跑，是来得及的。这样，被炮弹击中的可能性也会小一些。”纪排长根据刚才的实战经验讲了下。

令营长又接着说：“还有个问题是，我拿不定主意，如果敌人也来了增援，进行强攻，前面一线顶不住，龙头镇还要不要守？”

胡指导马上插话：“坚决要守。龙头要是丢了，政治影响太坏，对团里、对县里，都没法交代。那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潘连长也说：“是啊，我们完全可以依托龙头城墙抵挡一阵。”

“我有点不同看法，”纪排长说：“龙头是很难守的。龙头镇里没有粮，没有水，现在都得上镇外挑水喝，老乡们早晨就要出去打树叶、挖野菜，拿来当一天的口粮吃。围起来了，再怎么办？再有，那城墙

的土，早已经酥了，经不起炮轰，起不到防守作用了。还有，那样打的话，龙头镇的损失就大啦。听说，除了杨虎成1926年守西京外，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还没有什么能依托城墙守成功的例子。”

“看你平常挺勇猛，这事情上，怎么胆子不大啦？”令营长笑着说。

“我考虑得也不一定对。我刚才那话的前提是，敌人有大量增援，敌我力量对比有重大变化。”

“要想到有这个可能性。现在，先不定。一要看，敌人有没有变化。二要请示上级。”营长最后说。

太阳快要到了头顶，没觉出时间过得这么快。

“炊事班呢？”胡指导问。

“也都上前线了。”营长说：“好在赵玫送来了一些饼子，还不错，大家啃啃吧。”

“她呀？刚才我和她还在阎王面前走了一遭呢。”潘连长还带着点激动说着。

“是吗？怎么回事啊？”大家都惊讶地问。

潘连长把刚才敌人打冷炮时，和赵玫一起被埋在沙土里的事说了一遍。他没说是谁救了谁。

“解放区的人民，为了革命，为了我们，真是奋不顾身，付出了他们所能付出的一切。”令营长感慨地说。

“我们也只有用鲜血和生命来报答了。”纪排长说。

“她人呢？”胡指导问。

“还在前线没回来呢。”纪排长说。

“真是个好同志啊，要是在咱们部队上就能评上英雄模范啦。喏，这些干粮还是赵玫带来的呢，先吃点吧。”令营长拿出了身后的花布小包袱，打开，拿出里面装着的几块玉米饼子。大伙也不分什么长，伸手拿着，也不用就水，张着大嘴，咬着就吃。

潘连长啃着饼子，心里还想着赵玫。

令营长知道胡指导吃不惯这东西，却朝他开心似的笑了，“胡指导，只好委屈你了。哈，哈！”

只有胡指导，皱着眉头，掰着小块，放在手心里，慢慢地小口吞咽着。

第七章“这是国民党吗？”

1949年1月7日

7.1 青年军

海面上，那十几个小船还在四处飘荡，等着进一步的指令。

“济成”号上，指挥舱里。

这几位，都低着头，默默无语。

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还是不行。怎么办？

方舰长，看着并不焦虑，他是舰长，只管运来，别的，没他事。陶县长倒是最紧张，上不了岸，还当什么县长。罗团长，最没面子，看家的本事都拿出来了，还是这个样，连绣花枕头都不是，既不中看，更不中用。

其实，心里最着急的是章团长。最交不了差的是他。一遍遍的电话，催促着。直到知道，他的一团一营，连同他所最牵挂的那两辆装甲车，都已经上了船，这才松了口气。但是，他们不来，这台戏就唱不下去；来了，又全看他一个人唱了。

按临走之前定的方案，这些人马装一艘登陆舰和两艘商船。这是章团长留的一手，但这也是最后的一手了，再也拿不出别的了。

章团长焦急地望着西南方的海面。

太阳过了头顶，开始西斜了。

李策进来向章团长敬礼报告：“报告总指挥，一团一营呼营长来电话，他们已经进入本海域，已经看到我们了。”

一向稳重的章团长，也几乎跳了起来，“我去接电话。”

章团长快步走进报务舱，拿起话筒就说：“可盼到你们了，呼营长啊。这场戏，全看你老弟啦！”

.....

“我马上下令，向西海滩和南港轰击。你们跟进。炮火延伸后，你们就向沙滩冲。后面的事，你不用管了。海面上还有十几个小船，百号人，马上就可以跟过来……接得上的。”

.....

“上去以后，什么也不要管，就是往里冲……南塔那个小山头也不要管……连老县城也不要管……对，对……我怕到时候联系不上，先跟你讲好了。”

国民党登陆舰。

宽阔的甲板上，整齐地坐着一排排青年军的士兵，一色的橄榄绿军装，一色的绿钢盔，一色的美式冲锋枪抱在胸前。

舰首的栏杆边，站着一个军官，国民党青年军211师一团一营营长呼年富。呼营长，如其名正当年，约摸三十岁，皖南人，出身商户人家，家境一般。但呼营长，或许是历史条件使然，也或许是个人秉性使然，没有走很多皖南人家走的“学而优则商”的徽商道路，而是穿上了军装，不过穿的是国民党军装。抗战前夕，呼年富考上了清华，虽然皖南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但这件事当时在家乡远近几十里仍然是个大新闻。他兴冲冲地到了北平，可第二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又跟着学校千里跋涉，到了昆明。毕业后，也回不了家，在“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召唤下，穿上军装走上前线，在湘西参加了芷江保卫战。抗战胜利，他只是路过家里，看了下年迈的父母，还是停不下脚步，又听从命令，北上徐州，进了国民党第一个坦克团，当了个营副。再以后，跟共军作战几年，虽然是国内第一流的装甲部队，却发挥不了作用，稀里糊涂地越打越少。尤其是在徐蚌会战，东奔西突，劳苦不堪，他自己都纳闷，手下的坦克都丢到哪儿去了。最后，逃到黄港，只剩了三辆装甲车。被章团长看见，当成了宝贝，其中一辆还已经修不好了。

此时的呼营长，扶着栏杆，眺望越来越近的海岸，思绪连翩。他在想，这辈子，他在忙了些什么呢？他真的是在忙，真可以说，连一天也没停下。十几年来，东征西战，几经磨难，自己却还是孑然一身。可为的是什么呢？为国家、为革命、为理想？过去追随的背负着国民革命、三民主义理想的青天白日正在被打得粉碎。而共产党的红色镰刀斧头，始终在对面飘扬，自己完全茫然、不解、甚至怨恨。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什么不行了呢？到现在，已是身心疲惫，热情全无。蓦然回首，想归去，却已断了去路。昨天，听电台说，皖南各县已悉数被共军占领。父母安在？出路安在？到了这步，还能上哪儿去呢。跟随章团长？应该说，他对他的上司是很尊重的，是敬佩的。然而，章团长又能往哪儿走呢？

前方的海面上，第一梯队的舰船，就在眼前。

“呜……呜，呜……呜。”

“济成”号鸣响了汽笛，表示欢迎和接应。

呼营长，这才收住了思绪，抬起了头，转向士兵，指着天边一行青翠的山峦，说：

“准备！”

弟兄们！海源的土地就在眼前，我们的战场到了。我想最后再讲一句：我们是革命的青年军人，肩负着国父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理想，我们要尽心尽力、英勇作战，开辟一块三民主义实验区，为中国创造一条新的道路。

共区的老百姓，已经苦了几年了，我们不要再去骚扰他们。

要严格遵守军纪。除了经过特许的搜查，不得进入民房。

村里的矛盾，地主雇农之间的纠纷，由我们专门的政治人员处理，士兵不要干预。军人就是打仗。”

“是，是！”

队列中发出整齐的应答声。

这帮青年军，主要是从城市学生中招募。比起其他的国民党军，装备较好，纪律也较好，比较能听长官指挥。但缺乏作战训练，不果断，不灵活，对情况变化了的、长官没说到的，就不知所措了。

呼营长队列讲话完毕，又单独喊了声：“一连长！”

“到！”

“一连，一列纵队下舱，一排先进装甲车。排长进第一辆，连长进第二辆。”

一连士兵列队走下铁梯，下到底舱。

底舱里，两辆履带式装甲运兵车，已经打开了后盖。

这种车辆，火力并不强，右前舱有挺机枪，后舱两侧有步兵射击孔，可装载十名左右步兵。由于有装甲防护，可抵挡子弹和手榴弹，在对方没有穿甲弹和反坦克障碍的情况下，对付当时的步兵阵地，还是绰绰有余的。它本来不是登陆用的，但可以水陆两栖，在没有风浪的浅滩区，也能凑合使用。所以，章团长把它当成宝贝，将全部的指望押在它上面了。

呼、章两人，交情不错，缘于呼营长当年在章团长的老家与日本鬼子打过几年仗，被章团长看作半个老乡。呼营长知道章团长的意思，知道自己肩负着团长的全部期望。所以，也下到底舱，把装甲车的驾乘人员喊过来，作最后的具体布置。

“济成”号指挥舱。

章总指挥在给方舰长下命令：“立即开炮！主炮轰击南塔，尾炮轰击西海滩，侧舷炮轰击海角。叫共军搞不清我们要进攻哪儿。”

又对罗团长说：“海上的小划子，等登陆舰靠岸后，也集中在海角的西侧登陆，向龙头攻击。”

章团长继续说：“这次青年军的攻击方向，就是在西滩登陆，而后直插望海山，作为我们今后的一个据点。这样，既可以把共军的援军挡在大河以北，也可使海角和龙头的共军失去依靠，不战自退。”

陶县长和方舰长听了，连连称是。

罗团长明着在点头，心里却在嘀咕：“他妈的，那你早干什么呢，拿我334团开心啊。”

方舰长和身后的副官说着，副官随后离去。

几分钟后，大炮又开始震响。

对面，海源的岸边，又迸发出点点红光，黑色的、灰色的、白色的烟云，又四处腾起，随后就传来隆隆的爆炸声。

残酷的战斗，又开始了。

登陆舰驾驶舱。

呼营长朝外喊着：“甲板上的弟兄们，卧倒！”又向登陆舰舰长问：“方向对准了吗？这可是最要紧的。”

“请放心，调整好了，舰首正对着西海滩。”

“行！那就往上冲吧！”

“呜，呜。”舰尾的推进器挂上了档，还略略加了点马力，螺旋桨翻起浑浊的涌浪，庞大的舰船便朝着沙滩，直冲而去。

海角的西侧，是一条宽宽的沙滩带，宽约百米，长达几十里，除了在大河口那儿被冲了个缺口。那沙滩，色泽金黄，沙粒细软，是极好的旅游胜地，千百年来却养在深闺无人识，只是静静地躺着几条小渔船。今天，它却要第一次成为血染的战场。

解放军三连的两个排，已从西面的新河镇赶来，作为预备队，安排在南港上。为扩大警戒，他们又向海滩一线派出两个班。在沙滩由海面逐渐向内地升高、并转化为耕地的边缘，有一条与海岸平行、天然隆起的土坎，土坎的后面是条不深的沟壑。警戒的战士们，就隐蔽在这里，面对着大海，面对着各种各样、不认识的国民党舰艇。

国民党登陆舰的攻击，正是对着这儿。

炮弹在四周落下。

有一只他们从没见过模样的方方正正的大船，朝着他们开来。

正当他们满心奇怪这船怎么要往陆地上撞的时候，登陆舰的船头却冲上了岸，他们都惊诧了，愣住了。因为，他们从来都没看到过这么大的船，这么奇形怪状的船，更没有想到，船还会跑到岸上来。

随着“哗啦啦”的铁链响，那大船的船头突然放下了吊桥似的船板。黑洞洞的船里面，还没等看清有什么东西，又响起了“轰隆隆”的响声，从里面钻出了战士们也从没见过的用铁甲裹着的车辆。

有明白一点的战士，马上嚷起来：“坦克，坦克！敌人派坦克过来了！”

“不对吧？怎么上面没有炮呢？”也还有不同意的呢。

“快别说了，打吧！”还是班长果断。

于是，他们纷纷举枪射击。

子弹打在铁甲上，迸着火花。

可装甲车不但丝毫未损，继续往前开着，上面的机枪还“突突”地喷着火舌、扫射过来。

“他妈的，我就不信！”一个战士拿起手榴弹，一跃而起，想拼了，被身边的班长压住。

装甲车从战士们据守的沟壑上碾过。

又一辆装甲，从舰里开出来，后面跟着一群猫着腰、蜂拥而出的国民党兵。

班长高喊着：“打后面的敌人！”

海滩上响起一片相互对射的激烈枪声。

金黄色的沙滩上，立刻倒下几个国民党兵。

突然，从战士们的背后，也响起枪声。

回头一看，前一辆装甲车，在突破战士们第一道防线后，又掉过头，从战士们的背后冲过来。装甲车的后面，还跟着从车里出来的一群国民党步兵。

沟壑里的战士，已经腹背受敌。

这一切，都看在南港上三连战士们眼里。

三连的叶连长，立刻站起，说：“一排不动。二排，跟我上！”

没有任何的间隙和停顿，三十名战士，端着枪，嗷嗷直叫，像饿虎扑食一样，向山下奔去。

已经过了沟壑的敌人，被迫停止行进，原地趴下，进行回击。

第二辆装甲，也已到了沟边，疯狂地扫射着，碾压着。

第一辆装甲，回到船旁，装上步兵，又开过来了，车后依然跟着一批步行的步兵。

守在沟壑里的解放军战士，原本没准备正面应对敌人的进攻，不过才十余人，警戒数里长的海滩，力量过于薄弱，过于分散。面对这样强势的进攻，力量对比悬殊，明显是力不从心的。随着伤亡的增加，第一道防线的口子，慢慢地被撕开了。

在前港坡顶上的一连一排，也看到了远处西南方的紧急情况。不但如此，海面上的小划子，也逐渐向海角西侧、靠近西滩一带靠拢。纪排长明白了敌人的意图：敌人在遇到坚决抵抗的情况下，放弃了从正面攻击海角、再攻击龙头的办法，而是想从西面开阔地带发起攻击，迂回到龙头的背后，以发挥他们机动兵力的作用，这一招不可不谓毒也。

纪排长立即安排一位战士去报告连部，一排将插向海角西侧、直至西滩一带，请二排进一步向西靠拢，进至海角东侧和正面。

随即，向战士们说：“同志们！看到了吗，敌人已经上来了，我们必须出击了！向着海边，冲！”

一排在纪排长的带领下，冲向海边，在海角的西侧一线，抵挡想要靠岸的那批小船。

7.2进占赵村

那两辆装甲车，在隆隆地开进，在春天绿油油的农田里开进。小麦已经拔节、玉米长得有半人高，翠绿的庄稼在装甲车的推进下纷纷倒下，脆嫩的枝叶在履带无情地碾压下立马支离破碎，叶梢上还挂着被挤出的浆液。

国民党的步兵，背着行军袋，跟在后面。沉重的军靴，践踏着即将收获的大地。与前面的装甲车，渐渐拉开了距离。

呼营长也在装甲车里，蜷缩在后舱的顶板边。装甲车里，浓重的柴油味，超乎想象的剧烈颠簸，震耳欲聋的噪声，那漆黑，那憋气，看得出呼营长实在是无奈地硬挺着。

按照章团长的交代，呼营长没有与南港的解放军死拼，只留下少数兵力对峙，其余大部队跟着装甲车继续往前行进。

“到哪儿了？”呼营长在问。

没有应答。

呼营长忽然意识到，这是在装甲车里，讲话的方式可不同平常。只好转过身来，嘴对着铁板上的缝隙，向着前舱大喊：“到哪儿了？”

“估计已到龙头西门一线了。”驾驶员在前舱回答。

“外面没有共军吗？”

“一开始，南港那儿有，进来以后就没有了。”

呼营长心里在嘀咕：“共军怎么就这么点兵力。334团打了一上午，怎么还就打不下来，真是怪事。”

“后面的步兵，距离有多远？别拉大了。”呼营长还怕中了什么计。

“有半里地了。”

“别再往前了。左侧是什么？”呼营长也从射击孔往外张望，在一片树丛后，有些屋顶，好像是个村庄。

“从地图上看，应该是赵村。”

“好，我们过去看看。”

于是，装甲车调了下方向，朝赵村去了。

赵村在龙头镇的正西，大河的东岸，是大河入海前的最后一个村庄。

赵村的老百姓，听到枪炮声，很是紧张，不停派人去乡里打听，可乡长也一直没有明确的答复。村里还派出民兵到海边，看究竟打得怎样了。去的人看到敌人连装甲车都出动了，知道大事不好，赶紧跑

回村去报告。这回儿，村里的百姓正在紧急疏散。满村的人，拖家带口，扶老携幼，带上最要紧的，背的、扛的、挑的，还有牵着驴、赶着猪的，满街巷的叫啊、喊啊，都急忙忙地往村西跑。村西就是大河，河上没有桥，都得趟水过去。河床很宽，河水看起来并不湍急，河面上泛着一圈圈的水纹，河面下却既有浅滩，也有深潭。只有当地的老百姓才知道，过河得拐哪几个弯，才能过得去。

已经有不少老乡走到了河中间，在远处枪声和炮声的驱赶下，搀扶着老人和孩子，背负着沉重的包裹和粮食，脚下要摸索着河底的沙石，一步一步走着，异常地艰难。村里的小巷，逃难的人群，还在拥挤着、推搡着，相互催促着、叫喊着。

就在这时，一阵“隆隆”的响声传来，一个巨大的钢铁怪物，突然从村北的小树林里钻出，“叽叽嘎嘎”地压倒一片树木，又一头扎进了河里，“呼隆呼隆”地像船一样开行起来，再又掉转方向，从水里窜上了岸，把人们挡在了村口。

正当人们惊讶无比的时候，钢铁怪物后面的铁盖打开了，竟然是一个国民党军官走了出来。他看着背着大包小包的人群，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又爬上了那怪物的顶盖。几个面目稚嫩的国民党兵站在四周。人们一下子更是目瞪口呆，全都鸦雀无声，连孩子们都闭上了嘴。

面对青天白日的帽徽，那可是个邪恶和杀人魔鬼的象征，人们将会面对怎样的杀戮。每个人都不寒而栗、毛骨悚然，等待着灾难的降临。

“乡亲们！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们是国民革命军青年军211师的官兵，我们也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这次来，不是为了反攻倒算，而是为了开辟新的三民主义实验区，是为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其实“人民子弟兵”的说法在红军出现以前就已经有了。

“你们中间有的人，在共党的土改中，分了地主的地，我们不会要回来。地主的损失，由政府来补贴。请你们不要走了。你们要走，我们也不会强迫阻拦，但我们欢迎你们留下来。”

话没讲完，人们以疑惑的眼神和口吻议论纷纷，人群里一片嘈杂。有个大胆的，叫赵刊新，竟敢扯着嗓子问：“谁敢相信你们啊？”

“我们不是来抢东西、抢田地的。如果不信，我们可以立刻撤走。你们自己考虑，是走还是留。”

说完，呼营长爬了下来，拔出手枪。老乡们一阵惊呼，向后退去。但他不过是对空开了两发信号弹，而后，对士兵们挥手说：“上车！目标，直接到望海山！”

装甲车又下水，在河里调了头，又上岸，朝着望海山去了。

留下老百姓们议论开了：“这是国民党吗？”“有这样的国民党吗？”“是假的吧？”

可是国民党连南京都丢了，眼下都不知道逃到哪儿去了，还会跑到这儿来寻开心么？大家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有的犹豫了，有的继续往前走了，有的没再挪动脚步就留下了。

可能是本村乡邻都是同姓近族，赵村的土改相对来说比较平缓，对地主管得也比别的村松。地主赵炎黄听到动静，还上街看了下，没见到国民党，反被赵刊新看见了，大声喝道：“你敢乱说乱动，小心砍

了你！”

赵炎黄连屁也没敢放，赶紧缩了回去。

呼营长讲的这些，倒不是假话，是国民党方面有些人想出来的东西，想搞以调和与改良为主的“民国新政”。但是，已经到了这种双方都杀红了眼的时候，它还能缓和阶级矛盾、化解仇恨情绪、改变斗争格局、重建社会结构吗？它还能化腐朽为神奇、出现历史奇迹吗？

不管是贫农，还是地主，心里都是一片迷茫和疑惑，只有摇头，没有点头的。

第八章 故土难离

1949年1月8日

8.1 含泪离去

两颗信号弹的升起，原本是呼营长发给章团长看的，可龙头的老百姓们也看见了。老乡们知道，解放军的地方部队是没有这玩艺儿的。随着枪声的临近，他们知道，国民党已经上来了。

趴在城墙上的人，看见穿橄榄绿的国民党兵，正在远处往北开进，便慌忙翻下城墙，嚷着：“国民党来啦，国民党来啦！”

街上，已经有人拖家带口，背着、驮着，往外走了。

“哪个让你们走的？还没见到敌人，就逃跑啦。这是叛变行为，知道吗？”大程在当街拦着群众。

街上挤成了一团。

乡政府里。

令营长正在与团里通电话。

“情况严重，情况严重……啊。”这是团长在答话。团长是个很严厉的人，对下属言语简短，而且也不按语法，即使是令营长也得悄悄地听着。

“是的，是的。”

“怎么才说呢，早干什么啦？……啊？”

“先前胡指导已经跟政委汇报了。”令营长解释道。

“说了什么？还是这个样？……啊？”

“是，是。”

“现在还说什么呀？撤吧。防线也突破了，顶也顶不住了……啊。”

“往哪个方向撤？”令营长请示道。

“往北吧。还能往哪儿呢？……啊。”

“我们没打好，这个责任，我来承担。”

“现在别说这个啦。你们没打好，我也无光。其实，你们的战士打得还是很勇敢的，我是知道的。”

“谢谢团长。”

“嗨，你们这次呀……我不想多说……军区已经决定成立前线指挥部，统一指挥，我这个团长也都得靠后站咧。从黄港前线调一个团来，正往东走；从北海调一个团来，正往南走。我们团，全部出动，压到龙头的正面。你们出来以后，也往李家泊一带靠拢。”

“是！”

“你们撤得不要太快，注意掩护群众。告诉你哦，也不能太慢，别叫敌人围在里面。革命都已经胜利了，别再叫敌人抓去当俘虏，那这辈子就完啰。”

“团长，你这个指示很要紧。我一定注意。”

令营长放下电话，经乡长也在旁边。

经乡长说：“县里也来了指示，要我们组织群众撤退。”

“刚来的电话？”

“是哎，我刚又把情况汇报了下。”

“那赶紧安排吧！重点对象，村干部，烈军属，一定要安排先走。要保护好，落到敌人手里可不得了。”

“是的。好在以前经历过，我们平常都有这样的安排。”

令营长心里原本还有点想法，这经乡长办事不上紧，这么大的事，动作有点慢。嘴上对他不好说，心里可有点急。刚才，团长批评他们打得有点被动，其实是跟乡里没有早作决定有关系。现在，听经乡长这么一说，既然他们都有准备，那也不再多说什么了。

“那我们就各自分头行动吧！”

“镇里各村，刚才已经通知下去了。”

“好，那我先走了。”令营长风也似的出去了。

有人急促地跑进来，说：“乡长，你快出去看看，大程不让人家走，街上都乱了套了。”

经乡长一脑门子的火，“这个大程，也不在岗位上，情况又不知道，弄了盘什么景。”两步就跨了出去。

果然，街上有一大群人围着大程。大程还在挥舞手臂很认真地说着：“乡亲们哪，我们不要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我们要敢于同国民党反动派做面对面的坚决斗争！最后一粒米也要送军粮，最后一个人也要上战场！”

经乡长一脚就插进了人群，大声说：“大程，你说啥呢？县里已经来了通知，叫大家往后撤。”

“啊？”大程一听转得很快，一下就换了口气：“乡亲们哪，我们要响应县委的号召，到北山去，保存革命实力啊。”革命队伍里真有不少这样的人，翻过来复过去都是他有理，脸皮厚嘴巴硬，而且还不吃亏。

现在最忙碌的，要数惠民寺里的救护站了。男民兵和妇女们都忙着扎担架、抬伤员，搀扶着、挪动着、轻声地叮咛着。不但是东北村，其他三个村的好多人，顾不上自己家里，也都主动地过来帮忙。亏得重伤员已经提前转移了，现在的人手，还能忙得过来。

转移的队伍向庙后的坡下走去，把枪声抛到了后面。

街上，撤离的场面有如刚才赵村的一幕。只是人更多了，街巷里更挤了，枪声更近了，人们的心情更急迫了。

老王头，更成了大忙人，放下自己的家，一户一户地去看组里的其他人家，收拾好了没有，走了没有。

伤残军人靳喜悦那儿，村里安排民兵扶他走了。

唐玉珍，刚才路上碰见她，也已经往外走了。

虽然想得这么周全，也还有不顺心的事。这不，在祖责成家，老王头还是碰了钉子。

“我就不怕，我就是不怕！国民党那个龟孙子，哪个怕他？哪个怕，哪个走。我不走！”没等老王头说完，祖大伯就先嚷起来了。

“这不是怕不怕的事，我们出去住两天，就好比出去住两天亲戚。”老王头苦心相劝着。

“我不走。就是你，从上午起就吵吵着，国民党要来，要来，结果真的把狼引来了，舒服了。”这话好像是说国民党是老王头引来的。

老王头无语，只好告辞退出，找村长汇报去了。

走过自己家门，往里看了一眼，只见丁妹一个人在那捆包袱。可老伴这时在哪，不知道，就知道开始是跟着赵攻去给解放军烙饼，也该回来啦。儿子在哪，也不知道，说是跟着民兵上南坎了。这会儿上哪了，更不知道了，好在是跟解放军在一起，不会有什么事。

老头一跺脚，没进门，还是去找村长了。

等找到于村长，村长说，对老祖头这种人啊，你把话讲到了，就行了。老王头这才回到了家里。

“爹，你怎么才回来呀？把我急死了。你们怎么一个也不在家呀？”平常没有言语的丁妹，难得说了这么一长串的话，也难怪她在这种时候怎么能不着急呢。

“哎，哎。村里事多。”老王头嘴里敷衍着，心里想，是不应该就这么把她一个人撂在家里。

“你妈和你哥，都没回来过？”

“都没回来过。”

“唉。”老王头除了一声叹息，也别无它法：“咱们先走吧，不管他们啦。”

“我们用小车推吧？”丁妹问。

“好的。”

丁妹推出小车，很利索地把几个包袱绑上了车。

老王头都没问，包袱里带了些什么，“我来推，你在前面拉绳吧。”

丁妹说：“还是我来推吧。”说完，就过来把车盘套在了自己的肩上。

老王头也无意和儿媳妇争，拿起车头的绳子，俩人把车拉出了门。

出镇的路上，老王头还特地拐了个弯，走到迟得法家的门口，喊了声：“老迟！走了没有？”

过了一会，里面才有声音出来：“还没呐，快了，快了。你先走吧。”

人和人不一样，九个人会有十个想法。在这大家都认为是大难当头的时候，也有人会觉得跟自己没多大关系。迟得法，就是这样的人。他觉得，他是中农，既没分过地主的地、也没拿过地主的東西；另一头，共产党也没给过他什么好处。这国共两党的斗争，虽然在他家院墙外演绎了十几年，可对他家里面，好像没造成什么影响。

老王头也知道迟得法心里的想法，所以也没多说，就像村长对他说的，对这种人，话讲到就行了。

他喊了声：“丁妹，走。”他们俩这才推着他们全家的家当，匆匆地往外走了。

他们不知道，这一走，得多少时日才能再回来；不知道，回来时又会是什么样。

8.2等待亲人

赵玫到海角给解放军送干粮，差点儿跟潘连长一起牺牲了，后来又搀扶着一个受伤的战士去到惠民寺。等回到村里，听说看这情况要往后撤了，心里很难受，难道真的要这么走了。想到她刚才看到的激烈残酷的战斗场面，想到伤痕累累、却还在英勇奋战的战士们，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街上，满是往后撤的人们，她却还在迎着面挤过去。

到了场院，已经空了，没有人了，只有另一袋玉米面，孤零零地放在一边。

“这袋面，难道还留给敌人？”赵玫扛起面袋就往库房走。

“赵玫，你还往哪儿去？”路上有人问。

“把这袋面送到库房去。”

“早就没人了吧？”

“我去看看。”

到了库房，果然，悄无声息。门上挂了大锁，从窗口往里一看，已经没什么东西了，地下一片杂乱，显然也已经转移了。

赵玫想，这怎么办，总不能丢给敌人吧，还是先拿回家藏起来再说。她又扛起面袋往家走。

路上又有人问，“赵玫，你怎么还往里走，不往外走？”

“这袋面，我得先藏起来。”

到了家里，炕上的宝宝还在甜美地睡着，一点也不知道他的爸爸、妈妈正面临着天塌似的灾难。赵玫一步跨到炕前，轻轻地抱起宝宝，放在怀里，眼睛仔细地看着孩子，一眨也不眨，眼神里露出了幸福和甜蜜。她的脸颊轻轻地靠上了孩子的脸颊，来回轻轻地抚摸着。孩子醒了，睁开了圆圆的乌黑透彻的大眼，看着妈妈，张开了小嘴，吐着奶香，说着咿呀的声音，赵玫的心都醉了。这是上天、这是命运之神赐给她的最美好的礼物，这对于她来说，那就是整个世界。

赵玫一下又想起了董平章，急忙抱着孩子四下看了下，又上堂屋，掀开灶上的锅盖，里面少了两个糠菜饼。赵玫知道董平章回来过，只拿了两个饼子又上山了，心里一阵疼爱、一阵焦急。“平章啊，都什么时候啦，还忙着上山干活啊，还不回来啊？会不会碰到国民党啊？少点水、少点肥，也不在这几天啊。”

急得赵玫抱着宝宝在街门口，东张西望，掂着脚、用手遮着眉目、四处张望着，见到往外后撤的人就问，你们还见到过董平章吗。

谁也没见到过。

小林姑娘，跟着她爹过来了。见到赵玫抱着孩子还在门口，非常惊奇，“赵姐，还没走啊？”

“哎，平章一早就出西门上山干活，到现在还没回来，叫人急死了。”

“赵姐啊，别等了，西门外已经有敌人了。说不定，董哥已经进不了西门，直接往北走了。你还是抱着孩子，跟我们一起走吧。”

“不，平章一定会回来的，这我知道。他知道，他的老婆、孩子还在家里，一定会回来的。你们先走吧，我会赶上来的。你们走吧。”赵玫一脸焦急，却执意不走。

“啊呀，都什么时候啦，你先走了，就算董哥回来没见到你们，他也会赶上来的。”

“不，不能呀。他见不到我们，会急成什么样呀？”看得出来，赵玫的着急，更是在替她的丈夫着急。

“我还是在这儿等他，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赵玫下定了最后的决心，“林妹，你们先走吧，谢谢你了。”

小林只好依依不舍地向她告别，往前走了。

赵玫这一等，却等来了一个天大的意外。再见到丈夫时，董平章竟然穿上了国民党的军装。

8.3 虐杀地富

秦德才负责看管和押送地主富农，这也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

地主富农和他们的家属，在当地解放后，特别是在土改中，被当成特定设置的斗争靶子，遭到了严重打击，满心的对立和仇恨，那是勿用置疑的。一旦有机会，激烈的反抗和残忍的报复，也是可想而知的。这可能是预想中的某种斗争需要吧。对地富的残酷打击、肆意摧残，能激起一些积极分子打了鸡血似的亢奋。而地富的反抗报复，又能成为阶级斗争教育、尤其是仇恨教育的新材料。但对这些可能的反抗，对于基层政权，又是不能不防的。因此，在斗争形势出现恶化的时候，解放区政府都会对他们采取极其严厉的管制措施。

这次，龙头镇有可能被国民党占领，必须要被转移的，除了村干部、烈军属，那当然就是地主富农了。

秦德才，还是那副打扮，黄军装，红袖章，长枪大刀背后挎，领着另一个小青年储小二，在最后面的那个小场院。叫他看管地主富农，那是他最愿意干的活。在他看来，那些地主富农，就像是踩在他脚下早晚要死的耗子，反正是要死的货，再怎么折腾也不为过。他对这些人，或者说根本不是人，施行着他看见过的、和自己想出来的种种酷刑。在这些对别人惨无人道的折磨中，在人性的泯灭中，他却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另一类的惬意和满足。

地主富农们，还都跪在那儿呢。至于有没有吃过饭、喝过水或者别的什么生理需要，谁也没有想到过。

秦德才领了任务，拿了一长卷粗绳，回到场院，看了看在他看来是耗子的这几个人，嘿嘿地笑了起来。

“枪也响了，炮也响了，你们就有好时气了吗？嘿嘿——嘿嘿，老子来领你们上路啦。”

“你们能见到国民党吗，国民党能见到你们吗？嘿嘿，那你们就走着瞧吧。现在，送你们上路。”说完，把那捆粗绳，往地下啪地一扔。

“耗子”们，暂且也按秦德才的想法说吧，都惊恐了，以为就要当场勒死他们了。尽管遭受过不知多少磨难，真的要死到临头，“耗子”们也眼色惊慌，妇女紧抱着孩子，一家人紧靠在一起，有的还呜呜地哭了。

“哈哈，哈哈，”秦德才无限快意地笑了，“原来你们这些狗东西也怕死啊。”

“还没送你们上西天呢，就这样啦，哈哈。今天送你们上老北山，叫你们和国民党两头见不着。”

“把他们捆成一串！”秦德才对储小二说，“把手绑在后面。”

储小二便开始一个一个的绑。

秦德才看了，并不满意，“你看我的，要使劲，要结实。要不，半路散了，不就叫他们跑了。”

他一把抓过老李头，就像从笼子里抓出一只要宰的鸡，使劲把胳膊往后一扭。老李头疼得“哇哇”直叫。

“看把你贵贱的！”秦德才一膝盖就顶在老李头的腰上。老头一下就没声音了，不知是接受了教训，还是顶得上不来气。秦德才很麻利地就把老头的双手紧紧地反绑住了。

“看见啦，就这样绑。”秦德才很得意地对储小二说。

他们俩把地主富农绑成一串，便大声吆喝起来：“走，快走！”

他们选择了从西门往外的路，因为人们大都走的是北门或者是东门，路上人很挤，不便于这么一长串人走，当然也不便于他俩随意打骂、颐指气使。

在这一长串人最前面的，是一个年青妇人，拖着一个约模三岁的小男孩。妇人虽然年轻，那低垂的脑袋，脏乱的头发，无神的脸庞，却是十分的憔悴疲惫，加上破烂的衣衫，无异于四、五十岁了。眼皮耷拉着，眼睛里黯然无光，没有任何生命的色彩，两手也耷拉着，只有两腿，随着边上尖亢逼人的吆喝，才机械地挪动着。

她的家，她的男人，要说起来，一时半会儿真说不完。她家男人就是辛家的三少爷幸福旺，因为家里地不多，三兄弟分家后只有几亩地，自己就出去找个事做，把那几亩地交给了长兄一起打理。长兄忙不过来，请了个长工，这一下，土改时就划了个地主。幸福旺念了点书也不多，干粗活力气又不够。正好警察局要有跑腿的，就上那里面混了个差事，学了几下拳脚，成了个半文不武、非官也非兵的人。

国民党的警察局，在共产党看来那是个罪恶滔天的地方。但你还别说，他们还真做了件侠义肝胆的大事。1938年11月，日军进攻海源北面的威海，甲午战争的最后一战也是在那儿，此事震动了整个齐鲁大地。当地政府紧急呼吁各县军警前去增援。海源县警察局保安大队的大队长姜仞九振臂高呼：“弟兄们，报国的时候到了！”便组织起海源县军警前敌指挥部，领着弟兄们开赴威海前线，在向阳山与日军激战数日。战斗打得非常激烈也很成功，总共毙伤日军达200余人，阻止了日军在这个方向的进攻，成了山东战场在台儿庄战役之前的一个大胜仗，而总指挥姜仞九当场阵亡。当他们回海源县城时（也就是龙头镇），受到了各界民众英雄般的热烈欢迎。辛富旺满心激动，就此改名为辛凯旋。

之后，县保安大队改名为特务大队。辛凯旋也就成了特务大队的一员。这还了得么？在这一边看来，国民党特务那个个是罪大恶极。解放后，有一个算一个，按政策都定为历史反革命。只要沾了边，那就是几辈子也还不清的孽债，人人得而诛之。可这海源县的特务大队还真是抗日的好汉。1940年2月10日，日军刚占据当时是海源县城的龙头镇，12日特务队就潜入城里，焚毁敌人汽车一辆。8月，特务队长刘超俊再次率队潜入城里烧毁日军宪兵队驻地。为这事，辛凯旋他家里还荣耀了一阵子。

这之后，辛家三少爷有如那时的时局动荡，人生也几经变迁。退出县城后，先上了黄港北郊的劳山，参加了那里的抗日游击队。后来又去了驻在莱阳万底的赵保元的暂编第12师，1945年2月日本鬼子还没投降，该师就作为“顽固派”被八路军消灭。打散之后，他又去了阙汉骞的整编第54师。54师的战史就复

杂了，1947年他们去过海源，1949年他们是唯一一支以完整编制撤往台湾的国军队伍。这些事，他家里都不太清楚，反正是上了国民党的部队，还当了个军官，至于当的是什么，究竟多大的官，村里也都不清楚。抗战胜利后，随54师回来过，家里高兴得不得了。听说是个师部的军需官，家里的人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官、或者该折合成多大的官。那时叫他多住几天吧。他说，国家刚安定，还有多少事啊。没住多少时候就走了，可是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到如今，已经有两、三年没消息了，连孩子出生都没回来。不知是死，是活，是逃走了，还是被解放军抓了。

她的公婆，共产党来之前，因为儿子打鬼子的事，在乡里神气过一阵。到了土改，划成份，既是地主，又有个蒋匪军的军官，还是什么警察局、特务队的，那还了得。本来就罪加一等，可他爹还嘴硬，说儿子参加国民党是去抗日的，是个英雄，还开了全县大会欢迎呢，村里都知道，竟然跟土改工作队吵了起来。那时这一边根本不承认国民党还有抗日的事（上面这些事，直到现在也没有公开讲过，如果不是专门翻阅档案去查也都是不知道的。姜仞九也是到了1984年才批了个烈士，反倒是那些胡诌八扯、被别人笑话的抗日雷剧还在铺天盖地的上演）。这个老家伙居然还态度恶劣，立马打翻在地、捆绑起来，划了个恶霸地主，被公审处决。在望海山下的大河边，辛家五、六口人，被绑成一串，插上刀子，推到河里了。倒是那长工有良心，说三媳妇人还不错，没有亏待过他，留下她母子俩吧。秦德才杀人没杀够，嚷嚷着全都灭了算了。还是于村长发话，村里地主都杀没了，以后民主村斗地主，还斗谁呀。这才留下了她们母子两条命。

这小孩，自小就生活在恐惧和饥饿之中，瘦弱而又木讷，连个名也不许有，大家都叫他“狗崽”，规定他家里也只能叫他“狗狗”。如今，四岁了，还是三岁的模样，也不会说什么话，只是跟在她妈边上，嘴里哼叽着饿。他妈想弯腰抱起他来，可是弯下腰，伸手拽了他的衣角，就是没力气抱他起来。

秦德才拿了根路边捡的木棍，过来就朝狗狗打来。

那妇人用自己的身体挡着，拖着狗狗往前走，嘴里无力地说着，“孩子，快走。”

出了西门，往北，开始上了山路。枪声更清晰了。山下的农田里，不时还能落下一些偏离的炮弹，爆炸的响声和烟雾告诉人们，国民党是不远了。

秦德才，这时更着急、也更暴躁了，不停地吼着，不停地挥动着木棍朝着“耗子”们劈头盖脸地打着。

储小二说：“咱不怕，有这些家伙在手上，正好成了我们的挡箭牌。国民党来了，把他们扒了衣服挡在最前面。看国民党还敢打咱俩？有这么干的哎。”

秦德才说：“呸！那咱也跑不了啦。”

已经走上后垭通往望海山的山梁了，两边是往下的挺长的山坡。

路更难走了，枪声更近了，秦德才也更失控了。

他开始用脚踢了，用手推搡了。

忽然，他在推搡最后一个李芹时，一下子，感觉又不一样了。

虽然，也是浑身脏兮兮、破烂不堪，头发遮盖着脸庞，甚至散发着女人不该有的酸臭味。但秦德才的手上还是觉出了异样的使他兴奋的感觉。

“哎，奇怪？”他重重地从背后使劲推了李芹一把。李芹向前踉跄了一下，回头愤恨地瞪了他一眼。

“嚯，小娘子还敢不服，要的就是你不服。”一把揪起了她的头发。秦德才看见了李芹脸上虽然层层灰垢却仍然掩盖不了的白皙的底色，这又催起了他从胆边生起的性子，想着怎么姜雪花脸上没有这种白颜色呢。

秦德才又推了李芹一把。这次，可不是一般的推了，而是把手伸进了她的衣衫，从后向前，又在胸前捏了一把。

还没等秦德才嘻嘻地笑出来，李芹反射似的跳了起来，大叫：“流氓！”

秦德才也瞪起眼：“他妈的，你敢骂我！我这是抬举你，你还敢啰嗦。我叫你躺下，你就得乖乖地躺下。”抓住李芹的头发就要往地下摁。秦德才到这个时候还有这心思，要在众地主面前公开收拾李芹。

老李头这时急得转过身来跳起了脚，直嚷：“你不是个人啊，你是个畜生啊！”

山下的枪声更近了。远处似乎已能看到国民党兵行进的影子了。

秦德才勃然大怒，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瞪起了血红的大眼，“看你们还敢反了！老子现在就叫你们上西天。”拔出背后的大刀，朝着老李头的脖子就砍去。或许是秦德才用力过猛，只见鲜血喷溅，老李头都没来得及吭一声，就歪倒下去，只剩了半个脖子连在上面。拴在后面的老李婆，被喷了一身血，立时就晕倒下去。其余人等，都跳起来惊叫着。

秦德才抡起大刀，一不做二不休，不管三七二十一，照着所有人的脑袋和脖子，疯狂砍去，还叫：“小二！快捅呀，国民党快上来啦！照着胸脯快捅！”

储小二也拿着手里的长矛，照着那些叫着、跳着、已经是浑身鲜血的人们，一枪一枪地捅去。

最前面的那个妇人，在最后的紧急关头，拼尽了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大叫一声：“找你爹去吧！”把自己的孩子推下了西面的山坡。

秦德才赶来，挥起一刀，砍向了妇人的腹部，五脏六腑立马流了出来。

倒毙在地上的妇人，还没闭上眼，朝天紧握的双拳和微微张着的嘴角，还在颤抖着。

被推出去的狗狗，滚到了半山坡，倒在一块石头旁，没了声息。

他母亲的这一推，却成就了狗狗的另一条奇迹般的生活道路。

秦德才还想追下去砍上几刀。

“叭叭”的枪声，在头顶响起。山下的几个国民党兵，显然已经发现了山上的哭喊，又不知是什么具体情况，开了两枪，准备往这儿过来。

储小二赶忙说：“不好了，国民党要上来了！那狗崽说不定已经摔死了，管他呢。快跑吧！”说着，径自就往东北方的另一面山坡跑下去了。

秦德才看了地下一片血泊中的一堆死尸，都已经没有了动静，还是不甘心，又挥动大刀，往死人堆上连连砍了几刀，这才有所解气，慌忙朝储小二跑的方向追去。

国民党呼营长手下的先头部队，一个班，已经进到了望海山下，听到半山坡上的哭喊，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放了两枪之后，便排成散兵状，上山搜索。

上了一半，走在前面的那个班长姓孔，突然叫道：“这儿有个娃哎。”

顺便说一下，这个孔班长，河南豫西山区的人，中等个，一般长相，只是年纪不大，额头上的抬头纹却很多。家里原本是小户人家，好不容易让他念到了小学毕业。抗战胜利了，可心中的激情还没完。头脑一热，参加了刚来收复沦陷区的国军。没料想却上了内战的战场，越打越远，越打越窝囊。就像跌进了泥坑，越陷越深，爬也爬不出来了。家里早就没了音信，自己也就是过一天算一天，也想不出来明天将会是怎样，成了一个还不算油的兵油子。

几个兵围过来，拖起了身上沾着斑斑血迹的狗狗，“死了没有啊？”

狗狗没大碍，睁开了眼，看见一圈从未见过的拿枪的人，吓得大叫起来，“喔，哦哦。”

“这是个什么人？怎么连小孩身上也是血？”兵们说着。

“哟，还是个小地主哎。”孔班长从缝在小孩衣服的布条上，看见了地主两字，接下去的名字，却被血迹染得看不清了。

“再上去看看吧。”

这些兵往上走到山梁一看，把他们这些打过仗、看惯了死人的人也惊呆了。

一堆老的少的、破衣烂衫、肢体残缺、鲜血流淌、皮肉外翻的被绳拴成一串的尸体，散发着浓烈的腥味，着实叫他们倒吸了一口凉气、不由得后退了几步。

这个国民党姓孔的班长明白了几分，朝着前面逃跑的响声，“哒哒哒”打了一梭子弹。但秦德才已经翻过了又一个小山梁，没影了。

“到底死了几个啊？”孔班长踩着浸透了血液的杂草，拿着枪，拨动着。

“还管这些啊？”有的兵不耐烦了。

孔班长直起了腰，刚想要拔起腿往前走，就在这时，他“噢！”的一声，把大家愣住了。

“还有呢，还有一个在动呢。”他叫着。

他们从死人堆的最下面，翻出了一个浑身血污、看不出是死活、却还在微微颤抖的人。那就是李芹。她是被拴在这一串的最后一个，所以被压在了最下面。

她的右腿被砍了很深的两刀，血还在流着，人还昏迷着。

“这该怎么办？”这些兵也不知怎么处理。

“啥咋办？先包上吧。”孔班长拿出救护袋，用纱布和消炎药，把李芹的腿包扎上。

“嗨，打仗还能遇上这些事。班副，你领着他们往前搜索。俺在这儿等后面的人，看有啥法。把那个小孩，也喊上来吧。嗨，都是可怜人。”孔班长倒也省了自己的事，在树底下坐下了。

第九章 转移大河北

1949年1月9日

9.1 纪排长殿后

海角。

纪排长领着战士们还坚守在礁石群。正面的压力不是很大，很可能是国民党军转移了主攻方向。听着西面、甚至西北面都有了枪声，觉得情况不大妙，可又没法分身出去探听。

这时，连里的文书气喘嘘嘘地跑来，“纪排长，有新情况。”传达了营里下达的向后撤的指示：撤出海角，也撤出龙头镇。

纪排长想到了会有这一步，只是觉得这个命令，应该早做出、早安排。撤出海角，没有难处。但等到撤至南门一线，海角两侧、东滩、西滩几个方面的敌人就都会行进到这儿，聚拢在一起，那时的压力会很大，尤其是还不知道群众已经撤退了多少。

纪排长跟身边的大郑几个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快速后撤，到前港停顿一下，看看情况再说。

“不要以为冲锋难，往后撤就容易。”纪排长在跟大家说，“其实，后撤更难，危险性更大。搞不好，就会被敌人咬住屁股，甩也甩不掉，自己的队伍也乱了，那会很被动。”

看着前方海面，有几个国民党的船就要靠岸，纪排长说：“先不忙，等这两个小船上岸。等他们上岸后，我们一阵手榴弹扔过去，把他们打个七荤八素，我们再赶紧走。不然，他们会一直紧跟在我们的后面，很讨厌。”

大郑他们几个，一致说好。

可小钱却听到了几块岩石之外的一个呻吟声。就是那个苦苦哀求着的不知其姓名的国民党伤兵，小钱还一直放在心上。

小钱对排长说：“那儿还有个国民党伤兵呢，怎么办？”

“杀了算了，省得国民党上来，把他救回去。”大郑说。

“可他自己恨死国民党了，说他是被抓来的，是国民党害苦了他。我们再去杀他，有点……”小钱说。

“你再去问问他，如果他真的想跟我们走，那我们尽量想办法带他一起走。不要把一个穷人的孩子再扔给国民党。”纪排长说。

“那他是个敌人哎。”大郑说。

“敌人也是人，更何况他已经放下了武器。我们要同样给以人道主义待遇，这也是对敌人内心的瓦解。如果他有思想觉悟的话，还可以跟我们一起战斗，去打国民党。”纪排长说。

“好，我去看看。”小钱说。

小钱跨过几块岩石，来到那个伤兵面前。

那伤兵还在低声地哭泣着，看到小钱又过来了，惊喜不已。

“大哥，大哥，你过来啦。”

“叫什么大哥呀。”小钱显然要比那伤兵小，听得有点不好意思，“我们要撤了，国民党要上岸了。你怎么办？留在这儿，等国民党救你，还是跟我们一起走，随你便。你要是留在这儿，我们还省点事。”

“大哥，大哥，”伤兵还是“大哥大哥”叫个不停，“我一定要跟你们走，就是死在半路，也愿意跟你们一起走。我死也不做国民党的鬼！”

“你能走么？”

“能，能，我就是爬，也要爬出去。”

“我来扶你，试试看。”小钱过去，把伤兵的手搭在自己肩上。

那伤兵咬着牙，把身子撑了起来，说：“行！谢谢你啊，谢谢你啊！你是我的再生菩萨。”

他俩爬过一块岩石，小钱又在地上捡了支破了的长枪，给那伤兵拿在手上当拐棍用，这下又省劲了些。

纪排长也过来看了下，说：“小钱，你可真是个好人啊。”

“是啊，是啊，”那伤兵忙说：“只有你们解放军，才有这样的好人啊。等我伤好了，一定会参加解放军，去打国民党。”

“欢迎，欢迎。你叫什么名字啊？”排长问。

“我叫包金贵，安徽人。家里本来就我和老父亲两个过日子。国民党来抓壮丁，我没跑掉，被抓住了。他们要拖我走，我爹去拦，当场就被他们打死了。我现在就这样死去，不甘心呀！这千刀万剐的国民党，我恨死啦！我还要去杀国民党呀！”包金贵说着，涕泪俱下，毫不掩饰自己的真情实感。

纪排长也没想到抓到了这样的一个俘虏，感慨了一声，便说，“你们先走吧。等到了南门外营房，小钱，你帮他脱了这身国民党服，找件旧军装换上。”

他们俩，搀扶着，先走了。

国民党军的小船，渐渐地靠了岸，士兵们缩头缩脑地四处张望着，小心翼翼地迈脚。正在纳闷怎么没有动静的时候，一阵手榴弹飞将过来，一阵爆炸声响起，随之，便是一阵鬼哭狼嚎，把上岸的国民党兵炸翻了一片。动作快的，赶紧趴在地上，还有敢抬起头看看究竟的，迎来的，又是一阵枪声。

纪排长他们，此时便抽身走了。

9.2杀出重围

在龙头镇西南方的南港，已处于两面受敌的半包围之中。南面，海角的国民党军334团已经上岸；西面，青年军更是挺进到了望海山的脚下。据守在南港的三连，已经是在敌军的后面了，情况比较危急。他们在西滩前沿的两个班，已经被打散，无法收拢。亏得334团和青年军之间互不通气，不然就很可能被两面夹击、包在里面。

在南港坡顶上的三连普指导员，接到了撤离的命令，望了望山脚下的战友们，在考虑怎么往后撤。他们三连从新河镇驻地过来了两个排，一个排由叶连长带着在山下，两个班在更远的西滩一线的沟壑里，伤亡情况还不清楚，现在还在港顶上的，只有二十余人。最安全的办法是，往东北方向撤，与营部和一连靠拢，一起往外走。但那样的话，山下的战友们怎么办，他们不但得不到消息，而且很快会完全陷于狼群之中。

普指导员考虑过后，很快把周围战士召集过来，说：“上级已经命令我们后撤。我想了下，如果我们往东北方撤，向营部靠拢，我们几乎可以没有伤亡。可是，我们的战友们还在山下，我们不能扔下他们不管。我们只有往前冲，朝着敌人往前冲，硬是要杀开一条血路。这样做，就全连总体来说，伤亡会少一些。但那样，我们这批人会有相当大的伤亡，我们要作好牺牲的准备。同志们！有这样的决心吗？”

“有！”战士们齐声说着，每个人的脸上都非常的坚定。

“这样，行动开始后，我们先悄悄地蹲着下去，减少敌人的注意。等到和连长他们汇合以后，再向前猛冲，杀掉所有挡在面前的敌人。要有准备，要猛跑五六里路以上，过了大河口，才能进入安全的地方。”

“特别是，我要向大家说明一点，如果有谁负了伤，队伍可能顾不上你，你要坚持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不要当俘虏。牺牲自己，为连队作掩护。我们就是一支敢死队！”指导员非常严肃地说着。

“是！”战士们无比坚定，更是种神圣和心灵的升华。

民主村的几个民兵，也在南港上。普指导员把他们喊过来，说：“你们赶快先走，往东北方向走。必要时，可以扔掉武器。万一遇到敌人，不要慌，坚持说自己是老百姓，不要让他们认为你们是有武装的参战人员。你们快走，你们走了以后，我们才会向西冲过去。”

一个军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扔掉武器，除非有长官的许可。三连指导员能对他们几个民兵讲这个话，那也是对他们极大的宽厚。

那几个民兵的小组长，姓连，叫连四娃。他是个贫农，而且大家也都知道他还是个共产党员，尽管那时都还没有公开身份。可连四娃自己，是个很老实本份的人，没有言语，在村里从不肯出头露面，是那种从不打探别人想法、别人也不知道他内心世界的那种人。因为是贫农，参加过县武工队，可能是在那儿入了党，回村后当了个民兵小组长。或许像这样深沉的人物，在农村很少有，以至于有人认为他负

有上级组织某种什么特别的任务，不过，一直未有证实。但是，在这种关键的紧急时刻，连四娃就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只是说了声：“那，大家走吧。”他自己身体不是很壮实，走路不快，说完这句话，才抬起一只脚。

王立年轻力壮，早就憋不住了，急着想回去看看家里怎么样了，没等连四娃放下那只脚，说了声：“我走啦。”一下就窜出去，往山坡下跑去了。

他是一头往北跑，因为西门外没有枪声，离家又最近。

太阳已经开始西斜。山岗和农田的绿色，显得清晰而又浓重。如果没有枪声，一切都是那样的亲切、平静而又自然。

西门外的大白果树（银杏树），在王立的眼里越来越大了，家越来越近了。他加快了步伐，再有几十步就能进西门了。

谁也想不到，改变命运的一刹那，就在眼前。

“站住！”突然，从白果树的后面，玉米地里，窜出了一个绿军装的国民党兵。因为眼前都是绿颜色，王立居然都没有注意到。这一个疏忽，让王立后悔了一辈子。

“怎么啦？”王立还没想好答话。

面前，玉米地旁又站起了几个端枪的国民党兵。

王立知道跑不掉了，“我去自家地里薅草的。”

“怎么连个锄头也没带？”那个兵还挺认真。

“天旱，草长得不多，用手拔就行了。”王立还能应付上。

“前面在打仗，你也别走了，就在这儿待着吧。顺便还能帮我们干点活。”

“不行啊，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等着我呢。”

“别啰嗦了。这年头，谁还顾得上老婆孩子。能留下你的命，就算不错了。”

“戴上这个布条，我们的人就不会找你麻烦了。”一个兵在他臂上系了个蓝布条。

王立，就这样被国民党扣下了。

后来知道，他们南塘的几个民兵，也就是跑得最快的王立和跑在最后面的连四娃给国民党扣住了。

他们几个民兵中有个叫平金刚的，走的线路跟他们不一样，看着走前面也不行，走后面也不行，干脆趴在玉米地里，一直等到了天黑。

在黑夜中，他偷偷地摸到城墙边，看并没有国民党兵的放哨和巡逻，便悄悄地从城墙上翻了进去。因为他知道，城墙已经年久失修，哪儿有坑凹，哪儿有裂缝，哪儿能踩上脚，对他来说，是了如指掌。

街巷里一片漆黑，只有三两个国民党兵在远处游动。他不费劲地就躲过去了。

他又了无声息地回了家，看见家里空无一人，知道他们都已经出去了，也就放心了。

于是，脸上用锅灰抹黑，换上最破烂的衣服，想再次翻出去，找到家里人。但巷子里响起了国民党兵的脚步声，就不敢冒然行事，趴在门后，这一天实在太累太紧张，竟然一趴就睡着了，就这样窝在了镇里。

普指导员在等连四娃他们走了以后，又过了一会儿，估计他们已经下坡走远了，便对战士们说：“从参军以来，最艰难、最能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我们要从敌人的军中杀出去，但我们也不是蛮干。敌人分得比较散，也想不到我们会杀个回马枪。我们要有必死的决心，就一定能带着山下的战友们一起冲出去。”

“准备好了没有？”普指导又看着大家十分郑重地问了一句。

“准备好了！”大家齐声答道。

“下蹲，快速滑下。最关键，是一个快字。”

二十多人，抱好枪，蹲下，从山坡上快速蹲步滑下。到山下后，迅速向叶连长他们跑去。

叶连长看见了，赶紧迎上，问怎么了。

普指导员简短地把情况一讲。

叶连长说：“是哎，我也觉得不能一直这样下去。你的决策很对头。现在我们的对面，有十几个敌人。我们用一阵手榴弹把他们压住，而后从沙滩后的那条沟壑里冲过去，把那儿的几个战士也带出来。”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普指导说。

“同志们！上刺刀！先扔手榴弹，而后跟我冲！”叶连长已经到了队伍的最前列。

一阵手榴弹的猛炸。

面前的这些国民党兵，只是奉命看住共军，并不是拼命要打。这一阵突如其来的手榴弹，把他们打得抱头鼠窜。

三连的战士们，端着在夕阳下闪着寒光的刺刀，瞪着血红的眼睛，张着大嘴，高喊着震天的杀声。国民党青年军的学生兵们，哪见过这等阵势。快的拔腿而跑，慢的便死在刀尖之下。稍远处的一些国民党兵，听见这一片杀声，吓得四下逃跑，惟恐避之不及，哪还敢作抵抗。

三连的战士们，终于在国民党军松散的阵势中杀出了一条血路。

“济成”号上的章团长，也在望远镜里看出了一些情况。他吃了一惊，难道共军要把呼营长的先头部队从后面包围起来。他还真没想到有这一招，不禁一身冷汗。距离太近，双方混杂，炮火支援也不行了。

下命令在前面堵截也来不及了，命令的传递速度还没有共军的两条腿快。只有听天由命，看一线指挥官的现场发挥了。

三连的战士们像一阵旋风似地冲进了沙滩后的那条沟壑。

国民党兵这才开始回过神来，在军官的驱赶下，从后面尾追三连。

三连的战士们还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对方正在从三面围上来，嚎叫着，美式冲锋枪的子弹叭叭地响成一片，越来越密集了。

三连的战士们一口气也不喘地奔跑着，眼看要和敌人拉开距离。就在这时，走在最后面的战士印冠亚，突然啊的一声，倒下了。

“小印，小印！怎么啦？”普指导员回过头，伸手要扶起小印。

小印推开指导员，说：“指导员，我走不了啦，我的胸部中弹了。你们快走，我在后面掩护。”

普指导说：“不，我背你走。”

小印很虚弱、也很坚定地说：“敌人快要围上来了，同志们还都在危险当中。用我一个人，换取全连战友们的生命，值得。我愿意。”

普指导说：“我们全连是一个整体，一个也不能落下。”

枪声更近也更急了。

小印也急了，喘着大气：“指导员，我留下掩护你们，就死我一个。你也留下，就要死两个，不值得。”

普指导无语，不舍地看着他。

小印更急了，连喘了两口气：“指导员，你难道要我在你面前自杀吗？”

普指导只能连说：“好，好！我走。”

小印朝前打了一枪，抑制下追兵的脚步，而后又对指导员说，“我是桓台城北印家庄人。等革命胜利了，有机会请告诉我的爹妈，革命的红旗上有我的鲜血，看见了红旗，就是看见了我。”

普指导员说：“等胜利了，我一定会去看望你的父母。你的父母，就是我们的父母。”

听了指导员的话，小印因失血而苍白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很快又坚定地使着劲对指导员说：“走啊，快走啊！革命需要你走啊！”

说完，转过身去，不再理会指导员，照着国民党兵的方向就啪啪地射击，对方的脚步停顿了。而小印身下的泥土和后背的军装上却渗着越来越多的血渍。

普指导员眼含热泪，追赶部队去了。

三连的后面又响起了剧烈的枪声，可是枪声没能赶上三连的脚步。

三连已经到了大河口长满芦苇的泥沼地。他们乒乒乓乓地快步跳入河水，在泥沼里涉行，迅速隐没在芦苇丛中。正是印冠亚的拼死掩护为他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随后赶来的国民党兵面对大水淹没的这数百亩茂密的芦苇丛，虽然这是围歼对方的机会，但也不敢贸然进。他们停下脚步，只是胡乱地往里射击。

子弹像蝗虫似地飞进芦苇丛，噼噼啪啪，被打断的枝叶四处飞起。三连的战士们躲藏在芦苇丛中的泥滩里，任河水没过小腿、滚滚流淌。

有战士受伤倒下，一个，二个，三个，那也毫无办法，任鲜血和着河水汨汨而去。有的已经不由自主地飘浮在水上，卡在芦苇间，随着河水上下起伏。

普指导员轻轻地向四周说着：“躺下，躺下，尽量躺下。”他知道国民党兵不敢进来。

士兵们躺进河水，尽量只露出脑袋，用手把枪举过头，往芦苇丛的深处爬去。

任子弹在头上飞。只看各人自己的命了。

芦苇丛的外侧就是大河口，正常情况下，是可以涉水过去的。但这时有敌人的射击，显然是不行了，只能无声地潜伏着。真的是本来意义上的潜伏了，潜在水里伏着。

直到枪声停了。

大河口连着大海，一片浩瀚。河水连着海水，呜咽着翻卷而去，无边无涯。三连的战士们撑着枪杆，慢慢地站起，一身泥水，靠着战友的遗体，无言地凝望着眼前一望无际的大海茫茫。

当然，三连这几个战士的伤亡是值得的，至少使青年军的动作有所迟缓。使他们没有去参与对龙头镇的进攻，减轻了一连突围的困难，更使他们没有加快步伐，在拿下望海山之后向北越过大河，扩大控制区。

9.3钱思富走散

纪排长他们已撤到前港。在坡顶上，往南看，黄衣服的334团的士兵们正三五成群地向北走来；往北看，镇上撤离的老乡还在穿出南门往东走，更北面的山岗，不时传来阵阵枪声。

纪排长知道，按国民党兵和老乡各自的速度，恐怕是撤离不完的。他向空中开了两枪，一是要催促老乡加快脚步，赶快走；二是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到自己这儿来。

小钱听到这两声枪响，是在镇东南角外面的小路上。

他到南门外营房时，潘连长还在。潘连长问清了情况，还表扬了小钱，能把敌人的伤兵从火线上扶下来，这种精神很伟大。只有这种具有伟大精神的军队，才是伟大的军队。

看着小钱已经走得很累了，潘连长往屋后一喊：“小杨！”

“噢。”随着一声答应，从房后走出一个穿着旧军装、还没有胸章、帽徽的人，小钱一愣，这不正是上午刚抓来的俘虏吗。

是的，他就是上午刚抓来的俘虏——杨定神。

杨定神被押到连部时，胡指导跟他谈了一个多小时。杨定神说，他很想参加解放军，不过就是想先回家看看。

胡指导心里在想，你这小子在逗我玩，让你走了，还会回来么？嘴上却说：“你的心情，我很能理解。不过，一个革命战士，首先要想到革命的需要。你比如说，上午抓住你的那个战士小钱，还是个孩子呢，就是海源本地人，可参军出来一年多，也没回去过。”

“那好，我就跟你们走，做一名解放军战士！”杨定神高兴地说。

“好，好。那我就叫你小杨啦。哈，哈，我们就是一家人啦。”胡指导也高兴地说。

杨定神就这样参加了解放军。

胡指导又补充了一句：“我先找一件旧军装给你穿上，等我上报团部，批准下来，再给你戴上帽徽胸章。”

“好，好。”杨定神高兴得差点跳起来了。

这时，杨定神很礼貌地向小钱点了点头，接过了国民党伤员包金贵。

那时，胡指导员已经后撤了。潘连长对小钱说：“你去那些房间里看看，还有扔下的旧衣服吗，给那小包换上，要不怎么出去？走在路上，真成了‘敌我不分’了。”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解放军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包金贵看出潘连长是个军官，直朝潘连长磕头感谢。

“解放军不但解放人民群众，也解放像你这样的被国民党反动派裹胁的穷苦人出身的国民党士兵。”潘连长说。

小钱拿了一套破军装过来，对包金贵说：“没有好的了，凑合着穿吧。”

包金贵又是一番千恩万谢，忍着疼痛，换下了国民党军服。

潘连长对小钱说：“你们一起走吧，你也好领个路。”

小杨扶着小包，小钱他们一起上了路。

他们一起往东。

路上还有一些老乡，背着大包小包，从南门出来，往东走。

小杨扶着小包，说：“能行吗？忍着点。咱得赶紧走。咱俩要是再落到国民党手里，还赶不上那些老百姓呢，肯定是说咱们投共，杀无赦。”

小包一听，更害怕，“快走吧，快走吧。可不能再落到国民党手里了，我实在是受够了，还不如去死呢。”

两人加快了脚步。小钱反而是累了一天，觉得疲惫不堪，咬着牙往前走着，渐渐地掉在了后面。

走着，走着，眼看已经走过了龙头镇城墙的东南角。突然，前面响起了枪声。路上的人群一下子乱了，有的往后退，有的沿城墙往北冲。小钱，因为走得比较靠后，前面的人都是往后退，不但挡住了他的路，而且还把他往后挤了。小钱急了，干脆下了路，走进了底下满是草丛的小树林，想尽快穿过去。

等他进了小树林，拨开树枝，往前走了一段，再仔细一看，坏了。树林外的路上，竟然出现了国民党兵。

“怎么办？这怎么办？”小钱还从来没有想过会自己一个人去面对敌人。

小钱赶紧蹲了下来，头上急得都冒出了汗，好在国民党兵还没往这儿看。

小钱跟自己说，要冷静，要冷静啊。他朝四下看了看，南面树林外不远处，有几间牲口棚，先过去看一下。

他悄悄地走了过去。三间牲口棚里昏暗无光，地下一片狼籍，墙角有堆柴草，上面还有几件破衣服。小钱，想了下，便脱下军装，换上破衣服。刚把军装放到地下，屋后响起了讲话声和脚步声，那讲话声一听就知道是国民党兵。小钱连忙把军装和步枪塞进了柴草堆。

小钱抬起身，知道自己已经躲无可躲，便壮着胆子往外跨步。还没走到门口，几个国民党兵端着枪进来了。

“哎哟！我的妈呀，里面还有个人呢！”这个国民党兵大概是眼神不好，差点撞到了脸上，才看出来对面有个人。

“你是干嘛的，躲在这里面？”大概是个班长模样的人在问。

“我是给他们看牲口的。”

“牲口呢？”

“给他们赶走了。”

“那你还在这儿？”

“我想走，可是枪响了，你们来了，走不了了。”

“真他妈的，一个共军也没抓到，真晦气。给我滚！滚！”这个班长正因为抓不到共军、没有赏钱而越说越来气呢。小钱一口本地的海源话，朴实而又带着几分稚气的模样，使这个国民党兵绝没想到，眼前

就站了个共军。

小钱一听，立马就走，往东北方，穿过小树林，穿过土路。路上，还有几个老乡在那儿团团转，不知该往哪儿跑。小钱对老乡喊了声：“往地里跑。”他就下到路北的一片玉米地里。

这时，天已黑下来。大概是牲口棚里的国民党兵发现了小钱扔下的军服和枪支，身后，远远地响起了叫骂声：“抓住他，抓住他！他是个共军！”

啪啪的枪声响起。

小钱在地里猫着腰东奔西跑。突然，前面也出现了敌人的身影，还在吆喝着：“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小钱赶紧在半人高的玉米地里藏了起来，开始了几天几夜饥困难耐的流亡生活，也开始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生命的转折。

9.4董平章被抓

董平章还在他那块地附近瞎转呢。

今天，他一早就挑上扁担、锄头和水桶，来到自家的这块地里。这块地，足有十亩大，是他爷爷辈留下来的。虽然离家挺远，在西门外，有六、七里地，土质也不好，原先是无主的荒滩地，硬是他爷爷、父亲，流了几十年的汗水，开出来的，成了不错的庄稼地。他爷爷咳着血，也没歇过一天，最后累死在这块地里，也埋在这块地里。那是他们董家全部的财产、全部的希望，比他们自己的性命还重要。土改时，因为这十亩地，划了个上中农。民主村，哪个中农也没有十亩地，如果不是他爷爷、他老爹宁可累死也没请过帮工，怎么也得是个富农。董老汉替他儿子出去支前，走的时候，扶着门框，怎么也迈不出这一步。四十的大汉流着眼泪，再三叮嘱儿子，要在地里下功夫啊，千万不要荒了地啊，我们董家就指了这块地啊。

董平章怎么会忘呢？他的血管里同样流着他的父辈、他的祖辈的血液，他的脑子里也全是他的父辈、他的祖辈乃至千千万万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理念——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共产党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走在国民党的前面，大搞土地改革，才唤起了千百万农民义无反顾追随革命。

董平章的这块地，不是抢来的，不是夺来的，是他家几代人用心血填起来的，能不当成命根么。他的家，他的全家，都指望着这块地，指望着他用辛勤的汗水去浇灌这块地，他能不全力以赴地去用心么。

是的。他有一个好妻子——赵玫，不但模样俊，而且勤快能干心眼好，里里外外一把手，又对自己好，对家好，远近乡亲谁不夸他的媳妇好。董平章想到这里，从心底里笑了。对这样的好媳妇，自己更得用辛勤的劳动，用汗水去感谢自己的妻子。

他还有一个天底下最可爱的小宝贝，才三个月大的小宝贝，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而且还会咧着笑了。漂亮像他妈，健康壮实像自己。小宝贝的到来，使他更高兴了，更充实了，责任更大了，干活更

带劲了。他盘算着，要给宝宝买个摇车，夏天的衣衫可以凑合，秋冬季的衣服是不可少的。虽然家境也不宽裕，可在民主村，他的孩子应该是最像样的。靠什么？只有靠自己的双手。

就是这些想法才使董平章天天起早贪黑、不歇气地干活。

今年的天又旱，自己的地毕竟地力薄。天一旱，板结得更厉害。所以，今天一早，又过来了。

上午，挑了几趟水。挑水得去西面的大河，来回一趟就得半个多小时。虽然，听见了枪声、炮声，可在董平章听来，还是那么的远，都没放在心上。1947年，国民党不是也打过来了，结果还不是给解放军打跑了吗，枪声好像比这还要近、还要厉害。

多挑一担水，就是多一份收获；多挑一担水，就是多一份希望。董平章怎么能舍得停下呢。中午晌了，肚子咕咕叫了，他这才不情愿地放下扁担，回家去了一趟。

回到家，赵玫不在。他知道，赵玫在村里也是个大忙人。他想，家里有个人在村里忙活着也好，不要都像他。宝宝还在炕上睡着，赵玫想得很周到，四面围得很好，不会掉下来。他看着宝宝睡得那么好，有点入了神，都不想走了。可是能不走么？他还是起了身，从锅里只拿了两块糠菜饼，在缸里舀了瓢凉水，咕咚咕咚地喝上几大口，望着炕上的小宝，又走了。

街上，老老小小，已经有人在往外走。

他能走吗？董平章在想。赵玫还没回来，去找她？她肯定有很多事，大男人去找自己的小媳妇，会叫别人笑话。在家里等着？他又不知道该怎么收拾。白坐着？手上不干活，那多难受。最要紧的是，那块地怎么办？能不去管吗？能没人管吗？爹要是回来了，该怎么说呢？

董平章想，还是上山去吧，等下午早点收工就是了。（说明：海源话里，把下地干活叫上山）

于是，他又踏上了上山的路。

下午，等他又挑了两趟水，南面的西滩也响起了枪炮声。

是不是该走了，他在想。可是他看到在风中摇曳的玉米叶，像是在向他招手；翻卷的麦苗，抚摸着他的裤腿，像是在拉拽着，叫他别走别走；更何况爷爷的坟头上，清明插的招幡还在空中飘荡，那种在心中时时涌起的共同相守的召唤，当孙子的能甩手而去吗？

董平章觉得很矛盾、很难办。他蹲在地上，思索着。他看着这些在他的汗水浇灌下茁壮成长的庄稼，他也不舍得离开呀。耳朵里听着枪声，眼睛却看着绿油油惹人爱的禾苗，鼻孔里吸着沁人心脾的土地的芬芳。他抓了一把土，越是要走，越是舍不得，他陶醉了，他麻痹了，但他却完全失误了。

把他从近乎梦幻中清醒过来的，是那不远处装甲车隆隆的轰鸣声。从没见过的那么大的铁家伙，从几块地的前面开过，连个车轮也没有，怎么过来的？没等董平章想过来，那履带的碾压，那机器的轰鸣，使空气和土地都在颤抖。吓得他赶紧趴下，伸头看着，四周陆陆续续出现了国民党兵。

过了一会儿，装甲车过去了，国民党兵也过去了。他试着爬起来，往回走走。好不容易，快到了西门口，却远远看见几个国民党兵已经堵在了西门外。

“唉，这条路是走不通了。”董平章在想，赵玫这时会在哪儿呢？孩子又会怎么样呢？他连连跺脚，后悔刚才走晚了。

一个朴实单纯的北方农民，在瞬息万变的战局动荡中，对他分析判断、迅速应变的能力还能提出多高的要求呢。

他又向后港方向跑，可是好不容易跑到后港，结果港上港下都有了国民党兵。又是急了一头汗。

只好调头再往南跑。四下里，国民党兵明显增多了。董平章更不容易跑了。他趴在玉米地里，寻找下一块要去的玉米地，不但要等这条线路上没有人，还要等四周没有人能看到这条线路上还有人在跑。这样的机会越来越难以等到了。等到又跑回南港这儿，太阳都快下山了。

这一回，他弯着腰，从一块玉米里出来，还没等跑几步，背后却响起了说话声：“别跑啦，早就看见啦。”

他回头一看，像一盆凉水当头泼在心上，完了。那是几个国民党兵站在玉米地的另一边，他开始没看见。

那几个兵看董平章跑得很累，还在说风凉话，“跑得挺辛苦吧？怎么不跑啦？不着急，有你出力的地方。”说着，也拿出一个蓝布条，系上了董平章的胳膊。他不清楚这是个什么东西，但总觉得不会是好东西。他伸手想去拽掉它。

国民党兵马上制止他，“别拿掉。现在兵荒马乱的，光我们国民党的兵，就有好几拨。到哪儿，都有人抓你。戴上这个，就知道是自己人了，不会来为难你了。跟我们走。”

“我要回家。”

“别傻冒啦。你家不是在城里吗？连我们都还没进去呢，你能进去？快走吧！”

“上哪儿？”

“不是叫你到美国，就到海边。”

董平章一想也不远，也没有别的法，只好跟着去了。

到了海滩边的沟壑旁，已经有几个老百姓蹲在那儿，也都系着蓝布条，由国民党兵看着。

董平章一看，竟然有王立、连四娃他们，还有西南村的几个。他们面面相觑，相互间谁也不敢搭话。

过了一会儿，一个国民党军官走过来。“老乡们，别害怕。我们是国民党青年军的，过来是为了开辟一块实行三民主义的实验区，实现孙中山先生生前的理想。我们也需要你们的帮助，你们呢，帮我们干

点劳务。我们会管饭，还会给点工钱。啊。没意见吧。”没等大家说话，便自说自话地自己往下说了，“那就这样吧。你们就是青年军的战地服务队了。”

这个军官又接着说：“在你们中间找个队长吧。”他把这几个老百姓看了一圈，可能是董平章长得比较周长一点，就指着董平章问：“你叫什么名字啊？”（说明：海源话里，“长得周长”就是五官端正的意思。此处的长，念作zhang）

“董……董……董平……”董平章居然紧张得说不上话了。

“那就是你了，董平队长。再分成两个组，你们自己找两个组长。”

董平章一听，急了，怎么一天没回家，就成了国民党的队长了，连说：“不行啊，不行啊。我从来没当过干部。”

那军官笑了，“共产党那儿，才叫干部。我们这儿叫长官。就是你了，你也是长官了，哈哈。”

董平章知道当国民党的官绝不是什么好事情，忙推脱说：“不行啊，不行啊。”

那军官脸一沉，说：“我看中你，你就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了。”军官指着那几个国民党兵，“你们就跟着他们几个当兵的干活。上船把东西搬下来，堆在这儿。等明天，我们进了龙头镇，你们也可以回家看看。但到时候，还要来干活，你们不来，就拿队长、组长是问。知道了吗？好了，孔班长，你过来领着他们干。”

就这样，董平章成了国民党的战地服务队的队长，并就此彻底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第十章 今夜无眠

1949年1月10日

10.1 龙头陷落

纪排长他们到南门外营房的时候，只有潘连长还在等着他们。

他们仔细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他们知道，自己的部队已经走得差不多，只剩他们这批了，这就很使他们放心。国民党兵也已经上来了很多，在他们的东南西北，都有敌人，都有枪声。怎么决策，从哪儿突围，关系到他们三十多人的生命安危。

他们发现，东面也有国民党兵登陆，枪声、嘈杂声，一阵高过一阵。西面，南门口，已经没什么群众在走动了，但北门外，还是有枪声。怎么办？往哪儿冲？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犹豫了。

纪排长，一拍大腿，说：“就往北面冲！往北，也是有敌人，但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他们也想不到，还会有解放军从他们那儿冲过去。而且，突围的距离也能短一些。”

潘连长沉吟了一下，说：“行！就往北冲！”

他们三十多人，稍作准备，端起枪，分三列纵队，冲进南门。

龙头镇的南街、北街，几乎已经没人了，灰暗的天色下，死一般地寂静。街上满是被丢弃的脏乱杂物，在冷冷的晚风中，夹着灰沙，打着旋涡飞转。才不到一天的时间，当他们再经过时，感觉和心情，那就完全不一样了。解放区老百姓宁静平安的家园，就要丢给国民党了。

走过十字路口，潘连长四处张望了一下，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乡政府的门敞开着，里面黑漆漆的，潘连长不放心地喊了声：“还有人吗？”没人回应。潘连长没停下脚步，继续往前走了。

要出北门了。潘连长停下来，跟大家很严肃地说：“同志们，我们现在要闯鬼门关了。也许敌人的火力会很密，但我们要不顾一切地冲过去，受了伤，也不能停。我说句实话了，谁受伤，谁就留在原地坚持战斗，为队伍作掩护。其他同志还是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冲出几个就是几个。明白啦？”

“明白。”大家坚定而轻声地回答。

几秒钟的准备之后，大家涌出了北门，再向前冲了一二百米，在上后堽之前，又向东拐。

天色模糊，堽上有国民党兵，下面有脚步声又看不清，在喊呢：“谁啊，哪一部分的？”

停了会，潘连长答：“一连的。”虽然说的是真话，但这时真话假话都是一回事。

“一连的？”堽上的国民党兵还没反应过来，过了一会儿，又问：“口令呢？”

没人理他们。

“口令？怎么不说口令呢？”

还是没人理他们。

“口令？口令！不说就开枪啦！”

噼叭，几颗子弹打来。结果，引来一排一阵猛烈地回击。

“啊哟！”对面堽上，大概是有人被击中了。

“有共军啊！快来人呐！”噼噼叭叭的子弹这才打过来。

真有倒下的。倒下的战士真是好样的，躺在路上一声不吭，等大家跑过去了，他才举枪射击掩护。

潘连长所能做的，只是回头看一看，连脚步也不能停。看起来很残酷，但这就是战争。

忽然，又一个战士晃了一下，左臂中弹了。只见他咬着牙，右手捂着左臂，硬这么跑了过来。虽然最后是落在了后面，但毕竟是跑了出来。

三排往东北方向冲出来了，他们选择的突围线路是对的。

334团的滕营长，已经在东门外了。

他也选择了一条他认为是很聪明的一条路，出其不意地带着几条小筏子，从东滩登陆了，而且果然没有遇到抵抗，顺利地上来了。

拿下龙头镇的头功，非他莫属了。不但占据了东门外的大块土地，使上岸的队伍站住了脚，还把一大群往外逃的老百姓给挡了回去，说不定还能在里面抓几个共党，又能领上一大笔奖赏呢。

滕营长心里还没有美够呢，北门外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坏了，怎么会在那儿打呢？

“全部卧倒！”他这一喊，东门外一二百个兵全趴下了。

枪声停了，他也不敢有新的反应，还趴在那儿。过了好长一会儿，确实没有动静了，镇里镇外都没有动静了。他还是不敢往镇里头进。他搞不清，共军是搞了个空城计呢，还是搞个四面埋伏，就等我进去，来个关门打狗呢？想不明白，实在想不明白。但也不能就这样老耗着呀，又等了一会儿，还是没动静。他壮着胆子，集合队伍，拿小兵的命试试看。

“不管是哪个连的了，集合，整队。”国民党兵排成了几行小的队伍。

“等我下了口令以后，第一行先往里冲，五分钟以后，第二行往里冲。后面的以跪姿掩护。”

“准备，冲！”滕营长一声号令，那些兵缩了脑袋，你推我揉，跌跌撞撞，往东门里冲。

镇里，没有反应。滕营长大喜，手一挥，“往里进啊。”龙头镇，落到了国民党的手中。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龙头镇淹没在了夜色之中。

10.2安身李家泊

丁妹驾着小推车，老王头拉着，车上驮着三、四百斤的包裹，是丁妹所能想到的、所能带得走的他们家的全部家当。从北门出来，上后港，下后港的北坡，弯弯曲曲的小路，来到大河边，份量都压在丁妹的肩上。丁妹的额头已挂满了汗珠。

老王头看着也有几分心疼，停来说：“来换换吧，看你出的汗。”

丁妹说：“不了，爹，还是我来吧。前面要下河了，水底的深浅，你比我熟，还是你在前面吧。”

老王头一想也对，就说：“行，那歇会儿再走吧。”

丁妹说：“爹，后面还在响着枪声呢，咱过了河再歇吧。”

老王头一想，又是丁妹说得对，便说：“好，先过了河再说。”说着直了直身子，又弯了弯腰，再拉紧了绳子低下身一使劲，说了声：“走，咱也听丁妹的。”小车又动了。

丁妹很难得地笑了下，又回头对她一直很费力地跟在后面的婆婆王大妈说：“妈，你先在这儿等一下，我过了河，再回来背你过去。”

王大妈笑着说：“哟，我还没老到那样吧？”说着，便挽起裤腿，抬脚要下河水。

老王头说：“你能行吗？这事还是听你媳妇的吧。”

王大妈也是个不愿服输的人，觉得自己也是个在村里跑来跑去的人，连这点事也不行？年轻时也不是没过河。于是，还是伸脚下去了。可王大妈那个辈份的妇女还都是缠的小脚，走平路，还勉强，要下水，那哪儿成啊。果然不出所料，刚一只脚进水里，就站不稳了。要不是丁妹眼疾手快扶住了，王大妈这下真要栽到水里。

“哎哟，年岁不饶人啊，可我真的还没老啊。”王大妈无奈地只好在河边等着了。

老王头拉着小车下了河，心里想着，还真没看出丁妹平时没言没语，到了这紧要时候，两个儿子都没靠上，倒是这个丁妹比儿子还强。

河水还是凉凉的，老王头一边用脚探着河底，一边往前走着，还不时提醒四周也在过河后撤的乡亲们，哪儿深，哪儿浅，别踩了空。

过得河来，丁妹放下肩上的车绳，又下了河去。

老王头说：“还是我去吧。”

丁妹没有停下脚步，甚至都没抬起头，只是说：“那哪儿行，还是我去吧。”

老王头望着丁妹的背影，心里酸酸的，有种感激，甚至是种愧疚，以前怎么没关注到自己还有一个好儿媳。

丁妹毕竟很少过大河，空身去的时候还行，等回来背着她婆婆时，又吃力，又得摸索着看不见的河底，跟在别的乡亲后面，小心翼翼地趟着水。

等丁妹背着她婆婆过来，老王头已经蹲在地边抽了袋烟，歇了一会儿。看丁妹上岸过来，老王头连忙站起，将老伴扶下，对丁妹连说：“快歇歇，快歇歇。”

王大妈也不好意思地说：“今天，丁妹可是出了力了。”

丁妹用手擦拭了脸上的汗，热得通红的脸上泛着笑容，只是说着：“爹，妈，咱走吧，咱走吧，到了村里再歇吧。”

这时，太阳已经西沉，天边只剩下红红的一抹晚霞。时辰不等人哪。

丁妹又套上小车的挽绳，双脚有力，无言无语地继续在往北的小路上走着。

到李家泊的时候，已是该点灯的时分了。

村外的农田里，已经驻扎了从县城赶过来增援的部队。

村口有个煤油灯挂在树上照着亮，一大群熙熙攘攘的人，在灯下忙碌着、招呼着、走动着。

从龙头镇撤下来的人，三三两两地迈着疲惫的脚步，扛着、推着、挑着，陆续走了过来。

一到村口，就听得有人喊，“民主村的人留下。其他三个村的人，喝口水歇歇，再往前走。”——解放区就有这个优点，各项工作组织得很好。拿今天这个事来说，尽管事情来得很突然，但后方各村接到县乡通知，马上就动员起来，安排落实，已经基本到位。

老王头家的仁口，刚走进人群，就有人走过来问：“大爷，辛苦了。请问，您是哪个村的？”

“我是民主村的。”

“那好，那您就留在我们李家泊住了。欢迎，欢迎。”那人还伸出了大手，紧紧地握着老王头还拿着纤绳的手，很热情地晃着，像迎接打了胜仗从战场下来的战斗英雄似的，弄得老王头挺不好意思。

那人又问：“大爷，您是第几农会小组的？”

“我是第八小组的。”

那人向人群里喊：“秀才！秀才！”

“哎！在这儿呐！”一个身材匀称而又轻巧的年青人挤了过来。清秀的脸庞在灯光下，还闪着两圈亮光，走到近处一看，才知是戴了一副眼镜，这在当时的农村是极稀罕的。

老王头见到的就是李辰。李辰从龙头小学回来就已经忙了一整天。眼见天都黑了，不但还没进过一步家门，就连是不是吃过饭，恐怕也没人惦记过。李辰依然是笑呵呵的，不知疲倦，那年头，大家好像都这样。

“这是到你们组的大爷，你领过去吧。”那人又向老王头介绍说，“这是我们村八组的组长，叫李辰，我们村的大秀才。”

李辰走过来，朝老王头笑着说：“大爷，我是八组的组长，姓李，您就叫我小李就行了。大爷，您贵姓？”

“好说，我姓王。你走近，我一看就知道了。你是学校的李老师。我们村里的人，都认识你。学生们都很喜欢你。”

“老王头！你也过来啦。”人群里一下有人叫他了，老王头抬头一看，是于村长。

“村长，你在这儿啊。”看到村长，尽管才隔了半天不见，老王头心里却很激动。

“哎，哎。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西北村第八农会小组的组长，老王头。”于村长说。

李辰他们两人也挺高兴。在革命战争的环境里，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斗争、共同的磨难、共同的命运，使这些不管是相识还是不相识的人之间，都有着一种油然而生的情感。

于村长是在接到经乡长告诉他，民主村群众安置在李家泊的通知后，没管他的老伴，自己就早早地来到李家泊，和李家泊的村干部商量落实群众后撤过来以后的具体安排。有多少事啊，怎么能不着急呢。至于老伴么，她自己会有办法的，不用他操心，于村长就是这么想的。

老王头一家，由李辰领着，朝一个小巷拐进去。

一进巷子更暗了，只有两边山墙的黑影，看不见地下的坑坑洼洼，不好走。

李辰想把丁妹替下，也看不清丁妹的模样，便说：“小妹妹，这么重的车，让我来推吧。”

丁妹扑哧一笑，说：“李老师，你比我还年轻呢。怎么能让你帮我推呢？”

“哎哟，是嘛？那真不好意思了。要不，王大爷，你让我来拉。头里的路，你看不清。我熟悉，让我来，别客气啦。”李辰连说带拽，把纤绳接了过来，在前面拉了起来。

李辰边拉边说：“实在不好意思啦。我们是个小村，不像你们城里，有那么多人家。”龙头镇外几个村的人，见到镇里的人，还是挺客气地照旧称他们是城里人，这也是龙头镇里的人最愿意听到的称呼了。“我们村一共才六个农会小组，一个组对你们一个组。你们多出来的组，我们就另外编组来安排。你们第八组，就安排在最西头的那个饲养棚。实在不好意思了，请多多包涵。”

“你别这么说了。这就已经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了。能不躺在露天地里就很不错了。这个该死的国民党，临到死了，还要给咱添这个乱。”老王头说到这里有点忿忿然了。

“是呀，这就叫垂死挣扎。它越挣扎，就灭亡得越快。”到底是文化人，说起话来，还有成语。

说着说着，就到了村西头的一处饲养棚，有三间。

每间都已点上了豆油灯，微弱跳动的火苗下，都已经有人在忙活着。

李辰把老王头领到了最东间。刚走近，很多热闹而又熟悉的声音扑面而来。进去一看，是唐玉珍、靳喜悦，他们两家都在里面了。

“大叔，你来啦。”唐玉珍自是忙不叠地先打招呼，帮着丁妹赶紧卸车。

“王大哥，谢谢你们村干部想得周到，把我先搬弄过来了。要不，光靠我自己，那咋办呢。”靳喜悦也在说着。

连李辰在边上听着，也挺羡慕，说：“你们民主村乡亲们的感情还真不错！有了这一点，什么困难也都不用怕。”

棚里棚外的地上，李辰已经领人打扫过了。缸里的水，李家泊的乡亲，也已经挑满了。棚子的外侧还需要有什么东西挡一下，地下也得有点东西铺着。

李辰不好意思地说：“实在抱歉了。这些事，我也都想到了，就是实在忙不过来了。我带你们一起去那边的场院，搬些玉米秸过来。王大爷，你就不用去了。”

这间棚里的三个媳妇，当然都站了出来。连唐玉珍那十二岁的小儿子，非要跟着去。大家怕他添乱，不让他去。

那小孩叫杜长贵，长的也不矮，“我比你们还要高了，怎么不行？”

李辰牵了他的手，“那就跟我去吧。”

五个人，钻进夜色里，向外去了。

老王头又上那两间棚子看了看，都是他们组的，还都没什么意外。

不一会儿，他们五个，背着大捆的玉米秸回来了。

大家都一起动手，遮挡风墙的遮挡风墙，铺地下的铺地下。尤其是那长贵，跑里跑外，兴高采烈，就像过年一样。饲养棚里，那散发不尽的浓烈的牲口臊味和饲料的、地面墙面的霉味也没有影响人们的情绪。

送走了李辰，他们三家又安排怎么躺下。靠墙一长溜，靳喜悦在最里面，老王头在最外面，各家的男眷女眷也各不相扰。带来的各色包裹物品都堆在靠外面刚用玉米秸编的挡风墙下。大家都各自相让，很快就安排停当，便翻开包裹，找出破被旧褥铺下。尽管都很破旧，连半新的也很少，尽管都是第一次把家里最私秘的东西拿出来展现给别人看，可谁也没笑话，大家都这样。还从来没有几家人睡在一起，头靠着头，被靠着被，真有意思，不但热闹，甚至还有点喜庆。他们过起了一段他们自己还叫不上名字的集体生活，确切地说，是一段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他们更不知道，他们的这些体验，会对革命胜利以后的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启示和影响。

民主村的乡亲们，在国民党的反攻面前，选择了跟着革命走。村干部们一句话，乡亲们就立刻抛开了他们祖祖辈辈赖以命根的土地、房舍，带着一条命以全部的希望来追随革命。是他们思想单纯，还是宣传教育的成功？是土改带来的物质利益，还是国民党统治的失败？是真心诚意还是被迫无奈，或是兼而有之？这个问题，一直值得我们思考。

三家人刚铺开被褥，要躺下，李辰又带了人，抬了一锅糊糊，招呼棚子里的几家都出来喝。

大家出得棚来，你一瓢，我一碗，虽说稀了点，可热乎乎地流到肚里，那滋味真舒坦。

老王头靠在玉米秸上，今天可是忙活了一整天，脚都没沾地，嘴里咪着糊糊，心里想着李家泊的人想得真周到，这才觉得肚子是有点饿了。

正舔着嘴呢，棚外又来了妇女的声音，“我看看，你们这儿怎么样？”

老王头一听，是经乡长的老伴，赶紧起身说：“这么黑的天，还过来？不等了明天么？”

“哎，不见到你们是怎么个样，我能躺下么？”经老太已经进了棚。

“乡里安排的很好，很周到。你和乡长，都请放心好了。”

“很好、周到，这些是说不上了。我来看看，能躺下，能喝上口糊糊，就行了，别的就抱歉了。这些事真的要多谢李家泊的干部们了，我也没想到他们会做得这么好。真要谢谢你们啦。”经老太对一起来的李家泊的村干部们说。（李家泊，也可简称为李泊）

李家泊的村长，一位身材矮小壮实的庄稼汉，回应着说：“应该的，应该的，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不到的地方，请民主村的同志多提宝贵意见。”

李辰也插上嘴，“民主村的同志对我们李家泊的帮助一向是很多的。连我们村小孩去龙头上学，中午也还是民主村的郭大妈过来做的饭。”

经老太落落大方地说：“如果有什么不到的地方，那也是经乡长和我责任了，请大家多多包涵。”

老王头和八组的乡亲们也都对李家泊和经老太真心地感谢了一番。

“这儿搞得是还可以。谁领你们过来的？”经老太还在问。

“是李老师。这儿都是李老师安排的。”老王头答。

经老太突然想起了什么，回头问李辰：“你们的余校长呢？怎么没看见？”

“我上午领学生走的时候，他还没出来。后来就不知道了。”李辰说。

“哎哟，这恐怕就不好了。他是村里、乡里都管不着，自己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人。”经老太的忧虑是有道理的，这等下文再说。

送走了经老太，大家慢慢地都躺下了，只是还静不下来，光是长贵一个孩子的话就说个不停，唐玉珍打还打不住。

王大妈就说：“孩子高兴，就让他去说吧。大人受那么多苦，不就是为了孩子们高兴么。”

老王头也睡不着，不是因为长贵的话吵，更不是那浓烈的牲口臊味，而是在牵挂着他的儿子——王立。这小子，怎么啦，怎么还没回来？想到他，平常也是毛毛糙糙、不够稳当，不免担心起来；再一想，他们上南港的民兵还有好几个没回来呢，不会都出事吧？听回来的人传话过来，说是在南港他们就散了，各自往回跑了。唉，这个连四娃，怎么领的队？但是，大家也没听到什么出事的坏消息。

老王头就这么不着边际地想着，翻来覆去地翻着身子，也没和他老伴王大妈商量。

惦记儿子，要数当妈的了。王大妈当然也在想着，但她更想不出结果来，又怕给老头心里添堵，也没去说。

其实，思念王立最重、最放不下心的，要数丁妹了。自己的男人，自己全部的指望和依靠，怎么能不想呢。丁妹从王立他们早晨一出发，就开始思念了。

丁妹很满足于自己的这个男人。他年青、有力、诚恳实在，没有坏心眼，没有叫人不放心的地方。所以，在王大妈想收她做儿媳妇时，她还特地流露出想跟小儿子的愿望，她婆婆还真成全了她。

她应该是满足的。不但王立从没打过她、骂过她，公公婆婆待她也很好，连大哥王山都很谦让她。她在这个家里从没受过气。只是她自己的性格，没有什么话。

唯一让她想不明白的是，王立好像常常躲着她。是不喜欢自己？也不像。是还年轻，还是喜欢在外面和那帮男孩子们一起玩？丁妹常常想不通。

尽管这样，丁妹还是喜欢这个家，喜欢王立。

这一夜，王立没回来，丁妹也一夜没睡。他会怎么样？会被国民党抓去，蹲在大牢里，正在挨打？还是中了子弹，正倒在哪个山沟里，淌着血，忍着痛，睁着眼，盼着她过去救他呢？丁妹真想爬起来，回龙头去，把所有的山峦沟壑都找一遍。但丁妹也是理性的，她知道这不可能。她想遍了所有的可能与不可能，也没和公公婆婆提一句，甚至没有翻过一下身。

丁妹就这样思念了一整夜。

第十一章 地富还乡

1949年1月11日

11.1 陶富贵又进陶家院

这一夜，还有很多人睡不着，尽管原因各不相同。

陶富贵，陶县长，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一整天，他就趴在指挥舱的窗沿，向外看着陆地上的战斗，随着烟雾的浓淡、枪声的远近，时而拍掌，时而跺脚，心情几乎比谁都着急。他的所有期望，所有财富，所有仕途，所有的所有，都寄托于战场上的胜负，寄托于士兵们的血肉拼杀。

天黑的时候，当陶富贵得知，龙头镇拿下了，激动得都站不住了。虽是一大把年纪，却也禁不住涕泪俱下，双膝跪地，两手紧握，仰天长吁：“老天有眼啊，我陶富贵也等到了今天啊。”

突然，陶富贵跳了起来，“我要下去，我现在就要进龙头镇。”

“要冷静啊，陶县长。”章团长劝他，“虽然，队伍是进去了。可是，很多情况还不明了。不用说，镇外面肯定还有共军，就连镇里还有没有埋伏的共军也难说啊。”

“那你们派一个连，随身保护我进去。”

“你没看见，天都黑了。打夜战，是共军的强项。不用说你一个半百老人，连我们国军都要躲得远远的。算了吧，明天再去吧。我还要替你的安全负责啊。”

“明天？要是明天再去，海源县政府不就又要晚工作一天了吗？”

“唉，不差这一天啦，我的陶县长啊。明天，明天我叫罗团长亲自带兵，风风光光地陪你进城。”

“好说，好说，章兄一句话，还不好说。明天，我陪陶县长进城。”罗团长有时也挺爽快。

“哎，那好吧。”陶富贵也只好无奈地点头，不再多说，下舱休息去了。

第二天，天不亮，陶富贵就起床了。

满心的仇恨怎么去报复，满眼的财富怎么去夺回，有多少事情要盘算，陶富贵怎么能闭得上眼呢。更何况，那舰艇上所谓的床，又硬又窄，陶富贵这样的人躺上去就像受刑一样，如何能享用得了。

陶富贵拿出了他最好的那一套行头，一遍遍地打扮着。头戴宽沿礼帽，俗称铜盆帽的那种，身穿蓝大褂外加羔毛背心，手拿欧式的克短柄手杖，胸前除了那条镀铜而没有挂表的挂表链之外，还别上了

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徽章。

陶富贵拿着小圆镜，上下翻动，对自己视之再三。又连着问身边的跟班戚和煦，“怎么样？可以吧？”

那个戚和煦，也只能点头称是，“不错，不错。挺好，挺好。”

直到陶富贵自己觉得能够上县长的气派了，又赶紧去敲章团长、罗团长他们的门。

章团长、罗团长他俩也无可奈何，知道与其多费口舌，不如顺其所好罢了，只好睁着惺忪的睡眼，满心不愿意地替他张罗去了。

当太阳刚升出海面，罗团长和陶富贵一行下到几个救生艇，章团长和方舰长在船舷旁送行。

方舰长还特地叫出了舰上的两个兼职鼓手，敲锣打鼓地一起下小船陪同。

晨风料峭，海水飞溅，一番颠簸之后，到了海角上岸。

陶富贵在戚和煦的搀扶下，跨出了小艇，一脚踏上了海源的土地。

海角的礁石群，经过昨天一天的激战，硝烟还未完全散去，空气中依然弥漫着焦糊和血腥的气味，到处都是崩裂的碎石、尸块和血迹。

他又一次感慨了，又一次泣不成声了。他又膝盖发软了，瘫坐在礁石上，低头弯腰，双手颤抖着捧起一把混杂着黑灰和血渍的沙石，使劲地闻着，以至于顾不上费了工夫的修饰和打扮，把脸庞深深埋进了那一抔沙土，满脸沾着黑的、黄的、红的颜色。

那也是生他养他的土地啊。

两边的人，好不容易，把他拽起，近乎拖着再往前走。

到了南门口，那个余排长带了三两个人在迎候。他们稍事休息，整理了一下队伍，开始入城。

前面打着一杆青天白日旗，一身戎装的罗团长和擦了一把脸的陶富贵，不，现在是陶县长，在后。余排长引路，两个吹鼓手随后，一个拿着军鼓，一个拿着铜号。再后面是十来个兵和三四个所谓县政府的工作人员。

进了南门，到了南街上。铜号在刺耳地吹着，军鼓在咚咚地敲着，街上却空无一人，连个狗叫声也没有，只有几只乌鸦在树梢上盘旋，呱呱地叫着，冷清得有点瘆人。虽然是春天了，却还是寒意阵阵。

罗团长是心闲气定，踱着方步，以一个胜利者自居。有多少年没有打过胜仗了，有多少年没有这样神气了。这个感觉还真不错。

陶富贵的感觉，当然大不一样。还是这一条街，还是这些房，可觉得是那样的陌生，那样的遥远。昨天，在船上，隔着玻璃，隔着海，看那龙头镇，是那样的近，好像伸手就能碰到。今天，真的走在龙头镇的街上，却没有了那种兴奋，没有了那种急切，反而是觉得走在另一个世界上。这还是我的家乡

吗？这还是我陶某人当年呼风唤雨、说一不二、跺一脚满街响的地方吗？两年，这才两年的时间，已然是物也非人也非，恍如隔世。

陶富贵的心里更多的是伤感，脚步沉重了起来。就好像曾经坐在椅子上的人被打翻在了地，以后即使再扶了起来，心里总还是颤颤巍巍。永远被撕裂了的，不只是重新捆绑起来的那条椅子腿。

来到十字路口，陶富贵一眼看到位于路口的自家宅院，便扑了上去。大门已经灰暗，墙皮已经脱落，屋沿长出了茅草，门口的一对瓦当，只留下了被砸碎的半截。更揪心的是，大门里的人，已经一个都没有了，只剩下了门外的他自己。

滕营长带了几人，在门口迎候，还啪啪地响了几下掌声。

陶富贵全然不顾这些，扑到了大门上，抚摸着已经龟裂的、褪色的门板，又一次老泪纵横了。

他使劲地拍打着门板，喉咙里不停地咕噜着，像是诉怨，又像是诅咒，那眼睛里搅合着哀怨、伤痛、愤怒、仇恨，别人是无法全部解读的。

滕营长举手向罗团长敬礼：“报告，团长。海源县城内，共军已完全肃清，请团长放心。原先的县政府大院早已被共党拆毁，荡然无存，别处也没什么像样的房子。团指挥部和县政府，我考虑就放在这陶家大院。这儿，地点适中，便于警卫。陶老先生也正好回到了家。”

“怎么就放在我家里啊？”陶富贵似乎没有这个准备。

“这不是很好吗？你办公、起居，都很方便，又提高了你家的地位，大家一看有这么多人扛枪保护你，这阵势多了得。”罗团长在劝他。

“这事情，要公私分明哦。私人住宅，怎么能用来做公用呢？”

“嗨，这年头，都是什么时候，还分什么公和私，都是为党国事业嘛。”罗团长还没理解陶富贵的意思。

“这县政府要是几年盖不起来，那得占用我家多少年啊？房屋维修可是个大项目啊。”

这下罗团长听明白了陶县长的意思，心里十分地鄙视，“那好吧，陶县长，你算一下，这大院一年的租金得多少啊？”

陶富贵一听，正中下怀，才觉得这一趟没白来。他眼珠骨碌一转，心里飞快地盘算起来。算起这些来，他陶富贵还是很有些才气的，精神一下子就上来了，手指就像上了发条似的，很敏捷地拨动起来，口中还不停地念念有词：“前院正房三间，加两间……再加三间……倒屋三间……再加三间……大间月银二两半，小间月银一两半……”

罗团长听了，笑了起来，“你这算的是哪年的帐啊？怎么还一两半、二两半？”

陶县长可是很认真地说：“不拿银子，拿什么算？拿法币？今天给了，明天就没用。拿金子？谁肯给？”

“行，行。你好好算，算准确了。以后，你们县政府好给你这个县长付银子。”

“我都算好了。戚助理，你专门找个本，拿笔记一下：海源县政府自民国三十八年五月起，租用陶富贵宅院正房八间、倒屋六间、厢房六间，每月租金：银三十五两，月息一厘。”

讲完这些，陶富贵似乎舒展了些。

11.2李策兄妹相见

李策也是彻夜难眠的一个。

三年了，从黄港念书、到留学英国、再到回国从军，人生道路几经重大变化。有多少事，想和父母、和妹妹说说。这几年，家里究竟发生了哪些事，亲人受了哪些罪，自己一点也不知道。真的是日思夜想，魂牵梦绕，时时涌上心头。

当夜幕徐徐降临，枪声渐渐稀落，他得知334团已经进入龙头镇时，多想立刻下船，一步就跨进家门去。

他甚至去找了方舰长。

黑夜中，方舰长站在舷梯上，指着前方黑黝黝的海岸，对李策说：“一个海军是永远也不会知道，在黑夜里的陆地上，每一步都有着致命的危险。不是不让你去。你这个时候下去，就像一只兔子蒙了眼睛往狼堆里钻，死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明天一早，你再走。我再派两个人护送你一起去。你在家多住几天。我还要上你家看看你父母呢。”

方舰长的话，讲到这份上，李策很感激了。

他回到舱里，心里依旧不能平静。海浪在耳边拍打着，作为一名海军军人，他一直无比地喜欢海洋。他喜欢它的辽阔浩瀚，他喜欢它的汹涌澎湃，他喜欢它的深邃与蔚蓝，他喜欢它无数次的朝辉与晚霞，甚至还有那不知疲倦翻腾着的白色浪花。可是，今天，他却厌烦了，厌烦了这阻隔在他和亲人之间的海水。这一夜，他就一直在听着这波涛的声响，眼睛里满是父母的身影，一直听到了天亮。

当晨曦透进舷窗，李策早已经起了床。

他拖出了床下的小皮箱，这可是离家时他父亲下了很大决心买的，花了三担小米，是他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了。

把小皮箱放在床上，打开箱盖，从几身替换衣服下面，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小包，再打开包袱皮，那是离开英国时买的几件给亲人的礼物：给父亲买的黑色纯羊毛衫、给母亲买的紫色毛围巾、给妹妹买的镶着红色玻璃珠的不锈钢发夹，这些用了他留学一年的几乎所有津贴。

乡情、亲情、思恋之情，也使这位七尺小伙潜然泪下。

他卷好包袱，去跟舰长告别。

方舰长拍拍他的肩膀：“去吧，代问你父母亲大人好。如果，家里有什么事，也要克制，不要太难过。这兵荒马乱的年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单独派个小艇。”

“谢谢舰长！我跟陶县长他们一起上岸就行了，不用专门特地派小艇了。”

“呵呵，”方舰长轻轻地笑了下，说：“我们跟他们最终恐怕不是一条船的。你放心，我都安排了，又叫了两个兄弟，陪你一起去。”

“不用了，舰长，不能再麻烦你了。这儿，我很熟，一个人不要紧。”

“还是有两个人陪着好。万一有什么事，好办些。你去找334团，恐怕不那么方便的。”

在陶县长他们走了之后，李策带着两个轮机兵，也上了岸。

李策匆匆地走过了海角，匆匆地走过了前港，匆匆地走进了南门，匆匆地走到了南街。一切的一切，都是那样的熟悉。他都没在意，还有什么不同。只是天空的冷清、气氛的凝重，使他有种异样的不祥的感觉。

十字路口的陶家大院门前，站着几个334团的士兵，李策也只是招下手，匆匆而过，没有停留。

他直朝着后两排的小巷而来。

他看见他家的屋顶了！屋顶的麦秸，灰暗了些。

他看见他家的院墙了！院墙上的石缝，泥土好像掉了许多。

他奔跑着，冲向他家的街门，使劲地拍上了，大声地呼喊着：

“爹呀！娘呀！我回来啦！”

“我回来啦！”

一行热泪，不禁而下。

院子里发出了慌乱的脚步。

“爹呀！娘呀！我回来啦！”

李策完全没有想到，开门迎接他的却是一双惊恐的眼睛。

开门的，是位已到风烛残年的老大爷，姓申，后面还有个站都站不稳的更加虚弱的老大娘，他们是土改时分到李策他家房屋的一对孤寡老人。他们的大儿子申世宝在抗战时是武工队的，参加过埋地雷、摸岗哨。1942年11月，在造成马石山大惨案的日军搜捕中，因为跑错了路，钻进了包围圈，他全家被抓，儿子、儿媳、两个孙子，都叫鬼子给挑了。小儿子申世堂跑得音讯全无，再也没有下落。后来是民主政府把富农李老头的房分给了他们。

李策并不认识申老汉，可是老人认出来了。

“啊呀，是李家的少爷啊。”老人惊呆了。

他们觉得，自己年纪太大了，已经跑不动了，不想再去逃难了，更不想再跑错了。况且李家都叫村里的民兵给带走了，李家的儿子听说是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兵，可是还不知道是死是活还是在哪儿呢。老人以为，不会有人来找他们麻烦的。

没想到的事，可就是发生了。天刚亮不久，就有人敲门了。听敲门的声音，那么急促，那么硬梆，还喊着爹呀娘呀，知道是事情不妙。更没想到，开门一看，竟然是几个国民党兵，最前面还就是李家的公子，就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突然。

“李少爷啊，李少爷。不是我们要住这房，是村里分给我们的，不要怪我们啊。”老俩口吓得手足无措、瑟瑟发抖。地主还乡团残酷报复贫下中农的血腥惨剧就要落在他们的头上，怎能不叫他们六神无主、心惊胆战。

李策冲进了院子，冲到了屋里，几间屋子都看了下。那个门板、那个窗框、那个房梁，告诉他，这儿就是他的家。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他曾经生活过的痕迹了。

“我爹、我娘呢？”李策向老俩口吼着。

老俩口相互搀扶着，颤抖得更厉害，话都讲不清了：“他……他们……在西北场院里……”

申老汉并不知道李家的老俩口已经被杀，不然真能吓得晕倒。

“哪个西北场院？”

“我……我……领你去……”老人说。

“快走。”李策已经急不可耐。

老人迈腿往外走，老大娘也赶紧过来，紧紧拽着老人，生怕就此会永远失去他，“我也和你一起去。”

尽管这申老大爷对于世界，不过是枯萎得行将熄灭的微弱火苗，但对于大娘她来说，那是她的整个世界。她虽然已经无力捍卫什么，但她至少知道要死在一起。

“不用了，你走不动了。”老人对他老伴说：“我很快回来的。我知道，他们李家是好人。”

“大娘，你就不用去了。我只是找我爹我娘，对你们不会有什么。你放心吧。”李策也对大娘说。

大娘这才松了手。

李策急匆匆地走在前面，老人跟不上，嘴里说着：“往前……再往前……再往北……一直往前……有块空地，就是了。”

李策果然看到前面有块空地，但是并没有什么房子，只是几个搭着芦苇席、盖着点玉米秸、人都站不直的窝棚。

李策一阵心酸，连叫：“爹！娘！你们在哪？爹！娘！你们在哪？”

突然，在一个黑呼呼的窝棚里，贴着地面伸出一只摇晃着的手。

一阵急促的尖叫：“哥哥！哥哥！”

吃力地爬出一个蓬头垢面、几乎失去了人样的女人，后腿缠着带血的布条。

李策大吃一惊，怎么，这是他的妹妹！

他两步跨过去，抱起他的妹妹。但是已经抱不起来了。

李芹一阵痛苦地惨叫，“啊！啊！我的腿已经断了。”

兄妹俩抱头痛哭。

李策：“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

李芹已是泪流满面，一遍遍地说着：“哥哥，你怎么才回来；哥哥，你怎么才回来……你怎么才回来……”一时竟晕了过去。

李策使劲地摇晃他的妹妹。

李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醒了过来，还是那句话：“哥哥，你可回来啦。”

“妹妹，爹娘呢？”

李芹又是一阵泪水，急剧地喘着气：“都死了，都死了，死的太惨了……就是在昨天。”

“在哪儿？”

“我带你去。恐怕还扔在山坡上呢。”

“你怎么能行？你说一下，我就去。”

“不，我一定要去。我现在这条命，一是要见到你，一是要替父母亲收尸。我已经不怕死了。”

李策问明情况，是在望海山连结后港的山梁上，便对两个轮机兵说，你们一个去找下门板、绳索，好抬着李芹去，一个去找334团，过来几个人，一起上北港，怕万一有情况。

又跟老人说，你先回去吧。

老人来到这儿，看到这情况，一直躲在一边。听李策跟他说话，便忙应道：“我有罪，我有罪。少爷，我不知道是这个情况。叫李小姐回去住吧，我们马上就搬出来。”

没想到李芹却说：“你们不用搬，你们也没有去处。我不恨你们，这不是你们的事。我还在这儿住，不是已经三年了么。”

“这事再说吧。”李策说。

不一会儿，余排长领了几人，扛着门板，拿着绳子，过来了。

捆扎完毕，把李芹抬上了门板。一行人，出西门，按昨天的原路去往后港的山梁。

尽管李策他们已经知道昨天所发生的事，尽管余排长这些人也是在死人堆里爬过，但当他们真的看到这一血淋淋的场面时，仍然震惊了。

草木稀疏的山梁肩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一堆血肉模糊的尸体。草地上，砂石上，积淀着厚厚的血渍，周围的树木枝叶到处粘着血迹，浓烈的血腥和腐臭呛人心肺、催人呕吐，一团团的苍蝇嗡嗡乱飞。

他们都不敢上前了。

李策大叫着：“爹呀！娘呀！”上前踩着凝固了的一地血污，不顾轰的一声、扑面惊起的苍蝇，翻动着尸体。

李芹发了疯似地扑了过去，爬着，叫着。

听到这消息，滕营长、罗团长都来了，站着默默无语。他们知道，这就是被共产党认为是敌人的下场。

连陶县长也来了。他要看看这里还有没有他的家人。尽管他本人在土改中也挨过斗，但今天这场景，依然使他心惊胆战，像筛糠一样，上下直抖。

他扶着戚助理，闭上了眼，都不敢看，不敢问。

对尸体做了初步处理，从那一串长绳上解了下来，拖到了边上一个小山凹里，而后堆上山里的石头。李策的父母，单独堆了一堆。李策特地找了块大一点的、平整一点的石头，压在前面。

李策兄妹，在石头堆前，痛哭流涕，长跪不起。

众人好不容易才劝起。

陶富贵这才问李芹：“李家小妹，我的家人呢。”

“陶大爷，别提了。早都死了，连今天也没等到。”李芹红着眼，叹着气说，“在你走后不久，你全家人就都被抓走了。”

“怎么死的？”

“不要问了，陶大爷，不要问了……”李芹说着，刚有点平复的脸，又极度地痛苦起来，“不要再问下去了。今天你们看见的，够惨了吧，但这已经是最愉快的了。不能再提这些了，陶大爷。提到这些，我心里就像刀戳一样，就像死过去一样。”

众人又无语。

“今天这里面是几个人？”滕营长问。

“一共七个。”余排长答。

“还有活下来的吗？”滕营长问李芹。

“我们这批，连我是九个人。还有一个小孩呢，是辛家的孙子，他家的三媳妇带在身边的。”

“这里面没有小孩。”余排长说。

“哦，是辛凯旋家的呀。后来，那小孩呢？”陶富贵问。

“他们杀人的时候，我已经昏倒了。不知道后来的情况了。”李芹说。

“谁动手杀的人？”陶富贵问。

“是那个秦德才和储小二。走到天边，我也忘不了。”李芹咬着牙说。

“绝不能放过他们，绝不能饶了他们。”陶富贵咬牙切齿地说，那手杖在地下重重地砸着，临了，又补充了一句：“他们总还有落到我们手里的时候。”

罗团长狠狠地说着：“滕营长，立刻封锁四周各门，进行全城搜捕，各家各户各个角落都给我翻一遍。把漏网的、潜伏的共党份子，务必统统抓获。”

“是。”滕营长敬礼答道。

陶富贵赶紧补上一句：“请营长顺便通知一下，下午在老县政府大院开全体乡民大会，发布重要通告，不得缺席。”

“谁救的你？”罗团长又问李芹。

“我醒来时，是一帮绿军装的国军兄弟。”

“哦，那是他们青年军的。小孩叫他们带走了？”滕营长说。

“不去管这些了。咱走吧。”罗团长说。

这时，那位一直躲在后面的老人，申老汉，颤巍巍地走了出来，一头跪倒在李策兄妹面前，一面鸡啄米似地磕头，一面直说：“我有罪啊，我有罪啊。我对不起李家少爷，对不起李家小姐啊。小姐还是回去住吧。我们马上就搬出来。”

“老人家，你还是起来吧。妹妹，你还是跟我到船上去，离开这块伤心之地吧。”李策说。

“不，我不走。船上，是男人的地方，我去不方便。再说，这龙头镇，你们都不熟悉。陶大爷也走了几年了，村里的情况，不了解。我在这儿，你们心里可以有点数。最要紧的是，我永远也不想离开爹娘的坟。我本来是和爹娘一起死的人，现在能多活一天，能看到哥哥回来，我也就满足了，也就死而无憾了。”

“李姑娘讲得也有理。住到县政府来，我安排人来照顾她。”陶富贵说。

“李家小姐，还是回来住吧，那是你家的祖产。”申老汉诚恳地说。

“那你上哪儿住？”李芹说，“我说过了，我不怪你，那不是你造成的。虽然你儿子是共产党的民兵，但那也是为打鬼子死的。我不会为难你的。”

李策说：“妹妹，窝棚，你是不要去住了，那不是人住的地方，更何况你的腿还不行。你还是回家去住。”

他转过脸对申老汉说：“这样吧，房子是我们家的。你呢，还在里面住。我家小妹也回来住，都是受苦人，一起住，有点照应吧，都不容易。”

申老汉自是千恩万谢。

李策接着说：“现在时局不稳，情况一有变化，你还是赶紧上船。我回去后，叫个医生过来给你看看，伤得到底怎样。”

“这好说，叫我们团里的医生过来就行了。”罗团长说，“余排长，你先回去，叫欧阳医生过来。”

这样，他们开始回镇里。

临行，李策兄妹，对着父母坟头，又一次长跪再三。

走到西门，只见一老妇人，飘着稀疏的白发，扶着城砖，向城外一步步地挪动，那就是申大娘了。她实在放不下心啊，她怎么也要再见到自己的老头啊。

镇里已经响起了乒乒乓乓的砸门声、吆喝声、叫骂声，一场大搜捕开始了。

李策在下午，回到了舰上。

上了舰，一头就扎进了自己的舱房，扑到床上捂着被就大哭起来。

一起的弟兄们，看着他，早晨是笔挺的白色海军装，回来却已经斑斑血迹、处处破洞，以为是遭遇共军受了伤。

喊来了医官，李策还只是哭。

有人叫了方舰长过来。

方舰长一看，知道是家里出了事，便轻轻拍着他的肩膀。

李策这才转过脸来，对着舰长大哭起来，把事情来龙去脉一一说来。

方舰长和弟兄们一听，都惊呆了。虽然他们也听说过农村里，地主和贫农相互斗争的激烈，但决没有想到会有这种程度。

章团长也闻声过来，等听完李策的话，内心也震撼不已，都找不出言语能来安慰面前的小伙子。早晨，还是那么期盼地、急切地下船。回来，却是人间最深厚最宝贵的情感被血淋淋地击得粉碎。

章团长心里很沉重，不但为李策和他的父母，也为他自己和穿着同一身国民党军装的人。他知道，在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了他们的去路。

第十二章 集思广益

1949年1月12日

12.1 团长来了

还是说那天的早晨。

李家泊村南面的一处场院。

撤下来的一连的士兵们，昨晚都在这周围的野地里露宿。这会儿，大都已起身。有的在拍打着身上的灰尘，有的在伸腿抬胳膊活动着，还有的坐在田埂上，向南远望，回想着昨天的战斗。

场院上，炊事班已经支起了锅架，点起了烟火，开始做早饭。

场院的一角，一个大大的碾盘。四周围坐着几个人，一早赶来的团长正和令营长和一连的干部们在开会商谈。

“情况，现在怎样了？”团长问，语言依然是简单而又不按语法。

“一连现在就撤在李家泊，二连撤到了矛山的北面，三连撤到了大河口的西面。”令营长在汇报。

“伤亡呢？”

营长答：“主要是一连的伤亡比较大，因为他们正好是敌人进攻的正面。伤亡数字，基本上还是昨天傍晚汇报的数字。撤退过程，没有发生多少伤亡。三连在大河口也有几个伤亡，尤其是有一位受伤的战士为掩护连队撤退而壮烈牺牲，这要表扬一下。”

“就这么点？”团长有点不信。

潘连长答：“伤亡数很难统计准了。什么叫受伤？碰破皮、拉个口子，不能叫受伤吧？失去战斗力，才能叫受伤。基本上就是这个数了。”

团长没接着问。

营长继续说：“一连有位小战士没有归队。”

“竟然有不归队的？”团长很惊讶。

“是的，是有一个，姓钱。往回撤的时候，还扶着一个国民党兵一起走。结果，那个国民党兵跟着一起过来了，他倒反而不见了。这样的事情，要严肃查处。”胡指导对下级一向是严格要求著称的。

“你的意思是？”潘连长有些不解地问。

“连国民党兵都能过来，这个人，为什么不能过来？我看，至少是个逃兵。”胡指导义愤填膺地说。

“指导员，我不能同意你的这个意见。小钱扶的那个国民党兵是个伤员，他本来可以不去管他的。但小钱可怜他，宁可增加自己的困难和危险，把他扶了下来，我认为是做了件好事情，是符合我军宗旨的。小钱是个新兵，没有经验，可能在途中出了什么事。在没有搞清楚以前，不能说是逃兵什么的。再说，我们事前也没有说明往哪儿集合。”纪排长还是很正直的，当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小纪，你不要因为小钱是你们排的，就给他打掩护。你为错误行为打掩护，是要给自己造成被动的。”胡指导马上就把话回了过来。

“不，不，纪排长说的还是有道理的……”潘连长也要发表意见。

“算了吧，这事不讨论了。”眼看连排干部为这事要争辩起来，团长显然有些反感。

“敌人，被你们消灭了多少？”团长又问。

“据初步统计，打死二百八十多。”营长答。

“可靠么，这数字？”

“我们营上报数字，一直都是很规矩的。”

“昨晚，在哪儿睡的，你们？”

“野地里。”营长答。

“好。”团长说，“你们把龙头镇都丢了，我看你们也不好意思再去住老百姓的房子了。现在，老乡很困难，一个村要住两个村的人，你想想？不要再去打搅老百姓了，知道啦。”

“好，好。有困难，我们一定自己解决。”营连长们一致点头。

“这次仗，你们打得不好啊。”团长重重地说。干部们在悄悄地等着下文。

“打得这么被动。你们自己说，打得怎么样？”团长又问。

“这次我们确实打得不够好。主要表现是，”令营长对回答这个问题似乎是有准备的，“事前，我们对敌情估计不足、准备不足；仗打起来以后，反应慢，决策也慢，给乡亲们组织撤离带来困难。”

“带来困难？这，你们也知道？就只是给老乡们带来困难？”团长话外有话地说了句。

“我们知道，给团长也带来很大困难。”令营长说。

“这个事，我觉得跟乡政府反应太慢有关系，他们直到下午还定不下来撤不撤。那个经乡长很不果断，老是拿不出意见。”胡指导又插了一句。

“别人的事，你就不用管了。”团长对有分歧的事好像从不感兴趣。

“确实是我们部队没有保护好龙头的老百姓。要讲责任，应该由我们负责。”令营长说。

“要说责任，我应该是第一位的。上级的领导是正确的，战士们作战是英勇的。我是直接指挥员，责任由我来负。”潘连长很大度地把责任都揽了过来。

“嗨！又在扯什么啦，你们。又没说你们打败仗。战士们打得确实不错，你们的战术处置、进退安排，都是可以的么。不讲责任啦，讲能总结些什么经验？”

令营长想了下说，“最主要的，是这么两个，一是我们在这儿太闭塞，消息情报不灵，所以估计不足；二是通讯太落后，所以，反应不及时。昨天傍黑我到这儿以后，想知道三连到底怎样了，具体撤到了哪个位置，派了个战士跑过去问问。直到下半夜，天快亮了，那战士流着血流着汗，才跑回来，我这才知道三连撤到了大河口的西侧。要是这个战士半路有个三长两短，我这个当营长还真不知道自己一个连在哪儿呢。”

“嗯，这讲得还有点道理。”团长点了下头，脸上有了点笑容。

胡指导看团长高兴了点，便说：“团长，我觉得，我们这次后撤还是值得的。”

大家听了都一愣，以为刚高兴一点的团长又要发火了，都一起看着团长，不敢说话。

谁知团长一伸脖子，“说来听听。”

“团长，你想啊，我们一撤，不过就让了几个村子。但是，黄港的敌人就要分散一批过来，这不就为解放黄港减轻了压力吗？”

胡指导这一分析，确实有道理，听得团长十分地高兴起来。

“好，好，说得好。我向师部和军区，就这么说。你们都注意了，以后，我们就这么说，是主动撤退，引敌人进来，减轻兄弟部队压力。”

听了团长的话，大家也跟着松了一口气。

令营长也就顺着说，“团长，那下一段我们要怎么做，请团长指示。”

“第一点，”团长开始说了，胡指导赶紧从胸前的口袋里拿出本本，掏出笔，做记录。

“这个第一点，先整理队伍，稳定情绪。你们的前面是望海山，估计敌人不会选择从这儿出发进攻。你们会有两三天的休整时间。看看伤员里，哪些能坚持，哪些还需要撤下来。我们的后续兵源，还是充分的。”

“第二点，组织指挥系统赶紧调整健全，伤亡的班排长，补充上。”

潘连长立刻想到，“三排长牺牲了，三排副也重伤。我看大郑可以顶上。”

“从普通战士，一下子就提到排长，太快了吧？”胡指导又有了他的疑惑。

“这个，你们会后去讨论。”团长又反感在他当面争论，继续说着，“第三点，调整部署，把三连也撤过来，也放在李家泊南面，一连的西侧。我们整个团都过来了，团部放在王庄。还可以告诉你们，军区

决定成立海源前线指挥部。从黄港前线调一个团，放在大河口一线。从北海调一个团，放在东面。后面还会有部队过来。”

“第四点，稳住现有战线，不能让敌人再往前推进。这一点，你们要特别注意。就算是敌人再增兵，海源县城我们是肯定不会让的。如果敌人扩大进攻规模，就组织群众再后撤，但你们要死守李家泊，不许再后撤。”

“是！”听到这儿，营连长们很严肃地答应着。

“最后一点，你们的担子很重。将来反攻，夺回龙头，你们很可能是主攻营，打头阵。龙头，在你们手里丢，也要由你们夺回来。”

“是。”营连长们更严肃了。

“还有，”团长又想起来一点，“班排长安排好以后，要准备接收新兵。”停了下，又想起来一句，“这次，你们还有俘虏啊？没听你们说起么。”

“有两个，要求参加我军的愿望都挺强烈。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伤兵。”

“那你们办下手续吧。”团长说。

连长看了下胡指导，这事该由胡指导管。

可胡指导没吭声，只是点了下头，大概是因为这事该我管就应该由我来说。

正巧，该说的话说得差不多了。炊事班也敲起了铁铲，一边吆喝着：“开饭啦，开饭啦。”

令营长站了起来，对团长说：“就在这儿吃吧，团长。可就是没有好东西，也就是玉米糊糊了。”

“不给你们添麻烦了。要知道，现在这玉米糊糊也是好的啦，老百姓那儿连这也没有啊。”团长也起身，告辞走了。

“我们再商量一下？”营长问。

“先吃了糊糊再说吧，早就饿了。”潘连长说。

“那好吧，先吃饭。”营长说。

“喝糊糊也叫吃饭？”胡指导还是不习惯。

“咱这儿就是这样，吃面条也叫喝面条，喝面条也叫吃面条，一个样。哈，哈。”潘连长大咧咧地说着，也不去管胡指导的感受。

大家也都哈哈一笑，各自盛糊糊去了。

12.2村干部

早饭后的时分。

李家泊的村公所院子，聚了不少人。李家泊和民主村的干部们在一起开会。

民主村的于村长，脸上显着疲劳和沉重，说：“民主村的各组，先报下数，有多少乡亲没过来？”

各组都在数着没来的人家，带着忧虑和疑惑，分析着没能来的情况和原因。

老王头说：“我们八组，有祖责成和迟得法两家没来。不是没跟上，而是没出来。祖大叔，是脾气太倔，怎么也说不听。”

于村长说：“唉，这大家都知道。这老汉呀，这回要吃苦头啦。”

老王头接着说：“老迟的想法，我也摸不透。他大概是想，这个大浪，他能过得去。”

于村长说：“这样的人，也不一定非要勉强啦。”

民兵队的鲁队长说：“大叔，你家的王立也没回来。去南港的民兵，有四个没能回来。”

于村长说：“最担心的就是他们几个，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情况。”

李家泊的李村长说：“要不我们李家泊派几个人出去找找？”

于村长说：“使不得，多出去一个人，就多一份担心，还可能多一份损失。还是等他们自己想办法回来吧。”

妇救会（说明：那时妇联和妇救会的名称通用）的小林姑娘说：“连赵玫也没能出来。往外走的时候，我见到她了，她一直在等她家小董回来。”

“那董平章跑哪儿去了？”姜雪花急切地问。她从后方临时医院刚回来，就过来参加村干部会。

“小董上山去了，舍不得那块地。”小林答道。

“糊涂呀，糊涂呀。土地和生命，哪个更重要啊？”经老太用拳头直捶着腿，“这些年轻人，怎么这么糊涂呀。”

但是，对于生活在土地上的农民来说，土地和生命是同样的重要，甚至比生命更重要。

数下来，民主村大约有二十多人没出来。

于村长说：“眼下这一段，我想主要是，能安排住下来，情绪稳定下来。看还有没有大的困难？”

老王头说：“没有什么了，李家泊的干部已经帮了很大的忙，尽了很大的努力。真的要谢谢你们了。”老王头对着李家泊的干部们点了点头。

“是呀。”民主村的干部们一片称赞之声。

李村长赶紧说：“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且也实在做得不够。我们的条件很有限，想做好，也做不到。你们还是说说，还有哪些需要我们做的，别客气，只管讲。”

姜雪花说：“确实没什么了，谢谢你们。有些小来小去的，我们自己就解决了。各组回去讲一下，有些小困难，尽量自己克服一下。”

经老太说：“被褥不够盖的，各户之间匀一下。带出来的粮食不够吃的，上山去挖点，不能再麻烦李家泊了。不行的话，一个组熬一大锅，大家一起挺过去。连他们部队现在也是吃糊糊。”

“对，对。”组长们都点头。

于村长说：“上山挖野菜，要几个人一起去，不要走散了。敌人随时还可能进攻，我们随时还有可能再往后撤。”

经老太又说：“一早又来了通知，部队的伤员还要往后撤。散会后，民兵和妇救会的同志安排一下。”

鲁队长和姜雪花都点了头。

于村长又对鲁队长说：“你们民兵，还要找几个人在村里村外放哨巡逻，要防止地富捣乱破坏。”

“这事情，我们来安排吧。你们事儿多。”李村长说。

“那个秦德才，怎么没来开会？”经老太问。说起地富，大家才想起还有秦德才这回事。

“噢，噢，来了，来了。”秦德才不知在哪儿睡了整整一晚上，这才擦着眼屎，跨进了院门。

看见秦德才进门，大家“哇”地全都惊叫了起来。秦德才身上还穿着那身杀地主的血衣，从上到下，斑斑血迹。

鲁队长忙问：“遇上国民党兵啦？哪儿受伤啦？”

“没有。我把地主给杀了。”秦德才很轻松地说着。

于村长问：“杀了几个？”

“哈，哈，全杀了。”

大家又是一惊。

经老太都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了。

老王头问：“你这样做，跟村里说过吗？”

“这还用说啊？我是贫雇农，想干啥就干啥。”秦德才很气盛地说：“那个姓李的老王八，还想跳，我一刀上去就宰了。”

李村长的脸上很不悦，毕竟还都是姓李的。

可秦德才还意犹未尽，说个没完，“后面，国民党兵‘叭叭’地响着枪。我就一不做二不休，抡起大刀，咔嚓，咔嚓，那几个脑袋就全都下来了。消灭敌人真痛快，哈，哈。”说到后来，秦德才竟然手舞足蹈地比划起来。

“这样做，恐怕不符合政策吧？”老王头轻声地说。

大家沉默了一会，没有人回答。

过了一会儿，于村长才说了：“唉，杀了就杀了吧。”

“不就是杀地主么，地主就该杀。政策算个什么东西呀？那都是说给别人听的。你老王头，认真个什么呀？照你这个样，革命还能成功啊？”秦德才还老大得不服气呢。

“哎，你秦德才也要尊重长辈么，不能对你王大叔这样。”于村长最后也就讲了这么句话。

第十三章 陷落之后

1949年1月13日

13.1 祖大爷惨死

下午天转阴了，满天的阴霾，萧瑟的凉风。

龙头镇里的一块空地。

那块空地，原先是旧县政府的大院。当地解放后，因为新的县政府搬到了北边的海源镇，就把这儿拆了，砖瓦用来建了南门外的兵营，留下了一块空地，有时当作集会活动的场所。今天却成了国民党、还乡团招集民众的地方。

镇里四村的百姓被稀稀拉拉地赶了过来。其实一共也没多少，大概才几十人，大多是些老弱妇幼跑不动的，有些是跑得慢，被挡回来的。也有极少数没想跑，以为这场大动荡和他没有直接关系、可以置身度外的，比如像迟得法这样的人。

四周站着持枪的国民党兵，枪口插上了寒光闪闪的刺刀。

大墙下站着一群神气活现的人，自然是罗团长、陶富贵那一帮了。

陶富贵一看，还不到百人，费了半天劲，占了一个城，好不容易，当了一个县长，才管这么几十个人。未免太不像样了吧，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

于是，赶紧催促：“快去抓！快去抓！”

罗团长一看，也知道就是这么回事了，再抓也没用，自己也站着老半天，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就说：“算了吧，陶兄。开始吧，也就这些人了。”

陶富贵也无奈，只好干咳两声，壮点声势，装腔作势地对着面前的这些人说起来：“现在，海源县乡民大会，开始！”

余排长在边上，鼓着掌，对下面说：“鼓掌，鼓掌！”

可下面，一个鼓掌的也没有。

余排长也只好尴尬地收起了巴掌。

陶富贵接着说：“现在，我给大家介绍，这位是，国军在咱们海源的最高长官——罗团长。欢迎！”

下面，还是没有鼓掌的。

罗团长，照例摆摆手，说：“这次，我们国军弟兄，经过浴血奋战，来到海源，把你们从共党手里解救出来了。这是国军的胜利，也是你们的庆幸啊！——啊，哈哈，哈！”

罗团长不知再说什么好，便哈哈过去了。他确实也没什么可说。停顿了一会儿，才想起还要连下去，又接着说：“下面，请——由黄港市最高当局任命的海源县县长，陶富贵先生讲话。鼓掌。”

下面的人，望着前面，开始有些细小的叽喳声，“是那个姓陶的回来啦。”

“啊，啊，啊，哦。”陶富贵打了个喷嚏，大概是早晨起得太早，受凉了吧，“我们海源县政府已经正式开始工作啦，各位乡亲要听政府的训示，不要再听共党的蛊惑。”

看下面还是没有任何反应，陶富贵也就不再讲什么废话，开门见山地讲他的真实意图了，“我现在向大家宣布县政府的训示。

第一条。共党的土改一律作废，所分的财产、房屋、土地一律归还原主，如有损坏，照价赔偿。”

话刚落音，人群里一片不满之声。

“吵什么！限令三天之内，归还原主。三天之后，强制执行。原主已故的，收归政府所有。原主未归的，交由政府代管。这几年种了别人的地，一律按五五开交租。听明白啦？”

“第二条。补交各项税款。从民国三十五年以来，未向国民政府缴纳的税款，全部要交齐。国军家属和被共党残害的家庭，可全部免交。共党和共军家属，加倍交纳。”

人群中的不满，尽管有刀枪架着，也压不住了：我们交不出，我们没有钱。

“谁说没有钱？哪个说没有钱？”陶富贵板着脸追问。

人群里一时没了声音。

过了一会儿，迟得法觉得自己是中农，和共产党也不是一帮，讲点话应该不会有事，所以就壮着胆子想替大家出个头：“陶老爷，这好几年收成都不好，今年也旱得厉害。这些年，人家共产党也没收什么税。现在收成也还没下来，一下要交这么多，实在拿不出来啊。”

“是哪个在讲？”陶富贵走进人群，恶狠狠地到处找。

“哦，是你啊？”陶富贵认出了迟得法，“你不就是那个姓迟的吗？共产党给了你什么好处，这种时候都还替共产党说话，你昏了头啦。”上去就给了迟得法一巴掌。

迟得法被打得全身一晃，差点跌到，一把年纪在众人面前挨打，满脸通红地羞愧，嘴上不敢对骂，心里却种下了切齿的恨：“狗日的，杀千刀，活该全家被杀掉。你姓陶的，也不得好死！”

陶富贵怒气未消，还在说：“没有钱？那好办。用土地、房屋、财产顶上。三天之内，交不上税，就别怪我陶某人不客气，那就派国军弟兄上你家收地、封门、搬东西！”

“还有第三条，要全力劳军。眼下正处于勘乱建国的严峻时期，国军在前方打仗，我们各位乡亲要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人出人。只要国民政府需要，我们就二话没有，一切照办，统统地捐献。”

“第四条，要严惩共党份子……”

正讲到这儿，场院的巷口，忽然嘈杂起来。几个国民党兵拖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走了过来。

余排长忙过去问了情况，又回来向罗团长报告：“团长，真的抓到了一个共党。”

“是嘛？还真能抓到？带过来！”罗团长大为惊讶和兴奋。

陶富贵也伸长了脖子在看，能抓个什么共党。

抓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倔强的老人——祖责成。祖大爷被全身捆绑，头顶只有几根短短的白发，脸上道道血痕，嘴里还在大骂不停：“狗日的国民党！狗日的国民党！”

余排长上去一巴掌，“你他妈的，还在骂，找死啊。”

陶富贵一看，还是个认识的人，“你这个老东西，快进棺材的人了，也算个共产党？”

祖大爷胸膛一挺，毫不含糊：“老子就是共产党，就是要灭掉你们这帮狗日的国民党。”其实，老祖还真不是共产党员。

“王八蛋，我就不信你不怕死，你再骂句试试？”余排长指着祖大爷的鼻子说。

哪知祖大爷，“呸！”地一口痰吐到了余排长的脸上，“告诉你这小子，老子亲手杀过不知多少地主国民党，早就够本啦。还轮到你还从裤裆里钻出来。哈哈，哈——老子就是不怕死。早死早投胎，早点回来再杀你们这帮地主国民党！哈哈，哈——”

祖大爷一阵又一阵地狂笑，从内心迸发出一种别人所无法理解的豪气。

陶富贵被祖大爷的气势给镇住了，气得浑身发抖，站在那儿说不出话来。

罗团长大叫着：“打！给我往死里打！”

余排长跳起来，一蹦老高，袖管往脸上一抹，擦去祖大爷的吐沫星，抓起身边一个国民党兵的枪托，向祖大爷的嘴巴砸去。祖大爷满嘴鲜血直流，但却毫不示弱，又是“呸”地一口，鲜血和着碎牙吐了出来。

余排长又一枪托砸去。

祖大爷身上不由自主地颤了一下，仍然毫不畏缩，直瞪着大眼，看着枪托过来。

这一枪托砸来，祖大爷被打倒在地。

“都上去打！”罗团长命令其他那些小兵。

于是，一群国民党兵一拥而上，围着倒在地上的祖大爷，噼噼叭叭一阵乱打。余排长，还不解气，居然转过长枪，用刺刀连着猛刺。

祖大爷始终一声不吭，鲜血染遍了他的身躯，淌满了身底下的沙土。

祖责成无畏地牺牲了。

人群尖叫着，哭喊着，往外跑着。

国民党兵拦也拦不住。

陶富贵还在后面咆哮着：“三天！交齐！三天！交齐！”

13.2平金刚脱险

被赶来参加陶富贵的乡民里，有一个没有引起别人注意的人，那就是平金刚。

平金刚在南港的民兵解散后往回走，连夜翻过城墙，躲进家里，一夜无事。本想第二天傍黑，再翻出城去，没料到下午就被国民党兵挨家挨户搜出去开会了。为了怕被别人认出再有意外，平金刚刻意穿着旧夹袄，拴着烂草绳，戴着破毡帽，佝着腰，缩着脖，还特地瘸着走。好在平金刚平常也不是抛头露面的人，大家也都低着头，一下午居然没被人认出。

虽然没被人认出，但国民党、还乡团一下午的猖狂暴戾，目睹祖大爷的被害，使他硬压着满腔的仇恨。往外走时，他看见了抱着孩子的赵玫，她也是紧咬着牙，一眼的怒火。他俩对目而视，没说话，各自走了。

回到屋里，平金刚好不容易挨到了天黑，出了门，躲过了兵士，从原处翻出了城墙。他本想往西面走，看有敌兵，就往东走吧。走一段，停一下，躲一会儿，再看一下，就这样，他从东面，再折向东北，一直跑了三十多里。到了刘家洼，天已经蒙蒙亮，确信没有国民党兵，这才在村外的野地里睡了会儿。

太阳升起的时候，他还在玉米地里趴了好长时间，东瞅西望，这才进村。见一家已经掀开了门，有位老汉在院子里干着活，便轻轻地敲着门板，叫了声“大爷。”

平金刚走的这条路，开始这一段，实际上也是小钱走的路。只是小钱，没有那么熟，更没有那么胆大、那么有经验。平金刚走了一晚上的路，小钱走了三天还没到。

等平金刚按着刘家洼村民的指点，跑到李家泊时，已经是下午了。

刚到李家泊的村口，平金刚就被小孩稚嫩的声息喊住了：“干什么的？”两个小孩从草垛后钻了出来。

平金刚还没遇到过这种架势，猛地一愣，“干什么？我来找民主村的人，民主村的人不是都到这儿了么？”

“你是民主村的人？你找谁？”

平金刚又累又饿，心里又窝了一大把火，看小孩才十岁出头，就这么挡着自己，还这么啰嗦，竟不耐烦起来，一把就推开了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又哭又叫，把村口的大人都引来了。

“哪个这么撒野？”李家泊的一个喊了起来。

“从哪儿跑来的？”

平金刚一下就被人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盘问着。

“我提了一条命，好不容易跑到这儿，还不让我进啊？”平金刚还不服气，可别人大眼瞪小眼没反应过来。

“我是从国民党那儿跑出来的！”平金刚只好大声吼着。

大伙一愣，有人说，“赶紧喊民主村的人过来！”

鲁队长腿快，先跑了过来，一见到平金刚，大吃一惊：“啊呀！是你啊！你跑哪儿去啦？这一夜，怎么过的？王立他们呢？”一连串的问题，劈头而来。

平金刚一五一十地说着。

平金刚说，“我躲在门板后，好不容易等到过了晌，国民党兵就砸开门，凶得不得了，二话没说，拖了我就走。我以为要把我拉出去枪毙了，把我吓得吧。”

“有没有抢东西啊？”鲁队长问。

“抢啊。街上到处都是国民党抢的东西，扔的东西，丢的东西，一塌糊涂。”平金刚看围着这么多人，急迫地等着他的话，也就顺着说了。

“国民党，有谁领头？有咱龙头跑出去的么？”于村长问。

“那个陶富贵回来了，还当了什么县长呢。”平金刚答道。

这时，民主村的乡亲们，听说有人从龙头跑出来了，都赶过来打探消息。平金刚的四周都围满了人，后来的人都挤不进去。

听到是陶富贵回来了，又是一片议论声：

“又是这个杀千刀啊。”

“又是这个冤家死对头。”

“他来找死啊。”

“你还见到谁啦？赵玫、董平章他俩呢？他俩也没出来。”姜雪花很关心地问。

还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围着过平金刚，等着他说话。平金刚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这么有身价，于是就说了起来：“我看到赵玫啦，看到啦。她抱着孩子出来，真可怜。有个国民党兵，还想对她拉拉扯扯、动手动脚，被她大骂一顿，都气哭了。”

人们更是一片怒骂声。

“还有更惨的呢。”平金刚说。

“还有什么？”大家问。

“祖大爷死了。”

“啊？！”人群里一片惊讶。

“祖大爷死得好惨哦，呜呜……呜呜呜”平金刚哭了起来，越哭越伤心，他是真的哭了。

“快说呀，快说呀！先别哭了。”大家一个劲地催着。

“国民党把祖大爷五花大绑地捆了过来，就用刺刀捅。捅得那个惨哟，肉一片一片地刮下来，白骨都剔出来了。呜呜……”

人们愤怒了，跺脚的，骂的，哭的，声浪高过了一切。

两个村的干部，部队的干部，也都过来了。

胡指导说：“这是阶级教育最现实最生动的材料，应该立即召开大会，把部队动员起来！”

于村长说：“那民主村的村民更应该参加。”

他们当即决定，立刻召开两个村和一连、三连的军民大会。

会场就放在村北的一个小山坡上。

令营长说，二连先别参加，由他们沿大河岸一线展开警戒。

人们一听说开大会，浩浩荡荡地都过来了。

会场也不用任何的布置，几个干部站在前面，留出一小点空地，人们就很习惯地站在下面。

胡指导在指挥着，“民主村的，在中间；李家泊的，在右面；部队在左面。往后排，往后排。”

大会由胡指导主持。

他站在中间，看到有这么多人下面热切地朝他看着，心里也不由得热情高涨起来。

“同志们！乡亲们！现在大会正式开始了！”胡指导嗓门宏亮地说，“我们今天这个大会，是个阶级教育大会，是个战斗动员大会。国民党反动派丧心病狂、垂死挣扎，悍然进攻我龙头解放区，地主还乡团对我革命群众疯狂报复，公然杀害我革命群众。下面，请刚从龙头镇突围出来的民兵英雄平金刚控诉敌人的滔天罪行。”

平金刚第一次走上了大会的前面，正不知道怎么站和怎么说，李家泊的村长走到胡指导前面说了几句，胡指导点了下头。

李村长便向下招了下手，而后大吼一声：“把李家泊的地主富农反革命押上来！”

只见从人群的后面，出来一队挎着枪、扛着长矛的民兵，拖着七八个年龄大小不等、衣襟破烂、脸色苍白的男女地富，来到人群前的空地上。

随着李村长的又一声大吼：“跪下！”

在民兵的一阵推搡踢打下，这帮地富就朝着群众低头跪下。

胡指导又朝平金刚点了下头，示意可以开始讲了。

“我要控诉，我要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平金刚在这气氛中也很快进入了角色，“我从南塘撤下来后，不放心家里面，就翻过城墙，进了城里。”

下面的一些妇女老少，传出了啧啧之声，“想不到金刚这小伙还这么有本事，还这么念着家里。”

平金刚听到了底下的说话，没想到自己还得到了乡亲们的称赞，心里也不紧张了，换气也顺畅了，嘴皮也溜荡了，“到了家，看家里已经都撤出来了，没人了。本想立即再跑出来，但满街都是国民党兵了，门外都是皮靴声，西赖子的叫骂声(说明：西赖子，是一些胶东人对他们所看不惯的西部地区一些人的贬称)，噼叭的枪声。我在门后趴了一晚上，想等第二天晚上再出来。结果，第二天中午，敌人就挨家挨户地搜。一脚就把门揣开，一刺刀就伸到了我脖子上，不由分说就把我拖了出去。我跳起来，一把推开刺刀，想跟他们这帮狗日的拼了。结果，他们上来好几个，把我打倒在地，噼噼叭叭地把我好一顿打。你们看，这身上的伤。呜呜……”平金刚不但痛哭了起来，而且还伸出胳膊、挽上衣袖、露出爬城墙时擦伤的皮肤。

“打得好狠啊！”乡亲们又怜悯又愤恨。

“这些国民党，不但抓人，还抢东西，把各家各户的东西，扔得满街到处都是。”

“啊？！”人们都瞪大了眼，不但可怜着平金刚，也开始牵挂起自己家里的不管是值钱还是不值钱的物品。

“到了场院，一片杀气腾腾，四处都是国民党兵，架着枪，端着刺刀。那个陶富贵，站在中间，耀武扬威，神气得不得了，说是自己当了县长了。”

“呸！”人群里一阵唾骂。

“那个王八蛋说，所有土改分的房和地，都要还给地主，这五年没交的租子，三天内都要交齐。”

“噢，噢！”

“早晚要刹了他！”

“抓回来，把他碎尸万段！”

下面已是一片怒骂。这是农民最痛恨的事，虽在大家意料之中，但最终听到耳朵里时，人们还是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胡指导不失时机地带领大家高呼口号：

“打倒国民党！”

“消灭地主阶级！”

“保卫胜利果实！”

口号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人们的情绪也激发到了高潮。

“那个姓陶的王八蛋还张口说，这几年的各项捐税也都要加倍交还。”

“嘘……”这样的话，大家也都不信了，知道狗屁国民党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那祖大爷呢？”下面都已经着急了，想听祖责成到底怎么样了。

一提到祖责成，平金刚又“呜呜”地泣不成声了，“惨哪，惨哪。”

“祖大爷来的时候，就已经是五花大绑，像狗一样被拖过来，身上被打得满是一条条血印。可祖大爷非常勇敢，虽然被打成那样，还一直在大骂国民党，还往一个国民党脸上吐了一口痰。”

“国民党这就气急败坏，几个国民党兵围上来用刺刀捅。祖大爷浑身血直冒。敌人把祖大爷的肉一块块地挑下来，把祖大爷的手指一节一节地剁下来，疼得祖大爷直蹦直跳，就这么活生生地弄死了。血肉淌了一地，都分不出人样了。呜，呜呜……”

平金刚真的嚎啕大哭起来。

于村长心里在嘀咕，看不出平金刚这么个平常少言寡语的，还真能说上这么一大套，行啊，到底是革命锻炼人啊。

这时，人们的愤怒像火山一样地爆发了。大家都站了起来，满腔怒火，浑身扭动，振臂高呼，口号声震耳欲聋。

“打倒国民党！”

“消灭蒋匪军！”

“消灭地主阶级！”

“血债要用血来偿！”

前几排的人，干脆冲上去，照着跪在地下的地富噼噼叭叭地打下去。李家泊的民兵赶忙加以阻拦。

最激动的人，恐怕要数他的妹妹平金芳了。她捏紧小拳头，忘情地呼喊，脑后的辫子又在直蹦跼。她为有这样英雄的哥哥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胡指导很满意有这样的教育效果。

于村长怕乱了秩序，赶紧接着讲话：“乡亲们，乡亲们！这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啊。下面请贫下中农代表姜雪花同志讲话。”

姜雪花满脸激愤地走上来，无比愤慨的说：

“地主国民党要变天，我们坚决不答应！地主老财的天下，就是我们穷人的死路。当年，我在地主陶富贵家当丫环，吃尽了人间的苦头。当时，才四、五岁，晚上都不让睡，给他们捶腿。稍一打磕睡，那铜的烟袋头就打到我的脑壳上。到现在，这一片都长不上头发。冬天，不管大风大雪，都要背着上百斤的衣服被褥，到大河，敲开冰去洗。皮肤都烂了，伸进冰冷的水，十指钻心疼，可有谁来管。永远忘不了，十二岁那年，有一次，下着雪，往回走，那份量更重，早晨喝那点糊糊根本不顶用。上坡时，滑倒了，手脚都冻僵了，牙齿直打颤，就是起不来，也喊不出声来。眼前一片白茫茫，全身都动不了，心里想，我今天就要死在这儿了……”姜雪花流下了泪，流下了别人很少看到的泪。

“我想，我死了，我爹妈都不知道。我到今天也不知道我爹妈在哪里。我只知道，我是个穷人的孩子，是个无家可归、四处流落的穷人的孩子……后来，那天，是王建悟大叔救了我，把我拖了回来。可是，没有人性的陶富贵，第二天，还要逼我去大河洗衣服。直到现在，我看见那条大河，心里就打怵……”姜雪花又流下了无声的泪。

很多老人和婆娘，也勾起了伤心往事，唉声叹气、唏嘘不已。

“是共产党领导我们闹革命，分了地，分了房，有了家，真的是翻了身。”姜雪花脸上露出了一丝喜悦。“现在，这个该千刀万剐的陶富贵又回来了，那就没有我们穷人可走的路了。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拼了命也要坚决走到底！”

“跟着共产党！”

“坚决闹革命！”又一阵激昂的口号声。

接着是民兵代表鲁队长、战士代表大郑等一一发言。

他们还没讲完，秦德才却跳了出来。

他还是那身打扮，旧军装上的血迹还没洗去，一脸的肃杀之气。

“我要讲，我实在憋不住了。”也没等别人发话，他就只管讲下去。

“我也没有更多的话。我和地主国民党，势不两立，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他抓到我，就是他杀我，抓不到，就是我杀他，没有第二句话。我知道，祖大爷和我一个脾气。从今往后，我要替祖大爷多杀几个地主。杀光地主富农反革命，才能天下太平。

我现在看下面这几个地主就不顺眼，砍了算了，省得拖来拖去多费事。”

说完，便抽出身后的大刀，高高举起，要砍下来。

下面一片哗然。

边上李家泊的民兵，赶紧几个人上去紧紧抱住，抓胳膊的抓胳膊，抱住腰的抱住腰，最要紧的是，把他的刀夺了下来。

秦德才一边挣扎，还一边喊叫着：“怎么不让我革命？你们怎么不抓地主反抓我？你们这是包庇地主，是富农路线，是地主路线！”

秦德才被李家泊的民兵抬了下去。

“你们压制贫雇农的革命精神，是要受到批判、是要受到审判的！”秦德才被抬到外面，还在人群中叫个不停。

李村长不悦地说：“这么大的事，怎么先前也不说一下。就算要杀，也轮不到他呀。”

于村长不好意思地对李村长说：“我们村有的人不懂规矩，我都不知道他会来这一手。实在抱歉，实在抱歉。”

令营长站了出来，没提这件事，对着大家说：“敌人这是在垂死挣扎，它跳得越高，越凶残，灭亡得就越快。它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却居然把尾巴伸到我们窝里来了，那我们当然要坚决斩断它！”

“当前的情况，使我们进一步理解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使我们看到几年来解放区建设的必要性，尤其是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是土地改革使我们广大贫下中农彻底翻了身，是土地改革使我们广大贫下中农下定了决心跟党走，是土地改革使我们广大贫下中农同地主国民党永远势不两立。”

“革命已到了最后时刻，胜利就在眼前。同志们！行动起来！坚决杀敌！我们有些同志，老觉得，我们没有跟着大部队跨过长江、解放南京，不过瘾，不够痛快。同志们哪，我跟你们讲，眼前这块龙头和黄港，是国民党在北方的最后一个据点。解放龙头，它的意义，跟打到江南去一样大。”

“同志们！拼着我们的血肉，奋勇杀敌！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李家泊的军民大会，是很成功的。统一了思想，稳定了情绪，激发了革命热情。无论是部队，还是老百姓，都从龙头撤出来时的那种焦虑茫然中摆脱了出来。工作、思想、备战、训练、生活、生产，渐渐走上了正轨。

但是，解放军部队没有立即反攻去收复龙头镇。前线指挥部采纳了一团团长的意见：暂时放弃龙头，未必不是好事。吸引黄港敌人的部分兵力到龙头来，有利于对黄港守敌的解决；在龙头镇外开阔地带消灭敌人，比在黄港高楼林立的大街小巷里要方便得多。所以，采取等一段时间，围而不打，看看敌人的反应。当然，非有特殊情况，战线不再后退。

从黄港前线 and 北海各调来的一个团，在东西线，已分别各自就位。还准备再调一个师，作为反攻龙头的主力师，正在动员集结中，不日即可到位。

13.3 分歧日渐

国民党军方面。

正从黄港运兵过来，速度也不是很快。

334团已基本来齐，驻龙头及以东地区，北面占了茅山。东面，想推进到小河口，但已被新来的北海团挡住。

团部设在陶家大院。虽说是大院，也不过前后两进，团部在后院，进出极不方便。更何况，陶、罗两人，各有自己的私秘，罗又极看不上陶的为人，尽管罗自己也算不上是君子之辈。

才三日，罗便提出分手。滕营长知道罗的心思，发觉城东的学校，位置不错，地方也不小，有好几排平房。尤其是，这儿最大的好处是，地势开阔，容易发现情况，也容易转移，往哪儿跑都行。已经有不少兵住在了里面。

“只是还有个外人在里面。”滕说。

“这时候还有谁啊？”罗挺惊讶。

“原先的那个校长，一个穷酸书生，大概共产党也不一定喜欢他。”

“那就让他还住着吧。士兵们开饭，也可以给他一份。”

“啊呀，难得团长还有菩萨心肠。”滕忙着讨好说。

“嗨，都是落难人。说不定，我们以后还赶不上他呢。”

这句话，把滕营长说得灰溜溜的，一时无语了。

下午，罗还去看了一下，也觉得这地方行。当然，他没去看那个余校长。而后，滕营长便叫余排长带人去收拾打扫。

罗回去，便跟陶说了。陶落得顺水推舟，连客套话也没讲，就欣然赞同。

第四日，罗便“乔迁新居”。

章团长有点郁闷。自己的青一团，老是不能全部调来。黄港司令部好像有点不那么痛快。章团长自己也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辗转反侧，百思不得其解，只好无奈之。

兵力布置，首先放在望海山，那是龙头镇和整个占领区的屏障。望海山一失，其它地方就绝无可守之处。二是赵村，那是青一团手里唯一的居民点。章团长所以想要掌握一个居民点，还是有他深层次的考虑。尽管，他对如今的国民党政权已经不抱什么希望。可内心里，对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想，总也

放不下，总还想找个机会亲自试一下，到底怎么样。这次，来到海源，有这个赵村，或许是最后的机会了。至于大河口，有大片泥沼，不便于大部队展开，估计不会是共军的攻击点，有少量兵员警戒即可。

青一团的团部，放在望海山南山腰上的望海教堂。章团长自己也挺满意。北靠自己重兵把守的望海山，南面就是龙头“县城”。教堂本身虽然小了点，却是方圆几十里内唯一的全砖结构的建筑物，打扫打扫还挺干净。第三天，把名义上的自己那个指挥部也定在了这儿。

几个头儿中，最不痛快的要数陶富贵了。尽管开了会，甚至还杀了老祖头作为祭旗，来个杀鸡给猴看。可这帮老百姓愣没给镇住，说了三天内要交租交税，连一个子儿也没见。要去抢吧，陶富贵不是没有这个念头，可手下没兵没卒呀，愣是没辙。陶，这两天是抓耳挠腮，挖空心思，急着呢。

还有个不痛快的事，就是也不见一个来退地退房的。这房，还好说，就明摆在那儿，去把人家赶走就是了。况且，当初分了陶富贵家房子的人家，这次全都跑了，连赶也不用赶，进去就是了，再不行，就贴上个封条。可就是这地，有点烦。原来的地契，土改那阵，藏在弟媳的内裤里。没想到女眷们个个被光屁股搜身。结果，因为藏匿地契，他弟媳妇被倒提着大腿从中间劈开了，地契也都给一把火烧光。现在，这些地，大块的，能记得，小块的，记不准了。尤其是，他兄弟份上的那些，现在当然也是他的了，就更记不准了。

陶富贵，今天在镇四周都已经转了一整天了。虽已日落西山，却还在南埂上，看这原先的地界，是在地埂的这边呢，还是在地埂的那边呢。

天色越来越晚了，视线越来越模糊了，陶富贵看不清了却还在那儿看。

13.4赵村新政

自从来了国民党，赵村人越来越搞不明白了。

明明白白是国民党兵，可跟以前看见的、听说的大不一样。住在村外的帐篷里，讲话也不是满嘴粗话，早晨还会帮村民挑水，虽然摇摇晃晃，不像挑水的样。开饭时，说不定还能给边上看热闹的小孩几个白面馒头，这可是过年也不一定能吃上的好东西呀。尤其是，没有来抓村干部，更没有来抢东西。

这是国民党吗？可分明扛的是青天白日旗，戴的是青天白日的徽章。

地主赵炎黄，憋了两天，实在憋不住了。从村边的窝棚里出来，径直来到了以前自己的房子，现在是贫农赵刊新住着。

赵炎黄怎么能不憋气？做梦也没想到国民党还能回来，可回来了，却什么动静也没有。穷光蛋还是住在他赵炎黄的房子里，一点也没有想搬的样子；自己眼看着自己的房子进不去，却还钻在窝棚里。

赵炎黄站在自己的院墙前，使劲地拍了两下大门，都没舍得拍第三下，大声地嚷着：“姓赵的，姓赵的！”

门并没有插，一拍就开了。

赵刊新出来一看，就明白了，可也并不气短，说：“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你说怎么回事？赶快给我走人。”

“凭什么？”

赵炎黄一愣，这小子怎么还问这种没道理的话，“凭什么？你没看见国民党都回来了，共产党都跑了？”

赵刊新心想，你这老小子还不知道我就是个共产党，当然嘴上不能说，“国民党来了，怎么啦？他也没说要还给你房子。”

赵炎黄一时还真没了理由，只是喊了声：“你给我滚！”上去就要拉扯赵刊新。

赵刊新哪容得他拉扯，两人便拉着，喊着，骂着，打着。

院里院外挤了好多看热闹的人，可都不知道该怎么劝了。

甚至还有两个挺年轻的国民党兵，也在一旁看新鲜，并不进来管个什么事。

过了一会儿，那个孔班长过来了，说：“都别吵了。国民政府会有统一安排。”他对着赵炎黄说：“知道你的心情。你先回去吧，先忍耐一下，一两天之内，肯定会有说法。”

此事，呼营长找了章团长。章团长又把随军来的省党部刘子录秘书长从舰上喊了过来。

这位刘秘书长，四十开外，戴个眼镜，瘦瘦小小。原是个中学教师，因进饷太少，便弃文从政，可也没多大进展。直到这几个月，“政府”里，人都跑了，机关都散了架了，才有一个“省党部秘书长”的衔掉到了自己头上。这名称，不明就里的人听上去觉得不得了，其实只有一个亭子间大的办公室，总共两三个人，放个屁也没人听的差事。

虽然如此，但刘秘书长本人是民国新政的热心者，喜欢倡导“新生活运动”之类的事。国民政府的土改事宜，归省党部管，所以，章团长这次特意把他给带来了。不过，刘秘书长长住城里，并不深知乡间世事，能不能开出好方子，也难知。

几人商量了一番，便约定次日上午开村民大会，公布三民主义试验区对于土地问题的新办法。

次日上午。

村西的河滩边上。

这次会，来得人挺多。孔班长一敲锣，说是开会啦，能来的几乎都来了。大家都想听听，这一帮的国民党，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大会由呼营长主持，刘秘书长宣布对所谓“光复区”土地问题的处理办法。

“乡亲们，你们受苦啦，我们来晚啦。”刘秘书长自然要讲一些套话，但下面吵闹得很，不想听这些。

这位刘秘书长只好赶紧往下说，“我们这次来，不但要把你们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还要推行三民主义的试验。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国父中山先生早就提出来了，蒋总裁也有意于此。只是世事多艰，国民政府一直没有腾出空来。共党所谓的土改，挑起仇恨，涂炭生灵，留下了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我们省党部对此已有全盘的周全考虑。”

“现在，我宣布如下：考虑到共党的土改，已经实行多年，牵扯问题较多。为减少矛盾，减少动荡。对共党的土地分配，一般予以承认，不再变动。”

下面一片喧哗，议论纷纷，都听不清说的了。

赵炎黄嚷得比谁还响：“那我的地就没啦？！”

“注意听，下面还有。第二，对地主富农分掉的土地，由政府予以补偿。但分去的房屋、财物，应予归还，损坏的，应予赔偿。”

下面更是吵成一锅粥。

“第三，这几年，在共党的控制下，你们也没能向国民政府纳税。考虑到你们的困难，这几年的捐税，包括今年的，政府全都免了。你们要感谢政府的良苦用心。”

“第四，政府考虑到你们在共党统治下，痛苦不堪。对于贫苦民众，不论地主，还是贫农，政府都将予以补助。”

“第五，共党分子中，对有血债的，杀过人的，必须严惩，其余的，不问。”

话还没完，下面就吵翻了天。

赵炎黄就第一个不算。他说：“那个土改，是共产党搞的。怎么能算数呢？我本来十二亩地，家里老小五口人，勉强过日子。土改时全部被没收，另外给了两亩多山地，喝稀粥也不够啊。”

赵刊新胆子大，面对国民党也敢说：“我是住了赵炎黄的房子，不错。可他那房子，实在不怎么样。进去时还漏水。我给他另翻修了，还上了两行瓦。这个怎么算？现在叫我搬出来，我往哪儿搬？”

“我管你往哪儿搬。我今天就要回去住。”赵炎黄赶忙接上话。

“我没跟你说，我是在跟长官说。”赵刊新没有好气地说。

大家都看着那位刘秘书长，那位刘秘书长竟然答不上来，一时语塞。

还是呼营长出来解了围，“我给你一顶帐篷，你搬进去。那比窝棚要强多了。”他对赵刊新说，“一顶不够，给你两顶。”

这话把赵刊新给说回去了。

可赵炎黄还没完，“这些年，我们挨的打，挨的骂，受的气，就这么算啦？”

一位白须老汉说了话，是族里的长者，还是个村长，“炎黄啊，有些事就算啦。人生一世，算不了那么多帐。你们家的人，都还在，比比那些死去的人，不错啦。”在共产党的村长里还很少有这样身份的。

“这位老人家，讲得有道理啊。”呼营长见有来圆场的，连忙夸奖了一句。

“那，死的人就白死啦。应该把民兵队的那个洪队长绑起来枪毙。”赵炎黄还没解气。

“我们村里死的几个，都不是我们村自己打的。是民主村那个老祖动的手。”赵刊新说。

土改当时，乡里看赵村发动不起来，便派了民主村的祖责成、秦德才几个过来动的手。他们一来，下手可不轻。

“民兵队的那个洪队长是外姓人，早跑了。斗地主的时候，跳得比谁都高。听见国民党来了，跑得比兔子还快。”看来，赵刊新对他们的队长也不喜欢。

赵炎黄还有说不完的话：“那分出去的地，怎么补？”

刘秘书长这时才又接得上话：“我们到时会逐户核实，将地折价发给土地债券。”

“我们不要什么债券，黄港的金圆券发了几个月，就不值钱了。我们要地，不要券。”别看赵炎黄被打翻在地好几年，可还是在观察着天下形势。

这句话，引来了另外两个地主的赞同：“我们要地，不要券。我们要地，不要券。”

刘秘书长又是无言以对。

“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你们国民党。弄了半天，就这个样啊？”地主们又是一片伤感，落泪纷纷。

赵刊新这帮贫农也不示弱，指着呼营长说：“我们是听了你这位长官在那天说的，才留下来的。如果还要把房子、土地交给地主，那我们早跑了，还用等到现在啊？”

呼营长跟旁边的章团长耳语了一下，章团长点了下头，而后呼营长便大声说：“这样吧，先每户发白面一袋。”

出于在黄港有美国驻军的考虑，为稳定当地市内局势，美方有慈善机构提供了一定量的面粉。这些面粉由黄港司令部分配，很少能上市面向老百姓销售，绝大部分到了军政单位，尤其是嫡系部队手里。青一团是汪司令的王牌，面粉是不缺的。

“噢，噢。”下面有不少人高兴了，纷纷往前挤过来，伸着长手要面粉了。村民们即使在过年，也很少有几斤面粉的。

呼营长脸有不悦，“这么吵吵的，像什么样子？面粉还在船上呢。一是你们要出人去船上去扛回来，顺便也帮我们干点活。二是，领面粉时，必须高呼：‘拥护国民党，拥护三民主义’，而后到孔班长那儿登记、摁手印，村长核实。”

这一下，场上顿时无声。那白胡须村长也连忙推托：“老夫朽矣，从不管具体事务，实难受此重任。”呼营长心里说，狗屁，这算什么重任，嘴上说：“如果大家都不喜欢面粉，那就算了。”

赵炎黄等几家地富忙着呼喊拥护国民党之类，跟着要去扛面粉。

大家也就一哄而散。

章团长穿着便衣，在一旁观看，一句话没说。

看大家走后，呼营长问章团长：“咱有这么多面粉吗？别发过了头。”

章团长一拍脑袋，苦笑一声，“我也没细算这个账。到底要多少，还能不够么？”

原来章团长也是这么一说。他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习惯算这些账。

“这样吧，发的时候，就把一个面袋分成二小袋。”刘秘书长出了个主意。

“行，行。”章团长倒也同意。

至于有多少村民真的敢去军舰那儿领面粉，就不得而知了。不过，至少赵炎黄是去拿了。

晚上，赵炎黄带着全家老小，扛着被褥，又来到赵刊新家门口。

赵炎黄说：“你还有什么话说？”

赵刊新也不硬顶，说：“急什么？国民党还没给我帐篷呢？”

赵炎黄当然不让，“给不给帐篷，那是他们的事。要住进来，那可是我的事。”

一个说，不给帐篷就不给进。

一个说，给不给帐篷，我都要进。

自然又是一番大吵。

刘秘书长领着孔班长过来了。

刘说：“现在没有现成的空帐篷。你，赵刊新，先腾出一半。人家在窝棚里住了好几年，也不容易，先让他们进来。等有了帐篷，马上给你，那就全部搬出去。”

这也安顿不下来。房子是四间，中间是堂屋，一边是一间，一边是两间。

赵炎黄说，“我家人多，我要先住两间。”

赵刊新说，“那我住这两间。中间这堂屋，就不让你走。”

“那我怎么进去出来？”

“那我才不管。”

刘秘书长又无奈。

孔班长出来调解，对赵刊新说：“你那两间里的东西，可暂时不搬，先堆在一起。但中间的堂屋要让人家走。”

赵刊新一时也无语。

“他的东西，得你们老总来堆。我来搞的话，又得啰嗦。”赵炎黄说。

孔班长只好答应，对边上两个兵说，进去收拾一下吧。

这事总算捱住了一时。

章团长和刘秘书长，都知道这事情的难办了。三民主义不是那么好推行的。

章团长思之再三，如果承认共产党的土改，地富手上的地，确实太少，难以维持正常生活；而且也变成了共产党闹土改，国民党来出钱买单，于理说不过去。

他又找来了刘秘书长，说：“要不，你再拟一个调整方案，试试看。土地全村按人平分，给地主富农再补一点地。分到地的农户也要多少出点钱，补给地主，贫农也不能完全白得地。这样两头都均衡点，能不能矛盾就少一点。”

刘，沉思，说，“好。”

13.5高增光逃脱

海角的炮声，震动的不只是龙头镇，也震撼了整个海源大地。

高家沟——海源县北面群山里一条很普通的山沟，在县城的东北面，离县城五、六十里。这儿是小东河的上游，在小东河的两岸和它的支流所形成的更小的山沟里，散布着十来个村庄。

高家沟，就是在这些更小的山沟里的一个小山村。前后是高耸的大山，村庄就隐没在浓密的树林和弯曲的山路后面。农家的炊烟和雄鸡的啼叫，才能让人知道那里面还有一些人家。尽管这儿离县城不算太远，但过去也很少有人去过，山路的崎岖造成信息的闭塞，多数村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不知有晋魏的农耕生活。但这些年剧烈的社会动荡，也照样冲击着这小小的山村，几乎没有什么遗忘的角落。

这是村北面一个已经被废弃的农家院落，是高家沟集中看管地富的地方。虽是很小的山村，但也被划出了三户地富，要不怎么开展阶级斗争呢。这是个狭窄破旧不堪多年没人住的院落，三小间泥墙草房，都快要坍塌了。

一个年近三十的男子，名叫高增光的，正蹲在地上，高高的个子，满脸胡子拉茬，脑袋和下额留着深深的刀疤，眼睛里流露着凶狠的目光。他连这样的房子也没资格住，他一家三口是住在窗外的猪圈里，上面搭了些玉米秸。应该说，他家在本村是第一大户，算得上是地主。他爹高老头在当地算是个能人，不但有两三座山峦，在北山镇上还开了个店铺。抗战时期，那一带，并没有日本人来过，但是国民

党、共产党、伪军、还有各色草头王，来往川流不息。他爹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两杆枪，联络了附近几个村，搞起民团，在北山镇拉起了“联防自保”的旗号，自封北山区区长。抗战结束前后，共产党的队伍，势力日见壮大。1946年，连海源县城龙头镇都已经被共产党攻下，高老头还不肯放下他那“联防自保”的旗帜。一天，八路军终于开到了北山镇外，兵临城下。各村的人马，不战自溃，夺路狂逃。高老头也跟着自己村的几个人，逃回了高家沟。八路军也紧跟而来，冲进村里。没料想，民团的那两支破枪，突然开枪抵抗，打伤了两个八路。不过几分钟的时间，高老头和那两个民团，就都被俘获。几天后，八路军把这几人交给了新成立的高山区民主政府处理，其结果自不必说，连高老婆也没能活下来。高增光，因为要看铺子，留在了镇上，没有跟着跑回村，所以当时没抓在里面，留了一条命。当然，罪也没有少受。不久，土改时，抓回村里，戴上恶霸地主帽子，被批斗无数，身上伤痕累累，看得见的，脑门上、下巴壳，留了两处深深的刀印。

天逐渐暗下来了。高增光还是蹲着，没动，没有做饭的打算，更没有吃饭的意思。做什么？吃什么？连麸皮都没有了，就是要上村外打树叶，还得报告批准，还得有民兵跟着，你自己不自在，来跟的人更不会给你好脸。

七岁的儿子大概饿了，伸着手，叫着“爹，爹。”扑通一声，又摔了一跤。儿子的一个眼睛，已经被打瞎，另一只，也看不清楚了，走路经常要跌跤。高增光都已经麻木了，过了一会儿，儿子有了哭声，才站起来，要过去扶。猪圈里的老婆，看见的是一个人影朝她过来，吓得直叫：“别打我，别打我呀。”他老婆，这几年下来，也已经疯疯癫癫，精神不正常了。

高增光扶起儿子，什么话也没说，又蹲在那儿了。他现在心里想的是，几天来，从南面传来隐隐的炮声。他知道，那不是别的，那是国民党来了，那是他值得一搏的最后的希望。他也知道，他一走，他老婆和他儿子的下场将会是什么。但他顾不上这些了，就算他在这儿，又能顾得上么。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这一点，他想通了。他要拼命逃出去，只有跑得出去再回来，才能有救孩子、救老婆的机会。他现在，等的是机会。从南面响起炮声以来，村里也加强了对地富的看管。他在等，炮声响了几天，他就已经在等了几天。哪天，炮声一停，他的心就像掉进了冰窖里，透凉透凉，都想去碰死。他，越来越焦急，他知道，机会正越来越少。今晚无论如何，要跑出去。

山沟里的天，黑得早。天色很模糊了，对面走过来，也看不清脸了。高增光下了最后的决心。白天值守的是个儿童团的，高增光认识，叫高梁山，还是个孩子样。高增光想过，对他下手，那是轻而易举的。但那孩子，取了个梁山好汉的名，却是文静得很。高增光一步蹿到他身后，那孩子转过身来，睁着大眼睛，看着高增光脸上的疤痕，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高增光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种，但看那孩子比自己儿子也大不了多少，那无知的愣愣的眼神，使高增光又放下了手。退一步说，白天下手，往外逃脱也不易，这才硬是熬到了天黑。但高增光脸上的疤痕，却深深地印在了高梁山的心上，以至于四年之后又显现了出来。

天刚黑，小小的儿童团员高梁山刚走，值夜班的民兵来了，那是细细瘦瘦的高乐学，站在了门口。他要值一晚上，明天天亮才会有人来接他，这一段的时间最长，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高乐学是个不善之人，虽体格不强，却喜欢逞强好胜，村里斗高增光一家，他常常是走在前面的。“姓高的，”高乐学一张嘴，觉得不对，赶紧又换了句。“你这个黑地主，小心点！”边诈唬边晃荡着手里的棍子，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

高增光满心的仇恨，一言不发，拿着根烧火用的小树叉，敲着锅。高乐学走进院来，看了下，也没觉得什么异常，便转身出去。等他刚一转身，高增光拼了全身的力气，从后面扑了上去，死死地掐住高乐学的脖子，一口气都没让他出，便摁倒在地下。

黑呼呼的天，谁也没看见。他儿子也看不见，他老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那两家地富天天躲在里屋不敢露面，更知道了。高增光又死劲摁了一会儿，确信已死无疑，便把高乐学拖到院门外草垛边，用草盖了下，返身进院，看了老婆孩子一眼，心一酸，没等泪花闪，一扭头就进屋，把堂屋的小后窗掀开，钻了出去。

跳下后窗，就是树林了，高增光一个箭步就钻了进去。

月亮已经出来。朗朗的月光，洒在树林里，本是一个好夜晚。高增光哪顾得这些，拼命地跑啊。好在他很熟悉这儿的地形，先反方向往北跑，跑进更密的树林，跑上更高的山，让人发现不了。而后，再拐向西南，虽然已经两顿饭没吃了，那也得拼命地跑。翻过了两道山梁，穿过了两条山沟，在天亮前，通过了本次逃跑中最关键的二十多里宽的村庄比较密集的平泊地。

东方开始发白了。高增光已经靠近了最后一道山，矛山。前面，枪声大作，高不敢冒然行事，钻进了一块玉米地里，趴着。

还是头天上午喝了点菜帮子糊，肚子都饿得疼，又一晚没睡，头又昏，眼睛都睁不开。高增光硬撑着，他在辨别着枪声的远近和变化方向，判断着双方的阵势。当太阳又一次下山，夜幕再一次降临时，他从玉米地里爬了出来，迂回着上山。一会儿猫着腰，一会儿站着走，一会儿停，一会儿趴，一会儿四下张望，一会儿又竖着耳朵听。终于，在一个四五户人家的小小山村前，高增光看到了戴着青天白日帽徽的国民党哨兵。

“老总！老总！”高增光一下子从小树林里跳了出来。没想到把那个国民党兵吓坏了，扭头就跑，没走两步就摔了个大老跤，枪也扔得老远。

高增光上去，想把那兵扶起来。那兵却浑身发抖，跪在地上起不来了，嘴里还是冀东话，直说：“大爷，饶命哪！大爷，饶命！”

高增光大声一吼：“你看清楚点，我不是共军！”

那小子还在犯迷糊：“不是共军？不是共军，你为嘛来缴我枪？”

“我不是来缴你的枪。我是被共产党逼得没活路，跑过来投奔国军的。”

“是嘛，弄了半天，是这回事。把大爷我吓了一跳。快扶我起来。”

高增光赶紧扶起那兵。

这时候，小村里的国民党兵被惊醒了，跑出来了五六个，大叫着，“咋回事，咋回事？”

这会儿，那兵突然神气了，也喊着：“我逮了个活的！”又向高增光狠狠踢了一脚：“他妈的，老实点，跟我走！”

走了两步，那兵觉得有什么不对头，自言自语地说：“那枪呢？”一看那枪扛在了高增光的肩上呢。

村里的兵，过来一看，就问：“你抓了一个，怎么枪还在人家肩上呢？”

那兵说：“我懒得背。叫他扛着，我乐得省点劲。”

上午的时候，高增光被绑着，押到了东门外的团部。

罗团长听说抓到了共军的一个探子，十分地高兴，跑过来亲自审问。

罗问主审的军官：“对面的共军，是哪一部分的？招了没有？”

“报告团长，始终没招，已经打过好几次了。”

躺在地上的高增光，一听是个官来了，用了最后的劲，喘着气说：“长官，你们要相信我啊。我是个地主，家里都被共产党杀光了。我是杀了一个共产党，拼死跑了过来。你们怎么就不信呢？”

罗团长听了一愣，看了看地下的高增光，想了想，凭经验觉得眼前这人，有点像被共产党镇压的地主富农，就说：“先松绑，坐起来，慢慢说。你们再去个人到陶富贵那儿，叫他们过来个人，认一下。”

高增光一听到陶富贵的名字，忙说：“我认识那个陶大爷，快叫他过来吧。”

高老头和陶富贵有交往，还领着高增光到龙头拜见过陶。所以，听到陶的名字，知道是有救了。

一个小时后，陶富贵和余排长一起过来了。陶看着眼前的这个人，瘦骨嶙峋，刀痕伤痕，面目全非，仔细端量之后，认出来了这个高增光。

高增光跪地，向陶富贵哭诉家庭变故，伤心之处，虽是凶悍有余的强汉，也嚎啕不止。陶富贵想到自家的遭遇，也是老泪纵横，不能自己。

高增光，自此也就走上了坚决与共产党为敌到底的道路。

罗团长说：“正好，我们团的医疗队也来了。你去看一下吧。”

高说：“有饭吗？先想吃点饭。我两天一夜没吃没睡了。”

罗说：“我都没想到这码事，你老高是个实在人。快去吃饭，但是，也没有好东西可吃。副官，你把他领过去吧。”

罗见了一同过来的余排长，也说：“你也去医疗队那边，看看你那胳膊怎样了？”

余说：“好。我也奇怪，怎么还没有好转呢？”

余排长的伤，在医疗队看出问题来了。那是几天后的事情，这儿先不表。

13.6苦力的干活

董平章他们在沙滩上，为青一团干活已经好几天了。

每天，有黄港过来的船，他们就上去卸货，搬到沙滩上，那儿成了临时的露天仓库。青一团还运来了一辆卡车，从海边到惠民寺的搬运，由卡车来进行，但装车也是董平章他们的事。

所谓“劳军大队”，那不过是说说而已的空话。国民党兵有一个班，管这事，有董平章他们干活，这些兵就轻快了，主要是看守，既看守物品，也看守他们几个人。要干活了，就找董平章，把董平章当成他们几个青年农民的领队。

晚上，他们挤在货物边的一顶帐篷里。干活虽然比较重，每次要出力扛上百多斤，但这对于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也并不算什么。吃的也不错，和国民党兵一样的白面馒头，并不是青一团要优待他们，而是因为没有别的粮食，这可是连过年也不一定能吃上的好东西啊。由于他们几个吃得太多，以至于后来规定他们每次只能吃两个，干重活时，吃三个。

尽管如此，他们能安下心吗？不可能的。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是心急火燎，他们都知道、也都看见过地主与贫雇农之间、国共之间曾经有过多少惨烈的事件。尽管今天遇到的国民党，好像比想象中的要“和善”些。但他们最牵挂的是，如今他们的亲人在哪儿？不会有什么事吧？还有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土地上的庄稼，还有给他们遮风挡雨的房舍和房舍里的一件件物品，这些都时时萦绕在他们的心头。

太阳已经很高了，差不多半头晌了。因为是中间休息，他们几个躺在沙滩上，个个心事重重，谁也没说话。

国民党的孔班长走了过来，不客气地喊着：“起来，起来！干活了，都躺了半天了。”

董平章只好答应着：“来了，来了。”站了起来。

王立嘴上说着：“来了，来了。”可是没动弹。

连四娃，是没张嘴也没动弹。

董平章看他们没起来，就说：“咱们还是起来，可以慢慢干么。躺在那儿不干，不就显鼻子显眼了。”

于是，几人懒懒地起来，走向船边。

王立靠近他们，悄悄地说：“咱们不能找个机会，跑回去么？”

董平章说：“你没看见，到处都是国民党兵。不容易。还是忍一下吧。”

王立说：“那得忍到什么时候啊？”

“唉，忍一天算一天吧。好在就听说，只是祖大爷一个人出了事，没听说还有什么别的人。但愿家里人都没事吧。”

几人无奈，又搬起了面粉袋。

连四娃，在这几人里性格比较特别。你可以说他很执着，也可以说他思维方法太简单，这些书面语言都很难用来说明一个朴实的乡间青年农民的行为方式。

他很少与人沟通，但决不是说，这就是心如止水，相反，内心的波涛说不准比谁都高。

刚才听了王立说可以想办法逃跑的话，别人说过去就过去了。他一句话没讲，可却记在了心里，不但记在了心里，还真想动脑筋跑了。

他上船下船，扛了两趟，就往北面走去，好像是要找个树丛撒尿，谁也没有在意。

他不露声色地四下张望，嗖的一声就跳进了那条沙滩与田地之间的沟壑。

他仰天躺在沟壑里，狗尾草伸在了他的脸上，土地和青草的芬芳灌进了鼻翼，灌进了肺腑。向上看，蓝天就剩了沟壑中间的一溜，白云就像从长在沟边的草尖上飘过，四周那么安静。

连四娃，觉得好久没有这么舒坦了。他在家，是老小，挺受宠的。两个哥哥，一个当兵，一个支前，有个姐姐出嫁了。前一阵子，家里正给他说媳妇呢。他还远远地见过，挺不丑的一个姑娘，不知道说成了没有。

如果，不是这次国民党闹腾，这事恐怕就差不多了。他憎恨国民党，不只为这件事。他家原本就是贫农，日子一直挺紧巴。所谓在家里受宠，也不过就是少干点活，有哥哥姐姐挡着，其实也从来没有穿过好的、吃过好的。因为没有吃的，所以，姐姐十四就嫁了出去。共产党来了闹土改，他们家才翻了身，分进了五亩地，分到了四间房，两个哥哥住了过去。本想着好日子要开始了，可就是国民党几次三番地要反攻，怎么也过不得清闲。他连四娃，很早就出去参加了革命，还参加了武工队，入了党，虽然不会说什么话，也看不惯秦德才那种人，但也是个积极分子。如今，反而落到了国民党手里，给他们干活，心里实在憋得慌。

突然，他猛地惊醒，啊呀，现在哪是想这些事的时候。他伸出沟沿一看，很平常，什么事也没有。于是，他向北爬出沟沿，爬进一块地瓜地，在瓜蔓和地垄之间，爬呀爬。接着，又钻进了一块玉米地。就这样，走呀，爬呀，觉得走了很长时间了，腰和背都挺酸了。

他想，干脆站起来走吧，谁会认识他呢，谁会来管他呢。于是，他站起来走了。

穿过一片麦田，一队国民党兵，和他交叉而过，没理他么。连四娃更放心了。

看见龙头镇了，说起来这段路也不算很远。

西门外的人影也能看见了。

怎么过这豁口、进镇里呢，连四娃站在小路上，在想。

“站这儿，挡道干什么呢？”后面有人吆喝了。

连四娃回头一看，是赵村的赵刊新和两个国民党兵走了过来。是那个国民党兵在喊。

连四娃和赵刊新，两人认识，都知道对方是党员。

连四娃吃惊不小，啊呀，难道赵刊新投敌叛变，领了国民党来抓我。刹那之间，连四娃的头脑还没有反应过来，那两条腿就像松开了发条似的，自己就狂奔起来。

“站住！”国民党兵大叫。

也该倒霉，连四娃心急慌忙之中，居然发条不好使，自己摔了一跤。

“你跑什么？共军的探子吧？”

连四娃无言。

赵刊新一看，怕国民党兵想多了，连四娃要遭罪，忙说：“这是城里连家的小三子，我认识。他胆子小，刚才叫你们给吓着了。”

“赵家大哥，你这是上哪儿？”连四娃还没想过来。

“长官要发给我一顶帐篷，叫我到海边来拿。”

连四娃更迷惑了，怎么国民党还发东西。

“你先说你自己在干吗？”国民党兵还在问。

“我，我是要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还用得着逃跑么？你看你胳膊上还有蓝布条，是劳军队的吧？是不是偷了东西，逃出来的？”

“不是，不是。”

一番搜查之后，确实也没有。

“那老老实实跟我们一起回去吧。不过，我可跟你说一句。以后，碰到我们，不要跑。刚才，你再跑三步，我一枪就把你撂倒了。听见啦？”

连四娃只好垂头丧气跟了回去。

太阳升到了头顶，已经晌了。

几人正准备上午要收工，卡车又从惠民寺开了过来。

“快，快！赶紧装车，装完了再休息。”孔班长嚷着。

几人又干了差不多一小时，看见几个国民党兵又带了两个老乡过来。走近一看，大家都惊了，原来一个竟然是连四娃，垂头丧气地走着；一个是赵村的赵刊新，大家也都认识，却是悠然自得地跟在后面。

那两个兵，喊来了这儿的孔班长：“看你怎么管的？把人都跑了，我们给你抓回来了。”

董平章等回头四下看了看，果然，自己人里面没有连四娃。大家都没在意，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大家议论的时候，他一句话没说，没料想，却一个人跑了。怎么又给抓了回来？

大家都很紧张，不知道连四娃将要受什么样的惩罚，遭什么样的罪。

那孔班长过来，哼了一声，煽了连四娃一个大巴掌，大声说着：“你他妈的，你跑了，不知道要连累老子吗？罚站！把那箱子举过头顶，伸直手。歪下来就打。”

旁边，那个副班长说：“班长，你叫他罚站，还不如罚他多干活呢。”

孔班长一想也对，便说：“你一个人把车装完，中午不许吃饭。”

赵刊新看着他们几个，没说话，还眯了一眼，大咧咧地笑着，扛上卷好的新帐篷，跟着那两个兵，要往回走了。

董平章跟赵刊新，多少还有点亲戚关系。董直看着赵，心里只嘀咕，愣是没看出什么意思。眼看赵刊新要走了，便不顾此时此地的情境，大声喊了出来：“大哥，我丈人家怎么样了？”

赵刊新对他一笑，说着：“没事，你放心吧。他们都已经出远门了。”

董平章听明白了，也对赵一笑，“谢谢，谢谢。”

赵走了之后，连四娃一个人毫无表情地、默默地扛着箱子。

董平章他们退了下来。那孔班长对着他们几个，狠狠地说：“你们别不知道好歹了。也就是俺青年军对你们这样客气。你们要是落到旁边334团手里，试试看？不扒掉你们一层皮才怪哩。”

孔班长又对董平章说：“你这个队长，咋当的？连这么几个人也管不好？”

董平章忙说：“我不是队长，我们这儿没有队长。”

孔班长一瞪眼说：“屁话！头已经说你是队长，你就是队长。往后，你们中间，不管是跑了谁，你们都要全体受罚，首先是你这个队长。”

连四娃还在默默无语地搬着。

董平章看，车上还差了一大截呢，便对大家说：“咱们一块去帮一手吧。”

大家都没说别的话，一起上去，十几分钟后，车装好了。

孔班长见了也没管，走了。

大家又坐在沙滩上。

一个国民党兵搬来一筐馒头，指着连四娃，说：“我们班长说了，那个人，没有份。”

大家默默地吃着。

董平章悄悄地塞了一个给连四娃。

连四娃依然无语，大口地咬着馒头。

孔班长见了走过来。董平章以为这下要挨训了，没想到那孔班长拍了拍董平章，说：“嚯，你这个人，看来还挺有义气，行。”说着便又递给了董平章一个馒头。

董平章不明就里，不敢冒然去接，就推辞着，指着筐里说：“不行吧？你那里面不就少了，长官不得责怪你啦？”

“噫——你说啥？”孔班长一听，反而有些不悦，歪着头，把那个“噫”字拉得特长、“啥”字说得特重，充分发挥着河南话的特色：“我说中，就中。谁也管不着。”

第十四章 闲情逸致

1949年1月14日

14.1 方舰长进城

章团长把指挥部，从“济成”号搬到望海教堂，已经三天了。虽然，三民主义的新政试验并不理想，甚至无从说起；虽然，青一团余下部分仍未能如愿调来，可这几天共军未有动作，战事暂时平息，心情倒也难得地轻松一些。想起来，不如叫方舰长过来一游。一则，方也应该踏上海源的土地看一眼。打了一仗，连泥也没沾过，难免有点遗憾吧。要是回黄港述职，也能说上一二三来，不至于对战场情况一无所知。再则，自己和方舰长，还能说得上话来。这年头，像这样称得上朋友的，实在是不多了。上岸两天，感慨良多，又无处可诉，所以，用无线电话约方舰长过来一叙。

指挥部已经有了一辆美式吉普。早餐后，章团长就带着勤务兵，开车来到海角西侧的沙滩上等着。

救生艇劈波斩浪地过来了，冲上浅滩，离沙岸十几米远停了下来。

方舰长还是一身笔挺的蓝色海军装，十分的显眼和雅致。因为知道要去的指挥部，原先是个教堂，所以特地还在胸前挂了个纯金的十字架。他低头看着再也熟悉不过的拍打着小艇的海浪，迟疑了起来。

章团长迎上前去，叫勤务兵下海把方舰长背了上岸。

勤务兵也偷懒，看边上有胳膊系着蓝布条、在干活的老百姓，就喊了一个过来，正巧就是董平章。

兵说：“你去把那几人背过来。这可是我们舰长，你要注意了，好生背着。要掉了水里，可有你好看的。”

董无奈，就过去了。他虽是农人出身，不避寒暑，辛勤劳作，可一生还没有干过此种下等的活。但也从未见过这样有派头的人物，不敢多攀嘴，默默地背着。

方舰长也没叫人背过，多少还有点不好意思。到岸边后，便问：“小伙子，是此地人么？”

董答到：“是的。”

见董平章一副无精打彩的样子，方舰长问：“国军来了以后，不好么？”

旁边的国民党兵，怕他说不好听的、扫了长官的兴，接过话来说：“这是龙头劳军队的队长，是自愿来为国军服务的。”

“是吗？真是难能可贵啊。”章团长不知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地说着。

“你们上岸的那天，我还在地里干活，就被你们带过来了。到现在还没回家看过，还不知家里到底是死是活呢。”董平章虽不敢顶嘴，却还是忿忿地说着。

章团长有点下不了台，又是一句“是吗？”又转头问那国民党兵：“是这么多天，不让人家回去看看吗？”

那兵也不敢答，就朝着稍远一点的人喊：“班长，班长！章团长问你话呢，快过来！”

孔班长一听，赶紧跑了过来，朝章团长一个敬礼：“团长，有什么吩咐？”

“老百姓已经挺不容易，还不让他们回家看看？”

“中。等这批东西搬完，明天让他们回去一次。”

“今天就让他们回家去，明天休一天。现在钱也不好使，就一人发一袋面粉。跟你们连长说，就说是我说的。”章团长又很大方地说了一袋面粉。

“中！”

章团长忽然又想起来那天在赵村差点说漏嘴的话，赶紧跟孔班长轻声地补充了句：“一小袋啊。”

孔班长疑惑地看了下章团长，马上也轻声地回了句：“中。”

董平章几人听到有面粉，这才露出了几天来所没有的一丝笑意。

处理完这事，章团长过来与方舰长握手寒暄，“部下连这样的小事都处理不好，让方兄见笑了。”

“能这样体恤民情，真是能感动上帝啊。”

言毕，方舰长环顾海滩四周，如此之美景，不胜感叹。尽管在舰船上已服役十余年，早已看惯了蓝天碧海，但能在这海滩上一站，也是很少有这机会，十分地难得。

绵延无尽的沙滩，逶迤起伏的山峦，春风拂人，阳光绚丽，白色的浪花，金色的沙砾，层层叠叠的青山绿树。如果不是沙滩上散布的三两个弹坑、堆放的弹药、行走的兵士，真能错把杭州当汴州。

这也已经使得方舰长连连赞叹：“当了十几年的海军，都没想到海边是这样的美。要是我人老以后，能在这儿闲赋晚年，实为人生之大幸也。”

“难得你还有这样的雅兴啊。”章团长笑着说道。

“上帝造物，原本就是为人类福祉，不是叫人争夺打仗的。”因为这次下船带有私人拜访的色彩，所以方舰长也完全不忌讳他的基督徒的身份了。

“哈哈，俗话说，三句话不离本行。不过，我还是很尊重基督教义的。请上车，上车。”

吉普从南门驶入龙头镇。

街上依然是一片萧条。满街的破布碎纸，随风乱转，无人清扫。家家关门闭户，悄无声息。偶有行人路过，也是神色紧张，行色匆匆。

“我这也算是进城啦？”方舰长知道龙头人自称为此地是城里，便自嘲地说，“不知共产党在的时候，会是什么样？”

“肯定也不是莺歌燕舞，你看这民房破旧，无一处新建，便可知其然。当然比现在这样会要好一点。”

“陶县长也不叫人把街上扫干净点？这举手之劳的事，也想不到？”

“老陶忙着呢。哪些房是他的，哪些地是他的，都算不过来呢。”

“陶富贵到现在还算不过这个帐来？还在算那个帐！他还不想想国民党为什么不行了？”

“恐怕人在其中，就身不由己了。我看他是从眼睛到心里，都迷糊了。”章团长说。

“他忙着收地收房，那我们来干什么？”

“所以，我想试一下省党部提出的民国新政的土地处理办法。”

“能行吗？”

“不大行。无论地主，还是贫农，两头都不满意。无法折中，找不到一个平衡点。”

“我想也是晚了。矛盾已经挑起，仇恨已经种下。双方都掐着对方的脖子，都往死里整，谁能放下手呢？”

“是啊，已经晚了。”章团长也感叹着，“土改这事，是孙先生先提出来的，而且还有了一些很具体的意见。可民国以来，说是忙不过来，忙东忙西，就是顾不上土改。实际上是国民党内，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所累，不愿意像样地土改。结果，国民革命错过了最佳时机，忙着去和共产党斗。可人家共产党，虽然天天在拼杀之中，却是到一处改一处，因为他们在分田地、搞土改的问题上没有个人私利。到最后，天下被人家拿去了。其中，土改是帮他们起了大作用的。”

“可是，共产党的土改也太过分了。”

“是过分了。他们利用土改，杀地主、灭豪门，挑起农民对地主的对立和仇恨，让农民冒死替他们打天下。可天下到了手，又有谁能有资格再去评判什么呢？”

车到了十字路口。

章团长说：“已经到了老陶的门口，还是进来看一下。”

两人下车。

“县政府”，即陶家大院，门口的哨兵赶紧进去报告。马上，余排长出来了。他现在是指挥部和罗团长驻“县政府”的联络官，所以常驻陶家大院。

余排长满脸春风，当了联络官，情绪高得很，虽然手臂还挂着绷带，却学着很有风度的样子说：“两位长官请进。”

陶富贵也是急急忙忙地出迎，“啊呀，不知两位驾到，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章、方两位，自然也是客气一番。

跨进院门，进屋。章团长发觉，此院不但墙皮剥落、门窗暗淡，家徒四壁，几乎一无所有，而且院里屋里，地面高低不平、坑坑洼洼，甚是奇怪，便问：“这地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个样？”

“嘿，别提了。”陶不由哀伤起来，“这都是共产党挖的。他们不但没收了我所有的土地、房屋、财产，还要挖浮财，找什么金银财宝。把我们赶走以后，屋里屋外，都掘地三尺。以前，我们都是上好的方砖，全被砸碎了，一块也没剩。他们是恨不能把墙都拆了、瓦都掀了。”

章团长抬头看看四周的墙壁，正要感慨一番，发觉陶富贵的身后，多了三个凶神恶煞般的人物。尤其是贴身紧靠、不离须臾的那个，脸色苍白，双眉紧锁，目露凶光，前额和下巴还有两处深深的刀痕。猛一看，真能叫人倒吸口冷气。

陶看出两位客人有所疑惑，便介绍起来，对那三人说：“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我们这次反攻行动的总指挥和副总指挥，章团长和方舰长。”

三人便忙不迭地点头鞠躬。

陶对两位说：“这几个是听到枪炮声，知道我们反攻过来了，冒死从共区逃跑过来的。”

陶指着为首的那个，说：“这个叫高增光，是北山高区长的儿子。他爹是本县有名的绅士，跟我是知交。他家现在也是被扫地出门，他爹妈也都被杀了。这次是杀了看守的民兵，拼死跑了出来。我已经任命他为本县警察局局长兼还乡团团长。”

高增光向两位再点头，“请长官多栽培。我高某与共党有不共戴天之仇，势不两立。长官有什么吩咐，尽管对我高某说，我高某万死不辞。”

章团长只好说：“好，好。党国正需要你们这样的有用之才。”

陶说：“是共产党把我们逼到这一步。我们只有动狠的了。”

章团长问：“怎么？准备怎么动？”

“明天开始，挨户搜查，收房收地，抓人杀人，我们对共党也决不客气。我都等了好几天了，眼睛都等得冒出了血。现在亏得有高局长几个人过来，我能搞得起来了。”陶愤愤地说着。

“当然这是你们县政府的事，我不便过多评点。但也要注意分寸，当此战乱时期，世事纷繁复杂，不能因小失大啊。”章团长说。他也是听说了，陶富贵当众杀了祖责成，所以想提醒一下。

方舰长也轻声地说：“适可而止啊，陶县长。怨怨相报何时了。”

陶，长叹了一口气，说：“要是共产党封了你家的门，杀了你家的人，恐怕你们也就不会这么说了。听说你们在赵村搞什么新政，搞得怎样啦？”

这下问到了章团长的短处，章团长也只能低声地说：“唉，也难，也难。”

陶有了底气地说：“不是我说，我早知道那一套完全是书生之见，根本行不通的。你们不想想，富人被穷人分去土地财产，那是在挖掉他心头的肉，而且还是家破人亡。反过来，你想叫穷人把已经吞下去的肉再吐出来，能愿意吗？”

高也插了句话：“现在的农村，和战场上一样，不是他杀我，就是我杀他。别的都是假的。抓住了，算我倒霉；抓不住，那就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章团长只有无语。良久，说：“好自为之吧。”

古人云，道不同，不与谋。章团长与陶之间，确实也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不多时，便起身告辞。陶也未多挽留。几人表面客气一下，就出来了。

“还得上罗团长那儿去一趟吧？”回到吉普车旁，章团长对方舰长说着，其实自己也是满心的不愿意。

方舰长知道章团长的心思，就说：“那就去吧。不管怎样，礼数要到。”

余排长一听，自是十分卖力，自告奋勇当向导。

好在车轱辘一转，不费事，一会儿就出了东门，到了学校，现在的334团团部。

这儿几乎是没有汽车的，所以，吉普车的响声，没有受到哨兵的阻拦。车径直开进了操场，引来了一大群的兵士的围观。

余排长先下车，吆喝着：“走开，走开，快走开！”撵开那些围观的兵士。

却见一位长者，一袭长衫，按说不老，已然是一副老者模样，步履迟缓，神情漠然，全不顾及长官的来临，挪步往前走着。

“这是谁？”章团长很奇怪地问着。

“这是这儿中学的余校长。”余排长答道。

“哦。”章团长应着。

余校长似乎也听到了，侧过头来，朝章团长等微微点了下头，也无停留的意思。

章团长便也只点了下头，看着余校长慢慢地往前，又问了句：“他没跟共产党走？”

“好像不是和共产党一路的。”余排长答着。

“跟你们好像也不热乎么？”方舰长插了句。

“是的，看不懂这种人。”余排长还是很简短地答着。他确实看不懂。

“这是社会大动荡中处在夹缝里的人，最是很难挨了。”章团长说。

这时，罗团长听见动静，出来了。

“哟，稀客，稀客。”罗团长装着很惊讶的样子，“哪阵风把你们给吹来啦？”

“我把方舰长领来看看，我们陆军兄弟是怎么条件艰苦、英勇作战的。”章团长故作谦逊地说。

“是啊，是得来看看。你看你们海军穿得多神气，你们嫡系的青年军，穿的也不错。你看，我们穿的，尽是土布。这还不说，吃的，不像你们尽是白面。我们，玉米面不说，还不够数，弟兄们都喊吃不饱。”罗团长一开腔就刹不住车了，“章兄，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呢。”

章团长这一来正好碰到了伤疤上。

334团尽管和青一团都是这次行动的参与部队，但后勤给养还是按各自原来的系统。青一团隶属的青年军211师，是个虚号，并没有这个师，它实际上是直属黄港警备司令部，因此各项军需供给，充分满足，源源不断，不愁吃不愁穿，别的部队都看着眼红，心生怨气。而334团归省防二师，是由一些民团收编过来的，在国民党军的派系中算是末流，可谓舅舅不亲、姥姥不爱的那种。所以，在各类物资供给方面，是有一搭无一搭，有时甚至连最低需要都不够。以致这些部队去骚扰百姓，军纪甚差。

“弟兄们在拼死打仗，可是我们快要连饭也管不起了。你叫我怎么办？黄港那边已经两天没运粮食过来了。”罗团长很生气地说。

章团长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忙问：“你们还剩多少粮食？”

“还有？还有……”罗团长其实也没个准数，转头问副官“还有多少？”

“只剩一天的了。”副官也是随口说了一句。

章团长心里有了点数，问题是存在的，但不一定有那么玄乎。

“你们总务主任呢？”

罗团长脸上掠过一丝不易为人察觉的不快，赶紧搪塞了过去：“他那个人呀，满世界地跑，谁也很难找到他。”

“管事的人都找不到，这事怎么办？”章团长问。

“我知道，你们青一团，有的是。搬点过来就是了。再不行，我打个欠条。可以了吧。”

章团长深知此人无赖成性，绝对不能让他给粘上，不然就甩也甩不掉啦。

“这样吧，我立即向汪司令报告。你也立即向你们师部报告。我想，不至于真的会让在前线打仗的士兵饿着肚子吧。”

话讲到这儿，罗团长反倒有些迟疑了。

“好，好。”他哼哼着。

太阳快到头顶了。

罗团长问副官，“你看下厨房里还有点什么？”

副官答道：“除了糊糊，就是昨天剩下的玉米饼了。”

“唉，这叫我怎么招待你们两位哟。”罗团长的脸竟然有些哭丧了。

章团长当然看得出来，各人一块小天地，不喜欢别人插进来，便说：“不用麻烦啦，罗团长。我那儿都已经准备好了，罗团长要是有雅兴，不妨跟我们一起去吧。”

罗团长哪里会肯去，推说：“我这儿一天到晚忙得晕头转向，哪里能离得开啊？”

“那咱们也不便多打搅了。”

章、方两人辞别上车，罗团长送行，一番客套自不必说。

14.2探访李芹

走出学校，章团长对方舰长说：“我们上李策家去趟吧？”

方说：“好啊，我正想去看看呢。”

余排在边上一听，倒也积极，马上说：“我来给两位长官领路吧。”

两位都说，好。

离开东门外的学校，要到李芹家，按说还要从镇里十字路口走。两人懒得再从陶家门口过，便从城墙外绕行。但那根本不是汽车走的路，是上山种庄稼、牵牲口的道，汽车上去，当然是颠簸不堪，有时不得不干脆往庄稼地里开。

坐在后排的方舰长，颠得屁股都跳了起来，“哎哟！”

“这比船上颠得怎么样？”章团长故意问道。

“完全是两码事。我不晕船但是晕车。”方舰长答道。

章团长安慰道：“好在不远，马上就到了。”

吉普车转了一大圈，又转到了西门，几人才下车，往李家走来。

几人穿过寂静的小巷，拐了两个弯，余排长指着前面说：“就到了。”

方舰长突然说：“咱们一点东西也没带，两手空空去，不好吧？”

章团长也猛地想起这事，“我们这些人，这方面太粗心，怎么没想到呢。这怎么办？”

章、方两人环顾四周，别无他法，同行的几人也想不出法来。

最后，方舰长说：“这样吧，我也豁上了，把这条金十字架给她吧。”

章团长知道这是很贵重的，便说：“这太贵重了不说，这十字架，对于你也是很有纪念意义的吧。”

“是啊，这是我从英国带过来的，我一直很喜欢。但我把它送给受苦受难的小李姑娘，也表示了基督对她的爱，愿上帝和她在一起。”

“那也好。”章团长说。

来到李家的门口，余排长上去敲门：“李小姐，李大小姐。”

开门的依然是申老汉，只是不再惊慌，而是惊奇，心想怎么又是一大帮当官的，“长官，是找李小姐吧，请进。李小姐在里屋。”

李芹的气色好多了，她原本也是个不错的女孩。才几天的时间，脸色虽然还是苍白，但嘴唇已有了些红晕，换上了几年都没能洗干净这回才洗净的衣服，长发也梳得很整齐，头上的发夹比银子还亮，几颗钻石般的红玻璃闪烁着光芒，显露出李芹原有的气质，只是腿上还缠着很多纱布。见几人进屋，她正想从炕上挣扎着下来。

方舰长忙上去阻止，“别动，你这伤，在好之前，可不能动。”

章团长说：“你就是李副官的妹妹吧？这位是你哥哥舰上的舰长，方舰长。听说你家的事了，特地抽空来看看你。”

方舰长忙说：“这位是我们这次行动的总指挥，章团长。”

李芹望着两位长官，心里充满感激，连说：“谢谢，谢谢，谢谢你们能来看我。可是，你们来晚了啊……”话还没讲完，语音已经呜咽，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令尊大人的事，我们都知道了，我们都非常难过。”章团长说。

“他们共产党要分地就分地吧，为什么要杀人呢？为什么呀……”李芹终于忍不住大哭了起来。

“李姑娘，请节哀。上天是有眼的，好人终究是会进天堂的。”方舰长一时拿不出更好的话来安慰她，只好拿出天堂来说。

李芹说：“我只是个农村的女孩子，并不懂得多少道理，也不知道共产党、国民党的。但是，我恨那些拿人不当人的人啊。”

章团长见申老汉一直站在堂屋里，就问：“这位老人，是谁呀？”

李芹说：“这位老人，姓申。土改时，我们家被赶出来，他们老俩口，分到了我们这屋。”

章团长很惊讶，“怎么现在还住在这儿啊？”

李芹叹口气，说：“他们也是苦命人。大儿子虽是共产党的民兵，却是为打日本，被鬼子杀的。小儿子还不知跑哪儿了，就剩他们老俩口，也是一无所有，没有去处。我没叫他们走，就在这儿一起过吧。”

没想到刘子录们想象的“民国新政”倒是在这个院子里实现了。

方舰长颇为感动：“你做得很对，李姑娘。这就是基督的精神啊。”

李芹又眼望着方舰长，说：“方舰长，我这辈子已经残废了，本来也就没指望什么。如今，我唯一的亲人，我唯一的牵挂，就是我的哥哥。我请求方舰长，能多关照点我哥哥，多帮衬点我哥哥，他是我们李家唯一的一条根了。”

方舰长说：“李姑娘，这事情，你尽管放心。你哥哥李策是个好青年，不但技术好，而且人品也好。大家都很称赞他。他将来是会有出息的。你可以尽管放心。”

章团长又说：“李姑娘，你受了这么重的伤，走路又不方便，还是去船上吧，万一有情况也方便些。”

李芹说：“谢谢你们了。我哥哥也叫我上船去，但我想，还是不去了吧。去了，给你们添麻烦。你们是办大事的人，我不能去麻烦你们呀。再说，我们海源有个规矩，女人是不能上船的。”

方舰长笑了：“这个规矩，就不必要了。在英国、美国，女人不但能上船，而且还有女船长呢。”

章团长说：“你现在不上船也行，在家里面住，能习惯些。但是，如果局势有变化，要赶紧过来。我们也会想着你，到时 would 派人来接你的。”

方舰长说：“我也会想着你的。你的腿伤怎么样了？”

李芹说：“还行，好在没感染。你们的医生也来看过，说看来没伤着骨头，慢慢养着就行了。”

方舰长说：“好。过几天，我叫医生再过来看看你的腿，千万不要感染了。”

章团长说：“你现在，吃饭怎么解决呢？哪来的粮？”

李芹说：“瞎凑和呗。”

章团长四下看了下，没看见饭碗，就跑到堂屋去找。在灶台的一角，看到两个破旧的饭碗，里面是已经发黑的树叶、地瓜蔓和粗糙的麦粳。

章团长问申老汉：“这是你吃饭的碗吗？”

“是的。李小姐也是吃的这个，那个碗就是李小姐的。”

章团长有些凄然，拿着碗，进里屋，问李芹：“这就是你吃的饭？”

李芹淡然地说：“是的，是我的碗。现在大家都是在吃这个。”

方舰长一看，十分诧异，说：“哎呀，李策怎么不跟我说一下呀。”

章团长跟后面的随从说：“马上扛袋面粉过来。”

李芹轻声地说：“如果可以的话，也给老汉一袋吧。”

章团长说：“行，可以。副官，那就干脆搬三袋过来。”

方舰长说：“李小姐真是个好人。我们这次来，也没有带什么东西，我把这个十字架送给你，愿基督的光芒能永远照耀着你。”说着，就把金十字架从脖子上取下来，递到了李芹的手里。

李芹虽然从没见过什么金银财宝，但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很值钱的东西，便推辞不要。

方舰长很诚恳地说：“东西不在贵贱，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李姑娘，不必客气。这十字架，是我们基督教的一种象征，让我们都追随基督的教诲，去寻求光明。我想，你可以是个很好的基督教徒。”

李芹这才不再推辞，很虔诚地接过这金灿灿的十字架，很郑重地把它挂在了脖子上，说：“好的，方舰长，我听你的。”

章团长说：“李姑娘，我们就走了。你自己要多保重啊。有事就说。”

李芹还想下炕，大家都没让。

李芹在炕上，向窗外再三喊着：“方舰长，走好啊。章团长，走好啊。”等他们走出院门，眼泪又不住地流淌在她的脸颊上。

出得李家，章团长说：“往前路也不远了，车也不好走，我们走过去吧。”方也点头。

众人走出小巷，余排长见他们要上望海山的指挥部去，便对他们说：“我得过去对西门的哨兵说一下，等会你们扛面粉进来，不至于有误会。恕不奉陪了。”

章、方见此，也不便多问，就让他去吧。

一段往上的山路。地上杂草丛生，山坡上稀疏的杂树，虽然无人打点，却也枝繁叶茂，满眼是鲜嫩的翠绿。一股青草的气息，沁人脾肺。碎步慢行，时而还能从草丛中惊起一两只小鸟，扑楞着翅膀，腾空而起。完全是一派与世无争的山野景象。

方舰长很少有这样踏入山林的机会，眼见这自然景色，脸上便从现实斗争的烦扰中解脱出来，露出几分欣然，不由得又要赞叹起来。

还没等张嘴，章团长脸色却沉重起来，指着不远处的小山梁说：“李策的父母，就埋在那儿。不去看一下么？”

能不去看么？章、方两人都是以能体恤下属为自律的人，既已到此，当然要去一谒。

两人过去，还未走近，腐臭味扑面而来，成群的苍蝇嗡嗡地飞着。再走近，那片被践踏的草地上，厚厚的血污已经变成了黑色。地上还有些残留的衣片。

章团长指着一堆石块，说：“那，就是。”

方舰长，看着，无语。走到边上，采了几朵小小的山花，蓝的，黄的，放在了石堆上。

两人又默默无语，伫立了一会儿，心里也都十分地哀伤，不仅是为李策的父母，也为自己的父母。此时，自己的父母呢？家书难托，生死无告。

转回头，又是默默无语地走了一段。

方舰长先开了口，“唉，为何要搞成这样呢？”

章团长说：“是啊，革命有时需要采取暴力的方式，这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万万不能搞成，革命就是暴力，暴力就是革命。当革命革到人的命不值钱了，那也就不是革命了。蒋先生指责中共说：共产革命是‘鼓动所谓无产阶级本身的利益，打倒其余的各阶级，所以他们的革命是出于恨。’以恨为动机的而实行的革命，不仅在革命的过程中会发挥残狠的行为，就是在革命胜利后，社会也不能消灭仇视嫉恶的现象’他还说，‘盖本党立场，不认阶级，反对斗争，关于土地分配，自应辟特别途径，以渐进于耕者有田’。”（引文请见：《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黄道炫、陈铁健，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

方舰长说：“唉，话好说，做起来难啊。老蒋讲的这些话，他自己也没能做到。国民革命、三民主义，当初是孙中山先生高举的旗帜，如今在老蒋手里，又还有几成光彩？”

章团长说：“不但是三民主义变了味，社会主义何尝又不是这样。当初在欧洲出现的社会主义，原是以人本人权为中心，是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所以，连孙先生也曾坦言，自己就是社会主义者。甚至还向第二国际领导人表示，要把中国变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连我也动过心，去相信社会主义。可是，现在连希特勒都号称是国家社会主义，史太林又打出了共产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的旗号下，反而是专制与暴力横行，完全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都是些彻头彻尾的假社会主义。”（说明：当时将斯大林译为史太林）

方舰长接着说：“不瞒你讲，我在英国几年，也关注过社会主义的观点，甚至还去参加过英国工人党的一些群众活动，但就是有很多问题不明白。最终还是选择了基督教。宗教有个好处，就是只管信仰，不管政治。”

章团长笑着说：“就怕到时候，你不管政治，政治却要管到你头上来。再往前走，你就明白了。”

14.3 宗教与社会主义

再往前走了一段，就到了惠民寺。

惠民寺，现在是青一团的物资仓库。船上搬下来的东西，先堆在沙滩边，董平章他们就是干这个活。而后从西门外，不进镇，运到这儿。

惠民寺，从外面看，还是庙宇的模样。两人进去看了下。进里面，已经与普通房屋无异。那些菩萨不但早已荡然无存，连底座也毫无踪影了，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中，这些东西好像也没有了它们的立足之地。

章团长虽是军人，却并不是武夫。他又开始发议论了，在他觉得可以一谈的人面前，还是很喜欢说话的。

“佛教，在中国信徒众多，香火绵延千余年，可惜在历史变迁中发挥作用始终不大。”章团长说。

“是啊，这主要是在于佛教的主张过于中庸，比较消极。”方舰长对宗教还是有点研究的。“它主张安于现状，无欲无为，四大皆空，清心寡欲，与世无争，甚至忍辱退让，这对于平常年份的底层贫苦百姓能有些精神安慰，以安贫乐道维持社会稳定。但在动荡时期，它既不能引导人们与恶势力抗争，又不能参与到社会进步的潮流当中。所以，在世界历史中，它是步步衰退，只有无奈。”

“难道它对统治者也没有帮助么？”章团长问。

“那得看是什么样的统治者。佛教说，‘助王化于治道。’可中国历史上，有过几个王道呢？”

“那佛教对我们就挨不上了？”

“也难说，说不定什么时候，你也会求助于佛祖，求它保佑平安。在中国，失意官员，落魄文人，和向前无望的人，改信佛教的多了。你看连陶富贵这样要拿刀杀人的人，在被共产党扫地出门之后不也说是信佛了吗？”

“我也会到那一步吗？”章团长大为不解。

“我不是说，你会沦落到那一步。而是说，有时候，无佛真的不如有佛。佛，在狂风巨浪或是空寂旷野中，或许是最后一点精神维系。”

“你这讲的，真还有点佛家哲学的味道。”章团长说。

临出寺门，方舰长又回头看了下房舍，停下了脚步，端详着什么。

章团长也朝着方舰长的眼光看去，并无什么显眼的东西。便问：“看见了什么呀？”

“你看，还有字呢。”方指着一根房柱上还残存的一些模糊字迹，慢慢地走了过去，仔细地看。

章团长也跟了过去，渐渐地看出意思来了。分明是这样一行字：

“世上事不了事以不了了之”

章团长心想，方舰长是留洋出身，对这些古文未必能读得下来。

还没发问呢，未想方舰长已经念了起来：

“世上事，不了事，以不了了之。深刻啊，深刻啊，说得多深刻啊。”一边念，还一边频频点头，表示佩服之极。

章团长也觉得此话极有道理，说：“佛教里的一些话，还是很有哲理的。只怕我们最后，想不了，也难啊。”

当然，谁也不会想到二十六年后，这行字被一个著名人物看上，成了他叱咤风云一生的最后结尾。

出了惠民寺，再上行一段路，在望海山的半山腰，有一片小空地，这儿就是望海教堂的所在地。

一个小小的却又是标准的教堂，虽是青砖黑瓦，在春日的阳光下，倒也轮廓分明，熠熠生辉，显得十分的精致。哥特式的尖顶映衬在蓝天之下，很有一种庄重而又新鲜的感觉。教堂不大，长约三十多米，宽二十来米，砖砌到顶，建于十九世纪末，是黄港大教堂派人过来建的。但只过了十多年，在义和拳之乱中遭到洗劫。洋传教士得到消息先跑了，教民们却被杀了不少，没死的也被驱往他乡。如今，只剩了空壳，不但门窗没了，连门窗框都被撬得一干二净，拿去当柴火烧了。亏得拳民们不想沾上洋人的血光之灾，不然，这砖墙瓦片也会被拆光，拿去垒自家的院子。

方舰长作为基督教徒，当然非常地感慨，“基督教在中国的道路，十分地艰难曲折。然而，中国社会发展，正是少了这一课，少了这份精神养料。”

章团长说：“是啊，民主的社会主义，之所以首先出现于欧洲，这与基督教在欧洲的发展，是有联系的。”

方说：“是基督教思想为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准备了暖床。尤其是宗教改革的开展，实现了基督教的世俗化，为欧文、圣西门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提供了条件。”

走到教堂门口，方舰长拍了拍门垛的灰砖，说了声：“嚯，还挺结实。”

章团长说：“那时候，房子的质量倒是不错。到现在，好像还没有漏水的样子。”

方舰长抬头细细地端量这小小的教堂，不禁触动了心灵的深处，嘴里哼哼起只有他才会唱的教会歌：

“罪恶忧愁不容再长，

世途荆棘消亡。

上主公义，无限荣光，

诸天万物歌唱。”

章团长听着也听感慨，“没想到方兄还有如此雅兴。其实，我也挺喜欢歌曲。你来听我唱一段我年青时喜欢的革命歌曲吧。”

章团长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竟然也唱了起来：

“热血滔滔，热血滔滔，

像江里的浪，像海里的涛，

常在我心头翻搅。

只因为耻辱未雪，愤恨难消，

四万万同胞啊，拼着你的热血，去除强暴！”

“这是首什么歌啊？”方舰长问。

“这就是黄自写的‘热血歌’呀，我就是在这首歌的召唤下，想着要去参加国民革命的。”

两位的歌声，赢得了在场的几个军人的小小的掌声。

进得门来，中间是三张方桌，铺了些地图、纸张，往里靠窗的地方，一侧是发电和通信设备，另一侧是几张行军床。

忽然，从两张床的中间，伸出了一个小脑袋。

方舰长颇为惊奇，问：“这儿，哪来的小孩？”

章团长说：“嘿，还是那段伤心事。李策父母被杀的那天，活下来的，除了李策的妹妹，还有就是这个小孤儿了。”

方，怜悯地看着小孩，在胸前划着十字，喃喃地说着：“可怜，我的上帝。”

他走过前去，伸手想去抚摸孩子的脑袋。谁知，小孩惊恐地直往后退。

方疑虑地看着章团长。

章团长说：“这孩子是吓怕了。什么也不会说了，只会说：死了，死了。”

“是谁家的？”

“听李策妹妹说，是一个姓辛的地主人家的。连个名字也没有，只许叫‘狗’，我们也只好叫他‘狗狗’了。他家里的爷爷奶奶，土改时被锄掉了。这次，是娘俩个。小孩的爹，在外面，是个党国军人，已经几年没有音信，不知死活，跟我们一样是天涯沦落人。只不过，我们比他要好一些，我们总还有妻子儿女在身边。”

方说：“唉，暴力带来多少惨剧。敌人也是人，下手不能这样狠。基督说，要博爱，也包括要爱你的敌人。”

章团长说：“要去爱自己的敌人，恐怕也有点过，难以做到吧。”

方说：“当然，对基督教义的理解，也不能片面，不能绝对化。基督教在中国一直受到很大的压抑和扭曲，有些是义和拳式的直接打击，有些是装扮成基督的邪教，比如像洪秀全的长毛。基督的基本精神，是博爱。博爱，是和民主、自由、平等相联系的。博爱，就是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尤其是尊重人的生命的权利。社会变革，不能采取剥夺人的基本权利、甚至轻易剥夺人的生命的方式，以一种暴力代替另一种暴力。”

章团长说：“咱们坐下，慢慢说吧。今天，是难得有这个时间，很想听你说说。”

两人在方桌旁坐下。勤务兵递过茶来。

章团长说：“你说的博爱，是挺好。但是，在中国，缺少这样的社会环境。相反，暴力在中国却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中国有庞大的流氓无产者群体，他们一无所有，最希望改变现状，他们在反抗压在他

们头上的权势时，无所顾忌，极为勇敢，但同时又表现出极大的破坏性。”

方舰长说：“有些武侠小说，往往在推波助澜，过分地张扬他们行侠仗义的一面，一味地鼓吹复仇，而掩饰了他们反社会的一面。”

章团长说：“这批人容易被煽动，容易被利用。在改变旧框架的时候，往往从很狭隘的角度出发，不顾社会规则，不讲社会进步，不分青红皂白，造成极大的社会动荡。”

方说：“这种时候就需要宗教出来发挥作用。宗教对于一个社会是需要的，尤其是在一个激烈动荡的社会里更是这样。它对社会矛盾能起到稀释、缓冲的作用。中国的佛教从印度传来，有先天不足，在社会风浪中没有起到足够的影响，不象它在自己的发源地可以成为非暴力斗争的社会基础。在中国，社会矛盾一旦起来，就会越演越烈，以暴力对抗暴力，最终弄得不可收拾。很多农民暴动，最后都成了这个局面。不管是以伪基督面目出现的太平天国，还是肆无忌惮地反基督的义和团，看起来很慷慨，看起来很正义。实际上，不但没有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反而给已经很混乱的中国社会添乱。非但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反而加重了社会灾难。”

章团长说：“当社会变革需要采用暴力革命方式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分寸，注意限制它的消极面，防止暴力手段无节制地泛滥。不然，真是连基督也没办法。”

方说：“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要明确，革命的目的，不只是一要改变一个政权，改变一个领导人，而是要改变不合理的社会体制，改变权力结构。”

章团长说：“是的，革命的目的是要还权于民，不是从一个人手里抢过来，转到另一个人手里。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很多，英勇激烈，不断地改朝换代，看起来很热闹，历史却踏步不前。原因就在于此：只换演员，没换剧本。”

方说：“中山先生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换了剧本。他的三民主义的核心，也就是还权于民。但是，到了蒋先生那儿，还是要把权力捏在自己一个人手里。”

章团长说：“其实，也难怪他，这样做的又何止于他。严格来讲，我觉得，对中国古代的社会性质，与其叫封建社会，不如叫皇权社会。在皇权社会里，权力是高度垄断在皇帝一个人手里。而封建社会，是分封制，是分权的。两者的社会发展不是一个途经。应该说，秦始皇是个历史罪人。从他开始，自称皇帝，实行专制独裁，其影响延续至今。中国古代社会就是个皇权专制社会。在这种皇权体制下，农民革命的目标往往就针对着最高权力，推翻皇帝。革命的手段也就只能采取暴力的方式。最后，谁打天下谁就坐天下，成千上万的牺牲，不过是造就了一个新的皇帝。别人压迫他，他不干；等他压迫起别人来，却比谁都厉害。”

方说：“我也一直在想，英国的农民运动为什么没有起来杀皇帝，没有采取改朝换代的方式。虽然，克伦威尔时期取消过帝制，后来又恢复了，难道这就是革命党人所指责的不彻底性？”

章团长说：“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句话说得好，善治在于妥协。不妥协，何以善治？”

方也说：“英国的几方政治势力，经过妥协，虽然一直还有王位，保留了君主立宪制，但却给英国的社会发展，带来了几百年的有利环境。改良比起革命，往往也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章团长说：“我们中国则不然，它既是个保守的社会，又是个偏激的社会。因为保守，它很难接受和跟上时代的进步。因为偏激，面对社会矛盾又往往容易走极端。保守来自于孔孟之道、封建礼教。偏激则来自于中国有个庞大的流氓无产者的社会基础。尤其可惜的是，我们中国前不久失去了一次很短暂的历史机遇。民国三十五年的宪政运动，因为老蒋的不妥协，坚持什么‘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些独裁专制的东西，使国共两党失去了最后和解的机会，也使中国失去了一次走向民主社会的难得机会，反而给对方有搞这些的机会。”

方说：“不知中共在拿到政权以后，在限制和改变暴力革命影响、发扬民主方面，会有多少作为？这个新的政权，对于我们，又能有多少希望呢？”

章团长说：“应该说，他们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民国三十三年夏，中共领袖人物毛泽东在回答中外记者团时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有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请见：“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想来，等他们当权以后，应该是很关心民主问题的吧。而且，他还说了，‘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请见：“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他们的另一个领导人刘少奇说得更明白，他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污蔑。共产党是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是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请见：《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

方说：“但愿如此。不过，他们说的话能算数么？我记得他们曾经把美国也说成是天使一样，他们的《新华日报》在讲到美国独立纪念日时说过这样的话：‘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世界还有希望’（请见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这才几年时间，又把美国骂得狗血喷头、畜生不如。这算什么呢？革命者啊，长于政治，往往也短于政治。这分寸也难把握，玩过了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章团长不无忧虑说：“如果这样就麻烦了。国民党已经灯枯油尽，行将灭亡。但愿共产革命不是又一次李自成、洪秀全式的农民暴动。共产党要是再过分，我们还指望什么呢？”

方说：“那就是照刚才庙里面的那句话，世上事，不了事，不了了之吧。总不能像陈布雷那样去自杀吧。”

章团长说：“自杀倒不至于，我是决不会自杀的，这一点，可以相信我。这时候，我想起了，我挺敬佩的一个老乡，沈从文先生。他从一个半吊子军人，到一个知名作家，现在又弃笔隐身。在巨浪狂涛面前，能做到这点，实在不容易啊。”（说明：沈先生在1949年北平解放后也自杀过，只是章团长那时还不知道。）

正说到兴致，勤务兵报告，饭好了。

章团长还想再说，门外又进来一批军官，直吵吵：吃饭了，吃饭了，今天来客人，可以吃好饭了。

章团长也哭笑不得，只好罢了，对方舰长说：“那就吃饭吧。不过，刚才的话，给我印象真的很深刻，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一点不假啊。”

第十五章 生离死别

1949年1月15日

15.1 回家

在章、方两人饭后茶余继续闲聊的时候，董平章他们也高兴了。

孔班长，把他们几个人，喊在一起，说：“为了体现兵民同心，共赴国难，上峰说了，让你们放假一天，明天午后再来。每人发一袋面粉，算是一个月的犒劳，今天提前发了。”

董平章他们真的还挺高兴，忙去扛面粉。这样一整袋的洋面粉，他们可从来连摸也没摸过呀。

孔班长又说：“不忙。”

“怎么啦？”董平章问。

“不是这样的袋，是小袋。”

“哪有小袋？”董平章往四下看了下。

“嗨，就是一袋拆三袋。”这一袋拆三袋也是孔班长在自作主张。

董平章他们几个当然就不乐意了，那也没法，找了几个空袋子，往外分装。

“哪有那么多空袋子？”王立有了点心眼，把几个空袋子塞到了粮堆的最底下。

孔班长也四下看看，确实没有更多的空袋子，“那就算便宜你们了，多装点，每人半袋吧，这样少用几个袋子。”

他们这几人这才又舒服点。

“好走了吧？”他们急着问。

“不忙。”

“还不忙啊？日头都到头顶了。”

孔班长又说了：“每人再给一套军衣，你们现在就穿上吧，这样过哪个岗哨也不会有麻烦。要不，没等回到家，半路就会被334团抓去。”

董平章他们面面相觑，心里直嘀咕，这国民党的衣服能穿么？

孔班长看他们还迟疑，就话里带话、轻飘飘地说：“我这是好意哦，不是非要给你们哦。等334团把你们抓去，给他们干活，那你们就苦了，就不是现在这个样了，想哭也来不及了，想求我也找不到我了。”

董平章他们，你看我，我看你，几番迟疑。

董平章最后想，反正上面也没有青天白日的帽徽，穿穿也没有什么关系吧，于是就穿了起来。

王立几个，看见董平章穿了，也就都穿上了。

只有连四娃没动。

董平章拿手碰了碰他。

孔班长看了一眼，说：“没有他的份，不放他的假。”他又接着说：“我还没讲完呢。你们一定要按时回来，我们让你们走，你们也要守信用，不要让我们抓你们回来。你们每人都说个话，行不行？从你开始。”班长指着董平章。

董平章想了一下，说：“可以。”

孔班长又指着其他几个，他们几个只好一个一个地表态，保证按时回来。

孔班长就说：“这样就好。明天到时候，少一个，就拿你们所有人是问！到时，别怪我不客气！走吧！”

看着别人要走了，连四娃跟身边的王立说：“你上我家去看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事。”

“好的，你放心，我肯定会去看的。”王立说。

于是，董平章他们几个，穿上了没有帽徽胸章的国民党军装，拎着半袋很难得有的面粉，带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心情，走向龙头镇，走向才离开几天、却已经是换了一个世界的家。

因为牵挂，因为焦急，因为根本不知道进了家门将会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他们都匆匆地走着。

一阵急走，走过白果树下，就到了西门。站在豁口、穿着蛋黄色土布军装的334团的几个哨兵，看到董平章他们几个，十分地惊奇。看董平章几个，分明是农民的模样，却穿着军装，而且还是青年军的军装；说是军装，却又没有帽徽胸章。怕是共军的侦察兵，可都拎着面粉袋。这是干吗，真是猜不透。

哨兵们再三盘问，又喊来了余排长，这才放行。

看着董平章他们进了镇，余排长在后面，十分地不平：“嚯，他们青年军，还真他妈的大方。老子都还没有吃上这么多白面呢。”

那些哨兵就起哄，“咱们都几天没看见白面馒头了。等明天，趁着大搜查，到他们家里去抢回来。”

进了镇，他们各自分手。董平章走在西街上，这才隔了几天，却像隔了好多年，竟觉得有几份生疏了。这几天，不知道发生了多少他所不知道的事情。不说别的，就是他自己身上，不也发生了许多连他

自己也不会相信的事情吗。穿着国民党的衣服，拎着国民党的面粉，干着国民党的活，这算什么事？董平章这时，又想看见人，又不想看见人。

急忙忙，就到了自己的家。门紧闭着，却没有上锁。赵玫，她一直在等着我呀，就这样的情况，她也没有一个人走掉。董平章想到赵玫这些年来对自己的情意，心里感激不尽，鼻子立时都发酸了。

“砰，砰！”敲了两下门。

“赵玫——”董平章的一声叫唤，在小巷里回转。

赵玫正在炕上，好不容易哄好了孩子，斜躺着，闭着眼，心里正又恨又气又急。恨的是，国民党王八蛋的猖狂气焰；气的是，董平章怎么这么不会处事，这种时候连家也不顾了呢？急的是，他又能上哪儿去了呢？该不会出什么事吧？这时候，可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

一听得门外的叫声，赵玫噌的一声坐了起来，啊呀，这不是他回来了么。怎么这个时候会回来呢？

赵玫三步两步就到了院子里，嘴上说着：“来了！”，手已经拉开了门栓。

“平章呀，你可回来啦，你上哪儿去——啦”后面的“啦”字没说完，开门见到的却是一身国民党军装，尽管套在衣服里的确实是董平章。

赵玫吓得跳了起来，往后直退，“你，你，好你个董平章，闹了半天，几天见不着人，原来去叛变投敌啦。”

赵玫发怒了，不顾一切地尖叫着：“滚！给我滚！这儿没你的地方！我没有你这个国民党男人！”

董平章连忙说：“你别大声吵吵，听我说。”

“穿了一身国民党服，成了国民党的人，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被国民党抓去干活了，这是他们发的。”

“那你不能不穿么。”

“不穿就进不了西门。我们是在西滩卸船。这城里，在西门站岗的，是另一帮国民党兵，见了就要抓到他们那儿去干活。那一帮才狠毒哩。穿了这一套，是这一帮的，你看和那一帮的衣服不一样，这才回得了家。”

董平章的话绕了一大圈，赵玫多少明白点，就说：“那你到家了，还不赶紧脱下来。”

“好，好，就脱。”董平章对赵玫瑰一向是言听计从的，没进屋，在院子里就立马脱了下来。

“那这一袋面粉呢？”赵玫又问。

“也是他们发的。”

“有这样的好事？”

“算是一个月的工钱。”

“那也拿得不舒服。”

董平章左手握着这一堆衣服，右手拎着面袋，进了屋。就赶紧钻进里屋，去看炕上的儿子了。

孩子因为院子里的吵声，醒了，睁开了眼，看着久别了的父亲，好像是认出来了，张着两只小手，嘴里嘟囔着。

董平章是个称职的好爸爸，对孩子也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见了孩子，一下就扑了上去，抱着，亲着，喊着：“宝宝，宝宝，我的宝宝。”

赵玫见了这情景，几天的焦虑，几天的怨恨，几天的委屈，也都化作泪水流了出来。

“那天，你怎么没跟着一起往外走？”董平章问。

“你还有嘴说。你不回来，我能放得下心，自己往外走吗？”

“那你这几天，是怎么过的？村里怎么样了？”

赵玫把村里面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董平章。讲到，陶富贵回来了怎么反攻倒算，怎么当众杀了祖大爷，夫妻俩都愤恨不已。

“你那天怎么一直没回来呢？”赵玫也关心地问着。

“唉，也怪我自己不好。总想出来一天，尽量多干点，不舍得空闲下来。也听到了炮声，没想到国民党真的会上来。等想到要回来，已经来不及了，国民党已经围上来了。我已经快跑到西门了，被抓住了。”

“还有谁在那儿？”

“我们村，还有王山、连四娃他们几个。”

“这几天，受苦了吧？”

“说句实话，到是没受苦。从船上往沙滩上搬面袋、木箱，不算很累。”

“国民党对你们很凶狠吧？”

“我们都感到奇怪的是，这帮国民党是叫青年军的，比起住在镇里的这帮，不一样。好像和善一点。除了连四娃因为要逃跑被打了一耳光，别的人都没挨过打。你看，还发了面粉、衣服。”

“你别给国民党说好话啦。”

“哎，你知道我还见到谁啦？”

“谁？”

“赵大哥，赵刊新。”

“是吗？你问到我爹妈怎么样啦？”赵玫急切地问。

“那时，好多国民党也在边上，没法多说。他就说，放心，没事，他们出远门去了。看来，是已经先撤走了。”

“那样就好了，我又可以放下一条心了。”

“你知道我是怎么遇见赵利新的？国民党给他发了顶帐篷，领他到海边来拿，这才碰上了我们”董平章说。

“哼。”赵玫还不大信，从鼻子里嗤了口气。

董平章又问：“你还没说说，你这几天是怎么过的？还有粮吗？”

“唉，就是这点困难，靠剩下的地瓜蔓、麸子。我到还行，不过就靠这些，我的奶水不行了，宝宝吃不饱。”

“好在这次拎回这袋面，能管些日子呢。”

“国民党的面，我不吃。”

“那怎么办呢？”

“其实，家里还有一袋玉米面，是村里的。我也一直没动。”

“那袋面粉，虽然是国民党发的。但这是我们出力挣的，那面粉也是贫雇农种的麦子磨出来的。有什么不能吃的？”

“那你吃吧，我不吃。”

“嗨，我说的意思，就是要你吃哎。”

“咱们先说说，现在咱们怎么办？”

“怎么办？还能怎么办？”

“咳，你这个人真是的。还能一点办法不想，在这儿等死么？”

“往外跑啊？”

“啊。”

“恐怕不大行。”

“怎么不行？”

“外面都好些国民党兵，西门就有好几个站岗，出不去。连四娃，轻身一个人，都没能跑成功。我们拖家带口的，更不行了。”

“我们有宝宝，偷着跑是不行了。明着走，试试看，就说是去赵村看父母，还不让吗？等到了赵村，再说下一步。”

15.2 锃亮的发夹

两人说做就做。先掩藏好粮食，把面粉再分出来点，装一小袋，藏在灶坑里，剩下的，塞在草垛里。玉米面放在了糊棚顶上。而后，包上几件衣服，裹上孩子，就往外走。

董平章又要穿上那国民党服，赵玫脸色又有不悦。

董平章赶紧解释说：“这也是为了出门方便，省得麻烦。”

赵玫瞪了一眼，再没说别的。

董平章匆忙穿上这所谓的军装，抱上孩子，三人出了门。

他们也不想见到别人，急匆匆地穿小巷，贴着城墙根，来到西门。

但是，把守西门口的这帮334团的国民党兵很不客气，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大声咋呼：“干什么，干什么？”

“我们到西面的赵村，看父母。”

“不行！这年头，谁还顾得上看父母。我们又上哪儿去看父母？”

“难道看父母也不行啊？”

“不行。不要啰嗦了。要不是你穿了这套衣服，早就把你抓起来了，给我们扛大包去。”

董平章还想再说，那兵竟然横下刀，要起蛮来。

赵玫一看，拉着董平章就往回走。

转进小巷，董平章说：“我说吧，不行吧。”

“呸！这帮乌龟王八蛋！我看还能蹦几天。”赵玫忿忿地说。

走过另一条巷，赵玫突然发现走错了，便说：“都气糊涂了，走过头了。”

“那就从那儿转过去吧。”董平章说。

于是，他们就从后面那条巷子走过去。

“哟。”赵玫轻声地叫了一声，想停下来、往回走，已经来不及了。

董平章往前一看，是李芹坐在山墙边晒太阳。

李芹，今天下午精神好多了。一身陈旧得已经泛白、却洗得很干净的浅红格子的衣裤，头上插着红玻璃珠子的锃亮的发夹，胸前挂着金光闪闪的十字架，裹着半条腿的白纱布，斜倚在巷口的草垛上，享

受着晚春的阳光。四年多了，第一次有了多少有点舒坦的感觉。

李芹也看到了董平章俩口。土改前，他们两家还是不错的关系。这几年，李芹只有在批斗的时候才被拉出来，哪有看到他们的时候，尤其是赵枚和小宝宝，还从没有细细地看过。

李芹先笑着打招呼：“董哥，这是从哪儿过来？”

董平章和李芹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当然很熟悉了。不但熟悉，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如果不是土改，他们俩恐怕已经是一家人了。当时，已经有人提了这门亲，都已经换了帖，眼看就要成一家人了。土改，把他们划到了两个完全对立的阵营。这才有后来和赵玫的事。这回，和赵玫一起见到李芹，不但突然，而且觉得有些尴尬。董平章的心里，还是喜欢李芹的。对土改以后，李家，特别是李芹的遭遇，不只是同情，而且是也感到很伤痛。又帮不上忙，又不能对别人说，甚至是对自己最心爱的妻子赵玫也不能说。

“哦，我们想去赵村看看小宝的姥姥、姥爷，可西门站岗的还不让走。”

“是吗？外面不平安，晚几天再去也好。这是赵姐？赵姐，你好。”

“你好，你好。”赵玫仓促地答应着，不知怎么称呼好。因为她知道在她前面的是个富农分子，是个阶级敌人。可人家这么好意地来招呼，一下子真想不起来怎么称呼好。

“姐姐真俊。董哥，你真是好福气啊，真为你高兴啊。”

董平章尴尬地嗨嗨一笑。

“我在棚子里也听说了你俩的喜事。出来批斗的时候，还想抬起头来看看，能不能见到你们，还被打了一下呢。”说到这儿，李芹还坦然地笑了。有不少被打击的地富子女，尤其是一些可以不划、或者不该划的地富的子女，在身心遭到严重摧残之下，心理往往扭曲，变得消极、惊恐、变态，或心如死灰，或极度仇恨。但在李芹的内心深处，还有着丝丝青春的阳光。

董平章很感动，难以言语。

赵玫也受了感动，说：“这几年，你真不容易啊。”

董平章问：“你这腿，是怎么啦？”

“往外走的那天，被秦德才砍的。”

“啊？大叔大姨呢？”董平章还是按辈份称呼。

愁云掩上了李芹的脸。她低下头，悲愤地说：“都死了，都死了。”

“怎么啦？”董平章问。

“那天我们被捆着，走到望海山后坡小山梁时，秦德才举起刀，对我们下了手。我们这八九个人，除了我是倒在我爸妈的身底下没砍死，其余的，都死了。”

董平章俩口听了，也都在颤动。其实他俩也都对秦德才这种人有看法。董平章之所以对村里的事，隔得有点远，不能不说这也是个原因。赵玫对秦德才有看法，但还觉得是一个队伍里的人，怎么说呢。

“不说这些了。”李芹叹了口气，而后说：“还是让我看看小宝宝吧。”

董平章把手里的宝宝伸过去。李芹轻轻地抚摸着宝宝的小脸，自己也浮现出欣慰的笑容，“真可爱，长得真好。”

“你回来住了么？”董平章问。

“啊。”

“那申老汉俩口呢？”

“还在，和我在一起。我没让他们走。”

“你还真是个好心人哪。”赵玫也终于说了这样一句。

“谢谢，天不早了，别叫孩子在外面时间长了。”

“好，那我们先回去了。”董平章俩口辞别了李芹，回了家。

回到家，放下孩子，董平章对赵玫说：“缸里也快没水了，我上城外去挑甜水。家里有白面，你就开始烙面饼吧。今天改善一下。”

赵玫说：“好。可是你再出城门，方便么？”

“都已经走过两遍了，应该不要紧了吧？”

“好。不行，就回来，不要跟那帮人啰嗦。”

董平章挑上水桶出了门，赵玫也和上面，到院子里拿了柴草点上火。几天来，第一次有了点过日子的样子。

还好，董平章顺利地挑回了第一趟水。

“没跟你打麻烦？”赵玫问。

“他们瞪了几眼，就说，这小子怎么又来了，也懒得再问了。”

“大概知道你不会撇下老婆孩子，自己跑了。”赵玫轻轻地笑着说。

董平章又去挑了一担。

第二次挑水回来，董平章对赵玫说：“现在时间还来得及，我再去帮申大爷挑一担吧。他们一屋子，老的老、伤的伤，怎么弄？”

“去吧。”赵玫又是一笑。

董平章挑回第三担的时候，太阳开始西斜了。

当他敲开李芹家的门，开门的依然是申老汉。

申老汉也是很惊奇，从国民党来了以后，还真没有见过村里的人，“平章啊，怎么是你过来啦。”

“申大爷，我给你挑担水来。”

“啊呀，啊呀，难为你有这个心。谢谢了，谢谢了。”老汉又凑到董平章的耳朵边问：“你怎么没跑出去，穿上这衣服啦？”

“唉，没能跑出去，被他们抓住，给他们出苦力啦。”

“唉，你董平章，也是好人没好命啊。”申老汉叹了口气，“进来坐坐吧，李妹也不是外人。”

“董哥，进来吧。”李芹也在炕上招呼着。

董平章进了李芹的屋里，因为没有凳，就坐在炕沿上。

李芹说：“刚才见到赵姐，真为你感到高兴，真的。”

“谢谢你，芹妹。我看到你这几年遭的罪，心里真难过。你不怪我吧？”

“这事能怪你吗？除了秦德才那种人，能怪到哪一个人吗？董哥，我知道你的心。你去好好地过日子吧，赵姐真的是百里挑一的好媳妇。我在这里真心地为你高兴。”

“那你呢？”

“我还有什么？我是这样的家，又已经成了残废。亏得国民党回来了，我还能进自己的家门。要不，喂狗还不一定要。”

“现在，对你来说，不是要好多了吗？”

李芹凄然一笑，“国民党能待几天？谁能指望？”

“你哥哥呢？”

“他到还行，就在海角边停的军舰上。”

“那你赶紧跟他走吧。”

“他有他的前途，我不能去妨碍他呀。再说咱这儿的规矩，女人是不能上船的。”

“嗨，都到这时候了，这算哪门子规矩呀？”

“还有，我好不容易有机会又回到了自己的家里。这里的一块砖、一块泥，都是爹娘辛辛苦苦垒起来的。我不能甩开手、一走了之。我哥哥有出息，让他去飘洋过海。我要在这儿看着爹娘的房、守着爹娘的坟。”

“你真是个不一般的女孩子啊。”

“那也是被逼出来的。”

停了一会儿，李芹很郑重地说：“董哥，我还要拜托你一件事。”

“你说，你说。”

李芹把戴在头上的发夹摘了下来，交到了董平章的手里，说：“请你把它给赵姐，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她收下。这是我哥哥从英国带回来的，算是我对你们的祝福。”

“这，这对你也是很有意义的，还是留在自己身边吧。”

“不。把它给赵姐，对我来说，更有意义。”

“那我替她谢谢你了。我这就要回去了。”

“董哥，那你走吧。现在，时世很乱，你们要多保重。你就把我忘掉吧。”

“别说后面这不吉利的话，我们都一起好好地活着，我和赵玫会来看你的。”

董平章走出了房门。

李芹泪眼汪汪，从窗上望着董平章挑着水桶走出院子的背影，哽咽着竟说不出话。

董平章回到家，放下桶，进了里屋，闻到了久违的烙饼飘香。

赵玫高兴地说：“回来啦。”

孩子也在炕上爬着，笑着。

董平章拉着赵玫，说：“你看，我给你带回一样什么稀罕东西？”

赵玫低头一看，竟是一根铮亮的金属发夹，上面镶着钻石般的红玻璃，闪闪发光，这在乡间绝对是稀有之物。

赵玫很是惊讶，忙问：“这是哪来的？”

董平章把李芹的话，跟赵玫说了一遍。

赵玫沉思了一会儿，说：“你们两个都是有情有义的人。”

董平章忙说：“这是怎么讲？”

赵玫笑着说：“我早就知道，她是你的未婚妻，差点就过门了。”

董平章一惊，“你怎么知道的？”

赵玫又笑着说：“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我早就知道了。”

董平章颇为狼狈，忙解释说：“其实，事情不完全是这样的。”

赵玫说：“平章啊，不用解释啊，我还不知道你么。我现在知道芹妹了，她是一个好姑娘，我认这个妹妹。”

赵玫把那发夹戴在了头上，问董平章：“我戴上也挺好看吧？”

“那当然，我媳妇那还用说的。”

“去，耍贫嘴。”

这锃亮的发夹就戴到了赵玫的头上。以后，这发夹随着赵玫颠簸万里，去了南疆，后来又魂归故里。最后转到了一位有着维吾尔血统的俊美少妇的头上。这也是本书的主线索之一。

低沉了一番之后，赵玫又说：“其实，我还真想，可以的话，叫她上我们家来养伤。”

“唉，怎么也难。国民党来了，我们过不下去。共产党来了，她又过不下去。难道就非得没有我们和她能在一起的一天吗？”董平章很为难地说。

那刚出锅的烙饼，吃起来，又少了点味道了。

“吃了，就早点睡。明天，我还想去我们那块地里看看。挑点水，几天都没去了。”董平章心里还始终惦记着他的地。

“还去看啊？”

“那些近处的地，都被来来回回当兵的踩得不像样子。我们那块地，隔得远，还行。我远远地看了，没怎么被踩。”董平章的心里始终牵挂着田地和庄稼。

赵玫没说话，因为她不知道明天将会怎样。

这一夜，对于他俩是平静地过去了。他俩都没想到，这一夜，竟是他们俩口生离死别的最后时刻。他们俩都没有感觉到这点，以至于相互间没有任何的叮咛、嘱咐、鼓励和亲热，这让赵玫以后整整后悔了一辈子。

15.3没有家的感觉

王立也拎着面袋回了家。

院墙门紧闭着，还挂着锁。王立知道，家里人都走了，也就没什么心事了。

他把面袋扔进了院子，自己又从院墙上爬了进去。

院子里扫得很干净，只是地上多了几片落叶。房门都锁着。王立趴在正房的窗上看了看里面，情况还正常。又走到倒屋跟前，掰开了窗户，钻进了屋里。

屋里收拾得很整齐，他知道，那都是丁妹的活。

他躺在硬硬的凉凉的炕上，没有水，也没有可吃的饭，没有铺的，也没有盖的。

他觉出了，没有父母没有媳妇就没有家的感觉。

但是，他对丁妹就是没有媳妇的感觉。他知道丁妹想和他好，他都觉得他这样做，有点对不起丁妹。可他总觉得丁妹好像应该他哥哥的妻子，使他和丁妹之间总有个看不见却又填不了的沟。丁妹对他的处处谦让，使他觉得丁妹好像是小姐姐似的。他没觉得自己和丁妹已经是个小家，更没有往远的地方想过。

他在炕上翻了几个番，睡不着。

瞪着眼，看着墙上。土墙很陈旧了，粗糙，灰黑，挂了些尘絮。他看了很久，虽然没什么好看。想些什么呢？也没什么好想。没想到，这土墙竟在他脑海里就这样定格了几十年。

他又翻了过来。没吃的，没喝的，这一天还真不好过呢，干脆走吧。

王立又钻出了窗，见了那袋面粉，想了下，在几年没养过猪的猪圈里刨了个坑。反正也是干土，埋了进去，再盖上一堆乱草。

王立翻出了院墙，又跑到连家的门口看了下，也是大门紧闭，无声无息，知道是人早走了。

回到海边，只见连四娃一个人没精打采地扛着箱子，便对他说，家里没事，人都走了。

连四娃一点头，还是默默地扛着。

王立一头钻进帐篷里，反而倒头就睡着了。

第十六章 还乡团

1949年1月16日

16.1 迟得法挨揍

董平章回家的第二天。

陶富贵看没有一个人过来交税交租，早就耐不住性子了。像高增光这样被打击的地富，陆续又有两、三个跑来，使他身边有了人手。还乡团可以派上用场了。前几天，就跟余排长商量了放在今天一起动手，挨家挨户搜钱搜粮。没人住的，就砸门。搜来的东西，六四开，陶得六，余得四。

余排长当然很乐意，今天一早，就把自己的那个排带来了。

陶富贵也已经带着高增光一帮，早早地在十字路口等着了。

见余排长过来，陶便兴奋地一抬手，大叫一声：“动手！”

一场大抢劫，开始了。

迟得法，这时正在他隔壁邻居连家的院子里。

要问他跑到隔壁邻居家干什么？迟得法看着国民党兵“乒乒乓乓”地东敲门、西砸窗，知道不是好事情。眼看就要到自己家了。家里多少还有几颗粮食，不能就这样叫他们抢去啊，这可就是全家的命啊。怎么办呢？对了，隔壁连家没有人，锁着门，说不定那些兵不会进去。对，藏那儿去吧。

但毕竟迟得法手脚不灵便了，好不容易翻了过去，手里那袋粮还没找到藏的地方，只听得街巷里嘈杂的脚步声一阵风似地过来。不一会儿，连家的门就“乒乒乓乓”地直响。迟得法一阵惊慌，赶紧想再翻回自家院子，已经来不及了。连家的院门被“咣”地砸开了。

几个国民党兵看见了正爬在墙头的迟得法，大喝一声：“干什么的？”

“咣”的一枪，子弹从墙头飞过。

迟得法一惊，便掉落在自家的院子里，并非是身手敏捷，实在是吓得不轻。

还没等迟得法爬起来，自家院门也被毫不客气地砸开，门板被砸得四分五裂。

一个国民党兵，上来一把就揪住了迟得法，“你他妈的，还想跑，你也不看看老子是干什么的？快说，你是干什么的？”

还没等迟得法张开嘴，另一个兵说：“一定是共军的探子。”

“对啊，是共军的探子啊。”马上又有附和的。

“抓住共军的探子啦！”一群国民党兵蜂拥而上。

噼噼啪啪，一顿拳脚就上来了。

“哎哟，哎哟。我是个好人啊，我是个本分人哪！”迟得法连忙解释。

一个班长模样的人问：“那你爬在墙上干什么？”

“我，我，”到了这份上，迟得法又不敢说是怕国军抢东西，脑子一转，便不顾脸面往自己头上浇屎了，“我是爬过来，想趁没人，拿点什么东西。”

“弄了半天，抓了个小偷呀。哈，哈。”兵们嘻笑着。

那班长还在问：“那你住在哪儿？带我们去。”

“我就住这儿。”迟得法低声地说。

他老伴听到动静，赶紧出来，看到迟得法衣衫不整、脸有伤痕，被兵们围着，不由得焦急地大声叫着：“这是怎么啦？”

迟得法挤着眼，小声地对他老伴说：“别嚷嚷啦，悄悄地吧。”

“你偷东西的事，咱就不管了。但是你家交多少？自己说吧。”那班长张了嘴。

“我交什么？我不用交。我是中农，我不是共产党那边的。我也没分地主的地，我也没分地主的房，我也没种别人的地。”

“你是不用交房交地交租，但是，还是要交税交捐的。这四年的，一起交。”

“啊呀，老总。我家里哪有什么可交啊？”

“别废话。搜！”

班长一发话，这群国民党兵，立时在屋里屋外翻腾起来。所有的角落都翻了个遍，所有的箱柜都掀了个底朝天。屋里的顶棚都撕开了，院里的草垛也推倒了。

在这个家境算是不错的家里，国民党兵也就搜到了一小袋小米和一小袋高粱。

“就这么点啊？”那班长说。

“你以为我们多有钱啊？”迟得法看着被翻了一地的家，有气不敢说出来。

“他妈的，这点也要。”

兵们拿着这两小袋，就要往外走。

迟得法急了，嘴里说着：“别拿走呀，老总。我们老俩口，就靠这点活命呀。”

“去你妈的！”那班长一枪托就把迟得法打倒在地，“没把你抓走，就算不错了。”

迟得法老俩口，坐在地上，相拥而哭，别无它法。

16.2 李芹的抗争

高增光带了一帮，往李芹家的这条小巷来。

来到李芹门上，照例是狠敲门。

照例是申老汉开门。申老汉已经是急急忙忙地过来，高增光显然觉得老汉开晚了，一把推开。老汉一个趔趄，差一点儿摔个大老跤。

高增光根本没理这茬，径直往屋里走去。

走到堂屋，一闻，有年青女人的气味。

往右一转，跨进里屋，一个年青的女孩，在炕上。

那当然就是李芹。

高增光已经几年没遇到年青的女孩了。这一见，眼睛马上一亮，“啊呀，好俊的女孩啊。”

一边撮着手，一边嘻皮笑脸地上前。

“干什么？”李芹正色道。

“嘻，嘻。你还不知道，你大哥我想干什么？”

高增光一步跨到炕前，把手伸到了李芹缠着纱布的腿上。

李芹出手很快，一记响亮的耳光，就落在了高增光的脸腮上。

高增光绝没想到对面的女孩会有这一手，勃然大怒，“你他妈的找死啊！”举手就要打。

李芹心想，共产党在的时候已经受了几年的气，国民党来了还要受气啊，便毫不相让，尖叫一声：“你知道本小姐是谁吗？”

高增光一愣，眼前这女孩，还有什么来历么？

申老汉赶紧在一边说：“李小姐受伤后，陶县长都来看过。昨天，还有两位很大的长官来看过。”

“有什么了不起，”高增光还在嚷，“我才不信！”

“你把陶富贵喊过来，你把章团长喊过来！这是方舰长昨天刚给我的。”李芹用手托起金光闪闪的十字架给高增光看。

高增光一看那金灿灿的东西，又见财起意了，伸出了手。

“呸！”李芹怒目而视，“你敢？”

“怎么啦，怎么啦？”正在这时，余排长听见吵嚷，走了进来。

一进屋里，余排长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啊呀，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快别吵了，都是自己人。哈，哈，哈哈。”余排长赶紧打圆场。

“这是方舰长身边李副官的妹妹李小姐，这是新任的警察局高局长。高局长，李小姐也是受了共产党的苦，这腿是叫共产党砍的。”余排长两边介绍着。

高增光马上向李芹陪笑，“李小姐，实在不好意思了，那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啦。是阿哥我有眼不识泰山，在此赔礼了。”

“呸！什么狗东西，算什么自己人。”李芹还不歇气。

高增光只得悻悻地转过身去，朝申老汉使能耐了，“还有这两间，给我翻！”

“这老头的儿子，以前是共产党的民兵，早年就叫日本人杀了。”高增光身边的人在跟他说。

“不管叫谁杀的，那还是共产党。更得搜！”

放在炕上的那袋面粉，很快被拿走了。

“不能拿呀，不能拿呀。”申老汉哀求着。

“这是章团长给的，不能拿！”李芹听见了，要挣扎下来阻拦。

余排长也说：“高局长，这一家就算了吧。”

“这一家也不要，那一家也不要，你们有军粮，我们吃什么？扛走！”高增光恶狠狠地对手下说。

李芹已经挪到了房门口，想拉住拿面袋的那个人。

高增光对李芹说：“你别忘了，那老头的儿子是个共产党。你都这样子了，还为共产党说话？”

李芹说：“我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拿人不当人，我就最痛恨。杀父之仇，一定要报，但决不是对无辜的老人下手。”

余排长也说：“算了吧，高局长。”

高增光脸一横，说：“你也不过就是个排长，还管到我局长头上了。”领了他那两三个人，扬长而去。

余排长气愤地往地下吐了口痰，“呸，不知好歹的东西。”又转向李芹说，“算了，算了，你和老汉先吃着，不够了，我去跟章团长说。别跟那种狗东西计较，活该叫共产党砍了脑袋，怎么不杀了去。”

一抬头，看李芹脸色不对，知道自己说漏了嘴，也赶忙走了。

16.3董平章的无奈

这条巷里，董平章还正准备挑上水桶扛上锄到地里干活呢，听得各处都有砸门声、叫骂声，真的像昨天西门站岗的哨兵说的，今天要有什大搜查了？也就没敢出门，穿上了那套国民党军服。

赵玫见董平章穿那衣服，又忿忿地瞪了一眼。

董平章知道赵玫的意思，便走到了院里，等着那些国民党兵来。

果然不出所料，“乒乒乓乓”的砸门声也在董平章的院子门上响了起来。

等开得门来，领头的国民党班长见董平章一身整洁的青年军服，倒是一愣，便问：“请问，你在哪儿贵干？”

董平章答：“我是青一团劳军队队长。”

“啊，我明白了。既然都是为党国效力，那就再请为党国出份力，捐点钱粮吧。”

“老总，你不知道这几年，我们的日子不宽裕，家里真的是没有什么可拿的了。你们也已经去了几家了，应该能看出来了吧。”

“正因为东西少，所以我们才要认真搜、仔细查，多少也要拿一点。”

“你们再搜，也搜不出什么来。”

虽然董平章穿着国民党的军服，可那班长搜起来也并不含糊，照样屋里屋外翻得一塌糊涂，顶棚也撕了，草垛也推了，炕上地下更不用说。

赵玫抱着哭闹的孩子，拍打着，眼睛里冒着火花。

面粉袋和玉米面袋，都被翻了出来。

“还说没东西？数你家的东西最多，到底是个队长。”那班长还在说风凉话。

董平章说：“这可是青年军发给我们的。你看，上面还有字呢。”

“我才不管谁发的呢，我只管收钱收粮。找不到，拉倒；找到了，就带走。就这么简单。”

“你要拿走，我就去找青年军，叫他们来找你们算帐。”

“哈哈，别来这一套。青年军算个屁。别说你不过是个干苦力的，就算他们来个营长、团长的，老子也照样不买他们的帐。”

“走！”那班长一招手，那帮兵面带喜色，呼呼隆隆地走了。那两袋面，是他们一上午最大的战利品了。

国民党走了以后，赵玫气得一屁股坐在炕上，脸色发青，一声不吭。

董平章赶紧说：“亏得我留了个心眼，把面粉分了点出来，塞在炕洞里，没有被搜走，还能撑个几天。”

赵玫吐了口气，还是没说话。

16.4祖大妈遇害

最惨的是祖责成家。

陶富贵后来知道，土改时，第一个砸开他门、冲进他家的就是祖责成；牵着黄牛，拉着铁耙，从他爹妈脑袋上过的，也是祖责成；烧红了铁锅，把他老婆扒光衣服扔进去活活烫死的，还是祖责成。

陶富贵的心里，对祖责成是千刀万剐也不解恨，那天就这么把他打死了，现在想来还便宜了他。陶富贵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祖责成应该知道这血海深仇，他陶富贵不会不报，为什么会不走呢？

是对他陶富贵的藐视？是江湖本色，一人做事一人当？还是杀了这么多人，到阴曹地府，见了阎王好交代？

陶富贵想不了这么多，只想这个仇，还没完。不是还有祖责成的老婆在么，他杀我老婆，我就杀他老婆。

陶富贵带了一帮人，直奔祖责成的家来。

祖责成家的，也是刚强之人。她觉得既然跟了这个男人，就要跟着他的路走到底。她知道祖责成在外面做的事，知道那结果可能会是什么，知道老祖既然不走，他的主意是想定了的，她俩口早晚是躲不了这一关。她跟着老伴不走，也是准备好有这一天的，只不过比她老伴又多活了几天。当她被陶富贵一伙抓出来时，脸不改色，正气凛然。

陶富贵没想到祖大妈还这么硬，将她推到院子里，跳着，咆哮着：“姓祖的，杀了我爹，杀了我娘，居然还烧红了铁锅活活烫死我老婆。今天轮到我杀你了！”

祖责成老婆，昂着头，眼珠不转，一言不发。

陶富贵还是跳着，咆哮着：“给我砸东西，烧房子，一样也不剩！”

乒乒乓乓，一阵狂砸，门板、窗櫺都被砸得稀烂，炕都扒了，里屋的墙都推倒了。

院子里堆起了一堆门框柜板之类的木料。

陶富贵依然跳着，咆哮着，身体扭曲了，脸都变形了，真的像鬼一样地狰狞：“捆起来！点火！开刀！”

祖责成老伴被捆了起来。

火点起来了。

陶富贵亲手拿过刀，对着祖责成老伴，一阵狂刺猛劈。可怜七旬老妇，血流如注。但还是咬紧牙关，紧闭嘴唇，啊啊了几声，便死了过去。

几个还乡团，在陶富贵的指使下，把她推到了火堆上。

烈焰跳跃着，黑烟滚滚。火焰中，尸体还在抽搐，血腥味、焦糊味，呛人鼻喻。

陶富贵瞪着眼看着，眼睛通红，一声不吭，嘴巴却在蠕动着，像在吃人一样。

火渐渐地小了，烟更大更浓，气味更呛人了。

陶富贵，一扭头，眼睛带着凶光，走了。

剩下的人，铲了几锹泥，胡乱地盖在了火堆上。

陶富贵回到自己的大院，内心的愤恨，没有丝毫地消解，反而更加强烈。

等着日头到了头顶，高增光几个喽罗，扛着几个小面袋回来。

陶富贵一看，一共才十几袋，而且还都是破布缝的小袋子，从申老汉家拿来的那袋章团长给的，算是最像样的了。

“就这么点啊？”陶富贵问。

“是的。看来，在共党统治之下，穷鬼们过的也不怎么样。”高增光答道。

“余排长那一路呢？”

“别提了。”高增光忿忿地说，“他把他搜到的，都拿走了。”

“不是说好了四六开么？怎么这样不讲信用？”陶富贵这时候居然也会想到信用。

“陶爷，这年头谁也靠不住，就得靠咱们自己哥儿们。”

“哼！”陶富贵愤然而又无奈地从鼻子里出了口气，使劲地拍了下桌子，满心想的报仇解恨、夺回家产，就这样结束了。

第十七章 侦察失手

1949年1月17日

17.1 敌后侦察

在一营撤到李家泊的第四、五天。

那天傍晚，一营的营部里又在开一次会。

这几天，双方都没有大的动作。解放军的前线指挥部，一时难以判断敌人的意图是攻还是守。按说，国民党方面不会就此止步，起码应该以海源县城为目标。不然，仅占个龙头镇，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又看不出有发动进攻的迹象。如果趁敌人立足未稳之时，反击过去，却对敌人地盘里的兵力配置，有无增援和调动，有无重型武器，有没有修建大的工事，都不很清楚，这就难以选择突破口。指挥部要求团里派人进去看看。因为，一营一直就驻扎在龙头，这个任务团部当然也决定由一营承担。

为了怕进去以后，万一被发现，单个人不好对付，令营长觉得还是组织一个侦察小分队为好，成员挑精明强干的。一旦有事，也能强行冲出来。

一连，刚补充的新兵太多。这个任务交给了三连。

三连的叶连长，已经把人员安排好，由普指导员亲自担任队长。

叶连长、普指导员和小分队的全体成员，都来到了营部。

令营长为他们送行，言词十分地感和恳切。

普指导员，对令营长、也是对小分队全体成员说：“我的生命，我们三连的生命，是印冠亚烈士用他的生命换来的。我们的生命已经交给了壮丽的革命事业，我们要用生命来保证完成我们的任务。”

营部安排了晚饭。晚饭里，还有一只很难得有的鸡。

晚饭后，小分队一共八个人，换上老百姓的服装，一律短枪，不带手榴弹，由李辰带路，出发了。

令营长、叶连长、战士们送他们到村口，没有任何的言语，只有紧握的双手，和表露着无限深情的双眸。

叶连长紧握着普指导员的手，使劲地晃着、晃着，不肯松开，多少话语尽在不言中。

队伍隐没在了夜色中。

队伍直接往东，在大河没拐弯之前，跨过了河。而后，再往南。

快到矛山了，在经过这边最后一个岗哨时，普指导员叫李辰别再往前了。

“回去吧。毕竟在这儿住了几年了，大路小路还都是熟悉的。”

李辰还是不放心，又走了一段，说：“翻过山，有个小村庄，那里面肯定有敌人，要绕过去。”

“好的，你放心回去吧，李同志。”普指导员再三说着。

李辰也知道再跟下去，反而给队伍添麻烦了，于是依依告别，往回走了。

队伍上山了。

在一个灌木丛中，静卧了好长时间，没有发现什么情况。月亮在薄云的后面，山上树影朦胧，四处非常安静，只有虫儿在草丛中“蟋蟀”地叫着。

他们两人一组，轮流往前。一组到前面，停下，最后一组再到最前面，停下，如此交替前进。

这矛山，是座东西向的长长的山堙，山顶平缓，长满了松树，比较适于隐蔽，所以小分队选择了这条路线。

快到山顶了，普指导员他们再次在草丛中静卧下来，向四周观察着，看对方固定哨的位置在哪儿，再等他们的流动哨走过去。

把流动哨让过去了，可固定哨没发现。

普指导员决定不等了，队伍仍然猫着腰，无声无息地依次交替行进，过了山脊梁。

已经下来一段路了，在一块大石头的背面，忽然走出来一个国民党兵，还提着裤子，大概是蹲在石头后面出恭，听见声音出来了。就站在前面几步，普指导员想回避，也来不及了。

“这么晚了，还上哪儿去啊？”那兵还在伸着懒腰，一边系着裤带。

“罗团长叫我们上尖山送粮食，要我们连夜赶第二趟。”普指导员学着当地的方言，回答着。矛山的东面是尖山，是敌人最东面的阵地，这都是事先编好的词。

“那，你们怎么从山上走？”

“老总，我们是想抄个近路。”

“路”字还没说完，另一个战士已经从那兵的身后掐住了他的脖子，一使劲把他压倒在地，拖进了岩石的背后。

“说，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普指导员开始审讯。

但那兵，拼命挣扎。稍微松开点喉咙，想叫他答话，他却想要嗷嗷地叫。两条腿不停地蹬踏，草木在晃动，有小沙石滚下了坡。

普指导员脸一沉，当机立断，说：“干掉。”

背后的战士，稍一用力，极轻微的“喀嚓”一声，就扭断了那兵的脖子，把他拖进了更深的草丛里。

队伍更谨慎地下山。下到山底，便沿着山坡和农田的边沿往西，这往往是人们最不习惯走的路。

到了相当于龙头镇外东北角的地方，队伍停了下来。

按计划，小分队采取昼伏夜行的方式，用三个晚上的时间，从东北往西南斜插整个敌占区，从大河口渡河返回。

天色已经微明。队伍找了个柞树林，隐藏了起来。本来，在当地种柞树是为了养蚕的。但这几年，这行业都荒废了，北山的巢丝厂关了若干年了。柞树林里，长年没人进去，蓬草长得有半人高，正是藏人的好地方。

普指导员在草丛中，啃着干粮，看着外面。其他人则轮流观察和睡觉。

这个位置很好。往南能看到已经作为334团团部的中学，那里国民党兵人数很多，军官们进进出出，显然是个指挥机构。没有修炮楼，但原有的校舍，已改造成有射击孔的半军事工事了。往东走的路上，都是穿土黄布的国民党兵。往西能看到镇北的惠民寺，那儿把守的，是穿橄榄绿的国民党军。普指导员知道，这是和他们交手过的青年军了。有一辆卡车过来，卸下了一些箱子。空车从西面走了，并没有过来。北门和东门，把守的都是土黄布的国民党。普指导员，已基本明白了国民党军的布置。

下午的时候，普指导员还有时间打了个盹。

傍晚时分，有个战士推醒了普指导员，指着前面说：“指导员，你看，好像有情况。”

中学里，敌人好像忙乱了。

岗哨增加了。

一会儿，哨子急促地吹起来了。大约一个排的敌兵集合整队，往东去了。

“看来，是敌人发现那个尸体了。”普指导员脸色严肃了起来。他把大家都叫了过来。

“敌人已经警觉了，我们的困难更加重了。大家要更加小心。”

“那我们怎么办？先撤回去吗？”有人问。

“不，我们还远远没有完成任务。”普指导员坚决地说，“还是按原计划，今晚我们翻到镇里去。镇外，敌人很可能会大搜查。翻进去，隐蔽到一个空屋子里，反倒能安全些。”

“好。”大伙都赞成。

17.2惨遭活埋

天，完全黑下来了。

中学里和往东的路上，敌人依旧忙乱着。

普指导员他们决定，再等一会儿。

差不多半夜了，国民党兵也渐渐地安静下来，中学里的灯光大也都熄灭了。

“走。”

队伍出发了。镇北的城墙外，早就没有了人影。按照村干部的详细介绍，他们找到了有几处坑凹和裂缝、适合于攀登的地方。上了城墙，又向前十几米，在另一处下来。神不知，鬼不觉，就这样，他们进了镇里。

镇里更是漆黑一片，没有任何的灯光。

八个人转进一条小巷。走了一段路，一个院子里传出有几个人划拳吆喝的声音。“六六六啊，七匹马呀，八魁首呀……”正赌得来劲呢。

普指导员他们便在巷子口靠墙贴边蹲下，观察着周边的情况。

突然，旁边巷子里响起了脚步声，一个国民党兵从巷口的墙角处拐了过来，一头撞在了普指导员的身上。几个战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压住了他。

普指导员低声地说着：“我们不想杀你，只要你交代情况。”

那兵没再反抗，被往后拖，普指导员想找个僻静地方就地审问。

可是，那边的巷子又响起了脚步声，喊着：“瘸子，瘸子，跑哪儿去啦？不许赖帐啊。”

被战士们压在身底下的敌兵，显然就是那个瘸子了。这瘸子听得喊声，猛地想跳起来，被上面的战士狠狠地压住。他又猛地蹬了一脚。这一脚却不巧正蹬在旁边用块石垒成的院墙上，这些石块之间没有任何的粘合。

这一蹬，石墙轰然一声倒塌。

在大家还没反应过来时，对面走过来的兵，突然大叫起来：“共军！共军！有共军！”

一位战士眼疾手快，一枪就打倒了那兵。

但那院子里的国民党兵冲了出来，朝这儿疯狂扫射。

战士们在这狭窄的巷子里毫无依托之处，立即举枪还击，打得对方不敢往前。

躺在地下的那个瘸子猛地跳起，大喊一声：“我在这儿呢！”旁边的解放军想压住他也来不及了，“啪，啪”两枪就结果了他。

就在这时，一颗手雷从院子里扔了出来，在普指导员他们中间炸开。

八位战士非死即伤。

四周哨声骤起，前后左右的巷子里都响起了慌张的脚步声和零乱的枪声。

国民党兵狂叫着，“抓活的！抓活的！”一窝蜂地扑过来，又拖又拽。

“还有活的哎。”

还有气息的，也都说不出话了。

他们都被拖到了东门外。

罗团长、陶富贵、滕营长、余排长等也都赶了过来。

八个解放军被拖来后，堆在了操场上，血流了一地。而后，一个个被国民党兵拽了起来。

“说！说！”周围的国民党兵狂吼着。

没有反应，就扔到地下。还有呻吟的，就棍子打，刀子捅，百般摧残。

普指导员忍着剧痛还睁开眼，怒目而视。

“都说共产党的骨头硬，那我连审也不用审了。统统拿石头砸死！”罗团长叫着。

陶富贵拍着手跳着。

八位侦察兵又被拖到了操场边的水沟里。

国民党兵用石头纷纷地砸去。不一会儿，水沟里就堆起了一堆石块。

17.3抓舌头

侦察小分队在镇里与敌人交火的枪声，因为正是夜深人静时分，李家泊前沿我军的哨兵依稀地听见了。虽然不敢肯定，但一定是有事了。

营、连长们得知哨兵回来的报告，说是望海山南面昨晚有枪声，知道是派出去的小分队有了事，马上在一起商量。也说不上是开会，反正成天也就在一起。

出了什么事？会是什么情况？他们能对付得了么？现在又是怎么样了？我们能帮上什么忙？让他们自己去见机行事？

大家焦急地议论着。

最后商定，派个人过去打探一下。

怎么打探？

最稳妥的办法是抓个“舌头”回来，行动的风险小，获得的情报又多。

好！

谁去呢？

一个是**大郑**，战场经验丰富。一个是**杨定神**，熟悉国民党军队的情况，一旦面对面遇上，能应付过去。

鲁队长，自告奋勇也要去。

大家觉得，去得人太多，也不一定好。这次派出的小分队，恐怕就是人多了。

鲁队长说，那我就到河边吧，这样更便于掩护。

大家都说好。

把**杨定神**喊来了，跟他一说。他很高兴，这是到了解放军部队来第一次接受任务。不过，他说，他想换上解放军的正式军装。

大家说，这事好办。不过这次潜回敌占区，要是能穿上青年军的军装才对，一时又找不到，那就还是穿身上这现成的一套吧。

他们三人出发了。

选择的地点，是**茅山**。

望海山的国民党兵，比较警觉，不易潜入。穿土黄布的国民党兵，相对来说，好对付一些。

到了河边，其他人，在河堤后趴下，等着接应。

他们三人悄悄下河，全身趴在水里，就露出个脑袋，爬着往前。

就这样，在夜色之下，他们三人没怎么费事就过了河。

鲁队长按原先的商定，趴在河岸的内侧，全身泡在水里，就露出个眼，在河岸边小草的后面。

大郑领着**杨定神**继续往前。

这儿的河岸离山脚，比较近，也没有那一层层层的梯田。他俩人很快就靠近了山下。

他俩趴在**梣萝**（一种灌木）丛下，等着。

过了好一阵，一前一后来了两个国民党兵，那两人相隔二三十米。

是两个兵，事先没想到，抓不抓？没法再商量了，**大郑**对**杨定神**挤了下眼睛，用手比划着，指指前面那个，指指小杨；又指指后面那个，再指指自己，这是**大郑**在作了分工。

两个兵过来了。**大郑**先把前面那个让过去。

等后面那个刚走过去，**大郑**就从背后扑了上去。一个胳膊紧扼住他的脖子，另一只手上的尖刀就插进了他的左后背。尖刀被肋骨挡了下，**大郑**手腕一使劲，刀锋一转，直穿心脏。**大郑**只觉得一股热流，从胸前湿到了脚背，一股腥膻的热气，直冲鼻子。**大郑**哪顾得上恶心，连气都没让他出，就拖进了灌木丛。

杨定神轻声往前面那个兵走去。

前面那个觉得不对劲，回过头来。杨定神见势，也立刻猛扑上去，把他打倒。

大郑连忙过来，一起把那兵压住，往河边拖。

那兵拼命地挣扎，等下了河里，直扑腾，水花四溅。

山上的国民党兵发现了，远远地喊着：“怎么回事？”有人开始下山了。

大郑干脆把那兵接到水里，把他灌昏了过去，俩人再死命地往回拖。

国民党兵下到半山腰了，“叭叭”地开枪了。

大郑俩人在河中间，使劲拖着俘虏往回走。

有两、三个国民党兵摸着山岩、扶着松树，急急忙忙地往下，眼睛紧盯着河里的人，就想一把抓过来。

突然，“叭”地从侧面过来一枪，立时撂倒一个。这是鲁队长的一枪。

剩下那两个兵，再也没敢动。

河岸对面的枪也响了，掩护战友们回来。

俘虏被拖上了岸。

鲁队长也回来了。

大家围着俘虏看，“没淹死吧？”

有人一摸，“还有气，心在跳。”

大郑说：“这还行，这趟算是没白跑。”

“翻过来，吐水。”有人说。

七手八脚、一阵折腾之后，那兵醒了。接着，就押到了营部。

在营部，俘虏交代，据他所知，头天晚上，是有几个解放军进了镇里，被抓住，都带到334团团部处死了。他还说，那个伪县长把前几天杀掉的老头的老婆也杀掉了。

人们震怒了，拍着桌子，大叫着，大骂着。

有人还上去狠揍那俘虏，被营长制止了。

第十八章 有口难辩

1949年1月18日

18.1 钱思富受困山村

在这之后不久，失踪了几天的钱出现了。

小钱从与部队走散、从镇外面东南角的饲养棚里跑出来，流落在野地里已经三天了。白天躲起来，又不敢睡，只能趁夜里悄悄地爬。就是太饿了，饿得胃疼，饿得没力气。实在饿得不行，就掰玉米叶，放在嘴里嚼，涩得满嘴发麻，咽不下去，咽不下也得咽。渴得不行，就喝沟里的混水。他也知道那水不能喝，喝了要生病。可是不喝，眼下这关，就过不去。

他就怕被国民党抓去，可是，外面的国民党兵好像越来越多了，自己敢于往外活动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身体越来越虚弱了。这一天，他拉稀了，肚子绞疼。可是，坐也坐不起来，就拉在裤裆里，臭得连自己也受不了。

所有的，都能忍，心里最难受的，就是太寂寞。从来没有自己一个人单独待过，没有人能来帮助他，没有人能来安慰他，没有人告诉他该怎么做。十六岁的他，流下了眼泪。难道这也能算是不坚强吗？

还要往前爬。只要还有口气，就要往前爬。浑身都是泥，手掌都出了血，手指疼得，碰哪儿都像钻心一样。眼睛都迷糊了，草木都看不清了，天地都在旋转。

小钱觉得自己就要不行了。他不知道，死是什么感觉，可能这就是了吧。身体死沉死沉的，拖不动。头疼得要命，像要炸开了一样。脑子里嗡嗡地一片空白。即使是这样，他就记得要找革命队伍。他知道，这时候想爹想娘也都没用，就记得要朝北朝东死命地爬。

他看见那儿的树后面，好像有房子。他不敢在路上爬，只能在草丛里，拽着草茎，把自己往前拉。还没到屋前，他就晕过去了。

当他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了炕上。

眼睛里看到的是一对破破烂衫、满脸皱纹的老夫妻。是老两口把小钱拖进了屋，抬上了炕。

小钱想张嘴说话，老汉摆了摆手，端上了一碗糊糊。

小钱已经几天没有喝上热饭了，几口下去，身上滋润了许多。再往下一看，身上的脏裤都已经换了，尽管穿上的裤也很破旧，但小钱心里很感激。他知道，他得救了。他被老乡冒着危险救下来了。

小钱又昏沉沉地睡过去了。

当醒来的时候，已经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老夫妻依然在炕边上，陪着他。

小屋很狭窄，很破旧，很阴暗，泥巴墙早已斑驳脱落，空气中飘散着枯草的霉味。看得出，老人的生活很拮据。他们渐渐地说起话来，知道了这个小村叫孙家乔。他们也姓孙，儿子也去支前了，留下老两口艰难度日。他们一见小钱，就知道是咱们部队上的。看见了小钱，就像见到了自己的儿子。小钱一开口，也是海源的口音，这就更亲切了。老两口也知道了，小钱的家就在北面百十里地，一年前从儿童团参了军。

老两口忙问，家里父母还在啊？身体还硬实啊？还回家去看过啊？

当得知小钱就在本县，这一年多，也没回去看过。老两口又嘘唏不已，难怪自己儿子，出了省，就更没有音信了。

老妇人说：“差点以为你醒不过来了，真急死人了。这下可好了。”

老汉说：“等这次病好了，回了部队，一定要向首长请个假，回家去看一下。”

小钱说：“敌人还没打跑呢，怎么能回家？”

老汉说：“这倒也是。这帮国民党从哪个裤裆里钻出来，又来祸害人。”

小钱说：“几百万国民党都被赶到长江南面去了。就他们这么几个人，猖狂不了几天。好日子很快就会来的。”

小钱说着，苍白而又疲倦的脸上，露出了几天来第一次的笑容。

老两口苍老的脸上，也有了难得的笑意，牵动起更深的皱纹，露出残缺焦黄的牙齿。

“大爷，看你们生活也挺紧巴。”

“是啊，这一片山峦都是陶富贵家的，我们是替陶家看山的。没有工钱，就是能划拉点掉下来的碎柴火，在山上养几只羊。”

“那粮食呢？”

“拿柴火和羊奶进城去换。”

“那应该说，日子是可以的了。”

“勉强过吧。就是受气，受陶家的气，进城换粮受大户人家的气，走哪儿都要低三下四。”

“解放后，好多了吧？分了山分了地。”

“解放后，是好多了。不过土改后，城里的大户都倒了，买柴买羊奶的人少了，山峦挣不出钱来。就是不受气了，没人敢欺负我们了。我们也能站直腰做人了。”

“是啊，我们家也是这样，土改了，翻身当家做主人了。”

“所以，我们都愿意跟着共产党走。”

老人和小钱都舒坦地笑了。

“哦哟，”不料，小钱的肚子又绞疼了。

老妇人赶紧下炕，去点上把火，端点热水过来，给小钱喝，又用热布敷在小钱的肚子上。

“哎哟，哎哟，”小钱忍不住地疼，一下子浑身又松软下来。

小钱脸上通红的。

老妇人知道，小钱又是肚子疼得憋不住，又拉了。

“别不好意思，就当是你的爹妈在身边。”老妇人说。

“是啊，都是为了闹革命，才撇家舍业出来的。我的儿子在外面病了，不也得靠别人来照顾嘛？”

小屋是昏暗的，甚至晚上都点不起油灯。但小钱的心里是暖暖的。

又过了不知是一天还是两天，小钱躺在炕上，精神觉得好多了。老汉刚外出捡了些树叶树枝回来，在院子里整理。

“砰。”几个国民党兵突然跨进了院子。

“你们家好像多了个人？怎么回事？”领头的兵在问。

“没有多啊？一直就是三个人啊。”老汉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已经有所准备。

“就你们两个老东西，怎么出来三个人了？”

“那是我儿子，一直病在炕上，出不了门。这么大的儿子干不了活，还要老的伺候，真是作孽啊。”

“别啰嗦，进去看看。”那兵推开老汉，进了里间。

一个年青人，满脸病容，躺在炕上。老妇紧张地站在门口一边。

“什么病啊？”

“痢疾，要传染的，我们都不敢进来。”老汉在后面答道。

那兵不信，问炕上的小钱：“干什么躺着啊？起来！”

小钱无力地答道：“我实在起不来，我得痢疾了，你别靠近了。”

小钱一口的海源话，虽然是老北山的话，跟南海沿讲的话是有区别的，但这种差别只有当地人才会听得出来。那兵也挑不出什么，无话可说，可临走还不泄气，又去掀开被。一股臭味扑鼻而来。吓得那兵赶忙走了。

三人都松了口气。

那兵走了以后，小钱对老两口说：“我得走了。要不，就要连累你们了。”

“现在还不能走啊。你的身体还不行，外面的国民党兵也太多，出去，太危险了。”老汉说。

老妇也说：“是啊，等再过几天，你身体再好一点，我们想办法打探清楚一点，再领你出去。”

“就是怕连累你们啊，那就太对不起你们了。”小钱担心地说。

“不是说军民一家人么，我们本就是一家人。再说，那国民党也被支出去了，不会有什么事的，放心躺着吧。”孙老汉说。

“我一直躺这儿，心里也不踏实，老想着部队。”

老妇人说：“我们知道你的心思，也不会一直留着你不走。但你现在身体太虚弱，走路都摇摇晃晃，怎么走回去？等再歇两天，身体再壮实点，再走。那样，我们也会放心点。”

小钱一想也对，也没有再坚持。

小钱又警觉地过了两天，又有情况了。这天夜里，村外的山上，来了好多国民党兵，来来回回地翻腾，想找个什么。脸色都急呼呼、凶巴巴的。听他们讲的意思，好像是他们有人被打死了。

半夜后，镇里又传来了枪声。

小钱知道不能再藏了。

他跟老汉商量了，不能再躲了，走吧。

老汉也觉得，情况有变了，国民党更加疯狂了，小钱应该离开了。

他们商量了等后半夜再走。

老汉装着捡柴火，白天特地上山去看了下。

院门房门都半掩着，省得夜里出去再有推门的声音。

晚上，老两口把家里所有剩下的粮食，都倒了出来，也就是一碗玉米面，做了两碗稠糊糊和两个玉米饼子。老汉和小钱一人喝一碗。两个饼子，叫小钱吃一个，再带上一个。

18.2孙大爷拼死掩护

半夜，老汉和小钱出门了。

因为村北国民党兵的活动比较多，他们先反方向往南，再往东，到尖山下，再折向北。

老汉对这一带的地形，真的是了如指掌，闭着眼睛也能摸着走出去。尽管地势并不复杂，但也有些平常走不到的沟壑。所以，一路上虽也躲躲藏藏，还是绕过了一些国民党兵，一个多小时以后，到了山梁。

两人在松树林里歇了会儿，看了看周围。四下非常宁静，月色朗朗，晚风清爽，草儿摇曳，虫儿鸣叫，松树都不高，但也有松涛轻轻响起。那大河就像一条银灰色的丝带，铺在山下。谁也感觉不出，这平静之下的山林，却是块凶险无比的虎狼之地。

他们站起身来，继续往山下走。

老汉选择了一条僻静的山沟，既没在山梁，也没在沟底，而是在斜半坡往下。通常不是这么走的，老汉考虑得够周全了。

离山底只有一二百米了。这一带，大河紧靠着山崖流过，河水在月光下的波纹都能看见了，汨汨流淌的水声都能听见了，就要下到山底了。

可就在这时，当他们扶着一块大的山岩，要跳下一小段山崖时，那山岩后面，一个国民党兵拿着枪出来，端着刺刀，站在了他们前面，挡住了去路。

“想投奔共军吗？早就看见你们了。”

正在小钱一愣之时，谁也没想到的是，老汉竟一把拽住了枪口，叫一声：“下了他的枪！”

小钱上去就一脚。别看小钱已病了多日，但那兵站的不是地方，在山崖的边上，这一脚却起了作用。那国民党兵晃了两下，失去了平衡，“啊”的一声，摔到了崖下。小钱顺势把枪夺了过来。

那崖并不深，也就两人多高。摔下去的那兵大声直喊：“来人哪，来人哪！”

山岩后的草丛里，又冒出几个国民党兵，嗷嗷地叫着，冲过来。

老汉这时也急了，对小钱说：“跳下去，打死他，别管我，快跑！”

小钱纵身一跳，就跳在那兵的边上。那兵还没来得及爬起来，就被小钱一刀刺上。那兵在地上打着滚，哇哇直叫。这是小钱第二次刺杀，这次可不像在海角那一次的胆怯和犹豫，他也不管曾经教过的拼刺要领，只顾得拔出来再刺，拔出来再刺。

崖上，老汉抱住了最先冲来的敌人，拼了全力，大叫：“快跑！孩子，快跑！”

小钱拔出枪，往下跑出两步，回头往上看，后面的敌人用刀在刺老汉，衣服上血渍在渗开，而老汉却死死抱住那兵不放。

老汉忽然又看见了小钱，拼着劲，说着：“跑啊，跑啊。”

小钱举枪，一扣板机，“叭”的一声，还真撂倒了一个。

趁敌人愣神的时候，小钱转身拔腿就跑。

小钱在跑，脸上满是泪水。

身后响起了枪声。

小钱回头，又是“叭”的一枪。

敌人又愣了一下，没敢追过来，只是远远地放着枪。

小钱端着敌人的枪，眼睛里又是泪水又是怒火，在草丛、石块、小树之间左右跳跃奔跑着。

就这几天的时间，小钱成长了。

到河边了，国民党兵的枪声还在后面跟着。

下河前，他又回头开了一枪，便下了河。

靠山崖这边的河水很深，是河水常年在山脚下漩出来的深潭。

小钱一下去，就没过了头顶。

小钱并不怎么会游泳，手脚乱扒拉。枪也沉下去了，他很舍不得那支枪。那是他第一次缴获的枪，那是孙大爷用生命换来的枪。他抓住那枪带，不肯放手，那枪却要连他一块儿拽下去。他还是不愿意松开手，他的眼又湿润了，已经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河水。

小钱用他自己的游泳姿势拼命扒拉着。水冰凉的，虽然拼尽了全力，可还是往下沉，又喝了两口水。

突然，对面也响起了枪声。

小钱真纳闷，怎么前面也是敌人。

在迷糊的眼前，飞溅起了水花，有人影跳动着，有人也跳进了水潭。

有一只大手抓住了他的胳膊，把他往前拖。

他，又一次得救了。

手里还没松开那枪带。

在枪声中，小钱被拽上了岸，拖到了河堤后的小斜坡。

敌人决不敢过河来的，枪声停止了。

小钱躺在草地上，睁眼看着面前戴着红五星帽的战友们，眼泪又止不住地下来了。

他拉着他们的手，嘴唇抖动着：“我可回来了。”

那些解放军问清了怎么回事。是一团一营一连一排一班的啊，眼前这个小伙，别看稚气未脱，还真是的老大啊。他们喜欢把排行是一的，比如一团称之为老大团。像小钱这样一字到头的，还真不多。

他们是北海团的，刚接防没几天。听见枪声，看见一个人影往这儿跑，应该是在被国民党追赶。所以，他们开枪还击，又见人影进了河里瞎扑捅，便派人下河来接应，还真救回来一个战友。

“那枪怎么是国民党的卡宾枪呢？”他们还疑惑这一点。

小钱说，这可是他拼了命、孙老汉又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才夺过来的。

北海团的战友们更敬佩这位小伙了。

他们领小钱回了他们在野地里的营房。说是“营房”，其实也就是一片窝棚。吃了顿饭，好好地睡了个觉。下午，他们还派了个班长，把小钱送到了李家泊的一营驻地。

18.3胡指导无端审讯

下午，小钱到了李家泊。

尽管部队派出的侦察队失利，驻地气氛有点紧张。但大郑和纪排长他们几个见到了小钱，还真的是喜出望外，又笑又叫，又蹦又跳，抱成了一团。

胡指导员在一边，把北海团的人喊了过去。

他们几个没注意到这点，还在高兴呢。

“你是跑哪儿去了？一眨眼就不见了。”纪排长问。

于是，小钱又把他这几天的苦难经历说了一遍。

“能回来就好啊，还是你小子命大。”大郑笑着说。

看着小钱还拎着一杆美式卡宾枪，纪排长问：“这是哪来的？”

小钱挺骄傲地说：“这是我缴获来的。”

大郑的眼睛都一亮，兴奋地说：“哟，真不简单呐，两天不见，小钱都能缴获卡宾枪啦。”

一会儿，北海团的同志从连部出来，跟他们告别。

小钱走过去，连连向他表示感谢。

那位同志的神情却没有刚才的热烈，表示不必客气之后就转身走了。

连里的文书过来，找到小钱，说：“小钱啊，胡指导员找你，快过去吧。”

“哦。”小钱答应着。

大郑说：“那就快去吧，小钱。连里还真关心你呢，刚回来，就叫你去了。”

小钱高高兴兴地跟着文书来到连部边的一个小屋。

胡指导对小钱的回来，却另有一番考量，这不是他政治工作的又一个好题材么？从到一连来，自己觉得样样工作也不错啊，为什么上级领导老是看不见自己呢？恐怕还是因为没有一项突出的、能拿得出

手的工作成绩。这一次应该是个难得的机会，拿出应该谁也不会有有的成绩，让领导们瞧瞧，我老胡可不是一般的能耐。他见到小钱进来，立刻站起身，迎了过去。

“啊呀，小钱啊，回来啦，快进来，快进来。”

小钱一个立正敬礼，“报告，指导员，一班战士钱思富报到。”

“哦，哦，先进来吧。”胡并没有回礼，对文书说：“你先忙去吧。”

胡很关心地问：“小钱啊，怎么这些天才回来啊？没出什么事吧？”

小钱毕竟还单纯，没听出胡指导话里有话，急急地说着：“这几天，真是，我一辈子也没有发生过这么多的事。”

“那就坐下，慢慢说，不着急。”

“那天，我和杨定神，因为要背着受伤的包金贵，走得慢了。跟着人群，走到南门外。前面出现了国民党兵，老乡们乱了，我们几个人被挤散了。我就找不到我们的人了，把我急死了。”

小钱停下来，看看胡指导。

胡指导听得很认真，见小钱停了下来，忙说：“说，说，别停下。怎么，听说后来又生病了？”又过去给小钱倒了杯水。

小钱接过水，连说谢谢，放在了桌子上。

“是啊，在野地里，饿得厉害，也渴得厉害，熬不住，知道喝脏水要坏肚子，也熬不住地去喝。哪有杯子里这样的水啊，做梦也不敢想啊。”

“熬不住？”胡很注意这个词。

“是啊，渴得嗓子冒火，都想用手把喉咙抓破。”

“坏了肚子，又怎么了？”

“拉肚子，呕吐，浑身没劲，爬不动，最后昏过去了。”

胡又警觉了，追问道，“昏过去了以后，又怎么样了？”

“一位老大爷收留了我。”

“哦，哪个老大爷？”

“那个老大爷，后来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牺牲了？那就是没有证明啦？”

胡的语调明显变了，小钱也听出来了，很惊讶，“他都为我牺牲了，现在还都躺在山上，这还用证明吗？”

没料到，胡的脸一变，说：“你的军装，哪儿去了？”

“我躲在饲养棚里时，听见国民党兵已经围在外面了，就把军装换下来，穿上老百姓衣服，好不容易才混出去了。”

胡突然猛地一拍桌子，正色道：“你的枪，上哪儿去了？”。

小钱都有点不知所措了，竟然口吃了起来：“也……也……也丢在饲养棚了。”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你这就是投降变节行为！”

小钱都慌了，不知该怎么回答了：“难道我要被国民党抓走，才行吗？”

“你难道不知道革命战士的职责吗？革命战士在战场上只有坚决战斗，流尽最后一滴血。宁可牺牲生命，也不能丢掉武器。这个，你也不知道吗！”胡一本正经地说。

见小钱没话说了，胡指导马上紧逼着问：“你是怎么回来的？”

“老大爷送回来的。”

“那支国民党的枪是怎么回事？”

“我缴获的。”

“你的枪丢给了国民党，国民党再丢支枪给你。你能自圆其说吗？”

胡指导步步紧逼，一句比一句快，一句比一句难以回答。这大概是审讯学里面的一个技巧（笔者不知道这应该叫什么学，或有没有这个学）。逼到最紧处，再来个摊牌。胡指导猛拍一下桌子，大吼一声：“是被国民党抓住了，再派回来的吧。让你带一支枪回来，是容易混过去一些。是这回事吧！”注意，这儿按语法虽然是疑问句，但讲的时候必须用肯定的无可置疑的语气，好让被审者顺口就答应下来。

但是小钱好像没学过（或者没看过）审讯学的书，没有按照那个顺序说下来，人都已经气得脸色发白，说不上话了。

这时审讯者要一下子就缓和下来，让被审者有个后退的余地。胡指导还真是按这一套来的，接着就说：“小钱啊，我知道你年轻，没有政治经验，一时做了糊涂事。只要向组织上说清楚，就可以了。我们组织上会考虑给出路的。”

“指导员，可不能冤枉我啊。是那位老大爷拼掉了自己的命，才救下我的呀。”

“冤枉你？你讲了个老大爷，又说他死了。叫死人来证明啊？你骗得了谁啊？”

“还有那些北海团的战友啊。”

“他们只能证明你在那儿下了河，不能证明是谁叫你下的河。”

“那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见小钱无言了，胡冷冷地说：“你不说，有人说了。”眼睛还斜斜地飘过来。

“有谁说？”小钱不知是计，只顾急着问。

“你急什么？杨定神都交代了！”

“他说什么了？”

“嗨嗨，”胡冷笑着，“他说什么，我会告诉你吗？你好好地仔细地想想吧！”

小钱还真愣着神，想了一会儿，“我跟他没说什么呀。我们没走几分钟，就走散了。”

“你们几个是不是串通好了，拿了枪去投奔国民党。他们俩是因为我们部队看得紧，没走成。你倒是跑掉了。跑掉了，居然还敢回来。怕别人不信，还带了支国民党的枪回来。演戏演得还真像啊！”

胡又重重地拍了下桌子，倒给小钱的那杯水也倒在了桌子上，水流了一桌，滴到了地上。

小钱哪见过这种阵势，完全给镇住了，脸色惨白，眼睛发愣，说不出话了。

胡指导一看火候已到，便走过来，拍着小钱的肩膀说：“有了错误，心里感到难过，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样的人还是可以挽救的。就怕犯了错误，还无动于衷，甚至抵触对抗。”

胡停了下来，留出半分钟的时间，等待小钱的反应。在胡看来，面前的这个小青年，不过是他政治工作的一个猎物。现在战斗就要结束了，猎物马上要就范了。

“你只要说一下，就没事了。就可以走出这个门，还是和大家在一起，又是革命队伍里的同志了。还可以休个假，回家去看看父母亲了。说吧。说了，马上就可以出去。”胡又把握着火候，指着那扇关闭的门，加上了一句。

胡指导的脸上，已经有了一丝笑容。这笑容，可以理解成他对同志的关心，也可以理解成对自己即将来到的胜利的喜悦。他对他长久以来积累的政治经验，还是有几分自信的。

小钱突然大哭起来，“指导员，你讲的不对呀，你讲的不对呀！”

胡瞬间就收起笑脸，勃然大怒，又猛拍桌子：“钱思富，这是组织上给你的最后的机会。党的政策，你应该清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屋里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如果拍电视剧的话，墙上一定要挂个钟，只听那秒针在滴答滴答地走。

注意掌握时间，又过七秒钟，胡指导再一次猛拍桌子，吼一声：“给你这条路，你不走，那就走另一条路。我宣布，对你正式进行政治审查！”

胡摔门而出。

胡指导出门后，找来了大郑和宗发奋。胡指导知道有些事叫别人出面更方便。找谁呢？胡指导只需要几秒钟就想出来了。对连里的这些人，他早就摸得很清楚。谁头脑简单、很容易被利用，谁对他有

求，一有机会就要表现自己、跳得很高，这些账早就在他心里，连翻也不用翻。这个本事，潘连长、纪排长就远不如他了。

在胡指导看来，大郑就是前一类，宗发奋就是后一类。宗发奋不是在海边受伤住医院了么？其实，他没有大伤，只是腿上穿透伤，破了皮，掀了点肉，没有伤及神经血管那些，前两天就回连队了。连里挺照顾他，没去班里，留在连部当文书。连里既没有“文”，也没有“书”，也就是个勤务兵吧，跟胡指导还挺合得来。

胡对他俩很严肃地说：“现在给你们俩一个新的战斗任务。我要你们对我们连的一个人进行政治审查。”

两人有点摸不着头脑：“谁啊？”

胡指导冷冷地说：“钱思富。”

“啊，是嘛？他刚回来，有什么问题？”虽然宗发奋对前几天站岗时跟小钱有点小矛盾，听到胡指导这么说，还是很惊讶。

胡指导继续冷冷地说：“在战斗中，他借机逃跑叛变，又被国民党派了回来。”

大郑更有点不信了，说：“他是这样的人吗？”

“怎么不是。你听他的名字，钱思富。钱字当头，还思念富农。什么玩意？不是反革命，还是什么？”

宗发奋似乎有点领悟，说：“怪不得，战斗打响的第一天，他就是从海边慌慌张张地跑回来。我要他说口令，他说不上来，还要硬往里冲，这里面就有名堂哎。”

大郑还在疑惑：“啊？那，那他真的叛变了吗？”

“对组织上的意见，不要有任何的怀疑。我们已经有了证据，但是还要他自己承认。这次审查，对他是个回到革命队伍的机会，同时，对你们也是一次考验。现在是看你们表现的时候了。特别是你，大郑，其他方面表现是不错的。我也考虑过提拔你当排长，但有些同志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当然也不能说不对。我也觉得你在政治方面还没有突出的表现。如果你对钱思富的这次审查有所突破，能拿得下来，那就说明你在政治方面也是成熟的、有能力的，是可以在各方面担负起排长职责的。至于你，小宗，我觉得你思想觉悟高，原则性强，我对你抱有很大的希望。希望你这一次有所表现，表现出你的觉悟，表现出你的能力，表现出比战场上更好的表现，不辜负组织对你的期望。这是组织上对你们的一个特殊任务，就看你们的了。”

两人忙点头。

大郑很认真地问：“那怎么审呢？我们还没有审过人呢，一点也不会。”

“这没有什么会不会，一审就会。主要是态度严肃，要有决心。就像打仗一样，要下决心，这个山头一定要拿下来。态度一严肃，决心一坚定，办法也就有了，他也就交代了。不能有半点的温情主义，那

就是对组织不负责任，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他不负责任，没能把他挽救过来。有些问题他还没有完全交代，就是要他承认自己的罪行，承认是被国民党派来的，尤其是要交代在我们连里还有哪些同伙。我们要扩大战果，把他们一网打尽，这对于眼前这场战斗的胜利，有着极大的意义。要他彻底坦白，完了，把他讲的，用纸记下来，叫他签上字，就行了。”

“是，坚决完成任务！”大郑一个立正，大声答道。

“我再补充一句，审查的具体方法，你们可以自己掌握，拿出你们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虽然钱思富和你们是一个排的，但他现在是审查对象，是潜在的敌人，不是同志，不是战友，要坚决和他划清界限。对他进行毫不留情的审查，这是挽救他的最后机会。对于你们俩，我再讲一遍，千万不能有温情主义，这也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要有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这是党组织对你们的考验，不要辜负了组织对你们的期望。知道啦？具体办法，你们自己想，相信你们是有办法的。”

“是！”两人再一次立正敬礼。

大郑俩极为严肃地进了屋里。

小钱见是大郑他俩进来，像是见到了救星，高兴地说：“大郑，小宗，你们来啦。”走过去要握手。

小宗脸一沉，说：“呸，你这个叛徒特务，快快交代！”

小钱一下子傻了，几个月来一直朝夕相伴、生死与共的战友，怎么说变脸就变脸了呢。他转向大郑，拍着胸脯说：“大郑啊，咱俩关系这么好，你是最了解我的了，我会是那样的人吗？”

没料想大郑也是一板脸，说：“这个就不好说了。在我们革命队伍里，只讲政治，不讲个人关系。你只有老实交代一条路。”

这一下，就像几天前从海边回营房碰上小宗一个味，而且还厉害得多了。小钱着急地说着：“大郑，我冤枉啊。我是吃了多少苦，冒了多少危险，才跑回来的。孙大爷还为了掩护我而牺牲了性命。”

“啪！”谁知宗发奋想早点取得胜利，倒也干脆，一个大嘴巴就搥了过去。“这些鬼话骗得了谁啊？胡指导员说了，你就是个叛徒特务。快说！不说，老子就对你不客气。”

小钱愣愣地看着小宗，又看看大郑，刚才见面还不是这个样子的，怎么才几分钟的时间，一下子就变得不认识了。

还没等小钱反应过来，“啪！”又一个大大耳光从左面搥了过来。宗发奋急于要表现自己的革命，这可是难得的机会，既不用上战场还要冒生命危险，又可以显显自己的能耐，胡指导找来的这个活真好。那天晚上站岗时，这小钱还不听自己的，这就落到自己手里啦，哈哈，宗发奋心里直乐。

“说不说？”宗发奋一把抓住小钱的衣领，提了起来，再一使劲又把他推翻到了墙角。

小钱的屁股疼得“啊咿”了一声，不由自主地弹了起来。

宗发奋一看，吓了一跳，真要打架，恐怕还打不过他，忙着大叫：“他要反扑了，他要打人了。大郑快来救我！”。

大郑本来没想动手，想着要是小钱真打了宗发奋，他在胡指导前面就没法交代了，于是就过来一个扫荡腿，就把小钱撂倒在地上，再一脚踩住了小钱的脚背。小钱更是痛得“哇哇”直叫。

大郑也狠狠地对已经倒在地上的小钱说：“说不说？不说，厉害的还在后面。”要说大郑也没搞过这一套，他怎么也会来这几下呢。这几下，那是最小儿科的了。各种各样的批斗场面，那时多了，大郑早就耳闻目睹、司空见惯了。

但对于小钱就完全不一样了。他的脑子全乱了。他完全想不出来，这世界到底怎么了，这天和地好像在飞快地旋转，都搅成一团糊糊了。他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他走错地方了，这儿不是解放军的地方，不是一连的地方？难道世界上还有另外像小钱、大郑一样的人？还是真的是自己投靠国民党了？还是自己睡糊涂了在做梦？

又一脚踹了他肋骨上，那是宗发奋的……

纪排长和潘连长他们听到了屋里的惨叫声，都过来了，刚要问门口的胡指导里面是怎么回事，那门却开了。

大郑手拿着一张纸，兴冲冲地对胡指导说：“你给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他承认了？”胡问。

“他全都承认了。”宗发奋高兴地赶紧插说话，“他是个软骨头，我才刚动了两下手，他就全都说了。说他是国民党派回来的。”

“好，他有没有交代在我们连里有没有他的同伙？”

“有，有。”宗发奋像立了大功似地兴奋地地说着。

“谁？”

“在纸上写着呢，这是他写的口供。”大郑真的还掏出一张纸，很使劲地看着上面的字，念着：“是，是……是胡，是胡什么来？”大郑不认识下面的字。

纪排长拿过纸来，很认真地看着，一脸的疑惑：“胡自豪。”

大郑一下子跳起来：“哪个龟儿子叫胡自豪，我去抓他过来。”

“呸！你搞的什么东西？”胡指导大怒。

大郑真是个大老粗。他真的是不知道他们的胡指导大名就叫胡自豪，他还没想到这一点。大郑是个简单的人，简单到了很多想法和做法，你都猜不透、不理解。所以有时候，你也别小看了简单的人。大郑就是这样既简单又复杂的人，革命队伍里有不少这样的人。宗发奋就更不用说了，一个会见风使舵、顺着杆子往上爬的小投机分子，在这个土壤里开始发芽了。小钱倒是不知道他是真吓糊涂了，在说胡

话，还是有意识地来这一手，恐怕他还没有这个水平。也许在连里，他只知道胡自豪一个人的名字，别的名字还写不上来，就只能写这个，可能还真是这样。

潘连长对着胡指导不高兴地说：“你看你，弄了盘什么景？”（说明：“弄了盘什么景？”，为当地俗语，意思是“搞了什么名堂？”）

“弄了什么景？正常的政治审查。”胡指导不想和他多说。

“胡指导啊，你说小钱是投了国民党又跑回来的。那太可怕了，小钱不会是这种人。”纪排长说。

“你的政治头脑不要这么简单。是这种人，不是这种人，都不是我们所能回答的，要经过审查才能回答。”胡指导对纪排长有话就直说了。

“那你怎么肯定小钱就是投了国民党？”纪排长追问了一句。

“那你能拿得出证明小钱没有投国民党？拿不出证明，就不能排除嫌疑。”胡指导说。

这一句话把纪排长说得给噎回去了。纪排长也难得地着急了：“这，这，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啊。”

“小纪啊，我再说一遍，你们不要头脑简单了。斗争形势是很复杂的，我们要绷紧对敌斗争这根弦。”胡指导又摆出了领导的架子。“不要因为他是你们排的，就不好意思下手。”

“这跟哪个排没有关系吧？”潘连长也不同意胡指导的说法，“小钱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很单纯，也许他还不是个优秀战士，也许他还需要更多的锻炼，但他不可能是叛变投敌份子。我们要对一个同志负责。”

“连长啊，你也不要感情用事。我这样做，是有政策根据的。我们要加强对失踪归来人员、对国统区过来人员的审查。我们在延安整风期间，抓出了多少从敌占区过来的国民党特务啊。”

潘连长说：“对同志，一定要实事求是。这方面，我们也是有很多沉痛的历史教训。”

“我不想和你们争了。我这是对革命事业负责。我军侦察兵的失利，是有原因的啊，要警惕啊！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这个时候，小钱就回来了？算了吧，这些，是在我的职责范围内，出了事情，我要承担责任的，那是吃不了兜着走，不是开玩笑的。政工方面的事，你们就不要多管了。钱思富，要继续隔离审查。”胡指导说完话，转身就走了。

胡指导提到了延安整风。那场整风，其中有个部分叫抢救运动。在那个运动中，延安抓出了一万五千名国民党特务。重庆的国民党情治系统二号人物唐纵十分不解地对蒋介石说，我们在那儿一个人也没有，不知道他们那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第十九章 血溅望海山

1949年1月19日

19.1 意图夺回

李家泊的村北，一所很不起眼的普通农舍。

房前几棵高高的杨树，翠绿的树叶下，挂着一条电话线。这告诉人们，这儿大小有个机关在里面。是的，这里现在是一营的营部。

“是的，是的。我们一直在密切注视敌人的动向。”这是令营长在电话里回答团长的提问。

“有什么动向啊？”团长问。

“对面望海山上，敌人兵力好像不是很强，也就一个连的样子。”令营长答。

“火力配置呢？”

“火力配置不是很清楚，但是没有修筑任何工事，很奇怪。”

“哦，能判断出敌人是什么意图吗？”

“觉得很奇怪。要常驻吧，却没有修工事。想往前进攻吧，兵力又远远不够。”令营长说。

“海边呢？”

“好像没有新的兵源上来。”

“我在想啊，敌人也是在举棋不定，没想好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趁他犹豫不决的时候，给他一下子。”

“好啊。”令营长高兴地说，“团长，你说，怎么做吧。”

“出奇不意，直接攻击望海山，打他个措手不及。”

“好。”

“打下望海山，龙头一带，敌人就无险可守，对我们而言则全盘皆活。”

“好。”

“这任务，我想就交给你们了。当初，我就讲了，你们丢的，还是你们去拿回来。早拿回来，早好。别叫军区、前指，留下我们团不行的印象。”

“是。”

“今天准备，明天行动。”

“是。”

“你今天怎么老是就一个字？”

“坚决执行团部决定，坚决完成任务！”令营长响亮地回答。

“这不只是团部的决定哦，我跟前指说了，他们也没意见，让我们试试看。”

“我立即召开干部会，布置下去。团长，你过来指导吗？”

“你们自己干吧，我相信你们。你们要干出个样子，给全军看看。”

“是！等我们商定好了以后，我再向你汇报。”

一营撤到李家泊，差不多一个星期了。

新兵的补充，很快就到位了。都是新解放区来的小青年，十五六、十六七的样子，一张张稚气而又兴奋的脸。

大郑提了个班长，还在一连，班里都是新兵，带兵的任务还挺重。

三排长，由二连过来的同志担任。

潘连长有点想法，都是胡指导多嘴，一连自己的人拼死拼活、流血牺牲，反而没能当上这排长。这想法也好理解，而且也只是想法而已，嘴上没说。

随着友邻部队的不断到来，一营的防线已收缩至李家泊南面的东西三五里地。

由于已经号不上民房，部队大多住在村外的农田里，搭个简易窝棚，条件是相当的艰苦。好在天气暖和了，并无大碍。

营连干部们也一直在注意着对面的动静、猜想着敌方的打算。下一步，对手是攻是守，真是有点琢磨不透。攻不像攻，守不像守。

令营长做了两手打算。村前、河岸北，战士们挖起了战壕。村北，还有个长长的山坡，叫北堽。令营长请村里的民兵，在山坡上挖了不少散兵坑，以防备敌人的进攻。

接了团长的电话，一个小时以后，营连干部会，就在这所农舍里开始了。

既然团里决定了，大家都没有别的异议，只是气氛不够热烈。大概是敌情不够清楚，对这个对手不熟悉，不知道对手将会是怎样的反应，谈不出更多的意见。

最后，令营长决定，考虑到二连前一段参与战斗较少、伤亡减员也较少，这次由二连担任正面主攻。当晚下半夜，部队潜伏至大河北岸。次日中午，进行强攻。我军进攻时间，通常选择在早晨或傍

晚，或夜战。采取中午强攻的方式，是为更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望海山，高约百米，北坡山脚距大河有半里路，是平泊庄稼地。山坡地势上升后，二三十米高度以下是几层梯田，而后便是高耸的山体。山上全是大小不等的岩石，石缝间长满了杂草，稀稀拉拉地还有些短矮的松树。

二连，将由一排首攻，在攻到一半高度时，二排接上去作第二波攻击，最后由三排负责拿下山顶。在二排发起第二波攻击的同时，一、三连分别从望海山的东、西、南、北四侧在山下绕道攻击山的南坡，完成对望海山的包围，打掉山上残敌的幻想，迫其最终放弃抵抗。

这个会后，令营长又召集李家泊和民主村的干部，商谈民兵的配合问题。除了运送弹药、抢救伤员、后方警戒外，还有就是强渡大河时，涉水的路径。哪是浅水，哪是深洼，事先要指点清楚。要派一部分老乡，到部队前沿，讲明白。

下午，部队开动员大会，早点开晚饭，早点休息，后半夜行动。民兵也从北塔撤回，重新分配任务，各就各位。

半夜后，月色深沉，晚风凉爽。

村里村外，人影趑趄。没有灯光，没有人声，悄无声息之中，部队完成了集结，开到了大河边各自事先指定的位置。

整个村庄，鸡不鸣，狗不叫，在夜色中，那么地安静。

李村长和李辰，跟随二连一排，来到北岸。战士们一队队，猫着腰，进到玉米地里趴下。班排长匍匐前进，直到河堤边。

“请各班长看好自己的前进路线，记清楚每一块石头。先看一个小时。而后，你们把你们的组长找来，再看一遍。进，往哪儿进，退往哪儿退，都要记清楚了。现在，我们请李村长讲下水流的情况。”排在讲话。

李村长很详细地讲了河底和水流的情况，声音很小但很清晰。

而后，各班分开，叫了各自的组长上来，仔细观察，听村长和李辰的介绍。

天，渐渐亮了。

情况看得差不多了，大家都退到玉米地里，啃干粮。再就轮流打个瞌睡，但不许打呼噜，尽管山上的敌人听不见。

19.2发起冲锋

中午，太阳当头照了。

排长看时间差不多了，便拍手让大家睁开眼、提起精神准备好。

大家也逐次拍手，传递下去。

每个人，都瞪起眼睛，握紧枪杆，每一块肌肉都绷紧了。

忽然，一块石头从后面扔到了排长跟前，这是连长发出的进攻信号。

“出发！”排长发出了简洁的命令。

一排的三十多人，无声地从青纱帐里一跃而起，有如离弦之箭，奔跑几步，便跨进了河里。“噼噼嘭嘭”，战士们在班组长的带领下，高举着枪，在河里大步地跳跃着，阳光下，溅起了无数的水花。

对面的国民党兵都没有反应过来，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大白天，不狂呼不呐喊，大摇大摆地，就进攻过来。

最前面的都要到对岸了，国民党兵的枪，才开始响。

枪声，只能催促战士们更奋力地前进。

配备给一排的三挺机枪，先后到了河对岸，在河堤上架了起来。“哒哒哒”地扫射过去，减弱了对面的火力。

战士们纷纷地冲上岸，穿过庄稼地，虽然已经有倒下去的，总的看，还是挺顺利。

但再往上，要跃上一层层的梯田，遇到了困难。这地势易守难攻，尽管国民党军没有修筑工事，可那一堆堆山岩就像一个个碉堡。哪个岩石的背后，都有可能发射出子弹。

山上国民党军的兵力比前两天增强了，尤其是青一团配置的冲锋枪在近距离的杀伤力很大，用于阵地防守很有效。而且他们在火力点的配置上也比较讲究，几乎没有什么死角。一个点在停止射击的间隙，其左右和上下层的火力点能顶得上。

一层层梯田所垒的地堰成了天然隐蔽的地方。战士们都隐蔽在第一层和第二层梯田的地堰下，一抬头，子弹就像蝗虫一样飞来。要跃起来，跳到上一层梯田，就要付出很大的伤亡。

排长在最底一层的地堰下，大声喊着：“集中火力，打左面那个岩石。三挺机枪都往哪儿打！”

所有的火力都朝向了左面那个岩石。随着毫不歇气、炸了锅似的爆裂声，那块岩石上，火花、弹片、石屑一团团地蹦起，都腾起了一层烟雾。那一片国民党兵的枪声被抑制了。

底下的四名战士，便一跃而起，跳到高一层层的梯田上。但那岩石左右的国民党兵，也同时开火。四名战士顿时倒下三个，冲过去的那名战士连滚几下，躲到了地堰下。倒下的三名战士，国民党兵也并没有放过，子弹继续射击着。身体随着被飞来的子弹击中而不断颤动，身上的弹孔，鲜血和布片飞溅，不一会儿浑身就成了血人一样。

战场沉寂了。

几分钟之后，更激烈的枪声又响起，子弹像瓢泼大雨似地扑向那片岩石。国民党兵的枪声也回应起来。

又一批战士跃起，又有倒下的，又有冲上去的。

再一次沉寂。

再一次子弹与血肉的较量。

第三层梯田上，已经有两三个战士在那儿了。但还远远不到扔手榴弹和拼刺刀的距离，那才是我们的战士的长处。

令营长和几个连长都在村口，蹲在地上，屏着气，看着战斗的进行。

令营长忽然听到后面的脚步声，回头一看，是团长来了。马上起立，敬礼，说：“团长，你怎么也来啦？”

“我能放得下心，坐得住吗？”团长答道。

连长们也都赶紧起立。

团长没问打仗，先倒问起了另一件事：“我刚才从村里过来，听见一个屋子里，有个干部在训一个小战士，那个战士还在呜呜地哭。是怎么回事啊？”

令营长看了下潘连长，说：“那可能是一连的胡指导员在审查小钱。小钱在从龙头撤回来的时候，没跟上队伍，晚了几天。”

“晚了几天，又怎么啦？”

“胡指导怀疑他，是不是投了国民党又回来的。”

团长一听，心里很有火。因为几年前，他在湖西根据地的时候，一次派往敌后侦察，由于情况有了变化，不能及时返回。归队后便受到了审查。这可不是一般的审查，嘴上问问就行了，还真上了刑，非逼着承认是投降了敌人又派回来的。最后，还用上了他们自己从日本鬼子那儿缴获来的电椅子、老虎凳。那上面凝固着的自己同志的血块竟比铜钱还厚。多少好同志没有战场上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自己人的手里。凭着一股硬汉子的骨气，和农民子弟的健壮体魄，他挺了下来。但从此以后，团长对这一套是恨之入骨。（说明：湖西根据地是指抗战时期八路军在山东微山湖西面的根据地，曾执行过肃反扩大化的左倾错误。）

“是这么回事啊，乱弹琴。把他们俩都喊来。”

有人去喊了。

团长又问前面情况怎么样了。

令营长答，二连一排在主攻，伤亡挺大。

团长说，你不用告诉我伤亡人数，你就告诉我离山顶还有多远。

前进了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令营长答。

下一步，你们准备怎么办，团长问。

二连长说，准备叫二排提前出击。

团长沉吟了下，说，行，试试看吧。

“报告团长，一连指导员胡自豪报到。我是在连部审查钱……”胡指导和小钱过来了。

团长脸色阴沉，打断了胡指导的话，说：“都这个时候了，还搞这一套！参加战斗，能不能杀国民党，就是最好的审查！拿起枪，给我上！”

小钱的眼睛里还含着泪光，精神振作了下，答道，是。拿起潘连长递过的枪，就往前跑去了。

倒是胡指导愣在那儿了。

团长毫不客气地说：“愣什么，也在说你呢，一起上。指导员不冲锋在前，算什么指导员？”

胡指导绝没想到会有这一下，对令营长他们几个看了下，但他们几个也没有一个替他说句话，只好低着眼皮，走出去了。

19.3攻击失利

二连的进攻又开始了。

三挺机枪已经损失了一挺，那两挺机枪又响起来了。

伏在河岸的机枪，需要抬高射击点、向上朝山腰扫射，却没有足够高的支撑点。一个战士过来，把机枪的支架扛在肩上，两手扶着支架。

机枪在怒吼。在前面扛着机枪的战士，咬紧牙关，浑身颤动着。

不多会儿，这位战士就中弹倒下。又一位战士顶了上去。

作为第二梯队的二排战士们毅然决然地冲过了河岸边，冲过了泊地，但是在梯田的地堰前，倒下去了一批战士，依然受到了阻碍。

小钱以拼死的决心，冲在最前面。当第一波攻击停下的时候，他竟然已经冲上了第三层梯田。

但是，他已经两处负伤。他仍然端着枪，在一丛野草下，凝望着前方。

胡指导好不容易滚到了第一层梯田的地堰下，他也受了伤。

二排的第二波攻击又开始了。

战士的呐喊，机枪的吼叫，手榴弹的爆炸，树枝和草丛的火焰，碎石和血肉的飞溅。

小钱已经跃过了最后的梯田，爬到了一块石头后面。

但是其他战士们进展不大。

胡指导还在原地。

看来二排也已经没有向前冲击的力量了。

团长和营连长们都到了大河边，蹲在河堤下。

二连长狠狠地把头上的帽子扔到了地下，猛地站了起来，“他妈的，我就不信。二连的，都一起上！”

令营长说：“不，你一个二连还是不行。我看得整个一营都一起上。”但令营长迟疑着，没有进一步往下说，却看着团长。

团长也在河边看着，看着河对面的山上。他已经看出来，不要说一个连，就是一个营也是完不成这个任务的。他对营连长们摇摇手示意，停下吧。

团长沉默了一阵，才对营连长们说：“停止吧，不用再增加牺牲了。”

“是啊，团长。我原先的决定，考虑不周，是不对的。现在看来，光靠几十个人端着步枪冲锋，是拿不下来的。”令营长沉重地说：“战士的生命最重要。我原先的想法太简单，当认识到自己想得不对的时候，在上级同意的情况下，就要立即纠正。”

“师部那边怎么办？”二连长问。

“我去跟师部讲，责任由我来承担，处分我来领。”令营长说，“战士们的生命比我个人的前程重要的多。”

“算啦，不要想这么多啦。前指、师部也只是叫我们试探一下，看看敌人的火力怎样。能拿下来，更好。拿不下来，下次拿么。”团长说。

“那前面阵地上的战士呢？”连长问。

“把一、三连都调过来，集中火力掩护。二连三排上去接应，首先要把胡指导救下来。”令营长说。

半个多小时后。

当机枪又响起，三排往前冲时，任务不一样了。

冲上去的战士在枪林弹雨中，把阵地上的伤员接应下来。

对方察了解放军后撤的意图，开始发起了反冲锋。三五成群，从岩石后向下攻击，企图加重解放军的伤亡。

受了重伤的小钱，处在了最前面。望着二三十米外、正步步逼近的国民党兵，眼看要被敌人抓去，又要脱离自己的队伍，跑回来以后又要像对叛徒特务一样的审查，胡指导那眼神就像国民党一样的可

怕。他想往回爬，可是腿已经拖不动了，他害怕极了，他恐慌极了，拼着最后的力气大叫着：“快来救我！快来救我！别叫国民党抓住我呀！”

可下面，在梯田上的战友眼睁睁地根本上不来。

小钱举枪，要射击，可已经没有了子弹。

国民党兵离他只有十几米了，虽然战友的子弹在掩护着他，在延缓着最后时刻的到来。但小钱知道，这最后时刻的到来，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他最后看着地堰下梯田里的战友，拔出枪口的刺刀，高喊着：“为我报仇啊！”竟戳向了自己的喉管，刹时，殷红的血滴满了全身。

国民党兵还是下到了小钱的身边，把小钱往后拖。拖了几步，他们又扔下了小钱，自己往回走了。可能是解放军射来的子弹更密集了，想阻止敌人，国民党兵想拖也拖不了；也可能是小钱已经死了，没有必要拖了。

小钱仰脸躺在岩石的间隙中，身上是燃烧着的卷曲的野草，身下是还在汨汨滴滴的鲜血。

在最下面的地堰旁，杨定神和另两个战士在抬着胡指导往后走。他们听见了小钱的呼喊，也看到了小钱的挣扎，可就是无能为力，心如刀绞。

快到河边了。胡指导问，小钱怎么没有声音了？

旁边战士回答，小钱为了不被敌人抓住，用刺刀戳死了自己。

胡指导还没忘记自己的职责，大声地说，革命战士怎么能自杀呢？这就不是个革命战士了么，革命战士要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么。

在河中间，飞来的子弹击中了杨定神，他倒在了水里，胡指导也歪在了一边。那两个战士连忙扶住胡指导，却腾不出手拉小杨。

杨定神跪在河水中，喊着：“别管我，扶住指导员。”就倒了下去，河水淹没了他。他用尽了全力又从水里伸出了脑袋，吐了一口水，说：“指导员，别忘了，告诉我家里，我是个解放军……”可怜杨定神，才解放了几天，就为了救这个胡指导，鼓着血水，随着河水，带着无限的眷恋和遗憾，漂走了。

这次战斗以后，胡指导去了后方医院。他再没回过龙头，龙头的老百姓也再没见过他。出院后，他去了师政治部。后来，随部队去了朝鲜战场。再后来，听说被美国鬼子掳去了，可停战后双方交换俘虏又没见他，就作为失踪人员处理了。几十年后，王立回来时才说起，他们那帮去台湾的海源老乡中还有人见过胡指导。说是在基隆老街，老胡挑了个担子，叫喊着卖正宗宁波汤圆。汤圆是不是正宗，不知道。但那一口正宗的宁波话，还是蛮像回事的。他见有人老眈量着自己，便挑起担子走了。从此，再没见过，也没人说起过，那还是六十年代的事。

第二十章 黄港之行

1949年1月20日

20.1 乱象丛生

解放军对望海山的进攻，引起了国民党军的焦虑。

章团长整日坐立不安，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思之再三，觉得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攻不能攻，守不能守，援军又不来，算是怎么回事。打电话也不管用，汪司令在电话里老是哼啊哈的。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警备司令部居然还拿自己和前线官兵的死活于不顾，太不像话了。应该回黄港亲自找汪司令力争一下。但共军随时可能会发动第二轮进攻，而且规模一定会更大，自己绝不能离开。

他想起了方舰长。方舰长的为人，他信得过。而且，方舰长跟汪司令的关系，要比自己深，不像自己是一年多前才来黄港。

于是，他跟方舰长通了电话，讲了这些意思，请方舰长回黄港面见汪司令，务必解决这些问题，顺便在家歇两天。

方舰长请章团长一起回去，在汪面前，更好讲一些。

章团长说：“其实我又何尝不想回去，但军情紧急，随时会有突变，不敢稍有疏忽，此处更不能离人啊。拜托方兄啦。如果方便，也请到舍下去看一下。说实话，我也是不放心啊。”

“好的，好的。小弟一定会去拜访方夫人。‘济成’号倒也是需要回去加补给了。我准备一下，今天半夜就起锚，争取尽早回来。有事多联系。”

方舰长放下电话，来到报务间。

“李策，给我往黄港挂两个电话，给汪司令和基地，我们要回黄港加补给。”

“好，我试试看。这几天，黄港的电话不正常，经常挂不通。”

李策“呜呜”地手摇了好一会儿，“喂喂”了半天，也没人接。

方舰长直皱眉头。

“我给你发报吧，这样他们肯定能收到。”

“好吧。”

李策发完电报，说：“最近，黄港市里秩序好像不正常，经常停电，电话也经常断。”

方舰长停了回，才说：“那更要注意保持联系。”

“方舰长，听说美国人已经断了对我们的援助。这仗还能打下去吗？”

方舰长无语，等了回，说：“你妹妹那儿，后来还去看过吗？”

“没有，这儿也走不开。”

“你现在就上岸去看看，给你三个小时，不，四个小时的时间。尽量说服你妹妹上船来，形势可能有变化。”

两个多小时后，李策回来了。

他跟方舰长说，他妹妹暂时还行，她说再等等，实在不行再上来。

方舰长叹息道，你妹妹也是个要强的人。

舰上准备停当，后半夜，起锚鸣笛返航了。

第二天，天已大亮。

黄港，这座美丽的海港城市，又映入方舰长的眼帘。

这是近百年前，德国人在这儿建的，一式的欧洲风格。当然，盖房的劳工是当地的老百姓。

起伏的山峦，郁郁葱葱，满是绿树。山上山下，绿树丛中，点缀着层层红瓦，错落有致，那是成片的欧式别墅。

天主教堂那高高的双塔尖顶，在阳光下闪耀。

对这座城市，方舰长很熟悉了。多少次的远方归来，多少次地迎着海风与晨星的眺望。

然而，这一次，却有种别样滋味在心头。

随着气笛声在港区的回响，“济成”号停靠上了黄港海军码头。

码头边，按惯例，已经有几位基地上的军官列队欢迎，只是已没有往日的规模和热情。

方舰长下了舷梯，与他们握手致意，便进了海军司令部的小楼。

楼里有方舰长自己的办公室。

原先的海军司令部，由于去年“重庆”号的起义，已经被撤消。一些舰船，大多已调往南方，港内已没什么船了。所谓的司令部大楼，也没有多少人了。全然没有最后决战将至的气氛。

因为没有了司令，方舰长已是海军方面的主要军官了。司令部的参谋们也就围了过来。

“方舰长，听说你们在那儿打得还不错，真是奇迹啊。”一位麻脸参谋说。

“黄港都保不住了，不赶紧回来么？”一个姓苟的白脸参谋说。

麻参谋推了苟参谋一把，“别瞎说了，尽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也不怕叫军统给抓了去。”

“就是这样么。方舰长，你也别去海源了。带上我们赶紧去南方吧，黄港眼看就不行啦。”

方舰长皱了皱眉头，才离开没几天，怎么乱成这样啦。谁都知道，一个军人讲这种话，该当何罪。现在却可以堂而皇之地公开议论。

“你们先联系总务，给“济成”号加油加水加粮食加炮弹。”方舰长说。

“是！不过我听说，弹药已经不多了。美国方面已经停止对我们的军事供应了。当然，我可以上楼去说一下。”麻参谋说着，往外就走。

“怎么不打电话？”方舰长问。

“方舰长啊，现在全乱啦，连这电呀也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的，打电话还不如走上去呢。”苟参谋说。

方舰长仰面长叹，心想怎么到了这种地步啦。

不一会儿，麻参谋下楼回来，说：“方舰长，屠主任说是有重要事情跟你当面商量。楼下人多，不便讲，麻烦你上去一趟。”

屠主任是海军基地的总务主任，管总务供应的，有事需要商量，也是很正常的。不过按官阶，应该是他下来找。方舰长虽然并不很计较这些，但是心里觉得有什么事在里面。

方舰长出房门，要上楼。

麻参谋跟了出来。

在楼梯拐角处，看四周没人，麻参谋跨前一步，对方舰长说：“方舰长，你先停一下，我有话要跟你说。”

方舰长一愣，停下了脚步。

麻参谋很谨慎地又看了下四周，见确实无人，便轻轻地说：“方舰长，你要小心啊。我听说，保密局已经盯上你啦。”

方舰长大惊，在下属面前也瞪大了眼睛，“此话怎讲？”

“大概，你是在那边的什么教堂里，讲了什么话。你想想，有没有这些事？可要注意啊！我不能多讲了，先走了。”

麻参谋抽身就走。

方舰长也了解麻参谋的为人，这话决不是在乱讲。更何况自己在望海教堂讲的话，麻参谋也决不会知道。肯定是有人在告密，以至于话传过来，连麻参谋都知道了。真的是见了鬼了。不过，这事极有可

能。他知道，自从“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后，保密局就盯上了海军。不过，他还真没想到，居然会直接盯上了他，而且还盯到了海源的最前线。有这本事，怎么不用到战场上对付共产党呢。

方舰长定了一下神，上二楼走去。

刚到屠主任办公室的门口，那位屠主任就迎了上来，满脸堆笑，紧握住方舰长的两手，“啊呀呀，回来啦。真是不好意思啦，应该是我下去的啦。但有些话，别人在场我怕不好讲啦，只好请你屈尊上来，真真不好意思，真地不好意思啦。”

屠主任用广东话连连致歉。

“楼上楼下，也就几步路，谁走也都行。”方舰长客气地说。

“方舰长，你是要补充些给养？”屠主任问。

“是啊，这几天，打仗消耗很大。特地回来要补充一下。还有些难处？”

“不瞒方兄啊，”屠主任开始打起了官腔，“这几天，你在外面，有所不知啊。”

“怎么啦？”方舰长也干脆装糊涂了。

“你还不知道吧？除了面粉和奶粉，美国佬已经停止了对我们的所有供应啦。”

“那东西，能打仗吗？”

“是啊，就是说呀。”屠主任停了会，向四周一望，又过去开门往走廊一望，随后把门带上，关紧。

“这仗是打不下去啦，我们弟兄俩要另想点办法啦。”屠主任把脑袋伸了过来，很神秘地样子。

“这时候，还能有什么办法？”方舰长还在装糊涂。

“我给你装油装粮，你给我留一个房间。你也能开得到南方去，我一家老小也有条活的路。怎么样？”屠主任把身子都挪了过来，挂着笑脸，盯着方舰长看，“怎么样？”

方舰长为难地说：“唉，难呐，有多少人跟我讲这事，我都招架不了啦。”

“现在，柴油可是更难啊。这可是别人谁也没有的啊。没有它，要上哪儿也动不了啦。”屠主任这几句话，可是句句有分量啊。

“啊呀，让我想想，就是怕安排不下啊。我也不瞒你说呀，连警备司令部都有不少人找上来，哪个也得罪不起啊。”

屠主任见方舰长还是不为所动，有点急了，“哗”地拉开抽屉，抓出三块金条，“叭”地放在桌上。

金灿灿的金条啊。

方舰长尽管有过纯金的十字架，可家里还从来没有过金条。

屠主任看对方还在犹豫，“叭”地又拿出三条黄金，一起朝方舰长推了过来。

“还不行吗？方舰长！”屠主任真的急了，“这是我的全部家当啦，我豁出去全都给你啦。给我家老小留条活路吧，我求求你啦，方舰长。”屠主任差点儿都哭出来了。

方舰长见屠主任把话都说到了这个地步，便把六根金条推回到屠主任的一边，说：“屠主任，你我也是多年的交往了。这金条，你先收起来，别叫旁人看见了。我肯定给你留地方。当然，不一定是单独一个房间，我们海军的人，一起挤挤。怎么样？你知道，我说话是算数的。”

屠主任见话已如此，也只好收摊，收起金条，说：“那好吧，柴油和面粉，我尽量给，我自己留着也没用。这点，你放心，你我都是一条船上的。”

“那好，麻烦屠主任尽快装上，我也要尽快回去。海源那一边该怎么就怎么，不管打成什么样，尽快脱身，我也想早点回来，看这儿再怎么处理。”

“好吧。”屠主任说。

20.2妻儿苦等

方舰长处理完这些事，叫上司机，坐上吉普车，回亚尔培路他的家了。

黄港的街都不宽，高低起伏，拐弯也多。两边是两三层的欧式建筑，人行道旁种着法国梧桐、香樟、菩提，晚春的树叶还都翠绿。

往常，街上的人是很少的，洁净而又静谧安逸。漫步街头，徜徉在林荫道上，看树影洒落，清风摇曳，眼望着各式洋房，小憩于路边的咖啡屋，耳听着海上传来的涛声，享受着这异国风情，这曾是多少中国布尔乔亚们的奢望。

然而，今天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

车出大门，沿海边的滨海路前行。

路两边，滞留许多散兵游勇，从各个战场败退下来的国民党兵。部队被打散了，更多的是连编制都被打掉了、没有了，他们的长官也是或毙或俘或降或早已逃到不知哪儿去了。这些人衣服破烂，面容憔悴，疲惫不堪，眼神或绝望、或凶狠，行踪或单个、或三三两两，或蹲或站，或依墙而躺或四处游荡。还有不少是伤兵，缠绕着的满是血污的纱布早已肮脏不堪。有的就躺在水泥地上，任其辗转哀号，无人理会。

转过去，上坡进市里。街两边，不但有散兵，更有许多各种难民，有躲避战火的，有被共产党赶出来或逃出来的，有害怕共产党而先跑出来的。他们无处躲藏，无人收留，只能任日晒雨淋，风餐露宿。有衣衫褴褛、脸露菜色，也有虽衣料华贵，却污垢重重、脸色惊恐，更有横卧街头、气息奄奄，就剩了最后一口气。更可怜的是一些孩子，没吃没喝，瑟瑟发抖，紧紧抓着旁边的大人，无助地沙哑地哭叫着。

方舰长见此，也是不忍目睹、伤感不已。

街上的商店，很少有开的了。

开了半扇门的一个食品店门前，挤满了人。人们在互相推搡着、争吵着、叫骂着。

穿黑衣服的警察，倒背着双手，在旁边看着光景。

“吱”的一声急刹车。

方舰长不由往前一倾。一群小孩，不知在争抢什么，其中一个突然横穿过来。亏得司机眼疾手快，停了下来。

那司机也是吓了一跳，开口大骂起来。

方舰长说，算了吧。

一个拐角，车子减速下来。

一个伤兵双膝跪在地上，拐仗扔在旁边，头上缠着绷带，一双脏兮兮的手托着军帽，哭喊着：“长官，可怜可怜吧，给点吃的吧。家是回不去了，让我多活一天吧。”

方舰长毕竟也是个军人。他打开了车窗问：“你是哪部分的？”

那伤兵直起了腰，回答说：“107旅的，在胶南被打散的。”

方舰长知道107旅已经没有了，这些人再能上哪儿去呢，已经无处可去了，正在低头想掏出几个钱来。不料，那人扑了上来，抓住车窗，连喊：“长官，带我走吧！求求您，行行好吧！我为党国流血卖命，不能把我扔在这儿没人管呀！”一边说着一边涕泪横流。

方舰长正不知所措，那司机却猛一加油门，“呼”地窜了出去。

那伤兵一个骨碌，翻了出去。

方舰长回头从后车窗看，那人没能爬起来，便问司机要不要下去看一下。

司机说：“这种时候，是不能也不敢可怜人的。满街这么多要救的人，都很可怜。能救得过来吗？你有心要救他，他还会把你都拉下去。”

车开进了亚尔培路，那是个别墅区。各式小楼，隐在高大的树丛中。

如今，这往日最幽雅的地段也流落着不少难民。街两边，有搭棚子的，有席地而躺的。

有一家大概是主人已经离去了的院子，被砸开了。院子里，沙发、床板、橱柜敲碎了，堆在一起，各种杂物散落一地，门板、窗框都被撬掉了。各色杂衣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挤满了院子。院子的一角，大概是在点火做饭，满院子烟雾弥漫，滚滚青烟升到了树梢之上。

到了家门，车停了下来。

可连这儿，也未能清闲。院门的两边，都搭起了窝棚，住着难民。

他上去敲了门，没有反应，再敲，还是没有反应。

他急了，放下了长官的架子，拉开嗓子喊了起来：“素玉，素玉！”但毕竟没这么当街大嗓门喊过，喊出来不是那个意思，都变了调了。

司机也帮忙喊了起来。到底是下里巴人的嗓子眼大，“方大嫂，方大嫂！”

两声之后，一位三十来岁的妇女，开门出来，身材匀称，素色的旗袍，快步走下台阶，打开院门，请进他俩。

司机说：“我就不进去了吧。”

方舰长说：“那也好，下午两点，过来接我去警备司令部。”

“是。”

方夫人跟司机道别，关上院门，挽上方舰长的胳膊，上台阶进屋了。

门外，窝棚里钻出了好几个人，看着院子。他们大概在想，这家还没走啊，还是个军官啊，不免有所失望了。

方夫人姓苏，上海人，皮肤细腻滋润，保养得很好，典型的中产阶级少妇。他俩是方舰长在上海念书时认识的，感情一直不错。

苏素玉，人如其名，性格文静，穿着素雅，连一进门的客厅，也是一色的象牙白。

方舰长坐进了套着白布套的大沙发，说着：“我敲了好几下门，你怎么也没听见啊？”

“听是听见了。但现在这种辰光，听见敲门，你就敢开门啊？”方夫人以那种依依软语的上海话说着，“你看门外头这许多人，吓也吓死掉了。”

“唉，”方舰长现在也是几多的一声叹息，“这几天家里怎么样？”

“这日子越来越难了，一会儿停水，一会儿停电，商店都关着门，想买菜也没去处。亏得你留下了一点面粉，要不真没饭吃了。”

“爸爸，爸爸回来啦！”方舰长十四岁的女儿，从楼上跑了下来，飞也似地扑进了爸爸的怀里。

方舰长抱了抱女儿，拍了拍她的肩膀，“小玉，今天怎么没去上学呀？”

“你看门口、街上，那么多叫花子，见人就抢，还敢出去啊。”方夫人几分疑惧地说。

“去了学校也没用。先生也在忙自己屋里的事，很少来上课了。就算有来上课的，也是在骂国民党，都没有念书的了。”

“学校也这个样啦？”

“你看这一天世界（沪方言：一塌糊涂的意思），哪还有像样的地方？”方夫人说，“我看你们还在外面打仗打啥劲啊？天都塌下来了，那（沪方言，读第三声：“你们”的意思）去顶啥用场啊？”

方舰长对着妻女，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茂名啊，别走了，看着家吧。这种辰光，我真怕，真怕说不定就会出什么事。”

“爸爸，别走了，陪我吧。”

方舰长低头不语，看着打扫得很干净的乳白色方砖地。突然抬头问：“怎么没看见张妈呢？”

张妈是他们从南通老家带出来的佣人，跟着他们多年了。

“她回南通了。她知道南通解放了，说什么也要回去看看。她想她的丈夫和儿子，几个月没有音信，快要想疯掉了。不管路上好不好走，她说她都要回去。”

方舰长又无语。

方夫人轻轻地捅了他一下，“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方舰长也轻轻地说：“我正在想呢。”

方夫人站起身，说：“我去做饭了。”

方舰长笑了一下，“张妈不在了，你能做什么饭？”

“就烤个面饼凑和吧，我也不会蒸馒头。再炒个鸡蛋。”

“真是难为你了。”

“哦，爸爸，你不知道，妈妈烧的饭可好吃了。”小玉说。

“嚯，小玉还会拍妈妈的马屁哦。”

“唔妈，看爸说的，真难听。”

一家三口都高兴地笑着。在那个年头，难得有一家，这样地笑着。

20.3汪司令

下午。

位于斯高塔路的警备司令部。

三层的方形楼房，浅灰的水泥本色的外墙，无论是外形还是建筑质量，都可以与碉堡相比。

门口有宪兵把守，盘查得很严。

汪司令的办公室在二楼。

室内的光线很阴暗。办公桌和整面墙到顶的大柜，都是深咖啡色，侧面挂着大幅的蒋介石画像，画像前竖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地下铺的是深蓝色羊毛地毯，高大的落地窗帘还没有完全拉开。

办公桌背后坐着的，就是汪司令了。

汪司令，河北人，肥头圆脑，其貌不扬。但他今天能坐上司令的位置，领衔少将，一路走来也不易。他既非黄埔嫡系，也非山野草寇。当初是保定军校出身，但又没挂上北洋派系；说是地方实力派，自己又没有一个兵、一寸地。抗战后，走投无路，居然投靠了日本人，没等鬼子投降，他又向国民政府反正。如今，黄港这一弹丸之地，聚集了三四万各路残兵败将，互不服气，难以制约。以汪的资历，抬出来当个领头，也是个不得已的办法。

汪当然深知自己的处境，盘算着怎么扮演好这最后的角色。

方舰长坐在一边的小沙发上，汇报着海源的战况。

“嗯，嗯，不错，你们打得不错。不但，我本人感觉不错，而且我已经向国防部报告，准备向你们发出嘉奖。”

“现在紧迫的问题是，下一步，我们怎么办？是攻、是守、是走？”

“这个，这个么，我们司令部会有通盘考虑，啊。你回去以后，告诉章团长，我汪某和司令部高度评价你们的战绩，要进一步鼓励士气，准备接受下一步的指令。”

“司令，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章团长特地嘱咐我，要请您解决。”

“哦，还有问题么？”汪故作惊讶地问。

“眼下，急需要解决的有，海源前线兵力严重不足。如果共军再发起进攻，就难以抵挡，我们将前功尽弃。章团长希望，把青一团剩下两个营都调过去。这两个营，比较能打仗，章团长对他们也比较熟悉，好指挥一些。334团，章团长不大好调遣。”

听到这儿，汪似乎有些心不在焉，“这个问题，我刚才讲了，我们正在筹划当中。”

“司令，这事情要立刻有个决定。说不定，这时候，共军已经发起第二轮进攻，兄弟们在战壕里眼巴巴地等着增援呢。”

“唉，你这个老兄啊，真是不明白。”汪有些不耐烦了，“我就跟你实说了吧。青一团的这两个营，是不错。正因为不错，所以，要留下来作为司令部的王牌，最后要用来死守司令部。”

“这可是章团长一手栽培的心血啊。”

“什么章团长不章团长，都是党国军人，以服从为天职。”

“那海源前线怎么办？”

“把335团调过去。”

“335团是个什么东西，这谁也知道。见了东西就抢，听了枪声就逃。谁能管得住？”

“就是不好管，才叫他们到前线去。”

“那我不也成了是不好管的了？”

“哎，你也真是敏感。你是海军，没有你，能行吗？”

“章团长的情绪还是要考虑一下的吧？”

“那就从青一团三营里抽一个连过去吧。”

“就一个连啊？”

“还少啊？”

方舰长有些泄气了。

那汪司令，往后一仰，靠在沙发上，手指在办公桌弹着，似乎知道方舰长内心的想法，又晃了晃头，慢慢地开了腔：“老方啊，有句话，本来不想说。看你这人太直，太没有心眼。我看了你也好几年了，提醒你一下。”

方舰长一惊，直愣愣地看着这位司令。

“你张嘴闭嘴章团长章团长的，你了解这位章团长么？这个章团长虽然是青年军的，算是蒋经国太子党线上的，我们动不了他。但他的思想亲共，这一点，我们早就掌握了。”汪的脸沉了下来，手指也不再弹了。

方舰长更是惊得不轻，张大了嘴，一动不动。

“他搞的什么土地新政，虽然还没有查到和共产党有什么直接联系，但这套做法，完全是共产党的那一套。那个省党部的刘秘书长，我们正要抓来审问呢，跑了，没抓到。不是那个章团长报的信，又是谁？”

汪拍了一下桌子，心里似乎十分地生气，又添了一句：“如果不是把他放到前线，就要查到他的头上了。”

方舰长连大气也没出，静静地听着。

汪又转过头来，看了方舰长一眼，说：“你呀，怎么说你呢，方老弟。别跟那个章团长扯到一起啦。听说，在海源的一个教堂里，那个章团长跟你宣扬什么社会主义，你居然还一起附和，是不是有这事？怎么你也昏了头了？”

往日还算法灵的方舰长，此时都有点张口结舌了。尽管麻参谋已经提起了这事，但汪司令这么一说，可是非同小可。

“那边有个小小的教堂，我们不过是说起了基督教。”

“不要解释了，报告早就打过来了，军统早就盯上那个章团长了。这话，你可别跟旁人讲啊。弄不好，他们还能连我也盯上呢。”（说明：那时军统已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但很多人习惯上仍称呼为军统。）

“怎么会弄成这样呢？”

“你们海军也要注意。你们海军里青年学生多，读书人多。书念多了，就念蠢了，反而去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你知道保密局对你的结论是什么吗？——没有通共证据，但有亲共倾向，要重点关注。”

“啊？！”方舰长急得都从沙发上跳起来了，“谁说的？没有证据，凭什么说亲共？”

“这些就不要深究了，不要去问了。都是我在护着你呀，没有我，你今天还能坐在这儿？我今天跟你讲的这些，不只是推心置腹，而是掏心置腹了，我的老弟啊。也就是我们兄弟俩能讲这些了。”

“是，是。”方舰长心想，汪讲的，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兵力调配就这样了。青一团的那个连，跟你的“济成”号走，明天就上船。335团，怎么走，我再想办法。参加登陆的商船都回来了吧？”

“都回来了。”

“那就再征用吧。”

“弹药、粮食呢？”

“这是个难题。节约着用吧。”

“光靠节约，能支撑多久啊？司令，你给我交个底。”

“连我自己也没有这个底。能撑多久就多久，尽量给我们多留点时间。”

停了会儿，汪看着方舰长说：“还有件最重要的事，把青一团的那个连卸下去以后，你在舰上要留出整个一层的舱房。下次回港，我们司令部上船办公。通信设备，也请准备好，要架一条我这儿直通你指挥舱的专用电话。”

至此，方舰长明白了汪司令今天这么一大番话的意思了，也就顺着说：“是，是，好的，欢迎司令上舰。”

“哈，哈，那样我们就真的成了一条船上的人啦。”汪也舒展起了腰，露出了今天下午第一次的笑。

20.4章妻受辱

方舰长回黄港的第二天。

出门之前，方舰长对他妻子说：“今天，我要去章团长家看望一下。你跟我一起去吧？”

“不了吧？”苏素玉细声细气地说：“这种辰光不敢离开家啊。就剩小玉自己一个人在家，哪敢啊？”

方舰长一想也对，就说：“昨夜，我想了一晚上了。走吧，我们也走吧。”

“到啥地方去啊？”

“现在还没有想好，先上船再说。你今天上午，收拾一下东西，把最要紧的东西装好。就装一个皮箱。”

“就装一个皮箱啊？太少了。你一件呢大衣差不多就要一个箱子了。”

“我们现在不是去旅游，也不是回老家，我们也是去逃难啊，素玉。”

“啊？我们也落到了这一步啊。”

“能好一点，也好不了多少。这样吧，你准备两个箱子，一个是最要紧的。到时候，能带两个就带两个，不行，就只好带一个。只要能保得住人，就行。”

“那只好这样了。唉，不好拣啊，哪一件也不舍得丢啊。”素玉难免一声声地叹息。

方舰长先去了海军码头。

上船看了看，还行。

油管正在输油。储备舱里堆满了二百多袋进口面粉。只是弹药补充得很有限。

“这位屠主任的动作还真快呢。”方舰长心里在想。

又到报务室看了下。李策靠在椅子上，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

“怎么没上岸走走？”方舰长问。

“提不精神来，听说岸上也乱得很。”

“跟章团长发个报，说青一团再过来一个连，弹药也有所补充。请他先放下心。”

“是！”

正在说话时，麻参谋在走廊里喊：“方舰长，青一团有人来了，要见你。”

“来了。”方舰长随后就上甲板了。

来人是青一团三营三连姓代的连长，还带了两个排长。见到方舰长，立即一个敬礼，说道：“卑职接司令部命令，随方舰长去海源，前来报到！”

方舰长回礼，又热情地伸出双手紧握住对方。他知道这个连，来之不易。

“要去打仗，弟兄们愿意吗？”方舰长问。

“我们愿意去海源，愿意和章团长在一起。章团长待我们不错。他们那两个连想去还都去不成呢。”三人争着说着。

“你们回去准备一下，把能带的都带上。明天傍晚，过来上船。不过，条件比较差，这是个战舰，不是运兵船，没有铺位。弟兄们来了，只能在走廊上、甚至甲板上。要跟弟兄们说一下，要辛苦一晚上。”

“这点苦算什么？听说要上大军舰，都高兴得不得了。大家都没有上过船，都没有到过海上。”

“那好，那好。你们就回去准备。我现在就要去你们章团长家里看一下。你们谁去过，帮我领一下路？”

大家都说好，“我们都去吧，我们还从来没坐过小车呢。”

一会儿，司机把吉普车开了过来。

代连长说：“方舰长，你在前面坐吧。我们三个就在后面了。”

“那辛苦你们要挤一下了。”

“我们也顺便上我们团长家去看看。”

几人挺高兴地往其美路上章团长的家去了。

其美路，也是条林荫道，但比亚尔培路要差一些。一年来，周边各路人马被解放军赶进黄港后，他们的军政要员，纷纷寻找主人已撤离而丢下的空房子。有打招呼的，有不打招呼的，也有找不到主的。甚至明明有人在住的，也恃强凌弱、以大欺小，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反正占上了，挤进去了。

章团长住的是一个小二层的二楼，楼下是334团的留守处焦主任。

车拐了几个弯，上了其美路。

“到了，到了。”朱连长说，指着一个黄色的小楼，院子的铁门紧闭着。

方舰长正奇怪，他家的门外怎么空荡荡的，没有难民搭的棚子。

“嫂子对我们可好了。”朱连长打开车门，下去，上了人行道，便去“砰砰”地敲门，嘴里喊着：“章夫人，章夫人！”

突然，楼上传出女人凄厉的呼救声：“来人哪！来人哪！”

二楼的一扇窗户，被一个板凳砸碎，玻璃片“哗哗”地掉落下来。

代连长回头向两位排长一招手，“快！嫂子出事了！”

他先一个跳跃，扒上墙头，翻身进了院子。又猛一脚，踢碎了门板，大喊一声：“嫂子，我来了！”便钻了进去。

那两位排长，也身手敏捷，翻过墙去。一人冲进屋去，一人打开院门。方舰长和司机也急忙跑了进去。

方舰长上楼一看，眼前的一幕，使他十二万分的惊诧。

章团长的妻子，头发零乱，衣领都被撕开了，掉了一个扣子，满脸涨红，怒目而视。她一手拿着板凳，一手指着对面的一个男人大骂：“畜生！你这个畜生！章团长平时待你多客气，你怎么是这样的一个畜生！”

对面的这个男人，就是她楼下的邻居，334团的焦主任。他已经脱了军上装，裂开了白衬衣，露出了满是黑毛的胸脯，脸上有几道被指甲划伤的血痕。显然，刚经过了一番打斗。他满脸激动，一手晃着皮带，一手已经拔出了枪，对着代连长，嘴里喷着呛人的酒气，还在说着：“你们这帮鸟人，想坏我的好事？”

桌子上，还放着三块金条，和军用公文包。

“焦主任！你认识我是谁吗？”方舰长大喝一声。方舰长和334团一起到的海源，这位焦主任当然是认得的。

但这时候的他已经完全昏了头了，一边说着：“你不也就和我一样穿着白褂子么？”一边把枪移向了方舰长。

说时迟，那时快。这一边，司机把方舰长推了出去。那一边，先进屋的那位排长已经到了焦的身后，一拳头把焦的胳膊往上打。

“叭”的一枪，子弹飞出了窗外。

那排长，立时就把焦扭了起来。对面的代连长，夺下了枪。

几人上去就将焦“噼里叭叭”地狠揍一顿，打得他杀猪似地嚎叫，也不停手。

又是“叭”的一声，桌上的公文包，被碰到掉了地下。四块金灿灿的金条，从包里滚落到地下。

“一个小小的团留守处主任，哪来这么多金子！到楼下他家里去查！”方舰长说。

“好！你们下去，我来看住这狗东西。”司机说。

焦，已经被捆得结结实实，扔在一边。

方舰长走过来安慰章夫人，“没事吧？”

“没事。真是瞎了他的狗眼，不看看老娘是谁。你们不过来的话，我这板凳就要砸扁他的狗头。”章夫人真的将板凳砸到了像死猪一样被捆绑着的焦主任的脑袋上。

砸得焦又是嗷嗷地叫，脑门流出了血。这一会儿，焦可真是吃了苦了。

“好，嫂夫人真行。”

“不好意思，碰上这倒霉事，叫你们见笑了。”

“哪里，哪里。这不是你的错。”方舰长松了口气，笑着说。

章夫人，姓安，安晓芬。个不高，红脸庞，跟章汉林是湘西大山里的同乡，也有几分山里人的豪气。差不多二十年了，跟着章团长走南闯北，也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今天这样的一场大风浪，她也没有通常女人的那些惊恐和伤憾。

代连长和排长他们下楼，翻了起来。

焦主任的老婆搂着孩子，惊恐地站在一旁。

因为枪响，门外的警笛，也刺耳地响了起来。

两位排长砸开小房间，一看，塞了满满的一房间面粉，少说也有三百多袋，够他们一个连吃两三个月的了。

他俩忙喊：“方舰长，你快下来看啊！”

方舰长忙下楼来，一看，全明白了，为什么334团的粮不够吃，那包里的金条又是从哪里来的。

两个黑衣服警察，慌忙地跑了进来。一看，方舰长他们都是军人，便问：“长官，有什么情况？”

“这儿有个败类贪污军粮，还开枪拒绝搜查。”

“人呢？”

“绑在楼上。”

一个警察对另一个警察说：“他们军队的事，你去叫宪兵队来。”

那个警察出去了。

“哟，这儿有个保险柜哎！”代连长又喊起来。

他在卧室床角边上，发现了一个并不很大的绿色保险柜。

“还真沉哎。”代连长试着挪动一下，拖不动。

“砸了它！”一个排长说。

“好！”

他们从厨房里找出锤子来，“乒乒砰砰”地砸了起来。

“哗啦”一声响，保险柜的门砸开了。

“啊哟！”大家齐声惊叫，都看呆了。

几十根金光闪闪的金条啊！

一阵脚步声，门外跑进来三个头戴钢盔、全副武装、胳膊上戴着“宪兵”袖章的人物。

他们一进门，没看到别的，就看见那桌上的金子，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

“这就是他贪污的吗？充公，充公！”领头的边说边伸手往怀里扒拉金条。

方舰长见此情景，忙说：“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就看见金子啦？”

那人这才抬起头来，看见身着舰长军装、官阶比自己大多了的方舰长，堆着笑脸说：“呵，呵，是长官啊。我们是司令部宪兵队二分队的。我是分队副，好说，姓楚。这些金子，是罪证，我们要带走的。”

“你们二分队的队长，外号叫什么？”

“呵，长官还信不过我们。我们队长姓郎，人称大豁子。这回，长官信了吧？”

“那你起码也得点个数，写个收据吧？”

“行，行。”楚队副很不愿意地说。

一五一十地数着，“二十六，二十七。一共二十七块。”

“再数一遍！”方舰长非常强硬地说着。

楚队副翻了一个白眼，很不情愿地又数了起来。在众目睽睽之下，点清了，是三十二块。

“写个字条吧。”方舰长说。

“不好意思，我还不会写字呢。”

方舰长叫连长拿来纸和笔，写好了纸条，又照着纸条，念了一遍。

“签个名吧。”

楚队副胡乱地写了个名字。方舰长一看，这么乱，叫另两个宪兵也签了字。最后，叫代连长作为见证人也写上了名。

“这事不能不认真，少一根，就是死罪。我要直接交给汪司令。”方舰长把这字据放进了口袋。

“人呢？”楚队副问。

“在楼上。带下来吧。”方舰长对连长说。

连长上去把捆得死死的焦主任拖了下来。

焦主任在楼梯上就看见保险柜被砸开了，急得大叫：“啊呀，你们闯大祸啦！那些都是罗团长的，还有汪司令的。我才有几个呀？快放下！”

方舰长冷冷笑道：“你到汪司令那儿去拿吧。”

那三个宪兵，押着焦，抱着金条，走了。

方舰长回到楼上。

“抓走啦？活该！这下够他受的了。就是他老婆要不好过了。那个男人在，她是天天受气。男的被抓走了，还要带个小孩，这日子更没法过了。唉！”安晓芬还在替焦的老婆害愁。

“唉，这种人是不会为家庭负责任的。章夫人，现在时局很乱，你连在家里都不安全，怎么办呢？我想一下。”稍停了回，方舰长说：“你收拾东西跟我上船吧，到海源去吧，跟章团长在一起。”

“哦，那太好了。我住这儿，一直很担心，就怕出什么事。就是我儿子上学还没有回来，那怎么办？”

“你先走，省得再出事。这儿，我留一个人在这儿，等你儿子回来。不行，我们再到学校去找找。”

“好吧，谢谢你安排了。”

“我们之间就不必客气了。章团长是我的知交，也是我的兄长。”

方舰长安排了一个排长留下，连长和另一个排长回他们营地准备换防。

安晓芬按照方舰长的吩咐，准备了三个箱子，上了吉普，先去了方舰长的家。

20.5美军查理

下午，方舰长又驱车来到东海沿的迪思威路美军驻地。

日本人投降后，美军在黄港驻了一个营的海军陆战队，和相应的后勤保障人员。他们在市区边缘选了址，修了一个小码头，划出了一个圈，俨然像一个租界。大概是因为有美军在，这几年国共双方的激烈争斗都避开了黄港，黄港真成了平静的港湾。美方出于有驻军的考虑，想稳住黄港的局面，对当地也有相当的粮食和药品的援助。尤其是随着北方各地战局的纷乱，省城乃至平津的达官名人也接踵而来，市面竟至于热闹了一把。但最近几个月，形势又出现了逆转。大批败兵难民的涌入，物价飞涨，治安混乱，已是一片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末日景象。美军在年前已撤走了两个连，还剩了最后一个连。这个连的去留，成了黄港这座城市最后沉没或是新生的风向，成了所有惊恐的或是期待的黄港人最关注的焦点。

很凑巧，这美军基地里有一位与方舰长在英国时一起工作的同事，现在的基地副长官——查理·史密斯少校。方舰长经常过来拜访他，这次更不会错过了。当然，史密斯也很高兴在这异乡有一位中国朋友。

车进基地大门，在院里的空地停下。

三排灰色的两层简易楼房。

空地。车辆。百米长的码头。小运输船。

港外停泊着两艘美国军舰。

天很明亮，桅杆上的星条旗在阳光下飘摇。

方舰长一下车，有人就喊上了：“哦，查理，你的中国朋友来找你了。”

立刻，前排二楼的一个窗口伸出了一个金发碧眼的洋脸蛋。

“哦，大卫，我的舰长，快上来！”

方舰长上楼，进了查理的房间。

房间里很简洁，行军床，小长桌，方凳，床边的旅行包，和连方舰长家也没有的冰箱和风扇。

“快坐，快坐。听说你去打仗了？怎么样？”查理是个很热情的人。

“哎，上了北面的海源，离这里也不过二三百里。暂时看，还行。但支撑不了多少天。”

“这个时候，你们怎么还想起来要打出去？还有用吗？”查理从冰箱里拿出两瓶可乐，打开，给了方舰长一瓶，“没有别的喝了。用你们中国人的话，凑和着喝吧。”

“没有用了。也用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说法：死马权当活马医吧。”

“国民党完啦，无可挽回地完啦。你别听了不高兴啊，你也是个国民党。国民党已经完全失去对国家的控制啦。”

“这一点，我们都看到了。只是，我们在想，怎么会失败得这么快？”

“我看，首先，国民党政权腐败了，完全烂了，连起码的自我净化能力也没有了。这种样子，是任何别的人都帮不了忙的。”

“是啊，现在是能跑的就跑，能捞的就捞。”

“你看，”查理手指着外面说着：“就拿这面粉来说，我们给黄港运来多少？这我是知道的，完全够黄港市里吃的。但现在市里粮食紧张到了什么程度？把粮店都抢了！这些粮食都到哪里去了？哼！还指望别人当傻瓜来援助么。”

方舰长一下就想起了上午的那个焦主任、那一堆的金条和那一房间的面粉，也悲愤不已：“天亡我，犹可谅，人自亡，不可恕。”

查理没听明白，方舰长又解释了一番。

查理又佩服地说：“你们中国文化，实在是太深了，我们永远也学不会。”

“你们那个杜鲁门也太不够意思。我担心，美国政府错误地判断了形势。就因为老蒋讲了几句对他不满意的话，就把整个中国抛弃了？”

“唉，是你们那个老蒋不怎么样，刚愎自用，跟不上国际民主潮流，又听不进不同意见，连史迪威的话也听不进。很多美国人也就不愿意再帮这个忙。”查理咕咚喝了口可乐。

“老蒋也是有他的苦衷。”方舰长觉得不能什么都去附和外国人，也装个样子辩护了一下，“他是怕搞了民主，让共产党钻了空子。”

“共产党有什么可怕呢？也可以很好地合作么。二战期间，不是和他们一起打德国人、打日本人，打得挺好的么？”

“唉，”方舰长也叹了口气，“就怕你们想得简单了。”便不再语。

查理看方舰长的那瓶可乐没动，就说：“你怎么没喝？”

“不好意思，太凉了，我有点不习惯。”

“这就是我们西方文化了。每天喝一点，能提精神。我看你现在就有点精神不振。哈，哈。”查理还开起了玩笑，又顺便说起了：“可乐在中国的形象代言人还是你们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阮玲玉呢。”

方舰长显然没有兴趣谈论那些议题了，“现在怎么办呢？我们大家都担心你们会走。”

“不但你担心，连你们的汪司令也来找过我们的乔治中校，希望由我们美军出面，让黄港作为非武装的中立区，保存黄港现有的行政管理系统。乔治没有同意。”

“这也是个办法哎，为什么不考虑呢？”

“我们出面？我们在这儿能做什么呢？看着你们双方打仗？更何况，据我们所知，中共方面已断然拒绝这个方案。而我们是不可能为你们国民党作战的，美国人的血是不可能为一个腐败的政权去流的。就像你刚才用你们中国人的说法，连你们自己都救不了自己，怎么指望别人来救你们呢？”

“那你们就这样眼睁睁地抛弃一个多年的朋友？”

“我们没有抛弃朋友。南京陷落以后，连苏俄大使都跑了。可我们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还在南京。那几年，苏俄承认了伪满州国，而我们美国没有。是我们美国一直在坚持反对日本。只是我们不干预中国的内政。中国的结局，由中国人自己决定。”

“时局已经很紧了，你们还能在黄港待多久？能告诉我吗？”

“我正准备跟你说呢。”查理笑着说，又喝了一口可乐，“只不过你不必跟你们司令讲，看他什么时候跟你讲，我这是拿你们中国人的做法来教你。哈，哈。”查理狡黠地笑了下。

查理挪了下凳子，看了下窗外，靠近了方舰长。

方舰长也喝了口可乐，皱了下眉头。

“据我们的情报，共军24军已经从长江北岸回头，目前已过了淮河，目标是黄港。估计，中共对黄港还在国民党手里的局面不会再容忍多久。我们也很快就要走了。我们在这儿，多则四五天，少则两三天。”

“你们一走，黄港恐怕两天也坚持不了。”

“这是可想而知的。只是舍不得你这位老朋友，所以告诉你这些。你要早做准备啊！”

“谢谢你的相告了。可又能做什么呢？”

“我们都是海军，这方面要方便多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能去哪儿呢？”

“这倒也是个难题。去海岛，去台湾、去海南。本来，当初，二战结束前，美国提出来台湾由联合国托管，老蒋还不干。现在连这条后路也没有了。我估计，也就一两年的时间，台湾也就落到共产党手里了。”

“那我们真的是毫无去路了？”

“那就到我们美国来吧。像你这样的人才，到美国来，还是不错的。舰长是当不了啦，可以到航运公司当船员。别看是船员，薪水可不少哎。我给你我在美国的地址，到时来找我，我们永远是朋友。”

“行，行。”方舰长苦笑着，端起可乐瓶，咕咚咕咚，竟把一瓶全喝了。

20.6街头学潮

方舰长告别了查理，乘车往回走。

穿过迪思威路，转入市区，上了其美路。

一阵激越的口号声迎面而来。

几十名警察排在马路上，警察的对面竟是浩浩荡荡游行集会的队伍。

前面不远处的小楼。楼上的窗口站了好多人，往外扔桌椅板凳、书籍纸张。院子里冒出了滚滚浓烟，大概是在焚烧这些东西。

楼顶上、院墙上，都爬了不少人。

院墙外的马路上，聚集着几百号人，大体都是些中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打着一些横幅，写着“反内战、反饥饿、反贪污”，“反对内战、实现和平”，“争取民主、争取自由。”

人们举着纸糊的彩色标语，振臂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不民主的政权要垮台！”“打倒法西斯！”

随着又一批文件纸张从窗口摔出来，火焰腾起，黑烟翻卷，示威的人们更兴奋了，口号声更加响亮了。

“这是什么地方？”方舰长问。

“省党部好像在这儿。”司机说，“你们到海源前，还到这儿来接过一个什么秘书长的。是吧？”

方舰长想起来了，是的。这刘秘书长又跑哪去了，怎么后来没见过他，这一会儿还能被围在里面？可这帮学生跑来砸省党部干什么呢？没有权，没有钱，养了一帮无用的文人。共产党怎么看上它了呢？

正思索中，方舰长忽然从屋上发现一个似乎认识的身影，好像是章团长十七岁的儿子，章加法。

是的，他正是章团长的儿子章加法。

章加法正爬在屋顶的瓦片上，举着标语激愤地呼喊口号，脸都涨红了，嗓子都哑了。

这时一个年青人挤过来，对楼顶上的人喊着：“加法，你们房顶上的人，都下来！”

“哼，他们敢开枪吗？要是开了枪，那就明明白白说明了他们就是历史的罪人，镇压学生就是罪人，永远洗刷不掉手上鲜血的罪人。”章加法的情绪还挺激烈。

“北洋军阀朝学生开了枪，没几天就垮台了。”边上另一个学生也说上了。

“开了枪，段祺瑞再吃素也没用了。”章加法说。

“那还是学生翻进了铁狮子胡同执政府的院墙，军警已经被挤到了台阶上才开的枪。”那学生还在说。

“你们也不用讲这么多了。肖老师说了，要注意安全，别摔下来。”这是加法他们的班长冷松柏。章加法也就从房沿的落水管跳到了二楼的阳台上。

马路上围观的人群也更多了。

这时一个也挺年青的老师从院子里出来，清瘦的脸，戴着一副眼镜，这就是他们的班主任肖福兴。肖老师以后和龙头镇也是有着不解之缘。和他一起走来的是学生班长冷松柏。冷班长拿着一块长板凳，走到路边放下。肖老师站上凳子，就向周围的群众大声讲开了：

“同胞们！天就要亮了，国民党彻底完蛋的日子到了，黄港就要解放了！我们要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后面的学生一阵欢呼，听的群众里也有鼓掌的。

“这一天的来到是不容易的。拿我们青年知识分子来说，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来，从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以来，到最近这三年‘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民主运动，我们都舍弃自我、追随革命，反对独裁统治。可是国民党反动派临到灭亡，还蛊惑人心，污蔑我们要搞‘一党专政’。同胞们要警惕啊，共产党人决不搞‘一党专政’，我们抛头颅撒热血，就是要反对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就是要争取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最高政治家毛泽东曾经这样表示了中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并不需要，亦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并不主张集体化，也不反对个人的活动……我们相信着，并且实行着民主政治’。他说得很对。（说明：这段话请见1945年4月19日的《新华日报》重庆版）

讲到国家，讲到政府，现在的国家是国民党的国家，现在的政府是国民党的政府，不是我们人民的政府。就像毛泽东说的：‘一个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有什么脸面代表这个国家？爱这样的国家，就是对祖国的背叛’（请见1946年大连大众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原文载于1944年6月13日《解放日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我们就是要推翻这个反动的政府，建立新的国家。”

突然警报器尖叫，两辆红色警备车（通体涂红的全封闭囚车，后侧开门，仅留小铁窗）呼啸而至，大批警察手持警棍冲过人群涌来。

“肖老师，快走！”冷班长自己挺身，迎着警察上去。

肖福兴在几个学生的簇拥下急促而去。

其他的学生手腕手，筑起了人墙，挡着警察。

警察挥舞警棍，将学生往外拖、往外拽。

警笛在尖叫。

不少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学生被抓走。然而，歌声却更嘹亮更激昂：

“天快亮，更黑暗。

路难行，跌倒是常事情，常事情！

跌倒算什么，

我们骨头硬，

爬起来再前进！”

这高亢的革命歌曲，在和警察的激烈搏斗中响起，不由得叫人心底震撼。

街头的一些国民党散兵，冲上去，对示威学生大打出手。这帮人下手最狠。

有的伤兵，就在路边向学生们扔石块。

一个伤兵，腿上绑着纱布，瞪着血红的眼，一蹦一跳地过来，嘴里喊着：“老子在前方跟共产党拼死拼活地干，这帮兔崽子在这儿替共产党闹事。”摇晃着拐杖，还想上去打人呢。

学生们也不甘示弱，竭尽拳脚之能事，一场流血冲突发生了。

一个警察过来，对着方舰长的吉普车说：“你们还不走啊？等着砸你们的车、烧你们的车啊？”

方舰长这才反应过来，对司机说：“掉头走吧。”

吉普车掉头走了。

留在车后的是悲壮的歌声：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

“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车已经前行了一段路，那歌声却始终跟随着方舰长。方舰长沉默不语，思绪万千。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

歌声还在黄港的上空飞扬。

方舰长回到家，跟妻子和安晓芬讲了有好多的年轻人在路上游行示威，大部分还是些中学生，跟警察、军人发生了冲突，肯定会有伤亡，还不知道最后是怎样的结果。

安晓芬急着说：“啊呀，我伢子从早就出去了，说是上学校，今天有活动。到现在还没消息呢。是不是也去参加游行了？”

“不瞒你说，大嫂，我好像看见加法了，还爬在屋顶上呢。”

“啊呀，这怎么办呢？”

“大嫂，别着急。现在游行大概还没结束，等晚饭后，我派人去打听下。”

“是啊，先别急。我们先弄饭吃。”苏素玉也劝慰着说。

“箱子，你准备好了吗？”方舰长问妻子。

“也算准备好，也算没准备好。怎么？很快要走？”

“是的，看这局势最多两三天的时间了。”

“那怎么办？”两位女士都焦急地看着方舰长。

“在船上等吧，我们至少还有船。”

晚饭又是胡乱吃些面饼，碰巧这两位女士都不会做面食。

安晓芬着急地看着方舰长，嘴上也不便多说。

方舰长知道章夫人的心情。他先打电话给青一团三营找代连长，问上午去其美路你们团长家的那个排长，回营房了没有，有没有什么情况。

找到了代连长。代说，那排长一直没回来，还不知道有什么情况。

方舰长说，你们再派个人过去看一下，不管什么情况，都来个电话讲一下。

代连长说行，马上去。

半个多小时以后，那排长在楼下焦主任家里打来电话，说是章团长的儿子还没回来。

安晓芬一拍桌，说：“啊呀，我怎么忘了他们楼下有电话，早就可以问一下了。”

方舰长仰首，闭了回眼，在想再去找谁呢。

“呜呜呜，”方舰长又摇起了电话，找宪兵队。

宪兵队说，今下午的事，不归他们管。方又顺便问了焦主任的事，对方说，一挨揍他就招供了，牵扯到的人还挺多，至少有罗团长，其他的，不好多说。

又找警察局。

几个电话之后，终于打听到了章加法确实被抓进了警察局。这一下午，最后抓了二、三十个。

方舰长又直接找到了警察局长，说了那是章团长的儿子，看怎么通融一下。

那警察局长，吞吞吐吐，直说为难。说，人是关在警察局，可是由警备司令部处理，他们只负责看管。他最后保证，章少爷可以不挨揍。但放人，恐怕要直接找汪司令。听说汪司令今天挺恼火，这批人要重办。

方舰长说，好，我明天直接去找司令。这一夜，你们千万别碰他。

方舰长顺便还问了下，当时省党部楼里还有人吗？那个刘秘书长在吗？

对方说，那个楼已经空了好几天了。

方舰长把这些情况，都跟安晓芬说了。

安晓芬再三感谢，提着心，上阁楼躺着等天亮了。

早饭过后，方舰长带上昨天那宪兵写的收据，急匆匆地又叫车出门，直奔斯高塔路警备司令部。

方舰长直接进了二楼的汪司令的办公室。

汪司令坐着没动，鼻子里哼了一下，而后阴阳怪气地说：“我知道你要来，一直在等着你呢。你真行，昨天一天，宪兵队来电话说你要来，警察局也来电话说你要来。你说吧，有什么事？”

方舰长说：“汪司令，你也已经知道了。章团长的儿子，昨天在游行现场被抓了，现在关在警察局。我想，如果不是共党骨干，就放了吧。”

“章团长的儿子？放了？这么容易？我那天已经跟你交底了，那个章团长不可靠。这不，连他儿子也是这种东西。不是共产党，也是在跟着共产党闹。这种事再不管，我们在黄港还能待得住吗？”

“章团长在前线作战，我们却在后面抓了他的儿子，恐有不妥吧？容易激发事变吧？”

“唔，”汪愣了一下，“他敢投共吗？”

“投共，章团长是决不会的。”方舰长说：“但他能全力以赴去打仗吗？”

“这个，让我再想一下。还有什么事？”

方舰长从口袋里拿出那张收据，递给了汪司令，“这是从334团留守处焦主任家里搜出来的金条，由宪兵队收缴了。”

汪见了这纸条，忽然脸色大变，猛地拍下桌子，大叫：“来人哪！”

方舰长一惊，脸都白了。

门外进来两个军官，毕恭毕敬。

汪叫着：“放人。枪毙！”

那两军官和方舰长都没听懂，没有反应。

汪重复着说：“通知警察局，把那个章团长的儿子放了。通知执法队，把那个姓焦的，立即枪毙。”

方舰长这才明白汪的意思，松了一口气。他刚才以为，汪是要对他下手呢，这种可能，不是完全没有。

他才喘口气，又张口说了：“这案子还没查完，还需要再审清楚吧？”

汪对他瞪了一眼，“你懂什么？乱世要用重典，快刀斩乱麻，决不能拖泥带水。快执行！”

两军官下去。

“这下，你满意了吧？到警察局去领人吧。方舰长，我对你可是够意思了吧？我还从来没有对别人有求必应，这样客气过。我跟你讲的事，你也别忘了。”汪说完，便倒在椅背上，闭上眼，不再言语。

方舰长为防夜长梦多，出了警备司令部，便直奔警察局。

进警察局门厅，值日官请方舰长留步，在大厅坐椅上稍候。他进去秉报，一刻，出来，说：“请长官再等会儿，一会儿人就出来了。”

此时，两辆红色警备车，拉着刺耳的警笛，车顶闪着红色警灯，呼啸着从院子的大铁门开出。后面跟着两卡车的警察。

又一刻，两个警察带着章加法出来了。

章加法认出了方舰长，说了声：“方叔叔。”

方舰长在几张保书和交接书上签字画押，领着章加法出了警察局的大门，上车走了。

车过了几个路口，到了裴拉法路的路口，那儿有个小广场。

广场上聚着大群人。那两辆红色警备车，非常显眼地停在那儿。几十个警察围出了一大圈空地。

方舰长的吉普车过不去，只能停了下来。

从红色警备车里拉出了几个被捆绑的人。

人们簇拥着，议论着，有伸脑袋的，有使劲推的，有喊着，别往前挤了。

一个警长在卡车上，大声宣布：“黄港警备司令部现将煽动暴乱、危害民国安全犯，破坏经济秩序、特大贪污犯执行公开枪决。”

黄港的市政管理都停摆了，然而杀人机器却依然开动着。

人声哗然，一阵骚动。

先拉过来的竟然是那位焦主任。焦挣扎着、大叫着：“我冤枉哪，冤枉哪！你们去找汪司令哪，他是知道的呀！”

刑警没管这套，把焦拖过来，摁着跪在地上，另一刑警拿着手枪，举起来，离后脑勺一尺不到，便扣了板机。“叭”的一声，焦应声而倒，血溅一地。

人群惊叫着，前面向后退着，后面却向前推着，掂起脚，生怕少看了什么。

刑警又拉过来一个，年青人，脸上几道伤痕，却还挺着头颅，眼望蓝天，不屈的神情流露在眉间。

警察要摁倒他，他反而挺直了身，疾声高呼起：“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冷班长！”章加法在车里叫起来：“我的班长！”

方舰长一手捂住他嘴，跟司机说：“赶快掉头走。”

吉普车很快掉头走了。

车窗外响着：“新中国万岁！”

又听得他们几个临刑前集体的呼喊：“新中国万岁！”

接着，是“叭叭”接连的枪声。

章加法在车里哭着，跺着脚，拍着腿，“让我一起去死吧，让我一起去死吧。”

方舰长低声喝着：“回去再说。”

回到亚尔培路的家，方舰长一声不吭地把他带进屋，关上了门。

当然是当妈妈的先迎上去，“啊呀。我的细伢子，可是回来哒。把娘想死哒。”尽管安晓芬的这个儿子已经是高中生了，可她一直习惯喊她宝贝儿子叫细伢子（湖南话：小儿子，小男孩）。

苏素玉也高兴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小玉也过来望着加法说：“哥哥回来啦。”

可加法却沉默不语，脸腮上淌着泪。

安着急地望着儿子的脸，用手擦去他脸上的泪水，“怎么挨打了吗？受伤了吗？”忙着撩开他的衣服，看有没有伤痕。

“没有受伤，没有挨打。”方舰长说：“他们班的班长，刚才在裴拉法路的广场上被当众公开枪决了。”

“啊！”三位女性都惊叫了一声，愣住了。

“这次汪司令恼火了，下手很重。连那个姓焦的，也当众枪毙了。”

安晓芬露出了点喜色，拍着手：“杀得好，这个杀得好。细伢子，你这次，没遭罪，能出来，全亏得你方叔叔。快谢谢你方叔叔。”

“方叔叔，谢谢你了。”章加法鞠了一躬，言未毕，就放声大哭了起来。

安晓芬有些紧张了，忙抱住了儿子。

方舰长说：“让他哭一会儿吧，把心里的苦处、委屈、难受，都哭出来。”

“他们打人太厉害了。这一晚上，除了我，所有被抓去的人都挨打了。”章加法哭着说：“打的很惨。我们刚进去的时候，精神都还挺足，还呼着口号，和他们争论。可是一关上门，不管三七二十一，劈头盖脑就打过来。一个人刚想张嘴说话，一铁棍就打在嘴巴上，满嘴的牙和着血就下来了。抓起一个人，就往水泥地上摔。根本不问你，根本不和你说话，就是往死里打。有的人受不了，喊爹喊娘地求饶，他们根本不听、不管，就是打。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他们自己好像也不是人，就是吃人的野兽。”

“你们年轻人，把事情看简单啦。人家都要灭亡了，都要垮台了，你们还要去招惹它。本来就红了眼了，能不吃人吗？”方舰长说着：“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小心啊。”

“要听方叔叔的话，知道啦？”安说。

“是。这一夜，让我知道了很多，也让我想了很多。”

“我就弄不懂了，你们跑到省党部去干什么？”

“省党部，不就是国民党的象征么。我们肖老师说，他们那儿没有军警把守，去那儿危险性小，可以冲一下。”

“你们就不怕牺牲？”方舰长接着问。

“没想那么远，只是国民党太腐败了，这社会太黑暗了，中国一定要改变。要改变，就要大家都去努力，尤其是我们年青人要去努力。谁也不去做努力，中国怎么会有希望？”

“年轻人，有抱负，有热情，这是对的。但是，到了想问题、做事情的时候，就不能太简单了。”

“唉，这年头，弄得是什么名堂么？老子在前方拼了命打共产党，儿子在后面反国民党。搞乱了套了。”安晓芬疑惑地说。

“不要说你们了，连我这几年都搞糊涂了，而且是越来越糊涂了。不管了，先吃饭。吃完饭，休息会儿。下午就上船，省得夜长梦多，再出别的事。加法呀，也正好你方叔叔这两天在黄港，要不啊，你还真麻烦呢。”方舰长说。

三位女性，又面面相觑，不再多言。

末了，方舰长又打电话给代连长，要他们自带干粮，傍晚前尽早赶到码头，早点上船，联络人员提前两小时到。

20.7不由心寒

下午两三点钟，方舰长向海军基地要了两辆车。

车来了。方舰长一家三口两个皮箱一个车，安晓芬一家两口三个皮箱一个车。

上车前，苏素玉把家里整理打扫干净，最后一遍抚摸一下白色的沙发布套，心想今后的岁月里，这上面不知将会落上多少尘埃。而后，锁上门，步下台阶，留恋地回头看着。

“方哥哥，”只有在很特别的情况下，苏素玉才这样动情地称呼自己的丈夫，“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呀？”

“很难说，真的很难说。说不定，这辈子也再见不到这所房子了。”

“这么悲观吗？方舰长，人生如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安晓芬说。她想问题倒是有些大度的。

“我是看不出来了。”方舰长很有些忧郁地说。

车发动了，离开了这亚尔培路美丽的林荫道。

车进基地，直接到了“济成”号的船舷边上。

安晓芬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现代化的大军舰，仰着头看那高高的桅杆和伸向天空的炮塔，不由啧啧称奇。

青一团已经来了一个班，由一位昨天来过的排长领队，那排长见方舰长下车，便过来敬礼报到，又喊过来几个兵帮着拿箱子。

苏素玉、安晓芬领着孩子，往船梯那边走过去。

突然，有人大喝一声：“站住！干什么的？”

方舰长真的一愣，在这码头上，还从来没有人对他这么说话的。定眼一看，就是昨天在焦主任家拿金条的那个宪兵队的楚队副。

“哦，楚队长，今天怎么在这儿呢？”

“本人奉司令之命，检查海军港区情况。”这位队副，今天可是有什么撑着，翻脸不认人了，“这些箱子和女人是怎么回事？”

“这是章团长的夫人和我的夫人，随船去海源前线。”

“不行！司令有命：为严肃军纪，除舰上人员，其他人等，一律不许上船。别想偷着跑。”

“胡说！我们是上前线，上战场。要跑，还有迎着子弹跑的么？”方舰长真的生气了。

“我不管这些，除非汪司令直接跟我说。”

“那你有汪司令的手令吗？”

楚队长也愣了。因为汪司令只是电话里跟队长说，队长再转告他的，并没有书面的东西。

“汪司令的手令，你也敢查吗？”楚队长干脆来横的了。

那排长却走了过来，对楚队长说：“这位是我们的团长夫人，要上前线看团长。怎么样？还要求你啊？”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楚队长还是硬得很。

“你他妈的，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滚一边去。”那排长一把就把楚队长推到一边。

楚队长“蹦”地跳了起来，“你小子好大胆，想反了啊？”右手往腰边移动。

耳边却响起一声吼：“你敢动！”

楚回头一看，乖乖，身后已经全是青一团的士兵了。没有自己的机会了。再抬头一看，前面也已经是“济成”号的水兵了。

“你小子再啰嗦一句，就立马叫你死到海里去！你信不？”那排长更硬。

楚队长只得好汉不吃眼前亏，嘟囔着：“你们等着瞧，我去找司令，看怎么收拾你们。”灰溜溜地走了。

“谢谢你们啊！”方舰长对那排长说。

“不客气，我们才是一条船上的人。方舰长，我们可以上船找安排的地方了吧？”

“好，上吧。”

剩下的事，整理上船的物资，清点人员，傍晚青一团那个连上船等，不一一表述了。

天黑下来的时候，船要走了。

值日官过来报告，楚队长拿着警备司令部的条子，要上船跟着去海源全程监察。

“不去管他，他要上就让他上。”方舰长忿忿地说。

随后拉响气笛、收梯、起锚、解缆，“济成”号缓缓地离开了码头。

水兵们按部就班地忙着。青一团的士兵们兴高采烈地挤在甲板上比划说着。

苏素玉和安晓芬怀着各自的心情，望着这渐渐远去的城市。

两个孩子，好奇地看着海港的夜景，似乎还没意识到，这一去，对他们的人生将意味着什么。

尽管这座城市已经陷入了灾难，然而此时此刻，从海上看黄港，依然是风情万种、美丽无比。夜幕下，起伏的山林已被万家灯火点缀得有如天上的繁星，海面上倒映着港区码头的灯光，绵延十几里。没有了尘世间的喧嚣，没有了呻吟和呐喊。身边只有浪花和波涛，闪烁着淡淡的荧光，宜人的海风吹动着衣衫。

“再见了，黄港。”他们几个人心里都在这样想。

苏素玉，对黄港是留恋的。这是她和丈夫共同努力了几年的地方，在海滨、在林荫道、在西式的小楼里，留下了多少美好的回忆。这对于她，就已经是理想的生活了，今后还会有吗？

安晓芬，对黄港是陌生的。跟随丈夫奔波操劳了一二十年，南北迁徙几千里，停留过的地方不下几十个。黄港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不过是又增加了辛苦与疲惫的一个。城市是挺洋气的，可是她又有多少时间去欣赏呢。

章加法，对这个城市是矛盾的。这个城市，告诉他，世界可以是很美好的，可以是充满着阳光、沙滩、海浪；但这个城市也告诉他，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苦难、卑劣、不公和邪恶。

黄港对于方小玉还像是小猫的窝，还是那样的温暖、值得依恋的窝。但她还不知道，这一去究竟意味着什么，还没有大人们那份伤感和思虑。

离开黄港的码头，对于方舰长来说，早已司空见惯。但他深知这一次的离开，绝非一般，下次什么时候回来，以什么方式回来，真的是连上帝也不知道了。但是，他不能把他的预感和忧虑告诉她们，只能是长叹一声，闭上眼睛，用耳朵去听那轮机的轰鸣和海浪的翻滚。

随着那轰鸣和翻滚，“济成”拉着闷声的长笛远去了。

他们这几个人，要说和黄港这块土地还有怎样的联系，那要到几十年之后了。

20.8家人团聚

“济成”号抵达海角外海的时候，天色微明，东方的天际露出了灰白，西面还是黑蒙蒙的，晨星稀疏。

“济成”号拉响了汽笛，停泊在海面上的其它几艘舰船也“呜呜”地鸣笛回应。

“济成”号的探照灯射向西海滩，信号灯“啪嚓啪嚓”地向岸上进行联络。

沙滩上有微弱的灯光在闪烁、在移动，已经有人在等着了。

是的，章团长知道妻儿要来，从后半夜就过来等着了。

章团长也是个很重感情、富有家庭责任感的人，虽然离开黄港才几天，但心里牵挂无比。如此战局纷乱的年代，没有一个男人在身边，家里只有女人和孩子，该是多么难，那是可想而知的，甚至有些是想也想不到的。尽管他家在黄港，算得上是上层人士了，但不免也会有些意外的事。所以，方舰长能把她们都带上船、一起过来，章团长心里是非常感激的。无论从哪一点上讲，他都觉得应该早早地过来迎接。

青一团三连的代连长，第一批下救生艇上岸，见到了章团长，十分地高兴，连说，弟兄们都乐意跟团长在一起，留在黄港的其他连队都羡慕死了。

章团长也高兴地笑了。

他握着代连长的手，说：“我这里真需要你们呢，还真希望我们青一团的人都能过来。代连长，你留一个班在这儿看守海滩，其余人员跟呼营长到望海山。”又回头，喊了声：“呼营长，你请过来。”

“代连长，这位是呼营长。在你们营长来海源之前，你们连归呼营长指挥。”

“是。呼营长，三营三连向您报到，请指示。”

“好，好。不用拘束，我们一起干，共渡难关。”呼营长也是很客气地说。

章团长上了第一只回去的救生艇，奔“济成”号而来。

章团长登上“济成”号甲板，方舰长也已在栏杆边等候了。

“这么早就来啦，急着看嫂夫人啊。”方舰长调侃着说。

“这时候，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我都快急死了，天天盼你回来啊。”

“这几天，海源还有什么情况吗？”

“新的情况倒是没什么，但是说变就会变啊。而且，要变就是大变啊。”章团长说。

两人进舱里，在走道上，方舰长就喊上了：“嫂夫人，章团长来了。”

安晓芬大概没想到章团长会这么早来，听得方舰长一喊，她“噢”的一声，就出了房间，见了章团长，先是一愣，眼睛里放射出激情的光芒，便旁若无人地扑了上去。

章团长扶住了她，“都老夫老妻的了，还用这样啊？”

安晓芬激动地说：“就这么几天，家里出了这么多事，差点见不着了。”

章团长忙问：“出了什么事？”

方舰长说：“进房间说吧。”

几人进了房间。苏素玉过来问好，小玉也甜甜地叫着伯伯，又上甲板看去了。只有章加法轻轻地叫了声“爸”，便低着头坐着。

舰上的房间都是很小的，大家都坐在双层床的下铺，膝盖顶着膝盖。

章团长又问，家里出了什么事。

安晓芬说，楼下那个姓焦的狗东西，居然拿着好几根金条，上楼来，想占我便宜。

章团长勃然大怒，跳了起来，脑袋都碰了上铺的床板。

安晓芬忙说，亏得那天方舰长带着人过来，立马就把那个姓焦的捆了起来，又揍了一顿，送到宪兵队了，真解气。

章团长忙转头感谢方舰长。

方舰长还没客气完呢，安晓芬又说了，要感谢方舰长的，远不止这些呢。

章团长又惊讶地“啊”了一声。

安晓芬说，你叫你那个细伢子自己说。

章团长回过头疑惑地看章加法。

章加法低头不语。

章团长又抬头看妻子。

安说，你那个宝贝伢子呀，本事大得很，竟敢去参加共产党搞的游行，被警察局抓了去了。他们那个班长，都已经枪毙哒。

章团长更惊讶了，问，后来又怎么出来的。

安说，又是亏得方舰长直接找了汪司令，这才去领出来的。

章团长转身握着方舰长的手，说，真不知该怎么感谢你了。

方舰长淡然一笑，汪司令也是看着我们都在前线拼杀，不能不有所顾忌，只能这样办。

章团长瞪了儿子一眼，你怎么能跟老子对着干，跟着共产党去闹呢。

章加法低声地说，社会太黑暗了，国民党太腐败了，再不起来抗争，中国怎么办。

方舰长说，年轻人看到社会黑暗，很容易听得进共产党那一套，一激动，就跟着去了。

章团长也不好多说什么，只说，真是亏得你回去了这一趟，又问，那几件事，司令是怎么答复的。

方舰长对安晓芬说，不好意思，嫂夫人，我要占章团长一点时间谈点公事。

安忙说，你们有事你们忙，别耽误你们。

章、方俩人，出房间往会议室去，经过报务室门口，章团长对李策说，李副官，你给罗团长发个报，请他到“济成”号来商量军务，就说方舰长回来了，带来了汪司令的意见。

李策答应着，去发报了。

章、方进会议室。

章团长转身要关门，被一人拉住门把。

章正在疑惑。方舰长一看，又是那个楚队副，便冷冰冰地说：“这儿没有你的事，没有请你进来。”

楚一脸狂傲，拍拍胳膊上的“宪兵”袖章，说：“我有权监督你们。”

方舰长冷冷地说：“但是你没权参加我们的会议，汪司令没跟我们讲。”就“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这是怎么回事？”章团长问。

“我正要跟你说呢。情况很严峻。门外的是条狗，是汪司令派来公开监督我们俩的。”

“啊？”章团长惊呆了。没想到方舰长回黄港就这么两天，竟然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还不止这些呢，连你的身边，都有狗。”

“怎么讲？”

“我俩那天在教堂的谈话，保密局都知道了，说是有亲共倾向。”

章团长惊得都说不出话了，伸长了脖子，深深地吐了口气。半天才说，“那会是谁呢？”

方说：“是谁，已经不重要了。汪对我们都不信任了。离开黄港的那天，甚至还不让我们的老婆孩子上船。如果不是代连长他们在，那天还真上不来呢。”

章团长气愤地站了起来，来回急促地踱步，他可是很少在别人面前这么激动。

章团长又想起来那个焦主任了，问：“那个姓焦的，后来是怎么处理的？”

“昨天就在街上被公开枪决了。我正路过，还正好看见了。”

“怎么这么快就枪毙了，事情搞清楚了么？”

“还用搞清楚么？潮水一退，谁是光屁股，不就叫人看见了么。”

“你是说汪也不干净？”章团长还是有点不愿相信。

“你还以为他是好东西啊。他派你到海源来，是想吞掉你的青一团，把青一团变成他的御林军。这次，他死活不肯再派青一团出来。我好说歹说，才让出来一个连，装个样子。”

“这点人，海源怎么守？”

“所以，派了335团来。”

“335团？还赶不上334团呢？”

“汪司令说了，就因为335团不行，不听话，所以才派到海源来，让共军吃掉它。”

“那他派我们来，也是这个意思？”

“你还以为真的是看重我们呐？把我们弄出来，既给他作挡箭牌，又清除了自己不喜欢的人。”

章团长又长叹一口气：“我都要叹不出气来了。对付共产党，一个个都是草包熊蛋，除了杀人，不知道有第二种办法。对自己阵营的人，就什么本事都有了。用尽心计，要尽花招。手段毒辣至此，这党国

再不灭亡，就没有天理了。”

这时，李策敲门进来说，罗团长已有回电，他不过来了，具体事宜尽由章团长安排，他一切从命。

方舰长说：“这小子肯定知道姓焦的出事了，不敢过来。”

李策转身要离开，章团长叫住了他，你先等一下。

“他不来，驻防的事，怎么商量？”章团长说。

“还商量什么？你定，就是喽。不管是商量，还是你来定，他都不会听的啦。”

“我看，这次共军进攻望海山失利以后，部队调动频繁，兵力大有增加。我估计，他们不会再去硬拼望海山，而会把主攻方向放在赵村以南，越过大河而来，从背后包抄望海山和龙头，我部则会军心大乱、全面溃散。靠我的那一个营来守从大河口直到望海山，力量太薄弱，毫无希望。我想，我那个营收缩到望海山，334团到城西来，新来的335团守城东。你看可以吗？”

“行啊。再怎么颠倒，也就是那么回事了。”

章团长对李策说，就按这个意思告诉罗团长，中学让给335团，赵村交给334团。龙头镇内，由334团和335团以十字路口为界分别驻守。明天，335团就开始来了，准备换防。

“你把城西交给334团，你到海滩的后路不就给堵上了吗？”方舰长说。

章团长想再问，当着李策又不便再说，就对李策补充了一句：西滩仍由青一团看守，两辆装甲车留在赵村，并请334团留出西滩到望海山的运输通道。

李策答毕，关门而去。

“说到赵村，那个刘秘书长，怎么一直没再看见？”章团长问。

“别提了。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跑了，也不知道上哪儿了。连这次学生们烧了省党部，也没见这位秘书长的人影。”

“当初，我也是把事情看得太简单啦。中国的土地问题不是那么好解决的。看来，赵村新政就只能这样无疾而终了。”章团长又感慨了一下。他可是已经知道中国土地问题的水深莫测。“赵村新政”那玩艺在那烽火连天、深仇血海的时候，无异是与虎谋皮，对哪方面都不可行。当然，也不能就把它完全看作是痴人说梦、搭错了神经。五十年代，国民党在台湾搞的很大程度上为以后经济起飞打下基础的三七五土改，不是能从“赵村新政”上看到某种端倪吗？

“先别想那么些远的啦。这次，姓焦的坏在我们的手里，罗团长是决不会甘心的。他和汪会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尤其是对你。你可要留心。”

“他还能把我怎么样？”章团长说。

“他们可是什么想不到的事，都会做得出来的。你在大局上看得比我透，但是对这些小人，还看得不够清。哦，说到大局，还有件更重要的事。”

“还有事情啊？”章团长又惊了。

“美国人已彻底抛弃蒋政权了。我听史密斯说，共产党在拿下上海后，共军第二十四军已从长江边掉头北上，日夜兼程，目标直指黄港。黄港的美军不会和共军做正面接触，这两三天就要撤走。黄港最后沉没的一天就要到了。”

章团长这次已不再叹气，只是停了一会儿，说：“一直在想着这一天，这一天终于来了。这么庞大的政权机器，说倒就倒了。”

“一旦美军撤走，黄港也就只有一两天的时间了，顷刻之间就会崩溃。就像船破了洞、进水下沉，一开始，你看它缓缓地，渐渐地，倾斜了。但最后的沉没，只是一刹那，巨浪一卷，那小山似的船体在你眼前就瞬间消失，海面上只剩下几个泡泡。”

“这个仗，还怎么打呢？”

“还打什么呢？所以，我赶紧把老婆孩子和嫂夫人都带到船上来了。我是怕我们连黄港也回不去了。几天以后，在黄港等着我们的，不是汪司令、宪兵队，就是共产党。”

“实在是要多谢你了。我真不知该怎么感谢你。这次来海源能深交于你，真是大幸。”

方舰长往四周扫视了一圈，把身体靠近章团长，悄悄地说：“如果你要投奔共产党，那也行，我就把嫂夫人送下船。”

章团长这下更是吃惊不小，“我可从来没有想到这一步。虽然已经完全没有了希望和前途，但我是个军人。作为一个军人，不能叛变，不能投降，这是最起码的。”

“章兄啊，情况变了，有些事，恐怕也不得不变通处理。”

“唉，我和你不一样。我和共产党已经打了这些年的仗，结下了仇，手上也沾了他们的血，他们容不下我的。你怎么会想到那儿去了呢？”

“不瞒你说，我还真想过。但后来‘重庆’号起义被炸沉，保密局又看得紧了，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那现在，你怎么办？”章团长问。

“把船开到南方去，到舟山、到台湾，最后实在不行，到海南吧。”

“那恐怕也躲不了多久。”

“躲一时算一时吧。你把指挥部也搬到船上来吧。共军随时都可能发起进攻，我们也随时可以走。”

“双方打得都这样残酷。我把弟兄们带来了，怎么能忍心就这样扔下他们呢？”

“你能把他们带到哪儿去呢？你现在已经是寸步难行啦。你想对他们负责任，可是我们有这个能力吗？应该对他们负责任的，不是我们，而应该是国民党政权，应该是蒋介石！”

“我要是上船走了，汪肯定会上报国防部，用军法处置我。”

“这种时候，你还管这些。连姓汪的自己，都要搬上来。要我给他留出整整一层的舱位，就因为这一点，他这次才没拿我怎么样。”

“我再看看吧。怎么跟弟兄们说呀，真是开不了这个口。”

“你这个心肠呀，真是比基督还基督。我就不再占你俩口时间了。今天，你也不用着急回去了。”

“唉，我何尝不想，再也不下去了呢。恐怕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了。明天，335团要来，334团要换防，这也是个大事呀。这种时候容易乱，容易被共军钻空子。我午饭后，就下去吧。”

午餐。“济成”号餐厅的一角。

狭长的一张餐桌，两边围坐着章、方两家六个人。桌上摆着几盘酱牛肉、火腿肠之类的罐头食品。

方舰长给大家倒着香槟，一边说着：“在船上，就这条件，凑和吃点吧。”

“这比我们望海山，又要好多啦。在我那儿，能吃上咸鱼干也是好的啦。”章团长说。

安晓芬很关心地看了丈夫一眼。

“为我们两家难得相聚，大家一起干一杯！”方舰长提议。

大家也都举起了手中的杯子，相互碰着。在这血战与风浪的间隙，真还难得有这样温馨的一幕。

章团长站起来，说：“晓芬，我们俩敬方舰长夫妇。”

“是的，是的。我们得好好谢谢方舰长。”

章团长很诚恳地说：“方舰长，方夫人，我们俩真不知该怎么感谢你们。无论是对晓芬、对加法、还是对我，你们对我们家都是有大恩啊！”

方舰长夫妇连忙客气一番。

苏素玉说：“还好，总算跑出来了。旧的生活要结束了，值得庆贺。”

“新的生活，又在哪儿呢？”安晓芬忧郁地说。

“新的生活，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小玉插了一句。

大家又高兴地笑了，说年轻人有希望。

章团长对他儿子说，你要单独向你方大叔敬一杯，要听方大叔的教诲。

加法起身敬方舰长。

方舰长说，这年轻人还是有头脑、有思想的，将来比我们要强。

章团长说，他比我们要强，倒不一定，但他们将要遇到的年代，应该比我们好。

“是啊，就像小玉妹妹说的那太阳，太阳会升起的，太阳正在升起。”章加法说。

“太阳会升起，这太阳就在我们心里。”苏素玉也跟着丈夫信起了基督教。她接着说：“有一首歌，我搬到这儿来，还是蛮适合的。”于是她又轻轻地唱起来：

“生命的河，喜乐的河，

缓缓流进我心窝。

我要唱上一首歌，一首天上的歌。

头上的乌云，心中的忧伤，

全都洒落。”

大家听了，也都轻轻地点着头。

“但是，最艰难的关口，还没有过去。”方舰长说。

章团长说：“但愿队伍能顺利撤下来。”

“首先是你能够顺利撤下来。”方舰长说。

安晓芬紧紧地看着丈夫，说：“老婆、孩子，都眼巴巴地盼着你回来啊，你可不能出意外啊！”

“身为军人，带着弟兄们，就像千斤重担压在肩上，身不由己啊。”章团长感叹着，举起一杯，对安晓芬说：“我经常不在你身边，你身上担子也不轻，难为你了。我敬你一杯。”

章团长举着杯，凝视着自己的妻子。

安晓芬端着杯，眼泪悄悄地下来了。

安晓芬说：“我这点难处算什么。你在前线，肩上担着千百人的生命。家里的事，我会担着的。素玉和方舰长也会帮我的。你也不用多分心了。”

“吃过饭，我就要下船了。”章团长说。

苏素玉说：“不能晚点过去么？等明天再走吧。”

“方夫人，实在是不行呀。下面的事太多，弄不好，就要出大乱子。我尽量早去早回吧。”最后这句话，也是对自己妻子说的。

餐后。船舷边。章团长下舷梯，上小艇。

两家人都来告别。

章团长指着远处的望海山，对大家说：“那龙头镇后面，第一座高高的山，长满了青松的那座山，叫望海山。我就在那座山上。看见了青山，就看见了我。”

大家都顺着章团长的所指，远远地望去。

对岸的陆地，似乎诡秘莫测。那山峦，那田地，那村庄，都凝固着、静止着、一动也不动，仿佛在等待着什么。只有望海山上绿树丛中还有残存的硝烟在飘动。尽管已经是在海上，可空气中还能闻到火药的焦糊。一片异样的寂静中，不时响着零星的枪声。

那是战场。大家的心沉重起来。

舷梯上，章团长再三嘱咐儿子，要听妈的话，要做有用的人才。你爸这辈子，没赶上好时候，是不行了，你要追求真理，追求光明。

安晓芬垂泪送下舷梯。

方舰长劝慰说：“章团长会平安回来的。”

小艇发动了，离开了，驶向岸边。章团长始终站着，朝送别的人们挥手。

安晓芬，泪流不止。

方舰长不断劝慰着，这战乱年头，我们已经比大多数人好多了。

海风中，留着小玉甜甜的声音：伯伯，再见，快回来……

第二十一章 回光返照

1949年1月21日

21.1 国军换防

罗团长从汪司令发来的电报中，得知姓焦的克扣军粮、倒卖成黄金的事被暴露，汪已当机立断杀人灭口，事态没有扩大，渡过了一大难关。既有几分庆幸，亏得上面有汪司令在；又愤恨方舰长坏了他的好事，惊讶这个方舰长居然如此大胆，不但和自己、而且敢和汪司令叫板，背后必定大有文章。

汪司令对他又有秘密托付，要他罗团长盯住章、方两人。一要提防章、方两人对他和汪有何不利举措，要防那两人突然下手抓自己；二要提防那两人私下投奔共军，卖了自己还不知道。

所以，昨天章团长来电，要他去“济成”号商谈军务，那显然是个鸿门宴，以他罗团长的聪明是决不会上这个当的。后来，章又来了换防的命令，表面上，他当然还是会接受。

章的换防令，要他撤出中学，又要和335团共分龙头镇，令他最不高兴。就说中学校舍，那么好几排平房，那么些桌椅板凳，尽管已是破旧不堪，可现在上哪儿还能找到这些东西。令他高兴的，也有，那就是能进驻赵村。听说，赵村老百姓听了那个刘秘书长的“新政”鬼话，很多人没跑。这次去，下手快一点，说不定，能抢点东西过来。

令他最不可思议的是，那个章团长怎么把自己收缩到一座没有水源、绝对不可久留的孤山上，而后路却交到了我罗团长的手上。奇怪，奇怪，难道他是在犯傻？哦，对了，他真的是要投共哎。而后一反手，再下山进城来抓我，交给共产党，那真是易如反掌。罗团长想到这儿，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亏得自己考虑周全哪。

罗团长觉得章团长这种人还是好对付的。他认为章团长自负得很，自以为青年军会打仗，顶住了共军对望海山的一次进攻就了不起了。其实，也就是学生兵心眼少，枪响了，不知道跑。这种打法，不用几次就会把队伍打没了。再往下跟共军的战斗中，损失最大的，一定是章团长的青一团，除非他真的要投共。

他找来了滕营长等商量换防事宜，滕当然没有别的意见。

早饭后，罗团长召集队伍讲话，宣讲各部队新入驻地点，三营守龙头至海角一线，二营守赵村至西海滩一线，三营守赵村以南至大河口的河岸。团部放在南门外的原解放军营房，离海边最近。这样，就算有风吹草动，他罗团长第一个就可以往海上跑。

同时，承载335团的几艘商船已经抵达海角，由小船转驳，开始在东海滩上岸。因为不让进城，先头部队先得开到矛山、尖山、小河西这些最前线。335团的士兵们，吵吵嚷嚷，骂骂咧咧，东倒西歪，在海

滩上，东一堆西一撮，不成体统。

而334团的兵士们，则一窝蜂地扛着各色桌椅板凳，甚至把门板也拆了下来，抬着、背着、抱着各种杂物，从东门涌进镇里，更不像军旅的样子。不大时辰，这支队伍又像蝗虫似地扑向十字路口的西面，又去砸门砸窗，进占院子，找住的地方。

可怜住在中学的余校长，被335团赶了出来，卷上了铺盖和一小袋粮食，进了西北村的地界。他不想住别人的空屋，刚在姜雪花家最前面的门洞里停下，就被一帮334团的士兵围了上来，任他争辩，任他央求，还是被抢走了最要命的那袋粮食。

头发已是灰白的余校长，昏倒在台阶上。

这般疯狂的闹腾，不但吓坏了龙头镇里所剩不多的百姓，连陶县长、高局长也坐不住了。

“这是怎么回事？”陶富贵大为疑惑，也颇为恼火：“要逃吧？应该朝南往海上跑。要去打吧？应该往北。尽拿些破布烂木头，往西跑，算是怎么回事？也不过来打个招呼。我这个县政府，还管什么？连个龙头镇也管不了啦，就能管着院子里面了。”

高局长自告奋勇，说：“我去看看。”带了几个喽啰，上了街。

街上，334团的士兵们像难民群一样，扛着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蜂拥而来，又大呼小叫，涌进各条小巷，钻进各家院落。

高增光站在街当中，喊着：“干吗？干吗？都跑进来干什么？还强占民房啊？这是县政府的驻地，有县政府的通知吗？”

士兵们没有听他的，还是从他身边视若无人地往前走。

却有一个军官，过来对着高增光以更大的声音喊着：“干什么，干什么？你挡着干什么？”过来的，是滕营长。他并不是不认识高，而是心里不舒服，不想理这个茬。

“我是本县警察局长，维持本县秩序。征用民房，必须经过本县政府的同意。”高还在一本正经地说着。

“你他妈的，是个什么东西，我还不知道，装什么蒜。”

高一听对方这么不客气，立马也就来了火：“我管你他妈的是个什么东西，没有本局长的批准，一律不准进民宅。”

“狗屁！”滕营长对周围看热闹的士兵们大吼：“看什么？只管往里进。”

高增光一把拉住一个兵，“给我回去！”

“我看谁敢妨碍军务！”滕营长掏出手枪，朝天“叭叭”两枪。

余排长一看不好，赶紧挤了过来，“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滕营长根本没把余排长看在眼里，“去！”把余推了一边。

余排长心里不满，可脸上还堆着笑，“有话好商量么。”

“商量个屁！你不替本营长说话，吃里扒外的狗东西，滚！”

余排长一时也没了趣。

罗团长也走了过来，问，刚才枪响是怎么回事。

滕营长说，那个姓高的还想挡我们的路，这个余什么，反而还替人家说话。

罗一瞪眼，“嗯？”

高增光赶紧溜走了。

余排长忙说，我是怕事情闹大了。

罗说，你是跟姓陶的走近了，跟我们不是一条心了。

余又忙说，不是，不是，小的哪敢。

罗说，这倒使我想起了的一件事，你这个胳膊上的枪伤，医官告诉我说，那不是共军子弹打的，是你自己打的，是吗？

余立时无语。

罗说，按军法，战场自残，罪同逃兵，就地正法。

余马上脸色刷白，一个扑通跪到在地，连连求饶。

罗说，算了吧，念你登陆时有功，这样吧，开除军籍，到姓陶的那儿去混吧。反正，你也帮他们说话。

余排长知道，那是二班长打的，再解释也无用，弄不好，露了真马脚，他是怎么对付支排长的，那就更是绝无生路，走就走吧。谢过罗团长，起身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形同乌合之众、蝗虫群般的334团的队伍，扛着、背着、拿着各种杂七杂八舍不得丢掉的东西，向着赵村滚滚而来。

在334团来之前，呼营长怕他们纪律不好、扰乱百姓，特地带了一个班留下来跟他们交接。他还提前跟村民们讲了，我们要走了，新来的334团跟我们不一样，蛮厉害的，你们要走就走吧。

赵村的老百姓又扶老携幼、拖儿带女，背着、驮着、推着，迈过大河，逃难去了。

想说明一下，前面提到青一团也自称“人民子弟兵”，其实这并不是他们的新发明。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就用“子弟兵”这个称呼。冯玉祥的部队驻西北农村时，也是给当地老百姓挑水、扫地，甚至帮着种庄稼。

可334团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等他们来到赵村的时候，村里面的人已经不多了。这使得这些兵士们更放肆地四处抢掠，哪个角落也没放过，尽管实际上也抢不到什么东西，不过是发泄一下而已。

呼营长见几个334团的士兵在砸一个农家的院门，便过去制止，“老百姓的家，是不能随便进去的。你们有上级的指令吗？”

一个班长模样的回头一看，是个当官的，稍微收敛一点，还是不服地说：“不进院里，我们住哪儿啊？睡野地里啊？”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叫你们军官来。”

“我上哪儿去找啊？哪有当兵的找当官的事，当官的不来找我们就不错了。”

正在这时，还真来了位当官的，就是那位腾营长。

腾营长见一位青年军军官跟自己的兵在争什么，走过来看看。看对方的军衔跟自己差不多，不止是个连排长，也比较客气地招呼：“啊哈，长官，您是……”

“我哪是什么长官。我是青年军一团一营营长，呼年富。”

“哦，呼营长，幸会幸会。在下是334团一营营长，姓腾。你们不是往北面望海山去了么，怎么还在这儿？”

“我们换防倒是好说，只是还惦记着村里的老乡们，别因为我们之间交接有不妥之处，给他们带来不便。”

“呵呵，呼营长爱民如子啊。这年头，还有这份心的，真的不多见了，可贵可贵。”

“这几个弟兄要砸老乡的门，有点不合适吧。这事，你们怎么安排的呢？”

“唉，这事难哪。我们不像你们有那么多行军帐篷、那么多的设备器材。不住老乡的屋子，住哪儿？”

“那你们在战场上，山野之间，那怎么办呢？”

“那就没办法啦。到什么山走什么路吧。现在有现成的房子，为什么不进去住呢？”

“要住，也不能这个样啊。要规规矩矩地进去，规规矩矩地离开，院子要打扫干净，东西不能有半点损坏，临走还要留下点钱。这些，条例里面都有的啊。”

腾营长连连摇头，“我们可比不了你们啊，没有那么多规矩可讲。听说你们临走时，还叫老百姓跑到共军那儿去。是这样么？”

“不是我们叫他们走，而是他们自己要走。我们只是不阻拦而已。像你们现在这样，我看还是让老乡们走了的好。如果老乡在，你们又是砸门又是砸窗，老乡们不反抗才怪呢。你们对付村民还来不及，还去对付共军？”

“所以，这个事，难啊。打仗打到这个份上，还能说什么呢？”

“我看你也不像草莽出身，还有几分军人素质，领兵打仗应该还是有几招的。但我看，恕我直言，你这帮队伍好像有点涣散。”

“呵呵，不瞒你说，岂止是好像有点。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想当初，我也是上山打鬼子，到哪儿老乡们都欢迎。弟兄们也是精神头十足。可这两年，是一年不如一年……”

“我们越说越近了。我当初也是为打鬼子进了国军，只是我们进的不是一个部队而已。”

“我进国军晚。我是黄港当地人。开始，我就近进了南面不远的黄港保安大队，老百姓叫劳山游击队。记得日本投降，1945年9月13日，在美军进入黄港的第三天，我们也列队进城，全城的老百姓都来欢迎我们。那个场面，热烈啊，激动啊，一生都忘不了。”

“现在呢？”

“现在呢？现在跟共军干起来了。呵呵。”

两人谈得正有点投机呢，那儿有个兵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营长，营长，那儿打起来了。”

“谁跟谁打起来了？”腾营长问。

“农民和地主打起来了。”

“这事也归我们管么？”腾营长淡淡地说。

倒是呼营长说：“还是去看看吧。驻地不平安，驻军也平安不了。今天遇到你，挺高兴。什么时候，我们有机会再聊聊。”

腾营长也有点不舍地说：“是哎，我现在连个营部也没有。等安顿下来，我请你过来。”

“好的，好的。但是跟老百姓的关系，劝弟兄们处理好。”

腾营长点点头，跟那个兵过去了。

呼营长也带着驻军的那个班走了。

但是他们两个再也没有见上面，他们都倒在了海源的土地上。

农民和地主打起来了，那又是赵刊新和赵炎黄闹的事。

赵刊新怎么还在村里呢？他年富力强，完全可以走掉，却没走。那是因为赵是个胆子很大的人，他就想留下来看看这帮国民党到底能坏到什么样，看看赵村的地主富农翻天能翻到个什么样。够有魄力的吧？

果然，事情来了。赵刊新一家在村口的帐篷，也被兵士们看中了，过来赶他们家出来。

赵刊新不服，说：“这是国军给我的，你们怎么能拿走呢？”

“去他妈的，我们才不管这些呢。那些国军能给你，我们这些国军就能要回来。我们只管剿共戡乱的需要，要什么就拿什么。”兵士说。

“那我们住哪儿去？”

“别废话，你问我，我问谁呀？自己想办法。再不走，别等我们动手啊。”

赵刊新往地上吐了口痰，没再多说，领着家小走了，卷上几个包裹，往赵炎黄家来了。

但赵炎黄家也摊上了这样的事，他的房也叫兵士们看上了。这帮兵士没有因为这家是地主而另眼高看，照样破门而入，东翻西翻，毫不客气。

赵炎黄忙对他们说，我是地主啊，受了共产党不少气，就盼着你们来。我这才回到自己的家。你们可不能这样啊，怎么不去对付共产党，反而来对我们这样呢。

兵士说，谁去听你那么多啰嗦，我们没有吃的，怎么打共产党。

一下子又翻出了那袋面粉，兵士们如获至宝，高兴得扛了就走。

赵炎黄急了。这袋面粉，也就是拿来的头天晚上，想要气气赵刊新，才狠狠心吃了一顿。这以后，孩子再哭，也没舍得动。

赵炎黄一下扑了上去，要护住那袋面粉。

兵士一巴掌，就把他打倒在地。

赵炎黄捂着腮帮子，半天没起来。

兵士们扬长而去。

赵炎黄心里苦啊。他在想，共产党在，他的日子不好过，国民党来了，他的日子也不好过，这日子怎么过呀。

事情还没完呢。还没等赵炎黄捂着腮帮子从地上起来，这赵刊新又领着家眷、扛着包袱进了院子，非要住进来。

“老黄啊，我那帐篷叫国军拿走了。我还得回来住。”在那个拼死拼活的年代里，一个贫农叫地主“老黄啊”，那是挺滑稽的，大概也只有赵村才会这样。

赵炎黄更急了，我打不过国军还打不过你么，一骨碌地爬起来，就跟赵刊新扭在一起了。

其实赵刊新心里很明白，他提前已经看好了村后面的草棚子，又矮又暗又旧，估计国民党兵看不上，其实挺结实、不透风，还是可以的。他所以要跟赵炎黄来这一出，是有点斗气寻开心的意思。赵炎黄那几下，根本无奈于他，试试就试试。在这种情势之下，敢来这一出，这赵刊新胆子也够大的。

还有谁能管这个事呢，当兵的把腾营长找来了。

腾营长一听两边讲的话，知道这是共党土改和民国新政闹的事。本来，他对这些是没有兴趣的，不但不会管，连听也不想听。还是刚才呼营长的话起了作用。他停了下，想了一想，说：“你们先别吵，等我们商量一下，一个小时以后，拿个意见给你们。你们在院子里的的老的小的，先进堂屋里歇歇喝口水。”能讲出这番话，对于腾营长来说，真是一个进步。

腾营长连忙开了个连排长会，叫各连排对士兵进农家院好好安排一下，不要让士兵个人瞎来。谁拿了赵刊新的帐篷，退还给他，也算是对前面那帮青年军搞民国新政的认可。

21.2另辟蹊径

龙头镇南门外，原解放军的营房，现在的国民党334团的团部。

屋里屋外堆了不少搬来的家什杂物，兵营不像兵营，难民营不像难民营。

门前的杨树日见翠绿，也掩饰不住来来往往兵士们的慌乱。

罗团长找了滕营长，正在屋里商量。

“这次去赵村，还有点收获啊？”

“就是十几袋面粉，还都是青一团留给他们的。太少了。”腾营长回答说。

“妈的，这么穷。”

“都是青一团坏了我们的事。是他们提前把老百姓故意放跑了。”腾营长在罗团长面前当然不会说青年军的好话。

“这帮狗娘养的青一团，老是和我们作对。总有一天，老子要他的好看。”

“团长，不如我们打出去，自己另搞一块，省得受他们的闲气。”

“自己出去？上哪儿？”罗团长挺惊诧。

“到河西去。听说那地方挺富，比这儿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要强。”

“能打得过去么？”

“看共军打望海山那个样，也就不过如此。以我们一个团的力量，我看可以。更何况，那两辆装甲车在我们手里，能派得上用场。”

“对，对。那两辆装甲是个好东西，青一团登陆也就是靠的这个东西。”

“趁现在这东西在我们手里，叫它替我们打头阵。以往还没有这个机会呢。”

“这太好了，我怎么没想到呢。我一直在等有我自己的地盘，等了几十年了。难道最后，却从天上掉下来这个机会？哈，哈哈——我罗某人也有这个机会啊。”罗团长忽然间悟出了什么，眼睛里都有了点光，自己怎么早没想到呢。他又佩服起滕营长了。

“滕老弟，你真行！”他拍着滕营长的肩膀说。他当时把滕营长拉过来，还拜了把子兄弟，是看滕营长能打仗、还是块料。即使这样，他也从没有动过真情。今天，他可是庆幸自己没看错人，想不到身边还真有这样有才干的明白人，危难时候能帮得上忙。

罗团长下了决心，猛地一拍桌子，：“好，好。那你就领上你的那个营，过河去干他一下。”

滕营长喜出望外，立即大声答道：“是，遵命。”

滕营长马上转身回赵村。一路上，喜滋滋的。

他喜的是罗团长没看出他的心思。

滕营长想的是，拉出去的队伍，那就是他姓滕的了。他虽然穿着这身黄皮，跟着罗团长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干了几年，但最终还不过是条狗，甚至不过是条狗尾巴而已。什么时候能畅快地吐出自己的气，像几年前在劳山上那样，那是他梦寐以求的事。也曾经试过几次，没有得手过。今天这个机会，是他滕营长的。那个姓罗的还在做梦娶媳妇，想好事，真是滑稽可笑，到时候被人卖了还不知道。想到这些，他滕营长怎能不偷着乐呢。

滕营长肚子里打的算盘就复杂了。他的这个想法，也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有来头的。抗战初，他在村里走投无路之际，义无反顾地上了劳山，参加了人称劳山游击大队的黄港市保安大队。这个大队在抗战中可是战功卓著、赫赫有名。他们就在这著名的海港城市、军事要地咫尺之遥的劳山之上坚持抗日。像钉子一样紧紧地钉在日军的卧榻之旁。任凭日军多次清山围剿，大小战斗打了200多仗，楞是坚持了下来，比国军在庐山的坚持更持久更经典。除了游击战士的坚定决心，劳山的地形险峻、山高林密、崎岖曲折，也是个原因。滕营长始终没有忘了在劳山的日子，说不定那儿还有他藏身的一席之地。他想要去试一试。

在那里，自己占个地方，树杆旗，当个草头王，谁也管不着，那小日子是最美了。要不，就窜回黄港，那儿的国民党多了，自己随大流吧，要倒霉也不是我一个。实在不行，就投奔共产党，带了一个营过去，应该算是立功表现吧。再怎么，也比现在跟姓罗的、姓章的混在一起强。

这些如意算盘能打得过来么？滕营长没想到这一层。他还只是个粗人，文化和意识还算计不到更远的地步。说起来，他也是个苦出身，年轻时家里过不下去，便出来瞎混，逞强好斗，打打杀杀。后来抗战时分，附近有不少各种旗号的队伍，大一点有“救国军”、“自卫军”等等。其实“自卫军”是共产党的队伍，那“救国军”是国民党纠集起来的。他那时大字不识一个，哪知道这一些，听说劳山的游击大队有点名气，大概要厉害些，便一头扎了进去，也算是个抗日的英雄好汉。抗战后，保安大队的编制和番号，又分又合，变动了好几次。滕营长遇上了罗团长，罗团长看中了他，两人也合得来，于是就进了334团。在几番吃苦忍辱、能屈能伸，学会了一身的匪气与痞气之后，也爬到了营长的高位，又开始有了自己的心计。但是，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是看不到、或者是看到了也看不懂的。

这一路，别看是营长，也得自己走着回赵村。

天很暖和了。满地的庄稼，绿油油的，在往上窜。但这么好的庄稼，被国民党兵几番的车来人往，早已碾得东倒西歪不成样了。

滕营长当然也顾不上看这些庄稼，只是兴冲冲地往前赶。他解开了扣，裂开了上衣，手里拿着帽子往沁着汗珠的脑袋上煽着风。

一到了村口，便大声叫喊着司务长，做饭，做饭，让大家饱吃一顿。没多少粮了？倒上，倒上，都倒上，只管倒上。连排长，都过来，有大事要讲。

滕营长忙完这些，又领着人，来到两辆装甲车前，找来了那几个装甲兵。

“你们先去吃饱饭。下午，跟我们一起行动，过河去！”滕营长说。

“章团长可没跟我们说。”车长回答说。

“你们在这儿，就得听我的指挥。这是指挥部在换防时说好的。”

“我们可没接到命令。”车长还在坚持。

“别废话。你听得听，不听也得听。”滕营长掏出手枪，随行的几个也摆出了姿势。

车长一见这情形，便说：“你们愿意坐，就坐，可别后悔。出了事，你们自己负责。”

午后。

滕营长的两个连集结在赵村南面的河堤后。留一个连随后跟进。

滕营长在装甲车后，对大家说，这次我们可是有这铁家伙，保准把共军赶得屁滚尿流。等装甲车一下河，你们就跟着往前冲，听见啦？刚才的午饭，都吃饱了吧？等打下河西的新河镇，咱们就吃肉！

下面一片“嗷嗷”的声音。

“出发！”滕营长一声命令，便钻进车里，关上了门。

装甲车乍一关门，里面漆黑一团。车辆往前一拱，滕营长便在里面翻了个四脚朝天，疼得“哇哇”直叫，一通大骂。前舱的驾驶员，不知是没听见，还是不想答理，没见反应。

装甲车“隆隆”地吼叫着，爬出了河堤，钻进了河里，翻着白浪，在河水里往前，车顶的机枪向四周来回“叭叭叭”地一个劲地扫射。

那些国民党兵就跟着这两辆装甲，端着枪，喊叫着，趟着水过来。

河对面是从西部平原刚调来的解放军部队，也是新战士多，哪见过这种能从河里开过来的铁壳玩艺儿，更不知道该怎么对付。

战士们从河堤后举枪向对岸还击，但顶不住那装甲车上的机枪。它的位置高，就像在头顶上，雨点似地泼过来，打得都抬不起头来。只能趁机枪扫那一面时，这一面的战士就赶紧往外射击。

装甲车依然肆无忌惮地往前冲，它身后的国民党兵接二连三地倒下去。

装甲车终于冲过了河，冲上了对面的河堤。

滕营长在装甲车里面可是受不了了。又黑又闷不说，轰鸣的机器声震耳欲聋，浓烈的机油味直叫人呕吐，尤其是那上下左右的剧烈颠簸，一会儿身体被掀起、脑袋撞到了舱顶，一会儿又被往下砸、屁股摔在了钢板上。

滕营长是一声接着一声地“哎哟哎哟”，叫苦不迭，朝着前舱大声骂：“你这车是怎么开的？”

这回，前舱的驾驶员有声音了：“你以为坐装甲车是享福啊？老子当这装甲兵，不知遭了多少罪了，你这还是头一回，就这样啦。”

“你不能开得稍微平稳一点啊？”

“没办法，就这样，除非停下来。”

“哎哟，怎么这么倒霉唉。”

“倒霉什么？赶紧往外开枪吧。”

滕营长从观察线（车体两侧钢板上特意留的横条缝隙）往外看，装甲车已经开进了农田。

两边的解放军，正朝着车辆射击，扔手榴弹，这是阻挡不了装甲车往前推进的。他们没有受过反装甲作战的训练，在他们现有的装备水平下，对付装甲车的办法，就是冒死靠近、往装甲车底盘下扔集束手榴弹。但他们还不知道这一手。

“开枪，快开枪！还等什么？”滕营长吼着。

车里随行的士兵，从射击孔往外开枪。

装甲车在平展的农田里横行无阻。

滕营长闭着眼，咬着牙，在忍受着颠簸痛苦之余，又颇为得意。

突然，车停了。

“怎么啦？怎么不开啦？”滕营长忙问。

“你还想一直坐下去啊？坐到什么时候为止啊？你还知道用装甲车打仗是怎么打的吗？”

“怎么打的啊？”滕营长还真不知道，甚至也没想过。

“现在已经冲过了共军在最前面的防线，得把车上的人放下来，建立阵地。我们再回去拉第二批。这还得我现教啊？”

“哦，是这么回事。快！开门！下车！”

驾驶员已经选了一块在平泊地里略为高起的地瓜地。车里的士兵们虽然不愿意，也只好钻出来，赶紧各自找个地垄趴下。

装甲车又“轰隆隆”地往回开了，又在解放军战士们飞来的子弹中开回了东岸。

装甲车回到河东，驾驶员爬出前舱，到后面打开后舱门。

滕营长却已经瘫倒在黑黑的舱里，出不来了。

驾驶员进去，把他架了出来。他脸色惨白，浑身瘫软，都走不动了，用手遮挡着阳光。

虽然样子狼狈不堪，但劲头还是很大，嘴里说着：“快上，快上！尽量多装点！”

滕营长又钻了进去，紧靠着隔舱板席地而坐。

每辆车都塞了十多个人，大大地超了员。

车又“轰隆隆”地开动了。

滕营长朝着隔舱板上的缝隙，对前舱的驾驶员说：“这次，咱们再朝南开点吧？”

“为什么？”驾驶员不解地问。

“往南去点，把共军防线的缺口再拉开得大一点。其他的人就可以一股脑儿冲过河了。”

“不行啊，我的大老爷。你怎么什么也不懂啊？”

滕营长听了，刚要发火。车辆猛地一颠，大概是在翻过河堤，整个车体又是上掀下砸，把滕营长到了嘴边的脏话给憋了回去。

喘过了一口气以后，滕营长这才接着说：“什么懂不懂啊？老子打仗，枪林弹雨几十年了，还用你说啊？往南，再往南！”

“我跟你说吧，这装甲车也不是随便能过河的。它不怕水深，但是最怕淤泥，进去就出不来了，就成了死蟹一个。再往南，水下面的情况，我们不清楚，决不可以这么轻率地冒冒然过去。”

“管不了那么多了，跟你说，往南！这一仗打好了，你就跟我干吧。我提拔你个连长，怎么样？”

驾驶员没再吱声。

两辆装甲，在河里翻着浪花、“呼呼隆隆”地往南开着。

岸那边的解放军，“叭叭”地不断地朝它开枪，也无奈它不得。

但就在它要拐弯上岸的时候，终于出了问题。装甲车在水里吼叫着，剧烈地抖动着，履带往后翻卷着泥浆，可就是一动也不动。

“坏了！坏了！陷进淤泥了！”驾驶员在前舱紧张地喊叫着。

“那怎么办？”滕营长也有点着急了。

“让我再试试。”

装甲车在更猛烈地吼叫，更剧烈地震动。车外，履带掀起了几丈高的泥浆。车里的人，像在地狱里似的忍受着煎熬。

装甲车不但还是原地不动，而且开始往下陷了。

“打开门，跑吧！”驾驶员朝后喊着，前舱的上盖也打开了。

“谁叫你们装这么多人，还要往河下游瞎开。越是下游，越是河口，淤泥越多。还就碰上了这么个瞎指挥，真他妈的倒了八辈子霉！”驾驶员越说越生气，“快跑吧，再不跑，共军围上来，想跑也跑不了啦。”

后门刚开了条缝，水就“哗哗”地涌了进来。兵士们吓得“哇哇”大叫。

“叫什么？淹不死的。”驾驶员很厌烦地说。

兵士们走出舱门，一脚就跌入半人深的河水。他们在泥浆里，相互搀扶着，一脚深一脚浅地艰难地挪动着。有的滑倒了，被旁边的扶了起来。有的陷进了更深的泥潭，只能看着他凄厉地叫着，越来越深地陷下去。眼见这人只剩了脑袋，淹没了脖子，又淹没了下巴，又淹没了嘴，又淹没了鼻子、眼睛……最后绝望的眼神和呼号，最后飘起的头发，最后摇晃的手臂，和最后冒上来的气泡……叫人永远地难忘。

滕营长最后离开了舱门，虽然还是头昏脑涨，但一进了水里就清醒多了。而且，情况也容不得他多想了。因为，解放军已经赶过来了，子弹已经朝他们飞过来了。

滕营长弯着腰，低着头，浑身糊着泥浆，混在这帮国民党兵里面，狼狈不堪。靠前面的人，探着水的深浅，靠后面的人，挡着飞来的子弹。

好不容易逃到了对岸，爬过堤坝，仰天躺着，听着子弹“嗖嗖”地从上空飞过。

他翻过身，轻轻地抬头一看，把他的鼻子都气坏了。

河里的那两辆装甲车，举起了白衬衣摇晃。他们向解放军投降了。

滕营长浑身瘫痪了，只觉得身上的每一块地方都不是他的，每一块肌肉和骨头都不听指挥，哪儿都动弹不了。只有灵魂在飘荡，还能在想些什么，想着这下全完了，自己这么好的如意算盘，怎么才一两个小时就完全破灭了。

河西岸，响起了一阵阵的枪声，又渐渐地稀疏了，平静了。

滕营长知道，那是留在河那面的二十几个人，被共军消灭了。

这下，滕营长觉得也没法再向罗团长交代，再没上团部去过。自己把营部搬到了大河口的东岸，靠着西海滩，为的也是，好早点往海上跑。跑得比姓罗的、比姓章的还要快，已经是他滕营长此时最强烈的愿望了。

第二十二章 姜雪花殉难

1949年1月22日

22.1 受命侦察

解放军对望海山初次攻击的失利，昨天国民党军又对河西用装甲车作先导进行反扑，尽管是失败了，都引起了解放军前线指挥部的高度关注。从全国大局看，解放军取得了绝对优势，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中国，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就像秋风扫落叶。跨入浙赣闽等省，更是势如破竹，几乎没有受到有效抵抗。但在龙头镇这一局部战场，国民党好像还疯狂得很。这个状况必须要改变。

解放军已经在迅速地调配力量，随着一个主力野战军从长江北岸回调，即将进入黄港外围，对海源前线也就能派来更多的兵力压上。

问题是国民党方面也在向海源增兵。从大河口、小河口两侧的观察，国民党的船只往来不少，岸上的兵力也有所调动。在明显劣势之下，还搞这些名堂，他们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呢？想在美军的保护伞下，营造个庇护所？这绝对是不许可的。更何况，美方也未必有和人民解放军正面相撞的意愿。

但是，要解决龙头的这批国民党军，从战术上讲，还是需要进去侦察一番。有关他们新的布局调整，特别是有没有火炮、装甲车这些重武器等等，还是需要知道的。

这天上午，姜雪花和小林姑娘从李家泊北坡的修建师指挥所的工地上下来，往村里走。

快到村口时，见令营长和大郑、鲁队长他们几个在争讲着什么。

走近一听，还是要派人进龙头侦察的事。

令营长说：“前指决定，要发起总攻，彻底消灭龙头的敌人。但是，在总攻前，还是要进去侦察一下，摸清敌情，了解他们新的布防，重武器的装备。这样，我们进攻的时候，可以更主动，减少部队损失。”

几个人听了，都很高兴。个个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大郑先说：“这事，当然应该是我去。上次抓舌头，就是我去的。”

鲁队长争着说：“这事吧，还是我去比较合适。为什么呢？因为我对这儿最熟悉，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本来就是老百姓，敌人不注意。”

令营长说：“这倒是个有利条件。”

鲁队长说：“就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人多了，有时候反而不方便。”

令营长说：“是啊，上次我们去了一个小分队，恐怕是个失算。”

姜雪花听了，连忙插上嘴：“令营长，还是我去吧。要说是老百姓，熟悉情况，我都够格。而且，我是一个女同志，就是个农村妇女，背上一篓草，更不容易被敌人注意。”

令营长在点着头，似在思索。

“还有，我的群众关系好，人缘比较广。我进去以后，可以去找赵玫，也可以到赵村去找赵刊新，他们都是党员，我和他们很熟。这次他们没出得来，我可以上他们家去。我还可以到海边，直接找连四娃，他也是党员。这样比光拿眼睛看一下，了解情况要多。”姜雪花说着由她进去的优势。

“群众关系多，是个好事。但也容易暴露自己。”令营长不无担心地说。

“我相信乡亲们，相信民主村的任何一个老百姓都不会在敌人面前出卖我。好在民主村的地富，一个也不剩了。除非是那个反攻倒算回来的陶富贵。我想，我不会这么巧就正好碰上他。”

“嗯。”令营长又连连点头，看来是同意了。

“我也去，我跟雪花姐一起去。”小林也着急了。

没想到，姜雪花很认真地说：“小林，这可不是凑热闹的事。我知道，这是提着脑袋、拼着命的事。拼上我一条命就行了，不要再拼上你这条命了。”

令营长他们几个都很敬佩地看着姜雪花。

令营长很郑重地对姜雪花说：“雪花同志，你的意见很有道理。我现在就去团里请示，等团里决定以后，再通知你。你先做准备吧。”

“好。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好准备，随时就可以出发。”雪花很高兴地说。

不到一小时，令营长派人找到姜雪花。

姜雪花马上赶到营部。

令营长说：“团部已同意你潜伏进去，务必注意安全。我想了下你刚才的打算，海滩边就不用去了，那样太显露。你准备怎么往里进呢？”

姜雪花说：“我想就大白天，背上一捆柴，就像上山拾完柴回家，大大方方地进去。从矛山孙家畚走，那儿的敌人刚来，还不熟悉这儿的情况，怀疑不到这些。”

“这样也好。什么时候走？我们到村口欢送你一下。”

“不要，千万不要。我就悄悄地走，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我等后晌再走，那样比较符合老百姓的习惯。”

“好。那你先回家吧。跟老秦也说一下。”

“哼，跟他说？”姜雪花也没再多说。

其实，并没有家了。姜雪花家是被安排在村外田地里的一排窝棚里，也还是跟原来的对门邻居齐阿姨紧挨着。小宝也一直请齐阿姨照顾着。秦德才天天不着家，也不知道在哪儿瞎混。姜雪花管不了他，甚至也不想见到他。

这一次，姜雪花觉得非去找他一次不可。在村前村后，转了好几圈，好不容易才在瓜田的看瓜棚里找到了她的男人秦德才。秦德才倒是什么心事也没有，倒头躺在那儿呼呼地大睡。

姜雪花踢了秦德才两脚，“都什么时候啦？别人都忙得不得了，你倒好，睡起来没有完。”

秦德才眯缝着眼，说：“你管呢，老子爱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

姜雪花还是关心地说：“你早晨在哪儿吃的饭？怎么到处也没见到你？”

“老子哪儿有饭，就巡逻到哪。巡逻到哪，就吃到哪。饿不着。”

“怎么弄得像个二流子似的，没有个正经样。”

“这就是革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揍谁就揍谁。痛快，痛快！”

“那还有革命的纪律，革命的原则嘛。”姜雪花正色道。

“革命的原则？别跟我讲这一套，我比你懂。”秦德才大咧咧地说，“革命的原则，就是充满阶级仇恨，彻底地斗，大胆地斗，眼也不眨地杀地主，把他们的东西抢过来，天不怕地不怕，翻身得解放。”

“跟你说个正事，我要潜入龙头镇，去摸情况。”

秦德才一愣，“真的啊？”

“谁跟你说过假话。”

秦德才连眨了两下眼，“你敢去啊？连解放军进去了八个，一个也没有活着出来啊。”

“有什么不敢去。我姜雪花这辈子，就准备为革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哎哟，哎哟，跟我说这些漂亮话。你以为你积极啊，我看你是个傻蛋。”

“你这是什么话？”

秦德才不无得意地说：“你以为我风风火火，杀来杀去，真的是什么也不怕啊？真有危险的事，我也不干啦。杀地主，我冲在前。分财产，我冲在前。那是我杀别人，不是别人杀我，我当然冲在前。上前线，你看我去过吗？嘻嘻。”

姜雪花大惊：“原来你是这么个东西啊！”

秦德才一笑说：“你还不知道啊？学着点吧！这就是我们革命派的策略！叫别人去冲去死，等革命胜利了，你们这批人死完了，那就更是我们的天下啦，什么都是我们的啦，哈哈。你们再想也没有咒念

啦，哈哈。”说完便大笑起来。

姜雪花气得一时没上来话，过了一会儿才说：“我要走了，你还有什么话？”

“这还有什么话？”

“我这次去，是很危险的。你要看好小宝噢。”

“那小子，不用我们操心。他是革命的后代，组织会教育帮助他的，他自己也会长大的。”

“我要走了，你也不回家？”姜雪花还带着一点妻子最后的温情说。

不料秦德才轻飘飘地说：“回家干什么？还有什么家？你是整天干革命，我也是四海为家。”

“难道你就一点也不想这个家？”

“有什么好想？我算是白找了你这个老婆。你看人家赵玫多俊，小林多水灵。就连那个李芹，被关了起来，几年没洗澡，那脸蛋还那么滑。”说着，竟忘乎所以地搓着手，禁不住地嘻嘻笑起来。

姜雪花大怒，“呸！”地一声，一把掌煽了过去，一句话也没说，扭头就走。

秦德才捂着脸“哎哎”地直叫，不知是因为疼，还是想叫他媳妇回来说清楚。

22.2告别亲人

姜雪花对自己丈夫最后一点情感也已吹走得无影无踪、没有痕迹了，所以也并没有什么伤痛和懊恼。她心里想的还是怎么往龙头走，还需要一篓柴草做个样子。她又进村，连家也没回，找了镰刀和绳索，就上北山去了。

出村的时候，正巧又碰上了小林姑娘。小林也要回北山的工地。

姜雪花说，要不，你先跟我一起去拾柴吧，我怕自己一个人来不及。

小林说，好。

山坡上，因为挖工事，掉落了一些树枝。她俩拾了起来

小林说：“姜大姐，这次去，很危险，你可要注意啊。”

姜雪花很冷静地说：“是啊，我是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别，也别想得那么可怕。”小林劝解说。

“不是可怕，而是现实。阶级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要推翻旧社会，就得有牺牲。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

“那还是少牺牲的好。”

“那当然，所以我不让你去。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你舍得你家里？”

“我那个家？别提了。那个姓秦的不是个东西，算我瞎了眼。”姜雪花很鄙视地说着。

“可那还有宝宝嘛？”

“希望他能在新中国里好好地成长。不要像了他那个爹。”

一听到新中国，小林眼睛里不由发出了亮光，脸上泛起了喜悦和神圣的表情，“新中国，新中国就要来到了！一切就都要好了！不用逃难，不用打仗，大家都安居乐业，人人都平等幸福，那是多么美好的世界啊！”

“是啊，就是为了新中国，为了没有地主老财，为了没有剥削和压迫，现在吃什么苦也不怕。我姜雪花宁肯付出我的鲜血、付出我的头颅、付出我的生命。”

“姜大姐，我真的很佩服你。什么叫革命者，你就是革命者。”

“嗨，你这么夸，我就不好意思了。我这也是参加了革命，跟着党走，才知道了这些革命道理，下定了革命的决心。”

“我真要向你好好学习，做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好啊，小林妹妹，你一直表现得很好。你要争取做个共产党员。等我这次完成任务回来，我要向组织上介绍你入党。”

“那太感谢你了。”

“希望你们年轻人的身上，很多革命工作要靠你们年轻人来做。”

“你才比我大几岁呀？就你们年轻人、你们年轻人的啦？”

“说真的，我是很羡慕你们年轻人。我的家庭幸福是已经没有了，年龄也不可能再倒回去。你们年轻人在即将来到的新社会里，会过得很幸福的。”

“啊呀，那就好了。”小林的眼里也憧憬着远方的美景，甜甜地笑了。

“对了，有件事，差点忘了，我一定要说。”姜雪花很认真地说。

“什么事呀？”

“你看李辰这小伙怎么样？”

“姜大姐，看你说到哪儿去啦？”小林不好意思了。

“我看李辰那小伙不错，对你也挺好。”

“看你说的。”小林都低下了头，红了脸，小声地嘟哝着。

“小林啊，我说的是正事。要抓紧，不要错过了。等到迎来了新中国，我来给你们办喜事。”姜雪花爽朗地笑了。

小林红红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姜雪花说着，看着天上的太阳，“有这些柴火差不多了，捆上吧。”

姜雪花很利索地捆上柴火，往肩上一扛。

小林上来要争着背。

姜雪花忙着说：“这可不行。你的皮肤还嫩，别起了老茧，人家李辰小伙就看不上了。”

“呸，呸。”小林拍打着姜雪花，俩人嘻嘻哈哈地下了北山。

姜雪花又回了趟窝棚的家。

儿子有理正围着齐阿姨、跟齐阿姨的一双儿女蹦蹦跳跳地玩呢。

姜雪花很歉疚地对齐阿姨说：“真不好意思，一直麻烦你了。”

齐阿姨很开朗地说：“这有什么？我不也是在玩么。公家的事情多，你去忙去吧。”

姜雪花说：“我真的还要麻烦你。这次上级给了我个任务，要去好几天，说不准还得很长的时间。这些日子，有理要托付给你了。他爹也指望不上他。”

“你家的事情，我知道。你放心吧。你在外面为革命拼死拼活，出了那么多力，大家都看得到，都敬佩你、支持你。有理，我会照顾他的，你放心去吧。”

“那多谢了。”

“我们老邻居，就跟一家人似的，还讲什么客气话。”

姜雪花转过来对儿子说：“有理啊，妈妈要出远门了。”

“啥叫出远门啊？”

“就是要离家好几天，要离开宝宝很长时间。”

“还是回来的吧？”

“要是回不来呢？”

“不知道。”有理天天在外面瞎玩，对妈妈的依恋也不是很深。

“嗨，你别跟孩子说这些，别吓着孩子了，再说他也不懂。”齐阿姨说。

“有理啊，你要听齐阿姨的话，长大的要做个好人，不要像你爹似的游手好闲。”

“知道了。”

“雪花，你今天是怎么啦？尽说些这样的话。”

“我最不放心的，就是这孩子了。”

“多好的一个孩子，虎头虎脑的。放心去吧，啊？”

姜雪花的心里，泛起了少有的不舍和眷恋。又猛得一停顿，不能这样想下去了，再想就出不了门了。她一狠心，到开饭时候了，也没领有理一起去村口喝糊糊，扭头就往外走，眼泪却在心里流。

到了村里，领了碗糊糊就喝了下去。

于村长和李村长都知道了姜雪花的这次任务，见到她，就都围了过来，鼓励的话，担心的话，敬佩的话，真有千言万语说不完。

最后，李村长说，不耽误你了。我们派李辰送你到茅山下的河边。

姜雪花说，不用麻烦大家了，这儿我都熟。

李辰这时已站了过来，说：“姜大姐，还是我送你一程吧。”

姜雪花见李辰已经在面前，就说：“好吧，那我们一起走吧。同志们，再见了！”

姜雪花扬起了手，李辰背起了柴火，在同志们的再见声中，踏上了征程。

一路上，先是往东过去。

姜雪花对李辰说：“说起来，以前我们就认识。这次，我们撤到你们村来，给你们添了麻烦，但是彼此间也更熟悉了。我发觉，你还真是个好青年。工作又主动又积极，办法也多，领会上级精神也快。”

李辰笑着说：“这点事，是应该的。虽然，我还不是党员。但是，我向往革命，向往进步，愿意为革命事业多出力。”

“好啊，你年青，有文化，应该为革命多出力。”

“但我知道，我也还有很多缺点。要讲革命的干劲、胆量，就没有你们强。”

“这当然要有个锻炼过程。你们文化人，有时候想得太多、太远。其实，革命的道理，并没有多复杂。坚决跟党走，不要想别的，就是了。”

“好，我一定记住大姐的话。”

“还有件事，你觉得小林怎么样？”姜雪花转过脸，看着李辰，“好像你还挺喜欢她。”

李辰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很坦诚地说：“是的，我是挺喜欢她。林海秀是个好姑娘。不知道，她能不能看得上我？”

“这事，那你要抓紧，你要主动。我知道小林对你印象也是挺不错的。”

“那太好了，谢谢姜大姐了。你还真关心年轻人的事啊。”

“是啊，我们流血流汗干革命，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大家所有的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么。”

说着说着，就到了矛山的正北面。一路上，只见北面的田野里，驻了解放军，一队队，一列列，一眼看不到头。有的在搭棚子，有的在整队，有的在操练，“杀杀”的吼声远远地传了过来，一片大战前的紧张激烈的准备场面。解放区的土地显得热气腾腾。

看到这景象，姜雪花的心里，也热呼呼的。革命是她的生命，向往胜利是她的动力。看到这么多的解放军部队，怎么不令人激动和兴奋。

就这两三年的光景，革命的形势，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呀。1946年，刚解放龙头镇，还只是一些小分队。前年，反击国民党进攻解放区，能看到一个连、两个连，就很高兴了。去年冬天，就有整团整团的部队往南开。今年，你看，才几天的功夫，就像从地里冒出来似的，漫山遍野地都是解放军。还有什么敌人打不垮！想到自己也能在这革命大业出点力，为解放大军做点事，姜雪花由衷地感到骄傲。

到了离河岸大约一里多地。

姜雪花对李辰说：“你就到这儿吧，不能再往前了。”

“好。”李辰把那捆柴火交给了姜雪花，说了声：“大姐，走好。”眼睛就湿润了。

“好，你回去以后，和小林两个多相互帮助。大姐走了。”

李辰呜咽着、握着姜雪花的手，说不出话。

姜雪花笑着：“你看你，一个大小伙。回去吧。明天，最多后天，大姐我就回来了。再见！”

姜雪花脸上露着微笑，大步向南走去。

李辰没舍得走，一直蹲在一棵小树下，望着她远去的背影。

22.3深入敌境

姜雪花向南走去。

她一身贫苦农妇的打扮，头上裹着发了黄的白毛巾，露出的头发也都一绺绺地粘在了一起，身上是补丁摞补丁、粘满了泥土和汗渍的黑色土布衣裤，腰间扎着条通常男人用的长布带，日月风霜吹打出来的黝黑而又透红的皮肤，粗糙的双手。谁也不会怀疑，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经年累月在田地里摸爬滚打、艰苦劳作的北方农村妇女。

这一刻，她跨进了大河。虽然水面下，河床比较复杂，但一个人趟过百多米宽的大河，对她姜雪花来说，完全是驾轻就熟，并不是什么难事。她知道怎么看水面的波纹和颜色。那深绿色的水面，看似静止却打着旋转的圆圈，那下面就是深潭；过于狭窄、湍急的水流，下面往往是个凹槽。要走，就找那些水流平缓、颜色浅绿透彻的河面。

顺利地过了河，连背上的柴草都没沾一点水。这可是很关键的，要不怎么应付敌人说是上山打柴的呢。

姜雪花放下卷起的裤腿，在石头上擦了擦湿了的脚底，穿上刚才拿在手上的布鞋，走上了敌占区的山路。

穿过几块地，就往山上走了。

姜雪花低着头走着，眼睛却往四下看着。

走到半山腰了。

前面有敌人了，穿着黄土布的国民党兵。

尽管姜雪花参加革命也有好几年了，但真的从拿枪的敌人面前走过去，这倒还是第一回。

姜雪花没有慌乱，没有后退，没有躲避，依然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走近了。

几个国民党兵散散懒懒地在靠山顶的山坡上走着，嘴里还牢骚不断，大概是上司叫他们熟悉地形，到山上来走走，心里老大的不满意。

姜雪花听不懂他们的话，半低着头，在十几米外的小道旁站着，等他们走过去。

这些兵没有在意她。

第一关，就这样过去了。姜雪花没想到会这么容易，大大地增强了信心。

到了山顶，往下看，南坡的国民党兵比较多，忙忙乱乱，不知在干些什么。

姜雪花想了下，还是按原计划先进孙家沟，看看有什么可用的消息，再走下一步。

下半山坡，小山沟里，就是孙家沟。姜雪花来过，有印象。

村口，几个国民党兵在坐着聊天。

姜雪花从他们身边走过。

几个兵抬头看了下，没吱声。惟独有个年纪大点的，开了腔：“干吗的啊？”一听就是西边的口音。

“拾柴火的。”

“还是个女的啊？没看出来。”另一个兵说。

“叫你看出来，就麻烦了。这样的，你也要？”又一个兵说。

姜雪花心里泛着恶心，一步没停地走了。

姜雪花走进了村，实际上就是四五户人家，家家都敞开着门，里面都有国民党兵的喧闹声，显然都是被国民党兵占了。只有一家紧闭着门。

姜雪花知道，那是孙大爷家的，便上去轻轻地敲门。

没人应，但姜雪花知道里面应该有人。

有国民党兵从身后走过。如果还是334团在，有过侦察兵进来的事，姜雪花那是要在劫难逃。可这帮335团的，倒是不管这些。

姜雪花再敲了敲，小院子里有了窸窣声。她又咳嗽了一下，透过破门板的缝隙，看到了孙大娘颤颤巍巍而又迟疑的身影。

“大娘！”姜雪花轻轻地却又很清晰地喊着。

孙大娘听出来了，忙过来开了门，见是姜雪花，大吃一惊，刚要开口，被姜雪花捂了嘴，示意进屋再说。

两人推上院门，忙进了屋。

孙大娘对姜雪花，虽然不熟悉，但是认识。

两人上了炕，孙大娘忧心地问：“你也没能出去？”

“我是出去了，今天又进来了。”

“闺女啊，你这是疯啦？”

“不，大娘，解放军要打进来啦！我是来侦察情况的。”

大娘一脸喜色，张大了嘴要讲话，姜雪花马上用手往下压，比方着要小声点。

大娘这才咽下一口气，轻声地说：“太好啦，快憋死我啦。我是在天天盼，夜夜盼，就这么几天的时间，你看，头发都白了一大把。”

姜雪花一看，真的，跟大娘几个月没见，大娘全变了，头发更稀疏了，全白了，神情憔悴了，尤其是那眼神流露着无法掩饰的悲愤。看来，这几天，大娘经受了一场巨大的创伤。

“大娘，这几天，你怎么过的？”姜雪花关切地问着。

大娘一时悲伤不已，老泪在布满皱纹的脸上横流，两手在半空舞着，又在腿上拍打着，好像要抓走积压在胸中那满心的郁闷和愤恨。

“大爷呢？”姜雪花问。

“别提了。给害了，叫这帮国民党给杀了。你看，剩我一个老太婆，没吃的，没喝的，活不下去了。要不是我要等着儿子回来替他爹报仇，我哪能扛到今天。”

孙大娘这才一五一十地把这前来后去的事讲了。姜雪花知道了，小钱进来在这儿养过伤，还住了几天，一定要回去归队，孙大爷把他送出去，结果遇上了国民党，孙大爷为掩护小钱而牺牲了。那天，枪声响过以后，乡亲们去山后看，看到孙大爷的遗体被那帮国民党扔到大河里去了。

姜雪花为孙大爷感到悲戚，也想到，胡指导员前几天对小钱的处理是不对的。当时，大家就觉得不对劲，现在就更清楚了。回去以后，一定要向组织上反映，小钱是个好同志，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就算是人死了，也应该改正过来。

当然，这些话，不能对大娘讲。姜雪花又多了一层伤感，一是为大爷的死，一是为小钱的冤。

姜雪花环顾大娘的小破屋，真是破烂不堪，家徒四壁，便问：“大娘，那你这几天吃什么？”

“哪还有吃的啊？”大娘伸手从炕角落捏了一把去年的槐树叶，干得都发了黑，“这是去年喂羊剩下的，实在是饿了，就嚼上一口。”

姜雪花难过得都掉了眼泪，从怀里拿出那两个从李家泊带出来的玉米窝头，递给大娘，“大娘，你吃上点吧，这是解放军给的。”

“解放军给的？”孙大娘浑浊的眼睛里也有了点亮光，“那我要尝一尝。”

大娘双手捧着玉米窝头，就啃上了。

姜雪花下炕，里外看了下。水缸是空空的。

“大娘，你这几天都没喝水啊？”

“命都没了，哪还有水啊？”

“我去给你挑。水桶呢？”

“别去了，熬吧。能熬一天算一天。外面都是国民党，别出事啊。”

“不会的，国民党也不能不让挑水啊。”

姜雪花问清了水井的位置，从院子里拿上桶，下坡挑水去了。

半山坡上，国民党兵在乱砍树，看来是想要搭棚子住。一棵松树，几十年才长成胳膊粗，“噼噼叭叭”，从半截就被他们掰断了。

山坡的那边，也有几个老百姓，被逼着干活，扛木料，搬石头。边上的国民党兵在骂着、打着。

姜雪花看出来，那是东北村的几个，大概也是没跑出来，被抓来当苦力。

她当然不会走过去，远远地挑着桶，走开了。

姜雪花挑来满满的两桶水，倒进了缸里，心想这一缸水，足够孙大娘等得到解放军打回来的了。

22.4 潜入龙头

这一夜，姜雪花在孙大娘家过了。

第二天，到了半头晌，姜雪花挑上那担柴火，要走了。

临出门，孙大娘要往外送。姜雪花再三劝阻，才让大娘进了家门。

姜雪花离开孙家乔，下矛山，往龙头镇去。一段最艰险的历程，开始了。

路上，也有不少国民党兵，急急忙忙，来来回回，好像慌乱得很。

过东门外的中学，看里面的国民党兵更多，还有一些军官。那样子，得是个团部了。不过也是神色慌张、吵吵嚷嚷的。

东门口，并没有站岗的，这倒是出乎意料之外。335团不是块打仗的料。

姜雪花顺利地进了镇。

这龙头镇，是她多么熟悉的地方啊。虽然，这儿并不是她的故乡，她也已经不知道自己的故乡在何方。但是，她的生命、她的苦与乐、她自己所有的故事都和这块土地联系在一起。这龙头镇、这海源，在她心中的位置比起故乡，不知要重多少倍。

然而，今天的龙头镇，已被国民党兵践踏得面目全非。几乎所有人家的门窗都被砸烂，家里的东西被扔了出来，街巷里到处都是被丢弃的杂物，兵士们在四处游荡，满街满镇都淹没在腐臭味里面。

眼看自己的家园被糟蹋成这个样子，姜雪花不由愤恨满腔。

往前走，看见十字路口了，那儿是陶富贵的家，是她不共戴天的仇敌。不过，现在还不是碰面的时候。

她往北拐进了小巷，从靠近北面城墙根的小巷，向西穿过了北街。

往北看，北门有站岗的。

一路上，没遇到一个老乡。北街上，就是兵也很少。有的话，也是在街的两边，各自行事，没有东西穿梭到街对面的。奇怪，就算是两个部分的，也不用这样泾渭分明呀。

姜雪花寻思着，也就进了西北村的地界。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和亲切。然而，如今就像换了一个天地。每一座房子，每一棵树，好像都刻上了痛楚和仇恨。

她真想从自己家的门口走过，看一看究竟成了什么样。刚要往南拐，南北小巷的不远处走来了一队国民党兵。自己背着一大捆柴，占了多半个小巷，不能和他们正面相碰。于是，姜雪花往前快走了几步，正好到了赵玫的门口。

像孙大娘家一样，也是紧闭着门。看来，也是没被国民党占用，应该有人在。

“砰砰”，敲了两下。姜雪花看着那队国民党兵还没出现在巷口。

“砰砰砰”，又敲了三下。这回，姜雪花是有点急了。这一面的国民党兵，好像没有那一面的好对付。

正在姜雪花焦急的时候，门开了一条缝，果然是赵玫。还没等赵玫把门打开，姜雪花就挤了进去，反身就插上了门。

赵玫正在惊讶之中，看出来，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她们的妇救会主任姜雪花。

“怎么是你呀？真想不到。我差点要找扁担，把你打出去呢。”

姜雪花示意，赶紧先进屋，便放下了柴火。

两人进了里屋，三个月的小宝宝正在炕上要翻身呢。尽管外面的世界腥风血雨，但是在这屋里，阳光照进来，洒在炕上，洒在宝宝的衣衫上、宝宝的脸颊上、宝宝的头发上，映照出闪闪的亮光。宝宝看见有人进来，还知道咧开嘴笑了，挥动着胖胖的小手。在这严酷的天地里，生命的花朵，依然在绽放。

姜雪花上炕，抱起了宝宝，亲着。小宝也“咯咯”地嘻笑着。

赵玫也笑了。

这屋里，顿时充满了生机。

赵玫先问：“你怎么又进来了？”

“来告诉你好消息，解放军要反攻了！”

“那太好了，太好了，快憋死了。”

“我先来侦察一下，看看敌人有什么情况。”

“我看这帮敌人不经打。你在街上不已经看见了，就是那副熊样。不过，你进来也太危险了。”

“是啊，我也想到了。但这是革命的需要，没有二话好说，明知刀山火海，也要去闯。”

“姜大姐，你真是处处叫人敬佩。”

“不说这个啦。哎，你什么时候有这样漂亮的发夹？”姜雪花看到了赵玫头上那银光锃亮的发夹。

“以前就有，一直没戴。”赵玫不想提小董和李芹的往事。

姜雪花对这些事也从来不细想，便又问：“小董呢？”

“唉，那天，他上山去浇水锄地。我一直在等他回来，谁知他舍不得丢掉那块地，走晚了，被国民党抓去了，当苦力干活。”

“我们村还有哪几个被抓去的？”

“有四五个，连四娃、王立他们，都在那儿。在西滩上，给国民党卸船装车。”

“苦吗？”

“这帮国民党，听董平章说是青年军的，不算很刁蛮，还给了袋面粉。但是，给国民党干活，总是憋气。结果，那袋面粉没几天，又被住东面的另一帮国民党、说是334团的抢走了。”

“国民党还进家里来抢？”

“抢！抢得厉害呢，就像从阴间跑出来的凶神恶煞。你看，满街上扔的到处都是。还抢了不止一遍呢。这些该千刀杀的！”赵玫愤愤地说。

“那你还带了孩子，怎么办？”

“我还好。小董怕这一手，特地拿了件国民党的衣服放这儿。喏，就是那件。”赵玫指着门后面角落里，地下果然有件绿衣服。“国民党兵进来，我就拿着，摇晃着，给他们看。他们就收敛一些。平常，就扔在地下。不过，他们东西照样还是抢。村里那天给解放军烙面饼剩下的那袋玉米面，也给抢走了。”

姜雪花略微沉吟了下，随后说：“那倒也是个办法。不过，那件衣服，你要早点扔掉。”

“是啊，谁去留它呀。还有一个情况，这帮国民党334团，好像缺粮食。你看，连玉米面、谷子、高粱也都抢，急吼急吼的。”

“你能知道，国民党的兵力部署是怎样的？”

“我听小董说，西门外一片，原是青年军的一个营，就是小董被抓去干活的那个队伍，现在他们撤到了望海山上。现在，十字路口以西直到大河是334团，十字路口以东是刚来的又一拨。青年军的军纪稍微好点，334团就不像样，听说刚来的那拨更差，打仗就更不行。”

“你还知道真不少，我这趟没白来。他们的武器怎样？有家伙吗？”

“就青年军强一些，那些也就一般化。大炮？那些别的？没有，没看见过，也就看见拿一些枪。”

“那个姓陶的，来了以后怎么样？”

“就他最坏。还有几个从北面逃过来的地富份子，领头的，是个姓高的，最凶恶。杀人放火，都是他们干的。祖责成老俩口，就是他们杀的。祖大妈的尸体，还在她自家院子里呢。”赵玫说着，就呜咽起来，“解放军来了，一定要抓住他们，替祖大爷报仇啊。”

姜雪花愤恨地拍了下炕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民政府决不会饶过他们的。”

赵玫说：“光去说话了，我下去做饭。今天就在这儿住了。”

“别，我马上就走。我想到赵村去看看，那儿是最前线。听说赵刊新也没走，我去找找他，再了解些情况。”

“雪花，还是别去吧，外面太危险了，到处是豺狼野狗。尤其是，不小心碰上那帮还乡团，可不得了。”

“但是，我进来一趟也不容易，能多走一点就多走一点，能多看一点就多看一点。为了解放军打进来更顺利一些，少牺牲一些。”

“我心里就是担心，别出事。”

“没事，别怕。我就担心一个人，碰上那个姓陶的。我想，不会那么碰巧吧。”

“可西门就有站岗的。”

“我能对付。”

“你还背着柴火么？”

“不背了。”

“那就放这儿吧。”

“不能，我得把它扔到街上去。万一我有事，他们就会查这捆柴火，那会连累你的。”

姜雪花下了炕，又一次拍了拍宝宝的小脸腮，招招手，“宝宝，再见。”就像走亲戚串门临走时那样，出了房门。

到了院子，姜雪花扛上柴火。

赵玫轻轻地推开院门，伸出头，看了看两边，都没人，朝姜雪花点了点头。

姜雪花背着柴，出了门，进了巷子，往西走。

赵玫还倚在门旁。

22.5千古英雄

姜雪花往西，在巷子转弯口，把柴火扔了，便转向南走。

在又一条小巷口，长着两棵槐树的那片小空地的井台旁，突然看见一个年青妇女的背影，披肩的长发，青花的衣衫，裹着绷带，在晒着太阳。怎么没见过？姜雪花在想，在西北村还能有谁呢？她猛然想起，这只能是……

那背影也回过头来，果然就是李芹。一反过去的苍白憔悴和忧愤，皮肤洁白了，脸色泛红了，眼睛有神了。秦德才不是说，都把他们杀了吗？怎么还……

四目对视。

李芹也愣住了。

那不是势不两立的仇敌么？就是她的男人杀了自己的父母、砍了自己的腿，李芹的头皮发麻了，像针刺一样地疼，脑子里一片空白，眼睛直盯着姜雪花，突然嘴里发出了长长的令人毛骨耸然的尖叫。

那尖叫，连空气和槐树叶都能发颤，整个西北村大概都能听到。

姜雪花立刻跳起来往回跑。

从街上过来两个国民党兵，还不知怎么回事，愣着。

“是她男人杀了我爹娘啊！”李芹不顾一切地哭着、喊着，用力拍打着腿、拍打着地。

就是在这样的紧急时刻，姜雪花也没有立马从赵玫门前的巷子跑，而是又往前跑了一个巷子。

但是，在那个巷子，迎面跑来了两个还乡团，堵住了去路。

顿时，各条巷子里都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各处都狂呼着：“抓共党，抓共党！”

姜雪花四面被围，无处可去，被那两个还乡团抓走了。

“还有一个，好像还有一个女的。”一个国民党兵说。

“是吗？再追！”一个小班长说。

李芹有点平静了。国民党兵说的另一个女的，不会是别人，一定是赵玫，因为姜雪花显然是从赵玫那儿过来的。

李芹对国民党兵说：“没有别人了，就那一个。我一直在这儿，没看见别人。”

那些国民党兵，也吵闹着，跟着去陶家大院的“县政府”了。

赵玫在院子里听到那声尖叫，和那杂乱的追捕的脚步。她知道，那是姜雪花出事了，那喊声是李芹的。

她懊悔，怎么没跟姜雪花说，西北村的地富，除了陶富贵，还有个李芹呢？雪花姐都已经提到了那发夹，怎么没再多说一句李芹的事呢。

她深深地懊悔，甚至想出去拼一下，把雪花姐给抢回来。但门外一帮帮兵士们在“砰砰”不停地跑动，震得胡同直响。她知道，是不可能有机会的了。

她瘫倒在了门板的后面。

姜雪花被绑着，推进了陶家大院。

陶富贵听见外面大吵大嚷：“抓着共党啦，真的共党啊！”走了出来，到了前院。

只见一个已经五花大绑的妇女被几个还乡团，推了进来。

陶富贵一看，不就是姜雪花么。他怎么会不认识姜雪花呢？一个早年的自己家里的使唤丫头，要就打，要骂就骂，小命就攥在自己姓陶的手里。后来共产党来了，就翻了天。往日的丫头成了共产党的土改积极分子、妇救会主任，领头到他家里分财产、搬东西，自己反倒天天被她管、被她斗，尤其是他家先后死去的七口人，除了那个姓祖的，都有她男人秦德才的份。

陶富贵眼睛都发了红，咬牙切齿地说：“姓姜的，我找还找不到你，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呵，呵，呵……”

陶富贵盯着姜雪花阴笑着，好像豺狼看着捕到的猎物。

姜雪花胸脯一挺，“老狗！你别高兴得太早了。我来，就是要消灭你们的！”

“你还嘴硬。你们分了我一百三十四亩地、二百亩山峦，我家七口人，死在你们手里。我老婆竟然被你们放在铁锅里烧火烫死。我今天，也要你好受！”

姜雪花毫不畏惧，大声叫着：“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共产党员的气概，根本不是你这条老狗能懂的。”

高增光在旁边说：“不用跟她啰嗦。打！”

上来就朝着姜雪花的脑袋一鞭子，鲜血立时就从头顶流下来。

高增光边打便嚎叫：“谁派你来的？”

姜雪花硬朗朗地说：“共产党！”

高增光跳了起来，又是一鞭，吼叫着：“他妈的，外面有多少共军？”

姜雪花眼睛冒着怒火：“漫山遍野都是！”

高增光气得手都发抖了，又掠了一鞭：“你还有一个同伙，在哪儿呢？”

“要杀要剐，就我一个。”

“啊，啊，”高增光已经无计可施，都说不上话了。

“我来！”余排长，不，现在已经是余大队长了。余排长投奔到陶富贵这儿，陶给了他一个清乡大队大队长的衔。这回，他也需要表现一下了。

姓余的操起鞭子，“呼呼”地直甩。

随着鞭子飞舞，鲜血四溅，姜雪花身上顿时皮开肉绽，衣服也被撕成一条条的碎片。

可她依然瞪着带血的大眼睛，不屈不挠，像喷着怒火。

陶富贵说：“姓姜的，最后，你还是逃不过我的手心。”

姜雪花说：“你别高兴太早，解放军就要打过来了。你们也会有落到共产党手里的一天。”

高增光暴跳如雷，拿起棍子，劈头盖脸就砸下去。

姜雪花昏死了过去。

陶富贵大叫：“把她拉出去，钉死在大墙上！把龙头镇的人都喊过来，看看分我陶某人的地、分我陶某人的房，最后就得是这样的下场！”

还乡团们四下吆喝、驱赶乡亲们到十字路口来。

两边的国民党兵也围了过来。

满脸伤痕、满身血污、已经昏死的姜雪花，被架了出来。

陶富贵站在他家大门口的台阶上，说：“共产党分了我一百三十四亩地、二百亩山峦，杀了我家七口人。这个姜雪花就是龙头镇、西北村共产党的领头人之一。我今天，就要大家看看跟共产党走，分我地、分我房，最后的结果！我要把这个姜雪花活活地钉死在我家的这面墙上！为我家的亡灵祭魂。”

姓陶的，手一挥。几个还乡团，把姜雪花架着靠到了墙上。

高增光把姜雪花左手抬起，就拿着大铁钉用锤子在手掌心钉了进去，鲜血喷涌而出。

下面的人，一片惊叫。

姜雪花疼得睁开了已经被血迷糊了的眼睛，眨了眨，什么也看不见，又颤抖着张开了嘴，想说什么，可是满嘴却淌出了鲜血和碎牙。

姜雪花又昏死了过去。

高增光又把姜雪花的右手钉上。

姜雪花低垂了脑袋，满是血污的头发披散着。

高增光又丧心病狂地抬起姜雪花的头颅，扒开她的嘴，在她的喉咙里，又钉上一颗钉。

姜雪花被钉成了十字形，鲜血顺着石灰墙淌下。

老乡的惊叫。

还乡团的嚎叫。

也有的国民党兵，低下了头。

高增光又在姜雪花的手臂上钉钉。

血流着，姜雪花颤抖着。

赵玫也在人群中，满脸泪水，想冲上去。被前面的迟得法挡着。

迟得法也是两行眼泪，底下却使劲拽着赵玫的衣襟，使着眼色，心里有话不能说。

血流着，姜雪花颤抖着。

李芹在人群的后面，看着眼前她完全没有想到的一幕。她心里很复杂，她忘不了爹妈的惨死、身上的伤痛，天天想着要报仇。但她没想到，这复仇的剑却落到了姜雪花的身上，而且死得更惨。姜雪花是个共产党，但是对她李芹也并没有过怎么样。她看到姜雪花后的尖叫，那只是本能的反应，不是要置她于死地。最后，怎么会是这样呢，这不是她想要的结果呀，不是呀，不该是这样呀……

李芹闭上了眼。

血流着，姜雪花渐渐停止了颤抖。

国共两党的争斗中，又一个惨烈的牺牲者。

第二十三章 穷途末路

1949年1月23日

23.1 四分五裂

章团长听说陶富贵钉死了一个女共产党，已经是快傍晚了。

他非常惊讶。他觉得，虽然是两军交战、难免有死人的事，但是也不能这样地残忍。尽管是姓陶的干的，是他们“县政府”的事，可以不去管他们。但章团长还是想着自己毕竟还是个“总指挥”，不能不去看一下。

他叫了几个人，开了吉普车，进了镇。

车到了十字路口。尽管作为军人，转战南北十多年，见过的残酷场面无数，但眼前的情景也着实叫他吓了一跳。

姜雪花被钉在墙上，披头散发，浑身血污，已经没有了人形。墙上地下，满是一片片的血迹。

副官忙进去通报。

陶富贵得意洋洋地出来了，后面跟了群高增光这批人。

“哈哈，章团长，你看我活捉了一个女共党，就地正法。痛快！”

“这是正法吗？这是私刑！快放下来，找地方埋了。”

陶富贵没料到章团长会说这个话，颇不满，回答说：“我就是要把她钉在那儿，让大家看看，警告所有参加过土改的人，和所有那些跟着共产党闹的人。分了我一百三十四亩地、二百亩山峦，没那么便宜。”

“那也用不着这么做。”

“你家里没有被分地，你家里没有被分房。你家里要是被分了地、分了房、死了人，也会这么做，说不定会比我更厉害。”

“这是私仇。两军交战，还是有社会规则的，不能这么乱来。”

高增光插上来说：“你是军人，我们不是。你管不着我们，我们不听你那一套。”

“你敢公然对抗上司。”章团长声色俱厉。

但在这儿已经没人听他章团长的了。

余队长也张了嘴：“你老婆孩子都过来了，就在海边的船上。你可以拔腿就跑，就在这儿说风凉话。我们呢？是我们在拼着命干。”

这话一说，陶富贵旁边的那帮人“嗷嗷”地直起哄。

逼得章团长只好连忙表态：“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章某人决不贪生怕死，决不临阵脱逃。你们会看到这一点。”

对方又是“嗷嗷”地起哄。

“我还是要说，难道我们手上的血还少吗，还要这么杀人吗？”章团长还想多说几句。

余队长说：“我们反正是死路一条，多杀几个是赚的。”

高增光也对章团长反唇相讥：“你也少不了啊。你说你是我们的上司，那姜雪花的血，你的手上也有一份，你能推脱掉吗？”

章团长几乎已无话可说。

这时，罗团长从里面出来。他也是听说了这事，过来看看的。

“算啦，章团长。这些事，就让他们去吧，犯不着我们去操心啦。”他倒算是在做好人。

章团长见了罗，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连招呼也不打了：“你为什么擅自动用装甲车？”

“军情紧急，看准时机，来不及报告了。”

“丢了装甲车，我们拿什么守河岸？你误了我们全军的大事啊！”

“大事？我们连饭都没有吃了，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吗？军心都不稳啦。”

“你还好意思说这个。”章团长毫不客气地说，“汪司令说，给你们的粮食一袋也没少。你们把这些粮食弄哪儿去啦？还来问我。”

罗团长听到这些话，毫无愧疚之色，“你现在还有，我借你点，还不行么？”

“绝无可能。”章团长冷冷地说。

罗团长也翻了脸，说：“别神气，没有你，我也照样有办法。”

同一个国民党旗号下的三股势力，分崩离析了。

章团长知道跟这些人走不到一块儿，但没想到，在共产党如泰山压顶之势的打击来临之前就已经崩溃了。

他心里发凉，灰溜溜地回他的望海教堂去了。

章团长坐在教堂里的凳子上，想了好久。他岂止是生气，更是在哀叹。他知道国民党气数已尽、回天无力。陶富贵的残杀，只能使局面更不可收拾，更成了共产党对士兵、对农民激发仇恨、鼓励士气的

绝好材料。他们在打回来之后，下手只会更厉害。国民党将会失败得更惨。作为这次行动的最高长官，他应该想得更多一些，要想到万一失败的事后处理。自己是个军人，军令在上，身不由己。可还有些民众呢，也跟着一起沉没？

他把呼营长喊了过来，“呼营长，你考虑个撤退方案。”

“撤退？汪司令来命令了吗？”

“不是我们要撤退，而是对民众要有一些预备方案。”

“对的，对的，是要有一些预备方案。可是哪些人跟我们一起走？……哦，不，不，哪些人可以比我们先走呢？”

“这个……所以，要你先考虑一下。有哪些受过打击、愿意跟我们走的，有多少……先了解一下，心里好有个数，不要到时候又像黄港那样乱成一锅粥，都被难民搅乱了，还打什么仗？”

“是的，是的。”呼营长只是一味答应着。

章团长一下又想了起来，连忙说着：“那个，那个，余校长那样的，恐怕不是共产党喜欢的人。你去找他一下，劝他上船吧。”章团长见过余校长一面，很可怜，很同情，印象较深。“还有那个李策的妹妹，都要提前准备好，别忘了。”

“是，好的。”呼营长一一答应着。

23.2 武装抢劫

尽管罗团长在章团长面前讲了硬话，可粮食问题成了334团的头等大事。尤其是滕营长一帮人，刚来大河口一带，一无所有。又要搭棚子、解决住的，又要挖工事，又没什么东西可吃，真成了问题。

三连长过来找滕营长，说：“营长，不行啦。没吃的，弟兄们都不干啦，也干不动啦。”

“不行，不干也得干。谁敢不干，毙他一两个。”

“别，别，这时候别把弟兄们逼急了，还靠着他们卖命呢。想想别的办法吧。”

“还能有什么法？”

“你看，他们青一团在海滩上堆了那么多面粉。咱不能拿点过来么？”

“怎么拿？抢啊？”

“别说这么难听么，拿点有什么不可以呢？他们天天吃美国面粉，都吃不了，连穷鬼都送，咱们提了脑袋跟共军打仗，拿点吃的，又有什么不可以？”

滕营长对这点也最感不平，但又怕打不过对方，怯声地问：“咱能打过他们么？”

三连长笑着说：“营长，你放心。我都留意两天了，就几个老百姓在那儿。当兵的顶多就两、三个人。这还干不过他们，那真就是熊蛋了。等他们大队人马赶来，咱早走了。”

滕营长一拍腿，吼一声：“好，干它一批来！”

三连长带了十来个人，来到西海滩青一团的物资堆积地。

果然，只有代连长领着三个兵在那儿。

那天，也没有东西可运。这些天，从黄港来的东西已大大减少。王立他们正躺在箱子边晒太阳。

代连长在那一头晒太阳。

董平章张口说：“连长，现在东西也不多了，不放我们回去么？”

“这，我也说了不算。反正，活也不累，又有馒头吃，这样的好事上哪儿去找啊？干着吧，兄弟。”

“长官，我们家里也有一大堆事呢。在这儿，心里着急啊，哪天夜里也睡不着啊。”

“你们就算回到家里，也不一定能安神啊。说句实话吧，这仗马上要打起来啦。你们在家里，两边打过来、打过去，子弹、炮弹飞过来、飞过去，往哪儿躲？真不如就在这儿呢。要是我，还真要把老婆孩子都叫过来呢。”

连四娃在边上，仍然没吱声。

334团的三连长走过来，只看见王立他们几个老百姓，没看见另一头的代连长，胆子便大了起来。

他看了面袋子就在靠最边上，拍了拍，又笑了笑，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要到手了。

王立他们没在意，虽知道三连长是另一帮的，但也是国民党啊，就没放声。

三连长朝后面一挥手，“搬！”

后面的兵一起上来，毫不客气，就像拿自家东西似的，扛起面粉袋就要走。

王立一看不对劲，从来都是他们扛袋子，而且这些面粉好像和这些穿土黄布的国民党也从来没有过什么联系。便喊了起来：“哎，哎，谁叫你们拿的？”

三连长一看，一个老百姓居然还来管，一把就推了过去。王立没防备，跌了下去。

董平章马上过去，拉住一个扛面粉，不让走，“你们得跟我们的长官说话。要不，我们怎么交代？”

三连长拔出手枪，“谁敢啰嗦？你们敢管到我的头上了？”

那边的代连长站起来，走了过来，对三连长说：“哪来的野小子，在这儿撒泼？”

三连长还想晃一下手枪，逞个能。

但代连长身边的三个兵已经端起了一色的冲锋枪。

这边抢粮的兵，想扔下面袋，再拿起肩上的枪，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三连长想缩回枪，又怕在自己弟兄们面前丢了脸，便朝天开了一枪。

一直没说话的连四娃，就蹲在三连长的跟前。此时，他突然一个扫荡腿，三连长一个嘴啃泥，倒在地上。

冲锋枪也“哒哒哒”地响了起来。

334团的兵们原本是来扛粮的，没想到有此一出，见这般情景，便扔下面袋狂逃。

王立他们也赶紧逃向海边的小艇，爬了进去。

等枪声平息，王立他们从小艇里探出头来，334团的兵已跑得很远了。

这边的冲锋枪也没有真朝人打。

三连长被代连长抓住。

尤其奇怪的是，三连长的枪居然已经到了连四娃的手上。

代连长大大地夸奖了连四娃一番，说：“这把枪，你先拿着，帮我看着他。”

代连长见事已闹大，恐怕334团不会善罢甘休，会反扑过来抢人，连忙押着三连长，坐上了小艇。他跟那三个兵说，对方要来了人，坚决顶住。又叫王立他们几人一起上艇撤走，怕万一真打起来，几个老百姓在下面，白吃亏。

代连长一行上了“济成”号，报告了方舰长。

方舰长长叹一声，“都搞成这样啦，气数已尽啦。怪不得古人云，族秦者，乃秦也，非天下也。”

又连忙用无线电话联系章团长。

章团长闻之大怒，334团公然武装抢劫军用物资，要立即逮捕滕营长、枪毙三连长。

方舰长劝解，先找罗团长沟通一下。

电话中，罗团长也撂挑子了，说：“我也管不了这么多了。那个滕营长，已经不听我指挥了，连他现在躲在哪个位置，我都不知道。这个三连长，你们愿意咋办就咋办，我都不管了。”

话已至此，不用再多说了。

章团长从望海山又反过来抽调一个排，由代连长指挥，防守西海滩，以防止334团反扑。因为抢夺物资事小，更怕的是不能让他们断了青一团的后路。

章团长还不解气，等那个排到达海滩后，傍晚时分，又命代连长将334团的那个三连长从舰上押下，在海滩执行枪决。

这也就跟334团，结下了不可解的死结。

23.3 走投无路

罗团长在南门外他的团部里坐着，前面是缓缓的前山，挡住了视线。

他一言不发地看着，心里知道已经无可救药了，一切全都完了。连在国民党的地面上，都搞成这样了，还能再指望什么呢？

他坐不下去了，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着。

陶富贵那么杀共产党，他也觉得有点过分，这么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章汉林这边呢，又太咄咄逼人，连自己的人也敢枪毙，分明是跟我罗某人已经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了。

回黄港去找汪司令？眼看队伍散了，带不回去，自己光杆一个。回去了，能有用么？更何况，敢回去么？说不定，人家正要拿自己开刀、把什么事情都推过来呢。

还能有什么路呢？走那条路？

罗团长虽然自知是诡计多端、反复无常的人，却也从未想到过这一条路。

能走得通么？共产党能容我么？自己手上的血，也不比姓陶的少。

他一屁股坐下，又弹了起来。他实在坐不住了。

可坐不住，又能怎样呢。

再一想，他可是个敢说敢做的人，他罗某人还怕谁不成？

于是，他跟团部的其他人说，要去赵村看看前沿阵地，便带了两个亲信随从，往赵村去了。

一路过去，大约十来里地。罗团长还很少走这么长路，气喘嘘嘘，狼狈不堪，自是不悦。

到赵村，已过了中午。

罗团长实在是累了，没等进营部，见了住有国民党兵的房子，就进去上炕躺下了。

兵们不解，找了他们的连长来。

来的是二营二连连长。这位二连长，罗团长见过几次，不像那种狡诈之人，印象还不错。别看罗团长自己两面三刀，可要求别人却是要忠心不二。再说眼下也没有别的人可托付。说实在，他也不敢上滕营长那儿去，滕营长也不敢来见他。罗团长别无他法，只好把心里的话跟这位连长说了。

二连长听了以后，既没有大出意外，也没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十分地平静地说：“团长，你这么想，是对的，应该试一下。我们确实没有别的更多的出路。”

“你自己想过么？”对于二连长的平静，罗团长反而感到奇怪了。

“没想过。这事情，不是我这种人所能考虑的。”

罗团长一想也对，便打消了一些疑虑，接着问：“你打算怎么跟共党联系呢？”

“团长，你有线索吗？”

“没有，我以前就从没有想到过这一步。”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干脆直截了当地大白天走过去。”

“别人知道了，不好吧？”从来就旁若无人的罗团长，这回却有所顾忌了。

“嗨，这年头，连傅作义都投过去了，更何况我等呢。”

“总得有个借口吧？”

“对营长和弟兄们就说是，去和共军商量，咱们放老百姓，换他们粮食。”

“他们能答应吗？去年共军围困长春，围了那么长时间，老百姓想出来都不让出来，还开枪挡回去。宁可让老百姓饿死在里面，也要消耗国军的粮食，搞乱长春的社会秩序，终于叫郑洞国撑不住了，举手投降。这回还能让用老百姓换粮食？”（事例请见参考书目中的《雪白血红》）

“嗨，团长啊，这不就是说说而已嘛，好有个过去的借口嘛。”

“好，好。那你现在就过去吧，此事不宜再晚。”

“不行吧？我这么走过去，对岸共军，不把我一枪给打死啦。”

“你的意思呢？”

“再叫上一个老百姓一起走，共军至少不会开枪吧。”

“行，你说怎么弄，就怎么弄吧。”罗团长已经心烦意乱了。

二连长往外走，在想找谁呢？他想到了赵刊新，住得不远，打过交道，人还行，跟一般农民不一样。

他找到赵刊新一说。赵说，他可以去，但得全家一起跟着走。万一出个什么事，一家老小死在一起，也就瞑目了，没有别的心事了。

二连长心里很生气，但没有别的法，只好就这样。

磨蹭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二连长和赵刊新一家，在罗团长目送之下，下了河。

太阳已经向西，平缓的河水泛着亮光。那一行人在波光粼粼中，走向了对岸。

对岸的解放军很奇怪，有的举枪，有的伏在地下，有的回去报告。

没等靠岸，二连长举起手，摇晃着，示意别开枪。

刚靠近岸边，赵刊新大叫道：“我是赵村的赵刊新，我要找部队领导！”

一上岸，二连长交出手枪，说：“我是334团二连连长，奉罗团长之命，有事与贵军商谈。”

解放军的驻地连长，也已到岸边，把两人带到连部。赵刊新的家人交王庄的人安置。他听了两人讲的情况，知道事情重大，又领着两人，喊上营长，来到位于王庄村里的团部。

当着解放军的团领导，二连长表示，那边的罗团长愿意率部起义。

赵刊新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共产党员。听得二连长差点晕了过去。

接着，赵刊新就愤怒控诉了敌人的累累罪行，尤其是他也从敌兵的嘴里，知道了姜雪花被钉死在大墙上的惨状。

团领导们十分愤慨，问二连长，是这样么？

二连长也心虚了，头上直冒汗，说，我也只是听说这事，那是那帮该千刀万剐的还乡团干的，不是334团干的。

团长对赵刊新说，你跟我一起到师部去；对二连长说，你在这儿等着。

团长领着赵刊新，立即起身，急忙赶往李家泊北面的师指挥所。

指挥所的工事还没完全修好，但师首长们已经进驻了。

到北山时，鲁队长和西北村的一些民兵还在工地上，见到赵刊新还十分惊讶。

鲁队长还远远地问：“你不是被堵在里面了么？怎么出来啦？没看见姜雪花啊？”

赵刊新一脸严肃，摆摆手，没言语，跟着团长进了工事。

一进工事，团长请赵刊新把敌人的情况向首长们做详细汇报。

赵刊新一五一十，把十几天来的情况详详细细地都说了。敌人的罪行，敌人的兵力调动，敌人的武器，敌人的士气，连青一团曾经搞过的什么“新政”，也都说到了。

师首长们听得很认真，连说讲得好，还提了不少问题。

接着，赵刊新又提到敌人内部的几方面，矛盾已经非常尖锐，“昨天，都已经为抢粮食，在西海滩上，开枪打起来了。”

“这点非常重要！”一位首长说。

“还有，敌人的粮食已经很紧张，有时候，也吃不上干的了，也在那儿喝糊糊。弄得那些国民党兵，牢骚很大，军纪很差。”

那位首长一拍桌，“行了，不用再等了，最后解决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立刻向前指汇报，请前指下达进攻命令！”

一位边上站着的参谋问，“敌人想起义的事，怎么回答？”

“这么猖狂，犯下这么令人发指的罪行，被我们已经团团围住了，现在才想起来要起义，没有这种好事了。最多算投诚，可以从宽处理，留一条命。但是，有杀人血债的，不在内。这事，也一并向前指请示。”

二连长在王庄等了一夜，没睡着，生怕解放军先拿他开刀。

罗团长在赵村等了一夜，没睡着，揣摩着这一关能不能混得过去。

赵刊新更是兴奋了一夜，没睡着，他一家，终于跳出了狼窝。

其实，最紧张、最忙碌、最没有睡意的，是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

第二天一早，二连长被叫起，喊到了营部。

他紧张得不得了，浑身都在打颤。我们的营长跟他说，你不用紧张，不是要杀你。你是来报信的，你的安全，我们绝对保证。但你带来的口信，我们要向你说明白。

是，是，二连长连连称是。

你们要作为起义，我们不能接受。因为你们犯下了太多的罪行，而且也没有立功的机会了。可以坦率地跟你讲，我们立即就要大反攻了。你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无条件投降，立即放下武器，缴枪不杀。你和罗团长，和其他参与想到要起义的人，可以比照投诚优待处理。但是，有非作战时杀人罪行的，除外。（说明：起义、投诚、投降的区别。起义一般是在战斗发生以前，愿意调转枪口加入我军，其部队一般保留原来编制，长官一般留任，当然还要配上解放军的干部，如何基沔、张克侠部。投诚则是大势已去，虽还有一定抵抗能力但能成建制放下武器，其部队解散，长官可以适当安排，如郑洞国部。战斗已经进行，就只能是被俘了。另外还有一种，叫：接受改编，如傅作义部。）

二连长听后，无语。

我们的营长说，你可以走了。

二连长说，我不走了。不管是算投降，还是投诚，还是抓起来审判，我都不走了。其实，我这次来，就没准备回去。

你不回去，怎么往回报信呢？

那，我在河这边大声喊吧，反正我是不回去了。

没办法，只好依他的办。

大河边，二连长颤巍巍地跨进了河里，就怕对岸开枪过来。

别怕，他们敢开枪，我们就机枪扫过去。我们的营长说。

二连长站在河里喊起来：“罗团长，共军，不，解放军叫我们立即投降。放下武器，宽大处理。不要再犹豫了！”

对岸没有动静。

二连长又喊了，罗团长，投降吧，我已经投降了。

对岸还是没有动静。

营长说，最后再喊一次。

二连长喊着，334团的弟兄们，向解放军投降吧。罗团长，你可以算投诚，可以优待，过来吧。

过了一会儿，对岸响起来枪声。那是对空开的枪，当兵的人都能听得出来。意思是，听见了。

罗团长，听到传来的话，浑身泄气了。

最后的一条路，也没有了。

现在就投降，或者叫投诚？还有点不甘心。

罗团长往回走了。

一直走着，一直往南走着，连自己的团部也没进。

一直走到最南面的海角，一直走到海水湿到了鞋子。

喊来了岸边的哨兵，看还有一只做联系用的小船，栓在边上。他上了船，叫了哨兵上来给他划船。

他，罗团长，抛弃了自己的部队，一个人上了“福隆”轮。那是装最后一批335团士兵来海源的民用客轮。一个人蜷缩在空空的客舱里。

罗团长烦心哪，自己也算是戎马一生、闯荡南北，最后竟落得孤家寡人一个。回黄港后，又怎么办？司令部，敢去么？留守处，敢去么？汪司令有两条理由杀他，一是丢弃部队，二是那贪污案，恐怕还要拿他当垫背。他是连家也不敢回呀。怎么办？再说吧，走一步，算一步啦。

但他罗团长如果知道，就是在他上船的时候，解放军前指已经下达了总攻的命令。起码眼下，他是逃脱了一次惩罚，会是怎样地窃喜啊。

第二十四章 大反攻

1949年1月24日

24.1 全线出击

在二连长、罗团长和赵刊新都睡不着的那个晚上，其实，最紧张、最忙碌、最没有睡意的，是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

根据汇集各方面的情况，尤其是最新的一个情报，驻黄港美军已全部登舰离岸，目前已经驶入公海。围歼黄港之敌的最后障碍已经消除。前指接到命令，首先消灭龙头之敌。

前指向各师下达命令，从零点开始算，给十二小时准备时间，进攻命令将于三十六小时内发出。估计用两天时间，解决龙头之敌。到那时，黄港之敌也会不战自乱，如同深秋的野果，风一吹就掉落，已是囊中之物，唾手可得。

龙头外围前线，解放军已迅速集中了两个建制师和其它一些部队，兵力超过三万以上，十几倍于龙头的国民党军，形成了泰山压顶之势。因此，作战方案采取全线同时出击，不必再分什么重点和纵深，就像对付一个鸡蛋，一脚踩下去就是了。

只是重武器少了点，六门山炮。四门对准望海山，两门对准尖山。能造出气氛，就行了。

在海源全县各乡动员了上万名支前民工，也已经陆续到达，配置在各自对口部队的尾部。

凌晨，天上还挂满着星星。这些天来，天气一直倒是很好。

令营长在李家泊村北的空地上，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

他宣读了前指的作战命令，而后揭露了这帮敌人进占解放区以来的滔天罪行。他指出，要用姜雪花同志壮烈牺牲的事例来教育和激励广大战士，奋勇杀敌。他同时讲到了敌人的困境，已经走投无路，讲到了我军这次作战的有利条件。

他特别强调说，前段时间，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尽管也作了努力，但是打得不够好。这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以后，我们就是想立功也没有机会了。对我们来说，这是建立新中国的最后一战。要拿出我们所有的力量来。

最后，布置作战任务。这次以令营长所在的守备团攻击望海山。一营，作为第二梯队，具体的出击时间和方向要根据前面第一梯队的进展情况而定。

大郑，已担任排长，作为基层干部代表，表态发了个言。

纪海洋已担任一连的指导员，同时负责李家泊、民主村的群众、民兵与部队的协调工作。这时，他也正在场院上召开两个村的干部会议，传达了与令营长所讲的相似的内容。

这儿会议的气氛更热烈。大家，谁都在说着、叫着。

纪指导员也沉痛地说到了姜雪花。

一下子，会场就凝固了。几秒钟之后，又爆发出怒涛般的吼声，振动着全村，能把屋顶都掀了。

“打回去！现在就打回去！”

“此仇不报，决不罢休！”

纪指导好一会儿才能继续讲下去。“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而且就是在今天！”

会场上又是一阵热烈的呼喊。

纪指导又布置了工作任务，进行了人员安排，大体跟以前差不多。只是由于姜雪花的牺牲和赵玫还陷在敌占区，妇救会正副主任，暂由小林姑娘林海秀和王建悟家的代理。

拂晓时分，所有的战士和老百姓都动员起来了。

沿前线差不多一百里的周长，都沸腾了。田野里，到处都是人群。车来人往，人声鼎沸，旗帜招展。有的干脆点起了火把，山上山下，火光点点。不但不避讳对方，更有的部队唱起了军歌：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各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这歌声振奋着人们的精神，感染着人们的情绪。于是，并没有事先的布置，几十里的战线都响起了雄壮嘹亮的歌声，那是何等强大的气势啊！

这儿是：

“从不畏惧，绝不屈服，英勇战斗，

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

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那儿是：

“听，

风在呼啸军号响；

听，

革命歌声多么嘹亮！

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战场，

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祖国的边疆。

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向着最后的胜利，

向着祖国的解放！”

从没有过在激战前夕，在朝霞升起的黎明时分，爆发出了激荡着百里战线的雄壮歌声。解放区的军队和人民，在即将进攻的号令下，群情振奋，足以叫国民党兵胆战心惊。

从没有过在进攻之前，就这样摆出了大军压境的阵势。

龙头的国民党军，真的是陷入了四面楚歌、重重包围的绝境之中。

中午十二点，各部队进入出发阵地。

下午两点，六门山炮齐鸣，在国民党占据的山头炸开。从西侧的大河口，到望海山，沿矛山，到尖山，一直到小河口，约一百里的战线，三万多名战士同时跃起，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向前出击。一时间，杀声震天，子弹飞射，炮声隆隆，硝烟四起，何等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何等震撼人心的人民革命的胜利场面！

24.2洪流滚滚

虽说事先已经有了一定的安排，等真的打起来了，民主村的干部群众都着了急了。于村长和鲁队长都来找纪指导员。

于村长是一脸的兴奋，说：“好啊，好啊，我们全村的人都在日日夜夜地盼着这一天呐。部队上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尽管说。”

鲁队长是一脸的焦急，连说：“快给我们布置任务吧。西北村的民兵都在那儿等着呢。这次我们一定要和解放军一起打进龙头镇。”

纪指导员倒是比较平静，解释说：“这次我们团分配是攻望海山，作为佯攻，拖住青一团，我们连还是第二梯队。李家泊对面的主攻方向是在矛山，由北海独立团担任。而且，我们团里也说了，你们西北村的乡亲，因为龙头被占，各方面损失比较大，没有安排你们支前任务。你们就整理好物品、照顾好老人孩子，等着部队解放龙头，你们回家就行了。这不是已经讲好了的么？”

平常脾气挺好的鲁队长也急了，拉着纪指导的手，瞪起眼说：“这哪儿行？解放龙头镇，我们龙头民兵的责任义不容辞，怎么能没有我们的份呢？再说，叫我们等在后面，等你们解放了，我们才进去，那些民兵小伙子也不干呐，劝不住啊。”

纪指导的手都被捏得有点疼了，只好笑笑说，“好，好，我能理解。这样吧，我领你们去找一下北海独立团，请他们考虑吧。”

纪指导带了他俩去了北海团。北海团考虑后表示欢迎，也考虑到西北村具体情况，只调用男民兵跟在部队后面支援。其他同志还是以安排好村里的事情为主。

于村长和鲁队长两人一想也对，这样前线、后方都能顾上了，就高高兴兴地回李家泊村里找自己村的人了。

民主村的民兵们看见部队的战士们忙碌开了，又集合、又打包、又擦枪，知道反攻就要开始了，不用通知，都等在了李家泊的村口。看见鲁队长回来，就急匆匆地围了上来。听鲁队长这么一说，有个平头小伙子，举起两手大声说：“我们现在就去找北海团吧。”这个是邬大妈家的小子，叫邬中和，今年十六岁。平常挺沉稳，今天倒是冒出来一句。

大家也七嘴八舌地说着：“鲁队长，我们现在就去吧。”

鲁队长说：“好。不过现在，一是有的民兵小组，要重新安排；二是，各人回家说一下，一小时以后在这儿集合，去北海团。”

小邬就说了：“家就不用回了。要回，也要和解放军一起打了胜仗，回龙头镇的那个家。民兵小组，倒是要重新排一下。连四娃、王立他们都没在。”

鲁队长说：“连四娃的民兵组长，现在就由邬中和代理吧。”

“好，好。”大家一阵鼓掌就通过了。

“那我们呢？”旁边还有几个女孩子嚷起来了。

“你们，你们……”姜雪花牺牲了，赵玫又没在，女民兵这一头还真缺个带队的。鲁队长挠了挠头，对站在最前面的小林说：“海秀，你来领女民兵。”

“是。”林海秀一个立正，向鲁队长敬了个礼，可是不够标准。把小伙子们都逗笑了。

“笑什么？”小林认真地说着，“我们女民兵也是兵，也是革命战士。”

“你们就在李家泊村里烙个面饼，看护个伤员吧。”鲁队长说。

“不，我们也要跟北海团一起跨过大河，一起进龙头镇。”

鲁队长停了下，看了看小林，知道拧不过面前这小丫头，就说：“好吧，我们一起走吧，到河边找北海团。”

“噢，噢！”男民兵、女民兵都高兴地蹦着、跳着，向南走去了。

小林刚要迈步，一只手从旁边轻轻地拽住了她，一看原来是丁妹。

丁妹轻声地说：“我也要去。我也是民兵。解放龙头，也有我的责任。”

小林忙说：“丁妹呀，你的责任可大啦。王山哥支前还没回来，王立哥又没消息。王大爷要忙他的那个农会小组，王大妈又要担负整个村里的妇女工作。你家里的事，全靠你啦。没有你，怎么办？你把你们家的事都挑起来，就是对村里的支援。解放龙头，也有你的一功呀。”

丁妹照例不会说不同的意见，她轻轻地点了点头，往回走了，可是还不住地回头看着往南走去的小林和她的同伴们。

当然，这种时候照例是看不到秦德才的。

李家泊村南的泊地，大河的北岸，挤满了解放军部队和各村支前的民兵。龙头镇几个村的乡亲们也已经迫不及待地背着包、挑着担、拉着孩子，等在了队伍的后面。

解放军的山炮响起，最前面的冲锋号响起。望海山、尖山、矛山，正面十几里的山脊，顿时爆炸四起，一股股浓烟升起。耳边机枪、步枪声像暴风雨似的毫无间歇地“噼噼叭叭”响成一片。先头部队的战士们随着冲锋号，呐喊着、跳跃着向河对岸冲去。

有的战士倒在河水中。

在北海团勇猛的冲击下，二十分钟后，对岸的335团后缩了，更多的战士跃入了河中向前冲刺。可是，昨天李家泊的干部只在河岸边对最前面的部队讲了河底的情况。今天，在先头部队之后那么多的后续部队战士就不了解了。在看似平缓的水面下，深浅不一，大部分水深是在膝盖之下，但也有齐腰、齐胸，甚至还有一、二人深的。知道的，一会儿向左跳过来，一会儿向右跳过去，也就能过去了。可是对于不知道的人就麻烦了。身背枪支弹药的战士碰到这样的深潭那真会遇到灭顶之灾。这不，在水中奔跑向前、浪花飞溅的队伍中，又有战士脚下踏空，跌进深水里。那战士露着脑袋，举着枪支，挣扎着，呼叫着，只几秒钟就被河水完全淹没。

郭中和在岸边对男民兵们喊着：“我们下去给部队指路。”

话音未落，几个小伙子就下了河，在知道的几个深水洼前站着，对战士们喊着：“往边上走，往边上走！”

战士们按他们的比方，左右跳跃，在大河里迂回着向前，可是那样就延长了过河的时间，加大了伤亡的概率。

小林也已经到了岸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见鲁队长他们扛着弹药箱已经过了河，就对身边的几个女民兵说：“姐妹们，我们搭起人桥，让战士从我们身上过去。不要让他们在子弹面前绕来绕去了。”

“好！”女民兵们齐声回答。

林海秀领着她们急忙回到了李家泊，跟村里的人一讲，李家泊的人二话不说，见门就拆下门板，也不分是哪个村的人，都跟着小林重新来到河边，扛起门板就下了水。她们在水深的地方，把门板扛在肩上，很快就搭起了人桥。

小林自己在水最深的地方，几乎只露出脑袋，潮湿的黑发紧贴着头皮，满脸是水珠。河水在她脖子四周哗哗地流过，浪花拍打着她的脸颊和嘴唇。她神情刚毅，两手使劲地抓着肩上的门板。她的手指还是不好使，只好紧紧用手把门板压向脖子，脸上的青筋都暴了起来，可还在拚命地叫喊着：“同志们！从这门板上过吧！为了消灭蒋匪军，从这门板上过吧！”

北海团的一个干部，站在河里，激动地都掉下了眼泪：“这怎么能行，这怎么能行，快上来吧，你们受不了的。也太危险了，子弹还在头上飞呢！”这段河面，这时还在望海山敌人步枪的射程内。

小林在水中喊着：“快！别犹豫了，为了胜利，快从我们肩上冲过去！”

那干部“唉”了一声，忍下了眼泪，大手一挥，朝战士们喊着：“冲！”

战士们也不再犹豫了，端着枪，呐喊着，从姑娘们扛着的门板上大踏步地冲了过去。

战士们的每一个步伐，小林都要吡着牙往下一沉。河水的冲击，很快使身体发凉。然而，冰冷的身躯里却是满腔的热血，小林和她的姐妹们，咬紧牙关，坚持着，坚持着。

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子弹在头顶上呼啸，浪花在四周飞起。成百上千的战士在河水中、在门板上冒着枪林弹雨跨越过大河。

队伍浩浩荡荡地过河了，这队伍是一条比大河更激荡、更澎湃的洪流。

不要忘了在洪流中挺立在河水里的姐妹们。

不要忘了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中无尽的功绩。

第二十五章 李芹之死

1949年1月25日

人民解放军的炮火也震动了国民党军方面所有的人。

方舰长虽然知道解放军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顶多也就是一两天的事了，但他在指挥舱里看到解放军从东到西，排山倒海似的攻势，也震惊了。他没想到解放军会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的兵力，对一个小小的龙头镇，会这么认真、下这么大的功夫。他看出来，龙头这一块的全部丢失，不用二十四小时。

他一方面下令开炮轰击。可由于“济成”号炮手的水平太低，别把炮弹掉在了自己人的阵地里，他也不敢到处乱打，主要是轰击西面、大河以北，这样也能减轻望海山青一团守军的一些压力。

他又立即拿起无线电话，叫章团长赶紧放弃阵地回撤，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电话里已是一片枪炮声、爆炸声、呼喊声，听得不是很清楚了。

章团长沙哑着嗓子，回话说，现在已经像两只牛打架，牛角都顶在一起了，撤不下来。我们的人手太少，都在一顶一地打，哪个也离不开。我这一晚上都没睡，现在指挥所已经搬到了半山腰，望海教堂腾出来，给伤病员。等过两个小时，看看能不能顶得住，再说吧。

李策火急火燎地跑来，满脸紧张，跟方舰长说，要下船，救妹妹回来。

方舰长说，按说这时，是最需要你的时候了。那，你还是去吧。但时间已经很紧急，只能给你一个小时，不，给你一个半小时，跑步过去。到时候，就不等你了。过了时候，恐怕连你也上不来了。你务必看好时间。

李策谢过，猛跑着下去。

下了个小艇，怕和334团打交道，就在西滩上的岸。

来到岸上，那枪声在天地间不歇气地响成一片，又是一阵阵闷雷似的炮声，一股股浓烟在远处升起。

见王立他们几个老百姓正不知所措，代连长在喊着，不要慌，沉住气，先把面粉往船上搬。万一要往船上逃，我们还有饭吃。

“让我们回家看看吧？”不知谁在说。

“北面的人，逃过来还来不及呢。谁还有迎着子弹，往前逃的啊？”代连长说。

众人无语。

李策也顾不上跟他们说话，急忙往西门跑去。

解放军的大炮直往望海山轰击，望海山已经笼罩在一片弥漫的硝烟之中。

有报告说，山那面有废弃的寺庙和教堂，估计一定会被敌人所用，说不定指挥所就在那里。打它几下。

炮火又延伸到山的南坡。

又是几十分钟连续的炮击，北门外的杂树野草都燃起了火苗。

突然，天崩地裂般的一声巨响，震得天摇地动。

惠民寺的弹药库被击中爆炸。

巨大的烟云冲天而起。无数的砖瓦、箱板、弹片、残骸、杂物被抛上天空，接着又在方圆数里内胡乱地砸下。那阵势，如果身在其中，真像世界末日一样。

李策这时快到西门了，冒着“噼噼啪啪”空中碎片的坠落，更是加快了脚步。

西门已有很多国民党兵和一些老乡，急呼呼地有的往外跑，有的往里挤，乱成一片。

还有人在喊：“快跑啊！共军要炸平龙头镇啦！”

李策挤进西门，转过巷子，走过井台，连喊着“妹妹，妹妹”，跨进了自家的院门。

李芹就坐在炕上，神情出乎意料地平静。

李芹见到李策，还露出一丝笑意，说：“哥哥，我知道你会来，我们还能再见一次面。”

李策急忙说：“快走吧，妹妹，什么也不用拿了。”

李芹说：“哥哥，我真的谢谢你还能来看我。但是，我想好了，我不走。”

“为什么？”

“我要在这儿陪爹和娘。”

“再落到共产党手里呢？”

“我也想过了，我已经死过一次了。从那以后，我就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也就不怕再死一次了。而且，我也已经报了一半的仇。”

屋外传来了枪声，好像解放军已经突破防线，到后山了。

前后巷子里都有慌乱的脚步声。

李芹从脖子上拿下了十字架的金链，递给了李策，说：“你去谢谢方舰长，我已经不用了。真的要谢谢他，它让我在最后看到了这世界上还有光明。”

李策流下了泪，拿着十字架，不顾一切地拉起他妹妹，“我背你走！”说着扛起李芹就往外走。

走进巷子，枪声更清脆了，就像从树梢上飞过。

街巷里很多国民党兵在东奔西跑、到处乱窜，不知往哪儿逃好了。

李芹挣扎着，叫着：“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拐过这边巷子，李策也并没有多少力气，已是气喘嘘嘘。

李芹挣扎着，一骨碌滚下来，坐在井台边。

惠民寺的大爆炸，把寺庙北面防线上的国民党兵炸懵了。这儿正是刚来的335团最西面的防区，紧挨着望海山的东坡。那335团更是一帮散兵游勇和一些曾经投靠日本鬼子后来没地方去的零星伪军凑起来的，哪有什么战斗力。当抛向空中的杂物像雨点似地往下砸，这些兵便抱头鼠窜纷纷溃散，各自逃命去了。

国民党军的防线，首先在这儿被突破。解放军北海独立团撕开缺口以后，越过后山，就到了龙头镇。

李策兄妹刚在井台边停下，几个国民党兵就从西面横冲过来，大嚷：“共军到西门外了！”

后面又有几个国民党兵，从他俩身边狂奔而过，惊叫着：“共军进城啦，共军从北门进城啦！”

李芹满含热泪，说：“哥，你走吧，你不要管我了，我就没准备要活。我的腿有残，走不了的。我不能连累你。西门不能走了，你从南面城墙翻出去。”

李策也流下了眼泪，“妹妹，爹妈都没有了，我拼死也要带你走。”

“哥，你听我一句，要死就死我一个，不要再死两个了。李家就指着你了。”

“妹妹！”李策泪眼汪汪，直看着他妹妹。

“快走！哥。再不走，我就在你面前跳井了！”

李策无语。

后面的巷子，已经了解放军战士的喊杀声。

李芹猛推一把李策，尖叫着：“走！”

李策似惊醒，最后看了下妹妹，扭头猛跑。

李策的身影刚在前面闪没，李芹转过身，只见两个解放军战士端着枪，冲进了这条胡同。

李芹本能地从地上拣起一块石头，就扔了过去，顺手又拣起了第二块。

战士一愣，停下了脚步。

从战士后面，又冲出一个年青妇女，直冲到战士的前面，手往前指着，嘴里喊着：“往那儿追！”

那正是赵玫。

李芹一眼看到了，赵玫头上那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发夹，她哥哥不远万里从英国带来的发夹。上面的红玻璃珠那么的耀眼夺目，一直刺到了她的心里。

赵玫也看到了李芹，看到了一个穿着整洁、也有了几分青春气息、正是花季的李芹。

她俩人又是四目对视，都像雕塑似的凝固了。

解放军战士向前跨了一步。

李芹突然发了疯似地尖叫：“别过来，我跟你们拼了。”

赵玫张开双臂，拦住了战士。她张开了嘴，刚要说什么。

李芹却扔出了第二块石头。

战士开了枪，子弹从李芹的头顶飞过，只是警告而已。

然而，那枪声却显得分外的响，在小巷中激荡，也在赵玫和李芹俩人的心头激荡。

赵玫无法用言语说，李芹又将要遭遇怎样的惨状，一个女孩子难以承受、自己无能为力却要眼睁睁地看着落到她身上的惨状。

战士推开赵玫的手臂，又往前跨了一步。

李芹知道，自己到了生命的终点。这一点，她早几天已经下了决心。当这一刻终于来临的时候，她心里仍然充满了仇恨、宽慰、了却和遗憾……

她最后一次看了看赵玫，她多想能和赵玫一起享受这午后的阳光和温暖，然而终于不能成为同一条路上的人。

她张了嘴，想说，又闭上；拿着小石子的手，举起了，又垂下。

战士又跨了一步。

这一瞬间，李芹用尽全力，往前一撑，一头钻进了井里。

井下传来轻轻的“扑通”一声。

赵玫大叫着，跑过来，已经无济于事。

狭窄的井筒，幽深莫测，什么也看不见。

只听得深深的井底下，“咕咚咕咚”的翻起气泡的声音。

战士们在身后跑过。

子弹在头顶，呼啸着飞过。

第二十六章 风卷落叶

1949年1月26日

26.1 陶富贵逃命

惠民寺的大爆炸，更是震碎了陶富贵的心，粉碎了他最后留存的一点幻想。

十几天以前，当他重新跨进他逃离了三年的陶家大院时，虽不说是风光无限，但毕竟也是踌躇满志，心想着陶家将在他的手里从此光大起来。

这才十几天呀，就这么十几天，这一切就这么匆匆结束了，想留也留不住了。

陶富贵不甘心哪。

当那惊天动地的爆炸袭来，门窗框震得“嘎嘎”直晃，从天而降的碎块“噼噼啪啪”地落在院子里、砸在房顶上，听着瓦片被砸碎的声音，陶富贵不但心疼，而且心也凉了。

他跺着脚，拿着斯的克朝着桌子、窗框、墙壁，到处敲打。他知道，这一切又要丢给共产党了。他真想一把火都烧了它，可又下不了手。

他实在不甘心哪，可还是逃命要紧。

他眼睛都红了，指着地上的几个箱子和布袋，朝周围的人吼：“把它们扛上，走！”

这些是陶富贵几天来已经重新准备起来的地契、单据等等，这可是他陶富贵的命哪。

高增光过来，用手提了下箱子，掂了下份量，还真不轻，便说：“都到了这时候，还带这些东西，有什么用？”

陶富贵瞪了他一眼，发怒道：“你懂什么？都扛上！”

高增光一言不发，扭头就往外走了。

余队长见此光景，过来捡了个小布袋，装个样子，扛上走了。

陶富贵自己也抱了一袋小的，对余下的人说：“都扛上，都扛上！”

有的人扛上一箱走了，也有的人不听这一套，自顾自地走了。

看着剩下的几个箱子，陶富贵急得都跳了起来。但是，那一阵紧似一阵的枪声，说明解放军的步伐已经越来越近了。

陶富贵急得嘴上都起了白沫，那也得赶紧走啊，更何况还要看着前面出去的箱子别给搬没有了。

他出得门来，最后回头看一看这十几天来更加破败的陶家大院，和那满墙的血迹，急匆匆地往南走了。身边跟着的只剩了那个戚助理。

海角边，已有不少人了。

陶富贵推开别人，挤到了海边。

海面上没几个小艇。一有小艇快靠岸了，人们就不顾一切地涌到海里，比划着，叫喊着，想叫小艇靠自己这边来。

有个小艇快过来了。陶富贵忙叫几个手下一起喊：“我们是县政府的！快过来！”

小艇靠了过来，四周的人蜂拥而上，陶富贵好不容易才被戚助理拉了上来。

陶还没有喘过气来，一看只有戚助理跟了上来，一共才带来两个袋子。其他的人，其它的箱子，则一个也不见了。上了小艇另外的那些人，都是和他不相干的。

“箱子呢，箱子呢？等等，我的箱子还没上来呢。”

“快跑啊，快跑啊！”更多的声音压过了陶富贵的声音。

小艇的机器发动了起来，不顾那些还站在海水里扒着船边的人的喊叫，“呼呼”地开走了。

小艇的发动机轰鸣着，海水翻卷着，很快就靠上了“福泰”轮的船舷旁。只有陶富贵的“我的箱子，我的箱子”的喊声留在了海面上。

跟着陶富贵逃出来的那些人，上哪儿去了呢？这儿先说那个余队长。

余队长没能逃出去。

开始他扛着那个布袋往外走，心里还有点窃喜。他在想，这一袋，说不定是一袋子钱吧。很可能哎，要不，姓陶的怎么这么着急呢。

他特地耍了个心眼，拐了个胡同，不和姓陶的一起走。到时候，姓陶的找不到他，这一袋子钱，不就是他的了吗。啊呀，临到这时候，还有这等好事，真是老天爷又睁眼了，他余队长命中有福啊。

虽然他心中喜滋滋的，可是他犯了个大错，他不熟悉龙头镇里的小胡同。等他转出来，走到南门口，前面后面都是解放军了。

本来，他穿的是老百姓的衣服，是能混得过去的。但他太慌张了，一张嘴，又是外地口音。问他扛的是什么，又答不上来，打开一看，尽是陶富贵自己写的欠条，都是什么“民国三十八年，某人欠陶富贵多少钱。”“民国三十八年，某人欠县政府多少钱。”不用说了，都是些变天帐，这人至少也是个地主的狗腿子，立刻被抓了起来。

26.2 李策回舰

李策的心情，已经难以名状。

他顾不上想更多的了，只想着要拼命地跑。他能跑出来，也就不枉费了妹妹用命换来的一番心意。

他跑到了西海滩。

海滩上也已经有了一些人。

李策望着远远地停在海上的“济成”号，焦急地挥舞着白色的军帽。

方舰长也一直在挂念着李策，嘴里不断地念叨：“怎么还没回来，怎么还没回来？”

他拿着望远镜，不停地看着，一是看望海山的炮火有没有停息，章团长还有没有可能突围出来；二是看海边有没有白色的海军帽出现。

看见了，终于看见了。方舰长终于看到了海滩边上有了顶白色的军帽在摇晃。

“快！快去个小艇！”

小艇向着西海滩过来。

海滩上的人激动了起来。

小艇看滩上的人不少，便要了个花招。快到岸边时，忽然往东而去。滩上的人们，纷纷往东跑去。

李策看出了这个意思，站在水里没动。

站在李策边上的，还有一个人没动，那就是高增光。

高增光在陶家大院的最后一刻，看出来再跟着陶富贵将有害而无益，便自己往外跑了。他想到海角直对着南门外，应该人很多，便来到了西海滩。

高增光也算得上是个智商高的人。他看到了李策，他知道哪怕别人都上不了船，李策也不会上不了船。

他就站在李策边上不动，而且，还很客气地跟李策打了个招呼：“李副官，您在这儿啊？”

李策并不知道高增光对李芹曾经有过的非礼，当然也没有什么好的印象，只是心里顾不上别的，轻轻地哼了一声。

果然，小艇往东转了一圈，把人引开之后，又飞快地拐了回来，朝着李策就过来了。

李策和高增光上了小艇，往“济成”号去了。

指挥舱里，方舰长问李策：“你妹妹呢？怎么她没上来？”

李策把一直捏在手心里的十字架交给了方舰长，把他妹妹的想法，讲了一遍，“她再三要我谢谢你，也谢谢这个十字架。她说，是这十字架，让她看见了这世界上还有光明。她带走，觉得太可惜了。”边讲边泣声不断。

方舰长听了，也是感慨不已，“唉，是位烈性女子啊，真叫人惋惜！”他接过十字架，说：“她应该过来呀！愿她能升入天堂，与基督同在。阿门！”他又缓缓地把十字架挂在了脖子上，说：“我会永远把它带在身上。”

方舰长又抬起头，望着远处的望海山，自言自语地说着：“难道章团长也回不来了么？”

26.3至死不降

其实，解放军的突击方向是放在大河口至赵村南面这一线。想在正面从望海山到矛山到尖山的全面攻击吸引住大部敌军，而后在赵村南面至大河口最下游的那段，从河对岸突然出击，沿海边往东横扫，把敌军悉数包围在里面，全部收拾掉，一个也不让他们从海上跑回黄港。只是北线的敌人垮得太快，以至于连陶县长都已逃到了船上。

赵村南面，大河东岸的这把尖刀出动了。在大堤后机枪的掩护下，大批战士，成群成群地跳进水里，从河面上涌过来。

河的对面，正是腾营长的那个营，沿东岸的大堤一字排开，朝着河里射击。

这一段的冲锋，比刚才讲的在望海山北面的涉水冲锋要艰苦得多。因为这儿的河面更宽，水流更深更急，尤其是防守的国民党军就在河堤上。

战士们一个个地倒下，随河水顺流而去。有的是被射中，有的是踩空，跌入深水。

虽然伤亡重大，但解放军的攻势没有丝毫的减弱，因为有的是兵源。河面上冲锋的士兵，反而是越来越多。前面的倒下，后面的涌上。岸上掩护的枪声越来越密集，像瓢泼似的“哗哗哗哗”响成一片。

这一边，防守的阵势变弱了。

差不多半个小时的冲锋，最前面的解放军战士终于冲到了对岸，开始了面对面的刺刀相拼。

334团比起335团还能强一些，但也顶不住越来越多的解放军兵士。

腾营长在最南面的那段河堤上，急红了眼，吼着：“顶住，顶住，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死也要死在这儿了。”

但那也无济于事了。解放军的兵士们真的像潮水般地涌来，完全淹没了腾营长的那些兵。

腾营长和身边最后的一些人，只好转身往后退，那儿只有那一大片芦苇荡。他们涉水下去，艰难地往芦苇丛深处钻。

枪声响起。那几个在最后面刚走进芦苇丛的人，就像活靶子一样纷纷倒下。即使是走进了芦苇丛，那也只能一时地挡住视线而挡不住子弹。外面的解放军为了减少伤亡没有急于进去，知道那些国民党兵已无路可逃，就守在外面等着，哪儿有声音就往哪儿射击。足足围困了一天两夜。最后进去搜索时，就只有尸体了。

滕营长最后就是这样，陷在淤泥里，进退不得，腿上的伤口流血不止，手也举不起来，更不用说抬起枪了。他硬撑着，知道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可还是在撑着。在等什么呢？什么也不等，可还是死死地撑着沉重的就想闭上却又不敢闭上的眼睛，看着眼前最后的光景，那汨汨的流水，那绿绿的芦苇叶，耳边似乎静静的没有声息。世界最后是这样的平静，战争和争斗都好像在另一个世界。眼前平静得没有任何感觉，平静得不需要任何的力气，没有任何知觉地闭上了眼。滕营长就这样最终还是倒下了，倒在泥水里，只有背部的一片衣服露在水上，搅起几圈小小的旋涡，大河水依然滔滔向前，再也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滕营长的这个结局，和他个人的性格也有关系。他还好点面子，不愿意在部下面前出去投降。他没有阻止别人去投降，但他自己不愿意。虽然他也曾有过自己的一些并不靠谱的想法，甚至前两天私自动用装甲车，闯了个不大不小的祸，使解放军反攻之时，这一边毫无还手之力，后悔、沮丧、绝望占据了他整个脑子，使他万念俱灰，宁愿子弹穿身倒在这儿，也不愿再去低三下四、苟且偷生，只想留下最后一点点做人的面子，或者说是作为军人的最后一点点尊严。

26.4王立上船

解放军发起总攻已经二、三个小时了。心情最激动的，大概要数西海滩上王立、董平章他们几个了。

他们站在那堆木箱、面袋旁，听着耳朵里那半空中不绝的枪炮声，望着远处不断腾起的烟雾，心里想着快解放了、快解放了。

望海山上又闪出几朵火光，卷起灰白色的烟雾，不一会儿就传来了“隆隆”的炮声。望海山国民党的阵地，又被击中了！

“他们还能撑多久啊？”王立在问董平章。

还没等董平章回话，代连长就朝他们瞪起了眼睛。

董平章也就不敢再讲话了，只是眼睛一刻也不离开望海山。

忽然，西边大河一带，枪声大作，那声音更近更密集。解放军要是从那儿来的话，没什么地形阻挡，会更快的。

“啪啪！”这几乎是耳边的枪声，子弹在头上横飞。

“啊！”的一声，孔班长胳膊中弹了，痛苦地趴在地上。

董平章他们则躲在那堆箱子后面，不知所措。

一艘小艇过来接应。代连长对董平章喊：“快上船，扶着孔班长上船！这儿没你们事了。”

董平章说：“我们躲在这箱子后面，就行了，我们就不上船了。”

代连长喊着：“别糊涂啦，这些箱子都是弹药，一打中就要大爆炸，你看我们都躲得老远。快上船，这是为你们好。”

“我们要回家。”王立喊着。

“你们有本事，你们就走。你没看见，我们已经被包围啦！到处是子弹，再晚了，你们想上船也来不及了。我们是军人，有军务在身，想上还上不了。别犯傻啦。”

孔班长也说了句：“走吧，你们不像我们，我们是没办法。你们能走为什么不走，躲过一阵是一阵。”

代连长转过身去，指挥着他那帮人了。

沙滩上已经飞溅起了被击中的沙尘。

小艇上的人大声喊着：“走不走啊？不走，我们走了！”

董平章这时拉着王立和连四娃，低声说：“唉，先上船吧，过一关算一关。”

他们几个弯着腰，扶着孔班长，快步穿过沙滩，爬进了小艇，往“济成”号去了。

这是他们第二次上“济成”号。

已经能看到解放军的红旗在西面不远的几里路外飘扬。从那儿到海岸之间，除了少数散兵，没有什么有组织的抵抗了。

方舰长又派出了一批小艇，还特地派了个副官随艇而去。

小艇靠上了沙滩，副官立即跑步见到代连长，说，方舰长请你们立刻全部撤回舰上，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代连长说：“谢谢你们，但是没有章团长的命令，我不能撤。”

副官说，方舰长是副总指挥，完全可以下这个命令。章团长已经过不来了，你看共军已经围上来了。你们是青一团唯一能留下来的人了。为了能保住青一团的番号，为了章团长的愿望，请你们立即上船。

代连长对几个士兵说：“你们赶紧走！我在这儿等章团长。我要在这儿等到最后……”说着，就蹲下来“呜呜”地哭了。

副官对兵士们说：“把他拖走！快！别看共军还有几里路，但已经没有任何阻挡了，很快就会到眼前了。”

副官说完，扭头就上艇了，机器发动了起来。

代连长被架着、哭着，一行人上了艇，走了。

“济成”号上，只有董平章几个挤在栏杆边，拍打着，叫喊着，“我们要下去，我们要回去。”

“嚷什么，嚷什么？你没看见334团在下面发了疯似地要上来。你们下去找死啊！别不知好歹。”副官说。

“那把我们放下去，把他们接过来。不是正好吗？”王立说。

副官一脸正色，道：“糊涂！方舰长说了，‘济成’号只许青一团的上，不许别人上。让你们上，实在是够意思的了。要是让334团的上来，还得了啊，连我们都要被吃了！”

董平章、王立他们几个只能眼望着解放军的红旗越来越近，自己的家已经解放了，而自己却在国民党的兵舰上，隔了这么一段海水，却难以逾越，心里就像猫爪子挠的一样疼。

方舰长眼见大势已去，已无力回天。从望远镜里看到，龙头镇的南门上已插上了红旗，望海山已被团团围住，完全笼罩在一片烟雾之中，已经看不出山石和青松。烟雾还在翻腾，火光还在闪烁，“隆隆”的炮声还在不断传来，章团长还在抵抗着。而从西面大河口来的解放军，一面面的红旗，黄色的军装，真的像黄河的洪流，浪涛滚滚，直泻而来。望海山已经被彻彻底底地包围了。

方舰长命令向望海山南坡和龙头镇南门开炮，希望能给章团长帮最后一点忙。

李策在一旁喊着：“不能啊，不能啊！里面还有人啊！”

方舰长冷冷地说：“拉下去！”

旁边的人一愣，忙把李策推了出去。

26.5直捣海边

突破了大河防线的解放军部队，浩浩荡荡地向东倾泻而来。腾营长那几个人在芦苇荡最后的表现丝毫也没能影响他们的步伐。

二十分钟后，先头部队已经抵达了西海滩。海滩上，只有几个零星的从龙头跑出来的国民党兵。海上最后的一个小艇，没顾得他们撕心裂肺的呼救，开跑了。他们只好躲在几堆木箱和布袋后面，作无望的抵抗。

涌来的解放军，没管那些木箱和布袋里装的是什么，照样不停地奔跑着射击过来。

“轰轰”，“轰轰”，又是一阵激烈的爆炸，那是成堆的弹药箱炸开了。

西海滩顿时吞没在遮天的浓烟烈焰之中。不用说那几个国民党兵，就是冲在前面的解放军也会伤亡不少。

这一切，被始终没有放下望远镜的方舰长全都看在眼里。现在，在他眼前，没有了陆地，没有了沙滩，更没有了青山，几百米远的海浪之上，便是厚厚的翻滚着的遮挡了一切的浓烟。方舰长的心惊了，也凉了。他知道章团长已经没有生路了。

大爆炸，使解放军没有沿着海滩往海角涌来，而是改为偏东北方向涌向了南港。越过南港，在前港，与从东边溃败下来的335团相遇。

335团防守从东面小河口到北面的尖山、矛山一线。他们那经得起解放军野战部队的打击，稍有抵抗便败下阵来。这时，正一窝蜂地向后逃跑，都想着能逃到海角还有上船的机会。

但是就在南港这儿被挡住了。即使是溃败的逃命，也没想到要就地坐下来举手投降。他们中间有不少人跟共产党交过手。

解放军攻到南港的时候，那上面已经有335团的士兵了。在一番浪潮般的冲击之后，南港就到了解放军的手里。退下去的国民党兵已经没有再后退的去路，却被从东面继续蜂拥退来的国民党兵又给顶了上来。南港东面的国军士兵是黑压压的一片。他们嚎叫着，做最后的拼杀。在最后的防线做最后的抵抗不行，但在夺取最后的生存希望之时，却都拼上了最后的老命。

南港上，来不及做工事了，解放军的士兵们就地卧倒，举枪射击。面对不分梯次、不顾死活、不断涌上来的国民党兵，架在港顶的机枪发挥了作用。那挺机枪不停地吼着，向四周来回扫射着。

冲上来的国民党兵，一片片地倒下。

随着机枪前面开阔地带堆积的尸体越来越多，那个机枪手竟然不安起来，脸无表情，神色呆滞，双手和脑袋随着机枪的颤抖而颤抖，一会儿就不知偏向哪儿了。

“混帐！看准了，往前打！”旁边的连长对机枪手骂着。

“もう、もうこれ以上戦えないんだ、杀された人は多すぎるんだ、私は天国にいけなくなりますよ。”（意思是：不能再打了。在我手里死的人太多了，我死了以后进不了天堂了。）机枪手用日语喃喃地说着。

这是一个当初俘虏过来没有回国的日本兵。

“去你妈的！”连长一把就推开了他，自己操起那歪把子，又“唵唵”地扫射起来。

当南港下堆积的尸体，到了难以跨越的时候，国民党兵的攻势才减弱了，而从东面追击过来的解放军也赶到了。

在被成千上万的解放军团团围住的情况下，剩下的这些国民党兵，不管是受伤的还是没有受伤的，不管是能站起来的还是不能站起来的，都成了俘虏。

至此，除了望海山上还有枪声，龙头镇和海边一线全都解放了。

第二十七章 将星陨落

1949年1月27日

望海山成了国民党军最后残存的一块阵地。

解放军从四面八方往山上冲锋。到处都是激烈的枪声，到处都是呐喊的杀声，已经辨别不出方向，已经没有可躲藏的死角。

解放军的炮弹，不断地落在山上。弹片和碎石，到处飞舞，对青一团造成了极大的杀伤。每一颗炮弹的炸开，就是一滩飞溅的血肉。

青一团的阵地，只剩下最后的二、三百米，却依然还在拼死抵抗着。

山上山下完全笼罩在硝烟弥漫之中，百米之外就是一片翻滚的烟雾，几乎分不清天上地下。已经没有一棵完整的树，已经没有一块完整的石头。耳朵里是震耳不绝的响声，眼前是不断的闪光，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和血腥味，令人窒息到难以呼吸。到处是焦黑冒烟的树枝和碎石，到处是血渍和残破的尸块和肢体，到处是挣扎着、哀号着的伤员。

望海山已经是一座战争的绞肉机。

章团长蹲在几块大石头后面，头戴钢盔，血红的眼睛，军服已经被弹片划破，额头流着血，守着无线电话机。

方舰长还在呼叫：“章团长，请赶快突围，请赶快突围！我再等你一个小时，不，我再等你一个半小时。共军炮火很快就要打到我们军舰了。你拼死也要试一下啊。”

章团长很平静地说：“方舰长，谢谢你了。我已经决心在这儿尽军人之职。何况，我也撤不出来了，离开望海山，我只会死得更快。再说，我到了黄港，下场也不会更好。”

“别这么想啊，中国人有句话，好死不如赖活啊。汪司令还有话要跟你说。”

“喂，喂，章团长吗？能听清楚吗？”汪司令的电话已经转了过来。

“汪司令，是我，章汉林。”章团长答道。

“章团长，你们打的很好，很出色。广州国防部来了嘉奖令，特授予你青天白日大勋章一枚，晋升为少将军衔。所有龙头前线官兵，都晋升一级。托你们的福，我也晋升为中将啦，嗨嗨，嗨嗨。”汪司令在电话中还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你们要坚持啊，你们多坚持一天，美国人就有可能插手，我们就多一天

有翻盘的机会。坚持啊，老弟！我已经派空军来支援你们啦！飞机都已经起飞啦，要去轰炸共军的集结地啊！老弟！空军啊，可是空军啊！”

章团长不想跟汪司令再说什么，就装聋作哑地应着：“喂，喂……”

那位汪司令还在大声重复着：“你升为少将啦，升为少将啦！”

章团长放下听筒，不再答话。

方舰长又在听筒里喊着：“章团长，你还有什么事吗？”

章团长轻轻拿起话筒：“哦，李策的妹妹上船了吗？”

“没有，她不肯上。李策还特地下船回家接她，她不肯来。她说宁死也要守着爹和娘。”

“唉，真是个烈性女子啊！……还有那个余校长呢？”

“余校长？没看见，没听说。这时候，你怎么还都想着别人呢？我叫嫂子跟你说话！”

章团长急忙贴近话筒：“晓芬！晓芬！”

安晓芬在那一头哭着说：“汉林，汉林！赶快回来吧！我不能没有你！这个家不能没有你呀！”

章团长脸有愧色：“晓芬，晓芬，我的好妻子！我这辈子，唯一对不住的就是你了。你跟着我，一辈子没过上好日子，担惊受怕，颠沛流离。今天，我们就要分手了。不是我不想顾家，是我实在顾不上自己的家。党国误我呀。

晓芬，忘了我吧，想一想这场战争中死去了多少人，我们又算得了什么。叫加法永远不要当军人，永远不要碰政治。如果，你要想我的话，你就看看这座望海山吧。

看见了青山，就看见了我。”

安晓芬哭喊着：“汉林！汉林！”

话机中，一声巨响，一下又全无声息。

指挥舱里，一下子寂静下来。几秒钟之后，安晓芬扑向话机，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起来。

苏素玉无言地抚摸着安晓芬的肩膀。

所有的人都抬头望着那远处的山，但是望不清了。近处的海滩，虽然烟雾有些散去，却依然是一片模糊的雾障，远处的望海山更是浓烟滚滚、火光闪耀、枪炮声不断。

一营的战士们，都在大河北岸集结待命。

忽然，天空中响起了机器的轰鸣声，云层下出现了几架飞机，朝着这边飞来。

纪指导员赶紧向大家招呼：“快卧倒！”

战士们急忙就地趴下，眼睛紧盯着飞机。没想到，关键时刻，国民党还拿出了杀手锏。

一会儿，飞机就飞到了头顶上，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可是，这几架飞机并没有找目标进行俯冲，而是在高高的云层下就投弹了。在飞机的肚子底下，黑黑的小点离开了弹仓，朝着地面就下来了。

黑点越来越大，好多新战士还没有经验，紧张得把身体紧贴着地面，双手紧捂着耳朵，眼睛紧盯着飞落而下的黑点。

“砰！砰！”黑点终于砸到了地上，砸出了几个坑，弹了几下，叽里咕碌地滚了起来，却并没有响。

这究竟是啥玩意？几个胆子大的，过去瞅近一看，原来国民党扔下的不是炸弹，而是石头蛋！

美国停止了对国民党进一步的军事援助，国民党连扔的炸弹也没有了。

这下，把这几个战士高兴得跳起来了，高叫着：

“国民党没弹了！”

满地的战士们也都蹦起来，跳跃着，欢呼着：

“国民党没‘蛋’了！国民党没‘蛋’了！”（蛋，北方话里是睾丸的俗称。）

连纪指导也笑得裂开了嘴，“国民党真的是完蛋了。”

望海山的国民党军只剩了最后一百多米。最后攻击的命令下达了，由一营接替二营，作最后的冲击。

令营长在河堤上振臂高呼：“同志们！先头部队已经打到海边了！国民党完蛋了！整个龙头前线就剩了望海山最后这一块顽石。整个前线部队都在看着我们，我们要拼尽全力打好这最后一仗。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有！”全营几百名官兵齐声回答。

一阵阵的怒吼从队伍中爆发：“消灭蒋匪军！”“解放全中国！”

“出发！”令营长大手一挥，全营官兵“嗷嗷”地呐喊着，冒着枪林弹雨，像潮水一样涌过大河，涌过对岸，涌上望海山，涌进浓密的烟雾之中。

国民党军的子弹毫无目标地泼洒过来，战士们毫不躲避、毫不迟疑。哪儿有枪声，就冲向那儿去，对射，投掷，刺杀。受伤了还往前冲，倒下了就往前爬，前面的牺牲了，后面的就跨过去。烟雾中，到处是令人战栗的喊杀声。

血染的红旗终于在双方拼死的搏杀中插上了望海山的顶端，在翻滚的浓烟中高高扬起！

章团长在离山顶不远的岩石后，看着漫山遍野、遮天蔽日的浓烟烈焰，不绝于耳的枪炮声、杀喊声，爆炸的闪光，翻腾而起的烟云，看着烟雾中越来越近的红旗，不由想起同样是隔山相望的两件往事。

一次是八年前，1943年9月，抗日战争最激烈、最艰苦的时候，为配合第二次长沙会战，他们第9师发起的第二次宜昌战役，打得分外惨烈。他们营抽调了五十名敢死队员，以必死的决心，身上绑着炸药包冲入敌群拼杀，最后被日寇重重围困在葛洲坝。这五十壮士，宁死不屈，不甘被俘，同时拉响身上的炸药包，在惊天巨响之中为国壮烈捐躯。当时，章汉林所部几经血战，已无力向前援救。就在几里外的山上，身受枪伤的他，眼看这悲壮的一幕，欲呼号向前而不能。

再一次是两年前，国共内战，新编74师被解放军死死围在孟良崮。他所在师已改编为第九军，奉命紧急驰援。可就只隔了一个山头，硬是打不过去了，被外围共军死死挡住。只见前方的山后，同样是翻腾而起、遮天蔽日的滚滚浓烟，只听得同样是暴风雨般不息的枪炮声，眼看着74师被消灭殆尽，欲呼号向前而不能。

章团长已经想不清，这历史的翻覆，对他究竟意味着什么。眼下，却轮到了自己，要和张灵甫同样的下场。这次是方舰长要隔船相望，看着自己的灭亡。

他忽而想起自己，想起父母，想起妻儿，鼻子酸楚，眼眶湿润。忽然近处又一声爆炸，沙石从天而降，根本没时间想那些了。

章团长摔掉了已经被飞来的石头砸毁的无线电话机。

他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

他对最后围在身边的几个人说：“你们一直跟了我好几年，我觉得很对不起你们。不但没有给你们带来金钱地位，最后还把你们领上了绝路。我一直没有下令向海边突围，现在看来，很对不住你们了。你们都是好样的，对得起军人的称号了。

我现在发布我的最后一个指令：你们自由了。你们可以突围，也可以投降，我不怪你们。那个小狗狗，谁尽点心，带着他。我自己准备尽一个军人最后的职责，殉职在这山头了。

我一生追随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想不到最后，竟至于此。”

章团长仰天长叹。

“团长，团长！”周围的人哭喊着。

“弟兄们，别哭！就算死，也要硬起来。没有时间了，各人自己行动吧。”这是章团长最后的话。

章团长话音刚落，呼营长猛地往前一站，大声说：“章团长，虽然我们失败了，但我是个军人。不管国共之间有什么是非恩怨，我也决心尽一个军人之责。章团长，感谢你这些年来，对我的栽培和信任。你不但是我的团长，也是我的师长，我跟着你死而无憾。今天是我们分别的日子，也是我们永远在一起

的日子。但我们也不要放弃最后的机会。我在前面为你冲出一条血路。如果我先倒下了，算是我对三民主义的尽忠，对你章团长的感恩。”

而后向后一呼：“一营的弟兄们，还有在的吗？我们保护章团长，一起往外冲！”

烟雾中已经没有几个人能站起来往外冲了。

呼营长拿着美式冲锋枪，大叫着，一边向前一边扫射。一股浓烟涌来，他回头大叫一声：“章团长，跟上！”

没走几步，又一股浓烟涌来。看不清呼营长的人影，只听得子弹呼啸，又是“噼噼啪啪”的步枪声，又是“哒哒哒”的机枪声，分不清是呼营长他们几个人的，还是对面解放军射来的。

枪声没有停，但呼营长已经倒在血泊中了。

冲上来的，正是大郑他们的一营。

大郑也已经杀红了眼，对着倒地的呼营长刺去。呼营长始终没有放开手中的冲锋枪，那枪最后一次响了。大郑也倒下了。

山顶的解放军，成群地迎面冲下来。

当章团长端起冲锋枪，还没来得及扣动扳机，他的身上已经连中数弹。

章团长也倒了下去。

“缴枪不杀！”

剩下的国民党军人，被团团围住，有倒下的，有举起手的，也有不知所措、或是心有不甘、动作稍有迟缓的，立即被乱枪击毙。

章团长仰脸躺在地上，又微微地睁开了眼睛。

“这家伙还没死啊。”一个战士说。

另一个战士飞起一脚就踢向章团长的脑袋，把脖子都踢歪了，头上的钢盔“叽哩咕碌”地滚到了一边。

章汉林永远地闭上了眼。

“哎，这儿怎么还有个小孩哎。”一个战士发现了躲在国民党兵堆里惊恐万分、穿着破烂衣服的狗狗。

“这小孩是怎么回事？从哪来的？”一个解放军干部问那群敌人。

那帮人都你看我、我看你，摇摇头，什么话也不敢吱声。

“一定是敌人抓来当人质的。”这个战士说。

“一定是敌人杀害了他的爹娘，把他抓过来了。”另一个说。

“一会儿把他送下去，给地方政府吧。”干部说。

第二十八章 亲人在何方

1949年1月28日

28.1 丧子之痛

战斗还没完全结束之前。

赵玫眼看着李芹死在自己的面前，一时心绪难平。

四周纷繁复杂，有国民党兵四处乱窜，有解放军战士四处追赶，有几个老百姓来回躲避，甚至还有已经缴了枪的国民党俘虏也在来回跑。

子弹还在呼啸，爆炸声还在响起。赵玫一下子却迟钝了，麻木了，不知道反应了，愣愣地站在井台边。

忽然，一声巨响，一颗呼啸而来的炮弹击中了后排的房屋。强烈的冲击波把赵玫掀翻在地下，砖瓦碎石砸了她一身，额头也破了，鲜血流了出来。她没觉得疼痛，倒是惊醒了。她一骨碌地爬起来，往家跑去。她还有她的宝宝，她的宝宝在家里。

炮弹击中的是她左面的那一家，大火烧起来了。

她家的山墙也倒了，左侧的屋顶也被掀掉了。

她冲进屋去。

屋子已经露出了天空，倒塌的房梁、木料燃烧着火苗，炕上、地下堆满了倒下来的砖石，空气中满是呛人的烟雾和灰尘。她家的山墙是砖石垒起的硬山墙，而不是泥坯垒的软墙，倒下来是要伤人的。

赵玫扑到炕上，扒开碎石，却惊呆了。

小宝浑身是血，脑壳都已经砸扁了，白白的脑浆都流出来了。

“宝宝！宝宝！”赵玫声嘶力竭地呼喊。

她抱起了宝宝，使劲地摇晃着、喊叫着。

这是怎么啦，才几分钟的时间，怎么成这样啦？天地之间，突然改变了颜色，她赵玫突然变得一无所有了。

不，她还有丈夫，爱着她的、生死不能分离的丈夫。

赵玫抱着已经死去的宝宝，发了疯似地冲了出去，向南海沿冲去，嘴里喊着：“平章！平章！你在哪里！快看看你的儿子怎么啦！”

这颗炮弹是谁打过来的，是国民党军舰瞎打，还是解放军打偏了，无从查起。虽然当时要是检验弹片是可以查得出来的，可从来没人管这些的。就说是国民党打的吧。

赵玫冲出南门，向南海沿冲去。

路上，漫山遍野都是奔跑着、呐喊着、像排山倒海一样勇往直前的解放军战士，和路边已经跑不过解放军的东一堆、西一堆扔掉武器、举着双手、低着脑袋跪着的国民党兵。

赵玫一边喊着：“平章！平章！”一边喊着：“抓国民党呀，抓国民党！”跟着解放军一起往前跑。

海角已是一片混乱。

几百号各色的国民党兵面对大海，望着远处的大船和波涛中的小船，你推我，我挤你，在蹦着、跳着、乱叫着：“快过来，快过来！”

穿着老乡服装的人，有的在喊：“快让我走，快让我走吧。共产党来了饶不了我！”

有的在呼喊着亲人的名字：“你在哪儿呀？快回来吧！你走了，家里人怎么过呀！”

海上没几个小船，而且也不敢再靠过来了。最后一只小船在岸边，船上人叠着人，船四周挤满了几十个人，连手都摸不到船梆了。

“共军来啦！”

人群像炸了锅似地乱了。

有的马上丢下武器，跪在边上，浑身打颤，嘴里不停地说着：“别杀我，别杀我……”

有的高兴得跳起来，迎上去，“同志，你们可来啦，我们可解放啦！”

有的还在四处乱窜，恨不得找个缝钻到地下去。

解放军战士们，喊着：“缴枪不杀！”朝天开着枪，以锐不可当之势，直冲到海边。有敢不老实、还想动弹的，立即射杀。

海面上，远远地停着几艘军舰和客轮，几个小划子正死命地往大船划去。

岸边的战士，端起了枪，“啪啪”的子弹追赶了过去，尽管没有多少作用。

岸上，刚才还在骚乱中的海角，顿时安静了下来。

“所有的国民党兵，举起手，往东海滩去！”有解放军干部模样的在指挥。后面涌来的解放军，已经开始押解俘虏，往东海滩走。

“老百姓，原地不动，别走开。等着由乡政府和各个村的干部领回去处理。”

扒在那小船上和围在小船四周的二、三十人，也都悄悄地、垂头丧气地按着要求走开了。

赵玫抱着死去的宝宝，在海角到处寻觅着，凄惨地呼喊：“平章！平章！快过来看看你的儿子！”

一位解放军干部过来阻挡，“原地别动！”

有位战士过来对干部说：“是她给我们带路的。她孩子被国民党炸死了。”

干部马上和颜悦色地对赵玫说：“大姐，你快回家吧！你在这儿，弄不好，别人会以为是想跟着国民党跑的地主富农呢。”

28.2海的边，天的边

枪声最后的平息了。

满山的解放军欢呼着，摇动着红旗，高擎着枪枝。

“胜利了！”

“我们胜利了！”

欢呼声从望海山上，一波波地传下来，传到了龙头镇，传到了海角，传到了东西海滩，传到了大小河口，传到了后方的山川平泊，传遍了海源的大小村庄。

战士们、乡亲们，跳跃着，奔跑着，欢呼着！

龙头前线，人们激动地相互握着手，流下了喜悦的泪水。战士们举起枪，把帽子抛上了天空。伤员们也扶着枪杆，要支撑着起来，摇晃着手臂。

胜利了！

终于胜利了！

十几个不眠的日日夜夜，十几个拼死搏杀的日日夜夜，十几个永生难忘、改变了许多人一生命运的日日夜夜，终于结束了，终于以国民党的彻底失败、人民革命的完全胜利而结束了。

最激动的要数龙头镇的乡亲们了。

总攻还没发起前，民主村的乡亲们就已经拖儿带女、肩挑手扛，出了李家泊的村口，等在解放军队伍的后面。

考虑到民主村的百姓，这些天来，体力、精力消耗很大，还有伤亡。所以，照部队和乡里的安排，除了男青年，没有动员他们支前，各自照顾好自家的家人就行了。因此，几乎所有的民主村老乡都过来了。

他们眼看着战士们一批批地往前冲锋，心绪随着战斗而起伏。他们为战士们的前进而呐喊，为战士们的倒下而揪心。当北山老乡们的担架队，抬下一个个皮开肉绽、血肉模糊的伤员时，民主村的乡亲们

痛哭着。他们知道，他们回家的路，是解放军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为他们铺开的。

当后山的国民党防线被突破，北海独立团涌过后山，而望海山还在激战时，老乡们就急不可耐地也要渡河，被干部们硬是挡住了。

望海山顶的枪声渐渐稀疏，还没有完全停息，民主村的乡亲们再也按捺不住，不顾劝阻，迫不及待地涌过了大河，朝着他们的故土——龙头镇，大步走去。

王建悟尽量叫他那组的几户前后在一起。

丁妹从大河上得岸来，依然默默地推着车，装着他家全部家当的、一大堆包袱的小车。老王头在前面拉着，不时看着左邻右舍的几家。老王家的，比不得前几天了，当了村妇救会代理主任，就不能只看着自己家，她要前后跑着，再没有停下的时候。

唐玉珍情绪很好，前面背着两个大包裹，牵着儿子长贵。十二岁的长贵也前后背着两个小包裹。

靳喜悦，由村里派的一个民兵背着。他媳妇背着大包小包跟在后面。

解放军冲上去后，小林她们也从河边撤了回来，好不容易抽空回棚子看一下，因为她知道她父亲已经年迈体弱，拿不了也走不动。她急急地拿起包袱家当扛着要回家。她父亲还是和她争着，最后是一人一个大包袱，一起往回。

李辰赶了过来，“这就要走啦？”

“是啊，没想到形势发展这么快，龙头这么快就解放了。这些天真是麻烦你了。”小林说。

“哎，海秀啊，咱们之间还用这么客气么？”

“什么咱们呀？”小林装着脸有嗔色。

“林大伯，我来帮你背吧。”李辰转向小林她爸了。

林齐心忙说：“我能扛，你还是帮海秀背吧。”

李辰又转过来对小林说：“那你们爷俩的，都给我背吧。”

小林噗哧一笑，“拿去吧。我可要去看看姐妹们怎么样了。再见！”手一挥，走了。

李辰背着包袱，跟着老林，往前走了。

所有的人，都很疲惫，但所有的人，都满怀希望，好像一个永远没有邪恶和灾难的世界就在前面。

过了大河，走上了后山。

往日的青草绿树，都烧焦了。满山满地都是发黑的、冒着焦糊味的石块、树叉、杂物，连路都没有了。半山坡的惠民寺，整个都不见了，只剩下参差不齐、尺把高的墙根。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国民党兵

的尸体，也还有一口气的，在那儿惨叫着，没人去理会。

没有像样的路了，丁妹推着小车更不容易，老王头在前面也更出力地拉着。

两人都出了汗。

老王头说：“我们走这段路，都这么难。解放军要打下来，又得多难啊！”

靳喜悦在后面，接着说：“是啊，我打过仗，我知道。这得牺牲多少战友啊。”说着，话音都呜咽了。

进得北门，人们惊讶了。往日的家园，眼前却是一片遭受大难洗劫后的场面。

满街是丢弃的、砸烂的老乡家里的东西。原先就算是缺了角的碗，老百姓还都要再用上好几年，如今，什么东西都被糟蹋掉了。几乎所有的门窗都被砸碎，满镇臭气熏天。有几处街巷被炮弹击中，房倒屋塌，烟火还在冒。

人们纷纷骂着国民党，骂着还乡团。

于村长忙喊着几个身体强一点的，先去救火。

其余的人急急忙忙地往各自的家走去。

老王头拐过小巷，路过迟得法的家门。

迟得法听见脚步声，先迎出了门外。

“啊呀，可盼到你们回来啦。都怪我手脚不灵便，走不快，被国民党堵在了里面。唉！你瞧，又遭罪，又丢人。哪像你们雄纠纠、气昂昂地，胜利归来。”

“你们更不容易啊。”老王头看他没有什么大碍，也就说着过去了。

老王头又拉着车，从胡同里急急忙忙地往家走，忽然发现在姜雪花家院子最前的台阶上躺着一个人，特地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余校长。老王头虽然和余校长从未讲过话，可是认识。

余校长此时躺倒在地上，全无往日的斯文样，浑身污垢，脏烂不堪，消瘦至极，就像个濒死的乞丐。他见老王头走近，微微睁了一下眼，竭尽全力地抬了抬手，却动不了身子；张了张嘴，想说话，却说不出。

老王头见不得别人有难，朝四周看看，后面还没有人过来，就对丁妹说：“我们先把推回家吧。他这个样子，怕是不行了，再躺在这儿有危险。”

“好。”丁妹停下车，也没多想，就卸下一些东西，放在墙边，和老王头一起，把余校长抬上车，推回了自己家。

老王头进得自己的家门，门窗也是被砸了，好像能轻一些，屋里屋外，一片狼籍。他顾不得这些，先和丁妹两把余校长安顿在炕上。

丁妹忙着再去把那条巷子里的东西推回来，再挑水、烧火，不管好赖，给余校长喝上一口热糊糊。

余校长几天都没吃上热东西了，捧着破碗，眼泪直淌。这可真是捡回一条命啊。

老王头已经里外转了好几圈。他是在看，他儿子王立有没有回来过。没有，看不出有回来过的样子。这是他是几天来，夜夜在心里叨念的事情，虽然在媳妇面前从没提起过。

丁妹虽然手不闲脚不停地忙里忙外。其实，她比老王头更急于知道王立回来过没有，现在又在哪儿。这家里，这院子里，找不到答案。真急人，可她也不好意思跟公公说。

她把院子里的杂物扫到角落。

老王头又转了两圈，停了下来，跟丁妹说：“我要去海边看看，这兔崽子还能上哪儿去。”

丁妹没回答，紧盯着猪圈看。

老王头正奇怪呢，因为丁妹从没有不理睬他的时候。

丁妹却开了口：“爹，你快过来看。这儿有一堆浮土，好像挖过的一样。”

老王头过来一看。果然，这猪圈里多年没养猪了，本来都是干的灰土，现在却有一堆新翻出来的黄土。

“赶紧往下挖挖看看，有什么？”老王头忙说。

丁妹操起了一把破锨，就往下掘。没几下，尺把深，见到埋了一包东西。

丁妹小心地拨开周围的土，拖出来一看，是一包面粉袋。上面写的是英语，看不懂。但老王头和丁妹一看就知道，这是面粉。

老王头把面袋破了个小口，用手指挖出了一点粉，在手上一捻，一闻，一舔，是上好的面粉，确定无疑。

这是怎么回事？显然，王立回来过，肯定人还在。可人在哪儿？

“我得赶紧上海边看看，说不定被堵在那儿呢。”老王头说。

“我也想去，好吗？”丁妹问。

老王头想，儿媳妇想找她自己的男人，那是理所当然的，还用说吗。按说，自己应该先跟丁妹商量，便说：“那我们一起去吧。”

两人出了南门，往前走。

到处是解放军部队，有往前走的，有往后走的，有原地坐着待命休整的。

国民党俘虏正一队队狼狈不堪地被往后押。

十几个北山的民兵拉着炮车，“呼隆呼隆”过来了。又一辆炮车拉了过来。

“这下要让国民党好看啦，就算有军舰也跑不了啦。”路边有人高兴地说着，大家还拍起了巴掌。

鲁队长领着一队民兵，每人扛着一箱炮弹，虽然热得头上是汗，却是喜滋滋地往前赶着。

“王大伯，上海边去啊？”鲁队长还跟老王头打着招呼。

老王头心里挺不是滋味，一样是民兵，人家都在高高兴兴地打敌人，可自家儿子怎么没了影呢？

“我去看看王立这小子到底在哪儿，家里还是没见影，能上哪儿去了呢？你到了海边，也帮我打听打听啊。”

“好，那是肯定的。大伯，你也别太着急，还有董平章、连四娃他们好几个，都还没见到呢。他们肯定都在一起的。”

说着话，于村长也从后面上来了。

“村长，你也来啦。”鲁队长说。

“是啊，部队通知各村到海边去，有批穿老百姓衣服的人被部队围在海边。里面有真的老百姓，被国民党押着扛东西的，有跑出来躲避炮火的，也会有脱了军装的国民党兵，也有地主还乡团想跟着国民党往外逃、没逃成，混在里面的。叫各村把自己村的领回去，就清楚了。”

“那样，陶富贵那批人就跑不了啦。”鲁队长高兴地说着。

“村长，你再看看王立他们会在里面么。”老王头赶紧接上说。

“是啊，我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事呢。他们几个这下也可以熬出头了。”

他们到了海角，那是海的边，不能再往前去了。

海角的那片礁石堆，还真有一些人呢。

村长先看到了在人群外面、坐在地上的赵玫，十几天不见，几乎都认不出了。她头发蓬乱，神情呆滞，脸颊消瘦，身上沾着血，还抱着已经死去了的孩子。

村长忙喊着：“赵玫，赵玫！”

赵玫看见了村长他们几个，一下就失声痛哭：“村长……呜呜……村长……”

“怎么啦，赵玫？”村长他们忙问。

“儿子死了，董平章又不见影，房子也被炸了，叫我怎么过呀！”

“别着急，村里一定会帮你想办法的。你先回去吧。我们就是来找平章他们的。”

旁边一位解放军干部说：“你们是她那个村的吧？你们要好好表扬她。她受了那么大的难，还不顾孩子安危，为我们部队指路，从镇里一直跑到海边。她是第一个带着部队跑到海边的老乡。”

“是啊，赵玫她就是我们村里的干部，什么事，都是走在头里的。我们一定会向乡里汇报这事。”

村长拍拍赵玫，说：“那我们再往前走走，看看还有没有我们村的人。你先回去安置一下。”

老王头问：“孩子不行了吧？怎么会这样呢？”

赵玫点点头，说：“叫国民党炸的。”

丁妹过来扶着赵玫，没说话，眼里噙着泪，心里有着同样说不出的痛楚。

他们怀着最后的一丝希望，朝西海滩走去。

西海滩也是一片嘈杂的人，精神振奋、来来往往的解放军，垂头丧气、目光呆滞的国民党兵，远望大海、神情各异的老乡们。

老王头、赵玫、丁妹也在焦急地走着、跑着、喊着、四处张望着，而一无所获。面对茫茫大海，也只能一筹莫展，一步也不能往前。

对他们来说，海的边就是天的边。

他们绝没想到，后面的路，会是怎样的艰辛。

第二十九章 仓惶逃窜

1949年1月29日

29.1沉入海底

解放军的六门山炮，很快都架到了海角前沿。

第一炮就打向了“济成”号。虽然没有命中，可就落在舰首不远处，飞起的海水，溅到了甲板上。

方舰长还一直定神地用望远镜看着望海山，没料到解放军这么快就来这一手，着实吓了一跳，赶忙下令：“转舵，转舵！后退！开炮还击！”

他知道海角近海已经呆不住了，得往后撤了。

“济成”号毕竟动力足，反应灵便，在第二批炮弹飞来以前，就驶出了山炮的射程之外。

罗团长在“福隆”轮上。当散兵和其他人等大批涌到海角时，他还上甲板指挥了一阵，让334团的人上来了一部分。没多久，就发现苗头不对，解放军的红旗竟然出现在了视野里，他都看见解放军的队伍漫过了前港。他马上跑到船长室，强令船长赶紧驶离海岸。

“福隆”轮的左舷挨了一颗炮弹，烟火燃烧了起来。船上一片惊慌混乱。

在汽笛的惊叫声中，“福隆”轮扭扭歪歪地先跑了。

陶县长在“福泰”轮上。从一上船，他就找了个上等舱，锁上了门，和戚助理两个整理着带上船的那两袋材料，看看里面有多少值钱的东西，心疼着丢失了多少更值钱的东西，全然不顾外面还可能发生的变化。他在想，他都已经到了海上了，共产党的手再长，也摸不着他陶某人的后脑勺了。

“福泰”轮猛烈地震动了一下，陶富贵都没去在意。又震动了一下。

陶富贵正在为少了那么多的书面凭证而烦呢，心想着不好好开船、在干嘛呢。

窗外的走道上，很多人在跑、在拥挤着。陶富贵对戚助理说：“门锁好了吧？别让那些兵挤进来。他们进来，还得了啊。”

戚助理答：“锁好了。”

陶富贵又安心地点起他的单据来。

忽然，脚下的地板怎么斜了起来。

“哎，哎！这是怎么回事？”陶富贵说着。

陶富贵不知道，“福泰”已被击中二发炮弹，船体破裂，正在迅速下沉。

“福泰”轮的汽笛凄厉地尖叫着。

船上的人，狂叫着，争先恐后地又一次抢夺能爬上挂在船顶的小划子的机会。在他们中间，不知道还有几个能重新回到岸上。

理应坚守到最后一个离船的船长，却第一个上小划子跑了。

唯有陶富贵还在担心外面的人别挤进来，还在奇怪这地板怎么越来越斜，叫人坐不住了。

直到窗外没有了人，直到海水从门缝里喷射进来，陶富贵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他扑到门口，使劲地扭动着门锁的把手。可是他忘了该怎么打开，他使劲地拍打着门板，嚎叫着，虽然即使开了门也无济于事了。

眼看着海水已经淹没了窗玻璃，上等舱里暗淡了下来，就像在墓穴里被盖上了最后一块石板。

海水淹到了肚子，淹到了脖子，淹到了鼻子，淹到了舱房的顶板，而脑袋却无法再升高。

昏黑的舱里，已经看不清陶富贵最后惊恐万状的眼神，只听见他拼命地拍打着舱板，手里还捏着一大把字据，“咕噜咕噜”地喝着海水，心里还在想着：“我的一百三十四亩地呀！我的二百亩山岚啊……”

陶富贵最后像只灌满了肚子的死耗子那样，鼓得涨涨地，浮在漆黑的舱房的顶板之下，永无天日。

他的尸骨的最后下落，要等到本书的最后一章。

还想说一句的是，人类历史上，死难人数最多的沉船事件，不是“泰坦尼克”号。

29.2 凄然离去

方舰长看着“福泰”轮先是渐渐地倾斜，最终被轰然掀起的巨浪彻底吞没，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对岸的枪炮声已经平息，硝烟正在缓缓散去。

他对安晓芬说：“嫂子，我们等不上了，我们要离开那座青山了。”

安晓芬早已泣不成声。她多想再多等一会儿，她多想永远等在这儿。但是她也知道不能拖累别人，她也看见那“福泰”轮冒着烟火沉到了涌起的海浪里，最终只剩下几个泛起的泡沫。可她又说不出要甩下丈夫的话，只能伏在轮机上低泣着，朝方舰长扬了一下手。

方舰长下令：“以三十节航速驶离，方向西南南。继续炮击海岸。”

“是。不过炮弹已所剩不多。”副官答道。

“炮弹全部打掉，一个也不要剩。留着干什么？”

“是。”

“济成”号的汽笛低鸣着。

在舰炮的轰击和轮机的隆隆声中，“济成”号加速离开了。

青一团来海源的一个营又一个连，只剩下代连长、孔班长这十几个人回来。更不用说334团和335团了。

指挥舱里，一片沉寂，只听见安晓芬的哭泣。

甲板上，董平章、王立他们可是不干了。

董平章哭着说：“让我们下去吧，我们要回家。”

代连长说：“我们都是身不由己啊。跟了船走吧，到了黄港再下吧。愿意的话，到我们营房，我给你们吃顿饱饭，再带上点干粮，自己走回去吧。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咒念呢，唉，都是不容易啊。”

太阳快要下到西边的山顶了，成了一个橙红色的火球。火球的四周，是亮亮的橙黄色。再四周，便是血红的一片。整个的天空，连同那飘在夕阳上的片片云彩；整个的大地，连同那层层叠叠连到天边的山峦；整个的海洋，连同那从天边不断涌来的波涛，都是血红血红的一片。

在这大海和天空的一片血色中，“济成”号铁灰色的轮廓渐渐地模糊了，隐没在了晚霞中，永远地离开了海源的这一片波浪涌动的水域。

29.3青山尚在魂安在

本书也许讲述不到21世纪的事情，但还是想提这样的一件事。

四十多年以后，已经七、八十岁高龄的安晓芬，怎么也放不下她的章团长，怎么也忘不掉他的那句话：

“看见了青山，就看见了我。”

和方舰长已是儿女亲家的安晓芬，跟方家，都定居在美国的旧金山。那是到台湾之后，方舰长，方茂名，想起了查理，几经周折找到了他在旧金山工作的航运公司，在那儿打个下手，后来也当了个船副，便把全家都搬了过去。经过了早期的艰难困苦之后，以后的二、三十年，应该说是衣食无忧。

可她，安晓芬，却时时忘不了那座青山，和留在青山上的章汉林。

不顾亲家和儿女们的劝阻，在21世纪初的一个年份，她在黄港东区买了套房，有时一个人回来住。觉得和永远离开了、却时时在身边的亲人要近一点。她要陪着在青山上游荡的章汉林。

二零零几年的一天，她领着加法、小玉、孙子，和旧金山当地的白人孙媳妇露西，跨洋越海，万里迢迢，登上了望海山。

接待她们，领着她们一起上山的，正是本书一开始到南港通知王山大爷台湾来了信的林李，她现在已经是在龙头镇外办的主任。

如今，望海山上早已看不到那场战争的任何痕迹。天高云淡，山风飒爽，青松挺立，草木葱茏，望海山的景色多么的宜人。只有山脚下的烈士陵园，还能提醒人们当年的惨烈。

安晓芬在儿孙们的搀扶下，来到山顶。

山顶上，风在吹着，云在飘着，树枝在轻轻地摇着，松涛在“呜呜”地低鸣。

可何处是章汉林的归宿呢？安晓芬跪倒在一块岩石旁，潸然泪下，低声地说着：“汉林，我回来啦。你听见没有？我回来啦，领着你的孩子回来看你啦……汉林，你的孙子也都成家啦……你在天堂里，放心吧。”

加法、小玉和孙子也都跪下。

孙子看露西有点迟疑，便说：“Lucy, kowtow to your great-grandfather.”（露西，给你爷爷跪下磕个头吧。）

哪知她却一撇嘴：“No, I shouldn't. People shouldn't kowtow.”（不，我不跪。人是不能跪的。）

露西拿出一袋远隔重洋带来的各色花瓣，抛向空中，纷纷扬扬，姹紫嫣红。曾经血迹斑斑的草地，这一刻，飘落着七色斑斕、五彩缤纷的花雨。那样的艳丽，那样的芳香，那样的赏心悦目，那样的使人感到欣慰和愉悦，恍若是换了个世界。

第三十章 庆祝胜利

1949年1月30日

30.1 庆祝大会

解放龙头的第二天。

李辰一早就过来看望海秀，听说余校长在老王头家，就先去看望了校长。见校长两眼汪汪，落得这个样子，李辰也伤感不已。赶紧去找了经乡长，希望乡长报告县教育局，快把余校长接到县医院去。

经乡长也直说，这事乡政府考虑不周，答应马上就报告县里。

李辰这才来到林海秀的家。他知道小林自小就没了母亲，父亲的身体又不是很硬朗。昨天，他是在忙自己村里的事，听说海秀带头跳进河里搭人梯让解放军冲过河去，敬佩得不得了。才找到她父亲林齐心，帮他一起回的民主村，看到她家里被弄得一塌糊涂，有一间的屋顶都已经被烧掉了，有很多活要做。所以，一早就主动过来了。

小林看到李辰来，当然是很高兴，不过嘴上还是要问的：“你怎么过来啦？”

“哎哟，这么多的事情，你们爷俩要忙到什么时候啊？我们村也没多少事，我来一起帮着干点吧。”

“那要谢谢你了。不过，今天还真要你来帮忙。”

“还有什么事吗？你说。”

“今天傍晚，要开庆祝大会。经乡长叫我领着喊口号，给了我一个单子，可上面我还有一些字不认识呢。”

“这好办，拿给我看看。”

小林递过来一张纸。

“哪个字不认识？”李辰正好能往前凑近乎了。

小林也没有表示异议，说：“你看这打倒国民党和打倒蒋介石，我就分不出哪句是哪句。”

“这好办。打倒，这两个字，我教过你了，还能记得吧？”

“嗯。”

李辰更靠近了点，从小林手里拿过纸，又从自己上衣口袋里掏出笔，在蒋介石的后面画了个光头，在国民党的后面画了个狗牙旗，说：“这下能明白了吧？”

小林喜笑颜开地说：“行，行，这下行了。”

李辰又说：“到时，我蹲在你身边，轻轻地喊着，你就能听见了。”

小林望着李辰满意地笑了，便接着说：“经乡长还说了，叫我们俩准备个文艺节目。过几天，还要开个全乡庆功大会，叫我们上去表演。”

“那太好了。没说叫我们演个什么节目？”这事可叫李辰更高兴了。

“说是演那个两个人唱的，叫‘兄妹开荒’？你会么？”

“我会。这是咱们解放区常唱的一首歌。”李辰还真开口唱了起来：

“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唱，

唱得果树长满了坡，

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呀，

为什么……”

“看把你美的，能的。”小林在笑话他。

可李辰非但没觉出来，话还没完呢，接着又说：“要是改成唱‘小两口开荒’，那就更美了。那我们就成了新中国第一对小两口了。”

“又想到哪儿去啦！”李辰的后脑勺挨了小林不轻不重的一巴掌。

上午。

南门外的营房里，令营长和连长们商量晚上庆功会的事。

“立功的名单，我们团里就可以定。名单已经批复了，晚上就可以宣布。战斗英雄、战斗模范，等军区、师部批复后再说。”令营长在说，“关于烈士的名单，现在就是看小钱的问题，怎么处理？”

“我始终认为胡指导对小钱的审查，是不对的，是莫须有的。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时，从小钱身上找到的他给他父母的遗书。营长，你请看一下。”纪指导员很仔细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血染的纸，递给营长。

营长拿起这看起来薄薄的一页、却重似千斤的这张纸，认真地看了起来：

“爹、娘：

儿在此写这封信，心情难平。

国民党反动派这次进攻，占了龙头镇。我随部队后退，不巧走散了，在野地里躲了三天，昏倒在地。被孙家乔孙大爷救起，又在他家住了三天。为了掩护我回部队，孙大爷还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可我回队后，连队的胡指导员硬是不相信我，硬说我是投了国民党、是派回来搞破坏的，还要叫我写检讨、揭发同伙。可我写什么呢？

爹娘，我冤呀。

我知道是地主国民党压迫咱们家，是共产党救了咱。我怎么会去投国民党呢？孙大爷也牺牲了。我死了，也说不清了。难道孙大爷也要这样白死吗？

爹呀，娘呀。我满怀高兴地代（戴）上大红花，离开你们参了军。你们送我到了村口，送我过了山头。我也一心一意要干革命，为你们争光。可我现在怎么对你们说呀。

为革命，我不怕流血流汗，甚至准备牺牲生命。可谁知道参加了革命，还有这些事呀。

爹呀，娘呀，我该怎么办呀。我实在写不出检讨，我只能给你们写信了。

我不知道你们还能听到我的话吗？

冤呀，冤呀！”

令营长看过，长叹一声，“我们党内的‘左’倾路线伤害了多少好同志啊！这样的信，我们怎么给他父母去看？！这样吧，小钱定为烈士，晚上该宣布先宣布。同时也报团里。”

潘连长接着说：“还有杨定神呢。算什么呢？算烈士，还是俘虏，还是解放兵？死了，也得给人家一个说法。”

“我没看到你们连里报来杨定神的材料。”令营长说。

“唉，这个胡指导，人家是为救他而死的，他倒连个材料都没报，怎么能这样呢。”潘连长说。

令营长说：“那你们赶紧补个材料吧，看团里批不批。”

傍晚，在东门外的学校操场召开龙头镇军民庆祝胜利大会。

按惯例，老王头都是自己一个人代表全家出来开会。今天，也是这样，他出来，丁妹在家收拾。

老王头走在街上。

才一天的时间，污烂不堪的街巷干净多了，垃圾一堆堆地扫在路边，不过一时还是难掩满目的疮痍。

人们的心情，既是高兴的，打败了国民党；又是沉重的，家园被破坏成这样，更有的家破人亡。

老王头的心里，也是这样。他低头走着，心事重重。

昨天，和丁妹、赵玫又去西海滩找了一大圈，都没有影，甚至都没打听到下落。难道真的被国民党抓走了。

他低着头，没敢往下想。

“老王啊！”倒是于村长先看见他，打了招呼。

“哦，村长啊。”老王头答应着，可还是焦急地问着：“王立他们还是没有下落吧？”

“唉，看来是被国民党抓走了。”

“啊呀，这怎么办哪？这日子，往下怎么过呀？”

“困难是会有有的，不过，我想，政府会想办法的。很快全中国都解放了，王立他们肯定会被救回来的。唉，这帮王八蛋国民党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烂事。”

会场在学校的操场上。

龙头镇四个村的百姓，和一营的战士们都来了。一营还是驻在南门外。

大会由令营长主持。

令营长在讲话：

“同志们！乡亲们！我们终于彻底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中央军委在5月28日发出指示，要求我们全军提高警惕，防止敌人从海上袭击骚扰我们的后方沿海。我们在龙头这一仗的胜利，正是响应了中央军委的号召，完成了军委的任务，彻底粉碎了敌人的企图！

从全国范围看，人民解放军不但解放了南京、上海，而且正向浙江、江西、湖南各省全面挺进。蒋家王朝的最后覆灭，为时不远了！”

下面掌声四起。

小林在主席台边，领着呼口号：

“打倒蒋介石！”

“解放全中国！”

全场也跟着响起了一阵阵激越的口号声：

“打倒蒋介石！”

“解放全中国！”

李辰还真蹲在小林的身边，小声地提示着。

令营长接着说：“在我们龙头战场，经过全体军民十几天的浴血奋战，消灭了包括他们姓章的总指挥在内的三千多名敌人，这将大大加快我省革命战争的进程。黄港的解放，也就是这两、三天的时间了。”

全场又是一片欢腾。

小林又领着呼起了口号：

“人民解放军万岁！”

“人民革命胜利万岁！”

“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的部队英勇顽强，打的非常出色，涌现出了许多英雄事迹。我们一营，光连排干部就牺牲了七个，有普指导员、顾排长、郑排长……牺牲的战士在百人以上。这里，我要特地说明一点，小钱，钱思富同志，是个好同志、好战士，前几天对他的审查是不对的。同时，我们的乡亲们，也付出了巨大牺牲。有姜雪花烈士、祖大爷俩口、孙大爷……等等。”令营长的话，有些低沉了。

小林又不失时机地领起了口号：

“向革命烈士致敬！”

“为革命烈士报仇！”

“经过师部的批准，我宣布，下列同志立功一次。战斗模范和战斗英雄，正在上报军区 and 前指。”

令营长宣读了一长串名单。

立功的战士们依次上台，戴上了大红花。

令营长接着又宣布：“经海源县政府批准，下列同志为‘保卫家乡模范’，请念到名字的同志上台领奖。”

民主村的不少人在里面，从鲁队长到平金刚、秦德才，高高兴兴地上台戴上大红花。

也有小林的名字。小林就在边上，有点惊讶，“还有我啊？”

李辰忙推着她，“快上去，快上去！”

也有赵玫。

赵玫站在上面，脸色悲切而又刚毅。

念到于村长的名字，于村长忙对令营长摇摇手，说：“我就不上去了吧？”

“上来，上来，怎么还不好意思得像个新媳妇。是模范，就得上来。”令营长弯着腰要下台来拉于村长。

于村长忙不迭地走上前去，差点儿还闪了下。

大伙反倒是哈哈地笑着，会场上又是一片欢腾的景象。

颁奖结束，令营长接着讲话，又恢复了坚定的语气：“我们还要讲到对敌人的打击和惩罚。烈士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陶富贵，让他跑了。但他的变天账，被我们缴获了。这儿有他的地契，有他的帐。龙头镇的贫雇农欠他的钱，欠他的税，他都一笔一笔地记着账。我们看了下，有好多都是他胡编的。那些单子，足足装了几箱子、几袋子。现在我们把它拿出来都烧了。”

“好哦，好哦！”

主席台前，让出了一小片空地。鲁队长和几个民兵扛来了那些箱子、袋子，倒在了地上，点上了火。

火苗越来越大，火焰卷了起来。一张张、一叠叠的纸据瞬时被火焰吞噬，纸灰腾空飞起。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象征，也就随之灰飞烟灭、无影无踪。

乡亲们站起来，笑着，叫着，跳着。地主阶级妄想靠着国民党试图再次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明明白白地在自己眼前、在千百人的大庭广众之下，又一次地砸碎了。

火光映照着人们兴奋的脸。

令营长又说了一句，全场人群的精神立即集中了起来。

“陶富贵跑了，可我们还是抓住了活的。北山跑过来的地富，已经交给了当地的乡政府处理。我们抓了个海源县还乡团的总头子，所谓的清乡大队的余大队长。带上来！”

余“队长”五花大绑，被秦德才拖了出来。

人们纷纷伸长了脑袋，想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

那余“队长”早已脸无人色，浑身稀软，搭拉着脑壳，像一只等待宰杀的瘟鸡。

赵玫一眼就认出来了，跳起来叫道：“钉死姜雪花的，就有他！”

平金刚也抢着说：“杀死祖大爷的，也有他！”

令营长愤怒地拍着桌子，高声宣布：“判处余犯死刑，立即执行！”

秦德才早就手握一把铁锹，大叫一声：“我来！”把余“队长”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提溜就走，还没出会场，就在人群边上，一脚就把他踢倒在地。秦德才此时扬起铁锹，朝着余“队长”的胸脯就打了过去。那姓余的，“啊”字才出来一半，就立时毙命了。等把铁锹抬起来，几根断裂的肋骨已经刺破皮肤，露了出来。

秦德才还不解气，连拍几下，弄得血肉飞溅，吓得旁边的人赶紧躲开。

“行了，行了。”有人说。

秦德才这才把地下的尸体，拖了出去。

30.2 乡长讲话

令营长接着往下讲：“还有一个好消息。随着解放区的扩大，新区需要很多干部过去工作。我们的经乡长，经大臣同志，要到南方去担任副县级领导，这一两天就要到省里去集训了。龙头乡乡长的岗位，由大家都熟悉的纪指导员，纪海洋同志，按副营职就地转业担任副乡长、代乡长。财粮干事大程，程贵安同志，已经调到县里当副科长啦。下面请经乡长讲话。”

实际上，经乡长调去南下这事在国民党反攻以前，上级就已经定下来了。不过是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战斗给拖了下来，现在才通知。

经乡长刚接到组织的通知，调他去上海，也没有思想准备。他知道他的沉稳，并不招人喜欢。这两年提拔调走了多少干部，都没有他的份，他也早就不想了，在龙头也挺好。上海对他来说，是个陌生新奇的地方，他只听说过几个并不真实的片段，想都想象不出来，还要去开展工作，这可是难了。再有，他对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总有些自己的看法，甚至为此受到过批评，难道现在是被容许了，说的是对的了？他还没有想明白。家里怎么安排呢？上级也没说。会场上的掌声，使他回过神来，走上了台。

经乡长说：“感谢上级领导对我的信任，感谢各村父老乡亲长期以来对我工作的支持。这几年来，我深深感到，我们的胜利来之不易。为了胜利，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些代价，有的是因为敌人的凶残，这是必须要付出的。但有些代价，却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失误，或者是因为我们的水平还有限，可以避免而没能避免。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更加讲原则，讲政策，讲程序。哪怕是在严酷的斗争中，我们也要讲民主，减缓社会的震荡，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矛盾。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到我们的革命运动中来。

刚才那个姓余的，要杀，该杀，但是杀早了。有些事还没来得及问，就杀掉了。姜雪花的遗体在哪儿，我们还不知道，就把敌人杀了。这十几天发生了哪些事，好多，我们还不清楚。现在去问谁？敌人，也有敌人的用处。我这样讲，恐怕有人又要说我是‘富农路线’、‘温情主义’、斗争不坚决。不是的，我这是叫更广泛的群众路线。让最多的人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尽可能地减少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减少中间群众对我们的疑虑。”

这些话，在当时的老百姓，是很难听到的。一时竟不知道拍不拍巴掌。

小林也不知道该呼哪句口号了，看着李辰。李辰也愣在哪儿，不知所以了。

令营长多少知道经乡长讲的意思，也不便再加解释和发挥，就接着说：“下面请纪乡长讲话。”

纪指导员对于转业到地方政府，也没有思想准备，他觉得自己在部队干了这么多年，也都习惯了，对地方工作并不熟悉，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干。当然他对龙头这块土地、对这里的干部群众是喜欢的，是有感情的。那是他和他的战友流血流汗，甚至留下生命的地方，和这里的老百姓可以说是血肉相连。组织这么决定，他没有二话，坚决服从，只是在想下一步怎么去转换思路，做好地方工作，只有多学习了。

纪指导员上来，开始了作为乡长的第一次讲话：“同志们！龙头镇的乡亲们！很高兴，今后我们就在一起工作了。”

纪乡长宏亮的声音，引起了会场上一阵热烈的掌声。没有人领头，满场都在此起彼伏地喊着：“纪乡长好！欢迎纪乡长！”乡亲们就像是在迎接一个最熟悉的亲人，那么地高兴，那么地真诚和自然。以至于以后多少年里，大家都在喊“纪乡长”，并没有谁去注意他在哪年正式转成了乡长。只有财粮干事程贵安站

在台下，听着不是滋味。他在想，经乡长走了，好不容易有个空缺，怎么没提他呢？上级怎么没想到他呢？怎么会去提个八竿子打不到的纪海洋呢，他们部队干部懂地方工作吗？前两天才是个排长，却连跳好几级，当了乡长。而自己才给了个副科长，一阵阵的失望，掠过程贵安的脸皮，和今天这大会的激情颇不协调，好在没有人注意到他。

纪乡长接着在讲：“刚才，经乡长讲的话，我很赞成。赶走了国民党，我们就要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就要诞生了。

在这个新的国家里，我们将要实现人人民主平等、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大家都像兄弟姐妹一样，一起劳动，一起生活。烈士的鲜血，千万人几十年前赴后继的奋斗，今天终于迎来了胜利的结果。

但是，眼下，各项任务，还都很艰巨。我们身上的担子，只会更重。就拿现在来说，我们有多少事情要做。当前的工作重点，我想应该是：稳定思想、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大规模的、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就要告一段落。今后，我们要着重解决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的具体问题。

我们商量了，为了解决乡亲们眼前的问题，每一户先发十斤粮食。房子被烧了，眼下没法住的，先住到学校里。各家各户，组织起来，相互帮助，共渡难关。要照顾好烈属、军属，尤其要关心、照顾好被国民党抓走人的这几家，他们是国民党反动派最直接的受害者。让我们团结起来，努力奋斗，共同建设起我们的新家园！建设一个人民民主的新中国！

如果我们建设不好我们新的家园，建设不好我们新的国家，那我们就对不起牺牲了的烈士。让我们振奋起精神，迎接新的任务。”

末了，纪乡长对林海秀挥手说：“小林啊，来，大家一起唱一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海秀忙说，好。

她第一次面向大家，也挺大方地打起了拍子：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预备唱！”

全场响起了歌声，这歌声唱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

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

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

他坚持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

他建立敌后根据地，他实行民主好处多……

实行民主好处多……

实行民主好处多……”

嘹亮的解放的歌声，久久地回荡在又一次获得了新生的解放的大地上。

30.3海秀入党

散会后，海秀领着赵玫往家走。海秀看赵玫遇到这样的难，房子被炸了，孩子死了，丈夫又被抓走了，还在那屋里实在没法过，昨天晚上就叫赵玫过来和自己一起住。

海秀胸前戴着大红花，一边走一边兴奋地说着：“太好了！赶走了国民党，又是解放区的天了。”

赵玫手里拿着大红花，走着说：“总算又等来了今天。”

进了院子，海秀爹还没回来呢。没等海秀摘下花，街门外于村长就喊上了：“海秀啊！”

“哟，村长啊，快进。”海秀招呼着。

于村长进了院子，见赵玫也在，就说：“你俩都在，正好告诉你们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喜事。”

“什么呀？”海秀依然兴奋地问着。

“海秀啊，乡党委根据你的表现，已经批准了你的入党请求，今晚上我们村党支部就举行你的入党仪式。”

“哦，太高兴了！”海秀兴奋得都跳了起来。

“这是你这些年来努力工作的结果呀。赵玫啊，海秀原先的入党介绍人是姜雪花。现在你来当她的介绍人，今晚的会上，你向支部介绍一下海秀的表现。”

“好的，好的。海秀这些年确实很不错，是个好同志。”赵玫说。

小林的声音低沉了一下，说：“雪花姐临出发前，还跟我讲过，鼓励我继续努力。我原以为雪花姐牺牲了，这件事要搁下来了。”

“不会的。我们每个同志的表现，党都在看着呢，组织会记得的。”

“这批还有谁入党啊？”赵玫问。

“还有平金刚。哦，还有个大事。我们党员要公开身份啦，今天晚上的会，可以让乡亲们都知道。”

“是吗？革命胜利了，还真有新气象啊。”赵玫说。

“是哎，我要求入党好几年，可是不知道村里还有谁是党员。一直在猜，这个可能是，那个不太像。”海秀说。

“你猜还有谁会共产党员？”赵玫问。

“你们俩肯定是，雪花姐就更不用说了。还有谁呢？经大姐？可她不是我们村的，不能算。彭会计？有可能。鲁队长，一定会是，他也那么积极。”

“你猜得倒是差不多。还有出去支前的杜家骏，还有秦德才。”赵玫说。

“还有他啊？”海秀有点诧异。

“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革命队伍里也是什么样的人物都有。以后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于村长说，“今晚上的会，最好有一面党旗，我带了块旧军装上的布片，黄颜色的，可以做镰刀斧头，可就是没有红布做旗子。”

海秀想了一下，说：“我有，我有件去年做的小红褂，还没舍得穿过呢。”

赵玫笑着说：“那是你准备出嫁用的吧？”这是她几天来第一次有了笑容。

海秀一推，说：“去。我是党的人了，我把自己嫁给党了。”

于村长也笑着说：“党有这么个好闺女，也会高兴的。今晚上的党员会就在你这儿开吧。”

海秀更高兴了，她知道组织是多么地信任她。

赵玫在一边淡淡地笑着。

于村长见赵玫情绪一时难以转过来，挺关心地说：“你没有别的事吧？要坚强啊，赵玫。有什么事，尽管跟我于大叔说。你可以把我当作同志，可以把我当作村长，也可以把我当作大叔。无论哪个角度，我都应该帮助你，有事尽管跟我说，啊？”

“没什么事，你放心吧，村长。这个坎，我能过得去。”赵玫咬了一下嘴唇，很冷静地说着。

“你在海秀这儿住，挺好，我就放心了。我走了。”

海秀和赵玫把于村长送到门口。

村长走了以后，海秀就连忙翻箱倒柜，找出了那件小红褂，轻轻地摊开，又拿在身上比了比。

赵玫看出海秀的心事，就说：“不舍得了吧？”

海秀一笑，说：“哪是不舍得，我是在看大小合适不？为了革命事业，牺牲了这么多烈士，我们还有什么可还舍不得？”

“是啊，为了革命胜利，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赵玫说。

海秀放下褂子，就用手把它撕开了。

“哟，怎么撕啦？”赵玫问。

“没有剪刀，只能撕了。”

“唉，我们连把剪刀都没有了。”赵玫好像还是有点伤感。为了革命的胜利，赵玫几乎是一无所有了，这点伤感，应该是好理解的。

“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在海秀的心里是一片向往、一片阳光。

“是的，是会好起来的。但是革命胜利以后，也还会有困难，也还会有斗争。”

“是哎，地主、资本家、国民党是不会死心的，他们还会来搞破坏的。”海秀有点忿忿地说。

“不只是地主、资本家，革命队伍内部也会有矛盾、有斗争。”

“是吗？”海秀有点迷惑地问，“刚才大会上经乡长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我说的，也有点他的意思。”赵玫说。

是的，不认识多少字的一个农村妇女赵玫，能想得那么远，真的是很难得。她对她自己的命运难道有预感吗。

第三十一章 千万里兮，不归路

1949年1月31日

31.1 永别黄港

“济成”号在海上搜索了几圈，除了被击沉的“富泰”轮，确认其它的舰船都已经走了。茫茫大海里，“济成”号已经成了殿后，便急急忙忙地穿行，赶往黄港。

途中，方舰长接到了汪司令的电令：美军已撤离，共军随时会进城，为坚持长期作战，命“济成”号星夜兼程，到黄港码头接司令部上船。

方舰长看到电令，只是从鼻子里出了点气。

拂晓时分，“济成”号缓缓进入黄港港区。

方舰长命舰只暂勿靠岸，弄清情况再说。

果不其然，码头上一片混乱。不知道是怎么知道的“济成”号要回港的消息，码头上挤满了想要上船逃命的人群。从岸边到港区的各条马路，到处都是见首不见尾的人潮，黑压压的何止是一片。有穿着军服的国民党官兵，有衣冠楚楚的达官贵人，有拖家带口、背着扛着的小市民，还有拄着拐杖、裹着绷带的伤兵。这时，谁也顾不上自己的身份，男女老幼都紧紧地挤在一起，头发被汗水沾湿，眼神是万分的焦急，衣服被上下左右牵扯得都走了样。人群的嘈杂声，在舰上都能听见。

先期抵达的那艘登陆舰停靠在码头的一侧，上面已经挤满了人。不只是甲板上，人挤人，人摞人，插脚的地方都没有。连窗框上、栏杆上、甚至桅杆上，都爬上了人。连结舰只和码头的梯架上，人群更是挤得气都喘不上。显然，这艘舰只已经根本不可能起锚离港了。

屠主任带着他的一家，领着他的太太，牵着他的女儿，后面跟着他的老爹，早早就赶了过来。现在凭着他的海军服，已经挤到了码头前的第一排，多少有点让他感到庆幸。

他正在朝着“济成”号使劲地挥着他的海军帽，巴望着方舰长能看到他。他们可是事先有约的呀。

“济成”号鸣了一声笛，似乎是有了反应。

码头上的人群看见“济成”号进了港区，好像天上掉下了救命稻草，便一起狂躁起来，争先恐后地往前推挤。人们被这潮流裹卷，向前涌动，甚至脚都碰不着地。

悲剧发生了。在码头岸沿最前面的一些人，刹不住脚，竟然被后面的人潮从高高的水泥岸沿上挤下了海。

好几个人，就像下饺子似的，“噼哩噗噜”掉进了海里，在阳光还没照来的黑暗的海水里挣扎。

屠主任站在岸边的第一排，后面的人涌来，他两脚想在地上抵住都没地方抵。面对深黑的海水，他往背后使劲顶了两下，却毫无作用。当脚跟被最后推出岸沿，腾空出去的时候，他大叫一声，松开拉着女儿的手，摇着双臂，坠入海中。

他在海里挣扎着探出了脑袋，死命看着岸上，只见他妻子在岸上发疯似地呼叫着。身边的箱子，箱盖也已经破开了，衣服杂物散落在岸边、掉落海里，那几根金条更不知在何处。

他比划着游到岸边，但那高高的、湿滑的、水泥砌起的岸墙，连手扶的地方都没有，更别说往上爬了。

又是“啊”的一声惨叫，他的夫人也被挤了下来。他的夫人，满脸的泪水和海水，说不出话，直愣愣地看着他，死命地抓着他，往下逐波下沉。

屠主任想拽都拽不开，在最后被波涛淹没之前，还想再看一眼岸上自己的女儿。但抬眼往上，只有高高的岸墙的黑影……

屠主任已经沉下了水面，在往肚里灌着大口的海水，这是行将溺死的人再延缓最后几分钟乃至最后几秒钟生命的最后办法。然而，却还能听见女儿在岸上的尖叫和哭喊。海水呛进了鼻腔、咽喉、气管、胸腔，剧烈的酸疼和喷射，海水在鼻腔中反复地喷出和回流，脑袋疼得发涨，颅骨像要炸裂，脑海一片空白，耳边又迅速响起了嗡嗡的尖啸，灵魂像要挣脱躯壳。忽然，脑壳无限地扩散，躯体飘隐，天地融入空白，那尖啸声盖过了一切……

人们的惊呼，女人的尖叫，小孩的哭喊，爆满了港区的上空。

就在这时，在港区东南角延伸出来的防波堤上传来一阵沙哑而悲催的喊叫：“章团长，章团长，我们是青一团！”“章团长，章团长，我们是青一团！”

方舰长很敏感地听到了，耳朵一竖，脸转了过去。远处的岸上，昏暗的灯光下，看不清究竟有多少人，大概是几十、上百个吧。黑黑的一团，挤在一起，举着胳膊，摇晃着枪支，虽然看不清神情，那喊声却是悲凉而揪心。

方舰长犹豫了。不管他们，抛下他们就走，那就太对不起在望海山殉职的章团长了，他方舰长做不出来。可是过去接他们吧，船又靠不上堤岸，派小艇过去，接不了几个人，不但耗时过多，而且肯定是你争我抢、现场大乱，弄得最后没法收拾。

方舰长一时还没理出思绪，这边舰上却响起了枪声。那楚队长一听是青一团的，恨得咬牙切齿，“他妈的，不去守阵地，到这儿来，扰乱军心民心，该当何罪！”边说边掏出手枪朝岸上开去。岸上的人群不知是否有受伤，却是更乱套了，喊叫着，推搡着，但挤得躲也躲不开。也有人叫骂着，举枪朝“济成号”射击过来。这边也有“啊呀”惨叫着受伤的，甲板上顿时乱了去了，却同样也没有地方躲避。

方舰长愤怒了，“谁开的枪？立刻禁闭起来！”

代连长二话不说往舱外跑去，一边朝甲板和过道喊着“快趴下！”，三步并作两步，最后两级舷梯干脆就跳了下去，朝着楚队长大喊：“不许开枪！”上去就把他胳膊扭了起来。楚队长还没反应过来，枪就被下掉了，刚想跳起来，就被代连长按了下去。楚队长此时心里明白，没再反抗，嘴上还在喊着：“我是宪兵队的，我是宪兵队的”，却被代连长乖乖地扭到底舱去了。

方舰长见事已如此，便立刻下令转舵离港，方向东南南。

“不能啊，那么多的人在水里挣扎。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李策哭声都出来了。他觉得，这群人都像他的妹妹一样。

“不行。如果我们不走，他们还会挤在这儿，掉到海里的人会更多。”方舰长说。

“不，我要去救，我知道他们的心里有多苦！”

李策竟谁也不顾，奔向栏杆，边跑边扔下军服军帽，一头跳进了漆黑的大海。

方舰长一声叹息，对代连长说：“你去下个小艇，到那艘货轮的黑影里接应下李策，但不要被岸上的人发现。我们在防波堤那儿等你们。”

“济成”号拉响了长笛，开始转向。

李策不顾一切地往前游着。水面上，波涛里，到处是揪心的呼叫、挣扎的双手、漂浮的杂物。李策都不知道该救哪个了。

忽然，他看见一个随波沉浮的包袱旁靠着一个毫无声息的脑袋。他游过去，一把抓住了那人的胳膊，就奋力地往回游。耳朵里满是呼救声，也只能救出一个算一个了。

也很长时间没这样长距离游了，李策感到有些吃力。他从波涛中抬起头，往前一看，心里不由一惊，军舰没了，再转头到处看，军舰真的没了。难道方舰长真的扔下他走了，不会吧？

正在这时，前面大货轮的黑影里，有人在喊他：“过来，李策，上这儿来。”

李策这才看出是“济成”号上的救生艇在那儿等着他。

救生艇也靠过来，把李策和那个被救的人拉了上来。这才看出来，是救了一个小姑娘，已经昏了过去。后来知道，她正是屠主任的女儿屠美丽。

李策还想再下水救人。代连长赶忙拦住，说这个还不一定活呢，得赶紧回舰上去抢救。

李策这才罢手。

救生艇飞快地往回转，背后岸上那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号，也渐渐地远去。李策看着码头的黑影，眼睛里全都是在水中挣扎的双手，耳朵里全都是哭救，心里满是凄楚，全没有救了人以后的那种欣慰。

李策回到舰上，刚换了衣服，指挥舱里的专线话机就响了。他接起电话，听了一会儿，对方舰长说，汪司令来的，说是务必请你接听。

方舰长神色淡然，没有反应。

“……方舰长，方茂名……你可不能走啊……”在李策手里的话筒，传出了汪司令嘶哑的急得已经变了调的声音，“我们司令部几十号人，就指望你了……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方老弟……那样，是要犯军法的啊……码头上人再多，我也能用机枪扫出一条路来……你快靠岸吧……”

方舰长依然没有反应。

楚队长这时，不知什么时候从底舱跑了出来，又进了指挥室，对着方舰长叫道：“你居然敢不听汪司令的命令，还有我宪兵队在这儿呢。”

方舰长连看都没看他，只对李策说了声：“把电话挂上吧。”转身就出去了。

楚队长还想追出去。

代连长上前一步把他挡住了，冷冷地说了声：“你想干什么？谁叫你出来的。”

楚队长一下就被镇住了，再没有多说什么，扭头就走了。

31.2新的地平线——台湾

“济成”号拖着低沉的长笛，驶出了港区，朝着方舰长所说的东南南方向驶去了。

金光耀眼的朝阳刚刚升起，绚丽多彩的朝霞映满了天空，万顷海面跳跃着光亮。那是一天中，海上最美丽的时刻。可是谁也没有心思去欣赏。

望着逐渐远去的点缀着红瓦绿树的黄港海岸，董平章他们几个急了。

董平章拍打着栏杆，喊着：“怎么又要走了，又要上哪儿去啊？”

高增光在舰上也没别人理他，就和董平章他们凑在一起，插嘴说：“能跑出来，就行啊。管他上哪儿呢。”

董平章没理他。

高增光觉得能跑出来，心里很是庆幸，见董平章他们不理，还有点意犹未尽，又说开了：“啊呀，想回家啊，就往海里跳呀，游回去呀，水里多凉快呀，没人拦你们呀。这海上面没盖盖啊。”

王立不愿听这话，就说：“呸！说什么风凉话，我们和你可不一样。你是被扫地出门的，我们可还有家口在海源呢。”

这下，高增光来火了，“你他妈的，老想着去投共啊。”

王立也不肯让，接上说：“你才他妈的，嘴上干净点。”

代连长过来打个圆场，说：“都落到这份上了，谁也别说什么啦，都别逞能啦。下一步，怎么样，谁也说不清，都省点油吧。”

董平章望着不断远去的轮廓模糊的海岸，真的是捶胸顿足，嘴里反复念叨着：“赵玫啊，宝宝啊。我回不来，你们怎么过呀。”

王立反过来倒笑话起董平章了，说着：“董哥真是个有情人啊，心里装满着老婆孩子。”

只有连四娃，依旧是一声不吭。

当海岸线最终在视野里消失的时候，人们反而沉默了，茫然了。

谁也没想到，这一去，竟然是相距千万里；这一去，竟然是几十年的生死离别；这一去，竟然是数不尽的相思、数不尽的哀怨、一生都难以穷尽的泪水和苦难……

傍晚，李策到苏素玉的房间来看望安排在这儿的屠美丽。

屠美丽躺在床上，眼睁开了，可意识还不清晰。

苏素玉对她说：“伊就是救依的人。”

屠美丽拉着李策的手，口不择言地说：“我爹呢？我娘呢？我爷爷呢？”

“我们还在找，我们还在找。”看着女孩痛苦而焦虑的样子，李策的内心一样地痛苦，说了两句就低头走了。

站在一边的苏小玉，看着屠美丽，忽然说：“你是和我一个学校的吧？”

小玉抬头对着妈妈有点高兴地说：“她和我都是初中部的。她还比我高二级呢。”

屠美丽无力地点点头，又痛苦地说着：“我的爹呢？我的娘呢？”

苏素玉无奈地叹息着。

茫茫大海，无边无涯，“济成”号在浪涛中颠簸。

楚队长没有回底舱而正以监军自居，想找个方舰长和代连长他们违反军纪军令的辫子，日后可以向上报告，正在四处溜达呢。这一阵上了甲板。代连长从方舰长那儿出来，已经跟了他一会儿了。

楚队长自己全无察觉，走过船舱拐角，冷不防被代连长从身后掐住喉咙。代连长一使劲，便把他的脖子都扭歪了，再一把就推到了海里。

波涛的声音没有任何的异样，海水溅起了几个浪花，一下就无影无踪了，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碧绿的泛着白色细沫的海浪，急速地从船舷旁向后退去。

过道边蹲着、躺着早已被颠簸搅得脸无人色的王山他们几个。代连长看了他们一眼，问道：“你们刚才看到了什么？”王山他们无力地摇了摇头，连话也说不上来。其实，代连长都不想避讳他们。

但是代连长没在意的是，在拐角的背面，闪过了高增光的身影。

“济成”号在航行中。

晚上。指挥舱里。

副官拿来“航海日志”，请方舰长签字。

其中有一行：“宪兵队楚队长，因不谙航海技能，不慎落海，溺水身亡。”

方舰长看后，在最后一个逗号的后面，添了几个字：“经打捞无果，”而后交回副官。

方舰长又问：“舰上给养能够多长时间？”

“粮食、油料没问题，就是淡水不够。”副官答道。

“明天起，淡水定量供应，每人一天两杯。我也一样。”

“济成”号在黄海上航行，海天迷蒙，连一只飞鸟也看不见，更没有半点陆地的影子。

王立、董平章他们在栏杆边说着、骂着、发着牢骚。

李策从边上走过，一听是海源话，而且听得出来是南面沿海龙头一带的话，就停下来问了句：“你们是龙头的吗？”

“是啊！怎么啦？”

“哪个村的？”

“西北村的。又怎么啦？”

“西北村的？是谁家啊？”

王山几个看这个国民党军官一个劲地问，颇感奇怪，就问：“你是谁呀？”

“我也是西北村的呀。我叫李策，能记得吗？你们怎么也上来啦？”

王山他们一听，惊的张口结舌，因为他们都知道老李头一家划了富农这几年被管制受罪的事，没想到李家的少爷就在这条舰上。

“你没回家去过吗？”王立试着问。

李策刹时阴云布上了脸，低下了头。

这几个同村人，慢慢地就这样说上了话。

每天，李策要过来看一下屠美丽。

屠美丽很感激李策，但毕竟还是个小姑娘，不会说更多的话，而那闪光又羞涩的眼睛，已经说明了一切。

苏素玉看出来了，便对李策说：“依好人做到底吧，美丽要靠你来照顾了。你俩都是没了父母的苦命人，以后的路一起走吧。”

李策和美丽相视一看，都没说话，又都低下了头，看来也都默认了。

两天多以后，“济成”号越过长江口外海。

上海已经解放，“济成”号继续往南。

又一天，到达舟山海域。

当时舟山还在国民党军手中，“济成”号通过电台向沈家门港要求靠岸，不料以安全为由被拒绝，说是到福建去吧。事后得知，那些天，老蒋就在舟山。

“济成”号又继续着漫漫长途。

几天的海上航行，连水兵们都疲倦不堪。最苦的要数董平章他们了。没有床位，就在过道的角落里蹲着、躺着。海上的颠簸，使他们内心的五脏六腑一起翻搅，呕吐不止，满身污秽，臭气熏人。最后人都虚脱了，瘫倒在那儿。别的人，也就是掩鼻而过，没有来过问的。更危险的是，他们已经无力支撑自己，任凭起伏的舰体把他们翻过来侧过去，几次差点要翻到海里去了，把他们吓得哑哑地惊叫。还是董平章想了个办法，把各人的裤带解下来，相互间把膝盖捆在一起。这样稍微好一些。不至于五、六个人会一起被大浪掀到海里去吧。

他们的衣服常被飞腾而起的海浪打湿，夜晚劲吹的海风又使他们冷得瑟瑟发抖。尽管说起来，五、六月份是一年中海上最为风平浪静的日子，那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了的。这些逃难的乡亲们，真的是在硬闯鬼门关啊。果然，三天以后，有人终于撑不住了。几步之外，另几个趴在走道上的老乡里有一个生病了。董平章他们也顾不上去问是哪个村、是谁了。

只见那几个人向走过的兵求救，嗷嗷地叫着，意思是这儿有人病了，发烧得厉害。那些兵，没怎么搭理。许久，才有个当官的过来看了看，说：“病了？病了也没法办。乘早扔到海里去吧，省得传染了别人。这船上挤了那么多人，传染起来不得了，谁也跑不掉。”

“不行啊，不行啊，他还活着呢。给他吃点药吧。”乡亲们央求着。

“吃药？说得轻巧。哪有药？那几天跟共军打，早就用完了。就算有，也轮不到给你们啊。也为了你们自己，扔吧。”

“别，别，再停停，看他能不能挺得过去。”

当官的也没别的法，就说：“那把他推到边上吧，别和你们挨在一起。”

同乡们把那病人挪到铁梯下的角落里。

傍晚时分，那军官还倒想起来，又过来看看，看那铁梯下的人一动也不动，掩着鼻子说，“都已经死了，还不扔啊？”

几个同乡爬过来看，流着眼泪，什么话也没有了。他们没有动，他们也没有力气或许更不忍心去往海里抛下他们的老乡。

那军官喊了几声，叫来几个当兵的，把那病人推到船边，乘着舰体在波涛中往下倾斜时，轻轻一脚，那人就顺势翻滚而下。然而就在最后一刻，那人似乎嘴唇一动、哼了一下，不等同乡伸手招呼，就已经消失在沿着船边砰然而起的浪花里。当舰体再次抬起时，人们的眼睛里只见得天边几抹绚烂的晚霞，那天色全然没有一点悲惨的迹象。

董平章他们看着，也都一句话也没有。

这是怎么啦，这就是他们的命运吗？他们的命运就落到这一步啦？

“济成”号穿过了整个东海，进入海峡。

“上哪儿呢？上福州？”有个海上联络处来电，要他们去福州。方舰长都没听说过有这个机构。从他们离开海源、离开黄港，理论上，他们已经没有上级指挥机构了。各级指挥机构都在各自狂奔逃命，哪有顾得上他们的。方舰长在想，顶多一个月，共军就会打进福建。到那时再走，恐怕就身不由己了。他没和任何人商量，也没去向上峰请示，他也不知道这时他的上峰到底是谁了，自己决定，干脆直接去台湾吧。

当“济成”号的指挥舱里，再一次看到陆地时，船上的人并没有更多的喜悦。

因为受到了岸上派来的巡逻艇的拦截。小艇发出旗语，问：有没有登陆许可证。

方舰长大怒，连这个文明人都气得破口大骂了：“真他妈的王八蛋！叫我们去打海源，死了那么多弟兄，什么时候还发过登陆许可证？到台湾，还要许可证？那去投共，反而不要许可证了？不管他，靠岸！”

过了一会儿，大概是和岸上联系了，巡逻艇不再阻拦。旗语道：请跟我来。

在巡逻艇的引导下，“济成”号没有进港，在淡水河口的一处海边抛锚停泊。

岸边过来几个小船。

岸上的高音喇叭在喊着：“请携带个人物品依次乘小船上岸。所有武器留在舰上。”

“济成”号经过了五天多的航行，终于抵达了它的终点。

人们相互搀扶着，摇晃着走出船舱。个个都脸色惨白，四肢无力。

亚热带的阳光，明亮亮，热辣辣，照得人们都睁不开眼睛。

董平章、王立他们颤巍巍地扶着舷梯下船。睁开眯缝的眼睛，他们看到的是跟家乡一样的蓝色的大海，好像更蓝一些；跟家乡一样的绿色的海岸，好像更绿一些。只是太阳更热一些，天空更亮一些。恍惚之中，好像是回到了家乡，可又不像。

除了方舰长和指挥舱的少数几个人外，他们，尤其是董平章、王立他们，根本都不知道，横在他们面前的这块陆地是他们从来没有踏足过的、甚至没有听说过的一它叫台湾。

卷尾语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人们通常称之为中国革命，胜利了。

国民党政权，败退到了海峡对岸——台湾。

对于国民党政权失败的原因，人们总结了很多，连蒋介石本人也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最近在大陆部分解密的《蒋介石日记》，仅1949年一年内对此就有多处记载。1949年1月31日，他谈到了国际因素：“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是失败于俄史，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说明：俄史，是指苏俄的斯大林，当时译为史太林；美马是指美国的马歇尔）。1949年2月1日，讲到了社会因素和思想教育：“为政二十年对社会改造与社会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以民生为基础”。在5月份，又指责国民党党内的其他派系，认为李宗仁是国民党失败的直接原因。他在《上月反省》中写道：“桂李投机取巧夺权夺利寡廉鲜耻忘恩负义”。到了年底，则哀叹：“我们此次失败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请见：《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杨天石，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应该说，这些原因都是存在的，尤其是最后一点，是“国民党自己打倒了自己”。但对于是国民党出了什么问题因而打倒了自己，蒋先生没有进一步详述。笔者认为正是国民党政权实行专制独裁制度，死抱着“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不放，想用独裁专制的办法来对付共产党，那是用错了药。这才使国民党政权跟不上战后盛起的国际民主潮流而倾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正是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实行的是专制独裁制度，所以使这个政权在历史潮流面前，背负不起时代的重任，到最后几乎不堪一击。在专制制度之下，这个政权变成了一台压榨人民血汗却又严重锈蚀了的机器，贪污腐败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终致失去了人心、民心。它的内部已像是被蛀虫掏空了的朽木，脆弱得不堪一击。不是说它的所有成员，而是相当多的成员在忙于算计、忙于掠夺，在大厦将倾之际还在你争我夺、分崩离析，白白错过了抗战胜利带来的难得机遇。也是因为这种专制制度，根本不能适应现代战场的要求，军事指挥主观、僵化、被动，既脱离实际，又昏着连连、败笔不断。在社会关系上，它的所作所为，不但使底层群众深感愤怒起而抗争，也为中间阶层所唾弃，有些社会精英想做些修正改良也插不上手，心有余而力不足，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感到失望。蒋介石虽然作过努力，对他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也不能完全否定，但是他有明显的缺点和弱点，在历史关节点上是个不成功的人。由此可知，国民党的失败不是蒋个人的问题，而是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专制制度缺少自我认识、自我矫正、自我更新的能力，最终必然逃脱不了被历史淘汰的命运。即使换了任何一个别的人，只要不抛弃这种专制制度，都不可能改变这种失败的结局。

促成中国革命胜利的又一重大因素是战后国际社会涌起的一股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潮流。这一方面表现为人们对刚扑灭下去的法西斯势力的憎恨，和由此而泛起的对现代民主的向往。这种向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搅乱了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判断。杜鲁门政府对国民党政权的嫌弃、乃至停止援助，就是一例。这一误判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势力残存的力量和斗志，使国民党统治立刻失去支撑、全面崩溃。直到金日成大举越过三八线，杜鲁门政府才如梦惊醒，悔之已晚。另一方面，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锋芒毕

露、节节向前。尽管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始终心存芥蒂，但毕竟是师出同门，对中共给予了各方面的大力援助。辽沈会战之初的锦州一战，解放军以千余门大炮攻城，表明即使在军事力量上，国民党也已处于劣势，它的败亡只是个时间问题。

而所有这些，都被中国共产党全方位地充分利用。它成功地通过土地改革等激烈的阶级斗争方式，在保卫胜利果实的号召下，发动起千百万农民（从斗地主到上战场），走到与国民党血战的第一线，把暴力革命、武装斗争和严密组织控制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军事战线之外，在国统区掀起了“反内战、争民主”的反蒋学生运动。它又十分注重宣传和统战工作，以多种策略团结了相当多的中间力量。尤其是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向全世界作出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的庄严承诺，在国内外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和期待，尽管后来并没有完全照着去做。在极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下，拉开了横扫八百万国民党军这无比壮观的一幕，并最终国民党政权无可挽回地迅速崩塌而结束。

中国革命有理由向全世界宣告，它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中国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革命胜利之时，全国人民对新中国抱着殷切的期望。他们希望付出的鲜血没有白流，希望几十年的奋斗没有白费。应该说，除了被推翻的旧势力，几乎所有的人那时都在欢欣鼓舞。但人们也忽略了在这胜利之下一些“左”的举动，比如在土地改革中的过火斗争，比如对旧政权人员的过重打击等等。比起夺取政权的辉煌胜利，这些代价对于胜利者算不上什么。更何况，胜利之后还有机会调整。

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春天，来了。全中国人民盼望的、龙头镇和西北村乡亲们盼望的春天，来了。然而，左的思维和习气，在革命胜利前就有端倪，在革命胜利后，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制止，反而还在步步膨胀。革命队伍里，那些使人意想不到、使人惊诧、甚至使人悲愤的故事，不只是屡屡发生，而且还越演越烈。

1949年，还只是本书“革命四十年”的第一卷。一切还只是刚刚开始。这之后的路程，其曲折、其艰难的程度，是我们在合上这第一卷时所万万想不到的。本书分为四卷，请读者继续往下看。

还想说明一点的是，与历史史实相对照，本书把1947-48年间国民党对胶东解放区（包括对海源和龙头）的进攻和占领以及后来从龙头海滩由海上败退、最后他们中的一大部分在1949年的6月又从青岛撤到台湾这一整个过程浓缩于十几天之内，时间上也是放到了1949年的5月。之所以这样做，是想简化大量的铺垫性、过程性文字描述。而这段国共双方的武装争斗对于共和国的建立和其后的发展，影响之深远，又是不能不说的。

第二卷 春去冬来

第一章 葬礼

1949年6月1日

龙头的历史，在几经磨难和奋斗之后，终于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当然斗争的胜利，并不能完全掩盖伤痛。很多遗留问题还要处理。

祖责成的院子，于村长一回来，就去看过。祖大妈被烧焦的躯体还蜷缩在炭灰中，惨不忍睹。于村长含着泪，铲上几锹土，先遮盖一下，临走又把门封上。在经乡长走之前，于村长去商量过。经乡长说，祖责成的儿子已随大军南下，联系不上，我们先把丧事办了吧。经乡长还说，是陶富贵犯下的罪行，把陶家大院的门板劈了做棺材，叫他们陶家永世不得翻身。

于村长一一去布置安排。

赶走国民党、龙头百姓回村的第三天，民主村的干部群众为祖大妈发丧。

一早，大家就聚到了村公所。纪乡长也过来了。所有的人都一脸悲戚，沉默着。

于村长穿了身破旧的黑衣服，腰间拴了根白布带，见人来得差不多了，便说：“乡亲们！祖大爷、祖大妈牺牲了，他们是为了我们而牺牲的。他们的儿子参加解放军，随部队打到了江南，不但回不来，而且都不知道自己家里发生的事情。今天，我们来替他尽一份孝道，也是为所有牺牲了的人们尽一份心。”

于村长举步往祖家走去。鲁队长和平金刚也腰系白布带，抬着一口刚钉起来的白木棺材随后。人们散开一条道，又默默地跟在后面。

来到祖家，于村长起下横钉在街门上的木条，对鲁队长说：“你们俩进去吧。”又转过身对大伙说：“你们别进去了。祖大妈，死得太惨了，太惨了……”

话未完，于村长呜咽起来，两行眼泪在脸腮上流淌下来，身体渐渐滑向一边，倚在街门上。他双拳捶门，浑身颤动，竟失声痛哭起来。

民主村曾有过多少严酷的斗争，经历过多少血雨腥风，大家也从来没有见过于村长掉过一滴眼泪。

这一下，大家一时愣了，几乎慌了神。纪乡长忙上去扶着于村长劝慰。后面一些人，就进了院子。结果，院子里顿时暴发出一阵痛哭声。

于村长支撑着，站直了身，擦了擦脸上的泪水，说：“我没事。起棺，走！”

鲁队长和平金刚等四个人抬着棺木，出了街门，向西门外走去。

于村长、纪乡长在前，乡亲们在后。

民主村几乎所有的村民都来了。连和李芹住一个院子的申大爷老俩口，飘着白发，颤颤巍巍，相互搀扶着，也跟在后面。大概除了秦德才，不过这时候，谁也不会注意到他。龙头镇那三个村也来了不少人。街巷里满是人，人们站立在街两旁，肃立着，等着灵柩过去，便加入到送葬的队伍里。因为人多，前面的队伍已经出了西门，祖家院子胡同里的人，才刚开始挪动。带着伤痛，带着极度的疲惫，带着对死者的思念与崇敬，带着对还乡团的仇恨，人们缓缓地行进着。

悲凉的唢呐声吹起。

队伍里的人们，有低泣，也有嚎啕大哭，为祖家老俩口，为所有死去的人们，也为自己和亲人们。

望海山的南坡。

几天前还是激烈的战场。焦黑的砂土地上，已经挖开了几排墓穴。

祖大妈的墓穴在第一排。

于村长把队伍带过来。鲁队长他们把棺柩轻轻地放进墓穴。因为已经找不到祖大爷的遗体，于村长在棺柩旁，放上了几件祖大爷的衣物，也算是他们老俩口的合葬。

鲁队长他们铲上砂土，临时插上个木牌，等以后再换个石碑。

哭声又起。

悲凉的唢呐声，揪着人们的心，缭绕在龙头的上空。

于村长，在墓前一头就跪下了，眼泪不住地下。尽管祖大爷生前和于村长的关系，并没有多密切。但于村长此时的感情是真摯的，那真的是同一条战壕，同一个阶级。

全场的乡亲们也都齐刷刷地跪下，匍伏在地，一起痛哭起来。多少天来，所有积压在心中的磨难、伤痛、郁闷、悲愤和仇恨，这一刻，都化作了再也抑制不住的嚎淘的哭号和不止的泪水。那阵阵的哭声，响彻十余里，盖过了望海山的松涛，使山川失色、鬼神都为之动容。

如果眼泪和哭泣能减轻龙头人民心中的痛楚，那就让他们哭吧。

许久，纪乡长擦了泪，劝起大家，简短地讲了几句：“乡亲们！我们会永远缅怀这些为人民的革命事业而献身的烈士们。我们以后还要在这儿建一个很好的烈士陵园，永远纪念他们。乡亲们，擦干我们的眼泪，化悲痛为力量，拿出参加革命战争、打败国民党的劲头，以更大的努力建设起一个美好的家园，来告慰这些长眠于此的烈士们，这也是他们甘于抛头颅、洒热血的心愿。他们希望看到的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们工作得更努力，生活得更幸福！”

第二章 恢复家园

1949年6月2日

2.1 家里

王建悟，老王头，从西门外跟大伙下葬回来，进家门，尽管觉得身上十分地疲惫和劳累，但是一刻也不能停下来。他知道，家里还有多少干不完的活在等着他；组里，也还有多少事，要他烦心和劳神。老伴现在是妇救会的了，整天在外面，家里的事是指望不上了。虽然，丁妹很勤快，也顶得起来，把院子都清扫过了，但那还只是表层的，门窗都要加固，锄头铁铲都锈了，得重新磨。

他正站在院子里寻思着先干哪件活呢，丁妹掀开门帘从屋里出来，一股带着小米面的热气也从屋里飘出。

“爹，我把槐树叶和上点小米面，蒸了几个饼子，刚上了锅。一会儿，我去大河边洗衣服。家里的衣服、被褥，我准备都要洗一下。爹，你这儿还有哪些要洗的？”

老王头知道，在李家泊的十几天，丁妹一刻也没闲，天天去北山上捋槐树叶，加上政府发的十几斤小米面，还能过上一段日子。没想到丁妹比自己腿脚快，已经回家做上了饭。闻着带有树叶味的饭香，老王头又觉得这媳妇比儿子还顶用。离家这十几天，他还发觉丁妹愿意说话了，心里挺高兴的，嘴上说：“一下子，不用洗那么多吧？那就让我翻翻，哪些要洗了。”

老王头和丁妹一起进了里屋，翻开了包袱，打开了箱子，顺便也清理下衣物。

翻着翻着，老王头拿着老伴的几件衣物说：“这是你妈的，等她回来自己洗吧。”

丁妹说：“妈现在也很忙，我一起拿去吧，也不多费事。”

在那个箱子里，又翻出了王立的几件衣服。两人一时都愣住了。丁妹拿起来，轻轻地拍了两下，迟疑着又放下。

老王头竟语塞，不知怎么对丁妹说好。他知道丁妹现在心里想的是什么，可他不知道该怎么劝。他这个当公公的，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儿媳妇说话，虽然一直相处得很好。好在老王头知道，丁妹是个心宽的人，能放得下，还不用自己去劝。

丁妹裹了两大包衣服，背着到西门外大河边去洗了，临出门，还对老王头说：“锅里的饼，再闷一会儿就可以拿出来吃了。别等我，天黑前我会回来的。”

老王头高兴地答应着。

他应该高兴。国民党被打跑了，好日子就已经到了。再出的力，都是为自己的了。再没有什么人，会来抢你了，会来剥削你了，会来破坏你了。虽然眼下日子还有点苦，可是咱庄稼人不怕出力，拼上几身汗，再补种些秋庄稼，到秋天，这日子就能缓过来。不用到那时，大儿子王山也就从南边支前回来了。想到自己家里，个个都能顶得上，老王头真的是从心里乐了。

唉，就是那二小子，不知道下落。会上哪儿去了呢？这不打紧吧？国民党还能逃哪儿去？逃到哪儿，也能消灭了它。他儿子一定会回来，而且，不会有多久。

2.2 村民组

老王头拿了把斧子磨了起来，他想先劈几个木楔子，打到窗框和石墙之间的缝里去。东屋的窗框松了，这是先要解决的事。

当然，老王头时刻也没忘了他是第八村民组的组长。还得上他组里那几家都去看看，他正想着。还没等他站起来，于村长就来了。

“老王头，老王头。”于村长一边叫着、一边就进了院子，见老王头正蹲在地上磨斧子呢，就说：“也不歇一会儿，身板能顶得住啊？”

“现在这时候，哪还有闲工夫啊。你不也是忙个不停吗？”老王头站了起来，直了直腰。

“你们组这几户，情况怎么样？”

“胜利了，把国民党赶跑了，大家情绪都很高，心里也踏实了。但是，困难还很多。有的房子，被烧了，被炸了，这是先要解决的事。再有，地里的庄稼，本来就天旱得厉害，又被国民党兵糟蹋了不少，加上十几天没去浇水，这是个大事情。可现在劳力又少，大家也已经累得不轻，有的还生了病。还有的家里，根本就没有劳力。”

“是啊，这要靠各户自己来，有点难，恐怕还是得靠全组几户人家相互帮助，比较好解决。修房子的事，花费大，村里来想个办法。不过，村里好几户人家，都叫村里来管，怕也管不过来，我想，主要是解决烈军属的问题。还有被国民党抓走了人的几家，像赵玫这样的，也要帮一下。”

“好，你说得对。我们组里的几户，我来想办法，你就不用操心了。”

“还有什么吗？”村长问。

“还有，地里，光浇水还不行，得补种点秋玉米、秋花生这些，要不等到了冬天吃什么？但是，种子是个问题，谁家也没有了。”

“哦，那我赶紧跟乡长说说，请他问县里能不能支援一下。这可是要紧事，你提醒得好，我这就去找乡长。我走了。”

“好，那我也上各家去看看。”

老王头就近先上唐玉珍家。

唐玉珍依然很开朗热情，连连招呼：“大伯啊，快进来，歇歇。”

老王头对她也不讲更多的客套，“玉珍啊，家里收拾好啦？”

“哎，哎，收拾好啦。其实，这么个破家，也没什么好收拾的。”

“地里还去看过啦？”

“去过啦，回来头一天就去啦。”

“哎哟，真不简单，不稍微歇一下么？”

“哪舍得歇，地里的庄稼就是咱命根。在李家泊的时候，心里是天天记挂着，早就想跑过来了。”

“地里咋样？”

“干得厉害，叶子都卷起来了，颜色也黄了。看样子，是要瞎了。”唐玉珍叹了口气。

“你看还有什么办法？”

“我就浇了遍水。”

“哟，你真行。”

“嗨，什么行不行的。这一年，老杜不在家，我不干谁干。”

“也难为你啦。可我在想，靳喜悦家怎么办？他瘫在炕上，他媳妇还得伺候他。”

“那我们大家一起去帮帮他，他也是为了我们大家才去打仗受的伤。”

“玉珍啊，你的思想还真开通。”

“唉，多少人都死在外边。我们在家里的，还有什么想不通呢。”

“好，那我去跟大家商量个时间，看哪天得空，我们一起去帮一下。”

老王头走过迟家的门口，在门外喊了声。

迟得法也不知在院子里干什么，只听得里面嗯了一声。

老王头也不想多问，就说，老靳家挺困难，也没有劳力，咱们什么时候过去帮帮他。

“怎么帮啊？”

“也就是帮他挑挑水，锄锄地。”

“唉哟，我这腰，那天叫国民党打的，还没好，到现在都直不起来。我自己的地还都没去看过呢，等我过几天，身子骨好一点了再说吧。啊？”

“好啊，好啊。”老王头原本也没指望到他，所以也就回应着，走了。

从胡同出来，老王头到街上看了下。

鲁队长带着一帮年青的民兵，正在清扫大街。还有几个解放军战士也在推着车，往外拉灰土。

老王头一看到他们，当然先会想到自己的儿子，眼睛一热，差点儿掉下了眼泪。

平金刚、小林他们几个也在，却围着，像是在讨论什么。

小林姑娘先看到了他，喊了起来：“王大伯，过来啦？”

“哎，哎，你们好像在商量着什么？”

“王大伯，你看，这件事，我们觉得不好办。你看，怎么办好？”

“什么事呀？”

“大伯，你看。”小林的手往前面一指。

老王头顺着看去，心一沉。那就是姜雪花被钉死的陶家大院的南墙。大墙上，血渍斑斑，地下的灰土粘着厚厚的血污，令人触目惊心。

他们几个年青人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铲掉？留着？

留着，不是个办法；铲掉，那可是烈士的鲜血。

“秦德才呢？他得有个说法。”老王头说。

“我们都找了他好几圈了，也没有人影。”平金刚说。

“这人也是。这样的事，都不管，太对不起雪花姐了。”小林说。

“要不，这样，雪花的遗体还一直没找到。我们仔细点，把这层墙皮铲下来，还有地下的血块，都铲起来，一点也不要留，铲干净。拿个包袱布，包起来，一点也不要撒。再拿几件她穿过的衣服。叫村里、乡里，拣个好日子、好地方，我们好好地也把雪花发送了。”老王头说。

“是的，是的。雪花姐的事迹，比刘胡兰还英雄，应该比发送祖大妈更隆重。”小林说。

“好，大伯这个想法好。我去跟于村长讲一下，我们就这么做。”平金刚说。

老王头又走进了靳喜悦家。

靳喜悦正躺在炕上埋怨他媳妇呢。他媳妇看见老王头来，赶紧擦着眼泪。

“喜悦啊，你家媳妇出了这么多力，还在说什么呀？有什么难处，说给我听听。”

“咳，怎么说呢？打败了国民党，挺好。可回来一看，家里成了这样，我又收拾不动，心里着急啊。”

“心里着急，也不能对着自己媳妇呀。喜悦呀，别着急，现在哪家都这样。当然，你这儿难处要大一些。我过来看看，能帮上什么忙？”

老王头转头，四下看了看。虽然家室贫乏、东西陈旧，可也摆放归整、擦洗干净。

“这不挺好么，我家还赶不上你这儿利索呢。”

“王大伯，你可别这么说了。你再这么说，可是笑话我了。”喜悦也开口笑了。

“这样吧，我已经和组里其他几户商量的，这两天，找个时间，一起过来帮你们家锄地浇水。”

“啊呀，这哪好意思。”

“都是一家人，都是为打敌人、为过上好日子，不用不好意思。”

“那谢谢了。”

“不用谢。跟媳妇好好过，别跟自己过不去。”

“好，好。”喜悦直点头。

喜悦媳妇也挺感激地把老王头送出门外。

2.3邻村的支援

民主村的群众，离开李家泊回去了。这十几天里，应该说给李家泊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和负担。但李家泊的干部群众还是想着民主村的群众。他们知道，龙头镇在这些天里被国民党兵破坏得很厉害，民主村的群众回去后，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没有县里的要求，没有乡里的布置，李家泊的干部群众虽然自身生活也很艰苦，却克服困难，真的是从牙缝里挤出来，自己筹集了一点粮食、种子、衣物。今天，他们推着小车过来了。

走在最前面的是李村长。推着第一辆车的，便是戴着眼镜的李辰。别看是教书的先生，可毕竟还是农家子弟，尽管车上装了不少，却是大步走来，脸上还笑盈盈的。车前还插了面小红旗，随着步伐而起伏飘摇着，平添了几份喜庆气氛。

小车队进了西门，往民主村村公所来。

民主村的人，事先谁也不知道这事，一点准备也没有。

等车队推进胡同口，于村长才听说，连忙跳着赶了过来，紧握着李村长的手，连说：“这哪行，这哪行。你们也不宽裕啊。”

“嗨，于村长，客气啥呀。一人有难众人帮。这是咱海源人的脾气。”

“这真叫我们怎么感谢啊？”

民主村的老乡们围过来，真的感激得不得了。什么叫革命友谊，什么叫兄弟情意，这就是。不需要感谢，不需要回报，甚至你自己都还没想到，你的需要就送到了你手上，真叫你温暖到心里。

车队到了村公所，东西卸了下来。

纪乡长也来了，感到很高兴，没想到龙头的各村之间这么团结，龙头的工作，以后一定会搞得很好。

小林也来了，一眼看到李辰站在小车边用袖子擦着汗，便递过一条手巾，说：“看你脸上擦得像大花猫似的。”

唐玉珍在一旁说起了笑话：“哎哟，小李啊，你这是给小林姑娘送聘礼来了吧。这么好几车，份量还真不轻啊。小林真是好福气哎。”

“这可不敢当啊，这些都是李家泊全体村民的心意。我李辰自己就是两只手，再有就是一张嘴，等着吃饭。”

“看你这贫嘴，不打扁你的头。”小林的手巴掌拍上了小李的脑壳。

大伙“轰”地笑了。

把小林羞得扭头就走了。

李辰赶了过去。

小林的家，很破旧了。土墙上，坑洼不平，门板和窗框已经开裂，屋里黑呼呼的。屋顶长起了青草，那苔草，也都凹陷了。

小林和李辰，相对站在堂屋门口。

……

“我的心是真的。”小李说。

“我知道。”小林说。

“那我们的事，你看怎么办呢？”

“我就是放心不下我爹。我娘很早就没了，是我爹又当爹又当娘把我拉扯大，现在他老了，身子骨很弱，我不能就这样甩下他，一走了之。你看，这屋子，撑不了几年了。我走了，叫他老人家一个人怎么办？我能安心吗？”

“这你放心，海秀。你爹就是我爹。你家就是我家。我不会不管。这样吧，这两年，我们自己的事先不急，先把你家这屋子修起来。不把你家屋子修好，我先不提这事。怎么样？”

“也好。现在我们两家的底子，还都不厚实，咱们一起辛苦两年，打下点底子再说。”

“好。”小李兴奋地说。说着忘情地伸出了手，刚碰着小林细腻的手指，又犹豫了起来，望着小林的眼睛。

小林也望着李辰，那眼神一半是期待，一半是幸福。

小李一股勇气涌上来，紧紧地握着小林的手。

送走了李家泊的小车队，于村长又喊起来了：“乡亲们！还有件好事情！”

大家又充满着期盼地望着村长。

于村长说：“县里非常关心我们龙头镇的百姓，决定支援我们一批夏播的种子，有一千斤呐。”

大伙一阵欢呼。

于村长接着说：“县长说了，就是自己两天不吃饭，也要省下粮食给龙头镇。咱们现在就找几个人进县城，把它搬回来。”

“那当然是我们民兵去了。”鲁队长的大嗓门马上开了腔。

“我们村没那么多小车了，怎么办？”有人问。

“那有什么？我们去挑回来，就是了。”平金刚拍着胸脯说。

“对，我们去挑回来！算我一个。”小林姑娘说。

“女孩子家，嫩皮肤嫩胳膊的，就不用去了。”鲁队长说。

“这十几天，枪林弹雨的，我们女孩子哪点比你们差啦？”小林还不服气。

“我来，我来，有我呢。我的小车还在这儿，我和你们一起去，一个能顶三个呢。”李辰从旁边开口了。

“这倒也是。那就辛苦小李和我们一起去吧。”于村长说。

不知什么时候丁妹也挤到前面，很诚恳地对于村长说：“小林就不用去了。我去吧，我真的能行。”

于村长看着丁妹，心里有所触动，知道这个平时默默无闻的小媳妇真是想为村里做点事，可要是同意去吧，真的是很累。他有点犹豫，望了望鲁队长，“你看呢？”

鲁队长没有像对小林那样，可以挤兑一下，甚至常常开个玩笑还过了火。他停了几秒钟，问：“你爹知道吗？”

老王头在人群后面马上搭上了话，“让她去吧，锻炼锻炼。”

“好，我也觉着丁妹行。”鲁队长最后定了下来。

丁妹的脸上微微地笑了。

一共四个人扛着扁担，加上李辰推的飘着红旗的小车和鲁队长推的丁妹的车，立刻就精神抖擞地出发了。

2.4合作的雏形

又是一天。重新解放了的每一天，都很新鲜。

老王头在头天已经安排好了，今天全组都来帮靳喜悦家。

一大早，大伙儿都扛着自家的农具，锄头啊，扁担啊，水桶啊，过来了。其实也没几个人，也就是老王头一家三口、唐玉珍娘俩和靳喜悦俩口。祖大爷死了，迟得法不来，这小组也就这些人。但他们七个人大概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正走上了中国农村生产关系变革的一条崭新的道路。

靳喜悦的地，有两块，都在西北方向。一块在望海山南坡，砂石地，本来就贫瘠，这一旱，玉米和地瓜都干死了，枯萎得像干草一样。另一块靠赵村的地边上，是泊地，土质比较好。靳家种的是小米，但毕竟二十天没浇水了，小米秸长得高高矮矮、参差不齐，有的还行，有的是不行了。

老王头扛着袋村里分给靳家的秋玉米种子，领着大家先来到泊地。他做了下简单的分工，大伙就干了起来。

天气依然很好，阳光明亮亮的。

老王头当然是个庄稼里手。他拿着锄，一行行地过来，哪棵小米秸看着不行，就锄了它，刨上个小坑。王大妈就在后面撒上三颗玉米种，盖上土，浇上一瓢水。

丁妹、唐玉珍和喜悦媳妇就去大河边挑水。挑一趟水，来回差不多五里地呢，是个不轻的活。

唐玉珍十二岁的儿子长贵，嚷嚷着也非得也要去。

“去吧，去吧。”他妈嗔怪着说，“到时挑不动，可别怪我啊，拖也得拖回来。”

“哼，我是个男子汉，挑个水还不行啊？”

“行，行，怎么不行。”喜悦媳妇给了他一副小一点的桶。

靳喜悦被他媳妇搀着一起过来了。他在地边，拿石块支了个锅，半躺在地下，用长贵背过来的碎木块，烧一点水，一会儿大伙儿好喝。

太阳升高了，天气也开始热了，人们的额头上沁出了汗珠。

三个媳妇又挑回了一趟水。

小长贵居然还走在头里。

她们走到地边，放下水桶。丁妹，稍微晃了一下，被细心的喜悦媳妇看见了，忙问：“怎么啦？丁妹。”

丁妹说：“没事，没事。”脸色却有些发白。

唐玉珍说：“这几天，丁妹太辛苦了。昨天，还跟男小伙们一起去县城挑种子，来回要几十里地呢！”

喜悦媳妇说：“丁妹，你还是回去歇息吧，这儿人手也够了。”

“没事的。”丁妹说：“我喘口气就行了。现在虽然辛苦点，可心里高兴啊。好日子一天天地近了，我也想出把力呀。”

“水开了！”这边喜悦招呼起来了。

大家围了上来，并不讲究什么，拿着带着裂口的破碗就在锅里舀着喝。

老王头说：“这块地，看上去，晌午就能搞起来了。”

王大妈说：“到底是人多力量大，出活。”

正说着呢，唐玉珍朝旁边一看，嚷了起来：“你们看，谁来了？”

大家转过头去一看，哟，是纪乡长来了。

大伙忙站了起来，招呼起乡长来。

纪乡长还是一身洗得很干净的黄军装，显得十分的利落。

老王头问：“乡长，你这是上哪儿呀？怎么走这条小路？”

纪乡长笑呵呵地说：“我这是特地来看你们的。听说你们全组一起帮助一个残疾军人种地，我就赶过来看看。”

王大妈说：“乡长你这么忙，还过来看我们呀？”

纪乡长说：“再忙也要过来看看。别看是你们就几个人一起干活，这个意义可大呀！现在我们生产、生活各方面困难还很多，要发扬相互帮助的精神啊！你们带了个好头。”

“这个头很早就有了。打日本鬼子那阵，咱这儿就有变工组了。谁家出公差，大家就替他家干活。等他回来以后，他再给别人干。”老王头回答说。

“那你们现在帮伤残军人干活，以后他再怎么帮你们干呢？”纪乡长问。

“这就不要他帮我们了。我们这是义务劳动。他以前为革命立了功，受了伤。我们现在帮助他，完全是应该的。”王大妈说。

纪乡长高兴地说：“那好啊，你们比变工组又进了一步，有点社会主义的味道了。”

“啊呀，要是能到社会主义就好了。纪乡长，哪年能到啊？我们都盼着呢。”唐玉珍一脸认真地问着。

“我们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阶段。要进入社会主义就不容易了，还需要长期的努力。没有个几十年，那是不行的。”纪乡长很认真地回答着。

“那我等得到吗？”杜长贵又问了。

“这位小弟弟是会看到社会主义的，那是肯定的。我们这一代么，是为你们这一代创造条件的。”

靳喜悦坐在地头朝杜长贵说：“你能看到社会主义了，真把我们羡慕死了。”

纪乡长忙补充着说：“社会主义不是等来的，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只要大家一起努力，社会主义就会早来到。当然，这事也不能太着急，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先把新民主主义搞好了，把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再去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像个样了。”

“好，乡长说得对。我们大家都来努力，建设好新民主主义社会，为进入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做好准备。”老王头似乎是在替大家表个态。

“好，好！”大家都拍着巴掌说，眼睛里闪烁着憧憬的光芒。

纪乡长看了看地里，问：“我们现在先说眼下的吧。地里干成这样，你们怎么做呢？”

老王头说：“这块地，土质好，我们准备留一点，锄掉一点。锄掉的，补种上秋玉米。这样，全年的收成，基本差不多。山坡上还有一块，太干了，春庄稼全死了。准备下午过去，全部薅掉，种上秋花生。”

“好，好。”纪乡长连连点头，“这么多的活，靠一家人自己是很难完成。尤其是家里缺劳力的，就更不行了。你们的办法，我要向全乡各村推广，都要向你们学习。”

“我们组，人还比较少，干不了多少。有些大的活，难的活，恐怕还得村里组织起来。”老王头又说。

“对，对。我们要帮助的对象，还很多。军烈属，残疾荣誉军人，男人在外面的干部家属，尤其是被国民党抓走的人家，有的房子都没了，我们都要去帮助。新社会了，人民政府了，不能落下一个人。”纪乡长说着，又想起了一件事，便问：“那你们中午还都各人回去吃吗？”

“一会儿，喜悦媳妇就要回家做饭。做好了，挑过来，大家吃。省得各人回家，还要自己做，还要来回跑，太费时间了。”

“这又是个好办法。喜悦媳妇呢？哪一位？”纪乡长问。

“是我，纪乡长。”喜悦媳妇答道。

“那你要辛苦啦。”

“这是应该的。大伙帮了我家的忙，我谢都来不及呢，做顿饭，还不应该吗？”

“烧水的那位大哥，就是喜悦了吧？”纪乡长又问。

“是的，是的。”靳喜悦答道。别看靳喜悦在家里对老婆挺厉害，可在外面、在生人面前，还是很腼腆的。

“大哥，是在哪一仗负的伤？”

喜悦一听，乡长还这么关心人，心里一阵激动，“47年，鲁南战役那一次。”

“哦，那一次，我也参加了。参军出来的第一仗，就是在鲁南。咱们还真的是战友呢。”

“嗨，咱们俩怎能放在一起比呢？你当个兵，现在是领导了。我当个兵，算个什么呢？成了残废。”

“大哥呀，可不能这么说。这江山，不是哪一个人、哪几个人打下来的，是我们一起打下来的。里面，有我的功劳，有你的功劳；有领导的功劳，更有战士的功劳；有部队的功劳，更有老百姓的功劳；在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有功劳，更有牺牲了的烈士们的功劳。不是说，现在谁当了领导，谁就可以多占一份、多得便宜。当领导的，就是为你们服务的，带了你们一起干的。谁干得不好，你们可以提意见，把他拿下来。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一样的地方。要不，我们就白革命啦，烈士们就白牺牲啦。你说是不是？”

“对，对，对。”纪乡长一番话，把靳喜悦说得直点头。

“乡长，你刚才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功劳。那我也有一份功劳啦？”长贵这孩子也插进一句话。

唐玉珍忙喝住：“大人说话，小孩插什么嘴？”

“别，别，现在新社会了，实行民主了。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连小孩也有。小朋友，你讲得对，革命的胜利，也有你的功劳。这些年，你们儿童团还真起了不少作用哩。”

长贵高兴得直蹦，“我也有功劳了，我也有功劳了。”

田野里一片欢腾的笑声。

2.5赵玫的房子

又过了两天。

是黄港解放的消息传来的那天。

大伙在一番高兴之后，按照于村长的安排，今天是帮赵玫家修房子，由鲁队长领头。

鲁队长也是个认真的人，头天晚上就找几个人商量怎么弄。当然以民兵为主，但是能出来干活的年轻的民兵，扒拉来扒拉去地算，村里也真没几个。还是老王头知道了，说：不行，就让我们组来吧。这样，鲁队长就和老王头商议了人员的安排，就是扛木料还缺个人手。鲁队长说，不行的话，我就跑两趟吧。

天刚亮，鲁队长就和平金刚俩要去扛木料。木料是李家泊北坡上修工事的料，乡里这回给了三根的指标。能扛木料的年轻人，村里大概也就他们两个了。丁妹从老王头那儿知道了这事，说：那我也去吧。

老王头望着这儿媳妇，心里一阵感激，知道她这是在支持他组长的工作，就说：孩子啊。这是老王头第一次称丁妹是“孩子”。虽然从来就是把丁妹当自己孩子看，可张嘴叫，却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丁妹当然也觉察出来了，心里又惊又喜，可嘴上依然只是轻轻地喊了一声：“爹！”

“孩子啊，不是爹不让你去。但那扛木料，一根就百多斤，确实不是女孩子干的活。”

“可是又没有那么多人手，三根木料怎么扛回来呀？”

“这倒是个问题，找不出男小伙了。”

“要不，我去找小林姑娘一起去？两人抬一根总可以了吧？”

“小林身体没你好，不一定能行。”

两人正说着呢，小林进来了。

“小林妹妹，正说着你呢，你就来了。”丁妹说。

“我知道你们在商量什么。鲁队长正为扛木头犯愁呢，又不好意思说，所以我过来跟你商量了。”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本来还想自己一个人去扛一根回来呢。我爹不让，怕我扛不了。所以正想着你呢。”丁妹说。

“那太好了，我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那咱走吧。”

她们俩到了北门，跟鲁队长他们汇合，一起往李家泊去了。

这正是他们撤离龙头时走的路。快一个月了，被弹片削去树皮的青松，松针更绿了；小草也长高了，把地上的焦土灰渣遮去了不少。可这一个月的经历依然强烈地冲击着他们每个人的心扉。

“这一个月，就像过了一辈子。”鲁队长说。

“这一个月，就像从阎王殿里走了一趟。”平金刚说。

“这一个月，就像块石头压在俺心上。”丁妹说。

“这一个月，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林海秀说。

“还是小林姑娘说得好。出了力，流了血，付出了代价，收获的是希望。”鲁队长说。

“希望？黄港解放了，新中国快要成立了，你们的希望是什么呢？”平金刚问。

“希望？那当然是希望国家富强起来，我们老百姓生活都好起来，不愁吃不愁穿。”鲁队长说。

“希望？那就多啦。希望我们的国家真的像春天里的大花园，到处开满了鲜花，到处充满了温暖，人人像兄弟姐妹。那多好啊！”林海秀说。

“到底是和当老师的好上了，讲起话来，也和以前不一样了，那么的有诗意啊。”平金刚说。

“去！”小林嘟哝了下。

“小林的希望，恐怕不止这些吧。比如说，春天的大花园里，不光有树，还要有鸟儿飞来飞去，成双成对的。有一对，飞得最欢腾的，叫什么名字来？”鲁队长一有机会就要拿小林姑娘开心，这也是因为他们从小是家门口的玩伴。

“去，不跟你们说了。”小林装着噘着嘴，心里当然想着，那春天的花园里有她和李辰的小窝。

丁妹的希望是什么呢？她没说，这还用说吗。

虽然还没到春天，人们的心里却像春天一样的温暖，充满着美好的希望。

在鲁队长他们去李家泊扛木料的时候，王大妈领着唐玉珍、齐阿姨几个上茅山去割蓬草，用来铺房顶的。

出北门外，镇东北那片树林里就不少。

几个中年妇女在一起，都是心事不少、话更不少。

玉珍说：“黄港都解放了，不知他们支前的，能什么时候回来啊。”

王大妈说：“是啊，全国都快要解放了，王立他们还能被国民党带走多远呢？还是齐姐好啊，男人在部队上，能有个信息回来。”

齐阿姨说：“唉，我这儿也是半年多没有音信了。也不知打到哪儿了。”

玉珍说：“什么时候，不打仗就好了。”

齐阿姨：“这样打仗，两边不知死了多少人哦。”

“那就等彻底消灭了国民党，解放全中国。快了，快了。”王大妈一边说着，一边镰刀下去得也更快了。

大家割了一会，玉珍又说了：“唉，最难的要数赵玫了。家都散了，儿子死了，丈夫被抓走了，公公到现在还不知音讯。一家四口，三个男的都没了着落，就剩她一个女人家。这日子，真不好过。”

王大妈说：“所以，我们今天都来帮她干点活。虽然各人家里也都有不少事，算是尽我们的一点心吧。”

玉珍说：“我也在想，我们村里这么多户人家，谁家最难呢。想想还是姜雪花死得最惨了。”

王大妈说：“是哎，还撇下了宝宝。”

齐阿姨叹了口气：“这事真是一言难尽。姜雪花是好样的，她在的时候，我跟她也是情同姐妹，她的工作忙，都把孩子放在我这儿。可现在，这个秦德才也不着家，也不管孩子，这算什么事呢？”

玉珍也说：“我早就看那姓秦的，不是个好东西。”

王大妈跟着叹气说：“怎么办呢？不看僧面看佛面吧。”

玉珍说：“时间长了，这样也不是个办法。村里要管这个事哎。”

“好，我去跟村长说一下。”王大妈说。

蓬草已经割了几大堆了。

老王头和皮安己，留在村里料治赵玫家的房。

那时在农村里，要称得上是干活的一把好手，不光是地里的庄稼活要样样行，而且盖房子的活也要能拿得起来。老王头对这些都是很在行的。

老王头先在塌了的那间屋里看了下，跟皮安己商议，房顶上的檩条和椽子，哪些还能用，哪些不能用，苫草要拆到哪儿。而后，怀揣一把斧子，就上屋顶干起来，往下砍烧焦的檩条。这是个危险活，因为被烧过了的房顶，不知道哪些还能撑得住，哪些地方撑不住人了。

皮安己在下面忙说：“不行啊！等鲁队长他们回来，叫他们年轻人上去吧。”

“那还得等多长时间啊，我先干着吧。你去挑点泥过来，我们还得把山墙重新垒起来。”

“大叔，可得小心哦。”赵玫也在下面担心地说。

“我心里有数，你放心吧。”

砍下来的烧得焦黑的木条、苫草，连同房顶陈年的灰土，哗哗地掉落，满屋子满院子腾起浓雾般的尘土。

“赵玫啊，你到街上去吧，院子里面太呛人了。”老王头说。

“噢。”赵玫答应着，退出院子，站到胡同里。

真不知道秦德才这种人有什么特别的嗅觉。这时候，他出现了，他朝站在街门口的赵玫走来了。

秦德才看见赵玫头上那闪着红宝石似光芒的发夹，恬着脸说：“大妹子啊，嘻嘻，站在门口啊。”

赵玫理都没理。

“大妹子哎，我在想啊，咱俩之间有戏哎。”在秦德才见过的人里面，他觉得赵玫是最漂亮的了，以前都没敢想，现在这机会从天上掉下来了。你看，这不，这漂亮妞儿明明白白地站在自己的面前，两边还一个人都没有。

“大妹子，现在你一个人不好过，我一个人也不好过。那咱们俩，就一起过吧。嘻嘻。”秦德才还把脸凑了过来。

赵玫根本没想到秦德才来这一手，气得跳了起来。

“呸！”赵玫用力地骂着：“狗东西！你不是人！”那唾沫都上了秦德才的脸。

“你骂人，你敢骂人。”

“我不是骂人，我是在骂狗！”

“好你个姓赵的，跟我姓秦的过不去，就没你好日子过。”秦德才气得扭歪了脸，说着狠话。

“怎么啦，怎么啦？”老王头因为扬起的尘雾看不清下面，就在房顶上问。

秦德才钻进了灰尘弥漫的院子，躲开了赵玫。

王大妈她们把蓬草背了回来，又去村西北角场院的空地搬些玉米秸来做椽子。

鲁队长他们把木料扛回来了。在院子里，刮树皮，锯开，粗的当檩条，细的当椽子。

皮安己挑了几回泥，赵玫也去挑水，平金刚和泥。大伙进屋子清理，搬出石块，扫出泥巴，准备重新砌山墙。

这时，秦德才从另一间窜出来，大叫着：“国民党！国民党！这儿有国民党！”手里使劲摇晃着一件国民党军装。

大伙一时都惊住了。

赵玫说：“这是董平章被他们抓去干活，国民党发的。凭了这件衣服，才能进出城门，不然就要被别的另一帮国民党第二次抓去。”

“你说的轻巧，明明是董平章叛变投降了国民党，你还想抵赖！”这下，秦德才可是瞪起了眼，决不会轻易放过。

老王头说：“你这话可不能随便讲。”

唐玉珍说：“那天，我听赵村的赵刊新说，他见过他们，干活时都穿着国民党的衣服。”

小林说：“解放龙头那天，解放军的一个领导说的，赵姐表现得最好，是第一个领着战士们冲到海角，一直冲在最前面。那天，你躲到哪儿去啦？”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把秦德才说得没话了。

赵玫蹲在地上，呜呜地直哭。

“干活吧，大家接着干活吧！这件衣服，赶紧烧了算了。”鲁队长说着从秦德才手里拽过了那件国民党军衣，塞进了灶膛。

这就是董平章给青一团干活时穿的那件，姜雪花还对赵玫说过别留着它。赵玫在天崩地裂似的这些天里，竟然忘了这件事。

过了晌的时候，开始上屋脊了。因为，原先的大梁还能用，直接上房檩就挺快。

按照农村的习俗，赵玫还叫鲁队长爬上去，在最高处的脊檩上系了根红布条。她又去唐玉珍家拿来一盆她在那儿蒸的小饽饽，给大家分发。这可是用白面和着玉米面做的，在那个年头，绝对是个稀罕的好东西。大家一咬一口，那个松软喷香好吃啊，都不由得赞叹起来。

“这可是有多少年没吃上这么好的饽饽了。”鲁队长说。

玉珍说：“里面好像有鸡蛋哎。是吧，赵玫？”

赵玫说：“这是我做月子省下的。给大家尝尝。”

那几年因为粮食太紧，村里几乎没有养鸡的，能吃上个鸡蛋真是太不容易了。

王大妈说：“这么稀罕的东西，怎么不留着自己补身体，反到拿给我们吃呢？”

赵玫笑着说：“难为你们都过来出这个力，一起高兴高兴吧。”

秦德才厚着脸皮没走，他知道这种场合，中午会有饽饽吃，没想到还真有这么好吃的，伸手就拿。赵玫气得一巴掌打过去都没打下来。秦德才咬了一口，刚觉得真好吃，可马上眼睛一转，又讲出歪话来了：“你这里面用了不少面粉吧，哪儿来的？不会也是国民党给的吧？”

赵玫气得没有好脸色：“呸！没给你吃，谁叫你拿的？”

“哼！我们都没有面粉，我都两年没吃过了。你怎么会有呢？”秦德才说。

小林说：“你没有面粉，别人也非得没有啊？就算是国民党给的，又怎么啦？他们赵村，每家人家都有一袋。都把他们当成地主？都杀了？”

“我们家，也有一袋，埋在猪圈里。大概是王立留下的。”老王头在这之前还没说过这事。

大家又惊了，不再说话。

第二天，赵玫的家修补好了。大家在高兴的同时，刚吹开的乌云，又好像起来了一些阴影。

赵玫说：“真得谢谢大家了。按说还得放个鞭炮，可实在弄不到。”

鲁队长说：“嗨，这上哪儿去找啊？好在现在也不兴那么多了。”

傍晚，赵玫上了她家西门外的那块地。

在董平章爷爷的坟头边，有一抔新土，那是她小宝宝的坟塋。按风俗，小孩是不入土的，只能扔到野外，任凭猫撕狗咬。赵玫实在舍不得，也把他埋到了这儿。

暮色苍茫，凉风渐起。插在坟头的幡，在风中飘摇。

赵玫在坟前，哭了好久。她知道，在她面前的路，不会好走。但是，不好走也得走。这个家，只有她了。如果她再坚持不下来，没有了她，她会对不起董家，也对不起所有关心她、帮助她的人。尤其是，要是有一天平章真的回来了，没有了她，他该怎么过。她，赵玫，只有挺下去，只有坚强地站起来，生活、劳动、工作下去，没有第二条路。

赵玫站了起来，擦去了眼泪，在越来越深的夜色中往回走去。

第三章 支前回家

1949年6月3日

高兴的事，也还有不少。

胜利的消息，不断地传来。长沙解放了。兰州解放了。

今天，民主村有个更大的消息。

王山回来了！

王山支前回来了！

王山支前，从淮河边走上回来了！

当王山极度疲惫地倒在西门口的时候，谁也没有认出他来。

怎么会认出来呢？这时的王山，身上的衣服已是黑灰粘着的一绺绺布条，肩上背着捆黑灰色的棉絮，双脚早已没有了鞋、用破布缠着，脸上黝黑憔悴，两颊深陷，胡子和头发像两堆乱蓬蓬的灰草，一堆在头顶，一堆在下巴。浑身连个黑颜色都没有，就是灰和土。蓬头垢面之上，只有眼睛，还有丝亮光，还一直朝前看着，看着故乡，看着亲人。眼睛里的亮光，就是心中的希望，就是脚底板的动力。他拄着根树枝，一步步地，从淮河南岸，二十多天，走着，挪着，终于回到了龙头镇。

当他趟过大河，见到了西门外那棵高大的白果树，真的是心在狂跳、血在沸腾、身体在膨胀、眼睛都迷糊了，不知道两条腿是怎么走的。

当他见到龙头城墙的那一刻，立时扔掉了手中的树枝，三步并成两步，几乎是扑了上去。当黝黑粗糙干裂的手掌摸到西门斑驳的城砖，王山就倒了下来，泪水止不住地下。

西门的老乡们，以为又是从西面来的一个叫花子，这也是常有的事，并没有多去理会。可那人，却抚摸着城墙，继而拍打着，从轻声的低泣，渐渐嚎淘大哭起来。

人们十分惊奇，围了过去。

秦德才对这种事，是少不了的。他大吼一声：“什么鸟人，在这儿撒泼。”举起棍，就要往下打。

鲁队长拦住了，“你先问问清楚哎。”便向倒在地上的人发问：“你这是要做什么呀？有什么事吗？”

这一问不打紧，地上的人抬起头，说：“你是来福啊？我是王山，我就是王山哎！”

人们惊呼起来！

“是王山么？”

人们怎么也想不到眼前瘫到在地上的人，衣衫烂缕，灰头土脸，竟是一年多前戴着大红花出去的民主村数一数二的棒小伙王山哪。

大伙瞅了又瞅，“是哎，是王山哎！”

“王山回来了！”

“王山回来了！”

人们几乎是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因为这是民主村去年出去支前的第一个回来的人。

人围得更多了，围得更紧了，人们更是七嘴八舌问个不停。

“王山，你还看见我家二小子啦？”

“小栓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啊？”

“你们最远跑到哪儿啦？”

“你就这么一直走回来的啊？”

王山张着干裂的嘴，嘶哑着，“啊啊”地说不出话。

于村长这时挤了进来，“别问了，先抬回家。”

大伙七手八脚把他往家抬。

满巷子、满村都是喊着“老王头，王山回来了”、“老王头，王山回来了”的声音。

老王头一家，都已经出了院门，在胡同里看到了被多少双手托着抬过来的王山。

王大妈死命地挤了过去，看见儿子劳累成这样，也是一行热泪潜然而下，双手不住地抚摸着，“儿子呀，可回来啦。”

王山也是涕泪横流，“爹呀，娘呀，儿可回来啦，总算还能见到你们。”

老王头拍拍儿子，再劝开层层围着的乡亲们，“先进家，先上炕。”

王山从人群中穿过，进了家门。

于村长在门口挡着，“就到这儿吧，别往里进了。让他先歇息吧。”

赵玫在边上看着，听见于村长的话，也就没往前挤，默默地看着，心里比谁都急。她一家四个人，已经少了王立，少了小宝，不能再少一个啦。

丁妹一直在边上跟着，直到进了院子，才说上了一句：“哥，你回来啦。”

唐玉珍硬跟了进来，于村长知道她跟老王头有点亲戚关系，没有拦她。但她没有进屋，只是在窗外静静地站着。谁都知道，她是在牵挂着同样是南下支前的丈夫。

进了里屋，王大妈连忙铺炕，一边说：“赶紧洗澡、换衣服。”

王山说：“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动，就想喝口水，就想好好地看看你们。”

“那就先喝点粥吧。”王大妈忙喊着：“丁妹，给你哥烧水，熬点小米粥。”

“噢。”其实，丁妹已经在灶台上忙活开了。

王山躺在炕上，腿和胳膊伸得溜直，连手指都舒展开了。他想让每一块肌肉都能得到最充分的休息，嘴还叭哒着，舌头添着嘴唇，说：“给我喝口凉水也行。”

王大妈说：“使不得，这时可不能喝生水。稍忍一忍，啊？很快就烧好了。”她又朝堂屋喊了声：“丁妹啊，多添把火。”

“噢，就好了，已经冒气泡了。”丁妹在灶前一边答应着，一边使劲往灶膛里塞碎木条，那风箱拉得“呱哒呱哒”直响。

王山一会儿看看坐在炕沿的爹娘，一会儿看看站在炕边的村长和鲁队长，心里还在想，我这可是真的回来啦。

“好啦，好啦。哥，先喝上碗热水吧。”丁妹端了碗走到炕边。

王大妈接过碗去，忙着吹了两口，说：“快去，下上米吧。”

“噢。”丁妹又低头忙着去堂屋了。

老王头问：“这一年的时间，怎么连一点音信也没有啊？”

王山说：“我们在外面，最着急的也是这一点。家里的事，一点也不知道。可我们天天在跑，一天一个地方，哪有发信送信的人啊。”

老王头又问：“这些日子，去过哪些地方？”

王山答：“数不清了，也记不住。就知道过了沂蒙山，又过了陇海线，又过了淮河。反正几乎没一天闲着，天天推着车，走啊走啊。后来，车也推坏了，就挑着担，走啊走啊。再后来，扁担也没了，就肩上背着扛着，走啊走啊。直到有个领导说，革命胜利了，不用背了，你们回去吧。大伙高兴得，把什么都扔了，转身就往回走了。去的时候编的队伍，早就走散了。往回走的时候，有同乡的、有同路的，就一起走，碰不上的，就自己走。我走的时候，有三、五个人在一起，都是往这边的。等过了胶济铁路，就剩我自己了。”

“那你背的那一扎，是什么呀？”王大妈问。

“那是睡的被褥啊。一路上，就用它连铺带盖。”

“都破成、脏成那样了，还能往身上盖啊？”

“有这个，那还是好的呢。他们还都没有了呢，到哪儿，就往地上一躺。”

“又冷又硬，能睡着吗？”

“妈呀，这话不能像现在坐在炕上这么说。”王山觉得有点可气了，“那时候，有让你休息的时间就不错了。一听有干部说，好，休息了。那就不管是泥里水里，躺下就睡。”

“唉，儿呀，遭了多少罪呀。”王大妈不禁又落泪起来。

“遭点罪，倒不算什么，能回来就行啊。有多少人死在外面，再也回不来啦。”王山有些黯然神伤。

于村长忙插上话：“王山这趟是辛苦啦，这也是为我们全村百姓吃的苦。回来就好啦。王山啊，我们村一起出去的那些呢，怎么没一起回来？”

王山叹了口气：“唉，开始我们都在一起。不光我们民主村，连我们龙头的，全海源的，都在一个大队伍。可等过了津浦线、进了战场，情况就一天一变，部队穿插得很快，我们都跟不上。而且，临时有很多任务，要这批人上这儿，要那批人上那儿。有时，到了敌后很远的地方。我们都不知道东南西北，就跟着前面的人拼命地跑。也有敌人冲过来的，还有糊里糊涂跑到敌人那儿去了。”

“那就被国民党抓过去了？”鲁队长皱起了眉头问。

“是哎，那就倒霉了，不知道要带到哪儿去了。以后，就算回来也说不清楚了。”王山无心地说着。

老王头俩口，紧锁起了眉头。

“你没碰上过国民党吧？”鲁队长问。

“还好，我们没碰上过。”

“那你们还真不错，就是累一点，辛苦点，也还行。”鲁队长说。

“那遇到的难事多着呢。地上炮弹子弹打得震耳朵，天上不知什么时候，飞机就来了，炸弹就往下扔。躲都不知道往哪儿躲，炸上谁，谁倒霉。”

“哎哟！”听得王大妈眼神一愣一愣的。

“打仗免不了有这些事，还有哪些难处呢？”于村长问。

“再有就是怕生病。要是太累了，撑不住，头疼发热、拉肚子，这些在家里是小事，可在那时就麻烦了。因为队伍天天在走，经常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情况都不了解，有的地方还没解放呢，把你放哪儿？真难。还真有倒在路边，死了。东北村的两个，实在渴得不行，在路边沟里喝了点脏水，又吐又呕，拉了一天肚子，还在扛着箱子走。第二天，就不行了，脸色都发绿了，躺在路边，还想爬着跟上我们。上边不让我们停，说是有人管他们。我们一步一回头，我们掉着泪，他们也掉着泪，还在爬着，哭着，喊着我们，不知道他俩后来怎么样了……”王山又一次呜咽着流出了眼泪。

听到这儿，大家不能不有所伤感了。

“后来，怎么往回走呢？”于村长问。

“怎么走？一步一步地走呗。怎么走着去，再怎么走着回来。”

“吃饭睡觉呢？有人管吗？”于村长还是关心地问。

“有的村比较好，还有管的，还在村口搭个棚子，摆上一桶粥，可以舀点喝，坐着歇会儿。有的村就不管了，说是没有，哪有吃的啊。恐怕他们自己也真的没有。还有的村，以为你是国民党逃兵呢，恶狠狠的，直往外撵。”

“晚上，睡哪呢？”王大妈凑前了问。

“走哪儿，就睡哪儿。什么场院、路边，这就没有讲究了。有个屋檐，算是最好的了。”

王大妈又叹了口气。

稀粥熬好了，丁妹盛出一碗，放在灶台上凉着，把剩下的碎木块拿到屋外去。她跨出屋子，一看唐玉珍一直静静地站在窗外，忙说：“玉珍啊，快进来吧。说不定，我哥还能知道家骏哥的事呢。”

玉珍抬起头，眼圈也挂着泪珠。

玉珍慢慢地进了里屋，她多想知道孩子他爹的消息，但她又多害怕听到的是像王山刚才讲的那些可怕的事情。

王山见是玉珍进来，想直起身子。

王大妈连忙按着王山，说：“你躺着吧，玉珍也不是外人。”

王山迟疑了下，说：“玉珍姐，你来啦。”

唐玉珍也迟疑了下，说：“王山兄弟，这时候，按说真不该来打搅你，可你也知道，我哪能放下这颗心。你知道，家骏怎么样啦？”

“我和家骏他们走散了。那天，是过了津浦线，正走着，敌人大部队横着插过来。家骏他们在前面，冲过去了。我们剩下的一些人，就被截住了，没能过去。后来，我们继续往南，听说他们往西去了，再也没见过面，相互之间也没有个消息。真对不起了。”

“不，不。”玉珍忙说。

“这就还有希望，玉珍啊。家骏，会回来的。咱民主村的民工们都会回来的。”于村长说。

“哥，小米粥好了。”丁妹端着碗进来。

“谢谢了，妹啊。”王山接过了碗。停了回，又望着丁妹，问：“俺兄弟呢？”

大家竟一时无语了。

王山诧异地来回望着大家。

停了一刻，老王头说了：“从你走后，尤其这一二个月，家里也发生了不少事。”

于是，老王头把国民党怎么反攻，占了龙头镇，敌人怎么凶残洗劫，解放军和乡亲们怎么英勇斗争讲了一遍。最后讲到了王立和几个民兵怎么被国民党带走，至今情况不明。

王山越听越惊讶，没想到连家乡也出了这么多惊天动地的事啊。尤其是听到弟弟王立，也被国民党抓去了。回到家来的满心喜悦，消去了一半。

于村长又劝慰说：“眼看全中国都要解放了，国民党还能再逃到哪儿去？王立他们肯定能回来，你们放心吧。”

老王头问：“解放军这会儿能打到哪儿啦？”

鲁队长想了下，说：“我算算，我们回龙头镇的时候，令营长说已经打到浙江了，上海都已经解放了。这又好几天过去了，该能打进福建了。”

“福建？福建在哪儿？咱们全国还有多少没解放啊？”王大妈关心地问。

“那就剩多少啦，就剩一个广东省啦。”鲁队长说。

“那不到一个月就能打下来，再用不到一个月就能走回来。最多，不出两个月，大伯啊，王立他们就能回家啦。”鲁队长高兴地说。

老王头俩口也呵呵地笑了。

唐玉珍也舒了口气，说：“那样的话，支前的人更能早回来了。”

“那当然。”于村长又低沉地说：“其实，我最担心的是老董头，年纪数他最大，身子骨又不好，怎么能顶下来？”

“是啊，我一路上，看着董大叔就挺吃力。我几次还劝他少挑点。可他很认真，说既然干了活，就要有干活的样，出来了，就不能丢咱海源人的脸。可是，从津浦线那次冲散后，我也再没见过他。”

“要是老董头出了事，这叫赵玫怎么过？”王大妈忧郁地说。

屋里又沉默了。

王山转着头看看大家，他不知道赵玫家遇到了更大的难事。

于村长见此，便说：“我们就不多打搅了。王山兄弟多歇几天吧。回来好啊，我们村又多了一个骨干。”

“是啊，等他们几个支前的，都回来了，我们民兵队的力量也就更强了。排个队，在街上走，那阵势也不一样。王大伯，大妈，我们走了。王山，你别下炕啦，别下来了。大伯，别出来啦，陪着王山兄弟

吧。大妈，高兴点，能回来真是不容易，要高兴啊。”鲁队长一边往外走，一边说着，“丁妹啊，这几天，你又要多辛苦点啦，要把你哥照顾好啊。玉珍姐，咱一起走吧。”

“好。”唐玉珍带着未了的心结，也和于村长他们一起跨出了老王头家的门。

想说的是，海源县著名的“支前模范县”。仅1946年，全县就派出民工46712人、担架2395副。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

1949年6月4日

银川解放了。

整个新疆都和平解放了。

一个最大、最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9月21日，北京举行了建国大典。毛泽东在当天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隆重热烈的庆祝盛典，组织了大规模的阅兵和群众游行。

整个龙头镇都欢腾了！

人们奔走相告，喜极而泣。多少年的奋斗，多少人的牺牲，终于迎来了革命的胜利。

多少个日日夜夜的盼望，今天实现了。在艰难困苦中咬紧牙关的坚持中，在血肉拼杀的呼喊里，在枪林弹雨下冒死冲锋的眼神里，始终闪耀着光芒、在前方鼓舞着人们忘却自我的这个理想，今天就在自己的眼前实现了，就在自己的身边了。简直都有点让人不敢相信，怎能叫人不忘情、不激动。

龙头乡立即准备召开军民庆祝大会。

民主村的干部们马上商量准备工作。

于村长说，咱们再舞起秧歌吧，上次舞秧歌，还是小日本投降那年呢。

好，好。大伙都拍巴掌欢迎。

老王头说，还是我来当“带傅”吧。（说明：“带傅”，带头的师傅，也可写作“大夫”，在队伍前面领舞的人）

于村长说，老王头干这行，可是行。

王大妈说，就是行头都没有了，这几年都搞没了。

经大妈说，那我们找几个妇女，连夜做吧。

经乡长离开龙头去南方当干部以后，经大妈和孩子还住在乡政府，即陶家大院的后院里。

鲁队长说，纪乡长跟我讲，会后有文艺节目，叫咱们村也出一个。

于村长说，咱们村，那就只有小林了。

小林说，那我还得现学一个啊？

鲁队长笑着说，这还不好办吗？现成的老师就在身边，不用说教一首，教十首也没问题。

呸，呸。小林回着嘴，两人又哄了起来。

两天后的下午，庆祝大会在东门外学校操场召开。

老王头带着几年来少有的喜气，穿好了唱秧歌“带傅”的行头：头上扎着黄头巾，腰系黄腰带，手拿缠着花布条的木棍。按说，带傅的行头还得花俏得多，得近似古代武士的打扮。但现在有这机会，有这心情，能缠上黄布条跳起来，就已经难能可贵了，也没去指望穿上金灿灿的盔甲。他一边哼叽着别人听不懂也不知道的什么调，一边去找秧歌队里的那些年轻人了。

王大妈走得更早了。她得去聚拢她那帮人多事多话更多的老姐妹。

王山，不听他妈叫他多歇几天的话，自告奋勇地也要参加秧歌队。用他的话说，这一年，太苦太憋气了，找个高兴活蹦哒一下，解解乏。

老王头说，那好吧。

昨天，王山已经练上了，虽然还显得很疲倦，可挺乐意。今天一早，就跟着老王头出去了。

丁妹也是喜气洋洋，这是她第一次出来开会。以往她家都是老王头一个人就代表了。今天，是建立新中国的大事，怎么能不出来参加呢。

丁妹穿上了她能翻出来的最好的也就是补丁最少的前两天就洗干净了的衣服。

她出了街门，把门板上的搭扣（搭扣：有着三五个环的小铁链，锁门用），向上扣进了门框上的门鼻，就出去了。海源的民风淳朴，如果外出不隔夜，一般是不上锁的。

来到街上，沿街的墙上贴上了很多彩色的标语。人们都穿着整洁的衣服，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相互间见了面，都是又客气又高兴。

出了东门，操场的四周插了很多彩色的旗帜，呼啦啦地迎风飘扬。会场里满满的人，大家席地而坐，又有老百姓，又有解放军。满场的欢声笑语，个个喜气洋洋。丁妹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人，第一次看到人们有这样的高兴。丁妹都不知道该往哪儿看，该往哪儿走了。

好在鲁队长老远就看见了，朝丁妹大声招呼道：“丁妹，丁妹！往这儿来，我们村坐在这儿。”

这一喊，不少人转过来看丁妹。丁妹是第一次被这么多人看。这样的大庭广众，这样的众目睽睽，丁妹的脸都红了，就想有个地方早点坐下，心里可还是挺感谢鲁队长的。

好在唐玉珍又在那边招呼了：“丁妹，上这儿吧。这儿有地方。”

丁妹忙挤了过去，一看，玉珍一家三口都在。杜家骏上个月也从淮河边支前回来了，只是身体要比王山回来时壮实些。小长贵更是高兴得人前人后又蹦又跳。一家人，其乐融融，真叫人羡慕。

靳喜悦，叫人背过来的，和他媳妇靠在边上。

迟得法也来了，脸上露着难得的笑容。

连申老汉俩口相互搀扶着也来了。纪乡长赶紧站起来，喊人拿两把椅子过来，叫老人家坐好了。

扎着黄头巾的秧歌队在会场的最前面，把锣鼓敲得震天响。

解放军的队伍更是热闹。这边是许班长（现在是排长了）在指挥着全排唱：

“我是一个兵，

来自老百姓，

打败了日本狗强盗，

消灭了蒋匪军……”

刚唱完，许班长就领着大家有节奏地喊着：“二排的，来一个！二排的，来一个！”

那一边，郝森林（也是排长了）马上响应，打着拍子，领起了全排唱起了：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三大纪律八项要注意……”

大会是令营长主持，纪乡长讲话。

纪乡长说：“9月21日下午，毛主席在北京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0月1日，又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整个会场顿时一片欢呼。

小林在主席台边上，拿着上级发的口号单，领着大家高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会场上空，响彻着热烈的口号声。

场地上的一角，迟得法悄声地问鲁队长：“旧社会对皇帝，才叫万岁呢。现在对领导人，也能喊万岁么？”

正好走到这边的余校长也插上了话：“是哎。听说孙中山先生有次坐船到马尾，看见码头上挂着‘孙大总统万岁’的横幅很生气，直到拿下来了，他才肯上岸。”

鲁队长说：“嗨，你们也多虑了。‘人民日报’上专门有文章说了这个事。喊万岁，并不含有任何的封建意味，而是人民自己的语言。别人喊，你跟着喊就是了。”稍停顿了下，鲁队长还想说几句，又觉得不好

说余校长什么，只好对迟得法说：“得法啊，以后，你还要多学习政治哦。”

“政治？”迟得法还是不明白，只是悄悄地晃着头，也看不出是点头还是摇头。

余校长好想也要再说些什么，嘴唇蠕动了下，末了还是缩了回去，无语地走了。

纪乡长接着说：“同志们！乡亲们！我们盼了多少年，奋斗了多少年，出了多少力，流了多少血，多少烈士为之献出了生命，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的诞生，它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从此，我们人民就要当家做主人。从此，将永远没有压迫和剥削，永远没有独裁和专制，永远没有黑暗和丑恶。我们将会享受光明和幸福。一个和平民主的新社会，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来到了！”

“当然，眼下，我们还有不少困难，我们还要发扬革命精神，刻苦努力，继续奋斗。生产上互助合作，生活上相互帮助。一心跟党走，光明在前头！”

我们曾经的汗水和鲜血不会白流，烈士的生命更不会白白地牺牲！我们的前途一定会是美好的，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是幸福的！”

在纪乡长讲话的过程中，人们鼓掌啊、呼喊啊。手掌拍红了，还在拍；嗓子喊哑了，还在喊。

纪乡长讲完话，令营长宣布：“下面，文艺表演开始！第一个节目，由李家泊的李辰和民主村的林海秀合唱，高楼万丈平地起。大家欢迎！”

全场掌声四起，都伸长了脖子，向台前张望。

小林姑娘临上台，心“怦怦”直跳，脚还软了一下，她拽住了李辰的衣角。

李辰感觉到了。他扶着小林的胳膊，有意识地捏了下，用鼓励的眼光望着小林。刹那间，小林不知从哪涌来了力量，挺起了胸，和小李一起跨上了用课桌拼起来的主席台。两人一站，就开口唱起了小林才学不久的陕北民歌：

“高楼万丈平地起，

盘龙卧虎高山顶。

边区的太阳红又红，

边区的太阳红又红。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

“好，好。”下面一片叫好。乡亲们第一次听到了自己的乡妹子在台上唱起了歌，唱得还真不错。

革命啊，真是神奇。它使林海秀显示出了好嗓子，它使丁妹在大庭广众之下坐在了人群里，当然，它也使秦德才那种人得意忘形。

台上的节目刚完，台前的锣鼓便敲了起来。“锵锵，锵锵，锵锵。”那锣鼓声，一阵高过一阵，敲得人们的心都要跟着跳了出来。

老王头领着他的秧歌队，跟着锣鼓高亢激昂的节拍，扭动起来，跳跃起来。

“锵锵，起锵起；锵锵，起锵起。”锣鼓按着秧歌打起了点，秧歌队扭得也更带劲了。

老王头扭得满头大汗，小伙子们扭得解开了扣子，露着强壮的胸膛，动作做得卖力而又夸张。

人们都站了起来，围出了好大的圈，跟着鼓点一起欢呼着、跳跃着。

秧歌队扭出了操场，扭到了镇里的十字路口，扭到了南门外的部队营房，扭到了龙头镇的四个村，扭到了赵村、王庄和李家泊，扭到了晚霞飞起，扭到了月亮和星星交辉……人们还没有尽兴。

从抗战胜利以来，民主村第一次耍起了秧歌，而龙头镇的人们也是第一次这样尽情地欢畅。

对于新中国的成立，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由衷地祝福、忘情地欢庆，至少在民主村是这样。

他们盼望的新中国、新生活，终于来到了。当然，他们不会想到新生活除了阳光和鲜花，也还会有阴晴圆缺、雨雪风霜。

第五章 新春新气象

1949年6月5日

1950年。春天。

新中国的第一个春天。

春天是最有希望的时候，也是最需要奋力拼搏的时候。

去年是这样，今年也是这样。去年是为了抗击国民党，今年是为了搞生产。

人们的心情，是舒畅的，可以为了尽快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拼命地劳作。人们肩上的担子，又是沉重的。在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和旧政权的摧残破坏，人们除了贫瘠的土地，几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1949年是少有的大旱，秋收只得了几成。好在赶走国民党之后，顾不得身上的伤痛和损毁的家园，咬着牙抢种，到晚秋，有了点收获，这个冬天是过来了。

为了秋天的收获，春天就要有更多的付出。人们努力着，就像那干涸的戈壁里，小草迎着阳光在挣扎着向上生长。

春耕是最辛苦的。农时不等人，农活又多又重，而且又正是青黄不接、缺粮断炊的时候。

老王家全体出动，来到了自己家的这块地。由王大妈在前面撒上些几个月来好不容易攒下的一些土杂粪，因为家里没有牲口，老王头和王山两个人拉犁，丁妹在后扶着犁把。两个男子汉拼了命地使劲往前拉，那管汗水噼啪噼啪往下滴。好歹犁完了地，一家人又齐下手，把土疙瘩打碎，荡平，再去大河挑水，让干涸的土地尽量地湿润，最后再小心翼翼地撒上那最珍贵的种子。一天下来，一家人轮番上阵，衣服被汗水浸湿，肩膀勒出了血痕，都在所难免。然而，对于老王家来说，什么累啊、苦啊，连想都没时间去想。

唐玉珍家也忙开了。有杜家骏在，事情也好办。只是家骏对农活还不十分在行，经常过来请教老王头。老王头也十分乐意，时不时地到杜家骏的地头去指导。

靳喜悦家，老王头还是领着组里过来帮着翻了地。别的活，喜悦媳妇也不愿多麻烦大家，宁肯自己起早贪黑，一个人顶下来。

要说最能吃苦、最下工夫的，那是迟得法了。老迟有个儿子叫迟一敬，已经成家，分开单过。按说，老俩口也没有更多的心事和负担。但是，农民的本性，对财产和富裕的追求，使迟得法不知疲倦、永不停歇地劳作。

老迟每天天不亮就出了西门，这在全龙头镇也是最早的了，而且不到天黑不回家。从早到晚，他不停地施肥、翻地、挑水、刨坑、点种。出的力，真是一个顶俩。没有什么肥，他就把自家的炕扒了，把炕坯敲碎，一担担地挑到地里。这是北方农民常用的一种施肥方法。这样地下功夫，在龙头镇也是数第一的。他说，他要把去年被国民党耽误的时间追回来。还真没有白下功夫，老迟家地里出的苗，在全村最齐最旺盛。

除了辛勤劳作，还有喜人的事呢。北街上的周家，添了个胖小子。周家有两兄弟，生孩子的是老大周伯生家。因为是在一个新的春天，特地取名叫新春。小新春的降生，也使民主村的乡亲们高兴了一阵。去年迟家就添了个小孙子，叫迟解放。不过，这个小新春有点不一般。他是本书中少有的从生到死都在本书时间范围内的一个人物。老二周仲生，还是个小伙子。

在一片和谐欣喜的氛围里，也有不和谐的音符。齐阿姨在她家里嚷嚷呢。

“连个窝窝都不想吃，整天吵着要吃烙饼。我自己都两年没吃过烙饼呢。”原来，秦德才把他儿子一直撂在齐阿姨家，自己整天不知在哪儿游荡。但他那儿子秦有理，虽然才三岁，却因为没有个好管教，也弄得没个好脾气。齐阿姨整天给他照顾着、做饭给他吃。有点吃的都给了秦有理，连自己的孩子也没有。可秦有理，这么点的小孩子，还净想着要好的吃。这叫齐阿姨从哪儿弄去，不给，那小东西就是吵。这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看在死去的姜雪花的份上，齐阿姨一直忍着。眼看一年了，齐阿姨今天因为秦有理非要吵着吃烙饼而实在忍不下去了。

“要吃，找你老子去，找我干什么？”

有理在地下打着滚地哭。

别看秦德才整天不着家，可一有这事，没多长时间，他就跳着进来了。

“怎么啦？谁欺负我孩儿啦？”他还很有理似地大着嗓门地喊。

“你秦德才，你自己的孩子怎么就不管啦？”齐阿姨问。

“我，我，村里那么多事，我整天都跑不过来。你看看还不行么？”

“我凭什么要看这孩。再说，我都已经看了一年了。我对雪花已经尽了心了。”

“这不是我的孩子，这是革命的孩子。大家都有责任。你们说，是吧？”秦德才对闻讯围过来的人群说。

“但首先，第一个有责任的是你哎。”鲁队长说。

“你整天忙个什么呀？村里有什么事交给你忙啦？”小林也不让他。

“革命的事，我哪样不是在最前面啊？为了革命，我老婆都死了。为了革命，我连孩子都顾不上了。你们这么挤兑我，这孩子我不要了。谁要，我把他卖了算了。”秦德才耍起了无赖。

“你说的是人话么？”齐阿姨气得真是连鼻子都歪了。

秦德才还要狡辩，于村长进来了。

“现在村里，人人都在忙着干活，就你秦德才有事。叫我怎么说你呢？”于村长对秦德才也是一肚子气，要不民主村真能评上全乡的模范村了。

“齐阿姨这儿呢，也真不容易。”于村长也跟着大家的习惯叫齐阿姨了。“上次，老王家的已经跟我说过这事。我跟纪乡长也说了，纪乡长也跟县里反映了，把孩子送孤儿院吧。本来，县里说，还有他爸在，哪有送孤儿院的。后来，纪乡长又去说。上县里开会的时候，还专门找了管民政的。说情况特殊，是烈士子弟。县里说，咱海源还没有孤儿院，黄港才有，还得去问人家。昨天，纪乡长跟我说县里来电话了，黄港那儿同意了。具体哪天去，再等通知。我还没来得及跟你们讲呢，你看你们这儿就捂不住了。”

“这下就好了，我可没有心事了。”齐阿姨说。

“你还舍得孩子离开你啊？”唐玉珍问秦德才。

“他还不愿意？巴不得早走呢。”小林说。

“孩子是革命的后代，交给国家，我一百个放心。”秦德才大言不惭地说。

“谁也别多说了。这几天，孩子就放在我家里吧。德才啊，孩子有什么东西，你也拿过来吧。估计这一两天就会走。”村长说。

“没有，没什么东西。”秦德才喃喃地说。

“你这样，还像个当爹的样吗？”唐玉珍说。

“你这小东西也是。”于村长对坐在地上的孩子说：“你不知道大人的难处啊？要这要那的。有给你吃的就不错了。起来，走吧。”

于村长把孩子拖走了。

就这样，秦有理有了条别样的生活道路。和那个从他爹秦德才刀下逃生的、地主的孙子，国民党军官的儿子，被错当成革命遗孤的狗狗，住到了同一个孤儿院。十几年后，他们又以不同的姿态，回到了西北村。

秦德才的事，还没完呢。

土改的时候，因为秦德才俩口在村里最是苦大仇深，因此分到了最好的地，就是刚出西门口的平泊地。土又厚，又靠着井，离家又近，早晨晚边、吃饭前后就能去伺候。

但就是这样的好地，被秦德才糟蹋得不像样子。这几个月，秦德才不但没来浇水锄地，甚至就没进去看过一次。地都干裂了，那一道道的裂缝能伸得进手指，干得连杂草都不多。从西门进出的人，看着这块地，都摇头直喊可惜。

尤其是迟得法，这样的庄稼里手，看到地被糟蹋成这样，都觉得心疼。

一天，迟得法从西门走过，看到这快地，又感慨了起来：“作孽啊，这样好的地弄成这样，老天爷要怪罪的呀。还不如给别人哩。”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不料这话，给正巧走在后面的秦德才听见了。

“老迟啊，你看中这块地啊。这是块好地哎。你看中给你哎，我也没用。”秦德才说。

迟得法当然知道，那是个什么人，忙说：“使不得，使不得。”

“嗨，你也别客气，我也不会白给你。这样吧，便宜点。一千斤面粉，不贵吧？四亩多地哩！”秦德才伸出了四根手指。别看他二流子郎当，干活什么也不会，可盘算起钱来一点也不含糊。

迟得法一听，秦德才把这事当了真，就说：“一千斤面粉？家里连一斤也没有。上哪儿去找？”

“要不，一千斤麦子也行。”

迟得法心里一动，这买卖值，嘴上却说：“可现在，谁家会有这么多现成的麦子？”不过这倒也是实话。

“再不，一下子你拿不出这么多，那我就每天上你家吃块烙饼。怎么样？”

迟得法心想，可不能叫秦德才粘上，以后就甩不掉了，就说：“或者这样，我每年给你一百斤谷子，怎么样？”

“谷子，我怎么吃呀？一百斤小米吧。”（说明：谷子是原粮，脱粒后叫小米，是成品粮。100斤小米比100斤谷子值钱得多。）

迟得法心里恨得直咬牙。这兔崽子，平时都是在装蒜，这种时候倒是一点亏也不吃。

“一百斤小米，多了点。八十斤吧。”迟得法说。

“你这么个有钱人家，还这么计较。好，好，我也不多说了，现在就去你家拿。”

“别，别，我现在别说八十斤，连十斤也没有啊。我还得出去借。再者，这事还得立个字据，请村长做个中人。”

这以后的几天，迟得法就去办这事。先借来了八十斤小米，再请村长写了个字据，算是迟得法租秦德才四亩五分地，年租金八十斤小米，两人都签了字。又找来了秦德才，给他念了一遍，没有异议，最后让他摁了个手印。

秦德才当即扛了小米就走。

迟得法下午就去刨那块地。

这是民主村土改以后，发生的第一次土地关系的变更，尽管还是不完全的变更。

这个经济往来，两年以后，给这几位当事人都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第六章 抗美援朝

1949年6月6日

6.1 解放全中国

1950年5月1日，海南解放了。

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一年的时间里就横扫了整个中国大陆。革命的铁扫帚，扫到了每一个角落，扫到了海上的岛屿。那是何等的了得！

这又给民主村的乡亲们带来了震动。这里的老百姓天天关心着解放军前进的步伐。与其说是在关心革命的进程，不如说是在关心自己亲人的命运。这两者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因为，解放军每前进一步，国民党就少了一块躲藏的地盘，被国民党抓去的人，就有可能早一天回家。

现在，海南岛都解放了，整个中国大陆都是共产党的天下了，王立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呢。国民党还能躲在哪儿呢。听说，还有个台湾，也是在海上的一個島，就像海南島一樣。以前，乡亲们还真不知道，或者是还真没注意到有个叫台湾的岛。现在，国民党就躲在那儿。

民主村的乡亲，就是生活在海边的人，以前怎么就没注意到海里面还有岛呢。龙头南面的海里，一二百里之外，就有个岛，叫千里岩，一个无人居住的荒岛。几乎就没人去过，连出海打鱼的渔民看见过那座凸出在万顷波涛之上的尖山，也极少有人上去过。怎么国民党现在就躲在一个岛上呢？有水喝么？不怕刮风起浪么？

老王头他们还特地到学校里找李辰想看地图。

到了李辰的办公室，一看，纪乡长也在。老王头大咧咧的说开了：“乡长，你也来找台湾啊？”

李辰说：“乡长可不光是为了台湾，三天两头就过来找书看、学文化。”

纪乡长也笑呵呵地说：“建设新中国，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可不行啊。你们是来看台湾在哪儿吧？上次来，我就特地找过了。你们看，在这儿呢。”

纪乡长指着墙上的地图说着。

地图上的台湾就这么一小点，不注意还真看不到。

“这么点地方，真不够打的。”鲁队长说。

“你别看，这海还是蛮宽的。”小林姑娘说。

“真叫人着急啊。”老王头急得皱着眉头、直搓手。

“大伯，别急。我看，到今年国庆节，就差不多啦。到那时候，大伯再舞秧歌，秧歌队里就会有王立了。”李辰说。

“那就好，那就好。”老王头心里觉得稍微宽慰了些。

不料，才过了一个多月，一桩世界历史也不会忽略的事件发生了。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朝鲜军队突然越过“三八线”向南推进，一举攻占汉城，直逼斧山，几乎横扫全境。

9月15日，以美军为主体的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战火又反过来烧向中朝边境。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为时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开始。

民主村的人们为此又兴奋了一阵。

“咱们的军队真厉害，都打到朝鲜去了。”鲁队长在场院里领着大家学习政治时事，拿着一张报纸说。解放后，村里有安排政治学习的时间了。

“怎么越打越远啦？”迟得法问。

“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解放全人类，解放全世界！”平金刚解释说。

“这样才好嘛。等解放了朝鲜，国民党就更没地方躲了。”杜家骏说。

“那再支前，就要跑到朝鲜去了。”王山说。他还是忘不了他那段支前的事。

“那咱们村的年轻人，要出国去了。”小林说。

“看这回国民党那帮兔崽子，还往哪儿跑？”彭会计说。

“就是绕个圈子，也能把台湾拿下来。”靳喜悦说。喜悦虽然身体不方便，可老躺在家里闷得慌，没个人说话，所以有个会开，他是最乐意叫人背着来了。

这些村民也许想不到，因为这场战争，使西方世界从另一种绥靖主义中警醒过来而改变了整个国际关系的格局，由欧美与苏联联手对付法西斯，变成了东西方阵营直接的武装对抗。从而改变了杜鲁门政府已经打算丢弃蒋介石集团的考量，马上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使解放军失去了在1950年秋季乘胜追击、趁势夺取台湾的大好时机，也使王立他们的回乡之路，延宕了数十年之久，甚至有些人苦等一生也没能等上。

6.2部队入朝

远在朝鲜的战争，渐渐地影响到了龙头镇。

1951年春，驻防海源的守备师，改变番号，调往朝鲜战场。相应的，个别有些人员要调整处理。部队医院也要重新组建，伤病员另行安置。

小宗，在反攻望海山的战斗中，又受了点小伤进了医院，其实已经差不多好了，一直找借口在里面养着。这时也不想再随军作战，找了好几次纪乡长。纪乡长不好意思推掉，跟县里讲了以后，把他安排在了龙头乡政府当干事。

解放战士包金贵，年龄已大，安排退伍。征求个人意见，他觉得安徽老家已经无亲无友，了无牵挂，只留下了伤心事，所以不想回原籍去。可胡指导员有些事没交代好，手续不全，又不能按解放军战士的待遇复员。实在不想回去，那只好就地当农民。

小包说：“当农民也挺好，我本来也就是农民。我喜欢海源这块地方。”

跟纪乡长商量，纪乡长挺好说话，同意接受。再和村里商量，村里又和组里商量。最后，包金贵落在了老王头的组里。村里，还给了他四亩地。在北门外的空地，土质不太好，所以面积多给了点。

驻守龙头的这支部队，在海源的土地上，两次打败过国民党的进攻，与当地群众结下了血肉深情。

但是按上级布置，部队这次调动，不搞仪式，不组织群众欢送，悄悄地走。

要走了。部队走的那天，不但没有仪式，甚至都没有通知村里。但这几天，村民们天天都过来看，看部队是不是要走。前几天，连队已经把大件东西都捆好了。

今天一早，鲁队长就过来探听动静。一看，营房内外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只听得，司号员吹起了集合号，战士们全副武装，背上了背包，带上了干粮，迅速整队了。

真的要走了。鲁队长三步并两步地跑回镇里，大喊着：“部队要走了，部队要走了！”

乡亲们纷纷涌到了街上，涌到了南门外、西门外。部队为了不打搅群众，没有从镇里走，而从南门外的小路直接往西门外走了。老乡们在西门外的大白果树下，迎上了部队。

乡亲们的手紧紧地握住了战士们的手，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说着，说着，大家都呜咽了，流泪了。没有战士们的血，没有战士们的伤，没有战士们付出的生命，哪有龙头乡亲们和平安宁的今天。

今天，他们走了，扛起枪杆就走了，连一根稻草都没带走。留下的只是一百多位烈士的墓碑。怎能叫乡亲们不感激、不留恋、不舍得、不牵挂？

纪乡长拉着令营长的手，久久没松开。真的是出生入死的战友啊，今天要分开了。两个硬汉，都红着眼睛，说不出更多的话。都知道这一去，天各一方，艰险难料，真难说今生还能有再重逢的机会，或许，今天就是生离死别。

只有纪乡长在说：“来信啊，来信啊。”

部队来到望海山下的烈士陵园，战士们要向他们的战友告别。

建国后，县乡政府在望海山的南坡修建了颇有规模的烈士陵园，安葬了在解放龙头镇战斗中牺牲的烈士们。墓区最前面留了片空地。第一排，就是被敌人杀害的八位侦察兵的大墓。在他们的旁边，是姜

雪花的墓，墓前耸立着高大的墓碑。整个墓区庄严肃穆，令人敬仰。每当重大节日，政府都会组织群众前来隆重祭奠。

潘连长带着部队在墓前的空地上整队，“立定，向右转，向左看齐，稍息，立正。报告营长，一连列队完毕，请指示。”

令营长面向战士们说：“同志们！我们来向长眠在这儿的战友们告别来了。全体默哀。”

战士们脱帽，低头。

乡亲们站在四周，也静静地沉默着。

潘连长接过文书给他的一个用路边黄花编起的花圈，放在了最前面那八位侦察兵烈士大墓的面前。

九名战士，代表全连九个班，在墓前对空鸣枪三发。

晨曦明亮，大地寂静，晓风萧瑟，松涛低鸣，山川草木都为之肃然起敬。那枪声惊起几只飞鸟，久久地回响在山林和田野之上，久久地回荡在人们的心底。

“默哀毕。”令营长向烈士们做了段致辞。

“战友们，我们来向你们告别了。”

“我们响应祖国的召唤，即将离开你们，要远赴新的疆场，与敌人再一次进行血与火的较量。”

“你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永远鼓舞我们胜利前进。”

“亲爱的战友们，你们安息吧，我们一定会给你们带来胜利的消息！”

令营长转向队伍：“敬礼！”

战士们再一次向烈士们致敬。

“礼毕，向左转，起步走！”

部队又起步了。

乡亲们又围了上来。

于村长拉着令营长，止不住地泪下，大声地说着，像是对所有的战士们说：“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啊！龙头的老百姓，海源的老百姓，永远忘不了你们！打了胜仗，你们再回来啊！”

平金刚跳起来喊着：“好不容易打败了国民党，美国鬼子又要来侵略。使劲地打他们呀，使劲地打他们呀！”这或许是很多老乡那时的心声。

乡亲们拿着他们用仅有的细粮烙的饼，拿着真是难得见到的鸡蛋，往战士的手里塞。

赵玫拿着白面烙饼，眼睛四处张望，正到处找人，远远看到潘连长，连忙挤了过来：“潘连长啊，潘连长，我一直在找你啊。你们都走到这儿啦，把我都急死了。”说着就赶忙把烙饼塞到了潘连长的手里。

潘连长忙推着说：“啊呀，不要送过来了。你们的粮食还很困难，这我知道。”

“潘连长，别客气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是永远忘不了的。这点东西，真的只是一点小小的心意。”

“那点事不算个什么。不过咱们倒也可以说是生死之交了。”潘连长知道她家里的变故，就说：“赵玫啊，我知道你现在的难处。但是，眼前的困难会过去的。”

“是啊，就盼着你们彻底打败敌人，把小董他们早点救回来。”

“那当然，解放军就是要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潘连长把烙饼推回去，无意间碰到了赵玫那细腻的手指。

赵玫一笑，扒开潘连长的上衣口袋，就把烙饼塞了进去。

潘连长无奈地笑着，抬头看着赵玫乌黑的头发上那闪着红宝石光芒的发夹，赞叹了声：“真好看啊。”眼睛在发夹上停留了一会。

“路上保重啊。一定要再回来啊！”赵玫说。

潘连长收回了眼光，说：“谢谢你了，赵玫。你们就送到这儿吧。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等潘连长再见到这亮闪闪镶着红宝石似的发夹，已经是十四年以后的南疆荒漠了。

乡亲们越来越多，泪水和话语也越来越多，队伍都走不动了。尽管十几天的龙头之战，补充了很多新战士，乡亲们并不认识，但那种深情厚谊丝毫也没有减弱，一身解放军的军装就说明了一切。

令营长大声说：“乡亲们，乡亲们！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来送我们！谢谢你们几年来对我们的关爱、支持和帮助！现在，我们为了世界和平，也为了保卫我们的家园，我们又要出发了。我们也忘不了你们，胜利后，我们会回来看望你们的！”

乡亲们，你们也知道，部队是有纪律的，我们要按时到达集合地。请乡亲们往后退一下，让我们赶紧出发。”

纪乡长、于村长也劝说着，乡亲们含着泪，往后退几步，闪出一条路。

潘连长打起了拍子，“同志们，雄赳赳，唱！”

部队一边行进，一边唱起了志愿军军歌：

“雄赳赳，

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

卫祖国，

就是保家乡。

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

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

没有鲜花，没有锣鼓，战士们在乡亲们的簇拥下、在嘹亮的歌声中，像英雄似地出发了。

乡亲们一直跟着部队走。走到了赵村，赵村的乡亲们也一起跟着走，一起趟过了大河，李家泊的乡亲们也过来一起跟着走……

队伍越来越庞大，气氛越来越悲壮。战士们一路唱着歌，乡亲们一路抹着泪，跟着太阳西斜。

渐渐地，部队跟乡亲们拉开了距离，远去了，成了天边绿色原野上一条模糊晃动的黄线。

乡亲们还是久久地不愿离去，一直看着那条不断远去着的黄线，听着从那儿传来的隐约歌声。

潘连长随着队伍，也融合在了那条黄线里，向着更遥远的征程，消失在了天边。

这支部队以后再也没有回到海源。

6.3 尽心竭力

一营的入朝参战，使民主村乡亲们的抗美援朝热情进一步激发。街上又贴上了许多彩色纸的标语：

“抗美援朝，踊跃参军！”

“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捐献飞机大炮，积极支援前线！”

“藐视美帝国主义！鄙视美帝国主义！仇视美帝国主义！”

上级政府一号召，民主村的村民几乎个个都行动了起来。

年青人首当其冲，踊跃报名参军。上前线打鬼子，是当时年青人最大的心愿。前些年的风云激荡，使民主村的适龄青年不多了。王山、杜家骏他们偏大了一些，彭小宾、杜长贵这些又嫌小了。邬大妈家的邬中和，年龄还合适。邬中和接替连四娃当了民兵组长，各方面都很积极，能去参军也很愿意。但他不是那种好冲动的人，他想到了他的家里。他父亲抗战时就是村干部，后来上了区政府，整天跟着游击队满山头地跑。1946年以后就没了音讯。解放后几次查找也没有结果，暂列为战场失踪人员，等着批烈士，批文还没有下来。他在想，他能走吗？他走了，他母亲一个人怎么办？知子莫如母。邬大妈看出了儿子的心事，倒是她过来讲：“儿子，你去吧！家里有我，你放心。”

“你一个人，家里、地里、学校里，能行吗？”

邬大妈是管着给学校做午饭。

“你把你妈当成大小姐啦，粗活、细活，你妈哪样不行啊？你还不知道，你妈当闺女的时候，在村里也是妇女干部哎。”郭大妈脸上泛着笑容，好像也被自己当年的青春感染了。

“但是毕竟我爹已经为革命而去了。”郭中和还是有点担心。

郭大妈也立刻严肃起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儿啊，我想过。我就想我们郭家，哪怕两代人都献给革命，我也心甘情愿。”

郭中和也感动了，连说：“好，好，我也就放心了。今天，我就去村里报名。”

“现在就去吧。”郭大妈开了房门，明亮的阳光洒了进来。

几天后，郭中和就戴着大红花，跟本村的周仲生，还有龙头乡的几个年青人，在乡亲们的欢送下，参军去了。

老王头家。

虽然王山在支前时吃过那么多苦，可他也还是想着要去参军。不过，村里和乡里都没同意。原因，一是他年龄偏大了，二是他支过前，出过力，身体受了点影响，三是王家上下就他一个整劳力了。

王山是个实在人，不让去也没有更多的说法，想着在家里面怎么为抗美援朝多出力。政府号召捐钱捐物，他就和家里商量，老王头比他更积极，虽然家里真是没有钱，但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给政府。

“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我们的一切。”老王头说。

全家人都在翻箱倒柜，看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都摆到了炕上。其实，“翻箱倒柜”只是个词组，老王头家连个柜子也没有。

丁妹这时有些为难，因为她几乎没有她自己的东西。她的全部家当就是一个旧布包袱，里面是她的衣服。不存在新和旧的问题，因为没有一件新的，没有一件不打补丁的。只有一块蓝布，还算是新的，那是王大妈当时因为让她合房，算是给她儿媳妇唯一的一件礼品。

丁妹手里抖抖地捧起这块布，舍不得啊，不是舍不得这块布，而是舍不得她和王立的缘份啊。丁妹不由得鼻子发酸、眼泪盈眶，丈夫在哪儿呢？几时能回来？还能回来吗？董家的老董头南下支前两年多没有下落，乡里来了通知，作为失踪人员。连支前都能失踪，更何况被国民党抓走呢？丁妹不敢往下想，那块布几次拿起，又几次放下。

但是自己能做什么呢？只有一个心思：听政府的话，支援志愿军。只有志愿军打胜仗，才能赶走美帝野心狼，才能消灭国民党，才能解救王立啊。丁妹一咬牙，又拿起蓝布，站起身，走到正屋，交给了王大妈。

王大妈见了，一愣，说：“你把这也捐出来啊。你可是几年都没有做件衣服了。”

“不打败美国鬼，不消灭国民党，我就不穿新衣服了。”丁妹斩钉截铁地说。

王大妈也就不再说话，沉甸甸地接过了这块布。

赵玫也在家里翻。还有什么呢？这个家已经只剩下她孑然一人。可是她还在翻，她把所有颗粒状的粮食都拿了出来，粉状的是一点也没有了。仅有的两碗面粉，那天都摊了烙饼，送给了调防的部队。她把玉米粒、小米粒，还有几碗小麦，装成几个小袋子，送到村公所来。

于村长心里是有数的，说：“你把家里的都拿来了，自己怎么过？”

赵玫说：“我自己怎么也好过。只要前方的亲人打胜仗，就有我们的好日子过。”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情深意重。老解放区的群众，依然保持着和部队血肉相连的情感，真的是一心一意扑在革命事业上。

也有不上腔调的。秦德才在这种时候，只有起哄的份。他看赵玫过来捐献，怪腔怪调地说：“哎呀，怎么不把头上的那个发夹也捐了呢？那可是值钱的东西啊。”

“呸！”赵玫瞪了一眼，转过身不再理他。

杜家骏在一旁说：“你这就是坏小子说的话。把发夹捐了去，做什么用？哪个志愿军能戴这个东西上去打仗啊？”

在场的人也嘲笑了一阵，秦德才又讨了个没趣。

还是于村长跟纪乡长商量了，也不能让乡亲们捐过了头。还要实事求是，还要根据各户的实际情况，也要根据前方的实际需要。

于村长带着组长们，上各户再三劝说，把一些物品退了回去，包括丁妹的那块蓝布。于村长多少知道其中的缘由。

关于朝鲜战争对于中国的得失和影响，本书将在后面稍作分析。

第七章 惊魂未定

1949年6月7日

7.1 陌生之地

这一年多，比起西北村的热火朝天，海峡对岸的那边就像掉进了冰窟窿里一样。这一章先讲方舰长他们几个。

到台湾的那天，他们从“济成号”下来，用小船摆渡到岸边，上了岸，又结队从小路行走数百米，来到一个院子。

方舰长一家、安晓芬母子俩，始终在一起。方舰长紧紧地看着安晓芬。在这陌生的、今后不知去向的地方，他不想再让安晓芬母子和自己走散。他甚至叫自己的妻子苏素玉挽着安晓芬的手。他们的箱子由两个水兵扛着。

方舰长这时的心情，很低沉，很失落，甚至有种男人少有的伤感。这一生，到现在为止的一生，他觉得自己是努力的，也算是能干的。在乱世之中，以他的身世、他的年龄，能混到舰长，已是不易。没想到最后却几乎是落荒而逃，抛下了军中的兄弟，抛下了黄港的百姓，尤其是抛下了难得的知己好友章团长，自己踏上了这陌生的土地，虽是捡到了条命，心里却是深深的愧疚。另一方面，逃来台湾，对他来说，就像是只被砖头砸到了尾巴的老鼠，好不容易挣脱了出来，全然不顾其它，有个黑洞就先钻进去再说。然而，他又是警觉的、提防的。他对这个政权，这个政权对他，都没有什么好感。他知道，打了败仗，又擅自撤回，上面对他已经不信任了，随时可以撤换他，甚至审查他。黄港的汪司令虽然没有跑出来，但他在灭亡之前，肯定会向国防部告发他，什么污言秽语都能用上。但是不上台湾又能上哪儿呢？留在大陆投共？那很难说会是什么结果。而到了台湾，国防部会怎么处置他？不知道，唉，想不了那么多了，走一步算一步吧，能跑出来总比没跑出来要好。

他抬起头，又看了看挽着安晓芬的妻子，看了看前后的孩子们，自己总算全家都出来了，可以先喘口气了。对安晓芬母子，自己会竭尽全力加以保护，这在炮火和硝烟笼罩望海山的时候，就已经下了这个决心。

屠美丽依然在伤感和恐惧之中，紧紧地靠在一直没有离开她的李策身边。李策轻轻地扶着她，心里想着要是扶着的是自己的妹妹该多好啊。妹妹留在了子弹呼啸的巷子里，现在到底会怎样呢？他一个冷战，不由自主地捏了屠美丽一把。屠美丽转脸看了他一下。当四目相视的时候，李策看到的是一张柔弱无力、惊恐不已的脸，屠美丽看到的则是张疲惫伤感的脸，两人什么话也没说。李策把屠美丽攥得更紧了。他知道，他就是她的依靠，他要把她当成自己的妹妹一样对待。老天没能留下他的妹妹，又补给了他一个妹妹，他认了。屠美丽也知道，她没了爹，没了娘，没了爷爷，没了所有的亲人，没了所有能赖

以生存的一切，真的是天塌地陷、无路可走，老天却给了她最后的一个支撑。她靠得李策更近了。他们俩都不是信神拜佛的人，但是在命运面前，他们只能也只有相依为命了。

这个院子原是日本人的一个小学校。战后，日本人走了，才三、四年的时间，院子就荒废了。现在正用来作临时接待处。进了院子，有一片空地，几个戴袖章的军人在那儿指挥、安排。

“请海军兄弟往左边，陆军兄弟往右边，老百姓往后面。”

方舰长自然往左边走。

左边有两排平房。见方舰长他们过来，从一个房门里出来二、三个人。为首的一个走向方舰长，脸上还带着笑，问：“请问，您就是方舰长？”

“是的，你都知道了？”方舰长也不觉得奇怪。

“知道，知道。在下姓惠，在这儿任联络副官。上峰已指令我接待您，请跟我往后面一排走。”还没抬脚，惠副官转向旁边的苏素玉、安晓芬问：“这二位是谁呀？难道您修了好福气，有两位……”

方舰长一瞪眼：“不许胡说！”

“是，是，是，我不过是随便一问。”

“这位是我夫人方素玉。”

“哦，嫂子真漂亮啊。那这位是……”

“这位就是为党国捐躯的章团长的夫人安晓芬。”

“哦，哦，失礼，失礼。”惠副官连忙赔不是。“不过安女士已经不是军属，要和乡亲们在一起。当然我们会特别加以照顾的，请安女士往这边来。”

惠副官朝安晓芬一摆手，往院子中间那几个坐在地上的龙头镇乡亲一指，意思是你就往那儿去吧。

方舰长又是一瞪眼，斩钉截铁地说：“不可以。安女士不只是章团长的夫人，也是我的亲家，我们是一家人，不能分开。”

这话一出，两位女士和孩子们虽然不便开口，却都瞪大了眼睛。

惠副官当然看出了门道，但也不想多问，就说：“那好吧，那你们就一起走吧。”却又拦下了后面的李策，指着屠美丽问：“那这个又是谁呢？”

李策淡淡地说：“这是我妹妹。”

“正巧有这么多亲戚啊。”惠副官明摆着不信。

方舰长回过头，也是冷冷地说：“这位是我的李副官，那位是他的妹妹李美丽小姐。”

惠副官自然不好再拦，一挥手，“走吧，走吧。”

按着惠副官的指点，他们进了后面的房子。一个大间，除了靠北墙放着几张课桌，就别无它物。

“不好意思啦，台湾是个小地方，一下子进来那么多人，实在安排不过来。上面又没说还有家眷，抱歉，抱歉。”惠副官表面上还是挺客气的。

方舰长看了下屋里，便说：“这样吧，把课桌拼起来，女眷睡上面，我们几个男的就睡地上。惠副官，你看有什么稻草的，我们自己铺一下。”

惠副官想了下，“哦，哦，我把对面屋里铺的搬点过来。这全院子就剩这几张桌子了，其他人都是睡地下，真是不知道你们有女眷来。我去叫他们从别的屋子搬点稻草过来。”

“那他们地上铺的不就少了吗？外面别的地方还有没有，我们可以自己去搬。”方舰长说。

“哪能劳您大驾。我去叫他们推两车过来。”

待惠副官走出门外，安晓芬走过一步，对方舰长说：“方大哥，谢谢你了。”

方舰长依然淡淡地说：“到了这一步，我们真的就是一家人了。不管是什么名义，一定不能再分开了。”

“是的，是的，不能再分开了。家法，你就照顾好小玉。”苏素玉对章加法说。

“好的，好的，我会照顾好小玉的。”章加法用一只手握住了苏小玉的手。苏小玉似乎脸红了下，那只手却没有缩回去。

“我和美丽以后真的就以兄妹相称。我没有了妹妹，美丽，你就是我的妹妹。”李策很真诚地望着屠美丽，也过来拉着她的手。

屠美丽一直紧张着的脸，直到现在才有了点放松。她害羞地看了李策一眼，便低下了头，长长的秀发遮住了她的脸。

说完这几句在惊魂落魄之中的肺腑之言，心里稍稍安定了些。苏素玉想稍微放松一点，往后依了下墙，可立马就“噢”的一声，像反射似的弹了起来。那墙可不是沙发背，又硬又潮又热。

她刚想说什么，方舰长开了口：“你以为还是黄港的别墅啊，没有那样的日子了。我们能捡条命就不错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新的生活，会有很多难处，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难处。但是，我们要硬着头皮往前走，甚至要脱胎换骨，不然我们是走不过去的。”

“是的，我们要好好地走下去。为了那些没能和我们一起过来的人，我们也要好好地走下去。”安晓芬说着，眼眶都湿了。

方舰长又低沉地说：“实际上，我们能在这儿住几天，也很难说。不用过几天，共军就能打到福建沿海。这台湾岛能不能守得住，还真难说。要准备吃更大的苦啊。”

大家竟一时无语。

李策便站了起来说：“我出去看看稻草。”

方舰长说：“我和你一起去吧，顺便也看看周围的情况。”

方舰长刚走出屋子，几个“济成号”上的水兵就围了上来。

“舰长，舰长，他们就让我们住这种地方啊。”

那个惠副官见方舰长出来了，也跟着过来，跟那水兵说：“别没有数啦，你们一上岸就有住的，已经很不错啦。天天是几千几万地上岸，哪有这么多地方？你看那几个老乡，就没有地方啦，今天晚上就只能躺在屋檐下啦。”

方舰长看见在院子的一角席地而坐的几个乡亲，深深地叹了口气。这种时候，他真的是无能为力。

“你不用难过啦。我知道，虽然他们不是军人，但毕竟和你们是一道出来的，在一条船上，算是有缘啦。不过，你看这屋檐还是挺宽的，睡一个二个晚上还是没有问题的啦。好在今天天气还不错，要是来了台风下大雨，那倒是麻烦啦。那只能都挤到屋里来，大家一起挤着坐在地上等天亮啦。”惠副官还真能说，绕了一大圈，说得那当兵的也只能认了。

旁边另一个当兵的，又出来说：“你看你们那边，还空着好几间呢。把我们舰长反而挤成那样？”这小兵还真不错，这种时候还能想到当官的，也是方舰长平时对手下也不错。

惠副官连忙用手捂着嘴：“快别说这些啦。上面还会来人的啦。你们从战场上下来的，都要经过审查的啦。”说完这话，惠副官侧过脸，看了方舰长一眼，又赶紧转了过去。

方舰长当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也不去多问，反而说是：“那稻草呢？”

“我已经派人去了，应该很快就会回来的。”惠副官答道。

“他们睡在外面的，你要多给他们铺一些。”

“那当然。那当然。”

“那我们今天吃什么？”一个兵也不讲客气，直截了当地就问。

“吃什么？嘿，嘿。”惠副官苦笑着：“还能吃什么？今天你们刚来，没什么别的啦。叫村里煮点稀饭给你们吧。我也是海军的，照顾咱海军弟兄，我叫他们煮厚一点啦。”（北方人叫“稠一点”，南方人叫“厚一点”，还没问这惠副官是哪儿人。）

“啊，喝稀粥啊？”把那小兵惊诧得瞪大了眼。

“明天连稀饭也没有啦，要你们自己做啦。你们来这儿，事先也没说，能喝上粥就不错啦。”

“我们有炊事员，叫他们给你们帮忙去吧。”方舰长说。

“今天就不用啦，已经吩咐下去了。明天你们自己做。大米、白面倒是有，其它就不一定啦。一会你把炊事员喊来，我跟他们讲讲怎么弄。”

方舰长点点头。

过了最混乱的头几天，情况稍微好一些。青年军的那些人，走了，说是整合后加入新的部队，还要上大陆去，还有广东、广西要守。那些老乡们也被带走了，说是有些日本人留下的空地，要他们去种。只是地的多少，路的远近，很难说，碰上哪块就是哪块。“济成号”上的水兵，那天说了，凡是当兵的，全部回舰上去。后来又说了，技术官回舰上，指挥官留下。李策也就回舰上了。可是这技术官、指挥官，有的也不好分，最后也就是方舰长留在这儿等待审查。方舰长也没多大表示，能和家眷们在一起也好。自己一个人上舰，丢下她们还真不放心。

别人一走，住的稍微宽松了一些。方舰长两口住了单独一间。别以为单间有多好，其实也就是堆放杂物的一小间。凌乱的东西差不多占了一半。也不知那是些什么东西，散发着浓浓的霉味。睡的还是课桌，从大间搬了几张过来。大房间的李策走了，就剩了章加法一个男孩子，靠在角落里，铺的还是一堆稻草。但毕竟不方便，过了几天，他上了别的大房间，跟其他人一起挤了。他也没有什么怨言，只是吃不饱。女眷们却睡得更挤了，因为课桌不够。章加法不知从哪儿硬是又搬来了两张更旧的课桌，才勉强凑和。

水兵们回了舰上，做了几天的饭撤了。方舰长他们也就跟着接待处的人吃。

看样子是平静了些。方舰长还对惠副官说：“这下，你可以清静几天了。”

“清静什么呀？”惠副官说：“说不定哪天又来一拨。你们这拨人不算多，也算是好伺候。碰上有不讲理的，自以为在前线有功劳，到这儿来就该怎么着，那个气大得……嗨，别提啦。当然，他们受苦受累，有的还断腿断胳膊，九死一生，是不容易。可咱也难啊，能有什么给他们？说给他们听，又不信。只好跟他们说，安稳几天吧，弄不好，共军炮弹一响，连这个也没啦，这才没言语了。”

方舰长听着点点头，看似很平静，其实心里很清楚，他将要遇到的，何止是这些呢。

连着几天，方舰长被叫到了办公室去，说是国防部来的人要了解情况。

“方舰长，知道你们辛苦了，可是这些问题呢，又不能不问一下。你离开海源，离开黄港，跑到台湾来，有指令么？”说话的是叫冯处长，瘦瘦的，面无表情地问着。

“我去问谁去要指令？能跑的，都比兔子还快。海军司令部跑到哪儿去了，我都不知道。”

“那黄港的汪司令，要你接他上船。你为什么来接？我们从黄港撤出了十二万军民，你为什么一个不接？”

“说起来，我应该归第十一绥靖区调遣。可绥靖区刘琪安司令，带着人已经先走了，都没跟我说。汪司令那边的撤退，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再说，我从海源撤下来的时候，舰上已经装满了人。作为一艘军舰，连甲板上、过道上、炮座上都挤满了人，按说，这是严重违反海军条例的。前几天这院子里有多少人，就是这一船装了多少人，你也是看见的。这还叫军舰吗？可是没办法呀，已经上来了，还能把他

们撵到海里去吗？。到了黄港，我是想上几个人，也是不可能啦，连码头也靠不上去啦。靠上去，爬满了人，就出不来啦，这‘济成号’就丢给共产党啦。”

速记者在刷刷地记着。冯处长在听着，找不出可以反驳的话。忽然，他又严肃起来，提高了声调说：“据我所知，你在海源前线还跟章团长讨论什么社会主义的问题。有这事吧？”

果然，这是汪司令在最后灭亡之际，心有不甘，狠狠地告了方舰长一状。

方舰长似乎已有准备，淡淡地说着：“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可以讨论呢？国父中山先生不是也说过，他就是个社会主义者。”

冯处长一惊：“他说过这话么？”下一句应该是“我怎么不知道”，只是没说出来。

方舰长却帮他说了出来：“你怎么会知道呢？中山先生有多少想法都被我们遗忘了，不然，何至于有今天。”

冯处长一时语塞，停了会，两眼盯着方舰长，似乎一定要看出个破绽来，说：“你们船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居然杀害党国军人！”

“杀害？杀了谁？”

“楚队长，黄港宪兵队的楚副大队长！”

“那是他没上过海，自己不小心掉下去的。”

“可有人看见，是被推下去的。”

“那这个人为什么当时不向我报告？现在怎么来查证？”

冯处长的嘴又被塞回去了。

过了一会，冯处长抬起手，自己朝空中挥了挥，意思是把这些都带过去了。他也明白，以现在的局势，在剩下的这些人里，还扯这些干吗呀。

“方舰长啊，这些话也不是我要问你。我也是在完成公务。”冯处长突然一停，朝速记者说：“这个可别记啦。记录的内容就到此为止，你可以走了。”

速记者递过记录本，“长官，请过目签字。”

冯处长接过来，飞快地看了下，手中钢笔一挥，“好了，没你事了。”

“方舰长啊，你可别在意。我知道，你要是有二心，早就把‘济成号’开进长江口投共去了，谁也拦不住你。”

“呵，呵。”方舰长依然是淡淡地笑着。他知道，这次虽然没有抓到他的辫子，但他在海军的路，也就像那记录本那样到此为止了。接下来，国共双方更会在海上拼死激战。国民党是不会把好不容易留下来的战舰放在他方某人的手上，他也不会再愿意替国民党去打仗。

半个月后，结果出来了，方舰长调任基隆军港总务部副主任。“济成号”重换了班子，这时已经开赴舟山海域。李策还在那舰上。

当方舰长拖家带口到基隆军港之后，为了安排好家口，也是费了一番口舌的争讲。原来的军官宿舍早已满了，只能在后面仓库挤出一大间，再用杂木板隔开，分成三小间。方舰长俩口、安晓芬母子、方小玉和屠美丽各一间。好在章加法、方小玉和屠美丽，都很快去市里上学了，平时住校，大人们住的也就稍微宽松些了。

7.2几起几落

方舰长，哦，不，现在应该叫方主任了。现在他要操心的，远不止是上峰是否信任的事，更不是拖家带口的事，还有更大的事情在他心里搅动，那就是家国大事。对岸的共军在大陆上挺进得那么快，快得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那迈进的脚步声，似乎天天“砰砰”地踏在他的心上。他紧锁眉头，沉默少语，像是变了个人。这些事，他回来都不敢对妻子说，说了也没用，徒然增加她的烦恼。苏素玉也看出来了，又不好多问，心情同样压抑着。

这天，差不多是1949年的10月了，对面已经成立起国家了。方主任低着头回来。他脸色苍白，步履似乎有点不稳，进门时还扶了下门框，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苏素玉赶紧过来，想搀他一把。方茂名却挪开了她的手，一屁股坐在了床沿上，叹了口气。

苏素玉急切地问“怎么啦，茂名？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吧。别自己一个人压在心里。”

方茂名缓缓地抬起头，看了看妻子，眼光在妻子的脸上停留了片刻，似乎是想再多看一眼，才缓缓地说：“唉，军情不好啊，军情不好啊。广州丢了，昨天，对面的厦门又丢了……”

苏素玉也大惊，直了眼，问：“那下一步，他们就要打过来了？”

“是啊。”

“那就没有办法啦？”

“没有啦，没有啦，挡不住啦。”

“那我们怎么办？”

“哪有怎么办？没有怎么办了。不像以前还在‘济成号’上，实在不行，硬挤也要挤上去，一走了之。现在可是死蟹一只，过一天算一天，过几天算几天了。”

“那连老蒋也没有办法啦？”

“老蒋？老蒋也没人理喽。不但美国人不要他，想搞个流亡政府躲到菲律宾去，人家菲律宾还不同意。”

“怎么会这样呢？”苏素玉也觉得脸上一阵阵发凉，心里一阵阵发慌，眼前竟然模糊了起来。

方茂名一看赶紧起来，反过来把妻子扶上床，轻轻地拍着她，说：“唉，我一直不想跟你说这些，就怕你这样。”

“你不用担心，一会就好，一会就好。”苏素玉小声地劝着丈夫。

两人对视着，相互握着手，成了十指扣。

这年头，真不是方茂名所能掌控的。

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才没过几天，方茂名回家的时候，脸上竟然有了喜滋滋的样子。

“古宁头大捷，古宁头大捷！”方茂名对忙着做饭的苏素玉说。（1949年10月24日，解放军攻打金门失利，损失近万人，台湾方面称此役为古宁头大捷。）

苏素玉其实不会做饭，但她也不喜欢去那军官食堂吃。不喜欢看那些人异样的眼神，不管是对她有莫名的兴趣，还是茫然的冷漠；不喜欢那些听不懂的鸟语；甚至不喜欢那饭厅里的味道，无论是人散发出来的、还是菜散发出来的味道。他们自己在住房的后墙开了扇门，在门外搭了个棚，摆上炉子和桌子，成了个简易的厨房。后来也帮安晓芬搭了个。别人好像有些看法，这像什么营房？不过也没有说出来。谁也在想，这日子还能混几天呢，还管这些干吗。

当然，刚才说了，苏素玉做饭是不行的，还是安晓芬常过来帮忙。她们两家也常在一起，没分什么你我。这天苏素玉炒的是青菜，很大路货的，所以也没叫安晓芬过来。

苏素玉听见丈夫在屋里说什么大捷、大捷，都没听出来说的是哪两个字。这也难怪，大概她也没听丈夫还说过这两个字。

“大姐，大姐？哪来的大姐？”

苏素玉对安晓芬虽然以姐相称，但都是很中规中矩地叫晓芬姐，不是叫大姐的。又见着丈夫脸上有着难得的喜悦，就很纳闷了。

“哈哈，哪是什么大姐啦。前方打胜仗啦，古宁头大捷啦。”才来几个月，方茂名已能下意识地学上了当地方言里那种拖腔的语调。“国军在金门前线把共军打败啦。”

苏素玉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愣在那儿只顾听丈夫说话。也是，这么多年，就几乎没听丈夫说过打胜仗的事。

“我们打赢了，金门保住啦。”

“就打赢了一仗，能行么？”苏素玉倒没那么激动，还在担心。

“虽然只是一仗，但是暴露了共军的弱点。他们没有海军，没有空军，想要登陆打海岛是不行的啦。”方茂名也难得话多起来。

“那台湾能安稳一阵啦？”

“能安稳一阵，能安稳一阵。只要福建、浙江的沿海岛屿在我们手里，台湾就还有一道屏障，就能稳住。”

“哦，哦，阿弥陀佛，总算能松口气了。”

但其后的日子，也没有好到那儿去。生活的清贫、窘迫先不说，那家国大事也是阴晴不定，时起时伏，而且有时是大起大落。一会儿是年底11月的登步岛大捷，国军又一次遏制住了解放军的步伐（1949年11月3日解放军攻打舟山海域的登步岛失利。解放军宣布自己损失1200余人，国民党称毙俘伤共军6521人；国民党方面的损失，双方都宣称为3394人，请见维基百科）。一会儿，转过年来，1950年的1月，又是杜鲁门发表声明，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美国无意干涉中国内政。这不是明摆着告诉中共，美国不准备帮助蒋介石国民党，你们有本事，你们就打吧。

这些事，方茂名都往肚里咽，没有跟苏素玉多说。跟她说也没用，只会白白地增加她的担忧。不过那个姓杜的也太不明事理，怎么能这样呢？丢了台湾，只能使全世界寒心，让共产党人壮胆。以后谁还会再来帮你美国呢。

果然，这以后的几个月，天色又渐渐地暗了下来。4月底，丢了海南，这么大一个岛丢了。5月又丢了舟山，那也是一个大岛啊，能看住长江口的一个大岛啊。舟山，说是主动撤出的，李策还随“济成号”去了两趟运人、搬东西。据说，那天宋美龄、蒋经国还在18号码头慰问来台的舟山军民。大横幅上写着“欢迎凯旋归来，协同保卫台湾”。中学生们的鼓号队，还去现场打鼓吹号。苏素玉、安晓芬她们没去看热闹。方茂名的心里苦得很，就剩台湾一个孤岛，还能撑多久。他依旧没敢向苏素玉明说这些事，只是眉头更紧了，心头更沉了。

终于有一天，6月底的一天，方茂名想不说也不行了。出大事了，出了个全世界都震惊的大事了。这年，1950年的6月25日，北朝鲜的金日成挥军南下，越过三八线，大举进攻南韩，打得甚至比大陆的解放军还快。没几天，就拿下了南韩的首都汉城，不多久就把李承晚逼到最南面的釜山的小角落。

那天，李策回港休假，正好也在。他提了瓶金门高粱酒，进了方茂名的屋。

方茂名一反常态，没有看李策，还是闷坐在床上。

苏素玉从后面厨房过来，一看不对劲，连忙先招呼李策，“啊，李副官来了，快坐，快坐。”虽然李策已经提了个苏素玉不太清楚、也叫不上名的官，可她还是习惯叫副官，当然李策也不会介意这些。她见李策提了瓶酒，就说：“还提什么酒呀，他已经不喝啦。”方茂名和别人不一样的是，以前还少许喝点，但心里一有事反倒不喝了。

“这可是名酒哦，是咱台湾岛最好的酒哦。这是我上次去金门带回来的。”李策的精神倒像是不那么消沉。苏素玉看着依然紧锁眉头、低头不语的方茂名，对李策说：“你看茂名，这是怎么啦？今天从下班回来就是这个样。又有什么事啦？”

李策在方家毕竟熟得很，自己拉过一个板凳就坐下。

“又有事啦，出大事啦。”李策说。

“什么事？”苏素玉停下脚，注意了起来。

“北朝鲜打过三八线，要解放南韩，快要全部打下来了。”

“啊？！”苏素玉一惊，手里拿着的铲子差点掉了下来。“这……这怎么好。那对面的共军不也就要打过来啦。”苏素玉紧张得几乎有点语无伦次了。

“那是肯定的啦。现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下，都抱成一团，一起往外打，要夺整个天下啦。”方茂名这时才插上话来。其实那时，共产国际早已经没有了，方茂名不知道而已。本书中还有其它类似情况，有些人说的话不够准确，不必太当真。

“你，你……你们可要顶住啊。”苏素玉似乎是在乞求似地看着李策。

“我们，我们会尽力的。毕竟还有这么宽的海峡，老天也会给我们留条路的。”李策说。

“这个姓杜的，把大家害苦啦。”方茂名厉声斥责起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来。

李策这一年来在政治上知道得多了，想得也多了，今天居然接着这话题说了一大套：“这个杜鲁门呀，也是意气用事、因小失大，受了共产国际的迷惑，上了他们的当。只看到他们也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面，却没看到他们利用这场战争把自己势力做大，反过来要和自由世界争天下。拿中共来说，那是最典型的了。他们总共才打了几次日本鬼子？却一直在背后跟我们争地盘。直等到美国人把日本鬼子搞定了，趁我们打日本鬼子消耗的元气还没恢复，在苏俄的支持下就大举杀将过来。杜鲁门还看不清这一点，还要在台湾问题上把自己撇开，那人家金日成看你美国人都闪到一边了，还不放手大干？”

方茂名气得拍了下床前的桌子，差点把那瓶酒给打翻了。

“那……那我们怎么办？”苏素玉没有政治上的那些判断，只是想着自己家的这几个人的事。

“没有怎么办。逼得太紧了，只有同归于尽。”方茂名铁着脸。尽管他依然觉得上峰的不信任，不想给国民党卖命，但这条命被逼得无路可走的时候，他也是会拼死对抗的。

“舰长，还没到这一步，没到这一步。”李策忙劝着。他对方茂名还是以舰长相称。

苏素玉不相信李策的劝慰了。她走近方茂名，久久地看着丈夫，一下紧紧地拉着他的手，说：“大不了，我们就死在一起。”这是苏素玉这样的女人所能表现出的最后的坚强。“可是我们的小玉，还能有屠美丽那样的机会么？”

苏素玉竟然流下了眼泪。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她流泪。

苏素玉同样也忘不掉逃离黄港时那恐怖而又漆黑的最后一夜，冰冷的海水，在岸上拥挤和在水中挣扎的人群，拼命的绝望的尖叫，水中最后摇晃着的双手……这一切又浮现在苏素玉的眼前，叫她不寒而栗。

金日成的战争扩张行为，震动了全世界，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谴责朝鲜侵略的决议。连斯大林也没有阻止这种谴责，在可以一票否决的情况下，只投了弃权票。同时这也惊醒了美国政府，杜鲁门意识到大事不好，被迫改弦更张。以美军为主体的联合国军，9月25日在朝鲜半岛中部的仁川登陆，不但包抄了北朝鲜军队的后路，几乎使他们全军覆灭，又迅速拿下平壤、快速北进，几乎到了鸭绿江的边上。朝鲜问题眼看这么快就解决了。尤其是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使对岸要渡海解放台湾的意图一时难以实现。

“高兴啊，高兴啊。把他们都喊来，吃上一桌。”方茂名几个月来展现了难得的笑容。

等安晓芬母子、李策兄妹都来了（李策和屠美丽已正式以兄妹相称），大家入座后，方茂名坐在床沿上，才笑着说：“总算可以喘口气了。”屋里没那么多凳子，人多的时候方茂名两口就坐在床沿上。

“这事情还得靠美国人么？”章加法摇着头说。

“看样子还真得靠他们呢。”苏素玉说。不过她也就是一说而已，并不懂这些。

“要是他们在四七年、四八年，就看到这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李策说。

“今天只管喝酒了，来，来。素玉啊，把李副官带来的金门酒拿出来，让大家都尝尝。”方茂名只顾高兴，没多说什么。

安晓芬没有插话。章汉林已经留在了大陆的望海山上，现在时局的几番变化，对于她又意味着什么呢，她都想不出来。

美丽和小玉，两个女孩子也没说话。她们还不会想那么多，这也好理解。

方茂名又只高兴了没几天，时局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没想到北京方面派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美国军队赶紧撤回三八线，可是志愿军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往南，不但收复了整个北朝鲜，而且再次越过三八线、攻下了汉城。

方茂名又泄气了。

逃到台湾的这一年多来，方茂名的思想似乎也在转变。原本他对国民党政权是没有感情的，对共产党也没有更多的仇恨。惟一的一次就是登陆海源时在舰上炮击过共军阵地，那也是奉命行事，实在没办法。但这一年来近似逃亡的生活，漂泊不定，担惊受怕，又使他有些可怜起国民党了。

他们几个人又聚在了一起，连李策兄妹也在。

这次，大陆的志愿军都过了三八线，按说对他们的压力更要大得多，可方茂名这次却和前几次不一样，他看着大家，冷冷地说：

“共军打过来了，又打过三八线了，还拿下了汉城。”

苏素玉自然又是吃惊不小，一愣之后见方茂名不像以前的那种压抑，便说：“不要再吓我了，我已经吓不起了。”

“不是吓你。中共派出的志愿军真的打过三八线了，朝鲜半岛又要落入共产党的手里了。”

“共产党真的是一点活路也不给我们留了。占了整个大陆不算，还要打到朝鲜去。”李策说。他这一年和方茂名一样，思想往那方面转了。

只是章加法还有点曾经被说成是进步的那种想法，说：“中共不是说，美国是以朝鲜为跳板进而要侵略大陆么，他们派兵出来是要保家卫国么？”

“你真信那些话啊。”方茂名说：“如果美国真要进攻大陆，还用等现在么？如果那样的话，一年前，他也就不会抛弃蒋介石，只要借口保护南京政府，派兵进来不就行了么？还用绕这么大的圈子，丢了大陆再从朝鲜过来么？那时，哪怕不用派兵，只要给点援助，给点支持，也行啊。”

李策接着说了一大段话：“美国人当初是没有看清啊。不过，那也难怪。那时重庆的《新华日报》，包括他们的领导人，讲了美国多少的好话啊。

我到现在还能记得1943年7月4日中共《新华日报》的一篇社论，叫作：《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那篇文章里有一大段，说：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在中国，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的诚实，每个中学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与怜悯，杰弗逊的博大与真诚。这些光辉的名字，在我们国土上已经是一切美德的象征。他们所代表的，也早已经不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荣誉了。玛克吐温、惠特曼、爱玛生教育了我们这一代。是他们使年青的东方人知道了人的尊严，自由的宝贵；也是他们，在我们没有民主传统的精神领域里，筑起了在今天使我们可以有效地抗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长城。这一切以心传心的精神道德上的寄与，是不能用数字和价值来计算的。中国人感谢着“美麦”，感谢着“庚款”，感谢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的寄赠与援助；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我们相信，这才是使中美两大民族不论在战时，在战后，一定能够永远地亲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当时我看到这篇文字的时候，激动得不得了，写得多好啊，所以一直都能记得。现在再看这段话，是有点滑稽了。美国人彻彻底底被玩了一把，上了大当了。”当然李策不会把整篇文字都背下来，本书按原文抄录了。

“八年抗战，我们在全力以赴，拼了命打日本鬼子。我们海军把舰艇全打光了，空军把飞机也打光了，牺牲了三百多万国军兄弟。他们才打死几个鬼子，数得出来么？只知道在后方跟我们抢地盘。等日本鬼子投降了，一看时机已到，趁国民政府立足未稳，在苏俄的援助下，就出来争夺天下。还说是别人下山摘桃子，其实蒋先生一天也没去过峨眉山。哼！”方茂名愤愤地说着。一年多前，他反倒没替国军辩护过。

苏素玉没想那么多，在问当下的事：“那他们占了朝鲜，下一步打台湾不就更方便了么？”

方茂名深深地叹了口气：“台湾是待不住了。”看来他对国民党还是不看好。

“那还能怎么办呢？”苏素玉在焦急地问。

“到美国去。”方茂名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着。

大家都停下来，吃惊地看着他。

“我已经想了很久了。到美国去，只有这一条路了。”

“怎么去啊？我们大人孩子，这么多人啊。”苏素玉很是疑惑。

“加法啊，你要好好念书，明年高中毕业，到美国去上大学。希望就在你身上。”方茂名对着章加法说。

小伙子还没搭话，安晓芬接上了：“那得多少钱啊？我们没这个条件啊。”

方茂名很认真地说着：“这些，我都想过了。以我现在的条件，供加法去上学，大家紧一点，加法自己再刻苦点，还是可以的。”

“这，这怎么行？现在你们也很难，小玉也还小，以后花费还多着呢，不能都用在加法身上。”安晓芬不安地说着。

方茂名难得一笑地说：“用在加法身上，就是用在小玉身上，也就是用在我们身上。这还用再分么。”

苏素玉也十分赞同地说：“对，对，茂名说的对。加法小伙不错，让他先出去闯一条路，小玉也就有奔头了。”

“就是太过意不去了。”安晓芬说。

“晓芬姐，我们之间还用说这个么。”苏素玉先替丈夫说上了。

不料章加法却在喏喏地说：“去美国？我，我，我还是……还是……”他把头转向门外看去，似乎还不放心，站起身，走到门外张望了下，关上门，回到桌边，压低声音说：“不瞒大家，我还是个共产党呢。”

“啊？！”大家又一次地大惊失色，这回更吓得不轻。

“怎么回事？”方茂名忙问。

“我在黄港上学时已经入共产党了。被枪毙的那个冷柏松就是我的介绍人。”

“嘿！这弄的是盘什么景！”方茂名一拍大腿，又连忙对大家说：“这事到此为止，到此为止。再也别提这事，更不能往外透露半点。加法啊，就当你刚才没说那句话，开个玩笑。”

“这，这是真的。”章加法还没想开。

李策忙说：“加法啊，不管是不是真的，都按你爸说的。现在当局抓共谍正在风头上呢。最近不是在澎湖破获了一起‘烟台联中共谍案’么？八千多我们胶东这面的中学生吃尽千辛万苦，跟随国府南下，好不

容易才在49年7月到了澎湖。说好了十六岁以上的男生参军，十六岁以下和女生继续读书，谁知当地的防守司令李振清不守信用，把不到十六岁的个子长得高的也拉去当兵。学校的总代表张敏之先生不服，往上举报。结果反被诬陷是共谍，抓了几十个人，说是有共党组织。但外界对此议论纷纷，似有不平，认为证据不足。你这事要让外面知道了，那还了得。正好被他们用上，假的也变成真的了。”

“啊？还有这样的事？”加法惊叹道。

“后来那边有人来找过你吗？”方茂名又问。

“没有。”

“那就对了，就没有那回事，对方也不认那回事，你也别再想那回事。去好好念书，尤其是好好念好英语。知道了吗？”难得方茂名很严肃地对章加法说着。

“好，好。”章加法点头，不过还没完全想通，说：“美国人抛弃了国民党，你们刚才还对他们有这么大的意见，那我们还去那儿啊？”

“美国人当时抛弃国民党，是他们的失策，国民党自身也在很多地方做得不好，比如蒋介石对美国政局发表了一些不当言论，偏向胡佛，国内治理又一塌糊涂。我们去美国，跟这些政治没有关系。况且，我们是去投奔美国社会，不是去投靠美国政府。刚才李副官讲的那段他们《新华日报》的文章，倒是很能说明问题。美国，值得我们一去。在那儿，才有你的出路。”

写到这儿，笔者不忍要插上一段话。方茂名，一个一直对美国政府的做法持批评态度的人，却要孩子和自己全家人都到美国去。笔者忽然想到正在写这些文字的现在（2015年），大陆上一些有点权势和表面上左得可爱的人，嘴上是在不断地咒骂美国人，咒骂西方社会，暗地里却把自己的老婆孩子送到美国去，把自己敛到的财富投到美国去，为自己留条后路，全然不念及自己天天在唾沫四溅地颂扬着的社会主义中国，跟方茂名还真是有点相似。但是，他们内心的龌龊与手段的卑鄙，却是方茂名完全望尘莫及的。有个厚脸皮的左派，居然说：他把老婆孩子送到美国，自己住到美国，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批判美帝国主义。天下还竟有这样无耻的人。就如鲁迅的那句话：“呜呼，我说不出话来。”

言归正传：

“那我们大人呢？”苏素玉还是想着眼前的事。

“我也想过了。我准备找那时在黄港的那位美国朋友查理，看他能不能帮我在那儿找个工作。他回美国之后退役了，在一个航运公司，正好和我的专业能对得上。”

这番话，说得苏素玉直点头。

“还有，”方茂名考虑得挺周全。他对李策和屠美丽说：“虽说美丽年龄小了点，李策的年纪可是差不多了。你们也别等了，早点成家吧，这样，很多事情也比较好办。”

“对，对。”安晓芬附和着说。

屠美丽脸一红。李策有点为难，先说了：“我们是一点准备也没有，一点东西也没有。”

“要什么准备？要什么东西？这年头，有人在，就行了。”方茂名认真地说。

“对，李策啊，美丽啊，你们有什么难处，有什么需要，只管说，我们会尽最大力气来帮忙的。”苏素玉很诚恳地说。

美丽红着脸说：“我还小呢。”

安晓芬又拿出直率的脾气，说：“还小？古时候有个说法，叫年方二八。就是说，十六岁那就是大姑娘了，好出嫁了。”

“呵，呵。”大家还笑了一阵。

在时局几经反复，经受了层层压力之后，他们几个居然还笑了一回。

第八章 对岸的烈士

1949年6月8日

8.1公田

这一章，还是讲海峡的对岸——台湾。

对岸的烈士？

是的，对岸的烈士。

那是在海峡对岸新出现的一批烈士。1949年大陆解放后，却还有一些依然坚持在台湾或被派往那儿搞地下工作的人，而被国民党捕获处决了。对于大陆来说，那当然就是烈士，牺牲在对岸的烈士。这段一直被严密封存了几十年的历史，直到最近才有所披露。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于2013年秋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建了个“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就是纪念这批人的。

现有的资料披露，20世纪50年代初国共双方在台湾爆发了一场地下斗争大战。毛泽东说，解放台湾，除了陆军，主要依靠空军和内应。于是在大军横扫江南、国民党狼狈败退的时候，有1500多名解放军干部以各种方式顺势被派到了台湾。国民党当局吸取了在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对此高度警觉、痛下杀手、全力清剿。前后抓捕了1800人，处决了自副参谋长吴石以下1100人，成了对岸的烈士。但是这个情况，在大陆是被严密封锁的。甚至一些烈士家人，还一直被当做反革命家属，在其后的历次运动中屡受牵连。

这儿讲的这位烈士，情况有些特殊，他就是从龙头镇西北村来的连四娃。

连四娃他们那批人，离开家乡，离开亲人，已经有两年了。家乡的亲人天天都在想念着他们，而他们更是无时无刻地思念着家乡的亲人。要讲连四娃，就把一起去了台湾的那几个西北村的人：董平章、王立他们，一起讲一下。

连四娃他们几个到台湾后，不象军政人员家属有眷村，而是安排到公田劳作。公田是日本人统治台湾时期的一种农业组织方式。日本人将一些“无主的”和所谓“占地过多、耕作不细”的农田归他们所有，而后雇佣劳工或出租，把台湾的农业经济命脉直接掌握在他们手里。这种方式后来有个意想不到的另一面效果，则是当地农民占有土地的多寡并不悬殊，没有形成按共产党的说法属于大地主的那种阶层，使国民党日后在台湾搞“三七五土改”的矛盾和阻力相对较小。

西北村的几个农民，被分到彰化西海岸的一个公田农场。数百亩的田地划出十来亩给他们三人作为一个劳作单位，集中住宿，集体耕作，近似于劳役了。第一年开始给一些粮食补助，第二年免租。看似优惠，实质对于北方农民来说，水田劳作既不熟悉也太辛苦，出力很多，所获无几。不但生活艰难，与

当地住民没有交往，孤独无助，尤其是思乡日重，时光难捱。家里毫无音讯，却在这儿日夜劳作，不是一天二天啊，两年了啊，七百多个日日夜夜啊，他们积压的愤懑可想而知。

这不，这天早晨，三人刚喝完自己熬的稀粥从居住的棚子里出来。他们住的是临时搭建的棚子，用竹篱笆当墙，外面用泥巴糊糊，锈铁皮搭的顶，低矮、潮湿、阴暗，夏天能晒死，冬天能冻死，最多也就是避个雨。面对这样的状况，当局则一个劲地要他们“克难”，能捡条命跑到这儿就算不错了，不要有别的指望了。

董平章走在前头，抬着木犁。董平章是他们三个人的组长，推不出去，自己就扛了。王立觉得过意不去，帮着抬着犁把。连四娃在一边走着，无精打采。走了十多分钟，到了地边。

董平章无言地下了水田。

连四娃忽然一甩手，说：“不干了。”

王立惊异地看着他，说：“不干了？怎么办？还能干什么？”

连四娃倔强地说：“就是不干了。”

王立说：“唉，这日子是难熬。可是难熬也得熬啊。不干，吃什么？”

连四娃扭着头，没动。

还是王立接着说：“忍了吧，连娃。到什么山，听什么歌。到了咱这一步，也就剩了一个忍字。能忍下来，就能熬到出头的日子。”

董平章下到田里，站在犁的前头，把纤绳搭上了肩，这是犁地最累的活。他一直没说话，抬眼看了下王立。

王立明白他的意思，就跳下去，扶起了犁。

董平章往前拉着，犁头歪了。王立扶着，犁头前行了。

连四娃嘴里还没停：“这解放军，怎么还不打过来？”

王立紧张得忙朝四周一看，瞧见有人过来，就阻止道：“快别说，快别说，有人来了。”

连四娃还不服气：“有人怕什么，等解放军一来，这些王八蛋一个也不剩。”

王立叹口气，低声说：“唉，真的，解放军怎么还不来，都等了二年了，等得心都烦死了。”

连四娃往田里扔了块石头，“外面什么消息也不知道，说不定解放军已经打上来了呢。”

王立看着那渐渐走近的人影，赶紧换了个话题，问在低头拉犁、一直不语的董平章：“你怎么什么也不说，真的什么也不想？”

其实董平章的心事比谁都重，因为他与他俩不一样，他有老婆、有孩子、有个温暖的家，他的思恋比谁都重，只是他想得都已经有点心灰意冷，嘴上已经不想再说了。

停了会，董平章才说：“怎么不想，怎么会不想老婆孩子呢？”

王立搭上这茬，说：“还是有老婆孩子的好啊。”

董平章疑惑地问：“你不也是有老婆么？”

王立愣了下。他忽然想起了那个丁妹。丁妹算是他妹妹呢，还是老婆呢。他一直觉得丁妹还是妹妹。虽然他母亲叫他们住在了一起，但他一直觉得那不算是夫妻，还是妹妹。

王立说：“我那个不算。”

董平章说：“那也是老婆啊。”

连四娃不大在意村里的事，便大咧咧地说：“算不算的，都是吧。”这时他也已经下来一起拉纤绳了。

董平章对他说：“你不想爹妈么？”

连四娃又愤愤起来：“谁能不想？不想，那才是王八蛋。”

王立又叹口气：“唉，不知道他们都怎么样了。”

那个渐渐走过来的人，正是高增光。他安排在这儿的“难民工作处”，是对这片公田里大陆来的人进行管理的。虽然都是从海源过来，他的感觉当然和田里的三个人完全不一样。听见田里的人在议论家里的人怎么样，便狠狠地朝他们嚷起来：“你们他妈的在瞎操心，你家里人还能等到今天啊，早叫共产党给杀了。还在想啊？”

连四娃回头想跳起来，脚却插在泥里拔不出来，差点歪倒了。董平章忙扶了他一把。

连四娃对着高增光嚷：“不可能！”

高增光吐了口痰：“呸！别做梦了。所有来台湾的人，共党都说是反革命。你们在家里的人，都是反革命家属，早就镇压得一个也不剩了。”

连四娃一点也不打怵，还在嚷：“你这个还乡团，才怕共产党。”

高增光更冒火了：“大胆！你敢替共党说话！”

要不是连四娃几个已经在水田里走远了几十米，我真想要跳下去抓人。

8.2连四娃

已经能看得出来，在西北村来的三个人中，情绪最激烈的要数连四娃。前面提到过西北村的人都不清楚他到底是不是党员。这儿说明一下，原因还是战争时代的党员关系不像后来那么严密、正规。国共双方控制区域的反复变化，各系统、各单位的迅速应变、自主活动，人员不断进出，地点频繁转移，相

互之间难以联系沟通，地方党组织尚未公开，党员之间单线联系，轻易不用后来的那种书面介绍信，造成在有些情况下，个人的党员身份难以确认。因此有了以后的甄别、重新确认、两次入党、甚至“不予承认”这些。后来一些运动中的所谓“假党员”、“混入党内”等等说法，也源于此。

连四娃在抗战后期上了县武工队，离开村庄去了北面山区，在外县入了党。后来武工队并入部队，有些人回了地方，连四娃就是回本村。党员关系交县委转回村里，可县委自己还天天在山沟里转呢。这个环节没跟上，连四娃的党员身份就没了下落。连四娃自己也不知道该找谁说这事，或者也没把这当回事。也许可以批评他是组织观念淡薄，但这样的一个普通青年农民，他的心里就是打敌人、保家乡，没有想到更多的。村里面听说他在外面可能入了党，自己不说，别人也不便多问。想等形势安定下来，再由组织出面正式解决。可没想到，连四娃却已经到台湾来了。

又过了几个月，1951年的夏天，酷暑难当。他们几个还要在他们并不熟悉的，比起北方旱作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恶劣的水稻田里劳作，在精神上、体力上都难以支撑。又听说大陆的志愿军和美国人在朝鲜打起来了，国民党又加强了对他们的监管，大家心里各种想法都有。可是看着近处的穿着国民党军服的监工，看着远处插着的青天白日旗，谁也不敢说什么话。惟独以往在家乡时沉默寡言的连四娃，这时话却反而多了起来。

烈日下，连四娃戴着并不习惯戴的斗笠，站在水稻田里，满身的污泥，满脸的汗水，在耘草呢。他一脸愤恨，两手捧着泥巴，大概是憋了两年实在憋不住了，大声地说着：“真他妈的，这是人干的活啊？”

高增光是“难民工作处”的管理员，正拿着短棍四处转悠，听着动静便朝这儿走过来。

“嘘，嘘。”旁边的董平章赶忙朝连四娃眨眼睛示意。

连四娃却全然不像以前那样没言没语地躲着人，这几个月来，还敢当面对着干，等着高增光走近，把手里的一把杂草使劲往水里一摔，泥水“砰”地溅了起来。

高增光自然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没有像往常那样发作，而是瞪着凶狠的眼睛看着，几分钟之后，才冷冷地说着：“你煽动对国民政府不满，我看你是个共谍。”

连四娃脸上一愣，反倒更大声地说：“我就是共谍。咋啦？”

高增光听着心里一惊，又冷冷地看了看，出人意料地往地上吐了一口痰，“呸！”转身走了。

高增光也是满心的仇恨压着、憋着，但眼下，连四娃这种农村楞小子还不是他的发泄对象。当时，解放军部队在浙闽沿海已是大军压境。台湾岛内草木皆兵、一片惊慌，“白色恐怖”乌云密布。“肃清共谍”的风声，在全台湾上下，一阵紧似一阵。上峰压给他的任务还重着呢，不能计较这些小事了。

“共谍在哪儿呢？就只在军政人员里面有？难道……”高增光已经走出去了一段路，又猛然回头，看着田里的那几个人，眉头一紧。

还没等高增光拿到把柄，连四娃自己却暴露了。他沉不住气了，他的思维被压跨了、断裂了。他绝不愿意再在台湾呆下去了，他要走，他能走，他会走。前两年在西北村时，被国民党抓住在西海滩当苦

力，不是走过一回吗？虽然当时就被抓回来，那是自己不够小心。这回自己小心一点，凭自己的一身力气，加上当年在武工队学的功夫，就是海上过不去，也能潜入深山里过一阵子，决不在这水稻田里为国民党出力，受窝囊气。

他一直在留心周围的环境。他知道，这儿西面不远就是大海。虽然没去看过，但是他知道。凭着海边人对海的敏感，空气中那种淡淡的咸味，早晨那种飘渺的薄雾，夜深人静的时候，还能听到海水磨擦基底的那种沉闷模糊的旁人察觉不到的声音，那不就是“海吼”吗。以他的经验，大海离这儿也就十几里地，一个钟头就走到了。到了海边，再怎么办？总有小船、小筏子吧？海边的小船就抛着锚，撂在沙滩上，并没有人看管，不像城里人的自行车在马路边上停一会儿还要锁着。上了船，就往大海里去，拼命地划，哪怕死在海上，也要比被国民党整死强。连四娃已经想了好些日子，高增光那冷冷的眼光，更促使他下了决心。他知道，以后的机会将越来越少，自己的党员身份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暴露，隐瞒不了多长时间了。还要准备什么呢？还有什么好准备的？就凭着一股劲，腿上的、手上的和心里的劲。

就在这天晚上，连四娃跑了，往西面的海边跑了。谁也没有察觉。他要跑向大陆，要跑回自己的党领导的、火红的解放区。

早晨起来的时候，董平章发觉连四娃不在了，满心的疑惑，却没开口说，只对王立挤了挤眼，谁也没说话。

临近中午的时分，田边的小路，远远地走来几个人。稍微走近一点，看出来那是高增光带着几个穿黑警服的警察，拖着一个五花大绑的人过来。那个人任凭两边的警察用棍子不住地往下打，还不时地跳着、叫着。

大家惊了，那不就是连四娃吗？

连四娃脸上已是一条条的血痕，绳索勒得脖子上的青筋直暴，破损的衣服撕了好几道口子，血红的眼睛喷着怒火，被强压着的脑袋一次次地要倔强地抬起来。

走到田头，高增光对董平章他们喊着：“你们都过来！”

“不该他们的事，是我自己一个人要走！”连四娃还很清醒，不去连累别人。

“你为什么要去投奔共产党？”高增光向连四娃吼着。

“我不是投奔，我自己就是共产党！”连四娃斩钉截铁地大声说着，这一句话犹如石破天惊。

“什么？！”高增光虽然想到过有这种可能，但真的听到这句话，一时竟怔住了。

董平章他们听着这句话，也都全身震撼，敬佩地看着连四娃。

连四娃又急促地对董平章他们说：“乡亲们，我是回不去了。你们以后有机会回去，告诉他们，我连四娃是1944年入党的敌后武工队队员。1951年被国民党杀害在台湾。你们要起来消灭国民党，回到解放区啊！”

高增光跳了起来，一拳打过去。不料连四娃还挣扎着飞起一脚，踢得高增光直喊“哦哟”。

“拖走，快拖走！”高增光嚷着。

连四娃被那几个警察，强摁着，额头几乎要碰到了地，硬被拖走了。

台湾中部那炙热的田间小路，留下了连四娃久久不能散去的呼喊：“打倒蒋介石！消灭国民党！”

没过几天，一早晨，董平章他们铁皮棚里的小收音机照例响着音乐：

“保卫大台湾，保卫大台湾，

保卫民族复兴的圣地，

保卫人民至上的乐园，

万众一心，全体动员，

支持生产，支持前线

……”

（歌词选自：2011年5月5日《南方周末》）

一段音乐结束，电台开始广播新闻：“现在广播重要新闻，现在广播重要新闻，潜伏在难民中的共党分子连四娃，日前被抓获。现已查明该犯是共党‘台湾省工委台中武装工作委员会’的成员。该犯对共谍身份供认不讳，昨日已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中共）“台湾省工委台中武装工作委员会”是台湾当局在1950年10月破获的一个共产党潜伏组织，这个案件在台湾曾喧闹一时。按说连四娃和这个案子没有任何的瓜葛，不知怎么硬把他给扯上去了。可能是因为是在同一地区，当地的情治机构怎么也不能放过，不认也得认。更何况，连四娃自己早已是视死如归，不去听他们说什么是了。

连四娃怎么会一个晚上没过就被抓住了呢？因为他想错了。彰化的西海岸，不是像他家乡龙头海岸那种迤迤无比的沙滩，而是一片难以插足的泥沼。他刚踏上海边灰黑色的泥沙，看见眼前翻卷的海浪，心里激动得不能自己，眼睛都放射出久违了的光芒。然而，一道铁丝网无情地挡在了面前。这铁丝网倒不是为防止连四娃这样的人逃跑，而是在防备大陆来的解放军登陆。连四娃忙着要空手扭断粗粗的铁丝，又谈何容易。更何况，前面还有一道铁丝网呢。没一会儿，就被海岸巡逻队逮住了。

对于连四娃来说，无论是曾经的少语，还是现在的冲动，都是出自面对社会激烈动荡而无法应对的一个青年农民的单纯。

那之后的几年，董平章、王立他们更是生活在恐惧、压抑，和对家乡、亲人无尽的思念之中。

第九章 潜回大陆

1949年6月9日

9.1海鬼

这一章依然是讲海峡的对岸。

连四娃因为那么急切地想回家，竟然一时冲动，使自己丢了命。然而，想回家的岂止是连四娃，不但是董平章、王立他们，连从共产党严厉打击之下好不容易逃出来的人，也何尝不是如此呢？

高增光就是这样一个。按说高增光一副凶神恶煞的样，还会想家么？他双手粘满鲜血，背负几条人命，还敢回家么？可是，即使这样，他还是想回家，他还是敢回家。就这样一个人，他的心里也丢不下痴了的妻子，丢不下瞎了的儿子。一年又一年地过去，这个凶汉，心里的仇恨日重，心里的思念日重。他在这儿一天天地毫无意义地过着。大海的对面，那痴了的妻，那瞎了的儿，又是在怎样地过这一天。他想不下去，他不敢想下去，可以肯定自己的妻儿早已命归西天，可还是在想，扔不掉，放不下，还是在想。

连四娃的被杀，可以说是他一手引起。可连四娃的死，也使他想起了回家。连四娃用了在他看来是愚蠢的办法。他高增光回家是不是可以有别的办法呢？

他想了一年多，终于想出来了，泅海而去。当然不是从台湾直接游到海源，而是要有船，要有专门设备，要有特种训练。他自己找到了军情局的特工处。

接待他的是特工处的崔科长。崔科长，少校军衔，四十模样，已有些发福，头发油光可鉴，精神头还挺足。听得高增光说出自己的想法，便神情专注、直视对方，心里还在想，这家伙是不是要借机逃跑投共吧？直等高增光把话说完，才说：“好，好，你的想法很好。不过这事得有周全的考虑。先说，你会游泳吗？”

“这……我还真不会。”高增光尴尬地说着。

“你起码要学会游二十里以上才行，而且还得是在海上。看你体质还行，不过能游到那个程度，得学上好一阵子。”

“我一定认真学。”高增光认真地答着。他对这个是有思想准备的。

“好的，过几天，我们会通知你，先把游泳学起来。”

为了回家，高增光还真当上了海鬼。

崔科长有了高增光，虽然没有形喜于色，心里却是如获至宝。他从事特务工作，已有十多年了，却屡屡失败，还差点翻船被共产党逮着。1949年，也是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所以仕途进展不大。正在郁闷着急之中，还真有人找上门来，愿意进大陆共区，这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么。当然，崔科长毕竟是搞特工的。他想的是决不只是会不会游泳的问题。首先是忠诚度。这人可靠吗？要是他去投共呢？弄不好不但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连送他去的人也都得搭上，被他卖了呢？说不定反过来还要追究自己的责任。

不过，通知还是很快就来了，人才难得啊。高增光离开“难民工作处”，到澎湖受训，首先是练游泳。审查和考验在背后进行。

高增光是个旱鸭子，年龄也已三十出头，学起来真不容易。教他的，是位张教官，江西人。1949年，国民党大溃败时，他不知怎么也稀里糊涂地跟着部队过来了。“手脚要快，腿使劲蹬。手掌平着往下压，侧着抬起，再下去，对。”好在高增光也真下工夫，这一阵基本动作已经会了，也能游了，关键是要延长距离。

这天，居然在海上能游出一里地，朝着一个砂礁，拼命地游去。

“游，使劲游，中间不会有船来。就是一句话，使劲游。游不动，就淹死。要想活，就往前游，到那个礁上去休息。”张教官毫无表情地说着。

高增光看着那张冷冰冰的脸，虽然有点心慌，有点厌恶，也只能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往前游。在汹涌的波涛中，被浪花迷湿的眼，紧盯着前方的那个砂礁，拼命地划呀、划呀，全然顾不上那些动作要领。

终于到了，高增光摸到岸边的礁石，半身还在水里，就不想动了，任凭海浪拍打着身上。

张教官随后上来，坐在他身边的岩石上，看着他。几十秒的沉默后，似乎不经意地说着：“唉，何苦呢，台湾就这么不好，非得要回去？”

高增光并没在意，还在那儿喘气呢。

张教官又说了：“唉，回去也好，去认个错，好好干活，不管别的事，也能混个日子，还能和老婆孩子在一起。”

高增光这才回过味来，眯着眼，望着他。

张教官的话还没完：“唉，不瞒你说，我也想走啊。在这儿有什么意思啊。整个大陆都丢了，还能指望有什么出头之日啊？”

高增光低下了头，顺着他的话说：“那还能怎么做？”

张教官俯过身来，靠近了高增光的耳边说：“咱俩一起过去。上岸就宣布起义，咱俩不就成了有功人员啦。”

未料想张教官的话刚完，没等抬头，高增光猛地就把他的脑袋摁到了水里。张教官的身躯横在另一块岩石上，使不上劲。眼看着手脚直扒拉，没几分钟就不动了。

事后，崔科长真是有苦说不出。那是他自以为聪明，安排的一计啊，没想到是这么个结果。只能叫张教官倒霉到底了，尽管高增光的报告也是口说无凭没有旁证，但崔科长心里是有数的，没法再去深究了。假戏真的成真，张教官真的被按上“煽动叛逃”的罪名，高增光则顺利成行。

又是一个月的训练。

1951年的夏末，高增光出动了。他要潜回大陆，救回妻儿，了解大陆情况，扩大台湾政治影响。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任务，潜回的时间、地点、过程，都作了精心的策划。

仿制渔船在东海和黄海上转了一大圈，从偏东东北方向靠近龙头沙滩。时间是拂晓前、天尚暗。此时从岸上看不清海面上有没有船，从船上倒能辨别大陆山坳的位置和方向。登陆地点，不是正对龙头的海角，那儿估计有人出现的可能性较大；而大河口有淤泥，不便于上岸；最终选择在了从孙家汊下来的那条小河的出海口一小河口。那儿既没有淤泥，也不会有什么人的出现。

船熄火，向着岸边滑行，尽可能地靠近。在一片朦胧中，海岸后的大山轮廓已现。四周那么地安静，船儿在轻轻起伏。那黑黛的山脉，那暗黄的沙滩。这就是海源大地，这就是高增光的家乡。高增光看见了天边的那排大山，心情难以抑制。因为那山的后面，就是他的家，就是他妻儿的所在。梦里想了多少回，如今就在眼前。还没等随船的崔科长发话，高增光就急着翻身下了海。

正值涨退潮的间隙，高增光游得也并不使劲。他知道用力气的还在后面。

高增光游到了岸边，手摸到了沙滩。他匍匐着，把身体隐藏在翻卷的海浪下，向四周观察。四周依然静静的，毫无异样。他起身快步走在沙滩上。在他即将走过沙滩，跨上沙滩后十几米宽的土坡时，他听见一阵“呵呵”的声音，转头一看，一个苍老的农妇站在近百米外的土埂上惊恐地看着他。

高增光真想抽自己的嘴巴，以他的身手和训练，应该是在听到声音之前就先看到人影。怎么会这么粗心呢？

好在老妇没有别的进一步的反应，只是站在原地“呵呵”地压着嗓子出声，既没有呼喊也没有奔跑。这个老妇就是孙家汊的孙大娘，她老伴曾为掩护走散的小钱而牺牲。这个时辰的海边是不应该有人的，她怎么会出现在那儿呢？她有个不争气的儿子孙二赖，好吃懒做，本书的后面还要讲到她。家里的活计都得靠年迈的老娘。孙大娘为了维持生活想尽了办法，想起了也可以像龙头镇的人去海边挖蛤蜊，自己吃点还可以卖点。但孙家汊的人因为远离海边，是不到这儿来捡这些的。所以孙大娘也不清楚什么时候涨潮退潮，该什么时候到海边来。结果，在这不该来的时候来了海边，却碰上了刚上岸的高增光。

孙大娘迎着五彩斑斓刚起的朝霞，看不清高增光的模样，只见一个黑影从海里出来，浑身湿漉漉的，说不定还能看见衣服上落下的水滴。她惊讶着，除了瞪大眼，张着嘴“呵呵”地发声，不知道再有什么别的表示了。她想逃，脚却不动。她想喊，嘴巴却不张，看着黑影走过沙滩，走进了庄稼地。等完全看不到黑影的时候，孙大娘还站在原地不动，揉着眼睛，想再看看是自己眼睛不行了，看不清了，还是真

的有个黑影走过去。她甚至怀疑起自己来。眼前是绚丽夺目的满天彩霞，和海面上跳跃着的七色光亮的浪花，没有人，没有什么影子。自己是见到鬼了，见到听海边人说起过的死在海里的人要回自己的家了？

高增光看出老妇人的反应，知道对自己是无碍的。他走进了农田，只是改变了原先的行动方案。原本是打算就在海边的农田里歇脚，等晾干衣服后再走。他现在只能穿着一身湿衣服走，不但是不舒服，更是增加了风险。一旦被人发现，这身湿衣服将特别显眼，而且还很难解释。

孙大娘回到小山村，已是晌午了。她把这事讲给儿子听，儿子笑话她神经。她把这事讲给村里人听，村里人没有一个相信。而这时，高增光正在孙家芥村东的山峦上。

9.2有鬼啊

按原方案，高增光应该是昼伏夜行。昼伏夜行，对于熟悉当地地形的人来说更安全。只是孙大娘的出现，使高增光上岸后的第一步就走了样。原本应该在上岸不远处就晾干衣服，现在只能继续往前走了。

夏末的农田还比较好走，不象冬季，庄稼收了，田野空旷，难以隐蔽；也不象盛夏，庄稼过于茂密，不便于发现别人。走的时候，既不能钻在高秸作物的地里，像高粱、玉米这些，那样虽然隐蔽，但一旦被人看见，则肯定被人生疑。而在地瓜地这些地方走，视线较好，容易发现别人，当然也容易被别人发现。所以一般都靠着玉米地外侧几米走，一边走一边观察，要是有关情况出现，也能随时钻入玉米地。

就这样，高增光凭着曾经的记忆和分析，他选择了离龙头较远、人烟最少的小河口东面北上。急步快行，不顾身上潮湿的衣服，尽量在人们下地干活之前走上茅山。在走出最初的沙滩、走进农田之后，相对要安全一些。因为那时还是各人干自己的活，既分散也不统一，各处的地块有零星的人员走动也很正常，除非是在自己地里看见别人在走。

高增光上了茅山。那山也就是几十米的高度。他在南山坡歇了下来，先要晾干衣服，不只是因为不舒服，而是穿着湿衣服会令人生疑。他把衣服脱下，摊在贴地的草梗上。兜里的东西也没往外拿，以便防备不测，可随时穿上。其实，他几乎什么也没带，只带了一把锋利的匕首、二包压缩饼干、一叠不知是真是假的人民币。连野外生存必备的水壶都没拿，更不用说枪。自己靠着一块稍大的岩石，静静地等着。他不累，也不困，等着天黑再前行。

快到中午，一切都很平静，没有什么事来干扰。他穿上已经干了的衣服，又起身了。他要转移一下地点，不能老呆在一个地方。还有他开始饿了，但他舍不得动那压缩饼干，非到万不得已不想动。他想喝点水，他知道山的后面就是大河，他要翻过山脊下到河边去。

当他刚越过二个山顶间的较低处（大山里的话，叫山垭，这儿还称不上），下面却有个人在那儿，离他大约几十米，想躲也来不及了。高增光的脑子一下子就激烈地转动起来，搜索着曾经想到过的种种

预备方案。那人倒是没动，还在东张西望。高增光不能停下脚步，只能缓缓地、保持一定距离、从斜方向走过。

“哎哟，伙计啊，你怎么穿了一身黑的，不热啊？”那人倒挺热情，虽然隔了几十米，却主动打起了招呼。海源人挺实在，在山上遇到哪怕是生人也会打个招呼，说不定相互间还能帮上什么忙。

高增光穿黑衣是为夜行，大白天是有点显眼，难怪人家会问。

“哦，哦，习惯了。”高增光敷衍着。

“是老北山啊。”高增光的口音，人家一听就听出来了。

“是啊，是啊，你在这儿忙什么呢？”高增光答应着。不否认，不解释，不反驳，倒过来主动反问别人，引开话题，让别人说。这是他在特训班学到的技巧。

“噢，我这是在瞎看看，有没有好的石礅。”这人是龙头镇上东北村的小伙哈联成，打石头的。他是趁中午过来看看有没有更好打的石礅。按说这儿不是东北村的地界，就算有看中的，要商量着买下来，也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哈联成不好意思地“嘿嘿”讪笑起来。本来他是可以不讲这些的，但刚才讲海源人很实在，他还是照实说了。

“这儿的石头是多，但是不成型，还不好搬。”高增光对打石头还是有点知道的，没停下脚步，边走边说着。

哈联成点着头，连说：“是的，是的。”往南坡走去了。他决没想到面前竟是一个从台湾来的特务，他都没有回头看一下。而高增光倒是回头看了下，继续往下走。

下午，喝过了河水的高增光，在更东面一些的连接着矛山的尖山北坡休息了。这儿山更高，树更密，人更少，通常是不会有人来。海源的山，一般都是碎石山，不下工夫搞培土这些，很难进行人工种植的，都是自然长着一些杂树的荒山。以当时的条件，只能用来割些柴草，所以通常是不会有人来的。高增光在树丛里，山石后，还睡了会。

太阳又下山了，天渐渐暗了，高增光又开始行动了。

他下了山，淌过大河。过河时，他尽量用脚摸索着。尽管这点水，对于他根本不算什么，他只是要尽量少湿衣服。这样即使被人看见，也可以少许多别人的猜测和自己的解释。

过了河，下河堤，蒙蒙暮色中，一块地里还有人在干活。这时候，高增光已经不紧张了。他斜斜地插过去，未靠近，已经看出是个老头。他更不担心了，甚至在想可以说几句话，问问现在的情况。不是在他的任务里还有一条是要了解和收集当地情况吗。

“老伯啊，还在辛苦啊？”

“喔，喔，”那老人抬头对来的人答应着，“唉，也是没法。分的地远，来一趟，就多弄些时候吧。”

老人是李家泊的，就是小学教师李辰的爹李老伯。土改分到了块地，李辰老不在村里，照应不到，分得就远了点，离村十里，都出了李家泊的地界。

“哎哟，分得那么远，不是在拿人开心么？”高增光是想挑拨一下。

“唉，有总比没有好啊。”这一招对李老伯没起作用。

“这块地有多大，你这么大年纪，能弄得过来吗？”高增光还在试探着。

“有四亩七。多出点力呗，给自己干活，也不怕出力。”

“你儿子怎么没来？”

“他在书坊呢。”

“还是文化人啊。这两年日子过得还行啊？怎么听说，你们平泊这二年赶不上北山。”

“谁说的？咱这儿比过去也强多了。”

原本想再挑一下，看老头有没有气话说出来，拿回去再编一下不就是好材料么。高增光也会搞这一套，可是又碰上了个实在人。老伯不知道要拐弯顺着别人说，就这么直讲了。这高增光当然就不愿意听了，才刚停下脚步，抬腿又走了。

“兄弟啊，这天都黑了，你还上哪去啊？”李老伯倒是挺关心。

高增光连话都没回，只顾往前走了。

黑夜中，高增光穿过了整个平泊地，走进了北山。

景色越来越熟悉了。那路，那山坳，甚至那一棵棵的树，都从遥远的记忆中跳出来到了眼前。

进村了，眼看就要进村了。他翻过两个小山坡，看见了村口弯弯的土路，看见了弯弯的土路边高高的枣树和槐树，看见了高高的枣树和槐树后面朦胧的房屋。

是的，那就是高家沟。高家沟，他的家到了，离别了五年的家终于到了。

高增光再次朝四周一望，穿过了土路，又踏上了一个山坡。他没有直接进村。他也不能直接进村，尽管村庄就在眼前。按原定方案，他是要带老婆孩子一起走的，而且是要偷一辆、哪怕是抢一辆车走的，这是整个计划中最难的一项。但在这之前，他必须要回家看看老婆孩子的情况，才能做下一步的决定。

他跨上了最后一个山坡，坡下就是关押他一家的破屋。五年前，他就是翻出破屋的后窗，从这个山坡逃走的。再有几十米，最多一百米，就要到他家了。严格说来，还不是他家，而是关押他家的屋子。斜斜的山坡下似乎能看到那破屋的后墙了。

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声响打断了他的思路。他的右后侧出现了个黑影。应该说，他也及时发现了这个黑影，但这影子已经出现，无法回避。他只能稍停一下，几秒钟的思索后，改变方向，往左侧山上

走去。那黑黑的人影却随他而来。

高增光走了几十步之后，那黑影还是跟着上来，而且还更加近了点。这是个什么人呢？高增光心一横，突然转身朝那人走去，想以此逼退对方，而且他也并不打算直接对抗，准备在走到还剩二、三十步的距离时，再转为斜方向离去。就在高增光走到按心理教程里说的既能达到显示实力、阻遏对方，又不使对方感到无路可走、被迫抵抗的极限距离，跨出斜方向那一步时，他，高增光走出了树影。月亮又从云隙中露出，一束惨白的月光，从高增光的头顶照下。这时候，脸上的五官突显得异常恐怖。背景是黑黑的山影、黑黑的树影，高增光黑黑的衣服也融合在黑影里，剩下的就是树丛间悬浮着的黑白相间、完全扭曲变形的鬼脸。

人，什么时候的形象最可怕？那就是在黑夜中，有束光从头顶垂直照下，就像高增光现在这样。那个五官，真的像鬼一样，连你自己都能吓倒。不信，你可以自己试试看。不过不要让你老婆孩子看见，那真的会吓着她们，使她们不再爱你。当然如果光线是从下往上照，那会更恐怖。不过一般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除非真的是装鬼。最能帮高增光掩饰这一情景的应该是那顶本可以遮挡月光的黑色草帽，却被不喜欢戴草帽的高增光始终拿在手里，从而再充分不过地突显出高增光那本来就凶神恶煞般的脸。

那人果然被吓倒了。他没有读过高增光读的心理教程，不知道还有什么心理极限距离，倒是被那月光下突然出现的悬空在漆黑树荫间的鬼脸着着实实地吓着了。不但是吓着了，而且是吓得魂飞魄散。他不顾一切地跳起来惊叫：“有鬼啊，有鬼啊，不得了了，有鬼啊！”

惊叫声震动了寂静的山林，惊叫声惊醒了沉睡的村庄。

高增光条件反射似地立即快步而去，没有往村外，更没有往村里，而是往左前方更高的山坡走去。在距离那老屋，关押着他家人的老屋，仅仅几十米的地方又离去了，并且是永远地离去了。

其实，高增光真的不用回来。他的老婆孩子在他上次走的几天之后就饿死了。他逃跑后，村里立即把那两户地富转走，丢下他老婆孩子再没有人去管，就饿死了。后来，是谁来看过，尸体是怎么处理的，都没人知道。当然，高增光就更知道了，至死也不知道。

高增光只能在快步中回头一瞥，最后地看一看那老屋，看一看那个还在惊叫中的人。

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高增光当初逃脱那天值白班的儿童团员高梁山，当然他现在已经不是儿童团了，现在也没有儿童团了。他已经是十五六的小伙了。他为什么也半夜跑出来呢？因为土改分给他家有十亩多的山坡地，在村里山峦的最外面。去年种了些柞树苗，不知怎么，有时就被人折断了些，叫人恼火得很。所以，他白天黑夜地常过来看看，谁想会遇到这样的事。

这样的惊叫，在黑夜的山林里特别瘆人，把整个村子都搅翻了。人们纷纷涌出家门，打探到底是出了什么事。

高梁山在众人的搀扶下，还带着一时难以平复的惊骇反反复复地嚷着：“有鬼啊，有鬼啊，我见着鬼啦。”

“有什么鬼啊？”有人问。

“黑漏的眼啊，就挂在半空中啊。”（黑漏，海源话，此处“黑”念he，意思是黑色的凹陷）。

“啊？”众人惊道。

“还有那个刀把印啊。”高梁山在头上比划了一下。这一比划，他突然想起来了，那不就是高增光么？高增光逃跑那天曾经愣愣地看过他，就是这个眼神，就是这个刀把。他一直忘不了，这下突然想起来了。

“就是那个高增光呀！高增光又回来了呀！”高梁山半躺在地下反复地嚷着。

众人一听，倒反而不信了。

有骂的：“真他妈的胡扯，一定是吓掉魂了。”

有好心劝慰的：“看把这孩子吓的，快回去上炕歇息吧。”

天亮后，村里还真把这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乡里。乡里一想，这算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真的呢，管不管呢。也还算是认真负责，又用电话报告了县里。县里怎么办呢？这种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退一步说，就算是有吧。下令各乡在汽车站、出县和出乡的路口进行检查。

高增光还能出得去吗？

9.3 狼狈而回

县里布置在路口设岗检查的时候，高增光已经出了大山乡，到了往龙头的大路上了。这回，他干脆不走小道，改走大路了。他是想走得更快一些。那时的大路，走的人不多，车更少，也就是些马车、驴车。觉得后面远远的有辆马车来了。那是县供销合作社给龙头供销社送货的车，上面堆着大大小小的纸箱，还有些空地方。高增光装着跛脚，一瘸一瘸地走着。等车慢慢地靠近了，很客气地问那车把式：“大哥，能捎上我一段吗？你看我……”

车把式也是个豪爽的人，见高增光一步一瘸的，就说：“上来吧，去哪儿啊？”

“龙头镇上，大姐病了，我去看看。”

“你大姐病了，怎么也不捎点东西？”

高增光心里一咯蹬，差点就说错了嘴，“从村里出来，没准备，到城里再买点吧。”

“还说城里啊？”

“说惯了，嘿，嘿。”

龙头镇的人一直以城里人自居，四周乡下也是这么叫的。但更远的地方，尤其是县城里的人，不这么叫了。当然这么叫，也不能算错。高增光干脆闭嘴了，怕再出没法自圆、难以挽回的错。

快到大河了，就要进龙头的地面了。

这时，大路的对面有个干部模样的人，带着两个青年民兵，站在路边，有从南面过来的人，就喊站住，看一下，问一下。高增光看到了这情况，心里想：“难道是在高家沟的行踪暴露，引来了这个结果。这可怎么办呢？”他没有翻身而下，而是屁股往后挪了挪，更靠近纸箱，身子更蜷缩了些，低头装睡。倒是那顶他始终当作是累赘的草帽，这时派上了用场，正好挡住了他低下的半个脸。手则伸进了裤袋，摸着刀把。他想的万不得已的最后一着是，推下车把式，策马狂奔。预定的方案里原本想要带着老婆孩子一起跑的夺车计划，却要在这儿用上了。

马车渐渐地靠近了路边的那几个人，其中的那个干部就是宗发奋。今天一早，接县里来的电话，宗发奋立马自告奋勇，赶到本乡从龙头往县城大道边的最后一个村庄——王庄，叫上两个民兵，就到路边盘查。要是那个可疑分子落到自己手里，岂不就是立了大功么。正巧，这时又从南面来了辆拉粪的驴车。宗发奋立即挥手叫停。

“拉的是啥啊？”宗发奋拖着长音问着。这时的宗发奋已经学会装腔作势了。

“你没看见么，这还用问吗？”拉车的是王庄的王立新。听这开口说的话，也是个实在人。

宗发奋当然就不高兴了，“这是政府在检查。下来！谁知道你这里面装的是啥？”这就分明是宗发奋在打着政府的旗号找茬了。很早就有人会这一套。

王立新很不乐意地下了车，对宗发奋说：“你要翻，那你就翻吧。”

宗发奋有点被呛在那儿了，稍停，才转过来对那两个民兵说：“你们去翻开看看。”

那两个民兵看来也不是什么“积极分子”。这个说：“这有啥好看的，不就是啥粪么。”不知道这民兵是知道面前的干部名字就叫宗发奋，还是真不知道。另一个民兵大概是听出来了，哈哈大笑起来。

“笑啥？不许笑！”这可把宗发奋惹火了，可又不能点穿直说，只好拿国民党说事，“都到什么时候了，国民党都跑到我们眼前了，你们还不知死活。翻！把这个驴车，给我彻彻底底地翻！他越是这样，越是说明他有鬼。说不定下面还藏着手枪、发报机呢。”手枪、发报机是那时描绘国民党特务最常备的两样东西，宗发奋所知道的大概也就是这些了。

高增光坐的马车在路对面过去了。

一个民兵在提醒宗发奋：“那个马车过去了。”

宗发奋自以为是地说着：“特务分子是往外逃，哪还有往里钻、往海边跑的。他再往哪儿去啊？跳海碰死啊？”

宗发奋没想到国民党还会从海上来。他板着脸，挺着肚，一句句地训斥着，还牛得很。真的国民党特务却真的在他眼皮底下一步步地离开了。

出王庄，过了大河，就是赵村。过赵村，远处就是龙头镇了。这时候，高增光还等什么呢，便跳下了车。

车把式还纳闷，问：“伙计，你不是要去龙头么？”

“我先下去看看，再去城里。”高增光往南走了。

车把式摇了摇头。

再往前走，大体的方向，高增光是知道的，就是往南再往东。

高增光往回走着，那心情比来时更纠结、更懊恼、更仇恨。几年的努力、几年的准备、几年的思念，好不容易来了一趟，还是一无所获。不但老婆孩子没见着，还像个被追赶着的兔子仓惶而逃，随时都有被逮着烹食的危险。他来不及细想，倒底在哪个环节出了差错。现在还不是想这个的时候。只是想着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赶快脱离险境。

他往南走着，地里没什么人。远处零星的几个人，也并没有在意他。他留心着，避开那些人，走着不大不小的田间小路，往南匆匆而去。

该转方向往东了。情况似乎很正常，在南门外的前港和海滩后的南港之间的平泊地行走着。有个农民在薅草。高增光也不想特地为此转方向避开，那样反而会引起嫌疑，不如照直往前走。

这位干活的农民，是勤快的迟得法。他从一早过来，到现在都还没吃早饭呢。他又是个多心的人，老远就看到有个人过来，心里就在想，这个人是谁呢，来干吗呢？没有什么人会走这条道。这儿的西面是大河口，没人的地方；这儿的东面，也没有人家，谁会从这儿走呢？难道是来找自己有事的，那也不会从那儿来呀。远处的人还没走到近处，迟得法已经是满腹狐疑了。如果大家都像迟得法那样有心眼，高增光早就跑不了了。

高增光从迟得法的地边走过。迟得法还特地从地里走过来，问：“这位兄弟，上这儿来有什么事吗？”

“没事，路过，嘿，路过。”高增光还难得地赔上一个笑脸，依然走着，没停下脚步。

“这路过，是从哪来，上哪儿去啊？”迟得法又问，还直直地看着从路边走过的高增光。这倒不是他的革命警惕性高，而是他的多心又多嘴。

高增光满心的讨厌，又赔上个笑脸，“上小河口，嘿嘿。”

“上小河口？上哪儿去干吗呀？”这确实是迟得法多嘴了。别人在路上走，管你什么事，哪有这么问的。不过确实也从来没有上小河口而从这儿走的人。因为这不顺路，高增光对这儿地形的熟悉毕竟还没有细致到这种程度，不怪迟得法会多嘴。而且高增光犯了个天大的错误，一个能要了自己命的错误。那就是，他讲出了他要离开大陆的真实地点——小河口。可是谁也没有注意到这点，不但是迟得法，甚至连高增光自己。

“你管我去干吗？”高增光极其厌烦地狠狠瞪了他一眼。

也正是这一眼，使迟得法看到了高增光的正面，不由得大吃一惊。这，这，这……不就是当年的那个还乡团么。他虽然已经记不起那个还乡团叫什么名字，却还能分明地记得杀害姜雪花时的那个惨状，那么地凶狠，那么地残忍，特别让人难忘的是额头上那么明显的深深的疮疤。

“你，你，你……不就是那个杀人的还乡团么？”此话一出，高增光也惊得跳起来。快到了这次行动的最后时刻，居然还是被人认了出来，那还了得。他猛地拔出匕首，朝迟得法挥去。

迟得法虽然多心又多嘴，胆子却小得很，见匕首一闪一亮就过来了，“啊”地大叫一声，想躲开，腿却不听使唤，直挺挺地站着，一动也没动。

高增光操刀挥来，说时迟那时快，在即将刺进迟得法胸膛的时候，突然手腕一转，改变了方向，朝上一翻，打向迟得法的，是五个紧握匕首的手指。那也不轻。迟得法又是“啊”的一声，结结实实地仰天倒在地里，没有了声息。

高增光看了下仰面躺在地下的迟得法，又使劲地踢了一脚，见一点声息也没有，又一脚把他踢到地埂边的小浅沟里，别人不走近是看不见的。再朝四周看了看，没有半点人影，便急忙往前走去。

穿过南门外通往南面海角的土路，按说是危险性最大的一段路。这条路上的人会多一些，南门外又有驻军的营房，稍有动静，就会有人赶过来。好在穿越这条路时，也是出人意料地平静。稍远处虽有来往的人，但都没有注意到他。

高增光回到刚上岸时的小河口，已是正中午。这里没有好的可避人之处。他只能后退到农田里，钻在已有半人高的秋玉米地里，竖着双耳，听着传来的任何一点细微的声音；隔着玉米秸，看着任何可能的情况。他在想着被打的那个人会不会醒来；他在算着布置岗哨盘查的领导什么时候回过神来，派人搜查到这儿；他在焦虑，接应的船是否会准时出现，会不会也出现什么意外。难熬的时辰啊，太阳光热辣辣地照着。忽而，有点饿了，这才想起来。这一天都没吃东西了。摸一摸口袋，压缩饼干还在。可是虽然饿，却没有心思吃。有点渴了，但也不想再多事，出去找水喝。一切都抛开，只有忍着，等着，等那太阳渐渐地西偏。

还没等太阳西偏，迟得法就已经醒来了。

迟得法醒来的时候，还是下午。高增光并没有真的想杀死他，也是怕万一发现尸体，搜查必紧，自己也跑不了。地埂边的杂草，遮挡了些阳光，也减少了他失水的危险，让他存活下来。

迟得法站起来，晃了两下，摸了摸胸口，还有点疼。走了两步，虽然有点晃荡，可还行。他不敢耽搁，遇见了国民党的还乡团，这可是个大事，得赶紧报告政府。不是说为了表扬，这个规矩，他还是知道的。连谁说了句落后的话都要报告，更何况是这样的事，这点觉悟，自己还是有的。

迟得法就这么晃晃荡荡地走着，走进了南门，走进了镇里。他忍着痛，坚持着走进了乡政府的院子。

门口的人，一听说是这事，就叫他去找宗发奋。宗发奋刚从王庄设点检查回来，白忙活了一天，啥也没有，正生着闷气呢。迟得法一头进来，说是被当年的还乡团打晕了几个钟点。

“呸，你说的什么梦话，又是见鬼了！”宗发奋最看不起迟得法。中农是革命的动摇分子，他们的话能信么？

“不是鬼啊，不是鬼。真的，我是在向政府讲实话啊。你看，我这儿被打得还疼呢。”迟得法撩起衣服给宗发奋看。

被打的地方，当然没有任何痕迹。宗发奋哪有兴趣去仔细察看，忙挥手，连连说着：“去，去，去，走吧，快走吧，没工夫跟你扯蛋。”

迟得法快快地走了。

别人问宗发奋，那老乡是来说什么的？宗发奋说，又是见鬼了。

其实，这时的高增光还躲在小河口的玉米地里猫着，焦急地等待着逃脱的最后机会。本来是有机会让他没有这最后的机会，真的是见鬼了。

高增光又一次逃过了他自己也不知道的危险。他要是真的知道迟得法进了乡政府向宗发奋报告认出了他，恐怕心脏病也会吓出来。还好，他一直在玉米地里慢慢地等着。终于，太阳西斜了，渐渐地天暗了。高增光没戴手表，但他也会大体算个时间。他看着四周，钻出了玉米地，俯身快行，走到沙滩前的土坎边趴下。看着波光粼粼的大海，仔细地搜索着。果然，有个船影在移动。暮色下，不注意观察，是不会引起注意的。高增光来的第二天起，每天的傍晚，这艘船就过来靠近海边游弋。这种办法效率极低而危险性极大。这在当时，除非从陆路潜入，在海上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唯一的好处是不引人注意。

那船朝岸边打出了亮光。高增光举起了草帽，帽底向外。这草帽最主要的功能就在这儿，帽底的里子是种不起眼的反光布，受到特定的照射后，会反射出别人不能轻易察觉的光线。

船上的人明白了，高增光到了，便轻轻地向岸边驶来。高增光则不顾一切地三步两步就跨过沙滩，跃入海中。

高增光回到了船上，完成了这一幕。当他抹着脸上、发梢上的水珠，又转回头去看看那渐渐远去的昏暗模糊的陆地，看看不知道还有没有家的家乡大地。

回到台湾以后，尽管高增光一无所获，但还是受到了非同一般的表彰。尤其是焦科长更是兴奋，这可是他一手栽培出来的呀，这对鼓励士气、扩大下步的行动规模，可是大有用处的啊。他鼓动上级要大力宣传，要让全台湾都知道他们特工处出了这样的党国英雄。但上峰另有想法，没有批准，说：要是对外一讲，引起了大陆的关注，加强了防备，下次还去不去啊。当然，崔科长还是有甜头的，晋升为中校，高增光则授少校衔。

高增光是不是对这授衔在意，不得而知。但是，海源和高家沟，始终在他心里。

十年后他又去了。但，那就是另一种下场了。

五十年代初期，台湾方面有过若干次派遣人员潜入大陆搜集情报、刺杀干部、制造事端、接回家人，有的还作为“英雄事迹”大肆宣扬。但是这次没有，因为他们还想有下一次。然而在海源等待他们的虽然又有不同的一次又一次，却再没有这样的下一次。

海源方面，虽然没有抓获高增光，连最后确切的情况也没有掌握，甚至怀疑过是不是高梁山那小子在故意造谣生事，还叫乡里审查过他的政治背景。好在高梁山才十五岁，三代贫农，本人政治历史清白，表现一贯正常，找不出作案动机和其它可疑之处，也就算了。宗发奋没有向上报告迟得法的遭遇。本来这件事，如果和高梁山的遭遇一汇集，那就可以肯定高增光来过海源。而且几件事情一串，高增光的整个活动轨迹非常清晰。但现在，县里掌握的也就是高家沟报来的这么个疑点，连个内部通报也写不了。但这类事件，依然引起了高层的极度关注。在这之后，台湾国民党派遣特务，成了阶级斗争教育经久不息的话题，各地也极大地加强了防范力度，可以说是扎起了几乎密不透风的一道道篱笆，几乎是滴水不漏。在这之后，企图以这种方式来的海源人，包括高增光自己，那个下场都是极其可怕的。

第十章 春风微漪

1949年6月10日

10.1 有了收获

夏天。1951年的夏天。

热风从西南面吹过来，小麦几天就冒黄了，又一个农忙季节到了。

农活的辛苦依旧，而农民的心情舒畅了，因为眼看今年有着比去年更好的收成。

老王头领着全家来割麦子，这个活可是要全家一起出动的。老王头觉得日子有盼头，去年秋天把这块三亩的泊地都种上了麦子。一冬天、一春天的力没白花，看那麦穗一踊一踊地，真是喜人。

昨天就磨好了镰刀，修好了小推车，轱辘上有点锈，也找不到油，就把外面磨磨亮。

今天，天刚发白，全家就都上阵了。老王头和王山、丁妹下地割麦，王大妈打捆。割了一阵，王山就用小车往回推。一家人，没有更多的话语，个个手不停脚不停，只有擦汗的工夫。望着一行行清理出来的麦田，心里都是喜滋滋的。

晌午了，王大妈说：“你们先歇息吧。我回去做晌午饭了。顺便喂下鸡。”

王大妈，可能是因为看着大儿子王山出去支前太辛苦，小儿子王立又没有音信，心里很有些失落，头年冬天就辞去了村妇救会的工作，叫赵玫干了。自己一门心思放在了家里。生活稍有好转，她就喂上了三只鸡，这会儿，还惦记着这事呢。

老王头说：“好啊，一起歇会吧。”

王大妈捆着刚割好留在地里的几扎麦子，等王山推车回来。丁妹还在低头使劲地割着，全然不顾汗水往下滴。

老王头说：“丁妹啊，坐下歇会吧。说起来，丁妹是最辛苦了，这本来都是汉子干的活。”

“这点活，算啥呀。”丁妹腼腆地说。

“那也不易啊，确实是辛苦丁妹了。”王山推车回来了，也说着。

“是啊，是啊，这些日子，是苦了丁妹了。”王大妈思念儿子，也想着这媳妇的难处。她知道，女人最苦的是什么。

王大妈说：“今年收成还行。等上了秋，有了钱，给丁妹割块布料，做件衣服。丁妹从办了喜事，还没做过新衣服呢。”（海源话里，习惯把买布叫成割布。类似需要割一块下来的买卖，都叫割。比如买肉叫割肉，而且还念成：ga-you，“嘎油”。）

老王头点着头，“嘿嘿”，似乎很有歉意地低声笑了两下。

丁妹忙说：“还是给哥做吧，哥还有用处。我不是还有那块兰布嘛。我要去捐给志愿军，于村长还给退了回来。”

王山知道丁妹的好意，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也只好“嘿嘿”地轻声笑着说：“我不忙，我不忙。”

王大妈对丁妹说：“嗨，你们俩都有用。那时我也没有别的布，就给了你这块兰布，不好看。你还是再去割块花布吧。”

多么朴实的一个家庭。

西北村几乎所有的人家都在忙碌着。

连新入户的包金贵，也没有闲着，甚至比别人更着急，因为他不会北方旱地的耕作。

老王头还几次过来，教他怎么种秋玉米。

别人问他，北方的农活怎么样。

包金贵说：“我们那儿的活，是牛干的；这儿的活，是人干的。”意思是北方的活要重得多。当然，要是北方人到南方去干农活，就会是另一种感受。

李辰还是担任龙头小学的老师。按说不用干农活了，可他着急的程度不比别人少。因为，在建国前，解放区的小学教师实行的是派饭，即每天轮流到各学生家里去吃饭。建国后，正规化了，采用供给制，每年发给固定数量的小麦、小米、玉米，甚至烟叶，这样就能保证教师有个基本的、稳定的生活。但这也就是有个吃，零用钱极少。这一两年，年景好，大家又肯出力，农户的收入提高了不少。李辰的这点粮食，不但比不上劳力多的老王头家，甚至也不一定比老迟家和杜家骏家的多，更不用说要攒钱帮小林家买石头、买木料、翻修房子了。

庄稼活可以起早摸黑地多干点，这石头不能一个人打，木料也不是上山可以随便砍。李辰心里着急，除了在学校里认真教好学，早晨晚边都过来帮小林家拾掇庄稼地。人挺辛苦，好好的小伙子，也黑了，也瘦了。

林海秀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说：“别着急，别天天这么忙，也不在这一两年。还有你自己家的地呢。别累坏了你的身子。”

李辰爽朗地笑着说：“别看我是个读书人，可身板子不比鲁队长他们差。”又拍了拍自己的胸脯，“砰砰”地，说：“多结实！”

小林这才放心地抿嘴一笑。

看到庄稼长得不错，人人都这么勤劳，村里没什么烦神的事了，于村长舒展开了眉头，从心里觉得舒坦。连秦德才有了一百斤玉米的烈属补助和迟得法给的八十斤小米，居然也有好长时间没来找他了。

看着街上，乡亲们忙忙碌碌地往家挑粮食，高兴地相互招呼着，不用挖野菜吃树叶了，还能听得到鸡鸣狗叫，于村长乐呵呵的脸上堆满了笑，心里想着：“这就是新中国啊。好啊，盼的就是这年头啊。流血流汗，换来这太平世界，值啊！再过两年就会更好啦。就是亏了姜雪花了。”

10.2海边的地

七月盛夏。

赵玫早早就起来了。

靠海边，有她家的十亩地呢。十亩地，民主村还很少有人家有这么多的地，那是董家三代人含辛茹苦开出来的。但是，十亩地，对于一个棒劳力也很难承担，更何况像赵玫这样一个女性，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但，赵玫是坚强的。她想着，哪怕再苦再难，就是拼上一条命，也要把这十亩地种好，也要把这个家撑下去，也要守住这块地、守住这个家，等着平章哥回来。

肩膀破了，她就纳了块厚实点的垫肩，尽管夏天披上这个更热。拿上昨晚就做好的菜饼，装上一葫芦的凉水，扛上锄头就去地里除草。夏天的草，长得才快呢。

赵玫走上了路，腰也疼，脚跟也疼，多想歇一天，多想有人来帮个忙。然而，她明白，这些都是多余的想法，只有不去想它，只有不停地往前走，只有等到平章哥回来的那一天。她只觉得，对董平章的思念，越来越强烈了。

快到自家的地边了。忽然，自家的地里，有个人影在晃动。念到谁，谁就会出现，显灵了？赵玫是不信这一套的。

是平章哥回来了？赵玫几乎要喊出了口。

她快步地走去。

在玉米地边，赵玫定睛看了看，是鲁队长，是鲁队长在帮她锄草。

鲁队长敞开着无袖的小褂，露着青春壮实的胸膛和臂膀，晶莹的汗珠挂在坚硬的肌肉上。他低着头，不停地锄着，都没察觉赵玫的到来。

赵玫愣了一会儿，没想到鲁队长会过来帮忙。她从心底感激，在她困难的时候来帮她。她感激，民主村的乡亲们真是好。

“鲁队长，怎么是你在这儿？”赵玫先开了口。

“哟，你也这么早就过来啦。我还想，趁早饭前干一点，我就走了，也不用你知道了。”

“做好事，还不想留名啊。我这地，这么远，你还过来啊？”

“我知道，这么多地，你不容易啊。”

“那也不好意思叫你出这个力呀。”

“嗨，平章和我们都是好兄弟。你的难处，就是我们的难处。”

“那我代平章谢谢你了。”

“客气个啥呀，赵玫。”

“早饭还没吃吧？那你先回去吧。”

“我就再干会儿吧，既然已经来了。”

“我怕，别人看见不好吧。”

“瞧你这个妇女主任，还想这么多。”

“我这儿带了干粮和水，你要不嫌弃，就先吃点吧。”

“我才干了这么点，就把你中午饭都吃了，哪好意思啊。等我把这垄地锄完，就走了。”

鲁队长上下挥动着锄头，加紧地锄着。晨风翻动着他的衣襟，也刮来男人汗水的味道。

赵玫看着鲁队长，想着董平章，手里举起锄头，但落下去很慢。

“好了，那我走了。”鲁队长锄完这垄地，就直起了腰。

“谢谢，真是谢谢了。”赵玫真诚地说着。

“有什么难处，尽管说。尤其是收了棒子，要往回推，一定要叫我们来哦。”

“行。”赵玫轻轻地应了一声，回过头就抓紧锄起了地。

10.3镇压反革命

秋风悄悄地来了。

这年的秋天，乡里来了上级精神，要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从乡里散会往回走，于村长对鲁队长说：“从赶走国民党以后，还没搞过运动呢。这又来了。”

鲁队长说：“不过，这倒也是需要。反革命不镇压，咱的好日子也安稳不了。”

“可咱村里已经没有地富反革命了，还搞什么？”

“虽然秦德才违反了政策，可现在倒是省了咱们的事了。”

“不搞还不行，那位宗干部还要参加咱们村里的会。”

“他参加就参加吧，也不是外人。”

“那明晚先开个干部会，到时，你去喊宗干部来。”

“好的。”鲁队长说。

第二天晚上，干部会在西北场院的空屋里开。

宗发奋作为乡政府的代表也来参加会议。宗发奋是本省西面黄河边的人，虽也是农民子弟，可上过两年小学，脑子也好使，参军三年思想提高还挺快，做事特认真，不来半点含糊。原名叫发财，来到队伍后，改名叫发奋，改得还挺好。这次能留在龙头乡政府，纪乡长是出了面，也是挺愿意的。宗发奋也是积极工作，就想表现好一点。

小小的火苗，在炕边的油灯上跳动。屋里挺暗，大家有坐在地下的，有半躺在炕上的，有站在墙边的。

于村长站在炕边，先开口说了：“伙计们，开会了，有日子没开会了。今天的会，有个大事情，上级指示要在全中国范围开展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这个事情，是非常的重要。下面请乡政府的宗干部给我们讲话。”

宗发奋还是第一次作为领导在会上讲话，有点窘迫，好在文件是看过好几遍了，还是有话可说。

原本坐在炕沿的他，站了起来，拿出个小本子，咳咳了两声，念着：“这个，这个，我首先要传达党中央的指示，一个很重要的指示。10月10日，党中央发出了‘双十指示’。这个指示，宣布要在全中国范围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具体讲就是要全面彻底地打击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各种历史反革命分子。”

宗发奋好不容易念下这一段，又连着咳了几声，再接着往下念自己提前写好的话：“这个，镇压反革命，很重要。我们战胜了国民党，消灭了地主阶级，建立了新中国，过上了好日子。但是，反革命、地主、富农，这些人还在，心不死。他们不会甘心失败的，一定会进行各种各样的破坏捣乱。所以，我们一定要镇压他们，把他们抓出来，消灭他们。我们推翻了国民党，再把反革命都消灭掉，才能确保我们有好日子过。”

宗发奋一口气把准备好的话，都说完了。

村干部们听得直点头。因为那时，多数人不识字，也很少有报纸书籍，更见不到上级文件。所以，一听到有干部能头头是道地说上一套，或者至少听起来是头头是道地说上一套，都是佩服得不得了，觉得这干部水平真高，和咱群众就是不一样。

“那怎么个镇压法呢？砍了？还是埋了？”秦德才对这种事是最来劲了。

“先得把他们抓出来。看看你们村里，哪个是反革命？”宗干部说。

“我们村里，没反革命了。”杜家骏说。他现在是民兵队的副队长。

“怎么会没有呢？”宗干部大惑不解。“人家北山里有的一个村，就拉出来枪毙了一排。那多有声势。”

“嘿嘿，都叫我杀了。我们村的地主富农，都叫我杀光了，省得今天还有事。”秦德才得意地说。

“难道没有别的情况了？大家再好好想想。比如说，什么反动会道门啦，什么一贯道啦。”宗干部拍着小本子，着急地说。

1950年、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还捎带了个打击一贯道的运动。这种封建迷信活动，带有一定的组织性，这是当局所不能容忍的。任何带有组织性的群体，都被认为是对政权具有更大的威胁，必定会遭至最严厉的打击。后来的法轮功，恐怕也是这个原因，尽管他们的反政府色彩起初并不浓厚。那个一贯道，五十年代在台湾也受到了打击，不知是什么原因。同一个群体，在那个时候被国共双方同时打击，倒也是蛮奇怪的事。

“什，什么一贯道？”有人没听明白，在问。

其实宗干部也不明白，他也是第一次听说，只好硬着头皮瞎解释：“一贯道，就是一贯偷盗，反正是个坏人就是了。”

“我们村里还有小偷么？”杜家骏疑惑地问。

“我们村可没有小偷。”于村长很干脆地说。

“再想想，再想想，还能一个反革命都没有么？”宗干部还是不死心，一个劲地追问。

“有，跟着国民党跑到台湾去的，就是反革命。那个董章平，就是。还从他家里翻出国民党军服呢。”秦德才想起赵玫对他的不客气，心里还耿耿于怀，嘴里狠狠地说着。

宗干部大为惊讶，连忙说：“哎哟，还有这种事啊？那还得了，赶紧查！”

鲁队长说：“这还是要实事求是。如果那样的话，那赵玫成了什么啦？”

秦德才咬牙切齿地说：“那就是反革命家属！”

于村长马上接着说：“秦德才，这话，你不能随便瞎说。乡里已经布置了，上南方支前没回来的，按烈士待遇对待。其中，就有老董头。赵玫就应该是烈士家属。”

小林说：“我们龙头镇，有多少老百姓被国民党抓走了。他们是受害者，我们要去解放他们，把他们救回来，怎么能是反革命呢？他们的家属，我们要安慰他们、关心他们，怎么成了反革命家属呢？拿咱们的赵玫姐来说，是我们的村干部。解放龙头那天，宗干部你还在医院里，不知道情况，赵玫姐可是不顾孩子被国民党炸死，领着解放军，冲在最前面，一直冲到大海边。你姓秦的，那天在哪儿？连个影子都见不着。你说，你躲到哪儿啦？”

小林气得不歇气地说了一大篇。

说得赵玫，在一边呜呜地哭了起来。

说得秦德才一愣一愣地翻着白眼，还不了嘴。

说得宗干部也接不上词，换了句话：“我看那个包金贵是反革命。”

宗发奋对包金贵很有看法。缘于在后方医院养病时，老是说国民党军队里怎么黑暗、怎么受欺侮，以至于好几个连队请他去做报告，好像荣耀得很，自己这个革命军人反而轮不上份。宗发奋为此心里很抹不平。

鲁队长说：“他不是解放战士么？”

宗干部说：“他根本没有手续，也没有参加过我们的战斗。”

老王头说：“就凭这一点，那也不能就说是反革命呀。”

鲁队长突然想起来一个事，说：“前两天，申大爷跟我说，那个李芹没死哎。”

秦德才跳了起来，“不会吧？那天，我把他们狗娘养的都杀了，一个也没剩。是我动的刀，下手可狠了，就算长两个脖子也能砍下来。”

“申大爷不会说假话。他说，后来还有好几个国民党官来看过她。”鲁队长说。

“人呢？在哪儿？我去把她拖过来，剁碎了她。”秦德才说。

“你也就是有这个本事。”老王头有点鄙视地说。

“这个事得好好查查。”宗干部说。

“可能是叫她哥李策带走了。李策就在那军舰上，他回来过。”鲁队长说。

赵玫没说话，她知道这时她还是沉默的好。

秦德才还不歇气，说：“那我们村就没有反革命啦？”

于村长说：“没有就没有。非得有反革命，才光荣啊。”

“对！没有反革命，还不好么？”鲁队长说。

宗发奋有点郁闷，没能旗开得胜，就觉得很没有面子。

几天以后，赵村在“镇反”排查时，查到赵炎黄在国民党反攻时有反攻倒算行为。宗干部可有了抓出运动成果的机会，说这是属于恶霸地主，上报要求立即枪毙。

等报了上去，等到12月，上级答复来了，说是已到了运动后期，要注意讲政策。赵炎黄不杀不关，改由本村管制。

“镇反”运动，在民主村倒是平静地过去了。但这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在全国可是激起了滔天巨浪。据“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尹曙生的文章《毛泽东与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披露，“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个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0000余名。其中杀掉反革命分子712000

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人”。杀掉的人数竟然与国共双方在内战战场上战死人数相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解放战争四年间，解放军阵亡约30万，国民党军队阵亡40万，国共相加大约70万）。在村里就被打死的、自杀的，还不在这数字内内。

该文又进一步披露，“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对判处死刑的人，不是根据犯罪分子的罪行来定罪量刑，确定该不该杀，而是根据人口比例，要求某地、某市必须杀多少人，这是最大的荒谬之处。毛泽东最初要求，杀人比例要达到当地人口总数千分之零点五，严重的地方，要达到当地人口总数千分之一；以后他又说个别地方可以突破，但不超过千分之一点五，最多不要超过千分之二。”

“1951年1月22日，毛泽东电告华南分局、广东省委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3700多，这很好，再杀3、4千人’，‘今年可以杀8、9千人为目标’”。“1951年2月中旬，毛泽东直接电告上海、南京两市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一年之内至少应当杀掉.....3000人左右’”。“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0人，这个数目太少。南京是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0余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西北村因为是老解放区，对地富、国民党、反革命不知已经杀过多少遍了，连一个活人也没剩下来，所以这次也就省了事，难得这样平静地就过去了。

这是民主村的春天里第一个小小的波澜。

宗发奋心里有点忿忿，才当了个干部，不肯甘心就这样偃旗息鼓。

附带说一点，连镇压反革命这件事，也有点意犹未尽。四年之后，1955年7月1日，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展开斗争 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示》基于当时对国内阶级斗争状况的严重估计，认为“在很多部门，在很多地方，大量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还没有揭露和肃清”。当时估计，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约占全国各类机关总人数的5%左右，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一场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简称“肃反运动”）。这场运动，至1957年底基本结束。据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公布的数字，这次肃反运动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内部，共清查出反革命分子8.1万人，其中现行反革命分子3800多人。（请见：《东莞日报》数字报纸，2011年6月22日）

虽然宗发奋很想就此再掀一次浪，但是因为西北村之前搞得太彻底了，也就那样过去了。本书不再说什么了。

第十一章 批判《武训传》

1949年6月11日

新社会对于普通农民来说，还是风和日丽的。多洒点汗水，多打点粮食，这生活就很不错啦。还需要搞别的么？没想过。但是，对于当政者来说，这些显然不是他所想的。他甘愿顶着腥风血雨、冒着狂风恶浪，所要的显然远不止这些。他要什么呢？他要的是斗争、斗争、再斗争。革命胜利了，斗争不能停下。上百万的军队开进了朝鲜，正和美国鬼子打得热火朝天。国内还能做些什么呢？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虽然地方拿下来了，但是还要彻底搅动和改变这些地方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改变这些地方的阶级力量对比，唯有此，新政权才能立足。还有，就是镇压反革命，彻底扫除旧社会旧政权留下的任何敌对势力，以确保新政权的长治久安。这两场规模空前的政治运动从1950年开始就在全国范围，尤其是在新解放区，暴风骤雨般地展开，震撼了整个神州大地。

好在海源、龙头、西北村是老解放区。1946年就解放了，海源的北山就更早了。土改早就搞过了，地富反革命不知镇压过多少回了。你看那西北村早就杀得一个不剩了。这次两大运动的隆隆雷声，对这儿倒也没有更多的惊扰。事情真就这样过去了么？没有。

土改、镇压反革命，主要是在政治领域里。可别忘了，还有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当政者是一直高度重视这个领域的，从延安时期对王实味的批判，就可以看出来了。新政权成立不到两年，这方面的活动就开始了，首先就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武训，何其人也？他是19世纪清朝的人，是个文盲乞丐，由于深感没有文化的痛楚就下决心“行乞兴学”，自己一贫如洗却把低三下四、备受侮辱乞讨来的钱用于兴办学堂。一百年来，这种精神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赞赏。到20世纪40年代，历经解放前后，上海昆仑公司拍成了由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影片在各地受到了欢迎。据说在中南海放映时朱德还称赞该片“很有教育意义”。尤其是在教育系统更是引起了轰动，老师们纷纷表示要向武训学习，做好本职工作。当然也有说，武训这个人表现得太窝囊。

海源县教育局也组织了全县教师观看这部电影。那时能看上个电影，是个极为稀罕的事，全县都没有一个电影院。县里来了通知，全体教师，除了留下必要的值班人员，其余都上县一中操场看电影。

通知一来，没等传达，老师们都知道了。就不到十个老师的小学校，什么事也瞒不下。大家都欢呼雀跃，高兴得不得了。尤其是李辰，他还从来没有看过电影呢。

他快步跑进了余校长的办公室，喊着：“余校长，余校长，要上县里看电影啊？”

余校长倒并不显得那么高兴。一是，年龄大了，性格使然，他不会像小青年那样，一有事就那么兴奋。二是，这事反倒有点叫他不好处理了，这么难得的机会，叫谁留下来值班呢？其实他自己并不想

去，还得走这么远的路，可通知上写明了要校长带队。

余校长看了李辰一眼，说：“是啊，是要上县城去看电影。可也有难办的事情啊。”

“看电影，还有什么难办的事？”李辰颇为不解。

“都去看电影了，那学校怎么办？还能空着，没人管？县里说，还非要校长带队去。我们下午不等放学就得开始走，可这么多学生怎么办？”或许大家有所不知，那时看个电影可是个大事。要到县城去，得步行二十多里地，下午不等放学就得开始走，那怕就是让学生提前下课放学回家，这学校也不能一个人也不留啊。

李辰明白了，余校长有为难的事，需要有人留下来值班。可叫谁留下来呢？这对谁都是个难得的机会。你听，在这儿都能听到那边办公室传来的欢笑声，几个老师高兴得现在都还没歇气呢。李辰又抬眼看了余校长一眼。按说，余校长可以不去。他年纪大了，走那么多路，还真不易，可他是校长啊，上面还指定要他带队呢。

李辰想了想，想说那我留下吧，话到嘴边又停下了。这对于他也是难得的机会啊，自己还从来没看过电影呢。他又抬眼看了看余校长，余校长也在看着他。他看出了余校长的意思，余校长是多希望他能留下来，又不好意思直说，因为这对于李辰也确实算是个损失。

李辰的心思在肚子里转了两转之后，还是开口说了：“余校长，那还是我留下吧。你看那办公室里都乐翻了天，谁也没有思想准备，还得留下一个人看门。不给他们泼冷水了，我留下吧。”

余校长很欣慰地笑了笑：“我也在想，只能叫你留下了。可是真的，你也没看过电影啊。真是谢谢你了。”

“哎，余校长，我看出来，你为这事有点害愁。我没事，看电影么，以后总会有机会的。”

“那好，谢谢你了。我去跟他们说，明天下午就停课，学生们中午就可以放学了。你就留下来看学校，再次谢谢你了。”

“这点事，不算什么。余校长你不用放在心上。这是我应该做的。”

第二天，老师们带上郭大妈特意做的两个玉米面窝窝头，高高兴兴地上路，去县城看电影了。

谁也没想到，李辰真的能看到电影，却要十多年之后了。

晚上，在县第一中学的大操场上，黑压压的一大片人群，有县中的学生，有县城里挡也挡不住、挤进来的男女老少。由县教育局通知来的附近学校的老师们在特地指定的放映机前最好的位置上席地而坐。

放映前，县教育局的程科长，程贵安，他现在是县教育局的财务科长，还站起来讲了几句话：“同学们，老师们，同志们，大家请安静了。咳，咳。”程科长咳嗽了两声，好像很多当小领导的，大体是都有这毛病，似乎反倒成了作报告必须掌握的一种技巧了。“我代表县教育局的领导讲几句话。今天要放映的

电影《武训传》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片子。武训是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子，他的精神是值得歌颂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看过以后，也不要白看了，回去要认真学习，组织讨论，对照自己，改进工作。”

顺便说一下，这个程贵安就是1949年龙头乡政府的那个财粮干事。那年的下半年，经乡长南下去了上海，他调到了县里，心里还常常的不服，觉得以自己的年龄和水平比经乡长强多了，怎么没叫自己去大上海呢。直到这回提了个科长，才稍稍有点舒坦。

电影开始了。影片中那个衣衫褴褛的武训，到处磕头下跪、苦苦哀求，真叫人唏嘘不已。自己忍饥挨饿、不吃不喝，几乎把每一分钱都用来办学，又叫人几分感动。被一群小流氓在嘲笑中围殴，武训满脸是血，还在说：“行行好，行行好，打我不要紧，给学堂捐个钱吧。”操场上还真传出了一些女同志的哭泣声。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龙头小学开了个教师座谈会，谈谈观看《武训传》之后的心得体会。这是新政权进行思想教育最常用的方法之一。

一间教室里，老师们在下面坐着，余校长在讲台上音调高一句低一句地讲着：“《武训传》真是部好电影呐。我看了以后，久久不能平静呐，久久不能平静呐。感人至深呐，感人至深呐。”

没想到，话还没讲完，县教育局的程科长从县城赶来了。他刚把自行车支好，就一头闯了进来，没等擦汗，就在第一排坐下了，对台上的余校长说：“还正巧，正在讲《武训传》呐。你先讲，你先讲，我先喘口气。”顺便说一句，那个时候有辆自行车，哪怕是会骑自行车，在老乡眼里都是不得了的大事，就像现在能开上奔驰小轿车一样，是某种特殊身份的象征。

“好，好，我们是在讲《武训传》呢。我先讲几句，你再来给我们作报告。”余校长在台上说着，也没下来握个手、倒个水，大概那时的上下级关系，无论是个人间、还是单位间，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世俗。

县里都来了科长了，余校长的精神也好了点，嗓门还难得地提高了点：“我再接着讲。就像那天程科长在放映前对我们大家讲的，他是我们全国人民学习的好榜样，更是我们全体人民教师的好榜样！”

余校长话音未落，程科长就急不可耐地站起来打断了余校长的话，径直走上台，大声地说了起来：“这个，这个，话还不能这么说。武训这个事呢，还得从另一方面看，还要进一步严肃地去看，不能只看事情的表面。现在我正式传达个文件。”程科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极其认真地念了起来：“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卑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应当歌颂的吗？还有呢……这儿还有一段呢。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种程度！”程科长念到这儿，抬起了头，握紧拳头，极严肃地扫视了四周，好像是他在发出了震动山河的警告。

老师们都怔住了。余校长也弄明白了，站在边上诺诺地说：“前两天，你不是才讲武训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典型吗？”

程科长一愣，瞪了余校长一眼，眉头一皱，心里想真是不知好歹，一点也不会看眉眼高低。他已经完全不顾余校长的面子，大言不惭地说：“我那天讲的话是根据上级指示讲的，你们不要理解错了。我现在讲的，也是根据上级指示讲的。现在，就按现在的上级指示讲。这点你们还搞不明白，还当什么老师。”经他这么一颠倒，弄得反而是他有理了。

“上级指示还没完呢。”程科长还在接着念：“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余校长和老师们听了全都惊呆了。他们绝没想到哪怕《武训传》有讲得不对的地方，也不至于这样严重吧。尤其是余校长就像被当众重重地搥了记耳光。其实，他哪里知道事情背后的由来。是毛泽东听到了对《武训传》有不同意见后，特地调来片子由江青陪同看了一遍，非常不满，遂亲自修改并发表了1951年5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虽说是“讨论”，但已是火力十足。程科长传达的就是这篇社论里的话。（所引用的有关批判《武训传》的资料，请见《文史天地》2014年第2期贺吉元的文章“新中国首部禁片《武训传》的坎坷遭遇”）

余校长哪知道这些，没听完就气嘟嘟地走了下去，坐到后面去了。一个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怎能一下子接受这种新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呢。然而问题更在于，尽管余校长像吃了苍蝇一样地难受，但是程科长对余校长居然当众指出他三天前曾经讲过的话更是不满。尽管这是三天前自己讲过的话，但也不能再公开拎出来啊。你再把它拎出来，那算什么事啊。这不是把自己的辫子掀出来吗。这种人就是绊脚石，看我怎么收拾他。

第十二章 “三反五反”

1949年6月12日

12.1 欲加之罪

程科长对余校长居然在讨论电影“武训传”的教师会上翻出他也会讲过“武训精神值得学习”的话十分恼火，在心里记上了一笔账，正要找机会给他穿个小鞋。虽然那时候还没有“穿小鞋”的说法，但这种做法却早已有之。没过多少时间，程科长就有了机会。而且，还远不只是穿个小鞋而已。

1951年底，新政权掀起了大规模的“三反五反”运动。它的具体内容是：“三反”是指在国家机关和企业中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是指在私营企业进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这场斗争非同小可。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下了很大决心。1951年12月8日，在他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中写道：“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1952年1月6日，他又在一份复电中写道：“各地如有需要杀几个贪污犯才有利于发动群众，亦可杀几个。”各位请注意，这儿讲的是需要杀就可杀，而不是罪该杀才可杀。于是这场运动便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地迅猛展开。他还担心各地动作力度不够，再三向下催促。毛泽东对山东的“三反运动”有专门的指示。2月5日他在对山东分局的批语中说：“像山东这样的大省，有党、政、军、民、学这五个方面，有很多分区和县城，一千万元以上的大中小老虎，应当不是几百只而是几千只，不是一二千只而是三四千只。其中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以十分之一计，应当不是几十只而是几百只。我提议分局立即召开一次打虎会议，规定打虎数目，限期完成任务。……无论何方面，凡打虎不力者立予批判，严重者撤销职务。”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些数目呢？毛泽东当时就讲了我们后来在各项运动中很熟悉的一些话语。首先是要提高思想认识。他在1952年2月12日说：“华东局的九条打虎经验极好……最重要的是第一条，不打倒‘思想老虎’，老虎是打不出和打不尽的。”对于负责运动的领导干部，他在1月25日的批语中说，作为“领导者必须指导群众不要松劲，不要住手，而要继续攻击，穷追务获，否则就是打败仗。”对于运动对象，毛泽东在同一条批语中说：“照我推测，在一百多万志愿军中很可能捉到几百个大小老虎，你们应该为此目标而奋斗……在运动中，兵团、军、师、团、营各级干部必须人人向群众做反省检讨，即所谓人人下水洗澡，以及限期展开、指名坦白等项方法，你们已经懂得，这里就不多说了。”

尽管毛泽东也在有的批语里讲要禁止逼供信，批评陆军第十军“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但由于这些不断增加的打虎指标并不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而是

凭空想象硬是挤压出来的，而且又要求穷追猛打，“凡打虎不力者立予批判，严重者撤销职务”。这使逼供信不可能得到有效遏制。这种大规模运动式的整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当时就暴露出来了。1952年当年就开始了甄别。据统计，全国县以上机关判处死刑为42人，离毛泽东原先说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的话相去甚远，可见这些话语的离奇与狂热。然而这种做法，在以后的年月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过，而且是越演越烈。（所引关于三反运动的资料，请见《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崔敏的文章《毛泽东怎样指挥三反运动》）

这些话，与上一章里毛泽东对“镇压反革命运动”所作的指示，又何其相似乃尔。本书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了好几段，实际上这些话已经勾划出了以后历次运动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做法。用这些话看以后的反右、看以后的社教、看以后的文革，几乎都是这个套路。只是事先定的调子越来越高，打击的手段越来越严酷，造成的后果越来越严重，最终酿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

让我们至今十分不明白的是，一开始就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的数字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这有什么依据吗，还是就这么拍脑袋拍出来的，那也未免太可怕了吧？那可是几万条生命啊，说毙就毙了啊？以至于后来又有要打击1%、打击3%、打击5%的说法。在那个人看来，我够宽大的啦，都团结了95%啦。须知，中国十亿人口，哪怕就是1%，那也得一千万啊，就这么把一千万人抛出去作为打击对象啊。想到这些，后来出现的一幕幕惨剧，就不会令人奇怪了。

这个运动到海源龙头的时候，已经是1952年的秋天。按说，龙头这小小的地方，还有什么可搞呢？除了乡政府，就没有别的机关单位了。整个龙头镇上，没有一个工厂，就一个个体的打铁铺，也得到农忙时才开张。也没有什么商店，要买东西，得等赶集时才有。更没有医院，生了病只有扛着，实在不行才到县城去抓个偏方。除此之外，唯一的一个单位，那就是龙头小学了。于是，这个小小的龙头小学也被这场三反运动扫到了。

余校长躺在办公室兼宿舍的床上，这一夜，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今天他上县教育局领到了任务，要回来打老虎。咱龙头小学会有什么老虎呢？这么小的地方，就几个老师、百来个学生，半碗水也没有，一眼就能见到底，什么事也瞒不了，放个屁全校也能听见，还能有老虎？这三反主要是查经济问题，可这儿连个会计也没有，学生也不用交学费，领个工资、买个粉笔、发个本子，都是自己捎带办了。还有什么问题？可是那个程科长又讲得那么严肃，各个学校都至少要抓出一个不可。这怎么弄？作为学校也好，他当校长也好，把学教好，把学生管好、不出事，不就行了么？还要管那么多管不了的、甚至没有的事这可怎么好。他睡不着了，一夜都失眠了。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事还要往自己头上想。

程科长可是个有心机的人。他叫余校长来，是有算计的。

运动一开始，说是要打老虎，查贪污受贿这些。有运动，对于程科长这种人来说，就是有机会。至于运动中是搞经济、搞思想，还是搞别的什么，那都是没有关系的。说到底，都是在搞政治。不懂这一点，就别在这个社会里混。程科长现在就是要整余校长，以解他的心头之恨，叫余校长和龙头小学的老师们看看，他，程科长可是个什么人——一个不可以得罪的人。要想在官场往上爬，对下就得有这一手。不然你就想也别想。至于是什么名称的运动，那无关紧要。搞经济方面的运动，你就抓出一个经济

问题；思想方面的运动，你就抓出一个思想问题；是什么样的运动，就抓出个什么样的问题。还怕抓不出？要是抓不出来，那活该就是你自己有问题。

但是余校长在经济方面有问题吗？有辫子可抓吗？在具体问题上，程科长也是绞尽脑汁在想这个问题。

龙头小学没有会计，日常的工资、办公用品都是余校长经手代管。程科长知道余校长是一介书生，耿直得很，不会去沾铜腥臭的，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想找问题找不出来，那就是自己没本事。就不信，这几年来就一点差错、一点漏洞都没有，真的就滴水不漏？程科长也知道余校长孤傲清高，不会算账，不会理财，不在意那些小来小去的收支，这种人那就更会有辫子可抓。

程科长又在深一步地想，龙头收复以后，对在国民党的反攻中破坏过的龙头小学做过简单的维修，后来县局又拨过款，重做了一批课桌，这应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尽管他那时刚到县局，不太了解这些具体情况，更没有实际经手，但对于他就更有想象空间了。对，这可是个好题材，就从这儿打开缺口。他还特地查了有关的帐目。现在他是科长了，可是他不用科里的同事，而是自己去档案堆里翻找。化了一下午，到底给翻出来了。县局给龙头小学维修房屋开支了二百万元，维修添置课桌开支了一百万元，加起来一共有三百万元。乖乖，不小的数目啊，够一个老虎了。程科长乐了，真是工夫不负有心人啊，余老头，你等着瞧吧。不过，现在的读者不要以为三百万就是不得了的大数字。其实那是旧币，折合1955年改制后的新币也就是三百元。

第二天一早，余校长跟李辰交代了几句，就心急火燎地往县城赶。因为他不会骑自行车，所以一早就得走，还想当天赶回来，要不李辰怎么回家，学校里那么多学生怎么办，好多事想不到就不行。

余校长一头汗水，找到程科长，一口水也没喝，就匆匆地说：“程科长啊，我们龙头小学真的是没有问题啊。”

程科长冷冷地说：“没有问题？告诉你，绝对不可能！连我都掌握了你的问题，还说没有，到边上想想去。什么时候想通了，再来跟我说。”他叫余校长一个人坐在了隔壁的空屋子里。

可怜年过半百的余校长一上午没吃没喝，到了中午，程科长也不来过问一下。倒是科里一位女同志，白干部，打饭走过窗前，看见里面余校长已经干坐了一上午。白干部知道余校长这个人，但没说过话。她还是推门进来，问：“哟，那不是龙头的余校长吗？还没吃饭吧？”

“嗯。”余校长点点头。他也是个不会多说话的人。

“来，这份你先吃着。”白干部把她打的那份饭菜留了下来。那时还没有饭票、菜票之类，每人都是一样的份。

“这，这，这怎么好？”余校长拘谨地说着。

“我跟食堂说一下，再打份就是了。”

白干部走出门来，被程科长看见了。

程科长阴沉地说：“呵，你倒是装个好人哦。”

“该交代就交代，该吃饭就得吃饭。人家这么大年纪，一大早就从龙头走过来，容易吗？”打县教育局一成立，白干部就在里面，所以她对程科长并不打怵。

下午，程科长找了但局长，汇报了余校长和龙头小学的情况。

但局长，中年人，穿着干净利索，看上去就和当时的那些工农干部不一样，但又和余校长那种多少有点迂腐的老知识分子也不一样，是个集革命干部与知识分子于一身的在革命队伍中不常见也不可多得的那一种人。他是山东大学的毕业生，在鲁中山区的一所中学教书。日本鬼子来的时候，他带了几个学生上山打游击。好在他没有靠上顽伪土匪之类，而是遇上了八路军。朴素的救国救民思想，使他参加了共产党，好像有了自己施展抱负之地。以他的水平和热忱，没几年，就到了师政治部主任的位置。可是不知为什么，好像有什么触动了他的内心深处。他像是察觉到了什么，就在革命节节胜利的时候，他以别人不易察觉的方式往后退了。他退出了军队，退出了权力机关，退到了现在的海源县教育局。其实，他本想是退到一个大学里教书的。可是革命的需要，没让他再退。

程科长察觉出这个但局长的不同常人之处，事先想好了，才过来的。

“余校长这个人哪，一贯落后甚至反动，出身于大地主阶级。国民党反攻过来，他居然没走，留下来为国民党工作。解放这两年来，还不好好工作，就想着歪路子。就在去年，他还召开全校教师大会公开吹捧那个武训，正好被我碰上，我当场就制止了。”

程科长在悄悄地观察着但局长。他本想，他上面这段话是个铺垫，先给但局长一个印象，那余校长不是个东西，等局长再深入一问，他就可以把问题和盘托出，果不其然，这个余校长还真有这么多严重的经济问题啊，正好是全县教育系统求之不得要抓的大老虎。这一套下来，正好顺理成章。

但是，出乎程科长的意料，但局长一直听着，没说话。程科长只好自己接着说，把自己掌握的最有分量的东西抛出来。他把龙头小学这两年修缮校舍、添置课桌，三百万元下落不明，余校长死不承认，等等等等，一五一十，讲了一番。

但局长问：“那房子修了吗？新课桌有没有？”

程科长稍一迟疑，就说：“房子是修了，可是那钱怎么花的，花了多少？都不清楚。只有我们县局给他的钱，他却没有怎么花的帐。这不就是有问题么？”

但局长似乎依然兴趣不大，就说：“那你再查查吧。”

“好的，好的。”有了局长这句话，程科长就放心了。“那我今天就把他留下来，叫他再仔细想想，交代问题。如果能把他拿下来，我们教育局的这次运动就算有了成果。”

但局长只是点点头，什么也没说。

到了晚上，等白干部下班走了，程科长才把余校长带到县一中学生宿舍那儿的一间空屋，开始了“审查”。可是任凭程科长再怎么追问，余校长一会儿说是记不得了，他的心事没用在这些上，教学上的事、

学生的事、日常工作的事，就已经忙不过来了。一会儿说，这些钱的去处，自己好像有个记录，等回去再找找。尤其可气的是，那修校舍的大事，余校长说是因为那时被国民党打了，正在养伤呢，还没有接手，自己根本不知道。

呸！一派胡言！程科长心里想，这老头看起来是糊涂蛋一个，其实狡猾得很哪，推得一干二净。别在我面前来这一套，我绝不会干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事，白费了这些劲。我就非得搞下去，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我最后再给你次机会，今晚你就在这儿，好好闭门思过。”

“那学校里没人，可不行啊！”余校长倒是急了。他心里牵挂的还是学校的事。

“你走的时候，没交待给别人么？”

“我跟李辰说了下，可没说是晚上不回来啊。”

程科长在龙头待过，知道李辰这个人的，也知道李辰和林海秀的事。可他对这事是羡慕嫉妒恨，心里很不爽，咽了口吐沫，说：“这个，你就别多操心了，没有你天塌不下来。”

“.....”

12.2无功而返

程科长没管龙头小学有没有人值班，第二天，他就去龙头调查余校长的事了。按照调查经济问题的基本规矩，得有两个人在场，所以他只好喊上白干部一起去。白干部虽是女同志，但那时干起工作来跟男同志一样，说走就走，骑上车就跟程科长来龙头了。

他们是先进了乡政府，找了纪乡长。跟纪乡长是老相识了，不用多客套，几句话寒暄过后，就坐下谈正事。宗发奋正好也在，他是个好奇心重的人，或者说是个喜欢多事的人。没有请他，但也就一起坐下了。

“龙头小学前两年修校舍的事，你知道吗？”程科长问。

“知道，知道。有什么事么？”纪乡长答道。那时虽然县里有教育局，但教育局主要是管教学工作、学生工作，基础设施这些还是由当地政府管。有点类似于现在部属院校、省属院校里的省属院校的管理办法。

“我们县教育局还特地为此拨了二百万元钱。这些钱是怎么用的？”程科长问。

纪乡长笑了，“你还好意思问这个。”因为是熟人，尤其程科长那时在龙头还是跑腿的一个，纪乡长对他也就不讲什么客气了。“那点钱够花吗？要不是乡里好几个村的义务干活，那房子能修得起来么？”那时还没有干一天要给多少钱的概念，老乡干活都是白干的。作为老乡，能为公家干活，公家有事能叫到咱还是挺荣耀的事。

“那些钱的具体去向，能找得出来么？”程科长继续在问。

“钱都放进乡政府的大堆里了。修校舍买了些木料、瓦片，估计那二百万也大差不离。人工费可是一点也没出哦。”纪乡长答道。这种办法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没有单独建账，没有专款专用。可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高的要求啊。你能要求一个当兵的才转业几天，就有多高的水平啊？

“那他余校长在干什么呢？”程科长还不死心。

“他，他那时……我想想，哦……对了，国民党反攻时，没有人告诉他该怎么办，没有人通知他撤退，结果没有走出来，被国民党打伤了。那时正在养伤呢。你们教育局，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来个通知？就把人家一个老头就这么撂下不管了？这事做得对么？当然我这不是怪你，你那时还没去教育局呢。”

纪乡长这一番话，让程科长不但没有捞到什么，反而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后来……后来，他们学校修课桌的事，也是你们乡政府管的么？”

“那个事，我不知道。后来乡政府管的事多起来了，这些事，我就不再管了。好像是西北村帮他们做的桌子，要不，你去村里问问他们。”纪乡长说。

“好的，好的。”程科长答道。

“中午回来在这儿吃吧。”

“嗯，嗯。”程科长含糊着。

按理，程科长他们应该去学校吃。但程科长明白学校里的伙食那是天知道。他也认识龙头小学做中午饭的邬大妈。邬大妈尽最大可能也就是做个玉米饼子给他吃，而且还不一定。因为邬大妈不喜欢他的为人，他自己也是知道的。可对纪乡长又不好直说，我在你这儿蹭饭了，就看了白干部一眼。

白干部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就对纪乡长说：“那就不好意思了。等晌午我们就过来。”

程科长他们到了西北村，把正在地里解决纠纷的于村长喊了回来。

“那个秦德才呀，真不是玩意儿。”于村长一回来，还在为刚才的事气愤着。

原来这个秦德才自己不干活、地里只长草，看见别人的地里眼看要有收成了，心里气不服，对旁人不敢欺负，只好去欺负那个残疾军人靳喜悦，在靳喜悦家的地边隔三差五地故意去踩倒几颗玉米。靳喜悦自己不方便，他媳妇也很少出家门，开始对这事也没办法。结果今天被老王头当场看见，老王头还是有点正义感，不算这个事。秦德才还杠杠着头不服。靳喜悦得知后，叫人背了过去，在地里和秦德才大吵了起来，引得半个村的人都来看热闹，说秦德才的不是。这不，于村长也是被人喊了过去。

程科长听了这些，觉得与己无关，不想多啰嗦就说：“那小子就是这德性，犯不着多生气。”而后就直奔主题：“于村长啊，龙头小学修课桌，给了你们多少钱啊？”

“哦，那个书坊修课桌的事啊？”于村长答道。当地习惯把学校叫作书坊，至今村里面还是这么叫。“这么点事，还算个事啊，还用你大科长专门跑一趟啊？”

“现在干工作，就是要认真哎。上面问到了，我就得跑一趟。你说一下吧。”程科长把事情推到上面去了。

“有这个事。我们村帮他们修了差不多七、八十张桌子。”

“他们给了你们多少钱？”

“这点事还用给钱么？乡亲们起个早、摸个黑，这些活捎带着也就干了。你大老远跑来就为这个事啊？”

“这么多课桌，那用的木料呢？”

“那些课桌原来的板子，能用的就尽量用。不够的，乡里申请以后，到北堽以前的工事里挖了一些回来，就差不多了。”

“那个钱真的没给么？”程科长始终尽盯着这个问。

“余校长当时是非要给。他还说，这钱不拿白不拿，你不拿，县里也就收回去了。”于村长说。

“这钱不拿白不拿！这话有意思。”程科长觉得是好不容易才抓到了一句有分量的话，还回头看了看后面的白干部。

白干部始终没说话。

“那你把钱收下了？当时没写个收据什么？入了村里面的账吗？”程科长又问了一连串的话，还挺专业的。

“我没要。给公家干活，还要钱？那个觉悟就太低了。我们西北村从来不会这么做。”于村长还裂嘴笑了两下。

“那钱，余校长都拿回去啦？”

“这个，我不太清楚。好像是乡里的宗干部拿去了。好像他也说，这钱不拿白不拿，还不如给乡里用呢。你去乡里问问宗干部吧？你不是刚从那儿来的么？”

又是一个程科长不愿听到的结果。

“好吧，正好我们也还要去趟乡政府。这天也快晌了吧？”

“都快过了。”于村长说。

那时除了县一级的领导干部，大家都没有手表，只有看看天上的日头，知道个大体的时间。不过大家都习惯了，不会差到哪儿去。

回到乡政府，也正赶上吃饭的时候。秋天的菜，也就萝卜茵子什么，大家都是一样的饭菜。即使是县里来人，也就是再打一份，没有什么特别的。尽管这样，比起老乡们，乃至学校的老师们，当然还是好了不少。

程科长吃着，又问起修课桌的钱。这时宗发奋才不好意思地说，是他把钱拿回来，放在乡政府了。

纪乡长还埋怨了一句，先头程科长问起，你怎么不早说。

“嘿，嘿，我是想为乡里做件好事。”宗发奋尴尬地说着。

说句实话，这钱倒是没进宗发奋个人的口袋，而是在乡政府自己另设的账上了。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小金库了。这在当时也是不容许的，只是没查到这一块，也就没有事。程科长的意图也不在这钱本身，更不想把乡政府也扯进去。那样，他也搞不过来，对他也没有特别的好处。不过真要扯起来，那也可以是个大事情。那年，作为共产党掌权后坚决反腐的典型案例、被大张旗鼓枪毙的刘青山、张子善一案，其实他们一大部分罪行就是设了小金库。

回到县教育局以后，程科长向但局长汇报说，“问题严重啊，问题严重啊。我觉得现在的问题不仅在于数额的多少，而是思想上的贪腐。那个余校长居然公开说，这个钱不拿白不拿。你看看，猖狂到了什么程度！这还是共产党员说的话吗？哦，哦，当然余校长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思想上腐败到这种程度，那是太可怕了。这不是思想上的贪污犯，又是什么？局长，你说么？”

但局长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问：“具体到底贪了多少钱？”

“问题严重，还要进一步查。”

“行。既然还在运动期间里，作进一步调查，把问题搞清楚也是有必要的。但是龙头小学的工作怎么安排？”那时全县才两个中学，县教育局直接管到完小。（说明，学校只有一到四年级的，叫初级小学，简称初小；五、六年级的，叫高级小学，简称高小；一到六年级都有的，叫完全小学，简称完小。）

程科长这又遇到了一个难题。余校长不能主持工作，那叫谁干呢？一时又没有别人，这好事难道真就掉到李辰头上？他更不愿意，眼珠一转，便对但局长说：“工作还是叫余校长干，问题还要他继续检查，还要看他表现怎么样，是不是对革命运动有抵触情绪。”

但局长微微地笑了一下，说：“行啊，就这样吧。但是最后要给他一个明确的结论。我们要对每一个人负责。”

“是，是。”

程科长事后还真是花了不少功夫继续在搞，但事实也就是那个样了，添油加醋实在是加不上去。

好在运动已经到了尾声。两个月后，上面来了新的精神，三反运动进入后期，话语有所改变，说是“重在实事求是，要进行甄别落实”。余校长的事也就没有再追究，也没说有事，也没说没事。余校长自己也没敢再去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程科长算是白忙活了一场，不过也不能说是白忙活。对于程科长，他整了别人，是不整白不整。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整了别人的，不管是整过了头，还是整错了人，整人者是从来不需要承担责任的。没给你戴帽子，或者是戴错了事后给你摘帽子，你还得感谢他的英明和宽大。他们对被整者（绝大多数是整错的，以后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非但没有任何的愧疚和歉意，却反过来要求被整者要“正确对待”、“向前看”、“以大局为重”。而如程科长那样的整人者最多只是暂时的收

敛一下，心里却在等着下一次运动的到来，等着再一次更厉害的出手，以施展他们的能耐，达到他们卑劣的目的。一场场的运动，正是在产生和培养着一批批如程科长那样的极左者，使这种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猖狂，越来越残忍。十多年之后，文革初期的高干子女红卫兵中相当一部分人不就是这样一批的整人者么？对于余校长，这笼罩在心头的阴云从此无法消散。他就此一蹶不振，完全像变了一个人，整天就在屋里坐着不动，或者就干脆躺着，实在有事才迫不得已应付一下。

“三反”运动结束时，在全县机关、企事业单位共收缴人民币5151万元（旧币）。

第十三章 老黄牛啊到我家

1949年6月13日

1952年的春天。

对于西北村的农民，是一个更美好的春天。

又到了春耕时节，暖风和煦，树枝吐出了嫩绿的新叶，土地散发着春天特有的那种芬芳。

老王头和王山、丁妹在南塔坡的沙石地里用锄头翻地，准备种花生。

父子俩敞开着夹袄的衣襟，任由海上过来的风儿翻动，那个凉爽劲，甭提有多舒坦了。生活正在变样哪。虽然，王山和丁妹都没舍得去做新衣服，可今年刚又养上了一头猪，这也是这几年来的新鲜事啊。

锄过了几垅地，老王头抬起头，不经意地望着前面。那是一望无际蔚蓝的大海。

虽然，老王头是海边人，可并不很在意这大海，很少去特地眺望这使多少人心神向往、充满着无限诗情画意的大海。龙头镇上，也很少有渔民，以出海打鱼为生。尽管打上鱼，挣的现钱比较多，但那活不仅辛苦，而且风险大。干农活再苦再累，至少晚上还可以回家跟老婆孩子一铺炕。但出了海，晚上躺在船舱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听凭风浪起伏颠簸，好像那个命不在自己手里，实在不是滋味。曾有过黄土文明与海洋文明对中华文化有何种影响的讨论。但对于淳朴的中国北方农民来说，尽管大海就在眼前，就在身边，却依然是那样的遥远、神秘和陌生，以前都没有好生看过，更没有认真地去想过海的那边是什么。

不过，今天，老王头看见大海，有了一种新的感受。因为在大海的那一头，据说儿子王立被国民党带到了那儿。

海浪翻滚不已，一波波，一层层，烟波浩渺，无边无际，气势非凡。那一头，有多远呢？那一头，会怎么样呢？他想不明白，他想不出来，老王头第一次对大海望出了神。

听说，志愿军节节胜利、已经打到了“三八线”，应该快了吧。王立几时能回来呢？

丁妹看着她公公朝着大海愣了神，察觉了老王头的想法。她也才转念想到，这无边无底的大海第一次和她有了关系，而且是和她的命运、她的希望、她的未来、她所有的所有，联系在了一起。她的牵挂，她的思念，她的梦魂，到了她永远不可知的海的那一头。在大海面前，她感到自己是那样地卑微、弱小、无力与之抗争，她甚至从心底里感到了一种无奈和悲凉。

王山也看出了老王头的想法，没想到他和弟弟、差不多三年没见的好兄弟，竟这样海各一方。以后会怎么样呢？一层一层卷来的浪花，能回答么？

他们三人看了很久，谁也没说话，谁也没有动。

忽然，随着风儿，坡下传来了一阵男人的歌声，把他们从纷乱的思绪中唤醒：

“老黄牛呀肥又大，

土改以后到我家。

干起活来真呱呱，啊啊啊，

一家大小都夸它，啊啊啊。”

随着歌声，走上来的是杜家骏，也扛着锄头来锄地呢。

老王头回过了神，先打上招呼：“家骏啊，有什么喜事，这么高兴啊？”

杜家骏应该高兴，三年前的激战，他家里没受到损伤。他俩口都是能干的人，肯出力。孩子杜长贵，长得也壮，也肯干活。这两年，家里过的真不错，连老迟都羡慕。

“怎么能不高兴啊？解放了，新中国了，天天都有高兴事。”

“说得对啊。你刚才唱的是什么歌嘛？”老王头问。

“哦，看不出大伯对唱歌还有兴趣啊？”

老王头是个有心人。他不是对唱歌，而是对歌词里的老黄牛有兴趣。

因为这山坡地，酥石多，用锄头锄不深，能翻动的就是地表的浅层。花生扎不下去，结的果就不会很多。可要深翻，没有牲口，靠人力是不行的。这也是老王头犯愁的一个事。

“你刚才唱的是老黄牛到你家？”老王头问。

“我这是图个嘴上痛快，瞎唱唱。”杜家骏笑嘻嘻地说。

“不光是图痛快，咱们真要有个牛，那就好了。”老王头说。

杜家骏和王山都惊了，他们从来都没敢想过还能有个牛。

“爹，土改都没分到一个牛，上哪儿再去想个牛啊？”王山不解地问。

“是啊，咱要是有个牛，那就好了，就能多打一半的粮。”家骏说。

“我在想啊，咱一家买不起，咱两家合起来买，怎么样？”老王头说

“哎，这倒是个办法。咱两家是亲戚，相处得一直不错，有事情能商量得起来。合起来买头牛，用起来，也不会闹矛盾。”家骏说。

“好是好，可咱两家，能凑得起这个钱么？”王山不无担心地问。

“咱们省一点，别的东西先不买了。”丁妹也关心地插了一句。

“嗯，嗯，”老王头点着头说：“我再去跟村长、跟纪乡长商量商量，看看政府还能帮咱个忙？”

“那样，就太好了。”家骏说。

“好，咱们回去再跟家里的说说。我准备把那头猪也卖了，多凑点钱。过两天，家骏啊，我来找你。”老王头说。

“好，好。”家骏很高兴地说。

两天后的傍晚，老王头换了件洗净的褂子，到了唐玉珍家，看来还是挺认真的。

“家骏啊。”老王头一到街门口，就喊上了。

“哟，大伯啊。快进，快进。”玉珍在院子里忙往里请。

“家骏在啊？”

“大伯啊，我正要过来找你呢，叫你先过来啦，真不好意思。”家骏从屋里走了出来。

“你们俩口，商量得咋样啊？”

“我和玉珍都很赞成这事。看我们家得摊多少？玉珍正打算上她娘家去凑点儿。”

“啊呀，还得难为玉珍啊。”

“这是个好事儿，也是大事。得从各方面想办法。”玉珍说。

“讲得对，讲得对。这事，我就开始走下一步，我这就去找村长、乡长看看，他们能帮上什么忙。”老王头说。

老王头找到于村长说了这事。于村长直说好，这个点子想得好。于村长还说，这几年，北山的生产没受影响，牲口繁殖了不少，我去找那几个认识的村长说说，挑个好的，价钱便宜点。有个认识的在中间，不会叫人蒙了。正好，咱们一块去找乡长，乡里出面，这事更好办些。

到了乡政府，纪乡长一听，也说好。我跟北山的乡长讲一下。看还有什么问题？

老王头说，就是经济上还有点问题。这两年虽然生产好了些，但毕竟还没什么基础。就是两家凑，一下子拿出那么多，也是有点难。

纪乡长想了下，说，好像县里下来一笔生产贷款，还没用。就先给你们吧。

这是龙头乡政府发放的第一笔贷款。

老王头和于村长忙谢过乡长。

纪乡长笑着说：“这谢什么呀？这样的好事，就盼着天天有。新中国了，政府干什么？政府就是要想办法帮助大家发展生产。我正愁使不上劲呢，是你们想了好办法。”

几天以后，老王头和于村长从北山牵了头两岁多的小牝牛。刚进了西门，就引起了全镇的轰动，多少人围了上来。这是龙头镇买来的第一头牲口。

杜家骏早早就等在了路口，看见那健壮的小家伙，金灿灿的皮毛，喜得接过缰绳，脸就亲了上去。

鲁队长说：“你看，家骏亲得，比亲媳妇还亲。”

“哈哈。”大家哄笑着，也羡慕着。

王山说：“家骏啊，那天你唱的是老黄牛，一唱就把牛唱回来了，今天，你还能唱什么呀？”

“那能唱的就更多了，你们听。”

杜家骏真的又亮开嗓子唱了；

“三套哪黄牛，一呀么一匹马，

不由得我赶车的人儿笑呀么笑哈哈。

往年这个车呀，咱穷人哪配用呀，

今年噫呀哈，

大轱辘车呀咕碌咕碌转呀，

大轱辘车呀咕碌咕碌转呀，

转呀，转呀，转到了咱们家。

哦噫，得儿，唻，转到了咱们家。”

杜家骏喜得闭着眼，伸手在空中划了个大圈，做了个扬鞭的动作。

“看把家骏美的吧，明年再把马车给唱回来。”平金刚说。

“行啊，除了要两个媳妇不行，别的都能给唱回来。”家骏笑着说。

“哈哈。”大家笑得更欢畅了。

这不就是新生活的开始吗。

第十四章 二次土改

1949年6月14日

老王头和杜家骏两家合买了头牯牛的事，在民主村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使人们看到了只要下力气，搞生产，就会有希望，就会有奔头，就会有以前所想不到的好生活。按理说，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搞土改分得了土地，赶走了国民党，镇压了反革命，再没有什么可害怕、可担忧、可分心的啦。在自己的土地上，尽情地泼洒汗水，用劳动换得丰收吧。这不但是领导开会作报告说的，而且就在乡亲们的眼前了。

老王头买牛，对迟得法的刺激最大。迟得法对地里又肯出力，又有技术，总觉得民主村的人家，在去掉了地主富农以后，讲收成、讲家底，应该数他是第一。尤其是土改以后，消灭了地主，更应该他是老大了。特别是租下了秦德才的四亩多地，去年打的庄稼多哟，这辈子都没想到，都不敢对别人说。这回买牲口的事，落到了老王头的后面，有点不大服气。

其实，迟得法也是想到要买头牛，有了它，那庄稼地里又是另一种成色啦。可是要买，力量毕竟还搭不上。犹豫了几次，没下得了决心。这回看到老王头先动了手，迟得法一咬牙，买。

找了他儿子，儿子说行，凑上一份。

找了于村长，问还能向政府贷点款啊？

老于说，恐怕难。

为什么？迟得法问。

政府的贷款恐怕不会给中农。你就别去找没趣了，也省得难为人家纪乡长，老于说。

迟得法这下更是非买不可，怎么也要争这口气。跟老婆一合计，把所有的开支都停下。又上几年没去过的大河西的丈人家，开口借了点。最后一算计，还差不少。不能买牛，就买头驴吧。

半个月后，迟得法也把毛驴从西门口牵了进来。

民主村又是一阵轰动，虽然赶不上老王头牵回牯牛的阵势，可迟得法也觉得挺风光了。

在兴奋的人中间也有受刺激的，但那是另一种刺激。

秦德才就是受到另一种刺激的人。

他看到了，在他的那块地里，迟得法去年收了那么些的粮食，比给他的八十斤小米可是多得多了。今年，这块地的麦子，这才开春不久呢，绿油油的，比去年还要好多了。给我才这么点，这不是剥削，

是什么？你看，又买头驴回来，不但剥削我，还要剥削驴，把我跟驴放一起了。这不是新富农，又是什么？有钱，为什么不给我这个贫农一点？我为革命出了多少力啊。

他找到了迟得法，非要加租金。

“得二百斤小米，至少得一百五十斤。”秦德才伸着手指大声说。

“都已经立下了字据，签过字画过押，村长做的中人，你想反悔，没门！”迟得法当然不会让。那块地，是他浇灌了多少心血和汗水的宝贝，是他发家致富的希望。

“你这是剥削！”秦德才嘴里喷着吐沫跳着说。

“你别来这套，我比你懂。现在是新中国了，地主富农早就斗倒了，没有剥削了。你跳什么？”

“我跳？我不但要跳，我还要斗你。你占了我的地，就是在喝我的血，就是新地主。”秦德才舞着拳头跺着脚说。

“呸！你有本事，找村长去，找乡长去，在我面前蹦哒什么？”

秦德才真的一个一个去找了。

当然，没有一个听他的。

别看秦德才不过是个流氓无赖之辈，可他的心灵深处还真有着某种的感应或是叫预知。

他前面讲的什么新地主一类的话，竟然应验了一场起于青萍之末而呼啸于山林之巅的风雨。

这年的冬天，“二次土改”（或者叫“土改补课”）开始了。

出于对第一次土改在某些地区、某些方面搞得不彻底的担忧，加之这几年来，农村土地关系、阶级关系有了新的变化。一些在土改中翻身获得了土地的贫农，有的又一次失去土地；而有的则上升成了新富农，剥削起别人来了。两极分化的迹象有所抬头。革命胜利两三年了，有的积极分子意志有所衰退，也需要再打一支强心针。因此，为防止农村社会状况出现反复，为巩固新政权的社会基础，上年刚搞了“镇压反革命”，今年就不失时机地开展“二次土改”。

秦德才从宗干部那儿听说，要搞二次土改，高兴得不禁手舞足蹈起来：“又能分土地、分财产啦，又能轮到我姓秦的神气啦！最好再能分个老婆么，哈哈！”

秦德才高兴之余，天天在打听，怎么还没开始搞啊？民主村，地主富农没有了，那斗谁呢？啊呀，那时杀早了，哪怕剩一两个也好啊，现在没得玩了。哎，怎么没有，第一个就斗迟得法，又租地又买驴，敢来剥削我，典型的新地主。那个老王头也跑不了，敢买牛，哼，也是新地主。林海秀，那张嘴不让人，要好好整整她，也叫她知道我的厉害。对了，别忘了那个赵玫，嘻嘻，不就是第二个李芹吗，得乖乖地听我摆布啦，长得比李芹还俊呢，嘻嘻，还是我有福。不，不，还是革命好啊。

那天夜里，村里开会了。

天有点冷，飘着雪花，地上一层薄薄的白雪。

西北场院的空屋子里，挤满了人。小小的油灯，跳动着微弱的火苗。火苗折射出满屋缭绕的劣质烟的烟雾，有人不停地咳嗽。

没等村长把上级的精神转达完，秦德才就迫不及待地说：“二次土改好！二次土改好！坚决拥护！坚决支持！”

“还没讲完呢，你急什么？”鲁队长没好气地说。

宗发奋作为乡里的代表，也来参加了会。

“老秦对革命的要求比较迫切，大家要理解。二次土改的意义很重大。我们要重新清理阶级队伍，挖出新的地主富农，铲除新的剥削现象。不要闹了半天革命，好不容易推翻了旧的地主，又出现新的地主来剥削我们。”宗干部拿着本书，说着。尽管他文化并不高，可开起会来，手里总是拿着本书。一年多下来，讲起话来，如今也自信多了。

“对，对，迟得法就是个新地主。他占了我的地，只给我很少一点粮，就是在残酷剥削我。要把他的地，拿回来，重新分。”秦德才开了第一炮。

宗干部一听，大为惊讶地说：“民主村还有这么严重的问题么？土地改革的成果，不就丧失了么？怎么回事啊？”其实，他完全知道这事，秦德才对他不知说过多少遍了。这回，他故作惊讶，完全是为了更好的效果。他的工作艺术可是提高得很快啊。

老王头很直率，也没去揣摩宗干部的意思，张口就说：“秦德才讲得不对。是秦德才自己不干活，是老迟给秦德才小米。”

鲁队长说：“这样算下来，是秦德才不劳而获，是秦德才在剥削老迟。”

“哎，哎，慢点，我怎么听糊涂了。到底是谁剥削谁啊？”宗干部连忙打住，其实他自己事先也没有深究这个问题。

于村长说：“按政策规定，秦德才不劳动，收租金，是种剥削行为。跟以前地主收地租，性质是一样的。”

杜家骏接着说：“那秦德才就是新地主了，至少也是新富农了。”

“别，别，先别这么说。”宗干部忙着摆手，“我想想。老迟有钱了，家里富有了，把秦德才的地也租下来了，可因为向秦德才交租子，就算是受剥削。秦德才穷得把地都租出去了，就收点可怜的租子，饭也吃不饱，就是剥削别人了。剥削量超过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就要划成富农了。秦德才肯定是超过了。这个账，怎么算呢？”

宗干部挠起了头。

宗干部不能不挠头，因为他的水平还远没有达到能算清这个账的程度。这是阶级划分中规定不当的明显漏洞之一。如果老迟肯花大价钱，以一千斤小麦一次性买下秦德才的地，尽管秦德才实际上得利更多，但因此而失去土地，按阶级划分就又成了赤贫，那就成了两极分化的典型。如果像现在这样老迟在秦德才的土地上耕种，每年交一小点租金给秦德才，尽管老迟为使用土地所付出的少了，但秦德才就成了不劳而获，应该是说老迟受剥削了。再如果是秦德才请老迟上门种地，打的粮食归自己，其中拿出一部分给老迟付工钱，哪怕给的工钱再多，那也是典型的剥削行为，秦无疑就是个小地主，尽管自己很穷，吃了上顿没下顿。

同样的，李芹她爹，一共就几亩地，家里没有劳动力，如果不是请人来种（请人种地，这叫雇工，上面讲了，是典型的剥削行为，就要被划为地主富农），而是租出去让别人种，说不定收的租金更多，按当时划分阶级的规定，那也就算是个小土地出租者，相当于中农，还算是劳动人民的范畴。或许李芹的家就不会因此而招来灭门之祸，李芹也许就是另一种命运。可是李老头哪知道以后会有这样的政策，和这政策里面出租与雇工的区别呢。要说深一点，把劳动（而且仅限于体力劳动）作为唯一的生产要素，否定资本、土地、管理、技术的作用；对于农民租种土地，只讲土地所有者对农民劳动力的占用，不讲农民对土地的使用，这是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个严重缺陷，也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一个先天不足之处。

当然这种政策本身也就是在理论上说说而已。真的在运动当中，那就由工作组、村干部、积极分子说了算。这些人往往有的是一朝得势、得意忘形、随心所欲；有的是挟私心而报复、故意往上搞；有的是不敢实事求是、违心地把别人往高里划，省得自己被打成右倾，说成是在袒护阶级敌人。

宗干部挠了一会儿头，还是想不出结果，便说：“这个事，我去向上级请示。还有别的情况吗？”

“没有了。”于村长说。

“没有了？民主村，镇反时，没有成果。这回二次土改，又没有成果。能行吗？难道民主村成了世外桃源？”宗干部追问说。

大家无语。

宗干部又说了：“那个包金贵呢？有几亩地？”

于村长说：“四亩。”

“四亩！一个人，这么多地。他是什么成份？”

“不知道。乡里只是叫我们落户口，没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成份。”村长答。

“怎么能不讲成份呢？那我们干什么革命呢？干革命，就是搞阶级斗争，就是发动贫下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在阶级社会里，没有一个人没有成份。怎么会没有成份呢？”

“那他是什么成份？”村长问。

宗干部愣了一下，说：“我看是反革命。”其实阶级成分里没有“反革命”这一项。

于村长说：“去年不是说了不是反革命么，要不怎么还会给他地、又落下户口呢。”

这回轮到宗干部无语了。过了会儿，才说道：“这事，我也去请示一下。”

宗发奋向纪乡长汇报了这些。纪乡长把于村长喊了过来，一起商量。

商量的结果是，迟得法和秦德才的成份都不变，秦德才的地退回给他自己种。

纪乡长对于村长说：“你去对他说，地要自己种，再不劳动，就要成二流子了。革命不要二流子。”

“你呀，于村长，这种事，还去当中间人。以后，这种事，可得谨慎点，别掺和了。”

对包金贵，纪乡长说：“也不要为难他了，应该说他也是属于劳动人民。如果觉得他地分多了，收回一亩半亩也行。至于成份，真要请示县里了。”

“我回去想了想，还有个事。经老太，也得给她分块地吧。要不，她不就吃了亏了吗？”于村长说。

“对，她现在虽然有点补贴，那也不够她用。况且，她还有个孩子在上学。她自己从来也没提过，可我们得替她想到。越是这样不说自己困难的好同志，当领导的，越是要替他们安排好。”纪乡长说。

“那我们安排一下吧。”

“可你们村还有空的地吗？”纪乡长问。

“两三亩地，还是能排得下的吧。”

“那好。”

于村长的一片好意，划给了经老太两亩半的山地，也起不了多大贴补作用。却想不到，这个举动给她一辈子定下了是农业人口而不是非农业人口的身份。这里面的差别，待后再说。她后来几十年的生活凄苦，这也是个原因之一。

于村长回去，把迟得法和秦德才找来，讲了乡里的意见。

两人都不乐意，可也没有办法了。迟得法真舍不得耗费了他不少心血的那块地。对秦德才来说，拿回地来，更不是他的本意。

“今年的租金，你还得给我。”秦德才满肚子地不舒服。

“呸！你想得美？！我下的种子、下的肥，你先得补给我。”迟得法心里更有火。

于村长也没想到还有这事，就说：“那村里吃点亏吧，补给你老迟一百斤麦子。你秦德才赚大便宜了，满地的麦子，长得那么好，再不好好干活，就对不起老天爷了。”

“老天爷算个什么东西？”秦德才心里嘟哝着。他还在想着，这就是“二次土改”？这算什么革命？革命不是这个样的。他心里的革命，没有别的，那就是暴力夺取。用暴力夺取权力，用暴力夺取财富，用暴力夺取地位，甚至用暴力夺取人家的老婆闺女，用暴力夺取一切的一切，用暴力来个人世间的天翻地

覆。从义和团、太平军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红卫兵，不都是这种革命派么？秦德才就是这种最革命的革命派。按说这种革命，在文字上是要打引号的。为了省事，也希望读者在这种时候能稍微注意观察一下，也相信读者朋友能够分辨出来，所以类似这些地方就不再打引号了。

这年，二次土改结束时，全县共划地主1837户、富农2754户、中农52051户、贫农40971户。当然，这时的地富是“徒有其名”了，背的是地主的黑锅，过的是最悲惨的日子。

第十五章 两个太阳

1949年6月15日

这年冬，学校里快放寒假了。按阳历，是1953年的年头。

李辰最着急的还是帮小林盖房子。盖房子最主要的是两件事：木料和石头。墙，可以凑合下，用泥坯子，不用砖。可木料和石头是少不了的。

龙头附近的山上，很少有大树。49年打仗，为修工事，双方都砍了不少树，现在还都插在坑洞和战壕里。少数情况下，经乡里批准，能挖出几根用用。

李辰去找过纪乡长。纪乡长跟李辰和小林都很熟，不过虽然表示很同情，可是不行。县里说过了，只能用于国防和生产。上次给赵玫用了三根，上面后来知道了，还批评过这事，特地说了以后不能再用。更何况当时县乡政府机关的“三反五反”运动刚过。这种时候，经济上的事，得非常谨慎。

纪乡长说：“很喜欢你们这两个小青年。什么时候盖房子，一定要喊上我哦。我一定来当个小工，出上份力，这是能做到的。”

李辰很能理解纪乡长的位置和处境。解放初的干部，不是后来某些人的那种样子。

还有石头。石头可以买，十斤小麦换一车石头。一辆手推车，只要能推动，装多少石头都行。

两年来，李辰攒了些麦子。那天，他借了村里的小车，推上扬了好几遍的四十斤麦子，乘学生下午放学之后，喊上了小林姑娘，来到了望海山北坡的采石场。

采石场是东北村的几个人开的。李辰跟他们已经说过了。

“来吧，装吧！给你们留了好石头，就是那一堆。方方正正的，多好。”他们说。

“谢谢啦。”李辰递过麦子，说：“这里面是四十斤。先推四车吧，缺多少，以后再过来。你们称一下吧。”

“李老师，你客气了，谁还能信不过你吗？全龙头镇的人都挺敬佩你，有学问，有情意。”他们说。

“李老师，我来帮你推吧。”其中一个小青年，叫哈联成的说。

“不了，不了，不麻烦你们了。我能行。其实，我也是个庄稼人。”

李辰高兴地对小林说：“咱装吧。”

他俩搬起了石头往车上装。

装石头，不但是力气活，也是个技术活。怎么摆，怎么绑，是有讲究的。要不就装不了多少，车还容易偏，不好推。

李辰虽然干庄稼活并不差，但这种特别的重体力活，还是不太行。呲牙咧嘴，扭扭歪歪，又怕砸了小林脚，又想尽量多装点，实在是难为了小伙。

小林看在眼里，就说：“能装多少算多少吧，不在于多这一块、少这一块。”

李辰实在不舍得少装一块石头，咬着牙又搬上了一块。

“好了，好了。”小林心疼地说：“一会儿还要往回推呢。”

“好，好。”李辰答应着，又绑好了车。

小林在前面拉起了绳。

李辰往肩膀搭上盘绳，喊了声：“走！”

两人一使劲，可是，车没动。

李辰有点急了，往后一退，再用劲往前一推。按说应该是往前走了。但是车太重，装的石头太多，而且左右没平衡好。这一使劲，小车非但没动，反而倒了。

“哗”的一下，车翻了，绑的绳也断了。

李辰侧歪了一下。

小林急忙回头，问：“没事吧？没砸到吧？”

采石场的人也赶紧跑了过来，“没事吧，没事吧？”

“没事，没事，没砸到脚。”李辰安慰大家。

“万幸，万幸。”大家说。

“你试着走一下。”小林轻轻地说。

李辰想站直腰，不由得“哦哟”了一声。

李辰扭了腰了。

“疼得厉害吗？回去歇两天吧？”小林焦急地问。

李辰试着往前走了一步，眉头稍微一皱，没啃出声，只是说：“明天还要上课呢，快要考试了，可不能停下来。”

那个哈联成说：“李老师，你回去歇息吧。这车石头我来帮你推回去。”

小哈又看了那车石头，笑着说：“李老师啊，你这车石头，真是不老少。别说你了，我推着都费劲。”

李辰说：“我怎么能好意思麻烦你呢。”

“嗨，别说这些了。你是民主村的女婿，也就是我们龙头镇的女婿。这点活，还不是一句话吗。”小哈乐着说。

大伙也哈哈地乐开了。

李辰让小林给扶了回去。

好不容易，两人扭歪着走回了家。

小林把李辰扶上炕，心疼地说：“这下伤筋动骨，得好几天不能上学校了吧？”

“不用，不用，今天歇一下，明天就能去。”李辰虽然扭了点腰，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能行吗？”

“能行。你看，我还能唱歌呢。”

说完，李辰就唱起了农村中知道的人不多的苏联歌曲：

“春天里的鲜花怒放，

春天里的姑娘更漂亮。

傍晚在花园里，

跟我爱人相遇，

生活就会立刻变了样。”

唱着唱着，李辰还朝着小林媚然一笑。

小林拍了下李辰的脑袋，嗔怪道：“都扭了腰了，还有这份心思。”

第二天的下午。

东门外，龙头小学。

学校有了些变化，教室的泥墙外面都刷上了白灰。

学生们已经放学了，嘻嘻哈哈地在操场上玩呢。

教师办公室里正热闹着。鲁队长他们得知李辰昨天因为推石头扭伤了腰，今天就把那些石头给推到了小林的家。听说李辰还坚持上课呢，就上学校来看望他。

“啊呀，我的李先生啊，要媳妇也不能不要命啊。”现在鲁队长也能对李辰开起玩笑了。

“多谢你们啦，真是不好意思啦。”李辰坐着板凳，半靠在墙上。

“小林啊，要不，我们也像帮赵玫那样，一起帮你们盖起来吧。”平金刚说。

“别，别，哪好意思。赵玫姐，那是因为她家出了那么大的事。我这儿，我们自己慢慢弄也就行了。这已经麻烦你们很多了。”小林诚恳地说。

“你这个样，今天还能上课啊？”鲁队长关心地问。

“行，还能坚持住。”李辰说。

“要不，让学生自习，我来试着帮你看一堂课？”一起来的平近芳说。平近芳小学毕业后又去了县城上初中，这才回来不久。

“谢谢你了，真要谢谢你了。不过，我觉得小平还真是块当老师的料。”李辰高兴地说。

她哥哥平金刚也忙插话：“我妹妹可喜欢学校了。平常学习也抓得紧，回来这些天，天天都在看书。”

“近芳妹妹自己愿意当老师吗？”小林问。

“当然愿意了。我喜欢学校，喜欢孩子，尤其是和李老师在一起，能学到好多知识呢。”平近芳的眼神里闪着迫切的希望。

李辰连忙说：“那好，学校里正缺人呢。我去跟余校长说说，问题不大。”那时找个工作还比较容易，不用那么多繁杂的手续。几天后，李辰就叫平近芳来学校当实习教师了。

大家正说着话，不知什么时候，秦德才也窜了进来，站在后面，插不上嘴。大家也没在意他。他有能闻到什么地方人多、就往那个地方钻的本事。

窗外，小学生们边玩边唱起了歌：

“胜利的旗帜哗啦啦地飘，

千万人的呼声地动山摇。

斯大林，毛泽东，

毛泽东，斯大林，像太阳在天空照。”

“这是首什么歌，还挺好听的。”杜家骏问。家骏虽然是有家口的人，可年轻人扎堆的地方，也还是乐意来，而且还喜欢唱几嗓子。

“这首歌，是唱中苏友谊的。”李辰说。

“苏联老大哥真是值得我们学习，是我们的好榜样啊。”鲁队长说。那个时候，苏联真是被说成了劳动人民的天堂一样。

“是啊，报纸上不是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么？”李辰又说着。年青的人们在一起，尤其是当小林也在，李辰是很愿意说话的。

“听说他们那儿种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杜家骏说。

“那用什么耕地呢？”平金刚好奇地问。

李辰说：“用的是联合收割机，叫什么‘康拜因’，像一间房子那么大。一突突地在麦田里往前走，前面把麦秸卷进去，后面一袋袋的麦子就出来了。我在报纸上看到照片了呢。”

“啊，呀！”把大家听的都出了神。

“那个坐在顶上的驾驶员还是个女孩子呢。”李辰意犹未尽地说着。

“有咱林姑娘漂亮吗？”鲁队长从不放过开林海秀玩笑的机会。

李辰一时措不及防，竟说不上来了。

在小林的“去，去”的嗔怪声中，大家一阵开怀的哄笑。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像苏联一样啊？”平金刚有点着急了。

“快了，快了。刚才不是说了，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吗。”李辰说。

“啊呀，我们明天就能变成苏联啦！”大伙高兴得差点都跳了起来。

“真等到了那一天，那个康、康什么来着？”鲁队长说不上来了。

“康拜因。”小林提醒说。

“对，叫康拜因。等那个康拜因进了咱们民主村，咱就叫林姑娘像坐大花轿一样地坐上去，当驾驶员啰。”鲁队长说。

“那还差不多。我要是能当上那个康拜因的驾驶员就好了。”小林姑娘喜盈盈地说着。这时，林海秀的向往已经盖过了羞涩。

“不过，我觉得，这个歌，有个地方讲得不合适。”小李毕竟带点小知识分子的味，凡事爱动点脑筋，愿意有自己的看法。

“你还挺钻研，我怎么没听出来，你说说。”鲁队长当然不会去钻研这些。

“你听那歌词里，毛泽东，斯大林，像太阳在天空照。天上能有两颗太阳么？”李辰说。

“是啊，小李说得对。古人不是说吗，天无二日。有两颗太阳，不得掉一颗下来。”秦德才插上了嘴，这时大家才知道，这个二流子也进来了。

“你瞎说什么呀？不懂别瞎说。”家骏马上堵住了他的嘴。

“不让我说，哼哼。他妈的，到时候，有我说话的地方。”秦德才斜着眼、撇着嘴，说着不干不净的话走了。

大家的兴趣也没了。

“这个狗东西，到哪儿也叫人厌。”小林忿忿地说。

但也就是李辰不经意间的这句话，被秦德才添油加醋之后，却在四年后的政治风浪中，彻底改变了他和小林的命运。

第十六章 互助组

1949年6月16日

当绿色又染上树枝、染遍山峦的时候，田野苏醒了。人们又兴冲冲地扛着农具走进田地。

1953年的春天到了。

春天又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今天一早，乡里在民主村的空地开了个会。村干部们刚散会，于村长他们几个走在回家的路上。

会议是传达开展互助合作的精神。

“要成立互助组啦。”于村长说。

“好啊，像老王头、家骏他们搞得就挺好。那不就是互助组么？”鲁队长说。

“我也觉得挺不错。这样比一家人自己干，带劲多了。”家骏说。

“最大的好处是，合起伙来力量大。要不，咱们哪辈子能买上牛啊？”老王头说。

“那咱们这个组，先成立起互助组。”家骏说。年轻人的劲头更足一些。

“好！咱这几年，就已经是互助组啦。”老王头也高兴地说。

“那你们在全乡也带了个头，是全乡第一个啦！我这就先去告诉纪乡长，让他也高兴高兴。”于村长说。

老王头没回家，就先到组里的几户人家走了一遍。

靳喜悦是最高兴了。这样，他就不用每次都去求别人了，很多话就比较好说了，可以平等地和大家在一起，付出自己的努力，获得自己的劳动成果。

包金贵见到老王头，说到这事，满心的愿意，又怕没他的份，抬着眼直望着老王头，怯声声地问：“我还能参加啊？”

包金贵在“二次土改”的后期，被定了个“无业游民”的成份，虽然不属于阶级敌人，但也不是贫下中农。而且还被划走了半亩地，虽然数量不多，但在全村是唯一被划走土地的人，明明白白叫人觉得他是个外人。于村长跟乡里说过，就这么一个人，不一定非要划出来啦。可宗干部坚持说，正因为还有这么一个人可划，所以一定要划。要不，整个民主村“二次土改”搞了什么呢。哪怕是象征性地划走半亩地，也要划。这使得包金贵相当地失落和自卑，觉得在村里抬不起头来，再想回原籍也不行了。

“你又不是反革命，为什么不能？只要是我们组的，都可以。”老王头毫不犹豫地说。

老王头觉得包金贵虽然是从国民党那儿过来的，但也算是个苦命人，比秦德才强多了。

包金贵感激得直点头。

老王头到乡政府后院找经老太，没在。

经老太的儿子正在县城念中学，她一个人住这儿。建国后这几年，村里是各户自己干，妇联（不叫妇救会了）也没多少事。当时南方各地宣传婚姻法热闹的很，街上到处都是站在长板凳上“婚姻法，有保障……”带有越剧调的叫唱，提倡婚姻自主、妇女解放、反对包办等等。但海源这儿解放早，妇女翻身也比较早，搞得相对比较彻底，所以这项工作很顺利地搞过去了。正好分了她一块地，她也愿意干农活，大多数时间就在地里了。尽管，地并不好，她就更想多下工夫了。

老王头知道这情况，干脆就出了北门，上了经老太的那块地。果然，经老太在那儿锄地呢。而且，一看就能看出，这块地比旁边包金贵的地，拾掇得要好多了。

“老太，经老太。”老王头喊着。虽然把不是老太年纪的中年妇女喊成“老太”，在当地是种亲切的戏称，但也就是经乡长不在这儿，老王头才敢这么没大没小地叫着。

“哎哟，你这块地收拾得还真不错哎。”老王头由衷地夸奖说。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奶奶。早两年，在村里，我还是把种地的好手，你们还不见得能赶上我呢。”经老太也不谦虚。

老王头讲了互助组的事。经老太也已经知道这事，就说：“这当然少不了我。”

“还得你来领着我们呢。”老王头谦虚地说，丝毫也没有做作的意思。

“你说哪儿去啦，我跟着你们干就是了。”

“经乡长最近没消息啊？今年不回来啊？”

经老太有点沉默了。经乡长1949年刚去南方时，是到了一个县城，当副县长。1951年春节，回来过一次。以后，说是调到大上海了，当个什么处长了，可再没回来过。也很少有信，难得有信也是寄给儿子的，经老太不识字。

“你不能去趟么？顺便也看看大上海，我们都没这个机会，好羡慕你哎。”

“唉，我是大字不识一个，到了那儿，恐怕连东南西北都摸不着。算啦。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真是不好说。我也不靠他。”经老太是几分伤感、几分无奈、几分自慰。那“婚姻法有保障”的歌声，最终也并没有使婚姻幸福的天平倒向经老太的一边。“婚姻法有保障”，保障不了经老太。“婚姻法”当中强调婚姻自由的部分反而成一些革命干部进城以后名正言顺地抛弃在农村老家的发妻、另求新欢的挡箭牌。

“这地，准备种什么？”老王头也知趣地把话叉开了。

“这地干得很，种别的还不行，种点花生吧。”

“也行，下种之前，我牵牛过来耕一下。”老王头看了下，边上包金贵的地也得用牛翻一下。有了互助组，他家的牛可是要辛苦了。他暗暗地心疼起他的小牡牛了。

回到村里，在胡同口碰到赵玫。

赵玫见到老王头连忙打招呼：“王大伯，我正要找你呢。”

“啊，啊。”老王头高兴地答应着。

老王头也很喜欢村里的这位妇联主任，不但人俊俏，而且聪明能干、讲正气。虽然，一家四口竟然少了三个，摊到谁身上也承受不了。但赵玫显得非常刚强，脸上看不出悲伤，更没有颓废和绝望，依然坚定地走着路，挑起了家里所有的重担，还欣然承担起村妇联主任的工作，和姐妹们一起，一样事情也没少干。她把对亲人的思念，对敌人的仇恨，都压在心底，化成了夜以继日地工作和劳动的动力。当然，身体的辛劳和内心的伤痛侵蚀着赵玫的青春，白皙的皮肤渐渐失去了那种亮丽的光泽。尽管，对这些，老王头这样的人是注意不到的。

“大伯，我跟你说件事。这回成立互助组吧，我想跟您在一起。”

老王头当然满心愿意，这样一来，这个组的力量可强了。

“那敢情好了，我拍巴掌还来不及呢。不过，你那个组不也挺好。”

“唉，你不是不知道，秦德才那人太不是东西，我懒得和他在一起。互助组了，要每天在一起干活，那怎么受得了。”

“是啊，是啊。”老王头知道那秦德才见了女的就没有好心思，赵玫还是隔他远一点好。

“那你们组里同意吗？”老王头又问，毕竟村里还有个相互关系的问题。

“这没问题。这次成立互助组，不是按原先的组，是大家自愿组合。”

“对，对。”老王头开过会，知道这自愿组合的精神，“那我跟村长说一下。”

“我跟组里、跟村长都说过了。他们都说，只要你点头就行。”

“呵，呵，我还有这么大的权力啊。”老王头笑得都裂开了嘴。

老王头又去了迟得法家。

迟得法为秦德才退租的事，还没伤心完呢。这件事，对老迟是有很大的损失。在地里下的力气、种子、肥料都白丢了不说，买驴子的必要性也不是很大了，尤其是精神上的打击，把老迟暗地想争当全村第一户的劲头，摧毁得一干二净。

这会儿，迟得法正躺在炕上，见到老王头，还在唉声叹气：“这秦德才，真不是东西啊。”

老王头知道老迟满肚子的不舒服，也只好说：“唉，算啦，事情已经这样啦，以后少跟秦德才这种人打交道。”

“我知道秦德才不是东西，可这都已经是村长做的中人，都签字画押了，还这样不作数啊？那以后还能相信谁啊？”

这一点，连老王头都不大好劝。

“老迟啊，现在要成立互助组了。你怎么打算啊？”

“唉，算了。”迟得法苦着脸说：“老王啊，不瞒你说，我现在是什么心思也没有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愿意和你在一起。但是我现在真的是提不起精神来，什么事也不想干了。”

“好，好。这事，等以后再商量吧。可地里的活，还不能停下来。有什么难处，跟老弟我说一声。”

“哎，哎。”老迟答应着。

村里办起了几个互助组，大多数农户都参加了。不少人是挺高兴的，也有是随大流的。比如像皮安己，他儿子皮高深不大想参加，说：咱家有两个男劳力，参加互助组，那就给别人干活啦，不合算。皮安己就说，嗨，参加就参加吧，别不参加，怎么还不能过。不要显鼻子显眼的，像老迟那样。

还有两种人是不想参加的。一种是迟得法这样的，觉得自己能干得比别人好，不愿和别人混在一起；另一种是秦德才那样的，属于人人厌的那种，自己不想进去出力，别人也不想要他。当时的政策，真的是完全自愿，不勉强他们。

秦德才，哪个组也不去。可他一点也不害愁，依旧自在得很。既能豁出面子去蹭，也能不怕挨饿、忍着几天吃不上一顿像样的饭，就靠着烈属那一点补助，整天也不知在哪儿混。他那块西门外的地，虽然没有剥削和被剥削了，但早已是一片荒芜、野草丛生，加上迟得法曾经下过的肥水，那草长得是格外的茂盛。叫老迟看着好不心疼，一声声地说着：“这是什么规矩啊，什么规矩啊，把地分给这种二流子。老天爷也看不下去啊。”

互助组是以组长的名字作称呼。王建悟组的第一次出工，是在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全组所有的成员，都一起到北门外给经老太和包金贵的地翻耕。

王山还不知从哪儿找了个破铜锣，几个巷子里转着走，敲着喊：“当，当！老王头的组，上北门外干活啰！老王头的组，上北门外干活啰！当，当！”

人们纷纷从家里探出头来，或走到街上，新奇地看着这龙头镇上互助合作的第一幕。

老王头组的成员们，一个也没少，都来了。王山扛着锄挑着桶走在最前面，后面是由媳妇搀扶着的靳喜悦，再有就是家骏俩口子 and 高兴得一直不停地在前后左右蹦蹦跳跳的他们的儿子长贵，更不用说民主村的前后两任妇女主任王大妈和赵玫，还有全乡人人都知道的经老太和包金贵。

在人们啧啧的赞许声中，丁妹不好意思地走在后面。

老王头牵着养在自家院里的牡牛，走在最后压阵。看着这人强牛壮的自己领导的队伍，看着这么多街坊邻居投来羡慕的眼光，老王头似乎显得有些悠然自得、信心满满。这些年没有白辛苦啊，拜托这革命的胜利，一个地道的农民，能这样从未有过的伸直腰杆、在众人的赞叹之下走在街上，真是没白活了这辈子。老王头更想明白了，要永远跟党走，要继续革命不停步啊。

北门外，上一个小山坡，在被炸毁的惠民寺的边上，就是经老太和包金贵的地。

老王头安排大家他早就想好的分工。他牵牛，家骏扶犁；壮劳力去望海山下挑水，年纪大点的去捡地里当时大爆炸留下的碎砖乱石；地堰边上，牛耕不到的，也要有人去刨。

组员们，不但听从指挥，而且还纷纷抢着重活干。挑水是个重活，来回要几里路，不但丁妹、赵玫要去，连经老太都上来和唐玉珍抢担子，各不相让。还是老王头过来劝下了：“这块地，你熟悉，你得留下来指挥。”

人们是那样的坦诚、和睦、勤劳。新的社会，新的气象。心里真像块明亮的镜子，没有一丝的杂念。几十年以后，又经历了累累创伤的人们，谈起五十年代初期，尽管物质匮乏，却还是那样地怀念。

一多半的地，犁下来了。家骏劲头未减，一声喊：“呸！”手一扬，鞭梢在半空中“啪啪”地响，只见那小牡牛也跟那时的人一样，不知偷懒，一个劲地低头猛进。

直看得老王头心疼那不谙事的小牛，却又说不出口。

正好在地头烧水的喜悦喊上了：“水开了，歇息吧，过来喝口水吧。”

老王头也招呼着大伙：“过来吧，歇息了！”

大家聚拢过来，在地边三三两两地坐着。

春天的风，特别地舒畅。大家喝着水，也注意到了山上山下自己家乡的美丽景色。

那天，天气也特别的好。高远的蓝天，丝丝的云絮慢慢地飘过。望海山上已是草木葱茏，地边开满了点点的黄色野花。向南望去，是龙头镇的城郭，城墙后面冒出几棵高大的树冠，升起袅袅炊烟，是那样的和平宁静。越过树梢，还能看到那天边的大海，一片融合为白色雾霭的大海。

“没想到咱们的家乡，还这么美丽啊。以前怎么没发现呢？”家骏说。

“以前？以前，又是地主压迫，又是国民党反攻，哪顾得上啊？”经老太说。

“这几年，日子真是好过了。”王山说。

“以后还会更好呢。”赵玫说。

“还能再怎么好呢？”王大妈有点不理解了。

“那就要像苏联一样，搞集体农庄，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喜悦说。他在家有时间，村里的报纸都叫别人捎过来给他看。所以，这几年也认了不少字，知道得比别人要多。

“啊哟，那我才买了的牛，就用不上啦？”老王头什么时候也忘不了他的牛。

“大伯，你担什么心哪，早着呢。开会时，上级说了，建设社会主义，是个长期的任务，要二、三十年才能建成呢。”家骏说。

“啊呀，还这么长的时间啊？”这回连小长贵也着急了。

“也不用着急，国家已经公布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大建设呢。”喜悦又说。

“对了，有支歌就是唱这个的。”家骏说。

“你唱唱。上次唱回来一头牛，这回看能唱回个啥来？”老王头饶有兴趣地说。

“看把你能的。”唐玉珍嘴上说着，心里挺喜欢。

家骏挺大方，张口就唱了起来：

“火车在飞奔，车轮在歌唱，

装载着木材和食粮，

运来了地下的矿藏。

多装快跑，快跑多装，

把原料送到工厂，把机器带给农庄。

我们的力量移山倒海，

劳动的热情无比高涨。

我们要和时间赛跑，

迎接伟大的建设高潮！”

这歌声，听得大家都入了迷。

暖暖的春风里，那歌声那笑声，乡亲们都有点陶醉了。

第十七章 统购统销

1949年6月17日

17.1过生日

日历又换了一本，时间到了1954年的早春。

人们进入这个春天，是眉开眼笑的。

今年，老王头家已经有了余粮、有了余钱，这可是多少年没有的事了。

阳历三月，农活还不是很多。今天，老王头给他老伴王大妈办起了五十岁的生日。虽然，五十岁按说还不是大寿之年，但难得有这样的好年头、好心情。王大妈还不舍得，经不住老王头和儿子、媳妇的劝说，终于答应下锅杂面汤（注：杂粮做的面条）。

丁妹利索地和着面，多一半的玉米面，小一半的粗面粉。那也叫王大妈心疼了好一会儿。

老王头切着过年后剩下的最后一棵白菜。

王山忙着去挑水、拾柴火。王大妈连忙说：“赶紧把那件新衣服换下吧。”

今年过年，王山还新做了件蓝布褂子，春秋也能穿，冬天也能罩棉袄。这是老王头家近几年来第一件新衣服。本想给丁妹一起做一件，可丁妹怎么也不肯，只让她哥哥做。

今天娘亲过生日，王山当然穿起了新衣服。可要出去干活，王山自己忘了这码事，王大妈怎能不提醒。

丁妹擀好了面，又“呱哒呱哒”地拉起了风箱。

老王头开上了卤，里面除了白菜还能再加些什么呢？碾碎了一些花生豆，还觉得不够，狠狠心，又打上了两个鸡蛋。

“哎哟，又不是坐月子，还用吃鸡蛋啊？”王大妈又心疼了。那年月，哪有舍得吃鸡蛋的啊。

“嗨，难得的太平日子，难得的好光景。吃个！”老王头也是难得这么大方地说着。

水开了，面下了。

丁妹“呱哒”地拉着风箱，那节奏也叫人陶醉。那风箱声也能让人听出这是好日子。

水又开了，掀开锅盖，满屋子腾起迷人眼目的蒸气。

“再开开。”王大妈说。

风箱又欢快地响了一会儿。

“好了，盛面了。”老王头高兴地说着。

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面，盛出来了。

海源的习惯，大喜日子做面条，是要分给街坊邻居、亲朋好友的。让大家来分享自己的喜庆，联络街坊亲友的感情，这才是本意，并非真的是要自己吃，自己是舍不得吃的。老王头更多的是想借此感谢本组的乡亲们，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加强团结、增强凝聚力。

王山又换上新衣服，一家家地去送面条。

老王头还特地端了一碗给村长。

秦德才自己找上门来，想要两碗。没给，给了一碗。

王大妈心里直嫌恶心，那只碗连洗了三遍。

直到老王头和王山回来，一家人端起了剩下的几碗，吃起了面条，王大妈心情才又舒坦起来。

“爹开的卤，真好吃。”丁妹说。

“丁妹擀的面，也好。”王山说。

“还是那鸡蛋、白菜好吃，不是假的。”王大妈说。

一家人都笑了。

“今天，我能大口大口地吃面了。”王山说。

“吃吧，吃吧，还有一碗呢。”王大妈说。

“什么时候能天天吃上面条，就好了。”王山说。

“快了，快了，到了社会主义就行了。”老王头说。

“那恐怕得等到共产主义了吧？社会主义也不会有那么多白面吧？”王大妈想象不出来有那么多的面粉、能天天吃面条，会是什么样。

“等什么时候，也给我做大寿啊？”老王头说。

“那就等你六十大寿啦。”王大妈说。

“我算一下啊，那就1959年啦，正好是新中国成立十年大庆啊！”王山说。

十年大庆，是多么令人神往的场景啊。似乎很遥远，又似乎很近了。

17.2自报公议

阳历五月了，小麦到了抽穗灌浆的时候。

上级又来了精神。

大家都在忙着挑水。村里怕白天耽误大家干活，晚上耽误休息，都是挺忙挺累的时候，于是，放在中午歇晌的时候开会，地点就在西门外大白果树下。

以前都说，解放区会多，国统区税多，可现在开会更多了。这也难怪，新政权在组织、动员、管理群众的时候，开会这种方式是最简便、最迅速、最有效率的了。

这时，大白果树的树荫下，已经坐了不少人了。

农村开会没有准时间，于村长看白果树的影子有点向东出来了，再一看人也差不多了，就开始说了：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事，又是一件大事。那就是，上级要开始搞统购统销了。”

大伙开了多少年的会了，还从没听说过“统购统销”这词儿，便纷纷议论起来。

于村长说，这是个新事儿，你们别瞎吵吵了，还是听我说吧。

“这些年，国家发展经济，城市里建了不少新工厂，增加了许多新工人，需要很多的粮食。而我们农村，这几年，生活提高了，吃的也比以前多了。你看，王大妈过个生日，还吃上了杂面汤。”

大家哈哈地笑起来。

“大家不用笑，这是个好事么。我也吃了一碗。”

大家这就更乐了。

“但是，国家能收上来的粮食就少了。一方面，吃饭的人多了；另一方面，收上来的粮食并没有多多少。这样，国家就难办了。所以，现在就提出了统购统销的办法。”

“统购统销，就是统一收购、统一销售。就是咱们农民打下的粮食，除了自己吃的、用的，余下的粮食都得卖给国家，再没有私人粮贩子了。先交公粮，那是顶农业税的，不给钱。交完公粮以后，还要把余粮卖给国家。规定你要卖多少，你就得卖多少给国家，少了不行。剩下的，才是你自己的。”

那价钱，谁来定呢？有人问。

“那由国家来定，不能讲价钱，这不是做买卖，所以叫统购。”

哪些人要卖；哪些人可以不卖呢？又有人问。

“所有的农民，也就是所有有土地的人，都得卖粮食给国家。顺便说一句，什么叫统销。就是所有的城里人，这里讲的是真的城里人，像住在黄港、或者县城里干公事的人。不是咱龙头镇，说是城里人，其实还是庄户生。”

下面的人，又都笑了起来。

“他们城里人，以后吃多少，也有规定，不能多买，不能多吃。”

“哎哟，那他们城里人得扎起脖子来，还赶不上咱庄户生呢。”不知哪个又插上了嘴，大家又是一阵笑。那时开会的气氛，还是很民主、很活跃的。

“那个就叫统销。”

那每户得卖多少余粮呢？有没有余粮，是不是余粮，谁说了算呢？还真有人问到了点子上。

“问得对。”于村长说：“今天的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每户要卖多少余粮，上面说了，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就是各户你自己报个数，大家再评议一下，看他报的是不是合理，就行了。报少了，国家收不到粮食；报多了，你自己的生活也受影响，不必要。”

“现在，各户自己报吧。”

大家安静了起来，只是三三两两地小声议论着。

“你们放心吧，国家不会让你们吃亏的。干部带个头，先报一下。我先报我自己家，六亩地，三口人，一百斤谷子。”

彭会计立马在纸上记着。

“我现在是一个人，吃得少，十亩地，多交点，二百斤。”赵玫说。

大家都惊得不得了，朝她那儿望去。只见她静静地坐着，虽然是树荫下，那红宝石似的发夹依然闪闪发光。

老王头笑笑说：“我不能和赵玫比了，我家是三亩泊地，四亩山地，四口人，也一百斤。”

于村长望着迟得法。老迟知道挨不下去了，就吞吞吐吐地说：“唉，我那点地，可怜啊，就五十斤吧。”

于村长说：“老迟啊，少了点吧？”

“那，那就六十斤吧。”迟得法不知怎么狠了狠心，从牙缝里挤出了六十斤的声音。

大伙又笑了。

鲁队长说：“你那地，怎么也得八十斤吧？”

“可不行，这可不行。”迟得法急得都站了起来。

“那就先写上六十吧。”村长说。

鲁队长又朝着大树后面喊了起来：“哎，哎！秦德才！别睡了！该你了！”

“啊，啊，什么事啊？”秦德才揉着眼装糊涂。

“你卖多少统购粮啊？”于村长问。

“我还卖粮？你看我什么时候还卖过粮？我自己吃的都没有了。今天中午，我还没吃呢，晚饭还不知在哪儿呢？”

鲁队长问：“那你来干吗？”

“我是来看看有没有吃的。”

大家又笑。

小林说：“有地就得交粮食。”

“那地我不要了。”

于村长说：“你那六亩，是全村最好的泊地，少报点吧，六十斤。”

“唉哟哟，给我六十斤还差不多。我可不要了，谁要谁去种吧。”

“这回可是谁也不敢要了。”迟得法忿忿地说：“你看那么好的地，长了这么高的草，作孽啊。”

“以后，就不是斗地主，而是要斗懒汉了。”小林说。

秦德才“哼”地一声走了。

17.3该交粮了

阳历的七月。

麦子刚收下来。

收的多的人家，在场上用石碾子碾；收的少的，就在自家院子里，用槌杖打。（注：槌杖，一种农具，脱粒用。用竹片扎成长约两尺、宽不到一尺的板，一头与一根木棍相连，板可转动。挥动木棍，板就顺势转动一圈打向地面。当然也要有技术。）

村干部们又要开会了。因为事情比较急，虽然天气很热，也没等到晚上，中午就在村西北的场院开了。

屋外的阳光很强烈，热气在往里涌。大家各自找地方坐，有的掀开褂子，用衣襟使劲地搨着，有的干脆光了膀子，喘着气，眯着眼向外看。

宗发奋也来参加了，坐在炕边上，看着大家精力不是很集中，有点不满意地说：“注意了，注意了，看这儿。”

于村长说：“不耽误大家时间了，我就赶紧说。关于统购统销，上级又来文件了。各家各户的统购数量正式下来了。最后的结果是，在我们上报的基础上各户再加百分之二十。”

大家听了一愣，脸上颇感意外。

宗干部看了大家的表情，更为不满，刚想张口，于村长看在眼里，赶忙先说话了：

“可能这个结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会给大家带来一定困难。但这是国家的需要。我们要理解，我们要接受，而且还要做好其他群众的工作。”

大家低头不语。

宗干部开口了：“乡亲们，同志们！这个数字，就是上级的任务，就是上级的命令！绝对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有困难，很正常。没有困难，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有困难，就要想办法去克服困难，千方百计地去完成任务，皱眉头干什么？大不了，自己少吃一口就是了，有什么了不起呢。想想那些牺牲了的烈士，我们还有什么可说。全村一万斤的任务，一定要完成。全乡二十万斤的任务也一定要完成。只能超额，一斤也不能少，就是头拱地也要完成。这就是我们革命队伍的规矩。”

说到最后，宗干部站了起来，把随身带的那本书往炕上一摔，脸色冷峻，声音嘎然而止。

宗干部学这一套学得很快，果然，显出效果来了。

民主村的干部们从没见过自己人开会还有来这一套的。

更没人说话了。

“大家说话吧。”宗干部催着说。

过了一会儿，还是老王头开了口：“多交就多交吧。”

于村长说：“秦德才的那份咋办？”

鲁队长说：“这种人，没办法。”

宗干部说：“这种人虽然有缺点，但还是我们革命队伍的战友。有困难，我们大家怎么不能帮他一下呢？”

于村长说：“要不，就大家分摊一下。”

小林说：“这没有道理，迟得法会愿意给他分摊吗？”

于村长说：“实在不行，那就我们干部分一下吧。”

大家又无语。

等了一会儿，于村长说：“没有反对的，就这样吧。”

大家各人走各人地散了。

路上，鲁队长跟上了村长，不解地问：“咱们村开会，从来没有这样过。为什么搞互助组都没矛盾，搞统购统销，大家心里会有意见呢？”

于村长说：“这还不明白，搞互助组没要大家往外拿。搞统购统销，是要往外拿的。如果上面的政策再不够完善，那矛盾自然就起来了。这样的事，以后还会有呢。”

是的，那个紧箍咒，这才开始紧了第一下。

第十八章 新疆在哪里

1949年6月18日

这年的秋天，1954年的秋天。

一个消息，对于乡亲们来说一个重大的消息在龙头镇、在民主村飞快地传开了。

原先驻防在南门外的一营，和龙头镇群众一起、为保卫龙头镇而拼死拼活、流血牺牲的三年前入朝参战的一营，已经换防到新疆去了。

这是潘连长刚来信说的。

前两天，潘连长给纪乡长来了封挺长的信。潘连长有两年多没来信了。纪乡长去了几次信，都没有回音。把纪乡长急得吧，生怕是出了什么事。上了前线，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封信里，潘连长才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他们守备师在入朝之前，和华北地区的一支原国民党起义部队合编，他们守备师的干部不少人都提了一级半级的。在朝鲜战场上，打得挺艰苦，部队伤亡挺大。当初，纪排长手下的许成才、郝森林也都牺牲了。连那个胡指导，也失踪了。民主村乡亲认识的原先一连的人，剩下的不多了。今年春天，整个部队都调到了新疆，大部分转为刚成立的生产建设兵团。他算是好的，转到了一个劳改农场，当场长。三连的叶连长到一个县政府机关，离他还比较近。只有令营长还留在部队上，大概是正团级了。

潘连长在信中，一再说是很想念海源，很想念龙头，很想念那儿的大海、山峦和乡亲们。说是在新疆，满眼的戈壁荒漠，风沙弥漫，干旱缺水，寒暑无常，很不习惯。尽管自己还是个走南闯北、能吃苦的人，也过不上来。真羡慕纪乡长当初及时转业在了海源。

纪乡长拿着信纸，真觉得有好重的分量，不禁低头沉思起来。昔日的战友们，又一个个活生生地浮现在眼前，多少次在战火中出生入死，一起拼杀。如今，他们在朝鲜战场又经受了一次血与火的历练，而且就是在这个大海对面的半岛上。自己却在大海的这一面，享受着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与安宁。想起自己能在龙头工作，真是十分的幸运，真要感谢当年组织上的安排。潘连长在信上说的一点也不错，龙头是个好地方，龙头的乡亲们更是好样的。战争年代，他们撇家舍业、舍生忘死，提着性命来追随革命，再大的牺牲也毫无怨言。和平建设年代，又是咬紧牙关，克服种种艰难困苦、辛勤劳作，硬是用一滴滴汗水，重新撑起了家园。日子稍有好转，还时时不忘克勤克俭、支援国家。多好的人民，多好的乡亲啊。而自己的工作呢？不能说做得很好，只能说是一般化，只是跟着上级的指示走。想到这些，纪乡长的心中似乎有着几分的歉疚，对战友的歉疚，对工作的歉疚，对龙头乡亲的歉疚。龙头应该有更大的发展，龙头的乡亲应该过上更好的生活。

纪乡长知道民主村的乡亲们一直在牵挂着部队，也该去跟他们说说。

他过来找于村长。于村长正在西北场院跟几个人议论着事呢。村里面已经成立了好几个互助组，可是有的户数多、有的户数少，有的劳力多、有的劳力少，是不是要由村里调整一下。于村长看见纪乡长过来，忙招手说：“纪乡长，你怎么知道我们正在讨论事呢？”

纪乡长说：“我这也是凑巧过来。你们在讨论什么呀？”

于村长把事一说。

纪乡长想了想说：“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还是要强调自愿。想调的人，本人要提出来，调进、调出的两个组都要同意才行。不要把好事情弄得疙疙瘩瘩，心里不高兴，这就不是我们的本意了。”

经老太说：“是哎，群众自愿是我们的基本原则。这样各项工作才能顺利进行，才会有成效。当然，这就要我们干部深入各户，多做工作。乡长啊，你今天来一定还有别的事吧？”

纪乡长笑起来了，“啊呀，经老太你真厉害，我的话还没说，你就知道我心里想的啦。”

杜家骏说：“乡长，你肯定是带来什么好消息了，快跟我们说吧。”

纪乡长看着大家，就说了，也算不上是好消息，就是我们以前南门外一连的潘连长来信了，说他们已经撤出朝鲜，调到了新疆。我知道你们一直都挺关心他们，所以，过来跟你们说说。纪乡长把这事大体讲了一下。

这一说不打紧，大伙的情绪都抑止不住了。怎么也不理解，当年的龙头驻军不但不打美国人，而且还撤回来了。虽然他们也已经听说，朝鲜停战了，不打了，可脑子里还是转不过这个弯来。

鲁队长就问：“为什么要停战？我们解放军从来就没有停战过。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想打哪儿就打哪儿。怎么要停战呢？”

平金刚更是急了，直嚷嚷：“还把军队给撤回来，这仗不就是白打了么？”

于村长看平金刚激动成那样，就来缓和一下：“也不能说是白打。这不是把美帝国主义赶回三八线了么。”

平金刚还不服：“咳，本来就在三八线。他过来了，咱再打过去，还是在三八线，这不就是白打了么。就算不把美帝干掉，怎么地也得把南朝鲜都给解放了呀。”

纪乡长明白些，就开导起乡亲们：“我说乡亲们哪，这不是白打。虽然还是回到三八线，但是我们给了美帝国主义一个沉重的打击。结结实实地把它打痛了，以后它就不敢再轻举妄动了。有北朝鲜在那儿，把美帝和南朝鲜档在外面，咱就安全多了，就可以安心搞建设了。要不然美帝跑到鸭绿江的河对岸，天天看着咱们，咱也天天盯着它，你能睡得着吗？你还有心思搞社会主义建设么？”

这一番话，说得大家直点头。是啊，是这么回事。用志愿军战士的鲜血，保住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让鸭绿江的对岸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地盘，争取到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大环境，也值啊。

西北村的乡亲们那时当然没法去全面分析朝鲜战争的得与失。这个话题讲起来，头绪就多了。即使是在今天，在朝鲜战争停战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也很难在这儿做个全面、透彻的评价。

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到底得到了哪些，又失去了哪些？简单讲，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是保住了金日成政权。但也就是这个政权的狂热无知，对自己的人民和别人都不负责任，一再的决策失误，才闹出了这场战争。当时，金日成简单地以为美国在1949年抛弃了蒋介石，也一定会在1950年再抛弃李承晚，这正是挥军南下、吞并整个南朝鲜的绝佳时机。谁知当北朝鲜真的突然袭击、大举南下时，世界哗然，美国当局如梦初醒，连忙反击，来个拦腰切断，打得北朝鲜措手不及、满盘皆输。就在美国军队横扫朝鲜半岛，眼看就要推进到鸭绿江边时，又一件出人意料的事发生了。中国出兵了。中国出动了78万军队（另一说是135万，这可能是一次性与累计数的不同，即统计上讲的时点数与时期数的不同）。美国当局也没料到这一手，连忙后撤，一口气退到三八线附近据守，北朝鲜得以继续存在。

然而，就是这个用几十万中国军人的生命和鲜血保下来的北朝鲜政权却自始至终与北京方面心存芥蒂，公开的和暗地的矛盾不断。据2014年2月2日凤凰资讯转引韩国媒体SBS报道，金正恩因对中国在东北地区军事演习不满而放狠话说，“鸭绿江不但是国界，也是战线。”看如今的中朝关系还真不如与原先的死敌韩国之间的关系。中韩关系还倒比较自然和正常。

而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首先是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巨大损失。据总后勤部卫生部编写的《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经验总结》里说，我军先后出动志愿军135万，最后健全回国的只有37.2万人，即伤亡、失踪、被俘近百万人。这场战争拖累了国内亟需的经济建设的后腿，也使我国在外交上陷于孤立，错过了建国后和平发展的大好时机。同时也使几乎已经水到渠成的台湾问题无法解决、延宕至今。

至于朝鲜战争对中国国内政局的影响，更是重大而深远，甚至到了无法评估的地步。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在志愿军总部被美军飞机炸死，影响了后来可能有的接班方式。毛对彭的芥蒂难以释怀。当初一开始是要林彪领军入朝，林当滑头推辞了，彭当了志愿军的总司令。1958年10月24日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才几个月之后，1959年7月庐山会议彭就被整，其原因远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

对参与朝鲜战争是否得当，三年之后，毛泽东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点。1956年9月18日，毛泽东就说：“对朝鲜劳动党的做法，过去就有意见，例如朝鲜战争”。1957年7月5日，毛对来访的米高扬说：“斯大林、金日成对中国刻意隐瞒发动战争的时机及作战计划，最后，中国却被牵连进战争，这是错了，绝对错了。”（这二句引文及上面提及的志愿军损失人数，请见《炎黄春秋》2013年12期何方的文章《朝鲜战争的得与失》）

今天再来看这个问题，看看金家政权的种种恶心表演，真是感慨万端，不仅仅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问题。都怪别人么？

但乡亲们的思想问题还没完全解决。“怎么上了新疆啦？为什么没回咱龙头呢？”平金刚又着急地问上了。

“这恐怕上面有统一安排。不过，不回到咱这儿还是太可惜了。我们真是想着他们呢。”鲁队长惋惜地说。

“他们都去啦？那令营长呢？”彭会计照例很少说话，这回却插了一句。

“他们都去了。令营长还在部队上，还当了团长了。”纪乡长说。

大伙也高兴起来，平金刚还拍了两下巴掌。

“潘连长自己呢。”杜家骏问。

“他转业到了一个农场，当场长。他在信中说，很想念你们呐。”纪乡长没说是劳改农场，怕说起劳改两个字会扫了大家的兴。

大伙也挺高兴。

“他们都当上长啦？”经老太问。她知道，当上长不光是意味着荣耀，还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也不是都当上长。一连有不少老战友牺牲在朝鲜了。当初和我一个排的，后来也都提了排长的许成才、郝森林他们都牺牲了。”纪乡长的声音低沉了。

大伙的眼神里也显出了悲切。

纪乡长又说：“那个胡指导员，也失踪了，不知下落。”

“噢？”大伙又迷惑了起来，本来挺开朗的心情又起了疑团。

“那新疆在哪儿呢？”经老太又问。

“新疆？新疆好远喔。在我们国家最西面、最西面的地方。”鲁队长知道点，回答说。

“那……那，上了那么远的地方，不去打台湾啦？”老王头又插上了一句。

这句话打中了民主村乡亲们心头的要害。这几年来，乡亲们所以对南门外的这支部队牵肠挂肚、念念不忘，不只是因为当年的战斗情谊，更是对他们寄托着更大的期望，盼望着他们能去解放台湾，解救亲人啊。

这下怎么去了新疆呢？老王头的心里似乎一凉。

“不要紧的，我们在东南沿海还有好多解放军呢。派一支部队去打台湾就行了。”杜家骏在解释着。

“那我们也想知道新疆到底在哪里，打台湾能够得着吗？”老王头还是执著地问。

“新疆可远了，走几个月也走不到。”鲁队长解释说。

“乖乖，到黄港走三天就到了。王山那年支前，走到淮河也就是走了一个月。走几个月的路，那得多远啊。”老王头说。那时的人们，都是用要走几天的行程来说明路途的远近。比如说，到黄港是要走三天，到省城是要走七天。

确实新疆之远，不是当时的老乡们所能想象的。

于是，场院上的人们沸沸扬扬地议论开了，都刹不住车。鲁队长比划了半天，最后说，跟你们说不清，领你们到学校去，拿张地图一看，就明白了。

“等下午再去吧，都快晌了。”于村长说。

“不，不，现在就去。这事搞不明白，吃不下饭。”平金刚的性子也挺急。

于是，好几个人立马跟着鲁队长拔腿就走，嘴里还嚷嚷：“去找新疆，快去找新疆，看看到底在哪儿？”往东门外疾步而去。

纪乡长看着热忱而又单纯的乡亲们，摇摇头，笑了。

鲁队长他们在街上走着。当年的一营调防去了新疆的消息立马一传十、十传百地轰动了整个龙头镇。人们纷纷走出院门，来到街上，或三五成群地驻足议论，或干脆跟着去了学校。东街上，人们纷至沓来，神情庄重，好像也要跟着一营去新疆一样。

龙头的乡亲把这事看得那么重，不仅仅是出于对一营的感情和牵挂，还有他们更深远的想法。就像刚才说的，他们是把解放台湾的希望，把解救自己亲人脱离国民党牢笼、返回家乡与亲人团聚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们所熟悉的、所敬仰的部队身上。

朝鲜战场的停战，去年他们听说了。

很多乡亲没听到纪乡长刚才在田里的解释，也是很理解：怎么不打了呢？怎么不打过去呢？打下了朝鲜，不就能转过去包抄台湾了吗？

可真的是停了。乡间还有一些传言呢，有的说，是因为斯大林死了。有的说，是因为打日本鬼子之前，美国和苏联讲好了，以三八线为界，这边不过去，那边不过来。

朝鲜停战了，部队可以回到海源来休整，再接着去打台湾呀。怎么去了新疆呢？新疆在哪儿呢？这不但是老王头所想的问题，也是所有龙头的乡亲们所牵挂的问题。

东门外的小学，正在午休时间。

孩子们在操场上唱着当时最流行的歌曲：

“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啦，

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啦，

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

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败了美国兵呀，

全世界人民拍手笑，

帝国主义害了怕呀。”

在孩子们的歌声中，鲁队长带着的几个人，先进了学校的办公室。那时，有点文化的、或者是向往有文化的年轻人，还挺愿意来学校走走看看。在农村里，学校就是文化的象征，是农村人心目中的一块圣地。所以，有乡亲们来，学校的老师们并不见外，还是很客气、很欢迎的。

李辰忙把他们请了进来。

平近芳现在也是这个学校的老师了，见着自己村里的人过来，嘴上说着：“哥，你们来啦。”高兴的忙前忙后。

可这些人也不需要请坐倒水的那些礼节，就平金刚还问了句：“你在学校还好啊？”

“多亏得有李老师一直在帮助指导我。”

李辰忙说：“嗨，平老师，你就别客气啦。在这儿，咱都是平等的、一样的，都是老师，相互帮助、共同提高。哎，今天你们来这么多人，是干啥呀？”

“找新疆，找新疆。”鲁队长急得没顾上多解释。

几个人朝着墙上的地图就过来，齐刷刷地围着，仰头看着。这回不是找台湾，而是在找新疆。

“新疆在哪儿呢？”平金刚问。

“我找找，我找找。”鲁队长满地图地找呢。

“找新疆？干什么呀？”李辰奇怪地问。

“咱们的一营，去了新疆啦。”鲁队长说。他又把事情解释了下。

“啊？这么回事啊……新疆啊，在这儿呢。”李辰也觉得很是意外，看大家这么急，便指向了地图的西北角，“跟咱西北村一样，它也在西北角。”

民主村因为是在龙头镇的西北角，所以也常叫成西北村。新疆也正巧是在祖国的西北角，冥冥之中两者还真的有什么联系？这几个西北村人，这时还没想到这一层，却是先想到了李辰。

李辰已经以西北村人自居。西北村人的活动，也常有他的身影出现。

“咱西北村，咱西北村……听听，多亲切。”鲁队长一边用手比划着一边夸张地说着。

大家哈哈地笑着，都喜欢拿这位西北村的可敬又可爱的准女婿开心。

“啊呀，那么远啊！”平金刚惊讶地说。

赵玫也过来了，站在后面，想看看新疆在哪儿。

一看到新疆在西北的西北，而台湾在东南的东南（她也早知道董平章在台湾，和台湾在哪儿了）。一个在地图的这头，一个在地图的那头，隔得那么远。赵玫不由心里凉了半截，这还能打到台湾去么？

看着解放军到了那么远、那么远的西北面，看着孤悬在海上的台湾岛，虽然从海源过去在地图上也就一个巴掌的地方，但觉得董平章回家的路更远了、更难了、更遥遥无期了。

五年了，董平章被国民党抓走五年了。赵玫哪天不在思念、哪天不在牵挂、哪天不在依门盼望。但却好像越盼越远了，怎不叫赵玫心里像猫抓一样。

赵玫的心里觉得发凉，鼻子发酸，眼眶都转着泪水。

她在强忍着，用手捂着鼻子，抹了抹眼睛。好在她是在后面靠墙站着，别人没注意到。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赵玫有着那样的伤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内地的人来说，新疆一直是个遥远的、神秘的、美丽的、令人向往的地方。

“别看着远，新疆可是好地方哎！”杜家骏说。他是属于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而自己尚属比较年轻的那一种人。他当然没有赵玫那样的感受。

“好像有首歌，就叫‘我们新疆好地方’。”平金刚说。

“家骏行吧？”鲁队长说。

家骏忙摇手：“这是首少数民族的歌，不好唱。我不会。”

“海秀，你来唱，你会。”不想李辰把小林姑娘拱了出来。

“哪有你这样的。”小林要拍李辰的脑袋。

“不可以，不可以的。李先生可是我们民主村的宝贝，不可以打的。”鲁队长忙装着护李辰的样子，这又引来一片笑声。

家骏说：“小林，你会唱就唱吧。我还想学学呢。”

小林也就大方地唱了起来。在李辰的精心指导下，小林的唱歌水平大有长进，已经唱得不错了：

“我们新疆好地方哎，

天山南北好牧场，

葡萄瓜果甜又甜，

积雪融化灌农场

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来哎，

我们美丽的田园，

我们可爱的家乡。”

“呀，唱得真好，新疆也真是好。”赵玫掩饰着内心的伤感，也插了一句。

“什么时候，咱也能去看看？”鲁队长神往地说。

“听说新疆的姑娘，也特别漂亮。”平金刚又多了一句嘴。

小林故意噤上了嘴。

鲁队长使劲地拍了下平金刚的后脑勺，说：“看你歪歪地想哪儿去了。你看咱西北村的闺女媳妇，天底下还有的比么？”

平金刚疼得“哇”地叫了一声。

“不过说真的，能有机会到新疆去看看，真的是不错。”赵玫平静地说。这几年，赵玫的伤感和坚韧，在别人看来更显得成熟了，虽然年龄和他们基本相仿。却未料十一年后，赵玫还真有了一段新疆地盘上的血泪之行。

“看新疆哦，看新疆在哪儿哦！”嘈杂的声音涌进了小小的办公室。

李辰往外一看，窗外、门外已是挤满了人。

“我们也要看新疆啊，我们也要看新疆啊。”门外的人嚷着，想挤也挤不进来。

李辰干脆把墙上的地图轻轻地揭了下来，又拿了个板凳，挤出门外，说：“不着急，别挤了，我来给你们看。”

人们的眼光都盯着那地图在移动，“新疆在哪儿呐？新疆在哪儿呐？”

李辰来到门外，站上了板凳，一手举着中国地图，一手指着图上的西北角，那一块最大的省区，跟紧紧围着的乡亲们说：“这就是新疆，这就是令营长、潘连长去了的新疆。那儿可是个好地方啊！那里有吐鲁番的葡萄，有又香又甜的哈密瓜。”

这些东西，乡亲们不但没吃过，还是第一次听说呢。

“那儿能打到国民党吗？”人群中还是有人问着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国民党啊？那肯定是跑不掉的。你们看，台湾在这下面呢，就这么点儿，一巴掌就过去了。”

李辰真的一巴掌打在了纸上，那地图立马就撕开了条裂缝。

乡亲们颇为满足地笑了。

李辰心疼得赶紧把地图放了下来。

第十九章 淮北灾民

1949年6月19日

19.1来了王溪

还是这年，1954年。阳历十一月。

庄稼都收回来了。

这一年，年景一般，雨水偏多。但有了互助组，还是起了作用，大家相互帮助，解决了一些单家独户不宜解决的问题。收成还是不错，但收入没怎么增加，因为政府对余粮定的统购价并不高。

有些人家对此是有些意见。不过，毕竟要比解放前好了，加上干部们带头交粮，又做了不少群众工作。所以，村里的情绪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波动。

海源的地形地貌、气候和土质等自然条件都不错，很少有过不去的自然灾害。但别的地方就不一定了。

这一年的夏天，淮河闹了水灾，还有两处朝北的堤岸决了口。有些灾民，就流浪到海源这边来。海源农村的条件比较好，是附近百里、千里都有名的。尽管说起来，也算不上富裕，可一到灾年，总有一些灾民拖儿带女，衣衫褴褛，脸有菜色，疲惫不堪，不远百里千里，来到这一方，以图度过这一段难关。虽是解放之后，也没断了这种现象。

这天，西门口又来了一老一少两个乞丐。年长的，是个女的，从外表已经看不出年纪，蓬乱的头发上顶着一个很不合适的破毡帽，破旧的衣服到处都翻出灰黑的棉絮，勉强遮盖着瘦弱枯干的身躯，扁平的胸脯，无神的眼睛，满脸的沧桑和疲惫，一手拄着棍，一手拿了个破铁桶，步履蹒跚，手臂颤抖，真不知这一千多里是怎么走过来的。小的，是个四、五岁的女孩，满脸满身的污垢，都看不出穿的是什么衣服，甚至看不出是男孩还是女孩了，只能从那一头乱蓬蓬粘成一团的头发，猜想应该是个女孩了。小女孩，倒并不瘦，苦难没有打蔫她，圆圆的大眼睛还滴溜溜地转，挺有精神。这是对母女俩。

王大妈，现在松快多了。地里的活，有他们爷俩；家里的活，有丁妹。吃完午饭放下筷，想起来还能出来走走。镇里的十字路口，已经开了两家店，一个卖杂货日用品、一个卖农具种子，使龙头镇的“城里人”有了新的去处。

王大妈出了门、上了街，瞧见西门口有几个人围着，便走了过去，看到的正是那要饭的一大一小母女俩。

那妇人坐在地上，倚着城墙，手擎着小铁桶，眼神满含着忧伤，哆嗦着，似有几份病态，不停地朝围观的人群点头说：“可怜可怜吧，可怜可怜吧。”

那小女孩，站在一边，噘着嘴，似乎在生什么气。

“扑通”一声，平金刚挤进来朝那铁桶里扔了块菜饼。

“谢谢，谢谢，恩人哪。”妇人朝着他连连作揖。

弄得平金刚怪不好意思的，赶忙又退到后面去了。

小女孩从桶里拿出饼子，看也不看，捧在手里就啃上了。

“恩人们哪，我知道你们海源这地方人啊。这是我的女儿。这孩子，我实在带不动啦，你们谁家大慈大悲收留了她吧。”

大家没想到妇人会这么说，都一愣，议论了起来。

“你把她留在这儿，你回去，孩子她爹能让你过去吗？”有人问。

“唉，她爹死啦，她爷爷奶奶都死啦，家里没别人啦，家里什么也没有啦。”妇人摇着头、不堪回首地悲叹着说。

“你把她留下了，那你自己怎么办呢？”又有人问。

“我还有什么怎么办？我是没有办法了，有今天没有明天啦。所以，我要给她找个人家，我也能闭上了眼了。”

“唉……”人群里也是一片可怜同情之声。

王大妈直盯着那小女孩看，一阵阵的心思涌上来。她一是心软，看着那孩子可怜，不免有侧隐之心；再个是，她又想到了丁妹，当初丁妹不就是这样来的吗。现在，她更觉得留下丁妹是做了件好事。她让丁妹有了好生活，而丁妹也是好样的，吃苦耐劳肯干，没有做错过一件事，没有说错过一句话，没有辜负她们王家对她的一片心。可是，眼看着本来好好的日子，没想到王立却被国民党抓去了。她王大妈既牵挂自己的儿子，也看着儿媳丁妹的失魂落魄，心里很不是味。虽然，丁妹从来没向自己说过这些，但自己作为一个女人，作为更年长的女人，完全能理解丁妹内心的想法。

王大妈看着那女孩，心想难道这又是一个丁妹？

给学校做饭的郭大妈在一旁看出了王大妈的心思，就低声说：“要不，你就领回去吧，也能和丁妹做个伴。”说完，还看着王大妈的脸，怕说错了话。

王大妈倒也是有了这个心，可不知道家里老王头是怎么想的呀，他在家还是个做主的人呐。

大概是王大妈朝那女孩多看了几眼，那小女孩突然扑了过来，抱住了王大妈的腿，喊起了：“娘，娘！”

王大妈先是一惊，推了一下，没推开，却没忍心推第二下，嘴里喃喃地说：“这怎么好，这怎么好。”

郭大妈说：“那你就收下吧。你看，那孩子也看上你了，也是有缘啊。”

那女孩子别看还小，却很懂事，很机灵，一听这话，更是靠在了王大妈身上，又是叫着：“娘，娘，我饿。”又是硬看着王大妈的脸。她知道，这是救自己的机会啊。

王大妈停了一会儿，心软了，就对那妇人说：“那你怎么办呢？孩子是你心上的肉啊。”

“不用管我了，不用管我了。”妇人含着泪说：“我也不舍得啊，但是不能让她跟我一起死啊。这孩子能有个活路，我就谢谢你了，我替孩子他爹给你磕头啦。”

妇人真的弯下腰，朝着王大妈触地磕头，弯得都直不起来了。

王大妈忙扶起妇人，只觉得那妇人很轻。

妇人拽着女孩，泪眼婆娑，迟迟不舍得放手。

“不舍得吧？”王大妈也不一定非要留。

妇人狠狠心，推开了孩子，“你跟着大妈去吧，再投一次胎吧。”

“孩子叫啥名，你们老家在哪？”王大妈细心地问。

“你不用问了，我以后不会来找她的，你们放心地养吧。我不会像有的人，过几年等人家把孩子养大了，又回来领走了。我真心诚意地把孩子交给你，谢谢你了，你是孩子的重生父母，大娘。”

妇人含着眼泪，又要磕头，王大妈拦住了。

妇人又说：“这丫头，挺有灵气的，也有点小脾气，不用惯她。”

“哎，哎。”王大妈连连点头，问：“那你呢？”

“我就走了，走哪算哪了。我小时候，跟爹妈要饭，也来过这里，知道这儿是好地方。那时我娘就想把我留在这儿，没留成。今天，我就是死在这儿，也能闭上眼了，这也是命吧。”

大家都欷歔不止。

“我回去拿几件衣服、几块干粮给你。”

“不用了……”妇人只是低头擦泪，听见有往外走的脚步声，才抬起头，一直看着女孩的背影。

女孩倒是乖巧，拽着王大妈的衣襟，一步不离地跟着走了。

不知她们母女俩，何时才能再见面。

丁妹收拾好了中午的碗筷，进了自己南面的倒房。

屋里很阴冷，丁妹也不想多烧一把火、暖和一下炕，毕竟拾柴火也是要花时间的。家里养了牛、养了猪、还养了鸡，这些都是自己的活，从早到晚几乎没有闲下来的时候，更何况地里的活，也是一样少不了的。活多一点、忙一点、累一点，对于丁妹来说，都觉得没什么。最难忍的是，进得屋来，自己一关上门，顿时就那么的暗、那么的冷，从心底里发出的彻骨的无处躲藏的冷。

五年了，王立走了五年了，自己的丈夫走了五年了。五年来，没有任何的音讯，好像越走越远。丁妹不愿意听“走了”这个词。民间的习惯，这个词说的就是“死了”。人死了，心也就死了。然而，这样的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却是最难熬、最难将息。

五年了，丁妹的内心没有一天不在思念，没有一天不在煎熬。丁妹只有不停地劳作，不停地奔忙，不停地擦汗，不敢有一刻的停下来。家里人、村里人，都在夸丁妹的勤劳，却不知丁妹心中深深的痛楚。

或许，王大妈和王老头不会不知道，但是开不了口，怕丁妹陷入更大的烦闷。纯朴的北方农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做这样的思想开导工作。他们只是各自默默地想着，说着一些题外的话，让岁月能抚去一些内心的伤痕。

丁妹依在凉凉的炕上，闭上了眼。眼前，就是王立，他现在在哪儿，他现在还好吗。千百次地问过自己，从来没有答案，却依旧还在千百次地问自己。丁妹睁开眼，眼前是暗暗的、无声的屋子……本来是多好的家、多好的男人、多好的生活……都叫该死的国民党给毁了。命运为什么会对自己这样呢？丁妹答不上来，也没地方倾诉，当媳妇的怎么好意思向公婆去说自己想男人。丁妹永远是默默地承受，只有这时，一个人关起门来的时候，丁妹才会流下痛苦、委屈的泪水。

忽然，院门“咿呀”地开了，丁妹听出是婆婆回来的声音，好像还有个小孩的脚步声。丁妹是个细心的人。

还没等再想下去，响起了老王头的声音：“这是谁家的孩呀？怎么脏成这样？”

“我又给你领个姑娘回来。”婆婆在答话。

“别看脏，眼睛到还挺精神。”王山在说。

丁妹已经跨出房门进了院，见到了小女孩，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一瞬间，脑海里闪过了多少往事，这不是又一个自己么。

丁妹弯下腰，拉着女孩的手，问：“孩子，几岁啦？”

这女孩还不认生、挺大方，回答说：“五岁了。”

“这孩子，还行吧？”王大妈问着大家。

“行啊，行啊。西面发大水了，又有不少人遭灾了，能拉一把就拉一把吧。”老王头也挺想得开。那时，也没有什么户口和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的困扰，想问题也比较简单，就应下来了。

“人已经领进门了，还能退回去么，又不是买头驴。”老王头其实也没想过还要添口人，不过既然老伴已经把人领回来了，就不能再说别的话了。何况，那时养个孩子不比养头驴更费事。他没想到的是，增加一个家庭成员，可不比增加一头驴，日后给这个家增添了多少是非纷扰。

“那赶紧洗个身子，换个衣服吧。”丁妹在这家里不会轻易表态，但行动往往是走在前面的。她对孩子的感情是复杂的，当然，首先是怜惜的、爱护的。

“你叫什么名字呀？”王山像个大哥哥似地问。别看是个大小伙，王山也是很善良、很富有同情心的。

“俺娘说了，到了新家，就用新的名字。”女孩说。

“那你妈早就准备不要你了，你愿意吗？”老王头有点疑惑，问了起来。

“我娘早几天就病了，走不动了，就跟我说，要给我找个好人家。我不愿意，娘就生我的气，说我不懂事，今早晨我俩还呕气呢。”

“那你愿意留在这儿啊？”王大妈问。

“我想通了，我在这儿才有活路。”

“唉，那就给小妹起个名字吧。”王山也是个憨小伙，这就已经叫起小妹来了。

“从西面来，那就叫王西吧。”老王头说。

“那就不如叫王溪，溪水的溪，更好听些。”王山说。

“好，好。”王大妈说。

“我叫王溪啦。”小女孩也挺高兴。

丁妹已经烧上了水，准备给小王溪洗把脸，手上、身上擦一下。那时候，专门烧水来洗脸洗手是很不平常的事。

王大妈突然想起什么，对丁妹说：“我差点忘了，你去找几件旧褂子。王山，你拿上几块干粮。给王溪她娘带上。我的褂子太旧太老，给她妈穿，不合适。”

不一会儿，王山就拿上丁妹找出的几件比较起来还算不错的衣服，裹上几块饼子，就出去了。

这屋里，那丫头却不会洗。她已经不知道怎么洗手洗脸了，都想不起这是怎么回事了，只是愣愣地看着丁妹。

丁妹看着小王溪满手满脸、甚至满身那黑黑的厚厚的灰垢，都结成了一层层皮的，头发里、身上散发着一阵阵熏人的恶臭。尽管丁妹家自己的卫生条件也很有限，但她也受不了了。她知道简单地擦一擦，已经解决不了问题。她干脆把小王溪的衣服都脱了，用瓦盆里的水认真真地擦着洗着。小王溪生平这还是头一回算是洗澡，这在西北村也是难得的事，这是淳朴的老王头家在迎接新成员的到来。

快一个小时了，王山又捧着衣服，原样地回来了。

“怎么了？”王大妈惊诧地问。

王山告诉了原委。原来，王溪她妈等王大妈一走，也就起身往东走了，大概是怕王大妈反悔再把孩子退回来。王山就往东赶去，在东门外追上了。可王溪她妈高低也不要衣服，说不是卖孩子，再说拿在身上也背不动。最后再三劝说，才把饼子留下了。

“唉。”大家只有叹息无语。

这时，丁妹已经把王溪擦洗好了，用自己的旧衣服把她裹了起来。

“还得赶紧给她做件小衣服。”王大妈说。

“今晚上，我找几件衣服改改吧。”丁妹说。

经过这番擦洗的小丫头，这才露出了点她皮肤的本色，在热水的刺激下似乎还有点红润，看上去跟之前那个讨饭的丫头已经大不一样。中国传统的汉语里没有“洗礼”这个词。这时候，看这小王溪的变化，倒是能体会出这个词的含义。

小王溪开始了她新的生命。而且由此在以后的几十年里，给她自己、也给老王头一家带来了一言难尽的后果。

19.2一对苦命人

第二天，清晨。

东门外八九里地的孙家疃。

昨夜下了场小雪，尖溜溜的北风刮着，树梢上没攒下雪，干雪片贴着地面随风飞旋。

天挺冷了，小河沟已经冻上了冰碴。

孙大娘，当年救过小钱的那个孙大娘，清早就出门上山拾柴火。

她的儿子孙武胜支前倒是回来了。可是她那个儿子不争气，是和秦德才一类的二流子，好吃懒做。回来几年了，房子还是那样，甚至更破旧了。一年的收成，还不够老少两个人吃的。连烧的柴火，满山都是，出门几步就有，也不肯去砍。说是支前太辛苦了，已经为革命出过力了，出力出过头了，听着出力就头疼，实在不想再出力了。就这样一年年地懒下去，三十好几了，一天天地躺在炕上。如今连打柴的活，也得七十好几的白发老母上山去砍回来。

孙大娘顶着嗖嗖的北风，踩过冰冻了的小河沟，走过村北的小场院，在一堆草垛下，看见一堆棉絮，心里正纳闷，谁会把棉絮扔到这儿来。

再走过去一看，大吃一惊，是一个人，一个女人，缩卷在那儿。

孙大娘走近低头仔细一看，那棉絮上、从棉絮里伸出的散乱的头发上，都是点点的雪花，棉絮和头发还在冷风中晃动。

孙大娘轻轻地喊了声，没有反应，又大声地喊了声，还是没有反应。

孙大娘又摇动了她一下。她的身子一下翻了过来，双目紧闭，脸色苍白，毫无知觉。

一个死人！

孙大娘大声地呼喊起来。在寒风中，寂静的早晨，那凄厉的叫声一下就惊动了整个小山村。

人们围上来，看着，说着。

“昨天下午，看见她过来的，好像走得很累。像是个要饭的，可是又没要。我没去问。”

“傍黑天，我看了有个人，在这草垛边，我也没理会。”

人们正说着，地下的棉絮里似乎呻吟了一声。

人们大惊，“还活着，没死！”

“别讲废话了，往回搬吧！”

孙大娘的儿子孙武胜也来了。

孙大娘对他儿说：“快，快搬回去！”

孙武胜抽了抽鼻子，满脸的不愿意，“这么重，哪搬得动。”

旁边有人说了：“孙小二，别想不开，这是天上掉馅饼，扛回去就是你媳妇啦。赶紧搬吧，晚了，就没你份了。”

孙小二一听，不知从哪来的力气，扛起那堆破棉絮，就回家了。

这堆破棉絮里的，当然就是王溪她妈了。这儿还是先称呼“那妇人”吧。

孙大娘忙着点火、热炕、烧水。

一个多时辰之后，那妇人才慢慢地醒来，睁开了眼。脑子似乎还清醒，问：“这是哪儿呀？”

“这儿是孙家芥。”孙大娘答。

“这儿离那个镇有多远？”

“八九里地吧。”

妇人似乎松了口气，她心里还是在怕，怕她的女儿再被送回来。她昨晚几乎要丧命的结果，说明她白天送走闺女的狠心是对的。

“我怎么上了你们家？”妇人虚弱地问。

“昨晚你在场院上冻僵了，我早晨出来，看见你了。”

“谢谢大娘了。”

孙大娘很轻地一笑，说：“没什么，都是苦命人哪。别多说话了，先歇息吧。我端碗糊糊过来，暖暖肚子。”

妇人慢慢地喝着。

孙大娘上院子收拾去了。

孙小二便急不可耐地进得屋来，看着炕上的妇人，虽然心猿意马、想入非非，可对方又是蓬头垢脸、面色焦黄，怕有四五十了。这样的人，也算是“天上掉的馅饼”么？

“管她呢，先尝尝再说。”

孙小二恬着脸，嘴里说着：“大姐，身上还疼啊？肚子还舒服啊？”便伸手往那棉絮里面去。

那妇人“嗷”的一声坐了起来，正色道：“你要干嘛？”

“还能有什么？你说干嘛呢？嘻嘻。”孙小二一脸流气。

“呸！你瞎了眼！”那妇人挣扎着要下炕，孙小二也不管妇人身上的恶臭，顺势抱了上去。

妇人破口大骂。

孙大娘闻声急忙进屋，见此情景，一把拉开孙小二，大骂道：“你这个没人性的畜生，怎么干出这种事。你这德性，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呀！”

孙大娘说得痛心疾首，连连咳嗽，弯在炕边，都直不起来了。

孙小二溜了出去。

那妇人说：“让你为难了，我走吧。”

“别，这时候你还走不得。我去叫村里人，叫他们想办法。我一会儿就回来，就在隔壁。你别着急。”孙大娘走到院里，还在喊着骂她儿子：“你这兔崽子，看你还敢回来！”

不一会儿，村长和妇女主任来了。他们商量了一下，基本意思是他们村小，留下来不方便，但推出去，更不行，得报告乡里，让乡里处理比较好。

中午时分，经老太带着赵玫，坐着辆牛车过来了。

孙家芥的人去乡里时，正好赵玫也在。于是，纪乡长他们一起商量：人先接过来，住在乡政府后院，和经老太一起，具体事情由民主村负责。人好转以后，再征求她本人的意向。

把妇人往车上扶过去时，她问：“这是上哪儿去？”

经老太说：“上我们乡政府去。人民政府绝不会让你冻死在外面的。”

“我不去。”妇人说。

“那为什么？”经老太很惊讶。

“我昨天从那儿过来的。”

赵玫已经知道了昨天她把女孩留给老王头家的事，就说：“我知道你小孩的事了，那没关系，那是两回事。现在，你是哪儿也去不了，先安心把身子养活过来再说。”

“那该怎么感谢你们呢？”

“不要谢我们，要谢就谢共产党，谢人民政府。”经老太和赵玫异口同声地说。

两天后。

经老太是个热心人，看着那妇人好转挺快，已能下床了。跟自己也一起住了两天，有点熟了，见她也是个正直本分的人，便打探起她的口风来，愿不愿意留在这儿。

“这倒是好，老家已经没有人，也没有房了，不回去倒更好。人随便找个，能过日子就行。不过，我的孩子已经放在这儿了，我再在这儿就不方便了。”

“你可以再领回来么。”

“这不好，已经给了，就不能不讲规矩了。”

“那也可以两家人，一份亲戚嘛。”

妇人不语，似默许。

经老太看上谁了呢？她看上包金贵了。她看的，不是没有道理。包金贵和那妇人，他们俩恰巧都是安徽人。以包金贵的情况，要在海源找个对象几乎不可能。现在可是个好机会。

经老太去找了包金贵。包金贵连人都没看，就一口答应，还感谢再三。

经老太又去了老王头家，说了这事。老王头俩口都挺大方，说小女孩领回去和不领回去都可以。就是不领回去，还住在老王家，她们也可以母女相称。

经老太又回去跟那妇人说了，妇人点头。

又叫包金贵过来，俩人见面，谁也不嫌谁。

那妇人也对包金贵说了小女孩的事。她说，她和女孩以后以亲戚相认，不以母女相称。包金贵都没意见。

在经老太忙活几天之后，包金贵办了喜事。当然，这个婚事，比不得这两年先后举办的鲁队长和平金刚他们的婚礼，他们俩可是办了两场风风光光、令民主村全村都高兴和羡慕的婚礼，既是庆贺自己的喜事，更是庆贺解放后新的生活。包金贵没有这些条件，也就是在西北场院自己的半间屋里，桌上放了几把糖，村里给了个新被面，床单还是经老太的，门前贴了张红纸。

那妇人，现在叫金贵嫂，再三再四对经老太和前来的民主村的乡亲们磕头拜谢：“还是解放了，新社会好啊。要不在过去，遇到这样的灾，就像我的爹妈，就像我以前的男人，不知死在哪儿了。小女儿，也是给地主老财当丫环，一辈子挨打受气。”说着眼眶一圈湿润。

包金贵也说：“是国民党弄得我家破人亡，弄得我成了鬼一样。是解放军给了我新的生命，是龙头镇、是民主村给了我新的生活，给了我新的家。”

两人跪地，不拜天不拜地，一拜共产党，二拜人民政府，三拜龙头镇和民主村的乡亲们。

这是一场没有彩礼和嫁妆的婚礼，

一场没有花轿和洞房的婚礼，

一场没有请柬和酒席的婚礼，

一场没有婆家和娘家的婚礼。

一对苦命人，开始了他们在海源的新生活。这段新生活又在十二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嘎然而止、悲惨结束。

赵玫在人群后面对小林说：“你看，他们这样都能办起来了。你们还多讲究什么？”

小林说：“差不多了，李辰说差不多了。”

王大妈没领小王溪过来看热闹。

第二十章 合作社

1949年6月20日

1955年初夏。

几个月没见，老王头已经是社长了。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化三改造”，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公布一年了。

海源的工作比较稳，1955年春，开始由互助组转为农业合作社。

王建悟互助组也改了，叫“光明农业合作社”。

但这绝不仅仅是名字的变更，而是有了性质上的重大变化。互助组，地还是各户的地，种什么由各户自己定，收多少也是各户自己的，只是农忙时，相互变工互助。

合作社，虽然土地在名义上还是各户的，但已经是统一耕作、集体劳动，收获的粮食按土地和人口各半进行集体分配。

互助组还是以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而合作社显然是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这对于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观念、能力和水平也是巨大的考验。当然人们没想到的是，这是策划好的把农民与土地所有权开始分离的第一步。

老王头知道身上担子很重，非同一般，家里的事也顾不上了，都推给了王大妈，自己整天皱着眉头在操心呢。

麦收过了以后，他就把杜家骏、赵玫找来了过来，在自己家里商量社里的事情下一步再怎么办。杜家骏已经是合作社的副主任了。

三人坐在炕上。两个爷们，隔着炕桌，面对面盘腿坐着。赵玫依在炕边。

窗户框支着上面的半页，阳光洒进来，屋里亮堂堂的。炕上的被，叠得整整齐齐。顶上那层，还是今年过年新买的花布被面呢。

老王头还沏了茶。虽然只是陈年的茶叶末，但在老王头家还是开天辟地的头一回。

“喝，喝。这还是从南方弄来的。”老王头殷勤地说着，把杯推向家骏，又端了杯递给赵玫。

“现在，大叔家里真是搞得不错。”赵玫客气地说。

“现在的生活真是没说的。前两年，谁还能想到，咱也能喝上茶叶水喽。是不？”老王头对家骏说。

“照这样发展下去，社会主义真是快到了，咱就要和苏联一样了。”杜家骏还没忘了苏联。虽然中苏之间已经有了一般老百姓所不知道的龃龉。

“不是说，建成社会主义不用二、三十年了，只要十五年就可以了。”赵玫说。

“是啊，党领导得这么好。十五年，就可以了，可以了。”老王头也开心地说着。

“咱们这合作社也得好好地搞啊，要跟上这新时代啊。”家骏说。

“是啊，今天请两位来，就是想商量下，咱们这社下一步得怎么搞才好？”

“大叔，你是庄稼老手了。你怎么说，咱做小辈的，就跟着走。”赵玫说的，也不全是客气。老王头不论是讲人品、还是讲农活，在民主村都是叫人尊敬的。

“哎，这合作社可不比互助组啦，不是一家一户自己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干得不好，自己咬咬牙挺过去，下年再追回来就是了。现在可是得领着大家干，这好几户人家、几十张嘴，就指着咱呢。”老王头忧心地说。

“是啊，首先就是要心齐。”家骏说。

“对，尤其咱们几个要团结。”赵玫说。

“说得对，好在我对这个倒并不担心。咱们这几户，人都挺实在，没有歪歪心眼，更没有刺头。”老王头说。

“这样合起来，也有好处。有什么难事，大家一起上，也就过去了。”家骏说。

“这样，地也可以成片种。不像现在一家就几亩地，还得种好几样。不好安排，也弄不开。”赵玫说。

“我就想商量下，咱这几户地合起来以后，怎么种？眼下割了麦了，马上就种什么？”老王头看着两人。

“我的地虽然多，都由你们安排。”赵玫说。

“我看，西门外的，是好地。麦子收下来，种点秋玉米还来得及。靠海沿的，盐碱大一点，种点地瓜。北堽上的，种花生、谷子这些。”家骏这几年，农活上已经学了不少了。

（顺便插段话，解释一下“地瓜”。地瓜，是海源当地的叫法，在全国各地有很多不同的名称，比如：红薯、白薯、甘薯、番薯、红苕、山芋等等，不一而足，都指的是这个。它是薯类作物的块根，原是印地安人种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把它传到了世界各地，尤其是明朝末年来到中国之后得到了极大发展。中国成了地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由于地瓜对生长条件要求低，产量高，又可生食，茎叶也可咀嚼，对于二、三百年来无数次处于灾荒中的中国人民来说，它救了不少人的命。请永远不要忘了印地安人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也有个别地方，比如南京，地瓜一词是指别的植物。）

老王头听着点点头，挺赞许地看着对面成长迅速的庄稼汉家骏。

赵玫想起来问：“那农具，怎么保管呢？”

老王头说：“农具还是各家自己保管，用的时候一起用。”

“那用的时候，就要注意爱护，就像用自己家的东西一样。”赵玫说。

“这个事，是个大事，赵玫提醒得对。要不就乱了。”老王头说。

“尤其是牲口，更不能乱来。这方面要是没有规矩，还不如各家自己干。”家骏认真地说。

“那咱们立几条规矩，写在纸上，贴到墙上，大家都照着办。”赵玫说。

“对，对，对。”老王头连连称是，“还是得人多，想得周全。我都没想到那么多，咱们马上就想几条。家骏，你掏张纸，先记上。”

三个人开始商量起来。

家骏一笔一划地记着，毕竟他也是在识字班里才学了几个字。

老王头更是又高兴又认真地说着。

合作社这种形式，既承认土地的个体私有，又有集体劳动的社会主义因素，按说是比较切合当时的农村实际状况。然而，农民对社会主义的热忱和向往，互助合作的顺利进行，使得一种观点开始膨胀，以为用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就可以推动甚至替代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藐视农民的个体财产权，尤其是越来越窥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于是，全国农业合作化的进程大大加快，超出了人们的预想。

老王头的社长只当了一年。

但这时，他们三人还在炕上，认真地说着、讨论着、写着。

事情说得差不多了，家骏突然想起来，说了句话：“你们知道吗，报上最近说，中央出了个反革命集团，头子叫高岗。”他们三个人里，家骏算是比较关心时事的。

这一下把那两个惊得愣住了，都盯着家骏看。

好一阵，老王头才惊奇地问：“中央还有反革命？”

赵玫毕竟是村干部，对国家大事也是知道一点的，说：“高岗是国家副主席哎，早先好像是陕甘宁边区的领导唉。也能出这样的事？”

“都有些什么事啊？”老王头关心地接着问。

“说是要反党篡权，是反革命。”家骏说。

“这么严重啊？”老王头嘟哝了一句。这个层次的事情，他已经弄明白了。

“一个两个反革命，怕什么？八百万国民党兵都给消灭了。”赵玫倒是想得开。

“是啊，是啊。一个两个反革命，算什么。咱们还是搞咱们的建设高潮，等着社会主义早来到。”家骏还是高兴地说着。

“对，对。咱们还是等着社会主义早来到。”大家都高兴地说着。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是解放后第一个引人注目的反党集团事件，也是林彪、四人帮之前唯一还没有被平反的高层政治案件，实际上是牵扯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关系问题。有意思的是，高岗的儿子，不管算是红二代还算是黑二代，改革开放后也当了省部级领导，也成了贪官，也跑到美国去了。作为普通老百姓，淳朴的民主村的村民们哪知道这些政治剧目的背后情节。那年还有个“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事件，涉及到天主教的事。海源那一带，在义和团时候天主教就几乎被剿灭了。对这事，本书就不说了。

说了那么多，不知不觉快到中午了，王大妈走了进来，说：“快晌了，你们也别走了，中午就在这儿吧。我到集上去转一会儿。”

“是啊，我这儿正好还有一点前几天打的白干。”老王头说。

“别麻烦了，大妈。”赵玫说。

“现在又有集，又有商店，方便得很。你回去还得一个人自己做，别走了。”王大妈说着，便领上小王溪出了门。

王大妈不经意的一句话，不由得赵玫又黯然伤神，好在两位爷们在炕上也没注意到。

龙头镇也是五天一个集，今天正好是赶集。

今年的收成不错，去年底又降了点统购的指标。农民手里面，粮也多了，钱也多了。是这几年来，生活最好的日子了。

从这集上也能看得出来。以镇上的十字路口为中心，东西南北四条街，挤满了各色小摊，从北山的干货到南海的鱼虾，从锄头犁铲到桌椅板凳，从粗细杂粮到瓜果蔬菜，从松枝柴草到锅碗瓢盆，挑高的竹竿上还挂着小孩的围兜、姑娘的花袄，连县城的百货商店也来摆了几大摊。只要在农村能想到的东西，几乎都有了。置身其间，真能称得上是琳琅满目，直叫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各种的吆喝声此起彼伏，还间杂着鸡鸣狗吠、驴嘶马叫。十里八乡的人们都聚了过来，小摊之间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人们挪动着、四处观望着、低头询问着、和亲朋好友前后左右兴奋地讨论着、跟小贩为一分钱的差价和难得有的自我表现机会而大声其道地争讲着。这就是淳朴善良的中国农民向往了几辈子的太平盛世啊。

王大妈拉着小王溪，穿行在热闹的人群中，还不时地提醒着：“小心别撞了人家的担子啊，小心别叫人家拐的篓子碰了你的头。”

小王溪一面急忙答应着，一面又兴奋得不停地东张西望。这场面对于她来说，无疑是展现了又一个新的世界。

王大妈在肉食摊前，切了贰角钱的猪头肉。

“秤杆这么平啊？”王大妈照例是要说上这一句的，尽管那时还没有短斤缺两、坑蒙拐骗的说法。

“大妈，你放心吧。俺做生意，不会少你秤的。”那伙计又飞快地削了一片添上。

王大妈这才小心翼翼地从小布卷里抽出一张崭新的五角钱的钞票，还有点不太情愿的递给了摊主，换回了三张一角钱的钞票和一包猪头肉。那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1953年版的新钞，一块钱顶过去的一万元。

王大妈本想再切点猪杂碎，再一转念，那猪头肉可以下功夫切薄一点，也能摆一大盘。于是，又往前挤到了鱼虾摊。再买块咸鱼干？现成的，也省事。一看旁边还有卖琵琶虾（说明：有些地方叫皮皮虾），还是活的呢，在满筐地爬。这东西一煮，红红的，又好看，又出货，又有味，下酒是个好东西。

王大妈站在鱼虾摊子前，边掏钱边明知故问：“这琵琶虾还新鲜啊？”

“你看活蹦乱跳的，能不新鲜么？”

“多少钱一斤？”

“我这便宜，才五分钱。”

“五分钱还便宜啊？”

“你问问别的摊，那还有卖五分钱的？我这是刚下船的。”

“好吧，五分就五分吧，称个三斤。”王大妈这时也难得的比较爽快。

“这么新鲜的虾，还不多称点？”卖虾的汉抓了一把称着。还没等王大妈开口说那句照例要说的话，那汉倒是先开了口：“哟，这不是民主村王社长家的吗？”

王大妈抬头，疑惑地看着，觉得见过。

“我跟你家王社长很熟哎。家里来客啦？”

“哎，哎。”王大妈点着头，掏出钱。

“我是赵村的赵刊新，你回去一说就知道了。还掏什么钱啊？”赵刊新推着王大妈的手。

“这哪行，该收的就收。赵玫也正在我家里呢。她是你表姐吧？”

“表妹，表妹。”赵刊新说着，又往王大妈的篓子里抓了一把，“回去代我问他们好。”

“好，好。也谢谢你了。”

王大妈掏出刚找回的两张一角的，把琵琶虾装进了篓里，又找回了五分钱。王大妈虽然没文化，可这时这些账也都能算得过来，也不会找错钱。虽然又往外掏了一角五，但她心里也高兴，因为口袋里有钱了，自己也有可以花的钱了。这一辈子，也就这两年还能在集上花钱买东西。这钱花得高兴、花得值啊。

说两句题外话：那时的琵琶虾才三、五分钱一斤，王大妈买的不算最便宜。而如今，2012年（笔者写这几个文字时正是2012年1月22日除夕夜，外面的鞭炮啪啪地响个不停。而我的习惯是从没有除夕和年初一，天天伏案工作如常），琵琶虾已经卖到三十多元一斤。海产品是这些年除了房价之外，涨得最厉害的。

再往前几步，一阵诱人的油香味飘来，是炸的油馃子，上面还有一只红彤彤的小虾呢。叫人看得、闻得都馋。

王大妈拉着小王溪的手，拉不动了。低头一看，小丫头挪不动步了。

小王溪抬起头，有点明知故问：“这是什么呀？”

王大妈苦笑着，叹了口气，不过也没有责怪，就问那小贩：“多少钱一个啊？”

“五分钱。”

“这也五分啊？”

“大妈哎，这可是又用油，又用面，上面还有个虾，可是不容易啊。”小贩也有一番道理说。

王大妈犹豫着没动，那小王溪却是眼巴巴的瞅着她，拽着她的衣角不动。反倒是那小贩看着动了心，便说：“看这孩子份上，就四分钱吧。”

王大妈这才又掏出小布卷，拿出一张一角的，买了个，还找回来六分钱，三张两分的。

小王溪吃得高兴啊，满嘴的油，十个手指一个个地往嘴里舔。

这是小王溪平生第一次吃上了油炸食品。

小王溪在王大妈家过上了从未有过的好生活，也不怎么想她妈了，尽管也见过几次。

其实，王大妈自己也从没吃过这样的好东西。不过这时，王大妈最感兴趣的是数着那几张找回来的新钞票。多神奇的钞票啊，不但能买回东西，付出去的一张五角钱，现在反倒变成了四张钱。当然，王大妈虽然不识字，但她知道那花花绿绿代表着不同的份量。尤其是那兰灰色的两分钱纸币上，画的是一架飞机。王大妈从没见过飞机，拿着钱，看了好一阵子。

不要觉得这几句话有点唠叨了。王大妈这辈子，手上也从没有拿过四张钱呐。

第二十一章 经老太去上海

1949年6月21日

21.1大上海

经老太又多了个烦心事。

本来她和经乡长，现在都不知道该叫什么了，就叫老经吧。本来她和老经的关系，就叫人够烦心的了。她和老经几十年，怎么说呢，平平常常，没有什么好，也没有什么不好，在一起不吵，不在一起也不想，更没有想过什么感情啦、幸福啦那些以前都没听说过的词。老经到南方去，也是革命的需要，经老太也没多想，更没有想到要跟着一块儿去南方。组织上没提，自己也没想。现在想来，有点不对劲了，老经怎么几年不回来了。还能在外面有花花草草？也不像啊，老经是个土得不能再土的人了，从没有过歪歪心眼，一直很本分啊。再说老经那样，长得像个土疙瘩，连我经老太都没看上，还能有外面南方城里更年轻的女人看上他？不至于吧？可又是五年没回家啦，革命工作也不会忙成那样吧？经老太也有几分着急，但再一想，以前农村里男人出去当兵、念书、做买卖，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不回来，甚至一直毫无音信、终其一生也不知下落的，有的是。老经毕竟还是有音有信有地址可找的，想到这些，经老太心里就平静些，这几年也就这么下来了。

今年夏天，经老太又多了个烦心事。她的儿子，经学文，县城高中毕业了，没考上大学。能念到高中毕业，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少有的。到底是乡长的儿子啊，人们还常这样夸奖地说。那时候，大学生是少之又少，甚至很多人没见过大学生。经学文原本也就没准备要考上大学，所以没考上，也算不上不光彩。可是，就这样回到村里，总是于心不甘。她儿子很想到上海要他爹找个工作。经老太一想，也对，也应该去一次了。

于是就开始收拾起要带的东西来。好在海源出产的东西也多，苹果正是下来的时候，这在当时也算是个稀罕物，这一片土地是中国最早种植苹果的地方。还有花生、梨，都是闻名全国的主要产地。更何况，海边还有鱼干、虾干。

经老太还觉得不够，还不能表达自己的心意，于是上街去买了五斤面、一斤油、半斤糖，这对于经老太来说，是从未有过的奢侈。回来又亲手做起了当地送给客人的传统食品，又蒸了饽饽，又烤了“火烧”（注：一种面饼），又炸了油粿子。那饽饽在蒸之前，又是捏、又是剪，做成了凤凰、花朵、刺猬和小猪小狗等各种花样，再涂上红绿颜色，搽上红小豆做眼睛，等蒸出来以后，活龙活现，惹人喜爱，真可称得上是民间工艺品，一件件都满含着经老太的心血。

儿子问：“还用装这么多吗？拿不了。”

经老太说：“都带上，都带上。你爸可喜欢吃这些了。那些年哪能吃上这些。有个饽饽，都舍不得，一次就咬一口，要吃上好几天。”

油炸的香味，引来了乡亲们的关注。得知经老太要去上海找老经，都说：对啊，好啊，该去啊。

纪乡长还特地半笑半认真地说：“你带个话，叫他回来看看，老伙计们都想他呢。别进了大上海，就忘了龙头镇了。”

只有秦德才舔着脸进来，想讨个油粿子吃。经老太哪舍得，把他骂了出去。

走的那天，经学文前后都背着包。所谓背着包，可不是背包，而是找块布，把东西裹起来背在身上。经老太也是大包小包的，不下四五个。

儿子说：“这样好看吗？”

经老太说：“这又不是相亲看丈母娘家，有什么好看不好看。”

在乡亲们的祝福声中，娘俩坐着于村长特地安排的牛车，上了县城。再从县城坐汽车到黄港，再从黄港坐大轮船到上海。

一路上，经学文又是兴奋，又满怀憧憬，上海是个啥样呢；经老太则又是急切，又是满怀疑惑，到了上海会是咋样呢。

差不多两天之后，船缓缓地驶进了黄浦江。江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大小轮船。沿岸几十里连绵不绝的码头、厂房、塔吊、楼房，一眼望不到头。看得经学文都不眨眼睛，心想：乖乖，到底是大上海啊，真是了不得。

船靠了提篮桥码头。娘俩跟着人流走出检票口，一下子就像掉进了人的海洋。密密麻麻的人群，几乎都没有往前钻的空隙，耳朵里“一嗡嗡”地满是不绝的嘈杂声，脑子里“哄哄”地直响，对面高高的楼房就像要倒下来压在身上一样。

娘俩辨不清东南西北，也听不懂“叽叽喳喳”的上海话，当然更不敢去挤长着长辫子“叮叮当当”响的有轨电车，只好按照别人原先教的办法，喊了一辆三轮车，也不会讨价还价，把写了地址的纸条给人家看。

一位中年车夫，看了条子，伸出三个手指，说着洋泾浜的普通话：（注：洋泾浜的话，指半生不熟、很不标准的话）

“蛮远的。三块洋钿。”

“我们哪有洋钱，我们只有这个。”经学文很老实地拿出了一张新的人民币给他看。

“哈，哈，今朝又碰上乡下人了。”那车夫笑得前仰后合，对着他们说：“这个就可以，这个就可以。三元钱。”

“多少？”经老太警惕地问。

“两元五。”她儿往少里说了点。

“两元五！”经老太吃了一惊。说起来，两元五并不是大数字，那车夫开的价也并没太离谱。但对于经老太来说，那可是相当于一分多地的小麦，大半年的起早贪黑。

正在经老太犹豫的时候，那车夫又说话了：“阿拉做生意，老规矩的。勿会多要你的。依要是自己走的话，半夜里也走不到的。”

娘俩也没有别的法，只好上了车。

三轮车过外白渡桥，沿外滩，再转进淮海路，这些正是全上海的标志性路段。那大街似乎看不到头，更走不到头。那个繁华，那个气派，那么多的能碰到云彩的各国样式的高楼大厦，那么多的有着漂亮橱窗、摆满五彩缤纷商品、鳞次栉比大大小小的店铺，那么多的各种形状跑来跑去川流不息、喇叭声不断的汽车，那么多的衣着鲜亮、神情怡然、摩肩接踵的男人和女人……对于只在北方小县城生活过的经学文来说，是看也看不过来了。他甚至还在想，这里的房子四面都开窗，不像海源农村门窗都是朝南的，到时候要是在这儿工作的话，恐怕连东南西北都摸不着啊。

至于经老太，就是只用眼睛看，也都享受不了了，干脆就眯上了眼睛。

21.2人是心非

三轮车在淮海路南的一幢十二层的高楼前停了下来。

“到了，就是这儿。”车夫说。

娘俩下车，抬头一望，这么高，差点要往后跌倒。

经学文正要找门在哪儿，那车夫伸着手巴掌，又说了：“钞票呢？”

小伙差点都忘了这事，赶紧付上钱。

那车夫也不是夹生的人，指着楼旁院墙的门，说：“从这里进去，上楼的门在后面。”

小伙谢过，背上包，领着老妈，进了大院的门。

门口也没人问。经学文走到楼道口，看着门上的牌子，又跟纸条上对了下，高兴地对她妈说：“到了，是这儿。”

娘俩走进楼道，学文说：“我爸住在十楼呢，咱慢慢地上吧。我再给你拿两件。”

经老太推辞着：“你拿得已经不少啦，我能行。”

娘俩在楼梯上，一圈又一圈地向上爬着。

“还没到啊？”经老太问。

“这才到了五楼，还有五层呢。要不，先停下，歇会儿吧。”

“好。”经老太已经放下包裹，停在一边喘着气，“啊呀，这大上海也不好住啊，爬个楼比爬望海山还费劲。出去上个茅房，还憋不住呢。”

“人家的茅房就在家里面，不用出来。”

“茅房在家里？怎么往外挑啊？还不得臭死啊。”经老太又疑惑起来。

“咱再往上走啊？”她儿催着。

“好，再往上走。”经老太应着。

又往上转了几圈，又歇了一次，又往上转了几圈。

“没走过头啊？”经老太问。

“快了，再有一圈就到了。”

再一圈之后，终于到了。

经学文再一次掏出纸条，又对了下，“1002室，没错，俺爸就住这儿。”

小伙放下包，整了整衣衫，擦了擦汗，喘了口气，抬起手，很认真地一下一下地敲起了门。

一个年纪稍大的人开了门，疑惑地看着他们：“你们找谁啊？”

经学文有点紧张地说：“我，我们，找经大臣。”

“哦，经大臣啊，是旁边那个单元的。你们下去以后，从旁边那个门洞子上去，也是1002。”

“啊？”小伙一下像泄了气似的。他大概没注意到在1002前面，还有标明A、B座之类的符号。

那人关上了门。娘俩只好又背上了包，一圈一圈地下楼去。到了楼底，又进了那个门洞子，又掏出那张纸，跟门洞上的牌子对了下，应该是没错，又走了进去。楼道边上有个金属的小房间开着门，没有人却亮着灯。他娘俩并不知道这就是电梯，可以省得一层层往上爬的电梯。他俩又踏上了那一格格的台阶，那一格格数不清的往上延伸的台阶，一圈一圈地往上爬。这回，娘俩也没有了说话的声音，不知中间休息了几次。终于又到了挂着1002牌子的房门前。

经学文稍喘了口气，就敲起了门。

门开了。开门的依然不是老经，是一个中年妇女，一身城市打扮，卷曲的头发，皮肤保养得挺好。一张嘴说的也是洋泾浜普通话，但却是那种尖溜溜的很夸张的虽在高音区却又变了调的声音，叫人听了不舒服。

“依来寻啥人啊？”女人问，也是一脸的疑惑。

“我来找我爸。”经学文答。

那女人一听，脸色突然很不自然起来，一阵红、一阵白，忙问：“依爷是啥人啊？”

“我爹是经大臣。”

“依是经大臣的伢子啊？”女人还在问。

“你是谁啊？问这么多？”经老太毕竟当过干部，并不怯场，反问了过去。

那女人没回应，转身朝里走去，对着里间喊：“老经啊，有人来寻依。”

那里间是个厨房，女人走了进去。

只听得老经不经意地说着：“谁呀？”走了出来。

娘俩一见到眼前的老经，愣了。

此时的老经，已经完全不是当年的老经了。

老经脚踏着皮拖鞋，挺着圆咕溜的肚子，大概是怕拴不住长裤，那裤子还用两根带子跨在肩上，上身披着薄呢黄中山装，里面是细蓝条的丝绸衬衫，鼻子上还架着金边的老花镜。身材也因为大腹便便而显得更加粗矮。只是那黝黑的肤色没有改变，但好像也没那么粗糙了。

娘俩愣神看了好几眼，才认了出来。

经学文好不容易才从牙缝里挤出了声：“爹。”

经老太看得都屏住了气，连声音都没发出来。

这一边，老经看见站在门口的娘俩，也愣了。

五年不见，儿子完全变样了，成了实实在在的一个年轻人，成了一个比当年的自己健壮高大得多的年轻人，走在马路上是认不出了。

五年不见，老伴更矮了，皮肤更黑更粗糙了，脸上刻着岁月风霜留下的道道痕迹，真的完全是别人所喊的农村老太的样子了。

老经惊讶的远不只是娘俩的变化，而是娘俩的突然到来。

老经接到过儿子的信，也知道了儿子的想法。但他以为，那只是年轻人好高骛远、嘴上说说而已。他也回了信，说是等我想想办法，有了消息再告诉，这不过是个缓兵之计，儿子怎么没看出来呢，而且还带了他妈一起过来呢。

这怎么办？这事叫小莉也看见了，该怎么收场呢。老经的脑子里在想这些呢。

老经刚南下时，在上海西南的一个县里当副县长，可能是工作能力这些方面有些欠缺，前些年调到上海市区的一个区里当统计局的局长。这倒是个好差事，工作不忙，责任也不大，最多写错个数字改过来就是了。其实，老经也认不了几个字，三加五等于八肯定是知道的，但三除五等于几那肯定是不知道的。好在他是局长，打算盘的事用不着他去干，他只要把握住政治方向就行了。每月初，别人拿来报表，叫他在这儿那儿的，签个字盖个章就行了。

而且还在这个区里最好的位置，按照局长的待遇，在淮海路边上的高层公寓分了一大套。这可是过去旧上海达官贵人住的地方，是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仰了脖子也不敢看的地方。每当华灯初上，老经站在窗前，俯看大上海万家灯火的时候，不由踌躇满志，心想革命怎么没早点胜利呢。

老经还缺什么呢？官也不想再当大的了，局长也就可以了，不想再费别的脑筋了。还缺什么呢？缺老伴。老家不是有个经老太么，一起闹革命、出生入死、风雨同舟的经老太么。唉，别提了。如今，可是进了大上海了，这样的老伴能拿得出手么，能和周围的同事们比么，甚至就是走在马路上也不像个样啊，这不就影响革命工作的开展了么。况且前前后后来的上上下下各级南下干部中重新换了老婆的太多了。老经虽然有这个想法，但他也很自卑，长得也土，又没有文化，城里女人能看得上么？

这种事，还不好办？局里有的同事看出了老经的心事，给他认识了一个叫小莉的女人。标准的城里女人，老经一看，挺高兴，自己八辈子烧高香也难有这样的女人。唯一的缺憾就是，她出身不够好。也不是她出身不好，她爹是个小职员，填在表上也能说得过去。是她男人是个国民党，跟着去台湾了。听她说她男人是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老经也搞不懂那是个什么东西，反正不是军官警察，也不是特务机构，这还好说些。但毕竟是个国民党啊。老经正为这烦心呢，先住一块儿吧，享受享受再说。向组织上报告说，小莉是个无业小市民，父母无历史问题，男人原是个小职员，因战乱失踪多年、无从考证。正待组织批准，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可就在这时，他娘俩来了，你说，上火不上火。

“怎么来啦？也不写封信？”老经说。

“怎么还不能来啊？”经老太正累得慌，心里有点气。

“进来吧，进来吧。”

娘俩跨进门槛。地下铺的是浅灰色带小白花的地砖，俩人还不大敢走，慢慢地挪着步。

老经讪笑了一下，又回头对里间说：“小莉啊，今天你先回去吧。”

那女人噘着嘴，满脸的不高兴，一句话也没有，仰着头，径直往外走，走到门口，回头对老经说了句经老太听不懂的上海话：“侬要想清楚哦，勿要拎不清。”便摔头而走，门外只留下“嘎蹬嘎蹬”一串高跟鞋的声音。

老经也是满脸的挂不住，尴尬地对娘俩说：“坐吧，坐吧。”

娘俩顾不上回话，小心地挪到墙边，摸到了沙发，坐了下去。哪知屁股却往下掉，俩人怕坐坏了，又不好意思多问，只好把屁股往前挪，就沾了一点边。

“那女人是谁啊？”经老太这才问。

“哎，一个邻居，没事来坐坐。”老经搪塞着。

经老太不大信，但这时又不便多问。

经学文忍不住了，就说：“我中学毕业了，没考上学，想到这儿来找个事。”

“我知道这事啊，我不是在信上说了吗，让我找找看。等有了消息，再告诉你。”

“你不把我放在心上，你可得把儿子的事放在心上哦。儿子，也是你的儿子哦。”经老太说。

“你们就知道找个工作。这么容易啊？”

“上海这么大，找个事还难吗？”经老太对这事比对自己的事还上心。

“难啊。你看这城市，花花绿绿的，谁不想进城啊？从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把我们赶出上海，我们花了二十二年才打回来的啊。现在，大家都想进来，能装得下吗？”这一会儿，老经俨然成了革命的主人，好像打出去、打进来都是他了。

“那我们就不能进城啦？”经老太又问。

“进城看看可以，但是住在城里不行。住在城里，得是非农业人口，也就是要有城里的户口。”

“农业人口怎么啦？”经老太在统购统销时，因为民主村给她分了地，娘俩就被定为农业人口。这一点，她当时并不知道，或是知道了也没当回事，而且还挺感谢民主村没把她当外人，给了她地，让她有了落脚之处，没想到现在成了问题。

“这些，你们就不懂啦。农业人口只能住在农村，不可以住在城里。农业人口生的儿子也还是农业人口，还是住在农村里。要转成了非农业人口以后，才能在城里落户口、给定粮，而后才能安排工作。”

“那怎么才能转呢？”他儿子问。

“三个办法：招工、参军、考大学。你们那儿招工，都是去大西北那些艰苦地方，不会从农村招你们到上海来的。还有就是去当兵，到部队以后，积极一点，提个干部，再转业就是非农业人口。再个就是考上大学。”

“考学这么难，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啊？”学文苦着脸说。

“我看，你能走的路，就是再复习一年，努点力，明年再考。这一年的生活费，我出。”

经老太颇为愤慨地说：“我就想明白了，为什么要这样跟贫农的儿子、革命的后代过不去呢？当初是我们贫下中农参军闹革命，流血流汗，打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城市，解放了全中国。这回，怎么连住进来都不行了呢？”

“这些，你们就更不懂啦。跟你们说，你们也听不明白的。把人分成农业和非农业，不光是个户籍制度，这是国家实施的一项重要社会管理制度。要是谁都能到处瞎跑、到处乱住，那些地富反坏国民党，怎么能管得住呢？”

“我们又不是地富反坏国民党，管我们干什么？”经老太不解地问。

“你们进城来住，国家还要给你们房子住、给你们粮食吃、给你们找工作，能管得过来么？所以，国家要控制城市人口。都到城市来，谁给城里人种粮食？不但你们不能进来住，连你们的孩子也不能进来

住。所以，农业人口的孩子还是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的孩子还是非农业人口。”老经讲了一大圈，以为经老太该明白了吧。

“那我们农民就该着祖祖辈辈种地啊。革命胜利了，也不能翻身啊。”经老太反而更生气了。

“你这话，不能瞎讲哦，要犯错误的哦，你还不知道革命队伍里的规矩啊。你可以做错事，但不可以讲错话。讲错话，就要倒大霉的。”老经赶紧把经老太的话打住，“说句实话，这样做，农民是吃点亏。但是，你们要服从革命需要的大局。社会发展了，变化了，你们已经不适应了。唉，怎么说呢？”

老经也说不清建国以后我们采用这套城乡割裂的二元化社会结构的前因后果。这套办法，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人与人之间（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之间）是不平等的，而且这种不平等是与生俱有的，从娘胎里就带来的，农业人口的儿子还是农业人口，确实带有世袭和等级这些明显的封建色彩，与封建社会特征相一致而与社会主义原则相违背，与社会发展大趋势相违背。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革命在胜利之后，反而采取了损害农民利益、伤害农民感情的这些政策，其个中缘由，即使在理论界也没有作出很好的解释。更不用说经老太，她对这些就更不能理解了。

要多说几句的话，就讲得远了。

这套办法形成的基本过程是：1951年7月，为适应镇压反革命的需要，公安部颁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1953年11月，由于实施粮食统购统销，对农村按户登记，对城市户口进一步清理。1955年11月7日，为进一步加强统购统销，国务院颁布“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在农村，搞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在城市，则按人实行口粮分等级定量供应，中国的票证供应时代就此开始。最终以法律形式将这种户籍制度确立起来的标志，是1958年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它的要点是：迁户口须经政府管理部门的事先批准，落户要凭公安部门的证明。

国家对户籍和人口进行这样极其严格管理的主要原因，一是建国初期，巩固新政权的需要；二是“一五”期间，农村过快推行合作化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所影响，从政治上经济上农民都向往进城当工人；而城市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阻碍了城市第三产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影响了对新生劳动力的吸纳，只能这样人为地机械地被动地消极地然而却是强制地彻底地阻断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

应该说，我们国家之所以采用这个办法，除了与强化社会管制的意图有关，还是和在城市里过早地、过于彻底地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有关。城市人口没有了自己的生产资料，也就没有了自己的谋生手段，生活资料就全靠国家提供。具体讲，就是居民的工作岗位、薪酬、住房、医疗等等都要国家来提供（虽然还有一些名曰集体所有制单位，实际上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所有制，只不过是国家所提供的可以间接一些、更少一些而已）。而农民则还有名义上的集体土地，就是说还有生产资料，那就由你自己来解决生活资料吧。在我国相对较低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之下，尽管国家对非农业人口所提供的生活资料也极其有限，但对比起更有限的农民来说，也足以让他们羡慕了。

而农民进城变成非农业人口，在那种所谓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就要给房子、给定量、给公费医疗，就要加重“国家负担”。为了既要让农民承担城市人口所不愿承担的艰苦危险的工种（如矿工），又能尽量减轻“国家负担”，六十年代又想出了一种“轮换工”，美其名曰“两种劳动制度”。就是叫农民去当矿工，年

轻力壮的时候，干个十年、十五年，在矽肺病没暴露之前就回农村。这样，既有人挖煤，又不用带家属、不用给房子、没有退休，甚至以后再查出来有职业病，也与“原单位”无关了。再以后，又出现了“临时工”、“亦工亦农”这些办法。对一些更偏远、更艰苦的劳动，则组建几十万人的“铁道兵”、“基建兵”，把劳役与兵役相结合，连一分钱的工资也不用给。

直到今天（指2012年之时），这套社会体制依然在困扰着我们，而且它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还在蔓延。尽管在它实行之初，有些看似不得已的苦衷，但时至今日显然消极面已远远大于积极作用。大量的农民工进城，终日辛劳而无所依托。请注意这个名词：农民工。农民就算是当了工人，也还是农民，也还是农业人口，所以叫农民工。社会的歧见和割裂，到了何种程度。过去计划经济下，农民被封闭在农村，这种城乡割裂的状态还能勉强为之。那末，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下，城乡人口的流转已不可避免，这种体制就走到了死胡同。

有位省委书记说，“农民工”这个称呼带有歧视性，建议取消，以后不要叫了。用意或许是好的。但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怎么称呼，而在于形成“农民工”现象的这种社会体制。只要这种有悖于现代社会的体制不改，哪怕下令不许再叫“农民工”，或是换个别的什么称呼，但问题的实质、农民工的处境和待遇也不会有任何根本性的变化。称呼只是反映了这个问题，只不过是一种现象，要解决的应该是问题的根源。

根源就在于这种割裂工农、割裂城乡、不让农民分享工业增长、城市发展、社会进步成果的二元化户籍制度和社会管理制度，即尽管农民进城干了工人的活，尽管职业都变了，但其户口、其身份依然还是农业人口。农民这个词，已经不是一种职业的名称，表明的不只是一种社会分工，而是一种轻易不会改变的社会身份。尤其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的第二代农民工的出现。他们从农村飘出（甚至就出生在城市没回去过），既很难再回到他们祖辈生活的乡村，但在城里又没有根基。工作、住房、医疗、养老、子女上学等等等等正常生活所涉及一系列最基本的问题都难以正常解决。他们看似工作、生活在城市里，却游离于城市之外。他们跟随父辈在城里打拼，可在父辈身上却看不到正常的出路和前途。随着人数的增加和时间的推移，这种矛盾以及所带来的各种实际困难和情绪上的忿懑越积越多，这正在成为我们国家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话，就更没法跟经老太说了。

“唉，别说了。这儿给你带了点东西来。”经老太听不明白那些，就回到眼前还放在包里的东西了。

经学文就一件件、一样样地拿出来。

经老太就一件件、一样样地说着，这袋是苹果，那袋是梨。这包是炸了些粿子，用了一斤多的油呢；那包是饽饽，也放了半斤多的糖呢……

“带这么些，干什么？”老经有些不以为然。

经老太没觉出来，还在说着：“这些都是你喜欢吃的，那时你都吃不够，捞不着吃。一个饽饽，都舍不得，要吃好几天……”

“这些东西，早就吃够了，一辈子不吃也不想吃了。”老经面无表情地说着。

经老太心里一沉：“……”

第二十二章 高级社

1949年6月22日

1956年初夏。

1956年，是喜庆的一年。

这一年，又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确切地说，是进一步变革生产关系的高潮。刚成立一年的合作社，又被说成只是个“初级社”（在成立的时候，可没有“初级”这两个字）。革命形势要不断往前发展，整个民主村合在一起，组成了高级社。这“高级”两个字，使生产关系一下子“高级”了不少。不但劳力在整个社内调配，大农具、牲畜交社里统一使用，尤其是土地归合作社集体所有。集体分配，也是按人口和劳力各半进行，明确并加大了劳动在分配中的地位，而使土地这一要素退出了分配制度。从此，使中国农民作为个体失去了与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之间哪怕是名义上的直接联系。农民对于土地，实质上只有了使用权，而且还只是名义上的集体的使用权。这个历史性变化的深层次含意，从对农民行使经济权利、政治权利的影响，到对朴素的革命理想“耕者有其田”开始有了隐约的偏离，这些，不但在当时，甚至直到几十年之后，也没有引起当事人农民和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当今社会，层出不穷、日见激化的征地拆迁矛盾，其实也是源于对农民的（哪怕是间接的）土地所有权完全彻底的否定与剥夺。当年在“土地还家”的口号下，从通过斗地主、分田地来动员农民参加推翻国民党统治的革命战争，搞得那样的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到现在通过合作化、集体化，又使土地离开了农民的家，是那样地悄然，使很多人，包括农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高级社的名称，沿用了他们村的名字——“民主”。社长当然是于村长，杜家骏作为后起之秀，当了副社长。妇女主任，原本叫经老太当，但她自去年从上海回来后，总也提不起精神，就叫赵玫当。赵玫也觉得自己有时难免有些心神不宁，说叫小林干吧，自己给小林当个副手。于是，妇女主任一职由林海秀担任了。

老王头当了组长，没有了社长之名。对于这个，老王头倒是毫不介意。

但乡亲们是喜庆的，因为说是成立了高级社，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要奔向社会主义了，这能不高兴吗。

今天，龙头镇举行庆祝全乡全面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活动。各村，现在是叫各社，都组织了队伍来。有舞狮的，有唱秧歌的，有踩高跷的，有跑旱船的，有戴大头娃娃的，也有准备不起来、就拿着纸糊的小旗使劲呼口号的。总之，所有北方农村的集体表演形式都有了。

镇里的十字路口，彩旗招展，锣鼓喧天，人头攒动，笑语连连，好一番热闹景象。人们一队队地来到乡政府门口，一拨跟着一拨。纪乡长和乡政府的人站在门口的台阶上，笑容可掬地接收着人们的庆贺。

在台阶上乡政府的人群里，多了个年轻人，那就是经老太的儿子经学文。他不想再去复习高考，纪乡长就把他安排在了乡政府，正好也需要。小经看着街上朴实的乡亲们，心里却晃着大上海那些高楼大厦的影子。

乡亲们的心情是热烈的、真诚的、喜庆的。因为从这一天开始，大家就要向日思夜盼的社会主义社会迈进了。几十年的奋斗拼搏，烈士们的流血牺牲，不就是为这一天么。而且，只用了几年的时间就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眼看着进入五十年代的这几年，生活在一年年地改善。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又该会有多大的提高啊！理想在不断地实现，新的更美好的憧憬又不断地到来。乡亲们能不高兴，能不喜悦么！

于社长擎着大红喜报，领着民主社的队伍来了。于社长的后面，是小林、赵玫几个女同志手拿锅盖大的纸扎的大红花晃动着，再后面就是老王头带队的秧歌队。今天的民主社秧歌队，那声势比1949年时可要大多了。村里有钱，专门做了一批行头。如今，每人头上一色的黄头巾，一色的黄褂子、红腰带。在老王头双手刚劲地比划中，秧歌队员的手臂在崭新的红腰鼓上整齐地起落，煞是好看，引得满街的人驻足相望；节奏强烈的鼓声，“嘭嘭嘭”地在空中振荡，敲得人都有种难以抑制的激动，心都要跟着跳出来了。

走到乡政府门前，于社长抬手一挥，腰鼓声嘎然而止。他朝纪乡长向前一步，拿着大红喜报大声念了起来：“敬爱的党中央：我们民主社的社员，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今天，我们成立了‘民主高级农业合作社’，特向党中央报喜……”

小林领着大家充满激情地高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坚决实行社会主义集体化！”

“坚决贯彻落实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中国共产党万岁！”

纪乡长眉笑眼开地从于社长手里接过喜报。

两人高兴地又是握手，又是拍肩膀。

老王头手一挥，“嘭嘭嘭”，那激越的腰鼓声又起。

民主村的乡亲，几乎都在队伍里。但也少了一两个。

迟得法这时就躲在街边的人群后面看热闹。不料却被宗发奋一眼看见了。

“迟得法！”宗干部厉声喝着。他对农民可是不讲情面的。在他看来，这些农民不过是他的工作对象。

他几步走了过去，大声说：“迟得法，你还不入社啊？”

周围大群的人都看着迟得法。

迟得法怯怯地说着：“不是说，入社自愿吗？”

“入社是自愿。但不入社就是落后分子，就是对社会主义不满、对党不满的反动分子。你想自愿当落后分子、自愿当反动分子吗？”宗干部声色俱厉地说着。

“我入，我入。”迟得法在大家的嘻笑声中忙不迭地应着。

“你他妈的讲清楚，你入，你入，你入个什么屁东西？”宗干部毫不客气地骂起人来。

干部除了骂被带帽管制的地富反坏，还张口骂群众，这在当时刚开始有，还比较少。宗干部学这一套，那是很快的。正因为骂人的情况还很少有，所以，宗干部这一骂，引来的反而是一阵更大的哄笑。

在哄笑声中，迟得法只好连忙说清楚：“我入，我入社，我入高级社。”

宗干部赶紧向纪乡长那边大声喊着：“纪乡长，迟得法也同意入社了。民主村的所有村民全部入社了！”

街上的锣鼓声更响了。

几年之后，有个对1956年的确切的表述：在实现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公私合营）之后，我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现在所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概要从这一年算起。

那时的人们都还不知道这就是进入社会主义了。因为什么时候进入了社会主义，是事后才讲的，进的时候没有明讲。

第二天，民主社的社员们都往西滩那儿去。按社里的规划，这一片地要种秋玉米。

早晨，太阳已经升起了二三尺高。鲁队长吹着哨子，满村地跑，边喊着：“出工了，到西门外白果树下集合。”

全村一二百个劳力，陆陆续续，前前后后，按照昨天散会前的布置，扛着镢头，背着种子，挑着水桶，来到白果树下。

于社长已经等了好一会儿了，看西门里面还有出来的人，就喊了声：“不等了，咱们走。以后，出来早一点，别这么拖拖拉拉的，还干什么活啊？”

队伍浩浩荡荡地来到靠近西滩的那一片地。从来没有过种地还有这么多人在一起的，看起来真热闹。张三在找李四，王五喊着赵六，这个说这地垄太密了，那个说那儿劳力太多了，过来几个吧，就像昨天上街庆祝那样聚在一起七嘴八舌、说个没完。甚至有的因为要站在大家的面前，还特地穿上稍微好一点的衣服，好像要出门似的。虽然看上去这么一大帮人，其实半天也干不了多少活，好在大家情绪高得很，时间也过得挺快。

也有人忧心的，迟得法就是一个。他跟于社长说：“这种干法能行么？这么多人一起种地，算是谁的？干多干少，有不出力的，怎么算？”

于社长点着头。

老王头在一边也说：“还是按小组好，不能这么大呼隆。还得要有记工的。”

于社长说：“那明天各组都安排个记工员。”

杜家骏说：“我看，每天晚上，咱们社长、组长都要碰个头，安排一下明天的活。早晨，就各组自己出去。像今天，光等人也不止一个时辰。”

于社长连连点头：“好，好，就这样。”

各户的地，被犁成了一片。

经过了解放、土改、再解放、二次土改，民主村村民对于土地的归属感已经大大减弱。中国农民对革命的追随和向往超过了对土地的眷恋，在放弃自家的土地所有权、进行集体化的时候，表现得比较平稳和配合，没有俄罗斯农民当时的那种激烈。

赵玫在她家的那块地边，看着储小二使着原先老王头家的牛犁了过来。对这块地，赵玫尽管出力不算多，但也是有着深深的感情。那是董家几代人的血汗，今天没有了。虽说是因为党的号召、归了集体，并不是卖给了外人，但也是有着莫名的失落，甚至是种负疚。董家三代姓董的人都没在眼前，地是在自己手上没有的，虽说不能怪自己，但毕竟是在自己手上没有的。

地头一大一小的两座坟茔，无言地堆立在边上，青青的野草那样地茂密。插的幡子，几年下来，布条早已经没了，那竿子却还在晃动。赵玫站在边上，站在已经不是自己的这块土地的边上，看着那牛和储小二一步步地过来。牛身后的犁，就像一把刀，不断地翻开熟土一步步地逼近过来。

“小二哥，这两个坟，先留一下吧。”赵玫挺客气地说着。

“社长没对我说哎。”小二还摆起了架子，尽管平常储小二在村里只是个人模狗样的东西。

秦德才不知从哪赶了过来，也叉着腰，大声说着：“留着这些东西干什么？要挡社会主义的道啊？”这个人憋了好几年，这几天又精神了。这么多的人在一起，又好混了，又可以到处瞎搅、到处表现蛮横无理、别人又懒得跟他争辩而自鸣得意了。

亏得鲁队长也在边上，说了句话：“留下吧。”这才结束了这场小小的争论。

赵玫转过脸，眼圈里含着别人看不见的泪水。

储小二心里窝了气，照着牛使劲一鞭，疼得牛“哐”的一声窜了出去，犁都翻了出来。

老王头老远就看见了，那鞭子就像打在自己身上，疼得都跳了起来，拼命地跑了过来，连连喊着：“哪能这么赶牛啊，哪能这么赶牛啊！”

老王头赶过来，拉住牛，心疼得轻轻地抚摸着小牛的背，夺过储小二的鞭子，扶起了犁，忿忿地说：“像你这种人，还能赶牛啊？”又朝着远处的于社长喊着：“再不能叫储小二这种人赶牛了！”再又俯首拍着小牛，低声说：“好了，好了，不怕。”

皮安己在一旁看着，一句话也没说。他的心里在想着另一个事，就是他女儿的婚事。其实，他并不是很看好老王头家。只是去年老王头当上了社长，所以才答应了大闺女皮珊珊跟王山的婚事，还换了帖、定了婚。可如今高级社了，老王头才是个组长。组长算个什么呢？皮安己心里正想着这个算盘再怎么往下打，看着老王头和储小二的争讲，自然也就没去插话。

夜里，老王头躺在炕上，望着窗外的星星怎么也睡不着。他心里想的却是那头小牯牛，看着身边的王大妈睡得还挺死实，便自己悄悄地爬起，拿起了半袋麸子，跑到北面的饲养棚去找他的而其实已经并不是他的小牯牛了。

第二十三章 春天的落叶

1949年6月23日

在生机盎然的春天，翠枝嫩叶生长得十分繁茂，满山遍野看上去是一片葱浓的绿色。可总还有几片叶子，在不该凋落的时候，离开了它们的枝干，悄然而下。在蓬勃发展的社会里，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它在给人以某种提示，而人们在当时往往不会去更多地注意。

常言道，一叶而知秋。当然在这之前，还有个狂躁的夏天。先不说夏天，先说说这第一片叶子的掉落，会是谁，又是怎么回事呢？

23.1 余校长死了

解放后的日子，真可以说是莺歌燕舞，四处欢腾，却还是有人落落寡欢，始终高兴不起来。那就是东门外的余校长。

他是在暗地里怀念国民党吗？绝不会的。1949年，是国民党的兵差点要了他的命。是不满新社会吗？也不是。虽然那时还没有实行工资制，发的是小米、烟叶，加点补贴，但也不比乡政府干部差。那为什么呢？不知道。没有人问他，他也从不跟别人说。他知道，他讲了也不会有人听；听了，也不会有人懂。

经过批判《武训传》时程科长对他的奚落，更由于三反运动对他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打击，余校长难以承受了，从精神到身体都跨了。他倒还是每天很早起来，就坐在他的屋里办公桌的椅子上。这么呆呆地坐着，实在坐累了，就在边上的床上躺着。有什么事来问他，倒也回答，只是答得过于简单，有时叫人摸不到头脑。他的反应越来越迟钝，他的动作越来越缓慢，他的表情越来越木讷。他老了吗？不是，他也就是刚五十岁吧。

他的内心经受着别人没有的痛苦，承受着别人没有的压力。或许对于别人，或许比起以后的政治运动，这些还真算不上是痛苦和压力。然而，对于他却是，而且已经是难以承受的压力。

1956年秋季开学不久，县里又要开会了。他实在不想去，可不去又不行，这校长的职务还没免呢。他走不动路了，正巧村里有辆马车要去县里，他搭个顺路，到县教育局已经是晌了。被程科长，不，已经是程副局长了，劈头盖脸地当众骂了一通。余校长一句话也没回，也没说自己已经走不动了，低着头忍着，听程局长骂完。

要问，程科长这种人怎么反而会得到提升呢？这你就不知道官场之道了。三反运动结束之后，但局长不想再在这儿呆下去了，他通过以前的战友，调到了省里的一个什么单位。新来的局长要有个帮手，

就看上了程科长。不是看上他能干、勤奋、有水平什么，而是觉得以后来了什么运动，那些事推到他头上，让他去弄就行了。要应付这些事，对于领导来说，单位里就得有这样能冲在前面的人。

余校长这次是来开什么会呢？通常开会上级布置任务，自己汇报工作，回去落实完成。还有一种会，是学习新的精神，自己对照检查，加以改正。后一种的会，后来叫“学习班”。会议的气氛和手段，因不同时期、不同对象和不同目的而大不相同。这次余校长参加的就是后一种会。

这次又是什么“运动”呢？说起来还算不上什么运动。新政权成立以后，除了着重打击原有的敌人、被认为是旧社会残余势力的地主富农反革命之外，对知识分子也越来越严厉起来。1953年批判电影《武训传》，讲的就是农村教育界。1955年揪出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主要又是波及知识分子。接着就在知识界较大范围地（包括农村中小学）展开了针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意图通过向组织表态“忠诚老实”、像竹筒倒豆子似地一股脑儿“坦白交心”这些办法，使从旧社会过来、接受了旧教育的知识分子，改变原有的旧的世界观，全面接受新的革命理念。

有人总以为在旧社会的学校（即旧学校）里念过书的人，一定是接受了旧的世界观，就是旧知识分子，就是革命的对象（尽管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也是在旧学校里念的书）。以至于后来对在新社会里念书的人也不放心，因为教他们的人是在旧学校里念的书。哪怕再后来由新社会毕业的年青教师教出来的学生，也不能放心，因为他们老师的老师的老师念过旧学校的书。别以为这是在绕口令，或是什么冷幽默。这个思路最后归结为一句话叫做，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就是有人对“文革”前十七年教育界的两个基本估计之一。所以，要对他们统统进行再教育，由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再来教育一遍。这之后的几十年中，这类事就愈演愈烈。

而这正是余校长参加的这次会议的内容。会上的具体情况，我们不得而知。只是余校长回来得很辛苦，走到半夜，实在走不动了，就在半道上的路边躺着，直到第二天，路上有好心的赶车人把他捎了回来。看来，这一折腾余校长是病了。回来后的这几天，非但没有振奋起革命精神，反而更加萎靡不振，几乎不再和别人说什么话了。

这天上午，李辰去上课时走过余校长的办公室，发现是关着门，觉得有点奇怪。这多少年来不管寒暑雨雪，余校长从来就是天一蒙蒙亮，就开了门，坐在那儿。这一年来，尽管不愿多说话了，可门还是开着的。今天是怎么啦？因为是要上课，李辰没停下，去了教室，心里却没有放下。

一下课，李辰就又跑了过来，余校长的屋子依然关着。李辰心想，是不是校长病了。这些年他无亲无戚，一个人单过，确实也不容易，身体也大不如前。前两天开会回来，确实是像病了的样子。李辰走到余校长的那间屋前，敲了敲门，里面没人应。李辰又敲了两下，还是没人应。他踮起脚，从窗上往里看。余校长的屋子装的是玻璃窗，这在当时的龙头镇还是唯一的，把全镇人都羡慕得不得了。窗户的下两格，玻璃上糊着纸。

里面暗暗的，看不太清。但是最里面的床上躺着个人，被子盖得严严的，这是可以肯定的。余校长病了，而且还病得不轻。李辰又重重地拍了几下门，还是没有反应。门插着，进不去。李辰急了，忙喊

了几个人过来。几个人又是拍门，又是拍窗。平近芳到学校里教书已经一年了，她用手围着嘴，急急地喊着：“余校长！余校长！”声音里带着哭腔，小辫子依然在脑后跳动着。

拍打着、喊叫着一阵，依然没有反应。

大家急了，有人说：“敲了玻璃，翻窗进去吧。”

大家相互看了看，“敲碎玻璃？”李辰小声地反问自己，还真有点不舍得，但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他拿起一块小石头，在窗玻璃的下角，轻轻地砸开了一个缺口，伸进手，拔起插销，推开窗户，跳了进去，打开门。

几个人顺着门外的光线看到了余校长的床。余校长笔直地躺着，上面很整齐严实地盖着棉被，只有脑袋伸在外面，枕在枕头上。看似熟睡，其实大不一样。他脸色惨白，双目紧闭，眼窝和两颊凹陷，嘴角扭曲，连唇上的胡子也显得那么僵直和刺眼。再往下一看，只见被角和靠床边的褥子上有红色，地上也有一滩红色。

大家愣了，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李辰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壮着胆子，走上前，把被子一掀。

满屋子一阵惊呼。

被子里、褥子上竟然全是已经凝固了的黑红的血！

余校长满是血污的右臂垂了下来，手腕上有几处皮肉翻开的刀割的伤口。

平近芳吓得尖叫着跑了出去，小辫子翘得比后脑勺还高。

余校长死了！

整个校园、整个龙头镇都震动了。

先是学生们围了过来。李辰叫着：“老师们！快把各班的学生带回去，管好！”但是已经管不住了，满校园都是慌张奔跑、大呼小叫的学生。

龙头镇的村民们也围了过来。因为学校没有围墙，几排校舍之间，挤满了人。人们在紧张而小声地议论着。

乡政府的领导也都过来了。纪乡长脸色凝重，走进了余校长的屋子。李辰看守在门口，使劲地挡着别人。

纪乡长一言不发，上下看看，在床边的桌子上，见到了一张纸。那是余校长的遗书，上面写着：

“……

我走了。

是我自己想走，我不怨任何人。你们也不要怪别的人。

我不知道这世界对于我是什么，这生活对于我是什么。

我只知道我对于这世界是多余的，我对于这生活是多余的。

我早就没有了往前走的力气，也许早就该走了，也许本来就不该来到这世上。

就把我草草埋了吧，我一无所求。老天容不下我，土地会容我吧？

……”

这份人世的悲凉，不由使人想起也曾在解放初自杀过的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八十年代的感言：“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说。”

纪乡长看着早就僵直的余校长，长长地叹着气，许久没说话。

县里也来人了。县政府唯一的一辆吉普车，载着县教育局副局长程贵安，和县公安局的一位卞公安员。那时已经是下午了。这两位，在以后的故事里还会多次提及。

程贵安铁青着脸走进余校长的屋子，没去细看床上死去的人，而是翻着桌子的抽屉，问李辰：“没留下什么文字材料吗？这种人，肯定会有反动思想流露。”鼻子里顺便往外嗤了一口气。

“有张遗书，叫纪乡长拿走了。”

“他拿走干什么？这是我们教育系统的事。”程副局长说着，又从鼻子嗤了一口气，说着转身走了。

卞公安员还挺年轻，二十出头，样子挺精干，也是铁青着脸，走到床前，四下很注意地观察着，自言自语地说了句：“从血块的凝固程度看，死亡时间是在前半夜。”过了一会儿，又冷冷地对李辰说：“怎么不注意保护现场。现在弄得这么乱，怎么勘察？”说着把压在余校长身子底下的一把沾满血迹的小刀，用纸包上，带走了。

李辰很佩服。他在这儿站了大半天，居然没看见那把刀。

这件事的轰动，在龙头镇是可想而知。尽管经历过四十年代血与火的拼杀，被敌人杀掉的和杀掉的敌人不知有多少，再怎么艰难困苦、甚至身陷绝境，可是人们完全没有想到过要自杀。直到年前出了个“高岗反党集团”，革命队伍里才开始听说有了自杀的事。但毕竟离龙头镇太远，人们没有往眼前想，谁知还真出了这样的事。好在那时的气氛还不是十分的严峻。余校长的事，没有像以后那样，人都死了还要定个“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结论，也没有别的说法。由于找不到亲戚去征求对后事的处理意见，就按照他自己的遗愿，草草地埋在了学校东北边的茅山坡上，连个牌子也没插。几年以后，人们就遗忘了，大概只有李辰才能找到这块地方。

余校长死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确切的岁数，应该是不到六十。好在也不用写悼文，不知道就不知道吧。

话说回来，其实余校长即使活下来，在接下来的肃反运动中，恐怕也难逃程局长布下的绳索。

23.2 经大臣离婚

这年（1956年）秋，经老太终于接到了来自上海的不幸的消息：老经跟她提出了离婚，说他已经跟她们那天见过的那个小莉住一起了，儿子就留在龙头她身边吧。那意思不是商量，而是通知。

连儿子也不要了，这畜生！经老太心里忿忿地骂着。

对这一点，经老太是有准备的，没觉得有什么天塌下来的感觉。问题是往下再怎么过呢，怎么跟别人说呢。不说别的，人家就不能再叫自己“经老太”了，那再叫什么呢？自己娘家的姓，差不多连自己也忘了，几十年都没回去过，恐怕连路也已经不认识了。

经老太先跟纪乡长说了。

纪乡长也早已看出些苗头，没觉得惊奇，宽慰着说，这种事，现在多啦，老经能拖到现在，已经算是有情面的啦。

经老太心想，这说的是什么话。

纪乡长又说，上海有什么好，听战友说，那自来水都有味，还赶不上沟里的水好喝。那地方你们也去过，爬楼都累死。茅厕盖在家里面，啊呀，啧啧啧……

纪乡长连连摇着头，虽说表情有些夸张，经老太倒也听得进去。

纪乡长说，你就在这儿过吧，龙头的乡亲们挺好，民主村的乡亲们挺好。我也是把龙头当成是自己的家了。学文，就在这儿干，去年我就想到这个事了，跟县里说过，就把他留下了。

这点，经老太还是挺感谢纪乡长的。

“你，大名叫什么？”

“车素花。”

“好名字啊，比那个经老太要好听多了。那以后，我就叫你素花姐啦。”

经老太心里也好笑，这一变，“老太”变成姐了。

经老太，不，素花姐，默默地接受了这一些，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她毕竟是几十年的农村妇女干部了，这点波浪还是经得住的。好在实际生活也没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只是心理上的委屈和忿闷，难以排解。

革命干了几十年，最后怎么会落得这样的结果？按说这不能怪到革命的头上。革命，调整了社会结构，也调整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及其利益。一些人上升了，一些人下降了。一些人的上升是以一些人的下降为代价的。但革命应该是使一些人获得本应该属于他的利益，另一些人失去本不应该属于他的利益。当不合理的利益由制度来强行维护时，就需要由革命来加以调整（本节暂不讨论改良与革命的异同以及改良较之于革命或优或逊之处，改良的效果有时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某些必要的情况下，革命也可以采取暴力的方式。然而，暴力革命在调整旧有的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时，很难恰到好处，往往会过了头。在革命胜利之后，亟需要加以进一步的约束、调整和完善。但那时操作的难度也比较大，因为这时

已经有了新的利益集团。这就需要革命者有无私的心境、冷静的头脑、高超的执政水平。如果没有做好这些，甚至还有意无意地放纵暴力革命的局限性，任由其继续留存、甚而扩大，那末，暴力革命的负面影响也会长期留存，以至不断地发酵、滋长、扩散，直到不可收拾，乃至出现诸如法兰西大革命的革命之革命。对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可能有的负面影响，国内还很少研究。

同时，革命的结果，如果是一些人利益的上升损害的是另一些人正当的利益，甚至还损害了革命队伍内部一些自己人的正当利益，而且还把这种损害扩大化、固定化、制度化，那么这个革命就变了味了，那就偏离了革命原先的宗旨，或者叫革命的异化，革命就只剩下了旗号（改革也是这样）。当然，车素花目前遇到的问题，还没这么严重，只不过是某种开端而已。

车素花，年近五十的车素花，觉得革命就像滚滚向前的大江水。他老经就像是水上的船，随着江水往前漂去，越漂越宽广、越漂越光明，一直漂到她看不见的地方。而她自己，就像一块石头沉在江底，眼看着水从身边哗哗地流过，留下的却是淤泥压在身上。

其实，车素花也不必过于伤感。岁月沧桑，人世难料。老经那只船也好不到哪儿去。在历史的浪潮里，也不过是纸糊的，又能经得起多少浪涛的翻卷？那船下的波涛，与其说是江水，还不如说是海滩上的潮水更贴切。一阵浪涛涌上来，又一阵浪涛撤下去。老经那只纸糊的船，没几下，就润湿了，就破成碎纸片了，一会儿卷上来，一会儿流下去，弄不好连个影也没有了。

经大臣和车素花之间的故事也远还没有结束。

23.3迟得法退社

1957年的初春，阳光依然明媚。

这天，社员们在北坡翻地。

一大群妇女上下抡着锄头，因为是出门在大伙面前干活，所以还都穿着花布袄。叽叽喳喳，嘻嘻哈哈，一片欢快。

看着日上三竿了，林海秀抹了把汗，一招手：“姐妹们，歇会儿吧。”

妇女们便像山雀似的，三三两两地扑向地边的树荫下。

新来的鲁队长的媳妇说：“小林姑娘，唱一个吧。好几天没听你唱了。”还记得李辰上北坡买石头推石头遇到打石头的邻街东北村的哈联成吧。鲁队长的媳妇就是哈联成的妹妹，大家习惯就叫哈妹了。

“今天干活，嘴发干，唱不了啦。”小林照例要推辞一番。

齐阿姨不饶不让地说了：“准是那李家小伙没在这儿，给你们唱，没劲。”

大家笑成了一片。

“没劲，就别唱了吧。”哈妹也是个挺大方的人，哈哈地笑着说。

这下，小林姑娘不唱就不行了。她停了下，说：“那我就给大家唱首新歌吧，叫‘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

齐阿姨带头鼓掌。一片笑声里又加了一片掌声。

于是，小林唱起了当时风行的这首歌：

“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

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

千家万户齐欢唱，

好像那春雷响四方。”

歌声、笑声和掌声荡漾在春天的田野里。

也有不高兴的。那一边，迟得法坐在地头，直愣愣地看着被平金刚牵着原先是自家的那头驴在犁地。按说，驴不是用来犁地的。但是，合作社没那么多牲口，好在北山上的地，土层薄，地质疏松，在别无它法的情况下，用驴犁地也是个无奈的选择。

平金刚兴致勃勃地吆喝着，像赶马车似地在空中“啪啪”地扬着鞭，小毛驴“啾啾”地叫着、用力地往前拱着。

看得迟得法那个心疼啊，看得实在坐不下去了，不由自主地站起来朝着平金刚喊：“不能这样使驴啊！”又对着坐在地下的于社长说：“你看这平金刚，把俺的驴使得像个什么啦？”

“不是你的啦。”于社长平和地说着。

“咋就不是我的啦？”

“入社时，不已经给你作价二十元了吗。”

“哎哟，我的天哪！”迟得法诉起了苦来，“我这是花了几百斤的小米，还借了钱。那借的钱，也不止二十元哪！”其实，连那二十元也只是记在账面上的虚数，迟得法并没有拿到手。

“就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储小二在边上瞎起哄。

迟得法忿忿地说：“就是我的。我不干了，我退社。我退了社，这驴还不就是我的啦。再说那个分配，这一年，出的力不少，还把驴都贡献了出去，可分的粮，还没有我自己种地打的一半多。”

老迟家人少、劳力少，高级社的年终分配按人不按地，对那些原先人少地多的户，确实吃了亏。按说是赵玫受的影响最大，她才一个人。当然，她不会说。

于社长依然是平静地说着：“这事，我可说了不算。你去找乡里吧。”

迟得法活也不干了，走了，去找乡里了。

迟得法刚走到乡政府的门口，撞上了往外走的宗发奋。

宗发奋依然是一脸严肃的干部样，板着脸问：“干什么？”

迟得法心想怎么碰上他了，可还是脸上挂着笑、点着头、轻声地说：“我找纪乡长。”

“他不在，有事跟我说吧。”

迟得法知道跟宗干部说了，没有好果子吃，可到了这份上还能不说么。

迟得法还在犹犹豫豫、吞吞吐吐，话刚到嘴边，宗干部却不耐烦了：“快说吧。”

“我，我想退社。”

“呸！知道你嘴里吐不出象牙。”宗干部大怒道：“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你这是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想走资本主义道路！”

“没有这么大的罪吧？”迟得法在围观人群的众目睽睽之下怯怯地说。

“没这么大罪？你这个中农，就是摇摆在贫下中农和地富之间，摇摆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摇一摇，就过去了，成了反革命了。你现在就快要摇过去了。”

“那我怎么办？你看我那个驴，现在都瘦成什么样了？这还不到一年呢。”

“什么你那个驴？没有你那个驴了。你们这些人，叫你们走社会主义还不肯走。那就把你当成驴，牵也得把你往社会主义的道上牵着走。看样子，非得出来个办法把你们嘴封上才行，省得整天在那儿说三道四。”

迟得法还想说什么，宗干部再也没有兴趣听下去了：“走吧，走吧，别想什么退社了。你要坚定革命信念，就是死，也要死在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上！没时间再跟你啰唆，我走了。”

宗干部抬腿就走了，剩下迟得法站在那儿干瞪着眼，没有咒念。

第二十四章 反右

1949年6月24日

这时，天上飘落的，已经不只是几片枯叶。

1957年是转折的一年，是由春天向冬天转折的一年。

1957年是重要的一年，在新政权前四十年的历史当中，是可以和1966年、1976年、1989年相提并论的一年。

24.1 申请入党

1957年初，龙头镇还是有件好事，龙头中学在东门外的原址重新组建了。

解放后这些年，上学的孩子越来越多了，龙头需要有个中学。应该说政府对教育是重视的，尽管这些年经济条件已经好多了，但除了因为成立供销社的需要而在十字路口盖了八间门市部外，公家没另外新盖一间房，包括乡政府自己。这回为了重建中学，特地在学校里又盖了一排新房，作为办公室、图书室和音乐室。因为经费实在有限，这排校舍没能用石灰把外墙刷白，还是露着红砖。

校长是从黄港调来的，正巧就是肖福兴。他就是章汉林的儿子章加法的中学班主任和入党介绍人。我们在第一卷解放前夕黄港街头的学生示威中已经见到过他了。肖老师的经历也是一言难尽。尽管他是地主出身，但早在师范上学的时候就向往革命、要求进步、热情澎湃、情绪高昂，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是多年的地下党员了。他冒着生死危险，贴标语，撒传单，反迫害，争自由，还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过，挨过打，上过刑，后来是家里花了大把的钱才保了出来。黄港解放前夕，在地下党市委的领导下，他在自己从教的学校里进行宣传教育、发动学生。面对旧政权灭亡前最后的疯狂，还组织了几次示威，又带领学生护校和上街维护社会秩序。解放后，当了个学校的教导主任，前年，又到远郊的一个中学当副校长。这回，又提了个校长，只是得离开黄港跑到农村来了。

肖校长的心中有个永远无法抹平的伤痛。他的爱妻，当年师范的同学，也是地富出身，1948年回到还是国统区的娘家探亲，住了一段时间。国民党逃跑时就没想到要跟着一起跑，要在家乡迎来解放。结果在随之而来的清匪反霸和土改中，却跟娘家父母一起被“锄”了。黄港一解放，肖福兴就去她娘家那地方打听，没想到是晴天一声霹雳，从乡政府知道了事情的结果。乡政府的人对他说，你怎么娶了个地主婆，亏你还是个干部。村子里，你就别去了，还去干吗呀，连骨头也找不到啦。去了，恐怕连你也出不来啦。他在惊讶、悲痛和恍惚中，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了黄港的家，独自面对才三、四岁的儿子。亏得那时孩子他娘嫌兵慌马乱的没带孩子一起走。

几年又已经过去了，肖福兴的心平复了些。离开黄港也好，他把儿子也带到了龙头，在镇上租了个小院一起过，期望能过几年平静的生活。

寒假前，他就过来了。了解情况，调配师资，安排工作，着实忙了一番。

经过了解，他觉得李辰各方面都不错，是块材料。

开学后，他特地跟李辰推心置腹地长谈了一次。

肖校长说：“小李啊，你各方面条件都挺好。我对你抱有很大的希望，希望你能在新的学校里发挥更大的作用。”

“校长，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

“我想安排你担任史地教研组组长。”

李辰显然没有这个准备，忙说：“这个恐怕不行吧。这些，我都没专门学过。”

“这个，我也想过。”肖校长说：“可是我们又有几个人专门学过呢。一边干，一边学么，干革命就是这个样。要拿出干革命的精神，来搞好我们的教育事业，这样才能对得起党对我们的期待。”

“好，好，我一定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不辜负党的期望。”李辰激动地说。

“你还要积极要求进步，争取早日入党。”

“我一直有这个想法，可不好意思提出来，怕离党员标准太远，被别人笑话。”

“在我们革命队伍里，哪有笑话人的。”肖校长笑着说。

“那我这两天就写入党申请书。”

“好，好。我们这个学校刚开始办，很多事情会想不周到。有什么问题，你要提醒我哦。”

“啊呀，校长，你太客气了。哪有教师给校长提意见的啊？”

“这你就不了解啦。你看，春天来啦，外面的天气暖和了，政治上的气候也暖和啦。最近，我们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知识分子的春天到啦。更不用说在本单位里面对工作上提出改进意见，那就更欢迎啦。”

“那好，那好，我也最希望我们的学校在各方面的工作都做得棒棒的。”

当天傍晚，李辰就和小林商量。他们俩盖房子的木料、石头，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本打算过了夏天，秋风一起，就动手盖房子了。这可是他俩靠自己的双手，熬了几年，积攒起来的。

李辰把肖校长的意思说了。李辰说，他想再集中精力努力一年。全力以赴，把业务拿下来，也对得起校长对他的希望，更是对工作、对学校负责任。

林海秀很赞成李辰的想法，说：“好，我支持你。先搞好工作，再说别的。我们之间的事，已经等了几年了，再等一年，也没什么。”

县城赶集那天，李辰带上攒了一年多的二十多元钱，特地来回步行去到县城。在县城的书店里翻了一天，甚至还央求营业员让他到后面的书库里翻了一阵。终于在有限的种类里，买了一捆历史、地理方面的书。

回来的路上，他没有回李家泊，扛着捆扎的书本，过王庄，面向东方，涉过大河，直奔龙头中学而来。他很少去县城，上一次，还是几年前和鲁队长他们一起替民主村推种子才来过。他匆匆来到大河边，卷起裤腿，迈入水中。凉凉的河水，有点扎人，都没觉出来，反到是那么地凉爽。西下的斜阳，照得前面的山峦、田地，连同整个的龙头镇和西门外那棵高大的白果树一片金黄。他看得都陶醉了，他从未有过地感受到这天地、这世界竟然是那样的美好，那样的灿烂辉煌。

从这一天起，李辰真的是把盖房娶媳妇放在了一边，发愤图强苦读书，比考大学还下功夫。不到一年的时间，李辰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学教师了。但是，也只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中学教师，对于李辰又成了永远的痛苦的奢望。

24.2 废寝忘食

树冠的绿色都浓浓的了，暖风吹过来一阵阵田野里的干香味，麦子快熟了，农忙的季节又要到了。

傍晚，李辰还在他的史地教研组的办公室里忙着。办公桌上，堆着一摞摞的作业本，摊开着一本本的书籍，一本叠着一本，都摆不下了。墙上挂着一溜各式的图表，李辰正站在一张世界地图前，脸贴着墙，满世界地找个什么东西呢。

鲁队长和平金刚他们又来了。一旦开镰，就会有好长时间不能再来，所以趁着这晚饭后的空闲过来看看，看看他们心里向往的学校，看看他们的好朋友李辰。

鲁队长在窗外看见李辰，就喊了起来：“哎哟，李先生，在干吗呢？小林不在，就跟墙亲嘴哪？”

李辰一看是他俩，忙不迭地招呼：“快进来，快进来。”

俩人进了屋，平金刚问：“你这是在找什么东西吧？东西掉了，得往桌子底下找，它也不能挂在墙上啊？”

李辰说：“我是在太平洋上找加拉帕戈斯群岛，那是大洋暖流经过的地方。”

“加，加……加什么来着？怎么这么难念，多长的名字啊，怎么记啊？”鲁队长听着这名字都绕不过来了。

“是哎，现在教的世界地理、世界历史这些课程里，那些外国的地名、人名真难记。”李辰说。

平金刚也在地图上找了好一会儿，“啊哟，这密密麻麻的，怎么找哦？你这活，还真不容易呢？真不如像我种地那么干脆。”

李辰说：“要让下一代更多地了解世界，我们自己就要下功夫先学习。”

鲁队长说：“是啊，时代发展这么快，我们也要好好了解天下大事啊。小李啊，最近报纸上有些什么消息啊？”

了解国内外时事，这也是当时农村青壮年常来学校转转的一个原因。毕竟李辰讲时事比起靳喜悦在炕上一知半解地讲要全面确切得多了。

李辰来了精神，说：“最近，党号召大鸣大放，希望大家对党的工作提出意见，帮助党改进工作，把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好。”

鲁队长听了，感慨得不得了，“我们的党，真是伟大啊。带领全国人民，夺取了革命的胜利，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那么多的成绩，还那么谦虚，那么诚恳，还主动向老百姓征求意见。真是不简单啊，别的党，别的人，谁能做得到啊？！”

平金刚又疑惑地说：“可是，咱们共产党已经做得这么好了，还能再提出什么意见呢？”

李辰说：“是呀，上次学校里开会叫大家提意见，大家想来想去，也提不出来。”

天色暗了一些。

鲁队长看了看李辰，突然问：“小李啊，你晚饭吃什么啊？”

李辰似乎愣了下：“到吃饭时间啦？”

“啊？你还没吃啊？”平金刚也惊了。

“到我家去吧。”鲁队长说。

“不了，不了。你看我还有一大堆事呢，作业还要改，一会儿还要上教室里看看他们学生上晚自习。好在我抽屉里还有块干粮，一会儿泡着水吃就行了。有时候，忙过头了，我常这样。”

“看来当老师也还真不容易哦。”平金刚说。

“我看你这几个月，为工作也真是豁出去了。不过，可别冷落了小林哦。”鲁队长说。

“要抓紧哦，不抓紧就要黄了。”平金刚说。

“小林倒不是那种人。不过工作虽要紧，个人的事，也不能这么一拖好几年。”鲁队长挺关心地说。

平金刚问：“我看你盖房的料，准备得差不多了，还不动工么？”

“是啊，木料、石料都备下了。上个月，我把瓦片也买了两行，准备盖个‘金镶玉’。等秋风凉了，就动手盖。”（说明：“金镶玉”，就是草房顶上，只在靠屋沿的边上铺两行瓦，比草房档次要高一些）

“到时，可要喊我们哦。我们想出这个力，也是等了好几年了。”

李辰也挺感激地说：“好，好，谢谢你们的关心。我和海秀定了，今年秋天一定请大家吃喜糖。”

“嗷，嗷。”鲁队长和平金刚高兴得大声吆喝着。

肖校长正好从窗外走过，听得屋里嗷嗷地笑着，便进来看个究竟，见是鲁队长他俩，就问：“什么事，把你们俩高兴得这样？”

鲁队长说：“你们李老师，今年秋天就要请我们吃喜糖啦。我们可是等了好几年啦。”

肖校长说：“好啊，好啊。哎，李老师，你怎么还没回去啊？”

“他连饭都还没吃呢。”平金刚说。

“那可要注意身体啊。”肖校长也挺关心地说。

“你当校长，应该好好表扬李老师。李老师真是个先进典型哎。”鲁队长由衷地说。

肖校长停下来，慢慢地诚恳地说：“这一年，我对李老师是最满意、最放心了。新建的这个龙头中学，亏得有这样的老师啊。到年终，李老师评个优秀教师那是没问题的。党组织也正在考虑他的入党问题呢。”

“这太好了。小李，跟着党组织，好好地干吧，前途远大着呢。”鲁队长说。

李辰的眼睛散发出希望的光芒。

24.3引蛇出洞

李辰所讲的大鸣大放，正在紧锣密鼓地一步一步地进行。

肖校长已经领着全体教师开过一次会，请大家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可没有一个人说话。难道是社会上的一些传言，被他们听到了？因为城市里有的单位，已经开始批判鸣放中出现的错误言论，而县乡两级的鸣放才开始。

肖校长刚在县教育局开过会。

县教育局程副局长说了，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搞出反右斗争的成果来，全县至少要有十个。最后，他拍着桌子说，十个还多么？搞不出十个来，我也不用当局长，你们也不用当校长了。

散会时，校长们面面相觑，无言而退。

肖校长回来以后，辗转反侧，几夜都没睡着。早晨，食堂门口挂着的一块钢板，敲响了，都到了开早饭的时间了。肖校长还在镇上他租住的屋子里躺在床上没起来，皱着眉头瞪着眼，正绞尽脑汁寻思着怎么办呢。明知是要引蛇出洞，再往七寸上狠命地打去。谁会上这个套呢？要是没人上套，那该把谁推出来呢？总不能不当校长，把右派的帽子扣在自己头上吧？

该搞谁呢？把十几个教职工，扒拉过来，扒拉过去，自己来的时间不长，也没有跟哪个过不去，再说这些教职工都挺努力。

搞谁呢？肖校长叹了口气，又一遍地问自己。要不，叫小李发个言吧。李辰工作积极，群众关系好，业务出色，是学校的顶梁柱，就算提点意见，上面也不会怎么样吧？十个右派可以摊到别的学校去么，非得扣在龙头中学么，不至于吧？全县不止十个学校，不是非得每个学校都要摊一个吧？肖福兴天真地想着。

肖校长找了李辰，在校长办公室里又一次做了专门谈话。

“李老师啊，这段时间你的工作更努力了，很好。大家都看在眼里，党组织也看在眼里，我们心里是有数的。”

“校长，那你看我的工作，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啊？”李辰很诚恳在向领导征求意见。

“最近有一项工作，希望你能积极参加。”

“什么工作啊？党布置的工作，我都会积极参加的。”李辰把身子往前靠了一下，听得更认真了。

“党中央在全国各地进一步深入开展大鸣大放，恳切希望同志们对党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你在这方面，也要带个头啊。”

“我也想过，真的是没有。”

“怎么会没有呢？你看，我也有啊。我租着房子住，多不方便，学校也不给我安排一间。我都向上级说啦，也还没解决。”

“我住在学校里，挺方便的，离家也近。”李辰很天真地解释说。

肖校长心里都有点好笑了：“你不是争取入党吗？你要更多地关心党的工作，关心党的各方面的工作，要起到带头作用。”

李辰思考了起来。

肖校长继续说着：“要打消顾虑，相信党。不要听信社会上的一些流言，说什么要批判错误言论。我们这是在帮助党更好地工作啊，这是多么神圣而崇高的工作啊！”

李辰在更认真地思考。

肖校长还在说：“我以党的名义，向你保证，提了意见，不但不会对你有看法，而且会更加信任你，说明你和党是一心一意，是一家人哪。一家人才肯讲知心话呀，是不是？”

“那我再好好考虑考虑。”李辰说。

肖校长轻轻地吐了口气，微微地笑了。

经过几天的精心准备之后，肖校长在一间教室里再一次召开全校教职工鸣放大会。

肖校长在讲台上作动员：“目前，我们党正在开展一场和风细雨的整风运动，真诚地请各位同仁帮助党克服在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东西，继续开展大鸣大放，进行恰如其分

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请同志们心里有什么想法、对学校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尽管说。”

肖校长看了下大家。

教职工们，有的低着头，有的东张西望、故意不往台上看，有的虽然看着校长，但也面无表情，捉摸不透是什么心思。

肖校长很庄重地说：“我还想请大家不要相信社会上的一些谣言。我以党的名义保证，决不抓辫子、打棍子。毛主席都说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他又停了一下，还带上了几分感情，说：“同志们哪，历史上，我们党出现过几次‘左’的错误，伤害过一些好同志，这样的教训不能再发生了。不瞒你们说，我曾经也是个受害者啊！我们这次就是要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努力形成一个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大家依然无语。

“我们的工作，肯定不会是十全十美的，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我身在其中，有些问题恐怕难以察觉，我再次恳求大家以学校发展大局为重，提出宝贵意见。拜托各位了。”肖校长的言辞十二分地恳切。

“拜托各位了。”肖校长又重重地重复了一遍，真想把心都掏出来了。

大家依然无语。

肖校长环顾四周，只有李辰在认真地盯着他看。那是一根现在唯一可以抓得住的稻草了。

肖校长马上不失时机地对着李辰说：“李老师，说吧，你带个头。这是党组织考验你的时候了。”

李辰回头看了下大家，大家也都在看着他，看来是推脱不掉了，只好站起来，说：“既然党组织这么诚恳，我也不能辜负了校长的一片好意。作为一个争取入党、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我应该响应党的号召，投入到大鸣大放中来。不过，我对党有什么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那些，倒是没有感觉到。新中国这几年来，尤其是咱们龙头中学成立这一年来，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话。大家说，是吧？”

大家都点头，纷纷称是。

“说意见，说意见。”肖校长催促着。

“对咱们学校，我就觉得，这新的一排房子盖得不错，就是外墙还一直没刷，红砖就露在外面，一是不好看，再一个这砖也容易叫雨淋坏。要是拿点石灰刷成白墙，走进来一看，亮堂堂的，多好，看着心里也舒坦。”李辰说。

肖校长松了口气，终于有可以向上级交差的东西了：“好，好，就这样。还可以再深刻一些。”

“我就说这些了。”李辰也如释重负，觉得也可以向肖校长交差了。

……

24.4改变命运

一周后，县教育局程副局长来龙头检查指导工作。

程局长，是海源北面靠北海沿的人，能说会道，人称“程套子”，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怎么说也有理。此人深谙革命队伍内部的潜规则之道，那就是“宁左勿右”，对上拍，对下狠，表面文章要做足。凡事紧跟形势，冲在前头，反正也解放了，用不着流血牺牲。宁可讲过头、做过头，不能不到位，可能会有些失误、有些伤害，那也是革命斗争不可避免的，更何况那是对别人，伤及不到自己。也只有狠得了心、下得了手，才能不伤到自己，这就是他的经验。所以，解放后是步步上升，仕途顺利，从副科长到了副局长，真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虽然自己没上过学，只念过两年私塾，却并不害怕当这个教育局的局长。他一再跟别人说，这个学校啊，很好办，只要上课铃响有老师进课堂、下课铃响食堂能开饭，就行了。他最主张“外行领导内行”，不要跟他们讨论什么业务问题。跟他们讨论业务问题，你怎么也讨论不过他们，那你就上他们当了。教师算个什么？几百万的国民党都打败了，连个教师都管不住，那就太熊了。对教师要狠，要从人格上侮辱他们、贬低他们，把他们搞得灰溜溜的，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了。这回儿，有了上级精神，要抓一批右派，正是我老程露一手的时候了。必须要有战果，也一定会有战果，不抓两条大鱼出来给上面看看，我还叫老程么。

因为老程是从龙头出去的，这回回来，纪乡长是要请个客的。这时已不像1953年三反运动中程科长为调查余校长的事来龙头时，就一碗和大家一样的萝卜茵子了，公款吃喝此时就开始有了雏形。

纪乡长在乡政府的后院摆了一桌。七八个菜，有：土豆、波菜、猪头肉，还有这海边特有的，像老板鱼、炸大虾、萝卜丝拌海蜇。虽说不上是盛宴，但这在当时也绝对是有条件的人家娶媳妇能吃到的东西。

作陪的还有肖校长和宗发奋。

程局长精神焕发地走了进来，当然先要讲几句客套话：“都是老熟人啦，别这么客气啦。”

老纪忙说：“别人都好说，你这个客，我是一定要请的。龙头的事，你还要多操心啊。”

“那当然，我不就是专门为这事来的么。”程局长当仁不让地入了席，就问肖校长：“怎么样了？我对你们龙头中学，可是很放在心上啊。”

“开了好几次会了，没提出什么意见。”肖校长为难地说。

“怎么能没有呢？反右斗争，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就你龙头中学风平浪静、安然无事啊？谁信啊？”程局长有点严肃了。

宗干部对这套也有门道了，便对肖校长说：“你要启发哎，要引导，要做工作，不能等他们自己说。”

“我也做了不少工作。”肖校长苦着脸说。

“一句意见也没有弄上来，你当的什么校长？”程局长当着面也很不客气。

“好不容易，我提前跟李辰做了工作，他才在会上讲了一句。”

“他讲了什么？”程局长马上很注意地追问。

“他提了个意见，说是新盖的那排房，红砖露在外面不好看，要是刷成白墙就好了，看起来心里就舒坦了。”

“把红砖刷成白墙就好了，把红砖刷成白墙就好了……这是什么意思呢？”程局长把头歪在一边，沉思起来。

纪乡长有点明白了：“这还有什么意思？”

程局长晃着脑袋，故作神秘地笑着：“有啊，有很大的意思咧。只要有政治头脑，往那儿去找，就能找出问题来。”

肖校长着急地问：“有什么问题？”

“要把红的砖头刷成白的。就是要把红的砖头，变成白的砖头。这不分明是要走白专道路么，这不就是在反对党提出的‘又红又专’的号召么。”

“这就算反党啦？”纪乡长不解地说。

“这还不是反党啊？而且这小子很狡猾，不直接说要走白专道路，绕个弯子，说是要把墙刷成白的。含沙射影，隐晦曲折，兜着圈子攻击党，这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新的手法，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白是什么？白就是代表国民党，我们讲的那个白色恐怖，不就是国民党屠杀我们共产党吗？那个姓李的小子要白色，他的内心思想里盼的是什麼，不就已经昭然若揭了吗？我马上向县委报告这个情况，我们的同志差一点儿被他蒙蔽过去。亏得我今天来了，把它分析出来了。要不，会给革命留下多大的隐患啊。”他心里还在暗暗高兴，那个余老头自己寻死，便宜他了，他看中的那个李辰这回可又落到我手里了，天意呐，天意呐。其实李辰从来没有得罪过他，甚至两人还没有直接交往过。但是程局长这种人内心之狭隘、狠毒，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

宗干部连忙说：“啊呀，程局长的水平多高呀。要不李辰这个右派眼看着就滑过去了，还继续混在革命队伍里，我们还搞什么社会主义啊？”

程局长听了宗干部的话，更来精神了，说起了一大套的话：“同志们哪，要绷紧政治这根弦哪。我现在是悄悄地跟你们讲啊，政治风向变啦，不是两个月以前讲‘百花齐放’的时候啦，事情发生了变化啦，是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时候啦，一场新的战斗开始啦。”

程局长咕咚喝了口二锅头，他是很能喝酒的。那三人直愣愣地听着，早忘了吃和喝了。

程局长有酒助兴，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你们不在文教战线不知道啊。这几年看起来风平浪静，去搞互助组、合作化了。其实在政治思想方面的斗争一直没停过，而且还很激烈哩。从解放后一开始批判电影‘武训传’，到批判丁玲反党集团，到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到知识分子思想教育运动，就从来没有消停过。”

肖校长说：“可李辰这同志不错，工作很积极，也很要求进步。”

程局长当着大家的面教训起肖校长来，很不满意地说：“你看你，还没转过弯来，别糊涂啦。李辰是个什么人？你当我不知道啊？我清楚得很，不就是跟林海秀好的那个人么。自以为是贾宝玉，有艳福，看把他美得吧，什么东西。完全是小资产阶级那一套，我就看不惯。”

肖校长还想为李辰争取一下，还在说：“李辰教学很不错，学生很欢迎，是我们学校的顶梁柱，少了真不行。”

“屁话！”程局长拍了桌子，满桌的人一震：“少了谁还不行，少了你就不行啦。告诉你，少了这种人，天塌不下来，地球照样转，革命洪流照样滚滚向前。不是有句话吗，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

吓得肖校长再不敢吱声。

停了一会儿，宗干部突然又叫了起来：“我想起来了，李辰有重大政治问题。前几年，就公开散布反动言论。”

纪乡长一惊：“还有这样的事？”

宗干部说：“前几年有首歌，歌里有句话，叫‘毛泽东，斯大林，像太阳在天空照。’他就说，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一定会死一个，结果没过多少时间，斯大林就死了。你们说，恶毒不恶毒？”

纪乡长问：“你从哪儿知道的？”

“听秦德才说的。”

“他的话，你也信啊？”

“他说，那天有好几个人都听见的。”

“还有谁？”程局长赶紧追问。

“好像有你们学校里的那个女老师。哦，对了叫平近芳。”宗干部对这种事记得是很清楚的。

纪乡长瞪了宗干部一眼，在程局长面前也不便多说什么。

程局长喜得拍着手说：“太好了，太好了，马上把她找来。这就能追下去了，跑不了那小子了。有这样的材料真是太好了。他当右派那就是铁板钉钉了，而且不是一般的右，而是极右。居然敢诅咒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死罪都不过分！”

纪乡长内心是不好受的，说：“小李就这样成右派啦。我认识他也多年了，还是挺好的小伙。反击国民党进攻时，出了不少力。姜雪花深入敌后，还是他带的路。”

宗干部却说：“为什么后来姜雪花死了，是不是他带得有问题，故意往危险地方带了？”

程局长阴冷地说：“现在我们真的要打几个问号。过去，我们在政治上还是太天真啦。说不定他在背后搞了什么鬼，造成了姜雪花的死亡。”

纪乡长的脸色，已有明显的不快了，“这可是很严肃的事，要有证据。”

程局长稍微缓和了些，说：“这个事可以再做进一步的查证。不过，有前两条，就足够定右派了。”

“那李辰就定右派啦？”肖校长小心翼翼地问。尽管说起来，论在革命队伍里的资格，还是对革命的贡献，肖校长比程局长要强多了。但是很多情况下，不是论这个。这时，肖校长在程局长面前几乎快要像小狗一样了。

“定个右派算什么呢。上级说了，要在人民内部划分左中右。右派也还是人民内部么。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也还有左中右。”程局长有点不耐烦了，“你去跟他说，划个右派，也没什么，这也是种锻炼。深刻认识了，改正了，也是个提高么。受点挫折，也是个人生财富么。这事就这么定了。”

在别人的杯觞交错之中，李辰就这样被改变了命运。一个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是个可悲的人。一个不能使人掌握自己命运的环境，是个可悲的环境。

此时，肖校长也只好低头无语，看着脚背。

纪乡长叹了口气，无力也无奈，便转过头去看窗外。

宗发奋拍着程贵安的大腿，说：“啊呀，程局长这几年真行。魄力是越来越大，水平越来越见长了。”

程贵安咧开大嘴，哈哈笑了，不无得意地说：“咱当领导的，没这几下，能行么？记住，不要有半点的妇人之仁。我们决不施仁政。这就是我们的经验。宗小弟，你学着点吧。”

宗发奋连连点头称是。

程贵安又猛地喝了口酒，一下又呛了，“噗”地一声把饭菜喷了一桌。一股恶心至极的酒酸味扑鼻而来。

24.5 软硬兼施

下午，平近芳按照肖校长的通知，来到镇政府的一间办公室，来找程局长。她一个农村的女孩子，从没有见过大领导。见过的最大的官就是纪乡长，纪乡长没有架子，认识多年了，但也没怎么说过话。冷不丁的，县里的局长要找她，心里能不紧张吗。她问肖校长是什么事，肖校长也没有多说，只是说大概是跟李辰有关系。她心里一边在嘀咕李老师会有什么事呢，一边走进了程局长临时的办公室。

程贵安，她是认识的，忐忑的心情稍微好了一些，但进屋以后还是朝程局长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说：“程局长，您好。是您找我吗？”

程局长坐在桌后，头也没抬，手里拿着茶缸，往嘴里灌了一大口，“咕咚咕咚”地涮着牙齿，直到咽了下去，才眼瞅着地上，说：“你就是平近芳？”

“是的。”平近芳赶紧答应。

“知道你干什么吗？”

“不知道。”

“你跟李辰是什么关系？”

“什……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啊。”平近芳被问得越发紧张了起来。“哦，念书时，我是他的学生，他是我的老师。”

“哦，听说是他介绍你进学校的？”

“是李老师跟余校长说过。余校长答应的。”

“是那个姓余的？你怎么尽是和这种人有关系。”程局长的鼻子里嗤了一口气。“直截了当地说吧，那个李辰，据你所知，有过什么落后言论、错误言论？”

平近芳心里咯噔了一下，想了一会儿，才怯生生地说：“没有吧？”

“没有？”程局长的鼻子又嗤了一口气，“连我都知道，你还说没有？”

这时程局长才把大眼直瞪着平近芳，看得她背后一阵冷汗，舌头都不好使了：“没……没有啊……真没有啊。”

“还用我提醒啊，他是不是对你们说过什么，说有首歌里‘斯大林、毛泽东像太阳在天空照’的话不对，天上只能有一个太阳，不能有两个太阳，得死一个。是不是？”

程贵安的眼光直通地射着，平近芳则是慌了，什么也想不起来，张着嘴，愣在了那儿。

“那天还有秦德才、鲁来福，还有你哥哥也都在，能说没有吗？”

“是，是，是。是有这么回事，不过那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但是那天他没提，要死一个的话。又怎么啦？”平近芳好不容易想了起来，可她又觉得这话是随便说说，没有什么吧。而“死一个”的话，是后来秦德才给添上去的。

“有没有死一个的话，已经不重要了。现有的这些话就已经够了。怎么啦？告诉你，这就是反苏言论！反苏言论就是反动言论，就是反革命言论！”程贵安斩钉截铁地说。

尽管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批判了斯大林的独裁专制、滥杀无辜之后，中苏之间事实上已经分道扬镳，但是社会上还不知道这一点。如果谁对苏联有所不满，在单位里还是按反苏、反共、反革命论处，照样严惩不贷。1957年的反右中，有不少是因为所谓的反苏言论，比如讲了苏军在东北期间有扰民作恶、强奸妇女、拆运设备物资等行为，而被打成右派。

平近芳脑子里嗡的一声，就像电线一下短了路，人一晃，差点倒了下来，好不容易才站直了，再拿眼睛去看程局长。只见程贵安极鄙视地瞥来一眼，鼻子里又是一声嗤气，“你要提高认识，经受锻炼啊。要分得清大是大非，站在组织这一边啊。”

“是，是，是。”这时，平近芳只有连连点头的份了。“没有别的事了吧？”她只想着早点走。

“不要忙。学校里要开会，批判李辰的错误言论，你要带头发言。”

“发言？说什么啊？”

“就是要公开揭发，再分析批判。李辰的话就是要挑拨中苏关系，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团结，替美帝国主义效力。”

“有这么严重吗？”平近芳还在问。

“你到现在怎么还没有觉悟。是不是李辰介绍你当老师，就划不清界限了。你还要不要当老师？”程贵安一句比一句严厉起来。

“不，不，不。”平近芳也急了，头上都出了汗。

“批判，一定要严肃、认真、深刻，不要怕话重，不要怕伤感情。就好比 he 得了病，你一讲，让他一惊，出了一头汗，你也出了一头汗，大家的身体都好了。这不是很好吗？这也是在帮助他，明白吗？”

平近芳点着头，没有说话。

最后，程贵安拿出了底牌，说：“这对你来说，也是到了关键时候。表现好了，不但可以转正，还可以火线入党，可以提干。表现不好，不但当不成教师，连家也回不了。谁包庇右派，他自己也就是右派，直接送去劳改农场。走哪条路，你自己掂量吧，回去好好想想。”

程贵安又端起茶杯，灌了一大口水，在嘴里咕咚起来，看也没看平近芳一眼。他深知这个小姑娘哪是对手，早就被打跨了。要不是那个肖福兴软弱无能，还用我姓程的出马吗？哼。

平近芳这时都已经不敢动了，站在那儿，微微的还有点颤，静静地等着程局长还有什么话。

稍片刻，程贵安一睁眼，怎么这小姑娘还站在面前，便一瞪眼，吼了声：“还不走！”

吓得平近芳脸色苍白，连“再见”也没顾上，低着头就往外走，差点碰到了门框上。

24.6 阳谋乎，阴谋乎

一个月后，肖校长把李辰叫到操场边的一个角落，跟他讲这个事。

肖校长连连咳了几声，心里在想怎么说这个事。

终于，校长开口了，“李老师啊，有个事，要跟你讲一下，你要有个思想准备。”

“什么事？”李辰还挺纳闷，什么事还要有思想准备。

“呵，呵。”肖校长又咳了两声，说：“县局来了意见，说你在那次会上的言论，是属于右派言论。”肖校长还没直说就是右派，只说是右派言论。

这也足够让李辰大感意外：“就说了刷个白墙，就算是右派言论啊？”

“就是这么么，我也有看法。当初是怎么跟同志们说的，嗯？”好像当初这些话，不是从他嘴里说出来似的。

肖校长话锋再一转，说：“但是，你呢，小李啊，有些话说得也确实不妥当。”

“什么话？”

“有人反映你说过，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毛泽东和斯大林，两个里面要死一个。怎么能这样说呢？糊涂呀，幼稚啊，我都替你感到痛心啊。”

李辰急了，马上解释说：“我不是这样讲的，我没有说要死一个，那是秦德才说的。”

肖校长又转了一个调：“态度要诚恳。上级不是说了么：有者改之，无者加勉。不要斤斤计较别人的话，哪句对，哪句不对。要学会正确对待同志们的批评。毛主席不是说了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些政治语言就这么怪诞，这话又倒过来，对李辰说了。

李辰说：“我知道右派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我可没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肖校长依然严肃认真地说着：“要深刻认识，挖思想根源，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要急于解释、急于推卸。要相信党。”

“我，我，我真的是一心扑在工作上，校长，你也是看见的。怎么我就成了右派了呢？”李辰几乎要哭了。

“成了右派，也没有什么。上级说了，要在人民内部划左中右。就算是右派，也是人民内部么。不是说了么，一万年以后也还有左中右。那时早就是共产主义了，也还有右派么，有什么要紧？”肖校长又改成了和缓的语调：“小李啊，你也不要想得太多。我们还是在一起上课教学么。在学生面前，我们还是老师么。挺起胸膛，照样上好课，而且还要上得更好，那才是好样的。我相信你。”

最后，肖校长拍了拍李辰的肩膀，说：“话又要说回来，必要的形式还是要走的。学校要安排一次会议，对你作一些批评教育，也没有外人参加。对同志们的批评，要诚恳接受，当面不要表现出抵触情绪。要多作自我批评，争取组织上的谅解，争取同志们的谅解，这样这个运动就算过去了。你表现好一点，以后也好从轻处理。我到局里，也好替你说话。”

肖福兴，一个曾经受过左倾灾难伤害过的人，到这时候也来帮着说这一套，真的是能令人深思。

李辰低着头，流着泪，走了。

龙头中学的李辰老师，民主村妇女主任林海秀的对象，因为发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被划为右派分子。这个消息，像炸雷一样在民主村人的头顶上炸开了，几乎把所有的人都炸蒙了。

对李辰，民主村的人像对本村的人一样熟悉，甚至还多了一层喜欢。他热情、肯干、率真、好学、有文化、懂礼貌，在农村小青年里还真是不多的好小伙，大家都为民主村能有这样一个未来的好女婿而高兴。

这样的好青年，怎么会成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了呢？好多乡亲们还都没明白右派是个什么东西，没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天，西门外的大白果树下，民主村的社员们在等着上工。玉米成熟了，等着去摘棒子、砍秸秆。人们聚在一起，议论开了。

老王头在问：“谁能知道啊，这右派是什么呀？”

平金刚摇摇头：“咱说不清。”

鲁队长带着几分玄机点着头轻声说：“反党反社会主义。”

赵玫一惊，急促地问：“那不成了反革命啦。”

鲁队长说：“现在还没说是反革命。”

老王头也挺着急：“怎么会这样呢？谁不知道李辰是个好小伙呀。”

“讲错话啦。”杜家骏说。

“讲错什么话啦？”赵玫追着问。

“说是，李辰说要是把学校的墙刷白一点，就好了。”鲁队长说。

“这怎么就是反党了呢？”老王头又问。

平金刚就坐在老王头的边上，以为是在问他了，便说：“你问我，我去问谁呀？”

“我听说了，我听他们校长说了。上级理解小李这句话的意思是：白，就是白色。白色，就是代表国民党反动派，我们平常说的白色恐怖，不就是指的是国民党吗？小李说要把墙刷白了，就是向着国民党。向着国民党，就是反对共产党。”鲁队长还真不简单，能把这一圈绕了下来。

老王头摇摇头说：“这能扯得上吗？”

平金刚说：“扯不上，现在不也就扯上了吗。”

赵玫挺关心地问：“那以后，李辰怎么过日子呀？”

鲁队长叹了口气：“唉，那天，李辰还跟我们说，等秋天，他就要盖房子、娶海秀呢。”

赵玫抬头望着站在一边、始终没说一句话的于社长，想从他那儿得到答案，问：“于社长，你说说，这是咋回事呢？”

于社长也摇着头，说：“说不清。这事，咱说不清。”

赵玫又自言自语地说：“小林又该怎么办呢？”

大家都低着头、摇着头，无语。

过了一刻，赵玫往四周一瞧，说：“小林没来。”她马上就站了起来，一边说着：“我得去看看她。”一边拍打着身上的灰就回镇里去了。

天气见凉了。阴沉沉的云，冷嗖嗖的风，还竟下起了细细的雨。海源的秋天很少有雨，可今天也下起了凉凉的细细的雨。

龙头中学趁今天是星期日，在一间教室里开批判右派分子李辰的教职工大会。

会场倒也没有任何的布置。

李辰站在门外的屋檐下等着。斜风细雨，刮得李辰全身上下直打颤。

肖校长站在讲台上，铁着脸，很严肃的样子宣布：“今天我们召开批判李辰右派言论的大会。”对着门外大喊一声：“李辰！进来！”

门开了，一阵冷风卷着秋雨扑了进来，坐在课桌后的老师们直往后缩。

李辰佝着身子，颤巍巍地进来。

教室讲台是朝西，肖校长指着靠北窗的地方，命令道：“右派就站在右面，站那儿去，接受大家的批判。”

李辰慢慢地走向北窗。

下面有人说：“靠南窗是右面。”

李辰又慢慢地走向南窗。

“才不对呢，哪儿是右面？得看和谁比，跟肖校长比，北窗才是右呢。”又有人说。

“都别说了。就跟毛主席比，以这讲台后面墙上的毛主席像为准，靠北面就是右面。李辰，你再过去吧。”肖校长不耐烦地说着。

李辰又慢慢地走向北窗。

肖校长拉着一副长脸，看着李辰站住了，想张嘴说了，忽然舌头怎么有点不好使了，使劲咳嗽了两下，才出来了变了调的声音：“我宣布，接县教育局的决定，李辰发表的言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他本人定为右派。我们要划清界限，对他进行严肃的批判。”

李辰大惊，刚开口说：“我怎么成……”，肖校长大手一挡：“你先别说，最后有你说的時候。下面，大家发言批判。”

下面的老师们也愣了。肖校长向他们布置发言的时候，也没说李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啊，就说是思想认识错误，改了就行。发言稿也是这么准备的啊，现在怎么说呢。

肖校长讲完话，等着大家发言，可没有一个人说话，冷场了下来。

两分钟之后，肖校长有点急了，眼睛来回看着下面的老师。老师们的眼睛却一个个离他而去，或是往上，或是往下，或者就干脆闭上了。

肖校长没办法，只好把眼睛直愣愣地对着平近芳。

平近芳被看得有点发毛了，脸腮通红，慌不择言地讲了起来：“我说，我说，那天我跟程局长都说了。”

老师们都惊讶地望着她。

肖校长觉得有救了，反到舒了一口气，说：“别急，别急，慢慢说。”

平近芳把那段话又说了一遍，末了说：“怎么能这么说呢？程局长说了，这是破坏中苏友好关系，恶毒损害革命领袖的伟大形象。”

肖校长马上接过去问李辰：“有这回事吗？”

李辰对平近芳的发言倒是并没有觉得意外，也不想推托，就说：“是的，是有这回事，确实说得不恰当。”

“仅仅是不恰当吗？”肖校长文绉绉地反问着。

平近芳涨红着脸，大概是要完成她的任务，干脆说完吧，便又接着说，“程局长说了，这是反苏言论，是反动言论。要狠狠批判。要李老师、要大家都出一头汗。”

平近芳说完这些，头上还真是出了汗。

李辰一听平近芳这么说，受不住了，就解释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实在不是这个意思。我没说两个里面要死一个，那不是我说的。我是说……”

肖校长马上打断他的话，正色道：“不要辩解，要端正态度。难道党组织会冤枉你吗？”

李辰没有住嘴，还在说：“你不是在会上说，欢迎批评吗？还说是毛主席说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

肖校长不知怎么，居然一时也学会了程贵安的那套，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大喊道：“你好大胆，还不服啊！跟你老实讲了吧，毛主席还说了，他们不是言者，而是行者。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这不是我编的话，这是上级传达下来的。上头还说了，事情发生了变化，我们欢迎的是对党的建设性的善意批评，而绝不允许右派利用鸣放向党恶毒进攻。我们反击右派言论，不是故意设陷阱、下套子，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李辰顿时像五雷轰顶，一时头晕目眩、六神无主，竟瘫倒在课桌边痛哭起来，反复地说着：“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呀。我怎么会反党呢，我怎么会反党呢……”

肖校长一看，也没辙了，摇着手，说：“散会，散会。”便扔下李辰不管，径自拂袖而去。

倒是有几个老师过来扶起李辰，这个宽慰说：“李老师啊，别急，别急，事情会弄明白的。”那个劝解说：“唉。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啊，李老师。”

平近芳愣在了一边。

24.7打入深渊

当李辰悲痛欲绝嚎啕痛哭、老师们手足无措的时候，肖校长上哪儿去了呢？

肖校长自己跑到乡政府往县教育局打电话去了。

他撑着从黄港带来的用了十几年的油布伞，顶着渐渐加大的风雨，吃力地往前走着。路上已经很泥泞了，他很不习惯走这乡村的下雨后的土路，一步一滑，踉踉跄跄，走得好不狼狈。想着会上的情况，凭良心说，他也并不想出现今天这样的结果，他甚至都没想到最后会是这样的结果，当然他更不会想到这还远不是李辰、包括他自己的最后的结果。

他也在想，这是在干什么呢？可是这话能对谁说呢？对李辰说，还是对程局长说？满脑子的疑问，只能硬往肚子里塞。眼前必须要解决的是，李辰摆在那儿怎么办？如果他天天在那儿又哭又闹，这台戏再怎么唱下去？这校长再怎么当？面对李辰、面对老师们，他的舌头是短的，很多问题他是解释不了的。严格来说，他自己也觉得是问心有愧的。

可他有什么办法呢？他觉得自己也是身不由己，被浪头推着走，扮演着自己并不想扮演却又不能不扮演的说起来很不光彩的角色。还是把问题推给县局吧，虽然内心有愧疚，可事情还得硬着头皮撑下去。好在还有县里，他们有权有办法也更有上级的精神，他们可以什么也不怕、可以什么也不管，他们不需要天天直接面对李辰和老师们，事情也是他们布置的，最后当然应该由他们来处理。

想到这些，他加快了脚步。在风雨飘洒的空荡荡的东街上，就他一个人在伞的后面跌跌撞撞地往前走着。偶有一两个人站在自家的门口看着他，那时的龙头镇还很少有人打伞的。

进了乡政府，他都没怎么跟别人打招呼。别人看着他阴沉的脸，知道这些天学校里有事情，也不去跟他说什么。

肖校长几步跨进去，手一摸到电话的把手，就赶紧摇了起来；刚拿起话筒，就急忙喊了起来：“程局长，我找程局长！有要紧事情！”

“讲吧，我就是。”电话那头响了。

“程局长，我是肖福兴。那个李辰在批判会上，又哭又闹，不接受批判，会都开不下去了。是不是请局里再考虑一下，如果全县那十个名额都满了，考虑到李辰平时的一贯表现，就不一定划他了吧。”

“我看你这个校长，也不要再当了。你知道划分右派的标准吗？里面就有一条，对右派同情、包庇、打掩护，我看你就差不多。告诉你吧，全县文教系统已经划了二十六个了，你想当第二十七个啊？正好少一个右派校长呢。”没想到电话那头是劈头盖脸的一通。

“不，不，不，不。”吓得肖校长一连串的“不”，“我坚决支持县局的决定。是他在闹。”

“这小子也不识抬举。后来，纪乡长跟我提过这事，我才没把他划成极右。已经是够意思了，还想怎么样？”

“但他要是再闹下去，那怎么办呢？”

“这还不好办么？就怕他不闹。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这么强大，还怕这点小事情么？他越闹，我们就越好下手，就越容易出战果。我们就是搞对敌斗争出身的，就是搞群众运动出身的，这点办法还没有么？我看你确实不是当领导的料，这么点气魄都没有，亏得还当过地下党员呢，怪事。”有些解放区的同志，看不上地下党的同志，其实，这才是件怪事。

“还得麻烦你过来一趟啊，局长。”

“你叫我怎么说你好？到现在都还没听明白，这事还用我来吗？我现在就报告公安局，明天就把那小子抓去劳动教养。我们县里正好缺少右派分子拒绝改造的典型，这不，又是一个战果么？哈哈，哈哈，我正愁没有呢。这下，我们县教育局反右斗争的材料就完整了，能拿得出手了，可以和别的县比一比了。”

程局长讲到了劳动教养，这儿就把这事解释一下。劳动教养，从字面上看，就是劳动、教育和培养，简称劳教。劳动教养制度是从苏联引进（他们叫“古拉格”），但在中国形成了世界上一种特有的制度。劳动教养并不是依据法律条例，从法律形式上也不是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依据国务院劳动教养相关法规的一种行政处罚，公安机关不需要经过法庭审讯定罪，就可将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施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进行思想教育等等的措施。

这个制度是在五十年代建立起来的。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其中讲到：“六、对这次运动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的和因为罪状较轻、坦白彻底、因为立功而应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去又会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给与一定的工资。”

法律意义上的劳动教养制度始于1957年。这年的8月3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在反右运动大规模开展以后，依据这个决定，将一大批划为右派的人员送去劳动教养。在随后的一年里，全国立即建起一百多处劳教场所，开始形成县办劳教、社办劳教、乃至生产队也办劳教。全国劳教人员很快就被收容到近百万。

到1961年，连公安部也认识到：在劳教工作中“扩大了收容范围和收容对象，错收了一批不够劳动教养的人。在管理上和劳改犯等同了起来。生活管理和劳动生产上搞了一些超体力劳动，造成了劳教人员非正常死亡的严重现象。”一直到1979年，劳动教养都还没有明确的最长年限，有些人劳教长达20多年。

这种制度一直受到过很多批评。主要的批评意见是，认为劳动教养制度违反了《宪法》，存在“没有法律的授权和规范”、“劳动教养对象不明确”、“处罚过于严厉”、“程序不正当”、“规范不统一和司法解释

多元化”等等弊端，而这些成为有关部门滥用权力、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现象屡屡发生的根源。

同时想说明的是，劳动教养与劳动改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劳动改造是按刑法判处徒刑之后所实行的强制劳动。（以上资料，请见：百度百科的相关条目）劳动教养制度直到2014年在各方反对下才予以取消。

程贵安就是依据这个，通过公安部门，要把李辰送去劳动教养。

第二天，天色更加阴沉。雨小了，风更大了，雨丝在风中急急地飘洒。

一个比惊雷更大的事情，震撼了民主村，震撼了整个龙头镇。

上午，一辆马车从县城过来，上面坐着县教育局的一个人，和两个公安局的民警，腰间还别着枪。年龄稍大点的民警，就是余校长死的时候来过的卞干部，现在是副科长了。更年轻点的民警，姓周。

走过乡政府的时候，宗干部也上了车。本来也不该他的事，但他分管保卫工作，也愿意上来，就跟着一起来了。

车进了学校，肖校长也有点意外。尽管昨天程局长在电话里已经说了，可他肖校长也没想到，今天真的就来了。

李辰还在教室里上课呢。尽管他一夜没睡，尽管他已经病了，尽管他从昨天下午以来连一口水也没喝，但他还想着今天有课，依然支撑着过来。此时，他两手撑着讲台，脸色苍白，声音沙哑，身子似乎还在微微地抖着。他心里还在想，无论如何要坚持住，不能在学生面前倒下。

同学们惊讶地看着他们的李老师，从来没有以这种形象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李老师。

这节课是中国历史，他在讲着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讲着人民革命的胜利，讲着国民党反动派的灭亡。讲着讲着，他也为革命的胜利所感染，疲惫凄凉的脸上竟然有了一丝笑容。

两个民警，拿着手铐，走到教室门口，正要一脚进去。肖校长说：“还是我把他喊出来吧，别吓着了学生。”

肖校长轻轻地敲着门，推开了一条缝，说着：“李辰啊，你出来下，有个事。”

李辰一脸迷茫，懵懵懂懂地走向门口。

“出来讲吧。”肖校长又轻轻地说着。

李辰走到了门外。

“你是李辰吗？”卞科长看了下眼前这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毫无表情的目光中，似乎也掠过一丝别人无法解读的内心活动。

“我就是，找我有什么事吗？”李辰还在天真地问。

“你思想反动，抗拒改造，县劳动教养委员会决定对你实行劳动教养，强制改造。”卞科长讲完，便对年轻的民警晃了一下脑袋。

只见那民警向前一步，突然一个扫荡腿，猛地横着扫向李辰的小腿。李辰毫无防备，就直挺挺地结实实地向前倒在教室门口的泥地上，摔了个“肯尼迪”（意即“啃泥地”）。没等李辰的一声惨叫喊完，周民警就一脚踩在了背上，再一把拽着衣领，就把李辰提了起来，很麻利地把手铐上。看那李辰被摔得鼻青脸肿、满身泥巴，鲜血从嘴角淌下，一截断牙还粘在嘴唇上。那拽起的衣领，勒得脸都扭曲得变了形，两眼紧闭，却全无声息。这一下，就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从这一刻起，你就不再是个人，你就没有任何做人的权利和尊严，连条狗都不如。

教室里的孩子们吓得哇哇大哭。

“别装蒜，去拿上你的铺盖卷。”周民警吆喝着。

李辰被带到宿舍，用戴着手铐的手捆扎着行李。

他艰难地拉开抽屉，拿起两本书，被卞科长一把就打掉了，一脚踩在地下：“就是念书念多了、念蠢了，进去了还想看书啊？干活还干不过来呢。”

“叫我上哪儿去？”

“你管不着。别磨蹭，快走！”卞科长在催促。

李辰一身的泥土、一脸的伤痕和血污，戴着手铐的手扶着肩上的行李，走了出来。

学生们在教室的门口、窗口惊恐地看着、哭着，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要走了。李辰被一根长绳栓在了马车后面。

马车动了，李辰踉跄地被拖着、跟着。

孩子们不知就里，哭着围上来，直喊着：“李老师，李老师……”

年轻的周警察，推开孩子，“走，走！老师呢，校长呢？干吗去啦？过来维持秩序。”

老师们在远远地探着头，无言地看着。

肖校长不见了。他一个人躲进了办公室，关起门，再没出来。

宗干部在挡着孩子们。

马车走了。

24.8 凄风苦雨

在寒风和丝丝细雨中，李辰被马车拖着，走进了龙头镇。

已经听到消息的乡亲们，都挤到了往日每到刮风下雨就空旷无人的街上。

前面的马车上，三个人都穿着黑色的雨衣坐着，像三个铁疙瘩，看不清他们的面目和灵魂。

再一看后面，人们一个个都目瞪口呆，谁也不敢相信，那个拴在马车后面、被拖着走的人，就是平日里可亲可爱的民主村的准女婿、东门外中学的李老师。

这时的李辰已经完全是另外的一个人，一个像是从坟堆里挖出来的人。湿漉漉的衣衫紧贴在身上，已经潮湿的满身的泥土顺着衣襟滑落，蓬乱的头发上一层水珠，脸上的灰土和血污和着雨水往下流，下巴颏上还挂着血滴。他神情痛苦，脸上的肌肉在抽搐，戴着手铐的双臂被长绳拽着往前直伸。亮锃锃的手铐，那么地刺眼。两手已经被勒得发了白，两只脚不由自主地听凭马车拖着、在泥泞的路上一步一滑地往前挪。他闭着眼睛，没有声息，大概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竟然是在这样的场合下和他们见面，不想看见他所熟悉的人们的各种各样的眼光，想挽留住做人的最后一点点点的存在内心里的尊严。

当然，这时，他最不希望的是，让海秀看见他现在这番被损害、被侮辱、被剥夺了做人资格的惨样。

“天哪！这是怎么啦！”一阵凄厉的撕心裂肺的呼喊扯碎了人们的心，小林不顾一切地从街巷里冲了出来，扑向李辰。

那两个身着黑雨衣的民警，身手敏捷，一下就跳下车来，挡住了小林。

“你们要把他带到哪儿啊？”小林哭喊着。

“你管不着，你又不是他家属。”卞科长硬硬地说。

“我就是他家属。”小林毫不迟疑地说。

“呸！还没结婚，就自称家属，不要脸！这家伙反党反革命，要送到黄河口去劳动教养。”车上县教育局的那人说。

“他不会反党的，他不是反革命！”小林叫着说。

“这些话，跟我们说没用。”卞科长冷冷地说。

“李辰，你要坚强啊，你要保重啊。”小林对着银铛而行的李辰喊着。

李辰转过脸来，满面泪水，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心里在滴血。那个痛苦，那个屈辱，一句话也说不出。

小林一看李辰，那满身湿漉的泥土，那满脸青肿的血污，才半天没见，几乎就难以辨认，顿时疼得像万箭穿心，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被周民警一把就推倒在地。

林海秀在满是泥和水的地上挣扎着痛哭。

赵玫几人赶紧上去扶住。

宗干部赶了过来，“散开，散开。哭什么？李辰已经是阶级敌人，我们要划清界限、一刀两断。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有应得。大家看好了，今后，谁敢对党、对政府不满，谁还敢瞎说八道，就是这个下场！”

秦德才也在一边高兴得拍手叫好，“好啊，好啊。阶级敌人就该是这个下场。平常看他美的，今天就叫他好看，活该，活该！看他再神气什么，我早就看出他有反革命的样，他那个反革命言论还是我揭发的呢。宗干部，这事，有我一功吧！”

边上的人听得，对他直翻白眼，连宗干部也没去理他。

李辰在风雨中，被马车牵着，走过西门口，走过白果树，来到了大河边。

小林在赵玫的搀扶下，已是浑身淋湿、披头散发、泪水和雨水滴满了面颊，还一直在后面跟着。她说，她要跟到县城，她要跟到底，跟到不能跟为止。

马车下了河，那三人稳坐在车上，像三座铁疙瘩一样。

李辰却要扛着湿透了的行李，手被铐着，又被马车牵着。一踏进冰冷的河水，激得一身的冷颤，却也没能清醒他迷蒙的眼睛、恍惚的神情，麻木的躯体哪还能辨别脚底下河水的深浅。东倒西歪，晃悠悠，没几步，李辰就歪倒在了水里。亏得是刚下河，水还不深，李辰挣扎着，把脑袋伸出了水面。

小林惊叫着：“李辰，李辰！”不顾一切地跑过来，还没跑到，脚下一滑，就摔在路边，立时晕了过去。

赵玫跑过去，俯下身抱起昏迷了的小林，拍打着她的脸腮，连连哭着说：“这怎么办，这怎么办啊？”

赵玫惊慌地四周张望，好在车素花、王大妈她们也一直在后面跟着，虽然拉下了一段路。她们也瞧见了，正急冲冲往这面跑过来。

赵玫跪着把小林吃力地扶上自己的肩膀。

小林昏迷中还在呻吟，还在轻轻地呼唤着李辰的名字。

赵玫看着小林，自己也泪眼婆娑。她到现在也还没有反应过来，这是怎么啦？赵玫对李辰是那么地了解、那么地熟悉，几乎和对好姐妹小林一样地了解 and 熟悉。那小伙是那么地真诚、那么地求上进、内心里没有一点瑕疵，怎么会像对国民党特务一样，被戴着手铐抓走了呢。解放以后的几年里，他全身心地扑在教学上，全身心地企盼着、努力着，要和小林一起用自己的双手建立起自己的家园，要一辈子和小林相厮相守。赵玫知道，这就是李辰的全部心思。想当年，看着他领着小林是怎样地满怀喜悦迎接革命的胜利，高呼啊，歌唱啊，欢笑啊。这样的人，怎么成了敌人了呢？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呢？是政府不对么？政府不可能不对呀。是她赵玫看错了么？眼前却是昏厥了的小林和还在大河中挣扎的李辰。真的是李辰不对，别人都不知道？可那也用不着这样对他呀？批评教育还不行么？这样做，叫谁也受不了啊？这叫李辰以后怎么做人呢？叫小林怎么过下去呢？善良的赵玫还在这样地想着。

周民警无奈地下去把李辰拖上马车。

卞科长闪出一丝笑意，说：“还从来没有犯人，享受过这种待遇，跟我们一个车呢。”

李辰坐不起来，横躺在马车的底板上，裹着潮湿的衣服，浑身颤抖，牙齿格格地响。紧闭的眼睛，前面一片的黑暗。任雨水在脸上淌，任寒风往脖子里灌，任心头在滴血，任躯体在上下颠簸摔打，任命运把他拖向一个谁也不知道结果的远方。

从此，李辰和深爱着他的林海秀，就被打入了无底的深渊。

李辰不过是那场运动中许许多多冤假错案中的一个。据有关部门统计，那年全国划了五十五万多的右派。另一个比较精确的数据是，1957年及以后的一、二年里，全国共划了3178470个右派，另外还划了1437562个“中右”（请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这数字还不包括1959年打的三百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海源全县划了右派211人。

对于1957年的“反右”，文革结束后，有若干种不同的说法。基本的看法是属于“阶级斗争扩大化”，意思是党的领导人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因此搞过了头。到八十年代平反冤假错案时，最后不予摘帽的只有包括笔者母校人民大学的林希翎在内的九十七人。即使不按四百六十万，就按五十五万算，那也是一个扩大了五千五百多倍的“扩大化”。一个多么令人可怕的“扩大化”！

也有种说法，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矛盾的影响已经很小，1956年中共八大决议已经指出：“我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基本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见《强国序曲》，罗平汉等编著，万卷出版公司）因此，1957年的反右是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而编造了所谓的“阶级斗争”，却把五十五万戴帽的“右派”和更多得不计其数的受牵连者推入了深坑。还有说，1957年反右初期的大鸣大放是被扑灭在萌芽中的新中国第一次对民主的诉求和表达。更有说，这场风浪其实是源自于当时尚不为人知的党内高层争斗。（本书只是列出学术界的几种不同观点，均出自公开出版物，仅供读者参考。有的观点，个别措词比较尖锐，本书在转述时，稍作了调整。）

当年被打入深渊的这些人讲过什么话，现在几乎已经无人提及。还是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在他的《不容抹杀的思想遗产—重读北大及外校的“右派”言论》一文中说：“1957年‘广场’上的思考与呐喊，正是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的思想基础，正是这样一些中国民间的年轻的先驱者以‘非法’的形式，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奠定的。”（请见：《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说明：《广场》是1957年北大部分师生自己编撰的一份小册子。）

1957年的反右斗争，还只是后来一系列事件的起始。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屈原开始，几千年来，就有他明显的特点和优秀传统。这些特点，主要表现为：独立思考，坚守道德底线，富有社会责任感。即使在专制体制的狂风恶浪中，仍然敢于不避斧钺、直叙己见。在漫漫黑夜中，依然苦苦地维持着一丝亮光。这当然为专制体制所不悦，从而遭致种种打击，就毫不奇怪。但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很不应该发生的事。

这些备受打击的“右派”们，后来遭受了怎样的境遇，读者们可以看《恍若隔世》（邢同义，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和《经历——我的1957年》（和风鸣，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

1957年反右之后，中国国内的社会生态迅速恶化。任何的不同意见，哪怕是善意的正确的意见，在社会上都没有任何存在的余地。就像那片绿叶，被狂风暴雨扫荡得一干二净，无论是挂在树上的，还是飘落在地下的，都被刮得无影无踪，社会状态已不再正常。1957年4月，来华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对中方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表示不理解、不赞同，毛泽东当时还引用了一句古诗开导他说：“万马齐喑究可哀么。”（请见：《中苏外交亲历记》，李越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是的，如果整个社会都变得万马齐喑，只剩一种声音，那么社会主义的民主与科学也就没有了立足之地。没有了不同的声音，也就没有了制约、监督和平衡，这个社会也就失去了自我调节、自我完善的机制。极端的观念，就可以毫无遮拦地膨胀；极端的做法，就可以毫无阻挡地横行。不幸的是，仅仅一个多月之后，事情就真的起了变化，和风细雨骤然间成了狂风暴雨，“左”的东西如同决堤的洪水，一发而不可收拾。于是，在其后的二十年里，又接连出现了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那一幕幕永远刻在世界历史上的违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违背人类社会共同理念的闹剧和悲剧。它们的深层次原因都是一脉相承的。

不仅如此，1957年的运动还冲毁了社会规则的底线，对社会心理、社会行为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巨大伤害。“因言获罪”和“言而无信”的叠加，使得“不能讲真话，不敢讲真话”反而成了社会常态。整个社会信用缺失、道德滑坡的负面影响，一直延续到很久、很久的后来，以至于再要完全修补和恢复，都很难、很难。2010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先生感慨地说，自己做高官20多年，感觉讲真话越来越难。（请见：《南方周末》，2010年3月11日）

也是在《南方周末》，看到一段令人心酸的话，抄录如下。一位女记者在感叹当下从小学生开始就要在作文里学着说谎时说：“美国孩子可以直接把真话写进作文里，而我们，从小就为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困惑着。”（请见：《南方周末》，2010年4月1日）

如何解决这一跨世纪难题，是关系到当今社会健康发展的大事。

其实，要想让大家讲真话，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就是要有一个允许讲真话的社会环境。时任总理的温家宝在2010年1月26日的一次座谈会上阐述“大学精神”时讲到：“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各大报纸均有报道）而1957年粉碎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灵魂。

“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这才是现代社会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这才是可以讲真话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一点，就不会有群众的创造性，就不会有国家的软实力，更不会有《共产党宣言》所讲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社会的民主和宽容，也需要个人的勇气和智慧。

联系到我们想要当文化大国、文化强国的良好愿望，最终能否实现，问题的关键也在于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办教育需要如此，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如此，文学创作更需要如此。惟有这样，中国当代文学才能改变乏善可陈的状况，中国的文坛才能出现大作和大师，中国的文学和中国的文化，才能迎来生机盎然的繁荣局面。若非如此，就只能是假大空话成流行色，垃圾作品堆积如山。若非如此，至少在文学领域，我们将一事无成。

某种意义上，本书的写作也是在力图实践这一精神，力求更多地讲一些可以讲的有用的真话，少讲一些言不由衷、并不想讲的话。

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本书仍将以认真而开放的态度，进一步展现如同层层巨浪涌来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以及在这惊涛骇浪之中人物命运意想不到的种种变化。

第二十五章 一定要解放台湾

1949年6月25日

25.1 炮击金门

1957年反右之后，不同意见就此销声匿迹，有很多事情就可以放手大干了，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各个方面。这不，1958年的春夏，在军事上就有件好几年没有的大动作。

这年4月，为打击美帝国主义妄图勾结犹太复国主义、扑灭世界革命怒火的嚣张气焰，声援阿拉伯人民的革命斗争，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几十万人空前规模的群众集会。7月，美军不顾世界革命人民的警告，在万里之外的中东黎巴嫩登陆。8月23日起，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趁美国无暇东顾之机，向国民党军盘踞的金门岛发起猛烈炮击，仅当天就发射了六万余颗炮弹，以彻底动摇国民党蒋介石在台湾的统治地位，史称八·二三炮战。（说明：为保留历史的画面，本书在叙述时仍采用了当时的语境，可能与现在的提法不一致。）

几万、几十万发炮弹倾泻在这弹丸之地的小岛上，金门顿时淹没在一片炮火之中，它的前沿阵地竟覆盖上了一层金属的炮弹皮。被打蒙了的国民党军，二十多分钟以后才开始还手。隆隆的炮声不但震动了台湾海峡，震动了全世界，也震动了龙头镇。

尽管这个行动被苏联的赫鲁晓夫当时讥讽为拿着马粪纸做的宝剑去试探资本主义的稳固性。然而，龙头的乡亲们又真的是兴奋了，因为他们又燃起了新的希望。解放军跨过海峡的时候，就是日夜盼望的被国民党掳去的亲人得救的时候。前两年，大家忙着搞合作化，都没怎么议论这事了。

现在，人们三天两头地跑到合作社办公室来，找报纸、看地图、打听消息。从李辰被抓走后，人们也再不去学校了。以往人们心目中圣洁的学校，变成了暗藏杀机、碰不得的地方。

杜家骏为此特地买了张全国地图挂在墙上。

这天，人们又聚在了这儿。

鲁队长在说：“咱们的解放军真神了。一炮就打死了国民党的参谋长赵家骧，还有个姓吉的司令。”

（说明：鲁队长所讲的那个姓吉的，就是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中打响全民族抗战第一枪的宛平驻军29军110旅219团上校团长吉星文，没想到21年后死在金门防卫司令部中将副司令的任上。另外：鲁队长讲赵家骧是国民党的参谋长也不确切。赵在五十年代初曾任过台湾陆军总部参谋长，58年时与吉同为金门防卫副司令。本书中人物所讲的不一定都对或都准确，笔者不一一指正了。）

赵玫拍着手说：“好啊，好啊。解放军真厉害！”

平金刚想开个玩笑，说：“这不是把你本家给打死了么？”

赵玫脸有愠色，说道：“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就在姓上么？”

平金刚看出赵玫不高兴了，便说：“我不过是想开个玩笑么。”

鲁队长的媳妇哈妹赶紧出来打个岔，大声地问：“还有什么好消息啊？”

杜家骏说：“咱们政府已经对美国军舰入侵我国十二海里领海，发出了第三次严重警告。”

鲁队长一听，便说：“中国有句古话，事不过三，再三不能再四。美帝国主义再敢来一次，咱就不客气，要动手了。”

平金刚说：“说不定，咱现在说话的时候，就已经打过去了呢。”

赵玫的大眼睛里都闪出了光芒。

鲁队长看到了赵玫的眼睛，说：“赵玫这下有希望了，快盼到头了，十个年头了。”

平金刚说：“十年了，不容易啊。”

十年了，不容易啊。十年了，这几个字，要装下多少酸甜苦辣，不管是装得下的、还是装不下的。

赵玫无意再去多想，只是在辛酸中露出笑脸，“真的能打过去么？”

“那还用说。”鲁队长很潇洒地说，“咱解放军都准备好几年了，这么个海峡，就这么点宽，算什么？迈个腿，说过就过去了。”

……

听说解放军炮击金门，老王头家也有了喜庆气氛。

这两年，丁妹过得越来越沉闷了。虽然集体劳动，使她有了更多的接触外面的机会；虽然小王溪来了和她睡一个炕，使她少了好多独自一人、暗自伤神的时候，但她的内心却觉得越来越累、越来越苦、越来越沉重、越来越封闭、越来越难以承受了。即使是在人多的地方，身在人群之中，自己的灵魂却总像飞了出去，在茫茫无涯的天际中寻找另一个灵魂。晚上，劳累了一天，躺在炕上，闭上眼睛，眼前却总是闪现出一个王力、两个王立、三个王立……乃至无数个王立在旋转、在朝她不知为什么地伸着手、在朝她不停地听不清地呼唤……

可这几天，丁妹也有了笑容。

她正背了一大捆柴火回来。

刚跨进院门，王山就喊了起来：“丁妹，丁妹，好消息！”

丁妹眼睛一亮，把柴火往地上一扔，就问：“什么好消息啊？打过去啦？”

王山说：“咱们的鱼雷快艇，又打沉了一艘国民党军舰。”

丁妹有些失望，她是在想解放军真能一步跨过去就好了，但还是很高兴地说：“好啊，好啊，看国民党还能有几艘军舰，还能再撑几天？”

丁妹心里更多的是希望，她就是靠这个希望支撑着、生活着。

小王溪背着书包，戴着红领巾，一蹦一跳地放学回来了。她已经上小学了，完全是一个沐浴在阳光下、享受着新生活的令人羡慕的幸福儿童。

“姐姐！”小王溪的嘴很甜。尽管年龄几乎差一辈，可在老王头家，还是按平辈称呼。

丁妹的心情，今天特别地好，对王溪说：“小妹啊，今天赶集，姐带你去买粿子吃。”

丁妹自己几乎没有钱，更少花过钱。今天，可是破天荒地第一次领着王溪去花钱。

25.2大海的怒吼

为了激励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乡政府在龙头中学召开了全乡“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群众誓师大会。大会过后，又集队游行到南面的海滩上。

龙头乡的许多村都有人在1949年随国民党去了台湾。中央一发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战斗号召，尤其是在炮击金门、马祖之后，整个龙头乡就像山呼海啸般的群情振奋。人们盼啊想啊，这一天终于要来了！大会至始至终都是在排山倒海似的呼喊之中，连纪乡长在台上讲了什么都听不清楚。往海边的游行，都等不及了，老人小孩也都蹦着跳着，蜂拥而去，好像这就要一步跨过大海，去踏平台湾岛。

人们涌向海边，大海却无情地挡住了人们的去路。昨天刚下过雨，今天天色放晴，一排排的海浪依然奔腾不息地拍打着岸边的礁石，白色的浪花在咆哮、在飞溅。人们停了下来，即使与海水搏斗，在海浪中前行，也走不了十几步。大海不管人们的想法，依然是从无尽的远处，永无止尽地送来一层层的海浪，一直扑到你的脚下。你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可以把它看做波澜壮阔，也可以把它看做绮丽绚烂，大海却还是一如既往、千百万年地不知疲倦。最远处的天边，蓝天下几片残留的灰云在翻卷，云海之间一片白茫茫、亮光光，深邃无比，似乎人世间永恒的秘密就隐藏在那无尽的尽头。

这片大海在两岸关系中还真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海峡对面的国民党方面也始终没有忘记过这片土地。就是这年的大年初一，1958年2月18日，台湾的一架RB-57A高空侦察机被由流亭机场起飞的歼5战机击落，正掉进了此时人们正南方的千里岩海域，只是龙头的乡亲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事后，这架飞机从海底被打捞上来，放在黄港的公园里展出，以展示国民党反动派贼心不死的罪行。七年后，高增光一伙武装特务也是在这片海滩登陆。

现在，人们看到的，只是翻卷着无尽波涛的茫茫的大海。然而即使是大海，也无法挡住人们的激情和思念，尤其是有亲人去了台湾的人家，更是不能克制。

王老头一家站在最前面，眼望着海天一色的远处，任海浪打湿着衣衫。他们似乎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海天那一头的王立。很少激动的老王头，捏紧着拳头，一遍遍地喊着：“解放台湾，解放台湾，一定要解放台湾！”尽管喉咙早已沙哑，可他内心还是在拼尽全力地喊啊，喊啊。

王山站在水里，朝前叫着：“兄弟啊，兄弟啊，你看到我了吗？我在喊你啊！你快要回来了，你再忍一忍，我们就要打过来了啊！”

血性正旺的连二娃，冲到了齐腰深的海水里，又是拍打海水，又是喊叫：“快打呀，快打呀！解放军快打呀！四弟啊！四弟啊！我要过来救你啦！”

王大妈的嘴角抽搐，满脸是水，已分不清是海水还是泪水，喃喃地说着别人听不清的话。

扶着王大妈的是丁妹，突然开大了嘴，喊了起来：“王立啊，王立啊，我一直等你啊！你要回来啊！”

老实的丁妹从没有大声说过话，更没有在众人面前大声说过话。她这一喊，着实让旁边的人都大吃一惊。那是她在心里憋了多少年的话啊，终于在今天喊了出来。

丁妹喊过之后，扑通一声跪在水里，嚎啕大哭起来。她要把这十年的泪水都倾倒出来。

王大妈反过来想扶丁妹，却就势也倒了下去。婆媳俩在海浪中呼天抢地地痛哭着。

鲁队长赶快过来，和彭小宾他们一起，把她俩使劲地搀起来。

包金贵两口子也来了。

包金贵对着大海跺着脚呼喊，他比别人有着更多的忿闷和怨恨。他本来可以和大家一起正常地生活，一起享受这和煦的阳光和蓝色的海洋。然而大海那一头的国民党，害得他总要比别人矮一头、缺一点，总不是一个完整的正常的人，都是国民党害的呀。他多想把国民党都炸飞了。这世界上再没有国民党，他也就再不用受国民党的牵连了。“打吧，打吧，快打过去呀！炸吧，炸吧，把他们都炸掉吧！”包金贵干吼着，声音虽然不大，别人也听不清，但那是他的真心呀。

金贵嫂紧紧地依在包金贵的身边，她也知道了远在千百里之外的台湾国民党跟他们家有多大的干系。随着包金贵的干吼，她的嘴巴也在一张一合，胳膊也在一举一落。虽然在队伍里，她是最不起眼的，那也是她全部的力量啊。

有个人在远远看着金贵嫂，那就是小王溪。

王溪上小学二年级了，跟着学校的队伍一起来到海边。她老远就看见了她的妈妈。她在老王头家过得虽不富足，但比起过去却是好到了天上。平常也并不多去想自己的妈妈，但是见到了，还是想多看几眼。

今天也是这样，她看到了她的妈妈，她妈妈也跟大家一样地激愤。她多想走过去喊一声。但这是在队伍里，不能随便出去。再者，她也渐渐明白了其中的一些纠结。小小的年纪也知道了，人是不能随意表达自己真情实感的。她和她的妈妈，虽然近在咫尺，却已经越离越远，成了往不同方向抛出的两条绳索，不会再有什么交集。小小的王溪又不能完全理解这些，心里升起了种种的茫然。这种的茫然，几年之后渐渐掩盖了、以至最终完全抹去了她原本还有的那点真情实感。

赵玫站在队伍的最前面，坚毅地望着远方，握着拳头，没有说更多的话，对着层层卷来的浪涛，心中的激情化成了歌声，轻声地唱起了：

“为领土完整，为保卫和平，

北京城发出了庄严号召，

听全国人民的钢铁誓言：

‘一定要、一定要解放台湾！’”

赵玫的歌声感染了大家，一唱十，十唱百，歌声越来越响亮。几十里的海滩，几万人的队伍，都唱起了这首激越的战歌。

“我们祖国的领土谁也不能侵犯，

我们强大的队伍谁也不能阻挡，

我们千军万马要跨过海洋，

一定要把胜利的旗帜插到祖国的台湾！”

这歌声连着阵阵愤怒的口号，响彻云霄，震撼着整个龙头海滩，激荡着整个海洋，整个天空。

在歌声中，人们多希望，解放军的千百万发炮弹能从身后呼啸而起、飞越云层、砸向台湾，把蒋介石、把国民党打得稀巴烂。

人们都希望，解放军的舰船千帆竞发，跨过海洋，一举拿下台湾，解救亲人，统一祖国。

歌声激荡着海洋，海洋激荡着浪花。

第二十六章 “八·二三”金门炮战

1949年6月26日

26.1 天崩地塌

本书中去了台湾的那些人，讲过西北村的连四娃、董平章、王立几位老乡，也讲过国民党方面的方舰长、李策、高增光。还有谁呢？还有334团的罗自成。他来台湾后，上了地方的一个警察局。青年军的几个人，重新编入青年军109师，1949年秋又被派往大陆战场，最后在粤西被歼。但有两个人没有一起去。一个是孔班长，年岁已大，身体又不行，在离王立他们不远的地方分了一小块公置田，退伍当农民了。还有一位就是代连长，代明安，开始时是在新兵教导大队当队副。1954年“九·三”炮战后，金门前线吃紧，他和一些新兵编入第9师，进驻了小金门。

代明安是浙江人，抗战时随家人退到了江西，在那儿参加了青年军。代明安和很多浙江人一样，也是很聪明的。但他又不是个功于算计的人，不会去计较一些小得失，看起来很平和、随遇而安，内心深处却想得很深，想得很远，还有几分正义感。而平常的表现则是个典型的尽职尽责的军人。不过，不知是年龄的增长，还是岁月的流逝，原本的热忱、原本的激情，却在不断地消退。在来台湾后的这几年，他对国民党的期望似乎在继续减退。他看不出来，党国的前途何在，自己的前途何在。虽已三十好几，却还是孑然一身。他甚至不知道该把家安在何处，或者说何处才是他的家。党国军人，对他来说，已经仅仅是个赖以生存的职业而已。

来到小金门，那是又上了前线，又要面临生与死的考验。有的人慷慨激昂，有的人脸色惨白。代明安则是很淡然，前方后方到哪儿都一样。每天也都很负责，每天也都很忙碌。“九三”炮战后，在刘玉章司令负责金门防务的这段时间里，十分重视工事的修筑，尤其是地下坑道的修筑，工程量十分浩大。他们新兵队的到来，实际上是在充实这方面的劳力。代明安作为副营长虽然不必去亲自挥动镐头，但督促检查是每天不可少的。

进入1958年，对岸的大陆不但掀起了大跃进的热潮，“一定要解放台湾”的调门也越来越高，意图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取得重大胜利。国际方面，这年的七月，如上一章所述，西亚的伊拉克发生革命，新政权退出巴格达条约，倒向苏俄。为稳住亲西方阵营的阵脚，美军随即开进黎巴嫩，东西方矛盾骤然加剧。东边的台湾海峡也日渐升温。随着鹰厦铁路和沿海六大机场的建成，中共空军进入福建，海军舰艇也有集中趋势。台湾“国防部”见势不妙，8月6日宣布台海地区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8月23日，对于在金门的国民党军人，是个永生难忘的日子。代明安已经得知蒋总统亲临金门前线视察（但那时已经离开），下午又来到三连的坑道工事看看。岛上虽有一些大型地下工事，有的甚至能开

进汽车、坦克，但对于最前面第一线的，还是靠人工开挖坑道。金门岛的岩石很坚硬，适合于修筑工事，但开挖绝非易事。

代明安冒着烈日，下到三连的地下坑道。但这地下坑道，并不阴凉，而是汽油灯下的昏暗、闷热的潮气、碎石的粉尘。士兵们个个都光着膀子，只穿一条短裤，汗流浹背，在用箩筐往外背打下来的石块。代明安一脚高一脚低的走到最里面的工作面。那儿的士兵在用铁钎和铁锤砸开石缝，还有的用铁镐敲开石块，嘴里一阵阵“嗨，嗨”的号子声。

“阿华啊，就你使这么点力气，就想敲开石头啊？”

代明安闻声看去，那是朱班长在训谢阿华。朱班长是第9师的兵，也是从大陆撤过来的。这回来了新兵，朱也就提了个班长。谢阿华是代明安带过来的新兵，台南人，个头瘦瘦小小的，一看确实不是当兵的料。

“用力，再用点力！就这点力气，怎么能砸开石头？就是给自己挖个坟，也得使点劲啊。”朱班长刚当上班长，还有点劲头。

“朱班长，在批评谁呢？”代明安对自己营的部下还是挺熟悉的。

“哦，是代营长啊。”朱班长见是代明安来了，立即来个立正敬礼。“这里面看不清楚，才看到你啊。”

“免了，免了。”代明安摆摆手，意思算了。这倒真不能怪朱班长，坑道里又是粉尘又是潮气，光线又不好，不走近是看不清楚。“在说谁呢，这么厉害？”

朱班长指指谢阿华，“我在说他呢。讲了几次，就是不肯出力。养这种兵，有什么用？”朱班长倒是一点不客气。

谢阿华站在那儿，委屈地对代明安说：“营长啊，我是真想出力，可实在是没有力气啊。”

代明安看着瘦小的谢阿华。这个兵，在新兵营就已经认识他了。确实是体质弱、体力差，但另一方面他自己实在是不想当兵。

代明安叹了口气，“在这里比不得在家里，这个时候又比不得平常时候。共军正对我们虎视眈眈，恨不得把我们一口吃掉。连蒋总统都亲自来金门视察了，我们能不多出点力吗？阿华啊，咬咬牙，把工事修好了，再安心歇会儿。”他对部下从不会凶神恶煞的那种样，还是挺体恤的。

“唉，到这鬼地方来，出这个力干嘛呢？”阿华还在嘟囔。

“我们在这儿出力，是为了保卫台湾，保卫反攻复国的自由基地。”朱班长没等代明安讲就先说上了。

“共军真要打台湾，我也会出力的。可这是金门，不是我们台湾，它跟我们台湾有什么关系？”阿华一直觉得他是台湾人，跟朱班长他们大陆人不一样。

“有金门在，才有台湾在。没有了金门，就没有了台湾；没有了台湾，就没有我们大中华自由的希望。”朱班长讲得跟当官的讲的一样。

“希望，希望……这还有什么希望。我可是实在敲不动了。我的胳膊太细，敲不动。”谢阿华脸上有着些许痛苦，不像是真要偷懒。

按理说，代明安这时完全可以惩处谢阿华，但他没有，停了下，说：“那你去往外背石块吧。”

谢阿华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往外走去，找背石头的箩筐了。

朱班长不解地问代明安：“营长，你对他怎么这么客气？要是碰上我们连长，可不算他。”

代明安说：“唉，他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和我们的看法是会不一样的。金门，对于我们来说，是反攻复国的希望；对于他们，却是块包袱，也好理解。阿华这个人，这么点小个，确实不是一块当兵的料，不是个干活的料。能干这些，已经不容易啦，不能太勉强他啦。没有他们，这些活，我们也得干。是吧？”代明安却是反过来说了这番道理。

朱班长歪着头听着，不知听明白了没有。

五点多多了。晚饭的哨声响了，大家陆续走出了坑道，用胳膊擦着脸上的汗。

代明安也在近处的山坡上走着，前面就是一片海，跟龙头那一望无际的大海不同的是，这片海的对面，波光粼粼之上，不多远就是一条连绵不断的山峦，横在天边。那儿，就是大陆。今天的天气特别好，对面的青山看得分外的清晰。就这么近，就隔得这么近，几乎是触手可及，却分明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不但是不相往来的两个世界，而且是相互怀着深仇大恨、不共戴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两个世界。对面的世界，按说是自己的故乡，是自己爹娘安生的地方，本应是充满感情无尽向往的地方。但那又是共产党统治下的地方，那是个斗地主、镇压反革命、清剿国民党残渣余孽、也就是代明安自己那类人的地方。还会去想它么？还敢去想它么？自己从离开家十多年来，就没有回去过，那感情既很浓烈也很淡漠。怎么回去？跟着国民党打回去？没想过，他早就不相信国民党有这个本事。再怎么回去？游过去？说不定还真能游得过去，可就算游了过去，那又会怎样？恐怕连现在的这碗饭也没有了。代明安尽管是个党国军人，而且看起来还是个很尽职的军人，然而内心里始终是那样的怆然。

“还这么慢吞吞的啊。叫连长看见了，连晚饭也不给你吃，叫你连着背一晚上。信不信？”朱班长的声音传了过来。

代明安回过神一看，是谢阿华还在背着一筐碎石，一个人艰难地下着坡往海边走去。

“走远点，一直走到海边上再倒下。”朱班长还是在吆喝着。

代明安走了过去，问是怎么回事，都吃饭时间了，阿华怎么还在背。

朱班长敬礼后答道：“连长刚才过来看见了，说阿华干活不像样，罚他再背一趟。再干不好的话，饭也不给吃，一直背到天亮。”

“唉，”代明安本想说，这也不是个办法，但在班长面前不能说连长的不是，这话也就咽了回去。“叫他多走两步，倒在最前面的海边上。就背这一趟吧。”代明安嘱咐完班长，自己就往回走了。

这时候，正是太阳西沉，晚霞将起，和风拂面，草木舒展，空气清新，山海亮丽。不管是这一边，还是那一边，都是那么的宁静和清晰。多好的世界啊，如果没有这些人为的对峙，那该……

代明安还没想出下面的词，突然，对岸响起了一片惊人的隆隆炮声，顷刻之间耳边满是炮弹的呼啸声，没等“不好”两字说出口，前面后面已有几处炮弹爆炸。

代明安回头看，士兵们四下里慌忙奔跑。

“快回坑道，快回坑道！”他大叫着，拔腿往回跑。

“轰，轰！”更多的炮弹在四周爆炸，山前山后烈焰四起，到处升起了滚滚尘土和浓烟。

代明安就近跑进了一个坑道。前所未有的密集炮弹呼啸而来，坑道里都感受到强烈的震颤，似乎就要塌下来。坑道口外，已是一片烟尘，什么也看不见了，炽热呛人的硝烟直往坑道里灌。

这两年，隔岸双方虽然也有过一些相互炮击，那也不过就是零星干扰一下而已。代明安感觉到这一次是非同一般了，难道真要拼出个你死我活来。

一颗炮弹在坑道口近处爆炸，那震耳的巨响，强烈的颤动，坑顶的一些细石在沙沙掉落，那呛鼻刺眼的浓烟一团团地涌进坑道，连飞起的碎石也打了进来，打得人嗷嗷直叫。此时这昏暗的坑道，真的像是陷入了世界末日。

“唉哟，妈吡；唉哟，我的妈吡。”坑道里的兵在大呼小叫。

“不能塌下来啊？”

“要塌下来，就成了我们的活棺材啦。”

“不许胡说！”代明安厉声喝道，“往里面去点，别堵在门口，外面的人在怎么跑进来。挤在这儿也容易受伤啊。”

士兵们往里面挪动了下。

“早知道，就再使劲往里挖了。”

“为什么要挖坑道，你现在才知道么？”代明安对刚才那句话很生气。

里面的兵，才没了言语。

稍过一会儿，烟尘还没散去，一个人影翻身滚了进来。

“哎哟，可是进来啦。”

那人正是朱班长，满脸是烟灰，衣服撕破了，手上也有好几处划伤的血口。

“你怎么才进来？”代明安问。

“哦，是营长啊。你问我才进来？营长啊，我能活着进来，就不错啦。刚才我在山坡下，想看看阿华搬得怎样啦。虽然我看不上他，但到底是我这个班的兵，我得去看看他。没想到，这一阵炮弹打得昏天黑地。满耳是轰隆的炮声，什么也听不见了。满眼是滚滚的黄尘，什么也看不见了。满鼻子是呛人的烟味，满脑袋也像被炸开了，嗡嗡地，什么也想不出来了。那小石子像雨点似的哗哗直下。也分不清天上地下，更分不清前后左右。我只好满地的爬呀滚呀。哪儿有坑洼，就跳进去躲一会儿，瞅准了下一个坑，爆炸过后，我就跳起来再滚过去。好不容易，东滚西滚，滚到这儿来了。”看来朱班长是个能说的人，这种时候还能说上这么些。

代明安赶紧问：“那阿华怎么样了？”

“不知道。这炮一响，头几十秒，还是有人到处跑来跑去。最多也就一分钟的时间，变得到处都是烟尘，见不到人影了。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你们排长、连长呢？”

“都没看见。”

“这儿有连排长吗？”代明安往里面大声问了声。

“报告营长，我是二连三排副瞿浪琴。”里面有人答道，往前挤了过来。

“你跟连里能联系上吗？”

“报告营长，我们这儿是新开挖的坑道，还没有电话，联系不上。等一会儿炮弹少一点，我派人出去联系。”

“你们这儿有伤亡吗？”

“现在在这儿的，和跑进来的，还没有。还在外面的不好说。现在还没法统计。有的人可能跑到别的坑道，也有三连的几个跑到这儿来的。”瞿排长答道。

代明安问朱班长：“你在外面有看见被击中倒地伤亡的吗？”

“我没看到，大家好像都挺灵活。虽然措手不及，不过还是能跑得出来，平时都训练过。不过伤亡肯定会有。”朱班长答道。据事后统计，这次炮击虽然十分猛烈，除了开始的突袭，所造成的伤亡总体来说不算大，对作战能力没有大的影响。在之后的日子里，主要是外出抢修接线的通讯兵伤亡较多。

“瞿排副，等炮弹一停，你们马上冲上去，一要防止共军趁机登陆，二要抢救伤员。你现在就分好工。”

“是。”

然而，炮弹还是一阵阵不断袭来，坑道还是一阵阵不停地颤抖。在昏暗中，在浓烟中，在颤抖中，在惊恐中，整个坑道就像是地狱一样。

就是地狱也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要崩塌的呀。

“八·二三”炮战当天，解放军第一波就连续炮击了20分钟，停5分钟后又开始第二波，前二小时就发射了4万余发炮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不但摧毁了金门各岛的许多工事、设施，造成440多人的伤亡，尤其是使国民党军的高层指挥遭到重大损失。金门防卫司令部的吉星文、赵家骧、章杰三位副司令阵亡，连带死了两个美国顾问，司令胡璉、国防部长俞大维负伤，他们是饭后外出散步，在水库边的亭子里毫无防备，正好被突如其来的炮弹击中。好在蒋介石刚已离岛。中共方面是否得知蒋介石来金门的消息从而成为这次炮击的直接导火索，目前的资料还都没有涉及这一点。

26.2 海边设伏

这之后的几天，虽然炮击的势头轻了点，但依然是不分时点地连续不断。人不敢停留在坑道外面，因为不知什么时候，炮弹又会飞到头顶上。

但是坑道里的日子太难熬。那里面的味道实在叫人难以忍受，除了以往的那种热气、潮气，更有那么多男人挤在一起的汗臭味，呛人的硝烟味，和最最难闻的尿骚味。连日的炮火，使人不敢出去走远。解手之类的事，也就在洞口附近解决，随时准备炮声一响，哪怕没尿完也得往里跑。日子一长，味道越浓，越难以散发。没有好好睡觉的地方，就不说了。吃饭、喝水，都成了难题。持续的炮击，使补给无法正常进行。有了这顿没下顿，水桶里剩下的水也不敢多喝，因为不知道下一次水什么时候能来。

更叫人提心吊胆的是，不知道对岸的共军什么时候会发起登陆攻击，把这些最难的难处也都化为乌有。前沿的观察哨，哪怕炮轰得再猛烈，弹片横飞，也都在瞭望口一眼不眨地四处观察。晚上还要派出暗哨，一直埋伏到海边的礁石，以防备对岸游过来的侦察兵。

这一夜，轮到了朱班长和谢阿华。天刚黑，两人就往外走。

“这么晚，还要去？”阿华依然是嘟囔。

“都已经这个时候了，要执行任务了，还啰嗦什么？在新兵队，代营长怎么教你们的？”朱班长瞪了他一眼。

“你怎么能跟营长比？说句实话吧，你这个班长脾气比营长还厉害。”

“规矩就是规矩，谁讲都一样。出了这个洞口，就什么话也不许说。一切按照已经布置好的去做，不然就军法从事，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朱班长严肃地说。

“金门，金门，屁个金门。”阿华不能不服，却还在轻声嘟囔。

朱班长瞪了他一眼，没再说话，在前面领着他走。

下坡时，他们开始猫步潜行。在一个弹坑里，两人趴着，朝前望了一会。前几天的填埋石块，这几天的炮弹爆炸，使微地貌有了很大变化。朱班长对阿华指指右前方，又比划了几下。阿华只知道是叫他按原定部署往那儿去，再多的意思就看不出来了。朱班长自己往前瞅了两下，就匍匐向前。爬得很慢，不过没一会儿，阿华就看不到他了。

夜幕已深，阿华也是极慢地往前移动，因为地下满是尖锐的碎石，那层灰色的伪装服起不了什么作用，碎石的棱角扎在身上依然很疼。他爬得更慢了。应该是差不多到位置了吧。在一块稍大的石块后面，他停下了。两眼看着前面，黑黑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连大海和陆地都分不清，只有一阵阵卷来的涛声，在告诉他大海就在眼前。按说，天色还不错，算日子，也快要中秋了，怎么还看不清呢？有了近视了？还真不知道。

他看着看着，有点困了。虽然这几天在坑道里躲着，没什么事做，可是却睡不好觉。空气的浑浊、浓烈的异味且不说，那震耳不绝的炮声，整个坑道乃至连带着身躯和心灵的震颤，才是最可怕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坑道就会被炸垮，自己就要被彻彻底底地埋在里面，埋在离故乡台湾隔着一个大海的不知名的一个小山坡和更加不知名的一个小山洞里。大脑和神经已经被震得麻木，满耳朵还是“嗡嗡”地听不清。倒是那习习的海风掠过，空气那样的清新，比起在坑道里要惬意多了。他深深地吸了口气，不知不觉地打了个哈欠。他都分不清，他是清醒了，还是更困了。他把狙击枪压在身底下，眼睛又朝前看了看，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睁开眼和闭着眼差不多。唉，连他自己也分不清自己是在睁着眼还是闭着眼。他强忍着打了个不出声的哈欠。他居然还能记得，暗哨是不能发出任何声音的。

朱班长那儿，可是不敢有半点的懈怠。他趴在修坑道推出来的一片碎石堆里，没有很大块的石头，看起来并不适合于隐蔽。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多美的夜晚啊，漆黑的天上，星斗在慢慢转移，凉风习习，能见度似乎好了些。圆圆的月亮已经升起。海浪在月光下一层层涌来，拍打着岸边，连那浪花像一条条白色的细线，都能看见。如果不是那两排挂着响雷和铃铛的铁丝网，真的可以是一块谈情说爱的度假胜地。

朱班长没有想那么多。他也晒了，当然，他既不敢打哈欠，更不敢闭眼，一直使劲瞪着眼往前面看，使劲驱赶着内心的睡意，一眨也不敢眨。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是后半夜几点了？他没有表，但他知道这是对岸最有可能派人来的时候。就在这时，果然，在海水中，顺着海浪涌上来一件东西，任海浪拍打，一动也不动。朱班长生疑了，在海浪的涌动下，它不该一动也不动，除非是有意识地克制自己。他一直盯着它。果然，十多分钟以后，那东西动了，往前爬了，爬向铁丝网，居然还伸出了手，用铁钳剪那最底下的一段铁丝。

朱班长心在扑扑地跳，来金门这么多年，这是他第一次真的遇上。什么时候动手呢，什么时候动手呢？他在问自己，“现在还远了点。等他爬进铁丝网来，到那时，他再要钻出去，就不这么容易了。”

“恐怕不会就这一个人吧？”朱班长在看更前方的海面。海上依然是黑黑的，除了一层层的涌浪什么也看不清。再看剪铁丝网的人，停了下来，用手撑着，意思是想要爬进来，可又不动了。他怎么了？不想进了？他发现了什么？一连串的问号在朱班长的脑子里闪过。毕竟是天黑距离又远，朱班长使劲保持着一动不动，仔细地盯着那人，却无法看清他的动作和表情。但显然那人是在犹豫，他也会知道，一旦爬进来，就很难再出去。任何一个细微的差错和闪失，都将意味着什么。

“不会有什么破绽吧？难道是发现了我？不会，如果真是发现了我，也就不会这么犹豫了。”朱班长在想着，但他已经不敢有任何的变化和挪动。“可能是前几天坑道里挖出来的填土和这几天翻天覆地的爆

炸，使这海边的样子跟原先不一样了，跟他们的军官向他交代任务时不一样了。是的，一定是这个原因，使他犹豫了。”朱班长心里想着，一边伸出了狙击步枪，开始瞄准了，心想只要那人一后退，就开枪。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一个“啊欠”从东面远远地传来，虽然至少有二、三百米，在那寂静的夜空里却是那样的清晰。这边在铁丝网下的那个人，扔下钳子就退了出去。朱班长猝不及防，不管三七二十一扣动扳机，手里的枪响了。对面远处的海面上，也立即响起了对射过来的枪声。显然，那个人是有同伴的，在开枪掩护他。

这边山坡上工事里的机枪也响了，子弹就从朱班长的头顶飞过，“一突突”地横扫着海面。等枪声停下，那人早已经没了。海面上也一点反应没有，一点声息也没有，一切都还是黑黑的、静静的，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对岸的那个人，是被击中了、沉了海底，还是脱险返回了，都不知道。

那个冒失的啊欠，显然是阿华的。他在半睡半醒之中，不由自主地来了这么一下。朱班长气死了，让他白白丢失了一次好不容易才碰上的立功机会。他报告连长，要求处分阿华。连长请示营里。代明安思索了下，说：“算了吧。有了军纪处分，对他一辈子不好，对连里也不好。这种事情算不算违反军纪？也可以算，也可以不算，看怎么说了。但是，连里可以对他训斥，可以关禁闭。尤其是要向他说清楚，在军队里任何一个小的疏忽，是会要命的，包括自己的命。这次是让对方跑掉了，下回你自己就不一定跑得掉。”

26.3 抢运补给

对岸的炮火，尽管给这边的补给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但并没有能完全阻止。金门各岛的运输在炮火中还在继续。虽然双方对这次战役都投入了海军和空军，奇怪的是，都是各打各的，双方海军的舰艇与舰艇交战，双方空军的战机与战机格斗，却没有真正形成陆海空联合作战的势头。对方舰艇没有过来炮击岛屿，对方飞机也没有过来轰炸扫射地面目标。这可能是对岸的装备和指挥能力还没有达到这一步。这就使金门各岛的补给运输有了继续的可能，而没有被完全封锁住。当然，在炮火下补给运输的困难和代价也是很大的。

这天夜里，抢运补给的任务由朱班长所在的三连承担，除留下少数值班看守，其余全部出动，跑到小岛南侧的海滩抢运物资。物资是由小船从大金门运来。这一段岸边没有码头，即使是小船也不能完全靠岸，需要士兵们涉水搬运。由于小岛这一侧有山峦阻挡，对岸不能直接观察到，他们也还没有夜航侦查，所以在夜幕之下抢运，是个较好的机会。除非有对岸的舰艇绕行过来，那就会有拼死一战。不然就是一些零星的干扰性炮击。

三连提前来到了海边，等大金门过来的船只靠近，稍一停稳，这儿的号令轻轻一吹，各班排队各自跑向事先指定好的船只，涉过一段浅水，上船扛箱，再快步搬到岸边山坡上的坑道里。月儿还没升起，潮汐也正退去，正是海边抢运的好时机。这儿直接面对的是大海，而大陆的对岸在另一侧，看不到这儿的场面，更听不见这儿的声。但这儿上百人的队伍，依然一句说话声都没有，只有匆匆的脚步和喘息，和偶尔发出的“快快”的催促声。

谢阿华也在搬箱子。一个箱子里两颗炮弹，七、八十斤。这回，他也在尽力搬运。几趟下来，体力渐渐不支，步伐有点踉跄。

“能行吗？”朱班长扛着更大的箱子，从后面上来，看阿华这个样，忍不住悄悄地问。

“还行，还行。”阿华答着。

朱班长有点不忍，心想难为他了，但是船上没有更轻的箱子，只能这样了，好在已经搬了几趟，剩下的不多了。

“轰！”山坡上响起了一声爆炸。

对岸也在估计这种夜晚应该是这边抢运物资的时候，但又无法准确判断，只能这样朝着大体的方位打去。

“轰！”又一发，就在岸边。

士兵们似乎有了这十几天被炮击的经历，没有慌乱，没有躲闪，继续在来回搬运，只是脚步更加快了。

“轰，轰！”海面上，岸边上，接连不断地爆炸。

士兵们在咬着牙奔跑，争取跑完这最后的几趟。这是在和生命赛跑。打中了，是命；没打中，也是命。

“轰，轰，轰！”炮火更密集了。在士兵们奔跑的路线上也落下了炮弹。

代明安冲了过来，吹着哨子，又大声喊着：“暂停，暂停，暂停搬运！”

空手跑向船边的士兵，反方向折回山上的坑道。正扛着箱子的士兵则拼着最后的力气，往山坡跑去。

小船也开始起锚离岸后撤。

就在海边搬运的人群将要走尽的时候，一个人影还在扛着一个箱子，吃力地走着。

“谁啊？快，快！”代明安朝那人喊着。

“轰！”一颗炮弹在近处的礁石上炸开，火光、水珠、烟尘、砂石，腾空而起。

阿华大概是走不动了，却还在往前挪。

“阿华，把箱子扔掉，快跑回来！”朱班长朝阿华快步走去。

“轰！”一颗炮弹在阿华身后炸开。

在火光中，阿华的身影倒下了。倒下的阿华，没忘了把肩上的炮弹箱使劲往前推开。

阿华倒在了地下，那炮弹箱还往前翻滚了两下。

“阿华，阿华！”朱班长不顾一切地向前跑去。

当朱班长半托起阿华的上身，阿华张了张嘴，已经说不出话。

“阿华，阿华……”朱班长几天前还在训斥阿华，如今却泪流满面。

“卫生兵，卫生兵！”代明安看到了这一幕，朝四处大声喊着。

有几个军人朝阿华那儿跑去。

阿华的手臂已经瘫软下来。我们已经无从知晓阿华最后想说的什么。

但是，金门坚持下来了。

又过了几天，金门运来了M55自行火炮，士兵们把它叫做8吋大炮。双方炮火的较量有了改变，这一边不再是单方面的被动挨打。朱班长也有了能看到对岸笼罩在一片硝烟之中的时候。

前后大约是一个半月的时间，到了10月5日，对岸宣布停止炮击7天，7天后又宣布再停两周。

朱班长又能在坑道外晒太阳了。他问代明安：“这是唱的哪出戏？打着打着，怎么又不打了？”

代明安浅浅一笑：“他们再打炮也没用了。”

朱班长又问：“他们会这么放手么？前几天他们不是还发表什么声明，非要拿下金门、马祖么？”

“他们实在封锁不住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自己找个台阶下了。”

“只是阿华永远地留在这儿了。我那时对他……唉。”朱班长对阿华还带着几分歉意。

“他留在这儿，是在看着金门，也是在看着台湾。”

这年的10月25日，中共方面以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了“再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以后单日打、双日不打，单日也不一定打。那时的炮击已经只剩下零星的象征性的射击。这之后，对岸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忙。过了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彭德怀本人就在庐山会议上被整。这场炮击，理论上的终止，是一直到了1979年中美建交之际，由时任国防部长的徐向前发表声明，停止对金门各岛的炮击。这样算的话，前后长达居然有20年之久。1949年之后，迄今为止两岸最大的一场军事冲突，就这样地落下了帷幕。

第二十七章 人民公社

1949年6月27日

27.1 成立大会

1958年国内的政治气候与1957年截然相反，从春天到夏天，随着天气的逐渐转暖，政治空气也不断升温，最终变成了难以抑止的高热。当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说，“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而后，这个赶超的时限，一个月一变，月月变得更提前。到了六月，毛泽东在给薄一波副总理报告所写的批语中指出：“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请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才隔了短短的六个月，赶超英国的时间就从十五年一下子变成了两年，就是变戏法也没有这么快的。

其间，公布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掀起了以高指标为特征的“大跃进”，鼓起了前所未有的革命和建设的热潮。到处都是欢呼雀跃，到处都是捷报频传，不能不让人以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在迅速发展，不用说超过英国，就是超过美国、超过苏联，也是不在话下。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的《决议》满怀信心地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请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中国要准备进入共产主义了。而且，还找到了通向共产主义的基本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并且在一个月之内就在全中国迅速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后来，薄一波在回顾时说：“轻率地发动农村人民公社运动，是我们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工作中的又一个重大失误。”（请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薄一波，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文中提到了党在工作中的失误，在此顺便插一句，对于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所造成的一系列重大失误，是党的领导人的失误，还是党的失误；是应该由党的领导人承担责任，还是由全党来承担责任，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个问题，请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四期的第一篇文章。

龙头镇，当然也在九月成立了全乡合一的“龙头人民公社”。应该说，在这时，广大人民群众还是表现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

庆祝人民公社成立的大会，正在东门外中学的操场上进行。会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声鼎沸，气氛热烈，比起早几年庆祝成立新中国大会的声势又要大多了。

全乡各村的人都来了。操场坐不下，教室前所有的空地都挤满了人，连两边的大路上也站了不少人。好在学校并没有围墙，站在外面倒是更风凉。

尤其是为庆祝公社成立，龙头镇通上了电，还特地在会场拉上了大喇叭。纪社长在台上讲话，那声音从喇叭里出来，响得不得了。三里五里都能听见，嗡嗡地压住了一切，震得耳朵都能跳起来。头一回当上公社社员的乡亲们，又头一回听到这声音，都惊讶得不得了。

民主村的队伍，因为来得比较早，就在操场上的主席台前，更是领教了这大喇叭的威力。

王大妈赶紧捂上了耳朵。

鲁队长对这声音却是佩服得不得了：“乖乖，到底还是人民公社厉害，连声音都这么响。”

平金刚说：“就凭这声音响的，什么困难也挡不住咱啦，全都给吓跑啦，哈哈。”

丁妹在纳闷，这世道变得，怎么连声音都变成这样啦，再往下还会变成啥样呢？

小王溪倒是高兴得到处钻来钻去，丝毫不受这大喇叭的音量和里面内容的影响。

喇叭里正广播着纪社长的声音：“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步前进。消灭三大差别，消灭资产阶级法权，一个令无数革命先烈为之奋斗、为之神往的共产主义社会，已经为期不远了！只要大家努力，我看只要三年就可以了。大干苦干三年，就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了。请同志们想一想，那是多么美好的日子啊。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实行政社合一，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今天我们成立人民公社，就是建起了一座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社员同志们哪！共产主义在向咱们招手了……”

下面又是一片欢呼、掌声雷动。

但是领头呼口号的，已经不是小林，而是哈妹了。哈妹也是热情奔放、尽其所能，扯着嗓子使劲地喊：

“人民公社万岁！”

“大跃进万岁！”

“总路线万岁！”

“三面红旗万岁！”

只是哈妹的口音不够纯正，海源的方言味很重。比如“万岁”的岁，先不说发音不准，念成了近似于shei-。尤其是那个声调也不对，本该是第四声，在哈妹的嘴里成了类似于第三声却还不是第三声的那种不知道究竟是第几声的声音。呼到后面，音调反而低下去了，好好的一个口号，变得满不是那回事。

27.2来电了

公社了，还真有新气象。

全公社通了电，而且电线还拉到了各家各户，也拉进了老王头的家。

民主村的电工是彭会计的儿子彭小宾，今年二十二了，去县城突击学了一个月，现在成了全村最受欢迎的人。

“砰，砰！”老王头家的门响了。

“王大伯，王大伯！”这是彭小宾在喊。今天轮到老王头家安电灯，彭小宾上门来了。

“哎，哎，来了。”老王头忙着过来开门。

为了这一天，老王头全家都在家等着，要看看这电到底是怎么进的家。

彭小宾穿着蓝布背带工装，腰间斜跨着工具袋，上面插满了钳子、板手、电工刀、胶布带等等，肩上背着捆电线，精神头十足，典型的当时农村女孩子最喜欢的青年工人的形象。

彭小宾刚跨进门，王山就说上了：“哟，小宾成了工人阶级啦，来领导咱们啦。”

彭小宾还挺谦虚，说：“嗨，都一样干活，革命分工不同么。”话里还是有点高兴。

老王头说：“这不但是领导阶级，而且还是技术活，将来有出息啊。”

王大妈说：“咱民主村又多了个能人，像他爹似的。”

彭小宾说：“这活也不好干，要学好多啊。”

在彭小宾后面，还有个剪短发的小姑娘，那是衣大妈的闺女衣春玲，肩上挎着小书包，满脸嬉笑地一步一随。

衣大妈的丈夫参军牺牲了，那也是解放后好几年才知道的。其实出去没多长时间他就牺牲在了沂蒙山区，具体的时间、地点、什么情况不是很清楚。村里对烈军属都挺不错，衣大妈自己领着闺女也已经过了好几年。所以这消息，当时对她们的打击还不是很大，娘俩在村里过得也还可以。

衣春玲今年十三、四岁，正在上小学，人挺活跃，到哪儿都讨人喜欢。而且人虽小，却很有主见。

老王头见了小春玲，也逗起了乐：“你这小丫头，也不去书坊，到处瞎跑啊。”

“我就跟着小宾哥，看看这电是怎么通的。”春玲笑盈盈地说。原来她是觉得这通电神奇得不得了，对会通电的小宾哥也是佩服得不得了，趁着还没上课的空挡非要跟来看看。

“你可别踩着电噢。”连最憨厚的王山也很难得地开起了玩笑。现在王山的心绪挺好，因为他和皮家的大闺女皮珊珊换了帖子，订了亲，都一年多了，明年就要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了。

可是小丫头也不相让，朝地下“叭叭”跺了两脚，“你家这地上还有电啊？电还在小宾哥的肩上呢。”

衣春玲说的是彭小宾肩上的那捆电线，满院子的人也都高兴地笑了。

跟在最后面的，还有个人，是储小二。他扛着个短梯。

储小二在村里印象不怎么样，老王家的人见到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

彭小宾站在院子中间，四处望了望，问：“装哪间？”

“就北屋这间。”老王头说。全家早就商量过了，当然是安在老王头这间了。

储小二放下梯子，彭小宾爬上爬下，钉钉子，拉线，干得挺忙也挺利索。

衣春玲蹦蹦跳跳、前后左右地忙活着，嘴里不停地说着：“小宾哥，我帮你拿这个……小宾哥，钳子在那儿呢……”

王大妈看着，随口就说：“啊呀，春玲真是小宾的好帮手啊。”

大家都没在意，王山还对他妈说了句：“看你说那儿去啦。”

谁也没想到，这句无意的话，十年后竟应了验。是的，他们俩差了十岁呢，谁会想到那儿去呢。但是岁月无常，在狂风恶浪的十年动乱中，他们俩真的走到了一起。

唯独储小二站在那儿没动。

老王头蛮奇怪，就问：“小二，你怎么不动？”

小二说：“不会。”

“那不会学么？”

“学会了，不就得多干活了吗？”

老王头无语。

彭小宾在北屋里拉上了线，在糊棚顶安了电灯，在炕头上装好了拉线开关。

全家人看得佩服得不得了。

王大妈小心地试探着捏了捏电线，问：“这电线是实心的，这电是怎么过来的，又从哪儿出去呢？”

彭小宾说：“这电线不要随便摸，万一破了，电就漏出来了，会电死人的。”

王大妈一惊，连忙将手缩了回去。

老王头问：“这就好了么？”

彭小宾说：“现在还不行，等今天晚上七点整，村里开闸，全村就都来电。这时，你们一拉这开关线，电灯就亮了。”

傍晚，老王头家特地包了饺子，包了一次难得自己家吃的饺子。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一家人围坐在炕上，丁妹端来了刚出锅的饺子，也都没人理会。大家围着放着饺子的炕桌，齐齐地仰头看着反射着窗外晚霞余光、此时还是静静的毫不起眼的灯泡，十分虔诚地等着，等着这对于农家来说等了千百年的历史性的神圣一刻。

七点，街上响起了急促的敲锣声，是彭小宾一边敲锣、一边满街跑着喊：“来电了，来电了！”

王山马上转过身拉了开关线。

“咋啦！”一声，电灯一下就亮了。

那么地亮，就像个小太阳。满屋子都神奇地亮了。炕席和炕上的被窝都亮了，炕下的桌子和桌子上摆放的大小杂物都亮了，连贴在墙上的不知哪年的旧报纸都亮了。每个人的脸上也都亮了，在陡然刺眼的光亮中每个人都绽放出灿烂的笑脸。

灯光穿过饺子蒸腾的热气，竟闪烁出点点的五彩光芒。

全家人都惊诧了，自己的家里从来没这样地明亮过，自己的心里也没这样地亮堂过。原来，夜晚可以这样的明亮；原来，生活可以这样的美好。

全家人都不由自主地“呀”地叫了起来。不但是老王头一家，整个民主村都沉浸在惊奇、兴奋和光亮之中，都盼望着今后的生活也能像这眼前的电灯一样光亮。共产主义啊，难道真就像电灯光照耀出的五彩光芒那样神奇？

27.3修公路

在“大跃进”中，把经济建设的重点，形象地比喻为：三个元帅升帐（钢铁、机械、粮食），两个先行官开路（电力、铁路）。龙头镇因此先通上了电；修不了铁路，那就修公路吧，这对于推动当地经济，确实是需要（海源县的北山就修上了从黄港到北海沿的铁路）。龙头镇，现在是龙头公社了，决定重修从龙头到县城的公路，出西门、经赵村、过大河、到王庄、再直往北，由土路改成砂石路。并且在大河上搭起个漫水桥。漫水桥，就是那种桥墩很矮，秋冬季枯水期河水在桥下过，夏天丰水期河水就从桥面上过的一种简易桥梁，这样可以大大节省建设费用。

为此，公社动员了全社的力量投入修路。北门外的茅山是采石场，山下是碎石场，把大石头打碎成小石子后再用手推车运到公路上，拌上沙土，夯实。龙头镇附近几个村负责修路。漫水桥，由县水利工程队来指导施工，北面几个村出劳力。

此时，整个龙头镇以北、以西，成了一大片建设的工地。到处都是彩旗招展，到处都是激越的劳动号子，到处都是挥汗如雨、你追我赶、奔忙的人群，到处都是热气腾腾、忘我而壮丽的劳动场面。整个就是一幅以群众运动大搞经济建设的画卷。

这天，纪社长领着于大队长（于村长）他们几个来到工地视察。

他们先来到茅山的采石场。

赵村的几个强劳力在这儿干着最艰苦的活。赵刊新是领队，他们分成两人一组，一人扶钎，一人抡锤。采石场在山腰里掀开了一片石棚，白晃晃的，在阳光下特别耀眼。赵刊新在光着膀子抡大锤，豆大的汗珠挂满了黝黑的脊背，两个胳膊鼓起了丰满的肌肉，张着大嘴一声声地喊着“哎哟，哎哟”，一下下地高举铁锤，又一下下地砸向铁钎，坚硬的石头一寸寸地崩开了裂缝，石渣和粉末四下迸溅。

纪社长向他们招手，“同志们，辛苦啦！”

赵刊新放下锤，抹一把汗，笑着说：“为建设家乡，为建设共产主义，再苦再累也心甘啊。”

赵村的大队长对纪社长说：“他们都连续作战，干了十多天啦。”

赵刊新兴奋地说：“现在真觉得是在改天换地，叫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浑身有用不完的力气、使不完的劲。”

纪社长说：“真是有公社社员的豪迈气派啊。”

于大队长说：“赵刊新的能干，在全乡都是有名的。当初就是他从敌占区跑过来报告了里面的情况，我军才下决心打过去。”

纪社长说：“我知道，我知道。当初立了功，现在又立新功。等明年，我们要大张旗鼓地表彰优秀社员。赵刊新就是一个。”

在场的这几个赵村社员，都高兴地鼓起了掌。

纪社长临走时又说：“你们要注意安全啊。这石头又硬又重，别让它伤着。”

“好，好，我们会注意的。”赵刊新说。

妇女们在山下的碎石场，从矛山下到北门外占了一大片，叮叮当当，粉尘飞扬。也是插了好多彩旗，有的上面还写着：“穆桂英队”、“佘太君队”等等，那是大跃进时期的一个风景。

几十名年轻妇女，不光是民主村的，由哈妹领队，站着把大石头打成小石头，有的也要抡大锤。本来应该是男劳力的活，但因为劳力紧张，都由妇女顶上来了，那是“穆桂英队”。哈妹凭着年轻，在领头抡着大锤。这种活，由于震动比较大，即使体力一时能跟得上，对妇女的身体也是伤害很大的。

年纪大点的，也有好几十个，算是“佘太君队”了，由车素花（经老太）领队，坐着一圈圈，头扎毛巾，戴着手套，用榔头再把小石头敲成比指甲还小的碎石子。还没走近，碎石场就已是一片尘土。那石屑和粉尘，落满了这些妇女们的脸庞和衣襟。

纪社长打了招呼，就对车素花说：“哟，素花姐，你也在啊，能行么？”

车素花说：“这点活，算什么？解放前，那时候，什么活也得干啊。现在出点力，可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啊。大家都有奔头，干得可欢呢。”

于大队长说：“你们也要注意身体，别累坏了。建设共产主义，也不在这一两天。”

哈妹插话说：“大队长，你赶不上形势啦。现在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啦。”

于大队长有点尴尬地说：“哦，哦，二十年，二十年……”

大伙都哈哈地笑了。

这时，几辆推着大石头的小车正往这儿过来。第一辆车是连二娃。连二娃是民主村普普通通、众多青壮年里的一个，没言没语，朴实肯干。在一堆人中，普通得很难会注意到他。就是肯出力、肯干活，有十分力不会只出九分。这回，车上推的是一大块七、八百斤的整石。进碎石场前，有一道缓缓的坎，得使上点力才能过得去。他正满脸涨得通红，额上憋着青筋，两脚叉开蹬地，拼着力气过这最后一道坎。抬头看见社长、村长都在，便低头猛地一使劲，小车颠了一下，就过了坎。哪知这一颠，小车就不听使唤了，往前直冲。而前面就是妇女们在砸石头。

“不好了！”一声尖叫，还是皮珊珊眼疾手快，一下就跳了出来。

连二娃一见不好，赶紧把车一拐。可是这么重的车，两个胳膊哪能拐得过来。车朝左一歪，眼看就要车翻人倒。说是迟那时快，突然，从边上闪出一个人，猛地过来迎着那块正在倒下的大石头，顶了上去。

她就是原本站在皮珊珊后面的连二娃的妻子，连二嫂。

大石块的倒下，因此而缓了一下。

也就这缓了下的刹那间，哈妹等几个妇女，连纪社长、于村长等都一拥而上，扶着、顶着，让那块大石头慢慢地倒下，连二娃从两个车把之间跳了出来。

好险呐！

于村长说：“你怎么推这么大一块石头，叫她们妇女也不好砸呀。”

连二娃惊魂未定，喘着气说：“这是他们开石头的赶进度，图省事。”

纪社长对于村长说：“一会儿，你去跟他们说说，再赶进度也要讲规格，讲质量。要注意安全，要为别人、为全局考虑。不然，出了事，修条路还要用命来换，那修这条路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地上的这道坎，为什么事先不平整一下呢？恐怕也是为了赶时间开工，顾不上这些了吧。还是先停一下，花点时间，把路平一平，以后就能干得更快、更顺利。”

“好，好。”于村长一一答应。

纪社长又对连二嫂说：“你这位女同志很勇敢啊，哪来的这么大劲。”

哈妹在一边笑着说：“那是在救自己男人啊，怎么能不勇敢呢。”

连二嫂忙拍了哈妹一下，说：“我倒没想到是不是自己男人，就想要是压了人，可不得了。”

“对，对，不管救谁，都是见义勇为，都应该受到表扬。”纪社长也笑着说。

现场的空气又轻松了起来。

“就是皮珊珊跑了。”不知哪个人说了这么一句。好几个妇女也都跟着说：“皮珊珊跑了，皮珊珊跑了。”

皮珊珊红着脸在边上，气得“哼”地跺了一下脚。她知道她们说的不是一回事，不是说她跳出来躲开了，而是说她几次躲开订了亲的王山跑了。

忽然边上的一个妇女，“咳，咳”地咳嗽起来。

纪社长一看，那妇女不但身上、头发上全是细细的石屑，连脸上、嘴唇上、眼睫毛上也都粘满了白色的粉尘，整个人就像是白灰粘起来的一座塑像，更看不出是多大年纪。

“哟，这位余太君是谁呀？干这活能行吗？”纪社长说。

哈妹笑得合不拢嘴：“哈哈，这哪是余太君呀，这是迟得法的儿媳，才三十出头。因为身子比较弱，队里照顾她，把她放在余太君队了。”

这迟得法的媳妇也很老实，不会说个话，还是低着头，不停地用锤子敲着面前的石头，石屑依然朝着脸上、身上飞来。

纪社长看着说：“你们还是要戴上帽子，戴个口罩的好。”

“我们农村人，哪有这么讲究的，还从来没有戴口罩的呢。”哈妹说。

“喂，喂。”纪社长应答着，也讲不出更多的建议。

迟得法的儿媳自此就得了咳嗽病，常常胸闷，喘不上气。乡亲们不知道这就是矽肺病，一种常见的、后果较重、按说又是比较好预防的职业病。但当时还没有人把这些当回事，很多人就此落下了病根，结果在谁也想不到随之而来的大饥荒中过早地倒下。

纪社长一行来到龙头镇外西北角的小路上。

几十辆手推车在路上来回奔忙，每辆车前都插着小红旗，个个都是不停的脚步、兴奋的脸。

杜家骏、平金刚他们就在这儿。他们是用小推车把石子从碎石场运往西门外的路上。小路在这儿有个拐角，是段上坡路。他们也是两辆车一组，到了这儿坡前，两人一拉一推，先把一辆车推上去，再下去推另一辆。

纪社长看着前面有四辆小车在往上推，便对同行的几人说：“咱们也上去帮一下。”一人找了个小车往前拉。

纪社长一看走在最前面的是杜家骏（这时是副大队长），就说：“不错，不错，当干部的走在前面。好啊。”说着就拿起一根拉绳拉了起来。

杜家骏忙说：“这是应该的。但这拉车，就不麻烦你们啦。”

纪社长说：“这就见外啦，都是一家人，说什么麻烦呀。”

大家一起用力推到了坡顶。

纪社长说：“坐下歇会儿吧。这儿有水吗？”

平金刚说：“有，有。”

路边还真有个大水桶，地上放着几个碗。平金刚给大家舀上水。

大家都在路边坐下。

纪社长一边喝着一边说：“路上的尘土太大，这桶得有个盖子盖上，这碗也要找个东西遮一下。我们既要忘我劳动，可以改善的条件，也应该注意改善。当干部的同志，尤其要注意这一点。”

纪社长还是想到要改善劳动条件的。

杜家骏马上应道：“好的，中午我就回去找东西拿来盖上。”

于大队长说：“你们这个活不易啊。”

平金刚说：“没什么，心情好就不累。”

纪社长问：“心情好就不累？”

平金刚说：“真的，杜队长还边推边唱呢，有个歌还就是唱咱们推车的事。”

“还真有这样的歌？”纪社长饶有兴趣地问。

“杜队长，唱给咱社长听听。”平金刚说。

“咱杜队长唱得可好呢。”于大队长说。

杜家骏倒也大方，喝了口水，便张嘴唱了起来：

“一辆哎小车哎，吱吱叫哎，

放开脚步来呀么来回跑哎。

不怕那路途长又远哟，

来来回回运土方哟，

哎嗨哟，哎嗨哟，推起来好像水上漂哟哎。

哎嗨哟，哎嗨哟，推起来好像水上漂哟哎。”

大家听了直鼓掌。

纪社长满脸高兴，“真不错，真不错。是能放松疲劳。”

于大队长说：“那以后多唱唱，发挥文艺的作用。”

纪社长他们来到了公路上。

这儿集中了上百号人，场面更是浩大，几十面的旗帜在风中飘扬。滚滚烟尘中，看到许许多多忙碌的身影。一队队的小车从各处运来碎石、黄土、沙子，堆满了路边，一群群的人把碎石搅拌上沙土，再有人推过去铺到路上。一群群妇女和年纪稍大点的男社员在把土夯实，赵玫和林海秀她们就在这儿。她们四、五人一个木夯，每人拉着一根夯绳，喊着整齐的号子，踏着整齐的步骤，按着整齐的节奏，一夯夯地砸向路面。随着“砰砰”的砸地声，那夯头便淹没在一阵阵腾起的灰土中，人也是一个个灰头土脸。

然而，赵玫头上的发夹，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很引人注目，脖子上搭着毛巾，依然是那样健康、丰满、乐观，在众人面前甜甜地笑着。

小林脸色有点严肃，闭着嘴唇，一下下地往上提着夯绳，很认真地在干着活。

还是赵玫在领着喊号子：

“大家齐心么，哟嗬嗨呀，

加油干哪么，哟嗬嗨呀，

共产主义么，哟嗬嗨呀，

就来到呀，哟嗬嗨呀。”

纪社长走到她们面前夸奖道：“看你们个个都像穆桂英，好精神啊。”

赵玫说：“以前都在家里，看不出来有这么能干吧？”

纪社长说：“是得刮目相看。”

他看见小林，特地转过去对她说：“这些活，能习惯啊？你可是你爹的宝贝疙瘩哦。”

小林嘴轻轻一抿：“还宝贝啊？都扔到破烂堆里去了。”

于大队长说：“不能这么讲。你还是咱民主村人人都伸出大拇指夸奖的人啊。”

纪社长也恳切地说：“是啊，要做个不管什么困难都压不垮的人啊。”又意味深长地拍了拍小林的肩膀。

小林紧闭着嘴唇，点点头，忍住了眼泪，没有流下来。

第二十八章 吃饭不要钱

1949年6月28日

28.1 大办食堂

1958年有很多事情都是以“大”字当头，比如：“大办钢铁”、“大办民兵”、“大兴水利”等等等等。其中有一大举措，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时的革命性变化，在一段时间内打破了（或者说是打乱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生活习惯，那就是“大办食堂”。

千家万户的农民再不用在自己家里做饭了，只要到集体食堂就可以吃上已经给你做好了现成的饭菜。吃饭——中国农民世代最操心的事，一夜之间就不用你自己管了，公社给你包下来了。据说，这能极大地提高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极大地提高劳动效率、极大地解放妇女劳动力、极大地……总之，是极大地了。

在人民公社所有的举措中，“吃食堂”，尤其是“吃饭不要钱”，一开始是最受欢迎的。

民主村的食堂放在西北角的场院。搭起了三、四十米长的席棚，垒起了一长排炉灶。车素花当起了总管，光炊事员就调去了十几个妇女，王大妈也在其中。于大队长、杜队长、鲁队长也都过来出主意、想办法，从人员安排、到选定菜谱、物资采购，几天下来忙得不亦乐乎。

四方桌，在场院里摆了十几个，可说是蔚为大观。但是桌子和凳子还是不够，因为开饭那天，县领导要来视察，这可是个大事。开始是动员各家往这儿送桌椅板凳，反正吃饭上食堂，放在家里也没用。还不够，怎么办？要是有人站着吃，叫县长看了多不好，那怎么能行。

这事反映到公社，宗干部出面，一下就解决了。宗干部，现在是公社政治部主任，喊来了秦德才，说：

“真他妈的没用，这点事还用我来告诉你怎么做？去搬就是喽。”

“上哪儿搬？”秦德才问。

“呸！真是废物！哪儿有，就上哪儿搬。都共产主义了，都是集体的，都是公社的。”宗主任的脾气是越来越大了。

“是，好，得令。”秦德才巴不得有这句话，他又可以神气起来了。

他喊来了储小二，储小二也是最愿意干这种事。

他俩满村地转，还没找到哪家有桌子。

走到林海秀门口，看小林刚进门，秦德才想跟着进去，哪料到小林早已瞅见，“砰”的一声，将门在身后用力推上，差点没把秦德才的脚夹了进去，但也是碰得不轻。

“唉哟哟！”只见秦德才疼得抱起了脚，单脚直跳。

“好你个林海秀，找个右派男人，还不服气，有你瞧的。”秦德才俩人骂骂咧咧地走了。

可怜林海秀靠在门后，淌着眼泪。

俩人想想，还是到迟得法家碰碰运气吧。干脆别敲门了，直接就闯进老迟家的院子，进了他家的屋里。看见有两条长凳，秦德才扛起就走。

迟得法站在院子里还没反应过来，秦德才就已经扛了长凳要往外走了。老迟赶忙上前拦，却被储小二一把推到在地。

迟得法在地上大叫：“还有王法啊？大白天就抢我东西啊！”

秦德才回头鄙视地说：“你这个落后分子，都共产主义了，还分什么你的我的，都是大家的，谁都可以用，谁都可以拿，这就叫各取所需。这还是马，马，马什么人说的。”

抢了别人东西，还说上了一大套道理，秦、储二人嘻嘻哈哈而去。

迟得法坐在地上，心疼着两条板凳，拍着巴掌哭着：“这叫什么共产主义哟。”

储小二听得此言，又从门外走了进来，大声喝道：“老头，你敢讲这话，这是反革命右派的话，就要叫你倒霉！”

迟得法只得无声，身上软得起不来了，无力地躺在地上。

这年全县办了2310个食堂。龙头公社选在“十·一”国庆节，各村食堂一起开张。那天，真的是人人喜气洋洋，场面热闹非凡。不但照例是彩旗飘舞、锣鼓喧天，各处贴满标语，而且还张灯结彩，挂上了好几条用崭新红布制作的横幅。席棚下长长的炉灶烟熏火燎，十几个炊事员炒菜的炒菜、蒸馍的蒸馍、烧火的烧火忙个不停。二、三十个方桌上，已经放上了一些盘和碟，里面盛着各种各样的菜肴：炒白菜啦、炒土豆啦、炖粉丝啦，每个菜里面还都有几条细细的肉丝，整个场院香味扑鼻。

场院上还安上了大喇叭，播放着最时新的歌曲：

“公社是棵长青藤，

社员都是藤上的瓜，

瓜儿连着藤，

藤儿牵着瓜，

藤儿越肥瓜越甜，

藤儿越壮瓜越大。”

全村的男女老少比过年还高兴，甚至比革命胜利还兴奋，穿上最好的衣服，扶老携幼，一家家，一户户，都来了。乡亲们相互问候着、道喜着。

于大队长几个干部在入口处招呼着大家进来入座：

“王大伯，请往里走。”

“张大婶，请这儿坐。”

等大家来得差不多了，于大队长站在中间，大声地宣布：“乡亲们，社员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公社社员大喜的日子，是我们农民世代做梦也想不到的一天。从今天起，我们吃饭不要钱啦！”

“噉，噉！”全场一片欢呼，碗啊、碟啊，敲得“叮当”直响。

于大队长接着又说：“还有件事，请大家注意了。一会儿，县长要到我们这儿来，考察我们食堂的工作。我们要热情礼貌，体现出我们龙头公社民主大队社员的精神风貌。县长说同志们好，你们就说县长好；县长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就说县长辛苦了。记住了，不要瞎说；谁说错了，不给饭吃。”

不一会儿县长一行在纪社长的陪同下来到民主村的这个场院。

纪社长说：“社员同志们！县长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看望大家了！”

场院上二、三十张饭桌旁，顿时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和掌声。听得出，这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欢呼，不是布置的，连县长都感动了。

县长也几乎热泪盈眶了：“同志们哪，我们千百年的理想实现了，共产主义在向我们招手了！”

“县长好！”下面齐声喊。

“我们要感谢党的领导好，把我们领上了幸福的金光大道。”

“县长辛苦了。”下面喊得更响了。

县长往里走了几步，正好来到老王头坐的桌子前，问：“吃食堂好吧？”

老王头连说：“好，好。庄稼人就盼着这一天。”

县长又问：“伙食怎么样？”低头看了看桌上的饭菜，惊讶地说：“啊呀，这么好啊？”

老王头也说：“比过年还好呢。”

县长调侃地说：“连我都羡慕了。”

老王头说：“要不怎么说，快到共产主义了。”

县长说：“是啊，共产主义好，共产主义好。”

县长又走到炉灶前，问车素花：“你们食堂是几点到几点开饭？”

车素花答：“从早到晚一直开，随到随吃。”

县长说：“是啊，粮食丰收了，一亩地几千斤，也不用害愁么。上头说了，粮食多了，可以一天吃五顿饭。”

秦德才听了，连连拍手叫好，“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我们多吃了，可以多干革命哪！”

宗主任说：“我们就是要敞开肚子吃饭、鼓足干劲生产。”

县长又问：“这么好的饭，吃一顿要多少钱？”

秦德才说：“没问我要钱。”

车素花说：“不用交钱。谁来，就登个记。我们向公社报个数，公社再拨款给我们。”

县长说：“好，好。上头还说了，现在吃饭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钱。”

“噉，噉！”四周的群众更热烈了。

鲁队长说：“共产主义要早点来啊。”

这时，秦德才端了一个空碗过来，问：“吃得不够，可以再添吗？”

车素花没吭声，要是往常早就骂上了。

宗主任说：“可以，可以。刚才，不是才说了么，敞开肚子吃饭。”

秦德才也不客气，自己拿起勺，在大锅里朝肉多的地方挖了满满一碗，喜孜孜地退到后面，“吧哒吧哒”就吃了起来。

28.2 入不敷出

县长走了。

迟得法有点忧心地说：“这样的吃法，能吃几天啊？”

老王头说：“是啊，这样吃，能行吗？于村长啊，大队算过没有，一天要吃掉多少斤粮，一天要花掉多少钱？”

宗主任不屑地说：“共产主义了，也不用货币了，也不用商品了，还算什么帐？你们的思想怎么老是跟不上呢？怎么不去下功夫多学点马列主义呢？你这个生产队长怎么带领大家进入共产主义么？”

于大队长打个圆场说：“老王啊，不用算啦，上级早就算好啦。全国到处都是大丰收，粮食都装不下了，不用我们操心啦。”

但事情远不像闭门造车、主观想象那样简单。由于农业生产水平的低下和人口基数的庞大，使中国的社会粮食储存能力十分有限，被辛辣地比喻为：就像只“贫下中农的饭碗”，一盛就满，一吃就完。意思

就是这个碗的容量太小，粮食稍微多一点就装不下，好像到处都是粮食，不知该怎么放、怎么吃了。可真要吃起来，就不经吃了，三口两口就没了。得赶紧找下一顿，而下一顿还不知道在哪儿呢，粮食供需平衡的能力十分脆弱，往往还得看老天爷的脸色。

这老天爷还没使脸色，事情就不行了。公社先期给的那点粮食，哪够折腾几天的。

果然，才热闹两天，矛盾就显现出来了。第三天一早，车素花就急匆匆地来到大队部找于大队长。

车素花对老于说：“不行啦，原先准备七天的，三天就吃完啦。”

老于问：“怎么吃这么快？”

车素花说：“这个流水席，一天到晚开着。有的人，像秦德才，一天不知来吃多少次，也不去干活了。一整天就是吃饭、睡觉、拉屎，再吃饭、再睡觉、再拉屎，整个就是一个生产屎的机器。这样下去，再有多少粮食也变成屎啦。不行啊！”

杜家骏也在，他看着也着急，就说：“那咱们赶紧想办法。一天就是三顿饭，按钟点开。”

车素花又说：“而且还得有个量。馒头，大人给两个，小孩给一个。”

老于说：“这个办法行。干重体力的，再多给一个。”

车素花还说：“还有，不管端来的锅大锅小，一人就给一勺菜。”

杜家骏说：“我们再印一些饭菜票，发给各户，以后凭票吃饭。”

老于说：“你们说得都很好，考虑得很周全。家骏啊，这几天，你先到食堂看着点。”

“好。”家骏说。

不到半晌，秦德才端着盆又来了，大咧咧地对着王大妈说：“给四个馒头，再来盆炖肉。”

杜家骏走了过来，一手挡住了秦德才的盆，“不行，等中午到点再过来。”

秦德才大为恼火，争辩说：“不是说共产主义了，敞开肚子吃饭么？”

“敞开也得有个底啊，饭桶都还有个底呢，你成了什么东西啦？”

“你不给我吃饭，就是妨碍我建设共产主义。”秦德才开始不讲理了。

杜家骏也来狠的了：“呸！这饭就在我这儿。给你吃，你才有得吃；不给你吃，你就吃个屁！”

秦德才真的碰上硬茬，也就蔫蔫地走了。

不过，这倒是提醒了一件事：吃食堂，显示了又一个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前农民在家是吃自己的劳动成果，现在进了食堂，吃饭却成了干部给他的赏赐。尽管，我们对秦德才不表示同情。

不到一个月，食堂就很难坚持了，只得一步步地削减社员口粮。从一天三顿变两顿，从细粮变粗粮，从干的变稀的，几个月以后就到了瓜菜代，到了野菜麸皮地瓜蔓，到一年多以后实在是什么也没有

了，宣布解散。而那时，社员家里又几乎没有任何存粮。随之而来的就是刻骨铭心的大饥荒，出现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应该说，1958年的大办食堂耗尽了社会存粮，又严重损害了农民家庭自我调节的生存能力，是出现这场大饥荒、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

第二十九章 窝心事

1949年6月29日

先说一句，“窝心”这个词，在大陆的语境里是指忿懣、难受又难以言说的事情。但在台湾的语境里正好是相反的意思。咱这儿当然是按大陆的语境。

人民公社了，也有窝心事。

29.1海秀评理

成立公社以后，原先放在陶家大院的乡政府驻地就显得太局促了，才两进八间房，比一般民居也大不了多少。现在的公社，有政治部、经济部、文教部、军事部、后勤部等等，光牌子都挂不过来。于是，又一项工程上马了——修建公社管委会大院，地点放在十多年前被拆掉的旧县政府院内的空地上。

经费比较好办。现在各生产大队（各村）都由公社统一管理、统一划拨。以全公社的力量盖一个大院、建几排平房，不会是多大的难事。有人建议，北门外那个望海教堂早就没用了，拆了吧，还有好些砖头呢。到底是公社了，人多力量大，要拆的说拆就拆，要建的说建就建。三排新房，在初雪下来之前就盖起来了。

西街上，从此又多了个崭新的大院。左右两个三米高的门垛，挂着龙头公社管委会、党委会的大牌子。两边是雪白的围墙，里面是三排整齐的平房，红瓦白墙，显得敞亮而有生机。这个大院，成了本书以后很多事情发生的场所。

建大院，还剩了些石灰。纪社长叫人把中学的那排房子一起给刷了。于是，中学的那排房子也不再红砖裸露，又好像是新房子一样。

那白墙，洁白的白墙，即使是晚秋的阳光，也映照得熠熠生辉，没有半点的浮尘和杂质。然而却深深地刺痛了一个人的心，那就是林海秀。

她怎么也想不通，就因为说了要在墙砖上刷白石灰，李辰就成了鼓吹走白专道路，就成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连大地主陶富贵也只戴了一顶“反共”的帽子，而李辰却被扣上了反这个反那个的那么多顶帽子。况且，现在中学也好，公社大院也好，墙上也都刷上了白石灰，这个理，怎么说呢？

李辰现在在黄河口被劳教、服苦役，三个月才能来一封信。每次的来信，就只有“我挺好，别挂念”六个字。第一次的信上还有一句话：“我对不起你，别等我了。”被别人用粗笔狠狠地划掉了。看来，这些信，都是被检查过的，所以不能说别的。小林回信苦劝之后，以后的来信才没了这句话，只剩了六个字了。小林天天牵挂着、思念着，不知道他在那儿，干的是什活，身体还好吗。尤其是她知道，李辰心里一定是非常的委屈和忿闷，他的精神能撑得住吗。

每每想到这些，小林都心如刀绞，就想起身立即去看他。但是，信上没有地址，只有信箱号码。她问过别人，知道那种地方是不允许探视的，只能眼泪往肚里流。

白墙，刺眼的白墙，反射着深秋太阳的光芒，就像一支支利箭刺在小林的身上。她再也坐不住了，直奔中学而去。

学校的门口没有传达室。林海秀大步往里走，穿过操场，却撞见了平近芳。

平近芳穿着整洁的衣服，端着书本，往教室走去。她近来似乎有些近视，不过没戴眼镜。当她发觉是林海秀走来时，心里一沉，想避让已经来不及了。

小林见是平近芳便怒目而视，心中像有一股烈焰腾起，“都是这个女人，居然不顾几辈子的乡亲邻里情份，去害李辰！”眼睛都冒出了火花，要不是还有学生在边上走动，真要上去撕她的嘴巴。

平近芳觉出了林海秀的仇恨，稍一停，转身从反方向走了。

这个矛盾，以后不断地加深。

林海秀余怒未息，直接闯进了肖校长的办公室。

自从去年李辰被打成右派被抓走以后，肖校长在教师中的威信一落千丈，只不过碍于他是校长，才硬着头皮听他的吩咐。至于在龙头镇乡亲们的心目中更是没有了任何的份量，都认为是他把李辰这样的好小伙送进了不该去的劳改场。

肖校长自己也觉得是做了件亏心事，并不像是掌握了生杀大权而有半点的神气，相反在别人面前，倒是觉得直不起腰、说不响话。他早就想不干这校长了，可是不干了，又能怎样呢？就能得到解脱和内心的平静吗？他觉得绳索也在慢慢地向他罩来，迟早也是逃脱不掉的。

他正愣着神，在找那个找不到的答案，门被“砰”地推开了。

小林闯了进来。

他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连忙起身让座。

小林没理这些，直截了当地说：“李辰当初只是说了个刷白墙，就是要走白专道路，就成了右派，抓去劳改。现在，你这外面也刷了白墙。这怎么说？！”

肖校长有点慌，说：“这不是一回事，怎么能扯得上呢？那是公社刷墙留下了点石灰。”

“你们的石灰，就不是白的吗？”

肖校长望着眼前倔强而愤怒的姑娘，突然变了腔调，拉长了脸，拍着巴掌（可能是拍桌子的话，怕外面听见），说：“你放肆！你有什么资格来质问党组织。李辰的事，是县教育局定的。”

“你们决定得不对、不合理。李辰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

“你这是公开对抗党组织，性质比李辰还要恶劣。”

“党组织也要实事求是、讲道理。难道只许刷白墙，而不许说刷白墙？”

“刷不刷白墙，只是表面现象，不是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是，李辰借此攻击党的‘又红又专’的号召，而我们刷墙是为了美化校园、为社会主义锦上添花，两者有根本的区别。你再胡搅，我叫宗主任过来，立即也把你打成右派。”

肖校长以为他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面前的这个小姑娘就会落荒而逃。

哪知林海秀毫不畏缩，说：“肖福兴，我知道你能做得出来。但是，你们扪心自问一下，李辰这几年来一心扑在教学上，把个人的事都扔在一边。你们这样做，良心上讲得过去吗？”

小林的这番话，打中了肖校长的痛处。他一下子接不上话了，脸色惨白，一会儿又满脸通红，一直红到了耳朵根。

肖校长缓上了劲，才说：“这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没有良心可言。良不良心的，那是资产阶级的语言。”

肖校长这个本能的反应，虽然嘴上说是“政治斗争没有良心可言”，但能够讲出来，却正好说明在他内心的深处，良心还没有完全地泯灭。

然而小林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却愕然了。

肖校长叹息一声，说：“小林啊，我知道你的苦，我也知道李辰的苦。可我也有苦啊，谁又知道我的苦呢，我又能对谁说呢？说句心里话，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们，我很愿意向你们表示歉意，尽管这句话对你对李辰已经没有意义。可就是这句话，我现在想说也不能说呀。小林啊！”

肖校长竟然流下了眼泪，在受害人、一个姑娘面前流下了眼泪。

肖校长抽泣得厉害起来，竟至捶胸顿足、涕泪横流，蹲到了地上，喘着气说：“小林啊，我憋得慌啊，我憋得慌啊……”

小林也不知所措了。她往后退去，想开门离去。

肖校长哑着嗓子说：“这事可不能跟别人说啊，这事可不能跟别人说啊……”

肖校长在重压之下，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坚持真理与谋求生存之间，在想说又不能说、能说又不敢说之间，分裂成了多重人格，练就了多个面罩，知道在不同的情况下、在不同人的面前，要戴上不同的面罩，讲不同的话。但是在率真而无畏的小林面前，居然被她打中了要害，自己在灵魂深处好不容易勉强搭建起来、聊以自慰的心理平衡，刹那间就全盘崩塌，竟然会如此地失态。难道还是他故意使出了这招，叫年青的毫无政治经验的小林没了招数、铩羽而归，避免了自己更大的尴尬？

肖福兴真的练到了这一步？说不清。恐怕这时连他自己也分不清，到底哪个面罩是他自己的真实。

过了两天，纪社长叫小林来他的办公室。

中午。公社大院静悄悄的。纪社长的办公室在中间一排。

小林敲了门。

纪社长开了门，“进来，”又关上门，说声：“请坐。”随手倒了杯水。

“中午，人比较少，特地找你说几句。昨天，肖校长跟我说，你去找他了。有些话，我觉得要跟你讲讲。”纪社长坐下来，很郑重地说起来。

“小林啊，现在的事情要比以前复杂。不像过去斗地主、打国民党那么简单。”

纪社长喝了口水，在低头想着怎么说明白这个问题。

小林坐在窗口的凳子上认真地听着。

“政治斗争的形势和方式都变了，变复杂了，变得我们都有些不理解、不适应了。这中间，可能会伤及一些人，要想开些。革命，需要有些人做出牺牲，而且会是各种各样的牺牲。现在，不像过去打国民党，只要勇敢就行，只有流血牺牲才是牺牲。在新时期里，被伤及、被委屈，也是种牺牲。承受这种牺牲，也是革命的需要，是对革命者更高的要求。我们要理解和适应这种变化。”

“这不是受点委屈，而是搞错了。不能对一个革命同志采用这种手段。不能昧良心啊，不能昧着良心说话呀，不能昧着良心对一个自己的同志啊。我最受不了这一点啊！”小林越说越伤心，呜呜地哭了起来。

纪社长望望窗外，轻声而耐心地说着：“我理解你的心情。这种事摊在谁的头上，也不好受。但是要相信历史，相信党。历史终究会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的。延安整风时期，也搞错了不少人，后来不也就纠正了么。你要劝劝小李，要端正态度、认真改造，争取组织上宽大处理，早点回来。”

小林的哭泣渐渐低了。

“知道我的意思了吗？不要再去找肖校长了。他也很为难。这也很难说是他故意和小李过不去，他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你也看得出来。换了别人当校长，也会是这样，说不定还会有两个李辰、三个李辰，除非他自己也当了右派。而且你这样做很危险，不但帮不了李辰，还能把你自己也卷进深坑。反右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运动后期一般还有个巩固斗争成果的阶段，要找一些不接受改造的典型。你这样做，是鸡蛋往石头上碰啊，要谨慎啊，小林。甚至，我今天找你来讲这些话，也是有风险的。说不定还会给有些人抓到辫子，这种人是有的啊。”

小林点点头，止住了哭声，无声地流着泪。

“小林啊，民主村的乡亲们对你很不错，没有见外，没有嫌弃，这是很不容易、很难得的。你要面对现实，好好过日子，等着李辰回来。”

小林抬起了头，“纪社长，你的心意我知道，多谢你了。以后，我会注意的。”

年青的林海秀，跨出大院的时候，没有眼泪，脸色刚毅。风浪中，她想得更多了，更成熟了。

29.2迁坟

人民公社了，土地要实行全公社大片耕作、统一平整。

老王头对赵玫说：“你那地里的两个坟，先迁走吧，晚了就只好弄。你去找老于，要个地方。等定了哪一天，我叫王山和丁妹过来帮你弄。”

赵玫谢过，去找老于。

老于说，那就放在望海山东侧吧。南面是烈士陵园，东侧也不错。

选了个日子，赵玫领着王山和丁妹来到西滩的那块地。

已经连片的大块土地，孤零零的一大一小两个坟头，枯草凄凄，秋风嗖嗖。

王山刨开坟堆，丁妹搬过来两个新的陶罐。

王山看着赵玫很有几分悲伤之意，就对她说：“你先过去歇会儿吧，别在这儿看了。看了心里还不好受。”

赵玫说：“不，我要看看我的孩子。十年了，我已经十年没见到我的孩子了。我怎么也要看看我的孩子，他在下面也已经十年了。”

赵玫说着便失声嚎淘大哭起来，瘫倒在了地上。十年的泪水，抑不住地往下淌。

王山说：“赵妹，别哭了。”

丁妹跪在地上抱着赵玫，说：“哥，让赵姐哭吧。把十年的怨屈，痛痛快快地往外哭吧。”她自己的脸上也挂满了泪水。

王山把坟里的尸骨往陶罐里装。

赵玫一眼看见在一把夹着纤细白骨的泥土里，显露出两个银镯，便挣扎着扑了过去。

她把银镯紧紧地抓在手里，捂在胸前，嘴里不住地说：“宝宝，宝宝。”

丁妹知道这是当初宝宝佩戴的，就说：“赵姐，你留下一个吧，当作是个纪念。”

赵玫听着，便把其中的一个连泥也没抹，就套在了自己的手上。这个银镯，从此成了赵玫生命的一部分，直到生命结束，再也没拿下来。另一个则放进了陶罐，仍然留在了另一个世界。

看着手上的银镯，赵玫止住了眼泪，脸色冷峻，缓缓地坚定地站了起来。

土地平整的那天。

赵玫在远远地看着。尽管已是空坟，赵玫依然是一直望着，望着坟头被推倒，望着泥土被耙平，望着被犁出了一道道地垄，望着董家三代人的血汗没有了任何痕迹，一切都融进了上百亩、上百亩成片的土地。

这时，赵玫已经没有了眼泪，生活还要继续。

她抚摸着手腕上的银镯，那是董家第三代血脉留下的象征。

第三十章 大跃进——高温发烧的日子

1949年6月30日

人民公社成立没多久，以高指标为特征的“大跃进”就进入了高潮。一时间，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被抛到九霄云外，最起码的客观规律被踩在脚下，主观唯心主义和高度集权体制催生下的“五风”席卷神州大地。尤其是经过了1957年的疾风暴雨之后，很多人学乖了，老实了，不会轻易地说不同意见了，好多偏激的事情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放手大干。整个社会迅速升温，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烧的程度。凡此种种，是今天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说明：所谓“五风”，是指“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共产风”又可具体解释为“一平二调”，即：绝对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

30.1 机械化深耕

1958年。秋耕时分。

秋耕年年有，今年秋耕可不同。怎样大踏步地奔向共产主义，大踏步地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和粮食产量呢？今年上级特别强调，一是要深耕细作，指出深耕是夺取粮食高产的重要措施，而且很具体地要求深耕达到四尺、五尺、六尺、七尺；二是要全面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极大地提高劳动效率。有了这两条，拖累我国经济的最大包袱——农业生产的落后面貌就将被彻底抛到太平洋里，粮食的稳产高产就会尽在掌控之中。

民主村的社员再一次被动员起来，涌到了西门外的那片收了秋庄稼准备种冬小麦的土地上。几百号人，男男女女，又在这块土地上挥汗如雨、辛勤劳作。又是插上了红旗，又是通上了喇叭，又是田边地头的标语，又是原野上空振荡的革命歌曲，几百张锄头上下飞舞，又是一派壮观的阵势。

皮安已搬来了双轮双铧犁，这可是前两年刚用上的最先进的农具，走一遍就能同时翻起两行土，但它也顶多犁尺把深。

平金刚说：“把那杆，调一下，就能犁得深一点。”

“已经调到头了。”皮安已说。

“那就叫老牛再使点劲。”

平金刚在黄牛身上抽起了鞭。那牛仰头惨叫着，蹄子抬起来又踏在了原地，眼神居然也流露出几分悲哀，它实在犁不动了。

“唉，不行啦。”皮安已叹着气说。

“它不行，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交差？这犁可是公社经主任亲自交给我的，指着我们给他搞出点名堂来。”

平金刚说的经主任，就是车素花的儿子，经学文。因为公社发展快，缺少干部，加上毕竟还有经乡长的老面子，所以经文学现在已是公社生产部的副主任了。

平金刚又使劲地在牛背上抽了两鞭。只见那牛一声吼叫，拼尽全力往前一拱。犁没动，那牛却口吐白沫倒下了。这些日，人都吃不上多少了，况且是牛。还要白天黑夜地超负荷干活，连牛也受不了。

好在鲁队长又从公社学了新办法回来。

鲁队长在西门口，跟围上来的人兴奋地说：“这下可有好办法啦！上级要求种地要讲科学，实行机械化，不用人力啦！”

老王头依旧很疑惑：“怎么个机械化？”

鲁队长解释说：“用绞盘机。在地两头打上桩，连上绳，犁就挂在绳上。用绞盘机作牵引，机器一开，绳就往前拉，犁也就往前走了。不像牛，有时赶它还不走。这是机器，一开，肯定就走。”

“好，好，好。”人群里发出一片赞叹声。

“机器在哪儿呢？”老王头问。

“明天就从县里运过来。”鲁队长答。

“那绳呢？”老王头很认真地一问到底。

“绳就要靠我们自己解决了。”鲁队长说。

“那怎解决？又得花钱买？大队早就没钱了吧？”皮安已说。

“还是老办法，发动群众。”杜家骏到底是干部了，有主意。

“对，各家捐献床罩被单，撕开再搓起来，不就是长绳子了么。”平金刚也学得有革命精神了。

“还得这么折腾啊？”老王头说。

“你等着看机械化、自动化吧。”平金刚对美好前景还是抱有希望。

“公社还要在咱们大队开现场会，要准备好啊。”于大队长说。

大队又向各家各户催要被子褥子。

于大队长留了个口子：“每家可以留一床被，其余才上交。”

平金刚这回带了个头。他是和西南村的庄姓人家的闺女结了婚，平金刚把新婚的被褥都拿了出来。

也有人家实在不愿意交，就把几床被子摞在一起，缝成一条被。把不像样的才拿出去，也不怕别人笑话，你家怎么盖这样的被啊。

各户都自己往外拿床单、褥单，省得再让秦德才一伙上家里面来搜。

宗主任看着一家一户都往外拿，也不用催，咧着嘴笑着说：“现在社员同志们思想觉悟高多了，多自觉。这几年我们的工作没白做啊。”

几个中老年妇女在车素花家撕床单、撕被子，再搓成绳子。

一摞破旧的单子，堆在炕上。

王大妈捧起一床被子，一直看着，虽说是破旧但也心疼啊，说着：“这怎么下得了手啊。”

解放后，虽然生活改善多了，可是新添一床被子，对于农家来说，也还是几年才能有的大事。拿王大妈她家，这些年也就是小王溪来了，才破例给她做了床新被。

“可惜啊，可惜啊。”齐阿姨边撕边说着。

“唉，还不知道又得搞成什么样呢？”郭大妈说。

“只要不死人，就行啊。”车素花也没了精神。

“机械化深耕现场示范大会，现在开始！”宗主任在西门外临时搭的台子，宣布了新一场示范表演的开始。

鲁队长已经在地两头，埋下了大树根作桩子，结实得很。一头安上轱辘，另一头安上绞盘机，那是万无一失的了。

在县农机局技术员的指导下，鲁队长、平金刚几个把那条用各家各户被褥搓成的、花花绿绿的长绳盘在了绞盘上，绳的那一头则穿过对面地边的轱辘再绕回来。犁就拴在地中间的绳上。

“准备好了吗？”宗主任问。

“准备好了！”鲁队长说。

“开始！”宗主任发令。

“拉！”鲁队长一声吼。

但接下来的事情，并不是合上电闸、机器转动、铁犁在田里划开一道道沟壑，而是十几个青壮劳力推着从绞盘机十字状伸出来的四根长棍，就像驴子拉磨一样围着转。原来这个机械化，只有传导装置，并没有相应的动力设备，动力还得靠人拉。这大概叫有中国特色的初级阶段的机械化吧。

为了步调一致，鲁队长还领着喊号令：“哎咳，哎咳。”

十几个劳力也用上劲，一起奋力发出整齐的“哎咳，哎咳”，声音在田野上回荡，倒也挺像回事。为此，昨天，他们还像大合唱似地练过。

绳子动了，铁犁往前了，翻起了几块土。

“成功了，成功了！”宗主任高兴得喊了起来。

前来开会、围在四周观看的人们也欢呼起来。

可是没一会儿，那犁就拱了出来，翻倒在地面上。

县里的技术员赶紧过去，想把铁犁压下去，可凭他一个人还压不住，大声喊着：“快过来几个人，把它压住！”。

地边上跑过去了两个，一共三个人，才使劲勉强压着，没让犁浮起来。

可这边推绞盘机的人，就更累了。

“哎咳，哎咳！”声音更响了，步子却更慢了。

宗主任没再看下去，便宣布：“机械化深耕示范表演圆满成功，大会胜利结束！”

人散了，旗拔了，歌曲也不再放了。

老王头说：“咱还得干哪。”

鲁队长说：“真不如干脆用锄头刨呢。”

绞盘机停在那儿了，用多少人家被褥搓成的长绳又被扔在了一边。

土要一层层地深翻。

鲁队长、平金刚已经到了下一层，把土铲上来。老王头他们在第二层，再把土铲到地面上。

下面铲上来的土，已经是发白的死贴贴的生土，翻到了顶上；原先长庄稼的黑土被压到了下面。

老王头着急地说：“这样不行啊，以后，庄稼怎么长啊？”

鲁队长说：“唉，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做吧。咱也烦不了这么多神了。快干吧，宗主任还站在那儿看着呢。”

老王头说：“可最后是咱靠这块地吃饭啊。”

平金刚苦着脸说：“哎哟，我那床好好的被单就算白搭了，还得上这儿来翻地。”

在深翻过的地里，妇女们在把大土块敲碎，再扒平。但已经没有那种热烈的气氛了，不再是争相穿着相对好看的衣服，高举锄头，神采飞扬；而是臂膀低垂，轻声地议论着。

哈妹一脸痛苦，站立不安地在地边。

宗主任走过来，问：“为什么不干活？”

哈妹闭着眼，咬着嘴唇，没说话。

宗主任来火了：“你是个聋子啊，见了我还不说话。”

车素花赶了过来，对宗主任说：“她是鲁队长的媳妇。”

“我知道，不就是个妇女队长么。”宗主任不屑地说。

“你知道什么？”车素花说：“她肚子疼的厉害。”

“肚子疼算个什么？我昨天晚上，吃琵琶虾，也还肚子疼呢。”

“你知道个什么？她子宫都下垂了。”

“下垂？什么下垂？下垂就不能干活啦？”宗主任还不想放过。

车素花很生气地说：“你懂个什么呀？女同志那地方，都翻出来了，站也不能站，坐也不能坐。你还要她干活啊？！”

宗主任依旧是不屑地说：“不就是那东西么，我就不信那东西还能翻出来。”

“我疼得那样，你还不信啊？我翻给你看！”哈妹气得脸都发白了，说着就要去解开裤带。

“哎，哎，哎，你这要干什么？你还是个队长咧。”宗主任赶紧扭过头去。

哈妹哭着说：“我干不了啦，我不干这队长啦。”说着就侧倒在地上，血润湿了她的裤子。

宗主任一甩手，走了。

“什么东西喔！还是个主任咧！”车素花更是气得大声地说着，也不管那个宗主任是不是能听得见。

30.2高产现场会

1958年的仲秋。

知了在剩下不多的几棵树上虚弱地发出最后的鸣叫。

地里的庄稼，虽然是深耕，虽然是细作，虽然是密植，却长得稀稀拉拉。

但是不管深耕是不是成功，也不管是机器搞的、牲口拖的、还是人拉的，对于粮食高产，上级是一定要的。

宗主任找到老于：“你们大队今年能打多少啊？”

“你看这地里，还看不出来么？”

“全国都在热火朝天地大放卫星，就你这儿冷冷清清、死气沉沉。不行啊，老于，当心变成右倾。过两天，地区在北海沿开春小麦的高产丰收现场会，给你们几个名额，你带着人去学学吧。”

老于问：“这时候有收小麦的吗？”

宗主任不以为然地说：“这你又不懂了。这叫反季节种植，是科学。懂吗？”

于大队长带着杜家骏、鲁队长、老王头几个，来北海沿的邻县参加现场会。

他们乘坐的由地区安排的大卡车，到了现场会的村口。

一下车，那场面热烈得着实叫人感动。

无数面的彩旗，从村口直排到地里。大喇叭里直喊着：“热烈欢迎兄弟县社与会代表光临指导！”

车的四周是黑压压的人群。脚刚着地，当地村民就围上来，笑脸相迎，热情地递上茶水、毛巾，连连握手，问候道：“代表同志们，辛苦啦！”

老王头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都受宠若惊、受不了了，低声跟老于说：“咱们村那次现场会，没像这么好好搞啊。”

老于也点头说：“咱落后啦，跟不上形势啦。”

转过村口要进地头时，一大群妇女在夹道欢迎。每个人都抹着大红的脸腮，头上戴着红花，手里摇着红花，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再走近一看，不得了！妇女们都光着上身，随着嘴巴的张合、胳膊的起落，一个个白花花的大奶子在胸前晃动。

还有这么欢迎的？老王头着实没料到竟然还有这一手，脸涨得通红，一直红到了脖子后，吓得连忙低下头，看着前面脚下的鞋子，跟着走了过去。

终于到了现场。这是靠路边的一块地，大小也就一亩左右。麦子的植株非常的密，以致四边都用红绳围了好几道，密密的麦穗都很饱满，弯弯地伸在了外面。

大喇叭里响起了声音：“同志们！你们看，有个小孩坐在了麦穗上，稳稳地，掉不下来。”

一个胖胖的两、三岁的小男孩，被人提着后背，坐在上层的麦穗上。随着麦穗的晃动，小孩也在笑嘻嘻地上下起伏，煞是可爱。

有新闻记者拍照。

“开镰！”喇叭里又喊上了。

有两、三个人过来，就在那块地靠边的地方割上了。他们十分地认真和小心，一个人拿镰刀割，一个人扶着麦穗，还有一个人用纸在下面托着，一颗麦粒也不让掉。一共才割了一尺见方的地方。三人起身把割下的麦子拿到主席台边。

老王头正纳闷，怎么就割这么点，还没结束吧，再上别的地方去割点？

大喇叭里又响了：“脱粒！”

主席台边上，一些人在忙着，大概是在搓麦粒。

“秤重！”喇叭又响了。

一个人拿着杆秤，秤盘里是麦粒，秤砣平平的。他举起秤，给大家看。

“多少重？”喇叭在问。

“一斤十一两陆钱七厘。”

“折合亩产量多少？”喇叭还在问。

“一万一千八百陆十陆斤一两陆钱！”

大喇叭一下子拉高了八度，放大了音量，高叫了起来：“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啊！立即向省委、省政府报喜！”

充满激情的歌曲声又响起：

“我们的人民公社真是了不起呀，

小麦放了个大卫星，

种粮都有九千七，

一亩地，九千七。

消息传到了美国去，

美国佬气破了大肚皮，

美国佬气破了大肚皮。”

歌声中，老王头在低头仔细看着麦田。麦秆一把一把地挤在一起，四周用厚厚的泥土压着，一看就知道是从别处搬过来的。

老王头低声对鲁队长说：“这是从别的地里铲过来，用泥堆起来的吧？”

鲁队长说：“这有什么奇怪，都是这样的。”

老王头说：“那这块地的产量再高有什么用呢？别的地，不就没有啦。”

“现在还哪管这些啊。”

“咱们可别这么干。”

“不干，怕混不过去啊。”

30.3大养小球藻

大跃进那两年，还穿插着一场滑稽剧，那就是大养“小球藻”。

它的依据就是传统的粮食生产太老套，又得深耕、又得播种、又得灌溉、又得施肥、又得除草、又得收割、又得脱粒，哎呀呀，多费事啊。小球藻那玩艺养在水里，只要光线一照，它就会大量繁殖，想

挡都挡不住，效率高极了。说不定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也将因此而发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性变化。

根据公社的要求，村里派杜长贵去县城学了小球藻的养殖技术。

杜长贵从县里培训回来，向大队部汇报，要推广养殖“小球藻”。

鲁队长长心眼了，问：“小球藻又是个什么东西？”

杜长贵说：“你可别小看它。它是种藻类，生长在水里，繁殖快，蛋白质含量高，不用种地，不用除草，不用收割，不用磨面，捞出来就吃。可好了。”

平金刚说：“啊呀，那太好了。”

老王头已经几次碰壁了，不太相信地说：“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东西？”

杜家骏说：“上面的号召还会有错？”

于大队长说了：“那就叫长贵试试，咱大家都支持。事情搞成了，是好事哎。我听了，也觉得怪不错的。”

又动员大家把家里的水缸都抬出来，这回说是借的了。

各家各户只好把家中的水缸扛出来，借给大队部。不借不行啊。不借，秦德才真能上门来砸缸。

民主村那个西北场院上，摆上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水缸，又拉上了蜘蛛网似的电线，挂上了几十盏大大小小的电灯。

人们抬缸的抬缸，挑水的挑水。井里的溲水不能用，都从大河里挑水过来。

王大妈想不明白，问那几个老嫂子：“以后就不吃棒子、不吃地瓜，吃那个小球藻了？”

齐阿姨也说：“咱都想不出来，这小球藻怎么发馒头？”

还是郭大妈明白点，说：“不是发馒头了，是舀着吃。”

王大妈又疑惑了，“那还赶不上喝糊糊呢。”

齐阿姨在猜：“说不定是晒干了吃吧？”

“吃干面，还不得把人呛死啊？”王大妈的疑虑最多。

车素花说：“共产主义了，吃的东西也变了，变得想不出是啥样了。”

一两天的忙活以后，大小水缸里都装满了水。

长贵往每个缸里都倒上了料，对大家说：“这小球藻白天晒太阳就行了，晚上用灯光照，加强光合作用，一天就能繁殖十倍。”

大家神奇了，早知如此，还修什么渠、翻什么地、放什么卫星呢。

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大家天天来看。

平金刚发现了变化：“水发绿了。”

“对，对，就是要发绿。这绿颜色，就是小球藻里的叶绿素，是水里微生物的颜色。”长贵说。

又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大家天天来看。

平金刚说：“这水越来越绿了，绿油油的，真好看。”

“好啊，好啊，这说明小球藻生长得好。”长贵说。

老王头问：“啥时能好啊？”

“快了，快了。”长贵说。

晚上，几十盏灯光齐放光芒，又从公社借来了老乡们从未见过的一百瓦的大灯泡，那个亮堂啊。小孩们都过来嘻闹，女人们过来做针线，男人们过来歇气乘凉、摇着蒲扇、打着蚊子、聊着天南海北。难得有这样的舒适景气，辛苦了两年，好像共产主义就要掉到脚跟前了。

又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大家天天来看。

平金刚说：“哟，这水墨绿墨绿的，闻到有味道了。”

长贵说：“好哎，这是小球藻大量繁殖，浓度高了，有了小球藻味。”

鲁队长说：“那就更有营养了。”

于大队长问：“还得多少天啊？”

“最多再要五天。县上培训班说，十五天就行了。”长贵说。

又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大家天天来看。

平金刚觉得不对劲了：“长贵啊，这水怎么有臭味了？”

长贵还在申辩：“这是臭味么？”

“这还不是臭味，是什么？”老王头说。

长贵拿勺子往缸底一搅，啊呀，坏了，乌黑的浊水往上翻，一股浓烈刺鼻的恶臭扑面而来。

于大队长着急地问：“怎么成这样了呢？”

长贵脸上也很不自然了，“我赶紧去县里找技术员问问。”

老王头从开始就不相信：“找了也没用。这么多的电，这么多天的时间，又白费啦。”

鲁队长一声长叹：“唉……”把头上的帽子扔到地上，一屁股蹲了下来。

小球藻的事，还不算什么，也就是浪费点水、浪费点电、浪费点时间，并不伤筋动骨。可别的事，就不一样了。

人们的思想由科学倒退到了空想，甚至狂想。亩产万斤粮也好，大搞小球藻也好，看起来是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狂热，胆子大得很，口气大得很，其实内心深处依旧是碰不得的神经脆弱，依旧是小生产者千百年来对饥荒挥之不去的恐惧，和对这种恐惧的虚张声势的恫吓。不幸的是，这种恐惧和恫吓仍然没有把饥荒赶走，只一年多点的时间，人类历史上一场少有的大饥荒很快就出现在中华大地上。

30.4大战小麻雀

1958年，还有一件荒唐可笑的事，就是全民围剿小麻雀。那年，上级领导几次号召要消灭麻雀。天上飞的小麻雀，不知得罪了什么，竟与老鼠、苍蝇、蚊子排在一起，并列为“四害”。据说是因为它吃掉了落在地上的谷粒，涉嫌浪费粮食，真是罪大恶极，消灭麻雀将大大地有利于对粮食的开源节流；再有，就是到处飞来飞去，被认定是一定会传播疾病，其罪当诛。那年头，在那种气氛下，不负责任瞎起哄的大有人在。有个著名拍马文人郭沫若就写了首所谓的诗《咒麻雀》，说：“你真是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请见1958年4月21日《北京晚报》）。于是，麻雀就成了“革命对象”。在全国范围，按照统一部署、统一时间，先后开展了几次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消灭麻雀的群众运动。一时间，数万万男女老幼齐上阵。不论大江南北，不论城市乡村，不论丘岳平原，满山遍野到处都站满了人群。在绵延数百里、数千里的地面上，无数的人们摇着旗帜，挑着竹竿，敲着盆罐，仰望天空，见有鸟儿飞来，立即不停地摇晃着、敲打着，大声地吆喝着，而且还是夜以继日、连续数天，声势浩大，蔚为壮观。其可笑之程度，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天上的小麻雀们惊恐万状，扑愣着翅膀，到处乱飞，哪儿也停不下来。哪怕是从北方飞到南方，从南方飞到北方，也逃不出神州大地上声震宇宙的一片呐喊之声，终至体力衰竭，从空中坠地而死。据报载，短短几个月，全国就消灭麻雀达20亿只之多。“人民战争”布下的天罗地网，其威力真是发挥到了极至。连无数其它的鸟儿，不论有害有益，也都一同跟着倒霉。

报纸上还算了笔帐，如果一只麻雀一天吃半两粮食，不多吧，一年就是十八斤。20亿只麻雀，一年就要吃掉360亿斤，那得要多少人、多少地去种啊？再如果，一只麻雀一年繁殖四只，也不多吧，那麻雀再生麻雀，一只麻雀三年后就变成了六、七十只，那时全中国种的粮食都不够它们吃的。啊呀呀，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啊！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怪不得千百年来，中国的农民吃不饱饭呢。这打麻雀的意义，实在是其大无比，岂有不打之理。

龙头镇民主村的社员们，那几天也被安排到了各个地块。放下正事不干，耗上几天时间，玩这种高智商的“游戏”，人们只能是无奈与苦笑。然而，可高兴坏了孩子们。打麻雀，成了他们的盛大节日，因为可以几天不上学，从早到晚在田里忘情地奔跑、叫喊，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好事啊。

民主村的孩子们被安排在西门外的沿大路两侧。大白果树的那一段，是平近芳带领的一帮小学生。他们笑啊、叫啊、跳啊、跑啊，尽管口袋里只装着要充当一天口粮的几块地瓜干，满心却是从未有过的

欢快。小脑袋们朝着天上，大眼睛直溜溜地四处看着，就盼着有鸟儿飞来。天空中一有鸟儿的影子就满脸兴奋，一个个都嗷嗷直叫，两腿蹦得想比鸟儿还要高。

“又来了，又来了！”在这帮十岁上下的孩子里，王溪稍微大一点，个头也高一点，她又看见了几只急急忙忙飞来的鸟儿，也不管是不是麻雀，就尖叫起来。

“哪儿呢，哪儿呢？”迟得法的大孙子迟解放急速地转着脑袋，在四下找。

“嗷，嗷！”于村长的孙子于又发，不管看没看见，先跳着叫了起来。

果然有几只鸟儿从镇里的上空慌慌张张地飞来，镇里已是吆喝声、敲打声响成一片。孩子们一见，立刻扯着嗓子叫着，使劲地蹦着。

可是，问题来了。那几只鸟儿飞到大白果树上，一见有这棵大树，一头就落在了树顶上。孩子们在树下叫啊、喊啊。鸟儿们飞起来，转了一圈，又落在了树梢上。之后，任凭孩子们再怎么叫唤，也不动弹了。

那大树可是长了一、二百年，足有二、三十米高，眼见着鸟儿就停在树顶上，孩子们没有咒念了。

“这怎么办？”皮安己的小闺女皮平平在问。

于又发仰着脑袋，看着高高的大树，急得挠着后脑勺。

“这有什么不好办？爬上去就是了。”到底还是王溪大一点，马上就想到了。

“这么高的树，谁敢爬啊？”迟解放人小，想得还挺多。

“看你们还亏得是男孩子，看我的。”王溪别看是个女孩子，人高胆子也大，说着跳起来抓住了最靠下面的一根大树枝，想要用胳膊把自己提上去。但毕竟是个女孩子，两条腿晃了几下，人就掉了下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她屁股坐在地上不打紧，却碰倒了旁边的小新春。小新春是周家周伯生的儿子，今年刚八岁，才上一年级。被碰倒了的小新春便在地上哭了起来。

皮平平忙过去扶他，“别哭，别哭，没事的。”

小新春也就不哭了。

王溪蹭地站了起来，拍拍裤子，没管小新春，倒是学着大人，往手掌上“扑、扑”吐了两口吐沫，嘴里说着：“我就不信，我再来上。”

迟解放说：“我去搬个梯子来吧？”

皮平平不屑地说：“看你们还是男生呢，还赶不上王溪勇敢。”

“你说我们不勇敢，哼，看我的。”于又发尽管个头不大，因为是村长的孙子，平常听的都是顺耳的话，养成了点小脾气。听皮平平这么一说，倒是来劲了。

“算了，看你长得这么轻飘，还赶不上我呢。”王溪酸酸地看着于又发说，不知是故意激他，还是就看不惯村长孙子的派头。

“你别小瞧人，我今天就要上去。迟解放，你帮我个忙，先蹲下，我踩着你的肩膀上去。”

“哎哟，这算什么本事。”王溪更是笑话开了。

迟解放倒是挺配合，扶着大树干就半蹲下，“你上来。”

于又发踩着迟解放的肩膀，手抓着上面的树枝。迟解放使劲一站直，于又发顺势就上去了。旁边围过来的孩子们都鼓掌叫好，喊着：“加油，加油！”

于又发倒也不负众望，在一片叫好声中，噌地往上爬过了好几根树枝。

“要小心呀。”只有皮平平在提醒他。

但是那树太高了。于又发捡着可以踩的大树枝，又往上爬了一段。可是才爬了一半呢，上面的树枝细了，踩上去直发颤，站不住人了。往上看，绿色的树枝好像伸到了云里；往下看，啊呀，下面的人这么小，自己离地这么高了。于又发还从没站过这么高的地方，心里一下子发毛了。他想下来，可是俗话说“上去容易下来难”。他用脚往下试了好几下，却够不着下面的树枝，他哪敢弯腰，他哪敢松开一只手先去抓下面的树枝，他只能两手紧紧地抓着，肚皮紧贴着树干，一动也不敢动。

下面的孩子们看着上面的于又发怎么不动了，王溪还在喊：“上呀，上呀，怎么不上啦？”

还是皮平平的心善，喊着：“下来吧，上面太危险了。”

过了一会儿，大家看着于又发还是一动也不动，迟解放对同伴说：“是不是有问题了，下不来了吧？”就朝上面喊着：“是不是下不来啦？”

没想到于又发这时真的是草鸡了，在上面哭了起来，边哭边说着：“我下不来了。”

“活该！看你再逞能。”王溪说。

“我去喊平老师过来！”迟解放说着，去找老师了。

“抓住树枝别放松啊，再坚持一会儿，平老师马上就过来。”皮平平大声说着。

平近芳却不像孩子们那样无忧无虑地欢快。她有点心不在焉，没和孩子们在一起，自己在路上慢步踱着。去年反右派的事，还在重重地压着她。在程贵安的威迫下，她在学校的会上公开揭发了李辰。结果，使她不但在学校里，而且在村里名声大跌，谁也不愿多理她。她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对，但这是按照领导的要求、组织的布置做的呀。有什么不对也不能怪我啊。当她看到李辰被警察抓走，她的心里惊了，怎么会是这样呢？她根本没想要，也完全没想到李老师会落到这一步。她也觉得对不起李老师，对不起他们家了。李老师是手把手教她的老师呀，是把她带进她所向往的教师队伍的领路人呀。她有着深深的内疚。不过，两个月后，她被提拔成教研副组长。这是她想也没想到的事，她也能成了教研组长了！又想高兴，又高兴不起来。李老师在劳改，她顶了他的位置，当了教研组长。这算是什么呢？是卖

师求荣？不是吧？别说得那么难听嘛。还是破土而出，打开了自己的上升空间呢？那上面的土，该破就得破？以平近芳的智力，至少在那时，是想不过来了。再想到林海秀那几乎想要劈了她似的仇恨眼光，身上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又一想，那能怪我么，恨就恨去吧，最后还不知道谁会怎么样呢。就这样一路的东思西想，不知不觉走到了西门口，碰上了迎面过来的杜长贵。

杜长贵在养殖小球藻失败之后，觉得在大伙面前丢了脸，心里很是丧气，也是在低着头走。两人差不多要碰上了，才发觉了对方，都只好尴尬地一笑。

平近芳对杜长贵的印象挺好，觉得他是挺肯干、挺实在，又不张扬的一个人。小球藻没成功，不能怪他，那是上面领导自己没搞明白，就推广了。他自己应该说是尽力了。她现在知道，好多事情并不取决于自己，甚至连自己的命运也这样。

杜长贵是去公社汇报、解释了小球藻的事之后，准备回大河边参加赶麻雀。因为全公社各大队养的小球藻都没成功，杜长贵已经是坚持得最久的一个了，所以公社并没有责怪。但他自己觉得很憋气，低着头，走过了西门口。

“干吗呢？”平近芳先开了口。

“还能有什么事。”杜长贵气嘟嘟地说起了小球藻。

平近芳这些日子心里有事也没人来劝解她，知道心里窝火的难受，反倒劝起杜长贵来：“咳，这事不能怪你。再说，革命导师说了，‘失败是成功之母’（说明：其实这话原是古文里说的，已多次变动，其源已难考）。总结经验，以后就会搞好了。”

“我是觉得窝囊啊，花了那么多的时间，乡亲们抱着那么大的期望，结果等来的是几缸臭水。丢人啊。”

“我觉得养小球藻，恐怕还有个技术问题、科学问题，还要好好钻研才行。”

“是啊，形势越发展，越觉得自己念的书太少了，肚子里知识太有限了，不像你当老师的，读的书多，还得向你学习啊。”平近芳是民主村唯一当老师的人，在杜长贵的心目中当然也不一般了。

“嗨，瞧你说的，我算什么呀。”平近芳被杜长贵的这几句恭维话，说得一时脸都红了。

就在这时，迟解放急急地奔来，老远就喊着：“平老师，平老师！不好了，于又发爬上树，下不来了。”

平近芳和杜长贵急忙跑到白果树下，只见于又发在大树上紧贴着树干，不管不顾地大声哭着呢。

“啊呀，这可怎么办呢？”平近芳一时也急得手足无措了，她知道这是她的责任啊。

“我上去，我上去把他接下来。”杜长贵很豪爽地说。他觉得这事对于他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

毕竟是农村的年轻人，杜长贵很敏捷地爬了上去，抓着于又发，叫他不要怕，叫他一步一步地踩着树枝往下爬，够不着的时候就踩着他的腿，踩着他的身子。在下面大群学生叫好声中，于又发终于又回

到了地面，虽然那些鸟儿们还在树顶上。

当杜长贵最后从树枝上跳下来的时候，孩子们更是像欢迎英雄似的欢呼着。平近芳在一旁含情脉脉地看着年青健壮的杜长贵。

这年的“大战小麻雀”获得了辉煌战果。报载，仅上海市在1958年12月13日一天，就消灭了194430只麻雀。第二年，1959年的春天，麻雀是了不少，可是树上和田里的害虫却多了许多。

不过，在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也并不是完全乏善可陈。就拿消灭麻雀这件事，还引出了一段佳话。在杜长贵爬上树解救下于又发之后，平近芳和他之间就萌发出了爱情的火花。这爱情升温得很快，这年秋天，建国十年大庆的时候，他们俩办了场热热闹闹的喜庆婚礼。但他们的婚姻可不像婚礼那样热闹，到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反而凋谢了，这等以后再说啦。

在他们结婚的时候，那棵长了一、二百年的大白果树已经被砍掉，永远地消失了。倒不是因为它窝藏了麻雀，而是因为又一场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大炼钢铁。站在那儿的白果树怎么又碍了炼钢铁呢？欲知其中缘由，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章 大炼钢铁

1949年7月1日

31.1以钢为纲

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最热闹的莫过于“大炼钢铁”了，这也是一个不会被历史遗忘的标志性事件。

钢铁，当时被当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即所谓“以钢为纲，以粮为纲”。工业生产以钢铁为中心，建设成就也好、赶超英美也好，都是以钢铁产量的多少为标准。年初，全国计划当年钢铁产量要比上年增长17%，达到624·8万吨。年中，则改为要翻一番，全年产钢1070万吨，而到八月初实际产量尚不足400万吨，还差得远呢。于是，就提出了要“全党全民大炼钢铁”。

这是一场主要决策人不顾客观事实、不尊重起码的科学常识、试图以主观唯心主义方式强行推动生产力超常发展的非凡剧目。一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都投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演出。

龙头公社因为修路和盖房子，对这件事延缓了一些，而县上接到的钢铁指标却一再加码。十月底，县长把纪社长等龙头公社的一千领导人都喊了去。当着大家的面，县长对纪社长发了火，臭骂了一顿。

末了说：“给你们公社三千吨的任务，这已经考虑到你们的困难，比起别的公社不算多。中央说了，全国一吨也不能少。炼铁也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计划的，要给予记过、撤职、直至开除的处分（请见：《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实录》，张树军、史言主编，200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你们公社也一斤不能少，到年底全部拿出来。办法就是全党动员、全民上阵，大搞‘小土群’，用人民战争打赢这场战斗。至于怎么炼出来，你们自己想办法，不要来问我。回去吧，马上行动！”

纪社长等回到公社，立即商量和布置，将三千吨任务按四千吨分到各大队。公社成立“大炼钢铁指挥部”，宗发奋工作有魄力，由他担任总指挥。

民主村（光明大队）领到了二百五十吨的任务，也立即行动了起来，由杜家骏任大队总指挥。

老王头从大队开会回来，刚进门就对着家里人唉声叹气。

“今天去开会又是什么事？”王大妈问。

“要炼钢铁。”

“这事听说了，全国都在热火朝天地搞。有了钢铁，就能生产好多的机器、拖拉机，咱们的生产就能更快发展了，好事啊。”他儿王山说。

“咱公社前段时间都去修路了，没顾得上来。这回，炼就是了，有什么好叹气的？”王大妈也接着茬说。

“咱这儿，没有铁矿，也没有煤矿，咋炼呢？”老王头还是苦着脸说。

“领导说怎么弄，咱就跟在后面怎么弄，就是了。愁什么？”王大妈说。

“你们不知道啊，全村要搞十个小高炉，分给咱生产队两个。我好说歹说才推掉一个。到年底，一个炉要拿出三十吨钢铁。”老王头又叹了口气。

“一天要炼一千斤哪！”王山说。

“就是啊，就是搬也搬不过来，不要说炼了。”老王头说。

“那怎么弄？大队怎么说的？”王大妈问。

“大队就说，他们也没办法，各人自己想办法。到时候，完不成任务的话，是干部的就撤职，是社员的不给饭吃。”

“有这么干工作的么？”王大妈说。

“那总得说说这铁从哪来、这煤从哪来？”王山问。

“杜家骏说，公社说了，没有铁就把家里凡是上面有铁的都拿出来，没有煤就上山去砍树。”

家里人听得都愕然了。

“这年头，变得真是叫人不懂了。”王大妈说。

“那垒小高炉的砖呢？从哪来？”王山问。

“明天，全体社员去拆城墙。”

“啊，老辈子留下的龙头城也不要啦？”王大妈更惊奇了。

丁妹静静地听着，没参加讨论。

第二天，龙头全镇几百号男女劳力全部出动，像蚂蚁啃骨头似的爬满了城墙，撬的撬、刨的刨、扒的扒。经历了几百年风雨沧桑、外立面早已斑驳陆离、坑坑洼洼的龙头城墙顿时淹没在一片冲天的滚滚尘土之中。

尘土中，王山站在城墙外侧的坑凹上撬着砖。不说头发上堆满了黄土，连眉毛和眼睑上都粘满了灰尘，只剩下两只眼睛在眨巴。

“好撬吧？”老王头在尘雾中都看不清几尺之上的他的儿子，关心地问着。

“还行。到底是年数久了，砖缝已经松了。”

“好，既然已经搞了，就好好搞。咱们使点劲，多搞点砖，咱生产队的那个高炉就能垒得最好。”

丁妹把头蒙得紧紧地，把撬下的砖装上小车，再推到西门外她们村垒小高炉的地方。

一路上，车轮滚滚，熙熙攘攘。丁妹正不知该往哪儿停，杜家骏见了远远地喊：“丁妹，你们队在那儿，见到小彭就是了。”

过了大白果树，果然一大片上百亩被砍倒了的玉米地，堆满了一堆堆的黄土、砖块、石料。彭小宾在那儿忙着呢。

小彭临时改行，当起了炼钢铁的技术员，拿着皮尺，量尺寸，划白线，正指导着几个人抹泥垒砖砌高炉呢。农村还真需要这样的多面手。

丁妹问：“是在这儿吗？”

小彭说：“是哎，放下吧，正需要砖呢。”

丁妹往下卸，不得不把砖压在砍倒了的青青的已经长出了穗的玉米秸上，眼看就要收到手的庄稼，真觉得心疼，就说：“多可惜啊。”

小彭说：“没时间啦，来不及啦。”

迟得法正在给小彭当下手，一边递个砖，一边嘴里还在嘟哝：“把城墙都拆了，那还叫龙头城吗？老祖宗几百年的风水，就给破啦，不好啊。”

“你在说什么？你敢再说一遍？”一个冷冷的声音在空中响起。

老迟回头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顿时傻了眼。

那是宗主任站在后面，也不知是什么时候过来的，正背着手，冷冷地看着他。

“你这个老东西，净说破坏话，处处和社会主义对着干。李辰是龙头中学的右派，你就是民主村的右派。送去劳改算了，省得在这儿碍手碍脚。”

老迟脸色刷白，腿都发软了，像捣蒜似地直点头：“不，不，我糊涂，我该死，我，我不再说了……”

于大队长也走了过来：“你这个老迟啊，狗屁也不懂，别再瞎说了。”

老迟又像见了救命稻草似的，连说：“不说了，我不说了。”

可宗主任铁着脸说：“不行，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今天晚上，你们民主村开大会，进行社会主义大辩论。让大家都明白社会主义好不好，大炼钢铁好不好，三面红旗好不好。我来主持。不搞明白这些，大炼钢铁也好，公社化也好，都不可能顺利发展。”

31.2 拔白旗

晚上，民主村的西北场院。拆了一半的城墙，已经不到一人高了。往常封闭的场院没有了遮挡，挂在槐树枝上的电灯，那光线再也没有反射回来，却一直往前飞向了漆黑无边的夜色，嗖嗖的北风从望海山顶刮过来，直接就钻进了人的脖子。叫民主村人心里实在是不习惯、不踏实。

人们劳累了一天，脸上、身上的尘土还没有扫去，还是陆续地过来了。听说是宗主任亲自主持，这样的会，是不敢不来的。大家或靠墙蹲着，或席地而坐，听着大喇叭里放着很是振奋精神的歌曲：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全国人民大团结，
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

宗主任站在中间，表情严肃，看了下四周，向后一挥手，歌曲停止，满脸不高兴地说开了：“今天我主持会议，可还是有很多人没来。车素花，你记一下，从现在开始进场的，算迟到，明天少给一个窝窝头（说明：这时的食堂已没有馒头可给，改为中午给两个窝头，早晚吃地瓜和稀饭）。今天不来的，明天只给稀的，不给窝头。”

他又停下，咳嗽一声，眼睛扫视了一圈，以提高讲话的效果（不知从哪学来的）。果然，下面鸦雀无声。

“今天是社会主义辩论大会。有人对我们大炼钢铁不满、对社会主义不满，说什么大炼钢铁是破坏了风水。今天，我们就是要批判这种反动言论。”

社员们听得个个惊讶，悄悄地四下张望，讲的是谁呀，又该谁倒霉啦。

“讲这个话的人，就是迟得法。迟得法，站起来！”宗主任大喝一声。

秦德才早就坐在老迟的后面，大声嚷嚷着：“站起来，站起来！再不站起来，我就要动手了！”

迟得法只好站起来，低垂着头。

“你说，你散布了什么反动言论。”宗主任命令说。

“我错了。我说，拆了城墙风水不好。”

宗主任对迟得法已经不屑一顾：“下面大家批判发言。”

杜家骏首先发言：“迟得法的话是错误的。我们要相信党的话，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多炼钢铁，就能制造出更多的机器，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就会有新的面貌。”

秦德才又迫不及待地跳了起来：“迟得法，你这个老东西，老中农，一贯说怪话、说反动话，对党三心二意，破坏革命。应该开除社员资格，滚到一边去！”嘴里说着，胳膊就抡起来，一拳就打向迟得法。

迟得法没料到这一手，“哇”地一声，差点儿就倒在地下。

大家也都看愣了。还是鲁队长说了句：“说归说，不要动手么。”

宗主任没管这些，催促着：“还有谁发言？”

下面还是没人说话。

宗主任似乎心有不甘，朝地下吐了口吐沫，再用脚使劲碾了一下，说：“为了打击迟得法这种反动分子的气焰，鼓起广大社员的革命干劲。我宣布，迟得法戴上右派帽子，从明天起监督劳动。”

大伙都惊悚地看着，没人敢言语。

迟得法这回，没人碰他也自己软塌了，蹲在了地下。

宗发奋都没看迟得法一眼，挥动胳膊，大声地说着：“明天上午，全体社员都去上山砍树。中午，把有铁的东西都交到高炉那儿去。下午点火，龙头镇就正式开始炼钢啦！散会！”

大喇叭里的歌声又起：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对于在大跃进里毫无科学和理性可言的发神经似的狂躁行为，即使在1957年的大板子打下去过后，还是有不满、消极和抵制的。宗发奋们对此有的是对付办法。比如这儿，对迟得法的办法，当时就叫“拔白旗”，是1957年反右斗争在农村的延续。宗发奋对迟得法的具体处理办法，有两点：一是戴“右派”帽子，二是监督劳动，这对于一个人可是了不得的大事，不亚于再投一次胎，叫他换了个世界。所以在这儿把“戴帽子”的事解释下：

所谓“戴帽子”，就是由专政机关经过审定，宣布某人为敌对分子，俗称为“戴上帽子”。这些敌对分子，在建国初期包括了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这四类，合起来叫四类分子。1957年经过反右，多了个右派分子，合起来又叫五类分子，不过通常也仍然叫四类分子。戴上了“四类分子”帽子的人，其政治身份就是阶级敌人，就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就要被剥夺公民权，接受管制或者监督改造。

从革命的理论来讲，地主、富农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人格代表，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是反对革命、破坏社会安定之行为的人格代表。但把他们真正组成为一个敌对阶级的集合名词，作为阶级敌人来予以行为管制、监督改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做法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1950年8月4日，政务院第四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据此历时三年才完成了土改工作，划定了阶级成分，将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列为革命的敌人和打击对象，并明确了划定标准和处理办法。比如说，反革命，有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分为十一类。不仅有历史上的反共宿敌、也有现行犯，还有以文获罪的思想反革命。本书就不细述了。

对“四类分子”的处置，主要是采取管制和监督改造两种形式。其中严重一点是管制，它兼有行政性和刑罚性的双重属性。管制是对罪犯不予关押，仍然留在原工作单位或居住地，但限制其一定自由，剥夺

政治权利，实行社区矫正的刑罚方法。被管制刑的罪犯在公安机关管束和群众监督下进行劳动改造，在劳动中理论上应当同工同酬。

被戴上帽的四类分子，因为是被宣布为敌人，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生活状况极为艰苦。几十年里，在一场场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其处境可想而知。不但要接受无休止的批斗，还要无偿承担最艰苦最危险的劳动，子女和亲属、几代人都要受到株连，真的是永世不得翻身。当然，为了体现政策，理论上也说表现好的四类分子可以“摘帽”。但除了困难时期，对一部分错打的“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过摘帽外，几乎极少听说有。（以上资料，参见百度百科的相关条目）

尤其还想说一点的是，“戴帽”和管制这些措施，尽管是涉及到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他们整个家族几代人命运的十分严重的大事，但都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在宪法和刑法里都没有，它的审定过程不需要法院参与。它只在各种政策里有，而这些政策到了基层单位里，往往就成了一些基层干部手里的一项生杀大权。本来这办法就有可质疑之处，而他们竟还可以另外再随意定夺。这次宗发奋将迟得法戴上帽，进行管制，不过是他心血来潮的随口一说，却让迟得法倒了大霉。甚至连日后的平反都没法进行，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没有算在右派里面，上级政府就没有这存档。但当时的迟得法和民主村，可不知道这些。那个时候，只讲所谓的政策、不讲法治，由此可见一斑。

往回走的路上，拐进胡同，见后面没人，老王头对杜家骏说：“这种会上，你去讲什么话呀，会叫人讨厌的。让秦德才那种人讲去。”

杜家骏说：“唉，我不讲，让秦德才一个人讲，他会更猖狂，还不知道会说些什么呢？连这样，都已经动了手了。”

“老迟怎么办，真成右派了？监督劳动，咱怎么去监督？”

“嗨，还不是跟咱们一样地干活。”

31.3“共产啰”

大炼钢铁要耗用大量的燃料、原料，哪来呢？当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共产”。

所谓“共产”，就是依仗高度的垄断集权，彻底剥夺任何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哪怕是一丁点的财产权，把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决策者手里大肆挥霍。这里讲的挥霍不只是指生活上的。一个人在生活上的挥霍，毕竟是有限的，而政治上、经济上的挥霍，那才是整个社会都承受不了的无底洞。1958年、1959年上演的，就是这样的一幕。

本来，社会主义的设想是，政府可以通过公权力集中相对较多的社会财富用于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用于不便于私人个体承担的社会事业、维持弱势群体的最低需要、限制贫富差距的过分扩大。但是毫无节制的狂征暴敛，只为个人的狂想而肆意挥霍社会财富，绝不是社会主义。

1958年的“共产”，就是这种狂征暴敛和肆意挥霍。首先，是对集体财产进行“共产”，就是不分哪个大队，只要公社需要，先拿过来再说。炼铁要焦炭，农村哪有？那就砍树吧，只要能点着火就行。

于是，公社一声号召，天刚蒙蒙亮，龙头镇的几百号人便又浩浩荡荡上了矛山砍树。说起来，矛山上的树也并不多，也就不管大的小的统统地砍倒。

王大妈和齐阿姨、邬大妈在一起。

这一片是樟萝，一种丛生的灌木，也就是笔杆粗的样子。

王大妈举手砍下去，说：“才这么粗细的枝条，砍了可惜了。”

齐阿姨忙摇手：“可别这么说，别叫外人听见了。”

邬大妈说：“唉，不能再说别的话啦，叫砍就砍吧，再说也成了右派啦。”

“劈劈啪啪”，只听得刀在往下砍。

矛山上长了几十年的大大小小的树，就这样倒下去了。往常郁郁葱葱的山峦，那经得起这番砍伐，没几个时辰就成了光秃秃的一片，只剩下零乱的山石、踩得东倒西歪的荒草、砍得七零八落、残存断裂的树茬……

炼铁可还得有铁矿石，海源也没有啊。那怎么办？有了“共产风”，就好办。集体财产不够，还有农民的个人财产呢，尽管就是少得可怜的那一点。为了大炼钢铁，各家各户，所有的铁器，都收（搜）上来。

这只要一句话就行了。下面的事，自然有起劲的。好在汉语里“收”和“搜”，发音基本相同，上面布置说“收”，下面的行动就变成了“搜”。

“搬！快搬！搞共产啰！”秦德才狐假虎威地在满街乱喊，“哎，你这门环赶紧拆下！”“说你呢，家里的铁锅快搬走！”

大家把家里所有带铁的东西都往外搬，其实也就是铁锅、门环、秤砣之类，农村的老百姓还能有什么呢？

宗主任铁着脸，在西门外的路上看着，心里很不满意。就这么点，能炼出多少铁？他这个总指挥，怎么表现出本事来？县长当着他的面，就批评纪社长，这可是有含意的啊，这不是明摆着是寄希望于我吗？

宗主任又把秦德才喊来：“给我到各家各户去搜，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铁都给我挖出来！你就跟他们说，砸掉一口锅，就是消灭一个帝国主义；私藏一颗铁钉，就是窝藏一个反革命！”

“是，好，得令！”

秦德才又叫上了储小二，说：“还能上哪儿去找呢？”

“到包金贵那儿去看看，还从来没去过呢。”储小二说。

“他那儿能有个什么？穷光蛋一个。”

“不去白不去。”

“好，去看看。”

包金贵住在场院边的一个单间屋，接在别人的山墙上，矮矮的，很破旧。

储小二把门一脚踹开，就进了去，看见门边上正好有个铁锅。金贵嫂脸上刚堆起了笑，一声“大兄弟”还没说完，储小二一脚就把它踢破了。

“真是顽固分子，有铁还不交公社啊？”秦德才以高八度的调门扯着嗓子喊。

金贵嫂赶忙解释：“这是金贵胃不好，吃不惯北方的面食，有时自己熬点稀饭吃，要用的呀。”

“去他妈的，有了公社食堂，不肯去吃，是什么意思啊？反对人民公社啊？”秦德才说。

储小二又看见靠里面的墙边上有个铁皮炉子，大叫起来：“秦哥，你看，有个铁炉子哎！”

“啊呀，真是没白来，拿走！”

金贵嫂上前拦住：“我这屋里没有炕，冬天就靠这个取点暖。不能拿走啊。”

“不能拿？你看不能拿！”秦德才抓起炉子就往下摔。“叭”的一声，泥土的炉壁碎了一地。

“你怎么像个国民党？”包金贵急了。

“呸！你才是地地道道的国民党，在我们民主村混饭吃，还敢说我是国民党。”秦德才说着，便一拳打了过去。

包金贵气得也举起了拳头，金贵嫂拉着他：“不能啊，不能啊。”

“怎么？你还想动手啊？反了，你这个国民党。”秦德才飞起一脚，踢向包金贵。金贵嫂用自己的身体一挡，被踢中小肚，只听“啊”的一声，就站立不住蹲了下来。

“怎么啦，怎么啦？”包金贵扶着他的妻子。

金贵嫂疼得脸色都变了，额头上沁出了豆大的汗，嘴里却说着：“不管事，不管事。”

秦德才一歪头，说：“还装蒜，呸！”

秦、储两人拿着破锅破炉，走了。

这几年，虽然于村长、老王头没有排挤金贵俩口子，但村里总有人对他们另眼相待，秦储二人更是白眼相加、得欺侮时就欺侮。俩口子的心情并不舒畅，几次商量着想走。可是，能往哪儿去呢？淮北的娘家，皖南的婆家，早就没了音信。要回去，恐怕连这一间草披房也没有了。在老家，就能比现在好？也不一定。在这儿，金贵嫂还能远远地看着小王溪在长大，这使她更不想走。俩口子垂泪之余，别无它法，过一天算一天吧。

秦德才在路上对储小二说：“那个林海秀，上次的账还没算呢。去看看。”

“好，去看看。”

小林她爹林齐心在家里。

秦德才一步跨了进去，见院子里一边堆着木料，一边堆着石块，那都是李辰、小林辛苦了几年，准备盖房用的。李辰被抓走了，一时也用不上了。

“炼钢铁，正需要这些，搬走。”秦德才又吼起来。

林齐心忙说：“这是我家盖房子要用的，怎么能搬走呢？”

“去你的，别不知好歹，还轮不到你说话。”储小二说。

这时，小林赶了回来，见到秦、储两人要搬走木料，便怒目圆睁，拿起扫帚就打过去。

“林海秀！这次非要你好看！”秦德才一面叫着，一面夺路而逃。

秦德才一口气跑到宗主任那儿，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

宗主任对林海秀本来就有看法，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想和无产阶级专政挑战，真是不自量力。叫鲁队长过来，动用民兵，强行搬走。我叫上公安员，带上枪，随后就来。她要敢对抗，立即抓走。”

秦德才大喜，“好，好，就得这样。”

鲁队长得知这一情况，知道事态严重，赶紧告诉了于大队长。

老于一听也急了，拉上杜家骏，就赶到小林家。

于大队长对小林是苦口婆心、再三相劝：“小林啊，忍了吧。下一步，不光是你家，所有人家的门板都要拆掉拿去炼铁。你看，北山乡那边那么多的树，照样不够烧，半月前就已经拆门板、烧桌子了。我们这儿用不了几天，也会这个样。眼前这点木头，我知道你和李辰不容易，但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不要硬顶啊，小林。”

杜家骏也在劝：“小林，要想远一点啊，想开一点啊。”

宗主任神气活现地走了进来。后面跟着的是公社的诸公安员，腰间别着枪，亮铮铮的手铐就拿在手上。再后面是鲁队长，带着几个民兵，推着车在门口等着。

宗主任对着悲愤不语的小林冷冷地说：“林海秀，我劝你不要对抗党和政府，不要对抗三面红旗。”转过头对鲁队长命令说：“搬！”

鲁队长对小林说：“不好意思啊，没办法了。”对几个民兵说：“搬吧。”

木料、石块被装上推车，运走了。

林齐心老泪纵横。

小林捂着脸在哭泣，心底在流血。

那一根根木料，那一块块石头，都凝结着她和李辰付出的汗水，凝结着她和李辰满心的希望，凝结着她和李辰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期盼，却又一次被血淋淋地打得粉碎。

宗主任临走，还说了句：“哭什么？今天没把你打成右派，没当场把你抓走，已经够客气的了。”

宗走后，小林嚎淘大哭。

于大队长、杜家骏，站在那儿，无言地陪着。

鲁队长也留在那儿，无言地陪着。

赵玫、老王头一家，还有一些民主村的乡亲，闻讯过来，无言地陪着。

没有一个人去劝小林，也拿不出什么话可以去劝慰小林。

大家都站着，在院里和院外，无言地陪着。

31.4 海滩铁矿

海滩？又是铁矿？啊呀，那是多么浪漫而又神奇啊。就在海源？就在龙头的海边？是的，就是，当然得有个前置词，1958年的龙头海边，就是个海滩铁矿。

砍了树，刨了草，好歹算是有烧的了。可是要炼铁，这铁矿石从哪来呢？在北山，砍完树就刨土刨石头，看看下面有没有铁矿石，多少还有点希望吧。可这南海沿呢？上哪儿去找这铁矿呢？你别说，这种时候还真有高人，说南海沿的沙滩，那黄澄澄的沙子里，还有些黑色的沙粒，说不定就是铁砂呢？这话也不知是从哪传来，就成了真的啦。宗发奋一听，立马就兴奋了，立刻跑到公社党委跟纪海洋说，“赶紧行动，咱们赶紧行动。”

没一、两天的时间，宗发奋就领着一帮人，出现在南海沿的沙滩上。经学文扛着上级发来的磁铁棒，西北村的几个干部跟着。那时，天已经冷了，农村人，哪怕是村干部，也没有什么厚衣服，个个都缩着脖子。

“这沙滩上，能有铁矿石么？”鲁队长疑惑地问着。

“不许说泄气话。我们就是要创造人间的奇迹。”宗发奋严肃地答道，又指着经学文说：“你就在这儿探测。”

经学文也不好多说，就拿着尺把长的吸铁棒在沙里划了几下。

“太轻了，要用力。深一点往下挖。”宗发奋嫌经学文不出力，也不给他面子，当众就这么训斥着。

经学文无奈，只好弯着腰往沙地里使劲拱着。过了一会儿，拔出来一看，上面果然粘着几粒黑砂子。

“这就是了，这就是了。”宗发奋高兴地说。

“就这么几粒啊。”鲁队长挺失望。

“这还少啊，可以积少成多么。你看这沙滩，在我们公社就有几十里长。要是把里面的铁都吸出来，炼成钢铁，那肯定比鞍钢还要多。”宗发奋在喜滋滋地说。

“可我们有那么多的吸铁棒么？”于村长问经学文，“这玩艺公社里有几根啊？”

经学文尴尬地说：“就这么一根。”

“那怎么办？”大家都看着宗发奋。

“这有什么？千难万难难不倒革命战士，这就是我们革命者的回答。我听说北海沿已经有了经验，用海水淘沙。既然大浪可以淘金，这海水为什么就不可以淘出铁砂呢？我们南海沿一定要赶上北海沿，把我们面前的这个龙头海滩变成世界闻名的大铁矿！”

龙头海滩的铁矿在公社的要求和安排下上马了。平日里少有人来的海滩，打破了往日的平静，坐满了各大队来的人群。一片片，一簇簇，足足有好几千。又是彩旗飘飘，又是车来人往，千百年来龙头海滩还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

考虑到淘铁砂这活，不是重体力，但劳动时间要比较长，各队都是叫了大闺女们过来。她们既干不了重活，也不用操持家务，干这活正好。西北村也是这样。赵玫虽然不是大闺女，但已经没有家庭要照顾，正好叫她过来领队。

别以为这十里海滩，现在成了旅游胜地，人们可以尽情地享受阳光和海浪，就是个好地方。对于淘沙的女社员来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虽然看起来活不重，每人在沙滩上找个地方坐下，从海边提来一桶水，挖上一铲沙放在陶盆里（那时的农户极少有铁皮脸盆），倒上水，一遍遍地淘去黄沙，最后留在盆底的便是黑色的粗砂，再把粗砂倒在另一个陶盆里攒着，这就是劳动成果。如此反复循环，好像很轻松。问题在于，已是初冬时分，气温已近零度，在一望无际的海滩上，那海风特别厉害，呼呼地刮过来无遮无挡。那时的人们衣着单薄，有的家里连条棉裤都没有，而且舀水、倒水、晃着盆里的水，身上、脚上、衣袖一天下来都是湿的，更不用说两只手还整天泡在水里。女社员们就这样，要在露天的寒风中，忍着饥饿每天连续十几个小时。这种奴隶般的劳动条件，绝对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而那时的人们就得这样承受。

如果说这对于别的女孩子都难以承受，那么对于丁妹就更难承受了。在这一堆女社员里，丁妹的年龄最大，身份最尴尬。说是小媳妇，却一直没有自己的男人、自己的家；说是大闺女，却背着早已为人媳妇的空名。这回，她是作为没有家庭负担的女社员过来的。别的女孩子，作为待嫁的闺女，总得有件在外人看来尽量像样点的衣服（虽然也并不怎么样），而丁妹为了顾及大家庭，即使是翻身解放十年了，也几乎没添置过什么衣服，只是在补丁上再落上一块补丁。

天空阴云密布，海上浊浪翻滚，寒风贴着海面呼啸而来。平展的沙滩上一无阻拦，虽然是坐着三三两两的人群，却丝毫也不能抵挡寒风的威力，刺得人从骨头里锥锥地疼，丁妹也和女孩子们一样，坐在沙滩上，用瓦盆淘着黄沙，那单薄的旧衣，早就被寒风穿透，一个喷嚏接着一个喷嚏。清水似的稀鼻涕流了下来，也顾不上起码的女性形象，不住地用衣袖擦着。

丁妹难忍的还不止这些。前面就是大海，那层层波浪涌来的大海。再抬眼望去，天边是一片灰暗不清的迷蒙。丁妹的眼里，丁妹的心里，也是一片灰暗的迷蒙。她的丈夫，她的王立，就在迷蒙的那一头。正是这海天一色、浑沌的迷蒙，把她和王立连在了一起。他在迷蒙的那一头还好吗？丁妹一天也没有忘记过王立。尤其是在海边的时候，她怎么能不想海的那一边，天的那一边？

“快干活！愣在那儿干什么？”

突然耳边猛的一声呵斥，惊醒了丁妹。她抬头一看，是一个威严的公社干部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她的身后。丁妹见过，叫不上名字，但知道是个公社的领导。

那人就是宗发奋。

“你淘的铁砂呢？在哪儿？”宗发奋一声也不停地呵斥着。

丁妹从没当面遇过这种阵势，一时楞住了。

“坐了一上午，一点没搞啊？”宗发奋生气了。

丁妹有点明白那干部的意思了，用手指指地下的陶罐。陶罐里大约有半小碗的黑砂。

“你他妈的，就这点啊？吃屎也不止吃这点啊！”宗发奋勃然大怒，飞起一脚，就把那陶罐踢碎了，碎片和黑砂散了一地。

“啊——”丁妹喊叫了一声，扑倒地上，用手指四处扒拉着那些黑砂。“那是铁砂呀，那是铁砂呀！”她哭着、喊着，那是她忍饥挨冻、淘了一上午才淘来的黑砂呀。

“这是谁家的婆娘，这么耍骨头？”宗发奋还不解气，头朝四处转着，大声地问着。

“宗主任，这是她费了一上午的工夫筛出来的。这就不少了，我们的还没有这么多呢。”别的女孩子都不敢吭气，只有赵玫站了出来。

宗发奋看了看赵玫，知道这是西北村的妇女主任，也不想当面顶，就说：“我在问，她是谁家的？”

“她是王老汉家的媳妇。”

“噢，原来是那个老保守家的。怪不得对社会主义没有热情、没有干劲呢。”

“宗主任别那么说。她们来这儿都不容易。你看这么大的海风，她们穿得那么单薄，一天下来冻得都受不了。不用几天，都要生病的。”

“吹点风怕什么？我们就是不怕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革命者连鬼都不怕，还怕风么？”那年有个文人何其芳奉命编了本书，叫《不怕鬼的故事》，意思是有点困难算什么，咱革命者不怕天、不怕地、不怕鬼，什么困难也挡不住奔向共产主义的大跃进的步伐，当然就更不怕什么风了。这个精神一直传达到基层，宗发奋也一张嘴就把这些挂在嘴上。

“那大伙的身子骨受不了的。”

“我不管身子骨，我只管铁矿砂。就像打仗，我们只问山头有没有拿下，不问死了多少人。过两天，我再过来看。还这个样，是不行的。你这个妇女队长也不用当了，所有的人都要受罚，一天不给饭。”宗发奋转身就走了，眼睛还朝着天。

丁妹还趴在地上，抽泣着，咳嗽着，眼泪鼻涕一起下，冻得红肿的手还在沙堆里扒拉。

女孩子们这才敢围过来，扶起了丁妹。

赵玫说：“丁妹，你先回去休息吧。我看你是生病了。”

“不，不，我能坚持。我不能拖大家后腿。”虽然丁妹不怎么参加活动，更不识字，可她也懂这样的道理。

赵玫叹了口气，“你还是回去吧，不能再撑了。”

丁妹软软地坐着，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可是她没有走，还是坐在那儿。两只手虽然已有点僵，却还是在机械地翻动着。

第二天，丁妹没有来，不是不想来，而是来不了了。

她发烧了，躺在炕上动不了。那时候发烧生病没有别的办法。躺在炕上，不出工，就算是最大的照顾。要是能喝上口热水，那更是天上的待遇了。那时很少有几家能有个热水瓶。至于药片，不到实在不行，那是没有的。只有硬挺，挺得过来算命大，挺不过来，那也是常事。

还好，几天以后，丁妹挺了过来。虽然挺了过来，却大不如前。再不是以前的那个健壮有力的丁妹，而是走向了疲惫和迟钝的丁妹，走向了下坡路的丁妹。或许丁妹早就走向了下坡路，只是以前别人没有看出来。

31.5土高炉

1958年大炼钢铁的基本经验是“小土群”，本来的意思是“小型企业、土法上马、群众运动”，后来就成了对当时遍布全国各地的炼铁小高炉的惟妙写照：小个头，土模样，到处是一群一群的。

其实所谓高炉，也就是些一人多高、用砖砌起来的大火炉，砖不够，就用泥坯垒，外面用黄泥一糊。

西门外一座座的土高炉，等着点火呢。

老王头害愁了，“咱都没炼过铁，这咋炼呢？”

“嗨，你操什么心哪？闹革命的时候，刚开始，你会斗地主吗，斗就是了；你会打国民党吗，打就是了。不也打出个革命胜利来了么。现在炼钢铁，也是这样，炼就是了。”杜家骏说。

还真的是不难，从上面塞进树枝、木块，倒上碎铁，点把火，烧上了，再摇上鼓风机，也就是炼上了。

老王头问：“得填多少啊？”

家骏说：“谁知道啊，看着差不多就行了。”

西门外原先一大片的玉米地里，排列着龙头镇四个村几十个土高炉。在阵阵的烟熏火燎之中，人们在忙碌着，有的把交来的铁器砸碎，有的把树枝掰断，有的往炉里倒料，有的在摇着风箱，好一派热闹景象。

老王头又问：“得烧多长时间啊？”

家骏说：“谁知道啊，把里面的柴火烧完，就行了吧。”

天黑了，炼铁场拉上了几十盏电灯，一片灯火辉煌。那几十个高炉，一个个烟囱顶上亮出火光，窜出的点点火星随风飞舞，在火光照耀下翻滚着的浓淡不一的烟雾，在夜晚的星空下真是绚丽多彩。如果不是家里门板被拆、铁锅被砸，还真值得坐下来欣赏一番。

老王头当然没这个心情，又问杜：“好了吧？”

杜家骏按照不知是从哪听来的、还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操作要领，说：“等凉一会儿，不烫手了，就行了吧？”

王山摸了摸下面的封口，“该差不多了，扒出来试试看。”

家骏说：“再等会儿吧。”

“我还真想看看咱农民炼出的铁。”王山抡起锤，敲开下层的封口。“轰”的一声，滚烫的炉渣倾泻而出，腾起一股热得灼人的灰尘。

“小心啊，小心啊！当心被烫着啊！”老王头说。

“不要紧的，不要紧的。”王山不顾热灰扑脸，赶紧用锄头去翻，一块黑呼呼的铁疙瘩露了出来。

“出来了，我们炼出铁来了！”王山高兴地蹦了起来。

“好，好！”宗总指挥倒也是一直在现场，马上就过来了。

“这是铁么？”老王头还在疑惑。

“不是铁，是什么？还能炼出金子来？”宗总指挥因为心情好，破例没有张嘴就训斥。

“这东西，能有用么？”老王头还在问，不知是出于认真还是真的疑惑，这就有点不知趣了。

宗总指挥马上就不乐意了：“你这人尽讲落后话，气可鼓而不可泄，这点道理都不懂？”回过头，他又对杜家骏等说：“赶紧把这东西抬上，到公社去报喜。这是我们龙头公社炼出的第一炉铁！”

红旗、锣鼓和写好的红纸早就准备好了，放在大白果树下。杜家骏、王山他们几个“叮咣叮咣”敲起锣鼓、打上红旗、举着喜报、抬着那块铁疙瘩，在满场羡慕的眼光中，到公社报喜去了。

31.6惊现尸骨

但这么白天黑夜地连着烧，没过多少天，铁也不够用了，木材也不够用了。宗总指挥号召全社的干部社员，动脑动手想办法。所有带铁的，掘地三尺都要找出来，哪怕是烟袋锅那一点，虽然不是铁的，也要。木料不够，就拆门板门框、搬家具，所有的木器，只要能烧的，都搬出来。宗总指挥还特别强调：“再不行，就学习外地先进经验——合并居住，两户人家合住一个院、拆掉一户房。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舍小家保大家，这是多么崇高的品质啊。”

社员们听了，都害怕了。本来不想交的桌椅板凳，赶快都交了吧，尽管这些也是祖上几辈留下来的，实在不舍得，但总比拆房子要好。

由秦德才领了几个人，把村里所有的门楼都拆了。

还不够？宗总指挥说，把西门外那棵白果树也给我砍了。

这棵三十多米高的、据说是和修建龙头城墙同年栽下的、长了几百年、已经长在了龙头老百姓心里的白果树，就这样轰然倒地，顷刻之间被劈成了碎片，永远地消失了。

当人们再看到没有了白果树遮挡的那片小高炉冒出滚滚浓烟和星火的时候，完全是另一番心情。他们看到的是，那烟囱冒出的黑烟就是庇护他们全家安全的门板、是他们曾经围坐炕上吃饭的炕桌、是夜晚在院子里乘凉坐的板凳、是镶着农村人难得有的几张照片的像框、是孩子儿时的摇篮、是擀面的面板、是堂前的案几、水缸的盖子、甚至是老人的拐杖……

炼铁炼到这份上，实在是没有铁了。有人提议，井里有前几年掉下去的铁皮水桶，可以捞出来炼铁。

民主村，就那一口涝水井。

于是，鲁队长领了几个人过来淘井。先是储小二带着桶下去，舀上水后，上面有人提上去倒掉。

几番工夫之后，下面的储小二说话了：“还真有哎。”

一会儿，一个锈得不行的掉了底的铁皮水桶，拔了上来。

“还有吗？”鲁队长问。

“看不清，还有不少水，再舀舀。”

又舀了一阵水。

“到底了，我下去摸摸。”储小二在井底说。

忽然，小二在下面大声惊叫：“啊呀，不得了啦，不得了啦！”

“啊呀，还有鬼啊。”秦德才这人就喜欢瞎起哄，在井边怪声怪气地嚷起来。

这一喊，弄得鲁队长也挺紧张，忙推开秦德才，探身俯下井沿问：“怎么啦？井壁要塌下来啊？”

“有死人啊，一把骨头啊。”储小二还在下面大叫着。

“怎么会呢？”平金刚说。

“先提上来看看吧。”鲁队长说。

真的，一桶白骨夹着泥沙提上来了。

几根细细的有点泛黄的白骨。

众人大惊，面面相觑。

半天，才有人说：“这多少年来，也没听说有人跳井啊。”

“再捞，再捞，都捞上来。”鲁队长说。

又一桶白骨上来了，还有一个白得瘆人的骷髅，两个可怕的大大的眼窟窿，里面灌满了泥沙，一缕纤细的头发缠绕在头盖骨上。

全村的人都闻声过来了。

几许，也没人敢说话。

终于有人悄悄地开了口：“这几年用的都是死人水啊？”

“亏得这井的水，是不喝的。”

“这是谁呢？”这是大家最关心的。

“这是个女人的骨头。”还是鲁队长有经验，很平静地说着。

“白骨精跑到咱民主村来啦。”秦德才还在嘻嘻地笑着。

众人围着这堆白骨看着，一段腿骨上有着两道深深的伤痕。

靳喜悦叫他媳妇背着也过来了，看着这两道伤痕说：“这是刀伤，这人被砍过。”

“是杀了后，再扔进去的啊？这可成了咱龙头镇第一疑案啦。”于村长说，这时他已经站到了最前面。

正当大家众说纷纭的时候，赵玫走了进来，脸色凝重，说：“我知道，这是谁。”

“是谁？”鲁队长问。

顿时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看着赵玫。

赵玫看着李芹隔了十年又重见天日的尸骨，心中又是惊又是哀，波涛难平。她和李芹之间，既是对立阶级又夹着一份亲情，既那么相近又隔了几重世界，既有满腹的话又一句也不能说。

她强忍着眼泪，一字一句地说：“这就是李老头家的闺女，李芹。”

鲁队长说：“他们不是都被秦德才砍了么？”

赵玫说：“李芹当时没死，被国民党从望海山上抬回来了，我还看见的。后来，解放军打回来的时候，她大概觉得躲不过一死，自己跳井了。不会是别人了。”

“是的，是的，那几天我也见到过她，腿上还绑了好多纱布。那时，她和申老汉住一个院。后来再没见着，估计是腿不好没能跑出去，自己投井了。”迟得法也说。

众人又大惊，眼光齐刷刷地转过来看秦德才。

“不是说，都被你杀了么？怎么又会死在井里呢？”鲁队长盯着秦德才问。

秦德才被看得脸色惨白，赶紧跑了。

“这怎么处理呢？”于大队长说。

“我来收吧。”赵玫平静地说。她已经拿来了一个瓦盆，把尸骨拾了进去。在众目睽睽之下，不避嫌疑，把一个阶级敌人的尸骨收了起来，真是不容易的。

当天，赵玫就把这个瓦盆埋在望海山东侧她公公和她宝宝的身边。当然，她没有说，那天李芹就是死在她的眼前；别人更不知道的是，她天天戴在头上的发夹，就是李芹的。

31.7喜报

赵玫的旧事重提，使人们想起了那年国民党的反攻。还真有人脑子好使，喊了声：那河里还埋着两辆国民党的装甲车呢，那不是两块大铁疙瘩吗？

全公社又动员了上百号人，把那两辆已经埋进淤泥整十年的装甲车硬是拖了出来。一敲开，分给各队，又能炼几天。

没过几天，炼铁的原料又成问题了。

巧媳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啊。老百姓家里都搜空了，但凡带点铁的都拿来了，连挖耳勺都搜走了，就差掘地三尺，还能有什么法呢？就算宗发奋这样有能耐的人，也是抓耳挠腮、一筹莫展。

可是，县里不会放过，又三天两头来电话催，不停地问炼了多少啦。逢月末、旬末的时候，甚至一天来好几个电话。逼得宗发奋都不敢呆在办公室里。

这天一早，宗发奋刚进办公室点个卯，还没来得及往外走呢，县里的电话又来了，照例还是问炼了多少了。

电话是经学文接的，“好，好，宗总指挥正好在，请他向您汇报。”

宗发奋气得不打一处来，连脏话都出来了，“真他妈的，把我说出去，干吗呀？”

经学文捏着电话筒，悄声地说：“是县长亲自来的电话。”

宗发奋急得直想把说出去的话再吞回去也不行了，只好硬着头皮拿过听筒。好在县长没问脏话的事，不知是没听见，还是也被炼铁压得什么也顾不上。只见宗发奋拿着话筒，连连点头：“是，是，是……三千吨的任务，快一半了吧……差不多一半了……有一半了……肯定有……是，是，是，在剩下的一个月里，保证完成……是，是，我用我的党性保证……是，我用我的职务保证。”

宗发奋最后放下话筒时，都已经是一头的汗了。他眼睛发红瞪着经学文，经学文吓得都往后退了两步。宗发奋正想发作，却无意识地看了下电话机，才没骂出来。大概是怕那脏话再从电话线里传到县长那儿去。

宗总指挥只好到下面各村去催，到哪儿都急得眼里冒火，见了谁都骂。

还没拐进民主村，先碰上了赵村的赵刊新，连招呼也不打就喊上了：“你们村那个二百吨，怎么说？”

“怎么说？连门把手都搜上来炼了，还炼什么？我是不知道再怎么炼了。”

“没用的东西！要你们这些干部干什么用？完不成任务，一律免职！”宗干部狠狠地说着，自以为这一手很厉害了。

“那你免吧。这种差事，谁愿意干啊？”没想到赵刊新无所谓地说着，这一套根本镇不住他。

“那就扣你们的粮！少一吨就扣你一斤粮，不，扣你十斤粮！”宗干部拿出了最厉害的杀手锏。

“哼，你还能把我们扎起脖子来？”赵刊新是个挺大度的人，听了这话也没急，而是带点调侃地说着。

宗干部正想发更大的火，杜家骏过来了。

宗发奋也对杜家骏吼了一遍。

杜家骏是另一种类型的人，能动点脑筋，想了想，便给宗干部出了个主意：实在没有原料，那就把炼过的铁，再炼一遍，不就行了吗。上级只说要炼铁，没说炼过的铁不让再炼一遍。

宗总指挥一听，高兴得直拍杜家骏的肩膀：“你真行，还是你这小子有办法。”

于是，传令各大队，如果炼铁没有新的原料，就把已经炼过的再炼一遍，提高质量，精益求精，数字可以再算一遍。

但是就这样，也不行了。

炉火还在烧着，烟还在冒着，但是越来越难以为继了。天越来越冷了，柴火也越来越少了，地里的庄稼没人收，都倒在那儿了。

时间只剩半个月了。可炼出的铁，离下达的任务还差一大截呢。

宗总指挥又急了，难道真的无计可施了吗？他宗总指挥要栽倒在“大炼钢铁”上？怪不得，纪海洋要把这个“总指挥”给他当，妈妈的。

这回，宗总指挥来找杜家骏，这是他难得屈尊找下属来了。

还是杜家骏脑子活，一听，就说：“这有什么难的？不就是个数字么。你炼出来的那块疙瘩，有多重？你说它是一百斤，它就是一百斤；你说它是二百斤，它就是二百斤。像我们西北村任务是二百五，那就写上个二百五，有什么关系呢？你还见过有谁来秤过，有谁来看过？”（二百五，在民间是傻瓜蛋的别称。杜家骏在这儿也是自我调侃）

宗总指挥又高兴得直拍大腿，“还是你聪明，我看咱们公社得提拔你。”传话下去，明天起，各大队的数字，自己看着报吧。心里想，这事办好了，上级要表扬下来，功劳肯定在我，我是总指挥。真有了问题，要追查，也能推到姓杜的那小子身上去。

“这下，不用说翻一番、翻两番，就是翻十番，俺也不怕啰。”宗发奋的心里还没美够呢。

于是，不到年底，各大队纷纷敲锣打鼓、前来报喜，这个说：“我大队提前××天完成了‘大炼钢铁’的光荣任务！”那个说：“我大队超额××吨胜利完成炼钢任务！”

于村长有点急了，问大家：“咱们村，怎么办呢？”

“也去报就是了。”鲁队长说这话一点也没犹豫。

“能行么？我记的数字还差不少呢。”彭会计做事依旧很认真。

杜家骏随手朝外一指说：“差什么差呀。那一大堆，我们还没称过呢，算上，不就行啦。”

彭会计还真扭头去看。

没等彭会计再开口，鲁队长笑着说：“老彭啊，你多虑啦。现在做事，哪有这么认真的。像你这样，就什么事也办不成啦。”

“对，赶紧写喜报上公社去吧。不争第一，也争个上游么。”平金刚说。

“也不是去争个什么。这事太折腾人，能了，就赶紧了了，算了吧。”（请注意“了”字的两种不同读法和用法）车素花的话，倒是道出了大家的心里。看起来，大家也都想得开了。

“那咱们到底是写多少啊？”彭会计拿着要填报的表格问。

“二百五，二百五。咱们的任务是二百五，就写二百五。”杜家骏说。

“二百五就二百五，咱西北村就二百五吧。”连往常不苟言笑的于村长也苦笑着说。

这不只是对统计数字的不尊重，而是整个社会信用的崩塌，在左倾狂热高压下的全面崩塌。

于是，光明大队（民主村）的一群人也手擎“胜利完成任务二百五”的大红喜报，敲锣打鼓，呼喊口号，去公社报喜了。

一到公社，被人喊过来的宗发奋已经满脸堆笑地站在大门口。

领头的于村长向宗发奋拱手致意：“我们光明大队特来向公社领导报喜，我大队已完成全年炼钢任务二百五！”

“好啊，好啊。”宗发奋回头一扬手，“点炮！”

噼噼啪啪的鞭炮声立马响起，竟然也洋溢起一阵喜庆的气氛。

“可是你们怎么也没超额点啊？”宗发奋还有点意犹未尽。

没想到杜家骏还带了支大毛笔，递给宗发奋说：“二百五还不行啊？宗主任，那您对我们大队不管有多少要求，只要您在这喜报上写多少，我们回去就保证完成多少，就算是两个二百五也行。”

“呵，呵呵。”听了这话，连宗发奋也尴尬地笑着，“真是公社社员志气大，革命豪情冲云霄啊。我在你这产量后面再加上两个零，看你怎么办？”

“哈，哈，那我就在这喜报上再画上两座大铁山。”杜家骏轻松地应对着。

“那再画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得画成没有门板没有窗框、没有锅灶也没有桌椅的房子了。”鲁队长也打了个趣。

“哈哈，哈哈。”大家在鞭炮声中笑着。这也是人们在无奈中学会了革命浪漫主义？

真不知道这一幕叫什么剧。

只有老王头太实在，还没学会这一套，还在问：“这不是在虚报么？”

鲁队长在跟他讲实话：“你怎么还不明白。连县委书记都说了，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的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我们脸上无光。”

年底，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向全世界宣布，我国一共生产了1073万吨钢，胜利完成了全年任务。正好比上年翻一番，一点不多，一点不少。如果是一个村、一个乡、一个县吹吹牛，也就算了。这样的郑重其事，不顾国家形象，不顾政府信誉，所造成的影响，多少年也难以消除啊。

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别人会信么。

不过，在龙头公社，既没有人来核实到底炼了多少钢，也没有人来说明年还要不要再炼，更没有人来把龙头镇人辛辛苦苦、花了那么大代价炼出来的铁块运出去造机器。留下的是白雪覆盖了的座座高炉和地里大片没有收获的庄稼，留下的是各家各户没有了门板的院墙、没有了铁锅的灶台、没有了桌椅的居室，留下的是心中种种不敢说的疑惑和缺憾。

下一步再怎么走呢？还折腾啊？该收手了吧？

第三十二章 反右倾

1949年7月2日

32.1 彭德怀

1959年8月。

正当大跃进的几大举措连连失利，社员群众普遍感到疑惑和迷惘，急切盼望能有正确解答时，等来的却是个意外的意外：一个重磅炸弹炸响了一党中央在庐山会议上揪出了彭德怀反党集团。罪名是利用大跃进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否定三面红旗，向党发起猖狂进攻，“犯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跟1953年揪出高岗反党集团不一样的是，彭德怀在社会上、在农民心目中的影响要大得多。谁不知道彭大将军是国防部长、志愿军总司令，战功卓著，赫赫有名。去年炮击金门，还是他发表的一篇篇告示。毛泽东自己还写诗说：“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况且他在庐山会议期间写给毛泽东信中所提出的问题，正是大家切身体会、深感困惑、又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人们纳闷的是，怎么中央又出了反党集团，而且竟然是彭德怀！

彭德怀反党集团事件，对于民主村的农民来说，不只是件印在报纸上的新闻，供人茶余饭后闲聊，而是实实在在的一场政治风暴，冲击到了民主村人的头上。

海源县委也特地举行了县社二级干部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会上，宗发奋因其在在大跃进中的出色表现，被提拔为龙头公社党委副书记。纪社长被批评，说是工作不力，差点被扣上右倾的帽子。他没被作为会上点名批判的二十几个人之一，已经算不错了。县里的会议之后，龙头公社大院里的空地上，正开着第一次全社三级干部大会（公社、大队、生产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县委的精神。

宗书记在讲话：“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要坚决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保卫总路线，保卫三面红旗，坚决打退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跃进，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

当前已经到了革命的关键时刻。虽然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但困难绝对吓不倒我们。气可鼓而不可泄。怎么鼓？那就是反右倾。右倾机会主义，就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最危险的敌人！

各大队回去以后，要进一步清查本大队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统统揪出来，把所有妨碍我们前进的绊脚石统统清除掉。

我要亲自到民主村，抓一个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

民主村的西北场院，又亮起了灯。

宗副书记亲自到场，在讲话：“我跟你们也混了好几年了，村里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一句话，就是右得厉害。你们民主村，真可谓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大本营，需要来个第二次解放。”

这话讲得叫民主村的老乡们十分惊讶。

“首先，你这个大队长，于继承，就是个右倾，什么事情都不积极、不带头，对积极的不支持，对错误的批评。派你去参观小麦高产现场会，回来一点反应也没有。后来县领导问我，我都不好说，弄得我很被动嘛。这怎么能行呢？站起来，检讨错误。看认识情况，再作处理。”

老于事先根本不知道宗书记会说这些，对此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站了起来，就像挨了一棍子被打懵了的鸡，吭吭哧哧，不知道说什么：“我，我对有些事情，确实认识不够深刻，反应慢……”

宗书记不耐烦地打断了老于的话，“讲得不对，你的实质就是对社会主义缺少热情。搞共产主义，不能靠你们这种人。算了，别多说了，免去大队长职务，由杜家骏代理。”

“啊？！”乡亲们惊讶得都喊了出来，事情太突然了。

宗书记看到乡亲们的反应，便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心血来潮，突如其来讲这个话。说句老实话，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不过是碍了老纪的面子。”他把干部之间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也直通通地在群众面前倒了出来。不要以为他是直性子，心里盛不住东西，而是他觉得他现在可以说这个话了。

宗书记的话没有停下的意思：“不但大队一级是这样，生产队一级更混乱。王建悟，讲你呢。你这个王建悟，更是个右倾的典型。对我们党发动的大跃进，处处看不惯，处处唱反调，我都发现了好几次。这次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就是要拔白旗、插红旗。你，王建悟，就是白旗，立即拔掉，马上撤职，换上红旗。插上哪面呢？”

宗书记停了一下，看来还没有想好，“插上哪面，由你们大队考虑。”

对一些革命热情很高的同志，像秦德才，在你们大队，长期受排挤。很不好，这很不好么。

还有些人，性质更恶劣，像迟得法、包金贵这些，完全是革命的对立面，处处捣乱，时时破坏，对他们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明天，就开批斗会，你们全体社员都要接受这样的教育，谁反对社会主义，谁对抗政府、对抗领导，就是这个下场！

散会！”

宗书记可是展现了他作为书记的权威，连叫杜家骏做个表面文章的表态也给忘了。

一说散会，大家还都愣愣的，没有反应过来。革命胜利十年了，怎么反而把全龙头公社有名的老干部、老村长给革了呢？

老于坐在那儿生闷气，没动。

杜家骏见了，想去劝两句，一看宗书记还没走，也不好往老于那儿去。杜倒也不是巴望着做官的人，没往宗书记那儿凑，见老王头一个人垂头丧气往外走，就在后面跟着过去了。

在外面走了一段路，杜家骏才和老王头并肩一起走。

杜家骏说：“嗨，我都不知道宗书记会讲这些事，也没跟大队商量。他既然已经这样说了，那你就乐得歇几天。”

老王头说：“我早就不想干了。这两年，都干了些什么事？唉！”他有些生气，看来并不是因为丢了生产队长的帽子，而是这几年的瞎折腾。

“那你看你们队谁干好呢？”

“我就不操这个心了。”老王头说。

“那叫秦德才干。”杜家骏故意在试探着。

老王头急了：“叫谁干，也不能叫秦德才那个兔崽子干。”

杜家骏笑了：“你不是不操这个心么，看你急得，哪能叫那个姓秦的干。我想，不行就叫平金刚干。”

“他人倒还行，可不在我这个队呀。”

“那可以调过来么。”

“姓秦的那小子，放哪儿呢？”

“让他当民兵队的副队长，反正还是鲁队长在管事。”

老王头点点头，走了。

“噹，噹。”西街上响起了敲锣声。

储小二敲着锣，喊着：“看右倾保守分子迟得法啦！看国民党反动分子包金贵啦！”

迟、包两人低着头走在后面。他们两人，也是没有任何手续，凭宗书记一句话，就戴上了帽子。

秦德才耀武扬威地走在后面押阵，一边举着拳头喊着口号：“坚决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坚决保卫三面红旗！”“掀起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新高潮！”

街上，人们隔得远远地看着。上次游街还是十多年前土改斗地主的时候，可比现在热闹多了。

小王溪在街边好奇地看着，自言自语地说着：“真有意思，真有意思。”放开了拉着丁妹衣襟的手，钻到了前排，好看得更清楚。

这拔白旗的事，对于老王头家，没有像小王溪看的那样好玩。老王头自己虽然没把队长、组长什么的放在心上。不当就不当吧，还省了不少心，没去多在意。可有人在意了。皮安己就不愿意他闺女皮珊珊和王山的亲事再拖下去了。当初看着王家不富裕，就不太愿意。现在连队长都抹了，还拉这门亲事干

吗呀？想着法把这事退了。这中间闹的事还挺大，这儿就不去细说了。老王头心里虽然有想法，也无可奈何，算了就算吧。就是王山的年纪也大了，这事黄了，白白地耽误了好几年，往下就更难办了。但他家倒也开通，没去多计较。比起反右派、反右倾，退个婚算个什么呢。确实也是这样，对于老王头家，艰难的路程才刚开始。退婚这点事，还真不算什么。

对彭德怀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批判，使我们失去了扭转左倾错误、及时减少损失的最后一次机会，相反，是无可挽回地陷入了更深的左倾泥潭。如果说，1957年的反右堵住了社会上老百姓的嘴。那末，1959年的庐山会议，则是连彭德怀这样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也不许开口讲话了。明明是应该往后退一步、退两步、退三步了，大家都看到了，却偏偏还要往深潭里走，而且还不许说，眼睁睁地看着整个国家和人民被拖进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

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被行为诡异的林彪所接替。

彭德怀后来惨遭迫害，在文革时被拉出来批斗二百多次，肋骨都被打断好几根。

然而，历史又一次开了个玩笑。那个被毛泽东树起来红得发紫、权倾一时、亿万中国人被迫向他三呼“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的林彪，文革中据说是要谋害毛泽东，反倒比已被打残了的彭德怀早死三年，而且是在乘三叉戟仓惶外逃时，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看来，尽管别人喊了那么多的“永远健康”，尽管他自己听了那么多的“永远健康”，这个“永远健康”也是靠不住啊。

32.2搜粮

1959年的秋天。

国庆十周年之后，征购任务下来了。

公社经济部的副主任经学文来到大队部，对民主村的干部们说：“今年你们光明大队，产量是50万斤，征购任务是15万斤，其中征收5万斤、统购10万斤。”（说明：在粮食收购中，征收是作为农业税无偿交给政府的部分，统购是按政府规定的低价卖给政府的部分。这两项都是必须完成的指令性计划，合起来叫征购任务。扣除这两部分以后剩下的，才是生产队集体可以分配和处理的。但那时的粮食市场是有限开放，集体的粮食不能上市，要卖只能卖给国家。在农村，对老百姓口口声声讲的国家，把粮食交给国家，实际上指的就是政府粮食部门，就是镇上的粮管所。而政府再以更低的价格按定量把粮食卖给非农业人口，叫统销，以维持城镇职工的低工资水平。另说明：民主村在大跃进时曾改叫光明村。才叫了一年，就没人叫了。）

杜家骏忙解释说：“这产量50万斤，你也知道，是为了好看、怕打成右倾，虚报的。大炼钢铁，虚报了那么多，一斤铁也没来要。这粮食虚报点，怎么还真来要？我们实际产量还不到40万斤，按这征购数字拿走，全村剩下不到25万斤，这一千多口人，怎么办？都得饿肚子。”

经主任说：“这可是你们自己报的，上级就按这个数问你们要粮。我也没办法。”

杜家骏认真地说：“那你也得向上级反映村里的实际情况，据理力争啊。要不，乡亲们就活不下去啦。”

经主任却说：“你们村虚报的还不算多，才多报了十万斤。有的村多报了二、三十万斤。听他们说，自己一粒不剩，就是都拿去交征购也不够。”

杜家骏问：“哪咋办？”

“就一句话：千方百计、老老实实、一粒不少地坚决完成任务。不然的话，你也变成了右倾，我也变成了右倾。”经主任说完就走了。

留下杜家骏一个人，愣愣地站在那儿，心里怎么也算不过这个账：虚报多了，公家要拿走的也多，剩下的老百姓不够吃；虚报少了，自己就成了右倾，就得挨批挨斗。这干部再怎么当呢？这是往哪条路上逼呢？

经主任向宗书记汇报情况，说是有的村说没打那么多粮食，交不了那么多征购。

宗书记说：“哼，我早就料到了会有这种情况，这又是阶级斗争新动向。阶级敌人变着法子向我们进攻。国家到处都需要粮食，阶级敌人就不给我们粮食，多么恶毒啊。我们打了这么多的粮食，一亩都产了几万斤，怎么会没有粮呢？一定是地主富农国民党在搞破坏。好在上级领导已经察觉到了。我们现在立即召开反瞒产、反私分、争交爱国粮的全社动员大会，就是要坚决贯彻落实上级指示，狠狠打击阶级敌人。没有专政的铁拳，没有革命的气魄，粮食就这么容易拿上来？”

经学文有点急了，说：“但确实是没那么多粮食，收不上来哎。”

宗书记又哼了一声，“明知不可为而偏要为，这就是我们革命者的脾气。上交的粮食，一粒也不能少。不然就是承认我们放的卫星是假的，就是承认我们大跃进是失败的，三面红旗是失败的。这个责任，谁也负不起。只能叫下面老百姓暂时艰苦点，我想他们能理解的。”

这回，是动真格，来狠的了。不像大炼钢铁，那废铁疙瘩，没人想要。这粮食，非但不能不要，而且还不能少要。到这时，就全然没有炼钢铁那时还有的几分无奈与苦笑，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冷酷了。

在全社大会之后，公社成立了“反瞒产、反私分、争交爱国粮行动大队”，秦德才任队长。

行动计划的第一步是，公共食堂停办。这食堂本来也办不下去了，一天只能喝两顿稀粥。剩下的粮食全部交征购。第二步，上各户搜查余粮。在集体没有完成征购任务之前，所发现的余粮一律上交。

消息一传开，村里的气氛就立刻紧张起来。

彭会计找到于村长（尽管老于不担任大队长了，村里人对他还是习惯叫村长），说：“我看这情况不好。大队仓库里现在还有六千斤粮，还没上账。你看咋办？我的意思是不要上交，说不定以后会有急用。”

老于真没想到，这个彭会计从来就是做事小心、为人谨慎，还会做出这样为大家留后路、而自己却要承担极大风险的事，便问：“不能查出来么？”

老彭说：“账上没有，应该查不出来。”

“东西在哪？”

“在场院边的老仓库里。”

“哦，那个地方。你等没人的时候，用一些破烂东西遮上。”

“好，我把绞盘机上的那捆破绳堆到上面，还有炼钢铁剩下的一些破木料，不起眼。别的，我也搬不动。老杜那儿，要跟他讲么？”

老于想了下，说：“不用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他要是知道了，还得多担一份责任。”

这六千斤粮，杜家骏不知道，秦德才更不知道，留在了民主村。几个月之后，这点粮，救了民主村人的命。

听说了要搜粮，各家各户也都做了准备。

老王头一家也在商量。

王大妈说：“唉，真是，食堂关了，叫回家吃。可又不发粮食，叫大家吃什么呢？”

王山说：“不但不发，还得上家里来搜。有这个道理么？”

“不说别的啦。家里还有粮吗？”老王头问老伴。

“还有点地瓜干、小米粒，还是前年的。”

王山说：“快藏好，这个月就指这些了，再搜走就更不得了啦，没活命啦。”

王大妈问：“藏哪儿？”

老王头说：“藏猪圈里。当初王立不就是把面粉藏在猪圈里的吗。”

老王头无意中提到了王立，大家立马不吱声了，脸色都阴沉了下来。丁妹更是流下了眼泪。

十年了。十年前，王立临走时在猪圈里藏了粮。十年后，又轮到了他爹老王头要藏粮了。

去年夏天，还在炮击金门，人们的心中曾经燃起了一点希望，盼望着能打过海峡、解放台湾、解救自己的亲人回家乡。如今，对美国的严重警告已经一百多次了，炮轰金门改成一天隔一天，谁都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了。可桌子上的饭却不够吃的了，还能再盼有打过去那一天么？

王山在猪圈里刨坑。

王大妈对小王溪讲：“这事对谁也不能说，记住啦？”

王溪点点头。

王溪十一了，上小学三年级。

约摸过了两三天，搜粮队上门了。

为了便于工作，免得本村的人抹不开面子，各村相互交换着干，由邻村的搜粮队过来搜查。带头的，就是那个孙家芥的孙二赖。要问，怎么尽是这种人出来？唉，这种事正经人不愿干，除非是被逼无奈。但你也不用担心，这种事也少不了有人愿意去干。孙二赖和秦德才、储小二就是这类人，到哪儿也有这类人。

秦德才把他们领到门口，说：“这是王建悟家。”便在门外等着。

孙二赖大喊了声：“这是王建悟家吗？”五、六个人已经进了院子。

老王头闻声赶紧出了屋，连声答应着：“是哎，是哎。”

王山也走出屋子。

孙二赖按照事先的布置，先装模作样地做了一番思想教育，从兜里掏出个小本本念上了：“积极完成征购任务，是我们公社社员的光荣义务，是以实际行动支援社会主义经……经……”

孙二赖是个半文盲，这段话都念不下去了。

旁边有个人赶紧提醒：“是经济建设……”

“是经济建设，我知道是经济建设。”孙二赖有点烦了，收起了本本，直接就问：“王建悟同志，据我们了解，你们家应该有余粮，请你主动上交给国家。”

老王头很诚恳地说：“没有，哪还有。从公社成立，就没分过粮。”

孙二赖对这种话也听多了，没等老王头说完，就说：“那我们就要搜查了。”往后一挥手，搜粮队的这些人立即行动了起来，先在院里翻草垛，又进屋里开箱倒柜、掏炕洞，甚至把手伸进水缸捞了几下。其中一人看着房间顶上的糊棚，便站到了桌子上，掂起脚，抬手想要撕开。

王山急了，连忙挡住，“好好的糊棚，撕掉它干嘛？你来糊好啊？”

孙二赖挺直了腰杆说：“你干嘛？想阻碍我们行动吗？宗书记说了，谁要阻碍我们行动，就叫公安员立马把他抓走。”

秦德才进来看看，那糊棚很陈旧，不像有新糊裱过的地方，难得一次还想装个好人，就说：“算了，下来吧。”

搜粮队走进里间，老少三个女眷都蜷缩在炕上。孙二赖选准了小王溪，一把就把她拖下了炕。

王大妈说：“你拖小孩干嘛？”

孙二赖没管王大妈，对着不知所措的小王溪大吼起来：“你说，你家的粮食放在哪里？”

王溪吓得惊恐万状，结巴着嘴，什么也说不上来。

“你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对党和政府说实话。不然的话，我就去告诉你的老师和校长。我知道，你是龙头小学三年级一班的，是吧？叫王溪。我认识你们的校长和老师。”

小王溪一下就被镇住了，啊呀，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啊？其实孙二赖是看见了王溪摆在桌子上的课本封面，居然还被他认出了三年级一班这几个字。

孙二赖这时也来了超水平发挥，猛地一拍桌子，再大吼一声：“还不说，拖到学校去！”说着拽着小王溪的衣领就往外拖。

吓得王溪哭着说：“在猪圈里。在猪圈里。”

搜粮队的人高兴得一下子跳到了院子里，一看，果然，猪圈里有新土，拿起铁锨就挖起来。

王山跑到院里，要去阻拦。

秦德才跳了过来，已经顾不上装什么好人了，一脸流氓样：“怎么？想对抗啊？别忘了，你家不但是中农，现在还是右倾下台干部，我想怎么整你，就能怎么整你。想试试看么？”

老王头劝住了王山。

搜粮队果然挖出了一袋地瓜干，便大呼小叫地喊着：“今天总算有成绩了，今天总算有成绩了！”兴冲冲地走了。

老王头铁青着脸，关上门，一言不发地进了屋。

王大妈气得一巴掌打了王溪的后脑勺，骂着：“你这个死丫头，谁叫你说了呢。你可害苦全家了，这冬天怎么过呀。”

王大妈可是第一次动手打了王溪。

小王溪呜呜地哭着。

丁妹把她拉了过来，给她擦着眼泪。

老王头只是一声声地叹息，什么也没说。另一袋更要紧的小米被他藏到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不好意思，本书也不能告诉您藏到了哪儿，这办法说不定什么时候还用得着。反正，这时他什么也不能说。

对老王头家，搜粮队还算客气的了。

在迟得法家，搜粮队那更是放开胆子、如狼似虎了。不仅是翻箱倒柜，连糊棚都撕了、水缸也推翻了、甚至把被子也扔到地上踩几下，看里面有没有藏了东西。不但所有可以吃的都被搜走了，五十多岁的老迟还因为试图阻拦而被挨了一顿打。

搜粮结束以后，照例又是总结表彰大会。虽然用尽了办法，龙头公社的征购任务还是没有完成。当然，会上是不会提这件事的，但是表彰还是可以进行的。

大会没有多少人去，宗书记在讲着话，也不管会场上有多少人在听。

秦德才、孙二赖这些人受到了表扬，戴上大红花，走上了主席台，站在那儿喜得情不自禁、手舞足蹈。

连小王溪也受到了表扬，被平金刚领着上了台，作为少年儿童的先进典型，也戴上了大红花。理由是：“小小年纪，思想觉悟高，能以国家利益为重，舍小家为大家。”

小王溪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在家里挨了揍，在这儿还能受表扬，还第一次戴上了大红花，走上了台。她不解地转着眼睛，东张西望，看着不同的大人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脸。她恍惚觉得在家庭之外、在家庭之上，还有一种更大的力量可以影响她、可以改变她。

搜粮的危害，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想。它给已经疲弱不堪的农村经济以沉重一击，它夺走了许多农民最后一点赖以生存的依靠，它断了很多早已没有多少存粮的农民最后的生路，使他们的基本生活无以为继，它是很多农村大面积非正常死亡的直接原因。

可怕的阴影越来越逼近了。

32.3 经大臣回乡

反右倾，不但在农村搞，在城市里、在党政机关里搞得更汹涌。

搞着搞着，还搞出了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有个人被意想不到地搞回了龙头镇。

谁？——经乡长，经乡长被搞回来了。当然早就不能称他是乡长了，称经局长也不对，因为他也不是局长了。虽然他和李辰情况不一样，却同样也是在政治风浪中一只纸糊的船，被打湿了，化开了，成了在波涛的翻搅中冲上了岸的一页碎纸片。

他在上海某区统计局长任上的时候，对浮夸虚报很是不满，在对月报的瞎填乱报压着怒火、忍耐了几个月之后，终于在年初爆发了，竟然拒绝在那套假的比真的还要多的年报上签字。用他的话说就是，你们瞎搞，最后推到我的头上，以后有事叫我来承担责任背罪名，不干！

虽然他工作很轻松，生活很悠闲，多少人羡慕他这个革命成功得来的位置，只要在月初签个字就行了，但他仍然不肯签这个字。尽管城市的花花世界，使他有了不少的变化，甚至抛弃发妻、另寻新欢，然而，农民耿直的本性还在他血液里流淌。他明知这样做的结果会是什么。

在西北村农民对那套统计数字毫无敬畏的时候，经大臣却还在苦苦地死守这条底线。尽管这条底线就像面对翻卷的浪涛，在沙滩上用手指划一条细痕那样不堪一击。

果然，经大臣不但丢了官帽，还戴上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消公职，下放回原籍，每月给点生活费。十二层高楼上的那套公寓自然是没有了，连那个小莉也跟他拜拜了。小莉会脱下连衣裙

换上大腰黑布棉裤跟他到海源的农舍里来吃地瓜干么？肯定不会。分手也好，经大臣在想，我一个人回去更好办一些。

全国有多少人摊上了跟经大臣同样的命运呢？“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当时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和干部，有365万之多。”（请见：《“文革”前夜的中国》，罗平汉，人民出版社，2007年）

他先跟他的儿子经学文主任写信说了这个事，说自己年事已高，不习惯南方城市的生活，想回老家来，还是当一介农夫。

经学文跟他妈车素花一讲，都不明白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究竟是什么意思。便回了信，问回来后是自己过，还是跟他们一家子一起过。

经大臣想了想，回信说，如果你妈没意见，那就一起过吧。

上秋的时候，经大臣提了两个箱，回来了。经学文到县城接的他。

民主村的乡亲们惊讶得不得了。怎么这年头，这些老革命，上至彭德怀，下至于村长都被免了，怎么连在南方城里当大官、多少年也没看见的经大臣也回来了呢？

经大臣跟大伙说，是因为国家经济困难，精简机构，下放城市人口，自己在南方也过够了，所以回来了。

乡亲们没多问，可纪社长、宗书记他们是猜到一点的。

纪社长问宗书记，对老经怎么接待。宗书记说，他不管，也不想掺和。

纪社长想，老经毕竟和李辰不一样。在组织处理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右派还是有区别的。毕竟经大臣应该说是过去的老战友了，是在血与火中一起闯过来的，怎么地也不能因为人家有点事就当作没看见吧。何况上级也没来文件，说对经大臣不可以接近。

纪社长以个人名义，找了几个当年的老战友，请经大臣吃了普通的一桌。

老经是不想来，实在推托不掉，好在都是多年的老朋友、老战友了，不见面也不好。

“呵，呵呵，真不好意思，我都沾上个右字了。”老经尴尬地说着。

“嗨，别说你了，我也是被骂成右。只不过没戴帽就是了。”纪社长在宽慰他。

“你这点算什么？我是在大会上被点名批判，当成是全社的右倾典型。”于村长忿忿地说。

“你们这都不错啦。你看人家李辰呢，不但戴帽，还被送去劳改。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呢。”鲁队长说。

“唉，李辰啊，难得的好小伙啊。怎么好人都受这种磨难。”李家泊的村长也来了。

“右，右，右，咱他妈成了右派大本营了。”于村长是越来越气。要说于村长就那么大度，革命了一辈子，结果是受了批判免了职，一点抵触也没有，恐怕也不现实。农村基层干部有怨气，大体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纪社长吓得赶紧制止：“可别这么说，可别这么说。咱们的心里都是向着革命向着党。”

“说咱是右，那谁是左？秦德才那些狗东西，反倒成了左派，打死我也不信。”于村长还是不泄气。

“是啊，说句心里话，咱都是想把国家建设好，把农村建设好，怎么会弄成这样呢。”李村长说。

“往下再怎么搞呢？”鲁队长打了个岔。

“我看是搞不下去了。”老经闷闷地说。大家的情绪还是提不上来。

“再往下，就只好去说了。咱吃咱的，吃，吃。”纪社长抬起筷子，劝着大家。

桌子的中间放了一盘鱼，那时条件的艰苦，即使是社长请客，那鱼也只是看的，而不是真的去吃。大家也只是挑撒在鱼上面的香菜、葱末吃吃。那个时候做客，要有这个眼色，只有当主人先把鱼肉挑开了，那才是真的可以吃。有的农户里甚至还有用木头刻个鱼，也做成菜，来客人时在桌上摆个样子。唉，实在是难为主人和客人了。

再往下，大家只好各讲东西、顾左右而言它了，全然没有曾经一起出生入死而今久别重逢的那种激情和热情了。

经老太一直没跟别人说，经大臣在外面已另有家室的事，甚至没说老俩口早就离了婚的事。别人也都没问过。农村的人有时也真粗心，这么大的事，都没去想过，或者想过也没当回事。

不过纪社长还是考虑到车素花现在住的不行，把老经他们安排到了旧乡政府（陶家大院）里，也就是老经当乡长时住的地方。当然，不是在原先的厢房，而是安排在了正房。

车素花对老经的回来与不回来，已经没有多大的感觉。只是从外面看起来像一家人，关起门来却是各人做各人的，各人想各人的。车素花当初也没有奢望过要和老经一起去享受大上海的生活，对老经在外面有了女人甚至跟自己离婚，看得挺淡，觉得是各人有各人的命，不去强求，精神上的创伤也就小多了。既然已经走上了不同的叉路，再回来也唤不起她的什么热情，甚至也没多去问那个上海的女人去哪儿了（经老太都不知道那个女人叫小莉）。就这么混吧，过几年又不知会是怎样了。

老经天天在炕上，抽着烟，吃着他的那点生活费，哪儿也不去。只是思量着，这十年真是梦幻一场，都分不清到底是得到了什么还是失去了什么。就好比是往天上扔了一块石头，直往上飞，啊呀呀，都要碰到云彩了，结果还是掉了下来，跌到了地上，滚到了沟里，还弄了一身泥。

革命改变了人生的轨迹，也改变了一个家庭的轨迹。

第三十三章 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1949年7月3日

庐山会议的失败，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使左的东西变本加厉、更加泛滥。明知已经不行，自己也心知肚明，却不许别人说，谁说就把谁往死里整。明知是深潭，却还要往里跳，反正不是自己跳，叫别人跳，怕什么？轮到下面，宗发奋这类干部看到了搞左倾狂热这套是他们一显身手的大好舞台，为他们打开了官运亨通的上升空间，岂肯轻易放弃这种绝佳机会。所以，尽管已经明知不可为，却还要不顾民情民力，就是要往死胡同里撞。有句俗话说，不撞南墙不回头，这回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人们不禁要想，这是哪来的“勇气和力量”？

宗发奋这类人是左倾盲动在各地的主要推手。不过，当狂热最终演变成了疯狂，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最终也被极左狂潮所伤及、甚至所吞噬。不过这是还要经过几个反复之后的几年以后的事了。先看眼下吧。

33.1 大办水利

1959年的冬天。

天已经挺冷的了。为显示继续高举三面红旗、坚决回击右倾机会主义的坚定决心，海源决定倾全县之力，搞一项“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的伟大工程，在北山修个上亿立方米的大水库，而后沿着山势修筑上百里的水渠，中间还要有几个跨度很大的高架大渡槽。这样，从北山两侧一直到南海边，全县耕地面积的90%以上将实现自流灌溉。多么伟大而壮观的工程啊。

在龙头公社的范围内，规划是这样的：从北山过来的水，经过高四十米、长约四公里的大渡槽，跨越一大片的平泊地，与尖山接上，流过沿着尖山、矛山、望海山向前延伸的灌渠，再连上前后塘、南塘的支渠，就一直能流到西海滩。大渡槽和尖山灌渠，就是龙头公社水利工程的关键。

民主村的社员，被分在尖山北麓修筑灌溉渠。所有劳力几乎全部出动，男女分开，按连排班编组，在尖山下安营扎寨，住的是用玉米秸搭的棚子，全面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家里不能上阵的老人、小孩，都交给大队办的养老院、幼儿园收留。中年妇女则随队在工地集中承担后勤服务，如：“战地食堂”等。连洗衣服，也由后勤队完成。每十天，各人将穿过的衣服上交，由洗衣队集中洗涮，再拿回去，当然不一定是原来的那件了。那一大堆，实在是分不清了。干部就可以先挑件好一点的穿穿，不过，好在那时候的干部对这些还不是那么关注。

家庭的基本功能，相当一部分，由集体承担了。那一阵，有人还曾想入非非地议论过：家庭是私有制出现的产物；家庭的消亡，是否是共产主义的特征之一；家庭功能的削弱，是否是迈向共产主义的步

骤之一。连刘少奇在1958年6月14日与全国妇联主席蔡畅等人的谈话里还传达了毛泽东的话：“家庭是历史上产生的现象，也会消灭的……现在的家庭已不成为物质生产的单位了，物质生产的作用很小了，但家庭还是个消费单位。”（请见《天堂试验：人民公社运动始末》，罗平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据说是由于妇联的出面干预，这个讨论才没有进行下去。其实男女分住、集中编队，并不是1958年左倾思潮的创举，百多年前的太平天国早就这么做了。不过太平军清教徒式的戒律，丝毫也没有妨碍洪秀全畜生般的荒淫无耻，那些规矩只是对别人的。后来有些看上去像似了不得的人，不也就是那么回事么？

天阴沉沉的，纷纷扬扬的小雪在无声地下。

鲁队长和平金刚他们在尖山的半山腰刨石开渠。

彭小宾，这回又扮演水利技术员的角色。一只手拿着皮尺，一只手从肩上背着的大口袋里抓出一把石灰，往地上做记号。大概是天冷吧，小彭的手直哆嗦，那记号也画得很不标准，别人都看不明白。不过，这也难为小彭了。他哪会那么多的技术，能做到这一步，实在是不容易了。

鲁队长是个比较认真的人，就说：“这线划得对么？”

小彭说：“就这样了。”

鲁队长说：“这可是大问题哦。这灌渠就指着你这条线了。线高了，水就过不来；线低了，水就漫出去了。”

小彭说：“不会的。”

平金刚说：“干吧，不罗嗦了，不操这个心了。”

他俩沿着石灰线，除去地上的浮土，露出石硼，再用铁锹刨。本来这儿大多是酥石硼，用铁锹也是能刨得动的，但现在是天寒地冻的时候，就是泥土也刨不动了，更何况是石硼。他俩使劲刨下去，然而，一锹下去只是一个白点，石硼却纹丝不动。

“干脆，我还是用铁锤吧。”鲁队长用劲地抡起了大锤。

“那得砸到什么时候啊？那些头也不过来看看，这天、这地方能干活吗？”平金刚颇有几分怨气地说。

“是啊，我看这共产主义一会半会儿难实现了。”鲁队长说。

“你也这么想啊，我一直都没敢这么说。”平金刚嘟哝着。

迟得法跟着老王头铲浮土，往小车里装，也算是被“监督”了。

丁妹、哈妹、小林这一帮推着小车过来了。

迟得法往丁妹的车里铲了几锹，就说：“行了。”

老王头是个实在人，对丁妹说：“还能行吧？”

丁妹也就说：“行。”

老王头又添上了一锹。

哈妹笑着说：“王大伯，你也忒实在了，不怕把儿媳妇压坏啦？”

哈妹虽然有病在身，但毕竟是个朴实的人，只要不躺下，能干还是出来干，而且情绪依然开朗。

老王头似乎回过味来，对丁妹有点不好意思了，“那我再铲掉点吧。”拿起锹，要从丁妹的车里再往外铲掉些。

丁妹忙说：“爹，不用啦，这么点我还是行的。”丁妹还很少在大庭广众之下喊爹呢。

储小二牵着那头合作化前原先是老迟家的毛驴过来装土。

看来毛驴已经累得不轻，虽是担的空筐，走路也还是一瘸一拐。

迟得法一看见，又心疼了，虽然离开自己家已经两年多，按理说跟自己早已没有了关系。

可老迟的嘴又说上了：“这驴不能再使了，你看，都累成这样了。”

储小二不以为然地说：“能动弹，就得干。还能像老太爷一样地供着它？”

老迟也不想跟储小二多说，只好无奈地铲上几下，说：“行了。”

储小二板着脸说：“不行。”

老迟又铲了一下，停下了。

储小二一瞪眼，拿过老迟的铁锹往筐里猛加了两锹石块。

毛驴腿都颤了下。

迟得法眼看着，叹了口气。

储小二大声地吼着：“叹什么气，不服啊？都被监督改造了，还在瞎操心，管好自己吧。”便牵着驴往下走。

那可怜的毛驴晃了晃，没有动。

储小二朝驴腓上使劲一鞭，驴疼得嗷嗷直叫，才迈开颤抖的腿往前走了。

迟得法转过头，捂上脸，闭着眼，不忍去看。

临时开出的运土的山道，又窄又陡，露出不少石头尖，上面又有了些雪，真的是沟沟坎坎、崎岖不平、又硬又滑。

储小二走了不远，在一个拐弯处，自己不经心，脚下一滑，整个人就撞在了毛驴背上的驮筐。

毛驴驮了那么重的泥和石，本来就站不稳，哪经得起这么一撞，便一声悲鸣，连驴带筐整个儿翻下了山沟。

山上的老王头、老迟他们闻声，连忙赶来，见那毛驴被压在驮筐和泥石之下，好几处划破了皮，流着血，前腿在乱抖，嘴里嘶嘶地出着气，已经没有多大的声音了。

老迟搬开驮筐，拨开泥石，想扶起驴子。那驴子颤抖得更厉害了。

老王头说：“老迟啊，别扶了，已经断了腿了。”

“啊！”老迟难过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下。

储小二满不在乎地说：“这就断啦？这么不经使啊。”

鲁队长说：“这怎么办？”

储小二脸上竟然露出了喜色：“趁早杀了，吃驴肉。早就听说，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还从来没吃过呢。这回，还真赶巧了。”

老迟心疼地说：“它还没死呢。把它搬回我家，我来养活它。”

储小二还在冷嘲热讽：“哟，比对他爹还孝顺呢。”

老王头说：“恐怕搬不回去了。”

中午，开饭了。也没让大家回棚子里休息，就在工地上，就地坐一会儿。

天上依旧飘着雪片。

王大妈她们挑来了午饭。车素花给大家发饭，每人舀上一碗玉米糊，再给两块地瓜。

平金刚说：“怎么没馒头啦？”

王大妈说：“省着点吃吧，玉米面也只够几天的啦。”

鲁队长说：“那怎么有力气干活呀？”

老王头说：“是啊，他们壮劳力是不够啊。”

车素花说：“艰苦点吧，过两天，连这个也没有啦。”

老王头着急地说：“那不赶紧向公社反映么，这是个大问题哎！”

“你以为公社不知道啊？”车素花说。

“他们知道了，那怎么不解决呢？”老王头说。

“那我们就知道了。”车素花说。

人们三口两口就吃完喝完，倒头就躺在雪地上睡了。因为大家太累了，从天不亮就要出工，天不黑不让回。干多干少，管不了那么多，但就得熬到那时候。人们的精力和体力，都远不像一年前，这时，想出力也没有了。

33.2“学乖队”

正在这时，纪社长来工地视察了。边上照例是宗总指挥（这回是龙头公社水利工程总指挥）和杜大队长。

宗总指挥见大家都三三两两地躺着、倚着、坐着，也没几个人热情地起身迎接，便问：“怎么没干活？这哪像是革命的样子？”

鲁队长见别人没站起来的，只能他站起来回话了：“领导都来啦。我们正中午吃饭休息。”

纪社长说：“是啊，要劳逸结合，注意身体健康。”

宗总指挥说：“对，上头很关注社员同志们的健康，还特别强调了要保证睡眠。睡眠时间不要少于六个小时，最少也不要少于五个小时。这就很可以啦，上级领导已经这么关心了，你们怎么现在还要睡？”

纪社长把话叉开了，问：“中午吃的是啥呀？”

看大家碗里盛的是糊糊，手里拿的是地瓜，纪社长就说：“怎么吃得这么差呀？”

王大妈说：“粮食不够了，都埋在雪地里没有收回来。”

宗总指挥说：“政府会有办法的。”

老王头说：“要抽一部分劳力去地里挖地瓜。”

纪社长说：“可以啊。”

宗总指挥赶忙说：“但是一定不能影响水利工程的进展。”

纪社长看着雪还在下，雪花都飘进了老王头的碗，用手一摸，凉凉的，也叹了口气，说：“天这么冷，中午还是回棚子里歇会儿吧。”

宗总指挥却来了劲了：“同志们！我们要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要用战天斗地的气魄来改造山河。雪花飘舞更增添了我们革命浪漫主义的战斗豪情。同志们哪！要实现革命理想，不吃点苦还行么？比起牺牲了的革命烈士，我们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我们的口号不是停留在：苦战三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我们现在的豪言壮语是：熬烂眼，连轴转，出尽力，流尽汗，拼命干，死了算！就不信在我们手上建不成共产主义！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啊？”

下面没人回应，宗总指挥快速地扫视了一下。

倒是平金刚感觉到了，就说：“是啊，是啊，我们一定努力。”

宗总指挥这才微微一笑。

不远的山坡下，忽然有人声骚动起来，一个男人的苍老的哭声传了过来。

宗总指挥真觉得扫兴，很不高兴地说：“都在忙着干革命，还有人在哭，成何体统！”

纪社长问：“这是怎么回事？”

平金刚过来说：“驴子干活驮得太重，储小二又撞了它一下，把它撞翻到沟里，断了腿。刚才，储小二干脆把驴砸死了，说是要剥驴肉吃。迟得法在那儿伤心得哭呢。”

宗总指挥不解地说：“死个驴，又不是死他爹，哭什么？”

老王头说：“合作化以前，那驴是他家的。”

宗总指挥不屑地说：“这个老东西，满脑子私有观念，还没转过弯来。把他轰走了，不要影响大家的革命情绪。”

储小二说：“他死活不走，要跟死驴陪在一起。”

宗总指挥骂了一句：“真他妈的，什么东西！所有阻碍革命前进的石头，都要搬走！”他猛地把路边的一块石头踢得老远，就好像那石头真的妨碍了他革命，非踢走不能解气，才接着说：“无产阶级专政，眼下已经发展成为群众专政。我们公社也要成立‘专政队’，把那些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保守、阻碍革命、破坏生产、刁钻偷懒的，统统抓起来，强迫劳动。对所有那些不想干、不肯干、不出力的人，让革命群众对他们统统进行专政。要是还不老实的话，哼，哼！我们有的是办法！”

宗发奋狠狠地瞪了下眼，想说句狠话，一下又没想出来，只好“呸”地吐了口痰，再往下说：“对付这些人，我们有的是办法。我就不信教育不过来。这些人只要不老实，就一直关在里面。就是死，也要死在里面。明天就搞起来，迟得法就是一个。你这个储小二，搞死了驴子，属于破坏生产，也是一个。还有那个姓包的国民党，更是跑不了的。那个右派家属林海秀，也算上。”

纪社长说：“小林就算了吧。”

宗总指挥没吭声。

老王头见公社领导都在，就想把问题讲出来，好让领导知道，早点解决问题，就说：“这天太冷，下着雪，地都挖不动。干活的效率太低，一天出不了什么活。以前没这么干的。”

宗总指挥拉长了脸，很不高兴：“你还是老皇历，下雪天就不能干活了吗？红军不就是下雪天过的草地嘛！我们革命者就是要和老天爷对着干。天冷石头硬，我们的革命精神更硬。多使点劲，不就行了吗？多出点力，身上也暖和了，石头也砸开了，这不好吗？这就叫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这就是我们革命者应有的宽广胸怀。”

老王头还在不知趣地说：“饭也吃不饱。你刚才也看到了，中午还吃的是稀饭。”

宗总指挥更是板起了脸：“不要老是强调困难。没有困难，要我们革命者干什么？面对困难，要用革命意志战胜它，这就叫‘人定胜天’。你懂吗？我看你这个人，右的东西还不少哎。都被免了职了，还没吸取教训啊？也想要进专政队再受点教育啊？”

老王头这下才泄了气，不吭声了。

宗总指挥说：“石头硬，就用炸药炸。我就不信这个邪，这石头还能硬过革命者？春耕之前，一定要打通这个灌溉渠。

人要是有问题，那更好办。谁想不通，谁不想出这个力，那就叫他进专政队。

专政，专政，这就是我们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法宝！根本不需要啰嗦那么多。”

“我们这里也没有什么阶级敌人，不一定要讲那么多的专政吧？”纪社长听了，有些想法，就婉转地说了这么一句。

宗发奋心里在想，你他妈的跟右派就是一步之差，还在那儿扯蛋，又不好公开顶，想了下就说：“那我们就换个名字，叫……叫‘学乖队’。对，对，叫‘学乖队’，这是西面有些地方的经验。这个名字好，就是要大家都学得乖乖的，这样，革命才好搞么。”

第二天，公社的“学乖队”就成立了。秦德才受宗书记之托担任队长，这事当然落实得很快。宗干部对秦德才说：“你要搞出个‘群众专政’的典型来。”

这种事还真需要秦德才这样的人。

被公社点名来接受“专政”的，不，接受‘学乖’的，有成份偏高的老中农迟得法、跟国民党能扯上“关系”的包金贵、平常确实表现不好的储小二，还有别的村的一些，像赵村的地主赵炎黄、孙家乔的赖子孙武胜、人称孙二赖的等，一共十来个人。孙二赖在前几天的搜粮活动中虽然出了力，但回到村里，好多村民对搜粮有气，他跟这些人接连打了好几仗，村里把他送了过来。

这些“学乖对象”在北门外的茅山下，站成一排，个个垂头丧气，听着秦德才的训话。

秦德才拿着一根棍子，又一次神气起来了：“你们落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手里，具体讲就是落到了我的手里，就得老老实实，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一句话，就是要学得乖乖的，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听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了。”那些人嘟哝着。

“他妈的，说得不响。”秦德才举起棍，朝着这些人就一个个砸下去。虽然他一字不识，却也懂得杀威棒的道理。

包金贵下意识地捂住脑袋，被砸了两下。

迟得法自知躲不过，没言语，硬挨了下，身体晃了晃。

储小二害怕了：“秦哥，秦哥，咱俩谁跟谁呀，饶了我吧。我听您的话，跟您走。”

“这还差不多。”秦德才一笑，棍子在自己手里拍了两下，又走到了孙二赖的跟前。

“老秦，咱俩是老交情了，嘻，嘻。”孙二赖自以为他跟秦德才应该算得上是“战友”了，所以还在大咧咧地笑呢。

秦德才这时为树起自己的权威，可是六亲不认，那棍子劈头就下来。

“啊哟”一声，孙二赖立马跪了下来：“秦爹，秦爹，我叫你爹了，别打我了。”

秦德才从鼻子里嗤出一股气：“你爹算什么？被国民党杀了，我才不做那个倒霉蛋呢。”

“那你是我爷。秦爷，秦爷，饶了我吧。”

“行了，免了，起来吧。”

“多谢秦爷，多谢秦爷！”

“你们俩帮我看管他们这些人，狠着点，别客气。”

“是，是，是！”两人好不欢喜。回过脸来，马上就变了个人，对那几个“专政对象”如狼似虎、又推又搽、又喊又叫：“走！走！干活去！”

“等等。”秦德才又想起来一件事，“咱学乖队有学乖队的规矩。你们这些学乖对象，以后没有自己名字了，一律用编号。”

储小二愣在那儿，还没明白。

“姓包的，你以后就是1号了。姓迟的，你就叫2号。听见啦？以后就不许叫名字了。”秦德才顺口就胡编起来。“下面去干活。”

“干什么活？”包金贵问。

秦德才说：“随便干什么。”又随手往地下一指：“就是这堆土，都铲到下面去，下午再铲回来。”

迟得法说：“这干的是什么活？拿人开心么？”

秦德才一棍子就砸下去：“叫你干，你就干，啰嗦什么？劳动改造，劳动不过是手段，改造才是目的，干就是了。”

“快干！快干！”储小二吼着，孙二赖也马上就学会了，跟着吼上了。

好些社员在不远处看着。

迟得法被看得还有些不好意思，就说：“这样影响不好吧？”

“你这老东西，就是打不醒。”秦德才上去又是一棍：“要的就是这个效果。通过打击一小撮，来教育90%以上的人民群众。就是要做给他们看看，谁敢不老实，谁敢不乖乖的，就拉到你们这里面来，做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33.3血的代价

“轰，轰！”尖山响起了一阵阵的爆炸声。

公社组织了一支专门的民兵突击队，由赵刊新带队，开始在尖山上炸石开渠。

又一批炸药埋下了，赵刊新最后一遍检查各炸药点的雷管和导火索，而后跟几十步外的几个说：“可以了。”

平金刚也被选在里面。他是安全员，在半山腰管着警戒，立刻向山下摇起手中的小红旗，又吹着哨，又扯着嗓子喊：“民主村的社员们，要放炮了，快往后撤！”

老王头虽然被免了生产队长的职，但这些要紧事还都是在最前面的，他在山脚跟对乡亲们喊：“要放炮了，快撤，快撤！撤到河边去！”

河边，是他们原先指定的安全区。

大家纷纷地下来了，站在河边，望着尖山上的那几个人影还在来回走动。

一会儿看见山上的几个也往下走了。

大家都屏声静气地等着。

再一会儿，果然，惊天动地的炸声响开了。一个接一个的爆炸声就像炸在头顶上，脚下的地都在抖动，惊起的鸟雀在乱飞。一块块石头腾空而起，拖着硝烟像千百支火箭飞向天空。

人们还没来得及欣赏这壮观的场面，就有人惊叫：“不好了，快跑！”

人们抬头一看，不得了，有些石头都飞到了头顶上的半空中，好像是高高地挂在天上。

有些小石头已经飞过来了，砸在山坡上。

老王头脸都变色了，大喊着：“快跑啊！看着天上，看着地下！”

社员们都惊慌失色、争先恐后、夺路而逃。

天上的飞石，不一会儿，便呼啸而下，有的就砸在奔跑的人群中。

现场已是溃不成军、一片混乱，还有的妇女“爹呀妈呀”地又哭又叫。人们拼命往大河北岸奔跑，一边跑一边还得看着天上飞旋而下的石块，哪顾得上脚下的河床和冰碴。好在冬天的河水不多，也都冰冻了，能跑得过去，不然，真要出大事。

跑到了北岸，当大家还气喘嘘嘘、惊魂未定的时候，老王头就在那儿左顾右盼，问着：“有人被砸到吗，还有人被砸到吗？”

还好，只听得有人喊爹喊娘的，没听见喊救命的。

山上，硝烟渐渐散去。

赵刊新有点垂头丧气，对平金刚说：“咱的药量没把握好，大概装多了。”

“上两次，不也是这些么？”

“今天，我是想多炸点，进度快一点，省得那个宗书记老是催、老是催，烦死了。药稍微多放了点，差点出了事。”赵刊新看着山下，说。

“你也是够大胆的。”

这能怪赵刊新么？他也不过是个从没受过这方面专门训练的普通农民，却要从事这种高危险的有相当技术要求的工作。

“我上炸点去看看。”平金刚说，他还是挺负责任的。

“我去吧。”一直没有说话的站在边上的连二娃说。

连二娃真是个实在人，关键时刻肯站出来。在工地上，他是放炮员。他觉得，他有责任先去看看。

“好吧，你过去吧。我去看看那堆雷管被砸到没有。”平金刚说。

赵刊新对连二娃说：“你上去要小心点噢，不知道还有没有哑炮。”

“不知道啊，所以，我要去看看。要不，一会，大家都过来了，再有响的，就麻烦了。”连二娃憨厚地说着，全然没想到自己。

按理说，放炮要有人专门看炮眼，要点数，看有几个响了，还有几个没响。可是，那时的他们没有这个经验，哪想到这一点，也没有这么多有技术的人可安排。

可偏巧，没料到的事情，就是发生了。

平金刚走到山腰下作为仓库的棚子，猛地，山上又响起惊天的爆炸声。

他回头一看，张着惊恐的大眼，啊！天哪！

连二娃，被炸得四分五裂，随同那一大团砂石、烟尘飞上了天！

一个哑炮延迟响了。

碎石、尸块、血滴飞在半天空，都分不清。但是，那撕裂了的腿，那断了的胳膊，弯弯的，却分明是在空中旋转。

乡亲们三三两两刚要往山上走，回去挖水渠，听到这惊雷一声，看到这血肉横飞的惨烈，在惊呆了几秒钟后，就漫山遍野哭爹喊娘地四下乱蹿。

也有好样的、胆大的，像鲁队长、老王头几个，迎着飞石往山上跑，直喊着：“谁出事啦，谁出事啦？”

“到底是谁出事啦？”鲁队长对山上的人吼着。

平金刚脸色刷白，吓得呆在那儿，一动也不动。

“连二娃，是连二娃。”赵刊新应答着，身上抖个不停。

碎石、尸块，噼噼扑扑落下来了。

“快去收吧，还等什么？”老王头眼里都急出了泪。

赵刊新连忙拿着个柳条筐，就上去了。

33.4惨淡收场

这事故怎么处理呢？

宗总指挥很想处理一下赵刊新，但赵刊新是民兵突击队的队长，影响面大，很多工作以后还得靠他，只能通报批评算了。就把安全员平金刚算是责任人，送到“学乖队”里了。

这天早晨，平金刚气鼓鼓地来到半山坡的“学乖队”。秦德才见又多了个管理对象，居然还是平金刚，在村里也算得上是知名人物，今天也来被我管。那太好了，我秦德才管的天地又大了一块。其实，秦德才以往跟平金刚也没有过直接的矛盾。但是秦德才可不想错过显示自己权威的机会。

“平金刚，这儿是‘学乖队’。不管是谁，就算是你，上了我这儿，就得乖乖的。”秦德才一上来，就在手里敲打着一截短棍，眼珠斜斜的，嘴里酸酸的。

平金刚一声不吭，连眼睛也没有转过去看。

秦德才心里一股怒火上来，他妈的，不识抬举，看我怎么收拾你，便指着地上的一筐碎石，大吼一声：“扛！把这筐石头扛到垭顶上去！”

这些碎石本来是该用小车推上去的，秦德才故意给平金刚穿小鞋。平金刚倒也不含糊，看了看筐里也就是一百来斤，往下一蹲，“嗨”地大叫一声，竟然把筐扛上了肩，又“嗨”地一声，站直了起来，往斜坡的小道迈了两步。

迟得法、包金贵几个，看了直叫好。

秦德才一计不成又想一计，“看你能的，我叫你能。”又上去挡在前面，指着更陡一些的没有路的上坡，说：“有本事，你从这儿上。”

这不是存心找茬吗？平金刚眼一瞪，把肩上的碎石筐往地上一倒，“哗”，碎石散了一地，蹦起的小石头差点打在秦德才的身上。这一下，把迟得法、包金贵他们都看愣了。

秦德才惊得跳了起来，“你他妈的，找死啊。”挥起短棍就朝平金刚打来。却被平金刚一把抓住，使劲一拔，反而到了平金刚手里。

秦德才吓得赶紧双手捂住脑袋，嘴里嚷着：“你要干嘛，你要干嘛？”慌忙跑开了。

平金刚用力朝天一扔，那根短棍，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

好在没几天，这工程就搞不下去了，“学乖队”也解散了，这事才没有再闹下去。

龙头的水利工程，是以生命的代价而告终。

不但，龙头的工地上出了事，那个尖山北的大渡槽接二连三地发生拱形桥洞的垮塌，也有人员伤亡。显然，无论是资金、劳力，还是技术水平、施工能力，以及气候条件等等，没有一项能够支撑工程还能继续下去。这个前所未有的理想化的庞大工程，即使想进行也进行不下去了。

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没忘了开个庆功大会。会上，宗总指挥宣布，水利工程取得了阶段性的伟大胜利。

宗发奋还顺便说了一段：“在这场战天斗地的伟大工程中，在公社党委的正确领导和大力培育之下，还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连二娃同志就是其中一个突出典型。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要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革命豪情。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连二娃同志就是重于泰山，死得其所啊！我们公社政治部号召全体社员努力学习他奋不顾身、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

连二娃的妻子连二嫂满含泪水，在风雪中领到了写着“水利先锋”的30厘米宽、40厘米长的一纸油印的大红奖状。

连二娃的父母，两位风烛残年的老人，生了两个儿子，一个被抓去了台湾，一个却这样死去了。

庆功会上，两位老人哭得呼天抢地，昏死了过去。要是这时老人知道，连四娃其实早已死在了台湾，更会活不下去了。

工程撂到了一边，又成了没有停工令的停工。

在“学乖队”干活的迟得法、包金贵，连同因爆炸事故负有安全责任刚去了两天的平金刚，也放了出来。

两个多月苦役般的集中劳动结束了，所有的席棚都拆了，所有的人都可以回家了，所有的人都吐了一口气。当然，宗总指挥除外。

白雪皑皑的山野里，遗留下几处黑黝黝的孤零零的大渡槽半截的桥墩，像巨大的墓碑，静静地耸立在空旷的雪地里。

尖山、矛山半山腰残存的灌渠，在白雪的掩埋下断断续续、坑坑洼洼，就像被打断了的、受了伤的龙脊。

到这时，连一字不识的眼花耳聋的老大娘也都知道，用诸如此类的办法是建不成共产主义的了。

春天的花朵，还没来得及盛开，就凋谢了。因为寒冬，裹着极左的狂风，强行来了。

第三十四章 大饥荒

1949年7月4日

34.1 困难时期

由大跃进的左倾错误给全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那几年，叫困难时期。讲全的话，是叫“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一般是指1960年至1962年。实际上不少地方在1959年，有些地方甚至在1958年底就已经陷入困境。当时是叫自然灾害时期，说是因为我国遇到了连续三年“百年不遇”的特大自然灾害。由于缺少确凿的原始气象数据的支持，八十年代后改称为困难时期。它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最严重的饥荒之一（如果不说是最严重的话）。

1960年的春天。最难熬的春天。

早晨，天亮了好一阵。老王头俩口躺在炕上没动，这可不是他俩的习惯。

院子里静静的，没有一点声息。那头猪，刚办食堂时就被牵走了。养的几只鸡，早就不给它们喂食了。王大妈也舍不得杀，让它们自己满地里去找食，结果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一只也没剩下，都不知道被哪个缺德鬼抓走了，真还不如自己吃了呢。唉，世道变了，风气也变了，以前哪有这种事呢。至于互助组时买的那头牛，去年就在公社里死了。当时，老王头还心疼了好几天，现在已不去想它了，眼下连自己也顾不上了。

从支起的窗框往外望去，阳光好像也没有神采，黄黄的、淡淡的，天上的几缕云丝缓缓地移动着。屋子里，也并不敞亮，全然没有那种早晨应有的生机。炕上炕下，几乎空无一物，都在大炼钢铁时被抬出去烧了。也就是在炕的一角，摆了几个纸糊的筐篓，装着农民们仅存的一点私有财产。（说明：筐篓，海源农村常见的一种用席子做衬、外表糊纸的方形或圆形的器物，大的约半个抽屉，小的有手掌大，用来盛放针头线脑杂物之类的小件。它是中国农村除石器、木器、铁器之外先后登场的又一类器皿。纸器真的大兴其道还得在十年以后的文革后期之后，那时要有个缝纫机的硬纸板包装箱，就宝贝得不得了。）

又磨蹭了一会儿，老王头憋不住，先开了口：“天都这么亮了，早该起来了。”

王大妈说：“起来干什么？躺着吧，省点食。”

老王头说：“是啊，肚里空空的，浑身没劲，真不想起来。”

“家里的粮，一粒也没有了。今天吃什么？真害愁。”

“再上西门外的地里翻翻看，有没有剩下的地瓜根？”老王头说。

“早就翻了几十遍了，连根须也没有了，还等你去翻。”

“那矛山上的几块地呢？”

“树皮也不多了，你还想地里呢。”

“那咋办？”

“你当了这么些年的互助组长、合作社长，怎么想不出办法啦？这一大家子就指望你啦。”

“嗨，别提这些啦。连公社都没办法，我还能有什么法？”

“那还搞什么公社？”

“快别说这个，连彭德怀也没说不要搞公社。”老王头急忙推着老伴。

“不让说，那我们今天吃什么？”

“不是还有点干树叶，和上点玉米秸，切切碎，煮煮吧。”

“唉，把以前放在锅底烧的拿到锅里煮，那再拿什么放到锅底烧呢？”

“这年头，过一天算一天，吃一顿算一顿了。”

“早晨这一顿，就已经没吃的了。还吃一顿算一顿呢，算也算不出来了。”

“那就真的只有喝凉水了。”老王头也没有法了。

“还是我上望海山，去挖点草根吧。”

“你还能走得动么？”老王头关心地问。

“这一年不行了，就这么一年多的时间，一下子就老了。可是走不动也得走啊，咬着牙也得走啊，还能躺着等死么。”

“叫丁妹一起去吧，好有个照应。”

“不用啊，也捡不了多少。不如叫她去海边看看有没有潮上来的蛤蜊。”

“今天，王溪学校不上课，叫她跟丁妹一起去吧。我和王山还是去队上点个卯，说不定以后还能分个粮。”

“你还指望它能分粮啊？”

“那怎么办呢？”

老王头扛着锄，往西门外走去，那是人们习惯的集合地。

差不多九、十点钟了，来的人还是不多。

已经来的几个也是横七竖八地躺着坐着，闭着眼睛，晒着太阳，懒懒的，谁也没说话。

平金刚忍不住了，说：“走吧，去干点吧。”

包金贵说：“你们看，我的腿都肿了，一摞就一个窝。”

皮安己说：“你还不错了，还能走。迟得法已经半个月没下炕了。”

老王头对皮安己的退婚并不很在意，对他还是和旁人一样地聊天：“他怕是扛不过去了。他家里，两个老病号，没人去打树叶。”

鲁队长说：“他儿不能给他点么？”

皮安己说：“他儿子家更可怜，今年刚生的小孩，才两个月。儿媳妇一点奶水也没有，大人也不行了，哪还有给他爹的。”

平金刚说：“谁能去帮他一下呢？”

皮安己说：“谁能去帮啊？现在谁家也不易。况且他还是个右派，哪个敢去沾边啊？”

鲁队长一声叹息：“唉，怎么搞成这样了呢？”

大家一时竟没了话。

原先大白果树的地方，竖了个电线杆。上面的大喇叭倒是依旧不停地播放着鼓舞人心的革命歌曲：

“红日出山临大海，照亮了人民解放的新时代。

看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穷苦人出头之日已经到来，已经到来！

帝国主义反动派、妖魔鬼怪，怎抵得革命怒潮、排山倒海！

哪怕它纸老虎张牙舞爪，戳穿它，敲碎它，把它消灭，把它消灭！

山连着山，海连着海，我们是山，我们是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大家听了一首歌，杜家骏的儿子杜长贵吐了口气：“哼，还唱得这么好听。赵村赵刊新的儿子好不容易考上了省里的一所中专，都不算数，念不成。这算是怎么回事？以前还从来没有这种事。”

那时在困难时期里，一些单位实在维持不下去了。有的学校干脆解散，学生取消学籍遣散回家。有的学校是高年级学生留下，低年级保留学籍，暂时回家，刚考上的就只好拉倒了。

“这不满意的话，可不能随便说啊”老王头说。

鲁队长说：“看你胆小的。今天早晨东街上就躺了一个死的，是从西面讨饭过来的。旁边还有个小孩在哭，真可怜。”

老王头挺惊讶，问：“人呢？”

鲁队长说：“叫公社拖走了。”

皮安己说：“咱这儿算是好的啦。你没听说，西面那些地方，死的人玄啦。”

平金刚说：“那些晦气的话，别说了，听得怪不舒服。今天的活，就到这儿。愿意上山打树叶，就上山去；不去的，就回家吧。常贵啊，今天来的人，就都记个工吧。”

王山说：“记这个还有用啊？也没钱也没粮。”

平金刚说：“过日子还得往前看啊，不会老是这样啊。”

大家坐着没动，好像在掂量着平金刚说的话，还是有几分道理。好一会儿，才有人慢慢地站起，懒懒地走了。

老王头也拄着锄头站了起来，对王山说：“我上望海山，看看你妈。她走路都不稳当了，别摔倒了，还没人知道。你去海边，看看丁妹和王溪。”

“好。”王山答应着。

丁妹还是挺愿意到海边来的，不只是因为能收获点可以果腹的海洋生物，而是能看到大海，那滚滚波涛、浩瀚无际的大海。丁妹现在知道，她的丈夫王立，就在那渺渺茫茫怎么也看不见的海的那一面。几年来，她已经看过多少次了，她没有看到过大海的蔚蓝和绚丽，只看到大海的灰暗，和人在大海面前的渺小与无奈。虽然越看越难受，可她忍不住还要看。

她走在沙滩上，海水在脚下永无停息地冲上来、退下去，当年的激战早已了无痕迹。但她却还在执着地寻觅着王立的足印，她时时想着，他就是在这儿走下了海，走到了海的对面。十年还多了，他还能再走回来吗？两年前，公社还专门在这儿开大会、游行，叫着喊着要解放台湾。这才两年的时间，如今乡亲们甚至连嘴上也不再提解放台湾的事了。难道，难道这事真的越来越难了吗？丁妹的心里满是悲哀和凄凉。她一直在问苍天，她一直在问大海，还要我丁妹再等多少时间呢？

苍天没有回答，大海也没有回答，只有潮上来一些海草、贝壳，也算是一种难解的解答？

太阳偏西了，照在身上已经没有暖气了。

人们从山上、从海边陆续往回走了。

龙头镇依然是静静的。没有绿荫，没有炊烟，没有鸟雀归巢的鸣叫，没有鸡鸣狗吠、驴马嘶咬，没有老人倚门呼唤儿孙，没有孩童们撒娇的奔跑。

王大妈挑了一篓枯草回来。把草根的泥敲掉，剁碎，再煮着吃；草茎就当柴火烧。

丁妹背了一筐海草，捡了几个蛤蜊，抓了几个小石蟹，还在礁石上撬了几个海蛎子，应该说这一天是很难得、很丰盛的了。

王山顺便挑了担水。

只有小王溪的情绪很好，家里一直尽量没让她饿着，长得差不多和丁妹一般高了。更何况这一天在海滩上，又是捡蛤蜊，又是抓蟹子，又是撬海蛎子，真如同丰富多彩的假日一样。

回到家里，把海草倒在盆里冲一下，那浓烈的海腥味顿时充满了全家。

老王头都捂住了鼻，这在以前是连猪也不肯吃的，如今，也是剁碎了和草根一起煮了吃。蛤蜊、蟹子这些，就另放一盘，连盐也没有，搁在锅架上蒸。

照例是丁妹拉风箱、烧着火，锅盖下冒出了热气，那腥味就更厉害了。

好了，往外盛了。可全家就只有两个破碗，办食堂时都拿走了，散伙时就拿回来这两个。

丁妹先盛了碗给老王头，老王头捏着鼻子、皱着眉头往里灌。

第二碗给王大妈。王大妈喝了两口就放下了，说：“我不饿，我中午已经吃了点了。”

其实，她哪里吃过什么。就是这猪也不曾愿意吃的东西，也不是天天有的。海边的东西，捡的人多了，也越来越少了。也得省着点，还有明天，还有后天，还有一家子几口人呢。

王大妈把碗递给了她儿子王山。

老王头喝完，把碗涮了涮。丁妹又盛了碗给王溪。

王溪尝了口，直嚷：“不好喝，不好喝！”

老王头瞪了她一眼，她才没再出声，喝着。

民主村亏得是在沿海的丘陵地，有山有海，素有物产丰饶的美称，如今也落到了这种民不聊生的地步。好在有山，毕竟还有野菜杂草；尤其是那无际的大海，还可以在岸边礁石群里、在沙滩上捡海贝、拾海草，甚至还可以下海捕鱼捞虾，虽然那时候还没有重视渔业。龙头人在艰难困苦的那两年，所以没有发生大量的“非正常死亡”，是多亏了大海的恩赐。所以，在本书里没有出现有些西部省份的那种惨烈景象。我们实在是要跪拜在大海的面前，感谢大海的神灵。

至于西部省份的灾荒情况，仅举邻省河南的例子：据胡绳主编的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11页载：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10%。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张素华所著《变局》中记载了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的话：“我到光山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说明：光山，河南信阳地区的一个县。）

当然，海源也不是一个没饿死。迟得法的孙子是一个，迟得法自己也是一个。

34.2撒手人寰

老王头家有三个整劳力在撑着，所以家里还能过得下来。老迟家就不行了。

迟得法早就和儿子分开过。儿子迟一敬领着他媳妇和解放那年生的儿子迟解放。他媳妇体质不算强，本来日子就挺累。1958年修路打石头，他媳妇又落下了哮喘病，整天地喘不上气，胸闷难受得厉害，怎么也治不好，也就干不了什么活。有的说是痨病，其实这是乡亲们叫不上名的矽肺病，是当年打石头时引入过多粉尘引起的，其病程基本上是不可逆的。这下又遇到了灾荒，这个坎就更难过得去了。

偏巧他媳妇又怀上了，不足月就生了。迟大妈行动也不便，好不容易挪过来帮着料治，才应付下来。

孩子两个月了，这两个月不知是怎么过来的。媳妇没有奶，婴儿整天哑哑地哭。没有粮了，实在没有粮了。迟一敬每天给他媳妇端上一碗玉米糊，那是所能有的最好的补品了。可他媳妇怎么能咽得下，都要去抹到孩子的嘴里。她自己吃的，还是地瓜叶、棒子芯。

那天，迟一敬端上每天只有一碗的玉米糊，还稍微有点热气。那热气居然还飘散出淡淡的香味。蹲在地下的迟解放，用鼻子使劲地嗅着，眼睛直盯着看，眼珠一动不动，嘴唇却在一抿一抿。他妈妈知道，这个大儿子也是饿得厉害，就问：“解放，你怎么啦？”

迟解放这才怯怯地说了声：“我饿。”

迟一敬一听，满心的苦处像怒火一样爆发了出来，跳起来朝着迟解放就吼：“你还想吃啊？你爷爷奶奶病成那样都还没有呢。”竟然顺手就过去一巴掌。

其实迟解放只说了饿，没说要。他满心委屈，也没去躲他父亲的巴掌，只是在墙角里蜷缩得更紧。

倒是迟一敬掉下了眼泪，呜呜地哭了起来。他心里难受啊，心里难受啊。他拍着自己的脑袋，拍着自己的胸脯，哭了起来。一个七尺男儿，一生辛劳，拼尽全力，居然养活不起自己的妻子，养活不起自己的孩子。连一碗稀稀的玉米糊都给不了十二岁的孩子，自己还配当男人吗？自己还配当爹吗？

他媳妇也无声地流着泪，咳了一阵，压着嗓子说：“要不，今天这碗叫解放喝了吧。”

迟一敬，流住泪，过来挡住了，“这是保你的命，保你和孩子两份的命啊。解放，你只能忍一忍啊。”

迟解放，眼睛也是湿湿的，点着头。

夜里，婴儿渐渐地没有了声息，不是睡着了，而是离去了。他来到这世界，只有两个月。这两个月里，他只见到过阴暗的屋子，只见到过父母的焦虑和眼泪，听到的只是叹息和哭泣，从没有欢笑，从没有温暖，或许父母轻轻的安抚，是他享受过的唯一的慰藉。就这样地去了，连个名字都没有。

媳妇又一阵的哭声，使迟一敬知道了怎么回事。

他爬起来，用一件破棉袄裹住了婴儿，这可是大人死了才有的待遇啊。

临出门前，媳妇还嘱咐了声：“扛把锨，把他埋了吧。”

那时小孩子死了是不埋的，随意地扔在荒坡上。

迟解放在黑暗中睁着眼，一口气也不出地看着，听着。他实在不明白，这才一、两年的时间，那时在西门外赶麻雀的尽情欢快的时光还像在昨天，怎么一眨眼现在就成了这样呢。不用说迟解放不明白，连他爷爷迟得法也不明白。

迟得法两个星期没下炕了。

他蜷缩在一堆破棉絮里，瘦的已经只剩一把骨头，叫人都认不出了。脸色黑黄黑黄，满是皱纹的皮肤紧贴在颧骨上。两眼干巴巴的、直愣愣的，一副绝望的神情。嘴巴张着，喉咙里还有一点响声，是不是想吃点什么而说不出来。原本体质还算不错的他，因为被宗发奋打了个右派，送进了“学乖队”受惩罚，秦得法对他家搜粮又特别的厉害，使他的身体状况比别人更差，使他家抵御灾荒的缓冲能力比别人更差，使他和他的老伴陷入了更深、更可怕的困境。

他老伴也是一天没进食了，脸上肿得都睁不开眼。满心着急，却不敢下炕，怕下去之后再上不来了。

今天是实在不行了，恐怕是撑不过去了。迟大妈好不容易下了炕，却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搜粮队搜得太狠了，没有留下任何可以吃的东西。

屋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只有破水缸里，有儿子前两天来挑的水。

院子里也是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连一棵草也没有长出来。

迟大妈扶着墙，出了屋，坐在门槛上，四处望望，实在想不出法，抹着泪，坐了会，又回到屋里，在墙角旮旯的一个布袋里掏了半天，掏出了几片年前的发了黑的卷曲的地瓜蔓的叶子，拿到炕边，递给老迟：

“孩子他爹，放在嘴里嚼嚼吧。想煮一下，都没有柴火了。”

迟得法，眼睛好不容易转过来，看着放在炕边的地瓜蔓叶，没有动，脸上抽搐着，表情极其痛苦。

他饥饿难耐，肚肠在绞着疼，浑身像针刺一样，可心里的酸楚更忍不下。

“实在是不行了。要不，去找儿子帮一点？”迟大妈吞吞吐吐地说着。她知道老头不想去麻烦儿子，可都已经到了这种时候，还不快去开这个口啊。

果然，迟得法摇摇手，知道这时候，谁家也不好过。他儿子家，前几天刚死了小孙子。他都没有力气爬过去看一看。怎么再去向儿子要吃的呢。就是死，也是自己先死了算了。

老俩口正在炕上叹气，忽听院门外有人喊：“老迟啊，迟老弟啊！”

迟大娘正诧异：“这种时候，谁会上门来啊？”

迟得法听出来了：“是老王头啊，这种时候只有老王头会来。”

可迟得法已经喊不出大声了。迟大娘在炕上朝外喊着：“大兄弟啊，进来吧。”

来的正是老王头。他手里还端着一个碗，碗里盛着些当时已是极为稀罕的小米粒。

老王头进了里屋，见迟得法躺在炕上瘦弱得不行，连说：“啊呀，迟老弟啊，怎么瘦成这样啦？”

“唉，唉。”迟得法连连唉声叹气：“真没想到会这样啊。我是眼看不行啦，谢谢你来看我啊。”

“可别这么说啊，熬过这一阵就行啦。1949年国民党反攻时，那么苦，我们不也是熬过来啦。”

迟得法摇了摇头：“不行啦。伤了元气啦，伤了元气啦。”

老王头把那碗小米递给一边的迟大娘，“也没有多的。这一碗，熬点稀的，让迟老弟再撑一阵吧。”

迟大娘一边接着、一边说：“这哪好，这哪好，你们也不富裕啊。”又找了块比较干净的布头，小心翼翼地把小米倒在上面，包了起来。

迟得法流下了泪，抽泣着：“这年头，怎么好意思拖累你啊。”

“不说啦，不说啦，我也要回去了。迟老弟好好养养吧。”老王头拍拍迟得法，眼睛也有点红了。

迟得法老两口千恩万谢。迟大娘还挣扎着想要挪下炕来，老王头摆手，说：“别下来，别下来了。过两天，我再来看看。”

老王头走了，掩上了门。屋里又暗暗的了。

“这小米，还真香。可是拿什么煮呢？”迟大娘捧起那一扎拳头大的小米布包，闻了闻，又迟疑了。她连熬粥的柴火都没了。

“别煮了，煮什么呀？等什么时候儿子挑水进来，拿去给小孙子吧。”

那包小米，迟得法没舍得吃，一直塞在炕旮旯里。

他知道，他没有几天了，说不定就是今天了，还浪费那小米干嘛呀，黑黑的干地瓜叶成了他最后的晚餐。他对这世界已经没有留恋，留在这世上只是痛苦。但他心不甘啊。他一生勤劳，肯干肯吃苦，也愿意琢磨庄稼活，把自家地里搞得好好的，只是想让家里过得好一点。也许他为别人想得少了点，可别人又为他想过些什么呢。他自认为从没有坑害过别人，他不明白为什么这十年，队上社里，大事小事，从没放过他，一次次地拿他开刀，找他的事。又是右派，又是右倾，又是落后分子，一顶顶的帽子向他压来，弄得乡亲们也不敢过来帮一手。他既不是地主富农，更不是国民党反动派，这是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是中农？他想不通啊，他死不瞑目啊。他的孙子死了，他的老伴看来也活不了几天了。他是得罪了谁了？他觉得，他无愧于天，无愧于地，无愧于人。可是，他却要这样地离开人世。

他挣扎着，他要找个人讲讲理，可前面没有人，只有明晃晃的白光，白光里好像有人影。他要去找那个人。他伸出胳膊要去拉，又够不着。他满心地着急。他浑身起伏着、翻腾着。白光更亮了，刺得都睁不开眼，那人似乎更远了。跟上去，跟上去，他要跟那人诉说怨呀恨呀。忽然，他觉得自己起来了，好像离开了炕，离开了地，飘起来了，飞起来了，迎着光亮，跟着那人的黑影去了。

迟得法在炕上，抬了下手腕，抖动了几下，又落了下来。

他死了。

迟得法是辛劳的，也是糊涂的。

下葬的那天，迟得法的儿子迟一敬把他爹弯曲地塞在小推车的侧筐里。别人都没有过来看的。那年头，这样的事多了，大家都已经伤心不过来了。他爹已经瘦成了长长的一把骨头，上面紧贴着黝黑粗糙的外皮，可怕得像鬼一样。一张破席盖不住他的身躯，这一头，脑袋顶着迟一敬的下巴，另一头两根下肢体像干柴一样高高地翘着。别看大大的一把，份量却很轻。然而，迟一敬还是推得很累。

迟一敬把他爹推到了望海山下。按说，村里是叫他推到山的北坡埋了。但他哪还有这个力气，看看四周也没人，就在烈士墓的边上停了下来。

十二年了，烈士们躺在这儿十二年了。碑上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墓间的青草长得很茂密，只是那些松树在1958年被砍了，只剩下些半人高的枝杈。

迟一敬见着这些烈士墓，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他找了个土层厚一点的地方，能好挖一点，“哼哧，哼哧”地挖起了坑。

忽然，从那个八烈士的大墓碑后面闪出了一个人影，把迟一敬吓了一跳，还能真的是惊动了墓堆里的神灵。

“谁啊？”迟一敬尖叫着。

“我……我，是我啊。”那人走了过来，原来是皮安已。

“大叔啊，是你。怎么上这坟堆里来啦？”迟一敬问。

“哦……哦，我上这墓碑后拉屎了。”皮安已很不好意思地说着。啊呀，这不是对烈士的大不敬么，皮安已一下子意识到了这点，还不如实话实说吧。“其实吧，我是来挖野菜的。我想这块地方不会有人来，能好挖一点。”

因为村里、乡里都有规定，非祭扫活动，不许随意进入烈士墓区，所以平常是没人进来的。皮安已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竟然在烈士的坟头上刨野菜，也是说不过去的。

皮安已正止步为难，迟一敬倒没想那么多。皮安已就走了过来，刚问了一句：“你这是在干什么？”看见了从筐里跳出来的迟得法长长的下肢，吓得跳了起来，连连嚷着：“这，这……这是？”

迟一敬低头，悲戚地说：“是我爹，他走了……”

“啊？”皮安已过来，朝着车筐一鞠躬，“好兄弟啊，你怎么走了呢，你怎么走了呢……”眼泪也无声地淌了下来。

说起来，老皮和老迟两家关系不是很密切。多年来，两家都是老中农，都是肯在庄稼地里下功夫，都在暗地里使劲比着，想争个西北村的第一户，直到合作化打消了他们两家的这个念头。但是看到迟得

法最终是这样地躺在小车厢里，瘦骨嶙峋，全无人样，毕竟是多年的老兄弟，皮安已是真的心里发酸，从心里难过。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啦。

“我也来挖几锹吧。”皮安已从迟一敬手里拿过铁锹，也挖了起来。

他们两个无语地挖着，埋了迟得法。

迟一敬还从旁边一个烈士墓松动的底座上，拿过几块砖来，压在了他爹的坟上。他爹的坟，连块木牌还没有呢。

这件悲切的事情，不料在几年后的文革中，竟成了两家相互攻击的话题。

这还是能埋到地下的，比起那些倒毙路边、抛尸荒郊的孤魂野鬼，算是可以的了。著名科学家袁隆平先生语重心长地说过：“你们年轻人不知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五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请见：《广州日报》2009年4月18日）

没过几天，迟大妈也死了。

老王头给的那包小米还在炕旮旯里。

34.3不吃肉了

接二连三的情况，表明饥荒严重了。

杜家骏急急忙忙跑进公社大院，院里飘来一阵阵鱼肉香。

他踏入宗书记的办公室，就知道来的不是时候，但已经退不回去了。

办公室里满屋鲜味，桌上摆着一大盘还没吃完的鲛鱼饺，这是海源久负盛名的一道美餐。开着盖的酒瓶，飘着醇醇的香味。

宗书记打着隔，拿着火柴杆剔着牙缝，脸有愠色地问：“什么事啊，这么急？”

杜家骏急急地说：“社员群众的生活很困难啊，不解决不行啊！”

宗书记不屑地说：“就这个事啊，你急什么？已经知道啦。”他指着盘子，“你看，我不是也不吃肉了么，饭也吃得少了么。你要向群众很好地宣传这个事例，我们公社领导也和广大社员一起同甘共苦么。啊？”

是啊。不吃红烧肉，可以吃法兰西大餐么。少吃点饭，可以多喝点茅台么。

据帅好先生的“大饥荒时代的茅台酒生产”一文披露：1958年茅台酒产量比解放初增长十倍以上；而在粮食最困难的1960年，茅台酒更比1958年还增长了46.4%。在许多农民饥饿难耐的1959至1961的三年间，茅台酒厂耗用粮食竟达2260万斤之多。（请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

反观过去的封建王朝，一到灾荒之年还有个禁酒令呢。

杜家骏说：“都饿死人了，迟得法家接二连三、连老带小死了三个人了。”

宗书记正色道：“别瞎说啊，共产党领导下怎么会饿死人呢？你还是个共产党员吗？”

“明明是饿死人了么。”

“那是得病死了。哪个朝代哪个国家也有生病死的，紧张什么？”

“还能一家病死三个啊？”

“那不就是传染病么，有什么好奇怪。死几个人，有什么好紧张。人要是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人死了也有好处，可以当肥料么，呵呵。”

杜家骏无语。

宗书记接着强调说：“你要记住哦，对外一定不能说饿死，那叫‘非正常死亡’。懂吗？要不，就是给公社党委抹黑，给社会主义抹黑，这可是原则性的立场问题哦。”

“那口粮的问题也要解决啊。”杜家骏说。

“只要我们依靠党依靠集体，团结互助共渡难关，什么困难也都能克服。帝国主义反动派想看我们三面红旗的笑话，那是妄想。特别是那个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最恶劣，趁我们困难的时候还向我们逼债，问我们要抗美援朝的子弹钱。我们要有这个志气，就是勒紧裤带，就是三天不吃饭，还！也要挺起腰杆，显示出我们中国人民的大无畏精神。少吃几口饭算什么？就算他们倒过来白给我们，我们也一粒粮食都不要！”（说明：《炎黄春秋》2008年第2期有篇文章“解放后苏联援华的历史真相”。文中列举材料，对当时盛行的所谓苏联政府逼债的说法进行了否定，而且在苏联历届政府中，恰恰是赫鲁晓夫当政时期援华数量最多。本书对此不再展开，读者可自行做进一步的了解和研判。）

杜家骏大声说着：“社员家里都没粮了。”

“怎么？向我示威啊？这不要来问我，我这屋里也没有粮。我跟你说了，只要发动群众，什么办法就都有了。”

杜家骏低着头转身走了

宗书记追到门口，说：“记住两条：第一，不许他们出去要饭，别丢人，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面。第二，对外统一宣传口径，以正面教育为主。就说咱龙头公社形势一片大好，绝对没有饿死人的事。有，也是生病死的。死个病人，有什么好稀奇！谁要出去瞎说，就是散布谣言，蛊惑人心，煽动不满，立即给我抓起来，以现行反革命严加论处。跟你讲穿了吧：中国人多了，死个几万、几十万，没什么大不了。让妇女们敞开肚子生，一年就回来了。”

宗发奋的妄言改变不了、更掩饰不了灾害的局面。

不要以为宗发奋对大饥荒的言论和处理办法有什么不当之处，这可是有来头的。

大饥荒在继续地蔓延加重，吞噬着越来越多的生命。

第三十五章 非正常死亡

1949年7月5日

35.1 精减下放

经济困难和饥荒，不但在农村蔓延，也波及到了城市。经济规模的萎缩，使城市里容纳不了那么多的劳动力。农村的减产，使粮食部门也没有那么多粮食供应城市人口。政府只能精减职工，把一部分已有的城镇职工停止原有工作、解除职工身份、取消相应待遇、与原单位脱离关系，这叫“精减城镇职工”。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及其家属则迁往农村，变为农业户口，从事农业生产，自行解决口粮问题，以减轻政府负担，这叫“城镇人口下放”。合起来，简称“精减”和“下放”，海源全县精减5126人，下放回农村3001人。但这一章讲的是已经到了外省的一个西北村人，那就是申世堂。

申世堂是谁？他就是第一卷中提到的住在李芹家中的申老汉的二儿子。申老汉的大儿子申世宝，抗日战争时参加了武工队。在日本鬼子1942年的马石山大扫荡中，因为跑错了方向，一家四口落在了敌人手里惨遭杀害。二儿子申世堂一个人跑了出来，一直跑到出了省的西面，在一个偏远的小县城落下了脚，给一个小老板打铁。终于熬到了解放，能伸直腰，见到了太阳。又娶了个也是逃难过来的女子，成了家。后来，又有了个儿子，取名叫光荣。1956年，县城里的几家小铁铺，合起来公私合营，成立了个铁工厂。申世堂因为已经干了十多年，还当了个小组长，能管着另外两个人。那时的申世堂高兴啊，这天这地真的变了，变得是咱穷人的了。他还盘算过领着儿子回海源老家看看。那时他知道兄嫂一家是死了，老父母一直没消息，恐怕也是不在了。回来让乡亲们看看他申世堂死里逃生、奔波忙碌，而如今也有家有儿子了，他们申家还是有后代在啊。但是掂量路费开销，还是沉甸甸的。有这钱，能把这草顶泥壁的房子翻盖成砖瓦房。申世堂试过几次，还是没能回一趟老家，当然也没能翻盖起房子，毕竟钱还是有限。

后来的几年，就像太阳慢慢地要落山了，天越来越凉，日子越来越不行了。到了1961年，这日子怎么就过不下去了。铁工厂在轰轰烈烈地炼了一年多的钢铁以后就没有活干了。连工资也没有了，只发个十几元的生活费，糊个口。可是糊口的粮食定量也逐渐地少了，发黑的高粱面里掺着花生壳、玉米芯，甚至树叶末，美其名曰“代食品”。申世堂的老婆病倒了，浑身浮肿，腿上一摞一个窝，怎么挣扎也起不了床，整日呆望着门外，一口接一口地喘着气，盼着丈夫的回来。申世堂整天在外拣垃圾，县城里的几条小街早已没有什么可拣，就跑到山郊野外去挖青草、捋树叶。已经上了初中的申光荣，也没法上学，跟着老爹四处跑。出去挖野菜也不容易，还得手提木棍，要时时提防那些吃死人吃红了眼的到处乱窜的野狗。好在申光荣渐渐地练得胆子大了一点，从跟在老爹后面走到能够和老爹并肩而行了。

然而，就是这样的日子，也没有了。

这年的晚春，申世堂接到厂里通知，说是为了分担国家的困难、不在城里吃闲饭，批准你志愿到农村自谋出路（尽管申世堂并没有向厂里申请过）。根据申世堂的具体情况，厂里安排他回原籍从事农业生产。按退职处理，一年工龄给一个月工资的退职费。工龄从1956年公私合营算起，按说是五年，为照顾起见，体现对老职工的关心，特地放宽标准，给了六个月的工资，共二百多元钱，另加六十元的安置费。

那天，厂里还来人把“热烈欢送申世堂同志自愿回乡务农”的大红喜报，贴在了申世堂那低矮黧黑的窝棚门上。

当来人走进暗暗的屋子，把三百元出头的钱递给申世堂时，那人还睁大了眼睛，不知是真是假地说着：“啊呀！三百多元钱呐！老申啊！我这辈子也没有一次拿到这么多的钱哪！要感谢党和政府啊！”

“感谢政府，感谢政府。请坐，请坐。”申世堂也不会说什么话。

“那你什么时候走啊？”来人马上转入正题。他想找个地方坐一下，满屋子看了下，除了一条长凳再没有可坐之处。凳子四条腿长短还不一样，那人坐上去晃了下，差点摔了下来。

申世堂指着瘫在床上、蜷在旧棉絮里的妻子说：“等过段时间吧？我老婆正病着，动不了，让她再好一好。老家那头，我是没房没地。还一点情况也不知道，还要再联系一下。”

这人心里老大的不高兴，没等申世堂说完，立刻正色道：“不行！要坚决响应国家号召，马上就走。你老婆的事算什么？你没听过有个先进经验的那句话吗：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真要走不动，我们可以派人帮你抬上车。老家那头，你也不用操心。相信那儿的政府和党组织，也都是关心群众的，会安排好的。”

“那总得缓几天，准备准备吧？这家具带不走的，也要处理一下吧？”

“有什么好准备的？你这土坯房破成这样，给谁，谁也不会要。你家里这点东西，没有一件像样的。你看你这条板凳还短了条腿，我坐着都不稳当，差点儿摔了下。”那人说着就站了起来，“我看你这些东西，送给废品站，人家还不一定肯收呢。”

申世堂低头无语。

“对你说吧，你不走也不行了。下个月起，你的粮食定量就取消了，你想喝粥也喝不上了。”来人转身就走了。

那人走后，申世堂的老婆哭着说：“孩子他爸，你领着光荣走吧。我就留在这儿，不要管我了。”

申世堂一怔，说：“那怎么能行？你为这家吃了那么多苦，我已经很不安了。”

“孩子他爸，有你这句话，我这辈子也就算没白活了。你还是走吧，我是眼看就不行了，不能再拖累你们了。你领着光荣，出去逃一条生路吧。”

“不，不，我们三个一定要守在一起。不要瞎想啊。有这点钱，明天先去多捋点树叶，再去买二斤棒子面，熬点粥，能过上一阵，啊。”

第二天一早，申世堂就出门破天荒地买了两个窝窝头回来。一个塞给了他老婆，一个递给了申光荣。那说是窝窝头，却是颜色发黑，散发着霉味，今天的人是绝对咽不下去的。可申光荣三口两口就吞了下去，跟着他爹又出门去挖野菜。

为了多挖一点，爷俩回来晚了点。当他们拎着一小袋野菜（那时能挖到野菜也已经不容易了），在暗淡的天色里踏进土坯房时，就觉得不对劲。那么地暗，那么地冷，那么地静。申世堂的心里也凉了起来，紧了起来。突然，他看到了什么，大声地哭叫了起来：“孩子他娘啊，孩他娘！”

申世堂的老婆自己吊死了。绳子的一头栓在破桌的抽屉上，她自己套着脖子滚落在地上……她知道，她要走了，她不能再连累自己的男人和儿子了。

她连把绳子拴在梁上也没有力气做到。可那只黑窝窝头还留在桌上，她要把它留给自己的男人和儿子啊。

申光荣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竟是恐怖的脸、吐出的舌头、突出的眼球，这一幕永远地记在了他心上。爷俩呼天抢地的痛哭，也救不回那个苦命女人的命。

那哭声甚至没有引来邻居的探望。那年头，这哭声，这悲剧，太多了。

家里连个棺材也准备不起来。申世堂心一横，反正也不过了，把门板拆了下来，把桌子、板凳都劈了，把老婆夹在里面，绳子捆着。天蒙亮，父子俩就把她拖到了郊外的小山下埋了。好在那时没人管，哪块地不让埋。申世堂所能做的，就是稍微埋深一点，不要让野狗刨了。

申世堂痛心啊。他老婆跟着他吃尽了苦、出尽了力，只是想安安稳稳地过几年，最后却是这个结果啊。

这土坯房和屋子里的东西，卖不出钱，甚至都没人要。那时的人，能活下来就行，谁还要这些破东西啊。

申世堂卷起铺盖，拉着儿子，怀着冰冷和愤懑，朝着城外小山的方向一拜，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那没有门了的土坯房，踏上了东去的路途。

从1961年初到1963年6月，两年半的时间全国共精简职工约2000万，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请见：《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增补本）》，杨胜群，人民出版社，2008年）。从端着铁饭碗，到敲掉铁饭碗；从城镇非农业人口转为农业人口，这个落差是非常巨大的。非农业人口毕竟还有粮食定量，尽管供应的数量、质量已大大逊色，但毕竟还有这么点，还能熬得过去，非正常死亡相对较少。然而在很多农村，就没了生活的基本保障。但愿像申世堂这样悲惨的遭遇，或许只是一个个案。

35.2 怆然离世

这一路，申世堂十分地疲惫和无力。他唯一的心愿，就是要把儿子带回去，带回老家去，带回他讲给儿子听的有着青山和大海的老家去。

路上、车上，有不少离家逃难的人，可也很难坐安稳。为了维持稳定、掩饰灾情，不时有人过来检查，在如狼似虎的吼叫和撵打中，把哭喊的难民毫不留情地赶下去。申世堂有下放的证明，才能坐在车上。这一路，申世堂除了给儿子买过二次杂粮饼，自己不舍得吃，只喝着凉水，时时摸着藏在裤腰里的小布包。

……到了，总算到了。申世堂领着儿子在海源县城下车的时候，认不出县城的模样了，打听了往龙头的方向后，开始步行而去。申世堂背着一个大包袱又加个小包袱，他儿子背了个不大不小的中包袱，这是他们全部的财产，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申光荣是怀着好奇、怀着希望，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这就是他家祖祖辈辈生活劳作的家乡。果然像他爹说的似的，这是个好地方。尽管都还是困难时期，然而这里的风是柔和的，太阳也是暖和的。那人、那树，也还都有点精神气，全不像西面那样的悲怆和凄凉。

按说申世堂的心情更应该是激动的、急切的。这是他离家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回家。然而，他兴奋不起来。他实在太累了，眼睛都迷糊了，腿都抬不动了，每一步都要咬着牙。他知道，他不能停下来。停下来，他就永远走不动了。他是在拼着生命最后的力量。

……终于到了大河边。看到了，看到了对面龙头镇依稀的房顶和树梢。亏得河上有了座漫水桥，要不，凭他最后剩下的这点力气，还真过不去。

就剩最后的一段路了，却没有最后的力气了。

他实在挪不动了，多想头一歪，就倒在故乡的河里，永远地休息啊。可是还不能啊，现在还不能啊。

他眼睛模糊了，四周白蒙蒙的一片，只有眼前的几步路。他就眼睁睁地看着这几步路，一步再一步地走。

申光荣看出他爹的脸色渐渐地不对头了，就说：“爹，咱先歇歇吧。”

申世堂已经说不出话了。他咬着牙，摇摇头。最后的几步了，爬也要爬回去啊。

申光荣把他爹背后的大包袱拿过来。他爹还不让。却没有力气阻拦了。这回是他儿子背着中包袱又加了个大包袱。一步，一步……申世堂使劲睁着眼皮，正奇怪怎么没有见到那棵大白果树，也没看到那陈旧的城墙……这是龙头镇吗？应该是，应该是的……不会错，他想起了儿时的情景，想起了很早就苍老了的父亲母亲，快要见到了吧……一股热流涌上心头，正要跨大一步，申世堂却撑不住，倒下了，倒在了他日思夜想的已经踏上了的西北村的土地上。申世堂离家的时候，西北村还没叫民主村。

他们已经走到了西门口。申光荣扔掉包袱，拍着他爹哭着，叫着。

民主村的乡亲们闻声围了过来，开始以为又是西面讨饭过来的人。王山的母亲王大妈心最善，先问上了：“小兄弟怎么啦？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呀？”

“我们从西面过来，老家就是西北村的，下放回来啦。想不到，爹坚持不住了。”申光荣虽然小，还都明白。

“西北村的？你姓什么？”平金刚问。

“我们姓申，我爹叫申世堂。”

“申世堂？这不是申老汉的二儿子吗？你大伯叫申世宝吧？”鲁队长还能记得起来。

申光荣迷茫地看着周围的故乡的人们，他不知道他们说的申老汉、申世宝是谁，但他觉得这些人还都不坏。

“快，先扶到大队部去。”鲁队长招呼着，大家七手八脚把申世堂扶到了大队部。

王大妈已经端来了稀汤，嘴里还不好意思地直说：“家里实在没有别的了。”

申世堂也苏醒了过来，最后看了看家乡的人们。他已经认不出曾经在一起的鲁队长他们，最后又看了看自己的儿子。他动了动手指，动了动嘴唇，大概是想说什么却没有声音。暗淡无神的眼光里，包含着焦虑、不安、歉疚、眷恋等等无数种的解读。忽然，浑身松弛，手指一落，就永远地闭上了眼。这也是他不幸中之大幸，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把儿子送回了家乡，交给了家乡的乡亲。

35.3后事

后事的办理，自然是极简单的，有村里揽过去，这儿就不多叙述了。

人们从申世堂的身上找到了那个小布包，证实了事情的原委，把手续都办了。申光荣的户口落在了民主村。考虑到他才十四岁，大队干部们商定，也跟公社、中学商量了，还是去中学念书吧。学杂费，中学都免了；村里给粮食；公社给少量补贴。他爹带回来的钱归申光荣，但由村里保管，直至独立生活再发还。住房，早先申老汉住的房子，已由大队收回。但这是土改分给他爷爷的，不能直接给申光荣。也不能另外再分，要不然在外面的西北村人都要跑回来了。土改时从辛家地主分出来的有三间房，那家人去东北了，房子空着。暂时借给申光荣一间半用。好在申光荣以后是住校的，也不用房。

这些事，申光荣还不能完全明白。短短的时间里，一系列突如其来的重大打击和变故，使他无法反应过来。眼见着父母亲的相继离逝，活生生的家庭被彻底撕碎。自己被抛到了一个据说是“老家”，其实是完全陌生的环境。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更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他满心惊恐、压抑和无望。他甚至不知道应该感谢故乡的人们，是故乡的干部群众在自己也很困难的情况下，给了他一个当时能够做到的比较好的生存条件。

申光荣在家乡的土地上，开始了惶恐孤独的路。从一个十四岁的小男孩的角度去看，他这样想，是可以理解的。

1959年到1962年的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这场大饥荒，不知夺走了多少中国人的生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或者换一种说法，究竟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其人数，至今还是个“谜”。最近的数据是《炎黄春秋》2010年第6期林蕴晖先生文章中的“三年大饥荒，非正常死亡3000多万人口”。最有影响的数据是杨继绳先生在他的专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一书中估计的，那几年全国至少饿死3600万！最近茅于軾先生与赵农所著《中国粮食安全靠什么：计划还是市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一书中所提到的，也基本上是这几个数字。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战栗的数字。

令人不解的是，几十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有不少人对这场大灾难沉默不语，三缄其口。还有一些人断然否认有过困难时期饿死人这回事，理由是：我怎么没看到过死人，没听说我家和我亲戚家那时死过人，或者干脆来一句，难道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会饿死人吗？甚至有人说：饿死人在哪个朝代也有，这是前进中的曲折，没什么好奇怪的。

对这些话，不能简单地只看作是他们对历史缺乏了解、意气用事而不去理会。我们真的是要痛定思痛，多问几个为什么。应该说，多少年来，我们对这个问题缺少深入研究，探讨说明得远远不够，反思得远远不够。不过这类否认那几年有饿死人的观点在正式出版物中未有所见，所以本书不便于直接引用。

然而，对这些话一定要加以认真的回答，不能这么稀里糊涂地过去。说起来，饥荒和饿死人在封建社会可能哪个朝代也有，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可以对六十年代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三千多万人的重大事件漠然置之，甚至沉默不语、不闻不问的理由。就像不能因为“贪官和腐败哪个朝代、哪个国家都有”，就可以对贪腐听之任之、熟视无睹，甚至可以作为搪塞的借口。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以“哪个朝代也有饿死人”为由，就可以对这场巨大的民族灾难轻描淡写，甚至一笔勾销。那样的话，对我们共产党人的要求也太低了吧，那就把我们等同于封建帝王了。那我们何必还要起来闹革命呢，何必还要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去夺取政权呢（请别忘了，战争，哪怕是革命战争，除了敌我双方武装人员的伤亡，还有数量更多的平民的伤亡），何必还要千辛万苦地建设社会主义呢？更何况，这样做，对大饥荒中几千万的死难者也太不责任和太不尊重了。

从正规资料中，我们也能看到大规模“非正常死亡”的一个侧面。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59年末全国人口总数为67207万人，到1961年末反而降为65859万人。两年中即使没有一个婴儿出生，也还净减少了1348万人（请见：《中国统计年鉴—1982》，中国统计出版社）。下面是笔者作的一个简单的统计图，反映1950至1964年间各年度的人口增长量。从这张图就能一目了然地看出那两年人口损失之惨重。本来正常地蜿蜒向上的人口增长量曲线，像被一把利斧劈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而这个缺口，填埋的正是无数逝去的生灵。

上图的数据来源于198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本身的准确率，那是另外的问题。海外学者有些不同的看法，现摘录一例，姑且听之：“西方人口统计学家的一致意见是，中国的资料大大低估了1949年以来整个时期的死亡人数。这一结论的根据在于，除非认为死亡率高于公布的数字，中国关于年龄结构

和分年龄组的生育率的资料就是不一致的。科尔估计，1953年至1964年间，记录在案的死亡人数只占总死亡人数的63%……”（请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王建明等译，陶文钊等校，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笔者是统计专业出身，在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项目中主持过我国人口中长期预测模型的编制。笔者认为，与其用繁杂高深的数学模型来推算当时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或者任由社会上做各种揣测，相互争吵，徒然产生许多不必要的社会纷争和裂痕，不如由权威部门正式提供相应数据和说明。不要让死亡人数成为数字游戏，而沦于意识形态分歧的混水之中。这是对死者起码的尊重，是对人民负责任，对历史负责任。

问题还在于，中外历史上单纯因为旱涝风雪自然灾害引起的饥荒，几乎没有延续几年的，也没有一个自然灾害能同时波及整个国家东西南北几百万平方公里广袤土地的。但是，如果有别的因素，比如在一个专制、封闭、僵化、冷酷的体制下，那就另当别论。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他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中说：“大饥荒不会饿死人，只有人祸才会饿死人。”——传统观点认为饥荒最重要的解释就是食物短缺，而且有时候是惟一的解释。他在研究了近现代史上孟加拉、爱尔兰、中国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发生的饥荒后，得出的结论是：“毫不奇怪，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农作物的歉收的发生并非独立于公共政策，即使农作物歉收了，饥荒也可以通过认真的再分配政策来抵御”。（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里，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往往不是因为自然灾害，而是制度出了问题，至少是粮食的管理分配制度出了问题。中国的情况正是这样。

在此摘录一段刚看到的英国剑桥大学刘瑜女士的话：“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民族的悲剧其实也可以是它的财富，而拒绝挖掘这个财富则往往导致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死胡同里原地踏步。很多时候，拒绝反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导致的往往是苦难的死循环。”（请见：《南方周末》，2010年7月15日）

面对几千万生灵的怆然离去，我们真的连头也不回、一声也不吭？他们也是中国革命进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先不说是应有的还是不应有的）。就让他们这样地离去，我们的良心能平静么？今天的人们回过头再去看看他们，总可以吧。不要忘记革命胜利后，依然有这样沉痛的教训，仅仅是不要忘记。

1962年7月的一天，国家主席刘少奇对党的主席毛泽东坦诚直言：“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请见：《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王光美、刘源等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或许，这段话就成了他们两人解不开的死结。

两年多后，1964年末，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竟然对刘少奇毫不掩饰地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请见：《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又过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毛泽东真的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

1969年11月12日凌晨6点45分，刘少奇悲惨地死于河南开封秘密监狱。

还想说一点的是，这场灾荒中的死难人数远远超过十年动乱。但文革的事，目前谈论的还算有一些，而这场大灾难却很少有人提起。或许，文革死难者中有不少是领导干部、知识分子，社会影响比较大；而困难时期死的绝大多数是平民百姓，尤其是乡村的农民。他们默默无闻地活着，也默默无闻地死去。

或许，还有个更深层次的因素：十年浩劫，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罪于林彪、四人帮。而这三年大饥荒的责任，往哪儿推呢？就这样避而不谈，最终能推到什么时候呢？人们在等着看，历史在等着看。现在有句话，对不讲过去几十年里的所谓“功绩”，叫“历史虚无主义”。其实，对这种全民族、全社会的重大问题避而不谈，那才是历史虚无主义呢。

更有些人为了回避历史真相、回避历史责任，就在名词上兜圈子。明明是饿死了人，还编造了一个词，叫“非正常死亡”，把它和车祸、凶杀、矿难、溺水等等混淆在一起，好像就没有饿死人这回事了，真亏得想得出来。直到去年（2014年）还有人在继续想，挖空心思又想出了一个新名词：“营养性非正常死亡”。有些人就是愿意在这上面下功夫。玩这些花样，觉得有意思么？

倒是刘源先生有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至今，因种种原因，对这场浩劫以及严重的灾难性后果，没有深刻总结。……总有一天，历史的伟人们，必须承受历史和后代给予的最严厉的评判。”（请见：《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83页。文中所讲的“这场浩劫”，是指六十年代初的大灾荒。）

笔者也相信这句话。

这场大灾难，是一座绕不过去的山。没有必要回避，也回避不了，即使是在今天。

这不是算历史旧帐。既不旧，更不是算帐。我们需要了解真相、吸取教训，改变眼下对中国当代史一系列重大环节反而讳莫如深的不正常状况。与其让大家津津乐道于唐宋明清那点事、三国那点事、孔老二那点事，与其沉溺于名曰魔幻悬疑武侠言情小男人小女人之类而实则既无社会意义又无艺术价值的垃圾堆里，与其那样的迷茫困惑麻木低俗无知无聊又无奈，不如睁眼看看五十年前的那场民族大灾难。

正视这场灾难，会使我们认清很多问题。

这场大饥荒，不是哪个个人的遭遇，不是哪个家庭的不幸，而是我们民族的灾难，是整个人类的悲哀。它对各个方面都有着持续的重大影响。它无可否认地损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损害了我们国家的国际威望，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也损害了祖国大陆对台湾同胞的凝聚力。

诚然，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没有对这场大饥荒做更多的阐述。但那是因为那时我们刚走出十年文革的阴影，对林彪、四人帮极左势力的斗争还没有结束，针对十年浩劫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任务还十分地紧迫和艰巨，对更早时期的大饥荒稍做放置是可以理解的。

但如今，岁月又过去了三十年，时代的步伐到了今天，就不能再继续无限期地回避下去了。不要低估这场大灾难在人们心中的伤痛。我们要真诚地面对历史，真诚地面对受害者，尤其是要真诚地面对今天的人民大众。对这场大饥荒的历史事实，和死亡人数的几种不同数据，有关部门都没有出面加以否认，既不批驳也不澄清。对这样一个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对于社会、对于历史都是天大的事情，却采取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于情于理于法，都是说不过去的。

是时候了，是到跨出这一步的时候了。大饥荒距今已经五十年了，难道还要让人们再等五十年吗？这不是揭历史伤疤，它原本就没有愈合。连个基本史实都还没有明确，怎么能愈合呢？听任这堆历史沉积捂着盖着，由它在角落里发酵发霉溃烂，恐怕不是良策。

更何况大饥荒不是我们的错，它是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完全没有必要由我们来背这个包袱。我们没有什么不好说的，用不着为此张不开口。我们需要的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与左倾错误切割，严肃认真地公布历史真相，作出能为全党全国人民认同、能为国际社会理解的说明和解释，给出一个完整的中国当代史。这样才能放下包袱，吸取教训，避免类似灾难，更好地向着现代社会大步迈进。

不敢面对大饥荒的历史真相，就不可能有对左倾灾难最起码的认知。

最后，引用于幼军在他最新著作中的一段话：“无论是一千万、一千五百万、两千多万还是三千多万，哪一个数据都沉重如大山，压得有良知的中国人透不过气来。执政党愧对人民，必须永远记住这沉痛教训。”（请见：《社会主义五百年》，于幼军，广东教育出版社，2011年）

第三十六章 李辰获释

1949年7月6日

最困难的时候，或许就是希望萌生的时候。就像股市那样，跌得越惨，就越有回升的可能。只是这种回升，不一定会有多高的度，而且代价也太大。当然话说回来，有总比没有要好。在泥淖中挣扎的人们，也终于盼到了好转的迹象。不过，也借用一句证券市场里的行话，这时的好转也只是下降通道里的一次超跌反弹，高度有限。

36.1 看守所之夜

好转的第一个迹象，就是李辰回来了。

李辰是因为劳改农场没有粮吃了，也发生了大批的“非正常死亡”，于是上级决定把右派遣返回乡。事情来得很突然，那天上午通知转场，右派们便立即按要求带上自己的东西爬上大卡车，而后往东开去，到一个县下一批。李辰纳闷不已，也不能问。晚上，终于进了孤悬于县城西南郊的海源看守所，这才告知明天可以回家了，回原单位监督劳动。李辰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日思夜盼而又不敢想的这一天，就这样来了。

他没等到龙头中学来领，一直毕恭毕敬地焦急地站在看守所大门的内侧等着。随行的劳改农场牛干部手里拿着警棍，过来毫无表情地对他说：“你是李辰吧？”

李辰以为有什么事要说，便跨前一步点头说：“是的，我是李辰。”

没想到那牛干部猛地将警棍戳向李辰的肋骨，再使劲一扭。李辰“啊”的一声还没喊完，就疼得蹲了下去，脸发白，一头的冷汗，一句话也说不出。

“出去了，对里面的事情不许乱说，懂吗？”牛干部依旧是冷冷地说，话虽简单，却极有权威。原来那一下子，不过是为了增加点讲话的效果。

李辰当然明白这道理，却手捂着胸脯，疼得脸都扭曲了，也说不出话，只好咬着牙点点头。

牛干部又摔出一张纸片，眼看着别处，说：“拿着这个，回原单位报到，接受监督改造。别以为没事了，知道吗？”

李辰扑上去，双膝跪地，在地上捡起这张纸，好不容易忍着痛，又从牙缝里挤出个声音：“是——”

“找个不碍事的地方蹲着去吧。”牛干部说。

李辰小心地往后退了退。

“等到天亮以后才能走，知道啦？”牛干部冷冷地说。

“是，是。”李辰怕再节外生枝，再疼，也得张口答应着。

牛干部脖子一扭，走了。

这回是轮到门旁的看守了。这看守还算好，只是张嘴吆喝着：“往后退，往后退，别碍事。”

李辰一直退到岗楼后的电灯杆下，无声地蹲在那儿，就像一只小狗那样乖。

那天的夜色很好。蓝黑的夜幕下，月色皎洁，繁星点点。淡淡的银河，从东到西横贯天空。柔和的星光在空气的流动中一闪一烁。四周万籁俱静。微微的凉风徐徐习来，更增添了几分惬意。这静谧、温馨的夜晚，真能叫人陶醉不已。

遥望星空，思绪常常会像童话里的小精灵那样，在无边无际的天际中自由翱翔，令人遐想无限。宇宙之浩瀚，时空之深邃，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有的想象。现在飞进眼帘的星光，已经穿越了不知多少光年，或许那时连我们自己都还没有出现。虔诚地仰望上天，视线一无阻拦地飞向那永无尽头的宇宙深处，永远、永远地不再回来。我们立足的家园，我们的地球，甚至我们称颂不已的太阳，都不过是沧海一粟。那时，你会从心底感到震撼，深感时间的短促、生命的渺小。人世沧桑，历史变迁，在宇宙面前，一切又变得那么地微不足道。

按说此时的李辰可以有一整夜的时间去看那些星星，他还从来没有花时间认真地看过夜空。他没有学过天文学的书，不知道春天的夜空里，北斗的柄把是朝向东面的，更不知道旁边的星座叫狮子座、巨蟹座等等。

对于李辰来说，只要视线低下二寸就能看到高墙上冷冷的铁丝网，就知道了归属于他自己的一切。

他没有半点哲理和诗意的感叹。他只牵挂一件事，那就是海秀有两个月没来信了。她，怎么啦？他的心里像被火烤一样地焦急。

他只在想着夜晚快过去，星星和月亮快走开，让太阳早点升起，让自己早点踏上回家的路。他无从判断时间的逝去，更没有钟表可看。渐渐地从铁丝网上的蒺藜做比照，他看出了星星的移动。他看得出来是怎样的移动，但确实是在移动，时间是在过去。真的有颗星星从铁蒺藜的上边移到了下边。李辰头一次体会到了斗转星移的含义。可是移动得那么、那么地慢，几乎难以察觉，时间过得怎么这么慢呀！

等啊，等啊，终于，终于黑夜慢慢变淡，东方泛白，星星和月亮逐次隐约而去。该可以走了吧？李辰可怜巴巴地像小狗似地一直耽眼看着门旁的看守。那看守反倒觉得这一晚上已经看厌了一身破烂、一身臭味蹲在一边的李辰，没说什么话就“哗啦”一声开了小铁门。李辰一个点头，居然还没忘了说谢谢，就什么也不要了，对那伴随了他三年的早已破烂不堪、发了臭的所谓铺盖看也没看一眼，就迫不及待地一步跨出了看守所的大门。

“拿走！”看守一声吆喝。吓得李辰赶紧又进来，把铺盖拎走，扔到了墙外的路边。

36.2回家路上

东方的天边由泛白成了光亮，几丝白云染上了绯红。

李辰急急地走着。

他的心里只有一个挂念，海秀两个月没来信了。她，怎么啦？

淡淡的红云，又变成了彩色的朝霞。红日从朝霞中升起，金光四射。尽管人间有多少的苦难，大自然依旧在展现它无与伦比的瑰丽。

阳光射进李辰的眼睛，给了他鼓励，给了他力量。一天一夜滴水未进，他还是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着。（农场食堂发给每人两个路上吃的窝头，都叫那个牛干部贪了。）

他的心里只有一个挂念，海秀两个月没来信了。她，怎么啦？

太阳渐渐升高，阳光洒在他身上，似乎有了点温暖，然而也渐渐觉得疲软，力气不够用了。想着要往前，脚步才能跟上来。

走到哪儿了？李辰抬头看看，差不多有一半了吧？

不能停啊，不能停。

他的心里只有一个挂念，海秀两个月没来信了。她，怎么啦？

太阳转到了前上方。阳光更有力了，可李辰觉得浑身都软了，脚上越来越沉重，越来越不听使唤。每走一步都要由大脑发出强烈的命令，才能往前挪一下。

是的，李辰已经不是在走，而是在挪了。

他的心里只有一个挂念，海秀两个月没来信了。她，怎么啦？

不能停啊，一定不能停。他知道，这时候停下来，说不定就意味着永远起不来。

这一路，从县城到龙头，往常推着车也只要两个来小时，他却已经走了四个多小时。心情是万分地焦急，步子却十分地沉重。三年常人无法忍受的劳改，耗尽了他的血肉之躯，能活下来就属不易。每迈出一大步，就要拼上全力。但是希望就在前面，家乡就在前面，父母就在前面，海秀就在前面。三年非人的折磨，有些人在累死、病死、饿死之前，自己就先选择了死亡。他李辰能咬着牙坚持下来，就是因为他的心中有着不灭的希望，海秀一直在等着他。在他这样的遭遇之下，多少人饱受了亲人反目、家庭离弃，在冷脸和白眼中抱憾终生。而海秀给了他生的希望，给了他活下来的勇气。再苦、再难、再委屈，他也要坚持活下来。如今，这一天终于等来了，海秀就在眼前。走一步，近一步；走一步，就近一步……

然而，心里是一回事，脚上却是另一回事。

有过这样的事例，苦熬了几年的“右派”，终于熬到了离场的那天，却倒在了回家的路上，再没能和家人见上最后一面。

快了，快了，快到王庄了。过了王庄就是大河，在河边就能看到龙头的城墙和西门外的那棵大白果树。那儿就是海秀的家和自己的学校了。

他的心里想得越来越多了。

然而，想了那么多，脑子又开始渐渐的空了，渐渐地白了，都想不起什么来了。

脚下实在没有力气了，踩下去都不知道是踩在什么上，那么软，那么飘，都抬不起来。

李辰不但控制不住腿，也控制不住脑子了。他想着要走呀，要走呀。可是大脑已经耗尽了电，发不出指令了，他晕倒了，一头倒在快要到河岸的路边，昏了过去。

亏得是倒在这儿，要再走二、三十步，倒在河里那就不堪设想了。

李辰就倒在路边。路上空空的，没有行走的，也没有推车的。那时的人，都要保持体力，能不动尽量不动。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约莫有一个时辰吧。有个人，裹着破烂的黑棉袄，浑身脏兮兮的，拿着大扫帚扫着路面，蹒跚地往这儿过来。这个就是赵村的地主分子赵炎黄，在第一卷“赵村新政”中已经见过他。他这是在被管制劳动——扫路。人，苍老得几乎要认不出了。

“哟，又有死人啦。”赵炎黄发现了躺在路边的李辰，还以为是从西边要饭过来的乞丐倒毙身亡，便蹑手蹑脚地走近细看。

没有拐棍，没有破碗，也没有一卷小小的所谓铺盖，这不像是要饭的啊。

赵炎黄又蹲下来细细看，刚一看，又想着不对，要是别人说是我害死的，这还得了啊。他“啊”地一声，猛地站起，不料还真惊醒了昏迷中的李辰。

李辰扭动了一下，哼了一声。

赵炎黄吓了一跳，“还是活的啊？”

李辰使劲睁开了眼，问：“大哥，这是哪儿呀？”

赵炎黄一听叫他大哥，更是吓了一跳：“我是地主，我是地主！不是大哥。”

被管制的地主分子，到哪儿都得先低头弯腰，自报家门：我是地主，我是地主。还从没有叫他大哥的。赵炎黄哪能担当得起，所以赶紧说明。

李辰还在迷糊中，没听明这一点，哼了声：“进西门了吗？”

赵炎黄这才听出来，这口音不就是咱龙头的人吗，是谁呀？赵炎黄怎么看也没认出来。

“你是谁呀？怎么躺倒在这儿啦？”

“大哥啊，真不好意思说，我是右派分子李辰，从农场放出来回家，到这儿实在走不动了。”戴着“帽子”的李辰，也知道这一套说法。

“你是李辰？是李老师啊？”赵炎黄这些年虽然很少参加活动，但李辰的事他是听说的，李辰这个人他也是知道的。他的小儿子还进过书坊，还是李辰教的呢。虽然他儿子上到四年级就不让再上高小了。

赵炎黄把李辰扶起坐着，“啊呀，实在没有别的，我先舀点水给你喝吧。”

赵炎黄从早到晌要扫大半天的路，又没有干粮可带，腰里就别了个葫芦瓢，到时候舀点路边沟里的水，解解渴。

李辰喝着舀来的水，稍微精神了点，便问了起来，这才知道对面的人是谁。

“李老师啊，我知道你是好人。那时，我儿子上学，你不像别人势利眼，从来没有另眼相看，欺负他。唉！怎么好人没有好报呢？”赵炎黄也是感慨不已。

他们俩刚开始还没说两句，路的那一头走来三个人。赵炎黄赶紧站直了，立正。

赵炎黄看见的是谁？

36.3节外生枝

赵炎黄看见的是宗书记、民兵队长赵刊新和村里一个民兵。他们三人正沿着大路巡查过来。

由于这段时间群众生活极度困难，不但出现了非正常死亡，社会秩序也有些波动，有成批外出要饭，有请愿上访，甚至有围困粮库和基层机关。面对这些情况，有关上级不但还没认识到这是左倾错误的后果，反而认为这些都是“反革命事件”，是阶级敌人在破坏捣乱，要求各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维护局势稳定。龙头公社政治部在宗书记的主持下，也做出了几条决定：一、立即加强对地富反坏右阶级敌人的管制，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二、对外流人口进行“劝阻”。就是说宁可饿死在家里，也不许外出要饭，不要出去丢人现眼。三、以正面宣传为主，对负面消息进行封锁。对于外面出现的饥荒情况，都是阶级敌人在散布谣言，本社社员要坚定立场，不许“造谣、传谣、信谣”，如有发现，定将严惩不贷，等等、等等。

这天是宗书记听说赵村的工作温情主义比较重，对阶级敌人下手太轻，特地来检查。村里只好叫民兵队长赵刊新带上一个小青年陪他四处看看。

对这些事，宗书记还真的是很认真，不但在村里四处都要看，还过河到这一边来，这儿也有赵村的一些地。

赵刊新沿路指着清扫得挺干净的路面，说：“宗书记，你看，这路扫得可以吧？这是我们叫地主赵炎黄天天过来扫的。”尽管当年赵村新政时，赵炎黄跟赵刊新争过房子，但赵刊新也并没有因此记什么仇，很平淡地跟宗发奋说着。

“光扫个地就行啦？阶级斗争不会这么简单的。”宗书记不以为然地说。忽然又警觉地问：“扫地的人呢？哪儿有扫地的？”

抬头一看，前面的路上一个人站着，地上还坐着另一个人。

“有情况。”宗发奋对这些有着天生的敏感，三步并两步就上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赵刊新也赶紧跟上，在后面问赵炎黄。

“报告领导，这是中学的李老师从农场回来，晕倒在这儿，走不回去了。”赵炎黄见是宗书记过来，更是必恭必敬了。

“李辰？这个右派分子，怎么出来啦？”宗书记看着坐在地上的李辰，端量了一会儿，没认出来。

“是李辰。”赵刊新过来，认出来了，忙弯下腰问：“李老师，你回来啦？”

“不许叫老师！怎么一点阶级观念都没有？”还没等李辰张嘴，宗书记对赵刊新都瞪起了眼，“把阶级敌人当老师，怪不得你们赵村的工作上不去。”又对李辰喊着：“李辰！你是怎么出来的？是逃出来的吧？”回过头再对那个小青年吆喝着：“快过来，把他绑上，带到派出所去。哼哼，我们这趟可是没白出来，当场抓获潜逃的阶级敌人，这又是我们龙头公社的一个重大战果。”

李辰立马被惊得清醒了，忙说：“我是放回来的，昨晚到的县城。这是农场的证明。”李辰拿出那张纸，双手捧上。

宗书记拿过来，略一看，就往地上一摔。李辰伸出的双手都没接住，忙趴下身子去捡。

宗书记对没有抓获阶级敌人还心有不甘，看着眼前这两个人，又嚇嚇地冷笑起来。“我说嘛，真是无巧不成书，两个阶级敌人怎么凑到了一起。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个大王八，真是不假。地主找了个大右派。你们是事先串通，秘密勾结，要搞什么阴谋吧？”宗书记马上脸色一变，大叫一声：“快说！”

吓得赵炎黄打了一个趔趄，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不是，不是，我是刚扫地过来，见他昏倒好一阵子了。”

“啪！”宗书记一个耳光就过去了，打得赵炎黄退了两三步，还不敢捂脸腮。

宗书记又对地上的李辰吼着：“你他妈的，既然放回来，为什么坐在这儿不动了？不是等着和地主分子搞联络，是干什么？”

“我是实在走不动了，差不多两天没吃东西了，自己也不知道，就倒在这儿了。”李辰可怜地说着。

“你他妈的，谁信你这一套。”宗书记一脚就踢过去。

宗发奋这时脸上怒气冲冲，心里却痛快得很。在这一亩三分地上，他就是地，他就是天，甚至没有地也没有天，就是他主宰一切。眼前的这些人，不过是任他宰割的鱼和鳖。

李辰轻轻的“喔呦”了声。

“还装蒜！”宗发奋又是一脚，踢到了李辰撑在地上的手臂。李辰往后一仰，“砰”的一声，又倒在了地上。宗发奋是这几个月刚开始学会踢人，觉得踢人比骂人还要痛快。不过，还不够专业，在那儿瞎踢，却更要人命。

赵刊新看不过去，弯下腰，托起李辰的脖子，说：“别踢伤了人。”

“什么？这种阶级斗争的第一线，你还替他说话！”宗书记朝着赵刊新也吼了起来。

那赵刊新却是正派之人，对着宗发奋就说：“现在死的人不少啦，还要再多死一个啊？”

宗发奋发起飚来了，“死个把人算什么？中国人多了，死了一半，还有一半。还用你来顶撞我啊？”

正在他们争讲的时候，一串自行车的铃声响了。

来的是民主村的邬中和。

邬中和是1951年抗美援朝时响应号召参军入伍，也上过战场受过考验，回国后在南方的一个地方驻防，后来还提了干部，现在是中尉副连长。这一阵，住河西三十多里地的丈人、丈母娘都病重，怕是挺不住了，他妻子托人打电报叫他赶紧请假回来。那时，有个电报来，可是个惊人的大事情。虽然领导脸有难色，他还是坚持着要回来，连夜上路，也是昨天刚到。他家有辆大国防车（“国防”牌的用脚闸的自行车，适合于山丘地行驶，在海源一带挺受欢迎。但当时能买得起的，绝对算得上是富裕户，在村里是种荣耀的象征）。今天他妻子烙上两张杂粮饼，坐在后座上，他俩就出门了。不料想，刚过大河，就遇上了这码事。

见有人争讲，还有人坐在地上，邬中和觉得自己是军人，就这样骑过去不管，不太好，就下了车过来看看。

宗发奋几个，看见是个戴着大盖帽、一条杠两颗星的军官从自行车上下来，就停止了争吵。

赵刊新认识邬中和，一看他是骑着车，带着媳妇，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于是先开了口：“哟，中和啊，回家来啦。去看老丈人啊？”

邬中和过来一一点头，问是怎么回事，赵刊新简要一说。

邬中和也一下认出了坐在地上的李辰。他弯下腰，就问：“李老师啊，还认识我吗？”

邬中和曾经也是李辰的学生。

李辰已经认不出邬中和了，但是听他们刚才的对话，也想起来了。他抬头看着昔日的小学生，如今是一身军官装束的男子汉，自己却沦落到这种地步，不免自惭形秽，内心深深地愧疚起来。想要张嘴，却一脸通红，竟结巴起来：“我，我……我是李辰，是右派……”

“啰嗦什么？给我带走！”宗书记觉得自己被撂在边上，十分地不快。再一看邬中和也不过就是中尉军衔，绝对没有自己的官大。自己是公社副书记，差不多相当于副营级，要是授衔也是个上尉大尉的干干了，于是便朝着那小青年又吼起来。小青年只看着赵刊新，连个动手的样子也没做。

“李老师现在这个样子，还是先让他回家歇几天吧。你看这证明上也是说限三天内报到，没说当天就要去学校。等我回来，傍黑我就上学校跟肖校长说说。”邬中和也看了那张证明，挺和缓地跟宗书记说。

“你们怎么对阶级敌人就这么有感情。你们可是要明白这是意味着什么！这是要承担责任的哟。”宗书记对邬中和不便发火，就话中有话地威胁起来。

“这事，我和赵大哥都可以承担责任。”邬中和说。

赵刊新也点点头。

宗书记气得一摔手，扭头就走了。

小青年倒是上去扶起了李辰，问：“还能走吗？”

李辰勉强站了起来，嘴上说：“能走，能走。”往前一跨，却是一个晃悠，亏得赵刊新在边上扶住。

邬中和看着，叹了口气，说：“要不，李老师你上车，我带你回去。”

“不，不了，让我自己走吧。”李辰跨一步，又是一晃悠。

“不，不能让你自己走，你让中和带你吧。跟自己的学生，不用客气。”赵刊新说。

李辰涨红了脸，脸上抽搐着，憋了好一阵，才说出：“我，我……我是右派，别连累了你们。”说着眼泪都掉下来。

邬中和心里也一怔，说：“李老师，我知道你是右派，我听说了这事。政府也在教育你们。但你现在又是病人，我们应该帮助你。”

李辰低头默默不语，脸上写满了心中的痛楚。

赵刊新倒是想起了，又问：“李老师，你是回李家泊呢？还是去小林那儿？连我都知道她天天在等你。”

李辰听到这话，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我去海秀那儿。”

“好，上来吧，李老师。你两腿劈开坐，靠在我后背上，两手搂住我的腰，抱紧了。”

李辰就这样上了邬中和的车。

邬中和这时才对他媳妇说：“你在这儿等一会儿，我一会儿就回来。”

他媳妇也只点点头，没多说。

赵刊新说：“叫你媳妇跟我们一起上大队部吧，你回来时，到大队部找。哪能把她一个人撂在大路上。”

邬中和“喔”地答应了一声，便对身后的李辰说：“李老师，坐好了，我们走了。”

一个部队军官驮着一个右派，要做到这一点，可真的是不容易。或许邬中和在部队的营房里，环境相对单纯些，对这里面的利害关系知道的不很清楚。

当邬中和带着李辰，骑车超过路边气哼哼地往回走的宗发奋时，谁也没理谁。

“哼，你有什么了不起，我一个小动作就可以叫你后悔一辈子，而且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等着瞧吧，小子。”宗发奋心里发着狠，以后还真为此而搞倒了邬中和。

36.4愧见乡亲

没几分钟，自行车就到了大河的河边。

李辰在车后座上：“要过河了，我下来吧。”

“不用下，李老师。这儿1958年的时候已经修了桥了，直接就可以过去了。”

三年了，家乡到底还是有变化哦，李辰在想。可是李辰更在想，自己怎么去见家乡的人呢？

过了河，很快就要进龙头镇了。怎么没了大白果树了呢？

他问邬中和。“砍了。”邬中和回答说。

再探头往前一看，怎么没了城墙呢？

他问邬中和。“拆了。”邬中和回答说。

看着渐渐靠近的一排排房舍，李辰抑制不住的激动。三年了，三年来天天日思夜想的家乡，终于回来了，终于这样地回来了。

李辰，泪水都下来了。

三年前，就是在这条路上，这条家乡的路上，在风雨交加之中，他戴着手铐，被牵在马车的后面带走了。他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耳边是海秀的哭喊、警察的嚎叫，身上是雨水血水和着伤痛在流，眼前是一片迷蒙，脚下是泥泞的路。他就是那样地一步一滑、踉踉跄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似地在乡亲们面前走过。

他，怎么再去见乡亲们，乡亲们会拿什么样的眼光看他？

他闭上了眼。

自行车进了西门，邬中和把他驮进了龙头镇。

西门口有几个民兵在站岗把守，严防本乡人出去外流，和外地盲流进来（这和现在花样繁多的各种截访倒有异曲同工之妙）。本来轮到的，就是于又发一个人值班，因为站一天岗能补二两粮，结果一下就来了好几个，赶也赶不走。

于又发见是邬中和驮了一个人回来，心里挺奇怪。因为进镇里是个小上坡，邬中和蹬得挺使劲，速度慢了点。于又发留心看了下，像是李老师么，不对吧，怎么会是他呢，也不好多问。

李辰就这样回到了龙头镇。

尽管太阳已经很高了，天也挺暖和的了，但龙头镇依然很安静，没有声音，没有人影。李辰听着邬中和在使劲地蹬上坡。

过西门口的时候，又听得有人说话的声音，心里在想是谁呀，却又迟疑，就自己这个样，怎么见他们呀？等一进西门，他就说：“中和啊，把我放下吧，叫别人看见你驮着我，对你不好。”

“再往前点，到胡同口吧。”

到了胡同口，邬中和还要往里面推。李辰执意要下来，邬中和才小心地扶他下车。

李辰再三感谢，邬中和摆摆手，调过车，走了。

李辰这才仔细地看了看四周，一排排的农舍，石垒的墙，草苫的房顶，才敢确信他回到了自己中断了三年的曾经有过的生活。

他走进小林没有门的院子，迟疑地举起了手，试着拍响了房门。当他看到窗扇支了起来，窗户后面露出了小林惊诧的脸，他激动得连一声“海秀”都没喊出来，就倒在房门上。

林海秀急忙下炕出门，把李辰扶进屋、推上炕，拍打着他的后背，呼唤着他的名字。好一会儿，李辰才缓过气来，泪眼汪汪，直看着小林。

小林端上一碗水，说：“你先喝一口，我再去烧热的。你是怎么回来的？”

“昨天突然叫我们上车，晚上到的县城，才说今天放我们回家，回原单位监督劳动。我没等天亮，就走回来了。”

“政府对你们宽大处理啦？”

“不知道，总能比过去好一些吧。”

李辰又看了看屋里，问：“你爹呢？”

小林低着头，眼睛湿了：“这一年的饥荒，他没能挺过去。三个月前就过世了。”

“唉。”李辰也眼圈红了。

“你还没去李家泊吧？”

“我要先看到你。我对不起你，我实在是辜负你了。”李辰呜咽了起来。

“别这么说。我相信你是好人，我会一辈子和你在一起。”

“那，那你怎么两个多月没来信？到底有什么事呢？”李辰知道海秀不会有别的念头，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海秀竟一时无语了，脸上悲愤着。

李辰急切地等着。

好一阵，海秀才哽咽着说：“没有纸，没有笔，我连买邮票的八分钱也没有了。”说完就呜呜地哭起来。

李辰听着，也只有仰面无语，泪流而下。

这时，听到小林家院子里的声音，就已经有人过来了。

第一个来的是鲁队长，一见到李辰，惊讶得瞪起了大眼：“啊呀，是李老师回来啦。刚才听到声音还不敢信，真的是你啊！”

李辰抹一把脸，尴尬地一笑，说：“我的事，叫你们笑话了。”

“哪里话。现在没有旁人，我先说上一句，你和小林，到现在也都是我的好朋友。”

“谢谢，难得有你这份情。”李辰说。

“别客气啦。一会儿人多了，我也不能说这句话啦。”

杜家骏也进来了，李辰也是真心地说：“惭愧啊，惭愧。”

杜家骏拍了下李辰的肩膀，“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说啦。”看着李辰消瘦的脸庞，他又“唉”地叹了口气，关心地问：“在那里面，怎么样啊？”

李辰欲言又止。

鲁队长接上去说：“在那里面，能会怎么样？别问啦。”

李辰低下了头。

海秀心疼地看着李辰。

杜家骏也觉出自己问得不对了，忙改口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李辰不能讲劳改农场里面的事，其实这一点，根本不用临走时那个牛干部的提醒也知道。如果读者想要了解右派们在劳改农场里的遭遇，请看和风鸣女士写的《经历：我的1957年》（2006年，敦煌文艺出版社）和邢同义先生写的《恍若隔世一回眸夹边沟》（2004年，兰州大学出版社）。这两本书是对人间地狱的血泪书写。只要将那两年右派农场的死亡率与二战期间各国战俘营、集中营的死亡率比较一下，就可知当时这些不幸的人们的处境。

于又发也跟着过来看，真的是自己当年的李老师回来了，高兴地跑出去对大家说：

“李老师回来啦！李辰回来啦！”

“李辰回来了？”

“是哎，李辰回来了！”

消息风快地在民主村传开了。

“在哪儿呢？”

“在林海秀家呢。”

乡亲们蜂拥而来，挤满了小林家破旧的院落。

李辰倚墙半躺在炕上，面色苍白，四肢瘦弱，满脸胡子拉茬，神情疲惫而刚毅，对着前来探望的乡亲们点着头，并不多说话。

小林端上了热糊糊。

民主村的人几乎都挤了过来，有说宽慰话的，有叹息的，当然也有看热闹、说风凉话的。

秦德才没有挤到院子里来，在胡同里探头探脑地说：“右派怎么还放回来？不会是逃回来的吧？”

平金刚觉得自己是干部了，不便于走进右派的家，停留在胡同里，但是对秦德才的话也是不以为然，“逃回来？说得轻巧，那种地方，你有三条命也逃不回来。”

老王头正往里走，听了秦德才的话，气得吐了口吐沫：“呸！也就是你说了一句什么话，把人家搞成这样。”

秦德才也呸了一声：“呸，我搞的？他活该！”

36.5迟到的婚礼

在炕边，赵玫看着小林和李辰，直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人瘦了点，好像还没有大事，多歇几天吧。”

李辰动了动，说：“我今天还要回李家泊，去看看爹娘。”

小林沉默了。

赵玫低声说着：“小李啊，跟你说了别难过。以前，小林在信里没敢跟你说。你爹妈也都已经过世了。”

李辰“啊”的一声，张着嘴，愣住了。

小林说：“他们俩一个是在去年冬天的第一场雪，一个是在过年前。”

“我没在家，连个发丧的人也没有啊。”

小林说：“是我去的。”

李辰万分感激，坐了起来，在炕上朝小林磕起了头。

小林忙拉住了他，“我就是你李家的人了，不用这样。过两天，我领你到坟上去看看。”

李辰垂泪不已。

忽然，肖校长从外面挤了进来。

没有一个人理他。他也是矛盾了很久。一早就接到了县教育局的电话通知，说李辰回学校监督劳动，人已经往回走了，今天必须到校劳动。他找了好几个人，想叫他们跑个腿，通知一下，可没一个人愿意来。直到传来话说，李辰已经在小林家了，他不能不亲自来了。

他硬着头皮走着，脑子里设想了无数个版本，李辰和老乡们会怎样对待他：是毕恭毕敬、诚惶诚恐，还是敬而远之，还是恨之入骨、痛骂一顿，甚或挨上几拳？自己又该拿出哪一副面具戴上呢？是作为板着脸、一副官腔的领导人、执法者出现，那样会不会老乡们不买账、更惹翻了众怒；还是去表示下同情安慰，装着悲天悯人、通情达理的样子，却又怕别人会更觉得虚伪、更不值钱。唉，也不知道下一步对右派的政策会怎么变呢。

肖校长还没想好，脚已经踏进了小林的家，收不回来了。

李辰在炕上看到肖福兴，没有半点的表情。

“呵，呵。”肖校长牵动着脸腮的表皮，尴尬地干笑了两下，“李辰，你回来啦。县里刚来了通知，叫你今天就回学校工作。”

肖校长自己改了个词，没说是“监督劳动”。

李辰依然没有任何的表情变化，小林也冷冷地看着。

老村长于继承开口说了话：“你也真是。他今天刚回来，都瘦成这样子了，还要叫他去啊？”

肖校长叹了一口气：“唉，我也是转告县局的意思。不去就不去吧。”

“我去，我会去的。”李辰说。

“那我扶你过去。”小林说。

“于村长都说了，今天就不用去了吧。还有个事，学校现在只上半天课，食堂也不开了。你吃饭怎么办？”肖校长说。

“你就住我这儿，我给你做饭。”小林说。

肖校长又说：“以后待遇是，每月发生活费十二元。”

“那粮食定量呢？”于村长问。

“李辰一直是村办教师，还是农业人口，没有定量。户口落哪儿，自己办吧。”

“于村长，家骏哥，李辰家里已经没人了，他的户口就放我这儿吧，好吗？”小林说。

“行，行。家骏啊，这事可以吧？”于村长对杜家骏还是挺尊重。

“行，行。这下我们村真的是多了个知识分子啦。”杜家骏对他们俩更是充满了同情。

赵玫又看着这对年轻人，说：“小林小李啊，小李以后也吃这儿、住这儿，户口也落到了这儿。我看你们俩也拖了这么多年，就早点把这事办了吧。”

小林想了一下，很冷静地说：“那我们现在就办。李辰，你说好吗？”

李辰说：“好，就是太委屈你了。”

小林对李辰轻轻一摇手，站起来，整整衣服，便对满屋的人说：“乡亲们，现在我和李辰在这儿办喜事了，你们都是我们的证婚人。”

于村长说：“我来做你们的主婚人。”

小林小林齐声说：“谢谢，谢谢！”

小林扶着小李下炕。

于村长说：“你们俩都没了爹妈，就对天对地对乡亲们三鞠躬吧。”

小俩口对大家深深地三鞠躬。

大家也忙不迭地点头回礼。

这是民主村又一场特殊的婚礼。没有喜糖，没有红布，甚至连茶水也没有一杯。

小林紧握着小李的手，四目对视，脸上除了一丝幸福，更多的是坚定和刚毅。

这婚礼，与其说是两个年轻人新生活的开始，不如说是对命运不公的一种抗争，是要面对更大风浪准备作生死拼搏的宣誓。

满屋的人都为这对年轻人的真挚和勇敢而受到感动。连站在最后面的肖福兴，内心都觉得有种震撼。

从窗外照进一缕阳光，给屋里带来了些许的温暖。

这又是场特殊的婚礼。本书前后会讲好几场情况迥异的婚礼。前面讲过包金贵和王溪她生母的婚礼，后面第三卷还会讲到彭小宾和衣春玲、地主后代辛狗狗和下乡女知青邢秋芬，第四卷里还有杜家骏的儿子杜长贵和平金刚的妹妹、中学校长平近芳离婚后又与北山来的打工妹毕丽芳重新组合的婚事等等。读者不妨可以比较一下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这些婚礼的不同之处。

第二天，李辰没让小林陪，自己去了学校。

学校里，草长得很高，因为是大棱野草，不能吃，没人来挖，所以也就有了它们的生存之处。已经放了学，没有学生，校园里静静的。三年的时间，就因为说了要刷石灰而遭遇了这般苦难的白墙已经不白了，泛着锈色的淡黄，有些已经剥落了。老师们远远地看着，远远地朝李辰点着头。他们毕竟是有份工作，不能像农民们那样可以比较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进了肖校长的办公室。肖福兴的态度还算诚恳，请坐倒水，说现在学生人数少了，教学任务并不是很重，也可以下学期就上课，也可以准备一学期，等明年再上。

李辰是个实在人，说下学期就上吧，还有一个月的暑假，努力一下，来得及准备。

原先的书都没有了，只给了一本教材。好在李辰的脑子还行，当时下的那么多功夫没有白费，至少还能记得加拉帕戈斯群岛在哪儿。

肖校长说：“这几天，你就在家看书吧，不用来了。”

李辰在小林的陪伴下，这几天，去上了小林父亲的坟，和李家泊自己父母亲的坟。是饥饿和自己的变故，夺去了他们的生命。到这时，李辰已经没有了更多的悲切。又去了两家自己的叔叔伯伯家，所到之处，都是生活的窘迫、身躯的饥困、乡亲的哀叹。一路上，虽是春日植物生长的旺季，地里庄稼却稀稀拉拉，好在田间路边青草萋萋、树叶翻卷，总算有野菜可以挖了。

第三十七章 长天当哭

1949年7月7日

37.1 只为苍生说人话

随后的几天，李辰常在炕上伏卷长思，拿着纸写了又写。

又过了几天，李辰把写满字的纸拿给小林看，说了一番令小林意想不到的话：

“我想向上级反映农村的实际情况。现在的社会状况到了这种地步，不能不叫人忧虑，不能不叫人深思。先不说，革命为什么会搞成这样。但乡亲们的生活状况要赶紧改变，不然这样靠着挖野菜度日，还会不断地饿死人。不能这样把国家的前途当儿戏，把群众的生命当儿戏。”

小林大惊：“你疯啦，还没有吃够苦啊？”

“怎么办呢？老百姓困难到这种程度，总得让上面知道吧？”

“你以为上面不知道啊？”

“上面要是知道了，还会这样吗？至少也是知道得不全面，很多人不敢说真话，还有的人故意讲假话，蒙骗上级。我们一定要让上级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赶紧来解决，下拨一些救命粮。我估计，我们这批人能放出来，也是有人去反映了。”

“那非得你去反映啊？要担那么大的风险。”

“这个也不反映，那个也不反映，那谁去反映呢？做一个人，就要有良心和勇气。过几天，咱们不是还要过端午节吗？端午是纪念屈原的。屈原就是这样一个不避斧钺、冒死进谏的知识分子，心里只有国家和苍生。咱们过端午，就是要赞扬这种精神，学习这种精神。”

“那是他们的事，你不能关起门来，只看你的书么？”海秀说这话，也不能怪她。她也是怕了。

“难哪，我就是平静不下来啊。有句话说‘哀莫大于心死’，我这是哀莫大于心不死。明朝有批反对魏忠贤宦官集团的东林党人，他们有个对联，叫：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就是放不下这个心。经历了这些事，我好像更放不下这个心。回来的那天夜里，蹲在看守所的大门里，看了一晚上的星空。以前从来没这么看过，这一看，使我想了很多。觉得个人太渺小了，只不过是一颗小小的星星，甚至连颗星星也算不上。只有宇宙才是无限的，无以穷尽的。我们应该尽一点自己的力，为这星空增添一点哪怕是微弱的光芒，也算是来到过这世界上。”

看来，在县看守所的那一夜，李辰还是认真地看了天上的星空。

“你学历不高，倒真像个知识分子。真拿你没办法。”

“扪心自问，我实在算不上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时时撞击着我的心。在劳改农场的三年，我看到很多被打成右派的人，实际上都是很好的人。他们关心社会、思想敏锐，能看出问题、提出问题。这三年里，我想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他们受到这种遭遇，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我们国家的重大损失。今天，我们的社会所以变成这种不是革命先烈所希望的样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社会上少了这样的一批人。我听他们说过，马克思说的，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是缺少有骨气的人。他们说，在中国最宝贵的也是这样有骨气的人。”

“你想做这样的人啊？我们这个社会还不到说真话的时候。出头的橛子先烂，你有这个思想准备么？”

“为了大家，不能顾小家；为了国家，不能顾自己。整个社会都这个样了，自己的家也好不起来的。”

“你的话讲得是对的，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应该支持你。但是，你的话不要讲得那么冲，不要让人家以为又要去冒犯他们，跟他们争什么了。他们是最忌讳这个了。不要意气用事，就是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

李辰低头想了会，点点头，说：“好。”

“唉……还是我来帮你抄吧。要不，万一上面查下来，一看就是你。”

“那不就要连累你啦。”

“这几年，这些事我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想想都要掉眼泪，渐渐也想通了，只要社会能健康，大家能平安，如果需要我来付出，那就由我来付出吧。”海秀很平静地说着。

李辰很感激也很敬佩地看着他的妻子。

破旧的茅屋里，暗淡的灯光下，一对年青人，静静地写着，轻轻地商议着，以他们的一腔热血，向党和政府倾诉着肺腑之言。

李辰并不知道台湾作家柏阳说过的那句话：“不向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他们俩，看来还是同一类型的人，傲骨凌风，可敬亦可叹。

不要以为李辰只是个乡村教师，还是个农业人口，按说只是个农民，就以为他写的那些东西不会有什么水平，是不是值得一看还是个问题。要知道，在广大的农村、在广大的普通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中，有着很多出类拔萃的优秀人物。他们中间照样有走在我们前面、足以令我们仰望的真正意义上的时代先锋、社会精英。陕西户县城关镇北街大队会计、才小学文化的杨伟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一位了不起的农民思想家。

1962年5月，杨伟名在困难时期的严峻局面下，忧国忧民，追寻真理，抛开个人安危，向党直言，写下了《当前形势怀感》，与大队支书、大队长共同署名，上报给各级党组织，直至党中央。文章分析透彻，判断准确，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放在今天都能令人发聋振聩。他提出的主要观点有：1，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初期的社会主义”；2，要扩大和发展“非计划经济”；3，在地权仍属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实行“分

田到户”。这与我们今天所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经济政策何其相近。这种远见卓识，除了惊叹，还能叫人说什么。

但是，那年的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严词批判了杨伟名的建议。

1968年5月5日，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杨伟名夫妇实在承受不了无休止的批斗，轮番的毒打、凌辱，双双服毒自尽。

1979年，杨伟名得以平反。以至于有人感叹说，对中国的问题，杨伟名早认识了二十年。在那时的中国，早认识二十年，竟反而成了个人的悲剧，成了我们社会没齿的悲哀。

200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将包括《当前形势怀感》在内的杨伟名数篇文稿收集出版。书名《一叶知秋》，既是取之于杨伟名自己在文中写的：“一叶知秋，异地皆然”，也是毛泽东当年批判杨伟名时所讲的一句话：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

李辰的境遇这时比杨伟名要好多了，他的人民来信竟然引起了上级部门的重视，又逢那时有一阵提倡调查研究之风，省委还专门派来一位处长了海源进行调研。当然杨伟名的建议，在毛泽东表态之前，当时也得到了当地省、地、县委一些领导干部的称赞，中共中央西北局甚至要调杨伟名去他们的政策研究室工作。其后的变化，本书就不多叙述了。

李辰的幸运也没能延续多久。

六年后，在文革中，出于对黑白颠倒、群魔乱舞的愤慨，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担忧，李辰再次奋笔疾书。那次，李辰和他的一家却遭到了灭顶之灾。他的妻子林海秀被押上刑场，死于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暴政。临刑前竟还被铁针缝嘴，活活地切腹挖肾，成了一名张志新式的烈士。这些将在第三卷中讲述。

37.2 上级调研

九月的一天。

一辆吉普卷着尘土，进了龙头镇。

龙头镇那时还很少有吉普车来，这说明至少是县里的领导来了。街上的社员都停下来交头接耳、驻足观望。

果然，吉普车停在了公社大院里。因为县里提前来了电话，公社领导早已等在门口，见车进了院子，很快就围了上来。县委办公室的曾秘书领着一位五十多岁干部模样的人下了车。

曾秘书介绍说：“宗书记，纪社长，这位是省委的但处长，专门到你们公社来调查研究。”

两位社领导又是点头又是握手，嘴里还不停地说着：“欢迎，欢迎！”

宗书记说：“还用但处长这么大老远亲自跑过来么，太辛苦了。我们到县招待所来向您汇报就是了。”

但处长相当地老成，点了下头，说：“进屋谈吧，就请你们两位进来。”

纪、宗两位点头，神情有点紧张。

宗书记对身边的其他人说：“你们就去干别的事吧。”

但处长就是十年前的海源县教育局长，由于对当时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教育运动、三反运动这些有看法，不想参与一些具体事务，自己想办法调到省里去了。这次回海源调研，他没提以前的有些事，宗书记，纪社长也没想起来。

进屋坐下后，但处长很认真地说：“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你们公社，群众的粮食情况怎么样？紧缺到什么程度？”

纪、宗两人对视。

宗书记一脸坦然地说：“挺正常的，没什么紧缺。”

“真的么？”

“是的，是的。”纪社长也帮着说。

但处长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纸，“你们下面的群众有反映啊。”

宗书记瞪着眼，答不上来。

但处长看了他俩一眼，“还不信？你们自己看吧。”

纪社长接过纸，看后皱眉沉思。

宗书记拿了过来，看后把纸上下掂了下，说：“他也没说是龙头的，怎么就说是我们公社的呢？”

但处长说：“邮戳是龙头的，我看里面讲的事，也是你们龙头的。”

宗书记很坚决地说：“我们龙头公社没有这种情况。这封信，完全是在诬蔑，一派胡言乱语，是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但处长，您放心，我保证三天之内就破获这起反革命案件。”

但处长摇摇手，“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群众能向我们反映个意见，是不容易的。我们先要了解一下，调查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要一有不同意见，就听不下去，就往死里打。现在，农民的口粮确实有困难，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饥荒。不只是你们公社，全省、全国也都有这个情况，有的地方还很严重。就是没有这封信，我们也想过来作些调研，看看农村的具体情况究竟怎样。”

纪社长问：“还要上村里看看？”

但处长说：“不但上村里，还要进农民家里。”

纪、宗两人又对视一下。

宗书记对但处长讪笑了下，说：“但处长，我出去下就回来。”说完抽身就走。

纪社长说：“但处长，我先向您汇报公社的基本情况，等下午再去村里吧。”

但处长说：“不了，你们也不用去提前安排，我自己随便走走。”便起身往外。

正好宗书记从屋外走进来，“但处长，这就要去啊？”

但处长说：“是啊，我自己走走就行了，你们有事就忙吧，不一定都去了。”

纪社长忙接上去说：“好，那由宗书记陪您去吧，我就不去了。”

宗书记端上一杯茶，说：“好。但处长，请坐，您先喝口水。这是我们海源北山自产的茶叶，您没喝过吧？尝尝，不比那些龙井、铁观音差。是吧？”

但处长摇着头，无奈地坐下，吹着，小心地喝着那刚泡的滚烫的茶水。

半小时后，宗书记陪着但处长在民主村的胡同里走着。

但处长问：“怎么这么多人家的院子没有门？是大炼钢铁时拆了烧了吧？到现在还都没安上啊？”

宗书记尴尬地笑着说：“我们这儿治安秩序很好，连小偷小摸也没有。有个门，还得开门关门的，大家反而嫌麻烦，所以不安了。只有咱们又做到了两千多年前秦始皇才能做到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啊。”

但处长也苦笑一下，“你这个解释，倒也挺有意思。秦始皇是靠‘谁拾东西就砍谁的手，谁家关门就砍谁的头’，便于官兵随时搜捕，那咱们是靠什么做到的呢？”

“嚯嚯，嚯嚯，”宗发奋更尴尬了，连苦笑也笑不出了，实在无言以对，就只好“实话实说”：“咱们恐怕就是无遗可拾、无门可关了。”

远远地有人在胡同里跑来跑去。

但处长问：“他们在干什么？”

“可能是要分粮食了吧，大家高兴得跑来跑去。”

走了一段路，但处长说：“我们进一户人家看看吧？”

宗书记指着前面平金刚家，说：“好，好，就去前面这一家吧？这家是个生产队长，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

但处长也没有什么异议，“好吧，进去看看。”

宗书记刚才在大院里已经派经学文去通知平金刚了。经学文带了两斤面粉，在平金刚家说得很明确，“省里有个大领导一会儿就要来你家，中午你们就烙油饼吃。领导问什么，只许说好话，不许说坏话。平常有什么意见，咱们内部解决。宗书记说了，你是公社党委提拔的生产队长，今后很有发展前途。今天就是考验你的时候了，看你的表现了，不要辜负了宗书记对你的期望。”

平金刚哪有不听从之理，就冲着这两斤面粉也值啊。

但处长踏进平家院子的时候，平金刚正在锅台前忙活，烙饼的香味已经飘散出来了。

宗书记笑着说：“金刚啊，省里的领导来看望你啦。”

平金刚头一次见到省里的领导，搓着手，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咧着嘴，干干地说着：“欢迎，欢迎。”

但处长闻到香味还挺高兴，“好香啊，在做什么吃呢？”

“烙饼。”平金刚答道。

“什么好日子，吃这么好啊？”

“我们天天都吃得这么好，共产党领导我们过上了好日子。”

“不会吧？今年你们分了多少麦子？”但处长问。

“很多，很多。”平金刚想了下，为了说得更像一点，又胡诌了一句，“一百多斤吧。”

但处长很有疑惑，便问：“一百多斤？你们队今年一共收了多少麦子？”

平金刚答不上来了，吭吭哧哧地说：“记不住了。乡下人，脑子不好使。”

但处长颇不高兴：“你这个生产队长，连队里打了多少麦子都不知道，怎么当的这个队长？”

宗书记瞪了平金刚一眼，也没法了，就转过来对但处长说：“具体数字，我回去问办公室一下。生活好，那是确实的。没有粮，哪舍得随便烙饼吃呢？”

但处长点点头，就出了平金刚家。

穿过胡同口，宗书记说：“不早了，咱们回公社吃午饭吧，都已经准备好了。”

但处长说：“不忙。”指着旁边的一户人家，“再进这家去看看吧。”

没等宗书记拦住，但处长已经跨进了院子。

37.3天地动容

这是老王头的家。

这时就老王头老俩口在家。

宗书记进来对老王头说：“王大伯啊，这是省里来的领导，来看看你们在人民公社以后，这几年生活提高了多少？”

老王头从没有听过这位宗书记喊他过大伯，心里一愣，此事不寻常，要认真对待，又一听是来了解生活情况，不是反右倾、反右派这些政治问题，稍稍放下了一些心，就回答说：“各位领导好，这些年，粮食是收得少了些，口粮有点紧。”

宗书记马上脸有不悦，轻轻地“哼”了一声，想提醒老王头注意。

但处长问：“今年你们分了多少麦子？”

“还没分呢。”

宗书记忙解释说：“那天分粮，王大伯没在家。”

但处长又问：“那你们现在吃什么？”

“还有去年的地瓜干、地瓜蔓，还能去海边拾一些蛤蜊什么，凑合吧。”

宗书记猛地想起了什么，说：“对，对，我们海源有很多有利条件。靠着海边，有不少海货。中午你就能尝到鲅鱼饺了。咱海源是个好地方啊，北面有山，南面有海，山珍海味样样有。但处长，您就常来吧。”

宗书记随后往前一伸手，想把但处长引出去。

但处长却看见在炕上的王大妈紧捂着口袋，便问：“大娘，你这里面藏的是啥呀？还有什么好吃的吗？”

王大妈捂得更紧了。宗书记以为是还藏着啥好东西，上去就把袋拖了出来，递给但处长，“我说么，肯定还有好东西，不至于就吃地瓜叶吧？”

但处长打开口袋，手往里一伸，一看，愣了，脸色都变了。

宗书记拿过来一看，也愣在那儿了。

那是一把鸡屎！

一把晒干了的鸡屎啊！

足足有几分钟的沉默不语，连空气都静止了。

但处长浑身都感到了震颤，问：“你就是吃这个么？”

王大妈点点头，老泪顺着皱纹默默地流下。

宗书记都急了，提高了嗓门，追着问：“不可能，这不可能！早就没有粮食喂鸡了，哪来的鸡屎？”

王大妈说：“去年。去年，我就看着不行了，要来饥荒了，就做了些准备。我看鸡屎里还有些碎的玉米碴，实在舍不得丢，就扫了起来，用水冲冲，晒干了放着。没想到真的用上了。”

老王头也呜咽着说：“她吃这些，都不让儿子和媳妇知道。吃地瓜叶，她都不舍得，就说吃过了，自己饿着肚子偷偷地吃这些。”

宗书记无语。

王大妈流着泪。

但处长的眼睛也湿润了，对老王头说：“请你对上级党组织说句实话，今年你们分了多少粮？”

老王头看了看宗书记，宗书记赶紧朝老王头挤眼睛。

老王头又问但处长：“真的是说实话吗？”

但处长说：“是的，党希望你说实话。我以省委的名义保证你的安全，不受打击报复。”

老王头说：“实际情况就是，从解散食堂以后，就没分过一斤粮。领导啊，我们都撑不住啦，快来救救我们吧。”说着就跪了下来，止不住地哭了起来。

王大妈也跪在炕上，哭出了声。

但处长扶着老王头，也流着泪，说：“革命胜利了这么多年，还叫你们过这种日子，是我们做得不对啊，是我们辜负了你们老百姓啊。”

宗书记也丧气地低下了头。

本书插一个比老大娘吃鸡屎更加震颤人心的情节。在任彦芳先生所写的《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大饥荒》的文章中有这样一个实例：“这年（指1958年）冬天，副省长赵文甫和地委书记陈冰之一人带一个秘书到下边私访，到了禹（虞）城杜集，一进村口，就见人们浮肿得厉害。老百姓哭着说：再不来粮食，就都饿死了。陈冰之从村西头走进一家，见一老人在草窝里睡，看不见粮食，见屋里有个小缸，淹（腌）着一缸肉，问：是什么肉哩，狗肉？猫肉？老人哭了，说那是我孙女的肉哩！

饿的（得）人吃人肉了！陈冰之再也待不住了，便找到赵文甫，一块看了看那淹（腌）女孩肉的小缸！……”（请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5期。）

这篇文章中的省和地区是指河南省商丘地区。也就是这个商丘地区，1958年还放了个笔者迄今为止所知的全国最高的粮食高产卫星：该地区观堂公社吴楼管理区，甘薯亩产高达183632.6斤。尊敬的读者，不要以为是笔者点错了小数点。让我再重新输入一遍：亩产183632.6斤！千真万确！（资料来自：《天堂实验——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罗平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

多么悲哀，多么悲哀啊！河南是受大饥荒冲击最早的地方之一，1958年底，就陷入了困境。在大放高产卫星仅仅几个月之后，这同一个地方，竟然沦落到人吃人的地步！

长天当哭——

长天当哭啊！

1962年刘少奇对毛泽东所讲的“人相食，要上书”的事，绝不仅仅是指这一个事例。

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中，有大量翔实具体的记载。没有机会看到这本书的读者，可以看看杨显慧先生的《定西孤儿院纪事》（花城出版社，2007年）。那里也有很悲惨的描述。没有经历过那场大饥荒的读者，尤其是对那场大饥荒不了解的读者，应该去读一下。那种惨状，真能叫天地动容，人鬼共泣。

但处长回到公社的办公室，拍着桌子。

“群众都困难到这种程度了，都没有活路了，你们还在那儿隐瞒，还在唱喜歌，还在说形势大好，于心何忍啊？于心何忍啊！说农民在隐瞒产量，明明是你们在隐瞒灾情。是人民把你们抬到了领导的位置，但是面对人民的疾苦，你们怎么能就这样无动于衷、毫无感情呢？！”

“同志们哪，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吧？我们这样搞，还是在为共产主义奋斗吗？！早晨我来的时候，在你们西门外的山下，看到了一群烈士墓，好像有几百座吧？那些躺在地下的先烈们，看到现在这个样子，他们能躺得住吗？他们撇家舍业，拼死拼活，牺牲了性命，不是为了让老大娘吃鸡屎啊！这不是他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啊！

我们对不住养育我们的人民群众啊！

我们没脸去见那些为革命而牺牲了的烈士们啊！”

但处长越说越激动，偌大的年纪，泪水在眼眶里转。

“跟你们说吧，四十年代我也在海源解放区。那时候战斗那么激烈，鬼子扫荡，国民党进攻，还乡团反扑，反复拉锯，反复拼杀。老百姓跟我们钻山沟、避战乱，还要支援前线。条件那么艰苦，真的是宿无屋、餐无粮，有了这顿没下顿。乡亲们跟着我们闹革命，拼死拼活，毫无怨言。就是这样，只有流血牺牲的，只有被敌人杀的，没有饿死人的呀！更没有吃鸡屎的呀！

想想吧，想想吧！

他们会想到今天的境况吗？老天爷要是知道了，也会掉眼泪的呀……”

但处长真的流下了泪，哽咽着，好不容易才喘上气，脸色都发白了。

“已经到了这种时候，你们居然还好意思吃什么鲛鱼饺子，还有这个脸去吃吗？还吃得下去吗？社会主义，都被你们糟蹋成什么样子啦？！”

“你们还好意思讲建设共产主义，把共产主义说成是‘除了一双筷子一个碗是自己的，其余的东西都是公家的’。这是什么共产主义？我说这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花子还穷，因为叫花子还有一根打狗棍么！我劝搞唯心主义的人歇口气吧！已经‘创造’出挨饿的‘奇迹’啦，不能再这样作孽了！”（说明：这一段是借用了杨献珍在1959年6月12日讲的话。请见《杨献珍文集》，杨献珍，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本书中有些人物的讲话也有借用了别人的话，就不再一一指出）

但处长气得都吼了起来，又猛得拍着桌子，手掌都发白了：“今天中午、晚上，你们都喝稀饭，这两顿的粮食都分给社员群众。”

办公室里鸦雀无声，纪社长、宗书记低着头，一个屁也不敢放。

但处长气得午饭也没吃，坐上吉普车，卷着尘土，飞扬而去。

宗书记望着吉普车消失在飞扬的尘土之后，铁着脸，狠狠地说：“他妈的，哪个王八蛋写的信，一定要查出来。我看在龙头镇，也就是李辰那小子。还有那个老王头，也是不识好歹，坏了我们的事。”

纪社长说：“让上面知道也好啊，赶紧想点办法，调点救济粮来。这样也能减轻我们的工作压力，不然，还真不好办。”

宗书记说：“你就不怕打右倾啊？只有不敢吹而被打成右倾的，还没有哪个因为瞎吹而受到批评的。这个道理，以后也会是这样。”

纪社长说：“群众的命运，还是比我们个人的前途重要得多啊。”

宗书记说：“老纪啊，讲穿了吧，群众算什么？管我们的是上级领导。群众不但管不到我们，还是被我们管的，去操那么多心干什么？别看今天这个样，你老是不跟我说到一个点子上。我最后还是要劝你一句。在中国，右在某些情况下，或许会被容忍于一时，但最终还是要跌入万丈深渊。左，哪怕是左过了头，却永远是张通行证。对于我们，右，就会失去权力；左，哪怕是再怎么左，靠了它，才能永远保住权力。你不信？”

“实事求是，替群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不能算是右吧？”纪社长的辩解，即使在这时也是很无力的。

第三十八章 救命粮

1949年7月8日

38.1 开仓赈灾

但处长回省以后的一个多月，省里来了通知，要求各地紧急进行“四保”活动，即：保人、保牲畜、保生产、保治安，重点是要保人的生命。这项工作报纸不登，广播不讲，但要扎实进行。省里还给各县拨了救济粮指标，由县政府根据各公社具体情况再往下分配。

龙头公社接到了县里的通知，问你们公社还需要向群众发困难救济粮吗。

宗书记问纪社长：“我们还需要吗？”

纪社长说：“怎么不要。”

宗书记说：“我觉得，我们公社虽然也有些困难，但现在国家更有困难。国家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粮食，工业生产要粮食，三线建设要粮食。我们还要支援世界革命，援助第三世界左派的武装斗争。没有粮食怎么办？我们不能再向国家要了。国家的利益永远要放在第一位。”

“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三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哪个放在第一位，要看具体情况、具体条件。现在群众生活困难到这种程度，就要先考虑下群众的切身利益。”

“这是怎么说的？我们不是常讲‘大河有水小河才能满’么？都从大河里舀水，大河怎么办？这个道理还不简单么？”宗发奋很是不服气。

“但是，不能只讲小河往大河里面流。如果小河都干了，大河哪来的水呢？”

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是那时常用来教育群众的话题。不过，在左倾思想的解释中，都是彻底否定个人利益、彻底否定个人权利的。所谓群众，最好是没有头脑、不吃粮草、只知道干活的躯壳，即所谓的“驯服工具”。这个问题，在后面“学雷锋”那一章里还会述及。

宗发奋已经不想再多说了：“不用讲那么多了。我们这点困难完全可以自己克服，绝对没有到伸手要救济的时候。个别户有困难，可以相互帮助、相互调剂。。”

“谁家还会有余粮能往外调剂？你说呢？”纪社长问。

“这个，我不管。这是你们行政上的事。我就知道公社党委的领导是正确的。向国家要救济，就是承认我们这几年工作的失败，承认我们党委领导的失败，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纪社长说：“都到这个时候了，有条件帮助社员解决点困难，为什么不去解决呢？”

“党的声誉是第一位的，党委的声誉是第一位的。其它的事情都得为这让路。”宗发奋的口气很硬。

纪社长有点生气了，说：“既然你说这是行政上的事，那就由公社管委会去上报。”

“我以公社党委的名义，坚决不同意。”

“我要向县政府反映。”

“那我也会向县委反映。”

两人都向县里作了反映。县里的答复是，等你们公社领导班子统一意见以后再上报。本来用于救急的粮食，就这样被耽搁了。

这事不知怎么传到了村里，社员们都气愤不已。

在西门口等着干活的社员们又议论开了。

彭小宾这一年多没有技术活可干了，心里有气，加上年轻气盛，先张嘴说开了：“县里明明有粮食，公社还不要，还不是当官的死要面子。”

皮安已说：“他们公社干部吃着公粮，当然不急了，把我们可害苦了。”

老王头不无忧虑地说：“大家都没粮了，这个冬天怎么过哟，恐怕要比去年冬天还要难熬了。”

包金贵惊恐地说：“那还要死人啊？去年冬天，我就剩了半条命，好不容易才熬过来的啊。”

该是掌灯时分了。停电已经几个月了，电灯都不亮，也没有人家再去买油点灯。朦胧夜色中，很少出门的彭会计上了于村长的家。

于村长轻轻笑着说：“我知道你会来的。”

彭会计说：“是啊，到时候了。公社又不发粮，我们藏的那点粮就不用再放着了。”

“群众都很缺粮，是到发的时候了。可是公社会不会怪罪下来，把粮食收走么？”

“怪不怪罪就不管了。只要群众有粮食就行。虽然不多，但也能撑几天。到是怎么不让公社知道，是个问题，所以我过来想好好商量这事。”

“我想就是动作要快。在公社做出反应以前，就分到社员手里。等吃到了肚里，谁也拿不走了。”

“具体怎么发，怎么分？”彭会计问。

“我想，不管是谁，每人一份。算好了以后，晚上通知，连夜分掉。”

“得告诉杜家骏吧？”

“那得告诉。跟他讲了以后，立即把生产队长找来，通完气后，马上就开仓分粮。你先把账算出来，把花名册搞出来，再去看看那批粮食，放在那儿有没有意外。”

彭会计和于村长的工作效率还真快。第二天晚上，社员们就接到通知马上去西北场院开会，每家去一个男的。

老王头早就躺在炕上了，听见平金刚在窗外通知开会，便应答道：好，马上就来。心里直纳闷，从来没有开会指名要男的去，这是什么会？自己懒得动弹，就在炕上喊着，“王山，你去看看吧，我就不去了。”

王山也觉得奇怪，开会从没有夜里现通知的，开的什么会呀，都好几个月没开会了。

王山下炕出门，走到西北场院，已经有不少人满脸高兴地往外走了，手里都用衣服包着一包东西。王山问是什么呀，走过去的人都笑而不答，匆匆而去。进去一看，原来是在不起眼的旧库房里分粮，每人五斤半。为了不声张，事先没叫大家拿口袋，来了就脱下衣服兜回去，拿不了的，赶紧回去再来跑第二趟。于村长、彭会计在称粮、记账，现任干部一个也没在场。于村长再三叮嘱，拿回去吃了就行了，对谁也不要讲。

王山拿上粮，马上回了家。

老王头问，怎么回事，这么快就回来啦？

王山把事情一说。老王头直感叹，老村长是好人啊，做了件大好事啊。

但第二天一早，公社还是知道了，民主村昨晚居然私分粮食。

宗书记可是震怒了，在办公室里气得跳了起来，叫经学文把杜家骏喊了过来。

杜家骏一进门，宗书记就吼上了：“你们民主村简直不把我们公社党委放在眼里，竟敢私分粮食！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完全可以把你们全部抓起来！”

杜家骏装作糊涂：“这事，我一点也不知道，都是老村长他们干的。”

“别装模作样啦，你当我不知道啊，你们都是一伙的，还想懵我。我问你，这些粮食是从哪儿来的？”

杜家骏还是一脸无辜的样子：“真的不知道啊。”

宗书记拍着桌子：“于继承开除党籍，立即报县公安局逮捕法办。”

纪社长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进来，说：“这恐怕还要慎重吧，算是什么罪名呢？”

“什么罪名？多了，侵吞集体财产，破坏人民公社，对抗三面红旗……叫什么罪名，就是什么罪名。哼！”宗书记气势汹汹地说。

唯独饿死人没有罪名！

38.2救济粮

情况渐渐有了变化。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使许多工作难以运转下去，政策开始有了松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代替了三面红旗的口号。虽然从来没有否定过三面红旗，但很少提了，至少是不提“大跃进”了。接着又公布了“农业六十条”，提出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正式放弃了作为人民公社核心特征的“一大二公”的模式（第一是大规模、第二是高度集中的公有制），在生产关系方面基本上回到了高级社时期。

政策的松动，使纪社长和宗书记为民主村分粮的分歧有所搁置，也使于村长他们松了口气。按照新政策，他们分的是大队自己的粮食，而不是公社的，只不过在一段时间里没有交给公社支配。

“六十条”下来后，日常生产活动不再由公社、大队安排，而是由生产队自行处理，土地、农具、牲畜也重新拨归生产队。

平金刚觉得自己肩上担子重了，找了老王头，把新分下来的地块都看了一遍，商量着这块地种什么，那块地种什么。

老王头也很认真地看了一遍，实实在在地跟平金刚说着自己的想法。

平金刚一家一家地走着，高兴地跟大家说，明天咱们生产队重新开始活动啦，上午我们先在西门外的地头一起开个会，再一起把新分来的那块地松松土，把土块打打碎就行了。

第二天，老王头早早就去了，在西门口等着。在老王头的带领下，他们全家也都来了。可别的人稀稀拉拉地来得不多。一年的饥荒，使人们的精神头还没有提起来。

中午就散工了，平金刚扛着锄头往回走，也觉得精神不爽。快走到西门，看着有个人在山坡上刨地。

这块地长着野草，现在已是一片枯黄，过去也没人在意，谁会在那儿刨地呢？平金刚上前一看，是皮安已。

平金刚说：“老皮啊，你怎么在这儿刨啊？这块地不是我们队的。”

“我知道不是我们队才来开的。”

“那是哪个队的？你经过人家同意么？”

“哪个队也不是的。”

“你是在为自己开噢？”

“是啊，哪个队也不是的地方，那我就为自己开点啦，也没妨碍任何别的人啊。”皮安已坦然地说。

“这可以吗？哪个队也不是，至少也是集体的啊，现在没有个人的地，你得跟大队讲一下。”

“你要是去问上面，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啦。”

“这样不行吧？你开一块，我开一块，不就乱了套了吗？”

平金刚去找杜家骏说了这事。

杜家骏想了想：“这倒是个新问题，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去问问纪社长吧。”

走到公社，纪社长见到杜家骏，乐呵呵地先开了口：“我正要找你呢，上面又来了新精神，赶快往下传达。允许社员有自留地啦，我们公社先定每人一分地（说明：一分地为十分之一亩，约67平方米），让群众种点蔬菜瓜果什么的。同时，恢复集市贸易，大家可以互通有无，做点小买卖。”

杜家骏也高兴地说：“那太好啦，这样才能活泛一点，大家才会觉得有奔头，才会有劲头搞生产。我刚才上各队的地里看了下，来的人还是不多，劲头也不大。”

纪社长说：“今天中午开大队干部会，你们下午就传达到社员，让大家早点高兴，早点动手干。”

“好，你看着吧，这事不用催，晚上各队就会下地去分，过不了夜。明天一早，大家都会上自己的自留地去干了。”

“是啊，调动群众积极性，既要靠思想教育，也要考虑群众的切身利益。前两年，我们很多地方做得不对，才搞成那个样。”

对了，刚才你说有的社员自己去开荒的事，公社还要再商量一下。这恐怕还得有个规矩，可以搞，但不能乱来。”

杜家骏说：“好，我等你的通知。”

纪社长说：“还有，救济粮的事，公社也同意给了。全社每人十斤，本来还能多给点，这里面的事就不多说了。这两天就到。”

你们村分粮的事，也有人去县里反映了。还好，县里说，这事，情由可原，不予追究，下不为例。”

杜家骏微微笑着说：“那太好了，我也可以松口气了。纪社长，我现在跟你说句实话吧，我是知道这件事的。事前，老于跟我商量过，现任干部不去现场。万一有事，我们好推托，也方便在旁边说个求情的话。”

“你以为我们就猜不到啦，没去细查就是咯。”

杜家骏感叹地说：“老于真是个好同志，他自己把责任全担下来了。”

“是啊，这样的好同志，以后还要用。”

杜家骏忽然又有点担心地问：“这样的话，救济粮也发下来了，我们村分粮也没事了，那宗书记会不高兴吧？你们两人的事，怎么办呢？”

纪社长一笑：“这些事，你们就不用去管啦。大家都凭良心、讲党性，就行啦。”

这一句不起眼的话，并没能掩饰住为如何看待和解决由于大跃进失误而造成巨大灾难所引起的党内纷争。像宗发奋这样的人，不会承认大跃进是左倾盲动，不但对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和惨痛后果毫无愧疚之意，认为最多就是“经验不足，难免有这样的事”，“错误就是那么一小点，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还不甘心就此罢休，总想有机会再来一番。要是有人提出来找找原因、总结经验、避免以后再犯错误，那可

不得了，就像触到了痛处，立马耿耿于怀、记恨在心，早晚要置人于死地而不可。此后的几年里，这个纷争，非但没有平息，反而越来越深化、越来越扩展、越来越激烈，乃至最终失去了控制。

发救济粮的那天。

社员们早早就来到大队部，还都挺高兴的。彭会计刚要分发，宗发奋不知怎么也来了。

这位宗书记过来，一把就挡住了彭会计拿秤的手，忙着说：“不急，不急，不能就这么发，得搞个仪式，表示一下。不能这么悄没声的。”

杜家骏挠着头：“这还要搞什么仪式啊？还得挂横幅、放鞭炮、找吹鼓手，像个娶媳妇似的？”

于村长在一旁冷冷地说：“这个时候还做这些表面文章啊？再说现在上哪去找这些东西啊？”

四周围着的群众也一起嚷嚷：“是啊，快点发吧，别搞这些啦。我们都饿着肚子，等着回去下锅呢。”

杜家骏看宗书记脸上很是不悦，就说：“要不您就代表上级，讲几句，就行了吧？”

宗发奋无奈，答道：“好，那我就说几句。”便叫人搬来一张椅子，不是要坐，而是站了上去，拉开架势，说了起来：

“同志们哪，乡亲们哪！我，代表公社党委，隆重宣布，县委、县政府给我们送救济粮来啦！”

宗发奋自己劈啪着鼓了几下掌，看下面没人应，又接着说：“就在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盼着粮食的时候，党和政府就及时给我们送来了，就像是久旱逢甘雨啊。这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我们人民群众的无比关怀和爱护啊。这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啊。让我们先唱首歌，表示我们对党和政府的深厚感情和无限爱戴。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

唱！”

宗发奋挥舞着手臂，可下面稀稀拉拉没几个人应。他只好尴尬地干咳了几声，又说下去了：“在这里面，公社党委也做了大量工作。或许你们不知道，我本人也做了不少努力，跑了不少腿，尽量为你们多争取点。不容易啊，同志们！这些，我自己就不好意思说了。

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我们党委领导也在和你们一起同甘共苦啊。你看，我那时候也好长时间不吃肉啦。”

“分吧，分吧！快要到晌午了！”下面社员们都不愿意听了，吵吵得不行。

宗发奋也气得不行，瞪了下眼，咽了口吐沫，手一挥：“分吧。”

38.3抓小偷

果不其然，给自留地的消息，让民主村的乡亲们在这以后的几天里兴高采烈，比过年还热闹，虽然没有鲅鱼饺、没有烙油饼，脸上却都是喜气洋洋，在各自的自留地里忙活着。把仅仅5%左右的土地的耕作权直接给了农民，淳朴的中国农民就欢欣鼓舞，就愿意把无尽的汗水洒向这块巴掌大小的土地。

然而，在发救济粮之前，倒是还有个插曲。

县里来的救济粮拨到了大队，放在了那个老库房里。那地方其实破旧得很，存放东西并不安全。后窗上连个窗櫺也没有，就用破席子挡着。之前那六千斤粮之所以没有出事，是因为大家都没想到里面会有粮，况且民主村这多少年还没有偷盗的事发生。这回可是大家都看见有粮食放进去了，但想到第二天就要分了，队里也就没去在意。

不料，第二天一早，平金刚满脸紧张地找到鲁队长：

“鲁队长，不好了，那库房的粮食被人偷了。”

“少了多少？”

“倒是不多，好像就一两袋。”

鲁队长跟着平金刚匆匆赶到库房，杜家骏、彭会计他们都已经在那儿了。一看挡在后窗的席子被掀了，窗台上的灰尘，踩上了几只明显的脚印。

清点了粮食，就少了一袋。

杜家骏在挠头想着：“粮食才进来一个晚上，不会是外村人。会是谁呢，这么缺德。民主村还没出过这样的事。”

鲁队长气愤地说：“不会是别人。平金刚，你跟我来。”又叫上了杜长贵、彭小宾几个年轻人。

鲁队长领着人，径直来到秦德才住的那套房的里院。

秦德才听到动静，忙从里面出来堵在房门口，虚张声势地问：“你们来这么多人，干吗呀？”

鲁队长没跟他废话，一把就将他推开，对平金刚说：“你们进去仔细看一下！”

秦德才“哎哎”地喊着，跳起来想拉住平金刚，被鲁队长一把揪住衣领。秦德才被勒得翻着白眼，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没一会儿，平金刚就在里面开了腔：“就在这儿，真的就在这儿！”说着就把那袋玉米给扛了出来。

鲁队长大怒，指着玉米袋，对着秦德才问道：“你还有什么话好说。”抡起一巴掌，就搥到了秦德才的脸上，又骂上了：“呸！你还是个人啊！这都是大家等着救命的粮啊！”

小宾说：“把他拖到大队部去。”

平金刚一直没忘了1959年在“学乖队”受秦德才的气，今天的机会哪会这么轻易放过：“先他妈的揍一顿再说。”

杜长贵忙响应说：“对，对，这个狗娘养的，早就该好好教训了。”

秦德才马上装熊，跪地求饶，“小弟不敢了，哥哥们放我一马吧。爷们，我喊你们爷了，以后听你们话，跟你们走。”

平金刚哪听这一套，噼噼啪啪，好一顿狠揍，出了口憋在肚里多年的恶气。

鲁队长在边上看了一会，觉得差不多了，别打过了头，就说：“行了，拖出去，游街！”

秦德才从没有这样狼狈，鼻青脸肿，嘴角淌血，背上驮着那袋玉米，被鲁队长他们几个押着，在街上转了两圈，最后拖到大队部。

一路上，平金刚在前面喊着：“秦德才偷粮食咯！秦德才偷集体的粮食咯！”

除了储小二站在远处偷偷地看着，民主村的人几乎都高兴地看着这一场游街，真有点扬眉吐气。有勇敢点的，还拍着几个巴掌，喊着：“好，好！”

想说的是，本书记载这一段，并没有称赞他们这样做的意思，尽管觉得能给他们解点气。

往日耀武扬威的秦德才，终于也有这样落花流水的时候。像贼一样的秦德才，原来还真的是个贼。

但秦德才是个能屈能伸的人，该逞能的时候逞能，该装熊的时候就装熊。此时，他装得像狗一样，被人推搡着、拖拉着，没有任何的抗拒。内心里，牙都咬得格格响，收起利爪，收起凶焰，等待着下一次嘶咬的机会。这，就是秦德才的能耐。

村党支部讨论要开除秦德才的党籍。

公社的宗发奋说了，上级有精神，困难时期的小偷小摸，情有可原，一般不作处理。

第三十九章 调整时期

1949年7月9日

为了克服左倾路线造成的种种困难，各级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做出了巨大努力。历史又走进了叫做“调整时期”的一个阶段，即搁置某些极端过火的主张，采取一些相对温和务实的做法。

39.1 三千会

1962年的春天。从严冬中走过来，有点微微的暖气。

寒气仍在，望海山北坡石头下的冰碴还没完全融化。但南坡的青草已经顽强地伸出地面，展露它的新绿，有的树枝也已萌发出叶芽。这又一个的春天，能给人们带来多少新的希望呢？

这年年初，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通常讲的七千人大会，深入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研究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安排。当然，七千人大会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还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党内高层在大饥荒的起因、程度、责任的认识上分歧已初见端倪，就不在这儿详述了。大会之后，各地层层贯彻落实，还是以总结教训、改进工作为主。龙头公社在县三级干部会（县、公社、大队）之后，也召开了本公社的三级干部会（公社、大队、生产队）。

会议安排在东门外的中学里举行。中学还特地放了一天假，好腾出地方。参加会议的，不但有各级全体在职干部，还请来了在1959年反右倾中下台的干部和一部分贫下中农代表。

纪社长在做大会发言：“……我们是糊里糊涂地过了几年，做了些错事，造成了严重后果。地也减产了，人也瘦了，生活水平也下降了。在龙头镇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作为公社的主要领导，要承担主要责任。在这儿，我向在座的各位基层干部，向全社的社员群众，表示真诚的歉意。”

“对，对，纪社长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当然，我也有我的责任。你们，你们大队干部、小队干部都有你们自己的责任。回去都好好想想。”宗发奋忙不迭地插上一段话。

纪社长接着说：“在龙头公社，首先是我来承担责任。”他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个躬，说：“今天请大家来，就是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好，心里还有什么憋气，都可以说出来。尤其是要找出经验教训，到底是些什么原因，使我们弄成这个样。来告戒自己，以后永远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究竟有些什么原因呢？我先讲几点，开个头，下午各大队可以分组讨论。造成近两年来严重的经济困难，既有自然灾害的原因，也有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我们是好心没有办成好事，只想更多更快地追求经济建设成就，步子太大了、太快了，因此走得就不稳。没走稳又想跑，结果反而摔了跟头。概括地讲，就是出现的这些问题，不能都怪天老爷，不能都怪自然灾害。自然灾害有，但不是主要的。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七分人祸就是我们的工作失误，我们的工作责任。这才是主要的……”

那时习惯用三七开来说明事情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对于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也是用这三七开来表述。不过，这三七开的具体内容却是前后变了好几变，而且这颠来倒去的改变最终导致了当代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事变。咋回事呢？且听本书在后面的章节里慢慢道来。

这时，各村的干部们坐在下面，联系着这两年的挫折，脸色是沉重的，听着纪社长的话频频点头，心里想着，是啊，是得拿出时间好好想一下了。

当然，纪社长讲的这些，也不算深刻。五十年代，中国大地上正在理性发展的社会主义进程，被非理性地粗暴打乱。有观点认为，1958、1959年的大跃进、公社化是决策者潜在的农民意识的产物。笔者认为，应该说是恰恰相反。正是左倾思潮把彻底否定私有产权、彻底否定个人利益的极端平均主义做法强加到广大农民头上，彻底打掉了所谓的“农民意识”，严重压抑、甚至彻底摧毁了中国农民勤劳致富的本性，才使得所有正常的、理性的意识都荡然无存，最终导致虚幻的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本来含义的“共产主义蓝图”惨烈破灭。即使真的是退一万步，退到被认为是落后至极的“农民意识”，哪怕保留一点点的小生产，哪怕保留一点点的小私有，也不至于弄出大饥荒的悲惨结局。梦想创造人间天堂、梦想出现中国奇迹，梦想在自己的领导下变出个盛世强国，不管这些是美好愿望，还是个人狂妄，但结果却都是使广大人民群众跌入深坑。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第一是自由人，第二是联合体，没有否认私有产权，没有否认个人自由，没有说非要把所有人都当作螺丝钉、零部件拼凑在如考茨基所说的“简单而呆板的机器”里。被一些“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看作是二号修正主义头目的左翼思想家考茨基在《社会革命》（人民出版社，1980年）一书中说：“最谬误的莫过于把社会主义设想成一部简单而呆板的机器，一旦开动起来它的轮盘联动装置就只能按同一方式不断运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可以有好几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企业形式，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工人报酬形式……社会主义社会是完全可以有多多样性的。”

这儿讲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多样化和多元性。这些话，好像就是在回答说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所发生的事情。

虽然纪社长的讲话仍然不够深刻（我们不能要求纪社长能完全按照马克思的原著来讲），但宗书记对纪社长的这些话很是不悦。他的不悦，不是因为纪社长讲的不深刻，而是他宗发奋有着更深远的、旁人无从探测的想法。他在等待着发言的机会，但不是在今天。没过几个月，他就等来了机会。

下午，纪社长来到民主村这一组参加讨论。

民主村的小组讨论，放在自己的大队部，就在西北场院的北侧，是在高级社时盖的。五间房，东侧是两个里间，分别是大队长和会计的办公室，西侧和中间的堂屋是打通的，一大间。讨论会在大间，虽是龙头公社第一次三千会，大家也是席地而坐，没有任何的讲究。

纪社长站在中间，说：“讨论之前，我先宣布一件事。过去几年，我们做的一些事，不但使乡亲们受了苦，也伤害了一些好同志。根据上面的精神，我们公社对1959年反右倾时受到错误批判的同志们表示道歉，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一律平反撤销。

你们民主村的老村长于继承，是个好同志。不但在大跃进左倾狂热的时候，态度是科学的、冷静的、正确的，而且在撤消职务之后，也能够正确对待，经得起党组织的考验，对工作任劳任怨，特别是为民主村的乡亲们留下了六千斤的救命粮，做了件大好事。这样的事，我也不敢做。但是老村长却敢于担风险担责任。

现在我代表公社党委宣布，于继承同志重新担任民主村大队长兼党支部书记。杜家骏同志任副大队长、副书记。”

屋子里响起一片掌声。

老村长在掌声中站了起来，说：

“我今年五十七了。按城里人的说法，快到退休年龄了。但我还是接受公社党委的安排。因为我觉得前两年做得太过分了，太过分了！不能这样瞎折腾下去了。逼着人讲假话，到老百姓家里去抢粮，那肯定不是社会主义！以前什么事情都说是国民党、国民党，只要有什么事都往国民党身上推。大跃进，饿死人，肯定跟国民党没什么关系，也可以肯定这不应该是共产党的做法。都饿死人了，想想这是什么滋味啊！这话叫我们怎么讲啊！这不是一点半点的差错啊，叫我们怎么去对革命烈士讲啊！钉在墙上的姜雪花，如果还能睁开眼，我们怎么跟她说啊！打鬼子、打国民党，那么艰难困苦，也没有饿死人的啊！”

于村长越讲越激动，眼睛都红了，气喘得都讲不下去。他停了下，擦了擦眼，才接着讲下去，“我觉得，我们龙头镇应该立两个石碑。一个，纪念1949年的解放，纪念为解放而牺牲了的烈士。还应该再建一个，纪念1960年的灾难，纪念在这场灾难中死去的人们。让子孙后代都不要忘了这场灾难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灾难。如果我们记不住这一点，那么，十几年前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记不住这一点，那么，十几年以后我们还会死更多的人。不信，你们就等着看。

我作为一个党员，作为民主村的一个社员，不能眼看我们的事业再有偏离，我们的家园再受损伤。现在党中央已经采取了措施，进行了调整和完善。我们有了新的希望。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坚持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让我们民主村的乡亲们过上好一点的日子。”

会场上又是一片掌声。

晚上，在中学的操场上，由请来的县吕剧团演出了传统折子戏“海瑞上疏”。

这个海瑞戏，还真不一般。海瑞是一位刚正不阿、敢于直言的明朝官员。当时演这种戏是想鼓励人们在左倾风潮余波尚存时敢于讲真话，能对大跃进的一些不当举措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以尽快地扭转被动局面、走上正轨。别看是小小的一出海瑞戏，当时高层是有所考虑和安排的，甚至叫吴晗在北京和上海之间来回奔波接受任务，这儿就不说了。但这事，后来也是出尔反尔，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四年后，吴晗写的另一部海瑞戏“海瑞罢官”倒了霉，出人意料地成了文革爆发的导火索。

乡亲们哪知道这些，只知道好几年没看戏了，热情都高得不得了。不但三干会的代表们都来观看，连周围十几个村的老乡们也拖家带口地过来。诺大的操场，被挤得水泄不通，有的爬上了房顶、爬上了树枝。在平地上站的更是人贴着人，即使是春天的夜晚里，也是满头大汗。虽是掂着脚，也看不见演员

的身影，看到的只是人的后背和脑勺、甚至是骑在大人肩膀上孩童裂开的光腚，再能看到的就是挂在横竿上的灯光，听着衣衣呀呀久别了的声音，粗糙的颜脸上高兴地笑了。

龙头的乡亲们已经四年多没听到他们自己的地方戏了。这样的日子似乎跟神仙沾点边了。

类似这样的三千会、四千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气氛之宽松为历年所少见，一时被称之为“神仙会”。所以，这儿也把乡亲们的感受套上“神仙”二字了。

39.2有了点热气

1962年的春耕，在困难中带着点希望的春耕。

讲困难，是因为过去几年狂热运动所造成的人力、物力、财力、畜力、地力等各方面的损害还远远没有恢复，尤其是对精神层面的伤害更压抑着人们的心情。希望是，一系列农村政策的调整，特别是把生产关系调整回“以生产队为基础”，以及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甄别，使人们感到前几年过火的做法正在纠正，社会主义的航船正在驶回正常的航道。

平金刚找了个晚上把生产队的几个主要成员，请到了自己家里商量队里的事情。

平金刚的妻子小庄，是个贤惠的人，个儿不高，话也不多，拿着大碗小碗，一趟趟地从灶上往屋里递茶水，一面说着：“真不好意思，家里也没有个茶杯，就端着碗喝吧，可别笑话。”

包金贵说：“看你说的，平嫂。谁笑话谁呀？我家里连这几个碗都拿不出来。”

一会儿赵玫进了院里，平嫂忙招呼：“赵姐来了。”

赵玫笑着说：“我来，你就别忙活啦，招呼那些爷们吧。”

平嫂牵着赵玫的手，把她拉进了堂屋。

赵玫问：“你家小宝呢？”

“正在西屋炕上睡呢。”

“我看看。”

赵玫随平嫂进了西间的里屋。平金刚的孩子三个月大，正捂在炕上的被窝里睡着呢。这大小正好和赵玫失去的孩子一般大。赵玫看着一阵悲凉涌上心，脸色泛白，眼眶湿润，伸手抚摸着手腕上的银镯子。平嫂一见，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忙把她往东间领去。

好在门外又传来了大大咧咧的声音，“平金刚呵，你这新房，我还是第一次来呢。”车素花来了。

平金刚迎到门口，“啊呀，素花姐呀，你来啦。我这破地方，都没敢请你来。”虽然老经已经回来了，可大家还是称呼素花姐，没有恢复以前的“经老太”的称呼。

“你不请，我也来啦。”车素花爽朗地说着。

平金刚说：“啊呀，我家这样寒碜，家里什么东西也没有。本来还有条新被面，1959年也都拿去搞机械化了。本来不好意思请大家来，就是实在没别的地方了，眼下季节不等人，所以请大家委屈点，来这儿商量商量队里的事情。”

长贵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说：“好啊。这回队上的事，队里自己说了算，真要好好地商量。我正好向大家学习学习种地的事。”

平金刚说：“我先跟大家说个想法。当时公社把于村长、王大伯从村长、队长位置拿下来，做得是不对的。现在老村长又当上了大队长。我觉得王大伯也应该重新担任队长，无论讲人品还是种庄稼，王大伯都是好样的，我都比不上，差远了。我真心诚意地请王大伯重新出山当队长。我会尽力为王大伯出力、跑腿、当助手。”

车素花说：“也好，也好。”

老王头摆摆手，说：“我说句实话。谢谢大家的好意，我是不会再干了。这几年已经伤了我的心，我现在身体也不行了，精神头也跟不上了。这两年，平金刚干得还真不错。金刚，你就继续干吧。需要我出主意、想办法的地方，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需要我提醒的地方，我一定会提个醒。就这样，大家说可以吧。”

皮安已说：“也行，也行。平金刚年轻力壮，就多干点。老王头就多出点主意。”

平金刚看着杜家骏。

杜家骏说：“不用看我。队里的事情，你们队里自己做主。”

车素花说：“那平金刚你就干着吧，让老王头歇歇。”

平金刚很谦虚地一笑，说：“这样的话，王大伯实在不愿意，我也就不勉强了，那我还干着。我想，队长这活就是为大家出力、跑腿，为大家服务。眼看春耕要开始了，今年的生产由各个生产队自己安排，前几年都是大队、公社搞大忽窿。今年咱自己做主了，看看怎么搞更好？”

老王头叹了口气，说：“可惜迟得法不在了，他可是把好手呀。”

杜家骏说：“不提这些伤心事了，看看现在怎么搞吧。”

皮安已说：“我看可以少种点高粱、糜子。”

老王头说：“对，这几年玉米有了好品种，可以多种些玉米，少种高粱，糜子可以不要种了。”

车素花说：“还可以种点绿豆，卖几个钱分分。”

赵玫说：“冬天地里闲着，可以种点秋豌豆。磨成豌豆面，大家都喜欢喝。我有好些年没有喝到了。”

平金刚说：“对！到底是人多，想的主意也多。”

老王头说：“靠西门口的地，土比较肥，可以种点蔬菜，萝卜、黄瓜。秋天种点白菜。”

包金贵说：“好主意，还可以种些南方的菜。西红柿，芹菜什么的。”

平进刚说：“这些我们这儿很少种，能行吗？”

包金贵说：“先少种点，试试看。种好了，能挣不少钱。”

老王头说：“地里要施肥吧，这几年搞什么深翻，把生土翻了上来，把庄稼都毁了。”

平金刚说：“肥从哪儿来？”

老王头说：“各家打炕。把炕拆了，敲碎了，挑到地里。”

皮安己说：“深翻还是要的，但不是那个搞法，一尺的深度最合适。”

赵玫说：“我还有个建议。北门外，望海山边上，可以开些荒，种土豆。”

皮安己说：“对了！我要问一下，我自己开的地怎么说呢？”

杜家骏说：“大队决定了，不能自己开，要归生产队。”

皮安己丧气地说：“那我白开了？”

平金刚说：“队上给你折合一些工分吧。”

车素花说：“杜队长……”

杜家骏忙说：“别队长、队长的，你还是喊小杜吧。”

车素花说：“好。不讲究这些称呼了。我建议大队在茅山半坡上种一些苹果树，几年以后就会有大量收获了。”

杜家骏拍了一下大腿，说：“好主意！参加自己生产队的会，真是有收获，我要跟于村长讲，各生产队春耕都要开好这样的会。集思广益，这样就能想出很多好办法，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今年这一年，我想会大有希望。”

39.3 从头再来

开完会的第二天，老王头就起了个大早。

“今天怎么起这么早？”王大妈惊讶地问。

“打炕，打炕。”老王头说。

“睡得好好的，打什么炕啊？”

“给地里积肥。”

“几年没打了，怎么想起来了？”

“就是几年没打，今年才打呢。今年由生产队做主，大家劲头又起来了。我提了个建议，打炕积肥。”

“是个好主意，那也不用这么早呀。”

“哎，你不知道这里面的事，起来再说吧。”

王大妈起床下炕，卷铺盖。老王头就拿了锄头进来，敲了起来。以前北方的炕是用黄泥垒的，经过烧锅做饭，有烟火穿过，几年下来会积攒不少烟灰，钾和磷含量很高。把垒炕的泥坯敲下来，捣碎再推到地里，是很好的肥料。家里再重新垒个新的泥坯炕。

王山过来，把泥坯用扁担挑到院门外。

平金刚听到动静，过来一看，忙说：“王大伯，这么早就干上了。真是老同志，觉悟高！我去喊咱八队的社员们，大家一起搞。”

其实，老王头这么早起来打炕，是有他自己想法的。因为在他的炕里有个秘密，老王头在炕里一角留了个夹层，1960年搜粮队没搜走的那袋小米，就藏在这个角落里，不打烂炕是发现不了的。当年土改时，有的地主也用这个办法掩藏财物。但那时，对不老实的地主家，连墙都拆了，房也扒了，人也抓走了，用这法不管用。但搜粮队跟斗地主毕竟不同，所以老王头的小米留下来了。但愿老王头和所有的中国农民，永远、永远不要再用上这个办法。（插一句，面对现在的“强拆”，这个办法也没用了。一百年以后的读者，不知道能不能看懂这个词。）

西门外，过了以前白果树的那一大片，八队的各户都在往这儿推泥坯。不但男劳力在推，几个妇女也在推。赵玫、丁妹身体壮实些，自不当说，连车素花、小林也推着小车过来了。

赵玫正空着车往回走，见着车素花歪歪扭扭地推着满满一车过来，忙停下来拦住，“素花姐，你这个年纪，可要小心别扭了腰，还是我来吧。”

车素花说：“咳，你一个人家里家外够你忙了，不能再麻烦你了。”

赵玫说：“这点活对我不算什么，快把车给我推吧。”

说着赵玫就拿起了盘绳，控住了车把，让车素花闪在了一边。

“老经怎么不出来帮你一把？”

“别提了，我从不指望他，就当他没回来。”

“素花姐，你就在这歇歇，帮我看一下车，我推过去就回来。”赵玫说着就往西门外去了。

丁妹也推着空车回来了，看见小林挺吃力地过来，连忙放下车，跳着跑过去。“啊呀，这可不行，你已经二个多月了，还干这重活，不行啊。”

车素花在旁边听见了，问道：“是吗？我还不知道呢。这可不行，小林，快放下。”

小林停下车，喘了口气，说：“我想不要紧吧。”

车素花说：“要紧就来不及了。快坐下，让丁妹帮你推过去。”

王山，有力气，从另一条田间小道往回走，虽然坑凹不平，却可以抄近路。前面有个妇女肩上前后背着几个包袱，手上领着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看上去走得很累。

“是谁呀？”王山想。走近一看，原来是连二嫂。

自从连二娃1959年冬天修水渠开石头时被炸死后，连二嫂日子过得很艰难。别人家有男劳力的都过不下去，她一个孤儿寡母，坚持下来，真是不容易。

王山这儿看连二嫂，穿着上下都是打补丁的灰白的衣服，洗得挺干净，尽管也只三十刚出头，脸上明显的疲惫和憔悴，一步步艰难地走着。

王山在背后问上了：“是连二嫂吧？走亲戚去啦？”

连二嫂回头，浅浅地笑了一下，说：“是王大哥啊。我回了一趟娘家，带了点杂粮回来。”

连二嫂家里没有劳力，这些年靠回娘家补贴点。她娘家是臧各庄，离龙头十来里。娘家哥嫂待她不错，知道她日子艰难，虽然谁也不宽裕，可还是叫她一年回来二、三趟，拿点什么回去，从地瓜蔓、麸皮到孩子穿小了的旧衣服。连二嫂就是靠这些苦撑下来的。

王山对连二嫂也很同情，尽管以前跟连家没什么往来。他忙说：“把包袱放到我车上吧，看你背得很累。”

连二嫂看了王山一眼，心里挺感激的，但嘴上推辞说：“你们干活这么辛苦，哪能再叫你添累。”

“我这也是空车，顺路。放上来吧，不嫌脏就让孩子也坐上来吧。”

孩子看着王山，又望自己的妈妈，轻声地说：“娘，我走累了。”

连二嫂叹息了一声。

王山把孩子抱进了车篓子里，包袱放在了另一侧，推着就往前走了。连二嫂在后面跟着。他们是不是还在说着什么，还是没说什么，我们就听不清了。

这很平常的一幕，叫还习惯于坐在没有了白果树的白果树桩边的那几位民主村的妇女看见了。她们几个的婚姻家庭有着各自的伤痛。小林虽然是新婚，却没有新婚的喜悦，更多的是精神和生活的压力，她的话已经不多了。赵玫看见了，当然会从连二娃想到去了台湾的连四娃，再想到自己的丈夫董平章，也没有说话。丁妹不大理会外面的事，一直低着头，尤其是对自己的大伯子，更不会插话。

只有车素花开口说了：“我看他们走到一起就可以。”

“你又瞎掰了，人家王山还是大小伙子呢。”赵玫说。

“哎，你没看见皮安己闹退婚那个动静多大，对王山影响挺大的。”车素花解释说。

赵玫推了推丁妹，说：“你说，他俩能连得上吗？”

丁妹把头低得更低了，“这事，叫我咋说呢。”

车素花大大咧咧地说：“这事，你不用说，我去找你娘说。”

为这事，车素花还真去找了王大妈。

八队的春耕开始了。

太阳升起不多久，平金刚和包金贵扛着两架前两天已经擦亮了的犁，往西门外去。

别的事情才开始有变化，西门口电线杆上的喇叭倒是先响了。那调门可没受饥荒的影响，跟以前一样地响：

“我们走在大路上，

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

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向前进，向前进，

革命气势不可阻挡！”

这激越的歌声，没引起他俩的多少兴趣。挡不挡的，没人管，有谁还来挡过你办人民公社？还是自己没走好摔了跤。写这歌的李劫夫，文革时挺起劲，因为靠上了林彪，文革后受了牵连。大概是因为这几首歌还要唱，后来就宽大处理，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这些歌也都还可以唱。本世纪初，左倾大将薄熙来主政重庆时，大唱红歌，这首歌又成为主打歌曲之一。但是人们再唱起来就不是那个意思了。

平金刚和包金贵当然管不了那么多，径直往他们队的地走去。地块已经由大队重新分配和丈量过，基本上和公社化之前的合作社时大体一致，略有调整。

八队的社员们也陆续来到了自己队的地块。

老王头叹了口气，说：“地是合作社的地，犁也是合作社的犁，可就是没有了牛。”

平金刚说：“那我们就重新开始新的征程吧。”

皮安己说：“没有了牛，谁来拉犁呢？”

平金刚说：“那当然是我了。”说着就拿起了纤绳，走到了犁的前面，又对皮安己说：“你来把犁吧。”

包金贵说：“那副犁，就我来拉吧。”

老王头扶着犁，说：“你年纪也不小了，这两年身子骨又不行，还是叫王山拉吧。”

平金刚说：“这犁一个人拉不动，多几个人吧。长贵，你们几个小年青过来拉绳。”

一个犁前面有二、三个人拉。犁启动了，土地又翻起了一道道沟壑。车素花、王大妈跟在后面撒种。赵玫、丁妹她们就到大河边挑水。

太阳在冉冉升起，河边的树枝发出了新绿。春风和煦，摇曳着枝叶，田野里孕育着新的生机。

经过了几年的折腾反复，民主村人又怀着希望，没有更多的怨言，肩负着重担，开始了在自己生产队的土地上的劳作。心里好像踏实些了，能够把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似乎更多一些了，自己的汗水能够更直接地变成自己的粮食了。

39.4求婚

这件事，本来跟“调整时期”没有关系。但也只有在调整时期，才会有这样稍微好一点的心情。不过，好一点的心情就一定会有好结果么？

阴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方农村，端午不算是个大的节。

所以说这一天，是因为停了三年的逢五开张的集市，今天恢复了。晚春的阳光还相当的明媚，人们的心绪也轻松多了。虽然集上的东西没以前多，但四里八乡来的人还是不少。

肖校长也过来看看，这对于他，也是个新的生活场景。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一下子看见了一个在阳光下闪亮的发夹，戴在乌黑的长发上。他知道，那就是赵玫。

赵玫一身素静的衣衫，在卖花布的摊子前看着，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三年了，也需要添一件新衣服了。

肖校长对赵玫心仪已久。他失去妻子已经十几年了，赵玫失去丈夫也是十几年了，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回来的希望了。饿得走路都心发慌，还能跨过海峡去解放别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么，报上也好一阵没提要解放台湾了。他需要有个家，赵玫也应该有个家。他知道赵玫是个好女人，不但外表白皙、修长、端庄，岁月和辛劳没有使她的肤色暗淡无光，相反更像历经阳光和风霜的成熟的苹果，在树枝上愈加散发出诱人的气息和光泽；而且，她处事大度、内心纯真、善良而又坚强。他暗暗地深深地敬佩她。他还把她和自己联系在一起，觉得组合起来那会是很好的一家。他有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表达。想托人去捎个话。可是，李辰的事使他在龙头镇成了孤家寡人，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说话。

今天见到她，真是难得的机会。他走近了过去，又觉得没法开口。她赵玫会怎么想呢？是还在想着身陷敌境十余年的丈夫，还是会看不上自己。肖校长又想，自己的条件在龙头镇是数一数二的，甚至可以说是在纪社长之下，论年龄、收入、家庭条件，尤其是文化程度，应该说是没有可比的。自己应该有这个自信啊。

他靠得更近了，站在了赵玫的身后。

赵玫也已经察觉出来肖校长的靠近，很大方地转过头，问：“肖校长，有事吗？”

肖校长真到了这时，反而有点手足无措，“嘿嘿”地笑着，竟然有点脸红了。

赵玫友好地笑了：“肖校长也赶集啊，想买点什么？”

肖校长这才平静了下，松了口气，说：“赵玫，有个事，我想跟你谈谈。再往前走几步，好吗？”

赵玫嘴上说“好”，心里觉得奇怪，他跟自己会有什么话要说呢。

两人往前了几步，在布摊后面，一家人家的门楼下，站住了。

肖校长咳嗽了两声，望了望赵玫，又低下了头。

赵玫也没催。

肖校长又咳了两声，只好壮着胆子说：“赵玫啊，我觉得你真是个好女人，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家十几年了。我想，你能不能考虑下，我们两个人能不能走到一起？”

完全没料到的是，赵玫一听到这句话，却是从未有过的勃然大怒，还没等肖校长抬起头来，就不顾集市上走动着的那么多的人，大声骂了起来：“你是个什么东西！你出卖了李辰，把人家小俩口害成那个样。你还有脸想这个事，你连做人都不配！”

说完便愤然转身，都没有看肖校长一眼，就大步离去。

谁也没见过，赵玫这个俊媳妇还会有这么厉害的狂怒。

周围的人都看着肖校长，也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认识他。

不管是不是认识，肖校长自己觉得真是无地自容，恨不得有个洞立马钻到地下去。他脸色惨白，人直晃悠，硬是扶着墙才没倒下。他绝没想到，李辰的事会在赵玫的心上，也会刻下如此这般深深的难以磨灭的记痕。赵玫跟李辰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利害关系呀。

他又不能停在这儿，只能在那么多人异样的目光中，慢慢地挪回学校去。

没有一个人问他一下，没有一个人扶他一下。这是他有生以来最狼狈、最失败的一天。

他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回去的。

肖校长回去后，病了好几天。

第四十章 右派摘帽

1949年7月10日

40.1 喜出望外

6月的一天，学校快放暑假了。太阳光明晃晃的，东门外中学校园里前两年重新栽的树已经有了一些绿荫，知了在“知—知—”地叫着。

上午的第四节课打了下课铃。

李辰打开教室门，两旁还围了不少学生。这个问：“李老师，这次考试难不难啊？”那个问：“李老师，第二章的重点是什么啊？我没记下来。”

肖校长等在门外，有些虚弱却脸带微笑，很友善地说：“李老师啊，有件事，你跟我来。”

李辰很感意外。他并不知道全校老师都知道的肖校长在集上的尴尬事，只知道校长这一阵身体欠佳，好几天没看见了。今天怎么又来找他，脸上还有些近些年少有的笑意，又不好直接问，便对周围的同学说：“你们先回去，下午我再跟你们讲吧。”就跟着肖校长往前走。

刚走到山墙头，还没到办公室，肖校长浅浅地笑着，对李辰说：“李老师啊，要恭喜你呀。”

李辰一怔，“我还能有什么喜啊？”

肖校长说：“县教育局刚来了通知，把你的右派分子帽子摘了。”

“摘帽子？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是右派了，是人民群众的一份子了。”

“真的吗？”李辰激动地拉着肖校长的手，“这就是说我可以拉你的手了？”

“可以拉，我们相互之间可以拉手啦。”

李辰使劲地摇晃着肖校长的手，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我又是人民的一份子了！”

“从这个月开始，就给你发工资了。虽然只按最低的，只有二十四元。比起现在只给生活费，还是要好多了。”

“钱多钱少，那倒无所谓。对我来说，只要有口饭吃就行了。”

“李老师，这事值得庆贺啊。这些年，叫你遭了罪，我心里也不好受啊。好多话，我不便对你说，希望你能理解我的难处。”

李辰说：“肖校长，我不怪你，我从来没有怪过你。我知道，把我打成右派，不是你的本意。”

肖校长说：“好，那以后我们还是往前看，朝前走，发挥你的长处。我看你还是有可能再争取当优秀教师呢。”

李辰说：“谢谢你的好意了，优秀教师我是不敢想了。肖校长，我先走了，我想赶紧告诉小林，让她早点高兴高兴。她为了这事，心里受的伤比我还重。”

肖校长说：“好，好，你快回去吧。”

李辰高兴得像孩子似地蹦了起来，匆匆地就往回走了。

在穿过操场的时候，遇见了拿着饭盒往食堂去的平近芳。

李辰高兴地说：“我摘帽了，平组长，我摘帽了。”

平近芳原本是小学教师，但正是在反右斗争中揭发、批判了李辰，被认为是立场坚定、靠拢组织，所以在龙头小学的位置上恢复组建龙头中学时，不但被留了下来，还担任了年级组长。李辰还因此特地要称呼她“平组长，平组长”的。

然而平近芳每次见到李辰，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有所愧疚？有一点，说不上。我是响应党的号召，还能是我错了？要是说我错了，难道说是党也错了？不可能吧。要是理直气壮，也不是。看看李辰的遭遇，毕竟以前是自己的老师，而且是他把自己带进了自己向往的教师队伍，前两年被弄成那样，遭那样大的罪，不能不说跟打右派、跟自己没有关系。该怎么看这件事呢？自己甚至都不知道是做了件好事，还是错事。反而是同事们、乡亲们好像是为了这事有点疏远了她。还有林海秀那毫不掩饰的愤怒目光，一直刺在她心上。面对李辰，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好。所以每次见到李辰，总是要躲开一些，也很少有话可说。

今天看见李辰老远就高高兴兴地冲着自己说摘帽了、摘帽了，心里直纳闷。她还不明白这摘帽是怎么回事，只好点着头，轻声地说：“好，好。”

李辰倒没想那么多，兴冲冲地走过去了。

平近芳转过头去，看着他一颠一颠的背影，还在想，这李辰，怎么又傻呼呼地，乐什么呀，有什么可乐？我都没有什么可高兴，你高兴什么呢？

李辰满脸喜气地蹦着、跳着跑回了家。这时的中学虽然已经有了食堂，可李辰还是回家吃饭，多少能省点钱。

今天李辰可是特别高兴，刚进院子就喊开了：“海秀，海秀，喜事啊！有喜事啊！”

小林从屋里迎了出来，有些疑惑地问：“什么喜事啊？”

“我摘帽子了！县教育局来通知了，我摘掉右派的帽子了！”

“真的？太好了！可摘帽子是什么意思啊？”小林有点高兴，但还是在问。

“摘了帽子就不是右派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而且从这个月起，开始给我发工资了，不是只给生活费，一个月有二十四元钱了。”

“哎，那太好了。总算可以过安稳的日子了。”海秀靠近李辰，双手紧握着他的手，渐渐地靠在他的胸脯上，眼泪就下来了。

李辰抽出一只手，轻轻地拍着他的妻子，用手擦着她的泪，“这几年可是苦了你了。”

海秀忍着泪，抬起了头，说：“别这么说。谁苦，也苦不过你啊。”

这一句话说得李辰也心头一酸，一颗大眼泪掉在了海秀的脸上。

“不哭，不哭，今天是高兴的日子。李辰，我们不哭。”

“好，我们不哭。咱们今天就包顿饺子吃，庆贺庆贺，赶巧今天正好有个集。”

“好！”

“我这就上集买二两肉，半斤面。”

“你就买半斤肉，多买点面。再把赵玫、鲁队长他们一起叫过来吧。他们为你这事，也一直很关心、很担心的。”

“好啊。”李辰放下课本，就跑出去了。

40.2希望在前头

当小林坐在灶前的草垫上，拉着风箱，锅里冒着热气的时候，赵玫进门了。小林连忙招呼着：“赵玫姐来啦。”

赵玫一面“哎哎”地应着，看见小林坐在地上拉风箱，一步跨进门就扶起她，数落李辰：“小李啊，你怎么还让小林坐在地上，不知道心疼媳妇啊？”

李辰腼腆地说：“那我来，我来。”说着自己坐到地上拉起了风箱。

“水快开了。小林你上炕歇着，我来下饺子。”赵玫说着把小林扶进了里屋，把放满了饺子的高粱杆盖子端了出来。

水开了，赵玫掀起锅盖，往翻腾的热水里下起了饺子。

这时鲁队长两口子进了门。哈妹还是穿着大腰裤子，能看得出来裤裆里包着鼓鼓的一团，走路时叉着裤腰，样子挺怪异。她在1958、1959年大跃进中过度劳累，落下了子宫下垂的病根。又碰上了随后的困难时期，不但没治好，反而越来越严重，子宫都翻了出来，只能在裤裆里用棉布兜着。一些坏小子还在背后起了外号，叫“大蛋”。这不但给哈妹的行走和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更严重的是损伤了她的生育能力。好在鲁队长对哈妹一直感情笃深，呵护有加。

鲁队长看哈妹行走很不便，便说：“要不，你就不去了吧？”

可哈妹说：“这样的高兴事，是一定要去的。”

鲁队长搀着哈妹进门，看饺子正在出锅，咧着嘴笑道：“哈，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我一来就赶上了。”

“哈，哈。”大家都笑了。

不一会儿，热腾腾的饺子就端上了炕桌。李辰结婚时没添什么家具，就新做了一张红漆炕桌。

小林说：“临时想起来的，做得不好，大家尝尝。”

鲁队长咬了一口，“啊哟，肉不少呢，像大肉丸子似的，过年也没吃上这么好的。”

赵玫说：“李老师这事值得庆贺啊。当时我们就都说，哪能这样对人家李老师。”

鲁队长说：“是啊，就算是李老师的意见不对，也不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何况还是瞎联系，刷个白墙就是反革命啦？”

小林说：“不说这些了，现在组织上改正了就好了。咱也不怪谁，当娘的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也有打错孩子的时候。”

赵玫在朋友面前是个很坦诚的人，讲话很直：“就算是打孩子，也不能这么打呀。哪有这么狠的爹妈？”

李辰说：“以后我自己说话也要注意，不能随便什么人面前都照直说。”

鲁队长说：“社会主义也难免会走弯路，我们老百姓也好，上面领导也好，这几年都有很多经验教训要吸取。”

李辰说：“感谢党，又给了我正常工作、正常生活的机会。我在教学上会更下功夫，把工作做得更好。”

鲁队长说：“我刚才来的时候，碰到了纪乡长，跟他说了这事。他也很高兴，他说他还有事，不能一起过来了，叫我带个口信，对你们小两口表示祝福。”

小林说：“纪乡长真是个好。要是领导都像纪乡长那样就好了。”

赵玫说：“现在不是上面领导有所感觉，开始平反、摘帽、甄别了吗。”

哈妹说：“还搞得这么复杂，又是平反、又是摘帽、又是甄别的。就是一个纠错，不就行了吗。”

赵玫说：“恐怕在上面看来，还是有分寸、有区分的，只不过咱搞不清。”

这些不同的名词，确实有不同的含义。李辰现在是摘帽。所谓摘帽，就是你还是个右派，当初搞你没有错，反右没有错。现在是对你进行宽大处理，去掉“分子”两个字，不是阶级敌人了，把你当做人民内部了，可以安排一定工作，但通常不恢复原职级。这你也要好好感谢党和政府，感谢组织和领导。而你自己别心里没数，你还是个右派，一个人民内部的右派。只有平反，才是说上级搞错了，你不是右派，

帮你改正过来，按原职级发工资，前几年没发的一般不补（你也不敢要）。这些话，当时都没跟李辰说。

李辰想得还挺多，问大家：“我的帽子摘了，还有他们的呢，不知怎么样了？”

赵玫问：“还有谁呀？”

“经乡长啊。”李辰说。

鲁队长说：“嗨，别提了。本来摘帽是件好事，可那个经乡长倒是怪了。通知来了，人却走了。”

小林说：“经乡长也摘帽啦？”

鲁队长说：“是啊，上个集来的通知，从上海寄来了一个大信封。听纪乡长说，是对经乡长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甄别平反，恢复工作，回上海报到。”

赵玫说：“那不是好事吗，素花姐又盼到头了。”

鲁队长说：“哪是那么回事啊。老经自己翻腾了两个晚上，就说是自己要回上海了，就这么走了，都没跟素花姐商量以后的日子怎么安排。走的那天，一大早一个人悄悄地走了，素花姐没去送，连经学文也没去送。”

小林说：“怪不得有日子没见到他了。这经乡长怎么这样做人呢？这叫素花姐多为难呀。”

李辰说：“人啊，就是很复杂。你看肖校长，虽然在我的事情上做得有些不对，以他校长的身份本来是可以适当保护我的，他没有这样做。但我看得出来，他也有为难之处。今天，我看他的态度还是蛮诚恳的。”

赵玫说：“哼，这种人。纯粹是小人。根本不值一提。”

鲁队长哈妹两人一笑。他们都知道肖校长在赵玫面前碰钉子的事。

鲁队长说：“是啊，人的复杂，有时就看不透。你看，经乡长应该说是个好人，尤其是能冒着风险，顶着风浪，不肯在浮夸风中随波逐流，这是很不容易的，很值得佩服的。但是在家庭关系处理上就不行了，涉及到道德品质问题了。”

小林说：“有时候坏事变好事，对素花姐来说，又是好事变坏事了。本来，儿子在身边当了主任，老头又回来了，一家团聚，多好啊。这又不知会变成什么样了，真是难有完全称心如意的时候啊。”

哈妹说：“你们小两口总算熬出来啦。小林妹妹，身子要注意啊。几个月了？有五个月了吧？”

小林悄声地说：“是五个月了。”

赵玫问：“都正常吧？有什么事，李辰不懂，就跟我说。”

鲁队长又开玩笑，说：“李老师，你教书行，学生都说你教书好，可伺候媳妇的事还得学着点喔。”

李辰连说：“是，是，以前我心里只有教学，以后要多关心家里，多关心海秀。这才是正事。”

赵玫说：“这话讲对了。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经过这么几年困难时期，大家体会更深了。”

小林看着哈妹，关心地问：“哈妹，你那两年得的病，现在怎么样了？”

哈妹叹气说：“唉，一直不好，还翻在外面，老是疼。吃了一些草药，也不见好。”

赵玫说：“最近镇上开了卫生院，看病方便多了，去看看吧，这事不能拖。”

鲁队长说：“真没想到，1958、1959年的穷折腾，叫大家遭了多少祸害。哈妹遭的罪，还没法跟别人说。”

“唉，前几年真是过的什么日子啊。”赵玫又想起来一件事，说：“对了，李老师的问题解决了，那迟得法的事怎么说呢？他不是也被戴了个右倾帽子么？”

“他的事还真没法办。我特地去问了公社，纪社长说，那是宗发奋随口说的，根本没有往上报，也就没戴帽，算不上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以也就不存在落实政策的问题。”鲁队长说。

“那就太亏待老迟了。斗的时候，按右倾来斗，落实政策了，就不按右倾了。这不是要活活气死人么？要不是被戴上了右倾帽，他家不至于会困难到那个程度，他也不会那样饿死。”赵玫说。

“那个宗发奋啊，做事情最极端。整风整社，怎么没整到他。”海秀也忿忿地说。

“不好说啊，不好说啊。”鲁队长摇摇头，不知什么意思地说着。

少数地方曾在1961、1962年搞过“整风整社”，主要是想纠正前两年“五风”盛行中的一些极端做法，但很快就被“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四清”运动所淹没，没再搞下去。

大家一起叹了一口气，不好再说什么。

停了一会儿，赵玫又起了新话题，说：“王山结婚，你们还去了啊？”

鲁队长说：“王大伯觉得这事有点窝火，也没操办。我第二天去的，送了两条新毛巾。”

小林说：“这事真是的。王山本来是个好小伙子，就因为王大伯1959年受了批，撤了队长的职，皮安己这种势利眼竟然把婚事给退了。王大伯对没当队长倒没什么，为这件事倒是上了好大的火。”

赵玫说：“这几年叫人不高兴的事多了。好在素花姐热心，拉上了这门喜事。其实也行，挺好的。连二娃的孩子留在自己爷爷家，连二娃的房子还是他儿子的，连二嫂自己过来。王大伯还把正房倒给了他们，老两口搬去了厢房。”

小林说：“他们两家都是过日子的人，在一起行。我想比皮家那个闺女强，更实在。”

鲁队长说：“这话怎么说呢？事情到这份上，就只能退一步说了。他们两家，一个王立走了，一个连四娃走了，两家能说到一块儿，想到一起。”

哈妹说：“解放台湾的事，这两年好像也不提了。”

鲁队长说：“顾不上了吧。”

赵玫一下又触到了伤心处，低头不语。

小林说：“十二年了，都十二年了。”

赵玫说：“想那时，1949年，因为打退了国民党的进攻，我们多兴奋啊，好像光明就在眼前。自己家里什么也不顾了，一心一意就是跟着党去奋斗。”

小林说：“赵姐，你还记得吗？国民党反攻那天，我们还去雪花姐家，把她家门板卸下来，到海角去抬伤员。”

赵玫说：“怎么会忘记呢，一辈子也忘不了。我留在场院烙干粮，看着你们一边走一边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赵玫说着就情不自禁地哼起来，海秀也跟着唱了起来，她们俩眼睛都发出了久已不见的亮光，好像是回到了那个充满激情的岁月：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解放区的太阳永远不会落

解放区的歌儿唱也唱不完……”

鲁队长说：“那个时候真值得回忆啊。真是撇家舍业、不顾身家性命，提着脑袋干革命啊。”

李辰说：“还有，你们民主村来我们李家泊的那些日子，我们都好像成了兄弟姐妹一样。”

小林说：“可我们前几年在干些什么呢？政治上伤害好同志，生产上搞浮夸、瞎指挥，生活上陷入困难，社会主义是那个样子吗？革命胜利十几年了，怎么反而成这样子了呢？我不知道雪花姐如果在天有灵，她会怎么想呢？！”

鲁队长说：“是啊，牺牲了那么多好同志，从雪花姐到祖大爷，从大郑到小钱，我们流的血还少吗？我们付出的代价还少吗？我想他们肯定不是为了大炼废铁、虚报浮夸、乱扣帽子、乱打棍子、最后饿死人而去拼命牺牲的吧？”

李辰说：“但是也要看到，这两年又往好的方向变了，就像鲁队长刚才讲的，社会主义也难免会走弯路，党正在进行纠正，政策会更加完善，日子会好起来的。”

小林说：“是啊，会好起来的，希望就在前头，明天一定会更美好。吃，吃，快吃吧，别凉了。”

这几个才端起碗筷，吃起了饺子。

民主村的这几个农民，应该说想得挺深入、挺全面、也挺远的了。但是，他们仍然还是天真了，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进程想得简单了。短短几个月之后，气候又开始变了，变得连纪乡长都不适应了。

一个新的名词出现了，美其名曰“波浪式发展”。就是说社会主义事业也不是一个劲地直线向前，是一波一波地、有高有低地向前发展。当然，总的还是上升趋势，每一波的高点和低点都在不断抬升。话说得看起来是不错，但它的意思是，那些挫折和失败再大都不算什么，不过是波浪的一种形式而已。在名词上、口号上兜圈子、搞花样，是左倾势力的一大本事。再大的失败和灾难，也就掩饰过去了。这并不是掩饰得有多巧妙，而是你不敢说，更不敢去掀开看。

第四十一章 以阶级斗争为纲

1949年7月11日

新的名词、新的提法又出来了。

大跃进一大饥荒之后的调整时期是短暂的，并没有按照当时大多数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愿望继续进行调整巩固、休养生息、恢复发展，而是很快又进入了一个更为残酷和血腥、并且愈演愈烈的斗争时期——社教运动和十年文革，更不用说是去认真思考一下前一段时间的历史教训。因为，类似在龙头公社三千会上纪社长和于村长的讲话，包括这年初七千人大会上对造成国民经济困难的原因和责任的讨论，有些人是很不愿意听的，“心里憋着一口气”，而且，岂止是不愿意听。这些话，在当政者看来，岂止是顶撞，岂止是冒犯。他自己最看重权，总以为别人也是最看重权，一有分歧，一有矛盾，首先想到的就是那小子是在窥视我的权力，想要夺走我的权力，尽管别人并没有想这么多。看起来是个大人物，其实整天想的也还是我、我、我。他决心要反击了，于是，一场铺天盖地的浪涛又凌空卷起。

当然，这种反击不是简单的打将出去，而是有一套精心策划的步骤。首先，要做好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意识形态的工作要做足，这样才能名正言顺。这种倾向很快就出现了，左倾思潮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出现了强化的态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趋势，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

对这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郭德宏等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是这样阐述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对所谓‘基本路线’的通过，标志着‘左倾’错误已经在党中央领导机构中占据支配地位。”这儿所讲的“基本路线”，就是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在这次全会上形成并写进全会决议。

这本书还写道：“……这次‘左’的思潮发展中，起主导和带头作用的是党的最有威望的领袖毛泽东。他紧抓不放，不断发表指示，更使‘左’的阶级斗争思潮带有高压态势和不可阻挡的势头，而逐步升级、越来越‘左’。”

当然，对该书的这段观点也是有不同看法的。有的说，“支配地位”这个措词有点重了；也有反过来说，这还不够，应该用“主导地位”、“统治地位”；还有说，左倾思潮在党内占上风，从1957年夏天就开始了。

先不说该怎么表述更合适，左倾思潮在建国以后的演进过程，还是有明显的线索可循。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这个期间（指1957至1965年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在这过程中，有这样几个节点：有前面提到过的1957年的反右、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现在讲的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及后面要讲的1965年的二十三条和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等。至于对这几个节点分别冠之以什么措词，怎么定位：是用启动、

形成、发展、顶点这些词，还是用系统化、理论化、纲领化的说法，以及对左倾是叫左倾思潮、左倾错误还是叫左倾路线，等等，这些问题，本书不去探讨了。留给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们去仔细斟酌吧。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邹讷先生在谈到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时说：“中国要发展自己的政治学，就要建立起无数的，至少是多数的，不同的政治学体系。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治学体系，这个国家就没有发展真正的政治科学的可能。”（请见：《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邹讷，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

不只是政治学，历史学等等也是类似的这个道理。当然，本书无意建立另一个新的政治学的或是历史学的体系。但本书在读者有兴趣观察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发展进程时，可以提供一个多元的而非单一的参照系。

回到我们的西北村吧，那儿会怎样呢？

41.1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1962年的秋收真不错。这一年的天气很顺人意，夏天里常常是晚上下雨白天放晴，地瓜都长得鼓出了垄。人们庆幸着，好日子又来了。

不过时钟并没有让人们消停下来。秋收一结束，宗书记便来到民主村，在西北场院里对全体社员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演讲。

“现在我要讲的是，毛主席在前不久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作的重要指示。他老人家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于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他老人家还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非常的重要，为我们今后的一切工作指明了方向，就是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也不管什么工作，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放在第一位。千重要、万重要，阶级斗争最重要。”

宗书记又瞪着眼扫视全场，拿着文件的手在空中挥舞了一下，接着说：“当前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目前形势的分析。当前我们的形势，好不好呢？我说很好，但有人说不好。我们的面前有没有困难呢？当然有。我们的工作中有没有缺点呢？当然也有。但是我们的缺点、问题、困难，相对于大好形势来说，只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是可以克服的。上头说得很清楚：‘错误就那么一点，没什么了不起’。但是现在就有人刮起了‘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把党的领导说成一团漆黑，甚至还想翻‘反右倾’的案，翻‘反右派’的案，真是猖狂至极。反右倾、反右派是完全正确的，是铁板钉钉的，永远不能翻案。我们现在对右倾、对右派的甄别也好，摘帽子也好，是表明我们党宽大为怀，是为了促进对他们的改造。这是把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是说他们就没有问题了。性质还是敌我矛盾，这一点大家心里都要有数。”

小林坐在角落里，听到这儿皱起了眉头，心里一阵阵地揪着疼。

“有些人否定大好形势，是有着不可告人的阴险目的。他们企图通过否定我们的工作，来否定三面红旗，否定我们党，否定党的领导人。险恶用心，何其毒也。”

对于前两年出现的困难，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把责任归咎于党的领导人，这是十分错误的。正确的说法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所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错误说法，将会受到批判。你们想想看，这种说法是想要否定党的领导人，该是什么罪名？”说完这句，宗书记神秘地点着头。

于村长听了，心里也是一咯噔，这不是在讲纪乡长嘛，宗书记怎么能这样讲呢？

宗书记没顾及下面听众的反应，继续说着：“我们所讲的七分天灾三分人祸，首先是指我们遇到了百年不遇的最严重的连续三年的全国范围的自然灾害。其次是三分人祸，这就是帝修反对我们的封锁破坏捣乱。对于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大家都很清楚，我不多说了。就说这个苏联修正主义，以前的苏联老大哥，现在也变修了、变坏了。当初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流血牺牲，死了多少战士，但他们现在反过来向我们要子弹钱，多卑鄙呀！而且趁着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吃不饱饭的时候，才来向我们要钱。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给他！就算他不要，我们也给他。就算自己饿肚子，也给他。他妈的，他们算什么东西，不欠他们的。我们海源的苹果也出口给他，抵钱还债。可他们还挑三拣四，用大格子筛，漏下来的都不要，这么大的苹果。”宗书记握紧了拳头，给大家看，“连拳头大的苹果都不要，还要挑更大的才行。多么狠毒啊。”宗书记的脸上显示着愤恨至极的表情。（说明：关于苏联政府的“逼债问题”，请参见本卷第二十八章第三节提到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2期的一篇文章“解放后苏联援华的历史真相”。那里面，对此有所说明。）

接着，宗发奋话锋一转，换了一种极为鄙视的表情，说：“你们不要以为修正主义就能过上什么好日子。他们吃的是什么东西呀？还赶不上我们呢。你们看，我带来了一块黑面包。”

宗书记从口袋拿出一块用报纸裹着的東西，打开报纸，里面是一块暗黑的粗糙的发了霉的面包片。宗书记捧着向全场的观众左右移动展示。秦德才伸过脖子，想看个仔细，不知趣地问：“这还好吃啊？”

宗书记拍了一下秦德才的脑袋，“你就知道吃！”又对着全场说：“你们看啊，苏联的老百姓就吃这个啊。这么黑的东西，狗都不吃。苏联人民群众遭罪啦。所以我们一定要大搞阶级斗争，反修防修，不然也要像苏联那样资本主义复辟，就会亡党亡国，也要吃这种黑东西，甚至还要千百万人头落地。请同志们想一想，那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啊！不但如此，我们中国人民肩上的世界革命的任务，大大加重了。以前，我们是说，要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现在，苏联东欧变修了，我们的任务是要去解放全世界四分之三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了！世界革命的重担，全靠我们啦！同志们，这是个多么艰巨而又光荣神圣的任务啊！所以，我们要紧抓阶级斗争永远不放。”

宗发奋展示给大家看的，是一块不知从哪弄来的燕麦面包片，大概是时间长了，都长了霉斑了。中国的老百姓没见过那东西，咋一看，以为很黑很粗糙很不好吃。其实，燕麦面包本该是咖啡色，口感较好，营养也比小麦粉的要好，是俄罗斯人民喜欢的一种食品。为了增强反修防修的宣传效果，宗发奋们真是挖空心思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顺便讲一句，我们通常说馒头是用“面粉”做的。其实，这个说法不够确切。“面粉”这个词的本义是指粉末状的物体，北方称之为面，南方称之为粉，合起来叫做面粉，只说明物理状态，不说明化学成分。它的标准学名就是叫“小麦粉”。

宗书记停下来，喝了一口水，冷冷地一字一句地说着，“回过来看，你们民主村有没有阶级斗争呢？有人会说，民主村的地主富农都在解放战争中消灭了，一个活的也没剩下。这样就没有阶级敌人，就没有阶级斗争了，是这样吗？地主是没有了，但有没有人站在地主的立场上呢？有没有人脑子里是地主阶级的观念呢？有没有人不满意社会主义、不满意党和政府，老是唱反调、消极对抗，起着地主没有起到的作用呢？我现在不点出来，你们自己去想，自己去留心观察，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一场阶级斗争的暴风雨就要来啦。让我们迎接这场革命的洗礼吧！”

宗发奋十分潇洒地结束了讲演。他自己很得意，觉得今天是超常发挥，一定会取得超出意想的效果。十几年来，他这方面的水平确实是见长了。

果然，疑惑的阴云又笼罩到了人们的脸上。大家不知道将要发生的是什麼，明天又会是什麼要降临到他们的头上。

散会时，乡亲们是面面相觑，不敢多问，悄悄地往外走。

鲁队长问走在一边的老王头：“今天这讲的，又是什么意思呢？”

老王头也没回答。大概是觉得事情不妙，又说不上来，心头一阵阵地沉重，连礼节都忘了，自顾自地低着头走了。

41.2忆苦思甜

1963年元旦后的寒假结束了，新的一个学期开始了。

下午，课后，史地教研组的办公室。李辰坐在办公桌前，好像在思索着什麼，桌上依然堆满了书本和练习册。加强阶级教育的精神也传达到了龙头中学。李辰很想表现得更好一些，加上对工作一贯很负责任的习惯，正在认真地思考起来，应该做些什么呢？

肖校长从窗外走过，看见李辰在深思，便走了进来，问：“李老师，在想什麼呢？”

“哦，肖校长啊。”李辰忙站了起来，说：“近来您几次讲过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我在想，对学生，我们能搞些什么活动进行这方面的教育？”

“想得好啊，你有些什麼具体设想吗？”

“我在想，可以搞个忆苦思甜会。现在的中学生离解放前都已经十几年了，都不知道劳动人民在旧社会受的苦，不知道地主怎么欺压穷人。”

“你考虑得很好呀，就以你那个班作为试点，先搞一次，然后全校各个班推广。找谁来讲，比较合适呢？那个秦德才怎么样，苦大仇深，又是烈士家属。”

“秦德才不行。那个人是典型的游民习气，讲话没有谱。”

“那谁合适呢？你对民主村熟悉，想想看。”

“哎，就在我们学校食堂做饭的邬大妈就行。她是贫农出身，她丈夫为革命牺牲，她儿子又是部队干部。既是烈属又是军属，难得啊。而且她这人讲话实在，不会瞎说。您看怎么样？”

“行，行，就这样。你去跟她讲一下，定个时间就开会，到时候我也参加。”

星期六的晚上。李辰担任班主任的班级—初一（二）班的教室里传出了稚嫩而又动情的歌声：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

全部生活都在两只手上……”

李辰一挥手，对大家说：“先停一下。这首歌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同学们，你们想听过去的事情吗？”

“想！”同学们齐声回答。

“是的，同学们，你们没有经历过那个万恶的旧社会，没有见过地主老财怎么凶狠，你们就不知道先辈们为什么要起来闹革命。今天，我们请来了民主村的邬大妈，就是平常给你们做饭的邬大妈呀。她在旧社会里可苦啦。她丈夫，邬大爷，就是为了推翻地主老财的统治，出来闹革命而英勇牺牲了。现在，我们请她讲讲她是怎么过的苦日子。”

孩子们瞪大了眼睛，看着平日里给他们做饭的邬大妈，今天要给他们讲课了。王溪坐在第一排，神情更认真，她还能记得幼年的苦难，在想着旧社会还会更苦啊。

肖校长和几个老师坐在最后一排，听着。

在孩子们的掌声中，李辰走到邬大妈跟前，伸手指着讲台，说：“邬大妈，请上台。给我们同学们讲讲过去的苦日子。”

邬大妈在前面站了起来，推辞着，“我就站在这儿讲吧。”

“上去讲，上去讲。”李辰再三请着。

孩子们的掌声更热烈了。

邬大妈推辞不过，三步两脚地上了台，眼睛往下一看，哟，黑压压的一片，都分不清眼睛鼻子，心里刚想着“当老师上课这活，也不好干呐”。下面又是一阵掌声催促着。

邬大妈赶紧收起目光，瞧着讲台的桌面，说了起来。“要我讲讲苦日子……嗯，那个时候，日子可真苦啊。唉！饭都吃不上，只能挖野菜，野菜没有那么多，只好挖草根。味道苦，嚼不动也得嚼。实在咽不下去，可是肚子饿啊，硬是含着眼泪往下咽。到拉屎的时候最遭罪了，屎干得拉不下来，得用手指去扣，腚沟眼那个疼啊。”邬大妈掉了眼泪。

下面有个小男孩竟然哧哧地笑了。

肖校长马上在后面拍了一下桌子，喝道：“不许笑！解放前贫下中农苦成这样，你还笑，还有阶级感情吗？”

教室里静悄悄的，孩子们又认真地听着。

邬大妈抹了抹脸上的泪，接着说：“唉，食堂解散了，又不发吃的，家里又没有存粮。那一年，真难呵，实在没办法呀。”

李辰听了一惊，忙问：“邬大妈，您这是说的哪一年？要讲解放前。”

邬大妈说：“我这讲的是苦日子呵，是前两年的苦日子呵。”

李辰急得手拍着巴掌，“你说解放前吧，地主怎么压迫你的。”

邬大妈睁大眼睛说：“解放前我都记不起来了，我就记得前两年饿肚子的事了。那日子，实在是难熬啊。”说着便呜呜地哭起来了。

邬大妈怎么能不伤心呢？她家儿子在部队还是干部，家里是军属，口粮有照顾，但还是不够吃。两个亲家身子弱，没顶住，虽不能说就是活活饿死的，却也是又饥又病，撒手而去。儿子回家来看过，也没有办法，叹着气、掉着眼泪走了。

李辰连连叹气，眼睛看着肖校长。肖校长摇摇头，没吭声。

李辰只好对学生说：“同学们，我们唱准备的第二首歌。”

教室里又响起了稚嫩、深情的歌声：

“天上布满星，月芽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怨伸，

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

千仇万恨、千仇万恨，涌上我的心……”

这事传到了宗书记的耳朵里，把肖校长喊了过去，狠狠地骂了他一通。

“肖福兴啊，你昏了头啦？怎么叫一个右派搞这种活动呢？李辰搞的这套就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这是右派分子在向党猖狂进攻，诉社会主义的苦，诉共产党的苦，还诉给下一代听，真是罪大恶极！”

肖校长问：“他不是已经摘了右派的帽子了吗？”

“糊涂！右派摘帽还是右派，性质还是敌我矛盾。1957年的反右派是不可能翻案的。要不，我们是在干什么，反而成了我们犯错误啦？决不可能！”

肖校长说：“他本来还是想给学生搞个阶级教育，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的。”

“呸！他是什么阶级？上级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剥削阶级，右派分子就是阶级敌人。你怎么糊涂到这种地步？他搞这种活动，你知道不知道？”

肖校长赶快推脱，说：“不知道，我事先不知道。”

“那个姓邬的老太婆，是个什么人？家里是什么成份？”宗发奋想从这儿打开缺口。

“她家是烈属，她儿子还在部队上呢，大概还是个连长。”

宗发奋皱着眉头想了想，问：“她儿子是个部队干部？那天李辰被放回来，是不是就是他驮着那个右派回来的？”

“这个，我倒不知道。”肖校长如实说。

“这事情就这么巧？”宗发奋冷笑了下，说：“这里面的关系，就复杂了，要往里深究啊。”

宗发奋又想会儿，追问道：“对了，民主村有一户姓李的地主，被杀光了。这个李辰和那个李家是不是亲属关系？”宗发奋还真能联系。

“好像不是，没听说过。”

“好像不是？我立即去查。我们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李辰这种猖狂表现，肯定是有阶级根源的。这不就找出来了。”

“就算是远房亲戚，还有什么关系吗？”

“你是党内的糊涂派！那些‘杀关管’的家属，就是被人民政府杀了的、关起来的、被管制的，这些人的家属，对人民政府必定有刻骨仇恨。他们是人还在，心不死；人不在，心更不死啊。我们要重点监视他们。”

现在，宗发奋连训人的口味也有点变了，特别喜欢训肖校长这样的知识分子。他觉得训个没文化的乡间老百姓，都有点没劲，训个知识分子才有一种特别的满足感和惬意。尽管他和肖校长之间并没有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肖校长想起在土改中被满门抄斩的妻子，无言了，脸色一阵苍白，只觉得手脚冰凉，一直凉到心头。

第四十二章 学雷锋

1949年7月12日

42.1 日记风波

1963年的春天，全国又开展了一场学习雷锋的活动。

雷锋是沈阳部队的一个士兵，生前在日记里写下了很多自己所做的好人好事和一些人生感悟、豪言壮语这些。

在上级的号召下，各地方、各层次、各行业都掀起了一阵阵的学习热潮，尤其是在年轻人中更为热烈。龙头镇、民主村也有不少积极分子，秦有理就是一个。

秦有理是谁？还得回想一下。秦有理是姜雪花和秦德才的儿子。姜雪花牺牲时，秦有理才两三岁，秦德才又整天不管孩子，不着家。邻居齐大妈看不下去，帮忙看了两年，结果反倒起了矛盾，没落个好。乡政府就把秦有理送到了黄港儿童福利院（被错当成革命遗孤的辛狗狗，现在叫党爱国的，也在那儿）。在福利院里长大的秦有理，挺能干，也挺求上进，可能是有种政治上的优越感，想要处处超越他人的架势逐渐明显。福利院颇感不悦，便以已满十四岁、家中又有亲生父亲为由，把他送回了龙头。可是秦德才还是连自己都管不好，更不去管儿子。乡政府只好把秦有理安排在中学里住宿，接着上初三，还当了班长。

自开展学雷锋，秦有理也很是积极。他知道自己作为学生干部、作为烈士子女，一定要带个好头。早晨，比别人早起打扫学校的操场。学校没有自来水，都是轮流值班挑水。秦有理是不管轮不轮到，都要去抢着挑。

五月了。一个星期天的上午，秦有理坐在教室里写日记，把早晨干的活都写上了。可是这些活大家也都在做，有什么稀奇呢？按书面的说法，就是事迹不够突出。怎样才能突出？他正在为这事绞尽脑汁，伤神呢。雷锋日记里有扶老大娘过马路，可龙头镇上很少有汽车，过街根本不用扶啊。雷锋日记里有帮一个大婶抱孩子，送她回娘家。可这样的事，怎么就碰不上呢。要不就写个帮大爷大伯种地？可现在都是生产队集体劳动，种地也轮不上他。哎，对了，要不就写个跳下河去救落水儿童，这个事迹可是突出啊，跟罗盛教差不多了。救谁呢？不能写救民主村的，也不能写救龙头镇上的。镇上的人，谁都认识。谁掉了河里，大家都会知道。写个远一点的。哪儿是远处呢？赵村。对，赵村就在大河边，而且秦有理所知道的比较远的村庄，也就是赵村了。

秦有理刷刷地就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上了：今天上午，去县城的途中，走到大河边，突然发现赵村的一个小男孩跌入河中。自己的脑海里马上想到了跳入冰窟的罗盛教，想到了勇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想

到了自己的母亲姜雪花，想到了无数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们。那些高大的形象鼓舞着我，他们在向我召唤，给了我无穷的力量。于是我立刻不顾刺骨的寒风，毫不犹豫地跳进了冰冷的河水，救起了这个男孩。虽然身上是冷的，但心里是热的。我终于向雷锋同志学习了，做了件革命青年应该做的好事。当村里的老大爷夸奖我，问我叫什么名字时，我谦虚地说，没什么，这不过是我应该做的，我的名字就叫“学雷锋”。

秦有理写上这一段之后，合上日记，自己也挺满意。多好的一个事例，要是让大家知道了，那多光彩啊。说不定能作为全校，甚至全县的学雷锋先进典型呢，老师们想找这样的还找不到呢。他看着课桌上的日记本，又挠起了头皮，怎样才能让大家都知道呢？他看了一会儿，又打开了，翻到刚才写的那一页，摊开在桌上，自己起身离开了教室，走出了学校，真的往赵村的河边那儿去了。

穿过龙头镇，出西门口，到了赵村的大河边，这几里路对于一个小伙子来说，实在是不算什么。村口的河边，有几个妇女在洗衣服。她们拿着棒槌在石板上敲打，这是北方妇女一种典型的洗涤方法。也真有领着孩子的，可大人都看得挺紧的，孩子们最多就是拿手拍打几下岸边的波纹，没有踏进河里的。再说阳历的五月，还没到下水玩的时候呢。

秦有理东瞅西瞧，看了好一会儿，也等不上救孩子的机会。眼看太阳快要到头顶了，得回去吃午饭了。为这事，少吃一顿饭，还真是不合算。他不再等了，走到村北，人少一点的地方，自己下了水。河水还真有点凉，怪不得小孩子不下水呢。秦有理找了个水深一点的地方，把全身上下都弄湿了，赶紧上岸。把湿衣服一脱，拧拧干，搭在肩上，在几个妇女异样的目光中往回走了。

秦有理就穿了个短裤衩，风吹得凉凉的，好在小伙子身体棒，不觉得什么。但路上的人都怪怪地看着他，使他不好意思再从镇里的大街上走，改从镇南面的小路，返回学校。

还没等他回到学校，秦有理“救人”的事迹却已经传开了。因为他的日记被别人发现了。

跟父亲下放回来的申光荣，也在这个班。因为父母双亡，政府给了一点救济，村里给了一点补助，也在学校里住宿。申光荣年龄小一些，个头也矮一些，由于身世的不幸，自卑和激愤在心里兼而有之，不过跟秦有理处得还不错。他自己觉得在别人眼里像是半个外来户，说话没人听，只能跟在秦班长的后面起个哄。

快到午饭的时候，他跟几个同学从外面进来，一眼就看到了秦有理放在课桌上的那本翻开了的日记。

“哟，谁的日记呀？”申光荣有点明知故问了。

“是班长的吧？”王溪说。王溪也是他们班的。现在王溪可是出落成大闺女了，个头比申光荣还高，不过头脑还挺简单。

“在他桌上，不是他的，是谁的？”于又发没有好气地说。他们几个年龄前后就差一两岁，所以都是一个班的。不过于又发跟秦有理不是很融洽。

“我看看，我看看。”申光荣很积极，拿起日记就看上了。看了不一会儿，就大声叫了起来：“哎哟，不得了啦，班长做了件大好事啰！”

“什么事，什么事呀？”王溪问。

“班长下河救人了。”申光荣还在叫喊着。

“下河救人？什么时候救的？”迟解放站在最后面，这时才开了腔。他比较稳沉，虽然还是孩子，却不是个随大流的人。

“我看看，我看看。”王溪把日记拿过来，又看了看，“就是今天上午哎。”

“那快去告诉老师吧，这可是大事情。我们学校也有活雷锋啦！”申光荣挺夸张地叫着，跑出了教室。于又发和迟解放没动，王溪迟疑了一下，跟了出去。

他们的老师是平近芳，又是他们的年级组长。平近芳看了那日记，也觉得是个值得一说的大事，那可是她年级的学生，是她教育的结果哎。于是平近芳带着申光荣和王溪两人去找肖校长。

正在这时，秦有理从校门外回来了。他浑身湿漉漉的，光着膀子，就穿着短裤衩，右肩膀上扛着一摞淌着水的湿衣服，前面用手抓着。

“救人的英雄回来了，救人的英雄回来了！”申光荣大声地嚷着。

很多学生从教室里出来看，申光荣就不停地向大家解释着。

秦有理装着不好意思地笑着，轻声地说：“没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不就是救个小孩嘛。”

平近芳拍着秦有理的肩膀，挺关心地说：“快回宿舍换衣服去吧，别冻着了。”

这时于又发、迟解放挤了过来。于又发却迎头质问上了：“秦有理啊，这事不对吧？你这是救人才回来，怎么日记里先写上了呢？”

“这……”秦有理没料到还有这一手，一时竟支吾起来。

“去救人就行了，早点写，晚点写，有什么关系呢？”申光荣在一旁帮腔。

“别说啦，别说啦。都先回去吧。”平近芳和着稀泥。

“平老师，学校应该去赵村调查一下，到底怎么救的，救了谁？”迟解放认真地说。

秦有理一听就急了，吼了起来：“你们怀疑学雷锋啊？雷锋日记里的事情，你也一件一件都去查过？”

“我们不是怀疑学雷锋，我们是怀疑你。”于又发也一步不让。

“快走吧，快去换衣服吧。”平近芳知道在这儿僵着不好，就推秦有理先走。转头又对于又发他俩说：“这事，我去向肖校长汇报。”

肖校长的精神这几年大不如前，听了平近芳的汇报，也有点为难，沉吟了一会儿，低声说：“这事也别去调查了。咱来个既不批评，也不表扬，以后就不提了。”

平近芳想了想，说：“这恐怕也不行。要是别人，也就算了。秦有理不是一般学生，他真要是救了人，咱这样处理，就不好办了。”

肖校长也无奈，直挠头，“为这事，还要去找县教育局？”

“要不，先问一下宗书记？”

“好吧。”肖校长也没有别的办法。

“就这么个事啊？我说你呀，肖福兴，亏得你没去找县局。去了，不是找骂吗？”

“秦有理这事，首先你要肯定积极性，肯定大方向。人家有政治觉悟，愿意表现一下，好嘛。总比一动不动好吧？”

“去查什么查？具体事情做了没做，做到什么程度，都不是实质问题。雷锋的事情，谁还去查过？别想不开了。十件好事，做了九件，少做了一件，哪有什么关系。那不就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嘛。主流是好的，本质是好的，就行啦。对于革命行为，不要老是在后面挑剔指责。”

“1958年大跃进，把一亩地打几百斤说成是几万斤，谁都知道是假的。怎么啦？讲了，怎么啦？没有哪个人因为讲了假话而受批评吧？相反，谁要是不知趣，敢讲这不是几万斤，才是几百斤。打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是轻的。”

“想开点吧，肖老兄。你肚子里的墨水比我多，但是那些东西没用。要讲政治，讲大局，懂吗？对秦有理，回去要表扬。通过表扬，只要能鼓励起大家学雷锋的热情，就行了，有这个效果就行了。至于被表扬的具体事情，就不用讲那么细了，有没有，都没关系。甚至连那个做好事的人有没有，也没关系，只要别人都跟着去做就行了。搞了这么多年的政治工作，还没明白这些啊？”

“唉，我要是你啊，在学校里面，有那么多年轻人，早就把局面搞得轰轰烈烈的啦。”

不用介绍，听这口气，就知道是宗发奋在振振有词、毫不客气地数落着肖校长，尽管他们并不是上下级隶属关系。

肖校长被训得一点脾气也没有，不住地点头。

42.2团日活动

还是有认认真真学雷锋的，那就是民主村的团支部。

没过几天，龙头镇正逢赶集。早晨七、八点钟，人们推着车，挑着担，从四处三三两两地进镇来，东西街、南北街已经摆上了一些摊子。

一队年轻人正从北街的西侧往南走来，这是民主村的共青团员们。

民主村的团员队伍，解放后变化不大，增加的新成员主要是从中学毕业回村务农的；超龄的团员，退团年龄都挺大，只要还愿意参加活动，没有去催他退的。也很少直接吸收新团员。团支书，这几年一直是彭小宾。

这几天，他们就一直在商量搞一次团日活动，踏踏实实地向雷锋学习。商量的结果，就是今天在集上进行宣传和进家里帮助烈军属。这不，今天几个年轻人从北门口往南沿街贴标语。当年和姜雪花对门的邻居齐大妈的儿子，二十多岁的齐成材，扛着一摞红绿彩纸条写的标语。是肖校长的儿子肖胜利，昨晚花了大半夜写出来的。他还在中学上学，但对这样的社会活动很乐意参加，不但连夜赶写标语，这会儿跟着村里的团员们，拎着糨糊桶，拿着刷子，沿街刷墙，齐成材往上贴标语。

肖胜利在一家人家的墙上刷好了糨糊，却看见齐成材眯细着眼，还在往地上东寻西找。肖胜利催促说：“找什么呀，掉东西啦？”

齐成材大概是近视眼，但在农村当时没有戴眼镜的，怕别人笑话，所以没配眼镜。平常看东西就眯细着眼，还是常被人笑话。齐成材挺失望地说：“唉！我在看地上有没有掉的钱。要是拣到了，交给大队部，也是我们学雷锋的一个成绩。”

衣大妈的闺女衣春玲笑着说：“就你这眼神，还能找到啊？就算是塞到你口袋里，也看不清是几毛钱。”衣大妈是赵玫的邻居，住在赵玫前面一排房。她闺女也快二十了，是个机灵的孩子。

肖胜利说：“找不到也不要紧，晚上回去在日记上，自己写上一段，不就是做了一件好人好事吗？”

衣春玲还是单纯，惊讶地说：“这能行吗？”

肖胜利说：“现在都这样，你以为日记上写的都是真的啊？都是写给别人看的，谁还去查啊？就像1958年大炼钢铁，你说翻几番，就是翻几番，谁还去查你啊。你看那秦有理，不就是那么回事吗。瞎写了一段，还生怕别人不知道，故意翻开，放在教室的课桌上让人看。还说是去救人呢，真可笑！”

这下把衣春玲弄得更惊讶了：“秦有理还是这种人啊？”

齐成材说：“我才不会那么干呢。”

肖胜利说：“快贴吧，再不贴糨糊就要干了。”

他们几个人沿北街南下，一直贴到了十字路口。彭小宾早在那儿等他们了。杜长贵领的另一帮人也已从西门口贴过来了，汇集在这儿。在十字路口的西北角，他们已经占了一小片空地，打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横幅。

彭小宾见到肖胜利他们过来，就问：“你们怎么才过来呀？”

肖胜利说：“齐成材一直想拣钱，好交到大队部，在好人好事登记簿上记一笔。”

彭小宾对齐成材说：“这个时候还有那么多事呢，等散集的时候，你再拣拣看吧。说不定那时候真会有呢。有这份心，也对。”

齐成材还真点着头。

杜长贵有点看不上，是：“嗨，费那个事。不如从自己兜里掏一毛钱交大队部说是捡来的，还省点事。”

彭小宾觉得杜长贵说得也不好，轻轻地推了他一下；“不好这么说。”

彭小宾转个话题，问衣春玲：“皮珊珊怎么没来？”

皮珊珊是皮安己的二闺女，原本是要嫁给王山的，现在也有二十八、九岁了，还没婆家。

衣春玲说：“我去叫过了，她说不来了。以后这样的活动，她也不想参加了。”

彭小宾说：“是啊，她年龄也大了，这两年心情也不好，不来就算了。愿意退团也可以。”

杜长贵说：“那我也应该退团了，我跟皮珊珊差不多大呢。”

彭小宾说：“咳，你又多想了，小伙子跟大姑娘不一样。大姑娘二十五就算老了，小伙子三十岁才开始呢。”

衣春玲就不算了，说：“说什么呢，说什么呢？真是重男轻女，封建思想！”

彭小宾说：“啊呀，我这是两面得罪人，不说了，干正事吧。赶紧排两行队伍，准备唱歌。”

这帮青年人很快在横幅下排成了两行。集上的人们围过来不少看热闹。

彭小宾对着人群宣传开了：“乡亲们，我们是民主村的共青团员，今天来宣传学习雷锋。首先，我们合唱一首歌‘学习雷锋好榜样’。下面有会唱的同志，跟我们一起唱吧。”他说完，向衣春玲点头示意。

衣春玲向前跨出一步，很大方地举起手臂指挥，“学习雷锋好榜样，预备，唱！”

“学习雷锋好榜样，

忠于革命忠于党，

爱憎分明不忘本，

立场坚定斗志强！

学习雷锋好榜样，

毛主席教导记心上。

愿做革命的螺丝钉，

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

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

衣春玲颇有激情地挥舞着双臂，眼睛闪着光芒，额头沁出汗珠，两条短辫子在脑后跳跃。看着衣春玲认真领唱的样子，不由得使人想起了当年的林海秀，是一样的青春，一样的激情，只是换了人，换了时间。龙头镇的上空，在那十几年之后又响起了充满青春和朝气的歌声。

下午，他们又分成几组。一个组由衣春玲领着，去了残疾军人靳喜悦家，帮助打扫卫生。靳喜悦在困难时期，因为有“二等残废”的荣誉证，每年有两次钱粮补助，还能勉强过来。前些年还有了一个儿子，如今也上小学了。

靳喜悦一见到几个年青人进来，说是帮忙打扫卫生，高兴得不得了。忙从炕上坐起来，连说：“坐，坐，你们能来我这儿，我就很高兴。卫生不用你们搞了，坐下来陪我说会儿话，就很好了。”

还有一个组，几个年龄稍大的，由杜长贵领着，来到了曾经的解放战士包金贵家，给他家垒炕来了。包金贵在民主村住了十几年，却不会垒炕，家里也一直没有炕。冬天是很难熬的，困难那几年差点要了他的命。

看到团员来帮自己垒炕，包金贵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在房里转着圈儿，搓着手，家里连开水也没有，只能连连说着：“学习雷锋好啊，学习雷锋好啊。”

这是他到民主村以来最舒心的一天。

这也是西北村的共青团员们充实而高兴的一天。

但是，民主村团员们的这次学雷锋，做了好事却没赚个好。

42.3宗发奋的理论

学雷锋，就是学习他助人为乐、做好人好事，这是人们首先想到的。这对于缓和当时刚从困境中走出来的社会气氛，缓和比较紧张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有益的。现在好多人学雷锋也是这么想的，这种朴素的想法很可以理解。但如果仅仅这样理解，就有点简单化了。听听宗发奋是怎么解释这个事的。

宗书记知道了这事，把彭小宾找了去。小彭原以为这次学雷锋，民主村走在了全公社的前面，时间早，内容多，反映好，公社党委会好好表扬他们，甚至会在全公社推广他们的经验。

可是，宗发奋不是这么想的。宗书记是真想把龙头公社的学雷锋活动抓起来，但你民主村团支部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分明没把我这个公社书记放在眼里么。彭小宾刚走进宗书记的办公室，就看见宗发奋铁青着脸，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宗书记已经拍着桌子，狠狠地批了他一通。那个声音之大，恐怕外面都能听见。

“你们把阶级斗争丢在脑后，去学雷锋，学什么雷锋啊？学雷锋决不是简单地做好人好事，那样理解太肤浅了，把学雷锋简单化、庸俗化了。以为就是扶个老头过个街啊，那个老头要是个国民党呢？不就是帮了国民党反动派了吗？！你们去给包金贵垒炕，他是国民党。你们去帮他的忙，就是帮国民党的忙！”

彭小宾大惊，连忙说：“他不是被我们解放过来，也参加了解放军吗？要不怎么会让他住在我们村呢？”

宗书记怒道：“糊涂！包金贵是国民党，我还不知道吗？包金贵就是我亲手抓来的，因为解放军优待俘虏，才让他留在民主村。”

彭小宾说：“那我们不知道，村里一直都说他是解放战士。”

宗书记说：“学雷锋，也要突出政治，也要讲阶级斗争。你们学雷锋，就学了个皮毛，不，连皮毛也没有学到。我问你，学习雷锋的实质是什么？”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不全面，没抓到实质。学雷锋活动的实质，是雷锋同志最核心的那段话。雷锋说，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同志还特地加上了第三句：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所以，毛主席号召我们向雷锋学习，这才是学雷锋活动的实质之所在。明白这意思啦？学雷锋，也是为政治大局服务的。别不开窍啦，不要只管低头拉车，不管路线方向。当个团支书，什么也不懂，怎么搞的？”宗发奋厉声说着。

这期间，左倾思潮的强化在各个方面都明显地表现出来，比如：不久后开展的城乡四清运动，发动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对杨献珍、孙冶芳、吴晗、邵筌麟和电影《早春二月》、小说《刘志丹》等等的批判），中苏论战、反修论调的升温，以及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等。这最后一点，林彪借着学雷锋活动所作的鼓噪，就是意图为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摇旗呐喊、推波助澜。当然，广大群众做好事的良好愿望与这些是两回事。

宗发奋的话还没完：“听明白了，向雷锋学习，还要强调一点，就是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把你钉在哪儿，你就老老实实地在那儿使劲干，一辈子不动摇。别的事情你就别去操心。至于做了哪些好事，做多做少，做了没有，那都不是实质问题。回去，你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每人买一套。”

彭小宾说：“我们团支部没那么多钱。”

宗书记又是一瞪眼，说：“这就没有办法啦。那我们红军怎么爬雪山、过草地的？少吃一顿饭，不就省出钱了吗？下次你们团日活动，我过来。看你们有没有人手一套毛主席著作。这点都做不到，还当什么团支书。”

宗发奋在这儿讲到的就是那个时代大名鼎鼎的“驯服工具论”。这个理论明显违背了《共产党宣言》所讲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也违背了当前所讲的“以人为本”精神。讲穿了，就是赤裸裸地叫你乖乖地当奴隶。正如易中天先生在2010年8月5日《南方周末》他的一篇文章中说的：“在他们眼里，人民不是人，是工具和武器。工具和武器，又要什么权利，讲什么自由？”易先生还讲到：“把这些‘个人’都变成既没有‘独立人格’，又没有‘自由意志’的齿轮和螺丝钉，那么，组装起来的，将是一架没有人性的机器，一架杀人的机器，毁灭人类的机器。”

笔者想说的是，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最大的意义，还不在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那些具体措施，而在于把“工具”又重新变回了人。我们改革开放成功的程度，就看这“工具”在多大程度上变回了人。

还想说一点，本书没有刻意划分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正面人物说的、做的，不一定都是对的；反面人物说的、做的，也不一定都是错的。至于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由读者自己去分析、理解。不同的读者，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本书没有提供标准答案。本书自身也不是标准答案。按说，小说的作者是不需要直接跟读者讲这些话的。但是，在当下的文化生态里，这些话又不能不说。

再想提醒一句，某些人（包括宗发奋）说的那些话，不能光从字面看，这并非就是他想告诉你的真实意图。当代中国话的难度，不在语法而在语意。不要以为写给你看的、说给你听的那几个词，就是他的本义。要会听得出他没给你讲而要你自己听出来的话，要会说你没说出来而要别人听得出来的话。这是几十年来从上到下一些国人练就的语言本领，宗发奋已经有点领悟此道了。更何况还有正话反说、反话正说、话里有话、话外有话那些更高的伎俩。那些人的“革命语言”，任凭你有三个心眼，也难以“深刻领会”。国人的本事都用到这上面去了，还谈何创造与创新，谈何大作与大师，更遑论诺贝尔奖了。（写这段文字时，莫言还没有获诺奖。另：本书是前后穿插着写的，文字的顺序与写作的时间顺序不一致。）

第四十三章 天上掉下个蒋介石

1949年7月13日

43.1 祸从天降

正当西北村的人们面临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潮的步步紧逼，远在台湾的国民党方面也来凑热闹了。

“祸从天降”这个词，一般是指意想不到、突如其来的灾难，天降不过是比喻而已。老王头一家这回遇到的变故，不但是意想不到，而且还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1963年秋天的一个清晨。

丁妹领着王溪来到海角拾蛤蜊，这已不像前两年是为了果腹，现在是为了改善生活，换个口味。王溪听说丁妹要来海边，也嚷嚷着要跟着，并再三保证不会耽误上学，丁妹就只好带着她来了。

太阳刚升起不久，东方的天空一片橙色，海面上跳跃着五彩霞光，礁石和沙砾边卷起一波波退潮的轻轻的浪花。海风习习吹来，真叫人舒坦，但海边的人往往顾不上欣赏大海的瑰丽。小螃蟹听到人的脚步声，在四处逃窜，有的躲在小石头下，有的扒拉着沙砾往黄沙里钻。王溪忙着翻动小石头，大呼小叫地喊着：“姐，你快来看，这儿有一个。”

丁妹在失神地向着天边眺望，过了一会儿才说：“你自己抓吧。”

“我不敢。”

“这有什么不敢的。”丁妹站在礁石前没有过来。

王溪试着用两只手去抓，小螃蟹也不示弱，一对大螯向上挥舞着。王溪左一下右一下的，就是没有下手的机会。

丁妹还在往远处望着。每次到海边，她都要愣愣地看上好一会儿。今天也不例外。十四年了，整整十四年。别人也许会记不准，甚至记不起到底过了多久，只记得是很长、很长时间了。然而丁妹记得很准，而且连多少个月、多少天，都记得清楚。尽管丁妹不识字，甚至不会加减法，但是她知道到今天已经整整166个月，4226天了！丁妹天天都记在心上。

十四年来，丁妹的内心里有过几度变化，虽然外人，包括老王头、王大妈都没察觉。开始时极度紧张、害怕，好像天都要塌了下来，整夜睡不着，天天想到海边看看，又怕人家笑话，说是就知道想男人。虽然王立对她的感情并不深，但她觉得王立是她的一切，是她的整个世界。她不能没有这个世界，她要找寻这个世界。在接下来的岁月，她始终抱着不灭的希望，盼望着，等待着。从抗美援朝到1958年炮

击金门，她都满怀希望，盼望着解放军能打过去，等待着王立回到她的身边，她也会有个像样的家。可这么多年以来，一次次地希望落空，但是她还是不能没有希望啊。从困难时期以来，饿着肚子，连自己能不能活过来都是问题，丁妹也不敢丢掉这个希望。这个不灭的希望，在冥冥之中支撑着她。虽然度日如年，可帮她度过来的，就是这个希望。一次次的失望，却又不能不想。不敢来海边，怕勾起心中的痛楚，可又想到海边来，看一看那永远看不见的那个远方，天马行空似的思绪一番。

“哎，这是包什么东西呀？”王溪说着，看见在礁石缝里有个五颜六色的纸袋，就拿了起来。袋子上有“台湾糖果”四个字。“台湾糖果哎。”她高兴地说着。

丁妹正走过来，忽然看见地上有一张纸片，拿起来一瞧，是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穿着大军阀的服装，丁妹不知道那是蒋介石。只是觉得不好，肯定不是共产党。翻过来看反面，有好多小字，还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图案，丁妹从没见过国民党的标志，不知道那是啥玩艺儿。

王溪已经拆开了袋子，里面有四颗水果糖。王溪剥开一颗就放到了嘴里，“真甜哎。”回头看见丁妹正愣着看一张纸，边走过去问：“姐，你在看什么呢？”

王溪拿过那张纸一看，就像触了电似地跳了起来。别看王溪年纪小，毕竟是上了学，知道那是什么标志，惊叫道：“国民党，国民党！这是国民党！”

“啊？这是国民党！”丁妹也紧张得脸色发白了。她从来没想到国民党竟然会跑到她跟前来。她第一次真的跟台湾有联系了，脑子一片空白，身子晃悠着差点倒下。

王溪扶住丁妹。丁妹冷静了一下，看着王溪嘴里嚼着什么，就问：“你吃什么呢？”

“喔，坏了，我吃了国民党的糖了。”王溪咧着嘴哭了。

丁妹拿过纸袋一看，后面的下方，也有个小的青天白日的印记。

“这咋办呢？”丁妹也知道跟国民党一沾边，那是要大祸临头的，急得哭了。好在她的年纪要大一点儿，过了一会儿，她往四处望望，幸亏这是一大早，周围没有别人，便拉着王溪往回跑，“快跑，别叫人看见了。”

两人急急忙忙跑回了家，甚至连手上的纸袋和照片都忘了扔。老王头看见姐妹两人慌里慌张地跑进门，觉得纳闷，就问：“咋啦？出了什么事吗？”

王溪拿着照片给老王头看，老王头也不认识，问：“这是谁？”

“蒋介石，这就是蒋介石。”王溪神色紧张地说着。

“啊？！”这一声“蒋介石”不但吓住了老王头，把王大妈、王山也都惊住了，围了过来。

丁妹把前后经过一说，全家人都惊得愣在那儿，一点声息也没有了。这还用说吗？十几年来，二十几年来，谁都知道一旦和国民党蒋介石沾一点儿边，那就是罪大恶极，死无葬身之地。今天怎么让国民党跑进家里来了呢？

“我还吃了国民党的糖。”王溪又呜呜地哭了起来。

王大妈一巴掌打了过去，“你还哭，还不快闭嘴。你真是害人哪！”这是王大妈第二次打王溪，第一次是1959年公社来搜粮的时候。

老王头反应过来了，拿过蒋介石的照片就撕得粉碎，塞进了灶膛，还点了把火，烧了。“这是个大事，在外面，谁也不许说！听见了。”老王头板着脸对全家说。

“还有那袋糖呢？”王山问。

老王头想了一下，说：“你去扔到猪圈里，铲在猪粪下面。”老王头家已经在院子里养猪了。

虽然事情已经处理完毕，但“国民党”却像挥之不去的鬼影似地爬上了每个人的心头，笼罩在老王头的家里。

43.2解药

大陆这几年出现经济困难，使得台湾国民党当局以为找到了机会，企图借机挑动大陆民众怀念国民党，起来反对共产党。他们在东部沿海搞起了空飘和海漂，就是通过高空气球和海上漂浮物向大陆空投和漂流宣传品，还有部分食品 and 小型生活用品。海源沿海当然不会例外，丁妹和王溪也不是唯一拣到这些物品的人。上午，公社就接到了报告，而后迅速层层上报。下午下班前，县里就给公社来了紧急指示。

太阳西斜的时候，龙头镇街上的大喇叭就开始响了：

“社员同志们注意了！社员同志们注意了！国民党反动派贼心不死，向我沿海散发反动传单，凡有发现的社员同志，请务必立即交到公社处理。不得传看，不得藏匿，违者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王溪在教室里上课。下午最后一节课铃响之后，班主任李老师拿着一张纸满脸严肃地走了进来，说：“现在传达县人民政府紧急通知。”除了上面那一段内容外，还有一段话：“国民党散发的糖果、饼干是有毒的，当时看不出来，三五天之后就会毒性发作，全身抽搐、痛苦而死。凡是误吃了国民党糖果饼干的，立即向学校报告，到公社去吃解药，不要误了时间。”

王溪一听，当场就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李辰走下讲台，问：“王溪，你怎么啦？”

王溪先停了一停，就哭着说：“我吃了国民党的糖。李老师，你救救我。”

教室里的同学们顿时都惊愕地看着她。

李辰说：“你稍等等，我就来。”

李辰匆匆忙忙地走出教室，不一会儿肖校长和校医都跟着李辰进来了。肖校长走到王溪身边，问：“是你吃了国民党的糖？”

王溪哭着点点头。

校医摸着王溪的脑袋，问：“有什么不舒服吗？”

王溪又停了一会儿，想了一下，说：“浑身难受。”

李辰说：“那赶快上公社去吧。”

校医问：“还能走路吗？”

王溪眼泪汪汪的，不语。

李辰说：“我来背吧。”说着背起王溪往外走，肖校长和校医在旁边跟着。

李辰背着王溪一直走到公社，到大门口一说，没让去卫生院，说要上政治部。政治部在第一排房，李辰几个人进门一说情况，里面的人目光立即异样起来，拿出本子先做起了记录。不到几分钟，宗书记和两个穿民警制服的派出所公安员也进来了。

宗书记一见李辰，就问：“你来干什么？”

李辰答道：“她是我的学生，我背她过来的。”

宗书记诡异地一笑：“倒挺关心学生啊。”回过头来说：“就是这个小姑娘？是谁家的？”

肖校长答道：“民主村王建悟家的。”

宗书记若有所思地想了一会儿，说：“是那个五九年犯右倾错误，被撤了队长职务的那个吧？”

“是。”肖校长答。

“他家有个儿子四九年跟着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了吧？”

“是。”

“事情会有这么巧吗？同志们，这里面的事情不简单哪！”宗书记又诡异地点着头说。

公安员大声地喝问王溪：“你还捡到什么了？”

“没有了，我捡到的就是糖。”王溪说。

公安员追问：“一共捡到几块糖？吃了几颗？”

王溪一下愣住了，答不上来。

公安员猛地一拍桌子：“说！”

那个公安员一把抓住王溪后脖子的衣领，一下子就把她提了起来：“说！”

王溪吓得直抖，忙说：“一共四颗，吃了一颗。”

“那三颗呢？”

“我大哥把它扔猪圈里了。”

“你自己去的海边？不会吧？”宗书记插进来问。

“我姐领我去的。”

“是不是跑到台湾去的那个人的老婆？”宗书记紧追不舍地问。

“是。”

“跟国民党跑了的人的老婆，表面上领着小孩去海边玩，却正巧捡到国民党的东西。这是偶然的吗？同志们，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就展现在我们面前哪！”宗书记朝着屋里的人大声地说着。

“还捡到什么？”公安员又拎起王溪，继续问。

李辰对这些动作在劳改农场时早已见怪不怪，不由自主地悄悄地往后退着。肖校长还是挺天真地说：“别吓着孩子，放下来问吧，看勒得喘不上气了。”

公安员把王溪往地上一墩，又喝道：“说！”

“我姐还捡到一张蒋介石的照片。”

“啊！”一屋子的人，连宗书记也都震惊了。

宗书记瞪了肖校长一眼，上来抓住了王溪的前襟，大声问：“照片呢？”

“扔到灶膛里烧了。”

宗书记对那两个公安员一挥，大吼一声：“赶紧去搜！”

43.3 百口难辩

宗书记带着公安员和几个公社干部拖着王溪，急急忙忙，穿过两条巷子，不消十分钟就进了老王头的院子。

老王头一看，知道是事情被公社知道了，连忙迎上去说：“宗书记，国民党这些王八羔子真祸害人……”

宗书记根本不听老王头说，猛吼一声：“那张蒋介石的照片呢？”

“我一看就恨得咬牙切齿，立即把它撕得粉碎，扔到灶膛里烧了。”

“烧了？把锅给我掀了，烧成灰，也要翻出来。”

公安员立马进屋，端掉铁锅，扒拉起灶膛里的灰，翻寻起来。

灶膛里没有纸片只有灰。可是公安员很有经验，印照片的铜版纸的灰和农家草木灰是不一样的。他们戴着手套，小心翼翼地捧起纸灰装进他们带来的铁盒里。王山不想看了，要进屋去，不料宗书记大喝一声：“不许动！往哪里走？在我们走之前，你们谁也不许动！那袋糖藏哪儿啦？”

“没藏。扔猪圈里了。”王山也没好气地说。

宗书记对那两个公社干部说：“去挖！”

那干部反过来又对王山说：“去挖！”

王山到院子里挖起了猪圈。满院子搅起了猪粪臭，猪也被赶得乱跑。那个装糖果的纸袋终于翻出来了。带着猪粪的纸袋也被装进了他们带来的盒子里。

“是哪个去海边的？”宗书记还在锲而不舍地追问。

“我。”丁妹怯生生地回答。

“你？”宗书记满脸狐疑地看着这个毫不起眼的、皮肤黝黑的、一身朴素的农家妇女，“为什么到海边去？”

“想去捡一点蛤蜊，回来做面条。”丁妹说。

“做面条？经常去吗？”

“不常去，队里的活，家里的活，还挺多的。”

“不常去？是想到海边看你在台湾的男人吧？看你还拿什么狡辩？”宗书记阴冷地说。

刹那间，丁妹脸色惨白，“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转身要跑回南屋，却被公社干部挡住，就伏在门框上大声痛哭起来。十几年来，丁妹在最难的时候也没有跟别人提起过王立，更没有在人面前为此而哭过。今天却被公社的宗书记在众人面前数落是在想台湾的男人，她实在忍不住了。她能说什么呢？说什么也没人会信了，只能是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痛哭。

王山刚过门一年的媳妇连二嫂吓得靠在里屋的门框上一动也不敢动。

宗书记一千人走了之后，丁妹还在伏门痛哭；王溪并没有得到解药，也坐在地上哭；老王头俩口皱眉不语；王山叹着气，看着掀起的锅灶，满院子还飘着臭气。前后胡同都挤满了看情形的人，但谁也不敢进来询问一声。老王头一家从此掉进了冰窟窿里。

尽管这两年农村政策有所放松，生产有所上升，生活有所改善，但是大的内外环境日趋严峻。在空飘事件前后，连续发生了美国海军“狄海文”号进入黄港外海，与中方海军舰只对峙八昼夜；以及国民党军舰也进入海源以东海面，与解放军海军相遇交火，等一系列严重军情。这些情况，当时并没有公开报道。民主村的乡亲们不知道这些，更不知道他们已经处在海峡两岸敌我斗争的风口浪尖之上。下面几章发生的事情就更严重得多了。

第四十四章 去了台湾的那些人

1949年7月14日

44.1 方茂名他们家

这一章，我们再次把眼光转向千里之外的海峡对岸——美丽岛台湾。看一下来到这儿、离开大陆已经十五年的本书中几个相关人物的情况。除了已经牺牲的连四娃，他们是：方舰长、方茂名一家三口，章团长妻子安晓芬母子俩，西北村的几位，334团的罗团长、罗自成，曾经回过大陆的还乡团高增光，“济成”号上的李策和屠美丽，还有青年军的代连长和孔班长，等等。这一节先讲方茂名和安晓芬两家。题目不是说方茂名他们家吗，怎么又是两家呢？因为原先是两家，现在已经分不出是一家还是两家，所以就干脆说是方茂名他们家了。

前面已讲到章加法去美国深造读书了。又五年多，方茂名一家（或者说是两家）也都去了美国。经过了几番艰难困苦，已经在大洋彼岸站住了脚跟。方茂名在海上航行了几年，已是那个航运公司的技术主管，连查理也在他的分管之下。章加法毕业后在一个电器公司当工程师。他们的住所换过两次，但一直还是在一起。现在是一个二层的乡间别墅，里面有三个相对独立的套房，各人有各人的空间。安晓芬在楼上。吃饭的时候，有时分有时合。今天，他们又在一起了，讨论着又一个重要的话题，那就是他们是否要申请加入美国国籍。

“加入美国国籍，那不就变成美国人啦？”安晓芬一时还没想过来。

“是的，我们就要变成美国人了。”方茂名很认真的一字一句地说。

方小玉拿着一大叠申请表高兴地说：“Are we going to be Americans?”（我们就要成美国人啦？）

章加法说：“Yes, we are.”（是的，我们就要成美国人了。）

安晓芬还有点着急，问：“那我们就不是中国人了？”安晓芬能听懂英语，出了门也能说一些，但在家里还是说汉语。

方茂名解释说：“确切地说，如果我们加入了美国国籍，那我们就是美国人了。是哪个国家的人，通常是按他的国籍说的。我们既然成了美国公民，那就是美国人了。中国是我们的祖国，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要问我们的民族，我们就是美籍华人。作为美国人，我们将要宣誓效忠于美国，但不是说要效忠美国政府，对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我们可以表示不同看法，甚至可以加以反对。作为美国的一个华人，我们会永远致力于中美两国、两国人民的友好。永远会把我们的祖国放在心上，把那座青山放在心上。”方茂名越讲越动情，眼眶里几乎有了泪花。

章加法马上接了上去，说：“China is our motherland forever.Our motherland wiu always be in our hearts.”（是的，中国永远是我们的祖国。祖国永远在我们的心上。）

这次再没提他曾是个共产党的事，大概他也不会再把这事放在心上了。

最后，只有安晓芬没有申请美国国籍。她想保留和亡夫章汉林尽可能多的共同点。二十年后，当她要回祖国大陆再看看那片青山时，她的中华民国的身份反倒比美国公民的章加法更费事些。

他们离开本书的视线，就越来越远了。

44.2 王立

再说王立。

王立他们几个人开始在公置田一起干活，两、三年后，就各自分开了。王立是个肯下力气的人。每到稻谷收获的季节，他不但下田帮人割稻，而且还帮人挑谷子进镇里，有时也帮下乡收稻谷的粮贩子挑谷子。渐渐地他也能听懂当地讲的一些客家话了，渐渐地他也发觉帮别人挑谷子还不如自己收了再进镇卖给米厂。当然他讲话一张嘴，别人就知道他是个“唐山崽”、“外省人”，价钱上要吃很大的亏，但算下来，还是要比帮别人挑谷合算。

渐渐地，他居然也有了点小小的积蓄。还娶了个邻村的大龄女子。她叫阿英，是个客家人，因为有点腿瘸，一直嫁不出去。家里对她也有了些冷落。所以，尽管阿英是满心的不愿意，也还是跟了这个外省人。有了家，王立更是卖力了。尽管客家人也是以刻苦耐劳、勤奋节俭著称。然而，王力那种不要命似的出力，村里的客家人见着都惊诧无比，他们再出力却没见过有这样出力的。等有了一个小孩以后，他把分给他的那份置业田卖了，在村外搭起了一个棚子，买了台碾米机，又当宅屋又当机房，还当仓库。稻谷下来的时候，镇里的米厂收不及，他就可以便宜点收下村里没卖出去的稻谷，堆放在自己家里，慢慢加工，冬春时节再把加工好的大米挑到镇里卖。十年下来，生活已经可以了，不愁吃不愁穿了。村里有些年轻人，不愿意再费事种田而进了城，他就以很优惠的条件把这样的几块田入股到自己的米厂。只需要年终给他们分点红，并不高过三七五地租（说明：台湾五十年代的土改规定，地租最多不得超过收入的37.5%，所以也叫三七五土改）。这个北方来的乡村汉子，随着台湾经济的推进，不知怎么居然也学会了这些应该说是现代经营的办法。差不多有二、三町的水田，可以归自己打点了。自己忙不过来，还请了当年一起过来的青年军的老兵孔班长帮忙。

王立这时按说日子算得上富足了，要划阶级成分，恐怕至少也是富农兼小工商业主了。在龙头的王家，祖祖辈辈也没有这么多的地，虽然理论上这地并不属于他。他应该满意了。然而，挥之不去的思念，天天在缠绕着他：老家不知怎么样了？父母不知怎么样了？长兄王山当时出去支前，早该回来了吧？还有个收养的妹妹，那时老妈还想把她跟自己凑合在一起，真是好笑，都还是孩子呢。或许她已经回去找她自己的父母了吧？始终没有答案的一串串问号，越来越多地堆积在他的脑子里。尤其是当他又听说大陆遭了灾、闹饥荒，说是饿死了不少人。家里到底会怎样呢？真的会过不下去吗？他甚至都不敢往下想。而他却可以躺在成堆的米袋上睡觉，如果他愿意的话。尽管这些米袋，对于他不过是些流动资产。但他睡不着。他和几乎所有来台湾的大陆人一样，不管生活境况的好坏，都睡不着。他心里盛着的

依然是千里之外、远隔大海重洋的龙头镇、西北村，依然是养育自己的爹和娘。十多年未见，却是夜夜梦里依稀回故乡，泪湿衣衫。

天天行走在村里，他却像是游走在另一个世界。虽然现在的家庭条件和个人能力，已不比村里的那些人差，然而在那些客家人看来，他永远是个“唐山崽”。原先公田里的外省人越来越少了，有留下来的，也不把他当成外省人，而是把他看作半个客家人。而在他自己看来，却渐渐地两边都挨不上了。那时村里的客家人是极少和外省人通婚的，只因为那个女人别无他法，才嫁给了他，所以也就和原先的家族，基本上没了往来。王山的生活，看似安定，实则心里空荡荡得很。

尤其是过年过节的时候，看村里人拜神、祭妈祖、化龙上天，那么地热闹，那么地喜庆。乡民们戴着古怪的面具，穿着戏装，执枪舞剑，敲锣打鼓，旌旗翻卷，鞭炮齐鸣，咿咿呀呀地唱着他听不懂的戏文，从村里到镇上，从街巷到田间，大人小孩都那么地热烈、那么地投入，连自己的孩子都在里面蹦蹦跳跳。只有他自己在一旁看着，是那么的陌生、那么的隔阂，从心里打着冷战。他的脑海里依旧是海源的大秧歌，依旧是龙头的爹和娘。正月初一，乡情难断，他都要包上一锅盖的饺子，换来的是老婆孩子的鄙视，只好他一个人闷头吃。一只一只的饺子在嘴里嚼着，心里却是一滩泪。

王立不是个歌曲爱好者，但他却从儿子那儿知道了一首歌，他很有感触，还叫他儿子写了下来：

“离别到这里不知多少年哟留恋的祖国，

望了又望眼前只是一片渺茫和辽阔。

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故乡的山河，

静静的夜啊冷冷风，明月向西落。

星儿暗淡独自披衣起哟悄悄向远方……”

据说这是一首韩国海外游子的思乡曲，王立却在一遍遍地听着。这歌唱到了他心头上。尽管比起那些同来的流落在台湾乡间的外省人，他应该算幸运的，然而遥望北方，心里依然在淌血。这些话，没法跟妻子说。他跟妻子阿英间的感情是稀薄的、脆弱的，隔着一道永远的沟，彼此之间都是没办法，维持而已。连自己的孩子发仔在学校里常被别的孩子欺负，骂做是“外省猪”，回到家对自己的这个父亲也是另一种眼神。这个家，不像是个家，倒像是个组合。王立在社会的大组合和家庭的小组合里，年复一年地熬着、盼着。

44.3 李策

李策头几年还在“济成号”上，后来转到了一艘不大的运输舰上，当了个副舰长。1958年“八.二三”炮战，还去过金门，差点被击中。过后不久，带着一身疲惫退了下来，到了台北的一个通信设备厂搞技术管理。他一直照顾着孤苦伶仃的屠美丽（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孤苦伶仃呢），供她上学。在方舰长他们去美国之前，屠美丽也高中毕业了，他俩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家。屠美丽内心的伤痛难愈，加上她对台湾社会生活和语言的不适应，她没有出去工作，就在家相夫教子、当全职太太了。

李策两口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又不是王立所能比拟的了，那真是血泪难诉。

李策始终不能忘记，他跑出胡同口的回头最后一瞥，他妹妹李芹倒在井口旁，还在使劲挥着手，叫他快走。他在急促的枪声和呼啸的子弹中跑了，而把妹妹永远地留在那儿。也许，他妹妹是对的，如果他背着李芹，必定是两个人都跑不出来。如今他还在，而妹妹呢？肯定是凶多吉少。看看他父母的惨状，他都不敢往下想了。他知道他妹妹肯定活不下来，只是不知道究竟是怎么死的，尸骨又何在？

屠美丽是眼看着她爹娘被挤下海的。在一片漆黑、起伏的浪涛里，她爹娘拼命地挣扎，撕心裂肺地呼叫。不到一分钟，她也被挤下了海。幸亏她手上还有一个包袱，让她在海上能多漂流几分钟，遇到了李策的相救。可是她的爹呢？她的娘呢？还有，还在码头边的年迈的爷爷呢？是最后也被挤了下来，还是留在了岸上？留下来的话，以后的日子，他一个人又是怎么过的呢？每一个问号都撕碎了她的心。她读不下书，更无心供职，好在李策对她不错，两颗撕裂的心，同病相怜，相互籍慰，相互舔着伤口，依偎在一起。

因为都是西北村的老乡，李策和王立之间还有些往来。民国五十年的样子，李策从海军退伍在台北安家时，王立还带着孔班长去看望过。几个人在一起，回顾往事，盘算将来，细数着“济成号”上同来的这些人，各奔东西的现状，真是万千感慨，说不完的话。

屠美丽问：“怎么没带你夫人和孩子一起来？”

“唉。”王立长叹，“这些事情，就说不到一起了，还不如不来。”

李策忽然想起来，就问：“村里来的几个人，怎么一直没见过连四娃？”

提起连四娃，王立更忧伤了：“刚来才两年，警察局查共谍查得很紧，他有点害怕。自己想跑，又不知该往哪儿跑。结果，自己想出来往海边跑，以为过了大海就能回家了。没料到第二天一早就被抓了。没几天，就枪毙了。”

“唉。”李策一声叹息，又问：“他是共产党吗？还用这么紧张？”

“搞不清楚。村里的共产党员好像没有他，但又传说他也是。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董平章呢？怎么也没来？”李策一个一个地问。

“他是太记挂他的家，太惦念他的老婆孩子了。精神负担太重了，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完全变了一个人。可惜了。”王立答。

“我看他在村里算得上是个能干人。”李策说。

“是哎，他比我能干。他要放在我这位置，要干得比我强多了。”

“唉，他的想法我能理解。头好几年，我也是一直神魂颠倒，不能自己，差一点成了精神病，亏得是李策哥把我劝了过来。”屠美丽说。

“你们都比我好多了。还有个家乡可以思念，我呢？”孔班长在边上听着他们说话，好不容易插上嘴，眼睛已经泪汪汪了。

孔班长比他们都要年长一些，早年日本人在的时候为了吃口饭，当了伪军。日本鬼子投降后又到了国民党军。家乡早就被共产党解放了，那时候就和老家没有了联系。他是作为老兵转到了青年军带新兵，因为多年的日晒雨淋，行军打仗，身子骨不行，军阶也一直提不起来，从到青年军是班长，直到来台湾以后退役，也还是个班长。分到了置业田，自己也种不起来，才投靠了王立。把田转股交给王立，在他这儿干些力所能及的活。所以仍然是孑然一身，思前想后，怎能不凄凉。

李策劝说道：“你这样有功于党国的老兵，全台湾多了。政府会有考虑的。”

“是啊，彰化也有荣军院了。”屠美丽说。

“那个呀，那是没有办法了才去呀。”孔班长是知道这事的。

“你比董平章又要好多了。你至少是个荣军，还有个保障，董平章呢？什么也没有。他以后怎么办呢？”

“你们见到他，要多劝劝他啊。别像我以前那样。”屠美丽说。

“是的，我也找他说说。最近他在哪儿呢？”李策问。

“好像他去横贯公路了。他把置业田也卖了。”王立说。

“啊？去当苦力啦？”李策感到颇为惊奇。

“他现在好像脑子有些麻木了，反应不过来了。上那儿，自己就不用打算了，听别人的支使只管干活就行了。”王立说。

“唉。”李策也只有叹口气。

“你们都在谈论你们西北村、龙头镇的。我还救过你们龙头镇的人，说不定还是西北村的呢。”孔班长说。

“是吗？是怎么回事？”李策又是惊讶了一下。

孔班长又把那天打到龙头镇西北角、望海山半坡遇到有人杀地富的事说了一遍，说那天救起一个年青闺女和一个小男孩。

“那女孩就是我妹妹呀。你还是我们李家的救命恩人哪。”李策站起来，就向孔班长鞠躬。

孔班长也忙站起，连说：“使不得，使不得。这也是命里有缘，碰上而已。”

李策又歔歔不已，“你们要是早去一步，我爹娘或许就活下来了。”

“不见得啊，”孔班长这回反过来劝李策了，“我们要先去，他们那边就会先动手杀了。”

“那个小男孩会是谁呢？”王立在想。

“村里的好些人我都不熟悉了。”李策说：“不过就算孔班长把他救下来，后来的事也难说。”

“后来大陆上怎么样啦？听说一会儿是一亩地打一万斤，一会儿又是闹饥荒饿死人。那里怎么了？老家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样啦？我是天天念叨家里的父母兄妹，心里真是难受死了。”王立在乡间，对这些事只听得片言只语，所以愣愣地看着李策，想听到答案。

“唉，这些年传来的消息多啦，大陆上斗过来斗过去，最后弄得饭也吃不上，饿死了不少人。”李策答。

“这是不是老蒋恨共产党，编出来的吧？”淳朴的王立还是有点不信。

“具体死了多少，或许会有些出入。但大体上是这个情况，不会有假。”

“唉呀，我的爹妈呀，他们能不能挺得过来啊？”王立心疼得脸上有些抽搐了。

“你是有这些牵挂，是挺难。我是尽量不去想它啦。说不想也难。但是只能劝自己，想了也没用，想了也白想，少去想点吧，要不怎么办呢？说白了，那片土地现在再怎么样，跟我们没有多少关系啦。”李策为了劝王立，只好淡淡地说着。

“我是丢不下呀，丢不下呀……”

“唉，丢不下也得丢啊，要不怎么办呢？过好我们自己的日子，老爹老妈的在天之灵才能有点宽慰啊。”李策因为知道爹妈已经死了，想得能少一些。他真的是不愿再想这些，大陆的份量在他心里是越来越轻了。

44.4董平章

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最深切的莫过于董平章了。他怎么也忘不掉几千里之外故乡的家园，因为那里有也深爱着他的、而且他也深爱着的美丽温良能干的妻子赵玫，有勤劳善良而又慈祥的父亲，有可爱的嗷嗷待哺的、正需要他关爱、一天也不能离开的宝宝，有他洒满了汗水、凝结着他家三代人心血的十亩土地和地边飘摇着招幡的爷爷的坟头。

每时每刻在董平章眼前晃动的就是妻子和儿子，心里呼唤着的就是赵玫和宝宝。曾经的劳作与艰辛都想不起了，留下的是永久的温存。曾经无比温馨的家，现在却比月亮还遥远。月亮虽远，却还能看得见。家乡和亲人呢？每日每夜都忘不掉啊，每天都是无尽的痛苦和煎熬。无论是太阳的升起，还是月亮的落下，都是希望和绝望的交替。一次次的破灭，连根稻草都没有。希望被破碎，再也捡不起来，心里只有伤痛和血滴。

董平章的精神都要崩溃了，支持不住了，整日地唉声叹气。虽然曾经是庄稼地的一把好手，把家里的十亩地拾掇得有条有理。然而眼前的这块地，虽然分给自己耕作却实在无心打理。他总觉得，那不是他的，他的家不在这里。几年之后，他实在种不下去了，便和那些荣民（退役军人）到玉山山脉修横贯公路去了。每日里做些机械地动作，让汗水和辛劳缓解些心中的痛楚，让自己变得麻木和迟钝。

最能醉倒董平章的，就是那首“三百六十五里路”了：

“三百六十五里路哟，越过春夏秋冬；

三百六十五里路哟，岂能让它虚度。

多少个三百六十五里路哟，从故乡到异乡；

三百六十五里路哟，从少年到白头。

三百六十五里长路，饮尽那份孤独……”

第四十五章 派遣特务

1949年7月15日

45.1 诱骗

1964年。大陆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并没有发生台湾当局梦寐以求的民众揭竿而起的“暴动”，政权依然稳固。国民党方面虽然也挖空心思搞了一些空投、海漂的宣传品，扔一些糖果饼干之类的小玩意，却丝毫没有起到作用，没有听到想听的动静。大陆那里面究竟怎么啦？来自大陆内部的消息十分的有限和混乱，国民党高层满腹狐疑、不得其解。就像四十年代在延安的“抢救运动”期间，陕北解放区在康生一伙的指导下抓了一万五千多名“国民党特务”，而重庆国民党情治系统的二号人物唐纵还在纳闷地对蒋介石说：“唉，我们在那儿一个内线的人也没有，真不知道那里面发生了什么。”

为此，台湾国民党集团在“国防部”内专门增设了“特别情报室”，加强对大陆派遣特务的工作。那个罗团长（罗自成）和高增光因为对大陆情况熟悉，也都调到这个系统，在台中工作组，搜集网罗可供派遣的对象。

罗团长刚到台湾时，已无一兵一卒，安排在一个县警察局当科长。虽然他对大陆了无牵挂，但在一个警察局里每天面对叽叽喳喳的当地土语，实在是脑袋都大了，头疼得很。时间长了，上头也看出来了。正好要加强大陆工作，就叫他过来了。他也没什么高兴，因为他对什么都没了劲头。唉，混吧，混吧，过一天算一天吧。这台湾也就是他老死的地方了，虽然离死的年纪还早了点，不过跟死也差不多了。

高增光上次窜回大陆，给自己争了面子，又正式授衔，留在了特工处。可在特工处没有适合他干的活，既不会训练别人，自己都还没学到手呢；也不能老是再去海源吧。这次有新的机构，从事大陆工作，看起来挺适合他，也把他给调过来了。还挺巧，又跟罗团长凑到一起了。

山前公路边一栋不起眼的小屋，由栅栏围了一个小院，几棵高大的芭蕉挡在前面，粗看与农舍无异，这就是他们的工作室。

高增光在屋里一个人喝着闷酒。这些年来，他仍然孑然一身，满心燃烧着对共产党的仇恨，无处发泄。他没有思念。他知道他的妻儿必死无疑，就算能活下来，也会是生不如死。他早就不去想了，可又扔不下，心里有的只是仇恨，连身体也被这仇恨煎熬得更加黑瘦。这会儿，一边喝着，一边拳头还朝着桌上敲，两眼冒着十几年不熄的怒火，嘴里喃喃地嘟哝着别人听不清的什么，额头的伤痕更深、更显眼了。

收音机里响着：

“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

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

大陆是我们的国土，大陆是我们的疆域。

我们的国土，我们的疆域。

我们要反攻回去，

我们要反攻回去。

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

高增光眉头一皱，“啪”地关掉了。

（说明：这首歌词取自台湾女作家龙应台的一篇演讲稿“从乡愁到美丽岛”，请见2010年8月5日《南方周末》。本书有意识地选取了一些歌的歌词，也想以此反映当代中国歌曲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要问，这国民党的歌曲也算吗？这也是曾经有过的历史存在吧。到后面，文革的“造反歌”也会出现。在本书的这些歌里，现在这首歌，是笔者少有的不会唱的歌。）

罗自成从门外进来。他倒似乎又有一些发福，两鬓稍有白发，但总的保养得还蛮好，腹部隆起，脸上似乎还有点红晕。他比较想得开，自逃出大陆，就觉得能多活一天就是赚一天。当个小小工作组的副组长，似乎有点委屈，但他知道过去的荣耀不会再有，过去的苦难也不会有。管他什么组长不组长，这辈子就这么过吧。家乡？没到台湾来之前就已经没有了联系。家人？还在大陆时就已经隔阂重重。不去想了，想不过来了，这辈子就这么过吧。从海源撤下来的人，除了方茂名能去美国，他比不上，其他人的日子，他都觉得赶不上他。

但他今天进门有点不太高兴，因为上面又在催他了。

“你还喝得下酒？”他对着高增光嚷着，“上面今天又说了，都讲了半年了，怎么还没找到派出去的对象？再这样下去，我们这个站就要撤了，让我们喝西北风。”

“哪有那么容易找？共产党统治得那么厉害，谁敢去送死？”高增光没停下他的酒，又咪了一口。

“那怎么办？还能我们自己去？”罗自成显然不是真要去，反而一屁股朝沙发里坐了下来。

“你别急，我在想着呢！你送早了，上面又会让你再找，那不自找麻烦吗。”

“你的意思是……，你已经想到一个了？”

“我是想到了一个，不知行不行。”

“喔？还真有？哪一个？”罗自成后仰的脑袋向前伸了过来。

“那天我在前面修路的工地上见到干活的一个。我一眼就看出来，那是龙头镇西北村的，跟我们一条船过来的。在彰化时，还见过几次。”

“村里的农民啊？土包子一个，能干什么呀？”罗自成往后仰了过去，有点鄙夷地说。

“到这时候，就不管土包子不土包子啦。”

“可上面那头能通过吗？”

“差不多吧，三十多岁，身体还行，长相平常，没有显眼的标记，不像我脸上有伤疤。我跟他一讲话，他的口音还没改，还是一口海源土话。”

“这样好啊。这些都符合上面千挑万选的要求啊。”

“而且我还记得，国军在海源反攻那几天，他还帮着青年军的章团长干活呢，还是劳军队的队长。”

“啊呀，那太好了，还是我们自己人呢。”

“哪里啊，那个队长是硬按上去的。他自己明白是拉过来当苦力，没办法违拗就是了。”

“那我们对上面可以说是，他多年来一直积极追随三民主义，愿意为党国效劳啊。”

“对上面的审查可以糊弄过去，就是不知他愿不愿意，干特工可是随时要掉脑袋的。”高增光觉得还有点难。

“那他家里有什么人？想不想家啊？”

“听他意思，是很想家。他家里有老婆、孩子。走的那年，小孩才几个月。”

“那是会想。”

“他老婆挺漂亮，是个美人胚子。我还见过呢，有印象。”高增光说到这儿，脸上也有了点愉悦之色。

“那好，那好。我们可以对他说，现在有机会让他回家，但就是要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身份，顺便还要完成一个特殊的任务。”

“这些都不用跟他讲。一个乡下人，跟他讲这些，就被吓住了，哪还敢去？就哄着他同意回去，就行了。”

“这样也好，这样更省事了。”罗自成更想着要急于求成。

“只是有一点不好办，他一个庄稼人，干苦力的，什么也不懂，怎么去接受那些专门的训练呢？”

“嗨，那些东西能免就免。又不指望他真能搜集情报发密码，更用不着学格斗射击。他能愿意去，一踏上大陆，咱们就完成任务啦。上面再下来新的任务至少又能拖后一、两年啦。”

“好，我这就过去找找他。”

“你可得多讲点好话。告诉他，奖金大大的有啊，都是美元黄金啊。”罗自成眨巴着眼睛补充说。

山里的一段公路，横贯公路的一条支线。

两边是高耸入云的山脉，下面是深渊峡谷。正在修建的公路劈山而过，蜿蜒而来。道路已大体成形，劳工们正在碎石铺路、压碾，工地上尘土飞扬，热浪滚滚。

路边的一个棚子，高增光通过筑路队的工长把董平章找了过来。

“真的能回去？”董平章听了高增光的话，惊奇地瞪大了眼睛，反复地问着。那是多少年梦中的期盼，以及不敢再想的奢望，真的就能变成现实了？

“当然能回去。”高增光很有把握地说。

“那你自已为什么不回去呢？”董平章不解地问。他还没有被这个天大好事昏了头。

高增光一怔，没法说自己还真去过一趟，却是白跑了。“我是地主，杀了共产党逃出来的，我怎么能回去呢？要是被他们抓住了，还不五马分尸啊？”高增光忿忿地说着，两眼都有了凶光。

“那我跟你们跑到了台湾，再回去，共产党也会抓我的。”

“当然啰，你不能就这样回去，要另外有个身份和名字，找个借口再走。”

“还得改名字啊？改成什么呢？”董平章在政治上毕竟很天真，不解地问。

“这些事，等定下来以后，我们会帮你安排好的。你现在只要同意了，我马上向上汇报，想回去的人多着呢。我是一片好心，知道了情况，马上来告诉你。现在你定不下来，就没你份了。”

“好，好，能让我回去，那太好了。谢谢你们了，多亏遇到了你。”

“但这件事，现在不能告诉任何人。不然知道的人多了，也就没有你的份了。”

“我明白，明白。”董平章欣喜地答应着。

45.2 贼船

淡水。特种培训班。

一个月之后，董平章在高增光的陪同下，来到了这里。

董平章不知道自己已经是国民党特情室的特务了，正在接受派遣训练。

高增光也跟他的主任说了，董平章不过是个庄稼人，能回大陆看看情况就行了，不能要求得太多，训练项目能少则少。

主任接见董平章是在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当董平章跟着高增光走进主任办公室的时候，那个场景吓了他一跳。主任办公桌上放着一套叠好的军装，桌后是大幅的蒋介石像，两边插着青天白日旗，一直垂到地上。一边的墙上是几幅地图，上面画着不少圈圈点点；另一边墙上则贴着“精诚团结，收复河山”的大字。耀眼的灯光下，主任胖胖的，一身笔挺的少将军服，斜视着眼，满脸肃杀。

董平章从没经历过这样的场面，脚下都胆怯了起来。

高增光介绍说：“这是我们崔主任，崔将军。”

崔主任就是当初训练派遣高增光潜回大陆的那个人。这会都已经是将军了。

董平章赶紧对着主任一点头。

“董平章同志，你是我党的精英。此次身负重任，返回共区，必定马到成功。哈哈，哈哈。”主任牵动着脸上的肉，好不容易地笑了一下。

董平章不知所以地也咧着嘴笑了一下。

一个上尉女秘书递过一张纸，放在董平章前面的桌上。

“请董平章同志在这儿签个字。”主任说。

高增光在那张写满字的纸上，指着一个空白处，说：“就签在这儿，写上你的名字。”董平章茫然地看了一下高增光，拿起笔，在空白处歪歪扭扭地签上了名字。

高增光阴阴地笑了。主任轻轻地拍了几下巴掌，说：“董平章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我党的好同志，就是我党情治系统的一名无畏的英雄。现在你就化名叫季行程，代号5451。”

主任又拿起桌上的军装，递给董平章，说：“季行程同志，我现在授予你为少尉谍报员。”

董平章正不知所措。高增光提醒说：“请收下，感谢主任的栽培。”董平章懵懵懂懂地接过军装。

上尉女秘书又拿来一瓶红酒和三个高脚酒杯。

主任倒上酒。

高增光对董平章说：“这是主任亲自为你斟酒，荣幸啊。”

主任潇洒地手一指，示意董平章端起酒杯。

三人一起举起酒杯，主任说：“祝你马到成功！”便一饮而尽。高增光也照此一番。董平章转着脑袋，来回地看看两人，也仰脖灌下，脸上还呲着牙。他不会喝酒。

就这样，董平章就成了连他自己也不清楚的国民党特务。但他也觉得有点不对劲，这个谍报员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谍，是不是间谍啊？出了门，他就问高增光，什么是谍报员啊？高说，就是去大陆走一趟，回来把看到的情况说一下就行了。那不是刺探情报么？董平章追问道。嗨，说这么难听干什么，你回来以后，看到大陆的一些情况，跟朋友讲也是讲，跟主任讲也是讲，没什么不一样，高说。不行啊，共产党不得抓我啊？董平章说。不会的，共产党本事没这么大，你在街上走，他们怎么知道你是干吗的？高说。不，不，我不敢回去，我不干了，董平章恐慌起来。不干？这时候不干也得干了，你已经是党国军人，违抗军令那就得军法从事、立即枪毙；要不，发军装给你干什么？高一下就变了脸，翻着眼睛狠狠地说。

董平章这才知道，他掉在谁的手里了。上了这个贼船，就再也下不来啦。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试一试，闯一闯吧，说不定进去以后，真能再见到赵玫呢？要真能见到，我就不会再回这个鬼地方了，把话跟村里讲清楚了，反正我也没做过什么坏事，就留在西北村还是种自己的地算了。硬着头皮往前走，总比在这儿不死不活的强。董平章就这么天真地想着。

接下来的日子里，董平章穿上了少尉军装，出现在培训班里。

董平章的心情很复杂。对国民党，董平章是厌恶的，是国民党毁了他的家，毁了他的生活和前途。如果他知道了他心爱的宝宝也是死在国民党的炮弹之下，更会对国民党恨之入骨。即使不知道这一点，他对国民党也是憎恨的。这十几年来夜难眠的乡思，不就是国民党造成的吗？但作为一个底层的农民在最艰辛的劳作时，擦去汗水抬头看到那些穿着军装、神气活现的军官们的时候，心里也是有羡慕之意的，但是从来也没有和自己联系在一起。如今，这套军官服穿到了自己身上，这番滋味，真说不出到底是什么。但决不是欣喜，更不是得意，因为他看见连那个端酒的女秘书都是上尉。

至于专项训练，倒也不难。有社会实践和文化课两大类，特务专门技术基本没学。所谓社会实践，就是要了解大陆社会生活状况。特训班尚无法模拟大陆的城乡环境，只能常去台北市里活动。对于董平章这样的人，尽管到台湾十五年了，其实仍然是游离于台湾社会之外的，并不了解台湾的社会生活，更不用说大陆的事了。所以要董平章一个人去市区坐巴士打的士，上车下车，买票退票，逛商店买东西，问路寻物，上医院下馆子，进工厂跑单位，好熟悉外面的世界。特训班一直暗中派人跟随，有时甚至故意在街上撞他找岔，回去后再指点如何应对，训导一番。文化课主要是写字，这些年董平章也学了一点儿。还有就是讲解大陆这几年的变化和重大事件，别进了大陆什么也不知道，像个傻瓜，一下子就露了馅。

鉴于董平章的情况，入境时将什么器材也不带，只带一只普通居民都有的九管三波段收音机，通过收听短波接受指令。当然这玩艺在当时的中国大陆也是很少见的，

唯一学的特务技术就是知道了用糯米粥写在普通信纸上，干了以后看不出来，然后再用钢笔写上别的无关紧要的话，寄给在香港的指定的公开机构，他们会用碘酒显影。

给董平章指定的公开身份是香港华信贸易公司的业务员。当时一些西方大公司不便于与大陆直接买卖，而是通过一些香港和东南亚的小公司进行。这些小公司再与有中方背景的中小公司交易。华信公司便是这类公司其中的一个，但实际上是台湾在香港的一个秘密机构。它既做买卖，也承担特殊任务，两条线分开，不易暴露。

在淡水待了三个月，董平章被送到了位于香港东砂湾的华信公司。他已经有了全套的名叫季行程的香港身份证明。这套资料，十年以前就准备下了，就等着有人来用它。营业部在楼下，董平章等有特殊使命的在楼上，前后门分开进出。

香港的街道很狭窄，开了窗伸手几乎能碰到对面的楼宇。办公室也很狭窄，放上办公桌文件柜以后，就只剩下转屁股的空挡了。床铺在三楼，一天三顿饭在旁边的饭摊吃。每天这样的生活环境，董平章心里烦躁得很。

每天并没有多少事，天天看业务单，并不需要再学什么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与国内的小公司往来，单据都很简单，有限的一、二十个名词，品种都是糖类、小麦、玉米、大豆之类，这已经考虑到董平章是农民出身，看到这些品种容易进脑子。董平章以后公开的活动，就是去华信公司的国内客户、一些可能也是挂着名的小公司看看，来了解国内的社会、经济、民情等方面的状况。再有就是天天收听收音机，知道国内外的一些事情。听街上的香港话，至少要大体听得懂，像个在香港生活了十年的人。这一点，对于董平章来说最难，住了三个月不过关，又要再住三个月。在这样的环境下，尽管衣食无忧，可以说是他这辈子最舒服的日子。但董平章愈加焦躁烦闷。他坐不住了，他的心早就飞了，飞到了龙头，飞到了赵玫和宝宝的身边。十五年了，终于快要回来了，他怎么还能沉得住气，去听那种他所不喜欢的那么难听的叽叽咋咋的香港话呢。

他甚至还要求早点入境，以至于台湾的指挥机构有点喜出望外，他们还没见过哪个特务有这么积极的。

45.3 歧途

1964年的秋天，入境指令下达了。董平章被派往东北，到那儿的几个海边城市的几家贸易客户转转。家属可以到东北见面，但他自己不能回老家，以免暴露。实在有事情，用糯米粥写密信；指挥部的指令由短波广播。停留时间暂定15天，以后看进展再逐步增加难度。

董平章兴冲冲地启程了。一个旅行箱，装着几件替换衣服；一个公文包，装着证件和几份文件资料，再有就是那个九管三波段的收音机。没有人送他，按照事先告诉他的路线，他首先来到了罗湖口岸。

过边境检查站很顺利。第一次看见新中国的警察，不但不是国民党说的青面獠牙，反而是十分礼貌。关卡的民警拿着他的入境通行证、香港居民证，对着他上下打量，点头一笑把证件还给了他。董平章便急忙进了关，跨进了共产党管辖的地界。

当董平章兴冲冲地跨过当时他并不知道、按说应该想到的他将永远跨不回去的这一步，看到蓝天下飘扬的五星红旗，听到“歌唱祖国”的雄壮歌声，他的心里并没有那种随时被抓获的紧张感，也没有那种他和他的亲人将因此受到万劫不复的最严厉惩罚的恐惧感，也没有那种背负着特务使命的罪恶感。相反，董平章是兴奋的。

大厅里的喇叭响着激越的歌声：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

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宽广美丽的土地，

是我们亲爱的家乡。”

以为他也像歌声里唱的那样，在“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因为他将要见到家乡和亲人了。他又是好奇的，他想了十几年的大陆到底有了些什么变化，终于会有答案了。他甚至有种似曾相识的归来的感觉。他毕竟在解放区生活过，对共产党是了解的。于村长、姜雪花不都是共产党吗，甚至连四娃说不定也是共产党呢，有什么可怕的呢？是共产党给他带来了在西北村的新生活。他回来，不就是想要延续那段新的生活吗？但他并没有意识到，此时他已经不再是那个西北村的普通农民了，而成了和高增光一样的共产党的死敌，正面临着能将他撕得粉碎的狂风恶浪。

然而，他自己却几乎一无所知。或许这种无知，让他在一路上走得还能平静些。要不然，鬼鬼祟祟、提心吊胆，用不了走几步就会露了陷。

他上了长途汽车，来到了广州。尽管从没有来过，但在照片上已经见过多次了，甚至还看过车站的平面图，售票处、候车室，连洗手间的位置都事先知道了。他先到了售票处，窗口前有两三个人排着，他站在了最后面。

一个人买完票，走了。前面还有两个人。

他放下旅行箱，打开公文包。

又有一个人买完票，走了。前面还有一个人。

他打开钱包的一刹那，抬头看见售票窗口上的价目表，上面印着去往各大城市的票价。忽然“黄港”两个字冲进了他的眼帘。那两个字，大大的，遮住了眼前的一切，占据了他脑海里的一切。事前的训练中，没有说到售票处还挂着有价目表，然而这个小小的意外打乱了他的一切，甚至打乱了他的一生。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个柔和的女售票员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同志，你去哪儿啊？”

这一问也巧，没有问买去哪儿的票，而是问你要去哪儿。买去哪儿的票，已经几次三番被告诉得很明确，买到大连的票，先在沈阳转车。而要去哪儿？自己不就是要去龙头吗？不就是要去海源吗？不就是要去黄港吗？“黄港”两个字十五年没见了，如今塞满了他的眼睛。

“黄港。”董平章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脱口而出。

当他手里拿着写有“黄港”两个字的车票，离开售票窗口的时候，心里非常激动。“要到家啦，要到家啦。”一直走到候车室里坐下，才想起来，“啊呀，不对了。怎么没有买去沈阳的票呢？”不去管他了，董平章向四周张望了一下，没有人注意他。他舒了一口气，又想：“老子出来了，谁也管不着我了。那个崔主任和高增光，算个啥？他们也管不着我了。他们也不知道我会跑回黄港，跑回龙头去了，去看老婆孩子了。”他心里嘻嘻地笑了，甚至根本没注意到在他后面，又有个刚买了票的人在另一排长椅上坐下。

火车傍晚才发车，他在长椅上睡了。他没有去吃晚饭，他不喜欢吃这儿的饭，无论是台湾的，还是香港的。广州的，他想自然也不会好到哪儿去。饿一顿算什么，他董平章这些年饿肚子的时候多了。明天，明天就可以到黄港，到龙头，就可以在家里和赵玫一起吃韭菜饺子了，十几年没吃到正儿八经的韭

菜饺了。也不知道儿子长成什么样了，成了大小伙子了吧？董平章喜的，差点没笑出声来。这样的人能当特务么？

在火车上，已经过了一个晚上。他看着窗外的景色，看着四周坐的人，并没有什么特别，以后就算回去恐怕也没有什么可报告的。人们大都穿着黑的、蓝的、灰的，扛着大包小包，虽然行装和气息赶不上台北和香港，但也不像特训班里讲的那样，更不是“哀鸿遍野，赤地千里”了。

他想过要和周围的人聊聊，好了解一些大陆的情况，但他是个不善说话的人。他也不敢随便说话，毕竟现在自己是一个特殊身份的人，更不知道开口跟别人讲什么好，别一张嘴就露了馅。边上的人也都在低头不语打磕睡，只有斜对面的一个人在看报。打开的报纸遮盖着那人的脸，也不用去打搅他了。

董平章就干脆一直闭着嘴，只在买盒饭的时候，才开了腔。吃完，他又闭眼休息。他觉得闭上眼，是最好的办法，既不容易暴露自己，眼前又能浮现出家里的情形。

45.4落网

黎明。

太阳初升的时候，董平章在黄港火车站下车了。

出站后，他回头看看那个典型的德国式建筑，还是他在儿时不知为了什么事和他的父亲来过。仅隔了一条马路之外的大海，吹过来习习海风。他一下子感觉到，这就是家乡了。那海风的凉气，那海风里的味道，告诉他到家了。尽管台湾和香港也有海风，但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

他不知道汽车站在哪儿，便问旁边一个也是刚下火车的人。

那人一笑，说：“你问对了，我也去长途站，你跟我一起走吧。”

说话间，那人把他领到了一个公交车的站台。一会儿，一辆公交车来了。那人还很客气地一摆手，“就是这车去长途站，请上。”

董平章先上了车，打开公文包，用手摸索着，在里面找小额的纸币。还没等掏出来，后上来的那人已经把钱递给了售票员，说：“买两张去长途站的。”又对董平章摆摆手，示意不用再摸了。董平章连说：“谢谢，谢谢，真不好意思了。”心里还挺感激的，“啊呀，大陆上的人，还是挺不错的嘛。”

汽车站在城北。

董平章和那人一起走向售票处。那人很客气，让董平章在前先买。

董平章又是感谢了一番，买了张去海源的票。

“啊呀，你也去海源啊？真是凑巧了。”那人挺高兴地说。

董平章也觉得这事挺巧，一起走就一起走吧。

不久两人坐上了开往海源的长途汽车，并排坐在一起。

那人问：“你是海源人？”他听出董平章是一口地道的海源话。

“哎，是的。”董平章没有多说。

“回来探亲啊？”那人又问。

董平章一下子不好回答了。因为原来准备的是作为一个商人或是业务员入境，现在到了海源，怎么说呢？董平章只好含糊地哼哼着。

“家在海源哪儿啊？”

董平章来不及瞎编，只能照实说了，“龙头乡”。他忘了，应该叫“龙头公社”。

那人咯咯地笑了，并没有指出他的不当，而是又接着问：“你好像有好长时间没回来了吧？”

小小的一个问题，又打乱了董平章肚子里原先准备好的腹稿，只得喃喃地说着：“是啊，是啊，差不多有十年了吧。”眼睛里似乎有了一些慌乱。

那人看着董平章，竟然从内心深处升起了点恻隐之心，就说：“我是县政府的，你要是有什么事，就跟我说。说不定，我能帮你点什么。”

董平章一愣，奇怪，我有什么事要跟他说呢？董平章还真想了一下，有什么要跟他说呢，我的事能跟他说吗？难道，难道，他知道我的事？董平章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作为他，是在否认自己的猜想。作为那人，是理解为对自己建议的否定。就这样，董平章失去了一次难得的自救机会。

这时，董平章的眼神已经不只是慌乱，而是有些近乎哀求了。

那人看出来，不能再问了，再问就要露馅了。现在还不是要他露馅的时候，还得替他包着点。

“你好像有点晕车吧？”那人说。

董平章心想，这人想得还真周到。自己实在是不想说话了，再说下去真要遮盖不住了，真想要求求他了。那人却恰到其时，给了自己一个台阶下。就顺着这话连连点头：“是的，是的，我不习惯坐车。”

“那你就闭上眼，睡一会儿吧。”

董平章真的闭上了眼，可是却不敢再去想什么了。

到了海源县城。

董平章出了车站，看了看县城的大街，有了一两个二层的小楼，但依稀还能想起当年的模样。觉得新鲜的是，大街上插着红旗，墙上刷着各种革命标语，喇叭里不停地放着他听不懂的歌曲，特训班里没有开设音乐课。街上的人，穿的也都是蓝的、黑的、灰的，比广州的还要破旧，看得出来上面都还有一层灰土。但也没有衣衫过于褴褛的，也没有乞丐，更没有病卧街头、行将倒毙的模样。看上去还算安定，不像动荡不安的样子。

从县城到龙头并没有公共汽车。董平章有点犯难了，特训班也没有说如果没有公共交通该怎么处理。走回去？以自己的体力是不成问题的。但他忽又想到，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就这样回去，能对得起赵玫吗？万一被抓了怎么办？叫赵玫怎么做人？那怎么办呢？找共产党去自首？那就会立即被抓起来，那得到什么时候才能见到赵玫呢？这怎么办好呢？

董平章拖着旅行箱呆了，站在车站门口犯难了，东张西望，脸色红一阵白一阵，不知该怎么好。

这时，他看见和他一起下车的那个人从街对面走过来。刚才他去干什么啦？董平章没有注意到，好像是到街对面打公用电话了。那人过来，又走到董平章的面前，停下来，说：“伙计啊，到龙头没有车，你怎么走啊？”

董平章心想，这人还真是个热心人，就说：“你还没回去啊，我就准备走回去了。”

那人说：“走回去？太费事了。我刚才问了办公室，说下午有吉普去龙头，你先跟我去县政府吧。等到下午就跟那辆吉普回去吧。”

董平章说：“啊呀，你太客气了。不麻烦你了，还是我自己走吧。”

这时，董平章觉得好像有几个人从四面朝他走来。正在董平章疑惑的时候，一辆吉普驶来，嘎然停在自己的跟前。那个人毫不见外地提起董平章的旅行箱，还是不动声色地说：“没想到这车现在就过来了，你赶紧上车吧。”

董平章想拿回旅行箱，伸过手去，说：“不用啦，不用啦。”再一看，不对劲了，四周围上来几个人，脸色都非常严峻，那冷峻的眼神容不得半点商量。

董平章不敢再说话，知道已经晚了。他的双手已经被两边的人夹住，脑袋被后面的人压着，推进了吉普车的后排座位上。

一同回海源的那个人，就坐在前座。当车轮启动之后，那人回过头来，居然还笑着说：“季行程先生，你也真节约，没舍得买卧铺，买了慢车的硬座票过来。叫我也陪着坐了两个晚上硬板凳，屁股还疼着呢。”

董平章听得目瞪口呆，还愣愣地看了那人几眼，竟然还没看出来那人就是火车上坐在他斜对面那个看报的人。没等他看明白，旁边的民警就重重地拍了他脑袋，吼了一声：“看什么？低头！”

董平章脑子嗡的一声，好像炸了似的，知道全完了。

“我是要找政府自首的呀。”

“我就是想回来看看老婆孩子，实在没有别的意思。我想家想得熬不住了，只是想回家看看。求求你们，让我回趟家吧。”

董平章双手捂着脸，哭了出来。

“闭嘴！到里面再说！”那人立即变了腔调。

旁边另一辆吉普也尾随而走。县公安局仅有的两辆吉普都出动了。

董平章的回乡之路，在离家二十多里的县城，永远地终止了。

其实，在董平章还没从香港的贸易公司出发之前，大陆的公安部门就已经得到了“小狗即将出窝”的报告。根据线索，在日以继夜地分析来的将是谁，会上哪儿去，会去干什么，准备好了应对各种可能情况的若干套方案，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在为董平章的到来而忙碌。

董平章怎么可能跑得出去呢？

不只是董平章，像大陆这样组织极其严密、控制极其严格的社会里，台湾特务机关的成功率是极低的。一些像董平章这样的非职业特务，就此遭遇到了极其悲惨的下场。

董平章这样毫无悬念地被抓，不像那些间谍小说或影视剧的复杂和惊险。这里，没有任何的离奇曲折和胡编乱造，没有任何令人匪夷所思的情节。其实，对于很多台湾特务来说，其过程往往也是这样的简单，两三页纸都用不上。而他们以后的经历和他们家人的遭遇，倒是可以写上一本书，甚至还不够。董平章也是这样。他的被捕，只是他和他的赵玫新的悲惨故事的开始。

45.5撕碎的心

县看守所。

五天之后，董平章被带到了审讯室。

这之前，任凭董平章在单人牢房里怎么吵吵嚷嚷，嗓子哑了，不肯吃饭，也没人理他。因为要等广州方面的材料过来，审讯人员还要看材料、讨论审讯方案。

和董平章从广州同车来海源的，正是海源公安局的周科长，也就是几年前跟着卞科长到龙头中学抓走李辰的那个民警小周。实际上，董平章在香港华信公司的时候，他的活动就已经被大陆的安全机关掌握，并且做了董平章可能去东北和可能回海源的双重准备。说不定华信公司斜对面的某个窗户，早就在对他们日夜监视。隔着一条街，看不到纸上的字，至少也能知道有哪些人进哪些人出。根据基本的情况分析，两个地方的公安部门都派了人到广州等待收网。只是想抓个现行，所以一直在他身边等待着。而董平章浑然不知，以为谁也管不到他，可以自作主张地走来走去。

坐在办公桌后的除了周科长，县公安局的卞局长也亲自到场主持。当年的卞科长，如今已是卞局长了。还有几个人，可能是省局，甚至是公安部的人。

此时，铁栅栏里，铐在审讯椅上的董平章早已彻底崩溃。连问也不用问，竹筒倒豆子地一股脑儿全说了。平时话不多的他，几次被卞局长打断，“没用的话不用多说。”

董平章哀求着，时而大声嚎啕，时而低头呜咽，要不是双手被反铐在椅背上，早就跪在地上了。

董平章心里怎么不难受呢。十几年的煎熬，十几年的期盼，只是为了见上妻子一面，却落得如此下场。下一步将会怎么样呢？他不敢想，只知道，家越来越远了。

他愣愣地看着审讯员们一言不发地起身走了。

县公安局的会议室。

几个身着警服的公安干部正在讨论对董平章特务案的处理。

周科长跟了董平章有二、三天，对他有所了解，说：“这个人还挺老实，不是罪大恶极的那种职业特务。他的本意可能就是想借机回家看看，没有实际从事特务活动，尚未造成社会危害，可以不算现行，从轻处理。”

卞局长一瞪眼，说：“这可不行。从他跨进罗湖口岸的那一步起，就是现行活动，就要依法严惩！决不手软！这是我们海源公安局对敌斗争的重大成绩。等都等不来，怎么能不算。”

一个不清楚身份的干部说：“现行特务，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情节上有轻重程度的不同，这一点，以后处理时可以考虑。我把他带走吧。”

卞局长不以为然地说：“这是我们海源抓的，要开全县公捕大会，造个声势。既是敌情教育、阶级斗争教育的需要，给阶级敌人来个震动，也表明是我们海源公安系统的战果。”

那个干部说：“最好不要声张，台湾方面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抓了董平章。这小子，弄好了，说不定还能被我们再派回去，为我所用。”

周科长摇摇头说：“这个人是个老实农民，没什么本事，不是做特务的料，用不起来。”

卞局长说：“不管怎么样，公捕大会还是要开的。要不，没声没响，我们的工作就白干了。”

那个干部不语。

周科长想搭个梯子让大家下来，就说：“那就在龙头公社开吧。这样，公捕大会也开了，对外面的影响也不是很大。”

那个干部说：“要不，就在他家那个大队里开吧。”

卞局长也不好再多说，就哼了声：“也行吧。”

那个干部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

周科长答：“只有一个老婆，在家务农，当初还是个积极分子。那时候还有一个孩子，才三个月，国民党逃跑那天，朝镇上开炮，被炸死了。他到现在还不知道。”

那个干部也叹了口气：“唉，他现在该恨国民党呢，还是恨共产党呢？”

卞局长说：“当然应该恨国民党，是国民党杀了他儿子，是国民党让他当了特务。我们抓他，也是挽救他。”

那干部说：“他老婆也要被管制了吧？”

周科长说：“那就由他们公社定吧。”

董平章关在单人牢房又四、五天了，哭也哭不出来了，喊也喊不出来了，倒在那儿，整日里浑浑噩噩，像个痴人一样。他知道，这脚下就是家乡的土地，他离妻子从来没有这样近。然而，命运为什么这样残酷，他抛弃了一切，苦苦寻求，却是深陷囹圄，落得这个结果。在台湾，他和赵玫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现在一番挣扎之后，回到了家乡的土地，他和赵玫却还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只不过是划分的方式不一样。

“董平章，起来！”牢门打开了，进来几个民警，把董平章拖了起来。其中一人一拳打向他的下颌，再一拧，董平章的下颌骨就脱臼了，没法再说话。

他痛得直叫，然而除了往外喷出“滋滋”的气息，却已经叫不出声了。眼睛又立即被蒙上，被那几个人不由分说地拖了出去。凭感觉大概是拖到了一辆车上，车又开动起来。

董平章紧张起来，莫非是要拉出去枪毙？身体不由地扭动起来，脑门上立刻被狠狠地拍了一下。他浑身又瘫软下来，像一只死狗。

他并不是怕死。他觉得，活着对他已经没有意义，只是觉得不甘心，千山万水地过来，临死也没能见到妻子一面。

但这一趟，倒并不是要枪毙他，而是拉到民主村召开公捕大会。大会的场景就是本书一开始王山大叔回忆往事的第三节所记述。

车停下来。还是蒙着眼，被拉下来，拖到一个角落里被摁倒。他听到外面讲话声、口号声。他听出来了，那是多么熟悉的乡音啊，这是西北村？是的，是的，一定是的。

他知道，他终于回到了西北村！

能在西北村被枪毙，也认了。只要能让他睁开眼，最后看一眼赵玫，死了，也值了。

在一番激烈的口号声中，他被揭开了眼罩，往会场上拖。当眼睛还在金花四冒的时候，他使劲往四周看，可是，脑袋被摁着，抬不起来。只能看见脚下西北村的地皮，是的，这是西北村的地皮。十几年来，在台湾走过许多地方，也没有这样的地皮。

当一阵撕心裂肺的女人的嚎叫“平章，平章！他不是国民党特务，他是来看我的！”震颤着整个会场的时候，董平章知道这是赵玫对他的呼喊。从这拼了命的呼喊，他知道，这十几年，赵玫也是在每日每夜地期盼着他的归来。

他用尽全力抬起了头，一瞬间，他看到了赵玫，披头散发的、苍白的、被人架着、脸部扭曲的，却依然是美丽的赵玫，他甚至还看到了赵玫头发上那只依然锃锃闪亮的李芹的发夹。

他呼喊，拼命地呼喊着自己的妻子。但是嗓子像刀割一样疼，发不出半点声音。他很快又被摁了下去。但他还是拼命地挣扎，想再跳起来看一眼心爱的妻子，却被左右的人横着拖了出去。等重新回到车上，再被蒙上眼睛的时候，已经是鼻青脸肿、气息奄奄了。鞋子早不知道掉到哪儿了。

会后，董平章被带走了，带到了谁也不知道的地方。

那几周，半夜时分，短波里有个频道还时常在反复广播着：“5451同志，5451同志，你回到单位了吗？家里人很想你，家里人很想你。”

可董平章还从来没有打开过那个挺高级的收音机。

第四十六章“反共救国军”

1949年7月16日

46.1前途难料

1965年，台湾海峡的阴云越来越浓。

台湾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的心情越来越急迫，机会明摆着是不多了。那几年里派往大陆的特务多达数百人，可绝大多数被对方捕获。连刺探个情报都如此惨败，蒋介石便孤注一掷，干脆筹划武装窜犯。可怜的是，此举没能得到华尔街的公开支持。大规模的几万、几十万的反攻，是不可能的了。于是国民党当局又绞尽脑汁，分批组织策划小股武装特务在东部沿海登陆。意图能搅乱大陆局势，在海峡对岸的南北各地建立起一批大大小小的反共根据地，再趁机煽动大陆民众的反共暴乱。到那时，再大部队过海策应，美国人也就会跟进来了，反共复国就可以大功告成了。在台湾当局的这个如意算盘里，这些武装特务的攻击目标，海源竟然也名列其中。

那是六月的一天，按说还不到台风肆掠的季节，天却很闷热，乌云翻滚，雨却还没下来。

高增光在那间工作室里，掀开上衣，露着胸膛，靠着电风扇吹。

送走的董平章去了大陆之后再没有消息，也不知道是被捕了、反水了，还是隐匿了。全都不得而知，上锋又压下来任务，再寻找派遣对象。

“说的容易，上哪儿去找？又不是找条流浪狗。”高增光举起杯，猛喝了一口，又往桌上打了一拳，心里在忿忿地想着。

罗自成挺着大肚，乐呵呵地从门外进来了，还没擦头上的汗，就对高增光说开了：“老高啊，有你的好事情了。”

“这年头还有什么好事情？”高增光不高兴地应着，这两年他和罗自成合作得并不愉快。罗自成又奸又滑，又是他的上司，高增光也只有生闷气。

“上锋对你有重任，叫你到台中训练处报到。”

高增光一听，脸上瞬间就变了颜色：“叫我上突击队？”高增光听说“国防部”在台中山区成批地训练突击队，再派去大陆沿海地区，建立游击基地，以策动当地大规模暴乱。但高增光清楚，以他的经验，这无疑是在以卵击石，白去送死。

“我都四十多了，还叫我上大陆打仗拼命？”这时，他已经不再想动了，尽管老婆孩子还是一直在心里放不下。

“这是上峰看得起你，咱们的崔主任很欣赏你。在我面前几次提到你，说你对党国一直是忠心耿耿，有勇有谋，难得的栋梁之材啊。”

“别说这些好听的啦，是你把我推出去的吧。”

高增光觉出来，自己和罗自成一起从海源过来，在站里也算是老资格了。姓罗的一直把他当成是职务上的潜在威胁，几次想把他拱出去，这次肯定也是。

“别这么说嘛，老高。这次是机会难得啊，我听说，这回安排你是上校队长。一旦成功回来，就授少将衔，就成了我的上司啦。我是想去还不让我去呢。”罗自成到这时还想卖个乖。

高增光知道这是军令，跟姓罗的多啰嗦也没意思，就不再说了。

高增光在台中山区营地接受强化训练一个月了，从射击、刺杀、格斗、游泳、急救、化装，直到无线通讯、长途行军、野外生存等等，项目倒是很齐全，管不管用只有天知道了。

这天夜里，天下着雨，高增光在帐篷里躺下了。

领队的冲进来喊：“高增光，立即出发！什么也不用带。”

外面，天很黑，雨很大，高增光和另外几个被喊到的人爬上一辆军用卡车，就走了。车前的灯光在雨夜中照射着，眼前是一片跳动闪亮的光点。耳边是打在车顶棚帆布的滂沱雨声，车辆在颠簸着急驶，像是朝着无尽的黑暗奔去。

高增光的心里也像这雨夜，黑黑的，凉凉的，一片茫然。

高增光对于这项任务，心情复杂。首先，这是军令，他不能不从，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不从。他没有别的生计，也无处可去，他早就被国民党牵住了，还能干什么呢？对于再次重回大陆，他几乎没想过，甚至这十年他都没有真正地想过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他们肯定活不下来。稍一想，就不敢在想下去。一想，就心疼，不再去往下想。有的，只剩下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这仇恨，十几年来一天也没有平息。这次任务，如果推不掉，那就只有回去跟共产党拼了算了。也许，他这一生就这样了。但是，这条命就这么拼了吗？共产党哪是这么好对付的？这一点，他高增光更清楚。在高家庄被管制、被斗争的日子，尽管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但每每想起来，连他这样狠毒的人，心里也会发抖。上次潜伏回去，也是步步艰难，寸步难行啊。这回非要自己去呢？唉，硬着头皮上吧，这辈子也不想多活了，就算是跟老婆孩子死在一起吧。

两个小时后，卡车到了一个海边码头，立即就上了一艘改装的渔轮。高增光很疑惑，怎么什么东西都不带，就要上大陆？可没有任何人说明，也不知道究竟去哪里。只是告之，如果遇到盘查，就说是台湾渔民，出海打鱼的。

下到舱里，所谓的船舱真的很狭小，得弯着腰进出，上“床”更得爬着跪着才行。所以叫“床”，也是因为能躺个人，不过是底舱里钉了一排木条，下面放杂物，上面躺人。

高增光躺在上面，抬手就能碰到上面的木板。外面风浪大，船颠簸得更厉害，人被一会儿抛下，一会儿抛上。高增光侧身紧贴着船帮，头和脚顶着两头，尽量固定自己。

船里的灯，关了。眼前漆黑的，谁也没有说话，只有风雨声、浪涛声和隆隆的机器声。满舱的汗臭味、海腥味、柴油味，和机器的嘈杂与抖动搅合在一起。高增光突然想到这不就是被埋在活棺材里吗？这是他第三次坐船，第一次是逃命，第二次算是侥幸捡条命，这一次可是要送命了。

“妈的，真棺材也比这活棺材好受一些，起码会安静些。”高增光心里骂着。

下一步会怎样呢，谁知道？高增光已经想不了这么多。

46.2 孤岛受命

差不多三天两夜之后，渔船靠岸了。这是个远离陆地、孤悬于大海之上的一个小岛，一共就是两个小小的山峰。下船一看，岛上只有三、五栋韩式民舍。过来的几个人也穿着韩式的平民衣服，一张嘴，才知道都是中国人。这儿是借用韩国的一个无人居住的荒岛。

来人把他们请到屋里，里面全是武器、机械、通讯设备。坐着的几个人也穿着韩服，为首的一个胖墩墩的中年人，站了起来。高增光一看，不就是崔主任嘛。

崔主任露出黄灿灿的金牙一笑，“诸位辛苦啦。先休息，下午再说。”高增光满肚子的不高兴，都这时候了，还卖什么关子呀。

下午，高增光早早地进了崔主任的屋子。崔主任见了，也没多说。不一会儿，人也都来了。还有几个不是他们一条船来的，高增光也没去多注意。

这些人坐着，低着头，全然没有那种要去做拼死搏杀的精神头。他们之中，除了个别是从国军现役军人中挑出来的，大多是1949年从大陆撤下来的“难民”。他们这些年来基本上游离于台湾社会之外，生活上拮据艰难，精神上倍受煎熬。回头望，难舍旧日的富贵，仇恨满腔；向前看，台湾社会没有他们的位置，无路可走，前途茫茫。能打回去，当然是个机会。可是能行吗？能打得过共产党吗？共产党曾经给予他们的打击，可是刻骨铭心的深，时时也难忘。不过又听说大陆上闹了大灾荒，死了不少人，应该是次好机会吧。仇恨，无望，侥幸，恐惧，走投无路的一拼，装满了他们的心。

他们只能听天由命地挨着时辰。

崔主任这才站了起来，清清嗓子，说了起来：“本人十分欢迎诸位到来，在这儿都等了你们好些天了。事情重大啊，弟兄们！根据最新情报，共区内部有异动，又开始搞什么四清运动。民怨沸腾，人心思变，闹得不可开交。这是我们反共复国的绝佳机会。所以上峰要求你们立即潜入敌后，开展游击斗争。共区的老百姓一直在盼着你们呐。一见到你们，一定会一呼百应、揭竿而起。你们站住脚，搞出声势后，我们会空投精锐部队，甚至直接派几万、几十万国军，大规模登陆。反攻复国的重任就在你们肩上。”

尽管这些人也知道是要来干什么的，但真的听到是这事，也有些惊了。

“长官，既然时机成熟，为什么不直接大规模空投和登陆呢？就光叫我们这几个人去呢？”旁边有人突然插话。讲这话的，是个留着大胡子的人，看上去年纪不小了。

崔主任眉头一皱，不悦地说：“你们有所不知啊，美国人的看法和我们不一样，要维持所谓现状，不主张大规模开火。我们就是要有骨气，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一旦你们上去了、成功了，火苗点起来了，烧成大火了，美国人想置身事外也不行了。所以你们责任重大啊，党国复兴全在于此啦。”

下面又乱哄哄地议论起来。

崔主任一见不好，赶紧加高了嗓门说：“这次任务，是国防部定的。整个方案已经确定，不用再讨论了。我现在宣布突击队名单，念到名字的请起立。”崔主任开始认真起来。“此次突击队的番号是山东省反共救国军第十二纵队。大队长，代明安上校。”

代明安起立，敬礼。

高增光转头看那人，好面熟啊。再一细想，心里不由得一怔，这不是当年在“济成号”上把宪兵队楚队长推下海的代连长吗？十几年没见，怎么他也在这儿。刚到台湾的时候，告发方舰长，已经和他结下了梁子，怎么又和他碰到了一块儿。还没等他想下去，就念到他的名字了。

“副大队长，高增光中校。”

高增光听到了，也起立敬礼。但一肚子狐疑，罗自成不是告诉我是上校队长吗，怎么变成了中校队副了？中间又是谁搞了鬼，这一趟走的就更不值了。再有，怎么和那个姓代的在一起呢？两个仇家放在一起，是打共产党还是防着姓代的呢？

正在胡思乱想之中，崔主任又说了：“你们两位队长，我知道当年是一条船从大陆撤下来的。现在又要一条船打回大陆去，有缘啊。不但今生有缘，也是前世有缘啊。我相信，你们一定能精诚团结，马到成功。”

代队长主动过来跟高增光握了一下手，看不出是什么意思地笑了一下。

全队共十二人，分二小组，两个队长各领一组。

“登陆地点是，海源县西海滩。”崔主任指着墙上的大地图布置任务。

高增光又是一怔。

“之所以选择海源，一是你们都熟悉，当年就是从那儿出来的；二是地形适宜。一登陆，半个小时就可以到望海山，休息一下，就可以穿越泊地进入北部山区，那是打游击的理想之地啊。”崔主任露出了几分欣喜。

高增光心里在说：“妈的！穿越泊地？理想之地？你去过吗？站着说话不腰疼！”

“好了，你们下去准备，等下次大潮的时候出发。”崔主任最后说。

晚上，吃了顿好饭，都是些新鲜海货。

高增光还是气不服，擦了擦嘴，自己来找崔主任了。

崔主任没有和他们一起吃，自己在办公室里。听哨兵通报，就叫高增光进屋了。

高增光一推门，崔主任已经微微地咧着嘴站在门背后。这可是姓崔的很少有的给客人的待遇。

崔主任呲着大金牙，说：“高队副啊，我知道你要来，在这儿等着你呢。请坐，请坐。”

这一来，高增光反倒有些局促，就近坐在一个沙发上，望着崔主任。

崔主任在他面前踱起了方步，不紧不慢地说：“你的心事，我知道。我也是了解你的，你对共党有深仇大恨，对党国忠诚不二，尤其是你成功地进入过大陆共区，有经验了，这是谁也比不了的。你是我最放心的人。原先我也是安排你当队长，那时我也是这样跟老罗说的。可警备司令部的那帮人推过来那个姓代的，非要他当队长。我争了好久，争不过他们呀。他们那儿有人马，我这儿不过是个空架子。难呐，高老弟啊。”

高增光只是看着，没说话。

“后来，我一想也好。”崔主任接着说，“就让那个姓代的当队长。什么事都让他在前面挡着，你也就不用多烦心了，也好。你说呢？”

高增光还只是看着，没说话。

崔主任看高增光没动静，只好继续往下说：“高老弟啊，咱们是自己人。有件事，我还要托付你，对旁人都不能说啊。”

崔主任说着还特地点点头。

高增光听到这儿，脖子一伸，也认真地往下听了。

“姓代的这个人，虽说是青年军的，其实原本也是杂牌，不可靠的。1949年，你们撤回台湾时，告发他溺死个人……是个什么人来？”

“楚队长，宪兵队的楚队长。”

“对，对，是楚队长。这事，虽然后来查不下去，但我是相信有的。”崔主任又点了点头。“所以，这次行动，你要替我看着姓代的，一有异动，你可立即除掉他。这是我给你下的令。”

“既然如此，警备司令部那儿为什么还要推他当队长？”

“嗨，你以为那一头看重姓代的啊？那也是没地方推出去，把他推过来了。前几年在金门，不是很积极，也找不到辫子，年纪也大了，没地方安置，才派了他这个差事。又怕他不肯过来，就给了他个上校队长的帽子。”

“那我不是吃了亏啦。”

“高老弟，你放心，我都给你准备了。”说着崔主任走过去，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在高增光面前晃了一下，“只要一踏上大陆的土地，我就给你报上去。”

高增光看见那上面的大字标题写着：“晋升高增光为上校军衔的报告。”高增光心里一喜，脸上紧绷的皱皱皮一下都不由自主地松开了。

崔主任看出来，拍拍高增光的肩膀，说：“好好干吧，老弟，前途大得很呐。一旦上去搞成功了，不是个县长的问题，市长、省长也都有你的份呐！”

高增光更是难得地笑开了脸。

46.3师未出，身先卒

第二天早晨，进行跑步登山的训练。

这儿的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与海源很相近，也是一、二百米高的山头，也是松林和山岩，只是海流和海雾大了点，是他们集训的理想之地。

他们十二个人，每人背上行李、子弹、药品，尽管已经很精简，大约也有五、六十斤，手持消音短柄冲锋枪，腰上别着手枪和匕首，穿着却是北方农民的打扮。代明安在前，高增光在后，带着这帮人，从住宿的“小村庄”跑步上山。

对于他们来说，虽然体质上还不是很差，所背负的重量按突击队的要求也并不算多，但年纪毕竟都已在三十以上，要承受这样的训练，决不是轻松的事。上了半山腰之后，已经没有小路，就在山岩和树林间攀爬。个个气喘吁吁，满头大汗。

代明安回头看着这帮人的熊样，心里知道着急也没用，喊着：“歇会吧。”

那些人求之不得，立马停下脚，一屁股就地坐了下来。

代明安点了下人数。树影之下，怎么没见高增光。他走下去一看，高增光正背靠一块大岩石半躺着，上衣敞开，胸口一起一伏，手拿着草帽使劲地搨，嘴巴张着大口直喘，行李装备全散了摊。

代明安苦笑了一声，走了过去。

高增光见代明安特地走过来，却没有起来的意思，只是抬了抬上身，表示了下了。

代明安也没有在意这些，只是说：“歇着，歇着，不用起来了。高队长，有点累了吧。”

高增光鼻子里哼了哼：“我们没受过专门训练，比不过你们职业军人，怕要拖你们后腿吧。”

代明安没听明白，这话是自谦还是暗讽。不过想起昨天夜里临睡前崔主任还把他特地喊去面授机宜的那番话：“高增光此人有勇无谋、桀骜不驯，可用而不可信，”心里也就坦然一些，装着没心没肺的样子，说：“哪里，哪里，我们这支队伍进去以后，全靠你们熟门熟路来打开局面啊。”

高增光对这句话还能听得过去，不过还是故意叹了口气：“常言道买卖好做，伙计难合啊。”

代明安听出此意，便说：“过去的事，都不提了。就像崔主任说的，我们能再次合作也是缘分。这次，我跟你老哥只有相互帮扶，拼了命往前冲，绝无旁骛。咱们俩真的是像一根线上的两只蚂蚱啦，只能精诚合作，往前拼啦。你说对不对？”

“对，对，代大哥说的当然对。我们一起往前拼。”高增光硬撑着站起来，拍了下代明安的手掌。

代明安欣慰地点点头。面对就像要往鬼门关里闯的军令，两人也只能搁置前嫌，去死里求生了。

到了山顶，海风呼呼而来，松涛低鸣。小岛不大，几层山崖之下，便是飞卷的浪花。四周都是茫茫的大海，远处海雾缥缈，若隐若现，无边无际。应该说，这儿有点像海源。却提不起大家的思乡之情。代明安不是海边人，当然没有这种感受，高增光是北山的人，在老家时也没见过几次海。倒是昨天在崔主任讲话时插话的那个留胡子的人，坐在石头上大发感慨：“这儿可是像俺老家噢。”

此人姓薄，我们叫他老薄吧。老薄的老家是海源的邻县。他可是个老资格，论年纪还是这帮人中最大的。当年还是赵保元的兵（赵保元部就是抗战时驻扎在海莱山区的暂编第十二师，1945年2月被八路军围歼），来台湾以后非兵非民，跟着军队干点杂活。年数挺长，可什么也不是，这次是想出来碰碰运气。遇见高增光，并没有碰到了半个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感觉，反倒觉得那小子哪点能赶得上我，让他当队副，不屑之意溢于言表。高增光当然也看出来了。不过，高也非等闲之辈，而是隐而不发。别的人跟老薄扯起了各自的家乡，高增光一句话没说。

下山了。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因为下山有个冲力，身体的平衡和发力更不容易控制。

因为是常年无人的小岛，岛上野草特别茂密，半人高的草丛只露出大的山岩和树木。

“小心石缝和树尖，看准了再往下。”代明安还在提醒别人，在草丛和大小石块中找落脚点往下踩。

话刚落音，后面就传来了“喔哟”一声，回头看去，只见密密的蒿草不见人影。代明安喊了声：“是谁啊？大家快过来找一下。”

结果，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老薄，一脚踏空，崴了脚，蹲在一边。

“能走吗？”代明安问。

“喔哟，喔哟。”老薄一脸痛苦，只顾哼哼，半天才说：“我走不了啦。”

“走不了也得走。”高增光这时发狠了，“到时候，头顶上共军的子弹啪啪地响，谁背谁啊？”

老薄试了两下，没能站起来，抬起头可怜地看着大家，“真是不行了。”

代明安便吩咐旁边两个人，说：“你们两个扶他下去吧。”

回到营地，高增光把身上的装备往地下一扔，坐在地上嚷了起来：“上哪儿洗澡啊？上哪儿洗澡啊？”喊了两声，没人理。便起来朝一个屋子的房门揣了过去。

“干吗呀？”里面一个瘦高个子开门吼道。

高增光一见对方是上校衔，就放低了声音，说：“在哪儿洗澡啊？”

“还想洗澡啊。这儿的水都是用海水淡化来的，都是靠从台湾运来的柴油换的。这水钱比油钱还贵，做饭解渴都不够。还想洗澡？”

“那怎么办？”

“怎么办？等你们有本事上了大陆再洗吧。”

门“砰”地关上了。

高增光“呸”地吐了口痰，脸上忿忿地，转身走了。

第二天夜里，模拟登陆演习。四周一片漆黑，只有风声和浪涛声，一点灯光也不许有。

十二个人上了一条改装渔轮，绕着小岛转了二圈，朝着一个预定的目标靠近。在离岸二百多米的距离停下，船上的人转乘有动力的橡皮筏（叫橡皮艇也可以，标准最低的那种）。就这么个简单的事也有点犯难。渔轮的二边没有栏杆，也没有下船的舷梯。要下橡皮筏，只能是从摇晃的渔轮上翻身滚下摇晃的橡皮筏上。难度虽不大，但要是滚得不准，掉到海里也就没命了。

一个一个好不容易滚下去，轮到老薄就更难了。

本来老薄年纪大一点，身子不像别人灵活，加上崴了脚，更是不便。一出船仓，在晃动的甲板上就站不直。另外有个人一只手抓着桅杆，一只手伸给他。老薄抓着那人的手到了船边，看着漆黑一片之中在波涛里上下起伏的小筏就是不敢动。

“真他妈的！”高增光气死了，猛地在背后推了老薄一把。

“喔哟。”老薄又是喔哟一声，翻了下去。“呼”的浪花溅起，不知是老薄掉进了海里，还是本来就该卷起的海水。

好在筏子上的人眼疾手快，抓住了老薄，把他已经掉进海里的半个身子，硬是拉了上来。

事情还没有结束。

十二人分乘两只橡皮筏，代明安和高增光各带领一只驶向岸边。

四周一片漆黑，只有风声和浪涛声，一点灯光也不许有。

“呼。”橡皮筏撞上了礁石。

“上！”高增光低声喝道。

“嘭。”第一个人跳下去了。“喔哟”，也是一声“喔哟”，这海水还有半人深呐。“呼”，一阵海浪上来，那人乘势往前去了。

“嘭，”又一个人下去了。

“哒哒，哒哒。”左侧响起了低沉的枪声。那是代明安领的那帮人也在登岸。按照预定方案，突击队登上陆地后可以向假想敌射击。那就是说，代明安一帮已经赶在他们前面完成登陆了。

“赶紧下！”高增光不顾假想的情景，大声吼了起来。

筏子上只剩下了老薄。老薄试了试，好不容易伸出脚去，还没碰到水底，“嘭！”浪花又起。这是一个回潮，海水哗哗地下撤。老薄没站住就被回撤的海水冲倒，卷到筏子下面，再也看不见。

四周一片漆黑，只有风声和浪涛声，一点灯光也没有。

老薄就这样永远地消失了。

两个小组在山脚下集合。代明安点了下人数，漆黑之中，没有了老薄。

“怎么回事？”代明安问。

“可能是没上来，被海水冲走了。”高增光答。

“还没有出发，就少了人。怎么向崔主任交待？”代明安着急地问。

“怎么交待？这种人，到时候，真的是种累赘，不如现在就没了。”高增光答。

代明安竟也无语了。

就这样的一支队伍，还想要上大陆作战？

次日，崔主任的办公室。

“还没有出去，就这个样。真出去了，怎么办？”崔主任有点怒。

坐在对面的代明安和高增光都无语。

“党国不是要你们去送死，而是要你们弄出动静来。你们这种样子，就是上去了，也会连点声音都没有，白打了水瓢。”崔主任继续在训着，但是也在压着不能过于狂怒，不能惹翻了他们俩。

代明安和高增光各自揣着自己的心事，没有话。

崔主任对他们翻了翻眼，把语速慢了下来，“跟你们说白了，不去是不行的。不要以为出点事故，消极怠慢就可以不去了。上头在等着你们的消息。去，是一定要去的。问题只是怎么个去法。在这儿，你们好糊弄。到了那儿，共军可不是吃素的！”

高增光听着崔主任老是拿共军吓唬他，最不高兴，一时又来性了。“共军又怎么了？要是怕共军，我也就不来了。”

“好，好，是条汉子。”崔主任还在有意撮弄着。

“我就把话挑明了。我高某这次回去，不是为当队长，也不是为当县长，就是为了杀共产党。别人说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不，我高某人要杀五个才够本。”

“怎么要杀五个？”连崔主任也惊讶地问。

“除了我，还有我爹，还有我娘，还有我老婆，还有我儿子，不杀五个，怎么能够本。”高增光涨红了脸，目露凶光，已经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任其喷发了。

“好，好，高队副真是忠勇之士。”崔主任一听，可是高兴得不得了。他要的，不就是这个么。

代明安心里也在暗叹，这小子有种。

“这我就放心啦。不过，真的要上去，也不能这样稀里哗啦。”崔主任说。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代明安想了一会儿，才说：“这儿的海流太急，船不稳。在海源的岸边，可能会好一些。”

高增光听代明安讲的也对，也就跟着说，“我们不如在内河里登陆。从大河口进去，在河边上岸，既平稳，共军也不会防备到这点。”

到底是海源当地人，高增光这个主意是有道理的。

“这倒是好，这倒是好，可以这么办。我这就向上报告。真想不到高队副还粗中有细。”崔主任的脸上有了笑容。

“粗？你以为我是个粗人啊。我要是个粗人，就不可能从共区里过五关斩六将跑出来了。”高增光越说越来劲了，也不管顶头上司愿不愿意听。

可是，粗也好，细也好，就能改变他们灭亡的命运吗？

第四十七章 全民皆兵

1949年7月17日

47.1 国民党要来了

面对台湾国民党集团的反攻图谋，大陆方面做好了更大规模的、更充分的准备。海源城乡各社队进入了“全民皆兵”的总动员。

民主村的乡亲们又面临着一场血与火的考验。没有召开大型的三级干部会，中午于村长从公社领回来精神，下午就在大队部召集大队党支部会。按说，于村长的官衔正规的称呼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兼大队长，但乡亲们几十年来还是习惯叫于村长。

村党支部的成员还有：杜家骏、车素花、彭会计和鲁队长。

根据上级在全国各地“大办民兵师”的要求，村民兵队已改叫民兵连。鲁队长应该叫鲁连长了，但乡亲们还是依旧叫鲁队长。于村长传达完公社精神后，党支部立即讨论民主村的战备工作，重点是民兵的组织工作。按照1949年的经验，全村男女青壮年分成武装基干组、后勤组、运输组、救护组、治安组、宣传组，分别由鲁队长、车素花、平金刚、衣春玲、秦德才、林海秀负责。

对于林海秀能否担任宣传组的负责人，于村长特地起请示过纪社长。纪社长沉吟过后，说：“可以吧，我们党的政策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连犯过错误的人都应该团结，何况小林自己并没有犯错误，表现一贯是很好的。宗书记那里我去说。”会上，支委们也都同意这样的安排。公社下发的两支半自动步枪、五十发子弹和五支训练用的报废步枪，存放在陶家大院的专门库房，由彭小宾领着三个人日夜看守。

最后决定晚上立即召开全村社员大会。

初夏的夜晚，清风徐徐，月色朗朗，繁星点点。

社员们没有心情留意这凉爽的好天气，收工回家后扒拉完几口饭就早早地过来了。自从出了董平章的事，人们的心都收紧了，耳边也能听到些蒋介石想要反攻大陆的事。这些事不敢多问，就在心里打鼓。一听说要开这方面的会，都一路小跑地过来。进得西北场院，彼此也不多说，赶紧找个地方蹲下，眼瞅着大队部，等干部出来讲话。

大会当然还是由于村长讲话。

于村长说：“现在形势很严峻，台湾已经派了好几拨美蒋武装特务在南方几个省登陆。虽然被我军民全部歼灭，但敌人绝不会死心。我们龙头镇地处沿海前线，很可能成为他们下次登陆的目标。1949年他们

就是从这儿上来的，逃跑时还带走了一批人，这其中有一部分人因为对这儿情况熟悉，国民党很可能再把他们派回来，像董平章那样。而且，敌情通报说，前不久有架美蒋U-2高空侦察机就是从我们海源上空飞进来的，后来飞到了河北，最后在内蒙被我们导弹打下来了。当时它飞进来的时候，就是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去的。说明敌人真的是在准备了。”

“嚯！”社员们瞪大了眼，一阵惊叫，有的还抬头望望那漆黑的天空，好像真有一架飞机在头上的星空划过。

笔者说明，这架飞机的飞行时间和途经，不是本书虚构，而是确有其事。其实，乡亲们不知道的是，当时不但有这架U-2侦察机，1964年6月11日晚11点，一架从台湾新竹起飞的P2-V侦察机飞过来后，在海源的北部邻县被米格战斗机击落，机上十三人全部毙命。台湾国民党还真是盯上了海源这块地方。这事当时也没有公开披露，近年台湾方面来寻找遗骸，当地还搞了假墓来应付（此事请见《凤凰周刊》2010年第11期）。

回过头来，继续听于村长的报告吧。“国民党要敢来，也好。我们想抓还抓不到，送上门来，正好把它消灭掉。对于这件事，我们一方面要藐视国民党，对付它根本不在话下；另一方面，又要重视它，把它当回事，认真准备好。国民党究竟能来多少人，我们还不清楚。但要准备他来的人多，比1949年还多。是打大仗还是小仗？我们要准备大打，打得比1949年还激烈，还残酷。只有我们充分准备好了，我们才会更主动，我们的损失才会少一点。”

“而且党和政府已经做好了周全的布置。我们南门外的兵营和小河口东的浮山卫、大河口西的新河镇，部队都增加到一个营。连赵村、王庄也都驻上一个连。我们这一带的兵力，比1949年增加了十倍。”

“社员同志们！拿出我们老解放区人民的革命精神，行动起来，坚决消灭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

会场上的气氛也活跃了起来，大家精神振奋，一个个都磨拳擦掌。

台湾国民党的企图，实在是打错了算盘。尽管十五年过去了，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黑暗与混乱，和长期的宣传教育，人们对国民党的憎恶和失望并没有减轻。尽管十五年来，人们也曾经历过不少挫折，对于有些人甚至还是灾难，但是几乎没有人会反过来指望国民党来解救。相反，却激起了人们已经有所减弱的革命热情。有些人找到村干部，要求担当最困难、最危险的任务。

年轻人要求拿起枪，到海边第一线和解放军一起巡逻、站岗，不用说了；齐阿姨、衣大妈向于村长提议她们还去纳鞋底、烙大饼。于村长笑笑说：“纳鞋底就不用了，现在解放军穿的都是解放鞋，橡胶底，又舒服又结实。时代发展了，支援解放军的方式也不一样了。烙大饼嘛，到时候再看吧。”连靳喜悦也懊恼自己残疾，这些年一直没好，不然还可以再上前线。

因为几年前偷粮食而被游街的秦德才，靠着烈属补助也熬过了困难时期。沉寂了几年之后，现在又抖擞精神了。管治安，那是他最拿手的。他又可以瞪眼扒皮了。但是他敢去瞪眼的人还不多，满民主村算下来就包金贵一个人。现在赵玫成了特务家属，他也可以去瞪眼了，不过那样一个漂亮女人，哪舍得

去瞪眼，只敢远远地偷看两眼。他的儿子秦有理，被政府送到黄港的儿童福利院寄养，如今已经念高中。去年回来了，在龙头中学住宿念书。和秦有理同去的另一个孤儿狗狗，因为一直没有查到家人亲属，仍住在黄港福利院上高中。

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那就是和台湾有牵扯的几户。

老王头对国民党是最恨的了，儿子被国民党抓去，十几年一直是心头之痛，但是在社会上、在村里，情况变得不一样了。解放初期，被国民党抓走人的几家，大家还都挺同情，甚至还有帮助照顾。现在不了，自己家反而好像成了和国民党一伙的了。一说起国民党，总有人会转过脑袋，用异样的眼光看他。好像国民党是他养的儿子，是他老王头在指使国民党回来，真气人！可那有什么办法呢，连公社都有这个意思。国民党的传单，后来也有别人拣到，也都没什么事。可是丁妹、王溪捡到了，却成了一桩大罪似的，从此抬不起头来。老王头真的恨国民党，真的想消灭这些敢反攻大陆的国民党。可要是王立也在里面呢？不是没有可能啊，国民党抓壮丁的事多啦。要是那样回来，被咱们解放军抓了俘虏，像董平章那样，或者被打死了，那自己一家更完了，那就真的是永无翻身之日啦。嗨，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丁妹的感受就更复杂了，盼丈夫、盼丈夫，天天盼丈夫，盼着解放军去解放台湾，解救自己的亲人回来。盼了十几年，几度希望显现，曾有过抗美援朝，曾有过炮击金门。那时每天都在喊着“一定要解放台湾”，前两年因为饿肚皮不怎么讲了，现在怎么又变成了国民党要打回来呢？真想自己的丈夫王立回家来，又怕的是当俘虏被押着回来。当然更怕国民党真的回来，又像旧社会一样，王立还不是给国民党当苦力。满心的翻腾和难受能对谁说呢。说了，别人会说是你在盼国民党回来啊。闭嘴不讲，别人又会说，你看那丁妹心里还不知道在想什么呢。丁妹是难熬又难受。

包金贵是更难受了。他本是苦命人，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是共产党解放了他，给了他新生。可在有些人眼里，他成了国民党的代表，和国民党永远有着拉不断、扯不清、分不开的关系。他逢人便说国民党的坏处，乌龟王八蛋地直骂，要求扛起枪，到海边去打国民党。可有几个人会信他呢？尤其是会有几个人真的信呢？说不定就会有人想，这小子准是想跑到最前面，好早点投奔国民党。宗书记、秦德才肯定是这么想的。

赵玫也是这样，对国民党是恨上加恨。国民党不但抓走了她的丈夫，而且把他变成了特务。尽管她始终如一地相信董平章不是坏人，可如今千真万确地成了敌人。她真的是想上前线，豁上命，跟国民党拼了。她知道，这一生已经不可能再见到董平章了，不可能再在一起了。当她看到，当她想起董平章在公捕大会上被公安人员拖出去的时候，她不恨共产党，她恨的是国民党。当国共双方面临又一场生死较量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理所当然地站在共产党一边，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理智上。是国民党毁了她的家，毁了她全部的甚至是最后的希望。她要 and 国民党去拼个死。当然民兵连不会要她，很好推辞，她早就超龄了，事实也确实是这样。

47.2 民兵训练

一早，太阳刚升起。西门外，刚收拾完麦子的打麦场上。民兵们就开始训练了。

鲁队长在领着年青的基干民兵学刺杀。在讲完基本的动作要领后，鲁队长在喊着号令：“向前，突刺，刺！”

民兵们排成几排，每人拿着步枪形状的木把，也高喊着号令：“杀，嗨！”跨出一大步，再向前猛刺。

鲁队长看了一下，大多都挺认真，就是皮安己的小儿子皮高深胳膊没伸平，没有用劲。皮高深是高中念了一半就不念了，上县城又没找到工作，就先回村里了。

鲁队长就吼上了：“皮高深，别偷懒，把胳膊抬起、伸直。”

皮高深嘴一撇：“国民党哪敢真来，瞎说说就是了。”

齐成材是最认真的，马上插话说：“不能这么想，前天报上还说了，有一股国民党特务在广东沿海登陆，被解放军一网打尽。”

“那还远着呢，离我们也不止四千里。”皮高深还在辩解。

鲁队长可不客气：“民兵也是兵，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你来了就得认真练，没啥好说的。要不，你就退出。”

皮高深再不敢多说，也只好使劲地练了起来。

打麦场上一片激昂的喊杀声。

练了一阵，鲁队长抬头看看太阳，说：“今天早晨就练到这儿，回去吃饭吧。早饭后到西北场院集合，进行搜山训练。”

小伙子们嗷的一声都散了。

那半边的姑娘们，在衣春玲的带领下，还保持着队形。林海秀始终在一边看着，本来她是不用来的，但先前搞过多年的妇女工作、青年工作，使她习惯了在有事的时候要到现场来。但是她现在有了不方便的地方，她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如今一岁多了，正离不开妈妈。好在早晨李辰还没去学校，她可以到操场来看看。她看衣春玲领着姑娘们往回走，就说：“咱们唱个歌吧，我来起头。‘飒爽英姿五尺枪’，唱！”

女孩子们的队伍立即发出青春亮丽的歌声：

“飒爽英姿五尺枪，

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

不爱红装爱武装。”

鲁队长听了，就说：“你看，你看，女孩子家就是好，看你们愣头青，东一个西一个的，比比人家像什么样子。”

彭小宾连忙招呼小伙子，“过来，过来，咱们也列队，唱个给她们听听。”

姑娘们刚唱完，小伙子们也排好队，踏着整齐的步伐，在彭小宾的领头下唱起来了：

“日落西山红霞飞，

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

胸前的红花迎彩霞，

愉快的歌声漫天飞。

米嗦拉米嗦，拉嗦米多来，

愉快的歌声漫天飞。

一二三四！”

“怎么样？”彭小宾在对衣春玲夸耀说：“这声音多洪亮，多雄壮！”

衣春玲也毫不示弱地反唇相讥：“唱的什么呀？早晨太阳刚升起，还什么日落西山，牛头不对马嘴。”

“都挺好，都挺好。”林海秀在中间打圆场，“年轻人就要有这种朝气蓬勃的精神。”

鲁队长看着民主村的新一代年轻人在重大考验面前还能这么乐观，也咧着嘴笑了。

上午，八点多。西北场院。

场院里集合的人更多了，年轻人扛着真枪和临时赶制的红缨长矛，站在前面。中年人在后面，有拿锣鼓的，有拿脸盆的，有拿绳索的（大概是准备用来绑俘虏的）。每个人脸上都很兴奋，不用下地干活，还能上山爬一阵，这样的机会实在不多。

宗书记也在场院里，背着手来回走着，看着场院里不时走动的人群，又抬臂看看腕上的手表，眉头紧皱着，焦虑地说：“速度太慢了，素质太低了。”

鲁队长只好吹起了哨，“各班排，集合，列队，点名。没来的，记上，扣工分。”

队伍站好了，鲁队长向宗书记敬礼：“报告宗政委，民主村民兵连集合完毕，请指示。”宗书记这时的身份是龙头公社民兵团政委。十五年前，当他还是一个小兵的时候，是绝不会想到还有当团政委的这天，那时见到营长就不敢喘气。所以当听到鲁队长喊他政委，心里喜滋滋的，不过脸上是不能表现出来的。

宗书记先挺大度地表示一下：“稍息，稍息。”而后又皱起眉头说：“你们的速度太慢，动作太不上正规，说明你们的训练还很不认真，很不到位。要像你们这个样子，真来了敌人怎么办？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敌人抓了去。这不是吓唬你们啊！”

宗书记这类干部对被领导的惯用手法，一个是吓，一个就是压。被领导要是不怕吓、不怕压，他还有一手，就是整。他手上有权，这你就跑不了了。所以不管信不信他的吓，大家都是规规矩矩地听着。

“现在，我下达命令，根据敌情通报，望海山上可能有个空投特务，立即上山搜捕。出发！”

基干民兵的各班排按事先布置的路线，前面打着红旗，一队队地向北走去。一时间望海山上旌旗招展，人声鼎沸。黑压压的人群高喊着“缴枪不杀”，像潮水一样向山顶涌去。山下则是更多的中年人群，把望海山围得水泄不通，敲锣的、敲鼓的、敲盆的，敲着所有想得到的东西、拿得到的东西、可以敲的东西，摇晃着各种旗帜，不停地呼喊着：“缴枪不杀！”“抓活的！”那气势真的是声震十余里。不由得让人想起了1958年消灭四害时全民围剿麻雀的场景。

于村长站在山顶，看着山上山下一派人民战争的浩大声势，高兴地说着：“好啊，好啊，这就不怕敌人来了。”鲁队长也说：“就算来了，也叫它们插翅难飞，有来无回，像个小家雀一样。”

人群都涌到了山顶，山顶快挤不下了。鲁队长向大家说：“好了，演习结束。回家吧。”

下午，青年基干民兵在陶家大院集合上课。今天上政治课，由平金刚讲述1949年龙头军民反击国民党登陆反攻的战斗经历。

讲课前趁着等人，大家又聊了会。

皮高深说：“这些国民党王八蛋，那时把大陆搞得一塌糊涂，还敢来啊？”

齐成才推推眼镜，点着头说：“现在台湾老百姓遭老罪了。”

皮高深的妹妹皮平平，一个很文静的女孩子，平常不多话，这时才悄悄地插了句：“不知他们那儿苦成什么样了？”那话里是几分担心、几分同情。

团支书彭小宾又兴奋起来了，说：“哎，最近衣春玲学了首歌，就是讲的台湾老百姓怎么过苦日子，怎么想念祖国大陆的。”

还没等衣春玲说“讨厌”，大伙的掌声、笑声就起来了。

衣春玲也只得说：“好，好，我就唱几句吧，别笑话就行了。”就轻声地唱了起来：

“我爱我的台湾哟，台湾是我家乡，

过去的日子不自由，如今更苦难。

我们要回到祖国的怀抱，

兄弟们呀姐妹们，不能再等待。……”

大伙掌声又起。这时，鲁队长和平金刚进来了，按原定程序，平金刚开始讲起来：

“现在讲那个时候，我们西北村的民兵是怎么对付国民党反攻的。那个时候，国民党反对派可凶恨啦，尤其是那个还乡团，真是杀人不眨眼啊。”原先平金刚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从1949年那次在李家泊的

军民大会上讲了一段如何从敌占区逃出来的经历后，发现居然自己还挺能讲。这几年也有了这兴趣，常应邀到中小学给学生讲讲阶级教育课，也觉得挺荣耀，不过平常的时候话还是不多。这回，平金刚站起来上前一讲，看见大家都这么认真地盯着他，就又有精神了。

“我们几个在南港上牵制敌人，眼看敌人都围上来了，我们才分散撤退。那个险啊！我趴在玉米地里，敌人的靴子就从我身边经过。”

“喔！”小青年们有的紧张地叫了出来。

“我回到龙头镇外，那时候咱们龙头镇有城墙。我一看四个城门都有敌人把守，戴着钢盔，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就像日本鬼子。你们没见过日本鬼子吧？我见过，就是那个样。我灵机一动，‘嗖’地就从城墙上翻了进去。”

小青年们瞪着大眼，听得都入了神了。

“第二天，敌人把我们赶到西北场院。那个伪县长、大地主陶富贵。这儿，我们上课的地方，以前就是他的家。”平金刚指指这房子，小青年们也抬头四下张望，好像也在找陶富贵的影子。

“这个陶富贵，人性全无，硬是把我们村的军属祖大爷，一刀一刀地刮了，当场血流遍地。”

小青年们怒火迸发，彭小宾领着高呼：“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

小青年们也都怒吼着：“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愤怒的吼声震动着屋宇。

“我，我，我恨不能冲上去跟他们拼了。但是我又想到了革命的策略，要沉着冷静啊，不能冲动啊。我硬压着自己，终于从敌人中跑了回来，找到了亲人解放军，又带领大军打了回来，重新解放了龙头镇，把国民党赶下了大海。”

“那个陶富贵呢？”齐成材认真地问。

“也跑到台湾去了。这次很可能他又要回来反攻倒算，想要回这间屋子，复辟变天。我们能不能答应啊？”

“不能，绝对不能！”小青年们又怒吼起来。

民主村的人们并不知道陶富贵当天就沉海毙命了。那艘船还一直沉在龙头镇外面的海底里。

47.3夜半演习

半夜了，后半夜了。辛劳了一天的人们都在沉睡中。

突然，海角方向传来了两声枪响，望海山上升起了三颗信号弹。龙头镇里马上有人敲锣，四下奔跑着喊起来：“敌人上来了，敌人上来了！”

一时间，整个龙头镇就像炸了锅似的沸腾了，到处是人声、奔跑声、哨子声。所有街上的和单位的电灯刹那间都亮了（困难时期停了电，去年才又通了）。

“基干民兵按班排到指定地点集合！”鲁队长在灯光下喊着。

“救护队扛上担架，到西门外集合！”衣春玲对着姑娘们喊。

“中年人等年轻人走了以后再出发。”于村长也在喊。

“家里有孩子的，要留人看好孩子。”车素花也在四处跑着。

1949年的血腥拼杀，又要重演？真到了这时，人们不能不紧张。老人惊恐地望着窗外，战争的残酷对于他们还是记忆犹新。孩童躲在妈妈的怀里不敢出声。

王溪虽然已经十五六岁了，也吓得脸色发白，“姐，这怎么办，怎么办？”带着哭腔直朝着丁妹嚷。

“别吵了，烦不烦人，就在炕上呆着。外面有解放军呢，有什么怎么办？”丁妹自己因为烦躁得很，却说不出话来。

一队队的民兵从南门、西门、东门朝海边进发。

不但是龙头镇里，而且东自浮山卫、西到新河镇的几十里长的海岸，到处都是浩浩荡荡进发的人群。前面是扛枪的基干民兵，后面是几万名打着火把、呐喊着的社员群众。

解放军部队也从各自的驻地，一队队地向前开进。

海源县几十里的海岸线，全都是一片片的火光，一片片的吼声，真的是一片叫任何对手都要胆战心惊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一张空前的大网张开了，正在等着敢来窜犯的国民党武装特务。

这是海源县组织的全县军民围歼登陆特务的大演习。

村干部们是事前两个小时知道的。乡亲们是按事先的各种方案，寻找自己的位置，进行自己的活动。

但也有不知道自己位置的，赵玫就是一个，她事先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当枪声响起、哨声响起、脚步声响起，她以为真的是国民党反攻来了。对国民党的仇恨，使她想也没想，从院子里顺手拿起一把铁锹就冲出院子。街上到处都是——一队队朝前走的人，她也来不及问，就跟着人群往外走。

走到南门口，突然路边一句大声的话喝住了她。

“那个人，不是赵玫吗？怎么她也跑出来啦？站住！”

赵玫转头一看，路边的台阶上站着几个人，正是公社的几个干部，说话的是宗书记。

“赵玫，你拿着铁锹，想干什么？”宗书记喝声问道。

“不是国民党上来了吗？我去打国民党。”

“哼哼，”宗书记冷笑一声，“你是管制分子，还敢跑出来。”

“我？我是管制分子？我怎么从来不知道？”赵玫一下子懵了。

宗书记也愣了一下，他知道自己说漏了嘴。从董平章被捕后，赵玫作为特务家属被定为内部控制对象。所谓“内控”，就是由组织上掌握，指定专人监视，但本人和社会上并不知道。而“管制”则是公开戴上帽子，受到整个社会的监督。但在宗书记的印象中内部控制和管制并没有区别，所以也就脱口而出了。当然宗书记并不想解释和改口，继续厉声喝道：“别啰嗦，给我老老实实地回去。”

赵玫还愣愣地站在那儿。

经学文走了过来，接过了铁锹，低声说：“走吧，回去吧。”

民兵们吼声震天，高喊着“缴枪不杀”扑向海边。海边还是漆黑的一片。民主村的民兵冲在最前面，穿过海岸前的最后几道礁石群。

“哎哟！”一声惊叫，一个人影倒下了。

“有情况！”有人喊道。

“什么情况？”鲁队长马上问，又向后一挥手：“全部卧倒！”

一大群人立马齐刷刷地卧倒，不管是碎石还是水洼。

“唉哟。”前面倒下的人在叫着。

鲁队长跑过去一看，原来是齐成材躺在地上。

“怎么啦？”鲁队长问。

“我没有看清脚底下，踩了个空，脚崴了。”

“嗨，叫你小心点，小心点。怎么还这样？还跑得这么急。”鲁队长埋怨着。

“救护队，救护队！”彭小宾向后喊着。

“起来吧，起来吧。”鲁队长朝大家挥着手，民兵们爬了起来。

衣春玲急急地跑了过来，胳膊上戴着白底红十字的袖章，远远就能看见。

“什么事？什么事？”她急忙问。

彭小宾指着躺在礁石缝里的齐成材，说：“他摔了一跤。”

“嗨，这算什么？我还以为叫国民党打伤了昵。”衣春玲又对地上的齐成材说：“摔了个跤算什么？起来吧。”

“唉哟，我崴了脚，起不来了。”齐成材只管哼哼。

“我拉你起来。”衣春玲一把将齐成材拽了起来。

“还是不行。”齐成材苦着脸说。

“那我背你。”

“这可不行，这可不行。”齐成材想推又动不了，只好用双手向前挡着。

“哎呀，这么好的福气，还推什么呀？我都羡慕得流口水。”彭小宾笑着说。

“去！”衣春玲对彭小宾白了一眼，顺手就把齐成材扶到了肩上。

齐成材满脸通红，好在天黑，别人也没看出来，嘴上连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没走几步，后面的担架就上来了。衣春玲把齐成材放上了担架，和队员们一起把他抬了回去。

担架往回走到前港，平金刚他们运输组在那儿待命，看到担架都抬着人下来了，急忙围上来问：“都有伤员啦？前面打起来啦？”一看是齐成材躺在上面，是脚崴了。

“嗨，你这个齐成材呀，真是有出息。”平金刚摇着头，说了这么一句。

各路队伍都到了海边，在一阵阵的高喊和欢呼之后，纪社长出来宣布：“今天晚上的活动是解放军部队和地方政府组织的联合演习。这次演习充分显示了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我们脚下的万里海岸就是钢铁铸就的万里长城。敌人胆敢来侵犯，我们就叫它彻底灭亡。我宣布，今晚的军民大演习胜利结束！”

在又一阵欢呼之后，人们兴冲冲地往回走了。

第四十八章 有来无回

1949年7月18日

48.1 窜犯

海的这一边，高增光 and 代明安还并不知道，在海的那一边，一张大网正等着他们呢。

经过了四、五天的准备之后，他们一行十一人在太阳初升的早晨登上了一条挂着韩国旗帜的改装渔船，出发了。

这两天代明安和高增光之间没有多说话，也没有提起往事，不管是曾经的枪林弹雨，还是彼此间的宿怨。代明安，当年青年军的连长，来台后在新兵训练队当队长，后来去过金门前线。表面看一直很平静，不像别人或是乡愁万重、夜夜难眠，或是怒火满腔、仇恨难消，他什么也没去想，甚至这一次行动，成功了会怎么样，失败了又会怎么样，都没去想。他只是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奉命而已。他有过去，却没有未来。当初，为了打日本鬼子而参加了青年军，反倒和共产党干了两、三年。那两、三年早已飘忽而去，在台湾已经十几年了。但他一直觉得，台湾不属于他，不是他站脚的地方，可是海的对面也没有他站脚的地方。那就漂吧，随它去漂吧。在外人看来，他处事随和，一无所求，甚至有点潇洒，他自己知道这是另一种的消极和无奈。这次奉命潜入海源，也没在他心中掀起更多的波澜，甚至没去想成与败。唯一想起的，是他的老上级章团长。他自己作为党国的军人，追随孙先生，谈不上；追随蒋公，更是扯蛋；他倒是愿意追随章团长，那是他一生唯一敬重的人。这次要是能重新踏上海源的沙滩，踏上望海山，唯一的心愿就是再看看章团长，看看可能还留在山上萦绕不去的团长的魂灵。

渔船朝着西西北的方向航行了一整天，在漆黑的夜色中靠近了海源的外海。黑得整个大海和天空就像扣上了一个大铁锅，伸手不见五指，看不出上下有多高、有多深，看不出前面有多远、有多近。除了渔船的上下颠簸，就没有任何感觉；除了海浪拍打着船梆的叹息，没有一点声响。

代明安仔细地观察着，没有任何发现，没有任何异样。渔船缓缓地向前，靠着定位仪摸到了龙头海边。出发前，高增光提议不在海滩登陆，而是乘大潮进大河口，在河口芦苇滩北面的河岸登陆，这倒是有可取之处的，别人绝对想不到。代明安也有几分放心。

渔船在离岸一千米的地方停了下来，把充气皮筏打开，他们分乘两个筏，代、高两人各带一个。按原计划，高增光在前，代明安在后，向大河口的内河驶去。

皮筏是消音的，无声地在前行。高增光坐在最前面指挥着。

在黑暗中，更黑的岸边靠近了。高增光的心情是激动的，这儿毕竟是他的家，尽管是被革命毁掉了的家，一个没有了踪影的家。

开进河里，两岸迅速收紧，河面狭窄了，芦苇迎面而来又到了身后。四周还是寂静无声。

黑暗中似乎看到了望海山的影子，等上山就能看见自己家背后的大山。白天的话，在河口就能看见望海山后面更高的那座大山的山脊。

要看到自己家了。连高增光这样一个凶狠的家伙，此时也是感慨万千，心潮难平。

“队长，可以下船了吧？”反倒是旁边有人在提醒。

前面河道更窄，有村庄，有漫水桥，无法通过。这是他们事前在U—2侦察机航拍照片上看到的。

高增光一挥手，“下！”

皮筏靠上河的左岸（对于高增光他们来说是右侧，河岸的左右是按河流的方向说的）。五个人身穿农民服装，带上轻武器和物品，翻身下船。皮筏则放了气，先随身带着。

高增光四下看看，依然悄无声息，只有远处还有一些虫儿在叫。

五人走上河滩，要翻过一道不高的河堤。高增光站上河堤，眼前依然是茫然漆黑一片。他庆幸他们选择了一个好的时机、好的地点，居然不费吹灰之力就成功登陆了。他暗暗高兴，回首示意叫那帮人赶紧向前。

就在他们最后一个人翻过河堤，高增光还来不及感慨又一次踏上海源土地的时候，突然前面的黑乎乎的地里发出了一阵女人尖利的叫声：“有人！有人！国民党！国民党来了！”

高增光看不清，前面那女人在哪儿，有多远。刚疑惑了才几秒钟，旁边的手下人里，不知是哪个的手提冲锋枪已经响起。所有的预想，瞬间都打乱了，高增光已经无法判断该不该开枪和该不该责骂那人。只说了一句：“快！向前跑！”

女人依然在黑暗中尖叫，“国民党来了！”

冲锋枪响着，高增光一伙夺命狂奔。

48.2一网打尽

那尖叫的女人，不是别人，正是赵玫。

赵玫怎么会在这深更半夜来到这荒郊野外呢？

赵玫在演习那夜被宗书记当众斥之为管制分子、强迫回家，思想上彻底绝望，精神彻底崩溃。应该说，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十几年来多少磨难都挺过来了，多少委屈忍受了，多少眼泪往肚子里咽。因为她还有希望，还有指望，希望还有和董平章团聚的一天，指望党和政府能理解她、能容纳她。董平章的被捕，破灭了她的希望，而宗书记的话，则断绝了她的任何指望。她忽然觉得，她的生命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还去等什么呢？还能等来什么呢？她曾经当过村干部，知道“管制”的含义是什么，那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起码权利，只能等来没有止尽的更严厉的打击。虽然也还有几十年情谊的好友的同情，但那些都已经无济于事，支撑不了越来越严峻的重压。

她想到了结束自己的生命，该结束了。死在哪儿呢？她想。死在家里？这儿也是宝宝离开人世的地方，可那样会让邻居们受到惊吓。死在望海山上爷爷的坟头，可董平章和他爹的尸骨也不在这儿。她想到了曾经是董家的那十亩地，那饱含着董家三代人心血的十亩地。和那块踏遍了董平章脚印、浸满了董平章汗水的土地一起长眠吧。

赵玫带上了一把菜刀，绕过了西门口的岗哨，来到了位于大河口的这块地。尽管这块地早已经和别的地连在了一起，如今是一垄垄长长的地瓜地。但她心里清楚地知道这块地东南西北四处的边界。她坐了下来，弯下腰，轻抚着黑色的土地。她没有流泪，心里只觉得悲戚，只觉得不知道被关到哪儿的董平章，还是个未了之事，虽然说不定已经被枪毙了。她拿起了刀，心里还有最后一点犹豫，那就是还没有知道董平章最后的消息。

忽然，她发觉远处有人影晃动，还能是董平章显灵了，来叫她过去。再定神一看，河堤上有一个一个人翻过来。赵玫不相信鬼怪，她马上想到这真的是国民党特务来了。在这没有半点星光的月黑之夜，在这几里地内没有人家的河口之地，正常人是决不会来的。是民主村巡逻的民兵？也不会。民主村的任何一个人，她老远一看背影就知道是谁。只能是国民党，不可能是别的。她没去想特务们会不会扑过来，而是毫不犹豫地尖叫起来。

高增光一伙只顾向北逃窜，朝着她盲目地扫射着。赵玫转身趴在地垄里，没打着，她继续不停地拼命尖叫着。

手提冲锋枪的声音并不响，但赵玫凄厉的尖叫能传出好几里。

鲁队长听到了。鲁队长带着民兵小分队是从海角出发，正在西滩上进行每半小时一次的夜间巡逻。鲁队长听到了大约二、三里外的赵玫的尖叫，停下脚步，侧耳静听，分明叫的是“国民党来了！”，便举枪朝天射击，领着小分队向叫喊声处奔去。

“叭，叭。”尖锐的枪声，立刻惊动了安排在南港和海角日夜守卫的解放军战士，他们也立即举枪朝天射击。一分钟的时间，南门外军营的警报器呼啸着响起，那尖厉的声音能传出十几里。整个龙头镇，整个龙头乡，整个海源县又沸腾了。

刹那间，人们纷纷涌出村庄，高举火把呼喊、打着、奔跑着，涌向田野，涌向海边。

高增光奔跑着，看见远处的前方，越来越多的火光，越来越多的呼喊，渐渐地连成了一片。不一会儿，从东到西，整个山野遍布火光，没有一点空隙。而且光点越来越密，呼喊声越来越高，人群越来越近。人群中开始射出了枪声，“噼啪，噼啪，”子弹在不分东南西北地尖叫着飞过。

高增光往回一看，不但没有看见代明安那组的影子，后面也响起了一阵急促一阵的枪声，那是鲁队长的民兵小分队和南港冲下来的战士已经到了他的背后。连大河的对岸，也是火光连线、吼声阵阵。高增光心里凉了，知道完了，没想到大陆军民的声势这么大，没想到上来才一、二十分钟就落进了挣不脱的大网。

高增光看到了在火光之前有人影在向这儿迅速跳跃，那是一排排的解放军战士在下蹲向前，进行拉网式的搜索。

高增光下令射击，手提冲锋枪响起。对面，看不到有人跳跃了，可听得出来，他们在匍匐而来。看不见人影，可声音在哗哗地朝这边过来，还不时地举枪回击。

高增光眼珠一转，下令：“撤！”那四人边射击边后撤。高增光却扔掉了身上所有的东西，只在贴身留下一把尖刀。他往前爬行了十几米，而后掉转头趴在一条地垄里。他在等着。他是想等解放军上来以后，装成是同样在追击国民党的民兵。以他高增光的口音、装扮，他想是能混得过去的。等最前面的解放军一过去，他就能趁乱逃走了。

林海秀，在炕上一听到警报和枪声，只对李辰说了声：“你不要出去。”便冲出了院门。在街上没等到自己的民兵队，就出西门往海边冲了。正赶上一队解放军战士，就一起往前跑。小林对这里的每一块地、每一条沟都了如指掌，再熟悉不过了，正好给这队战士领路。

这队战士冲在最前面，背后是群众的火光和呐喊，前面是漆黑空荡的农田。战士们排成了几个横排往前推进，不时向前射击，进行探索和警告。在过一块玉米地时，对面有冲锋枪射击过来。排长一声令下：“有敌人！卧倒！匍匐前进！”战士们立即卧倒，继续向前匍匐前进。

排长不断地朝前开枪，告诉友邻部队，这儿有敌情。部队和民兵从四处朝这儿围来。

小林仍然在最前面一排，往前爬着。爬过玉米地，是一块地瓜地。正爬着，猛然发现前面地瓜垄里像是有人躺着。刚要惊叫又冷静下来，仔细一看，确实是个人。是被打死的敌人？向前趴得这么笔直，这么正，不像是死人。是自己村的民兵？也不对，她知道在她前面没有别人了。

小林大胆地喊了声：“前面是谁？”

高增光一听是妇女的声音，心里气得发抖。他知道是当地群众，就不容易混过去，就回了句：“国民党就在前面，快去抓。”

或许别人听了只知道是海源口音，可小林一听是老北山的口音，更觉得诧异，又大声问了一句：“你是哪个村的？”

高增光回头看林海秀已经爬到自己身后的脚边，已无法脱身，竟然孤注一掷，猛地跃起拿刀向小林刺来。

好在小林也是在高度警觉中，看见高增光跳起来，便滚到一边，大叫着：“有敌人！”

高增光见第一下没刺上，便不顾一切地向小林扑来，一手已经压住林海秀的腿，另一只手拿着匕首高高举起。

小林一边拼了命地高叫着：“国民党！”一边用右手去抵挡。

说时迟。那时快。小林两边的解放军战士离得也不过五、六米，听见小林问话，已经注意到前面有人，看见黑暗中跃起的高增光，便都扑了过去。

高增光刺下去第一刀，再拔不出来刺第二刀，已经被解放军战士死死地压住。他成了这批派遣特务中第一个被抓住的人。

林海秀的右手被刺中，鲜血直流。战士们扶了她下去。

快到西门外的時候，路两边挤满了举着火把的群众，看着五花大绑押过来的高增光，都唾骂着。秦德才还想过来打，被战士们挡着。

人群中真有人认出了高增光，“这不是那个还乡团头子高增光吗？就是他杀了姜雪花！”

“就是他！”

“要报仇啊！”

人们呼啦一下子涌上来，眼里冒着怒火，真要把他扒皮吃了。战士们死拽硬拖，把他带到了军营里。

挂了彩的已经缠上绷带的林海秀，由战士们搀扶着过来，人们像迎接英雄一样欢呼着。衣春玲、车素花忙过来接过战士的手，扶着林海秀往前走。

小林脸色惨白，纱布上、衣服上都是斑斑血迹，却依然淡淡地笑着：“没什么事，没什么事。”

没走多远，解放军的担架队过来了，让小林上担架。

海秀说：“也就是手受了点伤，包一下就行了，不用躺担架。”1949年，她给宗发奋抬过担架，知道抬担架的不易。当时被扭伤了右手，不巧这次又被刺伤。

但是人们没听她的推辞，还是把她放到了担架上，又抬上汽车送到县医院去了。

跟高增光一组的那四个，没一会儿也全部被抓获。

至于代明安那组，刚登上岸，天边就已经是四处火光、吼声震天了，河对岸也都是这样。连河口外的海上也驶出了好多渔船，此起彼伏地呐喊着。送他们来的那艘船没了影，早就退出了十二海里之外。代明安心里明白大势已去，或者就从来没有过这种势。他干脆叫那几个人把枪放下，在芦苇边蹲着，等解放军过来，举手投降。

48.3庆功大会

台湾国民党集团精心策划的这一出，仅半个小时就彻底破灭了。这无疑是给年迈的蒋介石当头一棒。解放军的力量强大，尤其是大陆民众对国民党军事窜犯的反应，完全出乎台湾当局的意料。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时，也并没有得到受斯大林政权压迫的那些人的欢迎。不但横遭迫害的布尔什维克没有倒向德国人，连深受苏维埃之害的被推翻在地的地主资产阶级也没有向入侵者露出笑脸。一个乌克兰地主对德国军官说：“你们来晚了。如果你们二十年来，或许我会欢迎你们。但是，现在，不会

了。”当然，这种情况还不能完全与大陆民众对台湾国民党的态度类比，只是有某种含意相似。以至于日后大陆爆发“文革”，武斗四起，全面内战打得那么厉害，蒋介石也没敢趁此机会再用这个办法。

被捕获的十一个国民党特务，都经过了严格的审讯。高增光在历史上血债累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次作为武装特务登陆被捕获，不属于战俘，依法判处死刑，公开枪决。审讯时，高增光一直闭着嘴，没说别的话，唯一说的一句就是想要看看老婆孩子，那怕是知道他们的下落。当然，这一点，也不会给他以任何的答复。

临刑时，他嘴里被堵着大木球，脖子和胳膊都被粗绳勒得青筋突暴，眼珠翻出，眼睛里金花四射，鼻子里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脑子已经无法正常思维。在他离开这世界的最后时刻，在他被子弹射入后脑，洞穿前额，爆裂得血污四溅之前，唯一想的也只是老婆孩子。不是说在同情他，毫无这个意思，但是恶人也有想老婆孩子的，当然不是所有。

倒是庆功大会之前，公社在评定谁是“民兵英雄”时又有了一番争论。鲁队长向敌人开了第一枪，评为“民兵英雄”，那是没有问题的。林海秀冲在最前面，为抓获高增光立了功，而且还英勇负伤，按说也不该有问题。可宗书记提出，右派家属当英雄不合适吧。这之前，纪社长告诉他，同意让小林当民主村民兵连的宣传干事时，宗书记已经在干部面前发了牢骚，“右派家属就是反革命家属，怎么能当民兵干部呢”，是纪社长坚持下来的。宗书记不知道，反革命家属里真还有大得不得了的大人物呢。这次小林还立了功，再要评为“英雄”，宗书记脸上怎么能挂得住呢。还是公社党委投票表决，才通过也将林海秀评为“民兵英雄”。

又讨论到赵玫，是赵玫第一个发现了敌人，而且不顾危险地呼喊，为这场围剿赢得了时间、赢得了主动，应该是第一功。宗书记当然又反对了，“特务家属去抓特务，还要立第一功，这讲得过去吗？本身她就被管制的，擅自跑到海边，就已经违法了，是不允许的。这个动机，还要好好查查。没有追究就不错了，还想当英雄，门都没有！”

纪社长想，已经为林海秀争了，赵玫的事也就只好算了。

大约过了十天，在中学操场上召开全公社的歼灭美蒋武装特务庆功表彰大会。

大会由纪社长主持，宗书记讲话。

“……这次围歼美蒋武装特务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伟大胜利，充分表明了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无比威力，也显示了我们龙头公社广大民兵、广大人民群众在公社党委正确领导下的革命精神和战斗力。

……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窜犯我龙头公社完全是自取灭亡。他们就是一群秋后的蚂蚱，离死期不远啦。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能解放台湾。我都等不及了，我等得头发都白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打到台湾去！

……在这次围歼美蒋特务的战斗中，我公社的广大人民群众和民兵，出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涌现了许多英雄模范人物，尤其是民主村的民兵连表现尤为突出。在此，公社党委给予表扬嘉奖如下：

民主村民兵连评为‘民兵英雄连’。

评为‘民兵英雄’的有：鲁来福。”念到这儿，宗书记停顿了一下，挺含糊的把“林海秀”带过去了。

“以上同志，每人奖励《毛选》一套。”

坐在下面的齐大妈没听明白，低声问旁边的人，“奖毛线？毛线不是论斤的吗？怎么还一套一套的呢？”

“嗨，你这又跟不上了。说的是《毛选》，不是毛线。毛泽东选集，一套有四本。”旁边的衣春玲解释说。

“老了，跟不上了。”齐大妈不好意思地说。

“还有件事需要通报。”宗书记又严肃起来，“由于敌情严重，为防备敌人再次来犯，维护沿海地区的社会治安，稳定沿海地区的局势，防止反革命分子的捣乱破坏、内外呼应，政府决定把‘地富反坏’和与台湾国民党有关系的人员迁移到北山，也叫他们死了这条心。他们敢乱说乱动，不等国民党上来，就先杀了他们。具体的名单和迁移地点，由各大队回去公布和安排落实。”

会场下又是纷纷议论。

“别吵了。”宗书记一瞪眼，“下面请受表彰的同志上台领奖。”

大喇叭里雄壮的歌声又起：

“……

我们强大的队伍谁也不可阻挡。

千军万马

跨过海洋，

一定要

一定要解放台湾！”

当林海秀右手缠满纱布、右臂吊着白色的绷带，走上主席台的时候，纪社长给她戴上大红花。会场上响起了一阵高过一阵的热烈掌声。

林海秀两眼噙着泪花。她倒不是为自己负伤的紧张一幕而激动，而是为自己、一个右派家属也能走上主席台、也能戴上大红花而激动。党和政府是认可她的，乡亲们是认可她的，认可她三十多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在逆境中为党为革命所做的工作。再苦再累再危险，也值了。

在灿烂的阳光下，身穿花格短袖衫，梳着齐耳短发，胸前的大红花映照着稍显苍白的脸庞，满脸的笑容分外灿烂。娇小的林海秀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美，这样开心。

卷尾语

这一卷是以春天开始，而以冬天结尾。

回想起五十年代初，曾经是那样的欢欣鼓舞，曾经是那样的充满希望。辛勤的劳动，带来了丰收的喜悦，合作化的道路也曾闪现过令人憧憬的期盼。尽管物质并不充裕，但生活毕竟在变样。然而，曾几何时，生活却渐渐地变成了另一个样。空想、盲动、燥热，令人难以置信地爆发，使虚构的乌托邦大厦顷刻间轰然崩塌，整个社会跌入了令人窒息的冰窟。

轰轰烈烈的1958、1959年的“大跃进”就这样结束了。决策者以大规模群众运动、革命斗争、人民战争的方式，在全国范围的社会经济领域，搞了场主观盲动、左倾狂热的共产主义实验，使整个社会和人民群众付出了难以承受的高昂代价。然而，对于有些人（比如宗发奋）来说，恐怕连教训也不是，充其量不过是一些代价而已，而且还是别人付出的代价而已，哪怕是带血的。以至于有些人到现在还想用“主观愿望是好的”来辩解这一切。所以，书中的标题没有写“血的教训”，而是写作“血的代价”。

其实，即使是被一些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欧文、圣西门、傅立叶，他们的理论创新和社会实验也是严肃而慎重的，并没有这样随心所欲、率性而为。中国人民这几年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不仅使美好理想愈加遥远，更是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随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便是经济的崩溃、灾荒和饥饿，带来的是政治上更激烈的纷争和日后谁也没有预见到的更加血腥和残酷的争斗。

毛泽东在晚年曾说过：“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了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那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请见：《毛泽东传（下）》，中共中央文选研究室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他没有提大跃进的事（日本人是不是被他请回老家去的，这儿暂不讨论）。

其实，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有着一层明显的因果关系。问题不只是由于大跃进而出现了经济困难、生活困难，不只是如何去克服这些困难。在一个不正常的政治环境里，它引来了更大的问题，暴露了这个体制下难以克服的深层次弊端。正是大跃进的盲动造成了随之而来的大饥荒，而在如何认识这场大饥荒的程度、原因、责任和应采取何种对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党内高层产生了严重分歧。由于缺少正常的党内民主机制，这种分歧难以得到有效协调。正常的不同意见，不但不能被容忍，反而被当政者看作是对自己的挑战和威胁。他再次挥舞起“阶级斗争”的棍棒，步步打向曾经是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党内矛盾迅速激化到无法调和、无法收拾、甚至非要到你死我活而不可的地步，最终导致十年文革的爆发。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自己也说，对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

高层对于如何看待和解决六十年代初的这场大饥荒的分歧，影响了、决定了各地基层、包括龙头和西北村的大局和走向。所以，尽管本书是小说，我们也有必要化些篇幅从宏观的层面说一下。

这儿且以河南省信阳地区为例，分如下几点来再次说明大饥荒的严重性及其对于干部队伍、乃至对更高层次以及对整个政局变化的连锁影响。

1. 浮夸风导致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1959年该地区实际粮食产量为20多亿斤，上报为50亿斤，结果下达征购任务为10亿斤。

2. 为完成征购任务，各级干部怕自己被打成右倾，在“先下手为强”的指示下，边收割边征购，穷凶极恶地向农民抢夺粮食、竭泽而渔，甚至以“反瞒产”为幌子，不惜随意批斗、滥用酷刑，各种刑法有数十种之多。该地区潢川县傅店公社，公社干部15人中11人有人命；全社大小社队干部1316人中，有626人打过人，171人打死过人；被打群众2358人，被打致死304人，逼死45人。

3. 在极度饥荒之下，还动用武力阻止外出逃荒要饭，大批农民群众就此被逼上绝路，活活饿死。据信阳地区1961年向中央报告，1959年11月至1960年11月，全区共死亡1070321人。该地区光山县斛山公社，原有658个自然村，其中175个村完全死绝；全社原有8178户，死绝1603户；原有人口36110人，死亡13674人，其中饿死12962人，被打死591人，逼死24人。

4. 引起中央关注后，上级部门反复调查。1960年3月，内务部前去调查，估计有20-30万人饿死。内务部随后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报告，习又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报告。董派人调查了三个月，查出饿死人数为70万，又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周又派出几十人的中央工作组前去调查。工作组来到信阳，亲眼见到许多村子已绝人迹，和人吃人的惨状，见者无不掉泪。1960年11月，中央书记处开会，由安子文向毛泽东汇报。

应该说，尽管当时信阳地区对灾情进行了天罗地网式的封锁（信阳在1958年大跃进可是立了头功的，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就在信阳地区遂平县嵯峨山），但有关部门并非这时才知道。1958年12月，以笔者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为总领队的人大、北大（人民公社）调查组分赴全国三个地方进行为期将近半年的调查。其中有一个组去的就是信阳，领队是笔者后来就读的计划统计系的主任薛政修（李震中）。他们在当地已经见到了严重灾情和许多浮肿病人死去的惨状。回校后，他们忧民忧国，赤诚向党，实事求是地归纳了人民公社运动中存在的485个问题，写了180万字的调查报告交北京市委（那时高校归北京市委管）。1959年5月，这项工作受到了彭真市长的表扬和人民日报的肯定。

那知天有不测风云，仅仅三个月后，出了个庐山会议，他们被新华社《内部参考》专门发文批判，说他们是诬蔑大好形势、否定三面红旗、配合彭德怀向党进攻。调查组的许多师生，因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和右派。1959年10月26日，邹鲁风愤而自杀。（请见：《中国人民大学纪事》，校史丛书编委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邹鲁风死时已调任北大副校长）

2012年11月，当时人民公社调查组组长之一的原人大副校长李震中教授给笔者寄来一份讲述当年情况的材料。在此，我想引用其中一段邹鲁风自杀遗言里的话：“我相信调查组的工作没有错。我的工作是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的。我个人没有什么，我感到痛苦的是因为我连累了大家，痛心的是党的是非被颠倒了。相信总有一天真相会天下大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处理人大调查组仅仅不到半年之后，内务部等中央机关又开始了信阳地区进行走马灯式的反复调查。而毛泽东在听取安子文的汇报以后，面对上百万人的死亡，却仍然以阶级斗争的一贯思路来处理这个问题，而且更加固执、更加强化，硬把这场灾难推到国民党头上。他说，信阳

事件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实行阶级报复，信阳地区需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要彻底清除国民党、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随后，信阳地区不是把如何拯救灾民放在首位，而是全面开展清查漏网地富和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夺权斗争，逮捕4220人。原准备将一部分基层干部当成阶级敌人大开杀戒，以推卸上层应当承担的责任。后来发现饿死人在全国各地是普遍的现象，才将死刑改为死缓。

毛泽东的这种认识和处理方法，与很多干部的想法大相径庭。直到八十年代，一些信阳事件的当事人说出了他们当年的想法。原罗山县委书记许文波认为，信阳事件既不是阶级报复，也不是违法乱纪，完全是因为执行了极左路线，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到了极点，在粮食问题上执行了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所造成的。

原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说，我认为我不是反革命，信阳事件的性质根本不是反革命复辟，责任也不都在下面，省委有责任，地委有责任，县委有责任，中央同样有责任。只处理下面是不公平的，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本卷尾语中有关信阳事件的资料，请见：《国史札记》，林蕴晖，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

这两位县委书记的话，虽然是在八十年代说的，但反映的是他们在六十年代的想法，而且这也决不只是他们一、两个人在这样想，毛泽东不会没有察觉。这样大的事情，这个责任谁能承担得起？对于大饥荒的原因曾有“三分人祸七分天灾”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以及这人祸到底指的是什么的争论，其核心就在于此。先说是“七分天灾”，把责任推到老天爷身上。实在推不过去，就说是人祸。这人祸，也是先指的是帝修反，后来就扣到了刘少奇头上。

在毛泽东看来，他提出的“三面红旗”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很好地发展，在实践上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他是把“三面红旗”作为党的根本路线来对待的，作为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来维护的。因此是不允许遭到任何怀疑的。”（请见：《我观党史二集》，石仲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说明：‘三面红旗’是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毛泽东一方面缩小灾难的程度，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请见：《大往事》，叶匡政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另一方面把大跃进失败、导致大饥荒的责任推到了基层干部身上，甚至说“有1/3的政权不在我们手上”，并力图通过整风整社、四清运动的办法来整肃基层干部。这就在党内、干部队伍内产生了明显的分歧。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个分歧，不只是存在于基层，而是一直延伸到最高层。1962年1月，刘少奇在整理自己的七千人大会报告时，曾情绪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1962年3月17日，刘对谢富治说：“有那个事实嘛，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也要揭。”（以上请见：《刘少奇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这些话使毛泽东如芒刺背，担心在他身后，也会有人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焚尸扬灰。毛泽东明确地说，“我是不下‘罪己诏’的。”（请见：《新发现的毛泽东》，王若水，（香港）明报出版社，2003年）并且当面责问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我死了怎么办？”（请见：《你所

不知道的刘少奇》，王光美等，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毛泽东此处讲的“不顶住”，还不只是指刘少奇一个人。据《变局》作者张素华在解读毛泽东的这番话时就指出，“其实，在毛泽东看来多数常委并没有‘顶住’。”（请见：《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对于有不满和不同意见的，毛泽东习惯于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来对付，是领导干部的，再加上夺权。前面曾提到的他对陕西杨伟民的批判，也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子。而且毛泽东绝不只是说说而已，很快就在全国范围掀起社教运动。某种意义上讲，社教运动是毛泽东在更大范围内用处理信阳事件的思路来对待农村基层干部，即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方式来消除农村基层干部在大跃进和大饥荒之后存在的不同意见和不同做法。所谓“1/3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说法，亦源于此。任何从极左做法向后退、采用相对务实做法的，比如“三自一包”等等，都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将要用非常手段加以整肃。

社教运动将是本书下一卷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本卷末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起始和端倪。

同时，在本卷末的六十年代初期，海源、龙头和民主村的人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而严峻的局面，几重的乌云交集着过来。

台湾国民党当局也在趁机搅浑水。他们依旧没有扭转他们旧有的思维，依旧没有分辨出中美、中苏、美苏之间日益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关系格局的重大变化，依旧做着试图用武力反攻大陆的梦想。虽然大小动作不断，却依旧一次次的失败。不但没有撼动大陆的政权，反而是给大陆上正在燃起的阶级斗争烈焰再加上把干柴。直到美国在七十年代再次抛弃国民党集团，实现中美建交，这才彻底打破了这场迷梦。然而又有多少人成了这场争斗的祭品（不论他们自身罪孽的有无和轻重）。在这些人里，我们已经在本书中看到了几个海源人的悲惨结局。

台湾国民党的武力试探，已不再是个像样的威胁。然而，大陆内部的争斗却越来越烈，刹不住车了。下一卷将讲述民主村、龙头镇陷入的一场长达十余年的噩梦——一场比起刚过去的困难时期时间更长、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后果更严重的左倾大灾难。

第三卷 噩梦

第一章 西去南疆

1960年1月1日

1.1 送别

就在海源军民全歼国民党武装特务的当年，国民党又在崇武海战中失利，护航炮舰“永昌”号被解放军击沉，使蒋介石感到台湾海峡的制海权并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大规模登陆已成泡影。而在1960年到1965年间，派出去多达三十四股武装特务、共计420人，北从辽宁、南到广东，都去试过，竟然也一一被歼，无一幸免，最后的指望也落了空。“反共复国”只能是水中捞月、画饼充饥，连表面文章都做不起来。国民党集团对人民政权的武力威胁大大减弱。蒋介石心头发冷，神色怆然，只能坐等着对面大陆的内部变化。

然而大陆这一边的各种矛盾并没有因为对国民党的军事胜利而减缓，相反依然在日益积累和加重。民主村的空气也越来越凝重，没有半点胜利的喜悦。

这时大陆各地农村陆续开展了“四清”运动，后来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海源县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的试点单位，西北村在这场运动中又是首当其冲。为了叙述的方便，这儿将赵玫和董平章的命运先直线铺开，对民主村的“社教运动”和随后开展的文化大革命，则放在后面讲述。

全歼美蒋武装特务的庆功会后没几天，老王头一家、包金贵一家，就在民兵的看护下遣送到北山高家庄，还正好就安排在当初关押高增光的老屋。王溪原本也是要一起去的，于村长以王溪和老王头不是一家的为由，硬是保护了下来，还是在中学里住校念书。

赵玫也是在遣送的名单里，但是她病了。于村长就说，那就再过几天吧，病好一点再说。

赵玫真的病了。高增光一伙前来窜犯的那夜，赵玫虽然因此而没自杀成，甚至按理说也能沾个民兵英雄的边，但她的精神散了架了。当她听说自己也要被遣送到北山时，她都不知道该有什么反应了，昏昏沉沉地躺了几天，最多就是喝几口凉水。

就这样，秦德才也没有放过。这不，他又过来猛敲门，狂吼着：“姓赵的，你这个特务老婆，还不滚呵！快开门，看我来拖你走！”见没有反应，又拣了石块往里扔。“劈劈啪啪”地，赵玫的院子里、屋顶上直响。

前屋的衣大妈听不下去，掀开后窗看。秦德才正要爬墙进去，衣大妈这不算了，扯开嗓子就大叫：“你这个剃了头的，杀千刀，你要干什么？是要耍流氓，还是偷东西啊？”

秦德才试了几下，也爬不上去，听着衣大妈在后窗上喊，就像响在头顶上，也叫着说：“我这是执行公社决定”。

“有你这样执行决定的吗，你存的什么心啊？”

秦德才只好快快地溜了。

鲁队长听说这事，很为赵玫难过。鲁队长从赵玫一到西北村就很敬重她，虽然赵玫还比他大几岁，但他觉得赵玫无论在外形体态、举手投足、家里家外、对公公对丈夫对孩子真是无可挑剔，是个标准的好女人、好媳妇。用现在的流行语可以说是他的“心中暗恋的偶像”，以至于这个标准使他自己的婚事拖了好几年。在以后村里共同的工作中，彼此相处也都挺好。如今赵玫落到这个地步，他感到很难过，也很同情、很不平，尤其是他从高家庄民兵连长那儿听说，老王头、包金贵他们去了以后，就是住在当年关押高增光的破屋子里，跟关押地主富农没什么不一样，他更难过，更彷徨了。他觉得，无论是以赵玫的为人，还是为村里所做的工作，对革命的贡献，都不应该是这个下场，可是还能说什么呢。这是公社的决定，恐怕还不仅仅是公社的决定。

他思前想后，找了个中午，瞅准了没有人，推开了纪社长的办公室。

纪社长正趴在办公桌上打盹，听见声音抬起头看是鲁队长进来，忙站起轻声示意，叫他到跟前来。

纪社长又到门口往外看了下，回身推上门，对鲁队长说：“我正要找你呢，”

“噢？”鲁队长惊异地问。

“我接到了潘连长的信。当初我们连的潘连长，你还能记得吧？”

“当然，当然，怎么会忘了那个年代呢。他们不是去新疆了么？”

“是啊，还是在新疆，在南疆麦提那的一个劳改农场当场长。”

“哦，”鲁队长在听着。

“他说，他那儿去年来了个姓季的犯人，是国民党派过来的特务。因为是个海源人，所以他留了点心，还在信上问了问。”

“那不就是董平章吗？”

“是啊，我在想要不要让赵玫知道，叫她稍微放点心。”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赵玫太可怜了，她不应该遭这个罪，能有什么法帮她一下”。

“还能有什么法？要是去了北山就更遭罪了。在民主村，毕竟还有你们这批人，还不至于差到那儿去。”

“留不下啦，那个姓秦的狗东西，天天去找事。”

“如果知道董平章的下落，赵玫会怎么样呢？”

“她会拼了命去找。”

“是吗？”纪社长也一惊。

“是的，她会那样做的。”

“恐怕，或许就这一条路了，以后的形势说不定会更严峻，你看这四清的阵势就知道了。”

“叫她走？”

“我没有说，我什么也没有说”，纪社长低着头。

“要走，也不易啊，那么远的路，去了又会怎样？”

纪社长刚想思索，忽然，窗外有人走过。两人一惊，四目对视，一会儿，脚步声过去了。纪社长望望窗外，说：“没有别的路了，有这个机会，总比坐以待毙好。”他拉开抽屉，拿出了五张拾元和一些零钱，“我身边就这些了，你都带给她吧。”

纪社长又在一张一毛钱上画了两个不起眼的小五星。

“纪社长，我替赵玫谢谢你了，龙头镇亏得有你啊。”

“不说这些了。”

“这两个星星是什么意思？”

“也不说了。你要有心帮赵玫，你就去安排吧。要小心，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也不要对赵玫提起我，尽管我也觉得赵玫是个好同志。你也不要提潘连长在那儿，事先知道多了反而容易坏事，还牵扯别人。真要能起作用，到时会起作用的。”

鲁队长还是找了个中午，敲了赵玫家的门，喊着赵玫的名，大白天，别人也不会怀疑。

赵玫听是鲁队长的声音，出来开门，便说：“怎么是你过来？”

“进去说吧，”鲁队长说。

两人进门，鲁队长看见赵玫虚弱的样子，叹了口气，又眼盯着赵玫，说：“今天有件要紧的事，想跟你说。”

“是什么？公社要派人把我押到北山去？”

“不是的，我想告诉你件事，你不要激动。”

“什么事？”赵玫很平静，并没有觉得会有什么别的意外发生。

“如果董哥有了消息，你会怎么样？”

“什么，平章有消息？”赵玫一下伸直了腰，眼睛发出了光亮，忽而又缩了下去，焦虑地问：“已经被枪毙了？”

“不是，他被关在新疆麦提那的一个劳改农场。”

“是吗？我要去！”赵玫立刻情不自禁地嚷了起来。

“嘘，闭上嘴！”鲁队长一手就把赵玫的嘴捂上了，“怕外面听不见啊？”停了下，听听外面没有声音，鲁队长又接着说：“去，是个办法，但是谈何容易啊。那么远，去了之后，在哪儿落脚，怎么生活。我一个大男人，都想不出该怎么办！”鲁队长皱着眉，真的也是在设身处地为赵玫想。

赵玫丝毫不迟疑地说：“我不管，我什么也不管，只管往前走。能够见到他，能够说上一句话，我死了也值了。现在这日子，比死了还难受。”

“唉，”鲁队长叹息着，“我想留你，可又帮不上你的忙。看你过这日子，我也难受，走就走吧。有一个人想帮你。”鲁队长从口袋拿出那几张钱，递给赵玫，说：“你先收下这些吧，这个人不想让你知道他是谁，我已经替你谢过了。”

“这怎么行，谁的日子也不易，何况还是这么多钱。”

“你收下吧，几千里路，这些钱还是不够的。我再想办法凑点。里面有一张一毛的，上面画了二个小五星，你留着，说不定有什么别的意思。”

“还有什么意思？”

“我也不清楚，他没说明。哦，还得商量一下，你怎么离开这儿。”

三天之后，清早，鲁队长套上牛车，带着媳妇哈妹去县城看老毛病。赵玫就躺在车板上，盖了条小花被。

在县城汽车站前面的小巷子，赵玫下了车，两眼热泪，哽咽难语，“这辈子我该怎么谢谢你们二位。”

鲁队长说：“什么也不要说了，别叫人看见了，走吧。我也走了。”

鲁队长一声“哦依”，牛车继续朝前走。

赵玫转过身，哈妹也是两眼泪水不止。

赵玫家的院门，从此挂上了锁。再打开，已经是十四年以后了。乡亲们都以为赵玫已经被遣送到了北山，除了叹息，再没有人过来敲门。

1.2万里迢迢

赵玫在黄港火车站，身着深蓝布袄，肩上背个布包袱，胳膊上挎了个蓝花布小包袱，正在焦急地东张西望。

这次万里之行，真是难为她了。尽管在前面称赞过她是个坚强能干的女性，但她毕竟只是个农村妇女，终日在家里地里操劳，哪见过什么世面，县城也只去过一、二次，连字也不识几个。她真是扔掉了这一切，拼上了性命往前走，手里拿着纸条，照鲁队长行前的吩咐，打听。

当在售票窗口掏出几十元先买到西安的票，她真是心疼。她从来没有花出过这么多的钱，更何况已经是占去了她身上带的大部分钱。

上了火车，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她一直闭着眼，一直很不舒服，她不知道这是叫晕车。她只是喝了点凉水，实在饿了，就啃一口带的干粮。

她不知道到了这个站，到了那个站，也根本没去看车窗外的景致。好在西安是终点站，火车不走了，大家都下去了，她也一起下了车。

出来，又重新打听，又买上了乌鲁木齐的票。她甚至也说不清楚乌鲁木齐那四个字，心想什么鬼地方还是外国名字。贴身衣服里面的钱不多了，赵玫更不知道怎么来逃票、蹭车之类的伎俩。得亏还有这刚通车了两三年的兰新铁路，要不赵玫就更不好办了。

又是两天两夜的慢车，到了乌鲁木齐，这儿的天气凉爽多了，天也好像蓝得很，亮得很，高得很。

当她挤在南郊汽车站里等车，才头回看见身穿少数民族服装的人，这才想起曾经听过的有那首很好听的歌：“我们新疆好地方”，想起听说龙头南门外的部队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到了新疆的事，想起还有那个潘连长。那时还想过新疆那是多么远、多么远的地方，想也不敢想。今天居然自己也会来到这儿，却是这么狼狈，这么凄然，只带了半条命在逃亡。

喇叭里照例是革命歌曲，使她没有忘掉虽是万里之外，却还是同一个天下。

“向前看，向前看，

我们是人民公社社员。

集体生产优越无限，

意志坚定不怕困难，

改造那旧世界的决心，

谁也不可阻挡。

一条大道在眼前，

嗨！在眼前，在眼前，在眼前

一条大道在眼前！”

这歌声虽然响亮，却不管在赵玫眼前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

没想到长途汽车也开了两整天，翻越了巍峨的天山山脉，穿越了广袤的戈壁和平坦的农田。那壮阔无比的南疆风光，不能不撞击着赵玫的心扉，然而，她又无心顾及。她头疼，她恶心，她不但是在晕车，她更不知道命运会将她抛向何处。

晚上，停宿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天黑黑的，她看不清，只知道别人都下车，她也随着走进一个黑黑的屋子。一股羊膻味扑鼻而来，她不由后退一步，又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只有跟着往里进，蹲在一个角落。别的人，都去买饭吃。只有她默默地蹲着，没有一点声息。

过了一刻，边上有两位维吾尔中年妇女，好心地看着她，又指着碗，对她说：“塔玛克扬。”（维吾尔语：来吃饭吧）

赵玫明白了意思，只是摇摇头。她吃不下，满心的翻搅，更没有这个心思，因为她不知道，明天将会是什么。

“扑尔拉茨姆-阿玛思。”（维吾尔语：不要钱的）那两位妇女又说，还用左手捧过来一个碗。

赵玫还是摇摇头，轻声地说：“谢谢。”

“唉，”那两位维吾尔妇女也只有摇摇头，叹息着：“比加拉-阿达姆。”（维吾尔语：是个可怜人哪）

两天一夜之后，才到了麦提那城。高高的杨树，黄黄的土房子，黄黄的砂土路，能看见路上走着最富有异域风情的维族妇女，穿着各种俏丽花色的孔来克（维族女裙），和戴着方帽、穿着长袍、赶着毛驴车的维族老乡。当然赵玫是顾不上看这些了。赵玫浑身软软的都不知道是怎么下的车。再问才知道，去那个五三农场没有公共汽车，天哪！这怎么办？还有两百多里路哪！那个劳改农场是在荒漠戈壁的最深处。

赵玫向车站大院门口摆摊的大爷要了点水喝，又装上一壶水，要走着过去。

老大爷一听，是要走着去五三农场，惊得瞪大了眼，“不可以的，农场在——那——里呢。”

大爷拖着长音，手指着远远的天边，说着“那里”。按新疆话的习惯，是用拖腔的长短表示路途的远近。大爷的这种表示，是说这路远得不能再远。

“不可以的，你这样走，三天也走不到。路上会累死、饿死、渴死，你还会走迷路，还有吃人的野狼。不可以呵，你走不到的。”大爷再三说着。

赵玫还是抬脚要走，她早就下了决心，死也要死在路上。

大爷没办法，给了她一壶水，三张饼。赵玫要塞给她钱，大爷摆摆手。但他没说以前有过探视犯人的家属死在半路上的事，更有的是死了也不知道的。

赵玫在车站门口汉族和维族老乡们诧异又惊叹的眼光下，一步一步地按他们说的东南方向走了出去。

其实，赵玫几乎已经好几天没吃没喝了。按照常人，或是赵玫在以前，那是一步也跨不出去的。然而，眼下，赵玫却是没有任何表情、没有任何想法，不知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催动着，机械地却是坚定地往前跨去。

小城不大，很快就出了城。眼前极为开阔，平缓起伏的土地无边无际，大片大片的农田种着春小麦、玉米，长得很稀疏，也见不着人。

黄土路上积满了厚厚的尘土，一脚下去，就扬起一股粉尘。

大路静静地伸向无尽的远方。

赵玫默默地走着，不知道尽头在何处，不知道远方等待着她的将是什么。

走着，走着，也不知道是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了，或是更多的时间了。太阳快到了头顶，虽然是秋天，可空气热燥起来，跟下车时不太一样。两边的农田，越来越来稀疏，越来越少。景色越来越荒芜，不用说房屋人家，连遮荫的树都很少。

四周寂静的，了无声息。越走越累，越走腿越软。这时，赵玫才感到了害怕，第一次走到了没有人的地方。可是，她不能停下来，她知道停了下来，她连走回去的力气都没有了。何况，她本来就没有了退路。

再往前，农田没有了，眼前是漫无边际的黄砂地，和一个个长着红柳的土包。连路也没有了。起伏的砂土地里，有一趟朝前沿伸的积着厚厚尘土、汽车轮碾压出的断断续续的长印，那就是路了。

赵玫不知道自己是在走向希望，还是走向死亡。

1.3天不该绝

忽然，她听到了呼呼的响声。

“是野兽在奔跑？”

她四下张望，看见后面远远地有个黑点，拖着长长的卷起的尘土，朝这儿过来。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是躲还是等。

那是一辆解放牌卡车装着几桶柴油，不一会就开到了赵玫跟前。驾驶室探出一个穿着黄军服的脑袋，“是要去五三农场啊？”

“是”，赵玫答。

那个脑袋这才注意到车下走着的还是个女的。他打开车门，又问：“找谁啊？”

“董平章……。”

“董平章……？”那脑袋晃了晃，记不起来，“是在五三农场吗？”

“是”。

“那上来吧，还远着呢，坐汽车也得傍晚才到。”

“得多少钱呢？”

那脑袋笑笑说：“不用钱，上来就行。”

赵玫上车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包袱就抱在身上。

车又卷起尘土往前开了，路边的土堆、沙丘迅速往后退去。“到底是汽车啊，跑得多快，”赵玫心里在想，要多谢这位司机了。

这位司机姓粘，五三农场的干事，二十八、九岁，转业军人，粗糙的脸皮，呲着黄牙，他是来给农场装柴油回去的，“你找这个董平章，多大年纪啦？是个干部还是……？”

赵玫一一照实说了。

粘干事嗯嗯地应着。

赵玫急切地问：“你认识他吗？他现在怎么样？”

“有印象，还行。你是从哪里来？”粘干事应着，脸上似乎轻松起来。

“海源。”

“你坐好了，前面有个坑。”粘干事伸过右手放在赵玫身上。车颠了一下,那只手顺势摁了一下。

赵玫没在意。

“海源在哪儿呵？”那只手竟然在赵玫身上游走起来。

赵玫惊讶地看着粘干事。粘干事不动声色，眼看着前方，左手把着方向盘，右手还伸进了赵玫的衣服里。

赵玫身子一颤，把粘干事那只伸进了内衣的手拿了出来。

“嗨，还是有个性子的人呵。别犟啦，实话告诉你吧，到这儿来的女人，没有能逃过这一关的。要不，你就死在路上；要不，就算你走到那儿，连个门也进不去。还是乖乖地跟我乐呵乐呵吧。”一手就插了进去，伸得更里面了。

赵玫哪受过这样的侮辱，不知怎么，脸色也变了，用双手推开了他，正色道：“同志，别这样！”

“嗨，有意思，还来这一套。也行，这样更有味。”粘干事干脆停了车，双手就扑了过来。

“你这是干什么？”赵玫大声叫道。

“叫什么？这儿出去一百里也不会有人，你们这种犯人家属就是来为我们服务的。”说完就全身扑了上去。

赵玫性急之下，朝着粘干事的小臂就咬了一口。

“哎哟！”粘干事疼得喊了一声，“你他妈的，给我滚！”一把就把赵玫推了下去。

赵玫仰天倒在地上，大包袱、小包袱又扔在了她身上。包袱里带给董平章的几天来再饿也不舍得吃的几个“火烧”（烧饼，海源话叫“火烧”）滚落在地上。

汽车卷着尘土走了。

四周又是悄无声息，陪伴她的只有头顶明晃晃耀眼的太阳。老天爷呵，我赵玫怎么会落得这样。赵玫真想现在就死，可现在死都死不起来，连一块碰死的石头都没有，除非等着太阳把自己晒干。

赵玫咬咬牙，坐了起来，收拾好包袱，决定还是往前走。我赵玫尽了力，尽了最后的力，老天爷让不让我见到董平章，那是老天爷的事了。

在炙热的阳光下，赵玫又跨出了脚步，一步一步往前走。

又不知道走了多久，太阳一点也没有西斜的样子。赵玫热得满头大汗，而前面还是灰蒙蒙、雾蒙蒙的一片，几乎没有任何的变化，没有任何靠近一点的感觉。

赵玫走不动了，实在走不动了，两只脚不听使唤了，想挪都挪不动了，不是发沉抬不起来，而是发飘，踩不到地下了。嗓子在冒烟，脑子里发白，不知道在想什么，也想不出什么来了。

眼前无边的黄澄澄的沙土，在阳光下，反射着光亮，越来越亮，融合成一片光芒。地面的热气在向上蒸腾，远处的景物在跳跃、扭曲、晃动，人在热暑难当、体力不支、心绪恍惚的时候，这种感觉更明显。脑子里、眼睛里都是一片白色的光芒。手和脚都感觉不到了，浑身轻飘飘的，像飞了起来。其实赵玫是重重地摔倒了。

赵玫倒下了，她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倒下了，她没有知觉地倒在远离家乡千万里，而离自己亲人咫尺之遥的南疆的砾石和沙尘之中，倒在明亮炽热的阳光下。

对于旷野来说，那只是红柳和骆驼刺旁一堆隆起的蓝布，浸着汗渍、落着尘土、不起眼的蓝布。

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赵玫的生命也在一秒一秒地逝去。虽然听不到空中的滴答声，但这比滴滴答答更紧张。如果没有别的事情发生，不用一个小时，赵玫就将在暴晒下毙命。不用24小时，赵玫就将变成南疆荒漠中一具永久的干尸。几天之后，就只剩了在沙土覆盖下伸出的几片晃动的蓝布衣角。赵玫就将永远在人间消失，谁也不会知道。粘干事是决不会跟人说，他在路上还曾见到过一个探监的女人。

或许是天不该绝，远处又出现了一个黑点，卷着滚滚尘土而来。五三农场在一年中，是很少有在同一天里会有两辆车回场的。

这是辆老式的嘎斯吉普，坐着的是潘场长和场里的司机小商，从喀什开会回来。当吉普车驰过赵玫身旁的时候，潘场长正在闭目养神呢，看了十几年的黄尘沙土，他当然不会有兴趣再去看车外。

潘场长闭着眼在想什么呢？他想得多了。我们在第一卷已经知道，他原本也是海源邻县的人，上一辈就闯关东，落脚在关外。后来日本人太横，他回到老家，可无房无地，四处打短工，勉强度日。自从来了共产党，他就参加了八路军。从那以后就跟着部队转战南北、纵横东西，甚至还出国门，到过朝鲜战场。有几次都打得太辛苦了，尤其是从汉城撤出来那一仗，身上至今还留着那一仗的弹片（胡自豪就

是在那次被美国人俘去的)。后来又驻防新疆,守护祖国的西大门。后来又就地转业,到了这劳改农场,看押这些阶级敌人,保卫革命的成果不受他们的破坏。可能是年龄的增长,还是阅历的积累,他渐渐地不像以前那么有激情了,渐渐地淡漠了。当然他每天面对的是凶狠的敌人,他们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自己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和麻痹,每天都还是恪尽职守、尽心尽力,可总觉得心里少了些什么。老婆和儿子还在原籍,一年,甚至两年都不一定能回去一次。而要把家里搬到这儿来,这鬼地方哪是人住的地方,别的不说,儿子上学怎么办。不去说这些了,家在他心里也渐渐地淡了。这一生还有什么呢?不知怎么有时还能想起当年驻在海源的日子,他觉得那是他这一生最值得怀念的时光。尽管也有1949年打退国民党反攻的拼死血战,可那交织着战斗的激情和胜利的喜悦。那绮丽的山峦,那辽阔的大海,还有乡亲们浓浓的军民情谊,使身处戈壁风霜的他常常难以忘怀。所以他很羡慕留在龙头镇的纪排长,所以他还一直保持着和纪排长的书信来往。至于这两天去喀什开南疆几个劳改农场的片会,他倒没去多想。会上的内容,一是要增加生产,多打粮,减轻负担,支援国家;二是近来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复杂,通报了几个案例,要进一步加强监管,不可疏忽大意。这些,他都知道,听了多少遍了。五三农场工作很平稳,一直没出过什么事,所以他可以平静地闭着眼,慢慢地想着几千里以外的事。

倒是司机小商发现了那堆蓝布,心中有点迟疑,茫茫荒漠之中,谁会丢东西在这儿呢。他停下车,走过去一看,才发现是个女人,一个已经闭上了眼睛的女人。

“场长,场长,一个女人!”小商惊叫着。

潘场长睁开眼,并不惊讶,随口应了声:“是吗?”

“好像是刚死。”小商又说。

“哦,”潘场长这才下了车,走过来撇一眼。这一撇不打紧,眼光就离不开了。尽管躺在地下的那女人已是满面尘土、脸色焦黄,可那头发上锃亮的发夹,使他想起了什么。在哪儿见过这发夹?在哪儿呢?他一时想不起来,可肯定是见过。

潘场长弯下腰,把女人翻过来,仰脸朝上。那女人鼻翼似乎动了一下。

小商看得仔细,说:“鼻子还动了下,还没死哎。”

潘场长还在认真地看着,一言不发。

小商又说:“做人工呼吸还能救过来哎,在大奶子上使劲摁。”

这个建议太敏感了,潘场长瞪了小商一眼:“想哪儿去啦?”

小商忙辩解说:“我听说过的。”

“别说那些了,还有水吧?往她嘴里灌点,剩下的倒在她脸上。”

“好,”小商拿过来水壶往赵玫嘴里灌,剩下的水倒在了她脸上。赵玫果然哼了一声。

“先抬上车,到场里抢救。”

“好，”小商和潘场长把赵玫抬上后座，再拿上那大小两个包袱。

“开快点，”潘场长催促着。

太阳西斜的时候，吉普车进了五三农场的大门。

第二章 劳改农场

1960年1月2日

2.1 故友相逢

五三农场地处戈壁深处，规模不大，主要关押五年以上到十来年刑期的犯人。它的西面靠着能流入叶尔羌河的一条支流，三四千亩的地种着春小麦、春玉米等。当然那一亩地不能和口里的比，种种就是了，不能指望什么。场里关着三、四百犯人，这两年多了些，已经有五、六百了。因为不怕他们跑出去，以前连院墙也没有。犯人们没有钱，没有粮票，没有介绍信跑出去也没用，吃不上，住不上，连张车票也买不上，一身破烂的囚衣也很好认。这两年为了正规化，加强管理，才逐渐垒起了泥坯的围墙。分成两个院子，外院是管理人员办公室、宿舍、食堂、仓库等等，里面是几排监舍和警卫队。两个院子的中间都有块大空地。犯人们住大房间，一间一、二十人，睡的是草铺的地铺，晚上门上锁，除个别犯事关禁闭的，也不带脚镣手铐。

农场外院的大门是开着的，吉普进了院子停下。

潘场长叫小商把赵玫抬进了厨房后面一排的一小间空房子，有一张用二条长凳架了块木板的床。潘又喊来了卫生员。卫生员也看不出什么，估计是累的、渴的，体力不支吧。

赵玫躺着，仍然是闭着眼，哼哼着。

潘场长他们也就离开走了。临走，潘场长在外面把门锁了。

当赵玫苏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夕阳在窗玻璃上留下最后一抹的斑斓。

她睁开眼，房里暗暗的，窗外进来一丝淡淡的光亮，自己躺在一层草铺的垫子上，房间里有种浓浓的臭味，显然这是男人们住的地方。

“这是哪里？”她紧张了起来，四下张望着，想挣扎着下来，可浑身无力，动弹不了。

不知过了什么时候，房门开了，进来一个穿黄色军装的中年男人。房里稍微亮了点，可他又把门关上了。他走过来，走到床前。

赵玫紧张地想坐起来，可是手不听使唤，只是动了动，怎么也撑不起来。

那人摆摆手，说：“不用动，不用紧张，你下午昏倒在路上，我们把你拉了回来。这儿是五三农场，你要上哪儿去，我们可以帮你联系。”

“是吗？”赵玫沙哑着嗓子说。

“你先喝口水吧。”

赵玫端起床边的茶缸咕咚喝了一大口水，水好苦啊。

“我就是要到五三农场。”

潘场长一听就听出这是海源话，十五年没听过的海源话，除了那个季行程，便忙问：“哪你来找谁？”

“董平章！”赵玫一字一句地说着，两眼直愣愣地看着潘场长。

潘场长闪电般地思索着犯人们的名字，心里想着：“我们这儿没有叫董平章的，”就问：“你是海源人？”

“是。”

“海源哪个乡？”

“龙头。”

“龙头镇上的？”

“是的。”

潘场长喜从心上，真没想到在这儿会以这种方式遇到海源人，真比遇到老乡还亲，脸上竟露出了久违的喜悦。他又端详着赵玫头上的发夹，心想难道就是她吗？

潘场长刚想说，我就是当年驻在龙头南门外的潘连长啊，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潘场长毕竟风雨闯荡了几十年，倒不是不相信赵玫，而是事情不那么简单。过早地暴露他以前就认识赵玫这层关系，反而不利于以后对赵玫可能的保护。

“你丈夫出了什么事？”

赵玫把从1949年董平章被国民党带走，到1964年开公捕大会讲了一遍。潘场长明白了，董平章就是三中队的3214号囚犯季行程。

潘场长没有马上告诉赵玫，董平章就在这儿，说了声：“等我去查查。”又嘱咐说：“你现在身体还不行，先歇两天再说别的。还有一点，你别出去，也别开窗，吃饭会有人送来。这里都是男人，你出去不方便。别的事情，我找个犯人来帮你处理。等过两天，查清楚了，我再来告诉你。”

那个男人出去了，咔嚓一声又在外边锁上了门。

赵玫没看出来那人就是潘连长。

2.2相见难相认

早晨，天刚亮，赵玫就听到几排房之外有人活动的声音，但没有什么人讲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后，一队队的犯人扛着工具，背着挎包，低垂着脑袋，排着队往外走了。他们穿着原先是灰白的，现在早已成

了灰黄的、破旧的囚衣，旁边有全副武装、牵着狼狗的警卫押着。

赵玫从窗口斜斜地能看到院子中间空地的一角，看到犯人们一队队地默默地往外走着，响起的只有零乱的脚步和带队的哨声。她趴在窗上认真地看着，或许董平章就在里面。然而赵玫失望了，直到最后一队犯人走出去，她也没有认出来。这些犯人看起来都一个样，一样的衣服、一样的神情、一样的形态和姿势，个个都是疲惫的身驱、无神的眼光、消瘦的脸庞、蓬乱的头发和长长的胡须，真的是心如死灰，形同枯槁，除了有高矮的不同，愣眼一看甚至看不出他们之间的相互区别。赵玫怎么能看出来呢？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只剩了人的躯壳，而人的本性、人的灵魂或者是消失了，或者是被深深地压抑了、扭曲了、隐藏了。

傍晚时，那个男人进来了一会，简单地问了下身体还好呵、还习惯呵，很快也就走了。

两天，三天，都这样。

赵玫很是奇怪，好像她也被关了起来，可是又不像。

第四天，那个男人又来了，不是傍晚而是中午，屋里比较亮，这让赵玫能仔细地看看他。

那个男人说：“这儿是劳改农场，做事跟外面不一样，喜怒哀乐都不会轻易表示出来，不管是犯人还是我们。”

赵玫静静地听着，点着头。

“有件事想告诉你，你会很激动，但是你不能激动。最多也只能激动在心里，不能表示出来。你要答应我，才能告诉你。”

“我答应，我不激动。我已经死过好几次了，还有什么好激动。”

“你的丈夫董平章，在这儿。”

“啊！”赵玫张大了嘴，从床边站了起来。

“我说你不要激动吧，当然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他在哪儿，我要见他。”赵玫急迫地说。

“你不能认他。你要是让别人知道你是犯人的家属，是国民党特务的家属，马上就会被赶出去，连我也会倒霉。”

赵玫急得掉出了眼泪，“我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到了这儿，到了他身边，还不能见吗？”

“你可以见他，但是你不能认他。只能让你远远地看见，当作不认识。”

“那也行，那也行。”

“他现在的名字叫季行程，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给他起的。他在这儿是三中队3214号。我们这儿不叫名字，就喊号。”

潘场长看着赵玫，赵玫忍着，不激动了。

“今天收工的时候，我把他喊到你后窗户这儿走过，你见一下，但要忍住，不能出声，不能开窗户。如果做不到，那就马上叫你走。”

“嗯，嗯。”赵玫答应着，身子竟一软，跪倒在潘场长跟前，“我谢谢你了，”说完要磕头。

潘场长伸手扶住她，当两手碰到虽然是沾满黄土的衣服，但衣服下依然是柔软的双臂，潘场长下意识地缩了回去。

赵玫磕了头，潘场长还是把她扶了起来。赵玫无力地靠着潘场长的胳膊，倚在床边。潘场长还替她拍了拍身上浮灰。

傍晚，伴着哨子声，杂乱纷错的脚步声由远及近，进了大院。劳动了一天的犯人们收工回来了，又从空地走过。

赵玫把脸紧紧地贴在窗玻璃上，斜斜地看着空地上的人群，一个走过来的人也不肯放过。

忽然，她看见那个男人走了过来，站在离她后窗户不远的地方，双手背在身后，一脸的严肃。又一队犯人过来了，他突然朝着队伍厉声喊着：“3214，出列！”

一个蓬头垢面的人，弯着腰，低着头，走出了队伍。

“过来！”那个男人喝道。

那犯人无声地走了过来，好像还有点瘸。

赵玫在窗上仔细地看，没看出来。再看，再看，两只手扒着窗框，眼睛鼻子都贴在了玻璃上。

“天哪！是的，是他！”赵玫看出来，真想推开窗，窗是钉死的，也推不开。真想喊他。可赵玫也知道人家的好意，为了能多看几天，只能忍着。嘴巴在一张一张，心在揪、心在疼，硬撑着没倒下来。她还要睁大眼睛看啊。

去年的公捕会上都没看清，今天可是看清楚了。还是那个脸庞，还是那副憨厚认真的样子，只是瘦了，黄了，黑了，皮肤粗糙了，身体佝偻了，像是缩了一个号，不停地朝那个男人点着头。不知道那个男人说了些什么，董平章像是在遵命整整衣服，扣好扣子，又弯下腰系紧鞋带。赵玫明白了，是那个男人叫董平章在这儿多停一会。

董平章又站直了，那个男人一挥手，他走了，他都没朝这儿看一眼。

董平章走出了视野，到是那个男人朝窗里的赵玫看了一眼，也是一挥手，面无表情地走了。

赵玫的脸离开了玻璃。玻璃上留下了两行热泪。

这一夜，赵玫都没睡，眼睁睁地看着黑呼呼的房梁。见到十几年日思夜想的丈夫，不料却是在这儿，千万里外的劳改农场。丈夫成了别人砧板上的犯人，自己也几次差点丢了性命。命啊命，怎么会是

这样呢？

2.3救命恩人

过了一天，中午。

潘场长进了赵玫的屋。

“见到了吧？”他问。

“见到了，谢谢你，真的谢谢你。见了这一面，我死了也值了。”赵玫依然忧郁地说。

“别说那些。要这样悲观的话，他们就一天也过不下去了。你还行，那天我就怕你喊出声来，那就麻烦了。”

“谢谢你了，”赵玫第一次抬起头，看着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一笑，说：“我还要说一件事，你听了，也不要激动。”

“我不会激动了，我早就不会激动了。”

“你是赵玫吧？”那个男人说。

“啊？你知道我啊！”赵玫一时都惊呆了，她绝对想不到跑了千里万里，进了这戈壁深处的劳改农场，还会有人叫得出自己的名字。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我看见了 you 头上发夹。我从见到你的第一眼，就注意到了这发夹，可一时想不起，想了好几天，这才想起来了。”

“你以前见过我的发夹吗？你在哪儿见到过我？”赵玫惊奇地连连问着。

“你看看我是谁？”

赵玫听着愣了，认真地看着那个男人，还是摇摇头。

“啊呀，我老了，你认不出来了。我就是那个驻在南门外的潘连长啊。”

“啊？！”赵玫又惊了，再一细看，想起来了，果然是，“是啊，是啊，想起来了。”赵玫高兴地拉住潘场长的双手使劲晃着。“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啊。当年在战场上救过我，在这儿，你又救了我。”

“嘘，小声点，不要让外面听见。”

“哦，哦。我想起来了，纪社长说过，你们从朝鲜回来后，就到了新疆，没想到是在这儿啊，”赵玫还是握着潘场长的手。

“你怎么知道董平章在这儿？是纪社长告诉你的吧？”

“不是。哦，对了，你等等，”赵玫抽回了握着潘场长的手，从小包袱里找出了那张画着两个小五星的一毛钱。

潘场长拿着那一毛钱看了又看，感叹说：“纪社长真是好人哪。他既要叫你来找我，又不让你知道他在帮了你。”今天潘连长收到纪社长的来信，说赵玫要找董平章，以这张钱为记号，务请多关照。

“你们部队上真是有好同志，”赵玫又深情地看着潘场长。

“这样吧，我不能在这儿多待了。千万记住，不要让别人看出来我们以前就认识。再见到董平章，也还是装着不认识。”

“嗯，”赵玫点头。

“为了能多住些时间，就说是老家没人了，找亲戚走错了路，一时没有地方去，先留在我们这儿。明天起到前面一排的厨房帮忙，烧个火什么的。我已经跟徐司务长说了。老徐明天上午会来叫你。厨房里的人都是二劳改，也就是刑满释放回不去，留场就业的。这些人也都很胆小，很听话，不敢欺侮你的。你不用怕他们。你改个名字，叫，叫李淑英吧，怕海源那边真的有人来找。好了，我走了。”

“嗯，”赵玫很感谢潘场长会想得这么周到，站起来送潘场长到门口。

“我该怎么感谢你啊，潘连长。”赵玫紧靠着潘连长，闪着大眼，真诚地说着。

潘场长看了看赵玫，似乎也有点动了情，拍着她的肩膀说：“谢什么呀，也算是我们两个有缘吧。好了，就到这儿。今天我不在外面上锁了，你在里面插上，听清楚了再开门。”

赵玫点头，潘场长抚摸了一下她的头发，走了。

赵玫感激地看着潘场长背影，关门后插上了门栓。

赵玫就这样在五三农场住了下来，白天在厨房洗个菜，烧个火，并不累，厨房的几位职工还处处让她。

一早一晚，赵玫就在厨房门口看着犯人队伍的进出，偶然远远的能看见董平章，多想喊一声啊，多想扑上去啊，可是都不能。赵玫忍耐着，她相信潘场长早晚会想办法的。

潘场长隔个两、三天才会来一次，看望一下，说个几句话也就走了。

除了厨房的几个人外，赵玫没有和别人讲过话，她不想多和别人啰嗦，她觉得厨房的几个二劳改还好相处一些。而那些穿军装(没有领章帽徽)的管教干部反到叫人不踏实，远远地都用那种叫人说不出的眼光看她。她也躲得远远的，见到他们比见到院里养的狼狗还害怕，除了在厨房里干活，就插上门关在自己的房间里。

只有潘场长来的时候，屋子里才光亮点，赵玫的脸上才有了笑容。赵玫还真想潘场长多坐一会儿，可又不敢影响潘场长。看来潘场长也挺愿意来，每次走，都要轻轻地拍拍赵玫的肩膀，轻轻地抚摸她的黑发，抚摸下那锃亮的发夹。那只手虽然只停留几秒钟，赵玫却感觉出了这里面的情意。

2.4再次相救

才过了半个月，赵玫遇到了一件意外的事。

赵玫在厨房里，看到了那个粘干事。粘干事也直愣愣地看着她，而后一步一步地向赵玫走来。

赵玫一步一步地往后退，她惊恐地向那两个还在厨房里的二劳改看着，向他们求援，可那两个二劳改却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直愣愣地看着。粘干事一步跨前扑了上去，一句话不说，就伸手摸了起来。

赵玫急得大声呼喊。

徐司长跑了进来，粘干事的手还在赵玫的身上。司长喊道：“粘干事，你这是干什么？”

粘干事不屑地说：“没你事，我跟她玩玩。”

“你别瞎来，这是潘场长救回来的人。”

粘干事一愣，像是反应过来了，站起身来，一声不吭地走了。

傍晚，潘场长又进了赵玫的屋里，问起了这件事。

赵玫这才说了那天来农场的路上先碰到的是这个人。潘场长一拍大腿，埋怨说：“嗨！你怎么才说呢？”

“我不知道他也会是这里的人。”

“好，不说这些了。”潘场长想了好一会儿，对赵玫说：“他这个人不会这么善罢甘休的，他还会再来的。他要来，你不要怕，他晚上要是硬闯进来，你就砸碎玻璃窗，我就会过来的。这两天我都会留意的。”

“我害怕，”赵玫的眼睛都直了。

“不用怕，我会安排的。”

夜里还不到后半夜，果然有人来推赵玫的门。

赵玫已经插好了门，还把屋里除了床之外唯一的一样东西——一张方凳顶在门后。听到声音，赵玫站了起来。

那人推不开门，一拳就砸碎了窗玻璃，伸进手拉起插销，推开窗。粘干事居然从窗户跨了进来。

赵玫惊叫起来。四周却没有动静，粘干事依然一步步逼近。

赵玫退到了后窗口。

粘干事走到了床边。

赵玫瞪着惊恐的眼睛，尖叫着。

粘干事还没等赵玫举起手敲碎窗，一把就抓住赵玫，把她摔到了床上。

赵玫惊叫着，用双手拼命地抵挡着。

粘干事一下扑了上去，狞笑着撕扯起赵玫的衣服。

赵玫拼命地惊叫着，心想完了，敲不上玻璃了。

就在这时，“哗”的一声，后窗的玻璃突然被打碎了，一道强烈的白光从窗外射了进来。

“粘干事！你明白你在做什么事情吗？”潘场长在窗外叫着。几个管教干部从前窗和后窗里翻了进去。

“捆起来！”潘场长喝道。

“你敢！”粘干事居然不示弱，“你玩特务的老婆，就不让我们玩啊！”

一句话，说得进来的几个人面面相觑，不敢上前。

“姓粘的，你严重违法乱纪，还敢诬陷领导，该当何罪！”潘场长又对那几个人说：“把他捆起来。”

还是司机小商一直跟着潘场长，潘场长一发话哪有不从之理，第一个上前把粘干事从赵玫身上拖了下来。另外几个人一看，也一拥而上把粘干事捆了起来拖走。

粘干事跳着叫着，被那几个人拖进了禁闭室关了起来。

夜又安静了下来。

可赵玫的前后窗玻璃都已经打碎了，凉风呼呼地吹进来。赵玫受了惊吓，一直靠在潘场长的身上哭着。潘场长扶着她，一边劝着：“别怕，别怕，有我在，”一边整理着她被撕破了的衣服，抚摸着她的黑发，一直到天亮。

天一亮，潘场长就把粘干事捆着扔在了卡车的车厢里，亲自把他送到喀什，交由劳改局南疆办事处处理。

潘场长要送走粘干事也是心存已久，这次还真是找到了机会。五三农场里，潘场长是一把手，不用说犯人，其他管教干部对潘场长也是唯唯诺诺、客客气气地。唯独这个粘干事目中无人，狂傲不羁，有时还敢顶个嘴。无非是仗着他爹是农三师的一个什么团级干部。有的说他爸和潘场长是同级，有的说建设兵团的团级只能顶个营级，可粘干事自己觉得在农场里面应该能和潘场长平起平坐。潘场长早就心存芥蒂，这次粘干事又已经知道了赵玫就是从海源来的，自己又接了下来，这麻烦事以后就多了。还好乘粘干事行为不端，正中下怀，略施小计除之而后快。

当然事情也没有像潘场长想得那么顺利。粘干事在这之后并没有受到什么处分，而是调到了别的农场。一年多后，他又回到了五三农场。

2.5亦真亦幻

但是潘场长这次从喀什回来后，心情要轻快多了，去赵玫那儿也方便多了，不用再避什么耳目。赵玫也不再是烧个火、洗个菜，而是帮着司务长，管个厨房，可以自由进出大门和各个院子。

赵玫也安心了些，平静了些。但是她看到潘场长那越来越热烈的目光，越来越亲昵的举动，以她女性的感受，能觉察出潘场长对她的想法。怎么办？她需要在这儿，能常常看到董平章；她又得感谢潘场长，那是她的救命恩人。在不同的时期，曾经两次救过她的命。她还要留在这儿。回去，那是死路一条，早晚也是落到秦德才一类的手里。可这儿虽然已经走了粘干事，还是有几十双如狼似虎的眼睛时时在盯着她。能保护她的，只有潘场长，可是，能退让么？她一个女人能怎么办呢？不敢想……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中午开完饭，赵玫回到了屋里休息，潘场长后脚就进来了。

“中午的菜不错，大家都说好，”潘场长说着就靠近了赵玫。

赵玫笑笑，没有回话。

“你的手真巧，”潘场长抚摸着赵玫的手。

赵玫想抽回手，潘场长顺势就压在了赵玫的身上。

赵玫看着潘场长，潘场长干脆抱住了她。赵玫看到潘场长的眼睛突然放了光，身体扭动起来。赵玫的手想推，可一点力气也没有，潘场长的扭动更厉害起来。

赵玫就说：“潘场长，我都四十了，你还要？”

潘场长兴奋地说：“你在我眼里，永远是朵花。你还记得当时我说的话么，现在还是这样。1949年那次，国民党的炮弹飞来，我压在你身上的时候，已经有了这种感觉。没想到，今天又有了这样的机会。这真是老天给我们的福分啊！”

赵玫当然不会忘记，“可是，潘场长，你先等等。我知道，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你，我早就死了。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我已经不是赵玫，我是另一个人了，我是李淑英。对李淑英，你怎么都可以。但是，董平章在这儿，那样对董平章就太不公平了。你叫董平章过来，不是在窗外……”

潘场长停止了扭动，想了会儿，说：“好，你说的对。”坐了起来，“让我想想怎么安排……明天我就叫他过来打扫卫生。但是有三点要记住：第一，他不叫董平章，叫3214；第二，不能让他知道有我在里面，还得像普通犯人一样地干活；第三，平常你们还是装着不认识。”

赵玫点点头，也坐了起来。

潘场长又抱了一下她，走了。

第二天一早，一队队的犯人还在往外走的时候，赵玫的门外就有了响声：“报告！3214号前来报到！”

赵玫拉开了门，一身灰黄囚衣、一头蓬发的董平章还低着头站在那儿。

赵玫一把就把他拖了进来，又推上门。董平章一怔，抬头一看，还是个女的，就低头直往后缩。

赵玫急着说：“你看我是谁？”

董平章再抬头一看，更是愣住了。他看见了那发夹，看见了那弯弯的双眉，丰腴的脸庞虽然有了细细的皱纹，少了圆润的光泽，可还是白皙如前。那不是赵玫么？怎么会在这儿？

董平章双手扶着赵玫，连连说着：“你，你……怎么会是你？”从到了这儿，曾经魂牵梦绕十几年的妻子，都没有敢去再想。董平章真的死了心了，一辈子就等着埋在这儿的荒草砾石之下。突然之间，就像从地里冒出来、天上掉下来一样出现在面前，是自己看花了眼，不会，决不会的。

赵玫紧紧地抱住了董平章，“平章啊，平章啊……”眼泪止不住地下。董平章也是大滴的眼泪，两人相拥而泣。

忽然，赵玫松开手，过去插上门，把董平章扶到床前，“平章，来，先不说别的。你有一上午的时间，把过去的补上吧……”

董平章迟钝地过来，怯怯地不敢动作。赵玫躺着，抱住董平章，董平章知道意思了，可是更大的泪滴流了下来，又脏又黑的脸抽搐着，喃喃地说：“赵玫啊，赵玫啊，我不行啦。没上这儿之前就被打伤了，四十一啦（说明：“四十一”，海源话，性功能丧失的意思），成了废人……真对不起你呀！”

赵玫捧起董平章的头，看了看，又把他抱在胸前，泪水不住地下。反复地说着：“平章啊，平章啊，我们太苦啦……”

董平章在外院扫了两天的地。

中午，潘场长又进了赵玫的房间。

“这两天，过得不错吧！”潘场长讪笑着问。

赵玫没有答，潘场长把她抱起放到了床上。

赵玫却问：“董平章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我看过他的材料，他的情况是罪名很重而罪行很轻。国民党特务，还有什么比这罪更重？罪行么，他还没有来得及活动，就被抓了，没有严重后果。”

“那判了多少年？”

“没有多少年，没有刑期，连无期也不是。”

“这怎么说啊？没有头啦？”

“这要看大的形势啦。要是国民党大规模地反攻大陆，立即就会拉出去枪毙，营造个对敌斗争的声势。要是国民党想开了，看穿了美国人没拿老蒋当回事，跟咱们和谈。咱们也和苏联人闹翻了。都是中国人，再折腾什么呀，和谈吧。上头也说了，要是老蒋肯回来，给他个国家副主席当当。那样的话，董

平章也就会穿上新衣服放出来，说不定还能领上一笔补助金，回海源安排个工作。嗨，说这些干什么呀！”

潘场长已经伏在赵玫的身上。

赵玫没有任何的反应，只是双手捂着脸，闭着眼。

“你不高兴么？”潘场长问。

赵玫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你要是不说话，就是愿意了。”

“这些年董平章受了罪吗？”赵玫心里装的还是董平章。

“从到这儿以后没挨过打，也没生过病，我知道他是海源的，就留心了。他自己不知道。嗨，这时候又说这些干什么？”

赵玫还是捂着脸，再没说话，听凭潘场长在她身上的动作。

潘场长兴奋地“我的花呀，我的花呀”地哼着。

当潘场长起身的时候，看见赵玫双手下的脸上流着泪。

潘场长一惊，忙去拉赵玫的手。

赵玫紧紧地捂着脸，不让他拉动手。

“你恨我吗？”潘场长问。

赵玫摇摇头。

“那你哭什么？”

“不知道，”赵玫这才开了口，又拉上被子盖住身子，说了声：“你走吧。”

第三章 荒漠绿洲

1960年1月3日

3.1新的日子

冬天，1966年年初的冬天。

一场少有的大雪刚停下，五三农场的旷野铺着厚厚的白雪。

在农场那排办公室的一间房子里，亮着电灯，潘场长正领着几个管教干部和犯人在开会。去年刚入冬时，农场为了集思广益搞好生产，也为了调动犯人的劳动积极性，找了三个犯人成立了生产技术组，配合场里的生产技术科完成一些具体工作。这在劳改农场的管理中还是很少有的。董平章也在这组里面，劳动也轻多了，三个人单独住一间，条件也要好多了。当然董平章早年就是劳动好手，要讲生产技术也是找对了人。另外那两人，一个是农校的老师，1957年打了个极右，因为不服，1962年不但没摘帽，还加了刑送到了这儿；另一个是农业局的，南方人，大概是困难时期饿肚子贪污了粮食。

这会儿，犯人的生产组和场部的生产科在一起研究开春的生产。以前，农场是不管这些的，尽管是天天在生产，却不考虑生产问题。因为有的是劳力，有的是时间，打多打少也都拉走，犯人才吃多少。可从去年秋天，来了赵玫以后，潘场长的情绪好多了，对犯人的态度也平和多了，虽然他以前也不是凶狠冷血的那种。对农场的工作也愿意多想一些了。

会上，生产组的人提了不少以前没想到过的好意见。比如，每个中队分一些地，相对固定，从种到收，各自负责，不必每天都是几百人的大集体行动；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无效的、重复的劳动。以前农场的劳动就是为了惩罚，为了尽量地消耗犯人的体力、时间，尤其是要磨损他们的思维能力，所以几乎不考虑劳动效率。“干就是了。不干活，犯人还能再去干什么？”这是管教干部的口头禅。现在，在这方面从提高生产来说，有不少改进的余地。还有，要了解和关心犯人的思想活动。在这种长期关押、失去自由和基本权利的特殊处境下，犯人们看似心如死灰，其实内心波动是很剧烈、很偏激的，容易走极端、出事情，减少思想问题、稳定情绪，也是搞好生产的重要保障。反过来，真的认真去搞生产，能调动起犯人的积极性，也能起到稳定他们思想情绪的作用，有利于做好农场其他各方面的工作。

潘场长听了直点头，“有道理，有道理。”自到农场来后，他还没有听到过这样有用的话，尽管面前的这三个人身着囚衣，平常都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生产科的几个人听了也愣了神。他们虽然分管生产，可除了指手划脚，还真没有想过这些。

董平章还提了，这两天这雪下得挺好，可以把空地上雪搬到地里。大家都说是好主意。尽量不去大河里敲冰运回来，不但路太远，还容易得病冻伤人。接着就商议铲雪、运雪的分工，同时也把各中队负

责的地块分了下。明早，再找中队长开会落实。

这个冬天，是潘场长最舒心的了。

潘场长敲门又进了赵玫的屋。

赵玫站了起来，走过去，说：“怎么又来了？”

潘场长笑笑说：“我那屋里的炉子又灭了，过来暖和暖和。”

赵玫低头说：“看你鞋上沾的雪，快跺跺。”又弯下腰，拍去潘场长裤腿和鞋面上的雪。

潘场长喜孜孜地说：“这么大的雪，今年会是个好收成啊。”

赵玫靠近潘场长说：“你这粒扣子也松了，不往里灌风吗？脱下来，我帮你钉一下。”说着就去解潘场长上衣的扣子。

潘场长不由自主地端量起赵玫，抚摸着她的黑发，说：“真是个好媳妇。”

赵玫嗔怪道：“去，谁是你媳妇？”

潘场长认真地说：“赵玫啊，真的，我想过很多次。真不如，我回去离婚，我那个家真不象个家。还是咱俩成一家吧。”

赵玫拿下了钉扣子的手，说：“不，不可以这样。我不能破坏你的家庭。你要这样，我马上就走”。

“嗨，你别这么急吗，我说给你听嘛。董平章现在虽然过得还可以，那只是跟别的农场比，跟别的犯人比。形势不会一直这么平静的。万一有个变化，第一个受到打击的就是他。他是没有尽头的。就算台湾解放了，国民党被消灭了，他也还是国民党特务，你永远是特务家属，永远抬不起头的。你跟我结婚，就是革命干部家属，完全不一样了。而且，你和董平章分离十几年，婚姻关系在法律上已经不存在了。这样做，对他没有什么损失，没有任何变化。”

“那样也太对不起大嫂了。我是个女人，我知道一个女人的难处。”

“或者这样，我先去离婚，我们结婚。有了这一层关系，我在这儿能把你的户口迁过来，还能安排个农场正式职工，以后再迁到哪儿都是非农业户口、干部编制了。我当个场长，这点我还是能办到的。如果，以后董平章真有出头之日，你可以再离开我，怎么样？要不，我回去假离婚、我们假结婚，先把你的身份改了。”

对于这番话，赵玫的心里是震颤的，一个男人能讲到这一步，那都是在为她想。她停了会，说：“潘场长，我真的很感谢你。但是，我是董平章的妻子这一点，永远不会变。最后不管是什么下场，我都认了。董平章在你面前是3214号犯人，但在我心里，他永远是我的丈夫。另一方面，作为李淑英，我是你的人。你救过我两次命，我现在的每一天，都是你给的。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是个好人，我愿意侍候你，但是离婚、结婚的事，就不说了。你可别像那个经大臣。”

“经大臣？那个经乡长吧！怎么啦？”潘场长顺手把灯关了。

赵玫那间屋的玻璃黑了。房顶和门前的积雪，在月光下是那么的皎洁。

3.2老两口

又快过五一了，当然对于五三农场，是没有五一节这个概念的。春天了，路边稀稀拉拉地冒出了小草，农场院子里的杨树伸出了嫩叶。赵玫领着两个留场人员到大院门外的菜地拔一些葱，割一些韭菜。这些也是赵玫想到要种的。

突然，菜地里远远地有人影在动。大家正奇怪这荒天野地，哪会有人呢？大概是听到有人过来，人影站了起来要跑。看清了，还是两个人呢。但是跑得很慢，晃晃悠悠的样子。赵玫身边的人喊着：“什么人？”跑了过去，不费事就抓住地里的那两个人了。

赵玫过去一看，是一男一女，五十多岁，像是一对夫妻，也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完全是一副难民的样子。男的还背着一个破旧的包袱，女的拐着一个破篮子，里面是一些野菜小草。两人相扶着，神色惊恐，浑身哆嗦，跪在地下连连磕头哀求：“放了我们吧，我们没有偷菜，我们只是拔了一些野草。不信，你们看。”老两口，女的捧上篮子，男的把包袱都翻了过来，里面什么也没有。浓重的地方口音，那两个职工听不懂，没有反应。

老两口又说：“我们看这儿的野草长得多一些，才过来的。我们就走，我们就走。”

赵玫叫那两职工放开这两人，问：“你们是哪儿的呀？慢慢说。”

这才知道，老两口是从湖南来的。去年儿子因为讲错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才十六岁，就判刑十年，送到这五三农场服刑。从儿子被抓走后，村里一些“积极分子”就天天来闹，砸门撬窗，屋顶也掀了，锅台也砸了。他们实在呆不下去，就弃家舍业冒死到这儿找儿子。

“来多长时间了？”赵玫问。

“有一个多月啦。”

“见到儿子了吗？”

“远远地看到过。”

“讲上话了吗？”

“冒得（湖南话，没有），靠不上去，刚靠近就来赶了。我伢子还是近视眼，他还冒（没）看到过我们。”老两口流着泪说。

“唉，”赵玫也叹息了，“你们住哪儿？”

“哪有住的？有棵树底下蹲着就不错了。”

“那吃什么？”

“就是呷（湖南话，吃的意思，念qia）不上饭，天天饿得发昏。唉，活不了几天哒。”老俩口又是泪流不止。

赵玫的眼睛也红了，用手抹着。如果不是遇到潘场长，眼前的老俩口，不就是她今天最好的可能性吗？

“你们跟我来，”赵玫说，又对那两个职工说：“你们再掐点葱，割十几斤韭菜回来。”

她带着那老俩口来到大门口，叫他们在外面等着，自己匆匆地进了门。

走到办公室门口，潘场长看见了她，过来问：“什么事啊？这么急。”

赵玫大体说了一下。

潘场长沉吟了下，“是有这么个人，老是吵，老是闹，不肯安静，原来是这么回事。他们老俩口住在野地里也不是个事。死在我们大门口，影响也不好。你从伙房拿几个窝窝头给他们，跟他们说，从大门往东一直走，走十几里路后，有一片胡杨林。沿着胡杨林的边再一直往东，还有几里路，就有一个小绿洲。那儿有个已经被维族老乡遗弃的小村子，也就是三四户人家的房子。我估计有的倒了，有的还能避个风。那儿还有个大水塘，有上百亩荒废的田地，说不定能养活个人。叫他们过去试试看，总比在这儿的野地里游荡要强。”

“那好，我原本就是想拿几个窝窝头给他们。要是那个地方，也能对付一阵子。那，什么时候能让他儿子见他们一眼？”

“这事要慎重，不能感情用事，不然反而坏事。”

“嗯。”

赵玫进伙房用纸包了几个窝头，又出门，给了他们。他们俩千恩万谢，又磕头又作揖。赵玫扶起他们指了指向东的路，说了那儿的情况。

老俩口相互搀扶着，一步一瘸，颤颤巍巍，摇摇晃晃，向那片荒漠尘土的远处走去。

赵玫望着他们远去，自己眼睛也湿润了。

3.3心的激荡

这以后，赵玫经常带上几个窝头，趁午休在大门外走走看看，希望能看到那老俩口，能多少帮他们点忙。五天六日的，还真能碰上他们。其实老俩口，几乎每天要来回走上四五十里路，想看上他们儿子一眼。赵玫能遇上的，也是碰巧了。老俩口手捧窝头每次都很难为情，又不能不接，没有这点接济还真不行。

在一场昏天黑地的沙尘暴之后，赵玫有十来天没见到他们了。赵玫心里很惦记，出了什么意外啦？她跟潘场长讲，想过去看看他们。潘场长说：“也行，要不派个人跟你一起去。”赵玫说：“不了，我能行。”

赵玫起了个早，带上十几个窝头，装了一个行军壶的水，带了根有尖刺的长棍，朝潘场长指的东方走去了。那天早晨，天气不错，风儿不大。一路走来，大地是那么的空旷辽阔，地势平缓而稍有起伏。四处是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土堆、沙丘，土堆的顶上和四周长着红柳、荆棘和蒿草，除此而外满眼只有一种单调的土黄色。从近到远，直到天边，都是这亘古不变的景色。四下里万籁无声，静静地，静得从心里发怵。唯一活动的就是风儿卷起的阵阵沙尘，贴着地面卷过，鼻腔里满是干燥呛人的土腥味。

在这苍穹之下，茫茫大漠，当只有你一个人孤独地走着，内心会变得十分地寂寞、无助和凄凉，甚至是悲壮。你会强烈地感觉到人的渺小，生命的脆弱与短暂。人在这漫漫黄沙与尘土之间，不过就像脚下无以数计的砂粒中的一颗，那样的细小，小得可以略而不计，甚至连这样的一颗砂粒也不如。当你在世界上消失掉多少年以后，那颗砂粒却还依然存在。

赵玫为萍水相逢的老俩口走的这一趟，也是有风险的。一则，南疆是有野狼的。虽然因为猎物的稀少而狼群也很少出现，但一旦遇上，也是不好对付的；二则，南疆的旷野很容易迷路。万一迷失方向，在戈壁荒漠中，下场可想而知。在五三农场东面一带，还有土海，意思是一片能淹死人的像海洋一样的尘土。那是一种极细的尘土堆积在原本的沟壑里，表面平坦，看似灰土，与四周无异，下面却是深达几米、十几米。人畜上去，就像沉入无底的泥沼，越挣扎越往下沉，不用几分钟就埋没得无影无踪。

赵玫按照潘场长的嘱咐，迎着太阳，在远处的天边找一个高大的容易识别的土堆，盯着它一直走。等走到了，再在天边找这样的。潘场长说，回来时，也是这样，而且要等太阳西斜时再走。一是天气凉快，二是迎着太阳更好找方向。千万不要中午走，南疆一天中的温差极大。中午太阳当头，整个大地都会反射出刺眼的白光，蒸腾上升的热气使远处的景物晃动扭曲，眼睛会因此而迷糊，心绪也会因此而虚幻，那只能是一步步走向死亡。

当赵玫走过了两个作为标识物的土堆，远处就见一片胡杨。渐渐地树林走近了，她照着潘场长指点，沿着树林的南缘往前走。她，看到胡杨林心里感慨万分。在这样恶劣的几乎寸草不生的自然条件下，胡杨神奇地挺立着，那么地生机盎然，那么地高大伟岸，绿色的枝叶伸向天空，几乎触及到云彩。那苍老皴裂的树皮，见证着它的拼搏与顽强。树下灰白色的叫做胡杨泪的碱性结晶，诉说着它的艰辛与苦难。据说，胡杨树三百年不死，死了三百年不倒，倒了三百年不朽。生命在这里又显示了神奇的力量，不由得叫人惊叹、叫人震撼。

走过胡杨林，再往前有个小小的山坡，南坡下果然有几间土房。都是黄土的颜色，远远的真是看不清。山前有一片平展的土地，厚厚的黄沙里居然冒出一些植株，显然这是一块曾经耕作过，而又遗弃了的田地。再往南还有一大片水塘，夏天丰水期，还能和不远处的一条河流相通，一直连到叶尔羌河。这儿曾是维族的一个小小村落，只三五户人家。1958年，当地为扩大粮食生产，动员了几十人过来翻耕垦荒。结果原有脆弱的土地结构被破坏，导致盐碱上升，地下水位下降。不但新的耕地没种成，原有的二百多亩地也只能舍弃。到了困难时期，那几户人家也只得背井离乡，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只剩下这好似历史遗迹的几间房。而今成了潘场长指点那老俩口的庇护场。

赵玫走过两排已经坍塌的平房，那是当时垦荒人的集体宿舍。走近这几间民房，房前的木栅和围墙已经东倒西歪，门窗残破不全，到处是厚厚的尘土，屋里黑黑的，没有动静。赵玫一个院子、一个院子走下来。当她推开中间的院子，屋里有了惊恐的声音：“哦，哦，”门紧紧地推上了，门后面还有什么声音。

赵玫上前敲门：“是湖南来的马大爷吗？”

屋里沉默。

赵玫又敲门。

门后面有了动静，一会儿出来了声音：“你是地里的那位好人？”

门迟疑地开了，门后面正是那位马大爷。

“啊呀，是你呀，真不敢相信你会来。一开始怕是有野兽，以后又怕不知道是什么人。不敢开啊，有时候人比野兽还厉害啊。”

“好几天没见到你们，过来看看怎么样了。”

“进来吧，进来吧。可惜都是灰，冒（没）得地方坐。”

屋里很暗，尽管屋外已经很热，可屋里还有点阴冷。屋子空空的，除了地上厚厚的灰，就是靠门边的一口破水缸。角落里堆着一摊草，那个马大娘正趟在上面。

“前两天，大风沙那个厉害，从来冒见过。我们都回不来哒，不知道走哪儿了，在野地里土堆下过一夜。第二天，看见这胡杨林，才摸了回来。一回来，我堂客就起不来哒。”

渐渐地从说话中知道两位老人并不老，也就五十刚出头，苦难使他们从内心、体力到外表都提前衰老。他们的儿子小马初中毕业就在村里当代课老师，虽然一个月才24块钱，却是多少人得不到的好差事，有多少人想把他拱下来，尤其是那个村支书的儿子一直在想顶他的位置。一天，他领着学生在场上干活，旁边村支书的儿子在扬场。一阵风从东面吹过来，扬起的碎屑进了小马的眼睛。小马就说了句：“刮什么东风啊，叫人睁不开眼。”支书儿子马上举报，“这是跟毛主席唱反调。毛主席说：东风压倒西风。小马说刮东风不好，这不是对抗毛主席吗？”当天晚上，就开社员大会，村支书点名批评。小马才十六岁，哪知道深浅，还不服，红着脸跟支书吵。第二天，村支书上了公社报告，公安员当时就过来抓走了。一个月后，来了判决书，说小马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现行反革命，还态度恶劣，反动气焰嚣张，从重判处十年徒刑。三个月后，小马给家里来了信，说是已经到了新疆麦提那的五三农场，那是1965年的秋天。那时湖南的社教运动全面铺开，阶级斗争的烈焰越烧越旺，积极分子们纷纷要表现自己的立场坚定、斗争坚决，对老马俩口子岂止是冷眼相待，而是可以随意欺凌。于是老俩口拼着一死，转换到了现在的场面。

赵玫无言以对，讲不出什么话可以宽慰他们两位，拿出窝头，留下水壶，四处看看能帮点什么。找到了一个铁盆，虽然锈了，可还能盛水，顺着一片片鱼鳞似翘起的曾经是水湾而干涸了的地面，赵玫走

到一里多外的小湖捧了一盆水回来。那湖泊也有几百米的方圆，四周是一丛丛芦苇和蒲草，岸边浅浅的水里居然还能看见白鲢子和鲫鱼在游动。一只卡盆（新疆话，胡杨树刻的独木舟）斜斜地半沉在水里。看来当初还真是一片鱼米之乡的好田园。

赵玫一直陪他们到太阳西斜，才往回走。

迎着灿灿的太阳，走过一个个土堆，赵玫这才想起，从早晨出来还没有吃过一口饭，喝过一口水。累了、饿了、渴了，农场还远呢，四周还是亘古不变的土黄色的景色。赵玫真想停下来，可又不能停。无尽的旷野，哪里能有个依靠，有个支撑，有个强壮的臂膀，孤独和渴求又涌上心来。

哎！一个土堆下，忽然走出一个人影。赵玫立刻紧张起来，这地方怎么还有人，会是谁？

这人，不是别人，正是潘场长。潘场长，他在这儿等了很久了。他怕赵玫迷了路，有意外。

当赵玫看出来是潘场长的时候，像是见到了渴望已久的救星，心里热血涌动，不能自己。两人走到一起的时候，紧紧相拥。赵玫靠在潘场长的身上浑身瘫软，身体慢慢滑落下来，横躺在了空旷的蓝天白云之下，亘古不变的黄沙与尘土之中。

在热浪澎湃的激情中，赵玫都分不清，这是真实还是虚幻。

两个中年男女的这份感情，不是用“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焰”之类的说词所能解释。

赵玫回农场的时候，还到伙房里看看菜炒熟了没有，馒头有没有出笼屉。

潘场长进农场的时候，嘱咐门口的哨兵说，关上门吧，外面我都看了一圈。

第四章 社教运动

1960年1月4日

4.1 运动初始

1965年，对于民主村，除了歼灭高增光一伙国民党武装特务而外，更大的一件事情是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开始是叫“四清运动”。1964年前的四清是小四清，即：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1964年后扩展为触及农村社会各方面的“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对于社教运动，有些人并不陌生。最早在解放之初，1950、1951年，就有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那时也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后，1958、1959年，在农村也搞了一场以“反右倾”为主要内容、以大辩论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习惯上称做“反右补课”。后来，因为“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才没有进一步激化。

但是，从1963年开始的这场社教运动可不一般了。在大跃进失败和遭受严重经济困难后，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对经济工作中极端做法的怀疑和异议。有些地方为恢复生产力，改善农民生活，则采取了一些自发的相对务实温和的补救措施，比如：开放集市贸易、重划自留地、分田到户等等。也有一些干部因此而意志消沉，脱离群众，甚至多吃多占、贪污盗窃。对于这些原本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当政者认为都是属于阶级斗争的表现，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威胁，绝对不能容忍。为了统一思想、整肃纪律、消除对权力的隐患，于是再一次以习惯了的急风暴雨的群众运动和对敌斗争的方式，发动了这次大规模的社教运动。其决心之大，出手之重，时间之长，涉及之广，在建国之后的历次运动中是空前的。

为此，中央先后于1963年5月发布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前十条）、1963年11月发布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第一个后十条）、1964年6月发布了“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贫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的指示”、1964年9月发布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订草案）”（第二个后十条）、1965年1月发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等一系列重要文件。

在这些文件里，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尤其是“二十三条”，第一次指明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的对象由1957年反右派时的知识分子，1959年反右倾时的党内不同意见者，这次直接指向了广大农村，指向了广大农村的基层干部。并在全中国范围组织了数百万工作队员分期分批进驻各地农村，整个运动成了“阶级斗争理论”的一场大操练。（在一些城市和企事业单位也

开展了社教运动，这儿就不多说了。）出手之重，下手之狠，打击面之宽，也是前所未有的。这场运动由此而号称是自土改以来最深入、最广泛、最伟大、最彻底的革命运动。

这一期间，中央领导的有关论述比较多，为简便起见，本书就引三段话。

第一段是《四清运动实录》（郭德宏、林小波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所述：“毛泽东更加坚信，社会主义教育势在必行，‘如果我们不整风，哪个县都要出修正主义’，‘如果我们不搞增产节约，不搞社会主义教育，不搞阶级斗争，就要变成南斯拉夫。’”

一段是毛泽东在1963年2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现在又证明，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请见：《毛泽东传》-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另一段是从《六十年国事纪要（政治卷）》（朱永红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一书中转述：“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在农村和城市，大约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而掌握在敌人手里……会议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对烂掉了的单位要夺权，不仅要追‘四不清’干部在下面的根子，还要追他们在上面的根子，把运动搞深搞透。”

从这三段话，我们就可以看出社教运动的意图和基本做法了。

海源竟然有幸成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社教运动试点单位。

县工作团的成员，有中央机关和省地县各级干部，还有根据“文科要以社会为课堂”而参加进来的文科高年级大学生。龙头公社工作队队长就是建国初期的海源县教育局长、1961年曾来过这儿的省委但处长。远在上海的经大臣1962年复职后在新组建的中共中央华东局某处任副处长，因为对海源情况熟悉，也过来参加社教，担任团部的联络员。

西北村的工作组有四个人：组长，很不幸，正好是宗书记；另外，一个是省里一个出版社的时编辑；一个是县民政局的（建国初也是县教育局的）女干部，四十多岁的白云。这个组里还有一个人，想特别说一下，是1949年被国民党杀害的祖责成的孙子，祖云涛。祖责成的儿子祖如海，早年参加革命，当兵在外，前两年才转业回来。现在在县粮食局当副局长，按说以他的资历，不该就是个副科级（当时的县局是科级），这儿就先不说。祖云涛父子俩跟他们那个冲动、蛮干、走极端的长辈祖责成不一样，文化程度一个高过一个。祖云涛现在是北京一个财经学院的大三学生，还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全然不像一个义和拳的后代。他爹也没怎么带他回过民主村，民主村的人并不认识他。

工作队是在十月国庆节后进的村。在县城集中训练了十天后，坐着卡车分赴各公社。到龙头公社各村的工作队员，在西门外下车，然后按各组排队步行进镇。他们每人肩背行李，手提装着脸盆和日用品的网兜，一脸严肃认真，走进了西门。

街两旁挤满了观看的乡亲们，他们也是脸色茫然。他们听说了这是一场大运动，却不知道这场运动将给他们带来的是什么。以前的运动也有过，但像这样派出大队人马，连中央北京都来了人，还要住在

村里，吃在老百姓家里，还要搞好几个月，这可是头一遭。以乡亲们的智力，已经想不出来将会是怎样的结果，只能茫然地看着。

没有布置各村要出来迎接，村干部知道自己将是这场运动的对象，也都没有出面的。只有在镇的十字路口，挂着一条横幅“欢迎社教工作队进驻我公社”。留在公社维持日常工作的纪社长领着几个人，在陶家大院那垛姜雪花牺牲的墙下，站着鼓掌，算是迎接。简单的几句话后，工作队队部的几个人进了陶家大院，其余驻各村的工作组再继续步行前往各自的驻点。

民主村的工作组是最近的了。拐过胡同向北，他们住进了申老汉原先住的院子。申老汉俩口子五十年代去世后，一直空着。祖云涛和时编辑住西面的外间，宗书记住里间；那位白云住在李芹原先住的东间。放下行李，吃过自己带的干粮，宗书记说：“下午咱们各自找个生产队干活去吧，晚上开社员大会。”

宗书记对这次运动是考虑了好久的。他意识到这又是一次对各人利益的大调整，是又一次对各人政治地位、社会角色的重新洗牌。如果抓得好，那又是一次绝佳的表现和上升的机会，所以要不断革命啊。他不同于其他公社干部的疑虑重重，反而主动要求参加工作队，他相信以他自己的政治素质和能力，更适应于这种大风大浪。别人呛水的时候，正是他得心应手、向前冲刺的时候。

当天晚上，民主村场院又拉起了电灯。

社员们陆续地来了，唯一不同的是于村长、杜家骏这些村干部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在前面，而是和普通社员一样找了个犄角旮旯蹲了下来。

电灯下摆了一个方桌，方桌后坐的是宗书记他们四个人。

当然是宗书记在做报告：

“社员同志们！从今天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在我们西北村正式开始了。

这次运动不同于以往的运动，这是一次比土地改革更加广泛、更加复杂、更加深刻的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这是因为当前农村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已经十年没有搞阶级斗争了。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乘着困难时期，和帝修反、国民党反动派相配合，不断地猖狂进攻，企图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在派遣特务、武装登陆失败以后，就改变了反革命策略。从内部拉拢腐蚀我们的干部，把一些看上去是共产党的干部变成了他们的代理人，到处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威胁到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了。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们，中央在经过调查研究之后，竟然发现全国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了。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情况啊！反革命复辟的危险就在眼前了！难道我们海源县、龙头镇会是例外吗？不会的。我们这次社教运动就是要把无产阶级失去的政权再夺回来。但是别看问题严重，只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

你们这个村，我是知道的，问题不少啊！可以这么说，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不说别的吧，就说这个村的名字，叫什么‘民主村’，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腔调嘛！以后不要叫了。什么民主啊、自由啊、人权啊，鸟东西，那都是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外面裹着的花花纸。我们无产阶级决不施仁政，只讲无产阶级专政。用专政的铁拳，把那些阶级敌人砸个稀巴烂！

我警告西北村的大小干部，要积极主动地检讨这几年存在的四不清问题。有不少的干部，这几年馋懒占贪变，也变成了革命的对立面。有人说，我们都革命几十年了，还会有问题吗？毛主席说了，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请见：《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有了问题就不要怕疼，不要怕丑，要自己脱裤子洗澡，把腚沟里的屎洗干净了，不就好了吗。党在挽救你们，要不就要和地富反坏右站到一起了，真的就变成了革命的敌人，被革命所打倒……

你们不要小看我们这四个人，我们虽然只有四个人，但我们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是刘主席派来的。虽然我是龙头公社的书记，就住在你们隔壁，差不多天天见面，但是这一次我是毛主席派来的，是刘主席派来的，是代表党中央的，手里有尚方宝剑，权力大得很呐，不管什么样的石头都能搬掉……

在这次运动中，我们会坚决依靠贫下中农。贫下中农同志们，你们要勇敢地站到斗争的第一线，做革命的主力军，你们在这次运动中会得到第二次翻身解放……

对于我们工作队员，我们也会严格要求自己。对我们的纪律，我现在告诉大家，请你们监督，哪个工作队员违反了这些纪律，立即开除。第一条，要和社员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吃，就是要到贫下中农家里去吃，不但地富反坏右家里不能去，也不能到干部家里去吃。而且还规定只能吃素，不能吃荤。不但肉和鱼不能吃，鸡蛋不能吃，豆腐也不能吃，酒更不能吃。只要好一点的菜都不能吃……”

宗书记洋洋洒洒地讲了两个多小时，除了于村长他们几个村干部一句也不敢漏地听着，秦德才搓着手也来了精神，其他好多社员群众都已经睡着了。

4.2 访贫问苦

虽然是中午，天气却已经秋风凉了。可宗书记还是高高地挽着衬衫的长袖，黄军装的外衣披在肩上，裤腿卷到了膝盖，扛着一把锄头在西街上走着。乍一看有点像报上登的焦裕禄照片上的样子，像个干部参加劳动的模样（说明：焦裕禄是困难时期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因肝癌死于任上，当时是作为一个勤政爱民的领导干部的典型而广为宣传）。可这时是收秋玉米的时候，扛个锄头干啥呢？不去管了，这时他正要去吃午饭了，今天轮到秦德才家。

秦德才还是住在那个两进房的里院那套的西屋。对面的齐阿姨因为实在不愿意再看见秦德才，已经另外盖房跟儿子出去住了，东屋一直空着。宗书记踏进后院，秦德才就从屋里迎上来了，满脸堆笑，连连称呼：“宗书记，宗书记，您来了。里面请，里面请。”

宗书记走进里屋一看，炕上已经摆得满满的，不但有一盘猪头肉，竟然还有一只乡间难得一见的烧鸡，边上还竖着一瓶白酒。

宗书记不悦，说：“我跟你弄一点，没叫你弄这么多。别人知道了多不好。”

秦德才狡黠地一眨眼，“宗书记，您放心，我这是叫储小二昨天上县城买的。村里人谁也不知道。”

宗书记：“嗨，想不到你这鲁莽之人也有这个心眼。好，好，他妈的，饿了这么几天了，今天可是得解解馋了。”

“是啊，是啊。革命干部不保重身体怎么干革命呢？西北村的革命事业全靠您啦。”

“也得靠你啊。这次社教运动，要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就是要发动、依靠你这样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你才是西北村的革命主力军啊。秦德才啊，这回好好干，会有你的出息。”

“是，是。我是最愿意革命的啦。夜里躺着都想革命，都想昏头啦。想了这么多年，被那些干部，喔，被那些四不清干部压了这么多年，终于又要革命啦！可盼到头了，嘻嘻。”

“对，社教运动就是第二次土改，你们就会有第二次翻身。但是你得好好地干。”

“对，干，干。宗书记，咱们先干它三盅。”

“好，好。”宗书记是个好酒量，三杯下肚脸不红，一点没事，又连忙扯开鸡架子，狼吞虎咽起来，毫不谦让。吃了一会儿，宗书记又说：“不过你这小子，得听我的，懂吗？”

“是，是。不管什么事，只要你宗书记一句话，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秦德才决不会皱一下眉头。”

“好。你一个人还不够，还要有一帮人，才能搞得过于村长他们。像你这样的苦大仇深、又愿意干革命、不怕四不清干部的，再去串联几个，就成气候了。西北村你就踩得响了。”

“好，好。还有这么几个人，比如像储小二。”

“行，你去找去。有了人，就可以成立贫下中农战斗组，你当组长。”

“好，好！”这下，秦德才更是高兴得不得了，拿起酒碗连连敬酒。

“你这家伙，才喝了几口，脸就红成这样。”宗书记满脸通红，瞥了秦德才一眼，“这么不中用，下午就别出去了，睡一觉吧。省得叫人看出来。”宗书记自己打了个饱嗝，也倒头呼呼大睡了。

4.3 四不清干部

社教运动的重点当然就是要对付村干部了。讲到要对付基层干部，那历次政治运动就积累了太多的经验，用也用不完。比如，怎么跟干部谈话呢，基本上是这样的三步曲：

先是“唬”。告诉你，这次社教运动是很严肃的，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决定部署的。不是吓唬你们，再不搞运动不行啦，眼看就要党变修国变色啦。你们看苏联都变成修正主义，劳动人民受二茬罪啦。我们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不搞出点名堂是决不收兵的，你看北京的大干部都下来了。你们队就没有阶级斗争的表现？你们这个队问题也不少啊。你就没有问题啦？不要再抱幻想啦。

二是“诱”，诱导。你那点问题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可大可小，就看你什么态度啦（这是以所谓“政策”代替法制的典型话语。多少年来，不少干部对这套办法运用得可谓轻车熟路、得心应手，所以很不喜

欢用有明确规定的法律法规行事，更不喜欢公平公正公开的阳光下的操作了）。我们工作组对你抱有很大希望啊，你毕竟是经过党的多少年教育培养了，应该是有觉悟的，不要辜负了组织的期望。我们工作组搭个梯子，帮你下楼，洗洗澡，把灰去掉。（当时有很多这种形象的能让人容易接受的比喻说法）。怎么样？快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吧。你过不了关，我们也替你着急啊。这个大队的工作，还准备靠你呢。

要是不肯交代，不承认有问题呢，那工作组手里的办法就更多了，增加生产、改善生活没有多少本事，搞这些可有的是办法。第三步，就是“压”。猛喝一声：呸！你还没有问题，那谁有问题啊？我们都掌握你情况啦，群众都揭发啦，连你和那、那、那个的狗屁事，我们也知道啦。要及早回头啊，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以为我们是白吃饭的啊，不要低估了我们工作组的能力。不肯交代问题，就是站到了党和组织的对立面，与党和人民为敌。给你出路，你不走，想一想吧，那会是什么后果。你的那些问题，说实在，拉一拉就过来了，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还是同志。推一推就过去了，那就到敌人那一边了，我们之间那就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了。在原则问题、立场问题上，我们决不会心慈手软。那就不光是开除党籍的问题了。漏网地主、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现行反革命，这几顶帽子，你看要哪一顶？你想不通？想一死了之？那你就更错了，那就是自绝于党和人民。别拿这套来要挟我们，告诉你吧，我们见多了。你死了，你以为就完啦，没事啦？你不想你自己，你就不想想你老婆孩子？你死了以后，你的老婆孩子会比你更惨，你信不？讲了吧，不就是讲几句话么。我就不信，怎么就这么难呢。不要怕脱裤子，不要怕丑。把屁洗干净了，再穿上，不就行了么。群众会谅解的，党和人民会谅解的。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不要再执迷不悟、错失良机了。

这台词写出来了，下面就套到具体的人身上了。

大队部办公室。

夜已经挺深了，北风敲打着后窗，屋里透着阵阵的凉气。幽暗的电灯光下，宗书记一脸杀气瞪着站在角落里的于村长，祖云涛在桌上摊开纸准备着。

“于继承！今天找你来，已经是对你很客气了。别以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掌握了很多材料，完全可以给你定性，你就是西北村资本主义势力的总代表。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给你个梯子，你自己下楼来。不然，过了时候，我们撤了梯子，你就只能摔下来。你自己说吧……”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当干部几十年，跟着党革命几十年，我问心无愧。我从来没有贪过一分钱，没有多拿过集体一根草。当然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出工少了，休息的天数多了些，这是有的。但这不是腐化变质。”于村长脸色苍白，精神疲惫，但头脑还是很清醒，还是倔强地说着。

“我就不信，哪有当干部几十年不贪一分钱的。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说……”宗书记瞪着眼，拍起了桌子，反而把桌子边拿着钢笔等着记录的祖云涛，吓了一跳。

“……”于村长干脆闭起眼不说了。

“好小子，竟敢顽固对抗。你不要以为我们就拿你没有办法了。我宣布，立即对你隔离审查，不交代清楚问题，不许回家。”宗书记又对祖云涛说：“4号，你在这儿看着他。明天通知他家属送饭、拿被子来。”说完，就走了。

祖云涛怎么变成了4号？这次社教运动为了确保对基层干部的高压势头，采取了一些神秘主义的做法，其中之一就是工作队员不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身份和单位。宗书记为了简便起见，就给他们四个人编了号，祖云涛自然是排在4号。宗书记自己，大家都认识，这个1号的称呼一直也没用上。

4号祖云涛看宗书记摔门走了，也叹了口气，合上了记录本，扶了扶眼镜，对于村长说：“老于，你也坐吧。”

西北场院又拉起了电灯，北风更是飕飕地凉，阳历已经十一月了。

今天是批判于村长的大会。

于村长站在前面的电灯下，拿着一张他儿子给他写的纸。从来的大会都是批斗地富反坏分子，还有逮捕董平章，还从来没有批干部的。西北村的乡亲们坐在下面惊讶地看着这一幕，这世道怎么变了？

大会由衣春玲带领呼口号，她本来不想在这种场合干这种事，但看了一下口号的内容，也并不针对哪个人，所以也就站在前面领着呼上了：

“坚决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彻底铲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宗书记手一挥，示意衣春玲停下，对于村长说：“开始吧。”

主持过多少次大会的、在全村大会上讲过不知多少次话的于村长，哆嗦了起来，嗑嗑巴巴地念着：

“我参加革命几十年来，工作是努力的、认真的，但是不免也有很多缺点，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很多工作抓得不紧，关心群众不够，参加劳动也不是很积极，比起焦裕禄同志有很大的差距……”

“不要你讲这些轻描淡写的，要检查四不清的问题。”宗书记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

“我虽然工作做得不够好，但是确实没有四不清的问题。”

“你还不老实，闭上嘴。下面由群众检举揭发批判！”宗书记眼珠骨碌，看着下面。

好一会儿，迟一敬举手开口说了。他是个很少在公共场所说话的人。所以，他一开口，把大家惊了一下。

其实这也不奇怪，困难时期，他爹迟得法死了。他觉得是不应该死的，那是压在他心上的山。

迟一敬悲切地说：“那时，你们大队干部没有尽到责任啊……”

他不会说话，嘟囔了两句就没了。就这，也是宗发奋提前找了他，躲不过去，没办法才说的。

乡亲们听着也都难过得低下了头。

于村长回应着：“是的，这事尽管和大环境有关，但是我们大队，特别是我自己是有责任的，没有照顾好大家，没有照顾好迟老弟。我在这儿郑重地向迟老弟，向你们家属赔罪。”

按说反右倾时于村长已经被免了职，灾荒时没担任什么职务，对这事没有直接责任，但于村长没有辩解，还是认认真真的向迟一敬鞠了个躬。

提起那时的事，大家也都深深叹气，不再多语。

宗书记又拿眼睛四处看着大家。

好一会儿，戴眼镜的齐成才举起了手，喏喏地说：“我给于村长提个意见。今后要多关心青年工作，多参加一些共青团的活动。”

于村长又谦逊地说：“好的，好的，团支部是党支部的助手。过去，确实关心不够。”

于村长还没讲完，秦德才憋不住了，噌地站了起来，大声说着：“我来讲。我们贫下中农讲话没有这么文质彬彬。于继承是个四不清干部，他刚才避而不谈，我来揭发。困难那几年，我们那么困难，国家那么困难，他却私藏粮食好几千斤，这是什么罪行？你要老实交代！”

底下的群众嗡嗡地议论起来。

“噉，对了，我想起来了。”宗书记好像恍然大悟似地拍了一下大腿，“这是个严重的问题，破坏国家政策，损坏国家利益，这是个危害社会主义制度的典型案例！”

“这些粮，于村长分给大家了，救了大家一命啊！”皮安己在下面喊了一声。

“呸！”秦德才瞪着眼说：“分了的，才有多少？他自己吞的要得多得多。”

“你这时候不能血口喷人啊！”于村长激愤地说。

“那天我就是来查你们到底私藏了多少，才爬进去的，结果被你们抓起来游街。是你们要掩盖罪行哪！”

“这是个大问题，一定要一查到底。杜家骏，你讲讲，是怎么回事？”

“我，我事先不知道这事。”杜家骏说。

“噉，噉。”对于杜家骏的推脱，下面又是一片不满意的嘘声。

“不许吵，严肃点！社教运动不是儿戏。我现在宣布，立即停止于继承、杜家骏的职务，由我们工作组实施对西北村的全面领导。于继承，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山上的玉米还没有收完，地里的地瓜还没有刨，搞革命不要忘了生产。不要再出现1958、1959年以后的困难时期。”

“这个，不用你操心了。你还想盼望再有困难时期啊，盼我们再失败啊，痴心妄想！你这是以生产压革命，又是一个反革命阴谋！”宗书记忿忿地说，“于继承，继续隔离审查，直到彻底交代清楚为止！散会！”

第五章 攻坚阶段

1960年1月5日

5.1 好言相劝

运动进入到攻坚阶段。

西北村运动的关键是要拿下于村长这颗钉子。宗书记盘算了很久，这回叫白云出一次马，说不定女同志一说，会奏效呢。

白云领着小祖来到关押于村长的那个曾经为西北村留下救命粮的旧库房。白云对看守了一夜的储小二说：“你先回去吧。”储小二巴不得这句话，一溜烟地走了。

白云看着消瘦了的于村长，叹息着，连说：“瘦了，瘦了。”

于村长还躺在临时搭的床板上，钻在被窝里没动，也没理。

“住这儿多少天啦？”白云问。

于村长还是没理，小祖说：“快二十天了。”

“啊哟，二十天啦！就这个空屋子，这么冷，怎么受得了。”

白云停了一会儿，过来坐在床板上，说：“我们理解你的心情。革命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没有功劳有苦劳。结果还被关在这儿，隔离审查，是会有想法的。碰上我也会有想法的。”

于村长动了动。

“老于啊，但是我们还是要认清形势，顺势而为啊。搞运动嘛，就是这样的，你也看见过。”

于村长睁开了眼，还是没说话。

小祖插话说：“这次运动比以前又不一样。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主持。你看，我是北京的，听了党中央的指挥，也到这儿搞运动来了。不要顶啊。”小祖讲的普通话，也叫人相信他是从北京来的。别人都不知道其实他是西北村祖家的后代，要不，按照回避的原则，他是要换个村搞运动的。

于村长掀开了一个被角，气呼呼地说：“我没有顶。我是多年的共产党员了，搞社会主义教育我赞成，但不能这么搞。”

“这次主要是检查自己的问题，先不要计较别人的态度。”白云说。

老于呼地一下坐了起来，“我有问题，但没有四不清问题，叫我讲什么？捏造罪名，往自己身上扣啊。”

“不是叫你捏造罪名，但你多少得讲一点。眼下先过了这关再说嘛。”白云说。

“你们心眼活，会这一套。我可不行。”

“唉，老于啊。怎么说也劝不动你啊。再这样下去，我们也帮不了你啦！”

“我知道你们俩不错，不是宗发奋那种人。但是，我确实没有错误可交代的。”

“这样下去，你要吃苦头的。上级的决心很大啊，运动再怎么发展下去，我们都吃不透啊，老于！我只能把话讲到这个程度，你要细掂量啊！”

“谢谢你，白同志。我相信党，相信党会讲政策的。”

“你知道我姓白？”

“嘿嘿，都是一个县的，怎么会不知道呢？你还是纪社长俩口的介绍人呢，是吧？”于村长还笑了一下。这是他运动开始以来第一次开口笑了。

白云不由得也笑了。说起来纪社长在这事上也是低不成高不就，是白云在前两年给他介绍了一个北山公社农技站的技术员，中专毕业生，这事龙头镇全公社的人都知道。

“事情，是这么回事。但是老于啊，我不能不再次提醒你，要小心啊。这次运动不比以前啊，说不定比反右派、反右倾还要厉害！”

于村长点点头，又刚毅地闭上了嘴唇，不再说话。

小祖合上了记录本，和白云一起走了。

大队部。

工作组在开会。

“又没有效果？”宗书记满脸气愤。

白云谨慎地点点头。

“又是什么都不肯说？”宗书记有点愤怒了。

白云还是小心地点点头。

宗书记猛地拍着桌子，怒火又一次地爆发了，“你们这些东西真没用！跟你们一个组算是倒霉了，什么也干不成！”

他又从抽屉拿出一个本本，“叭”地往桌上一摔，“社教运动首先就要从我们工作组里搞一遍。上级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运动推进不理想的根子就在工作队里。一定要扫除怕‘左’不怕右的情绪。历来的运动

经验就是运动初期要反右，运动后期要防‘左’。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你们自己不要当了右的典型哦。”

宗书记手指着白云，都忘了叫三号了：“你，白云，就是满脑子的温情主义。不是对革命同志的温情，而是对阶级敌人的温情。要不得啊！”

白云紧张地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时编辑低着头，坐在后面。

只有小祖没觉出压力，抬起头，眼看着宗书记说话。

宗书记指着那个小本本说：“这是中央刚发下来的‘桃园经验’。上级再三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你们懂吗？”

宗书记拍着桌子，气呼呼地都说不上话了。他喘了几口气，才说：“这两天，我们工作组集中学习上级文件，想通了再开展工作。”

5.2赤膊上阵

北门外，望海山的半坡。树叶凋零，枯草在风中摇曳。

宗书记在对秦德才说：“明白啦？下手要狠一点，只要不死人，就没事。啊？”

秦德才满脸兴奋，连连点头，“是，是。多少年了，我就等这一天，又有我秦某人的用武之处了。宗书记，您放心，我一定会马到成功，不说手起刀落，也是我的手起他的嘴巴就会张。哈哈。”

“一定不要把我露出去。”宗书记再三叮咛。

“是，是。”秦德才转身就下山了。

关押于村长的旧库房。

“于继承！你睁开眼看看我是谁！”秦德才用手托起了坐在床边的于村长的下巴。

“呸！”于村长厌恶地转过脸去。

“装什么正经！”秦德才一拳就朝于村长的胸脯打去。

于村长“唉呦”一声就倒在床上。

秦德才又一把抓起来，又是一拳，“说不说！你私藏了多少粮？自己贪了多少？”

“我没有贪污！”于村长倔强地说。

又是一拳。

于村长瞪眼看着秦德才。

秦德才把于村长拖到了地下，使劲用脚踹，嘴里还不停地叫着：“踢你这个村长，踢的就是你这个村长！哈哈！村长也能被我踢，痛快！痛快！哈哈！革命啊，就是痛快！”秦德才又连连踢了好几脚，心里有点舒服了，却还是一无所获。

大队部的门口。

“还不说？”宗书记问。

“还是不说。”秦德才答。

“抄！”

“抄？抄什么？”秦德才不解地问。

“抄他的家，抄出来的粮，就是他贪污的。”

“好，好。这更痛快。”

“多叫上几个人。”

“好，好。”

秦德才带着储小二，还有一、两个小青年，比如像刚从小学毕业、不想再上的周新春，直奔于村长家而来。离开1947年土改抄地主的家有28年了，离1949年国民党反攻、地主还乡团抄贫农的家有26年了，离1959年进户搜粮食也已经有5年了，西北村又一次出现了抄家。

于村长家的门前已经有了一群人，那是学校的老师平近芳领着一帮学生在唱“社教歌”。龙头中学已经有了高中部，平近芳在教初中。但运动期间的活动，按各个村组合。这是平近芳领着民主村的中小学生在本村干部门前唱歌。

这时的小学生又换了一茬，有1959年因公死亡的连二娃的儿子小连子，伤残军人靳喜悦的儿子靳宝康，他们这一批了。

中学生们站在后面，没多言语，倒是王溪在大着嗓门唱着。小学生们张着大嘴，跟着王溪也在认真地唱：

“社教运动是这样的好，

贫下（那个）中农站起了腰。

坚持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

四不清干部没处跑，没处跑！”

小朋友们的天真，并没有改变冷酷的另外一幕。

秦德才他们几个凶神恶煞般地闯了过来，到了于村长家院门外，连门也没敲，直接就用脚踹。储小二干脆翻墙而入，把门栓拉开。于大妈这几天气得，在炕上起不来。这几个人就如狼似虎地进去了。

秦德才对于大妈大喝一声，“我们奉工作组之命，前来抄家！”也学着宗书记的样子朝后面一挥手，这几个人便翻箱倒柜起来。

于大妈从炕上挣扎着起来，说着：“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

“去你的！”秦德才一巴掌就把她推倒。

“这里有粮，这里有粮！”储小二在里间的炕上翻到了小麦、玉米粒、地瓜干、地瓜面，一共也就一、两百斤。

“拿走！还有桌子上的座钟、竹壳暖壶（说明：就是热水瓶，在当时的农村里还是个稀罕物，少数富裕人家才有。），都拿走，我们贫下中农家里哪有这些。”秦德才叫着。

“干脆把三抽桌也抬走！”储小二说。

“对！这张桌子我知道，当初是陶富贵家的，是土改时分过来的。现在于继承成了新地主了，我们就分他的。”秦德才说。

这几个人嗷嗷地，把东西往大队部搬。秦德才还趁机把抽屉里的几个零钱装进了自己衣兜里。

村里人，都阴沉着脸在远处看着，既没有过来阻拦的，也没有过来插一手的。

平近芳和学生们还愣愣地站在门口。

杜长贵走过来，从背后把平近芳拉走了。

“你怎么这么死心眼，这种事你也出头露面啊？”杜长贵在屋子的拐角后小声地埋怨着。

“这是宗书记到学校来亲自对我布置的任务，说是为了扩大社教运动的声势和效果，叫我领着学生到四不清干部的门前来唱的。”平近芳还是认真地说着。

“别二百五啦，那是拿你当枪使呢。”（说明：二百五，海源话里是缺心眼、傻瓜的意思。）

“我这是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啊，别人还会有意见吗？”

“你真是一根筋到底了。1957年你揭发批判李老师，有多少人在你背后戳脊梁杆骂你呢。”

“骂什么？”

“骂你缺心眼，害人，跟秦德才差不多。”

“那你还找我啊？”平近芳听别人骂她跟秦德才差不多，倒是生气了。

“别说那么多废话了，快走吧。你没看见，有多少人正在看着呢。”杜长贵又伸出手拖了平近芳一把。

平近芳气得抛开了杜长贵的手，对着学生们喊了声：“走吧，都回家吧。”

夜里，西北场院又拉起了电灯。风更冷了，还卷着干雪在洒落。

今晚是召开“社教运动胜利果实分配大会”。从于村长家里搬出来的桌子、几张凳子、几袋粮放在了前面，桌子上还摆着闹钟、暖壶等几样东西，一条长绳上还挂着于村长的几件半新不旧、专门出去开会时穿的衣服。

来的人不多，宗书记为了增加气氛，对衣春玲说：“你领头，叫大家唱个歌吧。”

“我不会唱社教的歌。”衣春玲说。

“我来，我来，我会。”秦德才插上嘴。

“好，那你来领。”宗书记说。

“咳，咳！”秦德才清了清嗓子，居然他也会唱歌了。

秦德才拉开嗓门，真唱上了：

“社教运动是这样的好，

贫下（那个）中农站起了腰……”

两句还没唱完，就变了调了，下面也没有一个人跟着唱，宗书记摆摆手，这个内容就算了。

不过，宗书记还是很得意，很有点成就感，在说着：“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我们贫下中农都在艰苦奋斗，可于继承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生活多么腐化。你看看还用上了闹钟，看看太阳不就知道几点啦？要这玩意干啥。你看看这衣服，还是呢子的呢，解放前，只有国民党大官才有呢，连陶富贵还都没有呢。这一件得多少钱啊？谁知道啊？”宗书记故意问下面。

“得四十多元吧？”别人没有回答的，就秦德才在说。

“乖乖，四十多元。得多少斤麦子啊，四百多斤吧？（说明：那时国家从农民手里收购小麦一角一分钱一斤。）一件衣服四百多斤麦子啊，同志们！我们一年才能分多少斤麦子？也就十几斤吧。你们算算，三口家要十来年分的麦子才够这一件衣服啊！这些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是在喝我们的血啊，在喝我们贫下中农的血啊！”

衣春玲不再愿意呼口号了，秦德才领着喊了起来：“打倒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可没人应。

“这些是社教运动第一批的胜利成果，数量还不多，先分给积极分子。等以后运动再深入发展，有了更多的胜利成果，我们所有的贫下中农都来分。我们工作团有个要求，让每个贫下中农都要能分到十斤粮、十元钱。”

秦德才几个高兴得嗷嗷叫。

宗书记接着说：“我再宣布一件事，西北村贫下中农协会正式成立，简称贫协。贫协是农村的最高权力机构，贫协主席由秦德才同志担任。这些胜利果实由秦德才同志负责分配，现在你们分吧。”

“噉！”那几个积极分子一踊而上。“哗啦”一声，热水瓶被挤得掉在地上打碎了。“别着急，别着急。”秦德才捂着那个座钟说。

“秦主席先拿，秦主席先拿。秦主席你把这三抽桌扛回去吧。这桌子在这里面最值钱，红木的。”储小二还会拍马屁呢。

“这次你辛苦，桌子你扛走吧。”秦德才捂着座钟不动，其实是他喜欢这玩意，他知道这还是大名牌“北极星”的呢。

储小二也不客气，抱住那红木桌子，又顺手抓住那件呢制服。红木桌子太重，储小二搬不动，秦德才把座钟放在上面，储小二也把制服放在上面，两人抬走了。另外两个人也把几袋粮扛走了。

群众不愿意看这一幕，都走了。

会场上只剩下那只热水瓶的竹壳倒在地上，大大小小的碎玻璃散了一地，在摇晃着的电灯下，闪着白森森的光。

晚上回家，周新春的爹周伯生知道他儿子也去于村长那儿抄家了，进门就给了他儿子一巴掌，骂还不敢大声骂，压低了嗓子吼着：“你这个兔崽子，不知好歹啊，去做这种缺德的事。这是咱们家能做的事么？”周伯生是个不露山不露水的人，按城里人说法，就是很低调了。其实，他真是没有什么山水可露，什么多余的能耐都没有，只有悄悄地做人做事。以至于本书，前面一直都没有提到他，尽管他比鲁队长岁数还要大。当他得知他儿子居然会参与抄村长的家，真的是愤怒了。因为他知道这样的事，决不是他们这种人家所能应付得了的。所以他狠狠地揍了他儿子一下，以表示他对儿子的教育。

周新春从小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一直也显得很懦弱，很少有男孩子的阳刚气，但又没有女孩子的那种细腻，似乎渐渐掉在了村里同龄人的后面。念书也不大行，上完小学就不想再上了。连初中也没上，这在西北村是不多见的。干农活呢，也不在行，刚下学体力也不怎么强壮，也很少和别人多说话。说他傻吧，也谈不上。看上去也并不比别人笨，说不定内心世界还要比别人丰富呢。关于他，就先说这些吧。至于村里的事，他爹这么一打，他也就不去掺和了。本来那次抄家的事，也是储小二一鼓动，他也不清楚到底是咋回事，就跟着去了，自己也没当真。

但工作组里也不平静啊。白云就觉得不对劲，觉得运动不能这么搞，应该向上级领导部门反映，可找谁呢？在龙头镇，她觉得只能找纪社长了。她跟纪社长能讲得上话，就算讲得不对，恐怕也不要紧。

她找了个上午在北门外干活的时间先回来了，工作队员进出公社大院也并不显眼。走进纪社长办公室的时候，也巧就他一个人在，这时候也没有什么人来找他请示汇报了。

纪社长当然是很客气地请进白云，关心地问：“这些天，这个也不准吃，那个也不准吃，能行吗？我记得你好像还有点十二指肠溃疡，是吧？”

“唉，这时候哪顾得上这个呢？硬撑着吧，反正也死不了。”

“嗨，别这么说，还得好几个月呢。要不我给你准备点饼干什么的，下次你过来拿。你自己也不能上街去买。”

白云望望窗外，轻声地说：“社长啊，我也不说别的客套话了。你说这运动这么搞能行吗？用这些二流子动手打人，逼着老干部承认贪污，这对吗？这秦德才是什么东西，连我都听说过。”

“唉，不用说你，连我也不理解啊。有什么法呢？”纪社长也低着头，“但处长他也知道这些。不狠着点，搞不出成果；狠一点，就过了头。他也是走一步看一步，上面逼紧了，就往前动一动。下面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那这种打人骂人，是我们党的做法吗？”

纪社长苦笑了一下，没回答，停了一下又说：“你还要做好运动会进一步发展的准备。”

“还要怎么发展？还‘左’得不够啊？那最后怎么收摊啊？”

“收摊？有收摊的办法，又不是没搞过运动。最多大不了，像1959年反右倾那样，到1961年再平反就是喽。”

“那还要再折腾一遍？打在于村长的身上，可伤了多少人的心啊。革命几十年，就这样对人家？”

“谁愿意这样呢，没有办法啊，我也说不清了。你这些话也就到此为止，不要再跟别人讲。老于那儿，你就不要管了。以后要遭罪的，远不止于村长一个人啦。最多有机会的话，你悄悄劝他想开点。北山别的公社已经有打死人的，也有自杀的啦。我想老于还不至于走这条路。你自己也要当心，工作队里也要反右啊。”白云也只有默默地点点头。

是啊，连纪社长也看不清了。1959年的反右倾，于村长在两年后平反。可1965年的社教，一年后却谁也没有幸免，不管是挨整的，还是整人的。

5.3搬石头

社教运动中有很多形象的说法。“搬石头”，就是指对那些问题严重又拒不交代的四不清干部采取坚决的严厉的措施，作为重点攻下来，为整个运动的开展打开局面。

宗书记正踌躇满志，运动按着他的想法在进行。他认为西北村的重点是于继承，可一下子又敲不开，那就从外围着手，先打开薄弱环节。哪个是薄弱环节呢？女的，对，女的性格软弱，好对付。宗书记竟一时后悔，为什么没早想到呢？对，先拿车素花开刀。车素花对西北村什么事都知道，一旦打开这个缺口，下面就势如破竹了。

宗书记找来了秦德才，如此这般地交代了一番。秦德才又是手舞足蹈起来，连说：“好，好！”

宗书记又找来了衣春玲，也如此这般地交代了一番，末了又说：“春玲啊，要好好表现，这次运动是党对你的考验。以你的条件，前途大得很，这次很快就可以火线入党。等扳倒了车素花，村里要提拔个女干部，那肯定就是你了。”

衣春玲没有多吭声，这个曾经充满革命激情的小姑娘，别看年轻，还是挺有头脑。她也看到了里面的蹊跷，只是不说而已。对宗书记的一番话，她没有表现出激动，只是点点头，走了。

晚上，大队部。

车素花被喊来，站在中间。

宗书记、秦德才、储小二，还有衣春玲、齐成才几个青年团员，这次宗书记是扩大了革命队伍的力量。

“车素花，你看仔细了。你是要站在革命力量的一边，还是站在四不清的一边？”宗书记首先发问。

“我当然站在革命的一边。”

宗书记没想到车素花这么痛快，嘴里一乐：“那好，那你就把于继承四不清的罪行，检举揭发一下，你就是个好同志。”

“于村长有没有四不清，我没看到。别人看到过没有，我不知道。”

“嗨，你这死老婆子，还不老实。赶快交代你和于继承怎么串通起来私藏粮的？”秦德才狗仗人势地拍着桌子。

“你嘴干净点，我没有四不清。”车素花对秦德才吼了起来。

秦德才一愣，从运动以来还没有谁敢这么对他的。他举起了手，刚要打过去，宗书记咳嗽了一声。宗书记的意思，对女同志动手还是由衣春玲她们出面的好。

秦德才缩回了手，心里可不乐意：“死老婆子，你别以为经大臣这回回来能护着你。人家可是想着上海的大姐，没你的事，别指望他了。”

车素花一听，勃然大怒：“呸！”一口痰差点吐到了秦德才的脸上，“你这是搞社会主义教育，还是要流氓啊！”说着一甩头，也没看谁一眼，便往门外大步走去。

宗书记嘴里“哎哎”喊着，眼睛朝衣春玲眨眼。衣春玲的嘴角浅浅的一丝冷笑，一动也没动。

等车素花门外的脚步走远了，屋里宗书记和秦德才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话了。衣春玲站了起来，说：“宗书记，今晚没事了吧，我也走了。”没等宗书记吭声，也没招呼齐成才他们，径直也走了。

宗书记看这一手不行，知道关键就在彭会计了。彭乐宾是私藏粮食的当事人，撬开他的嘴，不就全都解决了吗，还去费别的事干嘛呢？

他又找来了秦德才，“这一次是关键一仗，也就是我们讲的搬石头。那个姓彭的，就是阻挡西北村运动向前发展的石头，坚决要搬掉。社教运动能不能在西北村取得胜利，就看这一仗。四不清干部能不能拉下台，你能不能上得去，我能不能在龙头站住脚，也都指望这一仗了。不要怕左，不要怕狠，只要不打死人，怎么都行。知道啦？”

“是，是。这种事你就尽管交给我。上次，对车老婆子，要不是你对我眨眼，早就拿下来了。”

关押彭会计的屋子，就在关于村长的隔壁。彭会计在这儿也已经关了十几天了。

秦德才领着储小二进来了。

彭会计正在低头吃家里送来的饭，没理他俩。

秦德才过来一脚就踢翻了彭会计手里的饭盒，二话不说堵上嘴，捆起来，一根粗绳甩上大梁，绕过来缠上老彭的胳膊。储小二拉着绳的那头，一使劲，就把老彭吊了起来。

秦德才拿起板子就打。“叭，叭，叭，叭。”

打了四五下，秦德才对储小二说：“放下来！”

彭会计摔倒在地上。秦德才拿掉堵在老彭嘴里的布，问：“知道为什么打你吗？”

老彭喘着气，说：“不知道！”

“不知道？叫你不知道，那是打得轻了。”秦德才扒下了老彭的棉裤，又堵上嘴，一声吆喝：“拉上去！”

储小二又把老彭拉了上去。

“叭，叭，叭，叭。”又是六七下，“放下！”

老彭又摔倒在地上，浑身发抖。秦德才拿开老彭嘴里的布，“说，你们到底私藏了多少粮？”

老彭嘴里一个劲地“哎呦”，别的什么也不说。

秦德才红了眼，拉掉了老彭的夹裤，下身只剩了裤衩，再堵上嘴。“再拉上去！”秦德才一声吼，又去把后窗推开，北风呼啸着灌进来。老彭颤抖着，脸色刷白。

秦德才飞舞起木板，“叭，叭，叭，叭。”直往下打。他热血沸腾，浑身是劲，像吃了鸦片一样亢奋。这就是秦德才的“革命”。有多少年没用上啦？十六年，十六年啦，秦德才盼了十六年啦。十六年才来这么一次“革命”啊。

“叭，叭，叭，叭。”

“你们不能这么打啊，你们不能这么打啊！”隔壁传来了于村长撞门撞墙的声音，这才惊醒了秦德才。他已经忘了打了多少了。一看彭会计已经垂下了脑袋，脸涨得通红，却没有声息了。

“放下来。你先到隔壁教训一下老于头，不许他嚷。”

储小二拿着板子过去了，一会儿听见了开门声，接着是储小二的嚷嚷声，“叭，叭，叭”的板子声，后来也安静了。到底还是板子管用。

秦德才拿开堵在彭会计嘴里的布，躺在地上的彭会计已经没气了。

又听见储小二关隔壁门的声音，一会儿就进来了。“死啦？”储小二一见地上的彭会计没有任何反应，有点慌张。

“去！别叫隔壁听见。”秦德才搥了彭会计两个耳光，没有反应；又在地上把他翻了个个，还是完全没有反应。彭会计的脸色已经发灰了。

“这么不经打啊？不会吧？”秦德才也在纳闷。

“你堵得太紧了，憋死的。”

“去，别瞎说。”

“这怎么办？”储小二紧张地悄声地问。

“怎么办？好办。这种事，我见得多了。”秦德才眼珠子一转，把彭会计松开绳，提上裤子，把那条绑人的粗绳在梁上栓了个套，把彭会计的脑袋摁了进去。

其实，这个时候窒息的彭会计是完全能够抢救过来的，却被秦德才伪造成了自杀现场。

“彭乐宾自己承认私藏贪污公粮五千斤，揭发于继承私藏贪污一万斤！”

“彭乐宾为逃避惩罚，畏罪悬梁自杀！”

一条条传言在西北村飞快地流传。

西北村的乡亲们惊恐不已，这是怎么啦。

5.4弹冠相庆

中午，秦德才家。

炕上摆满了丰盛的酒菜。

宗书记和秦德才、储小二三人觥筹交错，满脸酒气。

宗发奋先开了腔：“今天我们这么喝，也不用怕人。我们这是庆祝胜利啊。还是秦主席行，打了个漂亮仗。西北村的阶级斗争盖子终于揭开了，西北村的社教运动即将取得全面胜利。”

“我是老运动员了，一来运动就精神，这点活算不了什么。”秦德才自己觉得还是谦虚一点。

“我看你不但是运动员，而且够得上运动健将。有你这样的一批人，就不怕搞不起运动来。”宗书记放下了筷子，翘起了大拇指。

“全是托您宗书记的福，还是靠您的领导好。”秦德才嘴里塞满了东西，嘟囔着说。

“全亏了您宗书记，我们西北村的贫下中农才翻了身。”储小二也帮着腔。

“哈，哈，哈。不是吹，你们还真得谢谢我。你们以后过上好日子，可别忘了我啊。”

“那是，那是。”两人忙不迭地点头。

“不过，弟兄们，你们也不要松懈麻痹，这才是刚开始，好日子还在后面呢。”宗发奋在吊他们的胃口。

“是吗，是吗？还有什么好日子啊？”两人急着问。

“先不说什么好日子，但你们还得好好出力，这才是第一仗，刚打开一个缺口，咱们还得再接再厉、乘胜追击。”

“对，对，对，乘胜追击。”储小二连连眨巴眼，点着头。

秦德才更是凑了上来，一脸急切：“再去追击谁呀？”

“追击谁？这些村干部，从大队干部到生产队干部，一个也不能少，都得攻下来。我们这就要全面出击。”

“是，是，是。全面出击。”秦储二人自是鸡啄米似地点头。

“我都已经想好了，咱们分成几个组，工作队员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合起来，分成几个战斗组。一个组搞一个干部，我就不信攻不下来。”

“好，好，好。”

“秦德才，我跟你一个组，去攻杜家骏。你储小二跟老时一个组，去攻鲁来福。”

“老时？是哪个？”秦德才一头雾水地问着。

“喔，我忘了，老时就是2号。以后就叫名字吧，叫几号太别扭。”宗发奋一时兴起，忘了说编号了。其实这种隐瞒工作队员真实姓名、身份而改称编号的做法，一、二个月就不好使了（少数高层干部除外）。

“行，行，行。”秦储二人说着。

宗发奋又接着说：“白云，那个女同志叫白云，跟衣春玲一起，攻车素花。那个讲北京话的小年青，叫小祖，跟那个迟一敬，是叫迟一敬吧？去攻平金刚。我看平金刚有希望能最早攻下来。虽然是个生产队长，也值得第一批去攻。”

“那个迟一敬是中农哎。”秦德才在提醒宗发奋。

“中农？但是这个人他爹死了，对干部肯定是有意见的，咱们还要利用他。不然哪来这么多的积极分子。就作为我们团结中农的典型吗。”宗发奋为自己斗争的策略之高而笑了起来。

“高，高，实在是高。”秦储二人也忙竖起大拇指奉承起来。

“等这些干部全部拿下，西北村实行全面夺权。西北村就是你们的天下了。那时，你们的好日子，就来啦。”宗发奋笑得眯起了眼。

秦储二人的脸，都凑到了宗发奋的鼻子前，“那会是什么好日子啊？”

宗书记已经是酒足饭饱，用手指剔着牙，忽然想起了个事，“你们俩小子还都是光棍吧？”

“嗯，嗯。”两个不好意思地说。

“嗨，这是过的什么日子？这回运动胜利了，你们也二次翻身了，干部也当上了……”

“储小二还不是干部吧？”秦德才试探着问。

“可以当贫协的副主席。”

储小二高兴得在炕上直点头，差点就成了磕头。

宗书记又接着说：“等再分上胜利果实，钱也有了。再赶紧娶个好媳妇，谁也比不上你们啦。你们对革命有功嘛，应该的，应该的。”

“是，是。应该的，应该的。”听得两人直盯着宗书记看，都入了迷。

“当然也不用着急。你看我，革命胜利多少年，在县城找了个纺织女工，是个工人阶级嘛，领导阶级嘛。不像纪海洋，还去找了个中专生、小知识分子，不利于革命啊，不利于自己进步啊。”

“……”两人听得都没有话了。

“你们没有媳妇没有感受啊。我那个媳妇可好了，小巧玲珑，又会伺候人，皮又细……”这宗书记也真是喝多了，嘴也把握不住分寸了。

那两人也听得神魂颠倒，宗书记说他的媳妇好像也成了自己的媳妇，在那儿美得不行。

第六章 脱裤子

1960年1月6日

这一章的题目，怎么这么写呢？多难听啊，有点庸俗了吧？

这大概是为了通俗易懂，让农村基层干部易于接受，有关领导把自认为的这些“群众语言”融进了各种讲话，用来形象地说明农村干部要尽快认识错误、主动交代问题、积极退赔。类似的说法还有：下楼、洗温水澡，甚至还有擦屎、洗旋沟眼这些更难听的。

我们也只好硬着头皮往下看吧。

6.1 不肯脱

按照宗发奋的布置，工作组和积极分子又开过了联席会，分了几个组，对又一批隔离的队干部，进行“重点工作”。

宗发奋和秦德才跟杜家骏在一个屋。

“我跟你都说了那么多了，两条道路随你走，还没想明白？”

看来宗发奋已经说了不少话了，这么能说的人嗓子都有点哑了，连连喝着杯里的水，又“吓”地往外吐了一口。他为了装样子，在村里就不泡茶叶了，可这水又那么的“涝”，实在喝不惯（水中的盐碱含量较高，味发涩，当地称这种水叫“涝水”）。

秦德才一看，觉得是该他出马的时候了，猛地一拍桌，大吼一声：“小子，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还用我动手吗？”

这一下杜家骏没什么，宗发奋反倒吓了一跳，又不好发火，只得使了个白眼，还是自己接着说吧：“家骏啊，我还是很看重你的啊。1958年炼钢铁那阵，你表现很好嘛，出了不少好主意嘛。我在公社党委会上几次提出来，要表扬你。你在西北村前途最大啊。嗨，嗨。我这是说真的，嗨，嗨。”宗发奋在勉强地装着笑。

秦德才在一边，脸上不乐意了。

“什么前途不前途，我都要半辈子过去了，还盼什么前途噢，”杜家骏有时也回答两句。省得一言不发惹毛了宗干部，也没什么好处。

一听杜家骏有了回话，宗发奋来了点精神：“你才多大呀，怎么叫半辈子了呢？再说，这不光是关系到你的前途，还有你的孩子呢”

杜家骏眉头一皱：“我的事，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你别糊涂啦。咱们的政策，几十年不都是这样子的吗？你看地富反坏右的孩子，哪个有出息了啊？连小学也不让他们上完。你要不检查交待，那就成了西北村的走资本主义典型。你的儿子、孙子也都完啦。”

“我的儿子，也就是个庄户孩子，也不指望有什么别的出息。”

“哎，哎，不对啊。”宗发奋对这些还是很能抓住机会的，“你儿子，不指望他，还有你儿媳呢。你儿媳在学校还有一定职务呢。她可是吃公家的饭。只要公家一句话，就全都抹掉啦。”

“你们有事就对我来，别去牵扯她！”杜家骏来火了，抬起了头，声音也大了。

这倒使宗发奋看到了可趁之机，心里想“有戏”，嘴上却说：“你还是好好想想吧。”

6.2儿媳的无奈

宗发奋当天就把平近芳喊到了公社大院里的办公室。

这时的平近芳已经是龙头中学的教务处副主任。一听是宗发奋有事喊她，便急急地过来了。

“平近芳啊，当前开展的社教运动，这声势、这意义，我想你也是知道的。虽然你们学校里暂时还没搞，但这样大的运动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你作为一个党员干部，要更加积极地投入这场革命运动。”宗发奋讲这一套，是不需要任何准备的。

“是哎，宗书记。你看你上次叫我带学生进村里做宣传，我不是上都带了他们去了吗？”

“这还不够，还远远不够。革命有时还要革到自己家里，革到自己头上。”宗发奋不急不慢、抑扬顿挫地说着。

“革到自己家里？你说是我公公啊？”

“你很聪明嘛，一提醒就知道。到底是国家干部啊，水平比村里的人高多了。”

“他有什么问题吗？我公公是个很好的人，没看见他有什么贪污腐化的事啊。”

“现在是查四不清，四不清的范围就广啦。他也是干了十几年的干部，不可能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我们工作队、公社党委要求你配合我们的工作，去做杜家骏的思想工作。他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讲出来，认识到了，就行了，还是好同志，还可以继续担任大队领导职务。能不能做通他的思想工作。不光是涉及到他一个人的问题，也关系到你的问题，这是我们党组织对你的重大考验。”

“跟我还有什么关系吗？”

“你怎么一下又糊涂啦？你们是一家人，能不关系到你吗？你们看林海秀本来不是很有前途吗，李辰成了右派，她这辈子不也就完了吗？你公公要是过不了关，成了西北村走资本主义的典型户，甚至是堡垒户，你这个教务主任还能干得成吗？是不是能继续待在中学里还是个问题嘛。”

这一下，平近芳有点急了，忙问：“那根据你们掌握的情况，他会有多大问题呢？”

“不多，不多，也就是几千块钱、几千斤粮的问题。”

“啊？这么多啊，不会吧，我公公他家抽屉里能有十几块钱就不错了。家里也从来没有添置过新东西，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

“嗨，扛不了天长日久，积少成多嘛。你想啊，当大队干部整天晃悠，懒得下地，一天少干4个小时，还按一天十个工分记，就相当于多记了五个工分，一年下来就相当于多记了180多个工日。就算五角钱一个工日，那就是一百多元钱。十年下来，不就是一千多啦，还多啊？”

生产队集体劳动，每天要记工分。通常一个男整劳力一天记十分，叫一个工日。半劳力、妇女、老人、儿童等逐次减低。年底决算分配时，生产队总收入，除以全队总工日数，就得出一个工日能分多少钱，叫工日值（但习惯上叫工分值）。那个时候，大多数生产队一个工日，也就是一、二角钱。还有不少队，才几分钱。比如七十年代的山东省泰安地区有2000多个大队工日值在二角钱以下，有200多个大队在一角钱以下。也就是说，在那种情况下，一个棒小伙干一天活，还赶不上老母鸡下个蛋，一个蛋还值好几分钱哩。而且这还不是所能分到的现金。分现金是生产队出售农副产品所得的钱扣除生产队分配的粮食、柴草等实物的价值，和生产队集体性开支之后再分给社员，那就更所剩无几了，有时甚至还会出现工分值不够抵实物款的，这就会出现干了一年的活，农民还反过来要给生产队交钱的怪现象。不交，就不给你口粮，当时中国农民的贫苦状况由此可见一斑。宗发奋所讲的少干半天活，就是多拿了五角钱，纯粹是在瞎说。

“这就算是一千多元钱啊？”平近芳也是很理解。一千元钱对当时的人们是想也不敢想的天文数字。

“具体问题还可以再商量，但是思想上先要认识到。认识到了，觉得疼了，这才会惊醒过来，彻底改正吗。”宗发奋自有他们那一套逻辑。

宗发奋看平近芳低头不语起来，知道她在想什么，便又说：“至于退赔多少，那要看各人的态度。态度好了，能主动配合工作组，可以从宽处理。讲通俗点，就是可以打折扣吗，到时候要赔多少，还不是我宗某人一句话。”

宗发奋又嘻嘻地笑了起来，看着平近芳愣愣地看着他，便也端量了她一会。

平近芳长相一般，但毕竟是年近三十的少妇，成熟丰满，虽然她不爱打扮，是个极朴实的人，无论冬夏始终是一身蓝褂灰裤，却也能撩动起宗发奋的热望。忽然宗发奋心里一热，把脸凑过去靠近她，小声地说：“我跟你说句贴心的话吧。公社和县教育局一直在考虑你们学校的领导班子问题。那个肖福兴的政治素质不行，一直就想换掉他，只是没有合适的人。你啊，你要努力啊，我可以帮你搭个梯子……”

说完就把手搭到了平近芳的肩上。平近芳似乎惊了一下，身子往后缩了回去，语无伦次地说着：“我，我……我回去跟杜长贵，哦，不，跟杜家骏说说。”忙不迭地赶紧转身走了。

宗发奋无奈地落下了手，“真他妈见鬼，这么敏感干什么。”再一想，小不忍则乱大谋，还是从长计议慢慢来吧，又不是什么俊嫚，以后说不定还看不上这样的呢，宗发奋眼看着平近芳走了。

平近芳当晚回家，就跟杜长贵说了这事，当然宗发奋上来搭肩膀的事除外。

杜长贵这些年也没有沾到他那个当大队长的爹多少光，最多也就是干点轻活，少出点力，听他妻子这么一说，还要他们倒过来做他爹的工作就上来气了。他把鞋子往地上一摔（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好摔），“什么四清四不清？庄户人家天天从早到晚在一起，谁家有几条裤衩都看得清清楚楚，有什么四清四不清的。这运动搞得越来越不像话，真操蛋。”

“可不能这么说，这可是党中央发起的运动，叫大家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咱们都要积极参加，至少也要配合吧。你就去跟爹说说吧。”

“我不去。我又不知道咱爹有什么问题，叫他说什么？”

“多少承认点，赚个好态度，争取早点过了关，不是大家都安心了吗。”

“咱有什么不安心。”

“宗书记、咱学校里都要求我积极参加。要是不的话，对以后要有影响。”

“弄了半天，是怕对你有影响。你要去你去，我不去。”杜长贵有时蛮硬的，硬邦邦地讲了这么一句，就不再说话了。

平近芳知道已经劝不动杜长贵，也就不说了。

平近芳躺在炕上，想了一夜，没合眼。她觉得杜长贵的倔也有道理，不能再去勉强他。可是这工作还得去做，那只能她自己出面跟公公讲了。虽然她进杜家十几年了，全家也都一直很和睦，她对公公也很敬重，但是还真的没怎么说过话。再一想，公公被关在大队部隔离几天了，作为媳妇也是应该去看看的。便一早过来找婆婆唐玉贞。

这天早晨，唐玉贞就为杜家骏熬了点粥，把前天用家里所有的白面蒸的饽饽拣了两个热了下（说明：饽饽，是当地的叫法，就是硬面馒头）。自己吃的，一点也没有准备。

她正被这社教弄得心烦意乱，怎么这革命运动搞到自己家来了。想当年自己男人南下支前，吃尽了千辛万苦，自己在后方虽然是个女人家，又要带个孩子，却是家里家外样样事情不落后，硬是撑起了这个家。怎么好不容易革命胜利了，前两年还弄得饭都吃不上。这两年才端起了饭碗，气还没喘上，又来运动，把自己男人都关了起来，就是因为当了个大队长？只要是在队里当了干部的，不管是大队的还是小队的都成了有问题的，这对吗？尤其是前两天，彭会计死了，死得不明不白。这一批又把更多的干部关了起来，叫她怎么能不担心呢。

见媳妇平近芳过来，说她想去给公公送早饭，觉得媳妇有这份孝心挺好，便盛上稀粥，包上饽饽，递给了平近芳。

平近芳见婆婆把锅底都刮干了，便问：“妈，那你吃什么？”

“我还吃什么呀？能有他的就行啦。”

“妈，你等会儿，我从爹那儿回来再来看你。”

“不用啦，你有时间还是早点去学校吧。”

平近芳到大队部，找到关杜家骏的屋子时，秦德才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因为是叫隔离，不是关押，看的人也就不那么认真，不像前一阵对于村长和彭会计那样。

杜家骏正懒洋洋地躺在草席上，见是儿媳妇来了，忙坐起：“近芳啊，你来啦。”

杜家骏对这个有点文化的儿媳始终是敬重三分，以名字相称。

“爹，这几天怎么样？身上没事吧？”

“我这身体枪林弹雨、跋山涉水都去过，这点事不打紧的，就是心里窝得慌。革命胜利十几年了，反过来要对我们下手，这是要干什么呢？1958年大跃进，疯成那个样，造成那么大危害，饿死那么多人，不去认真检查检查，反过来对少出工多记分这些事，倒当成大事，要这么下狠心整，这是在干什么呢？”

面对公公的这一阵牢骚，平近芳也解释不了。

“很多的事，我也不理解。但这是党中央发动的运动，当然会有它的道理，我们只有认真学习、认真思考，努力跟上去，早早过了这一关，就没有心事了。”

“咳，我也是想要过关。可硬是要我交待问题，交待什么呢？你说，我有什么可交待呢？”

“是啊，我知道你是勤勤恳恳十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是，运动当头，总得弯下腰啊。这个关不过，你的日子不好过，全家人也都不能安心啊。”

“我倒没什么，就是连累你们一起替我操心。”

“不光是操心啊，牵扯的事还多着呢。”

“还牵扯什么？”杜家骏警觉地看着平近芳。

平近芳一时语塞，她不好意思把和她的前程也有关系的事就这样说出来。

“还会有什么别的事？”杜家骏追着问。

平近芳不知道怎么绕过去，就把宗发奋讲话的意思说了下。

“可恶！”杜家骏气得拍着大腿，“我认！我认！我什么都认！”

“爹，你也别上这么大的火。宗书记说了，只要态度好，退赔时可以从轻处理。要退钱的话，我把这几年攒的钱，也都给你。我想，差不多能过去。”

“近芳啊，爹不要你的钱，爹不会让你为难。爹想得开，爹能过得去。”

门外响起了秦德才的脚步声，“跟谁说话呀？哪个龟孙子钻进来啦？”现在秦德才才是张嘴必骂、逢人必骂，痛快得不得了。

杜家骏和平近芳都懒得吭声。

秦德才跨步进来，一见是平近芳，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毕竟平近芳是公家人，还是个什么主任。尽管秦德才并不明白这教务主任是多大的官。

“嘻嘻，嘻嘻，平主任啊，你们谈，你们谈。”

杜家骏和平近芳依旧懒得吭声。

“近芳啊，你先回去，爹这儿没有事，你放心吧。”杜家骏朝平近芳摆摆手。

“好，那爹你好生吃饭吧，身体保重要紧。”平近芳把婆婆捎来的稀粥罐和饽饽推到杜家骏跟前，又从口袋里拿出两个自己带来的鸡蛋放在桌上。

“嗨，还是平主任想得周到，带了两个来，正好一人一个，不然还不好分。”秦德才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等别人吭声，拿起一个就扒皮吃上了。

平近芳起身跟杜家骏点了个头，就走了。

6.3脱了算了

杜家骏都认了。

西北村的社教运动终于打开了缺口。

“趁热打铁，继续追击！下一个目标，就是鲁来福。”宗发奋高兴得不得了。

鲁来福这一头，不用攻也就克。并不因为他是个软骨头，而是他想得更开。频繁的运动使越来越多的人，“想开”了。顶它干什么？干脆顺着走。就象河水里的小船，下面是激流，上面是劲风。你要顶着走，不用几下就翻了。顺着流吧，流到哪儿？管它哩。连这河水自己也不知道会流哪儿去，这风自己也不知道能吹个几天，管它哩。这与其说是“想得开”，还不如说是消极与无奈。

因此当老时问他：“老鲁啊，这些年你多吃多占，能有个什么数？”

回答是：“我想不起来了，你帮我算个数吧。”

“喔，这样吧，一天就算二角钱，不多吧？”

鲁来福没吭声。

“一年就是七十元，十年就是七百元。建国十五年了，算下来是一千零五十，去掉个零头，就算是一千吧？”

“时干部，你算个多少就是个多少吧。”鲁来福倒是爽快。

“那多占的粮呢？”

“多占的粮？那就不用这么算了，多费事啊？时干部，你就说个数吧。”

老时没想到鲁来福会这么痛快，简直有点喜出望外了，连说：“两千？三千？”

鲁来福听到这儿，脑子里忽然转了个念头，便说：“好像不止吧？”

老时听了，心里都激动了，眼睛都睁大了，伸着五个手指，说：“五千？五千！”

鲁来福都没回话，好象从鼻子里哼了声。

老时连忙在本子里记上：五千。

这位城里的老编辑，居然也上了农村汉子的当。

当然，鲁来福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爽快，谁愿意这样丧失尊严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呢。在扭曲了的社会环境里，只能扭曲自己，才能有一条扭曲了的生存之路。

由各人对政治斗争的不同理解，作出了各种无奈的不同选择。

而且，鲁来福的心里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讨厌看到和老时一起来的储小二。那算是什么狗东西，也配跟着来找他谈话？鲁来福也是想就此结束和他们的往来，随便他们去讲什么，懒得答理了。

当老时，时编辑，兴高采烈地告诉宗发奋：那个老鲁被攻下来啦。宗发奋对他却并没有什么夸奖的话，因为平金刚，作为一个生产队长的代表被更轻而易举地攻下了。而且可以说平金刚不是被攻下来，而是自己投诚的，甚至可以说是自己起义的。

平金刚对这场政治运动作了自己另一番理解和选择。

他在想，我为什么要这么被动呢？这场运动主要是针对大队干部的，我又没有多少问题，陪着他们挨斗干什么？不如我自己先出来。真要是他们大队干部都不行了，这西北村说不定还有我的一份。与其让秦德才那种狗东西跳，不如让我跑出来叫。

他把事情前前后后想了好几天。在这些方面，他毕竟还脑筋不够使。好不容易想通了这些以后，就直截了当跟小祖说了，因为祖云涛是与他结对的联系人。

“我，我作为一个贫下中农，当初打国民党那么积极勇敢，受了那么多表扬，但是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确实思想上后退了，长毛了，发霉了，长出了修正主义的苗子。多亏这次社教运动啊，及时挽救了我，使我惊醒了，觉悟了。我要下楼，脱裤子，洗澡，洗腋沟眼……”

后面这些话都是当时用来教育干部解放自己，主动交待问题的形象说法。现在看来确实不够文明，那时可都是最流行的话呀。

祖云涛听了也十分惊讶，这一套话，眼前这位庄户打扮的汉子怎么说得比天天学文件的他还要讲得顺溜。

“好，好，我们欢迎你觉悟过来。看看你有什么包袱要放下，有什么问题要交待？”

“我，我贪了不少钱。生产队里有钱，我就往家拿，生产队里有粮，我就往家里搬。”

“不，不，这个具体的问题，具体的数字也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什么实事求是？在会上，没听宗书记说过嘛。”

运动初期要反右，运动后期要防左，这是搞运动时的惯用说法。平金刚讲这些话时，至少还没到运动后期，所以他还没听说过要实事求是的说法。

“喏，喏，”祖云涛苦笑着说：“实事求是，就是有多少就说多少。不是说越多越好，你得说个实数。”

“实数？这么多年下来，谁还能记得清？你就帮我估摸一下吧。”

“这事哪有估摸的？”

“你就记上个数吧。你记多少，我就认多少，还不行吗？还不能下楼过关吗？”

“好，好，我这就向宗组长汇报，说你思想端正、态度积极、主动下楼，愿意退赔。”

“愿……愿意……愿意退赔。”平金刚听到这，才想起还有退赔的事。但这舌头已经伸出来，缩不回去了，只得心里叫苦。

虽然跟祖云涛一起负责平金刚的还有迟一敬，但这整个过程没有迟一敬一点的事。迟一敬毕竟还是个老实农民，对政治运动摸不着头脑，这一点上连他儿子也赶不上。

宗发奋听了祖云涛的汇报，高兴得不得了。想大张旗鼓地开个大会，造个声势，让全公社的人都知道他在西北村的工作打开了局面。再一想，不对，这些承认交待的数字，毕竟有水份，还没有落实。真要退赔，那些四不清干部肯定会心痛，要是在大会上反悔了，闹起来捂不住，可怎么办？

亏得宗发奋的办法多。他脑子一转，就叫祖云涛用两张大纸，画了个“西北村社教运动成果一览表”，把这些队干部的名字、各人的交待数、退赔数，都写上去，贴在了大队部的墙上。

公社的工作队队部组织了各村的工作组、队干部络绎不绝地过来参观。叫宗发奋好得意了一阵。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杜家骏、鲁来福那样轻易被攻破，更没有第二个人像平金刚那样自己缴械投降。车素花就是另一个类型，就是块硬骨头。

车素花现在是工作组来喊，她都不去、不理。宗发奋恨得咬牙切齿，也没有咒念。他没敢在车素花面前提：你要考虑经大臣的形象啊，你这样叫他怎么在海源工作啊？也没敢跑到经大臣面前去说，你去劝劝经老太不要硬顶死扛啦，这样对运动进展不利，对你开展工作也不利啊。没有，宗发奋没有去说，别人更不会去说。经老太成了宗发奋啃不动的钉子户。

宗发奋气得没有别的法，只能在贴在大队部门前的“社教运动成果一览表”上最后一行的车素花，把那黑字写得大大的。后面的“交代数”是零；“退赔款”更是零。可效果还是没有。

宗发奋气得实在不行，那天用黑笔在车素花的名字外面画了个大大的黑框。

谁知才过了两天，那“成果一览表”的下半页，竟被车素花撕掉了。

那天，迟解放和皮高深两人一前一后地过来。迟解放一下就看到，贴的那张“一览表”被撕了，下半截没了，就嚷了起来：“太监了，太监了……哈哈，太监了。”

皮高深还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连问：“怎么啦，怎么啦，怎么太监啦？”

“咳，你还没看明白啊？”迟高深指着墙上破了半张的纸，说：“下面都没有了，还不太监吗。”

“喔……喔，喔。”皮高深一下子反应了过来，连连失笑着：“喔，喔，太监，太监，太监了。”

不要以为没有下楼的干部，都可以这样“放肆”。别人要这样“对抗社教运动”，这罪名就大了，早就叫派出所抓起来了。车素花，实在是个特例。

第七章 清经济

1960年1月7日

7.1 退赔

名叫四清运动，总得查个账，清理清理吧。但宗发奋对此是没有兴趣的。他只喜欢做上一、二个小时的大报告，大大咧咧地骂上几句，心里多痛快。做这些查账的事，一笔一笔地算，多没劲啊，他是不会去做的。找村里的年青人，有点文化的，要么是干部子弟，像于又发、杜长贵、彭小宾这些，不能用；要么就像个二愣子，不敢托付。那就只能叫祖云涛做这些事了。

祖云涛从大队部搬来了一摞账本，放在他住的屋里的三抽桌上。

“这么多账本，彭会计也不在了，怎么查啊？”祖云涛跟宗发奋说。

“姓彭的不在了，不就更好办了吗？”宗发奋还有点高兴呢，彭会计不在了，不就是愿意怎么查就怎么查了，愿意说成是个什么，就是什么了嘛。

祖云涛拿起一本账，翻开一页，念着上面的账目：“这是去年的，第一项，支出150元，买入麦种1000斤。”

“买来的麦种上哪儿去啦？都是以生产队为主啦，还用大队买麦种干吗？一定是贪了。记上大队干部集体贪污麦种1000斤。”

祖云涛又念：“卖出席棚20卷，收入现金100元。”

“现金？现金上哪儿去了？没有现金，就是贪了。”宗发奋说着：“查账也没什么难。小祖啊，就这么办，凡是收入现金，抽屉里没有钱的，就是贪了；凡是买进实物，仓库里没有看见，也是贪了。”

“那算是谁贪的呢？”

“第一个就算到那个姓彭的头上，占50%，反正他也死了，没有话说。第二个就算到姓于的身上，他是大队长，是主要责任，占30%。还有就是杜家骏，占10%。剩下的10%，其他人分了。”

“就这样啊？”

“就这样。”

“要是他们不认呢？”

“不认？连说也不跟他们说。不需要他们认，我们工作组说的，就算数。”

7.2 收赃

就这么算个帐，记个数，倒不难。退赔，要那些人从家里往外掏，可是最难的事。这就好比要从他们身上割肉啊。宗发奋也知道，这是关键一仗。事先，他找了秦德才、储小二再三嘱咐，一定要冲锋在前，不怕打硬仗。

秦、储二人当然又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这一次，周新春被他爹挡住了，没让来。

首先是上杜家骏家。宗发奋选择杜作为突破口，是有所考虑的，他相信他对平近芳的话是会有作用的。

宗发奋带头第一个进了杜家的门，对杜家骏说：“杜家骏啊，今天是要落实对四不清的退赔。我相信，你会理解党的政策，请积极配合我们工作组的行动。根据我们的调查，你一共贪污粮食5000斤，钱款5000元。鉴于你态度还算诚恳，这次先交1000斤粮、1000元钱。”说完，眼睛直盯着杜家骏看。

杜家骏压抑着愤懑，冷冷地说：“我没有那多的钱和粮，你看着办吧。”

宗发奋此时也没有更多的客气，转头对秦德才一摆手：“搬。”

秦德才又转头对储小二说：“搬！”

储小二大声地答道：“搬！”

二人进屋，便见东西就拿，堆在堂屋的案几上往外抬。

唐玉贞哭着要上去阻拦，杜家骏一言不发，在身后拉着唐玉贞的手，没让她上去。唐玉贞知道丈夫的意思，没再往前挣，却是泪如雨下。

正当秦储二人把案几放在院门外的胡同里，再进来搬第二趟的时候，平近芳急冲冲地奔了过来。

从没见过她奔得这么急，冲进院子，朝着宗发奋直晃着手中拿着的纸包，嘴里却说不上话。

好一阵，才喘着气，把纸包打开，里面尽是各种面额的纸币，从三、五元到一角、二角，甚至一分、二分，乱糟糟的一大摞。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宗，宗书记……，这里是一百二十四元柒角三，算是退赔的。再，再不够，上，上我那儿去搬东西。”便把这一包钱塞给了宗发奋。

“算了，算了，就这样吧。”宗发奋接过纸包，对秦德才摆摆手：“搬完这一趟，就不搬了。”

退赔抄家队来到鲁来福家。

任宗发奋说了多少话，鲁来福只是冷冷地看着，一言不发。

宗发奋翻了个白眼，对秦德才也没说话，只是对他一摆手。

秦、储在鲁队长家转了二圈，虽是西北村的资深干部，家里也是空空如也，并没有什么好东西。连个桌子也没，都在1958年炼钢铁时拿去烧了。二人就在炕上的纸箱里翻衣服。

哈妹是两眼怒火，看着丈夫紧闭的嘴唇，她也一直忍着没爆发。直到这帮人走出院门，哈妹实在忍不住了，一下子连哭带骂，那声响得满胡同都能听见。

宗发奋只当没听见，一个劲地往前走。

秦德才背着东西，喷着唾沫，跳着脚回骂着。

宗发奋对他一瞪眼，他也就不放声，只顾往前。

平金刚那儿，宗发奋觉得不会有什么事，就懒得去了，有秦德才出面就行了。

秦德才心想，可等到机会了。1959年，公社办“学乖队”那阵，自己没管住他，还叫他跳得那么高，心里不舒服了好几年。尤其是1961年把我抓了小偷，还游街打我，就是平金刚这小子打我最凶。硬是憋了这口气，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还说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说的这些屁话，哪用三十年，连十年也不用。这不，五年也不到，这小子又落到了自己手里，老天真是开眼啊。这回是政治运动，可得好好整治他一下了。想到这，秦德才咧嘴笑了，催着储小二：“快走，快走！”

二人径直闯进平金刚的家，便嚎叫起来：“退赔，退赔，把贪污的东西吐出来！吐不出来就搬东西。”

平金刚本是想表现一下，主动认了一些问题，大部分还是没影往自己身上揽的事，没想到还真要退赔，而且还是这个赖皮狗进家来讨，心里怒火直往上。但一想，正值运动高潮，又是自己要表现一下，只好先忍一下，便头一扭，没理他。

“嗨，态度还不老实。抄！”秦德才对储小二一吼，便先动手翻起来。

平金刚家更是没什么东西了。那几年，农民的家当真的是由木器时代退化到了纸器时代。大小几个纸箱，几个筐箩（纸糊的小盒），几乎盛下了全部家当。能有个装缝纫机的大纸箱，那就不得了了，比后来有个大衣柜还展扬。平金刚家里，最值钱的，也就是摆在炕上的几个小纸箱。

秦德才也不嫌弃，上去就把纸箱翻过来，乱七八糟地都倒在了炕上。还没等平金刚说话，秦德才先看到几件花格衣服，一把就抓了起来，流里流气地说：“哈哈，还有花衣服呐。花衣服配花姑娘，这花姑娘在哪儿呀？”

平金刚的妻子庄妹连忙抓住衣服的那一头，说：“这是我从娘家带来的嫁妆，快给我放下。”

秦德才趁机使劲一拽衣服，差点把庄妹拉到了自己怀里，嘴里说着：“早都成老婆子了，还讲什么嫁妆？还不如嫁给我哩，嘻嘻。”

这“嘻嘻”还没完，平金刚就已经勃然大怒，象霹雳似的一声怒吼：“你这畜生！说什么？再说一遍！”

秦德才不由一怔，抬头一看，只见平金刚两目圆睁，怒火直喷，一只大手护着庄妹，另一只大手已经举到了半空。秦德才以为那大巴掌就要落下，自知不是对手，竟像触电似地一屁股跳了起来。

“干嘛？干嘛？要干嘛？”

一边说着，一边就往外撤了。

走到房门口。还不小心碰了门框，“哎哟”一声，喊着：“我去叫宗书记，我去叫宗书记。”都没跟储小二打招呼，拔腿就跑了。

储小二一看，更是慌不择路地跑了。

平金刚这才把大手狠狠地放下，砸在炕沿上。

于村长家。

这是第二次来抄于村长家了。

宗发奋知道这老于头的厉害，还从南门口的派出所叫了两个警察来。

这架势可就不一般了。一个警察把着院门，不让于村长的儿子、孙子进来；另一个把于村长老俩口挡在了西间。老于头是瞪着一双血红的大眼，怒不可遏，他老伴一直破口大骂。那警察当然也不好意思拿于老太怎么样，只是装样子地摇着头说：“行了，行了，把耳朵都震聋了。”

秦、储二人顶着骂声，在东间匆忙地翻着。已经抄过一次了，哪还有什么值得拿的东西。他俩胡乱地翻了一阵，随手拿了几件，便退了出来。见院子里还有辆自行车，也叫储小二推上。秦德才对在院子里坐阵的宗发奋说：“也就是这些了。”

宗发奋当然也明白：“那就走吧。”

这行人便出了院门。

于震祥在院门外一看，储小二还推着自行车，急得大喊：“这是我的车，这是我的车！这是一早，我给我爹推柴火过来的。”

宗发奋扭头说：“不管这些，你爹要退赔的数，还差远着呢。”

储小二推着车，还得意地装了个鬼脸。

于震祥想冲过来。

那警察死死地挡着他。

7.3分配果实

在分配果实之前，有项工作很琐碎，也很具体，就是对抄来的物品估值，就是能顶多少钱。这也是嘴皮上的事情，由工作组说说而已。被认为态度好的人，他的东西可以估高一点，也就是能少退赔一点；被认为态度不好的人，那东西自然也就说成是不值钱的了。

宗发奋烦不了这么多，就对几个大件说了下。比如，杜家骏算是态度好的，那个案几就算三百元了；于村长家的自行车，还是五、六成新呢，就说：“五十，最多算五十了。”其余的，就叫祖云涛大体算一下。祖云涛哪明白这些，还不是由秦德才随口瞎说说。

还有个也是挺烦人的事，就是胜利果实的分配。

不像第一次，主要是鼓励积极分子，没几个人参加分，都叫秦德才他们拿走了。这次是要照顾到面上，要让大多数社员都能享受到开展运动的成果，这就费事了。

从程序上说，跟生产队搞分配相类似：把抄来的东西加起来，一共值多少钱，再把全村人数（除去四类分子、四不清干部和家属不算）一除，就是每个人能分到多少物品。可是这些东西一共没多少，平均一人也就是相当于几块钱。杜家骏的那个案几，算了三百元，那得二十几个人合起来，才能扛回去。再说放在谁家呢？其余没扛回去的那二十个人，不就等于零吗？

宗发奋也管不了这么多，叫祖云涛在每件物品上贴纸条，纸条上写着分给谁，大一点的物品就写上几个人的名字。尽量把一家人写在一个纸条上，到时候，纸条上谁家的人多，谁家就优先拿回去。

祖云涛直摇头啊，这也太不认真细致了。到时候，会闹出多少矛盾来啊。可是这令人担心的事，倒是没出现。

西北村的“分配社教运动胜利果实大会”，今天召开了。

因为要点名，西北场院里来的人还不少。

会场的最前面，摆着几个纸箱，放着一些破旧衣服，再就竖着一些铲子、扫把、铁锨之类的用品。最显眼的就是杜家的案几和老于家的自行车了。

照例是宗发奋先讲话。今天宗书记也是难得的高兴。在他的领导之下，你看，西北村的社教运动如火如荼地顺利进行，而且还是全社少数几个能分配胜利果实的大队。但是，他今天也没有请工作队领导和别的大队的人来现场观摩。他知道这里面还有不少问题，怕到时连表面上也糊不住。他只需要上面知道他的工作已经能进行到这一步就可以了。

在宗发奋讲完“今天，我们贫下中农获得了第二次的翻身解放”之类的话之后，祖云涛宣布分配胜利果实开始，请大家上来看纸条，把写了有自己名字的东西拿回去。

结果没想到的是，没几个上去看的。只有秦德才、储小二高高兴兴地转来转去地看。

皮安已上去看了下，还没等找到自己的名字，一看大家都没上来，自己也悄悄地下去了。

为了增加点气氛，宗发奋远远地看见了申光荣，便喊起来：“小伙子，那个小伙子，小申！过来，快过来，也有你的。”

申光荣虽然住在学校里念书，可还是西北村的社员，所以分果实是有他的一份。

申光荣高兴地走了过来，翻了一遍，还真翻出一件。那是一件浅红的女式汗衫，上面贴着的，还真是申光荣的名字。申光荣举着汗衫摇晃着，故意说着：“这是我的啊，这是我的啊？叫我怎么穿啊？”

宗发奋不乐意了：“你拿了就走吧。回去穿在里面不是一样吗。”

其实不用说，这些东西对别人家不实用，也不好分。就算是好用好分，人家敢拿回去吗？谁都知道这是谁家的东西，明摆着的事情，能拿回去吗？运动就搞几个月，运动结束以后，都是一个村的，还有几十年，甚至祖祖辈辈要在一起，这个账就算不清了。所以，除了秦德才这样的混子以外，别人是没有去拿的。这毕竟不是斗地主、分田地那回了，斗地主、分田地是彻底把人家打垮了、打死了，才去分的。四不清干部毕竟不是像地主那样被“扫地出门”、彻底斗垮、甚至连家连人都没有了。连这些农民都知道，四不清干部人还在、家还在，说不定还会有重新“解放”站起来的日子。就是前一、二年不是还在对“反右倾”搞什么甄别、平反么？上面的人，怎么这么快就把这些都忘了么？就是这样，分了地主的房，几十年之后，人们还常习惯地说谁家住了谁的房子呢。

这一幕没唱好，好在还有下一幕：分现金。退赔收上来的，全大队有二百多元，其中大多数是平近芳交的那份，一人也就能分几角钱。等祖云涛一说：“下面发钱，大家到时干部那儿接手印，在白干部这儿领钱。”全场哄的一声，一个不少，都上前面来领钱了。

“别乱了，别乱了，领完钱的原地坐好。会后还有电影看啊，最新的电影‘夺印’啊。”宗发奋喊着。

“夺印”，是为配合社教运动而赶拍的一部影片。但是一阵功夫之后，场院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领了钱的人都回家了。留下几个想看的人，也是远远地靠边站着。在难得放一次电影的乡间，这种情况还真少见。

第八章 清组织

1960年1月8日

8.1“组织干事”

多吃多占，贪污蜕化，村干部也认了，也退赔了，这社教运动还有什么呢？

宗发奋当然很清楚，这才是四清里面的一清，还有更重要的：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如果说，那前二个是软任务，可以这么说，也可以那么说，但这清组织是实实在在的，是要拿出点东西来的。这个任务也是很重的，如青海省在试点地区对农村党员给予开除、不予登记、劝退等各项处理的，竟达45%（请见：《“文革”前夜的中国》，罗平汉，人民出版社，2007年）。自己作为书记，这应该是自己的强项，可是要搞出点名堂来。

这不，他在秦德才的院子里来回踱步，已经踱了好一阵子了。

按说这对他，并不是难题。多少年来，他就是搞这项工作的。组织工作，无非就是吐故纳新。要处理一部分，要吸收一部分。他想来想去，已经有了底。处理人嘛，这还不好办，想处理谁就处理谁，这是他最喜欢做的事了。这种时候，是最能体现他的价值，满足他内心欲望的时候。什么于继承啦、车素花啦，都该好好整一整。怎么整法？反正“二十三条”上说了，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的走资派。至于怎么整，条文上面没说，是疏忽了忘了说，还是故意不说清楚，那就不去管它了。意思也就是把这权力交给我了，愿意怎么整就怎么整。这么做也是整，那么做也是整，反正去整就是了。

那个杜家骏吗，也不能令人满意。至于怎么处理，那要看他儿媳妇平近芳怎么表现了。嘻嘻，嘻嘻，平近芳……嘻嘻。说不定这回还能赚个便宜，尝个甜头。虽然不是俊嫚，可也是工作人呐，不是一般的村姑，要是真能到手，玩一玩，那味道一定不错。嘻嘻……宗发奋在那儿美得差点乐出了声。

平金刚？还有个平金刚，宗发奋对他没有兴趣，印象也不深。算他识时务，自己主动交待了。那就不去管他了。

还有，吸纳谁为新党员呢？宗发奋的心一沉，就这点，西北村还真没什么合适的。运动积极分子里面也就是储小二了。不过那小子确实有点流里流气，怎么办呢？那也得搞一个呀，这就叫需要。工作上需要，政治上需要，别的条条框框就要让路。条件不够也可以先进组织，进来以后可以继续教育、继续努力嘛。

为难的是，谁去做这项工作呢？宗发奋对工作虽然想法很多，提出的意见也很多，可是不愿动手。这些具体工作，他看不上眼，觉得那不是他当书记做的事。那叫谁去呢？村干部是不行的。工作组里，算来算去，也没有合适的人。时编辑，不但工作能力不强，政治上也不强，不打个右倾已经不错了。那

个白云吧，倒是有点能力，也敢讲话，可是不跟自己一条心。弄不好，说不定还会去纪海洋那儿通气，这可不行。

那怎么办呢？只有小祖了。小祖，还年青，有点文化，心眼也不多，应该能听使唤。只能找他了。可他还不是党员啊。嗨，还管那些，能把事情办起来就行。

中午，他找了祖云涛，说了这个事。

祖云涛听了，很惊讶：“不行吧？这能行吗？我还不是党员呢。”

“嗨，小祖啊，这是组织对你的信任，这是领导对你的培养。不要推辞了，好好干吧。以后有出息了，不要忘了我哦。”宗发奋讲这一套是不用打草稿的。

祖云涛只好点点头。

宗发奋交待给祖云涛的任务，主要是储小二的发展工作。事情再简单，也是有一整套的程序要走。

按说应该先开个党员会，让大家讨论讨论、谈谈看法。宗发奋知道储小二给大家印象不好，在会上要是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别人都会顺势说不好，那就不好办了。所以他跟祖云涛说，不用开会了，你就个别问一下就行了，重点是征求积极分子的意见。

祖云涛就一个一个地去找。

杜家骏在家里没出来，见是小祖，还是勉强客气了下，在炕上欠了下身，说：“进来，进来，炕上坐吧。也没有生火，连柴火也叫秦德才他们搬走了。”

祖云涛听了，人家没说是叫你们工作组给搬走了，可讲的就是这回事，也挺尴尬。他只好照直说了发展储小二入党的事。

杜家骏，先是眉头一皱，停了会，缓缓地说：“这事问我干吗？我自己还是个‘四不清’，还没解放呢，我还没有发言的权利呢。”

“这个是宗书记叫我来征求你意见的。”

“嘿，嘿，谢谢他好意了。我可是说不上这个意见，你们工作组自己颠倒去吧。”

祖云涛只好再去找鲁来福。听说是在西滩的地里，小祖一直走了几里地，都快到河口的泥滩了。几个男劳力在那儿平整土地呐。

“唉哟，祖干部怎么大老远的跑这儿来啦？要同劳动，在西门外，跟女劳力们铲铲地皮就行了。”因为鲁来福是管民兵、治安这一摊事，这四清运动相对说来对他碰的不厉害，可他对工作组也是不冷不热，隔着几步，不肯靠前。

祖云涛把鲁来福拉到一边，说了这事。

鲁来福听了，没有惊奇，眼睛望着远处，嘴里说着：“这事吧，一时半会说不清，要把大家叫在一起，好好商量商量。”

“你的意见呢？”小祖在追问。

“这事我看不那么简单，我个人的意见说明不了问题。”

又碰了个钉子。

祖云涛饿着肚子往回走，进了西门，正巧碰上了平金刚，又把这事跟他说了。

哪知平金刚还没听完就跳了起来，“这不行，这哪行？这个人，那德性，当个社员都不够格。没有开除社员的，要是能开除社员，早就把这种人开除了。还要入党？你们怎么想的？真是的！”那唾沫星差点都上了祖云涛的脸。

看平金刚那瞪着眼，涨红的脸，看来还有好多话呢。他不敢对宗发奋讲，可是敢对祖云涛讲。

祖云涛往后退了一步，连忙说：“行，行，我明白你意思了。”赶忙走了。

还有车素花呢。祖云涛知道那车素花会更厉害，想了想，就没去。

回去跟宗发奋一说。宗发奋听了，鼻子里哼了两下，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亏得没有开党员会，要不真的搞不下去了。现在还不要紧，他对祖云涛说，你去把秦德才的意见记下来，那可以代表党员的意见。他知道秦德才对这事最积极。

“你再去找储小二本人谈谈，叫他写个入党申请书。”

“他恐怕还不会写字吧？”

“那你帮他写一下，念给他听一遍，签个名字就行了。实在不行，名字也不会写的话，那就摁个手印。”

“好的。”

“还有，过两天，我代表党组织跟他谈话，这也是入党过程中的必要程序。叫他准备准备，谈谈对入党的认识，今后的打算，怎么更好地为党努力工作。”

“好的，好的。”

要找储小二，可得费点事，上哪儿也打听不到。还是秦德才告诉祖云涛，你上草垛跟前去找吧。

果然，西门外，生产队场院上的草垛前，储小二躺在那儿晒太阳呢。要问，他不去干活吃什么，能有工分吗。这一阵，他可是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生产队敢不给他记工分嘛。

祖云涛喊醒了他，说了要发展他入党的事。

储小二好不容易才睁开半只眼，用衣袖抹了抹眼屎，说：“我都是副主席了，不是比党员还厉害吗？还用再入党啊？”

储小二，时刻也没忘了自己是贫协副主席，其实这个头衔，从宣布那一天之后，再也没人提起过。

“嗨，嗨。”祖云涛实在笑不出来，只好干笑了两声。

“这事吧，这是两回事……”祖云涛耐着性子跟他解释起来。“……共产主义是全人类最美好的理想，是我们终身为之奋斗的崇高事业……哎，哎，醒醒……醒醒。”祖云涛还在那儿讲呢，储小二已经又睡着了。

“吵醒我干吗呀。你讲的这些，我听不懂。”储小二还有点不耐烦。

“那你怎么写入党申请书啊？”

“你认的字多，你帮我写不就得啦。”

“还有，宗书记要找你谈话，讲对入党的认识，你要准备好，到时候我要作记录的。”

“咳，你现在就一块写上，不就行啦。”

“唉。”祖云涛也只好这样，走了。

那储小二倒头又睡去了。

回到大队部（现在也是工作组的办公室），白云见祖云涛为这事忙来忙去，笑着说：“嚯，这回你可是成了组织部的组织干事啦。”

8.2清理阶级队伍

屋外起了漫天大雪，出不去，也干不了活。

工作组和贫协主席在大队部商量清理阶级队伍的问题，这是社教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重新清理各人的成份，有没有错划、漏划的。在那个年代，每个人都有两个政治标签，一是“本人成分”，是指本人参加革命工作或入党以前的个人社会地位。解放后出生的一般就是“学生”。第二，最主要的是“家庭出身”，是指本人取得独立经济地位前的家庭阶级成分。阶级成分应以土改或土改复查和民主改革时划定的为准。通常也就是地主、富农、中农、贫下中农这些，还有手工业者、小土地出租者等等。严格讲共有59种之多，这在第二卷里已经讲过。

在那时的社会体制下，“家庭出身”对一个人可是不得了的大事。它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决定了你是“主人翁”还是永世不得翻身的“罪人”。不但是决定了你的命运，还决定了你全家、你整个家族的命运。而且，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家庭出生还是世袭的，即地主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还是地主，哪怕那块地在他爹的爹的爹的那时就已经被土改分了，半点的剥削也没粘到过。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文件上，对如何划分“家庭出身”有着很多的政策规定，甚至有量化标准，比如剥削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百分之多少以上算地主，多少到多少算富农（各地各时的标准不一样）。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掌握

的，尤其是在左倾狂潮来临的时候，划分标准会大大放松，还要查一查以前划的贫下中农里面有没有“漏划地主”，以表明自己眼光尖锐、立场坚定。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打碎了这个吃人的枷锁。

对这些，宗发奋自然是拿手好戏了。他觉得安排得差不多了，于是就开了这样的会。

“于继承，严重贪污，定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四不清干部，那是没有问题的。”自然是宗书记主持会议，他在说。

“老于自己没承认吧？”白云问。

宗书记一翻白眼，“有彭乐宾的证词就足够了。”

“那不是老彭的亲笔字。”白云还在说。

“有两个贫协主席的证词，还不行吗？”宗书记不悦地说。

“是啊，是啊。是我们当场记下来的。”秦德才和储小二赶紧帮腔。

时编辑在后面轻轻地点了一下白云。

白云没再说。

“西北村，整个一个村，这么大的一个村，怎么会没有地富反坏呢？大家看看有没有？哪怕是漏划的、新生的。”宗书记又问。

大家相互看看还真没有。

“便宜那个王建悟了，搬到北山去了。要不可以定为国民党分子。”秦德才说。尽管家庭出身里没有“国民党分子”那一项。

储小二也嘟囔着：“那个赵玫，也跑了，不然也能算一个。”

“哎，这个事要重视。我听说赵玫没有去北山，再没见下落，这个事情要查。”宗书记板着脸说。

“好，好，这事情让我们贫协查。只要工作组支持，我就是跑到黑龙江、海南岛，也要把她抓回来。”

“好像没有这么多经费吧？”时编辑难得插了一句。

“这事就再说吧。再想想还有没有别人。”宗书记说。

“要不就把包金贵再抓回来。西北村一个‘分子’也没有，阶级斗争斗谁呀？”秦德才说。

“我看了一下材料，那个包金贵就算没参加解放军，也不过就是国民党兵，够不上历史反革命。历史反革命里的党政军警宪特，政府系统是指在旧政府里保长以上的、军队里连长以上的才算。”时编辑还挺认真，学过政策。

“可以算坏分子嘛。能说他是好分子吗？一个国民党兵。”宗书记历来是最看不起包金贵。

“是的，是的，一贯不好。”两个贫协主席又连连点头称是。

“表现不好，就是坏分子。我去和北山公社说一下，把姓包的迁回来。这样西北村的阶级斗争就有活靶子了。”宗书记一锤定音。

“一个少了点。再想想有没有，漏划的、新生的富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什么的？”宗书记继续问。

秦德才眼珠子转了两转，“有，我看那个皮安己差不多。困难时期自己在西门外开了一块地，典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

“那天批判于继承的大会上，皮安己还公然跳出来为他评功摆好。分明是对抗社教运动。”储小二也在说。

“那就可以定性了，新生的富农分子。”宗书记一拍桌子，又定了。

“我看那个车素花，硬得很，公开对抗社教运动，得给她个什么。”秦德才说。

“人家男人还在县里工作团总部呢。”储小二说。

秦德才从鼻子里一哼，不肖地说：“人家早就甩了她了，和她没关系。咱该怎么定，就怎么定。”

“唉，这老婆子确实不是个东西，但这一层也不能不考虑。我看她是属于革命意志衰退，可以作劝其退党处理，戴帽子还戴不上。”宗书记无奈地说。

秦德才又想起了一个，“那个林海秀，右派家属，一贯坚持反动立场，也不肯离婚，还一直跟着他那个右派男人。要是一起抓上来斗斗，挺有意思。嘻嘻。”

白云忍不住了，又发言了：“我们党的政策没有株连九族这一说，何况林海秀还是民兵英雄，有功之臣。”

秦德才卡壳了。

“再想远一点。”宗书记还不泄气。

过了一会，储小二眯起眼，神秘地说：“我想起来了，还有这么个人。1949年解放军拿下望海山，在国民党队伍里还有一个小孩。那个小孩到底是谁家的？什么成分？”

“是啊，我也一直在想，怎么会出来一个小孩呢？”秦德才说。

两人都想不出来。

8.3发展党员

这个会，还没结束。

“那就算了吧，反正现在人也不在西北村。好了，这个会就到这儿，党员留下，再讨论组织发展问题。把等在外面的党员喊进来。”宗书记说。

西北村的党员，除了担任干部而还没有“下楼”、暂不参加组织活动的之外，也没几个。今天，他们和工作组一起开临时支部大会。小祖不是党员，列席参加做记录。

“先讨论储小二的入党问题。我和秦德才同志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秦德才一听，觉得荣耀得不得了，一个劲地直点头。

宗发奋没等秦德才打叉，赶紧说下去：“我先说一下。储小二同志祖祖辈辈是贫雇农。他本人在旧社会苦大仇深，对敌斗争坚决，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表现突出，革命性很强，尤其在这次社教运动中，又是个先锋，担任贫协副主席。我认为，已经具备共产党员的条件。所以，我介绍他入党。”宗书记首先介绍情况。

没想到白云马上就发言：“我不同意。1949年，储小二在没有组织批准的情况下，跟秦德才一起擅自杀人，严重违反党的政策。平常游手好闲、吊儿郎当，一贯表现较差，群众反映不好。这次，又对彭乐宾捆绑吊打，也是严重违反党的纪律，这样的人不能入党。相反应该从革命队伍中清除出去。”

大家一下子都愣了，没想到白云当着宗书记、当着储小二，就敢说这话。

秦德才也不顾白云是工作队员的身份，跳了起来：“那时杀地主富农，是革命的需要，就使国民党反动派没有了内线，就是少了个阶级敌人，就是立场坚定、斗争坚决。我们的行动，从来没有被要求检查过。你怎么要算这旧账呢？”

宗书记气得翻着白眼说：“革命就需要这样的勇敢分子。你白云能叫彭乐宾交代问题吗？你白云能打开西北村运动的局面吗？”

“我不相信储小二这种人，对入党会有什么认识。”白云还在说。

“我代表组织跟储小二同志谈过话。他谈得很好，很深刻嘛。储小二，你可以对大家讲讲么。”

“嗯，嗯……”储小二吱唔不出来了。

祖云涛只好出来打个圆场，说：“这个材料，在我这儿。”

储小二也连忙说：“对，对，在4号这儿。4号帮我写得挺好的。”

大伙听了，吡吡地出气，也不敢笑出声来。

宗发奋可是气得没处发狠，便直说了：“储小二的入党问题，我跟公社工作队谈过，他们也是同意的。”

“如果这事是组织决定，那我个人服从组织。如果是给我投票的权利，那我就投反对票。”白云也是一身正气，硬朗得很。

宗书记没辙了，“投票就投票，我介绍储小二同志入党，同意的请举手。”

宗书记瞪大眼睛看了一圈，只有秦德才一个人使劲地往上抬着手。别的人竟然都低着头，没有一个举手的。西北村的几个普通党员，宗书记并不熟悉，甚至连名字也喊不上来。他转过来看着低着头的时编辑，一时竟忘了喊二号同志，大声地喊了：“老时，你的意见呢？”

“我？我没什么意见，大家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时编辑假装从瞌睡中苏醒过来，敷衍地说着。

宗书记又指着一个穿着旧蓝布褂的一个人，觉得眼挺熟，一时没想出来，就问：“你是叫什么名字？”他居然没看出来那是平金刚。

平金刚这时很不愿意让宗发奋注意到他，只好嘟囔地说，“平金刚……”

“哦，平金刚。我知道，我知道。1949年是你从国民党占领区跑回来，向解放军报告的吧？这次运动又能够积极退赔，虽然是小队干部，也是第一个被解放，能恢复党组织活动，参加到我们今天的支部大会。不错，不错。你应该是拥护社教运动，赞成储小二同志入党的吧？”

这时的平金刚，心情也是一言难尽。他没有多大的政治野心，但也知道这次是向上升的机会。这场运动过后，看来于村长是倒了，杜家骏也不见得能起得来。秦德才那小子，别看现在蹦得厉害，真的组成新班子肯定不会用他。就算是上级瞎了眼，也不至于糊涂到这一步吧。那时村里会叫谁领头呢，那好像就只有我啦。要是我是工作组的话，也会选我呀。所以这段时间，平金刚是小心翼翼，不对抗、不抵触。心里不抵触，那是鬼话，只是表面上装着不抵触。也不知道是不是装得像，至少还没有人说他是装的。其实这时，谁也顾不上谁，哪个来管你平金刚是在装还是不装呢。于是，平金刚也很配合工作组，承认自己贪了。贪了多少？你工作组说多少，就是多少吧。“作为队长，真是不应该啊。”他在全村的检讨会上，认真检查，还被宗书记当作干部主动“下楼”、“洗澡”的典型。其实他还真没有拿队里的东西。所以，从内心里，平金刚对这场运动、对宗发奋，是有看法的。尤其是对秦德才这种人，更是鄙视到极点。不过，这时连这样的老实人，也被逼得学会了两面派。他也在想，运动不会老是这样吧？秦德才不会一直这么猖狂下去，连开会都懒得和这种人挨在一起。熬吧，熬吧，熬到运动结束，再看我的。

不料，宗书记又偏偏点名，要他对储小二的入党表示意见。那个储小二，更是恶心人了，平金刚在心里“呸呸”地吐唾沫，十二分地不愿意，那天都已经跟祖云涛说了，怎么还不明白。但今天这种场合又不一样，无奈之下，他都没敢抬眼看宗书记，动了动坐麻了的屁股，轻声地说：“唉，怎么说呢，这事情呢，本来也不是不可以。不过呢，看起来有点意见不一致，那就会后再做做工作，再看看吧。”

没想到平金刚还会说出这样有点政策水平、能绕点弯子的话了。你别说，政治运动还真能锻炼人，不过得看是往哪方面锻炼了。秦德才眼看没有一个人表态赞成，你平金刚还故意兜圈子，有点急了。一，那是宗书记的意思，不能给宗书记下不来台。二，储小二是自己的狗腿子，怎么地也要帮一把。对白云、时编辑，他们是工作队员，他没办法。你平金刚含含糊糊想就这么混过去，没门。

“我们贫下中农应该坚决支持社教运动，应该坚决支持运动积极分子。我作为贫协主席，代表全体贫下中农，坚决赞成储小二同志入党。”秦德才情绪激动地说着。

平金刚一听，反倒气不过，心里一横，大声地说：“我不同意。贫协是贫协，不能代表党员意见。”

“你不同意什么？是不同意贫协代表党支部吗？”宗发奋很警惕地问。

“我明确表态，我不同意储小二入党。他根本不够一个党员的标准。那天我都跟祖干部说过了。”平金刚被逼到这份上，反而斩钉截铁地说起来了。

“这可是宗书记的意见啊！”秦德才瞪着眼说。

平金刚反过来对秦德才瞪着眼说：“我就是不同意，你还有牙啃啊？”

宗发奋气得把本子“啪”地一合。

平金刚这几个月费了半天劲假装的不抵触、假交代等等，也就白费了。毕竟，他还远远没有练到这一步。

宗书记没料到，会是这个结果。连介绍个人入党，也不能如他的意。气呼呼地，话也说不上来了。

“还有衣春玲的入党问题，请支部大会讨论一下。”白云又说。

“那就更没门了。”宗书记拍着桌子，又一次起身摔门而走。

哪怕是这么一点点的党内民主，就能使极左思潮不能轻易地肆无忌惮地横行。

第九章 背后一刀

1960年1月9日

9.1 写黑信

对于清理阶级队伍、重新安排干部，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宗发奋心里还是有点喜滋滋的。毕竟有这么多人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想要他怎么的，他就得怎么的。是上，还是下，哪怕是叫他趴下，全都是凭自己一句话，甚至是脑子里极随意地一闪念。这叫什么？这就叫权力，而且是权力中的权力，决定别人命运的权力。我宗发奋十几年混下来，这方面的权力是越来越大了，用起来是越来越得心应手。想想，还有哪个地方没用到？

宗发奋想了一下，有，怎么没有？那个，就是那个，他一下子想起来了，就是那个西北村的小军官，他后来打听是姓郭的那个小军官（海源人习惯把年轻的部队干部叫“小军官”）。那年右派分子李辰回来，他居然偏向李辰，不给自己面子，最后还把李辰驮回了家。宗发奋最痛恨的就是眼睛里没有他的人。这件事，他是骨鲠在喉好几年了，怎么能忘了？那年他就下了决心，早晚要叫那个姓郭的吃个苦头，现在不就是时候了。

想个什么法呢？叫他吃个什么苦头呢？这方面，宗发奋有的是办法，不用别人教。

上部队告他，向他的所在部队上级领导那里告他，包庇右派，这可是一告一个准。他部队上不能不处理，而我宗发奋又不会有任何损失。不像那个李辰，写那种信，反映社会阴暗面，做这种事，对自己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写对了，不会来表扬你；写得不对，或者说你写得不对，那你就吃不了兜着走。虽然，四年前把省委但处长引来的信没再去查是谁写的，但肯定跑不了是李辰那小子。这事以后肯定还会有个说法。眼下，倒是轮到我来写信了，告姓郭的那小子。

告什么？那还用说：包庇右派，跟右派划不清界线，从思想感情到实际行动都和右派穿一条裤子、坐在一条板凳上……具体例子呢？对右派分子和地主分子相互勾结不闻不问，反而包庇打掩护，还亲自把跑出来的右派驮回家去。还有什么呢？对，就说是他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反正是相互对话，多几句，少几句，无所谓。就是再编上几句，也没地方追究。

还有呢？宗发奋看看纸上写的，觉得还不够。对了，还有！宗发奋一下又想起来那年李辰搞的什么“忆苦思甜会”，叫姓郭的娘来诉新社会的苦、诉社会主义的苦，很能说明问题嘛。一定是姓郭的在背后指使他娘，在右派分子的配合下向党发起的又一次进攻。对，对，对。写上，写上。

宗发奋把有的、没有的，猜到的，瞎编的，足足写了好几页，最后落款写了：“西北村社教工作组”。觉得还不够分量，又跑到公社大院的社教工作队办公室，叫他们盖上了工作队的章。

办公室的人还问，这是什么材料呀？宗发奋说，这是外调材料，盖上工作队的章，表示更加重视。类似的外调材料，每天往外寄的多得是，办公室也懒得去看。

等盖完章回来，宗发奋又在大红印章前面添了一句话：以上情况完全属实，请贵部严肃查处。这下就更有分量了。

宗发奋心安理得地亲自把信寄了出去。

9.2离队复员

郭中和所在的，是个工程兵部队，正参加三线建设，在贵州山区挖地下战备仓库。那几年，东南亚地区的革命正如火如荼地展开。首先是越南在美国的咄咄进逼之下，反而节节胜利，不但对南越志在必得，连老挝、柬埔寨也在其影响范围之内。印尼共产党又成为除社会主义国家之外的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在国内可以呼风唤雨，政权的转变几乎已无悬念。其他各国的武装斗争也成了燎原之势，四处蔓延。缅共、马共、菲共、泰共的游击队一时间还真方兴未艾，有声有色。对这些，中方都全力支持。在国内，尤其是在大西南进行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为可能发生的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把大西南建设成能防备美帝和台湾国民党在东南沿海武装进犯和支援东南亚革命斗争的战略大后方。

郭中和和他的连队就在肩负着这样的光荣使命。

偌大的山洞，一阵爆破刚过，浓烟还未散去，空气还十分呛人，郭中和带着战士就推着铁板车、扛着工具进去了。有的班，忙着把碎石搬上车，推出来；有的班，抡起大锤把一些大的石头砸碎；有的在查看爆破情况，选定下一批的爆破点；也有的抬进鼓风机通风。

郭中和本来完全可以就在洞外，指指点点就行了，但他是个实在人，穿着和战士一样的工作服，戴着柳条帽，同样是一身一脸的灰土，干得比战士们还带劲。真的是实实在在地为革命出力。

这时，连里的姚指导员很严肃地进来了，在一群灰头土脸之中都认不出哪个是郭中和，只好喊了声：“郭中和。”

那喊声还挺奇怪，再说往常都是叫“郭连长”的。今天，是从未有过的直呼其名，怎么啦？连战士们都停下了手。

郭中和知道是怎么回事，应了声，自己走了过去。姚指导员冷冷地站在他对面。

他俩的关系本来是不错的，都是三十多岁还在连级的职务上。要是在一般的野战部队里恐怕就转业走了。也就是在这种部队，那时又没有文职编制，所以一直干到现在，两人也就多了些共同语言。可是从上个月，姚指导员通知他去团部以后，指导员明显地对他冷落下来了。

那次，就是师部接到海源县龙头公社社教工作队来信后，要团里调查处理，团部找本人了解落实具体情况。不到一个月，团里又来找他了。

姚指导员一直走到他跟前，才很简短地说：“换件衣服，上团部去吧，易政委找。”

邬中和骑了辆工地的破自行车，一个小时后到了团部。

常年的野外作业，四十多岁的易政委，也显得黝黑，满脸的沧桑，见邬中和进来，示意他坐下。易政委很严肃地宣读了团里的决定：从即日起，解除军籍，按复员处理。

尽管邬中和有所思想准备，但听到这决定还是很意外，就说：“上次我来已经解释过了。那个李辰，是政府放出来的，不是逃出来的。遇到他病了，倒在路上，我是用自行车带他回家去，不是背他走的。”

宗发奋写的信是很鬼的，说李辰是“跑出来”的，部队领导一看以为是“逃出来”的；又说是“驮回来”，而不明说是用自行车带回来，叫人一看以为是和右派亲密得背了回来。

易政委一摆手，“这些细节就不用讲了，反正是属于政治性错误。考虑到你这些年来工作比较努力，为部队做过一些贡献，所以，我们在结论里什么也没说，只是说按复员来安排。就是经济上的补偿要少一些。但是，我们也是为你向师里做过一些努力的，最后的这个结果，希望你能理解。”

邬中和在部队多年了，完全明白这些，还能再说什么呢？

部队的军人到一定年龄要退出现役，叫退伍。一般来说，战士就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原来是农业人口的，还回农村去，叫“复员”，大概是恢复原状的意思。部队干部就在城里安排个工作，转为非农业人口，叫“转业”，意思是转换个职业。军人本身没有“常住户口”，不存在农业人口还是非农业人口的问题。复员与转业，在个人的经济待遇上当然有明显的差别。对邬中和这样的干部身份采用“复员”的方式，也是一种极特殊的处理办法。组织上考虑过，如果做出处分，依据也不是很充分，对当事人的影响更大；不处理，组织上更要承担谁也不愿意承担的政治风险。

为了让邬中和理解领导的苦心，易政委又说：“这不是处分，这是处理。这样处理，档案里不留材料，政治上也没有多大的影响。现在这样，已经是最好的可能啦。”

易政委讲的意思是，经济上会有些损失，但政治上不受什么影响，已经是很好的啦。其实政治上，怎么能不受影响呢？只不过是影响小一些，不是“打击对象”，而是“抛弃对象”，这辈子是不会再“使用”了。

邬中和理解这些，知道领导这种特殊方式的“好意”。所以，他没有说更多的话，只是点点头。

易政委还有点不放心，说：“你也不用再上师部去找，那样反而不好。你懂我的意思吗？”

邬中和这才说：“政委，你放心。这已经给你们添麻烦了。”

易政委舒了一口气，淡淡地一笑，过了一会儿，又说：“跟你说句实话吧。这话你听了，可不要告诉任何人。你离开部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我们这个部队可能很快要去越南了。你倒是可以回家跟老婆孩子在一起了。”

六十年代初，美军对越南北方的轰炸不断向北扩展，为支援越南的抗美战争，“中国从1965年6月开始，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达32万余人，最高年份达17万余人。”（请见：《‘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李可、郝生章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

“我也听说了一些，谢谢政委了。”

邬中和回工地后，向姚指导员汇报了团部对自己的处理决定。

姚指导员看着邬中和，欲言又止，过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说：“我也已经知道了。”

过了会儿，又慢慢地说：“我们要再见了。”

那眼神，那语气，又有着种种无法解读的异样，看来有多少想对战友倾诉而又无法说出的话，憋在姚指导员的心里。连句告别的话都无法完整地说出来。

最后，姚指导员慢慢伸出了手，似乎要握一下，却又缩了回去。一会儿，又抬起来，在邬中和的肩膀上拍了一下。要知道，在中国的礼节里拍肩膀要比握手亲近得多但又是非正式的。

邬中和回家乡后，那支部队换上蓝衣服，真的去了越南，修筑安沛机场。一年的时间，部队换防回来。邬中和得知姚指导员牺牲在了越南的土地上，他想去部队凭吊悼念一下。回复是，难以接待，因为他们不是以公开身份去的。当时，我们对外声明，在越南我们没有一兵一卒。

1979年，那支部队又进入越南境内。不过，那次是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去跟越南人打了。那时，邬中和已经和部队没什么联系了，不知道部队去了以后的情况。

1966年的春节前，邬中和没带领章、帽徽，赶回了家。

他的妻子很惊讶，怎么没像往常那样，戴着大盖帽，那么地神气，那么地俊气，走在路上人人都羡慕。邬中和把事情一说，妻子十分地悲戚，眼泪在眼睛里转，怯怯地问：“你犯了什么错误吗？”

邬中和没有说是因为那次带李辰回家的事，只是说在部队上十几年太累了，哪是什么当兵呀，就是在出苦力。一样地出苦力，不如回家了。

妻子无语。

邬中和又劝说：“现在外面世道很乱，不如在家里。一家子在一起，还安稳点。”

妻子点点头，说：“这样也好。”

邬中和回家后，家里能不能真的安稳，咱们往下看吧。

第十章 难以收场

1960年1月10日

10.1 秉烛夜谈

龙头公社的干部有不少抽出去到别的公社搞社教，经学文没去，纪社长留了他下来协助抓生产。几年下来，经学文对农业生产这套已经挺熟了。

这天经学文在胡同里碰到祖云涛。经学文是龙头镇上少数几个认识小祖的人之一。那年祖如海转业回海源，在县城安下家，经学文还跟他妈车素花一起去看。以后，偶尔间还有过书信往来，因为经学文对大学生是从心里羡慕的。

“哎，今晚没事吧？没事，到我家来坐坐吧，正好我老婆领着孩子回娘家了。”学文说。

当时在海源要找个非农业人口的姑娘当媳妇是挺不容易的，要不怎么连纪社长、宗书记都停了那么多年。经学文最终是娶了个龙头镇北邓家庄的媳妇邓明英。这户口就费了番周折。这种情况在农村叫单职工户，按说应该是女方户口落到男方家的村里（这时男方村里是不能不接的，落下后就成了村里的薪金户，以后孩子户口也在村里。到年底，生产队分配后，由男方出钱买队里分给老婆、孩子的口粮、柴草等，所以叫薪金户）。可经大臣早年在外干革命，与村里早就没了瓜葛。村里一般也不想接，因为多一个人要多分一份口粮，能推就往外推了。女方村里更有理由不接，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要是都留在村里不走，加上以后出生的小孩，那要分的口粮、自留地这些，还有个完么，谁能扛得了。还是西北村好说话，是纪社长找了于村长，邓明英的户口才落在了西北村。（还要继续说明，如果女方是非农业人口，找了个农民，各自的户口都可以不动。他们的子女，户口随女方，也是非农业人口。有中国特色的这个户籍制度，有时还真没法解释它的道理在哪儿。）

经学文原先是和车素花一起住在陶家大院后一进的东两间，要再娶媳妇就太挤了。结婚时，使使劲，出点力，村里再帮一点，毕竟还是公社的生产部副主任，于是在北门外盖起了四间新房。这还是龙头镇第一户在镇外盖的房，尽管紧靠着镇里的最后一排。

小祖也挺喜欢和经学文在一起的，不但年龄接近（经学文要大五岁），而且经学文对社会实际了解很多，不像自己只是从书上、报上看来的。所以经学文叫他去，他也挺高兴。两个都想上进的年轻人，挺合得来。这是又一种意义上的西北村年青一代。

宗书记不愿意跟老时、小祖一起住，早就搬到秦德才的东屋了。小祖只需要跟时编辑打个招呼就过来了。

进得屋子，小祖先跟在西屋的车素花说个话。车素花这一阵也不愿跟人多说，哼哼两声就过去了。

进了东屋，经学文倒上茶水，“炕上坐，炕上坐。”

小祖看见窗台上有个三寸高的小铁人，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呀？”

学文看看西屋，关上房门，悄悄地说：“这是小孩他爷爷来看他孙子，从上海带来的机器玩具，上了发条会自己走路呢。”

“噢，试试看。”小祖饶有兴趣地说。

学文在小铁人的背后上了发条，放在炕桌上。那绿铁皮的小邮递员真的晃晃悠悠地走了起来。两个年轻人都哈哈地笑了。

收起了小铁人，学文问小祖：“你这个工作队员，感觉怎么样？”

“感觉多啦，一言难尽啊。前所未见，闻所未闻，决不是在学校里课堂上所能知道的。”

“我听说很多村干部意见很大，觉得太冤屈了。革命了几十年，怎么一夜之间当成敌人对待了，思想上都受不了。”

“参加了这次运动，也使我想了很多。很多问题一直想不透，也想不通。比如就像你刚才讲的，当初民主革命的骨干、领头人，现在搞社会主义革命怎么成了革命的对象呢。”

“是啊，我也在想，我们革命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啊。”小祖顺口就能答上。

“那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呢？就是现在这个样吗？”

“社会主义简单讲，应该就是在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共同劳动，共同富裕，人人平等，个个自由发展，心情舒畅。是一个我们所理想的社会。”

“民主革命的胜利，打倒了地主资本家，到1956年已经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什么在这之后，反而斗争越来越激烈，矛盾越来越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呢。至少西北村就是这个样。”经学文说。

“这里大概出了什么问题。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显然不能再延续以前的斗争方法，不能再这么一搞就是你死我活，对人伤害这么深。更何况，我们连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全部完成。”

“你可能想到点子上了。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性质、环境、目标已经完全变了，而我们的思维模式、工作方法却还没有变。在政治上，只讲专政不讲民主。经济上，只有国家垄断的计划经济，没有发挥市场的作用，用政治斗争代替市场竞争。1958年的大跃进，明明是搞生产，却是用革命战争大兵团作战的方式，搞人海战术。这次社教，是场政治运动，用的也还是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一个公社就来几百上千个工作队员。为什么不能有些新办法呢？”

“新办法？”小祖在沉思，“要有新办法，首先就是要对社会主义有新的认识。社会主义应该是个富裕的、民主的、文明的社会，是个道德和充满美的社会。不应该像现在这样你斗我、我斗你的，没有起码

的民主和法制。”

“现在这个搞法，叫人担心啊。人心都散了，各人都在保自己，生产更没人操心了。而且有话还不敢讲，明知道是不对的办法，还都要照着去做。整个社会没有一种自我完善、自我调节的机制。”

“你说这运动再这样搞下去，会怎么样呢？”

“你问我，我问谁啊？非得等到矛盾积累多了，问题实在大了，才会出来调整政策，纠正一些过分的做法。就像1959年，明知已经搞过头了，还要反右倾。非得等到1961、1962年，闹出了大饥荒，再来纠错、甄别。”

“但愿如此吧。”小祖显得很没有把握了。

10.2“还有几天啊？”

春节后。

风云又变幻了，不但纪社长看不透，连宗书记这样的政治老手也把握不住了。

联络员经大臣来龙头工作队传达了上面新的精神。

老经这次回海源，也是有点心神不定。1963年摘掉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甄别回上海。组织上还不错，原单位不想去，安排在了华东局调研处当副处；淮海路原来的房子有人住了，就在西郊公园那儿给了半套别墅（副处职务、正处待遇）。那个条件，是大多数上海人几辈子也不敢想的。小莉也自己回来了。最气人的就是小莉，算什么呢？大难临头各自飞，有了好日子又不请自来。唉，老经觉得过得没意思，也推不出去。省得多啰嗦了，就这么过吧，谁叫自己当初走了这一步呢。正巧这次运动，机关的试点在海源，他当然成了派出去的第一人选。他自己也想去，不过不是为了车素花，而是想躲开小莉一阵子。

来到海源，工作团总部本来是安排他在龙头的，他自己要求换个地方，于是就担任了团部的联络员。不过，他没有来看过车素花一次，说是要回避。对这场运动，他是看得很开了。无非是因为前几年的失误，给群众和基层干部带来了伤害，下面有了点怨气，结果当政者不仅没有歉意，反过来再来一巴掌，看你服不服，还取了个名字叫“社会主义教育”。当然这是他的看法。因此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和变化，他也觉得毫不奇怪，全在意料之中。毕竟是在上层机关待的，见识多了。

这次他来龙头传达的是，运动已经到了后期，要进行政策落实、组织落实。工作队但处长看了文件，许久没有言语，又自顾自地苦笑起来。可能是觉得老经还不是那种面目可憎的“左派”，有些话可以对他说，就说了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又要落实啦。”

老经往外走的时候，正好叫纪社长看见了。纪社长悄悄地用手比划着叫他过去。

老经进了屋里。

“你们要走啦？还有几天啊？”纪社长问。

“快了，估计最多再一个月吧。”

“搞了半年多了，有头没尾的，怎么一下子又要走呢？”

“原单位又要开始搞新的运动啦。”

“啊？这个还没结束，新的又要开始啦？什么运动啊？”

“文化革命。”

“你们既不是教师，又不是演员。文化革命，该你们什么事？”

“你有所不知啦。只怕是，文化只是个旗号，革命才是真的。”经大臣答道。

“还要革什么命？”

“社教运动搞得这么厉害，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还产生了新的问题。”

“又会有什么新问题？”

“这社教本来是要解决四不清的问题，这四不清不怎么提了，又有了新的提法，要重点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是的，是的。”纪社长说，“我在看‘二十三条’的时候，也注意到了这句话，还捉摸过这到底讲的什么意思呢。而且文件里还是用了个‘整’字。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么，订几条杠杠出来，大家对照着办，不就行了么。还要来个‘整’，干什么呢？批评，也是整；处分，也是整；骂，也是整；打，也是整；这含含糊糊地，算是怎么回事？”

“这里面的意思就深啦，这远远不是用来对付四不清的问题啦。”

“那又有什么问题呢？”

“本来社教是要解决资本主义势力抬头的问题。现在看来对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势力以及如何解决，产生了分歧。反过来说，也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到达社会主义有了分歧。”毕竟经大臣是在上层机关的，讲起来要深刻一些。

“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看法，很正常么。花点时间，坐下来商量商量、讨讨论论，不就行了吗。还非要这么大动干戈不可？”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认识上的不一致，只是表面的。只怕是党内个人之间有了更深的分歧。”

“这可是个大事哎！到底谁跟谁有分歧啊？”纪社长虽然也长期担任行政领导，但对高层事物还是少了解。

“这个不好说。但是，我很忧虑，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感觉。我们党内要出大事，决不是针对村党支部书记那样的事。说不定，是比彭德怀还要大的大事。至于以什么形式爆发，谁都不知道。”

“啊？！怎么会搞了这么多运动，反而问题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大呢？”纪社长大惊。

“小声点。这就是指导思想的问题。多年来，党内有个思想，很极端。有了分歧，就非得来个你死我活。从来没有个相互间的调和、妥协、退让，更不用说求同存异这些了。都是党内同志，都是一起出生入死走过来的，每次都要搞成那样，心痛啊。唉，不说了，等着看事情的发展吧。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啊。到此为止，到此为止。”经大臣连忙制止，结束了谈话。

纪社长还没答话呢，老经就已经匆匆走了。

10.3虎头蛇尾

但处长在陶家大院开了个工作组长会，宣读了有关精神，重点是做好干部处理和班子安排两件大事。干部处理，总的原则是批评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各种四不清问题，要干部自己认可。

“我以前讲过了吧？搞运动既要积极，又要慎重。干革命，心要热，头脑要冷。要落实了吧？这回是不等运动结束，就要落实了。你们自己搞得一团糟，现在好了，你们自己拉的屎，你们自己擦。拿你们西北村来说，宗发奋啊，前几天我还跟你说过，搞得那么大、那么多，怎么收场啊？定了那么多‘分子’，是戴啊，还是摘啊？怎么向本人解释？怎么向群众解释？都是你自己找的。”

“这些都是有供词的。我们都做了大量的过细的工作。材料都写了那么多。”宗发奋用手比划着，还在辩解。

“有于继承亲自写的吗？有彭乐宾亲自写的吗？”

“我们都有谈话记录。”

“你们那谈话记录不能用来定性。没有本人签字画押，没用。”

“再叫他们按上一个手印就是了，这还不好办？”

“你怎么还没转过弯来？现在已经不讲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了，而是说干部的多数是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你把西北村的五个支部委员都搞下去了，都贪污那么多，没有一个好的了。”

“那都是他们自己交代的。”

“自己交代？谁相信？于继承私藏贪污一万斤粮食？你不想想，这一万斤粮食，他家里能放得下吗？你家里能放得下吗？”

下面哄地笑了。

宗发奋扭着头。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他们是在逗你玩。知道总会有落实政策的一天，就往多里说。私藏一百斤，可能是真的；私藏一万斤，肯定是假的了。你宗发奋自己觉得挺聪明，还真上了当。”

“那怎么办？”宗发奋问。

“怎么办？你自己去办。上面说了，谁拉的屎，谁自己擦。反正是要按照党的政策，实事求是。”

在几番激烈的争辩之后，新的西北村领导班子出台了。杜家骏任村支书、大队长，鲁队长任副手，所有的贪污、私藏之类的经济问题都一风吹。

鲁队长以前管的是民兵，跟经济没太大关系，跟运动也没关系，而且是“民兵英雄”，所以社教运动没找到他头上。

包金贵被迁了回来，但是没戴帽子，又塞到场院边的那间破屋子。皮安己当然更戴不上了。

最难的是对于村长的处理。于村长的所谓经济问题，也是一项也落实不下来，可总不能一点东西也没有吧，那西北村的运动不就白搞啦。他宗发奋再怎么在龙头镇待下去呢。

最后的结论是：“于继承同志，过去对革命有过功劳，但近年来思想僵化，行动落后，认识水平跟不上形势，对社教运动有明显的抵触情绪。组织处理：撤销党内外职务，暂缓登记，以观后效。”（暂缓登记，是一种组织处理办法，即：对被认为是犯了错误、不够党员标准，但还有教育余地、有拉回来可能的，在一段时间内停止党籍、不参加组织活动，待改正错误、表现良好、群众认可后，再恢复党籍。）

但在宗书记向于村长宣读这项处理意见时，于村长跳了起来，大叫：“我没有落后，是你们搞逼供信，是你们搞法西斯！彭会计是被你们活活打死的，我都听见了。这笔帐早晚要算的！”

宗书记听了，汗毛都竖起来了。他要求调离龙头镇。但文革的风潮已起，干部调动冻结，办不起来。还是纪社长帮他把老婆柏惠珠调到龙头供销社当售货员，就已经很不易了。

于村长还真向公安部门报了案。一个月后，县公安局来通知，说是证据不充分，不予立案。当然这里面也有维护社教运动的因素考虑在内。

秦德才的贫协主席，本来就没人提，运动之后，更没人提了。不管是政府还是社员群众，既没有人说解散，也没有人再说起这主席的事。

10.4社教后遗症

四月的时候，工作组撤了，说是各人要回原单位参加文化革命。匆匆地走了，留下了一地鸡毛。材料烧掉了一大批，主要的交给了公社封存。很多问题最后都没有向大家、向本人交代说明清楚。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都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工作组是离开了运动现场，但是运动并没有结束。遗留的和暴露的问题，都扔在那儿。更还有一些原本隐含的问题，被捅破了皮，在感染、发炎和鼓脓。

这些问题，有的是在农村基层。很多农村基层干部在这场运动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们不只是人格受到损伤，经济遭受损失，有的家里粮食、家具、用品被抄走，有的挨骂挨打，甚至上刑逼供，组织上又被错误处理，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压抑。很多人弄不懂，对1958、1959年那样的穷作胡闹瞎折腾，造成经济崩溃、出现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的严重灾难，不去说一句话，反而对农村基层干部却这样的小题大做。很多人想不开，为革命辛辛苦苦几十年怎么被这样对待，像对敌人一样地往死里整。实际上，社教运动把农村基层干部一律当作是整肃、清理、甚至打击的对象，确实是很不公正、很不合理的。

很多农村干部为此而深深地怨屈、不解和忿懑，有的人竟然就此选择了绝路。举个有明确记载的例子是：“陕西省长安县在运动中共发生自杀事件182起，154人自杀身亡，28人自杀未遂。”（请见：《“文革”前夜的中国》，罗平汉，人民出版社，2007年。被打死的尚不在内）。长安县，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社教试点单位，也是笔者就读母校人民大学时，人大师生参加社教的三个地点之一。笔者去的是湖南湘潭，是中共中央中南局的试点单位。该书还记载，连人口稀少的甘肃省张掖地区五个县，还自杀了212人。而海源全县在八个月的社教运动中，被打成“四不清干部”的有28101人，致死306人。

至于全国的数字，据资料，1962至1965年全国范围的城乡社教运动，有532万人挨整，死亡（被打死和自杀的）77560人。这个资料，有一点想特别加以说明。笔者一直想以正式出版物作为资料来源的依据。所以，当在网上看到这个资料时，并没有想要引用，只记了数据，而没有记来源。但以后尽管查了很多资料，却没有在正式出版物中找到更具体的社教运动期间全国死亡人数的数据。等再回过头来找这个数据的出处时，也找不到了。所以，这个资料只有数据而无法提供出处，仅供参考，特此说明。

社教运动，是在全国农村试用了处理上一卷卷尾语中所提的信阳事件的思路，由于被认为是刘少奇的干扰，而没有达到毛泽东需要的效果。那就再用处理信阳事件的思路，来个更大范围的针对上下各级领导干部的运动。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初由来。当然，必须说明的是，本书不是政治学专著，不想全面分析文化大革命的成因。比如，反修防修的问题，本书就基本没涉及，其原因在本书开头的序言里已经讲了。

当一年后，刘少奇在文革初期再次按搞社教的办法派出工作组时，毛泽东的反应就可想而知。

回想起来，毛泽东最早提出要搞社教运动是在1963年。他在为《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所作的批语中写道：“……那就不用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在这个批语中，他还写道：“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请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六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然而，当这一次教育运动收摊之后，全国并没有出现事先所讲的那种欣欣向荣的景象，相反却是出现了遍地哀鸿、十年浩劫的实实在在的危险情景。在笔者的记忆中，在毛泽东描述反革命复辟危险情景的那段话里原来还有一句：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现在的出版物中没有这一句了。出版物中是没有了，但在随后的文革中，却真的是不知有多少人的大头落地了。

不久之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海源又是个重灾区。两派严重对立，武斗血腥惨烈。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社教运动的后遗症，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节文字，没有场景，没有情节，基本上是在论述，这还是小说么？是的，是有这个问题。笔者就想探索一条把本书写成既有叙述、又有论述，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学术价值的创作路子，采用“小事件，大背景；小人物，大手笔”的写法。把西北村、龙头镇发生的小事情放在整个社会波澜壮阔的大背景中去

写。没有后者，这些小事情既是不足道的、更是说不清的，没有多大的意义。当然如果只写大背景，那就真的不是小说了，不是本书的意图了。至于是否做到了，是否做好了，敬请读者朋友们指正。

第十一章 山雨欲来

1960年1月11日

11.1“秋后算帐”

文革还没来，这后遗症已经先冒出来了。

工作组走了，可事情并没有完。于村长仍然是忿忿不平，带着他的儿子、孙子们，找到了秦德才、储小二两家的门上，要讨回被搬走的东西。于村长的儿子于震祥，今年四十了，因为一直有于村长在前面顶着，在家里不怎么主事，在村里反而很低调。孙子于又发，十六岁，还在上高一，可是勇猛得很，和他爹不一样。

爷孙仨先上储小二家。储小二一见来意，倒也爽快，马上投降，“不就是一张桌子吗，我一直没用，放在这儿也碍事，拿去吧，拿去吧。当时不是宗书记说，我还真不要呢。”红木三抽桌，又抬回了老于家。

爷孙仨又到了秦德才家。

秦德才正在炕上躺着呢，心里也不舒服。革命了几个月，跑了不少腿，出了不少力，怎么一下子就像气球撒了气，瘪下去了呢。我这是算干了什么呢？听见窗外嗷嗷地叫，还没等下炕，老于家的爷仨已经进了屋。

“姓秦的，你拿我家的钟、我家的衣服、我家的粮、我家的自行车，一样不少地交出来！”于村长在激愤之下，声音还真洪亮。

“你们这是干吗？这些都是工作组分给我的。你们要秋后算帐啊？这秋，秋天，不是还没来吗？这就上门来啦，你们也忒猖狂了吧？”

“秋天？还用等秋天？老子说哪天来，就是哪天来。”老于头也不顾当了几十年干部的修养，只管大声地嚷嚷。

“爷爷，不跟他罗嗦，拿！”说着，于又发就搬起了桌上的座钟。

“咳，要抢啊。”秦德才从炕上跳了下来，抓住于又发的衣领。

那于震祥平常话不多，可这时朝着秦德才就猛挥一拳。立马秦德才就摔倒在炕边，血从嘴角淌出，杀猪似的乱叫着：“打人啦，打死人啦！”

于震祥还不解气，吼着：“那件呢制服呢？”

秦德才只顾着“哇哇”直叫。于震祥一不做两不休，一脚就踢翻了桌子，抽屉里的东西哗地倒了一地。

秦德才坐在地上，拍手拍脚地嚎啕大哭。

窗户外渐渐有围上来看热闹的人了。

于震祥只顾着翻找，看见不顺眼的东西就一脚踩扁。

杜家骏闻声过来了。他是真不想来，两头哪一头都不好说。但是又刚公布了新的村支部书记，村里有这样的事又不能不来。

“于村长，你消消气，这些当初都是工作组定的，咱慢慢解决。”

于村长觉得杜家骏在运动中没有坚持原则，没有坚决斗争，当了滑头，只顾自己少遭罪，就瞎承认，不说是叛徒也差不多，全村的工作却受了损失，让秦德才这种人钻了空子，所以对杜家骏也有意见，便说：“工作组最后也没说我有经济问题，这些被拿走的东西当然要物归原主，一样也不能少。”

“秦德才，你就把那些东西给于村长吧，留着有啥用呀。座钟，已经在这儿了，还有一件衣服，是吧？衣服呢？”

“衣服我已经卖了，卖了十块钱，吃了。”秦德才哭丧着脸说。

“什么啊！”于村长从来没有这么发怒，“啪！”的一巴掌，把刚站起来的秦德才又打到了地上，两颗牙都和着血掉了出来。老于头还真没动手打过人。

“你这畜生！这件衣服是1944年我们从日本鬼子手里拿下龙头城时，县长亲自从战利品中奖给我的。我一年也舍不得穿一次！”

于震祥气得又猛踢了一脚。秦德才今天可是吃了大苦头，满地哇哇直叫。杜家骏怕出事，赶忙拦住。于震祥气犹未尽，跳上炕，啪啪两脚把窗棂全踢烂了。

一下子看见窗外院子里站满了人，还有人在叫：“好！好！”

于村长对儿孙俩一声吼：“走！”没看杜家骏一眼就径直走了。人群自然闪开了一条道，于又发捧着座钟、背着个包袱跟在后面，于震祥则是从窗户跳了出去。

“这儿还有辆自行车呢。”迟得法的孙子迟解放到是心细，见院子里有辆车，知道是从于家搬来的，便嚷了起来。

于震祥见了，手一伸，都没谢人家迟解放，把车大梁扛在肩上就走了。

老于头一家的行为，就政治运动来说，那真是属于“反攻倒算”了，绝对不许可的。但那时，工作队的人已经走了。宗发奋虽然还在本公社，可他的心事已经不在这上面了，他在忙着琢磨即将来到的新的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对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该采用什么对策。他也看到了窗外已是山雨欲来。他在掂量着，是该关上门躲起来，还是干脆走出去，把别人家的窗给砸了。所以，老于头的动作，虽然他听说了，却没去管。

当需要用暴力来维护被另一种暴力夺走的自己正当利益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可悲可忧了。

这才是西北村社教运动结束后激起的第一朵浪花。

11.2风雨前夕

社教工作组走了，运动结束了。可西北村的空气没有缓和下来，人们的相互关系还很紧张。谁都在惦记着运动中谁在背后说过我什么话。即使没说，也惦记他在背后是不是可能说过我什么话。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都在提防着什么时候谁会再来咬我一口。

鲁队长在想，往日相互间挺平和的乡亲们怎么就这样了，不能老这样下去吧。地里的活也散了摊，没有正经人去招呼。虽然生产队长们都官复原职，可劲头全没了。春天已经来了，往常该是很紧凑的农活，今年可是稀松。时不我待啊，鲁队长心里很着急，觉得在这场运动中，自己没怎么挨整，也没去整过别人，有些话可能好说些。他想找受过伤害的那几个人去聊聊，解解疙瘩，队里的活总还得搞起来。

吃过早饭，鲁队长跟哈妹说，想去找几个人聊聊。哈妹不乐意了，“管那些事呢，没找到你头上就不错了。”哈妹原本也不是这样的人，看看那几个村干部的结果，再热的心肠也凉了。

“大家都躺倒不干，集体的事怎么办呢？吃了几年集体的饭，就为集体想着点吧。顾不上这么多了，还能再来次运动？”

鲁队长说着，披上件褂子，出去了。

鲁队长先来到于村长的家。老于虽然不当干部了，可大家都还有几分敬畏，还是叫老村长。

“村长啊，干吗呢？”鲁队长进门就先吆喝上。

于村长正在灶头盛稀饭呢，见鲁队长进屋就说：“哎哟，来福啊。真不简单，从运动开始到现在，除了工作组和秦德才来找茬，你是头一个来串门的。”

“运动过了，也该串串门啦，在家里不憋气吗？我是憋气，出来散散心。”

“你憋什么气？运动也没搞到你，你真是来福气啊。”

“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重新开始过日子吧。”

“过去了？你过去了，我可没过去。挨整白挨啦，挨打白挨啦？”于村长一提起这些，气又上来了。

“老村长啊，我知道你这次是受苦了。可是运动就是这个样，党不是给你落实政策了吗？”

“党的事情，我不记恨。但那个宗发奋我是记恨，搞的什么东西？不是去发动群众，而是发动秦德才那种王八蛋。我看他不像个共产党的干部！”

“宗发奋不是也没落得好吗？听说省里的那个但处长把他骂得一愣一愣的。”

“活该！光骂就行啦，应该撤职处分！”于村长越说越来气。

“别，别上这么大的火嘛。你在这喝着稀饭，我再去看看老杜。”

“老杜？我算看错他了。弄了半天，自己先转身跑了，没有的事先招认了，给别人造成多大的被动啊。他自己不知道吗？这种人算不上英雄好汉。”

“他也是没法。可他没有去瞎说别人，这我知道。他瞎说自己贪了几千斤、几万斤。最后工作组反而没法落实，反而是把大家的都一风吹了，不挺好吗？”

“那他倒反而是有功了？”老村长难得地笑了下。

鲁队长出来去找杜家骏，胡同里碰上了平金刚。

平金刚正扛着锄头要上自留地呢。工作组要取消自留地，说那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可话说了两个月，地也没收，工作组倒是先收摊了，所以各户自留地还是照常种。

“你这生产队长啊，还得领着干啊，八队的社员全都指着你呢，”鲁队长拍着平金刚的肩膀说。

“领着干？叫谁领着干？叫秦德才那杂种领着干吧。”平金刚的气更大。他平常话不多，但一说起来能砸死人。

“他不也是没捞到什么好处吗。”鲁队长劝着。

“他还想捞好处？下次见到他，看我不砸死他。”平金刚依然愤愤地说，真是使劲把那锄头狠狠地往地上砸了下。

“可别这样。时间还长呢，斗争还多着呢。往长远看，别使笨方法。”鲁队长这几年学长进了，“我先往前走了。”

鲁队长去找杜家骏，没在家，唐玉贞说他已经去大队部了。

“现在，家骏身上担子重了，嫂子也多受累，多辛苦了。”鲁队长说。

“嗨，我倒是没什么。他那活儿，也是没法子，推不出去。”唐玉贞客气地说着。她是个识大体的人。

鲁队长也往大队办公室去。路上，鲁队长又碰上了纪社长。

纪社长问：“在忙什么呢？”

鲁队长说，去找了队上的几个人聊聊。社教运动也结束了，大家把气消一消，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别耽误了地里活，耽误了队里的事。

“难为你有这个心啊，”纪社长说。

“哎，潘营长那儿有信来吗？赵玫不知到了新疆没有？差不多快一年了，也没有个准消息，”鲁队长一直牵挂着这事。

“潘营长前段时间有信来，没有明说，但看得出来意思是有这回事，就说他会尽量安排好。又说现在形势很复杂，以后信上不要提这个事了。我也就只好再问。”

“她能到那儿，见到她男人就好。要在这儿，这两次运动要够她受的。”

“来福啊，这次文化革命不比寻常。要多提防，少说话。”

“哎，哎。”人家社长能把话讲到这程度，鲁队长心里就挺感谢了。

鲁队长到了大队部，还在门外就看见杜家骏拿了好几张报纸正低头哗啦哗啦地翻。

“哎哟，学习时事政治还这么认真啊？”鲁队长先打上了招呼。

“什么学习时事啊，在家烦死了，出来散散心。”

“事情都过去了，你都当上了一把手了，还烦什么呀？”鲁队长知道杜家骏为社教的事心里烦得很，先就劝上了。

“都他妈的弄得什么景。”杜家骏在鲁队长面前不掩饰什么，气得把手里的报纸往桌上一摔。他对社教运动也是一肚子气，大概仅次于于村长，尽管他表面上还没去怎么顶。

“现在春耕快要开始了，不得去管管呀。”

“唉，真不想去管，当这干部当出罪名来了，谁还去管？不管吧，又要说你对运动有抵触情绪。你说这日子，怎么过？”

“看在乡亲们的份上，看在全村五、六百口人的份上，你就挑起这副担子吧。我们再不干，平金刚他们气更大，这全村的事，就转不下去啦。”鲁队长很诚恳地说。以他和杜家骏的关系，他想，他的话，杜家骏是听得进的。

“唉……”杜家骏又一声叹气，“说的也是啊，时节不等人。可是……”杜家骏讲了半句，又咽了回去。

“还有什么难处啊？”鲁队长关心地问。

不料杜家骏倒笑了起来：“嘿，嘿，家里面这一关也难过啊。你嫂子就不让我再干了。”

“哦，嫂子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我刚从你家里来，很支持你工作哎。不像我家里那位，跟我真吵，说退赔抄家时那个板凳还没拿回来。我说那板凳就算啦，人家彭会计人都没了，这账就不能细算了。”

“是啊，彭小宾那儿，我们以后还要多想到点。”

“我看彭小宾那小子行，还挺坚强。”

“坚强好啊，坚强好啊。”杜家骏若有所思地说，手一松，那些报纸哗哗地流到了地下。

鲁队长弯腰过来，一起拾起报纸，问：“最近有什么消息？”

“多啦，多啦，都看不懂啦。”杜家骏边理着报纸，还直摇头。

“前两天，报上说，是要批‘三家村’，这两天我没过来看，现在怎么样啦？”鲁队长问。

“整篇都是，整篇都是，都在讲这个事。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杜家骏答。

相比较起来，鲁来福看的报纸、认的字还多一些，他就解释起来：“‘三家村’就是北京市的几个领导，有市委书记邓拓、副市长吴晗，还有个叫廖沫沙的，一共三个人，在一起写文章，讲社会的阴暗面，被批判了。”

“吴……吴晗，头年前不是批判过他了吗？说是他写了‘海瑞罢官’，是要为彭德怀翻案。这两件事，能连在一起吗？”杜家骏想起来了点，又问。

“唉，连不连得起来，不就连起来了嘛。”鲁来福也是心有疑惑，说不清楚。

“这还没完啊，还要批啊。批什么呀？”

“事儿大啦，说他们讲毛主席不好。”

“唉哟，这事情真是严重了，那会是个什么结果呢。”

“结果？事情只怕是刚开头啊。”

“啊？北京的市委书记、副市长都批了，还能再批谁啊？”

“这就不是咱说得清的了。这一阵子，嘴要紧一点。在外面，不要多说。”鲁队长点着头，把刚才纪社长对他讲的话，又认真地对杜家骏说。

“是啊，是啊，我看公社院子里气氛也不一样了，一个个都紧溜溜的样子。”

11.3灾难逼近

1966年5月公社大院里的气氛，还真不一样。

这是因为整个宏观形势的气氛不一样了。报纸上，天天是在大批判，批判的调门越来越高。从前一、二年开始，一部部电影当成大毒草被拿出来批判，有《早春二月》、《林家铺子》、《舞台姐妹》、《北国江南》、《红日》、《革命家庭》、《聂耳》、《怒潮》、《不夜城》、《抓壮丁》、《兵临城下》、《武训传》等等一大串。村里人、镇里人、连公社的干部们愣是没看出多少毛病来。

这一年来，又转向了对理论界的批判。比如，发起了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和孙冶方“市场经济论”等等的批判。最热闹的是史学界，文章可多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和戚本禹批判太平天国李秀成的文章，都上报了。也知道这些文章话里有话、甚至话外有话，是有所指的，但没有想到他们会一直指到最高层，没想到是一场大风暴的前兆。终于批到了“三家村”，批到了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头上。谁都能感觉到，一场空前的政治斗争运动已经逼上来了，打破了所有人的善良愿望和平静的心思。

也有人暗自高兴的。宗发奋就是一个，他的心里又热乎起来了，不像上个月社教工作组撤走时的那种灰溜溜的感觉。“啊呀，这时代真好，又要大革命了。”他在想，他的机会又要来了。

“你看，你看，正在批判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哎！”他在对纪社长说。那神情好象下一步就要轮到纪社长挨批了。宗发奋当然是希望这样了。那不就腾出一把手的位置了吗。宗发奋在自己的位置上已经干了好几年了，一、二、三……他开始掰起手指头数，都数不清楚了，便愤愤地甩下了手。

纪社长还以为他在数北京市委有几个书记处书记，就说：“还有刘仁、万里、郑天翔呢”这几个人那一阵子也成了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名字。

“不光是他们几个，恐怕连那个……那个老革命也不行了唉。”宗发奋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故作神秘地眨了眨眼，还在卖着关子呢。他是搞政治的，比别人掌握更多的有关时局的信息。“你们可不要小看我哦”，这是他的潜台词。

但是，纪社长没有多在意这些，淡淡地说着：“那就等着看中央文件吧。”没停下步，径直走了。

宗发奋在心里“哼”了声，往前到了第二排房。见经学文拿着几份材料刚开门出来，便靠近了问他：“这几天，你还看报纸啦？”

“看啦。”经学文有点奇怪，平常宗书记是不大跟他说话的。

“看出什么来了吗？”

“好象斗争还挺激烈，阶级斗争这根弦，看来还不能松。”

“是啊，不但这根弦不能松，还要认准方向，不要站错队、跟错人。”

“是的，是的。”经学文大概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不由停住了脚步，认真地听了起来。

“要接受过去的历史教训啊，在政治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差一点儿也不行啊。”

“是的，是的。我得好好向你学习，你要传授点经验给我哦。”经学文也听出点意思来了。

“那好说，好说。”宗发奋看出来大的的风浪要来了，这种时候，周围是要有几个人的。

“宗书记，我先走了。”经学文其实也并不想多停留。

宗发奋看着经学文空的屋子和往外走的背影，想往地上吐口痰，没吐出来。他知道这些人都靠不住，可是风浪即将来临，他要有所准备。他想起了东门外的中学。

搞文化革命，批判资产阶级，肯定会有中学的事，那儿肯定会是一大战场，最有可能搞出点声色，他要去提前布置一下。

他骑上自行车进中学的时候，正是课间休息快要结束。满操场的年青学生，嘻嘻哈哈，蹦蹦跳跳，一群群地往教室走去。这种青春，这种热情，已经感动不了宗发奋，他往校长办公室径直走去。

龙头中学有个变化，就是新来了个姓石的副校长。因为县教育局嫌这儿的校长肖福兴魄力不足、精神不振，拿掉又没有更多的理由，所以派一个来作为帮手。而且这也是公社的宗书记多次去教育局反映肖福兴不行的结果。

肖福兴近些年来精神上受了两次大的打击。最大的一次是1957年的反右。虽然被打的是李辰，但他知道自己对不起别人，对不起良心，有种深深的负罪感，压抑得他常常喘不上气。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甚至李辰已经从劳改场重新回了家，也不能使他的心病有所减轻。还有那次对赵玫的试探，自己觉得尽失颜面，尽管没有人拿这笑话过他。他渐渐地都很少出学校了，甚至见到自己学校的教师们都有种局促不安。他想退都无处可退，龙头中学是他人生最后的一个壳。等退休，还得十多年，打报告辞掉校长的职务，局里还是挺客气，没让。听说程贵安要把他拿下来，可局里的一、二把手都没同意，程贵安为此还气得不得了。既然如此，自己也要打起精神，别对不起局里的主要领导啊。正好局里也派来了石副校长，很多事可以交出去，自己也可以省心了。

刚来的石校长，石向上，今年36岁，正是人如其名，为人行事，一丝不苟，毫不马虎，总想把事情做好。他不是正规师范科班出身，是本县北山人。北山，可以是泛指，指本县的北部山区；也可以是专指北面的那个北山乡，此处是泛指。他是一个很纯朴的农家子弟，在解放区的小学、中学，一直念上来。中学毕业就当老师。除了教好书，没有别的心思，石向上就是这样一个人。天份不一定很聪慧，可工作就是努力，所以年年受表扬、评先进，上升得也挺快。这不，在北山当了四年的教导主任，就上这儿当上了副校长。

宗发奋骑了车进来，两位校长还正好都没课，在办公室里。

石校长见宗发奋来，忙起身让座，“宗书记，您来啦，请这边坐。”很是客气，其实宗发奋比石向上大不了多少。

按说公社党委对中学，要管也能管，不管也讲得过去。中学的行政关系在县教育局，党务关系在公社，但布置工作主要还是教育局这一头。不过，宗发奋从来认为这中学是在他的管辖范围，而且还是相当主要的一块管辖范围，所以他常来，而且是大大咧咧地来。

面对石校长的客气，宗发奋很有领导风度地摆了摆手，“不必啦，不必啦，现在阶级斗争态势很严重。批判资产阶级，你们学校是重要阵地啊。县教育局有没有什么布置？”自己随手坐下。

石校长看了看肖校长，想让给肖校长说。

但是肖福兴没动，他对宗发奋早就看透了，没有多少兴趣说话。

石校长只好接上去说：“是的，是的，当前中央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我们要高度重视。不过县局倒是还没有下来具体任务。”

“这样的大事，怎么还不具体安排啊？”宗发奋做出不满意状。“我们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可不能无动于衷噢。”

“是的，是的，我和肖校长正打算安排教师们认真学习。”

“嗯，不但教师要学，学生也要学，要专门拿出半天时间，开大会，造声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宗发奋开始说得来劲头了。

“这个，要是停课开大会，是要跟县局说一下的。你说，是吧？”石校长转过头，跟肖校长说。

肖福兴这时推不掉了，说：“是啊，在我们学校，停课是个大事。不象生产队早点晚点收工，都没人管，这儿可不行。再说，不能影响学生学习啊。”

“这怎么能行呢？这不是在大风大浪面前，变成死水一潭了吗？这不是跟北京市委包庇吴晗同样的问题了吗，不能用上课抵制革命大批判吗。”宗发奋变得生气起来。

石校长见状，忙说：“宗书记，您别急，课也要上，革命大批判也要搞。我看这样吧，咱们先在教师里进行发动。您的政治水平高，到时请您来给我们作个动员报告。这样老师们也受到了教育，工作也搞起来了，我们再进行下一步，好吗？”

宗发奋虽然喜欢做大报告，在大会小会上讲起来也是一套一套，但那是对村干部、对老百姓讲。粗话、俗话、套话、不着边际的话，往外讲就是了。这真要对那些老师们，好歹大小也算是个知识分子的人讲，而且是讲意识形态的问题，宗发奋自己知道揽不下这个活，也就泄了点气，说：“这个嘛，具体工作，你们自己去搞吧。我只是来提醒你们，要重视这个问题，不要说党委没说这个问题。”

“是的，是的，好，好。进行到哪一步，我们一定会来向您汇报的。”石校长说。

宗发奋起身走了。

石校长依然客气地说：“宗书记，您这就走啦，不多坐会吗。”

“我这边的事儿还多着呢。”宗发奋一边往外走一边说着。

“宗书记您真是关心我们学校，您来个电话就行了，或者喊我们过去，不用辛苦您跑了。”石校长送到门外。

宗发奋骑车走了。

肖福兴只是抬了抬屁股。

宗发奋对走这一趟，很不满意。看来姓石的那小子，也不是个敢于冲锋在前的积极分子。就凭他们两个，这以后，中学的文化大革命还不知道是怎么个样呢。

再去找谁呢？那只有找村里了，各大队才是他的基本阵地，刚才瞎跑什么呀？想到这儿，他又马不停蹄地朝西北村来了，那是他熟悉的地方。

进到大队部的院子，就听到里面的声音。那是衣春玲在跟杜家骏争辩。

西北村的团支书原是彭小宾，当了多年了。他父亲彭乐宾在社教时成了“四不清干部”，还“畏罪自杀”。虽然大家心里都明白，但是材料里还是这么写的，只不过“贪污”的数字不像宗发奋、秦德才讲的那么多。彭小宾自然也就不适合再当团支书。他自己也决不会再去当这个团支书。谁来继任，工作组直到离开也没有找到合适的。白云推荐由衣春玲来担任，但是衣春玲本人不同意，不想接这个手。工作组临走，叫村里继续做做工作，动员衣春玲接下来。现在，杜家骏把衣春玲找来，就是这项工作。

衣春玲这个人，积极热情，要求上进，工作仔细，讲水平、讲能力，当这个团支书是可以称职的。但是，她不愿接这个手。因为她觉得，彭小宾干得好好的，比她强多了，没有必要换下来。更何况，社教运动对他爹的做法是不对的。她深信彭会计是冤枉的，是受害的。彭小宾也是受害的。这个时候，叫自己去顶彭小宾是不道德的，她不想在村里人面前去做这个恶人。

“我知道你的意思，春玲啊，你想的也对。”杜家骏还是在苦口婆心地劝她，“彭小宾是个好小伙，我也知道，全村人都明白。可是他受了这么大的打击，他还有这个心思去干这团支书吗？”

“我知道，他爹出了这事，他还是挺坚强的。没有躺倒，没有骂人。要是别人，早就跳起来，要去杀人报仇了。”衣春玲愤愤地说着，眼眶里似乎有了点莹莹的泪水，强忍在那儿。

“是啊，我想，这事迟早是会搞明白的。”杜家骏也咬着嘴唇，点点头。他的心里，何尝也不是这么想的呢。

杜家骏停了下，调整了下自己的心思，说：“小彭是挺坚强，可是他也明确说了不再担任团支书。这团的工作，总要接着开展吧。从去年冬天到现在，差不多半年了，你们团员一次活动还没搞呢，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吧？”

衣春玲也想到了这么个情况，也就没言语。

杜家骏觉得有点希望了，接着说：“要不这样吧，你先当个团支部的临时召集人，该干的工作干起来。书记的事，等下一步再说。我也跟社员、群众解释解释，这是我们村党支部的安排，要求衣春玲先把工作做起来。这样也好说话一些，可以吗？”

衣春玲听杜家骏已经把话说到这一步，考虑得挺周全，实际情况也摆在这儿，总不能让工作受损失，她没法推辞，又不想明说接下来，就说：“最近这段时间，团里也没有什么事吧？”

“没听公社团委布置什么，你们团员先开个会，收收心，知道社教已经结束了，该开始正常工作了。春耕生产，我看各队都有点松，共青团员该带头还是要带头。”

衣春玲点了点头。

善良的人们，虽然遭到了莫名其妙的打击，虽然心里有种种的怨气，可是首先想的还是集体，还是生产劳动。可是现实又一次冷酷地打断了他们的想法。

宗发奋进来了。

杜家骏和衣春玲说话时，并没有关门。宗发奋骑着车，一直到了门口，所以也就听到他们在说什么。

“没有布置？没有布置什么？”宗发奋进门就开始说不停，“现在的形势这么紧，任务这么重，还说没有事。”

“有什么事啊？”杜家骏对宗发奋，既是感到不舒服，又是无奈。

“批判资产阶级啊，搞文化革命啊。没看报上天天在说，广播里天天在讲吗。”

“喔，喔，那是他们知识分子、文化界的事，咱们种地的庄户生，不明白那些。”杜家骏在推。

“什么？批判资产阶级，是全社会的事，工人、农民都要参加，而且还要带头批给他们知识分子看看。”

“那怎么批啊？”

“开会，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学习大批判文章，要搞清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底放了些什么毒，再开展大批判。”宗发奋看到了衣春玲，“你现在是团支部书记吧，共青团员首先要带头批判。”

衣春玲淡淡地说：“我还不是。”几个月的社教使衣春玲这样的社员对那些干部改变了态度。衣春玲原本是很热情、很积极，甚至是好动的。

“怎么，你们村团支书的工作还没落实？”宗发奋又反过来问杜家骏。

“嗨，嗨。”杜家骏只好尴尬地说：“正在落实当中，我们让衣春玲先当个临时召集人。”

“不管怎么，这批判资产阶级的大事，一定先要抓起来。过几天，我再来检查。”宗发奋知道多说也没用了，也没说具体怎么抓，就走了。

这之后的几天，村里也没去抓，也不知道怎么抓。

但是这文化大革命，却快步地逼上来了。没几个星期，就变成了谁也意想不到的文化大革命。那滚滚巨浪，把每个人都卷了进去。

第十二章 大字报

1960年1月12日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这份大字报言辞犀利，说“要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京大学校党委。

这份大字报的出现，反映了党内高层斗争的一个重大进展，是“左派大将”康生把大字报的底稿用专机直接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作了批示：“伯达、康生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见：《毛泽东传（1949-1976）》，绛先知、金冲及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广播的第二天，《人民日报》还配以评论员文章，高度评价、全力支持这份大字报，说它是一张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是当代的巴黎公社宣言。用词热情，溢于言表。这个过程，本书不再多叙。就整个社会而言，就群众直接感受而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就是这一天，尽管实际上应该是从这之前的五月中下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算。在那次会议上，做出了几个重大决定，有：批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组成新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通过“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改组北京市委等等。这份大字报是这次会议事态的延续。

这份大字报的公开广播，比大字报本身的内容，更有重大含义：它被形象地比喻为“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它突破了被认为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有关大字报内外有别等等规定的种种限制，把斗争从党内高层引向社会，直接向全社会发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号召；是把在文化领域中的理论性批判，转变成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斗争运动；也说明正常的党内分歧，已经无法通过或不想通过正常的方式，而是要采取一种风险和代价极大的极端方式来解决。

从这一天起，到七月末撤走工作组、红卫兵兴起，是文化大革命公开发动后的第一阶段。在这段日子里，文革由过去通常的那种政治运动，演变成了一场谁也意想不到的非常规的暴力运动。

12.1 头一炮

西北村，龙头镇，也不例外。尽管那时，他们还没见到过大字报。

第一个在心里激起浪花的，是李辰。应该说，在他心里激起的不只是浪花，而是波涛了。

林海秀把热腾腾的地瓜干、玉米饼端上了炕，“趁热快吃吧。”炕桌上已经有了一碟咸菜。平时，他们也就是这样的饭菜，能吃上两顿干的，比前些年已经很不错了。

李辰坐在炕边，手里拿了本书，嘴里哼哼点着头，眼睛却一动也不动，显然他是在听墙上的小喇叭呢。

农村里那个小喇叭，对于基层管理可是起着大作用呢。村里有什么事，干部在喇叭里一喊就行了。要批评哪个人，干部就在喇叭里骂上几句，全村人就都听见了。如果事情不严重，第二天，那个人一出门就成了大家取笑的对象；如果是严重的事情，联系到阶级斗争了，第二天，大家就躲这个人远远的。

全国性的事情更是这样的了。别看这小喇叭，天天能传来中央的声音。上面一句话，喇叭里一响，千山万水，千家万户，也立马全都知道了。所以农村里的人，尤其是多少关心点政治的人，这小喇叭是每天非听不可的。

林海秀看李辰听得认真的那个样子，也不奇怪。她知道，李辰是天天这个样。

他们的女儿婷婷，三岁了，长得乖巧可爱，爬过来，拉着她爹的衣襟，喊着：“爸，爸，吃饭啦。”

李辰一反平常喜欢和女儿打闹、嬉笑的劲头，唬着脸，还朝婷婷的身上打了一下。

婷婷刚想哭，只见李辰站了起来，立在炕上，把脑袋都靠到喇叭上了。

“还有什么要紧的事吗？”海秀问。那喇叭的音质已经不太好，嗞啦嗞啦的杂音很多，李辰也不愿意上大队找人去修，一直这么凑合着。海秀没有仔细去听，也就没注意是在讲什么。

李辰直摆手，只管认真地听，不去答话。

直到听完了，李辰才坐下来，拿块地瓜干啃。海秀说：“都快凉了吧，我去把饼子热热。”海秀向来是自己吃地瓜干，把饼子留给李辰。海源这一带，是把玉米面和水以后，揉成面团贴在大铁锅的锅壁上，熟了以后铲下来了，就成了饼子（即玉米饼子）。不同于别的地方，把玉米面团揉成圆锥形后隔水蒸，那叫窝窝头。

“不用了，不用了。吃点地瓜就行了。”李辰低着头啃，似乎不想多说。

“怎么啦？有什么事吗？”海秀也挺关切地问。

“刚才中央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的一篇大字报。”

“大字报？听说城里有些学校又有大字报了。五七年，不就是因为大字报，才……”海秀说到1957年，那就是反右的事了，这样的伤心事不想再提了，所以把话又吞了回去。

“很多事情就是搞不懂啊，所以我才仔细地听。这份大字报，直接把党委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真是厉害啊。”

“这么大的胆子啊？”海秀也很惊讶。

“问题不只在写的人胆子大，而是把它拿出来向全国人民广播了。这可是不一般。”

“难道还要叫人家起来批评领导，反过来，再打……”海秀还是没把“右派”两个字说出来。

“不像，怕是不像。这一年来，一会儿批判这个，一会儿批判那个，一直没停歇。这会儿嗓门又更高了，恐怕是事情还没完，还没有找到真要打的地方。”

“还要打什么？还要打右派啊？”海秀还是没憋住，把右派两个字说了出来。

“恐怕不是那么简单。这次，恐怕跟五七年不完全一样。”

“那会是怎样呢？”

“我也搞不清楚，还看不明白。”

“那我们怎么办？你可得小心再小心，不要再搭进去了。这个家，全指着你了。”

“是啊，是啊，所以我很仔细地在听。往下更要步步小心了。”李辰沉重地应道。

小婷婷也觉得气氛有点不对劲，一会儿看看她爸，一会儿看看她妈。

知识分子对这种事，一般要更敏感一些。

龙头中学的校长肖福兴也是这样。两、三天后，他在办公室里，推上门，独自一人，把刊登着那份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报纸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他也想要找出时局变化的蛛丝马迹。

他皱着眉头，又一次地把报纸摔下，扔在了桌上，一屁股坐了下来。他知道事情不一般了，但是，说不出究竟怎么不一般。是再一次搞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右，还是在机关、文教单位来一场比农村更厉害的社教运动？实在看不出来，唯一能看出来的是，这不会仅仅是上次宗发奋来催的批判“三家村”的事了。

难道是再揪出一个彭德怀？不对呀，揪出彭德怀，一个庐山会议就行啦，还用这么大动干戈吗？肖福兴，以他一个中学校长的水平也想不下去，和不敢往下想了。他只知道，要出大事了。

也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这么敏感。石校长下了课，回到办公室，见桌上摊开了好几张报纸，肖校长又一脸的严肃，就知道个差不多了。

“肖校长啊，报上有什么新消息啊？”

肖福兴吐了口气，才慢慢地说：“北京大学的这张大字报啊。”

“噢，我也看了。”石校长说，“北京的事儿就是多，还是我们这儿好，平平静静的。”

“能平静就好啊。”肖福兴似乎不想多说，却又显得心事重重。

“当然，当然，我们还是教好我们的学，管好我们的学校。”石校长对那个话题也没有更多的兴趣，一句话又回到教学的老本行了。“宗书记实在要催，我们就开个教师批判会。嘿嘿，也就过去了。”石校长又补充了句，看来他的思想还停留在一个月以前。

北京大学的这份大字报，不但对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更大。

肖福兴的儿子肖胜利，是本校的高三学生，工作能力还挺强，担任着校学生会主席，这倒不是因为 he 爸的缘故。

他这时不但听到了广播的这份北大的大字报，也听说省城的一些学校里学生也动起来了，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他感到革命的形势越来越热烈了，他和他的同学们也该做点什么了。可是，在这儿，在海源，在龙头，似乎一切还都静悄悄的，什么也没发生。应该批判点什么。批判点什么呢？报上说了，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海源有吗？县里的事，不知道。龙头有吗？公社的事，也不知道。知道的就是学校里的事了，学校里有什么资产阶级路线呢？他想来想去，没想出来。不会吧，不会没有吧。不是说了，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龙头中学怎么会没有资产阶级路线呢，至少有资产阶级的影响吧。阶级斗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龙头中学怎么会没有呢？有的话，又是什么呢？对了，学校冷冷清清，在革命浪潮之下冷冷清清，还在那儿按部就班、上课下课，这不就是问题吗。对革命不热情，不支持、不鼓劲，不就是问题嘛。

对，这就是问题。可是，又来问题了。讲这些问题，不就是自己老爸的问题吗？自己老爸是校长哎。应该说自己老爸是有责任的，新来的石校长也要承担责任。再说，这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吧，改变一下态度，对革命热情一点，支持一点，不就行了嘛。

肖胜利也要写大字报，在龙头中学带个头，至少让别人看看自己没有白当这个学生会主席。但他还是走到外间，跟他爸说了这个想法。

肖校长没有觉得意外，这是迟早的事，自己儿子不写，别人也会写。

他沉吟了一会儿，说：“这个运动，不参加不行，参加也不易。要慎重啊，处处要慎重。前后左右要多看看，走路要可进可退，讲话要留有余地。这些，对你们年轻人来说，也实在是难为啊。”又想了想，说：“对我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可以提。比如工作热情不高，暮气沉沉；对年轻人不够理解，不够支持。这些问题是有的，应该批评。”

肖福兴满腹心事地对儿子说这番话。他体谅儿子这么做，虽然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风险。

肖胜利当晚就写了起来，题目叫《批判我校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想不对，话太重了，就在后面加了三个字：“的影响”。改成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校的影响》。看了三遍，觉得对老爸狠不下这个心，又把“反动”两个字去掉了。再看看，又觉得份量轻了，哪像个革命的战斗的大字报啊。实在没法，狠狠心，在最前面再加上“彻底”两个字，这样就显得有点力量了。大字报的最后，写上：“校领导、党支部要积极开展工作，热情支持青年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肖胜利这才舒了一口气，觉得这样对革命、对同学、对老爸、对自己都能讲得过去。作为一个中学生能想到那么多，实在是不容易了。

等抄写好，已经是后半夜。他伸头看看睡在外间炕上的父亲，心里也是一阵的酸。这些年，父亲是又当爹又当娘的，把他拉扯大。这回还要往他身上不说是用刀割，也是用针刺。肖胜利无声地叹气，把头悄悄地缩了回来，上炕睡了。

其实肖校长没睡，他怎么能睡得着呢。革命在促动着他儿子，要对他有所动作。他知道儿子的苦衷，唉……

第二天一早，当肖胜利拿着卷起的大字报，走到学校门口，要贴出全校、全公社第一张大义凛然的革命的大字报时，他愣住了。

这儿把学校的平面布置，大体说一下。龙头中学在镇的东门外，大道的南侧。大门朝北开，门口也没有传达室这些，就竖了个木板的布告栏。门上有两扇铁栅门，也很少关，晚上也不关。就是这围墙，也是前两年，刚从困难时期出来，为加强对教育的投入才修的。进去，就是操场，四个篮球架，那是龙头镇上最好的体育设施了。在操场的靠北墙处，垒了个土台子，开会时当主席台用。操场的南面，有六排平房。第一排是办公楼、图书室、实验室这些；后两排是教室，再后两排是学生宿舍，最后一排是食堂、仓库、教师宿舍等。每一排房，实际是东西两幢，中间有条路。南墙上，有个小门，很少有人走。没有礼堂这些，有个教工食堂，还当大会议室用。学生们的主要活动场所，当然就是操场了。

肖胜利走到学校，没想到在靠校门口的北墙上，已经有好几张大字报贴上了，挤着好些同学在那儿看呢。

他走近一瞧，大标题豁然醒目：《揪出大右派李辰！》《肖福兴是包庇大右派的黑后台！》

他气得自己手里的大字报差点掉在地上。从墙上那歪歪扭扭的字迹，他猜得出这些东西是谁写的。

是的，不错，正是他，秦有理写的。

秦有理，姜雪花烈士和西北村贫协主席秦德才的儿子，自小在黄港福利院念书长大，受到党和政府的特别照顾。即使是大前年回龙头上初中，也仍然有政府补贴。他在政治上受宠，一直是学生干部，现在是高二年级的团支书。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的秦有理，对党和政府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有着一一种强烈的优越感。他一直以烈士子女自居，总觉得自己是当然的革命接班人，要由像他这样的人举起革命的大旗，接过革命的班。所以他觉得，他对革命的感情最纯，任何人都没法和他比，他的血管里流着革命的血，他对革命有着无比的向往、激情，甚至冲动。

回到龙头以后，他对什么都看不惯，包括他父亲。这里的一切都太落后，太狭隘，没有一点革命的气氛。即使是社教运动，他也觉得不够革命。就是嘴上说说，最后什么结果也没有，算什么革命。至于他父亲，他也很看不起，觉得那不过是个猥琐小人，就知道眼前那点一个馒头、一杯酒的好处。在学校里，现在的学生会主席是肖胜利，在他看来，那不过是沾了他爹的光。等今年夏天，姓肖的一毕业，这学生会主席就是他的了。不，按说现在就该是他的了。

他，秦有理，最欣赏毛泽东的那首诗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才是革命情怀啊。什么时候，自己才能碰上大革命的一天呢？眼前，眼前风起云涌的文化革命，不就是一生难得的革命机会吗？他不能等待，这是革命在向他召唤，他从血管的膨胀、热血的激荡中感觉到了这种召唤。

今天，眼下，学校里要贴大字报了，北京大学带了个头，省城的、黄港的学校里也都有大字报了。在这个学校里，自己就应该带这个头，要超过肖胜利，要像个学生会领袖的样子。姓肖的他爹是校长，他肯定不敢出来贴大字报，肯定不敢去批资产阶级。我，姓秦的，就敢。我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在这场革命中，我就可以尽情地表现，就能走在所有人的前头。

看我的吧，终于有我振臂一呼的时候了。

果然，昨天晚上，他刷刷地写了好几份大字报，而且也不需要像肖胜利那样冥思苦想、反复斟酌，更不必去管字写得好看与否。

在他看来，龙头中学的革命打击对象很好找。李辰，大右派，现成的一个。任何时候搞他，都不会有错。接下去，那就是当权派，刚结束的社教运动不是已经说了，要整那些当权派吗？批判“三家村”，不就是三个当权派吗？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点名批判陆平什么的，不也是三个当权派吗？罪名呢？那还不好找，包庇右派，不支持革命运动，等等等等，怎么说也能说上几条。

刷刷地一写，一张少了，再来一张。批一个人、两个人少了，还有那个新来的石校长，虽然还不认识，没讲过话，但那也是校长，也是当权派，跑不掉。还有呢？还有那个平老师，教导处的平老师，别看是女老师，也批一批她，这样的大字报，看的人一定多。一下就写了好几份，到底是几份，他都没数。

一早，拿到学校，就都贴上了。

一下子，就围上了好多同学看。秦有理开心地笑了。

龙头中学，龙头镇的文化大革命，应该说也就此开始了。

12.2初露锋芒

秦有理的大字报一出，轰动了整个校园，连锁上的一些人也来看了，想看看大字报是个什么样。1957年的反右，虽然有过大字报，但龙头中学太小，没等贴，李辰就被抓走了，所以龙头的人还没见过那大字报是啥样。

肖胜利的大字报一出，就更热闹了。同学们、老师们、街上来的人，不但是看，还在比较，还在议论。

“李老师的右派，早就摘了帽，现在还说这，干吗呀？”

“不能说肖校长是黑后台吧？那次批判李老师的会，还是肖校长主持的呢。”

这话传到肖校长那儿，他听了真不是滋味。这是在替他辩解呢，还是指责呢。

“还是肖胜利说得对，校党支部要站出来领导运动。”

“……”

“当，当，当……”大家还在议论没完呢，挂在大树上的一根长条钢板敲响了。

“上课了，上课了，进教室上课了。”平近芳在喊着大家上课，但没怎么有人听。

“快走！谁还在这儿看，就记名字，处分！”石校长对此很生气，没想到在自己学校里也有学生这么不听话的。

同学们这才陆陆续续地进了教室。

这些天，秦有理在课堂上已经听不进去了。这一炮打响了，他成了全校、甚至全镇瞩目的人物，走到哪儿，都像英雄一样，很多人都看着他，很多人都围着他。但是，这还不够，肖胜利也贴了大字报，而且还有一些人说肖胜利讲得有道理。怎么才能超过他呢？这是秦有理这几天最操心的事。

几天来，秦有理也在认真地听广播、看报纸，也在急切地打听各处的消息。他想起来了，下一步要是能开个批斗会，这一下就能吸引全校、全公社的目光。别的地方都有斗领导的了，咱这儿斗个右派还不行么？不过开斗争会，一个人不行，还得找几个。他从经常围在他身边的人找起，也找到了几个愿意跟他在一起的人，比如说申光荣。

先说申光荣吧。

就是当初土改分房子住在李芹家的那个申老汉的孙子，从西面的那个省下放回来、父母双亡的申光荣。那时从北京传来一个说法，叫“红五类”，就是按阶级划分，那些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知识分子，他们的家庭成员就属于“红五类”。这些人才是革命的主力军，才有资格参加革命。申光荣觉得自己比秦有理这个“红五类”还要“红五类”。他的大伯被日本鬼子杀害，应该算是烈士（但是没评上），他爹是正儿八经的农村很少有的产业工人，他爷爷是几辈的贫雇农。红五类里能占上三项，根正苗红得没有再比的了。自己又憋曲压抑了那么多年，连土改分给他爷爷的房子也没给他。改天换地的积极性，他有的是。带头闹革命，本应该非他莫属。可秦有理有他爹在，气势比他要大多了。申光荣明白也只能跟在人家后面闹腾了。

秦有理毕竟还是个学生，不敢就这么出手。等了好几天，看看不能再等了。全国的温度在上升，龙头中学的劲头，反而好像要过去了。那贴在墙上的大字报，都已经破了，就剩了几个纸条在风中飘摇。这天下午，他心一横，决心一下，就跟申光荣说了。申光荣很高兴，连说：“好，好，就应该有点革命行动。那现在咱往哪儿去？”

“咱们先到校长办公室，要求校长把大右派李辰交出来，让革命群众批斗。”

“好！”申光荣很积极，还向旁边的同学一招手：“要革命的，跟我们走！去批判资产阶级，批斗大右派！”

还真有一些同学跟他们走，边走还边喊：“我们要批判资产阶级！”

小小的队伍往前走着。后面有个壮实的扎着两个小辫的女孩子飞奔而来，“我也要参加，我也要参加！”

“谁啊？瞎吵，别影响咱们的革命行动！”走在前面的秦有理不耐烦地问。

“还不是那个王溪，非要参加。”申光荣一直跟着秦有理，往后一看说。

王溪拼命地跑来，全然没有妙龄少女常有的矜持。

王溪自己一个人在中学里住宿念书，觉得很孤独、很无助。尽管现在的养父母、王山哥、丁姐都对她很好，可是一次次地运动，他们的日子越来越难熬，都顾不上自己了。去年因为那个从没见过面的哥哥在台湾，又被全家赶到了北山，已经成了和地主一样的反革命家庭。生母因为舍不得自己的女儿，没有走远，嫁给了包金贵，可还是一个国民党。亏得公社、村里有人替她说了好话（不知道是谁），自己才没有被一起赶到北山。社教运动又一次使她这个才十六岁的女孩子知道了政治斗争的厉害。她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去靠谁呢，去指望谁呢？只能去靠革命，指望革命队伍能收容她，成为革命队伍里的一员，才能有她的出路。她越来越清晰地明白了这一点，脚底下更加快了脚步，跑到了队伍的前面来，喘着气说：“我也要参加。”

“我们是去斗右派，是去搞革命行动。你家里是国民党，你妈也嫁给了国民党，你不能参加！”秦有理一口回绝。

“可我自己出身贫农，我亲爹是给地主逼死的，为什么不能参加？我就是要参加革命，谁也挡不住我。”王溪态度坚决，嘴也很利索，两个小辫随着说话也一翘一翘的。其实，她爹是五十年代初灾荒饿死的，不过秦有理他们不知道这些。

“好，好，参加吧，也不多你一个。”秦有理犟不过，就不多说了，还是开批斗会要紧。

他们来到校长办公室门口。两位校长都在。

很多同学不敢往里进，有的退到后面去了。还是秦有理站在最前面，对校长无所畏惧地大声喊着：“请校长把大右派李辰交出来，让我们革命学生批斗！”

没等肖校长说话，石校长先站了起来：“这些事情，县教育局会有统一布置，不是像你们这样乱来的。”

“我们要参加文化革命！”申光荣紧挨着秦有理，胆子也能大一点，就喊了起来。于是，后面也有三五个同学跟着喊。

“不像话，你们还听不听领导的话！”石校长有点火了。

“我们要批判资产阶级！”秦有理还是不退让。

“不要再讲了，马上到上课时间了。上课钟响，没进教室的，就是违反学校纪律，都要受处分。”石校长很坚决。

“同学们，回去吧，先回教室去吧。有事情，我们慢慢再商量。文化革命是个大事，不要着急，不是就在这一、二天。好吧？”肖校长这才慢慢地说。

“当，当，当。”钢板的声音又敲响了，上课的时间又到了。

“走吧，快走吧！”石校长挥着手，轰他们走。

“我们就是不走。校领导不支持我们斗右派，就是不革命！”秦有理拧着头，挡在门口，就是不走。

“我们就是不走。”申光荣也跟着喊。

“我们就是不走。”王溪不知从哪儿来了胆子，也喊了声。

“我们就是不走。”后面有些学生也跟着喊了。

李辰在后面一排的教室门口，知道了这件事，也听见了前面的吵声。他沉吟了一会儿，自己走了过来站在人群后面，说：“同学们要批判我，完全可以，应该批判。但是，是不是等下了课以后，我过来接受你们的批判。”

这几句话，把现场都镇住了，立刻静了下来。

秦有理也没想到会有这一出，愣了下，“你，你，你……”

还是申光荣先反应过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什么呀？现在就批！”

“对，现在就批！”秦有理也回过了神，和申光荣两个推着李辰往操场前的土台子走去。

后面的学生马上也起哄：“斗右派了，斗右派了，去看斗右派了。”吵吵嚷嚷而去。

已经进了教室的学生们，有在门窗边探头看，也有胆子大的跑了出来，更多的是坐在座位上不知所措。

秦有理把李辰推上操场那头、靠北墙边开大会用来当主席台的土台子上，开始了批斗。“你老实坦白，你有哪些右派言论！”秦有理并不知道当时李辰是为什么而打的右派。

“有，有反苏言论。”

“有什么反苏言论？快说！”申光荣也很起劲。自己从来没有在这台上站过，今天不但能站上来了，而且还有这么多人看着他，使他浑身热腾腾的。

“那时有句话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说苏联的情况跟咱们不一样，人家是集体农庄，咱是合作社，不能简单地说人家的今天就是咱的明天。”

“好小子，你反对苏联……”秦有理刚举起手，不知是要打下去还是要呼口号，觉得不对，手停在了半空，扭头问申光荣：“他反对苏联？对不对？”

“现在苏联是修正主义了，他反对苏联？”申光荣一时也转不过弯来，看见下面几十双眼睛都在紧瞪瞪地看着他，就急了：“他反对苏联，结果把苏联变成修正主义了。真是罪大恶极，罪大恶极！”

“对，对，李辰把苏联变成修正主义，罪大恶极！”秦有理也喊了起来。

连王溪这样没什么头脑的人都在想：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苏联今天变修了，明天我们呢，也要那样吗？如果这句话不对，为什么讲这几句话又要打成右派呢？当然王溪还远不到明白在政治上此一时彼一时的程度。

“呵，呵。”下面都笑了起来。

两个校长这时都已赶了过来。

“不许胡来！”石校长大声说道：“李辰老师早就摘帽了，不是右派分子了。他是我们龙头中学的老师，也是你们的老师。如果他有错误需要批判，那也是由学校来组织领导，由不得你们乱来！”

肖校长也过来拉着李辰的手：“李老师，下去吧，下去吧，不用管他们。”

秦有理还有点意犹未尽，但看着石校长对他瞪着眼，除了“哼”的一声，也没有别的办法。

其他同学见此情景，也就“噉，噉”地散去了。

12.3派出工作组

校园里的动荡局面，越来越厉害了，成了全局性的问题，尤其是北京的高校最为典型。6月18日，北京大学某些人开了次批斗黑帮大会，出现了戴高帽、挂黑牌、罚跪打人等情况，开了个极其恶劣的先河。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等人，为了稳住局势，按照过去的惯例，在没有其他领导反对的情况下，陆续向大中学校派驻工作组，试图把运动纳入可控制的轨道上。此时，不管刘少奇是否已经察觉到毛泽东的意图，他也只能走这一步了。于是，全国各地也迅速照此办理，纷纷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却非常短暂的阶段。

面对学校里这种非同寻常的状况，石向上着急得不行了。学校这副局面不能指望肖校长。临来龙头时，程局长已经跟他说得很清楚了，不能指望姓肖的，要靠你了。可是，他知道，照这样子，很快他就控制不了了，所以，急忙打电话给程贵安。

“程局长，不行啦。”

“怎么不行啦？出了什么事啦？”电话那一头是程贵安。他还是县教育局的副局长，但是语气比以前更要沉着威严一些。

“有学生批斗老师啦，都不听我们当校长的话啦。”

“呸！连学生都管不住，还当什么校长！”程贵安对下属是越来越严厉了。

“是，是。局长，您要是有时间，是不是抽空到龙头来看看。”

考虑到全县也有几个中学多多少少有这种情况，相对来说，龙头他还比较熟悉，下来看看也行，省得有别人说他是官僚主义。

“那好，我明天就过来。”

程贵安对这种事也是很认真、很积极的，一早就蹬着自行车赶到了龙头，一头就钻进了校长办公室。这时，学生刚吃完早饭。

“怎么个情况？”程贵安上来就直入主题。他办事、说话，不能不说不麻利。

石向上把事情前前后后都说了下。

“那你们准备怎么办？”

“我们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肖校长揣揣不安地说。

“哼。”程贵安对他所鄙视的人和事，照例是从鼻孔嗤出口气，连看都不看。

“连怎么办都不知道？连脑袋丢了都不知道！”程贵安猛地一拍桌，声色俱厉地说起来：“这是阶级敌人在向我们猖狂进攻，这是比1957年反右更严峻的斗争！”

“秦有理他们斗的就是右派啊。”石校长提醒说。

“糊涂！他们明里斗的是右派，实际上是在向我们挑衅，说我们不行，要把领导文化革命的大权抢过去！这样严重的阶级斗争还看不出来？”

“那秦有理还是烈士后代，贫下中农出身哎。”石向上也知道秦有理是革命先烈姜雪花的后代。

“糊涂！”程贵安又一个“糊涂”砸了过来。“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你以为阶级斗争就一定是地主老财明目张胆地向我们进攻啊？所有向我们挑衅，所有想要夺取我们权力，哪怕是想要分一部分权力的人，都是我们势不两立的敌人，不管他以前是谁。”

“是，是，是。”肖、石两人连忙点头称是。

公社的宗发奋也闻声赶了过来。这种事情，怎么能少了他呢。

“是啊，这事情不管不行啊。”他一进门就很严肃地说上了。

程贵安还没说完呢：“现在，省城里已经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了。虽然有关通知还没来，不过，我看，我们县可以先向你们这儿派工作组，作为试点。”

“对，对，我们这儿刚有了社教运动的成功经验，中学里的这点事，我想是不在话下的。”宗发奋倒是先抢着说。

肖、石二位更是赞成了。

“我马上回去向局里汇报，尽快派出。”

“最好能以县委的名义派。这样吧，我也向县委汇报，我们公社党委也要积极参加这项工作。”本来这事公社完全可以不掺和的。宗发奋就是这样的人。

程贵安难得一笑地说：“宗书记的这种精神真值得学习。工作组，公社的同志也可以参加。这样更好，几方面的力量可以合起来。”说完就站起身来。

“程局长，等吃了午饭再走吧。”肖校长说这话，倒也不是在敷衍。

程贵安摆摆手，“这种关键时候，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那时的程贵安不但精神头足，身体也很好，骑个二十多里地的车，就算有小坎，也不当回事。

难得有这样神速的办事效率。程贵安回县里的第三天，电话通知就来了：县委决定向龙头中学派驻文化革命领导工作小组。组长是县教育局的一位科长，姓管。宗发奋、石向上任副组长。而且第二天，就文到人到，程贵安领着管组长就来了。县里也知道，火已经烧到眉毛了，能不急吗？

这位管组长，以前是部队机关的一个连级股长，转业到海源也已经五六年了。对机关工作倒也适应，就是觉得提拔太慢，现在还是政工科的副科长，比比转业到其他地方的、或是留在部队的，都比自己强。他不知道，海源是革命老区，资历长的人多，提拔相对要慢。不过，他也知道，这次可是个机会，表现的时候到了。

中学里已经摆出了开大会的阵势。学生们都按班级整齐地坐满了操场。土台上摆好了一排桌椅，当主席台用。上面连横幅也没挂，来不及了，也不知道写什么好。

石校长和平近芳在满世界地招呼学生：“坐好了”，“别讲话了”，“县领导马上就要来了”。

其他任课老师排在最后面，李辰也坐在里面。大家都很茫然，不知道领导会来说什么。

一辆吉普卷着尘土，嘎然而至，从校门外的道路直接开到了土台旁。那时还很少有汽车来，所以不由得引起学生们的一阵惊呼，知道今天这会议的份量了。

石校长忙大声吆喝：“安静了，安静了。”和肖校长两人走向吉普车。

车里走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程贵安、管组长、宗发奋。宗发奋是在公社大院门口等着上车一起过来的。即使是宗书记，也很少有坐上汽车的机会，所以虽然他自己骑车也挺方便，还是等着汽车过来。当他从车里迈出一步，看见肖校长他们一批学校干部的笑脸相迎，看着满操场等待着他的的人群，心里惬意极了，自己也觉得好像顿时就身价百倍，飘飘然了。

领导们直接就上了主席台。

石校长主持大会，直截了当就请程贵安讲话。

程贵安从公文包里拿出文件，说：“今天是龙头中学历史上的重要一刻。县委、县政府决定向龙头中学派驻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也就是说，在文化革命期间，你们中学的一切工作归工作组领导。

为什么要派工作组呢？你们也看到了，当前，阶级斗争又进入了一个你死我活的白热化高潮。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在向我们党、向社会主义发起猖狂进攻。他们想篡夺对文化革命的领导大权，改变文化革命的大方向，企图转到他们的邪路上去。我们能答应吗？”

程贵安特地大声地问下面，果然全操场发出整齐的回声：“不答应！”这是增强大会效果的常用办法。程贵安对这一套早就是轻车熟路了。他又停顿了下，提高了嗓音，尽力拿出几分威严，说：“所以我们要派出工作组，直接领导文化革命。为此，县委专门发了文件。而且，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派出工作组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我们的工作组，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

宗发奋抑制不住激动，站起来，奋力地鼓掌。一时间，全场掌声雷动。

程贵安不失时机地又停了一下，用目光扫视全场，再干咳两下，场面静了下来。

“下面，我受县委、县政府的委托，宣布工作组成员名单。”

全场肃静，都在洗耳恭听。

“组长，管抗先同志。”

会场上，同学们热情鼓掌，还以为是从哪儿来了个大人物。

管抗先站起，也向大家鼓掌，招手致意。

“副组长，宗发奋同志。”

操场上，“嗷”的一片声音。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弄了半天，还是本公社的人啊。掌声顿时稀落下来。

但宗发奋很兴奋，脸上是灿烂的笑容，伸出双手，向会场四周来回致意。

“副组长，石向上同志。”程贵安继续宣布。

这不是自己的校长么，这就更没有新鲜感了，满操场也就剩下三、五个掌声了。

程贵安讲完之后，三个组长都讲了话。管组长讲了：“我们这次来，是受了党中央的委托，受了县委的委托，切实抓好龙头中学的文化革命，把它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我们听说，前一阶段，你们这儿出现了一些混乱，这是不可以的，是不能容许的。参与了那些错误行为的同学，要主动交代，承认错误，争取组织上的宽大处理。”

宗发奋讲得更厉害：“同志们，同学们，这是一次比1957年更严峻更复杂的斗争！1957年，是右派向我们进攻。这一次，除了右派在向我们进攻，还有人打着反右派、反黑帮的旗号，向我们进攻。说我们是包庇右派，说我们是黑帮，这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这种人就是反动学生，比右派还厉害！任何想脱离党支部、脱离工作组的做法，都是反党反革命的行为！”

这一番话，震惊全场。说得秦有理，脸色发白，都坐不住了。说得申光荣，眼睛发红，快要哭了。队伍里还真有了哭泣声，那是王溪。好在平近芳就在她身边，忙去推她。

石向上本来不想讲，宗发奋再三催他，也只好讲了几句：“在进行文化革命的同时，我们还要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在这里，我说件事：根据上级指示，这学期的期末考试暂时推迟，今年的高考也暂时推迟。”

石向上讲这个话的依据是，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的通知说，当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到6月18日，人民日报又发出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提出了废除高考制度。

听了这个话，全场一下子骚动起来。一片噪声涌起，盖过了石校长在喇叭里的声音。这可是前所未有的、闻所未闻的大事。拿高考来说，这一暂停，就暂停了十二年哪。

石校长赶紧拍拍麦克风：“安静，安静！听我讲！不考试不等于不上课。课程表和各项作息制度照常执行。各门课程，不但要上，还要上得更认真，要不怎么叫文化革命呢？我们要更加严格遵守各项纪律，按时上下课，老师要教好，学生要学好，一堂课也不能少。谁不好好上课、听课，谁就是在干扰、破坏文化革命！”

龙头中学，来了工作组，情况就不一样了。

第十三章 反干扰，抓游鱼

1960年1月13日

这个标题是什么意思？叫人看不明白。是的，那时候的政治术语真是“丰富多彩”，光看字面，你是猜不出来的。这又是在讲什么呢？这是文革初期派遣工作组时特有的词汇。

工作组来了，学校的各项工作就要牢牢地掌握在工作组手里，就是要在保证正常教学秩序之下，进行文化革命。用句最常用的话来说，就是要牢牢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但是在“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文革时的重要文章都是以此名义发的），尤其是《人民日报》一篇篇文章的鼓动下，那不断激起的革命浪涛，已经难以平息。按说，这儿的革命两字，应该加以引号。但那样的话，本书要打的引号就太多了。为了省事起见，就免了吧。读者能看得出来，哪儿要打，哪儿不用打，哪儿还得费几分心思去揣测，这样也好。包括其他有些词，比如左派等等，也是这样。

13.1 记过处分

申光荣这几天挺不爽，因为不能像前几天那样闹革命了。既不能贴大字报，又不能喊口号，更不能上那主席台了。整天地上课，学那些课文，真没劲。尤其是工作组来的那天，开大会讲的要抓反动学生、抓新的右派，把他吓得不轻。可是后来秦有理又给他鼓劲，说，不用怕，《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啦，题目就叫“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工作组讲得不对。申光荣听得心里都没了准数，晃悠悠地，不知该怎么弄。这不，上课的钟声响了（其实就是敲钢条的声音），申光荣还在教室门外转悠呢，眼睛朝四处瞅着，像是在找这革命上哪儿去了。

“申光荣，进教室上课了！”平近芳在喊。申光荣在高一，平近芳是他们的班主任。

申光荣一扭头，不听，也不动。

没进教室在门外站着的，还有好几个，都在看着。

平近芳生气了。连这也管不住，那还行么？于是，她拽着申光荣的胳膊往教室里拉。没想到往日里很听话的申光荣，这时犟了起来，撅着屁股偏不走。

“给我走！”往日里也很平和的平近芳这时也来火了，推了申光荣一把。申光荣没防备，摔倒在门槛上。

“平老师你怎么打人呢？”秦有理也没有进教室。这些天他也在东张西望地找机会，他觉得工作组待不长。他在东面一排的屋外，发现这儿有情况赶紧过来，一看申光荣倒了，马上就嚷了起来。

“平老师打人了，平老师打人了！”旁边有些学生也跟着嚷起来。

“啊呀，申光荣你快起来吧。”平近芳忙伸手去拉，申光荣还知道躺在地上就是不起来。

“怎么啦，怎么啦？”管组长、石校长闻声也都过来了。

平近芳把事情一说。

石校长先张嘴了：“申光荣，你先起来。上课的钟响了，不进教室，是你的错。”

“平老师她打人了。”秦有理在边上说。

“你别瞎起哄。”管组长一脸的严肃，又对申光荣喊道：“你这个同学，我命令你，立刻站起来！”

管组长是部队出身，习惯于下命令。

“平老师要赔礼道歉。”秦有理还在说。

“岂有此理！我命令你也赶紧回教室。你敢不进，看我怎么收拾你！”管组长真的举起大手，横眉冷对，把秦有理都吓了回去。

下午，工作组开会讨论这个问题。

宗发奋也过来了，头一个就发言：“这跟我们一开始的分析，完全吻合，这就是阶级敌人在向我们进攻啦，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

“也不能这么讲，都还是些孩子么。”石向上说。

“不管孩子不孩子，也不管敌人不敌人，干扰我们的运动就是不行。上面来了精神，要我们反干扰。而且，还打了个很形象的比喻，叫‘抓游鱼’。俗话说，一个游鱼三个浪。他们就是要兴风作浪。”管组长讲话一直是很严肃认真的。有的文章里写成“抓鱿鱼”，是不对的。

“这个比喻好，这个比喻好。你别看这鱼不大，掀起的浪头还真不小。秦有理就是这样的一条鱼，我们就是要把他抓出来，省得他再掀浪。”宗发奋又来兴趣了。

“那怎么抓？叫派出所来？”石向上还是没想通。

“那倒还不用，咱们可以在广播上点他的名，杀杀他的威风，也镇一镇其他那些跟他走的人。”管组长到底是县局的人，水平要高一些。

“好，要不，到时候，我来讲。”宗发奋自告奋勇。

“行，行。”他们两人当然没有异议。

因为肖校长老是不发言，这次会就没叫他来。

“同学们注意了，同学们注意了。现在向全校师生员工通报一件事情。”下午上完第三节课，学校的大喇叭响起来了，各教室里的小喇叭也响起来了。宗发奋用他那带点西面腔调的普通话挺兴奋地讲了起来。毕竟在龙头待那么多年了，讲的虽然不是海源话，可海源人也能听得懂。

“今天下午，我们学校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高一（1）班的申光荣，明明听到上课的钟声，却故意不肯进教室，严重破坏了学校纪律。而高二（1）班的秦有理明知申光荣违反学校纪律，不去帮助老师进行劝导，反而火上浇油，故意扩大事端。在当前文化革命进入高潮，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候，这些行为不只是一般地违反校纪校规，而是在配合阶级敌人破坏文化革命。性质是十分严重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我们工作组经研究决定，给这两个学生以记过处分，特此向全校通告。”

龙头中学以前给学生处分的不多，有的话也是在校门口的布告栏里贴张纸。像这样大张旗鼓地在全校广播，还是头一回。

秦有理非常地不服气。他觉得不应该给处分，最多批评一下就是了，更何况还是平老师推了人。他就拉了申光荣来找工作组。申光荣还有点怕，跟在了后面。在很多同学的注视下，他们到了办公室门口。

宗发奋这些日也常住在学校。他觉得这活不错，整整这些小毛娃蛮有意思。他们既说不过你，也打不过你，愿意怎么弄就怎么弄。命运全捏在你手里，他就喜欢这样。不像村里还有些二赖子、滚刀肉，还挺缠人，不好对付。见到他们两人来，他先开了口：

“怎么？不服气啊？”

“你们处理得不对，是平老师推的人。”秦有理说。

“是的，是平老师把我推倒了。”申光荣也跟着说。

“平老师的事，我们会开教师会处理，跟你们没关系。”这些话对于宗发奋来说，很好回答。

“你们对我们的处理也太重了。这点事情，根本不够处分的。”秦有理说。

石向上从后面拉过宗发奋悄悄地问：“昨天下午的会上，没说要处分他们哎。”

宗发奋甩开石向上的手，有点不屑地说：“这你就不懂啦。”又走向门外，对秦有理、也像是对石向上说：“这种非常时期、关键时刻，就是要从重、从快、严肃处理。不这样做，就不能稳定大局。这既是在教育你们，也是在教育全校的同学。你们只有老老实实地接受组织处理，今后才有出路。”宗发奋把政治运动中的这些套话又都拿了出来。

秦有理一时也说不上来，停在了那儿。

“还想说什么呀？什么也别说了，说废话也没用。回教室规规矩矩上课去吧。”宗发奋说完转身就上里面去了。

秦有理瞪着眼看着，没有法，也猛地转身走了。

13.2一波三折

早晨，操场土台子后面的围墙边，聚集了一大堆人。

平近芳从人堆里挤了出来，脸色有几分紧张，“太不可思议了，太不可思议了。”

石向上正要上那儿去，就问迎面而来的平近芳：“那儿怎么啦？”

“秦有理敢贴工作组的大字报，说工作组的大方向错了。这还得了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平近芳急匆匆地说着。她怎么也没想到，还会有这样的事。

石向上也急匆匆地过去，学生们闪开一条道，让他上了最前面。

墙上大字报的几个大字豁然醒目：

“工作组不革命，就请他走开！”

这些话在大城市里已经很平常了，但在龙头可是第一回。整个操场就像炸开了锅，人越聚越多，都在议论纷纷。

石向上粗略地看了下，就出来了。

上午，工作组又要开会了。

“这事情啊，宗书记给他们处分，有点操之过急了。”石向上讲得还是很留有余地的。

宗发奋可是听不进，“哼，给处分还是轻的。”

“那天开会，我们也没说要给他们处分啊？”石向上继续说着。

“这有什么？这就是战场。战场上指挥员对不听指挥的人，要怎么处理就可以怎么处理，当场枪毙都可以，不要说处分了。你说是吧，管科长？”宗发奋喜欢叫管抗先为科长，因为他觉得书记要比科长大。在他们工作组三个人里面，他应该是最大，没当上组长，已经是很大度了。这点小事情，他还不能做主啊？

“呵，呵。”管组长也不便反驳，只得干笑着，“那眼前的问题，怎么处理呢？”

“去把它撕了就是了。”宗发奋倒挺干脆。

“撕掉不好，那样就把矛盾更激化了。”石向上说。

“那怎么办？”管组长在挠着头。他始终拿不出什么办法。

“用别的大字报把它盖上。”石向上说。

“哎，这是好注意。”管组长高兴了，“可谁去写，谁去贴呢？”谁会去愿意干这个活呢。

“这事，我们不能出面，老师也不能出面。找个学生去。”石向上说。

“叫哪个学生去合适呢？”管组长又问。这倒不怪他，他确实不了解。

“我去找平老师，她对学生比较熟悉，叫她去安排一下。”石向上说。

中午，石向上找了平近芳。平近芳沉吟了会，说：“我看于又发可以。”

“他可是四不清干部的孙子哎，能行吗？”石向上怕依靠错了对象。

“那就没别人了。这种时候，谁敢出这个头？”

“那好吧。”

“我也就是去试试，肯不肯，还不一定呢。”

下午，工作组又要开会了。

上午才开的会，怎么下午又开？不能不开。因为上面来了个出意料的通知：所有学校，自6月18日起停课闹革命。这分明是一记重重的耳光打在了工作组的脸上。因为说是要维护教学秩序，而处分了秦有理、申光荣两人，上午这才跟他们两人争吵了一番，刚伸出去的舌头再怎么收回来呢？

一下子难住了他们三个人，一时都没有话讲了。

“嗨！”气得管组长猛地一拍桌子，可是后来还是没有话。

气得最厉害的，要数宗发奋了。因为一些硬话都是他说的，处分那两个学生，也是他擅自做的主张。要讲责任，他是最大的了。他偷偷地瞄了他们两人一眼，也不放声，看事情怎么发展再说。

“我刚才都已经跟平老师说了，叫她找个学生把秦有理的大字报给盖了。这怎么弄？我还得赶紧找平老师说一下，别去盖了？”石向上问。

他们两人没作声。

“那我去了。”石向上起身要走。

宗发奋这时觉得不能不说了：“不用这么急么，这点事情就顶不住啦。急什么？这个通知，先放一放，过两天再讲。等我们准备好了，再传达给老师，而后再传达给学生，最后再停课。不然，今天一说停课，不用到晚上就乱了，我们就会很被动。”

“嗯，对，对，先放一放，先观察观察、准备准备，好主意。”管组长说。

石向上也只能勉强地点点头，“那我去跟平老师说了，这事先算了。”

“别，别，先别去说，就当没这回事，先不要露风声。”宗发奋说。他可是鬼得很。

“那好吧。”石向上的头点得更勉强了。

也是下午。

平老师去找了于又发。于又发也在平近芳当班主任的那个班，高一（1）班。所以，平老师去找也比较好说话。

没想到的是，于又发很爽快地答应了。

在这种分外险恶之时，于又发怎么会答应呢？他还是个孩子呢。答案就在这儿，因为他还是孩子，还不知道里面的深浅和利害。

于又发没有想这么多。他作为于村长的孙子，社教运动的点点滴滴都在他心上。秦德才两次到他家抄家，那嚣张猖狂的嘴脸，时时在他眼前。他跟秦德才种下了不共戴天的仇恨，恨不能杀了他。这种仇恨延伸下来，就是恨他的儿子。不管秦有理说什么做什么，他都坚决反对。谁怕谁啊？他就是这么想。

当平近芳跟他一说，他立马就回答：“没问题。”都没跟平老师商量写个什么，什么时候去贴。

结果，还没等工作组他们的会开完，于又发已经把秦有理的大字报撕了，又贴上了自己的大字报：“支持工作组干革命！”

那墙的前面围了更多的人，连土台子上都站满了。

又过了两天。下午刚放学，路近的同学有的已经开始往家走了。忽然，一个消息传遍了校园。

“停课了。”

“县中都停课了。”

“真的吗？”

“真的，东南村在县中上学的战大个都已经回家了。”

“那我们为什么不停课呀？”

没等工作组传达布置，县城里第一中学停课的消息传到了龙头中学。这下可捂不住了。

“我们为什么不停课？”

“我们为什么不停课？”

同学们都在操场上嚷着，连平常最听话的一些女同学也不在教室里了。

满心忿闷的秦有理总算盼到了头。自己替申光荣讲了话，就受了个处分。贴的大字报也被于又发撕了又盖起来，真是太欺负人了。这下连县中都停课了，他们工作组还有什么话说？还能用维持教学秩序来压人吗？他觉得他早就看出上级的精神来了。他觉得他是能理解、体会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是工作组在压制他。现在，他该怎么做？满操场都是人，大家都在走来走去，说来说去，正是缺少一个中心，缺少一个站出来召唤的人。那个人，不就应该是我吗？对，就应该是我！

秦有理找来块木板，贴上张纸，写上：“强烈要求立即停课闹革命！”而后，他走上土台，双手高举木牌，高呼起来：“同学们！我们向工作组强烈要求立即停课闹革命！工作组压制革命学生是错误的！”

果然，大批同学聚了过来，不时也有学生应声喊道：“立即停课闹革命！”

工作组面临着一个严峻而又难办的局面，捂不住了，也掩盖不下去了，因为别的学校都停课了。宗发奋的自作聪明，反而使工作组愈加被动。

工作组的三个人又赶紧开会商量怎么办，石向上似乎有点不想多说了。管抗先是始终拿不出什么主意。宗发奋明白只有靠自己了，只有靠自己来闯过这一关了，别的哪一个人也指望不上了。

“要顶住，坚决顶住，这就是阶级敌人在向我们进攻，要抢夺我们的阵地，这还不明白吗？我们工作组来的第一天，是怎么讲的？就已经讲得很明白，这是一场比1957年还要严酷的斗争。现在，证实了吧？那时，我还讲阶级敌人打着红旗反红旗，现在那个秦有理是干脆连红旗也不打了，直接向我们进攻了。还等什么？别看跳得厉害，去直接扣起来，宣布为反动学生，一下就解决了。”宗发奋还在坚持他那一套，振振有词地说着。

“他还是个中学生呢。”石向上说。

“不管什么中学生不中学生，只要思想反动，就要专他的政。我都听说了，城里的大学正在搞‘清理反动学生’呢。咱这儿，虽然还没有布置下来。但要是先抓住一个，那可是立了个头功啊。”宗发奋说。

“不过，要下结论，一般说来，也是要等运动后期再处理。现在就下手？”管组长不象宗发奋那么冒进，便问了句。

“这还等啊？不用等到后期，再过个二、三天，说不定，我们就要被他打成反革命了。他不是已经在说我们在压制革命了吗？压制革命不就是反革命了吗？”宗发奋越讲语速越快，看样子，他是一刻钟也不想等了。

“那么多的学生在那儿，靠我们能把他们扣起来？”石向上问。

“是啊，我们真还没那个力量呢。”管组长说。

“一个中学生都对付不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宗发奋嘴上说着，心想这倒也是个问题，万一有什么事，真能吃个亏。他拿起电话，抓住电话柄使劲地摇了几下，喊上了：“给我要南门外的派出所。”那时的电话还都是人工接线的。

管组长和石校长都很惊讶地看着。只有宗发奋才会有这一手。

“老诸啊，我是宗发奋！”

老诸，诸清明，是龙头派出所的副所长，这一阵所长没在，由他当这个家。

“情况紧急，紧急情况！”宗发奋把事情添油加醋地讲了一番。

诸所长一听是这种事，就说：“这事还用得着我们出面吗？”

“当然要你们出面啰，1957年抓李辰的右派，还是县公安局卞科长亲自来的呢。这是发挥你们作用，提高你们形象的好机会哦。再说这也是你们份内的事哦。”

诸所长，将近四十，年富力强，从工作这个角度讲，真是个好同志，认真、负责、积极、肯干，所有能评价先进工作者的词汇都能套在他头上。不仅上面县公安局布置的各项任务都认真完成，就是公社党委有什么事，他也能积极配合。而且人还很随和，挺好说话，甚至对专政对象至少在表面上也不是那

么凶神恶煞，跟人们通常印象中的公安人员不一样。如果不穿那身制服，喝酒打牌都是把好手，还真像个哥儿们。诸所长能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性格脾气使然。另一方面，他还有个盼头。他还不到四十，就是个副所长，在最基层，在那时，升得不算快也不算慢。还有二十年呢，急什么。他不想过于表现，让别人看出什么来。就想这样下去会有结果的。至于是什么结果，什么时候有结果，他还想不出来。他想，以他的如此这般，总会是好结果吧。

“好吧，我就来。”

“别忘了带上手铐。”

“这就不用了吧。”

不到半小时，诸所长和工作组的三个人，就出现在学校操场的土台子前。

一见工作组的三个人，连派出所的警察都来了，满操场的学生都静了下来。

诸所长也是知道秦有理这个人的。他站在台前，招招手，说：“秦有理，你下来。”

“怎么？要抓我走啊？”秦有理看见派出所的警察都来了，也傻了眼了，紧张得脸都红了。

“你这是聚众闹事，违反了治安条例。你先跟工作组走，听他们处理。我这儿明天再说，看工作组的意见。”诸所长不紧不慢地说。

宗发奋急不可耐了，“秦有理，你这小子太猖狂，居然敢煽动同学对抗工作组，对抗党组织，快跟我们走。”

秦有理看着目无表情的诸所长，目无表情的管组长、石校长，心里没谱了，放下了牌子，嘴巴还没完全软：“走就走。”

办公室里。

秦有理站在窗边，那四个人都坐着。

“秦有理啊，对今天的事，你有什么想法吗？”石校长先发问。他的意思是给秦有理一条退路。

秦有理毕竟没这么多经验，没听出这意思来，眼睛看着地下，没放声。

“你对你的问题，一点认识也没有吗？”石校长提高了点音调，继续问。

这是领导对认为有问题的人进行问话时，一上来都是这套路子。

秦有理还是没作声。

“怎么？不回答？用不回答来进行对抗？”宗发奋可是不让腔。

“参加文化革命没有错。”秦有理拖不下去，开始说了。

“什么？你还这么嘴硬。秦有理，我告诉你，我是看在你是烈属的份上，在给你最后的机会，别没有数了。我们已经忍耐很久了。”宗发奋的嗓门越来越高。

“怎么处理？还准备打右派啊？”秦有理不知深浅，还想做最后的抵抗，不但不后退，嗓门竟也跟着大起来。

“你……你吃了豹子胆啦！”宗发奋气得也拍了桌子。

门外、窗外，有好多同学围着看。

石校长走出去，把那些学生轰走，“看什么看，回教室去上晚自习。”

“不是要停课么？”正有学生要问。

“晚自习，不算上课。就算停课，也是停上课，不会停晚自习，所有的自习课都不会停。要不，你们在这儿干吗？白吃饭、晒太阳啊？不可能的。都走吧，走吧。”石校长的话也能解释得通。

管组长觉得，他得讲话了：“秦有理，别以为你爹是社教积极分子，你就一定是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你现在的角色，就是反动分子，对抗党组织、对抗工作组的反动分子。”

“你讲得不对。《人民日报》又发表文章了，说‘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你们为什么还要反过来压制群众。”（说明：这是该报6月16日的文章）

“唔，有这回事吗？”管组长一下被噎了回去。他看的报纸比学生还少。

宗发奋马上接上去：“你不要一知半解。我告诉你，中央还有明确的精神，对大中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经过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说明：6月23日，刘少奇在对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北局“文革情况报告”上，确有这样的批示。请见：《狂飏》，丁晓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

“什么？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秦有理这下也急了，嚷了起来。

“哎哟，哎哟，你反了天啦！”管组长也拍了桌子。那时，干部的火气大，拍桌子是家常便饭，常有的事。

这时，诸所长不急不忙地插上话：“秦有理，再跟你说一次，你心里不要没有数。看在你烈士子女的份上，我没带手铐来。你今天这个表现，就是聚众闹事。戴个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都不为过。还在自称闹革命呢。赶快低头认罪吧，不要多说了。”

诸所长的这几句，一下就把秦有理打闷了。

诸所长见有效果，又加上几句：“你要是对问题有认识，就留在学校里接受批判。你要是还坚持错误，那现在就跟我去上那里关禁闭室，等县公安局来处理你。你看，要走哪条路？”

“我留下，我留下。”秦有理急急地讲着，有些磕巴了。

“那留下，就有留下的说法。”管组长说。

“明天就开批判大会，批判反动学生秦有理大会！”宗发奋在边上叫着。

“好，明天就批斗，连那个大右派李辰，一起批斗！秦有理，今晚上你要认真检讨，交代你的反动意图。明天的大会上，你要公开检讨。”管组长这时说起话来，也是硬气得很。

“秦有理，你今晚上就别回宿舍了，就在这办公室里，哪儿也不许去！”宗发奋说。

“石校长啊，你去喊两个学生，晚上看着他。”管组长对石向上说。

“老石，今晚你也不用回宿舍了，就在这儿吧，省得有什么事，那些学生处理不了。”宗发奋在对石校长说。这些人都挺会支使别人的。

石向上只好出去找学生。肖校长看来是什么也不想管了，却一直在门外，见石向上出来，便跟上几步，对石向上悄悄地说：“这事情，要适可而止啊，留有余地啊。”

石向上“嗯，嗯”地应着，只顾往前走。

13.3 傻眼了

这一夜，秦有理坐在办公室里的一张板凳上，一直睁着眼，没有睡，连平近芳给他打来的饭也没吃。他怎么能睡得着呢？天一亮，他就要像真的反革命那样，被人绑着、扭着、推着，押上台。原本想斗右派，却要和右派分子一起被斗。明天将怎么被押上台斗，那种情形，他都没见过，也从没想过，但无数地听别人说起过。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啊？挨打挨骂是小事。但是，这个人，作为一个人，就完啦。从此以后，这一辈子就再也抬不起头，不能做人啦。永远被社会清扫了出去，真的是只能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时时担惊受怕，时时要躲开随时随地飞过来的石块和唾沫，甚至连躲也不让你躲。

天渐渐地亮起来了，秦有理不敢往下想了。

他，秦有理，一个革命的“天之骄子”，怎么会落到这一步？自己错了吗？响应号召，参加革命，有什么不对？批判右派，有什么不对？停课闹革命，有什么不对？报纸上、喇叭里，不也是在天天讲要积极参加文化革命、批判黑帮吗？难道真的是又一次反右，先骗大家出来反黑帮，而后就看谁出来就逮谁？是肖校长还是石校长、还是谁，好像提醒过自己。自己怎么没听进去呢？后悔啊，后悔啊，自己干吗要出这个力、逞这个能呢？秦有理恨不得抽自己的耳光，便使劲地拍打起双腿来。惊得坐在门口看守他的于又发和另一个同学，愣愣地盯着他。

再一想，不对吧？听那中央的广播和报纸，不像是假装骗人的样子啊。这一年半多来，尤其是这几个月，揪出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从吴晗、三家村、北京市委到彭罗陆杨，像刹不住车一样。看样子，更大的还在后头呢。这时候，跟着干革命，肯定没有错。想到这儿，秦有理又像是松了口气。

可是，眼前怎么办呢，难道就这样硬顶下去？

起床的钟声，也就是那敲钢条的声音，已经响过一阵了。

可是，这眼前谁来救我呢？那个管组长不是说了中央有批示，要抓一批反动学生吗？这也不会是假的。派出所诸所长等着要抓他，是明明摆着的，也不是假的。操场上的大喇叭，正“扑扑”的试着声音，准备着大会，更不是假的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哪一边说的是真的呢？”秦有理心里在挣扎着，实在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唉，不用说，他一个中学生不明白。就是北京的政治局委员之间也正在激烈争吵着呢，在要不要“放手发动群众”和“坚持保留工作组”之间激烈争吵呢。

操场上的大喇叭又响了：“请各班整队集合，请各班整队集合！”

“哦，我完了，我完了。”秦有理一下子头皮发麻，头脑空白。

他猛地站了起来，大声叫着：“我完了……我完了……”双手捂着脸，眼泪从指间刷刷而下。

“怎么啦，怎么啦？想通啦。”于又发也站了起来，幸灾乐祸地看着他。

“我有罪啊，我有罪啊。”秦有理不知从哪也学会了黑帮们被批斗时照例用的台词，说着说着，便声泪俱下。

于又发一看情况不对，不会是精神受了刺激吧，便对另一个同学说：“快去把校长喊来！”

不一会儿，石校长就过来了。

“怎么？想清楚了？有认识了？”石校长对着嚎淘大哭的秦有理，心里有了几分怜悯。

“我错了，我错了，我不想上台被批斗，我在这儿认错了。”

管组长和宗发奋也先后到了。

宗发奋昨晚没回公社，就在中学睡了，积极得不得了。他看着秦有理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熊样，很得意地说：“我早就对你说过了吧？你非不听，死扛，非得到现在这个样。晚啦，你听，会场上的人都到齐了，就等你去呢。”

大喇叭里果然在响着：“各班级赶快到指定位置，各班级赶快到指定位置。大会很快就要开始了，大会很快就要开始了。”

“我检讨，我有罪。我检讨，我有罪！别让我上台批斗了吧，我求求你们啦。”秦有理哭喊着。

管组长站在那儿，看着秦有理沉默不语。他在想，是按原计划开这批斗反动学生大会呢，还是能松一步就松一步。这对学生本人，尤其是对学校运动的平稳开展，或许都有好处。原本也就是吓唬吓唬，能稳住局面也就可以了。

就在这时，平近芳匆匆过来，站在门外，急促而又轻声的说：“管组长，请您来一下。”

管组长转过头，问：“什么事？”

只见平近芳招手示意。

管组长走了出去，平近芳把他带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小声说着什么。

还没说完，两人就匆匆走了，甚至都忘了过来说一声。

大喇叭又响了：“请各班级最后清点人数，请各班级最后清点人数。请工作组、校领导准备上主席台。”

秦有理一听，便“扑通”跪了下来，“求求你了，宗书记，别让我去吧。”

“不行，根本不可能！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在宗发奋这儿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他又对于又发说：“你们俩把秦有理押到台下等候。”

于又发和那个同学，相互看了看，对秦有理喊了声：“走！”就拽着他两个胳膊往外走。

秦有理踉踉跄跄被推着往前，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排在操场后面的学生都瞪大眼睛、不敢作声地看着他。没想到往日里龙头中学最神气的一个学生，今天怎么也落得像右派一样的下场。

秦有理刚被推到人群的后面，平近芳急急地走了过来，对于又发摆摆手，说：“停下，快停下。”

于又发不解地应声停下。

“怎么啦？”宗发奋在后面问。

平近芳把宗发奋和石校长拉到一边说：“情况变啦。县局刚来了通知，工作组要撤走。所有没有停课的学校，马上停课，连自习课也停，统统都参加文化革命。刚才我跟管组长说了。管组长说，今天的这个会也不能再开了。所以，我赶紧过来告诉你们。”

“咳！这弄的是盘什么景？”宗发奋忿忿地往下一甩手。

“既然如此，那就先把秦有理放了吧。”石校长对于又发说：“放了吧，先放了吧。”

平近芳的话，多少被秦有理听到了些。他挣开两手，跳了起来：“解放了！胜利了！”

秦有理满操场地蹦着，跳着，叫着！

申光荣、王溪他们几个，也跟上去，蹦着，跳着，叫着！

更多的同学也跟上去，蹦着，跳着，叫着！

管组长、宗发奋、石校长他们几个退到一边，冷冷地看着这些蹦着、跳着、叫着的学生。

大喇叭没有声音了。

平近芳一个人喊着：“同学们，回教室去吧，今天的会不开了。”

“停课闹革命了，工作组要滚蛋了！”秦有理蹭地跳上了土台。这布置好了的批斗反动学生大会的主席台，此刻好像是反过来为他准备的了。他涨红了脸，以最大的声音向全场喊叫：“同学们，中央来精神

了，让我们停课闹革命，停课闹革命！”

“噉，噉！停课闹革命了！”满操场的学生都欢呼起来。

6月18日，北京就发了“停课闹革命”的通知，被一层层地压了下来。7月28日，北京又发出了“撤出全部文化革命工作组”的通知，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进行宣布。这就压不住了，到海源，再往下传达，也就是过了一二天的时间。

可以再不用上课了，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啊，而且连工作组都不要了，怪不得所有的同学都激动了起来。但是，所有这些同学，以及所有的老师，乃至所有的干部，哪怕是程贵安、宗发奋这些经验老道的干部，也未必能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它至少意味着，这场运动已经不再按照他们所能理解的往常轨道运行。

秦有理还在台上没完没了地振臂高呼：“解放了，胜利了！”

他怎么能不兴奋呢？县委的工作组、学校的领导，那么些了不起的人物，都在他面前败下阵来了。

管抗先、宗发奋、石向上都在愣愣地看着，目瞪口呆傻了眼了，不知下面再会怎么变。

工作组这才来了几天，形势就发生了翻了个儿似的巨变。搁谁那儿，谁也弄不明白。

秦有理还在兴奋地叫着。

心里最发凉的是宗发奋。他在政治上还从来没有这样失算过。这甚至已经不能怪他不成熟。工作组的来与撤，不用说他没算计好，连在中央的最高层也都闹得不可开交，进行着一场尖锐激烈、最后被证明是生死攸关的大搏斗。

中央决定撤消派往全国各大中学校的工作组，是在1966年7月24日。这时离派出工作组，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即使是在社会上，人们也感觉出这里面意味深长，绝不一般。

这件事说明，毛泽东要搞掉刘少奇的行动，已经进入倒计时。他的这个打算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本卷的卷首语中就已经讲到，1970年12月，他在回答美国记者斯诺问“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时说，“那就早喽。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但是，要铲除刘少奇，即使对于毛泽东也绝非是一般的事情。因为这个行动要面对的是共和国主席，面对的是他所代表的上上下下、许许多多和他有着类似想法、即希望对大跃进、大饥荒有所反思的干部们。社教时所谓“1/3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说法，绝非随便说说，也是由此而来。想要肃清这么大量的“不同意见者”，仅仅打到几个人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撤掉几乎整个的行政官员层。这个前所未有的大动作，按原先通过党组织，通过行政组织，通过党内斗争和纪律处分的办法，比如像对彭德怀那样，显然是行不通的。不一般的事情，只能用不一般的手段。于是从社教运动后期开始的文化革命，把批判对象从文化界，渐渐引向党政领导；斗争方式从意识形态领域的学术性理论性批判，渐渐引向放手发动、大搞群众运动，完全甩开党政组织系统。

在这些方面，毛泽东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高超手段。他从1965年11月起就离开北京上南方去了，连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的重要活动都没有在京。把这一摊丢给了刘少奇，看他如何接招、如何反应。期间还不时来个动作，比如，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

刘少奇只能按传统做法，从6月上旬开始派出工作组。这时的党内高层对此并没有不同意见，甚至江青自己还想参加北大的工作组。直到康生知道毛泽东的意图后才开始表示反对。

7月19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第二天他就明确表态：“有人镇压学生运动”，“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7月24日，他又说：“全国95%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请见：《狂飚》，丁晓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7月25日则进一步说：工作组“起破坏作用”，“统统驱逐之”。（请见：《乱云飞渡》，姜华宜，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

工作组的撤走，使刘少奇失去了最后的防御阵地，便再无抵抗能力。平心而论，如果工作组坚持下来，按照这个方式走下去，那也会有一大批人遭殃。应该说，这种办法，是沿袭了1957年反右的指导思想，具体做法则是依照社教运动的那一套。“据很有限的部分统计，工作组的‘反干扰’运动，在仅仅20余天时间里，在24所高等院校就有一万多名学生被划为右派学生。”（请见：《狂飙》，丁晓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

当然，撤走工作组并不是为了拯救这些人，而只是为了打倒派工作组的人，不管他是派还是不派。不派，那可以有另外一些话可说，这也是一开始派工作组时，没有人表示异议的原因，好等着以后另外有话可说。

一个严重的局面摆到了几乎所有人的面前，从上面的刘少奇，到下面的管组长、宗发奋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走了。就在7月29日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宣布撤走工作组的“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刘少奇黯然坦承：“至于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请见：《回首“文革”》，张化、苏采青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

但是，不晓得怎么走，也得走啊。

就是傻了眼，也得走啊。

宗发奋马上就走了。连大门也没走，从学校南面的小门出去，绕道而行，走了。

管抗先，那名字原本是取之于“抗日先锋队”的意思，也走了。来的时候，是小吉普。走的时候，怎么办？还是借了石向上的自行车，卷上铺盖，等天色暗下来，少有人知的时候，走了。

没有任何的仪式，没有任何的说明，他们悄悄地走了。连石向上想送他们到校门口，都没让。

只有石向上没办法，还在学校里。

可是，即使是他们就能这样走得掉么？

13.4对立

撤走工作组，秦有理知道他胜利了，他彻彻底底地胜利了。一个普通的中学生，面对工作组，面对公社党委书记、校长，甚至派出所长，他都胜利了。这是何等的力量啊。他知道这不是他个人的力量，他个人可以说是渺小得微乎其微。不用说派出所了，就是工作组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过来扣上他一个右派学生、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都可以置于他死地。是什么人解救了他，是什么使他有这样的力量和勇气？是革命，是文化大革命的滚滚巨浪，在推着他向前。他要在这巨浪的推动下，永无止尽地勇往直前。

现在，他在校园里，说话有人听，做事有人跟了。老师们见了，也都站得远远的。

“工作组压制革命，找他们算帐去！”秦有理心里有气，振臂一呼，后面也有一、二十个同学跟来。

秦有理领着他们朝着校长办公室而去。

办公室关着门，学生们在外面吼着：

“工作组滚出来！”

“工作组滚出来！”

秦有理上去推门，肖校长正要出来开门。里面还有石校长在。

“同学们，有话好好说。”肖校长和颜悦色地说着。

“有话好好说？他们什么时候对我们好好说过？”秦有理答道。

“那你们就请说吧。”肖校长还是耐着性子。

“没你的事，跟你没什么好说。我们要找工作组。”秦有理知道肖校长在这些事情里没掺和，也不跟他多说什么了。

“他们都已经回县城、回公社了。”

“他们都跑了？不行！还有石校长呢。”秦有理哪肯放手。

“对，对，还有石校长呢。”那帮学生也都喊起来。

“石校长必须接受我们的批判。”说着，秦有理要往里挤进来。

“不行啊，不行啊，这里是校长办公室，你们不能进。”肖校长往外推着秦有理，想关上门。

“还想关门？”外面不知谁喊了一句，“咣”的一声，一块石头飞来，把玻璃窗砸了。碎玻璃“哗哗”地掉了一地，那声音这么脆，这么响，这么地刺耳。肖校长心一惊，脸一沉，知道这事情跟以前不一样了，远不是他能管得了的了。

石向上见此情景，也只得缓缓站起，向外走来，很生气地说：“有什么事就对我说，砸玻璃干什么？”

“砸玻璃算什么？我们还要砸你呢。你必须接受革命学生的批判。”秦有理说着，朝申光荣一摆手，“把他押到操场，进行批判！”

申光荣二话不说，就和秦有理一起，拽着石向上的胳膊往操场上拖，一边还大喊着：“工作组压制革命没有好下场！”

肖胜利这些天来在干什么呢？

他在想，他在想革命，他真的是在想干革命。

在他看来，生活中有阳光、有鲜花，但也有烦闷，也有不愉快、不理想。这些不理想，有的是个人生活中都会遇到的，有的确实是社会带来的。他希望生活能更加阳光，更加舒展，生机勃勃，所以需要改变，需要革命。

可是革谁的命呢？革地主、资产阶级的命，他们早就被打倒了。说是还有他们的代理人在。谁呢？右派，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右派。具体讲，学校里就有，那个李老师，李辰。可他怎么看，也不像个敌人的样。是自己政治水平低，还是他会乔装打扮？好像都不是。那再革谁的命呢？走资派。这次文化大革命不就是要打倒走资派么？走资派，就是当权派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当权派里，谁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呢？拿自己学校来说，是谁呢？是他爹？这，他可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虽然他父亲这些年有些低沉了，可也决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啊。再说，就是要走，也走不上去啊。一个中学校长，他父亲能有多大的权，他还不知道吗？对下，对付个学生，对付个老师，校长是有点权。但是，要决定学校往哪儿走，即使是校长也绝对没有那个权。

再向上，县教育局？公社党委？那些他就知道了。那些机关里会有人走资本主义，不知道，没看出来。工作是肯定会有缺点的，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也是可以肯定的事。

想来想去，真是矛盾。而且他还觉得，这回文化革命，搞来搞去，上头的一些做法更矛盾。既是来势汹汹，场面大得很，调子高得很。可是派来个工作组，这个也不许，那个也不准，那个文化革命看样子最多也就是开开班会、写篇稿子发个言，还用得着这么大张旗鼓地搞么？这种按常规、走老路的方式，也不是个办法。尤其是，工作组突然地走了，连声招呼也不打，一点说法也没有。这里面，很蹊跷，很难捉摸，肯定背后是有什么事，有什么我们所不知道的事。

敲碎玻璃的声音，惊醒了他的思绪，看到一群学生推推搡搡地拉着石校长往土台子去，看样子又要批斗了。

肖胜利马上就想到，不能让秦有理这么搞。他也走了过去。很多本来在远远看着秦有理他们动作的人，也都跟着肖胜利过来。

肖胜利这么做，是有很多原因的。一是，他对石校长有所接触，觉得这个人还是不错的，对工作认真负责。老婆孩子都留在北山，好几个星期才回去一次，真的是一心扑在教学上。上的课也不错，在龙头中学，上的课受学生的欢迎程度，可以跟李辰老师一比。自己老爸也是校长，肖胜利知道校长的辛苦。再说，如果石校长倒了，下一个毫无疑问那就是他老爸。就从这一点说，他不能不起来维护石校

长。更何况，他很讨厌秦有理这个人。总觉得这个人不正派，是个需要提防的人。在这样大的运动面前，更是这样。

石校长很狼狈，看来是不想走，却硬被秦有理一把一把地推着。

秦有理还一声声地高呼：“工作组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石向上就是龙头中学的走资派！”这些提法，在龙头可都是第一次。

肖胜利带着那一群人走了过来，站在秦有理的前面说：“先停一下。石校长是不是走资派，要由上级来说，我们当学生的，没有权利下这个结论。工作组做得不对，我们可以反映情况。但是在没有上级的结论之前，不能像对阶级敌人那样随意批斗校长。”

肖胜利朝着后面的学生大声地问：“你们说对不对？”

“对，不能随便批斗！”

“要尊重校领导！”

好像有更多的学生不主张随便斗。

其实，无论是肖胜利还是秦有理，到这时，也只是听说外面城市里有开批斗会的，却并不知道批斗会是个什么样的。

“我……我们不是批斗，是批判。”秦有理也会转个弯。

“要批判，在教室里就完全可以。有话说话，有理说理，用不着这个样。”肖胜利也能转过来。

“对，对。”全操场都在叫着。毕竟肖胜利在同学中的影响更大一些，形象更正面一些。操场上的声音似乎压倒性地支持肖胜利的意见。

“走，走，上教室去。”秦有理把气压在心里，将石校长推到肖胜利面前，“我看你怎么批判？我要看你怎么包庇走资派？”自己却走了。这大概是龙头中学两派群众组织对立的早期萌芽。

“噢，噢。”全操场的人又都瞎喊着，走散了。

那碎了一地的玻璃，不知后来是谁扫的。

大风暴既然已经来临，就不会这样地停息。

第十四章 红卫兵

1960年1月14日

14.1红卫兵的由来

文化大革命的步伐，越来越咄咄逼人。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炮口直指资产阶级司令部。

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文化革命，正式称之为文化大革命。一字之差，性质却完全不一样了。

8月10日，毛泽东以不同寻常的姿态，走到中南海西门的群众接待站，直接向人民群众发出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请见：《人民日报》，1966年8月11日）

对全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8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红卫兵。以此为标志，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颠峰时期。

这是毛泽东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又一重大举措。于是，成百上千万身穿黄军装、臂戴红袖章的红卫兵一时间就像滔天洪水，卷着旋涡、巨浪和泡沫，冲向整个中华大地。所到之处，摧枯拉朽，势不可挡，所向披靡，任何出现在它面前的东西都像碎片一样被顷刻吞没，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人们的震惊和伤痛之中，席卷一切，滚滚向前。红卫兵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角，成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不会忘却的一页。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先后有三个大动作。一是1965年底在上海由江青策动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这是个信号弹。但发现各地、尤其是北京没动。二是，五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不少重头戏，包括撤消“二月提纲”，包括制定“五一六通知”，包括改组北京市委，包括抛出彭罗陆杨，包括重新组成“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即“中央文革”）。这是下了文化大革命的总攻令。刘少奇来了个“反干扰”，毛泽东就再出重拳，拿出了第三个动作，就是八月份掀起红卫兵运动，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亲自率队去炸开“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城墙。

红卫兵的出现，作为名称，有它的偶然性；作为运动，又有它的必然性。

几个月来，高层分歧的蛛丝马迹，首先为一些高干子女所察觉，觉得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在专制体制出现裂痕的时候，他们力图要抢在前面，保住和扩大自己既有的特权地位，抢先冲击他们以为无产阶级司令部要冲击的对象。他们要充分利用他们的政治优势，决心在这场大动荡中打头阵、立头功。由此，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以“血统论”为组织路线，以赤裸裸的血腥暴力为武器，这样的学生组织首先在北京一些高干子女集中的中学里出现。一开始，是些名称各不相同的“战斗队”。1966年5月29

日，清华大学附中八个学生，为对抗校领导和工作组的压制，最早成立了一个名叫“红卫兵”的组织。6月24日，他们贴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响亮地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7月28日，江青把这份大字报带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到了可用之处，立即给予高度肯定。几天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发布的文件之二正是《毛泽东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在信中，毛泽东连用了三个“热烈的支持”，对红卫兵以极大的鼓励。（本节的具体事例请见：《狂飙》，丁晓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于是，这两种想法交汇到了一点。红卫兵运动受此鼓舞，一下子就风起云涌，排山倒海般地起来了。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清华附中的几个年轻人把他们战斗队的名字叫作“红卫兵”，有它的偶然性。而毛泽东要按照他的思路，甩开一大批党内当权派放手推进文化大革命，急需要有一种非常手段，这又有它的必然性。红卫兵正好迎合了这种需要。它作为运动很快地兴起，就是这两者的结合。按照辩证法的说法，就是偶然性中有必然性，必然性中有偶然性。

14.2造反有理

毛泽东8月18日接见百万红卫兵，就像原子弹爆炸一样震撼了整个中国大地，冲击波也像巨浪一般卷到了龙头镇。

龙头中学，虽然停了课，虽然没了工作组，虽然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可学生们还都圈在教室里。第二天早晨，听到这个广播。上午，每班一张的省报刚进教室，秦有理一把就抢了过来，看了那大标题，看了那大照片，一下就热血沸腾了，从书桌里抽出书本就往讲台前扔，大叫着：“闹革命了，造反了。”

满教室的学生们也都纷纷把书本往天花板上扔，“噉，噉，闹革命了，造反了。”

秦有理站了起来说：“红卫兵是毛主席的近卫军，咱们也要成立红卫兵，跟着伟大领袖干革命！”

“好，好，我参加。”“我也参加。”学生们一哄哄地说。

秦有理看着满教室围着他的人，兴奋无比，大声招呼着：“红卫兵，也不是谁都能参加。首先要政治表现好，要有政治热情，要有造反精神。而且，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只有红五类才能参加红卫兵。谁是红五类的，到我这儿来报名。”（说明：红五类，当时是指属于革命队伍的家庭阶级成份，如：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知识分子等。他们的孩子自然也就是革命队伍的人。实际上是种封建主义的血统论。）

一群学生立马围了上来。

“我是贫农！”

“我爸是干部！”

“我爸是上中农，但我妈是下中农，可以吧？”

“那得看今后表现了。”秦有理更神气了。

同学们围着他，挤得不可开交。

后面有个同学喊了声：“有理，上前面来吧！”

秦有理挤了出来，站在讲台上激动地说：“我宣布龙头中学红卫兵成立了。我就是司令。”

“秦司令”，“秦司令！”叫声居然还真此起彼伏。

这叫喊声惊动了旁边的教室，马上就有不少脑袋出现在窗户上和门口外。

秦有理大手一挥：“我们上操场去，让全校的人都知道我们有红卫兵，让全校的人都来参加我们的红卫兵！”

顿时，满操场都挤满了人。

“我要参加红卫兵！”

“我要参加！”

“我也要参加！”

秦有理已经忙不过来，分不清哪个可以、哪个不可以参加了，“只要听我的，跟我走，就都可以参加！”

越来越多的同学把秦有理围得连脑袋也看不见了。

申光荣来得稍晚了些，挤不进来，急得在外面大喊了声：“秦司令，高一年级的那边，我帮你去招呼了。”

“好，好，我封你为红卫兵高一年级分部司令。”

“得令！”申光荣高兴得蹦了起来，往他们那排的教室走去，边喊着：“高一年级同学，要参加红卫兵的，到我这儿来！”

没一会儿，申光荣这边也被一大群学生围上了。

“嗷，嗷！”

“红卫兵，红卫兵，造反有理”

“红卫兵，红卫兵，造反有理！”

操场上，一大群已经参加了和以为参加了红卫兵的人，起劲地、热情地跳着、叫着、喊着，以为他们的节日到了。

还真有仔细的，人群里忽而有人说：“你看报纸上红卫兵打着红旗，戴着红袖章。咱也得有吧？”

“对，对，咱们也得有！”很多同学也在回应。

秦有理抬起头，想了想，说：“对，咱们上仓库去看看，把红旗拿出来。”

“嗷，嗷。”一群学生跟着秦有理向后面的仓库走去。

仓库锁着。

秦有理想也没想，就把它扭开了。

“在这儿呢。”有人一眼就看见了。

果然，在墙角落竖着一捆旗帜，立马就被搬了出来。大家七手八脚，把其它颜色的扔到一边，一面的红旗扛了出来。

王溪的眼睛尖，还看见了木架上放的红布横幅，就说：“这红布正好能做红袖章哎。”

“好，好，你这主意好！”秦有理拍了下王溪的肩膀。

大家又把横幅打开，找来了剪刀，一条条剪开。有的等不及，干脆就用手撕了，也不管大小整齐与否。撕下一条，后面就有好几只手伸过来拿了。不多会，仓库里的红布就被撕光了，还不够。

申光荣带了高一的一帮人过去，红布早已没了。他对秦有理说：“秦司令，最要紧的是，我们也要穿上军装，那才像个红卫兵！”

“对，对，可是，这上哪儿去找呢？”秦有理向大家喊着：“各人回家去找解放军的军装。谁能穿上军装，明天我们就一起集体行动。”

有的同学高兴地走了，有的同学害愁了，“我家也没有当兵的，这怎么办？”

“大家想想办法。有多多的，就相互借一下。”申光荣说。

“对，有办法的，就多拿出来点。谁能拿出五套军装，就让他当队长。谁能拿出十套军装，就封他为副司令。”秦有理干脆开出了价码。

大家高兴地向各处散去，就像潮流一样向各处涌去。

面对这一幕，校长和老师们五味杂陈。

肖校长隔着窗玻璃（打碎的玻璃，第二天就装好了），长叹一声：“真的是造反了。他们的日子来了，我们的日子去了。”“不行，不能让他们这么闹，居然敢把仓库抢了。”石校长想出去制止。

“算啦，算啦。这阵势，不是你我能挡得住的，世道变啦。”

石校长打开门的手放下了，可是也没回屋里，站在那儿看着。看着，看着，大概是心有不甘，又往前走了两步，在屋檐下看着那些在亢奋中奔跑涌动的学生。

这时的学生，没有一个转过来看校长的。

平近芳看到这一幕，身上已经有点发抖了。她更不会想到会这样。她不敢想，甚至不敢看。办公室里有的老师说把门关上，有的老师说要出去看看。她都没听进去他们在讲什么，愣愣地站在自己的办公桌后面，看着窗外几乎已经不认识的学生。

于又发和申光荣是一个班，见到申光荣拉走了一大帮同学去参加什么秦有理的红卫兵，气得过来找肖胜利。

“不能让他们这么猖狂。他们这是在抢劫国家财产，我们去把红旗抢回来。”

肖胜利在看着，也在想着，听了于又发的话，他抬起手，好像不赞成，说：“还要再看看想想，这不是抢一、二面旗帜的事情。”

“那怎么办？”

“我们也要成立红卫兵。红卫兵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也要跟着毛主席走。”

“对，对，我们也要闹革命。那我现在就出去喊人。”

“等等，再看一看，再想一想。”

“再晚了，人都跟秦有理走了。”

“是的，不能晚，但也不用太早。”

肖胜利和秦有理，会各自走什么路呢？

14.3破四旧

破四旧（即所谓的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项重要活动。是林彪在他著名的“5·18讲话”中最先提出的，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又提出破四旧。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林彪再次讲到要破四旧，并号召“红卫兵小将立即行动起来！”

破四旧，是推动红卫兵运动掀起高潮的重要一环。

在龙头中学也是这样。

第二天，果然不断有学生穿着各式旧军装来到学校，黄的，绿的，实在找不到军装，还有把黄工作服穿来的。

学生们又渐渐地聚在操场上。

秦有理看来得差不多了，又站到了台上喊起来：“同学们，不，红卫兵小将们！”

“噉，噉！”下面齐声欢呼。

“我们红卫兵今天就要开始行动了！我们要响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大破四旧。所有封资修的东西，都要彻底铲除！”

“那我们去铲什么呢？”下面有人问。

“就从我们的学校开始，从我们的教室、从我们学校的每个角落开始！”

“图书馆里有好多旧书，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最集中的地方。”申光荣站在边上说。

其实，龙头中学里也就是个相当于一间教室大小的图书室，充其量千把本的书，多数是些教辅材料。

“好！各班回去几个到教室里检查一下。我们大部队，现在就去抄图书馆，把封资修的书都烧掉！”秦有理不用学，就知道下达指令了。

“嗽，嗽，”在一阵吵嚷声中，秦有理领了一帮学生，直奔学校最后一排房的图书室去。

管理图书馆的是个退休的老教师，忙拦住这帮学生：“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去你妈的！我们要革命，要造反，要破四旧了！”秦有理一把推开他。他们冲进图书室，把书架上的书往外扔。

“这本还是四旧啊？”申光荣拿着一本书问。

“不管那么多了，只要不是毛主席的，不是马克思的，统统都烧！”

“嗽，嗽！”龙头中学不多的几百本书都扔到了窗外，堆成了一堆。火点起来了，火焰烧起来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围在火堆边，激动地跳着，叫着，舞动着。

李辰赶了过来，忙说：“啊呀，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不能破坏公共财物啊！”

“哈哈！”引来的是一片哄笑。

“你这个右派分子！从现在起你已经不是我们的老师了！今天没斗你，就算便宜你了，还敢凑过来？快滚！”秦有理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李辰没走，只是在一旁着急。他眼见着十年前刚办龙头中学时步行去县城买回来的历史地理参考书，被吞噬在火焰中。

两位校长也过来了。几百本书已经是烈焰腾腾。

肖校长几乎是掉着眼泪，痛心地说：“同学们哪，不能这样做啊，书是没有罪的呀。这些书都是几十年来一本一本进的呀，来之不易的呀！”

肖校长的这番苦口婆心，引来的却是一阵嘲笑。“这年头，还讲这些，过时啦。”秦有理对肖校长还不是很厉害，只是嘲笑而已。

石校长则是严厉地说：“你们这是要犯错误的！不要胡来啊，社会主义社会不允许这样搞的。你们要革命，学校支持，但一定要通过合法途径啊！”

“我们这是革命行动，是以实际行动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要支持同学们的革命行动！”秦有理更不把石校长放在眼里了，对着石校长大声说话了。

“对，要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一大帮学生也喊着。

“不许这样做！”石校长都声嘶力竭了，还在坚持。他伸出手，想要挡住往火里扔书。

倒是秦有理发怒了，“你敢！你们工作组压制革命的账还没算呢。你还敢挡，就把你推到火里！北京的学生都已经把校长拉出去游街了，你别心里没数。”

看着秦有理已经扭曲了的脸，李辰硬拉着石校长走了。

学生们更无所顾忌了。不少学生还把课本、作业本也往火堆里扔。火越烧越旺，黑烟卷起。学生们围着火堆，兴奋地跳着，还唱着他们还不太会的文革歌。龙头的学生们，从没有过夏令营，从没有过篝火晚会。可怜只有文革的疯狂，才给他们带来这种冲动和亢奋。

石校长急忙赶到公社。

宗发奋说，公社党委不能不管这事。于是，公社党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

宗书记依然一脸严肃。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出了半天力，最后没有落个好，使他十分不快。眼见着文化革命来了，又是展现自己水平的时候到了。他还主动要求参加了中学的工作组，本以为能抓住机会，表现一番，谁知却又灰溜溜地出来了。其中的原因还没搞明白，更大的浪潮又打来了。中学文化革命的成败，已经和他联系在了一起。他已经趟了这潭混水，粘上了泥。如果中学的局势控制不住，他也脱不了干系。到今天，这帮学生娃居然敢公开不服管教，烧毁公共财物。虽然毛主席表态支持红卫兵，可也没说让这么胡闹呀。一定是受了坏人指使，又一次跳出来反对社会主义。这一网下去，肯定比1957年反右捞到的鱼还要多。工作组不在了，他要顶得住。在这场大风大浪中，他要在领导干部中起个表率作用。等到运动后期，那个个都得向他伸出大拇指。到那时候，呵，呵……

当然，宗书记表面上还是沉着脸，说：“他们居然公开对抗社会主义，对抗党的领导，公然扰乱社会秩序，要查出闹事者和幕后策划者，立即严办。”

纪社长是另一种想法。他一直没开口，沉思着。他在想，1957年反右，过了头；1958年大跃进，过了头；1959年反右倾，过了头；刚过去的社教运动又过了头；这次文化大革命恐怕还是要过头。他在想，这次运动的形式好像跟以往都不一样，不是从上面一级一级布置下来，而是从下面先闹起来再说。而工作组的仓促派出又匆匆撤出，暗示着这里面的事情，不是一般的复杂。

宗书记讲完话以后，好一阵子，纪社长才开口：“现在的形势要比我们想的复杂，两方面都要慎重。对学生要加强劝导，教育他们不要冲动；作为我们，处理上要慎重，不能轻易出手。”

“这可不行，”宗书记态度很坚决。“这个时候不干预，两、三天的时间我们就会失去控制，那时想管也管不住了。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中学的问题，很快就会影响到整个公社、整个社会，就会出现匈牙利

事件的重演。我的意见还是态度要坚决，坚决制止，坚决打击。我们公社党委是强有力的，不是吃素的。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出动的时候了。”

石校长说：“另外请通知各大队。要求他们通知各学生家长，叫他们的孩子退出红卫兵。我们有团组织嘛，要什么红卫兵呢？不要跟了少数野心家犯错误啊。”

“对，哪家的学生参加红卫兵，运动后期打成右派，哪家就按反革命家属处理。我就不信治不了这帮毛孩子。”宗书记狠狠地说。

会议决定成立龙头公社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宗书记，副组长纪社长、石校长。明天就进校宣讲遵纪守法。

石校长忧心地说：“县委派出的工作组都不行，我们能行吗？”

宗书记说：“不行，也得行。那个工作组实际上就是教育局派的，力量不行，不坚决，不果断。”看来他对管组长还挺不满。他接着说：“把派出所诸所长也叫上。我建议，诸所长也作为副组长。叫他多带几个公安员。不行，就坚决镇压，当场抓他几个。”

纪社长说：“公安员就先不要叫吧。”

没等宗发奋他们去中学，中学的红卫兵却走出学校进了镇。

第二天，校园里那点小小的闹腾，就已经满足不了红卫兵们革命的热望。秦有理他们几个一商量，“夫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咱们就去镇上破四旧。”“好，好！”一片响应的声音。

秦有理把手一挥，三、四十个龙头中学的红卫兵，穿着旧军装，戴着红袖章，上面用黑墨汁写着“红卫兵”三个字，高呼着口号，往镇里走来。前面打着也是黑墨汁写的“红卫兵”的红色大旗。

这支红卫兵虽然有点土气，没有一色的军装，没有带铜扣的皮带，甚至还不会唱当时最流行的造反歌，但这可是龙头镇上第一支红卫兵。老乡们都停下来看，这红卫兵是怎么回事。

红卫兵们来到十字路口，站下了。秦有理扯着嗓子喊开了：“革命的同志们！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今天来破四旧。所有封资修的那一套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统统在扫除之列。”

但转头四望，这龙头镇毕竟还是农村，没有城市里的那些花花绿绿，一时竟找不到什么可破的。

“那张县京剧团的海报，撕了！”秦有理说。申光荣立马过去撕了。那还是正月里县剧团过来露天演“三堂会审”的海报，贴在墙上，早就破得只剩下几绺纸条了。

“喂！那个女的，站住，不许留长头发！”秦有理指着远处走过来的一个妇女说。吓得那妇女立即转身一溜烟地跑进胡同里没影了，逗得街两边的老乡哈哈直笑。

申光荣又提议：“要不，把这个陶家大院砸了吧，这是地主阶级的象征。”

“对，对！”很多人跟着喊。

“好，砸了它！”秦有理说。

还没等找来锤，公社领导过来了。

宗书记背着双手板着脸走过来，对秦有理说：“秦有理，你这小子，已经对你宽大处理了，还敢出来？”他想居高临下地压住他。

“是啊，怎么啦？是你们工作组失败了，逃跑了。”秦有理面对宗书记轻轻一笑，已经不打怵了。

“昨天烧书本，今天要砸房子。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吗？”

“什么行为？”

“这是破坏公物，危害社会秩序，是犯法的事。必须立即停止，赶紧回学校去。不要以为没有工作组，就没人管你们了。政府还在，公社党委还在，我宗发奋还在。由不得你们乱来。”

申光荣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秦有理却不为所动：“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你们无权干预。你们这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反了。来人啊，把这个秦有理扣起来！”

后面的几个公社干部往前走了两步，可并没有动手的意思。

“党中央决定要搞文化大革命，你为什么要对抗？”秦有理还不服软。这次真的是宗书记的理解错了，红卫兵是有毛主席、党中央支持的。

“你有什么资格谈论党中央？我是公社党委书记，是龙头公社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在这儿，龙头的地面上，我就是代表党的领导！”

秦有理不知哪来的胆子，居然向同来的学生说：“不要跟他啰嗦，我们走。谁阻挡革命绝没有好下场！”看也没看宗发奋，扭头走了。

不过，他们也没去砸陶家大院。既没有找到铁锤这些工具，也不想真的出这个力，而是回学校吃午饭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出现了红卫兵这种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政治怪胎，除了是推行极左的政治路线、政治运动的必然结果外，还有其深刻的社会思想根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大地出现的这场红卫兵运动，作为左倾暴力的极端典型，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绝无仅有的记录。尽管国内还很少有专著、论文对此作专门的论述，但如同“文革”中的很多问题一样，将会给以后的人们留下研究政治、研究历史和文学创作以无尽的材料，使人们能认清很多问题。

本书无意对红卫兵问题作全面的论述。如果要对“红八月”的这种恐怖现象，进行社会原因分析的话，其中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流氓无产者”的意识和行为对中国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在中国几千年既高度专制又极度贫困的社会里，有一大批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群。他们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不但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固定资产可言，连最起码的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都没有，过着有今天没有明天的日

子。他们除了仇恨和拳头之外一无所有，所以他们观念狭隘，崇尚暴力，思想偏激，行为极端，急于改变现状而可以不计后果，蔑视各种规则，敢于铤而走险，甚至仇视社会，毁掉在他们面前出现的一切。这种意识是封建思想在底层社会的表现。看起来和帝王思想水火难容，实际上两者是经常相互利用、相互推动，甚至合为一股。

他们的革命性表现在敢于推翻一个旧朝代。“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他当得皇帝，我就当不得？与其他当，不如我当。可是，他们的局限性也在于此。他们的革命只是换了一个皇帝，换了一个朝代。至于这个新皇帝当得怎么样，只有天知道了，全赖于他的个人品行。老百姓们有切身感受，当然也知道。但是，知道了，也晚了，没有用了。治理社会的权力始终没有交给老百姓，哪怕是历尽千辛万苦、追随他们革命的老百姓。甚至连一起出生入死、共同奋斗的亲密战友，也不肯给一点。对于这些流氓无产者，如果引导得法，则可以作为社会革命的一支力量；反过来也极有可能被人利用，成为一股反社会的逆流，表现出令人瞠目结舌的破坏性。

并不是说秦有理他们本身就是流氓无产者，但是相对来说，他们（包括申光荣、王溪）的社会地位更类似于此，他们的思想意识更接近于此。他们觉得在这个社会体系中受到了较多的压抑，他们想伸展自己的身躯，伸展自己的手脚，想要有更多的活动空间，却苦于一直没有正常的渠道。是文化大革命为他们打开了一个旁门左道，他们要冒险一试，不理会有怎样的后果，不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而极左势力正是在误导他们，利用他们，使他们在革命的号召下，热血沸腾，头脑疯狂，动作越来越失控，像中了邪似地冲向前去，不管前面是幻影还是悬崖。

这种思想意识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社会。即使在今天，在某些政治权力的保护之下，哪怕是已经腰缠万贯、洋房豪车、骄奢淫逸的某些官二代、富二代们，本质上骨子里也还是流氓无产者的那套意识，而且在行为上，强取豪夺，寡鲜廉耻，也是一副流氓做派。

14.4 革命不分先后

肖胜利躺在里屋的炕上，望着窗口外的树叶在风中翻卷，在阳光下不时折射出不同的光芒，忽而亮，忽而暗。

他作为肖校长的儿子，按说既是知识分子家庭，又是革命干部的家庭，遇到革命大潮也应该是精神抖擞。可他的心情很复杂，因为他的父亲出身剥削家庭，他的母亲还死于土改中的满门抄斩。对于革命，他有着另一番滋味，既不同于贫下中农的孩子，也不同于地富“狗崽子”。比起同龄的同学，他要成熟得多。这并不是说他从内心学会了圆滑世故，他一样有革命热情，追求上进。不同的是，他既在做，又在想，面对这场把中学生直接卷进去的文化大革命，他应该怎么做。不只是怎么做，还要考虑做了以后的结果和影响，领导、老师、同学和父亲对这些会怎么想，倒不完全是要去迎合别人。对于秦有理，他也很了解、甚至是理解。他知道秦有理有着和他那个父亲一样的狂热和冲动，而且更加自以为是，更加以天生的革命派自居，不像秦德才到时候会夹着尾巴逃走。

肖胜利想了一个小时，终于想过来了。尽管在这之前，他已经想好了，与其他造反，不如我造反；与其他革命，不如我革命。他能拉起红卫兵，我也能再搞个红卫兵。在同学里的影响，我还不一定比他

差。只是有个时间的选择问题。

当秦有理烧书本、上街破四旧之后，他觉得到了该他出手的时候了。

他下炕到外间，他爹正趁中午时间拿着一大堆报纸在炕上看。

“爸，北京还有什么新情况？”

肖校长只顾趴着头，看得很认真，嘴里嗯嗯着，也不抬起头来。

肖胜利跟着翻起了报纸，“大串连”、“外地红卫兵进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些闻所未闻的新名词跃入眼帘。他也如饥似渴地看了起来。看着看着，他放下了报纸，声音响亮地说了一句：“爸，你停一下，听我说一句。我也想成立一个红卫兵，革命主动权要抓在自己手上。”

肖校长沉思了下，说：“也好，但是要很谨慎。这场运动会怎么发展，怎么收场，现在还看不准。违反政策的事，不要去做。要抓住革命大方向。”

“好。”

第二天，龙头中学第二个红卫兵组织，“东方红总部”出现了。肖胜利任总指挥，人数也不比秦有理的少。这里面，我们认识的有，高一的于又发，高二的迟解放等等。

“我们上哪儿去破四旧呢？”于又发还挺积极。

是啊，作为红卫兵要有革命行动啊，那上哪儿去表现呢？也上街去剪头发、砸招牌？弄得满镇的人议论纷纷，大家都反感得很。可又不能不表现啊。

“有了。我们上望海山去砸庙、砸教堂，这些正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象征。”

“对，对，我们去砸庙、砸教堂。”

在第一卷里我们已经知道龙头镇后面的望海山上曾有过寺庙和教堂。那寺庙当时国民党存放军火，被解放军击中而炸没了，剩了些墙根。直到前两年困难时期，才有人在上面支了个棚子，难得也有人去烧柱香。至于那教堂，也是多年无人理会。1958年大炼钢铁，想到把它拆了拿去砌土高炉。可是那破墙很结实，就是砸碎了，也拆不下整砖，就算了。那些屋顶、窗框有木头的东西，在更早的时候就都没了，只剩半截破墙任凭风吹雨打，成了上山的人拉野屎的地方。

肖胜利他们就是要砸这儿。

二、三天之后，又一帮红卫兵，也就是“东方红总部”的人马，也穿着旧军装，戴着红袖章，举着红旗，扛着铁锤、羊镐，上望海山去了。在一阵阵“吡吡况且”之后，随着粉尘的扬起，那原本名不副实的寺庙和教堂，也就真的连根彻底消灭了。

就此，龙头中学有了两支红卫兵。那时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红卫兵和类似红卫兵的各种各样的战斗队多去了。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

一是早期在北京和省城里出现的高干子女红卫兵，是那个时代红卫兵的典型代表。他们是一些中、高级干部的子女，比起普通民众更接近于上层领导，最早得知领袖人物的某些想法。于是就急于跳出来表现自己，最早提出了“造反有理”、“打倒黑帮”的口号。所表现出的方式，也是专制体制下那种特有的极端行为。高干子女红卫兵是“文革”急先锋，表现最猖狂，打人最凶狠。他们虽贵为高干子女，内心深处却依然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意识。他们这个红卫兵的性质也是个群众组织，但比起后来几乎全社会都参与的群众组织，不是一回事。然而，尽管他们知道的内情要多一些，但终究只是知道领袖的某些想法，而不是全部想法，尤其是更不知道、也不理解领袖深层次的想法。他们不知道，他们高喊的造反并不是毛泽东要的造反，他们也就不可能去完成毛泽东讲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战斗任务。所以，当后来“文革”的矛头指向整个官僚层时，包括他们自己的爹娘时，他们傻眼了，不知所措了，甚至也知道要起而抗争了。不过也没有用了，那么快地就被毫不留情地扔进了垃圾堆。

在稍后的时间里，对于普通干部和普通民众，面对汹涌而来的革命大潮，他们并不理解左倾做法的真实意图，只是想维持原有的秩序，在相对还有点了解的现有干部的管理下保持住那“铁饭碗”里还有的几粒可怜的米，生怕连这一点也没有了。当然更多的人是在响应号召，随革命大流。这就是1966年8月下旬以后大量出现的普通干部和民众子女的红卫兵。他们也喊着“文革”的口号，但没有那种激烈的行为。他们既不满高干子女红卫兵的嚣张与傲慢，也反对改变现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反对后来出现的可能会动摇他们现有（哪怕是很低的）地位的造反行为。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是“保守”的。说明一点，本书在这儿和后面所讲的“保守”与“造反”，没有褒贬之分。保守派红卫兵，与作为“文革”标志性事物的高干子女红卫兵相比，其特征要平淡得多。这是第二类红卫兵，也是人数最多的一类红卫兵。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展，对走资派的打击已从彭罗陆杨少数头面人物，向上直指刘邓，向下则开始了对各地各级领导干部的全面扫荡。这时，高层极左势力既不能借助高干子女红卫兵，也不能借助保守的红卫兵。第三类红卫兵，此时就应运而生。那就是在专制体制下相对受压抑者或他们的子女。他们受到过各级管理层的直接压制和打击，他们是红卫兵群体中真的造反者（此处无褒贬之意）。1966年9月6日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就是个典型代表。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应该说，是他们最能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此时，他们这批红卫兵的内在含义已经和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完全不同了。当时，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拥护者，然而，最终却也是最倒霉、最被愚弄的一批人。前面对红卫兵的某些叙述已经不适用于他们。

当然，这三类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他们的组成和思想认识常常是相互交错，有时还会相互转化和演变的。

对于农村地区学校里的红卫兵，还有所不同，要具体分析。他们那儿没有高干子女，也就没有早期红卫兵的那种无敌于天下的狂傲。对于秦有理而言，基本上是属于第三类造反派红卫兵，但又有某些近似于第一类的自命不凡的政治优势掺杂在里面。至于肖胜利，则更接近于第二类保守派红卫兵。

第十五章 大串联

1960年1月15日

15.1我们要到北京去

为了最充分地发挥红卫兵冲击社会秩序的作用，“无产阶级司令部”又掀起了一场大串联的热潮。从6月初广播北大的大字报开始，就有一些周边地区的学生跑来北京看究竟。据丁晓禾的《狂飙》（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一书说，“早在1966年6月10日杭州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说，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啊！”最早成批的、数量较多的学生进京，是8月中旬天津的一些学生为寻求中央“文革”的支持和北京红卫兵的声援，要“告万晓塘的状”，就往北京跑，中央“文革”派人在中途迎接了他们，以示支持。

正式通知是9月5日下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大串联的通知，题目挺长，叫《关于组织外地高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说的是，学生出去串联坐车可以不买票，有的地方连吃饭都不要钱，试图以此把红卫兵的洪流冲向各地，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这下，红卫兵们可高兴了。不光是北京，几乎全国各地的学校都像炸开锅一样地沸腾了。

但那时中央的这个通知还没下发，龙头的红卫兵们已经按捺不住了，听说县城一中的学生有往黄港去的了，也要想走。

秦有理也在挠头这个事，龙头街上没有多少四旧可破，再搞什么呢？他正在教室里挖耳挠腮呢，申光荣来了。

别看申光荣个头小，革命的劲头还挺大，兴冲冲地跑来说：“秦司令。”现在开口都要称司令了，“秦司令，听说县中有的人都去黄港了，说是去取经，学习革命经验。”

“对啊，是要出去看看人家是怎么闹革命的。”秦有理的眼睛顿时也亮了。

“是啊，外面都已经热火朝天了。咱这儿，上街撕了张广告就没事了，大家都闲得要回家了。”申光荣说。

“那咱们也出去。”

“上哪儿去呢？”

“上……先上县中吧。”秦有理还没有想得远，甚至还没想到要去看看生活了十几年的黄港。

“好，上县中方便，现在就可以走着去。”

“多喊几个人，愿意去的都可以去，声势大一点。”秦有理说着就起身了。

那申光荣跑得更快，转身就出了教室，边走边喊了起来：“上县中去啦，上县中去串联啦！”

一些穿着黄军装、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学生，围了过来，问是怎么回事，等听明白了，都嚷着要去。

操场上又嚷嚷了起来，很快就聚起了一大帮人。

石向上在办公室里听见了，急得皱起了眉头。“这怎么办，这怎么办？上面也没有通知，这事倒底行不行，让不让走？”

他看了下肖校长。肖校长都没有抬头，虽然他听到了操场上的声音，但似乎懒得过问了，懒得几乎是不负责任了。肖福兴不是这样的人。他内心里充满了痛苦，但他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表现，表现得连自己也厌恶和憎恨。

石向上知道不能指望肖福兴，就拿起电话向县教育局请示。接电话的正是政工科的管科长。

“要劝阻，要劝阻。昨天程局长还说了，这事要劝阻。他批评了一中的领导不力，怎么能让学学生瞎跑呢，这还像个学校吗？”管抗先这回又有精神说话了。

“劝阻？怎么劝阻？这种时候恐怕劝不动了吧？”

管科长又换了个腔调说起来“嗨，石校长啊，能劝多少就劝多少呗。这个时候你问我，我去问谁啊？工作做到了，就行了。再问多了，谁也回答不了。”

石向上放下电话在想，我该怎么办呢？这形势真是吃不透。广播里、报纸上都说要支持红卫兵闹革命，可地方上县教育局就是不吐口，要么不表态不说话，要么就是说要保持警惕、不能失去控制、要把文化革命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可是这些话管用吗？工作组问题上，已经说我们是压制学生，栽了个大跟斗，以后还不知道追究不追究。现在再去劝阻，弄不好，又是一个跟斗。可是明明看见学生没有政治经验在那儿瞎闹腾，早晚要吃大亏，作为老师，作为校长不能不管啊。哪怕是提醒一下啊。不要等以后学生吃了亏来埋怨自己，老师你那时候怎么不来说一句。到那时当老师的，能心安吗。再说，学校的秩序要维持，学生的安全要维护，就算是要串联，也不能这样说走就走，总得要组织一下、准备一下吧。

石向上走出办公室来到操场上，走到学生当中，对正在四处招呼的秦有理和那帮学生说：“同学们，你们要出去串联、学习革命经验，很可以理解。但是县教育局还没有来通知，还没有具体布置。我们等县局来了通知，认真地准备一下。到那时，我都想和你们一起去。好吗？”

石向上讲得很诚恳，那是他的心里话。他对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真的是有些不理解，真的是很想有机会学习学习。

没料想到的是秦有理大笑了起来：“哈哈，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种话。成立红卫兵，还来过通知吗，还提前有布置吗？”又突然脸一翻，说道：“讲得好听，要和我们一起走，是要监视我们吧？到这个时

候还想阻挡我们革命，快滚开！”

听着秦有理的吼叫，连石向上也愣住了。他这才明白在这些学生眼里，他这个校长已经没有了任何的位置，或者就已经是应该一脚踢开的绊脚石。他终于后悔不该出来讲这些话。

秦有理和一大帮学生走出了校门，要往县城去了。他们也没排队，或一群群，或三三两两，大呼小叫着，兴奋地往前走去。

宗发奋接到石向上的电话，知道学生们出发了，要去县城游行、串联。这不是在丢他脸么，说明龙头的文化革命没有控制好么，没有做到不要上街、内外有别、就地闹革命么。这怎么办？立即采取措施，他宗发奋有这个魄力，有这个能力。中学生要上县城，必定会经过镇上，必定会经过赵村的大河。在镇里堵，是来不及了，就到赵村的大河边拦住。喊派出所的警察过来，人太少，怕拦不住。用民兵，一个大队就能出几十个，看这些小毛娃怎么过去。

他叫来几个人，叫他们赶紧通知龙头镇四个大队和赵村的基干民兵到赵村的河边紧急集合，拦住中学生。他自己亲自赶往西北村调集民兵。在西北村的大队部门口，见到了彭小宾和衣春玲。

“你们西北村的共青团员和基干民兵立刻紧急集合，跑步到赵村大河边待命。”

彭小宾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一句话也没有，转过了身去。

衣春玲说：“我不是团支书。”

宗发奋气得一跺脚，心想社教的事还在记我的仇啊，这笔账以后算，忙问：“谁在大队部？”

他们俩谁都没回应。宗发奋只得自己进去，一看是鲁队长在里面。

“你听见我来，还不出来？”宗发奋很气愤，心想要不是这种时候，我这个书记，你们就这样对待我？

“我在看老三篇呢，正入了神。”鲁队长淡淡地笑着说，手里还真拿了个单行本。老三篇指的是毛泽东写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这三篇文章，当时被认为是毛主席著作中精髓的精髓，要人人都会背诵。人家在学老三篇，宗发奋当然就不能说别的。

宗发奋赶紧把事情简要一说，要马上集中民兵，“你这个民兵连长，是用武的时候了。”

“这事最好跟杜书记说一下，由大队党支部出面比较好。我出面怕喊不动，来的人少。”

“嗨，还推辞什么，赶紧的，赶紧的。”宗发奋还没有这样急过。

等红卫兵们三三两两地穿过镇里，来到赵村河边的时候，镇里的民兵也没来几个。倒是赵村的人围了一大堆，也是过来看热闹的多。

最着急的是石向上。他从中学赶了过来，走得比红卫兵还快。宗发奋也到了村口，他叫赵村的书记赵刊新放了张凳子路中间，又对石向上说：“还是你来说两句吧。”

石向上没法推，只好硬着头皮站上去再说两句：“同学们哪同学们，我们支持你们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革命也是要有秩序进行的。大串联也是要有组织有准备地进行的。不要这样匆匆忙忙。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教导我们说，不打无准备之仗。”石向上也学会了用毛主席语录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可秦有理还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你们一贯压制革命，我们不相信你们，我们要上县委去。”

“对，我们要上县委去！”四周的红卫兵也跟着嚷。上县委，这可是中学生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对于很多中学生来说，县委的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

“你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宗发奋一下来狠的了：“你们这样胡来，就是在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正常秩序。公社党委不答应，贫下中农不答应，广大的人民公社社员不答应！我们要求你们就地闹革命，不准游行。我们的民兵队伍都已经准备好了。你们敢跨过大河一步，就立即采取行动！”

人群立刻乱了，吵闹声一片，学生们也不知该怎么办了。秦有理赶紧和周围几个商量，申光荣不知上哪儿去了。

就在这时，肖胜利出现了。今天的活动，虽然没有事先讲好，但因为是上县中串联，两派红卫兵没有分彼此，都过来了。

肖胜利挤不过来，在后面举了张报纸，大声地喊着：“宗书记，你又错了！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了，叫工农群众要支持学生闹革命，不要站在学生的对立面。挑动工人农民和学生搞对抗，是走资派抗拒文化大革命的阴谋！”

其实在这前后，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保障红卫兵运动毫无阻拦地向前推进，让红卫兵放手大干一场，曾多次要求各地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比如有：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8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特别是北京郊区苏家坨公社六百多名群众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保护受到运动冲击的该校党委书记郭影秋（郭影秋在苏家坨公社参加社教运动，给苏家坨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毛泽东9月7日在他的最高指示中特地讲了这个事：“中国人民大学调动700多农民进城保郭影秋”；又说“组织工农反学生，都是错误的。试以中央发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9月11日中共中央立即专门发出了“关于转发毛主席不准挑动工农兵干预学生运动的决定”。宗发奋不知怎么，这么聪明，却利令智昏只想了自己的事，却忘了这些更大的事。

于又发在边上也喊了起来：“我们不但要上县委，我们还要到北京去！”

“对，我们要到北京去！”红卫兵们立刻呼应起来。

“我们要到北京去，我们要见毛主席！”

“我们要到北京去，我们要见毛主席！”

赵村河边掀起了一阵阵巨大的声浪，一阵阵无法遏制的巨大声浪。仅仅在几分钟前，去县委还要鼓起很大的勇气，这下就要到北京去了。这就是革命的力量啊！

宗发奋脸色发白，他又一次在大风浪前失败了。

学生们绕开了那张放在路中间的凳子，也没看宗发奋和石向上的反应，出村口，来到了大河边。

河上是座漫水桥，即那种桥墩很矮，其实说不上是桥墩，实际上是几个大排水管上面铺着石块水泥而已，造价很低廉的“桥”。夏天河水大，下面的排水管流不及，就从桥面上漫水而过，所以叫漫水桥。好在近几天没有大雨，河水虽说漫桥而过，但两边的铁链栏杆还能露出来。只要小心点，不踏出铁链外或在水中滑倒，是没问题的。

可真的到了河边，有的同学就犹豫了，停下了，不走了。有的是真没走过那么多路，怕坚持不了；有的是什么东西也没带，怎么出去啊；有的是怕没跟家里人说，爹妈不担心么？当然也有不少，不管三七二十一，脱下鞋，卷起裤腿就下河了。

还是这位石校长，真是好人。他也赶紧下了河，站在铁链旁的水里，对学生们招呼着：“靠中间走，离边上远点！”“哎，那位男同学，扶着点你边上的女同学。”

红卫兵们过河了。

宗发奋还在愣愣地看着。

还是这位石向上，往回走的时候，先进了公社大院，给县教育局打了电话，说龙头的一批学生几十人往县城来了，要到北京去。请县局尽量安排好，让他们去黄港上火车吧。

这回县教育局倒是想通了，反应过来了。当秦有理、肖胜利他们一到县中，没停留就上了由当地驻军帮忙派出的三辆卡车，当天就到了黄港火车站。

到了黄港已经领不到火车票了，他们这些也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自想办法去了。

秦有理几个不管三七二十一，愣是冲进了车站。

一节节的车厢里都塞满了红卫兵。好在年轻人对这点困难毫不在意，硬是从车窗里爬了进去。前面几个都进去了，唯独王溪爬不上去。秦有理在最后一个，他叫先挤上了车的申光荣拉住王溪，他托着王溪的臀部，使劲往上推，好不容易才塞了进去。秦有理最后爬了进去，已经是人贴人了，实在是没有落脚的地方了。秦有理紧贴着王溪，硬往前拱。座位上的人还算照顾，屁股往前挪了挪，秦有理的两只脚才落在了座椅上。

“这怎么坐呀？屁股都没有地方放了。”王溪嘟哝着。她只能两只脚直插在座位上那人的背后。

“就放在我腿上吧。”秦有理已经坐在了椅背上。

“这好吗？”王溪还有点不好意思。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刚才我还不是托你的屁股了。”

王溪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坐在秦有理的大腿上。刚才被推上来的時候，好像没有感觉到，现在意识到是坐在一个小伙子的腿上，脸上不觉泛起了红晕。好在秦有理是在背后，并没有察觉到。

火车开动了，车厢一晃动，王溪往前一倾，秦有理顺势在背后抱住了她。

一个晚上，满车厢的红卫兵们都唱着歌，呼着口号，意气风发，向往着将要去的革命圣地北京。

15.2恐怖“红八月”

第二天，下火车，出了北京站。

1966年的8月底，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最疯狂的阶段，整个北京城陷入了一片海啸般的惊涛骇浪之中。让这些从农村来的孩子们顿时傻了眼，亲眼看见了被极左势力称之为“好得很”的血腥场面，看见了在历史上永远留下罪恶一页的所谓恐怖“红八月”。

出了站一看，到处是飘扬的红旗，到处都竖立着领袖像和语录牌，大楼的墙上贴满了革命标语、大字报和“砸烂×××狗头”之类的横幅。那大字报都有一人多高，而且还都打上了红叉叉，那些名字都是以前想也不敢想的领导人啊。震耳欲聋的大喇叭播放着革命口号和革命歌曲，那音量之大连脚下的地都在抖动，整个人都在震颤。

他们第一次听到了激情无比的造反歌。

“原来造反还有歌啊？”申光荣还十分地惊讶。

那个歌真的是激情无比，透着一股逼人的杀气：

“拿起笔做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

文化革命当闯将。

杀杀杀，嗨！”

街上一队队的红卫兵目空一切、精神振奋地来来往往，不停地振臂高呼，那眼神毫无疑问地告诉你，他们就是这世界的主人。大街旁有不少搭的台子，那是各种红卫兵的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有的念着战斗檄文，那些北京话念得跟广播里一样的标准。有的在斗黑帮，黑帮们个个低头认罪，戴高帽、喷气式、挂牌子，不时地挨揍。

街上还不断有卡车装着戴高帽挂黑牌的黑帮被摁着脑袋游街。路过一个居民楼门口，四五个黑帮跪在地上，有老有小，大概是一家，被一群红卫兵看着。家里噼噼啪啪地响着砸木板砸玻璃的声音，不断地有书籍、衣服、各种用品被扔到街上，打得粉碎。这就是秦有理们从未见过的抄家。

一群十几个男女老少黑帮被押着走过来，个个满脸伤痕，身上血迹斑斑，年轻一点的搀着年老的，妇女抱着幼童，无言地、悲愤地、一瘸一拐地走着。边上的红卫兵喊着“彻底消灭剥削阶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吸血鬼从北京滚出去！”

红卫兵中还有两个模样俊俏、十五六岁的女孩，怒目圆睁，举起雪白的玉手，抡起皮带头，朝着一个眼看走不动的老人，“啪”地打下去，那样的熟练，那样的无情，好像被打的连条狗都不是。年轻一点的

黑帮护着老人，双手捂着头，鲜血又汨汨地淌下。年轻人只是轻轻地哼着、忍着，眼睛里充满了绝望，连仇恨都不敢有，像是在等着最后的倒下。

在这年8月的中旬后，红卫兵杀向社会，大搞“破四旧”。所到之处就像决堤的洪水，打砸抢烧杀抓，为所欲为，横行无阻。这就是可以作为文化大革命典型标志的令多少人家破人亡，至今心有余悸、切齿难忘的恐怖“红八月”。

在这疯狂的岁月里，暴行首先是从学校里开始，而后迅速向整个社会、整个国家蔓延。十几岁的中学生，包括一些稚气未脱的女孩子，拿着铜头皮带，雨点似地打向自己的老师、自己的长辈，没有半点迟疑。如花似玉的脸庞扭曲得变形，眼睛里全是孩童们不该有的凶残目光。不光是皮带抽，更是用棍子打、用石头砸、用刀捅、用火烫、用开水浇，逼着吃屎，脖子上挂着四块砖还要在碎玻璃瓶渣上跪着爬，各种各样想得到的和想不到的酷刑都用到了自己老师的身上。北京西城区的一个中学，竟然蘸着老师的鲜血，在墙上写下“红色恐怖万岁”的大字！更有甚者，连畜生都不如，把老师赶出去批斗，竟想在老师家里强暴师母。那时甚至连小学生也像中了魔，在北京中古友好小学，那些原本天真无邪的小学生竟把他们的女校长脑袋上钉满了图钉。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学生针对老师的大规模血腥暴行。极左势力在利用青年的无知和狂热去无情地打翻他们的老师和校长，作为撕碎社会规则的突破口。

这时，江青惟恐乱得还不够，出来传话说：“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在极左势力这样的推波助澜之下，很快又由杀教师，扩大到杀“黑帮”、杀“黑五类”、杀私有房主、杀毫无根据的所谓“阶级敌人”、甚至杀他们的亲属和亲属的亲属等等，形成了一股乱杀人的狂潮，在南北各地毫无节制地蔓延。其残忍野蛮的程度远远超过臭名昭著的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那一夜，德国法西斯大规模捣毁犹太人的商店、住宅，杀害了91名犹太人。

而据不完全统计，在破四旧期间，北京就有3.3万户被抄，8.5万人被赶出北京，致死1772人。仅大兴县，三天时间就杀了325人，灭门22户。死者中，上有八十多岁的老人，最小的才是38天的婴儿（请见：《中国“左”祸》，文聿著，朝华出版社，1993年）。在那些日子里，北京的火葬场都来不及烧，尸体堆积，血水横流，只得放上冰块（此事及上面北京中古小学校长的事，请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这决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行为，也决不是共产党人所能容忍的行为，这是每一个尚有良知的人，都该明白的事。但是却发生了，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在以革命的名义下发生了！所谓的“革命”，就可以不要人性了吗？

这儿还想讲一下人性的问题。在人的心灵里，有人性的一面，比如善良、正直、宽厚、互助等等；也有动物性的一面。在动物性里，有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东西，也有丑恶的、卑劣的、甚至凶残的，我们称之为兽性的东西。人性与兽性，两者之间相互对立，此消彼长。在一个正常的理性的社会里，在社会成员长期的不懈的艰苦的共同努力之下，人性逐渐增长、扩展，人们的自身修养日臻完善、道德水平逐步提高、思想境界不断升华，社会处于良性发展。

但是，在相反的情况下，比如在文革的十年动乱中，由于极左势力的主导和推动、极端分子的嚣张和狂热，正常的社会规则被倾覆，人性受到压抑、鄙视和摧残，兽性却迅速膨胀，吞噬着一切的良知和理性，整个社会面目全非。人，从内在灵魂到外在表现都出现了异化，变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这个变化，其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如果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而兽性的发作则像一场猛烈的失去控制的森林大火，几十年、几百年才长成的林木，顷刻之间就被浓烟烈火吞没，再要恢复生长谈何容易。

文革就是这样吞没人性、吞没社会的一场熊熊野火。从它一开始短短的几十天，就使多少人，包括那些无知少年，变成了野兽；又使更多的人变成了被野兽撕咬的猎物。没有人性的革命，就是兽性，不要以为只要贴上“革命”两个字就一定是好东西。文化大革命就是场反人类的滔天罪行。而由此所需要的道德和人性的修复，则要用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时间。这个惨痛教训，我们中华民族永世不要忘记。

大串联的目的之一，就是让北京成为那些红卫兵极端分子的经验展示交流会、现场观摩会。

这效果马上就有了。

秦有理看着，对他们几个说：“你看北京的红卫兵多革命，咱要向他们学习啊。”

王溪见这场面都不敢看，低着头，怯怯地说：“我怕。”

秦有理大咧咧地说：“这有什么好害怕。所以，我们要出来经风雨见世面，才能把自己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申光荣说：“是啊，我们龙头跟北京红卫兵相比，真是太惭愧了，那算什么革命呀！真得要好好向他们学习。”

大串联，这场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大人口大流动，对于左倾势力来说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彻底打乱走资派的阵脚，彻底打乱行政官僚的运转体系，使它在全国各地上下各级迅速地完全地瘫痪。大串联确实很快地做到了这一点。

对于传统的管理层（也叫执行层，即各级原有的领导干部），在大串联的初期也明白这是意味着什么，也曾有过抵制，也曾试图限制。但很快就无法抵挡这汹涌而来的浪潮，连自己也被纷纷吞没。

对于那些意气风发的红卫兵小将，大串联完全是自己组织、自己安排，走到社会上，行进在风雨中，开阔了视野，受到了一些锻炼，更深地介入到了文化大革命当中。一些人就此对文革了解得更多了，理解得更深了，头脑更清晰了。也有些人却更发热了，陷得更深了，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自觉不自觉地冲在前面，甘当马前卒，甚至成为极左势力的帮凶和打手。

等到1967年初，大串联在再三的呼喊和要求之下基本停息之后，无产阶级司令部原本设想的“以大乱达到大治”的目的只实现了一半。“大乱”，倒是乱得不可开交。不过离“大治”却是越来越远了。

15.3 康生接见

由崇文门大街红卫兵接待站分配，秦有理他们到西郊海淀双榆树的一个接待站住下。几天里到附近各高校看大字报，看批斗会，忙得不亦乐乎，暂且不说。这天接待站来通知，说中央文革同意接见海源

县所在省的红卫兵代表，秦有理他们也一起参加。

这下，秦有理几个可高兴得跳起来了。秦有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连中央文革都知道我们啊，都这么重视，还要接见我们啊！他们兴奋得连怎么集中、怎么上的车，车是怎么走的都忘了。车停在了北海西侧的一个大院前。那是相当于古代王府的一个院落，灰砖灰瓦，很庄严也很深沉。进大门过照壁，穿过院子，进得一个厅堂。里面光线很暗，窗帘没有拉开，开的电灯也很小。摆着几十张椅子，坐不下的人站在后面，前面长条桌后的沙发椅还空着，大家都悄悄地等着。

过了一会，一个矮胖女人从侧门进来，满脸堆笑地说：“我是曹大姐。”

人群中有人鼓掌，知道的人悄悄地说：“这就是康生夫人曹轶欧！”

曹轶欧摆摆手，依然笑容可掬地说：“不要客气啦，今天康老代表中央文革来接见你们。不过康老很忙很辛苦，刚睡下不久，请你们再等一会儿。”

接着她又说了些“你们来北京不容易，挺辛苦”之类的不着边际的话，东拉西扯了一会。

一个干瘦的老头在侧门出现了，因为光线暗淡，看不清什么，只能看见从他眼镜片后面露出的光也像这屋子一样地阴暗深沉。这就是康生。

满屋子都爆发出了掌声。农村的孩子们第一次见到大人物啊，他们的心里怎么能不激动啊。

曹轶欧先开了口：“哎呀，康老，你怎么不再歇会儿？”

“不好意思叫你们久等了。睡不着啊，这个时候，敌人都没睡着，我们能睡得着吗？”

“每次见到红卫兵小将，我都很高兴，特别是见到家乡来的红卫兵，我更高兴。”又一次更热烈的掌声。

“我跟你们讲的最主要的一句话，就是要听主席的话，造走资派的反。我们党内，在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出现了一个跟毛主席对抗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跟他们的斗争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要有任何的幻想，不然他们得逞了，就会像主席所说的：党要变修，国要变色，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请同志们想一想那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啊。”

“他们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是磨刀霍霍了，就是今年2月他们制造了‘二月兵变’。贺龙把两个营的军队开到了人民大学，就是离你们住的双榆树不远的地方。同志们，他们已经把刀架在我们的脖子上了，我们能坐着不动等死吗？我们能睡得着吗？！亏得被我们及时发现了，制止了，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二月兵变”详情请见笔者回忆录《风霜雨雪忆年华》，漓江出版社，2012年9月）

康生讲得激动起来了，提高了噪音。

红卫兵们听得一片惊讶声，眼睛都不眨了。

“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要对党内走资派狠斗猛批，决不手软。”

“我知道你们各地的红卫兵不容易。很多地方上的走资派拼命地压制你们，迫害打击你们。我知道，你们能来北京也不容易，克服了很多困难，经过了很多斗争。见到了你们很高兴，我也要向你们学习！”

又是一片掌声。

秦有理听得，就像讲到了自己心里去。

“你们要挺住，你们要坚持，你们要拿出更大的勇气，要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精神。

我支持你们，中央文革支持你们，毛主席支持你们！”

满场的欢呼：“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

当场有红卫兵站起来表态，刀山火海也敢上，坚决跟着中央文革干革命。

也有个红卫兵说，我们那地方冒出来的好几派红卫兵，有的说是红卫兵，其实就是在包庇当权派。

“我们也了解到了这种情况，有些所谓的红卫兵是假革命，两面派，就是保皇派。我可以明确地说，那些保皇派就是反动组织，你们要坚决跟他们斗争。我们中央文革的态度是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只要你们抓住革命斗争大方向，我们就支持。”

又有红卫兵问：“社会上有人反对我们红卫兵的行动，百般指责，说是过火了。”

康生说：“什么过火？革命没有过火。主席早就说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也许你们还不成熟，但是你们不要有顾虑，我们都坚决支持。在当前阶级斗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我们没有任何退路，只有奋勇向前。对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绝不能犹豫彷徨，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消灭了再说。”

秦有理也想插嘴问问工作组把他打成反动学生的事，但毕竟还是第一次进京的农村孩子，几次张了张嘴，没能说出来。

“最后，就是一句话：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分子彻底打垮，消灭干净！”康生说得也情不自禁地挥了下手。

在场的红卫兵又激动了起来，一阵阵的口号：

“向康老致敬！”

“向中央文革致敬！”

“不怕上刀山下火海，坚决跟着康老干革命！”

那狂热的呼喊，几乎要把屋顶都掀翻了。

15.4见到毛主席

令秦有理们更激动的事来了。傍晚时分，接待站来了通知：毛主席要接见你们了。

整个接待站顿时就沸腾了。他们把所有能扔的东西都往上扔了，跳啊，叫啊，整整一个晚上都没停息。连秦有理抱着王溪跳了几下，王溪也都没有别的感觉。

第二天他们清早就起床了，认真地穿上了旧军装，一遍遍地摸着扣子有没有扣好，一遍遍地试着鞋带有没有系紧，相互之间检查了一遍又一遍。秦有理和王溪一遍遍地相互对视着，沉浸在革命的激情和幸福之中。

不到中午就出发了，一辆辆的大卡车把他们带到了市区外的东北角，而后走了好长的路，到了农业展览馆前。他们的位置就在农展馆大街的东北拐弯处。近百米宽的大道，笔直地向西和向南延伸，在蓝天和绿树的衬托下，气势非凡。两边都是红卫兵的海洋，几十人宽的队列，绵延出数十公里。翻卷的红旗，涌动的绿军装一直铺到无尽的天边。现场上声浪滚滚，各种文革歌和语录歌此起彼伏，一阵高过一阵。秦有理他们这几天也学了不少，跟着大家一起忘情地唱着。一会儿这边唱：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

春风最暖，毛主席最亲，

您的革命路线永远指航程……”

一会儿那边唱：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贴心话儿要对您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终于现场指挥部传来指示：请安静。原先沸腾的海洋，一下子安静下来，鸦雀无声。静静地等待着那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下午，三点多钟，这一时刻终于来了。大喇叭响起了“东方红”的乐曲声：

“少少拉唻，叨叨拉唻，

少少拉叨拉少，叨叨拉唻。”

这是一个只有特殊时刻才播放的乐曲。

顿时红卫兵们沸腾了，排山倒海般地爆出欢呼的巨浪。“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呼喊，盖过天，盖过地，似乎盖过天地间的一切。人在其中，几乎都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

在压倒一切的欢呼声中，在秋天的阳光里，毛泽东的车队从远处开来了，在摩托车队的引导下，一辆吉普、后面又接着一辆辆的吉普，驶过来了……

毛泽东站在最前面的第一辆车里。他身着崭新笔挺的草绿色军装，身材高大，巍然不动；两眼凝视前方；左手扶着前面的车把，右手半举，缓缓地动了下；脸庞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一层薄薄的涂抹折射的光芒……

因为正是在拐弯处，车队减速缓行。秦有理他们看得比较真切。

车队远去了。秦有理他们还在忘情地欢呼着，停不下他们的手，停不下他们的嘴，久久地，久久地……

不知道秦有理他们回去以后是怎样兴奋地向同学和乡亲们讲述他们见到毛主席的激动情景。

可也不能没有分寸地随便说哦。有这样一件事：1964年，广东省宝安县西坑大队团支书杨谭发作为“反外逃”先进典型，上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回村后，他告诉乡亲们说，毛主席好高啊，手指头很粗很大，都有香焦那样大。文革时，却被说是污蔑伟大领袖，被斗得死去活来。七十年代初，这个曾经是“反逃亡”典型的大队，青壮年几乎全都逃到香港去了。有个村，剩下的男人里，最大的才八岁……（此事请见：《大逃港》，陈秉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

秦有理被接见那天，后来知道差点出了大事。《炎黄春秋》2006年第4期张辉灿口述、慕安整理的文章《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内情》说，那天下午，毛泽东的车队从农展馆前（秦有理站的位置）开过去后不远，在大钟寺东侧被数百名刚到北京的激动的红卫兵围住，有的甚至爬上了后面的吉普车。卫戍区紧急出动在北太平庄的四个机动连，开出一道人墙通道，才使车队脱离险境。那天，北京卫戍区出动了所有四个师的兵力还不够，还调用其他军兵种的力量。

这篇文章还讲到，这年的11月26日，毛泽东在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散场时红卫兵拥挤不堪，结果将机场外的一座罗锅桥压断，踩死了几个人，伤了十几个人。这之后，就再没安排这样的活动，这天的就成了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

第十六章 红色恐怖

1960年1月16日

16.1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在北京的十天，像是革命的速成班。

从北京回来，秦有理变了个人，处处以京派红卫兵为榜样。他们这派红卫兵胸前都挂满了毛主席像章，腰间也束上了铜扣皮带，走起路来昂头挺胸，一副舍我其谁的做派，而且还真有实际行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京派红卫兵最响亮的口号，最拿手的好戏。那就让全龙头的人看看，红卫兵、学过京派红卫兵真传的红卫兵是啥样的，他们这几人马上搞起了龙头镇的第一场黑帮批斗会。

在县中红卫兵的支持下，秦有理几个把县教育局的程局长和工作组的管组长挂上了大牌子，用卡车从县城押到了中学。程局长过去傲气十足，得罪的人最多，这次挨斗也最多。现在腿骨都已经被打断，用木板缠着布条夹着，却还是被拖来拖去地揪斗。

卡车驶过龙头镇，程局长被押在车厢的前排，脖子上挂着写有名字、打着红叉的大牌子，两边各有一个红卫兵扭着胳膊，秦有理在他身后揪着他头发，不时拽起他痛苦而抽搐的脸向四周示众。王溪在领着车上的红卫兵呼喊：“打倒走资派程贵安！”“打倒走资派管抗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阵口号之后，红卫兵们也唱起了从北京学会的造反歌：

“拿起笔做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

文化革命当闯将！

杀，杀，杀，——嗨！”

从未有过的精神，从未有过的爽快，小将们都觉得当红卫兵真过瘾。

龙头镇的老百姓第一次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游街示众，这阵势比土地改革还厉害，都紧贴着墙，或干脆躲在胡同口的拐角处瞪着眼看，一声也不出。眼见着车上的红卫兵们，原本就是隔壁邻居的农家子弟，如今一个个威风得就像是天兵天将似的都认不出来，革命真是神奇啊。连平日趾高气昂的宗书记也只得躲在传达室的窗玻璃后面往外看。他的心思多得很，又要看是哪些小子在蹦达，运动后期跑不了他

们，哪笔帐也少不了；又是满脸的狐疑，看着管科长都被抓来了，会不会也有自己的份，心里盘算着下一步应该走什么棋，可又算不出来。

车进东门外的中学，程局长、管组长立刻被拖到操场一头的土台子上。

秦有理一声喊：“跪下！”

程局长腿不好使，颤抖着动不了，秦有理一脚就踢了过去，这一手跟他爹一样利索。

程局长一声惨叫倒在地上，立刻被边上的申光荣拉起上身，摁做跪姿。

管组长不等人吆喝，自己就跪了下来。

秦有理一声呼喊：“把石向上、肖福兴揪出来！”

石、肖二人被七、八个红卫兵揪了过来。

“跪下！”

肖福兴稍作迟缓，照样被秦有理一脚踢得跪在那儿。只见肖福兴脸无人色，鼻涕都流了下来。

石向上则是一脸愤慨、双唇紧闭、两腿挺直。

“嚯，还有不怕死的。”秦有理冷冷一笑：“告诉你，姓石的，你已经不是前两天的那个姓石的。我姓秦的，也不是前两天的那个姓秦的。今天就要你姓石的尝尝我姓秦的厉害。”

秦有理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没头没脸地打下去。石校长脸上都破了，嘴角流出血，却一声不吭。但还是被几个人摁着跪下。

秦有理又一声呼喊：“把大右派李辰揪出来！”

李辰被红卫兵拉着，自己走了过来。

“跪下！”

李辰自己跪了下去。

“五个人少了吧？”申光荣说。

“把所有的教研组长、年级主任，都揪过来！”秦有理继续喊着。

往常传道授业、文质彬彬、年龄上也是长辈的老师，一个个被学生们拖着、拉着、拽着、架着揪了出来。昔日年少的循规蹈矩、天真烂漫的学生们顷刻之间变成了不可理喻的另一类变态的冷血动物。抡皮带，掴耳光，往老师身上吐唾沫的野蛮行为，从没有学过，甚至都没有看见过，忽然间都无师自通了，一个甚于一个。人性，人的善良本性，被这种暴力行动涤荡得荡然无存。

操场的土台上已经跪了一排，一个个狼狈不堪，斯文扫地。

“我们班那个班主任也不是东西，上个月还把我推倒呢。我也去把她揪过来！”申光荣又带着他班上的两个同学，不一会把他们的班主任平近芳也拽着头发揪上来。平近芳决没想到对她也会这样，没想到平日里她钟爱的这些在她看来没长大的孩子一下子变成了吃人的凶神恶煞，又害怕又害羞，低着头直哭，恨不能往地里钻。

秦有理朝平近芳那边大吼一声：“哭什么？闭嘴！”便踌躇满志地宣布：“龙头中学红卫兵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现在开始！”

王溪又领着呼起了口号，那声音比十多天前响亮了许多。

肖胜利在教室里看着这一切，看着自己的父亲跪在那儿被批斗，眉头深深地皱着。

于又发在边上，他是个敢想也敢干的人。他看着窗外，也看着肖胜利，知道肖胜利在想什么，说了句：“他们能斗，咱们也能斗。”

这句话讲到了肖胜利的心里。

肖胜利转头望着于又发，问：“人在他们手里，咱们怎么斗？”

“抢过来。走资派，谁都可以斗。”于又发冷冷地说。

“好，立即召集我们的队伍。”

“东方红”总部的四、五十人很快就召集好了。队伍集合在两排房的中间。

肖胜利讲明事由后，于又发说：“肖哥，这事你不用出面，交给我就行了。”肖胜利一想也对，点了下头。于又发一声令下，他们出发了。没有喊口号、举红旗之类，在操场上看批斗会的人群后面并不显眼。

他们悄悄走到人群的前面，等接近到土台子的旁边，走在最前面的于又发大吼一声：“你们这些走资派往哪儿跑！”“东方红”的人便一涌而上。

秦有理看到他们冲上来，已经来不及了。他跨前一步，朝于又发喊：“你们要干什么？”被于又发挡在那儿。

迟解放，迟得法的孙子，对秦有理也是看不惯，上去就推开押着肖福兴的申光荣。迟、申两人本是同班同学，申光荣没防备，再说那小个子哪经得起这一推，便四脚朝天地倒在台上，台下反是一阵哄笑。

迟解放拉着肖校长就走。

秦有理被于又发挡着动弹不得，又事发突然，没有准备，怕打起来不赚便宜，只好干瞪眼看着肖福兴被带走。

其他的教研组长、年级主任便趁机一哄而散，忙不迭地跑走了。

平近芳还在那捂着脸哭哭啼啼的，被几位女同学扶了下去。

台上只留下动不了的程局长，被死死摁住的石向上、管组长和自己不想走的李辰。李辰明白，如果他走了，秦有理就会把“包庇右派”的罪名加在肖胜利那一帮的头上。他觉得肖胜利是个好青年，龙头镇今后的希望是在他们那批年青人的身上。他知道，自己是早晚躲不了的。

见此情景，自己策划的这么大的一个革命行动，被“东方红”冲了，秦有理气狠了。他知道在学校里面，他在人数上不占优势，便手一挥，“把这几个人押上车，到镇上去斗！”到那儿，产生的效果会更大。

把他们挨斗的人押上汽车的时候，石向上还在尽力地挣扎。

秦有理随手一棍子就砸下去。

没想到满脸是血的石向上，拼着全身的劲，跳了起来，说了句：“毛主席没有叫你们这么做，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秦有理根本没回话，朝着石向上的头部，使劲地又一棍子。

石向上惨叫一声，鲜血直流，仰面倒下，可还是用手撑地，喘着气，微弱地说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要讲政策……”话没讲完，就昏死了过去。

申光荣看着秦有理，心想这怎么弄？

秦有理心里稍有一慌，又一横，“还装死呢，拖上车，照样斗！”讲这话时，音调都变了。

卡车装上人，往镇里驶来。

申光荣对秦有理说：“压制龙头镇文化大革命最大的石头，就是那个宗发奋。要处分我们的，就是他；把我们打成反动学生的，也是他；说我们破四旧是反革命行为的，也是他；不让我们上北京串联的，还是他。这个王八蛋，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累累。我们把他一起拖出来斗。”

秦有理愤愤地说：“对，龙头公社最大的王八蛋就是他！今天跑不了他。”

卡车开到西街上公社大院的门口，秦有理喊了声：“王溪你们几个留在车上看着，其余的跟我下！”

其他的红卫兵一拥而下，直奔宗发奋的办公室而去。公社干部们感到愕然，不知他们要干什么。秦有理一马当先，踢开了宗发奋的办公室门。

宗发奋正在训经学文呢：“你就知道用生产压革命。什么秋收秋种啦，老一套，哪个都懂，还用你讲？要注意收集红卫兵的动向，等运动后期，一笔一笔帐都要算的！尤其是秦有理那小子，不知好歹，他老子不是我撑着，有他的今天吗？”

经学文站在一边，只有点头称是。

没想到后两句被冲进来的秦有理听到了，更是不得了。秦有理一把揪住宗发奋的衣领：“好你个走资派，还想要镇压红卫兵运动，证据确凿，拉出去，公开批斗！”

宗发奋当了十几年的官，从没料到会有这一手。挣扎着说：“我是党委书记，是党委书记！你们这样做，是反党反革命行为！”

可这时这帮红卫兵不但没有理他这套，申光荣拿下铜头皮带已经朝他脑袋上打下来了。任凭宗发奋怎么挣扎，也被这群红卫兵连打带拖、不由分说地架了出去。

经学文站在墙角，秦有理也没理他，大概是觉得这个角色太小，不值得斗。

“还有那个纪海洋，也算得上是走资派，把他也抓来！”秦有理吩咐着。

纪海洋没在院里。他在看到一卡车红卫兵押着程局长气势汹汹而来的时候，就知道事情不会仅仅局限在中学校园里。他走了。

秦有理他们转了一圈，没找到，也就算了，已经有很多事情要他们做的了。

宗发奋被押到车上，也挂上牌子，戴上高帽。

车开到十字路口，停下。这车厢成了批斗会现成的台子。

“宗发奋被斗了，”“宗发奋被斗了！”

龙头镇的群众，甚至附近几里路外的乡亲都闻讯赶来，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隔得老远看上一眼，又惊讶又奇怪：怎么连党委书记都能斗啦？搞社教，斗个大队支书，就挺叫人吃惊的了。而且去年是宗发奋领头斗村支书，今年又变成了宗发奋自己挨斗了。这叫乡亲们怎么也看不懂了。更看不懂的，还在下面呢。

秦有理抓起原本摁着低头的宗发奋的衣领，吼着：“说，你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

宗发奋被抓着仰起脖，脸色苍白，嘴角斜拉。

龙头镇的乡亲们从没见过往日风光无限的堂堂一个公社党委书记竟会被这个样，都目瞪口呆了。真的是天地颠倒了？

“不敢，不敢，我哪敢反对毛主席。”宗发奋的声音也又细又尖，变了调了。

哪知秦有理一个耳光就上去了，“还敢不承认。工作组镇压革命学生，就是反对毛主席！”

下面的乡亲们更是一阵尖叫。这公社书记，不但能揪，还能打啊。

“要文斗不要武斗啊。”宗发奋吃不消了，说了一句。

结果秦有理更重的一巴掌就下来了：“这就是文斗！”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王溪接着就唱起了那时最流行的语录歌。车上车下的红卫兵门也都唱起来了：“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朴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那“暴动”两字唱得特别地响亮和有力。

宗发奋也听明白了，不想再挨了，只得悲苦地说着：“是，是，是，我承认。”

“说，为什么要把我们打成右派学生？”申光荣也插上来了。

就是这时候，宗发奋也没糊涂，“我对你们学校不了解，是公社党委叫我来的。不是我的主意啊。”

秦有理转过来对管抗先吼道：“你是龙头中学镇压革命的主犯，你该当何罪？”

管抗先也知道，这时候保自己要紧，忙说：“我一直在县里，对下面真是不了解啊。”

“啪！”管抗先的头上还是挨了一下。

“你就没有事啦？”秦有理问。

“我有错，我有错，太官僚主义。”

“啪！”又一下，“就是有错么？”

“有罪，有罪，我有罪，我向革命小将低头认罪！”说完，管抗先自己捣蒜似地连连磕头。

“那准备批斗反动学生，是谁的主意？坦白交代！”

管抗先和宗发奋都没放声，看了看倒在车厢地板上的石向上。

秦有理弯腰一把将石向上拎起来。

石向上脸上身上都是血，双目紧闭，浑身瘫软，已经没有气息了。

下面的群众，见这模样，一阵惊叫，太可怕了。

“说！快说！”秦有理不管这些，还在吼着。

石向上，整个人毫无反应，随着秦有理手臂的晃动而晃动。

下面的群众直喊：“不行了，人都不行了，快叫医生来吧。”

“他妈的，装死。”秦有理一松手，石向上“啪”地摔到了车板上，毫无声息。

秦有理转向程贵安，把气往这儿撒了，“你这个狗东西是全县镇压学生的总后台！根子就在你这儿！”也不等程贵安回答，几个红卫兵“劈劈啪啪”这一顿就打上去。

只听得程贵安爹呀妈呀地直叫。

见穿白大褂的公社卫生所的人过来了，秦有理没忘了还有李辰呢，“就是龙头有你这个右派，连我们也跟着倒霉，也要把我们打成右派。”“啪啪”几下，打得秦有理也没趣了。

卫生所的医生爬上车厢一看，“哦哟”一声，“都这个样啦？还在斗啊？”龙头的红卫兵还不算狠到头，在北京，哪有敢这么问红卫兵的。

“快扛块板来！”医生朝下面的人说。那时连个担架都没有，还是用门板栓绳子的办法。

秦有理知道是斗不下去了，手一挥：“散会！”红卫兵们都下车回学校，到吃午饭时候了。

宗发奋、李辰各自回家。

程贵安、管抗先在车上，拉回去了。

只有石向上，无声地躺在临时找来的门板上，被抬走了，永远地被抬走了。

16.2 心态各异

在挨斗的几个人里，程局长是心理落差最大，最惨痛的了。

多年来他对下是目空一切、颐指气使，俨然以革命的主人自居，他就是党的代表，他就是革命的化身。处处都是说一不二，叫别人下不了台。来了运动非要找出几个打击对象，而且毫不留情。这次文化大革命来临，他还居然跑到县中门口，不让红卫兵出去。没几天，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是第一个被拖出来挨斗。哪一次批斗也少不了他，哪一派批斗也少不了他。无数的棍棒和皮带之下，他伤痕累累，哀号不已，腿都被打断了，还是批斗不已。没有人同情他，至少出现在他面前晃动的人里，没有人同情他。他想到过自杀，拿下了自己的裤带，想拴在窗台上，可是断腿又挪动不了。被看押的红卫兵发现，又是一顿更厉害的毒打。

这次从龙头被拖回来，虽然挨的打比起别的中学还不算多，但伤腿的撕裂叫他实在疼痛难忍，嗓子几乎喊不出来，手指深深地掐着大腿，喉咙在干嚎，疼得实在不行，只好脑袋直往墙上撞。他被关押在县中已经十多天了，家里一点信息也没有，他也顾不上思念家人，顾不上对这场运动的思索，日日夜夜在剧烈的疼痛中想死。

宗发奋被推下卡车后，没有再去办公室，而是回到了自己的家，自己在陶家大院后面一进、原先车素花住的那两间房。

他怒火中烧，以至于他妻子柏蕙珠从供销社商店赶回来安慰他，替他擦洗脸上的污垢，他都一句话也没说。他是在想以后怎么工作，在大庭广众之中丢这么大的丑，以后再怎么领导下级。他在想，这次运动真厉害，不是批判，不是处分，不是送去劳改，而是叫小孩子起来把你打翻在地，顷刻之间就颜面扫地、威信全无，人格尊严扫荡以尽，叫你自己就无地自容，别的什么也不用说了。谁想的这个法？他宗发奋经历过多少次的运动，从来就是他整别人，怎么这次被别人整了呢？而且还是一群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亏得当时倒在地上的石向上，把秦有理的注意力引了过去，而且倒在地上也不会说话。要不，今天要遭的罪就可大了。要追究起来，在工作组时，整秦有理的主意还真是自己出的。唉，谁叫石向上没有这个福呢，没有过这个坎。我可没有出卖他哦，没说他一个不字哦。

但侥幸之余，他气啊，他要等运动后期算帐。他记住了秦有理。啊呀，还有那个小个子红卫兵是谁家的崽子，明天一定要弄清楚。运动不会总这样乱糟糟，总会有后期处理的时候，总有他下手对他们不客气的时候。嘿嘿，想到这儿，他几乎又笑了出来。到时候，他宗发奋就是在阶级斗争第一线经受了考验的英雄。那个纪海洋躲到哪儿去了？他又在想，这回是不是又像1957年那样叫阶级敌人自己跳出来充分表演后再收拾他们。对呀，又是这个计谋呀。不过那也让阶级敌人跳得太高啦，自己吃这么个大亏。

李辰悄悄地回了家，自己打水洗脸、换衣服。

林海秀心疼地帮他脱袜子、脱鞋，关切地问他：“打得厉害吗？”

李辰反过来劝慰说：“不厉害，都是教过的学生，哪会下死劲打。就是可惜了这件衣服，才穿了两
年，早知道换件旧衣服去。”

林海秀听了也一笑：“你呀，不心疼自己，倒去心疼那件衣服。”

李辰上炕半躺着，又拿起了一本书看。

林海秀拿走衣服要去洗，看见李辰手捧着书本，便数落起来：“又是看书，还没看够啊？少看点，少
动脑筋，心就少烦点，还没接受经验教训啊？”

“唉，有句老话，哀莫大于心死。一个人彻底地心灰意冷了，那是最悲哀的了。可是中国知识分子
的社会责任感还特别强，哪怕是挨了整，受了厉害的打击，可还是在想问题，还是在关心国家的命运，哪
怕是冒着更大的打击。这又成了：哀莫大于心不死啊。”

“这场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到处是打人，斗领导干部比斗地主还狠，这样下去社会不就乱了吗？这
是谁在革谁的命呢？”

“我最担心的也就是这个。我个人受点冲击、遭点罪，都好说。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方向可别乱了
啊。”

“你又要去操这些心了。”

两人都沉默了。

肖福兴在自己家里，虽然还不知道石向上已经死了，但他心里早就凉透了，凉透了。他甚至回顾几
十年来的努力、奋斗和辛劳。他忽然明白了当年余校长为什么选择了死。余校长要是在，更躲不了这一
关，因为他还是地主出身，被打的会更厉害。当然他肖福兴不会去自尽。他还有他的儿子，他的儿子能
保护他。更主要的是，他要看着他的儿子成长，那是他生命的支柱，也是对在他心里几十年来拂之不去
的亡妻的告慰和交代。他要活下去，他要活下去，他相信世道不会一直这么颠倒下去，虽然或许他看不
到那一天。

“东方红”冲击了秦有理的批斗会，抢回了自己的父亲，可肖胜利的心情始终没有放松。文化大革命，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他不相信，他不相信文化大革命会是这个样子。是秦有理做得不对，是秦有理他们
走上了一条破坏革命、破坏社会主义社会的错误道路。他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把文化大革命搞下
去。他知道秦有理不会就此罢休，斗争才刚刚开始。他，一个还不到二十岁的中学生，如今要考虑的问
题太多了，要面对的问题也太多了。或许很多问题，他处理不了，但处理不了也得处理。不但风风雨雨
的这条路要走下去，更何况，他的父亲还得靠他来保护，不然石向上的悲剧就会发生在他父亲身上。

秦有理回到学校，又有种痛快的感觉，又有种不快的感觉。痛快的是，是他组织了一场龙头历史上
最大的革命斗争，把那些走资派、大右派，斗得落花流水、威风扫地，往日那么耀武扬威、神气活现的

领导们，在他面前竟如此地不堪一击，都乖乖地向他求饶。从没有过的痛快，从没有过的淋漓。他真正地体会到什么叫革命，什么是革命的威力。他秦有理如今在龙头镇可是个说一不二的人物，谁也不敢小视。然而，觉得痛快之余，还有些不痛快，倒不是因为石向上死了。他是后来知道石向上死了。他觉得自己好象没怎么使劲，没怎么认真打，也就是打了几下，这个人怎么这样不经打。这个事，他倒没怎么去多想。不是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吗，一次大的革命运动哪能不死几个人呢？北京打死了这么多人，还有谁去说了呢？搁在他心上的事是，肖胜利和他那个“东方红”，专门和自己作对。怎么去铲除，还真是个问题。他们分明是保护走资派，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自己既然已经跨出了这一步，都已经打死人了，那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在革命造反的路上走到底。决不能让那些走资派、保皇派有抬头还手的机会。

这些日，秦德才的心里痒了，发热了。他盼望的革命运动终于又来了。那个社教运动算什么？自己当了贫协主席。可是主席啊，这是多大的官啊，吓死人的官啊。可是结果，最后连个屁也没有。分的果实，被于村长抢回去了不说，还挨了顿揍。这算什么革命？你看这次，那天在十字路口的批斗会多来劲，那才叫革命呢。他尤其高兴的是，是他儿子搞起了这次斗争。他儿子比他还有能耐，这是他最高兴的。尽管秦有理并没有跟他说起这些，不但事前没和他商量，事后也没跟他说。这儿子呀，我可是几十年的革命老手啊，怎么不来向我请教呢。不过，那也没关系，他秦德才完全能搞一场更大更厉害的惊人之举，彻底革命到谁也不可能超过的程度。

秦德才 would 怎么做呢？

第十七章 乱杀人

1960年1月17日

17.1 灭门

秦德才要搞个什么样的惊人之举呢？他有他的能耐。别看他不看报、不开会，可这些事却比别人“明白”得多，反应快得多。他脑子里在转着：我可是贫协主席哎，是主席哎。主席是什么意思啊？谁还不明白？可又没有一个人喊过自己是秦主席。你说气人不气人？你们不喊我，我就叫你们看看我这个主席的厉害。他也看到了，贫协所以没人理，就因为它只是个空架子，没有实权。现在公社都垮了，书记、社长都能随便斗，大队书记也都是走资派。谁来接这个权呢？满公社数下来，没别人了，那就应该是我秦德才了。叫我来管整个公社？种地、浇水、挑粪，都要我来管？那不干。只管最有权的那点。哪一点最有权？那就是人命权，杀人的权。对了，就是这个。他脑子转了两圈，居然能转到这儿来了。手一拍，对，成立个“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不管别人认不认，到时候，谁抡出的拳头大，谁就是老大。

具体行动还得有人啊，找谁呢？这件事，费了他几天工夫。别说，有不干的，也还真有愿意跟他干的。储小二，是一个。还上外村找，凭他的臭气，怎么也能招来几只苍蝇，比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知道的孙家芥的孙二赖。有了人，不管多少，就是个队伍啊，名字就叫“龙头公社专政队”。这还是宗书记在1959年搞的，秦德才可一直没忘。那时爽快了一阵，没过瘾，还老惦记着。这回用上了，作为“最高法院”的“执法队”。秦德才封自己是“最高院长”、储小二为“专政队长”。木棍换成了铁棍，他要给“阶级敌人”下手了，要向全公社显示他秦主席的威力了。要问，他不才是大队的主席么？能管全公社的范围么？真犯嫌，多这嘴干什么？别坏了秦主席的好事，小心棍子朝这儿过来。

对谁下手呢？能对谁下这个手呢？这是行动的关键。走资派在公社大院里，现在还不就敢这样打进去、把人抓走。外面的地富反坏右呢？西北村没地富分子，赵家庄的赵炎黄远了点，下次吧。这回先找包金贵，又是国民党，又是外乡人。对，搞死他也不会有人管。

“储队长！”他朝屋外喊了声。

这储小二，还真有点奴性，一直在秦德才的屋外等着听候使唤。有队长干，门外站站也行。

“有！有何吩咐，秦司令。”储小二立马应道。秦德才还不知道应该给自己封个什么官，先叫司令吧。“司令”，挺好听。

“专政队集合，咱们去教育教育那个包金贵。不然咱们革命派，只吃饭，不干事，算什么革命派！”

“好，”储小二哨子一吹，来了三个人，都拿着半人高的铁棍，由秦德才领着出发了。

是因为宗发奋在社教时说西北村要有个阶级斗争活靶子，包金贵才从北山搬回来。回来之后，还是住在西北场院里十几年前为他搭的那间小房。

他已经很疲惫、很虚弱，天天对别人点头哈腰、担惊受怕，不到四十的人，头发蓬乱、皮肤粗糙、皱纹深陷，都驼了背，整天裹着几个月不洗的黑褂子，就像已经五十开外。

只听得门外又喊开了：“国民党分子，出来，出来！”

包金贵弯着腰，点着头，出了屋子。还没等看清是谁，一铁棍就猛地砸到了腿上，包金贵“噢”地一声，就倒在了地上。

“今天，叫你这个国民党分子尝尝我们贫下中农的铁棍。”秦德才抡起铁棍劈头盖脸地就往下打。

包金贵被打得喊爹叫娘，在地上翻滚。

秦德才边打喊：“叫你喊，叫你喊，打你个国民党，打你个国民党！”

包金贵媳妇在屋里听见惨叫声，便往外冲，反而被孙二赖一把抱住，“嘻嘻，国民党的娘们儿，让贫下中农看看国民党娘们儿的大奶是啥样。”说着，就去撕包金贵媳妇身上的衣服。

储小二们在边上哈哈地笑开了。

包金贵媳妇挣扎着，尖叫着。

满脸是血的包金贵猛地跳了起来，抓住孙二赖的后衣领：“今天我跟你们拼了。”

“啊！你敢造反啊？”秦德才抡起铁棍向包金贵的后脑勺砸去。

“卐”的一声，包金贵应声倒下。脑壳已经碎裂，红的鲜血，白的脑浆，流淌在地上。

已经被撕碎了衣服的包金贵媳妇发了疯似地嚎啕着扑在包金贵身上。

“妈的，国民党的娘儿还不让碰，就一齐死吧！”孙二赖也抡起铁棍，砸向包金贵媳妇的后背。“辟辟叭叭”，也不知到底抡了多少下。包金贵媳妇的背后血肉模糊，连骨头都翻了出来，只惨叫了一声，就死过去了。——又是一条人命！

屋里传出了包金贵两岁大的儿子的哭声。

“一不做，两不休。国民党的种，一起干掉！”秦德才这时觉得自己比阎王还厉害。

孙二赖转身进屋，抓起小孩，高举过头，砸向地面，也只“卐”的一声，就没气了。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一家三口，就这样斩尽杀绝，被灭了门。

看到这些最猖狂的极端分子，真是有些“不怕死”的狠劲。现在看来，“不怕死”还真有不同的情况呢。卑鄙凶残的人也可以不怕死，就像流氓无产者一样，认为自己的命不值钱而无所顾忌，就像国外有些极端分子的自杀式爆炸。但他们与文革中的极端分子相比又不一样了。外国自杀式爆炸的极端分子是要尽

力克服对自己死亡的恐惧，泯灭掉自己的人性，与别人同归与尽。而文革的极端分子则是在极大地膨胀、释放自己的兽性，在别人的痛苦和死亡面前尽情地欣赏作乐，认为别人的命不值钱，却很在乎自己的存在。他们的不怕死，只是不怕别人死。对于自己，不但很在乎自己的存在，还想飞黄腾达、傲视天下、做人上之人。

哭声、喊声、惨叫声，惊动了四邻。最先过来的郭大妈，吓得跳起来就跑了，在胡同里拚命大喊：“杀人啦，杀人啦！”

整个西北村惊动了，人们惊叫着，到处是“乒乒乓乓”的关门关窗声。女人们在家用被子，把孩子死死地捂在炕上。男人们则操起家伙，把门反锁，涌到胡同里来。

杜家骏在家里一听到秦德才又在杀人的时候，浑身一惊，立马往外走。

唐玉贞拖着不让走：“这种地痞流氓，现在没人管他了，纯粹是条疯狗，连宗书记都被他们打了，你去干什么？”

“公社是瘫痪了，可是我们村干部还没有被免掉。这种时候，这样大的事情，发生在西北村，我不出面谁出面？这事不管还了得吗？那还得死多少人？”

杜家骏甩开了唐玉贞的手臂，径直往外走了。

鲁队长、平金刚他们也在一片关门声中走了出来，挡住了秦德才一伙的去路。

秦德才们身上沾着血迹，举着杀人凶器，大摇大摆地出来了。

“再去杀哪个？”孙二赖杀上了瘾。

秦德才眼珠一转，凶光四射：“杀那个姓李的右派。杀右派，杀了也白杀！”

转过这条街，有一群人居然敢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秦德才一愣，还真有不怕死的。定神一看，最前面站着的是杜家骏，两手空空，却是一身胆气，毫不畏惧。旁边是鲁队长、平金刚、彭小宾一大群人，个个长棍短棒，怒目相视。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人民政府还在，公安局、法院还在，轮不到你们胡来！”杜家骏斩钉截铁地说着。

秦德才虽然猖狂一时，但一见到杜家骏，尤其是身后的鲁队长，居然腿也不敢往前了，可嘴里还在硬：“国民党分子包金贵搞阶级报复，想杀害我们贫下中农，被我们‘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处死刑，镇压了。他们危害革命，死有余辜，死得活该。”

“你们不要走开，保留现场，听候处理。我去叫公安员来，”杜家骏说。

这一大帮人的正气，压住了秦德才想继续杀人的凶焰。

17.2活见鬼

杜家骏立即跑到南门口的派出所，找了诸所长。

诸所长也是满脸阴沉，可却是另一种阴沉：“我也听说了，我也派人远远地去看了。按说这事，我们派出所应该在第一时间就出来管。可是，老杜啊，现在这形势你也看到了，我们也管不了啦，也不能管啦。”

“杀人的事，也不管啦？”运动至今，虽然发生了很多令人惊讶的事情，可杜家骏听到这句话还是又一次惊讶了。

“公安部长谢富治说了，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全国九千万红卫兵，到时，他们不冲你的公安局就算好的了。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他还说，民警要始终站在红卫兵一边。”（说明：这段话请见《狂飙》，丁晓禾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

这叫做：不管也是种管。

“那秦德才，也算不上红卫兵啊？”

“咳，别计较这些啦，都叫做革命群众组织啦。”

诸所长见杜家骏还愣着，就接着说：“你就看到西北村这一件事，外地闹得可厉害啦。光是北京市大兴县，三天就杀了325个人，上至八十多岁，下至一个月的婴儿。”（说明：此事请见《中国“左”祸》，前已提及）

杜家骏还在问：“就这么杀下去？”

“唉，你叫他们各人自己想办法吧，我们是管不了啦。”

事后的事后，这类事情，被叫做“乱杀人”事件。这一个“乱”字，就不再有前因后果，抹去了是非曲直；这一个“乱”字，成千成万罹难者的生命就此湮灭；这一个“乱”字，杀人的罪责便烟消云散；这一个“乱”字，好像历史就从此了无痕迹。这堆杀人血案，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清理。

杜家骏回到包金贵那小屋前时，已经挤满了人，挤满了愤怒和惊恐的人。秦德才和储小二两人被大家紧紧地围在里面。

鲁队长忙过来问，派出所怎么说的？

杜家骏还真没法说，就对秦德才喝道：你们两人先把尸体抬进屋去，听候处理。

秦德才并不愿意，可是看着杜家骏、鲁队长铁着个脸，看着围在前面大伙儿愤怒的脸，知道这事执拗不起来，只好对储小二哼哼说，那就抬进去吧。

打的时候痛快，真到抬尸体时，到底是心虚，这两人也是脸色苍白，不敢言语，浑身都在打颤，脚底下慢慢地挪着。等最后把那小孩也抬进去时，储小二一头栽在床边，躺倒在地，动弹不了了。

秦德才还有贼心思看着，包金贵媳妇手腕上还有个银镯子呢。那是他们俩结婚后两年，日子过得最好的时候买的。

还没等秦德才往下想，杜家骏在门外大吼一声：“用被子盖上！”就这么一声，也把秦德才吓得灵魂出了窍，一个趔趄竟跌倒在屋门口，翻着白眼，靠在门上，喘着粗气却上不来话。

天已渐暗，众人久久不散。

杜家骏见了，和鲁队长几个商量，先就这样吧，让他们俩陪死人去吧。鲁队长找两个胆子大一点的，在旁边看一下，万一有什么其它意外。结果，叫谁，谁也不肯留。本来就已经是一片混乱了，这种惊天动地吓人的事，谁敢留下。最后也只有鲁队长自己和彭小宾留在那儿，蹲在十几米开外看着。其他人也就慢慢散去，等天明再说吧。

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秦德才好像自己能动了。他挣扎着，扶着门框，站了起来。

“要上哪？”鲁队长问。

秦德才没搭话，晃晃悠悠往前走，没几步，“叭叽”一声就倒下了。过一会儿，晃晃悠悠又起来了，扶着墙往前挪着。

秦德才已经明白点了，但这种人还有最后一点鬼主意。他知道，他不能张嘴说话，要不鲁队长真能揪住他不放。这时候，他也真是有点迷糊，也装着点迷糊，就这样晃晃悠悠地出来了。

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大约是半夜时分，储小二醒了。他觉得怎么不对劲，跟平常不一样，使劲睁开眼睛看看，秦德才不知什么时候走了，那小子怎么也不喊一声。自己怎么是躺在地上，抬头往床上一看，怎么有三个人，一下想起了白天的事。啊呀，那不是三个死人么？一身冷汗骤起，顿时汗毛直竖，储小二猛地站了起来，床上躺的真的是三个血污不堪的尸体。包金贵还暴裂着眼珠，好像在瞪着他。

储小二这下吓得不轻，魂都没了，一个晃悠侧着就往死人堆上倒。他赶紧用手一撑，不巧正压在包金贵媳妇仰着的肚子上。这一压，包金贵媳妇突然吐了口气，喉咙里竟发出了“喔”的一声，那胸脯，那胳膊似乎向上动了下，好像要抓住他似的。

“哇！”储小二吓得惊叫起来。

“有鬼啊，有鬼啊！”储小二跳出小屋，奔跑着，喊叫着。

鲁队长都没能拦住他，看他手上也没拿什么凶器，也就让他去了。

“有鬼啊，有鬼啊！”西北村的夜空里，飘荡着这样或近或远的惨人的阵阵惊叫。

满村的人都没法睡，本来也就没睡。

他们连夜把包金贵一家埋了。

他们的心情异常地沉重，知道这文化大革命不但是死了石向上，也死到眼前来了，会不会死到自己头上呢。不一定了，真的不一定了。人们不但为包金贵一家哀痛，也警觉起来，要应付这不一般的文化大革命了。

那个储小二，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发现他躺在望海山上的一个角落里。从此，他落下了这个病根，一有什么事就蹦起来，大声惊叫：“有鬼啊，有鬼啊！”

大家都说他活该，老天长眼了。

第十八章 大漠芳魂

1960年1月18日

18.1 风起云涌

当文化大革命这场急风暴雨扑向海源大地的时候，身在南疆的赵玫，又会怎样呢？

赵玫在几乎与世隔绝的五三农场里相对舒心的日子并没有延续多久。作为“文化大革命”先锋的红卫兵运动已经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正从首都北京如溃堤之势向四面八方冲去，连这遥远的千里之外的戈壁深处都没有例外。一张巨大的吞噬了无数人生命的血盆大口朝着赵玫袭来。

首先有所感觉的是潘场长。他从报纸上、广播里、文件中感觉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激烈的社会动荡正在逼近。首先来到五三农场的红卫兵，是些外调人员。五三农场，一年要接待许多批的外调，一般都是各地组织部门、政法部门派来，气氛虽然严肃，倒也平和。现在的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外调，叫五三农场的人见识了红卫兵的派头和装束。他们见到调查对象大呼小叫，威胁漫骂，动辄就拳脚相加、皮带飞舞，打得犯人哇哇直叫。潘场长几次都加以制止，红卫兵们临走还大为不满，连呼你们要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不要把劳改农场变成反革命的庇护所！

潘场长对听到的、看到的，越来越感到不对劲。虽然省里刚公布五三农场评了个先进农场。要在往常，他不但自己会多喝几盅，还会搞干部聚餐，甚至犯人们也会改善顿生活，可现在没有这个心情。

他去了趟麦提那。他要找当年同在海源的三连的叶连长。叶连长和潘场长一起离开海源，一起入朝，一起进疆，也是就地转业，安排在了麦提那的农机局当局长。与潘场长不同的是，他在这儿成了家，娶了个维族洋冈子（维吾尔语：妇女），有了个可爱的巴丝克（女儿），取名叶丽娜，如今在上初中。

车进了麦提那城。往日宁静的小城，这时像打翻了的杂货铺。商店的招牌都砸了，街上到处是丢弃的杂物，焚烧的灰堆，墙上刷满了标语、领袖的头像和一层层的大字报，砸烂×××狗头的字样特别的显眼。人们行色匆匆、脸色惶然。一队牛鬼蛇神被押过来游街，那景象不比北京差多少。

“快走，快走，”潘场长很愕然，催促着司机小商。

吉普车直接开进了农机局的院子，开到了局长办公室的门前。麦提那都是平房。当潘场长走进叶局长的办公室，叶局长正独自一人低着头想着什么。潘场长一声：“老叶。”

叶局长抬头看是潘场长，脸上却是一惊：“这个时候，你还敢出来啊？”

“我就是想来看看，问问你，这时局到底是怎么啦？怎么革命胜利了几十年，还要造反闹革命，阶级敌人反而越来越多呢？革命怎么革成这个样子呢？”

“谁知道呢？谁能说得清楚呢？现在是斗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下一步斗谁还不一定呢。”

“还能再斗谁？”

“北京都在斗校长、斗老师呢！”

“啊？！连校长、老师也要斗啊？”

“不用说老师，接着就要斗当权派啦。连你我，恐怕都难保啊。北京市委的领导也都拉出来啦，咱们自治区的赛福鼎、张仲翰、鲍尔汉，他们也都被点名了。咱们还不快吗？我真羡慕你啊，你们劳改农场、监狱，红卫兵是不敢冲的，我这儿就难保啦，还不知道这条命能不能过得了这一关呢！”

“革命怎么会革成这样呢？我们那时是革地主、资本家的命，革国民党的命，现在是谁革谁的命呢？”

“说不清这些啦，能保住命就行啦。说不定到时候我还要躲到你那儿去呢！”

“不至于吧？”

“唉……，中午上我家吃吧。这样的机会以后恐怕不多了，媳妇做的朴鲁（维语：手抓饭），炒的皮牙孜（维语：洋葱），还是不错的。”（北方话里，媳妇是妻子的意思）

叶局长媳妇和女儿，潘场长都是认识的。但今天他不想去了，只想早点回去。

“不去我家也好，”叶局长说：“家里也乱啦，我女儿这么小年纪，屁事不懂也参加了红卫兵，今天跟她同学一起去斗老师了。我怎么劝也不行，唉！”

潘场长当下就辞别，在街上买了张艾买尔（维语：馕），他和小商一人撕了一半啃。过十字街口时，看见有一群人围着，堵在街上看热闹。

人群中间是几个穿着绿军装的红卫兵，正兴奋地一遍遍地唱着潘场长第一次听到的“造反歌”。

“拿起笔做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

文化革命当闯将。

杀杀杀，嗨！”

一个稚嫩的女声在尖尖地喊着：“坚决打倒走资派张××！”“坚决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王××！”

车过不去，潘场长一看是一群年纪很小的红卫兵在批斗几个脖子上挂着黑牌子低头弯腰的人，原来是中学生在斗他们的校长和老师。那个领头喊口号的，正是叶局长的女儿叶丽娜。

叶丽娜虽然才十三四岁，却已经有了维族女孩撩人的身材和线条，如今罩着一身绿军装，头戴红星闪闪的军帽，腰间束着皮带，更显出别样的青春和风采。

小叶眼神很好使，一眼就看见了车里的潘场长，刚才还横眉怒目的脸蛋，一下子就绽开了花朵般的笑容，大喊着：“潘叔叔，你来啦。你下来，参加我们的革命行动吧。”

潘场长忙摇摇手。

小叶还在喊着：“下回，我们到你们农场去，也去点一把革命的烈火！”

潘场长当着没听见，跟小商低声说：“掉头，快走。”

18.2冲击农场

1966年“十·一”国庆后，形势进一步激烈。北京的红卫兵，也来到了戈壁小城麦提那，设立了“首都红卫兵麦提那联络站。”

“你们这儿的文化大革命，一点气氛也没有，根本还没有开展起来，太温文而雅了，哪像个革命的样子。”已经长了小胡子的联络站的头很不满地对当地中学生红卫兵说。

“我们这儿地方偏、地方小，就这么几个牛鬼蛇神，我们都斗过了，”一个胖胖的男孩说，他大概是当地红卫兵头。

“不会的，越是偏僻角落，越是藏污纳垢的地方。我们要提高革命警惕。”

“我想起来了，我们这儿有个劳改农场，里面肯定关着不少坏蛋。我爸爸的战友，就在那儿当场长，我领你们去。”叶丽娜插了这个嘴。

“好，好。”“噉，噉。”其他的红卫兵高兴地叫着，“我们可以狠狠地教训他们了。”

“从来这儿，我们还没有教训过人呢，太不过瘾了，我的手早就痒了。”

五三农场的大门，白天是不关的。

这天上午，满载着三十多个红卫兵的一辆大卡车，卷着尘土，一股风似地驶向五三农场。还没等门岗看清，就已经进了前院的空地。

红卫兵们纷纷跳下车，直嚷嚷：“我们是红卫兵，来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对阶级敌人进行专政！”

农场的干部们还不明就里，问：“怎么个专政法？犯人关在这儿，不就已经是专政了吗？”

“不行，我们要实行最革命的红卫兵的专政！叫阶级敌人尝尝我们红卫兵的铁拳！你们要配合我们的革命行动！”

“犯人都到地里干活了，很远，喊不回来。”

红卫兵们嘀咕了几声，“把还在这儿的坏蛋都喊来，一个也不能少。”

管教们把在场部的几个犯人，叫了过来。这几个都是年老力衰，体力不行的，不去大田了，留在农场里打扫卫生，干点杂活。那个湖南的小马，这几天被照顾留在场里，这回也被一起叫了过来。

七、八个穿着灰色囚衣的犯人，在空地中间站了一排，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红卫兵们把他们围在中央。

小胡子在他们前面转了三圈，那眼神就像野狼在挑选哪个猎物下手。他看了三圈。对这些犯人，哪个都看不顺眼，对哪个都不感兴趣。把他自己都看烦了。他随意指着一个又瘦又高的犯人，喊着：“出来，出来！”谁叫他长得比别人高，好指呢，活该。

那犯人瘸着腿走了出来。

“你是什么罪行？”

“我把大队食堂里的铁锅拿回家了，说是破坏人民公社。那铁锅本来就是我家的……”

“你这小子，到现在还不老实！打！”没等犯人说完，小胡子红卫兵就甩起了带铜扣的皮带。打到头上，就是一淌血印。

旁边的红卫兵们也纷纷扬起皮带抽打下去，那犯人被打得满地翻滚，哀号不已，成了血人一样，抽搐一阵就不动了。

犯人们惊呆了，旁边看的管教们也惊呆了。

小胡子红卫兵又朝剩下的犯人扫视着。

犯人们大气都不敢出。

小马惊恐得嘴里“喔喔”地发出声响。

被小胡子注意到了，“这么年轻，就反党反人民。出来！”一把就伸过手，拽住小马的衣领往外拖。

带铜扣的皮带，雨点般地落下。

小马一声声“啊，啊”地惨叫，在倒下去之前，突然朝拽住自己衣领的那只手咬了上去。

小胡子红卫兵疼得“啊呀”一声跳了起来，“他要杀害红卫兵！他要杀害红卫兵啊！”举起留着牙印的手叫着。

那还了得，几十根皮带更是铆足了劲抽向了小马，抽向那一排犯人。

“住手！”一声大喝响了起来。

潘场长带着全副武装的警卫队过来了。

红卫兵们停下了手。

那个小胡子还不服，指着已经倒在地上的小马说：“这个反革命，疯狂进行阶级报复，妄图杀害我红卫兵战士。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儿的犯人由我们来管理，由我们实行专政，请你们退出去。”

“你是什么人？敢对抗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小胡子又对着潘场长举起了皮带。

“这是潘叔叔，是这儿的场长，”叶丽娜这时站了出来。这个活动开始还是她提议的，没想到会弄到这一步。

“场长？狗屁场长，场长就是走资派！给我上！”小胡子对着两边的红卫兵喊着，自己并不上前。

“哗”的一声，警卫队的战士都举起枪。

“你们走吧。”警卫队长对着红卫兵冷静地说。

小胡子只好放下了皮带，又一脚踢向小马，“但是这个人不能放过，这个是反革命凶手。”

“他犯了罪，我们会交给县公安局处理。”潘场长说。

“那我们去找公安局强烈要求严惩反革命杀人凶手！我们走！”

“嗷，嗷。”红卫兵们又一阵狂叫，爬上了车。

叶丽娜临上车还看了潘场长一眼，潘场长转过了脸。

在狂叫和尘土中，装着红卫兵的卡车走了。

那个又高又瘦的犯人，被拖到了大门外东南面的麻扎（维语：坟场）堆里埋了。新埋的小土堆，会有一个木牌插上，写着姓名和囚号。但不过几个月就干裂了，两、三年就成了断裂的朽木，再往后就不见影了。那一大片密密麻麻的小土堆，淹没在一人高的随风摇曳的蒿草和荆棘中。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数字，据说比现在农场里的活人还要多。

地上的血迹赶紧铲掉。而小马，则叫县里的公安局来车带走了。

18.3流落孤洲

地方上的很多部门已经失去了管理能力，甚至连本单位自身也控制不住了。为了防止意外发生，自治区劳改局对农场派出了工作组，以加强领导。

来五三农场的工作组一共三个人，一辆吉普车就从喀什来了。潘场长等在大门口等候，下车的第一个人是组长，潘场长上去握手欢迎。又下来一个，又是握手欢迎。

又下来一个，却是粘干事。

潘场长愣了。

粘干事冷冷地笑了，脸上是一副胜利者的神情，意思是，“你看，我还是回来了，怎么样？”

组长忙解释说：“粘干事是老熟人了，我就不介绍了。局里考虑到粘干事对五三农场很熟悉，所以就叫他一起过来了。”

潘场长哼哼着没吭声。

粘干事也自顾自地往前走。

工作组一来，潘场长的权限当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在如何对待红卫兵的态度上，潘场长和工作组出现了分歧。

粘干事说：“我们要坚决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要烧遍大江南北，五三农场也决不例外。潘场长你在上次红卫兵来农场时的表现是错误的。态度不积极，旗帜不鲜明。”

“你讲得根本不对！”潘场长针锋相对地说，“如果照那帮红卫兵的做法，把人活活打死，那几百号犯人被逼急了，分散在几千亩地里，要闹起事来，集体逃跑，甚至集体暴动，你能压得住？！杀了你脑袋，也承担不起这个责任。我们五三农场凭什么得先进单位，就是这几年从没有打死过犯人。”

组长也觉得事态严重，问：“那怎么办？”

“再有红卫兵来，挡在外面。就说不许冲击专政机关。”

“好，今后，大门要随时关上。没有有关部门特许，不能随便进来。”组长说。

“哼，”粘干事很不服气又很不甘心，眼珠一转又说：“那个什么特务家属烂女人怎么还在这里？”

“这是怎么回事？”组长问潘场长。

潘场长说：“有个女人来探视，走错了路，没找到人，也回不去了。正好伙房缺人，就留在这儿帮忙干活了。”

“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吧？”组长又对粘干事说。

“不是大事，可是个好事噢，”粘干事话中有话地冷笑着说。

潘场长再没理这个茬。

形势还会再怎么呢？潘场长想了两天，也想不出来，于是他拿起电话，想问叶局长，城里的红卫兵现在又怎么样了？

电话那头半天也没人接，刚要放下，话筒里响了：“你找谁呀？”

“我找叶局长。”

“现在没有叶局长了，他已经靠边站了。这个电话是农机局革命造反大队的专用电话了。”

潘场长愣了半天，真的像老叶上次见面时讲的，革命搞到自己头上了。正在出神想着呢，小商递过来一个文件。潘场长拿过来一看，又是一愣。

那是县法院的一张布告：“为保卫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从重从快打击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敌人，对妄图谋害红卫兵小将的反革命杀人犯马××，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么快，抓走才十天啊。虽然潘场长见过的犯人多了，见过犯人死了的也多了，枪毙的事，对他早已司空见惯。但这一次，却在他心里掀起了一阵波澜。

天旋地转了。

他不能再在晚上去找赵玫。中午，潘场长一脸沉闷敲了赵玫的门。

赵玫开门一见，忙问：“怎么了？”

潘场长哀叹再三：“我保护不了你了，我留不住你了。”把前后事情一一细讲。红卫兵的出现，使什么悲剧都可能出现；工作组的到来，使他没有了实权；粘干事的阴招，使事情无法再掩饰。

“赵玫啊，实在对不起了。今后我连自己也保不住了，有许多老干部死在了红卫兵造反派的手里，我恐怕也逃不了这个命。你先走吧，我想过了，你回海源去吧。如果回海源有难处，你可以去我家。我媳妇是个很老实的人，我会跟她说，你就住我家，就说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

赵玫想了一会儿，平静地说：“我哪儿也不去，我放心不下董平章，我也没地方去。我早就下了决心，最多跟董平章死在一起。”

“董平章那儿，我会尽量保护他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这个，你放心。”

“我想好了。我就去那几间小房子，跟那老两口一起。我想，我还是能挺一阵子的。”

“哦，你提起那老两口，我想起来了。他们的儿子，已经被县里判死刑了。这两天恐怕就要开大会公开枪决了。”

“啊？！”赵玫也惊了，“那我也得去跟他们说一声，我这就走。”

“不急，再过两天吧。在这儿能多住一天就多住一天吧。”

“不，我在这儿，也会连累你。”

“那就明天一早走吧。”

一早，别人还没有起床的时候，赵玫用扁担挑了两个水桶，里面放了碗筷、勺子、火柴等一些最必需的生活用品和几天的干粮、苞谷面往那儿走了。潘场长替她开的大门。

赵玫又踏上了这条神秘未可知的路。

两个多小时后，赵玫又到了这个小村庄。老两口还趟在草铺上没起来。赵玫敲门进去，他俩还惊奇得怎么还挑这么多东西来，以后就方便多了。

老两口的情绪难得地高了起来，说是好几天没见到儿子了，今天早点出去。

赵玫真不忍心把他们儿子的死刑告诉他们。话到嘴边，忍了又忍，可看到老俩口搀扶着要往外走。赵玫心都碎了，强忍着眼泪，跟他们说了实情。

老俩口顿时脸色刷白，靠在墙上，半天没有返过神来。

好不容易喘过气来，婆婆先开口说：“走，走，伢子就是死了，我们也要去收尸啊。”

“对，对，我们走，”老头说。

“到县城有两百多里路呢，你们怎么走啊？”赵玫问。

“怎么走？一步一步地走，总会走到。”老头说。

赵玫沉默了，她不能再多说了，流着泪看着他们远走。

这之后，人们再没有见到这两位老人。或许他们还没走到麦提那就倒下了；或许，在他们儿子还没有倒下之前，就先倒下了。

也许有人要说，他们俩要是不来南疆就不会丢掉性命啦。这倒难说，1967年秋天在湖南南部掀起了杀人狂潮，大规模屠杀对立面和“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和家属的家属，比如仅道县一个县，在66天内，就杀死4913人，自杀326人。杀人手段之残忍，惨绝人寰，令人发指。（请见：《中国左祸》，文聿，朝华出版社，1993年）。这老俩口在家不见得能逃脱恶运。

最令人扼腕叹息的是，那个小马至死也没有看到过他的父母，至死也不知道他的父母拼着命赶到了他身边、死在了他的身边。

他是近视眼，看不清。

他的眼镜，早在来南疆之前就被打掉了。

18.4香消玉殒

革命的怒潮卷起了更高的浪涛。

在麦提那的北京红卫兵和麦提那当地的红卫兵，坐着满满的一卡车，又来到了五三农场。

这次，农场可是大门紧闭。门外的岗哨增加到四个，个个都是全副武装，头戴钢盔，枪头装上刺刀，腰间是一盘子弹袋。这个行头，又让这些穿着不知从哪儿要来的旧军装，腰间最多是个铜扣皮带的红卫兵们相形见绌、自叹弗如了。

“开门！我们要对犯罪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红卫兵们喊着。

警卫队长来了，依然是面无表情，冷冷地说：“不卖的（新疆语：不行的）！上级有指示，群众组织不能冲击专政机关。”

“开门，开门！你们要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

警卫队长冷冷地看了一眼说：“最后说一遍，不卖的！”转身就进了门，门后响起了拉上铁栓的声音。

那个小胡子在原地跳着叫着，也并不往前。

大门又响了，开了一条缝，露出粘干事的半个脑袋，“你们往东去吧，那儿有个小村庄。上次咬你的那个反革命凶手的爹妈，和那个特务老婆都住在那儿，去教训教训他们吧。”

“真的吗？”

“热丝，热丝。”粘干事还学着新疆话讲着。（热丝：维语，是的。）

“走！”小胡子一挥手，红卫兵们爬上车，往东去了。

卡车走了几次叉路，差点迷了路，一个多小时后，到了那个小村庄。

红卫兵们像狼群一样扑向那几间土房。

赵玫还在屋里收拾，虽然并没有什么好收拾的。从老俩口走了后，她一直是一个人住在这儿。头几天很是害怕，晚上彻夜不敢睡，用树枝顶在门后，坐在角落里，听着风声呼啸，黄沙拍打着门板，直到天亮。这几天好了些，出来走走，最远能走到胡杨林里拣拾一些蘑菇。她还在想，门前的这片地，收拾好了，还是能开出一块来种的。要是董平章真有出来的一天，她想他们俩就在这儿过吧。

忽然，门外响起了突如其来的一阵杂乱的脚步和喊呼声，还没待赵玫反应过来，那破门板就被踹开了。

一群身穿黄的绿的各色旧军装，胳膊上戴着红袖章的人冲了过来，赵玫不知道那叫红卫兵。

“你男人是国民党特务吧？”为首的小胡子问。

“就是她，这儿没有别人了。”胖胖的男孩说。

“拖出去！”小胡子吼着。

赵玫刚被推出屋子，七、八个人围上来，皮带头就“叭叭”地打下来，打到哪儿就是一个血窟窿，脸上、身上马上血迹斑斑。

院子外面还有更多的红卫兵叫着，“拉出来，拉出来！”

小胡子揪着赵玫的头发拖到院子外面，那群红卫兵一涌而上，没头没脑、劈头盖脸地，皮带头就像急风暴雨似地抽下来。

赵玫顿时成了血人，要倒下来，却被东边的人推到西边，西边的人又推向东边。她双手捂着脑袋，想护住那发夹。皮带抽得更狠，扬起的皮带带着血滴、带着皮肉，血肉纷飞。

叶丽娜也在这群红卫兵里。她举起了皮带，可是手却在颤抖。她也打过不少人，可今天的手怎么不听使唤，抽不下去了。面对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她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干什么。

在旁边的小胡子瞪了她一眼，叫喊着：“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叶丽娜也把皮带抽了下去。

赵玫摇晃着，支撑不住了。

她想最后看一眼太阳，最后看一眼这世界。已经被鲜血迷蒙的眼睛往前最后一睁，突然她的眼神直了，说了声：“有狼！”

“呸，这个时候还在造谣！”小胡子朝着赵玫的眼睛抽去。

“啊，”赵玫一声惨叫，顿时眼球迸裂，血流如注。

她倒下了。

这群人一下子也声息全无了。并不是可怜赵玫，而是他们看到，一群狼真的围了上来。

这群人刷地转身看去，这群狼，一共八只，戈壁里的狼难得有这么一大群的。它们发现人在看它们，也停了下来，围着人群排成弧形的半圈，露着锋利的牙齿，吐着血红的舌头，用更凶恶的眼光看着人。

顿时一切都凝结了，连空气也凝结了。

红卫兵们一下都脸色惨白，愣在了那儿。

这几个月，村里、城里非正常死亡的人多了。野狼吃到了人肉，更加十倍的疯狂。它们这是闻到了血腥味。据说狼在十几里外就能闻到血腥，而后会不顾一切地赶来。如今，血腥味就在眼前。这血腥对于狼来说就是最强烈的兴奋剂，刺激着它们的每一根神经，燥动着它们的每一根血管。这时，它们是绝不会后退的。

狼群蹲着停留了一会，观察着前面的人。中间的一只狼，看来是头狼，抬起了后腿，低低地吼了声，起身了。其余的狼，也都起身了。它们一步一步地，很坚定地往前，这是说它们决定进攻了。尽管前面的人比它们要多得多，但它们相信可以取胜，值得一搏。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躺在地上的赵玫突然喊了声：“快跑啊！”话还没说完，一口血痰就堵住了她的喉咙。

听得这一声，刚才还猖狂无比、不可一世的红卫兵就像一群惊慌的麻雀，一下子全跑了。小胖子“噢”的一声，先跑了，其他人也争先恐后拼命地往车上跑。

“等等，等等，还有我。”小胡子的鞋都掉了，在喊着。

狼群加速了。

红卫兵在狂逃。好在卡车停得不远，他们争先恐后地往车上爬。

狼群冲刺了。

叶丽娜的位置在最后面，愣住了，再跑已经晚了。但是没有一个红卫兵过来救她。

头狼赶过来了。

就在头狼要扑向叶丽娜的时候，躺在地上的赵玫突然支撑了起来，先扑向那匹头狼，一边还喊着：“快走啊，姑娘，快走！”

叶丽娜跑开了，跑到了卡车边。

是赵玫挡住了狼，头狼转而咬住了赵玫。

卡车发动机的吼声，使其它的狼停了一下。还是那个小胖子，拉了叶丽娜一把，把她拽上了车。

当卡车卷起尘土仓皇逃窜的时候，那几只狼都围着赵玫撕咬。

叶丽娜看见赵玫僵硬的、血淋淋的一只手，向上翘着，随着狼群的咬嚼而晃动着。手腕上的银镯还在阳光下闪烁。

叶丽娜满眼是泪，扯下了红卫兵的袖章，扔到了车后的黄尘之中。

满车的红卫兵看着她，都没有说话，包括那个小胡子。

而当年如花的赵玫，民主村的妇救会主任，就这样留在了离家千里之外的荒漠之中。

18.5又见赵玫时

飞扬的干雪又掠过南疆的荒漠。

董平章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见到赵玫了。他很想问问潘场长。但他知道这是文化大革命了，有红卫兵，有造反派，有批斗会。各人过得都不容易，没出事就不易了。生产技术组，解散了好几个月了，从工作组一来就撤了，再见到潘场长也很难了。远远地看见，场长的精神也不好。自己决不能贸然走去问，只能一直在心里嘀咕，她上哪儿了呢？回海源去了？怎么也没跟我说一声。

红卫兵倒是再没有来五三农场，可五三农场的文化大革命还是有声有色地继续着。

各个环节、各种过程，基本也都没缺少。本书主要是讲述千万里之外的海源县西北村的经历，对五三农场只能寥寥数语、一带而过了。

1967年春天还没来，粘干事就领着造反派夺了权，赶走工作组，成立了农场革命委员会，他当然是主任，潘场长跟二劳改一起干活了。春天来了，上级派来了军代表，劳改农场实行军事管制。来的军代表，凑巧是潘场长当年的老部队的。当初驻海源的令营长，令锦绣，已经是师长了。有这层关系，军代表自然跟潘场长走得近了，粘干事又看着不舒服。那年夏天，出了武汉陈再道事件，粘干事也趁机在五三农场演出了一场针对军代表的“打倒军内一小撮”的表演。可好景不长，秋天的时候，风头又变了，粘干事又成了“毁我长城”的“五一六分子”，被带走隔离审查。潘场长的日子好过了点。

直到1968年的春天，军管结束。潘场长又恢复了场长的职务，他又可以说了算，又可以自己爱上哪儿就上哪儿了。

他又想起了赵玫，想去看看她。说实在，他对赵玫是有感情的，一直没有忘记她，一直在惦记她。但是这一年多，实在是身不由己，自己都顾不上来。当他自己能做主的时候，首先就想到了赵玫，想为她做点什么事。

这一年多来，忧郁一直压在他心上。他知道赵玫肯定是凶多吉少。南疆的冬天，她一个人是很难过得去的。两个老人也没有再见过，肯定是出事了。出了什么事，怎样出的事情，他一定要弄清楚，也才能对得起赵玫对他的情义，自己心里也才能安生一点。

前两天，董平章还特地走出队伍，问他赵玫怎么了。他说，赵玫回海源啦。董平章还问，临走怎么没说一声啊，他说有红卫兵来冲击，情况紧急，仓促而走。就为了董平章，他潘场长也应该把赵玫的下落搞清楚。首先应该去那个小村庄看看。

潘场长自己一个人往那小村庄走去。

两个多小时，小村庄到了。小村庄已经显得更加萧条，尘土更厚。潘场长一个一个场院、一个一个屋子去看。在中间屋子里，潘场长看到了水桶、勺子，窗台上摆着的碗和筷。潘场长一看就知道那是他农场的，是赵玫那天带过来的。人呢？碗里都已经攒了半碗的灰尘，看来是走了很久了。门板是被踢破的，歪倒在一边，说明是有外人闯入，走得很突然。潘场长心里收紧了，用屋里放着的当扫帚用的树枝把屋里扫了一遍，看不出什么痕迹。潘场长又出来，把小院子扫了一遍，也没有痕迹。潘场长有点急了，头上冒着冷汗，他干脆脱下棉衣，抡起膀子，在院子外面的平地上一行一行地扫起来。他想，他应该能找到什么。

哗，哗，哗，一行行地扫着，扬起一片尘土。突然在灰尘中，他看见光亮的一闪。他马上扫过去，那闪亮的东西露了出来。

潘场长一看，就跪下了，扒开尘土，愣愣地看着那闪亮的东西。

那就是赵玫的发夹，从李芹给她之后一直戴在头上从没离开过的发夹。如今锃亮的发夹还连着缕缕黑发。潘场长捧起那缕夹着发夹的黑发，黑发下“扑通”掉下个东西，那竟然是个已经发白的骷髅。

那个有情有义的赵玫，那个风韵犹存的赵玫，一年多不见，就成了骷髅。

潘场长见过的死人无数，各种惨状都有，从不在意，但面对这样一个骷髅，潘场长掉泪了。他细细地看着，那头骨上还有些干瘪的肉屑，面颌部已经破碎，越看越哭。他从来没有哭过，今天最终忍不住在这无人的旷野嚎啕大哭了。

他又站了起来，把周围的地都扫了一遍，零零碎碎又找到一些断骨。还有那段套着银镯的尺骨和绕骨。从骨头的破碎程度和骨头上的裂痕，潘场长知道这是狼咬的。

他含着眼泪，把所有捡到的骨头，都放到屋里的水桶里，那个头骨放在了最上面，再用另一个水桶倒扣上，而后跪在地上，朝水桶磕头再三。那个发夹和银镯，连同那缕黑发和那段白骨，揣在了怀里，紧紧地用手捂着，临走又带上门板，一步三回头，离开了那个小村庄。

第十九章 夺权

1960年1月19日

19.1 木棍子里面出政权

夺权是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必然出现的一个环节，尽管运动初期并没有预定出它的具体安排，比如，将在什么时间、以什么形式还要进行夺权等等。在大批的走资派不是一般地受批判而是被彻底打倒之后，在各级机关已经瘫痪无法正常运转之后，这个问题势必提上了日程。由谁来填补这个权力空缺，以什么方式填补？这就是当时的文化大革命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极左势力费了这么半天劲，出了这么大力，不就是为了这一步么？为了稳固和扩大自己的实力，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打出来的机会，岂肯轻易错过。更何况，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和8月的“十六条”，都已经写明了要“夺权”。

就全国范围而言，上海“一月风暴”是大规模夺权的第一幕。它是由张春桥策划、由王洪文领衔的“工总司”（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打头阵，以武斗方式夺取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力。由此开始了全国上下一浪高过一浪的夺权浪潮。不只是造反派向当权派夺权，更有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相互夺权。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只为一己狭隘私利的夺权，还不如说是抢权更贴切。由此，抢权乃至抢权之后的反抢权、再抢权等等，一幕幕的大剧层出不穷。

在很多基层单位，群众组织夺取行政权力早在1966年的秋冬就开始了。龙头镇上的这一幕，虽然不典型，却也照样拉开。

杀了人，都没事。秦德才的劣性迅速膨胀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

这个不只是一是要当“运动员”，而且是要当“运动健将”的人，感觉到了这场文化大革命又是一次绝佳的机会，很可能是一生中最后的机会。这场革命最合秦德才的口味。它不是斗个地主右派之类的死老鼠，也不是斗个本大队的干部，而是要斗公社的、县里的干部，甚至可以跑到北京去斗中央的大领导；而且没有任何的管束，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皮鞭、棍棒可以随便地打。何等的潇洒，何等的痛快啊，从土改以后，就没有可以这样痛快过。一定要过把瘾，再过上这一把瘾，我秦德才此生就足矣。

包金贵不过是小老鼠，掐死个小老鼠算什么？虽然闹了场活见鬼，吓了一跳。但是，干革命还怕这些么？还要干更大的，那就是批斗公社领导。秦德才不知道陈胜吴广曾有过对“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挑战。但他知道这个院子，公社大院，现在他也可以进去。不是走进去，而是坐进去。他儿子秦有理斗过宗发奋，斗过之后，居然自己走了，不在那儿了，让宗发奋他们又回到了公社，又坐进了他们的办公室。多傻呀，儿子，多傻呀。不让他们回去，你自己坐进去不就行了吗。打了人，杀了人，都没人来管；坐到办公室里去，那就更不会有人来管了。秦德才也并不明白夺权的道理。但他的直觉告诉他，现在到了可以自己坐上位子的时候了。

打进公社去，我把纪海洋、宗发奋这些走资派反掉，不就可以当书记、当社长了吗？啊呀，就是人家宗发奋对我不错，多亏了他，才有我这个贫协主席的官。嗨，到这时候，还管那个呢，下级超过上级有的是，更何况现在是革命时期。老宗啊，我秦德才就对不起你啦。

他找到儿子把这事一说：“儿子啊，你那些革命的事儿，怎么不跟我这个老革命商量呢？我现在有个好主意，你看怎么样？”

秦有理听了恍然大悟，心想：“姜还是老的辣呀，还是老爹行啊”，马上一拍即合，说：“我可以动用红卫兵配合。这样革命的红卫兵，就和贫下中农合在一起，这两支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可真是全无敌了。整个龙头公社，谁也挡不住咱啦。”

初冬，寒风刮起的时候，秦德才行动了。

以龙头中学红卫兵为先锋队伍，四、五十人，每人手持根木棍（拆下来的课桌腿），后面就是孙二赖、储小二这些，也有二、三十人，高呼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坚决夺回走资派手中的权力！”在咧咧寒风中，由秦有理领头冲进了公社大院，冲向大院里几排平房里的各个办公室。

随后进来的秦德才站在大院中间大喊：“今天，龙头公社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委员会成立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从走资派手中夺取龙头公社的大权。是当权派的，乖乖站出来，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一般干部靠后站，不要阻挡我们的革命行动。”

在院子里的几个公社干部见这架势，纷纷躲避。

秦有理首先冲向在中间的宗发奋的办公室。

宗发奋看见进来的是秦有理，气不打一处来，正横眉冷对，还没张嘴，谁知秦有理两话不说，抡起手中的木棍砸向了办公桌面。办公桌上的玻璃板，“咣”的一声砸碎了，玻璃碎片四处飞溅。

宗发奋愣了，他面对的不是李辰那样的书生气十足的右派，而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全凭暴力行事的造反派。

秦有理大喝一声：“把他押下去！”

后面立马有三个红卫兵上来，扭胳膊的扭胳膊，搥脑袋的搥脑袋，不管宗发奋怎么挣扎，就像老鹰抓小鸡似地双脚离地架了出去。

秦德才则冲进纪海洋的办公室，对着纪社长大喊：“姓纪的滚开！这个位置是我的了！”

纪海洋还在愣神之中，秦德才已经走到桌后，把他拉了起来。听着外面一阵阵的吼声，听着隔壁秦有理对宗书记的叫骂声，纪海洋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什么话也没说，自己走了出来。

没等纪海洋走到门口，秦德才已经忙不迭地一屁股坐进了纪海洋的办公椅，嘴里乐得都合不上了：“哈哈，哈哈，这椅子今天我也能坐上了。哈哈，哈哈，哈哈……”

秦有理却跟了过来，“爹，你别光顾得哈哈，还有最要紧的呢？”

“什么啊？什么最要紧啊？”秦德才眨眨眼，想不出还有什么最要紧的。

“印啊，那个大印啊！”

“印？什么印？”秦德才没听明白。

“嗨！你怎么什么都不明白？没有那玩艺，你就算坐在办公桌上也没用。”

倒是纪海洋听明白了，很平静地说：“那些东西都收起来了，要紧的一些，县里都已经收走了。”

“什么？”秦有理听得跳了起来，忙追问：“还有哪些在哪儿？”

“在办公室那个屋。”纪海洋依然静静地说。

秦有理吼着：“申光荣！你们快去公社办公室那屋，就是砸柜砸桌子，也得把那些印章都翻出来！”

“是，是。”申光荣们赶紧去了。

倒是秦德才难得慢悠悠地说了句：“原来是那玩艺儿，不用急，咱自己刻几个不就行了嘛。”

秦有理这才缓了口气，走向大门口。这里，还有不少事要他亲自指挥。

大门外的牌子，当然要改。重新刷漆，是来不及了。留出原来“龙头公社”的字样，其余的就用白纸盖上。一个牌子写上“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委员会”，另一个牌子写上“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大队”。

其他各项事情准备停当，“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委员会”成立大会暨批斗走资派大会，就要开始了。

19.2夺权大会

大会就在公社大院的门口。主任以上的，几乎都拖了出来，戴上高帽、挂上牌子，站着长长的一排。平日在农民眼里最有身份的、穿着中山装的这些人，今日被穿着破旧灰袄黑褂的人像狗一样地拖来拖去。

纪海洋和宗发奋排在中间。

秦有理主持大会。

“首先让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革命热情，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现在，我宣布，龙头公社‘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委员会’成立大会，……”下面这个“暨”字，秦有理不认识，念不上来了。

开始大家并没在意。等了一会儿，大家看秦有理还在盯着手里的那张纸，知道是在纸上出了问题，也不好意思凑过来认。还是王溪大胆地喊了句：“开始了！”

“对，对，”秦有理这才反应过来，感激地看了王溪一眼，也喊着：“批斗走资派大会，也开始了！这次，是由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贫下中农一起联合批判走资派！下面由龙头公社‘贫下中农革命造反

委员会’主席秦德才同志主持！”

秦德才先是干咳了两声，从衣兜里掏出红宝书，念上一段。别看他大字不识几个，可背起毛主席语录来，一点也不比别人差：“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就坚决批斗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最后那句是秦德才自己加上去的。

先是批斗纪海洋。

“纪海洋！你有没有罪？”秦德才吼道。

“有罪，有罪，”纪海洋连连点头。

“什么罪？”储小二虽然活见鬼时受了惊吓，今天因为人多，胆子也壮了点，还能跟着叫两句。

“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不起贫下中农。”纪海洋又连连鞠躬。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谁的反动路线？”储小二问。

“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你跟刘少奇是什么关系？”秦德才问。

“我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

“你是刘少奇的走狗！”储小二又吼道。

“是，是，我是刘少奇的走狗！”

“学狗叫，刘少奇的走狗怎么叫的？”秦德才狞笑着说。

纪海洋迟疑了一下，只得叫着：“汪，汪，我是刘少奇的走狗。”

秦德才、储小二和那帮造反派们哈哈地笑开了。

纪海洋低垂着头，我们看不清他脸上是屈辱还是愤怒。一个当年的战斗英雄，一个堂堂的领导干部，要自比于狗，你能责怪他是卑躬屈膝，毫无骨气吗？保存革命实力，还是必要时的一种斗争策略呢。所有人，不管是整人的还是被整的，人性的被摧残、扭曲和异化，这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这个影响决不仅仅限于当时，而是要延续几十年，乃至更漫长的时间。直到今天，人与人之间公然地不讲信用、互不信任，没有道德和规则可言，就是一例。看起来现在是纪海洋在忍辱负重，这不就是为将来一旦形势变化，反过来把秦德才一类的造反派往死里整留下了伏笔吗。1949年之后，以致更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政治舞台，来回反复演出了多少回这样的剧目。当然，还要说明一点，造反派并不都是秦德才那样的。

宗发奋不知是不满意纪海洋的不坚决，还是不屑于秦德才这种人，扭着头鼻子哼了一下。

秦德才马上跳了过来，“你这小子还不服。”“啪”的一棍子就打过来。

宗发奋自认为对秦德才有恩，不会有什么过不去，没想到会挨这一下子，翻着白眼看着秦德才。

显然宗发奋是看错了人。秦德才这种人是任何信义的。

“你还不服？”秦德才“啪啪”地两个耳光搥过去，储小二又一脚踢了过去，“去你妈的。”把宗发奋踢得“啊”地惨叫一声跪了下去。

“社教时，你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贫下中农革命派支持不够，我们贫下中农革命派还是没能伸直腰干、扬眉吐气。现在我们要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彻底地造你们的反了！”

一瓶黑墨汁倒在了宗发奋的脸上，黑污流了一身。

宗发奋听了憋曲得啊，心里直骂，这个乌龟王八蛋忘恩负义啊。

这些在运动中豢养起来的极端分子，对他们是不能有任何道德上的指望。

在造反派们前言不搭后语的批判和殴打之后，就开始了游街。

一长串头戴高帽、胸挂牌子的队伍走上了西街。秦有理在最前面举着“红卫兵”的大旗，王溪领着高呼口号，秦德才在边上前后看着，手里拿着木棍，敲敲这个，敲敲那个，神气得不得了。

宗发奋和纪海洋在最前面的大旗之后，各自敲着脸盆，喊着：“我是走资派宗发奋，”“我是走资派纪海洋。”

纪海洋在喊这句话时还自然点，宗发奋看来实在不愿意喊，每每声音一发出就咽了回去。声音一低，旁边申光荣的棍子就打了下来。

最兴奋的是储小二、孙二赖这几个，跟在后面高兴得都手舞足蹈，不能自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出人头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可以耀武扬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别人要另眼相看。他们一路上扯着嗓子跟着王溪在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街两边观看的人很多，已经不像上一次的害怕，都在交头接耳地指点着、议论着：“那家的小子也在里面哎。”“看秦德才那狗模样。”“这回宗发奋又要吃苦头了。”“这一出算是干什么呢？”

农家子弟的红卫兵们在行进中又唱起了令乡亲们耳目一新的毛主席语录歌：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

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队伍向东而去，把走资派都关到了中学里的“牛棚”。

龙头中学里，已经用玉米秸分成了两个不来往的区域。秦有理的红卫兵在北面，肖胜利的“东方红”在南面，进出学校走各自的校门。

19.3抄家

下午，秦德才们马不停蹄地对走资派抄家。

那时的公社干部很少有双职工（即：夫妇双方都是领工资的非农业户口）。又是领导干部，家又安在龙头镇的更少。西北村造反派知道的也就是宗发奋和经学文了。

其实经学文算不上是个双职工，只是老婆的户口放在了西北村。不过他虽然名为生产办公室副主任，但还是个小角色，比办事员强不到那儿去，够不上当权派。而且，中午他找到秦有理，说他完全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完全拥护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参加了工作，已经是干部身份，他一定会带头参加红卫兵。

秦有理听了很高兴，说：“那你就是和我们一条战壕的战友啦。快出来，快站出来。”

那时候“站出来”的意思是，干部都已经被打倒了、趴下了，能被“革命派”允许起来重新工作、站到革命队伍里来，就叫“站起来”或“站出来”。

经学文本来也没有戴帽子、挂牌子，红卫兵们恐怕还不大认识他，没给他准备帽子、牌子。他也就没到走资派的队伍里，而成了一个“革命干部”。

经学文此举倒并不是向造反派的妥协投降，而是觉得这社会应该有一场革命。几年的工作经历，使他感到行政管理部门无论是领导作风，还是管理体制，还是一系列具体的措施方法，都存在着很多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没法通过正常的途径加以探讨、研究、调整和改进，结果是日积月累，越来越重。即使有所调整，也是于事无补，反而加剧了矛盾，比如社教。这场文化大革命或许正是要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改进领导机制。他并不赞同造反派的做法，但他觉得中国需要革命，把已经异化了的革命，再革过来，可谓是对革命的革命。

不过，经学文这样做也是有代价的。他回家时，车素花正在东间的炕上跟他媳妇逗着满炕爬的小儿子呢。他妈就问：别人挨斗，你怎么先回来啦？他就直说了，他已经表态支持造反、支持红卫兵、支持文化大革命，所以不用挨斗了。车素花放下孙子，一脸怒气，抬头瞧着经学文：“没有骨气，像你那个爹一样没有骨气。你就愿意跟秦德才那种狗混在一起啊？”说完就“嘸”地一声，下炕走进她的西间，“砰”的一声关上门，再也不理他儿子了。

文革中间因为观点不同而使亲人反目、家庭分裂的事比比皆是。

那再主要的就是宗发奋的家了。

十几个人在秦德才的带领下，去了陶家大院里的宗发奋家。也就是两间房，极简易的长桌、箱子，还不够一个人翻的。

宗发奋的妻子柏蕙珠是个胆子小的女人，站在一边，看着造反派如狼似虎地翻箱倒柜，身上吓得瑟瑟发抖。

宗发奋原本也革命得很，哪有什么“四旧”。造反派们抄走了几件好衣服，储小二拿走了一只座钟，孙二赖拿走一个新脸盆，再也没什么好拿的了。

秦德才看着柏蕙珠，想起了宗发奋在四清时曾夸奖过他的老婆，其实长得也不算强，个头也不高，只不过皮肤稍微白细一点。忽然，心里起了一种兴趣，便对那几个说：“你们走吧”。又对柏蕙珠说：“你给宗发奋准备几件衣服，我带去。”

其他的人都走了。

柏蕙珠在捡着炕上被翻乱了的衣服，一边怯怯地说：“老宗他不是坏人，对你也不错，你要对他好一点噢。”

秦德才靠了上去：“那当然，那当然。”

柏蕙珠诧异地望着秦德才：“你，你，你要干什么？”

秦德才嘻嘻地笑着：“我要对老宗好，你就要先对我好。”一把就抱住了柏蕙珠把她压在炕上。

“不能啊，不能啊，”柏蕙珠使劲往外推秦德才。

秦德才一瞪眼，把木棍往炕上猛地一拍：“那你们两个就都要死在我手上。”

柏蕙珠又不敢喊，泪水直流，挣扎不过秦德才这头恶狼。

第二十章 群雄蜂起

1960年1月20日

20.1 群众组织

夺权活动的出现，使中国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尽管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组织早在1966年6、7月间就已冒出。但到了这时，它的性质和作用已和当初大不相同。那时，除了早期红卫兵在极左势力的指挥下成了打砸抢烧杀抓的“冲锋队”，在很多单位里，一般的群众组织还只是不同观点的组合和表达。而在这时，群众组织则成了各派政治势力夺取权力和保住权力的主要工具。尽管参加在其中的人们，他们自己的想法各不相同。

到了1967年初，各地各单位纷繁林立的群众组织渐渐形成了派系，通常情况下是分为对立的两派。

群众组织在各地都分为两派，从根本上讲，是极左势力在篡党夺权过程中，故意而为之。他们既需要借助“群众组织”为其冲锋陷阵，又要让这些力量相互争斗、争相效忠，从而轻而易举地加以控制。这样一来，任何一派不管对别人再猖狂再嚣张，只要“无产阶级司令部”有所不悦，另一派就会马上毫不迟疑地扑过来撕咬。这就是分而治之的做法。

有个现象可以看出来，极左势力哪怕是对那些死心踏地跟随的人，也是一个也看不上、一个也不信任、一个也不放心，这就是他们的用人之道。所以，尽管各类群众组织五花八门、山头林立，但是一开始就不容许出现全国性的群众组织，以免尾大不掉。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极左势力的预谋和手腕。

原先的红卫兵只是用来摧毁原有秩序，不到一年，此时已经失去利用价值。在随之而来的夺权浪潮中，所谓的各派组织也就应运而生。在“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一方面向“走资派”夺权（有时是假的），另一方面从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相互争斗（这完全是真的）。加上极左势力的唆使煽动，甚至直接插手指挥，更使两派斗争很快就走上了血腥的暴力之路。在时间上，也是从1967年上海的“一月夺权”开始，全国的两派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各派政治力量为争权抢权开始了刺刀见红的拼杀，大批群众成为两派斗争的牺牲品。

至于具体到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两派的形成过程和原因也挺复杂。简单说来，开始是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不同，常见的是对单位领导人赞成还是反对，也即所谓“保皇”还是“造反”。这个问题又与过去的处境有关。受压抑的一方，往往较早扯起造反的旗帜。有的则是理解的片面性，你革命，我比你还要革命。也有“宁当鸡首，不做牛尾”，自己拉出一个队伍。过去几十年也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不如趁机表演一番。更有一些，是一派组织起来夺权，另一些人赶紧纠集起来反夺权。还有很多其它一些原因，比如人际关系。过去政治运动的反复，造成整人与被整角色的多次交错与移位，又把这些搞得非常复杂。也有

很多普通群众，是在随大流，等等，等等。而军队的介入，所谓三支二军（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军管），更使矛盾扯不清理还乱、甚至火上浇油。

同一单位、同一地区人群的分裂和不同的站队，最主要的原因，是这场大动荡中的利益再分配。最核心的，就是要在权力再分配中为自己夺取利益最大化，都想在因“走资派”倒台而出现的权力真空中夺得最多的权力份额。一个有“战斗力”的群众组织，就成了必要的工具。所以，后来大家也都以“造反派”自居，参与抢权夺权了。为了增强己方的力量，同一地域相近观点、相近处境的组织也寻求相互抱成一团，形成一些规模更大的一个县、一个市、甚至一个省的地区性组织，在一方之内竟可以呼风唤雨。过去党内政治生活长期不正常的状况（即使是正常的不同意见，也非要弄得你死我活），使那些有权力欲望的人只能走这条路，谁也不肯、也不敢甘居下风。

讲到群众组织和造反派的问题，笔者认为，对十年文革的社会动荡过程不能一概而论。实际上文革中的斗争是有多个不同的层面，比如，一个是毛泽东与他要打倒的“走资派”之间的斗争，一个是受体制压抑的群体趁机起来反抗当权派及其支持者的斗争。上面的那个层次，毛泽东始终占据上风，赢得了胜利；而下面的层次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是当权派及其支持者在经过激烈斗争，甚至数次反复，付出巨大代价后，获得了最后胜利。虽然在这过程中，有不少当权者受了罪。这就可以解释，到文革后期还没等结束，虽然四人帮一伙还能身居高位，而各地当初的造反派大多却已打入另册。因此，不能简单地把造反派与极左派划等号。

本书的这个看法，并不等同于海外学者中有一种“两种‘文革’”的说法。所谓“两种‘文革’”的说法，就是把上面讲的第二个层次的斗争，说成是“文革”中的又一个“文革”，是人民群众起来造“官僚集团”反的“文革”，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这儿所讲的第二个层次的斗争，始终不是“文革”的主流，甚至并没有形成一种单独的潮流。这些起来斗争的群众，不仅还是打着极左的旗号，而且总的来说，还是在极左势力的控制和影响之下，为极左势力所利用和服务，最后，有的直接成了极左势力的鹰犬，而多数则被压制。有的虽有觉悟，也已晚了，成了这场左倾狂潮的牺牲品。他们的表现虽有不同，但都是整个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两种‘文革’”的说法，近来被有些企图煽动再次“文革”的人所利用。他们装着否定党内高层的“文革”，而鼓吹再用第二种“文革”的办法来冲击和惩治当前的“官僚集团”，这是十分错误，也是十分有害和危险的。

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现在似乎名声不大好。谁要是嗓门大点，就要被讥讽为造反派的脾气。其实，这个群体，它的组成也是很复杂的。大体有这样一些人在里面：

原有体制下受到压抑，起而反抗的人；

听从领袖号召，造反有理，真心实意投身革命的人；

经验老道，看见有机可乘，想要重新洗牌的人；

流氓本性，好打好杀，想毫无顾忌痛快一番的人；

本无身份地位，红五类不要，别无选择；

因为各种原因，前期受到冲击，对单位领导或保守派有纠结；等等。

造反派的人，也不是在整个运动中都一成不变。他们的认识、心态、行为，随着事态的变化、遭遇的不同，也会有多种改变。

有新参加进来的：明白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图，反戈一击，来了；有看到造反派一度得势，重新站队，来了；迫不得已，表态支持；等等。

更有离开这山头出去的：看透了极左势力，知道上当，走了；多数情况下，造反派处于劣势，趁早弃船而去，走了；迫于压力，投降了（此处无贬义。在有些地区，投降也不行，照样屠杀）；等等。

最后，绝大多数造反派被压制，不少骨干成员（此处也不表明褒贬）遭到沉重打击，甚至镇压。造反派中也还有个别勇敢者，起而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极左势力而惨遭杀害。虽然他们当时看问题没有像现在这样完整和准确，但也足够我们深思。

这儿举个江西李九莲的例子。她是江西赣州人，1946年生，三岁就当童养媳，解放后才回了家。她学习刻苦，勤于钻研，是学校团委宣传部长、学生会的学习部长。文革初，她满腔热情地响应号召、投入运动、参加造反，是赣州三中造反兵团副团长，全省学习毛著积极分子。1967年夏，当地一场武斗死了168人。她在收尸时思想有了剧变，开始质疑文革、质疑林彪，却被她在部队的男友出卖。1969年被捕。林彪死后，于1972年获释。出狱后，为能彻底平反，她多次活动。在派性干扰下，1974年再次被捕。1976年文革结束，她在狱中无法获得准确认识又质疑华国锋。于1977年12月14日处死。临刑时，被竹签穿过下颚和舌头，再用毛巾堵嘴。死后，抛尸荒野，竟被歹徒奸尸。

1980年，在胡耀邦的直接过问之下，李九莲得以平反。（具体事例，请见《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戴煌，新华出版社，1998年）

《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有篇韩钢先生写的《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文章在为华国锋政绩作了全面辩护之后，说他“最大的错误”是延续了“恶毒攻击罪”。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以“反革命罪”处死了44人，其中李九莲就是典型案例之一。本书提到李九莲，与华国锋问题无关，只是想说明一个如此单纯执着的追随革命造反的年轻人最后的悲惨下场。

文革期间，两派各自扮演的角色和应承担的责任，各地很不一样，本书无法加以详尽叙述。应该说，两派都有害人者，两派都有受害者。两派中都有极端分子，两派都不过是被极左势力玩弄于股掌的工具。仅仅一、两年之后，也都被扣上各种帽子，比如“五一六”分子，被相继抛弃。当然，两派组织中的大部分群众是无辜的，也是无罪的，更是可怜的。

要说极左，两派都受极左的影响，两派中都有极端分子。倒下的人中有极左的，也有不是极左的；没倒下的，也是有极左、有不是极左的。但最后命运的改变，不是因为他造反，也不是因为他极左，而是没有抢到权。由此可知，处于文革中不同层次、不同阶段、不同矛盾之中的不同的人对文革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

有这样一种说法，这两派都好不到哪儿去。说“造反派”不过是想当奴隶都当不上的人（比如：出身不好、知识分子、受单位领导压制等）在争取当奴隶，而“保守派”则是通过维护单位领导来保住自己可怜的奴隶地位。本书在此无意对文革中派性组织的始末作全面论述，也无意对这种说法作出评价。我们对文革很多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甚至可以说在有些方面还没开始。

龙头镇、西北村的群众组织，随着运动的进展，也纷纷出现，并开始了愈演愈烈的相互争夺。最早是中学里秦有理领头的“红卫兵”和肖胜利领头的“东方红”。村里面，秦德才的“贫下中农造反大队”，虽然没有正式地宣布成立，也没有自己的章程、机构，但也算是个群众组织吧。不过，秦德才冲击公社大院的做法，却给西北村带来了人人自危的巨大震动。

20.2“红海洋”战斗队

西北村“红海洋”的成立，应该说，是在更早一些。

毛主席、党中央着力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和措施，不但鼓舞着青年学生，在农民群众、尤其是在青年农民中也引起了反响。

西北村的几个年轻人，正在大队部办公室碰头商议，也不是正式通知开团支部会，有好些事看不透、想不通，大家在一起议议。

彭小宾虽然一直没有接过团支书的职务，不过西北村的年轻人还是把他当成他们的领头人看。彭小宾这个人物，尤其在农村，确实不一般。他的父亲大队会计彭乐宾，一生为公、行事谨慎、低调做人，却还是在社教运动中被秦德才打死，还说是“畏罪自杀”。这对于彭小宾不能不留下极大的伤痕。如果是别人，决不会咽下这口气，恐怕这一生也愤恨难平，或怒目相视、公开叫骂，或磨刀嚯嚯、伺机报复，非要寻机报这杀父之仇不可。但是，彭小宾不是这样的人。他不是无动于衷，而是看得更远。他看到了，杀他父亲的，决不是秦德才一个人，秦德才算个什么东西？秦所以敢于这么做，甚至到现在一点伪装都不用，直接就去杀了包金贵，这里面肯定是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彭小宾学历不多而学识不少，职位不高而水平不低。在农村乡间，是个少有的人物。他虽然还想不到体制、机制这些概念，但他的思路已经靠近这一点了。他在想，这西北村，这龙头镇，这中国农村，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出了个什么必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解决他父亲的问题，才能解决秦德才的问题，也才能解决他自己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他还没有想清楚，也没法和别人讨论。但是，他在想。

汹涌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他更多地想到了这些问题。文化大革命所讲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难道真的要解决自己所想到的这些问题？他不能肯定，但觉得很有可能。文化大革命，恐怕值得去追随。要改变社会中的一些阴暗面，改变那些根本配不上是社会主义的阴暗面，只能这样去做了。

他在对年青的朋友们说：“虽然好多事，我们不明白、不理解，但是我想党中央既然号召搞文化大革命，那就是对的。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党内领导也出了修正主义，所以不反修防修是不行的。有的群众，在行为上可能是过了火，但是要看到整个运动的大方向，是对的。我们要正确理解。”

衣春玲看来也是肯动脑筋、想问题的，她很赞成彭小宾的话，接着说：“现在形势很复杂，公社和大队都停止工作了，党组织、团组织也不活动了。我们还能聚在一起，是挺不容易的。我们也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要注意不要上一些坏人的当，不去做不符合政策的事情。”

“对，对，”大家议论了一番。

“那我们怎么做呢？现在兴那个‘造反’，像秦德才那样也叫造反么？”皮高深问。

“虽然我赞成党中央的号召，觉得造反有理，但决不是秦德才的那种造反。”齐成才说。他是西北村唯一戴着眼镜的，看上去颇有书卷气，看起来挺有头脑，是属于很认真地参加革命运动的那种人。

“是的，我们也要参加革命运动。但是现在团中央也停摆了，团组织已经不活动了。咱们要活动就换个名称，叫战斗队，是革命群众组织。眼下文化大革命就兴这个，怎么样？自愿参加。”彭小宾说。

“好，我看他们中学生能当个红卫兵什么，挺有意思的，我们也可以组织起来。哪叫个什么名字呢？”皮平平说。皮平平是皮高深的妹妹，是个很温和善良的女孩子，平常都很少出来。连这样的女孩都能对文化大革命有了兴趣，可见革命的号召力。

“取什么名字？咱们靠着大海，我看就叫‘红海洋’战斗队吧。”衣春玲说。

“行，那就叫‘红海洋’吧。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文化大革命。同时稳定咱西北村的局面，不要激化矛盾，不要出大事。”彭小宾说。

“好，好。”

“我能参加么？”周新春在一边轻轻地问着。小周还没入团，所以也很少参加他们团员的活动。但是他在想，也想参加革命活动，也想知道这就在身边的热火朝天的文化大革命倒底是怎么回事。

“欢迎欢迎，每一个想要革命的同志都可以参加。”彭小宾说。

就这样，以西北村团支部为主体的龙头镇第一个农村革命群众组织“红海洋”战斗队成立了。

（说明一点，1967、68年间，不少地方为表示革命激情和对伟大领袖的热爱崇敬，在街道两旁、院里院外到处都刷上以红色为底的语录和领袖像，放眼望去一片通红。这个现象，被称之为“红海洋”。与此处所讲的群众组织、战斗队的名称，有联系但不一样。）

衣春玲看着平平，像是想起了什么，问皮高深：“你家珊珊怎么也不退团，也不参加团日活动？”皮珊珊是皮高深的姐姐。

彭小宾说了：“以前就这样，现在更不用来了。”

“嗨，她这人怪了。”皮高深摇摇头，开始说起他的姐姐来，“她这人，说起来，也挺积极，很关心国家大事，听广播看报纸，比我们还认真。在家里老是说要参加文化大革命，要斗私批修。思想觉悟高得不得了，对我们谁也看不上，一个个都要受她批判。说我爸是自私自利、小农意识，说我妹没有远大理想、就知道眼前一小点。”

“那说你什么啦？”衣春玲听得挺有趣，还要追问。

“说我？她不敢说我，呵呵，我是刚吵了架出来的。”皮高深笑着说。

彭小宾就说：“她要是在家闷得慌，就过来和我们一起活动吧。”

皮高深说：“她是谁也看不上，就是在家里自己看自己不错。”

衣春玲说：“她怎么成这样了？以前不是这样的。”

皮高深俏皮地说：“就是当老姑娘当的。女孩子大了，心态就变了。”

“去你个头！”衣春玲不愿意听了，伸出巴掌，扬了过去，“这跟女孩子大了有什么关系？”

皮高深忙嘻皮笑脸地赔不是：“没关系，没关系。”

彭小宾也开怀地笑了。

停了回儿，彭小宾说：“再讨论个正经的事。”

衣春玲问：“什么事？”

“就是秦德才他们杀人的事。”彭小宾很认真得说。

衣春玲一听，脸也沉了下来，着急地说：“这可是个大事情，不是闹着玩的。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地痞胡闹，他们那样做完全是背离了斗争大方向，是犯罪！”

“是啊，那样搞下去，就太危险了。不用等资本主义复辟，法西斯就先上台了。”彭小宾说。

“那我们先把秦德才抓起来惩办，让大家知道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不允许他们胡闹，”皮高深说。别看他做事三心两意，不肯真出力，不过有时也爱激动。

“不能啊，我们要去抓秦德才，肯定要打起来，事情就更复杂了。”彭小宾说。

“那我们还是用我们的办法：拿起笔做刀枪，到街上去刷标语，让大家知道我们真正的造反派的观点。”衣春玲说。

“好，”他们几个就行动了起来。

傍晚的时候，西街、北街都贴上了一幅幅醒目的大标语。

“要文斗不要武斗！”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方向！”

落款都是“红海洋战斗队”。

秦德才跑了出来，看见彭小宾几个在刷这些标语，有点看不明白，挺不高兴地问着：“你们写这些是什么意思啊？是在说我们不讲政策啊？”

彭小宾反唇相讥：“你还讲政策啊？”

秦德才眼一瞪：“你敢污蔑我们革命造反派啊？”

彭小宾毫不退让：“你是革命造反派？我们才是革命造反派！”

“你他妈的，看我揍你！”秦德才两话不说，拿起铁棍，又要动武。

衣春玲一看不好，一下子跳了进来，挡在秦德才的面前，大声喝道：“有理讲理，不许动手！”

那个大义凛然的样子，秦德才不由得被镇住了，顿时矮了半截，放下了铁棍，嘴里嗫嚅着：“你，你，你算是什么？”

“我也是革命造反派，就只许你是啊？”衣春玲挺立地站着，横眉冷对，那个勇敢，那个威严，使秦德才这种人都得退让三步。

秦德才吐了口唾沫，转身走了。

衣春玲兴奋之余又带着他们几个唱起了语录歌：

“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

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

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四周看光景的乡亲们对衣春玲、彭小宾们有叫好的，称赞的，能把秦德才都吓退了回去；也有不解的，“怎么衣春玲这样的闺女，也去当了造反派，这是中了哪门子邪？”

这是“红海洋战斗队”的首次出动，旗开得胜。

20.3“红太阳”战斗队

秦德才的乱杀人事件震惊了西北村的每一个人，公安部门居然还不去管。

杜家骏回到村里，鲁队长、平金刚他们还没散，还堵在胡同口，怕再有什么事。

杜家骏跟他们一说，平金刚第一个就气得脸都发白了。捏紧了拳头，直往墙上打。“这样下去还了得吗？谁知道他们会再去杀谁？说不定杀到咱们头上来呢？”

于又发小伙子在边上，因为学校里没什么更多的事，也就经常回村里来了。对秦德才杀人的事，他特别激愤，说：“他能拿起铁棍，咱也能拿铁棍。不等他下手，咱先宰了他。”

鲁队长说：“别，别，宰了可不行，早晚还是有法律的。但是拿起铁棍是可以的。”

“对，他们能成立造反队、战斗队，咱也能成立。彭小宾他们小青年成立了一个，咱们也成立一个。”杜家骏说。

鲁队长问于又发：“你怎么没去‘红海洋’呢？你们年轻人在一起么。”

“我，我……”于又发自己也没想到这个问题，便胡诌了一句，“他，他们，彭小宾和春玲俩挺好，我去干吗？”

大家哄堂大笑，这些天来难得有的大笑。

“呵，呵，呵……”鲁队长笑得合不拢嘴，好不容易才说：“他们叫‘红海洋’，好。那咱就叫‘红太阳’，海洋和太阳还是在一起。”鲁队长说。

“对，太阳还在海洋之上呢。”于又发说。

“成立个也好。党团组织都瘫痪了，有个战斗队也好。有个什么事好召集。我就不出面了，我还是个当权派呢，你们是革命群众组织。没有我，你们更方便。”杜家骏说。

“也对，我也不出面了。平金刚，你来当队长吧。”鲁队长说。鲁队长后来连“红太阳”的一些公开活动也没去参加，这也为“红太阳”后来的其他一些事留了些后路。

平金刚想了想说：“好，我当就我当。还怕那些驴操蛋不成？”

杜家骏对平金刚说：“你们第一件事，先把李辰两口子押到肖胜利那儿，他们在村里住有危险。鲁队长你先去趟中学，跟肖胜利说说，看是不是可以。”

一个多小时后，鲁队长回来了，说肖胜利那儿已经准备好了。

平金刚就带了三、四个人，拿上铁棍、尖杈、钉耙，来到李辰家。

李辰家紧闭着院门、房门，喊了好一阵，林海秀听清了是平金刚，才出来开门，脸色紧张得很。

平金刚对他俩如此这般说了下。他们想想也对。虽然去中学里住，跟秦有理他们在一个院里，只隔了一道临时挡起的篱笆。但毕竟是和几十个“东方红”的人在一起，比孤零零地住在家里要强多了。住在自己屋里，一旦有事，别人都来不及帮忙。

于是，李辰两口被平金刚几个“押着”去了“东方红”的地块。

他俩口的心里非常感激西北村的乡亲，在这种非常时刻以这种非常方式来保护他们。

跟“红海洋”不一样的是，“红太阳”在西北村、在龙头镇不但公开地打出了旗号，而且还在大队部（现在也是“红太阳”的队部）张贴告示，招兵买马，扩大队伍。引得村里人都过来打听是怎么回事，能不能参加。

这天，皮安己和迟一敬在大队部碰到了一起。

皮家和迟家虽然都是西北村的中农，政治上都没有优势，可皮安己总喜欢和迟家比一比，总觉得自己要比迟家高一等。不但迟得法活的时候比自己窝囊，而且现在迟家更是一年不如一年，跟自己家的景况越差越大。

迟一敬在村里是个边缘人物，想想自己老爹勤勤恳恳，从不惹事，从不坑人，可还是多次遭受不应有的打击，结果还在困难时期饿死。不但老爹老妈饿死了，自己老婆两年后也死了，虽然不能说就是饿死的，但那也是和大跃进干重活得下了痼病又加上大饥荒直接有关的。可是，村里和公社从没担过什么责任，连句安慰话也没有。几年来，他觉得憋气得慌，甚至有点恨，又不敢说。村里的事，也就什么也不想掺和。社教时，于村长这些人受到冲击，自己觉得稍微好受些，可是时间不长，就过去了。这次文化大革命，跟自己也没什么关系。不过看到宗发奋这些干部也有被批斗的时候，心里就难得地爽快了一会儿。可是领着斗的人，是秦德才这些，又觉得不爽了。什么时候有好人起来斗坏干部呢？听说村里平金刚他们搞起了“红太阳”，所以，过来看看。不想遇上了皮安己。

迟一敬对皮安己没什么话可说，本来自己走进屋子也就算了。可皮安己这个人对别人唯唯诺诺，见到迟一敬却觉得自己人也高了，腰也直了，说起话来也硬气了。而且皮安己觉得自己比迟一敬还长一辈呢，这迟一敬居然没先跟自己打个招呼。

皮安己等了五秒钟，看迟一敬还是没有打个招呼的意思，便话里有话地说：“你也来革命啊？”

“你能来革命，我就不能来革命啊？”迟一敬也没有什么好气。

皮安己一听，怎么对自己一点恭敬也没有，自己怎么也是他的长辈啊，就不高兴了：“你也能革命？”皮安己也真是。有些人就喜欢管一些自以为能管得起来，其实根本不需要他管的事。

“我能不能革命，关你什么事啊？”迟一敬从来没有顶过别人，这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皮安己虽然也受过不知多少次的冲击、批斗，早就学会了逆来顺受，可这一次迟一敬的顶嘴，却使他接受不了，尽管院子里才不过两三个人看见。

“你，你，你……从来就不革命。那年你爹死了，你竟然把他埋在烈士身边。对革命烈士多么不尊敬啊。”皮安己一时想不起别的话，就把这事说了出来。

迟一敬一听皮安己提起了这件最使他伤心的事，便愤怒了起来：“你他妈的，你那天还在烈士墓的坟头上拉屎呢，算个什么东西，丧良心啊！”迟一敬还是第一次骂人呢，但一骂就骂得重了点。这样的老实人，不会掌握这些分寸。

“你，你，你……天天躲在家里。我不相信你会革命。”皮安己站在大队部的门口跳了起来。

“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挡在这儿就能挡住别人革命啦？老子上哪儿还不能革命啊？”迟一敬也不会多说话，扭头就走。别人谁也想不到，他反过头去参加秦德才的“造反队”了，尽管这不是他的本意。

不知谁讲了一句：“咳，你们两个都是中农，吵什么呀？”

皮安己这才回过神来，两个都是中农，连革命资格都没有，吵什么呀。

西北村也有三个群众组织了，他们之间该打起来了吧？他们还没打起来，在他们之外，还有一股更大的力量，在龙头镇掀起了一个大浪。怎么回事？请看下一章“反夺权”。

第二十一章 反夺权

1960年1月21日

21.1 于村长的动作

于村长，于继承，他也在反复地想。“革命”，迫使他在日夜思索，不过不是作为农民应该想的怎样去播种、收获，而是在想怎么在残酷的斗争中生存，去夺取胜利。不是争取，而是夺取。他怎么能不想呢，革命了几十年，为了西北村，自己可以说是尽心尽力。可是那有什么用？社教运动时，不是一样被打倒在地，一样被秦德才这种无赖欺侮。真的是不能不问政治啊，那怕是在农村的茅屋里。

他在想，秦德才这种无赖能占据公社大院，坐上了书记的办公椅，凭什么？居然还没人去管。什么是变天，这就是变天。还用地主富农来变天吗？流氓地痞变天更歹毒。他秦德才坐，我于继承就不能坐？对了，去抢回来。于村长并不是要抢公社书记当，而是要把抢了位置的秦德才赶下来，是另一种造反，造“造反”的反。于村长也不懂得“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古文，更不知道后来有“反夺权”的名词。他就是要将秦德才赶下来，龙头镇、西北村决不能交给这种人。

找谁一起干呢？他有儿子、孙子，叫上他们，那是最自然的了。杜家骏身边倒是有一批人，还取了个名字，叫“红太阳”。但他不愿意找杜家骏，他总觉得社教运动里杜家骏太软弱，甚至是有滑头。这个气，他还没有消。他把西北村的人，理了一遍，也能找上几个人。

果然也有一些，愿意响应于村长的。比如邬中和，他既对宗发奋那样的老当权派有意见，更看不惯秦德才这些造反派。他从部队复员回来，本来什么也不想管，活动圈子很小，干完活就回家。什么人也不想多见，什么话也不想多说。可是，这事态的发展，逼着他去看，去想，去说，去管。再不说，再不管，真的就“变天”啦，地痞流氓就“变天”啦。再这样下去，他想有块安静的立足之地也没有啦，不干也不行啦。于是，于村长一发话，他就跟着干。谁都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一场不小的雪，停了。天放晴了，湛蓝湛蓝的。

那是1967年初，快过春节了。这一年国务院通知了春节不放假，所以革命也没有停下来。

早饭后，于村长就领了七、八个人，没有名字，没有旗帜，更没有成立和誓师大会，一声号令，手持木棍，就冲进了公社大院。

他们高喊的口号是：“不许包庇走资派宗发奋！”

“把宗发奋交给革命群众批斗！”

他们喊出这个口号也是经过考虑的，比较策略，不是针对造反派，更不是针对文化大革命，走资派谁都可以批。真打起来，也占理。

造反派（他们的简称叫“造委会”或“贫造会”，反正也没有什么标准的叫法）这边没料到还会有人冲击公社、冲击他们的事。门口和平常一样敞开着，没有任何防备。大门口的人，见一伙人拿着木棍冲进来，也就散开了。

公社干部们除了少数短时间回家之外，大都还在。因为还要等着领每个月的工资，虽然只有三、四十元，但这是他们（包括他们的妻子儿女）唯一的生活来源，所以尽管形势险恶，他们也得硬着头皮顶着。

在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里，工薪人员都有一个单位。这个单位对他来说，不只是意味着工资，还牵涉到户口、住房、医疗、福利，连以后的退休金，甚至包括子女安排等等你能在社会上立足的几乎所有方面。失去单位，就失去了这一切，连回乡当农民都不行，因为没有当地的户口。而且这个所在单位还极难变动，以至于那时有大量的夫妻长年异地分居而无法调动，直到退休才能聚到一起。甚至红极一时、操纵了别人生杀大权的造反派也不能把自己转为非农业人口，也不能给自己提高一分钱工资。这种管理体制造成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即使是文化大革命这样大的动乱，也没有使社会崩塌，但也使无数的普通群众无处躲避。

公社干部们远远地躲开看着。

于村长冲进原先宗书记的办公室，秦德才没在，就把窗户砸了个稀烂，碎玻璃掉了一地。运动以来，这玻璃窗已经碎了好几回了，那年头，玻璃厂的生产大概很红火（还有造纸厂、墨水厂、油漆厂这些）。

于村长原来是个很沉稳的人，社教运动中无端被打击的怒火在他心中始终不息，他要找秦德才算帐，也要找宗发奋算帐，今天这两人一个也没在。他虽已年近六十，却手持木棍，瞪着布满了血丝的红眼，像一头被彻底激怒了的公牛，四下张望着可以攻击的对象。

窗外，“嗷嗷”地响起了人声，储小二领着造反派围了上来。

于村长居然一反常态，毫不畏惧地迎面冲出屋去。

储小二见于村长那边没几个人，也一时性起，回头向同伙一招手，学着电影里的人物喊一声：“弟兄们，给我上！”

双方就干上了。

于村长看见储小二，就想起惨死的彭会计、想起包金贵，血涌心头，分外眼红，那布满血丝的眼睛瞪得竟像铜铃似的大，抡起手中的长木棍朝储小二的铁棍打去。

只听“咔嚓”一声，木棍不经打，一下子断了，大家正为于村长捏一把汗。说时迟那时快，看那储小二却立定不动。他看到的不是木棍断了，而是于村长那血红的大眼，在他储小二的眼里变成了包金贵的血

红大眼。啊呀，怎么是包金贵站在这儿？他的头皮突然竖了起来，跳起来大叫：“有鬼啊，有鬼啊！”竟然向后逃跑去了。

他带的那帮人自然也就稀里哗啦地向后退去。

于村长还来劲了，挥舞着那半截棍，直喊：“打这些王八羔子，打这些王八羔子！”

正在于村长以为自己要大获全胜的时候，大院外的西街上有了大队人马的声音，秦有理领着中学上百号的红卫兵赶来了。

“嗷嗷”一片喊杀声，从街上涌进大院门口。

这么一大帮穿着旧军装、戴着红袖章、举着各色棍棒的红卫兵，很快就冲到了大院里。

邬中和始终在于村长的身边，这时问：“看来他们的大队人马来了，怎么办？”

“冲出去！”于村长说。

“不可以往外冲，正好和他们迎面相撞。他们人多，咱们要吃亏。我们从后面翻墙走。”

“好！”

于村长等迅速撤向后墙，借着一个砖砌的垃圾箱，那边侧的半截砖垛，翻了出去。

邬中和站在最后，把于村长托了上去，翻过了墙。

秦德才也从后面赶了上来，已经跑到墙边。穿着旧军装的红卫兵们嗷嗷地叫着，眼看要围了上来。

那邬中和，曾经是一个解放军的连长，大吼一声，抡起木棍往下扫去，吓得那些红卫兵直往后退。

这时邬中和一个箭步，蹬着墙下的砖垛，翻了过去。

秦德才和秦有理眼睁睁地看着于村长他们一个个地翻墙而去，跳着叫骂，叫红卫兵们赶紧出院子绕过去追赶。

等秦有理带着红卫兵，返身跑出大院从西街上再要进西北村时，平金刚领着“红太阳”的人马，手持长棍，已经把胡同口封住了。

这么窄的胡同，这么些人挡着，秦有理知道是冲不过去的，也骂骂咧咧地转身走了。

于村长知道，这次是杜家骏、平金刚的“红太阳”解了他的围，心里很是感激。

于村长清点了一下自己的人马，还好，没有大碍。邬中和破了点皮，擦点红药水就行了。

这次反夺权，就这样无功而返。按理说，在于村长面前，秦家父子算什么东西，大吼一声就能喝住了。可还是败落而回。因为这不是两个人之间的较量，而是更大背景之下的政治势力间的较量。或许于村长还不能完全看清这一点，然而，这种较量会更加激烈地进行下去。

21.2 秦德才的对策

秦德才被于村长这么一搅，虽然没有大的损失，最多宗发奋的办公室不住了，住到纪社长的办公室，但总是心神不宁。他的墙外，就是西北村。西北村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冲进来抓了他，杀了他。

西北村不服他的人多啦，不只是于继承，从鲁来福、平金刚，到邬中和、彭小宾，连那个小丫头衣春玲也不服他。不但西北村的不服他，连本公社别的大队的造反派也没几个服他。他杀了包金贵一家，虽然政府没有力量管他，但留下了恶名，有人怕他、躲他，更多的人在恨他。

找谁商量这事呢？那只有自己的儿子。他儿子有文化，有本事，又是红卫兵的头，就他爷俩就能把龙头镇镇住。全公社也再没有这样有本事的一对父子了。想到这儿，秦德才又乐了。

他跟秦有理一商量，还真想出了几条办法：一是红卫兵的主要兵力进驻公社大院和陶家大院。既保护了秦德才和造反派的安全，又扩大声势。红卫兵还偏在东门外中学的一角，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

二是释放被看管的走资派。现在造反派面对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跟走资派过不去，而是来自别的群众组织的威胁。而且红卫兵也没有粮食给走资派他们吃，这也是个实际问题。更何况还可以向他们招安，争取有几个领导干部投向造反派，岂不又壮大了队伍。

秦德才跟纪社长谈了话。秦德才的心里那个高兴呀。曾几何时，他还是别人眼里的一条狗，现在可以以领导的身份，倒过来找公社社长谈话了，而且还可以决定他的去留，决定他的命运，心里那个爽啊。

但谈话的结果，并不随心所愿。纪社长淡淡地说，要是放他出去，就回家去看看，这些日子，觉得身体也不行，想休息几天。

“那你就走吧。”秦德才心里不快，站起来就走。

跟宗发奋谈话，秦德才心里就复杂了。看着这个看起来挺精明的中年人，当初不可一世的党委书记，如今也乖乖地落到了自己手里。尤其他老婆，嘿嘿，他老婆也被我用过了，嘻嘻，心里不免又乐呵起来。

宗发奋的心情也很复杂，本来是指望着等到运动后期“秋后算账”，把眼前这家伙狠狠地往死里整。可运动的发展不是这样，不但见不到往常运动后期的迹象，而且报纸上、广播里，中央文革还一再号召要支持红卫兵、支持造反派，最近又提出了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革命的发展，真的和以往不一样了，那我还硬扛干什么呢？不如转向造反派，又能少遭罪，说不定还能成了“革命领导干部”，进入新的领导班子。

所以当秦德才说希望他能站出来，支持革命造反派，做全公社领导干部的表率，他强忍着厌恶和愤恨就应下了。不过他看着这秦德才的模样，实在也是够恶心的，料定这小子最后必定没有好下场。我这权当是人在屋檐下，暂且低回头吧。

秦德才看着宗发奋，毗着黄牙笑了。

宗发奋看着秦德才，闭着嘴从鼻子里哼哼出两声，也笑了。

秦家父子想的第三条是，收编彭小宾的“红海洋”战斗队，壮大自己的力量，但这不过是一相情愿。谈判并不理想，彭小宾他们显然不愿意跟秦德才合伙。最后的结果是，双方互不攻击、互不妨碍，在坚持革命大方向的前提下，可以做某些合作。虽然，结果不够理想，但对于秦德才来说，至少也是巩固了后方。而且，彭小宾答应帮助修复公社广播站，双方共用，这对于壮大声势，将是十分有利的。

几天后，彭小宾把公社大院里的广播站修好了。彭小宾干过电工，这个活还是干得下来的。

街上的大喇叭又响了。

广播站里很简单，也就一间房。窗前有二张长桌子，桌上桌下放上了全部的机器。一个立柜，放着书籍、文档，靠门口是一张值班用的小床。

这回王溪当上了播音员。她坐在话筒前，嘴一张：“革命的同志们，革命的同志们！龙头公社革命造反广播站开始广播了！”

虽然王溪的普通话也不标准，自小也在龙头长大，但毕竟还有外来的底子，海源那种特有的地方口音要轻一些。当院子外面电线杆上大喇叭里自己的话音从窗外“嗡嗡”地传进来，她觉得神奇极了，都不敢相信，那是自己的声音吗？自己的声音有这么洪亮、这么好听吗？那个感觉啊，好极了。全身心的喜悦和振奋，人都好像离开地面浮了起来。

秦有理在边上，赞赏地看着她，拍着她的肩膀。

王溪念完一篇短短的宣传稿，便关掉话筒，转成播放革命歌曲。

秦有理用火辣的眼神看着她，把手伸了过来。她觉得心脏在狂跳，热血在奔腾，呼吸急促，脸色潮红。眼看着秦有理靠上来，他手指伸向的每一处皮肤都敏感地刺激着神经，心更跳，更激动，更不能自主。整个身体都觉得在膨胀，眼睛里充满着激情和渴望。她喘着气，闭上了眼……

第二十二章 再夺权

1960年1月22日

22.1 砣码移动

1967年春节后，力量对比好像在向造反派倾斜。

西北村的农民们，祖祖辈辈上山种地、割草养猪的农民们，如今在大革命中，都一反常态地盘算着政治斗争的方略。人们被卷进了各种各样的派别和组织。按照通常说法，有“造反派”和“保皇派”两大派别。造反派，一般认为是自身利益在体制内受到较大损害，要求改变社会地位而起来反对当权派、乃至向当权派夺权的势力；而“保皇派”或者说“保守派”，则是自认为在现有体制内还有几粒可怜的米而想通过维护当权派、从而间接维护自身利益的势力。本书在前面已有说明，本书使用“造反派”与“保皇派”这些词汇时，没有褒贬之分。实际上当时各地群众组织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各不相同。他们的立场、态度、行为，都是十分复杂的。具体到一个单位，往往不是简单的“造反”、“保守”两个词所能概括和区分。

我们看一下西北村：首先以造反派自居的是秦德才，行为极端，对当权派的伤害最大，其实他们从原有体制收益最多。在旧社会，他们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处在社会最底层；新社会里，他们至少也是衣食无忧，可却因为没有进入权力层，依然心有不满，照样发起了最激烈的挑战。彭小宾、衣春玲，打的也是造反派的旗号，他们对这个体制没有过节，只是出于真诚的革命愿望，响应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于继承，没有打任何旗号，其实应该是很认真的造反派；他们为这个体制努力过，但却受到了这个体制的伤害，他们希望这个体制能作出调整和改善，他们也对当权派发起冲击，却痛恨秦德才那一类的造反派。按说受这个体制伤害最大的是李辰、肖福兴、包括已经死了的包金贵这样的，但他们根本没有参加革命的资格，还要受到各派为了表明革命态度或真或假的打击。最应该造反的，却连造反的资格和想法都没有。当然，也有愿意维护原有体制，或者对原有体制也不见得完全满意却不知道除了这个体制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可替代、可改革的办法，这些人的数量最多，比如杜家骏、鲁队长他们。也还有因为多年的动荡而早就害怕了，不想有任何的变动，比如皮安己这些。

以上分析的，不是他们的个人，而是他们这一类型。当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文革中人们行为的类型远不止这些。更何况，这些类型里面，也都是良莠兼备、参差不齐，不能一概而论。本书在这方面不做鉴定和评价，而且西北村有它的某些特殊性。它是公社机关的驻地，村里的造反派就直接指向了公社的当权派，没有一般农村里，本村群众围绕本村当权派、本村利益所发生的争斗，相对来说直接碰撞要少一些。让我们继续看西北村事态的发展。

说力量向造反派有点倾斜，是因为他们这一阵有了两颗新的炮弹。

一是，从上面来了一个文件，说是要保卫社教运动的成果，不许四不清下台干部反攻倒算。这不正是在说于村长吗？于继承冲击公社大院，冲击造反派总部，正是四不清干部还不老实的典型事例。

二是，北京发生了“二月逆流”。说是有几个副总理、老帅大闹怀仁堂，围攻中央文革。中央文革说了，这是右倾势力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势态，要坚决反击。

龙头的造反派，按说还有个重大利好消息。就是，这年的春天开始，借着中央文革反“二月逆流”的势头，本省的造反力量发起了“反复旧”，一时间声势大作，在省一级占据了主要位置。本书的写作有个想法，既想“具体化”，又想“抽象化”。说是“具体化”，就是把西北村、龙头镇的文革过程，写得尽量具体一些，让读者对此有具体印象。尤其是想在几十年、几百年之后，让人们知道当年的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不给以后可能有的人为编造篡改而故意炮制的以讹传讹的假历史、假文革留下空隙。又想“抽象化”，是说本书不准备对某省、某县、某地的文革实际过程进行写真式的描述，不写成纪实，不对当地的具体事件、具体人物进行评价。那样作为文学创作会更主动一些、效果更好一些。更是为了不把哪个人与哪个人的具体矛盾再挑出来，避免去算一些“细账”、纠缠一些个人恩怨，那样社会效果就反而不好，那不是本书的本意。

西北村、龙头镇的文革过程放在全国范围看，既典型又不典型。说它典型，是因为它经历了文革的完整过程，文革的基本现象和基本矛盾都有反映。说它不典型，是就某一具体事件而言，它又不是最激烈、最极端的。比如斗走资派，比如乱杀人，比如武斗，比西北村厉害的情况有的是。如果把那些最激烈、最极端的情况集中在一个村庄，也可以有那种写法，但是作品的可信度、读者的接受度，会有影响。所以，本书对该省该县的一些具体事件未作更多的联系和直接描述。“反复旧”的问题，也就是在这儿提一下。读者也可以和别的省的文革过程相联系，其大意是一致的。

这下，秦德才拍着手说：“中央文革说得太对了。这些话，说的就是咱西北村。于继承这个四不清干部，就是乘着二月逆流，向我们造反派猖狂进攻。一定要彻底清算，坚决打击！”

于是，街上的大喇叭连着白天黑夜地叫：

“坚决揪出四不清干部于继承！”

“于继承是龙头公社右倾复辟的总代表！”

“火烧于继承！油炸于继承！”

22.2 堡垒——粮管所

那么大的音量吵得全龙头镇的人日夜不安。其实，秦德才没有胆量也没有力量真的去抓于继承。但是杜家骏很认真地看待这件事。他觉得这是个很严重、很危险的信号，西北村的文化大革命要进入一个更严酷的阶段。

他带上平金刚，去了于村长家。

于村长正躺在炕上生气，那个大喇叭喊得，耳朵里老是不清静，心里烦得很，又没有别的办法。

“于叔啊，在家那？”杜家骏进了于村长的院子。从社教开始之后的二年来，杜家骏还是第一次进于村长的家。

于村长听是杜家骏来了，心里也很感慨。社教运动开始，是因为受审查、受隔离，才没了往来。社教后期，因为对杜家骏有了看法，心里有了疙瘩，更没了来往。文革来了，斗争这么激烈复杂，谁也不知道谁的心里在想什么，还是没有来往。还是年前自己冲击秦德才没有成功，是杜家骏他们挡住了胡同口，而且直到现在还明里暗里地在胡同里看着，才没让秦德才的黑手伸进来，要不自己的这把骨头恐怕还不知道躺在哪儿呢。到底还是几十年在一起的老兄老弟，可靠啊。

于村长忙下炕，迎上去，拉着杜家骏的手说：“那天亏得你啊。”

杜家骏谦和地一笑，指着边上的平金刚说：“要谢，你得谢金刚他们啊。”

平金刚也客气地说：“我们也就是在那儿一站，没出什么力。到你那天，这么大胆量，把我们佩服得不得了，真的豪气不减当年啊。”

于村长摇摇手，说：“惭愧，惭愧，一时冲动，也没搞成。先进屋，先进屋。”

二人进屋上炕，于村长的儿孙俩也从西屋过来。从安全考虑，他父子俩过来和于村长一起住了。

“这喇叭，天天吵死了！”于村长心烦得一甩手。

“于叔啊，这恐怕还不只是心烦的事。”杜家骏说。

“怎么？他们还敢真动手啊？”于村长横着眉毛说。

“要防这一手。防，总要比不防好。”杜家骏说。

“怎么防？再打出去？”小孙子于又发问。

“打，恐怕真要打，但不是现在。现在，我想于叔你还是出去躲一下。”

“躲？我还从来没躲过，再说能往哪儿躲？”

“我想好了，你先到西门外粮管所去住一阵。我已经跟祖所长说好了。”

于村长想了一会儿，说：“也好，那我就住过去。我在这儿，也给你们添麻烦，你们心里也不安定。”末了，于村长又愤愤地说了句：“就是这喇叭太讨厌。”

“听说那喇叭还是彭小宾给接上的。真奇怪，彭小宾怎么会去给秦德才帮忙？这文化大革命，把人都搞糊涂了。”于又法不解地问，也搞不清他是在说自己糊涂，还是在说彭小宾糊涂。

“不，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杜家骏轻轻一笑，没有多说。

倒是平金刚对于村长表态说：“这你放心。等你住过去了，我们就把这些喇叭都砸了。”

“砸，就别砸了。把线剪掉就行了。”于村长说。

“于叔到这时还想着公社财产啊。”杜家骏笑着说。

这粮管所和祖所长是怎么回事呢？

困难时期后，政府感觉到粮食问题的重要性，逐渐加大了对各地粮库的建设。1965年，在龙头镇西门外建了一个占地六十亩的大粮管所。由于当地不习惯用圆筒仓，建的是几排大跨度钢结构平房粮库；四周是坚固高大的围墙，围墙顶端插着玻璃碎片；大门是厚厚的铁板门，大门上还套了个小铁门。这是当时海源最大的一个粮管所，也是龙头镇自1958年建公社大院以来最大的一个建设项目。

粮库建成后，县里特地安排县粮食局分管政治工作的副局长祖如海过来，兼任所长。因为是常住龙头粮管所，所以副局长一职已成空名。祖如海就是1949年国民党反攻时被还乡团残杀的祖大爷的儿子。他在部队时是营级，提拔得不快，转业到地方按说可以是县局级，甚至副县级也可以，结果弄了个粮食局副局长。县局的副局长，在当时实际是副科级，祖如海没有多说。这回当了粮管所所长，才是股级，祖如海也没有多说。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原因，或许是档案里被写了什么。祖如海也不想去知道，领着妻子到了粮管所安家。

这一年，祖如海工作很认真，新的粮管所很快走上了正轨。同事们也都是新来的，没什么陈谷子烂芝麻的矛盾。祖如海自己觉得粮食工作方面自己是新手，对职工很尊重、很虚心，从征收、统购、征购、超购的基本概念（中国的粮食收购政策很复杂，一般人搞不懂。生产队必须向国家交售的粮食数量叫征购，其中作为农业税无偿交纳的部分叫征收，其余低价收购的叫统购。超过征购任务多交的，按较高价格收购，叫超购。此外还有用议价收的，叫议购），到财务上的成本、费用；从谷物的水分、比重、千粒重到仓库的温度、湿度，一样一样地向职工虚心学习。大家相处的都很融洽。以至于文化大革命兴起，龙头粮管所里却少有的平静如常。什么事也没有闹出来，没有造反的，也没有保皇的。当年文革狂潮中，还少有这种世外桃源式的单位。他自己干脆辞掉了副局长的职务，免得县里面的造反派来找麻烦。

杜家骏过来找他谈让于村长进来躲一躲的事，祖如海觉得挺为难。西北村的张三、李四是什么人，他都知道。他和于村长的交情也不错。社教一结束，于村长心里烦闷，没地方诉苦，就跑到他这儿喝二盅。可是真要他住进来，实际上就是卷进了西北村的风浪，这是他所不愿意的。他还想在这滚滚波涛中留下这片平静的孤岛。

杜家骏反复跟他讲形势的险恶，于村长处境的危险。这时外地的武斗已多有耳闻，有的地方已从棍棒对峙发展到了开枪扫射。海源县里也发生了几起刀枪相拼的事件。照这趋势，龙头镇早晚也是难免，要早做准备。

杜家骏说：“与其让恶势力嚣张，被恶势力淹没，你这个孤岛不如成为一个碉堡。龙头镇才有希望，才能少死一些好人。”

祖如海本是一个疾恶如仇、刚正不阿的人，听了这些话，他站了起来，很认真地说：“好吧，我站在你这一边。西北村的事就是我的事，尽管跟我说。”

杜家骏沉吟了一会儿。

“还有什么为难的事吗？”祖如海问。

“还有那个李辰，你知道的吧？住在中学里面，和秦有理那帮红卫兵在一个院里，也不安全。我是天天替他们捏把汗。”

“我知道，李老师是个好人，是我们的政策有偏差，伤害了好人。来吧，一起到这儿来吧。但是要悄悄地，不能让外人知道。就像赵玫走了，谁也不知道去了哪儿一样。保密工作做得越好，他们就越安全。”那时，西北村的人谁也不知道，赵玫已经在南疆的荒漠里香消玉陨。

几天之后，神不知鬼不觉，于村长自己一个人住进了粮管所。而李辰、林海秀最后是转移到了赵村，住在赵刊新在土改中分到的小地主赵炎黄的那间屋子。赵村和西北村不一样，人心比较齐，几乎是清一色的保皇派。李辰住那儿，别人想不到，也比较安全。也是因为杜家骏后来考虑，事情万一泄露，叫粮管所背上“保护右派”的名声不好，保留住粮管所作为他们这派的堡垒更为重要。以后的事实表明，杜家骏的这个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当然，这也是和赵村的书记赵刊新一腔正义、敢于揽下这个事有关。

后来的几天，祖所长把肖校长和回龙头后已无处可住的纪社长也接到了粮管所。

22.3牛刀小试

秦德才的三点对策，没能使他们的处境稳定多长时间。

日夜烦人的大喇叭，使杜家骏这边下决心除掉它。

“红太阳”战斗队建立了专门的“行动队”，也是一色的旧军装，人手一根一人高的铁棍。邬中和也参加了进来，并且当了行动队的队长。

这天中午，太阳明晃晃的。

西街上，从西北村一边的胡同里突然涌出了身着军装、手持铁棍的十几个人的队伍。那是平金刚、邬中和他们带领的“红太阳”行动队。他们先围着一个电线杆，于又发一声“我上”，便很利索地爬了上去，可是比当初打麻雀时爬白果树要麻利多了。他拿出插在身后的大铁剪，“卡嚓”剪断了电线，再用扳手扭松紧固的螺丝，三下两下就把一个喇叭拆了下来，“嘭”地扔到了地上。行动队的人一阵欢呼。

他们又上了另一个装有大喇叭的电线杆，又一个喇叭被扔了下来。周围看的人更多了，欢呼声更大了。

“哟，造反派出来了！”乡亲们又惊叫起来。

只见从公社大院里冲出二、三十人，也是身着军装、手持铁棍的打扮，为首的是储小二、孙二赖。他们仗着人多，“嗷嗷”地喊着：“打倒保皇派！”“消灭保皇派！”冲了过来。

“红太阳”的人还没经过这种阵势，往后退缩了。把爬在电线杆上的于又发闪在了双方的中间。

储小二指着杆子上的于又发，叫喊着：“抓住这个走资派的孝子贤孙！弟兄们，冲啊！”

造反派们又“呼啦”地向前，到了电线杆的底下。眼看于又发要落到造反派的手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郭中和抡起铁棍，大喊：“看谁打得过谁！”朝着造反派们就扫了过去。

“铛”的一声，储小二手里的铁棍一下子就被打落在地，吓得他“嗷”的一声就往回钻，好在这回没犯病，大概是来不及犯了。

“红太阳”这边的人步步推进，造反派们退到了公社的门口。

平金刚摆摆手，示意不要再追了，杜家骏事前交代了尽量不要直接接触。他也明白，一旦打起来，局面就很难控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

于又发跳了下来，还不解气，捡起地上的石块就去砸公社门口的那个喇叭。那一边的人，又扔过来。一时间砖石纷飞，双方互扔了十几分钟后，喇叭也不响了，就都收兵回去了。

当晚，在大队部，“红太阳”开了一个骨干会。

杜家骏坐在那儿，浓眉大眼，目光炯炯，文革还不到一年，把这个庄稼汉锻炼成了近乎成熟的政治斗争指挥员，既坚决又稳重。

“我在想，光砸几个喇叭还解决不了问题。严重的问题是，叫他们这么一搅，春耕春种都耽误了。不要忘了，我们是农民，吃饭要靠我们自己种的。难道还要像60、61年困难时期那样，吃不上饭，饿死人吗。一定要把他们赶走，先安定下来，再赶紧种粮。”

“是哎，是哎，听说外面好多地方铁路线都断了，火车都不通了。到时候，想要粮都运不来了。”于又发知道外面的情况多。

杜家骏接着说：“我就想捣它的老窝，把他们撵出公社大院。这样，我们西北村和整个龙头公社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就会彻底转变。你们看，行不行？”

“对，对，冲进去，打他个落花流水。”平金刚紧握着拳，今天的胜利使他很解气。

“不，咱们不要正面冲进去，那样对方没地方逃，只能跟我们死拼，那样代价就大了。我们的目的，只要把他们赶走。上次于村长从公社的后墙出来，给了我启发，咱们就从后墙进去，逼他们从前门逃走。我们尽量用最小的代价达到目的，力争不死人。”看来杜家骏已经考虑得很细了。

“还有，争取‘东方红公社’跟我们配合。”于又发说。

“好。你回中学去跟肖胜利商量，那天请他们搞点动静出来，吸引住中学的红卫兵，我们这儿的压力就小了。”

“行，我明天一早就过去。”

22.4夺回大院

行动的这天到了。

按照约定，这天一早，在中学院子里，肖胜利的“东方红”这帮红卫兵，踊到与“红卫兵”总部相隔的玉米秸篱笆边，吼叫着：“假造反，滚出去！我们才是真革命！”“假造反，滚出去！我们才是真革命！”又用木棍铁棒或相互敲打、或伸出去击打篱笆。弄得秦有理这边的红卫兵一时摸不着头脑，赶忙紧急集合，排在篱笆的那一边，对峙着准备迎战。

秦有理立即派人去公社大院，叫他老爹赶忙派人来增援。秦德才反应还真快，听说“东方红”要拿下“红卫兵”总部，这还了得。不到半小时，住在公社的红卫兵，再加上十几个农民造反派，就一口气也不歇地跑进了中学。

平金刚正趴在公社大院后墙外的屋顶上，脑袋刚露出屋脊，看着院子里那帮人急急忙忙地走了。这一边，“红太阳”行动队的人，都蹲在公社后墙下的胡同里。郭中和在眼看着房顶上的平金刚，看他做什么手势。

十分钟过去了。

二十分钟过去了。

公社大院里又安静下来了。

大街上也听不到什么动静了。

时候到了。屋顶上的平金刚站起身来，大叫一声：“开始！”

墙下的“红太阳”们立即“嗷嗷”地吼叫起来，把事先准备好的石块纷纷扔进公社大院里。院子后面的几个人赶紧跑了。“红太阳”们马上往墙上架梯子，翻了进去。

翻过墙后，马上排成队伍，高举铁棍，大声喊着：“杀！杀！”踏着整齐的步伐，向前迈进，速度并不快。这是在告诉造反派们，你们快跑吧。

秦德才被秦有理派来的人搅了一阵，刚躺下，又被院子里的喊杀声吵起，心里正烦着呢。他披上衣服，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可出门一看，立刻傻了。

整整齐齐的一排、两排、三排的手举铁棍的队伍，圆睁着眼，高喊着：“滚出去！滚出去！杀！杀！”走两步，又有节律地跺脚，把铁棍也朝地下跺着。跺几下，再往前走两步。那地面的震动，那耳膜的震撼，叫秦德才胆战心惊。他知道一切的抵抗，甚至只是装个样子，都毫无意义了。他转身就跑，连办公室也再没进，袜子也没穿，拖着鞋，直接朝大门跑去，跟那些惊慌的造反派们一起往东门外的中学跑了。

街上满是大呼小叫、狼狈逃窜的造反派，陶家大院里的几个，听见动静也都慌忙跑了，放弃了龙头镇里的所有据点，逃进了中学里红卫兵总部的地界。

“红太阳”战斗队并没有追击，以收复整个西北村为限，甚至没有跨到街的那一侧。

北街对面的东北村，哈联成带着本村的造反派，已经堵上了自己村的胡同口。东北村基本上是由哈联成的那派控制。哈联成算是造反派，但有点假造反的意思。文革中的各种花样多去了。这假造反就是看上去夺了当权派的权，由新上来的人掌权，但这些人并不得罪原先的当权者，私下里还有几分默契，还有点利益输送。有的甚至就是原先当权者的代理人、傀儡，可表面上也是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推倒了“走资派”。只要里面能镇得住，外面人就不能说什么。这回，哈联成是既没让秦德才他们过，也不准备让“红太阳”的人进。东北村的局势要比西北村平静。

赶走了秦德才，西北村平静了几天。

各队抓紧春耕春种，不用别人讲“抓革命，促生产”的道理，地里的活也不能放下啊。八队的社员们也来到了地里，但气氛有种悲凉。

平金刚领头犁地，可人却是稀稀落落，少了老王头一家，没了包金贵一家，死了迟得法老两口，缺了赵玫。平金刚看着这队伍，说话也没劲了，可还得打起精神干哪。他知道，他再撑不起来，这生产队真的就完了。

车素花知道队里人少，赶了过来。

“素花姐，你还过来了？”平金刚忙打招呼。车素花今年五十五了，应该是长一辈，可称呼惯了。

“现在缺人手，多一个是一个吧。”车素花说着就翻起了地，停了一下，向四周一张望，又说：“那时我们八队多兴旺啊，看看现在剩下几个人，真想掉眼泪。”

“唉！”大家都无语。

不一会儿，经学文抱着孩子，带着媳妇也过来了。

平金刚挺惊讶：“学文啊，你是公社干部，吃皇粮的，来干吗呀？这儿也不给你记工分。”

“不记工分就不来啦？八队也是我的家，也有我一份，我也应该出这份力。以后再有事，你就招呼我吧，反正这一阵也没有公社的事。”

车素花还没忘了对经学文表态支持造反的不满，也不搭理他，扭头就往边上去了。

学文的媳妇邓明英忙走过去，接下车素花的锄头，把抱着的孩子递给了她，说：“妈呀，您就别跟他一般见识啦。您年纪大啦，哪能再扛锄刨地呢。给我吧，您就在边上看着孙子就行啦。”

车素花甩了两下手，是觉得才抡了两下，这胳膊就不得劲了，就说：“那行，我先看一会儿孩子。等你累了，我再替你。”

八队还有个生产能手，那就是杜家骏的儿子杜长贵，正值年轻力壮。几年下来，跟他爹、跟大伙学了不少农活的技术，地里场上的活都能拿得起来。再加上经学文就是管全社农业生产的，八队有这两个人，还有当队长的平金刚，出力的活靠前，占便宜的事靠后，八队还真搞得不错。

“素花婶啊，你别嫌学文是造反派。咱们也都是造反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他老人家说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咱也积极参加。他老人家说‘造反有理’，咱也造反，谁说不是？”杜长贵在劝车素花。

“是啊，是啊。咱们都是造反派。”大伙也一起哄着说。

“那连我也是造反派啦？”车素花咧开嘴笑了。

“是哎，你不是造了经学文的反了吗？只不过造反派跟造反派不一样，咱们才是真正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造反派，又搞革命又搞生产，不是秦德才那种破坏生产破坏革命的假造反。”

地里的气氛又好了起来。

第二十三章 黑云压城

1960年1月23日

23.1磨刀霍霍

以暴力对付暴力，只能解决一时的表象，结果或招致更大的暴力，或留下更多的隐患。西北村的平静气氛没能延续多久。

秦德才被赶出公社大院，受到震动的不只是秦德才那一帮人，而且是震动了整个龙头公社的造反派，甚至包括海源全县的造反派。龙头是全县少数几个由造反派占了公社大院的地方，县里的造反派从全县战略考虑，岂肯善罢甘休，轻易放弃。

这时间，中央文革搞了次被称为文革第三战役的反击“二月逆流”。所谓“二月逆流”，就是1967年2月14日政治局碰头会上，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等几个老帅、副总理在怀仁堂对文革的一些错误做法表示了不满和批评。极左势力正当气盛之时，立即进行了压制。（后来有的书上，把“二月逆流”称之为“二月抗争”）

这场反“二月逆流”的激烈程度，与“文革”中其它几次事件相比，算是很平缓的了。但其含义却非同小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毛泽东的大举进攻下，到1966年8月之后已无还手之力。连刚上来站到了第四位的陶铸，因为不愿意对反刘少奇做过多表态，在当年底就被打翻在地。“文革”的第二战役，也因此而称之为“打到刘邓陶”（第一战役是“打倒彭罗陆杨”）

然而无产阶级司令部看上去的节节胜利，丝毫也掩饰不了它的内部裂痕。毛泽东在向“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进攻中，依靠了三股力量：一是江青带队的打头阵的中央“文革”系统，二是林彪带队的用来压阵的军队系统，三是周恩来带队的国务院行政系统。社会再混乱，也是有大量的必不可少的事务要处理。这三种力量在“文革”中的位置、想法、做法、作用，都是不一样的。所谓“二月逆流”就是中央“文革”和行政系统发生了碰撞。在刘少奇还没有完全打倒之时，这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内部斗争已经浮出水面，而且在日后的“文革”全过程中占据了主导篇幅。

差不多是同时，省里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趁机发起“反复旧”，夺权基本成功，在省革命委员会中占了很大的份量。海源县里的造反派受此鼓舞，挂上了省里造反派的这条线，回来又联络了县里各方面的造反势力，把机关、学校、工厂、农村的各造反派组织整合在一起，成立了“八一八红色造反司令部”（简称“八一八”）。

中国的单位通常分为企业、事业和机关三大类。一般来说，县里的造反派群众以事业单位为多，如：农林水气（农业、林业、水利、气象，这儿讲的农业单位是指农技站、种子站这些，不是指农

村)、文教卫生等。可能是这些单位知识分子较多、从学校毕业分来的较多,喜欢独立思考,在这个体制下受压抑相对较重,要求改变现状的欲望更强烈一些。而县里的机关,哪怕是企业(工厂、商店),是另一种进入门槛,通过招收进来的多。总得有点这样那样的关系才能进得来,哪怕是当个工人。相对来说他们从体制的获益更多一些,因此在机关、企业里另一派(即“保守”)的群众更多一些。想再三说明的是,本书称呼这两派群众组织,不论叫什么名字,“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保皇派”,都没有褒贬之分,里面的群众多数都是好人,两派之中也都有投机分子和打人凶手。而且以后的结局表明,两派群众组织都不过是被某些上层人物利用的政治斗争工具。在这些上层人物的操纵和挑动之下,两派组织一会儿这派兴,一会儿那派兴(也有从来没兴过的),相互争斗厮杀,不亦乐乎,最终都是在为他人火中取栗。

这时,连驻防的解放军部队,也根据某些渠道的要求,表态支持革命造反派。这使得造反派的气势一时又膨胀了起来。

风云在不断变化。正当“八一八”有所得意的时候,这年夏天,县里的另一派观点的群众组织也联合了起来,挂出了“革命联合指挥部”的牌子(简称“革联指”),出于人数上的优势,便以闪电不及掩耳之势,用棍棒把他们赶出了县城。“八一八”因此而流散在附近各个公社,好不狼狈,当然他们也不会就此收手。前不久,被称为“文化革命旗手”的江青号召造反派要“文攻武卫”,传话说什么“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要坚决反击”之类的谬论,意思是怎么打也没有错,公然煽动武斗。更还有说要“武装左派”,搞“全面内战”。这无疑给造反派中的一些人打足了气,他们现在迫切需要有个立足点,于是下决心夺取龙头镇。种种的准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要夺取龙头镇,西北村无疑是最大的障碍。

西北村又要面临一场急风暴雨,乌云越来越稠密了。

在县“八一八”总部的撮合下,龙头也成立了组合全公社各造反派组织的“八一八”分部。由于秦德才的名声太臭,司令由东北村哈联成担任。为这事,秦德才还气赧赧地好几天。

失去了县城的县里各单位“八一八”,有不少人也住进了东北村和东门外的中学,整日里有这样的人进出、游荡,使得西北村人十分不安。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有人看到了“八一八”还偷偷运来了成捆的武器,比如像顶端已经磨尖了的长铁棍,头上戴的柳条帽(当时的一种安全帽),铁皮做的护胸板等等。这是要干什么?还不明白么!几天后,真的有人看到了“八一八”们身穿护胸,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在列队操练。

一场血腥的屠杀真要降临到西北村人的头上了?!

23.2心急如焚

这决不是一场儿戏!

很多人为此而焦虑,其中也包括彭小宾和衣春玲。

彭小宾因为自己的父亲在社教中死于非命，当然心中难以消恨。他觉得这个体制的很多东西应该加以改变，他曾经为革命毫无保留地激动过、投入过。大跃进的时候，又是深耕机械化，又是大炼钢铁，而且还是带着乡亲们一起搞，结果却一次次地被愚弄，害得自己在乡亲们面前都没法解释，抬不起头，满腔的热情换来的是满心的惭愧。所以就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必要的，通过这场革命来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东西，使社会主义少一些污点，使革命的前程更加平坦光辉。他的这些想法，跟经学文相似，只是要求更强烈些，投入革命的热情更高些。但是他更不希望西北村的乡亲们陷入一场血战。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知道至少在这一段时间，在龙头这个局部上，造反派的力量在积聚，而且准备不计后果地一战。“红太阳”要是在这时候和它一拼，西北村将会出现不堪设想的惨痛局面。

他不敢往下想，来到了大队部，想找“红太阳”的人谈谈。

平金刚见到他，没等他开口就露出一副很不肖的样子，完全不顾过去的友情，先说上了：“嚯，你这个大造反派，还好意思到我们保皇派这儿来啊？”

彭小宾冷静地说：“我也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革命造反，没有别的意思。”

“那你要造反，也不能跟秦德才那狗东西造到一块儿去。”平金刚还是很不高兴。他以为凡是造反派，就是跟秦德才是一伙的。

“金刚哥啊，我们先不说这些。我今天有要紧的事来说。”彭小宾还是很客气地叫了一声哥。

“我可担当不起这个造反派的哥，你跟我们的郭队长说去吧。”讲完就甩手走了。

“喔，小宾啊，有什么事你就说吧。”郭中和倒还是挺客气的，他知道彭小宾的为人。从于村长前次冲击公社失败以后，郭中和他们几个也和“红太阳”走到一起了。

“中和啊，现在情况很严重。‘八一八’那边看来是要硬干一场，你们这儿要注意啊。”

“是啊，那你的意思是什么？”郭中和问。

“你们一方面要早做准备，另一方面在风头上也不要硬顶，可以缓和一点。”

“怎么缓和法？”郭中和既敢干，也有一定的心计，自己不说，先问下去。

“我也没想好，比如，说话口气可以缓和点，骨干人物先出去避一避。”

“哦。”郭中和点点头，又探起了口风：“‘八一八’那边从外面来了多少人？要打起来，他们能出动多少？”

“现在来的人不多，而且也不是些能打的人。但我担心，他们真的会把武斗队派过来。他们失去了县城，是要把龙头作为他们的据点。这个打算，看来已经定了。”彭小宾沉重地说。

“好，我会把这些情况告诉家骏、金刚他们，谢谢你过来。”郭中和最后又笑着说：“你也不怕他们以为你是来通风报信的，把你当成叛徒。”

“唉，这时候眼看一场拼死血战要在西北村打起来了，多少乡亲们要遭难，我自己这点有什么好顾虑的。更何况，我和他们不是一帮的。以后你们会看到的。”

衣春玲的想法，更加单纯。她就是一心跟党走，毛主席号召搞文化大革命，自己就是一个念头：积极参加，决不落后。当然她也有一些不理解，而且不理解的事情越来越多。这文化大革命到现在怎么就成了干部下台、两派武斗了呢？一定是有人不听党的话，破坏文化大革命。可是谁在不听呢？好像还真找不出来，除了秦德才这种不争气的东西。你看，人家东北村的造反派哈联成，虽然是造反派，可是非常通情达理，又能干又有水平。

这次眼看着“八一八”要对西北村的“红太阳”动武，她和彭小宾一样地着急。怎么来避免呢？彭小宾去了西北村，她想她认识哈联成，她应该到东北村去说说。

她从陶家大院出来（秦德才前一阵被赶出公社大院和西北村的时候，他们“红海洋”的人并没有跟着走），穿过北街。北街上，死一般的静，一个人也没有。对面东北村临街只留了一个胡同口，有人扛着长矛把守，其余的都堵死了。

衣春玲走过去，看守的认识她，还打了一个招呼：“哟，这时候一个姑娘家，还敢走来走去呀？”

“我找你们的哈司令。”

“哈司令大概不在，你去看看吧。”

衣春玲到了东北村的大队部，跟各村的大队部差不多，一个大一点的院子，一排整齐一点的平房。通常这个院子应该清扫得挺干净，如今也是杂物乱放，杂草丛生。

衣春玲走到办公室门口，喊道：“哈司令在吗？”

出来的不是哈联成，而是那个又黑又壮、咧着黄牙的秦德才。

“是你在这儿？”衣春玲不悦地问。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哈司令、秦司令，都是司令，司令和司令在一起，有什么好奇怪的。我跟哈司令是哥们，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嘿嘿，这时候正巧，哈司令不在，旁人也没有。不正是咱俩拉呱的好时候吗？”说着秦德才就过来想拉衣春玲进去。

“你想干什么？”衣春玲正色道。

“嘿，看你正经什么？叙叙革命友情嘛，这阶级感情啊，战斗友谊啊，可深厚啦。你说是不是？嘻嘻。”

秦德才还要过来拉扯，衣春玲勃然大怒，“呸！”的一声朝秦德才吐了一脸口水。

秦德才跳了起来，正要大骂，看外面有人进来了，只好赶紧用衣袖擦脸，不好再声张了。

衣春玲气嘟嘟地走了。

进来的人直愣愣地站在那儿，看着。

23.3两头为难

焦虑不安的，不光是村里的人。

南门外驻军的辜连长，这些天比谁都急，真的是茶饭不思，寝食难安。因为他能知道一些两方面的背景情况。他的团长是倾向于“八一八”的，当然他也知道这不是团长个人的意见。本来地方上的几派谁是谁非，跟他们团长、连长不相干。可是文化大革命，军队也被要求支持左派。但谁是左派呢？在部队里不存在个人意见，连长听营长的，营长听团长的，倒底是真左还是假左，就是睁着眼，也不会去看。这一阵军队里有的人也要支持文化大革命，具体讲就是要支持革命造反派。军队有这个意思，地方上的造反派一听就能听出来，一时更加狂傲起来，武斗的危险在龙头急剧地上升。

现在的驻军与当地的联系，比起解放战争那时要少多了，也就是过春节、过“八一”建军节时相互走动拜访一下，平时往来不是很多。但毕竟是在这儿驻了好几年了，公社的干部、大队的干部，辜连长都是认识的。不论群众组织双方的观点是什么，要打起来，死伤的都是平日里熟悉的干部、认识的乡亲。这边“八一八”是要不惜代价夺取一块立足之地，那一面“红太阳”势必会拼死保卫自己的家园。而自己作为军人，既要保护老百姓，又要支持左派，上面还要连里拿出支持左派的具体措施和实际行动，实在叫辜连长为难死了。“八一八”的调子越来越高，火药味越来越浓，东北村的喇叭成了“八一八”龙头分部的广播站，整天在叫喊：“头可断，血可流，革命造反不回头！”“要用鲜血和生命，誓把龙头建成井冈山式的革命根据地”。就像一颗已经启动了定时炸弹，定时器正在“滴答，滴答”作响，引爆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靠近。

对于辜连长来说，夹在上级、两派群众、军人职责和自己的良心几方面之间，实在是难办。但是不管怎么难，豁上去，也要坚决制止这场流血冲突，辜连长下了这个决心。他先去了西北村。

西北村的沿街各胡同口也都站上了手持刀枪的岗哨。

他走进大队部，村干部和“红太阳”的主要成员都在，个个都表情严肃，像是在讨论什么重大问题。

招呼过后，辜连长说：“你们是在商量什么吧？”

“商量什么，就一句话，准备迎战。‘八一八’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组织。他们要翻天，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决不答应。他们敢动武，我们也决不客气，坚决回击，把它消灭不留情。”平金刚大着嗓门，毫不畏惧地说。

“我知道你们很勇敢、很坚决，都是英雄好汉。可是为了西北村的乡亲们，要尽量避免这场流血。”辜连长说。

“怎么避免？我们无路可退，这是我们的家园。我们往哪儿退？按现在的力量对比，东北村的，就算加上全公社那帮‘八一八’，我们算过了，都能对付得了。”邬中和说。

“但问题在于，很可能全县的‘八一八’都开过来。你们想过吗？”

“大不了拼个你死我活，同归于尽。他们敢冲进来，真要打巷战，我们死一个，他们要死十个。”平金刚咬着牙说。

“你去拼死了，叫老婆孩子怎么办？同志们，不要意气用事啊。这毕竟不是跟国民党打，不是跟日本鬼子打，多想几个办法嘛。”

“还能有什么办法？”于又发问。

“该让的地方让一点，该撤的时候撤一点。英雄好汉也不争一时的长短嘛。”

“辜连长说得也有道理，我们要认真考虑一下。”杜家骏听了一阵后，说话了：“谢谢辜连长过来提醒。到时候还希望部队能发挥关键作用，制止对方的行动。”

“唉，说起来难啊。上面说了要支持造反派，也就是要支持‘八一八’。我这趟来，说不定还违反纪律呢。”

“啊？他们算什么造反派？我们才是革命造反派！”平金刚气嘟嘟地说。

“不跟辜连长争这些啦。我知道辜连长这趟来也不容易。我就代表咱们这一面表个态：我们坚决反对武斗，我们不会出去挑衅，不会打第一枪。我们也不会越过大街去进攻东北村。但我们坚决保卫自己的家园。”

“你这讲得对，但是还不够。你们还要考虑好预备方案。红军还要走二万五千里长征呢。”

“好，那我们再考虑考虑。”杜家骏礼貌地说。

辜连长走了以后，杜家骏对大家说：“我们要很认真地看待这件事。不屈服，不惊慌，还要有灵活性，不能光凭一腔热血蛮干。从彭小宾和辜连长带来的信息，都说明对方‘八一八’准备集中全县的力量大干一场。而我们这边，本公社的都还没有联合起来。靠我们西北村自己，要对付全县的‘八一八’是有难度的。真要硬拼，那个代价、那个伤亡是很大的。我们要好好考虑一下对策，而且要尽快，现在就要拿出方案。‘八一八’的进攻随时会发起。”

“把我们经常出头露面的几个人的家属，转移出去。到时候打不赢，我们能跑，老婆孩子决不能丢给对方。”邬中和先说。

“对，先把他们撤走，可以像于村长那样，退到粮管所去。”平金刚说。

“行，我去跟祖所长讲讲，他会同意的。明天我们就开始撤一部分。”杜家骏说。

“实在不行，我们可以放弃公社大院。我们以一个大队占了公社的院子，也有点说不过去。我们退出大院，对方就没有更多的理由。退到村里，在胡同里打起来，对方占不到便宜。”邬中和说。

“这可以考虑。我再去找辜连长，请他跟对方通气，但是对方也不能得寸进尺，欺人太甚。”

辜连长没有回南门外的兵营，他又去了东北村，找到了龙头公社“八一八”的司令哈联成。

哈联成，三十五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挺开朗，乐于助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可办事挺得体，群众关系都挺好。就是有个问题，不爱拍马屁，不喜欢跟领导套近乎，自己还常常有主见，和领导往往想得不一樣。所以尽管群众威信也不错，人也正直能干，也当过团支书、生产队长、副业队长，可一直没进入村里的核心层。这个人还有个特点，就是虽然跟领导有距离，可也不去闹别扭，有自己的想法，放在肚子里，最多说说而已，不对抗、不顶撞，也就这么相安无事下来了。文革一来，大队的原来班子怕受冲击，立马都躺倒不干了。村里事事都没人管，总得有个人出头吧，大伙再三劝说才把哈联成请了出来。由于跟原来的当权派不是一条路，所以就号称“造反派”，但实际上也没有更多的对立，有时就被那些真造反的人说成是假造反。哈联成也没多去理会这些，只要村里人少一些争斗就行了。就这么，大家还都挺拥护，结果就当上了东北村、乃至全公社的造反派的头。

辜连长见到哈联成，两人都挺熟，年龄也差不多，两句话过后很快就切入正题。

“你这趟过来，准备怎么支持我们呢？”哈联成笑着说。

“你还笑得出来，事情比火烧眉毛还急呢。”辜连长说。

“是啊，我也正为西北村担心呢。他们能挺得住吗？”哈联成这么个说话口气，一点也不像是对立面。

“他们还挺硬，我就是怕他们硬顶，打起来要吃亏的。我又不能多劝，怕他们说我是在帮造反派说话。你这儿是个什么态度，非要打一仗吗？”

“唉，你这一问是问错人了。这事情我说了不算，大头头们都在中学里。我这儿你放心，东北村、西北村都是乡里乡亲的，我不会让东北村的刀去捅西北村的人。那样我会背一世骂名的，连我儿子以后也会抬不起头的。文革会一阵风过去，可我们还会在这儿祖祖辈辈过下去，我不会把事情做绝的。我不会让东北村的人进西北村一步。当然也会有不听我话的人，那我就管不着了，随他去。各人自己负责。”

“这样你这儿，我就放心了。我再去中学见见你们‘八一八’的总头。”

“这时候，他们都红了眼了。你的话，他们不一定会听得进去。说不定连门也不让你进。你也真是难啊，上面叫你支持造反派，你又不能不管。管了吧，恐怕两边都没有说好的，弄不好最后落得个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帽子。”

“其实，我也早就想转业了，我这么个年纪也提不上去了。可碰上这个时候，还转不了。我现在也是豁上了，不管别人说是向着谁，还是得罪谁，我决不让流血武斗发生，除非从我身上跨过去。”

第二十四章 龙头易手

1960年1月24日

24.1 千钧一发

尽管辜连长做了种种努力，可抵挡不住大局的变化。

这年的夏天，出了个震惊中外的武汉“七·二〇”事件。事情是这样的：湖北武汉在进入1967年之后，两派群众组织的争斗日趋激烈。一派是所谓的保守组织“百万雄狮”，一派是所谓的造反组织“工总司”。如前所述，这儿的造反与保守，都没有褒贬之意。而在武汉地区支左的部队，对地方上的两派争斗介入较深，而且还是明显倾向于“百万雄狮”，压制“工总司”，引起了中央“文革”的不满。为了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一些中央要员，如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郑维三、李作鹏、余立金、王力等，在这年七月都到了武汉。

其间，毛泽东两次召开会议，指示要给“工总司”平反，还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可以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此话请见：卜伟华2007年9月在香港科技大学所作“‘文革’与红卫兵”的讲座）7月18日，周恩来根据毛的意见，召开军区党委扩大会议，说：把“工总司”打成反动组织，镇压那么多工人，是不对的，应当平反；并说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时，这个意见还没有向外扩散。

然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王力却想抢头功、出风头，会后深夜，和谢富治一起竟然跑到“工总司”总部，表态支持，还戴上了他们的袖章，并透露了一些风声，斥责“百万雄狮”为保皇派。这一下惹怒了不明就里的“百万雄狮”，还以为这只是他们个人的表态。“百万雄狮”出于策略考虑，觉得谢可能不好啃，就集中力量盯上了王力。

7月20日上午，“百万雄狮”和湖北省军区独立师的数百人带着武器，冲进王力所住的东湖宾馆“百花二号楼”，把他抓走，还动了手，打伤了他。哪知毛泽东当时就住在这个宾馆的另一个院子“梅岭一号楼”，受了惊动。刚回北京的周恩来，闻讯立即派出飞机，当天就把毛泽东转移到上海。使毛泽东原本想再次横渡长江，借此掀起文化大革命又一个新高潮的打算落空。这是毛泽东极少有的几次坐飞机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这下，“百万雄狮”及支左部队就此闯下大祸。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被撤职。（具体事例请见：《狂飙》，丁晓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

极左势力正好拿此大做文章，以为是找到了千载难逢的抢权夺权的好时机。他们说武汉驻军是在搞武装叛乱，是要谋害毛主席，试图趁机拱倒他们一直想拱而拱不动的军队当权派，从而把他们的势力伸进军队。于是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一场更大规模的赤裸裸地武力抢夺各级政权的浪潮，在一些地方，军队也直接或间接地卷入进来。

时间转眼到了八月，海源的“八一八”也迫不及待，终于刀剑出鞘了。

这天清晨，“八一八”的“文攻武卫”战斗队，全副武装地从龙头东北的集结地，涉过大河，翻过矛山，经孙家乔，往东门外来了。他们共一百余人，头戴柳条帽，帽子下面连着由横的、竖的铁丝扭结的网罩，从外面只能看见他们黑黑的脸，和眨巴的眼睛，个个都毫无表情；身着一色的旧黄军装，前胸和腹部挂着二块铁皮做的护板。最前面打先锋的两排，连手臂和大腿也都裹着护板，那模样像是古代的武士，可又是那样的可笑和可悲。有的铁皮还是从那时街两边盛行的毛主席语录牌上剪下来的，红底白字，清晰可辨。手持一人多高的自来水管，前端都磨成了尖刺，做成长矛。据说尖的铁管比实心的铁棍，刺杀时更有效。因为对方的鲜血可以从铁管中涌出，刺入和拔出都更加利索。人，等到挂上了这副装扮，也就成了吃人的野兽。

“八一八”的武斗队踏着整齐的步伐，“嘭，嘭，嘭”，地面发出震动，泥尘在鞋面扬起。

西北村的胡同里，老人妇女孩子们背着包，拐着篓，呼爹喊娘地往外走。

郭大妈前后扛着东西，还在说：“这不又跟1949年跑国民党似的？”

“八一八”武斗队在行进。

西北村的“红太阳”战斗队也全副武装，在胡同里奔忙穿梭。

平金刚在挥着大手，喊着：“按照指定地点，各就各位，注意听号令。”

郭中和、于又发、杜长贵、齐成才等等的身影，一一闪过。

“八一八”武斗队进了东门。

西门外的路上，西北村的乡亲们扶老携幼，急急奔走。

车素花在问：“靳喜悦没出来吗？怎么没看见靳喜悦，他也是‘红太阳’观点的人。”

衣大妈说：“他都是残疾人，什么活动也没参加，‘八一八’不会跟他过不去吧？”

“八一八”武斗队行进在东街。

武斗队的北侧，队列外有一个也是身穿盔甲护板的人，大概是现场指挥的头。突然他大叫一声：“准备！”

武斗队员们把扛在肩上的长矛，“忽”的一下都横下来，朝着前方平举，尖尖的矛头对着前方，依然“嘭嘭”地跨步向前走。

十字路口的北面和西面，西北村“红太阳”战斗队也在街中央平举着长矛，列队等候。

“嘭，嘭，嘭”，“八一八”的武斗队在行进。

一根根尖尖的长矛在向前。

“正步走！”“八一八”的指挥又喊了一声。

武斗队员们抬高了脚，步子更响了，口中还喊着：“揪出纪海洋！扫平西北村！”

“揪出纪海洋！扫平西北村！”

整个龙头镇的土地和空气都在震颤，家家户户都关门闭窗，气都不敢出。

“嘭，嘭，嘭”，“八一八”的武斗队在行进。

一根根尖尖的长矛在向前。

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已不足百米。

陶家大院里一片嘈杂，几个声音在喊：“纪社长，你不能去啊！纪社长，你不能去！”

一个中年人从陶家大院走出来，朝“八一八”武斗队走去。

“他们找的是我。我不能自己躲起来，让你们冒风险。豁上我一个，换取你们全村的安全，值！”

他正是纪社长，纪海洋。他毫无惧色，迎着那一排排铮亮的长矛走去。

“立定！”“八一八”的指挥把手一摆，武斗队的脚步砰然停止。

“你是什么人？”指挥走过去问。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纪海洋。我可以接受你们的批判，但是你们不要对西北村的乡亲们下手。”

“哦，你就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纪海洋，你是龙头公社保皇派的黑后台。拿下！”后面立刻有两个武斗队员过来，扭住纪社长，把他押到边上。

“你们的目的是不是达到了吗？把武斗队撤回去！”纪社长还在挣扎着。

“嘿，嘿！今天就是要你在这儿，眼看保皇派们覆灭的下场！”那个指挥又喊了一声：“正步走！”

“嘭，嘭，嘭”，“八一八”武斗队又向前跨步行进。

一根根尖尖的长矛在向前。

“八一八”武斗队已经行进到十字路口的东侧。

“停住！停住！”两个年轻人奔跑过来，那是彭小宾和衣春玲。他俩跑过来，挡在武斗队的前面。

“又是什么人？”“八一八”的指挥在问。

“我们是革命造反派‘红海洋’战斗队的负责人。我们同样是革命造反派，但是我们决不赞成武斗！”衣春玲大义凛然地站在十字路口中央，风儿吹动着她的秀发。

“春玲，你回去，我在这儿挡着。”彭小宾说。

“不，这儿也是我的战场，是保护群众生命的战场。我决不回去！”

“八一八”的指挥，“哼”了一声，铁丝面罩遮住了，看不清他的面目，只能看见他两眼发出狼一样的冷光，“你们还想挡住我的脚步？继续前进！”

“嘭，嘭，”，“八一八”武斗队又向前跨步行进。

一根根尖尖的长矛在向前。

衣春玲昂首挺胸，面对这一排排闪亮的长矛。

“嘭！”武斗队又是向前一步，刀尖离衣春玲的胸前只有一米。

衣春玲怒目而视，岿然不动，令人想起了西北村当年的女英雄姜雪花。

“嘭！”武斗队又是向前一步，刀尖已经抵住了衣春玲那隆起的胸膛。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停下！停下！”一个男子汉粗旷响亮的声音传来。随着一串“滴铃铃”的铃铛声，一辆自行车飞快地驶来，辜连长赶到衣春玲身旁，翻身下车。

一队解放军战士，也随之徒手从南街跑步过来。

“停下！”辜连长用手挡住前排的长矛，大声叫道：“你们的指挥呢？”

那个全身盔甲的指挥走了过来。

“怎么回事？”

“我刚和你们的总部司令谈好了，你们在这儿待命六个小时，再按双方协议执行。”辜连长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片。

那个指挥接过纸片看着，就说：“我们的头还没来呢，我不能自作主张。”

“这不就来了。”辜连长回头指着。

解放军战士已经列队在十字路口，排成人墙，将双方隔开。

队伍的后面，走来了双方的两个代表，西北村方面的是平金刚和郭中和。“八一八”的两个人，我们不认识。

辜连长念着：“为更好地开展龙头镇的文化大革命，现在双方协议如下：1.‘八一八’进驻公社大院和陶家大院。2.‘红太阳’的武装人员撤出西北村。3.‘八一八’的武装人员不进入西北村。4.双方保证西北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特立字为据。”然后抬起头，看着隔在解放军队伍两边的双方代表。

“可以了吧。双方要严格遵守协议。好了，‘红太阳’在晚上六点以前撤出。六点以后，‘八一八’进驻公社大院。”

“我们要纪社长回来。”平金刚说。

“不行，这个走资派一定要批倒批臭！协议里没有让他回来这一条。”对方代表说。

“不用争了。把纪海洋押到兵营，由我们看管。”辜连长拍了板。

事情刚处理完，衣春玲一下就瘫倒下来，彭小宾扶住了她。

平金刚见状，忙说：“快扶过来吧。”

彭小宾扶着衣春玲穿过部队的人墙，回陶家大院。

“八一八”的指挥还在嘟囔：“这算什么造反派，怎么跑到人家那边去了。”

辜连长对“八一八”的头目说：“还有件事，中学里的‘东方红’那批红卫兵，也让他们走吧，和你们住在一个中学院子里，早晚会不安生。”

“行啊，让他们走吧，看着也烦，不过不能带走武器。”“八一八”的头目说。

“他们有什么武器啊？你们还看上他们的木棍、皮带？”

肖胜利的“东方红”红卫兵，当天也撤出了中学，先在南门外军营住下。这时的“东方红”，人已经不多了。大多数学生已经回家了，省得住校还要另外花费。其实到这时候，无论是“东方红”还是秦有理那帮造反派红卫兵，都已经过时了。文革一开始，当别人还不敢起来的时候，用了他们一下。现在，叫他们先起来冲击既有秩序这个目的已经达到，红卫兵的作用就不存在了，只剩下跟在两派大人后面起哄的份了。

24.2耀武扬威

当晚六点，按照协议，“红太阳”撤除所有在村里的岗哨，原定安排撤退的人员和家属都已经退至粮管所，有的则进了赵村。“八一八”的头目和武斗队则进驻公社大院，造反派不带棍棒可进入西北村。部队的战士在西北村的胡同口把守。

“八一八”算是赢得了一场胜利，在龙头镇有了个落脚之处。

最高兴的，莫过于秦德才了。他领着“八一八”的头儿们进了公社大院，手舞足蹈地比划着，当初这是谁的办公室，那是谁的办公室。他指着中间的一间，有点得意忘形了，说：“这就是我的办公室，我从宗发奋那儿夺过来的。我还在这儿，你们可以住后面，有什么事来找我吧。”

一个瘦高个的“八一八”的头，脸一沉，说：“这儿没你说话的地方，也没有你待的地方。这是海源县‘八一八’总部所在地，你上别处找地方去。”

秦德才象是被浇了一头凉水。弄了半天，自己跑前跑后，结果什么也没有啊。其实，他不知道，他在造反派里也不过是条狗。不过，他不会去多想，也没泄气，一转身走了，他有他逞威风的地方。

他带上了储小二，挺着肚子，在西北村的胡同里游逛起来。现在，他又回来了，而且就是这个村的老大了，谁能比得过他。社教时，得意过一阵，不过上面还有宗发奋。现在的西北村，他就是天，不信就试试看。往旁边一瞧，正好是伤残军人靳喜悦的家，进去试试看。

靳喜悦也想撤走。考虑到粮管所里也住不下太多人，况且西南村、东南村也有一些人要躲开“八一八”，撤进粮管所的。平金刚就劝靳喜悦不要走了，“你跟‘八一八’无怨无仇，连炕也下不来，他们不会来找你麻烦的。”所以，他就留在了家里。

可是，平金刚他们才走了一个来小时，秦德才这东西就进来了。

“哈哈，你这断了腿的狗东西，没想到我还会回来吧。”秦德才大咧咧地走进里屋，在靳喜悦的炕沿敲打着，还呲着牙笑着，真好像是狼逮到了一只断了腿的羊。

“你不敲门就进来，干什么啊？”靳喜悦并不怕他。

“嚯，我进来还要敲门啊？现在西北村就是我的天下，我要上谁家就上谁家。我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你总得有个事儿吧？”

“……”秦德才连找个什么茬都还没想好，“……你，你，我知道你是保皇派的观点，应该向毛主席低头认罪，向我革命造反派低头认罪。”

“呸！你是什么东西！我朝狗低头也不会朝你低头。”

“你他妈的，敢骂人，不想活啦！”秦德才脱下鞋子就朝靳喜悦打去。

“不能打啊，不能打啊，他是残废人，你还打他啊！”靳喜悦的媳妇哭着叫着跑过来拦着。

储小二对喜悦媳妇嚷着：“不许过来，不许过来。”又推又挡又是摸着。

“来人哪！来人哪！”喜悦媳妇扯着嗓子哭喊着。

“你们保皇派都逃走了，你喊也没用了，没人了。”秦德才气势汹汹地说。

但西北村并不是真的没人，还真有人跑过来。先是迟解放。迟解放在读高中，他爷爷奶奶和小弟弟饿死在困难时期，那阴影始终笼罩在他心头。所以一开始他就认为“造反有理”，这世界应该有所改变。但是，他看不上秦有理那一套，就参加了肖胜利的“东方红”，还挺积极。为这事，跟他爹迟一敬还闹得不愉快。迟一敬还一直算是造反派的，可是和秦德才也弄不到一块。迟解放虽然是“东方红”保守派的，但这次“八一八”来打，“红太阳”要撤，他觉得他不是村里的，跟他们那些派别关系不大，所以就留下来了。

他听到又是吵吵嚷嚷，本来不想管，但今天“八一八”全副武装的武斗队真的出动了，“红太阳”的人都走了，村里说不定会出什么事，自己是个年轻人，怎么也应该出来看看。他快步过来，进了靳喜悦的家，看到这情况，就对秦德才不乐意了：

“不管他是什么观点，他都下不来炕，你跟他逞能干什么？刚才街上差点动刀打起来，你上哪儿去啦？”

秦德才瞪着眼，“老子是司令，你还管得着我啊。你也得听我的。”忽然又想起来，问：“你是哪一派的啊？”

“你管我是哪派的。我们都听毛主席的，我还听你的啊？”迟解放对秦德才毫不相让。

正吵着，皮高深、衣大妈等也来了。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人家打国民党光荣负伤的时候，你在哪儿呢？”

“你不能学陶富贵那样当还乡团，过来反攻倒算啊。”

说得秦德才也只得灰溜溜地转身走了。

出了靳喜悦家，秦德才觉得不解气，领着储小二，又过了两个胡同，有个院子敞着门，是皮安已家。他想，皮安已是个老顽固，又怕事，找他个茬耍耍威风，应该没有事。于是他又跨了进去。

皮安已好像对这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反应平静得很，有点像当年的迟得法。他好像是参加了杜家骏那边的保守派，却又不像，因为没见过他参加那边的活动，但肯定不是造反派这边。他也在想，你造反派关我什么事？还在院子里拿着大扫帚扫地呢，见到秦德才进来，冷眼看了一下，都没啃声理他。

“你这个保皇派，见到我秦司令，怎么连个招呼也没有。”

“你当你的造反派，关我什么事。”皮安已冷冷地说。

“哼，现在我们造反派胜利了，你得向我们低头认罪。”

“你是造反派？你算什么造反派？我儿子才是响当当的造反派、红卫兵呢！”皮安已的儿子皮高深，是“红海洋”的，在村里也算是造反派。而皮安已自己是跟着杜家骏的保守派。一家人两派观点的都有，外面哪派赢了也不碍事，所以皮安已自己觉得笃定得很。

“你别忘了，我是造反派的司令。”秦德才一分钟也没忘了他是司令。

“去你的吧，你这个司令就能管你后面的那个储小二，还能管谁？”这一句把秦德才气得给噎了回去。弄了半天，虽然“八一八”进了龙头镇，可是这村里，好像还不是造反派的天下。

秦德才这个司令，在这儿还是不好使。

24.3引狼入室

晚上，“八一八”在中学操场上开庆功大会。中间坐的是卸了装的武斗队，四周是附近几个村的造反派群众。扩音设备坏了，喇叭也不响，彭小宾也不愿过来修。王溪倒是越来越能干了，照样能扯着嗓子领着喊：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保皇派不投降，就坚决消灭它！”

在稀稀拉拉的几盏电灯下，那个瘦高个（看来是全县“八一八”的头了）出来讲话：

“首先让我们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在我英勇的‘八一八’强大攻势下，保皇派们土崩瓦解，望风逃窜。我‘八一八’兵不血刃，一举捣毁了保皇派的老巢，夺取了西北村。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再一次证实了毛主席讲的那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就像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还要趁胜追击，誓把资产阶级保皇派全部消灭，实现海源大地一片红！

……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总部决定成立龙头公社革委会。我宣布，革委会领导班子的名单……“

坐在下面的人，包括秦德才，都一个个伸直了脖子，仔细听。可是，念的名单里，主任是找了个北山来的一个大家不认识的农技站的人。副主任里有哈联成。居然还有宗发奋，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也当了副主任。

散会后，宗发奋成了宗兴奋，一定要他认识的几个造反派上他家撮一顿，秦德才也乐得再蹭一顿。去的也没几个人，也就是储小二、王溪这几个。

宗发奋俩口还是住在陶家大院的最里面。走进陶家大院，黑糊糊的。

秦德才问：“广播站怎么也没亮灯啊？”

“东西都叫‘八一八’总部搬走了，说是要在中学里成立总部广播站。”宗发奋说。

“那咱们的呢？就没啦？怎么也不跟咱们说一声。那个广播站还叫咱们王溪去吧？”

“没说。他们里面能念稿子的人，有的是吧？”宗发奋没把这当回事，在随便说说。

王溪满脸的不高兴。

秦德才看出来，就拍拍王溪的背，说：“大妹啊，别难过。这儿毕竟是咱的地面，我想办法再把它搞起来，还是让你去广播。”

王溪靠秦德才近了点。

经过这几番折腾，宗发奋的家也不像个家了，只剩下炕上堆的被子，几件散乱的衣服，还就是墙角边放着两个大一点的破了角的纸箱子。

宗发奋领着这几个人高高兴兴地进了家，连声朝屋里喊着：“贵客来啦，贵客来啦！赶紧弄几个菜。”

宗发奋的妻子柏惠珠过来站在那儿，挺纳闷，“这年头还有心思上菜啊。”

“你不知道啊，我又当上主任啦，龙头公社的主任。”宗发奋低头跟媳妇说着。

柏惠珠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容，在门后招呼客人：“啊呀，是王溪妹妹啊。请进，请进。”再一看王溪的后面是秦德才，马上身子一颤，脸色刷白，转了过去。

宗发奋在屋里没注意到这点，还在那殷勤地比划着：“上炕，上炕。临时搞的，也没有什么好东西。”

确实也没有什么好东西，就是拌个萝卜丝，白菜帮，咸花生豆之类。

宗发奋喊着媳妇，“进来，进来，上里屋来。站外面干啥呀，你看你。”又对炕上的人说：“我这媳妇呀就这样，来了客人就上不了台面。”

储小二说：“嫂子啊，都是自己人，别不好意思。”

柏惠珠只得进来，宗发奋又比划着说：“这些都是我一条战壕里的亲密战友。很多事亏得有他们，以后你要好好待他们，就像自己家里人一样，啊。”

宗发奋又对炕上的人说：“我也说句实话，运动初期你们也批斗过我。但这是革命的需要，我想得开，都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嘛。我不往心里去，你们也别抹不开，继续大胆革命，尤其是德才啊，你还是司令，我还得叫你一声司令。咱们更得像亲兄弟一样共同战斗，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是吧？兄弟？”

这一番话把秦德才乐得，偷偷地看着柏惠珠。宗发奋哪知道他媳妇心里在流血。

宗发奋还越说越高兴，“咱们几个还得做点事儿出来，给大家看看，咱们革命派的厉害。”

“是，是，就是的。下午我上村里转了下，没人理我们。”秦德才记得下午进村碰了一鼻子灰。

“你这样子去不行。还是那个老办法，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咱们把阶级斗争搞起来，拉几个阶级敌人出来批斗，一下子就能把大家镇住。”

“对，对，对。可我们西北村没有敌人呐，包金贵也杀了，一个戴帽子的也没有。”储小二说。

宗发奋沉吟了一会儿，说：“还有那个国民党他爹老王头呢。”

“在北山高家庄呢。”秦德才说。

“抓回来，把他抓回来。就说是他们北山保皇派包庇掩护国民党。这样咱们把他抓回来，既给保皇派抹了黑，咱们又成了英雄，又有阶级敌人可以随时拉出来批斗。这真是一石三鸟啊。”

“高，实在是高。”储小二拍马屁还是行的。

“可靠咱们这两个人，还不行吧？”真的要秦德才冲锋陷阵，也就不行了。

“我去找总头说说。”宗发奋把事情揽下来。

“要把你爹妈抓回来，你是高兴啊还是伤心啊？”秦德才对着王溪问。

“他们是国民党，不是我的爹妈。我的爹妈是革命队伍。”王溪已经把自己的父母撇开了，因为她知道如果她还和老王头一家栓在一起，将会是如何的悲惨。

“好，好，像个革命的后代。造反派就得这样大义灭亲，是块革命接班人的好材料。”宗发奋也竖起拇指。

秦德才几个人走了以后，宗发奋就问他媳妇：“今晚上你怎么老是不开心，不是不给我面子吗？”

“你找了些什么人来？这些人没一个好东西。就是那几个人斗你最狠，你忘啦？”柏惠珠不能明说，只能这样拐个弯。

“你懂什么呀？你真以为我忘了，把他们当好人啊，利用他们就是了。我刚当了主任，身边一个人没有，怎么开展工作？”

见柏惠珠不言语，宗发奋自顾自地说起来：“我呀，这前程刚开始呢。别看我现在还只是副主任，甚至还排在哈联成的后面。那些人毕竟是泥腿子，怎么能跟我比。纪海洋那小子这回也算错了帐，跑到保皇派那一头去了。现在，造反派里就缺领导干部哎。咱南面的那个王副市长，一造反，中央文革就表态支持。听说还有更上头的支持，一下就当了省革委的领导。可是省革委的领导哎，相当于省长哎，不得了的大官哎。”宗发奋连着几个“哎”，那神情啊，就像官帽掉在了他头上似的，还意犹未尽，接着说：“你看，我一出来就是副主任，再有几个月就是一把手。等明年，我就能到县里啦。哈，哈！”说着说着，又咧着嘴自己笑起来，哪顾得柏惠珠在那儿偷偷地抹泪。

秦德才几个从宗发奋家出来，还没觉得高兴过瘾。秦德才说：“再上我们家去乐呵乐呵。”

“好啊。”储小二应着。

“这么晚了，还去啊？”王溪说。

“我那家里前后都没人了，晚不晚都一样，累了就在我那儿歇。”秦德才说。

秦德才住的是三进的老宅院，人都走没了，只剩下秦德才一个人。

三个人进了黑洞洞的院子。

“唉哟，怎么什么也看不见。”王溪的脚碰了一下门槛。

“唉哟，我的花呀，可别摔着了，我来扶你。”秦德才趁机搂着王溪的腰往里走。王溪身上青春少女的气息直往秦德才的鼻子里灌，弄得秦德才张着大嘴直往里吸。

好不容易摸到里面一进，进了东屋上了炕。秦德才点上了小小的油灯，那火苗暗得连鼻子眼睛都分不清。

“咱们来点什么呀？”储小二问。

秦德才总还得装着点样，就说：“咱大妹子嗓子好，来段样板戏吧。”

“对，对，咱革命人就爱唱样板戏。”小二附和着。

“这么晚，吵了别人。”王溪还得推辞一下。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前后二排都没人了。要不，咱们就在耳朵边唱，好长时间没听大妹子唱了，心里痒痒的。”

王溪经过这几个月的闯荡，已全然不是十七八岁姑娘的样子了，在炕上盘着腿，用手点了秦德才的额头，就话里有话地唱起了《红灯记》里的一段，“……这里的奥妙，我也能猜出几分。他们和爹爹都一样，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猜出就好，猜出就好。你当铁梅，我就当你爹李玉和。你听我也会唱，‘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啊啊啊。’”秦德才也扯着哑嗓子唱开了。

那时的样板戏，不过就是江青一手导演的政治滑稽戏。那句词，分明就是在鼓吹封建“血统论”的陈词滥调。

“那我真要喊你声干爹了。”王溪是真想背靠秦家父子，再风光下去。

“做什么干爹呀，就是爹。跟爹亲一下。”秦德才把王溪抱在了怀里。

王溪不但没有装生气，又跟上了一段：“爹爹呀，……爹爹给我无价宝，怎说没留什么钱。爹爹的胆量传给我，儿敢与豺狼虎豹来周旋，……”

“噉，这个闺女好。”秦德才朝王溪脸上亲了一嘴，这才发现储小二在一边看着呢，“小二，你快找别的地方玩去。”

“是，是。”储小二知趣地赶紧翻身下炕走了，还在门框上“唉哟”撞了一下。

秦德才更是抱紧了王溪，放肆起来。

“我是你儿子的朋友哎。”王溪说着。

“我儿子是司令，我也是司令，反正你是司令太太了，伺候哪个司令都一样。”

“他今晚不回来吗？”

“他才不回来呢，不知跑哪儿疯去了。咱俩今晚闲着也是闲着，不玩白不玩。来，乖乖。”

“那你以后要让我当播音员哦。”

“那当然，这还不是我司令一句话吗。革命工作应该争着上。”油灯灭了。

王溪在交易、幻想、放荡之下，哧哧地笑着。

讲最革命的话，做最无耻的事。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24.4皮家的纷争

本镇、本乡时局的巨大变化，不仅搅起了不同政治力量的激烈争斗，而且连一些普通农家内部也卷入了这场漩涡，激起了翻滚的波涛。由于“八一八”进驻龙头镇，不但使两派的力量对比有了重大变动，也

冲击了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反应。这些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反应，在家庭内部也产生了激烈碰撞，使一家人也说不到一起、坐不到一起、住不到一起，有的因此而父子结怨、夫妻反目、家庭破裂、分崩离析，甚至还有相互揭底、相互仇杀。

皮安己一家虽然远没到这个程度，可也值得一说。

皮安己因为秦德才过来搅了一下，心里十分地不快正在炕头生气呢，手拍着炕沿，嘴里骂骂咧咧：“什么造反派，真他妈的乌龟王八蛋。”

皮安己骂的，实际上比这要难听多了。笔者没法进行实录，只能用一些大众化的词语了。

当他儿子皮高深从外面回来时，他还在不停地、反复地骂着：“什么造反派，真他妈的乌龟王八蛋，真他妈的乌龟王八蛋。”

“你在骂谁呢？”皮高深不解地问。

皮高深对他爹一向有矛盾，刚才在外面见了秦德才一伙的胡作非为，听着他爹也在骂骂咧咧，心里就更加不快。

皮安己听着儿子的口气，觉得又像是在训自己，也没有好气：“你管我骂谁呢？我是在骂那些造反派。”

皮高深虽然反感秦德才一伙，但对造反派并不反感，相反觉得这社会应当造反，而且他也参加了彭小宾的“红海洋”战斗队，自认为是造反派的一员。所以听到他爹骂造反派就不算了，“造反派怎么啦，造反派没有错，造反派是在跟着伟大领袖干革命呢。”

皮安己这才反应过来，他儿子也算是造反派，但嘴上不能服软，在儿子面前更不能服软，反而更拉大了嗓门：“我说这些造反派不是东西，就不是东西。你看那秦德才还是东西啊？”皮安己有他的理由。

“那是造反派里极个别坏人，秦德才不能代表造反派。”皮高深讲得也对。

“造反派就不是东西，就是在破坏革命，就是反革命。”皮安己有时也不讲理。

“造反派要都是反革命，那我成了什么啦？”

“我才不管你是什么呢。”

“造反派是反革命，那‘八一八’来占了龙头镇，你怎么不跑呢，不跟着进粮管所呢？”

“我怕谁啊？跑什么跑啊？”皮安己一想，不对啊，儿子要他跑干什么，是要占这个房吧？虽然皮安己就这么一个儿子，房子早晚也是皮高深的。但皮安己总觉得这儿子和他不对码，总想挤他、盼他早点死。皮安己的这个想法，对还是不对，我们无从判断，但皮安己由此对他儿子是很有意见的。到这时又扯上这事了。

“你想让我跟着别人跑，什么意思啊？就想早点占这房啊？”

“嗨，爹呀，你想哪儿去啦？”至少在这时，皮高深倒真是没往那儿去想。

“就是那么回事，怕我老不死，就想早点占我的房。”皮安己还真倔。这两派的事跟家务事扯到一起，那就更扯不清了。

“那，那……那我走！”皮高深气极了，吼了起来。

“你走？我没拦你。但你要走，还没人要你呢。”皮安己还在故意气儿子，以为他儿子反正也没地方去，就气气他。皮安己这点就不好，有了事情不知道往回收，而是一个劲地往前拱，非要争个出人头地，在别人面前争不过，就跟自己儿子争。

皮高深稍一愣，是哎，那粮管所是“红太阳”、“革联指”的地方，想去还去不成哎。不过他脑子转得也快，拿起炕上的被窝，卷起就走。“你管我上哪儿，你以为我就没地方住啦？”转身就出了房门。

这一下，皮安己反倒有点慌，下了炕，跟在后面直问：“哎，哎，你要去哪？”

皮安己的大女儿皮珊珊，听见有这么大的动静，从西间出来了。

皮珊珊一副懒慵，脑子却是很清醒。差不多十年前，皮珊珊是许配给王山的。虽然王山的家境赶不上她家，但是在生产队里，集体经济，说起来各家也差不了多少。而且王山人也勤恳厚道，皮珊珊心里是愿意的，虽然嘴里从来说过行还是不行。1959年反右倾，王山他爹老王头（王建悟）被打了个右倾，免去了生产队长的职务。自己的爹皮安己马上就转了风向，解除了这份婚约。其实，她也不愿意她爹这么做，只是作为女孩子自己没法说这话，尤其是她爹那个人不听劝，认死理，还坏脾气，她也就没管这事。然而却心灰意冷，整个人渐渐地变了，变得索然离群，变得孤单落漠，变得大事小事都与己无关，提不起兴趣了。尤其是，婚事一拖就是快十年，不用说找个般配的，就是不般配的也难了，更不用说心里也曾向往过的那种爱恋。人家都说是老姑娘脾气古怪，在别人看来是这样，然而她自己真的不这么认为。她自己觉得心死了，可是又不甘，在矛盾和煎熬中苦度时日。外人觉得皮珊珊这好好的闺女怎么变得冷漠刻薄、不近人情，有点不认识了。而她心中无名的怒火，只能常常向自己的家人发泄。尤其是她母亲前两年去世后，更觉得在这世界上是那样的无依无靠和无援。

她听了她爹和兄长的争吵，倒是直截了当地发言。她在家里已经是无所顾忌、无所避讳了。

“吵什么？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不是好东西！”

别看皮珊珊好像是超脱于生产队和家庭之外，但对这文化大革命还是很关心的。这关系到上至国家、下至千家万户前途命运的大事，能不关心么？而且，她的观点还与众不同，同样有一种超脱，对什么派都不屑一顾。

“那世界上就没有好人啦？”她爹问。

“有好人，那就是解放军。”珊珊答道。不知什么时候，解放军的光辉形象进了她的脑子。

“解放军？解放军也在帮造反派，也没有主持公道。”

“不许污蔑解放军！”皮珊珊对她爹也照样吼了上去，毫无父女情份。

皮安己被气得差点儿噎死。“你，你，你……”都上不来气了，最后才来了一句：“那解放军是你什么人，这么上心？”

“这你就别管，反正我就知道解放军是最革命的人。”

皮高深又踏进了屋门。他没走远，只是把铺盖搬到了南屋，听见大妹也参加进来，就又回来了。他对这个大妹这些年整天不出去，就在家里耍本事、呕气，也挺有看法。

“你别光在嘴上讲，还有半点革命行动啊？”

“你怎么知道没有行动啊？”皮珊珊当然也不会相让。

“在哪儿呐？我怎么没看见？”皮高深还步步紧逼。

“到时候，你看。”

“看什么？看什么？有本事，你找一个大军官回来。”皮高深这话讲得就不对，哪能用这话来刺妹妹的痛处。

果然，珊珊气极了，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拿起手边的笤帚就打过来。

“男不跟女斗，男不跟女斗。”皮高深知道大妹是要真打了，赶紧跳出了屋。

听得家里吵成这个样，小妹皮平平从西里间出来了。

皮平平是个平和善良的人，平时话也不多，有事情都是往好里想，要说话也是往好里说。

“姐呀，就少说两句吧，这家里还不够乱啊。”

“你也想管我啊，全家人都嫌我啊。”没想到今天皮珊珊怎么毛了，什么话也听不进。她总觉得别人都在嫌她，都在挤她，总觉得不但在队里，在家里也没有她立足的位置，对她妹妹也发起火来了。其实，平平还真不是这个意思。

“姐，我没这个意思啊。”平平非常愕然。

“都在看我笑话，都想挤我走。”珊珊都哭了起来，这是她多少时日来内心压抑的发泄。

“跟你好好说，也说不清。”平平也生气了。

“我说不清？你说得清？你有本事？有本事，找个小白脸去。”珊珊边哭边嚷着。珊珊说这话就更不对了。她也是在拿女孩子最敏感、最脆弱的话题来刺激自己的妹妹。

皮平平也气得转身回了里间，大哭起来。

“唉！这他妈的文化大革命，都弄了盘什么景！”皮安己看着家里闹成这个样，除了上火，除了咒骂，没有别的办法。

皮家的这点纷争算是很小的了，还更有家庭内部亲人间，在极左思潮的挑动下，完全置亲情伦理于不顾，相互告发、相互争斗、甚至相互残杀，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

皮家的这点纷争，也为他们家后来的变化，埋下了一些线索。

第二十五章 长途奔袭

1960年1月25日

25.1 难熬的日子

又是一个冬天。

“八一八”觉得已经在龙头站稳了脚跟，又想再试一下锋芒，于是接受了宗发奋的提议，由西北村的造反派带一支武斗小分队，长途奔袭，深入北山的高家庄，把老王头一家抢回来。既能够显示与国民党、阶级敌人势不两立的革命姿态，又能锻炼队伍的作战能力，鼓舞士气。

武斗队由青年农民组成，其中以复员军人居多（双方皆如此）。为了方便几十里的行军，他们不戴护甲，一身轻装，只拿半人多长的带尖铁棍。为准备夜战，所以上下都是黑色衣裤。事先还从北山的造反派那里打听了关押位置和沿路的情况。由秦德才、储小二领队指认，孙家乔的孙二赖还特别好事，主动要求参加，便一块儿加入进来。

老王头一家作为国民党家属，迁到北山的高家庄，开始住在村最后面靠山的一座破屋子里，就是当年关押高增光一家的那地方，村里也不会拿出别的房子给他们。尽管他们没有被剥夺公民权，但在村里肯定是种另类，没有正常的权利，也不参加村里的活动。白天劳动，有人在旁边顺便看着，晚上不得出门，平时不得出村。村里人对他们虽不像对地主那样有深仇大恨，但也是冷眼相待，不会有半点温情。

文革风潮一起，高家庄也闹腾起来，占上风的一派倾向于保守派。想再说一次，本书中所说的保守派、造反派没有褒贬之分。实际上，尤其是在村里，因何而分成两派（或三派，或更多的派），以及靠上了公社或县里的哪一派，往往是和这个村里以往的矛盾、历史因缘，和这派头头与公社、县里哪派头头的个人交往等等都有关系，不一定是某种政治态度的表示。村里的这派，对老王头一家厌烦得很，虽然为表明革命态度，也拉出来顺便斗了几次，可终究和村里的事情拉扯不上，反而觉得多了一个累赘。知道他们也跑不了，便把他们一家子赶到山上原先看林人的孤立小房去了。晚上由巡山的人捎带看一下。

冬天里其实没什么农活了。前两天，生产队长叫他们搬石头。山上下来的小河，来雨水时一时间冲刷力挺大，要在一些拐弯处垒上石头挡着，免得冲走了泥土。但这些弯曲在若干年之后会有一些变化，水流的冲击方向也会有变化，用来挡水的石头就要相应地调整。所以队长叫他们家把这个弯左侧的石头搬到下一个弯的右侧。两端虽然只隔着百多米，是再小也不过的工程。可这对于老王头一家来说却是十分的艰难。没有路，没有工具，只能扛着、抱着石块，在满是大小石头的河床中摸索着向下走。那些石块或是坚硬锐利，或是结着冰碴哧溜打滑。在重负下踉踉跄跄，可想而知；不时地摔倒，碰破了皮，更不用说了。

这天中午，没让回家歇气，还一直在寒风中干着。单薄的衣衫，饥饿的肚子，抱着沉重的石头像冰一样凉。人发虚，腿发抖。还要求三天搬完，眼看完不成，老王头劝着叫王大妈也过来一起搬。老王头的脾气是，虽然已经沦落到这个份上，也不能叫别人说闲话。

一家人无声地吃力地搬着。

忽然，山上有几个人过来，这是大队里的几个头（基本上还是原先大队干部的一些亲戚，因为大队干部属于当权派，现在还不能出面），出来四处看看他们掌管下的地面，看见老王头一家在搬河边的石头，有个尖脑袋就大为光火：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破坏水利啊！”

“是队长叫我们搬的。”老王头忙加以说明。

“这个队长怎么这么糊涂，这么搬不就把水冲到那一面了吗？给我搬回去！”

“怎么能这么安排活呢？你一句话，我们这几天不就是白干啦？不是拿人开心吗？”王山还要争辩一下。

“呸！你还敢犟嘴，就是拿你们开心，怎么啦？”那人捡起一块石头，就要扔过来。边上有个小平头在劝和：“算啦，算啦。跟这帮国民党去扯什么蛋，走吧。”又回头对老王头一家使个眼色说：“赶紧搬，两天搬回去。两天后搬不完，就开会批斗！”

待他们转身一走，王山气得把一块石头往地下一扔，叽里咕噜地往下滚得老远，“这个国民党，该我们什么事，真他妈的操蛋！”满腹的气只能往国民党身上撒。

“唉，不用生气啦，争也没用，就是这个命啦。赶紧搬吧。”六十六岁的老王头扛起一块大的石头往上走。

“前世做了什么孽，怎么摊上这个命。”王大妈抹着泪，当年的妇女干部也认起了命。

心里最难受的是丁妹，她悲伤的脸、悲伤的心，嘴上一言不发。她觉得，家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因她而起，她实在对不起全家。

王大妈抱起一块石头走了没几步，滑了一下。丁妹一直有意识地走在王大妈的边上，一见她打滑，丢下自己手里的石头赶紧去扶，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两人都跌倒在石头堆里，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王大妈痛哭着，丁妹一声也没吭。

王山扶起他妈。丁妹挣扎着起来。老王头回头看着，凄凉悲愤的眼神里有着多少含义。那是老天不公的怨恨，是抗争失败的痛楚，是保护不了自己家人的愧疚，是对命运的失望和无奈。

那一夜，他们回家挺晚。喝了几口稀糊糊之后，躺在窄窄的破炕上，劳累、伤痛和心忧，使他们迟迟没有入睡。这日子熬到哪一天才是个头啊！

天完全黑下来了。嗖嗖的风声外，屋外响起了脚步声，到了门口又停住了。王山怕有什么事，披上小褂，拿起根棍躲在门后。一家人都瞪起眼盯着门板，心里七上八下，不知道又要发生什么事情。意外的是，门只是被轻轻地敲了两下，门外问着：“躺下了吗？”

王山满腹狐疑地开了门。原来是白天那位小平头的大队干部。他一进来就把门推上，看了看挤在炕上的老王头一家，便叹了口气：

“唉，有些话，有些事，也是没办法。嘴上不对你们狠，我们也过不去啊。要被对方抓辫子的，说是包庇什么的。你们也不要往心里去。”这个小平头就是高梁山，当年看管过高增光的那个儿童团，是个平和良善之人。怕老王头因为白天的事心中有恨，会做出什么傻事来，过来看看。

这年头还真很少有人，尤其是还能这样地表示出来。老王头感激地说：“谢谢啦，你放心。这十几年我们也遇到的多啦，要想死早死啦。”

“我也是看着你们难，心里也不舒服。你们能这样想，就好。我不能多待了。外面还有两个在看你们的，你们也不用理。”

老王头要下炕送。高梁山摆摆手，关上门的时候特地拉大嗓门吼了两声：“给我老实点，明天好好干活！”那年头，连做好人也要装个假。

25.2如此回家

后半夜了。迷糊之中，老王头只听得不远处有“啊，啊”的打杀之声，接着便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过来，听声音还有不少人。

老王头一听不好，说了声：“有事！快穿衣！”便翻身下炕，屋门已经被踢开了，一股冷风卷进。好几个人冲了进来，前面的拿着手电筒直照。

“在这儿，在这儿！”“就是他们！”来的人嚷着，上来就抓人，直往外拖。

“你们这是干什么？搬石头给了两天时间呢。”王山以为村里人来找事。

还是领着认人的储小二实在，开了腔：“是王山啊，我们是‘八一八’的。要把你们带回龙头镇批斗。别罗嗦了，跟着走吧。”

来的人蜂拥而上，连衣服也没让穿好，把老王头一家架出去就拖走。

这时山下的村里像炸了锅似的，脚步声、叫喊声，吵成了一片。大概是情况不明，怕是“八一八”来攻打，高家庄的人也就在村口呐喊着，尤其是那个尖脑袋的，喊得最起劲，挥舞着胳膊直喊：“冲啊，冲啊，弟兄们！”后面挤了一大堆人却没有一个冲上山的。

“八一八”的人架着老王头一家从山上狂奔而下，倒也没费更多的事。可是要穿过二、三十里宽的平泊地，不是易事。尽管行动速度不慢，但山那边高家庄吵嚷的动静，还是惊动了山这边的一些村庄。毕竟这是非常时期，人们都没有敢放心睡大觉，一有声响就冲了出来。

村庄里立马狗吠人叫，这村又传到那村。一时间，几十里路上，虽是深更半夜，村村都被搅翻了，好在各村的人敢冲出来的不多，冲出来又敢挡在前面对阵的更少。海源的民风还不是强悍的那一种，不是被逼到墙脚也不会去拼命的。

只是到了李家泊，是大河北的最后一个村了。“八一八”的人从北山过来，也有一个小时了，李家泊的队伍已经排列在村东的路口等着。李家泊的李村长是铁杆“革联指”，对“八一八”这伙人最看不惯，亲自领队站在最前面。1949年国民党攻占龙头镇的时候，曾经敞开胸怀援救西北村的李家泊人，今天却要尖刀对阵。

“八一八”这边来回几十里的路途，已是跑得气喘吁吁，眼看快到龙头镇了，心里已不是很在意。冷不防路边有十几个人影，手里都拿着家伙。李村长猛喝一声：“最高指示！”

这最高指示，指的是毛主席的某一段语录，人人都要反复学习、背诵如流，而且一见面，都要相互对答，成了一种不可少的仪式。比如要买斤肉，有时还得这样：“世界是我们的。这肉多少钱一斤？”“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八角。”（那时可千万不能说成是八毛。那不成了“拔毛”了吗，死罪都有啊。）“天翻地覆慨而慷。来半斤吧。”“为人民服务。好了，拿走吧。”“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你这秤杆低了点吧？”“要斗私批修。这还低啊？”……现在看来，成了滑稽戏一样（说明：所讲的语录是各人自己临时挑的）。不过这最高指示，有时还有别的用处。在两派群众组织对立期间还成了接头的暗号，好比是口令。听得李村长一声喝，走在前面领路的孙二赖不明就里，随口应了一句：“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这是最高指示没错，但不是那晚“革联指”的口令。

“你们是‘八一八’的？”李村长追问道。

“是啊，我们去偷袭高家庄了。快让开一条路，我们好回去睡一觉。”在一旁的储小二是个没头脑的人，先照实说了。

“伙计们，打这些‘八一八’啊！”没等储小二说完，李村长又是一声大喊，抡起棍，带头就冲了上来。

“唉哟，是‘革联指’的。”别看储小二没头脑，腿倒是快，赶紧跳到一边，不过身上已经挨了一下。他是什么也顾不上了，撒腿狂逃，连“有鬼啊，有鬼啊”都没有来得及喊。

倒是孙二赖，虽然也是无赖之辈，这时他还敢上去挥舞铁棍一番。虽然手上被挨了一下，“八一八”武斗队的人上前把他保护了下来。

“不要纠缠了，快从地里走。”站后面的“八一八”的指挥说的倒是的。

这帮人赶紧拖着老王头一家从旁边地瓜地里走了。

李家泊的人因为情况不明，原本也是以保境为主，没有再贸然追击。

这种时候是看不到秦德才的，他始终藏在队伍中间。

老王头被一路拖回西北村，扔到西北场院冰冷的小屋时，已经气息奄奄，衣服撕烂了，脚都磨破了，鲜血淋漓。一家四口只剩下微弱的哼哼声。

直到中午，靳喜悦家的路过那儿，听见已经空了几年的屋子，怎么有了哼哼声，壮着胆子进去，才发现了他们。推着喊着，老王头一家也只能哼哼却答不上话了。靳喜悦家的赶忙叫来了衣大妈几个，忙活了好一阵，给他们端来了稀粥，这才使他们缓过气来。

几天之后，“八一八”为了炫耀战果，秦德才为了耍威风，而孙二赖为了解恨，就在西北村批斗了老王头一家。活活打死了老王头，这就是本书开始时王山老汉回忆往事的第三节的情景。有个情节在那一段里没说，当时开始是秦德才叫储小二拿钉板打老王头的，储小二还不肯，后来孙二赖肯出头，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充当打手。

“八一八”把可怜的老王头一家抓回来，成了他们炫耀的战绩。吹嘘成了“黑虎掏心”的离奇经历，在他们那一派人里面流传。孙二赖虽然回答最高指示不对，差点节外生枝打了起来，却被说成是敢于出来抵挡李家泊的人，掩护队伍顺利回撤，手臂还因此而光荣负伤，受到了表扬。储小二反到没有被夸奖。这下，孙二赖自己就更狂了，以为是“八一八”的头号英雄，要把秦德才和储小二都比下去。

“八一八”的头头们则感到自己的实力还可以，就开始酝酿着更大的行动。

第二十六章 一心向党

1960年1月26日

26.1相聚

“八一八”这一阵是最兴盛的时候，有的人就不够舒坦了。

辜连长就是一个。这地方上的事多少年就没参与了，文化大革命，还非得要求支持左派。两边都是群众组织，哪边是左派呢？团长说了，“八一八”是左派，所以“八一八”要进占龙头镇，他也没阻拦。可团长还是批评他了，说他从内心里同情保守派，还保存了保守派的实力，让他们毫发无损地退到了粮管所，而且至今还把保守派的红卫兵“东方红”保护在营房里。辜连长再三说那是为了制止一触即发的武斗，不能让双方群众打起来，互相残杀，血流成河。团长说那不行，革命不能有妇人之仁，不是看在你是老同志的份上，早就撤了你的职。

西北村的人进了粮管所，辜连长也管不着了，可“东方红”还在这儿，那是住不下去了。辜连长跟祖所长、杜家骏他们商量了以后，决定把“东方红”也安排到粮管所里。

辜连长回到营房后，他找到了肖胜利。

肖胜利正坐在床沿上看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呢。

“东方红”还住在兵营里的，只剩下五六个人。或者是因为跟家里或跟村里的观点不一致，不想回去；或者是革命热情还没有完全宣泄，还想等着更激情的下一幕。但肖胜利自己的迷惑则越来越多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怎么就分成了两派。如果仅仅是观点不一致、看法不一致那也很正常，怎么又变成了两派武斗，成了你死我活的流血冲突。而且不止是龙头，不止是海源，全国都是这样，很多地方还要打得更厉害，这是一场什么革命？他反复去想，也想不通，正想从“毛主席语录”里找答案呢。

看见辜连长进来，肖胜利连忙起身。对于辜连长把他们安排到营房里，他是很感激的，避免了一场很可能发生的流血冲突，给了他们一个安全平静的场所。

“在学习‘毛主席语录’啊？来了以后，吃住得怎么样？”辜连长先关心一番。

“很好，吃得跟战士们一样，只是我们在这儿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那倒没什么，不过有件事，想跟你说。考虑到这儿四周都是‘八一八’，你们是一步也不能出去，很不方便，也容易起冲突。我跟粮管所里的人商量了，你们上那里面住吧。”

“好，我也想过。到那里面，我们的人就更集中了，力量也更大了。”

“不是我不想留你们，事情很复杂。如果你们要找解放军，你们就去找野战军吧。他们的态度会更友好些。”那时，部队的观点，相互间也不一致。

辜连长派了一个班的战士，送“东方红”过去，还尽量让他们每个人背着粮，拿着油，甚至还扛上半只猪。纪社长也跟他们一起过去。

本来往西北方向走二十分钟就够了，这回可是先往南，快到海边了再向西，到了大河口再沿着河岸往北，绕了一个大圈。到粮管所跟前，只见它的大墙外十几米处挖了一条深沟，沟的前后都拉上了铁丝网，把粮管所整个围了起来，就像个壁垒森严的监狱。

喊话之后，大铁门上的小门开了。他们从搭在沟上的床板走过，进了院里。院子里可倒是热气腾腾，墙后面有几张大梯子搭在墙顶，有人站在上面把守瞭望。走来走去的男人们手里都拿着带尖的铁棒，邬中和正领着一帮年轻人在操练。来的几个“东方红”叫着要参加。

“好吧，好吧。那就过来吧。”邬中和这话一出，那几个中学生便高兴地过去了。

几排平房所有的窗都封死了，再用麻袋堵上半截。所有的门都只开半扇，再用麻袋堵上一半。仓库的大房子没有窗，里面暗得很，妇女老人们都坐在各自的门口。晚上就铺着草睡在地上，吃着统一的伙食，好在粮库里粮还是有的。

西北村的人们又一次过上了“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第一次是1949年国民党反攻，乡亲们撤到了李家泊。第二次是1959年大搞水利建设，男女劳力们都上了尖山北面的工地。这一次，是1967年，不到十年，人们又在地上的大通铺上睡在了一起，只不过是只来了这一派的人。

平金刚和杜家骏闻声都出来了，说：“好啊，好啊，还是在一起好。”

纪社长跟他俩握手，连说：“又要麻烦你们啦。”

杜家骏说：“哪里话，有我们的就有你的。咱们的上下级关系、干群关系还从来没像这样密切过。”

“哈哈。”大家反倒都笑了起来，走进了祖所长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除了祖所长，还有他在北京上大学的儿子祖云涛。因为学校里也是两派闹武斗，不如回家来了。

祖云涛是个冷静的人，虽然参加了学校里的一派，文革期间种种狂乱的活动，他都去了，但并不积极参与。属于一种既是个亲历者、又是个旁观者的特殊角色。对这场革命，既有亲身感受，又有冷静思考。尽管一时间无政府主义甚嚣尘上，并没有别人来管自己，但他知道，打人骂人是不对的，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不管什么时期，什么政府之下，都是这样。他没有像有些红卫兵那样忘乎所以，做出种种为法律和道德所不允许的事情。虽然那个时候，法律和道德都被砸得粉碎，然而在他的心中却依然静静地保留着。他更没有像有的学生返乡闹革命，把北京红卫兵的做派带到家乡，掀起老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成了风光一时的家乡造反派、红卫兵的高参，甚至太上皇，做出种种出格而无法后悔的事。直至文

革后期身败名裂，最终无颜再回来见家乡父老。而祖云涛看似个逍遥派，却是个惊涛骇浪中的思考者。不过是只去想，而不去说，也不能说。

纪社长一进屋见到他们，就说：“我这条命，都靠了部队，靠了你们各位，才能保下来的啊。”

祖所长说：“都是一条线上的蚂蚱了，拴在一起了。不说客气话啦。”

于村长听到消息也赶了过来，纪社长对于村长说：“你还真勇敢，就那么几个人就敢去拔钉子，真叫人佩服啊。”

于村长这股气还在，愤愤地说：“对恶势力就不能软。”

纪社长又说：“啊呀，人都在这里，万一他们打进来怎么办？”

“你别怕，我们也不是吃素的。真要讲打，那些狗娘养的打不过我们。”平金刚的劲头这几个月更盛了。

“纪社长，你放心。这高墙深院，他们要打，不死十个、八个是打不进来的。我想他们不会有这个胆量。”祖所长说。

“还有，我跟大家透个实话，县里的‘革联指’已经派了个‘文攻武卫’小分队，大概三十几人，悄悄地驻在旁边的赵村。河对面的王村，大概也驻了一百人。只要‘八一八’敢对我们动手，他们就马上出击，把这些狗娘养的围在泊地里，打它个措手不及。那样的话，‘八一八’就要吃大亏喽。”杜家骏凑近悄悄地说。

“那不事情就闹大了吗，真的要死人啦。”纪社长担心地说。

“这文化大革命，搞的是什么名堂？这是革命吗？”于村长愤愤地说。

“唉，真是搞不懂了。”平金刚说。

“那请社长讲讲这文化大革命到底是要干什么？”杜家骏说。

纪社长赶忙推辞：“不好说，不好说，看不透，不知道究竟是要干什么。”

“本来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走资派，防止修正主义，揪出刘少奇，但是有点搞过了头。弄得好像哪个省哪个县哪个公社都有刘少奇。”一直没讲话的祖云涛插上了嘴。

“我觉得这个观点就不对，下面哪有那么多的刘少奇。社教的时候说有三分之一的单位不在共产党手里了，我就觉得这个话不对。”于村长还是没忘了社教的事。

“你要打倒刘少奇，打倒就是了，何必还要弄成两派，叫群众相互打。”平金刚说。

“可别说远了，不能你啊你的。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杜家骏忙出来纠正。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平金刚皱着眉头说。

纪社长把话又叉开，说：“现在刘少奇也倒了，怎么这文化大革命反而更加激烈，好像刹不住了。”

“西方有个故事叫‘潘多拉魔盒’。把极左思潮的妖怪从盒子里请了出来，却再也请不回去了。这局势恐怕一时半会停不下来。”祖云涛说。

“你把北京红卫兵现在的情况说说。”纪社长饶有兴趣地问着。

“早就不是造反的红卫兵，而是武斗的红卫兵了。不是斗走资派，走资派都倒了，就相互斗。学校里也都分了两派，拿起了棍棒刀枪，搞起了武斗。学校里的地盘也分成了两块，中间拉起了铁丝网，搞得像朝鲜战场似的。这儿恐怕也是学北京的吧。”

“怎么全国各地到处都成了两派呢，县里省里都这样。”于村长又有了疑问。

“全国性的群众组织可没有，只到省里为止。”纪社长说。

“分成两派，恐怕是为了好控制吧。谁不听话，就用另一派打他。”祖云涛说。

祖所长觉得讨论可以适可而止了，便说：“还是那句话：相信党，相信群众。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愿望。中国是会有希望的。”他讲了一句原则话，倒也是对的。那时候，人们相互间讲话是不敢往深里讲的，能讲到这份上，已经很不易了。

肖胜利上后面一排房，去找他爹了。

肖校长还躺在房角旮旯地上的草铺上。屋子里很暗，只能刚看得出有个人在那儿。他已经连出去坐在外面、跟人家闲聊的兴趣都没有了，整天就这么躺着。

肖胜利摸索着进去，“爹，爹！”喊了一声。

肖校长才坐了起来，“你来啦。”就再没有言语，甚至都没有问外面怎么样了。

“这大白天的，怎么还躺在屋里，出去晒晒太阳吧。”

肖胜利硬把他拽到了门外。

阳光下，肖校长眨着眼睛居然有些不习惯。肖胜利看他消瘦、苍白得多了，心疼了起来。他知道，自己从小没了妈，是他爸又当爹又当娘地把他拉扯大。他爸在工作上也是兢兢业业，辛辛苦苦。这些年有多少不顺心的事，下面的老师们都怪他，他父亲也只能往肚里咽。他知道他父亲心中的怨闷，尽管他所知道的只是很小很小的一点。

“爹，想开点，你在这儿虽然一半时不能为党工作，可是这处境已经比大多数当权派好多了，至少没有皮肉之苦。城里面的校长老师，都被打得哭爹叫娘的。被打死的、自杀的，多啦。北京的红卫兵还有浇着开水把老师烫死的，蘸着老师的鲜血在墙上写‘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你现在这样，应该庆幸啊，应该高兴啊。”

“我不是在为我自己难过，虽然也应该为我自己的经历难过。但我现在是为我们的党难过，为我们的国家难过。几十年的革命，怎么到头来会弄成这样呢。姜雪花、郑排长这些革命烈士在地下能瞑目吗？”肖校长气得用拳头直捶墙，疼得又缩了回来。

“他们‘八一八’猖狂不了多少日子，很快会翻过来的。”

“这不是哪一派的问题。这好比一辆车往前跑，方向已经偏了，换哪个轱辘也不行，还是要翻到沟里的。”

“唉，爹，你也不用操这么多心，那样没好处。管他呢，你革命了几十年还没悟出这个道理，我革命才一年多，就明白了。再叫我造反当红卫兵，不会去干那傻事了。”

“你能明白，可是还有那么多人不明白，还在一批批地去参加武斗，去自相残杀，去相信那些鬼话。”

“这不是我们小小老百姓所能解决得了的。咱们能有个馒头吃，就不错了。”

“所以我就这么躺着了。”

26.2李辰上书

为形势的恶化，为国家和社会遭到损失，为乡亲们蒙受灾难而感到焦虑的远不只是他们。

最为忧心如焚、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的要数李辰了。

尽管李辰被安排在赵村的小屋，很少能与别人交流和来往，几乎被排除在社会之外。难得有张旧报纸，那就是稀罕之物了。然而他的内心始终没有平静下来。他也在看，他也在想。虽然他能看到的，只是很小的一个局部，但他想的却是整个天下。他从时局的动乱，想到了群众的苦难，想到了革命的前途，想到了国家的命运和希望。他跟祖云涛不一样的是，不但在想，还想说，犹如骨鲠在喉，要一吐为快，才能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和人民。

按说以他右派的身份，在那个血腥的年代，蜗居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小屋里，能安度些许时日，已是最好的景况了。可他还要冒着被碾得粉碎的危险，总觉得人民的安危、国家的安危比他自己的安危重要的多。

多少个不眠之夜之后，他又拿起了笔。

林海秀再一次苦劝他。

他说：“疯狂的车轮正在把社会带向崩溃的深渊，我要做一个挡在这车轮前的小石子。也许这个小石子起不到任何作用，但没有这样甘愿粉碎的小石子，这社会就会崩溃得更快。”

幽暗的油灯下，李辰在炕桌上奋笔疾书。

屋外月朗星稀，

李辰在出神地想着。

大雨滂沱，房檐下的雨帘像瀑布似的直下，

李辰撕掉一张纸，搓成团扔了，又接着写。

街门外，一队手持长矛的武斗队走过，

李辰只披了一件小褂，光着膀子，滴着汗珠，写着。

李辰终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扔下笔，靠在墙上，面前是几张写满了字的白纸：

“敬爱的党中央、毛主席：

我是一个普通的群众。对于当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我深感忧虑：

……一大批领导干部被残酷迫害……

……往日的邻里乡亲在相互仇杀……

……正常的工作、生产都被抛到了一边……

……一定是有坏人在破坏我们党、破坏我们国家……

……中央文革的一些做法，是明显不对的，偏离了革命大方向……

……社会主义应该是和平的、民主的、富裕的、人人安居乐业的社会……

……也许我讲得不对，讲得不全面，但我是一颗红心向着党，毫无保留地把心里话都对党讲。这是儿女对母亲的诉说……”

林海秀拿过来看了，无言。

她理解李辰，也觉得李辰想得是对的。社会到了这种局面，谁都不愿意看到。但是这种话，能说吗？当年反击国民党，是怎样的精神抖擞、英姿勃发。她甚至想，还真不如像姜雪花那样当时英勇牺牲就好了，落个光彩千秋；到如今，反到成了革命的打击对象，想做个人，都做不起来。而李辰对革命还这样一往情深、忠心耿耿，把心都掏出来了，党怎么还不知道呢？

海秀流下了眼泪，为李辰，为自己，为今天的革命。

海秀歇了一会，对李辰说：“我来帮你抄吧。”

李辰大为不解地说：“你的字写得不好，这是要给上级党组织看的。”

海秀说：“如果你写，上面一查下来，就知道是你的字。那你就是罪上加罪了。我来写，这字迹歪歪扭扭的，一时半会查不出来，上面不会想到是一个农村妇女写的。就算查到了，也不过是个农村妇女，能有多大罪呢？”

“还要追查吗？还有罪吗？我这里面一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思都没有，一心一意希望国家更美好。”

“1957年，你还反党了吗？”

李辰只能无语，非常感激地看着自己的妻子。

海秀用她在1965年围歼国民党登陆特务时被高增光刺伤的右臂、1949年抬宗发奋时受了伤的手指歪歪扭扭地抄写起来。

四岁的女儿婷婷在炕下，蹦蹦跳跳地玩着，扭头望着她妈妈：“你也要写作业啊？”

海秀满含深情又忧虑地望着女儿，嘴里只“嗯”了一声。

第二十七章 “三支两军”

1960年1月27日

1967年，上海“工人造反派”开始一月夺权后，形势并未如无产阶级司令部想得那么顺利。相反，全国各地，各派势力相互争夺更加激烈，局势更加混乱。为了使大局能按照预想的进行，那就要加入一个强大的制约、推动力量，毫无疑问，这就是军队。所以，1967年3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简称“三支两军”。根据这个决定，人民解放军由此正式、公开、全面地介入“文化大革命”，直接登上了前台，几乎是接管了整个国家各方面的管理工作。

“三支两军”的规模，可见这一条：“到1970年底，人民解放军共有干部战士279万余人次参加过‘三支两军’，当时仍在‘支左’的有40万余人，其中担任县及县以上革委会委员的有4·9万余人。”（请见：《‘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李可、郝生章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

辜连长离开军营，这么辛苦地跑来跑去，也就是为了执行上级下达的这个决定。

27.1军代表

上一章讲了粮管所里面的事，这儿再回过头来看看村里的事。

“八一八”能进驻龙头镇，跟部队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本书不想多讲部队在龙头、乃至在海源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和作用，不想多讲不同部队、乃至同一部队内部之间在观点上的分歧。只是说，这一阵子，驻龙头的这个部队是支持“八一八”的。

在“八一八”开进龙头镇之后，部队又要求在地方的支左人员进一步明确表态，加大对他们称之为革命左派的“八一八”的支持力度。辜连长已经是这支部队派驻龙头公社的军代表。在得知这个要求后，他是暗叹一声，一个劲地挠头。

辜连长已经三十岁了，是鲁南地区的一个农家子弟，很朴实很正派的一个人。当兵以来，什么事都兢兢业业，很想把事情都做好。但这两年来，开展了文化大革命，情况就变了，变得看不懂了。地方上出了那么多的事情，领导干部都被批挨斗，甚至被打死逼死，他很难理解。好在他是在部队里，可以不参与、不作声，不理解也没关系。可现在又非得要“三支二军”，非得要支持所谓的左派，就是那个革命造反派，这就把他难死了。他的思想又很正统、又很简单，也拐不了更多的弯。上级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可执行起来又那么地难，不是那么回事。真是把他难死了。这种时候，他只能闭着眼走路，凭自己最后一点良心，走到哪算哪。他今年三十岁了，忙乱之中现在都还没有娶媳妇呢。他更多地是在想，能娶个媳妇，早点回家算了。可这点心事。也不能跟别人说。

龙头镇，乃至各村，比如西北村的情况，他都很清楚。要说造反派，秦德才倒真是“造反派”，但那能是革命派么？杜家骏那一面，虽然人品做事可以放心，可是对文化大革命，他们确有抵触情绪。彭小宾那几个，对运动的理解，行为做派都比较靠谱，但是人太少，撑不起局面。这去依靠谁呢？

好不容易，没让双方打起来，避免了一场血战，辜连长觉得已经是费了大劲，尽了最大努力了。还要再坚决地支持“八一八”，他真的是为难了。可是在部队上，上级话就是命令，百分之百要执行，没有二话可说。这可怎么办？

辜连长只好来到西北村，开了个会，表了个态，算是走了这一步了。

会场依然是在大队部的场院。时间放在白天，因为好几天就没人下地干活了，白天没有事，用不着放在晚上开。

没有人管会场布置这些，就从屋里搬出来一张桌子，站在旁边。按理说，秦德才对村里的大权是垂涎三尺，此时正是表现自己或者说是拍马屁的绝佳机会，但秦德才擅长的是另外一套，想不到这些。倒是皮珊珊看没有人出来也不好，从家里拿来一个暖壶，倒了杯水，放在桌子上。这凳子，就成了这个“主席台”唯一的装饰。

会场上来的人，也不能算少。留在村里、没有跟“红太阳”出去的，基本上都来了，因为这是第一次由部队干部在村里开会。

辜连长，作为连长，也常给战士们开会，所以到西北村来给乡亲们讲个话，没什么困难，尽管他也不是会讲话的人。问题是讲什么呀，怎么讲？

“这个，我们开会了，啊？”这就开始了。

“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看起来是乱了点，但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我们自己，啊。”辜连长还把手挥了一下。这些话都是报纸上说的，也不得不照着说。

“根据上级指示要求，我们要进一步旗帜鲜明地支持革命造反派。是他们在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路线的斗争中迎着风浪，走在最前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敬！”

“噼哩叭啦”，下面只有三五个掌声，那是秦德才和储小二他们几个。

辜连长看这这冷清的光景，也只能尴尬地笑笑。

倒是王溪反应过来了，举起拳头喊了起来：“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

申光荣、周新春几个年轻人也跟着喊起来。申光荣是因为在学校里没有更多的事，也就回家住，参加村里的活动了。

看着气氛活跃了点，辜连长稍微有了点笑意，作为回敬。他也举起了手，喊了两下：“向革命派学习，向革命派致敬！”

秦有理这下高兴了，站起来连着喊：“向‘八一八’学习，向‘八一八’致敬！”

辜连长对这秦有理也是有看法的，心里是有数的，就说：“还有‘红海洋’呐。”

彭小宾就在下面。他不在意这些，就说：“我们算不算无所谓。”

皮高深可是要争：“怎么不算？我们‘红海洋’就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

申光荣也插嘴说：“那我们红卫兵就更是了。”

辜连长顺水推舟，说：“都是，都是，你们西北村的革命派还真不少哩。”

秦德才还要争：“那我们‘八一八’就是核心，要以我们‘八一八’为核心。”

有辜连长在，料想秦德才也不敢要横，大家都敢说了。

衣春玲始终不怕邪，直接就顶了上去：“你是核心，那好，你明天领着去干活。”

一听要干活，秦德才就闭嘴了。

衣春玲这一说，皮安己真的想起农活的事，大声地说着：“这农活真的是要紧事。两三天都没人下地了，这怎么能行？”

秦德才见是皮安己，又硬起来了，“你这个保皇派，又是个中农，没有发言权。”

衣春玲一步也不让，又回过去：“只要不是反革命，谁都有发言权。革命派不是哪个自封的。”

辜连长赶紧拉架，说：“别吵了，别吵了，都是革命派。我们支持革命派，好好革命，好好生产。”

皮安己又问：“现在这个样，那怎么生产呢？”

辜连长挠了下头，说：“这个，你们自己商量吧，我们就不包办啦。”低着头，走了。这倒不是辜连长不负责任，他真是拿不出办法。

秦德才来回拨弄着头，看看大家，想喊住吧，又怕真要领着干活，那可咋办？喉咙里“啊，啊”了两声，就没声音了。

大家也都没有理他的，一个个都走了。

周新春他爹不想参加这种会，叫他儿子来了。周新春参加大队的活动也比较少，尤其是在这种纷争中，站在后面，有点不知所措，也是来回拨弄着头，还没看明白，也就走了。

最后一个走的是皮珊珊。她等人走得差不多了，过来拿着杯子、拎着暖壶，再慢慢地往回走。她不是一个爱出头露面的人，在这种场合有这个表现，应该说是很特别的。但今天却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倒是有点意外。连衣春玲、王溪这些年青的女孩子，应该有这方面某种敏感的，也都没注意到。可能这时的人们，心思都放在革命上了。

走了几步，珊珊忽然有种感觉，是女孩子的那种特别的感觉。她回过头来，辜连长原地没动，在看着她。那感觉，是男人的眼光落在了她的身上。珊珊觉得，她应该做点什么。对了，应该把桌子搬回办

公室去，他一个人不好搬。于是，她走回几步，把暖壶放在地上，走过去，看了辜连长一眼，辜连长还在看着她。珊珊用手拿起了桌子的一头，辜连长这才反应过来，拿起桌子的另一头，搬进了大队办公室。

屋里，黑黑的，他俩把桌子搬到了最里面。放下桌子往外走，珊珊从辜连长身边擦过。那是她第一次靠男人这么近，几乎碰到了身上，心一慌，脚下被绊了一下（不知是辜连长的脚，还是珊珊自己绊了自己）。珊珊身体一晃，辜连长忙去伸手抱住。这一抱，可不得了，那么有力的拥抱，那么壮实的肌肉。珊珊的脸绯红了、发烫了，浑身的热血往上涌。辜连长看不出这一些，只是停不下来了，抱得更紧了。珊珊只觉得辜连长那热辣辣的眼光已经穿透了她的全身。当辜连长弯下头吻她的嘴唇，那浓浓的男人的汗味，珊珊觉得浑身都软了、醉了、融化了……

他们俩相互都见过，但没有交往过。这第一次的接触，就有这样神奇的效果，连一句话都没说。或许这就是古人说的，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焰。或许他们俩都在等待着这一天，等待着这个人。虽然事先没有明确，甚至没有明确就是他（她），但显然对方已在自己许可的范围内。我们不能更多地责怪什么，尤其是辜连长，说不定这还是个要开除军籍的大错误。但这能怪他们早已过了婚嫁年龄的不算年轻的年轻人么？是那个时代，没有给年轻人的恋爱婚姻以起码的正常的条件，把本来是很美好的事情变成这种苟合之事。

这件事的影响，要等差不多二十年后，才极大地发挥出来。

27.2革委会

春天，1968年的春天。但这个春天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希望和喜悦，反而是更多的烦躁和不安。

辜连长所在的部队，守备师，是怎么看待和部署日益紧张的局势，我们不得而知。部队上的事，我们也不想探究。但辜连长的上级对辜连长的支左工作显然是不满意的，认为是消极的、不得力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因为辜连长被“降了一级”，由驻公社的军代表，改派为驻西北村的军代表。师部又派了位汤副营长任驻龙头公社的军代表，加大支左力度，并要求在各大队尽快成立革委会。

辜连长对自己的变化，早就料到会有这个结果，也没有更多地去想，倒是这村里的革委会的班子怎么搭，要费思量了。民主选举？上级没说要民主选举，而且想通过选举的办法，肯定不可行。要按社员的多数意见，肯定还是杜家骏，说不定还能把于继承再选上来，那不就成了四不清下台干部重新复辟么？用所谓的“协商”？可是，怎么协商呢？要是找他们一起来开会，又会吵得一塌糊涂，弄不出个所以，不打起来就是好的。那就个别“协商”吧，先个别征求意见。辜连长能想到这些办法，作为一个连队基层干部已经挺不易的啦。

辜连长先找了彭小宾。彭小宾说这事很难。讲人数，“红太阳”是大头，可他们都在外面，不会进来参加。秦德才最积极，恨不得一把抢过来，可人品又太差，没几个人会听他，就算给他个革委会主任，也没用，当不起来。

“那你呢？”辜连长问，“你也是造反派哎，群众威信也挺高。你来当，‘红太阳’那边会接受的。”

“我？连长，你别开玩笑。我还背着四不清家属的黑锅呢。你不怕上级说你立场不稳？”

“连地富子女都可以算作‘可教育好’呢，你那个算什么？别有思想包袱，啊。”

“这，我也知道。不过这革委会的事，我现在还是不参与的好，怕会给你造成被动。”

话既如此，辜连长也就不勉强下去了。

辜连长又去找秦德才，这可是费了劲了，又不知躲哪儿睡懒觉去了。秦德才这阵子自在得很。因为很多人家撤出西北村，空了很多院子。秦德才就有这个本事，翻墙上人家家里找东西吃，吃喝拉撒就在人家屋里。

这怎么办？连叫个人通知他，也没人肯揽这差事。辜连长想到了周新春，这个小伙很年青、很单纯，也很好找。果然上周家，就找到了他。

小周在家反正也没事，就上街满胡同地喊上了。别看年纪小，小周也有他的头脑。他在想，怎么才能把他从哪个角落里喊出来呢？那就是用那小子最巴望的东西。

“秦德才，辜连长喊你出来当官咯！”

“秦德才，辜连长喊你出来当官咯！”

周新春一条条胡同地喊着，才两条胡同喊下来，秦德才就从一家院墙上探出了脑袋。

“你在喊什么？再说一遍。”秦德才还在擦着眼屎，听到有这种事，声音立马就传进了耳朵，一骨碌就翻身起来了。

“辜连长喊你出来当官咯。”

“是吗，是吗？你小子没骗我吧？你敢骗我，看我揍死你。”

秦德才连门也没开，就从墙上翻了出来，一溜烟地跑到南兵营去找辜连长。人家说，辜连长这些日忙得就一直在营房里。

“呸，真他妈的！”秦德才骂了声自己，怎么着急得没问下人在哪儿就瞎跑啦。

他又跑到公社大院，又跑到陶家大院，都没在。那个火啊。他这多少年也没有跑过这么多路，跑得都累死了，都提不起脚跟了。可提不起也得提啊，这不眼看要当官了么。

转了一大圈，辜连长就在大队部里。辜连长说：“想听听你的意见，这村里的革委会怎么安排好？”

秦德才一听，急得赶紧开了嘴：“这还用说么？肯定是我了。‘八一八’是响当当的造反派，我是西北村‘八一八’的头，不是我还是谁啊？还能把那些逃跑了的保皇派再请回来？他们也不敢进来啊。”

“也不能就你一个人吧？”

“还要有别人？要那么些人干吗？我一个人就行了，我都能干下来。”

“唉，”辜连长叹了口气，知道跟他真的没有更多地好说。

“要不行，再加上储小二，他当副的。社教时就是这么安排的，嘿嘿。”秦德才咧着嘴笑。

辜连长也只好一丝苦笑，一句话也没说，起来，走了。

“哎，哎，这还不行啊？”秦德才想追出来，可脚上累得实在抬不起来了。“妈妈的”，他在心里骂了起来，也不敢骂成“他妈的”，这就是秦德才的能耐之处。

秦德才知道这是个大事儿，赶紧去和儿子秦有理商量。秦有理一听，确实是个大事。“八一八”集中全县之力，进驻了龙头镇。龙头已是他们的天下，怎么这西北村就掌握不了实权呢？还是秦有理想得多，他去找公社大院里的“八一八”总部。总部的人说：“哎？这是怎么回事？就在我们的墙外，还掌握不了权？你们自己成立就是了，难道他们‘革联指’还敢进来抢？”

于是秦德才带着储小二、王溪，进了大队部，门口贴上了“西北村革委会”的字条。怕他们几个压不住阵脚，秦有理还领了几个中学的红卫兵过来。

秦德才终于坐进了大队部的办公室，虽然没有前一阵子在公社大院里那么宽敞风光，但也还是可以了。

下一步呢？下一步召开社员大会，宣布大队革委会成立。可是任凭储小二几个再怎么跑腿吆喝，愣是一个人也不肯来，连周新春那小子也没来。

辜连长知道了这事，很生气，这不是眼里没他么？。找到彭小宾问：“这种情况，你怎么也不来向我反映呢？”

“反映干吗？”彭小宾越来越看得开、沉得住气了，“反正他们自己成立也没用，谁听他们的？”

辜连长也靠不上彭小宾，便去找驻公社的军代表汤副营长。

“没经过我们允许就乱来，这是不可以的。”辜连长介绍完情况，最后说。

汤营长（在中国社会交往的称呼里，“副”字通常就不叫了）虽然很想跟上革命形势，来几下声音响的动作，无奈于对当地情况还不熟悉，也拿不出什么别的好办法，但话讲得简短、明确而又硬气，这是他的特点。

“他们可以、不可以，我不管。我只知道革委会是一定要建起来的，这是上级的要求。”

“他们这样搞，村里头别的人不服，又得打起来。”

“这个我也不管，再说一遍，我只要求你建立起革委会。至于怎么建，我不管，不用来问我。”

“唉，”辜连长低下了头。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这副营长比连长才大半级，就这样毫无商量的余地。忽然，他又抬起了头，说：“不行，那就我来管，还少一些矛盾。”

“这个可以考虑。连里面可以临时安排一个代理连长。”

“这样叫秦德才、彭小宾都当副主任，也就能讲得过去了。”

“那些具体名字，你也不用跟我说，我也不认识，我也记不住。”汤营长依然很干脆。

“到时候，请你到村里来宣布一下。”

“这个可以。”

辜连长从南门外叫上两个战士，进了西北村的大队部。秦德才正仰身坐着靠椅，两条腿拉扒着伸在桌面上，嘴里“吧哒吧哒”不知在嚼着什么，舒服得很呢。

“秦德才啊，我们驻公社军代表经研究认为，你们自行成立什么革委会是不合适的。公社汤营长会来正式宣布村革委会的组成名单。”

“是谁，是谁？你们安排了谁？”秦德才噌地坐了起来，一个劲地问。

“这个，你就放心吧，有你的。”

秦德才高兴得一蹦老高，“我说嘛。是哎，那能没有我呢。这西北村，没有我，还能有谁呢？”

“安排你为副主任。”

“啊？那主任是谁？”

“是我。”

秦德才一下蔫了。眼下的西北村，不管安排哪个当一把手，他都会去吵，会去闹。可没想到是安排了解放军，这可就没法吵、没法闹了。

“行啦，你也去安排安排吧。明天我们就开会宣布。”

西北村又一次开了大会。这回真的是汤营长亲自出马来了。可是出来开会的乡亲们要少了些。

等汤营长一宣布，辜连长一表态，乡亲们的反应既不热烈，好象也不意外。秦德才也没跳，彭小宾也没多少笑意。大家都知道难事在后面呢。

会后，辜连长真就搬进了大队部。

彭小宾几个在大队部的墙上贴了左右两条标语：一条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条是：“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以示欢迎。

皮珊珊又拿来了暖壶和杯子。

西北村这一段时间的态势，因为辜连长“支左”的不坚决，自己挡在前面，因而少了很多风浪，少了很多恶斗。这是西北村人不幸中的大幸。

又是几天过去了。天气一天天地暖和，这地里的活怎么办呢。现在两派不但镇里镇外分开住，还想你抓我的人，我抓你的人，这怎么干活呢？不要说有没有责任感，只要是稍微正常一点的人都会着急，

天不等人呐。

彭小宾和衣春玲都是二队的，彭小宾就叫上衣春玲，扛上锄上西门外地里去了。他们俩，两派谁也不会抓。

到地边一看，已经有人在那儿刨地呢。再一瞧，是杜长贵、齐成才几个。

“哎，哎，你们已经来啦！”彭小宾远远地就喊上了。

杜长贵见是彭小宾他俩，也很高兴，已经有段时间没见着了，以往都是好朋友啊，也喊上了：“啊哟，彭大主任，你也来啦。”

他们也都知道成立村革委会的事，碍在辜连长的面子，住在粮管所里的“革联指”一帮对此没表态。

“你看，你这就见外了吧？”彭小宾答道。

“嚯，还带了大妹子来啊？”齐成才也哄上了。

“谁是大妹子啊？我是你大姐呢。”衣春玲当然也不会让。

“啊呀，有段时间没见面，大家高兴过了，现在说正事。咱队的地，怎么安排啊？”彭小宾认真地问杜长贵。他知道，杜长贵他们能来，他爹杜家骏肯定是考虑过这些事了。

“你是主任，当然你安排啊。”

“这农活的事，还是你爹当家，照他说的办。”

……

几个年轻人说着，商量着，农活也干起来了。

这四队就不是这个情况了。

又过了几天，皮安己看队里农活的事还没有动静，急了，去找同队的秦德才。他知道，找他也不会有结果。但人家是副主任啊，不找他找谁？

好不容易找到了秦德才，对他一说。谁知还没等说完，他就两手一推，说：“我是战斗队，不是生产队。我只管革命，不管生产。生产的事，不要来找我。”

皮安己气得当面就“呸”的一声，扭头就走。

秦德才对这也不生气，就当没这回事。

再去找谁？皮安己进了大队部，直接找了辜连长。

辜连长无奈地说：“说实在话，我十来岁出来当兵，这农活的事，还真不懂。这样吧，地里怎么安排，您老先费点心。出力的事呢，我叫几个战士来帮忙。”

“这不是长久之计哎。”皮安己不但不说声谢谢，还在嘟囔呢。

“嗨，过一阵算一阵吧。谁知道哪天的形势又变了呢。”辜连长在皮安己面前说这种话，很不合时宜，大概也是心中装满了郁闷，都溢出来了，漏了嘴。

第二天，辜连长还真派了几个战士来四队帮忙。你别看，这事还在省报上登了条新闻。说是驻海源支左部队，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造反派，搞好春耕生产，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

但辜连长的这点良苦用心也没能改变局势的继续恶化。

第二十八章 腥风血雨武斗场

1960年1月28日

28.1 抢劫商店

“八一八”二、三百人住在龙头，几个月下来，吃用花费日渐困难，已经沦落到去撤走的老乡家空房子里翻箱倒柜找粮食的地步，近似于当年占了龙头镇的国民党兵了。有的头目就想起了砸合作社，砸信用社。当时的镇上，没有国营商店，也没有银行，都是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供销合作社（开了个百货门市部、农资门市部）、信用合作社（相当于银行的农村基层金融机构）。那个瘦高的总头目不敢表态，示意你们底下的人自己搞吧，他也管不了。

搞这个，武斗队不一定在行，孙二赖、储小二这些人来精神了。在一大堆“八一八”的人围观之下，孙二赖第一个用铁棍撬开了供销社的门，储小二等几个人一拥而入。只听得里面“乒乒乓乓”砸玻璃柜的声音。孙二赖兴冲冲地抱着一箱饼干出来，嘴巴还塞得满满的。

顿时，围观的“八一八”们也都往里涌，门口都挤不进人了。

储小二拿着铁锄把供销社窗外挡着的木板，“咔咔”地都砸了，玻璃窗也一起砸了，里面的东西，衣服、罐头、文具等等纷纷往外扔。每扔出一件，外面的人就欢呼雀跃、一轰而上，喜滋滋地口袋里装着、怀里塞着，抱着、扛着走了。不要的、散落的、踩踏的，满地都是。比起土改时分地主的浮财更热烈更轻松，近乎是一种喜庆的场面。马克思讲的“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可不是指这个。

彭小宾急急地走进公社大院，找到瘦高个的头，大声说：“你要立即下令停止这种行动。这是犯罪行为！我们革命派不能当土匪！”

瘦高个冷冷地说着：“我没有叫他们去拿，是他们自己去的。”

“这不是拿，这是在抢劫。我们革命派就要毁在他们手上啦。”

“就你是革命派，你们‘红海洋’革什么命啦？不就是贴几张标语，还尽在那儿碍事。”旁边也有人在冷嘲热讽。

“是革命派，就要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维护好革命秩序，保障文化大革命的正常进行。”

“正常进行？你拿什么保障这几百号人的吃穿用？你走吧，别啰嗦了。”

“不好了，他们要抢信用社了。”衣春玲也急冲冲地跑进来。

“抢银行，那可是死罪啊。不要犯糊涂啦！再不停下，性质就要变啦！”彭小宾大声喊着。

瘦高个停了一会，才极不情愿地转头对旁边的人说：“告诉他们，信用社就不要砸了。”

28.2杨余傅事件

1968年，大的形势是全国进入了一个武斗高峰期。有件事是起了很大的影响，那就是被称之为“文革”第五战役的“杨余傅事件”。当时，杨成武是代总参谋长，余立金是空军副司令，傅崇碧是北京卫戍区司令。3月22日深夜，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驻京团以上军队干部万人大会，由林彪宣布打倒上述这三人。毛泽东在凌晨1点35分前来接见了与会人员。他说，这件事不算很大也不算很小。

这又是一场大的震动。借用地震学的专业术语，就是不同政治势力的板块又发生了碰撞。某种意义上，这件事是“王关戚事件”的延续。文化大革命的争斗此时已经发展到对军队、对实际控制权的争夺。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想染指军权，借助“武汉七二零”事件向军队发难，矛头直指军内当权派，提出要“打倒军内一小撮”（这当然不是他们自己个人的想法），结果由于中央文革某些人的过于猖狂，触怒了军队实力派。极左势力无奈之下，为了稳定军队，只能丢卒保车，把这三个人扣上“反党乱军”、“毁我长城”的帽子，抛了出来。这就是文革的第四战役“打倒王关戚”。

然而，才几个月的时间，这“第五战役”抛出来的，竟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这个反差，只能说明，抛出“王关戚”并没能被平息高层争斗，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波涛，而且影响到了军队内部。更多的实力派之间（原有的和新起的，林和非林的，北京的和各地的，军队的和地方的等等），在打倒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没有了那块幕布的遮挡之后，就更直接、更激烈的碰撞起来，成了内部相互间的互殴。打到杨余傅，实际上就是军队内部林彪系对非林系的一场争斗，原先的次要矛盾一时间上升为主要矛盾。而且，左倾势力显然章法已乱，已经无法平衡和平息自己身边的这些争斗和倾轧，刹不住车了，之后即使是打倒林彪这样的大事也不再数是第几“战役”了。“杨余傅事件”就是这种无节制争斗的产物，它再次说明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场“伪革命”。高层的这种争斗，也很快激化了地方上在不同政治势力操控下的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争斗。

在“资产阶级司令部”轰然倒塌之后，各地上下出现了一些权力真空，各种政治势力拼了命地抢权、反抢权和再抢权，为此而上演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恐怖大片。此时，在很多地方已经分不出什么“保守派”、“造反派”了，都是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与对方拼死一战。尤其是在一些地方，到后来已不是两派组织对等的厮杀，而是与原有行政体系（政治学里叫执行层）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保守派”组织，在介入“三支两军”的部队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向对立的“造反派”组织发起毫不留情的剿灭。“三支两军”所起的作用，各地很不一样，是非功过一言难尽，本书不说了。但是几乎所有武斗最激烈的地区，都有部队的插手，比如，广西、四川、湖北、江西等地（在此期间，林彪集团的势力借机急剧膨胀，以致使毛泽东终于察觉原来林彪比刘少奇是个更大的威胁，于是有后来林彪事件的发生）。即使是由部队直接掌权的地方，他们对地方工作的运转也得借助于原先的地方行政体系、借助于所谓的“保守”组织。“保守派”在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的得势，也就可想而知了。

而且，这儿的“保守派”、“造反派”的称呼，都早已名不副实。所谓“保守派”，既不表明思想观念的保守，更不见行为方式的保守，全然不是那种循规蹈矩、谨小慎微的形象。他们对待对立面群众的手段，

照样是杀气腾腾、毫不留情，没有半点保守的样子。只是说，他们与原有的执行层有更多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所谓“造反派”，也全然没有了运动初期高喊“滚他妈的蛋，罢他娘的官”的精神头了，说不定已经成了尖牙利爪撕咬之下的几片碎肉。在一些“造反派”势力尚有余力的地方，两派的决斗更是到了你死我活、眼睛都要喷血的最后关头。应该讲，就血腥残暴来说，这是在极左势力鼓动下，早期红卫兵极端分子那些恐怖暴行的延续。

而对于最高层来说，刘邓司令部既然已彻底垮台，心头之恨已除，对那时响应号召、拼死造反的人，已经无心也无力多去过问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有时对某省某地的讲话、指示、表态，最多不过是加深了那里两派的裂痕，加重了争斗的激烈，造成了更多的反复，丝毫无助于那些造反派悲惨命运的改变，有时还不如不说。在造反派中，除了有些野心家、政治流氓应该受惩罚的之外，那些受旧体制压抑试图起而抗争的底层群众也同样付出了巨大代价。

由此，1968年夏天以后，各地相继发生了一些大规模武斗，海源也是这样。但各地发生武斗的直接原因，争斗的格局和表现很不相同。海源武斗更高层次的背景，那里省级、地市级几方政治实力派的背后角逐，他们对海源各派的各种指令，以及不同驻军的不同态度，本书无从查实。笔者在这儿只讲龙头和它周围发生的事。

28.3攻打县城

这年（1968年）的秋天。

“八一八”总部的头目们终于做出了一个大胆而冒险的决定：倾巢而出，突袭县城。偏隅龙头一角几个月来，使他们对全县的影响越来越小，指挥和联络极为不便。尤其是小小的龙头镇无法提供后勤支持，长此以往，将难以为继。而且他们探听到“革联指”的主力队伍已经部署在龙头镇西的王村一带，不如趁对方在县城力量薄弱之际，来个突然袭击，打它个措手不及，定能收到奇效。更何况上次奔袭高家庄，说明这个队伍还是有战斗力的，值得一试。从根本上来说，这些群众组织头头也是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想用暴力从对方手里夺取权力，至少要抢占生存的地位。

“八一八”把队伍分成两份，前面是主力作战部队，即“文攻武卫”专业武斗队，除留下三十多人留龙头看守外，其余二百多人全部出动；后面第二方阵是总部人员，和从龙头镇召集的武装人员，他们是作为护卫，相当于地方部队，只拿长矛、棍棒，没有护甲。储小二、孙二赖是很乐意参加的，对他们来说又是到了热闹的时候，也是显示他们有能耐的时候。而秦德才则是打人行，打仗不行。想推辞，总头目又不让，“你还是龙头的副司令呢，就想退缩啦。还要带队伍呢”。彭小宾和衣春玲的“红海洋”则坚决不去，总部也没办法，因为毕竟不是归他们管。

“八一八”的队伍后半夜从北门出发，绕过村庄，穿越田野。海源虽然是丘陵起伏，但毕竟是人烟稠密的地区，一时远近村庄鸡鸣狗叫。“八一八”在路上走着，消息也就传到县城了。

这将是海源在文革中最大的一场武斗。

当“八一八”走到预定的攻击地点，县城南面的县政府大院南墙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深秋的早晨，还有几分凉意，四周反而安静得很，只有树梢上的枯叶在晨风中飘落而下。

“八一八”拟定的战术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集中力量拿下县政府大院，对全县行使的权力自然就到手里了。而且，大院就在县城的边缘，南墙外就是开阔的农田，不必进行伤亡难以预料的巷战。翻进墙，打开大门，冲进去，就是大功告成了。

队伍全部集中在开阔的玉米地和地瓜地里，连城西南的小山丘也没去顾及。地瓜蔓被践踏在脚底下，正在生长的夏玉米更是被糟蹋得枝叶破碎、东倒西歪，挤在穿着旧军装的人群中。

武斗队员们穿好护甲，戴上加了铁丝面罩的柳条帽，五六人一组，其中两人扛着准备好的长梯，以备翻墙。铁丝面罩后面已看不清队员们的面目，只射出冷冷的光，望着前方。前方对他们来说，不是一堆高墙，而是生死相搏的拼杀，一场拿命下注的赌博。或者是胜利，或者是死亡，永远倒在这墙下。

这支队伍里也有西北村的人，除了秦德才、储小二外，还有迟一敬呢。

这迟一敬怎么会参加武斗队呢？话说迟一敬听说平金刚他们成立了“红太阳”，原本也想参加，不料碰上了皮安己，闹了矛盾。一气之下，转而投向了秦德才的“贫造队”（贫下中农造反大队）。不过，人虽然过去了，心里并不顺，加上他儿子迟解放跟秦德才的儿子秦有理不对码，所以也很少参加他们的活动。这次可不一样了，这次是“八一八”豁上老命，要和“革联指”拼一下。要求各村“八一八”一派的要全力以赴支援。西北村属于造反派、倾向“八一八”的，也就是秦德才的“贫造队”那有数的几个人。以至于秦德才还被“八一八”那个瘦高个总头骂了一顿：“原来你们就这么几个屁人啊？还当什么副司令啊？”秦德才弄得很没面子，所以这次非要迟一敬参加。

“我都四十啦，还要去武斗啊？”

“你也不去，他也不去，大家都不去。这红色江山，谁来保卫啊？”

“我连长矛也扛不动呀。”

“不行。扛得动、扛不动，是力气问题。去不去、参加不参加，是立场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

“没这么严重吧？”

“这还不严重啊？不去，就按背叛革命论处，就是逃兵，就是叛徒，立刻就地正法！”

“我家里走不开啊。”

“没时间废话了。储小二，把他拖走。”

储小二、孙二赖上来架着他就走。

“哎，哎，干吗呀？要他上哪儿去呀？”正在里间的迟解放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叫他一起上县城开庆功会，戴红花，喝喜酒。”

“啊？那还要拖啊？”没等迟解放明白，迟一敬就被拖走了。

迟解放还小，也拦不住他们。

迟一敬在想，他妈的，别看你们现在厉害，真到那时候，还不知道是谁捅谁呢。谁也想不到，一个憨厚朴实到极点的迟一敬会有这样的念头。

迟一敬就这样连拖带拉地进了武斗队。这时的他，身上挂着铁皮盔甲，盔甲的背里还都钉上了书本，以增加防穿透能力，手里拿着冰凉的铁制长矛，眼睛透过铁丝面罩也在看着前方那堵墙，然而心里却在发颤。他从没有穿过这种行装，更没有想到过要打人杀人。今天穿上这种行装，就要冲上去，其结果不是捅死别人，就是被别人捅死。他的心，不是激动，不是紧张，更不是狂跳，而是发凉。他觉得不但是心脏，而且手和脚都在发凉，尽管走了几十里长路，身上却热不起来，反而觉得越来越凉了。他甚至想到要找秦德才这个王八蛋算帐，回头看看，能看到铁丝面罩的后面都是无情的脸、无情的眼，一排排整齐地矗立着，到底是些什么人，都看不出来。他又想回家了，这家全指着呢，没有他，怎么能行呢？他要走，他要回家。可是，两边的铁甲武士都紧紧地靠着他，他几乎都动弹不得。尤其是后面的长矛，还紧紧地顶着他的后脊梁，想走也走不出去。

他都想掉眼泪了。他是个胆小的人吗？他自己觉得不是，虽然看起来他有点散漫，表现不是很积极。但他也想积极，愿意积极，只是没有让他表现的机会。他和他父亲迟得法从来就被别人看作是“落后分子”，他们家在村里没有什么份量，什么事也不会轮到他。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来，他参加“八一八”，不就是想积极嘛。以前要积极，得别人让你积极才能积极，文化大革命是你想积极就可以积极。但这样的“积极”，也太离谱了吧，这不是他的本意呀。他自己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到没什么，他挂念的是他家里，是他还在中学念书的儿子。家里全靠着他呀，全家所有的指望都在他身上呀。但今天他要把这条命交给谁呢？他忽而想到，这事不值啊，不值。但是想什么也不行了，进攻的号令马上就要发出了。

对面依然是静静的，只有墙上的几面红旗在飘动。

四周依然是静静的，静得怪怪的。

从头脑到心灵，迟一敬都空白了。

“同志们！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前进！”“八一八”的指挥在后面发出了号令。

“八一八”的队伍有节奏地高喊着：

“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踏着正步出发了。耳边是高昂的口号，脚下是震撼的大地，最前面的是在晨风中飘扬的“八一八”大旗。武斗的机器开动了。

迟一敬想不了那么多，也跟着一起向前走了。

“持枪！”号令声又响了。

队员们指向斜上方的长矛向前平举，直指前方。他们高喊着口号，“嘭嘭”地迈步向前，那声势能叫对手胆寒。

迟一敬慢了一步，后面的人差点撞了上来，把他推了一下。

“同志们，冲啊！”号令又响了。

“嗷！……杀！……”队伍发出一片喊杀声，在离大墙约一百米处，开始跑步冲刺。在喊杀声中，人们没有了恐惧，没有了犹豫，丢掉了一切思索，往前奔跑而去。

一直安静的对面的大墙，突然锣鼓大做，喊杀声四起。大墙的顶上，伸出了一排同样戴着柳条帽的脑袋，只是帽子上扎着红头巾，伸出了同样亮闪闪的长矛，高喊着同样的口号：

“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在这同样的口号下，双方开始了一场真刀真枪的厮杀。

迟一敬的双脚不知是发沉还是发轻，都有点不好使了，可还在不自主地随着口号的节奏往前跑。

就要冲到墙脚下了。但是在墙之前的一、二十米还有一条壕沟，壕沟的后面则是一排铁丝网，跟龙头粮管所前的一样，只是扎得更密更结实。“八一八”们虽然事前有所准备，有几个人下沟拿出大铁钳绞断铁丝。可是情势容不得这样做，大墙上的红头巾们突然扔出了一批批密集的砖头石块，看那半天空像是飞起了一群蝗虫。不一会儿，那些砖石就从半空中“噼噼叭叭”地砸在了“八一八”的队伍中。

“八一八”们到底不是身经百战、训练有素的部队，一时慌乱起来，“哇呀哇呀”地喊叫，东躲西藏，纷纷往回跑了。

“稳住！稳住！”现场指挥又在后面喊了：“这点困难吓不到英勇的‘八一八’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前进！”

第二次冲锋又开始了。

迟一敬随着队伍也在往前。这时队形已经乱了，他已经不必被后面的人顶着非走不可了。他可以放慢脚步，东瞅西望了。

最前面的人，已经剪断铁丝，扛着梯子，爬出壕沟，眼看就要到墙脚下。越是最后的历程，越是艰难。飞来的石块，在壕沟之前被打中，有盔甲的保护还只是疼一点；但冲到墙下，这石块就能把人打倒。

“胜利就在眼前！”指挥在大叫。后面第二方阵的人也高举长矛，舞动旗帜，拼命地鼓劲呐喊。

在大墙之前，在纷飞的石块砖瓦之下，“八一八”的队员们有的奋勇向前，有的拼命呐喊，有的惨叫，有的倒下……

在这最紧张的关键时刻，守卫大墙的“革联指”一方拿出了杀手锏。突然，一声炮响，火光、浓烟、碎石，一起飞来，“八一八”的人应声倒下了好几个。其实那并不是炮，那是个大的铁皮汽油筒，里面装上火药，用导火索连结出来，再塞上碎砖石，点上火，便像大炮一样轰然而响，砖石瓦块能横扫一片。就相当于以前的火铳，只是口径大了点。那东西杀伤力并不强，但用来对付长矛棍棒，那是足够了（不过药量不易掌握，也很容易伤及自己）。

“八一八”的人，愣住了。他们没想到对方还有这一手，光靠手持长矛的进攻显然已经无望了，他们连大墙上的砖头都没有摸到呢。

两声“炮”响之后，又是一阵呐喊。但那呐喊是来自于“八一八”的后侧，西南面的小山上冲下来大批“革联指”的武斗队员，也是一身盔甲，手持长矛，头顶的安全帽上都扎了一块红布。几百个红脑袋从绿树丛中涌出，在几面红旗的引导下，像一盆倾倒了的红色熔浆，直接冲向“八一八”的第二方阵。

“八一八”的队伍顷刻之间就垮了。

迟一敬身边的人，有的往回撤，去援救第二方阵；更多的人，则往东南方向跑了。还没等他想过来到底往哪儿跑的时候，“哗啦”一声，县政府南墙的大铁门也推开了，成批的全身盔甲、头扎红头巾的“革联指”武斗队员从大门里蜂涌而出。

在大墙外的这片地瓜地里，前面的“八一八”们已经逃出几十米了；从大墙里冲出的“革联指”们离迟一敬也只剩几十米了。在这两个几十米之间，留下的是踩踏得一片狼藉的断蔓碎叶，满地的砖瓦石块，在地上挣扎爬滚哀号的几名伤员，被丢弃了的“八一八”大旗，和站着不动的迟一敬。

四周是一阵阵的喊杀声，双方的武装人员在各自奔跑，红旗在摇晃。

“不要再继续下去了！”一个念头突然闯进迟一敬的脑海，他大叫一声：“我不干了！我退出‘八一八’！”说着摔掉了手中的长矛，又把头上的柳条帽扔到了地下，盔甲的缺口上露出了流着鼻涕和泪水的脸，以及头顶上那蓬乱的头发，在这疯狂拼杀的成百上千人中，唯有他是露出了人的面容。

前面逃跑的“八一八”中有人回头惊讶地看着。后面追来的“革联指”也惊讶地看着。

迟一敬有点站不稳了，左右地晃着，眼睛直直地看着端着长矛奔跑而来的“革联指”。

那锐利的尖刺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

长矛的尖端从他身边而过，端着长矛的“革联指”从他身边而过，没人理他。

当第一批“革联指”从他身边走过之后，后面有非武装的“革联指”人员过来把他领走了。

当把他领进“八一八”没有打下来的县政府大院时，里面还有好多人，男女老少都有。更有一些拿着半自动步枪的人，站在窗后。这些原本是民兵连的武器。“革联指”的最后一手就是，如果“八一八”真的打进

来大院里来，那就开枪射击，格杀勿论。迟一敬这时更明白了，“八一八”打了一场错误的战斗。

没想到的是，人们对他还鼓掌欢迎，女同志端来了茶水，还有的呼着口号：

“造反不分早晚，革命不分先后！”

“反戈一击有功，欢迎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28.4 储小二死了

“八一八”的第二方阵也在仓皇后撤。现场指挥要求第一中队殿后掩护，第二中队护卫总部。西北村的那几个就在第一中队。但队形已经乱了，所谓的“主力部队”第一方阵逃到了更前面的地方，秦德才、储小二他们的第二方阵被甩在了最后面，直接暴露在“革联指”的追击之下。

“革联指”的人渐渐上来了，把秦德才急得直蹦脚，恨不得能长上翅膀飞了。储小二端着长矛，边往后看边跑。

已经没有什么好看的了。

“革联指”到了一、二十米前，又停了下来。是要歇口气，整理一下队伍，最后调整一下心态。

储小二还在看着发愣。

突然，也没听见下令，“革联指”的队伍暴发出了震天的喊杀声，“缴枪不杀！缴枪不杀！”几十人、几十人一排，几十支、几十支尖尖的长矛就冲了过来。

储小二转身没跑两步，“革联指”的脚步就跨到了跟前。

储小二本能地转身，往后一看，那长矛的尖几乎要碰到了鼻子。他“哇”的一声跳了起来，大叫着：“有鬼啊，有鬼啊！”但这已经毫无用处，赶来的“革联指”的就像根本没听到这种声音一样，毫不留情用长矛捅了过来。

储小二连民兵训练都没参加过，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对方的尖刺刺进了腋下，血喷涌而出。

他“啊啊”地大叫，想用自己的长矛抵挡一下，可对方已经拔出来，对他的胸膛毫不客气地刺进了第二下。他们第二方阵，身上没有盔甲。

储小二倒在地上，手中居然还没有扔掉长矛，又被刺了一枪。他已经不能说话，嘴巴、鼻子都淌出了血，却还想挣扎着坐起来，又被刺了一枪。旁边又冲上来几个“革联指”，对着这个已经横躺地上，遍体血流如注，显然没有抵抗能力的人，连连刺杀。

倒在地上的储小二右手还朝上举着，随着“革联指”们长矛反复地刺进与拔出而晃动着。

事后，有人数过，储小二身上被穿了十一个窟窿。

储小二，就这样死了。

储小二是个有劣迹的人，跟着秦德才做过不少错事、坏事、缺德事。但他也是个可怜的人。他自小是孤儿，虽然名叫小二，却并不知道兄长在哪儿。没人疼，没人怜，一直是一个人，四处游荡瞎混。也就是集体化，使他还有口饭吃。有运动来的时候，能跟在秦德才的后面，蹦达几下，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日子。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他遇到的最大的运动，也是他最认真、最卖力的时候。没想到，杀“国民党”包金贵俩口子时，遇上活见鬼，把他吓得不轻。那时还真想过“金盆洗手，立地成佛”，改邪归正了。但是难啊，又有句话说：“江山易移，本性难改”。没过多少时日，劣性又起。不跟秦德才干，又能干什么呢？上次偷袭高家庄返回时，他居然还敢站出来挡住李家泊的人。他那时觉得十分的光彩，觉得自己还是个有用的人。于是这次出来，他也是认真的、卖力的。虽然他并不懂格斗技术，但他以为他还能再立新功。而这个结局是他没想到过的，即使在他闭上眼的时候，他也没弄清楚这是怎么啦。

他是个无赖，但还没有无赖到秦德才的地步。不懂得既要能当咬人的狼，又要能当摇尾乞怜的狗，该当狼的时候当狼，该当狗的时候要会当狗。又是狗的，又是狼的，这对储小二来说，太难了，当不了了，于是就这样躺下了，尽管是被动的、却永远地躺下了。

那时那么多人参加武斗，大概有这样几种情况：

好斗逞能，天不怕地不怕，把打人杀人当乐趣，把别人的和自己的生命都当儿戏；天真幼稚，头脑简单到不知轻重好歹，以为好玩，一直后悔怎么没碰上当初老一辈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的立功机会，这回可赶上了；政治热情高涨，不能让修正主义在中国复辟，真的是用鲜血和生命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也有被动型的：

别人都去了，我能不去吗？在中国，人都是有单位的；农民没有单位，也都是属于哪个村的。文革期间，看似单位不起大的作用了，可还有两派呢。在很多两派争斗激烈的地方，你不能不属于哪个派，要不你连睡觉、吃饭的地方都没有……

对方都打上门来了，你连退的地方都没有……

或者几种情况，兼而有之。

储小二属于哪一种，不去分析了。对这样可怜又可卑的人，既然已经死了，也不再去判别他是罪有应得呢，还是罪不当死呢，还是可怜他吧。

在十年文革中，死去了无数的人。

主要有这四种情况：①被批斗的走资派、知识分子、黑五类、“有问题”的人，和他们的家人以及被牵连的人。他们中有被活活打死的，有被逼致死的。其中有些所谓“有问题”的人，即使是按当时极左的政治标准也够不上是“阶级敌人”，完全是由各地大小有权者（以前的有权者和临时的有权者）出于各种莫名其妙的念头而被随意扣上的。②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所致。③在一派失势之后，其成员和家人被另一派报复杀害。比如，1967-1968年间，广西两派的武斗和随后的大屠杀，大批尸体抛入邕江漂流而下直至海上，引起世界震惊（具体事例，请见：《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组，广西人民

出版社，1990年）。④看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质，起而反抗，发出正义的呼声，被极左势力杀害。⑤毫无道理，被极端狂热分子一时性起，随意杀害。

文革十年，全国到底有多少人死了多少人，始终没有一个较为确切的数字。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文革”总结时讲到了，十年“文革”“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请见：《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董宝训、丁龙嘉，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

死了那么多人，除了少数高层领导，对于大多数的死难者，几乎没有什么祭奠和表示。每念于此，痛彻心肺。我们能对得起那几十万、上百万的冤魂亡灵吗？而且在这些事件中，不论是被杀的还是杀人的，大多数都没有什么说法。被杀的，混于烟海；杀人的，除了少数失势的一派有被追究，其他也几乎都没有什么说法。

就武斗而言，不论这些死难者，曾经是充满政治热情的热血青年，还是无辜的误伤者，不论是被迫充当炮灰的无奈者，还是有劣迹的好事者，都这样无声无息地逝去了，永远地逝去了。到今天，只能说，不论哪一派的武斗死者，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都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受害者。没法肯定，没法褒贬，更不能谴责。要谴责，只能谴责极左势力。对他们受害者而言，只能是寄托哀思和给以同情了。

28.5 铩羽而归

秦德才是在不远的地方，眼看着储小二惨死在长矛的反复刺杀之下，早就吓得魂破胆散，还没等“革联指”冲过来，就两腿一软跪了下去，高举双手，嘴里直嚷：

“我投降，我投降！那‘八一八’真是杀千刀的，王八蛋！我是受蒙蔽的革命群众啊！”

又觉得这恐怕还不够，又朝跑来的“革联指”连连磕头：

“饶了我吧，爷！饶了我吧，爷！我家上有老下有小，老婆孩子一大堆。饶了我吧，爷！”还真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叫人看了不能不信以为真，动恻隐之心。

秦德才被拖走了。

还是孙二赖跑得比兔子还快，早就没影了。

秦德才被押进县政府大院的时候，可没有迟一敬那样的好待遇。在一个大会议室前的空地上抱头蹲着，四周是端着长矛的“革联指”。

秦德才大气也不敢出，心里在盘算着怎么逃过这一劫，怎么将功赎罪。得检举揭发个什么事，什么事呢？刚才看见储小二被打倒了，看样子伤得还不轻。对，就说他，反正看样子他也说不了话了。就这小子对“革联指”有深仇大恨，抢商店、抢银行就是他领的头。这次打县城，西北村的几个，就是他领队。对了，西北村来的人，还有谁？还有迟一敬。咦，怎么没见到他呢。这小子虽然参加了“八一八”，也是心怀二意。说他什么呢？一会儿就向“革联指”告发，迟一敬这人是漏网富农。对党和政府有深仇大恨（刚才

讲了“深仇大恨”，这儿怎么又讲了，不能换个词吗。嗨，你能要求秦德才掌握多少词汇呢？）。他参加“八一八”武斗队，就是要推翻“革联指”红色政权，可不能饶过他呀。

秦德才心里想着这些，正为自己的锦囊妙计暗自高兴。这时，有“革联指”的人过来喊了：“你们过来看看，有没有你们认识的人。”

秦德才被押着，走到大院门外，只见地下摆着一排四具死尸，盖着白布，露着脑袋，个个都是惨白的失血的变了形的脸。

“你们看一下，这几个是什么人？哪个单位的？”

秦德才走近一看。“哇！”立即闭上了眼，身体晃了几下，差点没倒下来。尽管是那么可怕，鬼一样的脸，还是一眼能看出来，那个不就是储小二吗？秦德才又像活见鬼那天吓了一跳，今天可真是死活见了鬼了。怎么？他死啦？刚才还想把污水往他身上倒呢，这下倒不出去了。

中午，秦德才他们几个“八一八”的被俘人员，关在了县政府大院里的一排平房里。

“开饭了，开饭了。”

他们挤到了门口来，一人给一个窝窝头，发一个碗。那边有人提过来一个水桶，给每人舀一勺咸盐汤。

秦德才捧起碗，抬起头，看那舀汤的人。这一看不打紧，惊得他把碗都掉到了地上。

“你，你……是你？你怎么在这儿？”

那提桶舀汤的不是别人，正是迟一敬。早晨还是跟着“八一八”的武斗队一起出来的，才半天时间，这迟一敬怎么就在县政府大院里面了呢，而且还戴上了“革联指”的红袖章。

迟一敬看到秦德才，心里也气得不打一处来，把勺往桶边一敲，不打算给他舀汤，嘴里还骂着：“你这个王八蛋，也有今天啊，也被抓来当俘虏了吧。”

“我，我……我是起义有功人员，我就好比是傅作义。”秦德才居然还知道1949年初对北平和平解放有功的傅作义。

“呸！你算什么傅作义，就是条叭儿狗。”迟一敬想不出什么历史典故和名人，就知道骂他。

“你，你，……你在这儿还骂人，你是个叛徒，造反派的叛徒。”

这句话叫旁边看押的“革联指”的人听了，一棍子就打了上去。“你他妈的活腻啦？当了俘虏，给你吃，给你喝，还骂人，别不知好歹。”

秦德才“噢”的一声，便没了脾气。这一棍子，把他赎罪立功、栽赃陷害的幻想都给打没了。

“这汤就不给他了。”迟一敬还知道趁机给他穿个小鞋。

“好，不给了。”“革联指”的人说。

秦德才嘴里干得咽了两口口水，眼睛瞪着迟一敬，心里还不知道在怎么骂呢。

“八一八”的残兵败将往龙头镇退去。一路上偃旗息鼓，垂头丧气，还有不少人悄悄地离队而去。

“革联指”也没有出来乘胜追击，也没有组织各村在半途截击，也没有出动在赵村一带的另一支主力趁机夺取龙头镇。按说这些都有很大的胜算把握，甚至能把“八一八”一举歼灭。“革联指”的头头们是看到这几步的，知道也可能会成功，但要付出伤亡的代价。这种伤亡之大，往往是无法控制的。他们知道“困兽犹斗”的道理，不想把“八一八”往死胡同里逼，再逼得狗急跳墙。他们不想承担、或许也无法承担可能会有几十条生命死亡的责任。时间会耗去“八一八”的信心、能量和资本，他们只要等着就行了。

“八一八”快回到龙头了，队伍也渐渐收拢了，人数只剩下出发时的一半。大家零零散散灰溜溜地走着。忽然，前面出现了一支队伍，挡住了去路，只有李家泊的人敢这么干。又是李村长领了三十多人，手持棍棒，站在地头。

“八一八”的队伍中，有些人是觉得失望、泄气，但也有人觉得这一仗憋气，内心里更加仇恨。无处发泄的怒火，前面居然还有人敢挡，便迸发了出来。刚才还萎靡不振的队伍，突然像吃了兴奋剂，反到振作起来，一阵冲杀。李家泊的人毕竟寡不敌众，往后退去。

“八一八”的瘦高头头尖声叫着，“抓呀，快抓呀，多抓几个。这是以后我们和‘革联指’对阵的筹码。”

“八一八”里也有铁杆的，不顾疲惫和伤痛，居然也抓了六、七个人过来，其中包括李村长。

“八一八”的队伍又回了龙头镇。先忙着清点人数，就知道回来了多少人，少了多少人。但是不知道少的人里面有多少人是跑了，有多少人是被对方抓了，尤其是不知道到底死了几个人。想评烈士、献花圈、开追悼会都不好办。

阴沉的乌云笼罩着“八一八”的驻地。

第二十九章 残害

1960年1月29日

29.1 剜眼

被抓的李家泊的人关到了中学里，成了某些“八一八”人员发泄仇恨的对象。天天挨揍，遭了不少罪。尤其是那个孙二赖，跟秦德才一样，武斗时逃跑在先，回来后比谁都神气，打人的活比谁都积极，下手比谁都狠，从来不管别人死活。

李村长单独关在一个屋子，坐在冰冷的泥地，上身绑在竖起来的课桌上。天天受刑审问，其实并没有什么口供要问，就是在折磨。“八一八”里龙头公社的人都避开了，因为多少都认识。只有这个孙二赖气焰嚣张、赤膊上阵、当面就打。

这会儿，孙二赖又来了，把门“砰”得推开就不再关上。冷风呼呼地往里灌，冻得李村长直打哆嗦。

李村长看见又是姓孙的进来，头一撇，不去正眼瞧他。

孙二赖又气了，心里想着：“好啊，老小子，不把我孙某人放在眼里。看我怎么收拾你。”便喝道：“姓李的，转过脸来，看着我！”

李村长就当没听见，没动。

孙二赖飞起一脚踢过去。

李村长一声惨叫，就是不转过脸。

孙二赖又是一脚踢去。

李村长一声惨叫转过脸，血丝的大眼，大叫：“你这个无赖，你要我看着你。好！我就是要看着你没有好下场，看着你下地狱！”

“你说什么？王八蛋！”孙二赖跳了起来，面对李村长仇恨的双眼，他害怕了，他竟然丧尽天良、惨无人道地将罪恶的、肮脏的手指戳进了李村长的眼睛。

李村长长的惨叫，惊动了整个中学的校园。不少“八一八”的人进来看个究竟。

只见李村长的左眼眶里，血水、黑水、灰白的水一起往外流。几条细细的管脉连着已经破碎的瘪下去了的眼球，夹杂着凝胶似的碎块，挂在眼眶外。李村长疼得浑身直打颤，一声声地嚎叫着。

李村长的眼睛竟然被孙二赖活生生地挖了出来！

那些“八一八”的人也面面相觑，不敢说什么，忙把头头叫了过来。

那个瘦高的“八一八”头目铁青着脸，一言不发。

李村长的眼睛被挖掉了！这消息像重磅炸弹一样震撼了整个龙头镇。不但“八一八”的头头们过来了，连经学文、鲁队长和南门外的辜连长，以及其他听到消息的人都过来了。尽管在“文革”中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但活生生挖掉眼睛却比打死一个人更让人吃惊。

鲁队长没参加“革联指”，也没参加“八一八”，但他有另一个身份：龙头“八一八”司令哈联文的妹夫，所以他在龙头镇出入无碍。一听说这消息，立马就赶了过来，他跟李村长都是熟人。进屋见了李村长还被绑在课桌上，眼珠挂在眼眶外面，指着那头目就骂起来：“你们‘八一八’还是人啊？”跪在地上就替李村长解绳，边哭着说：“李村长啊，李村长，我不知道你在这儿啊。我要知道怎么也不能让他们下这个毒手啊。”

经学文也急得在吼：“还不往县医院送啊？”

彭小宾和衣春玲匆匆地跨进屋，一边扶起李村长，一边说：“我们刚才跟县医院打电话了，可他们一听说是‘八一八’的地盘，不敢派救护车来。他们推说治不了。”

“那就送部队医院去，直接送到黄港去，我去打电话。”辜连长跳起来往外走。临到门口，回头对“八一八”瘦高个的头目说：“你们是在往自己身上抹大粪，还用别人来打倒吗？”辜连长一路跑步回连部，这时的连部已经有电话了。

半个多小时后，驻在县城的团部来了辆吉普。一位副连长和衣春玲陪李村长去黄港部队医院了。

李村长的眼睛被挖掉，使“八一八”彻底丧失了人心。

龙头镇四周“革指联”占据的各村群情激愤，尤其是李家泊，更是全村男女老少淌过大河到了北门口，要求释放亲人，惩办凶手。

粮管所里和赵村、王庄一带的群众也是义愤填膺，不听头头的苦心劝阻，拿着棍棒，在西门口和“八一八”对峙起来。

粮管所里的人们也在激烈辩论，到底怎样应对。

平金刚是竭力主张打出去，借这机会收复龙头镇。于村长也是坚决赞成这个主张。

杜家骏说：“这是个大事，我们一个村不能自作主张、自行其事，要慎重，要听从总部的统一指挥。”

纪社长说：“不能感情用事啊。要打就会流血，就有伤亡，要尽量避免。‘八一八’气数已经不长，多行不义必自毙。等着看吧，有人会收拾他们。”

祖所长说：“是啊，‘八一八’自己在走向反面，等它烂透了，自己就会从树上掉下来，还用我们动手吗？”

“那西门口、北门口的群众怎么办？弄不好，动起手来，他们要吃亏的，”邬中和说。

“派我们‘文攻武卫队’去保护他们，维持一下秩序。”平金刚说。

“不可以，那样‘八一八’会以为你们要去打他们呢，会搞得更紧张。”纪社长说，“我打个电话跟辜连长联系，请他们部队出面维持，把双方隔离一下。”

“对，对。”大家都点头。

粮管所也有了电话。有了这个现代通讯设备，尽管还是手摇的，还是人工转接，可方便多了，这种关键时候起了大作用。十几分钟以后，部队战士就出现在西门和北门，把双方隔离开，把群众劝阻回去，又一次避免了流血冲突。

在大河对岸王庄的“革指联”前线指挥部”里，这一边的头头们倒是在偷着乐，“八一八”出这样的昏招，真是求之不得，正中下怀。

从“八一八”攻打县城失败，汤营长就被部队喊过去了，不知是追究责任还是再次面授机宜还是别的什么，总之这时没在这儿。所以最忙的就是辜连长了，有很多话电话里也不好讲，就骑着车在“八一八”和“革指联”之间两头跑。最终在南门外的连部里，把双方头目找来，坐下来面对面对谈判。

“八一八”自知元气大伤，就算有招架之功，也是力不从心了。而“革指联”也不想冒险大动干戈，来个以时间换空间，拖下去，时间对“革指联”有利，不急于求成。辜连长又拿来中央的两个制止武斗的文件，话就好说了。在此基础上，双方达成了协议，主要是：一、交换俘虏，释放全部关押的对方人员；二、互不侵犯，停止武力挑衅行为；三、允许双方的非武装人员相互来往；四、龙头镇的群众可以回村居住，“八一八”保证其安全，尽快恢复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至于惩办打人凶手，因无处理文革期间打人杀人事件的相关办法，暂时搁置，眼下先由“八一八”禁闭关押，待运动后期处理。

这是文革开始以来一年半多的时间里，在恶风险浪之中，难得的一步。

29.2交换俘虏

1968年末，初冬的一天，双方交换俘虏，地点在西门外。

“八一八”来了二、三百人，在东半边站队；“革指联”的人更多一些，在西半边站队。中间由部队的战士隔开。

两边的人隔着战士相互看着，好多都是几个月来第一次看见。有的相互间怒目而视，也有的相互间会心一笑，还有的举起手打起了招呼，大多数的乡亲们之间并没有那么多的势不两立的刻骨仇恨。

会上播放着一个与现场内容文不对题的毛主席语录歌：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

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之间是革命的战斗的友谊，

是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

大会由辜连长主持。他站在大白果树的树桩上简短地讲了一些要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要讲政策顾大局、搞好革命大联合之后，双方交换俘虏开始。

两派人员的前面留了一片空地。中间划了一道白石灰线。辜连长和几个连队干部、战士站在线上看着两边。东面是“八一八”的几个头头，西面是“革指联”的几个头头。双方要释放的人员都已带到了空地两侧。首先是“革指联”这边放人。

县“革指联”的头，先拿出一张纸，说道：“首先宣布起义人员名单。有一些受蒙蔽的群众，被裹胁参加了“八一八”。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感召之下，他们提高了阶级觉悟，认识到参加“八一八”是走错了路，站错了队。现在他们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们表示热烈地欢迎。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希望回到本村本大队参加文化大革命。今天我把他们领回来了。也希望有关大队要热忱地欢迎他们，今后要一视同仁，不要有任何的歧视。从今天起，他们也是我们革命队伍里的一员了。”下面一片掌声。

对面“八一八”的人，马上就是一阵阵“抗议”、“抗议”的吼叫。辜连长赶紧对“革指联”那人说：“不说这些了，就念名单，带人上来就行了。

于是，那“革指联”的头头接着宣布：“他们是：……西北村的迟一敬……”

除了会场上的掌声，还引来了西北村人的一片惊讶。他们不知道迟一敬参加了“八一八”的武斗队，尤其是惊讶于迟一敬还戴上了“革指联”的红袖章。西北村人自己最多也就是戴上本村的“红太阳”。而迟一敬竟然戴上了县里的袖章，比他们还高一等呢。

这又引起了同是中农的皮安己的不服。他使劲从鼻孔里往外嗤嗤地出气以显示他的不满。鲁队长赶紧在边上轻轻地捶他，示意他这种时候要顾大局，别显鼻子显眼。

杜家骏代表村里上去，跟迟一敬又是握手，又是问候，把他领了下来。

迟一敬又上了主席台，又是大队干部亲自上来欢迎他。他这辈子也没受过这个待遇。

“革指联”这边接着释放二十多名在上次“八一八”进攻县城时俘获的对方人员，其中就有秦德才。西北村的人们看到了秦德才。他被带出来的时候，贼头鼠眼地四处张望。当他越过中线，走近“八一八”队伍的时候，突然跳起来大叫：“我又回到革命队伍一边啦！‘八一八’万岁！‘八一八’是我的亲爹亲娘啊！”说着便涕泪俱下。

“八一八”这边的自然是欢呼声起，热烈鼓掌。

“革指联”这边的人，尤其西北村的人，知道秦德才是个什么东西，则嗤之以鼻，唾骂不已。

而后是“八一八”放人。

“八一八”这边释放六个李家泊的人，五个被扶着出来，头上有纱布，脸上有伤痕，走路一瘸一拐，满眼冒着仇恨的怒火，有一个还是用担架抬出来的。

那担架抬到中线，由“革联指”的人接手抬过去。

五个能走路的人走过中线，走到自己人跟前，都伏肩而哭，又转过身对“八一八”的人破口大骂。

“革联指”一边的群众见此情景，都怒吼起来，有人自发地呼起了口号：“‘八一八’是反动组织，坚决消灭它。”马上一呼百应，“消灭‘八一八’，消灭‘八一八’”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人群要动起来了。于又发、迟解放这些青年都要冲过来。

中间的解放军战士坚决地把他们挡住。

尤其是李辰，最是激动了。他从下面的队伍里扑了上去，拉着刚过来的五个人的手“哥呀叔呀”地直喊。李辰是李家泊的人，当然和他们都拉得上亲戚关系，打在他们的身上，也是筋骨相连。

林海秀拉着李辰，不让他太冲动过于显眼。其实她是不希望他出来，临来时她劝过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尽量不要出现在公众场合。李辰觉得自己本家这么多人被抓了、被打了，现在放出来，不过来看一下，于情于理讲不过去。

但是，林海秀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她觉得有两个人的眼睛一直在盯着她和李辰，那眼神多么可怕，就像秃鹰一样。不祥之兆在她心中升起，而李辰还全然不知。

辜连长见现场有些混乱，便赶紧宣布：“现在由‘革联指’移交四个‘八一八’人员的骨灰盒。这四个都是死在那天发生冲突的县政府大院南墙外，死者已查明身份，名单如下：有本公社西北村的储小二，……”

每一个死者的名字，都像落下的重磅炸弹，震动着对立两派在场的所有人的心。全场立刻寂静得鸦雀无声。刚才的激愤与骚动，瞬间就无影无踪。

“革联指”人员捧出四个黑色的骨灰盒。“八一八”人员走到中线接过来，不管是真是假，还都流了眼泪。

“八一八”的队伍里传出了哭泣声，哭声越来越大，成嚎啕一片。他们是在为死者哭，也是在为自己哭。为了追随革命路线，投身文化大革命，弄得现在不只是背井离乡、抛家舍业、一无所有，而且还伤痕累累，前途难卜。这几个死者说不定就他们的归宿。面对凶险的结局，他们难以抑制压抑了许久的悲痛。

“革联指”这边的人，也悄无声息，静静地听着那一边的哭声。不能说这是兔死狐悲，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的本性。面对活生生的人死于非命，活活地死在刀枪的杀戮之下，生命就这样被撕裂，被粉碎，毫无价值、毫无意义地终结在这个黑色冰冷的盒子里，不管他们生前曾经是丑陋还是正派，都是令人哀伤的事。那怕是储小二这种人的死，也在西北村人心上升起一片无言的阴云。

29.3片刻平静

两派群众组织达成协议，又相互释放关押人员，这使龙头镇平静了一段时间。

“八一八”这一边自知大势已去，实力上已无法与对手抗衡。不但没有了还手之力，连招架之功也所剩无几，越来越采取守势，气势日渐消沉。不少人在权衡利弊：是认输，回去算了，哪怕是接受“革联指”的各种批判甚至是惩罚；还是硬撑在这儿，再坚持一阵看看，还有什么更好一点的结果。一番盘算之后，不少人渐渐离开，回自己家或自己单位去了。外村的“八一八”也就剩了三、四十人，基本上是属于铁杆或者是头头，自己觉得无路可去，或者还是不肯甘心的那种。

粮管所里的“革联指”这边的人，有的一般群众，自己觉得没有跟“八一八”结怨的人，还回镇里看看。大多数人也没有进镇，毕竟两派仇恨已深，不敢贸然进去。

生产的事，还是要搞。各队的人，镇外递话进去，约好了，哪天到哪块地干活。到时大家都来，干活只能是表面凑合，也都没心思在庄稼活上了。两边的铁杆也不会来，怕见面打起来。都是些平常并不出头露面的最老实巴交的那些人。见了面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半头晌就三两句话。

这平静中也有人不甘寂寞的，秦德才就是一个。

秦德才回到村里又得意起来，他以为谁也不知道他投降时的丑态。再怎么表现呢？眼珠一转，有啦。上迟一敬家去神气一下。迟一敬一贯是落后分子，居然敢战场“投敌”，不肯回“八一八”，而且那天还不肯给我那碗盐水汤。这就是“叛徒”，罪该“就地枪决”。秦德才心里又气愤起来，对，去他家威风一下。

一早，他就去迟家。迟一敬原本是安分守己的人，不多搭理外人，平时见到秦德才也是唯恐避之不及。见到他进了院，四周邻居还没什么人，怕吃了亏也没人知道，不想再多惹事了，能退就退一步吧，就赶紧退到屋里，把房门关上。

秦德才一不做二不休，“呼呼”地使劲敲起房门，嘴里还嚷嚷着：“迟一敬，你是革命的叛徒！快出来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

任秦德才再怎么敲打，老迟一忍再忍不敢出来，也不回应。

正在这时，东北村的哈联成作为龙头公社“八一八”的头，带着几个人，连同西北村的彭小宾等人，到镇内四个村看看。因为估计昨天达成协议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对方群众回到镇里来，不要再出什么事。

正走到这儿，就听见“呼呼”的砸门声，过来一看，又是秦德才。问明情况之后，彭小宾便说：“两派都是革命组织，参加自愿，来去自由，不存在叛变不叛变的问题。”

秦德才还不服：“你小子，攻打县城为什么不去？现在装什么正经。”

哈联成是个正直的人。一是一，二是二，就说：“秦德才啊，你也别多说了。你那天跪着向‘革联指’举手投降、磕头求饶的样子，还算好看啊？”

秦德才一听揭了他的老底，脸虽红，脖子还硬：“你瞎说，没有的事。谁看见啦？那天我表现可勇敢啦！”

哈联成说：“你别吹啦，那天我就在你边上。我本来是要拉你一起走的，没想到你跪得那么快，我想拉都没拉上。”

“哈哈，”旁边的人一阵哄笑。

秦德才又是讪讪地走了。

这平静中，林海秀依然心神不宁。

她忧心忡忡，对李辰说：“我想起来了，那天在交换俘虏的会上，那两个老是看着我们的人，就是十一年前，从中学把你抓走的县公安局的人。”

“是吗？那又怎么啦？”李辰疑惑地问。李辰在政治上依然天真，这给他和他的妻子带来灭顶之灾。

“唉！”林海秀长叹一声，说：“我们写的那封信，恐怕不会就这么过去的。如果有了事，你要记住我的一句话，这事跟你没关系，都是我林海秀一个人做的。千万，千万！”

“这是为什么？”李辰还是不解。

“你还不明白？不要把我们两个人都陷进去。那样的话，婷婷怎么办？她才四岁多啊！”

“那样的话，我去顶罪。我反正是右派了，你留下来吧。”

“是我写的字啊，我是跑不了的。我当时帮你抄，就是想留下你。看你是个人才，国家少了你们这种人是种损失啊。”

“唉，现在社会混乱成这样，我们在信里讲的话都没错啊。”

“现在不是对和错的问题，就是要你去跟着闹。要不，怎么叫闹革命呢。谁还这样真的去为社会思考呢？”

“唉。”李辰又无语了。

四岁的婷婷望着父母问：“你们又在说什么啦？”

林海秀心疼地抚摸着女儿的脑袋，说：“唉，但愿到她长大的时候，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样。”

“会好的，我相信中国的社会主义一定有光明的前途。要不，我就不会冒险去写那些东西了。不就是因为对国家、对社会前途还抱有希望吗？”

然而，林海秀对李辰那封信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只不过这几个月还没有发生。但是，命运永远不在他们自己手里，他们不知道那柄悬在头顶上的剑什么时候落下。

这种短暂的平静并没有延续更长的时间。

第三十章 清算“八一八”

1960年1月30日

30.1 追悼会

对于“八一八”来说，这一阵正是凄风苦雨。1969年初，他们在中学大院里，开了个“烈士追悼会”，对那四个死者有所表示。死者家属都没能来，参加的人也不多。

“红海洋”战斗队在讨论要不要去参加追悼会。他们本来人不多，现在也就剩了彭小宾、衣春玲和皮高深三个人了。

衣春玲不赞成去。她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参加武斗而死就是轻于鸿毛，不值得。”

彭小宾则不然，说：“我们毕竟和他们是一起的，出这样的事不去，情理上说不过去。”

皮高深说：“那小宾哥代表我们‘红海洋’去吧。”

三人一想，这办法也行。于是由彭小宾代表‘红海洋’去了。

会场气氛十分地悲切。

那个瘦高个头目致辞悼词，两眼含泪，神色凄然。

会上播放着“国际歌”：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和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国际歌”是全世界左翼社会主义者的共同战歌，那高昂、悲壮的歌声，激励过多少革命者的斗志。在中国的影视剧里一般作为烈士牺牲时的背景音乐。它的意境，跟“东方红”里面歌颂的“他是人民大救星”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注意到的人还不多。不过，在这儿放这“国际歌”，有点觉得不是那个意思了。

这样的“烈士”，运动后期民政部门是不认可的。

会后，四人的骨灰盒埋在望海山坡，几个月之后就被铲掉了。据说，在本书完稿时，全国各地尚存的武斗“死难者”墓群还有几处，重庆保留得多一些。一般说来，也只是后来占上风的那一派，还能留下少

量的自己一派武斗死难者的墓穴。

30.2风云突变

俗话说：“祸不单行”，“人倒霉了，喝口凉水也呛着”。然而，这一回“八一八”连没喝凉水也呛着了。这年（1969年）春天，没有多大的征兆，天平突然向更不利于“八一八”的那边倾斜。这并不是“八一八”又做错了什么事，也不是海源县两派自身有什么变动，而是更大范围的形势发生了转化。

1969年3月2日，就在中共召开党的“九大”前夕，中苏在东北珍宝岛打了一仗。这之前，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的方案，设想以三个连的兵力参加，以一部分兵力上岛潜伏。2月19日，总参谋部、外交部对该方案予以同意。2月23日，沈阳军区就珍宝岛斗争的具体问题再报告总参谋部，总参亦作了答复。（请见：《‘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李可、郝生章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对苏方提出的是中方挑起事端的指责，《回首‘文革’》（张化、苏采青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一书说，“苏联军方对中国的反击缺乏准备还是事实。然而，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冲突的双方在这次事件中哪一方有所准备，也不在于谁先开了第一枪。”

不管怎么说，这场战斗，不但使中国的国际关系发生急剧变化，中苏之间白热化的紧张状态擦出了战争的火花，中美之间的宿怨出现融化，连中越关系也因此而开始了逆转。尤其是国内政治气氛跟着骤然趋紧。高层出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新动向。10月间，安排北京的高层机构和人员进行战备疏散。各地许多单位也纷纷效仿。特别是，据说林彪未经毛泽东过目，就发了“第一号令”，进行全军军事动员。这件事引起了毛对林的警觉，最终导致林的叛逃，这是后话。同时，对社会上也实行大规模的进一步从严整治。（本段的事例请见：《回首“文革”》，张化、苏采青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

这个事件，所带来的国际关系上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和对上层政治格局的影响，本书不去涉及了。但它在客观上要求国内局势进一步从紧，强化控制，尽快消除在一定范围内摆不平的事。这一、两年奉命闹事的造反派，逐渐失去了利用价值，越来越不待人见，在政治舞台上逐步走向了反面。

果然，海源所在省的极左势力代表人物在红极一时之后，被无情地逐出上层权力机构，黯然下场。各级权力机构几乎都为军队所控制，两派力量对比由此急转直下。

五月初，又一颗重磅炸弹落下。“八一八”在省里的靠山倒台后，被宣布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尽管还留了一小点余地，（如果是宣布为“反革命组织”，那就是镇压了，结果是不一样的。）也是意味着“八一八”末日的到来。

辜连长所在部队，因为当时曾倾向于“八一八”，也被换防。辜连长本人停职检查。辜连长觉得，自己为双方避免冲突做了不少工作，为此还受过团长的批评，要团长出来为他作证。答复是，不必找团长了，他的处境还不如你。那个驻龙头公社的军代表汤营长，后来就没回来过，不知是他自己有先见之明，还是部队内部里的上面已经有所觉察不让他回来了，以便事后好推卸。

属于野战军编制的另一个连队进驻南门外营房，连长姓门。

动手的一天，到了。

那是五月底的一天，解放军的宣传车（装上大喇叭的卡车）在西门口和南门口，放足音量，口气十分强硬地宣读着一份“县革委和当地驻军的联合通告”，主要内容是：一、勒令所有“八一八”人员放下武器，接受审查；二、所有非本镇的“八一八”人员，下午六点前必须撤出龙头镇。违者后果自负。

部队战士已封住西门和南门。上午十点左右，在战士的护卫下，宣传车开进镇内，一辆停在十字路口，一辆停在中学门口。

镇里的“八一八”像炸了窝的马蜂似地乱了。

中午，在公社大院开了“八一八”最后的一次会。

“我们怎么办？”那个瘦高的头目忧郁地问着。

“敢与魔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分寸！”有人先喊出了这句文革中很常见的口号。“坚持到底！”“绝不退让！”“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院子里一片激愤之情，什么时候都有这样的铁杆在。

但也有不是铁杆却吵得比谁都响、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比如象秦德才。他嫌气氛还不够，跳起来举着拳头喊：“‘八一八’要抗争到底，血战到最后一个人！冲出去，上山打游击，重上井冈山！”这一闹腾，除了孙二赖跟着喊，几乎没人响应，会场反而冷却下来。

“算了吧，胳膊扭不过大腿。上面的风向转了，咱们还能再去争什么。”队伍里有人说话了。

“大势已去啦。来龙头的时候，是几百人。你看咱们现在才剩下几十个人。承认现实吧。”

“接受县革委的领导吧。”哈联成说。

但又有很多人不同意：“我们这就算完啦？”

下面争吵不出什么结果，有人提议：“头儿，你来定吧！”

那个瘦高的头目，在大家的注视下，沉默着。许久，那个曾经近似乎叱咤风云的“草根英雄”终究无计可施，眨巴着湿润的泪眼，跟围在他周围的人说：“解散了吧，我宣布‘八一八’解散。各人自找出路吧。我对不起各位兄弟了。”说完竟呜呜地哭了起来。

“那几个伤员怎么办？”哈联成问。

“把剩下的钱，都分给他们。”头目说。

“就这样把他们交给‘革联指’吗？”有人问。

“只能这样了。”头目说。

“呸！什么头？这种熊包蛋，我们算是跟错人，瞎了眼了！”有人愤怒地说。

“我们走，往外走，走到那儿算那儿。”更有人转身往外走了。

“走，我们抬着伤员走！”

“走？走？就这样走啊？那太便宜他们了。我们也来个坚壁清野，一砖一瓦也都把它砸烂，决不留给‘革联指’！”不知是哪个小头目喊了声。

“对，对！砸掉它，砸烂它！决不留给他们！”还真有些铁杆，难平心中的愤恨。

更有秦德才这样起劲的：“好，好，砸得好，砸得对。我来领你们去，有几家特别恶劣，对我们‘八一八’特别坏，先去砸了他们。”

几个运动中的狂热分子，跟着秦德才呼啸而去，村里顿时响起了“噼噼啪啪”的声音……

30.3 撤出龙头

随着天色的暗淡，更多的“八一八”的人开始三三两两地往外走了。

他们丢弃了刀枪棍棒，身体疲惫，神情茫然，无言无语地往外走了。他们背着少量的衣服，扶着、还抬着几个伤员，从北门往外走了。

在越来越低沉的夕阳下，曾经为某个理想努力过、奋斗过、挣扎过的这支队伍，凄凉地、一无所有地、没有任何目的地往外走了。

没有“国际歌”的伴奏，却真的是十二分的悲壮。

他们中间不乏有劣迹的人，参与文革的一年多来做过错事、坏事。但就大多数而言，在当时极左舆论的鼓动之下，是兴冲冲地朝着革命而来，却卷入了一场他们并不了解、自己也无法控制的政治狂澜之中。经过头晕目眩的几番纷争之后，作为群体，最终被无情地淘汰出局。

这又是文革中被翻开的书写着令人无法相信的内容、而后又匆匆地合上了的许多页中的一页。

往东走，中学以东已被部队和“革联指”封住，“八一八”们只有往北走。可大河北岸，站满了高举棍棒刀枪、高声呐喊着的李家泊的人，情形更凶险。走投无路的“八一八”只能上了望海山，渐渐地在山顶集中。

走不走，成了每一个“八一八”人员都要做出的选择。

经学文原本就不是铁杆，不会跟着走。宗发奋就难了，他是“八一八”封的“副主任”，算得上“主要成员”或“骨干分子”了，心里害怕得很。思之再三，觉得“八一八”是彻底沉没了，没有必要再死心眼待在这条沉船上，还是识时务留下来吧。孙二赖因为民愤太大，不敢留下来。虽然不知道还能上哪儿去，走一天算一天吧。秦德才一下子又变了一个人，躲起来不露面了，他以另一种方式留了下来。

出人意料的是，彭小宾和衣春玲这两个“红海洋”，反倒和“八一八”的人一起出镇上了望海山。

从“八一八”进占龙头镇，“红海洋”有的人不愿跟“八一八”在一起，出镇去了粮管所，投了“革联指”。有的没打招呼就走了，这“红海洋”本来也没几个人，现在也就剩下彭小宾、衣春玲和齐成才、周新春了。他们三、四个人正商量这事呢。

彭小宾是觉得“危难见真情”。他并不是同情“八一八”，而是认定了革命、造反是正确的道路，认为自己是坚定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衣春玲说：“对，通告上说的是‘八一八’是反动组织，又没有说我们‘红海洋’是反动组织，又不是取缔我们，我们紧张什么呀！”

彭小宾说：“你还是不要去吧。这一去，凶多吉少，还不知道最后是个什么结局。“革联指”说不定最后还会围剿望海山，死的人会比他们“八一八”去打县城的还要多。”

“我不怕。要去，我们就一起去。你一个人去，我还不放心呢。”衣春玲说完这句，觉得好像有点说得过了，便低下了头。

彭小宾听着这话，心里也是一热，看着衣春玲。

衣春玲的面庞微微泛起了红晕。

“好，你愿意去那就去吧。”彭小宾说。

“还有我呢，我也去。”齐成才说。（齐成才，本来应该是叫齐成材，后来大家都叫混了，本书也不分了。）

齐成才一直和彭小宾在一起活动。齐成才不只是敬佩彭小宾的为人，更是和彭小宾一样，真心想要参加文化大革命。他相信伟大领袖的教导，相信要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他远远算不上共产主义者，更算不上革命家，但他相信革命家的话，想走革命的路。尽管他只是个农民，一个地地道道、普普通通的青年农民，一个普通得在村里、在队里都排不上号的农民，连在我们的小说里也很少提到他。但他是个有头脑、有思想的人，或者说，是个愿意有头脑、有思想的人。但他的头脑、他的思想，在他那个狭小、封闭的环境里又受到很大的局限，以至于无法正常地思维。他在现实中看到了一些错误的东西，想到要否定、批判这些错误的东西，却又找不到正确的东西，不能以正确的东西去批判错误的东西，很可能结果是用另一些错误的东西替代了原先错误的东西，或许这两种错误的性质、程度和表现形式不一样。这，也不能怪他。因为在他极其有限的生活范围里，找不到可以用来寻找正确东西的工具。

这时，他很想跟彭小宾一起行动、一起走。他想不出来的，他想不周到的，相信彭小宾能想得出来，能想得到。

“我也跟你们一起走。”齐成才急急地说。

衣春玲马上就不赞成：“不行啊，这怎么能行？你去上山了，你媳妇怎么办？她还怀着孩子呢，连水也不能挑，你怎么没想到？”海源话里常把老婆称为媳妇。

齐成才是去年娶了个小河口东面修家的姑娘（修家是指姓修人居多的那个村子）。因为世道乱轰轰的，家境又不好，这事也没怎么操办，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很低调。衣春玲可是想着这事。

“是啊。是啊。这次上山，怎么个结果，还真难说。弄不好，还真能下不来。我们是无牵无挂，你可不能走这一步。”彭小宾很诚恳地说。

齐成才一下子想起了家，想起了自己不是很经意的家。但毕竟是个家呀，那个瘦小、言语不多的妻子，样样都在指望着自己呀，想想这一点，是走不开。可他又觉得，“革联指”做得不对，人家“八一八”也是为了响应号召才起来造反的，就算有些事情做得不对，但也不能逼到这个程度啊，叫人家无路可走呀。

彭小宾看齐成才没有言语，就说：“齐成才啊，我知道你的想法。但是，革命的道路有很多，不是上山这一条路。听衣春玲的吧，你留下来，既要照顾好小修，万一我们走远了，这‘红海洋’的旗帜，还要靠你在西北村扛下去。啊？”

齐成才顺从地点了点头。彭小宾站起来，从门后拿出一面“红海洋”的旗递给了他，说：“我们‘红海洋’有两面旗帜。一面我们带上山去，这一面就由你留在西北村，能扛多久，就扛多久。”

齐成才有点动情，泪光在眼框里转，接过旗帜，说：“你们保重，我会把旗帜扛下去，扛到底。”又和彭小宾、衣春玲两人一一使劲握手告别，手臂晃了又晃，好像生离死别的样子。

彭小宾想说点什么，一时竟也想不出来。

“那我呢？”小周问。周新春对这形势是想看却越来越看不懂、越来越不明白了。脑子里搅得一团糟，连个问题也提不出来。唉，多少的老革命都遇到了新问题，适应不了，更何况这样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村小伙呢。

“小周啊，你也回家吧。你还小，你爹看不到你，会着急的。”彭小宾很诚恳地说。

周新春一想也对。他爹头脑更简单，没有他，什么事也想不过来。他还离不开那个家，慢慢地站起来，走了。

齐成才一下把旗扛在肩上，一起跟着出去了。

彭小宾也是一声长叹，和衣春玲一番对视之后，再没说更多的话，便并排走出屋去。

他们俩各自卷了个简单的铺盖卷，走北街，出北门，也随“八一八”的人群上了望海山。彭小宾走在前面，还举着“红海洋”的战旗，衣春玲紧随其后。红旗在呼呼啦啦地飘着，这在往望海山上走的人群里，是唯一的一面飘扬着的红旗。他俩的脚步是坚定的，脸色是刚毅的，心情是复杂的。

他们还边走边唱着：

“毛主席，哎毛主席，

您的话记在我们的心坎里，

喀拉昆仑冰雪封，

哨卡设在云雾中，

身上热汗烈日晒，
盖着蓝天铺着地，
只要想起您毛主席，
紧紧腰带，又是哎又是一百里。”

在一群群落魄的“八一八”人的注视和惊叹下，一步步地登上望海山顶。

30.4又一次回家

时针快到下午六点了，进龙头镇的时刻一分一秒地近了。

西北村的乡亲们，在隔了十九年之后，又一次以跟在解放军后面的方式回到自己的家园。

西门、南门、东门三面，连各胡同口都已经派了解放军的队伍，新来的连队全部出动，最前面的几个战士还扛着枪。

后面是“革联指”的成员。“革联指”总部迅即成立了龙头公社指挥部。由赵村的赵刊新任总指挥。县社二级“革联指”的指挥部都在西门外。再后面就是乡亲们。

许多人都快一年没回自己家，心里急得不得了，都在吵着说还不到点啊。那时大家都没有表，连脱产的公社干部中也很少有。但这并不妨碍计时的准确。

五时五十分，离进镇还差十分钟，东、西、南三个门，同时响起了三声枪声。这是对“八一八”的警告，表明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不要作任何无畏的抵抗。

清脆的枪声，响彻了龙头镇的上空，也震撼了人们的心理，既包括“八一八”的人，也包括“革联指”的人。将近两年的争斗，即将以一方的胜利、另一方的失败而告终。

人们都静了下来，无论是镇里，还是镇外。

西门外，西北村的人们都在翘首期盼着六点钟的到来。

下午六点整。

新来的连队门连长站在西门口，一声令下，又是一阵清脆的枪声响起。

部队作为先导，“革联指”跟进，乡亲们随后。

开始行进很谨慎，战士们弯着腰侧着身，贴着墙根、相互掩护往前。每个院子，都踢开门，扫视一下，再冲进去，逐房搜查。不多会，就发现“八一八”不准备作任何抵抗，要不就是走了，要不就是坐那儿、站那儿，没有任何反应。不到半小时，整个龙头镇平静收复。

西北村的乡亲们也都回了自己家。“解放了，又解放了！”乡亲们真的像1949年时重获解放，欢呼着又一次回到了自己的家。那一次是十几天，这一次却是几乎一年。可是一到家门口，都愣住了。什么样的

家，能经得起抛开一年。更何况是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几乎所有的家都遭受到损失，粮食几乎被搬空了，家什衣物也少了。尤其是“红太阳”主要成员的家里都是受到了有意识的破坏。像平金刚、郭中和、于村长几个的家里，被砸了个稀巴烂。

西北村又被洗劫了一遍。

平金刚一进院子，看家里被砸成这样，破碎的木板、锅碗，撕烂的衣服、被褥，扔了满地，都气红了眼，“不消灭这帮‘八一八’匪徒，誓不为人，看逮住了，怎么收拾他们！”

郭中和的家里也是被砸得稀里哗啦，他心里早就料到有这一步，对他妈和媳妇说：“东西砸了就算了，人都在就行。他们‘八一八’，人也死了好几个，剩下的这些还不知道能往哪儿去呢。”

于村长的家同样的遭遇。于村长正气愤不已呢，秦德才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讨好地说：“于村长啊，我来帮你一起收拾吧。”于村长恨得拿起扫帚就横打过去，打得秦德才又叫又跳地跑了。老于头火气也越来越大了，亏得身边不是木棍，要不真能打出人命。

肖校长租住的家也被砸了。好在肖校长父子并不很在意这些，收拾收拾，肖福兴就躺在炕上了。

李辰、林海秀俩口，觉得住在赵村挺好，没有急着回来，第二天才过来的。

倒是宗发奋主动到公社大院来找纪社长，一个劲地点头，说自己毛主席著作没学好，看错了形势站错了队，作为领导干部，实在是不应该啊。纪社长淡淡地说：“这些话讲给我听也没用，我们都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啊。”

杜家骏没有直接回家，叫唐玉贞先回去看看，自己在村里转了一圈。来到西北场院，看到老王头一家还在窝棚里。王大妈已是病倒在地下的铺上，王山和丁妹也都面如菜色，无言无语，神色木讷。杜家骏忙说，你们也快回家吧。王山说，不敢，不敢。直到杜家骏再三说了，“八一八”已经垮了，你们也不用再去高家庄，这儿我可以作主了，你们放心回家吧。王山和丁妹才回去看了下，那个家已经三年没住了，更是破败不堪，需要大修。回来跟王大妈一说，可王大妈死活也要回自己家，王山又背起了他妈妈回了家。

一走进自己的那个胡同，王大妈在她儿子的背上，就看到了自家的院子。

三年了，终于回家了。

王大妈要下来。

王山说：“我背你进屋。”

王大妈说：“不，我要自己走进我的院子。”

王山在院墙外把她放下。王大妈扶着墙，颤颤巍巍地走近院门。

院子的两扇门都没有了，门框都干裂了，院子里长满了蒿草，高过了膝盖。

王山和丁妹一边一个搀着王大妈走进院子。

王大妈看着这院子里的草，看着剥落了泥巴的墙，看着歪倒破碎的窗框，看着已经灰暗了的屋顶的苦草，看着黑洞洞的屋里，看着这一砖一瓦都是老俩口用几十年心血垒起的窝。如今，窝被搞得稀烂，老王头却永远也回不来了。王大妈心如刀绞，她一步一行泪，一步一声呼唤：“老头子啊，我们回来啦；老头子啊，我们回来啦……”

那声音的凄惨，闻者无不落泪。丁妹在一边用衣袖直抹脸腮，也还是擦不完的泪水。

杜家骏又到了公社大院看看，见到纪社长。纪社长问情况怎么样。杜家骏大体说了下，有的家里砸得不像样，但总的情况还算可以，群众情绪虽然气愤，但还在意料之中。

虽然是“革联指”这边获胜，纪社长也不担任任何职务，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可还是忧心忡忡地说：“我还是放不下心啊。既怕‘八一八’狗急跳墙，又怕这一边过于激愤，上边的意图咱还吃不准，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来个大转弯，要步步小心啊，家骏。”

杜家骏连连点头称是。

纪社长又问起村里有谁跟着上山啦。

杜家骏说，可能彭小宾和衣春玲他们两个跟着上去了。

纪社长一声叹息，他们太天真了，天真到糊涂啦。

杜家骏说，不至于出事吧。

纪社长说，谁知道呢，看明天吧。

他俩向北望去，望海山已沉没在黑暗之中。

30.5望海山之夜

夜色笼罩着望海山。

近百名“八一八”的人员聚集在山顶。虽然已是春夏之交，海上来的凉风，依然湿冷难挡。

山下，四周都有火把，都有人声，显然是只等着天亮扑上来。山顶，松树摇曳，青草瑟瑟。乱石堆中，人们或背靠石块，或相互依偎，等待着明天不知将是怎样的命运。

“红海洋”的两人在一棵松下相依而坐。红旗插在石头缝里，“扑啦扑啦”地飘着。衣春玲望着山下，望着山下黑影中绰绰约约的龙头镇，想着自己的妈妈，想着两年来的历程，不禁滚出了眼泪。

彭小宾一见，拿出手巾（农村的男孩儿几乎没有带手巾的，不知小彭怎么想到了这点）想去帮着擦一下。

衣春玲轻轻地推开了，望着没有半点星光的夜空，说：“我们一起唱个歌吧，来度过这难忘的一夜。”便神情专注地唱起了：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黑暗里想你有方向，

迷路时想你心里明。”

彭小宾跟着唱了起来，整个望海山上也都唱了起来，苦盼着黎明的到来。

天亮了。

也是六点整。“叭叭”地一阵步枪响过，依旧是门连长走在最前面，部队战士为先导，“革联指”大队伍跟进，从四面向望海山顶进发。

山顶上的人，在顶峰上聚成一团，面对从四面八方围上来的人，手挽起了手，高唱起“国际歌”。

部队战士已经到了面对面的跟前，门连长出来喊着：“别唱了，所有人员举起手，排列单行下山，到中学里接受审查。”

“八一八”的人，依旧高唱不停。

部队战士们上前，把“八一八”们一个个拽出来。

“革联指”的人群闪出一条缝，让“八一八”们下去。

“八一八”们被拽出来、推下去的时候，个个都热泪盈眶，高呼“毛主席万岁！”，从“革联指”怒吼的人缝中走下去。不肯走的，就被架着拖下去。

山坡上、山底下，到处都是“革联指”的人群，留出一条空隙做通道。“八一八”的人下来，若还有呼革命口号的，便一阵拳脚“噼噼啪啪”地打下来。再厉害的人，不到山脚也乖乖地没有了声息，只顾捂着头狼狈不堪地往下走。

只可怜那几个伤员，抬着下来，满眼泪水。就是“革联指”的人看着也难受，没有动他们的。

轮到彭小宾他们俩了。门连长看见还插着“红海洋”的旗帜，上去就要拔出来。

衣春玲一步上去，用身体挡着，满脸是泪地说：“我们是‘红海洋’，不是‘八一八’。‘八一八’是反动组织，没有说我们也是反动组织。”

门连长一时竟无语，就说：“那你们上来干什么？一起下去！”

衣春玲扛起了那面红旗。他们俩泪水满脸，哽咽着，连歌也唱不出来，跟着一起下山了。

所有下山人员，都进了中学，集中住宿，接受审查。

留在镇里的“八一八”主要成员，如秦德才、宗发奋等，当天也都进了中学。

彭小宾他们俩，下午就出来了，这里面有他们自己的据理力争，也有纪社长、杜家骏的奔走努力。不过旗帜是收缴了。

30.6 控诉大会

一个月后，在中学操场召开了“清算‘八一八’反革命罪行大会”。

会场上四乡八里的乡亲们来了不少，要看看对“八一八”们怎么处理。

大会由“革联指”龙头公社总指挥赵刊新主持。

领着呼口号的，这回是肖胜利了：

“坚决镇压反革命！”

“彻底清算‘八一八’的反革命罪行！”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赵刊新宣布大会开始，在一番敬祝万寿无疆之后，大喝一声：“把‘八一八’坏头头、骨干分子、打人凶手，统统揪上来。”

一长串“八一八”的要员们，大概有三、四十个，胸前挂着牌子，像上两年斗走资派那样被押着，拉了上来。因为拉上来的人太多，下面的人纷纷伸直了脖子都看不清。

首先由县“革联指”宣传部长程贵安讲话。程贵安，原来的县教育局副局长，拄着双拐，很吃力地走向台中间，使劲地抓着麦克风，两眼冒着怒火，讲了起来。从运动初期，被红卫兵打断腿之后，他对所有的造反派都恨得咬牙切齿。从来都是他革别人的命，没想到这次会吃这么大的亏。心里充满着复仇的怒火，于是，伤口一结上疤，他便不顾一切地、拼尽全力地积极投身到与“八一八”的各项斗争中。其态度之坚决，劲头之狂热，即使是年轻人也难与其相比。如果不是残废，略有影响形象与士气之虞，恐怕能当上全县“革联指”的总头了。

程贵安在麦克风前用极快的语速声讨着“八一八”的罪行。如妄图颠覆革命政权，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迫害革命领导干部，残害“革联指”人员，制造武斗，抢劫商店、银行，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犯下了滔天罪行。这帮王八蛋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加以严惩。坚决打击，决不手软……

接着是受害人进行控诉，当眼睛绑着纱布的李家泊李村长被扶着走上台去，人们的心底又受到了彻底的震撼。“坚决镇压反革命！”“血债要用血来偿！”全场一阵阵的怒吼，把气氛推到了高潮。

而后，由原“八一八”人员反戈一击的典型发言，上来的是秦有理。秦有理现在也会表演了，一上来就涕泪俱下，说当初是满腔热情，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投身文化大革命，结果上了“八一八”坏头头的当，站错了队，反而是在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对抗革命组织“革联指”。“我有罪啊！我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罪……”秦有理一边朝四周鞠躬不已，一边大哭着都说不下去了，以至于旁边的人再三劝他控制情绪。

秦有理镇定了一下，又大声说起来，“我要揭发坏头头、我父亲秦德才的反革命罪行。”全场为之一惊，顿时静下来，想认真听一听。

秦有理愤愤地说，这个秦德才完全是个流氓，他投机革命，到处搞打砸抢，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在解放军和“革联指”要收复龙头镇的时候，居然叫嚣要进行暴力对抗，其反革命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是可忍孰不可忍！

下面又是一阵激烈的口号声。

秦有理一看有这么好的效果，就刹不住车了，继续往下说：“秦德才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流氓，他都跟我女朋友王溪在一起乱搞男女关系……”

全场大哗。

赵刊新赶忙拿过话筒，说：“不讲这个了，不讲这个了。”

最后，宣布处理结果，“下列人员，定为坏头头……”

被念到名字的人，被往前推出一步，好让大家看个清楚。第一个推出来的，就是那个瘦高的头头。

在逐个推出来的人中，西北村人知道的有：脸色苍白的宗发奋、不很在乎的哈联成、像落水狗一样猥琐的秦德才……

最后的最后，还有一项内容，“下面由县公安局卞局长宣布逮捕令。”赵指挥说着。

原先没站在前面的卞局长一身警服，从人堆后面走了出来，一脸威严，放大嗓门，一字一句地说：“我宣布县公安局逮捕令：海源县公安局决定，将现行反革命犯孙武胜依法逮捕！”

孙二赖已经是五花大绑被三个人推了出来，照例被摔倒在地，而后拽起来，周科长过来铐上手铐，把他塞进了刚开过来的吉普车。

会场上一片欢呼。

会上的内容没有提及包金贵一家被杀和老王头被打死的事。

会后，除了在会场上被示众的那些“坏头头”以外，其余“八一八”的人员全部释放回家，由各单位各大队自己处理。

第三十一章 大联合

1960年1月31日

31.1 经大臣又回来了

“经大臣又回来了！”

“经大臣怎么又回来了？”

这又是一件叫人意想不到的事。

解放战争时的龙头乡乡长经大臣，1949年南下去了上海当大干部，1960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下放回乡，1962年落实政策回去了；1965年参加社教，作为联络员回来了，运动结束又回去了。怎么这又回来了？又把西北村的乡亲们稀奇得不轻。

这回经大臣是被单位的造反派赶回来的。1966年社教结束回单位，本来是可以办退休的了，可文革一来，什么事都停了下来，没人管了。虽然华东局机关多次受冲击，可经大臣在里面的官太小了，连拉出去批斗都轮不上他，所以两年多的文革虽然惊涛骇浪不少，但他倒是难得沾上几滴水，最多在一起陪斗而已。现在单位又忙着斗批改，华东局面临撤消，掌权的造反派当然要打发他走。尽管经大臣在上海生活了近二十年，在龙头镇的乡亲看来，老经的衣着谈吐早已不是“乡熊”，而至少是多半个的“城里人”了。但在上海人的造反派眼里却依然还是“土包子”，就这么让他拿高薪、住别墅，太便宜他了。更何况机关造反派的一个小头头还惦记着老经住的那半个别墅呢。于是又拿出1959年曾经“追随彭德怀”，充当“右倾机会主义”急先锋的旧帽子，以“勒令退职”处理，给了几千块的退职金，走人吧，回原籍去吧。临走，人家造反派还说了，看你经大臣这两年基本上没有反动表现，没有按敌我矛盾处理，没戴走资派的帽子，已经是很客气啦。

这退休和退职是大不一样的。退休，是将原工资按工龄长短打一定折扣后每月发给退休工资，医疗等其他福利不变，人还是单位的，叫在册人员（在职的，叫在编人员）。退职则是一次性发给一定数量的退职金，以后与原单位再没有关系，也不再享受医疗劳动保险等，比起退休的待遇就差远了。

小莉是在运动一开始游街批斗的时候就吓跑了。什么时候走的，走到哪儿去了，老经都不知道。

老经无奈给儿子经学文来了封信。

好在龙头的两派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已经过去，不然还真不好办。

经学文想来想去，找了粮管所的祖所长商量。粮管所里原先住的西北村的人，都已经回村了。

祖所长说，好吧，先叫老经在这儿住一阵吧。

祖所长当然认识老经，虽然自己参军出去比较早，与经乡长见面的次数不多，但那时对经乡长还是蛮敬重的。

经大臣回来的那天，经学文去县城汽车站没接到。六十出头的老经，居然自己背着、扛着行李从县城走了过来。

按照儿子的来信，他到了西门外的粮管所。1966年走的时候，粮管所刚刚建好，还没进去过。

老经在大门口说明了来意，不一会儿，祖所长就脸带笑容地出来了，双手紧紧地握着，暖着他的手心。这是他在上海多年来所没有感觉到的。

老经进了办公室，祖所长忙跟边上的会计说：“快叫车大姐过来。”

车素花因为儿子经学文比较倾向造反派，再者跟儿媳妇一起过总有些不自在，所以别人都回村里了，就她还住粮管所里。这阵子，正帮着所里补面袋子呢。

当粮管所会计过来喊她时，说老经又回来了。她不相信，说了句：“别熊人了。”（“熊人”，海源话，骗人的意思。）

“真的哎，所长叫我过来喊你的，谁来熊你了。”

车素花歪着头，眼睛转了好几圈，放下手里的活，将信将疑地过来了。

隔着窗户，果然又见到了老经。两年多不见，人又老了，头发都花白了，脸上更瘦更黑了，车素花不由得心生几分怜悯。但又想到这老经几次不顾夫妻情分，做得太不地道了，又上来了几股怨气，于是停下脚步，没往里进，任凭会计怎么喊，又低着头往回走了。

祖所长说：“不用喊了吧。”又对老经说：“老经啊，不是说你啊，这事你做得是不对。你得好好地跟车大姐赔个不是，以后还是一起过吧。”

老经也点点头。

傍晚，祖所长喊来了纪社长、于村长，一起凑了一桌。战争年代的人，还能过来坐在一起的，已经不多见了。

于村长的心里一直抹不平，对这几年的事始终耿耿于怀，看到老经几起几落，也是感慨得很，“这些年的事，就像翻烧饼一样，翻过来复过去。拿咱们经乡长来说，这就翻了几次啦？”

还是纪社长心里宽一些，说：“凡事还要向前看啊。还会有运动后期的，还会再落实政策的。你信不信？社教运动搞得那么汹涌，最后还给谁戴上帽子了？记得那天，老经还跟我说了一阵，说搞过了头的，还会再搞过来。后来事实就是那样嘛。老经，你说对吧？”

“唉！”老经一声长叹，“这文革就不一定了。过得太过了，都沉下去了。恐怕再翻不回来了。”

祖所长劝着说：“管他翻不翻呢。咱这几个老哥，说起来，文革还都没有遭大罪，万幸啊。你看多少人，家破人亡的。你看那个程贵安，一瘸一拐的，还那么起劲，拿了棍子想打人，还打不着，又何苦

呢。”

老于说：“我能理解他。他心里是气啊，比我还气。你们是没有摊上挨揍的滋味啊，这个比挨地主、国民党的打还不一样。挨敌人的打，自己还觉得是一种锻炼，是一种考验，甚至觉得是一种光荣，正是表现革命者意志的时候。可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挨打，心里的那个痛楚，那个冤屈，真是没法说啊。”

老经说：“我们党这个习惯不好，党内斗争老是那么频繁、那么激烈、那么残酷。本来，有不同的看法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一斗起来就是你死我活，就往死里整。”

“要不，怎么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呢。”纪社长说。

“斗争哲学恐怕还不能这么理解。这马克思主义啊，真还要好好学习呢。”祖所长说。

“这还不全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不光是个理论问题哎。”老经说。

“那是什么问题呢？”于村长很认真地问。

“这就是个体制问题，权利的分配、平衡和监督的问题。有权的人权利太多，有权的和没权的差别太大。在这种情况下，没权的人要拼命地抢权夺权，有权的人也不踏实，稍微有点事就以为别人要抢他的权，什么手段也能使出来，能不往死里斗吗？”老经说。

“是啊，是啊。”纪社长点着头说。这几年他也都感受到了。

“那也斗得差不多了吧，还能没完没了吗？于村长又问。

“快了吧，快了吧。我看这文革啊，也快差不多了。原来不是说，一年发动，二年高潮，三年收尾。该是时候结束了，老经你等着落实政策吧。”纪社长说。

“我能有什么盼头啊？”老经挺悲观的，“你们俩还能等‘三结合’，再进领导班子里去，我再去等什么啊？”

“唉，什么结合不结合的。我也都这把年纪了，还去指望什么前程啊。”纪社长夹了一筷子菜，笑着说，“老祖啊，咱俩差不多年纪吧？”

祖所长给大家倒酒，“喝，喝！老纪啊，你比我长一岁，我要叫你大哥啊。”

“唉，我称不上大哥，大哥在这儿呢，咱们的老村长才是大哥呢。”

“嗨，什么大哥不大哥的，都这么混吧。在座的，我是混得最差的，可别笑话我。”于村长说。

“你还行啊，我现在真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啊。”老经皱着眉说。

“嗨，你放宽心，只要你在西北村，就不会有你苦日子过。”于村长说。

“是啊。农村的老头老太太，七、八十了。都自己过，还得去捡柴火，拾个麦穗。过年时，儿子能过来给个五元、六元的，就已经不错了，算是有个孝顺的好儿子。你这一大笔退職金，顶多少个儿子啊？哈哈。”祖所长说。

“对啊，老经，你再跟车大姐好好表示一下，我们再在边上撮合一下，还是老夫老妻好啊，一起过吧。你的日子还是不错的。”于村长说。

“好，好，谢谢大家了。”老经认真地点点头。

31.2革命大联合

经乡长第三次又回西北村，已经够出人意料了。但更出人意料的事，又降临了。

正当“八一八”被全面取缔，头目们被关在中学里审查，“革联指”的人们心满意足、高枕无忧了三个月，1969年秋天来临的时候，新的情况发生了。中央召开了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概是出于维持稳定的考虑，还是高层各派政治势力有了什么新的博弈的结果，反正上面又来了新的说法：不能说“八一八”是反动组织，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两派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好的，两派中都有少数“坏头头”，要搞革命大联合。

这话是对的，但到了下面，则又要折腾了。

因为这本来的意图，也不是真要让“八一八”东山再起，而是反过来还要消除“革联指”的作用和影响。

当一只拖鞋被扔掉以后，另一只也就没有用了。

这年的十月，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戴上“叛徒、工贼、内奸”的帽子，永远开除出党。以打倒走资派为目标的任务基本完成，而作为斗争工具的群众组织也就该结束它的使命了。

“八一八”的人，除县总部的头目继续隔离审查，其余的都从中学里放了出来。他们中的多数人如获重释、庆幸万分，以后的路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走了。

最高兴的要数宗发奋了。原先挡得眼前一片漆黑的幕布掀掉了，那耀眼的光芒又刺亮了他的眼睛，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他宗发奋是什么人？怎么会这样就完了呢？这不，机会又来了吗。

他从中学出来，回了家，洗了澡，换了一身衣服，又要出去。柏惠珠看他精神挺好，也没有挨过打的样子，也就放心了，随他去吧。

他先去找了纪社长，再三说参加“八一八”实属无奈，是他们扣押了自己的老婆，实在没有办法才走这条路的。纪社长说，嗨，都一样是革命群众组织了，有什么无奈不无奈的。

他又去找了经学文。本来，经学文比他资历差远了，根本不放在他的眼里。但人家两面不得罪呀，说不定以后还用得着他呢。所以也屈尊上门拜访了。嘴里连连说着：“啊呀，你老弟真行，真有水平，既参加了造反派，又没受牵连，有水平啊，有水平啊。这一手怎么学的，教教我老哥吧。”

经学文一笑，说：“这有什么，我不过是任何情况下，不说过头话，不做过头事。”

“对，对的，对。”宗发奋连连点头称是。

他还去找了祖所长，他这也是先埋下关系，以备后用。宗发奋可是个有心机的人。祖所长却说：“你现在也别忙着找。大家都还不知道自己下一步是怎么回事呢，你先看看再说吧。”宗发奋又连连称是。是

哎，还是人家祖所长沉得住气。还不知道哪个菩萨能管用呢，先烧那么多香干什么。

秦德才也是忙开了。

他先回了家，一看竟然是王溪在里面住，自然就抱住不放了。

王溪从中学出来，又不愿回家，就住在秦德才家的这所空屋。从老王头一家在北山被抓回来以后，除了在批斗会上打了父母几个耳光之外，就没见过他们。

秦德才又跑了几个地方，可大家都很忙，顾不上和他说话。

他又跑到粮管所，粮管所前一段是“革联指”的大本营，他还从来没去过，正想拜访拜访。可是人家粮管所连门也没让他进。

这个政策下来，对于“革联指”的人似乎有点傻眼了。弄了半天，自己跟“八一八”造反派一个样。已经把他们打翻在地，还要再请回来平起平坐。尤其是也要在自己内部找出“坏头头”和“打砸抢”分子，这就难了。都是患难与共的战友，找谁去顶呢。

西北村里无论是一开始的“红太阳”，还是后来又一起加入进去的“革联指”，头头都是平金刚。平金刚可急了，不算了。

“我这不过是替别人传个话，怎么我是坏头头了？主意都是杜家骏拿的，出去武斗都是邬中和在最前面，我算老几呢？”他到处这么说着。

杜家骏不吭声，因为这事怎么也按不到他头上，他压根儿就没参加这些组织。

邬中和也不吭声，他很看得开。他那时能拼了命，冲在最前面，并不是想图什么，而是对“八一八”、对秦德才这种人有气，心里就是在想宁可拼了自己也不让坏人得逞。现在要追究什么责任，追就追吧。当初连部队干部都不当了，现在这点得失，还有什么可计较的。

于村长可听不下去了，说：“这种时候最能见人心。老话说得好，危难之中见真情。你平金刚实在不地道。”

纪社长说了：“吵吵什么呀？还没说有数量指标，没说非要抓几个‘坏头头’，就这样吵啦？”

于是，都没有声音了。

后来，西北村的“革联指”也没有划“坏头头”。但是，平金刚自己觉得像是在悬崖边差点被人推下去似的。从此以后就开始变了，变得凡事要为自己想一想，心存他念了。

经过一个月的磋商，各级领导班子搭起来了。

西北村的革委会主任是鲁队长，副主任是杜家骏和彭小宾。本来主任应该是杜家骏，可杜家骏死活不干，硬推给了鲁队长，说鲁队长哪边都没参加，这样反而两边都能接受。气不过的是平金刚，直嚷嚷：“怎么‘革联指’的一个也没有啊？”

龙头公社的革委会主任，还是纪社长，副主任经学文。心里不舒服的是宗发奋，不过他嘴上没嚷嚷。

两派群众“革命大联合”的实现，应该说是文革第一阶段的结束。在这之前，是各种政治势力，在无政府主义营造的舞台上争相表演；这之后，就是这些势力一个个被挣扎着清除出场。有言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些曾经看似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人物，也不过是别人手掌中的玩物。

那天晚上，西北村还很难得地搞了台文艺表演，庆祝“大联合”的成功。

“没有什么专门的准备，大家辛苦了两、三年，上来自娱自乐，高兴高兴，烦人的事就过去了。啊？”鲁队长在招呼大家。

秦德才不甘寂寞，拉着王溪就到了前面，“咱俩给大家来段样板戏。这样样板戏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是文化革命旗手江青同志亲手培育的，到哪时也别忘了。来，王溪，咱唱起来。”

两人又唱起了那个苟合之夜唱的“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

台下一片嘘声，盖过了秦德才的哑嗓子，“你们没唱够，我们早就听够了。”他俩也只好狼狈而下。

衣春玲看不下去，拉着彭小宾也上去了。“这革命的舞台，咱不占领就要被他们占领。咱们为什么不唱。”

“对！对！”四周的人直鼓掌。原本不好意思的彭小宾也只好上去了。

春玲说：“咱俩给大伙唱个‘二月里来’。”结果两人唱得还真不错。

全场为这对年轻人，又是鼓掌又是欢呼。好几年，西北村都没有这样热烈的场面了。

鲁队长最后布置了个任务，可谁也不知道上级的这个任务的真实意图，包括鲁队长自己。鲁队长是在说：“还有个事啊，每个人都要写一份关于‘大联合’的体会感受。每个人都要写，不会写的，请会写的写。都要表个态，明天，各队收上来。”

班子搭起来后，经学文跟纪主任讲的第一件事，是北门外的那块大大的毛主席语录板，“那么大的一块竖在那儿，又碍事，又是他们‘八一八’的标志，又不能拆。这怎么办？”

纪主任说：“这好办。它不是长8.18米，象征他们‘八一八’吗？咱们在两边砌上个砖垛，它的长度不就不是‘八一八’了嘛。”

“对，对，好主意。把上面那段语录也换一下，换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样谁也挑不出毛病。”

没过几天，北门外的那块大语录牌，就用上好的油漆，重新刷写了一遍，两旁新砌了水泥面的砖垛，更有气派了。他俩这么一弄，既坚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又搞掉了“八一八”的招牌。这事办得叫好多人称赞，只是车来人往拐起弯来更费事了。

第三十二章 “一打三反”

1960年2月1日

32.1 告发

那时阶级斗争理论经常引用的一句话，叫“树欲静而风不止”。意思是，不是我想要搞阶级斗争，而是阶级斗争它自己停不下来。这儿提起这句话是想说，事情老是停不下来，像是一块块大大小小的石头，接连不断地扔进水塘，那水面始终在水花四起，波浪激荡。

这会儿，落下的大石头，一个叫“一打三反”，一个叫清查“五一六”分子。这一章说的是“一打三反”，是指1970年1月、2月按照中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和“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指示所开展的运动。这场运动的“战果”，据《大动乱年代》一书说：“据统计：1970年2月至11月共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逮捕了28·48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该书由王年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而“清查五一六”一事，则是根据中央在1970年3月发出的“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发动的。在清查中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受到残酷迫害。”（请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

当然并不是说，这两次运动中的运动，都是由林彪、四人帮直接组织指挥，实际上是被不少地方的当权派和拥护他们的群众组织用来对付敢于起来造反的另一派群众，是用极左来反极左、保自己，出现了不少冤假错案，跟“一打三反”字面上的意思完全不一样了。要想了解和研究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人，不要仅仅从字面上去理解它的意思，那样就太天真和想当然了。当然，也有确实需要打击的，但把握的尺寸是否恰当，则另当别论。

经过前期的大规模武斗，基本的势力格局已经分出。但要站得住，稳得住，那还得痛下杀手，靠“大联合”是做不到的，只能毫不留情地继续镇压、继续杀戮。“一打三反”也好，“清查五一六”也好，都是在提供这样的借口，还美其名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这时的两派，已经没有了造反和保守之分。造反派掌权的地方，向保守派继续进攻。而多数地方则是保守派占据明显上风，把苟延残喘的造反派当成落水狗穷追猛打，虽逼到墙角也决不放手。所谓“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是也。当然，所谓保守派掌权，其实也并不是原先的保守派群众组织掌权，而是保守派所支持的那一类当权派掌权。此处，说的是那一类，不是指具体的哪一个。

这块落下来的石头，在龙头、在西北村，激起了怎样的浪花呢？

平金刚在两派大联合后，心里很不服气。“凭什么，凭什么？”不但心里在想，连嘴上有时也嘟念出来。他们“红太阳”这边，也就是“革联指”这派，是追随了革命路线、经过了艰苦卓绝斗争、赢得了胜利的

那一派。不说别的，就说政治眼光吧，那也是够可以的。有多少人，看不准，站错了队，跟错了人，跌到坑里去了。连公社宗书记，那么精明的人，那么会察言观色的人，不一样站到了“八一八”那边，想投靠造反派，结果摔了一个大老跤吗。

可是现在凭什么两派又都一样了，都算革命派了，平起平坐了？“凭什么呀？”他的心里又嘟念了。

这时，“一打三反”的精神一布置，他嗅出点什么来了。这么一个以往根本没有什么弯弯肠子的直筒子，最多为了面子好看、说话有时稍有夸张，总的来说还是一个极为朴实的农民，这时竟然也有点政治嗅觉了。他觉得有某种机会来了。

什么机会？——打击对立面的机会。虽然两派都已经取消了，在组织上、形式上都不存在了。但他总觉得对面的人还是“八一八”，还是造反派，还是跟着错误路线犯了罪，是应该受到惩罚的人。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们，那样我们不就白忙活了？“一打三反”说要“严厉打击各种现行反革命”，现在的反革命是谁？谁在反对革命、反对共产党？那些“八一八”就是在换个旗号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上面号召打击现行反革命，是因为明里不好讲要打击造反派，实际上就是要用这种办法来打击他们。“对，对，就是这样。”平金刚不知怎么理出了这条思路。

那自己认识的“八一八”里，谁是反革命呢？储小二死了，孙二赖抓了，就是秦德才。那小子最坏，彻头彻尾的流氓无赖，可是要对付这样的无赖，也真不容易。弄不好也会被他死缠在一起，不被他咬一口，也弄得一身臭。所谓“歼敌一万，自损八千”，也不合算。还有谁呢？平金刚接连想了两天也没想好。

那天，他扛着修房顶的高粱秸在胡同里走，只顾低着头想，一头撞上了皮安己。

“啊哟，哪个不长眼，往前瞎撞啊？”因为有高粱秸挡着，皮安己没看清是谁，先骂了起来。

平金刚把脑袋往外一歪，见是撞上了皮安己，忙打招呼：“哎哟，是大叔啊，不好意思啦。都是那些杀千刀的‘八一八’把我的房顶都捅破了。我得赶紧补一下啊。”

“这帮杀千刀的‘八一八’！”皮安己提起“八一八”，也是义愤填膺。说起来，“八一八”也没碍到他什么，除了秦德才想要欺负他。秦德才这个人败坏了“八一八”在西北村、在整个龙头镇的名声。但是皮安己有更深远的想法。虽然他在村里也一直受压，为什么没有跟着造反派起来伸一下腰、吐一口气呢？皮安己看出来了，那些造反派站起来伸腰，那是暂时的，还没等伸直，又会有更大的棍子打下来。这一点居然被皮安己当时就看出来。反复激烈的政治运动，把中国的普通农民都造就成了“政治动物”，都有了敏感的政治嗅觉和政治拳脚，竟然连皮安己这样的“土鳖”（此处无贬义）都练出了这等眼光。

此时，皮安己的脑子里闪出了一个火花，忽然冒出了一句：“哎，对了，这次要打击反革命，不就是要打击‘八一八’么？”

“你说，要打谁好呢？”平金刚一听，挺投机，便把高粱秸放下靠在身边，问了起来。

“第一个就是秦德才，那家伙是西北村头号乌龟王八蛋。那天武斗怎么没捅死他。”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这个人太无赖，纯粹是个滚刀肉，怕是不好弄。”平金刚他们在“政治动物”里只能算是最初级的，远还没有进化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欺软怕硬就说明，连第一个台阶都还没有跨上去。

“嗯，是哎，那搞谁？”皮安己也低头沉思起来。

“迟一敬，搞迟一敬那小子怎么样？”

“对，对，搞他，就搞他。他居然和我翻脸，去投奔‘八一八’，真是活腻了。”皮安己对迟家几十年来都有难以释怀的看法。其实也就是想别个苗头、比个高低，总想比别人高一头。哪怕已经是中农，在广大贫下中农面前抬不起头，也要让另一个中农迟家比自己更矮一点。

“那说他什么呢？”平金刚问。说什么都还没想好就要搞别人，这在那个年代是常有的事。

“他是革命的叛徒，投靠‘八一八’。”皮安己说。

“叛徒”是文化大革命中最重的“罪名”，比地富反坏还要坏、还要臭，是极左势力用来打击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的最狠最毒辣的一招。其实要说“叛徒”，迟一敬只是背叛了“八一八”。从那一面叛了过来，也算是“叛徒”么？皮安己这时也不管这些。

“还有，还有，困难时期那一年，他居然把他爹埋在了西门外的烈士陵园”皮安己忽然又想起了这件事。“他爹算什么？是反动中农。这种做法，是对革命烈士的极大侮辱！”其实根本没有“反动中农”这种说法，皮安己真有点口不择言了。那句话真可以用到这儿：“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有这一条就够了。”平金刚说。

“那，咱上大队部，跟鲁来福说去。”

平金刚迟疑了下，“跟他说没用，他是装得八面玲珑，四面不得罪人。”这运动把平金刚和鲁队长之间也撕开了裂缝。

“那怎么办，找谁说？”

“到公社，直接找纪社长。”

“那，那你去吧。公社，我就不去了。”皮安己推辞了。他知道，上公社，就没有他说话的地方了。

“咳，咱俩一块去。你等着，我把这捆扛回家，就过来。”

他俩还真去了公社大院。纪社长没在（应该叫纪主任，革委会主任，大家习惯了，还是叫社长）。经学文接待了他们。经学文现在兼任公社“一打三反”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一律由革委会主任亲自担任）。

经学文听完了他俩说的话，心里想你们在瞎掺和什么，当然嘴上说的是，这事我知道了，但你们还是要向大队反映。公社只管大案要案。你们讲的情况，由大队处理就行了。

“大队？大队斗争性不强，态度不坚决。他们现在坐上位置了，才不管这些呢。”平金刚说。其实，平金刚最大的意见就是在这点上，大队革委会怎么没有“红太阳”、尤其是没有他平金刚的位置。

“那好吧，我去跟他们说说。”经学文最后答应说。

鲁队长知道了经学文反映过来的情况，跟杜家骏、彭小宾两人说了。

杜家骏轻轻地一笑：“他们这两人，也是没事找事。”

彭小宾说：“还是他们自己有什么事没想开，找个别的什么闹一下吧。”

杜家骏说：“有多少大事还没处理呢。这事不能让他们闹，要不我们西北村真要乱套了。”

鲁队长说：“要不，我去给他们解释一下，就说大队上已经很认真地研究了这个问题，整理了材料上报公社‘一打三反’办。我们就等上级来处理。”

“行。”杜家骏、彭小宾两人都说这样就行。

鲁队长找他们两人说了，但并没有真的写材料报公社，当然也就没有下文了。他们两人大概也就是说说而已，也没有再去问。事情也就过去了。

好在迟一敬自己不知道这事，

这正是那个政治体制下的一个悲哀之处：自己的命运并不在自己手里。任由别人把你的命掂量过来、掂量过去，你自己却一无所知。哪怕是一锤子把你砸扁，你不但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有时你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而锤你，甚至都不知道这锤子来自何方。

32.2枪毙孙二赖

但别以为这“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就像平金刚、皮安己那两个人这么好糊弄。一大批赶上这拨风头的人，真的就送上了断头台。龙头镇就有，十字路口和东西南北四条街上都贴出了大字布告，被逮捕了将近一年的孙武胜被判处死刑。罪名是带头聚众抢劫国家财产，挑起武斗，残害革命群众，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手段特别残忍，影响极其恶劣，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其实，孙二赖的案子当初在县里判的是四年。孙二赖不服，要上诉。拿到省里重审，正好赶上开展“一打三反”，要从严整肃社会秩序、杀一儆百的时候，结果从重判处死刑。

同时判处死刑的，还有原先并没有抓起来的县“八一八”的那个瘦高个的总头。他也是倒霉，因为孙二赖的重审，又被拉了进来。他是总指挥、总策划，罪名可以加得比孙二赖还要多。而且还可以说他是“五一六”极左分子，这也是当时扣给对立面的很常用的一顶帽子。“大联合”并没有妨碍对另一派的惩处。用极左的方法，以反极左的名义，去杀所谓的“极左”分子，这也是当时的一大发明。直叫人看得眼花缭乱，晕头转向，知道是看糊涂了，却不知道糊涂在哪儿了。

对于孙二赖这家伙要被枪毙，龙头镇的人似乎也没有人去可怜他。

枪毙是在县城执行，照例是召开公判大会。跟高增光那时一样，宣判后五花大绑押上卡车，满城游街，背上插着亡命牌，嘴里堵着大木球。卡车四周围满了跟着车跑的兴奋的人群，都想看一看临死之人最后的模样。

孙二赖的表现实在很令人失望，远不如看高增光那样的过瘾。他两眼紧闭，脸色发白，浑身瘫软，脑袋低垂，只有头发挂在前面。下面跟着跑的人什么也看不见。孙二赖就这样一直被后面戴着大口罩的军人提着肩膀上的绳索，开进了有军人封住路口的小山坡后的刑场。

而“八一八”那个头的表现，似乎很淡然，很平静。他很顺从地被押着，眼光看着远方，都没怎么眨眼睛。好像他早已经知道会有今天的事，尽管他被抓进来还只一个来月。看他押赴刑场，跟别的看热闹的情况不一样。跟的人并不那么踊跃，有对立面的人带着兴奋和解恨，“倒了，‘八一八’可是彻底倒了”。也有“八一八”的人默默地跟着，看他们的头的最后一程。也有更多的“八一八”的人不敢也不忍过来看。

那天，龙头镇几乎所有能走得动的人，都去了。

风烛残年、已过八旬的孙大娘，耳又聋，眼又花，已经出不了院门。人们都没有告诉她这事，只说是孙武胜跟着“八一八”上北山了，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回来。

第三十三章 海秀被捕

1960年2月2日

33.1 笔迹

国内紧张局势的加剧，使公检法的工作压力骤然加重，不只是孙二赖之类的事。从龙头镇寄出的“反革命信件”，一直没有破案，这时排在了最前面。不但县局周科长来过几次，连卞局长都亲自来了。

宗发奋因为还没有职务，所以也没能参加卞局长在龙头的活动。他知道这是他翻身东山再起的机会。怎么抓住这机会？他急得抓耳挠腮，想了又想，想了又想，想了又想……他去找了南门外派出所的诸所长。

诸所长年近四十，提了个副所长，就碰上文革，受到了冲击，这才恢复工作不久。卞局长来所里时，再三对他说，“这反革命信件可是大事，你今后的发展，就看这案子了。到时候破不了案，有你好看的。”这几天，诸所长也正在绞尽脑汁、寝食难安：“这他妈的，会是谁呢？”

正冥思苦想之中，看见宗发奋又兴奋又神秘地来了。

诸所长知道宗发奋的为人，知道他肯定是为这案子而来，而且知道宗发奋在这件事上一定是个有用之人。所以虽然按说这案子对别人不能讲，但仍然伸过脑袋、凑着宗发奋的耳朵，一五一十地都说了。

“压力大得很呐！”诸所长最后说，才把脑袋缩了回去。

宗发奋听完后，看了诸所长一会儿，“嘿嘿”了两声，才说：“这次我要帮你个大忙。”

“此话怎讲？”诸所长甚是诧异，又把脑袋凑了过来，盯着宗发奋看。

“此人必定是李辰。干这事，龙头镇没有别人。”宗发奋一字一句地说。

“唉，我也想到过。”诸所长听了有些失望，脑袋又回去了，“我查过了，不是他的笔迹。李辰的字，写得挺漂亮，而信上字歪七扭八的。”

“喔？”宗发奋对自己的这一枪没打响，也有点意外。低下头，想了一会儿，毕竟是有多年的政治斗争经验，抬起了头说：“可以发动群众嘛。”

这次诸所长的脑袋没有过来，淡淡地说：“这事又不能对外扩散，怎么发动群众？”

这回是轮到宗发奋把头凑了过去，耳语了一番。

诸所长脸上有了笑容，脑袋上下直点，连说：“好主意，好主意。”

这就是几天之后，前面提到的西北村大联合联欢会上，鲁队长要大家每人都要写一份心得体会的事。这是公社革委会向各村布置的。

宗发奋知道什么事该找什么人。他又去找了平近芳。

“近芳啊，立大功的时候到了。”

学校已经“复课闹革命”了，可是没人真想教，更没人真想学，整天乱哄哄的。平近芳当老师也当够了，每日这么应付着，正坐在办公桌前一个人无聊着呢。突然听得宗发奋进来这么近乎地喊她，真有点吃惊，这可是以前的书记啊。

“立什么功啊，这一阵没人来批斗咱，就不错了。”

“没人批斗，就行啦？真要想没人批斗你，就得你去批斗别人。把别人都斗倒了，就没人批斗你了。这就是斗争哲学的精髓！”宗发奋对斗争哲学也真是学到家了。

“别人不斗我就行了，我还去斗别人？”平近芳此时对这些话显然没有兴趣，只是轻轻一笑。

“你怎么不能去斗别人。一个革命战士嘛，首先要有斗争精神。”

平近芳不大想去听这些话，但她觉得宗发奋显然是有事而来，就问：“宗书记找我，还有什么事吗？”

宗发奋听平近芳叫他好几年没人叫的“书记”，心里真是一热，便直奔主题而来，把“反革命信件”的事简单一说，“你对李辰很熟悉，他会不会怕别人看出来，故意改变笔迹，歪扭着写的？”

宗发奋的这番话，叫平近芳陷入了沉思。

怎么又是李辰？1957年的事，使李辰在她心上永远抹不去。李辰的遭遇，曾使她深深内疚，甚至有种负罪感。但后来渐渐地感觉到她和李辰已经是两种不同的人，是同一天底下、甚至是同一屋檐下，而不同圈子、不同命运、不同结局的两种人。她甚至庆幸自己起来批判了李辰，而确保了自己以后几年的政治上的安全。虽然推了人家一把，自己却上了岸，成了革命派。但是文化大革命，使自己又和李辰这种人一起挨批斗，“臭老九”不就是和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差不多的同一种人嘛。她知道眼前又有了推别人、救自己的机会。可是，这一次的性質跟1957年又不一样了，那将会给李辰和他的一家更严重的后果。还能再出手吗？她有点犹豫了。

“在想什么呢？对李辰还有同情啊？”宗发奋不愧是搞过多年政治工作的，在捉摸人、对付人的方面极有经验，一眼就看穿了平近芳在想什么。“他们是右派，对社会主义是有刻骨仇恨的。我们跟他们是势不两立啊。”

平近芳倒也是有这个感觉。1958年林海秀来学校找肖校长那次，她们两人在校门口相遇，林海秀对自己那种仇恨的、几乎是喷着怒火的眼光，深深地刺进了她的心，永远忘不掉。在她的眼睛里，突然又闪现出林海秀愤怒的样子。她立刻知道了现在宗发奋所讲的“势不两立”的意思。

没等平近芳开口，宗发奋又说了：“这可是个立功的大好机会啊。你要是把这案子破了，这校长的位置肯定是你的了。”

平近芳的心里又闪了一个火花，校长可是和公社主任、书记平起平坐的位置喔（虽然实际上并不是，平近芳理解错了），可嘴上的话却是说：“你现在不也是什么也没当上嘛？”

这可是碰了宗发奋的痛处，心里酸酸的，“头上没有乌纱帽，连这种小妮子也看不起咱喔。”脸上却还是灿烂如花，“我这是等着大妹子立了功，再来拉我一把。”

平近芳哧地笑了声，说：“我知道是谁。”

“谁？”宗发奋大惊，把脸都贴了过来。

“李辰的老婆林海秀。她的手指伸不直，写的字是歪的。”

对了，自己怎么没想到呢？宗发奋恍然大悟，一下子跳了起来，就朝门外跑。边跑边说着：“好，好，立了大功了。”

平近芳坐着没动。

“有了，有了，有结果了！”宗发奋溜烟地跑进派出所，朝诸所长嚷着。

诸所长正带着几个民警，一张张纸地翻着对笔迹呢。桌上摆满了从各大队收上来的社员们写的心得体会。

宗发奋如此这么一说，诸所长立刻把西北村的那堆纸划拉过来，把写有林海秀名字的那张纸找出来。

林海秀没有想到要改变笔迹。

诸所长再把公安局留下的那个信件的照片拿过来，两下一对。

“是的，是的，就是的！”诸所长高兴地叫着，对着边上一位年轻的民警说：“立刻写材料，明天我就送到县局去。”

还用等明天嘛。

宗发奋从派出所出来，什么也不顾，就骑着自行车，一口气蹬了几十里路，进了县公安局的大门，亲自找到了卞局长。

卞局长在百忙之中抽身见了，他，听完后，点着头说：“好的，好的，你谈的情况很有价值。”

宗发奋没有提到诸所长，更没有提到平近芳。

当年，在战场上林海秀为救下受伤的宗发奋，抬担架扭伤了手指，而无法正常地握笔写字。没料到二十年后，却反被宗发奋抓到了告发的机会，因此而抓进了监狱，送上了断头台。

33.2逮捕海秀

当林海秀被公安局抓走，人们更愕然了。

正是准备早饭的时候，林海秀在院子里劈小木块，任大队治安主任的平金刚阴沉着脸，走了进来，说了声：“林海秀啊，大队有事，叫你去一趟。”

林海秀抬头一看，平金刚的身后还有一个人，那不就是1957年抓走李辰、去年抓孙二赖的、又在大会上硬盯着她看的人嘛。

她放下斧子，转身就跑进屋。李辰在炕上穿衣服呢，还问：“这么早，大队会有什么事？”

“千万千万记住，就推给我一个人。”林海秀靠近李辰的耳边，一字一句悄悄地，却是清晰地说。

李辰一怔，抬起头望着自己的妻子。林海秀脸色镇定，目光紧紧地看着李辰。

平金刚进屋了，“走吧，还说什么悄悄话，以后有时间说。”

四岁的婷婷还在被窝里，伸出小手，娇滴滴地问：“妈妈，你要上哪儿呀？”

林海秀扑在婷婷身上，眼泪止不住地流，抚摸着婷婷的脸蛋，“婷婷，妈妈要出远门了，往后你要听爸爸的话。”

公安局的周科长，已经站在了房门里，“走吧，走吧。你自己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林海秀还在亲着婷婷的脸，周科长伸手就把林海秀拉了起来。

“这是怎么啦？”李辰在问。

林海秀站直了身，理了理衣襟，对李辰说：“我走了，看好家，看好婷婷。”便往外走了出去。

李辰抱起婷婷也要往外走，被平金刚挡在屋里。

周科长紧跟在林海秀的后面。林海秀刚跨出院门，门外已经有两个警察等着，过来就给带上了手铐，一边一个架着林海秀往公社走。

俊俏的林海秀，戴着手铐，被警察架着，几绺散乱的头发在风中飘逸，坚定的眼神，坚定的脚步，眼眶下却还留着泪珠。在胡同里，在街上，乡亲们看着都惊呆了。个个都张口结舌地愣住了，没有一句话语。

李辰推开平金刚，抱着婷婷，追了上来。婷婷在怀里尖声地哭喊着“妈妈，妈妈”。

在公社大院门口，停着两辆吉普车。林海秀被塞进了后面一辆。她在被推进吉普车的最后一瞬间，听见了婷婷的哭声，转过头来，看了奔跑过来的李辰和怀抱中婷婷的最后一眼。但这只是一瞬间，林海秀立即就被无情地推进了车。

吉普车卷起尘土远去了。

李辰抱着孩子，仰天而泣，孩子在嚎啕大哭。

四周站立着无声的人群，呆呆地看着。

看守所。

审讯室。

铁栅栏的后面，林海秀坐在靠墙的椅子，双手反铐在椅背上，低着头，闭着眼，看来已经十分疲惫，很难再坚持了。

这之前，刚来的十天，没人理她，没有跟她说一句话，只有稀饭喝。而后就是连续十天的密集审讯。

林海秀始终坚持两句话：信是我自己写的，信里的话没有错。

今天是卞局长亲自出马，他和周科长坐在铁栅栏外面的办公桌旁。

“这信是你写的吗？”卞局长一张嘴就开门见山。

“是的，是我写的。”林海秀眼也没睁。

“承认得倒是很爽快。”卞局长冷笑一声：“这个不用你说，我们也知道。我们已经进行了笔迹鉴定。”说着，拿着一张纸晃了晃。

卞局长停顿了一下，又重重地说：“不过，字是你写的，但内容可不是你写的。背后一定有人指使。只要你把他的名字说出来，你就可以回去了。”

林海秀靠在椅子上，没有回答，甚至还是闭着眼，一动也没动。

“想好了没有，谁指使你写的，快说！”卞局长猛地一拍桌子。

林海秀无力地抬起头，使劲睁开已经肿了的眼睛，微微翻动了一下干裂的嘴唇，“是我，是我自己写的。”

“骗谁啊？你能写得出来？！快说吧，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你胆敢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知道这是什么罪吗？这是死罪！”周科长也在吼。

林海秀闭上了眼。

“还装蒜，上铐！”卞局长又是一拍桌子。

林海秀立即被狱警拖起架到铁栅栏前，两脚站在小凳子上，双手向上提起穿过铁栅栏的横梁，那小小的指铐就铐在两手的大拇指上。这刑罚几乎不留下伤痕。

“说不说，最后一次问你。”

林海秀连眼睛也没睁。

狱警一下子就踢开了小凳子，林海秀脚离了地，全身的重量在拉扯着拇指的关节。

林海秀疼得睁开了眼，“啊啊”地叫着，浑身像撕裂了一样，豆大的汗珠流了下来，直到眼前黑了过去。

“醒过来，再铐！不信她不开口！”卞局长吼着起身走了。

33.3 拘捕李辰

几天之后。

吉普车又到了龙头镇的西街，这次是来抓李辰。

李辰没戴手铐，被两个警察架着走。周科长在一旁。小婷婷呼天抢地地在后面哭着，跟着，追着，跌倒了又爬起来。

“孩子！你们把我抓走，我的孩子怎么办？”李辰走到吉普车前，抓着车门不肯上。

“你这个现行反革命，还想着孩子？走吧！”周科长一把就将李辰的胳膊扭到后面，顺势就推了进去。

小婷婷哭着追了过来，“爹呀，爹呀！”直喊，满脸是泥土，嘴角都出了血。

吉普车卷着尘土走了。

婷婷追着车，倒在地上，惊恐万状地哭着。

四周依然站着不少人，虽然也有人泪眼婆娑，却没有人敢出来伸一把手。

鲁队长在人群外看着，对哈妹说：“你把婷婷领回咱家去吧。别人没有敢领的。”

哈妹走向婷婷，弯腰扶起孩子，说：“婷婷，乖，跟阿姨回去吧，等你爸爸妈妈回来。”

哈妹把孩子抱起来，也不敢流眼泪。

县城派出所的一间审讯室。

“你说，你是怎么指使你老婆写反革命信件的？”周科长问。

“没有，我没有。”李辰有气无力地答着。

“你老婆都承认了。你还说没有。”

“没有，我没有。”

周科长从桌子上的文件夹里拿出一张纸，在李辰眼前晃了晃，“这是她的供词，她都招了。”

“没有，我没有。”李辰没有去看那张纸。

“你只要承认了，就行了。你老婆可以回去，你也可以回去。不就是写封信，向上级反映反映情况嘛。虽然有些错话，承认了，认识了，也就行了。不要和政府对抗到底。说吧。”

李辰知道这时海秀在遭罪呀，在遭多少罪呀，都是自己的错，都是自己没听她的劝，拼上自己也要救下她。嘴里刚在蠕动，脑海里突然闪现出海秀坚定的眼神，和轻轻话语：“千万千万不能啊”，“不是，不是。”李辰惊叫着。

“是，还是不是？”周科长提高了嗓子问。

“是，是。”李辰沙哑着说。

“是你写的？”

“不是，不是。”李辰的声音更低沉了。

“不是什么？”

一个响亮的耳光毫不留情地打了上来。

这个耳光不是疼在李辰的脸上，而是打到了他的心里。他的内心在翻搅。他知道海秀也在受苦，在受更大的苦。他知道那些苦，那是连男人也受不了的苦。李辰的眼前出现了海秀的幻影。她，蓬乱的头发，脸上的血印，撕裂的衣服上满是点点的血迹，双手绑在身后，被劈啪地打着耳光，血滴从嘴角流下。不承认，会苦了海秀。

“是……是我。”

“签字！”周科长立刻递上纸和笔。

李辰看到了已经写好了满满供词的纸，浑身又打了个冷颤。他怕的不是自己签上字后马上将有的可怕的结局，而是俩口子都进来了，婷婷怎么办？李辰的脑海里又闪现出婷婷的泪眼和悲惨的呼叫。

李辰又发了疯似地嚷着“不是我写的，不是我写的呀……不是我写的呀……”他毫不掩饰地痛哭起来。

“呸！你他妈胡说！”

又一个耳光搥了过来。

“我要见海秀，我要见海秀！”李辰哭着说。

“做梦去吧！”

李辰的神情真的开始迷糊了，他哭着，嚷着，再多的耳光也打不醒他了。

“说不说？”周科长瞪起了眼。

李辰还是自顾自地哭嚷着。

周科长走过来，抓住李辰反铐在椅背后的手，用劲一捏，再反方向一掰。疼得李辰一声惨叫，双脚直跳，差点把椅子都颠翻了，只见他直直的眼神，大口地喘气，豆大的汗珠沁出脑门。不一会儿，脑袋一歪，便晕了过去。在那里面，想叫你遭罪，是连刑具也不用的。

周科长鄙视地看了李辰一眼，又“呸”地一声，真的吐了口痰，走了。

公安局的一间办公室。

“怎么办？审不下去了。”周科长问。

“审不下去也得审。”卞局长说：“你不要有任何的犹豫。已经请示过上面了，虽然没有向社会扩散，但是通过信件反对文化大革命，也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公安六条’上讲得很清楚。”

“但是那封信里面，也没有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的言论啊。里面有些话也是指出了一些问题的。”

“你别糊涂啦，怎么当的公安？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否定毛主席，就是否定共产党。这一点，谢部长说得很明确了。他（1967年）11月2日在公安部的讲话中说，‘办专案，整档案，对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损害，一个字的损害也不行。’（谢的讲话请见：《文革中的谢富治其人其事》，赵明，百年潮2003年第七期）

“那李辰怎么办？到现在也还没有认定他指使的证据。他家里还有个四岁的小女孩呢。”

“可以先放了他，但不是因为他家里有小女孩。干我们这行，可不能儿女情长。”

“最后怎么定案啊？”

“推给上面就是了。咱们不提个人看法，咱们就是服从、执行。”

关于“公安六条”补充一点。它就是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因其内容分为六条，所以简称“公安六条”。这是为保证文革的全面推进而制定的，直至197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才宣布撤销。其中第二条特别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极左势力就是利用这个“公安六条”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许多所谓的政治犯，就是依据这“公安六条”被判刑和处决的。“据统计，‘公安六条’公布后，仅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就有3000万人被斗，50多万人死亡。”（请见：《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与集体记忆》，宋永毅主编，田园书屋，2010年）这个条例在当时的政治乱局中就显得很荒谬。“炎黄春秋”2012年第12期崔敏的一篇文章《为祸惨烈的‘公安六条’》就指出了这点：时过不久，“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就相互闹翻。“伟大领袖”采用了“甩石头”、“掺沙子”以及“敲山震虎”等手段去收拾“他的亲密战友”。而“他的亲密战友”居然策划要用各种方式去谋杀“伟大领袖”。如果按照“公安六条”第2条的规定，无论是攻击“伟大领袖”或者是收拾“他的亲密战友”都是绝不允许的，难道由此能得出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的荒唐结论吗？

李辰在离开看守所之前，还要履行一定的手续。这种事连周科长也不用出面。

他被喊到一间空屋子，一个姓堵的警察坐在桌子后面，桌上放着一张纸。那警察板着脸，毫无表情地说着：“为了再给你一次悔过自新的机会，政府，不，军管会，对你仁至义尽，决定放你回去。”

堵警察说到这儿，把话一停，等着李辰的反应。他以为在他面前站着的那个可怜人，一定会对他感激涕零、跪拜再三，要感谢他的胜过父母之恩。

而李辰却始终低着头，垂手而立，一言不发，听到这句话，身体微微一怔。

“怎么？还有意见？”堵警察不高兴了。

“感谢政府，感谢政府。”李辰劳教过，知道这些规矩，赶紧鸡啄米似地连连点头。

“放你回去，不是叫你看孩子，而是要进一步深刻反省，知道吗？”堵警察特地拉长了声音。

“是，是。”

“走之前，再签个字。”堵警察朝着纸片一指。

李辰低头看过去，也不敢多看，只见上面写着：“……在此期间，我没有受过任何不良对待，没有打骂……我真诚感谢政府对我的教育和宽大处理……真诚感谢县看守所给我的良好待遇……永不反悔，立字为凭……签字人……”李辰看到这儿一股心酸涌上心头，鼻子都酸了，眼睛都湿了。

堵警察看着李辰有些迟疑，便不耐烦了，猛地往桌子上一拍，“怎么？不想走啦？”

“哦，哦，我签，我签。”李辰也猛地清醒了过来，赶紧走上前一步签字摁手印。

李辰又一次走出了看守所的大门，上一次是八年之前。而这一次脚步更沉重，远没有那次遥看星空的闲情了。前面是嗷嗷啼哭的小女，后面是因为自己还在牢狱中煎熬的爱妻，两头都撕心裂肺，两头都难以割舍，两头都无从选择。

出了看守所的门，李辰是走不动又不能不走。这就是李辰此时走的人生之路。

第三十四章 知识青年

1960年2月3日

34.1 上山下乡

1969年的秋天，开始了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

由于社会秩序混乱，各项生产和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更不用说扩大生产、增加新的员工，各级各类学校也都瘫痪，无法接纳新生。1966年以来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已经积压了好几届，无从去处，于是除了个别确实病残和有本事参军的以外，几乎全部实行上山下乡，到农村去。

这些曾经喧嚣一时、令走资派闻风丧胆的十来岁的红卫兵们，也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背起了铺盖卷，告别父母、远离家乡，到农村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各地农村、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对来到自己村的城里学生娃，其欢迎程度和安排情况，大不相同。有同情的，比较客气的，甚至尽力相助的；也有冷眼相待、不问不管的；更有歧视的、排挤的，甚至摧残迫害的。应该说，海源县，包括西北村都还是做得不错的。

各级都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西北村知青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衣春玲。接受的第一个知青不是别人，是肖胜利。尽管他还是和他父亲一起住在镇上租来的院子里，看起来和秦有理回西北村没什么差别。实际上这将对他的个人命运发生重大影响，因为他得把非农业人口转成农业人口，户口落进了西北村。

对肖胜利来说，这个弯好转，因为他本来就住在这儿，跟西北村的人也很熟，只是要跟着一起下地干活了。对于转户口的后果，他还没有体会。

不久之后，来了两位真的是城里的知识青年。一位是从黄港来的小姑娘，叫邢秋芬，才初中毕业，16岁。个头倒不小，人也挺文静。衣春玲把她从县城领回来的时候，还挺胆怯，寸步不离衣春玲。一个女孩子住哪儿呢？衣春玲干脆叫她进自己家，跟自己一起住了。

另一位是男小伙，叫时治国，高中生，20岁了。人们很快知道，他是1965年搞社教来村里驻点的工作组老时的儿子。老时觉得海源这地方气候好，生活条件不错，人也实在，在全省也是数得上的好地方，与其上别的穷地方插队，不如上这儿来了。老时也是经过了省、市、县各级知青办，费了不少周折，才办成了这件事。虽然他知道，社教时也跟当地干部产生过一些矛盾，但他相信龙头镇、相信西北村，还是把他儿子送到这儿来了。

时治国这小伙长得还可以，只是不谙世事，什么也不懂，书生一个。安排住在原先李芹的房子里。申老汉两口子早就不在了，那房子也空了好长时间了。可让他一个人住也不行，挑水做饭都不会。就叫

肖胜利当个知青队长，住了过去。

肖胜利跟他爸肖福兴说了。肖校长这一阵子心情已经平复多了。就说：“去吧，我这习惯了。我们还在一个镇上，到西北村比到中学还近一些呢。要照顾好人家，人家一个人，大老远地从省城到这儿来，不容易。他爹，听说人也不错。”

他们几个知青都安排在八队，就是老王头那个队。八队这些年，去世的人不少，像迟得法、包金贵、老王头等，剩下的不少人也老了、病了，不能干什么了，像皮安已、车素花。所以就把新来的年轻人安排到了八队。

头一天下地干活。玉米已经收了，要砍下秸秆往回运。一早，社员们先到生产队场院集中。男劳力们一人推起了一辆独轮小车。时治国试着也推起了一辆。看着别人的样子，把绳索套在肩上，两手一抬，车居然也往前走了。

平金刚还是兼队长，见状就问：“还能行啊，不行，就换个别的活吧。”

“能行，能行。”时治国答应得挺好。

一路上，歪歪扭扭，跟在人家后面，居然也一起到了西门外的已经砍了玉米的地里。小时心里想还行，这农活也就这么回事。

地里，人挺多，全队的人基本都来了。

青壮年推车，年纪大点的男人就砍秸秆、装车，妇女们就在运走了秸秆的空地上翻耕。

皮安已见小时推车过来，只给他装了一半。可小时拿起车把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走起来直晃悠，东一脚西一脚，就像喝醉了酒。没出十步，就连人带车翻在了地边，差点被压着。

四周一片哄笑。皮安已的小女儿皮平平，在边上笑得前仰后合，最开心。当然大伙的笑声毫无恶意，一边笑着就赶紧过去，扶车的扶车，扶人的扶人。

皮平平还埋怨她爹，“人家新来乍到，你也不少装点。”

“我哪儿装多啦？我已经少装了，你看一边才一捆。”

平金刚走过来，对平平说：“这也不能埋怨你爹。”又问时治国，“要不，你就拿刀去砍秸秆吧。”

皮平平为这事也一反常态地多嘴起来：“恐怕这也不行吧。别又砍伤了腿，更不好。不如就跟我们妇女一起翻地吧。”

时治国自己没哼哼，他也是一个话不多的人。

平金刚说：“好吧，那你跟她去那边的地里吧。”又对皮平平说：“你去帮他找把锄。”

皮平平对小时说：“来吧。”

小时也就跟着过去了。

在砍去了秸秆的地里，翻地的妇女们早看到了这一幕。杜家骏的媳妇唐玉贞就先说上了：“哎哟，你看平平带了个大小伙来。”

皮平平说：“去，去，我这是领了个壮劳力来，给咱们省点力气。哪儿还有锄头啊？”

“我娘身体不好回去了，就用这把吧。”丁妹说。王大妈比一年前身子骨要好一些，今天还跟着一起过来想干点活，也活动活动，不料还是不行。丁妹劝她先回去了。丁妹现在说话更少了，但这样的事还是开口的。

时治国拿起了锄头，甩起膀子就刨起来。没几下，就觉得累得慌，胳膊酸得抬不起来，咬着牙坚持了几下，还是挺不住，放了下来，手心通红，气还直喘。

看看周围的妇女们，连年近六十的车素花也没有这个样子，不紧不慢地一下接着一下，脸不红气不喘。

车素花见小时在看她怎么刨，就说：“小伙子啊，刨慢点，别着急，一开始谁也不会干。你胳膊没练过，先慢点，手往前拿。右手握中间，左手握前面。对，对，这样就省劲了。”

小时试着照车素花说的那样拿锄头，果然胳膊不用抡那么高，锄头抬到半腰就可以下去了，动作幅度小了，自然也就省力了。

唐玉贞看着觉得不顺眼了，就说：“哪有这样拿锄头的，像小鸡啄米似的。小伙子啊，得这么拿，左手握在中间，右手握在锄头尾，这才像个样子。”

唐玉贞说着便做起了样子。

小时正不知所措，该听哪一边的呢。

皮平平说话了：“嗨，小伙子呀，你该怎么锄就怎么锄，怎么顺手怎么来。”

车素花又笑着说了：“小伙子真有福，刚来就有人关心上啦。”

“哈哈。”妇女们一阵嬉笑，西北村好久没有这样的欢笑声了。

邢秋芬很腼腆，一直没有说话。

晚上，衣春玲和邢秋芬在一个炕上，钻在各自的被窝里。

“睡炕习惯不？”衣春玲问。

“还行，我爸老家也是睡炕的，小时候常去。”对于比较亲近和熟悉的人，小邢还是愿意说话的。

“这儿也是你的家，你现在是换了一个家。有什么不方便的事，就跟我说。”

“嗯。”小邢低头轻声地哼着。

“听说你白天干活，跟大家在一起很少有话，是吗？”

“……”小邢没有回话。

“一回生，两回熟。慢慢就熟悉了。”

“……”小邢低着头说，“我的成分不好，怕你们嫌弃我。”

“喔，这我知道，我看过你的材料了。现在政策宽松了，成分不好，那是你们的父母不好，你们是可教育好的子女，只要和贫下中农站在一起，还是有希望的。”

在中国的人事管理办法里，有工作单位的人，每个人都有一份档案，记录着你的各种有关事项，比如：家庭成员、升学就业、工作调动、职务变迁、工资升降、各种奖惩、不同时期的表现、领导对你的看法、评价等等等等，一应俱全。而且永远跟着你一辈子，随着工作调动也会转到新单位的人事部门。但你自己却永远看不到它，不知道里面都是谁写的和究竟写了些什么。

但是，农民是没有个人档案的，或许是他们世代居住在这儿，相互间十分熟悉和了解。连箱子里面有几条裤叉，彼此都很清楚，用不着再有什么书面材料了。

对于学生，介于两者之间，有份履历表之类的。至于衣春玲所讲的“可教育子女”，是文革中后期为缓和“对地富反坏右”黑五类过于严厉的打击而不断加剧的社会震荡，对这些阶级敌人的子女放松了点，称之为“可教育子女”，以示与他们的父母相区别，减少他们的对抗情绪。

“你父亲以前是干什么的？”衣春玲问。材料上只是说邢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

小邢原本不想说，但一看衣春玲还挺诚恳，就讲起来了。

“我父亲解放前还到龙头来过呢。”

“是吗？”衣春玲大吃一惊，“什么时候？为什么事？”

“就是1949年国民党进攻那次。他是跟着青年军过来的，想搞国民党的那套土改办法。”

“喔，我好像听说过。”

“我跟我父亲不是一个姓。解放后，我爸怕影响我，让我跟我妈姓，我就姓邢了。但是也没用。”

邢秋芬的父亲就是刘子录，原先是个中学教师。临解放时，国民党军政人员四处逃散，很多事没人管，就到处拉人，把这样一个教师，也拉来当上了有职无权的市党部的秘书长。那时国民党中有个别知识分子，也想推行以赎买为主的土改，以缓和对抗和减轻国民党的压力。刘子录当时对这个也有兴趣研究，于是就干上了这个差事，以至于跟着青年军跑到赵村，搞了几天新政。事实证明，这个办法在当时国共双方已经是你死我活、白热化斗争的情况下，根本是不可行的。刘子录也只好悄悄地不辞而别，跑回黄港，改头换面地躲了起来。但是解放后，还是被揪了出来。按照“市党部秘书长”的职务，定了个“历史反革命”，在街道的小作坊里靠着糊纸盒勉强为生。（说明：“历史反革命”的划分标准基本上是：在敌伪方面担任下列职务的人员：党（区党部书记以上）、政（保长以上）、军（连长以上）、警（警长以

上）、宪（宪兵）、特（特务）等。）邢秋芬也就从小抬不起头，一直受歧视，受欺压，养成了这个不敢说话，离人三丈远的习惯。

衣春玲听了，想了好久，也不知道该怎么劝，就说：“踏下心来，在这儿好好劳动，来个脱胎换骨。几年以后，争取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员。”

“嗯。”邢秋芬点点头，也沉思着。

34.2革命婚礼

1970年的春天。

西北村有一件喜事：彭小宾和衣春玲这对年轻人结婚了。婚丧嫁娶在农村是个大事，但在本书四十年的跨度里，西北村这样的事有不少，无法一一介绍。这儿之所以提及他俩的婚事，是因为他俩举办的是一场当年时兴的革命化婚礼。

彭小宾心仪于衣春玲是很早的事了，团支部的活动使他俩常在一起，但小宾觉得春玲比自己小了很多，也没敢更多地往那儿去想。春玲对小宾，也是觉得在工作中两人挺合得来，很多事能想到一起，说到一起。因为小宾比她大十岁，所以对小宾很敬重。春玲没有兄长，对小宾也就觉得像大哥哥一样。倒是村里人看他俩常常出双入对，就议论起来，觉得他俩还挺般配。尽管年龄差得稍微大一点，龙头一带俩口子差十岁的并不多，但这样能投缘的还真是难得。然而他们俩自己并没有多往那儿想。

最终使得他俩走到一起的，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中，他俩观点相同，志趣相投，在两大派之外另立了以他俩为主的“红海洋”。共同的战斗使他俩认识到，他们之间已经走得这么近了，近到相互间难以割舍了。也使村里所有人都觉得，他俩之间谁也不可能再有别人来替代了。他们的事真是水到渠成了！

讲家庭条件，他们两家在村里都一般化，并不富裕，也不是艰难到哪儿。小宾在他父亲彭会计社教中被打死后，是家里的顶梁柱。他把家里的老屋用白纸重新糊了一遍，贴上革命的宣传画，作为新房。衣春玲这边，是衣大妈的宝贝女儿，准备了一铺一盖。虽然只是一套被褥，但是在一人一年只有三尺五寸布票的情况下，要办得起来，大家都知道衣大妈是费了多大的难。好在是革命化的婚礼，在经济上要省力多了。

结婚那天可喜庆了，西北村的乡亲们几乎都来了，他们要庆贺西北村的新一代。

新郎彭小宾穿着一身从南门外营房借来的新军装，胸前大大的毛主席像章下戴着大红花，手捧“毛选”四卷，在几个小伙子的陪同下，来到新娘衣春玲家。

春玲今天一身新装，红格子外罩衫，配米黄色的长裤，胸前也是毛主席像章和大红花。

“噼啪”的鞭炮响起，春玲在姑娘们的簇拥下出门，肩上挎着背在身后的捆得像行军包似的花被，双手也捧着“毛选”四卷。那床被褥同样叠得整整齐齐、方方正正，由彭小宾背着。

没有花轿，没有大马，更没有婚车，两人向彭家走去。前面还有一个人举着贴有毛主席像的木牌，后面是亲朋好友，还有的敲着锣鼓、吹着唢呐、举着红旗。好一个喜庆的队伍，就像是送去参军似的。胡同里站满了看热闹的乡亲们，气氛相当热烈。

肖胜利忙前忙后地跑着，想领着呼个什么口号，再壮一点声势，就是没有找出来合适的口号和革命歌曲。

阳光格外的灿烂，爆竹在半空炸响，彭小宾显得兴奋而又英武，衣春玲面庞红润，步伐矫健，更是充满了青春和秀美。

人们端详着春玲，这是西北村又一位风采四射的女性，西北村人的又一个骄傲。不由得叫人想起，永远留在西北村人脑海里闪亮的几个女性：壮烈牺牲的姜雪花，不知下落的赵玫，被公安局抓去的林海秀……

进了彭家的院子，大爆竹又“砰砰”地响起，锣鼓敲打得震天响，院子里早早挤满了人。

身为村主任的鲁队长，这回当主婚人。他一伸手，示意鞭炮、锣鼓停下，从口袋里拿出红色的“语录本”，在一番敬祝万寿无疆和身体健康之后，宣布彭小宾同志和衣春玲同志的革命婚礼现在开始。

“首先向毛主席像三鞠躬。”他俩向举着的贴有毛主席像的木牌，认真地鞠了三个躬。

“向革命群众三鞠躬。”两人又朝着乡亲们鞠了三个躬。

“两位革命新人相互鞠躬。”两人相对鞠躬。

“让我们共同学习一条毛主席语录：‘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你别看，鲁队长还真能想起一条能应景的语录来。不管是不是贴切，谁也提不出意见。接着鲁队长又提高八度，像开大会似地大声说：“我宣布，彭小宾同志和衣春玲同志已正式结为革命夫妻。让我们热烈祝贺他们俩由革命的战友成了革命的伴侣。”院里院外掌声、欢笑声四起。

“今后你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搞好革命大联合，做一对革命的好夫妻，为革命事业做出更大贡献！革命婚礼到此结束！”

小两口向乡亲们发喜糖，一群小朋友围上来嬉闹着、抢着。

大家都围过来向他们祝福，一拨拨的人不断从院子外挤进来，道喜。

大家让于村长先过来，于村长也满脸高兴：“喜事啊，喜事啊。西北村的革命传统有你们继承，我就放心啦。”

杜家骏称赞说：“他们是我们西北村的革命接班人啊。”

平金刚握着两个人的手，说：“西北村的未来靠你们啦。”

齐大妈、邬大妈、唐玉贞这些妇女都围着衣大妈：“衣大妈，今天你可熬到头啦，有了这么个好女婿，从心底高兴吧。”

“高兴，高兴。”衣大妈都笑得合不拢嘴。

肖福兴也来了。中学重新开学了，新的一批娃娃们进了中学，肖福兴还是任校长。这回肖校长又好多了，倒并不是重新又当了官，而是又有工作可做了，又可以站在讲台上教学生了。一个有责任感有事业心的优秀教师，离开讲台、离开学生是很难受的。

他穿上一身笔挺的蓝卡其中山装，在贺喜的人群中很显眼。还带来了一支那时刚开始有的、从黄港捎来的、龙头镇还没见过的塑料花。把衣春玲高兴得，连连称谢。

祖所长和祖云涛也来了。祖云涛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大学延期毕业，在学校前后六年，又去了黄河口的农场劳动锻炼，这才分回了县里，在县工业局。这天，是特地从县城赶来的，和老爸一起过来道喜，还送上了一本在农村也是很少见的像册。

车素花和经大臣老两口也来了。他们已经住到一起了，但是没有办任何的仪式。他俩一起过来道喜，也是他们老两口在西北村乡亲们面前的第一次重新亮相。

宗发奋也来了，但他这次是少见的低调，来了就走，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

纪社长和经学文上县里开会，没能来。

年轻人围过来了。小宾作为西北村年轻人的代表，这两位新人的喜事，他们更是高兴得手舞足蹈。

齐成才拍着彭小宾的肩膀：“彭哥，好样的。”

皮高深对着羞涩的衣春玲还说起了调皮话：“今天春玲这么俊俏，真想亲一口。”

皮平平拍了一下他哥的脑袋：“胡说什么呢，你有咱小宾哥的能耐吗？”

时治国、邢秋芬两位知青在热闹的人群里显得有点拘谨，他们认真地向两位新人点头致敬。

邢秋芬还再三说：“谢谢春玲姐，对我来了以后的照顾。”

春玲说：“不用谢。我嫁过来以后，已经安排好了。你上陶家大院，跟王溪姐一起住，她来照顾你。”

前两年住在南门外的辜连长也来了，还带来了新婚的妻子、皮安已的大闺女皮姗姗。两人也都满脸喜庆，高兴的程度不亚于两位新人。他们俩是什么时候挂上钩的，人们都没发现。关于他俩后来的秘闻，这儿就不多说了，本书始终不以这些为写作重点，其实也没有什么事，至少是没有什么小青年们那种甜言蜜语、花前月下的事，双方都是出于很现实的考虑。以前没见他们有什么往来，可能是“红太阳”撤出镇里、大家住粮管所的那段时间，留村里的人少，为他们提供了机会。大家应该能从皮姗姗为辜连长拎暖壶、倒开水，看到事情的蛛丝马迹。皮姗姗快三十了，能找到个“大军官”（海源人对部队干部羡慕的称呼），自然是心满意足。辜连长那时心知自己在部队时间不长了，赶紧找个当地媳妇，在部队调离龙头时，跟姗姗挑明了这事，姗姗也答应了。作为地方部队，守备师也没走多远。但辜连长也不想多待了。他申请要求转业，并留在海源。部队领导考虑到他对海源的感情，也就批准了。何况这支部队的领导自己对海源也是深有感情的。辜连长现在安排在县工商局当副科长。这个局，对外挂的是工商局的牌

子，对内还只是县商业局的一个科。辜连长还只是科下面科的副科长。中国的行政机构，叠床架屋到什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辜连长的待遇不能算好，也不能算差。这个部队被说成是“支左”有错误，能有这一步，已是不错了。皮姗姗的户口也没能转出来，不过比起要回西面辜连长的老家，两人还是挺高兴的。

现在南门外的门连长也来了。道喜之后，于村长又提起那段两派的往事，说：“你那时支持‘革联指’还挺坚决的啊，什么事都站在最前面。”

“你以为我是偏向‘革联指’、打击‘八一八’啊？现在你们两派的人恐怕都在，我就说实话吧，不是的，难办啊。不在我的位置，是很难体会到的。这种处境，只有辜连长才会知道，是吧？”

辜连长，这时应该叫辜科长了，也忙说：“是啊，是啊。那种情况下，上头压着要支持那一派，又不能出事，双方又剑拔弩张，虎视眈眈的，真是操心啊。弄不好，就要出大事啊。”

门连长接着说：“上级说要取缔‘八一八’，我得执行。我又怕两派打起来，那天把‘八一八’围在望海山上，要不是我在最前面挡着，真要打起来，得死多少人啊。那山顶上，人没地方躲啊，只能拼死打，是不？”门连长在问彭小宾他俩。

“是啊，是啊。那天确实亏了有门连长在，要不真的很难设想会怎么收场。”彭小宾说。

门连长脸上挂着笑容，说：“那天我虽然虎着脸，要收你们的旗帜。但我看得出来，你们是正派的好青年。而且看得出来，你们两个之间有戏。哈哈，哈哈！”

鲁队长也哈哈笑着说：“都那个时候了，门连长还有这份心思。”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杜家骏过来对两位新人说：“院门外还有几个挤不进来，你们去看看吧。”

“好，好。”两位新人赶紧走出门来，只见王大妈在丁妹的搀扶下，依在墙边。王大妈抬起手，对春玲说：“闺女啊，大妈这身份不知该不该来。可是我总想我和你们，和你们的爹妈，都是几十年的情份，我得过来看看啊。”

春玲听了也是眼睛一热，差点掉下了泪，双手捧着王大妈，说：“你永远是我的长辈，你永远是我的大妈。谢谢你能过来，谢谢你能过来。”

李辰抱着婷婷，也说：“我也是想了好久，该不该来，能不能来，就怕反而影响了你们。”

“李老师，你说哪里了。我们也在想你，想海秀姐。”彭小宾说。

春玲抱过婷婷，眼泪已经止不住了，只好把脸捂在婷婷的身上，“好孩子，好孩子，没事就到阿姨这儿来玩。啊？阿姨给你糖。”

婷婷高兴地接过糖，说了声：“谢谢。”

萧瑟的寒风中，这两位年轻人，让我们看到了人间还有春天在。

没来的，恐怕就是秦德才了，好在人们也并没有想起他。

34.3 辛狗狗

出人意料的事还是层出不穷。

运动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各地搞起了“清理阶级队伍”，不断有些单位到公社、到村里来调查与龙头镇、与西北村有关联的人和事。

这一天，黄港国营第二棉纺厂（简称“国棉二厂”）来人调查他们厂有个叫党爱国的青工的身份。接待他们的经学文说，龙头没有姓党的，北山倒有个党家庄。来说，这人就是你们龙头的，是烈士后代，从国民党手里救下来的，一直在黄港福利院长大，直到高中毕业才离开福利院，分到他们厂。

大家一听，说是有这么回事。经学文问，这人出了什么问题，还需要来外调？

来说，这位同志根正苗红，表现很好，现在担任我厂团委副书记呢。

“那还来调查什么问题？”

“我们是想了解他父母的英雄事迹。回去以后，作为全厂阶级教育的生动教材，让广大职工更加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

“哦，具体的我真还不知道。我帮你召集个座谈会吧，我也挺想知道的。”

座谈会在西北村大队部召开。找了几位老同志来，有于村长、皮安已、车素花、鲁队长，当然还有秦德才，纪社长也来了。

来说了意思，大家就说开了。

于村长先开了腔：“龙头的烈士是有几个，可他们家里的情况大家都很清楚，没有这样的一个小孩子。”

鲁队长也说：“这事我也一直没弄明白，这小孩究竟是谁家的，哪儿来的呢？”

纪社长说：“我也一直奇怪，参加龙头反击战的部队很多，可没有一个带小孩的，这我知道。可是革命烈士的子女怎么会在国民党军队里找到的呢？”

“弄不好啊，是搞错了。”车素花说。她问秦德才：“那天你上山杀地富，到底杀了几个人？”

“我，我……我也记不清了。”秦德才有点急了，话也说不清了。

“你杀了几个人也不记得，你以为是在杀鸡啊？好好想一下。”

秦德才一个一个地扒拉着指头，“……七个，八个，九个……”

“我问你，老李头家那天死了几个？”车素花又问。

“老李头家，全家都带出来了……两个老家伙，还有那个李芹……”秦德才还能记得李芹的名字。

“你是在半山腰杀的人，李芹的尸骨后来怎么又是在村里的水井里捞上来的呢？”皮安已问。

“这我哪能知道？难不成是有鬼了？”

“别扯鬼了，那天你杀的人里面有没有小孩？”于村长问。

秦德才愣了愣神，忽然说：“有，有，我想起来了，有一个三、四岁的小孩。”

“谁家的？”大家不约而同地齐声问。

“我想想，哦，是辛家的，是辛家三媳妇带的。”

“那孩子叫狗狗吧？”皮安已最先想到了。

“对，那时因为他是地主家的，连名字也不让取，就叫狗狗。那年应该是……应该是4岁。”于村长说。

“那今年应该就是25岁了。你们那位党同志多大了？”车素花问。

来说：“是24岁。”

“那就差不多了。”车素花说。

纪社长说：“不对呀，那小孩不是被秦德才杀了吗？”

“就那小孩没挨我的刀，被他妈扔到山下去了，所以当时我对他妈还多砍了几刀。”

“那小孩扔下去以后呢？”车素花又问。

“我看滚得挺远的，没有气了，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我以为是死了。再说那时枪声直响，远处已能见到国民党兵的影子了，我什么也顾不上了，就赶紧跑了。”

“国民党兵就上来了？”鲁队长问。

“是的，那子弹从我头顶上直飞，吓得我直跑。”

“这么说，国民党兵就上来了，救起了李芹，也救起了那个小孩。”于村长说。

“这事怎么变成这样啦？”来人大惊。

“你有那位党同志的照片吗？”鲁队长问。

“我带了一张，是他在厂门口照的。”来人把照片拿了出来。

大家相互传看。皮安已一看，就说：“长得跟辛家三少爷一模一样。”于村长、车素花年长一点的，看了都点头。

“啊呀，弄了半天，这个烈士子弟是个狗崽子。共产党算是白养他了，我们都上当受骗了。”来的那人竟然大呼小叫起来。

“你先冷静一点，等我们再了解了解。你回去以后，先别对外说，把详细情况、材料再拿过来。等都落实了，再给你正式的结论。”纪社长说。

来人点头。

“我们也真是，这么大的事，现在才去搞清楚。”鲁队长说。

“唉，历史上的遗留问题多了，都去搞清楚，搞得过来吗？”于村长说。

党爱国自己一点儿也不知道，这背后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

他就知道他是烈士子女，革命的后代。福利院一直对他很好，来到厂里，厂领导对他也很重视，一进厂就当上了这个有几千职工国营大厂的团委副书记。他很感激党对他的培养，是党给了他生命，是祖国母亲养育了他，连他的名字也是福利院给他取的。他时时刻刻没有忘记这一点，对自己也一直严格要求，事事都要走在别人的前面，应该说已经成长为各方面都很优秀的青年。而且前几年厂里混乱，两派恶斗的时候，他还没过来，现在形势相对比较清晰，表态处事也容易多了，厂里各方面的人都很欢迎他。他自己也很少在团委办公室里，经常在车间里劳动。纺织厂的车间里，机器噪音很大，对面讲话都听不清，温度、湿度都很高，人在里面是很难受的。车间里的人能跳出来进办公室，那真是求之不得，烧高香了。但是，党爱国还坚持在车间，不会挡车，就跟着机修工学技术。尤其是，这样一个正当年的帅小伙，出现在众多的纺织女工面前，其受青睐的程度，是可想而知了。

当他被叫到厂长办公室里，办公室主任一反常态，非常严肃地对他说：“你不能再叫党爱国了，我们查到了你的名字叫‘辛狗狗’。”狗狗顿时愣住了。

“你的父母不是革命烈士，你的全家已经被我们人民政府在土改时镇压了。只有你父亲跟随国民党逃窜了，至今也下落不明，大概早就死在哪个阴暗的角落里了。”

主任把一大摞调查材料、证明材料往桌子上一摔。

狗狗都天旋地转了。

“从现在开始，你已经被开除了，跟我们厂再没有任何关系。你欺骗了党和人民二十多年，组织上决定把你押回原籍处理。”

主任把这事说成是狗狗骗了国家骗了单位，实在是没有道理。

说着就有人跟着去宿舍，卷上铺盖，上了厂里的一辆工具车，连办公室的杯子、钢笔都没有让去拿。这事传得才快呢，当他走过厂区，往日里喜欢和他嬉闹的女工们，也只是远远地站着，无声地看着他。汽车一阵风似的把他送回了生养了他而他却记不起印象的西北村。

同样的一个人，还是这个躯体，还是这个大脑，只因为家庭出身的不同，一下子就从众星捧月似的王子，立马就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从此，他就从党爱国变成了辛狗狗。

34.4知青生活

党爱国变成了辛狗狗，回到了村里，回到了生育了他而他却是完全陌生的村子。好在西北村对他还可以。经公社研究后，狗狗毕竟和一般的地富子弟不一样，就按回乡青年对待，跟肖胜利、时治国俩一起住在以前李芹住过的院子里。

当辛狗狗进了西北村，把铺盖卷扔到里屋的炕上时，他认真地看了看屋里屋外，这就是他从来不知道的家乡，这就是他以后要生存一辈子的地方。

但是，他没有萎靡不振，没有低迷消沉，一路上他想了很多。或许是他一直生活在儿童福利院里，社会经历不多，对社会上风浪险恶体会不多。但他决心站起来，决不趴下，照样做人，照样往前走。前面的路，到底有多远，到底有多难，现在还不知道，但他决心走下去。

路上，中午都没有让他吃饭。理由是这一年多国家发的工资就应该吐出来，还想多吃一顿饭，没门！

他就问外间的两位年轻人，“这晚饭是怎么安排的啊？”

时治国转过脸，没吭声，嫌他是反革命的儿子。自己的父亲虽然不是属于领导阶级，但也属于当时讲的红五类的范畴，还不屑于和黑五类的儿子在一起。

还是肖胜利说：“这两天你就别操心了，以后我们三人轮流做。口粮，第一年是国家按定量发的，明年就靠我们自己在生产队挣。”

“行。”辛狗狗相信自己能挣出吃的来。

“干活咯！”平金刚一声招呼，八队的地里又多了一个年轻人。大家都过来看，辛家的孙子回来了，西北村的人几乎都过来了。站得有近的，有远的，一大片。有人说，秦德才这家伙，干事情这么不利索，连杀人的事都搞不清杀了几个。也有的说，他们辛家命不该绝，硬是在刀下留了一条根啊。还有人说，现在都搞不清这孩子是命苦还是命好。说命苦吧，居然还能活下来；说命好吧，还是被查出来，从城里赶了下来。最后，大家都在摇头，这事真没法说，这话真没法说，命这事真是没法说。

辛狗狗自己没理会这些。今天是往地里运肥，两人一车。他们四个知青，但是时治国不愿意和狗狗在一起，如果和邢秋芬一组，一个拉不动一个推不动，那就只能和肖胜利一组，而狗狗就和小邢一辆车了。

辛狗狗虽然过去是城里人，没干过农活，但大概是因为二十几年来一直心情愉快，吃得好，所以体质好，推起车来还不是很费力。虽然推小车也有一定技术含量，但体力是第一位的。至于技术问题，他就跟在肖胜利后面看。一个上午下来，也不比肖胜利差。

他看着拉纤的邢秋芬远不是干农活的料，有小斜坡、有沟坎的地方，总是自己一使劲顶过去。邢秋芬的纤绳，有时甚至可以不伸直，弯弯地荡在那儿。小邢也意识到了这点，回头腼腆地笑了。反而是时治国这一头，遇到不好推的地方，自己没有劲，车过不来，还嫌肖胜利没力气推，嘴里又嘟囔着。肖胜

利一个劲地苦笑，没去跟他计较。倒是平金刚过来说，你们能推多少算多少吧，下一车不一定装这么多。

对于这些活，虽然队里已经有了一定照顾，可时治国还是累得不行。就几天的时间，就浑身疼痛，手都抬不起来。从早晨下了地就眼巴巴地看着太阳，怎么还不下去，怎么还不下去。那太阳却一直高高地挂在天上，一点也不动。一分钟一分钟地苦熬着，一小时一小时地苦熬着，一天天地苦熬着。这才几天呢，要熬到什么时候才是头呢？满心的苦楚，向谁说？时治国实在撑不住了，流泪了。怎么办呢？生场病吧，生场病总可以请假回家了吧。

怎么生病呢？他想了很久，终于走到他们院子的粪坑边，坑洞是朝向院外的胡同。粪坑上阵阵臭味，有几个苍蝇在飞。他看见这几个飞舞的苍蝇，眼神都有点恍惚，终于伸出手，要去抓。可苍蝇比他灵活得多，哪能抓得到？他想再引几个过来，更好打一些。便蹲下“噼噼啪啪”地拉了一阵，用旧报纸擦了，扔下了坑洞。一阵更浓的恶臭之后，果然有几个更大的绿头苍蝇，闻味而来。时治国脱下鞋，用鞋底居然拍死了一个。时治国拣起了这只已经被拍扁了腹部、甚至挤出了白色蛆粒的绿头苍蝇，硬着头皮，闭着眼，含着泪，居然、居然生生地吞了下去！为了能生病，为了能生病而可以回家去住几天，时治国居然抓苍蝇去吃！

吃一只恐怕不行吧。时治国还想再拍一只，院子外的粪坑口却响起了两、三个小孩的声音。

“快来，快来，我说这儿有吧。刚才我听见拉屎的声音了。”

一个小孩的话音刚落，几只铁丝绑的小扒子，就从外面伸到时治国刚才拉的屎里，扒那擦腩的纸。

“到底是城里人，擦腩还用报纸哎。”

“这下拿回去晒晒干，做饭引火，能用两三次了。”

时治国惊讶得不得了，也没有再去拍第二只苍蝇。

然而，第二天，时治国还是流泪了。

他流泪，是因为他还没有生病。

生生地吃了一只粪坑边的大苍蝇，也还没有生病，也还是不能回家去，他能不哭么。

其实，这也只是时治国的一厢情愿，生了病就能回家啦？哪有那样的好事，就那么容易让你回家，那谁还留在乡下？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还能搞得下去么？亏得时治国没有生病，要不，他会更苦更惨。

也许会问，为了回家，还至于用得着这样吗？可是，你知道这件事吗：当年，在云南的数百上千名成都、重庆的知识青年，为了回家而集队徒步行进，一路冲破重重阻挡。1974年8月28日，行至滇缅公路瑞丽江桥，为了冲破军队和当地民兵用步枪和刺刀架起的封锁，他们不惜组成敢死队，上身赤膊，手持刀棍，吼声震天，一次又一次地拿着命反复冲锋，最后虽然冲过了桥头，还是被四面八方围剿，没能回

得了家。（请见：《中国青年梦》，邓贤，作家出版社，2009年；《我们要回家》，刘晓航，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

这些孩子，只是为了能回家，只是为了能回城啊！

对新来的几个知青，秦德才也在一个一个地捉摸，能不能玩出个什么花样来。那天，他特地跟着狗狗一起走，看能搭上什么话。忽然，看见胡同口后面那排房有个旧瓦房，秦德才凑近狗狗说：“那就是你家的房哎，那就是你家的房哎。土改时被分掉的哎。”

狗狗虽然来村里时间不长，就觉得这秦德才不是个东西。狗狗知道，地富子女想动被土改分掉的财产的脑筋，那就是反攻倒算，那就是死罪。秦德才明摆着不是在下套子么？他瞪了秦德才一眼，迈出大步，拉开距离走了。

秦德才一看不上当，“呸”了一声。再看时治国，他爹是个省城的编辑，还是当时的社教工作队员，先不下手，等放一放再说。不是还有个邢秋芬么，嘻嘻。

从衣春玲结婚去了彭家以后，邢秋芬就跟王溪住在陶家大院最前面的那排倒屋。但王溪已经变得放荡不羁、恬不知耻了，跟秦德才父子俩都常来常往。

那天中午，邢秋芬回来想歇一会儿，正躺在炕上呢，秦德才也没敲门就蹑手蹑脚地进来了。

邢秋芬以为是来找王溪的，也就没在意，说了声：“王溪姐没回来呢。”

“找王溪干什么呢？找你也行哎。”说着就嬉皮笑脸地到了炕边，伸出手，要拉开邢秋芬搭在身上的毯子。

邢秋芬大惊：“干什么啊？”

“什么干什么呀？你还不知道要干什么啊？”秦德才知道邢秋芬胆子小，不敢说话，所以放肆得很，一只手就压住了邢秋芬的手，那无耻的脸就凑了上来。

邢秋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急得不知道该怎么反应，用一只手想推开秦德才的脸，可毫无用处。

就在秦德才要跨腿上炕的时候，邢秋芬不由自主地尖叫起来，秦德才愣了一下。而辛狗狗刚好走进来，因为邢秋芬有封她父亲来的信，他特地送过来。在街上就听见一声尖叫，他三步并两步地跑了进来。一看见如此这般，上去就扇了秦德才两个大耳光。秦德才刚要叫，又被辛狗狗一把推倒在地上。

秦德才倒在地上，杀猪似地直叫：“反革命的儿子打人啦，反革命的儿子打人啦！”

辛狗狗还想上去踢几脚，被邢秋芬拉住了，“还好，还没出事。”

外面听见动静，忽忽隆隆来了一大群人，听了这情况，都纷纷骂秦德才“狗改不了吃屎”，“真丢西北村的脸”！

辛狗狗听了前一句话，又不乐意了，“狗吃屎，也比耍流氓好。”

杜家骏听出这话的意思了，就说：“小辛啊，要不你就改个名字吧。”

“我就不改，这是革命群众给我起的名字，为什么要改？”辛狗狗也有他犟的一面。

鲁队长说：“秦德才，你跟我回大队部，先办个三天学习班再说。”按说大队一级是不能关人禁闭的。但当时有个流行做法，叫办“学习班”，就是不让你回家，变相禁闭。“学习班”涉及的内容就多了，从干群矛盾到小偷小摸，从男女关系到计划生育，直到私自开荒、下海摸鱼、上山捡了树枝，不管是应该由治安管理办法处置的，还是应该进行正常思想教育的，一概都由“学习班”解决，至于在里面是否挨骂挨打，那要看站在你面前的那个领导的意思。据说，办班“效果”一时还不错。

衣春玲说：“这样，小邢也不能在陶家大院住了。”

“跟我们一起住吧，我保证她安全。”辛狗狗说。

“那不行，你们三个大小伙子，多不方便啊。还是上我家吧，跟我妈一起住。”

这件事以后，邢秋芬对辛狗狗由感激发展到了爱慕。渐渐的，在阶级斗争的风霜雪雨中，开出了一朵难得的爱的火花。

第三十五章 苏修特务

1960年2月4日

35.1 林彪跑了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它有无数田野和森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打从莫斯科走到遥远边地，

打从南俄走到北冰洋，

人们可以自由走来走去，

就像自己祖国的主人。

到处生活都很宽广自由，

像那伏尔加直泻奔流。

这儿青年都有远大前程，

这儿老人到处受尊敬……”

这首《祖国进行曲》（又名《我们广阔的国家》）曾经是苏联的国歌，在五十年代中苏友好时期，为很多中国人所熟知。那时热爱苏联就是热爱革命，向往苏联就是向往革命。这首歌所描绘的情景，先不说与斯大林统治下的实际情况有多大的反差，是多大的讽刺，但确实引起了当时很多中国青年的深情向往。

但本书提到这首歌，不是在大街上，不是在公园里，而是在深更半夜的被窝里，是在周新春那捂得严严实实的被窝里。他听到的这首歌是作为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台呼。

“扫扫倒-西，垃圾（西）倒来倒-少……莫斯科广播电台对华广播现在开始……”

啊呀呀，这不是在收听敌台么，这不是被明确规定为现行反革命的行为么？周新春怎么敢听呢？

是的，周新春正走上一条危险的路。

周新春，这个小青年，有点知识却远远不够。他虽然是个极普通的青年农民，普通到即使是在本村里也往往想不到有他，但却在政治运动不断的熏陶和感召之下，分外地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他所关心的程度，恐怕连大队干部都要吃惊，只是没有人问过他，没有人想到过他。他所看的、所想的，决不是眼前的田间地头。他对这个大千世界充满了好奇，渴望了解社会、了解这世界上更多的东西。炕头上小喇叭里公社广播站讲的那点事，已远远满足不了他求知的渴望。他也向往革命，向往美好的理想社会，而眼前的文化大革命粉碎了他所有美好的向往。他看到的是他所讨厌的秦德才们在跳，往日的校长老师们却被批斗，被打得是那样的惨。他也像李辰一样反感黑白颠倒、群魔乱舞的社会现状，却没有能够正确认识、正确分析判断的思辨能力。他小学毕业就下地干活了，脑子里印象深的，还是五十年代老师讲的“苏联老大哥”、“社会主义阵营”、“集体农庄”那些，耳朵边响的还是那时中苏友好的歌曲，比如：

“在伏尔加听到长江流水声，

两大民族友谊团结紧。

淳朴的人民并肩站起来，

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听我们，在听我们。

莫斯科——北京，

莫斯科——北京，

人民在前进，前进，前进，

为光辉劳动，

为世界和平，

在胜利的旗帜下前进！”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搞成这个样，还骂苏联是修正主义，他反而在想，是现在讲错了，还是以前讲错了。总之，至少是有一个讲错了。他的脑海里有着许许多多的为什么，却找不到答案。没有人告诉他这是为什么。他不敢去问，别人也不敢说。更难忍的是，他没有这个头脑去想，却偏偏要往那儿去想。

去年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他在他那个简陋的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了苏联台。就是那个他曾听到过的、听起来还挺有点气势的《祖国进行曲》，引起了他的新奇，甚至是种兴奋，好像飘飘然离开了地面，探头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他知道偷听敌台，可是件犯罪的事。但他却像打了玛非针那样兴奋，欲罢不能。常常在半夜时分，在他睡的里屋的炕上，躲在被窝里听上一会儿。虽然这是件危险的事，可他反而觉得是种神秘，是种勇敢。

这会给他带来什么呢？

带来的结果是爆炸性的。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有两颗震撼力极大的炸弹,一颗是要打倒刘少奇,另一颗则是林彪的出逃。而且后一颗更具有突然性、有着更大的震撼力。这第二颗炸弹,在西北村,竟然首先是在周新春身上引起震荡。

刚过“十一”的一个晚上,周新春又躲在被窝里开始听了。在“扫扫倒西,垃圾(西)倒来倒少……”那使人想起克里母林宫钟声的开始曲之后,突然广播了一条重大新闻:“中国政局出现重大变化,据悉林彪已叛逃出境,坠机身亡。”

周新春听了吓得一跳,被子都捂不住了,后背拱了出来。

“什么声音啊?”他爹在外间炕上都听见了,在问。

“哦,我在听广播,又有重要社论。”周新春掩饰着。他爹那儿还不好糊弄么。

“什么社论还不能白天听啊,咱管那么多干吗呀?”他爹周伯生是个什么事也不管的人,当然也不会想到那些方面去。

“哦,哦。”周新春只好答应着,把收音机关了。

可关了以后,他再也睡不着了。是他们在造谣吧?不对呀,这样大的事,造谣是造不起来的。这么大的领导人一出来,这谣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想想是的哎。今年国庆,这么重大的节日,林彪没出来哎。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怎么大家都不知道呢?只有他周新春才知道。顿时,他觉得他成了个不一般的人物。

天亮了。

周新春应该算是嘴紧的人,能上说知心话的朋友也不多,平常不跟别人多说什么。可今天,这么大的事堵在心里实在是憋得难受。看见这个人,就觉得,唉,这么大的事你们还不知道啊。看见那个人,也觉得,唉,这么大的事你们还不知道啊。看见墙上刷了那么多林彪字迹的题字:“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下面落款林彪两字赫然在目。“啊呀,啊呀,不对呀,得赶紧涂掉呀。”突然间,他觉得,他成了世间少有的明白人了,连大队主任、公社主任都不明白这事呀。

正好齐成才走了过来,周新春看见了人,就觉得,唉,这么大的事你们还不知道啊。不知不觉中,脑袋就这么东一头、西一头地直晃,脚也这么连连跺着,嘴唇好像在一张一合地,不知在嘟囔什么。齐成才一看,没往国家大事上去想,而是觉得这周新春不对劲啊,好像精神受了什么刺激。

“你是遇到了什么事,还是有什么不舒服?”齐成才还挺关心地问。

齐成才是西北村唯一戴眼镜的,虽然看上去有点像文化人。不过说实在话,他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并不算强。但周新春对他还是挺尊重的,就因为他戴了副眼镜,和别人不一样。

“出大事啦,出大事啦。”周新春把这在心里翻搅不止、堵到了嘴边的话,不知怎么就堵不住了,顺嘴往外流了。

“什么事？”齐成才不明白。

“林彪出事啦！”

“别瞎说哦，要坐牢的哦。”齐成才的脸色也变了。

“真的，连国庆节都没出来。”

“嗯，倒也是。”齐成才想了下，又点了下头，又说：“那说不定是生病呢。这事不要再跟别人说了，等报纸上说了，咱再说。”

“哦，哦。”周新春点头答应着。他知道齐成才说的是对的。

不过齐成才劝周新春不要再说，他自己却也憋不住，这事在心里也搅了一上午。到中午时候，碰上了于又发。他跟于又发挺说得来，把这事讲了。

于又发听了也是脸色一变，到底是干部子女（哪怕只是村干部的子女），政治意识要强得多，觉得这事不一般，问题很严重，要是个政治谣言，不枪毙，也得判个十年八年，马上就说：“这事得报告大队部。”

“那，那……小周不就有麻烦了吗？”齐成才还有点不忍心。

“这种事，不能犹豫，不能心软。不然就是咱的事，说也说不清。”

于又发拉着齐成才就去找了平金刚。

考虑到平金刚的情绪，大队给他安排了个职务，治保主任（治安保卫委员会主任）。平金刚也就平下心来，认真工作了。

平金刚听了于又发的报告，脚都跳了起来：“这是谣言，是重大案件！马上去派出所。”

平金刚不由分说推着他俩，连公社也没去，直接就到了在南门口的派出所。

35.2派出所

派出所还是诸所长在管事。

诸所长在办公桌后听平金刚讲完，反应却很平常，一点也没有紧张或亢奋。或许他毕竟是在公安部门，多少能知道一些？但更主要的是，这几年的案子，都是些什么东西。应该说，他已经看出些问题来了。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些良知尚在。他并不希望平金刚他们来报这种案子。报了案，就不能不处理。要处理，就要伤害一些人，而这些人往往有可能是好人。但是，人家来报案，又不能表示出反感，那样不就站到“阶级敌人”那儿去了，连自己也站不住了。

诸所长停了下，看似很随意地用手指敲了敲桌子，嘴一咧，似乎是一笑，说：“还真有这样瞎操心的人。这个人平常表现怎么样？”这话是一语双关，但在平金刚听起来，当然是在问周新春这人怎么样。

“很平常的一个人，是个小青年，没言没语，不大和别人来往。”

“这还好一点，要不，查起来工作量就大了。”

“所长，这事怎么处理？”平金刚问。

“你们先派人悄悄地看着，别让他出村，走没了。我向县局汇报请示。”

“好。”

“再有，你们自己可别往外传，别把自己搭进去。”

“那是，那是。”

县公安局的卞局长得知这一情况后，反应和诸所长大不一样。

公检法里的有些人，在文革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也是特殊的角色。虽然在1966年底和1967年，极左势力为夺取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控制，发出过“砸烂公检法”的叫嚣，对公安部门、尤其是公安部门的高层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对于很多基层的公安机关，相对来说这个冲击比较小。他们在理论上不属于哪一派，不参与两派之间面对面的直接对抗。也因为专政机关的特点，他们的很多负责人没有受到各级行政部门负责人所遭受那种程度的批斗打骂。1967年之后，许多地方的公检法实行了“军管”。但基层公检法人员真正靠边站的不多。这时候，他们在当地文化大革命和两派斗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又有很多的不同。比如，卞局长和诸所长就有很大的不同。

海源的公检法也实行了“军管”，卞局长被结合进了“军管会”。他对于维护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和秩序是非常积极的。他认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忠于职守，决不懈怠。始终都要保持高度警觉，瞪大眼睛，得不停地来回看着四周有没有“阶级敌人”。就像他要求他的下属，当公安的就要像警犬一样。按说下面应该还有句话，那得看是被谁牵着呢。卞局长没提那句话，不知道他是没想到过，还是想到了也不说。

听到电话里诸所长说这个事，卞局长立即意识到这是个大案要案。跟“军管会”的头一说，再喊上那个堵警察。别看卞局长是四十好几的人，跨上自行车，几十里的路就过来了。

“人呢？”刚进龙头派出所的门，还没下车呢，卞局长就喊上了。

诸所长急忙出来迎接，“人，我们已经监视了。”

“怎么不抓起来，跑了怎么办？马上抓过来，现在就审。”

正在堂屋的灶前拉风箱烧火做饭的周新春，被县里来的那个堵警察喊起来带走了。

“哎，哎，这是怎么啦？”不明就里、满脸皱纹的周伯生从里屋追出来问。

跟在后面的诸所长把周伯生挡住了：“你儿子有事啦。”

“什么事啊？”周伯生还是满脸疑惑。

“什么事？我也不知道。这不就是要带过去问问么？过两天就知道啦。”

于又发、齐成才站在远处愣愣地看着。他们绝想不到，这么快连县公安局都过来了。

“喊你来，是什么事，你知道吗？”在派出所后面一排房的审讯室里，卞局长亲自发问。一般来说，第一句都是这样问的。

“不，不……不知道啊。”周新春本是个很老实也很胆小的人，面对这个场合吓得话也讲不上来了。

“不知道？你今天跟别人讲了什么话？”

周新春这才知道，肯定是跟齐成才讲了林彪外逃的事。他一面惊讶派出所这么快就知道啦。他要是知道坐在他对面的是县公安局的局长，还不知会惊讶到什么程度呢。再就是后悔啊，怎么把这事讲出去了？自己是知道不该往外讲的呀，就是讲给齐成才听，也是不行的呀。这可怎么办呢？

“说！”没等周新春愣下去，卞局长就猛地拍桌子。

“哦，哦，我说，我说，”周新春惊恐万状地抬起头，“我说林彪跑了。”

“你他妈的胆敢污蔑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堵公安（那时对公安局的人习惯称公安，通常不叫警察或民警）站起来，跨出一步，“啪”的一个大巴掌就打了过去，“林副统帅是我们伟大领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你不知道吗？”

“是谁跟你说的，你要交代清楚！”卞局长厉声喝道，这是他最关心的问题。因为他明白“军管会”的军代表，一、两年，两、三年，总是要走的。他们走了以后呢？这摊子给谁呢？他要是拿得出手的一、两件事，这县公安局不还是他的么。抓获林海秀是一件，眼前这不又是一件。龙头镇，西北村，还真有东西可挖。

刚才那一巴掌，把周新春打得脑袋晃了一下，也忽然使他清醒了点。不能乱说了，不能乱说了，现在的每一句话都非同小可，要想好要讲的每一句话。

“我是听来的。”他轻轻地说。

“听谁说的？”

听谁说的？要是说听苏联台的，这一条就够现行反革命。人的心理有时挺复杂，平时脑袋挺简单的周新春，一下子转过这个弯来了。

“听解放军说的。”

“呸！不许诬蔑解放军！”堵公安上去又是响亮的一巴掌。

“是哪个解放军？”卞局长依然很威严、很简洁地问着。

第二个巴掌使周新春知道不能再改口了。

“我也不认识。”

“不认识？那他怎么告诉你的？”卞局长问。

“不是他们告诉我的。是那天我在县城的汽车站等车时，听旁边两个解放军在那儿说的。”

“你小子偷听军人讲话，就是在窃取军事机密。”堵公安又想上去，再来一巴掌，被卞局长举手制止了。镇上的派出所，条件简陋，打厉害了，哭喊声传出去也不好。

卞局长退了出来。他也在想，很可能眼前这小子给他出了道难题。首先林彪出事，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感觉。但他不愿意往那儿费脑筋去想。一切按照中央文件来，文件说他是副主席，那他就是副主席；文件说他是反革命，那他就是反革命；文件没说他不是副主席，那他就还是副主席。自己用不着去操别的心，所以这案子还得照散布反革命谣言来办。但是这个谣言的源头呢？怎么去查？那小子是听两个军人说的。要查的话，那就得查那天有哪两个军人去了县汽车站。不是查不出来，而是不好查，真的去查军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万一弄不好，可是吃不了兜着走，要摔个大跟斗，一辈子也爬不起来。

他对诸所长说：“你们继续审。我上县局向军代表汇报。”

诸所长看出来卞局长想抽身走的意思，可嘴上还是很客气的挽留，“这么晚了，就别走了，在这儿挤一挤吧。”

那时的公社没有招待所。镇上的所谓旅店，也就相当于车马店的大统铺。县里干部下来，都是自己带铺盖，或者当天回去。像卞局长这样临时要住下来就只能睡已经下乡的人的空铺了。虽贵为局长，也是这样的。

卞局长一想也是晚了，这事也不急，就住下了。

第二天一早，卞局长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交代了：“要继续抓紧审，严肃点，可以适当加点温。竟敢造林副主席的谣，这是个重罪。全县还没有过，破了这个案，就是立了一大功。那个报案人，还有那个姓周的他爹，也都要去抓紧调查。”

诸所长忙着点头不已。

早饭前，突然县局来了通知，要卞局长赶紧回去，县革委要召开全县科以上干部大会，八点前务必赶到，具体内容不知道。卞局长没来得及吃诸所长特地叫公社食堂炸的油条，兜里揣了个馒头骑上自行车就走了。连油条没吃就走，在那时肯定是有了要紧的事。不过，他临走还没忘喊了声：“抓紧审啊！”

早饭后，审讯又开始了。

周新春还是坐在那小凳上，与其说是坐着，还不如说是瘫在凳上。他一晚上没睡，也没叫他睡，也没有吃到饭。他昏昏沉沉，东倒西歪。

“啪！”一个耳光又上去了。对于周新春来说，这意味着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说！你为什么要造林副主席的谣，你的反革命目的是什么？”堵公安吼着。在他看来，加强审讯的力度，就是提高嗓音的高度和手巴掌的力度。

诸所长在一边看着。

“我，我，我……”周新春只是晃着身子，一个趔趄，差点要倒下。

堵公安又要上去扇耳光，诸所长看周新春的脸都肿了，就拉了他一下。堵公安还很不解地看了诸所长一眼。

正这时，屋外有人喊：“诸所长，卞局长喊你接电话，说是有要紧事，赶紧过来！”

诸所长赶紧过去。

不多会，诸所长匆匆地回来了。神情十分地紧张、十分地严肃、又十分地……总之是十分地不一般。

堵公安正抓着周新春的衣领往上提。周新春像是用尽力气在睁着眼，两只胳膊无力地浪荡着。

诸所长忙拍了拍堵公安，眨眨眼示意他出来。一走出门外，诸所长就靠在他耳朵上悄悄地说了几句。

堵公安闻声大惊：“那咱这儿怎么办？”

“给他吃顿饭，叫他走吧。”诸所长说。

“那我也走了。”堵公安说。他真的转身就走了。

诸所长走进审讯室，见周新春闭着眼，依墙半躺在地上，便上去拍拍他，“起来吧，吃顿饭，要睡就再睡会儿，没事就回去吧。”那话说的就像人家自己要来串门似的那样轻松。

周新春倒是没听明白，睁开眼，抬头看了看他。那眼睛里充满了疑惑。

“不骗你的，起来吧。”诸所长上去搀了他起来，走到前排的办公室。

周新春晃晃悠悠地跟着诸所长走了过来，原本给卞局长准备的油条、稀饭还都在桌上。他看了一眼似乎没有多大的兴趣，趴在桌上就睡了起来。尽管这油条对于那时的农村青年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稀罕物。

周伯生可是急得一夜也没睡，早就想过来看看，又怕工作人（这是农村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另一种称呼）还没到上班时间打搅了他们，说不定因此而被骂得灰头土脸下不了台。一直耐着性子等到日头升到有一竿多高了，才敢到派出所来看看情况。

周老汉进到派出所一看，“咦？”儿子正趴在桌上睡呢，正疑惑着，诸所长上来一笑说：“把你儿子领回去吧。没什么事，就问问了。以后叫他别有事没事随便说。”

周老汉把儿子拍醒了，“走吧，回家吧，要睡回家睡吧。”

周新春又朦胧着抬起头，似乎没反应过来，晃了晃脑袋，揉了揉眼睛，看了下他爹和诸所长，又看了屋里一圈，想起来是怎么回事了，站起来拿上那把油条，什么话也没说，跟着他爹走了。

出门前，诸所长没忘了叮嘱一句：“小周啊，这儿可是有个规矩，里面的事可不能往外讲，知道啦？不要再吃苦头喔。”诸所长边说边点着头。

街上的人都知道昨晚周新春“进去”了，但不知道是为什么事。大家都在纳闷，这老实小伙会有什么事呢。这时，大家都远远地看着，看着周家父子回来，在奇怪怎么一晚上就出来了，而且手里还捏着油条，这是怎么回事，也没法过来问。

周新春蓬松着头发，只顾低着脑袋，眼睛瞧着地上。谁也看不清，他的眼神里是忧伤还是悲愤。脸还有些肿，别人也想不到那是被扇了耳光。手里还拽着一把油条，也看不清是几根，至少有三四根吧。这是什么待遇？没听说过进了派出所还有给油条的。

35.3黑龙江畔

周新春回家就上炕钻被窝睡了，一天都没下炕，只是在下午啃了两根油条，也没嚼出什么味来。

晚上，不死心的周新春，又拱起被窝，打开了收音机。在破棉絮遮盖下、充满着男人臭味、漆黑一团的那点空间里，又响起了辽阔宽广的《祖国进行曲》。周新春又进入了另一个虚幻的世界。

“中国有关方面已在内部传达，确认林彪已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

周新春听着，流下了眼泪，当然不是为林彪，而是为自己，为这条消息给自己带来的遭遇。

周新春没再跟别人说，可村里人也渐渐感受到了风急浪高。那些天，人人都是惊恐不安的脸。常能见到，在偏僻背阴之处，有人相遇就窃窃私语几句，对方瞪大眼睛看你一眼，便迅即转身、各自匆忙而去，等遇到下一个人，如此这般再重演一遍。渐渐地，大家也知道了。

没过几天，十月底，正式文件传达到了大队干部。又过几天，十一月初，由各大队向全体社员传达。

人们虽然从相互传递的消息中已经知道了这事，但真的在大队场院听到正式的传达：“1971年9月13日，林彪已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依然是惊得目瞪口呆。全场鸦雀无声，连声咳嗽都没有。

当鲁队长念完文件，没有加任何一句自己解释的话，就说散会。

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没有一个人动的，都在瞪眼看着鲁队长。

鲁队长一言不发，自己甩手走了。

大家这才慢慢地起身，一个个地往外走，路上谁都没说一句话。

这件事太惊人了。这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除了一开始红卫兵造反、打倒刘少奇之外，最厉害的一颗重磅炸弹，把人们都炸蒙了。

这是怎么了？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了？如果说这之前是为了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打倒一大批走资派，说这些走资派是自己“钻进”党内、“窃取”高位，可恶可恨。但这林彪可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斗

争中，由伟大领袖亲自选定的革命接班人啊，都史无前例地写进党章里去了啊，差不多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了啊。怎么还会这样呢？甚至更加歹毒，要谋害伟大领袖呢？刘少奇也没有这一条啊。

谁也解释不了。

本来在人们心目中就有很多疑团，那么多的领导干部被打倒，不少坏人反倒跳出来猖狂表演，群众之间相互厮杀、血腥武斗，打人杀人那么地残忍……

这一下，升起了更大的疑团。

谁也解释不了。

林彪事件，实际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宣告了这是一场已经是包装不起来的、千疮百孔、无法遮掩的假革命、伪革命。林彪的自取灭亡，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而是这场假革命、伪革命的必然结果。且不说它对中苏关系、中美关系变化的影响，或者说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的变化对发生林彪事件的影响。单就国内政治来说，它也极大地震撼了人们的内心深处，动摇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尚存的天真的想法，动摇了那个领袖在许多人心里近乎神仙般的位置。

只是谁也不会说。

对于周新春来说，仅仅是因为先知道了这个事，就吃了这么个亏。而那些真正具有远见卓识，能够在这之前就看透林彪反革命本质，大义凛然，敢于直言的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们，又会是什么结果呢？这个问题在下一章讲。

这才是这个体制最大的悲哀！

在这些疑云迷雾里，周新春想得更多，心里是越来越多的怨恨。他恨齐成才，恨村里的人，恨派出所，恨县里的公安局，恨……在家里，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在外面，别人还取笑他，他也不再理任何人。

在憋了一个多月之后，忽然，他想出了一条路。他要走，他要离开这西北村，离开这龙头镇。上哪儿去呢？他跟他爹说，他要上他叔叔那儿去。他叔叔周仲生是黑龙江边防部队的一个团长。他爹也没有法，在家里也待不下，那就出去散散心吧。只是叫他去了，也不要待太长时间，别给他叔叔添麻烦。

其实他心中冒出了个惊人的想法：投奔苏联去，到那个播放着“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的国家去。那是个怎样的国家呢？应该是个辽阔广大、自由无比，像天堂般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吧？它应该会胸怀宽广、张开臂膀欢迎每一个人的到来吧？十几年来一直都是这么说的么，连林彪都往那儿跑，一定错不了。我也要去。在这儿太欺负人了，已经没有任何意思。林彪能去，我也能去。而且以自己的条件和能耐，林彪没成功，我就不见得不能成功。叔叔就在黑龙江岸边，和苏联就是一步之隔，这不是最有利的条件么。

周新春，一个不起眼的农村小青年，竟然要走这条别人想都不敢想的可怕的路。

当然那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

先是他给他叔叔去了封信，说想来看望他。他叔叔是个很率真的人，从抗美援朝参军入伍起，很少有时间回家乡看看。自己的这个侄儿也有好几年没见了，上次见到好像还是他小学刚毕业时候，现在不知长多高了。自己从朝鲜战场回来，就一直驻守在这人迹罕至的黑龙江边，老家的至亲从没有来过，连自己的爱人也是在地区所在的小城市里，很少过来。这次，周新春能来，他当然很高兴。

能允许到边境来，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确实多年未回老家，而且近期也没有回去的可能；还有来的人必须符合相应的政审条件。他很郑重地向上级领导部门打了申请报告。一个多月后，上级考虑到这些情况和周团长的一贯表现，报告批了下来。而后，他回信告诉周新春，在老家那一头，还要办哪些手续。

周新春根据叔叔信上讲的要求，跟鲁队长说了，要去看在边境地区的叔叔，原籍要开证明。不但大队要开，还要上公社盖章，还要上县公安局审批。好在周新春以前没有任何劣迹，人家叔叔是守卫边疆的解放军的团长，过去看看，也是人之常情，说不出拒绝的理由。虽然前一个月，在派出所蹲过一晚上，但这已经说不上是对是错，甚至说不上是谁对、是谁错。而且也没留案底，谁也不用向谁解释说明，就这样不算一回事，就过去了，当然也就不会影响到开证明。而且，在县公安局开这证明审批时，卞局长不知道这事。他作为局长过问不到这些事，不然真说不定会节外生枝。

十二月，周新春揣着这些证明，带着他爹捎给他兄弟的花生、芝麻、绿豆，穿上他所能有的厚衣服，踏上了那条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可怕的路程。

下火车，换长途车到县城。按他叔叔信上说的，找到了部队接待站。接待站很认真仔细地查看了他的各项证件，甚至还翻了翻他的行李，这才安排他住下，因为部队还远，当天已去不了。又通知了他叔叔所在的团部。

第二天中午，他叔叔特地派了辆吉普来接他。周新春跟着司机上了车，往部队驻地赶。

沿途，周新春也没多说话，目不转睛地看着车窗外。那一片片的树林，覆盖着白雪，绵延不断。海源也有山，也有雪，但远远没有这种壮阔的气派。路在山间缓缓地弯绕，越往前，树木越来越高，雪越来越厚，渐渐地完全没有了田地，完全没有了人家。静静地，静静地，四周是那么地安宁，好像是在另一个世界。只有不时的颠簸，才把思绪拉了回来。

到团部，已是暮色重重。团部也只是树林深处的几排平房，在一片雾霭之中，显得有几分神秘。他叔叔，个儿也不高，出来迎接，拉着多年未见的侄儿，连连夸奖：“好小伙，好小伙！”

周新春住了两天，才知道团部不在黑龙江边上，离江边还有一二十里。他叔叔说，这团部原先是在江边的，考虑到局势紧张，以防万一就后撤了。江边原来的团部，现在驻了一个连。周新春说，他想去江边看看。他叔叔稍有迟疑，也答应了。哪能大老远地几千里路到了黑龙江，还没见到黑龙江。

第二天，团长派车，陪他一起去了江边的那个连队。这儿已是原始森林般的参天树木，到江边又是豁然开朗，冰封雪白的大江静静地横贯在眼前。江面有二、三百米宽，江中还有几块冒出树丛的沙洲。对面就是苏联，更浓密的森林，更厚重的积雪，没有一丝的声息和人烟，更是一片神秘的气氛。

周新春的内心很激动，那不就一直是在心里好奇着、多少次地牵挂着的苏联吗，那不就是夜晚在被窝里传来“祖国进行曲”的那个苏联吗？现在终于就展现在自己眼前啊。

“我们还到江上巡逻吗？”周新春问。

“就在岸边陆地上巡逻。那几个沙洲很小，通常就不过去了。”

“这儿能滑冰么？”周新春又问。海源的冬天水面上也结冰。小河上人们也能踩着冰走过去。但是没有滑冰的，一是没有那个闲情逸致，二是冰面也不够结实。

“当然能。这是我们战士冬天里的一项主要活动呢。”

“叔叔，我也想学。”

“你也想学？”他叔叔沉思了一下。他倒没去想更多的，只是怕万一磕了碰了什么的。再一想这样的小伙，学个滑冰也不会有什么，机会也难得，说不定他这辈子也就这一次能滑上冰，“那好，我找两个战士，教你下。”

跟连长一说，很快，有两个战士拿着冰鞋，就来到江边，坐在石头上换鞋，教周新春学起来。

那江中沙洲内侧是个江汉，正是战士们平常滑冰的地方。周新春他们三个也就在那儿滑起来。

刚穿上冰鞋，站都站不起来。周新春看着远方，终于挺了起来。到底是小伙子，劲头挺足，一天下来，居然能自己扭扭歪歪地滑了起来。他叔叔还夸奖了一番。

第二天，又滑了一天。周新春觉得这漫天的白雪、无边的森林、浩瀚而又凝重的大江，真的很适应他。他觉得他来对了。

傍晚，接到团部来的电话，要团长到师部开会，大约要三天时间。

他叔叔本想带他一起回去。周新春说，我在这儿等你吧。他叔叔说，也好，不然，好不容易来一趟就住一、二天也太短了点。你在这儿滑滑冰也好，等我开会回来，我们再一起去城里看你阿姨。

周新春点头，说，好。

他叔叔走了。周新春每天从早到晚苦练滑冰，三天下来，不见得技术有多好，但滑得已经稳当了。

第三天，他叔叔来了电话，说他已经回团部了，明天就可以接他回去。

周新春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他已经横下一条心，脑子里飞快地转着，能找个什么样的机会呢。

天渐渐暗了，风也渐渐大了，江面上扬起阵阵雪雾。这儿的冬天，黑得很早。陪练的两个战士说：“时间差不多了，咱回去吧。”是的，是到该回去的时候了。

“好。”周新春坐在一块石头上，嘴里应着却没动。

两个战士过来坐下，脱下冰鞋，换上靴子，正要起身，周新春看着已经暮色迷离的江面，说：“让我滑最后一圈吧。”

那两个战士相互看了看，只好说：“那就再滑最后一圈吧。”

周新春站了起来，不紧不慢，靠着江边，向下游滑去。渐渐地比之前滑得要远一些。两个战士看到了，并没觉得有异样，以为他这是最后一圈，想多滑一点。

影子又远了点。两个战士正有疑惑的时候，周新春开始转弯往回滑了。因为滑得比较远，这个弯子转得也有点大了，靠着沙洲的那边，往回了。

雪茫茫，雾蒙蒙，但江上的人还是看得见的，两个战士又安下心来。

但是，当周新春滑过沙洲的边缘，来到开阔江面时，他突然又拐了个弯，向北，向着那个更开阔的地方快速滑去了。那两个战士一惊，都站了起来。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搞错方向了，喊他恐怕也听不清了。

再一看，这周新春又转弯了，加速向沙洲的背后滑去。此时，周新春的企图已明了，显然他是想尽快地消失在战士的视野之外。

周新春这时候显然是什么也不顾了，不顾家中含辛茹苦、拉扯他长大、依门望他归的老爹，更不顾一片好心接待他的叔叔将会是怎样的结果了。

那两个战士见状，急得大喊起来，营房里的战士们也都闻声赶了过来。只见茫茫暮色里，一个模糊的黑影在风雪中在急速地离去。连长断然地拔出手枪，朝着前上方开枪了。他是在最后地召唤他回来，也是在作最后的警告。枪声在寂静的旷野和江面上刺耳地回响。这时，周新春已经消失在沙洲的背后，急速地向着对岸滑去。

这边，有战士穿上冰鞋，冲了出去，但赶不上了。周新春已经滑过了主航道的中线。

那更模糊深沉、一直毫无声息的对岸，此时，也响起了枪声，也有军人滑冰过来，在朝天对峙的枪声中，把周新春接了过去。

当周新春看到对面有军人过来时，知道自己有救了，脚下却一滑摔倒了，在冰面上一直滑到了对面军人的脚下。这大江大河的冰面不像城里滑冰场那样的平整，有起伏、有坑洼、有裂隙，以周新春的水平，在这之前居然没摔倒，真是很难得。这个问题，是周新春没想到过的，不然，他未必敢这么做。周新春更没想到过的是，当苏联军人搀他起来的时候，才发现苏联人是蓝眼睛、高鼻子、白皮肤，真的是外国人。这一点，他也是这时才明白过来的，这之前怎么没想到过。但到这时，一切都不用想了。他被苏联军人架着滑到了对岸。

周新春的这一走，他叔叔马上就遭到灭顶之灾，第二天就被关押了起来。

35.4死路一条

西北村的乡亲们，都不知道这事，以为周新春真的是闯关东去了。海源一带，无论解放前后，都有一些生活无着、难以为继的人，去东北找活路，称之为“闯关东”。连周伯生自己也不知道，只是焦急儿子怎么还不回来。去信问问他叔叔，却连个回音也没有。他还以为，是他叔叔给闯关东的儿子找了个工作，有了落脚之处？那也得告诉爹一声啊。

直到一年之后，又一颗炸弹在西北村炸开了。西北村的炸弹真多，请读者做好思想准备，后面还有呢。现在这颗炸弹，就是张贴在龙头镇街上的县公检法军管会的布告：判处苏修特务周新春死刑，立即执行！

周新春怎么是苏修特务了？龙头镇有了个台湾派遣特务董平章，有了个美蒋武装特务高增光，怎么又会有个苏修特务了呢？而且是周新春，一个没言没语的小伙子，一个大家平常都想不起来的这么个人。他不是上东北找他解放军团长的叔叔去了么？西北村的人还都这么想着，谁也没想到事情后来的发展。连我们也会目瞪口呆，前面不是说他跑到苏联去了么，怎么又押回海源要枪毙呢？

我们没有看到卷宗，说不了这事的详情。大体是这样的，苏方对从对岸跑过来的人，一般不予接受，不少被遣返回来。对于一些他们认为有利用价值的人，比如还年青，比如有专业背景等，会作一定的使用。周新春就不知怎么被他们看上了，交由远东情报所加以培训。而且这小子还加入了苏联共产党，成了他们的一个党员。十个月之后，赶在大江冰冻之前，他几乎是原路被派遣回来收集情报。

但这回来的路，就没那么顺利了。

拂晓时分，趁天色未明，他乘着小筏子过江而来，两个苏联士兵划着。他的心情很复杂，说实在他不愿意回来。当初走的时候就没准备要回来。但苏联情报机构的态度很明确，在苏联境内，没有适合他的地方，他只能回来工作，苏方将会提供良好的条件。当黑暗笼罩下的江岸渐渐靠近的时候，他的心情由忐忑不安变成了紧张。他完全没有把握，他猜不到接下去会发生什么。

小筏子在一个草丛茂密的隐蔽处靠了岸，四周全无声息，似乎很顺利。他踏上岸边的时候，还回头轻声地说了句：“打死喂打你呀，打瓦里稀。”（俄语，“再见，同志。”的意思），便钻进了草丛。按计划，他要穿过两个小山头，在中午时分到一个小镇，而后坐长途车离开。身上没带多少东西，先是穿草丛，后是穿树丛，上山坡，下山坡，这些对一个农村小伙来说，真不算什么。一切似乎很顺利，四周也见不到人，连他也有些奇怪。

远处已能看到镇里的几个烟囱了，应该是到了，没有走错路，他暗暗地庆幸着。

忽然，树丛中钻出二个人，戴着红袖章，肩上扛着长枪，是当地的民兵。

“上哪儿去？”

“去县城。”这些答话已经编排过多次了，所以，周新春很容易就答上来了。

“证件呢？”

在边境地区通行，是要有很多证件的。周新春从挎包里一样一样地拿出来。苏方也已经很熟悉中方的边境管理办法，这些证件制作得看起来都无懈可击。但往往一些不起眼的细节，会露出马脚，全功尽弃。这份通行证的签发单位写的是生产建设兵团一百八十六团。在中国，中文字一百八十六，作为数目是186的意思，这是不错的。但作为编号，无论是读音还是书写，都是186，念幺八六，而不会是一百八十六。

周新春就这样被民兵带去作进一步的检查。他回头一看，连夺命而逃的念头还没出来，又有好几个民兵和解放军从树丛中围了过来。他知道完了，一切都到此为止，结束了。

审讯过程就不再叙述。其实早在周新春乘小筏子渡江靠岸的时候，就已经被解放军的巡逻队发现了。只是不想让苏方当场看见，以便作更长远的打算，等在后面一点的这个地方才收网抓捕。更不想当场抓住过来的苏军士兵，免得再惹些外交麻烦，只抓周新春一个人，好处理。在中国这样一个各项管理都极其严密的社会里，采用派遣特务的方式，无疑是在以卵击石，很难成功的。董平章是一例。周新春又是一例，哪怕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混乱的日子里。

当地的公安部门也曾考虑过把周新春当着双面间谍用，继续与苏方联系，以引出更多的东西，叫苏方上一个大当。但周新春显然不是这块料，用不起来。后来，案子和人犯都交回原籍海源处理。在那时的高压态势之下，连写错念错一些政治口号都要受到严刑峻法的处置（有的甚至连没有错也不行。有个人写了个“撬”字，就被说成是要打倒毛主席，而且是还要打倒三遍。此人不服，又被说成是态度恶劣、负隅顽抗，结果被判处重刑），这个案子被判死刑，已无意外。

只是西北村人不知道这个过程，真是惊讶得不得了。和以往大不相同的是，在县城开大会执行枪决的那天，西北村很少有人去看热闹。据邻村去看的人回来说，都认不出来了。只有从脖子上挂着的大牌子上写着的“周新春”三个字能知道是他，牌子上面那个浮肿的苍白的变了形的脸，完全看不出是他了。

他的爹，周伯生，从此病倒，一、两年后就死了。

他叔叔，周仲生，进了部队劳改农场，以后再无音讯。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和最后是怎么个结果。

连海源县公检法军管会给周新春开证明的那个人，也被清除出公安队伍。

公社革委会里是谁盖的章，因为当时没人专职管这事，现在查起来，大家都避之惟恐不及、相互推诿，查不清了，也就不了了之。

只有鲁队长，还是鲁队长。

这件事，当然是个悲剧。所以造成这个悲剧，周新春本人首先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作为社会也有着应该反思的地方。

第三十六章 活摘器官

1960年2月5日

36.1六月雪

林彪事件的冲击波，也横扫到了林海秀的头上。林的逃亡、国内政局的动荡，使得以“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为重点的“一打三反”运动，掀起了又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风暴潮。林海秀的案子成了上级督办的大案要案。

她被押在省城的监狱里已经一年多了。无数次的审讯，案情几次的反复，连专案组的人也都烦了。

林海秀从身体到精神都已经崩溃了，再坚强的人也是顶不住的。她头发枯乱，形体消瘦，目光呆滞，都完全认不出是当年俊俏而又精神抖擞的林海秀了。尤其是她的神经已经错乱，整天里只会反复说着两句话：“我反对……我有罪……”“我反对……我有罪……”。

林海秀又一次被提出来审讯。

林海秀被按在椅子上，她歪倒在椅背上，两眼斜视着地面，脑袋在不住地点着。

“坐好了！”副审的下命令了。

林海秀没有反应，还是那样。身后的警察提着她的衣领，让她稍微正一点。

“你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态度是什么？”上面来的主审官发问了。

“我反对……我有罪……”

“呸！胡说！你对刘少奇的看法呢？”

“我反对……我有罪……”

“哼！你对林彪的看法呢？”

“我反对……我有罪……”

“这人已经是神经病了。”副审的对主审官悄悄地说。

“她反对毛主席，有这一句话就可以定案了。拖出去枪毙，别的话不用管。”

“她那材料里，只有说林彪不好，没有反对毛主席哎。”

“他有那个先见之明啊，我才不信。就算她有那个本事也不行。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毛主席。公安六条没有撤销，就得继续执行。不然我们就白抓了、白关了。”

“毛主席不是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她这个人是动口不动手，没有搞破坏，也要杀吗？”

“她这就是在搞破坏。你没听说还有一句话吗，‘他是拿笔的杀人犯’。谁反对毛主席，那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这是林彪说的哎。”副审更悄悄地说。

“林彪说的，这句话也不能改了。你能改吗？就不用诛，不用讨了吗？这些捣乱分子，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主审官极鄙视地看着副审，走了。

龙头镇的街上，贴出了“判处现行反革命犯林海秀死刑”的布告，布告上还印着大大的红色大勾。

一个个惊天动地的炸弹，炸得人们的神经都瘫痪了，都没法作出反应了。

龙头镇，西北村，都肃静了。没有人说一句话，所有看到布告的人，都立即移开视线，低着头，匆匆地悄悄地回家，关上门。

李辰近乎疯了，在家里呼天抢地，“我害了你啊，我害了你啊！”他在拼命地撕纸，撕掉了家里所有的书和纸，又向半空抛着碎片，炕上炕下，屋里屋外，伴着哭声，那些碎纸片在四处飞扬。

婷婷也哭着，看着她爹：“爸爸，你怎么啦？爸爸，你怎么啦……”

平近芳看到这布告，真是如五雷轰顶，从发梢到脚底都震颤了。

是她告发的林海秀，但只是想表示革命，表示划分界限，最多是想立个功，再上一个台阶，其实后来也并没有安排她去当校长。她也想过告发的后果，林海秀将会受罪，说不定还要去劳改。但怎么会是……怎么会是枪毙呢？是自己把林海秀推向了死亡，自己的手沾上了她的血！冥冥之中，她会饶过自己吗？

平近芳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的家，刚把房门推上，就瘫了下来，跪在门后痛哭流涕，一遍遍地磕头，一遍遍地念着：“不要怪我啊，不要怪我啊……”

当她的丈夫杜长贵回到家，进屋推开房门，看到门后头发散乱、脸色惨白、半躺在地上的平近芳，不由大惊失色，忙拖她上炕，连问：“你这是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平近芳半晌才缓过气，无力地说：“没什么事，我只是想起了我爷爷。”其实她爷爷是在日本鬼子没来以前就死了，他们之间并没有见过面。

杜长贵有点知道了眼前的蹊跷，嘴皮刚一动，就不想再问了。

只有秦德才是另一种心态。他在想着一个女犯人是怎么被枪毙的，没见过哎，一定会很好看吧？等哪天枪毙的时候，一定赶个大早到县城里去看看。但他没有等到。

龙头镇的人看到那布告时，林海秀已经死了。

36.2千古英烈

林海秀最后的那一天。

当林海秀被拖出牢房，宣布执行死刑的时候，她已经听不懂对她所说的话了。没有任何反应，只是颤抖着脑袋，不停地喃喃说着：“我反对……我有罪……”

“她妈的，死到临头了，还反对。”一个狱警上去就狠狠地抽起了耳光。

海秀的脸上顿时起了几个血红手印，她只知道嗷嗷地叫：“我反对，我反对……”

“还在呼反革命口号，赶紧处理了。”一个头极厌恶地说着。

两个警察上来就把海秀的脑袋摁进一盆生石灰里。

海秀疼得好像虾一样地直蹦，脑袋却一直被死死摁在石灰盆里。

当海秀身体软下来，停止挣扎的时候，她的脑袋才被提起来。

满头的白石灰粉。

满脸的白石灰粉。

从眼窝里流出两行殷红的鲜血，流过脸上白白的石灰粉。

海秀的双眼被石灰粉烧瞎了。

她浑身瘫软，没有任何声息，只有嘴唇还在颤抖。

“嘴还他妈的在动呢。”一个警察说。

“堵上！”头很干练地说着。

一个警察拿来一团乱布，另一个警察用劲掰林海秀的下巴，掰了两下，也没掰开。

“没用的东西！”头拿过一把尖刀就插进林海秀的嘴里，撬开了她的牙关。

海秀疼得刚有“啊，啊”的声音，乱布团就塞进了她的嘴里。

头还嫌不够，怕那布团再掉出来，居然用针线上下穿过林海秀的嘴唇，生生地缝住了她的嘴。

头一撇嘴说：“看你还反动。”

鲜红的血渗过布团，从嘴角流出，流在满是白石灰粉的脸颊上，分外地刺眼。

林海秀终于被塞进囚车，摔在车厢底板上，用收尸布卷着，在郊区的公路上驶往刑场。可生命即将结束的林海秀，罪还没有受完。

将林海秀押往刑场的有好几辆车，除了囚车、前后的武装警车，还有两辆画着红十字的救护车。在即将进刑场大门的荒僻路上，车队突然停下。前后警车跳下若干武警进行警戒。囚车后门打开，紧随其

后的一辆救护车上跑来三个穿白大褂的人。其中一人，大概是领头的，科室主任什么的，急迫地喊着：“快，快！”

有个带眼镜的问道：“能有多长时间？”

那主任答：“最多十分钟。”

眼镜又问：“能来得及么？”

“来得及来不及，就是这点时间，快！”

眼镜先跳上车，看车上没有绑着的犯人，便问坐在两边的军人：“犯人呢？”

那些军人都虎着脸，没一个说话的。有一个还好一点，歪着头用下巴壳往底板上的那卷东西点了下。眼镜俯身刚把盖在林海秀身上的收尸布拉开一角，就吓得“啊，啊！”惊叫起来。

“怎么回事？”踏上车的那主任刚张嘴问，脑袋往前一伸，也“啊”地惊叫了一声。连他这种在人身上动过不知多少次刀子的人，见到这等惨状也不由吓了一跳。不过到底是那头经验丰富，他赶紧说着：“不要看脸，尤其不要看眼睛！”

原来林海秀那蘸满了白的石灰，流着道道红的血水、黑的眼球液的脸，真的比鬼还要可怕，着实把这些见惯了各种尸体的医生也都吓得不轻。

“翻过来，快翻过来！”那主任喊着。

另两人把海秀翻了过来，海秀毫无知觉。

“针管，快拿针管来！”那主任一个劲地喊着要快。这不但是医学上的要求，也真的是怕了，赶紧搞完吧。

两管防血凝的药水打进去，海秀是一点反应也没有。

接着有两人扭着林海秀的胳膊，把她摁在车厢的侧面，那主任扒她的裤子。

“怎么还扒不下？”主任使劲扒了两下，没扒下来。

“哟，裤子跟衬衣缝上了。”另一人说。

“真他妈的，这种死鬼一样的女人，也有人想玩啊？”

海秀为防备被强暴，平时都是把裤子跟上衣缝上的。

于是那主任拿起手术刀，干脆一把就从后背将海秀的衣服往下一撕到底，一刀就捅了上去，再往下一使劲，海秀的后腰被切开了大口。一股热臊气蒸腾而起，熏得那头转过了脸。昏死过去的林海秀浑身抽搐了起来，虽然被堵住了嘴，鼻腔里还在发出“嗯嗯”的声响，那是海秀留在人间最后的声音。

“快压住，快压住！”主任喊着。眼镜拼尽全力也摁不住，干脆“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双膝压在海秀的小腿上。拿刀的人直接就把手伸进伤口，拉扯着，掏出了一侧肾脏，三下五除二就切断了那些连接的血管、脉管。每拉扯一下，每一刀下去，海秀都痛苦地颤抖着。滴着血的肾脏装进了白糖瓷的器皿里，上面还冒着热气。接着又摘下了另一个。

“编号，写编号，注意别写错了！”那主任直起腰来，还没忘了嘱咐别人。

眼镜匆匆地掏出笔，在标签纸上慌乱地划上几笔，贴在器皿上，又慌忙地把器皿放进手提箱，跳下车就匆忙走了。在最后面的那主任刚到车门口，将要跳下又扭头过来，嘴上说：“差点忘了个大事。”手伸进白大褂从里面衣服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那是自愿捐献器官的承诺书，歪着脑袋斜着眼，实在是很不情愿地翻开卷在林海秀身上的收尸布，抓起海秀一只被铐着的已经毫无知觉的满是血渍的手，在纸上按了个手印，连收尸布都没顺手盖上，一口气也没来得及吐，便立刻跳下车，跑回到他们那个救护车了。据说那是省里一个领导的儿子要换肾，早就挂上号了。

囚车上的几个警察和军人，一直冷冷地看着，一言不发。先前用下巴壳示意的那个人，又顺势踢了一脚，把收尸布盖上了林海秀敞着两条血盆大口的下身。

车又开动了，几十米后就进了刑场。林海秀躺卧在收尸布上，身子已经不再颤抖，身下的血越淌越多，粘满石灰的脸都浸泡在血液里，却还是要去挨那免不了的一枪。尽管这一枪已经没有必要了。

囚车进了刑场，平常那是附近驻军的一个靶场，车停在山坡边的小空地上。林海秀不是被押下来，而是卷在收尸布里，被前后两个人抬下来的。另一辆车上下来两个戴着大口罩的行刑员，这时已经无法按常规让犯人跪着，向他的后脑勺开枪。也不需要像往常那样验明正身，这个犯人太特殊，这么一目了然，还验什么明？一个行刑员冷峻地打开收尸布，抓起林海秀的头发，提起她的上身。海秀已经完全瘫软了，没有半点的声息。另一个同样戴着大口罩、也同样毫无表情的行刑员提着枪过来，从口罩上的眼睛看不出任何的表示，只见他缓缓地提起枪，把枪口抵近了海秀的左后背，板机一扣，发出沉闷的一声……所有的程序都走完了。

一个曾经在枪林弹雨中，为解放军伤员抬担架的林海秀；

一个还是大闺女却为作为伤员的宗发奋解裤带导尿的林海秀；

一个在解放军反攻龙头、强渡大河时，站在深水中为强攻部队搭人梯的林海秀；

一个在抓捕国民党武装特务时，冲在最前面而英勇负伤的林海秀；

却在革命胜利后二十年的时候，被自吹是最革命的一些人以革命的名义，扣上反革命的罪名，就这样残忍地杀害了！

在文化大革命黑云翻滚、万马齐喑的年月里，依然有这样一批思想解放的先驱者无畏地站了出来。他们在左倾错误最狂暴、最肆虐的时候，敢于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崇拜，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反对迫害干部和群众，奋力地呼唤社会主义民主。在大多数人没有想，也不敢

想，更不敢讲的时候，他们苦苦思索、苦苦追求，拼着一死，用生命发出振耳发聩的悲壮的呐喊，而遭致残酷的杀害。

他（她）们中有：遇罗克、林昭、张志新、丁祖晓、史云峰、李新夏、陈寿图、朱守中、贾正玉、马绵征、官明华、安文忠、杜正绪、王笃良、邓思京、张坤豪、王韵芬等等、等等……在此，我们无法全部列举出他们的名字。（说明：请参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7期等）

他们是为捍卫社会主义而英勇牺牲的烈士。

他们的事迹，会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感到最强烈的震颤。

我们在他们面前只有敬仰、惭愧和不安。

他们是中国人民的脊梁、精英和骄傲。

他们的惨死，是我们社会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

他们的血，滴洒在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路途上。

但愿他们的血，同样不会白流。

安息吧，海秀。

第三十七章 工农兵上大学

1960年2月6日

37.1 推荐

接下来的两、三年，是在压抑和沉闷的气氛中度过的，乏善可陈。有几件事，可以提一下。

大学又要招生了。既然叫文化大革命，就不能连大学也不要。原先的文革前经过入学考试的在校生都走了，新来的大学生都要从工农兵中间推荐上来。这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要由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上面来了推荐上大学的名额，西北村分到了一个。该谁去呢？那就应该是政治表现好，革命热情高。西北村的党支部认真地讨论了一次。基层党团组织也已经恢复了活动，村支书由杜家骏担任，鲁队长是大队长，又是名副其实的队长了。革委会的称呼也不知什么时候悄然而去。团支书由衣春玲担任。

杜家骏说，那就从咱村里几个高中毕业生当中看看，谁最符合条件。

彭小宾说：我们村人才还真不少，当过团支书的就有肖胜利、秦有理，人家辛狗狗还当过团委书记哩。

于村长说：“辛狗狗人不错，我看以后这人能有出息。”

鲁队长说：“唉，肯定不能选辛狗狗。就算报上去，公社也不会批，不就浪费了名额了吗？”

车素花说：“我看肖胜利各方面就行，人品也好，工作也积极，听说以前在书坊里念书还不错。”

于村长也说：“我看也就是肖胜利了。秦有理那东西跟他爹是一路货色，成不了好东西。”

杜家骏看着大家，说：“大家看看怎么样？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那就报肖胜利了。”

秦德才不知从哪儿听说，上大学村里报的名单不是他儿子，气得又蹦了起来。上大学，可是庄户生们老辈也不敢想的事，西北村这十多年还没有出去上大学的人（祖云涛是在外面的大学，不是从西北村出去的）。这个机会怎么能错过呢？他拉着秦有理，秦有理也不用他拉，气头更大。两人直奔公社而去。

进了纪社长办公室就闹。

秦有理说：“他是团支书，我也是团支书。他是红卫兵头，我也是红卫兵头。谁比谁差？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

秦德才说：“我儿子是革命烈士的后代，这一条谁能跟我儿子比！”

纪社长也不好多说，就说：“等我了解了解情况吧。”

宗发奋在边上看着哧哧地笑，也插上了嘴：“他们俩说得也有一定道理。这名额是给西北村的，西北村的人不去，怎么能让外人去呢？”

因为肖胜利算是插队落户进来的，本不是西北村的人。

“是哎！是哎！怎么能让外人去呢？贫下中农、革命烈士子女不让去，怎么能让臭老九的儿子去呢？！”秦德才父子吵的更来劲了。

纪社长听着也烦，“我叫西北村支部再重新研究研究吧。”

西北村的党支部为此又开了一次会。他们除了对秦德才又骂了一通王八蛋，也没有别的办法，人家有烈士子女的金字招牌。

最后杜家骏说了：“让这种人走吧。走了，村里还能清闲一点。肖胜利他们，只要是好样的，以后有机会。”

于是，秦有理就成了西北村自文革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去省城上学了。羡慕的人很多，送行的人却没有。

37.2 另类的大学生涯

秦有理拿到的是省建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他很高兴。实际上，他并不知道，留给他的是这批录取中最靠后的学校、最靠后的专业。他只知道，他是大学生了。比起肖胜利他们，他上了一个层次，在人生的阶梯上，跟他们拉开了距离。他当然高兴了。

秦有理是在本县北面的一个小火车站上的车，行李也很简单，没有任何的准备。

他爹秦德才，也很高兴。这几天，在村里几乎是仰着脖子走。他儿子是大学生了，这在西北村是祖祖辈辈的头一个，能不高兴么。可是到具体问题，比如，给儿子准备点什么好出发去上学，秦德才是什么也不知道。他就没想过这些。

秦有理也从没指望过他的爹，自己一个人扛着行李，走了。走的那天，村里人并不知道，除了王溪。王溪是想送他的，可秦有理不肯。他在想，现在我是大学生啦，她一个庄户生丫头算个什么？可别拖累了我。以后，自己起码不得找个穿裙子、戴手表、骑自行车的城里姑娘？那时，至少是海源的农村妇女，能穿裙子、戴手表、有女式自行车的，几乎为零。不但农村姑娘以此为向往，连镇上的小伙子们也以此为追求的理想，梦想着能娶上这样的媳妇。秦有理此时当然不会去理会王溪，在他看来那不过是王溪的一厢情愿。

有过五年前大串联的经历，秦有理是第二次坐火车，对这些并不陌生。下了火车，刚出站，大红的横幅“热烈欢迎工农兵大学生”赫然映入眼帘。秦有理心里激动了起来，那是新的生活在向他召唤。有好几处摆着桌子的新生接待站，他看到了“建工学院”的字样，走了过去。

桌子后面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站了起来，说：“同学，你好，你是来建工学院的吧？”

“是的，是建工学院。”

“欢迎，欢迎，我是建工学院的是老师。”

“老师好！”秦有理这时候还知道谦逊地点了下头。

“噢，还是我们系的呢。”是老师看了下秦有理的通知书。

“老师，您贵姓？”

“我是是老师。”

秦有理一脸疑惑，还以为这个老师怎么还有点口吃，说话都结巴，怎么当老师？

“哦，我姓是，是不是的是。所以呢，叫是老师。”是老师看出了秦有理的疑惑，解释道。

秦有理这才又点头道：“是老师好。”

“先把行李放到那边，而后，你上这辆大客车等着。一会儿，就会把你们拉到学校去。”

“哦，哦。”秦有理像个很听话的好学生，把行李放到那边的行李堆上，自己上了大客车。

大客车上坐满了，都是兴高采烈的年轻人，也有些年龄稍大些的。

不多会儿，车开了。

建工学院在城南的经纬路上，汽车向南开去。整齐的道路两旁是高大的梧桐树，和绿树下一排排红瓦红墙五十年代建的三、四层的楼房。在秦有理看来，展现在他面前的是新的城市、新的生活。他说不清，他是已经拥有、还是已经融入了这全新的城市生活，成了这美丽城市的一员。革命真是好啊，终于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是向上改变，而辛狗狗则是向下改变。这时，他想到了辛狗狗，狗狗是他最好的对比。那个肖胜利，更是永远地被甩在了后面。

他惬意地靠在汽车软软的椅背上，美美地思量着。

车进了学校。

校园里依然也是整洁的林荫道，高大的梧桐树后面依然是五十年代建的红瓦红墙三、四层的楼房。

车在五层主楼前停下。门厅前也是挂着大红的横幅“热烈欢迎工农兵大学生”，秦有理没有更多地看它。车前的空地上，已有老师在看各人的通知书，记下名字就分配宿舍。

老师把秦有理的通知书看了一眼，在登记册上写了下，旁边的另一位老师立即大声地说着：“工民建，秦有理，去5号楼304房间，住一个晚上，发一天饭票，明天下午去鲁西校区。下一位……”

秦有理都没听明白，这鲁西校区是什么意思，没等开口问，那老师已接了下一个同学的通知，也不好再说什么（“工民建”，是工业与民用建筑的简称，是建工学院里最常见的专业）。

秦有理扛着行李，找到了自己的宿舍。里面已经来了一位同班同学，戴着副眼镜，年龄要比自己大，肤色黝黑。说他像个农民，可怎么又戴副眼镜？秦有理不喜欢戴眼镜的人。看到戴眼镜的人，就会联想到“臭老九”。文革中，知识分子排到了“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这些黑帮人物的最后面，以示社会地位的低下，是最讨厌的人。

“你好，我姓母。”那位同学接过秦有理的行李，先自我介绍起来。

“母？”

“是的，母亲的母，很少有这个姓。名字叫母志浩。叫不惯的话，叫志浩就可以了。”

秦有理一边点着头，心里想，真是怪了，今天尽是遇到这样的姓。

两人聊了起来，知道母志浩是位民办教师，虽只是初中毕业，但文化知识已是相当了得，满公社都知道，所以推荐来上了大学。

也从母同学那儿知道，他们的学习生活并不在省城，而是在本省西部的一个新校区（或叫分部），实际上是个新办的农场。因为要搞教育革命，推行开门办学、实践教学，所以要去那儿一边干活、一边学习，以示与旧学校不同。

秦有理心里倒吸了两口气，弄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啊，怪不得能轮到我呢。“这教育革命，怎么能这么革呢？”这话当然没有说出来。不过，这是秦有理第一次对革命有了疑惑。

第二天，他们又上了车。行李扔到了卡车上，秦有理还在等大客车呢，不料被招呼说：“上去吧，一起上去吧。”原来没有大客车伺候了，都爬上去坐在自己行李上。

汽车的行进大体是朝西南方向。眼前是广袤的鲁西平原，无限延伸的公路两旁，阡陌连片，忽远忽近的绿树后点点的农舍，那路先是柏油路，很快就变成了沙石路，最后便是颠扑不平、灰尘飞扬的土路。路旁的民房，也很快变成了泥墙草屋。看得出来，这一带很贫瘠，全然不是胶东的瓦房。

接近傍晚时分，卡车在乡间的土路拐了几个弯，便到了学校的鲁西分校，或叫鲁西农场。这儿前两年是全省建工系统的“五七干校”。这会儿，挤出一点地方作为学校。校舍显然不够，正在突击建盖。还没完全平整出来的土地上，堆着一些建筑材料，砖瓦、木材、盖着帆布的水泥袋。还有几排尚未完全竣工的平房。那就是秦有理他们的宿舍。屋檐下也挂着大红的横幅“热烈欢迎工农兵大学生”，只是秦有理看着，有点忿忿然了。

有人领着他们到各自的宿舍。那是一排平房，三个大房间，里面就是砖头垛上搭着床板。为节省地方，床板与墙面垂直摆，而且还两两并拢，中间只有极窄的通道。每个房间可睡十六、七人。

秦有理和母志浩找到自己行李后，走进了宿舍。砖墙还没抹泥，连窗框都还没安玻璃呢。

母志浩是在做好事，对秦有理说：“你就睡在靠窗的床吧，亮堂还风凉。”

秦有理可不理解人家的好意，“到底是个臭老九，鬼主意多。把我弄在窗口边，刮风下雨怎么办？”当然他的心眼也多了，有长进了，心里有话可以不说出来，嘴上还能说：“谢谢，谢谢，那您呢？”

“我这样的，随便有个地方躺着就行了。”母志浩还真是这样想的。

又过了一夜。早饭后，在屋前的空地上，举行开学典礼。学生们每人一个马扎，按班级坐在空地上。平房前，就在挂着“热烈欢迎工农兵大学生”的大红横幅下，放着几张桌子和凳子，就是主席台了。当然，正中的墙上还挂着一张挺大的毛主席像，用来遮挡没有玻璃的窗，四周还插上了几面红旗。

秦有理心里想着，唉，这场面哪赶上龙头中学呢。

在宣布开始后，便是一位姓汤的校革委会主任（相当于院长了）讲话。汤主任掏出了一大叠稿纸，在一番敬祝之后，转入正题，翻开稿子开始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旧学校是个大染缸。在他老人家的带领下，这些旧学校已经被我们彻底砸烂了，新的建工学院在革命斗争中诞生了！”秦有理在想，这一大落稿纸，得念到什么时候啊？此时，汤主任已经翻过了一页，原来那一页上没写几个字，这点倒可不必担心。

“你们工农兵大学生的到来，标志着新的建工学院的延生。”还没等下面听的人反应过来，旁边的人赶紧提示：“是诞生”。汤主任眉头一皱，嘟哝着：“上面写的是延生么。”全场笑了起来。

“你们的到来，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次胜利！括弧全场鼓掌。”下面还是没反应过来。汤主任似有不悦，抬起头来看着大家说：“上面写了括弧全场鼓掌，你们怎么不鼓掌？”

下面又笑声四起，全场鼓掌。

汤主任又翻过一张：“为什么要由工农兵来上学呢？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了”。此时汤主任突然盯着稿纸停下了，过了会又说了遍：“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了”。看来是汤主任认不得下面的字，卡壳了。可是毛主席的教导怎么能卡壳呢？下面听的人紧张了起来。那年头，因为把毛泽东的话念错了，当场就从台上揪下去成了现行反革命的事例，常有所闻。“伟大领袖说了什么呢？”汤主任还会灵机一动，来个缓兵之计又迅速地将稿子在旁边的人眼前一晃。但这一晃，又晃得太快了。旁边的人也没看清楚，就轻声地对他说，是“啤”。

“对了，对了。”汤主任可是松了口气，“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旁边人一听，知道是自己看错了，忙说：“是卑，卑贱者。”

汤主任还在强调，“是啤么，先有啤酒后有杯，对的，没错。卑贱者最聪明，就是说，地主老财有钱人看不起我们工人农民。我们工人农民就不信这一套，我们来上大学，我们来掌握知识，让那些地主老财，让那些臭老九，统统滚开！我们才是学校的主人，我们才是知识的主人！”

大家刚要鼓掌，汤主任又来了句：“转下一页。”

场上又笑声四起。

“笑什么？这回，我可没念错。”

全场更是笑声一片。

反而是汤主任有些生气，他把稿子一摔：“哼，你们还笑，我看你们笑不了多长时间了。为了彻底改变旧学校旧大学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恶劣现象，我们无产阶级的新学校，要进行彻底的教育革命，开展开门办学和实践教学。在劳动中学习，在汗水中学习！”

汤主任讲这些倒是很溜溜，也不用看稿子了。

所谓“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是左倾势力为了在整个社会推行极左观念，就百般侮辱贬低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甚至对青年学生也不放过，竭尽污蔑丑化之能事，散布了大量贬低矮化青年学生的言论。仅举二例：一是，说城里学生到农村，“连韭菜和麦苗都分不清”，以此来嘲笑城里学生，说他们无知无能，鼓动一些狭隘偏激的情绪，挑动农民鄙视青年学生。其实，这本来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城里学生从没去过农村，没见过麦苗，“分不清韭菜和麦苗”是很正常的，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大呼小叫。如果他们对农村的事什么都明白，哪倒反而要奇怪了。同样的，农村居民到了城里也会有很多事情不熟悉、不明白，这也没什么可奇怪、可鄙视的。问题在于，社会的不同群体之间应该是相互交流、相互学习，而不应该相互贬低、相互藐视、相互对立、甚至相互仇恨，极左势力想挑动的正是这一点。竭力制造社会对立、社会混乱，是极左势力的拿手好戏、一贯做法。这样，他们才会从中浑水摸鱼、乱中取胜，去实现他们打击异己、加强控制、进一步实施愚民专制的阴暗目的。例子二，就是这儿提到的当时很流行的一个段子，说工农家庭的学生上了大学，就会“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以挑动工农家庭的父母对他们上了学的儿女的不信任，从人伦道德上彻底贬低、丑化青年知识分子。极左势力为了制造社会裂痕，真是处心积虑、挖空心思，什么卑鄙的招数、言语也都想得出来。

晚上，在大宿舍里开了第一次班会。全班三十多人，其中还有五、六位女同学。

主持会议的是老师，他好像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学校把他从教师队伍里挑出来，让他带一个班级，是对他的信任，认可了他也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紧张的是一个“臭老九”能带好工农兵学员吗？自己还是他们的再教育对象呢。

他满脸堆笑，大概是又不习惯于这个动作，脸上肌肉常常松弛下来，又赶紧牵上去，以至于鼻梁上的眼镜也在一上一下的，叫人看了很是滑稽。

是老师念了段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我们大家一起大声念一下。”是老师还是会点群众工作的方法。大家又一起跟着念了下，果然气氛要好多了。

“从现在开始，我们三十几个人就是一个革命的大家庭。在今后的三年里，我们就要搞好团结，互相帮助，共同奋斗，努力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

“为了便于工作，我们安排了一位临时召集人，就是这位宁国旗同志。他是位革命军人。”

是老师指着一位穿着军装的同学。他便站了起来，大声喊道：“战士宁国旗，向同志们致敬！”“啪”地立正，向大家行了个军礼。

他虽说是个军人，但个儿不高，也挺瘦小，不象个威武雄壮的军人形象。或许，他看出来大家会有这个想法，便补充了一句：“别看我个儿小。雷锋也是小个子，照样能当英雄。”大家也都笑了起来。

“我们还安排了一位副召集人，就是这位甄武装同志。”是老师继续说道。

一位其貌不扬的女孩子，也是一身军装（不过没有领章帽徽），齐耳的短发，还戴着军帽，还是一副红卫兵的打扮（尽管红卫兵在那时已经过时好几年了）。她也站起来，向大家敬礼，“战士甄武装向同志们致敬，向同志们学习！”

甄同学是一个大队书记的女儿，原名叫小红，因为有了那个著名的诗句“不爱红装爱武装”，就该改成了现在这名字。虽然只是小学程度，但她爹在村里保守派力量（此处无褒贬之义）的支持下，已经重新掌握了大队的实权，而且还是当地公社革委会的重要支柱。他的女儿当然成了他们公社推荐上大学的第一人选。

秦有理看着，吐沫往肚里咽了下去，敷衍地拍了几下。他看不上这些人。他已经知道，在这个班里，讲出身，自己是正宗的烈士后代；讲政治，自己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讲文化，也是班里少有的几个正而八经的高中毕业生。为什么班干部，轮不到他来当？

他和班里的裂痕，从第一天起就开始了。

第一次的教学活动，就是干活，搬石头，女同学们也不例外。从停在河边的船上，把船舱里的石块搬到岸上，以后再用手推车、板车这些运到工地。好在石块不是很大，从三、四十斤到七、八十斤，是用来给平房作地基的，比较方正。同学们排着队，挨个从跳板上船，抱上一块，有力气的就扛上肩膀。很大的石块，就两个人抬。因为毕竟是力气活，又怕不小心砸了别人，同学们前后也拉得比较分散。刚去时，还有些话语，相互认识，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不多会，就没有什么声息了，各自抱着、扛着、抬着，费力地走着。

这种情况，秦有理是不会积极的。他决不会争先恐后挑大的搬。好像也没有别的人那么做。满满一船，恐怕他们几天也搬不完，着那个急干吗？虽然昨晚的班会上，是老师说了，明天我们的第一堂课就是搬石头。搬石头，是为了打地基。我们搬石头，是为了打基础。我们的实际工作是这样，我们的专业学习，也从这儿开始。后来每人还表了态，要积极参加劳动，我们工农兵大学生就是不同于旧学校的旧大学生。可今天，一扛上石头，那热情没半小时就下去了。秦有理拣着不大不小的石头，顺着次序往上走，心里那个不舒服呀，呸，他妈的，要知道是搬石头还用上这儿来吗？

到快休息的时候，实在忍不住了，秦有理放下一块石头，眼前也就母志浩一个人，就装着自言自语地说，旧知识分子才要这样的锻炼呢。

母志浩扶了下眼镜，也好像不经意地轻声说，“嗨，保持劳动人民的革命本色么，搬吧。”

秦有理听了，当然不舒服，呸，也是个假正经。真要装革命，你们哪个也赶不上我。

上课了。

其实昨天的搬石头，也是上课。可老的传统观念，还是觉得捧起书本，在教室里，老师讲，学生听，那才是上课。但今天的上课，还是不一样。没有教室，每人一个马扎，就坐在屋前的空地。本和笔是发的，因为附近目前还没有商店，买不到。是老师在木头架上挂块黑板，就开始讲了：

“我们的教学要和旧学校的教学有所不同。你们工农兵大学生是社会的主人，也是学校的主人。我们不用分老师和学生，就是在一起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啊？你们说是不？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提出，我们一起切磋、讨论，啊？千万不要把我当老师。”

是老师停了下，见大家没有反应，又把脸上的肌肉拉紧，讪笑了下，接着讲：“好，那我们就开始了。今天我们这门课叫‘建筑学概论’。”

是老师刚讲了一句，宁国旗就很认真地举手提问了：“什么叫概论啊？哪两个字啊？”

是老师又是一笑，说：“这个，所谓概论啊，就是……”

话音未落，这边的秦有理又插话了：“不要所谓了，那多酸啊。直接就讲吧。”

是老师无奈，不过脸上依然还是一笑，说：“好的，好的，不要所谓了，咱们就直接讲。这个，这个，讲哪儿啦？”是老师都被问糊涂了。

“概论，所谓概论。”还是甄武装没糊涂，提醒道。

“哦，哦，这个概论，概，就是大概的概；论，就是议论的论。合起来，就是大概地说一下，介绍一些基本概念。明白啦？”是老师特地看了下宁国旗。

宁国旗在认真地听着，右手捏着笔，在本子上使劲地比划着，看来还挺费劲，大概是在写那概论两个字，不知写对了没有。

是老师又把脸上的肌肉拉紧，讪笑了一下，接着讲：“我们先讲建筑。什么是建筑呢？建筑这个词看起来挺好理解，但解释起来也挺费事。它既是个名词，又是个动词。所谓动词……呸，呸，不好意思，又忘了。当它作动词用的时候，就是指建筑工程的建造过程，比如说，盖房子，修铁路，这些活动就属于建筑。”

“老师，那什么是建筑工程呢？”宁国旗又问。

这时的是老师的笑，只能是苦笑了：“建筑工程么，就是建筑类的工程，就是刚才说的盖房子、修铁路这些。啊？挺好明白的，是吧？”

是老师赶紧糊弄过去往下讲。这样的解释是有点同义反复。不过即使到现在，对什么是建筑也没有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再讲建筑的另一个含义。建筑，作为名词，就是指建筑活动的具体物质成果，比如盖好了的房子。通常叫建筑物，也叫建筑。

这个建筑，或者叫建筑物，有很多不同的分类。比如，可以分为房屋和构筑物。所谓房屋呢？”

“又来所谓了。”秦有理对这方面倒是认真得很。

“喔，喔，又忘了，习惯成自然了。一定改，一定改，这……这个，这个房屋呐”是老师好不容易拗了过来，“这个房屋呐，就是上有顶，四周有墙，有门可出入，供人们生活、工作、储藏的场所。”

“场所？场所是什么意思？”宁国旗又有疑问了。

“场所就是某种地方，可以让人们用来生活、工作、放东西的地方。”

“那叫地方，不就行了吗。还叫什么场所，不通俗易懂，不是劳动人民的语言。”宁国旗还挺振振有词。

“是，是，那就叫地方。通俗易懂，完全可以，哈，哈哈。”

那边甄武装也发问了：“这房屋怎么没提到有窗呢？没窗户怎么住呢？”这问得认真里带有天真了。

是老师依然拉着脸上的肉笑着，他要表现出百问不厌的耐心：“啊，小甄同志，你学得很认真，这么小的细节也注意到了。不过，没有窗也可以住，没有窗也可以住。”

“没有窗，在里面怎么住啊？”甄武装还在问，好像今晚上就要让她住没有窗的房屋了。

“没有窗，就不能住啦？”宁国旗反倒开导起甄武装了，“旧社会，贫雇农有个地方住就不错了，哪管有窗没有窗啊？”

“对，对，旧社会贫雇农住的，哪有什么窗啊？还是解放军同志阶级觉悟高，马上想到了这一点。”是老师像盼到了救星，脸上的笑肌抬得更高了，眼镜又跳了一下。

“那汽车，上有顶，有门有窗，四面有挡，也能叫房屋么？”甄武装又问了。

“那有很大的不同。汽车是工具，属于交通工具，它是工业生产的产物。咱这儿讲的房屋，是建筑物，是建筑活动的产物。明白啦？”

甄武装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是老师环顾四周一圈，看看没有提问的了，又把脸上的肌肉提一下，接着讲：“关于房屋的概念，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它的高度要在一米八以上。”

“矮一点，就不行了么？”甄武装学得真的是很认真，又问了。

“唉，你们的问题真是多。”母志浩的理解能力要强多了，有点听不下去，自告奋勇帮老师解释起来，边讲还边用手比划在膝盖高一点的地方，“要是矮了，那就不叫房屋，叫鸡窝了。”

大家哄堂大笑。

是老师也笑得差点掉了眼镜。

上午的两节课也就到点了。

在搬了一天半石头之后，又上了堂课。这回，不但要学基本概念，还要学基本的计算公式，因为要讲面积和体积了。建筑行业里涉及的面积就多了，比如，有：建筑面积、施工面积、有效面积、使用面积、投影面积等等（那时还没有公摊面积一说）。尤其是对投影面积的解释，着实让老师难为了好一阵，还不知宁国旗他们明白了没有。

秦有理对学这些，倒没什么困难。他毕竟是正规的高中毕业生。但是，他学得很不舒服，他看不惯这些，他看不上这些。在他看来，这算什么教育革命。虽然干了点活，劳动得还很辛苦，但跟教学还是各归个的，还是两张皮，相互之间没多少联系。应该说，秦有理的这个想法不是没有道理。当时的教育革命，虽然叫得很响，但并没有什么真的是革命性的措施。一些看起来很革命、甚至很左的东西，比如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比如搞开门办学之类，并没有触及到传统教育弊端的根本之所在。不过，秦有理想得更远了。他在想，这场所谓的教育革命并不彻底，是在走过场、假革命。突出表现就是，还是臭老九唱主角，还是老师讲、学生听，还是老师主导学生，学生还是配角，跟再三受到批判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没有本质的不同，教育领域需要更加彻底的革命。

秦有理还有机会再显革命“本色”么？

37.3 碰撞

这个机会还真出现了。

作为极左势力主要人物之一的林彪垮台以后，否定极左、批判极左、纠正极左的想法，在很多人的心中升起。但这又是极左势力所忌讳、所不容的。于是，1972、1973年，在一些地方又搞起了一个运动中的运动——“反复辟、反回潮”。

这样的机会，秦有理怎么能错过呢？学院革委会才传达了文件，当晚秦有理就写了份大字报。

秦有理基本上没怎么构思，倒是找纸找笔费了点事。那时已经不怎么兴大字报了，班里、系里也没有笔和纸，还是老师领着他到校办公室才找到这些。拿回宿舍，铺在床板上，就写了起来。

和他床铺并排连在一起的母志浩，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这东西在当时虽然已不算稀罕，但有的人也不多。晚饭后，母志浩习惯要听一下。有的同学也喜欢跟着听点新闻，有时还叫他放大声点，大家一起听。今天这声音，就惹得秦有理有点不舒服。

“你关一下吧，我要写大字报。”

“哦，大字报？那我也看看。”母志浩很例外地关了收音机，站在铺的对面，看着秦有理写。

“建工学院不是在教育革命，而是在教育倒退！”

秦有理一落笔，标题一出现，围着看的同学都愕然了。尤其是满心热情、帮他找来笔和纸的是老师，经常要使劲提着的脸部表情肌全部松弛了，拉耷着。宁国旗、母志浩都黑着脸，在一旁看着，一声不吭。甄武装也是大为不解，看看这个，看看那个，见谁也不作声，她也不作声。对于掀起文革风暴的武器——大字报，即使在这些顺着文革浪潮上来的人里，也已经有所反感了。

秦有理写的主要意思是：在今天的建工学院依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据舞台，工农兵大学生还是二等人，尤其是真正的革命后代没有发言权，教学方式比资产阶级旧学校还要资产阶级。应该说，他骂的是不符合实际的。建工学院有关方面在贯彻执行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上，应该说，是不遗余力的，做的不说出格，也至少是够可以的了。甚至连宁国旗、母志浩这些大多数工农兵大学生自己也很难适应。

所以，当秦有理找不到浆糊，问食堂要了碗稀粥水，把大字报糊上墙的时候，尽管围观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叫好，没有一个出来附和的。

第二天早饭前，那张大字报已经被吹落到不知何处了。

这时，入学有一个多月了，班级里正要确定班干部。那时的班干部可不叫“班委会”，而是叫“上管改小组”这么别扭的名字。它的全称就复杂了，取自于那句有名的口号：“工农兵学员要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因为宁国旗已经是临时召集人，所以班里同学对选班干部没有更多的想法，唯有秦有理可不这样。他知道，这对于他来说，是这三年里最后的机会。要么成为班里的一个人物（哪怕只是在这个小小的班级里），要么就默默无闻地在这儿毫无意义地了此三年。这是他不甘心，认为也是不值得的。乘着班会，是老师要大家议一下这个事，酝酿个初步名单。

一开始，母志浩就提名宁国旗。宁国旗自然也要谦虚一番：“我不大行，我自己学习挺吃力，怕跟不上。母志浩同志就挺合适。”

秦有理一听，前一天的第一炮没打响，今天一定要来第二炮，便迫不及待地站起来毛遂自荐：“革命的同志们，既然宁国旗同学自己觉得并不合适，我们就尊重他本人的意见。我向大家推荐自己。我觉得自己在各方面都挺不错，我就挺合适。”

大家很惊讶，都转过头来看他。

秦有理毫不停顿地继续说：“我觉得，我的条件是很全面的，符合作为班级上管改小组负责人的条件。可能大家不是很了解我的情况，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出身是革命烈士，我母亲姜雪花是胶东远近闻名的革命英雄，解放战争时期被国民党反动派活活地钉死在我们镇上的十字路口，血流遍地，死得那个惨啊。”说到这儿，秦有理竟至于哽噎起来。引得甄武装摇摇他：“慢慢说，慢慢说。”

秦有理抹了下泪，继续说：“作为我自己，文革前，我就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学校的团委副书记。文革中，我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一开始就起来造反，还受到了刘少奇派来的工作组의残酷迫害，被残酷批斗过好几次。”

秦有理停顿了一下，又换了种坚强有力的语调：“但是，我坚决不信邪，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发扬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提倡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带领全县的红卫兵轰轰烈烈地起来革命造反，受到过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讲到这儿，秦有理的眼睛都亮了，脸上发出了光芒，最后以“难道我这样的还不行么？”作为发言的结尾。

秦有理讲完，很得意地坐下，满以为会引来全班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结果却出人意料地平静，不但没有一个掌声，甚至都一言不发，冷场了起来。

许久，母志浩忍不住，说了：“秦有理同志确实也有很多优点、很多长处，比如革命性比较强，斗争比较坚决，文化学习也比较好。但是相对来说，从这一个月多的实际表现，全面来看，宁国旗同志更合适一些。宁国旗同志更加成熟，处理问题更加周全，对于要团结和带领全班同学一起向前，宁国旗同志确实要更合适。秦有理同志，可以担任学习委员，以后甚至可以到系里的上管改小组担任一定工作。这话，我不知讲得对不对？”

母志浩一讲过后，气氛好像活跃了一点。稍停，宁国旗也发言了：“母志浩同志对我的评介，我自己不好说。但我喜欢有话直说。我对秦有理同志提点意见。你前二天贴的那个大字报，对学院教育革命的看法有片面性。学校教育革命的成绩是主要的，是首先要加以肯定的。”

秦有理马上反驳道：“学校教育革命的大方向就是错了。”

是老师一听，怕真的吵起来，连忙加以阻止：“这个问题，先不讨论。今天我们就是酝酿个初步名单。甄武装同志，你的意见呢？”

这种情况下，甄武装还能说别的么，况且她对秦有理也没有什么好感，就顺水推舟说：“我同意大家的意见。”

是老师也赶紧收场，“母志浩同志提的是宁国旗同志。大家还有不同意见么？”稍停四秒钟，是老师就作了结束语：“没有不同意见的话，就这样了。这只是初步意见。我们先报到系里，一周之后，由系里作最后决定。”

秦有理的这一炮又没打响。但他是个不服输的人，是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至少在这时是这样的。

一周以后由系里作决定？也就是说这一周系里还没有作决定，也就是还有机会。秦有理要作最后一搏。问题在于怎么才能让系里改变决定呢？这一招，必须是狠招，是常人所不能为。而且，这一招必须

打到宁国旗的死穴，一打就倒。宁国旗的死穴在哪里呢？秦有理想了一整天，都没想出来，着急啊，着急啊。

37.4栽赃

这一天，全班又在干活，男同学是推小车，把石头从河边推回来。秦有理推了两趟，就他的体力来说，推小车是不成问题的。但他很少干过重活，加上心里憋气，推得很不顺，两条腿生扭，连里面的裤衩也撕裂了。他要回宿舍换一条。

宿舍都是敞着门，里面静静的，一个人也没有，床上各种衣服、物件也是随手乱放，看样子还是要先接受军训、学会整理内务才行。

秦有理从床下翻出自己的裤子，看见另一侧母志浩的床下，那翻开的书包里塞着那台半导体收音机。秦有理忽然一个念头出来，迅速地抬头朝四周一望，空无一人，便迅速伸手抽出那收音机，把它塞到了对面铺位宁国旗床下的一大包衣服里。而后，又很从容地走了出来，若无其事地推着小车搬石头去了。

晚饭后，自由支配时间，母志浩习惯性地往床下伸手。一摸，没有，再摸，还没有。“喂，怎么回事？”母志浩蹲下弯腰低头，在床下认真地找了起来。

秦有理还神情自然地问：“怎么啦？”

“奇怪，我的收音机怎么不见了？我明明是放在这床底下的。”

“这事倒奇怪了，谁还能把它拿走了？问一下，不就知道了么？”秦有理说。

“先别问大家，我先自己找找。”母志浩说。

别的同学听到了，围了过来，七嘴八舌起来，“这事奇怪了，啊？咱这里面，还能有这事？”

“大家各人都自己找找。”秦有理还显得很仗义的样子。

这时候，甄武装端着脸盆进来，招呼着：“你们谁有要洗的衣服？我们女同学帮你们一起洗了。”甄武装原本也是个挺娇惯的孩子，因为当了“副班长”，自然也要表现一下。

“谢谢，谢谢，不过我们也早会生活自理了，不麻烦你们了。”母志浩说。

“今天班长干活最多，出汗也最多，现在还忙得没回来呢。要不，你先把他床下的衣服洗一下吧。”秦有理说。

“噢。”甄武装转身把宁国旗床下的那包衣服抱出来放进脸盆。突然“嘭”地一声，一个收音机掉了出来，摔到了地上。

大家一看正是母志浩的那台。

“啊？”大家都惊讶了，愣住了，空气在刹那间凝固了。

五秒钟之后，母志浩大声说着：“误会了，误会了，这是一场误会。是我自己忘了，记错了今天上午我把它借给宁国旗了。”

空气依然凝固着，无人搭话。

班里的上管改小组，系里批下来了。组长、副组长依然是宁国旗、甄武装，而且还加了个副组长母志浩，这可能是老师给系里提的建议。

他们三个加上是老师，一起开了个碰头会，除了讨论班里的日常工作，“半导体”事件也是他们必定要讨论的事。宁国旗在事情的当时没在场，被母志浩打圆场一定程度上糊了过去。但宁国旗内心的愤恨可想而知，第二天，他到处在放话：“是哪个乌龟王八蛋敢陷害我，找出来非拍死他不可”。

虽然好几天过去了，宁国旗这时还在愤愤地说：“是哪个乌龟王八蛋搞的？”

“过去了，就过去吧。”甄武装毕竟是女孩子，善意地说着。

“不会的，不会过去，这个鬼只要不抓出来，这种事早晚还会发生。”母志浩肯定地说。

“是么？哪会是谁呢？说不定是外人呢？”甄武装还是往好里说。

“肯定不是外面来的人，我们这儿这么偏僻，没有外人进来。这个鬼就在我们班上。”母志浩极为肯定地说。

“是哪个龟孙子，我去揍扁他。”宁国旗拍着大腿说。

是老师盯着母志浩看，一直没说话。他从上次秦有理的大字报之后，就不大敢说话了。脸上的肌肉，掉下来的时候，要比拉上去的时候多多了。

母志浩却没有说出来。他知道，虽然面前只有三个人，也不是说出来的时候。“由我和宁组长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需要系里配合吗？我可以跟系里说一下。”是老师这时说了句话。

“好的，到时我会请求系里帮助的。”母志浩说。

秦有理没想到系里还是把宁国旗作为一班之长，心里气愤极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来个鱼死网破。你们不是不信吗？我就再来一次，叫你们怎么也想不到。

这个星期六的晚上，看电影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戏里的东西，他早就倒背如流了，还看个什么景？对于他，反倒又是个机会。

不去看，是不行的。各个班级都集体排队，拿着马扎，坐在操场上。

秦有理看不进去了。他忍着，又不动声色地用余光扫视四周。差不多演了一半了，差不多是时候了，他稍稍低头弯腰，装着好像要出去解手，出了放映场。

天公挺作美，黑黑的，一颗星星也没有，更不用说月亮。秦有理东张西望地走回宿舍。宿舍前，也是一个人也没有，黑呼呼的，几乎分辨不清什么，这倒使他更放心了。他突然拐弯，走近前两排的女生宿舍，又警觉地弯着腰四处看看，没有发现任何情况，便捏手捏脚地轻轻推开门，刚露出一条门缝，就钻了进去。

他这是要干吗？他这是要追求最好的效果。他要拿走甄武装的东西，再去塞到宁国旗的铺底下。那不就有最佳效果啦？哈，哈，有好戏看咯。真亏的秦有理想得出来。

女生也是一样的大宿舍，甄武装在哪个铺位，他也知道。进了屋，往里摸索，快走近了，但毕竟不熟悉，又那么的黑，“砰”的一声，腿碰了床角。虽然声响不大，可却是那样的清晰，把秦有理吓了一跳，赶紧蹲下。几分钟之后，心里稍稍平静一些，再听得四周还是寂静无声，没有任何的反应，秦有理这才从甄武装床上被窝底下抽出一件东西赶紧就走，那东西不大，软软的，可能是件裤衩吧，心里还在想：“真他妈的，这比真的当小偷还吓人。”

又悄悄地来到自己宿舍的房前，依旧蹲下，向四周察看有无异常，依旧是轻轻地掀开一条门缝，俯身弯腰钻了进去。宁国旗的铺位，他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可刚才那一响，心理却有点忐忑了。屋里也是黑黑的，他几乎是四肢爬着，从床铺间的通道中爬向宁国旗的铺位。到了，他手一伸，把甄武装的那东西塞进宁国旗的床下。

就在他的手伸进宁国旗床下的一刹那，绝对令秦有理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另一只手出现了！这另一只手，也从床下伸出，紧紧地抓住了他的手！

只听得大喝一声：“你这个狗东西！”秦有理还没听清是谁在吼，宁国旗已经怒不可遏，把床铺都掀翻了，从床底下站了起来。

几乎是同时，屋外也有几个在大叫：“抓贼啊！”没有玻璃的窗框被砰然打开，有两个人干脆从窗外跳了进来。

电灯一亮，一切都明白了，什么也不用说了。

母志浩算计着秦有理还会有这一手，叫宁国旗在看电影时提前趴在自己的床下，还请系里从外班安排了两个人潜伏在外面。没想到，还真逮了个正着，秦有理的手上还拎着甄武装的一条例假带。

宁国旗愤恨至极，一拳砸下来，秦有理便“哇”地一声歪倒在一边。宁国旗又一脚踢过来，把秦有理疼得又是“哇”地一声。

众人怕出事，连忙把宁国旗拉开。好在宁国旗个头小，力气也不大，打得不算很重。

事情已经清楚得不用再说了。

学校对秦有理的处理倒是很微妙。按说，又是盗窃，又是栽赃陷害，性质十分恶劣，不用说是开除，就是送去劳改也不为过。可是这样一来，就丢了工农兵大学生的脸，尤其是丢了学校的脸。留下来又肯定是不行了，那就让他自己走吧。就说他不适应这儿的生活，自己要走。档案上不留一个字。秦有

理自己当然也不想呆在这儿，走就走吧。唯一遗憾的是，那晚上，他怎么没注意到宁国旗没在那儿看电影呢。走的时候，秦有理又看见那条挂着的大红横幅“热烈欢迎工农兵大学生”，气得都“呸”了一声。

秦有理就这样又回到了西北村，说自己不希得在那儿（不希得，海源话，不屑于的意思），还是愿意待在西北村里和乡亲们一起当农民。村里人也没有来问他的，就像他走的时候，也没人来问他。

秦有理短暂而又难忘的大学生涯就这样结束了。只可惜西北村浪费了一个宝贵的上大学的名额，也不知道他会向王溪怎么解释这个过程。

第三十八章 赤脚医生

1960年2月7日

38.1 合作医疗

翻过年，又来了个新生事物，叫合作医疗。本意是好的，就是大家各人都凑点钱，大队、公社也都出一点，谁有了病，就帮助他点。每个大队要安排个“赤脚医生”，作为村里自己的卫生员，就是还保持农业人口身份、直接为乡亲们服务的医务人员。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事情，也不能说都是坏事情。这不是为文革辩护，而是这些事不是文革的本质性的东西。比如，“文革”期间也有成果：钢铁的冶炼、石油的开采、大桥的合拢、粮食的收获。这些应该感谢那些在重压下，在政治和生活的重压下，依然勤勉地劳动着的工人和农民兄弟们，而决不能记在“文革”的头上。

这儿要讲的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事，也是属于这一类。这事还源于毛泽东的一次发怒。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听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时，站起来严厉地说：“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这就是有名的“六二六”指示。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再次召见钱信忠说：“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他还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毛泽东不但说要有一大批农村养得起的医生在农村给农民看病，他还划定了培养这样的医生的两个条件：一是高小毕业生，二是学三年医学。于是，在农村合作医疗框架下的赤脚医生便在神州大地风生水起。尽管这个办法有很多不完善之处，尤其是它没有建立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肯定不可能有正常和持续的发展，但有这个总比没有强。（这段资料请见2011年08月24日09:55:27，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这事到了海源，大家觉得这是好事啊，西北村也挺支持。找谁干呢？当医生，给人看病，打针、吃药，这可不是马虎的事。弄不好，病没治好，把人给治死了，他自己还吃不了兜着走。得找个有点知识，待人诚恳，做事负责，又肯学习的人。

大队党支部又研究了。几个小伙子，毛手毛脚，虽然有的也能干，但那是干庄稼活，再说他们给大妈小媳妇的看病，也不方便。几个闺女里面，皮平平没怎么上过学，邢秋芬太嫩，王溪就更不行了。扒拉来扒拉去，叫衣春玲干吧。

大家一合计，还行。

跟衣春玲说了，她想了想，答应了。把团支书的活，交给了肖胜利。

大队挺支持，队上的钱不多，还是尽量买了一些药、针管、听筒、血压计等。两个玻璃柜，一个办公桌，一个病床，都是队上自己做的，刷上白漆，还挺像回事。地点就放在陶家大院。

衣春玲上县医院培训了两个星期，回村里后就在陶家大院的厢房，挂上了“合作医疗室”的牌子（也叫“卫生室”）。衣春玲穿上了自己做的白大褂，也挺高兴的。西北村有了自己的“医生”啦。

赤脚医生，本人还是记工分的，而且在多数大队也不因为这是技术活而多记点。村里给衣春玲记了9分，高于一般的女劳力。衣春玲自己倒是不很计较这些。

合作医疗的经费，由大队按全队的总人数拨给，通常一人一年也就是块把钱，这已经是不错了。也有的大队自己都没有钱，一年年地不给，使合作医疗没法开展下去。社员要有住院的，合作医疗也就象征性地补个几元钱，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在被压抑着的那么低下的生产水平、经济水平之下，当然不能去有什么别的指望。

这么点的经费，怎么去治疗疾病呢？也是按照当时搞革命要轰轰烈烈，而办正事、办实事就要实行“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这时候，中医药就有了用武之地，大力提倡“一把草药一根针”。合作医疗室里通常都备有常用草药，比如消炎用的甘草、黄芪、陈皮，治风湿的防风、葛根、伏苓，治妇女病的红花，等等。衣春玲好不容易记住了这些。为了有所补充，秋天还得上山去摘野菊花、挖土大黄，大队再拨块地，种点三七、薄荷这些。再就是针灸，所谓“一根银针闪闪亮，革命精神放光芒”。衣春玲又上县医院学了一星期，回来好歹也能扎几下。

皮安已快六十岁了，有些老寒腿、老胃病，天气一变就不舒服。这天，他皱着眉头，来合作医疗室找衣春玲

“春玲啊，我这老毛病又犯了。你看有什么法，帮我扎固、扎固？”（扎固，海源话，修理或治疗的意思。）

“大叔，你坐，你坐，我来看看。”衣春玲对乡亲们一直很是和蔼的。

皮安已坐下后，衣春玲给他敲敲腿、摁摁肚子，一边问：“这边不疼啊？那边呢？”

也只能是这样的检查了，“要不，我给你抓二副草药吃吃看，再给你扎几根针？”

皮安已忙说：“就吃点药吧。针就不扎了，我怕疼。”

“我下手轻一点，不疼的。”

“还是不做了吧。”

“那也好，先吃两副看看。不行，再扎。”

皮安已对那针灸，怕疼是其次，主要是怀疑那能行吗？衣春玲这孩子是不错，人人都夸奖。可针灸那玩艺儿，去县里三、五天就能学会么？那时自己学垒墙，当了好几年的下手，才让上呢。他对那针灸

不放心。

两副草药，省着点，喝了八天。效果有没有？皮安己仔细想了想，摸摸腿，摸摸肚，没有，还是没有。再去找衣春玲？不好意思再麻烦人家闺女了。去了，也不好意思说不好，说了不好，也就是扎几针。不去了吧。

那天，他勾勾着腰（海源话，弯着腰的意思）下地。虽然腰疼胃疼，活还是要干的。要不，记不上工分，吃什么？

平金刚看他不自在，便问：“大叔，怎么啦？”

“唉哟，老毛病又犯了。”

“上赤脚医生那儿看过啦？”

“看过了，没有用，我也不好意思再去说。”

“现在兴打鸡血哎，你去试试。我也去打过一针，还挺好的。”

“是么？”

38.2 打鸡血

当时，不知怎么，在全国范围兴起了打鸡血的热潮。就是把公鸡的血从翅膀下抽出来，再注射到人的屁股里。据说能包治百病，不管是什么病都有效。其实，这也就是在缺医少药、又没有文化知识情况下的一种精神寄托，一种实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无奈而已。

皮安己听平金刚这么一说，也想试试，为保险起见，还特地去问了问衣春玲。衣春玲也知道这一阵外面对打鸡血是大兴其道。但她也说不清这里面的道理，也有疑惑。她去问过彭小宾。

彭小宾也吃不准，说：“那玩艺儿啊，呵呵，说不上是歪门邪道，可也不像是个正道。毕竟是往人身体里打呀，还是谨慎些好。打进去，就拿不出来了。出个事，就是大事。还是不搞这些为妙，省点心吧。”

“你好像对中医药，不是很感兴趣么？”衣春玲觉察出彭小宾有这个想法。

“也不能这么说。”彭小宾说：“打鸡血也不能说就是中医。不过就算是中医，也不需要非要分成中医、西医，而应该是古代医学和现代医学之分。没有必要什么事情都要按东方、西方来分。西方也有古代医学，比如西半球的印第安人，也早就有了医学，有些也沿用至今。欧洲古代也有医学，只不过是他们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向前发展了，发展成现在的现代医学了，而且还在不断地往前发展。但中医药在相对封闭专制的空间里，从医学理论到医学实践，基本上没怎么发展。张口闭口还是两千年前的黄帝内经，显然是不能适应社会需要了。当然，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用用也还是可以的。”

衣春玲说：“你别说，封闭起来不发展。中医里动不动就有老中医拿出祖传秘方来。”

彭小宾说：“这就更滑稽了。现在的科学技术，包括医学理论和医学实践的发展，真的是日新月异，那种老皇历早就应该被取代了。什么事情都需要开放、更新和发展。封闭起来，固步自封，还是老一套，那就只能是步步落后，最终被淘汰。社会领域是这样，医学我不懂，但我想道理是一样的。拿不出科学依据，拿不出实验数据，就靠两张嘴皮子，说得再玄乎也没用。把中西医对立起来，过分强调中医，看起来是在保护中医，其实从根本上是不利于中医的发展。对于一些曾经的辉煌，可以去肯定，可以去赞扬，比如对时间的度量，古代有沙漏，有日晷，是很了不起的发明，但是我们现在不需要再去用它了，因为时代发展了。”

彭小宾这也是在有感而发。

村里人也有抱着公鸡来叫衣春玲打的，她都回绝了，叫上公社卫生院去打。这回，皮安己来认真地问这事。衣春玲想了想说，你先去试试吧，有效果，就继续打；没效果，就算了，还是上我这儿来扎针吧。

皮安己想，也好，试试吧，反正也只是试试。回去后，特地上集买了只公鸡。本想豁上了，省着钱干吗呀，买只好一点的六七斤的大公鸡。谁知这一阵公鸡都紧缺了，价钱翻了一倍，只好买个三斤多的回来。第二天，抱着公鸡到了卫生院，一看，嚯，人还不少，都揣着公鸡在那儿排队等着呢。那些公鸡有抱着的，有捆着爪的，有扑楞着翅膀挣扎的，有旁若无人、引吭高歌的，还有拉了一坨屎的，热闹得很。

皮安己排在后面，问前面的一个老头，还是城东十里下河头的，“这法能好使么？”

“好使，要不，怎么大家都争着打？血是生命里最宝贵的。给你补充血液，你想想，能不好么？别的药，都得花钱。这鸡血，它自己就长出来了，喂它一把食就行了，多好。谁想出了这个法，真是要记大功啊。”这老头还挺愿意说话。

“还得天天来打么？”皮安己还是不很明白。

“最好是天天打。我是路远，没法，三、四天来一次。”

“你不在村里合作医疗室打么？”皮安己还问。

“我们村那个赤脚医生，技术不行。上星期在他那儿打，疼还不说，腓都打肿了。没办法，还是走着上这儿来了。”

皮安己听了，直点头，庆幸自己上这儿来打了。

轮到自己，交上五分钱的注射费。别看这五分钱，现在因为面额小，市面上已见不到这种硬币。可那时劳动一天的工分值才一角钱上下，这五分钱差不多要顶干半天的活。所以当皮安己掏出这五分钱硬币时，还是有点心疼。

医生从鸡翅膀下抽出一管鲜红的血，转头对他说：“还没脱裤子啊？”皮安己一看，满屋子都是人，有点不好意思。医生可不耐烦了，说：“嗨，老得都没毛了，还不开通。就是娘儿们结扎，当着这么多人也

得脱啊。快点！”

皮安己听了，气的真想回嘴，要是迟一敬敢这么说，早就要跳起来了。但看着这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心里又矮了半截（村民们往往把吃公粮的人，即能享受定量供应的非农业人口，都看成是非同寻常的国家工作人员，称之为工作人）。唉，算了，这小子不会说话，不跟他计较了。一狠心，咬咬牙，滋溜一声脱了裤，裤子一下就掉到了脚背上，惹得满屋的人哄堂大笑。

这时，那医生又说了：“瞧你这人，不用这么实诚。裤子拉到腓沟眼就行了。”（实诚，海源话，实在的意思，有时带有贬义）

皮安己满心地埋怨这医生，你也不说清楚，再一想，又算了，咱一个庄户生到哪儿也被人笑话，算了吧。别看皮安己在村里对迟一敬那么有本事，在这儿，可是一点能耐也没有。

那针“扑”地捅了进去，皮安己不由“啊哟”了一声，弯着的腰直了起来。

“不许动！”那医生像是对抓来的俘虏似的，“针断了，谁负责。好了，下一个！”

皮安己提上裤，抱起鸡，赶紧回了家。

一、二天过去了，除了腓还在疼，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皮安己扭着腓，坚持着上工。

平金刚也是扭着腓过来，遇上他，问：“大叔，你这是怎么啦？”

“我去打鸡血啦。”

“有效果么？”

“就是腓疼。”

“啊哟，看来咱俩是难兄难弟了。我这也是打鸡血打的，腓都肿了，不能再打了。”

“那我咋办呢？”

“再坚持看看吧。”

四天后，皮安己的腓还是疼，可鸡血还是得打啊，要不就白买了那只大公鸡啦。

皮安己又抱着公鸡去了卫生院。当他按照医生上次的要求，很标准地把裤腰脱到腓沟眼时，那医生却说：“你还打啊？”

“怎么啦？不是说脱到腓沟眼就行了么？”

“嗨！你这腓都肿了，还打啊？你自己不知道啊？”

“哪，怎么办？”

“交三角钱，打针消炎药。”

“啊？”

皮安己只带了五分钱，说不定他家里还拿不出这三角钱。

皮安己回家了。

打鸡血的热潮在全国热闹了有二、三年。最热闹的时候，镇上单位里的单身职工宿舍（那时双职工很少），几乎每人床下都有个养公鸡的鸡笼。不过，由于卫生条件不行，消毒不干净，鸡血本身的成分也不纯，打鸡血这事也没有科学依据，大量的医疗事故不断出现，以至于有关部门不得不出面叫停。这个完整的过程，我们就不说了，就以皮安己的这次遭遇讲讲就行了。

皮安己很郁闷。花了钱买的公鸡，杀了吃，舍不得；养着吧，白喂食，也不下蛋。按海源话的说法，又是“这弄的是盘什么景？”

也不扎针灸，也不打鸡血，吃草药又不见效，那怎么办？总得治病啊。天无绝人之路，一种既不花钱又有神效的办法，又一次在神州大地上从天而降。那就是紧接着打鸡血热潮之后又一次风靡全国的喝红茶菌热潮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蓬勃兴起。和打鸡血相同的是，其源头至今不详。

红茶菌，不是单一菌种，是一类水生微生物，肉眼看不见，繁殖于水中。只要倒入点菌种（从别人的缸里舀来点），兑入茶叶水，有条件的放点糖，放在瓶里、缸里、大茶杯里、各种容器里，均可。常温下，它就可以自行繁殖，不用再操心。大约过半个月，就可饮用。

说是红茶菌，其实，那水的颜色并不是红色，而是淡淡的，淡淡的，说白了，就像那淡淡的尿液。呸，呸，不文明！换种说法，是淡淡的棕色，带点浅黄。味道么，笔者也尝过，也是淡淡的，有点酸，有点涩，还有点甜。其实，它并没有什么严格的国家标准，各人培养出来的也大不相同。所以，那颜色，那味道，在各人的茶缸里也就大不相同。而且用量不限，就是说平常当茶喝，随意。

皮安己从于村长那儿要来了点，宝贝似的倒在曾经的酒瓶里。大约半个月，果然，颜色有那淡淡的黄色出来。呷上一口，是那么个味。其实，皮安己自己也不知道该是什么味，便安心地喝起来。一瓶不够，自己又连装了三瓶，轮着喝。每天两杯，比起打鸡血可是要自在多了。只是对那只公鸡，不知该怎么办。

一个月、二个月、三个月过去了，红茶菌是喝了不少，只是照样没见效。四个月，五个月，六个月过去了，红茶菌真的是喝了不少，还是照样没见效。渐渐得开始喝得少了。

就全国范围讲，红茶菌的热潮平息得比较慢，延续了好几年。可能是，如同它的疗效不明显，它的副作用也不明显。直到喝了好几年，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效果，人们才慢慢地放下了它，慢慢地遗忘了它。也有人坚持了十几、二十年的，既没有看到什么好处，也没有看到什么不好处。问题在于，它容易霉变。完全霉变了，你能看得出来，而不完全的霉变，你看不出来，稀里糊涂也就都喝了。

皮安己对这红茶菌差不多坚持了两年多，才喝得少了。完全不喝那东西，已是文革之后、改革开放了，因为条件好了，兴趣多了，再不需要这无趣的东西了。只是还是不知道对那只公鸡该怎么办。那

时，那只公鸡，远不止六、七斤，得有十多斤了，可是成了西北村数一数二的大公鸡。

第三十九章 只生一个好

1960年2月8日

39.1少养孩子多养猪

看这题目，什么意思啊？明白的人就会知道，这是当时搞计划生育的一句口号。

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长期以来生产水平的增长极其有限，尤其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微乎其微，在有些年份反而下降。六十年代，我国粮食人均产量六百来斤，甚至还低于两千多年前西汉初年的水平。有限的生产资源，越来越难以承受人口增长的压力。这个压力在文革开展以来的这些年里愈加明显。没有那么多新的工厂，没有那么多新的土地，那新增加的人口怎么办？还去上山下乡？几千万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已经闹得满城风雨、鸡犬不宁，还要往下插？再说这乡下也就是这些地，它的人口也在不断增长，有的地方已经是硬插下去的，还能再插多少下去呢？

于是，左倾势力不顾五十年代中期发表过的“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多好办事”、“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的高调言论，忘了马寅初早就好意提醒过“要控制人口”建议、反而一巴掌把他打成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闹剧，又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急于用高压态势，以行政命令方式，强制推行违背常理、违背人性的所谓“计划生育”政策，以解决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经济、政治压力。

上有好之，下必甚焉。在专制体制下，什么事都这样。计划生育这个关系到千家万户几代人生命与健康的大事，又成了某些人表现自己、邀功请赏而不惜戕戮健康、残害生命的血淋淋的“儿戏”。

这个任务，或说是命令，也下到了龙头公社。

照例是要成立专项指挥部。对这个活，头儿们都挠头。指挥部总指挥，由一把手兼任，那是推不掉的。还得有个具体操作的常务副总指挥，这个叫谁来当呢？大家都躲开了。宗发奋知道了这事，主动请缨，愿意担当此任，并向公社党委、革委会立下了对自己的“军令状”，保证完成县委、县革委会下达的各项计划生育指标，并且还能把全公社的生育率再下降千分之一，乃至百分之一。他还表示，如果不达目标，自己辞去所有本兼各项职务。

宗发奋为什么要把和婆娘们打交道，大家都认为是最难缠、最难办、避之不及的事揽在身上呢？他分析了大的局势、更分析了龙头公社的局势，甚至公社里每个人的长处、弱点和行事方式，分析了每个人上升与下降的可能性和去向。而自己数次失败，站错了队，走错了路。他要想重新出人头地，要是只按常规出牌，可以说几无可能。因此必须出险招，放手一搏，才会有一丝希望。这次计划生育，对于他是个难得的机会，是他在逆境中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要问，他对计划生育、医疗卫生、乃至妇产科这

些一点知识也不懂啊。这，你就又天真了。倒是宗发奋看得很透，这不是一项专业技术工作，这又是一次政治运动，又是一场政治斗争，只不过是斗争的具体载体不一样而已。你看，宗发奋是公社政治部副主任兼计划生育指挥部副总指挥，就知道宗发奋的理解是有道理的。

西北村也要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自然由村支书杜家骏担任，副组长就是衣春玲了。她又是赤脚医生，又是女同志，也是理所当然。

西北村，对于宗发奋，是多次工作的重点，再熟悉不过了，连具体的哪家哪户都知道。所以，这次他又把西北村作为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要做出个样子，作为全社的典型加以推广。搞好了，说不准能在全县推广，那就给自己扬名了。

按常规，第一步就是动员大会。西北村照例也开了这样的会。这个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妇女多，几乎把所有的已婚妇女，除了七、八十的老太太，都喊了过来。

宗发奋来了，见这么多的娘们，整个会场叽叽喳喳，说个没完。他，一是皱着眉头，心烦；一是在想怎么拿出非常手段镇住她们。他坐在会场前的桌子旁，宣布开会之后，又足足停了几分钟，看着满场的妇女还说个不停，突然站了起来，用手掌猛拍桌子，把那桌子都蹦了起来，没等妇女们反应过来，就大声吼道：“今天的这个会，是个要命的会！”

果然，大家吓了一跳，不解其意，被镇住了。满会场鸦雀无声，眼睛都滴溜溜地看着他。

“今天这个会，就是要你们娃儿的命！”全场肃静。

停三秒钟，吸口气，宗发奋像有乐谱安排好似的，再大声说道，“我们国家机关以前对你们是要粮，交公粮，交农业税。现在又多了一条，还要你们的命，要你们还没有生出来的娃儿的命。以后，你们要生几个孩子，就不是你们俩口子私下里嘁嘁嚓嚓商量的事了。而是政府的事了，而是国家的事了。国家让你生，你才能生。国家不让你生，你就不能生，给我缩回去！”

紧张了好一阵的会场，这才有了点笑声。

“不要笑。”宗发奋依然板着脸。他很知道该怎么掌握火候，现在还不到撤火的时候。“你们不要觉得国家不讲理，管你们俩口子的事。国家也是为你们好啊。”在那些具有浓厚专制观念的人的嘴里，张口闭口就是国家，言外之意，他也就是国家。谁要是跟他有不同意见，那就是对国家有意见，就是反对国家，至少是不爱国。

“我们要控制人口，减少人口出生。这样一来，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去生产，去种粮食。打的粮食多了，反过来，吃饭的人又少了，生活不就改善了吗？你家里，两张嘴吃饭，跟五张嘴吃饭，是不是大不一样啊？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么，要想富我们就要少养孩子多养猪。与其养那么些孩子，还不如多养几头猪。这话，说起来不大好听，可就是这么个理。”

宗发奋到底是搞惯了政治宣传的，绕了一大圈又转了回来，既叫你吓一跳，不敢有所反对，又叫你觉得还是有些道理啊。不过，这道理，真不知道是种什么道理。

所谓计划生育，就是要控制和减少生育，主要措施有避孕和绝育。对于已经有了孩子的妇女，就不让再生了。本来是可以采用以避孕为主的方式，比如带环、服药这些。但当时的当政者觉得这些办法太不可靠，不能毕其功与一役，上报个数字也不显眼。一旦怀上了再去做工作，那就麻烦了。不如一刀了之，把输卵管切断，再截去一段，两头扎死，就永绝后患。而且搞起来，声势又大，效果又显著，便于掀起一个个的高潮。当时的计划生育工作，实际上就是大力推行结扎手术。要在人身上割一刀，叫他（她）家永不生育，这工作可不好做。不好做，也得做。你看宗发奋是怎么做的，就知道当时的政府工作人员得具备怎样的一手。

39.2 干部带头

第一个拿来开刀的，是衣春玲。自己就是计划生育副组长，又是赤脚医生——村里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士，要带这个头，那是跑不掉的。尽管衣春玲和彭小宾满心的不愿意，但知道他们家躲不过这一刀，只能硬着头皮带这个头了。

好在公社卫生院为此也作了相当的准备，特地在东门外新建了二排房作为新址，几乎停下了所有的其它业务，全力以赴搞结扎手术。不但本院的所有医生都进行了培训。没有那么多医生，只要是穿白大褂、条件差不离的，也都要培训，准备人手不够时一起上。县医院也派出技术骨干下来巡回指导。

衣春玲是公社卫生院的熟人，特地找了县医院来人的时候，给她做了结扎。她是全公社做这手术最早的几个人之一，对她自然也就十分地尽心，效果说起来还是不错。当她被彭小宾用自行车推回家的时候，大婶大妈们围过来问这问那，“不疼吧？”“没事吧？”她只能微微地笑笑，还能说什么呢。

搞了第一个，旗开得胜，下一个搞谁呢？宗发奋想着，对，就从干部家属下手。他们自己是干部，说不出“熊”话。对别人也能起个示范作用，可以大大减少今后的阻力。衣春玲就是一个好例子。

对，下一个，就是杜家骏的媳妇唐玉贞。前已说明，海源话里，妻子通常称为媳妇。儿媳妇，就得在前面加个“儿”字。宗发奋找到杜家骏的家，当着杜家骏俩口，直截了当说了这事。因为这二年两派的关系，宗发奋对西北村的主要干部已谈不上密切，只能公事公办、说官话了。

唐玉贞大惊，忙说：“我都四十多了，还要扎啊？”

“四十多了怎么啦？国家没说，四十多就可以不扎。”

“四十多，我都……我都不来那个了，生什么孩子啊？”唐玉贞急得把不跟别人说的话也都说了。

“我懂，今天不来那个，不等于明天也不来。四十多就不生孩子啦？还有六十多照样生的呢。”宗发奋只管完成任务，好往上报全公社有多少人结了扎，才不管具体到哪个人该不该扎。

“宗主任，这事也得看各人的具体情况吧？”杜家骏早就不想跟宗发奋多说话，这时也只能插上嘴了。

宗发奋依然毫不退让：“我告诉你，杜家骏，咱全公社大队书记里，基本上都扎了。你就不要当钉子户了。我这是代表公社党委的意思，特地上门来向你提出这个要求。你自己掂量掂量这个份量吧。”

杜家骏叹了口气，无语。

宗发奋也没再说话，转身走了。

杜家骏到底是让了步，在宗发奋走后，跟唐玉贞再三商量。说，看来这次国家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衣春玲也去做了，看上去问题也不大，自己保证以后会对她更好。唐玉贞虽然哭过几次，闹过几次，但看在杜家骏多年来对她确实不错，是个顾家的好男人，为了丈夫的前程，为了这个家，唐玉贞抹抹眼泪去做了。

再下一个，鲁来福。打开了缺口，就要扩大战果，宗发奋对这一套，已是轻车熟路。但他知道鲁来福的媳妇哈妹生性刚烈，不是唐玉贞，所以他就不是去登门拜访，而是把鲁来福喊到公社来跟他说。

鲁队长一回到家，哈妹就问，那个宗发奋找咱，是个什么事？

鲁队长照实一说，果然哈妹跳起来破口大骂。她想到会是这些事，这些天计划生育成了全社全队的大事，大家都在议论，但也仍然没想到还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她在1958年大跃进时，也是这个宗发奋逼她干活，结果得了严重的子宫下垂，不但遭了十几年的罪，还没法生育，领养了孩子，全村全社都知道这事。这宗发奋居然还有脸来叫她结扎。

“这个杀千刀的，怎么连一点人味都没有了！”哈妹吼着，眼里喷着怒火，顺手拿起个板凳就要往外走，“他那天不是说要命么，我就去跟他拼了这条命。”

“使不得，使不得。”鲁来福急忙拦住，再三劝说，“就算他没有理，咱也不值得这么做。咱们不理他就是了。”哈妹这才停下脚，嘴里还愤愤不平。

哈妹是劝住了，但鲁来福知道，看上头来的这种架势，怕是躲不了这一关。几天之后，他瞒着哈妹去做了男性输精管结扎。尽管有关部门也主张由男性来做结扎，手术更简便，创伤面又小。但男性在农村是家庭的主劳力，是全家人的顶梁柱。一旦手术效果不好，影响了身体健康，丧失了劳动能力，那全家就塌了，所以在农村，几乎都是由女性来做。

后来，哈妹知道了这事，这位刚烈的女子流下了泪。她知道，她丈夫也是为了她，为了这个家。她流着泪，对鲁来福说：“还是应该我去的呀，我已经是病人了，做不好，再多一个病就是了。你要是做坏了，这个家怎么办呀？”

鲁来福没有说更多的话，拍拍哈妹的肩膀，说：“没事的，不会有事的。就算身体真受了影响，队里还是会给记十分的。”

39.3 结扎行动队

全村全社那么些的妇女，难道还要宗发奋一个一个地去想办法去对付么？当然不会，把计划生育当成是一项政治运动，那办法就多的是。这不，根据外地经验，宗发奋也在龙头公社组成了“计划生育行动

队”。1958年大跃进不是有“专政队”吗？就是那个意思，用强制措施、甚至用专政手段来搞，效果灵得很呢。

行动队的队长是谁？秦德才。怎么又是他呢？秦德才对宗发奋来说，有夺妻之恨、不共戴天之仇，怎么会用他呢？可不用秦德才，宗发奋又能用谁呢？这种缺德、丧天良的事，只有秦德才之流才会去做。秦德才的长处，就是只要有骨头，不管叫他往哪儿咬，他都会去咬。这是他的生存之道。在一个需要有这种狗存在的世道里，就会有这样的狗存在。宗发奋也在安慰自己，宰相肚里能撑船。毛主席为了搞文化大革命，明知林彪不是东西，不是照样也起用吗，还让他当了一阵接班人呢。我为什么不能用秦德才呢？先用了，达到了这个目的再说。

秦德才呢，也是前一段站错了队，这一阵闲来无事、难受极了，一听宗发奋还要用他，立刻像打了鸡血似地亢奋起来。

“只要您一句话，不管上刀山下火海，您指哪我就打哪。”秦德才对宗发奋不住地点头说。

“上刀山下火海，倒用不着。只要抓几个妇女来，摁到床上，就行了。”宗发奋答。

“还有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家？快，快，我都等不及了。”秦德才满脸嘻笑，搓着手，口水都流下来了。

“具体对象，你们行动队商量。总的原则是先易后难。”

秦德才的这个行动队里，还有谁呢？当年的专政队，储小二死了，孙二赖毙了。想起他们，秦德才有时也会悲戚。但现在顾不上想那些了，行动要紧。至于人么？或者换句话说，找条狗么，全公社的范围内总还是能找到几只的。况且，在狗道盛行的世道里，原本不是狗的，也会变成了狗。

别看秦德才像断了脊梁的赖皮狗，但咬起人来，也是有不少的计谋。他第一个就盯上了残疾军人靳喜悦。他在想，一个残疾，最好对付。就算当面扒了他媳妇的裤子，他也没有咒念。上次，“八一八”进村时，还不让我摸。呸！这次连蛋也要骗掉。

秦德才一伙的“行动队”阵势还不小。公社专门配了辆小型拖拉机。那时，拖拉机还不多见。车斗两边挂着“计划生育光荣，早生多生可耻”的标语，车头上还插着面红旗。

这天上午，趁大家都已上山干活、村里人少之机，行动队的几个人乘着拖拉机，“突突，突突”开进了靳喜悦家的胡同边。为了配合行动，跟以往的一些左倾做法一样，大街小巷贴满了宣传标语。那是有关部门宣传工作的一大特色。那些话，写出来都是一套一套的，可一看那个话，都能吓死人：“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宁可断子绝孙，也要让党放心”、“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能引的引出来，能流的流出来，坚决不能生下来”……

秦德才带着他们，跳下拖拉机，直奔靳喜悦家，踢开房门，对在屋里的靳喜悦大声宣布：“靳喜悦，根据公社安排，今天轮到你家媳妇去卫生院结扎，现在就送她走！”便指着喜悦媳妇，大叫一声：“走！”

喜悦媳妇吓得还不知怎么回事，就被几个大汉架着往外拖。

靳喜悦忙挣扎下炕，说：“这几天，她正有病呢。”

秦德才说：“有什么病？正好到卫生院去治。”

那边，喜悦媳妇想抓住门框不走，嘴里连叫：“放开我，放开我！”

秦德才对那几人说：“快拖走！”

靳喜悦下了炕沿却不能走，情急之下，拿起炕边的一个破碗，朝秦德才砸了过去。

秦德才被砸到脑门，“哇”的一声，跳了起来，“好啊，你小子敢对抗政府，反对党委。抓起来，快抓起来！”

拖喜悦媳妇的几个人中，又跑过来两个人，把靳喜悦死死摁倒在地上。

这时候，门外，任凭喜悦媳妇再怎么喊“放开我”也没用了。她已经被三个大汉死死地压在车斗里。拖拉机“突突，突突”地开走了。

屋里，靳喜悦被捆了起来。

秦德才摸着脑门上渗出的几滴血，喊着：“押到公社办学习班！”

这个“学习班”，是文革时期为解决有“各种问题”的人，让他们端正思想态度的一种办法。这个办法，可是有来头的。196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于是，各地就开始大办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实际上，就是把人变相关押起来，里面的具体操作那只有天知道了。总之，直到整得你受不了了，自己认错，表示悔过，有的还要你赔偿损失，揍你的人的饭费还得你来付，最后签字画押，才放你出来。

喜悦媳妇，则是拉到卫生院，又被压在手术台上。所谓“手术台”，也就是个木板床。医生扒开半截裤，露出一点白屁股，就打上麻药。那几个大汉，还站在床边愣愣地看着。

医生一瞪眼：“看什么？还不快走！”

那几个才怏怏地走了。临到门口，回头，也是一瞪眼，“我们忙活了半天，让这小子看光屁股。呸！”

先易后难，这靳喜悦算易的，那难的呢？邬中和。邬中和的媳妇大肚子好几个月了，属于第二胎，那是坚决不可以的。宗发奋正想出了一个新花样叫“无孩月活动”。就是在这一个月里，全公社不生一个孩子。不管你是什么情况。不管你大人的死活，就是不让生。这正作为计划生育的一项创新措施，在全县广播呢。宗发奋知道邬中和是块硬骨头，非他亲自出马不可。

这天，宗发奋带着行动队的一千人马，来到邬中和家。

“你家媳妇呢？”宗发奋问。

“在里屋炕上休息呢。”邬中和警觉地回答着。

“根据最新公布的计划生育政策，你已经有了一个孩，你媳妇肚子里的孩就要打掉。”宗发奋冷冷地说着。

“她都已经六个多月啦，不能再打啦。”邬中和很诚恳地说。

“六个月？六个月怎么啦？现在技术提高了，没有问题啦。”其实宗发奋并不知道对大月份孕妇打胎有多危险，或者是，知道了也当作不知道。

“这可不行啊。”

“这有什么不行？”宗发奋对行动队的那些人一挥手，“把邬中和的媳妇请到卫生院，不，大队部去。”

这结扎不是在公社卫生院吗，怎么去大队部呢？原来，结扎的人太多了，卫生院都放不下了，就把全社划成几个片。每个片找个条件相对来说好一点的院子，附近大队的妇女就近上那儿结扎。那卫生条件就可想而知，哪赶上白求恩那时候呢。龙头镇上就在西北村的大队部里设了个点，往那儿拖倒是近了。

那几个人立马向里屋踊去，邬中和连忙挡在里屋门口，“不能这样做。”

“邬中和，你要放明白点。”宗发奋厉声喝道：“你是共产党员。党号召计划生育，提倡只生一个好，你跳出来反对，是什么意思？你要是坚持跟党对抗的立场，决没有好结果。你已经有过一次教训，那一次，党原谅了你，没有把你怎么样。你这次要是再跟党唱反调，就决不会有好果子吃。”

宗发奋这儿讲的是文革前他向部队诬告邬中和包庇右派李辰、致使邬中和被迫退役的事。提起这事，邬中和当然愤恨在心。虽然前两年两派斗争，他已经给宗发奋造成过不少困难。可这时，宗发奋以党的名义，翻出这些话，又觉得难以抗拒，一时竟沉默了。

宗发奋抓紧时机，对秦德才喊着：“快把人请走！”

秦德才拖着邬中和媳妇就往外走。

邬中和媳妇眼含泪水，看着无语的丈夫，知道这事已很难违拗，只是秦德才那家伙下手太重，拖得太狠，一阵疼痛，“唉哟，不好，轻一点。”

“哼，轻一点？掉下来才好呢，就省得做手术了。”宗发奋阴险地说着。

要说宗发奋、秦德才这些人有什么大的本事，以至于这些干部、这些群众不敢反抗、任其摆布。并不是宗发奋、秦德才之类有什么本事，而是他们掌握着权力，掌握着极左时期给他们的过大的权力，以及他们在这基础上又膨胀发酵起来的更大的权力。在那个体制下，掌权者拥有过大的权力，把大量的本应该是人民群众自己的权利都毫无依据地集中到了自己的手里，比如生育权，比如居住权，比如思想和言论的权。当政者的权力，则庞大到了毫无边界、毫无约束、毫无道理。而普通老百姓，除非被逼到实在无路可走的地步，那都只能逆来顺受，毫无反抗能力，只能被美其名曰说成是“还是群众觉悟高，能配合各级组织的工作。”

但也真有不怕死的。谁？于震祥。

当秦德才一千人闯进于震祥的院门，于震祥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为这计划生育，为这结扎，整个西北村都弄得鸡飞狗叫、人仰马翻了，谁还不知道？更何况家里炕头上的小喇叭，天天在指名道姓地骂。计划生育工作，除了对一些特殊人物，或有些基层干部素质较高能做些思想工作之外，大量地是采取歪门邪道的办法。比如前面讲的喊去办学习班，不同意就不让出来；或干部坐在你家里，白天黑夜地不走，不同意就不走；或干脆上门抓人，拖到卫生院，摁倒就骗；或高额罚款，没有钱就搬东西，甚至还有拆房子的。西北村还有一种当时农村常用的办法，那就是在小广播喇叭里骂。这个每家炕头都有的小喇叭，可是发挥作用了。白天黑夜地骂，指名道姓地骂，怎么难听怎么骂，全村全社都听到。直到骂得你走哪儿，别人都笑话你，直到骂得你自己抬不起头来，直到骂得你受不了，同意结扎为止。

对于震祥就是用的这个办法。秦德才也很乐意以“计划生育行动队”的名义，在大队的广播站里从早到晚地骂人。尤其是对于震祥，平常骂不着，这回真是有了借口，骂得前所未有的痛快。

“于震祥，姓于的，你老婆还不来骗啊？你老婆不来骗，就骗你的蛋。快来骗蛋！还要等我来扒你的裤啊？”骗，海源话里就是阉割的意思，明摆着是在侮辱人。

“姓于的，快来骗蛋！”那小喇叭一遍遍地不停地叫着。

秦德才跟于村长、跟于震祥在社教中、在文革中早就结下了不可解的深仇大恨，尤其是社教后期于家祖孙三代上他家抢回分配来的“四清”胜利果实，还挨了揍，那是他一生中吃的最大的一次亏，肚子里一直憋着气呢。这回可是找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把你老婆拖出来骗，呵呵！

全村所有人的家里，全村所有大大小小的胡同里，从早到晚都在响着骂你的声音。你说，你会有多恼火。要么，就赶紧退让，去结扎；要么，就仇恨满胸膛。于震祥就是后一种人。

“也不敲门，就闯进来，想干吗？一点规矩也没有啊？”见他们来，于震祥一反常态、大声嚷着。他以前从没因为是书记的儿子而在村里发过横，相反就因为一直有他爹挡在前面，反而成了个不爱多说话也不愿多事的人。但也就是这样的人，被挤到退无可退时，会爆发出常人想象不到的能量。

秦德才以为有上级号召在手，倒没把于震祥放在眼里，就是那个于村长也得乖乖的。没料到于震祥会来这一手，便瞪着眼跳起来，指着于震祥大骂起来：“你这个保皇派，敢在这儿阻挡革命！”

秦德才这时不讲计划生育，又翻出派性的事，就既没有道理又没有水平了。

那知于震祥像变了一个人，根本不拿秦德才当回事，指着鼻子对骂：“你这个反动组织的坏头头，还敢嚣张！”其实，于震祥讲得也不对。后来对“八一八”也平反了，不是反动组织，都实行革命大联合了。但在普通群众里，往往一有矛盾，还拿这些说事。

这一下就触到了秦德才的短处，秦德才一拳就挥了过来。但讲打架，秦德才哪是对手，被于震祥反掌一推，就往后仰歪倒在了地上。行动队的那帮人，见队长被打倒在地，便一嗷嗷地围上来。于震祥虽

说年近半百，平常说话、做事都很迟缓，不过这时却身手敏捷，向后一跳，顺手抄起门旁的一把大铁锹，又向前横的一扫。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吓得行动队的那帮人，“哇哇”地直往后退。秦德才坐在地上，脸都发白了，往后爬又来不及，更不敢站起来，在那儿目瞪口呆，张着嘴“啊啊”直叫。

于震祥干脆高举铁锹，朝着秦德才就拍下去。吓得秦德才闭眼抱头，大叫一声：“哇！”竟像泥塑似的动也不动了。其他那几个人不是上来勇夺铁锹，而是夺门而逃、狂奔而去，一路连呼：“出人命啦，出人命啦！”

其实，于震祥也就是拍在秦德才的面前。“咣”的一声铁锹跳将起来，秦德才竟然晕了过去。

等到村里杜家骏、鲁队长他们闻声赶来，只见于震祥手扶铁锹，一边还在大骂“狗东西”。秦德才呢，已经醒了，只是躺在那儿不敢动，像条死狗一样。

“教训一下就行了，教训一下就行了。”杜家骏忙过来接过大铁锹。

鲁队长对着躺在地下的秦德才极鄙视地喝道：“快滚吧！”

秦德才好不容易挣扎起来，腿都不好使了，晃晃悠悠，走到门口又绊了一交，跌到在了胡同里，引得过来看的人一声声地“呸，呸！”

俗话说，硬的怕不讲理的，不讲理的怕不要命的。秦德才真碰上不要命的，马上就显了原形，比狗还不如。不过，秦德才还是记吃不记打的。当时是吓了一跳，但不久之后，他又可以厚着脸皮出来。

39.4讨论计划生育

对于计划生育，本书想说几点。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基数过于庞大、生产水平又相对低下的国家来说，适当降低出生率，减少出生人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必要的。这一点，很多有识之士，比如前面提到的马寅初先生，都曾很认真、很负责任地提出过。尽管马先生在五十年代提出这个建议时还被认为是与“人多好办事”、“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说法相违背而当作马尔萨斯资产阶级人口论加以严厉批判。但是这个降低出生率的目标必须是通过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在人们的观念不断改变、自愿接受的基础上稳妥地渐进地推行。绝对不能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像对待商品、物件那样简单地机械地去规划、去安排，不能以行政命令、甚至以专政、以暴力手段不顾一切地强制推行，更不能完全不顾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以突击方式进行。

（一）实现低生育水平，是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比如：

1.医疗保障、特别是养老保障的完善。人们的生活没有后顾之忧，不需要靠养儿来防老，社会和政府就负担起来了。

2.人的素质的提高，收入水平的提高。相应地，人的意识的现代化，愿意接受现代理念。意识到人的素质的提高，才是第一位的，而不是人的数量。整个社会是这样，在一个家庭里也是这样。

3.社会财富、经济总量的增加，不是靠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不是靠多几个人去刨地挖土，而是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尤其是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人的供养、新增劳动力的吸收，不是靠原始的生产方式，不是靠有限的土地，不是靠简单而机械的劳作，而是靠产业的提升、尤其是靠发展第三产业来实现。靠土地、靠人的体力，那都极其有限，而现代产业的发展才有着无限的空间。

4.消费水平及生活成本的提高，尤其是儿童养育成本的提高。这里不是讲要涨价，而是说随着生活水平的上升而带来的生活成本的提高。在生产水平、生活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养个孩子比养个牲口还便宜，他当然会去多生孩子。这个现象，在一些贫困地区并不罕见。

（二）然而，这些条件的实现，是需要经过全社会长期的努力，而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仅凭着一时脑袋瓜发热就可以实现的。一些大权在握的人，等不了这些，不愿意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去做大量的长期的艰苦的工作，去实现社会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而把计划生育简单归结为“只生一个”，又把“只生一个”简单归结为动刀子、做结扎，轻易地断了人家子孙后代的后路。曾有个口号，叫：“一个戴环，二个结扎，超孕又流又扎，超生又扎又罚”。实际上在很多地方，简化到了“又绑又扎”，把人拖过去，摁倒就扎。试图用主观唯心主义的狂热，在最需要讲科学、最需要对人的生命和健康保持敬畏和高度负责的领域，照搬暴力革命、群众运动的模式，以强制乃至暴力的手段推行所谓的“计划生育”。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就可想而知。

1.大批妇女的身心受到严重创伤。人权被践踏，人格被蔑视，健康被摧残。医疗条件的有限，操作人员专业水平的低下，结扎人数的剧增，出现了很多甚至难以计量的医疗事故。割破结肠、割破膀胱，是司空见惯的事。许多妇女留下了难以言说的后遗症，附件炎这些还是小事情，家庭生活也由此而留下了许多难以言说的阴影。更有因为手术大出血，而祸害了生命。

2.激化了干群矛盾。许多基层干部，不管他本人愿意还是不愿意，被迫站到了强制推行计划生育的第一线，又一次造成了干群关系的严重对立。有的群众把公社干部比喻成像宗发奋所说的“一手要钱，一手要命”。

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成了有些部门极其卑鄙的敛财手段。时至今日（2013年10月），报载，有些省份的计划生育部门仍拒绝公布他们所收缴的巨额“社会扶养费”的去向，也没人再去追问。

3.由于社会发展水平的低下，各种灾难时有发生，而独生子女家庭抵御灾害的能力特别脆弱。一旦不幸发生，独生子女罹难，其后果是十分残酷的。影响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家庭，是几代人，甚至是这个家庭、乃至这个家族永无后续。

1994年12月8日克拉玛依的大火，至今伤痛难平。那天，克拉玛依市教育局为欢迎上级“义务教育与扫盲评估验收团”的官员，组织中、小学生在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剧场举办“专场文艺演出”。因舞台上的幕布被邻近灯光烘烤过热而燃烧，酿成大火。有关人员不是积极组织应对疏散，而是喊：“同学们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结果造成夺去325条生命的惨剧，其中288人是少年儿童，这之中又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独生子女。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18年，但灾难却依然在延续。这些罹难的独生子女的家长（有个新

的词，叫“丧独者”或“失独者”），多数已无法再生育，有的过于悲伤已经离世，有的导致家庭破裂，有的至今以泪洗脸、难以忘却。

据2012年8月27日京华时报的文章说，中国失独家庭将达千万，而按照医学上49岁生育极限年龄来看，这些失去孩子的母亲很少能再生育第二个孩子。面对这些失独家庭的多重困境，如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现实问题，不知有关部门和社会，对他们作了怎样的帮助和准备承担怎样的责任？2001年12月份出台的《中国计划生育条例》第27条规定：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害、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但对于这个“必要的帮助”究竟是什么样的标准且如何实施并没有明确说明，有的地方一个月能补个几十元算是好的，在很多地方还只是空话一句。

4.独生子女在他青少年时期，由于家庭结构、社会角色的特殊性，被称之为“小皇帝”。这种环境不利于他的进步、成长。而在他成年之后又要承担起沉重的赡养负担，即所谓“二四八”现象，就是说一个独生子女家庭的俩口子，要负担四个父母亲、八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能承担得起来么？如果都想推给社会，社会也承担不起来。当初推行这种政策的人，想过这些问题没有？如果没想过，那是不负责任。如果想到过而不管，那是……反正他们自己是有公家的服务员。

5.整个社会老龄化过快。由于新增劳动力人口下降过快，他们所要赡养的人数迅速增加，而生产水平的提高则相对缓慢，很快就会到达他们（包括整个社会）难以承受的程度。在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老龄化过程，在中国几十年就出现了，而我们的生产水平、经济水平又远远落后于他们，被称为“未富先老”。这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非常现实而又难以解决的困境。眼下有些部门想要多收养老保险金、减少退休金支出而主张延长退休年龄，而这一措施将影响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在社会上又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其实也是这一矛盾的体现。人口问题，它的出现、累积和解决，都有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跨度，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岁月。前面决策者种下的苦果，将要由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吞下。

再加上，有些部门、有些官员的讲话前后不一、相互矛盾。网上有人戏称：“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1985年）；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1995年）；养老不能靠政府（2005年）；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2012年）……推测：到2025年：再老也得养政府……”。这对政府的形象不利，对公信力的树立很不利。有关部门一定要认真对待、处理好这个关系到全社会全民族的大事。

（三）造成这种状况最根本的原因，还不在于主观唯心、冒进狂热，更不是所谓“好心办坏事”，而是极左时期的专制体制。

这个体制由于过于专权，集中了过多的权力，把许多原本属于个人的基本权利，也都集中到了决策者手中。生育权，本来就是公民自己的权利，没有人把这个权力交给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把它强行拿过去，是没有道理的，也是没有依据的。只有在专制体制下，决策者才有可能想到并有可能推行这种不合理、不人道、也带来很多不可预测严重后果的做法。而这种严重后果，将要延续几代人的时间。

孩子多不一定有希望，但孩子少希望就少，没有孩子就没有希望。

由于这些年老龄化速度的加快，社会负担急速加重，“只生一个”的负面效应日趋明显，有关部门开始放宽相应的计划生育政策。一年前（笔者现在写这段文字是在2015年），有的地方放开“单独二孩”的政

策，即夫妇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又只有一个孩子的，可以生二胎。结果，出乎意料的是，增加新生儿的效果并不明显。可能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压抑，生活成本的上升，使当下的生育意识已经淡漠。

于是，有些部门，有些人又急于完全放弃计划生育政策，甚至现在就有提出要鼓励生育。关系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多少代人前途命运的大事，就要像儿戏一样地翻来翻去。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缺少民主的弊端，从各个方面都可以表现出来，人口政策又是一例。

第四十章 文革花絮

1960年2月9日

40.1学马列

那几年在两派争斗逐渐平缓之后，对政治学习又抓紧了，不但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还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不但干部要学，农民也要学。每天晚上，在劳累了一天之后，都八、九点钟了，还要到生产队的饲养棚里学习。而且学的还都真的是马列原著，有“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等。

八队的饲养棚里，点着暗暗的油灯，烟雾在灯光下缭绕。肖胜利拿着书紧贴着火苗，呛得不住地咳嗽，还在给大家念。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怎么像个绕口令似的。”车素花说话了。

肖胜利解释了：“这里面前后有两个武器，武器跟武器不一样。前后还有两个批判，这两个批判，批判和批判的意思也不一样。”

“这谁能搞明白啊？你就说这书里面有没有种庄稼的吧？”皮安已问。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种过庄稼，里面没提到种庄稼的事。”肖胜利没说完，又咳嗽起来。

平金刚站起来，不满地说：“抽烟的别抽了，你看把人家胜利咳得，还怎么学？”

大家悄然了一阵。

“不讲种庄稼，那咱还学什么？”皮安已又接着茬说。

“咱学了，是为了更好地搞清革命大方向。”肖胜利答道。

“都革命几十年了，还没搞清大方向啊？还得现学啊？”皮安已说。

车素花资格老一点，比较明白一点，帮着解释，说：“这好比边开车边问路，要去社会主义，往哪儿走啊？”

平金刚说：“大概是这样。刘少奇领的路不对，林彪领的路不对，看看人家老马一开始是怎么说的。”

杜家骏忍了半天了，说：“别问了，学吧。”

皮安已说：“还学啥呀，都几点了？明天不干活啦？睡吧。”

大家也没等队长发话，轰地一声就抬屁股走了。

40.2最新指示

马列著作要学，对毛主席语录的学习就更重视了。每当有最新指示的发表，都是非常隆重地对待。

这不，深秋了，晚上七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广播了毛主席发表的最新指示：

“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

七点半，中央的广播一结束，大队马上在大喇叭里发布通知：“社员同志们请注意，社员同志们请注意！全体社员立刻到大队部来。大队组织游行，庆祝最新指示的发表！”

肖胜利、辛狗狗几个年轻人立即到了大队部，彩色的小纸旗早就准备好了，赶紧往纸上写字。

各家各户的人，都纷纷往外走，去大队部。

王大妈下了炕，摸索着找鞋，也要去。

丁妹劝着：“妈，不要去了吧。这么黑的天，还要去游行，路上可不好走。”

王大妈有点生气：“喇叭上说了，社员同志们都要去。我们好不容易才有了社员同志的资格，为什么不去？都是你，把家里搞成了这个样子。”

丁妹掩面而泣。

王山过来，也劝说：“妈，这不是去开会，站在那儿不动。这还得上地里游行呢。天上一点月亮光也没有，你怎么走啊。崴了脚，更不好了。在家吧。”

王大妈这才没出门。

大家陆陆续续到了大队部，大体差不多了，队伍就出发了。

最前面是举着毛主席像，后面是红旗和锣鼓，再后面就是乡亲们了，有的手里就拿着彩纸贴的小旗。

队伍先到公社门口，锣鼓打了一会儿。而后出北门，从望海山拐向西门外。衣春玲、肖胜利在队伍的前后领着呼口号。

“要过细。”

队伍一起呼喊：“要过细。”

人们穿过黑黝黝的山坎，山林里回响着“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

黑夜的山路不是很好走，只有少数几个村干部才有手电筒照着亮。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能摸着走。年轻人扶着年纪大一点的，郭大妈、衣大妈、齐阿姨这几位也顾不上呼口号了，战战兢兢地挪着。

时治国更不习惯了，尽管不是近视眼，可也是一脚高一脚低。皮平平在边上看不过去，伸手拉了他一下。时治国从没碰到过那样滑腻、叫人心跳的肌肤，还不好意思，把手缩了回去。这一缩回去不打紧，人却站不稳了，晃晃悠悠地一脚踏了空，人往一侧歪了过去。皮平平赶紧一把拉住。时治国擦了一把汗，只好由皮平平搀着他的手，往前走了。

时治国看了皮平平一眼，皮平平在看着前面。

队伍从西门外的田里继续往前，在龙头镇外绕了半圈。走过地瓜地，走过小麦地，走过白菜地，走过收了玉米秸的空茬地，从南门外回村。

龙头镇外黑糊糊的旷野里，飘荡着一阵阵的口号：

“要过细，”

“粗枝大叶不行，”

“粗枝大叶往往搞错……”

40.3赛诗会

文化大革命中能和文化扯得上的，大概有两件事。一件是“革命样板戏”。

所谓样板戏，是江青为捞取政治资本，把她插手的一批文艺作品封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代表作。这个词来源于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贯彻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文中第一次开列了“八个革命样板戏”的名单，它们是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在文革中，宣传和推广样板戏已经不是单纯的文艺表演，而是他们从事政治阴谋活动的主要部分之一。

就样板戏的创作手法而言，就是所谓的“三突出”，即：在所有人物的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其实，换成林彪的那句话：“要突出政治”，一下子就讲清楚了。就其表演而言，也就是一些紧跟四人帮的人物，满嘴的革命唱词，听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其实不过就是一出政治滑稽戏。

文革期间，没有别的戏可看，老百姓只能翻来覆去地看这几个样板戏。都能背出来了，还得看，还不许说不行。

本书前面已几次提到秦德才和王溪唱的样板戏，所以对这样样板戏就不再提及，省得大家更烦了。

还有件事，就是学习小靳庄的赛诗会。1974年，江青又树了个典型，把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的赛诗会树为一个在农村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典型，在全国广为宣传。其后又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大出风头。

杜家骏回来，在大队部讲了这事。

平金刚很纳闷，说：“这有什么意思？现在那么忙，哪有闲工夫搞这个？”

鲁队长挺想得开，“搞就搞吧，管它有没有意思。现在没意思的事多啦。”

平金刚还没想过来，说：“咱这些大老粗、庄户生，会写诗么？”

彭小宾倒是很平静，大概已经料到会有这事，说：“这事，可以叫年轻人多写些。”

杜家骏点头答道：“对，对，我去和肖胜利商量下。年轻人不像我们，他们喝过墨水。”

彭小宾说：“书记啊，”在公开场合，彭小宾对杜家骏都是以书记相称，“咱这几个，谁都能躲开。就你当书记的，可是躲不开。怎么地也得来一首，第一个就得是你带头。”

杜家骏拍拍后脑勺：“啊呀，这可怎么得了。”

鲁队长又说了句：“为了让大家有积极性，我建议，可以放假一天，让大家写诗。”

杜家骏一听，说：“行，这个办法好，大家一定会很高兴。”

彭小宾说：“谁写出诗来，写得好的，还可以再奖励歇一天。”

杜家骏笑着说：“这赛诗会就能像过年一样热闹了。”

晚上的社员大会上，杜家骏讲了这事，尤其是讲了放假写诗的事。不过，话没有那么直讲，而是说，我们全大队将利用田间劳动的一天时间，来写革命诗歌，来个物质、精神双丰收。

果然，满场的社员都高兴得不得了。要知道，在农村，除了过年那几天，是没有放假那一说的。除非下大雨，才能猫在家里歇一歇。

过了几天，当然包括放了假的那一天，西北村抽了个星繁月朗的夜晚，在大队部的院里，开了个学习小靳庄的赛诗会。

公社的宗发奋主任照例过来了。他还是想找个典型，好表明自己的工作成绩。虽然，他对西北村是又气又烦，可又离不了西北村。别看西北村常常不听他的话，不如他的愿，可是很多工作还就是西北村像点样。拿这个赛诗会来说，别的村不是不想搞，要不就搞不起来，要不就搞得不像样。

他和杜家骏坐在最前头的长条桌旁。

赛诗会由杜家骏主持，他站起来说：“今天我们学习小靳庄，开个革命的赛诗会。这可是破天荒的大喜事啊！我们祖祖辈辈、年年月月手握锄头把的庄户生，今天也握起笔写诗篇了。真是时代不同了，大变样啦。我们革命群众真的是换个活法啦，不但是国家的主人，是土地的主人，而且也是文化的主人啦。所有的舞台统统都被咱们占领啦！

下面我开个头，先来一首。念得不好，大家不要笑话。”

“咳，咳。”他连连咳了几下，清清嗓子，从兜里拿出了稿子，看着上面的字，又咳咳了几下。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过那么多的话，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费劲。

他又不好意思地看了看大家，再低头看稿子，又不由自主地“咳咳”了起来，引得大伙一片笑声。

见此光景，鲁队长急了，在一边大声说：“家骏啊，你就别拿它当诗念，就当它是作报告。”

杜家骏也不好意思了：“这，这念诗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真不一般，就是和作报告不一样。那我就豁出去啦。”只见他眼睛使劲一闭，又大大地睁开，终于念出来了：

“最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无限敬仰您，

我们无限爱戴您，

您的功绩比天高，

您的恩情比海深。”

鲁队长又插话说：“这比天高、比海深，你得比划一下，才有那意思。”

宗发奋有些不乐意了：“别打岔哎。”

杜家骏倒是真的比划起来了，又重复了那二句：“您的功绩比天高”，把手往上一扬。“您的恩情比海深”，把手往下一压，又弯着腰，再使劲往下压了压。对这大队书记从未有过的表演，大家开心地笑了。

杜家骏忙说：“还有一句呢，

千言万语说不完我们对您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无限的深情！”

最后，杜家骏还做了个两手分岔向上、仰脸往上的结束动作。这一手，谁也没想到，引得全场一阵热烈掌声。

杜家骏长长地吐了口气，心里想，这玩艺儿还真不易啊。

“下面，我来了。”新任的团支部书记肖胜利自然不能落后，马上接了上来。他毕竟是年轻人，有文化，对这些不打怵。到了前面，把手一挥，用龙头人听来很是标准的普通话，声情并茂地朗诵了起来：

“革命青年志气大，

豪情满怀战天下。

彻底横扫封资修，

永保红旗代代传。”

“好，好，念得好。能赶上广播员了。”乡亲们也是一阵叫好。那时，村里管小喇叭里的播音员叫广播员。

“下面该谁啦？”杜家骏问道。

这时，年轻人争先恐后地纷纷上来，大概是为了那难得有的多放一天假。

申光荣个头小，挤得快，上来就说：“我这首是揭露黑暗的旧社会。”不需要情绪过渡，也没有动作配合就念起来了：

“提起旧社会，心中怒火烧。

三座大山压迫咱，有苦有难无处告。

周扒皮，刘文彩，还有牟二黑子王八蛋，吸尽咱穷人血和汗。

劳动人民做牛马，地狱里面受煎熬。

来了救星共产党，脱离苦海得解放。

从此当家作主人呀，金光大道红灿灿。”

齐成才刚挤到边上，就念起来了：“我这是学大寨的啊。

学习大寨好榜样，龙头大地绣河山。

敢叫高山低下头，敢叫大河让条路。

天寒地冻算个啥，各种困难都滚蛋。

舍得脱掉三层皮，敢教海源换新颜。”

“好，好，好！”随着革命诗句的鼓动，会场气氛也很热烈，下面一片叫好。乡亲们还没见过村里的小伙也有这等从未见过的本事。

杜家骏的儿子杜长贵也上来了，嚷着：“我这是批林批孔的：

割资本主义的苗，

种社会主义的草。

克己复礼是谬论，孔老二是个大坏蛋。

文化大革命开新篇，批林批孔当闯将。”

鲁队长对杜家骏说：“嗨，你儿子还真行来，写得不错。”

杜家骏谦虚了下：“他那些，就是瞎划划，还赶不上我呢。”

迟解放刚挤过来，也说：“就是，那赶上我的。你们听我的。”没等别人点头，就自顾自地先念起来了：

“重担上肩一声吼，

震得大地抖三抖。

百斤千斤算个啥？

世界革命装心头。”

还没等杜家骏夸呢，于又发就从后面伸过脑袋来了，手里晃着稿纸，“好的在这儿呢，好的在这儿呢。”就大声念起来了：

“榆木扁担三尺三，

一对水桶两头拴。

毛泽东思想威力大，

千担万担如飞燕。”

见年轻人热闹得差不多了，衣春玲走了上来。彭小宾也是写好了的，但他见着宗发奋，心里不舒服，不想上，叫衣春玲上了。衣春玲一捋短发，说：“我这是说咱妇女解放的，没几句。

封建礼教是枷锁，

砸烂迷信那一套。

妇女能顶半边天，

革命重担肩上挑。”

全场又是一片掌声。

杜家骏高兴得连连说：“咱西北村真是有人才，有人才哪。”

秦有理也上来了。秦有理从被大学退回来后，没怎么出头露面，连每天都要参加集体劳动，有时也不来了。其实，他也是在想，总这样不行啊，怎么重出江湖呢？这次说不定是个机会。但写诗不是他的强项，写什么呢？对于他，当然是要写歌颂文化大革命的，写阶级斗争的。怎么写呢？战斗力要强，语言要简洁，念起来要铿锵有力。对，就这样写。

你听他的诗：

“刘少奇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

抽你的筋，扒你的皮，把你的脑袋当球踢！

誓死捍卫党中央！

誓死捍卫毛主席！”

辛狗狗也写了首，站起来，正要往前走。宗发奋见了，忙制止：“这不是地主子弟辛狗狗吗？你也要写诗啊？不行！今天是劳动人民占领文艺舞台，轮不到你的份。”

狗狗一声没回，愤然坐下。

杜家骏、鲁队长见了，吐了口气，也没说话。

这时，秦德才跳了起来，说道：“我也有诗，我也有。”

鲁队长一把挡住了他，说：“不行，你这个不行。”

宗发奋在桌子边说：“怎么不行？”

鲁队长说：“他这个肯定不是自己写的，肯定是抄别人的。”

坐边上的于又发几个人也吵吵着说：“肯定不是他写的，肯定不是他写的。他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哪会写诗啊？”

杜家骏说：“秦德才，那你把那张纸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秦德才一听，反而捂紧了口袋：“不会就不会，不念就不念。有什么大不了的，哼！”歪着脑袋，坐了下去。

“还有谁要上来念？”杜家骏问大家。

稍停片刻，鲁队长对坐在后面的靳喜悦说：“喜悦，你上来念一首。学习小靳庄，是你的本家。你不得上来表个态？”

“对，对，喜悦上来露一手。我知道你看过不少报纸，这个应该没问题。”杜家骏也朝着靳喜悦大声说着。

靳喜悦在后面，红着脸，连连搓手：“我哪行，我哪行。”

杜家骏对肖胜利几个一招手，说：“你们几个把喜悦请上来。”

肖胜利他们不管靳喜悦怎么摇手，连扶带抬，就把靳喜悦弄到了最前面。这可是靳喜悦第一次上主席台呢。

“我哪行，我哪行。”靳喜悦被放到长条桌后面的椅子上时，嘴里还说不行。全场可是一片掌声。

“嗨，你就随便说一句，大伙就帮你说下句。”鲁队长说。

“那好，那好。”靳喜悦看着满场热情的人们，知道是躲不过了。他东张西望地看着大家，嘴上动了动，却没出声音。

大伙掌声又起。靳喜悦又脸红了，嘴又动了起来，可还是没声音。

鲁队长见状，忙解围说：“咱就来个学习小靳庄的吧。”

靳喜悦望着鲁队长，突然来了一句：

“咱们学习小靳庄，

大家都来把诗写。”

杜家骏说：“好，好。”

大家都望着靳喜悦，等他再来下句呢。可靳喜悦又没有声音了。

鲁队长忙插上：

“你一篇来我一篇，

人人都是大作家。”

杜家骏朝鲁队长说：“也不错，也不错。谁往下接？咱今天又创造了个学习小靳庄的新形式，不但是个赛诗会，而且还是个接诗会呢。”

平金刚也来兴趣了，举手说：“我也来两句：

歌颂革命歌颂党，

批判林彪黑心肠。”

杜家骏依然带头鼓掌：“真不错，真不错。”

这种时候，王溪是决不会示弱的。她在人群中站起来大声说道：

“豪情壮志冲云霄，

革命诗歌漫天跑。”

秦有理就在下面使劲鼓掌。

皮高深也不怯场，原地就接了下句：

“一心跟着毛主席，

社会主义闪金光！”

杜家骏又带头鼓掌，连说：“好，好！”

全场又是一片掌声。

（本节部分诗歌选自《小靳庄诗歌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年；部分自创。）

这些年来，西北村过了难得轻松的这么一个晚上。如果不是天天你死我活的争斗，生活本来是可以很美好的。虽然这一夜，也还远远说不上是美好。

第四十一章 种个毛主席像

1960年2月10日

十年文革中有很多奇怪的、特别的社会现象，归纳起来都是为了表忠心，表示对毛泽东个人的三忠于、四无限（三忠于，指的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是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比如有类似于宗教仪式的“早请示、晚汇报”，比如有大兴其道的跳“忠字舞”，有些甚至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外省有个村庄，干脆男的一律改姓毛，女的一律改姓江，以示对毛泽东的忠贞不二。

秦德才也把这事弄到了西北村，叫大家也都改成姓毛、姓江，来个彻底的革命化。连祖宗都改了，还不彻底啊？可村里没人理他。他没办法，只好自己一个人改了，叫毛德才。可是也没有人这么来叫他，除非是特意讽刺挖苦他才这么喊。

他还跑到派出所要求改户口，在户籍登记上正式更名为毛德才。

派出所诸所长对他说，“你敢跟伟大领袖认祖宗啊？吃了豹子胆啦？”

“我这不是要永远追随毛主席么？”秦德才说。

“有你这么追的么？他老人家同意你跟他一个姓么？”

秦德才答不上来，没改成。

还真有这么改的，据说改革开放以后，根据有关部门指示，这类改姓又一律改了回来。

这是比较极端的。为了表衷心，话都说尽了，歌都唱尽了，连姓都改了，还有什么法呢？还就有人想出来，那就是“红海洋”。到处都涂上毛主席语录，到处都画上毛主席画像，放眼望去，满街满墙都是，让人们走到哪儿都能温习毛主席的谆谆教导，走到那儿都能敬仰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因为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画像都是以红颜色为主，这样全国各地、城市乡村、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一片红彤彤的革命景象，所以称之为“红海洋”。

这又是一个典型的形式主义，典型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至于内心里是不是“忠于”，那是谁也不知道了。林彪喊“万岁”，喊得那么起劲，不是照样叛国了么？那涂在墙上的，还能管多少用呢？大家整天看着这些，也就没把它当回事了。也有反感的，也有反对的，只是谁也不敢说。谁要是一不留神漏了嘴，那就立刻陷于灭顶之灾。

笔者在部队农场时，听过一些内部通报。其中一例说的就是，一位部队干部看见营房里的通道两侧尽插着毛主席画像的牌子，开了句玩笑说：“怎么弄得像个动物园似的。”谁知那时人们的革命觉悟都是比

天高，话音刚落立刻就被左右的人拿下捆绑起来，扭送至上级机关。

明显敢这么嘲讽的，当然不多，敷衍的、拖拉的，那是有不少。西北村的几位，就是这样。推说是红油漆没那么多，买不到，队里也没那么多的钱，只是沿大街写了几个语录、画了几个头像。

画头像也必须十分地小心，如果画得不好，弄得非驴非马，那就成了“滔天罪行”，惹来大麻烦。虽然不是自己画，找个宣传画，往墙上放大，即使是这样，那也不容易。这个活，在西北村谁也干不了，只有肖胜利。肖胜利忙不过来，心里也烦，也有对付的办法，那就是拖。一幅画画上一星期，别人也不好说什么。

也真还有人积极的。谁？迟一敬。他一个老实人，怎么会想到要在这方面积极呢？迟一敬在村里，尤其在秦德才面前老是受欺侮、老是受压。他想改变这种状况，这两年的运动也使他渐渐地看出一些门道，就是要在政治上表现突出，别人就得对你另眼相待。

他想到了什么呢？他想到了把毛主席像种到地里去。这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有来由的。和“红海洋”有异曲同工的，当时还风行绣毛主席像。一块布，先用铅笔细细地描上画像，用绷子撑上，再用绣花针穿上彩线，一针针地扎就行了。男女老少都可以绣，不难，就是费时间，不如干点别的。迟一敬，别看他是老实人，思维很愚钝，却在想既然可以画在墙上、可以绣在布上，为什么不可以种在地里呢？按照画像的轮廓，撒上种，出来的不就是一幅绿油油的毛主席像吗？那多好啊！迟一敬没听说过英国有些好事者搞的麦田怪圈，就能想到这一点，还真是不简单。

其实，迟一敬是受了另一种启发。公社生产部的经学文来队里推广种植文冠果。本来，文冠果是种不错的油料作物，尤其是在一些贫瘠地区，由于它对生长条件要求不高，是适合于种植的。但就是这样很平常的作物推广，极左势力也给它掺上了政治含义。

但老乡们不明白，在七嘴八舌地问：“文冠果？那是什么东西呀？”

“听说是一种油料啊？”

“咱这儿的花生，全国闻名。怎么还去种那些东西？”

经学文答道：“上级说了，那东西种下去就不用再管了。果子能连着结一百年、二百年。”

“那不成了神仙果了，天底下会有这种好事情么？”一个朴实的农民都不会信这种鬼话。

“你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啦？这可是江青同志亲自推广的啊。”经学文说。

“江青是推广样板戏的，怎么又来推广油料作物呢？”皮安己问。

“这里面就有学问啦。”经学文说。

“这还有什么学问？”迟一敬问。迟一敬通常是不说话的。

“你们听，这叫什么？”经学文拿起一个文冠果的植株，加重语气地说：“这叫文冠果！”

“文冠果？”大家还是不明白。

“文冠果就是‘文官果’啊。文官的果，明白啦？文官。”

“那跟文官有什么关系啊？”

“嗨。你们真是榆木疙瘩，不开窍，那些中央文革，不就是文官么？”经学文见他们几个还愣着，又说：“嗨！搞了这么多年政治，连这个还不明白，白吃饭了。林彪那一伙是武官，江青他们几个不都是文官么！”

“啊？就是为这个，叫大家都来种文什么官果啊！”皮安己也惊讶了。

“哦。”大家这才明白，为什么要推广文冠果了。迟一敬也就明白了，原来种庄稼也能联系上政治啊。他们能种文官的果，我就不能种个毛主席像？于是，他就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但他自己不会画，于是，就去找了肖胜利。肖胜利对这些本已厌烦了，不过迟一敬这个老实人从来不求人，这么找上来，不好意思推。再说这个想法也挺新奇，可以试一下，就跟迟一敬到了他的自留地。

迟一敬的自留地位置还不错，就在西门外烈士陵园南的大道北侧。迟一敬豁上，也不种蔬菜了，全都用上。还小了点，太不够。想往外扩点，去跟村里商量，杜家骏又和队里商量，大家都觉得这事也不好反对，不过就几分地的事，就让他去吧。连自己的自留地，连队里给的，一共差不多三分多地。划出地以后，肖胜利过来花了一天的工夫，画了幅当时最常见的毛主席戴军帽的侧面头像。迟一敬怕风把石灰给刮了，连夜刨地、浇水，将冬小麦沿着石灰线给种上了。

村里人听说了这事，都好奇得不得了，过来看。但因为地已经翻种过了，坑坑洼洼，看不出什么来。皮安己看不上迟一敬，又在底下悄悄地说：“搞这玩艺儿，别弄巧成拙哦。”

而后，麦苗渐渐地长出来了，贴着地面。人们居然看出来了，是的，是个头像，是毛主席的像。全村的人，甚至三里、五里的外村人，也都过来看，也都在称赞着。啊呀，西北村可是出了个能人，叫迟一敬，在庄稼地里种了个毛主席像，他对伟大领袖是多么地热爱啊。一时间，迟一敬的那块地竟成了龙头公社的一个新景观，常有人过来看。迟一敬也是难得地高兴，头一回尝到了人们对他不曾有过的赞赏。

消息也传到了公社里，几个领导也过来站在路边看，点头赞许。宗发奋本想大大表扬一番，这可是“三忠于、四无限”活动的新发展。再一想，这是迟一敬搞的，这小子那年是“八一八”的叛徒，宗发奋心里还在记恨呢，也就罢了。

整个秋冬季，麦苗不怎么长，静静地在那儿，整个画面也很好地保持着。不过随着春天的到来，小麦要长高了，麻烦就来了。首先，小麦返青需要养料。当他挑着尿瓮，走到地头刚要浇，路边就有人说了，“啊呀，使不得啊，一敬啊，怎么能把尿啊尿的往他老人家头上倒呢？老人家要生气的呀！”

迟一敬一想，是啊，这可是大不敬啊，怎么能行呢？他又把尿瓮挑了回去，边走还边向四周望着，再没别人看见吧？

那施肥的事，怎么办呢？就找晚上的时候，撒点化肥吧。那时，社员自己家里没什么化肥。能过来撒点，也就难得一、二次。虽然缺肥，但麦苗毕竟到了拔节的时候，往上长了。因为碍着那些事，这田间管理也没法正常进行。地块不大，却长得高矮疏密不一。这头像也就渐渐地模糊了，眉毛和眼睛长在一起了，嘴巴和下巴也分不清了。尤其是随着小麦不断长高，还站在路边平视，效果就不行了。除非是在边上搭个三、四十米高的观景台，从上往下看，那还差不多。这一点，是迟一敬没想到的。迟一敬没想到的，还多着呢。

那些杂草也不长眼，在种着毛主席像的地里照样长起来。这怎么好呢？按常规是用镰刀去割草，但现在能拿着刀在毛主席的脑袋上割么？连迟一敬也不敢往下联想了。他只好走进地里，在毛主席画像的脸上用手薅起了草。村里不但有人好奇，也有人等着看玩玩艺，甚至等着找茬。平金刚就是一个，这回被他盯上了。平金刚原本也没什么劣迹，不是秦德才那号人。他怎么也会盯上迟一敬这样的老实人呢？平金刚是心里不舒服、摆不平。他总觉得，他在文革中有眼力，站对了队，又为此出了不少力，结果一无所获，还差点被打成“坏头头”（其实没人要打他“坏头头”，是他自己在那儿想）。相反，杜家骏、鲁队长他们没出力、没遭罪，却还是掌了队里的大权。秦德才那种小人，作了那么多恶，还杀了人，也没什么事。这是什么世道？他不甘心，他还要想办法，他还要出力，不能半途而废、功亏一篑，不然前面的力就白出了。

想什么办法，出什么力呢？平金刚在这个社会环境里也渐渐变成了政治动物。他知道，他必须要咬人，必须要打倒别人，踩在别人身上，才能往上爬，哪怕踩的是尸体。

这回，他盯上了迟一敬。他觉得，迟一敬种那毛主席像，有辫子可抓，可以往上扣帽子，想扣什么就可以扣什么。第二，迟一敬是个老实人，没有什么反抗能力，又没有什么关系和背景，不会有什么人来帮他。把他咬了，也就咬了。第三，迟一敬当时参加的是“八一八”，和自己是对立面，那就是敌人。虽然后来叛变了，那也是叛徒。敌人加叛徒，最是不齿的了。不咬他，咬谁？（尽管迟一敬是往自己这边叛。）

“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平金刚看见迟一敬在地里拔草就大叫起来。

“你叫什么？不就是拔草么。”迟一敬看是平金刚老是和自己过不去，气得将一把野草扔了过来。

“你这是拔草啊？你这是在拔毛主席的汗毛，你这是在拔毛。拔毛？‘拔毛’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要拔掉毛主席，就是在谋害毛主席！”平金刚把这些词在自己嘴里这么转了一圈，就得出了原先连自己也没想到的不一般的结论。原本也是拙于言词和思维和平金刚，不知怎么，这时的脑子和嘴皮都出人意料地利索了起来，在路边不停地大叫起来。

赶过来的齐成才，听了倒是不服气，反问道：“那不拔怎么办？就让野草在毛主席脸上随便长啊？”齐成才原是“红海洋”的，属另一拨。虽说这些文革初的派别，到这时已经时过境迁，眼前这事跟派别也没关系，但又不能不说是有所关联。派性的裂痕，在人们心中的影响是很深、很长久的。

这一问，平金刚也回答不了，扭头走了。

虽然，齐成才帮迟一敬解了这个围，可迟一敬自己已心灰意冷了，也不想再去管这毛主席像了。

夏天渐渐到了，收获小麦的季节到了。迟一敬自留地里的毛主席像，因为没有肥料和管理，长得又矮又黄又乱。早过抽穗的时候了，这儿却长得像狗尾巴草似的。当然，这话谁也不敢讲。野草甚至超过了麦杆，毛主席像早已是一团糟，不成个样了。但大家都知道，那可是非同一般的毛主席像啊，人人敬而远之。

大田里的小麦开始收割了，这块地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这么长吧？

迟一敬趁着傍晚，拿着镰刀，也要过来收割，却早被平金刚盯上了。

平金刚不甘心那天齐成才抢白他，他总觉得迟一敬的辫子太好抓了，早就在瞅着这个机会，而且事先还跟宗发奋说了。虽然平金刚跟宗发奋不是一路人马，但平金刚也能察觉，这事只有宗发奋能帮他。宗发奋一听，也说是个机会，是抓获一个猖狂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的绝佳时机。

平金刚因此而盯了好几天了。当迟一敬从毛主席头像上帽子部位举刀收割的时候，平金刚从暗处跳了出来，大叫道：“不得了啦，迟一敬把刀砍向毛主席啦！迟一敬要杀害毛主席啦！”那声音凄厉得就像真的出了事的。

虽是傍晚，大家都在忙活的时候，听得平金刚那种叫声非同小可，纷纷从四周跑了过来。

这回是申光荣腿快，走在前面，一看是这么回事，就不乐意了：“嗨，你这搞的是什么景？人家是在割小麦，跟毛主席有什么关系？”

“你看，这不是在割毛主席的脑袋么？”平金刚当然不会退让。

“这种的脑袋和真的脑袋是一回事么？”申光荣反问道。

“有什么不一样？反正都是毛主席的脑袋。”平金刚还在狡辩。

“这假脑袋和真脑袋还分不清啊？你这不是在没事挑事么？”申光荣也不让。

正争吵中，宗发奋带着事先准备的民兵小分队赶来了。

“大家闪开！”宗发奋进到人群中厉声说道：“同志们，不要糊涂了，要提高革命警惕！现在反革命的卑鄙伎俩多得很，他们在用各种手法损毁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来发泄他们对伟大领袖的刻骨仇恨。各地已经宣判了一批。这个迟一敬就又是一个典型。”

那时，还真有不少这样的案例。农民群众要抽烟、擦腚，能有张纸就不错了，通常就是想办法找张报纸来。可那个时候，几乎每张报纸上都有毛主席的像或毛主席的话，至少也会有“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的字样，于是不免有那样的事。也真为此被人检举揭发，说这是对伟大领袖的极大侮辱，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判刑劳改。即使是万分小心，也有“处理不当”的时候，还是惹下了灾祸。比如，报纸破了、旧了，就很难处理，扔也不好扔。有人自以为小心，悄悄地撕了、烧了，一旦被别人看见，说不定就会惹来大麻烦。还有，陶瓷的毛主席像，那时也很多，不少人家都把它摆放在家里的正中间，像神仙一样地供起

来，以示对他老人家的虔诚之心。但那东西，万一打碎了，更不好办。得赶紧关起门来，诚恐诚惶地捡起来。扫，是绝对不可以的，对敌人才扫地出门呢。更得煞费苦心地寻思，往哪儿扔，才不会被发现呢，比小偷作案还提心吊胆。

先不说这些，还是看眼下宗发奋要把迟一敬带走，大家都吵吵着不让走。连鲁队长也出面说：“宗主任，你看这事由我们大队来处理吧。我们办他个学习班，好好地教育教育他。”

“不行！这可是很严肃的事情。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决不能轻易放过！”宗发奋口气非常坚决，毫无商量的余地。

那民兵队的几个当然也就狐假虎威，吆喝着，把迟一敬带走了。

迟一敬被抓到公社，公社的几位领导就觉得很不好处理。他们也觉得没必要小题大做，但谁也不敢为迟一敬说情，就说交给派出所处理吧。宗发奋不管政法，在公社也没有最终发言权，只好又扭送到派出所。

派出所诸所长见又是宗发奋这么起劲，给自己揽了个麻烦事，心中颇为不悦，嘴上也不好说。在龙头年数长了，也知道迟一敬是个什么人。如果再推出去，在宗发奋手里，这个老实农民说不定还会吃更多的苦，所以没当面说怎么处理，就说把人放下吧，等着向县局请示。

宗发奋走后，诸所长向县局去了电话，说有这么个事，看怎么处理。这一阵，由于情势的复杂，各种情绪烦躁，不满与亢奋并起，认识的偏激，处理的不当，再夹杂着两派斗争的遗留问题，社会矛盾激化，政治类案件大幅度增加，叫县公安局不胜应付，对诸所长又来这种电话，都有点厌烦，说是，嗨，这种事，你们自己处理吧。

诸所长要的就是这句话，回头就说，把人放了吧。第二天，宗发奋知道了，还跑来问。诸所长也好回答，说是“公安六条”上没有这个具体规定。所谓“公安六条”，就是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197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宣布撤销）。其中第二条特别规定：“凡是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这一条是“公安六条”的核心，很多冤假错案是依据这个而来的。但诸所长说的也对，因为它上面也没具体说迟一敬的这个行为算不算在里面。说算也行，说不算也行，看你怎么说了。

迟一敬回到家，在炕上躺了三天，说不上是病，也说不上是气，总之是糊涂了。该怎么热爱毛主席呢？管不了那么多了，也不想管了。那草愿意长，就让它长去吧。各家原本修整得挺好的那片自留地，出来这么一块蒿草丛生之地，成了这一阵西门外的又一个景致。直到秋霜都下来了，迟一敬一发狠，把它们全刨了，种上了大白菜。这时候，也就没什么人出来说别的话了。

平金刚的这一出，不但没给自己加分，还惹来了村里人不少的白眼。杜家骏、鲁队长他们也觉得平金刚是在变了，变得……唉，没法说，各人走自己的路吧。也没有人愿意去跟平金刚说一说。

迟一敬那儿，后来大家也都没提这事。只有老村长于继承说了句：“老迟啊，你这是余外搞了一出。”

迟一敬，从此又退出了村里人的视线，又开始默默无闻、好像村里没有这个人似的生活。

补充一句，迟一敬被宗发奋抓走的那天傍晚，他儿子迟解放和几个小青年到大河里玩水（游泳）去了。等他回来听说后，气得不得了，原来是平金刚搞的鬼，心里也暗下了主意。一个多月之后，趁风高月黑之机，他偷偷地在胡同拐角朝平金刚扔了块黑石头。没砸中脑袋，砸到了肩膀上，平金刚疼得直叫，在胡同里大骂了好一阵子，也没人出来看看。平金刚又去向宗发奋告状。宗发奋知道西北村里的事还真棘手，就说你上派出所去报案吧。平金刚还真去了派出所，诸所长也没把这当回事，排查不出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第四十二章 治理整顿

1960年2月11日

1971年林彪垮台后，行政系统官员的势力有所上升，这引起了江青一伙的不满。1974年，极左势力发动了一场“批林批孔”运动，以批判孔老二为幌子，目标对准了当时的总理周恩来，试图夺回政治上的主动权，但是对国民经济却无济于事，各项工作依然毫无起色。

1974年的年末。虽然有阳光，却依然很冷，晶莹的干雪在北风中飞扬。地里、场院里、胡同里都很冷清了。人们头上的鸭舌帽，已换成了棉帽，盘坐在家里的炕上，心里寻思着今年的分配能是啥样，能分到多少钱、多少粮。这可是辛苦了一年的人们对未来一年的全部期盼。

现在的大队会计是杜家骏的儿子杜长贵。他忙活了好几天以后，最终结果出来了，分配方案是一个工日一角二分钱。这儿把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村劳动报酬分配办法说一下。先讲工分，一个男整劳力，劳动一天为一个工日（习惯上叫工分），记十分；女整劳力，为七到八分；半劳力、老人、小孩再往下有若干档次。一年下来，生产队有个合计的全队工分总量，各户也有自家的工分总量。而后把粮食，即总产量去掉交征购、超购之外剩余的生产队可支配的全部粮食，分成二部分。一部分按人口分，一部分按工分来分。那时为了减少所谓的贫富差距，不使所分的粮食差距过大，因此按人口分配的部分要占大头，文革期间这部分一般要占80%。就是说这80%的粮食按全队人数一除，就是一个人能分多少粮。有的队，小孩要打个折扣；有的队，就大人小孩一样。这样家里小孩多的占便宜，劳力多的反而不合算，这不利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是不合理的。按工分分配的部分，就是把这部分能分的粮食用全队工日总量一除，得出每个工日可分配到的粮食数量，每人每户所能分的粮食也就能算出来了。钱，基本上也是这样算，把生产队所有的收入，包括分给社员的实物（如粮食、柴草之类）也都折合成钱一起算上，被全队总工日数除，就是一个工日多少钱。这只是收入，不是现金。现金分配也大体上按这办法再算一遍。

由于当时生产积极性不高，生产水平很低，各户收入分配所得很少，少到现在的人们都难以置信的地步。有的甚至一年所得的收入还不够买下一年所分的实物，尽管这些实物已经少得可怜，却还要倒过来向生产队交钱。所得现金，有的只有几元钱，连买盐买点灯的油都不够。辛苦终日，一年下来打的粮食不够自己吃，挣的钱不够自己用，这就是当时农民的真实写照。

一角二分的分配一出来，虽然人们原本也没指望什么，可这也太令人失望了。五十年代初，合作社那时凑起来的家底，被58年大跃进和困难时期打碎了。63~65年好不容易攒一点，又被两派争斗搞掉了。人们都急盼盼地等着这一点点呢，可这一点点也太少了吧。

皮安已先不算了，“怎么就这么点？还让人过日子吗？”

“你这老小子，运动搞了这么多年了，还敢这么说话！”平金刚在制止他。

“这就不错啦，皮大叔啊，”杜长贵在劝他，“咱们还能指什么挣钱？就这点地，卖粮能卖多少钱？粮管所收去的，玉米粒就九分钱一斤，小麦也就一角一分钱一斤。一亩地才能打一二百斤，能有多少钱？咱队里什么还都没敢花，我那算盘缺了好几个珠，我都凑合用了好几年，也没敢提出来要买个新的。”

“嗨，老哥啊，咱西北村算不错啦。”于村长知道村里当家的不容易，也过来劝，“你不知道，东面的孙家乔一个工分才六分钱，那人家也得过日子啊。”

“才六分钱？”迟解放听了大惊，“一个鸡蛋还卖五分钱呢。一个棒小伙，干一天活，就顶个老母鸡下个蛋啊！”

于又发说了句调皮话：“能顶个蛋就算不错啦，还有不少队连个蛋也顶不上呢。”

大家都苦笑了一阵。

“唉，皮大叔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鲁队长和杜家骏正走过来，鲁队长低沉地说：“乡亲们这样穷，我们当干部的，对不起大家呀。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啊。”

杜家骏说：“大家还是要有信心，我看还是有希望的，好多工作不是正在逐步走上正轨吗？”

杜家骏倒真的是感觉出一些问题了。

第二年，1975年的春天。极左势力面对难以为继的局面，终于做出了一个大的转变，很难得地向后退了一大步，在得到邓小平说“永不翻案”的承诺之后让他复出，重新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对已经混乱了多年的各项工作进行全面的治理整顿。

邓小平复出后，立刻借用毛泽东的话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第一项，是学习理论；第二项，要安定团结；第三项，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在煞费苦心地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转移掉。在农村主要就是要“抓革命、促生产”，这在当时是很得人心的。

开春的时候，西北村就开了次“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

村支书杜家骏先讲话：“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放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去年村里的分配，一个劳动日只有一角二，大家的日子过得很紧巴，我们当村干部的脸上也无光。为了落实‘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我们村支部研究了几项措施，来调动大家的生产积极性。乘‘治理整顿’的东风，让今年有个新的气象。下面请鲁大队长宣读一下这几项措施。”

鲁队长在大家期盼的眼神中，拿出一张纸，讲了起来。

“第一条，为了打破绝对平均主义，今年的分配要改为人七劳三，劳动报酬的分配比例增加到30%，进一步体现马克思的按劳分配原则。”

到底是这两年学了马列著作，鲁队长的讲话也用上马克思的话了。

“第二条，自留地扩大一倍，由每人一厘地扩大到二厘地。”

二厘地大约是13平方米。这也使得下面听的社员气氛热烈了起来。

“第三条，允许社员同志们去赶集。赶集那天上午不出工的话，不再扣工分。”

好多人点起头来。

“第四条，每天晚上的政治学习，改为五天一次。”

“好，好！”大家都叫了起来，对这一条是最高兴了。尤其是对家里有小孩的人，是最欢迎这一条了。

大家还等着鲁队长讲第五条呢，鲁队长把纸条收起来了，放进了口袋。

“没啦？”齐成才问。

“没了。”鲁队长答。

“就这四条啊？”皮高深问。

“就这四条。”

“太少了，再来个五条吗，还差不多。”皮安已说。

“这四条，也不容易啊，我们支部讨论了好几次，又怕犯左倾错误，又怕犯右倾错误。我还特地请示纪社长。纪社长点了头，我们才敢开这个会的。”杜家骏说。

“啊哟，这治理整顿的步子也太小了。”肖胜利也说了这么一句。

杜家骏赶忙又说了：“当然我们支部讨论的还不止这些，但是有些我们还没有把握。比如我们也商量过搞个多种经营什么的。我们守着大海，却只有两条小划子，出不了大海，有鱼打不上来。想搞个机帆船，可是这钱，以大队现在的情况差得太远。想搞个副业，办个鞋厂、针织厂什么的。可是机器、技术、原料、销路，都成问题，也没人懂，想搞也搞不起来。等慢慢发展吧，会好起来的，面包会有的！”

杜家骏也学会了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里的一句台词。

“干活啰，干活啰。”平金刚满街喊着，人们三三两两地往外走了。

今年有了这些新措施，尤其是劳动力占分配的比例提高了，人们干活的劲头要大了一些。瞎混了好几年，该好好搞生产了。

鲁队长也在胡同里四处转悠，看看情况。看见秦有理挑着水过来，便问：“人家都上山干活去了，你怎么还没去？”

“我还没吃饭呐。我这不还在挑水，准备做饭呢。”秦有理有气无力地说着。秦有理从被省城的大学退回来后也没有精神头了，整日里无精打采，不知干了些什么。

“都什么时候啦，还没做饭？”鲁队长责怪着。

“我不吃饭倒不打紧，我爹还躺在炕上等我做饭呢。”

鲁队长一听更生气了，吼了起来：“这抓革命，已经到了促生产的时候。你爹光知道革命，不知道生产啊？再这样无理缺工，倒扣十分。”

“倒扣十分？队里一天才给他记九分，他有意见。”

“记九分就不错了，要我当你们队长，最多给七分。”鲁队长再往秦有理挑的水桶里一看，又说上了：“你这么个大小伙，就挑个半桶水啊，不寒碜人啊？人家城里来的知青时治国也挑得不比你少啊！”

秦有理还不服气：“人各有的命，各有各的路。你说这么多干啥呀？”

二人气呼呼地各自走开了。

西北村里就这么个小小的“治理整顿”，也不容易啊。

在极左路线占据主导地位的大背景之下，局部的、哪怕是枝节性的治理整顿也是很难进行的。短短的几个月之后，极左势力就无法容忍他们认为的“倒退”，无法容忍他们认为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也就是对他们的否定，很快就掀掉了“治理整顿”的牌子。

第四十三章 成家

1960年2月12日

43.1 连四嫂

在停止“治理整顿”之前，这年的春天，不但田野有了些前些年没有的热气，村里面也有了些喜庆气。王山的媳妇连四嫂，从娘家回来了。差不多十年没了媳妇的王山，又好像成了回家。

1965年歼灭了来犯的高增光一伙国民党武装特务，老王头一家被强制迁往北山，刚过门嫁给王山的连四嫂，也只好哭哭啼啼地回到了大河北面的娘家。在娘家虽然哥嫂对她还可以，但又是社教，又是文革，尽管她哥嫂家也是老实农民一个，并没有受到直接冲击，然而生活的不易，难免有些磕碰，难免有些怨言。或许这些并不是针对连四嫂来的，连四嫂心中也是委屈难当，常常暗自流泪。所以尽管都已经十年过去了，运动的形势稍有缓和，王山那面托人捎信过来想接她回去。连四嫂同意了。连四嫂对王山的家境并不满意，但自己男人连四娃在1959年修水渠时被炸死，只能怨自己命苦。连家有个大哥连二娃，那年跟着国民党走了，那知这王山家有个小弟也是那一批跟着国民党走的。天下哪有这样的巧事，可都叫连四嫂摊上了，不是命苦又是什么呢？好在王山人还实在，尤其是王家人老的少的都对她挺好。自己父母已经过世，侄儿也大了，总不能在哥嫂家待一辈子，就回来吧。自己的儿子也长大了，十多岁，都上初中了，一直放在连家也不放心。这次跟王山也说了，能不能把儿子叫过来一起住，王山也同意了。连家也挺大方，说小孩可以跟娘一起去王家，但是不要改了姓，因为连家也就剩下这一根独苗了。

王山接媳妇的那天，换上了件干净的半旧蓝布褂，推上手推车要走了。

王大妈说：“今天要不把王溪一起喊来，热闹热闹？”

王山说：“她呀，算了吧，算你白养了一阵。到现在看见了，也还当不认识。别去碰这个钉子了。”

王大妈说：“唉，总算还是一家人嘛。去叫了，她不来，那是她的事。不去叫，就是我们的事，日后给她留下话柄。”

王山说：“我不去，”扭头推车就走了。

王大妈低头叹了口气。

丁妹一看，难得家里有这样的喜庆事，就别叫娘心里不痛快了，便说：“那我去试试看吧。”

王溪一直周旋于秦德才父子之间，秦有理曾经和她萌发过的最初的纯情火花早就不知烟消云散到哪儿去了。王溪已经名声在外，也不太好找一般的人家。但也真有碰巧的事，前二年青海来招人去柴达木修铁路，那是海源人想也不敢想的荒远高寒之地。东南村的田家，家里儿子多，有这机会能出去一个也

行啊。家里老三耳朵又有些背，将媳妇也难（注：这儿的“将”，海源话，娶的意思），好歹找到了县医院的关系，在体检时听力填个合格，送了过去。已经去了三年了，也转正了，可婚姻问题难解决啊。青海那边茫茫戈壁哪有女孩子，这一边也不愿意把闺女嫁这样的，太远了，两年合起来才有一个月的探亲假。有人提起了王溪，田家也只好退而求其次了，有个总比没有强。王溪也愿意，男人两年才回来一次，她更是招蜂惹蝶，直至明铺夜盖疯张得不得了。田家对这样一个已经炼就了造反脾气的媳妇也别无他法，只有无奈。

丁妹其实也是实在不想去，心想着别扫了婆婆的兴，硬着头皮才过来。王溪家虚掩着院门，丁妹敲门没人应，就进了院子，又敲起了屋门，喊着：“小妹啊。”

突然窗櫺后面的屋里爆发出了炸雷似的声音：“谁啊？不长眼睛！这个时候来敲什么门？”

“我是你丁姐啊。我妈想你回家一趟。”

“我早就没有那个家了，快走吧。”

“你听我把话说完。王山哥今天要把嫂子接回来。咱们家在一起吃顿面。妈说，好长时间全家没在一起了。”

那知道窗里面爆发出了更大的骂声：“又是国民党家的把另一家国民党召回来了。什么东西，滚！我没有那个家！”

丁妹分明还听见屋里有个男人哧哧的笑声。她扭头就走，跨出院门的时候，悄悄地擦去了脸上的泪水。

其实，已经好几年没人提国民党的事了，而这个王溪开口就是国民党，太刺痛丁妹的心了。

王山一辆小推车，一边是连四嫂，一边是两个包裹，把连四嫂迎了回来。

村里有见到的人，都点头招呼：“连四嫂，回来啦！”这大概也是龙头人淳朴的本质使然。按说应该叫王山嫂了，还叫连四嫂，在别的地方是极为忌讳这些的。连四嫂和王山也都不太在意这些，也点头微笑着答应：“回来了，回来了。”

听见胡同里有了动静，王大妈急忙下炕，丁妹搀着她一直走到院门外。看着王大妈一头白发飘散，连四嫂心头一酸，泪珠如帘，哽咽着说：“娘啊，我不该走啊。”

王大妈说：“唉，嫚啊（注：“嫚”，海源话里女儿、女孩的意思，通常是个昵称），你走得对啊。跟我们一起去看北山，就算能留下这条命，也要掉几层皮啊。”

王大妈想起老伴，又是不止的泪下。

连四嫂走进屋里，看见老王头的遗像，不由得跪下连连磕头，说一声：“爹，我来看你了。我来晚了啊……”又是泪流满面。她知道，这一家子这几年不容易啊，她心里还是一直惦记着他们的。危难时候她没能和他们在一起，也有几分愧意。

丁妹扶着她起来，“嫂啊，别太难过了。好日子要来了。”

晚上，他们吃了顿海蛤蜊开卤的面条。按照海源的习惯，他们还给四周的邻居也送上一碗。王山和连四嫂特地一起去了连家，给连家老俩口也送去了两碗。

连家也是苦命人家。连二娃不明不白地去了台湾，连四娃又死在水渠上，大份、三份都是闺女，早就出嫁了。老俩口，快七十了，身边跟着十几岁的孙子在上学，觉得养不起了，他娘要领他走，就走吧。

往回走的时候，连四嫂叫他儿子小连子跟她一起下跪向连家二老辞行。

连四嫂哭着说：“爹啊，娘啊，你们永远是我的爹娘。我永远是你们的儿媳妇，小连子永远是你们的孙子。这儿也是我的家，我会常回来看你们，你们俩老有什么事就跟我说。”

忽然王山也跪了下来，朝连家老俩口磕了个头：“连二娃、连四娃，当初都是我的好兄弟。他们不在了，我叫一声你们爹娘了，我愿意做你们的儿子。我和连子她妈把这两家都扛起来。”

老小五个人，抱头痛哭。

他们五个人，却是四个姓，已分不清是一家、二家还是三家，真的是苦命一家人了。

最后，连家老俩口又悲戚又感激，把他们新的一家三口，送出了门。

43.2 狗狗有家了

这一年，辛狗狗被黄港国棉二厂打发回来已有五年多了。他和邢秋芬之间的感情也早就成熟了。开始，他只是觉得邢秋芬小小年纪，还要被秦德才这种坏人欺侮，很可怜。做人的正义感，使他觉得理所当然地应该站出来保护她。久而久之，他对邢秋芬由感觉可怜到感觉可爱。邢秋芬的小鸟依人、温和贤惠，使他一个棒小伙饥渴的荒野找到了绿色的生机。而邢秋芬对狗狗是由感激到爱慕，狗狗的壮实，狗狗的伟岸，狗狗推小车那通通的脚步声，狗狗挥起锄头那赤裸的胸膛上反射着阳光的汗珠，狗狗靠近自己时那急促的呼吸和呼呼的心跳，都能使自己陶醉和融化。她知道那就是她的依靠，就是她的归宿，就是她的另一半，就是上天在冥冥之中赐给她的最好的礼物。

没有书信往来，没有温情话语，更没有打情骂俏，他们俩早就定下了关系。可就是没有条件，不但政治上压力重重，经济上也不允许。他们俩尽管都是正当年的棒劳力，可是几年下来，除了自己当年带过来的铺盖卷，还是一无所有。而且真的是一无所有，有的就是一副碗筷、几件衣服，寒酸得能让人掉泪。

这一年，狗狗都三十出头了，不能再拖了。看着政治形势稍有缓和，他们俩商量，不管怎么难，那怕两个人合用一个碗，也要走到一起。

由狗狗起草，他们俩向大队打了份申请结婚的报告，大意是：“为了进一步响应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我们俩决心扎根西北村，当一辈子农民，向贫下中农学习……，特申请结婚，请予批准为盼。”

杜家骏看着笑了：“结个婚，还用讲那么些政治意义么？”

鲁队长说：“不这样写，哪怎么写？好事，好事，应该支持。”

鉴于情况特殊，他们两人既是知识青年，又都是可教育子女，杜家骏还去请示了纪社长。

纪社长一看，也挺有兴趣，连说：“这个好，这个好。现在全国正在开展打击残害知青、尤其是打击强奸女知青的活动，各地正在抓典型案例，枪毙了一批。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有个团长奸污了一百多个女知青，完了还把她们推给政委、副团长继续奸污，太不象话。我们这儿正好是个正面典型，说明知识青年在我们这儿正在幸福成长。你们大队上还要适当加以支持。”

杜家骏回到村里，支部一商量，大家都觉得是好事，应该支持。还研究了把现在他们知青住的西间，给他们住。

这事还就时治国不高兴。尽管自己也是知青，却还看不上比自己成分高的知青（注：在中国，阶级成分是成阶梯形的，如：贫农→中农→富农→地主等，越高的越不好），总不愿意和辛狗狗在一起。

大队为避免矛盾，住在一起也确实不便，就把狗狗他俩安排在包金贵住过的那小屋。鲁队长跟他俩说的时候，还觉得有点歉意。

狗狗倒很大方，“挺好的了，谢谢鲁队长。我们只要有个地方，不漏雨就行了。”他俩也知道包金贵被杀的事，但没在意，也在不了意。

鲁队长嘱咐平金刚，把那小屋房顶的苫草重新换了，里外又用白石灰刷了一遍，还配置了一套最简单的生活用品：铁锅、风箱、碗筷和两只大纸箱（盛放衣物用）。钱由大队上出，事情是由肖胜利和衣春玲前后领着忙活。

狗狗他俩把东西搬进来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仪式，只有门上的大红喜字和俩人的相视而笑。

第二天，他俩就请了七天的假，去黄港“旅行结婚”。

走之前，鲁队长说，你们还有件事情，就是要换粮票。

城里人吃饭都有定量的。像邢秋芬的父亲在街道糊纸盒应该是按“轻体力劳动者”那一档，因为成份不好，又低了一档，照“16岁以上居民”每月定量给24斤。这24斤，可不像现在有鱼有肉，一天8两粮大概还用不了。但在那时买肉要有肉票，买鱼要有鱼票，具体数量各个城市不一样。肉票，一个月大约也就是斤把或者几两。买根油条还要半两粮票。这已经不是困难时期了，局面已经好多了。然而靠这点粮食定量度日，特别对于刘子录这样的孤身老人，就是要省出一碗饭都不是易事。所以那时要出门上别人家，都要自己带粮票，不然别人怎么过。可是农民却是连定量也没有，哪来的粮票呢？政府为方便农民群众，对于确实需要外出的，如探亲、看病等，经批准后可以拿粮食到粮管所去换粮票。

鲁队长给狗狗开了大队证明，请换给半个月的本省粮票。狗狗又到公社去盖了章。按当时该省卖给居民是20%的细粮（面粉）、80%的粗粮（玉米面等）的比例，半个月的12斤粮票，要拿三斤四两小麦、九斤六两玉米粒去换。意思是，你拿了12斤粮票到了城里，城里的粮店就卖给你二斤四两面粉和九斤六

两玉米面。为什么要交三斤四两小麦？是因为磨二斤四两的面粉，要去掉麸皮，按70%的出粉率，所以向你要三斤四两的小麦。实际出粉率一般是90%，这样粮食部门可以就此多得二两六钱的小麦。要问，这个帐怎么算得这么细？要知道，在困难时期，一碗稀粥就可以救一条人命呐。

狗狗也不明白这些，问怎么这么复杂啊？

粮管所的祖所长对他说，这还复杂啊。这是换本省粮票，要是换全国粮票，你还得拿半斤花生米过来。

因为拿全国粮票到城里买粮，在落下临时户口后，还要按城市居民的食油定量一个月卖给你二两到半斤不等的食用油（数量各城市不一）。那你在换入粮票的时候，就要另外再交油料。至于从花生果到花生米、从油料再到油品、从粮票里的含油量到实际供应量的折算和计量，这儿就不说了。笔者曾经当过粮食院校的专业教师，对这些算是知道一些的。然而对于非专业人士那是说不清、甚至听不清这些的。由此可知，那时的农民，想在中秋节买块月饼，或者是小孩吵着要一小包饼干，都是不容易办到的。要想到城里去走走看看，那就更难了。

当然狗狗和邢秋芬去黄港，既不是“旅行”，也没有结婚仪式，主要是去看望邢秋芬的父亲刘子录。

邢秋芬的家在岗东一个三层楼房里的一间，从外面看是种简洁的欧式风格，似乎不错。其实里面已是十分的陈旧。黑乎乎的墙面，阴暗的通道，走在上面“嘎吱”直响、生怕踏碎了会掉下去的楼梯。尤其是住得十分拥挤，一般来说一家也就是一、二间。甚至那种随时会跨塌的楼梯下也住着人。那时全市人均住房面积还不到八平方米，住房特困户的标准是人均在二平方米以下，单位才能考虑优先解决。至于能不能解决，什么时候解决，只有天知道了。楼梯道上都塞满了各种杂物，人走过去要小心地侧着身。

辛狗狗在邢秋芬的带领下，小心翼翼地上楼，穿过楼道，推开了两边杂物堆放都顶到了天花板、几乎把门扇也要掩埋进去的房门。辛狗狗见到了他的岳父。

刘子录，也已六十出头，苍白瘦弱得早已没有当年在历史风云剧变之际还想研究另一种土改的志趣。

在辛狗狗恭敬地喊过一声“爹”之后，刘子录又喜又悲。他看见女儿领回了这样一个英俊健壮的小伙，从心里由衷地高兴。他伸出颤抖的手，在辛狗狗半新的旧布褂上抚摸着。辛苦半世，拉扯大了女儿，没有白养啊。这么小的年纪，下去插队，自己在家日夜提心吊胆，生怕有意外，今天终于有了最好的结果，他怎么能不高兴呢。

他嚅嚅地说着：“谢谢你这几年对秋芬的关心照顾啊。秋芬跟了你，我也就放下这条心啦。”

狗狗谦和地说：“我没做什么，倒是秋芬对我照顾不少，帮我洗衣服什么的。”

刘子录又对女儿说起了话，脸上一阵悲苦：“可惜你妈妈见不到你今天大喜的日子了。”

邢秋芬也是垂泪欲滴。她已经记不起母亲的印象了。

刘子录刚解放时，为躲避打击，四处东躲西藏，市内郊外，山区海边，甚至连东北的深山老林一个人也去过。但终究也没能躲过去，却把秋芬妈给弄丢了，再也联系不上了。几十年四处打听，又不敢大张旗鼓地明找，一直没有音讯，这成了他最大的心病。刘子录所以这么快地衰老，这大概是最主要的原因。每天夜里闭上眼，就是妻子悲苦求救的眼神。如果不是有女儿在身边要扶养，刘子录大概早就精神崩溃，追随了过去。刘子录这几十年耗尽心血，把对妻子的愧疚和思念，把做父亲应尽的责任，都花在了女儿的身上。把女儿改成妻姓，原因之一也是作为对妻子永远的思念。今天看见女儿长大成家了，怎么不喜极而泣。

停了一下，刘子录又升起了愁容，“你们的事，我实在是高兴。可是你们的爹实在是无能，没办法帮扶你们。”

狗狗说：“爹，我们不用帮扶，我们知道这情况。我们年青，我们有两只手。”

“唉，我们两家都是苦命的家庭。这样也好，你们更能相互理解、相互体贴。这世界上风云难测，只有你们自己紧紧靠在一起相互扶持了。”

“嗯，我们会好好一起过的。这世界很大，但对于我来说，爹，你和狗狗就是我的整个世界。”秋芬听了父亲这番话也是很动情的。

“我这儿，你们看中什么，能用得上的，就都拿去吧。我一个人怎么也好糊弄。”

“不，我们什么也不拿。农村里生活简单，大队上对我们也不错，日常用的，都准备好了。”狗狗说。

“那真不简单啊。这年头，能遇到这样的领导，真是不容易啊。我原来想，我已到了六十了，不知道能不能办退休，能不能顶替。要是能顶替就好了，就能先回城一个，再慢慢办一个，就能回来了。”

七、八十年代，有个政策叫“子女顶替”，是为了解决城镇职工子女就业难的问题而出了这么个办法。那时，上山下乡的阻力越来越大，城市招工又少，职工子女中学毕业后难以就业，呆在家里无所事事，乃至惹事生非，日益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于是就允许职工本人退休时，他的子女可以顶替他的岗位成为职工。应该说这种办法是极不合理的。因为它固定了非农业人口对农业人口的不平等，甚至把这种不平等加以世袭化。说重了是带有封建专制的意味。现在的“官二代”，某种意义上也是种权力的“顶替”。再者，对于单位来说，它无法从社会吸纳更为优秀的职工，只能近亲繁殖，使员工素质整体上退化。比如，最简单的道理，医生的儿子顶替他爹进了医院，就能当医生么？但是，刘子录在街道上糊纸盒，是属于“小集体”，是集体所有制中层次较低的那种，连顶替也没有。另一种单位叫“大集体”，虽然也是集体所有制，却和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的性质、待遇相近（要低一些），有退休，退休后每月有退休工资。而“小集体”干一年是一年，没有退休，年纪老了，给一笔补助后回家，以后跟单位就没有什么关系了。这样的人员不在“城镇职工人数”的统计范围内，也就不存在“顶替”的问题。这些刘子录还不了解，这个愿望，又要落空了。

可狗狗笑笑说：“这没什么，农村也挺好，我们也能过得下去。等我们扎下根，过好了，把爹也接过来。我没有别的亲人，爹，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说到这儿，狗狗也伤感了，说不下去了。

刘子录只好浅浅一笑，“不提那些伤心事了，说起那些就没有完了。我看形势还是往好的方面发展。这日子还是有点盼头的。”

三个人都轻轻地笑了下。

在家里住了三个晚上后，狗狗和邢秋芬就回到了西北村。他俩不忍心再打搅老人了，也是想多省下几斤粮票，以后用得着的地方还多着呢。走时，他们只拿了张一两的黄港市地方粮票，作为结婚的纪念，剩下的都留给了刘子录。

狗狗和邢秋芬回到了西北村，带来了二斤龙头镇见不到、但却是闻名遐迩的上海“大白兔”奶糖。西北村人也高兴了一阵，说是到底是城里人，让西北村人也尝到了只听说过而没看见过的“大白兔”。

这两位年青人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在风雷激荡的岁月里，向着不可知的远方，扬帆起航。

43.3皮平平

辛狗狗和邢秋芬的婚事，触动了皮平平的心。她是真心喜欢时治国，尽管村里有人对时治国有些看法，但她就觉得时治国不错，跟村里的那些小伙就是不一样，眼界宽，想得多，肚子里有才气，虽然为人处事有些生涩，但那是初来乍到、对农村的人情世故不了解，情有可原，以后会慢慢变的。

皮平平觉得，她也不能再等了，应该拿出勇气去争取幸福。对她来说，与其说是对时治国的爱慕，还不如说是对新生活的向往。她对现在的这个家有些厌倦了。她爹开口闭口就是你哥怎么的，她姐嫁给辜连长，又老说你姐怎么的，好像她是永远的不行，好像是你该走了。她应该寻找自己的世界了，是时候了。可是，时治国不太会说话，不好跟爹开这个口。那我自己去说，她知道她爹跟她已经有了些隔阂，但再怎么也是闺女跟自己的爹，不好说也得说了。

想好了以后，找了个空，把这事跟皮安已说了。

那知皮安已却不乐意，说：“啊哟，要上省城啊，这么远的婆家，太远了吧？”这恐怕还不是心里话。

皮平平忙解释说：“我们还是在自已村里，就象狗狗和邢秋芬那样。”

皮安已又说：“不行，那个城里人什么活也不会，以后拿什么养活你？”这倒是句真心话。

“这些农活，又不是什么难事。他有腿有胳膊的，都能学会。”

皮安已停了下，说：“我看这小伙，不是很踏实，不像肖胜利、辛狗狗他们那样可靠。”

“我了解他了，他是个好人。对我可好了。”皮平平有点急了。

“你急什么？你看你姐，一直等到三十多岁，最后找了个大军官，多好。要是一开始就答应老王头家，这一辈子就有遭不完的罪。”皮安已又拿她姐说事了。

“我都二十四了，还不急啊？”

“不行！上次我就提醒过你，不要去靠近那个姓时的，你还不承认。弄得村里到处都是闲言碎语，别再去丢人现眼了！”皮安已斩钉截铁地说。

“不行也得行啦，我已经是他的人啦。”这事情不知道是真是假。但这句话一出，皮安已直瞪着眼，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拿起笤帚疙瘩就要打过去。

皮平平斜了下身，说：“这时候，打也没用啦。”

皮安已气得把笤帚疙瘩往地下一扔，一句话也不说了。

皮平平回过来又找到时治国说：“咱俩的事，怎么说？”

“什么怎么说？”时治国还没反应过来。

“别装了，我们什么时候办喜事吧？”皮平平直截了当地说了。

“……”时治国显然没料到平平会来这一手，吱唔了一会，就推说：“这事我得跟我家里商量一下。”

其实，时治国跟他省城的父母说过这事，但家里不是很乐意。老时编辑打的是这个主意：下乡不过是权宜之计，他一直瞅着机会、想着办法把儿子调回来，一旦在农村成了家那就麻烦了，就不让回城了。虽然现在还看不出政策有松动的情况，回城暂时还没戏，但一定要坚持。他跟儿子说，非到万不得已，不能在农村找对象。这下叫时治国难办了，知道那一头老爸讲得有道理，要为长远考虑；这一头皮平平对他真心付出，他对皮平平也是情意难却，已是到了覆水难收的地步。

皮平平看他还有点犹豫，拿不定主意，就来了个杀手锏：“我都已经有了，你还不当回事啊？”

“啊？！……”一下子就把时治国惊懵了，结巴着说：“那就结吧。”

时治国也向大队打了份报告。大队当然也很快批了下来，而且还把时治国现在住着的那东二间给他们用。为了表示没有偏差，大队也花钱添置了一套生活用品给他们。

皮平平 and 时治国也上省城去了趟。可能是婆家对她不冷不热，皮平平回来也没多说，带了几斤省城的花纸包装的糖果，特别是那种高粱饴，也是挺出名的。

皮平平他俩回来后，皮家摆了二桌，宴请了几个亲朋好友。

又一对年青人开始了他们的风雨历程。

第四十四章 反击“右倾翻案风”

1960年2月13日

44.1“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继续革命的车，又颠簸了起来。

林彪事件以后的短短几年，一会儿“反复辟”、“反复旧”，一会儿“抓革命，促生产”，一会儿“批林批孔”，一会儿又“治理整顿”。当政者苍老的手已经无力把控方向盘，一会儿扭过来，一会儿扭过去。既想要消除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混乱，又想要坚持左倾错误的实质，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而这是一个根本无解的难题。

当邓小平纠正和消除左倾错误的一系列做法，无疑将引向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方向盘又一次打转了。

对国民经济的治理整顿还不到一年，极左势力就无法容忍了，因为这不但将失去他们的表演机会，也将失去他们表演的场地，从根本上否定了他们立足的基础。1975年下半年，一场来势汹汹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又开始了。由于上层的目标是直接针对重新出来工作的邓小平，所以这场运动里的运动，习惯也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这毫无例外地也波及到了龙头公社，波及到了西北村。一些比较热心于治理整顿的干部下了台，而文革前期有着强烈表现欲望、在踏踏实实搞经济活动中无法施展才华的一些人又不甘寂寞地重新崛起。为“革指联”出了不少力而没争到台前来的程贵安，不知怎么被任命为龙头公社的一把手，纪社长被挤了下去。到处上下找人、托关系的宗发奋，当上了二把手。

程贵安和宗发奋他们俩人，尽管曾经分属不同的两派组织，所谓的观点不同，却照样能走到一起，也算是“革命大联合”吧。实际上他们有更大的共同点，那就是利用文革、利用政治运动，迅速占领制高点，不惜代价和手段，宁可去踩别人，也不能被别人踩。虽然他们本身也都是文革的受害者，程贵安还仍然拄着拐，宗发奋自己老婆被人欺，还一直蒙在鼓里，见到秦德才还笑嘻嘻地想利用他一下，但文化大革命、搞运动、整别人、政治动荡，是他们能爬上去的唯一绳索。他们在政治漩涡中被抛上抛下、四下翻滚，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那根绳索，一旦抓住，拼了命也要把自己拉上去。不是他们的本性如此，而是几十年的政治风云让他们练就了这身本事。

程贵安在召开公社三级干部会，动员“反击右倾翻案风”：“文化大革命进行了这么多年，但是我们龙头公社的阶级斗争还是不彻底。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嘴上说永不翻案，事实证明不可靠嘛。我建议

你们去看看那部电影‘欢腾的小凉河’。啊，那里面非常生动地说明‘走资派，还在走’。他们和地富反坏一样，人还在，心不死。”

宗发奋也说了一通：“各大队要回去对照一下本大队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凡是有资本主义回潮的现象，要坚决刹住，立即改正，狠狠批判、严肃处理！”

他端起了一大缸红红的水，咕咚喝了一大口，打了个饱嗝，又喝了一大口。宗发奋喝的是当时流行的又一种养生之道——红茶菌。各人自己在缸子里用点种菌培育，每天捞出来点当茶水喝，据说又是跟前一阵的打鸡血一样效力无比。但宗发奋喝这非但没见什么效果，还老是肚子不舒服。每天另外还得加上“痢特灵”，听说这又是治胃病的好药。喝上两大口后，觉得舒服了些，宗发奋指着平金刚他们几个西北村的干部，说：“就拿你们那个西北村来说。把劳动分配，由‘人八劳二’改成‘人七劳三’，这不明明是扩大贫富差距，为产生资本主义提供温床嘛！还有对地主富农、国民党的子女那么温情脉脉。他们结婚，大队还提供房子、生活用品，这是哪个阶级的感情啊？屁股坐到哪儿去啦？我是革命干部，我结婚的时候，也没见你们西北村送东西来嘛！”

下面哄然大笑。

“严肃点，不要笑，这不是好笑的事。”程贵安依然板着脸严肃地说：“早在1962年，毛主席就说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现在他老人家又说了：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你们要注意了，不要以生产压革命，不然就没有好下场！我们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永不停止！”下面又鸦雀无声了。

按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老王头一家，又被指定有“专人看管”了。

这一天，是轮到迟解放“看管”他们。正在院门外等着，要跟着他们家一起上山干活。

王山扛着锄，在院子里没动。他真不想在别人的“看管”下出去，他更担心连四嫂会受不住。

他见连四嫂也扛着锄出来了，轻声地问：“这儿的日子不好过。要不，你还是回娘家去？”

“我哪儿也不去了，就跟着你了，”连四嫂也是轻声地却坚定地说着。

王山放下了心，又说：“天天这么有人跟着，就怕对小孩不好。要不，让他回连家住段时间？”

“唉，真不想一家人再分开。”

“我们可以常去看他。”

王山说得也对，连四嫂点头同意了。老王头家（尽管老王头已经去世很久了，大家还是习惯叫老王头家）一家五口，五个姓。其中的一个，小连子，来了几个月，又要离开了。

迟解放看着他们在院子里挺伤感、挺为难，反倒走进院子，对王山俩口说：“嗨，什么‘看管’呀，你们也别看得太重。上面说上面的，咱们还不是乡里乡亲，把它看成一起干活就是了。大队不叫我来，我也得扛锄上山干活嘛，我也可以来喊你嘛。”

王山俩口才略略宽慰些。

王家五个人里，没把王溪算上。王溪还挺得意，觉得自己有眼光，你看国民党又不行了吧，亏得自己没有扯进去。她真想把姓也改了，以示跟老王头家没有任何关系，可是改成哪个姓呢？改成哪个也没有依据。问过公社的民政干部，人家也不赞成，这才算了。

44.2搜查集市

政治学习又恢复到每个晚上都要搞，尤其是赶集那天的前一个晚上，必须要学到十点以后，省得第二天精神十足地去赶集。

对赶集，完全取消又太过分，于是公社做出了一系列严格规定，比如必须是社员群众的自产自销、互通有无，而且只限本公社社员参加，以避免“长途贩运”，还要组织民兵上集巡逻检查。

现在西北村的民兵队长是彭小宾，彭小宾把这事交给了迟解放安排。迟解放就带了时治国、齐成材几个上集了。尽管公社要求很严，真到了具体执行也就打了很多折扣，文化大革命都十年了，没有几个人再有这劲头了。

民兵小分队带上红袖章，四处走走。赶集的人也并不是很多，摆的摊子也稀稀落落。那个年头，想买的、想卖的，都不是很多，但毕竟还是需要的。公社要求只能是本公社的人来，本公社四乡八里的人，尽管不认识，但看上去总有个差不多。只有时治国不认识，还特认真，一个摊、一个摊地去问。人家告诉他，他还听不懂，因为他不知道这些村到底在哪儿，是不是本公社的。

还在大家有点对他嫌烦的时候，时治国问到了有一份卖蘑菇的，也就一小篓，是个中年汉带了小女孩，从北山来的。时治国一下子高兴起来，问了半天，总算有了成果，发现了一个不是本公社的，要赶人家走。倒是在边上想买蘑菇的老乡不干了。

“就买这么三两四两的蘑菇，你还得叫我上北山去跑一趟啊？去到那儿，人家又要说是外公社的，不让来。那这一辈子就不用吃蘑菇啦？”

“是哎，人家这么远从北山过来不容易，也方便了咱们。赶人家走，干什么呢？”旁边的人也都这么说。

时治国答不上来，就说：“这是公社规定的。”

迟解放过来打个圆场，说：“人家篓里剩得也不多了，卖完这份，就叫他走吧。”

“不行，得全部充公，人带公社去。”时治国不知道是过分认真，还是过得太乏味，想找点刺激，上去就要提走人家的篮子。

卖蘑菇的带来的那个小女孩却挺勇敢，抓住篮子不放手，叫着：“你凭什么呀，你凭什么呀？”

这时，王山正好走过来。他本不想多嘴，但一眼看过去，挺眼熟。再一看，不就是高家庄的高梁山么？好在有迟解放在里面，好说话一些，就走了上去，说：“啊呀，兄弟，来龙头一趟，也不上我这儿来

坐坐。”

“我这不正想过来，叫这位同志给拦住了。”高梁山反应也挺快，随口就应上了。

“解放啊，小时啊，这是我北山的一个亲戚，真不知道咱公社的规矩。你看……”

“行啊，行啊，不知道是你亲戚，快过去吧。”迟解放还是挺通情达理的。

时治国也没别的法，只好松了手，还没忘了说：“下次别再来啦。”

王山领了高梁山父女就回家了。

民兵小分队又走到一个鱼摊前，时治国看见一个人推着自行车，穿着中山装，不像个老百姓。革命几十年以后，老百姓这个词渐渐地专门是指农民了。好像在单位里有工作的人已经不是老百姓了，是老百姓之外、老百姓之上的人了。时治国认真得很，又上去问了，果然不是农民，是县城里一个饭店来买鱼的，他又要赶他走了：“不是本公社的人，不让来买。”

“不让我们来买，你叫我们县城里的人上哪儿去弄鱼啊？上地瓜地里去钓啊？”那人不在乎时治国，还说起了俏皮话，惹得四周的人哈哈大笑。

时治国脸上一阵红，想发个脾气、摆个架子，可还没学会这一套，一时有点下不了台。

迟解放又出面了，问那人：“你是哪个饭店的啊？”

“东风饭店。”

“带介绍信了吗？”

“没听说买鱼还要带介绍信的。”

“为了加强市场管理，这是我们公社的新规定。这次不知道就算了，下回要带上啊。”

离开了鱼摊，时治国好生郁闷，就问迟解放：“这公社的规定执行不下去，怎么办？”

迟解放说：“这要看具体情况啦。人家有正常的需要，非要去拦，当然就执行不下去了。”

“那咱们怎么办呢？”

“也就根据具体情况啦，人家也不是干犯法的事，这么认真干吗呀？”

王山把高梁山父女领到了自己家。

王大妈一见，也能记得起来，连忙倒水请坐，“那时得要谢谢你们啊。”

“唉，那时想帮你们，也帮不上啊，也不敢帮啊。”高梁山还问起了回龙头以后怎么样啊。

王山母子又是几声哀叹，一行热泪，把老王头的惨死等等说了一遍。

高梁山听了，也是又惊又悲。

王山说：“不讲那些了。你怎么想到过来了？”

高梁山说：“想卖点蘑菇，换点现钱。连买油买盐的钱都没有，怎么过日子？”

小女孩说：“我是想来看看大海。”

“好，一会儿我们就去。”王山对高梁山赞赏地说：“你这丫头挺不善。”（“不善”，海源话里有时是褒义词，勇敢、不打怵之意。）

“不好意思啊，都是在家里惯的。”

小女孩叫高秀珍，不认生，刚十岁，在上小学，提起刚才的事还气鼓鼓的：“我就看不惯坏人。”

大人们都笑了。

“走，我们到海边去。”王山说。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这儿的。”高秀珍说。差不多十年之后，高秀珍竟然成了老王家的一员。

44.3 铲资本主义的苗

集市上的事可以睁一眼闭一眼，收回自留地可真像是从社员身上割肉一样。公社要求自留地每人不超过一厘地，就西北村来说，就要收掉一半，这可是难办的事，而且公社真的还要来检查，想瞒也瞒不过去。怎么去收？叫团支部去收，肖胜利不干；叫民兵队去，彭小宾也不干。平金刚实在没辙了，只好又叫了秦德才来。谁说秦德才没有用，这不就有用了吗？

秦德才又高兴起来。可再叫上谁呢？储小二死了，少了一个跟班的，这对秦德才是个大损失。秦德才想来想去，能喊得动的，愿意干这事的，首先是他儿子，再有就是时治国。还有就是齐成才、皮高深几个。秦德才去喊一遍，除了他儿子和时治国外，没人愿意来。

社员们看躲不过去，把自己自留地另一半地里的白菜、土豆都砍了、拔了，一边拔一边心痛得直骂。

秦德才领着那两个人来了，又是几番鸡飞狗叫，又是几番争吵和叫骂。

邬大妈已经是满头白发，可还是气不服某些事情，见秦德才收地铲庄稼，就讲了：“这算是在干什么呀？家里都没有粮没有菜，还这么糟蹋啊。”

秦德才一拍胸脯，呲着牙说：“这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通通都要铲掉。”

秦德才他们又来到于村长的自留地旁，于村长扶着锄把站在地头，秦德才都不敢上前。秦有理上前，不敢提收自留地，而是挺客气地说：“老于村长，我们来丈量下各户的自留地，你家还整出来啦？”

于村长手指着旁边一块已经铲掉了植株、地上狼籍不堪的空地，从鼻子里哼了一下，说：“喏，就是这块。”

“好，好，好。”秦有理连连点头，叫时治国在纸上记下。

他们走后，于村长脚一跺，往地上“呸”地吐了口痰：“弄了盘什么景？那块地腾出来有用啊，谁要？还不是白白地晒太阳。”

是啊，各户退出来的那小块自留地，并不能再分给别人。因为别人要了这块地，他自己原先的地就要交上去，上面的菜不是白种了吗？所以尽管从每户收回了一半的自留地，可那些地块都很细碎，好几十块，分散在社员们的自留地之中，生产队也很难利用，白白地闲在那儿。开春以后，胆子大一点的，还是捎带种上了。

就这样，大田里的生产上不去，自留地又收了上去，社员们的生活水平又降到了仅高于三年困难时期的水平。正如万里委员长在文革结束不久从农村视察回来后所说的：“我是在农村长大的，但这次到农村一接触，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真是家徒四壁呀！”（请见《改革年代：邓小平的改革岁月》，韩广富、胡永强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

第四十五章 农业学大寨

1960年2月14日

文革时，除了大学毛泽东著作、大学毛泽东思想，还有全国范围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对于农村来说，大寨就成了要顶礼膜拜的学习榜样，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也成了红极一时的权臣。早期的陈永贵以及他所领导的大寨，确实还是一个干出来的先进典型。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陈永贵也是头脑发热，卷进了政治狂潮，处处以阶级斗争为纲，跳得很高，成了执行“左”倾路线的一个典型。

就以凌志军先生的一段话作为佐证：“陈永贵的施政原则是，专政的力量必须覆盖所有农民，始终不能有丝毫懈怠……基于这样的信念，陈永贵订立了一整套驱除人们内心私欲的方法。其要点就是严密注视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从中找出违反政治标准或者道德准绳之处，将之消灭于萌芽状态。每天晚上，党的支部委员们要在会议上将每个社员的思想动向公布于众，以供分析并研究之用。至于对策，则会由于不同的人而采取严厉程度大不相同的办法。”（请见：《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凌志军，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至于做表面文章、搞形象工程、虚报产量、飞扬跋扈，这些更不用说了。陈永贵的事，远不止上面这些。据最早在六十年代初采访过陈永贵的原《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副总编燕凌先生给笔者的口述材料中说：“甚至后来在‘文革’中有人举报且经调查证实陈永贵在敌伪时期做过日本的情报组织兴亚会昔阳分会头目，报告给毛，毛却硬压下去，说这个事不许再提。于是，陈永贵这个不光彩的历史污点也就不算什么问题了。”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批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中央在批语中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寨成为执行“左”倾路线的典型，学大寨运动造成了严重后果。

而在劳动生产方面，可以说，学大寨运动中的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则近似成了奴隶主对奴隶的强迫劳动，亿万农民又一次遭罪了。

这年冬天，寒风凛冽，雪花飞舞，又到了兴修大寨田的时候了。这是极左势力在农村搞生产的主要方式。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皮鞭，强行驱使农民，不顾实际可能与需要、不计成本、不惜民力，去做农田水利建设的表面文章。如果说1958、1959年是以假共产主义的狂热和欺骗来推行这一套，到了这时则完全是以暴力手段推行。谁不好好干，那就是破坏生产、破坏革命，就要进“专政队”。

要问，为什么非得等到天寒地冻才来修大寨田？因为一年之中，只有这个时候农民才没有别的农活，地里也没有别的庄稼，才能空出时间来瞎折腾。

程贵安和宗发奋制订了龙头公社大寨田规划，要在大河南北搞万亩大寨田，连成一片，中间有一条条笔直的机耕路和沟渠，每块地都四四方方。田野里的村庄都搬迁出来异地重建，搞社会主义新农村。画在纸上真好看，恐怕真的到了共产主义也不过如此。

又像1958、1959年那样了，社员群众一早就上工，集中几个大队的劳力，大兵团作战，离家几里、十几里。左倾狂热的家伙们，思维既很出奇又很贫乏，弄来弄去也就这么几招。但是没有食堂了，要靠家里来送，饭食的好坏还在其次，顿顿吃的都是冷饭，不到天黑不让收工。

难怪，经济学家董辅弼在八十年代说：“人民公社制度从社会学意义上说是现代农奴制度。”（请见2008年11月27日《南方周末》）

这些天，西北村在粮管所西南面的大田里开挖四个大口井。因为传统的水井，口径小，出水量有限，于是就开挖边长几十米的大水塘，像个游泳池那样。这本来并不是不可以，但是要根据不同的土质，因地制宜，合理施工，注重实效。

程贵安在县里已经把牛吹出去了，把龙头公社的大口井说得天花乱坠，就像把三峡水库变成千百朵花瓣散落在龙头大地。县里决定在龙头公社开现场会推广。

可西北村才刚开始挖。

平金刚对程社长说：“等下个月再开现场会吧，我们抓紧点，下个月有个差不多。”

程贵安对平金刚都不肯多看一眼，说：“不行，这是军令，必须执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把全部劳力都压上，白天黑夜地干，我就不信搞不起来。搞农田建设，也要敢于啃骨头，敢于打大仗、打恶仗。跟革命战争一样，集中兵力，不惜代价。我们就是靠这个取得胜利的。”

这几天，西门外，白天红旗飘扬，晚上挑灯夜战。大喇叭里放着最时新的学大寨的歌曲：

“一道清河水，

一座虎头山，

大寨那个就在山下边。

七沟八梁一面坡，

层层梯田平展展，

层层那个梯田平展展……”

看起来是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

第一个大水井快要挖出来了。有二人多深，地面上已结成了冰碴，底下，水在不断渗出。辛狗狗、齐成才、迟解放几个在下面挖，掀到中间一层。中间一层有皮高深、于又发、时治国几个再往地面上掀。由于没有条件装抽水机排水，下面的几个人都站在水里。虽然在不断地抡胳膊挖土，往上掀，头上在冒汗，双脚却冻得发麻。

由于水的浸泡，土不结实了，承受不了上面站的人。突然，那泥壁毫无先兆、毫无声息地塌了下来。只听得“啊”的一声，一切都来不及了。

迟解放眼疾手快，跳了出来。

齐成才是个近视眼，反应不过来。在他边上的辛狗狗大喊一声：“快跑！”一把就把他推了出去。

被推出来的齐成才回头一看，辛狗狗不见了，全部被埋在泥土里，而且能看出他在泥里还高举着双手，托着从上面掉下来的时治国。大家把时治国拉上来，看见了辛狗狗被泥浆糊住了的几个手指。

“快呀，扒呀！”迟解放喊着，大家都围上来扒，四周的人们都跑了过来。

几分钟之后，辛狗狗被扒了出来，完全是个泥人了，鼻子里、嘴里、耳朵里也全是淤泥。

“快用水冲啊！”鲁队长跑过来，大声呼喊着。也不管水有多凉，大家用手掌捧着水，冲洗着狗狗的脸。

迟解放用手去掏辛狗狗嘴里的泥，还不行，又用嘴巴上去吸，一口口地吸进自己嘴里，再吐出来，又去吸食狗狗鼻子上的泥。终于，狗狗吐出了一口气，使劲睁开了泥巴糊住的眼睛，说了声：“没有出事吧？”

这时，时治国才在边上哭出了声，狗狗是为了自己才差点丢了命，而自己以前还那么对待人家。

迟解放背起狗狗就往回跑，彭小宾脱下自己的外衣，披在狗狗的身上。于又发把自己的外衣披在彭小宾的身上。

迟解放把狗狗背进了粮管所。祖所长一看，二话不说，立即招呼人，把火弄旺，烧开水，让狗狗洗个热水澡。

衣春玲背着药箱也赶过来了。

等邢秋芬闻讯赶来，已是最后一个了。当她听说工地出了事，狗狗被埋到了泥里，那是一边哭一边跑过来的。等跑进粮管所，看见已经洗过澡的狗狗躺在被窝里朝她一笑的时候，秋芬说：“可把我吓死了。”两滴泪就掉在了祖所长的被窝上。

当程贵安听说西北村的工地出了事，有社员舍己救人，连说：“好啊，赶紧向县里上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伟大胜利，是龙头人民在党委领导下战天斗地的胜利凯歌，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生动事例，要大力宣传。”

当他再听到舍己救人的英雄不是别人，而是国民党地主的儿子辛狗狗时，脸一沉，说：“不会吧？那就改成时治国救辛狗狗。”再一想，也不对，那就成了知识青年救狗崽子，也没有宣传价值。“那就不提是个人了，就说是龙头公社的社员。他们也是社员嘛。”要问，那英雄事迹里的具体人物也能改来改去么？你要是问宗发奋，他就会笑话你了，太天真太幼稚了。他就会告诉你，那个工业学大庆的经典场

面，第一个跳到泥浆池里用身体搅拌泥浆的人原本是个技术人员，因为不想用知识分子作为典型而换成了一个工人。

他还特地关照了：“要保护现场，保留原样。等县里来开现场会，这是最好的现场。这下我们汇报的时候就有了最新最好的内容，但是不要说那个国民党的儿子。要说成是西北村英雄集体舍生忘死在救一个人。要突出那个迟解放的救人事迹。是叫迟解放吧？什么成分？中农？怎么没有贫下中农呢？你们贫下中农都去干什么啦？名字还叫个迟解放，姓什么还不行，非得姓个迟，还迟解放。改过来，叫早解放，盼解放，多好啊！”

那拼死拼活挖出来的大口井，二、三年后就弃之不用了。因为后来有个专家指出，靠海边太近，这样用水反而把海水从地下渗透过来，不用几年，这龙头最好的良田，就会变成盐碱荒滩、不毛之地。

第四十六章 粉碎“四人帮”

1960年2月15日

46.1 天怒人怨

1976年，将是永远写进中国历史的一年。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

1976年4月，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发泄对极左势力的不满。极左势力出动以“首都工人纠察队”为名义的武斗队，进行残酷镇压，称之为“四·五天安门事件”。

1976年7月，朱德委员长逝世。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24万人罹难。那一夜，笔者在隔了一个渤海湾，又隔了一个胶东半岛的海源，也感到了床铺的颤抖。

这年局势动荡，天气也不正常。龙头乡天旱了，从秋冬季雨水就不多，到了这盛夏之际，更显得旱情之重。土地龟裂了，玉米叶都缩卷着，边缘泛起了黄色。人们的心里更着急。

皮安己虽然对平平的婚事不甚满意，但已经这样了，也不去多想它，地里的庄稼还是牵动着他的心。尽管这庄稼跟他的关系，不是很直接、也并不是很多，然而庄稼人的本能使他放不下这颗心，就跑来队部问平金刚：“怎么上级还没说话呀？这地干成这样，总得拿出个办法呀？”

要说这天旱，各队各户自己浇水不就得了嘛，还要问上级干什么？但那时候，什么事都是由上级管着，你没有生产自主权，你只有听命令、干活的份。

“上级是说了话，但不是去抗旱，而是要去种文冠果。”平金刚也是在无奈地说。

“那灌溉的事呢？去年搞了那么多的水渠、水塘，不是都可以用上吗？”皮安己还在问。

“别提啦，那些东西，开现场会看看还差不多，真用就不行啦。”平金刚说。

“那怎么啦？”

“修了那么多的灌溉渠，要从北山引过水来。可咱这儿没雨水，几十里外，百把里外的北山，就有雨啦？它也没有水，引什么呀？”平金刚忿忿地说。

“唉，白出力气、白辛苦啦，狗狗差点也白死了。迟解放也白当了一回救人英雄。”皮安己说。

又过了半个月，旱情不能再拖了。县委终于来了通知，要求深入发动全县广大群众，大打一场抗旱保收的人民战争。龙头公社也立即召开三级干部会，坚决贯彻落实县委通知精神，号召在全社范围男女老少齐动员，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旱保收的群众运动。

大会放在中学的操场。说也奇怪，当人们陆陆续续来到操场，准备开这抗旱大会时，天上起了云彩，掠过来一阵久违的凉风。

郭中和坐在人堆里，吹不到，干脆迎着风站了起来，掀起了衣襟，嘴里嚷着：“好痛快啊。这大太阳一听咱们要抗旱也躲了起来。”

周围的人还一阵哄笑。

程贵安叫人扶了上来，拍了拍麦克风，大喇叭里“噗噗”地响着，这是提醒被领导的常用信号，而后又极威严地扫视了会场，用早已沙哑了的嗓子喊着：“都坐好了。各队清点下人数。马上开会！”

会场安静了下来，风在刷刷地吹，云层渐渐地上来了。

程贵安掏出了准备好的稿子，念了起来：“首先，宣布大会纪律：第一，与会人员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云层越来越厚了，天色竟然暗了起来。

程贵安在念：“我们要充分认识抗旱保收的重要意义。首先，第一条，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风也越来越大了，郭中和已经扣上扣子。

“旱情是老天爷对我们的挑战，我们要以人定胜天的大无畏精神，战胜一切困难……”

天都黑了，乌云在翻卷。人们都在抬头望着天上。

“注意听讲，注意听讲！下面讲抗旱保收重要意义的第四点……”

“咣”，一道闪电过后，一声惊天霹雳从天而降，打得坐在操场的人们屁股都跳了起来，吓得这些庄稼汉子也都拍着心口，直喊“喔哟，喔哟。”

“打个雷，算个什么，看把你们吓的，像个干部样么？”程贵安鄙视地看着下面，“都坐好了。我接着讲……讲到哪儿啦……都是叫你们搅的……下面接着讲抗旱重要意义的第三点……”

“第四点都讲过了。”人群里有人在嚷。

“吵什么呀？多听一遍，不是更好么。”程贵安很不耐烦。

一阵大风过后，天上竟然掉下了豆大的雨点，“啪啪”地打在人们的身上和地上。人们慌忙地跑开了。

“不许走，不许走！我都还没走，你们走什么！要做好抗旱斗争的长期准备。不要因为下了几滴雨，而存在任何侥幸麻痹心理。”有人给程贵安撑起了伞。“下面讲抗旱保收的具体事项……”

从没见过的瓢泼大雨，当头浇了下来。操场上溅起了一片水珠和雨雾，不一会儿满地浊水横流。人们都躲避在各处的屋檐下，听程贵安还在讲如何抗旱浇水的具体操作要领。

半小时之后，有人拼命地跑进操场，大叫着：“不好了，出事了，孙家乔的水库垮坝了！好几户人家被冲没了。”

“打个电话，问下情况。”程贵安很不高兴地停下演讲，说了句。

“电线杆都冲倒了，电话都断了。”来说。

人们纷纷冒雨往外跑。

程贵安还在喇叭里叫：“还没散会呢，还没散会呢，抗旱的具体问题还没讲完呢。”

郭中和站在雨中，对着台上喊：“该结束啦！”

这场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冲垮了孙家乔的塘坝，冲倒了沿河沟的几栋民房，更不幸的是冲走了在沟底舀水的孙大娘。

孙大娘九十多了。从孙二赖被枪毙以后，孙大娘就自己一个人过。其实这个儿子有没有也一样，孙大娘从没有得过他的济（得济，海源话，是得到帮助的意思），更没有指望过他。她每天颤颤巍巍地自己拾柴、点火、做饭，在邻居乡亲们多少有点的帮助下，令人难以置信地存活了下来。

孙大娘已经不能从井里拽一桶水上来，平常用水就到屋后的沟里去舀水。这一阵天旱，她要到更下面的沟底的一个小水潭里去舀。那沟底满是陡峭、坚硬而又滑溜的石块。当大雨突降的时候，她想往上爬，一半时也上不来。

孙家乔河沟上的上游有个人工筑坝的水塘。几万立方库容的塘坝，在水利工程的分类上称不上水库，说不定在县水利局的档案中还没有它的份。然而一旦溃坝，在一条小山沟里，在孙大娘的面前，其威力决不亚于原子弹。当山洪冲决堤坝，数万立方的水卷着杂木、泥石，在暴雨中翻着几米高的浊浪，呼啸而下，就像一个巨大的恶魔，瞬间就吞没掉它所遇到的一切，包括孙大娘。

几天以后，人们在海边的浅滩上发现了大娘的尸体，不知是洪水冲过来的，还是冲下海后又被卷上来的。按海源的说法，大海是不留人的。

人们掩埋孙大娘的那天，程贵安召开了另一次的全社干部大会。会上，他继续做着报告：“今年，我们战胜了百年不遇的旱灾，接着又战胜了百年不遇的洪灾。这再一次体现了我们镇党委坚强正确的领导，体现了龙头人民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尤其是再一次证实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

他没有提到久旱之后，最要注意的、最容易出危险的是那干裂了的堤坝。

自然界往往以这种人们所意想不到的方式，在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出现意想不到的警示和变化。在社会生活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46.2毛泽东逝世

1967年9月10日，很平常的一天，天气也很好。

中午，正是各户人家吃饭的时候，小喇叭突然响起了公社的通知：“今天下午四点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第一遍说的时候，还没怎么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那时的重要通知太多了，有时一个月就有好几次。

但十分钟以后，这个通知又重复广播了一遍。再十分钟后，又重复了一遍。这可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这之后，又不断地重复，而且还加了一句，请各大队组织社员集体收听。

即使是在文革的惊涛骇浪中摸爬滚打了十年的人们，也感觉出今天这个重要通知的不同寻常了，怕是中央又出了什么大事情。人们开始有些喘喘不安。有的人，悄悄地关上了门；有的人，则端着碗走出家门去找可以说得上话的人探个究竟。

大队干部们则更有这个意识，杜家骏嘱咐唐玉贞关好大门，自己轻轻地走出去找鲁队长，只在他家窗上轻轻地说了句：“五分钟后，你也去彭小宾家。我先走了。”

杜家骏到彭小宾家，既没敲门，也没打招呼，轻轻地进了门。彭小宾俩口，抬头一看，什么话也没说就明白了，轻轻地请上炕，放下窗櫺，掩上房门。不一会儿，鲁队长也这么来了。

三个男子汉上炕。衣春玲则坐在堂屋里，要是有人来，也可以先说上几句话，让里面的人有所准备。彭小宾虽然前段时间拉起了“红太阳”战斗队，观点上与“革联指”不尽相同。但他们三人间，都还觉得彼此之间是可以信任的朋友。

彭小宾先问：“不叫平金刚了？”他觉得平金刚也是“革联指”的，所以要问一下。

鲁队长说：“不用了。”也没多解释。

杜家骏说了：“我们这不是开会，就是三个好朋友一起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三个悄悄地议论起来。具体每个人说的是是什么，我们就不记录了，主要是在猜测今天下午的重要广播可能会是什么，需要作些什么准备？他们谈到了有这样几种可能：又出了林彪事件？不像。周恩来、朱德已先后去世，在台上已没有影响力很大、可以与他们相比的人物了。即使出了这种情况，也用不着以这种方式通告。林彪事件那时，是采用通常的逐级扩大范围、一层一层往下传达的办法，以减少震动。往好里想，是宣布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那句话，都已经讲了十年了。也该结束了，今天终于真的到底了？也不像。真要那样的话，应该是全国欢庆、全民欢腾啊。不会是这种沉闷的方式吧？再想远一点，往坏里想，还能是发生政变，修正主义上台了？更不像。真要是修正主义上台，也不会是这种方式，不会是发个通知说，我这个修正主义今天上台了。

那到底会是什么呢？西北村的三个农民政治家直到重要通知广播之前，谁也没想出来，谁也不敢往那上面去想啊。说他们是农民政治家，也不是奉承。那时候的人们，尤其是男人们，几乎可以说人人都是“政治家”了。

下午四点，全大队的人几乎都来了，悄无声息地坐在大队部前的空地上。那是西北村多少个政治事件发生的地方，今天又会发生什么呢？

大喇叭终于响了，中央台的播音员发出了极其沉重的声音：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毛泽东逝世了！

毛泽东逝世了？

是的，毛泽东逝世了！

全场惊愕。人们都张着嘴巴，瞪大眼睛，望着大喇叭，都在怀疑自己的耳朵。

人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尽管林彪事件之后，大家看得出来，他老人家已是面露憔悴、老态尽显，尤其是近两年看到他接见外宾时已是步履蹒跚，需要有人扶持。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伟人也是人，也有人生终结的一天。不但没想到，连想也不敢想啊。

广播在继续：“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全面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作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乘胜前进，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的伟大胜利。”（请见1976年9月10日《人民日报》）

场上有人轻轻地哭泣了，那是衣春玲。邬大妈、唐玉贞一些妇女也哭了。哭声渐大，没几分钟，男人们也哭了。很快，人们都反应了过来，全场痛哭，不止地嚎啕痛哭。好像要趁着今天，把这些年来受的苦、遭的罪，都倾泻出来。那哭声大得隔了几个胡同也能听得见。连从来不会哭的秦德才看着大家都在哭，也立即使劲地干嚎起来，哭得比谁也响，难听得不得了。

广播结束了，哭声依旧。人们一动也不动，都在那儿使劲地哭着。看上去，要是没人劝，都不会起来的。

差不多十分钟了，杜家骏红着眼，看看鲁队长，看看彭小宾，而后慢慢地站了起来，十分沉重地说：“社员同志们，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离开了我们，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们要继承他老

人家的革命遗志，沿着他老人家指引的革命路线永远前进！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向他老人家汇报。现在散会。晚上，各生产队再开会。”

有了杜家骏的这番话，人们慢慢站起，慢慢地相互搀扶着，依然哭泣着，抹着红肿的双眼，走回家去。

回到家里，各家各户都有程度不等的哭泣声。

要数靳喜悦家、迟一敬家哭得最厉害。靳喜悦当初是为革命而战斗，作战负伤而残疾。这些年来受了生产队集体不少照顾，他对革命是有感情的，对政府是感激的。因而对毛主席也是有着深厚的朴素的感情。他老人家一走，顿时就像缺了依靠，不知日子再怎么过。那个痛哭是发自内心的。

迟一敬虽然是中农，没沾到革命什么好处。但他对毛主席是由衷地敬佩。他觉得文化大革命应该搞，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干扰，没听老人家的话，才没有搞好。往下再怎么办呢？甚至在愧疚是不是自己种的那个毛主席像真的没种好，对他老人家有影响？迟一敬也只有痛哭了，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痛哭了。

也有人，不只是想到自己，不只是想到自己的家，还会想得更远一些。但要想得更远一些，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于西北村的人，这要求就高了些。

杜家骏在轻轻地流着泪，唐玉贞也是在流着泪问他，这文化大革命往下还会怎么样呢？虽然杜家骏在社员大会上的那番话讲得很得体，但是要问他往下会怎样，他也答不上来，确实是答不上来。他只能轻轻地摇着头。

同样的问题，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哈妹也在这样问鲁队长。鲁队长虽然也是摇摇头，却似乎更悲观一些：“不好办啊，不好办啊，以后谁能压得住这个阵脚？”

同样的问题，竟然也有不同的回答。彭小宾在跟衣春玲说：“说不定，新的一天就会开始。只是说不定，不能肯定。”

当然也有根本不去想的，比如秦德才。他才不去想那么些呢。以往几十年的经验告诉他，总会有需要狗的时候，总会有他用武的时候。说不定，就又有机会来了。尽管他也吃过不少亏，但那都是小亏。在那个世道里，他从来就没吃过大亏。怕什么？

晚上各生产队的会，传达了公社的意见，要大家扎花圈，准备开追悼大会。

晚饭前后，几个大队干部都在忙着。处在这非常时期，不能不多想一些，多准备一些。杜家骏到北门外找了经大臣。经大臣可是高级机关的干部，见多识广，应该会有自己的看法。但老经回龙头后，就没参加两派活动，也很少出头露面。甚至连那个重要通知也是在家里听的，没出去。当杜家骏问到他的时候，他想了一会儿，又想了一会儿，最后摇摇头：“这个不好说，这个不好说。”

杜家骏又找到了肖福兴。这位是知识分子，又是多年的中学校长，应该有见地。肖福兴对杜家骏的回答是：“看不清，现在还看不清。但是，会有变化，不会一直这样下去。不过往哪儿变，怎么变，什么

时候变，都难说。但肯定会变。”杜家骏连连点头，扎煞着其中的滋味（扎煞，海源话，品味的意思）。虽然各人说的不同，而且也都没有细说，但是好像没有一个人说，这文化大革命还会继续进行下去。

鲁队长想得更细一些，悄悄地来到李辰的家，对李辰说：“这段时间，一定不要多说话。”还给李辰正在上小学的女儿塞了十元钱。十元钱，在当时的农村，是个大数目。

那一夜，大概除了秦德才，大家都没睡着。半夜里，各队散会后，杜家骏、鲁队长又来到彭小宾家。事情是知道了，他们还得进一步商量村里可能会就此发生的事，和提前要做的事。比如，要及时掌握情况、互通信息，注意各种动态，要管好枪支，组织民兵夜巡，特别要注意阶级敌人、敌对势力的蠢动，比如地富反坏（好在西北村没有），同时也要注意原对立派别里少数品行恶劣的人可能有的活动（比如秦德才）。一旦再出现动刀杀人的事，立即坚决镇压，决不让文革初期的混乱状况再次出现。在这些方面，三个人的意见很一致。后半夜了，才分头悄悄回家。

9月19日，中央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群众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城楼前，新筑起了追悼大会的红色高台，上面排列着翠绿的松柏和淡黄的秋菊，陈放着“由栩栩如生的葵花，嫩绿的玉米，金黄的麦穗、稻穗和谷穗，以及果实累累的白色文冠果花组成的花圈”（按新闻稿原话）。

龙头公社同时也在中学操场举行全公社的追悼大会。

会场秩序井然，全场肃立，先是全体默哀三分钟，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而后听着来自天安门广场的广播。北京的大会结束后，公社领导作了简单讲话。这种场合也不敢多讲，事先也不知道中央怎么讲。所以也就讲了几句，还赶不上杜家骏那天在西北村讲的呢。末了，各大队向主席台前献花圈。

最后，各村群众哭着鼻子缓缓离场，谁也不能走快。这场景，对有的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比如申光荣。他父母双亡，饿死在困难时期。但他自己感受深刻的是，集体收留了他，政府养育了他，他感谢党和政府，感谢毛主席，他觉得千万人的悲痛是真情流露，也是他的真情流露。也有想得不一样的，比如邬中和。他心里在想，快点走吧，整天喊万岁，喊了几十年了，终于也喊到了头，有了这最后的一天。不知道这态度，算不算是唯物。

46.3金秋十月

人们的心情非常沉重。毛泽东的逝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新的时代（或时期）的到来。但人们不知道的是，将要到来的将是个怎样的时代（或时期），以及将会怎样地到来。

答案很快就有了。

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同志代表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

文化大革命，人类历史上少有的这场悲剧、闹剧和丑剧，终于以毛泽东的逝世和“四人帮”的彻底覆灭而结束。

这么重大的事件，人们一开始还并不知晓。

一个多星期之后，对政治最敏感的程贵安听说了。他是从县城里原先“革指联”的人那儿听说的。

他听说之后，内心的震颤难以言状。但毕竟是多少风浪挺过来的人，外在表现却是脸色沉重，一言不发。

等回到龙头，他倒在床上，想了一下午，想了一晚上。

“这是怎么了？”他心中在想。

“这是怎么了？”别人在看他。

第二天，他找了觉得还能说得上话的宗发奋，把这事一说。

宗发奋一听，惊得从坐椅上弹了起来，瞪大了眼睛，一个劲地问：“真的吗？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程贵安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却自言自语地说：“下一步局势会怎么变呢？”

“那就全变啦，全乱了套啦。连毛主席的夫人都敢抓，这胆子也忒大啦。这不就是修正主义复辟了吗？”

“这倒不用操这个心。在中国，就算是复辟封建主义，也不会复辟修正主义。”

“那我们怎么办？继续造反闹革命？警惕走资派重新上台？”

程贵安原本也没打算从宗发奋那儿得到什么教诲和指点，但这么一说一讲，心里倒是清晰了一点。这才对着宗发奋认真真地说：“要坚持他老人家的革命路线不改变，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有我们继续革命往前走的路。”

“对，对，对。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高举革命的旗帜永不变。”宗发奋也想起什么来了。

这之后几天，消息就传得越来越快了。

乡亲们的心情跟程贵安不一样，人们的脸上有了欢欣的喜悦，见了面都高兴地点着头，靠近着说：“好啦，好啦，好日子快来啦。”

彭小宾把鲁队长、邬中和、肖胜利叫到了自己家里。衣春玲问，怎么没叫老杜。彭小宾说，他是书记，不方便来。

来的几位都听说了那事，也不知道这话是谁传给谁的。

走进彭小宾的堂屋，大锅里冒着热气，满屋子一股海鲜味。

“哎哟，做什么好东西呀？”鲁队长心里很明白，还在明知故问。

“一会儿就知道啦，先屋里坐。”衣春玲一脸笑容，忙着招呼大家。

几位上了炕，邬中和还压着声音神秘地问大家：“你们都知道啦？”

大伙都笑了：“知道啦，都知道啦。”

肖胜利说：“还是党中央有力量啊。别看那几个跳得那么高，你看一下就解决问题了。真是大快人心啊！”

邬中和愤愤地说：“这帮家伙，真是乌龟王八蛋，装得比谁还革命，讲的比唱的还好听，却是一肚子坏水。不得人心，就该灭亡啊。”

彭小宾站在炕下说：“这十年是群魔乱舞，跳梁小丑尽情表演，人民群众受气，正直的人、有正义感的人受难。”

鲁队长说：“是啊，你看这文化大革命，折腾了多少回，搞了多少名堂啊：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开始，什么挖出三家村、揪出彭罗陆杨、打倒刘邓陶、反二月逆流，还有什么打倒王关戚、打倒杨余傅、抓五一六、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又是林彪出逃，又是批林批孔批水浒，临末了还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有天安门广场事件。这十年的事，数都数不过来。老百姓早就受够了。”

邬中和急着说：“那怎么不赶紧公布呢？”

彭小宾说：“恐怕是防止还有些四人帮残余分子狗急跳墙搞捣乱。中央先安顿好了再说。”

邬中和点着头说：“对，对，先收拾完一批，再搞下一批。”

鲁队长又有点忧虑了：“这是个大事情哎，下一步不知会怎么发展？”

邬中和有点生气了，“他们造反派还会再闹？咱不怕他们。”

肖胜利说：“这不是造反派、保守派两派的事情，这是正确路线和极左路线斗争的问题。极左路线在中国影响很大，势力也很大，要想到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不会一步就到位。”

鲁队长仰起头说：“嗨，多怀念五十年代建国初期的岁月啊。那时的人们多么兴奋，多么单纯，对革命是一心向往，又有激情，又有盼头。可惜是没几年就变味啦，变得不是那么回事啦。”

彭小宾说：“会好起来的，面包会有的，而且将来一定会比五十年代更好。”

“好东西来啰。”衣春玲进来把一大盘煮好的通红的梭子蟹端上了炕。

“哎哟，叫大妹子费事啦，”鲁队长忙客气着说。

“咱们不说别的，先庆贺一下，哈哈。”彭小宾说。

肖胜利倒是眉笑颜开：“听说外面都在吃螃蟹庆祝粉碎四人帮，还都是四个一串，三个公的，一个母的。咱可是一大盘啊。”

鲁队长哈哈大笑：“咱就不管三个、四个，公的、母的，有几个就干掉几个。”

“可惜没有好酒，只有二锅头，大家凑合喝吧。”衣春玲带着几分歉意，拿来了酒瓶和酒杯。

邬中和大嘴一张：“大妹子，客气个啥呀。有这么高兴的事，二锅头也能尽兴啊。”说着拿起酒盅，脖子一扬，咕咚一口，就喝了个底朝天，还连说：“好，好，好酒。今天觉得这二锅头也变得好喝了。”

肖胜利拿起一个蟹就掀开了盖，还拍打着：“叫它横行霸道，叫它横行霸道。”

小小的屋子里，充满了西北村农民纯朴的笑声。

卷尾语

人类历史上少有的这场闹剧、丑剧和悲剧终于收场了。

中国人民在这场大灾难中付出了巨大代价。对此，所有经历过“文革”的人（除了四人帮及其走狗）都感同身受，深切体会到那是个人妖颠倒、群魔乱舞、杀人如芥、冤案无数的黑暗岁月，无不痛恨极左路线。

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文革”总结时说，十年“文革”“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请见：《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董宝训、丁龙嘉，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

回忆这一段历史，我们有太多的感慨。

文化大革命，无疑是毛泽东一生最大的败笔。

所谓目的是为了“防修反修”，显然是言不由衷。采用的手段，也是极端的非理性的。整个过程惊涛骇浪不断，变化之快，起伏之大，反复之频繁，常常是出人意料，令人目不暇接又目瞪口呆。

文革初期的目标还比较明确，那就是打到刘少奇及其同伙。但1966年之后，再打到谁，就搞不清了。只看见打到了一批又一批，连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也一个接着一个地被揪出来。一开始还在数这是第几个战役，后来数不过来干脆就不数了。再后来，甚至依靠谁，也搞不清了。他所利用的三支力量，一个是打头阵的中央文革那帮，连连损兵折将，最后只剩了气焰很嚣张，却没有任何实力的四个人；一个是用来压阵的林彪军人集团，在与毛发生直接碰撞后全军覆没；一个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行政官员系统，也因为批斗走资派而屡屡伤及，后来其中的一部分，不很情愿地被重新启用，如邓小平，但最终还是放心不下，又一次地被整倒。到最后剩下的，只是少数几个有直接关系上来的地方官员，如华国锋和几个非林系的军人，如叶剑英（身边的服务员没算在内）。而在他逝世后才一个月就拿下他夫人的，正是这后两者的联合。

党内有意见分歧，本来很正常。但他不是用党内民主去解决，而是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而他所讲的阶级，不是马克思讲的经济概念，而是他自己定的政治概念。他所搞的阶级斗争，也不是本来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而是以我划线，打击他认为的异己。这些异己，往往还真不是异己。文革中被清除的，从刘少奇到林彪，哪个不是为他立过汗马功劳。

文化大革命，是史上最大的一场大忽悠。尤其是那些抱着一腔政治热情、真以为要用生命和鲜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追随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真心实意起来造“走资派”反的人，被忽悠得最惨。弄到后来，连忽悠别人的人，自己最后也被忽悠了。

文化大革命对全国各族人民所造成的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巨大损失，至今难以估量，也给之后的领导层带来了许多难处。

文化大革命对社会最大最深远的伤害，就是使社会信用荡然无存。不但人与人之间难有相互信任和理解，连政府的公信力和革命的号召力、凝聚力都受到了很大影响。再有什么人物出来讲话，不管是天花乱坠还是情真意切，人们心里都不免要掂量几下，这人讲的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虽然不会当面去问他。

“文革”最核心的要害，就是摧毁民主。“文革”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在民主被彻底摧毁之后，给国家、给人民能造成多大的灾难。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民主，社会就不可能正常发展；没有民主的社会，不能叫现代社会，甚至不能叫正常社会。

在社会主义时期，就更是这样。就如邓小平说的：“没有民主便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笔者还想指出的是，没有民主，就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民主，那只能是个人的专权。

到1976年“文革”结束时，革命胜利已经二十七年了，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却被极左势力糟蹋成那个样，是令所有人非常痛心的。尤其是令那些撇家舍业、拼着性命参加革命，建国后又为尽快实现美好理想而忘我劳动的人们，包括龙头和西北村的乡亲们，痛心疾首，难于言语。那时常常有人这样问自己，眼前极左势力造成的几近崩溃的社会状况，就是我们几十年来前赴后继、努力追求的革命理想吗？

历史有偶然，也有必然。

历史警钟，需要长鸣。以“文革”为标志的左倾灾难给了我们太多的历史教训。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噩梦？怎样才能防止这类灾害的再次出现（或许会换种别的形式）？到今天，还仍然需要我们深思，这决不是多虑。

文革是场噩梦。当文革结束的时候，就该是梦醒的时候。

但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梦醒了。有清醒的，也有还在沉迷的。

好在历史又开始了新的航程。

中国人民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执着、向往和韧性。他们在风浪和困难中继续前行。

下一卷就将讲述西北村、龙头镇的人们在新的时期里将是怎样地前行。

第四卷 乍暖还寒

第一章 解放思想

1978年1月1日

1.1 真理标准

1977年，一个新的春天。

大街上反复地播放着施光南作曲的“祝酒歌”：

“美酒飘香啊歌声飞，

朋友啊请你干一杯，

请你干一杯，

胜利的十月永难忘，

杯中洒满幸福泪。”

西北村的乡亲们又是高兴，又是期盼，又是等待。

高兴的是粉碎了“四人帮”，极左势力的猖狂终于走到了头，期盼着平和的好日子又能来，等待着新的政策早早地颁发，好让大家把憋了多少年的劲头再使出来。不是这地没能耐，更不是这人没能耐，而是这十多年把劲使歪了。

但是，“四人帮”是倒了，思想斗争却远没有结束，极左势力的影响也远没有结束。极左的那套做法，对于很多人已经是根深蒂固、习以为常了，稍一改变反而觉得不正常了。

这不，程贵安书记又召开公社三千会，布置在新的一年里继续“抓革命、促生产”。他拄着双拐，还不肯坐，站着靠在讲台边，讲得很辛苦、也很激动，不时还抬起胳膊舞动两下，又赶紧收回去来夹着拐杖，“我们要永远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搞好‘农业学大寨’。今年春天，要抓住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机遇，以阶级斗争为纲，掀起‘农业学大寨’的空前的大高潮。前两年我们规划的全公社万亩大寨田，被右倾翻案风和‘四人帮’的干扰而停顿了。我们要排除右倾翻案和‘四人帮’形左而实右的干扰，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价，在今年把它搞起来。我们全公社组成一个大兵团，打破各大队的界限，集中兵力，打一场‘农业学大寨’的人民战争。谁敢反对，那就是敌对势力，就是和林彪、四人帮一伙，我们的回答就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永远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会场上鸦雀无声，只有听的，没有说的。

大队长平金刚回村，当晚就召开社员大会，传达公社程书记的讲话。

“明天一早，大家带上两顿饭的干粮，到望海山下集合，听从公社统一安排。叫上哪个村干活，就去哪个村干活，不得有误。”

邬中和虽然在文革时坚决和平金刚在一起，但这时两人的看法不一样了。因为自认为和平金刚的关系不错，所以也敢公开讲：“怎么还和四人帮那时候一个样啊？”

“是啊，干农活不能这么干，我们从1958年到现在，吃这种苦头还少啊？！”于又发也在下面喊。

“是啊，是啊，不能这么干啦！”下面一片吵吵声。

“这里公社的安排，你们吵什么？不怕无产阶级专政啊？”平金刚讨厌起邬中和、于又发了，也想学程贵安的办法压一下。

“我们不去，我们就是不去！”下面到处都是这样的声音，平金刚已经看不过来到底是谁在这么说。

平金刚感到，情况不一样了，不是几年前谁也不敢放一个屁的时候了。只好宣布散会，支部留下来讨论怎么办。

村支部在大队办公室里继续开会。

都已经过了半夜十二点了，15瓦的灯还在亮着。

“怎么办？”平金刚问。

“折腾了那么多年，应该让大家喘口气了。困难时期以后，1963、64年那两年的调整，和1974、75年的治理整顿，现在看来都是对的。”鲁队长说。尽管他已经什么队长也不是了，大家还都是这么称呼。

“四人帮不对，没说反击右倾翻案、搞社教，也不对吧？”平金刚问。

“现在没说，不等于以后也不说。”鲁队长很平静地说。

“那明天怎么办？社员都不去，程书记那儿怎么交待？”平金刚问。

“那你就说社员都喊不动，我也没有办法。”杜家骏说。

“要是程书记说再搞‘专政队’，再把秦德才请出来呢？大家不得更倒霉啦。”平金刚还是担心。

“现在还叫秦德才这种人出来？没等他动手，大家就先把他的腿砸扁了。这家伙杀人打人，还一直没有受到惩罚呢。”鲁队长说。

彭小宾又提出了新的问题：“趁现在这个时候，社会正在大变革，我们把有些办法改一改。把以前能调动大家积极性、行之有效的办法，再拿出来，比如：扩大自留地，人七劳三，甚至还可以改成人六劳四。这样大家干劲就大了。”（说明：人七劳三，是生产队年终分配的比例。增加按劳分配的比例，能鼓励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这个问题，平队长就更不敢去跟程书记说了。”杜家骏呵呵地笑了起来。

第二天，整个龙头镇没几个社员去望海山下集中。

程贵安眼看自己的宏伟规划成泡影，连忙召开公社党委会，要用党委的力量来推动计划的实施。

他显然被激怒了，用拳头敲着桌子：“胆敢对抗公社党委，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我建议再次组建‘专政队’，还是那句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就不信那些家伙，不怕对他实行专政。到时候，哪个也会一溜溜的。”

好长时间没人发言。程贵安的眼睛威严地四下扫视着，是在寻求支持者，也是在迫使别人表态。他的眼光停留在纪海洋的身上。纪海洋现在没有担任职务，本来他不想发言了，发现程贵安在盯着他，只好讲几句了：“现在再搞专政队的那种办法，恐怕不合时宜了吧。”

“‘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讲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是毛主席讲的。怎么不合时宜？这可是个原则性的问题啊，纪海洋同志！要知道，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指示，我们都要不遗余力地遵循。谁想改一个字，我们就坚决打倒谁。”

“对，这是个大的问题。”宗发奋也接着说。他现在是党委宣传部长兼公社政治部主任。“我们相信毛主席要迷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盲从的地步。他老人家不在了，我们更要按既定方针办，一字一句不走样。”

“你们讲到哪儿去啦，”纪海洋也正色道：“我没有说不照毛主席的指示办，我也没有说不要学大寨。问题在于怎么学。毛主席说了：要实事求是，要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在当前条件下，在龙头镇这个地方，具体怎么学大寨，要好好研究。不能动不动就把过去极左的一套拿出来。”

“你说我搞极左啊？这个帽子戴不到我头上！我才是极左路线的最大受害者，我的腿都被造反派打成这样了，我还会搞极左？谁要搞极左，我第一个站出来和他斗。”程贵安都有点急了。

纪海洋说：“可是你这套办法拿出来，群众不欢迎，受到了群众的抵制，这就很能说明问题。毛主席也说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不愿意做的事情，不能再强制推行下去。”

宗发奋就说了：“你也找几条毛主席语录，他也找几条毛主席语录，哪个是标准啊？照哪一条语录办啊？”

这时祖云涛说话了。他是前不久，作为“吐故纳新”，“吸收新鲜血液”，刚提拔为公社副主任的。“看来我们也真需要来一场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啊。对毛泽东思想，我们要全面地、准确地加以理解，不是就某一句话、某一段话。哪个是标准啊？不知道你们注意学习了没有，不是哪个人的哪一句话就是标准，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死抱住一句话、一段话不放，搞‘本本主义’，这也是他老人家所反对的。”

这一番话，说得大家目瞪口呆。一是这样的话，他们都没怎么听说过，也没想过；二是，这年青人一来就和这些“土八路”不一样（注：“土八路”是解放初期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农干部对自己既谦虚又自豪的称呼）。

“我听说，西北村有的干部还要求恢复1975年初治理整顿时提出来的一些办法，比如扩大自留地、分配改为人七劳三，恐怕你们就更不敢同意了。”纪海洋对程书记微微笑着说。

程贵安的劲头也没有刚才那么足了，说了句：“别人的意见，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不同意。”

会议最后不了了之，无果而终。

1.2民主选举

西北村的社员们就这样等了一年。

1978年的春天又来了。

“还要等啊，我们不等了。文化大革命耽误了我们十年，这又等了一年，我们还有几年可以等啊。”彭小宾兼任第三小队的队长。这天出工前，他们在三队的饲养棚里对三队的社员们说：“咱们队自己改变一下，还按人七劳三来分。各家的自留地，1974年分给你们的那块，大队也没收回去，反倒荒了好几年，今年各户自己再去种上吧。你们看怎么样？”

“好，好，”大家叫好声一片。

于又发问：“好是好，大队能同意吗？”

“咱们悄悄地，就咱们队里知道，对外不要说。就像当年老村长分粮那样。”

“好，好，”又是一片叫好。

当然再有好事也有不乐意的。这件事上不乐意的就是申光荣了。因为他个子小力气也小，也可能是因为力气小，就更不爱干活。大家对他印象不好，只给他定了七分劳力，还是彭小宾把他加到了八分。分配当中把人口所分的比例降下来，劳力比例加上去，对他这样有两个小孩，自己工分值不高，又不能常去干活的人，有一定影响。虽然算下来也就相差几十斤粮，但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这可是个大数字。所以他是挺不乐意。但因为在文革初期，他跟着秦有理当了一阵真的造反派，到现在还有人嫌他，他也就不愿意多说话。这事大家都高兴叫好，他也只能憋在肚里生闷气了。

今天，三队的社员往北门外的地里送肥。你看邬中和和他的儿子、还有于又发几个驾着小推车，跑得真欢。别看齐成材戴着眼镜，推起来还是挺认真，挺像回事。申光荣，力气小点，彭小宾给他少装点，一路上也没有拉下。

大家正干得带劲时，申光荣又出了点小问题。

北门外立的那个语录牌，这时就特别碍事。推车出镇时，又是上坡，又被那大牌子横挡在路中间，要连着拐四个急转弯，多出双倍的力还不止。回来的时候是下坡，本来放空车往下跑挺省劲，结果又要在牌子前后十几米的地方连着急拐弯。申光荣一不小心，没刹住脚，在第二个弯时，一头撞上了大牌子。“咣”的一声好大的声响，那白铁皮的语录牌也瘪了一大块。于又发看见了，就吓唬他：“好啊，撞了毛主席的语录牌，该当何罪啊？”

申光荣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急得满脸通红，手足无措。

迟解放也来拿申光荣开心：“哎哟，这要是在前几年文化大革命当中，可是死罪啊，枪毙都有份啊！”

申光荣都快掉眼泪了。

邬中和过来说：“嗨，这事别当真，要我说啊，这么碍事的东西，实事求是地讲，应该拆掉。大路朝天，一通到底，那走起来多痛快。现在这样算什么？”

邬中和说这话，胆子可真够大，听得人一愣一愣的，不敢多作声了。思想解放在一个普通农民的心里先发了芽。他们几个把小车推得更起劲了。

平金刚看着奇怪，别的队都是蔫蔫的，怎么这三队不一样，来的哪门子劲？正看着，正巧推着空车的申光荣来了。他知道申光荣平常干活不是这个样，就问：“你们今天怎么啦？个个都像劳动竞赛似的，多少年也没看见这么肯出力的。”

申光荣就把这事都告诉了平金刚。平金刚一听觉得不行，这不又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吗，还不跟大队讲，要是公社程书记他们知道了，那还得了啊。

平金刚急匆匆地跑到饲养棚，找到正在装车的彭小宾。彭小宾就穿了件夹袄，站在猪圈里往上翻呢。

平金刚没管这些，拉开嗓子就责问：“你呀，彭小宾，这么个大事也不跟大队说。要搞独立王国啊！”

彭小宾一听，知道这是有人把事情捅出去了。他知道这事也瞒不了多久，心里早有准备，就不紧不慢地说：“你说的是改成人七劳三的事吧。这种事，生产队完全可以自己定，大队管这么多干吗呀？”

“大队不管？告诉你吧，这罪名重啦，你我都承担不起。”

“承担不起就不用承担，我们三队就用这个办法了。”

“好啊，你彭小宾，我去报告公社程书记，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平金刚气呼呼地往外走。

边上邬中和劝彭小宾：“你去跟平金刚好好说一下，就说是全队社员都同意这样做的。”

彭小宾说：“我才不和他去讲。当了三年大队长，人好像有点变了。生产没上去，脾气倒见长了。”

平金刚走到胡同拐弯处，遇上了杜家骏。

杜家骏看他走得这么急，就觉得有什么事。平金刚把事情说了一遍，说是要去找程书记。

杜家骏劝平金刚说：“算了，有些事睁一眼闭一眼吧。这也不是做坏事，群众又愿意，对生产又有好处，顺水推舟。捅到公社去，到头来你也不好办。”

平金刚不听，去了公社。

半个小时后，宗发奋就匆匆地赶到了三队的饲养棚。平金刚紧跟在后面。

宗发奋一进饲养棚，屎臭味扑鼻而来，不由得用手捂上鼻子，一开始都没看清彭小宾在哪儿。连忙问：“人哪？人在哪儿？”

彭小宾是在坑的最里头往外翻，看见宗发奋，就慢慢地走过来，说了声：“部长来啦？不怕这有味啊？”

“彭小宾啊，你还有心思讲风凉话，哭都来不及啦，你犯事啦！”

“我犯什么事？我调动群众积极性，又参加生产劳动，犯什么事？”

“你别嘴硬，你这是在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资派还在走的一个典型。”

彭小宾笑笑说“我赤着脚在挖猪粪，有这样的走资本主义吗？”

“彭小宾，你别犟了，马上停止三队的办法，这样宗部长还能放你一马，不然你就要负全部责任。”平金刚在边上说。

“负就负，有什么了不起！”彭小宾说。

“好啊，看来文化大革命还不彻底，结束了不到两年，又出来一个死不悔改的。怪不得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你敢写下书面保证，由你来承担全部责任吗？”

“写就写。”彭小宾毫无怯色。

“好，你小子有种。”宗发奋从上衣口袋掏出纸和笔，交给彭小宾。彭小宾把两手在衣服上擦擦就接了过来。

这时，三队的社员有不少推粪回来，饲养棚边上站着一些人。

于又发说：“宾哥别写啊，他们要整你的。”

“是啊，别写啊。”大家也都说着。

彭小宾笑笑对大家说：“我写。我认准了，能调动大家积极性自觉自愿地劳动，过上富裕日子，那才是社会主义。像四人帮搞那种强迫劳动，大家都贫穷，决不是社会主义。”说着便在纸上写了起来。

“你又讲错了，彭小宾，你没听说那句话吗：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宗发奋很得意地拿过彭小宾写过的那张纸。

“我也签上名，这个事我也同意的。”邬中和说。

“是啊，我们也要签上，我们都同意的。”三队的社员都在说。

“不，你们就不用掺和进来了，我一个人来承担。”彭小宾说。

“冤有头，债有主。这事你们等着瞧吧。”宗发奋倒是挺高兴地拿着纸条走了。因为他又有了可以上报的材料，他又有了立功的机会。

果然，来了通知，西北村当天晚上就要开批判彭小宾的大会。公社的宗部长将要亲自出马。

衣春玲在家里急得快哭了，直埋怨彭小宾：“我知道你心是好的，想法也是对的。可是还要讲策略嘛，不能这样硬来啊。你看海秀姐那个结局，还不接受教训吗？”

彭小宾拍拍春玲的肩膀说：“我心里有数，现在已经不是文革那几年了，真理终究会胜利的。”

衣春玲将信将疑地看着自己的丈夫。

社员大会依旧是在西北场院召开。

来的社员不少，都想看看这文革结束了，再怎么批判人呢。

大会由平金刚主持。他也是学着一挥手，叫大家安静，“批判彭小宾错误大会，现在开始。”

会场上一阵骚动声，平金刚连说：“安静，安静，现在由彭小宾作检讨。”

彭小宾在一边站起来向大家说：“我没有什么可检讨的。我就是把三队的劳动分配由人八劳二改成人七劳三，原先收回的自留地还归各户自己种，队里的社员都同意了，我们就这么做了，就是这个样。”

“好，好。”

“我们队也应该这样做。”下面反倒是有不少叫好声。文革结束的头几年，出现的一个情况是干部的威信和控制能力大为下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不同于过去传统习惯的一些想法、一些做法的产生提供了机会。

面对下面的嘈杂一片，平金刚也干瞪眼，只好往下进行。“现在由秦德才同志进行揭发批判。”

秦德才憋了两年，这下又轮到表现机会，兴冲冲地几步就走了上来，哪知下面一片喝倒彩。有的干脆骂了起来：“姓秦的，滚下去！”“姓秦的，滚下去！”骂声越来越高。还有的捡起了地上的石子往上扔。秦德才还没张嘴，就被哄了下去。

“下面由时治国同志进行揭发批判。”平金刚接着说。大概是下午已经布置好了哪几个发言，提前都有所准备。

时治国一看这场面，哪敢上去，对着平金刚连连摆手，“还没准备好，还没准备好。”

平金刚气得“呸”了一声，又接着宣布：“下面由申光荣同志揭发批判。”

下面没有反应。等了一会，平金刚朝下面到处张望：“申光荣，申光荣，上来！上哪儿去啦？”

原来申光荣看这架势早就开溜了，哪还敢留在会场上。

宗发奋在一边看着，都气歪了嘴，也不顾场面，就说：“你这个大队长，当的什么队长啊？”

于又发听见了，马上大声叫起来：“那我们另选一个队长吧！”没等宗发奋回话，迟解放、皮高深都接过话茬，直嚷：“另选队长噢，另选队长噢。”

邬中和又说了句：“我提议选鲁队长担任大队长！”

“好，好。”会场上顿时热烈得不得了。

平金刚一时愣在那儿，不知如何反应。宗发奋一看不好，连说：“这个不算数。”

邬中和说：“那我们就举手表决。同意鲁来福同志当大队长的，请举手！”

整个会场顿时都举起了手。

“鼓掌，通过！”邬中和高举双手，直拍巴掌。

会场上又爆发出一阵真的是雷鸣般的掌声，一阵真的是响彻云霄的欢笑。这久违了的掌声，这久违了的欢笑，人们几乎都想不起来，曾经是哪年有过。

“不算，不算，举手不算数！”宗发奋还在叫着。

“那我们马上投票选举！”彭小宾立马对几个年青人布置相关事情。杜长贵转身就上队部办公室拿出白纸撕成一条条，辛狗狗点数，迟解放他们几个下去发票。皮高深拿个大簋子对大家喊：“同意鲁队长当选的，把票放这簋子里，”又拿了个纸盒喊道：“同意平金刚当选的，把票放这盒子里。”

衣春玲说：“也给杜家骏准备一个吧？”杜家骏忙说：“别，别，我就不掺和了。”

前后一、二十分钟的时间，整个过程就完成了。平金刚只得了四票，其余到场的三百多张都是鲁队长的。

“好啊，好啊，还是群众有眼光啊，”老于村长上来跟鲁队长握手祝贺。

鲁队长原本是个很平和、很看得开的人，不在乎这些功名利禄，但看到乡亲们从未有过这样的激情，他也感动了，走到中间跟大伙说：“我就没准备要当这个队长，但是老少爷们这么信得过我，这么看得起我，我领这个情了。”说完，朝四周再三鞠躬致谢。

宗发奋一看不行，便吼起来了，“你们不要来这套。一人一票那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是不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民主不搞那一套。公社党委不承认！”拍屁股走了。

“我们承认鲁队长，我们承认鲁队长！”这声音在全场此起彼伏，一阵高过一阵，恐怕在公社大院里都能听到。

见平金刚还直愣愣地站在那儿，杜家骏最后说了：“这样吧，平金刚也还是队长，公社要开会就平金刚去。咱村里面呢，就是鲁队长了。”

“也好，也好。”大家也都这么说着。

没查过相关资料，这恐怕是中国农村村民直接选举的最早案例之一了。

1.3 新老校长

1978年底，中共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中国跨出了历史性的关键一步。

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

龙头公社由纪海洋任书记兼主任，祖云涛任副书记、副社长，排名第二（县委下发的文件里都要写明谁是排第几）；宗发奋任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经学文任副主任兼生产指挥部主任。

程贵安按年龄和身体状况，应该是退休了，可是他不肯。为照顾情绪，正好龙头中学肖校长要退休，便把他安排当中学校长。好在他以前当过教育局副局长，对教育工作也熟悉。可是公社党委书记是正科级，中学校长才是股级，又特地把龙头中学拔高为县重点中学，与一般中学不同。所以公布的文件里是写：程贵安任县重点中学龙头中学校长（正科级）。这在官场上都摆平了。

公社再公布西北村的班子：杜家骏任支部书记，鲁来福任大队长，彭小宾任副书记，平金刚任副大队长。

之所以要多费口舌，说上这么一大段，是请各位理解有关部门的良苦用心，和有助于理清日后又一番眼花缭乱、纷繁变化的基本线索。

公社新班子成立以后，经学文又提出来北门外那块大语录牌的事。“上面还写着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这可是毛主席的话，最高指示，不能随便动。”宗发奋说。

“毛主席的话，我们也可以换一段嘛。”纪社长说。习惯了，我们还是叫他纪社长吧。

“我说啊，拆了吧。放在那儿多碍事。学习毛泽东思想，不一定非要用这种方式。”祖云涛说得很干脆。

“那怎么行？你才上来几天，不要犯错误哦。”宗发奋警告说。

“我看也可以拆。竖在那儿妨碍交通，那天西北村推车积肥，还把它撞了呢。到现在还凹了一大块，多难看，拆了吧。你说呢，纪主任。”经学文又说了。

“不是不可以拆，但这事得大家统一认识，要写下书面决议，所有的党委委员都要签字，这样才能拆。等下次运动来了，党委所有成员集体承担责任。”纪社长说。

“我第一个就反对，不用说签字了。”宗发奋歪着头说。

“那就换个语录，就用‘抓革命，促生产’吧，凹的地方，找人敲敲平。”

“好，没意见。”

公社领导班子为这事讨论了一个下午，终于达成了这个一致意见。

1979年，年初的寒假前。龙头中学召开“欢送老校长，迎接新校长”全体师生大会。虽然天气挺冷，刮着北风，操场四周插着的彩旗被吹得呼啦啦直响。但肖校长，肖福兴，坐在台上依然还有几分精神，他在讲：

“我今天来向老师们、同学们话别了。”

“我来龙头中学二十多年了，看着它变化，看着它发展，对它的一草一木都很有感情。要离开它，很舍不得，我最舍不得的是，教育战线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我却要离开学校了。”

“回忆过去的十年，在文革中教育领域是重灾区。学校受冲击，操场变成了武斗场。许多老师被批斗，挨打骂，甚至死于非命。尤其是在政治上对教育领域的两个估计：说是解放后的学校是被资产阶级统治的；说是我们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基本上都资产阶级的。这两个估计把我们压得抬不起头来。是邓小平同志帮我们掀掉了。今年我们又恢复了高考制度，27万新的大学生跨进了大学校门。所以，我羡慕你们，也祝福你们。”

“在新的历史时期里，你们要好好工作，努力学习，抓住机遇，创造优异成绩！谢谢大家！”

师生们一阵阵地鼓掌。

李辰坐在下面，手在拍着掌，心里思绪万千。他是今年刚被喊回学校来工作的。既是因为政策宽松了，也是因为工作上的需要。恢复高考了，教学任务重了。算起来，他是龙头中学在校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人，可还是个代课老师。能喊回来就已经不错了，这还是亏了肖校长上上下下做了不少工作才能回来的。他对这一点，早已不抱希望，能回到学校也没有更多的欣喜。他天天难以释怀的，是他失去了最亲爱的妻子林海秀。是他害了她，沉重的负罪感，时时痛击着他的心灵。精神的煎熬，使他生不如死。回学校来，唯一的好处是，把所有的时间用来学习，更新知识，投入教学，和学生在一起，能减轻点他心中无尽的痛苦。唯一能够安慰自己和告慰亡妻的是，他们的女儿长大了。他特地把女儿改名叫林李，以永远地铭记自己的妻子。林李，现在就在龙头中学读高中，品学兼优，聪明、热情、能干、正直，就像了她的妈妈。他没有跟女儿更多地谈起她的母亲，在她的履历表上只有简单的四个字：自幼丧母。

一个沙哑、刺耳又装腔作势的声音，打断了李辰的思考——新校长程贵安在讲话。

“我虽然是新校长，但是，是教育战线的一个老兵了。刚才肖福兴讲了文化大革命，受冲击。受点冲击怕什么，要正确对待，这也是一种锻炼嘛。你看我，受的冲击还小吗？”他拿起拐杖往地下敲了两下，“我们始终要相信党。野鸡打了满天飞，家鸡打了团团转。我们就要做个挨打的家鸡，就是挨打了也无怨无悔，还要围着主人转。我们就要有这样的宽广胸怀。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那就要斗私批修，认真改造世界观。你们知识分子跟我们工农干部就是不一样，自以为是，自命清高，动不动就爱提个意见，这种人最讨厌了。不要一听教育战线的春天来了，就又要翘尾巴了。你们听着点，做人要夹着尾巴做人，你们谁要翘尾巴，我就把它打下去。哪个教师要翘尾巴，我就要从人格上侮辱他，叫他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来。我这个人做得出来的！”他又把那拐杖使劲地往地上砸了两下，连大喇叭都传出了“通通”的声音。

全场鸦雀无声。

第二章 魂归故里

1978年1月2日

2.1 释放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之后，厚厚的冰层迅速融化。在龙头镇，在西北村，几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接连发生一连串完全出乎人们所能想象的重大事件，社会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

首先是赵玫、董平章有了下落，而这个下落超出了任何一个人的预料。这件事，还要从千万里之外、几乎遥不可及的新疆麦提那说起。

从最动荡的文革初期、赵玫的罹难、潘场长的靠边和重新上台，时光已经过了十二年。

对于身处戈壁深处五三农场的潘场长来说，这十二年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按说从1968年重新当上场长以后，农场里没有什么剧烈的争斗。犯人的进出更频繁，情况更复杂，数量更多了。这倒不要紧，超强的无休止的体力劳动就能制服他们，只要逼得不是太狠就行。潘场长自己的生活也很平稳，不用担心像地方单位的许多当权派，整日被批斗、游街、抄家、挨打，甚至性命不保。但心里总觉得缺了一块，整天像丢了魂一样。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已经五十多岁的汉子，常常拿出藏着赵玫断骨和发夹的布包，反复抚摸着，贴在脸上，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他放不下他对赵玫的感情，他忘不了赵玫对他的感情，不管对这种感情该怎么评价。其实，他可以退休了，按照对进疆干部的相关政策，潘场长可以提前退休回原籍安置。然而，他还在想，要是自己走了，董平章怎么办？他对董平章怀着深深的负疚。董平章也往五十上数了，只要他潘场长在，董平章还能有些照应，干些打扫卫生的轻活，待遇几乎和场里的“两劳改”相近了。（说明：“两劳改”就是服刑期满仍留场劳动的人）

董平章的身体更是赶不上潘场长，早已经满头白发，佝偻着腰，拿着大扫把，每天扫地十多个小时。他知道，这是潘场长对他的照顾，这使他能够在这个严酷的环境里存活下来。能支撑他活下来的更是对赵玫日夜不息的牵挂和思念。无论走到哪儿，总觉得赵玫就在眼前。他不说什么话了，在外人看来他已经是个痴人。他整日默默地走在他自己的、永无希望、永无尽头的世界里，准备一直走到大门外东面的那堆麻扎里。（麻扎，维吾尔语，坟墓的意思）

人在完全绝望的时候，有时还真有意想不到的事突然发生。

1979年秋，中央来了文件，释放全部在押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包括文革前捕获的特务。五三农场经过核实后认为董平章符合这一条件，向上级申报。年底前，场里接到同意释放的批文。潘场长马上把董平章喊了过来。

这时临近午饭了，潘场长叫伙房现炒了两个菜，又开了一瓶白干（农场里没有别的酒）。

董平章在门外轻轻地喊着：“报告！3214号报到。”

潘场长过来把门拉开，搀着董平章进来，连连说：“老弟啊，恭喜你啦。”

董平章抬头，连连用手推开，“不敢，不敢。”

“你熬到头啦！”潘场长握着董平章的手，由衷地替他高兴，替赵玫高兴。

董平章一脸茫然，嘴唇皮在蠕动，却说不出话来。

“你先进来，坐下。”潘场长开了瓶，倒了两小杯，“兄弟，先干上一杯。”

董平章知道这肯定不是国民党回来了，那又会是什么呢？听说在枪毙前会有“送行酒”，那也是放在盘子里送进牢房的，不会由场长请到办公室来，难道是赵玫有消息了？

“赵玫有消息了？”董平章愣愣地问。

乌云掠过了潘场长的脸，他把酒杯一放，稍微停了一会儿，又举起杯，“不是赵玫有消息了，是你有消息了。今天，现在，你就释放了！你现在自由了。”

“啊！？”董平章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手中的酒杯差点拿不住了。酒水洒在了桌子上。

“真的，上面来了批文。”潘场长把释放决定书拿给董平章。“你在这上面签个字吧。”

“那我能上哪儿去呢？还是像他们那几个在农场的伙房里？”董平章疑惑地问。

“不，你愿意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台湾方面都有了消息，他们只接受1949年以后由台湾派出的特工回去，不接受解放战争期间被共产党抓获的人。也就是说，如果你愿意回台湾，你就可以回去。我们这儿放，他们也会接。”

“不，不，我受罪已经受够了。是那帮狗东西害了我，我跟他们没关系。我只想见到赵玫，你快告诉我，她在哪儿呢，她在哪儿呢？”董平章几乎哭着说。

潘场长沉默了。

董平章看着潘场长，不祥之兆渐渐升起，“难道，难道她出事了？”

“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本来不想告诉你的。既然如此，我就实说了吧，你可要有思想准备喔。”

“嗯，嗯。”董平章连连点头。

“你等一下。”潘场长走出门，从宿舍里拿来那个小布包，脸色阴沉，又坐了下来。他缓缓地从小布里拿出了那个至今依然锃锃闪亮的发夹。

董平章一见，就伸手拿了过来，捂在脸上。早已经麻木的脸上，流出了眼泪，呜呜地哭着。

潘场长站起来，拍着董平章的肩膀，“赵玫是个好样的，我知道她一直在想着你。”他把布包交给了董平章。

“她死在哪儿？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董平章急急地问。

潘场长把当年红卫兵冲击五三农场，赵玫被迫躲到小村庄的事说了一遍。

“那时候就死啦？那时候就死啦！”董平章喃喃地说着，“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我要是早告诉你，你能支撑到现在吗？”潘场长说。

“我要去看看，我要去看看她。”

“好，明天我带你过去。”

“不，我现在就要去。不就是二十里地吗？我能走。”

潘场长拧不过，当即就叫了小商过来（他现在是办公室主任了），带上个小木盒和工兵铲，开了辆新来的北京吉普就出发了。

寒冬的戈壁，更加苍凉。

天碧蓝碧蓝的，丝丝白云像冻僵了似的挂在天上，静止着。地面积雪不多，只有土包的背风处红柳、荆棘丛中残存着斑斑白雪。北风呼啸着，卷着干雪和沙粒，在地面滚过。车轮碾过冻结的地面，发出比平日响得多的沙沙声。

不多时就到了那个小村庄。

十二年过去了，小村庄更加荒芜。那几间土房，大都已墙倒屋塌，沙砾都已埋到了窗台。屋前的百余亩田地，已是一片沙漠，没有了半点的植物茎叶。那小湖也已被沙砾填没，全无了踪影。

潘场长领着董平章到了中间的那个院子，屋顶已倒塌了一半，埋在沙里的门推不开了，两人从窗台上爬了进去，那窗框一碰就碎了。屋里满是沙土，一脚下去能陷到小腿。

“赵玫在哪儿？赵玫在哪儿？”董平章朝着挂满尘土的四壁呼喊。

潘场长默默地走向角落。

角落里的两个水缸还在，没有破损。搬开上面的缸盖，赵玫白森森的头颅依然还静静的在那儿，似乎一直在静静地等着亲人的到来；那眼窝的黑洞里面，似乎还有双明亮的眼睛，在深情地看着亲人们；只是没了下颌骨，残存在上颌骨的几个牙齿再也无法向亲人们诉说。尸骨边还有个已经暗淡了的孩子的银制手镯。

董平章扑到缸上，捧起一把白骨，顿足捶胸，失声痛哭，久久不息。

几十年的苦难，等来的是今天。

潘场长也在一边垂泪，等着董平章渐渐地平静。而后，两人把赵玫的尸骨装进了带来的那个木盒。

在回程的车上，董平章一直没有说话。

快到农场的时候，董平章才说了句：“我要把她带回家。她是为了我才来这里的，我要把她带回去。”

2.2 离场

董平章穿上了场里给他的一套旧军装，连同棉大衣、棉帽、黑色大头棉鞋，挎着一个简单的小包，捧着那个木盒，踏上了回家的路。

他要回西北村了。

潘场长陪他到了麦提那，送他上了去乌鲁木齐的长途汽车。怕他十几年的隔绝人世的生活，路上会有许多不便，所以再三叮咛他路上小心。

董平章点头，再三表示感谢。他知道了潘场长就是当年龙头镇南门外部队的连长，才明白了十几年来他总感觉到有人在暗暗照顾他。

冬天的南疆景色单调，董平章本来也无心去看。

两天的漫漫长途到了乌鲁木齐。潘场长特地写了一封信，叫他去找叶局长，能方便一些。叶局长在文革中的几年，日子很不好过，挨过打，受过罪，老伴也为他而死。运动后期也没有恢复他的职务，所以心里一直气得很。好在他的女儿叶丽娜，由于托了令师长的关系，入伍当了个卫生兵，后来又选上了工农兵大学生，读的是医学院。毕业后不想回部队，就留在了乌鲁木齐。叶局长早几年就退休了，现在租了一间小屋，跟女儿住在一起。

董平章拿着信，捧着木盒，东问西找，还真的在长春南路背后的小巷子里找到了叶局长。老叶住得不宽敞，里外两间。外间又是床，又是方桌，又是炉灶，挤得很。老叶正在方桌上切白菜，听见门外有人问：“是叶局长的家吗？”心里还在纳闷，这年头还有谁来找他。

“进来。”

推门进来的是穿着一身军服的董平章。

“你是从哪儿来的？”

“我从五三农场来。”

“哪一个科的？”

“我刚释放出来。”

“啊？”叶局长挺不高兴，“犯了什么罪进去的？”

“国民党派遣特务。”

叶局长大惊，像被蛇咬了一口似地跳了起来，大喊着：“滚！快滚！”

董平章慌了，忙说：“是潘场长叫我来找你的。”并把那封信递给了叶局长。

可叶局长看也没看，把那信一摔，还在跳着，好像那条蛇咬在手上还没有甩掉。“你快滚，你这个国民党特务，还要连累别人呵。”使劲用门把董平章推了出去。

这是董平章出了劳改农场以后接触到的第一个人，就让他知道了这个社会对他的态度，心里刚刚燃起的光亮又熄灭了。

他自己默默地找到了火车站，默默地登上了东去的列车。几天里，他没有说一句话，甚至没有吃一口饭，最多是喝了几口凉水。只是紧紧地捧着那只木盒，很像当年赵玫西来时的情景。

董平章去叶局长家的那天，傍晚叶丽娜下班回来了。刚到门口，自行车铃铛就响了，叫着：“爸，我回来了。”小叶已经26岁，正是鲜花盛开的好时候。

可是，门里的老叶没有像往常那样高兴地回应。

小叶觉得奇怪，推门进去，见老叶气鼓鼓地半躺在床上，晚饭还没做。女儿知道爸爸这些年心情一直不好，但到了乌鲁木齐以后已经好多了，今天怎么又不高兴了。

“爸，怎么又肚子发胀了？”（新疆话，生气的意思）

“怎么能不发胀？那个老潘真是糊涂，叫个国民党特务上我们这儿来。”

“这是怎么回事？哪来的国民党特务？”小叶见地上有一个信封，这正是潘场长写给老叶的。小叶就捡了起来，打开来看。

“喔，那个人是海源人，就是在你当初驻军的地方。他是1949年被国民党带走的。”小叶一边看一边说着。

“他老婆因为是特务家属，在老家待不下去了，找到了五三农场。特务家属？”小叶若有所思起来，又接下去看。

“1966年，她死在了农场东面的一个小村庄，从骨头的伤痕看……是被狼咬过的。被狼咬过！？……”小叶忽而睁大了眼睛，攥紧了拳头，呼吸急促起来。

“爸，那位董大叔呢？”

“被我赶走了。谁还敢和国民党粘上边啊。”

“他带了什么呀？”

“带了个木盒。”

“你知道那里面装的是啥吗？”

“装了什么？”

“是他老婆的骨头。”

“特务老婆的骨头，那又怎么样呢？”

“她是我的救命恩人呐！我当时就跟你讲过，有个被叫做特务老婆的女人，是她挡住了狼，自己被狼群撕咬，却救出了我。来的那个大叔就是她的丈夫，他手里捧的就是我救命恩人的尸骨！”

“啊？我怎么知道啊？”

“他人呢？”

“走了。”

“应该是去了火车站。我这就去找。”

“我也去吧。”

父女俩直奔车站而去。

2.3 归来兮

董平章在迷迷糊糊之中走出了德国式尖顶建筑的黄港火车站。正碰上漫天的大雪，长途汽车停了。直到中午，因为有好几个人在等车，所以车站才发了一班去海源的车。

汽车在厚厚的积雪中“叽叽嘎嘎”地开着。天快黑了，才到了海源县城。这时从县城到龙头已经有公共汽车了，只是早晨和下午一共才两班车。他当然不会去等到第二天，更无心顾及县城的变化（比十四年前多了几个二、三层的小楼），就往龙头走去了。

这回，没有人问他要上哪儿，更没有人请他上车，他自己一个人默默地走着。

厚厚的雪地，走起来很费劲。天渐渐暗下来，路上没有一个人。没有风，静静的，大片大片的雪花无声地飘舞着，潇潇而下，又无声地落到厚厚的积雪上，融合在了一起。

他走着，呼吸着，他知道这是家乡的空气，是那样是湿润，那样的清新。不似台湾压抑的闷热，也不似南疆呛人的干燥。回来了，终于真的回来了。三十年了，整整三十年了，从1949年离开家乡，离开赵玫和孩子整整三十年了。如今回来了，捧着赵玫的尸骨和孩子的银镯回来了。董平章眼睛湿了，不能想下去了，他还要走下去。

他捧起了一团雪，含在嘴里，家乡的雪也是甜的，真的。

天黑了。好在皑皑白雪，泛着浅浅的光。茫茫原野上能分得清村庄、道路和山峦。他也不需要辨认，就径直地朝前走。

走过了王庄，走过了大河上的漫水桥，走过了赵村。到了，他看到了龙头镇，他看到了西北村，尽管没有了城墙，没有了白果树。

尽管是已经离开了三十年，但是村庄、巷子、院子，还是那样的熟悉。那是他日夜思念了整整三十年的地方，能不熟悉吗？半夜时分，他径直走进了自家的院子。没有了院门，可他知道这是自己的家。满院是枯草，虽然是冬天，可还是高高的、密密的，可见夏天会是多少。如今厚厚的草上又盖着厚厚的雪。

四间房，有三间塌了房顶。董平章不知道，塌了的是他以前的老房；没塌的，是1949年他走的那天被国民党炮弹炸塌后，村里鲁队长他们帮着新盖的。他也从窗台翻进去。屋里黑黑的，空空的，就像他看到的赵玫最后生活过的南疆小村的屋子，这儿只是多了一铺塌陷的炕。

他把木盒放下，轻轻地说着：“赵玫，我们回来了，我们回家了。”

他已经没有了眼泪。

他静静地看着从倒塌的屋顶、从破裂的窗框飘飘洒洒飞进的雪花，那么的美丽，那么的纯洁，那么的宁静，轻轻地落在地上，静静地躺在那儿，没有烦恼，没有忧愁，更没有苦难。

他还能再求什么？能把赵玫带回来，这就是他所能做的更大的成功了。等天亮以后，乡亲们围过来，会怎么看他、怎么说他呢？说这个国民党特务居然又回来了，老婆也死了，带回来的是一把骨头，怎么去见人呢。那个老叶把他赶出来，也很好理解，谁叫自己是国民党呢？虽然是放出来了，可还是放出来的国民党。其实，董平章并没有想这些。对他来说，已经没有天亮了。

既然把赵玫领回来了，自己就再没有别的牵挂。他把赵玫的发夹塞进内衣，贴身放着，银镯装进了口袋，把裤带解下栓在里屋的歪倒的梁上。他要和赵玫，和宝宝永远在一起，就在这里……

鹅毛大雪静静地下着，下得越来越大，盖住了董平章来时的脚印。

西北村的乡亲们都不知道董平章回来了，更不知道他和赵玫都留在了这倒塌了十几年都没有人进去过的破屋里。

2.4 叶落龙头

我们把目光转回乌鲁木齐。当董平章踏上东去的列车离开新疆的那天，叶丽娜拉着她父亲从家里匆匆赶到火车站的时候，天已黑了，候车室里已经没什么人了。工作人员正在扫地，早没有了董平章的影子。

小叶父女又在站前广场转了好几圈，也没有找到董平章。看着火车时刻表，傍晚是有一班东去的列车。这段时间，火车并不挤，估计他也不会再去住旅馆等一晚上再走，他肯定是已经走了。

小叶很着急，眼睛都湿润了。

“走就走了吧，”老叶还不理解叶丽娜的心情。

“我忘不了呀，我忘不了。我这辈子也忘不了，在那群狼的嘶咬中，那只向天上伸出晃动的手，那只还在阳光下闪亮的发夹。那种惨叫，十几年来天天在我的耳边。她是为我而死的，我能忘了吗？……”

叶丽娜不顾边上看着她的路人，失声痛哭起来。

“那怎么办？人都走了。”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海源看看他们。我一定要在她的坟前跪下磕几个头，我心里才能好受点。”

“你真的要去海源啊？”

“是的，我一定要去。要不，我这一辈子也不能心安。”

老叶知道他女儿的脾气，纯真中有几分执着，想做的事情别人是挡不住的。“那也行，我陪你一起去。这多少年，我也想回去看看，总觉得海源好像是自己的家乡似的。”

“那我就去买票。”

“你先得跟单位请个假，安排一下吧。对了，我去问问老潘，看他会不会一起走。”

“好。”

潘场长那边也一直放心不下董平章，听老叶一说，也愿意跟着去。跟省局请了个假，把场里安排一下以后，便到了乌鲁木齐，跟叶丽娜父女，一起赶往海源。

到海源县城已是临近中午。下车一看，县城虽然并不很像样，但比起解放初他们走的时候，可还是大不一样了。他们买了下午去龙头的车票。

“要不要给老纪打个电话？”潘场长问。因为走得匆忙，临走时也没跟这儿的纪社长说。

“不用了吧。他知道了肯定还要特地赶过来，先不用麻烦他了，以后要麻烦他的时候多了。”老叶说。

他们在路边的小饭店见了有鲅鱼饺子的牌子，老潘一见就说：“啊呀，可是几十年没看到了，快来一盘。”于是每人点了一份。那个价钱便宜得，跟新疆没法比。叶丽娜虽然是北方人，吃饺子并不稀罕，可这是第一次吃上鲜鱼饺子，在新疆哪有这，把她吃得高兴得不得了。

老潘和老叶，嘴里吃着饺子，耳边听着四周都是浓浓的海源话，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下午，班车在西门外停下。他们一眼就认出来了，这就是当年的龙头镇。这是他们曾经跟国民党浴血拼杀的地方，多少战友还长眠在这儿的地下。这儿也是和解放区乡亲们结下深厚情谊的地方。

他们在车上就问了同车的老乡，知道了公社就在西街上，知道了纪海洋这两天没出去，就在公社里。

当老潘和老叶大声喊着：“纪海洋，纪海洋！”推开纪社长办公室门的时候，纪海洋立马站了起来，都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

三十年了，整整三十年了！当年风华正茂的小伙子，现在都已是两鬓斑白的半老头。纪海洋迟疑了一下，因为他根本没想到他们会出现在这儿，但很快就认出来了。他猛地扑了上去，抱住了他俩，连连说着：

“你们怎么会来的？你们怎么会来的！”

“想了三十年了，就想来看你啊！”老潘忘情地握着纪社长的手，使劲地上下甩着。

“这位姑娘是谁呀？”纪社长问起了边上站着的如花似玉的叶丽娜。

“这是我女儿。”老叶又对叶丽娜说，“快叫纪叔叔。”

“纪叔叔。”叶丽娜虽然是在南疆偏僻的小县城长大，说的却是一口极标准的普通话。

“啊呀，啊呀，老叶啊，你女儿都这么大啦。真是个好姑娘啊。坐，坐，先都坐下。”纪社长马上又问：“你们怎么会有机会来龙头的？”

老潘和老叶把前后事情一讲。

纪社长很感疑惑，“我没听说董平章回来啊？如果回来，这样的事，我会知道的。他家离我们这个大院还不到两百米。我马上把他们大队干部找来问问。”

现在，大队和公社也都通上电话了，尽管还是用手柄摇和人工转接。

十分钟的时间，鲁队长就急匆匆地进来了。因为这还是纪社长第一次用电话找他，一定是有不寻常的事。

鲁队长一头撞进纪社长的办公室就问：“纪社长，有什么事吗？”

纪社长站起来，指着边上的两位，说：“你看看他们两位是谁？”

鲁队长愣愣地看着，硬是没认出来。老叶那时驻在新河镇，也没怎么接触，那倒好说。可是连潘连长，他也没认出来。

“这就是我的老领导潘连长啊。这位就是当年西北村民兵队的鲁队长啊。”

纪社长这么一说，两人都同时叫了起来，“认出来了，认出来了！”

一番重逢的话语之后，说到了正题上。

鲁队长也疑惑：“没见到啊。他那房子塌了几十年了，队上也不能没收，也不能处理。一直扔在那儿没管。这几天也没见动静啊，昨天我还从他门前走过呢。”

“难道是没回这儿来，上别处去了？”老叶问。

“不会，不可能。以我对董平章的了解，他不会去别处。这十五年，他是天天在想着回来。”老潘说。

“要不，我们进他院子看看吧？”纪社长说。

“好，进去看看吧。这房子该拆也得拆了。”鲁队长说。

鲁队长领了他们四人往董家的胡同走去。

路上碰到住在董家前排的迟解放。鲁队长问：“这两天，你后面的董平章家没有动静吧？”

迟解放听了一惊，“哪有什么动静？连个骚鼠狼也没有啊（海源话，就是黄鼠狼）。怎么啦？”

“有可能是董平章回来了，我们正过去看看呢。”

“啊？！还有这事啊？！”迟解放惊得一抬头，连帽子都掉了。也急急地跟着他们过去，边走还边跟遇到的人说：“董平章回来了，董平章回来了！”

有人还讥笑着说：“熊人也不换个题目，怎么想起来拿董平章开心。”（熊人，在海源话里是骗人的意思）

更多的人看到是纪社长领着两个老干部和一个年青姑娘，这么急匆匆地走，看迟解放那认真的表情，不像是在骗人，也都跟了过来。

董家的院门，门板早就没了，只有那朽木似的干裂的门框还勉强支撑在那儿。院子里是没膝的蓬蒿，院墙后面还有残存的积雪。

鲁队长走在前面拨开草，解释说：“这十几年连小孩也没有进来玩的。”

东面的两间都塌了，南墙只有窗台高，屋里也长满了蒿草，草丛中横七竖八地伸出几根断裂的房梁和檩条。

房门已经陈旧得像出土文物，上面并没有挂锁。鲁队长推开房门，那房门居然一碰就倒了下来，砸在地上飞起了破碎的木屑和尘土。一股腐败霉烂的臭味扑鼻而来。

鲁队长走了进去，屋里挺暗，靠北墙的案几已经散了架，垮在那儿。他跨进黑糊糊的西间，突然“喔哟”地惊叫了一声。因为他猛然看见在北窗下吊着一个人。

那就是董平章！

董平章的尸体已经发黑，肌肉塌陷，躯体变形，形状极其恐怖，完全没了人样。如果不是知道他是董平章，绝对认不出是哪个人的。他的双脚没有离地，不然真会尸体断裂，肠流一地。

纪社长几个闻声赶紧进来，都瞪大了眼睛，屏住了气息。

叶丽娜一脚踏进来，双手不由得捂住了脸，只露出惊恐的大眼睛。好在她是学医的，见过尸体，没有过分的惊吓。

鲁队长上去，想把尸体扶下来。叶丽娜忙拦着，“不能碰！他里面已经烂了，一碰的话腐肉都会掉下来，粘到手上。”是的，如果是夏天的话，他们看到的将是更可怕的景象。

老潘说：“快找块布来，铺在地上，把上面的绳剪断。”

别的事还好办，这布就难办了，谁家也拿不出这么大的布。要知道那时一人一年才四尺五寸的布票，虽然比前些年已经多了一尺了。

“不行就到粮管所去借块毡布吧。”纪社长说。

鲁队长对后面的迟解放说：“你赶紧去跑一趟吧。”

迟解放出去的时候，人们的视线又转过来，炕中间端端正正地摆着一个木盒。

老潘凝重地说：“这就是赵玫的遗骨。”说着，眼睛就湿了。

叶丽娜朝着那木盒，扑通下跪，哭喊着：“大姐呀，赵玫姐呀，我来看看你了，我来看看你了。”连连磕头，双手拍打着炕壁。那种悲痛，那种哭喊，在屋外的人听着都无不动容。

鲁队长、潘场长、纪社长都流下了泪。

挤进来的衣春玲和车素花也都满脸泪水，扶起叶丽娜，劝说着。

迟解放往外跑的时候，胡同里已经有不少人，都来问。迟解放顾不上一一回答，边跑边惊叫着：“董平章回来了！董平章吊死在他自己的屋里了！！”

还能有什么事比这更惊人！

当迟解放和祖所长回到村里的时候，所有的胡同都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迟解放头顶着毡布，又喊又叫，生生地挤了回来。整个西北村、整个龙头镇的人都来了！甚至连宗发奋、秦德才也站在后面望着。

当铺好毡布，剪断那根吊在董平章脖子上的裤带，董平章的尸体掉落下来。皮肤几处溃破，尸液流淌出来，恶臭味更浓了。

叶丽娜还是很清醒，劝大家说：“这儿已经不能待人了，别感染了。我留在这儿，你们都到外面去吧。”

潘场长也是经过风浪的人，既是很重感情，处事又很冷静，说：“我来看看他口袋里还有什么？”

从董平章的口袋里翻出了孩子的银镯子，几张车票和一百多块钱。

潘场长沉重地说：“这钱是场里给他的安置费。除了路费，看来他几乎没花一分钱。”

潘场长把钱交给了鲁队长，说：“你们大队上帮他把丧事办了吧。”又把车票和银镯子放回了董平章的口袋。

这时，那个发夹从衣服里面滑落了下来。

依然发光锃亮的发夹。

这是叶丽娜、潘场长、鲁队长、纪社长和所有西北村人都能记得的发夹。

叶丽娜拿起发夹，又哽咽起来，对大家说：“能不能把这留给我，我要一辈子戴着它。”

大家都点点头。

叶丽娜就要往头上戴。衣春玲说：“我拿去到大队卫生室消一下毒吧。”

叶丽娜摇摇头，说：“不。”拿出手绢擦了擦，就戴到了她和赵玫同样乌黑秀美的头发上。

大队部连夜叫人刻墓碑，钉个薄皮棺材，连漆也没来得及用上。

晚上，派两个年轻人在董家门口值班看一下。

叶丽娜想要留下守夜，大家都不同意，毕竟是寒冬腊月，这无门无窗，跟野地里一样，不行的。硬把她拉走了，跟老潘、老叶一起在公社招待所安顿下。那时的公社招待所也极简易，大通铺，跟骡马店差不多（骡马店，供驾骡马车、搞长途贩运的车夫们下榻的乡间旅社，极简陋）。纪社长想叫几个干部下乡去，好腾出床铺让老潘他们睡。这个办法，是那时公社对县里来的干部留宿的最好待遇了。他们忙推说不用了，还是去招待所吧。

第二天上午就下葬。鉴于董平章的特殊情况，纪社长商量说，现职干部就不参加了，毕竟有所不便。但鲁队长出于他对赵玫的情分，坚持去了。

西北村的乡亲们几乎都去了，虽然没有披麻戴孝，但那凄凉的唢呐吹起，人们都分外的伤感，其心情的悲痛、气氛的压抑，甚于往常任何一次葬礼。

赵玫的娘家是邻村赵村。赵村的乡亲们，不管是不是赵玫的本家，还是亲戚，在赵刊新的带领下也都来了。因为是赵玫这一边的，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戴白布黑纱。赵刊新没有因为是全公社“革联指”的头而受到什么影响， he 现在是赵村的书记兼大队长。

葬礼没有任何的仪式，更没有致辞。原先董平章爷爷的墓穴，早已找不到了，临时另找了一块地，挖了个坑，把董平章的薄皮棺材和赵玫的尸骨盒放了进去。盖好土后，上面放着一个连夜刻出的两尺高三尺长的石碑，没法写什么称呼，就写着：“董平章赵玫夫妇和他们的孩子葬于此”，而且还是乡间极少用的横排字。

老潘、老叶父女、鲁队长、赵刊新在最前面。

培好土之后，头扎白布、臂戴黑纱的叶丽娜又在坟前跪拜痛哭。有些乡亲还不解，一个素不相识的远方姑娘，怎么戴这么重的孝，行这么大的礼，哭得这么真切。等传开了赵玫被红卫兵打成那样，还以身躯挡住狼群救下了这姑娘的事迹后，乡亲们个个啧啧称赞，也为赵玫这个曾经为西北村人津津乐道的媳妇而伤心落泪。

老潘胸戴白花，十分郑重地行三鞠躬。人们都认为，以一个劳改农场场长之尊能对一个曾经的囚徒有这份对待，真是做到家了，到底不亏是一个老军人、老干部的胸怀啊。可谁也难以了解他心中对董平章的歉疚和对赵玫的那份无法诉说的情感。

下葬以后，叶丽娜说她想调到龙头来，要在这儿永远陪着赵玫姐。老叶听了以后，觉得也行，他对于西陲边疆也没有更多的留恋，能跟了女儿一起过来也挺好。

纪社长说：“那好，你们过来一起陪我吧。只是海源在外工作想回来的人很多，调动的事一定不容易办，我尽量努力。”

老潘一听，也说：“我也真想来，回去就办退休，把老婆一起从老家搬过来。我儿子在四川大三线的大山沟里，我在哪儿对他也无所谓。”

纪社长说：“你倒好办些，我跟西北村说说，给你块宅基地就行了，反正吃的喝的，你自己有退休金。”（说明：宅基地，由大队无偿拨给本队社员用于自建个人住宅的小地块，控制甚严。）

约莫半年多的时间，叶丽娜真的调来了，在龙头卫生院。从此，龙头镇上多了个头戴锃亮发夹、身材丰韵婀娜多姿、讲着一口极标准普通话、人人见了都要侧目相望的美女。老叶也一起来了，在西北村租了个院子，父女俩住。老叶说，我这片老叶子最后飘落在西北村，也算是跟大西北命中有缘啊。

秋天的时候，老潘退休了，也和老叶一样，从西北到“西北”，真的把老婆带了过来，在西北村的地面安了家。

西北村人想的是，连国民党都放了，都能让他们回台湾去，那国民党的家属呢，也不应该算什么了。那跟了国民党到台湾去的人，和他们在大陆的家属呢，就更不应该算什么了。还有什么能压在他们的头上呢？

春天真的来了吗？

天在变了，变得越来越晴朗了。

第三章 春天又来了

1978年1月3日

放晴了的天空，又一缕耀眼的阳光照了下来。这回是照在了李辰的头上，也照在了大家的心上。

李辰的命运又有了转机。

1980年的春天，有文件下来，对1957年所划的右派进行复查和摘帽安置工作，并给以基本的生活条件。文件上说：“许多忠诚于党的同志，许多同党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朋友，许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许多政治上热情而不成熟的青年，”由于错划右派，“受了长期的委屈和压抑”。然而，多少人满腔热诚、一心向党，却落得惨遭迫害，直至走投无路、家破人亡，甚至几代人的命运都因此而改变，岂止是“委屈和压抑”所能概括的啊。

当程贵安校长把李辰喊到校长办公室，仰在沙发椅上，瞄了他一眼，不急不忙地说：“今天我代表党组织向你宣布一件重大事情，啊？”又喝了一口水，拿出一张纸，咳嗽了几声，像是想念又不想念，又瞄了下李辰，以为李辰会着急地求着他念。李辰静静地站着，没有吭声。

程贵安从鼻子里嗤出了口气，慢慢地念了起来。这是对李辰的复查结论，再次明确撤消1957年的定为右派的结论，可以享有和其他同志一样的全部政治待遇，而且把每月的代课费提高到28元。此时，李辰却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的喜悦。类似的宣读和摘帽，1962年已经搞过一次，可是到了1966年，还不是遭到更残酷的打击。

他点点头，静静地说：“谢谢，谢谢组织上的关心爱护。”

“是啊，你要感谢党啊，是党又一次把你挽救了过来。为你这事，我跑了多少腿啊，光是县教育局，就跑了多少次啊。今后，你要更加听党支部的话，靠拢组织，别见了我就隔十丈远，我还能吃了你啊。啊？”

“是，是，”李辰诺诺地向后退了几步，才转身离去。

程贵安又不屑地从鼻子里嗤了口气。在程贵安看来，李辰这种人就是他在政治斗争中少不了当作牺牲品用的道具。

李辰对这种再次摘帽虽然没有什么更多的激动，但是他在重新回到中学任教以来的两年中，真可谓是尽心尽力、努力工作。他想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重温旧知识，补充新知识。尤其是对教学改革，他有他独到的想法，在龙头中学的教师里还很少有他想得那么远的。

他讲课既简明扼要、条理清晰，又分析透彻、令人深思。他知道现行教育体制弊端重重，不是他一个人所能改变。他又想从自己做起，为传统课堂教学透进一丝新的光亮。

这次历史课的期中考试，他就想改变一下方式。

他跟同学们说：“就要期中考试了。”

“是啊。”下面的同学们齐声说着，都拿出本子准备记考试重点。

“这次考试啊，我们换一种方式，我把题目先告诉你们。”

“啊？！”学生们都惊讶地叫着，“不会吧？李老师。”

“真的，现在就告诉你们。题目是：封建意识对当代中国有哪些影响？”

“这怎么写呀？”“老师，你好像没有系统说过？”“这要写几条呀？”同学们纷纷议论起来。

“你们拿回去写，先看一些书，再联系实际好好想想。这个题目，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规定非要写几条。你可以写三条，也可以写五条，你也可以就重点写一条。但是不许抄，抄来的只能得零分。你们也可以相互讨论，相互启发，但是不能两个人写得一样。我可以讲一下基本思路，比如封建意识在当代的表现、造成的后果、产生的原因、怎么解决。当然这只是基本思路，不一定完全都照这个来。还可以估计会有哪些不同看法，怎么加以解释。还有哪些问题，与此有关，但因篇幅所限，我这儿就不谈了，等等。不需要面面俱到。关键是要独立思考，有创造性思维。

高中阶段，学习基本知识是主要任务，进行一定量的背诵、记忆是必要的。但是也要开始学习分析推理，要学会发散性、创造性思维。这方面，现在还不一定要有多高要求，但是一定要有这方面的意识。人，不能只成为知识的奴隶，而要成为思想的主人。”

“噢……”同学们都十分的高兴。

这是个高三毕业班，李辰的女儿林李也是这个班的。

林李长得像她妈妈，个儿不高。由于有这种身份在，她在一般场合很少讲话。关于母亲的事，她知道一些，但是不多，因为怕父亲伤心，她也从来不提及。在默默无语中，依然能感觉出她有着同样的那份执着和追求。她的学习很努力，很刻苦，她知道那是她唯一的希望。

放学后，她跟她父亲说：“爸，你这种考试形式很好哎，大家都很有兴趣。议论得很热烈，都去找书看了。”

“好，好，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一周后，卷子收上来了。

同学们写得都很认真，有个同学竟然写了整整一本，一万多字。

同学们都感觉这种方式真好。有的说，这次真的是动了脑筋；有的说，别看是不用背书，其实看的书比哪次考试之前都多；有的说，这样的考试看起来省事，实际上压力更大；有的说，这是从上学以来，第一次感觉到真正是在学习。

平近芳，那时已是史地教研组的组长，听到了学生的反应，觉得挺好，就找李老师交谈了一次。应该说，作为教研组长的平近芳对李老师还是很尊重的。不只是因为曾经的那些事，就是教学上的事，也是经常来请教李辰的。

“啊呀，李老师，你真行。没想到你不但平时教学效果好，对教学改革还这么有研究。那些师范科班出身的，都还没有想这么多。”

“我也是干了这一行，就多往这上面想想。”李辰谦虚地说，“我总觉得我们的教学方法要改。首先是教育思想要改，我们一直是用的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在三十年代的传统教育思想，就是“教学活动以教师为中心，教学内容以教材为中心，教学场所以教室为中心”的三中心论，它虽然对维持常规的教学活动有好处，但是束缚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现在他们有一些新的教育思想，比如七十年代赞可夫的发现法教学，让学生自己探究结论，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那多好啊。我们从六十年代开始骂人家是修正主义，人家的教育思想早就改了，往前发展了，可我们反而还在用凯洛夫的那一套。到了文化大革命，甚至把这一套也都全砸了，现在又捡了回来。”

“啊呀，你讲得太深刻了，真够得上专家的水平了。我们大家都来推广你的方法吧。”平近芳说的倒不全是奉承话，还是有点想着要搞教改的。

“不，不，也不用这样。教学方法是千变万化的，要因教师、因课程、因内容、因学生而宜。如果大家都用同一种方法，那最好的教学方法也就成了最差的方法了。更何况，几年来教学改革讲了多少遍，可老是改不动，主要原因不在教师和学生，也不在学校，而是整个社会大环境，我们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还没有完全转过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某种意义上，这句话也能用到这儿。比如说，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现象，为什么不能改变，是因为我们对人才的培养、选拔、任用的这一套制度还没有改变。人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而能够成才的渠道和机会很少，尤其是向上流动的渠道和机会很少。所以大家都只能走这座独木桥。也许以后桥能加宽点。但是，桥基本上还是这么一座桥。”

“啊呀，你太不简单了，我这个组长怎么一直没有发现你。我赶紧去跟程校长说说。”

“不要去跟程校长说。一百个人会有一千种想法，各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咱们这儿讲的想法，到他那儿就行不通了。我只是个人搞一点探索而已，没有更多的期望。”

“哎，他思想上是有点保守，但毕竟也是老教育出身的嘛，应该会支持的。”

平老师很认真地向程校长汇报了这一情况。

程校长后仰在沙发上，又是从鼻子里嗤出一口气，毫无表情地说：“这样能学好吗？哪有这样学的？对考大学有用处吗？问题还不仅仅于此。”程贵安这才低下脑袋，平视着平老师，那眼光冷冷的，把平老

师看得后背都凉了。

“说什么封建意识在当代中国的影响？是不是又在影射我们社会主义，是不是又在说我们是在搞现代迷信？要注意啊，别以为平反了，摘帽了，他们就会和我们一条心啊。狗改不了吃屎的。”程贵安一下子觉得说漏了嘴，“当然，这句话就不用对外传达了。但是，你心里要有数，阶级斗争这根弦，到什么时候都不能丢。”

平近芳垂头丧气地走出了校长办公室，半路碰到了李辰，叹了口气，说：“李老师啊，你的那些啊，就别搞了。想是想得挺好的，可没人支持，出了力，搞好了，没人会称赞你，连句话都没有。要是出了点问题，那就坏了，往死里整，什么帽子都扣上来。算了，你也快退休了，别给自己添麻烦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龙头中学就再没有什么真正的教学改革了（做样子、给别人看的除外）。作业越来越多，晚自习的时间越来越长，课桌上堆的书越来越高，学生的脑袋成了复印教材的机器。

这年，李辰眼看到六十了。平老师跟程校长说，给李辰转成公办教师吧，再不转就没有机会了，正好今年还有指标。

程贵安又是从鼻子里嗤出口气：“这种人算什么，快走吧。走了，学校还省点心。什么尾巴也没给他留，已经很不错啦。还要转正？想都不用想。”

学生高考前，李辰又离开了学校，离开了讲台。因为只是代课老师，不存在退休的问题，给了一百元补助，还是平老师争取来的。

那个转公办教师的指标，给了程贵安一个远房的小姨子，去年初中刚毕业。为了转成公办教师，特地把她从程校长的老家搬过来，原定教一个月的学，结果教不下来，只教了一个星期。转了正，就去当图书室的管理员了。

别看程贵安对别人颐使气指，他自己也有不高兴的时候。这年暑假开始前，他接到县教育局的通知，免去校长职务，办理退休，由平近芳任副校长，主持工作。

“怎么能叫我退呢？我怎么能退下去呢？我退了，这龙头中学再怎么搞下去呢？革命还需要我嘛。这是谁搞的名堂？”

程贵安把县局的通知“啪”地摔在桌子上，朝屋里的几个人吼着。当然屋里的这几个人谁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其实程贵安过了退休年龄已经三年了，县教育局几次找他谈，他都勃然大怒，县教育局都缩了回去。这回，县局不知是换了局长，还是怎么，没跟他打招呼，就来了通知。他怎么能不发火呢？

“这儿还需要我。没有我，谁来把关啊？李辰那些人，不又得跳出来啦？”

“李辰已经不在学校了。”旁边有人提醒他。

“喔。”他也想起来了，改口说：“我说的是李辰不在了，李辰这种人还有嘛。我就不相信阶级斗争熄灭论。你们有这个政治敏感性吗？你们有这种斗争的坚决性吗？还是得我这样的老革命嘛！”

程贵安说了一大堆话，已经没人理他了。

但是，他还要说：“起码，起码新上来的干部也要扶上马，送一程么。我可以当书记，送平近芳一程么。”

平近芳终于以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进了曾经是程贵安的办公室。

她轻轻地带上了门。当她的手摸到这扇门的把手，心里是多么的感慨啊。她也曾多少次地进过这个门，可每次都要先必恭必敬地站在门前，再不轻不重、不急不缓地敲门，连敲的轻重，敲的次数，甚至敲的节奏，都要再三的掂量，而后再硬着头皮以一种既敬仰又谦卑，既亲近而又不能是过分的语调，问一声：“程校长，您在吗？”连自己都头皮发麻，连自己都感到恶心。现在终于不用了，现在终于轮到别人像这样站在自己的面前了。

她想起了在这屋里自杀的余校长，想起了安于淡泊的老校长肖福兴，想起了最后一刻也不肯离开、往地上扔茶杯的程贵安，更想起了自己始终有歉疚、至今没有退休金、到老还要自食其力、种自留地的李老师，不能不感慨这人生的无常。

但是那又怎样呢，现在坐在这办公室里的是她，不是别人，更不是李辰。有这个结果，就行了，这就足以能说明所有的问题了。过去所有的是与非，都烟消云散，可以忽略不计了。至于李辰嘛，有够得着的时候，帮他一点就是了。

平近芳释怀一笑，一屁股坐上了办公桌后面的沙发椅。这么软啊，到底是校长坐的，椅子也不一样。哎，还是可以转的呢。她拍了拍椅把，真有意思，又饶有兴趣地来回转了两圈。

第四章 安息吧，海秀

1978年1月4日

1980年的暑假。

当然对于李辰来说，也不存在暑假的问题，上大田里跟社员们一起干活，体力也不行，就在自家的自留地里拾掇着。

突然，杜家骏一脸认真地跑过来，喊他：“李老师，李老师，快跟我回去。县上来人找你。”

李辰心里咯噔一沉，脸上刷地发白发凉了。又出了什么事，这正是他女儿考大学的关键时候啊，又有什么事？

杜家骏见他愣在那儿不动了，就说：“看上去不像是坏事，可是个大事。纪社长也来了，都在你家门口等着呢。”

“什么事？”李辰经受过多少次的打击，事临到头还是有些恐慌，眼神发直，脚挪不动了。

“你先别怕，他们是先来找我，再一起来找你的。态度很认真，但是不严厉。什么事，没说，说是要当面对你说，但不像是追究什么。”

李辰这才拔起脚，忐忑不安地跟着杜家骏回去。果然有好几个人等在他家门口，纪社长、平校长都在，其余的，不认识，大概是县里的了。他们老远就看着李辰过来，那眼神非常急切。

纪社长先开口：“李老师啊，下地去忙活啦？”

平校长也忙不迭地说：“李老师，这些天在家还习惯吧？”

从这些话听起来，不像有什么坏事啊，李辰心里在想。

李辰放下街门顶上的门扣，把大家请进屋里。龙头镇直到那时民风依然淳朴得外出不用锁门。

李辰站在墙边的桌子旁，有点不知所措，搓着手喃喃地说着：“家里连点热水也没有，不好意思。”

“不了，李老师，这是县委管政法的卞书记，向你正式传达一个省委文件。”纪社长说。

李辰望着那位脸色红润、大腹便便的干部，这是位县委书记啊，怎么会亲自到自己家来，还要传达省委的文件。看着看着怎么还有点脸熟，李辰猛然想了起来，这不就是1957年反右时抓他的公安局卞科长，1971年抓走林海秀的卞局长吗。他现在是县委卞书记了？李辰又有点诚惶诚恐起来，不知道又是什么厄运要降临到他的头上。

是的，眼前这位就是当年的卞科长、卞局长，现在的卞书记。卞书记现在可是富态多了，所以一开始李辰都没认出来。卞书记没等李辰平静，就接过边上一位干部递来的一份文件，念了起来：

“关于为林海秀同志平反昭雪，并追认为革命烈士的决定。”

李辰一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一下子什么都听不见了，眼前一片迷蒙的花白，手硬撑着身边的桌子。平校长忙过去扶了一把，才没有倒下去。

文件不长，卞书记念完以后，又对李辰说：“林海秀同志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进行了坚决顽强的斗争。杀害她的，是猖獗一时的极左路线。林海秀同志坚持真理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她在最后时刻始终没有屈服，没有后退。她是人民的好女儿，革命的好女儿。”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李辰嘴唇哆嗦着。

“是的，这是真的。这是省委的决定。以后我们会复印一份给你。”

李辰直直地愣了一会儿，突然捏紧拳头在胸前挥舞，大声地朝天喊着：“海秀，海秀！你听见了没有？你听见了没有？你也有出头的一天啊！”便倒地大哭不止。

杜家骏、平校长怎么劝也劝不住，只好把李辰扶到炕上，县里来的干部们也唏嘘不已。

忽然，李辰在炕上坐起来，问：“她的遗体呢？有没有她的遗言遗物？”

“很遗憾，省里各有关部门查了很久，直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她的遗体，也没有发现她留下的遗言遗物。组织上很对不起你。”卞书记说。

“我一定要见到她的遗体，我一定要见到她的遗体！”李辰哭喊着。

卞书记的眉头闪出了一丝不快：“李辰同志，有些事情很复杂，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好多事情不能再深究，就到此为止吧。能够走到这一步，不但平反了，而且授予烈士称号，很不容易啦。已经是最好的可能啦。如果不是省委领导顶着压力，坚持真理，坚持拨乱反正，林海秀这案子还很难翻得过来。我们县公安局在这件案件中，也作过很多别人不知道的努力啊。这些，你们都是很难了解的。比如，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要对林海秀从重判处死刑。最后的结果，我们也没想到啊。好多话就不说啦，不说啦。”

卞书记说到这儿似乎也有一些难言之隐，眨巴着眼睛，但没有泪花出来。

李辰冲下炕来，在墙角的纸箱里拿出几件他一直保存的林海秀的衣物，紧紧地捂在胸前，又是一阵痛哭。

卞书记见不便再待下去，就说：“李老师请你多保重。县委决定，将你特批转为公办教师，每月领取51元退休金，你女儿高考结束后，如果没有录取，也可以安排正式工作。我们走了。”

李辰在痛哭中好不容易说了声谢谢。

卞书记离开的时候，西北村的胡同里、龙头镇的大街上又挤满了一堆一堆的人群。

三天之后，西北村在西北场院为林海秀举行了一次庄重的追悼大会。

也是从这一天起，西北村又恢复了民主村的名字。乡亲们也知道民主的分量和不易。

大会的横幅是“勇敢的战士，不屈的英魂，沉痛悼念民主村人民的好女儿——林海秀烈士”。

主席台后的黑布上，挂着一个手绘的烈士遗像。正中的方桌上摆着一个红布覆盖的红漆木盒，里面装着海秀曾经用过的一块围巾。

公社、邻近的大队都来了代表。

大河北面的李家泊，是林海秀公婆的村庄，来了不少李辰家的亲友。老村长虽然在文革中被孙二赖挖去了双眼，已经失明了，却非要叫人们搀着，站在李辰的边上。

杜家骏代表大队做了悼词。

但是任何的言语都已经无法抹去人们心中的伤痛，都无法解释在革命的名义下所发生的这场悲剧。资本主义没有复辟，地主富农没有翻天，国民党也没有回来，而我们的好女儿却悲壮地倒下！

面对横幅上的白底黑字，面对音容犹存的遗像，面对红布覆盖的小盒子，悲伤、愤懑、痛惜、感叹都已经表达不了人们心中的震颤。

人们永远忘不了1949年海秀在敌人炮火下勇敢的身影，

人们永远忘不了1965年海秀在围歼国民党武装特务时冲在了最前线，

人们永远忘不了1971年海秀被公安局抓走时冷峻忧伤的脸庞，忘不了才一岁多的女儿在追赶她妈妈时那呼天抢地的哭喊……

沉重低回的哀乐声中，只听得人们的哭泣。

追悼会后，人们来到望海山坡，在林海秀父亲林齐心的坟边，埋下寄托着海秀英魂的木盒。

林李抱着妈妈的木盒，哭得死去活来，久久不肯放。她的心里早就认定，她的母亲是一位社会主义时期的像姜雪花那样的英雄。

李辰在林齐心的墓碑前捶胸顿首，哭喊着：“爹呀，爹呀，海秀回来啦！海秀没有错，海秀没有罪！是他们搞错了。海秀永远是你的好女儿，海秀是民主村的好女儿，你在地下放心吧……”

李辰在海秀的墓前几次昏厥，最后不得被乡亲们抬了回去。

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是邓小平和胡耀邦在改革初期最为人乐道的两项重大举措。正是有了这两项举措才有了后来改革开放的进程。

冤假错案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一再发生，从三十年代反AB团，四十年代的延安抢救运动，五十年代的反胡风、反右、反彭德怀等，到六十年代的社教、文革，这类案件难以计数。而且数量都很巨大，手段也很残忍。一旦下手，受害者就连申辩还嘴的机会都没有。有人说，这是受了斯大林三十年代大清

洗的影响。其实中央苏区发生的“富田事件”是在1930年，比斯大林的大清洗更早（说明：富田，是当时中共江西省委所在地。左倾领导人以肃清AB团的名义，先后冤杀红军官兵、干部群众达万人以上。见《中国左祸》，文聿著，朝华出版社）。

海秀的平反，对平近芳的震动，当然也是巨大的。

但她已不是天真的小姑娘了，她现在能够应付了。事情远不止是内心的愧疚之类的东西，感情用事已远不能成就大事。她还要掂量这件事对她的影响，要观察人们，尤其是上级部门对她的态度。还好，好像没有察觉到什么变化。当初她的告发，除了宗发奋，别人都不知道。看那宗发奋不是也没有别的事嘛，好像稍微话少了点，深沉了一点。

平近芳心里有数了。当然还得有点后续措施。她上了县教育局，又直接和省招办电话联系：我们这儿有了个新的烈士子女，要考大学，你们要想办法解决喔。

过了两天，平副校长急急地走进李辰的家，很关心很亲切地对李辰说：“李老师啊，李老师啊，办成了，好不容易办成了，你女儿的事办成了。”那种语调的亲柔、分寸的把握，决不是一般人能练就的。

李辰茫然地抬起了头。

平副校长忙接着说：“啊呀，李老师啊，赶紧上县里去，把林李的考生登记表的成分改了，马上改成“烈士子女”。以林李的表现，想上哪个大学都不成问题。”

李辰睁了睁还是红肿的眼睛，沙哑地说：“算了吧，不麻烦组织了。就以她的实际水平，接受祖国的挑选吧。”

一个月之后，通知书下来了，林李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这是有史以来从民主村第一个走出去的大学生（那个秦有理不算，祖云涛考大学时户口已不在村里）。

九月，林李离家上学的那天，不少乡亲们来送行。

在西门外上车前，林李到她妈妈的坟前，摘了一朵小黄花，戴在头上，眼睛红润，说：“妈，我要走了，我的心里永远有你陪着我。”

第五章 阳光的折射

1978年1月5日

1981年的早春，又一缕阳光照了过来。这回是照到王山一家的身上，可王山一家没怎么感觉到，因为这缕阳光折射了。

中央下发了有关落实去台人员及其在大陆亲属的政策。文件是早些时候下的，主要内容是：对所有去台人员在大陆的亲属，应与社员群众一视同仁。在劳动安排、分配报酬、招工上学、入党提干等方面都平等对待，不得歧视。生活有困难的，予以照顾，使之不低于当地平均水平。允许通信往来，不得干涉，欢迎回乡探亲。以前在大陆哪怕是犯下罪行，只要是在当地成立人民政府以前的，一律不再追诉。

这事归宗发管，他也不着急。等想起来了，召集了各大队的治保主任开会，讲了主要意思，也就六、七成吧。

“这事，你们回去摸个底，有哪些人家属于这个情况。你们也不用和他们直接去说，省得他们冲着你们来要这要那。他们对我们政府肯定会有很大的意见，这个你们心里要有数，该硬的还要硬。具体内容，跟大队书记说一下，以后注意对他们不要太显鼻子显眼就行了。有什么反常情况，及时反映。”

龙头公社有几个人是敢说的，赵村的赵刊新就打了第一炮：“这些年，我们亏待了他们不少。”

和平村的哈联成说了一个更不好回答的问题：“民主村的秦德才把人家老王头都打死了，怎么说？”

宗发奋没想到下面还真提出问题，赶紧说：“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特殊时期，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等上面有了处理办法再说。散会，散会。”

民主村是平金刚来的。平金刚回去跟杜家骏说了，杜家骏说这事光咱们俩知道还不行，开个支委会吧。

当晚，开了个支委会。平金刚把内容一传达，杜家骏沉吟了好长时间，才说：“这个问题应当解决啊，过去对他们是不公正的。”

鲁队长也说：“按理说，赵玫在1965年消灭国民党武装特务时，是立了第一功的，应该是个‘民兵英雄’，结果最后落了那个下场。”

彭小宾说：“老王头，多好的人，老互助组长，老合作社长，竟然被秦德才这种人活活打死了。”

平金刚忙解释说：“会上，哈联成还特地提了这个事。宗主任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以后再说。”

鲁队长冷冷一笑，说：“这才过了几年的时间，就算历史问题啦，不管啦。”

杜家骏说：“我们还是把咱们村这几家理一下吧。其实也没剩几户了，李策家、董平章家都没人了，就是王立家和连二娃家了，他们两家也合成一家了。”

彭小宾说：“唉，也真难为王山了。”

鲁队长说：“我看这样吧。王家和连家都挺困难，住的也都是解放前的老房子，也不大行了。连家那个小儿子也大了，咱们就帮他们把连家老两口的旧房子翻新一下。也不说是因为他们是去台人员家属，就说是大队帮助困难户。这样，村里议论也会少一些。”

杜家骏想了想，说：“这个办法挺好，应该帮他们一把。”

连家的老房子是修了一下，可落实去台人员家属待遇这么重要的政策，对于几十年来深受牵连的老王头一家反而一点也不知道。以至于如本书第一卷开头所讲，六年之后，王山老汉一听说“台湾的国民党弟弟”来信了，还被吓成那个样。好好的一缕阳光，硬是被一些人折射歪了，需要照的地方没照到多少。

第六章 联产承包

1978年1月6日

6.1 分田地

不久，一个春雷在中国炸响。全国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每户按人口分得一定量的土地，由各户自主生产，然后各自按地亩交公粮、税款和各项附加费，剩下的就是农户自己的。

民主村得到消息，立刻赶在春耕前推行。这件事，谁想挡也挡不住了。尽管干部再三说这不是分田到户，不是单干，实际上相当于农户向上级行政部门租赁，在一定程度上农户有了生产自主权。可乡亲们都觉得是好像自己有了块土地，这是农民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事，也是从五十年代以后，大家想也不敢想的事。革命胜利三十多年了，农民作为个体，才在某种程度上直接享有了土地的使用权。

生产队把队里的地块按土质好坏，埧地泊地，路的远近分成几种类型，每种类型再分成几十块，编上号，写在纸条上。然后各户在这几种类型中，各选几块。民主村基本上是每人分二亩地。

八队抓阄那天，全队的男女老少都来了，还都穿上了好衣服，人人脸上喜气洋洋的，比过年还高兴。皮安已说：“想不起这些年来，还有哪天比今天更高兴的。”

为了以示公平，大队派了别的队的彭小宾、齐成才过来主持。邬中和的儿子邬朝阳，初中毕业了，喊了来做记录。

饲养棚的门前，摆了两张方桌，上面放了四个纸箱，每个纸箱里放着这一类型地块的纸条。

彭小宾问：“都来了吧？”

大家齐声答道：“早都来了！”

“来了就开始。”彭小宾把一个纸箱里的纸条倒在桌子上，“大家看好了。”再捧回箱子里，叫皮高深伸进手去一搅。然后几个箱子都这么来一遍。

“谁先来抓？我这口袋里，也有几个阄，上面都有号。”彭小宾也把口袋里的阄拿出来给大家看了一下，又放进口袋。“你们过来摸吧，是几号就第几个抽。”

稍有一番谦让之后，皮安已第一个上来摸，一脸神圣的模样，从彭小宾的口袋里翻了好几下，才拿出一张纸条，又颠来倒去地看了好几遍，嘴唇动了两下，都没能念出来。

皮高深赶紧过来帮他爹看了一下，“三号，第三个抽。”

大家一一抽过之后，第一个要抓阄的是一号，荣残军人靳喜悦。

靳喜悦今年也六十了。儿子靳宝康也成家了，为了方便照顾他爹，他们爷俩还在一起过。这是两家算一家，合起来是四个人，分八亩地。宝康看他爹行走不便，就说：“爹，我上去抓吧。”

靳喜悦一瞪眼，他的脾气还是不好，对儿子也是这样，说：“这样的大事，得我来。”

宝康和他媳妇搀着靳喜悦上前。彭小宾说：“靳大叔，你家是八亩地，正好在这四个箱子里，每个箱里抽一张。”

靳喜悦也是一脸认真，小心翼翼地伸进手，在里面拨弄了好几下，才拿出一张纸条。自己看了一会儿，看不懂，给了儿子。

宝康看着纸条，彭小宾说给大伙儿念一下。宝康转过身，面对大家，大声念着：“西门外第二排东面第四块，泊地二亩。”

下面一下子鼓起了掌声，和干部们开会不一样，农民们是很少有自发鼓掌的。这是乡亲们高兴啊。

掌声和欢笑过后，宝康问：“这西门外二排东四块，是哪块地呀？”

彭小宾举出了一张大纸，上面画了全队土地的示意图，表明了各类型各地块的位置，说：“等都抓完了，我来解释，给你们说一下。”

宝康又问：“这回俺家是按四个人分的，要是明年我媳妇添了一个娃，那咋办呢？”

彭小宾说：“各队的地块还都留了点零头。你得抓紧时间快点生，晚了就没有了。”

大伙又是一阵哄笑，羞得宝康媳妇低着头，不知该往哪儿钻了。

王山家比较特殊，他家是五个人五个姓。加上连家老两口年事已高，叫他们自己种地很勉强，分的地也要并过来。现在王山一个人要挑起两个家，好在小连子已是大小伙子了，也是一个棒劳力。年前已经订了婚，对象就是高家庄高梁山的小闺女高秀珍。为了多分一份地，前两天现去民政登了记，领了结婚证。王山怕小连子单立门户没有经验，商量之后两家还是合一，小连子也挺愿意。这次分地也在一起，一共算是八个人，十六亩。（读者能记得是哪八个人吗？他们是：王山、连四嫂两口，连家老两口，王大妈，丁妹，小连子和还没过门的高秀珍）

当王山上去抓了阄下去，回到自己家人身边，看到这几张写着一共是十六亩地的纸条，全家人都哭了。他们最伤心的是王山的爹老王头没能看到这一天。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他们全家都去了山上（海源话里，下地里干活，不管是去泊地堰地，都可以叫上山），一块地、一块地地全都看了一遍。村里各家各户的人也都来了，从北门外到南海沿，从大河岸边到望海山坡，到处都是来来往往的乡亲们，指点着、比划着，热烈地议论着。队干部们也在跑前跑后，说着、解释着。

王山一家看完后堽上的地，又去看海边南堽上的地。王大妈说：“啊哟，几块地隔这么远啊。”

王山说：“再远也跑得高兴啊。”

小连子一路上堪，跑在前面。各地块的边界上都插着写着编号的小木桩。小连子一个一个数过去，指着一根小木桩高兴地叫着：“在这儿，在这儿，就是这一块！”

王山几步跑过去，在地边上跪了下来，捧起一抔黄土，把脸都埋了进去，许久，才把脸抬起来。

王大妈看着王山粘满泥土的脸，说：“看你脸上脏的。”

王山一边用手摸着脸，一边孩子般地嬉笑着：“脏吗？脏吗？”一会儿又举手向上，仰天大笑：“哈哈，哈哈！我们也有土地啦。我们也有盼头啦！”

小连子也动情地说：“这真像第二次土改啊。”

七十四岁的王大妈眼睛渐渐地湿了，从丁妹搀扶的手中滑了下来，跪在了地头，双手拍着地，磕着头，声泪俱下：“老头子啊，老头子啊，你睁开眼看看吧，我们家也分了地啊。老头子啊，你能看得到吗？你死得冤啊……”

丁妹和连四嫂也都在一边抹泪。

丁妹，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妹妹了，这年也已经五十，按海源的戏称可以叫“老太”了。多年的压抑，使得皱纹早就爬上了她的脸，黑发中夹杂着白发。这些年，她的言语越来越少，神情愈加木讷，但是干活依旧麻利，依旧勤快。她扶着婆婆，挂着泪花的眼睛一片灰蒙，看不出有半点思维的活动。站在这黄色的山埂上，背后是辽阔无垠的蓝天，眼前是波涛汹涌、一望无际的大海，谁都会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然而，丁妹却是木木的，全无反应。她的心早已经死了，像早已冷却的一堆灰烬，她只有不停地干活，才能维持肌肉骨骼的运动，才能支撑自己的躯体不至倒下。当然，谁也不知道，在她的心底，在那堆冷却了的灰烬的深处，还有一个发着暗红的亮点。她所以不再说话，不再有思维，不再有对外界的反应，实际上都是在以她所能有的全部力量，以她自己特有的方式，刻意地维护着这最后仅存的亮点。没有了这个亮点，也就没有了丁妹最后的那一点世界。这个亮点，显然就是，尽管麻木、尽管没有任何幻想，却仍然无法了结的、对大海那边王立的至死不灭的思念。

6.2 迎亲

自打分地以后，王山是铆足了劲，在地里干活。每天起早贪黑，有十分力也要用上十二分。他知道他的肩上挑着王家和连家两副担子，责任可不轻。这三十年来，他们家过得越来越压抑，压得都直不起腰，压得都喘不上气，更没敢有半点的希望和幻想，真没想到还能有自己土地的一天。虽然他今年已经五十七了，早过了身强力壮的年纪，也不知道更多的关于改革的一些道理。但他下决心拼上命，也要把这个家，不，是这两个家，过得像个样。因为这是他这辈子最后的愿望，也是最后的机会，他怎么能不努力呢。

麦收时分，是农民们一年中最辛苦、也是最欢欣的时候，尤其在这联产承包的第一年。每一滴汗珠和每一颗麦粒都是自己的。

当太阳升到竹竿头的时候，地面已经烘热。王山一家在西门外的田里，已经割了一分多地的麦子。王山身上那件褪了色的旧衣服，前胸后背都被汗湿了个透，他顾不上擦汗，只见手起手落，镰刀飞舞，刷刷地一行倒下的麦秸在他身后延伸。

小连子也在使劲地追赶。

王大妈颤巍巍地提着一瓦罐烧好的水，走了过来：“喝水吧，喝点水吧。”

王山这才直起了腰，看一看割下的麦子还真不少呢，从天蒙蒙亮到现在还一口水没喝呢，可现在还不是喝水的时候。他对丁妹和连四嫂说：“你们俩先捋麦子，往回推吧。”

丁妹说：“我自己一个人就行了，嫂子先歇回儿吧。”

连四嫂连腰也没直，说：“那我还是接着割吧。再往下，太阳就要晒得厉害了。”

连家老两口跟在后面捡麦穗，那么认真，那么仔细，一颗麦粒都没落下。也是从清晨到现在，一口水也不舍得喝。

几个月的辛劳换来了王山家几年不曾有的欢乐，小连子办喜事了。

新娘子是个山妹子，一个大大方方、泼泼辣辣的山妹子，就是北山公社高家庄的高秀珍。

为了迎亲，家里、队里都作了不少准备。大队上已经把连家的老房子翻新了。房顶铺上了新的麦秸，靠屋檐还上了两层红瓦，当地叫做“金镶玉”。又换了几根檩杆，墙面重新抹了泥，刷了白灰，就像新房子一样。

王山全家也竭尽全力地准备了一番。那时已经有“三转一响”的说法，他们也买了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在农村不实用，就买了台座钟，全家都能看。就是那一“响”收音机，实在买不起了，以后再说吧。好在小连子和高秀珍都挺通情达理，不在乎这些。

迎亲那天，村里特别热闹。大家都知道这些年王山家所受的磨难，今天能有这样的喜事，大家都替他们家高兴，也是为民主村高兴，是民主村有了新气象。

鲁队长自告奋勇当了总指挥，他派平金刚的儿子平海波，开了大队那辆新的手扶拖拉机去迎亲。拖拉机上坐着一位“抽新人”。海源的风俗里，搀扶新娘的得找一位五福齐全的妇女，即上有公婆下有儿媳，叫“抽新人”。今天找的是于村长的儿媳，于震祥的妻子，正合适。本来“抽新人”要和迎新队伍一起出去，但是考虑到路远，坐手扶拖拉机又不舒服，王山说你在村口等着就行了，但震祥媳妇为了礼数更到，一定要跟着拖拉机去。肖胜利当了迎新队伍的“指挥”，领着一帮年轻人，簇拥着穿着一身新衣的小连子，跟在拖拉机的后面，欢天喜地地出了西门。

一般来说，迎亲队伍出去三、五里路就可以了。小连子的队伍为了显得更诚心、更隆重地对新娘，一直往北跑到了北山公社的地面。

在一处山峦的拐弯处，肖胜利看见山坡后面开来了一辆披着红花彩带，插着彩旗的“东方红”拖拉机，便喊了起来：“来了，来了！”

小伙子敲起了锣鼓，吹起了唢呐。对面的拖拉机开到跟前，小连子赶紧跑上前，拉着新娘的手，连说：“来啦，来啦！”

高秀珍一身红袄，低头笑而不语。小连子又对岳父母高梁山两口请安、问好。一阵礼节之后，高梁山说：“小连子，你也上来吧，这辆拖拉机大，坐起来稳当点。”

小连子又把震祥媳妇介绍过来，也把她请上了大拖拉机，说自己年青，在前面带路。

戴着大红花的小连子，骑着自行车在最前面，喜滋滋地领着迎亲的队伍。那时刚开始有把拖拉机当迎亲用，又是锣鼓唢呐，又是红花彩旗彩带，又是欢声笑语，惹得沿路三四十里的乡亲们驻足相看，又羡慕又称赞。

过了粮管所，要到西门口了，一大群民主村的乡亲们等着呢，看见迎亲队伍过来了，连忙点起鞭炮。“乒乒，乒乒”，爆竹声响彻了龙头镇的上空。乡亲们不但是为小连子、为王山家，也是在为龙头镇的新生活而高兴。

拖拉机开到西街上停下。用大小拖拉机迎亲，在民主村还是头一遭，整个龙头镇都轰动了。看热闹的、道喜的，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王山两口领着丁妹和三位老人，忙迎上来。

震祥媳妇扶着新娘下车。高秀珍搭着震祥媳妇，在鞭炮声中，在人们的注目和笑语声中，从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缓缓而过。红红的脸蛋上那充满喜悦的眼睛，不时抬起来张望一下，又迅速地害羞地低了下去。她怎么能不张望呢，对于许多中国农村女孩子来说，出嫁就像是第二次投胎，是又一次人生的重新开始。她要看一看这天，看一看这地，看一看这儿的乡亲们，这是寄托着她一生幸福和希望的新的天地。街上的喇叭里放着歌曲：“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娜尔汗的心儿醉了。”大概正好能表达高秀珍此时的心情了。

乡亲们也都在议论着新媳妇，这个即将进入他们生活圈的新成员。

郭大妈说：“这媳妇还真不丑哎。”

齐大妈说：“是哎，你看这眼睛水灵的，还是老王家、老连家有福啊。”

这边，迟解放在开玩笑说：“哎呀，你看，老王头家在北山管制了两年，还能领回个儿媳妇来。”

齐成才正色道：“你愿意那样去？那可是拿了老王头的命换的。”

第七章 地富摘帽

1978年1月7日

改革的进程风驰电掣，几乎令人目不暇接。

1982年，取消了人民公社，改为乡政府。这事当时虽然没有着力宣传，但它的意义却非同小可。这在中国农村是影响全局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的重大变革。（对于龙头乡政府的所在地，老乡们还是习惯于叫龙头镇）

为便于平稳过渡，领导班子没动。纪社长又变成了纪乡长；祖云涛还是二把手，分管党务；宗发奋是三把手，分管行政；经学文是四把手，分管生产。撤消政治部、生产指挥部，另设各种职能的办公室。

村里的大队管委会，改叫村民委员会，大队长改叫村委会主任。可民主村人还是习惯叫鲁队长，村支书还是杜家骏。

随着改革进程的加快，改革的政策力度也越来越强劲，又一次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又一个新的政策下来了：给所有的地主富农摘帽子，他们的家庭成分改为“社员”。

天天在批判地主富农的中国人，不再有斗争对象。地主富农和他们的子女，这批永世不得翻身、被剥夺了做人起码权利的人，连“贱民”都赶不上的人，忽然之间，能伸一下腰，和大家一样地生活。这世道真的是变了。这个政策落实到民主村，已经是1982年了。

民主村的地主富农在土改时和革命胜利前，就已经被杀完了，唯一的一个就是后来从黄港福利院回来的、一度曾被错当成革命遗孤的狗狗。这个摘帽改成分的政策对狗狗的冲击，比其他的地富子女又要大得多。因为他曾经被当成是烈士子女，享受过这个社会所能给予的最优厚的待遇。那时，所有的阳光都照在他身上，他能体会到作为一个国家的主人、革命胜利者的所有感受。一夜之间，就是因为成分不同了，他又跌到了社会最低层，失去了任何最起码的权利和最起码的尊严，像狗一样地被唤来唤去，甚至常常连狗都不如。尽管民主村的大多数人做得还并不过分，这也已经使他尝够了人间的辛酸炎凉。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成分”的不同，一张贴在人身上的标签的不同；是因为以阶级斗争作为推动力的那种革命的需要。需要有人被贴上这种标签，来充当不断革命的打击对象，从而对所有革命和不革命的人都能起到威慑作用。

西北场院的社员大会上，杜家骏刚念完文件，全场一片肃静，大家还都没有反应过来。

杜家骏又进一步具体说明：“我们民主村有两位同志符合这项政策的条件。一位是辛狗狗，他原来的成分是地主；一位是邢秋芬，她原来的成分是富农。我宣布从现在起，他们的成分就是“社员”了！他们自

己也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员！我还要说一句，邢秋芬的父亲原先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我们接到通知，她父亲也已经摘帽了，而且实际上她父亲以前也并没有什么反革命罪行。从现在开始，大家可以称他们为同志了。我们向这两位同志表示祝贺！”（说明：这项政策制定时，人民公社尚未取消，所以文件上说的还是地富摘帽后给予“社员”待遇。）

会场在凝滞了几秒钟之后，彭小宾带头鼓起了掌。全场跟着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辛狗狗站起来，拉着邢秋芬，走到了会场的前面。他已经是胡子拉茬的中年汉子了。这个轻易不动感情的倔强汉子，这时也流下了泪。他说：“今天，是我和秋芬重新获得生命的日子，我们俩要重新拜天地。首先，要感谢民主村的乡亲，民主村的干部。十一年来，没有为难我们，还尽你们的可能照顾我们，使我们能有这片栖身之地。这第一拜，要拜民主村的乡亲，民主村的干部们。”两人扑通跪下，朝前向大家恭恭敬敬地磕了个响头。

大家都没料到会有这一幕，全场寂静，都能听到他俩口磕头碰地的声音。

辛狗狗拉着邢秋芬站起来，又说：“这第二拜，要拜天拜地拜父母，也拜我们自己。是天地创造了这个世界，是父母带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不管他们今天还在这世上还是已经离去，永远难忘他们的养育之恩，难忘他们的艰辛。到了这世界，还要靠我们两个人自己的努力，相互帮助，相互搀扶，走完人生的路。”

两人跪下，面对面相互对拜了三拜。辛狗狗再扶起邢秋芬时，邢秋芬已是泪流满面，好不容易才站了起来。

全场静静的，只听得邢秋芬的低泣。

“这第三拜，是感谢共产党。是党的好政策，给了我们新的开始，新的希望，新的生命。没有党的政策，就没有我们的一切。”

两人又跪下，向北遥拜。

场院里，有了不少妇女的哭泣声。

当狗狗再要拉邢秋芬起来的时候，已经拉不起来了。邢秋芬想着自己三十年的艰难，想着自己父亲怎么过的日子，想着几乎记不起来的母亲，挺不住了，身体瘫软了。

直到叶丽娜背着急救箱赶来，又是掐人中，又是针灸，邢秋芬才缓过气来。

第八章 抛妻回城

1978年1月8日

在一浪一浪的冲击中，也有招人议论的。

几个城市知青下乡来到民主村，十一年了。辛狗狗和邢秋芬，时治国和本村的姑娘皮平平，各自成了家，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日子虽然艰辛，政治上也是几度风浪起伏，可他们的小家庭都坚持下来了。但是当又一场社会变革来临的时候，情况变了。

1980年，知青可以回城了。当时的政策是，除在当地结婚成家或安排了工作的，都可以回城，于是各地出现了一场比当初下乡时更加急速凶猛的返城浪潮，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还留在乡间的知青几乎就绝无几有了。

邢秋芬是跟定了辛狗狗，扎根民主村。他俩盘算，这两年生活改善挺快，等条件再好一些，有了自己的房子，就把秋芬的爸爸接过来。

时治国这边就犯难了。这农村他是一天也不想待，可是他已经和皮平平成家了。按政策是不能回城的。他苦在心里，脸上又说不出。

皮平平看出来了，就把一岁多的小丫头往他怀里一塞，问他：“是不是后悔啦？后悔了，就说，我不拦你。”嘴上这么说，心里却虚得很。

“哪能呢，哪能呢。”时治国嘴上敷衍着，心里还不知怎么想呢。

“治国，你家里来信了。”肖胜利在外面喊着。肖胜利也成了家，媳妇是他念高中时的同学，姓盛，现在在龙头中学当代课老师。成家以后，肖胜利也就搬出了和时治国合住的那个以前李芹家的院子，跟父亲肖校长租了一套院子住在了一起。这是看到时治国有信，特地跑过来的。

“哦，哦。”时治国放下孩子，急忙出了堂屋门，接过信就在院子里看了起来。

“肖大哥啊，进来坐一会儿。”皮平平走到门口说着。

肖胜利见皮平平的神情不是很自然，也知道他们小两口平时有些磕磕碰碰，于是说了一声：“不了，不了，我还有事呢。”就抽身走了。

时治国看完信，把信纸塞进了口袋，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却没有说话。

“信上说什么了？”平平抚着孩子的手，问。

“没什么，没什么。”时治国有点慌张，搓着手，眼睛只朝着地下转悠，并不看皮平平。

“到底是什么事呀？”平平过来一把就从时治国的口袋里，把信拿了出来。时治国也没去拦。

信是时治国的父亲时编辑写来的。意思是说，为了你能回城，我已经办理了退休顶替手续，你务必尽快回省城。我已经尽了所有的努力，这是你唯一的回城机会，也是最后的机会。其他的事情以后再慢慢解决。这是关系到你一生前程的大事，务必务必。

平平看了以后，心都凉了。显然在时家人看来，她和孩子的前途命运不过是属于“其他的事情”，他们儿子的前途才是唯一要考虑的事情。

“你准备怎么办？”平平正色道。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时治国苦着脸说。

他们俩都没动，中午也没做饭，也没吃。小丫头哭了，皮平平塞给她一个窝窝头。

过晌了，两个人憋了一个多小时没说话。

时治国终于慢慢地抬起了头，看着皮平平轻轻地说：“平平，要不这样，咱们俩先假离婚，等我到了省城就好办了。慢慢地再把你们娘俩办来。”

“这不行。你倒是走了，把我们娘俩甩在这边啦。”皮平平不答应。

“怎么会呢？你对我的恩情这么大，我怎么会对你忘恩负义呢。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吗？”

皮平平想想这几年来，时治国虽然为人处事不老道，在村里评价并不高，但是对自己应该说还是可以的，对家庭、对孩子也是尽力的，口气就软了点：

“难道就这一个办法吗？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如果有别的办法，我家里肯定会去试的。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政策规定我只有是单身才能顶替我爹的工作。而且我爸都已经办了退休手续，这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如果现在我不回去顶替，那就作废了，以后就再没机会了，就真的鸡飞蛋打，什么也没有了。我怎么跟家里说呢？”时治国也急得泪眼汪汪。

“那你要是回了城里，变了心呢？”

时治国一下子跪在皮平平的面前，起誓说：“我要是那种人就天打五雷轰。”

皮平平倒是先流出了眼泪，没了主意。

“你还不信，我写个书面保证，你拿在手上。”时治国连忙找出纸和笔，刷刷地写满了一页。意思是，为了能顺利回城，我俩是假离婚。我时治国一定永不变心，皮平平永远是最爱我的人。如违背承诺，我时治国愿意承担一切责任，接受任何惩罚。

皮平平拿着这份保证，泪水不住地下。当初不顾父母的反对，顶着乡亲们的非议，毅然决然地跟一无所有的时治国走到一起。十年夫妻今天却换来了这样一张纸。

皮平平拿着这张纸，回家跟父亲商量。

皮安已当然跳起来反对，“什么混帐东西，这种时候就只顾着自己先跑啦。这种人在日本鬼子打进来的时候，肯定是自己拔腿先逃，把老婆孩子丢给日本人也不管。”

“我看他这个人比较懦弱，但还不是个没良心的人。”平平还在维护着自己的男人。

“他要是走了，翻脸不认人呢？”

“真要翻脸，就是不让走，也留不住啊。”皮平平说。

“当初就是你不听爹的话，落到这一步。”

“让他走吧。在他面前，在我面前，也只有这一条路了。”皮平平无奈地说。

“那你可得自己想好了。”皮安已说。

皮平平平时治国来到乡政府民政干事那儿，讲了这事。现在龙头乡干民政的，就是当年在西北村搞社教的白云，如今也五十出头了，可还是热心、正直的一个人。她一听俩人的事，先是一惊，说：“这不是闹着玩的。”

时治国说：“这事，我们商量了很久，才定下的。”

“你的想法呢？”白云看皮平平一直低头不语，特地问了平平。

皮平平点点头。

白云说：“皮平平，你过来。”把她带进了旁边一个房间。

白云对皮平平说：“你坐下，好好对我说。这事对女同志是个大事，不比他们男同志。你是怎么想的？”

“他要回城，我总不能非要挡住吧。他在农村过日子确实不行，非要留下，会影响他一辈子的，我心里也不安，就想了这个办法。”

“唉。”白云叹着气，“如果这假离婚，万一弄假成真呢？”

皮平平拿出那份时治国写的保证书，白云看了看，说：“这是没有法律效用的。而离婚不管真假，却都是真的。”

皮平平对“法律效用”这样的话没有更多的理解，“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只能相信他，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唉，这事叫我也难办。办吧？替你捏把汗；不办吧？他这辈子真的就是另一回事了。他也会怨你恨你。”

“白大姨，那就办吧。我就认命了。”

“你再好好想想。”

“我能再想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种政策，非要拆散我们俩呢？”

“我们的一些政策，确实考虑不周，不够讲人情，不够人性。可我们都没有办法。”

“其实，我也害怕，害怕一下子什么也没有了。丈夫没有了，孩子没有了，家庭没有了，我全部的希望就寄托在时治国是个有良心的人。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我曾经拉过他一把，指望他今后也能拉我一把。”

“平平，你公公我认识，都是在你们村搞社教的。以后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

皮平平点点头。

白云把皮平平领回办公室，对时治国说：“今天，你们都同意，我把这证办了。不过，时治国，我要告诉你，我跟你爹认识二十年了。以后，不许你对不起平平，要是有了事，我就找你爹算帐。”

“好，好。”时治国一个劲地点头。

皮平平与时治国离婚了。整个民主村都一声叹息，说得最多的是，这事也真是难为他们俩了。

时治国走的那天，皮平平领着小丫头一直送到了县城。

时治国的心里也是七上八下，没有一点的把握，不知道未来究竟会是什么。

一路上，两人都没说什么话。

时治国坐的汽车都走得没影了，皮平平还是一行泪下，痴痴地望着。

第九章 平步青云

1978年1月9日

因为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各处都需要人才，这一年县里要招一批脱产干部。由于是好多年没招了，年龄放宽到三十五岁。

民主村党支部讨论了，虽然村里的一批年轻人里也有不少出色的，但要讲比较成熟、比较全面，还是要数肖胜利。肖胜利作为知青，按说应该是回城的，但他又没有城可回，户口还是在民主村，还是个农业人口，这样就有点亏待他了。所以这一次还是向乡里提名肖胜利。

秦德才听说没有他儿子的份，又跳起来了。他又去找宗发奋。

秦德才对于宗发奋来说，纯粹是根鸡肋。说起来，宗发奋对秦德才还是挺讨厌的，他知道这个人成不了大器，有时还能坏事；但是又少不了，离不开。到关键时候，还真需要有这种谁也不敢惹的人敢于拉下脸去打头阵、唱黑脸，没有这样的人怎么搞运动。

当秦德才找他说这事的时候，宗发奋眯起了眼，心里在盘算着，要办这件事得出多大的力，办成了又会有多大的好处，会得罪谁又会有利于谁。嘴里哼哼着：“啊呀，民主村的决定也不是没有道理啊。要改变村里支部的决定，谈何容易啊。”

秦德才回去跟他儿子秦有理说了。

秦有理比他爹有头脑，他一听就知道这是宗发奋在等着谈条件。那么作为我秦有理要考虑的，就是这件事办成了对我会有多大价值，那就能相应地确定我秦有理需要花多大代价去办这事。秦有理一想，当干部要比上大学更有价值。上大学不就是为了当干部吗？现在直接就能当干部，岂不更好嘛。弄好了就是一本万利哎！

那怎么去下功夫呢？给钱？且不说秦有理不舍得，他秦家父子也没有钱。这一年承包到户，对他父子俩来说，还赶不上以前在队里吃大锅饭好混，哪有什么钱？那怎么办呢？秦有理想了一晚上，最后想出来把王溪用上。王溪会为了秦有理干这事吗？秦有理摸准了王溪的心思，这女人会干。

秦有理上她家找到王溪。王溪见到这位昔日的情人，也是又喜又怨。喜的是旧情未断，怨的是最后没有娶她。不过王溪知道这事也不能全怪他，是自己做得太过了火。所以这回旧情人能来看她，自然先是亲热一番。

王溪在秦有理的怀里撒娇嗔言，说：“你不会就为了想我才来的吧？”王溪倒也是看准了秦有理的为人。

秦有理笑着说：“你猜对了一半，我是真想你，也是真有事。”

“你找我还有什么事？”

“我想给你铺条路。”

“这是什么意思？”王溪奇怪地问。

“你看你整天来往的都是些什么人？东头的李瘸子，南门的王大麻子，他们能给你什么？你自己不觉得屈了自己的身子吗？我都替你不平。”

这话倒也说到了王溪的心里，可是在村里风流又能去找谁呢？年青一点的小伙子或是嫌自己名声不好，躲得远远的；或是被自己媳妇管着不敢靠近。“那你是在替我想办法？”

“我在替你挂个勾，包你在龙头镇从此不一般。”

“是吗？有这样的好事？”王溪摇着秦有理，忙着追问，“是哪条路？”

“说出来叫你喜得合不拢嘴。”秦有理凑在王溪的耳朵边，悄声说着。

“唉哟，你把我看成啥啦？”王溪还要装成不乐意的样子，捶了秦有理一拳。

“别假正经啦，要是真能攀上宗书记，你在龙头镇进谁家的门，也是踏得一呼隆的。”

王溪立马伸直脖子，问：“能行吗？人家宗书记还能看上咱？”

“有我呢，有我秦有理在中间呢。我是谁，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不过，你也得拿出本事来，让宗书记开心。”

“这你就不用小瞧我了，再有几个姓宗的，我也对付得了。”王溪嘻嘻地笑着。

秦有理又去找了宗发奋，“宗书记，听说你最近腰背不大利索？”

宗发奋早就不是书记，别人都改了口，秦有理还在叫书记，宗发奋心里还是挺乐意的，“你怎么知道的？”

“我天天关心书记您，怎么会不知道？我找了一个会按摩的，来给你浑身上下搓搓。”

宗发奋听着觉得有意思，忙问：“按摩？光听说南方有，海源哪会有？”

“这你就放心吧，明天上我家来，包你满意。”

“不会是你老婆吧？”宗发奋哈哈地大笑起来。

“嘿，嘿嘿。”秦有理尴尬地笑了两声，“我老婆算个什么，有你喜欢的。”

“那我得过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秦有理回家就把老婆赶回了娘家。

他老婆刚要问是什么事，他就瞪起了眼，“男人们的事，你不要问！”

秦有理这一头叫来王溪，那一头叫来宗发奋。当宗发奋走进秦有理的里屋，只见王溪穿着一件贴身背心，难掩丰硕挺起的胸脯，那种媚笑，风骚至极。这几年有了个词，叫“色权交易”，那个时候秦有理就明白了。而且这种事至今在法律法规里还没有加以惩处的明文规定。这时，宗发奋也全明白了。下面的话，就不用再说了……

乡政府会议室。乡党委正讨论招干人选的问题。

纪乡长在说：“民主村的那个名额，我看就照他们村里报的那个肖胜利吧。”

“不，不，不。”宗发奋顾不上礼节，连忙打岔，“我看还是那个烈士子弟秦有理最合适。招收干部，可不是小事情。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安危存亡，关系到革命事业千秋万代的大事。我们招收干部，是在选拔革命接班人啊。一定要让革命的后代接替我们，我们才能放心啊。肖胜利是什么？地富出身，她妈还是被我们人民政府镇压的，这种人能和我们党一条心吗？”

祖云涛提醒说：“宗主任，党的政策已经调整了，地主富农不再是家庭出身的一个项目了。”

经学文也说：“那个秦有理前两年不是已经给他上大学了吗，结果呢？他上不起来嘛，被学校退了回来，给我们龙头造成的影响多不好。”

“嗨，他上学念书不行，不一定当干部也不行嘛。当干部是要另外有一套的。”宗发奋觉得有点说漏嘴了，赶紧调整过来，“他的活动能力强，熟悉当地环境，都是当好干部的有利条件啊。”

纪乡长他们三个都不同意，但是宗发奋无论如何坚持要报秦有理，而且他是分管这项工作的，这项议题只好暂时搁浅。

两天以后，县委卞副书记打电话给纪乡长。原来宗发奋特地跑到县里，找了他能说得上话的卞书记。

纪乡长跟祖云涛和经学文，说：“县委卞书记来电话了，说那个招工的名额就安排给秦有理吧。”

祖云涛感到奇怪，就说：“卞书记也不是分管这方面的，他表这个态干什么呢？”

纪乡长说：“唉，再怎么，人家也是县委的一个副书记。就这样吧，胳膊扭不过大腿啊。”

经学文说：“那宗主任算哪条腿呢？”

“不说啦，不说啦。这些年，这样的事还少吗？”纪乡长说。

这事传到民主村，一片哗然，都为肖胜利鸣不平，但是也没有办法。原来春天里也会有凉风吹来。其实春天里何止会有凉风呢。

肖胜利自己倒不这么想。他跟着父亲自小来到龙头，对大海越来越有感情。不但是对大海瑰丽的景色、对大海宏大的气魄感到折服，而且感觉到大海对人类的思维、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对物质财富的创造，都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他觉得人应该有大海一样的胸怀和气魄。

肖胜利站在浩瀚的大海之滨，面对滚滚波涛，思绪连篇。那无限辽阔的海洋，不就意味着无限辽阔的生命、无限辽阔的社会发展么？

面对这么辽阔的大海，天天看得见的大海，怎么没去更深地想过它。人们祖祖辈辈就守着黄土这一半，怎么就不知道利用那蓝色的另一半呢？抬起大脚，一步跨到海上，不就是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吗？不就是开创了一个发展生产的新天地吗？

秦有理抢着去上大学、抢着去当干部，而这天底下还有蓝色的另一半。我去闯海洋！拿出大海一样的勇气去闯海洋！

他去跟杜家骏说了。杜家骏照例很支持。

杜家骏觉得肖胜利想得很好，于是对大家说：“不一定非得挤一条道。叫肖胜利去北海学习驾驶渔轮，等明年我们村也买上一艘渔轮，开发海洋，来个大发展。民主村正需要这样的人才。”这样就把几方面都应付过去了。

第十章 貂场

1978年1月10日

随着改革春风的频频吹拂，人们的生活正日渐发生重大变化。

这年的春节，1983年的春节，杜家骏家买来了全村第一台电视机，日本产的NEC。除夕晚上，因为想看的人太多，杜家骏干脆把它搬到西北场院，放在叠起来的两张桌子的上面。尽管只有12寸，还是黑白的，尽管场院上北风呼呼，雪花飘飘，可是男女老少还都站在那儿，昂着脖子，跺着脚，津津有味地看着第一台春节联欢晚会。看不见的人，就在那儿听着。著名花鼓戏演员李谷一唱的“乡恋”，把人听得入了迷；姜昆说的相声，又把人笑得乐开了怀。这就是新的生活啊。杜家骏特地安排几个老大爷老大妈坐在第一排。王大妈看着电视，愣是想不通，这么点小的匣子，人是怎么装进去的，又怎么会在里面又蹦又跳的呢？

杜家骏这时想得多了，决不是看个小电视的问题。

他感到民主村遇到了历史性的机遇，该怎么用好这个机会，使全村来个大发展。他总觉得应该有个新思路，才能有新发展。民主村的发展思路在哪儿？那天肖胜利想要去学捕捞的话，对杜家骏有很大的启发。

他自己在家拍着脑袋，连说：“蠢啊，蠢啊，以前怎么就没想到呢？”

过完年，他就带着村委会的班子到北海沿去参观学习。看看人家，比比民主村，差距太大了。同样是靠着海边，人家是海里去捕捞，海边搞养殖，岸上有水产品加工，不要的鱼头杂碎还可以喂貂，那个皮毛比鱼还要值钱。一个大海，能有多少活，能养多少人，能创造出多少财富！以前就知道死啃那一亩三分的黄土地，就不知道上那蓝色的大锅里面去舀一勺。

回来后，村领导班子进行了热烈讨论。

鲁队长说：“看人家真是不错。照这样搞，三年时间，咱民主村也能家家都有电视，不用都挤到老杜家去看了。”

“到那时，就不是电视机的问题了。”彭小宾意气风发地说。

“还能怎么样？”杜家骏有点不解地问。

“我们要把民主村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一个社会主义的示范村。”彭小宾还真有点锐意进取的劲头。

平金刚有点忧虑：“事情是好事情，可不好做。资金呢？技术呢？谁懂？谁会？要好搞的话，早就搞了。究落实。”鲁队长说。

“你们研究吧，我是不明白这些了。”车素花已经快七十了，虽然身体还不错，也关心大队工作，但是要研究这些新问题，确实是勉为其难了。

“我看，我们先定下搞不搞，再说怎么搞。”杜家骏说。

“搞，当然搞。”鲁队长说。

一番商量讨论之后，决定先搞个养貂场。因为搞捕捞，要买船，资金量比较大，一时搭不够。先缓一步，可以叫肖胜利先到北海上人家船上去学一年。而建个养貂场前期投入少，沿海几个村的鱼杂碎现在都没利用上，白白浪费，饲料来源比较好解决。最主要的是技术问题，眼下村里没有一个人会，村委会决定公开挑选，看谁能挑起这个担子。

彭小宾夹着一张大纸，在村委会（还是原先的大队部）门口的告示栏里抹糨糊。一会儿就有人看见，围过来了。

彭小宾正在贴着呢，皮安已父子凑在最前面。皮安已问：“这又是什么事呀？”

还没等彭小宾贴完，皮高深就念上了：“公开招聘养貂技术和管理人员的通知”。

“怎么？养貂？这是怎么回事？”皮安已问。

这时围上来的人就更多了。彭小宾向大家做了一番解释。

“哟，咱们村要办貂场啦！”

“好啊，是得搞点副业啦，光指着种那点粮，才能卖几个钱？不行啊。”

大家议论纷纷，都在说好。

“那我去报名，上外面去学门技术。”皮高深说。

“别，你那么死心眼。真要是好事，还能轮到你啊，还能贴在墙上到处找人啊，不早就有人去啦，还等你啊。”皮安已遇事想得多，有时想得也可能过多了。

“说得也是啊。”邬大妈又插话了。

“那个貂是个活物，天天要吃东西，一天也不能断食，比养孩子还要操心呢。小孩感冒，还能摸个脑门，知道是发热了，去找衣春玲要袋小柴胡回来冲水喝。这貂要是感冒了，你能知道？它那个小脑门能让你摸？”皮安已说得好像在理，说得皮高深也搭不上腔了。

秦德才也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露着大黄牙，说：“这水貂啊，我知道，就是跟黄鼠狼一样。放个屁可臭哩，就算放在南海沿养，也能一直臭到大北山。到那时，能臭得咱在屋里都呆不住人。谁去养貂，身上能臭得娶不上媳妇。”

“我可不信你说的，还是你的嘴比黄鼠狼还臭吧。”邬大妈回了一嘴。

“嗨，看你说的。到时候，要是水貂不臭，我把铺盖卷都送给你。”

“呸！你那铺盖卷扔到街上都没人要，扔到炉膛里都臭得点不着。”邬大妈是不屑秦德才的。

“哈哈，哈哈。”大家一乐都散了。

可是秦德才的臭嘴还是起了一点作用，通知贴了好几天，也没人来报名。

杜长贵问他爹：“也没人来报名，这咋办？”

杜家骏说：“没人去，就你去。”

杜长贵一愣，说：“我这会计干得好好的，怎么去养貂呢？”

“别人不理解我，你还不理解我。别人不支持我，你还不支持我。这不光是支持我一个人，而且是在支持民主村的发展。革命战争要牺牲个人利益，搞改革开放，有时也要牺牲一些个人利益。何况这点个人利益算什么，大不了，就是不坐办公室而已。”

“那报酬怎么说？”儿子问。

“那有怎么说，记工分呗。”当爹的没多想。

“这哪行，怪不得没人干呢。又要掌握那么难的技术，又要多出那么多力、操那么多心事，还要冒那么大的风险，那些貂死了怎么办？”

“还真没想那么多。你说怎么办？”杜家骏问。

“土地能承包，那貂场也能承包。不过一开始，养貂大家都没有把握，万一养死了，养亏了，个人承担不起。”到底是当了几年会计，又年轻，思路开阔多了，一些就想到关键之处了。

“这，我得跟村里商量商量。”杜家骏觉得自己做不了主。

杜家骏跟村里几个干部说了。彭小宾听出来了，这是包赢不包赔。亏了，是村里的；赚了，个人就拿提成。鲁队长也听出来了，他是好说话，没等小宾开口，就说行啊行啊。心想，那是村支书的儿子，再多说什么呢。

一周以后，村委会就定了由杜长贵出去学养貂。至于报酬问题，没说。

貂场就选在南塘下靠海边的一块地方。基本建设也不用多大开支，房子就是办公室、宿舍、伙房、仓库，分两排共八间，形成一个小院子。就这几间房，暂时还用不了。另一个院子，就是养貂区。那貂舍只需要顶棚就行了，连四壁也不用。那貂笼，后面是小木箱，前面是小铁丝笼，一笼养一只。所有这些，都可以村里自己做，尽管简单，却也是动员了村里几乎所有的力量，这是民主村第一个除农业以外的项目。大家都在看着，盼望着，期待着，这庄稼人祖辈从来没搞过的玩艺儿，能下出个什么蛋呢？

虽然工程不大，但也得操不少心。貂棚的屋架搭起来了，可等着要去拉瓦片回来，出问题了。杜家骏要皮高深去叫平海波开拖拉机，上北山拉瓦。

皮高深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说：“不行了，平海波说不行了，他今天要帮王庄运货。”

“怎么咱本村自己的事，他也不管了？”杜家骏生气地问。

“他说都已经跟人家约好了，不能不去。不过我听那意思，还是话里有话。”皮高深把后面那句话压低了声音说。

“什么意思？”杜家骏不解地问。

皮高深把嘴凑在杜家骏的耳朵边，说着。杜家骏一会儿眉头皱起，一会儿又从鼻子里哼了声，半天又摇了摇头，接着又叹了口气。

原来开始时，村里没人会开拖拉机，平金刚的儿子平海波学了这门技术。为了鼓励积极性，大队接到外村的活，拿出运费的10%给平海波。后来平海波提出，凡是自己拉来的活，这个比例要提高到30%。村里考虑，这样村里也能得70%，不然也是什么也没有，就同意了。打那以后，平海波就在外面跑得欢了。到底在外面接了多少活，村里也不清楚。以至于到今天，村里有活他也推辞不干了。

杜家骏心里有气，但眼下木梁已经起来，这可不能等，就压着火气，对皮高深说：“你去告诉他，这貂场的活也按30%提成给他。先把别的停一下，这里的活要紧。”

皮高深连忙又跑了出去。

中午时分，平海波把瓦拉来了，杜家骏都没理他。天黑前，貂舍的瓦就都上好了。

貂场盖好了，杜长贵学习也回来了。一开始，先买了三十只貂养一下。

还得找饲养员这些。不知道是不是深深地潜藏于乡亲们心灵深处的保守、惰性在作怪，这些大姑娘、小媳妇尽管平常也挺勤快，这时却没有想来干的。杜家骏不得已，叫自己的媳妇唐玉贞领头，可是人手还是不够啊。

小连子的新媳妇高秀珍听说了，第一个站出来报名。

那个秦德才又出来搅局了。这时的秦德才也六十出头了，腰背佝偻得更没了人样，坏心思却还是不少。他在胡同口，碰到高秀珍，见边上有人，又有点“人来疯”了。照例毗着黄大牙，说起来了：“你要去养貂啊？”

“怎么啦？”高秀珍也听说了秦德才这个人，所以挺警觉。

“啊哟哟，啊哟哟，怎么去干这活？”

“又怎么啦？”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活啊？整天拎着母貂的腓去找公貂干那事，啊哟，啊哟哟，丑死了，丑死了。……我都不好意思说……”秦德才还边说边表演，好像不屑于那样，很正人君子的样子。

“呸！你干的那些事，你好意思说啊？没有你爹搞你妈的腓，还有你这条狗啊！”

秦德才绝没想到一个新媳妇会说出这样的话，周围一阵嘲笑声起，“好！好！讲得好！”秦德才居然结巴了，居然脸红了。一辈子自恃“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秦德才居然第一次卡壳了。

秦德才瞪着眼，看着一脸怒气的高秀珍，两嘴唇动着，就是说不上来。

“是你害死了我老公公。总有一天，老天是要报应你的！”高秀珍激愤地叫了起来。

这句不留退路的狠话，令周围所有听见的人都震惊了。民主村的人都恨秦德才，却从来没有人敢于说出这句话。是这个才来不久，还穿着新婚红袄、身材秀气的小媳妇，说出了这句石破天惊的话。

秦德才也震惊了，几十年来自己做过种种坏事，只觉得痛快，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句话。是这个大义凛然、疾恶如仇的小媳妇在这个没想到的时候，给了他当头一棒。他转身一颠一颠地逃跑了。

身后，高秀珍还在尖叫着：“你是跑不了的！”

听到的人都竖起了大拇指叫好：“好！好！咱民主村又有了女豪杰！”

秦德才回去后病了，病了好一阵子。秦德才还从来没有病倒过。

第十一章 新的生活

1978年1月11日

11.1 甜蜜蜜

秦德才虽然一个人病了一阵，但民主村的乡亲们都觉得改革的春风暖人心。

你听，那街上大喇叭放的歌也不一样了：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

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

啊，啊，

在梦里，梦里梦里见过你，

甜蜜，笑得多甜蜜。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邓丽君那甜蜜的歌声真的是甜到了人们的心里。不一样的歌声，使人感到了不一样的生活。人们听到了这从来没听过的，来自海峡对面的歌声。不但听到了，年轻人还都唱上了。

这天，小连子两口包了饺子，高秀珍用券盘（用高粱槌杆编的平盖）端了两大碗饺子过来给长辈家，嘴里哼的正是这首“甜蜜蜜”。

高秀珍进门了还在哼呢，见了王山，鞠了一个躬，说：“爹，丁婶，我给你们送碗饺子，尝尝味道。”

等秀珍放下饺子，王山就问：“这是首什么歌，还挺好听的。”

“是首台湾歌曲，叫甜蜜蜜。”

还没等秀珍说完，王山、丁妹都大吃一惊，把王山急得差点跳了起来：“什么？唱的是台湾歌啊？这还了得啊！”

“这首歌还很流行呢，你听大街上也在放。”

“台湾不是国民党的吗？怎么还能放国民党的歌呢？”王山还在问。

“台湾是被国民党管，但是台湾的歌不一定是国民党的歌。”

“啊呀，国民党反动派、蒋匪帮那儿还能有好歌？”王山还是疑惑。

“爹呀，党的政策变啦，不叫国民党反动派、蒋匪帮了，叫台湾当局啦。”高秀珍是一个初中生，就多明白了好多道理。

“当局？当局是个什么东西呀？”王山又问。

“当局？”这下秀珍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这个我也说不上来。不过，我们现在不说‘一定要解放台湾’了，而是说要‘和平统一’，实行‘一国两制’。”

高秀珍这么一说，全家的大人都围了过来，认真地听。

“那，台湾很快就要解放啦？喔，很快就要统一啦？”王山又着急地问。

“不是说很快，而是说有希望了。”秀珍说。

“哦，我的儿呀，你快回来吧！娘想你，想了几十年了。你再不回来，我要等不上啦，死了闭不上眼啊！……”王大妈突然双手拍腿，呼天抢地哭了起来。

王山和连四嫂忙上去劝。

丁妹默默无语，这当然也触到了她的伤痛，但内心最深处的那个亮点，似乎又亮了一点，虽然从她脸上是看不出来的。

王山转过脸，对秀珍说：“以后在咱家，别唱台湾的歌。”

高秀珍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感到既疑虑又意外，紧张地连连点头。

11.2 哈妹

鲁队长最大的心事，还是他媳妇哈妹的病。二十多年没见好，这一阵还见重了，下身淌脓淌血，没法走路了。以前有个乡卫生院，也没有合适的医生，有点经验的，就是男医生，看这病也不方便；女同志里又是护士多，也不能治病。他们俩口不好意思，硬是拖了这么些年。这回有了叶丽娜在卫生院，鲁队长找到叶医生说了说，叶丽娜背起药箱就跟着鲁队长过来了。

叶丽娜去年已经和祖云涛结婚了。这也是很顺理成章的事，以叶丽娜的漂亮、学历、工作，不用说在龙头，就是在海源全县，也很难找到和她相配的。老天正好在龙头安排了一个祖云涛，也是大学生，还是副乡长，虽然年长几岁，但总的来说，还是很般配的。作为祖云涛，按说也早该结婚成家了，可他一直拖着，也不知他在等什么，没想到竟被他等来了天仙似的叶丽娜。从叶丽娜到龙头镇，也不用人介绍，不用人撮合，很自然地他们就走到了一起。婚礼很低调，远远赶不上小连子的热闹，好像仪式也没举行，就去了趟叶连长的老家。

叶丽娜对她的生活是满意的，她感受到祖云涛对她的爱，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幸福。她喜欢龙头乡亲的热情、淳朴，她喜欢这里的海洋性气候和海边的风光。她尤其喜欢大海的波涛，有时甚至能一个人出

神地看上几个小时。直到祖云涛骑着车来找她，她还要说上一句：“你那‘云涛’还不如改成叫‘海涛’呢”。

她现在住在李芹的院子里。从时治国回城以后，皮平平也不愿意自己一个人住在那儿，回了娘家。祖云涛就向村里租下了这个院子。叶丽娜所不知道的是，她头上始终戴着的从赵玫那儿接过来的那个亮铮铮的发夹，它最早的主人就是住在这个院子里的李芹。

顺便提一句，潘场长住在董平章的院子里。村里把那个院子和房子推倒，重新盖了。通常都会认为那是“凶宅”，住着是不吉利的。但是潘场长没管这些，和老伴一起住在里面。在这里，他能始终感受到董平章和赵玫的气息。

叶丽娜进到鲁队长的屋里，看了看哈妹的裤裆，大惊失色，连说：“怎么会这样？怎么拖到现在？”

哈妹说：“这还是在1958年大跃进时得的病，也不能怪他。这些年也找不到合适的人给瞧瞧。”

“唉，你怎么忍了这些年？”叶丽娜很心疼地问。

“熬熬，也就过来了。咱农村人，都是这样的。”哈妹说。

“你们一直也没过夫妻生活啊？”叶丽娜问。

“唉，唉，哪还能顾得上那些。”鲁队长红着脸，傻笑着说。

“你又是粗心的男人，又是好男人啊。”叶丽娜说。

“那现在怎么办？能用什么办法治？”鲁队长问。

“现在还能怎么治？只能手术切除了，再加个阴道前后壁修复。”

“啊？”鲁队长两口都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

“那我们不能有孩子了？！”哈妹有点悲戚。

“不要紧，你能好了病就行。”鲁队长握着哈妹的手。

“先治病吧。”叶丽娜叹了口气，又被他俩的情分所感动。

后来，叶丽娜叫祖云涛派了那辆乡政府新来的吉普车，陪鲁队长两口去县医院做了手术。

11.3 辛勤劳动与现代迷信

村里的年轻人也有走另一条路，搞自主创业的，比如像于又发。

于又发喜欢自己捣鼓，拆闹钟，装收音机，倒也学了不少小技术。现在这业余爱好正派上了用场，干脆在西街上开了个龙头镇第一个修理铺。农具、电气、钟表、自行车等等，什么都修，虽然不一定都能修好，至少能看看是个什么问题，修好了再给钱，要不不还非得去县城。既方便了群众，自己又自得其乐，收入也远高于种粮的。这也是以前没有的事。

村里的多数人还是下力气种地。特别是郭中和父子，把中国农民几千年的本分都发挥了出来。就像迟解放他爹、当年的迟得法，又肯下功夫，又肯去琢磨，把种地当绣花一样，那个仔细，那个认真，年年好收成，一年比一年好。而且郭中和开始注意到了科学种田，试了几回新品种。尤其是今年还改进了耕作方法，又是间作套种，又是“垄耕沟灌”。这几项还没放下，他又在想怎么倒腾茬口，把当地一年一熟改成两年三熟，甚至两年四熟。可惜本书不是农业技术读物，没法将这些事一一都说上。而民主村的年轻一代农民对此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土地使用方面，也有了新的突破。迟解放去城里打工了，把地交给了郭家。他们两家是怎么商量的，不得而知。因为从政策上讲，当时还是不允许的，因为这又涉及到这是雇工啊还是出租啊，有没有剥削的成分在里面啊，又扯不清了。两家自己商量，村里也不管，倒也清静，总比让迟家的地撂荒了，没人种要好。

皮家也是这样。皮安己已经是民主村为数不多的上一辈的种地好手了。他现在出力是不行了，可还是天天到地里，指挥着皮高深干活。几个小一辈的，像齐成才这些，也都悄悄地照着皮安己的办法来。皮安己，成了除郭中和之外的又一个种地的好榜样。民主村的庄稼，越长越喜人了。

也有差一点的，像申光荣。申光荣体力弱，技术也不大行。他是干着急，后悔前几年往“八一八”那一派跑得多了一点，后来转得也不像别人那么快，心思没有及时转到种地上。这时才知道，庄稼人的本分还是在土地上啊。可他还是在留恋人民公社，留恋那一种的火红的革命年代啊。那时，可以那么潇洒、那么畅快、那么地没有压力而且不需要负任何责任。他就在想，以后会怎么样呢？还会有革命年代吗？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呢？

别说，还真有人说他能回答。谁？秦德才。别人都没有理他的，申光荣可还愿意和他说个话。秦德才听了申光荣的一番牢骚，说这个问题好解决，现在有一种新的算卦办法，才灵呢。在一个扁箩里平铺一些粮食，两手拉紧一根绳，绳中间挂上一根针，闭上眼，心中默念，那针就会抖动，在米堆上留下划出的沟痕，形成字迹，告诉你心中所想问题的答案，甚至还会写出伟人的名字。

“能行吗？”申光荣还将信将疑。

“骗你是小狗。不信，你跟我来。”

申光荣还真的跟了秦德才到了他那臭哄哄的连王溪也已经很少来的家。

秦德才也真的搞了场现场表演。他在炕上倒上一些小米粒，用绳拉着针，闭上眼睛，两手抖擞着，嘴里念念有词，也听不出说的是什么。

“看好了啊，要出来了。”秦德才说着，那针在小米上跳动着。

“有了吧？”秦德才说。

“有了什么呀？”

“没看出来？”

“没有。”

“这说明你的心还不够诚，功夫还没到家。”

“这上面有什么呀？”申光荣壮着胆子问。

“你看，你看，这不是有两条横杠吗？”

米面上是有那棵针划过的横杠，好像还不止两条。比较深一点的就算是两条吧。

“那又怎么啦？”申光荣又问。

“你没见还有一条竖的吗？”

申光荣看见是有一些竖的痕迹，“那又能说明什么呢？”

“嗨！你白念了高中。两横一竖，是个什么字？”

“是个干哪。”

“对啦，是个干。他老人家是在叫我们干革命哪！”

申光荣听得一头雾水、满肚子的狐疑，离开了秦德才的家。

临走，秦德才怕他不信，还说：“我家里没有面粉。用面粉更好使。”

申光荣回到家里，真的试上了。在炕上铺上旧报纸，家里剩的三斤面粉也都倒上了。拿了线，穿上针，两手撑着，弄了好几遍，也没有看出来什么。

“你这是干什么呀？家里就这么点面粉，等着给孩子过生日用呢。”他老婆一进门，见了奇怪就问。

他老婆齐小嫚，是齐成才的妹妹。

“你知道什么呀？告诉你也不知道。”申光荣自己不行，却一直也看不起自己的老婆。

“你什么都不行，还会搞什么呀？”齐小嫚实际上也看不上他。

“告诉你，能把你吓了一跳。这可是要把他老人家请回到家里来啊。”申光荣凑到他老婆的耳边，轻轻地说道，一脸神秘兮兮的样子。

“那你还看出什么来啦？”她倒也有点虔诚了。

申光荣又弄了一遍，还是不灵光。

“秦德才是个什么东西？你一定是被他耍了。哈哈。”齐小嫚倒是转过了弯，笑话起申光荣。

申光荣在想真是秦德才骗了他？忽然他想起来了，还得念词呀。哎哟，忘了问老秦，念的是什么词呀。又不好意思当着老婆的面跑出去问，自己编一个吧。于是，他又闭上眼，两手抖动，嘴里念着：“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小儿郎……”

这下，齐小嫚更是“咯咯”地笑个不停，说：“念的是什么呀？你别把马嘴按在牛头上。”

申光荣肚里窝火啊，心里直骂秦德才，嘴上又不能服输，低着头，背着手，一句话也没有，就出了门。

“哎，哎，这面粉你不管啦？”齐小嫚还追到门外问。

申光荣上哪儿去了呢？他还有个佩服的人，那就是于又发。于又发可是个聪明人，他应该会知道。

到了于又发的修理铺，于又发正在给一辆自行车上车轮。申光荣把他拉到一边，挺神秘地把这办法告诉了他。谁知道，于又发鼻子一哧，说：“这不是现代迷信吗？”

申光荣赶紧捂住于又发的嘴：“别说这种大不敬的话。”

“那你试过啦？”于又发问。

“试过了。”申光荣点头说。

“还行啊？”于又发又问了。

“没试出来。”申光荣低头说。

“还是不行吧。”

“唉，那也不一定。人家说，心诚则灵。一定是对他老人家心还不够诚。”

“那你诚去吧。”于又发笑着说；“我还得干活呢，西南村送来台收音机，我还得拆开看看呢。”

申光荣愣愣地看着于又发，心想这个自小同行的玩伴，怎么想法也不一样啦？

于又发看他愣着，就说：“你有这时间捣鼓这种迷信的事，还不如去学点技术呢。要与时俱进啊！”

第十二章 农民工

1978年1月12日

改革开放的到来，也使村里的年轻人有了新的过法。迟解放就走了一条新的路，成了西北村出去的第一位农民工。

1984年6月，麦收的季节。

深夜了，天空月朗星稀。

迟解放拼了全力，把二亩地的麦子都割下来了。两口子一个拉，一个推，把最后一车子麦子推进了自家的院子。

他妻子还没放稳车，就急忙开房门跨进屋子，唤声：“小强！”见刚上小学的儿子正在睡梦中安静地躺在炕上，才吐了口气，放下心来，转身再进院子，帮助丈夫一起卸车。

迟解放把车绳一甩，说：“累死了，先进去上炕躺会儿，反正这天也不会下雨，明天再说吧。”

他妻子答应说：“好吧，你先进去歇着吧。这两天把你累得够呛。我去烧点水，给你擦把汗洗洗脚。”

“不了吧，你也没少干活。今天先都歇着吧。”

“那你就用凉水凑合擦擦吧。”妻子给他端来了水。

迟解放只擦了把脸就翻身上了炕，看着熟睡中的儿子，忍不住去亲了下小脸，就伸开两腿，实实在在地躺下了。

迟解放的妻子是老于村长的孙女于又珠。前些年，时势闹腾得乱，也是拖到改革以后，三十出头才结婚的，婚后两口子相处不错。

于又珠比迟解放小五岁，虽然是村长孙女，在村里属于“高干子女”了，但干活很勤奋也很泼辣，没有一点娇生惯养的影子。不过她没怎么上过学，对高中毕业的迟解放挺尊敬，事事言听计从。

于又珠倒过水，也上了炕，说：“也就这么两亩地的麦子，还用赶得这么急？”

“我这人心急，也就因为只有两亩，豁上去，出把力，两天弄出来也就算了。”

“这两亩麦子能卖多少钱？”

“今年收成不错。这两亩麦子差不多有一千斤呢，自己留点过年过节，能卖个一百多元！比生产队时好多了。那时一年才分个一、二十元。”

“是要好多了，所以大家也都肯出力了。不过要修个房子，添置点东西又不行了。”

“是啊，我也在为这个着急。咱又有儿了，不能不有所准备啊。”

“你倒想得挺远。不过，那也没办法，慢慢来吧。”

“那得等到几时啊。我在想啊，能不能想点别的办法？”

“还能有什么办法？”于又珠疑惑地问。

“我想出去打工。”

“出去？上哪儿去？”于又珠惊讶地抬起了脸，她从来没想到过这事。

“上城里去，去城里找个工。”

“能有咱的工作吗？”

“我想了好长时间了。你姥姥家，不是有个姨表姊妹，有个女婿在县城什么建筑公司吗，听说还是个领导呢，不能托托他？”

于又珠眨巴着眼，使劲地想着，过了一会儿才说：“是有这么一个，可多少年也没来往了，我都没见过。”

“这时候也顾不得见没见过，试试看吧。从来没求过人家，难得一次，说不定能行。”

“那我跟我妈去说说看。那这个家怎么办？”

“是哎，那样也要苦了你了。这个家要靠你挑起来了。”迟解放也有点舍不得，拉起于又珠同样晒得红肿、磨起了几个水泡的手。

“家里你倒是可以放心，就是你一个人要在外面，怎么也比不得在家里方便。有个头疼脑热的，咋办？”

“这倒没什么，你看我这身体，多棒。”迟解放“嘭嘭”地捶了两下自己健壮的胸脯，惹得于又珠也笑了。

“你看胜利村那田家，连青海那么远都敢去，咱不就还在自己县里吗。现在麦子收下来了，地里也没什么事，等秋天农忙时，我再回来。”

“……”于又珠低下头不语。对她来说，丈夫离开自己出去打工，虽然也是为了家里宽裕一点，可心里十分不舍。她从来没想到过，要靠她自己一个人撑这个家，立马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背上，喘不动气。

迟解放虽然是个急性子人，倒是为这事想过很久。他家三口人，连泊地带地才分了五亩多。以他这个棒劳力，每个农忙季节，几天就干完了。再干什么呢，身上有劲却没地方用，硬憋在家里。打这些粮，自己吃是够了，但要过上好生活那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出去打工吧。那时，出去打工的人不多。

倒是从外面来狗狗厂打工的，使人们想到了还有这样一条路。但敢于走这条路的人，在民主村还没有。他迟解放将是第一个。

他不是没想过出去的艰难，尤其这第一步，找工作就不易。他走之后，家里的事要全丢给于又珠。他知道于又珠虽然是老村长的孙女却是个肯吃苦的人，但真要都挑起来，能行吗？但是他想来想去，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不然就只能是过一天算一天，混日子。他毕竟还是上过中学，有点文化，有点思想，不能一天天只干活不去想。说干就干，所以他豁上力气，两天就收完了两亩麦子，他要走出去。

于又珠觉得丈夫说得也对，第二天就去找了她妈妈，就是前面提到的当高秀珍婚礼“抽新人”的震祥媳妇。她妈一听，有些为难，“哎哟，这多少年就没有来往了，这咋张口跟人家说呢？”

“因为好多年没去了，以前日子乱，走不了。这回儿才要去看嘛。”

于大妈经不起她闺女一缠，就松了口。可又问上了：“他一走，你可要吃苦受累了，能行啊？”

“你闺女不是娇生惯养那种人。他出去也会吃更多的苦，我在家也多吃点苦，这样日子才能好起来。”

“行，你有这个准备就行。”

在准备了送礼的饽子、桃酥之后，迟解放推着小车送他丈母娘到了她北山有二十多年没去过的娘家。一番的找寻、感慨、话语，就不细述了，当然也捎上了这次去的正题。亲戚说，这事他们也不清楚，去说说看吧。

差不多过了将近有一个月，那边有回话了，叫解放去县里那单位看看吧。这下，把迟解放两口高兴得不得了。

走的那天，迟解放换上了一套新装，扛上了于又珠给他准备的家里最好的被褥，提上了一个新买的网兜，装着脸盆牙缸等全套的用品。

尽管并不是出远门，只是去县城，可那个意义不一样。不是去赶集，不是去逛街，而是去工作啊。村里不少年青人都兴高采烈地来送他。

“你小子啊，要当城里人啦？”郭朝阳拍着他的肩膀说。

“你去了，别忘了我们啊，到时候拉一把，把咱弟兄们都弄出去噢。”靳宝康眼睛热辣辣地还真满含着希望呢。

“啊呀，你真行呀，飞起来啦。什么时候下手搞的，也没说一声啊。刚才宝康说得对，进城了别忘了咱哥们，当然别忘了小嫚妹妹。”皮高深啰嗦了一阵，惹得大家又都笑了。

于又珠在边上，听得脸也红了。她本想送到县城去，可迟解放不让，“也就这几十里路，不用这么隆重啊。”

于又珠红着眼睛，把几个煮鸡蛋塞进了解放的衣兜里，一眼不眨地看丈夫登上汽车。别人都高举着手，大呼小叫地挥手道别。她只能把手抬在胸前，摇晃着，汽车还没走远，心里已经觉得空空的。

汽车到了县城，迟解放走出汽车站，啊，太阳是那么明亮，天是那么湛蓝。这县城，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一年都能来好几次。然而这次的感觉却大不一样，心里是那么舒畅，连脚踩在沥青路面上也是从没有过的踏实。这县城已经和自己联系在了一起，自己就是这县城的一份子了。这几年县城发展挺快，那个工程机械公司都盖起了七层的大楼，成了县城新的标志性建筑。尽管顶上三层只有四扇窗户的宽度，可那也是七层楼啊。上次来见到，那是赞叹。这次来见到，就成了自豪，这也是自己的骄傲啊。

大街上熙熙攘攘、人来人往，以后自己会是这人流里的一员，天天可以在这繁华的大街上来来往往。看着这街上人的素质也提高多了，大家都自觉地靠着两边走。不像以前根本不管什么汽车在后面鸣笛，照样大摇大摆地走在马路中央。哟，那个路口，还真的像黄港市里那样，装上了红绿灯。红灯一亮，不用人喊，那些车就停下了。对面的超市门口，更是挤满了进进出出的人群。记得去年第一次进超市，居然没有柜台挡着，直接就用手在货架上想拿什么就拿什么，真有点半个上帝的感觉。满街是商铺里放的最流行的台湾歌曲“酒干倘买无”的声音：

“没有天那有地，

没有地那有家，

没有家那有你，

没有你那有我。

假如你没有养育我，

给我温暖的生活，

假如你不曾保护我，

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

望着前后左右匆匆行走的人们，迟解放真想对他们说，“你们好啊，我也和你们一样啦，也是这个县城里的人啦，不是一无所有啦。”

迟解放背着、扛着，身上也热了，汗珠冒出了额头。就这样，他也舍不得揭开领口的纽扣，也该像城里人一样注意形象了。边走边打听，才知道他亲戚的建筑公司是在城北。这县城比以前大了，他走了二里多地，走出了城，在一座小山脚下，终于见到了“县第三建筑安装公司”的样子。一个大院子，几排平房，出人意料的是这儿挺安静，没有城里的喧嚣，只有几个穿工作服的人在院子里走过。

迟解放走近传达室，没顾得擦汗，堆着笑脸，向坐在里面的老头说出了自己亲戚的名字。意外的是，老头摇着头说不认识。迟解放急得眼都直了，铺盖卷一下子从肩上掉到了地下。老头说，你别急，我帮你问一下，你先等一会儿。

老头进去了，不一会就出来了，说：“你要找的人，不是我们公司的，是工程队的。现在在招金山施工。”

招金山，是海源县北面再隔一个县的一个矿区，盛产黄金，离这儿大概二百多里路。

这下，迟解放傻了，这怎么办？

迟解放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随着经济改革的进行，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和用工方式有了很大变化。由于缺少合理的制度安排和必要的监督制约，出现了一些很不规范、也很不合理的现象。比如同是在一个企业里，有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等等不同的身份，相互间的薪金待遇差别很大，而且跟他的劳动付出往往还没有什么关系。最苦最累的活，正式工不愿干的活，就招合同工、临时工干，他们的收入往往反而要远逊于正式工，更不用说转户口、公费医疗这些事。他们永远游离于他们所辛勤劳动的城市。这种差异之大，足以引发企业做出非理性选择。有的企业甚至一方面以生产任务不足之名，让正式工“下岗”，被当成包袱甩掉；另一方面却又在招收临时工，以降低工资开支。当然这些被要求离开正式工显然是非亲非故的了。

经营管理方面也是这样。公司接到施工任务后，它自己不干，压低价格后再转包给别人，它等着吃差额、吃回扣就行了。有时还不是真不干，转包的对象可以是某个以他人名义登记的工程队而实际是操控在公司某个头头的手里。迟解放的亲戚，就是这样的一个工程队里的一个工头。那个传达室的老头当然就不认识了。

这种改革奏鸣曲中不和谐的音符，不巧，落在了迟解放的头上。

迟解放又背着、扛着，走回了县城汽车站。已是中午时分，街上更热闹了，行人更多了。街两边大大小小的饭馆都飘出了诱人的菜香味，掌柜的吆喝，五颜六色的招牌，对于迟解放反而没有了吸引力，尽管他已经因为来回奔波而饥肠辘辘。

他没有回家，而是踏上了开往招金山的班车。到了招金山，还要换乘一趟到矿区的班车。到了矿区，找到他亲戚老岑头的工作面，太阳已经西斜了。迟解放的那套新装也已满是折皱，领口都浸满了污渍。

老岑头还不认识迟解放。当他被人喊过来，说海源有人来找他，见到满头汗水的迟解放时，还愣了一会，才想起老家有人对他提起过这事。

“啊呀，你来之前也没先说一声。”老岑说。言外之意是，我没叫你现在就来。

“我还以为就是在县城呢，就跑过来了。”迟解放说。

“咱们这活不会在城里的，都是些苦活、累活，不是享福的噢。”

“大舅，这您放心。侄儿决不会给您丢脸。我是个吃过苦的人，什么苦活、累活，你就尽管先交给我。”

“好，好。”老岑这才有点笑脸，“这就好办了。你这一来眼下也没有正经活，你就拿个镐处理地边吧。”

这个工程队正给一个金矿剥离山体表面，机械挖不到的、炸药没震透的一些边角需要人工刨，那是矿山上最苦最累也是档次最低的活。迟解放还不明就里，乐呵呵地说：“行，行！”

“你吃饭了没有？食堂正开饭呢。”老岑问。

“吃过了，吃过了。”其实迟解放从一早离开民主村就滴水未进过。

“佟班长，佟班长！这是海源来的小迟，就跟着你干了。晚上就在你们棚里挤一挤吧。”老岑喊了个一身灰土的中年男子过来，叫迟解放跟他过去。

迟解放跟着佟班长，翻过半个山梁，见到一排灰白色的简易工棚，外面的铁丝上挂满了洗过的已经看不出什么颜色的破旧工作服，随着风乱晃荡。走近工棚，里面黑乎乎地什么也看不清，一股浓烈的混合着男人汗味、屁味、脚臭味的酸臭直冲迟解放的鼻腔。这一瞬间，迟解放明白了什么叫农民工。

迟解放的脚不由得停了一下。但他还是咬着牙，走了进去。

他知道他不能后退，为了妻子，为了孩子，为了自己的家。

第十三章 此怨此恨永无期

1978年1月13日

难过的是皮平平。

时治国回省城有一年了，信来得越来越少了。信里面的字也越来越少，口气越来越平淡。最近是隔了两个月才来封信，寥寥草草的几个字，像是在应付差事，压根儿也没提两人之间的事，更没有要把她办到省城去的意思。

皮平平坐立不安，跟爹讲了她要上省城去看看。皮安已说：“是哎，是得去看看了。这小子啊，恐怕是变心了。”

“不，不会的，治国不会变心的。”其实，平平是最担心这一点的，但是真要有人点穿这一点，她又拼命地否认。与其说是否认，不如说是她不愿意真的发生。

“你这话不要说早了。早想到就早有准备。要是他真变了心，你就赖上他，别回来！”皮安已狠狠地说。

平平心里也慌了，不知该怎么回答她爹。连夜烙了几个火烧，把家里的一点油，一点糖都放了进去。

天一亮，她背着包袱，抱着女儿丫丫，上省城去了。

路上的不易，按信址找时治国的难处，就不多说了。虽然结婚那年，跟时治国来过一次，那也只留下一些模糊的印象。

换了两次车，又坐过了站，再走回来，在泉边路的五十年代建的灰色三层楼房里，终于敲开了时治国家的门。

开门的正是时治国，但是写在时治国脸上的不是惊喜，而是大惊失色。在一阵惊慌之后，不是接下孩子，而是堵在门口，没让平平往里进。

“你，你怎么来啦？没有叫你来啊。”

“好啊，你时治国，我来还要你批准啊？”平平心里知道时治国已经变了，就急得喊了起来。

“谁啊？谁啊？怎么回事啊？”屋里一个年青女人过来，站在时治国的后面。

时治国转身想把那女人推进去：“没你的事，那是我下乡时，村里的一个女人。”

“爸爸，爸爸，我好想你啊。”女儿丫丫也张嘴喊了起来。

“什么？喊爸爸？你们是什么人啊？”那女人在时治国的身后，大声问着。

“我是时治国的老婆，这是他女儿。我们从海源来看他。”平平说。

“时治国，你在骗人啊，还说一直没结婚，差点被你骗到手啊！”那女人狠狠地打着时治国的后脑勺。

时治国的父母也走到了前面来，他妈拉着那年青女人说：“思思啊，上里面来，听我跟你解释。”

他爸老时编辑也是一脸无奈，对平平说：“平平啊，治国对不起你啊。不过，我们会对你有个说法的，会给你补偿的。”

皮平平这时嚎啕大哭，瘫坐在时家的门口，痛骂着时治国。

时治国低垂着脑袋，无言以对。老时编辑在那儿跺着脚，原地打转，嘴里唉唉地直叹气。他妈在朝天哀怨：“老天爷，这怎么是好哦。”

小丫趴在平平的身上，哭叫着：“妈妈，妈妈……”

皮平平突然站起，把丫丫推给时治国，说：“这是你女儿，你总不能把她也抛弃吧。”说完，推开围观的人群，狂奔而去。

那个叫思思的年青女人，看此情景，使劲挣脱时治国他妈的手，冲了上来，猛搥了时治国两个耳光，也是夺门而走。

一个星期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皮家一直没有平平的消息。皮安已有点急了，等到第二十天时候，皮安已上镇政府（这时龙头乡改成叫龙头镇）了。找了民政干事白云，他知道白云认识时家。

白云赶忙打长途，从出版社找到时治国现在的单位，找到了时治国，听到了时治国在电话里慌乱地回答：

“她走了，她早走了，她当天就走了……我以为她回家了……怎么没回家啊……叫我上哪儿去找啊……”

这一下，皮家象炸了马蜂窝一样，先是上所有的亲戚家去找，都没有。整个民主村也为之震惊。皮平平会上哪儿去呢？

皮安已，皮高深父子，皮姗姗和她的丈夫、当年的辜连长、现在的县工业局长，都上了省城，像疯了一样地四处寻找。

和时家的争吵已经于事无补，都一起满城地找啊。老时的单位出版社，时治国的单位，也都派人一起找。尤其是辜局长找了在省市公安局工作的老战友，动员了很大的力量，到处寻找。满街的告示，报纸电台的寻人启事，一条条线索的排查。

前后几个月，始终没有找到皮平平的下落。从她离开时家的门，就没有了有关她的任何信息。

永远无法摆脱的压抑和愧疚，使时治国的精神不再正常。他躲着他的父母，整天反复地说着：“都怪你们，都怪你们。”

老时老两口，每天面对着哭着要妈妈的丫丫，愁眉苦脸，哀叹不绝。

皮安已也是老泪纵横，常常在后悔，“我不该说那句话呀，我不该说‘他变心了，你就别回来呀’。这里毕竟还是你的家呀。”

很多年以后，皮平平依然没有任何消息。

对皮平平的最后下落或下场，人们后来有过无数的猜测。然而最悲惨的猜测也抵不上无尽的思念，那是永远无法愈合、时刻都会被撕裂的伤口。这不只是皮家，也是所有西北村人永远的伤痛。皮平平的悲剧，时治国无疑首先要承担直接的责任。但这仅仅是他一个人的责任吗？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这是一个社会的悲剧。把十几岁的孩子，从父母身边赶出来，从城里的家庭赶出来，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赶到千百里外的穷山僻壤，要他们自己生存，就是极端不负责任的，甚至可以说是不人道的做法。

这是仍在延续中的无数个文革灾难故事中的小小的一个。

第十四章 海外来客

1978年1月14日

改革春风不但吹遍龙头，吹遍海源，吹遍祖国大陆，那暖意使得整个地球都有感觉。

1984年的春天，从大洋彼岸的美国来了一个中国人，确切地说应该叫美籍华人，在民主村的胡同里转过来转过去。他一身西装革履，花白的头发，宽边的眼镜，尽管看上去有六七十岁了，可依然是精神奕奕，眼神急切而又迷茫，旁边还有个年轻人陪着。

这是革命胜利以来，第一个从海外归来的民主村人。鲁队长看他已经转了一阵了，便上去问：“同志，你是在找人吧？”

“喔。”那人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人家是在问他。这才想起来，大陆上对人都是叫同志。老人讲的倒还是海源话：“是的，是的，我是在找人。”

“你是要找哪家？”

“我是要找……”那人欲言又止，吞吞吐吐起来，眼睛看着边上的那个年轻人。

那个年轻人就说：“我是黄港市外办的。你们镇政府在哪儿，我们先上政府去。”

“在前面，我领你们过去吧。”

鲁队长把他们领到乡政府，祖云涛在。那年轻人说，这是一位老华侨，原籍是这儿民主村的，这次回来看看，想找一下亲属。

鲁队长问那老人：“您贵姓？您是谁家？”

老人却有点紧张起来，不知该怎么说。

倒是年轻人先开口了：“辛老先生，不必有顾虑，不管你们家以前是地主、富农，还是国民党官员，我们现在都友好相待，都是炎黄子孙，毕竟血浓于水。”

鲁队长睁大了眼睛，问：“您是辛家的？”

“是的，在下姓辛，叫辛凯旋。你知道我们家的情况？”

这回轮到鲁队长无语了，怎么跟人家讲辛家的遭遇呢。缓了一口气，鲁队长抬眼望着这位老人，果然他跟辛狗狗真有几份相象，说：“辛先生，你们家那几年遇到了不幸。但还是有幸，你的儿子还在。”

“是吗？”辛凯旋老人激动地站了起来，“1948年接到家里最后一封信，说是我有了儿子，从此再也联系不上。没想到他还在，他妈呢？还有我爹，我娘呢？我儿子在哪儿？我要去看看。”一连串的话语都停不下来。

辛凯旋的身世在第一卷的第八章里说了。四十年代末，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接连溃败，使他和家里失去了联系。后来他去了台湾，又去了美国，早就加入了美国籍。因为感到回乡无望，若干年之后，就在美国另成了家。现在退休下来，得知祖国大陆改革开放，就想回来找找自己的家人，又怕自己有历史问题，进来了出不去。在美国的老婆孩子都不赞成他回来。犹豫再三之后，还是乡情难却，亲情难却，尤其是放不下老家那一头的老婆孩子，他们是在过什么样的日子呀？辛凯旋始终把他们牵挂在心间，思情难了，责任难卸。再一想自己还有美国国籍，安全系数要高一些，才横下一条心、壮着胆子回来看看。好在进关之后，有关部门态度都很友好，挺讲政策，看他年纪大了，还派了一位年青同志陪他，进了龙头。家乡的记忆已经恍惚，自家的老宅已经认不出了，没料想自己的儿子一问就问到了。

可鲁队长有点为难，他知道面前的辛凯旋已经是美国的中产阶级了，可是辛狗狗还是住在那间破草屋里。他犹豫起来，怎么叫人家进去看呢。

辛凯旋倒着急了，问：“他被关在什么地方了吗？”

祖云涛说：“鲁队长，你就领辛先生去吧。我们这儿的条件，不能和美国比，他们知道的。”

鲁队长一边差人先去看辛狗狗在没在家，不在的话赶紧找，一边和祖云涛一起，领辛凯旋往西北场院的那间旧草房去。

当辛凯旋走到西北场院，辛狗狗和邢秋芬已经换了件最好的衣服，站在草屋前。邢秋芬的怀里还抱着一个几个月的孩子。辛凯旋走到狗狗跟前，仔细地端量着，伸手抚摩，半天终于说了出口：“儿啊，你就是我的儿啊，你长得就像当年的我啊。”说着老泪纵横，不禁而下。

狗狗也颤颤地问：“你就是我爹？”

辛凯旋含泪而语：“只要你姓辛，你就是我儿子。”

鲁队长在边上忙说：“前些年，为这事，我们反复查过，他就是你儿子。现在的名字叫狗狗。”

老人伸手拍着狗狗的肩膀，涕落泪流，许久才说：“苦了你们啦。”

狗狗说：“爹，这几十年我终于能喊声爹啦。”也是扭过头去，一行热泪不禁而下。

邢秋芬拿出手绢给老人，“爹，你擦擦吧。”

辛凯旋看着邢秋芬，狗狗说：“爹，这是我媳妇邢秋芬。这怀里的，是你的孙子。”

辛凯旋双手在身上摸着，“不好意思啊，我没想到还能见到我的儿子，更没想到还有了儿媳妇，还有了孙子，也没有准备。我和别的华人还不一样，不喜欢戴金镯子、金链子。这个给你吧。”说着把手表拿了下来。

邢秋芬连忙推辞，眼睛里也是一汪泪水，“爹，这辈子儿媳妇还能见到你，就是最大的福气了。我和狗狗什么也不要。能见到你，就好。”

辛凯旋拍拍邢秋芬怀里的孩子，“啊呀，真是好孩子。叫什么名字啊？”

邢秋芬说：“还没起好名字。爹，你给起了吧。”

“哎呀，我回来还能赶上给孙子起名字，真是想不到的大福啊。让我好好想想。”

“爹，不急。您进屋坐会儿吧。”狗狗说。

辛凯旋抬头看看那草屋，问：“你们就是住的这个屋啊？”

“是的，是旧了些，不过有住的，就可以了。”狗狗说。

辛凯旋踏进屋里，屋里光线幽暗，地上地下摆满了杂物，几无插足之地。

祖云涛看出来了，上前说：“辛老先生，您今晚就在我们镇里招待所住吧。”其实，这镇上的招待所也好不到哪儿去。

陪同的年轻人说：“现在回黄港还来得及。大家一起去吧。我会把你们都安排在宾馆里的。”

辛凯旋说：“哪儿也不去啦。几十年了，天天想着自己的家，自己的儿子。今天，我就在这儿啦，就是躺在地上，我也心甘啊。”

整个民主村都轰动了，整个龙头镇都轰动了。西北场院都挤满了人。大家都在讲着同一个话题：辛家的三少爷回来了。民主村人想看看久别了几十年的辛家少爷，别的村的人更想看看，经过两次满门抄斩之后，居然还能留下来的辛家父子。挤在前面看到辛家父子的人，都说：“这爷俩还真像。”

当年曾经见过辛凯旋的人，反而没出来。于村长当初虽然没有下手，甚至还把狗狗母子从第一次抄斩中留了下来，可现在能对人家说什么呢？是表功？还是忏悔？还是别的？说什么，也不好，就没出来。皮安已也认识辛家的人，可自己因为平平的事，到现在也没音讯，哪还有心思去管别的。秦德才，那就更不用说了。

乡政府和村里本想请辛老先生，人家毕竟从大老远来的。可是坐到一起说什么呢？这边既不能赔罪，也不好谦虚，啊呀，怎么还少杀了一个。人家也不能来讨债，还是反过来谢谢你们还给留下了个儿子？想想算了吧，也都没有表示，只是留下市外办的那个年轻人吃了顿饭。

晚上，辛凯旋也在这草房里睡了。

狗狗叫他爹在炕上睡，他们两口在地上。皮高深、邬朝阳他们帮着搬来好些玉米秸，铺在地上。于村长叫于又发抱来了两床被子，知道狗狗家肯定是被褥不够。

狗狗一一介绍这些年轻人。听说于又发是于村长的孙子，辛凯旋想起来了，说：“我还能记得，于村长是个不错的人，至少不是那么凶。”

狗狗说，听村里人讲，当初辛家被拉出去满门抄斩的时候，是于村长顶着压力留下了他们娘俩。

辛凯旋说，那我明天要去看看你爷爷。

于又发说，我爷爷也想来看你的，怕勾起你的伤心事，又不好说什么，所以没过来。

辛凯旋说，唉，家里出这么大事。忘，是忘不了的。但是怪谁呢，我知道，那时候，你爷爷就是想出来挡也挡不住的。

这一夜，狗狗的小草屋里谁也没有睡。狗狗把这前前后后，他所知道的事都说了，包括他母亲在望海山坡被秦德才杀的事。

“坟地还在吗？”辛凯旋问。

“我找过，没有一点影子，不会留下来的。”

“谁杀的？”

“秦德才。那个凶手还在，去年被一个新来的媳妇骂的，病在炕上一年没起来。”

“这种人会有报应的。”

辛凯旋又把他这几十年讲了一遍。现在他在美国也有了个家，也有了儿女，本想带他们一起过来看看的，又吃不准大陆的政策，怕进来了再一网打尽，所以只豁上他一条老命进来看看。只要能知道家人的下落，死了也能闭上眼了。

辛凯旋说，“要不，你们跟我一起上美国去吧。你们过去，我可以另外给你们买栋房子。这点钱，我还是有的。”

辛狗狗想了想，说：“不了，我们过去不适应的，连话也听不懂。好在这儿已经改革开放了，不是以前那种样子。我们也可以站直身子过日子了。”

“那你准备怎么过？”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就办个厂子，做那种针织活，卖到外国去。”

“哦，”辛凯旋想了想，“这也是个办法，在国外这种手工活没人愿意做，一块钩花台布，十几美元，在国内就是上百元钱了。”

“在这儿，靠人工做，只能挣几块钱，因为要交到村里，村里再交到镇上，镇上再交到县里，一级一级交上去，一层一层地扣钱。如果自己做，跳过这几层，能直接出口的话，可以多挣不少钱，还能让很多人有活干。”

“这种想法好，需要多少钱，尽管跟我说。”

“这些手工活，小机器，花不了多少钱。一开始先不搞大，先搞几台机器试试看。那种机器，一台还没有一张桌子大。”

“那些技术，你们能会吗？”

“爹，那些技术不是很难，我都会了。”秋芬插话说。

“是啊，爹，我们实际上已经开始注意了。前几天，我还跟秋芬说，今年秋天有了钱，不盖房子，先去买机器。不够，哪怕再去借点。”狗狗说。

“好样的，有志气。”辛凯旋欣慰地说。

“土改时，连名字也不许我有，只能叫狗。开始落实政策时，有人劝我把名字改了，改个好听的。我就是不改，我就是要别人看看我辛狗狗到底行不行。”

第二天，辛凯旋叫狗狗领着上了于村长的家。

于村长这两年身体明显不行了，可听说辛凯旋来了，硬是从炕上挣扎下来，摸到了门口。

两位老人相见，相互间一直端量着，都想从对方的皱纹中看到当年的模样。

于村长握着辛凯旋的手说：“变化大了，认不出了。要是在街上遇见，谁是认不出。”

“是啊，我走的时候，你还是正当年呢。”辛凯旋说。

“你出去当警察、打鬼子的时候，我还真羡慕你呢。你们在威海打胜仗回来，县里开庆功大会，那气势，我现在还能记得。”

“哈，哈，好汉不提当年勇啦。”辛凯旋爽朗地笑着。说真的，海源军警那次去威海消灭日寇的数量，在山东战场打这之后（除了台儿庄那一仗）还没有谁能超得过，包括后来讲的那个地雷战，。

“唉，如果后来国共两家一起真心打鬼子，那该多好啊。”

“谁知道后来变化会这么大，物也非，人也非啦。”

“唉，难为你们家啦。”

“不说了，你那时能留下他们娘俩，已是不易啦。为这一点，我要过来看看你。”

“唉，一言难尽啊。我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这些事，唉……”于村长用手拍了下墙，说不下去了。

停了一会，于村长说：“你现在的身份变了。我去乡里问问，能不能把你家土改分掉的房子再退给你。按说应该是可以的。”

辛凯旋连忙摇手：“使不得，使不得。那些早就没有意义了，不去提它了。于村长啊，倒是有句话我不知道能不能问？”

“你说，你说。”于村长抬起了头。

“我爸妈的尸骨能有吗？大体上的位置能找到吗？”

于村长低下了头，许久才叹息说：“没有了。那天是在北门外大河边杀的。一家人绑成一串，插上刀子后推到了河里，都沉底了。一串串地都推到河里了……以后都冲走了。几个月后，河上都能看见漂浮的尸块……”

辛凯旋听了泪水止不住地流。

有句古话说，“相逢一笑泯恩仇”。可这句潇洒而又大度的话远远说明不了两位老人此时的心境。等了一会儿，于村长缓缓地说：“好在你还不错，现在比我们都强多了。你的儿子狗狗是个好样的，能干，正派。在压力之下不弯腰，是个有出息的人。这一点，我早就看出来啦，只是不好说就是了。”

“谢谢，谢谢村里对狗狗的关照。”

从村里出来，辛凯旋和狗狗一家来到望海山的半坡，那个狗狗后来听说被他娘从刀下扔出来的地方。满山的青草丛生，山石零乱，什么痕迹也没有了。尽管说不定哪块石头就在当年掩盖过他娘和李芹父母的尸体。

辛凯旋无言地跪下，狗狗两口抱着孩子也跪下。辛凯旋叩头三拜，实在没有别的，就拿出一张美钞，用打火机点上，对空遥拜。

狗狗扶起他爹。辛凯旋没有言语，还要往前走。

狗狗说：“爹，出来挺长时间了，快一上午了，回去吧。”

不料辛凯旋一行热泪潜然而下，哽咽着说：“我都出来三十八年了，就是为着这一天，我就是爬也爬到大河边。”

狗狗也含着泪，扶着他爹一步一步翻过望海山，来到大河边。

辛凯旋在河滩上跪倒痛哭。清冽的河水，哗哗流过，带走了他的父亲，带走了他的母亲，带走了三十八年的岁月，却依然带不走心中的悲愤和儿女对长辈无尽的思恋和歉疚。

辛凯旋走之前，还对狗狗说，这次来没时间了，你有空帮我打听打听，当初在劳山游击大队还有个新河镇的老乡，姓杭的，抗战后没跟我们走，回家种地了，现在不知怎样，等下回回来我去看看他。

这年的秋天，辛狗狗用他爹汇来的钱，在西门外粮管所旁盖起了一排八间房，安上了八台机器。从北山招了几个小姑娘。还是高秀珍回娘家一说海边好，有不少小姑娘想来。狗狗他俩也搬出了草屋，住进了这排房的东两间，里间住宿，外间当办公室。另外拿出一间当伙房，自己也跟工人们一起吃，真的是厂就是家、家就是厂。

在申请办厂的过程中，都很顺利。问村里要块地，杜家骏还有点犹豫，不是不肯给，而是没有这个先例，以前没办过，得去问问乡里。彭小宾说，别去问了，一问就事多，又不是卖给他，咱是借给他用。杜家骏说，好吧。借多少年呢？谁知道过几年会怎么样，先借着吧。租金是多少呢？也不知道这厂会办得怎样，就出利润的10%吧。双方也都没有规范的意识，好歹最后还是写了个纸条。

到镇上，说还要到县里办营业执照，办税务证，跑了一大圈，单位是跑了不少，公章也盖了不少，不过倒还没有从中作梗、刁难的，那时还没有“权钱交易”这一说。

对这事，也有不高兴的，第一个要数宗发奋。他说，这是地富反坏变天的一种新形式，明明是被咱们打倒的敌人，又神气起来了，又剥削起咱们的阶级姐妹了。好在他不分管这项工作，也只是说说而已。

祖云涛说：“先让他办吧。不管成不成，也是给咱们提供了经验，何乐而不为呢？”

民主村、龙头乡的第一个民营企业就这样办起来了。

办这个厂，狗狗花的钱，比起他爹给他的，连个零头也没用上。按说再盖个小别墅都不在话下，可是狗狗每一分钱都很仔细，连吃饭都是和工人们一个锅里做，一个勺子舀。这顿没吃完的，下顿热了再吃。凡是出力的事、跑腿的事、烦人的事，都是狗狗自己来。

狗狗万分地珍惜这个机会，真的把它看成是自己的第二次生命。

第十五章 惊魂湘南

1978年1月15日

15.1 连夜出逃

不要以为改革就这么轻快、这么顺利，它也遇到了来自各个方面、不同情况的阻力。最常见的阻力之一，就是文革中曾经得势的某些势力。

有些事真是事先想不到的。潘场长就遇上了这样的事。离开五三农场差不多五年了，却突然间来了长途电话，还是被喊到纪乡长的办公室去接的。来电话的是小商，原来的干事兼潘场长的司机，现在提副场长了。场里也在搞落实政策、重新审查一些案子。小马被判死刑的案子肯定是有问题的，现在拿出来重审，需要到他老家湖南去核实一些情况。所以叫上潘场长，一是潘场长对案子情况比较了解，二是也能再见个面、叙叙旧，出来玩玩，费用由场里报销。问潘场长愿意不，潘场长说好啊。

这儿把小马的案子再复述一下。小马是湖南人，初中毕业，在本村的小学里当民办教师。虽然每月只有24元的工资，但在农村还是非常令人羡慕的。村支书的儿子就想顶他的位子，这就有了矛盾。一次干活，小马在下风头，嫌刮来的风里有草灰，便说这东面来的风里有灰。结果被村支书说成是攻击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东风压倒西风”，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判刑十年，发配到五三农场。他的父母也深受骚扰，在村里呆不下去，流落到了五三农场外的荒漠里。文革初，有红卫兵冲击农场、殴打劳改犯人，小马情急之下咬了他们一口，就被说成是要谋杀革命小将，处以死刑。他父母在荒漠中也不知所终。商场长他们的初步意见是小马的杀人罪肯定不能成立，之前的反毛罪也应重新考虑，所以要到他原籍来调查了解。

他们二人约好在长沙五一路省委招待所碰头。见面后都挺高兴。小商夸潘场长不见老、还更年轻了，老潘夸小商更成熟了。两人去了趟岳麓山、橘子洲头，第三天去了小马的老家湘南县。到了县公安局的接待站，人家一点也不热情：又是来外调的啊，再翻这些老账有意思么？不，不，不是不让你们翻。你们爱翻不翻的，我们管不着。这事你们自己去调查，跟我冒得（湖南话，没有的意思）关系。只是按例行公事，留下小商带的农场的介绍信，另开一张县公安局的介绍信。

到了乡里，更不行了，都没人理。好歹有个人出来说话：这事找不着我们，我们嘞里（这儿）冒得相应的部门来接待你们。你们也是没事找事，愿意下去调查就去吧。不过要提醒你们一句，下去要注意安全，会有些人不欢迎你们去，会不高兴的。别说我们冒跟你们打过招呼。连在介绍信上签一句“请某某村接待”的话也懒得写了。

“这还会有什么危险么？”小商问。

“咽（这）个，我们就不知道啦。也可能有，也可能冒得。”

两人离开乡政府，就步行去村里。在县城时，买了张全县地图，找到了要去的田家湾的所在。没有大道，只有供手扶拖拉机行走的那种土路。一路的风景倒是不错，江南丘陵高低错落有致，一座座的青山，一块块的水田，一湾湾的池塘，一些黑瓦黄泥墙的农舍散落其间，跟照片里的毛泽东故居很像。

两人颇有兴致地走着，十多里路，一个来小时，在一个坡前空地上找到了田家湾的村委会，一个跟普通农舍不一样的平顶红砖房。里面的一个人，见了他们的介绍信，颇为疑惑，拿在手上看了又看，便出去了。少顷，喊了一个人过来，指着潘场长两人，说：就是这两个。那语气不只是不礼貌的问题，好像是逮着两个小偷似的。

来的那人，手里拿着他俩的介绍信，也是对他们看了又看，才问：你们的工作证呢？

小商拿出了他的工作证，那人拿过去后又是看了又看。潘场长把他的退休证递了过去。那人从鼻子里嗤了口气，说：“退休了，还出来啊？”

小商忙说：“这是我们的老场长，对情况比较了解，所以请他一起来了。”

那人又问：“你们要了解什么情况嘛？”

小商说：“差不多二十年前你们村的小马，因为反革命罪，判了十年，在我们农场服刑，文革时又被判了死刑。现在中央提出要平反冤假错案，我们看看这个案子里会有什么问题。这也是对所有的人，从当事人到办案人都负责任。”

“会有什么问题？那是罪有应得。”那人很不高兴地自言自语，又说：“那你们住下吧。这儿老百姓住的很分散，找人不好找。你们住下来，再慢慢找吧。小亢啊，你安排一下。你们的证件先放在我这儿，等走的时候再给你们。”说完也没理他俩，径自走了。

小亢其实并不小，也有三、四十岁了，领着他俩又走了半里地，到了一个村落。这里的农舍很奇特，十几幢农舍如网络状连在一起，有廊檐，有小门，串通起一个个小天井。走进去很狭窄、很幽暗，拐来拐去，外人进来一半时搞不清楚。小亢把他俩领进一个倒屋，里面有张床，床上的被子很脏，整个屋子散发着浓浓的霉味。再是一个水缸，一个破桌，桌上有盏小油灯。

看潘场长两人有些迟疑，那个小亢说，咱这儿就这条件，觉得不合适那就回乡里去，每天来回跑吧。

两人无奈放下包。小亢说，晚饭安排在一个农户家，到时候会来叫你们的。说完这些，小亢就走了。

潘场长说，咱两出去走走，熟悉一下环境。两人出得们来，见每个屋子都是一户户的人家，住得挺挤。可能是白天的缘故，虽然这么多屋子挤在一起，也没有多少声息。两人穿过一道门，又是一个天井，天井的四面屋子，有的是开了门窗，有的看来是后墙。再往前走，廊檐下的小门又开往另一个方向。潘场长忙提醒，得记住这些门，别回来时找不着。

晚饭是有人来喊：“同志哎，恰饭哒（吃饭啦）！”进一老乡家，一人给一钵米饭。钵，一种小型陶罐，里面放上米和水，隔水蒸。一钵米，也就二两样子。菜呢，就是一碗红辣椒，辣得不得了。不能吃辣的话，那就只能扒拉干米饭，而且也就这么一钵，不管你吃不吃得饱。那农户的俩口和孩子，也围着桌子吃，都是这个样，你也说不出别的来。

饭吃得很沉闷。潘场长几次想挑起话题，问问你们的生活怎么样啊。男主人只是嗯嗯，女主人更是连个声音也没有。这是什么地方？潘场长肚子里真是不舒服。

一直等问到老潘他们住的那屋，老潘说：看你们住的都挺挤，怎么还空了那一间？男主人怪异地看看门外，说：那是个鬼屋，谁敢去住？再一问，才知道那屋子原先的主人，一家四口，在文革初都被砸死在里面了。家具杂什后来被别人搬空，就一直空在那儿没人管。这两年，外面有来村里调查那几年事情的，村里就按了张床，当成是“招待所”。老潘两人听得是面面相觑。

吃完饭天色已晚，虽然住宿的那屋近在咫尺，老潘他俩却认不出了，只能叫那男主人送了回去，帮着点上油灯。等人家走了，小商也忍不住说了，这是什么地方？

第二天上午，先后找了两户人家，想问问小马当时的情况。可人家都是神色紧张，摇着双手，站起来就走，唯恐避之不及，没人愿意对他们说。

下午他们约了村主任在村委会办公室谈，就是昨天刚来时那个红砖平房。等了挺长时间，村主任才来。那个村主任不是别人，正是昨天过来的那个人，姓俞。

姓俞的一进来，就很不客气：“你们这两个人要做什么？你们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你们不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却要为反革命分子翻案，到底居心何在！”

小商忙解释说：“我们只是了解一下小马当时的情况。有什么情况你就介绍什么情况，不用上这么大的火啊？”

这个姓俞的一听，火气更大了，瞪起眼说：“老实告诉你们，当年揭发检举那个姓马的反革命言行的，就是我，你们想要怎么样？”

老潘两人无言了。

姓俞的又接着说：“我们这一派是经过了血与火的考验的，是我们牢牢地掌握了革命政权。这里所有的人都得听我们的。就是你们到咱里（这儿）来，也得听我们的。那个姓马的就是反革命，永远翻不了案。”

老潘说：“我们来，不是要翻案，只是想了解一些情况。我们会尊重各方面的意见，也包括你们的意见。”

那个小亢歪着头跟老俞说：“莫跟他们多啰嗦吵。”那头一歪，才看见后脑勺上还有一道深深的刀痕，那是当年武斗留下的。

那个老俞也是一扭头，不管不顾地就走了。

小商对那小亢说：“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走吧，不用在这儿了。”

小亢半天没啃气，末了说：“那你们得问我们的主任。”

小商说：“你去对他说一下，把证件还给我们。我们现在就走。”

小亢哼了一声：“我才没工夫伺候你们。”

老潘和小商两人相视，又无语了。

两人只得往回走，小商悄悄地说：“这个地方怎么像黑社会似的。我们真要注意哎。”

老潘连忙摇手，示意别说了。

前面有一个人，扛着锄头，正慢慢地走着。老潘以正常速度走过去，不过还是挺警惕的。就在和那人擦肩而过的时候，那人突然开口说话了：“你们要了解小马的事？当时的巩校长现在退休在斯家冲，你们可以去问问他。”

老潘看他时，他头不抬、眼不转，依然慢慢地走着，却闭上了嘴。老潘四周一看，没有别人，但也没有停下脚步，只是在嘴里轻轻地重复着“斯家冲、巩校长”。那人点点头，依然没有看他俩。潘场长明白了，和小商以他们的速度继续往前走。在相交而过的那一刹那，那人抬头看了他俩一眼，眼神中是无尽的哀伤、痛楚，似乎还有种期盼；又是像有无尽的话语，却硬生生地被压抑着的欲言又止。那只是一刹那，在这一步之后，他又低下了头，慢慢地走着，拉在了后面。

当潘场长两人暗自庆幸有了新线索、这次外调不至于白来的时候，事态变得严重了。

睡到后半夜，其实他俩也没睡着，和衣躺着。突然那木棂子窗被人重重地拍了两下。两人惊起，小商抢在前面，大吼一声：“谁？”拉开房门。哪知房门外不知是谁搬了块大石头靠在了门上。小商一拉门，那石头就往里倒下。好在小商是军人出身，这点反应还是有的，他闪过一旁，便冲出门外继续喊着：“谁，谁！”此时，一道强烈的手电筒光从天井那头的小门照来，晃得小商睁不开眼。老潘毫不退让，大吼一声：“抓住他！”冲了上去。对面“腾腾”的脚步声响起，那人跑了。小商说：“算了吧”。老潘也知道这种情况下，人生地不熟，不宜穷追，两人便回了房。

此时，整个村落，那紧紧挨着的十几户人家，没有一家发出声响，更没有一个人出来问一声，静静地、静静地，像死一般地寂静。

天亮，潘场长两人找到俞主任，说了昨晚的事，要村里调查处理。老俞说，这怎么查？冒得人会承认。我又不是公安局，查不了。就是报告公安局，这种小事，他们也不会来查。

小商说，那我们没法工作了，现在就走，你把工作证、介绍信还给我们。

那老俞一个狞笑：还给你们？那你们得写下调查结论，那个姓马的反革命言行确凿无疑。我们村委会可以盖上章，不然，你们先别走。

老潘说，那你们还要留我们啊？

老俞说，可以啊，可以啊。我们是很好客的咪。

老潘说，晚上还来砸石头啊？

老俞说，你们要是不喜欢这个地方，可以换一下，换个清静的地方。

老潘胆子大，想看看这儿到底有些什么名堂，看了小商一眼。小商也点点头。

老俞叫小亢又领着他俩走了。临走，小亢还叫他俩扛上那破被子，说是那儿没有。沿着半山坡的小路，路更窄了，两边的草丛更高了，坡上的树林更茂密了。

经过一个场屋，一边是两间农舍，另一边则是已经倒塌了的废墟。看上去已经塌了有年数了，密密的茅草几乎淹没了残墙断壁。从草丛中露出的几段残壁，最高的也只到窗台。还有一、二根房梁，斜斜地伸了出来。小亢说，这就是那个姓马的家。

潘场长他俩稍稍地停下脚步，看了看，又一户消失了的人家的遗迹。

再往前去一段路，才到了给潘场长他们安排的地方，一个小场屋。一间正房，两侧都有厢房，他俩就安顿在西厢房。房东是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小亢把他喊出来，跟他说了几句。那小孩的眼神也是愣愣的，什么也没说，不过看来小亢是明白他的意思。小孩推开那西厢房的门，小亢对老潘俩说，你们就在这儿吧，“恰（吃）饭呀（也）在细伢子（小男孩）囡里（这儿）。”

这小孩身世也很苦，是个孤儿。父亲在文革武斗中被对方刺死，母亲弃他而去改嫁他乡，毫无音讯。这些年来，就是自己一个人这么苦熬过来的。看他的表情始终是冷冷的仇恨的。

小亢走的时候，那个小孩（姓夏），靠上说了两句。潘场长只听得好像是在讲，……来干什么……算了……。小亢走了以后，潘场长想靠上去跟小孩聊聊，那小孩理也不理，自己转身进了他的屋，推上了门。

老潘俩进了西厢房，里面真的是家徒四壁。除了一张破床和窗台上的一盏小油灯，别无它物。看着窗外，蓝天白云，青山绿水，这世界依然很美。但是在世界上的这个角落里，怎么却这样的怪异。

傍晚时分，小亢又来了，不过不是来找潘场长他们，而是直接进了小夏那屋。小商这时正出来在屋后方便，听得声音，便转到了小夏的屋后，想听他们在屋里讲什么。但是，一是，泥坯墙厚，听不清；再是，湖南土话听不懂。把小商急死了。想把耳朵再凑近点，又怕被发现，只能干着急。不过，断断续续，还是听到一些片言只语：什么后半夜啰，什么你们再来啰，不要跑了啰。

等小亢走了，小商才回去跟老潘一说，两人觉得里面肯定有问题。要不要把那小夏喊来咋唬一下，把话套出来？估计要把小夏的话挤出来，凭他们俩是有这个办法的。但是再下一步，对手会做什么，就不可能再知道了。那样会更危险，不如自己先行动。

晚饭，他俩不动声色，跟小夏一起吃了。还是那样的辣，尤其是小商真扛不了，那也没法。看那小夏却是鬼鬼祟祟、贼眉鼠眼，眼睛一会儿往这儿看，一会儿往那儿看，就是不敢看他们俩。

老潘故意问：“今晚你还有什么事做么？”

小夏先是一愣，又慌忙答道：“冒得什么事做，冒得什么事做。”

“那好，今天我们也累了，过去早点歇歇了。”老潘说。两人就回西厢房去了。

渐渐地天黑了，老潘他俩要连夜走了。之前，他们已经很详细地研究了那张本县地图。出去以后要反方向走，不走村委会前面的那条路，而是翻过山脊，再过两个山坡就有条公路，沿路向前往邻县走。

等老潘上去推门，发现门却推不开了，已经在外边被反锁了。

小商紧皱眉头，推了推，也推不开。他过来使劲推窗，也推不开，就一拳朝窗扇打了上去。那些都是陈年老屋，木质已朽，那经得起打，一拳就碎了。小商再“几哩咔嚓”几下，窗户就全散了架。两人翻窗而出，看小夏屋里似乎有人影晃动，小商上去就拿一根小木棍，把那门鼻给插上了，叫他也开不开。

而后按计划走上山坡，在小树林里穿越。后面传来了小夏的敲门声和喊叫声。当他们翻过山脊，走上又一个山坡时，后面传来了不少人声，好几个手电筒在照来照去。老潘说，快走，他们找上来了。

两人又翻过一个山坡，后面隐约的人声似乎更多了。但他们毕竟不能确定老潘他俩逃脱的方向，灯光和人声散开了，也被老潘他俩甩得更远了。

到了公路边，两人商量不能沿公路走。因为老俞他们也一定会想到要到公路上找，他们也会猜想对方最有可能是沿着公路往外出逃。于是他们穿过公路后继续上山，在一个坡顶歇了下来，拿出地图看看，天太黑也看不清。往前也不能沿小路走，因为沿路会有村落农舍，会引起狗叫。虽然这儿的狗不算多，但只要有一个叫，就麻烦了。在山上走的问题是，对地形不熟悉容易绊倒，弄不好还会碰上蛇。湖南的蛇多是有名的，柳宗元的“捕蛇者说”，讲的就是湖南。他们决定在原地不动休息。看着山下的公路上，还有一二个手电筒的光在晃悠，看来他们也已经找过来了。老潘他俩商量，如果他们上山来找，那就站起来走，如果他们不上来，就坐在原地继续休息看他们晃悠。

这一夜，就这么过去了。

15.2 两个过来人

天微微亮，看看山下的公路上没有人了，老潘他俩还是沿着山梁走了好几里路才下到公路，又走了好几里路才搭上了车到了县城。亏得老潘他俩都是军人出身，在艰苦环境中经受过长期锻炼的，身板子硬，不然还真过不了这一关。

老潘他俩的连夜出走，是完全必要的。田家湾村主任老俞就打算在那一夜领着小亢、小夏，把他俩砸死而后埋在山后面。要是有人来问，就推说不知道，他们自己早已经走了。当得知老潘他俩把小夏关在屋里自己逃走了，气得老俞鼻子都歪了，那真的是在追杀。一旦抓到，那就不堪设想。

老潘他俩又找到县公安局，把事情一讲，要求公安局严肃处理。值班的荣民警一听，只是一笑，说：这帮人真行，都现在了，还敢这样啊？我问一下吧。他电话联系了乡派出所。乡派出所已经接到了

田家湾的报案，说是有两个人假借外调进村绑架村民、妄图加以杀害，被发现后连夜逃窜，请公安部门立即通缉追捕。

荣民警说，他们也真能编啊。他们人呢？对方答：已经回去了，走了一个多小时了。

荣民警直接打电话到田家湾村委会，找老俞。老俞他们也刚从乡里回来，听说是县公安局来的电话，马上接过话筒说，他们差点要杀人啊，他们差点要杀人啊。

荣民警说，他们俩就在我这儿，你过来啊？你以为你是在杀两个盲流啊？人家两个可都是县团级啊。你再这么莽撞，早晚要找到你头上。

老俞一下子愣了，连个屁也没有，过了会，放下了电话。

荣民警对老潘他俩说，还算你们机灵，跑出来了。要是被他们杀了，也就杀了。杀人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就算我们再去调查，你们也已死了，没有用了。

老潘说，我们还想去斯家冲，小马原来的校长退休了，住在那儿。

荣民警说，你们还要去啊？真是佩服你们了。想去就去吧，我也拦不住你们。这次可要当天去当天回哦。在下面村里，住什么住啊？明天一早再走吧。

老潘他俩表示了谢意，说，要不，今天有时间就找找当年的档案资料。

荣民警说，这又难了。这么多年了，现在又分了公检法三家，谁知道放在了哪儿。那你们就一家一家地查吧。

查到下午，老潘俩还是在县法院找到了小马一案的原始材料，都进行了复印。那时县一级有复印机的还真稀少。

第二天一早，到县汽车站赶头班车，去斯家冲，下车还要走几里地。所谓“冲”，就是小山沟的意思，河水冲出来的一长条地。北方有的地方叫“芥”，那字体就更形象一些。好在荣民警昨天已跟村里电话联系过，叫巩校长在村委会等着。

老潘他俩一进村委会，巩校长起身迎接。巩校长很清瘦，头发花白，衣着整洁，像个农村老知识分子的样子。村干部也挺客气，把他们请进里面的办公室，让他们单独谈，气氛比田家湾好多了。

他们渐渐地谈起来。老潘说了他们在田家湾的经历，说这儿要比那儿好多了。

巩校长说，这斯家冲从文革一开始就是一派压倒性多数，几乎没有另一派，所以打斗较少，结怨也较少，不像田家湾那儿，两派杀得太厉害。他们那儿一开始就有人做得太过火，抄家杀人。另一些人起来要保护自己，不打也不行，不杀也不行。相互间都把对方逼到死角没有退路，就杀起来没完了。到现在，这个账也算不清。稍微有点事，就往那上面想，就要先下手为强。这怎么能行呢？

讲到小马的事，巩校长长吁短叹，低下了头，“我心里有愧啊，我保护不了他呀。小马是个好青年，是个好教师，可惜了他。对了，后来他在你们劳改农场怎么样了啊？”

老潘说了，后来因为所谓的杀人罪被判了死刑。巩校长惊得目瞪口呆，久久说不出话，两行热泪潸然而下，好一会才懦懦地说：“我对不起他呀，我对不起他呀。”

巩校长说，他那时在田家湾小学当校长，看出来村里的俞书记想叫自己的儿子替下小马来当民办教师。可他虽然是校长，也没有权利处理这事。他想到要把小马调到另一个学校，可就算是小学教师在那时也是个热门，哪里也没有空缺。就算有，也轮不到一个偏远小学的去染指。眼看着村支书和他儿子硬来挤兑小马而毫无办法。他也私下劝过小马，遇事要忍。没想到在一件完全不搭界的事情上，硬是往小马头上扣上了反对毛主席的帽子。他也觉得他们做得不对，可是他也不敢说。那时谁敢说呀？小马被抓走的那天，他都没敢出来。第二年，他就申请辞去校长职务提前退休了。他说，亏得是提前退休了，要不文革来时，能被田家湾老俞那帮人砸死。那时他们那帮人什么人也敢杀。你们现在见到的村委会小亢，还是我的学生，就杀过三个人。文革后，也就判了一年劳教，出来后，跳得更高，更没人敢惹。那个俞书记的儿子顶了小马当民办教师才一年就不愿干了，顶上他爹当村支书了，称霸一方直到今天。你们现在要翻以前这些事，比掘了他祖坟还厉害，他能不和你拼命么？亏得你们跑得快啊，他们真的是杀人不眨眼的啊。

老潘问，那县乡政府不管吗？

“管？怎么管？”巩校长说，他们都是一派的，都是掌权的那派。他们能抓保自己、和自己生死与共的人吗？他们会替打他们、杀他们的对立面说话吗？早就没有是非原则了，只有赤裸裸的利益，还是和生命攸关的利益，能解得开么？要怪就得怪文化大革命。是文化大革命造成了这些恶果。不彻底地持续地批判文化大革命，批判极左思潮，这些结永远解不开、理不顺。这些问题不解决，这些人是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文革中他们能打着革命旗号整人杀人，今天他们就照样敢把你们都杀了。你们也看得出来，他们手里抓着权，老百姓哪个敢开口说话。当然，这些话，也就到这扇门为止。出了门就不要再说了。这儿的村干部也不愿听这些。

老潘俩再三表示感谢巩校长的这番肺腑之言。

巩校长又长叹一声，我也是多少年了没有地方说这些话，也就是你们外地的来了，才敢说说。

临结束，巩校长写了份证人证言，还认真地签字按手印。

因为要赶回县城，中午也不留下了。巩校长依依不舍，陪他们走了几里山路，直到上了公路，等长途车过来，把老潘他们送上了车。

回到县城，老潘还想到了最好能见见当时的办案人员。一问，当年该案的主审法官是现在的司法局局长，姓库，快要退休了。

库局长开始不愿意见面谈这些，潘场长好说歹说之后，看在都是转业军人的份上，同意在办公室谈一下。

见面落座后，库局长说，你们转业安排在边疆劳改农场，条件那么艰苦，常年在那儿，真是不容易。还为二十年前的一个小小犯人那么大老远地跑过来，不见你们有点讲不过去。可这些事，谁也不愿

意再提起。谁都知道这些事情做得过了头。连我当年给这案子落笔的时候，也知道是过了头。可有什么法呢？你个人有什么法呢？当时形势就是那个样，政治环境就是那个样。上面要的就是这个压力，就是要显示他的无限权力，不允许有任何的挑战和怀疑，哪怕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挑战和怀疑。你不跟着去压别人，有人就会来压你。不是现在替自己说好话，当时我也是顶着压力，上报时把十年徒刑改成四年，结果批下来还是十年。唉，谁知小马连三年也没能扛过去。

现在又要纠错，谁愿意纠呢？虽然我刚才说了我还有点良心，但是真要纠错，我也不愿意啊。案子纠错了，不就是否定了办案的人吗？变成你在那个时候，也是跟着错误路线跑了吗？

唉，该纠就纠吧。我们这些人多少风雨、多少磨难都过来了，说点什么就说点什么吧。人家小马人都不在了，我们还去多想什么呢？是吧。

你们说到了田家湾。现在不是一个田家湾的问题。一些农村基层政权变了味啦。有的是文革时遗留下来的一派组织彻底掌了权，有的是原有的领导班子变了质，有的则是黑社会组织渗透、篡夺了权力。这些势力在一些村子里横行霸道、一手遮天，完全没有了社会主义的味道。上级政府管不住，或不想管，有的甚至就是保护伞，睁一眼闭一眼。田家湾的情况，他们知道吗？连我都知道，他们会不知道？你们问我，你怎么不去管？我怎么去管？管不了那么多啦。我明年也就退休啦，安安稳稳地退吧。况且，这也远远不是我能管得了的事。

我说啊，像田家湾那种情况，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没有解决好。文革虽然被否定了，但是没有触及到它的根本性问题。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很多思想认识问题、很多浅层次的具体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比如有个说法，叫“宜粗不宜细”。从理论上讲，话是说得不错，但是太笼统。什么叫粗，什么叫细，没有说明白。对文革的错误高举轻放，都推到林彪、四人帮的身上，能解决问题么？不彻底地批判极左路线及其根源，就会给那些死抱左倾思想、坚持左倾做法的人留下了余地。给他们日后为极左翻案、甚至再次上演文革悲剧留下了余地。这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只是到时候具体的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前些年，我们也按照下达的文件精神，处理了一些文革中明显乱杀人的犯罪分子。但案件太多，也很难办。具体到哪一个人的，他又会一口咬定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主观愿望是好的。他老人家说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矫枉必须过正。所以，他们只认错不认罪，只是有些事做过头了。上头还有人为他们说话，说是还是娃娃么，能有多大错啊？在台上的和他们是一派的，你叫我们怎么下手处理啊？唉！好多事讲不通，说不清。

还有什么办法？我看只好糊里糊涂地拖，拖他几十年，拖到大家淡忘了，拖到一代人、两代人都死了，也就过去了。用文学家的话来说，就是让岁月的长河去冲淡人们的记忆、磨灭人们的伤痛，到可以哀悼的时候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库局长说到这里，顿了一下，若有所思，又说道：可这些创伤会轻易地忘掉么？前些日子，广东有个三十多岁的年青人杀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因为那个老头二十年前文革时杀死了他的父亲。他天天

记在心里，天天在找机会报仇。想着靠掩饰、靠遗忘、靠转移目标，都不是办法，那只能是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在不断产生。

库局长说完，摇了摇头，有点失神地望着窗外。

大家都沉默了。潘场长、商场长原本并不了解刚认识的这位司法局长，但库局长那么不见外，对他们一见如故，说了心里话，尤其是最后那些话，无疑刺中了他们心头的疙瘩。这疙瘩，是一种眼下一时说不明道不白的东西。历尽沧桑的潘场长不想多说什么了，缓解一下凝重的气氛，用轻松地口气说：“库局长啊，不管怎么样，总算有了今天，不要急，慢慢来吧，总会好起来的！这回真是谢谢库局长！”

库局长说：“是我讲得悲观了吧。呵呵，但愿不是这样吧。如果不是这样，那不是更好么。我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办法。他们会有他们的办法。相信他们会比我们处理得更好。

这个案子，最后怎么说？你们办吧，按你们的意见办。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会尽量配合的。

都是希望社会往前发展，希望国家变得美好。我们的想法都是一致的。”

“对对，还是库局长说得对！”潘场长和商场长被库局长一片真情感动，多天来的紧张、愤懑的心情一扫而光。他们三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使劲地握着摇着，久久没有松开……

这次调查总算较好地完成了。商场长回去后，整理了一份报告要求有关部门改正原有结论，还小马一个公正。后面还附上了巩校长、库局长等人的证明材料，和办案单位一些原件的复印件，应该说，材料的证据是充分的，提出的改正结论是有根据、有道理的。劳改局将此转给了原案件受理单位麦提那县法院和湘南县法院。半年后，两个法院都发出了对小马撤销原有判决、宣告无罪的文件。

这是一份因为大的形势已经转变而来的文件，是一份经过了像商场长、潘场长、巩校长、库局长和那个路上不知名的人等等这些还有良知的人努力而来的文件，尽管又是一份迟来了二十年的文件。

潘场长收到了商场长寄来的复印件。他激动地给李辰、给纪海洋、给经大臣、给龙头镇的人讲小马冤屈的故事，唯独没有讲他在田家湾那惊魂的一夜。

平反的文件到了田家湾，被俞主任“呸，呸！”吐上两口痰，又用力撕碎后扔到了墙角。好在那时还没有国家赔偿一说，要不然，那个赔偿受害者的钱回到村里，也就到了加害者俞主任的口袋里。这种并不滑稽的滑稽事，可并不少见。

五三农场那边，连小马的遗体埋在哪儿也无从找寻，更不用说小马的爹和娘。商场长把平反的文件贴在了小马当年牢房的门上，算是个告慰。

南疆麦提那无边无际的或烈日如火或风雪呼啸的荒漠，还能记得那个瘦小忧郁的小马吗？还能记得他那苍老无助、颤颤巍巍的爹和娘吗？

他们在滚滚沙尘中的冤魂，能就此安息吗？也许，他们已化成那沙尘里的一粒，在大漠中永生！

第十六章 旧情新缘

1978年1月16日

16.1 小楼房

1984年，龙头镇、民主村还有件更离奇的事。这回讲的是经大臣。

经大臣又一次落实了政策。文革中虽然没有给他定个罪名，但是按退职处理显然不当。上海有关方面来联系了，撤销原有处理，改为“离休”（说明：离休，是对参加革命较早的老干部的一种优待办法，即退下来后不但拿100%的工资，而且还提一级，在医疗、福利、疗养、用车、度假、书报等一系列方面都有特殊待遇）。并一次性发了几万元补助，愿意回上海住干休所也行。

这回经大臣跟车素花商量的。车素花说随你，愿意再去找那个小莉也不管。

提起上海，经大臣是五味俱全。上海，既是他的梦幻之地，也是他的伤心之地，不想再去了。跟老婆、儿子、孙子一起在龙头过吧。几万元钱的补助，那时在龙头是可以盖一幢二层的小楼，还花不了。

第二年，1985年的夏天，经大臣真的在北门外盖起了龙头镇的第一个小楼（那时还不叫别墅）。入住的那天，经大臣请了好几桌。从纪乡长、老潘、老叶、祖所长、肖校长、辜局长、宗发奋、祖云涛两口，到于村长、杜家骏、鲁队长、平金刚，直到彭小宾、衣春玲，龙头镇和民主村新老几代人，济济一堂，高朋满座，好不热闹。

经大臣举杯致辞，花白的短发，布满皱纹的脸上笑得像开了花。从来没有看到他有今天这样高的兴致，“感谢龙头镇、民主村的老领导、老伙计、老少爷们，没想到我经大臣还有今天这样高兴的日子。这几十年，过得像做梦一样，今天这么样，明天那么样，总算最后有了好模样。也是靠了在座各位的帮扶。谢谢大家了，谢谢大家了。”

于村长身体不太好，还是坚持来了，也是想看看大家。他颤巍巍地说着：“也是你经乡长的福分，一样出来干革命。你看你，又去上海见了大世面，回来又盖上了小楼，连咱民主村也沾上了光，有了小楼了。”

车素花，大家又改回去叫经老太了。这时的车素花真的是老太了。她说：“看这改革发展的势头那么快，我看大家都能住上小楼，这日子不远了。”

杜家骏说：“这几年农村变化确实大，家家户户都泼上力气地干活，日子都变好了。”

彭小宾说：“政策变好了，得人心啊。大家愿意出力啦。”

祖云涛说：“关键是解放了思想，进行了拨乱反正，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左倾路线，否定了阶级斗争理论，这才有了这样大的变化。”

宗发奋可不这么认为，他说：“这几年是有进步，但是不能因为否定文化大革命而否定社会主义；不能因为否定阶级斗争理论，而放弃无产阶级专政。”

祖云涛咪了一口酒，来了兴趣了，他说：“否定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否定社会主义。恰恰相反，正是为了正确地建设社会主义。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旗号，欧洲有东欧的、北欧的、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拉丁美洲有古巴卡斯特罗的、尼加拉瓜奥尔特加的、智利阿连德的、巴西古拉特的社会主义，非洲有埃及纳赛尔的、加纳恩克鲁玛的、刚果卢蒙巴的、埃塞俄比亚门格斯图的社会主义，亚洲有朝鲜金日成的、缅甸奈温的、柬埔寨波尔布特的社会主义，这些社会主义都是真的吗？甚至连希特勒的纳粹，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缩写。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说是社会主义，就以为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严重教训，就是林彪、四人帮那条极左路线，在社会主义的旗号下，搞了很多假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东西；在革命的名义下，搞了很多假革命、反革命的东西。而我们却一时分辨不出来。”

鲁队长忿忿地说：“那几年乱杀包金贵、打死王建悟，肯定不是社会主义。”

肖校长感叹地说：“你看那样板戏，明明是文化专制主义的产物，因为前面有革命两个字，就被当成了红色经典。好像嘴里唱了革命的腔调、讲了革命的词语，就能变成革命者。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到了什么程度，至今还有人信这一套，搞什么唱红歌之类的玩艺来迷惑无知的人。”

纪乡长说：“是啊，要把过去的传统思维转变过来，还真不容易。思想解放的道路还路远程长啊。”

鲁队长说：“解放思想确实是个关键。思想解放了，政策才会不断地调整，新的政策才会越来越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才会越来越符合人民群众的需要。”

经大臣说：“也只有解放思想，才会解放大批干部，才会解决那么多冤假错案。没有思想解放也就没有我经大臣的今天了。”

潘场长饶有兴趣地问祖云涛：“改革的下一步，会是什么呢？”

祖云涛在今天这个场合觉得没有压力，也就侃侃而谈起来了：“现在是改革的第二步，就是对人的解放。你们刚才讲的解放老干部、平反冤假错案，包括这两年对地富右派摘帽、释放国民党人员等等等等，都是着眼于对人的解放。”

衣春玲睁大了眼，说：“听你这一说，是有道理。把人解放了，积极性就都调动起来了，社会很快发展起来了。”

老叶相对来说话少一些，这时也插话说：“我们在座的人，大多数也都得了这一条的益，才从牛棚里出来了。”

纪乡长说：“听说连1965年国民党反攻大陆上来的那个代连长也给放了。不但放了，而且按他自己的意愿又回台湾去了。”

老叶问：“哪个代连长啊？”

纪乡长说，你们在新疆是不知道，我们龙头镇的人都知道。他又把1965年歼灭登陆的国民党武装特务那桩事讲了一遍。

叶丽娜听得都入了神，“你们龙头镇还真有那么多事啊？”

宗发奋又嘬起了嘴，说：“但是人的解放也不能过了头啊。比方说，叫国民党的儿子办厂，成了新的资本家，又来剥削咱劳动人民，我就想不通。”

经学文插上说：“我说啊宗主任，解放人就是解放生产力。人家办了个厂，又增加了新的社会财富，又增加了就业，还增加了地方税收，咱们又没有任何损失。多好的事情啊。”

纪乡长说：“我说你呀，小宗，”纪镇长与宗发奋共事几十年，虽然常有意见分歧，但总是放在心里，很少说出来。今天是第一次以这种口吻说话，不知道是因为喝了酒，还是真的也解放了思想，“你是思想解放这一关还没过，怎么会去解放别人呢？你还是死抱着过去那套传统思维，不行啦。”

潘场长也说：“我来龙头这二年，也有这感觉。小宗啊，你还年青，思想解放应该走在我们前面啊！”

宗发奋满心的不悦，但是在老连长、老排长面前又没法发作，憋得满脸发红，好在都是喝了酒，也看不出来。

彭小宾为了把话岔开，又问祖云涛：“那改革的再下一步呢？”

祖云涛想了下，说：“再下一步，就是体制的解放了，建设现代民主政治和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社会首先应该是个民主的社会。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一定是个假社会主义。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不是各人自行其是，而是让思想的解放、人的解放有一套制度保证。每一个人既能充分地行使自己的权利、表达自己愿望，又能够受到监督和制约，共同遵守社会规则，不去侵害别人的合法权益。没有监督和制约，经济上就会产生腐败，政治上就会演变成专制。”

辜局长说：“但是走这一步就不容易了。”

纪乡长说：“这是改革最关键、也最艰难的一步，这要触动一些人的利益了。”

祖云涛说：“是的，这一步阻力很大，所以既要积极又要稳妥，但是不能等。一等一拖，不但原有的左倾影响是个阻力，一旦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又会造成新的阻力。”

经大臣的宴席成了一场改革讨论会。好像就是平金刚没有宏篇大论，他的心思已经不在这里了。

程贵安没有来。经大臣没有请他。尽管程贵安是经大臣的老同事、老部下了。经大臣当镇长时，程贵安是财粮干事。但这几年，经大臣觉得那个程贵安左得出奇。话不投机半句多，有宗发奋一个“左派”来就够了。

程贵安退休后也没有回老家，在东南村（胜利村）租了个院住下了。他的行动更不便了，上轮椅都要人扶。当他在炕上听说老经家有这样热闹的活动而没有请他，心里的忿懑可想而知了。

16.2 小莉也来了

讲经大臣的离奇经历，倒不是他盖了小楼，而是小莉来信了。

在文革初期就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小莉，竟然来信了，而且信上的内容绝对出乎经大臣的意料：小莉解放前的丈夫找到她了。

小莉信上说，她的丈夫一直在找她，今年特地从国外赶回上海，费尽周折才找到了她。她丈夫名叫柏雅洪，当年在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单位当工程师。1949年时忙着在武汉一带拆机器后撤，无法赶回上海而直接南下广州，后来去了台湾，最后到了澳大利亚，从此天各一方，杳无音信。柏工程师是个性情中人，几十年始终不忘留在大陆的发妻，至今孑然一身漂泊异乡。小莉说，她丈夫要她出去重新团聚，她也愿意去，她希望能了结和老经的这段感情。她丈夫知道解放后她的经历，不但表示理解和接受，而且感谢经大臣这些年对史小莉的照应。她说，老柏还准备专程到海源来表示谢意。

老经跟车素花一说之后，赶紧回了信，说完全赞同小莉的想法。还客气了一番说，自己这些年实际上也没有照顾到多少，只是柏工程师就不用来海源了，路太远，挺费事。

谁知半个月之后，经大臣的小楼前来了一对客人。

经大臣听到敲门声，下楼开门一看，愣了。门外是一对衣着得体、提着小皮箱的夫妇。老经虽然十七年没见到小莉，但一眼就看出来了。小莉依然鲜亮，没有变老。老经跟她一比，真是差得太远太远。柏雅洪，按推算，年龄应在六十开外了，但气色、神情都不错，看起来像是一个中年人。

“小莉啊，你们还是来啦？”

“雅洪说，一定要来看看你。我想也好，毕竟也是在一起生活过了，最后见面告个别吧。”

“是我跟小莉说一定要来的。你们也是正当夫妻，要分手也要正常地分手。作为我一定要当面谢谢你，谢谢你这些年来对小莉的照应和保护。如果不和你在一起，小莉的命运和结果也真的很难说。跟你，一个国民党家属才变成了革命干部家属，没有遭到更多的罪。”

“啊呀，我没有多大作用啊。”老经对柏雅洪如此大度，挺有几分钦佩，也轻松了起来，“我这个干部自己，也是几次受冲击，小莉跟着我也是几次担惊受怕，几次离散。”

车素花出来了，说：“怎么在门外站着说话？快上里面，快上里面。”

这两对夫妻，一时间就像了朋友一样。

上了二楼坐下。小莉环顾四周说：“老经啊，依（你）勒（在）格搭（这儿）过得蛮惬意嘛。这房子在上海少说也要一百万啊。怪不得我找不到你了。”

“见笑，见笑。别看是楼房，但卫生间没有下水道，跟农村的茅厕一样，还得上外面蹲坑，呵呵。文革后期，我是找过你的，打听过你娘家，没找到。”

“我娘家是资本家成分，我哪敢在娘家啊，躲到乡下姨娘家去啦，都不敢跟别人讲。”

“我跟车素花恢复夫妻关系，想告诉你都没地方告诉。我一直在担心，怎么跟你解释啊。”老经挺真诚地说。

“我知道你是实在人，还是你们原配在一起合适。”小莉笑笑说。

“革命把我们打散了，改革又把我们重新聚合了。这几十年的经历，真是一本书也写不下。”柏雅洪说。

“现在又是恢复原状了，这段人生真是又辛酸又嘲讽啊。”老经说。

车素花插话说：“别的，我知道的不多。不过我看柏先生真是好男人，几十年在外国那样的好生活，却还是旧情难舍、不离不弃，难得的好人啊。比我家老经要强多了。”

经大臣被说得脸都红了。

小莉偷偷看了老经一眼，掩着嘴，笑了一下。

“我也是没办法啦，在那边都是洋女人，也看不上咱。”柏雅洪自嘲地说。

小莉瞟了他一眼，把脚勾过来，轻轻地踢了他一下。老柏哈哈地笑着。

大家都笑了一阵。

“经先生啊，我还有个正事。你和小莉毕竟是合法夫妻一场，现在虽然在事实上已经分离多年，还是要有个正式手续为好。我在上海办了个你们俩确认分离的公证书，需要您亲笔签字。您请看一下。”说完从小皮箱里拿出一份文件给老经。

老经戴上老花镜，看了会，又看了小莉一眼，叫车素花拿过笔，签上了字。

柏雅洪收起公证书，说：“我知道你和经太太都是好人，是值得相信的人。我现在说句实话，我在澳大利亚过得不错，在布里斯班定居，那儿也是海边，风景气候比这儿还要好，社会又安定。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帮助你们移民过去。甚至你们以后的生活费，我都可以负担。”

老经看了看车素花，对柏雅洪说：“柏先生，你能有这个打算，我真要谢谢你。可是我们老俩口，其实就是对老农民。国外的现代化生活，我们是享受不了这个福啦。我和素花真诚地祝你们以后一生幸福。”

车素花也在一边点点头。

柏雅洪转头看着小莉，小莉也不好再说什么。

这时，经学文进门上楼来了，他是听说家里来了上海客人，知道是他的后妈妈来了，怕有什么事，赶过来看看。上楼一瞧，不但没有剑拔弩张、冷眼相向，反倒是弥漫着一种友爱，心里也就释然了。尽管三十年前的上海之行，使他对他的后妈一直有着一种深深的怨恨。

一番介绍之后，气氛倒也平和，经学文也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是个好小伙啊，年青有为。”柏雅洪还称赞着经学文，“应该出去见见世面。这样吧，你们不喜欢移民出去，我也不勉强了。我请你们出去看一次，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经大臣又要推辞，他是真的不想麻烦小莉俩口。经学文开口说了：“爹，柏老先生的好意，我们就领了吧。出去看看也好，对我们开阔眼界、开拓思路，进一步搞好工作都有帮助。我们龙头镇上还没有人出国去看过，这个机会也难得啊。”

“是啊，是啊，出去看看，对你们改革开放会有帮助。”柏雅洪真是想促成此行，好了却他与经大臣之间不知是谁欠谁的这段感情债。

经大臣也就答应了。只是车素花推说身体不好，执意不想一起去，最后商定小莉出去安定以后再联系，让经大臣父子去一次。

第十七章“精神污染”

1978年1月17日

17.1 澳大利亚

这年，1984年的秋天，经大臣父子真的去了趟澳大利亚。

他们是在上海虹桥机场登机出境。走之前，经学文问他爹，还有点时间，不去单位看看老领导、老同事、老邻居？经大臣毫无表情地摇了摇头，连话也没说。

十天之后，他们回到了龙头，那种兴奋，那种惊叹，时时溢于言表。

经大臣见了谁都赞不绝口：“那个好啊。真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地方。走到哪儿，都那么漂亮、那么干净，整个就像是在一座大花园里。天是那么蓝，草是那么绿，到处也没有一点灰尘。和咱这一样的大海，那海水、那浪花都是亮晶晶的。”

龙头的人谁也没去过国外，都听得一愣一愣的。

老经还跟车素花说：“后悔那时没答应跟了一块儿过去住。”

当然这只是老经的一句笑话。老经对澳大利亚的倾倒，或许是因为他去的是布里斯班，那是全球极负盛名的旅游胜地。他只是见到了在旅游胜地度假休闲的人们，没见到他们在激烈竞争中奋力工作的情景。

倒是经学文认认真真的向纪乡长、向乡党委作了次汇报。

他说，他这次出去真的很有感触，咱们真的需要向人家学。过去搞运动、搞斗争几十年，某种意义上是白活了几十年。一样的海滩，人家是宾馆、别墅、各种休闲旅游项目连绵几十里，一天能挣到多少钱？！老百姓也得实惠。看看咱们的海滩，白白地在那儿晒太阳，最多拾个小石蟹、挖个海蛎子，可惜啦。我建议，咱们龙头镇开发海滩，除了搞渔业，也可以搞旅游。我想了下，咱们这片几十里长的海滩，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在机构上，我也建议赶紧搞个外办，外事办公室。今后对外联系多了，需要这样的机构。上次狗狗他爹来，如果咱们工作做得好的话，完全可以让他为咱们乡办个大点的企业，而不只是给他儿子盖那几间屋。”

“这是个好思路，今后咱们更要眼光向外，更加大踏步地改革开放。”祖云涛说。

“还是要一分为二吧。西方的东西就那么好？我就不信咱东方的社会主义就赶不上西方的资本主义？”宗发奋不屑地说。想到经学文这趟去澳大利亚回来在龙头镇很是风光，他心里就觉得不舒服。

“赶上赶不上资本主义，要看哪一方面。讲科学技术，咱们就是差了很大距离。美国的宇航员都登上月球好几年了。”经学文说。

“谁说的？你看见啦？有证据吗？我才不信。别去为美帝国主义鼓吹了，长别人的志气。”宗发奋自有他的一套。

“《参考消息》上都登了。”（说明：《参考消息》是新华社编发的一份限定内部发行的报纸，主要转发外国通讯社的稿子，在当时是很热门的，只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方可阅读）

“《参考消息》也就是参考参考。我还是不信，不信那个帝国主义纸老虎有那么大的本事。”

“咱们还是要丢掉束缚、解放思想，姓资姓社先不讨论，能发展就行。”纪乡长在总结，“我看就请经学文赶紧搞个开发海滩的规划方案，早点报到县里去。机构问题也提一下。”

龙头镇的发展，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17.2 反“左”防右

改革的进程也不是没有风险。

在乡领导的例会上，宗发奋提出了要召开全乡政治工作会议，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要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纪乡长说：“有什么事就说吧。”

宗发奋说：“当前上级提出了要反对精神污染，我们龙头镇也不例外。县纪委转来了检举信。”说着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封信，大家都愣神地看着，“这封信揭发经大臣散布了大量崇洋媚外的言论，还包括你，经学文同志。”这封信是程贵安写的。

经学文马上就问：“我说了什么？”

“信上说了，说你说的，国外什么都比我们好，要向资本主义学习，要全盘照抄国外的那一套，搞全盘西化。”

经学文一拍桌子，情绪激动地说：“他是在胡说，我已经两年多没看见过他了，就没跟他说过话。”

“那你有可能是跟别人说的，别人又告诉了老程。”宗发奋还不肯收兵。

“那个别人是谁，叫他自己出来说。”

“信上倒是没说。”宗发奋语调变低了。

经学文这下对着宗发奋反倒说开了：“有的打着‘左派’旗号的人，动不动就指责不同意极左主张的人要搞全盘西化。可是究竟有谁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讲过要‘全盘西化’的？你能拿出证据来吗？料你拿不出来，因为解放后就没人讲过这种观点。这种伎俩，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中早就批判过了。那就是假造一个明显错误的观点，硬套在别人头上，而后自己再装作斗士去声讨对方。”

“西方的东西，总是不好吧？”宗发奋在无力地抵挡着。

“那澳大利亚是在西方么？它明明是在我们的东南面。”经学文说。

“它，它……它是在东面？”真要深入地讨论一些问题，宗发奋也就连一些基本常识也不知道了，尽管东西方不完全是个地理概念。

祖云涛说：“对外国的东西要具体分析。凡是先进的东西，不但是先进的技术，包括先进的管理、先进的文化、先进的思想，我们都应该谦虚地、认真地学。马克思也是外国人嘛，不能一提外国就简单地一概否定。我们开发海边、开发海滩，也是学的外国人。我们中国历来是闭关锁国，只有躲到深山里修炼的，哪有上海边去玩的？明朝时，倭寇来了，明朝政府反而叫百姓后撤三十里，来个“禁海”，把大海和海边都丢给了日本人，结果倭寇更加猖獗。我们不能再学那个样子了吧？经学文同志提出开发海沿，思路很好，是个重大进步，绝不是精神污染，再不要像过去那样动不动就扣帽子。”

“什么都学外国，那成了什么啦？那还叫社会主义吗？”宗发奋依旧不服。

“小平同志说了，‘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极左路线那一套，能叫社会主义么？”

“我们现在要解决眼前的具体问题。这可是县纪委来的信，我们要书面答复的啊。”宗发奋一听邓小平都说了这话，心里泄了气，可手里还拿着信纸摇晃着，想要找个最后的台阶。

祖云涛说：“那就实事求是地回答。经学文同志向乡党委汇报出国的情况，他的发言和向党委的建议，是有记录的。”

纪乡长总结说：“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更何况即使有不同意见，也是很正常的，完全可以实行党内民主，进行同志式的交流。不要把本来完全可以正常解决的事情，非要弄得鸡飞蛋打、不可收拾、几败俱伤。这样的教训，我们还少吗？”

我们要认真地、虚心地向国外学习一切可以学习的东西，不要把新生事物、把社会进步当成污染。当然，作为经学文同志以后讲话要注意场合、注意措词、注意社会影响、注意实际效果。

我们搞改革，总有一些人在冷眼相看，巴不得能挑出一些毛病，恨不能一棍子否定改革，开倒车再回到极左路线，这更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在当前左的那套还相当有市场的情况下，左的言论因为有革命的幌子，几乎可以不负责任。他们可以很放肆，而我们必须很谨慎。

据我所知，县以下不搞‘反对精神污染’。这件事，就到这儿了。”

第十八章 婚外情

1978年1月18日

18.1 貂棚下

1985年的五月。

民主村的貂场越来越红火了。这年的幼貂就繁殖了三百多只，这可忙坏了饲养棚里的那两个北山来的小姑娘。领着她们干活的高秀珍更是几个晚上没合眼。

又到了繁殖期。当貂箱里母貂“叽叽”的叫声又响起的时候，合衣而躺的高秀珍又从被窝里一骨碌地爬起来，往貂棚走去。这一个月，她就搬到这儿住了。两个小姑娘也忙跟过来。快到貂箱跟前，她对两个小姑娘嘘了一声，关了手电，蹑手蹑脚，走近那只貂箱。貂场的百多只貂箱，她已经了如指掌，哪一只刚抱上，哪一只只有一个月，哪一只大概就这几天了，她都很清楚。她轻轻地站在貂箱后面侧耳听着，听着箱子里悉悉唆唆的声音，这个时候是不能打扰母貂的。要等看到母貂排出黑油色的吃下胎盘后的粪便才能最后确定是产貂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逐渐长大的幼貂要一个一个地分箱。哪个断奶了，哪个能离开母貂自己过了，哪个喜欢在小兄弟之间撕咬，得先拎出来，都要做到心中有数。对这些肉团团的幼貂，也得像对幼儿园的小朋友那样花上心血，甚至更难。因为这些小崽子们不会说话，全靠你去细心观察。

小连子实在挂念他的媳妇，带了碗饺子跑过来看看。一见面，惊了下：“啊呀！”

“怎么啦？”秀珍问。

“看你瘦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眼圈黑的，都认不出来了。”

“是吗？”秀珍自己还没有很觉得。

“不能这么豁上命地干，日子还长着呢，事儿还多着呢。”

“过了这一阵，就能好一些了。貂场的活就这几个月离不开人。”

“你可要自己留点心，这么没死没活地干，值吗？”

“为村里干，为集体干，怎么不值？再说杜书记这人也不错。我在这儿出点力也没有什么。”

“你这么说也对，可你自己身体要当心喔。”小连子走了。

夏天的时候，有一阵水貂里有的不吃食，精神不振，流鼻涕有眼屎，像是生病了。高秀珍比谁还急，自己又不明白。找了唐玉贞。唐玉贞也不明白。找了杜长贵，杜长贵也不明白。她一想，还是去找

衣春玲吧。

衣春玲还在她那个村卫生室里，见高秀珍来，很是高兴，“哟，现在这时候还有来找我这个赤脚医生的啊！”

这些年赤脚医生有点衰退了，一是不像以前村里直接拨钱过来，而是直接向各户收钱，这就不容易了，收不上来。有的户还好，有的这几年就一分钱也没交过。其实就算是收上来，那几块钱也是不够用的。再是镇里的卫生院比以前好多了，看病也方便了，技术也提高了，到村卫生室的自然也就少了。况且，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都在镇上，差不了几步远，大家也就去卫生院了。

所以，衣春玲见到高秀珍来就很高兴。高秀珍倒是高兴不起来，把事情一说，衣春玲也为难了。她也不懂兽医，卫生室里也没什么药了。她跟着高秀珍骑车去了趟貂场，也没法量体温、听胸诊，看着像是感冒，确定不了。

“这样吧，咱们去找叶丽娜。现在有高人了，不怕了。”

两人又去找了叶丽娜，叶丽娜马上跟她们来到貂场。果然，到底叶丽娜是医师，虽然学的不是兽医，但也能看个明白。

她说：“轻的那些是感冒，重的几只是肺炎。赶紧打针吃药，不然很快就会传染。”

不能吃食的打青霉素，20万单位；能吃食的打安痛定。一个个貂要抓出来，按住，把她们忙活了好几天，事态才控制住了。

杜长贵在管着貂场的日常事务，本来可以不提他了。可是有件小事情的发生，就不能不讲一下。

通过高秀珍的联系，貂场雇佣了两个北山来的小姑娘，其中一个是非家庄的非丽芳，个头不高，圆圆脸，笑嘻嘻的，蛮可爱。听说海边要比山里好多了，所以一定要到貂场来。可这小非，虽说是山里人，却没有山里人的那种勤劳和刻苦，整天照个小镜子，穿个最时尚的紧身牛仔褲，喜欢个小打扮，尽管也没有更多的可打扮。干活老要叫高秀珍催着，高秀珍有点小想法，但总觉得她年纪还小，又是小老乡，也就一边提醒点，一边还替她遮掩点。

但那天晚上的事，让情况有了变化。

那晚，已经后半夜了。高秀珍听得貂舍那边有响声，她照例起身下床。一看，小非没在屋里，高秀珍满心纳闷，便轻轻地推开门，出了屋，走进了养貂的后院。为怕打搅水貂，她没打开手电，一排排地察看着貂箱。到了最后一排，在一堆麦草边，分明是站了两个人。

站着的是小非和杜长贵两个。小非看没地方躲了，到是先轻轻地甜甜地喊了声：“秀珍姐。”

高秀珍虽然有这个思想准备，临到这时还真吓了一跳。一看两人慌里慌张、脸色绯红，小非的头发上还粘着草屑，心里便明白了。就淡淡地一问：“你怎么在这儿？”

“今晚是我值班。秀珍姐，你忘啦？”

高秀珍当然不会不知道今晚应该是唐玉贞值班，可能是杜长贵顶了他妈的班，把小半约了出来。小半这时很快就平静了下来，说着假话也不气喘了。

“是啊，小半说她一个人害怕，叫我来陪陪她。”杜长贵也在一旁解释着。

“喔，我听着这边沙啦沙啦响，还以为是哪只貂不老实呢。这我就放心啦。”高秀珍也没有按往常快人快语的做法，没去点穿，笑着就回去了。

小半看着高秀珍走去的背影，笑着用手指点了一下杜长贵的额头。杜长贵点着头，却没有笑。

中午，午饭后休息的时候，高秀珍把小半喊了过来，在昨夜的麦草堆前，很认真地对小半说：“别糊涂啊，丽芳，这种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嗨，秀珍姐，没什么事。”别看小半年纪不大，态度到挺大方，全然不像从山里小村庄出来的人。

“杜长贵可是有家庭、有孩子的人啊。”高秀珍讲得够严肃的。

“嗨，秀珍姐，你想哪儿去啦？不过玩玩就是了，谁去当真啊。”小半的话，把高秀珍听得都晕了。

“那你就这样下去啊？以后的日子不过啦？”

“嗨，这日子过一天算一天呗。反正北山我是不想回去了。”

“那你也得正儿八经找个婆家吧？”

“这就各人有各人的办法喽。”小半轻佻地说。

“你就用这个办法？”高秀珍瞪着大眼，还在问。

“用什么办法，我不管。只要能留下来就行。有了事，杜长贵他会替我想办法的。”半丽芳的战术很简单。

“啊？！……”高秀珍瞪眼看了看，知道再说也没用了。

跑去找杜长贵说？自己算什么呢？不好说这个话。去跟杜长贵的爱人平近芳提个醒？高秀珍知道平近芳跟李辰、林海秀那些事的牵连，不喜欢她的为人，更何况人家还是中学校长呢！我管这些干什么？

杜长贵想的就复杂了。

杜长贵对半丽芳的亲热，不只是逢场作戏。他和妻子平近芳既是同村邻居，又是小学同学，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在火热的大跃进年代里，他们走到了一起。可渐渐的两人之间有了裂痕。一方面是双方身份的差异逐渐增大。平近芳从民办教师，逐步转为非农业户口的正式教师，最后成了中学校长、领导干部。天天是衣着整洁、工作繁忙，身边常常围着好几个人，一会儿要听这个汇报，一会儿要嘱咐那个干什么。而杜长贵是个农民，虽然当了个大队会计可以不用下地干活，但理论上却是个“泥腿子”无疑。不管平近芳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对于杜长贵，心理压力是很大的。望着平近芳忙进忙出、不着家的样子，心里涌出的不是为有个村里其他人所没有的非农业老婆的自豪，而是一种被压抑、被扭曲的酸

楚。更主要的是，杜长贵越来越不满意于平近芳的行事为人，觉得平近芳那么热衷于周旋在干部圈子里，那么热衷于发号施令、指使别人。如果这还属于工作需要，那么，她的虚假、她的巧言令色、她越来越自以为娴熟的种种手腕，杜长贵却不能忍受。而平近芳自以为得计的这些花招，杜长贵在旁边看得最清楚（说句公道话，平近芳还没练到那个程度）。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平近芳对李辰、对林海秀的出手，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事情的发展，显得越来越卑劣。尽管旁人没有一个人提起，但是杜长贵知道，乡亲们、包括他自己对这种事的唾弃。他知道，他和平近芳从心里已经离得越来越远了。

当然，杜长贵也不是君子。他渐渐地也会盘算了，但他算的是另一种帐。他当了十几年的大队会计，从接手貂场的管理开始，发现当会计、搞管理远不是加减乘除、收支进出那么简单。他看到了和集体经济不一样的新模式。他想到了为自己发财致富的路子，不是一分钱、一分钱地去攒，不是一分钱、一分钱地去挣，而是一条新的路子。但他还说不上来，还想不透，还在想。在个人情感上，新来的北山女孩小半，浑身充满了青春活力，那一个笑容，甚至最平常的一个步子，都撩起了他心中的浪花。哪像他老婆平近芳已经成了一种机器人，既被别人支使又去支使别人的机器人。他知道小半的需要，小半也知道他的需要。他正要头也不回地走上这条充满了诱惑和刺激的路，却碰上了高秀珍来碍事，心里何止是不快。

18.2 私有化

冬天，是杀貂取皮的时候，杜家骏从北海请了个师傅来指导。可动手的活，还得场里人自己来。杀貂可是得伸进笼里把貂抓出来，扭断脖子，捅进刀子，还不能让貂血沾上貂皮。几个小姑娘都吓得直往后躲，还是高秀珍操刀上阵，把这些活都干下来了。

送走了貂皮，杜长贵的算盘啪啦一响，一年下来，竟然挣了三万多。年初，杜家骏已经跟村里签了貂场的承包合同。鲁队长他们也不清楚，这貂场一年到底能挣多少钱，杜家骏说我一年交村里五千吧。鲁队长一想，五千就不少了，就签了五千。

除了交村里，别的成本也去掉，剩下的就是发工资了。小姑娘，每天按五角算，去掉休假，发了个整数一百八十元。小高按六角算，发二百二十元。杜家骏想凑个整数，给个二百五十元。杜长贵不干，对他爹说：“疯啦？有这三十元，咱家能吃十几顿饺子呢。”杜家骏也就没吭声。

杜家骏在把钱递给高秀珍的时候，嘿嘿笑了两下，说：“这点钱不算多，比她们两个还是多了点，收下吧。我知道，你这一年出了不少力，这貂场多亏了你。本想再多给点你，但我们现在规模还小，还在创业初期，困难还不少，委屈你了。以后貂场发展了，我会报答你的。”

高秀珍笑笑，也说了句客气话。不过，她对貂场的收入和支出是一清二楚的。

杜家骏面对一叠叠钞票，也没有看花眼，心里想了很多。他在想，当初办貂场发展村里的多种经营这条路是走对了，下一步再怎么搞呢？他为民主村操心出力几十年，却不如这一年来得快。看看人家经大臣从天上掉下来的福，也该为自己攒几个啦。想了几晚上，他找了鲁队长说，这貂场的事挺磨人，自己年纪也大了，精力跟不上了，他想辞掉村支书的职务，集中精力办貂场。再说现在也鼓励搞民营经济，这貂场他想自己盘下来算了，当初也是自己一手搞起来的，别人也不熟悉。

鲁队长跟其他村干部一商量，又去问了镇上的意见。镇上说是符合改革的方向，可以这么办。村支部就接受了杜家骏的辞呈，村支书由彭小宾接替。

那貂场得作价多少呢？好在村会计就是杜长贵。粗略算了下：土地是不能卖的，就不算钱了；那二排房子已经三年了，折一下旧；貂笼都是自己做的，值不了什么钱；那几只貂也是当年生的，当初队里买的早就没有了。合起来一共算了一万五千元。一万五千元，在村里也不是个小数，鲁队长当然也不会提出别的意见。杜家骏就和村里签下协议，貂场就成了杜家的了。那一万五千元，杜家骏其实也没往外掏，找了信用社贷款。信用社一想这么个好项目，每年就等着收利息了，还不是好事吗。就这么一变，信用社把民主村历年的欠款一万二千多扣掉，把剩下的二千多元划给了村里。再另立个户头，杜家骏借款一万五千元。一年能挣二、三万的貂场就这样一分钱没花地到了杜家骏的手里。虽然杜家骏还没听说过“资本运作”的概念，却已经成功地运作了一遍。这幕后的操手其实是杜长贵。于是，杜家骏成了民主村第一个先富起来的人，如果不算经大臣的话。老经的户口已经从村里转了出去，成了非农业户口。

貂场盘下来以后，杜家骏不再任村支书，而自任貂场场长，由党的书记变成了私营业主，尽管只是一个基层支部的书记。儿子杜长贵管财务和经营，妻子唐玉贞管后勤，叫高秀珍管饲养。

但高秀珍却已经心有去意，没有接，推说自己有点头痛，想歇一阵。任杜家骏再三挽留，也没有用，她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貂场。她在拿二百二十元钱的时候，心里就十分地不悦。倒并不是因为她听说过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要去算这里的剥削率是百分之几百还是几千。虽然她算是个快人快语，可这事她没对任何人说是是什么原因。有两个月，人们都不知道她在家里干什么。两个月后，正值辛狗狗的工厂要扩大，她去了狗狗的厂里当了生产组长，甘受一个真的是民营资本家的剥削。可见促使她离开貂场的原因，不是因为她明白了马克思的理论，不想再受剥削。原因还是待遇上的不公正，从而觉得是作为一个人的不平等，不被认可和尊重。再有，她也不想再看见杜长贵和毕丽芳越来越放肆的亲热。

第十九章 两个孩子

1978年1月19日

本书还很少讲到民主村的孩童。这一章要讲两个，一个是皮平平的女儿丫丫，一个是迟解放的儿子小强。

19.1 丫丫回村

时治国的家。

皮平平失踪已经两年了。两年来，时家和皮家都耗尽心血，千方百计地四处打探，却依然没有任何的音讯。平平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无影无踪，没有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这可苦煞了活着的人。

时治国的母亲半身不遂，躺在床上一年多，下不来了。老时编辑端了盆水过来，掀开被褥，给老伴擦洗。一阵阵恶臭熏来，老伴的褥疮又烂了。老时已经尽心竭力，可他哪能弄得了这么多。老两口满含悲伤，无言以对。他擦一把，老伴就疼得眉头紧皱一阵，咬着牙，忍着痛。

“别跑，你别跑！”时治国痴痴颠颠地追着小丫丫，从外间跑进来。小丫丫哭着喊着，钻进床底下，躲了起来。时治国从平平失踪以后就疯了，整日在家里癫狂，由老两口看着。好在时治国的单位还讲人情，没有把他除名，每月发个生活费。这也是国有单位的优点之一。

“别跑呀，别跑，你往哪儿跑呀！”时治国见丫丫钻进了床底下，便坐在地上哭了起来。也许他心里留下的，永远是平平丢下丫丫、转身跑开的那一瞬间。

“快起来吧，你！”老时对儿子瞪了一眼。

“咣！”时治国抬手就把脸盆打翻了，床上、地上、身上都是水。

老时急了，一巴掌就打了过去。

时治国在那滩水里翻滚着、哭叫着。

“你别打他呀。”老伴在床上哭

“前世作的什么孽呀？”老时实在忍不住，低头也哭了起来。

丫丫在床底下哭着。

哭了一会儿，老时没理会时治国，站起来对老伴说：“我给你换被子吧。”

“不用了。”老伴说，“就这样吧。天天都这样，换不过来了。”

“这日子，熬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老时啊，我一直在想，把丫丫送回去吧，送给她姥爷家。她在这儿，我们实在照顾不了她。治国天天这么对她，对她成长很不利啊。”

丫丫还在床底下没出来呢，只是不哭了。

“他们皮家恨死我们了，能愿意接她吗？”

“那怎么办呢？我们已经对不起丫丫她娘了，我们不能再害了丫丫了。”

老时低头沉思。

白云坐车从县城到民主村来了。

这时白云已经退休，住在县城，依然是个热心、也是个负责任的人。她接到了老时从省城来的电话，知道了时家想把丫丫送回来的想法。白云一想也对，没娘的孩子再落在精神病爹的手里，那日子真的没法过。按说丫丫本该可以上小学了，可是老时顾不上，还在那个家里整天担惊受怕、东躲西藏。白云受托过来听听皮家的想法。

皮安已家也仍然沉浸在压抑和哀伤之中。皮安已听了白云讲的来意，沉默了，低着头，半天没说话。虽然看不清他的眼神，但可以觉出来他心里是在剧烈地波动。

“我能怎么办？”许久，才说了这么一句，又是沉默。

突然，皮安已控制不住地爆发了。他一下子站起来，高举双拳，双目朝上，喊着：“我管不了。”随即又低下头，低声说：“我管不了啦……”眼泪就哗哗地下。

白云忙上去劝说。

从皮家出来，白云想这事还真不好办，再找谁商量呢。可以去找纪乡长，可纪乡长在海边，还有好几里地呢。她便去找了叶丽娜。叶丽娜已经是卫生院的副院长了，并没有专门的办公室，还是在看门诊。

白云跟叶丽娜一说。叶丽娜没觉得难办，说可以找鲁队长问问。

“鲁队长是个大好人，什么事都好说好商量，很有人情味，决不会错待丫丫。”叶丽娜说。

白云手一拍，说：“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他家正好少个孩子，想找合适的，还不容易呢。”

白云又去了鲁队长家。

鲁队长一听，说：“到也可以。不过就是本村的，以后不方便。”

白云说：“本村的也好，知根知底。干脆讲明了，和皮家也是一家人。孩子长大了，会懂这个道理，会感谢你们的。哈妹，你看呢？”

哈妹说：“唉，就看那孩子可怜。我挺喜欢那孩子的。这样处理也好。干脆不改名，还叫丫丫。我会待她好的。”

“行，那我再去皮家说说。”白云说。

“不早了，在这儿吃了午饭再过去吧。我也没准备，有什么吃什么。”鲁队长说。

“我这个人办事着急，等我去后再回来吧。”

“好，我这儿等你噢。你就跟皮大叔说，丫丫就姓皮吧。以后既是我鲁家的人，也是他皮家的人。”

“鲁队长啊，你这人真是大度。喔，我忘了说还有一句要紧的话。丫丫已经转了非农业户口，就是回来，也是城里人噢。”白云笑着走了。她知道，这事有个差不多了。

十天以后，白云跟老时商量好了，又在县民政局开了领养证明，带了鲁队长两口和皮安已去了省城时家。

皮安已已经七十了，这两年身体迅速衰老。白云劝他不用去了，在家等着就行了。可是皮安已一定要去，一是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个外孙女，哪怕能早一天看见也好，尤其是怕丫丫对别人不认识，心里又要害怕。自己去，丫丫见了心里能安稳些。大家一想，也对，就一起去了。

当白云敲开时家的门，见到满头白发、满脸愁容的老时编辑时，真是感慨万千。

“老时呀，二十年不见，你怎么老成这样啦？”

老时连连叹气，声音都带着悲怆，“我没脸见你们哪，我对不起皮家，对不住民主村哪。”

时治国在后面摇晃着身体，两手乱晃，嘴里反复说着：“别跑啊，别跑啊。”

鲁队长看着，也叹气道：“唉，好好的一个小伙子，怎么会这样呢？”

几个人进屋。

丫丫见到他们一脸茫然，甚至对皮安已也没有反应过来。

皮安已一把抱住丫丫，双膝碰地，一声声地喊着：“丫丫，丫丫，……”止不住的泪水直下。

老时也愧疚地说：“我对不起亲家呀。”

皮安已翻了白眼，说：“算什么亲家！这儿没有亲家！”

老时“砰”地一声跪下，猛地磕头，“我向你谢罪，我向你谢罪！”

里屋老时的老伴听见声音，也翻下床，硬是爬到了房门口，哭着：“亲家呀亲家，我们对不起你呀，你打我骂我吧……”说完，便伏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

白云和哈妹连忙过去扶起老时的老伴上床。

鲁队长扶起老时。

白云说：“这事不能全怪你们。你们也受了不少苦，你看治国都成了这样。不再去说谁对谁错了吧，啊，老皮啊？这苦，这眼泪，就让它过去吧。我们都一起向前看吧。愿今后少一些苦难，多一些快乐。”

鲁队长也说：“老时啊，丫丫我虽然领走了，可你还是她的爷爷，你要是愿意，还可以到龙头镇来看她。以后她大了，我也会领着她来看你们的。”

老时的泪一直没止，哽咽着说：“好人啊，你们都是好人啊。丫丫遇到了好人，算是她有福啊。”

白云看老时家的境况，也不能久留，就说：“老时，我们走了。你自己要保重啊。”

哈妹领着丫丫，说：“丫丫，跟爷爷再见。”

老时一下子过来，又跪下，一把搂住丫丫，满脸泪水，“丫丫，丫丫，爷爷没有本事把你养大，有愧啊，有愧啊……”

几个人又是一番感慨、一番伤感、一番劝慰，依依道别。哈妹牵着丫丫往外走，丫丫似乎是明白的，离开家门的时候还是一步一回头。

老时依在门口，依然泪流不止。

皮安已一声不吭地低头在前走着。

时治国还是手舞足蹈地在门后嚷着：“别跑啊，别跑啊。”

19.2 留守儿童

“缴枪不杀！”迟解放的儿子小强倒过来拿着扫帚当冲锋枪，从外间冲向里间打敌人呐。

“还玩啊？不做作业啦？”他妈妈于又珠刚挑回一担水，还没往缸里倒，又扛起一袋玉米往外走，要拿去磨面。

“没多少作业，等中午，我一阵就做完了。里面还有个国民党没消灭呢。”说着，嘴里又“突突突”地冲向里间。

于又珠放下粮袋，一把就把他拖了出来，“你这么不好好学习，等你爸回来，叫他揍你。”

“我爸？他回来还早着呢，少说还得十天。”

“唉。”于又珠叹了口气，“要不，你去喂鸡、扫院子。家里的事儿多着呢，哪有你玩的时间？”

于又珠把小强手里扫帚翻了过来。

“嗯，”小强皱着眉头，很不愿意地答应着，“不过我爸回来，你叫他给我买个真的木头枪。”

“等他回来再说吧。”于又珠敷衍着。

“吱。”这时外面的街门响了。

“爸爸？是爸爸。”小强的耳朵一下就竖了起来。尽管还没见到人，但这声音，他一听就知道是他爸爸。他也是天天在盼望着他爸爸回来好买枪呐。

小强一下就窜到了炕上，朝窗外一望，果然是他爸爸迟解放挎着包回来了。

“爸爸，爸爸！”小强大声叫着，从窗台上就跳到了院子里，飞也似地扑到了爸爸的怀里。

迟解放也一把抱住了小强，抚摸着他的脑袋，直说着：“儿子，我的好儿子。”

于又珠泛着笑容，幸福地看着。

这时已经是过了“十一”国庆节，农忙就要开始了。

其实，迟解放在工地上早就想回家看看，但一直没舍得走。一是多干一天能多挣一天钱，再是想把休假攒起来，到农忙时回家多干几天活。所以连国庆节那两天也没休息，替别人顶班。直到下旬，老婆于又珠从家里捎来口信，说是儿子小强皮得不得了，快回来管管吧，才请假回家。

他从心底里喜欢自己的儿子，是调皮一些，他妈都管不住。就为这事，叫他回去么？他也很喜欢他的老婆于又珠。人家于又珠是老村长的孙女，肯到他迟家来，真是不易。他家是中农，底子也早就枯了。于又珠来了以后，和他一条心，吃了多少苦，硬是把这个家撑起来了。

所以，迟解放干活很卖力，又有点文化，在队里干得不错。他那个远房亲戚老岑头渐渐地也挺看重他，说队里还要增加两台推土机，到时候向队长推荐，叫他去学开机器。迟解放这就干得更欢了，心想这几个月的力没白出。

秋叶飘落的时分，他踏上了归程。他又穿上了来时于又珠给他准备的新衣服。这件衣服，来了以后他就收了起来，再没穿。他先是从招金山工地到县城，这回进县城，迟解放的心情是复杂的。他既不像以前作为乡下农民进城只有东张西望看热闹的份，哪舍得买什么东西；也不像真正的城里人走在街上那么悠闲自得，俨然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但他还是自信地走进了百货大楼，那一排排琳琅满目的各色商品，好像都是为他而摆的，欢迎着他的到来。他仔细地看了起来，认真真地挑选了起来。他兜里有钱了。第一次有钱了。三个多月的苦活，除去饭钱，竟然还有差不多一百元钱。

先是得给老婆于又珠买件衣服。他很敬重也很心疼他的老婆。他看着他媳妇从进他家门的这几年来，红润细腻的脸庞在日晒汗浸、辛勤劳作中变得黑了，变得粗燥了。尤其是他离家以后，所有的担子都压在了她的身上，多么不容易。迟解放充满了怜惜和感激，又珠在他心里是崇高的。

百货大楼服装柜前的衣架上，挂了一串各色的两用衫，有一件是红白相间的大格子。他记得又珠曾对他说起过她喜欢这样的样式，不知什么时候能买得上。这不，就在眼前吗。女售货员看他停下了脚步，便笑盈盈地过来，轻声地问：“老板，看上这件了吗？这件很好哎。你很有眼光哎。”几年的时间，售货员们过去那种淳朴的乡音在南国之风的吹拂下也有点那种味了。迟解放第一次听到有人称呼他老板，心里喜得吧，都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了。嘴里却还是顺口而出：“多少钱啊？”全然没有老板的风采。

“今天正巧搞活动，只要25元。”

25元！要拿出口袋里的1/4啊，回家还有多少开销啊。现在自己不在家里干活，所有的花销都要靠这些啊。他沉默了。

“老板，只要你有心想买，好商量啊，再让你一元五。二十三元五，怎么样？这可是全城最低价了。”

这仍然远远高于迟解放的心理价位，他依然沉默。

女售货员见他如此，嘴一撇，走开了。

他看到了柜子里面有一排花布罩衫，花色也挺好看，问：“这样的多少钱啊？”

那个女售货员远远地看着他，都懒得过来回话。

迟解放明白了，这县城还不属于他。

他走到了鸭湾的农贸市场里，花了五元钱买了件花布衫。又在路边的小店里买了三袋方便面。现在谁也不会把一袋方便面当回事。可那时，方便面是走亲戚送礼的上品，全家人难得的美味佳肴。

还有儿子小强哪，今年上小学了。买点什么呢？在商店的玩具柜前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都没能下得决心买上一件。“农村的孩子，玩什么不行，还非得买玩具？”最后，迟解放这样替自己解释，无意之中，还是承认了自己依然是个农村人。

迟解放进了自己的家门。

只见八岁的儿子小强见到自己，竟然高兴得从窗口跳到了院子里，飞也似的跑过来，一头扑向他爸，“爸呀，爸！”地直叫。

把迟解放喜得，什么苦，什么累，一下就全都没了。

“你妈呢？”

“妈在家忙着呢。妈，妈！爸真的回来了！”小强往屋里叫着。

说话间，他妻子于又珠推开房门。蓬乱的头发上粘着草梗；一身打补丁的旧衣服，前后都被汗浸湿了；黑黑的脸庞泛着过重体力劳动后的那种潮红，嘴里喘着气，脸上却笑着，“听街上人说你回来了，我就先回来了。东边那块原先的自留地还有两行白菜没浇呢。”

迟解放一步上去，就拍打去妻子头上的草屑，心疼地说：“我信上不是讲了，这些活，等着我回来嘛。”

“我还能在炕上坐着干等啊？能捎上千点就干点吧。活么，干掉一点是一点。”

迟解放往水缸里倒上水，放下水桶就从行李包拿出那件花布罩衫。

他妻子虽然知道这罩衫很廉价，很平常，但她满心地喜欢，两手忙在衣服上擦擦，拍拍身上的尘土，就把新衣服在胸前比量起来，直说：“真好，真好。这么好看的，我能穿出去吗？”

“这件算什么？我老婆什么漂亮衣服还不能穿啊。”迟解放也高兴地说。

“爸，给我带了什么呀？”小强在旁边等了好一会儿了。

“这……”迟解放挠起了头，这怎么向儿子交代呢？一件东西也没给儿子买。“有，有这个好吃的。”他一下子想起了方便面。

于是，于又珠拉起了风箱烧火煮水。一袋方便面下去，一会儿就胀了起来，小包的作料倒下去，满家都香气扑鼻。

盛到碗里，小强扒了一口又一口，高兴得直说：“好吃，好吃，真好吃。从来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又珠尝了一口，说：“是好吃，怪不得孩子这么喜欢吃。解放啊，你也尝尝吧。”

迟解放推辞说：“你们吃吧，我在外面吃过了。”其实，迟解放也从来没吃过方便面。

饭间，迟解放问起来了，“儿子啊，上学了，功课怎么样？”

说起学习，小强低头没声音了，全没有刚才吃方便面的高兴劲头了。

“唉，不行。咱儿子别的都行，就学习不行。回家就知道玩，也不看书。整天在外面疯颠傻跑，就像个野骡子似的。你快来管管他吧。”于又珠说。

“把作业本拿来给我看看。”迟解放板起了脸。

小强很不情愿地把作业本拿了过来。

迟解放翻过一看，果然不行。里面有好多空白，再就是老师打的好多叉叉。

“连这个字也不会写啊？”迟解放指着一个字对小强责问着。

小强低头不语。

“那你也不管管他？”迟解放对又珠难得有不满意的时候。

“管不了啊，我家里家外都忙不过来。书本上的事，我也不明白。而且，也不能全怪他。家里的好多事，还都要他帮忙呢。”

“唉，难道他这辈子还是当农民？”

“我不要当农民，我要你领我出去玩。”小强还不明白父母的心焦，一个劲地撒娇。

“你就陪他出去玩玩吧。这几个月，他一直念叨你呢。”又珠说。

迟解放扭不过儿子，就领着他上街了。

乡间的商店，打烊反而比城里晚，因为农民收工回家的时间晚。

迟解放踏进十字路口供销社的门，才四间门面，这才觉得镇上的供销社跟县城的百货大楼差得远了，根本没法比。其实供销社已经是发展了，光是食品、文具这些就有四间房，另外服装布料、五金家电各有四间，是前两年刚分开，在十字路口排起了长长的一溜。然而，县城的百货大楼那个宽敞，那个亮堂，那个川流不息的人群，那个在迟解放看来应有尽有的物品，都能看花了眼。而眼前半明不暗，门窗和房间近似于农村住房的格局，又让迟解放有了城里人到乡下来的感觉。

“小迟啊，回来啦？”年长的一位男售货员打上了招呼。镇上的人，别说是一个村的，就是这些单位里的人几乎也都认识。

“嗯，嗯。”迟解放的思绪转了回来，赶忙答应着。

糕点的香味把小强吸引住了，他拖着他爸到了食品柜前。迟解放是真不愿意。

“买个吧，买个吧。”小强抓着迟解放的手，硬晃着。

在四周人群的注目下，迟解放没办法，只好称了半斤桃酥。

小强拿到手，迫不及待地就要撕开包装纸。迟解放忙喝住：“兔崽子，这么馋，回去先给你妈吃。”拖着小强就要往外走。

小强不肯走，“我还要买把枪，我还要买把枪。”

迟解放尽管心里觉得儿子的要求并不过分，但自己家还远不到可以尽意地买东西的程度，所以下了力气，一把就把小强从柜台前拖到了门口。

小强不知是被弄疼了，还是心里受了委屈，哇哇地哭了起来。其实迟解放的心里也并不好受。

“哎，城里人回来了，就看不见我们啦。”是皮高深进了供销社的门，“哎哟哟，怎么把宝贝儿子弄哭了，亲还来不及呢。”

“嘿嘿，他在无理取闹，瞎要东西。”迟解放干笑着。

“儿子哎，要什么呐？那个木头枪啊？嗨，我以为是什么呢，不就是把木头枪嘛，才五元钱。你这个城里人，在儿子面前怎么连五元钱也不舍得？你说呢。”

“那破玩意，能当什么用？有了更淘气，更得出去打架、惹祸。还不如买支笔呢。”迟解放掏出了五毛钱买了两支铅笔、一块橡皮。

“再不给我好好学，我就使劲揍你。”迟解放狠狠地瞪着眼，把儿子拖出了供销社。

皮高深和售货员们在后面哈哈地笑着。这样的一幕，在农村供销社里是常有的事。

第二十章 环境污染与GDP

1978年1月20日

20.1 筹建

杜家骏的事例教育了平金刚，再不能这么傻呼呼地过下去了。其实，从经大臣盖起那小楼，他就在想，原来人还可以有另一种活法，居然还能像洋人似的住上楼房。这几年叫他儿子平海波开拖拉机，用多收运费少交村里的办法，是挣了几个钱。那个时候，比比那些街坊邻居脸朝黄土背朝天、终年辛劳只挣个几百块钱，还心里喜孜孜地，数着三、五千块钱偷着乐。可现在跟经大臣比，跟杜家骏比，算个什么呢？能算是先富起来吗？那能用什么办法呢？

他从杜家骏的身上看到了办法，那就是用别人的钱、用别人的力气给自己挣钱。或许杜家骏自己也没有总结出这一点，平金刚可是想到了。平金刚觉得民主村这潭水已经太浅了，养不肥多大的鱼了。如果以镇政府出面，以他们的名义办个企业，那个机会、那个赚钱，不就会大得多了吗？

他去找了乡里的领导，领导们不约而同地表示了支持。

纪乡长已经向县里打了报告，要求辞去乡长职务，集中精力去搞海边开发。县里对开发海边很支持，但乡长职务还不能拿走，乡里的具体工作祖云涛可以多做点。所以纪乡长这一阵是在海边忙，又要搞规划，又要筹资金，又要拉单位，这些工作过去又不熟悉，所以忙得不亦乐乎。他听了平金刚的想法，感觉很好：“好啊。现在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具体问题，你可以跟祖云涛多谈谈。”

第二天宗发奋听到动静，先凑了过来，“平主任啊，纪乡长跟我讲了，你的想法很好啊。你现在手上有项目吗？”

“没有。我只是刚有个想法，你们拿出办法，我来替你们出力。”

“好，好。我有个战友在河北当厂长，是个工具厂，想把他们厂里的热处理部分分离出来。我看放到我们这儿就行。”

“热处理？把工具放在热水里煮煮，还是放在火上烤烤。”

“嗨，你是一点也不懂，一时跟你也解释不清，搞起来就明白了。那玩意可挣钱啦。”

“哦，哦。”平金刚一头雾水，又去找了祖云涛。

祖云涛说，等我想想，去问问别人。

过了几天，祖云涛跟平金刚说，“我打听过了。那个热处理啊，技术挺复杂。简单讲，就是工具放到盐水里过一下。”

“那还不容易吗？家里面拿个脸盆，倒上盐和水，不就行了么？”

“可不得那么简单。那个盐水啊，不是把盐化在水里。而把盐用高温融化了，成了液体，像通红的铁水似的，再把工具放进去。而且那工具，也不是咱们说的镰刀锄头，而是机器的刀具、钻头。热了以后，再拿出来冷却，叫什么淬火、退火。”

“又是放进去热，又是拿出来冷。这不是闲得没事、吃饱了撑的吗？”平金刚说。

“嗨，可别这么说。那里面的学问多了，温度、时间、冷却速度都有很大讲究。没有工程师干不了那活。我这是特地去问了在工厂的老同学。他说那东西，耗电量和污染都很大，咱这样的小地方搞不了，换个项目考虑吧。”

宗发奋提前已经听到了，祖云涛把他的提议否了，心里不痛快，就去找了秦有理。秦有理招干后，在外乡干了几年，这又回龙头乡政府，在生产办公室当个一般干事。宗发奋老觉得在龙头，还就是和秦有理能说到一块。

宗发奋说：“这事啊，还是抓在咱们手里好。咱现在算是公务员，不能经商，那靠什么挣钱啊？看看人家杜家骏滋润的吧。那个辛狗狗，更是发大了。听说他给连家小媳妇，一个月开五十多元，比你的工资还多啊。咱吃那个死工资，什么时候能出头啊，不想办法不行啦。那个祖云涛，还把我的项目给否了，莫不是他自己手里有东西？”

“哦，这好事可不能放过。我回龙头镇，看似老地方，其实就是新地方，一点基础也没有，全靠您宗书记帮扶了。这事我一定放在心上，这两天就给你个说法。”

不几天，秦有理就找到宗发奋，一把把宗发奋拉到门后，兴奋地说：“有了，有了。”

“有了什么？”宗发奋还翻了下眼。

“项目啊！”

“什么项目？”

“我在地区里干部集训的时候，认识了个西面的人。想起来了，他们那儿搞造纸厂，技术也不难，资金也不用多，挣钱也不少。”（说明：“地区”，原本是省政府的派出机构，文革前叫“地区行政专员公署”，后来成了省政府之下的一级政府，管辖若干个县和县级市。）

“喔，我也听说了，西面不少县是有搞造纸厂的。可以搞。”

他们俩一合计，再跟纪乡长一讲。纪乡长觉得没有反对的理由，就说你们先出去考察一下，拿出个方案。

于是他俩就拉上平金刚，到西面那个县看去了。

20.2 冲突

在龙头乡政府大院门口传达室的隔壁一间，挂出了个小牌子：“龙头造纸厂筹建指挥部”。别看牌子小，这是龙头乡自己办的一项新工程。平金刚辞去了村委副主任的职务，担任了这儿的指挥长。秦有理是办事员。

办项目首先是要用地。如果是乡里搞就要征地，手续是很麻烦的，所以就换个名义：民主村与镇政府合办。地点放在北门外后港的北坡，大河的南岸。这块地就是当年民主村的乡亲们为躲避国民党进攻撤往李家泊、以及后来打回老家重回龙头镇时过大河那一段，正是潘连长、纪排长他们第一次强攻望海山而没有成功的那一段，也是后来友邻部队突破敌人防线、首先攻入龙头镇的那一段浴血拼杀之地。地是民主村的地，占用四十亩，镇里以二千元一亩的价钱给村里，村里再给承包这块地的农户另换块地。

在这地块上的主要是皮家和齐家的地。他们的地是靠河边的好地，要是收走半山坡上的地倒也无所谓。皮家和齐家接到村里的通知，要把他们的地换到东北面矛山的北坡。村里考虑到这种情况，还多给了点，一亩换一亩二。

皮家和齐家一听都急了。新换的地路远不说，都是砂石地，是指望不了收粮食的，而原先的地都是靠着河岸的平泊地，是要拿它当饭碗用的。两家人一起找到了平金刚。平金刚把这事推给了乡政府，说是乡里定的，村里没办法。

皮高深和齐成才又找到了乡里，在那个“指挥部”屋里围住了秦有理。

秦有理说：“是的，建厂的地点是乡政府定的，也是为了你们民主村好，没有占西门外的好地。跑到北门外，其实我还不愿意呢。”

“你还不愿意？占了我们的地，还嘴硬，说这种风凉话。收走了我们的地，叫我们拿什么打粮食啊？往后靠什么过日子啊？你说呢？”皮高深说。

“这我就管不着了，村里已经换地给你们了。”

“村里换的什么鸟地，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怎么种庄稼？”齐成才说。

“怎么种，那是你们的事，问我干吗？”

“不问你，我们问谁啊？你是政府的人，不为老百姓想想吗？你们都不为老百姓着想，那我们还去指望谁啊？你说呢？”皮高深说。

“我们政府是为最广大的老百姓想，办造纸厂是为全乡群众服务，又不是单单为你们俩。”

“我们两家也是人民群众啊，你们政府也要管啊。”

“你们两家的事由村里管，别来缠我。”

“村里叫我们来找乡里，乡里又说是找村里，是在要我们啊。”两人急了。

“你们快走，不要影响我工作。”秦有理说着就想脱身往外走。

皮高深一把就拉住秦有理，吼了起来：“姓秦的，问题还没解决就想走啊？你往哪儿走啊？问题没解决，你就哪儿也不许去，就呆在这儿。你说呢？”

秦有理跳了起来，叫道：“干吗？想动手啊？”

齐成才挡在门口，双手一拦，说道：“不解决问题就不能走！”

秦有理用力推开齐成才，齐成才也用力把秦有理推回来，没想到秦有理没站好，被门槛绊了个四脚朝天。

秦有理干脆在地上喊了起来：“打人啦，打出人命啦！快来人啊！”

皮、齐二人也愣了不知怎么好。齐成才伸手去拉，秦有理不但不起来，反而还拽着齐成才的手不放。

很快院子里的干部们围了过来。宗发奋走在头里，大声喝道：“怎么回事？”

秦有理一看是宗发奋来了，拽着齐成才的手就说：“就是他，竟敢动手殴打国家干部。”

宗发奋对齐成才瞪着眼说：“好小子，想反了天啊。才松快了几年，阶级斗争还真是不抓不行啊。赶紧喊公安员过来，把这个威胁国家工作人员安全的家伙铐起来。威胁国家工作人员安全，就是威胁国家安全。”

不一会儿，派出所的诸所长领着一个警察赶来了。诸所长这近二十年也没有变动，一直在龙头干所长，他一直是按照奉命从事的信条办。

“铐上！”诸所长对那警察说。

“是他推的我！是他先推的我！他自己没站好！”齐成才也叫了起来。

“有话进去说！”诸所长面无表情地说。

“还有他！还有这个姓皮的！”秦有理躺在地上还不泄气，指着皮高深说。

宗发奋对诸所长使了眼色，诸所长就对那警察说：“快带走，快带走！”只把齐成才带走了。

这件事，弄得满村、满镇都议论纷纷。

纪乡长问宗发奋是怎么回事。宗发奋哼哼了两声，说：“这事很快会圆满解决。”

两天后，齐成才写了份书面检讨，从派出所里垂头丧气地出来了。出来以后，再也不提换地的事，也不提在里面的事。

秦有理对宗发奋说：“怎么不把皮高深也关进去，那小子跳得更高。把两个都关进去，更能显示出咱们的权威，看以后谁敢不听话。”

宗发奋说：“你怎么也糊涂啦？那姓皮的小子，他姐夫不就是县里的辜局长吗？你想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啊？”

秦有理拍拍脑袋，“哟，差点忘了这事。”

20.3 后果

造纸厂的院墙围起来了，厂房也盖起来了，卡车装着机器也开始运来了。因为北门外有那块大语录牌挡着，所以卡车从镇外的西北角绕着走，就是当年青年军301团从海边运军火到惠民寺的那条路。这条路很不好走，司机们埋怨不迭，那也没办法了。

纪乡长他们重新商量过，把那块语录牌干脆拆了。这样车辆可以从镇里由十字路口直接往北，经北门口到大河边方便多了，好走多了。一想到为这事，还曾专门研究过两次，意见也不一致，更何况这真的是个敏感问题，谁也承担不起这责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即使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日子里，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所以这事又再一次搁下了。

工人们扛着、抬着，把装在木条箱里的机器部件搬进了厂房，大一点的就用起吊机卸。不用拆箱，透过木条，就能看见这些部件都已经锈迹斑斑。

平金刚赶了过来，一看是这样，就问秦有理：“怎么都是些旧的？”

秦有理把平金刚拉到一边，说：“勤俭节约嘛，我们买旧机器回来，省了好多钱。擦一擦，一样用；刷下漆，跟新的一样。这些旧机器，才说明性能稳定、能用这么长时间呢，不行的机器早就不能用了，还能等到现在。”

秦有理一边说着一边眨着眼。这说的算是什么理？

他们往回走翻过后堍的时候，秦有理见四下无人，从衣兜里掏出一个信封塞给了平金刚。平金刚一摸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可嘴里还是问：“这是干什么？”

“人家给的买机器的辛苦费。”

“咱出钱买人家的机器，人家反而给我们钱？”

“不给钱，我们就买他的啦？哪儿还没有机器卖啊。”

“那他们不是吃亏了吗？”

“吃什么亏？现在还有谁会做吃亏的事。”

“那比如说我买他一万元的机器，他再拿出一千元给我。他不就少得一千元吗？”

“看你这么大的人，还这么傻。问你要一万五，不就得了吗？再还给你一千，你说他亏了吗？”

“那我们不是亏大了吗？”

“你还亏？你平金刚还多出了一分钱？”

“哦，都是公家给报了。那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哈哈哈哈！”平金刚像是明白了。

“这羊毛是出在这羊身上啦？这是羊毛出在狗身上。这些事，别多问了。办这厂，以后好处多了。你好好干，听我的指挥，好处有的是，就等着收钱吧！”

平金刚虽然在钱这方面想过很多，却还没有想到这一步。他把那信封小心翼翼地从小子的领口塞进了贴身的衣服里，再用手摸了摸，这位主任才放心地跟着办事员往前走了。

其实，平金刚才能拿多大点呢。

1986年夏天的麦收时节，造纸厂建成了。投产仪式也很隆重地举行了。工厂冒出了浓浓的黑烟和白烟，附近几个乡的老乡都把麦草推了过来，路上小车来往，厂门口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很是一番热闹景象。造纸机的滚筒居然也卷出来了纸张，虽然黄了一点，糙了一点，可那毕竟也是纸哎。世代代的庄稼人造出了纸。一时间，龙头镇、民主村的人都很高兴，没白出力啊。尤其是平金刚，平厂长，是最为高兴了。因为他也能离开庄稼地了，成了一个企业家了。他觉得他的这个造纸厂，讲规模、讲产值、讲影响，比起狗狗的那个针织厂可要强多了。至于杜家骏的貂场，那算什么？工人不算工人，农民不算农民。他平金刚知道阶级划分的理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可 he 现在是领导工人阶级的领导，走在街上也能像宗发奋那样挺起肚子了。

当然也不是事事如意。排出来的黑液顺着新挖的小沟直接流进了大河。那往日清冽的大河水，靠纸厂的这边都成了暗灰色，上面飘浮着一团团棕黄色的泡沫顺流而下，刺鼻的臭味散出好远。平金刚只好叫工人到晚上再放。那也不行，没几天，赵村的老书记赵刊新就找到了镇上。

“这河水都不能洗衣服了，再过几个月就不能浇地了。以后拿什么灌溉呀？”赵刊新在乡长办公室里吼着。

纪乡长和祖云涛都跑到厂里看了下，是不行。车间里那个灰尘大的，尤其是切草车间，见个人影都是模糊的。黑水就流到厂后面的一个大池子里盛着，等着晚上往外放。

纪乡长问平厂长：“这些问题，你们事先不准备好吗？”

平厂长说：“我哪知道还有这些事呢？我以为造纸就是把纸造出来不就行了吗？谁知道还有个污染问题。”

祖云涛说：“那你们也得上个污染处理设备什么的。”

平厂长说：“我问过宗书记了，他说上那设备太贵，得几百万，买不起。买回来也用不起，那样造纸成本就高了，得赔钱了。”

“怪不得人家把这套旧设备卖给你们了。”纪乡长说。

平金刚说：“出去听人家说，这种造纸方法，就看地方政府的态度了。地方政府愿意干，睁只眼闭只眼，就能搞得下去，多少还能挣几个钱。要是按规矩办，这种方法是生产不下去的。”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纪乡长说。

“建起这个厂一共花了多少钱？”祖云涛问。

“大约是三百多万。”平金刚说。

“三百多万？咱们乡有这么多钱？”纪乡长大为惊奇。

“都是向信用社借的。”平金刚说。

“人家肯借吗？”祖云涛也挺奇怪。

“宗书记去办的，信用社哪好意思不办。”平金刚说。

“就这么些旧机器，还不连污染处理系统，就三百多万。我在海滩那边才多少钱？”纪乡长真有点气愤了。

其实，小造纸厂的这种污染，纪乡长他们看到的还只是表面。造纸厂的废液，对土壤的盐碱化，对地下水的渗透，即使是停产以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都难以改善。更何况，废液中还会有大量的被世界卫生组织视为最危险的污染物二恶英——一种最强烈、最稳定、最难以降解的致癌致畸物质！

对于龙头造纸厂，问题还不只是环境污染的问题，经营上也是困难重重。因为机器陈旧，生产技术又不行，生产出来的纸张质量当然也不行。印书不行，连做小学生练习本也不行，价钱远远赶不上原先想象的。而且纸张的销路完全是通过秦有理认识的那个人安排，人家说卖几个钱就卖几个钱。这一头，平金刚他们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但是反过来再说，龙头镇建了一个造纸厂，再怎么也是领导的成绩啊。就算是赔钱，那个GDP（国民生产总值）是摆在那儿的，一年增加了好多，要算地方GDP的增长率那是很漂亮的。因为计算GDP是不管你赔不赔钱，也不管污染不污染，都是往上加的。再说如果不去管那个污染治理，还是能挣点钱，镇里还可以分点，过年能发个奖金。再多少弄两个去交点税，对上也有个说法，上下都光彩。更何况那么多老乡能把麦草卖掉，能卖个几块钱，哪怕是几毛钱，也是钱啊，也能赶个集，换两块糖回去，小孙子也高兴啊。至于那个环境保护嘛，等过几年，实在不行了再说吧。

第二十一章 外资企业

1978年1月21日

21.1 针织厂

相比起来，辛狗狗的针织厂发展得比较快。刚建时是一排房，现在又加了一排房，差不多40台机器，六、七十个工人，宿舍也住不下，伙房也装不下。民主村各户人家的院子里也都分散住了不少外来的打工妹。这些打工妹虽然每天工作时间很长，工资也很低，可还是都穿着鲜亮的外罩衫，情绪都挺饱满，因为比起她们在老家的日子，这又是种全新的生活。大街小巷里随时都能听到她们唱的最流行的歌曲，从“妹妹找哥泪花流”、“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到“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天天就像开演唱会似的。民主村也因此而增添了青春的活力，增添了一道亮丽的流动的风景线。

看到这些女孩子，最有感慨的要数丁妹了。因为在她们里面有不少来自于西面的一些县，听着这些浓浓的乡音，丁妹不免想起自己的身世。尽管对老家已经无所记忆，但听到乡音毕竟能勾起对故土的联想和思念。同样是故乡的人，同样是海边的这块土地，她们却不需要像自己当年那样逃荒要饭而来。她也想念她的家乡、她的父母和亲人，可是她连自己的家是哪个县哪个村也不知道，自己父母的姓名和模样也记不起。心里虽然忍受着这种煎熬，但她却没有向这些女孩打听过那边的情况，甚至听见讲乡音的女孩子走近，她还下意识地走开。

相比起来，高秀珍已经成了主要的管理人员，出去学了三个月，回来当了会计。对于这样的企业，会计决不仅仅是打个算盘、算个帐而已。订单在不断增加，生产越来越繁忙，各项事务应接不暇。

高秀珍在办公室刚放下笔，还没合上帐本，门外就闯进了好几个人。

“大姐，大姐。咱这批货交给谁验啊？”

高秀珍一看，笑了起来，“哦，三妹，这么快就做出来啦！”为了扩大生产，狗狗的厂不但由自己厂里的工人两班倒生产，还组织村里的妇女按要求在家里自己生产，再集中交到厂里来。按后来的说法，这叫“工厂加农户”。这种方式，其实那时已经有了。高秀珍想到的是娘家的姐妹，所以叫高家庄的姑娘们也搞起了这项副业。

“三妹，你坐下喝口水，我这就去找人。”高秀珍一出门就喊上了，“大年，大年！”

大年有个很奇特的好名字。他姓过，真的就叫过大年。他也是北山的人（北山也有好几个乡呢），当过几年兵，是个复员军人。大年工作很认真，是厂里少数的几个党员之一。到了厂里，狗狗叫他学了个验货的技术，为厂里把着质量关。

“哎，这儿呐。”大年正被一堆大姑娘小媳妇围着低头验货呢。

“你帮高家庄的先验一下，她们路远，得早点赶回去。”

“高会计啊，麻烦啦，仓库里都堆满了，先验收也放不下啦。”大年说。

“厂里的车呢？”狗狗的厂都已经有了自己的货车。

“车到北海码头送批货，今天是回不来了。”

高秀珍想了下，说：“你先验，验完以后叫她们搬到我家去，放在炕上。”

“那你们两口睡哪儿？”大年还真有这份心思。

“睡地下。”高秀珍说完就进了屋，拿起电话就要了黄港的一家经常做业务的外贸公司。

“喂，黎经理吗，我是小高，我这儿货实在堆得不少，你先帮个忙，来辆车，搬走点……运费吗，好说……，就按你说的……，对，对，以后要麻烦你的事多了。好，好，再见。”

高秀珍遇到的事还不止这些，厂里办得红火，民主村的一些人也想进来。狗狗的意思尽量不用本村人，因为对民主村的人，总有个人情面子在里面，给的工资不能太少，派的活又不能太重，出了什么事又不能管得太多，所以不如用外乡人。他之所以用高秀珍，一是看重高秀珍的为人，是块材料；二则也是觉得高秀珍和自己一样，只能算半个民主村人。

今天，高秀珍就遇到了一个想进厂的人。谁？王溪。王溪觉得自己是高秀珍的姑姑，倒挺大方，推门就进来了。不管有人没人，先喊上了：“哎哟，我的侄，在忙啥呢？”

高秀珍在龙头镇最厌烦的就是王溪，甚于对秦家父子的厌恶。她连头也不抬，鼻子里哼了声，继续在记着帐。

王溪一看她不理不睬，心里压着火，把事就挑开了讲：“啊呀，侄儿呀，厂里把我放在哪个岗位上呀？我想今天就来上班。”

“上什么班？什么时候招你进来的？”

“唉，不是辛厂长说的让我进来的吗？”

“你进来干什么？上机器两班倒，你能行？还是上伙房抡大铲，几十个人的饭菜你能炒得动？”

“这可是辛厂长说的，叫我进来。”

“我没听说过，辛厂长没跟我讲。辛厂长说的，你去找辛厂长。”

王溪其实是乘辛厂长不在的时候咋唬高秀珍，让自己进厂待两天，造成既成事实，反过来再逼辛狗狗认可。谁知一上来，这第一招就不灵。她发火了，叫了起来：“好你个高秀珍，坐了两天办公室就不认识你姑奶奶啦？”

高秀珍也是个不好惹的，把帐本一合，往桌上一拍，“你赶快出去，没有人请你来！”

王溪跳了起来：“哎哟，还是国民党向着国民党呀，国民党儿子用了这个国民党媳妇！”

“我是国民党媳妇，你还不知道是谁的媳妇呢？你能算得清楚啊？”

王溪虽然名声不好，可是整个龙头镇还没有人敢在她面前挑明这个事。她一听此言，脸刷地发白，又刷地发红，脑子里几个闪念一过，三秒钟时间最佳方案就筛选出来了，立刻便躺在地上打起滚来，不住地哭喊着：“哎哟，我的娘哎，谁来给我作主哟。”

高秀珍一听，更是发怒了。指着王溪的鼻子骂：“你还有脸喊娘？你的亲娘被谁杀死的？就是被你的野汉子杀死的！还跟人家鬼混在一起，你还配喊娘啊！”

所有在场的人都惊了，惊的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事，惊的是高秀珍敢于说出来。

连王溪自己也惊了，惊得从地上爬起来就走了。

王溪咽不下这口气，去找了宗发奋。

宗发奋办公室里还有别人呢，王溪也是照样一步闯了进去，头发也散了，眼泪鼻涕还没擦干净，嘴里还干嚎着。

宗发奋望着屋里的那些人，觉得挺尴尬，说：“这是干什么？我这儿有正事呢。”

那些人见状，说着：“宗主任，换个时间再说吧。”暗暗地嗤笑着，一溜烟地都走了。

“你这是干什么？怎么一点也不注意影响？”宗发奋居然也学着政治工作的那一套批评起王溪来。

王溪把事情一说，宗发奋的脸也沉了下来。他一是气辛狗狗。为了王溪想进厂的事，宗发奋找过辛狗狗。他自以为已经是放下架子来找你辛狗狗，谁知辛狗狗一点面子也不给，一口回绝了；二是气那个高秀珍居然这么猖狂，她敢点王溪和秦德才的事，以后说不定就敢点王溪和自己的事。

“反了，反了，国民党的儿媳妇居然敢污蔑革命群众，”宗发奋气愤地说着，但至少有一半是做给王溪看的。

“你要替我做主啊！”王溪哭着说。

其实宗发奋也没办法去整高秀珍，手上没有以前的那种权利了。人家高秀珍不吃你的、不穿你的，没有求你的地方，没有掉在你手里，宗发奋本事再大也没咒念，不过宗发奋还是说了：“你先不用急，过两天我把你弄到造纸厂去，那地儿比狗狗那儿要好。”

王溪这才破涕为笑。

21.2 图发展

狗狗呢，狗狗上哪儿去了？

狗狗两口领了孩子上美国去了，去看望老父亲，讲一下家里办厂的情况。最主要的是狗狗想看看美国的社会，美国的街上人们穿的是什么，他们会用什么样的针织品，自己生产这类针织品美国人是怎么

用的，还上订货的那家美国公司去看了看。

在回国的机舱里，他已经无心像去时那样一直兴奋地趴在圆圆的机窗边往外看不够，甚至还和自己三岁的儿子争着看。此时，他看了下飞掠而过的白云和白云下蓝蓝的大海，便闭眼沉思起来。世界是那么地大，有多少事情要做。他现在更觉得生活多有意义，生命多有价值。要想不白活一生，要想不白来到这世界上，对于他狗狗来说，就是要把这厂办好，自己的才能得到发挥，自己的财富有所积累，同时也帮助了家乡，帮助了更多的人，社会也因此而更加精彩了一点。如果人人都能这样奋斗，人人都可以这样奋斗，社会不就发展了吗。

这次美国之行，他了解到美国市场对价格这么低廉的针织品十分欢迎，他可以直接和美国的公司挂钩，由国内的外贸公司代理。按照中国外贸体制，在那时一般的企业没有直接出口资格，只能通过专业外贸公司这个环节。虽然还是要被外贸公司挖走一块利润，但是比起以往由外贸公司下单子（工厂接受的是外贸公司的生产任务），利润又要大多了。厂子的发展遇到了空前的机遇，而且经济上也不用他父亲更多的帮助。眼前要做的事情，真的很多。他想到了，首先场地要扩大，这是第一点。还要盖厂房、添设备、招员工，尤其是生产技术要提高。同样的原料，同样的工时，花色图案不一样，那价钱要差好几倍。还有，要和外国人直接打交道，还得会外语，狗狗觉得这是自己最大的不足。虽然差不多已经四十岁了，也还是要尽量的补点课。自己上高中时，外语学得不错，但那时还都是学的俄语，现在都没用。

邢秋芬在边上哄着孩子睡了。辛狗狗看着她娘俩，心里觉得甜甜的，有种幸福感。这个家庭，支撑着能让他干一番事业。他也要干一番事业让这个家庭更幸福。

辛狗狗一回来先把厂里的情况看一下。这些天，他是把厂交给了高秀珍。小高这小媳妇把厂里管得还真不错，但厂里的地方确实是太小了，转不过身来。下面村里送来的货，不但厂里放不下，连高秀珍自己家里也放不下，都放到王山老汉家了。

下午，辛狗狗就去找了彭小宾。现在村里是彭小宾和鲁队长主事。

彭小宾完全赞成，不过彭小宾说：“村里再给你十亩、二十亩地，那不成问题。但现在跟头两年不一样了，土地使用规范了。你还是上乡里办个手续，以后政策再有调整也不怕，这地就真到你的手里了。光是跟村里签个纸条，不牢靠。谁的嘴大，吹口气，就吹没了。”

狗狗心想彭小宾说得对，转身就去了乡政府。

土地管理属行政事务，这事乡里归宗发奋管。狗狗一问，是宗发奋管，心里就凉了半截，那也得硬着头皮往里走啊。

果不其然，宗发奋坐在沙发椅里听辛狗狗把话说完，心里嘿嘿笑了两声，你辛狗狗也有求我的时候啊。脸上一副很严肃认真的样子，慢条斯理地打起了官腔：“这个，使用土地是很严肃的事情，需要全盘考虑，很好地研究。你先打个报告，经过村委会同意，盖好章再拿过来。”

“好的，好的。”辛狗狗觉得宗发奋说得也在理。

“但是，我要指出的是，”宗发奋的脸越来越冷了，语调也越来越低沉了，“你的问题还不是新增加几亩用地的问题。你现在用的地，没有经过任何合法手续，是非法用地！”

“我跟村里都有协议！”

“那个不算数，我们乡政府不承认。你什么时候跟我讲过的啊？你小子玩得太过头，根本不把我们一级政府放在眼里。今天，我要让你知道政府的权威。你现在的地，立即收归乡里，还要罚款五十万元。土地上的东西，三天之内全部清理完。清理不完的，由乡里没收。你这是一起非法占用土地的大案！”

宗发奋说完，用力地拍了一下桌子，身上觉得轻快了好多。好些日子没有这样舒坦了，今天终于又可以显示一下自己的权力了。

辛狗狗退了出去，找了祖云涛。纪乡长已经到了海边办公，不再管乡政府的事。

祖云涛听了以后，沉思了会，说：“要是说宗发奋故意刁难你，有这个可能，但是抓不到证据。因为你和村里的那个字条，确实不行。反过来，如果真是出以公心，从发展经济大局出发，考虑到那时的实际情况，补办一下也不是不可以。这两种态度，两种办法都可以，但是宗发奋用了前一种，你也没有牙啃。

你赶紧到县里去，先不要去找土地局，先去找外事办。现在县里也有外办了。你说你这是引进外资。你这个厂真的是外资企业哎，能享受不少优惠呢。”

狗狗连连拍着自己的脑袋，“咳，这几年下来了，我自己怎么没想到。”

“把法人写成你爹的名字，不就行了吗。你跟外办说，在这里遇到困难，搞不起来，要搬到黄港去。自己县里要少一个外资企业，他们外办自然就会着急的。其他的事，他们都会帮你去办。”

“是吗？会有这样的好事？”狗狗还将信将疑。

“外办刚成立，他们要拿出他们的工作成绩，正急得满世界找项目呢。你这一去，帮你安顿下来，不就是他们的政绩了吗。”

“那土地局会买这个帐吗？”

“土地局也会拿这个说事，说他们如何为招商引资办了多少多少的实事。”

“那政策都这么明确，宗发奋还从中作梗干什么呢？”

“宗发奋对你有气，觉得你下眼皮太高，眼睛里没有他，没有听他话。其实你要是给他点好处，也不用你上这个火。”

“我才不干那种事呢。我自己出力，办厂，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给他好处干吗？”

“哈哈，我知道你这个脾气，所以才叫你上县里去。不过走之前，可以到秦有理那儿要张土地使用申请表，他是具体办这事的。”

辛狗狗又到了后面一排房找了秦有理。

秦有理一听，既没有开抽屉拿表，也没有说正事，而是有一打无一打地说：“美国那地方不错吧，带回来不少好东西吧？”一副装着言者无心、叫你听者有意的样子。

狗狗听出了意思来了，一摸口袋没有多的，还有二张百元钞，就放到了秦有理的桌子上，边说：“真不巧，今天没准备，也没带别的。”

秦有理眼睛没往钱上看，手却把它们撸到了抽屉里，嘴上说着另外一套：“美国那么个好地方，不至于就这么点东西吧。”还是没提拿表的事。

狗狗气得站起来就要往外走。

秦有理这才赶紧抽出一张表，扔了过去，说：“光拿张表有什么用？后面的程序还多着呢！”

尽管“吃拿卡要”是以后总结出来的词汇，但一些手里有点权的人，这时已经无师自通了。

辛狗狗骑上摩托车就上了海源城里的县外办。其结果，跟祖云涛说的完全一样。不但没费什么事，而且还态度热情，非常支持。县外办的人领他到工商局办了外资企业的工商登记。工商局的人又是请坐，又是倒水，马上填表盖章。法人代表是辛凯旋，注册资本一栏给填了500万美元。辛狗狗忙说，没那么多，五十万也没有，五万还差不多。工作人员说，多了还压死你啦，又不是按这个交税，写得越多，上级就越重视你，没坏处。

到了土地局，人家一看就问，“要多少亩？”狗狗壮了壮胆说：“二十亩，行吗？”

狗狗看里面的工作人员拿起笔就哗哗地写上了，又对狗狗说：“本来是优惠到5000元一亩，，看你这项目规模达到500万美元，可以用最优惠的价格，3000元一亩。购地款可以在三年内付清，还有困难的话，可以凭我们这儿的手续去拿到银行去申请无息贷款。”

“不用了，谢谢，我可以付。”

狗狗拿过盖好章的登记表一看，是二十九亩半。

里面的同志又说了：“过了三十亩，要到省里去批，那麻烦就多了。所以这次就给你二十九亩半，不够的话，下次再给你二十九亩半，好吗？具体哪块地，到乡里跟他们商量，他们会支持的。落实了以后，叫他们把表报来，就不用你再跑了。”

辛狗狗回到龙头，刚进厂门口，经学文就骑着自行车赶来了，急呼呼地说：“祖云涛叫你赶紧过去。”

“怎么啦？天快黑了，你们也快到下班时间了。”

“特事特办，哪有什么下班时间。县政府办公室来电话啦，点名要祖书记亲自接，要求乡政府全力支持你的项目，要什么给什么。还点名批评了宗发奋，思想赶不上形势发展，这下你的好日子来啦。”

狗狗跟着赶紧到乡政府里，把事情都落实了，就在原来的场地，往前扩大到大道边，往后扩大到粮管所的大墙。

“多点就多点，不用去细算了。以后有什么事，你就直接找我。宗发奋这个人，你也知道，就不用去多理会他了。”祖云涛说。

“那个秦有理更差劲，收了二百元钱，还不肯办事。”

“有这事？那我得去查查。”

祖云涛第二天真的去查了。秦有理当然死活不承认，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乡里也成立了外办，秦有理就去了那儿。因为没抓到辫子，所以还提拔使用，当了外办的副主任。

辛狗狗的外资独资企业“兴华针织厂”正式挂牌了。

为了感谢镇领导和龙头镇、民主村的乡亲们，辛狗狗请大家看场电影，地点就放在刚划出圈，铲了庄稼，还没盖房的厂区。

这晚上可热闹了，不但龙头镇上，附近五里八里的老乡们也都来了。大道上都站满了，连粮管所的高墙也爬上去不少人。

放电影前，辛狗狗讲了几句，表示感谢镇党委、镇政府，感谢龙头镇，尤其是民主村的乡亲们，完了，说：“为了表示感谢，我向大家献个丑，唱一个‘我的中国心’”

辛狗狗趁着高兴，拉开嗓子就唱了起来：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

在我心中重千斤，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心中一样亲。

流在心里的血，

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全场掌声响起，辛狗狗唱歌并不怎么样，只是表示种心情。

唱完了，又说：“我唱得不行，下面有好的。我们兴华厂的全体员工给大家来个合唱‘在希望的田野上’。”辛狗狗已经想到了企业文化。

高秀珍在灯光下站起来，指挥着几十名兴华厂的女工唱起了由著名歌唱家彭丽媛唱的这首脍炙人口的歌：

“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

人们在明媚的阳光下生活，

生活在人们的劳动中变样。

老人举杯，（那个）孩子们欢笑，

小伙儿哟弹琴，姑娘们欢唱。

哎咳，呀儿伊呀咳，

我们世代代在这田野上奋斗，

为她幸福，为她增光。”

年青的女孩子们，身着统一的浅蓝色的工作服，胸前挂着岗位牌，青春的脸庞，青春的歌声，这在龙头镇也是新的一幕。引得乡亲们好不羡慕，自己生活的家乡也在变化，也在发展，也充满了希望。

这种场合，王溪也仍然忘不了要自我表现一番。等兴华厂的员工们刚唱完，热烈的掌声像海潮似的还没平息下来，王溪就自己站起来，朝着四周的人群说：“我也给大家献上一首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李铁梅的一段。”

话音未落，四周的嘘声骤起：“你还没唱够，我们已经早就听够了！”

“下去，下去，我们要看电影！”

在一片倒彩声中，王溪只好无奈地坐下了。

放的电影叫“枫”，是部反思文革的片子。讲的是，文革时一群原本热忱单纯的青年学生，受极左思潮的蛊惑，在誓死保卫革命路线的名义下，狂热地参与武斗，反目成仇、自相残杀。影片愤怒地控诉了泯灭人性、伤天害理的十年浩劫。

这部片子后来不让演了。人们称它是被遗忘了的一部中国经典影片。

第二十二章 教师节

1978年1月22日

1986年秋天，我国的第二届教师节。

在镇外办工作的林李接到了龙头中学来的电话，请她父亲李辰参加学校的教师节大会。

林李去年大学毕业了，本来是可以留省城，甚至可以跟同学们一起去当时最热门的南方城市。但是她没有，她首先想到的是她的父亲，满心创伤的孤零零的父亲。她一定要回来永远陪在她父亲的身边。

回来后安排在外事办公室，跟秦有理在一起。秦有理是副主任，主持工作，尽管还并没有多少工作。凑巧的是两个都是烈士子女，一个是革命战争年代的烈士，一个是新时期的烈士。

林李是个能干、认真的姑娘，从外在看更多地像她母亲，身材娇小，也挺开朗，但内心里是个很有头脑的人，兼有她妈妈、爸爸的优点。

中午回家时，跟她爸爸讲了。李辰现在是一生中第二个好时候，仅次于革命刚胜利那一阵。那时候充满了激情、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喜悦和幸福。但是后来的日子却是充满了血泪和苦难。现在好了，没有追查、没有担忧、没有恐惧，只是时时忘不了亡妻林海秀。这个悲剧，有时代的责任，也有自己的责任。他时时想着自己的责任，心中有着永远难以排解的压抑和伤痛。

“这春天，来晚了。”这是他最常念叨的一句话。

“我还去吗？我还去干吗呢？”听了学校里要他去参加明天的教师节大会，李辰首先说了这一句。并不是他对学校没有感情，也不是对现在的领导有什么意见。虽然他是在学校、是在这个教学岗位上受到的伤害，然而他对学校，对教学，尤其是对学生依然充满感情。“都已经二、三年没有摸教学了，现在形势发展那么快，我都跟不上了。说出话来恐怕要叫人笑话了。”

“爸，你还是去吧。我知道那学校、那讲台，是你一生的牵挂、一生的思恋。”

是的，这句话说到了李辰的心里。稍停了会，他就说：“那就去吧。”

“我明天请个假，陪你一起去。”林李说。

“这还用你陪啊，我自己去不就行啦。”

“正好我也去母校看看老师们。”

“那好。”

第二天上午，父女俩来到东门外的学校。李辰老远看到那一排排不同时期的校舍，心里的感触又油然而生。这里有解放前留下的房子，有五十年代建的有廊沿的教室，还有这二年刚建起来的二层楼的新教学楼。这里也是龙头镇历史的见证，这里是黎明前解放军八烈士牺牲的地方；是庆祝新中国成立第一次召开全乡大会的地方，也就在这一天，他和海秀还第一次上台表演；更是1957年反右，他被抓走的地方。这里记录着李辰整个人生几乎全部的脚步。

每次走进学校，他都想摸一摸在阳光下耀眼的抹着石灰的白墙。当年就是因为说了红砖墙外面要抹上白石灰的话，才被说是鼓吹“白专道路”而被打成右派。或许有人会责怪怎么老是丢不开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往事，总在耿耿于怀呢？可是，对于李辰来说，这些往事仅仅是陈谷子烂芝麻吗？能“往”得了吗？

今天的龙头中学是一派节日景象，满校园的彩旗飘舞，欢声笑语。学生们穿着统一式样的鲜红校服，正列队入场。操场上像是一片青春的火焰。大喇叭放着一曲曲时兴的校园歌曲，有台湾的、有内地的，一首接着一首，一会儿是充满童趣的“童年”：

“总是要等到睡觉前，
才知道功课才做了一点点，
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
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
一寸光阴一寸金，
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
盼望长大的童年……”
一会儿是曲调幽雅、令人深思的“脚印”：

“洁白的雪花飞满天，
白雪铺盖着我的校园。
漫步走在这小路上，
脚印留下一串串……”

别看李辰年纪大了，还是挺喜欢这些流行歌曲，尤其是这些歌曲还都和自己的教学生涯联系在一起。这一首还没听明白，下一首又来了：

“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
清晨来到树下读书，

初升的太阳照在脸上，
也照着身旁这棵小树。
亲爱的伙伴亲爱的小树和我共享阳光雨露。
请我们记住这美好时光，
直到长成参天大树。
……”

李辰听了直赞叹：“真好，真好。真是岁月如歌。”

李辰父女往操场上走的时候，见到了肖校长，肖福兴。

一转眼，肖校长快要七十了，已是满头银发，比过去清瘦了一些，精神还是不错。他是自己一个人来的，他的儿子肖胜利没有陪他。肖胜利在北海沿的渔村里学习驾船捕鱼，学了一年多。回来时，风吹日晒得浑身黑红黑红的，都认不出来了，完全看不出曾经的学生模样。那时的打鱼人，很少有上过学的。高中毕业还下船出海，更是极为罕见。村里就有人说，可惜了肖胜利大材小用。但是肖胜利的书没有白读。毕竟有了文化知识，再学这些技术，上手要快得多。这一年从修理船上的柴油机、收音机，到识别方位、看海流、下网、起网，他都能拿得起来。在以前，这些活，一个小伙十年八年也拿不下来，而肖胜利成了龙头镇即将兴起的渔业生产的顶梁柱。这一天，他还在海上。肖校长自己一个人来学校，好在肖福兴的身子骨没什么大问题。

李辰见了肖校长，很高兴，“啊呀，肖校长啊，有两个月没见了吧，身体还好吗？自己一个人过来啦，儿子呢？”

“儿子还在海上呢。还是你有福啊，女儿就在身边，大学都毕业啦，还这么俊俏。”

“肖校长好，肖伯伯好！”林李喊了两声，还补充说：“作为学生，我喊您校长好；作为晚辈，我还得喊伯伯好！”

“啊哟，啊哟，”肖校长听了高兴得合不拢嘴了，“谢谢，谢谢！好闺女。龙头镇的明天，靠你们这批年青人啦。羡慕你们呐。我和你爹是从冬天里熬过来的人。创造春天，还要靠你们啊。”

他们正谈着呢，身后却传来一个冷峻的声音：“什么冬天、春天？社会主义从来就都是春天。”

三人回头一看，是程贵安坐在轮椅上停在一边。程贵安显得老多了。头发枯死，肤色焦黄，尤其是原先脸庞上堆满的丰厚肉皮都耷拉了下来，叠成了一层层赘肉。眼袋肿得都鼓了出来。只有讲话的声音，沙哑中还想显示出几分威严，但这已经吓不住别人了。

肖校长回了句：“文革那几年，我们挨斗，也是春天啊？”

“那……，那是下雨天，春天里也会有下雨天啊。”程贵安狡辩说。

“春天的雨，是让大地滋润，百花萌发。你讲的雨，那是狂风暴雨吧？”肖校长说。

李辰说：“老程啊，不用在名词概念上兜圈子啦，要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啦。”

程贵安是最不屑于李辰了，总觉得那是比他程贵安低一阶层的人，“什么经验教训啊。我说就是他老人家走早了，文化大革命没有深入进行。你看看，国民党儿子又当老板啦。右派分子又……”程贵安看了李辰一眼，把话吞了回去，又换了一句说：“村里的集体企业也成了私人老板的名下，劳动人民又饱受剥削。变啦，变啦，他老人家要是在，一定不会允许这么搞啊……”

程贵安说得激动地咳嗽了起来，连忙用手捶着自己的胸脯。

“您这条腿，也是在他老人家在的时候断的吧？”没想到肖校长来了这么一句，噎得程贵安差点上不来气。

这时平近芳走过来了，她已经是校长了。看到这几个当年的冤家对头站在一起，她并没有感到意外。她现在也渐渐地趋于平淡，见怪不怪了。甚至当她耳闻自己男人杜长贵与貂场小半有暧昧之事，也没去追问。她也在反思自己这几十年、学校这几十年、社会这几十年。往事不会如烟，只是要重新审视。

她也听明白了他们讲话的意思，对极左的那套东西也已心存反感，在点头招呼以后，就对程贵安说：“老程啊，实行市场经济啦，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在不断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不管，我就知道他老人家说，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再来一次。这都已经过了九年了，怎么还没来呢？！”

“你还想来文化大革命啊，你没忘了我们四个人一起被红卫兵批斗那天啊。你不就是被红卫兵打断了腿的吗？”平校长这辈子最不能忘的，就是被批斗的那天。所以，一提起来还是气愤不已。

“怕什么，这次我有经验了。这次，我要比红卫兵还红卫兵，不等别人打断我的腿，就先打断别人的腿。”程贵安激动得都哆嗦了起来，连连拍打着他那条断腿。

肖校长和李辰已经不想和程贵安说什么了，只有平校长还在跟他说：“你讲的这些是社会主义吗？社会主义应该是民主的、繁荣的、祥和的社会。”

“那就不搞无产阶级专政啦？这才是我们的传家宝。对那些新生的资本主义，不管是党内还是党外，就是一句话：专政，坚决打击各类现行反革命，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打击现行反革命？这些话，我们不提了吧？”肖校长说。

“不提了？哼。”程贵安又从鼻子里往外嗤了一口气，他有好长时间没有嗤气的机会了。“要知道，我们只是从策略考虑改变了一些提法，暂时不用过去的一些提法。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否定过这些说法。到必要的时候，就会毫不犹豫地再次拿起这些直截了当、明确无误的革命口号，用群众专政的铁拳砸向那些阶级敌人。”

平近芳对程贵安还不想甩手就走，还在耐心地说：“这样恐怕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了吧？”

“离社会主义有多远，你们有什么资格讲？在你们面前，我是老革命。只有我最有资格讲革命，讲社会主义。对于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来说，我只知道继续革命、永远革命，直到共产主义。”

肖校长悄悄地碰了下平校长的手，示意走吧。他们三个跟程贵安说个再见就往前走了。程贵安照例嗤了口气。

边走，李辰说：“怎么老程的思想这么僵化？”

肖校长说：“他不仅是思想僵化，而且是对左倾错误没有起码的认识，还有依恋，还有幻想。”

平校长说：“我想起李老师那年给学生出了个题目叫封建主义残余意识在当代中国有哪些表现，给我印象很深。现在看来真还要深一步认识。左倾错误在当前还有那些表现。”

肖校长说：“是啊，德国、日本都有一些参与过法西斯战争的老人在作忏悔、反思。但是在中国，有哪个整人者、害人者、打人者，还有过真诚的像样的忏悔呢？”

李辰说：“说不定还在角落里等着下一次整人、害人、打人甚至杀人的机会呢。时至今日，还有人在讲，文化大革命怎么不再来一次。左倾错误的残余和影响，在中国根深蒂固，令人担忧啊。”

“是啊，甚至在年青人里有这种想法的，也不乏其人啊，还以为红卫兵好玩呢。不认真去搞这段历史的教育，怎么能行呢？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大隐患啊。历史的灾难被淡忘，沉痛的教训被遗弃。弄不好，就会来个大反复、大折腾啊。”肖校长忧郁地说。

平校长说：“现代民主的教育，在中国真的很有必要。要不，你们两位在大会上发个言吧。”

肖校长说：“我就不讲了吧。今天是教师节，李老师作为教师代表应该讲一下。”

平校长说：“李老师，那你讲下？”

李辰沉吟了下说：“那就我讲吧。不过我就不讲政治啦。”

大会开始了。

平校长请肖校长和李辰上主席台。肖校长说，不用了吧。我们上了，程贵安不上，就不好。他要上了，又要弄得大家不愉快。

平校长在讲了教师节的意义、尊师重教的道理和布置了学校的一些工作任务之后，说：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教师代表，那就是李辰老师。

她说李老师是林海秀烈士的爱人，是我们龙头中学资历最早的一位老师，在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之后，对教育事业依然无怨无悔，为教育改革作出了很多贡献。现在我们请李老师讲话。

热烈的掌声响起，李辰在掌声中走了上去。站在主席台上，抚摸着话筒，看着下面一片火红校服衬托着年青的脸庞，他哽咽了。他当教师几十年，还从来没有在大会上、在主席台上讲过话。

他停了停，开始说了：“我羡慕你们呐，同学们！有的同志说羡慕我，因为我已经退休了，不用工作也可以拿退休工资，我的孩子也大了，都已经大学毕业了，不用我操心、不用我负担，一切都可以高枕无忧了。而你们还要读书，还要考试，以后踏上社会还要参与竞争，还要一直努力工作几十年而不能松懈。但是，我还是羡慕你们呐，同学们！

有一首歌说得好，这是首流行歌曲。别看我年纪大了，我还是挺喜欢流行歌曲。我不会唱，只能念给你们听了：

也许你没留意，你也许不相信，

有多少人羡慕你，羡慕你年轻。

这世界属于你，只因为你年轻。

你可要抓得紧，回头不容易。

你们会唱吗？”

同学们一片呼应：“会！”

“那你们就唱一遍！”李老师说。

会场上此起彼伏地响起了歌声。

李辰见差不多了，招手示意停下，又接着说：“我就是一个羡慕你们的人呐！

我羡慕你们，是因为你们年轻。正因为你们年轻，所以希望才属于你们，机会才属于你们，美好的前程才属于你们。

我羡慕你们，尤其是因为你们赶上了好时代，赶上了中国几千年、解放后几十年来少有的、难得的好时代：政治开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你们拥有你们的父辈从未有过的有利条件。你们可以尽情地欢笑，尽情地培养锻炼自己，尽情地发挥你们的才能。

当然，新的时代给了你们优越的条件和从未有过的好机会，同时也向你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你们具备更高的素质。作为一个老教师，我衷心希望你们能不断地全面发展，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创造性地学习，做个具有现代意识，掌握现代知识和技能、拥有强壮体魄的现代社会的合格成员！”

浪潮般热烈的掌声又起。

最后是学生代表、应届高中毕业生经普仁发言。经普仁是经学文的儿子。

第二十三章 另一种牵挂

1978年1月23日

龙头乡南海沿的开发，在纪乡长的奔波之下，已经初具雏形。

沿海几十米、乃至上百米宽的沙滩，被清理了出来。相当长的一段距离，辟为海滨浴场，建起了相应的一套淋浴房、衣帽间、小型休息室、简餐厅、停车场等等。尤其是搞起了几个小型的现代雕塑，修了一段观光步廊。海边撑起了几把五颜六色的遮阳伞，翻卷的海浪里几个穿着泳装的人在嬉戏。虽然不能与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相比，但乍一看，还真有点现代旅游休闲区的风貌了。沙滩的东北面，建起了几个宾馆和外地单位的度假村。龙头镇的面貌在这儿有了历史性的变化。

纪乡长在沙滩上往海角一带漫步，看着沙滩，看着大海。大海的美丽与壮阔，在眼前一览无遗。无边无际的蔚蓝的大海一直铺到天尽头，蓝得叫人神往，叫人心醉。宽阔的金色沙滩沿着海边往两侧无限延伸，直到隐没在远处海陆之间灰蒙的山峦之下，如同蓝色大海与绿色大地之间一串金色的项链。那脚下永不平息的白色浪花就像项链上镶嵌的水晶钻石，闪烁着光芒。这段在国内少有的黄金沙滩，过去沉寂了千万年。被搅得驴嘶马叫、人声鼎沸的，只有本书中提到过的三次。一次是1949年把登陆的国民党从这儿赶下了海；一次是1958年大炼钢铁时搞沙滩铁矿；再一次是1965年，把又一次登陆的国民党特务在这儿全部歼灭。每一次都在纪乡长的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如今，龙头海滩披起了盛装，迎来了她的新生，唤起了她的青春。

这一阶段工作很辛苦，但也是纪乡长觉得这是一生中最值得、最欣慰、最有成就感的岁月。一个曾经连光屁股小孩也难得来的海边，换上了现代化的新装，怎么能叫人不高兴。

纪乡长跨过几块礁石，越走越慢，凝视着地上的每一处细微。这里的每一块岩石，每一颗沙粒，甚至每一朵浪花，都和他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他怎么会忘记，这里曾是他和他的战友们浴血拼杀的疆场。他似乎又听到了战友们的呐喊，伤员的惨叫，呼啸的枪声和震耳的爆炸；似乎又看到了滚滚浓烟，看到了熏黑了的沾满血污的面庞和横七竖八的尸体；似乎又闻到了布满整个天空、呛得令人窒息的火药味和催人呕吐的血腥味。这里曾经是战场，倒下了无数战友和敌人的战场。这些是前来旅游度假的人们决不会有的感受，而纪乡长却每次都能感受到，而且感受得越来越强烈。

在海水冲上来又退下去的一块礁石边，他突然停下来，除了想起战友，又想起了另外一个人，一个不是战友与同志的人，而是一个敌人。在1949年反击国民党登陆的血战中，这儿倒下了数百具国民党的尸首。有一具，他印象特别深刻，始终难以忘怀，就是那个支排长。

这个国民党支排长就是死在这块礁石上。纪乡长记得很清楚，那人是在宗发奋被人击伤之后，被大郑打死在这儿的。纪乡长所以还记得支排长，是清理他的尸体时，在他身上发现了一封他的老父亲的来

信。在信中，老人哭诉凄惨的家境，深深地打动了纪乡长。他一直把信留着，文化大革命中居然也没有被抄走。

回到办公室，在最角落桌子的抽屉里又翻出了那封信。将近四十年，信纸发黄了，墨迹变淡了，原先被海水泡渍的印记更明显了，但依然是原样保存着。纪乡长觉得，对对方军人下场的关注，不是兔死狐悲，这也是对人的命运的关心。双方的军人都是人类社会自相争斗的一部分，哪一方的命运都值得关注，不管是胜者还是败者。

他甚至想要照着信封上的地址，去看看支排长的家人。在贫病交加、横征暴敛中被逼得走投无路的那一家老者、寡妇、孤儿，最后的境况会怎么样，能撑得下去吗？现在还在吗？很早，纪乡长就有这个想法，几十年都放不下。随着岁月的流逝，现在更强烈了。

他去跟潘场长讲了。

潘场长住在董平章房基上翻建的屋子里，生活还挺悠闲。因为没有他的自留地，就在不大的院子里种满了黄瓜、西红柿这些，连院墙外墙根下也长着一排月季，从春到秋都开着美丽的花。在董平章和赵玫曾经生活过的这块土地上，几乎能闻到他们的气息，潘场长觉得心里踏实，感情上没有了负担。他觉得这儿就是他最好的归宿，只是他的老伴并不知道他心中的这个秘密。

潘场长对老纪说，他也有这个印象。当初在南门外小山上开连队干部会，纪排长念了这封信，他也记住了。都是当兵的人，虽然上了战场，各为其主，但那些国民党兵，也往往是身不由己，走错了路。责任不能完全由他们自己来承担，更何况是他们家中的妻儿老小。

潘场长说，当时他在外当兵打仗的时候，家里的老父母，也是整日提心吊胆，夜夜睡不着，人同此心啊。现在有时间，也有这条件，就去看看吧。

纪乡长也是觉得这段时间有点空闲，请了一周的假。除了文革中间，纪乡长还从来没有请过这么长的假。他跟祖云涛说，他要去看一个远方的朋友。他还带了一千元钱，万一那家真需要补贴一点的话。

支排长的老家在湖北汉水边，按照信纸倒也不难找。

矮矮的山丘，绿树葱浓，山前是一片片的稻田。稻田和山丘之间是一座座的农舍，有的也盖了两层，一派平和安详的气氛。

到了村里，一打听，都不知道有这一家，说是年代久了，找老一点的人吧。

终于找到一个六、七十岁的人，听说是打听支家的，便十分惊诧，有几十年没有人来找过支家了。

“你们是支家的什么人？远房亲戚？他们家好像没有北方的亲戚。”

纪乡长他俩没法解释，只好说是“地方志”办公室的，来了解一些以前的情况。

“这个你们就问对了。我的话，你们能听懂啊？地方志，怎么不找湖北人，找你们北方人来写？”

“能听懂，您老稍微说慢点，就行。”

老人是村上的老住户，情况还是挺熟悉。他说，支家早就没人啦。抗战的时候，张自忠在这一带打日本人，支家的男人也跟着出去当了国民党兵。后来听说是当了一个小官，至于是什么官，也不清楚，就是听他爹说过。他本人开头两年还回来过，以后就没见过。后来就没有音讯了，到现在不知死活，也不知道是不是跑到台湾去了。虽然他家是国民党的官，但是生活一样很苦，没有别的来源，也没有什么钱寄回来，一年能有一两封信回来就不错了。解放军打过来那一阵，社会很乱。解放军穿插很快，国民党到处乱跑，南面那个镇比我们这儿还早解放十天，解放军住了两天就又走了。一会儿这边枪响，一会儿那边枪响，都不知道往哪儿躲。他媳妇就是在那时候跑没有了，不知道是跟着解放军跑了，还是跟着国民党跑了；还是被人掳走了；或是自己留在哪儿了，死在哪儿了，都不知道。她娘家人也不知道。那一阵子，什么事都有，国民党的太太小姐被抢得光着屁股在路上往南逃的都有。

他那小孩？他那小孩，没等到解放军来就死了。他爹，解放后在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死了。其实，村里面知道他是早年的私塾先生，家里日子跟贫雇农也差不多，没准备怎么斗他。但毕竟他儿子是国民党，批斗时一起拉上了台。一上去就不行了，到底是年纪大了，家里就剩下他一个人，几天都没吃饭，身体本来也就不行。上去就倒下了，反而是村里第一个死的。

他家的房子？早就塌了，早没了，连个影子也没有了。

支家的事情，也就剩下我嘴里的这点了。等我死了，支家就连我这几句话也没有了。

晚上，回到县城里的招待所，纪乡长和潘场长也是感慨无比。

纪乡长摸了摸包里没拿出来的那一千元钱，许久没有说话。

都知道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原来付出这个代价的还不只是解放区军民。有些事情，到现在再来讨论或许是多余的了，但还是不免叫人感叹万分。

突然总台的服务员在门外喊上了，“海源来的纪同志，长途电话！”

纪乡长一惊，翻身下床，出去听电话。

不一会儿，纪乡长回来了，一进门就慌忙整理起东西。

“怎么啦？出什么事啦？”潘场长一头雾水，忙问。

“县委来了电话，说是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还指名要到龙头海边。叫我务必明晚赶回县里。”

“能来得及吗？都夜里了，还有车吗？”

“我问了，半夜有趟火车到武汉。明天再坐飞机到黄港，要是顺利的话，明晚能赶回县里。”

“到底是现在交通方便哦。我跟你一起走？”

“你就不用这么急呼呼地连夜赶了。你明天白天到武汉，再住一夜，去看看黄鹤楼。好不容易来一趟。”话没说完，到底是军人出身，纪乡长已经挎上包走出房门了。

第二十四章 胡耀邦视察

1978年1月24日

三天以后，潘场长也回到了龙头。第一件事就是赶过来问纪乡长，是什么领导来，把你叫得这么急。

纪乡长兴奋地说：“大领导！是大领导啊！”

“大领导？哪个大领导啊？县委卞书记来，不用这个样吧？”潘场长疑惑地问。

“是总书记！胡耀邦总书记来龙头视察了！”

“是吗？胡总书记！他可是我们最尊敬的改革家啊！”潘场长也大为振奋，“他说了什么？”

“他说我们改革开放的力度还不够，很多地方还要继续深入改革，思想还要再解放。要好好开发沿海地区。他还到南海沿的沙滩上走了走，亲笔题写了‘万米黄金海滩’的字幅。”

“那龙头就有大发展了。”

“是啊，今天我们乡党委就要研究，具体落实总书记的讲话精神。”

龙头乡政府的小会议室里，热气腾腾。

县委卞副书记在主持会议，首先他宣布了县委对于沿海开发的机构调整和人员安排。宗发奋马上竖起了耳朵听。县委决定为加强对沿海开发的领导，县里成立领导小组，卞书记亲自任组长，纪海洋任副组长。成立相当于乡镇一级的沿海开发区管委会，纪海洋任主任。同时，将龙头乡正式更名为龙头镇。乡长、乡政府、乡党委改叫镇长、镇政府、镇党委。镇一级的领导干部，比原先乡里的干部一律提高半级。比如乡长原先是科级，而改为镇长后，原地没动，就升为副处级了。这一宣布引来了满屋子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大家盼的就是这个。

为了便于开发区与龙头镇的工作协调，纪海洋兼任龙头镇党委书记，祖云涛任副镇长（主持龙头镇工作），宗发奋、经学文原位不动。宗发奋一听又耷拉了耳朵。

纪海洋问：“那我们还用搞个镇党委、镇政府的成立大会和挂牌典礼？”

祖云涛说：“那就不用了吧？现在要办的事情太多。有这个时间和精力，还是去做点实事吧。”

卞书记说：“那也行，就不搞那些表面形式的东西了。我在这儿表个态，我们县委全力支持龙头沿海的开发，决不辜负总书记的期望。下面你们谈一些具体设想吧。”

祖云涛首先发言：“当务之急是要完善海滩的服务设施，扩大旅游项目，比如沙滩运动啦、海上摩托啦，要让人家玩得起来，玩得开心，增加咱们龙头海滩的吸引力和知名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发展旅游业，不能只知道种地瓜。”说得大家都哈哈笑起来。

纪主任说（这回又要改过来叫纪主任了），“讲到发展第三产业，海边要多建一些宾馆和度假村，这样可以增加收入、提高人气。别一到晚上就黑灯瞎火的，没人影了。我可以叫老潘、老叶上新疆拉一些单位来建疗养院。他们那儿哪能有这样的好环境。”

经学文说：“纪主任讲的是个好办法。不但要拉外地的单位来建疗养院，还要拉他们来投资建厂。咱这儿建的不但是旅游开发区，同时也是经济和技术开发区。不但拉外县市、外省市过来，我们还要引进外资，给他们优惠条件，让他们过来办独资、合资都可以。”

卞书记称赞说：“你这个想法好，思路开阔，我们的干部就要有这种开拓精神。我记得上次谁跟我讲过，你们龙头有个海外人士的儿子，要扩大投资、扩大厂房，还有人从中刁难。是有这回事吧？谁干的？”

他们几个相互看看，怎么说呢？宗发奋已经练出来了，没有低下头脸红，而是照样若无其事地看着卞书记，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

卞书记也并不是真的要追查，便对经学文说：“你接着讲吧。”

经学文接着说：“我们可以划出一片土地，平整以后卖给这些厂商。我们镇政府又可以收回一大笔钱，再用来推动开发区的建设。”

“这个主意好。当然出让土地的钱，不能给你们镇上，至少大部分不能给你们镇上。由县里面统一投入开发区建设。好，这个意见好。”听到现在，卞书记对这个提议最感兴趣。

宗发奋察觉卞书记对这个话题有兴趣，也开了腔：“咱们还可以在海边划出一片地盖别墅，卖给黄港、省城的有钱人。听说北京都有人愿意上海边来买房，夏天过来住。这个卖地的钱，会更多。咱可以多盖几套，咱自己镇上的、县上的领导，可以每人给一套。”

纪主任觉得不对头，刚想说，一看卞书记好像没有反对的意思，也就没张嘴。

卞书记把手里的笔在桌上敲了两下，说：“给，不大好吧，不能白给吧？”

宗发奋马上就说：“不是白给，咱哪能让领导犯错误呢？多少交一点，算是集资建房，不就行了吗？”

卞书记点点头，“这还差不多，可以考虑。不过先得把开发区搞像样一点再去建别墅，不然太显鼻子显眼啦。”

祖云涛又接着发言：“还有个大事情，搞这些项目之前，先要完善基础设施，通水、通电、修路。不能像经大臣那样，住着二层的楼房，拉屎还得上院子里面的茅坑。”

卞书记听了也带头哈哈大笑起来，“咱们以后的别墅，可不能那样。”

纪主任说：“说起修路，我还是建议龙头镇从北到南，修一条笔直的象模象样的等级公路。从县城过来，走李家泊，在大河上修一座大桥，穿过龙头镇，往南直到海角，多便捷！”

卞书记听着也点点头，“这条路，不光是你们龙头的，县上可以出一部分经费。”

大家都说：“好，好。”

宗发奋说了：“修这条路，别的没什么问题，就是要穿过北门口。北门外有座毛主席语录牌，这怎么办？”

卞书记也愣了一下，说：“你们考虑怎么办？”

“我们讨论过多次，意见不统一，决定不下来。”纪主任说。

“我的意见一直就是拆了它。我们处理问题要从实际出发，从发展生产力出发。就让一块牌子老是挡住我们的路？”经学文说。

“这可不是一块普通的牌子啊，说得这么轻巧。”宗发奋说。

“现在你们的意见呢？”卞书记问。

“我的意见也是拆了它，让路。”祖云涛说。

“我也赞成拆了。”纪主任说。

“多数同意了，就行了，发扬党内民主嘛。”卞书记说。

“那得做书面记录，作为一个决议，大家签字。”纪主任认真地说。

“呵，还挺当回事啊。那你们记吧，作为镇党委的工作记录。我就不在里面了。”卞书记笑着说。

纪主任在记录本上写好了，自己先签上了名。祖云涛和经学文也都签上了。纪主任把本子传给宗发奋。

宗发奋推脱说：“我不同意，也签字啊？”

纪主任说：“不同意，就签不同意的意见。”

卞书记也说：“既然签，那就都签吧。”

宗发奋没办法，也只好潦草地画了几下。

祖云涛又接着说：“我还有个建议，既然修了路，通到了海角。那干脆就接着在海角建一个港口。”

“建港口？！”大家听了都一惊。这可是天天守着大海也从来没想到过的事啊。

“可是一个大事啊。那得多少钱？”经学文说。

“一下子修不了大的，可以先建一个小码头，分几期来。用他个三年、五年、十年的，就能建起来。”祖云涛说。

“对，对。我们可以向上级申请财政支持，县乡进行自筹匹配。这个办法可以。”纪主任说。

卞书记听得有些迷糊，没反应过来。

纪主任解释说：“就是，比如说咱们县里出100万，请省里出200万，再请中央财政出300万。把建设龙头港的意义讲重要点，发展前景讲美好点，上面肯出的。等把项目拿下来，我们这100万出得了还是出不了，就是另外回事了。”

“哦，哦，我明白了。”卞书记拍着脑袋笑着，“我想起来了，这就是叫钓鱼工程吧？”

“对，对，还是卞书记理解得快。”宗发奋附和着。

“好，好，就这么办。我叫县计委赶紧办。”

“有了港口，不但便于对外运输，而且还可以发展渔业。我们上外海去捕捞。”经学文说。

“是啊，长期以来我们守着大海，白白地看着浪花飞卷。我们开发海滩，是第一步。我们还要跨进海里，那个发展前景就没边了。”纪主任说。

祖云涛若有所思地说：“最近有个专题片，叫《河殇》。讲的是，过去我们属于黄土文明，比较封闭、比较保守，要向蓝色的海洋文明学习。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我们不是贬低黄土、不要黄土，而是要依托黄土，跨向海洋。到那时，就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要到大海里去游泳。那真是海阔天空，豪情万丈，前途无量了。”

“啊呀，还是你们年轻人行，接受新鲜理念快。以后你们多给我讲讲这些。”卞书记似乎也受到了感染。

“还有一件事，就是那个造纸厂。群众反映很大，污染太严重，整个一条大河都给毁了。时间长了，海水都要被污染，海边的环境、海上的渔业都会受影响。这个问题要趁早解决。”纪主任说。

“不行啊。”宗发奋一听要动造纸厂，哪舍得，这里面的好处，外人是不知道的，“污染是有点，但是财政上的税收、镇里的提成，群众又能卖麦草，解决了不少问题啊。尤其是算产值，能顶上全镇一、二十个村的农业产值呢。”

“现在不是不算产值了嘛，叫什么……几里地的屁？”卞书记问。

“叫GDP，中文叫国民生产总值。以前是算工业总产值，那个水分更多。本来一个厂几个车间，只要把车间叫做分厂，各车间的产值就可以重复往上加。现在不用了。”祖云涛在解释。

“嗨，有中国名字何必还要叫外国名字。这些老九……（说明：‘臭老九’是文革时期对知识分子的贬称，意思是排在‘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和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后面。）”卞书记知道说漏了嘴，赶紧用手捂上，笑了笑，又说：“习惯了，习惯了，哈哈。你祖云涛不在老九里面，是革命干部嘛。这些知识分子也是，

吃饱了撑的，直截了当说个中国名字不就行了嘛，就是和工农干部过不去。”卞书记又把手上的笔在桌面上敲了两下，说：“这个问题也要考虑哎。‘几里屁’一下子少了，对上面就不好说了。这样吧，在不减少‘几里屁’的前提下，你们想办法解决造纸厂的污染问题。至于用什么方法解决，你们看着办。”

会议安静了二十秒钟，纪主任说：“今天谈的意见都很好，都很重要，我提议整理一下，发给全镇各单位、各村。大家都讨论一下，怎么去做更好，还有哪些好办法。这样既能激发起大家的劲头，我们也能听到更多的好主意。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同样也需要发扬民主。”

“嗯。改革开放这几年来，我看你们的水平都提高了，思路也开阔了，也知道讲民主了。好，好！”卞书记最后说。

会议之后的第二个月，北门外的语录牌拆掉了。在一片尘土中，南北大路也开始修了。拆掉的，不仅是一块牌子。人们都在想，文化大革命大概是不会再来了，至少不会七、八年再来一次了。

半年后，在海角西边的海滨浴场入口处，竖起了一个巍巍壮观的大牌坊。牌坊上镌刻着胡耀邦总书记亲自题写的“万米黄金海滩”的金色大字。

这金灿灿的大字，受到了每一个经过这儿的人的瞩目。

第二十五章 台湾的“国民党弟弟”回来了

1978年1月25日

25.1 乡思难了

镜头再转到台湾。王立在彰化市郊小小的只有一台碾米机的米厂。

他从隆隆作响的机房里出来，站在门口满枝盛开着花朵的芙蓉树下，抽着烟，望着天上淡淡的云丝往北移去。他的心里很平淡，就像此时从头顶飘过的浮云，那么的薄，那么的透彻。来台湾眼看快四十年了，自己从无到有，从给人家挑担推车，到如今有了自己的米厂，应该是知足了。虽说自己的米厂往后也不会有什么更大的发展。因为近几年，台湾的农业不算景气，人都去了繁华的城里了。乡下的水田少了，种粮的人也少了，甚至吃的米也比以前少了。尽管翻盖了机房，换上了新机器，由一台混合机，变成了筛选、垄谷、碾米一套三台机器，出的米比以前多了。为了适应现在的消费习惯，也用上了五斤、十斤装的塑料包装袋。但挣的钱并没有比以前多多少，所挣的钱也不断投入在新机器上，再扩大也难了。搞深加工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都有困难。尤其是王立也没有这个劲头，自己觉得挺累了，想歇歇了。

但好像又歇不下来，心里又觉得重得很，压得很。虽然几十年下来，谋生早已不成问题，然而这生活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按说自己在这儿早就有了家，有了相处了三十多年的老婆。儿子也二十多了，都到了该成家的时候了，这生活应该是很安逸的了。留在他家打下工的、那个当年打海源时青年军的孔班长，对他羡慕得不得了，老是说，怎么前世修了这么好的福。

然而这里面的福不福，只有王立自己心里知道。跟老婆同床几十年，却依然形同陌路，都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或者是即使知道了也不理解为什么。连自己的儿子也是这样，父子之间没什么话可说。他儿子不想在家干这碾米的活，想和村里的许多年轻人一样进城里去，享受五颜六色的繁华。但是他又念不进书，才国小毕业，城里没有他愿意干而又干得了的活。每到这时，他儿子还反过来埋怨他爹，没能给他铺一条好路。去年家里买了一辆二手的日产工具车，他儿子可以四处开来开去，但从脸色看，他儿子依然情绪不高。

唉，王立心里知道，新住民和老住民之间，那种难以磨灭的隔阂和无处不在的差异，决不仅仅在于骂人时“干他娘”和“操他妈”的不同。自己亲生的儿子还都这样，这隔阂和差异可见一斑。

尽管看得见、摸得着的机房就在身后，机器在响着，脚底下还有一些微微的振动。王立总觉得自己生活在虚拟中。那机器、那机房，连同老婆、孩子，都分不清到底是虚幻还是真实。王立常常在怀疑这是我的吗？常常觉得这一切都不属于自己，这一切都会稍纵即逝。他甚至还问过自己，我是王立吗？

王立是我吗？王立不是哲学家，不知道这应该表述为虚幻的真实，还是真实的虚幻。台湾意识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对他来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他的耳边又响起了那首歌：

“三百六十五里路哟，越过春夏秋冬，

三百六十五里路哟，岂能让它虚度。

三百六十五里路哟，从故乡到异乡，

三百六十五里路哟，从少年到白头。

三百六十五里长路，饮尽那份孤独……”

也正是这样，王立没有更多的可想，倒是越来越想老家了。

随着岁月流逝，老家的印象越发模糊，然而思念却愈益加重。听说前些年，大陆上文革内乱，又是批斗又是武斗。据说只要跟台湾国民党有关系的都要遭殃，可自己虽然来了台湾，却是被抓来推车扛袋子、出苦力的，自己的父母应该不会被牵连吧。他们还健在吗？能吃上饭吗？还听说一年只发二、三尺布票，做半件衣服也不够。他们能有衣服穿吗？对大陆的传言难以计数，大陆之外的人，都很难想象那日子是怎么过的。每想到这儿，王立就揪心地疼，心烦气燥，难以言表。老婆和儿子，每到这时，只会用怪异的眼光看他，反过来倒觉得他才是个怪异的人。

王山哥哥，算起来已经有六十开外了，该早就成家了吧，按说他的孙子也会有了。对了，那个小妹，是叫丁妹吧？怪可怜的，要饭进了他家，早就回她老家了吧？好像娘有意思把自己和丁妹弄到一块儿，可没看我们还都是小孩子呢。他那时还不懂那些事。

这两年，又听说大陆也改革了，变好了。台湾这边，蒋经国先生主政以后，开放了党禁、报禁，解除了戒严，社会宽松多了。从1987年开春以后，很多老兵纷纷聚会，要求回大陆看看。一解乡愁，成了他们人生最大的、也是最后的愿望。有的人还真的跟大陆老家的人联系上了。

这在王立的心中激起了千层波浪，再也不能抑制。怎么地也要去问问，怎么地也要回去看看。但他既不知道家里现在究竟是什么情况，有没有人在；又怕给家里人添什么新的麻烦，听说“私通台湾”在大陆是个死罪。于是，王立郑重地向老家所在地的政府写了封信。这就有了本书第一卷开始时的那个镜头。

三个月后，龙头镇还真给王立来了回信。

当骑着摩托的邮差在门外喊：“王先生，有你的信。大陆转来的信！”王立扔下了手中的箩筐，就跑了出来，双手在衣服上擦了两下，接过了信。他笔挺地站着，眼睛直愣愣地瞧着信封，真的，信封的右下脚分明写的是海源县龙头镇秦有理。“这秦有理是谁？”他都没顾得谢谢邮差，就撕开了信封，把信纸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这才知道秦有理是家乡镇政府的人，他出面写的这封信。信上说，他母亲、大哥都在，家中平安，欢迎前来探亲、投资，镇外办将全力提供方便。

王立的心里这下像炸开了锅，再也收不回来了。他拿着信，跳着双脚叫着：“来信了！老家来信了！我娘还在，我娘还在哎！”

老孔连忙凑了过来，“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哎。”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喜悦。

他老婆和儿子愣愣地看着他，一言不发。

“我要回家看看，我现在就要回家看看。老婆哎，你帮我收拾一下。”哪知他老婆却阴沉着脸，冷冷地说：“去个老鬼啦。大陆那边都是个穷鬼，花那个钱，屁用啦。”

王立的热脸又碰了个冷屁股，转过来跟儿子说：“你跟我一起回去看看？看看老家，看看你奶奶。”

儿子一动也没动，更没有回音。

“听见啦？”王立又问，听到的回答依然是一个长长的逐渐降调的拖腔，“有一啦——”。王立知道，后面就不必再说什么了。

他只有转向孔班长了。只有孔班长的老脸上，还有一点兴奋。

“你可是盼到头啦，王老板。”老孔说。

“下回你也写封信，打听打听你老家的情况吧。”

“唉，一提老家就心痛啊，不提啦。我老家河南那一带，那几年打得比你们龙头还要血糊。国民党、共产党几次来回打，不管是国民党抓了共产党，还是共产党抓了国民党，都不会放过。我不像你是老百姓，我老家都知道我是被国民党拉走的，当了国民党兵。这几十年下来，不会放过的。我在那儿的时候就已经没了音讯，更何况现在呢，留不下的，留不下的。问了更伤心。”

老孔的神色黯然起来，王立也就不好多说了。

“你真要走啊？”他老婆倒是又问起来了。

“是啊，几十年没见娘了，她老人家恐怕也是在天天想我。”

“你实在要去，也不要多带钱啦。听说大陆那边的人，见了从台湾去的，就像抓到了财神，都拼命地要钱，再多也没有够的啦。”他老婆瞪大了眼说。

“我家哪有那么多钱啦，我也是知道的啦。”王立也用那种闽南腔说起来。

王立他老婆不知道有丁妹这回事，要是知道，恐怕死活也不会让他走这趟了。

停了一会儿，老孔又说了：“你真要是去了，要不就打听打听那个小孩的情况吧。就是那天我们攻上海滩以后，在半山坡救下的那个小孩。后来我把他交给了团部，在那个教堂里的团部，我还见过那个孩子，我记得他的名字叫狗狗。”

“对，对，你讲起过。那个小孩，我知道应该是辛家三少爷的儿子。那时被关在西北场院的地富家属，就这么一个小孩。”这民主村弄了几十年才明白的事，王立反而倒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啦？”王立老婆问。

王立和老孔把当年在血泊中救出狗狗的事讲了一遍。

王立老婆大骇，惊得都说不出话，许久才说：“没想到你老孔是个大好人啊。以前我都嫌弃你，嫌你要多吃一口饭，真是不应该。你跟王立一起回去看看吧。”

“我去干什么呀？我是一直惦记着这个小孩救下来以后的命运，在枪林弹雨中会是怎么样的结果。”

“唉，打仗，打仗，丢了多少人的命啊。”王立老婆叹气说。

十月，天凉快一些的时候，王立背着大包小包，拖着滑轮箱，踏上了归程。包里塞了一些台湾的小特产，像金门贡糖、蜜饯、茶叶、凤梨酥等。在台北登机去香港前，他去了一趟李策的家。

李策住在台北西区的一幢公寓楼里。他已经退休了，有时也出去做点技术咨询方面的活。他的一双儿女，都去美国读书又在那儿定居了。儿女们叫他们老两口过去住。按说出国对于李策，无论是经济条件还是语言方面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李策总说，再等等吧。他对于这片不是故乡的土地，心情也是百味交集。

而提起故乡，那种伤痛，又是王立所不能感受的。每一次想起老家，就如同撕裂一次伤口，撕心裂肺地疼。不去想它吧，可还有一个妹妹。虽说是必死无疑，可是又不能不想。他的身上时时感觉到妹妹对他的最后一推。这一推，是以她面对死亡而换取了他的活路。他时时也忘不了他的妹妹。大陆对于他，是实在不愿再去想，可又像总有很多的丝在牵扯着他。当然，他在妻子屠美丽面前，几乎从来不提这些，因为在屠美丽的心里有着同样深的伤口。

上美国去，到大洋那边去，彻底忘了这一切，李策又做不到。隔一条海峡总比隔一个大洋，离父母、离妹妹近一些。

当王立穿着西服，拿着大包小包，站在他家门口的时候，李策惊讶得不行。这位朴素了一辈子的农民兄弟，今天怎么这身打扮？

李策把王立请进客厅，知道了事情的原委，真替他高兴：“可喜可贺啊。这几十年就盼着这一天呐。美丽啊，美丽啊！王立弟弟的老家来信啦，他要回大陆去看看啦。”

屠美丽急忙从厨房奔出，也是一脸惊喜，“是吗？大兄弟啊。要回老家去看看啦？”

“是啊，是啊。可盼到这一天啦。”王立应着。

屠美丽请王立坐下后，对李策说：“我们要不要也回去看看。几十年了，不知道到底怎么样了。”脸上浮起了些许阴云。

“我们还不行啊。王立弟弟按共产党的划分是贫雇农，我们可是地富国民党啊。回去要是出了事，就后悔也来不及啦。”

“不会吧，我这几年很留意大陆的消息，说是地富都不算啦，以前国民党的事也不算啦。”王立说。

“说是这样说，不知道究竟会怎样。”李策说，“唉，是国民党害得咱有家不能回啊。”

“你不也是国民党吗，还说国民党不好？”王立问。

“其实，我是不相信国民党那一套的。以前在军舰上，那是集体加入了国民党。这事，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共产党老是拿参加国民党说事，实在是冤枉了很多。参加国民党的人，不一定信国民党那一套，就像参加共产党的人，也有很多不信共产党的那一套。离开军队后，我就退了。现在已经加入民进党了。”

“民进党？我们村里就有民进党哎，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好像都是本省人哎，你怎么会进去的呢？”

“民进党是反对独裁，反对专制，不管本省不本省。”

“这不是反对国民党吗？不怕抓起来啊？”王立有点急了。

“不怕，社会进步了，民主成了大潮流了。国民党再不变革，就没有出路了。”

“听说大陆也在搞改革，不像以前那样了。”

“不知道他们走到哪一步了。”李策淡淡地说。

“那我先去看看，情况清楚了，你再去。”

“好啊。你去了，务必帮我打听一下我妹妹的情况。”

“那当然，那当然。”王立连连答应。他们两个同村老乡，关系已经很久了。

“董平章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李策又想起了同村的另外几个人。

“还有那个连二娃，脾气太直了，没熬住啊。要熬到今天，就算真是共产党也不要紧了。唉，他家里还不知道他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我怎么跟他家里说噢。”王立自然也想起了刚来台一年多就被枪毙的连二娃。

又是一番感叹和悲伤。

屠美丽很想叫王立路过黄港时，也能去打听打听她家的情况，又觉得此事非同一般。她家是国民党军队的，既不容易打听，别再又节外生枝，连累了别人。也就在心里作罢了。

25.2 故乡的云

本来，王立是想从广州坐火车回来的，好省一点钱。但是他老婆自从听了狗狗家的事以后，知道他们曾经有过怎样的灾难，便对王立多了几分的好意，劝他说：“到了广州后，还是坐飞机回去吧。听说大陆的小偷多、警察多。火车上人多嘴杂，你又不大会说大陆上的那种话，别一不小心，又被人家偷了，又被人家抓了。还是坐飞机，早点到家算啦。”

王立坐上了从黄港机场到海源县城的长途汽车。

车窗外，路边的两行白杨伸向远方，一层层平缓起伏的山丘，一片片连绵不断的玉米地、地瓜地、花生地，一座座的村庄，虽然同样是绿的山、绿的地，但那绿也和台湾不一样，没有台湾绿得深，绿得

翠……王立一下子想起了，这就是家乡，这就是离别了几十年的家乡啊！

王立趴在车窗上，一眼不眨地往外看着，一秒钟也不舍得闭上，每个景色都舍不得放过。是的，这就是真真切切的家乡。

这几十年，王立再苦再难从没掉过眼泪。这时，心里一酸，眼泪却不住地下，两眼都迷糊了。他怕哭出声音，就捂住嘴，咬着嘴唇，心里却在不停地喊：“回来了！我回来了！”

歌曲《故乡的云》或许最能描述王立此时的心境：

“踏着沉重的脚步，归乡路是那么漫长。

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

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

我已是一身疲惫，眼里是酸楚的泪，

那故乡的风，那故乡的云，

为我抹去创伤……”

虽然村舍有所变样，大都盖上了红瓦，刷上了白墙，但王立能看得出已经进了龙头乡的地界。车驶过赵村的桥，他知道这就是大河。到了，到了！西门外有一些二层的小厂房，那是认不出了。车在十字路口停下。王立下车，不需要东张西望，一眼就认出了那个陶家大院。他不需要打听，便背上包、拖着滑轮箱，急冲冲地往家走。

街上的人都看见了这个身着西服的王立。尽管在海源，甚至在龙头也有了穿西服的人，但人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从远方回来的人。可大家看不出来，这个就是王山的兄弟，这个在龙头镇、在民主村被议论了几个月的台湾的“国民党弟弟”。

王立径直往民主村的巷子里走，尽管不少房屋已经翻修，但他还是认出来了，不但格局没有变，有些院子他已能想起来是谁家的了。胡同里的人，站着好奇地看着他，有的还在小声议论：“谁家又来客了？”

王立走进了自己家的胡同，往前一看，自家的院子就在眼前！四十年了，一点没变，就站在那儿，等着他回来！

他三步并二步地向前跨去，还没到门口，就喊起来了：“妈，我回来了！妈！我回来了！”

他推开院门，一步就闯了进去，迎面走来一个短发蓬松、胡子拉茬的老头，满脸疑惑地问：“你是……”

王立想，这应该就是哥哥了，就大声地说：“我是王立，我是王立啊！你是哥吧？哥！……”

王立摔掉手里的行李就抱住了他的哥哥，“哥啊，哥……”大声地哭了起来。

王山这才抱着王立的头，细看着，一会儿才说：“你是王立？你是王立？兄弟啊，兄弟，你总算回来了，总算回来了……盼了几十年啊，妈盼得眼睛都快瞎啦。”这才猛地回头，喊道：“妈！妈！王立回来啦！”

王大妈跌跌撞撞地从屋里出来，用手揉着眼，嘴里在问：“什么？什么？王立？在哪儿呀？”

王立过来一把拉着王大妈的手，双膝下跪：“妈，妈！儿子回来了！你的儿子王立回来啦！”几行热泪涌下。

院子里，三个人相拥而哭。

丁妹和连四嫂站在一边也痛哭不止。

一声“王立回来了”，惊动了整个民主村。大家议论了几个月的台湾的“国民党弟弟”，真的回来了。

王家的院里院外，一会儿就挤满了人。

车素花、衣春玲几个扶着王大妈，这边鲁队长说：“快进屋，快进屋。其他人就留步，以后有时间。”

丁妹终于见到了她日思夜想的丈夫，西装笔挺，身体壮实，精神还挺饱满，已经完全不是当年的样子，也不是自己脑海里一直想念的那个样子。如果不说，一定认不出来。几次想上去喊一声，可自己破衣烂衫，早晨起来就忙得没顾得上仔细梳洗一下。这像个什么样？稍等一会儿，人少一点的时候再说吧。

丁妹一直站在一边，出神地看着自己的丈夫。

王立在人群中没注意到这一点，他抬起头看看屋子，还是四十年前的模样，只是更老了、更旧了，屋顶的毡草、门框、檩杆都暗淡的，甚至发黑了。进得堂屋，也是黑乎乎的。转过身进里屋。王山说：“兄弟啊，上炕，上炕。”

王立好不容易上了炕，想了几十年的炕，终于又重新坐上来了，怎么是这么硬，这么凉？记得儿时的炕好像不是这个样的。炕上的一床被，也是补丁叠补丁。

王立上得炕来，看着母亲头发花白，眼神蒙蒙的，不禁又心酸起来了，看来这些年，日子过得不易。

“妈，俺爹是什么时候走的？”

“别提你爹了，儿啊。一提你爹，娘的心就像刀戳一样。”王大妈的泪又涌出来，用衣襟擦着。一边有个女人从炕角抽出一块脏布，递给了王大妈。

“唉，兄弟啊。咱的爹，是在文革中被人打死了。”王山叹气说。

“为什么？”王立问。

“为什么？就是因为……”王山还真没法说就是因为你去台湾了，只好摆摆手，说：“唉，不提了，没法提这事了。”

王立心里挺疑惑，看着这破旧的屋子，家里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当，便问：“妈，你就一直住在这样的屋子？”

“我不在这儿，你哥嫂在这儿住。”

“那你在哪儿住？”

“我在那厢房住。”

王立从支起的窗櫺看到了那更加衰败破旧的厢房，脸上不由得有些不快。

王山忙解释说：“我结婚时，妈非要把这正屋让我住，她搬到厢房去。”

王立的脸色凝重起来，停顿了一会儿，说：“我给妈盖四间房，需要多少钱，你尽管说。”

那炕边的女人高兴得忙说：“啊呀，多谢兄弟了，这一回来，就叫你破费。这妈的屋，是好另盖了。我们这些年，实在是没力量。”

王立又疑惑地问：“这位是……？”

“哦，这是你嫂子，连四嫂。”王山说。

王立转过脸，看看连四嫂，点头道：“嫂子啊，你好。”又对他哥说：“你刚才说，……是连四嫂？”

王山又前后解释了一番。

连四嫂也怯怯地靠上来，轻声地问：“兄弟啊，当时孩子他二伯也跟你们一起去了那边，现在他怎么样了？怎么没有音讯来？”

王立只好如实相告，连二娃刚去台湾一年多就想跑回来而抓住了，还刚强得说自己就是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枪毙了。

众人都惊叹起来。

“啊？”连四嫂的泪漱漱地下。

鲁队长直说：“连二娃真是个好汉。他是我们民主村的又一个英雄啊！”

这时，小连子和高秀珍两口子挤进来，齐声叫道：“叔叔好！”一起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王山一一介绍。王立听说是连家的骨肉，也没有更多的喜悦，嘴上说着：“好，好。”

王立顺便也说起来自己的事，“我在那边也成了家，找了个媳妇是客家人。开始时说话也听不懂，两人像哑巴似的用手打比划。哈哈……”说着自己也失声笑起来。“有了一个儿子。可是到底是那边的人，不

像我，也不听我的。这次叫他们一起来，都不肯来。”说完把手一挥，好像那媳妇、那儿子也随手就挥掉了。

倚在房门边的丁妹，听着这话，脸色一下变得刷白，身子都晃了，使劲用手扶着门框。

王立这才注意到这位门旁边的女人，一个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破衣烂衫、目光呆滞、木讷无语，连街头乞丐婆也不如的老妇人。

王立看了那妇人一眼，眼睛一瞥，就对王山说：“这是谁？怎么这样的人也挤进来？”

王山一惊，说：“这就是丁妹呀！”

“丁妹？丁妹是谁？……哦，哦，我想起来了，妈从西边来的人里领养的一个小姑娘，怎么还在咱家啊？没回她老家啊？”

“儿啊，你糊涂啦，这是我给你配的媳妇呀。”王大妈说。

“哦，是吗？”等王立再转过头去，丁妹已满脸泪水而去。

鲁队长伸手想拦一下，说了句：“丁妹，你上哪？”

丁妹没有应答，从门口挤了出去。

“这，这……这怎么说呢？”王立见丁妹跑出门去，就对他娘说：“我就没觉得她是我媳妇，一直当她是个小姐姐，我们一直连那事都没有。”

“哎呀，她一直等了你这几十年，比我还不容易啊。”王大妈含泪说着。

“那她跑哪儿去啦？”王立急急地问。

“是回她那倒屋了吧。她心里难受，让她歇一会儿吧。”连四嫂说。

早已成了丁婆、甚至丁老太的丁妹，在满院子人诧异的眼光中，并没有回她的倒屋，而是往外跑，一直往外跑，跑出了民主村，跑出了龙头镇，还在一直跑。

这就是自己想了几十年、等了几十年的男人吗？不但在那儿有了家室，有了后代，而且把自己忘得无影无踪，尤其在那么多人面前还不屑一看。

丁妹从看到王立的那一眼起，就知道她和王立已经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王立不属于她了，虽然他说出那种令她伤心欲绝的话，可也不能怪他，或许他真的是忘了，或许她和王立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是自己想错了。想错了几十年，可她又属于哪儿呢？她的世界在哪儿呢？

几十年来好不容易支撑着丁妹的那一点点的精神寄托，顷刻之间被彻底地最后地摧毁了。心如死灰的那堆灰烬深处，最后一个暗红的亮点被彻底地掐灭了。几十年的等待，等来的却是这个结局。此时，丁妹的心在颤抖，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不停地往前奔跑，往前奔跑。她好像从没有奔跑过那么多的

路，而她并没有感觉到奔跑，只觉得往前、往前、不断地往前，直到一个没有人的、别人永远找不到的、再也不能往前的地方。

她往前奔跑，过了前港，到了海滩，她依旧往前奔跑。那金黄的沙滩，蓝色的大海，在她眼里都已经没有了色彩。这儿曾经是她无数次望穿双眼、期盼丈夫归来的地方，是她和王溪拾到台湾国民党宣传品而使全家遭到灭顶之灾的地方，这时她全然没有了这些感觉。她只知道往前奔跑，去找一个自己的归宿，只属于自己一个人的归宿。

她已经碰到了冰凉的海水，但这并没有使她的精神有丝毫的清醒。她感觉到的，依然是往前、往前、不断地往前。身后的世界，已经没有她的立足之地。归宿就在前面，白茫茫的前面。当她的手脚已无知觉、呼吸已经窒息、身躯随波起伏而后下沉的时候，她就融化在了白茫茫的终结的归宿里。

她，丁妹，一无所有地来到这儿，又一无所有地离开了这儿。

她是四十年前那场血战的又一个牺牲者。

25.3 往事联翩

晚上，由村里出面，到海边的饭店宴请王立。这是民主村、也是整个龙头镇第一个正常地从台湾回来的人。村里的大小干部、亲朋好友都来了，连纪主任、潘场长、宗发奋和经大臣两口也都来了。只有于村长在炕上起不来了，没能来。

这也是村里第一次在海边的新饭店里请客人，村里、镇上来的人都很高兴。大家举杯祝贺，整整三十八年，王立又回来了，真觉得岁月如逝、命运无常啊。

还是鲁队长觉得少了个人，问：“丁妹怎么没来？”

“派人去找了。”彭小宾答道。

“吃完饭，我们都去找，一定要找回来。”车素花着急地说。

“小彭啊，等这儿散了席，叫村里的民兵出动，都去找。我们也都去。”杜家骏说。

王立有点不自在了，正巧平金刚举着杯走过来了。王立一见，又是一惊：“这不是金刚哥吗？那天我们一起在南港上，你怎么跑出来了？”

平金刚有点醉意，说：“是啊，老弟啊，那天在南港的几个人，就我跑回来了。没想到一南一北，就差了三十八年啊。”

“你是怎么跑出来的？”王立还在问。

平金刚颇为得意地又把当年翻入龙头城墙，几进几出的事说了一下，听得大家都入了神，仿佛又重新回到了血与火的时光。

“你真行啊。”王立夸奖地说。

“什么行不行啊？彼此彼此。听说你现在是个什么粮食公司的老板。托共产党的福，我现在也是造纸厂的厂长。你看家骏哥，也是貂场的场长。不管是海峡这头、海峡那头，都是企业家啦，哈哈。”

“我那算啥公司呀，也还是个小本生意。”

“别谦虚啦，王总。”秦有理也过来了，他作为镇政府外办的人，这个场合当然是要来的。

王立愣了一下，还从来没有人叫他“王总”。平金刚介绍说：“这位是秦有理，是秦德才的儿子，现在是镇外办的主任。”

“哦，就是你给我回的信？多谢啦，多谢啦。”

“这也是我份内的工作嘛。”秦有理挺大度地摆摆手，说：“不过，你今天按说应该先到镇政府来，先到我外办来。不是中国公民的，都得先到我这儿来登记，这样我才能帮你联系事务，维护你的权益啊。哈哈哈，不过也不要紧，不知者不为怪。哈哈，干，干，干了这杯。”

秦有理像他爹，也挺能喝，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王立看看自己杯中的酒，抿了一口，皱了皱眉头。王立是不能喝的人。

“王立弟，随意随意。”平金刚在边上解围。

“王总啊，喝酒可以随意。有件事可不能随意。”秦有理又接着说。

“什么事？”王立毕竟还是实在人，不明白秦有理这一惊一乍的。

“投资啊，回来投资办厂啊。发扬海外华人爱国爱乡的优秀传统，回来办个企业啊，我给你优惠。啊？”

“我那个厂就是我爷俩在忙活，勉强维持，哪有力量来投资啊？我回来看看老妈就是了。”

秦有理一听，泄了气，“你看你说的，没劲了吧。”转头就走了。

“王立，你讲讲去了台湾的那些人，情况都怎样啦？”经大臣把话又叉开了。

“唉，我们去台湾的那几个，也是各不相同，一言难尽啊。连二娃，白天我在家里说了，去了才一年多，就被枪毙了。”

全场一片惊骇。大家谁也没想到会是这样。

王立接着说：“他是个硬汉子啊。平时没言没语的，到了台湾，敢骂国民党。我想他也是心里上火，压不住呀。他对着国民党警察，敢挺着胸脯说，我就是共产党！英雄啊！”

“真看不出连二娃，是这样的一个好汉啊。”杜家骏敬佩地说。

鲁队长说：“得赶紧跟镇政府说，申报烈士啊。”

“马上办，马上办。我回去就跟民政干事说。赶紧往县民政局报。”纪镇长说。

“这恐怕还得有旁证吧。”宗发奋也算是在提个醒。

“那还得上台湾去外调啊？”平金刚半开玩笑地说。

“咳，要办总是有办法的。”潘场长说。

小连子脸带喜色地说：“那我也是烈属啦。”

“唉，那一边是英勇牺牲，这一边你们连家这些年被当成国民党家属。受这牵连啊，真是不应该。”经大臣说。

“嗨，这事我们也是一直都没搞明白。就听说他是最早打鬼子的时候，在北山里入的党，后来回到家因为村里的党组织还没公开，他没能转组织关系，村里也搞不明白，就这么拖了下来。几次政治运动、清理阶级队伍，外调来外调去，把狗狗都翻出来了。连二娃的事，却还没搞明白，对不起人家啊。”杜家骏说。

辛狗狗说：“嗨，这种阴差阳错的事还有呢，不少当年的国民党抗战老兵，只看他们是国民党的一面，不看他们打鬼子的一面，后来的境遇都很凄惨。比如前一阵，我爹回来，讲起了他在劳山抗日游击大队的老乡杭令桥，家住新河镇的。抗战结束后，他们大部分人编入了国民党军队。老杭因为挂念家里老婆孩子，硬是要回家去。老爹叫我帮他打听打听那老杭回老家以后的情况。我去新河镇一打听，结果怎么着？刚解放，1950年，就因为劳山游击队是国民党的，被当成历史反革命镇压了。老婆吓得改嫁了，儿子在文革中也被打死了。唉，一个对民族有功劳的人，就这个下场。下回要是老爹再来问，怎么跟他说？”

“那些事，就更说不完了。”大家一阵唏嘘。

皮安已算是村里的老人，更是感慨不已。他说：“这人世啊，真是说不准。有句老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现在弄得是一会儿河东，一会儿河西；上面是河东，下面是河西；又是河东，又是河西。实在看不懂，说不清了。”

大家连连点头。

“再说说董平章吧。”王山接着说，众人的眼睛又刷地聚焦过来，一齐静了下来。

“董平章也是这样，见不到人了。他和我不一样，他是真想这儿的家，想老婆孩子，干什么也没有心思，干什么也搞不起来。我知道，他是把好手，是个能耐人，可惜了。”王立说到这儿，满屋子静得鸦雀无声，盯着王立看。

王立觉得很奇怪，接着说：“后来高增光给他找了个差事，他就离开了我们，也不知上哪了，再没听说。”

大家都沉默了，王立更奇怪了，转过头看大家。

鲁队长说了：“董平章回来了，比你先回来了。”

“啊？！”这下把王立惊得不轻。鲁队长把前后的事一说，讲到董平章到了潘场长那儿服刑，讲到赵玫死在南疆荒漠，讲到董平章最后把赵玫的尸骨抱回了民主村，最终吊死在老家的旧房子里。

王立听得是目瞪口呆，他怎么也想不到还有这样的事。“那个高增光真是个王八蛋，把好好的平章哥弄成了特务，祸害了他们全家！”王立气得直拍桌子。

平金刚说：“那个高增光自己也没有好下场，1965年反攻大陆，他也来了，就在这儿西面一点的大河边上来的，被我们抓住，枪毙了。”

“是吗？”王立又是一惊，“怪不得以后再没见到他。1949年，国民党进到龙头镇里，数他最凶，比陶富贵跳得还高。杀害姜雪花那天，听说那个惨啊，我们在沙滩上扛箱子，没过来。到台湾以后，他还管了我们一段，好厉害哦。死得好，死得好！”

“那个陶富贵呢？”经大臣问。

“没看见，到台湾后就没听说他。他也逃出来啦？”

“这儿也没有他哎。”车素花说。

“莫不是那天解放军打沉了一只船，陶富贵就在那船上？”经大臣说。

“很有可能哎！”鲁队长说。

“如果去了台湾，应该能知道，我们几个相互间都知道，连国民党军队里的几个，我们也都知道。那个罗团长，到台湾后，也是和高增光在一起的。前两年听说已经病死了。我们村那个李策从工厂退休了。”

“李策？就是那个李芹的哥哥？你知道他的情况？”鲁队长急着问。

“是哎，我们都是一个村的，现在相处的就像亲戚一样。来的时候，我还特地上他家去了次，他特地要我回来问问，他妹妹李芹后来怎么了。”

满屋的人又沉默了。

“他说，他和他妹妹是在村里那个井台边分的手。他妹妹腿被砍了，走不动。李策背着也走不了，他妹妹一把把他推开了。李策说，他跑出来了，一直惦记着他妹妹最后怎么了。”王立还在接着说。

大家依旧是沉闷。

鲁队长打破了僵局，说：“他妹妹就死在那井里了。我们一直不知道，直到1958年挖水井才发现她的尸骨。”

这回轮到王立哑然了。许久，才说：“国民党在龙头的那几天，我还见过她。她头上还戴着他哥哥从英国带回来的发夹，亮锃锃的，很显眼，很好看。”

纪镇长手指向另一桌说：“你看，是不是这个？”

王立顺着手指望过去，是一位美艳俊俏的少妇，头上果然是那只亮锃锃的发夹。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我能记得。”

叶丽娜站起来，向王立点个头，嫣然一笑。

王立从未见过这样漂亮的女人，也点头傻笑着。

“这位是当年驻在新河镇的叶连长的女儿叶丽娜。”潘场长起来介绍。老潘又把赵玫在新疆的一段和他们部队怎么到的新疆又说了一遍。

“事情是这么复杂，又这么凑巧，真叫人难以相信啊。”王立感慨地说。

使王立心灵受到震撼的不只是叶丽娜的美丽，而是这亮锃锃的发夹在几个美丽的女人的头上转换，命运竟是这样发生着鬼使神差般的巨大变化。

“原来这个发夹还真不简单，是这么来的啊！”杜家骏说。

“李策给了她妹妹，李芹又给了赵玫，后来又到了小叶的头上，写本书都说不清楚。”彭小宾说。

“可是这发夹怎么从李芹到了赵玫姐的头上呢？应该说李芹还没戴几天哎。”衣春玲又深究起来。

“噯，这倒是哎，这个环节怎么连起来的呢？”鲁队长也在思索着。

“你们要写侦探小说啊？还这么研究啊？”车素花说。

鲁队长说：“我总觉得，李芹和她父母死得挺可惜。他们家日子过得那么苦，不应该划成富农，就是因为李策出去念书了，家里没人种地，请了个帮工，就成了富农。”

“当时有些政策定得有点左，执行起来更左，就是使得我们的革命，付出了更多的不必要的代价。”经学文又深思着说。

“解放以后，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所以要改革开放嘛。”祖云涛说。

宗发奋和秦有理悄悄地没说话。

“我们在台湾不但见到了国民党军队的人，还见到了解放军的人呢。”王立忽然又冒出了这么一句。

“谁呀？！”全场又是一惊，异口同声地发问。

“胡指导员！”王立说。

“啊？！”今天晚上谈论的事，件件都惊人，最惊人的莫过于这一件了。

“我没见到，跟我们那批一起过去的东南村的居小三看见的，是他后来告诉我们的。那还是五七、五八年，在基隆老街，老胡在那挑着担子卖宁波汤团。”

“是他吗？”潘场长问。

“千真万确。居小二就住南门口，跟你们兵营可熟了。你们记不得他，他可是记得住你们。他正想上去说话，老胡大概是看出来了，挑起担子就走了。以后就再也没见着。”王立说。

“他卖宁波汤圆行，张嘴就是一口正宗的宁波话，大家都会相信的。”经大臣笑着说，引得大家的气氛也缓和了点。

“不会吧？胡指导员革命觉悟很高的，他给我很多帮助，我的很多革命道理就是从他那儿学的。再说，他怎么跑到台湾去的呢？”宗发奋这时插上了话。

“王立先生说得对啊。好多事情，几下里这么一对，一理，就理出头绪来了。我们团在朝鲜的最后一仗，没打好，损失了一些人。老胡是在那一次列入失踪人员名单的。1953年停战后，双方交换俘虏，有一些人没有回来。弄了半天，没想到他去台湾卖汤圆去了。”潘场长说。

“是啊，那时，他的革命调子唱得最高。”纪镇长说。

老叶也插进来说：“如果接着刚才的话说，有时也是我们的政策没有把握好，造成了一些副作用。我们要求战士只能英勇牺牲，不能投降，也就没有被俘这个概念。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对一些不是自身原因而被国民党俘获的战士，后来处理得过于严厉。这一点，老胡自然是知道的，很可能他因此而不敢回来。”

屋里又一次沉默。今天聚会的气氛真是大起大落，惊讶与沉默几度交替，诉说着这四十年的风云变幻、人世沧桑。

“哦，还有个国民党兵呢，现在住在我家里，是青年团的一个班长，姓孔。1949年反攻，他们是在最前面。他叫我找一找当年他在望海山坡从刀下救下来的一个小孩。我推算了一下，这个小孩应该就是辛家三少爷的孩子，叫狗狗。”

王立的话音未落，邻桌站起了一个魁梧壮实、衣着得体的中年人，很客气地向他点头，“狗狗就是我，我就是辛狗狗。”

彭小宾忙介绍说：“这位是我们兴华针织厂的辛总。”

狗狗过来拉住王立的手说：“那位救我的恩人，真的是在你家？”

王立把孔班长那天的事一说，大家前后都能对得起来，“是哎，是哎，是这么回事。”

狗狗的眼圈立即红了起来，“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王立一声叹息：“他无家无业，孤身一人，我看他日子不好过，又是一个船上过去的，也不像个歹人，就留在我家帮个工。在他们老兵里面，无依无靠、无家可归的可怜人很多，他们以后的日子真不知怎么过。”

狗狗说：“我们这儿现在还去不了台湾。你回去后，请他过来，我养他一辈子。”

“好，好，你有这份心就好。我回去跟他说，他一定会很高兴。”

“这样吧，你给我留个你公司的地址，我从美国的客户公司转一万美元过去，先给他用着。”

“哇！”满屋里又是一片惊讶声。狗狗家自己还没有屋子，就住在厂里面。

“哦，他现在住在我家，钱上面还不缺花的。”王立替孔班长客气起来。

“这是我的一片心意。我再无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的一切都是因为他才有的。”狗狗真诚地说。

“好，好。”王立从西服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狗狗。

名片在龙头还是新鲜的东西，平金刚几个都围过来看。平金刚连说：“好，好，是个好东西，我也去印一套，联系人方便多了。”

“我说王立啊，你也回来吧，把厂也搬来。”杜家骏说。

“喂……”王立的话，一下子打住了，“这边也是家，那边也是家，难办呐。”

“王立啊，不管你在哪儿，你可要好好待丁妹啊。她可是为你苦守了几十年噢。”车素花好心地劝说。

“是啊，我们这个家，这些年丁妹出的力能顶一半。没有她出的力，我一个人也是顶不下来的。”王山说着。

王立低着头。

“好，这样吧，时辰也不早了，咱们也一起去找丁妹吧。”杜家骏说。

25.4 家务事

这一夜，王立没睡着。

这一天，对王立的冲击太大。父亲的惨死、母亲的伤悲、兄长的艰难、房屋的破旧、家乡的变化……，哪一件都重重地打击着他的心扉。这一切对王立来说，不叫时空穿越，而实在是时空跳跃了。就像在刹那间，亲人们老了四十岁，屋子旧了四十年，树木长了四十年（一下子想起来，西门外的那棵大白果树怎么没看见呢），发生了多少想也想不到的事啊。尤其是丁妹，丁妹的存在、丁妹的苍老、丁妹的出走，对他来说太意外，他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应该说他自己是有责任的，话讲得太唐突，处理得太不合适。几乎全村都出动了，都没找到。心上的阴云越来越浓，她会上哪儿呢？都不敢去想。这时，王立才细细地想起了以前的事，孩童时丁妹像姐姐一样地爱护他，帮他洗衣服、帮他抬山草、帮他挡住父母的责骂。这几十年里怎么没想起来，现在才想到呢？来的时候，太兴奋、太冲动了，都没有顾得细想，才搞成这个样。要真出了事，一辈子也心不安啊。

早晨起来，想去祭扫老父的坟茔。王大妈又是一声悲叹：“唉，最后也没有见到你爹的去处。后来问过好几次，都说找不到了。”

“那是谁打死的？”王立问。

“大会是那个秦德才主持的，就是那个秦有理的爹。动手打人的是孙家乔的孙二赖。”王山低沉地说。

“那个姓孙的，人呢？”

“被枪毙了，不是因为打死咱爹，是因为挖了另外一派人的眼睛。”王山依旧低沉地说。

“上哪儿能祭奠一下爹呢？”

“上西北场院看看吧，那时我们就住那儿的，最后爹是从那儿离开我们的。”王山说。

兄弟俩来到西北场院，王山领着王立进了那排饲养棚里的一间，臊臭味扑鼻而来，里面暗得白天都没什么光亮。

王立停住了脚，问：“那时你们就住这儿啊？”

“是啊，现在的饲养棚已经比那时好多了，已经不透风、不漏雨了。”王山说。

王立无语，默默地往回走。

快到家时，王立问：“哥，现在这儿盖四间房得多少钱？”

“如果出力的活自己来，买点砖瓦、木料，四、五千就够了。”

“这倒不贵，比那边便宜多了。我回去以后就把钱汇过来，赶紧盖上吧，让妈过得好一点。”

“好啊，好啊。我也是一直这想，可是实在没这个能力啊。一直觉得对不起娘。那个小连子的房子，还是村里帮着把旧房子翻修了一下，不然我还真没办法呢。”

王立听着王山说小连子，又不言语了。

回到家里，王立对他娘说，“我觉得总要向爹磕几个头吧。”

“唉，家里连张照片也没有。”王大妈能做的只有叹息。

“不是还留着两件爹的衣服吗？”王山说。

“是的，是的，我都不敢再想起这些。”王大妈赶紧从纸箱里翻出了一件当年老王头的衣服。

王立拿起一看，上面有好几处斑斑点点的破洞，很明显还有些已经发黑的血迹。

王立哽咽了，问：“这就是爹那天被打的血衣吗？”

“哪是，那天的衣服，被打得撕成一条一条的，都被血浸透了。这件衣服还是平常挨的打，就不算什么了。”

王立把他爹的这件衣服放在堂屋中间的小桌，扑通跪下，连连磕头，哀哭不已。

王山和连四嫂也在他后面跪下磕头。

王大妈抽泣不止，连四嫂上去劝说：“妈，你不能再哭了。”

小连子两口进来一瞧，也跪下磕头。王立看见他们，无言地站到了一边。心里想着王家的血脉在这儿已经断了，没想到转到台湾去了。可自己的儿子，一口的闽南腔，那个做派，像个王家的血脉吗？那不像是移栽，倒像是嫁接了。

正在这时，一个人高马大的中年妇女闯了进来，这人正是王溪。脚没停下，那大嗓门就先开了腔，对着王立就说了起来：“啊呀，大兄弟啊，你妹妹我也是一直在想你啊。昨天你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叫我到处找啊。”

王立又是一愣，问王山：“哥，这是谁？”

王山说：“这是你走了以后，妈怕丁妹一个人孤单，又从外面过来要饭的人里留下来的。”

王溪说：“我也是王家的人啊。大兄弟啊，有什么事都要跟我说一声啊。”

王立说：“哦，我就是回家来看看，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啊？不是说要盖房子吗？别瞒我啦，我都知道啦。咱们这儿是新社会，男女都一样，有王山大哥的，就有我王溪的。你说是不，大兄弟啊？”王溪倒也坦率，直奔主题而来。

王立真不知怎么说，连四嫂说上了：“要盖也不是给王山盖，是给妈盖的。”

“哎哟，给娘盖的？说得好听。盖好了，还不是你们住，而且还是给姓连的住，跟王家有什么关系？到时候说不定就会有人在里面贪污钱呐，大兄弟你可不要那么实心眼。我帮你管着钱，大兄弟。”

王山忍不住了，说：“你不是早就跟我们划清界线了吗？”

王溪还在大言不惭地说：“我现在不是还姓王吗？我就是王建吾的闺女。王家的事，就有我一份。”

王大妈这时哭着说：“你还好意思说这些，批斗大会上你啪啪地打我们耳光，我到现在也忘不了啊。”

“嗨，说那些干吗？那是运动，响应号召，没办法的事。”

王大妈喘了口气，又说：“那就说后来，我们都忍了这口气。王山结婚的时候，我叫丁妹去请你来，你都不肯来。”

“哼，把连家的拖油瓶带过来，我才不稀得来。”王溪翘着嘴巴说。

这一下把高秀珍的火给点上着了，一下就从后面跳到前面来，朝着王溪就“呸”地一声：“你这个破鞋，认贼作父。是秦德才害死了咱爷爷，你还跟他们爷俩个一起鬼混，还有脸说是王家的人。”

王溪没看见高秀珍也在这儿，愣了一会，那也只好硬着头皮应战了，“你……，你血口喷人！”

“呸！”高秀珍对她所痛恨的人，第一句照例是呸，“你搞了不止十个野男人，还要我一个一个讲出来？别看我是外来的，我还没进民主村，就闻到你的臭味了。”

王溪还要硬顶：“你再敢瞎讲，我就揍扁你！”

“呸！别人不敢说，我就敢说！你还甘心做人家小老婆！”

王溪一听，这真是揭了她的老底了，而且居然敢掀宗书记的底，她不怕，我也不怕。王溪也跳起来冲过来，要抓高秀珍的脸。没等她靠近，小连子一把就从后面抓住她的衣领，蹭蹭两下，拖到外面去了，嘴上还大骂道：“你这个婊子，还敢到我家来闹。”

王溪知道已经占不了便宜，便拨开围在外面的人群，哭着吼着：“你们诬陷好人，我要到政府去告你们，你们等着瞧。”

对于这突发的一幕，王立都看晕了，问：“这事还要告到政府去吗？”

“她的野男人，就有在镇里面的。”高秀珍毫不忌讳地说。

“秀珍啊，不能这么说，讲话要避讳噢。”王山倒有点急。

不到十分钟，王溪又神气地回来了，站在院门口喊着：“高秀珍，高秀珍，你听着，镇上的宗书记叫你去！”

“呸！”高秀珍还真勇敢，听到宗书记的大名也不打怵，“我才不去，有本事就叫警察来抓。他叫我去，我就去啦？”

王溪还在喊。小连子操起了根棍就往外走，嘴里还在骂：“这个臭婊子，就是欠揍。”

连四嫂赶忙拉住了他。

王溪看这架势，一边说着：“等着瞧，等着瞧，”一边退到人群后面，走了。

王立看着，心里沉沉的。他们王家又多了这么一些事，多了这么一些完全不同的女人。来了这才一天的时间，他的心境已经不一样了。

第三天，丁妹仍未找到。

王立要走了，虽然原先打算是多住几天的，但现在这样，与其等到最后的结果，不如现在走了。

临走那天，王立到海边看了看。与当年不同的是，海边有了几顶彩色的遮阳伞，有几个嬉水的人。王立走在沙滩上，心里真是百感交集，难以名状。这里就是儿时捞鱼摸蟹的地方，这里就是被国民党抓来扛箱扛包的地方，这里就是离开故土一去就是四十年的地方，这里或许就是两天前丁妹永远消失的地方。今天过来看一下，又要离开了。什么时候再来？还愿意再来吗？只是心里还牵挂着老母亲，去台湾住吧，虽不是洋房豪宅，比这儿还是要好了许多。谁知老母亲一听要她去台湾，吓得浑身发抖，嘴里连说：“别害人了，别害人了。我再也吓不起了。”

“国民党弟弟”又要走了。

村里的人都围过来。

“怎么，这就要走啊！好不容易回来一次，不多住几天？”鲁队长闻讯第一个赶过来问。

“唉，那边的事一天也放不下，大事小事都得我来。”王立皱着眉说。

“是啊，是啊，开个厂不容易，我也有这体会。”平金刚说。

辛狗狗开来了工具车，把王立、王山兄弟俩请上。

王立在车门口拉着娘的手，呜咽着说：“妈啊，我就是放心不下你啊，你就跟我走吧。”

王大妈流着泪说：“不敢啊，我是想跟你在一起，可是我不敢去啊。那是国民党的地方，我去了，你大哥、你侄儿他们怎么办，说不定又要遭罪啦。”

彭小宾说：“不会的，不会的，现在的政策好啦，等允许咱们这儿的人能过去，你就过去看看、住住，也省得王叔牵挂了。”

王大妈泪流不止，连四嫂劝着：“妈，别哭了，让他叔安心心地走吧。”

王立又对彭小宾说：“丁妹的事，还要麻烦你们，有破费的地方，尽管跟我说。”

彭小宾说：“好的，你放心吧，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虽然隔着海峡，我现在觉得，我们真的就是一家人。”

小连子也在往前挤，想跟着车一起送到县城。

高秀珍在后面拽了他一把，嘴上说：“叔啊，走好噢，我们就不送了。”

王立在车上，探出脑袋，向大家挥了挥手：“都回去吧，都回去吧。有事就来信，有空我还会再回来的。”

车走了。

小连子还在埋怨他媳妇：“你刚才拽我干吗？我不但想送他到车站，以后我还想咱一起去台湾呢。”

“你别做梦啦。”高秀珍趁人散了，悄悄地对小连子说：“你一点眼色也没有啊？他觉得你是连家的人，每到说起你，就哼哼哈哈的，都没认你这个侄，你还没看出来？”

高秀珍疾恶如仇、敢怒敢骂，但并不是个鲁莽之人，心细得很，知道进退。

“……”小连子哑然了。

25.5 促膝长谈

王立回到了台湾，回到了家。

他的妻子阿英也挺奇怪，“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还担心你一去不回来了呢。”

王立苦笑说：“我不回来，我还能上哪儿啊？”

“那儿不是你老家吗？”

“唉，是啊，是老家。”话语中似乎透出了苦涩。

“有不称心的事吗？”这苦涩没能瞒过做妻子的眼睛。

“唉，变化太大了，事情太多了。”

“不着急，说给我听听啦。”

他的儿子发仔也围了过来，老孔也围了过来。

从李芹的死、赵玫的死，到他父亲的死，王立一一讲来。一件一件事，惊得他娘俩都瞪着大眼、张着大嘴，半天说不上话。

“真是这个样吗？”发仔听得心里恍惚，都不敢信。

“你做得对，该劝你娘过来住，辛苦了一辈子，太不容易了，该轻松一点了。我可以侍候她。”阿英说。

“她不敢来，不敢到国民党的地方来。”王立又苦笑了。

“现在还讲什么党啦、党啦，我还倒忘了这事。”阿英也哑然失笑了。

“不过，还是有个好事情。”王立对老孔说：“你救的那个小孩，就在民主村。”他又把狗狗的经历说了一遍，他们三个又听得比“山海经”还神。

“狗狗说，你要是愿意可以去大陆住他家，他养你一辈子。不去的话，他可以给你一笔钱，让你养老。”

“他能在就好，我倒不是图他报恩，我没想到这点。我只是想烽火连天，这小孩的命到底会怎么样。没想到还真有个福贵命。”老孔说。

未几，美国一家公司汇来了一万美元，狗狗也从龙头来了信。

王立的妻儿正为这天上掉下来的一万美元而纳闷，王立却拿着信，低头不语，暗自落泪。

“怎么啦，孩子爸？”阿英问。

“这钱是狗狗给老孔的。他当时就说要寄一万美元，我怕寄不来这么多，老孔反而会失望，所以没说一万。没想到他真寄了一万，其实他自己也不是什么大厂子，老婆孩子一家人就住在厂房的楼上，还赶不上我们呢。”

“啊呀，那我不能收这个钱，把它退回去吧，就说谢谢了。”老孔开始有些衰老的脸上显得很诚恳。

“那倒不用，那是他的心意。他还说，以后他还会再寄来，不够就跟他说。”

“不能那样，不能那样，这就已经不知怎么感谢了。王厂长，那你先帮我存起来吧。”

“这是你的钱。明天，我领你一起去银行，这样以后你也就知道怎么上银行了。”

“那你好像还有好大的心事啦。”阿英又问。

王立一下脸色刷白，手脚发抖，说不出话来。阿英急得快哭了，拍着他的背，大声说：“怎么啦，怎么啦？有事你就说吧。”

发仔和老孔也都喊着他。

王立吐了口气，缓过神来，眼珠也使劲地转动了下，对着阿英说：“丁妹死了，丁妹到底是跳海死了。”

“丁妹？丁妹是怎么回事？”阿英忙问。

王立这才断断续续地把丁妹的事讲了一遍。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你是怕我想不开跟你吵，是吧？”阿英说。

“不是，不是。”王立摇摇头。

阿英说：“我也是女人，我能理解丁妹心中的痛楚。真不容易啊，等了四十年。你对不起她啊……”说着，就哭了起来。

王立说：“那时候，太年轻，不懂这些事，脑子里没留下这些。这一回，只急着要回家，没有细想这些事，酿成这大错。我不是人啊，我不是人啊……”竟然拍打着脑袋，哭了起来。

阿英停下了哭泣，扶住王立，说：“这几十年，我们之间一直隔阂很深。虽然是几十年的夫妻，却相互不了解，相互不信任。但是经过了这一次，我算是认识了你。你和你老家的人经过了那么多的苦难，看得出来也都是些好人。我也觉出了人生道路的不容易，一个家庭的不容易。我们真的要爱护自己，爱护对方，爱护家庭。你也是好人，我也是好人，好人应该有好日子。你是苦命人，我也是苦命人，不能再过苦日子了。我们三个，还有老孔，今后更要好好地过。老家那儿，我们能帮助的，尽量帮助，好吗？”

他们几个都点点头。

“明天，我们就去城南的庙里，给丁妹多烧点纸钱。”阿英说。

“好，我俩一起去吧。发仔，你再辛苦点。”王立说。

发仔乖乖地点头。

“不要紧的，你去吧，还有我呢。”老孔说。

25.6 李策来访

又过了几天，王立对阿英说：“我的老乡李策要过来，他们两口都过来，说是还要领个老朋友过来。这要给你添麻烦了。”说得还有歉疚。

阿英说：“来吧，咱家的亲友也不多。来了，不就是炒几个菜吗，现在也方便。”

果真，李策开了自己的汽车带着老婆孩子过来了，找到了王立的米厂。高兴得老远就打招呼了：“王立，王立！你快把老孔喊过来！”

王立赶忙迎上，叫过来自己的妻子，也喊来了老孔。

他们两家早已熟悉，李策也认识老孔。一番寒暄之后，李策说：“你一直没进我家，我还以为你还得住上一段时间呢，没想到这么快就过来了。”

“我是从高雄下的飞机，所以没从台北走，直接就回家了。”王立编了个谎，糊了过去。他那时是心神不定，就想早点回家。

李策接着就从身后拉过来一个人，对老孔说：“这你认识吧？”

老孔使劲地看着对面的那人，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可对面那人比自己还老。正在犹豫当中，对面那人倒先说话了：“小孔啊，我是代连长啊！”

“代连长？……哦！认出来了，认出来了！代连长啊！两个苍老的脸上都流下了热泪。

是的，来的正是代连长，1949年国民党登陆龙头时，孔班长的顶头上司——代连长，他们曾一同随“济成号”来到了台湾。孔班长解甲归田，跟王立他们一起屯垦。代连长还在军队上，1965年跟高增光一起武装潜回大陆被俘获，1980年释放回到台湾。前不久，才碰上了李策。李策说，我领你见个人吧。

进得屋来，阿英忙着炒菜，屠美丽跟着下厨房，说是也想学学闽南菜。发仔还是上机房去了。他们几个老男人就在饭桌边聊起了天。

王立开始还不想提起那些伤心往事，先是说起了龙头镇，说起了民主村，说起十字路口的陶家大院还在，说起西门外的大白果树没有了，说起了南面的沙滩开发成了旅游度假区，盖起了漂亮的宾馆。

王立还没讲到兴头呢，李策就打断了，急急地问：“王立啊，先别讲这些了。我家里怎么样啊，我妹怎么样啊？”

王立一下就阴了脸，停顿了下来。

李策一看就知道是出了不好的事，就说：“王立，你说吧。我知道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你说吧。”

王立这才抚着李策的肩膀，缓缓地说：“李策啊，你可别太伤心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李策紧闭着嘴，紧盯着王立，点着头。

王立慢慢地讲起了当年的情景，讲到了李芹当时就投井而死，十年后才挖了出来，都不知道是谁的尸骨。

李策虽然一直想着他妹妹肯定是这个结果，但真的听到这确切的消息，还是忍不住失声痛哭。

大家自是一番劝解。

王立又说：“董平章的结果还要惨呢。”

“董平章？董平章又怎么啦？”李策缓了一口气，疑惑地问。

王立苦笑着说：“他比我还早二十多年就去了民主村。”

“这怎么会呢？”大家更奇怪了。

王立又一五一十地讲了董平章的事。

当大家得知董平章这么个老实庄稼汉竟也被高增光拉去当特务，气得代连长直骂姓高的不是东西。

代连长说：“当时就觉得那个反攻大陆是在捏着鼻子做梦，根本不可能的。上去，我就没准备要打。果然，刚上岸没多久，就被人家围上了，我就叫手下几个举手投降吧。姓高的还傻乎乎地直往前，跟这种人干事，哪有不倒霉的。”

王立又讲了董平章老婆赵玫的身后事，讲了那只亮锃锃的发夹，从李芹那儿，到了赵玫的头上，现在又到了一位有着维吾尔族血统的美艳绝伦的女医生头上。王立说，从赵玫到女医生，民主村的人知道了，是因为赵玫救过那位女医生，可是都不明白怎么从李芹的头上到赵玫那儿。

李策一脸苦笑说：“这个，别人就不知道了。董家跟我父母提过董平章和我妹妹的事，他们俩自己也愿意。是划成份斗地主冲散了这件事，但他们俩情意未尽，后来赵玫也知道这事，很同情很理解他们俩。我妹也盼着他们俩能过上好日子，所以把我给她的发夹又给了赵玫。没想到，这发夹还经历了这么不寻常的路。”

王立对李策说：“那个漂亮医生真巧，就住你家以前的院子里。我还特地去看了下，还是那老样子。”

李策低着头，“是吗？命运真是这么无常，人生真是这么难以捉摸。”

王立还讲了林齐心的女儿林海秀死于刑场，储小二死于武斗场，连四娃死于1959年修水利，迟得法死于1960年的灾荒。这些人，李策还都有印象，听得连连点头。

过来放盘子的阿英和屠美丽，听得站住了脚步。发仔从门口经过，也走了过来，不再回机房。

“李哥，你不回去看看吗？”王立问。

李策显得很迟疑：“回去还能看什么？就看看我的那个发夹戴在美女头上？”

屠美丽看着李策，欲言又止。

李策看出来了，“我知道美丽是想回去看看，看看父母、看看老爷爷到底是什么结果。还能有什么结果？不像王立可以回民主村找，你上哪儿去找？我知道我们‘济成号’以前的码头、营房、宿舍这些，早就是共军的舰队司令部了。怎么去找？门都进不去。”

屠美丽没说话，她又一次失望了，眼睛里擒着泪花。

老孔转了这话题问代连长：“你怎么没留在大陆老家，又回来了？”

“唉，别提了，我也去看过。父母早没了，亲友也因为我受了牵连，见了还心里有气，都躲着，村里的干部也是几份白眼，几份提防。想住一晚上，都没有敢留的，我只好连夜走了。留在那儿干吗？不像民主村对你们还真可以。”

“老代啊，你还算是不错啦，能回到台湾了。黄港司令部的那个汪司令，你们还记得吗？”李策说。

老代、老孔都点点头，“记得，记得，听说过。”

“他是跟你老代是一个时间放出来的。大陆想显示他们的统战效果，搞了个国民党释放人员参观团到香港摆个样子。老汪就在那个团里，想投奔台湾，找机会跑了出来，好不容易找到了国民党的办事机构。没想到台湾不让他进来，说是对1949年之前被共产党抓获的不再接受。他又没法再回共产党那一头，说是不想从小监狱出来再进大监狱，结果只好在香港自杀。这事还轰动了一阵子呢，香港报纸都说两边做得都不对，尤其是台湾做得更不对。”

叹了几声之后，老孔问老代：“那你现在靠什么过日子？”

“一个月二千元津贴。”代连长答。

“勉强过个日子，生病就不行了。”王立说。

“过来跟我一起住，做个伴吧。”老孔说。

“还不行呢，因为我现在是住在荣军院里，房租水电都免了。住在里面省点钱吧，也不图别的了。”

大家又是一声叹息。

李策感慨说：“哎，现在咱们是弄得老家不是老家，国家不像国家。”

“你们民进党不是想把台湾分出去吗？”王立问李策。

“哎哟，那样我们不就成了外国人了吗？那怎么能行？”老孔说。

“民进党里有人有这个想法，一般都是本省人。我这个民进党没有这个想法。我想的就是民主和进步。”李策说。

“本省人也不一定啊。我们村里都是本省人，也没听他们说要独立不独立的。他们只是觉得国民党管得不好，也不想叫共产党来。谁也没想到要当外国人啊。”阿英说。

“台湾独立肯定行不通，两岸的对立又这么深。那怎么办？”王立说。

“这个进程，很大程度上要看大陆的发展。他们的社会状况、民生状况发展了，对台湾民众有很大的吸引力了，这个问题也就水到渠成了。如果大陆自己都没搞好，天天搞政治运动，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叫人都害怕，那还谈什么统一呢？”李策说，“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有一个和平、民主、繁荣、自立的台湾，对于全民族、全世界，都是一个幸事。”

李策看了看坐在座的各位，又感叹地说：“我们这些人代表了台湾的几个不同的阶段。我和老代、老孔只能算是过去了的四十年代；连二娃，是五十年代；董平章，是六十年代；你王立又是第四个阶段。”

“那第五个阶段会是什么呢？”代连长问。

“第五个阶段就应该是两岸统一，骨肉团聚了。”王立说。

“现在谈统一问题，还有点早，两岸的隔阂这么深，我看还不行。等再过二十年，到二十一世纪再说吧。就像刚才李策说的，两岸先都把自己的事情搞好，别的事情也就好说了。”代连长对海峡两岸对立、国共两党对立是深有体会。

孔班长指着发仔，说：“这第五阶段不就是该他们了嘛。”

听着这话，发仔一愣，他还没想过这些问题呢，就说：“指望我啊？我能做什么呢？”

老代说：“指望你回去娶个大陆媳妇呢，那不就统一了么。”

大家更是笑开了。

阿英一时紧张起来，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她不知道，发仔真要是娶了大陆妹，对她来说将是意味着什么。

还是王立看出了妻子的心事，说：“是啊。娶媳妇倒不一定，但是两岸应该逐步增加交流与了解，减少隔阂和仇恨，再做到能互利、互助、互信，逐步增加共识。等共同语言多了，统一问题也就好说了。比如我这次回去，感触和收获就很大。我是了一个心愿，有了一个改变，多了一个情结。”王立说。

“什么心愿？”李策问。

“就是见到了老母亲，见到了兄长，知道了老家的情况，不用再天天挂在心上了。”

“还有什么改变吗？”阿英问。

“就是老家是家，这儿也是家，这儿更是家。放下了那个心，再就一心一意放在这个家。爱这个家，爱我们的台湾，台湾也是我们的家。”王立说。

“是啊，台湾也是我们的家。但是国民党要把台湾管好啊。”李策说。

“是的，我虽然回来后又参加了国民党，但也只是为了办复职手续更方便一些。国民党啊，真是要改改啰。”代连长说。

“那还有个什么情结呢？”屠美丽问。

“就是想把这两个家连在一起。这两个家要多联系，多来往，多活动。慢慢地这两个家就像一个家。”

“好啊，我也想去看看你的老家，看看你的老娘，那也是我的娘。”阿英真诚地说。

“哦，我也能去大陆看看啦。先不说那么远啦，我要吃饭啦，肚子都饿死啦。”发仔在自己家说话就不避讳。

“啊呀，说到吃饭，我这菜都还没做好哩。”阿英跳起来说。

“这些就不少啦，不用再忙了。”李策说。

一顿饭，菜没有做几个，话可说了几箩筐，几个人都是有说也说不完的话。一会儿哀痛，一会儿喜悦，一会儿感慨不已，一会儿仰天长叹，一会儿像是前途迷茫、不知所措，一会儿又像是看透人生、大彻大悟……

“今天说个痛快吧，平常跟谁去说……”李策把瓶底的酒都倒进了嘴。

“阿英，再去拿一瓶。”王立说。

阿英起身去拿酒。

“行了，喝了不少了。来台湾以后，他还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屠美丽忙挡着。

“今晚就在这儿住了，多喝点，不管事。醉了也不要紧，人生难得一醉啊。”王立也喝得满脸通红。

只有发仔看看大人，好像还不能完全理解，又低头忙着自己拣菜吃。

第二十六章 野男人

1978年1月26日

王立这趟回来，在民主村、在龙头镇引起的震动，从人生观念到人际关系是多方面的。即使王立又走了，它的余波仍然在回荡。

王溪向宗发奋报告了高秀珍居然敢讲她王溪当野男人的小老婆（在广东那一带就是叫二奶、小三之类）。

“这明摆着就是指的你哎。你要给我做主哟。”王溪扯着宗发奋的衣袖又是拽又是晃，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着。

宗发奋知道这可不是儿戏。一个高秀珍竟然敢向我叫板，这不是要断我的前程吗。这是非要有我无她、有她无我了。

宗发奋上南门口派出所找到诸所长。

诸所长在这儿当了几十年的所长，谁是谁都很了解。多少年来，工作很认真，执行领导意图很坚决。可最近几年有点变了，年纪比他轻的都提上去了，他不知为什么老是停在这个位置上不去，眼看是等着回家了。这几年，治安的情况比以前复杂了。以前社员们老实，整天干活，有什么事，队里就管住了，来找他的也就是些邻里纠纷、家庭矛盾。现在可是多了，从经济纠纷到交通事故，从孩子失踪到抢劫偷盗，在这曾经民风淳朴的土地上，渐渐地也都有了。他也顾不上这么些，有事叫下面的人干去吧。

诸所长一听宗发奋说的，就咧开嘴笑了：“宗主任，你说这事，以什么罪名追究呢？”

宗发奋一瞪眼说：“诽谤罪、污辱罪、侵害他人名誉罪！”宗发奋管过公社的政法，能说出一大串罪名。

诸所长不紧不慢地说：“那咱们怎么去落实查证呢？去找几个知情人，写个笔录？”

宗发奋一听，反倒舌头短了。心里想，凡是现在叫我主任而不叫书记的人，都不会真心帮我办事啦。去找知情人？明知是这么回事，这不是反叫我难堪吗？这个老东西，现在也变鬼啦，分明是叫我知难而退啊。哼，没有你姓诸的，我宗发奋在龙头镇照样还是能办成事的。说了声：“那我去找找看吧。”就走了。

宗发奋去了民主村的村委会。现在各人都在忙各人的，村委会里没人，电话铃响着也没人接。宗发奋心里想，现在真不象话，人心都散了，怪不得一个小小的村姑也不把我放在眼里。现在的领导不好当啊，不是有个顺口溜说：政治上不怕你，经济上不求你，有了问题找你，解决不了骂你。真他妈的，现

在这是有问题也不来找，就敢在外面骂我。心里正气着呢，碰上皮高深来找人。宗发奋叫他去把村干部赶紧找来。

不料皮高深头一歪，说：“我有事，还正忙着呢。家里两头猪还在哼哼等着吃呢，我先得解决它们的问题吧。你说呢？”

“镇领导交待的事，也不是事啦？赶快去叫。”

皮高深没吭声就走了。

结果，宗发奋在那儿白等了半小时也没个人影来，气得他鼻子也歪了。站起身就往外走，自己去找了。

一出院子就碰上了邬中和， he 现在是村里的治安委员（也有叫治安主任的，治安委员是党支部里的分工，治安主任是指村里有个治安委员会，其主任通常由支部的治安委员兼任）。宗发奋正找对了人，就对邬中和发了一顿脾气。

“立刻把高秀珍叫来，村里要叫她做出深刻检查，向王溪做出公开道歉。我在这儿等着！”宗发奋特地重重地说了最后一句。

邬中和知道宗发奋是碰上了硬茬，心里高兴得很，可表面上宗发奋是他的顶头上司，他只能听吩咐，急急忙忙赶到西门外的针织厂。

高秀珍的身边围着不少人，正忙着呢，头也没抬，就没有好气地说：“不去！你没看我正忙着呢，谁去管他的闲事！”

“不行啊，他在办公室里坐着不走呢。你就看在我份上，去给他说明一下吧，态度好一点。啊？”

高秀珍抬头看了下邬中和，心里转了一下，忽地站起身来说：“走就走，谁怕谁呀？”便大步往外走。

旁边的人，有的说：“不就是宗发奋吗，怎么啦？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也去！”

“对，我们也去看看。”

好几个人跟在后面去。

“哎，哎，干吗呀，你们去干吗呀？宗主任又没有请你们去。”

邬中和说着，可没人听，一呼隆地都去了。

宗发奋还摆着架子在村委会办公室等高秀珍来，想着怎么训她。

听着外面有声音，知道是邬中和领着高秀珍来了，宗发奋摆了摆姿势，端端正正地坐着，脸一沉，眼睛故意往边上看，不往前瞧。看你高秀珍怎么开口跟我说。

不想外面进来的却不是脚步声，而是劈劈啪啪一阵脚步声，听来能有七、八个人。脚步在自己面前停下了，没动静了。

宗发奋转过脸一看，哟，竟然是七、八、十来个人。高秀珍就站最前面，两眼直直地看着宗发奋。

宗发奋被看得不自在了，就问：“你是来干什么的？”

高秀珍反问道：“不是你叫我来的吗？”

宗发奋一愣，就喝道：“你污辱王溪的人格，随便瞎说八道，这是不可以的，你要做出深刻检查、赔礼道歉。”

“我没污辱她，我讲得都是事实。不信，你把她叫来，她敢否认吗？”

“你还态度不老实，等我把派出所叫来，你就后悔来不及了！”宗发奋提高了嗓门。

“你把谁喊来我都不怕。”高秀珍斩钉截铁地说。

一刹那间，宗发奋怀念起1957年了。1957年反右对付个李辰真是易如反掌，现在怎么连个小小村姑也无可奈何呢！

“你怎么诬陷王溪跟秦德才父子两个的，这个，这个……我都说不出口。秦德才可是龙头镇的革命老前辈啊。”宗发奋有点急了。

“呸！”高秀珍居然在宗发奋面前也敢于呸了一口，“这种狗东西算什么革命老前辈，纯粹是混在革命队伍里的乌龟王八蛋！”高秀珍讲话没有任何的掩饰，更没有任何的修饰。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敢骂人，我马上叫派出所来抓你！”宗发奋气急败坏地说。

“哼！你要是能叫警察，早就叫来了，还用等到现在啊。”高秀珍也早就掂量了宗发奋的能量。

“你，你，你怎么能这样说一个革命同志。”宗发奋面对这样的对手无计可施了。

“革命同志？宗主任，这个秦德才做过多少坏事，恐怕连你也不知道！”高秀珍却是寸步不让。她觉得她是有重磅炸弹在手，别人不敢扔，她敢扔。

“他这个人我怎么不知道，他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说到这些，宗发奋觉得自己就有发言权了。

“你知道他除了和王溪有关系，还和谁有关系？”高秀珍突然减缓了语速，一字一句地说。

宗发奋一惊，觉得高秀珍话外有话，强作镇静说：“还和谁？”

“还和你老婆，柏蕙珠啊！他欺侮柏蕙珠多少次啊！我作为一个女人，看到别的女人受欺侮气不过啊！”高秀珍语速急促起来，语调提高到近似尖叫，激愤得眼泪都出来了。

宗发奋浑身震颤了，脸色发白，“你，你……，你怎么知道的？”

“宗主任啊，全龙头镇的人都知道，就您一个人不知道！”

“这……，这……”这句话一出，宗发奋眼发黑、手发抖，只觉得天旋地转。

这句话一出，邬中和想挡也来不及了。

全场的人都镇住了。满屋子静得只听得墙上的挂钟在滴滴答答地响。那个几秒钟就像几个小时一样地长。

就在大家不知道这一幕怎么接下去的时候，外面有人叫着：“不好了，不好了！”肖胜利满头大汗地跑了过来，叫着：“不好了，丁妹被我们从海里拖上来了！”

“啊！”

大家迅速都往外跑。

还有人说：“丁妹心里屈呀，大海不留人，又把她送回来啦。”

邬中和也要往外跑，只是觉得眼前的事不好处理，便对高秀珍说：“小高啊，你怎么敢这么对宗主任说话呢？”

“你放心吧，他以后不会再找我了，也不会找你了，麻烦你告诉下我娘，我先去海边了。”高秀珍也不管宗发奋的反应，头也不回地往外跑了。

邬中和回头看一下宗发奋。宗发奋还愣愣地站在那儿，邬中和觉得没法再说什么，丢下他，也跟着高秀珍往外跑了。

丁妹是被肖胜利他们机帆船的渔网挂住，拖了上来，静静地躺在沙滩上。

龙头的沙滩现在已是绚丽多彩。那阳光、蓝天、和风、不息的浪花和三两个穿着泳装的女郎，然而这一切已经离躺在这儿的丁妹是那么地远。丁妹的尸体已经被海水浸泡得鼓胀起来。肿起的面庞被鱼蟹咬得千疮百孔、皮肉翻卷，惨不忍睹。一张油腻的帆布盖在了上面。

这世界离她而去。或许这世界从来就没有属于她。

几十年无言无语的苦熬苦等，无数次的心如刀割，做不完的牛马活，没有了眼泪，没有了痛觉，甚至没有了思维，生命的存在只是种符号，唯一剩下的就是熬。而如今，生与死，对她来说，唯一的不同就是不需要再等待，不需要再熬。

民主村的人来了。

王山跪在盖着丁妹的黑蓬布前痛哭：“丁妹呀，丁妹呀，这几十年最苦的就是你了，哥哥我对不住你呀……”

王山掀开蓬布看了一眼，更加泪如泉涌，“丁妹呀，丁妹呀，你不该这样走啊。没有王立兄弟，我们一样可以过日子呀。这么些年都挺过来了，现在怎么就走了呢……”

王大妈听说了，死活要过来，大家劝不住，用拖拉机把她带来了。

王大妈对丁妹的感情是复杂的。是她在当年战乱流离的岁月中收留了丁妹，使丁妹的生活有了延续和新的开始；她是喜欢这个女孩的，以至于想让她做自己的儿媳，永远成为自己家庭的一员，尽管这个想法不一定合适，当时做得也没有到位。她很感激丁妹几十年来对这个家默默无语、尽心尽力、完全忘

我的奉献。这个家能够在一系列的厄运和打击中挺得过来，丁妹有很大的功劳。尤其是在一场场的灾难中，丁妹对这个家，对自己的儿子王立，始终忠心耿耿、从不言弃，尽管她也可以像王溪那样拔起腿来就走。这一点是王大妈对丁妹最尊敬、最感激的地方。虽然王大妈在重压之下有时还暗暗地埋怨过丁妹，好像是丁妹带来了这些阴云。王大妈从来没在嘴上讲过这些，但自己知道会有意无意地流露。以前没想到过这对丁妹会有怎样的伤害，如今都成了无尽的愧疚。现在才觉得，丁妹像儿子一样也是支撑自己活下去的不可或缺的一片天。

王大妈一见那蓬布就呼天抢地，不顾一切地跪着爬了过来。她要掀开蓬布，别人怕她更难过都不让掀。

“怎么地也要让我看看她，让我看看她……，我的好闺女啊。”王大妈拼了命一样，挣脱别人的手，掀开了蓬布，一下就扑到了丁妹的身上。

“闺女啊，闺女啊，你为王家一辈子做牛做马，王家亏待了你呀……你怎么就这样走了呢……”

王大妈哭得昏死了过去……

按当地农村的习俗，死在外面的丁妹不能抬回家，在南垵下就地安葬。

宗发奋看着眼前的人都走了，缓过了神来。高秀珍讲的事，他不是完全没有感觉，但总觉得不可能的。柏蕙珠对他百依百顺，两口从没争吵过，夫妻感情一直不错，不至于吧。秦德才不过是他养的一条狗，不可能把他老婆弄到手。所以一直以来，他就没往那儿去多想，真的会是这样？想了一下，先赶回家来。

瘦弱的柏蕙珠正在炕上缝补衣服，她从文革后，身体和精神都不行，也没再参加工作，卷缩在家里。

宗发奋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站在炕前，吼了起来：“你他妈的做的好事，丢人现眼！你怎么跟秦德才混到了一起！”说着就爬上炕，抓住他老婆的头发，挥起了拳头。

柏蕙珠没有做任何的抵挡，任由他撕打。在雨点般的拳头下，痛哭了起来。

听完柏蕙珠的哭诉，宗发奋也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倒在炕上。自己是一世英雄，整倒过多少人，却吃了这么个大亏。自以为是在老百姓面前吆五喝六、颐指气使，却丢了这么大脸；自以为是养了条叫咬谁就咬谁的一条狗，却反过来被他咬了一口；自以为是在龙头镇数一数二、说一不二的革命领导干部，却被别人背后戳脊梁，自己还觉得是风光无限。

丢人呐，丢人呐！宗发奋越想越恶心。怎么办？去把秦德才揍一顿。那就更把事情弄得满城风雨、家喻户晓了。难道就此密而不发、悄悄地过去，那又咽不下这口气，他在地下转了好几圈。

一股恶气涌上脑门，他冲出了房门。

宗发奋冲到了秦德才的家。

秦德才还是住在土改分的房子，当年一户地主三进房的最后一进的西屋。大概是都去到海边看丁妹了，宗发奋一路走来，直到进院子也没遇到什么人。

秦德才自从被高秀珍当众呛过以后，病了好几个月，从此也就一蹶不振。虽然心里还想着闹点事，不过却力不从心了。就像秋天的蚂蚱，想跳却跳不起来了。自己独居在这最后一进的小屋里，儿子秦有理很少来看他，别人就更没有理他的了。今天是难得的好天，出来看看太阳。那明亮的阳光，他只觉得刺眼，又躲了回去，佝偻着猫在炕上。肚子里咕咕地响着，又懒得动手做饭。秦德才像往常一样过着他的一天。

宗发奋冲进里屋，也不管秦德才已经是多大年纪了，身体是否经得住，爬上炕就从炕角里把秦德才拖到炕边。

秦德才一看不对劲，嗷嗷地叫着。

宗发奋两个耳光就上去了，“你他妈的狗东西，连狗都不如！”宗发奋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说什么了，啪，啪，啪，接连又是几个耳光。

秦德才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杀猪似地拼命嚎叫。可前后屋都没有人过来，或许是真的没人，都去海边了；或许是别人听见了也只当没听见。

宗发奋打过之后，满目怒火，觉得还不过瘾，临走又往秦德才脸上吐了几口唾沫。

真到天黑了，晚饭时分，人们才在院子里看到满嘴是血的秦德才在地上爬着。他是想出来求救，不然死在炕上好几天，也不会有人知道。

没有什么人愿意靠近散发着一身臭气、像狗一样的秦德才。还是叶丽娜过来把他拉上炕，喂了点药。

晚上，掌灯时分，派出所的诸所长到了宗发奋的家。

诸所长笑笑，对宗发奋说：“老宗啊（这回连宗主任也不喊了），不冷静啊，不冷静啊。要是老百姓出这事，我早就过来把你铐到县里看守所了。下不为例噢。领导干部嘛，要注意影响，注意身份。”

宗发奋听了这些自己也会倒背如流、拿来教育别人的话，一声也没吭。

当晚，他向县委写了个报告，说是自己在龙头镇工作了几十年，按照干部交流的原则，希望能离开党政系统，到异地工作，以期得到更多的锻炼。

第二十七章 造纸厂出事了

1978年1月27日

27.1 碱回收炉爆炸

丁妹的离去，使民主村、龙头镇沉闷了好几天。可是祸不单行，没过一个月，北门外的造纸厂出事了。

造纸厂的生产工艺，说简单也简单，要搞好可也不容易。龙头造纸厂本来就用的是别人淘汰下来的旧设备，厂里的人从平刚到操作工人，对这一套又不熟悉，勉勉强强，磕磕碰碰，运转下来也快三年了，小毛小病不断。

尤其是秦有理去了外事办，对造纸厂有些事不好插手，捞不到更多的好处，他也就不多管了。没有秦有理的中间搭桥，造纸厂的产销更被动了。平刚掌握不了里面的奥秘，吃别人的亏也就更多了，经营上日见困难，对于要花钱的事，尤其烦弃（厌烦，在海源话里叫烦弃）。因为维修上多花一分钱，他自己就有可能少挣一分钱。

厂里的一台配套设备碱回收炉运行一直不太正常，炉温偏低，熔融物流出不畅，溜子口经常堵，得时不时地用长铁钎捅。这天，堵得更频繁了，炉前操作工人靳宝康，从早上一接班就边捅、边设法提高炉温，忙得不亦乐乎，汗出如水。他是个三十出头的汉子，也是因为照顾他爹靳喜悦是个伤残荣誉军人，家庭生活比较困难，才把他招进厂来，好歹也是“领导阶级”的成员。

虽说是“领导阶级”的成员，但日子也并不好过到哪儿。造纸厂里有的车间粉尘大，噪音大，有的车间温度高、湿度大，好一点的工种轮不到他干。工作时间又长，劳动强度又大。尤其是天天被火气越来越大的平厂长训斥，当工人的像孙子一样，挣的钱也并不比种地的多。靳宝康几次想不干，都被他爹呵斥住了。

“别忘了你是工人阶级了，这可是咱祖辈都想不到的事啊。”靳喜悦每次就是这一句话。

靳宝康虽然心知肚明，这“领导阶级”不能当饭吃，但老爹的火爆脾气他是知道的。到时候，他老爹是不跟他讲道理的，于是他就硬着头皮干下来了。

虽说靳宝康操作水平有限，但他还是认真按照试车时从西面请来的师傅教的方法，反复调节喷液的液量和风量，设法提高炉温。九点半左右发现炉火呈暗红色，只有使上最后一招：喷重油提高炉温。然而，开了油泵，却不上油，再次启动油泵，还是不上油。急得他直跺脚，这才想起上星期催了十次八次才进的小半罐重油早就用完了。再一细看，溜子口被堵得严严实实，靳宝康使出吃奶的劲，十几分钟也

没捅开。靳宝康急了，一路小跑，上厂长室找到了平金刚。平金刚虽然喜欢别人叫他厂长，却最讨厌下面的人来找他问事。因为找他，他也答不上来。

“平厂长，碱回收炉炉温死活提不起来，溜子口堵了快二十分钟了，情况紧急呀！”

“慌什么慌，喷油啊。”平厂长三天两头被碱回收工段吵着要进重油，也学会了这一句。

“上星期重油进得太少，第二天就用完了。再说炉底死垫层太高了，得赶紧把汽车库里存的那几桶柴油用上，停炉处理，否则要出危险的。”

碱回收炉，四方形状，俗称方炉，讲究还不少。进去的叫黑液，烧出来的熔融物溶解在水里叫绿液，再苛化又叫白液。平金刚搞不明白这些，一听就烦。

“什么呀？什么呀！又要停炉，这不又要影响抓革命、促生产了吗？”其实那时已经有好几年不说这个口号了，可平金刚还是习惯于讲这些。

那阵子柴油有钱也不好买，平厂长一想到要动用他千难万难找来的那几桶柴油，马上从打官腔回到现实世界了。

“有什么危险？造几张纸，打打浆、漂漂白，有什么危险？停什么炉，乱弹琴，找根粗钢钎，你一个人捅不开，多找几个人，我就不信捅不开。”

“要是出了问题怎么办？”靳宝康还在问。

平金刚更不耐烦了，朝靳宝康挥挥手，“我是厂长，出了事情还会找你一个操作工吗？去，去，走吧！”

靳宝康走了。不到半小时，“轰”的一声，车间里传来巨响，接着就是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碱回收炉的溜子口堵得时间过长，炉膛里积攒了大量的熔融物。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硬捅，捅开的口子大小很难掌握。假若口子过大，就会涌出过多的熔融物，导致溶解槽爆炸。靳宝康一看平厂长火了，也不敢再多说什么，又是一路急奔回到炉前。他手忙脚乱地找了一根粗钢钎，又叫了齐成才过来帮忙。

齐成才是因为占地纠纷，纪镇长说了话，“把那两户人家也招到厂里来吧”，才进来的。当时也叫了皮高深进厂，但皮高深有主意，不愿意进来。

于是，靳宝康在前，齐成才在后，两人紧握着那根粗钢钎，靳宝康喊着“一二，一二”，便使劲地捅了起来。一直捅了二十几分钟，外边的硬壳基本上捅掉了。

“喔哟，快好了，再使把劲就好了。”靳宝康还在高兴地叫着，再使劲一捅，坏了，一捅捅了个大口子，一大股铁水似的火热的熔融物涌了出来。靳宝康惊得大叫：“不好啦……”话音未落，溶解槽爆炸了。

等人们赶过来，车间里一片白雾，热气逼人，溶解槽上方的附属装置全都炸飞了。只见靳宝康浑身烫伤，疼得在地上打滚。齐成才人在后面，跑得快，又背对着溜子口，伤得轻一点，但也是烫起了一大

片水泡。

厂里的人一边叫汽车来，一边往外抬。穿越龙头镇的南北大道，正好从厂门口过，可是到现在还没修好。翻起的路面，碎石嶙峋，汽车反而过不来。从北面抬过大河，到李家泊上大路还能快一点。可是天气冷，河岸边已有薄薄的冰皮，无法涉水而过。工人们只能临时拆了块门板，把靳宝康抬了上去。按说烫伤，皮肤上不能再盖衣服，然而都已是冻冰的天了，工人们脱下自己的大衣，遮在他身上，在寒风中硬是抬着。齐成才咬着牙、忍着疼，在后面跟着。他们翻过后堍，进了北门，遇上了叶丽娜，才上了等在那儿的汽车，往县医院而去。

27.2 靳宝康烧伤

靳宝康可是靳家三代人的顶梁柱。他这一进医院，县医院都治不好，当天就转到黄港的市立大医院，生死难料。先不说那几万元的先期治疗费，对靳家来说是个天文数字，都想象不出来这个数字对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要相当于他们几十年、甚至是几辈子的生活费用），单说是眼下的日子就没法维持了。

靳喜悦在炕上等了几夭，等不来厂里的消息，就叫老婆和儿媳搀扶着，牵着小孙子，在飘舞的雪花中，好不容易到了造纸厂，要找平金刚讨个解决办法。

平金刚躲开了。

靳喜悦一家在厂里等了一天，大小领导没一个出面，还是工友们给了他们一碗菜汤，几个窝头。

靳喜悦一看没办法，就在下班的时分，带了全家，进了镇政府大院。干部们已经下班了，办公室都关了门，上了锁。靳喜悦一家就在飞雪中，在小孙子的啼哭声中，坐在冰冷的地上，不走了。

祖云涛回到家没多久，叶丽娜刚端上饭，就有人来报告靳喜悦一家坐在镇政府大院的雪地里，不解决问题不走了。他皱着眉头，跟叶丽娜打个招呼，站起来就出门了。

回到镇政府院里，见靳喜悦一家四口还坐在泥土上。他们的肩上已积起了雪花，小孙子已哭得没有力气了，一口气一口气地喘着，小脸蛋冻得通红；婆媳俩掩面而泣，靳喜悦则是一脸怒气。祖云涛忙扶起他们，把自己的办公室打开，把他们请了进去。

祖云涛对门口传达室说：“今后有来访的群众，如果领导不在，一律先领到屋里，开个会议室什么的，不能让他们在外面。就这样让他们等在雪地里，不知等到什么时候，这是我们的政府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吗？”一面吩咐人叫平金刚、经学文和民主村的干部赶紧过来。

没一会儿，这几个人都匆匆过来了。

祖云涛先问：“靳宝康在医院怎么样了？”

平金刚说：“厂里有人在那儿，说是问题不大，没有生命危险，就是要植点皮。”

靳喜悦着急地说：“医院里催着要医疗费，得好几万呢！我们怎么办，连几百元钱也没有啊。”

喜悦妻说：“宝康出了事，叫我们家怎么办？”说着就哭了。

宝康媳妇只知道在一边流泪。

平金刚说：“靳宝康虽然在厂里干活，但是跟厂里没有劳动合同关系，还是村里的人。这些问题应该由村里解决。”

虽然平金刚和靳宝康都是民主村的人，但这种时候彭小宾也不让步：“这不对吧？你造纸厂没有给村里交提成，靳宝康也没给村里交提成。挣钱是你们的，出了问题推给我们，有这个道理吗？”

平金刚还在狡辩说：“你们还有赤脚医生呢！”

鲁队长一笑说：“你倒是想得出来，赤脚医生还能治得了大面积烫伤啊？连县医院都没办法。况且赤脚医生早就散了摊，一年五元钱都收不上来。衣春玲那儿什么药也没有。”

经学文对平金刚说：“没有合同关系，只能说明你们厂里用工不规范，对工人不负责任，不能作为推卸责任的借口。今后，厂里要对所有的员工都要签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的保险。不但你们厂，镇里所有的厂，都要这样。”

平金刚苦着脸说：“我们现在没这个钱，这几个月连银行贷款的利息都拿不出来了。”

“你们钱上哪儿去了？”祖云涛问。

“你是不知道啊，现在纸卖不出好价钱，就是卖出去了，钱还是拿不回来，这就叫三角债啊。”平金刚还是苦着脸说。

经学文很坚决地说：“你们砸锅卖铁也要把医疗费付上。为了一个人的生命，为了一个家庭的安康，你这个造纸厂算什么？社会主义就是要以人为第一要义。”

平金刚没说话。

祖云涛说：“经学文讲得对，这个事主要由你们造纸厂负责。实在不行，镇政府可以适当补助。他们家里面的困难，你们民主村要多担当一些。”

彭小宾和鲁队长连连点头：“可以，可以。”

经学文说：“平厂长，你要领着靳宝康的家属，去黄港医院看一趟。”

“行啊。”平金刚简单地答了下。

“你看工人家庭那么困难，那么无奈，你平厂长家里倒盖起了二层楼。”祖云涛说。

“这算什么？杜家骏的貂场搞得不怎么样，老是死貂，家里不是一样盖起二层楼吗？”平金刚还有点不服。

“连秦有理都盖起了二层楼。”经学文说。

“喂，秦有理不过是工薪阶层，哪来的钱盖楼？”祖云涛问。

经学文笑笑不说。

“明天查造纸厂的账！明天一早，我和学文上你们厂检查，连机器设备、连财务经营状况，趁停产期间进行检查整顿！”祖云涛说。

27.3 调查造纸厂

接下来的三天，镇政府对造纸厂进行了检查。

平金刚心里没底，还跑去问秦有理，会有事吗？秦有理一笑，这么容易就查出来啦？你以为我是吃素的啊？除非是我到外事办以后的事，我就知道了。

还是宗发奋耳朵尖，听说要查水泥厂的账，来问秦有理。秦有理没有很当回事，淡淡地说了下。

宗发奋正色道：“你小子别心里没数，被别人搞倒了还不知道。这件事上，一点差错也不能出，知道啦。”

秦有理这才认真地点着头，“那还能怎么做？”

“你去探听一下，会叫谁去造纸厂查账。”

下午，秦有理就来告诉宗发奋，祖云涛叫信用社的尹会计去查账。龙头镇上能懂账的也就这么几个人，能估计得出来。

宗发奋立马去了信用社。信用社的主任们见是宗主任来了，个个起身，热情相迎。宗发奋摆摆手，说是找尹会计有事要说。很快，尹会计就进了主任办公室，那些主任们都退了出去。

尹会计年纪不小了，头发稀疏，有些花白，见到宗发奋也是连连点头，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宗书记来啦，宗书记来啦。”

宗书记一脸严肃，用手示意轻声点，“镇党委准备安排你去造纸厂查账，我先来跟你打个招呼。”

尹会计笑得眼睛都睁大了，“感谢组织信任，感谢组织信任。”

“不过有些问题，你要注意一下。”

“哦，宗书记有什么吩咐？”

“咱们镇上的造纸厂刚办没多久，还是个新生事物，经验不多，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还是从关心爱护支持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这些问题。”

“是的，是的，那当然是。”尹会计忙不迭地说。

“有些问题，都反映出来，给县里知道了，对造纸厂的发展不利，对我们镇上也不好。对吧？”

“对，对，对。”尹会计还能说不对么。

“具体怎么处理，你就看情况咯。我们党委是相信你有这个能力的，所以安排你去。”

“宗书记，您请放心，我会处理好的。”

“这些话也就到此为止，别人面前不要再提。”

“当然，当然。”

宗发奋说完这几句，也就走了。

信用社的主任们，连连挽留，说在这吃了饭再走吧。宗发奋当然知道今天不是吃饭的时候，客气了两句，没停下。

宗发奋为什么敢这样直截了当地找尹会计说这事。毕竟在一个镇上多少年了，不管对哪个人，都会知道一点的。再说，经过了那么多次的运动，像尹会计这样上了点年纪的人，几乎个个都是胆小如鼠。别人不找他就谢天谢地了，哪还有胆量去找别人的事。

平金刚提心吊胆地等了三天，结论出来了。

机器设备是通过县工业局副局长找县机械厂的技术员来看的，说是都不能用了，早就该淘汰了。

财务上更是一团糟。那几本账簿破烂得象一堆废纸，里面记录不全，单据缺损，白条子比比皆是。前后数字、合计分项都对不起来，还有空白的、缺页的，至于会计分录记得不对的就更不用说了。连到底是亏了多少，也说不清、算不出来。来查账的尹会计对祖云涛说，这账簿啊，是有点乱，但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就这么个小厂，能乱到哪儿去啊。你再找别人也不好查。以后叫他们记账要规范点、认真点，最好派个人出来学学。我费点事，到我这儿学也行。尹会计说的话也在理。

管理上，开了员工座谈会和个别访问。大家纷纷说是厂里的事都是平金刚一个人说了算，什么事都是他一个人才知道，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监督。工人只有干活和挨骂的份，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恶劣，劳动报酬低，没有安全保障，缺少技术培训……，提了意见也没人听。

听得祖云涛直摇头，说开党委会讨论。

镇党委为这事进行了激烈的交锋。

经学文一开始就很鲜明地说：“造纸厂的问题很多，有机器设备的问题，有财务核算的问题，有经营管理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是对厂领导缺少监督和制约。只有权力而没有监督，在政治上就会出现一言堂，就会出现专制，在经济上就会出现贪污腐败。这一点是通过这次检查，我最深刻的感觉。对所有的单位、所有的干部都要有监督，既包括来自上级部门的监督，更要有群众的监督、社会的监督。没有监督，像造纸厂那样发展演变下去，我们的社会就会变成官僚资本主义，变成名义上的公有制，实际上的私有制，甚至连私有制都不如。”

祖云涛点点头。

宗发奋仰着头看着天花板，表示既不赞同，又不想跟别人一般见识，不想再去争辩什么。从高秀珍当众挑明他老婆的事情之后，宗发奋就彻底地灰心丧气了，就等着调动工作离开龙头，眼下只要不出事就行了，还管那些干什么。

见别人没说什么，经学文接着说：“造纸厂，在经济上肯定有问题，说不定是个大问题，不能把国家财产、集体财产，这几百万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变没了。损害了国家和集体，肥了个人。如果不从这儿刹住，以后就没有完了。要追查下去，追到哪一级，就是哪一级！”

宗发奋听到这儿，目光马上转到了经学文的脸上，心想，“怎么？要朝我开刀啊？”这话就不能不说了：“我认为经主任把话讲重了。造纸厂的问题，就是造纸厂的问题，不要扩大化，那样不利于安定团结。造纸厂的问题，是平金刚的个人责任，由平金刚自己承担，就到那儿为止。做事情要有条线，不能没完没了。镇党委没有必要大动干戈、替他承担。那个靳宝康的问题，也应该由民主村解决，不能什么事都揽到我们镇政府来。”

经学文也毫不相让：“我觉得造纸厂的问题，不单是平金刚的个人责任问题，而是我们该怎么样办厂，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平金刚，对造纸厂的领导之所以缺少监督，就是因为造纸厂的工人缺少基本权利。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劳动者应该享有充分的基本权利。而我们缺少的正是这些。”

“经学文同志，我可得要提醒你，你口口声声讲这个监督、那个监督，就是没讲党组织的监督，这是什么意思？最近正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革命领导干部都被下面的群众来监督，那领导的权威从哪里来？不就是自由化了吗？那还要我们领导干什么？你还侈谈什么人的基本权利，那些热衷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分子才最喜欢讲人权。邓小平讲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基本原则里，只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可没有讲什么人权。”

“维护人权和四项基本原则并不矛盾。维护人的基本权利，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具有超越于不同社会形态的共同价值。”经学文坚持说。

“那些话完全是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人权首先是生存权。我们这儿也有人权，而且有更充分的人权，天天能吃饱饭，不像1960年那样饿肚子了。这就是有了最充分的人权。”

“你讲的那是人权吗？人权有更深刻的含义，不是像头猪有个食吃就行了。比如，还要有对社会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哈哈，你把西方资产阶级攻击我们的话都搬了过来。对于革命者来说，人只有阶级性，决不承认人的共性。你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已经暴露无遗。经学文，你会为此而付出代价的。”宗发奋好像心里有底，皮笑肉不笑地说着。

祖云涛脸色发沉，却是很清晰、很明确地说：“我基本同意经学文同志的意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不能随便扣。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要否定社会主义，推翻社会主义，是一种敌对势力。不能把我们同志之间的不同意见随意扣上这个帽子。不能用‘左’的办法去对付‘右’的东西。更何况那些意见还不是‘右’的

东西，而正是说出了我们过去还没有认识到的真理。对于造纸厂的具体处理办法，要上报县委，我们听取县里的意见。”

第二十八章 征地冲突

1978年1月28日

28.1 新官上任

两个多月之后，1988年的春节后，县里的意见下来了：一、为加强龙头镇的工作，任命县工业局的辜建功为龙头镇党委书记；二、考虑到宗发奋同志多次要求调离，现调任其为县粮食局副局长兼龙头中心粮库主任。龙头粮库已升格为国家粮食储备库，但主任仍由当地配备。原粮管所长祖如海去年退休后还没有人顶上去，这回正好由宗发奋填上；三、为加强龙头港及其配套设施（如：龙头南北大道）的建设，设立龙头港建设指挥部，经学文任指挥部专职副主任（副乡级），主任由辜建功兼；四、造纸厂的问题，由辜建功来后具体处理。

县里意见一来，祖云涛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他的思路没有得到认可。但他想得开，有人在他前面主事，也好。他不用再承担什么责任，也不用再费大的心思了。

宗发奋一声叹息，往上跑了那么多的腿，县委竟然没理解他的意思，或者就是不赞成他的意思。虽然他实现了一半的意图，到上面讲了祖云涛不少坏话，终于挡住了那小子的上升之路。但他自己的目的反而没有达到。他是要离开龙头镇呀，又不是就离开个镇政府。弄了半天，还在龙头镇上，跟那些人，尤其是跟那个秦德才还天天混在一起，恶心哪！看来县里的想法是，对他和祖云涛两人都进行低调处理。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还能再打报告要求调动吗？过一天算一天吧，反正离退休也没多少时间了。说不定到粮库，弄个钱什么要比在政府机关方便多了，去就去吧。

对经学文，文件上没写，但口头传达时讲了，以后讲话要注意分寸，要注意保持一致。经学文也明白指的是什么。能一个人去搞一摊建设项目也好，受的干扰、牵制要少一些。龙头港虽然立项了，可是拖拖拉拉进展不大，连那条南北大道，修了两年还没修好，走起路来反而更不方便。经学文很想把这项搞起来。改变龙头镇面貌，这个项目有着关键性的意义，自己是愿意出力的。

没几天，辜建功就走马上任了。

辜建功，四十来岁，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身体健壮，那种几乎成了领导干部象征的大腹便便的“将军肚”在他身上不明显，尽管转业到地方快十年了，部队干部那种雷厉风行的干练作风似乎还有点。

他对海源和龙头，是有感情的，这是他当兵、提干、转业的地方，是他人生发生转折、掀开新的一页的地方。他成了龙头的女婿，而且真的把龙头看成是甚于自己故乡的第二故乡，这儿也就是他的家。甚至很可能会像老潘老叶老宗一样，在海源当兵，又在海源落下了根。

辜建功来了之后，自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把全镇的村庄都跑了遍，从最北的尖山到南面的海角，从大河口到东沙滩，仔仔细细地看了遍。尽管这些地方，他当兵时都去过，各村的干部也多少有所知道。但他还是下了这几天的功夫，他在想龙头镇应该怎样建设。

对于辜建功的到来，龙头镇的群众和干部是欢迎的、高兴的，因为他们也熟悉他、了解他，对于他在文革时尽量平息两派矛盾、避免流血冲突，以及转业之后在县工业局时对龙头的关心帮助，大家都是看到的、感激的。大家都在期望着一个新的领导对龙头镇将有怎样的作为。

然而辜书记又已经不是当年的辜连长了。从进驻龙头镇、安排被围在望海山上的“八一八”人员后撤，过去将近二十年了。这些年月里，辜建功，无论是内心思想还是外在派头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曾经的单纯，曾经的热忱，都已远去。他现在想把龙头镇建设起来，不只是因为还有点事业心。当一个领导要懂得怎么应对比他大的更上一级的领导，和怎么应对在他下面的被领导。对上一级领导，除了“感情”上的热络而外，还要有拿得出手的东西，其中重要一项就是要有看得见的“政绩”。建设龙头镇，为他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尽管他心中的这个建设，与实际的可行性，与现实的需要与可能，还差了别人量不出来的一段距离。

几天后，辜书记召开了包括沿海开发区和建港指挥部在内的第一次镇党委会。

在纪主任代表原班子表示欢迎之后，辜书记讲话了：“能回到龙头来，很高兴。我对龙头是有感情的，我是龙头的女婿。

听说在这之前，龙头的班子里有一些分歧，当然这并不奇怪，今后我们都要团结一致向前看。上级考察一个班子，首先是看这个班子团结不团结。人家才没有功夫来看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谁对谁不对啊。就是两个字，要团结。谁不团结，就没有他的位置。

对于龙头的发展，我是很有信心的。这两天，我把全镇都跑了一下，有很多有利条件嘛。我想，下一步要把龙头发展起来，重点抓二方面：一是沿海开发，二是乡镇企业。”

大家都点点头，表示很赞同。

“关于乡镇企业，我们还不多。那个造纸厂，出了点事，但是生产要立即恢复。”

“我不好意思插一句，辜书记，造纸厂的碱回收炉坏了，碱液没法回收，那个污染就更厉害了。”经学文忍不住插话了。

“生产上的具体问题，我不知道。能回收更好，就算不能回收，生产也要开始。我在工业局就知道龙头镇的GDP、工业产值就指望造纸厂。没有了造纸厂，就没有了GDP。难道我们新班子一上来，GDP反而就下去了？”辜书记马上就挡了回去。

“那平金刚还让他在造纸厂？”祖云涛问。

“在有更合适的人选之前，先用他。”辜书记的回答都是很果断的。

“至于沿海开发区，我们要搞个大项目。”辜书记接着说。

大家都非常认真地听了起来。

“我们要搞个高档次的高尔夫球场，占地三百亩。”

大家惊了一下。

“投资三千万。”

不知谁还情不自禁地“喔”了一下。这可是龙头镇从未有过的大投资、大项目啊。

“有了这个高尔夫球场，各地的精英人士就会纷纷前来，甚至国外的大资本家也会慕名而来。到那时，我们龙头海滩就会闻名于天下。”

有人高兴得都鼓起了掌。

“三百亩啊，能少打多少粮食？”有人忧郁地问。

“这就是小农经济思想了吧？”辜书记笑着说，“同志们哪，改革开放了，眼界要开阔一些，要看到全世界。世界上别的国家，土地多得很，我们叫外国的农场主给我们种粮食。我们请他们来打高尔夫球，他们请我们吃饭。哈哈，好买卖。”

“具体建在什么地方？”纪主任问。

“在西门外的粮库以南，大河以东，把你们开发区扩大。”

“那太好了。我们沿海开发区又有沙滩，又有高尔夫，又有胡总书记题字的大牌坊，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了。胡总书记那天来的情景，我一直记在心里。”纪主任高兴地说。

辜建功撇了一眼纪主任，说：“怎么一点敏感性都没有，今年和去年、前年不一样了，那个总书记已经下台了。”

“他那个题字怎么办呢？拆了它？”有人问。

“既不要拆它，也不再说起它。”辜书记冷冷地说了句，缓了口气，又接着讲：“至于占用的土地，我们对村里会有补偿的。开发商给县里交五万元一亩，县里拿三万，我们拿二万。我们再给村里五千，镇里留一万五。三百亩地，就是四百五十万元呐。能做多少事啊？同志们！我们镇上也可以到海边盖宾馆，我们自己用地也不用花钱，这点钱盖个宾馆是够了。有了宾馆，就能够再挣钱，我们自己也能去歇几天，再开会也用不着在这五十年代的老房子啦。咱们的镇政府也能搬到海边去，也建得像白宫那样。他老外能现代化，咱们就不能现代化？哈哈。”说到这儿，辜书记笑了起来。他在为自己的思想之解放、思路之开阔，而且能在自己手里得以实现而高兴。有的干部的思想解放，都往那儿去了。

“给村里一亩地才五千，少了点吧。现在一个农民平均大约是二亩地，地被征走了，他就拿个五千元，以后几十年的日子怎么过，他的下一代又怎么过？”经学文不无忧虑地说。

“看你操那些心。这个价钱和分成比例是我和县土地局定的。这个给村里的五千，是给村委会的，还不是给村民的。至于给村民多少，由村里自己定。我们这也是把权利交给村民自治，实行经济民主嘛。”

“能不能向开发商再提高点地价？现在这几年地价上升很快。”有人问。

“不可能。这个开发商不是一般来头，据说是韩国的。我们都够不着和他们说话。这个项目也是上面牵的线，我辜某人也没有本事把它拿回来。叫上面牵线，也不会是义务劳动。其实，连我也不知道韩国人给的是多少钱一亩。那些事，你们都懂的。没有他们的就没有我们的，不用多说了。再说要价高了，把人家吓跑了，谁能负责任啊？”

“这样说起来，我们镇里和村里也没有多大的机动余地。”有人说。

“还要多大余地？这就很不错啦？同志们，打个比方，好像一个猴子，以前计划经济时被铁链锁着，转来转去就是这么两步路的地方。”辜书记讲得高兴得都站了起来，还学着猴子受拘束的样子。“现在我们搞改革了，实行商品经济了，把铁链拿掉了，它可以在笼子里跑来跑去了，愿意怎么跑就可以怎么跑，欢腾得很啊，同志们！还要怎么样？不要笼子啊？那不就成了自由化啦。没有笼子，猴子都跑没了。剩下我们干什么，要自己啊？哈，哈，哈。”辜书记挺兴奋地说着，觉得这个比方很生动。

辜书记的这个比喻，实际上是“鸟笼理论”的翻版。当时在解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有个高官就把它比喻成用个笼子来养鸟，既不用栓它的腿、绑它的翅膀，又能让它在里面扑腾着转来转去，想跑也跑不掉。这就是高官愿望中的市场经济，就是他们觉得已经很开恩了的理想社会。

“但是，笼子再大，那怕是给它个猴山，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跑来跑去，那也还是只猴子，只属于它主人，而不属于自己。改革的终极目标，社会主义的理想应该是实现人的解放，人最终属于他自己。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自由的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中心思想。”祖云涛说。

“哼，你这一套讲给谁听？我们这儿没人听这些。你们这儿倒是挺民主的喔。我书记在讲话，你们就这么议论？这个规矩要改。”辜建功心里颇为不悦。

龙头镇党委开会，大家还可以相互议论一番。这是纪镇长主政多年形成的习惯。

最后，辜书记严肃起来，“我再说一遍，这是上面定的项目。我们全镇上下。一定要齐心协力、全力以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散会！”

28.2 事态渐起

民主村村委会接到镇政府通知，征地三百亩，每亩补偿五千元。

这像又一颗重磅炸弹投向了民主村（本书用“重磅炸弹”这个词已经若干次了，很想再换一个词，但最后还是觉得这个词更能说明问题）。民主村的每个角落都受到了震荡。

首先是村委会接连开会研究。

村支书彭小宾讲了开场白：“镇上要在我们村的土地上建个大项目，是个好事情。这对于我们村也是个大事情，要好好地研究。”

“三百亩地？三百亩地呐！这可不是个小数字。西门外的地就是我们民主村的饭碗。去了这三百亩，我们还能有什么。以后我们靠什么吃饭？”郭中和并没有为这项目感到高兴，相反很不满。他和平金刚、杜家骏不一样，他没有实力自己办个企业，然而他是个种地能手。尽管他也曾是部队干部，但是在庄稼地里这二十多年的摸爬滚打，加上他的用心和用力，他可以称得上是民主村农业生产的标兵。他和他的儿子郭朝阳，不但种好了自家的地，而且把外出打工的迟解放他们几家的地“借来”一起种了。由于土地还不允许转租转包，因为这又会涉及到要交地租、受“剥削”，这些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里也解释不清的问题，于是就由各户私下里自己谈条件“借用”，上面也不管。这两年，“借”来的地就更多了。郭中和一家一共种了有三十几亩地，这在民主村是头号“种粮大户”，日子真的是蒸蒸日上。虽然没有平厂长、杜场长那样“风光”，可是加上养猪喂鸡，年收入也有上万元，而且比较稳定、踏实，操别的心相对要少一些。只要不重新划阶级，郭中和还没有要很担心的事。不过说回来，真要是再重新划分成份，还真麻烦。一方面要给借出地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儿童交点钱粮，受他们的“剥削”，那些老弱病残反倒是“不劳而获”；另一方面，农忙时也要请一些人来帮工，给点工钱，又在剥削别人。如果人家不好意思收钱，就吃碗面条，那不就剥削得更厉害啦，少说也是个富农啦。好在现在没人计较这些。而如今，虽然没有要划成分，却要把这些地征走。这几年的心血和希望，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打得粉碎。所以，他是坚决反对的。

鲁队长对这些事也挺担心。他现在年纪大了，不指望有更多的长进，和哈妹俩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把领来的皮平平的小闺女丫丫拉扯大，就行了。好在小丫头以后的开销小，自己也不用攒什么钱，这几年的心态挺平和，日子过得也蛮好。他的地也不在要征的范围，本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总觉得这是民主村的一件大事，是民主村乡亲们的大事，关系到整个民主村以后的发展变化，乃至影响到子孙后代的大事。地没了，靠这么几千元，过个一年、二年、三年，以后呢？这事不能不认真斟酌。

“这事还真要好好考虑考虑呢。三百亩，不是小数字啊。以前我们喜欢说自己是城里人，可真要没有了地，去当‘城里人’，我们还真当不起。我们毕竟是农民，没有了地，我们要饭也没有地方啊。他们征地能不能少一点，一百亩还少啊。”

杜家骏尽管有地块在征地范围内，但是他早已不靠这地吃饭了。貂场已经占据了他的全部精力。这两年，他的貂场搞得不顺利，貂皮的价钱回落，养的貂又常生病。他又怪叶丽娜那儿没有好药，又怪场里的工人不懂技术、不尽力，但是他不知道只靠他和自己的老婆、孩子，无论是技术还是管理更不用说思想观念，都难以承担一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企业。可以说，他的貂场，发展已经到了尽头，能维持就不错了。杜家骏自己没有意识到这点，他为貂场操的心更多了，貂场却依然没有起色。如今又要征地，按说这对民主村确实是个大事，可他的脑子顾不过来了。

“噢，征地啊……，是个大事，是个大事，要好好研究。一亩地给村里五千，我们村委留多少呢，给村民发个二千就差不多了。”

至于平金刚，他的户口、组织关系还在村里，还是民主村的支部委员。可他已经几年不回来开会了。连他自己的地也交给了郭中和。郭中和种他的地，给他的钱粮当然要多一些，并不赚便宜。自从造纸厂出了事，停了几个月的工，平金刚窝在家里挺上火。辜书记刚一说要恢复生产，他马上就蹿到厂

里，精神也来了，劲头也足了，又可以指挥这、指挥那了。反正，碱回收炉炸坏了就干脆不用，造纸厂再没有什么危险的东西了。回收不了废液，污染就污染吧，反正也不是污染了自己家。污染的事，现在大家都知道，辜书记是最清楚了，都没有说话的，自己就更放心了。靳宝康嘛，治治就行了，也不是要命的事。就算不植皮，也就是脸上留个疤，样子难看点。好在早就有媳妇了，儿子都有了，脸上难看点也不挡害。所以这一阵，平金刚情绪又好了。村里征地不征地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他根本没过问。

彭小宾说了：“征地这事对我们民主村确实是个大事，大家刚才提的两点很好。一是，征地的面积要控制，少征一点，一百亩还差不多；二是补偿要提高，五千元一亩，最多只能管二、三年，以后会后患无穷。另外我还在想，农村的土地关系，不能这么简单地变成买卖关系。宪法规定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我们民主村可以以土地入股方式加入那个球场，以后他们有了盈利，就分红给我们。土地还是我们村里的，他们也搞起了项目，我们村民也每年有收益可得，不就解决了长远之计吗。再有，办起了球场，里面的工作人员要优先录用咱们村的人，比如先定好名额，用十个、还是二十个。非得要先拿走我们的地干吗呢？”

鲁队长脸上一下子有了笑容，“啊呀，小宾说得好，有水平。”

邬中和还有疑惑，“那你跟镇上去说说看。”

彭小宾去了镇政府，把他们村支部的想法、意见和建议，逐一向辜书记作汇报和解释。

辜书记没听他讲完，就摆摆手，虎着脸说：“说那么多干什么呀？什么土地入股，没听说过。在我这儿就是一句话，讲政治，什么事情都要讲政治。建高尔夫球场看上去是建设项目，实际上也是个政治任务。我们只有坚决执行的份，雷厉风行、保证完成任务。虽然改革开放了，但是这些革命队伍的基本原则是不能改变的。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个项目一年见成效，绝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不然，我们龙头镇怎么能三年改变面貌。”

彭小宾很失望地转过身去，走了。

征地的布告贴在了龙头镇的大街和民主村的胡同里了。不但被征到地的农户焦急万分，整个龙头镇的群众也都议论纷纷。

民主村的村民不约而同地来到了西北场院。邬中和的儿子邬朝阳态度最激烈，红着脸在叫：“这怎么能行呢？不让我们过日子啦？”

皮高深一看村支委的儿子都能这么说。自己是辜书记的小舅子，更可以说了。皮安己一家也是靠种地打粮，这几年刚有点好日子，怎么说变就变了呢，“这不符合党的政策啊，土地是咱们的命根啊。我们农民没有了土地，指什么来钱？指什么吃饭？算个什么呢？蹲在炕头喝西北风啊？你说是不？”他在问周围的人，周围的人也纷纷地应着：“是啊，是啊，以后我们算什么呢？”

王山还是没出来，窝在家里生闷气。小连子过来了，可他不像他媳妇，不会说什么，就跟着大家说：“是啊，是啊，算什么呢？”

齐成才因为造纸厂征地的事被抓过一次了，这次他没敢多说话，可也是来了。用脚跺着地，眼睛冒着火。其实他比谁都更气愤。

于又发也过来了。他的小铺子变成了三间门面的商店，连卖带修，生意不错。地交给了别人种。虽然也不指望地里的收成，但他一算，一亩地补给村里才五千，补到自己手上还不知道是多少，这也太便宜了吧，也就是一台电视机的钱，所以他也不能不过来看看。

也有为这事高兴的。谁？申光荣。申光荣从分田单干以后，日子过得不舒畅。他身子弱，不大会农活，叫他独自挑起全家的生产重担，真是有点勉强。他很向往以前生产队集体劳动的日子，什么事也不用他操心，跟着一起混混就可以了。虽然日子并不富裕，可大家都差不多，再有能耐也就是这么回事。如今，有的都已经盖上了楼，有的人还有了自己的汽车，有了拖拉机，可自己什么也挣不回来，生活状况还赶不上以前那时候。媳妇还为此整天唠叨个没完，今天说张家买了新衣了，明天又说李家割了几斤肉了，耳朵根都听得起了老茧。所以，他不喜欢改革开放，他喜欢集体经济学大寨那时候。那时候，说不定自己有时还能跟着秦有理咋唬个别人，小小的风光一下。现在，是个人都超过了他，在村里他被别人比得都没有了。他最希望能回到以前的那个时代，照旧做个人民公社社员。这次要征地，他挺高兴。三百亩？征少了，恨不能把地全都征了才好呢。都征了，大家都一样，国家不会不管，又能吃大锅饭了。所以他也悄悄地跟在后面看光景。

大家在民主村场院里吵了半天，没有用。村里的干部一个也没过来。

“这种时候，村干部们连个影也没有了，整天不知道他们去干什么了。”齐成才从上次被抓进过派出所之后就对所有干部都有意见了。

“你要指望这些干部，黄花菜都凉了。”申光荣说。

郭朝阳把拳头一举，说：“在这儿说，没人听。那我们到镇政府院子里面去说，说给领导听听。”

“对，说给领导听听。”大伙儿簇拥着，到了镇政府门口。

大院门口传达室老头，一看这么多人来，就挡着不让进。

大伙儿嘴上说：“怎么不让进啊？为什么不让进。”其实也没有真的往里进，虽然老头一个人是挡不住大家的。

大家就在大门外，说着、吵着、议论着，并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知道该找哪个领导说说。

有人去报告了辜书记。辜书记笑笑说：“让他们在门外说去吧。到了吃饭时间，咱们也不管他们的饭，他们自然会回去的。哈哈。”

到了中午，人并没有散去。围上来看的人反而是越来越多了。

又有人去报告了辜书记。辜书记这时脸上不高兴了，“我们的干部，这种时候怎么不站在群众面前呢？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吗？影响多不好啊！”他自己却没有挪步的意思。

还是祖云涛出来，走到了大院的门口，听了听大家的说话。而后对大家说：“你们的意见，我们听到了。村委会的意见，我们也听到了。我们会认真地考虑。是征三百亩，还是二百亩，还是分几期，先征一百亩看看，这些都好商量，包括补偿的标准，都可以协商。你们先回去吧，别饿坏了肚子。让我们再考虑考虑。”

人群渐渐地散去。

28.3 群体事件

太阳快下山的时候，西门外突然响起了“隆隆”的机器轰鸣声。

远处开来了五、六台大型挖掘机、推土机，下了公路，往南面的地里推进。

正在自家地里的皮高深看着这些大家伙朝自己开过来，跑上前去一看。第一辆推土机的驾驶室里有人站着，说了声：“就从这儿开始！”那推土机前面的铲刀又往下一落，马达吼吼地一响，推土机往前一蹭，几行青翠的玉米秆就倒下了。

皮高深急得就站在推土机前，伸开双臂挡着，高叫着：“这是我的地，凭什么来铲我的庄稼？”

推土机上的人说：“这儿的地，政府已经征下了。快走开！”

“我就不走！”皮高深往前一步，抱住了铲刀。

这时驾驶室里伸出了一个脑袋，说：“哟，不是高深兄弟吗？这块是你的地啊？”

皮高深抬头一看，说话的正是迟解放，忙问：“解放啊，你不是在县城打工吗？”

“说是在县城，是公司在县城。实际上整年累月在外面的工地上，哪儿有活上哪儿去。”迟解放下了车，说：“这是怎么啦？我们是中午接到紧急通知，说龙头有个项目马上要上马，连忙从北面赶过来，要连夜施工，平整土地。”

“哪是这么回事，这地还没征呢。”皮高深说。

车上指挥的人，正是老岑头。他走过来说：“这事你跟我们说没用，我们是按上级的指令办事。你要是不同意，得去找村里、找镇上。看在这是小迟的老家份上，我等你二十分钟。二十分钟镇里不来人说明，我们就按上级指令推土施工。”

人家说得对，皮高深就撒鸭子似的往回狂跑，进了西门就满街满胡同地喊：“不好啦！狼来啦！推土机来铲咱们的庄稼啦！大家快去啊！”

一时间，“狼来了！”的喊声，传遍了民主村的街巷。乡亲们一听，知道是怎么回事，急得丢下手里的活，男女老少都往西门外跑去。

二十分钟后，镇里的干部没有来，倒是民主村的乡亲们在推土机前围了一圈。连龙头镇其它三个村和邻近的赵村、王庄的群众渐渐地也都过来了。

有人跑进镇政府报告辜书记，说民主村的人把施工队都围上了。

“好大胆，干扰经济建设的正常秩序。民主村的干部哪去了？叫他们上第一线把村民劝走。”辜书记一反以往经常微笑的脸，板着面孔对来说。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在领导嘴里，群众和乡亲们的词听不到了，变成了“村民”。

事情的变化，是中午村民们聚集在镇政府门口，辜书记立即给县委卞书记打电话，说民主村的干部群众对征地有意见，他本人建议加快办事速度，先造成既成事实，叫民主村想改也改不了。县委卞书记甚为称赞，通过县建筑公司下令调工程队紧急赶来龙头，连夜铲庄稼平土地，这样叫后面的人什么话也不用说了。没想到民主村的村民居然又围了上去。（这时卞已是县委一把手了）

半个小时后，祖云涛过来跟辜书记说，西门外已经聚集了数百人，有的人已经爬到了推土机的顶上，再不处理要出事情的。

辜书记狠狠地说：“民主村的干部呢？把他们喊过来！要是出了事。把他们一锅端，全部撤职！”

有人去喊了。

祖云涛说：“现在的事情不是撤不撤职的问题，是要对现场群众进行劝导。”

“劝导？劝什么导？对于错误倾向绝不让步。”

一会儿，彭小宾过来了。

“你作为民主村的支部书记，你们村的群众在闹事，你为什么不去劝阻？”

“我劝了，但是我的话没有用，他们不听。中午，祖镇长已经说了，有关事项要再研究再考虑。为什么现在就派推土机去铲庄稼？”彭小宾说。

“你讲话不要站在民主村的村民一边，而是要站在镇党委一边。老祖中午的讲话，只代表他个人意见，没有经过镇党委研究同意。限你半小时以内把村民劝走。”

“我没有这个本事。”彭小宾冷冷地说。

“那要你这个书记干什么？我现在就宣布撤消你的书记职务。”辜书记大声说着。

彭小宾没有申辩，转过身去，就走了。

“老祖啊，你马上去赶到现场，向村民宣讲党的政策，立刻解散，不然就是聚众闹事，性质就变了。”

“你这意见，经过党委研究了吗？”祖云涛反问。

辜书记大吃一惊，没想到祖云涛会反过来问自己，铁青着脸说：“我作为第一把手，我的意见就是党委的意见。祖云涛同志，在大风大浪面前要经得起考验！”

辜建功看了窗外一眼，夕阳快要失去它最后的一抹光辉。他拿起了电话，要了派出所，叫诸所长立刻派警察去赶走围观群众。

诸所长在电话里说：“辜书记啊，这不是围观群众，这是对征地有意见啊。征地的问题没有妥善解决，是赶不走的。硬要去赶，是会出问题的。这种事情，最好不要出动警力，你们领导去现场和群众面对面地协商。”

辜建功的眼睛里冒了火，这个老狐狸，都这时候了，还跟我兜圈子。他放下这个电话，又直接和县委卞书记通话，说民主村纠集了龙头各村数千人围攻工程队，情况严重，已经超出了反映情况、要求解决问题的正常范围，矛头是针对党和政府来的。事态即将失控，我快要坚持不住了。请求书记下令出动警力强行驱散，并且对少数不法为首分子逮捕法办。

县委卞书记随即给诸所长下了命令。诸所长这才喊上全所除了留个人看门以外的所有警察，全副武装，跑步赶到西门外。

当诸所长带着这队警察，跑过西街的时候，街上没有什么人，都去了西门外了。只有辜书记、祖镇长和一些镇干部等在大院门口，见诸所长他们过来，辜书记一挥手，示意他们停下，铁青着脸，跟他们说：“这是一次很严肃的政治任务，是一场很严重的政治斗争。到了那儿，出现在你们面前的就是一些胆敢向政府挑衅、跟政府作对的人。我们决不能姑息，决不能手软。该动手的时候就要坚决动手，决不能有妇人之仁。同时也要注意文明执法，要做到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又要他受不了。这些方面，我想你们比我更内行。好了，去吧。”

辜书记的这个“文明”执法要点，是见之于某地城管执法的书面培训教材。

去了西门外，人渐渐多了，能看见前面黑压压的人群，一片嘈杂声。

在最外面的，是些老人、妇女、小孩，见了警察来，也都让开。

辜书记、诸所长他们往里进并没有费什么事。等下了公路，往里走，路边还有一辆轮椅。

竟然是程贵安。

程贵安虽然整天躺在炕上出不了门，头发老长，眼窝深陷，可还是很关心时事，听说镇上出了这么个大事，怎么也耐不住寂寞，一定要爬上轮椅，自己摇着过来。看见这队警察从自己身边鱼贯而过，激动地拍着手，连说：“镇压，镇压！一定要镇压！看他们要反了天了！”

警察队伍没理会他，从他身边匆匆而去，程贵安还想往前摇，那田间的路终究不比大路，一下子那轮椅就翻了。程贵安“哎哟，哎哟”地从轮椅里爬出来趴在路边的地上。旁边是一、两个比他还要老的老人，也没办法扶起他。只见他双手颤抖却还在拍着地，嘴里不停地说着：“镇压，镇压！坚决镇压！”

天色已经暗下来，推土机、挖掘机四周黑压压地都是人群，也看不清有多少人。一大片的地里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庄稼全踩烂了。施工机械打开了前面的车灯，灯光里能看到人们在叫着、跳着。一、两个小时过去了，没等到领导来，人们的情绪开始激动了。

郭朝阳坐在了推土机前面的大铲刀上，皮高深更是爬到了驾驶室的顶上。

更有人瞎起哄。秦德才，别看他这两年都是病歪歪的，这时候不知怎么像老鼠一样钻到了最前面，像打了强心针似的来劲了。露着大牙喊着：“砸了它，干脆砸了它！”

申光荣就朝迟解放叫着：“开呀，往前开呀！大胆地往前走呀！”

迟解放当然不理不睬。

老岑头，此时站在推土机的大轮胎上，一脸的焦急，拿着大哥大，一会儿给这个打电话，一会儿给那个打电话。

衣春玲和车素花也都挤了进来。见皮高深站在了顶上，衣春玲忙喊：“高深啊，快下来！冷静点，别给人家抓住辫子。下来一样能说话。”

皮高深还不肯听，反而在上面蹦了起来，使劲地用脚跺，“嘭嘭”地直响，赢得下面一阵阵的叫好声。

忽然人群外一阵呼叫：“警察来了，警察来了！”随即闪开一条道，辜书记、诸所长板着脸领着一队警察匆匆进来。

辜书记一见站在顶上的皮高深，大喝一声：“皮高深，快给我下来！”

皮高深一看是姐夫亲自喊他，一哧溜就下来钻进人群不见了。

辜书记爬上推土机，站在驾驶室外的踏板上，望着在车灯照射下激动的人群，心里也是百感丛生。这些村民啊，本可以和自己一起开发龙头镇，可以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一股可以利用的力量，眼下却成了自己向上发展的绊脚石，可悲可叹。一种厌恶油然而生。他朝地下吐了口痰，对着四周大声地说：“村民群众们，你们是不明真相的，不要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挑动。有人在利用你们反对政府、反对改革开放、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你们不要上当受骗啊！你们现在已经到了违法的边缘，赶快离开现场回家去。只要现在就离开现场，政府可以既往不咎。再不走，性质就变了，就是站到党和政府的对立面了。对立面是什么意思，我想你们应该明白，对于事件的策划者、组织者，我们一定会依法制裁、严惩不贷！”

辜书记威严地扫视了下四周，可人们站在那儿静静地、一动也不动。

辜书记看见最前面还坐在铲刀上的邬朝阳说：“你怎么还不走？”

“我们要地。没有地，我们吃什么？”邬朝阳说。

“这个不用你操心。政府很快会拿出方案，明确答复你们。”

“没有明确答复就来铲庄稼啦？我们不走！”邬朝阳还是执拗地说。

“对，对！没有明确答复，我们不走！”四周的人也都喊了起来。

辜书记大怒，对诸所长大叫一声：“这就是个带头闹事的，抓走！”

后面二个警察走上来，正要动手。

已是满头白发的车素花上前说：“不能抓人啊，辜书记！”

人们也都往前踊，“不能抓啊，不能抓啊。”

最前面人都已经和警察挤到了一起。

“不能抓人啊！”

“我们要地啊！”

人群吼了起来，声浪一阵阵地抬高。前面的人被后面的人推着，一步步地往前挤，眼看就要挤过警察，挤到诸所长的前面了。诸所长往后退，也爬上了推土机。

人们举起的拳头都已经高过了警察的帽子，似乎要伸到辜书记的身前，局面眼看就要失去控制。辜书记的脸发白了，头上冒汗了。他回顾四周，都是激动的人群，他被包围了，他没有退路了，他真怕被人群拖下去，他不敢想那会是什么结果。他紧张了，突然情绪失控，尖声叫道：“开枪！开枪！诸所长，开枪！”

诸所长的手在腰间掏啊掏，楞是没掏出来。急得他干脆就拿着手枪套在半空中比划着。

然而，诸所长的这个动作，却被他身后的车灯照耀着、放大着，老远就能看到他那模糊的身影，在腰间摸了好一会，又在半空中摇晃。

这不是拔出枪来了么？要干什么？

车素花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嘴里尖叫一声：“不能开枪啊！”话没讲完，脚却没站稳，又被后面的人一挤，还没等衣春玲扶住就“啊呀”一声倒下了。

一见有人倒下了，后面的人就大喊：“开枪了！快跑啊！经老太被打中了！”

刹那之间，满山遍野地都喊了起来：“开枪了，快跑啊！死人啦！”这数百上千人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跑，也有摔倒的，也有撞到一块儿的，哭的，喊的，叫的，整个西门外几百亩地里乱成了一片。

诸所长忙着大叫：“我没开枪，我没开枪，大家慢点跑。”

可是，没人听了。几分钟的时间，人们都跑远了。衣春玲扶着车素花走在最后面。

车素花还在说：“不能抓人啊，不能开枪啊。”

衣春玲说：“没开枪，我们先回去吧，叫村干部来说。”

黑漆漆的田地里，还能见到一些丢弃的鞋子和帽子。

辜书记对工程队的老岑头说：“现在可以开机器推土了吧。”

老岑头板着脸，没说话。

迟解放把帽子往地下一摔，哭丧着说：“还开啊？我不干了！”下了推土机就要走。

老岑头喊着：“解放哎，别走哎，你能开上机器不容易哎！”

迟解放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了。

28.4 事后处理

民主村的干部们这一夜当然更焦心，都在西北场院的村委会办公室里，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们没想到工程队会突然进来铲庄稼，更没想到后来辜书记会带了警察过去。当听说西门外开了枪，人们慌不择路、拼命狂逃的时候，都坐不住了。

彭小宾站起来说：“马上分头下去，看看伤了什么人，有没有没回来的。我们再想办法，去找，去救。老杜，你留在这儿，汇集情况。”

一、二十分钟后，他们几个都回来了。情况明了了，既没有开枪，也没有伤人，连迟解放都回来了，只有邬朝阳被警察带到派出所去了。

邬中和瞪着通红的牛眼，跳起来，直骂人，要去冲派出所抢人。

彭小宾说：“不可以。越是这时候越要冷静。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邬朝阳在这件事中没有错，更没有罪。如果你们赞成的话，我们村干部集体去镇政府请求放人。”

彭小宾看了看他们几个。

杜家骏说：“这种时候，咱们村干部又要上最前面，难呐！我听说村里还有些群众对咱们不理解，说咱们的坏话，说为什么不到现场，领着他们跟工程队干。”

鲁队长说：“是哎，咱们村干部就是难啊，另一头，辜书记还训彭小宾呢。咱呀，就是个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但是，话说回来，难归难，难也得去啊。谁叫咱们是村干部呢。”

杜家骏说：“这个辜建功也真是。以前看他还是个挺好的人，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怎么变成了没心没肺的人。文革时两派斗争，他还能讲政策，不让事态恶化，处理得还是不错的。”

鲁队长说：“人是会变的。比起那个时候，他现在有更多的个人利益要考虑、要获取、要维护。”

彭小宾说：“还有我们的体制也有些问题。是我们的体制在让这些干部这样去想、这样去做。体制变好了，人会变好。体制不变，人也会变，但那是另一种变了。他要去适应、去迎合这种体制，辜书记就是这样在变。”

鲁队长又接着说：“人家高尔夫球场要买地，是商业项目，他们是为了挣钱的。政府工作人员在里面掺和什么呢？去帮人家挣钱，自己也从中拿好处。那还是为人民谋福利么？”

“不用讲这么多了，去还是不去。”彭小宾说。

“去！你们不去，我一个人也要去！”邬中和气鼓鼓地说。自己的儿子被抓走了，有这个想法好理解。还能坐下来，跟大家一起商量事，已经算不错了。

“那我们就一起上镇政府去吧。”彭小宾说。

于是他们四个一起往镇政府院子走来。

路上，于又发过来说，他爷爷于村长也要来。这几年，老于村长的身体越来越不行，咳嗽气喘得厉害，天天吸一小瓶“鲜竹沥液”，那时在农村这也算是挺贵的药。七十大好几的人，平常也不出门了，有什么事，别人也不让他出来。

“别，别让他老人家过来了。这都已经后半夜了，他还没睡啊？”彭小宾说。

“他一夜没睡，一直在炕上等我回去。等听到了这情况，一定要来。”于又发说。

“别来了，别来了。”鲁队长、邬中和也都说。

“那好，我回去再劝劝他。”于又发往回走了。

彭小宾他们四个进镇政府大院，大院时里四处都亮着灯，谁也没有睡。祖云涛听到他们来，先过来把他们请进办公室，又把辜书记喊了过来。

辜书记走进屋来，冷冷地看了民主村的干部们一眼，说：“你们民主村闹出这么大的事，你们村干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说，你们该当何罪？”

彭小宾平静地说：“在这次事件中，民主村的村民没有错。”

辜书记白了一眼，“那你们是来干什么的？”

彭小宾说：“被抓走的那个邬朝阳也没有错，更没有罪。我们希望镇领导能放了邬朝阳。”

“彭小宾，你已经不是民主村的书记了，你跑过来说什么话？”

“我可以不是书记，但我还是民主村的村民。作为村民代表，我可以讲这些话。”

“弄了半天，你们不是来负荆请罪，而是来向党委集体示威的啊？”辜书记狠狠地说。

鲁队长说：“抓人更容易把矛盾激化，对立情绪会更严重，希望镇领导把人放了，便于我们去做群众的工作。”

辜书记闭上眼不说话了。

祖镇长拿起电话，叫诸所长立刻过来。

十多分钟后，诸所长赶了过来。他前脚刚进，后面又响起了人声。原来于村长也过来了。于又发实在拗不过，正搀着他进来。

于村长一走进屋，除了辜书记，其他人都赶紧站起来，连声说：“您老怎么也来啦？您老就不用过来啦。”

于村长拍着胸脯，气还没喘定，就说：“民主村出了这样的大事，我怎么能不来啊？我放心不下啊。辜书记啊，改革开放到今天不容易啊，不能再折腾啦。要珍惜现在这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啊。过去搞斗争、搞运动，搞了几十年，结果是怎样？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受了伤害。或许不应该由我来对领导讲这些话，但这是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啊。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要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啊。”

“什么群众？这不是群众，这是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群众跟政府对抗。”辜书记说。

于村长又咳嗽了。鲁队长拍拍他的后背，于村长摆摆手：“我还没说完呐。辜书记啊，不要让政府的征地行为伤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伤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啊。对群众的不同意见，也不要听不进去，就扣帽子打棍子，就上纲上线，甚至动用专政机构进行镇压。过去左倾错误的时代，一有个什么事，就非要来个你死我活。不给对方留退路，也不给自己留退路。现在不需要这样了嘛。很多事情，我们可以民主协商嘛，可以包容、可以妥协嘛，甚至可以退让嘛，相互间要有良性互动。很正常的事情，不要弄得鸡飞狗叫、几败俱伤，大家都不要情绪化……，咳，咳，咳……”

于村长的话又被一阵强烈的咳嗽打断，鲁队长拍打着于村长的后背，也无济于事。突然于村长的喉咙嘶鸣起来，拖着长长的、尖尖的啸声，很费劲地喘气。

祖镇长对门外喊道：“快叫叶丽娜过来。”

有人在胡同里边跑边喊了：“叶大夫，快！有急病！在大院里！”没等那人跑到叶丽娜的家，叶丽娜就迎头跑过来了。她这一夜也没睡，刚去看了车素花的脚才回来。

叶丽娜跨进办公室一看，于村长只剩了极细弱的气息，鼻翼在微微煽动，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脸憋得通红。

“他这是喉咙里有痰给堵住了。”叶丽娜掰开于村长的下颏，就把自己的嘴对了上去，猛地一吸，不行，又一吸。而后她转过头来，眉头紧紧一皱，“泼”地一声，从她嘴里吐出一口浓浓的黄痰！于村长嘴里的一口浓浓的黄痰！

刹那间，屋里都安静得鸦雀无声，大家都敬佩地看着叶丽娜。这位美艳丰韵的少妇，竟还是这样的高尚、伟大。

叶丽娜也没说什么，拿起祖云涛的茶杯漱着口，回头看看于村长。

于村长长地舒了口气，看着大家，似乎不明白刚才的事，断断续续地说着：“我不行了，我快要死了。我最后的一句话就是，可别再把民主村搞乱了啊。”

祖云涛拍拍于村长说：“老村长啊，您老就放心吧，民主村不会乱。乱的苦楚，我们都尝够了。”又对旁边的人说：“你们到卫生院拿副担架来，把于村长抬回去吧。”

于又发和一个镇干部拿来了担架，把于村长抬走，叶丽娜也跟了过去。临走，于村长还在担架上抬着手说：“要妥善处理啊，要妥善处理啊。”

祖云涛送到门外说：“您老放心，明天我会过来看您。”

于村长走了，屋里又静了下来。只听墙上的钟摆在“滴滴答答”地响。

过了一会儿，彭小宾开口了：“我们希望镇领导和派出所放人。”

又寂静了一会儿，辜书记闭着眼说了句：“放不放人，权力在诸所长。”

又静了一会儿，诸所长说：“放。”

辜书记依然闭着眼说：“我可什么也没说啊。”

邬中和这就憋不住了，一下就跳了起来：“我这就去派出所领人。”

诸所长微微一笑，说：“邬主任啊，你我都是老相识了，我还能把你儿子怎么样？放心吧，连禁闭也没关，在会议室的长椅子上躺着睡觉呢。”

邬朝阳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

第二十九章 付局长来了

1978年1月29日

29.1 308房间

这一阵，造纸厂的污染少了些。不是因为重视了环境保护，增加了治污设备，而是销量不行了，机器开一阵停一阵，处于半停产状态。工人们辞退了几个，剩下的这些也是来几个月歇几个月。平金刚不着急，这对于他个人并没有多大损失，他是从镇政府拿的固定薪酬，另外再拿效益提成。倒是工人们沉不住气了，因为他们歇不起，他们远不到潇洒得一年可以休闲几个月的地步，家里的老婆孩子还要等着他们回去养活呢。

这不，齐成才夹着一包用报纸裹着的東西，进到了平厂长的办公室。

“平厂长，在忙着呐。”齐成才见着厂长客气得边说边点头，把那包东西放在了办公桌上。

平金刚当然知道其中的意思。因为即使开工也用不了几个人，有时叫张三来，有时叫李四来，全凭他厂长一句话。这厂长干得反而比以前滋润多了。这些工人忙着巴结他，送来的东西有时就比他的提成还要多。他现在想的是，给他的包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呢。

“你这小子，在家闲不住啦？”平金刚也会装着腔调拐个弯问。

“是啊，在家没有事，上海边摸了几个虾，带给你尝尝，还是活的呢。”齐成才答。谁都知道，在海边只能摸蟹而摸不到虾。虾，显然是花钱到水产站买来的。

平金刚伸手在包上一摸，果然里面噗嗤噗嗤还在动。“嚯，个头还不小呢。”脸上有了点笑意。

“厂长，那咱们快要开工了吧？”齐成才眼盯着平金刚小心地问着。

“快了吧，到时会通知你。”平金刚随口说了句。

“那谢谢厂长啦。”稍停了会，齐成才又说了句：“还有个事呢。”

“还有什么事啊？”平金刚装着不是很在意的样子，把那包虾放到桌子下面了。早点拿下去，省得有人进来看见。

齐成才从口袋里掏出一叠单据，放在办公桌上，说：“这是靳宝康托我拿来，要厂里报销的医药费。”

平金刚一听，像被毛毛虫蜇了似的，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还要花厂里的钱啊！没有了，咱们这儿没有实行公费医疗。上次是没有办法，祖书记说了话才让报。现在还想报啊？没门！”

“他家里挺困难，一个劳力也没有，现在吃饭钱都难，更不用说是医药费了。”

“你替他操什么心啊？走！”平金刚把桌子一拍，吼了起来。

齐成才也生了气，转身就走。

平金刚忙说：“把那医药费发票拿走。”

齐成才没理，继续往外走。

平金刚两步上去，就把那些单据塞进了齐成才的口袋里。

那些虾还在厂长办公桌下面的纸包里蹦哒呢。

靳喜悦听齐成才回去说平金刚拍了桌子不让报，又把单据拿了回来，心里火啊。自己为革命上战场拚命，英勇负伤。儿子上工厂，也是为革命干活，你厂里设备有问题，出了事故，我们受了伤、遭了罪、家里生活没着落，怎么公家反而不管了呢。这算什么道理？可是上哪儿讲这些道理？靳喜悦想的还是去找公家、找政府。上次来找，不就是祖书记解决的吗。于是，他又领上了全家：他老婆、他儿媳和他孙子，往镇政府去。本来是要抬了靳宝康一起去，可是凭他们四个抬不动，只好罢了。

他们四个走到镇政府大院门口，被门卫挡住了。正吵闹着，院子里面出来一个人，正是秦有理。秦有理一看是靳家老小四人衣衫不整、悲悲切切，心里不由一惊，对他们喝道：“有事去找厂里、找村里，上这儿来干什么？”

靳喜悦刚要开口说明，秦有理并不去听，对门卫正色道：“一定不能让他们进去，听见啦！我进去说一下。”

门卫张开双臂挡着靳喜悦。靳喜悦也已六十开外，更是个要人扶、要人背的残疾人，人家手一挡，他也没有办法了，只得哭了起来。

秦有理为什么见靳喜悦来访要心里一惊，因为今天县里多种经营管理局的付局长来龙头视察，正在小会议室里。人家难得来一次，万一叫人家看到这种事，成何体统。更何况这付局长不是一般人物。

这个付局长，不是副局长，而是姓付，是正局长。听说是省里哪个领导的外孙女婿，研究生毕业没多久，去年就从省城“空降”到海源，担任个局长（科级）。“空降”，是安排任用干部的一种形式，直接从上面派过来，一、二年之后，就能回省城当个处级干部。简历上也看不出有什么裙带关系，这样原单位、新单位都说不出意见。要是在原单位硬等，十年八年也不一定能行。

这付局长也确实是个人才，也就是三十岁吧，不但符合对干部的“年青化、专业化、知识化”的要求，而且是相貌堂堂的、风流倜傥。一副踌躇满志的心态，毫不掩饰，全写在脸上。

选拔干部的四条原则，第一条不是还有个“革命化”吗？但这一条没有明确的量化指标，决定权很大程度上在领导的领导手里。尤其是有些地方操作得不公正、不透明，所谓“革命化”也就是嘴皮子上的事。因此有副民间对联就说道：“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是“不服不行”。像付局长这样的人物在官场舞台上频频升起也就毫不奇怪了。

这时他正仰坐在会议室顶端的大沙发里，跷着二郎腿，手指上夹着根香烟，有节奏地上下点着，嘴里很有技巧地向上吐着一个一个烟圈。平金刚站在中间，向他汇报工作。

然而他的眼睛不时地望着坐在边侧的林李。林李现在是镇外办的副主任（无主任）。顺便说一下，秦有理去了民政办当主任。这是一定要说明一下的。因为这儿的人们（恐怕不光是这儿）最津津乐道的、谈论最多的，莫过于谁去了哪个部门、谁又当了什么官、排第几。尤其是副手，连文件上都要写清楚是排第几。没有一把手的，要特地标上括弧无主任或无局长、无科长之类的话。今天，林李能坐在付局长的边侧，是因为辜书记觉得镇政府办公室主任是个挺率性的男人，对下行，跟在付局长身边恐怕不行，特地叫林李过来在边上招待一下。林李也年青，有文化、又能干，应该合适。不想竟引起了付局长的兴趣。

林李也觉出来付局长的那种眼神，忙拿过暖水瓶给付局长的茶杯里添上热水，想打个岔。

“付局长，请用茶。”林李笑着说。

“不用叫付局长，叫局长就行啦。”付局长最不喜欢别人叫他付局长，就怕外人听成是副局长。“林主任啊，我看你这么有气质，在一个小镇上干，可惜啦。到我局里来，当办公室主任吧。”

众人没想到付局长在这个场合会开这个口，一时都瞪了眼。

林李笑着说：“我就是龙头镇的人，在这儿习惯了。”尴尬地望着辜书记。

辜书记只好说：“局长真是有眼光，一眼就看出来小林有水平。林主任可是我们龙头镇的后备干部，要等着挑重担呐。”

“喔，喔，喔。”付局长也点着头，把话收了回去，又若无其事地转过头对站在前面的平金刚说：“你刚才讲的是……造纸？对，对，造纸很重要，是我们整个工业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在国民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好好办下去，听说你们最近还减少了污染？”

辜书记马上答道：“是的，是的。对于环境保护的问题，我们镇党委很重视，他们厂里也做了很多具体工作。”

“喔，”付局长点点头，忽而又想起了什么：“听说你们造纸厂还烫伤过一个人？”

“啊呀，局长您真了解下情啊，这么点的小事，都知道啊。”辜书记的语调也夸张了起来，又放低音量，说：“那是好几个月以前的事啦，一个工人不小心，叫热水瓶给烫啦。”

“对，对，对，叫热水瓶烫啦。”平金刚连忙附和着。

“喔，”付局长又点点头，略作停顿，问：“下面还有什么内容？”

平金刚松了口气，赶紧下去了。其实，造纸厂对口县里的部门，是归乡镇企业局分管的。龙头镇的多种经营项目不多，有几个前面也已经汇报了，只好把造纸厂也凑了上来，差点还掉了链子。

“下面我们就去沙滩看看，晚上就在海边便餐一顿。”辜书记起身，笑着在前面引着。一大群人前呼后拥，步出会议室。

“晚上？晚上不搞个舞会吗？林主任啊，陪我跳几圈吧？”付局长还是兴趣不减。

“喔哟，真不好意思。我真不会跳舞，局长。”林李忙解释说。

付局长又问：“你们龙头还有谁会跳舞，不会一个也没有吧？”

辜书记抓耳挠腮，实在想不出来，就朝祖云涛说：“祖镇长，你家叶医生会吧？”

祖云涛一笑：“她都四十的人了，就是红卫兵的时候跳过忠字舞，哪会跳现在的舞？”

众人哈哈一笑。

付局长也苦笑着，不无遗憾地摇摇头，“你们跟不上形势啊，连交际舞都不会，怎么搞改革开放啊？不行啊。”还话外有话地看了林李一眼。

正在这时，秦有理挤过来朝辜书记挤着眼睛，辜书记走出人群轻声问：“什么事？”

秦有理把靳喜悦一家还在大门口挡着的事一说，辜书记差点脸都白了，急急地说：“不就是报销个医药费吗，先在我们这儿报了，赶紧叫他们走。”

边上还有个不明事理的人多嘴，说了句：“他那种医药费，在我们这儿报，不好下帐吧？”

辜书记朝那人瞪了一个白眼，又对秦有理说：“快去！付局长就要出来了。”

辜书记又走进人群，跟付局长满脸堆笑地说了几句。瞅个空，又把平金刚叫到人群后，埋怨着说：“你这个人呐，怎么办的事？快把靳家领回去，今后不许他们上访。再跑出来上访的话，拿你是问。”

平金刚低着头，匆匆地溜着墙边先出去了。

按说辜书记跟付局长是平级，本不用这么地客气。辜书记心里是有盘算的，人家付局长可是有来头的。县委的卞书记到年龄了，说不定就会是付局长顶上，那关系就大啦。心里在搜肠刮肚地想着，这晚上到底怎么安排呢。

晚饭自然是在海边新建的宾馆吃的。辜书记把龙头镇能拿得出手的都拿出来了。应该说是不错的，那可都是刚打上来的最新鲜的海货啊。笔者在此就不一一介绍了，不然读者也会馋的，可又吃不上。不过付局长好像不是很满意。这些东西对他来说算个什么呀，鲍鱼、海参、还有那大澳虾，就像大饼油条那样平常。他一边用牙签剔着，一边阴阳怪气地说：“晚上怎么安排呀？”

“晚上，晚上……”

这一点是辜书记最挠头的了，因为那时龙头海边还真没有别的项目。实在没办法，辜书记只好直说了：“局长，您一整天辛苦了，晚上早点睡吧。”

付局长呵呵了两下，说：“咱中国的旅游景区实在是单调无聊得很，叫做‘白天看庙，晚上睡觉’。你这儿倒好。成了‘白天汇报，晚上睡觉’。”

“对，对，晚上睡觉。”

“那还得看怎么睡啊。”

付局长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把辜书记猛地提醒了。心里那个懊恼啊，怎么没想到呢，怎么没想到呢，恨不能掴自己几个耳光。

见付局长直愣愣地看着自己，辜书记急的就差头上冒汗了，一边对付局长说：“我已经安排了，我已经安排了。”一边对林李说：“小林啊，我们陪局长上去看看吧，看房间安排得怎样了。”

林李过来跟辜书记一起陪这个饭局。她一滴酒不沾，任凭付局长和辜书记怎么劝，也不碰这酒杯，知道付局长心里不爽。听辜书记这么一说，跟辜书记上去看看怎么安排，也在情理之中，也就不再好推辞，“好，我们上去看看。”

那时建的宾馆也不大，三层楼，更没有电梯，从楼梯上去，到顶层，要了个这个宾馆里最好的308房间。服务员已经开了房门，在门口鞠躬示意请进。

房间朝南，没有阳台，窗户要大一些，正对着大海。夕阳刚落，晚霞涌起，辽阔无垠的海面上，层层卷来的浪涛色彩斑斓、绚丽无比。林李也是第一次来这宾馆，第一次站在楼上看大海，觉得更加美丽非凡，似乎有些陶醉了，不禁地说：“真美啊。”

“小林，你在这儿陪局长欣赏一会儿。”辜书记朝付局长一点头，便抽身出去带上门走了。

付局长一分钟也没停，就靠了过来，嘴里还呼着酒气，“真是难得的美景良辰啊。”一只手就伸过来搭在林李的腰上。

林李侧身躲了下，往边上挪了半步。

“哈哈，机会难得，别浪费时间了。”付局长那只手不但没松开，反而还搂了起来。

林李惊讶了，“付局长，别这样。”

“嗨，跳舞不会，连睡觉也不会么？哈哈。”说着便两只手把林李抱住了。

林李哪经历过这种情况，不由得惊叫起来。“啊”的一声，推开付局长，往房门冲去。

这时辜书记还没走到楼梯口呢，听到惊叫，赶紧折回，刚开门，林李一脸气愤冲了出来，两人差点撞到了一起。

辜书记没顾得去问林李，忙着给付局长赔不是。“啊呀啊呀，对不起，对不起，是那小姑娘没经过世面不懂事。”

付局长反倒很生气地责问起来：“呸，你弄了个什么东西来，事先没说好么？”

“别生气，别生气。局长啊，我在正儿八经给你找个好的来。”

“哼，今天的事怎么说？”

“你放心，我会处理好的。那小丫头不敢乱说的，这我知道。”

这时那个女服务员探头进来，大概是想问出了什么事。

“刚才的事，不许跟别人说，知道啦？”辜书记大声呵斥着，好像反倒是他很有底气似的。

“知道，知道，这个我们都知道。”女服务员忙点头说。

“你进来。”辜书记脑子转得还挺快。

那服务员倒是愣住了，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了。

付局长连看也没看一眼，拍了下桌子，“今天没有兴趣了，哼。”

女服务员赶紧转身出去，临走还没忘了关上门。

从海边宾馆出来，辜书记又马不停蹄地赶到李辰的家，有些话要跟林李说明了，要不真会给付局长、给自己带来麻烦。

开门的是李辰。他一脸疑惑，这么晚了，镇上的书记还亲自登门啊。按说时间还不算晚，也就八点多。要是十点多，按当地习惯，辜书记确实不便上门了。

但李辰的疑惑，也说明林李没有把这事讲给她父亲听。这就好办了，这姑娘还不是盛不住的人。

“嗨，辛苦什么呀？现在的事儿多啊。这不，这么晚了，还得跟小林说上几句，打搅您老人家了。”辜书记这样回答着李辰的问话。虽然是从部队下来，可不知什么时候，也会这一套了。

进了林李的西间，看小林显然有些不快，但也还不是很恼怒的样子，辜书记稍微放了点心，便解释起来。“唉，我也没想到那个姓付的，会是这个样子。亏得我过来快啊。对不住你啦。你就消消气吧。我这个当书记的，来向你赔不是啦。”

“那倒不用，这不是你的事。”书记都道歉了，林李还能再说什么呢。

“这个社会呐，复杂得很呐。这样的人，以后还会遇到的啊。”

“我就不明白，像付局长这样的人社会地位、家庭条件、个人前途都那么好，为什么还要这个样呢？”

“都是惯的，从小家庭惯，现在是整个社会都在惯他们。文革时他们跟着他们的父母受到冲击，遭了点罪。现在拿回权了，就想都补回来，不但是补回来，而且是明着要什么得给什么，什么都不顾了。”

“我看你还处处让着他。你和他都是平级的，哪为什么呢？”

“唉，别看是平级，其实是不一样的。他靠的不是他自己，是他那个家族、那张大得了不得的网，可以呼风唤雨，要什么有什么。我们呢，全靠我们自己。可我们自己有什么呢？只能去靠他们，靠他们的

帮助支持，甚至是靠他们的提携和恩赐。不管是我们个人，还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发展，都得靠他们。”

“改革开放了，这种状况还不能改变么？”

“不但没有根本上的改变，某种程度上，在某些方面更严重了。”

“你是从部队上下来的，看得惯这一套么？”

“呵呵，”辜书记尴尬地笑了笑，“部队上又怎么了？你以为部队上就没有这些事么。某种意义上更严重，更没有商量，很多风气还就是从部队上带过来的。”

“那我们怎么办？”毕竟在龙头多年相识，林李到现在为止对辜书记还是尊重的，还是愿意和他讨论问题的。

“没有别的法子，随大流走吧。有些事，想开点，尤其是女同志。有些话，我不好多说了。进退取舍，靠各人自己把握了，你懂的。”

“我是不会那样去做的。”

“还是像你母亲啊，那么耿直。不这样做，又能怎样呢？”

“我也想过，要不是我父亲年纪老了，我就准备去美国留学了。”林李还悄悄往她父亲的东屋看了一眼。

“你年轻、有文化，还有别的办法。我既没有辛狗狗那样的爹，也没有付局长那样的丈人家，只有跟他们走。咳，我怎么跟你讲这些呢？”

“书记，你放心，我不会跟别人说的。”

“我是从来不说给别人说这些的。这是在官场上混的人都知道的最起码的规矩。今天可能是付局长对你做出的这种举动，对我也有了感触。”

“我理解。我对你今天的话，和现在做的一些事，能理解。”

“理解就好啊。”辜书记起身要走了，脸又正经了起来，“明天你把付局长对我镇有关工作的指示整理一下，叫经学文传达给各单位。”

“好。”

辜书记差点要掉落的假面具，刚掉到了耳朵边又扶了上去。

29.2 秦有理支招

第二天。

平金刚在厂里把齐成才找来了。

“你是厂里的工会主席，我给你布置个重要任务。”

“什么任务？”齐成才挺疑惑。要不是厂长提起，都忘了自己还是个工会主席。

“你也不用上班啦，就盯着靳喜悦家，不让他们去镇政府闹。”

“一天二十四小时，我能看得过来吗？”

“你跟你老婆可以两个人倒着来嘛。”

“那家也顾不上啦？”

“不行就给你两份工资，怎么样？”平金刚还从来没有这么大方过。

“人家要出来，我凭什么去挡人家？”

“你就说要注意身体，注意休息，注意影响。实在挡不住就报告村里，报告政府。”

“我这算是啥？这不就是特务么？我不干。”

“你不干？你不干，就开除你！”平厂长拿出了杀手锏。这时他倒忘记了齐成才是工会主席。

“你开除我？我先辞职。老子早就不想干了。”齐成才扭头就往外走。

直到这时，齐成才就像卸下了重担，而且在厂长面前竟然能够自称了一回“老子”，挺着腰杆走出了厂长办公室。

平金刚这个气呀，可是没办法了。齐成才不只是走出了他的办公室，也走出了他的权力范围。

平金刚也无奈地慢慢骑着车往回走，在北门口遇上了秦有理。

秦有理跟他提起昨天的事，皮笑肉不笑地说：“挨批了吧？昨天的事，要不是我替你挡着，就闹大啦。你老小子能吃不了兜着走。”

秦有理对着六十岁的平金刚张口闭嘴就是“老小子”，平金刚也听惯了，不生气，反而是一脸苦样，“唉，怎么办呢？刚才叫齐成才去看着靳喜悦，他还不干，辞职走了。”

秦有理哼了两声，说：“你老小子，还是嫩。我教你个招吧。他齐成才可以辞职，你也可以辞退哎。”平金刚听了一愣。秦有理接着说：“你可以辞退靳宝康嘛。就说是靳宝康违反操作规程才出了事故，本应承担全部责任，但厂里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和他家的实际情况，不叫他赔偿厂里的损失就不错了。不就行了嘛，你不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嘛。”

“喔，……喔，喔。”平金刚直拍脑袋，恍然大悟，“啊呀，还是你老弟行，以后可得多指点我。”

“嗨，这不是看在刚办厂的时候咱们是在一块儿，有的事还有我的份嘛。要不，我才不会操这份闲心呢。”

平金刚回去就通知了靳家，把靳宝康辞退了。

第三天

彭小宾为这事，来镇政府找到了辜书记。

“辜书记，我作为村民代表，向你汇报个事情。”

“啊呀。彭小宾啊，你还记着那件事啊？那天情况特殊，我只是随口一说，没有经过党委研究。别往心里去，啊！”辜书记很大度地笑着说。经过那天的征地冲突，他也是汲取了一些经验教训。

“那你得向我们村党支部确认一下。”

“可以，可以，我正要上你们村里看看。来有什么事吗？”

彭小宾把平金刚辞退靳宝康的事说了下。

辜书记不以为然地说：“嗨，这样的小事也找我啊。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这对于靳宝康来说，对他们一家来说，可是天大的事啊！”

“这些具体问题，你去找祖镇长。就说是我叫你去找他的，他可以全权决定，他的意见就代表我的意见。”

彭小宾只好出来，又进了祖云涛的办公室。

祖云涛听了事情的原委，皱了下眉头，“这事以前我们不是商量过了吗？把你们村里的、厂里的都叫到了这儿，研究定了的吗？还要再炒一遍啊？”

“是平金刚想完全推给村里，不想管了。”

“把平金刚喊来。”

旁边的秘书跟造纸厂通了电话。在等的这个时候，彭小宾向祖云涛说起了他们村里想搞新型合作组织的事。

祖云涛说：“好啊。我就一直在想，怎么改变过去计划经济下那种政府、集体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使农民成为真正拥有自己的利益，并且能够有效维护自己利益的独立群体。做到让农民真的又有权、又有利，现在最头疼的‘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才能得到解决，我们的社会才能往前发展。”

祖云涛又讲到了，造纸厂的问题，靳宝康的问题，实际上也是这三者关系没有处理好。过去是政府的利益、企业的利益、工人的利益都捆绑在一起，实际上是由企业和它的主管部门来统一行使，又代表国家，又代表工人。那时，工人连表达权都没有，工人自身利益也比较少，都在国家手里，所以虽然效率很低，但企业内部矛盾相对少一些。现在改制了，承包了。在企业里面，企业的利益，或者说就是承包人、企业负责人的利益，他们跟工人的利益分离了，有时就直接对立了。工人得的多了，企业负责人得的就少了。而我们正是缺少一种把这种劳资关系加以制约、加以平衡的机制。过去我们赋予了厂方和它的主管部门过多的权利，现在对这方面又没有更多的约束。但是在市场经济下，企业和企业家有着扩张自身利益的强大驱动力。如果工人还是这样缺少基本权利的话，那他们一下子就成了弱势群体，在利

益的调整和维护方面，只能是被动的、受损害的一方。如果企业负责人自觉，还能稍微好一点，而企业负责人往往做不到这一点，或者做不好这一点。

彭小宾听了，连连点头：“是哎，靳宝康就是这样的例子。在市场经济下，如果工人没有相应的权利维护自己，那就会出现像夏衍写的‘包身工’里面的景况，甚至更惨。就会完全脱离社会主义，搞得比资本主义还要黑、还要惨，比如像黑矿工、黑窑工、黑童工这些事。”

祖云涛说，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责任在政府部门，要把所有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分开。这个企业归你工业局管，不是说这个企业就是归工业局所有，而是要你工业局去监督管理，去管它的经营活动、生产活动是不是符合相应的法律法规，比如产品的技术标准是不是合格，有没有非法经营、非法排污等等。尤其是要管有没有给予了工人应有的待遇。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是，企业里要有个独立的强有力的工会，能够有效维护工人自身利益的工会。这在三者平衡机制中是很重要的一方，而我们缺的就是这一环。

彭小宾插上了话：“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平金刚还要齐成才去堵靳喜悦的家，不让他们出来上访，齐成才不愿意这样做，平金刚反倒要开除他，结果没等开除，小齐就先辞职回家了。那个齐成才还是他们厂的工会主席呢。”

“这也不符合相关条例哎。这样的工会连主席自己的合法权利都维护不了，还能有什么用呢？”祖云涛是一阵阵的感叹。“再说人家要上访，应该允许。人家的合法利益被侵犯，或者有什么委屈，有什么忿懣，要允许他们诉求，允许他们表达。哪怕他们诉求的内容，不一定完全合理；诉求的方式，不一定完全理性。我们可以解释嘛。这正是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沟通党群、政群关系，做群众工作的时候嘛。另一方面，这也说明我们给群众能够解决问题的合法的诉求渠道太少，造成了这种状况。不让说，捂着，问题就解决了？下级没有解决，人家来上访，不就是给了我们一个解决问题的机会嘛。不给群众机会，不给我们自己机会，那是很危险的。就像那个高压锅，得有减压阀。下面有气不让出，硬捂着，怕面子不好看。把面子和帽子捆在一起，这也是我们干部管理体制的一大弊端。捂一时可以。时间长了，不就爆发了，不可收拾了，就会出现谁也不愿意看到的场面，发生冲突，局面失控。到那时，再去打击什么犯罪分子，那也是为时已晚。”

彭小宾说，你讲的这些，对我们组织新型合作组织很有启示。

祖云涛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的新型合作组织，一定要有新思路、新办法，要把政治民主考虑在里面。不然，我们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就会搞成地主、资本家似的，搞成像官僚资本主义似的。权和钱就会勾结在一起，有权的通过种种公开的、隐蔽的方式，就变成了有钱的；有钱的通过种种公开的、隐蔽的方式，就变成了有权的，那才是一种可怕的景象啊。”

十几分钟后，平金刚赶到了。

一进屋，就急急忙忙地先把他辞退靳宝康的理由讲了。

祖云涛一直听着他讲完，才慢慢地说：“你说靳宝康是违反操作规程，你有证据吗？那就得把这事的全部过程再详细调查一遍。你厂里的机器合格吗？定期检修维护了吗？工人上岗前培训了吗？他们的操作过程，有人检查指导吗？你作为厂长了解这些情况吗？”

这一系列的问话，把平金刚给问得张口结舌。

“社会主义的企业要充分重视、自觉维护工人群众的利益，不然，叫什么社会主义？！”祖云涛很严肃地说着，“以前我们经常讲，是劳动人民养活了我们。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劳动人民是我们的父母。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员应该有的感情。这些正确的话，应该永远记住的话，现在怎么反而不说了呢？反而忘记了呢？！每一个工人，每一农民，每一个他们的家庭，都要沉甸甸地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当领导的，坐在办公室里的时候，每天都要想想是谁让我们当了干部，是谁让我们当了领导？是上级部门的任命吗？不是，是那些最普通、最基层的劳动者。是他们的辛勤劳动，支撑起了我们的管理层。没有他们，就是给我们发十个任命书也没有用。”

祖云涛说着，都动起了感情，语气急促了起来。他舒缓了一下，接着说：“靳宝康是你们造纸厂的职工，是因工负伤，你们造纸厂要永远对他负责。如果说要承担责任，第一个倒应该不是你平金刚。你是怎么当的这个厂长？”

平金刚一听这话，牵涉到他的帽子问题，可是急了：“他自己也有很大负责。他的皮肤不好，有皮肤病，所以一烫就伤，连植皮还有一大块要植别人的。”

祖云涛越听越生气，打断了他的话：“越讲越不像话了。你皮肤好，你去烫一下试试看。”

平金刚还不死心，嚅嚅地说：“我们造纸厂眼看要撑不下去了，我是在硬扛着。哪里还有钱去支付他的医药费。听说他吃的是植皮以后治排异反应的药，要吃一辈子呢。哪儿是个头啊。”

“只要造纸厂存在一天，就要对靳宝康负责一天。除非你们造纸厂真的不行了，那就按破产处理。就算那样的话，也要在清算资产时给他留出一块。”

说得平金刚没有话了。

“那个齐成才，愿意回去的话，要让他回去。工会的活动可要开展起来。”

平金刚沉默着，也没有表示反对。

祖云涛等了一会，最后又对彭小宾说了句：“你们民主村也要把另一头承担起来。靳喜悦家里的困难，你们村里要多担当些。”

彭小宾连连点头。

平金刚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在街上，凑巧又碰到了秦有理。

秦有理拉着他到街角的屋檐下，问：“又怎么啦？”

“都是你出的馊主意，辞退靳宝康，结果被彭小宾告到镇里。祖云涛把我猛批了一顿。”平金刚心里气嘟嘟的。

秦有理听了反而笑了，“嗨，你这想不开的。哪个在领导面前不挨批的？你老小子批评下面的工人还少啊？还轻啊？更厉害吧？”

“那怎么办？听这口气，还要追究我的负责，弄不好还当不成厂长呢。”

“嗨，又糊涂了吧？你老小子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你得这个呀。”秦有理朝他眯着眼，手里做着捻钱的样子，往上扬着。

“唉，我哪有这个力量啊？”平金刚看明白了，但嘴上还装穷。

“都到了这个时候，还想不开啊？你下面的工人，每年、每个月给你送了多少啊？”

平金刚一惊，直盯着秦有理看。

“看我干什么呀？看你自己吧。那天齐成才卷了一大包，是什么东西啊？”

平金刚更惊了，“你怎么知道的啊？”

“别装糊涂啦，这种事谁还不知道啊？你这老小子只进不出，大家都在看着你呐。有的人还在等着你呢！真到了找到你的那天，就晚啦，也完啦！”

“那……那怎么办？”平金刚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嘴都不好使了。

“你以为下面给了你条鱼，你就能都吃啦？你最多吃个尾巴就不错啦，那中间鱼段子，你得往上那个……”秦有理又比划着。

“那我怎么送呀？谁在等着我呀？”

“呸！你这老小子还在装蒜，我都说到这个地步了，还叫我帮你送啊？”秦有理一甩手，走了。

平金刚一方面自以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把秦有理那坏小子气走，心里还哧地一笑；一方面又是把秦有理奉为师傅，佩服得不得了。只是今天秦有理教的这一手，不知平金刚会修炼出怎样的道行，得到的是怎样的结果。

第三十章 婚变

1978年1月30日

这一阵，造纸厂困难重重，这貂场也没好到哪儿去。杜家骏年纪大了，更多的事就由杜长贵来担当。全国南北各地养貂的比以前多了，竞争挺激烈。价钱不那么好卖了，有时一张貂皮还卖不到一百元。杜长贵对于市场营销毕竟不熟，只好增加貂箱。结果是，场里养的貂比以前多了，挣的钱反而比以前少了。这多了几十箱貂，就多了几十箱的心事和杂事。高秀珍在，各种事情还能有些条理，从她走了以后，场里就更忙乱了。杜长贵手忙脚乱都顾不过来，只能更多地靠着毕丽芳。小毕是个聪明人，也觉出自己的份量，她知道机会越来越临近了。

那天小毕冲洗了貂棚，卷着裤腿，挽着长袖，胸前的上衣开着两个扣，头发上还闪着晶莹的水珠，走进杜长贵的办公室，就坐在从镇政府搬来的人家淘汰下来的长沙发上，甜甜地叫了声：“哥，过来歇会儿吧。”

这称呼都有一番变化。前一年，小毕先叫“杜会计”，觉得太正规了，后来叫“长贵叔”，因为俩人差了二十多，这样叫不是不可以。可杜长贵不让这么叫，很快就改成了“长贵哥”。现在，长贵两字也没了，就剩了“哥”。

杜长贵正在翻一大堆纸呢，不知道在找什么。杜长贵学过会计，记个帐行，可要把貂场都管起来，虽然摊子不算大，但头绪也不少，有点力不从心。正烦着呢，刚要发火，一听小毕甜甜的一声，一下就没脾气了，迟疑了一下，便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坐在小毕的身边。那个芳香，那个柔软，杜长贵马上就魂不守舍了。那个感觉就像费翔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熊熊火焰温暖了我。

每次当你走近我身旁，

哦，火光照亮了我。

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

就像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

“哎，急什么？有正经事儿跟你说呢。”小毕是会把握火候的，“那个事，跟你那个老太婆说啦？”

毕丽芳所讲的老太婆，不是指杜长贵的妈唐玉贞，而是指杜长贵的老婆平近芳。

“嗯，嗯……”杜长贵应付着。

“还没说啊？”小半圆圆的眼睛也会瞪起来。

“喔，喔，讲了，讲了，哪能一讲就行呢。”

“那个老太婆，有什么好留恋的。整天板着个脸，纯粹是个政治动物。”

平近芳虽然在外面很会看人说话，嘴上功夫很是了得，但在家里，跟杜长贵早已经没有了共同语言，整天冷冷的，没什么话。

杜长贵抬眼看了下跟前的小半，明眸皓齿、脸色红润，翻敞的领子下那白皙细滑的皮肤，又要愣神了。

“我给你新生活，还不要啊？”小半一张嘴，不但声音甜得叫杜长贵心里发痒，连那飘出来的香味也都沁人肺腑。

“好，好，我再去说……”

其实，杜长贵没跟老婆说想要离婚的事。虽然，这些年他跟平近芳早已无话可说，形同陌路，但真要提出这个事，还是挺难，开不出这个口。这话在嘴上已经转了好几个月了，还是没有讲出来。

杜长贵在想，这事不能再拖了。家里的日子实在没趣，这充满异性魅力的小半，不是老天爷掉下来给他的吗？这样的青春亮丽、风情万种，谁能推得开不要？就照小半说的，跟平近芳捅开这层纸吧。更何况外面的风言风语已经不少，再拖下去，反而不好做人了。他终于下定了狠心，回去，说！

杜长贵在貂场吃完晚饭，回到家，等着平近芳回来。他们家早已经不开伙了。从儿子离开家上黄港读中专以后，除了儿子回来，家里就几乎没再开过伙。平近芳平日也是在学校食堂吃的饭。

这天难得是杜长贵在等她回来，可是平近芳依然很晚没回来。

桌上的座钟，敲了八下，她没回来。

敲了九下，没回来。

敲了十下，还是没回来。

这并不是平近芳在外面有什么情况，真不能怪她。为了考高中，考大学，农村中学每天都要上晚自习到很晚。平近芳每晚都要到各教室去检查，一圈转下来不知得什么时候。

杜长贵倒在炕上，睡了过去。不知什么时候，听到开门的响声，知道是平近芳回来了。

她回来，走路、喝水，都是悄悄的，可能是怕打搅杜长贵。可在杜长贵看来，跟没回来一样。

杜长贵忍不住了，“你还回来啊？”声音大的出奇的响。

平近芳依然静静的，没有回应。

“这日子还过什么过啊？”杜长贵站了起来，连连拍着炕沿。今天不知道哪来这么大的劲，平常可不是这样的。

一场风暴眼看就要在这个屋子里掀起来了，可平近芳依然还是出人意料的平静。

“要离就离吧，我早就看出了你的意思，还犯得着这么使劲地拍啊，怕东屋听不见啊？”

杜长贵答不上来了。自己憋了几个月，想过多少个方案，事情会怎么开始，怎么结束，会出现多少种可能。最后，却像淋湿了的手纸，刚吹口气，没怎么地，就破了。

平近芳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

由于她对李辰、林海秀的检举批判，她被组织认为是“可靠的”。这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她没受过冲击，没遭过罪，没受过人格的屈辱。除了1966年那天下午，跟着大家被红卫兵批斗的那次。由于她渐渐学会了在什么人面前说什么话，在什么境况下做什么事，渐渐地被提拔了上来，还当了校长。民主村这几十年前后有过那么多出色的女性，她是唯一当上了领导干部的。这一点，她自己也没想到。

然而她又是不幸的。她自己也觉得层层的重担压着她，她没感觉到幸运。

因为李辰，特别是林海秀的事，在学校、在村里一直受人鄙视，自己的心里也一直是无尽的愧疚。这是她一生的心病和不安。她知道，杜长贵的离去，开始也是因为这事。也因为如此，对他的离心离德，她甚至表示了某种程度的理解和容忍。

在工作上，虽然教了一辈子书，但毕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门训练，现在坐在校长的位置上，她还是很愿意搞教育改革的，可是不知道该怎么搞。她对于现代教育理论，确实知之不多。她甚至觉得自己既不适应于改革前的时代，也不适应于改革后的时代，越来越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早两年，她就跟教育局提出辞掉校长职务，想退休、退二线了。可教育局又没同意，还这么撑着，实在是勉为其难。

至于家庭婚姻，就更是个失败者了。按说，她和杜长贵也是自小熟识、情投意合，怎么会弄成现在这样呢。林海秀的死，造成了杜长贵和她之间的裂痕。可她却无力去填补，也无法去填补，她能怎么做呢？眼睁睁地看着裂痕的扩大，只能是无奈地叹气。毕丽芳的出现，更使这一切无法挽回。她也不想挽回了，她太累了，早就累了。当她听到杜长贵与小毕的传闻时，竟然和所有做妻子的反应不一样，而是像有首歌里唱的：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她早就想到了杜长贵会对她说出这句话。她对杜长贵、对于这家彻底地绝望了。

今天，杜长贵终于说出这句话，她反倒是心如止水，出奇地平静。

说一下这之后。之后，没有任何的纷争，平近芳离开了那个院子。杜家的院子，对于平近芳来说只能算是屋子，而不是家。她住到了学校里，学校在最后一排房，安排了一间原先李辰他们讲课的教室。隔成两小间，还挺宽敞。

孩子原先就是跟着平近芳，就是非农业人口。现在黄港有了工作，成了家。工作单位给了个十几平方的小棚，能凑合过，这在人均住房不足十平方的城市里，实在是很不错了，不用爹妈操更多的心。

平近芳又向上打了份辞去职务的报告。能在充满朝气的校园里，在学子们朗朗书声中度过晚年，应该满足了，她想。

平近芳是出奇的平静，平静得别人都没察觉到她家里出了事。直到她搬进了学校，别人还来问，你这是怎么了？

平近芳这头没事了，杜长贵那头反倒有事了。

平近芳的平静与大度，杜长贵反倒觉得可能是自己做错了，对不起平近芳了。毕竟是几十年的夫妻啊。平近芳对这个家，可是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啊。对他、对孩子、对公婆，可是挑不出一毛病啊。怎么说散伙就散伙了呢？自己为这个家又做过什么呢？政治上的风风雨雨，扯到家里去干什么呢？再有，就是因为来了小半。小半年轻、漂亮、活泼、懂感情、会打扮、能花钱……想着，想着，才觉得这小姑娘不光是有长处，也有缺点啊。能跟她过上一辈子吗？讲年龄，跟他儿子都差不多了。这事，怎么去跟他儿子、爹妈讲呢？

杜长贵没去找他爹杜家骏，杜家骏找上来了。

“听说你跟你媳妇离婚啦？”杜家骏惊奇地问，还有点将信将疑。离婚，在农村可是件大事情。

“嗯，离了。她已经搬出去了。”

“嗨，你这浑小子，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爹妈说一声。”杜家骏气得一巴掌抡过去，打在他儿子的胳膊上。

“近芳是个好媳妇啊，都当上校长了。你是高攀人家啊，你上哪儿再去找啊？那些日子我听到些风言风语，我还不信，还在想，我儿子不至于这么糊涂吧。弄半天，还真是这么回事啊，让我把老脸往哪儿搁啊？快把她给我喊回来！”杜家骏气得说了一大堆话。

“我们已经上镇里办了离婚证了。”

“啊？”杜家骏又惊奇了下，“这可得把她伤心坏了。”

“没有，她很平静，一点也没有伤心。”

“……”这回反倒是杜家骏没话说了。他愣愣地看着他儿子，都看不懂他儿子和想也想不懂的他曾经的儿媳妇。

“下步你打算怎么办？迷上了那个小半啦？”许久，杜家骏才又问上了。

杜长贵点点头。

“呸！你可别上了她的当，那可是个小狐狸精。我早就想把她撵走了。不许你往家领，我杜家骏不会认这种人的。”杜家骏绝然地说着。

“都已经这一步了。”杜长贵吞吞吐吐地说。

“不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当老子的，坚决得很。

杜长贵犯难了。他的内心思想也动摇了。

这些天，水貂们又不知得了什么病，接连死了十几只，那可是一千多块钱呐！杜长贵心里一股火，走进了棚舍。

小半正捏着鼻子，用纤细的小手拽着一只死貂的尾巴，从笼子里提出来。看见杜长贵过来，知道已经和他老婆离婚了，高兴得满脸笑容，更是甜蜜蜜地叫着：“哥，哥，你来啦。”

谁知小半今天可是热脸贴上了冷屁股。杜长贵板着脸说：“看你这是干活的样吗？都是你们冲洗不干净，消毒没搞好，死了那么多水貂，年底还想发工资啊？”

小半一听，这哪是对准新娘说的话，也就生气地说：“我都是你的人了，就要在一个锅里吃饭了，还讲发什么工资啊？你还把我当成雇来的小工啊？”

一下，杜长贵又上不来话了。

小半看杜长贵没话了，便又打又拉，继续进攻：“你跟那个老太婆离了？太好了，咱们的事，也得抓紧办啊。”

杜长贵沉着脸，不作声。

小半一看，不好。前几天，不是这个样啊，难道会有变故？这可怎么得了，干脆来个破釜沉舟，用了高八度叫了起来：“杜长贵，你不要犯糊涂！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这事，你不办也得办。”

惊得另外两个女工从前院跑过来，站在院子的门口看着。

小半又缓和下口气，带着感情说：“哥，我和你都没有退路了。”

杜长贵和半丽芳结婚了。

杜长贵的婚变，在民主村议论了一阵子。或许是流言已久，倒没有更多的意外。

只是杜家骏虎着脸好些天。一个多年的村委会主任，家里怎么出了这种叫人笑话的事。但是他没上儿子家去训斥，省得别人再看玩艺。杜长贵更不敢带小半到他爹妈的院子去。

那怎么办呢？

杜长贵又没了主意，小半说：“这儿办不起来，上我们家去办，我们风风光光地上北山去一趟。”

杜长贵一想，只好这样了。

小半找到高秀珍，要借针织厂的工具车用。高秀珍虽然满心不愿意，又不好推辞，脸有难色。踌躇之间，小半竟然当面落了泪，说是女孩子出来不容易，看见你秀珍姐，就像见了娘家人，你陪我一起回去吧。

高秀珍心也软了，谁叫她是自己的小老乡呢，当初还是自己把她带过来的。如今弄得满城风雨，自己脸子也不好看，但还得往下走吧。不过她也觉得，这事要怪也得怪杜长贵。借车的事，她要找辛总去说。一起回北山，恐怕是不行了，她实在走不开，她对小半说。

高秀珍跟辛狗狗说了这事，狗狗很爽快，“行啊，结婚是件喜事，君子哪有不成人之美的。”

“小半说，她要付车费。”

“嗨，这说到哪儿去了。咱就差这个钱？到那天，叫她们把车刷洗干净，贴上红纸、挂上彩带，这些活，咱们帮她弄了。我知道，这些天杜长贵也难啊。”

“辛总，你也知道？”高秀珍打趣地问道。

辛狗狗和杜长贵当年在学大寨、修水利时，也是一起摸爬滚打过来的，当然都是知根知底的。

“长贵啊长贵，这是在给自己找块麻烦啊。”狗狗笑着点着头说。忽而又抬起头对高秀珍说：“你是她老乡，那天要是陪她一起去北山，我放你假。”

“唉，他们这事，办得真是没法说，我也不方便去。”

杜长贵和半丽芳，坐上精心装扮的工具车开往北山。虽然车上陪同的人不多，但车下送行的人也还是不少，有貂场的人、针织厂那帮北山的姑娘们，高秀珍也在里面。

一身新装的小半坐在车窗边，更加亮丽，更加动人，兴奋地向送行的人们招手。腿上放着那时农村中难得一见的收录机，那是半丽芳叫杜长贵一定要买的，作为结婚的纪念物。喇叭里正放着红极一时的摇滚歌曲“一无所有”：

“脚下这地在走，

身边那水在流。

告诉你，我等了很久。

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

我抓起你的双手，

你这就跟我走。”

彩车走了，车轮下不再是卷起尘土，而是干净如洗的水泥路面伸向远处。

一个北山的小姑娘，实现了她的心愿。以这种方式实现了她的心愿。

从农村进城的打工仔、打工妹，他们（她们）的生存、生活道路，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艰难得多。半丽芳只是其中的、其中的一个。不知我们帮他（她）们想过没有，她今后的道路，会像这条水泥公路那样顺畅吗？

第三十一章 私营企业与共产主义

1978年1月31日

31.1 工会选举

针织厂赶上了我国对外贸易大幅增长的黄金时期，正蓬勃向上地发展。

由于狗狗去过美国，直接向客户公司了解情况、征求意见，也粗略知道了美国社会、美国市场的状况，因此产品比较对路，销量年年增加。厂里的员工增加到了四、五百人，车间、仓库都翻建成了两层，好在针织机都很轻巧，搬上楼，对建筑物没有特殊的要求。职工单身宿舍，也上盖了二幢三层的筒子楼。外包给各农户的加工量，更是翻了几番。厂里一片红红火火，狗狗自己也整天忙得不亦乐乎。

有人提议，企业发展了，要搞得正规点，组建一些管理部门，比如财务部、技术部、人事部、保卫部、总务部、营销部、仓储部、运输部、质检部、机修部等等，出去都叫部长、经理，那多有面子啊。

狗狗听了，觉得对，管理上是需要更加正规了。不过不是为了面子，不是为了给别人看。于是，他对管理部门作了加强和调整，但是不叫部，而叫组。比如高秀珍人很能干，然而毕竟不是会计专业的科班出身，去当了总务组组长，会计组组长由一个国营企业下岗的老会计担任。厂里还来了几个大专生，有两个是师专美术系毕业的。虽然厂里的机构很精简，连人事组、保卫组也没单设，狗狗却专门为他俩成立了一个设计组。又怕他们一时还挑不起来，自己亲自兼任组长，常常和他们一起讨论翻新产品花样的想法。

质检组长过大年想起来了，提出还得建立工会，“哪个单位都有的。没有，上面要说话的。辛总，你随便指定一个人当主席就是了。上面问起，就说我们也有了。”员工对他当然都是叫辛总，没有叫狗狗的了。

狗狗为这事倒是想了好几天。现在厂里有几百号人，联系到各村各户的有好几千人，自己再忙、再千思万虑，哪怕有这些职能部门帮着，也会有想不到的地方，难免会有一些考虑不周。成立工会，让大家都来为企业献计献策、监督检查，让大家有个说话的地方，是个好办法。尤其是工人里面的事，平常自己更是看不到、想不全。有个工会，很有必要。

找谁呢？过大年，就不错。正派、肯想。白天，他都没有思考的时间。要安安静静地想个什么问题，只有等晚上上了床。

邢秋芬哄睡了在边上小床里的孩子，看狗狗还在睁大眼看着天花板，就问：“又在想什么呢？”

他们俩依旧没有自己的住房，还是在办公楼的二层。住了里外两间，外间算是客厅，里间是卧室。邢秋芬也没有安排职务，只是一个普通员工，相当于办公室秘书。

“厂里要成立工会，我在想挑谁比较合适。”

“有些事，其实不用你去想。”邢秋芬轻声地说。

“我不去想，怎么能行？”狗狗奇怪了。

“让员工们自己去挑选。谁最合适，他们比你还清楚。”

“对了，我一下子怎么没想起来呢。”狗狗高兴得拍了邢秋芬一下，“我也在想，现代企业还得有现代民主。可到具体问题上就又忘了。”

邢秋芬指着睡了的儿子，“嘘”了一声。

针织厂认真地搞起了工会主席选举。

一个周末的晚上，举行了选举大会。厂里没有礼堂，就在厂门口的空地上进行，拉起了电灯，挂起了横幅。所有的员工都来了，灯光下照着一个个兴奋的脸。所有的事情也都是员工们自己操办。事前，大家都已经推举了两位候选人：过大年和高秀珍。

他们两个还都上台作了“竞选演说”，都很简短，都没有稿子。

高秀珍说，好多女工来找我，说你来当这个主席吧，你来替我们说话吧。其实，我还真没有想过这事。既然，大家有这个想法，那我高秀珍愿意为大家多出点力。

过大年说，说起来，这个工会主席是在做义务劳动，没有另外补助的。但是呐，我们员工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组织，把大家联系起来。有什么话，可以到这儿说。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尽量帮你来做。

在一番很正规的投票和唱票、计票之后，高秀珍以高票当选。厂里的女工多，高秀珍当选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事。

阵阵热烈的掌声响起。高秀珍站起来，跟过大年握了握手。又上台来，发表“就职演说”：“谢谢各位姐妹、各位兄弟，谢谢大家！”高秀珍向大家深情鞠躬，眼睛里都噙着泪花。高秀珍不是一个爱掉泪的人。

“大家这么信任我，我一定会尽心尽力为大家服务。我们这个工会不能像国营大厂的工会那样，过年过节发袋茶叶、发盒咸鸭蛋什么，我们所有的开支都是要我们自己出。那我们做什么呢？我想，我们主要做三件事：一是，维护我们作为员工的自身合法权益；二是，帮助和监督企业合法经营、文明经营；三是，我们之间的相互帮助，谁遇到什么困难，我们来帮个手，扶一把。辛总也在这儿。辛总，我要对你说一句。”

狗狗也一直坐在下面，听到高秀珍提到他，忙朝台上点点头。

“讲个人关系，辛总是我的恩人。现在作为工会主席，以后厂里有做得不妥的地方，我会有话说话，有事说事。到时，请辛总要谅解了。”

“那是，那是。”狗狗也很客气。

高秀珍接着说：“我作为总务组长，会尽力为工厂工作；我作为工会主席，会尽力为大家服务。总之，大家都是一个目标，为了兴华厂的发展，为了我们所有兴华人，包括员工，包括辛总，大家都愉快地在一起工作。”

又一阵掌声之后，狗狗也举手向台上的高秀珍请求：“请允许我也上来讲几句话。”

高秀珍对大家说：“请辛总上台讲话。”

当然，也是一阵掌声。

狗狗也挺激动，说：“今天我看到了，我们厂的员工真是有素质，看到了我们厂的员工真是有能人。我为有这样的员工队伍感到由衷的高兴。”

讲到劳资关系，现在的员工与厂方之间，不是解放前那种你死我活的阶级对立的关系，只是各自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同。我们都是为了社会的发展，为了我们个人和家庭的发展。我们相互之间确实有不同的利益，但我们也有很多共同的利益，我们完全可以做到双赢互利。

历史的经验证明，在市场经济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要有一个独立的、强有力的工会组织作保证。

我在这儿表个态：我会完全支持高秀珍的工作，完全支持工会的工作，我会认真地听取你们的意见，让我们一起把兴华厂办得更好！”

台下是一阵更热烈的掌声。

狗狗特地腾出了一间房，给工会当办公室，也算是活动室。

狗狗对高秀珍说：“有什么花钱的地方，就对我说一声。不一定能全部满足，至少我可以考虑。”

高秀珍说：“这方面，尽量不麻烦辛总了。我们工会会员，每个人一个月交一毛钱的会费。我想，就照这个数来用。我们也不发福利，也不要补助，勤俭节约省着花，应该是可以了。实在不行的时候，我再来向你张口。”

狗狗点点头。这时，过大年过来说：“辛总，还有个事也挺重要。厂里有十几个党员，也要成立个党组织。”

狗狗笑着说：“你们组织的事，我就说不上。有句话说，党是领导一切的，我也得归你领导了。”

狗狗爽朗地哈哈笑着。

过大年反倒不好意思了：“辛总，这说到哪儿去了？在厂里，都得靠你支持了。”

狗狗收起了笑，认真地说：“你上镇里找一下辜书记、祖镇长他们。这事，得要他们拿主意。”

经过镇党委的研究决定，镇里成立民营企业党支部，针织厂成立党小组，过大年为党小组长。

有了这个决定，狗狗对过大年说：“也给你们党小组一间房。”

大年说：“不要了，厂里房子挺紧，我们和工会合用一间吧。错开活动的时间就是了，我们都是业余的，平常也不在里面。”

工会主席高秀珍，党小组长过大年，都是业余的，不占用工作时间。活动经费也都是在交来的工会会员费和党费里出，不多拿厂里一分钱，个人更没有额外的报酬。但他们都在积极地干着双份工作，充分地发挥着他们各自的作用。厂里的各项工作更稳定，更有起色了。

兴华厂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31.2 讨论共产主义

他们党小组还真的搞活动。

那晚上，过大年领着他们讨论“共产主义理想与在私营企业里干活的关系”。他的意思是既要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又怎么在私人老板手下干好活。其中有的关系，他自己也没完全想明白，看别的人更糊涂，大家在一起议议吧。

讨论会上，过大年先说了：“如果共产党员，不讲共产主义，不知道共产主义，岂非咄咄怪事。共产主义社会到底是个什么样呢？”

兴华厂的党员有十多人，大多是复员军人，在部队时入的党；有两个是学生出身，在学校入的党；只有二车间的主任（相当于女工大班长，女工们分成五个车间）是在村里入的党。有了党小组，他们都很高兴，好长时间没有组织活动，连党费也不知道往哪儿交。

过大年一说，同志们就纷纷发言。久违了的“同志们”一词，在这儿最是恰当不过了。

设计组的小舍第一个就讲了：“我知道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里早就说了，共产主义社会里，大家都高度自觉，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后来又怕大家都来自己取，取乱了怎么办？1959年我们就把‘各取所需’，改成了‘按需分配’了。”

检修员小劳就问：“到了共产主义，不是国家消亡了吗？国家机器也没有了，政府也没有了，那由谁来分配呢？”

小舍一时说不上来。

唯一的女党员，二车间的刁主任（虽说是姓刁，但她是个很热情、很肯干的女孩子）也知道一些，说了：“我听说五几年的时候，还讨论过到了共产主义，国家消亡了，家庭也会消亡的问题。说家庭是财产私有制的产物，没有私有制也就没有了家庭。那样的话，家庭都消亡了，那晚上上哪儿去呢，找谁去呢，不就乱了套了吗？后来，妇联提意见了，就没再讨论下去。”

小劳想得多了，又问了：“这家庭消亡还是小事，这国家的消亡更是个大事。共产主义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国家消亡。可咱说是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却从来不说国家要消亡的事，反而还天天在强调有国才有家，舍小家为国家，国家是高于一切的。看人家欧盟倒是在逐渐减低各国之间的门槛，用统一货币欧

元，有个欧洲议会，人员可以自由往来，不用签证等等，各国政府的权力和作用有所减弱。这还能看到点国家消亡的远景。咱们呢？”

又有人说了：“对共产主义是有不少问题。比如，对原始共产主义的事，我到现在也一直不明白。上学时念的教科书里说，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是原始共产主义。因为没有剩余产品，也就没有私有财产，所以也就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那个社会好得不得了。除了吃的肉是带血的生肉，好像比现在还要好。我就感到很奇怪，看电视里的‘动物世界’，一群动物里都有头领，等级是很分明的。小狼看见头狼都要肚皮朝上，表示臣服。动物园的猴山里，都有猴王，厉害得很。小猴见了都害怕，得让猴王先吃，哪有什么平等？猴子倒是没有私有财产，还是不平等。到了原始人，就一下子学会平等了？”

这问题大家都答不上来。

“现在好像也不说原始共产主义了。”小舍说。

过大年只好引导一下：“看来对共产主义的描述，还需要完善。”

小舍说：“共产主义不但是个蓝图，而且到现在也还没画好呢，谁也说不清。现在就要为它去奋斗终生，觉得好像有点早。”

小刁说：“是哎，我们名字叫共产党，实际上也很少讲共产主义了。”

小劳说：“听说有人建议把党的名称改成社会主义党，更加切合实际一点。可有关部门已经表态说不可以。”

大家一下子没话了，好像不知道该怎么讲了。

过大年也知道这是个大问题，不过也说不上来，干脆就岔开了，说：“咱们讨论现在的吧。共产主义要求剥夺私有财产，可咱们现在私营企业里干活，里面有没有剥削，跟共产主义理想是不是有矛盾，怎么解释？”

小舍又说了：“应该说，是有矛盾。但咱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事，还要等几百年以后再说。咱们现在就是好好干。私营企业，也是社会主义多种经济成分的一部分。干好了，企业发展了，也是对社会主义有利。”

小劳说：“嗨，管那么多东西干嘛？这些还不是旧社会时，为了推翻国民党，才说这些事。现在有的就说不通了。说不通，就不说了吧。还非得去说么？1949年，刚推翻国民党，刘少奇就在天津说，剥削有功。文化大革命好一顿批。现在这个话就不好说了。现在的私营企业算不算剥削？还真不好说。如果不算的话，那为什么旧社会的私营企业算剥削，要去推翻那个社会。现在的就不算？如果算的话，那在国有企业里的怎么讲？县里好多国有企业不景气，工资还赶不上咱，出的力不比咱们少。那反而是咱受了剥削他们没受剥削。那讲这个有没有剥削，还有什么意义呢？”

另外有一位说了：“是哎，这些事，咱们这儿讨论不清。有些问题，恐怕连大学教授也说不清楚。”

末了，过大年总结：“今晚上虽然有的问题没有讨论清楚，但我是明白了一条，各人要干好本职工作。这样对自己、对大家、对企业、对社会、对革命都有利，也不要再有些别别扭扭、疙疙瘩瘩的想法。”

最后，咱们一起唱‘国际歌’吧。国际歌可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战歌。现在，连‘国际歌’都好长时间没听到了。”

可是有好几位还不会唱。

大年问小舍：“小舍，你会吧？你会，你来教吧。”

办公楼二楼的工会兼党小组的活动室，传出了在这个国家里已经很少能听到的这首全世界无产者战歌的歌声：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和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那激越悲壮的歌声，引得楼下好多人驻足倾听，有些人还都没怎么听到过。这歌声与那个“他是人民大救星”，有着多么大的不同啊。

31.3 狗狗的新想法

歌声也传到了隔了几个房间的狗狗的卧室。

狗狗今天难得早回来，在看着那台21寸泰山牌黑白电视。电视里正播放着“晚间新闻”。

“狗窝”已经上了小床，还在翻搅呢。狗狗的儿子，有个大名叫“辛念祖”，是他爷爷那年回乡探亲时取的名。可狗狗还给他取了个小名，叫“狗窝”。

那时邢秋芬嫌名字不好听，对狗狗说，别叫人以为你还有什么不满呢。狗狗说，儿子在咱们的那个棚棚里出生，不就是个狗窝吗。他就算是忘了祖宗，也别忘了那个艰苦岁月。现在他儿子出去，大家都叫“狗窝”，没人知道还有个大名。

“那是个什么歌啊？”狗窝也听见了歌声，睁开眼睛问。

“睡吧，宝宝，那是大人的歌。”邢秋芬拍着孩子。

“过大年这个人挺有意思，想问题挺深刻。我知道他今晚是领着他们党小组在讨论共产主义和替资本家干活的关系问题。”狗狗说。

“这个问题，现在还真不好回答，既是个理论问题，又是个现实问题。”秋芬说。

“这个问题，确实能够叫人想得很多，想得很远。想到了当初我们为什么要闹革命，革命以后的路怎么走，当前的社会又往哪儿去发展……，我都想不出来。难为他们了，别看他们大多是普通工人，每天干活这么多，还都在苦苦地思索着这些问题。”

“那你想到了什么呢？”

“我想到了我们的‘狗窝’。”狗狗看着儿子，那种深情溢于言表。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到：“我想把‘狗窝’送到他爷爷那儿去。”

“把他送到美国去？怎么会忽然想起了要送走，是因为听到了那首歌？怕以后还是会闹共产革命？”邢秋芬吃了一惊，她从来没想到过这个问题。

“不是，不会听到一首歌就想走。”狗狗浅浅地笑着，“这事，我已经想了很久了。他们党小组讨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民营企业在中国的位置和今后的发展问题。这也是一句话说不完的事。中国的民营企业各不相同。有的名义上是民营企业，其实是原先的国有、集体企业换块牌子。更有的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打着民营企业的名义，却垄断了种种资源，享受了种种特权，把国有资产转变成私人资产，又在市场上横行无阻，大把捞钱。也有的，是民营企业，却对上送钱送色，对下压榨员工，又是假冒伪劣，又是坑蒙拐骗，又是偷税漏税，又是破坏环境，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很多民营企业在社会上的形象很差，弄得咱们这样的民营企业也很被动。不能不多想几条路。”

“到美国去，虽说他爷爷在那儿，可是狗窝这么小，去那么远的地方，能行吗？”邢秋芬担心地说。

“你也一起去。”

“那我们分开啊？”

“你领着狗窝一年回来一次，我一年去一次。”

“那得花多少钱？把钱都扔到路上啦。”

“钱？我们这一辈子，还讲什么钱啊？我们这一辈子就算了，我也不准备享福了。我辛苦、奔忙，就为了狗窝这一辈子。让他能接触到现代文明，就是我的心愿。再说，能经常去美国，看看那儿的市场，这钱也不白花。”

邢秋芬沉默不语。狗狗讲的这条路，她会有不解，会有茫然，但是她不会提出反对。

只有狗窝在转着小眼，问：“妈，咱们要上哪儿去啊？”

高秀珍有事找到了狗狗，狗狗很客气地把她请到他的客厅。

“辛总，今天我是作为工会主席来找你的。”

“好啊，好啊，不管你是以什么身份来，我都欢迎。”

“辛总，我觉得咱们厂外包给村里农户加工的针织品，给的加工费低了点，可以提高些。”

“喔？”狗狗一般不一上来就否定别人的意见，只是用了个疑问词。

“我觉得一件提高个五分钱，大件提高个一角钱，对咱们厂的盈利不会有大的影响，但是会明显地提高她们的积极性。因为这几年，其他的生产项目像喂猪、养鸡、种菜，收益都提高了，咱们的加工报酬一直没提高，我听到有些反映。”

“嚯，你这位工会主席，不但为本厂员工考虑，还为那些外包工考虑啊。”

“是哎，我觉得她们更难。一天从早到晚，要忙十几个小时，还得干家务，又没有各种保险，更没有退休，就靠这几个钱。提高点加工费，不但对她是个鼓舞，对提高咱们兴华厂的名声也大有帮助。别的针织厂要想抢咱们的活，就不容易了。”

“等我想想，明天再答复你。”

“辛总啊，还有，我建议把各村的外包工也组织起来，一个村编一个组，选个组长。这样以后咱们安排生产任务，培训技术这些就方便多了。”

“好，好。这个事，你马上就可以去办。秀珍啊，这些年你为厂里出力不少，我真得谢谢你。”

“谢什么呀，都是为厂里。以后，为了员工的利益，有些事，我可不会让步噢。”

“好的，好的，我能理解。这些就不完全是个人关系了。”

秀珍啊，还有件事要拜托你。过几天，我要去趟美国。秋芬和狗狗也都去。这厂里，又要像上次那样，都要交给你了。”

“是吗？去看看老爷子也应该。厂里的事，你放心，我会帮你办好的。”

“我给你公布个副总经理。”

“那倒不用。我跟这些部门相处得都挺好。说话，他们会听的。”

“这更说明我的这个安排是对的。你就不用客气了，这也是工作的需要。”

一个月后，1989年的4月，狗狗办妥了去美国的手续，一家三口登上了远去大洋彼岸的旅程。

他们坐的还是几个月前送小半去北山结婚的那辆工具车。

高秀珍，现在是副总经理，领着厂里的中层干部，在厂门口送行。

狗窝兴奋得不得了，动个说个不停，邢秋芬忙着把他捂在座椅上。

狗狗朝车窗外扬扬手：“回去吧，都回去吧。也就一个月，我就回来了。拜托你们了，各位要多辛苦了。”

“辛总，你放心地去吧，厂里的事不用牵挂。”高秀珍应答着。

工具车走了。

狗狗这一走，不是一个月，而是半年多以后，才匆匆地回来了。

第三十二章 王溪疯了

1978年2月1日

32.1 旧情人

王溪疯了。并不是要进精神病院的那种疯，而是自己气糊涂了。

1988年的年底，她离婚了，她的男人不要她了。她的男人和她的公婆，对于王溪的放肆实在忍无可忍了。她男人在格尔木那个单位有个同事，说是甘肃老家有个亲戚在山西矿难中死了，撇下孤儿寡妻好不叫人心酸。王溪的男人干脆离了这一个，要了那个矿难者的妻子，连她的孩子一起带到了青海，过起了正常的日子。这一边，田家的公婆就把王溪赶了出来。王溪哪肯走，王山家也绝不肯收她，结果吵得昏天黑地，成了那些日子龙头镇仅次于民主村征地事件的大事。最后，镇上出面调解，田家给了她两间倒屋的居住权。

即便这样，王溪也咽不下这口气，整天瞪着眼在胡同里乱窜。大人小孩见了都躲得远远的，免得被她平白无故地瞎骂一顿。

下一步该怎么办？王溪想到了宗发奋。这时候不找他，找谁？

据说宗发奋到粮库后，一下子就发了。盖起了龙头镇上的第二个楼房，虽然才抹完墙，家具还没搬过去，但小楼的外观就能叫任何一个龙头镇的人驻足观望。还听说宗发奋也正在和他老婆柏蕙珠闹离婚。

自打宗发奋知道秦德才欺负过他老婆之后，就不愿意再看他老婆一眼。尽管这并不是他老婆的错，实际上还恰恰是他自己引来的祸害。他没法再去追究秦德才的罪或错，却反过来跟自己老婆过不去。不论柏蕙珠怎么苦苦哀求，宗发奋毫无回心转意的念头，心里还一直在想这儿子是不是他的。无奈那时还没DNA技术，只能天天像吃了苍蝇一样地恶心。

王溪一想，这不是老天给她的好机会吗，这不正是叫她赶紧插进去吗？再一想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又听说宗发奋看上了粮库的一个女化验员，烟台粮校分来的中专毕业生，又有文化又年轻，惹得宗发奋整天跟在后面。

啊呀，自己没想到呀。前几个月，与其花时间跟田家争那两间破草房，不如把功夫花在宗发奋身上。一旦成了，那以后可是住楼房的官太太啊。王溪直后悔自己没算过账，便往宗发奋这儿过来。

傍晚时分，王溪进了西门外的粮库。宗发奋这几个月不愿回家了，也正在粮库里。他早已经看不上王溪了。粮库里女职工有好几个，个个花裙子、高跟鞋，戴着上海表，有的还烫着发，会唱歌、会跳舞，引得宗发奋心里直痒痒。王溪算个什么，跟她们比，连脚背也够不上。宗发奋尤其看中三年前分来

的那个化验员关秀娟，又白净，又大方，真不错，刚把她提拔成了化验科的副科长，看来是有点效果。今晚上还凑在一块儿吃了晚饭，那个王溪却来了。宗发奋心里那个恼火啊，可脸上还得陪着笑，这个时候可不能得罪她。要是叫她打翻了醋坛闹起来，再有理也是惹得一身臊。这时候最关键的是要在那些女同志面前保持良好的领导干部形象。

宗发奋马上站起来，迎上去，把王溪堵在门外，脸上装得笑容可掬，嘴里还得甜甜的，“哎哟，我的大妹子，这么远还跑过来？有事来个电话就是喽。”

“有半个月没找我了把，把我这个妹妹忘啦？”

“那能呢，那能呢。”一边说，宗发奋一边就把王溪往外领。

“你这里有了女人堆，想把我甩啦？”王溪步步追问。

宗发奋赶紧往四下瞧，好在没人，拉了王溪一把：“这儿是工作场所，能这么说吗？要注意影响！”

“这儿就不能说啦？”

“嗨，你怎么什么也不明白！这些事让别人知道了，上面对我的印象不好，这官就当不成了。你不也就不能跟着沾光了吗？你那两间房，还是我上镇里说下来的，不然哪有你的！”

“这么说，我倒要谢谢你啦？”

“那当然，你要谢我的地方多啦。看你现在疯疯癫癫的样子，没有我，你在龙头一天也呆不下去。”

“那我现在上哪儿去？”

“你先回家去吧，在这儿干吗呀？”

“不，你就想甩掉我，找那个学生妹，当我不知道啊？”王溪提高了嗓门。

把宗发奋吓得赶紧捂她的嘴，“我的姑奶奶哎，别喊了，就上我的新房子去看看吧。我在前面走，你在后面离开三十步跟着。”

宗发奋的新楼房，就在西门外，粮库的南面不远。有了这双轨制，宗发奋到粮库也就一年，就盖起了两层小楼。

宗发奋开了院子的门，等王溪进来，领着她上了楼上。两间朝南的房，一间空着，准备放床，一间还是按海源的习惯盘了个炕。两人上了炕，虽然是硬邦邦的石板，可还是打情骂俏了一番。

天黑了，可王溪不想走：“你这房子真好啊，咱俩快结婚吧。我这头已经离婚了，你那头要抓紧哎。”

宗发奋心里暗暗叫苦：真他妈的，我就算离婚，也不会找你唉。想什么法，把她支出去呢？哎，有了。

“我这房子算什么？你也有房子哎，你不去住。”

“那两间破草房，还得和他们一个院。见都不想见他们，门都不想进。”

“谁说是那个破草房呀？你怎么能去住那样的房子呢？”

“那还有什么房？”

“你不知道啊？说你人傻嘛！那个台湾国民党的王立回来出钱要盖的房，王山已经盖好了。那个房子多好啊。不说比你那草房，就是比我这楼房也是绰绰有余啊！”

“噯，我怎么没想到呢？他已经盖起来啦？！”

“不但盖起来了，而且里外墙都刷了，说不定连家的那小子已经住进去了呢。这倒是便宜了他们连家的。你这姓王的，也算是白姓了王！”

“哼，没我的份？没门！”

“你别自己觉得本事大，你能斗得过那姓高的？”宗发奋眼睛斜看着王溪，挑动着说。

“你等着瞧，看我怎么对付她。实在不行，我就撕烂她的衣服，叫她出丑，没脸见人。”

“恐怕你也就是嘴上说大话，也没见你动弹。有本事，你去哎。”宗发奋一心想把她引出去。

王溪呼地在炕上坐了起来，再一想，急什么，这儿的事还没办完呢，便眉头一笑，说：“嘿，宗局长啊，这天都黑了，我等明天再去找他们算账。今晚啊，我就在这儿了。”

宗发奋只好叫苦不迭：“哎哟，我的老祖宗哎。”这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33.2 大闹娘家

第二天，一清早，街上还没人呢，王溪就跑到了王家的门口，使劲地拍门，使劲地喊着：“开门！给我开门！”那声音大的，前后几排房都能听见。

王山把四间正房和两间厢房重新另盖了新的。为了不张扬，临街的原先丁妹和王溪住的倒屋没动，只是把街门换了新的门板。因为新房子刚盖好，为了更加喜庆、热闹，小连子两口这几天也在这儿新房住一阵。

王溪看着那崭新的门板，看着她早先住的倒屋还是旧的，更来气了，拍得更来劲了，骂得更凶了：“都死光啦？不敢出来啦？出来！你姑奶奶来了，出来！”

“你他妈哪来的野东西，到这儿叫春啊？”小连子走出屋进到院里，隔着门对骂。

“你算什么东西？叫你奶奶出来开门，我要住进来，这房子有我一份！”

“你早就不是王家的人啦。这房子和你没关系，想也别想。”

“我怎么不是王家的人，你才姓连不姓王呢。”

“我虽然不姓王，却是王家人。你名字上写了个王，却枉为王家人。”

“你算是哪来的种啊？有什么资格张口闭口说王家。”

小连子一听气得，跳上去拉开门栓，想出去揍王溪。王大妈过来了，把小连挡下，站在门后面，气吁吁地说：“王溪，别闹啦，王家不欠你的，还是走吧，不要弄得大家都没趣。”

“什么趣不趣？我是王家的人，这房子就有我一份。不给房子就给钱，你挑一样吧。”王溪一跳三尺高，手指差点碰到了王大妈的额头。

王大妈生气了，呼吸急促起来，脸色由涨红到变白，嘴唇哆嗦着说：“你这个害人精，还有脸过来！一根钉子也没有你的！你滚！”

王大妈身子一晃，刚想去扶门板，王溪却冲了上来，“我才不滚呢，我要住进来！”一下子就把本来就站不稳的王大妈撞倒了。

小连子随手操起大扫帚就往王溪身上打。王溪的脸上被刷出几条红印后，一边骂着一边跑了。

后面过来的王山和连四嫂忙扶着王大妈。王大妈躺在地上，想睁眼没睁开，嘴里还在骂着：“这畜生，这畜生……”

突然，“咣！哗啦啦……”后窗的玻璃被砸碎了。

“我叫你们住！我叫你们住！”原来王溪转到了后窗外，高八度地骂着。

“咣！哗啦啦……”又是一块石头扔在了后窗上，又一扇玻璃碎了。

小连子拿起一把铁揪冲出去，被高秀珍拦住了。小连子急得跳脚：“你拦我干什么？”

高秀珍说：“让她去砸，她要是点把火才好呢。”

“这怎么说？”

“砸别人玻璃，叫派出所关她几天。要是真点了火，就能叫她关几年。”

“那就让她骂、让她砸？”

“你可以骂，但是别动手。我可以比她骂得还厉害，但是我不动手，还有法律在。”

突然，又是突然，连四嫂带着哭声尖叫起来：“妈呀！妈呀！你醒醒啊！”

王山跪在他娘身旁，摇晃着她渐渐僵硬的身躯，声声痛哭：“这是怎么啦，这是怎么啦？娘呀，熬了几十年，眼看这好生活已经来了，你怎么走了呢，怎么走了呢……”

王山家的院子传出了一片哭声。

王大妈死了。

派出所。

诸所长因为被指责在民主村征地风波中维护治安不力，离六十周岁还差几个月就办退休了。

他正在脱警服呢，一粒纽扣、一粒纽扣地解开。虽然说是对此件事情的处理不服，虽说是从部队转业下来当警察几十年里有着诸多的不平郁闷，虽然也曾几次心里想着、嘴上说着不干了，现在真的要脱下这件警服，还真有点不舍得。不是身穿这警服还多少有点权，而是今后再没有为社会、为群众、为这龙头镇出点力、做点事的机会了。当他慢慢地沉重地解完最后一粒扣子，要去脱下袖子的时候，邬中和来报告，民主村出人命了。

诸所长又赶紧穿好警服，束上皮带，戴上大盖帽，喊上另一个民警，跟着邬中和走了。当他拎着手铐，跨出门时，对邬中和说：“这才是我要干的正事。那天跑到西门外，算是什么事？”

当王溪在王山家的后墙被戴上手铐要送到派出所的时候，嚎啕大哭，满脸的鼻涕和泪水，死活也不肯走，被那民警和邬中和拖着。王溪的头发全都散了，鞋也挣掉了，衣服也扭歪了，脸也变形了。

满胡同的人都说，王溪疯了。

在台湾的王立得知：房盖好了，老妈死了，王溪被带走了，既惊讶又不解，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只回了封简单的信，说：闻知此事，心中很是悲痛。这边事甚忙，赶不回来了，丧事你们办了吧。只是心中亏欠老妈，以后我会再补的。王立的文化程度不高，但在台湾自己补了一些文化，写起信来还带点文言文的味呢。

王山收到王立的信，又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了，当然不能等他回来了。

第三十三章 新型合作组织

1978年2月2日

1989年的春天，是个变幻莫测的春天。

小草刚开始冒芽，邬中和父子就急着去耕地了。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奔向勤劳致富的脚步更急切了。由于建高尔夫球场的征地，他们自己和转移到他们名下耕作的土地要少了。这不，刚犁完西门外的两块地，邬朝阳把手扶拖拉机开到北门外，在这儿的河边犁了起来。半晌刚过，这块地就又犁完了。

邬朝阳坐在地边，啃着干粮，喝着塑料瓶里装着的水，对他爹说：“嗨，真是没劲，才半天又犁完了。下午还得去南门外的海沿。这多费事啊。大家要是能合起来，地都连在一起，那多好啊。”

“好什么？”邬中和说：“五十年代，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地块倒是越来越大，结果呢？搞得一塌糊涂，搞出个大灾荒。”

“我说的不是那种合法。那种合法，不承认农户有他自己的财产权和自身利益。咱们现在可以这样搞，地还是各户自己的，只是相互帮助。我帮你种，你帮我收。这样效率就高多了。”

“这种想法好是好。不过，大家这些年都怕了。一提集体化，一提人民公社，心里就打怵。谁还敢再合啊？”

父子俩正说着呢，皮高深扛着犁从东边过来，看来扛得挺吃力。虽是早春二月、寒风嗖嗖，但皮高深还是敞开衣衫，喘着气，一步一步地走过来。

邬朝阳见状，迎过去，帮着皮高深抬了过来，说：“歇会吧。”

皮高深谢过后就和老邬、小邬俩一起坐在了地边。

邬中和问：“你家东边那块地也犁完了？”

皮高深挺不乐意地说：“本来那儿是三亩好地。结果建造纸厂占了二亩多，还撂下了不到一亩。我还得为这不到一亩地，特地跑过来犁。借个车子，还不值得，还得我自己扛。这弄了盘什么景？”

邬朝阳说：“看来大家都有这个问题，这些地大家一起耕、一起种、一起收，还能好一些。”

皮高深一拍大腿，说：“好啊，咱们两家可以先合起来啊。”

邬中和试探着问：“这不又是集体化、人民公社了？不害怕？”

“这是咱们自己搞，相互帮助。跟以前那种强迫命令不一样。”

“你还是回家问问你爹吧。”还是邬中和考虑周全些。

“我家里，我爹作不了我的主。”皮高深挺自信地说。

邬朝阳偷偷地瞄了他爹一眼。他爹眼一睁，邬朝阳又赶紧低下头。看来邬中和在他儿子面前还是挺有权威的。

皮高深傍晚回家，跟他爹皮安已一说。事情可不是那么简单。虽然辜书记是他家的女婿，不知是为显示清廉还是感情没到那份，并不管他皮家的事，家里的事还都是皮安已担着。

皮安已听儿子说了要合起来种地之后，非但没表示高兴反而把脸一沉，说：“这合作社、人民公社，还没受够啊？别忘了迟得法是怎么死的。就是对入社、对人民公社搞浮夸有意见，老是受批判。1958年当成白旗拔了。困难时候有了病，别人也不敢去帮他。结果，挺不过去，连饿带病，死了。可怜啊。”

“爹，你怎么老是想着他。”

“我和他是同辈人。一起长大，一起过来的，能忘得了吗？”

“但现在我们搞的，也不叫集体化。大家自愿，愿意合在一起的，就合在一起，不勉强。我们也不想搞得很大。”

“好不容易，人民公社才散了伙。就别再合啦。”皮安已还是忧心忡忡。

“我还是想参加。”皮高深执拗地说。

“唉，你实在要去，你就去。反正我是不去。”

“那，那怎么办？我要去，你又不去，怎么办？把家拆了，把地分开啊？”

“分就分吧。早晚有这么一天的。”皮安已悲切地说。

皮高深想的是往前走的事，虽然难，也要往前走啊。他相信新的合作办法，不是那种整天被赶上山学大寨、出工不出力，或者被强迫出力的做法。他也想到了他爹这几十年的不容易，尤其是母亲去世、妹妹失踪之后，满心装着苦楚却硬把这个家顶下来，不容易啊。虽然眼看七十出头，还天天在地里忙活着。现在也不能自己有了家就抛开爹走人了。

“那这样吧，我先去参加，你在外面看看。家里的地留给你一半。要是我们搞好了，你再来。家也不用分，做饭还是叫你儿媳妇做，我们一起吃。地搞不过来的时候，我也来帮忙。重活累活还是我来。你的地，收成算你的。这也叫一家两制，试试看，行吧？”

“那好吧。”皮安已倒也不为难儿子。

邬中和和皮高深两家要合起来耕作的事在村里传开了。没想到不但没有引起惊恐和疑虑，倒是有不少人来打听，也想参加。不光是种地，有的人还有了新的想法。

这几天，邬中和家热闹起来了。

齐成才过来说：“那个造纸厂，我一开始就不想去。这回，一起合作起来，不管叫什么互助组、合作社，我可是要第一个参加。”

迟解放过来说：“大叔啊，来的人家多了，地块也大了。光靠手扶拖拉机就不行了。我会开大拖拉机。咱们一时买不起，就去租个拖拉机，把大伙的地一起翻了。别的谁家愿意翻，咱们也帮他翻了，搞有偿服务。这事，我可以弄。”

于又发过来说：“要是参加的人多了，用的种子、化肥、农药这些也会多了。我来一起去采购，这样就便宜多了。现在合作起来，还有这个好处呢。以前这些东西，我不敢多进，怕卖不完砸在手里，只能搞代销，利润就低多了。要是人多了，地多了，用量多了，我们就可以搞包销。进的又便宜，利润还高。这几年，开了个小店，我明白这些了。”

当然，也有疑虑的，比如像王山。

小连子劲头挺足，一心想参加。虽然已经分了家，但这样的大事还是要跟王山商量的。

王山听了，一时没搭话，好一会才说：“这事好是好，可人家能要咱吗？”

“怎么不要？都是民主村的村民，凭什么不要？”

“咱们跟人家到底还是不一样啊。”王山这几年心里宽松多了，但真有事的时候还是有点担心。

“到现在还不一样啊？你看去年王立大叔回来的时候，镇里、村里多重视啊，像对贵客一样。”

“唉，以前吃的苦太多了，心里还是怕，还是谨慎一点好。”

“您老放心吧，我先进去。你在后面看着点，指点着。”小连子提出了跟皮高深一样的办法。

“可你进去能帮人家干什么呢？”王山的疑虑还没有完全解除。

“我一直想学外地搞个蔬菜大棚，可自己家单独在外面搞，也没有水，也没有电，很难。人多了，地块大了，可以集中搞三、五个大棚，连在一起，就能搞得起来了。”小连子兴奋地说，看来他也是想了很长时间了。

“好吧，你想得也对，我不拦你们。”王山还是从心里希望年轻的一代有更好的生活。

不到一个月，就有十几户聚到了一起。也不管是第几村民小组，凡是地块相邻的就都连在了一起翻耕。这些中年人、青年人，高兴得有点像五十年代初互助组的时候。

彭小宾见到村里热气腾腾地搞了起来，也是想了很多。他觉得是群众走到了我们前面。这种新的合作方式，是好事，方向是对的。不但符合农业生产经营方向，政治方向也是对的。作为村干部，也要去参加，还要去引导。以普通村民的平等身份去参加、去引导。

彭小宾在北门外的山塘地里找到了邬朝阳。

他们几个正在种春玉米。这垓顶的地，土质不好，不能种什么。他们几个（他们新办的这个组织形式，连个名字也还没有。不知该叫什么，暂时就称呼“他们”吧），他们几个一合计，多施点底肥，种春玉米吧。别看是十几户人家合在一起，真在这块地里干的，也就几个人，全不像以前人民公社那种看似热闹、遍地是人而实际上效率极低、效果极差的“大兵团作战”。迟解放在前面开着小拖拉机翻地，皮高深和郭朝阳两个挑着担从地边往翻出来的地沟里下肥，还有两个妇女跟着下种复土。

郭朝阳抬头看见彭小宾走了过来，连忙打招呼：“喔哟，书记来啦。”肩上还挑着两个空筐，就走到了地边。

“什么书记啊。”彭小宾笑着说，“我特地跑来问问你们，你们还能要我啊？”

“小宾伯伯，你这样客气，我可受不住了。我们想请你来都不敢请，那还有不要的话。我们当时也想到过，又怕拿不准上级的意思，给你们当干部的为难，所以就没敢请你们。”

皮高深也高兴地跑过来说：“能有你们的理解，能有你们的支持，那就太好了，我们就更踏实了。”

彭小宾看着他俩说：“你们要比我们强多了，又肯干，又会干。要不这样吧，今晚上我过来上小郭家。朝阳你叫上你爹，你们几个都来，我们再商量商量。”

“好，好。”

晚上，郭朝阳家。

他们，新合作组织的成员们，差不多都来了。满满的一炕都坐不下，还拿了几条板凳放在地下，坐了几个。

电灯光下，照着一个个兴奋的脸。

彭小宾先说了：“这件事，你们做得好啊。既保持了各户的独立性，又发挥了集体的力量，这是把农村经济改革又推向前啊。你们能同意让我也参加？”

大伙一阵掌声表示欢迎。

郭中和说：“看这样子，群众对这都挺有兴趣，参加的人恐怕还会增加很多。咱们现在连个规矩也没有，甚至连个名字也没有。得列出几条来，大家一起照着办。”

皮高深说：“叫朝阳拿纸记着，大家议议，写上几条。”

大伙很快就议了几条：自愿参加，所有帐目公开，所有成员相互平等，领导由大家民主选举，重大事项由全体成员通过等等。

郭中和又讲了，“由于各户人家的需要不同，在组织形式上可以多样化。比如可以分别有耕作组、收割组等等。愿意统一收获的，参加收割组。有的人，只需要统一耕作而愿意自己收割的，那就只参加耕作组而不参加收获组。反过来，也一样。到时候，咱们再组织耕作队、收获队来具体完成。”

邬朝阳说：“还有这样的情况，有的人家没有劳力或者没有时间，想叫我们耕种，但不参加劳动。这也可以，我们就收点费用。也可以是常年固定的，也可以是临时的。”

齐成才说：“这也行。对了，慢慢地以后我们还可以有蔬菜队、副业队、林业队这些。”

迟解放说：“我们还可以有搞供销的、有搞运输的。”

于又发高兴地说：“啊呀，这就发展大啦。我们就成了大公司啦。”

邬中和说：“为了不招人耳目，咱们先别叫什么公司。”

齐成才问：“那叫什么呢？总不能还叫互助组、合作社吧？”

邬中和说：“其实互助组、合作社，本来就不是坏东西、坏名字。不是不可以叫。但现在还叫这些名字，怕有些人会误解、会有疑虑。要不，就叫互助会吧，我们都是会员。”

“也好，也好。”大伙想不出更好的名称，也就同意了。

“得有个领头人吧？”迟解放说。

“对，今天一起选了吧？”于又发说。

“好。我建议由邬朝阳来担任，这事是他先发起的。”皮高深说。

邬朝阳忙摇起双手推辞，“不行，不行。我才二十刚出头，什么都不会。这起头的事，实际上也是我爹做的。”

“要不就中和，你来挑这个担。”彭小宾说。

邬中和也谦虚了一番，可大家觉得邬中和挺合适，就一致推举邬中和，他也不好再推辞了。

“那我为大家服务一回吧。也不用叫会长、主任这些了，不用名称，大家认我就行了。”

“那就叫负责人吧。”彭小宾说。

“好，好。”大伙一阵说好。

接着又议论，现在先分几个组、几个队，都有哪些人。这些具体事项一一讨论下来，都已经半夜了。人们依然兴致勃勃，没有半点睡意。

为什么经过那些年在人民公社、集体化的旗号下，几番左倾折腾之后，人们还愿意走合作经营的路呢？一方面是家庭经营明显的局限、小农经济先天的脆弱，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单门独户确实有许多难以克服的短处，农民们对此有着切身的体会。更重要的是，在民主村，社会主义的形象、基层干部的形象还没有完全倒。在中国，人们还没有看到可以替代社会主义的另一条路。

第三十四章 现代民主政治

1978年2月3日

34.1 讨论

彭小宾把自己参加互助会的事情，拿到支委会上讨论。

鲁队长说：“这是个好事情，民主村会因此而又向前发展一大步。不瞒大家说，我也想参加哎。”

杜家骏有点感叹：“是个好事，但我承包的貂场没搞好，今年还倒过来有点亏损，就不好意思参加进去了。省得别人说闲话，说我要去沾这个光。”

彭小宾说：“等等也好。现在的互助会都是农户以自己的财产参加。集体财产怎么投入，还得有个说法。”

鲁队长说：“肖胜利在外面学渔业还没有回来。他回来以后，渔业这一摊可以作为村里的财产整体加入互助会。有了收入，按比例给村里一份，给互助会一份。村里的收支，互助会的收支，各自分开，保持独立。”

彭小宾说：“对，对，这好比是出资人、经营者、收益者，要分清楚，不要乱了。不要像以前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说是全民，怎么体现？谁来代表全民？挣了钱怎么分，赔了谁负责？一笔糊涂帐。”

鲁队长说：“还有一点，既然名字叫互助会，就不能光是生产上的互助。生活上有困难的，经济上有困难的，也可以搞互助。互助会可以把合作医疗再搞起来。再搞个互助基金会，在资金上也可以互通有无，帮助一些有急事、有难事的。”

彭小宾说好，“这就有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味道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不就是借这个由头拆房子盖房子，搞个表面工程让外面人看，让个别人捞好处。新农村的发展，思路要开阔一些。除了生产之外，农村也要考虑社区建设、文化建设等等。有的可以由村委会来搞，有的可以由互助会来搞。”

杜家骏说：“我们村里正在海边搞的那个饭店，也可以交给互助会搞。村里的人也有限，不要太分散了。”

彭小宾说：“这事可以考虑。但还是需要村委会讨论决定。”

鲁队长说：“可惜平金刚没来。我去叫他了，从造纸厂停了以后，他在家没有别的什么事，也不肯来。不知道他会是什么态度。”

杜家骏说：“我估计他现在是不会有这个兴趣。用老潘学来的新疆话的说法，他的肚子还在发胀呢。不过，我听说他儿子平海波，还是挺想参加的，只是碍着他爹的面子，没有开口说。”

末了，鲁队长说：“这事还得镇政府批准吧？”

彭小宾说：“这事我想过，要是正式写成书面材料报镇政府，要他们盖大印批准，恐怕会为难他们。我先去口头跟他们说一下，算是通个气，看他们的意见再说。”

镇政府辜书记的办公室。

辜书记见是彭小宾来汇报民主村的事，照例把祖镇长请了过来。

彭小宾向他们俩汇报了民主村有了互助会的事。

辜建功跷着的二郎腿弹了一下，“你们民主村啊，真能想出道道。不就是互助会吗？我听说文革以前就有过。就是大家凑点份子钱放在一起，谁家有急事先用着。你们搞这么复杂，干吗呀？”

祖云涛说：“他们现在这个互助会，不那么简单了。名字叫互助会，内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经演化成一种新型的合作组织。”

辜书记皱了皱眉头，“这么搞能行吗？上面发的文件里没说到过吧？”

祖云涛说：“这是件好事情，我觉得应该支持。况且上面的文件里没说这样不行啊。”

辜书记摇摇头，“上面没表态，这事就把握不准。既然祖镇长支持，那你们就先搞吧。”

彭小宾笑了，说：“这也行，书记不阻拦就行。”

祖镇长对彭小宾说：“你们啊，要抓住两点。一是要充分发扬民主，二是要讲究实际效果。有了这两点，就能搞得下去，就能越搞越好。”又转过头对辜书记说：“这是自下而上地进行改革，也是推进改革的一条重要途径哎。”

辜书记轻轻地哼了一声，“你又讲要发扬民主了。农民没有多少文化，要那么多民主干吗？给了他民主，不会用，跟你乱来，不听话，那怎么办？”

祖镇长说：“我们党几十年来都在强调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毛泽东不是说‘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应当相信群众’么。可为什么往往到了真的要相信群众的时候，群众就变成了阿斗，就不愿意让他们自己去做，我们反而却高高在上、指手画脚、发号施令了呢？只有在想要堵住别人的嘴，才把自己的意见说是群众的意见搬出来。”

彭小宾接着说，“从民主村的情况看，农民群众是有觉悟、有水平的。不但有改革的创造性，也有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出问题的，往往不是农民，而是有些当官的有歪心眼。”

“嗯？”辜书记一听这话就不是味，歪着头看过来。

祖镇长赶忙解释说：“你看世界上这么多的国家，民主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往往社会就比较稳定；而那些多年来社会不稳定的，又往往就是缺少民主的国家。当然，也有的国家搞民主不完善的、甚至不成功的，那只能说，我们在搞民主的时候要更认真、更下工夫。就像不能因为有的国家搞社会主义不成功，我们也不去搞社会主义了。”

辜书记还是不以为然地说：“民主那东西是奢侈品，摆着好看，不实用啊。到时候，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你听谁的？讲什么话的都有，你拿他有什么法？不如现在，我们一挥手，大家一齐照着办，多好多省事。”

祖镇长耐心地解释着：“那群众怎么当家作主呢？如果村民们连村里的、家里的事都当不了家，那叫什么‘当家作主’呢？社会主义民主，有一条就是要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并没有很好地落实，往往是句空话。很多事情上，经常是我们替他们当家作主，他们是在‘被当家’、‘被作主’。社会主义的当家作主，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把村里的事，农民自己的事，这些事的决策权、行事权，交给农民自己。相信他们会搞好的，会搞得比我们更好。”

“那还要我们政府干什么？我们镇党委、镇政府还管什么？还要我们干什么？”辜书记挺惊讶地问。

“所以说，要搞大社会、小政府嘛。政府本来就不用集中那么多权力，管那么多事干吗？让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祖镇长笑着说。

“要慎之又慎啊，不要随随便便提民主的事。弄不好，不就又跟资产阶级自由化联在一起啦。左和右的关系，还是左一点好，没有风险啊，不会有人来找你麻烦。”辜书记不无忧虑地说。

祖镇长也感叹道：“有人一说到民主、自由，就马上联想到西方资产阶级。这些本来就是人类社会共同的美好愿望，本来就是社会主义核心的价值观念，为什么总要丢给资产阶级呢？这只能说明他们不过就是些连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都分不清的假左派。社会主义社会应该享有最充分的民主，才是啊。”

“唉，不是我不想搞民主哎。是中国这几千年，这几十年，专制的影响太大，民主不容易搞啊。”辜书记叹着气说。

“这就更需要搞啦。从群众到我们领导，都需要更多的现代民主的启蒙、培育和实践。开始，即使有点不足，也不可怕。这样坚持下去，不断改进，才能建设起经济繁荣、政治民主、人民富裕、社会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是包括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的现代化，也包括民主政治、思想意识、社会形态的现代化呀。”

“那，有一些左的旗号就不要啦？就是从策略考虑、装个门面，也得要啊。”辜书记说。

“也有人这样说，那些左的旗子，眼下既不能丢，又不能挡在眼前，上面有污点，洗也洗不干净，一洗就破，那就干脆高高举起，别去细看了，该往哪儿走就往哪儿走。这倒也是个办法。”彭小宾说。

“那算个什么办法。”祖镇长说。

“好吧，好吧，那你们看着办吧。我就当作不知道。”辜建功无奈地说。

彭小宾看着辜建功难受的样子，嘴巴张了两下，没说出来，最后还张口说了：“辜书记啊，我说一句不该由我说的话。我们民主村的人都把你看成是民主村的亲戚，我就大胆说一句：这些年，你有些变了。前些年，文革时，形势那么恶劣，可你还能敢说敢当、主持正义，现在怎么了，一会儿忽冷忽热，一会儿又畏首畏尾、裹足不前。”

“唉，我知道我是民主村的女婿，我也很喜欢民主村的乡亲。可是现在不是那时候孤身一人，卷起铺盖哪儿都可以去。现在要考虑的事情多啦，上下左右、张三李四，各种关系多啦，不容易摆平啊。就说征地那件事，你们不满意，我也很窝火。上面牵扯的事多啦，到省里都不止。那个压力大呀，我都没法说，嗨！”辜建功一巴掌拍在大腿上。

“这互助会的事，没这么复杂吧？还涉及到个人关系吗？”彭小宾有点不解地问。

“怎么不涉及呢？你以为所有的人都愿意看到你们搞得兴颠颠的啊。你等着听动静吧，会有难听的话出来的。”

“我们又不是搞资本主义。既不搞左的，又不搞右的，怕什么？”彭小宾说。

“左和右，就这么好把握？不瞒你们说，你们这个互助会，我就把握不准。凡是上面没有明确说的，我就不管。不管也是一种管。”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改革创新，不会有错的。”彭小宾耿直地说。

“嗨，我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还不明白？前天我上县里，特地去找了那位付局长，他可是在省里有来头的啊。他跟我说，上面又起云啦。你们不要走得太远啊。”辜建功压低着声音说。

“又起云了？是彩云呢，还是乌云呢？”祖云涛不紧不慢地问。

“不说啦，不说这些啦。还不知道这云后面会是什么风、什么雨呢，各人好自为之、夹着点尾巴吧。”辜建功说着，竟闭上了眼睛。

34.2 发展

村干部的参加，镇政府也没有阻拦，民主村的互助会更是发展开了。

齐成才的儿子是文革那时间出生的，取名叫齐文革，在那时是个很时尚的名字。可小伙自己倒并没有文革派头，还改了名字叫“齐改革”，很热情，肯钻研，刚农校毕业，也不在外面找工作，就直接找到村里的互助会干上了。这可是来了生力军。他讲了好多对于乡亲们来说是最新的科学知识，叫大家耳目一新。他说，我们不单要知道袁隆平，也要知道世界上引领以矮秆品种为核心的农业绿色革命的带头人，像勃劳格这些对全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他介绍来最新的品种，小麦有鲁麦14、鲁麦15，杂交玉米有烟单14、掖单2，还陪着于又发到处打听、到处进货。

大伙看着又一代新的民主村人成长了，高兴得不得了。

申光荣的老婆齐小嫚要参加互助会，申光荣还千方百计地阻挡，说是家里离不开，小孩没人照应。

于又发劝他这位中学老同学，要想开点，要跟上形势啊。申光荣还老大的不满意。他不满意什么呢？这儿先放一下，下一章会说到。

齐小嫚说，甬理他。他这个人，一粒豆子咬不动就生气，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齐小嫚本来就是在家里为针织厂干钩花的活。这回儿互助会，正好要成立针织组，既是互助会的一个专业生产组，也是针织厂在村里的联络组。经针织厂认可，齐小嫚当了组长。

高秀珍特地跑过来祝贺，说：“民主村按说第一个就该成立针织组。那时北山的各个村，一个个都成立了，怎么我自己的民主村反而没有呢，把我急死了。这下可好了。有什么加工任务，我会优先给民主村。”

齐小嫚握着高秀珍的手说：“秀珍妹，那可得好好谢谢你了。我们民主村的针织组，一定会给那些针织组做出榜样，也要给你脸上争光啊。”

“那你孩子怎么办呢？”高秀珍问。

“这个问题也解决了，互助会叫迟解放的媳妇于又珠领头搞起了幼儿园，放在西北场院。”

“那敢情好。再以后我们针织厂的女工们有了孩子也有地方放了。”

“等你有了孩子，也可以放进来了。”

“去，掌你的嘴。”高秀珍和齐小嫚都爽朗地笑了。

小连子把自己的地交给了互助会，另由互助会拨地、拨料、拨款，没几天就撑起了三个大棚。而后，又商定了一个每季度向互助会交款的数量，类似于承包的做法。

大棚顶上的透明塑料薄膜刚铺上，小连子就忙着领了几个帮工，在外请师傅的指点下，一刻不停地下种、浇水。一个棚里种豇豆和四季豆，一个棚里种黄瓜和香椿，一个棚里种茄子、辣椒，能比外面大田地早一个多月收摘。到那时，经济收益就可想而知。

这些帮工大多是从北山和本省西面来的，大多数还是针织厂女工的家人和亲戚。一般都是家人带家人、亲戚喊亲戚过来的。他们在这儿有了个相对稳定的生活，在当地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对他们，我们还真需要有更多的观察和更深的思考。至于彭小宾在想，用村里的地盖些简易房租给他们住，这大概是中国农村城镇化的途径之一。城镇化并不是农民都要到城里去，并不是意味着就要农村的空心化。这儿就先不讨论了。

王山一个棚、一个棚地转着看。看着外面春寒料峭之下，棚里的小苗纷纷地冒出了绿芽。

“好啊，好啊。”王山一个劲地直点头，笑得眼角的皱纹更深了。

“怎么样？爹。”小连子问。

“好啊，好啊，真好啊。没想到小连子还有这两下子。”王山高兴地说。

“连我自己也没想到啊，爹你来参加吧。”小连子诚恳地说。

“嘿，嘿，嘿嘿。”王山憨憨地笑着。

互助会原先议论的几项，只有合作医疗和资金互助会，还没搞起来。这是因为涉及到上级有关部门综合改革的配套问题，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险和农村金融的改革还没有进展到那一步，所以暂时还无法实施。

民主村的互助会短短的两、三个月就兴旺起来了，惹得四里八乡都十分的关注，还有不少人也想参加。甚至一些针织厂的女工，也想拉自己在北山的家人参加。尤其是一些地连地、亲戚带亲戚的邻村人，要求更强烈。说起来，让他们参加也是有一定道理。邬中和就跟互助会的一些人商量这事。

皮高深就不同意。他说：“外村人心里想的跟咱们不一样，都进来了，人多嘴杂，不容易齐心。”

齐成才说：“是哎，咱们好不容易搞起来，规模已经不小了。外村人再进来，摊子就太大了。不好管理，不好通知，也不好算账，算了吧。”

还是鲁队长是老干部，经验多，他说：“还是人多好啊。到时候，村连村，地连地，很多事就更好办啦。”

彭小宾也是赞同扩大的，他说：“摊子大一些，规模效应就更明显了。”

于又发说：“是哎，是哎，这样的话，供销进货方面的优势就更能体现了。”

邬朝阳说：“那就这样定啦。”

彭小宾说：“先别急，这也是个大事。这是跨行政区划的发展，要慎重，尤其是出现有不同的看法。要征求更多人的意见。”

邬中和说：“要不咱们就开个全体会员大会，让大家都表个态，最后来个决定。”

彭小宾说：“好。这在国外叫公决，咱们也试一回吧。”

互助会真的开了次大会，就这一专题进行了投票表决。结果，大多数票同意接受本村以外的成员。但要有个基本的程序，要有申请，要根据需要和情况而定，还要进行一定的筛选，不能随便什么人想进就进。互助会成立了个专门小组，迟解放当组长，办理接受新成员的事项。

这个会上，还搞了个会员退出的办法。他们想的还是挺周到的。

会后还真进了不少新成员，不但本镇邻街的东北村、西南村，而且赵村、李家泊的也有，更有北山的十几户组成了个山林队，接受互助会的统一管理。

连从新疆来的潘场长、叶局长也来参加了。他们说：“不是自己有困难，更不是想沾什么、图什么，而是想成为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大家当然也是一阵欢迎。

经老太车素花和李辰老师的户口已经从民主村转出，成了非农业人口。可民主村一直把他们看作是本村人，这回也是互助会的成员。七十开外的肖福兴肖校长，也是和民主村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这回把他聘为互助会的顾问。被聘为顾问的还有离休干部经大臣。难道农民就不能有顾问？

原先有些犹豫的，比如王山老汉，现在也参加了。

当王山由小连子领着，憨憨地站在迟解放面前的时候，迟解放立马就明白了，忙说：“欢迎您啊，大叔。”

“嗨，嗨，我来晚了。我来给你们牵个骡子吧。”王山憨笑着。

“哪里，哪里，您老来给我们晚辈人指点指点就行了。”迟解放很真诚地说。

34.3 健全

互助会的规模在这几个里月，翻了一番还不止。仅仅一个“负责人”肯定是不够的。

互助会的几位核心成员（并没有既定名单，有时要看谁正好在场，正好又碰上谁），为此商量了几次。

彭小宾主张最明确，“我们不是几个月以前了。我们的管理也不能停留在手工操作的水平，而是要建设一个现代农业组织，创建一个现代化的模式。首先管理要规范化、机构要规范化，才能保证我们有个良好的机制和平稳健康的运行。”

对于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他们多次请教过祖镇长和经学文，甚至还特地跑到省城，请教了省党校和农学院的有关专家。最后决定仿照股份制企业的办法，在合作组织内部搞权力的分散、平衡和制约，即分别设立执行会、议事会和监事会，议事会是权力机构。

彭小宾说：“这就是三权分立，把行政权、决策权、监督权分开。股份制，简单讲就是把三权分立的模式运用到企业管理上。一、二百年来，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具体操作的，下面再按业务范围高几个组，比如农业组、林业组、副业组、蔬菜组、餐饮组、供销组、运输组、科技组等等。肖胜利已经回来了，渔业组也可以成立了。听说王立还要从台湾回来一次，准备在这儿合作搞个粮食加工厂，这也可以作为我们的工业组嘛。当然要好听点，叫部也不是不可以。”

机构设置，大伙都同意了。名称怎么叫？也是七嘴八舌了一番。叫公司？不行。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与这个新型合作组织的宗旨不符。再者，叫了公司，就是工商企业，税务局就要来收税，工商局就要来检查，事儿就多了。就叫“农户联合会”吧，也不算社团组织，民政局也管不着。镇里也不用批，知道了就行了（相当于备案）。民主村“农户联合会”，就在这层层密密的行政管理的缝隙中萌发了。

最后的问题，负责人怎么安排？班子怎么配备？这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里恐怕是最大的事了。这原本是上级党委管的事，现在要靠自己了。

彭小宾提议，事先谁也不要定，完全交给群众选举。一开始海选。谁都可以推荐别人，谁都可以被别人推荐。第一轮如果没有人有明显的多数票，再在相对票数较多的人里再投一轮。

彭小宾说：“为什么要民主选举？为什么要投票？投票权、选举权是民主权利中最起码的权利。是一个有基本权利的人表达自己意愿、表明自己权利的最基本的方式，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要是连个选举权都没有，或者给个假的选举权，就谈不上别的啦。”

彭小宾继续对大家解释说：“选举出来的，跟上级任命的，或者老子传下来的，或是武力夺取的，他们的治理方式和态度是不一样。选举出来的，要直接面对选民，要对参加选举的人负责，要向他们交答卷的，不管是投了他票的，还是没有投他票的。”

“民主（村）农户联合会”隆重地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员大会，选举联合会的负责人。选举结果是：执行办主任是彭小宾，议事办主任是鲁来福，监事会主任是邬中和。各专业组（部）的负责人由彭小宾提名，大会表决通过。

联合会不设立党团组织。党团员在各自的行政村参加活动。

第二天晚上，“民主（村）农户联合会”在西门外望海山下搞了次庆祝成立的庆典活动。

鲁队长主持大会，由彭小宾讲话。

彭小宾首先宣布，“民主（村）农户联合会”正式成立。

会场上一片鼓掌欢呼。

彭小宾说：“我们之所以成立联合会，是在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为避免小农经济的脆弱性，而又迈出的农村经济改革的一大步。

我们都能体会到各家各户拘束在小块土地上，过于分散，力量小，效率低，成本高，风险大，难以往前发展。有了联合会就能既保持家庭经营的特点，发挥各户各自的积极性，又能够利用集体的力量，更充分地运用市场规律，实现规模效应。

我在这儿还得再强调一下，我们搞新的合作组织，不是养懒人，不是躺在集体身上就可以不出力、不动脑。当然更不会搞强迫命令、瞎指挥。

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是农业生产经营的特点，就是发达国家也是这样。过去的做法，否认了这一点，就吃了大亏，走了弯路。尊重农民自己的愿望和自身利益，尊重农民对自己事务的自主权和决策权。这是我们永远要坚持的。我们联合会，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提供服务、提供帮助，做好协调和支持，使我们农户的能动性、创造性有更好的发挥，创造出更好的效益。

我们联合会已经有了农业组、蔬菜组、林业组、供销部、运输部。过去长期的计划经济，实行的是农村支援城市、农业支援工业，因此造成农业利润很低，而工业、商业利润比较高。所以我们还要向农业之外的更多的生产经营领域扩展，今年就可以搞起渔业组、粮食加工组。逐步实现“种养加”一条龙、

“农工商”一体化。我们还准备向社区服务、医疗卫生、金融、文化这些领域扩展。比如我们刚搞起了幼儿园，我们也可以搞敬老院嘛。一个新的社会形态正在民主村出现。

这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雏形。当然社会主义新农村并不完全都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是多元化的、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可以是多元化的、多种形式的，它并不是个单一的模式，而且也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今后，我们还可以按照大家的意愿，对这个联合会从形式到内容，加以不断地改进。社会主义的明天会比今天更美好。”

会场响起更热烈的鼓掌。

祖云涛代表镇政府前来祝贺：“民主村的农户联合会再一次证实了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生产关系的变革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对这个观点的运用不能极端化。斯大林式的集体农庄掠夺农民，前些年的人民公社又搞“一大二公”。它们之所以失败，原因也在于此。

这方面的探索，既是漫长的又是艰难的。一百多年前，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圣西门、欧文、傅立叶，他们对于“劳动组合”的探索，不能完全说成是空想的。直到今天，还有在困难条件下坚持着“基法索”的以色列人。对于社会民主党、工人党这些，也不能把他们完全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则是另一种比较激进的探索。

今天，你们民主村人和联合会的全体会员们，也在进行这场探索。当然这是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新时期里进行的探索。今天这场探索的实质就是要把农村经济改革继续推进下去。我从你们的改革实践中深深体会到，经济体制改革一定要有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合。让农民有经济上的自主权，首先就要让农民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如果农民连个自选动作都不能有，那还怎么创新，还怎么改革呢？

你们的改革实践，是在市场经济自由度还比较有限，尤其是在土地产权不便于转移的情况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and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使各个项目的生产要素在联合会的范围内有序地向带有合作性质的专业户、专业组转移。同时，进行着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不仅是生产不同产品的分工，而且更深入地进行着不同生产环节的分工。

从目前看，这个改革的实践是成功的。几个月来已经有了明显的效果。当然，真要检验是否最终成功，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你们还要继续努力，认真实践，不断地调整和完善，同时又要相对稳定。

不容易啊，同志们！有不少人在看着你们。很多人想看到你们的成功，准备向你们学习经验，也有想看你们的笑话。我们镇政府支持你们。政府只管公共事务，不干预你们的具体事务。但是在政策上、导向上、全镇的统一协调上，尽力配合你们、支持你们。

很想看到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民主村、在龙头镇出现！”

掌声中，高秀珍作为驻龙头镇的兄弟单位、邬朝阳作为会员代表也作了简要发言。

有多年没舞动的民主村秧歌队，在几位发言完之后，跳动了起来。

铿锵激越的锣鼓，催动了一条新制的翻滚着的长龙。

长龙前领舞的“带傅”是王山老汉。他是年轻时从他父亲老王头那儿学来的。虽然是多少年没有重操这项旧业，可是你看他前后跳跃，挥动着手中的长掸，身手还是不减当年。

一片叫好声中，王山表现出了几十年难得有的兴奋。夜色的电灯下，一颗颗闪亮的汗珠，沁满了王山饱满沧桑、早已布满了皱纹的额头。

“啪！”突然漆黑的半空中，在人们的头顶上绽放出了一朵艳丽闪亮的烟花。

“噢！噢！”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高兴的惊呼。这太出乎大家的意外。人们只知道国庆之夜在天安门才有焰火。现在，龙头镇的上空也史无前例地燃放起了朵朵烟花。

“一颗！二颗！……”每一朵艳丽的烟花都引得人们翘首仰望，而且还都在认真地数着。

虽然只有八颗，这是彭小宾狠狠心买了八颗烟花弹，却不但绽放在望海山上的夜空，也绽放在龙头镇人们的心里。

第三十五章 新“左派”

1978年2月4日

35.1 匿名信

改革的进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它会遇到很多阻力。这些阻力，有些来自于原有的在左倾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希望把社会停留在极左时期，由他们来不断地斗争别人；有些来自于新兴的利益集团，他们利用改革中的一些偏差和漏洞，来扩大他们的权力和利益，甚至在扭曲改革，不惜让改革变味，以加快他们权力和利益的积累。当然，有些人，则同时具备这两种身份。

在社会层次上，这些阻力有些来自于基层，有些来自于管理层。这一章讲的是来自于基层的某些表现。

民主村农户联合会的发展，也有人看着心里不是味。

平金刚心里就不是味。前些日，他听了秦有理的话，去给辜书记、祖镇长送东西，结果反落了个没趣。不但东西没送成，还被受了次深深的“教育”。造纸厂已经停了工，因为上面来了文件，要整顿小水泥、小化工、小造纸、小矿山之类。亏得有上面的这个要求，不然造纸厂无论从经营管理到设备、技术都已经难以为继，这样顺势停了，倒也显得自然。只是停产时，镇里过来清理资产，还是一笔糊涂帐。里面肯定有经济问题，但查账的信用社尹会计也说不清楚，只能先放着，待以后再查。厂长的职务已经免去，要回村里，平金刚也不太愿意。他觉得自己已经是镇里的一个领导干部了，再和村里的在一起，有些掉架子。更何况村里成立了农户联合会，也没有他的位置。虽然辜书记答应在他找到新的位置以前，还保留厂长的待遇，可心里到是气啊。

平金刚一个人在家里喝闷酒呢。

“平厂长，眉头皱这么紧干什么？”秦有理走了过来，毫不见外地自己就坐到炕桌边。

平金刚一看是秦有理，心里更有气，都是你他妈的出的馊主意，可是又说不出口，也没搭理，也没抬头，只管自己拿着酒瓶给自己又倒了杯。

“看你有出息的。这点风浪就闹情绪啦？”秦有理对平金刚还是很有办法的，尽管平金刚比他要长一辈。

“你还知道这里面是谁在起作用吗？”秦有理又紧跟着一句。

这句话，果然起了作用。平金刚立马抬起了头，问：“谁？”

“这还不明摆的吗，就是那个祖云涛呗。”

“祖镇长？”

“就是他，硬是说你管理不力，要承担责任，非要拿掉你的厂长职务。其实，保留个厂长帽子，又碍得了谁呢？”

“哼！”平金刚心里也知道点，这时就气不过了，一脸的忿懑之情。

“事情还没完呢。造纸厂的帐还要查呢。他非要弄出你的经济问题。你那些帐怎么样啊？能糊得过去啊？”秦有理最关心的是这个。他是怕牵出他来，才特地跑过来问问。

“哼！我是干脆把糊涂帐弄得更糊涂，谁也弄不清、搞不明。反正我们文化低，都不懂财务。就这个样了，叫他们看着办吧。能拿出四不清的证据，就叫他们拿。”平金刚还能记起搞社教的事，没有证据，最后还是要落实政策。

“好，好！”秦有理放了点心，又说：“这事，宗所长也很关心。他不方便过来，叫我嘱咐你，这事不能大意啊。好在你老小子也还有一套噢。”宗发奋在造纸厂的开办初期也是沾到好处的。

“我还有什么一套啊？就是听了你的话，我去给辜书记和祖镇长送东西，反而被他们训得一愣一愣的。”平金刚还在为这事不高兴。

“你这老小子，有这么直来直去送东西的啊？你以为有东西就能送得上去啊？这么容易啊？里面的技巧多啦，学着点吧。”秦有理哧哧地笑着，反而奚落了平金刚一番。

“……那，那，那还有什么技巧啊？”

“先不说这些啦，还有要紧事呐。你的情况还挺紧急得哩。”

“怎么啦，怎么啦？”平金刚急得直问。

秦有理朝外看看院子，见四下没人，便凑过去悄悄地说：“你等着别人整你也不是办法哎，要掌握主动权哎。”

平金刚一惊，他倒是经验少，没想到这一招，忙问：“还能有什么办法？”

“主动出击哎。祖云涛能搞你，你就不能搞他？”

“咱能搞得倒他？”

秦有理一时也没话了。想了一会儿，秦有理凑得更近了，那嘴唇差点都碰上平金刚脸上的汗毛：“你可以先搞你村里的彭小宾。你们的村里，于老头快要死了，杜家骏也不管事了。拱倒了彭小宾，民主村不就是你的了？他和姓祖的是一条线的，把姓彭的搞倒了，姓祖的也就少了一条腿。”

“可是，有什么把柄呢？”平金刚比起秦有理毕竟还是要“憨厚”一些。

“再想想，再想想嘛。谁还一点辫子没有啊……”秦有理一个劲地在“启发”着。

他们想到了谁呢？想到了申光荣。

申光荣从于又发在西街上的农户联合会门市部出来，一脸的不高兴。听说村里的联合会来了一批夏玉米的新种子，他和他的大舅子齐成才一起去门市部买（大舅子：妻子的哥哥）。结果，于又发卖给他的要比卖给齐成才的一斤贵二分钱。问为什么，于又发说，齐成才是联合会的会员，可以享受优惠价。申光荣说，那叫齐成才帮我一起买吧。于又发说，也不行，会员买要凭证，并且作记录，要不，他们也会多买了再去倒卖。申光荣嚷着，本村人也不行啊？于又发说，本村人也不行，这是联合会的规定。

“这不明摆着是欺侮人吗！”申光荣甩头就走了出来，心里气极了，连齐成才喊他，他也没停下来。

申光荣这几年很不高兴。他不喜欢这样的年头，地都分到了户，要自己种。这不是倒退吗？对农活，他既不在行，又不在意，又没有好力气，所以打不到多少粮，勉强够吃就是了。家里的花销全靠着妻子齐小嫚整天钩花（说明：钩花，就是手工编织），交给针织厂，才能挣点钱。他觉得自己有文化，是高中毕业生，可现在是个人都比他强。瞧那个于又发，在学校时，念书比他差远了。现在算是什么经理了，还不是仗了他爷爷是老村长。哼！想到这些，更是气得不行。哪有人民公社、集体经济那个时代好啊，家家都一个样，谁也不会笑话谁，谁也不会嫉妒谁。

前两年听了秦德才编造的胡话，也试着想把现代神灵请回家，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可结果也并没有显灵。心里的疙瘩一直没解开，甚至系得更深了。村里成立什么联合会，还成立什么专业组，都是什么呀。不就成了新的资本家了吗？这不是跟集体经济唱反调、走资本主义道路吗？那些人，以前还赶不上我，现在一个个都神气起来，都挂上什么经理、部长的牌子。让我到他们手下混，我才不干呢。因为他没参加村里的联合会，结果，今天去买种子也碰了钉子，能不生气吗。

平金刚看见申光荣气呼呼地走来，也知道他这些时日的不高兴，正要找他呢，这不正是个好机会吗？

“光荣啊，生什么气呢？”

“一样的种子，卖给我是一角四，卖给他们自己人是一角二，不公平吗！”

“恐怕不是这么简单吧？这里面肯定有猫腻，还不知道是谁得了好处呢？”平金刚在申光荣面前又算是有“水平”的了。

“来，来，来，上我家歇会儿，消消气。”平金刚把申光荣拉到了自己家里，请上炕，倒上茶，拉呱了起来。

申光荣很少得到这样的礼遇，情绪好了点，话也多了起来。“他们这样做，不就是把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吗？”申光荣还挺有“政治觉悟”的，一说话就能上纲上线。

“现在民主村的问题，确实很严重哎。那个针织厂，那么大的企业，没有个党支部，也没有书记，弄个党小组长还是业余的，连个补贴也没有。这党的领导，体现在哪儿啦？”其实平金刚心里有个暗暗的想法，要是宣布他是那个针织厂的书记就好了，只管拿钱不干活，手里还有权。可是谁也没有这个想法，他想找人说，都不知道该找谁去说。

申光荣也不知道平金刚的心声，没有顺着讲，而是想着彭小宾、于又发他们，还是在不服气。“什么互助会啊，什么联合会啊，都是变相的私有化，出现了一批新生的资本家。”

“不用说别人，那个狗狗不就是个典型的资本家吗，而且还是外国资本家的代理人。”平金刚想的还是针织厂。

“是哎，我老婆就成天干活，受狗狗的剥削。要都这个样，国家不就变色了吗？不继续革命能行吗？我心里着急啊！”申光荣说着，还拍着胸脯，叫别人以为他真的是以革命事业为己任。

“要避免出现旧社会复辟的危险局面，就得斗。前几年，不是有那句话吗：不斗则修，不斗则垮。”平金刚到这个时候，“政治水平”也高起来了。

“怎么斗？”讲到具体操作，申光荣就不明白了。

“向上级反映啊，反映民主村的这种混乱局面啊，反映民主村负责人存在的问题啊。”平金刚倒是有办法了。

“有些什么问题啊？”

“嗨！你刚才不是还讲了那么多吗？有的卖一角二，有的卖一角四，差的钱上哪儿去啦？肯定是装到哪个人的口袋里啦！”

“装到谁兜里啦？”申光荣还是不明白。

“那肯定是装到彭小宾兜里啦。他是总负责，没有好处，他就干啦？你就这么写。”

“我这么一写，上面查下来，我不就也要成了林海秀啦。”

“嗨，那是什么年月？那是极左势力猖狂的年月，迫害敢于起来斗争的革命群众。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讲民主啦。”难得平金刚还能想起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里要讲民主，眼下他就需要民主了。

看申光荣还没动弹，平金刚又鼓气说：“你先写，民主村里的笔头，除了那个李辰，就是你最硬了。把你的水平拿出来，写！有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去找秦有理，他有办法。”

这些年，有个新名词，叫“新左派”，以有别于之前林彪、四人帮的那种“左派”。新左派，是在新的时期里，同样高唱革命的语调，以最革命的姿态，从“左”的角度扭转社会主义方向，给现代化进程增加阻力，给改革开放添乱。龙头镇、民主村，某种意义上，也有类似这样的人，虽然没有到那个程度。比如，有在原先的旧体制中获益而想要维护旧体制的，像秦有理；有在新体制下获得了灰色收益，从而想要抵制进一步改革的，像平金刚；有因为没有在新体制下获得足够收益（尽管在旧体制下他也并没有获益），而对新体制不满的，像申光荣等等。现在，他们三个人在某一个共同点上，走到了一起。想说明一点，这儿讲的新左派，跟政治学里讲的，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某个流派，不是一回事。

有种观点提倡，尽量淡化左右之争，大家都向前看、朝前走。这无疑是种很善良的愿望。但是极左思潮在中国有着很深的土壤，有着相当大的市场，尤其是还有相当大的能量。对于有些人来说，左的东

西还很有利用价值。别的人想淡化，想回避，恐怕也难。

申光荣回到家，拿起了好多日子没有拿起的笔杆，写了起来。毕竟不是搞文字工作的，写起来好费劲呐。写了一个晚上，也没写满一张纸。主要写了：民主村里不民主；成立什么农户联合会是变相私有，脱离社会主义，脱离党的领导；村里有经济问题，主要责任在彭小宾……，实在挤不出来了。临末了，申光荣又添了一句：他们这些人只讲钱，不讲马列主义，忘了贫下中农。

他妻子齐小嫚在一旁还问他：“写什么呀？啃哧了半天，都十点多了，不怕费电啊？”

“去，去，你知道什么呀？钩你的花去吧。”

申光荣端起那张纸看看，自己也觉得不满意，“明天去找秦有理吧。”心里想。

秦有理在他办公室里看了申光荣给他的那张纸，心里对平金刚恨得要死。“这老小子，怎么把这事往我这儿引。”脸上却堆着笑：“啊呀，写得好！真看不出来，你还有这么高水平啊。这完全是一篇革命派的战斗檄文，朝着黑暗的、腐败的东西开火嘛。我要不是国家干部，我也会在上面签名的。”

“就是内容少了点。”申光荣倒也挺实在。

“是的，有这个问题，要充实些。要着重在两个方面增加份量：一是要有政治方面的，这最容易打倒人。就说彭小宾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们不坚持继续革命，就是反对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搞社会主义集体化就是反对坚持社会主义。”

“对，对。”一番高论听得申光荣直点头。

“二要有生活作风方面的，这最能搞臭人。”

“还没听说彭小宾有这方面的事。”

“可以设想嘛。就说彭小宾看上了祖云涛的老婆叶丽娜。没影的事也能叫他们一身臊。别人不信，也能叫他们自己恶心好几天。”

“那上面要是下来查，不就露馅了吗？”

“嗨，这种事情哪能查得清。一查，不就满城风雨了，假的也就成了真的了。不等查清，过两个月再去一封信，叫他们弄不过来，嘿嘿。”秦有理还笑了起来。

“但是，”秦有理一下又收起笑容，很严肃地说：“不要对别人说，我看过这封信。以后你也不要直接来找我，有事就找平金刚，千万要记住！不送了，乘没人的时候赶紧走吧。”

在现行的社会体制里，人民群众能反映民情、反映自己心声的渠道很少，也很窄。各种各样的内容都是通过人民来信的方式反映。其中，真有冤情，真有亟待解决的问题，真有好建议；也有是写信人对一些事情不了解、不理解、没搞明白；也还有是搅浑水，甚至是恶意诬陷、攻击的。我们的信访工作承担了过重的任务，承担着很多应该由管理部门、基层单位、人大代表、新闻媒体承担的任务。因而在解决群众正当要求时往往效率低下，力不从心，以至于有时造成矛盾积累，甚至是怨恨、激化和冲突。这

些是源自于社会沟通机制的单一化和不畅通、不透明。到后来，很多地方对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产生了厌恶抵触的情绪，生怕影响了自己的政绩和形象，千方百计地加以压制阻拦，有时甚至到了不择手段、卑鄙恶劣的程度。好在申光荣写这信的时候，社会还没有到那一步。

35.2 县委调查组

当然，申光荣的信是属于社会噪音，另当别论。但是，这封信还是引起了县委的重视。

县委卞书记听信访办的同志说，有一封反映龙头镇一个村支书的群众来信，心里就有点烦。他对深化改革有些倦意，倒不是触动了他的利益，而是快要退休了，不想烦那么多了，就这样结束吧。他这两年排除干扰、积极办理的建个四层的居民公寓楼，快要完工了。在临退休前能住进去，这辈子也就了却一大心事，大功告成了。又来这些信，烦不烦人。他叫来了政策研究室的人。

“你去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事实一定要搞清楚。”他对要去龙头镇调查的贝科长说：“如果真有问题，决不迁就。该够哪一条处理，就按那条处理。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当然，现在搞改革，会有一些新的矛盾产生，去了解了解也好。政治上，就不要扯远。有牵扯个人利益的，咱也不要陷进去，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一辆吉普开进了镇政府的院子。

秦有理隔着窗户看到小汽车，知道是县里来人了。第一反应就是先跑出来，走到汽车跟前。下车的是县委的贝科长，秦有理忙满脸笑容迎了上去，“啊呀，是老兄来到，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贝科长和秦有理是当年同一批选拔上来当脱产干部，又一起进过干部培训班的，当然很熟悉。

“好长时间没来龙头了吧，哪阵风把你吹来啦？”秦有理上前拍着贝科长的肩膀，让院子里的干部们看看，自己跟县委干部是多么的近乎。

“有封群众来信反映民主村的问题，辜书记叫我专门来调查一下。我先找你们辜书记谈吧。”贝科长说。秦有理在镇政府是主任一级，这事倒也不用瞒他。

“是哎，是哎，我也察觉到民主村有问题，你这次来一定要深入调查，把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揭露出来。”秦有理心里想这回可有戏了，一边说着，一边往辜书记这儿走来。

辜建功见到贝科长，简单的寒暄过后，听贝科长讲了事情的大意，脸沉了下来，没说话。稍停片刻，对秦有理说，你去把祖镇长喊来吧。

秦有理“噢”地一声，痛快地答应着就转身出门去叫祖镇长。看样子，一会儿辜书记肯定要发火了，等着看玩艺吧，看姓祖的脸往哪儿搁，看辜建功会跳多高，看姓彭的那小子吃不了兜着走。

没五分钟，祖云涛就过来了。秦有理退出，三人坐下。

贝科长拿出那封信，辜书记、祖云涛两人都看了下。信很短，不到两页纸，不一会儿也就看完了。

祖云涛放下纸，递回给贝科长，不禁笑着说：“真滑稽，造谣编谎言，怎么还编到我家里来了。”

贝科长对改革倒是个热心人，他很想知道西北村村民主动的自发的改革情况。他说，那些个人作风问题，我相信是谣言。我这次来调查了解，主要是有关民主村经济改革、组建新型合作组织方面的事。

“存在一些缺陷、不完善，肯定是会有的。至于贪污、侵占，没听说。你可以去仔细了解一下。”祖云涛说。

辜书记果然发火了，拍着沙发背，说“这是暗箭伤人啊，这是给我们龙头镇抹黑啊。贝科长，就是你不调查，我也要调查。要把这写黑信的人揪出来。”

“调查是一定要认真调查，主要是为了改进工作。至于是谁写的，倒不一定要查了。我想，他们的目的是不会得逞的。”祖云涛说。

贝科长也说：“是的，我会去认真调查。这封信肯定有问题，但咱们的反应也不用太激烈。那样的话，反而让那些有阴暗心理的人正中下怀。”

民主村场院。

民主村村委会的会议室。

西北场院原先的饲养棚都拆了，建起了一排新房子，红瓦白墙，新崭崭的，煞是好看，颇有一派新气象。当年辛狗狗住的半间草棚，也没了影。拆的时候，狗狗真心疼，真是要想办法把它保留下来，对他来说，真想做个永久的纪念。可是有村里的统一规划，怎么也留不下，只能拆了。现在村民们开会，再不用蹲在饲养棚的炕头上，跟那些牲口们一起喘气了。

这是个小会议室，也是中间是长条桌，四周是长条椅，跟政府机关都一个样了。

今天是贝科长开小型座谈会，找了几个中青年村民，有皮高深、齐成才、迟解放、小连子他们几个，都是普通群众，既不是村干部，也不是村干部亲属，想了解村里和农户联合会的情况。

毕竟这几年宽松了，来的人也都很爽快，有什么说什么。

小连子说：“联合会办得挺好，虽然不是以前大队、生产队那种模式，但是比大队、生产队要好多了。不但集体经济壮大了，我们各家各户的生活也都好了许多。像我们家在村里条件不算好的，才几年前，我结婚时，连个收录机都买不起。今年，也都买上了摩托车。我那三个蔬菜大棚，里面长得好啊，眼看是个好收成。虽说那不算我自己家的。可在以前，整个西北村、整个龙头镇也没有这样的菜地啊。”

大家听了都点着头。

迟解放说：“是哎，主要是现在搞得活，什么项目都有，大家有什么技术、有什么本事都能发挥出来。比如我在外面学了个开堆土机，去年差点铲了自己人。”

大家哈哈地，笑得更起劲了。

贝科长问是怎么回事。大伙说，就是为建高尔夫球场征地闹腾的事。

贝科长也苦笑了一下，摆摆手，说：“不提了，不提了。”

“从那儿回来，搞机耕队，正好用得上。方便了各户，又发挥了自己的技术，挺好的。特别是回来能照顾上家里，我儿子小强也不用当留守儿童了。如果村里都能搞得这么好，谁愿意撇家舍业，出去当打工仔啊。别看好像是个城里人，那些苦处，真的只有在自己心里淌啊。”迟解放说到伤心处，话都有些哽咽了。

齐成才说：“我有个感觉是这儿的气氛比较民主。有什么话，都能说。不管是对村里，还是对联合会，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建议，都可以提。不像在造纸厂，那个平金刚啊，本来也是和我们一样的庄户生，当了几年厂长，都不知道姓什么了，脾气大得不得了。只有他训别人，别人一句话也不能说。所以我不干了，也回来了。在村里比在那个厂里强多了，收入也多了，尤其是心情舒畅多了。”齐成才说着，也笑了。

皮高深说：“我爹是个旧脑筋，听说村里要搞新型合作组织，以为又要搞合作社、公社化了，死活也不肯参加，还不让我参加。我是自己拿定主意要参加。这几个月下来，看搞得还不错，不用我讲，他的心也有点活了。”

迟解放哧哧地笑着说：“你那个爹的思想也解放啦。你爹真应该叫皮解放。”

皮高深一听，是迟解放要占他便宜，起身一把掌削到了迟解放的头上，嘴里还说着：“剃你个头。”

会议室里更是笑开了。

贝科长笑了下，还是很认真地接着问：“村里面，联合会里面有没有经济问题啊？”

“没有啊。”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又相互张望了一下，一起说：“没有啊。”

皮高深说：“今天来的这几个，我的年龄最大，村里的事情知道得多一些。我可以讲一句真心话，我们民主村在这方面几十年来最规矩，做得最好。从解放以来，除了1960年有过秦德才翻窗偷粮食，除此以外，经济方面没有出过任何事情。困难时期饿死过人，队里也没少过一粒粮食。文化大革命那么乱，没有少过一件东西。我这不是说瞎话，也不是为干部表功。”

“是的，是的。这方面，我们村的干部，从老于村长算起，直到今天的彭小宾，都是好样的，都可以伸出大拇指，上级应该表扬。”齐成才一脸诚恳地说。

贝科长试探着说：“可是我们听到了有这方面的反映哎。”

迟解放都气得站了起来，愤愤地说：“说我们民主村有经济问题，那真是昧了良心了。谁说的，叫他站出来，拿出证据来，我十倍赔偿给他，他敢吗？”

贝科长连忙摆摆手，叫迟解放坐下，说：“我们也不会轻易相信的，所以我们特地来调查。你们都这么讲，我们就放心了。如果有什么在这儿不好讲的话，会后也可以直接来找我们。”

贝科长同时还安排了对民主村进行查帐。这天，又找了几户作个别调查，王山是作为老农的类型选中的。

邬中和领着贝科长到王山的院子，没进门就喊上了：“王大叔，王大叔！”

王山在院子里修锄头，听着门外喊，挺纳闷。虽然自己年纪大了，但村里面还是习惯叫王山，或者就是王老汉，很少有喊大叔的。这一声大叔，顿时觉得不一般。刚抬头，邬中和就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干部模样的人。

“王大叔啊，”邬中和还是很高兴地叫着，“来贵客啦，县里的领导来看你啦。”回过头对那干部说：“贝科长，这位就是王山大叔，咱村里的种地好手。”再又对王山说：“这是县委的贝科长。”邬中和学的这套礼仪程序也不知道对不对。

贝科长过来，握着王山的手，也按照邬中和的称呼：“王大叔，你好啊，我上你家来坐坐，跟你聊聊村里的事，不耽误您吧？”

王山一下子激动得不得了，除了本村的，还从没有外面的干部进自己的家里来，握着的手一直没放，连说：“好啊，好啊。”又忙对屋里喊着：“孩他娘，孩他娘，沏茶，沏茶，快沏茶，沏上那台湾茶。”

“欸，大叔还有台湾茶啊？”贝科长问着。

“王大叔有个台湾的兄弟。说来可是话长，你俩进屋慢慢唠吧，我先走了。”

邬中和先走了，贝科长看了看院子，赞赏地说：“大叔啊，你这院子盖得不错啊。窗框还是铝合金的，我都没用上呢，哈哈。”贝科长轻松地说着。

“这也是我兄弟回来，给俺娘盖的。”

“噢，你娘呢？”

“唉，这些事，一半时说不完呐。贝干部，屋里请。”

俩人进屋上炕。连四嫂很热情地端上细瓷茶杯。一股扑鼻的茶香，从杯里飘出。多大的变化呀，十年前，王山家就是连个缺了口的粗饭碗也拿不出手来。

贝科长抿了一口，点点头：“好茶，好茶，确实是好茶。”

王山说：“这可是产自阿什么山的，正宗的台湾茶。”

“是阿里山。”

“对，对，是阿里山。”

“大叔，你兄弟大概也是1949年被国民党抓去的吧。”贝科长依旧微笑着。

王山心里略微一沉，似乎心有余悸，但看贝科长笑得那么自然，也就放松些了。这年头，早就不把跟台湾有往来当作什么事了。

“是啊，那一年，我们龙头镇，我们民主村，有好几个呢。我们村到现在回来的就是他一个。”

“我听说，他还准备在你们联合会投资，要帮你们搞个面粉厂。”

“是的，是的。他也是个本小经营，没多少钱。”王山还在替他兄弟谦虚着。

“等下次他回来，你叫他到县里来找我，我叫他跟我们县领导见见面。照上面写的，来个电话，我就派车过来了。”贝科长递了张名片给王山。

王山还从没见过这个东西，不好意思起来，把手使劲在褂子上搓搓，才伸手去接，连连称：“好，好好，好好。”

“我知道你们台属，前些年遭了罪。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这些年，大变样了。你看，这屋子，这院子，十年以前想也不敢想啊。能活下来，就不易啦。”王山刚往上翘的嘴角又沉了下来。

“村里的情况呢？”贝科长忙把话引开。

“村里？大家都过得好啦。你看，都有盖上楼房的啦，有买上汽车、摩托车、拖拉机的啦。1958年大跃进那一阵，说是要建设共产主义，也没有想到有今天的好啊。”

贝科长点点头，又问：“你们村里办起了互助会、农户联合会，你觉得怎么样？”

“好啊，好啊。这样可干的活就多啦。既不是各家各户完全单干，那样太分散，力量小，好多事搞不起来。又不是像人民公社，把大家死捆在一起，谁也动不了。好，现在这办法好。一开始连我也想不通。一看搞得真不错，我也参加了。”王山又憨憨地笑了。

“没听说，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

“没听说有什么意见啊？”王山想了想，又说：“噢，比如像称东西，那秤杆高一点，低一点；这样的意见，还是有的，这也免不了。这种意见，就算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会有。是不？贝干部。”

王山今天挺兴奋，这些年从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尤其是在县里来的干部面前也没怯场，竟然说了这么多话。

一个纯朴的老农，都还没有忘记共产主义，现在连党的书记们也很少说它了。贝科长的心理，对此十分地感慨。

贝科长向镇领导通报调查情况。结论是：经过开座谈会、个别访问、检查经营情况和相关帐目，未发现信中所反映的经济问题和其它问题，民主村互助会和农户联合会的运作是健康的、有创意的，绝大多数群众对村里的改革发展是满意的，对村干部，包括对彭小宾同志的评价是很高的。

“我说嘛，民主村不会有什么问题。”祖云涛心里轻松了些。

辜书记也挺高兴地说：“这说明我们镇党委这两年的工作没白做。”忽而又气愤起来，“既然事实已经说明这封信是在捏造，这个人就是在破坏社会稳定、干扰改革发展的大方向。下一步就要追查写信的人，把他揪出来，判他个诬陷罪。”

贝科长倒没有激动：“这事要冷静些，看怎么处理好？”

祖云涛说：“这事情在群众中恐怕已经有议论。与其在底下瞎传，不如开个大会，公布调查结果，为民主村的改革、为民主村的干部正名。”

贝科长说：“这个对。开个民主村的全体村民大会，包括外村的联合会会员。你们主持，我来讲。把事情讲开了、讲透了，那些流言蜚语也就不攻自破，没有市场了。”

“那……那封信呢？太恶劣了。对村里有意见，扯到人家叶医生干什么？我都为祖镇长感到不舒服。”辜书记还在说。

贝科长说：“从用词看，写信的人对我们现在的提法，讲得不熟练，不准确，看来是个一般群众。但写的内容，涉及的面比较广，大概背后有出主意的。”

祖云涛说：“既然是个一般群众，我觉得写的人，就不一定去追查了，因为信里虽然扣大帽子，瞎扯，但讲的具体问题也没有多严重。对于背后的人，怎么说呢？也不一定照老习惯说是“幕后策划”、“组织指挥”这些了。我想，这事，以正面解释、正面肯定为主。信本身，就尽量淡化。”

贝科长也感叹地说：“说实在，我们对‘左’的东西也没有更多的办法。他们可以很放肆，而我们只能很谨慎。”

祖云涛苦笑着说：“直到现在为止，搞‘左’的那一套，只要打着革命的旗号，仍然可以到处挥舞棍棒，不管是没打上还是打错了都没事，而不需要冒任何政治风险，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当然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人出来乐此不疲。”

贝科长认真地说：“但是我们自己要清醒啊。我们往前的路上，一边是右的峭壁，一边是左的悬崖。峭壁，我们时时看得到，稍加注意，很少会撞上去。而对于左的悬崖，却往往不在意。甚至还有意无意地再用一层漂亮的纸去糊住，糊得跟路面一样平，反而更危险啊。几十年来，我们为此翻过好几次车了。”

祖云涛接着说：“这些左派们也并不是真的要搞社会主义。当他们要维护和扩张自己的特殊权益时，就会满嘴的社会主义。当他们要打击别人的时候，他们的棍子上就会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但他们再怎么变化手法，最终所追求的就是两个字：特权，政治上的特权和经济上的特权。而这正是跟社会主义不相容的。”

辜书记忿忿地说：“我不管什么左和右，谁给龙头镇抹黑，就不行。以后给我查到了，就不客气。动不动就要麻烦县委来人，这怎么能行呢？”

“对了，我想起来，信里面提到彭小宾，你们要专门跟他谈一下。他恐怕也会听到一些，就不如直接跟他谈，鼓励他继续努力工作。”贝科长说。

辜书记听了，稍停片刻，转身对祖云涛说：“彭小宾那儿，你去跟他谈吧。”

“好的。”祖云涛答应着。

“我跟辜书记再电话汇报一下。没有其它情况，就这么办了。”贝科长最后说。

第二天，由镇政府出面，在西北场院召开了民主村全体村民暨互助会员大会。辜书记、祖云涛都来了，由贝科长讲话。

贝科长在村里活动几天了。乡亲们也已经议论纷纷，民主村出了什么事了，大家到处在打听呢。一听说要开大会，知道是要讲这件事，大家都来了，听得还特别地认真。

贝科长一上来就说，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向民主村的干部群众学习。听说你们办起了互助会，办起了农户联合会，很有新意。县委特地叫我来看看，经过这几天调查，我觉得你们办得很好。你们对农村经济改革有创新，实际效果也很好。县委卞书记也说了，这对全县的深化改革也是个推动。他鼓励你们，要办下去，办得更好。”

会场上热烈鼓掌。

贝科长接着说，当然改革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困难，会有一些不足。这些困难和不足，有的来自于我们的客观条件还有限，有的来自于我们的经验还不够，还要在前进中不断地探索，不断地调整和完善。在这过程中，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这些不同意见，有的是对我们工作的探讨，是出于不同角度的观察和反思，有的是反映我们工作中的不足和缺陷。这些，我们都表示欢迎。当然，也有一些是出于旧的‘左’倾观念对新事物的抵触，也有是在利益调整中产生了新的矛盾。这些，我们也要认真研究，进行解释，做好工作。但是所有这些不同的意见和反映，都应该是出于公心，实事求是。”

全场一下子静下来，等着听下面要点谁的名了。

贝科长也停了下，而后大声地说，经过我们几天的调查，你们民主村，你们的互助会和农户联合会不存在经济问题。你们民主村的干部是优秀的，是得到了广大村民的认可和支持的，彭小宾同志的工作是有成绩、有水平的。

全场停了三秒钟之后，雷鸣般的掌声响起。

“同志们，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朝着建设现代农村、建设现代企业、建设现代社会的远大目标努力前进。县委、县政府在看着你们，全县人民在看着你们，希望你们能拿出一份更加令人振奋的答卷。”贝科长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讲话。

在村里大会之后，祖云涛到村委会找了彭小宾。

彭小宾倒上两杯清茶，请祖镇长坐下。

“是为县委调查组来村里的事情吧？来做做我的思想工作，安定一下情绪？”彭小宾笑着说。

“到底是当了多年的干部，知道这一套程序。你还听到别的一些反映吗？”祖云涛也很轻松。他们俩人之间，相互了解，很熟悉了。

“群众里面没有更多的反映。这次倒是你们镇领导和县委很重视，下了功夫。”

“这就是我们上级部门的职责，就是要为改革事业保驾护航。有问题，第一要搞清楚，第二要解决掉。既不要大惊小怪、反应过激，也不能稀里糊涂抹过去，留下隐患。”

“谢谢领导关心、支持。”

“县委调查组对你评价很高，民主村的乡亲们对你评价很高，要继续努力，放手工作。你们民主村的改革，还有很多好文章，可以继续往下写。”

“是的，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反过来想，也确实有很多工作需要改进，还可以做得更好。写信的人，就不要去追究了，我知道是谁。”

“你知道是谁？”祖云涛反倒奇怪了。

“不讲了。是我们村的一个村民。这事过去就算了，我不会去挤兑他的。因为组织上没有点破是谁，我也就不好主动去找他。要不，我真想和他好好谈谈。”

“从信的内容看，还不是一个普通村民，背后恐怕还有别人。”

“那我就不知道那么多了。反正干部队伍里，各种不同想法的人也都有。听说那信里还提到了叶大夫。想挤兑我，好理解。挤兑你，是干什么呢？”

祖云涛听着淡淡一笑：“嗨，这一方面是说明有些人有阴暗心理。另一方面也是我们的体制有不合理的地方，搞官本位，领导手里的权力集中了那么多，利益那么大，引得不少人眼红。可领导的位置就那么几个。不拱倒你，他就上不来。于是就想尽各种办法、明里暗里地搞你。有人说，中国人爱搞窝里斗。其实这并不是中国人的毛病，而是中国现存体制的毛病。”

彭小宾叹了口气：“唉……不讲这些了，讲点高兴事吧。镇长啊，我们联合会最近还有喜事呢。”

“噢？什么喜事？”

“我们的渔业组和面粉厂都要建起来了。过段时间，新进的远洋渔轮要搞个首航仪式，我们请你过来噢。”

“那好，那好，我一定来。船长是谁？”

……

35.3 落荒而逃

秦有理知道了民主村的大会，没想到是这么个结果。想了这么个好办法，冒了个气泡，就没了？就这么过去了？弄不好，以后还能把自己给暴露了，不能就这样完了。我秦有理还不至于这么没本事吧？

他去找了彭小宾。毕竟是本村人，他和彭小宾还是说得上话的。文革时，他俩还都是造反派哩。这不，特地跑到彭小宾的家里，拍着彭小宾的肩膀，悄声地说：“小宾啊，这几天县里来了人，忙进忙出的，你知道是在干什么呀？”

“在干什么呀？”彭小宾假装不知道。

“是冲着你来的呀！你还没事的样子啊，我都在为你捏把汗呢。别看贝科长在大会上表扬了你，其实背后是事出有因啊。”秦有理很紧张地小声说。

“有什么因啊？冲着我干吗呀？我既没犯错误，也没得罪什么人。”

“嗨，这年头还用得罪人啊，你还没想到是咋回事，人家就朝着你来啦。”

“谁啊？谁会朝我来？”

秦有理习惯性朝四下望了望，尽管就在屋里，也没什么好张望的。

“唉，我说出来你都不信啊。平常看起来，那么老实的人。唉，啧啧。”秦有理直摇头，还就是不明说，想叫彭小宾着急一下，求他赶紧说。

可彭小宾并不着急，“咱民主村的人，你还不知道，都挺不错。”

秦有理见彭小宾不上钩，自己先着急了，“就是那个申光荣啊，真不是东西。是他写信到县里告你啊。”

“你怎么知道的？”彭小宾装作不信。

“县委来的贝科长，当初跟我是干训班的同学。他亲自把那封信给我看的。”这是秦有理在撒谎。

“不会吧？小申那人还是不错的。”彭小宾不想再继续谈下去了。

“这年头，你能信谁啊？这事情，你不能就这么过去啊。对你的威信损失太大了，以后你再怎么在村里做工作啊？”

“人心自有公论。况且，镇党委、贝科长已经在全村的大会上说明了嘛。”

“咳，你这人，真叫人急。怎么不明白里面的利害关系呢？”秦有理知道再说也没用了，就匆匆地走了。

秦有理出得门来，气得直跺脚。眼看彭小宾是不上当，不去把事情闹大。可反过来，申光荣再把自己供出来呢，那小子很有可能哎。

秦有理转了几下眼珠，调过头来，又悄悄地上了申光荣的家。

申光荣正在家里惴惴不安呢。领导在村里开的大会，显然就是针对自己写的那封信。虽然没说信的事，更没有点自己的名，可心里就像压上了千斤重石。往下，全村都知道了，再怎么过日子呀？

“申光荣啊，申光荣啊！你小子还待得住啊？大祸临头啦！”秦有理瞪大了眼睛夸张地说。

“怎，怎么啦？”申光荣吓得说不清话了。

“彭小宾已经知道是你写的信，要给你穿小鞋呐！”

“那，那怎么办？”申光荣真到了有事的时候，是一点主意也没有。

“走哎，赶紧走哎，三十六计走为上哎。”

“走？上哪去？”

“先走了再说，出去逛一逛，找个地方打工。迟解放能出去，你就不能出去？”

“走了，再怎么办？家里怎么办？”

“你走了，我在这儿可以说，你是受了彭小宾的打击给排挤走了。过段时间落实政策，就会把你接回来。说不定，还能给你不少补助呢。”

“那……那你现在就不能帮我说说吗？”

“现在？现在是风头上，谁能顶得住？”

申光荣低着头沉默，一脸的忧郁。

“不能再等了，最好今天就悄悄走掉，最晚明天。”秦有理怕别人看见他在这儿，也悄悄地起身走了。

民主村平静地过了两天，镇政府里倒是有了出人意外的一幕。

中午，饭后休息时间。秦有理在办公室里跟几个人打“拱猪”呢。正打得热闹，门“呼”地被推开了。打牌的人手已经凑齐了，是谁不请自来啊？几位抬头一看，是年已四十却更加丰满俏丽的镇长夫人叶丽娜。大家放下牌，刚要打招呼，却发现叶医生的脸色不对劲，平日笑容可掬的脸上，今天是横眉圆目，怒气冲冲。

叶丽娜不管有众人在场，指着秦有理大声说着：“秦有理，你对村里有意见，把我扯进去干什么？说什么彭小宾在追求我！”

秦有理一听，脸刷的白了，知道全完了，但嘴上还是很硬：“叶大夫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找我干什么？”

叶丽娜毫不退却：“是你在背后指使人写诬告信！”

“啊哟，天地良心啊，我跟祖大哥，就像亲兄弟一样，怎么会这么做呢？那我就不是人啦，我就该遭天打五雷轰啦。”秦有理朝叶丽娜连连作揖，眼眶里噙着泪水。那样子诚恳得，足可以叫人感动。

秦有理看见大家还愣在那儿，怕大家不信，又紧接着说：“要是大家不信，我对天发誓，绝无此事呐，绝无此事。”

“我不要你发誓。你敢到辜书记那儿去吗？”叶丽娜冷冷地说。

秦有理一想，亏得我去吓唬了申光荣，那小子大概已经走了，上哪儿去找对证啊。他就来劲了，也敢大声地说：“去就去，不用说去辜书记那儿，就是去县委贝科长那儿，我也不怕。我有理，怕什么？”

不料叶丽娜朝门外一喊：“申光荣，你进来！”

申光荣缩着脖子，轻轻地走了进来，一看见秦有理，就低下了头。

秦有理一看是申光荣，就傻了。

叶丽娜对申光荣说：“申光荣，你说说，是怎么回事？”

申光荣嚅嚅地说：“秦主任，这都是你出的主意。”

“你，你，你血口喷人，有什么证据？”秦有理跳了起来，还在作最后的抵抗。

“平厂长也在懊悔上了你的当。要不是他气得躺在炕上起不来，他也是要来的。”申光荣这回的声调响了点。

秦有理这回是彻底地愣住了。

叶丽娜大概是气愤已极，一步跨上去，对着秦有理大声喊着：“别不动哎，走哎，上辜书记那儿去！”

谁也没想到的是，秦有理忽然把手中的牌往桌上一撒，转身跨上后窗台，“嗖”地从窗口跳出去，跑了。

屋里的人，起着哄叫着：“有理，别走哎。”

“有理，别走哎。”

这之后，龙头镇上大家都调侃着这事，喊秦有理叫“我有理”，有事没事就叫着：“有理，别走哎，”“有理，别走哎”。

事情的发生，是申光荣在秦有理走了之后，怎么想也觉得不对。一直想了两天，又跟媳妇齐小嫚商量。齐小嫚一听气极了，“你呀，做这种丢祖宗脸的事。”一笤帚就打到了申光荣的脑壳上。没等申光荣反应，就拖着他到卫生院找叶丽娜赔礼道歉。齐小嫚没管信里面别的事情，就觉得这件事最叫人恼火。叶丽娜听过以后，来龙去脉一问，想了想说，“这事不怪你，但是秦有理作为国家干部，是不可以这样的。于是就有了前面说的这一幕。

第三十六章 官倒

1978年2月5日

改革的阻力，有时就是来自改革的不完善。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会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官倒，就是其中之一。

官倒，顾名思义，就是官员在进行倒买倒卖。这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之后，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经济体制改革渐渐与之脱节而产生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在没有相应完善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保障之下，推行由官员主导的市场经济出现了巨大漏洞。在那个仍然由党政官员控制的市场经济里，官员们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经济活动的规则，经济利益的流向，都是他们说了算，社会财富明的暗的流向了他们的腰包，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或者叫权贵集团）由此开始形成。这个现象也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愤懑，成了八十年代后期一再出现的抗议事件的重要原因。

讲官倒，就不能不讲到双轨制。价格双轨制，就是同一商品在收购（或销售）时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价格。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国内全面推行价格双轨制。从直接原因来看，是由于经济改革的需要，逐步从政府掌控的计划经济下摆脱出来，加大市场经济的成分，但又要有个过程，于是同一种商品一部分仍按行政部门规定的定价，另一部分则在一定程度上放开，更接近于市场的价格，通常叫议价。当然，议价也并不完全是随行就市，也是由行政部门订的，只是它的价格更接近于市场，或者说更接近于所谓的“价值”。

在这套价格双轨制里，粮食价格应该说是最典型最复杂的。粮食价格在政府掌控的计划经济里被扭曲得最厉害，完全是作为行政管理工具。长期以来，农民的负担最为沉重。经济上的负担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隐形的，设置较低的农产品价格和较高的工业品价格，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来汲取农民的收益。另一方面就是直接对农产品进行强制性的低价收购（对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问题先不说）。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对各生产队都下达有征购任务。比如说，对这个生产队的征购任务是6万斤粮食（具体品种也都是明确的），这是指令性计划，必须完成的。在这征购任务里又分为征收和统购两个部分。征收是指农业税部分。中国的农业税是实物税，由粮食部门收缴。比如这个队应交农业税2500元，但不要你交钱，而是用相当于2500元的粮食来顶。如果收购价是一角钱一斤，2500元农业税相应的就是二万五千斤粮食，这些粮食无偿交给国家（具体就是交给粮食部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得粮食，是不会轻易提高粮食价格的。扣下无偿征收的之后，其余的三万五千斤才结算成3500元付给生产队。

粮食的收购价低，粮食的销售价（叫统销价）更低。这种情况叫作购销倒挂。这个流通过程，政府要给予财政补贴。因而，对粮食销售也就有更加严格的控制，不然卖得越多，国家要补贴得越多。对非

农业人口全面实行定量供应，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大体在26斤左右（不同地域不同时期有所不同）。这点粮食，在鱼肉果蔬都严重匮乏的那时，只能是勉强度日。就是这点，有时也保证不了。那就在定量里增加粗粮的比例，或降低薯类的折合率，原本一斤粮食可买6斤红薯的改为只能买4斤了，甚至在粮食极度困难的时候，就直接减少定量（有时还美其名“帮助国家和农民度过困难”，“自愿”降低定量）。对其它饮食业、副食业、糕点业、工业等等的行业用粮，也全面实行低价的计划供应（所以居民上商店买个面包、下馆子吃个饭，也都是交钱之后还要交粮票，而农民连这点都很难办到，因为他们很难有机会得到粮票）。

之所以会采用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购销倒挂，以更低的统销价来销售粮食，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长期维持城市职工的低工资（那时大多数职工的工资在30至60元之间）。如果粮价提高，就要全面提高职工工资，这样政府就更不合算。实行粮食购销倒挂，虽然要给一些财政补贴，但比起要全面提高职工工资，全面增加工商业成本，那还是很有限的一点。当然更重要的好处是，整个社会就此被极其严格地操控在管理部门手里，想出去吃顿饭都如此不易，更不用说别的社会活动了。

当然，这种不正常的办法，彻底阉割了市场的功能，使社会失去了生机，最直接、最明显的后果就是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压制了粮食产量的增长。这就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尽管拼命号召农业学大寨，经年累月的大干苦干，尽管农民出了那么大的力，吃那么多的苦，十亿农民种粮食却还是不够吃的直接原因。粮食问题在几十年里始终极其严峻而过不了关。

在试图放松政府统制模式的计划经济之后，粮食价格的双轨制首先就应运而生。为了鼓励农民多打粮、多卖粮，在统购价之外，有了超购价。在完成征购任务之后再多卖的，按超购价收购。这一点还不够，又有了议购价。1984年之后，又有了合同收购价。因为专业性较强，笔者就不一一介绍了。

在销售方面，除了计划内供应仍按统销价外，有了计划外供应的价格较高的议价销售。这些称之为平价销售和议价销售，或叫平价粮和议价粮。议价也不是就一个档次，而是依据不同销售情况而有高低不等的若干档次。

粮食价格双轨制，对于在粮食流通领域发挥市场作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搞活农村经济、搞活粮食企业和用粮单位，无疑发挥了明显的积极效果。但是事情往往有它的另一方面。甚至有些明明是好事情，也会出来负面效果，在国内经常有这种情况。双轨制，不幸成了这种情况的一个典型。这些不同的价格，依旧不是由市场形成的，而是掌控在管理部门手里。一个商品是议价买进来、平价卖出去，还是平价买进来、议价卖出去，那个差别就大了。谁说了算？在市场说了不算的情况下，在没有充分的民主法制的情况下，那就是谁有权谁说了算。本来可以起积极作用的双轨制，却被广大群众所诟病的“官倒”利用了。官倒，就是利用行政权力，一手低价进，一手高价出，有时甚至连手也不用经过，一纸批文就行了。比如，按平价从张三手里买，但粮食还原地不动；再按议价卖给李四，叫李四直接到张三那儿去拿。粮食原地没动，看都没看见，那差价钱就滚滚而来了。这成了贪官们吞噬社会财富的巨大管道，为权贵集团的早期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

这个机会，此时就落到了宗发奋的头上。虽然宗发奋到粮库时间不长，但也看到了这个机会。很简单的，把一角一卖出的议价销售记成九分钱卖出的平价销售，不就能留下两分钱的销售收入了吗？实物账完全能对得上，现金账也可以不留痕迹。也许会说，两分钱有什么意思。可是，粮食这玩意儿动辄几十万、几百万斤的进出，看起来是不见波纹的浅水，往往却是难以见底的深潭。只要稍微一改动，那多得没有准数的钱，转手之间就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其中只要有一小点流进个人腰包，就能叫他撑破肚。也许会问，没有规章制度么？有，当然有，你看不都贴在墙上么，不过那是给别人看的。尽管按说这两种不同价格的粮食应该分账、分人、分库管理，但实际上不少情况下是分不清的（不只是基层的粮库）。更关键的是要有人去管。

谁管？这问题去问谁呢？反正，这些事就是宗发奋自己管，而宗发奋的事情是没人管。他的前任祖如海清正廉洁，同样也没人管。权力的过于集中，缺少应有的监督，是这个体制的主要弊端之一。

但是要在这些上面动脑筋，得有帮手，得有懂会计的、懂财务处理、懂粮食流程和政策规定这些的。宗发奋自然就想到了粮库的主管会计岳琦。岳会计从粮校毕业，工作快十年了。虽然文凭不高，只是中专生。不过那可是文革前的高中生，在县以下是不多的，加之要通过文革后恢复高考的严格筛选，能考上中专也属不易。个人的能力和水平由此也可想而知，而且工作以来一直认真负责，业务上已练成一把好手。这样的骨干，对于一个单位真是不可多得，但对于宗发奋的心里就不一样了，他的心里就嘀咕了。他知道这样的人往往不会随波逐流、不会轻易听命的。

事情果然被他猜中。那天，宗发奋特地叫伙房备了些酒菜，请岳会计到他办公室唠唠家常。几番寒暄之后，宗发奋渐渐引入正题，说：“这会计工作啊，既很复杂，又很专业，在一个单位里往往处于关键岗位，起的作用有时比领导还重要啊。”

岳会计对宗主任一反常态请他喝酒吃菜聊家常很是疑惑，但他没有点开，还是顺着往下说：“不能这么讲，不能这么讲。会计还是为领导服务，为上级服务，做一些事务性工作罢了。”

“对我们粮库的会计工作，我是很放心的。到县局，还几次听他们表扬我们会计报表做得好。呵呵。”

“也就是按要求做就是了。”

宗发奋话锋一转：“现在的粮食业务很复杂。什么购销倒挂、平转议、议转平啰，我都有点搞不懂。”

岳会计便简单地介绍一番。

“那我们把平价粮转成议价粮卖了，粮库不就能赚一笔了吗？”宗发奋揣着明白装糊涂在试探着。

“这个不行。平价粮、议价粮，都得各自记账，要分清楚的。”岳会计认真地说着。他开始知道宗发奋今天请他的意思了。

“嗨，账不账的，不就是那么回事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大本，谁还去看？想看也看不过来啊。咱们在不违反政策的情况下，想些办法，为咱粮库的职工谋些小福利，应该可以吧？”

“打擦边球啊？那还得凭自觉、讲原则、懂法律啊。”

“嗨，这些咱都懂。不管什么时候，想办成点事，总会有困难。不是还有这样一句话，办法总比困难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么。”

“啊呀，这个，我还真不行。我还没往那上面去想过。”

宗发奋知道，这话也不能讲太多，讲到这份上，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讲多了，反倒会有把柄落在人家手里。

“吃菜，吃菜。”宗发奋脸上没有不快的表示，还对岳会计劝着菜，“咱粮库的伙食也就这水平，不能指望有什么好菜了，凑合吃吧。”

一计不成，宗发奋另有一计：往外撵人。这当然要费点事，还不能明说。但就像宗发奋刚才说的，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手上有权，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呢？

白天天气好的话，有些库存时间长的粮食要从库房里翻出来铺在外面的地上晾晒。这可是力气活，由管仓储的人负责，人手不够的话，也请一些村里的老乡来当临时工。这回宗发奋提出来，粮库也要革命化，不能坐在屋里当老爷，管理人员也要按照毛主席的话，积极参加生产劳动。财务人员也要帮助晾晒粮食，不能光坐在办公室里当老爷，那样会脱离劳动、脱离群众，最终也就会脱离革命，那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啊。没有时间记账怎么办？可以利用晚上时间么，加点班么。这点活，算什么辛苦。比起我那时在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打国民党，这点活，算什么。

看着窗外，岳会计在太阳之下扛着大麻袋，宗发奋心里乐了。又一个被领导，就像猫爪子下的耗子，我想怎么玩你，就怎么玩你。还有那两个记账和出纳的女同志呢？这好说，她们两人白天有业务发生，柜台不能没人，还得在办公室里。哦，弄了半天，是在玩岳会计一个人啊。

不用几天，岳会计看出门道来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他想到了要走，但又有点不舍得。不是留恋现在这粮库，而是因为他和妻子分居五年多，费好大劲，去年才把妻子调到西面的王庄小学。这一走，又要两地分居。他深知，分居对于女同志实在是太难太难了，所以他一时还难以下这个决心。

别人也看出来了，这是宗所长在给岳会计“穿小鞋”啊，可不知道其中的缘由。这是怎么啦，可没有人敢问。

这事也传到了县粮食局。

有一次，宗发奋到县局有事，在院子里遇到财务科的饶科长。饶科长把宗发奋拦了下来，说：“怎么你叫岳会计白天还要扛麻袋晒粮食？”

“管理人员参加劳动，不好么？”宗发奋还在装糊涂。

“那要影响他本职工作的。你看，你们龙头粮库的报表从来都是没有问题的。这回就有个小差错，你看，这‘其它支出’加起来的合计数，应该是37860，结果写成了37866，差了6斤。别叫他去干活了。哪个粮库也没有这么做的，乱弹琴。”饶科长是个老会计，看来对宗发奋不是很买账。

宗发奋记住了这事，回来当天晚上就召开全体职工会议。

“最近我们粮库出了个不好的情况，很不好的情况。”宗发奋很严肃地开了个头，而后又把话一停，很威严地扫视四周。龙头粮库之前在祖如海当头的几年里，还从没有过这种场面，大家都惊得不敢喘气，等着所长下面会说出什么来。

“我们粮库的工作，这次受到了县局的严厉批评。很不好啊，这很不好啊。我们龙头粮库从建成以来，还从来没有受过县局这样的批评。”

又是一停顿，宗发奋对这一套把握得真是炉火纯青。六秒钟之后（不能太短也不能太长），宗发奋又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们粮库的财务报表出了问题，出现了数量上的差错。这是很不应该的！岳会计作为主管会计要承担全部责任，要认真地向上级、向全体职工做自我检讨，深挖思想根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错，它的严重后果是什么，今后怎么补救改正。”

此话一出，大家都愣了，没想到这个会是朝着岳会计来的。岳会计的工作，多年来在所里是数一数二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岳会计自己也愣了，因为县局财务科没跟他说起这些。

“宗所长，你说的是什么问题呀，我怎么不知道呢？”

宗发奋最恨的就是当面顶他的嘴，任何一个专制主义者都是这个样的。

宗发奋果然大怒，一拍桌子，大声叫道：“难道是我污蔑你吗？你出了问题，连是个什么问题都不知道，这本身就是个大问题！我宣布，你立即停职检查！”

按说，宗发奋是没有这个权力的。但这种人是从来不愿意想到这一点的，他们总是要无限地扩张自己的权力，无限地表现自己的权力。

把岳会计停职了，那谁来干这活呢？宗发奋已经考虑好了。第二天上午，他就到供销社找了尹会计。宗发奋虽然已经不是镇政府的领导了，但面子还在。那几位供销社的主任，见了还是点头不已。尹会计听说是找自己的，也赶忙过来，连连称呼着书记长书记短。宗发奋还是把他叫到主任办公室，其他人都退出了。

“我看你在这儿几十年，也就那么回事了，还有意思么？”宗发奋知道尹会计心里的短板，干了几十年，眼看五、六十岁了，工资也还就是四十几元，这已经是涨了。但在基层单位，当个正主任也才是股级，工资很难高上去。况且供销社又属于大集体（所谓大集体，就是有退休待遇的集体所有制单位，其人数纳入政府的集体所有制职工人数统计。其它的一些集体所有制单位，如乡镇、街道办的，被称之为小集体，连人数也不统计），职工工资普遍很低，也无其它待遇，更不用说什么前途了，只是比“锄禾日当午”的农民要好些。

“有意思没意思也就这样了，哪能和你们领导比。”尹会计早就没什么想法了。

“现在有双轨制啊。你看我们粮食部门就有这些，中间还是可以想些办法的。”

“你们粮食部门行，有平价粮、议价粮这些，就活泛了。咱供销社不行，没有这一套。旁边卖生产资料的，柴油、化肥也有平、议价，就比我们好过多了。”尹会计对双轨制也是知道一些的。

“今天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你想不想？”

尹会计没想到宗发奋会有这句话，连忙站了起来，眼都瞪大了，说：“想，想，做梦都在想。可哪有这样的机会啊？”

宗发奋“呵呵”了一声，才继续说：“这样的事情，不但要想，而且要会、要敢，你能行么？”

“行，行，粮食部门的账虽然和别的部门有点不一样，但基本道理还是一样的。这一点上，我还是行的。”

“你着急了吧？我还没说叫你上粮食部门哎。”宗发奋这一手是把对方先引上钩，要叫你求着我，而不是我来找你。

“呵呵，书记的好意，我已经听出来了。”

“呵呵，呵呵，你行，你行，到底你行。我还没说，你就听出来了。”

宗发奋这才把岳会计停职的事说了，叫尹会计顶上。当然一开始还不能正式调动，叫临时代理，这样报到县局也讲得过去。等过几个月，再走下一步。

尹会计乐得直点头。工作了几十年，在这剩下的最后几年，竟然出现了新的起点。

出了供销社，宗发奋就不辞劳苦去了县粮食局，径直找了人事科沙科长，说了岳会计的一大堆坏话，说是不安心工作，嫌多年没有提拔，早就想离开龙头粮库，结果思想开小差，造成了重大差错。尤其是私下联络起粮校来的那帮毕业生，自成一体，弄得领导很被动，很难开展工作。

“你看，粮库里，当会计的，干保管的，搞行政的，都是他们粮校来的。我们成了什么啦？”宗发奋有声有色地说着。

他为什么要说这个呢？这就是他的本事。他虽然来粮食部门时间不长，却摸透了县粮食局几个大小领导的心思，即使是中层科一级的，也没漏过。可惜宗发奋不是文人，不然他就能写出一部“中国官场心理学”（不过真要是文人，恐怕就写不出来了）。因为沙科长也是个到了五十岁的干部，掌管人事工作，却不喜欢这几年一批批分来的粮校毕业生（那时能分来大学毕业生还不多）。虽然只是中专生，却是有文化、有思想、有朝气，有些方面、有些想法，自己反而跟不上了。尤其是上面提倡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自己不但再上个台阶、升个副局长没指望了，反过来还要为提拔这些年轻人忙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宗发奋之所以要挤走岳会计，还有另一番考虑。因为他看中的那个年轻的女化验员关秀娟也是粮校毕业生，跟岳会计走得特别近，听他的话，受他的影响。自己下手所以屡屡无功而返，这恐怕是个重要原因。拔掉岳会计，自己在这方面也将会更为顺手。

沙科长没多说，只是点点头。

“他要走，就让他走。我不迁就他。让他到北山去，找个偏僻的粮库，就说那儿力量薄弱，叫他去充实力量，既是个锻炼，今后也能发挥更大作用。”宗发奋都替沙科长编好词了。

沙科长一笑，心想这些话谁都会说，还用你来讲吗。

就这样，岳会计被挤走了，不，是被调走了，调到全县最北面山区的一个小粮库。尹会计则进了龙头粮库，当了代理主管会计。档案、人事关系还调不进来，因为粮库是全民所有制单位，现在只能先算是借调。

宗发奋为此还作了一番布置。宣布在粮库里设科，虽然粮库自己也只是副科级。尹会计任财务科代理科长。那个女化验员关秀娟任化验科副科长，还煞有介事地按官场文件那样正儿八经地念道：括弧，无科长，括上。显然，这是宗发奋想作又一次的努力，能钩住小关。

尹会计来了以后，宗发奋没有着急去催。倒是尹会计比宗发奋还急，很积极地学习粮食业务，熟悉粮食会计和统计。一个月下来，觉得有个差不多了，悄悄地对宗发奋挤了个眼色，说：“可以了。”

“行，那你去弄吧。”宗发奋说。

尹会计先小试了一下，把一笔几百斤的议价销售作为平价销售，差价作为“其他收入”，而后再作为“其他支出”转出账外。尹会计怕以后时间长了记不清，另外设了个账本记上，相当于私设小金库。这事虽然查出来也算违规，但这种情况在各行各业、各个单位已是普遍存在，不算什么事情了。

尹会计看看没事，半个月后又弄了笔大的。反过来把一笔“平价收购”记为“议价收购”，而实际支出没有那么多，差额又记入小金库。

本书在这儿把这个过程简化了，把财务处理的方法也简化了。实际上比这复杂多了，花样也多去了。之所以把它简化了，一是专业性比较强，解释起来挺费事；再是不想把这些方法公开化，那就有教唆之嫌了。这儿也就讲个大概的意思。总的就是利用手上的权利，通过不同价格的差额，把财富，或许是国家的、或许是生产者或消费者的财富，转入特定小团体或个人的私囊。

过了一个月，宗发奋也有点等不及，过来问：“怎么样了？”

尹会计兴奋地压着嗓子说：“有一万多啦！”

宗发奋却很不屑，“才一万多。”

尹会计说：“一万多啊，很厉害啦。咱俩四六开，你拿六，我少拿点，拿四。”看宗发奋仍不悦，又赶紧说：“你拿七，怎么样？你拿七。”

宗发奋叹了口气，说：“唉，你干了这么些年的工作，怎么连这么点事也不明白。就这一万多，能干点什么啊？你以为我们留下这些钱，就是我们的啦？我们要是摸到了一条鱼，能尝到个鱼尾巴就不错啦。那鱼身，甚至鱼头，都要往上送的啊。要不，你连三个月也混不到，就完了。”秦有理对平金刚讲的那一套，宗发奋居然又照搬给了尹会计。看来，这一套已成了官场、商场、乃至整个社会谁也明白的潜规则了。

“哦，哦。”尹会计惊得裂开了嘴，恍然大悟，怪不得自己干了一辈子也提拔不起来，一直在原地踏步啊。“那怎么分啊？”

“对上面，县局，不但是领导，各个科室，除了干统计的，都要意思到。粮库里，每个人，多少也要给点，这样他们也就没话说了。财务科的那两个，稍微多一点。你我二个，每人能有一成，就不错了。”

尹会计这才倒吸一口气，出了那么大的力，冒了那么大的险，才得这么点。再一想，就是这么点，比起月工资，那又多了不知多少了，还是值的。这又倒过来佩服宗发奋了，亏得有他领着。

“书记，还是您考虑周全。有水平，有水平，到底是多年的老书记了。”尹会计连连伸着大拇指，接着说：“那我这两天就把钱取出来，再买上几个红包，送县局去。”

宗发奋又从鼻子里嗤了口气：“唉，你真是什么也不懂。你以为送钱就这么好送啊？你这样能被人家打出来，人家还难得有这样表现自己清正廉洁的机会。”

“那怎么办？”尹会计真是糊涂了，怎么也说不到点子上。

“你再弄点，下星期先把钱给我。我去办，你就不用操心了。”

“好，好。”尹会计直点头。

至于宗发奋怎么去送的，送了多少，连笔者也不知道，只有天知道。尹会计忙活了这么些天，还没有一点到手呢。就是这样，宗发奋还嫌尹会计这个人有贼心而无贼胆，成不了大事，不能指望太多，还得自己另外想办法。

宗发奋又能想出什么办法呢？有啊。这儿仅举一例。

貂场的饲料，以前都是用鱼杂碎，那样毕竟来源有限，影响饲养的发展，再是价格也较高。外地有经验传来，可以掺上一些下等的粗粮面，做成菜团、窝头一类，调剂着吃，就能解决这一问题。杜长贵就来粮库，跟宗发奋商量这事。

宗发奋一听有门道，就把办公室的门掩上，为难地说：“啊呀，难啊。今年东北玉米欠收，都得靠进口，价格不低啊，得两、三毛钱一斤呐。”

“那么贵啊？那还不如直接买鱼杂碎喂呢。”

“你别急么，让我再想想。你爹和我是多少年的老朋友了。我想想还有什么办法。”宗发奋装着很认真地思索起来。

杜长贵还真的很认真地看着宗发奋，不敢多说话了。

宗发奋停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说起来：“哦，有个办法，就是比较难。”

“什么办法啊？”

“就是去争取个平价销售的指标额度。按平价销售的话就便宜多了，还不到一毛钱一斤。”

“我也想到过这一点，但我也知道能按平价买不容易，没敢多想。”

“是难。差那么多钱呐。”

“那还有办法吗？”

“事在人为么。要往上跑，到县局去，找关系，申请点下来。”

“好啊，好啊。要破费点什么，就跟我说，算我的。”

“你能理解这一点就好。我就怕这一点，有的人不理解，也就不好多说什么。你点开了就好。这么吧，我就直说了。我去找张三、找李四，哪个给了什么，一个一个对你说，也不方便，就算个总数吧。我去找门子批下平价指标，按平价卖给你。这平议价之间省下的差价，一半给我，我去帮你上下打点。另一半就算是白得的。比如一斤玉米，平价销售九分钱一斤，议价销售二角三，中间差一角四。我按九分钱一斤卖给你，你再给我七分钱，我去打点。你实际省下了那另一半的七分钱。就是说，你是按一角六一斤买的。你看怎样？”

杜长贵眼睛往上一翻，想了几下，连说：“行，行，那就辛苦你了。”

“看你老爹的份上，我就去跑这趟了。不过要注意，你对别人说，就算按平价买的，花平价的钱。知道啦。”

“知道，知道。”

“唉，我在你面前，话是好说。可真要打通这些关节，还真不容易，连我自己心里也没有底。”

“宗书记，那实在要辛苦你了，辛苦你了。”

宗发奋这是赚了便宜还要卖乖，杜长贵还得书记长书记短地感谢他。

说真的，宗发奋为了要办成这事，他自己得付出多大的成本，还真难说。不过应该是有赚的，而且会是不小的赚头。以宗发奋这种人是不会做赔本买卖的。再说下了这些本钱，以后办别的事，也就方便了。

其实，在双轨制情况下，不用冒那些风险，也能大笔大笔地往自己兜里装了。比如，平价销售比议价便宜多了。来了十万斤平价指标，卖给谁呢？卖给张三也是卖，卖给李四也是卖。那凭什么卖给张三而没卖给李四呢，这里就有猫腻了，而且是可以对外拿得出很多冠冕堂皇理由的猫腻。经济学里有个词，叫“寻租”。这儿，还用得着寻么？不是明摆的么。在没有完善的民主法制的情况下，双轨制这种设计的漏洞，就为权贵集团，或者说既得利益集团，大肆敛财创造了条件。

宗发奋在双轨制的河里，就这样从摸着石头渐渐地学会了游泳。

第三十七章 海上走私

1978年2月6日

37.1 付局长又来了

到了八十年代的后期，一个新的社会状况渐渐出现了。

十年文革对中国社会最大的破坏，是对人们思想和精神层面的破坏。原来的革命理念彻底破灭了。曾经那么响亮的革命理论，不过是极左势力用来骗人和吓人的幌子。林彪、四人帮那些穷凶极恶的反革命也可以一套一套地讲这些革命口号，而且还跳得更高，显得比革命还要革命。到如今再听到这些，不仅是滑稽，而且是嗤之以鼻。这之后再有台上的人拿出革命的词句来念念有词，谁也不会信了（有的嘴上不说，有的嘴上就说出来了，这是和改革前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信仰危机”。

问题还远不止是信仰危机。十年文革（以及之前的一些运动），其卑劣、其血腥、其丑恶、其无耻，对人们心理的冲击，难以言状。整个社会由此而道德滑坡、信用丧失、私欲膨胀、不顾及起码的社会规则。尤其严重的是，这些不仅仅表现在社会底层民众，也表现在各级官员层，而且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更严重、更猖狂、更令人惊诧。

文革后掌权的，相当一部分，不是一个新的政治势力，而基本上还是原先的领导层（以及他们的子女和追随者）。他们在文革中一度失去权力，受到冲击，甚至受到迫害。但是一旦重新夺回权力之后，除了一些优秀者在反思和试图消除造成这种状况的体制的弊端，相当多的官员却是体会到了这个体制里的一句箴言：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他们利用重新到手的权力，不只要捞回这几年失去的利益，还要变本加厉地垒起他们的天堂。不是他们嘴上说的共产主义天堂（这也已经很少说了），而是属于他们个人、他们家族、他们那个小团体的天堂。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心情很急切，他们的步伐很坚决，他们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的子女和追随者，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这个势力的形成，最终成了气候，是二、三十年以后的事情。比如后来的薄熙来之流。但是我们在八十年代后期，已经看到了他们的起步。

他们攫取社会财富的主要方法，除了掠夺土地、占有稀缺资源、维持垄断经营等，在八、九十年代价格尚未理顺的时候，还有两个比较突出的方式。一是如上一章所讲的利用价格双轨制的官倒；再就是利用国内外价格的差距而大搞走私。当时，为了维护公有制企业的较高利润和保持政府的财政收入，国内的工业品价格往往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为此，在所谓“保护民族工业”的幌子下，对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

中国的关税高到什么程度？仅举一例，比如到岸价为10万元的一辆小轿车，按计算顺序，先交100%的关税（按不同情况，有个幅度），10万元；交消费税（暂按10%）， $[(10+10)/(1-10\%)]*10\%=2.22$ 万元，

交2.22万元；交增值税（17%）， $[(10+10)/(1-10%)]*17\%=3.78$ ，又是3.78万元；此时车价累计已有26万。若拟定企业利润为5万，汽车的销售价则为 $26+5=31$ 万元。此时还要交车价增加部分的增值税： $[31-(10+10)/(1-10%)]*17\%=1.49$ 万元，最后实际销售价为 $31+1.49=32.49$ 万元。而企业在5万元的利润中还要交所得税 $5*25\%=1.25$ 万元（国内的销售费用暂未算）。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后的32.49万元销售价中包括了：进口价10万元、企业利润3.75万元、各种税收 $10+2.22+3.78+1.49+1.25=18.74$ 万元。税收在车辆销售价中竟占到了57.7%！（说明：这是按2008、2009年有关税则计算）。要问，你这个小说怎么做起了计算题？这就是本书不同于一般小说的地方。它想让读者更具体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一些基本知识。有关更细的知识，比如价前税、价后税那些，就不说了。

正因为如此高额的税收，使得逃避关税的走私成了一种一本万利、趋之若鹜的勾当。在本书的人物中是谁想到了要走私呢？要走得成私，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因为它要牵扯到很多环节、很多部门，没有相当大的权力、相当大的关系网、相当大的魄力，是搞不起来的。那些靠进关时身上夹带点什么的小儿科，根本不是本书中的那个人看得上眼的。他是谁？他就是在前两章出现的到龙头检查工作时想调戏林李而没成的付局长。不过，现在他已经不是县多种经营局的付局长，而是省政府某个局的副局长。他没有走留在海源等着提副县长的路，而是回省里一下子就跃上了副局级的台阶，背后的名堂就不用多说了。而县长当时也才是处级。

付局长已经有了直接调运国外资源的能量。他就在想，何不跳过海关，直接联系国内客户来大捞一笔。这成百万、成千万、成万万的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甚至连老祖宗也没想过的巨款就会像洪水般地滚滚流入囊中。这也将完全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

国外的货源，他有。要去买外国的轿车还不容易？人家还求之不得呢。国内的客户，他也有。只要他说一声，不想买的，也就悄悄地买了，反正买车也不是花个人自己的钱。付局长是个聪明的人，也是个能干的人。为这个事，他苦苦思索了一个多月。从国外买上一批轿车，要是不通过海关，就能赚上一大笔。关键是在哪儿上岸，还能盖得住。他冥思苦想，终于想起来了。那年，他还是海源的一个局长，去龙头检查工作，夜宿海边的小宾馆。当地的辜书记安排了年轻的小林姑娘留下来。尽管事情没有办成，但还是留下了印象。那是三楼的一个房间。留在他脑海中的，除了窗前的小林姑娘，还有窗外作为背景的大海。虽然已是夜幕之下，那开阔的海面上，银色的月光洒下，波光粼粼的浪涛层层卷来，分外的迷人。他记得，在这幅模糊的黑白照片中，隐约还有个不起眼的小码头，一段伸向海里不多远的防波堤，两个小小的吊车的铁臂，都是那年轻姑娘的背景。而今，脑海里的这张黑白底片上，姑娘已被剪去，那背景却还记得。现在，不就能用上了吗？上哪儿去找这样偏僻的不为人注意的又能用得上的现成的小码头啊。付局长兴奋了，为自己的聪明而兴奋了。

付局长来龙头的那天，辜书记事先都不知道。直到小车进了镇政府的院子，经学文上前，看是县里的卞书记来了，又下来了付局长，赶紧上去握手问好，转身便过来叫辜书记。辜书记三步并两步地来到车前，老远就伸出双手，嘴里喊着：“贵客啊，贵客啊。”辜书记是知道付局长被提拔到省里去了，那可是海源全县各部门热议过的一件大事。他为什么会上去啊？他上去后对海源意味着什么啊？比讨论省政府

下来的文件还热烈。辜书记对此没有多说，可他心里想的比谁还多。他尤其庆幸，小林那事没有闹大，糊了过去。他也在想，这事没办好，付局长会如何看他。所以，他现在更要尽心接待。

他招呼过卞书记后，又笑着对付局长说：“你们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我好准备一下啊。”

“准备什么呀，随便一点就行了。”付局长答道。显然双方都不是在说准备商量工作什么的。

辜书记抬头，见付局长身后还有一位美女，漂亮得把他都惊了一下。

付局长一笑，说：“晋秘书啊，过来，这是龙头的辜书记，我的老朋友了。”

小晋身材高挑，体态丰润，颇有几分妖娆，是典型的高层圈子里才能见到的那种美女，现在是付局长的随身秘书。

晋秘书上前半步，嫣然一笑，一点头：“啊，辜书记好。”

“好好好，好好好。”面对这样的美女，把辜书记窘得只会连连点头了。

“辜书记啊，一起上车，先到海边码头看看。”付局长说。

“付局长这次来，是要关心我们海边的发展。”卞书记这才插上话。

“这么远了，也不先进来坐会儿。”辜书记还是要客气一下。

“不啦，不啦，先去看看再说。”付局长说。

“经主任啊，你把那个吉普开过来。”辜书记对经学文说。经学文忙去把车开了过来。那时镇政府也就这么一辆车，还是部队淘汰下来的。辜书记知道，付局长此次来必有要事，所以没叫司机开。说起来，辜书记对经学文的关系已经不错了。那时的司机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渐渐成了领导的心腹之一。

付局长看了这吉普，笑了下，说：“你们还用这种车啊？那我这趟来，还真有必要喽。”

“是么？我们县里的车也都不行了，我这桑塔纳在县里已经算是最好的了。”卞书记说。

“好，好，我这次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辜书记想起沿海开发区副主任的纪海洋了，便问：“付局长，纪海洋在我们这儿是分管沿海开发的，要不要叫他也过来？”

付局长停了几秒，没说话。

辜书记自然就明白了，便对经学文说：“那我们先走吧，在前面带路。”而后等付局长他们上了他们的车，便在前面领着驶往码头。

车在码头前就停下了，因为经学文的驾驶技术毕竟有限，再往前开别翻到海里去了。码头并不大，但基本设施还都有。不到一千米的防浪堤“L”形伸向海里。外侧是波涛拍岸、浪花飞起，内侧则停泊着船只。

付局长问：“这码头能靠多少吨的船？”

一个喊过来的码头负责人法主任回答说：“一千吨。”

“才一千吨啊？”付局长皱起了眉头。

“一千五的，要靠其实也行。但设计是一千吨的。”

付局长没说话，抬头看着远处的海面，过了一会，问：“如果是万吨巨轮来，得停多远？”

看来法主任答不上来，尴尬地看着辜书记。还是经学文开口解了围：“恐怕得二千多米远。这儿海底下的浅滩，往外其实并不远，一千多米以后，就一下子深下去了，像个大台阶似的。”

“你怎么知道的？”付局长很认真地问。

“建港的时候，从上海找来了勘查和设计的。我接待的，听他们说过。”

“如果来大船的话，停在外海，再由小船转驳，能不能行？”付局长问。

“……”这个问题大家都答不上来。

“那你们这个港口的作用和发展，就要受到很大限制咯。”付局长说。

突然，经学文又开口了：“恐怕行吧。我想起来了，听我爸说过，1949年国民党反攻龙头，最后又从海上逃走。来的时候，逃的时候，都是大船停在海上，由小划子来回运的。付局长您刚才的设想，还是可以的。”

“嗯。你们这两个吊车能吊多重？”付局长又问。

“一个三吨，一个八吨。”法主任忙答道。

“嗯。”付局长望着大海的远处，又沉思起来。

晋秘书拿着本本，一直在记。她恐怕不只是一个花瓶。

“走吧。”付局长往回走了，看到堤坝上货物堆放杂乱，很是不满，说：“看你们摆得乱七八糟，进去出来多不方便，叫人家怎么开车？”

“是，是，我们马上改正。”法主任应声答道，又吆喝远处的几个工人：“快过来，马上把这几堆理干净了，叫领导怎么走路啊？”他也不知道这位领导是干什么的，其实根本管不到他。

离开码头，他们还是去付局长上次夜宿的那个宾馆落脚。离开饭还有一段时间，辜书记正好叫经学文去厨房准备。他和付局长、卞书记、晋秘书进了个小会客室商谈。

一坐下，付局长就说开了：“我今天呢，是来跟你们商量一件事的。”卞书记、辜书记都正襟危坐地认真听着。

“现在省级机关需要增添更换一批小车。我准备从海上运进来，直接给各单位。这样就可以省去很多环节，减少很多费用。你们如果需要呢，也可以拨几辆给你们。”一开始付局长把事情说得很轻巧。

听得两位点点头。也可能意识到事情不会那么简单，要不付局长不会特地为此跑一趟，都没张口，在等付局长往下再说些什么。

付局长接着说：“我刚才看了下，可以在这儿上岸，这样可以避开好多动静，虽然条件不是很好。”

“这行吗？”卞书记皱了眉头。

“这事情吧，谁运也是运。我们运这趟，可以减少省政府购置车辆的开支，提升龙头港的运输能力，我们个人也会有一些劳务费。”付局长答道。

辜书记也有顾虑：“我们这龙头港太小。运汽车的货轮能靠得上么？”

“这是个问题。有两个办法，一是在黄港，从大船卸下来，再装到小船上运来。但是黄港人多眼杂，尽量不用这个办法。再就是我在黄港联系两条驳船过来。大船停在这儿的港外，再由驳船倒一次手，运到码头上来。这样也费事，但是在我们自己手里费事，好说一些。”

“这事有多大的收益，值得这么搞么？”卞书记的疑虑更多一些。

“收益是不少的。运一辆车，就能赚一辆车。”

“嚯，这么厉害啊。”说得辜书记的眼睛都瞪大了。

“那怎么分呢？”卞书记倒是直爽人。

“按三七开吧。我们省里七，你们县里三。”付局长面对他的老上级，一点也不客气。

“那我们镇上呢？”这是辜书记最关心的。

“你们镇上的，自然就已经算在县里的了。”

“这……这，这些事基本上都是我们县里要忙活的事。”卞书记显然是觉得少了。

“那我们先商量具体分工，再说分钱吧。”辜书记说。

“也好。”付局长说：“我负责最主要的两头，进货和销售，这是最关键的。你们这儿除了提供码头和场地，卞书记，你还有个事，就是要封锁现场，不让外人进来知道。我知道你是老公安出身，可以派一些警察过来警戒。这也是我考虑在龙头安排这件事的一个原因。”

“这个倒不难，我可以跟周局长说一下。”卞书记答。周局长就是1957年随卞科长来龙头中学抓走李辰的那位周警察。

“场地？还要什么场地？”辜书记觉得这个问题和他有关，也问上了。

“小车上岸了，总得有个地方先停一下。你看什么地方好？隐蔽一点的。”

辜书记想了下，高兴地说：“正好有个好地方，就是那个韩国人要来投资建的高尔夫球场，结果征了地又没搞起来，老百姓还闹了半天，地却闲在那儿了。”

“在哪个地方？”付局长问。

“就在离这儿西面不远。从龙头出去，不过河，没到赵村就往南拐，快到大河口的地方。”

“有路么？车能进得去么？”付局长又问。

“有路，就从大道走。在不到赵村往南拐时，有条特地新修的土路。”

“还得从镇里穿过啊？二百多辆小车，从十字路口过，那太招摇过市了，不得把老百姓惊死啊。还有别的路么？”付局长这倒说的是实话。

“也有，就是不进南门就往西走。不过那是条田间路了，拖拉机走走行，小轿车走就有点勉强，不过，要走也行。”辜书记答。

“你们啊，思路还是不开阔，步子不大。完全可以沿海边修条路，在大河口再往北，经过那球场和大道连上。要开发沿海，肯定要修这条路，晚修不如早修。修好了，别人才会愿意来投资。”

“是的，是的，付局长的意见真好。我们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没有这个力量。”卞书记说。

付局长也看出意思来了，便说：“卞书记要支持龙头镇的工作啊。这条路可以县乡合作，县里多出点。”

卞书记说：“这条路是要修的。这样吧，今年是来不及了，明年我们县里立项，作为基建项目上报省里。你们省里也参加，到时候多出点。哈哈。”

付局长说：“这也来不及了吧。那辜书记你先把南门外那条路修修好，能让小车开得过去就行了。”

辜书记又问：“二百多辆车，哪来那么多的司机？”

付局长说：“不用一辆车一个司机。把车开到场地，再回码头来开。”

“再走回码头还挺远，得半个多小时啊。”辜书记说。

“……想不到还有那么多具体问题哦。”付局长说。

谈话稍停，晋秘书插上了话：“那可以准备几辆自行车，让司机骑着车回码头，那就快多了。”

“啊呀，还是晋秘书聪明，我们都没想到。”辜书记又连连赞赏了一番。

“还得找几个人，等在码头上，由他们把司机骑来的自行车骑回球场，他们再走回码头来。这样自行车就倒换过来了。”晋秘书接着说。

“哦，想得周到，想得周到。”辜书记又是连连夸奖。这时他的心中是不是也悄然想起自己身边怎么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不得而知。

“这样镇上要安排一些人，一是来回骑车，还要有看场地的人，白天黑夜都要有人看。”卞书记这才插上话。

“是的，是的，这事我可以交给西北村。西北村，我熟，我媳妇就是西北村的。”辜书记对着付局长傻笑了一下。

付局长倒没接这个茬，接着说：“还有件事，你们看是你们搞还是我来搞。就是要有收款开票的，要单独为此成立个公司。”

“还要有公司啊？那还得有办公楼，有会计、有出纳啊？”辜书记完全没想到还有这一步。

“办公楼倒不用。”付局长笑笑说：“都是些银行转账，只要开个户头，在家里弄弄就行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皮包公司，连个办公地点也不用。

“那就让我来搞吧，叫我家儿子来搞。”辜书记今天表现得特别积极。

“你家儿子还没到十八吧，成立不了公司吧？”卞书记都忍不住了。

“叫我老婆开公司，她可以当法人，我儿子来管账，这可以了吧。”辜书记说。

“按说呢，这是有点不太合适。但这种事尽量要少一点人知道，圈子尽量要小，那就先这样吧。”付局长说。

“看来你们镇上、我们县里的事儿还真不少咧。付局长，你看这比例……”卞书记争取不到别的，回过头来又说起分钱的事。

付局长一笑：“这样吧，这件事的比例，三七开就不动。等明年那条公路立项，我让省里出七，你们县里出三，镇上就不用出了。怎么样？”

没等卞书记开口，辜书记高兴得连连说：“好，好。”弄得卞书记也没法再开口。

午饭，尽管只是五个人的饭局，却也算得上是盛宴，经学文的忙碌，这些都不说了。

饭后，卞书记有事要先走，由经学文开着镇上的吉普送。辜书记怎么也要让付局长再留会儿。卞书记不在，有些话更好说一些。

付局长看出这个意思，也就留下了。他们上三楼，还是进的上次来的308房间，那是这个宾馆最好的房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呀。这件事，你要多费心了。能不能办得好，社会上没有反应，不出现一些意外，全都靠你了，老哥。”

辜书记一听，这付局长居然称他为老哥，太激动了，急忙说：“知道，知道，我一定会用心，一定会全力以赴。我已经听出来，这里面也是有一定风险的。您信任我，我一定会和您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这是辜书记急着向付局长表忠心，看来他是急着要爬上付局长的这条船了。

辜书记为什么要这么急于投向付局长那一边，甚至甘冒官场大忌，不惜在卞书记面前都不掩饰这一点呢？辜书记有种危机感。他感觉出海源的官场，当地干部的势头在上升。拿龙头来说也是这样，不管

是行的还是不行的，如祖云涛、经学文、秦有理都在上升之中。而前后留下的这批部队转业干部都不行了，宗发奋走了，连纪海洋在这儿干了几十年也都退出了龙头的权力中心，虽然他和纪海洋也算不上一路人。他感到，他自己也快不行了，至少肯定没有任何前途的了。怎么办？他看出来，付局长还在上升途中，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上升。能对他使得上劲的、帮得上忙的，只有付局长了。那万一付局长也出了意外呢。他也知道付局长不是没有瑕疵的人。但是顾不上了，就是投机，也要赌一把了。今天，辜书记可是把比他小二十岁的付局长当干爹了。

“你把这个公司放在你家里，能行么？”

“行，行，没有任何问题。”辜书记把他家里的情况也说了一遍。

辜书记和皮珊珊在“三支两军”的那一夜擦出火花之后，也就走进了婚姻。按说，部队里是不主张军人在驻地农村谈对象的，尤其是士兵，那是不许可的。因为早在解放初，曾有沿海一些地方驻军较多，当地女孩相对内地要开放一些，好接触一些，因为部队的地位和待遇较高，她们也愿意当军人家属，结果谈得多一些，造成了当地男青年择偶的困难而引起了社会反响，使部队领导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辜连长的事，虽然不在明令禁止之中，也只好低调行事，况且他也没有经济能力来操办，所以连婚礼也没有举行，悄悄地就住到一起了。正逢也是人荒马乱的时候，谁也顾不上这些。他和皮珊珊就成了夫妻。住的地方，也是一言难尽。肯定是不能住在娘家，皮安己也没有空房子。婆家更不想去。南门外连队的营房，也没有安排随军家属的住房。西北村尽管一直很大方，连和村里不搭边的包金贵、潘连长都在西北村落了脚，但辜连长那时正赶上两派武斗呢，没人管这些。只好哪儿有空地方，就在那儿住上几天，一会这儿，一会那儿。十几年里，小小的龙头镇，都搬了好几个地方了。直到去年，在他的提议下，镇上才在北门外盖了一排宿舍，他和纪海洋、经学文几个才住上了安稳的房子。

说到开公司，皮珊珊有没有这个水平呢。怎么说呢？应该说是不够的，因为她没有受过任何的专业训练。不过，另一方面讲，比起别的农村妇女，她又有不一般的地方。她是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这在农村里是不多的。她的性格和思想层面又有她的特殊性，她看似低调，不出头露面，话不多，却善于观察、勤于思索，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但这些想法往往又负面的多。她对丈夫还是十分支持、鼎力相助，还没看出什么负面影响。至于要办公司，其实并不需要她做什么事，也就是那么回事就是了。即使要讲起来，她也还不至于像那些完全没有文化的村姑会不着边际地跑调。当然，真要往深里讲，也是根本不行的。

他的儿子辜向东，因为那时居无定所，上学较晚，此时刚初中毕业，没考上学，在家闲着呢。有公司的事，正好。

付局长听了介绍，也没多说。反正那公司也是个空名，谁都能干。他便换了个事说：“哦，我把公司取名叫奇芳，奇芳商贸公司。我的晋秘书叫奇芳，算是带上她的名字。以后你那个公司里有她50%的股份。啊？知道啦？有事情要想着她。”

辜书记心里在想，这一块他也要插进来，嘴上却说：“行，行，没问题。”

聊了一会儿，辜书记看窗外，太阳不怎么明亮了，就说：“今晚你们就在这儿歇歇吧，这一天也辛苦了。晚上，看看海上的夜景是很美的。”

付局长看了晋秘书一眼。晋秘书笑笑没说，意思就是可以。

晚上的事已经不用辜书记像上次那样操心，可是他突然又冒出了一句：“唉，上次来，没办好啊。”话一出，才知道说漏了嘴，马上捂起嘴紧张地看着付局长。

付局长转头看了看房间，想起来了，不过倒是大方，没回避：“喔，还是那一间啊。哎，那算个什么事呀，哈哈。”

辜书记又赶紧看看晋秘书，就怕在他们俩人之间闹出什么事来，那就麻烦了。

可晋秘书是何等聪明之人啊。她反而笑了起来。她或许是在笑辜书记的城府不够深，或许是在笑付局长也有吃瘪的时候。对自己男情人的这种事，她不会生气，不会吃醋，甚至不会去干预。她明白自己的身份，不会去越位，更懂得关键是要发挥自己的魅力。对小三的那套技巧，她已经是炉火纯青、应付自如。用哲学里话来说，就是已经进入了“自由王国”。

37.2 各得其所

付局长走了之后，辜书记先是跟自己老婆孩子说了。辜向东当然非常兴奋，忽然之间，他就可以掌控一个公司了，这是想也没想过的事情。皮珊珊还是很冷静。她说：“这事一定要做好。做好了，我们家就会有个大变样。弄不好，就会掉进黑窟窿。”

这句话，提醒了辜书记。他连连点头，对儿子说：“你是叫我最操心的。你能挑得起来么？”

“能。”儿子毫不思索地说。

“你连账本都没见过，还说能？”

辜书记替儿子揽下这活，其实他也是有担心的。那就学吧，得找个人来教。镇政府就有会计室，可不能让他们知道。他听说供销社的尹会计去了粮库，帮宗发奋办成了点什么事，现在俩人都挺滋润的。辜书记也把尹会计喊了来，要他帮儿子教怎么记账、怎么当会计。

尹会计很乐意干这事。以前连八竿子都打不到、只能远远仰望的镇党委书记都来请他，那可是何等的荣耀。无奈那个辜向东不争气，学不会。会计的专业知识，确实也不是三两天就能学会的。尹会计没办法，那就用最简单的记流水账吧。后来，就是那个流水账，辜向东也搞不明白，还是尹会计常过来指点，再后来尹会计实际上就成了辜家的兼职会计。

辜书记按照付局长的意思，跟纪海洋说了下，知道要从龙头港上来一批货就行了。对祖镇长说的就更简单了。他们俩没有更多地去想，没有意识到那是怎么回事。辜书记还说，付局长这趟来，挺关心龙头的沿海开发，明年还要以省里投资为主，建一条沿海边的公路。他们两个更是高兴了。

辜书记也叫了鲁队长来，说了有这么回事，要在村里找几个人来回骑车和看场地这些，又说也不用麻烦村干部了，让皮高深叫几个人就行了。还有就是要把南门外的那条路修整一下，镇上给你们一千元，连工钱、连影响到哪家的地边，一共这么些钱。这事，你赶紧办一下。

鲁队长一听，这还不是小事一件，爽快答应了。

还有成立公司的事，要到工商所和税务所办理。辜书记用电话跟他们打了个招呼，叫皮珊珊去办了，并不费事。有需要到县里办的环节，所里都帮着办好了。当珊珊高高兴兴拿着执照回家时，还疑惑地问，公司怎么取了个这样的名字。辜书记没法解释，就说是付局长取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意思。珊珊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名字的由来，直到后来知道了原来里面还有个大股东叫奇芳。

辜书记喊了小舅子皮高深过来。辜书记以前还真没在意过皮高深，没给过他什么好处。所以辜书记的话一说，皮高深高兴得不得了，说这事自己全包了。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能组织、指挥别人呢。

皮高深这个人，我们已经比较熟悉了，在前面许多地方都见到过他，可给人的印象不深。因为他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在村里，他跑来跑去得不少，可是既没有什么让人翘大拇指的地方，也没有什么招人骂的地方，是芸芸众生里的一个。即使成了辜书记的小舅子之后，按说这个关系可是不得了了，但皮高深还是那样，虽然哪个事也没拉下，甚至互助会他还是最早的发起人之一，人们的议论里却很少有他。西北村的人们或许看镇上的干部看多了，没把他和辜书记的亲戚关系当回事。

这次，皮高深觉得是自己翻身的机会到了，躺在炕上盘算了起来。还没几分钟，他媳妇回来了，见他躺在炕上就嚷开了：“你就那么舒服啊，院子里晾的衣服也不知道收回来。衣服都不要你洗，还不知道收一下么？进屋也不知道顺手带一点柴草进来。什么事情都得我来。”

皮高深的美梦还没开始就被打断了。可也不能说他媳妇说得不对，皮高深虽然听得烦，也只好一骨碌下了炕，帮着媳妇忙了起来。皮高深什么时候有的媳妇，前面怎么没说呢。书中的人物太多，每个人都要交代什么时候结的婚、生了几个孩，也太烦了，所以没说。这儿就说一下。皮高深结婚也十几年了，媳妇是一条街上的，叫小燕，相貌一般，干活还挺利索，能管得住皮高深。结婚时也是文革后期，没张扬。他爹皮安己也没那个心思了。他有个儿子，跟他外甥辜向东差不多大。因为懒得取名字，直到三岁多了，还没有。媳妇催了几次，不取不行了，这才取了个名。外甥叫向东，反过来叫向西也不好，那咱就叫向前吧。眼下正在上高中。

直到做好了晚饭，坐到了炕上，端起了饭碗，才抽出空跟媳妇说了这事。

“这算什么事？”媳妇更不明白这些了，有点不以为然。

“你知道个什么呀？”皮高深能被媳妇管得住，但心里常常不佩服，便一头转过去，躺在炕里头，又盘算起叫哪个人、不叫哪个人了。

一个月后，货轮到了，正好碰上个好天气。一艘五千吨级、从韩国来的货轮停在龙头港外约三千米的海上，比那时“济成号”停得还远。从黄港开来的两只驳船，把小轿车转运到码头。辜书记从本县北面硫铁矿上找了几个司机，负责把车从码头开到闲置的高尔夫球场。辜书记不想在县城找。他以前当过县工

业局长，知道那个矿上有不少司机，临时喊了几个过来。那个矿很闭塞，不会传出去多少话。这些，事先已经跟付局长汇报过了。

码头上停止了其他作业，县公安局还挺当回事。三四个警察封锁了码头的入口处，不让外人进来。码头上和沿着去球场的那条路，也都站上了警察，差不多有十几个呢。周局长还亲自坐了吉普车过来看了下。

鲁队长按辜书记的要求通知了村民，那条路以南的地块，今天就不要去干活了，别不小心叫车撞了。所以，今天南门外还算正常，只有少数村民在观望，一辆辆的小车驶过，看起来秩序井然。

付局长和晋秘书也都来了，不过没有去现场，还是在宾馆三楼的308房间里远远地隔窗望着，对辜书记和卞书记的安排还挺满意。辜书记在他们房间陪了会，借口说要到现场去看看，便抽身走了。只有卞书记没有来。

倒是皮高深费了点事。他原以为这样的事，别人都会抢着来求他，争都争不上，甚至自作主张把辜书记讲的十元钱一天的工资压低成四元钱一天，另外那些就自己吞了。唉，这样的事不用说、不用教，都会。有了哪怕是最小的一点权力，也会来这一套。但这样就喊不动了，有的是他本来就不想喊，像于又发，知道是老村长的孙子，不会听他的。有的是他想喊，人家不来，恐怕就是再加钱，人家也不来。比如邬朝阳、平海波，他们觉得他们在村里好歹也是干部子弟，你皮高深算什么呀。尽管早就不讲阶级成分了，但中农的影子，总在心里有那么块无声的痕迹。相反，他是辜书记的小舅子这一点，在人们心中印象都不深。或许是当时皮珊珊没办婚礼，以至于村里人都有点忽略了？还是辜书记至今行事还算比较低调，对皮家关照得不多，大家也就没觉得什么？也可能是那时拉关系、走旁门的歪风邪气还没有渗透到最底层？和皮高深的同龄人中也就喊来了齐成才、迟解放、申光荣，尤其是申光荣挺积极。申光荣身体弱，体力活不太行，干这些正合适，还嫌时间少，才三天。再就喊了几个小青年，比如像小连子，这些人还是愿意抽时间过来的。最合适的莫过于叫靳宝康过来看场地了。靳宝康在造纸厂事故中烫伤后，身体已经稳定了，人是能活动了。但因为钱不够，植皮做得不理想，脸上留着好些伤疤，挺吓人的。尤其是对于不熟悉的人，乍一看会害怕。去看场地倒挺合适，晚上真要有小偷过来，一见了，准能被吓跑。

迟解放在征地冲突以后，从建筑公司辞职回家了，改开货车，哪个地方有活，就去跑几天。这回皮高深让我也去干来回开小车的活，迟解放也挺高兴。

最后，皮高深对他们加到五元钱一天，迟解放则和那些司机一样。这一摊事情基本上也安排好了。

整个过程也比较顺利，没出什么事。停在球场的车，没几天，省里一些单位也都来开走了。给镇上留了二辆，一辆给党委，一辆给行政。当然钱还是要给的，没有优惠。县里也分了几辆。

按说这事可以皆大欢喜地过去了。申光荣挣了十几块钱，皮高深挣了几百块钱，辜书记分到了几万块钱，而付局长则是上千万的钱。对于付局长来说，这些钱不只是用于个人享受了，贿赂上级、稳住同级、收买下级，这下就有了别人所无法比拟的雄厚实力。

但总会有一些别的想法出现。那几百辆的车，尽管没有从龙头镇里过，但是从赵村的大河漫水桥过、从县城里过，不引起惊诧和震动么？大的震动没有，小的震动还是有。

首先是西北村。这些车是在西北村的地上过，是在西北村的地上停，还有西北村的人去骑车看车，而且还是皮高深牵的头。当这些车从西北村的田间土路一辆接着一辆驶过，还是有一些村民在驻足观望、议论纷纷，警察过来撵也撵不走。

回到村里，平金刚第一个就不服了：“这么大的事，怎么村里没说起过？”确实是没人跟他说起过。

杜家骏解释了：“这事，辜书记讲过，说是不要扩大影响了。所以，我就没跟大家说。”

彭小宾觉得这事有蹊跷，但是想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就说：“以后这种事，还是由村里来安排的好。”

杜家骏说：“唉，辜书记要让皮高深来牵头，我们还有什么法？这样的事，以后还会有。”

经过这一次，村里人才开始对皮高深另眼相待了。皮高深也因此就成了西北村核心圈里的人了。

镇政府里的人，想得就更多了。

经学文得了点好处，没多说。

纪海洋有点看法。他作为龙头沿海开发区的副主任，就这么说一下，心里不是滋味，但嘴上没有任何的表示。

祖云涛想得更多。他觉得，这事情不一般，这不就是走私么？是违纪违规的。他几次想跟辜书记说，这事干不得。再一想，不但辜书记卷进去了，县里的卞书记也卷进去了，省里的部门更是带着头干，事情真的是不一般。自己把这事挑出来，能行么？他想了好几天，想想算了，又想了好几天，憋不住了。特地跑到海边，找了纪海洋，悄悄地说了。

纪海洋长叹一口气，说：“这两年情况有些变了，变得我们看不懂了。文革，我们看不懂。现在，我们又一次看不懂，又一次不适应了。这事啊，先别急，等着慢慢往下看吧，看看再说。拱不动的时候，就不要去硬拱，那样反而伤了自己。有时主动会变成被动，有时被动会变成主动。你看胡耀邦，有些事主动了，结果被动了，辞去职务了。”

祖云涛一听，啊呀，这些年下来，还没觉出纪海洋有这水平啊。

1987年党内改革家胡耀邦的辞职，在村镇一级，还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

县委卞书记也明显地不高兴。他再也不愿见那个付局长了。他嫌拿的少了，有点上当的感觉。为了这么点而被套在里面，实在是不舒服。他一直在想的是，万一以后东窗事发，该怎么反击一手，打到别人头上去。别看是一个经济案件，却暗地里埋下了海源官场震动的导火索。

笔者再三声明，本书是小说，不影射某地某时的具体情况，更不是影射高层的情况。尽管在1999年厦门远华公司赖昌星走私大案中涉及的几百个官员中最大的一个——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是笔者母校同

一系低两级的校友。

第三十八章 官场震动

1978年2月7日

38.1 付局长又升了

谁也没有料到的是，海源和龙头的官场来了场震动。原先有人以为搞海上走私迟早会引发震动，然而这次并不是这个原因，恰恰相反，而是付局长又升了。由于年龄等原因，省政府班子进行了调整，作为省级领导的付局长老婆的舅舅退了，他推荐付局长上来。那时各单位为了解决职工子女的就业问题，有个政策叫“顶替”，就是在职工退休的时候，可以让他的子女安排到这个单位来。高层领导虽然没有这个明确的规定，但是可以提建议，显然那个舅舅的话是有分量的。

那么多的选拔对象，那个舅舅也有自己的子女，为什么单选上了付局长呢？因为单从条件看，付局长最符合选拔干部的三个条件，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对于付局长而言，后两个条件是显而易见的。他研究生学历，一表人才，工作有成绩，比如这次就解决了省城很多单位的用车问题。尤其是很会来事，对上下左右各有一套。尤其是他不仅仅是顾及自己的利益，而且能顾及到更大范围的利益，当然不是说“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是能顾及他那个家族、他那个小团体的利益。至于那个“革命化”，那就看怎么说了，说他是革命，他就是革命。当然，咱说了不算，有人说了算。就像那个老革命薄一波（2013年被判无期徒刑的原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父亲）说的，我们的孩子党性强，让我们的孩子接班最放心了（笔者插话：他只管他放心，不管别人放不放心）。于是付局长在争议中，通过协商，连跨两个大台阶上去了，由副局级成了副省级。也许是太年轻了，还有些不同意见，不能一下子当副省长，先当个省长助理，参照副省级待遇，过两年再走下一步。

消息传到海源，果然引起了震动。付局长能当上省里的副局长，就已经惊讶的不小了。这下子，副省级啊，海源的干部连想也不敢想啊。就是个副处级，也没有几个人敢想啊。

辜书记看到这消息，惊得差点连下巴壳都掉了。乖乖，乖乖，不得了啊，他当上副省级啦。他立马反应过来，庆幸自己投机投对了，得马上拉住这个关系，继续在眼前的龙头港做好那桩买卖。只要三、五年，就能发大财。到那时，就算不当这小小的镇党委书记也不要紧了，也可以像辛狗狗那样当个资本家，噢，不，当个企业家了。他对辛狗狗开那个厂，心里还是有几分羡慕嫉妒恨。

他回家叫来皮珊珊，去信用社取出六万元现金。在这方面，辜书记是有魄力、肯下本钱的。

皮珊珊大为疑惑，问：“取那么多钱干嘛呀？我们这些年一共才攒了不到十万元。要不是这次奇芳公司分红，我们还不到三万呢。”

辜书记只是说：“别问了，别问了。这是个大事，以后你会知道的。”

“哦。”皮珊珊也就没再多问。

辜书记把取来的钱，分装在两个精致的小礼盒，一个装五万，一个装一万，跟经学文在电话里说了声，便匆匆地走了。

他要上哪儿？这还用说吗？本来，辜书记也不是这样的人。你看当年刚来龙头镇“三支两军”的时候，还是多么朴实的小伙子呀！有句话叫时势造英雄，讲的有点窄了。应该说是时势不但造英雄，更是造就了一批批的人物。什么样的时势，就会造就一批什么样的人。文革就造就了一批打手和暴徒。而辜书记眼下的时势就造就了一批投机钻营、唯利是图的人物。虽然在某种既定的时势之下，会造就出各种各样的甚至相反的人物，但这些不同类型的人物都脱离不了那个时势之下的印记。比如文革造就了各种各样的人物，从张志新到四人帮，从红卫兵到造反派，虽然各不相同、差异很大，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类型，然而这些截然不同的类型也都印上了只有这个时期才会有的印记。在改革开放中期以后，那种时势就造就了一大批像辜书记那样的人物，尽管他们过去也曾经朴实，也曾经正直，甚至也曾经藐视过贪腐。还是前面提到过的那句话，体制能改变人，就看是怎么改变了。

他领着装着盒子的公文包，先进了县政府大楼卞书记的办公室。两年前，县委县政府机关已经从平房搬进了新建的四层的县政府大楼。这幢大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海源全县的地标性建筑。这样有个附带的好处，找领导说话、办事方便多了。不像在平房，窗外面难免会有人走过，哪怕是过路人无意识地扭头看一下，里面说话的人也多有不自在。辜书记凭着自己对县委机关和对卞书记的熟悉，径直上了三楼卞书记的办公室，甚至没和办公室秘书打招呼就进去了。卞书记在和一个人说话。年轻人见辜书记进来，就点头起身走了。这样去见领导的情况，在七十年代是常事。到八十年代，下一级书记这样来，大概还行。

卞书记伸手示意请辜书记在沙发上坐下，自己依然在办公桌后面的皮转椅上。

辜书记一落座就说：“卞书记啊，付局长升啦，升得这么快。咱们是不是得去看一下？”辜书记意思是能跟着卞书记一起去，力度是不是能更大一些。

“嗨，他升官不是很正常的么？”卞书记的反应不是很热烈，话里显然还另有一种意味。

“哦。”辜书记似乎也听出来一些，转了个话题：“前一段，你的咳嗽还好了点？”这既是没话找话，又是把关系再拉近一点。

“唉，也就这样了，没什么大毛病。今天你有什么事？”这句话的意思是卞书记要结束这个谈话了，不想继续聊了。

“哦，哦，没什么事。马上要到这个什么、什么节了，顺便带了盒补品来。”辜书记连是个什么节都没有想好，就从公文包里拿出那个红礼盒，起身过来。

卞书记明白是什么意思，连连摆手：“不用了，不用，不用。”

辜书记走近办公桌，刚要放下，卞书记站了起来，脸上没有更多的表情，用手挡住伸过来的礼盒，说：“辜书记啊，不用啦。我现在不是吃补品的问题。这情我领了，东西一定不要放下。”

辜书记从卞书记推礼盒的力度，就知道对方谢绝的程度，便不好再坚持。“啊呀，卞书记，你真是……好，好，好。那下次来龙头，请你吃最新鲜的大龙虾，半斤一个的，很少见到的噢。我还得去楼下计委一趟，先走了。”

辜书记走了，出了门口，心里当然有点不快。

在中国官场的某些潜规则里，人家送你东西，你不收还不行。你不收，就是驳了人家面子，看不上人家，就是给自己堵了一条路。卞书记为什么不要人家送上门来的东西呢，真的是廉洁么？卞书记有他的考虑。省里班子的调整，意味着县里也快了。他的年龄也到了，可是，他真的不想下。当了多少年的领导，当了多少年的书记，他比别人更清楚地知道，当领导和不当领导的差别。这一点，没当过领导的人是体会不到的。他觉得，领导与被领导的最大差别在于，领导是决定别人（利益分配、前途命运）的人，而被领导则是被别人决定的人。在这个高度集权的体制里，卞书记体会的没错，还真是这样。卞书记不想成为被别人决定的人。尽管他作为县委书记在省领导面前也还是被别人决定，但至少在海源县、在海源的几十万人面前，他是决定别人的人。他怎么会轻易地甘愿舍弃这一切呢？

卞书记的不快，是觉得辜建功和付局长走得近了，而付局长没有把他很放在眼里，这是个不利因素。辜建功的作为显然是在加重这个因素。卞书记还没想出对付辜建功的办法呢，他倒先出现了。

卞书记会想出什么办法呢？那是后话。先说辜书记出了县政府大楼的去向。

38.2 辜书记上省城

辜书记自己到了车站，坐上长途车去黄港，再坐火车去省城了。他没有要小车，没有带秘书，这倒还有些在基层连队的作风。

到了省城，要见省领导就不那么容易了。从火车站开始，一路找来。虽然辜书记在龙头镇是书记，神气得很，可是一进城，也像个农民似的，啥也不明白，连坐几路车、在哪儿上、到哪儿下都搞不明白。好不容易才找到了省政府的大门。门前人来人往，络绎不绝。门口有军人站岗，但进出不需要什么手续，只要正常行走，不是鬼鬼祟祟的样子，都不来盘问，也不用登记，可以自由进出。大概那时还很少有人上访，或者即使有上访也不像后来似的把他们当成了洪水猛兽。

可进了大院后，找人就难了。行走中向好几个人打听付名利在哪儿，没有一个人肯停下来认真地回答他的问题，不是摇摇头，就是说不知道。有的甚至颇为怀疑地看他一眼，脚也不停地往前走了。态度好一点的就说，我们也是来办事的。辜书记心里就纳闷，堂堂一个副省级干部，在省政府院子里竟然不知道。最后，他找到了省长办公楼。

楼下的大厅里，放有桌子，有人值班，进去的人要登记。桌子前面有不少人等着。辜书记走过去说，我要找付名利、付省长。人家问，有介绍信吗？辜书记没想到还有这一手，他原本是想跟卞书记一起来的，所以自己没准备。他跟人家说，我跟付省长是老熟人了。人家一个嗤笑，不屑地说，你就是他

舅子也没用。这是怎么说话，把辜书记气的吧，亮出了自己身份，说：你不信？我是海源县龙头镇的党委书记。他特地把最后几个字加重了语气，这回可以了吧？结果人家还翻了白眼，极藐视地说：一个镇的党委书记有什么了不起啊，你怎么不说你是国务院下来的呢。去去去，走吧，走吧，别在这儿碍事了。气得卞书记真想把公文包摔到桌上，那时县乡机关还没有工作证这些可以表明自己身份的东西。

都快晌了，自己连早饭还没吃，人家中午也要下班了。他只好出来，在路边小铺吃了碗面条。他自己不会进饭店，怕进去了，人家狮子大开口挨了宰。还是吃碗面条比较省心，店家在门口的牌子上写得很清楚，大碗面，五毛一碗。那是在沿街居民楼底下的一个小店，进得店里，二十平方大小的屋子摆了八张桌子，已经有不少人了。那时去饭店吃饭不用粮票还没多久，所以来的人不少。好不容易挤了进去，在一个角落里坐下。一边吃一边想，这怎么办，这怎么办？对了，自己有付名利的电话号码。他又赶紧翻公文包，一样一样翻出来，摆在桌上，两个红礼盒也摆了出来。猛地一想，不对，要是被别人偷了抢了，怎么办？他赶紧双手捂着桌上的东西，紧张地看着四周的人。那模样真能叫人怀疑，不是他怕别人偷他的东西，而是他偷来了别人的东西。

一番折腾之后，也没找到付名利的号码。辜书记在这方面绝不是干练之人。再怎么办？好在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往龙头打电话找经学文，让他找一下付的号码，他那儿应该有。

辜书记这才收好桌上的东西，胡乱地吃上这碗面，紧紧地夹着那个包，去找路边的公用电话。这就又要费劲了，那时不是一般的电话就能打长途的，要跑到邮电局才行。这又得去找邮电局。又得靠两条腿去找。辜书记多少年也没有走这么多的路了，腹部也已挺起了大肚子。虽然还是初春，头上却已冒了汗，只好解开扣子，敞开上衣，紧抱着公文包，喘着气，问着路。这一路的艰辛，不去细说了。你别瞧这个辜书记怎么这么狼狈，其实相当一部分官员在权力没有笼罩着的时候，还赶不上咱呢。

找到了邮电局，亏得还能记得镇上的号码，通上话，那面再找来经学文。经学文翻了本子，没有付名利的，只有晋秘书的。那也行，晋秘书的，就晋秘书的吧。

辜书记按照号码，就在邮电局里打了过去。一时还打不通，对方忙音。辜书记那个着急上火啊，恨不能一拳把电话机给砸了。

没等他砸，后面有说话的了。“打不通啊，走吧，走吧，后面人还要打呢。”那个时候连打个电话有时都要排队。

辜书记只好退出来，等了几分钟，又排了个队，再打一次。好在这次打通了，电话筒里传来晋秘书那甜甜的极为标准的普通话。

“哦，是辜书记啊，您好，您好。你怎么事先不说一声，我到车站来接你啊。”晋秘书听了辜书记说的情况后，马上很客气地说，“你现在在哪儿啊？我来接你。”

辜书记也不好意思说是在邮电局打公用电话，其实他也说不清楚这邮电局是在哪条街上，就说不用了，就想见见付省长。

“好的，好的，付省长正好在。这样吧，现在也快下班了，付省长晚上还有一批客人。明天上午你来吧。”

“可是我进不来。今天上午我来过了，楼下值班的不让我进。”

“嗨……”晋秘书电话里笑了起来，“下班时，我下去的时候，跟他们说一下。明天你来的时候，就说是我跟你说过了。”

“好的，好的。”

晋秘书没问今晚你住在哪儿。

晚上，辜书记投宿了一家小旅店，七、八个人一大间，床铺围了房间一圈。辜书记几乎一夜没睡。气味和鼾声不说，这个包可是自己的生家性命，可别睡着了叫别人偷走了。他紧紧地抱着包，捂了一晚上。

第二天上午，辜书记早早的来到省政府大院，到了省长办公楼的门厅，一说晋秘书的名字，果然人家什么话也没说，头也没抬，手一挥，意思就是进去吧。辜书记赶紧往里走，走了几步，不对，又退了回来，问人家晋秘书在几楼啊？

“四楼。”

辜书记爬楼梯，上到四楼，只见那长长的走廊，明亮又光洁。两边是一个个的门，门上有一个个的牌子，写着省长办公室、副省长办公室……他来回走了两趟，可就是没看见付名利的办公室。正当着急之时，亏得有个办公室开了门，他探进脑袋，朝人家连连点头，小心地问：晋秘书的办公室是在哪一间？

里面那人还很惊疑地看了他一眼，好像是说，你这样的人也认识晋秘书？不过还是告诉了他：“往东，朝北，倒数第四个房间。”

辜书记连忙说：谢谢，谢谢。这才过去，找到了晋秘书的办公室。

晋秘书很忙，里面已经有三、四拨人在坐着等呢。晋秘书见是辜书记进来，忙站起，跟那些人：“不好意思，稍等会儿。”便笑着迎向辜建功：“辜书记，您来啦。来，请上里面坐会儿。”

上下左右都要照顾到，又能看出先得接待哪一个，又不能让其他人有失落感，这是领导身边秘书的主要功夫之一。

晋秘书把辜书记请到办公室的里间。辜书记把那个大的红礼盒放下。昨晚，辜书记特地用报纸把装一万元的那个礼盒包住，五万元的那盒没包，这样省得到时候拿错了。辜建功真能干出这种事，他对这些事还不熟练。他对晋秘书说：“海源的有些事，想跟付省长汇报一下。”付名利虽然只是省长助理，但别人不好叫助理，也都叫付省长。好在也是副省级，不能说叫得不对。

晋秘书又嫣然一笑，自是明白，说：“好的，不过现在付省长很忙，你先在招待所住下。我尽快安排，到时候叫你。”

“好，好，那我怎么找你呢？”

“噢，明天上午你来个电话吧。”

“好，好。”

辜书记回到那小旅社大房间的床铺上，百无聊赖地躺了一天，除了傍晚出去胡乱地吃了一点。这主要的倒不是因为节约，而是他不懂，他不会，他没有别的生活内容。等到第二天，又给晋秘书去了个电话，说是定了第二天的上午。又是一个第二天？那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能见上就行了。终于，在那天的上午，他见到了好不容易才见到的付省长。

付名利显得更精神更潇洒了，辜书记觉得相比之下，自己都矮了一截。

“付省长，祝贺你，祝贺你。”

付省长一摆手，说：“坐，坐，这些日子，还都好啊？”

辜书记坐下后说：“都好，都好。海源的干部群众都在想念你，盼你回去指导工作呢，”

付省长又摆了摆手，上身往前倾了下，音调低了半度，问：“那件事，海源还有什么反映么？”

辜书记赶快说：“没有啊，没有什么反映。这件事，我们严格控制范围，没有扩散。”

“那在干部队伍里，在知情人里，也没有不同反应？”

辜书记朝四周看了下，其实屋里没有别人。那是辜书记习惯了，在讲要紧事情的时候都有这个习惯。这就看出了办公室由平房改为楼房的必要性，因为辜书记是一直在平房里，要面对窗外可能会出现的人。

辜书记在沙发上又往前挪动了屁股，悄悄地说：“好像卞书记有点看法哎。”辜书记只说“有点”，先看对方的反应，给自己留点余地。

付省长也装着有点兴趣、又不是很在意的样子，说：“有点什么看法啊？”

“他也没跟我具体说，只是感觉出他有意见。这个人，心里有话是不会轻易说的，不是那么好合作的。这次我叫他一起来，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肯来。”

付省长说：“是啊，我也觉出一点。但是，不管他有什么想法，龙头的那项工作还要做，龙头的沿海优势还要继续发挥。”把私事变成用官话来说，这是官场里的一大本事。

“是，是。只要您付省长一句话。我会全力以赴去做好。”

付省长停了下，又看了看辜书记，语调更轻更慢，似乎是在说朋友间的私话：“如果海源要调整班子，你看怎么比较合适？”

辜书记没料到付省长会提出这个问题。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是上面的上面考虑的，这回居然上面的上面来问他这个小小的镇党委书记，真的是受宠若惊了。这一瞬间，他不由想到了自己，但在这之前他真是没有把自己和这事联系在一起。可是，说了怕太露骨；不说，又丢掉了这难得的机会。要说，又怎么说呢？显然只有两、三秒钟的时间。这两、三秒钟的时间里，辜书记的脑子里“哗哗”地闪过了好几个片段。好在辜书记对这些要比下馆子、找旅店有经验。不到第三秒的时候，他就说了：

“要找一个对沿海开发比较熟悉的人。今后海源的工作重点应该是放在龙头的沿海开发上，”

辜书记这句话讲得很得体，既讲了拿得出手的理由，又明显地摆出了自己。在海源的干部里，谁对龙头沿海最熟悉，那当然只有他了。还有个纪海洋，已经过年龄了，不构成威胁了。而且这样说，还不直接说出自己，免得显鼻子显眼的。三秒钟，就能拿出这个回答，应该说辜书记在这方面是有水平的。

付省长点点头：“这事呢，我也在考虑。你在沿海开发方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会向省委省政府汇报。”

辜书记听得此言，简直是喜出望外，两眼发光，连屁股也抬起来了。

付省长笑笑，说：“这事，你回去先不要说。省委这一头，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去做。”

“是，是。”辜书记忙不迭地说，“我会听从付省长的话。今后不论您有什么指示，哪怕赴汤蹈火、肝脑涂地，我也万死不辞。”辜书记充其量也就是初中水平，可要讲这些话也是一套一套的。

付省长摆摆手，说：“言重了，那倒不用。不过海源的工作，要靠你们，要靠你们靠得住的人。有什么具体要求，到时候，晋秘书会告诉你的。”付省长传达的信息是明确的，但从字面上是挑不出毛病的。付省长他也在提高中。

辜书记回到小旅店，赶紧翻看自己的公文包，再一次检查，看送上去的礼盒是不是拿错了。还好，没拿错，他松了口气。可是，很快又疑惑起来。这事应该是加大力度、豁上老本，把家里的钱都拿出来放上去，让事情更有把握呢；还是就把那个小盒子送上，省下四万元，反正这事情也已经差不多成了呢？

辜书记坐在床沿，看着包里翻出来的东西，想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想出结果。这个时候辜书记的智力又不够用了。

这个事例，比起后来公然无耻地买官卖官，情节要轻多了。但这是八十年代末刚开始出现的苗头，后来的事态就日益泛滥成灾，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38.3 协商

没多久，海源的领导班子果然要调整。调整领导班子，通常都不是用选举的方式，尤其是不会用直接选举的方式，那些东西即使在改革最为红火的时候也是被称之为西方资产阶级的，而是用“协商”的方式，就是关起门来由有关领导，最多再捎带一些有关人员，进行内部商量，最后由某人拍板。比较认真

的协商，事先还要搞个调查。这次，省委组织部就向海源派来了调查组。组长是三处的一位副处长，姓谈。

他们一来，整个海源县直机关就暗波涌动。人人脸上都有种特别的说不上来的表情。是紧张？是兴奋？是神秘？是担忧？是期盼？都说不上来。即使是那些跟当不当领导根本不搭边的人，也有种莫名的敏感。那几天，相互间登门拜访的、饭店小聚的、来回传话的、路边悄悄说几句话赶紧走人的，想不到的传递方式突然都多了起来。甚至见面也要眨巴几下眼睛，想看出对方有什么不能说的信息，或者想传递给对方一个什么样的信息。一时间，各种议论和揣测，沸沸扬扬，数不胜数。

调查组头几天。是了解情况，找县委的几个常委谈话。听听他们的想法，也可以提一些建议人选，调查组也适当透露一些省委的想法。按照组织原则，这些谈话内容都严格保密，绝对不容许外传的。

三天后，谈处长专门找了卞书记谈话。

谈处长说：“这几年形势发展很快，对县委的领导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进一步加强县委领导班子的力量。”

卞书记答：“是的，我们县委班子意识到身上担子很重，经常组织学习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县委班子的领导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现在看来能够适应对全县领导工作的要求。”

看卞书记这么说，谈处长就直截了当地切入正题：“省委决定对各县的领导班子适当进行一些调整，使县委领导班子更加合理，更能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你们海源县就作为全省第一批调整县级领导班子的试点。你个人有什么看法？”

“好啊，很好啊。可以吸收一些年富力强、更富有经验的同志进入县委班子里面来。也可以扩大县委、甚至县委常委的名额。这样老同志、新同志都有。既有新鲜血液，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又有老同志在里面传帮带，也照顾到老同志的情绪，有利于整个干部队伍的思想稳定和工作的开展。”卞书记觉得自己讲得面面俱到、滴水不漏，很有水平哎。

谈处长却是淡淡一笑，说：“那你个人呢？有什么想法吗？”

卞书记心里一惊。他完全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我个人？我个人有什么想法？那就是任劳任怨、积极工作，带好这个班子，起到一把手的作用，为党的事业贡献出我所有的力量。”

“你考虑过由更年轻的同志来担任县委一把手的工作么？”

卞书记的脸似乎有点发白了，“我，我……我需要这样的安排么？不需要么。我离退休还有一年的时间呢。我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都很好么，完全可以继续为党工作。我已经想好了海源全县今后十年的发展规划，我一定要亲手实现这个宏伟的蓝图。”卞书记越说越激动，显然他是不想下。

谈处长遇到了难题，只好直说了：“你为党工作了这么多年，成绩确实很大，也很辛苦。我们考虑到这些情况，想让你肩上的担子轻一些，也能有个更好的身体。”

“不用，不用，谢谢组织上的好意。我愿意，也完全可以继续为党工作。”

谈处长没办法了，只能减慢语速，表情很认真地说：“希望卞书记能认真地考虑我们的意见。你先想一想，明天我们再谈吧。”

卞书记只能无奈地退出。

他很是失望。作为一个老公安，革命了几十年，为海源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从解放初镇压反革命开始，到反右、反右倾，到狠抓阶级斗争，即使是文化大革命那么乱，他还是坚守岗位，搞“一打三反”。虽然有些事情搞得不那么准，像那个林海秀，人是他抓的，但枪毙不该他的事啊，后来平反不也是他去的么，还要怎么样？这几十年，如果海源没有他，能压得住阵脚么？不知道要乱成什么样呢？弄到现在，还心不甘、情不愿，被人家撵着下去。这合理么？

卞书记越想越憋得慌，可找谁去说呢？对谁也不能说。跟那几个副书记、副县长说？说不定人家还巴不得我早点走呢。尽管看起来相互间还挺和谐，可是这种牵扯到各人根本利益的事，到时候，谁也不会让。或许人家在边上都等了好几年了，嘴上没法说，心里可着急死了。连林彪在党章上都写明了是接班人，没两年就闹出那种事，唉。

去跟老婆说？那根本没用，等于白说。

那还能跟谁说呢？对了，跟公安局的周局长说。公安局的周局长一直在他身边，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说得不好听一点，可以说是一个心腹了。

卞书记先用电话联系好，晚上在公安局的一个办公室里见，那样是非常的保密、稳妥。

天黑下来很久以后，卞书记到了公安局。那间屋，门是虚掩的，连敲也不用敲，一推就开。周局长已经在里面等着了，上来把门推上，这才开始说话。

“今天他们找你谈啦？”周局长当然也是很关心这事的。

“是啊。”从卞书记的神情看出来，是有心事。

“他们怎么说？”周局长紧跟着问。

“他们要我退。”

“啊？不会吧？”周局长很惊诧。其实，他是想到的，只不过这个时候一定要表现出惊诧。

“是的，他们就是这个意思。”

“那你怎么说？”都是老公安出身的，他们之间讲起话来也这么干脆利落，就像审案子似的。

“我说，我说……如果，如果工作需要的话，我可以继续为党工作。”即使在周局长面前，卞书记也不好意思说就是不想下。

“那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谈吧。”

“……”周局长也沉默起来。

“唉，革命几十年，最后还要被请着下来。”卞书记，身为县委书记，在很多人面前可以说一不二，可实际上也是经常戴着假面具，说些言不由衷的话。他也只能在周局长面前发个牢骚。

“是哎，当前正是海源往前发展的关键时候，全县的工作真是离不开你啊。”周局长在讲这话的时候，底气也不是很足。

“这明天，怎么回答他们呢？”卞书记问。

周局长又一次沉默了。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回答，不好替卞书记回答。劝卞书记一下，那就退了吧，卞书记肯定会气得恨自己一辈子，哦，弄了半天，你也是在盼我下啊。叫卞书记就是不下，跟省委调查组顶牛，显然更不是办法，弄不好最后还会怪罪到我这儿。

卞书记一直在看周局长，以为他能拿出什么好办法。

周局长见卞书记一直看着他，只好说：“难啊，真是难啊。”

见周局长也拿不出办法，卞书记有点泄气了，低下了头。

周局长一看，先得过眼下这一关吧，咳嗽了一下，就说：“卞书记，或者这么办，你看行不行？”

“哦，怎么办？”卞书记赶紧抬起了头。

“这事情可以两手打算。一方面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希望能继续工作。该争取，还是要争取到最后一刻。如果他们实在坚持他们的意见，那你只好先接受。因为，说不定那不是谈处长个人的意见，而有可能是省委组织部的意见，甚至是哪个省领导的意见，也未可知。但是要提出两点。一是，先要安排好你的出路，到地区一级担任个领导，比如地区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啊。再就是你提名一个你信得过的、你放心的人选来接你的班。这样，你的影响就还在，你在海源还能说了算。”

卞书记听了点点头，周局长说得对，也只能这样了，明天就这样说吧。

回家后，卞书记想了整整一晚上。他反复地在想周局长讲的意思。是哎，还是小周说得对，这些年对小周没有白培养了。而且，他还讲到了说不定是哪个领导的意思。卞书记一下恍然大悟，这不就是那个付局长的意思么？乖乖，他一上来才几天啊，才是个助理哎，这么快就对我下手啦。太厉害，太着急了吧。那小子还有把柄在我手里呢，走着瞧。不要欺人太甚，逼急了，我也亮出来给他看看。啊呀，小周又说了，万一不行，要推荐一个信得过、靠得住的人。那推荐谁呢？小周不是在讲他自己吧？噢，转了个弯，他把自己也塞了进来。原来这小周也不简单啊，行，行。

第二天，卞书记按时去了调查组那儿。谈处长还是淡淡地问，想得怎么样啦？

卞书记还是说：“我觉得，我身体还行，思想也不僵化，工作也有成绩，完全可以继续工作。”

“啊呀，卞书记啊，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么多退居二线的老同志，都是因为他们工作没有成绩吗？你不是也做过很多老干部的工作，动员他们下来吗？到了你这儿，你怎么就不理解了呢？”

“说真的，我没有思想准备，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现在你要认真想了。”

“不，我还是要继续工作。”卞书记想着要坚持到最后一步。

“不是让你完全不工作，你可以继续工作，给你换一个更适合你的工作，不行吗？”

“什么工作？”卞书记马上竖起耳朵，警觉起来。

“比如到上一级的立法机构担任领导，还可以升一级么。”谈处长微笑着，右手掌还往上抬了一下，动作很形象哎。

卞书记停了下，想作最后的努力，“我还是想坚持我的意见。”

谈处长脸一沉，“卞书记，你干了这么多年的革命工作，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啦？告诉你吧，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省委组织部的意思，没有什么接受不接受的。”

卞书记立马浑身就松弛下来，软塌塌地靠在了椅背上。亏得还有个椅背，要不真能倒下。

他的脸色有些白，一半时说不上话。

谈处长也停在那儿，让他去想。三分钟后，才说，喝口水吧。又过了三分钟，再说，想得怎么样啦？

卞书记这才稍微缓过点劲来，说：“既然你们都已经定了，那我也没有办法。”

谈处长马上接到第二个话题：“新的人选，你看怎么安排好？从外面调来，还是从本县提拔好？本县有比较适合的对象吗？”

卞书记这时脑子里的线路不太好使了。昨晚想了一晚上，这个问题都没有想好。又沉思了几分钟。要是从外面调来，人家都冲着新书记去了，而新书记又不认识他是老几，那他自己在海源的影响，可以说不用几个月就没了。还是小周说得对啊。其实他对小周也是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但事到如今，也只能推荐小周了。

“还是从本县提拔吧。毕竟对环境熟悉一点，对工作衔接有利一些。我看公安局的周局长，各方面还不错，可以考虑。”

“哦。”谈处长似乎已经预料到了这一点，就说：“现在各项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找一个熟悉经济工作的同志比较好。你说呢？”

卞书记又沉默了。他的又一个想法被否定了。他的心都开始凉了，不想再说话了，甚至连为周局长争取的话也不想说了。

停了会，谈处长又说到了第三个话题：“有同志提到了这几位，你看怎么样？比如龙头镇的辜书记？有人说，他在工商局干过并当过工业局长，对全县的经济工作比较熟悉，现在又在龙头当一把手，龙头

作为沿海地区，是今后海源的发展重点，由他当海源的一把手比较合适。”这显然是付省长替辜建功编的几条理由。

这一下，把卞书记惊得原本软塌下来的身体又弹了起来，这又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再叫谁当县委书记，也轮不到他呀。就是在全县十几个乡镇党委书记里，辜建功也是排在末了的呀。怎么会是，怎么会是他呢？

“他怎么能行？”卞书记脱口而出，“我们县里比他强的多得是。”

“他还有什么问题么？”谈处长问。

“他，他……是有问题的……不过现在还不是说的时候。”

“卞书记，如果他有什么问题，请你现在就说，这也是对党组织负责。”谈处长的语气又严肃起来。

“……”

卞书记没有想好要怎么说。因为海上走私的事，一时半会说不清。弄不好还会把自己卷进去。在这之前，他就想过要把这事情讲出去，把付局长搞下来。直到现在，付局长上去了，连辜建功也要上去了，自己就要下去了，还没想好怎么说。

谈处长等了会，说：“如果你没有其他意见，那我们就谈到这儿。如果你有什么新的想法，可以直接跟我说，我给你留个号码。”

不过，卞书记啊，我还是要跟你说几句。作为老同志，革命几十年了，有些问题，特别是牵扯到个人的问题要想开一些，要看到形势的发展，多从大局想想。你这一辈子已经过得不错了，连文革都没有受到冲击，我们都很羡慕你啊。你还要求什么呢？下来，退居二线，这是迟早的事么，有什么想不通呢？早一两年，晚一两年，有多大差别呢？我看你还上了不小的火，何必呢？弄得别人也不舒服。不用这个样，啊？我这是作为个人谈心，多说了几句。回家再想想。下次有机会再见面，高高兴兴的。啊？”

38.4 不眠之夜

不多久，震荡海源全县的消息来了。省委发布正式文件，辜建功同志任海源县委书记。文件传到龙头，已是下午。龙头全镇立刻涌现出一片欢天喜地的喜庆景象。

镇政府大院里的所有干部，几乎都涌到辜书记办公室的门前，连连道喜。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悦和兴奋的神情。这倒也不全是拍马屁。多年的老领导，至少也是多年的老同事了，能有这样的升迁机会，在龙头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喜事，也是全镇机关干部和全镇老百姓的喜事。这是对多年来全镇各项工作的肯定，也为龙头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有利条件。怎么能不高兴呢？

不但大院里的干部们来贺喜。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镇的各个单位、各个村庄。

“辜书记当县委书记了。”

“辜书记当县委书记了！”

各单位的领导和一些职工也纷纷自发地涌向镇政府大院。有的拿着喜报，有的举着红旗，整个西街挤满了人。说句实话，这真的是自发，没有人有意识地去组织。因为这儿的人们习惯了上街以这种方式表达庆贺。很快大院门口响起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沿街贴上了标语，镇政府大门上还拉起了大红横幅：“热烈祝贺辜建功同志升任县委书记”。

一个多小时后，连县里好些单位的领导，也开着小车前来贺喜。西街上热闹得，小车在西门外就开不进来了。

龙头镇连过年也没有这么热闹过。

晚上，镇政府在海边的那个宾馆举行盛大宴会，摆了二十几桌。纪海洋主持，祖云涛致辞。盛赞的话，这儿就不重复了。经学文前前后后、忙里忙外，辜书记能提升，他是最高兴了。

围着辜书记想来敬酒的，那是里三层、外三层，不是各村各单位的一把手，那是靠不上边的。

连宗发奋也跑了过来，挤到最前面，“辜书记啊，祝贺，祝贺。咱龙头镇真是块宝地啊，大富大贵出了真人啊。我还真想回到龙头镇，沿着您的足迹前进啊！”

辜书记已是满脸红光，语音都反应不过来了，只知道“嗯嗯，嗯嗯。”只有看到秦有理也想挤过来，就对经学文说，有理就不用过来了吧。当经学文把话传给秦有理时，秦有理鼓了一肚子的气，但也只好无言而退。

经学文还很有心地叫人赶到县城买来了焰火。到了半夜，整个宴会到了最高潮的时候，宾馆前的沙滩上燃放起了焰火，五彩缤纷的礼花在夜空中绽放。这是龙头镇在互助会成立之后的又一次燃放焰火。整个龙头镇的人，附近十里八乡的人，都站在院里、站在街上、站在村口，远望这海边一颗颗冲天而起又四下炸开的斑斓礼花，都鼓着掌，叫着好。那个神奇啊，那个美妙啊，看得乡亲们都不暇接。这次比互助会成立时要放得多得多，大约有三、四十颗。龙头镇真的是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天色渐明，晨曦渐起。祖云涛看着辜书记晃晃悠悠、不太好坚持了，说，今天就先到这儿吧。辜书记还没尽兴，连忙摆着手，嘴里嘟哝着：“还行，还行”。两、三次之后，连“还行”也说不出来了，这才让一直在边上的尹会计架着回去。

尹会计做事表面上一贯低调，但这一次却一反常态一直陪在辜书记的身边，还替辜书记挡了不少酒，让人看出来他们之间已不是一般关系。或许尹会计正是希望借此机会让大家看出这一点，他尹会计今天居然成了县委书记身边的一个红人。这对于他，是何等的了得。

可家也不好回啊。不说一路上人们的驻足观望，就是北门外镇政府的那个家属院也是挤满了人。经学文在前面好不容易推开一条路，辜书记才在尹会计的搀扶下进了家门。

一进门，经学文就赶紧推上房门。皮珊珊接过尹会计的手，把辜书记扶上炕。辜书记还没等躺下，就开始吐了。辜书记这些年已经练出了好酒量，不过今天确实是喝多了，虽然尹会计已经给他挡了不少。

有个事还要补充一下，省政府在公布辜建功任职的文件之外，还通告了两个任免决定：卞书记调任湖西地区政协副主席，在湖西当地的传达中还明确了是排在末位。国内实行中央-省（市）-地区（市）-县（市）-乡镇五级政府管理体制，地区管理若干个县和县级市。地区政协副主席相当于副厅级，比正县级要高出半级。不过一般来说，正县级领导如果从实职退下来，安排个荣誉性职务的话，通常是在本地区，像卞书记这样算是特例。周局长调任省第四监狱政委。第四监狱在黄河口，就是李辰被打成右派去劳改的那个农场。据说当年连夜押送李辰回来的那个牛干部，就是现在的场长。周局长过去，也就是个平调。这些对于卞书记和周局长来说，那肯定也是个不眠之夜。

卞书记在想，怎么办？其实，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他也很清楚，没有什么接受不接受的，他也不过是个棋子。在他手里的棋盘里，他下别人。在更大的一个棋盘里，他也照样被别人下。再去跟周局长商量下，听听他的意见？不去了吧，说不定，周局长正在恨他呢。周局长的被调走，显然是与他的推荐有关。把周局长调出，就能减少辜书记今后工作中可能有的困难。这一套，他明白，要是他是组织部也会这么做，只是苦了周局长。付名利啊付名利，算你狠。可是，谁怕谁啊？那件事，我迟早要翻出来，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反正我也离开海源了，那个好处我也得不着了，也不想得了，往下就看我的了。

38.5 余波未了

接连几天，登辜书记家门的人还是络绎不绝。不是都贺过喜了吗？怎么还来呢？没完没了啦？那是因为头两天人太多，好多话没法说。趁辜书记还没走，不得抓紧时间赶紧说说嘛。人家辜书记上县里去，镇上工作的交接那是镇政府的事，别人操那么多心干嘛呀？嗨，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辜书记走了，可辜书记的缺，谁顶呀？那顶上去的人，他的缺又让谁去顶呀？。在单位里工作了十几年、几十年，不就在等这个缺吗？这个机会能轻易放过吗？再说，省里调整完调县里的，县里调整完调镇上的，那镇上别的单位呢？下面的那么多村委会、党支部呢？这些事，都要提前做工作呀。等，能等得来么。再等，不就有那句话么：等得黄花菜都凉了。就像天上的流星，你能等它掉到你脚跟前么？

这两天，这个也来找，那个也来找，听得辜书记都烦死了。当然，他也不会去表态，就说这些由镇党委去全盘考虑吧，到时候，我能说得上的话，会尽量去说。但有一件事是不能不说的，那就是谁来接他的班。那天中午趁吃饭的时候，辜书记找来纪海洋，征求他的意见。

纪海洋想到辜书记会为这事来找他的，就说，祖云涛这个人不错，有水平，既思想开阔，做事也稳妥，可以担当这个工作。

但是，辜书记有他的想法，觉得祖云涛不如经学文。你看，这两天，这么多的事，这么多的人，全靠经学文在忙前忙后。祖云涛就表现得没那么积极，是对自己有看法？相当多的领导其实比别人更敏感。更何况祖云涛的思想过于开放，接受新事物太多。这一点，他既看不惯，也不放心，觉得不是一路人。他问纪海洋：“经学文这个人怎么样？”

纪海洋想了下，说：“经学文这个人是不错，是个好干部。但是相比较起来，要担当一个总揽全局的职务，从政治水平、思想深度、学识等等，比祖云涛还是要差一些。如果祖云涛改任书记，经学文提拔成镇长，恐怕会更合适一些。”

纪海洋的话很平和，不是非得要怎么样。

其实，辜书记对经学文也有不满意的地方，那小经在思想上也是受了祖云涛不少影响，但相比较起来他和经学文更近一些。他要维持自己在龙头的影响，在现有的这些人里，就得选经学文当党委书记。他当了多年的党委书记，很清楚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委书记没有明确的职责范围，想管什么就管什么。而行政领导是有职责范围的，多半是管一些具体的事务性工作。一般来说，当地出了什么事，都是追究行政领导的责任，没有追党委书记的。那两年，曾经有提出“党政分开”，这本来是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解决的问题。他是最反对的。党政分开以后，党委还能管什么？就管喊口号？在分开的情况下，就算叫你管人，能管得动吗？所以，在像辜书记这样的一批人反对之下，“党政分开”后来就不再提了。

“噢，这两个人都行，看县委怎么定吧。”辜书记也是淡淡地一说。他不想在纪海洋面前把分歧挑开。

最着急的，要数秦有理了。他听大院里的人在议论祖云涛和经学文，说这两个人最有可能当新的书记，实际上也确实没有别的更合适的人选。可是秦有理在想，谁说没有别人，还有我呢。人家跟他说，那两个可都是红二代啊。说来也是，那两人的爹都是1949年以前参加工作的老革命了。这儿有条政策杠杠：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算是革命老干部。就是到年龄退下来，可以享受高于一般职工退休待遇的离休待遇，不但医疗、用车、住房、疗养等待遇从优，工资还能再提一级，只是专职秘书略有减少。请注意，是指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以前，当工人、当农民的，哪怕是被称之为革命的主力军、同盟军，都不在内。

秦有理说，我也是红二代啊，我妈是革命烈士，我爹也是老干部啊，打鬼子那时就是民兵小队长、农会副主席呢。

别人对他说：“算了吧，那些官二代才算是红二代呢，你那个爹算个什么呀？”

“我，我，我……”秦有理涨红了脸，想去找辜书记说说。不过辜书记那晚传过来的话，他是知道的。唉，上了宗发奋的当，挑唆申光荣去写那个匿名信，弄得叶丽娜过来大闹一番，今后在镇上做人难，还谈什么升官呢？真的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当然，秦有理是不甘心就这样退出舞台的。往下再怎么做，只能等再说了。

还有西北村的事。西北村对辜书记的升迁，当然是特别的高兴了，那毕竟是西北村的女婿啊。西北村出了好几个女婿。出了个李辰，虽然是好人，可多少年里被弄得灰溜溜的。出了个时治国，那个没良心的。皮平平到现在还没找到，一直还是全村人心头的痛。连宗发奋因为王溪的事，也差点成了西北村的女婿。这回，辜书记这个女婿，是最撑面子的了。庆贺辜书记升迁的那个晚上，西北村还出动了久违的秧歌队，是王山接替了他爹的角色，在前面当起了领头的“带傅”。整个秧歌队也演得有声有色，赢得了满街的喝彩。

但是，这并不能改变辜书记对西北村的态度。因为辜书记不赞成西北村最近的改革，尤其是不赞成民主选举村委会的做法。他认为，那会削弱他对各村的领导，当然往外讲的话，要说成是“那会削弱党对农村的领导”。

他很不喜欢肯接受新鲜理念并有自己想法的彭小宾，现在可以撤掉这块石头了。他单独找来杜家骏说：“你们村里的选举没有经过镇党委的同意，是无效的。你们的班子要重新调整，把担子交给更年轻的同志。我建议你们可以考虑皮高深同志担任村党支部书记。面对年轻同志，你们不要有个人的私心杂念哦。据我长期观察，皮高深的水平、能力，各方面都是不错的。他接班，我们党委放心。”

杜家骏听了大为惊讶，不但惊讶于这位辜书记怎么好意思说得出口，更惊讶于皮高深还不是党员呢，就说：“我年纪差不多了，已经退下来了，村里的事，我也不管了。不过，您讲的话我可以回去转达。但是皮高深还没入党呢。”

辜书记也一怔，啊呀，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可是脸上却毫不改色，马上说：“你们的组织发展工作怎么这么落后呢？把这么好的同志挡在我们党的队伍的大门外，你们要尽早解决他的组织问题啊。要不他当村委会主任也行。”

“那我回去说说。”

“不是说说，而是要去做。”

其实，原本辜书记为显示清高，对皮家的事并不怎么过问，对皮高深也从来没有放在心上。现在他明白过来了，要办大事情，还需要一批帮手，而最放心的帮手就莫过于自家人了。这是他最近才想通的一件事。虽然他也很清楚皮高深不是一把好手，但也得这么去做，把他扶起来。

杜家骏回去一说，西北村整个像翻了锅。对女婿的庆贺还没过，这女婿反过来就已经不认全村老百姓认定的事。皮高深是什么人？从穿开裆裤开始，村里人彼此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皮高深不是坏人，是个好人，但绝不是能人。他怎么能带领大家奋勇向前、共同致富呢？

“辜书记说是我们村里的那次选举没有经过镇党委的同意，他不认。”杜家骏照直说了。

首先是几个年轻人就不算了。邬朝阳带头起来说：“那我们全村村民大家都来亲笔签名，向上级党委表明态度，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家的意见。看他党委怎么说？”

“对，对。”平海波、小连子也都附和。他们找来了纸和笔，一家一户地去跑。两天时间就征集到了全村村民对新选举的村委会和党支部认可的签名本。本子上，除了当事人村干部们和皮安已一家外，只少了一个人，那就是秦德才。秦德才已经糊涂了，嘴上还是喜欢不干不净，不过早没人理他了，邬朝阳他们也没去找他。

当邬朝阳他们把一页页签着歪扭的名字、按着鲜红手印的签名本送到镇政府、交到祖云涛手里的时候，祖云涛心里想辜书记何必多此一举呢，跟西北村的人说：“我们会尊重群众的意见，认真地向县委反映。”

又过了几天，还是挺快的，县委来了文件，龙头镇是全县最早调整班子的乡镇之一。镇党委书记由经学文担任，其他人基本都没动。沿海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由辜书记兼任。

镇政府还新设了企业办公室，由皮高深任副主任（代主任）。这皮高深不是农村户口么，还不是机关干部哎，能当主任么？那时有个办法叫“以工代干”，在县里面也就是以农代干，就是没有正式的机关干部身份，但从事这份工作。领的工资不按干部标准，另有一套，要低一些。在公务员制度完全实施以前，这种情况还是很多的。而且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它的具体形式还不一样。直到现在，有些行政部门执法出现了偏差，就把责任推到了所谓“临时工”身上，也是类似这种情况。

第三十九章 二奶

1978年2月8日

39.1 横刀夺爱

辜家进入了应该是最欢乐的时光。辜建功去县里当了县委书记之后，他老婆皮珊珊当上了龙头镇的妇联副主任，他儿子辜向东当上了镇团委副书记。新官上任，能依靠的人还不多，所以先得把他们提起来。新官上来，为显示清高，刻意和老关系、尤其是和自己的家人、亲戚保持距离，是一种办法。或者干脆打破这个框框，内举不避亲，先把七大姑八大姨提起来，这又是一种办法。只不过以前刚当上官就用这种办法，就这样显鼻子显眼把老婆孩子马上提起来的，很少有，现在真的是变了。

但是最欢乐的要数皮高深了。

皮高深是被公布为镇企业办公室副主任。这个企业办公室，别的乡镇还没有，是辜书记提出来要设的。他这两年看着镇上起来了一批企业，这些企业，有的不行了，如造纸厂，有的还真兴旺了，如针织厂。而且这些兴旺的厂，还往往就是民营的，说白了，就是私人老板的。这些企业，镇上管不着，眼看他们发展了，厂里的职工比他们镇政府的人还多，老板的收入比他们镇政府领导的工资不知要高出多少。让辜书记感到最不舒服的是，他们还轻易不来求领导，让领导插不上手、说不上话。按辜书记的说法，就是现在这帮人翅膀硬了，目中无人了。其实那些小老板还远没有到那个地步，可辜书记已经觉得很不舒服。你看这次全镇都来祝贺自己升迁，唯独针织厂的辛狗狗没有露面，就派了个妇女高秀珍的来。其实高秀珍当时跟他说了，辛厂长去美国了，她作为代表过来，是辜书记自己没听进去。别看那天来了那么多人，辜书记自己也是喝得醉醺醺的，可是谁来谁没来，辜书记是清楚得很呐。所以，辜书记是下了决心，要设这个企业办公室，职能是对龙头地面上所有的企业进行“调查研究、联络协调、监督检查、解决困难”，你能说不对吗？这就开始了行政机构对民营企业的干预。这叫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还是要把权用足啊。哪怕是用过了头，也不能白白浪费它啊。

问题是皮高深不是这块料，挑不起这个担子。一个中年农民，几十年来种地浇水，他哪知道什么叫企业管理呢？不会这个还不要紧，倒是又有权又有闲，整天到那几个企业里瞎逛，不会这个会那个了。会什么了呢？

他喜欢到海边的这几个单位来，因为这儿远离镇上，在这儿转悠自在得很，省得在镇上人多眼杂嘴碎。这天下午，他到貂场来了。这儿，他觉得也是他的管辖范围。

从高秀珍离开以后，这貂场就一点点赶不上以前了。当然，各地养貂的人多了，市场竞争激烈，价格上不去，是貂场难有起色的重要原因。再有貂场少了个像高秀珍那样肯吃苦又能干、样样走在前面的

人，能把那几个小姑娘也带起来，现在就没了那样的气氛。养貂既是个苦活，也是个技术活。尤其是制皮，是很有讲究的，行话说：皮差一线，钱差一万。不肯干、不肯学，怎么能行呢？

但现在的貂场，按说毕丽芳是个顶梁柱了。但她不但不肯干、不肯学，而且还是个极爱漂亮的人，远不是像高秀珍那种吃苦耐劳、肯铺下身子干活的样。睡完午觉起来，喊那两个小姑娘：“起来，起来，干活了！”在紧身的棉毛衫外面披上件大红褂子，卷起裤腿，穿上雨鞋，拎起水桶，拿着长把刷子，样子还挺像的，要去洗刷貂舍的地面。走进貂舍，天天是那股腥骚的异味，她实在是闻够了。虽然她已经是村主任家的儿媳了，可她还得干这活，她真是不情愿。她想在家里养起来，可丈夫杜长贵不同意，说这儿貂场需要人。经营不景气，雇不起更多的人，尤其是还真需要有一个贴心的人顶在这儿。而且她公公杜家骏还特地说了，咱家要在村里带个好头，都要在第一线参加劳动，要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保持劳动人民本色。“这么年轻轻的，不干活，像什么样？”

“小游，你到井边往上提水。”貂场没有自来水，都得靠自己从井里往上提，这是个辛苦活。

“小益，你往地上冲水，使劲刷。”

毕丽芳把水桶和长把刷给了小游、小益，支配着她俩干活，自己在笼舍间转一圈，看看有什么情况。

正在这时，前面院子有人喊起来了：“有人吗，有人吗？都在干吗呢？”

毕丽芳闻声转过身，皮高深已经踏进里院的貂舍了。

“唉吆，什么味，这么重。”只见皮高深鼻子一痒，忙用两手捂住，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两步。

“啊呀，是皮主任啊。”毕丽芳和皮高深算是一个村的人了，都认识，“快到前面屋里坐吧。”

“你们真是不容易啊，这么大的味，我可是受不了。”皮高深赶紧退了回去。“这是你们的宿舍？”貂场前院有两排房，前一排是办公室、宿舍，后一排是仓库。当然说是一排，其实也就是几间房。

“是的。”毕丽芳答道。

“你还在这儿住？”

“我在这儿还有铺位呢。有时值个班，或者晚上有个什么事，就在这儿住了。进来看看？”

“好，好。”

进得屋里，里面很窄，两边各两张床。虽然是女孩子的宿舍，但毕竟是砖墙泥地，没有鲜亮的感觉。

“真不好意思，乱得很。”毕丽芳解释着，顺手把肩上的褂子放在床上。

床铺间的空隙很狭小，面对面的站着，毕丽芳那隆起的双乳几乎能碰到皮高深的胸膛，说话的气息都能撩拨到皮高深的脸上。皮高深看着毕丽芳，那紧身的衣衫、丰满的体型、微微烫过的卷发、红润润的脸庞、笑盈盈的嘴唇，一时间竟走了神。

“皮主任，坐吧。”毕丽芳依然笑着说。

“噢，噢。”皮高深这才回过神来，说：“啊呀，啊呀，你们这儿条件还真艰苦啊。”

“是哎。”毕丽芳也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也就这么答应着。

“你这件衣服真好看。”皮高深一抬手，不经意碰到了毕丽芳的前胸，那柔软的感觉像通了电似的，传遍了全身。毕丽芳也不好意思说别的，伸手想挡一下，又不好太用力，她的手便落在了皮高深的手上。皮高深以为小毕没有不高兴表示，顺势就把她搂了起来。

毕丽芳轻轻的说：“别这样，她们还在后面呢。”皮高深也就松开了。

“你这么漂亮，在这儿有点可惜了。”皮高深说着。

这句话，毕丽芳听进去了，说：“在这儿真没意思。不过，这有什么法？命也就是这样。”

“我想想，说不定能有办法。”

看来毕丽芳很有这个意愿，她急着问：“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

“要不，就上那个宾馆。那里面条件好，风吹不到，日头晒不到，房间里还有空调呢。”那时海源才开始有空调，而且只有大宾馆里才有，连县领导家里还没有。龙头的第一批空调就安装在这儿，那时可是一件大事，乡亲们想进来看看都不让。

“是么？能行么？”这个吸引力可大了，毕丽芳的眼睛都有了光，那讲话的气息又洋溢到了皮高深的脸上。

“应该能行吧。我是企业办公室的主任，他们宾馆也归我管。”

“那好，那好，高深哥，快帮我说说吧。”毕丽芳的双手在皮高深的胸前轻轻地锤了起来。

皮高深又一次把毕丽芳搂进了怀里。这一次不仅仅是搂了，而是紧紧抱住。毕丽芳轻声地笑着，从背后反手把门推上了。

有企业办公室主任的出面，把西北村村主任的儿媳调到宾馆，没费多大的事。当皮高深把这事告诉毕丽芳的时候，毕丽芳当然非常感激。那宾馆她去过几次，那么地干净、整洁、舒适。在龙头的地盘上，这儿差不多是个天堂了。看看里面的服务员，虽然大多也是当地的女孩子，可个个是挑出来的俊俏丫头，穿着漂亮的服饰，踩着那时还不多的高跟鞋，随着一阵“咯噔咯噔”的响声，在亮洁的水磨石走廊上挺胸直腰，那么精神地走来走去，她羡慕死了，向往极了。但是，她从来也没敢往那儿想过。当皮高深告诉她，她也可以去那儿了，再也不用闻那些骚味，再也不用扫那些貂屎，再也不用扒拉貂的腚去帮它们交配，呸，呸，那是什么活。她对皮高深，怎么能不感激不尽。

然而，问题又来了。当她高高兴兴地告诉杜长贵，说她可以去海边宾馆上班的时候，她丈夫非但没有高兴的表示，反而是坚决的不同意。杜长贵除了觉得貂场需要有个家里人在那儿顶着，对于到宾馆工作，也有他的隐忧。

“你以为宾馆的工作好干啊？那是伺候人的活。”

“伺候人总比伺候畜生要强吧？”毕丽芳也反唇相讥，毫不退让。

“伺候畜生，畜生可没有坏心眼。伺候人，人有时候连畜生都不如。”杜长贵的意思有点讲出来了。

“要这么讲，那就没法说了。要讲人，哪儿都有人，都好不到那儿去。你就好到哪儿去啦？”

“你，你……”杜长贵被将了一军，竟然答不上来了，好半天才说了句：“你看不上我啦。”

“你扯哪儿啦，这事跟你没关系。宾馆里有空调，有自来水，为什么不去享受一下？”毕丽芳也没有更多地想到是去工作。

“那，那不是为你准备的，是为客人准备的。”

“为客人准备，我就不能跟着一起享受啦？”

“反正你不能去。”杜长贵也不是个会讲话的人。

“反正我是去定了，你想拦也拦不住。”

杜长贵举起了手，还没落下，反倒是毕丽芳挺起了胸膛，往前走了半步。“你敢打人？你以为你是村主任的儿子就可以仗势欺人啦？”

杜长贵还真没有以村主任儿子的身份去欺负过别人。这个身份还曾经吸引过毕丽芳，只是如今这个吸引力，渐渐失去了光泽。

杜长贵无语了。

毕丽芳却是气嘟嘟地走了。她真的去了那宾馆。好在宾馆里有吃有住，难不倒她。杜长贵也只好干瞪眼。

过了几天，皮高深来到宾馆。

毕丽芳见到他，高兴得不得了，“皮主任来啦，来歇一会儿吧。”便上三楼，开了那个最好的308房间。

皮高深跟在后面，一眼不离地看着毕丽芳。她穿着翻领紧身西式制服，脚蹬高跟鞋，走起路来屁股一扭一扭地。毕丽芳本来就是漂亮姑娘，这下更是风情万种，真把皮高深看迷了。

毕丽芳开了房门。皮高深进了门就目不转睛地看着她。毕丽芳带上房门，就说：“高深哥，要谢谢你了。”

皮高深咧嘴一笑，“怎么谢啊？”

“随你了。”毕丽芳抿嘴一笑，脸上绯红了。

皮高深高兴得一把抱住，下面就什么话也不用说了。

39.2 一刀两断

这之后，皮高深就三天两头来宾馆。虽然谁也没有亲眼撞见，但风言风语都传开了。

怎么没人劝呢？别人不好劝，他姐姐皮珊珊不能劝两句，说这样做对你姐夫影响不好么？这时辜书记一家都到县城里去了。卞书记在的时候，为县委县政府机关盖了幢四层的居民楼，有自来水，有卫生设备，这在海源全县是第一幢。现在刚盖好，卞书记就走了，没捞到。预留给卞书记的那套，正好给了辜书记。不但如此，连留给周局长的那套，辜书记也要了过去。管分房的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当然不好说别的，也就给了他。妻子和儿子，也都搬了去住。到了县里，工作当然也就换了。在为干部队伍增添新鲜血液的议题下，皮珊珊由镇妇联副主任升为县妇联副主任，辜向东由镇团委副书记升为县团委副书记。此时，官场的风气和前两年已经不一样了。有人会毫无顾忌地这么去做，但已经没有人会出来反对了。至于皮高深的那些事，就更没有人跟辜书记去说了。

毕丽芳这一头呢？毕丽芳看上去有时候打打闹闹、有说有笑，其实是个深交不多的人。不像别的女孩子，还有些同龄闺蜜。加上她是从北山来的，没有什么亲友在这儿。尤其是前两年，她撬掉了杜长贵的婚姻，自己取而代之，更没有什么人愿意跟她接近说什么了。按说高秀珍能和毕丽芳说得上话，是高秀珍把她从北山领过来的，也是高秀珍最早知道毕丽芳最近的这些事，凭着高秀珍在北山老乡里的威信，完全可以出来说几句。但是高秀珍也不想多这个嘴。她已经知道毕丽芳是什么人了。她已经离开了貂场，对杜长贵也没有什么好感。理论上讲，跟西北村也没有直接的联系了，不想再掺合进去了。

没有人过来劝这个新任县委书记的小舅子。大家都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权当没看见。实际上是在等着看这场刚开始上演的戏会怎么收场。但是，这在皮高深和毕丽芳看来，气氛是很宽松的。两人更不避讳、更加热烈了起来。连北门外镇政府家属院里辜书记原先住的那套房，也成了他们俩新的活动据点。

顺便说一下房子的事，有个很不合理的地方。因为那时房子还没有商品化，不存在买卖的事，都由单位来分配。职工的居住情况，就跟单位的性质和本人的职级有很大关系。很多基层小企业几十年也没钱盖房子，也就几十年没有房子可分。所以大多数人的居住状况是很窘迫的，子女长大了要成家，只能在屋子中间用板子前后隔开，还有的是隔开再隔开。再就是搭个阁楼，把屋子上下隔开，爬上去连腰也伸不直。而且有钱也没处可买，况且还没有钱，在这方面真的是无路可走。当时八十年代，在云南人口普查时有个例子，有一户六口人，住一套两间的房，似乎很正常。其实是一个老太和五个已成年的女儿。那五个已婚的女儿都没有自己的住房，只能五个女婿每周轮流过来睡一个晚上，那是多少的人间心酸啊。机关、事业单位要好一些，尤其是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分的房子都很大。调动工作时，事先要讲好，通常是接受单位要安排好房子。尤其是上级指令的，任命一个领导到一个新的单位，新单位肯定是要安排得好好的。而在原来单位，他往往又是老领导，原单位不好意思收回他的住房。这样就形成了一些领导到一个单位有一套房，到一个单位有一套房。在那时人均只有几平方米住房的情况下，这就不仅仅是不合理的问题了。一方面是有人想要几平方米的一张床大小的面积而不得，另一方面有的人是整套房整套房地拿。

首先挑开事的是杜家骏。他不能再忍受了。堂堂一个村主任，儿媳妇居然做出这等丢人现眼的事，成何体统。他把杜长贵喊到家里，大骂了一通。

“早就跟你说，那个不是好东西。现在看到了吧？她当时能贴你，现在就能贴别人。丢人啊！把杜家的脸都丢光啦！”

杜长贵虽已年近五十，也只好站在炕前听他爹骂。

“给她最后一次机会，叫她立即回来，承认错误，写下保证书，不然就扫地出门！”

毕竟杜家骏当了这么多年的干部，讲出话来既讲政策又有力度。

杜长贵听了这些自己都觉得胆战心惊的话，来找毕丽芳。可现在，他连要找到她都不容易了，毕丽芳躲开他了。那天他听别人告诉他，毕丽芳又去了乡政府家属院，他赶了过去。

可等到走到家属院门口时，他的脚步沉重了起来。他在想，他是来干什么的？是来劝毕丽芳回头？他已经没有这个信心。他知道，他曾经对于毕丽芳的吸引力，现在已经几乎荡然无存。他这两年在明显地趋向疲惫衰老，而毕丽芳却正相反，越发地年轻靓丽。貂场的衰落，使他也没有能力提供毕丽芳想要的物质享受条件。他是来捉奸的？他又没有这个勇气。杜长贵不是个勇敢的人，更不是个强悍的人。他没有在狂风恶浪面前敢于顶风而上的魄力。他见了皮高深会做什么呢？上去两个耳光，责问他为什么勾引自己的老婆？杜长贵远远没有这个胆量。人家可是县委书记的小舅子，想踢谁就踢谁，想踩谁就踩谁。正在寻思中，走过来一个人，看了他一眼，把他内心的思绪又完全打乱了。

等他停下脚步定睛再看时，暮色中的家属院里暗暗的，各家都已亮起了灯，拉下的窗帘布上透着灯光。他事先打听好辜家的屋子是在第……第几个门喽？正在懊恼当时明明是记清楚的，现在怎么又忘了的时候，突然发现这几间没有光亮。这时，杜长贵的心里真是五味杂陈。这屋里面将会是什么？他希望出现的情况又是什么，他自己都说不清楚。心里是抖抖的，可另一种呼喊又出现在他耳边，男人的尊严叫他不要退缩，脚步踟蹰着向前。到了门口，又在想，是喊还是敲门。喊的话，会有很多人听见，这事也并不光彩，他也不希望弄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于是拿起手巴掌拍了起来。

“嘭，嘭。”不大不小的声音。

在里间正拥抱着毕丽芳的皮高深立刻放下手，紧张地看着她。

杜长贵在外面等了会，里面没有动静。

“嘭，嘭！”敲门的声音又大了点。

皮高深无奈地拿开手，皱了皱眉头，表示厌烦。毕丽芳咧了嘴似乎想笑了。她一点也不紧张。

杜长贵在外面等着，里面依然没有反应。明明在里面，还不敢答应，气不气人？杜长贵冒了点火。

“嘭！嘭！”更大的敲门声。

皮高深只好有反应了。他挥了挥手，示意半丽芳躲到最里间去。可是半丽芳没动。他只好硬着头皮来到外间，嘴里嘟哝着：“谁啊，谁啊？都这么晚了。”把门一开，见是杜长贵，吃惊不小。

“是长贵哥啊？这么晚了，还来啊？”顺便还想用身体挡着门口。

杜长贵没理这个茬，挤了进来。

“哎，哎。”皮高深轻声地嚷着，眼看着杜长贵要走进里屋。这怎么办？这事要闹起来，对自己也不好。正在他着急的时候，不得了，反倒是半丽芳迎了出来，站在了里间的门口。皮高深心想，“坏了，坏了。”忙把外面的门推上。

真见到了半丽芳就在这儿，而且还这么毫不打怵地站在这里，杜长贵反倒没了主张，“你，你……你怎么在这儿？”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半丽芳一点也没有理亏的意思。

“噢，噢，我们在谈工作，谈工作。最近宾馆的事儿比较多。”皮高深解释说。

“谈工作？连电灯也不开啊。”杜长贵质问道。

“噢，噢，线路坏了，电灯不好使了。”皮高深说。

“谈什么工作，还用到这儿来？”杜长贵又问。

“办公室里，人多嘴杂，有些事不好说，就请小半到这儿来了。不凑巧，线路又坏了，没有电。呵呵。”皮高深尴尬地解释着。

一个不知道怎么攻，一个不知道怎么守。看似气氛紧张，却又不温不火。这二位比他们的前辈差远了。连杜长贵都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进行了。他看半丽芳反倒在一旁袖手旁观，便把矛头指了过来。

“跟我回家去，别在外面丢人现眼。”

谁知反倒是半丽芳来气了，嚷着：“回家？回什么家？这儿就是我的家。”

原来刚才在黑暗中半丽芳和皮高深相拥的时候。半丽芳想得远了，如果能把这套房子，不仅仅是个活动据点，而且是一个“家”，那该多好。当这个幻想还只是个依稀的影子，没来得及跟皮高深讨论呢，杜长贵就来敲门了，半丽芳心里怎么能不火呢。

“什么？你说什么？这儿就是你的家？”杜长贵大吃一惊，没想到半丽芳竟然这么厚颜无耻，举起胳膊就要打过去。

“这儿怎么不能是家？革命者四海为家，到处都是家，这儿怎么不能是家？”半丽芳还会讲这一套，回答得很利索。

啊呀，是啊，这个话好像是哪个革命导师说过的嘛。杜长贵一时记不起来，这该怎么反驳呢？杜长贵卡壳了，想不出来了，便不再拐弯抹角、直截了当地说了：“跟不跟我回去？”

“不跟你去。”毕丽芳回答得很干脆。

“那，那，那……我们就一刀两断。”杜长贵想起了他爹的话，也放出了狠话。

“两断就两断。”毕丽芳也绝情地说。

“你……你……”杜长贵又抬起了胳膊。

毕丽芳又一次瞪起眼，毫不退让。

“嘭！”杜长贵甩门而去。

“这……这样好么？”皮高深还在疑惑中，没有反应过来。

毕丽芳倒是上去把皮高深紧紧地抱住，热烈地吻了起来。“高深哥，你可看见了，为了你，我可是没有退路了。这个家，就是我的家了。”

皮高深一时没了主意，就闭上眼，让毕丽芳吻去。

39.3 旧爱新欢

杜长贵对毕丽芳的态度，没有常人那么激烈，实际上他对毕丽芳也是失望了，没抱什么希望。毕丽芳是个什么人，已经有点认识了。她曾经对他有那样热烈的激情，使他坠入了云里雾里迷失了方向，使他接受了她的。如今，她有了新的向往，就这样不顾一切，如此绝情地离他而去。他无法挽回，也不想挽回，不是因为高尚，也不是因为无能（至少他自己觉得），而是他也看透了，厌恶这种人，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失去这种人，或许不是一件坏事情。

此时，他想起了他的前妻平近芳，想到自己确实亏欠了她。平近芳是那样的温和，那样的勤勉。多好的妻子，自己一时糊涂，竟然失去了她。再去求求她吧，自己回心转意了，应该会原谅他的吧。如果那样就好了。和毕丽芳的那段，就算是人生中的一段艳史吧，那也是多少人没有享受过的一段艳史。想到这儿，觉得自己也没有吃多少亏呀，呵呵，心里面笑了一下，去找平近芳了。

平近芳从离婚后一直住在学校里。当然，条件要比余校长那时要好一些，有单独的一间宿舍。杜长贵赶到那儿的时候，天也已经黑了，学生们开始上晚自习了。杜长贵找到校长办公室，门开着，灯亮着，里面却没有人，平近芳没在。

他在校园里转了两圈，没找到，又回到校长办公室门口等着，着急地来回踱着步。

肖胜利的老婆小谢老师远远地看见了杜长贵，便过来告诉了正在教室里巡查的平近芳，有人找她。平近芳还在想，是谁呀。走过一排房子，在拐角处看到了等在门外正四处张望的杜长贵。是他呀，平近芳心里一怔，停下了脚步。他来会是什么事，要不要见他？她心里犯起了嘀咕。她也听说了，毕丽芳引起的那些事。是杜长贵走投无路，现在想要复婚了？对于这一点，她倒没想过。既然他过来找，很可能是这事。但是她没有这个想法，至少是现在没有这个想法。刚刚平静下来，不想再去搅那锅混汤。转身就走、不去理他？看他掂着脚、探头探脑的样子，一半时大概不会走，老站在自己办公室门口影响也

不好。自己该是什么态度就是什么态度，用不着回避。毕竟是一个中学校长的水平，处理这种事情的能力还是有的。于是她走了上去。

因为天黑了，平近芳走近了，杜长贵才看出来。真见到平近芳，杜长贵一急，竟然说不出话了。

平近芳站在那儿，等他说话，等了一会，杜长贵还是轻轻地晃着手，说不出话。

“有什么话，慢慢说吧。”还是平近芳先说了话。

“噢，噢，是我错了……我来向你认错的。”杜长贵态度很好，知道应该先认错，再提复婚的事。

“你的对与错，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平近芳很平静地说。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对不起你呀……”杜长贵差点要哭出来了。

远处好像有人停下来，往这儿看。

平近芳只好说：“你进来吧。”

杜长贵进了门，更是掉出了眼泪：“我真不应该啊，我真不应该啊……”

平近芳似乎无动于衷，甚至站在那儿没有回话。

杜长贵抬起头来，泪眼婆娑，恳求着他的前妻：“你回来吧，还是我们在一起吧。”

平近芳这时才冷冷地说：“不可能啦。从我走出杜家的时候，就不想再踏进这个门。一切都过去啦。”

杜长贵还在求着：“我离不开你呀。”

平近芳叹了口气，“晚了。”

杜长贵急了：“要不，我喊爹来跟你说说。”杜长贵知道平近芳对她公公是尊重的。

“什么都不用了，你走吧。”

“看在孩子的份上吧。”

杜长贵在作最后的努力，不料却引起了平近芳更大的反感。

“你还想到过孩子？你要是想过孩子，还会那个样？”那语调，冷漠中又加进了恨意，“走吧，快走吧！”

杜长贵怯怯地看着平近芳。

平近芳的脸上泛起了平时少有的愤怒。

杜长贵只能低着头，怏怏地走了。

平近芳看着杜长贵慢慢地走远，当看见杜长贵又回头望时，她关上了门。这时，她才扶着门框，流下了眼泪。

平近芳真的完全是心如死灰了吗？也不是。这时，她的内心是复杂的。她对杜长贵的情感背叛是有恨意的。虽然她表现得很平静，不爭不吵，就那样地走了。也唯其如此，正是表明了这件事深深地印进了她的内心，不会轻易抹去。她也想过自己的不幸。原本普通得再普通不过的小人物的平静生活，却被政治运动彻底地打破了。1957年批判了李辰。1968年又暴露了林海秀。尽管不是本意，但这种近似于出卖的行为，使她被全村的乡亲所不齿，杜长贵也因此而看不起自己。几十年来，她一直问自己，我错了吗，我错了吗？那都是上级叫我这么做的，还会有错吗？随着前几年李辰的摘帽、林海秀的平反，她真的知道是自己错了。那些上级领导错得更厉害，那些宗发奋、程贵安之类，害了别人也害了她。这几年，虽然离那些事在时间上越来越远，然而心头的压力却越来越重。平近芳觉得自己将一直背负这永远无法原谅、无法弥补、无法卸下的罪恶，为此而在夜里难以入睡，沉重得喘不上气。她把杜长贵的背叛看作是上天对自己的惩罚。她甘愿承受，平静地离开了杜家。她把这两年单身的孤寂当作是一种救赎。反过来，她更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心思投入了工作，投向了学生，成了一位称职的校长、一位好教师。她在以前的一段时间里，也曾有过很世俗的想法，羡慕过职位，关注过人际关系。从程贵安最后的结局，她也开始看淡了这些。她几次提出过辞去校长职务的请求，上级不批，她只好一直干下去。当今天，杜长贵来求她回去，她的态度与其说是恨意，不如说是淡然。她不想打破这种好不容易形成起来的怪异的平衡。她怕打破以后再也无法重新拾起来。如果不是喜欢那些天天在眼前活跃着的可爱的孩子们，她都想到要出家为尼了。

皮高深也遇到了难题，另一种的难题。

平丽芳跟他讲了，她跟杜长贵已经离婚了，她现在别无他法只能跟他在一起了，让他回去赶紧离婚吧，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皮高深一下子难办了，本来就是玩玩而已，哪想到那么多。这下要闹到家庭破裂，这怎么办？不过再一想，这个平丽芳确实年轻漂亮、热力四射、热情奔放，充满了青春活力，叫人看了不能不动心。比起自己那个老婆不知要强了多少倍。一个男人有这样的女人陪在身边，真是几世也修不来的福。能换到这样的老婆还真不错嘛。但是自己老婆肯离婚么？她不肯又怎么办呢？皮高深也想不出来。

皮高深想了好几天，想先准备好几个方案，以免到时候被动。但想来想去也想不出好办法，也就是直接跟她说，咱们离婚吧。要是她不肯呢？她不肯？那就伸出拳头揍她。揍她？揍她也不好，错的也不是她而是自己。真要揍了，事情就闹大了。现在好歹还是个镇政府的主任，在家里打老婆，传出去也不好。那怎么办？那只能吓唬吓唬了。如果吓不住呢，再怎么办？还真没有办法了。那就离家出走。对，负气离家出走，反正可以到镇政府家属院里去住。到时候，平丽芳也可以常去，不是一样可以快活么。对，对，就用这个方案。皮高深也就这个水平了。

果然，皮高深一回到家，干咳了两声，清清嗓子，便板起脸，对他老婆说：“咱们俩，一直性格不和，离婚算了吧。”

皮高深的老婆小燕，前面介绍过，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没有文化，更没有高深的水平，勤勤恳恳，几十年如一日辛勤劳动、辛勤持家，而且家庭还挺和睦，皮高深一直是听她的。直到最近也听到了

传言，说她男人和本镇仅次于王溪的风流女子半丽芳有一腿，吃惊不已。家里条件在村里一直不算好，最多也就是一般。这刚沾了他姐夫的光，当了个办公室主任，她也跟着高兴。好了才几天，就变心啦？这个杀千刀的。可是能杀吗？就算真杀了，又能怎样呢？出了口气，可日子更不好过。那怎么办？她也在想有哪几种对策，可她更想不出来。她也只有一条路，坚决守住这个家。拿有点理论性的话来说，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离婚？就这么容易？你这个没良心的，你不想想，这个家几十年了，过下来容易么，说拆散就拆散啊。”小燕理直气壮地说着，既是批评，也是教育。

皮高深听了，觉得是有点道理，但是挡不住要和半丽芳在一起的心。“这个，我不管。没有了这个家，可以有新的家，可以过新的日子。你也可以有新的家，过新的日子么。”

“呸！你别想得美。那个狐狸精能破坏杜长贵的家，结果没两年又甩了他。现在又来破坏咱的家，你以后会有好日子过吗？不用两年，你就连杜长贵也赶不上。试也不用试，就能看得见。”

皮高深一听，心里一惊，啊呀，自己倒是没想到这一点。不过既然已经到了这份上，还是继续往下走吧，先快乐一阵再说。“这个，你就别管啦，我走我的路。”

“你走你的路？你不想想，那你成什么啦？你要做另一个时治国啊？你不知道时治国被别人骂成什么啦？时治国他人不在这儿，听不见。听不见也成了神经病了，这就是罪有应得。你在这儿要是这样，还不知道要被骂成什么样呢。你还能做人啊，连脸都没有了，你还能当主任啊？”

时治国在西北村被骂得仅次于秦德才。连皮高深也是骂时治国最起劲的人之一。而今自己也要变成时治国那样的人，抛妻舍子，这下又打中了他。他真没想到跟半丽芳好还有这么多事。但是，他还是不想回头，在半丽芳与背骂名之间，还是选择要半丽芳。

“你就不想想你儿子啊？他能安心念书吗？”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反正是要离。”

“我反正是不离。就是上政府，就是上法院，我也不离。”

“那……那我也跟小半好下去。”

“你爱咋的就咋的，反正我是不离。”

皮高深也没有话了，连抬起胳膊吓唬吓唬也都忘了。

小燕说完这些，自己转身上炕睡去了。

皮高深在琢磨老婆这话是什么意思，是允许我跟半丽芳有那种关系，只要不离婚就行。是么？这么大方？皮高深想，社会上有句话：“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既能快活，又不影响家庭，这不是最好的结果吗？这好福气就要掉到自己头上啦？都有点不敢信！

像这种事情，要是在别的地方，不说是你死我活，也会弄得惊天动地、鸡飞狗跳。怎么在西北村，在杜长贵和皮高深身上表现得就这么波澜不惊，甚至挺“文明”的，不免会使一些等着看热闹的人有些失望了。或许是西北村村民还是生性善良，除了被政治运动搅和得出了那些悲剧，通常人们生活中的矛盾，何至于会那样呢？

毕丽芳常到镇政府家属院的事，当然会引起镇政府里一些人的不高兴。可别人嘴上都不会说，只有祖云涛实在看不惯、憋不住，在去县委的时候，很认真地跟辜书记说了，这恐怕不能只把它当成家务事看。

辜书记想了想，唉，这个皮高深啊，真是扶不起来的阿斗，难怪前些年自己没去帮他们。又在想，那个小姑娘是个什么样的人啊，能有这么大的本事敢到他家族圈里来拆墙。他有了几分好奇心，打电话给皮高深，问是怎么回事？皮高深就说，原本貂场有个职工叫毕丽芳的，人长的不错，待人也热情，觉得挺适合在宾馆工作，就把她介绍过去当服务员了。所以两个人走得近了点，没什么别的事，有人看得眼红了，在那儿瞎说。

“哦，你要注意影响哦。过两天我要到龙头来，我来做做她的思想工作，要正确对待，注意影响。”

皮高深把话跟毕丽芳说了，再三嘱咐毕丽芳：“丽芳啊，你要好好招待我姐夫哦。我俩的事，决定权全在我姐夫身上。他说行就行，他说不行就不行。这下就全看你的本事了。”

这话倒引起了毕丽芳的热情，“放心吧，这事全包在我身上。别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是跟男人打交道，谁也跑不了。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嗯，这是什么意思？皮高深没听明白，但也管不了这么多了，看她的本事吧。

辜书记到龙头来商谈修沿海公路的事，顺便到宾馆来看看毕丽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毕丽芳已经提拔为服务员的副领班了，由她来接待也是讲得过去的事。毕丽芳见到辜书记当然是格外的热情，当即把辜书记领到了那个最好的308房间。

308房间，辜书记当然很熟悉了。当他看到眼前年轻热情漂亮的毕丽芳，不由想起了至今难忘的那位气质高雅、鹤立鸡群的晋秘书。那时，他是多么地羡慕付局长啊。当领导当到那个份上，才算是领导啊。

毕丽芳推上房门，走近辜书记，握着辜书记的手娇滴滴地说：“辜书记啊，我的事就托付给你了，我这辈子也全靠你了。”

毕丽芳的意思是她和皮高深的事就拜托辜书记了，可辜书记理解的是，怎么这个小姑娘把她一辈子都托付给他了。这个意思，不就是她愿意把她自己都给了我吗？这哪好意思，这么点的小姑娘。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快别不好意思了，又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到手的快活，别让她跑了。眼前的小姑娘，不就是属于他的一个晋秘书吗？而且比晋秘书更年轻更热情更对自己胃口，想挡也挡不住啊。

“好。好，你放心，你的事都包在我身上。你想要什么，就跟我讲，一句话。”他抚摸着毕丽芳的手，那么地柔软，那么地滑润，身上一定会更滑吧，顺手就抱住了毕丽芳。

毕丽芳只是妩媚地笑着，心里想这是什么意思啊，连我都要啦。可是这种时候又没法拒绝，随他去吧。

辜书记看毕丽芳笑得更灿烂了，心里一股热情涌了上来，说：“小毕啊，要不你就跟我到县上去吧，比这儿还要好。”

“是吗，可以吗？”毕丽芳真没想到还能跟着县委书记到县里去。这种好事，不管什么条件都能答应了。

“可以，可以，只要跟了我，包你什么都有。”

毕丽芳一脸笑容，靠上了辜书记的胸前。辜书记则是紧紧地抱着毕丽芳，倒在了弹性十足的席梦思上。

毕丽芳不在海边宾馆工作了，到了县上，当起了二奶，住进了原先留给公安局周局长现在也是分给辜书记的那套房。跟辜书记在同一幢楼房，不是一个单元，方便得很。

毕丽芳是高兴得很，至少现在是高兴得很。她看着窗下县城的大街，也算得上是车水马龙、人群熙攘，也有几处霓虹灯在闪耀，也有几处商家扩音器里响着流行音乐。她很满足，满足得有些陶醉了。她，一个山沟沟里的女孩子，从没想过还有今天的生活。尽管这是种特殊的生活，不过那也是种生活啊。自己能够活到了县城里的楼上，山里的人祖祖辈辈，谁做到了呢？没有，只有自己。凭什么？有的是凭自己的学问，有的是凭自己的手腕，小毕我凭的是……凭的什么，你不用管，反正凭的是我自己。我不凭那个凭什么？毕丽芳的逻辑，我们也不用去多管了。

辜书记的妻子皮珊珊呢？她的态度和对策是什么呢？

她当然很不高兴了。但她觉得，她难以阻止。她觉得当了官的男人大多都是这样。当了官，就没人能管他，能管他的人都在忙自己的事，该管的事也管不到位。老婆能管得了吗？辜建功能一直坚持到今天，当了县委书记才这样，已经是不错了。应该说，辜书记这些年来，对自己还是不错的。二十年前，擦出猛烈火花的那一夜，其实，她是感谢他的。如果没有他的出手，她能去找谁呢？一个超龄大姑娘在农村，她的人生之路大抵上是灰暗的、凄切的，不是找个驼背的、瘸腿的，就是死了老婆留下一大堆孩子的老头子，娘家有哥嫂弟媳，那是留不下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再怎么有可能也不可能超过今天的现状。所以，她是感激辜建功的。今天这个事，她要向他表明态度，但不会因此闹翻。闹翻了，对谁都没有好处，连自己也会失去一切。她的原则是，既反对又容忍，还要监督，不能走得太远，有点类似于她弟媳妇小燕的招数了。她采取容忍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事也是由她弟弟引起，她也有推辞不了的责任。把毕丽芳引过来，也是减轻她弟弟的压力，保住她弟弟一家。皮高深一家如果闹翻，那会让全县的人看玩艺，于大局于小家都不利。让毕丽芳来这儿，过个一两年，找个人家把她嫁了，事情也就过去

了。毕丽芳这样的人，还是会有人要的，毕竟年轻漂亮。虽然有这样的事，但说不定还就有人看上这一点呢。因为毕丽芳有这种别人所无法比拟的跟领导的特殊关系，这就是有“人脉”啊。

皮高深因此而松了一口气，又享过福了，又不用面对难题。他怎么会不暗自庆幸呢。

毕丽芳走的时候，皮高深还去见过她，对她说：“你去了县城，以后别忘了我哦。”

毕丽芳笑着对这个不知道是旧爱还是新欢的皮高深说：“我怎么会忘了你呢。你是我的领路人哎。你别忘了我就行。”

啊呀，这么有情有义啊。皮高深听了，心里都酥了。

回到家里，见到老婆，真的要磕头谢谢她，亏得她没同意离婚。要不，自己离了婚，毕丽芳又跟着姐夫去县城了，自己不就两头翘了吗，那怎么弄？毕丽芳和姐夫之间，就算没有自己牵线，早晚也会那样的。毕丽芳在宾馆里，以后见的领导多了，这样的事说不定就会发生在谁身上，而且还会不止一个两个。皮高深想想，都有点后怕了，亏得及时收场啊。

最苦的要数杜长贵了。

他听说毕丽芳上县里去了，虽然并不清楚是被新县委书记收了，但他知道是彻底的无可挽回了。她离自己越来越远了，不可能再回头了。而另一头，平近芳又不肯原谅他。

他这一生算是失败了。从1958年大养小球藻失败之后，他就好像没有什么成功过。貂场也是，养那个屁东西干什么？他心里骂道。他埋怨起社会世态来，尽管这曾经是一次机会。

他还能干什么呢？他爹已经老了，也帮不上自己了，再怎么弄呢？他觉得自己不算是个坏人，怎么没有好结果呢？只有对天长叹，唉。

第四十章 新兴权贵

1978年2月9日

40.1 国企改革

皮珊珊能容忍辜建功包小三，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辜建功的势头迅速上升，对家庭是功大于过。现在的领导可不光是有点权、管点人，而且在经济利益上也是迅速膨胀。真的是既有权又有钱。国有企业的改制，就是某些人走上这条路的重要途径。国企改革的大规模推行是在九十年代，少量的先行试点，八十年代末就已经有了。辜书记在这一点上，就有这个嗅觉。

这不，北面硫铁矿的汽车队队长南师傅，在一个中午非要找辜书记。南师傅在那次海边运汽车中是起了作用的，这个人有事要见，是推不掉的。辜书记叫门厅值班的让他上来吧。曾几何时，他自己还是个在楼下门厅焦急地等待着楼上领导让他上去的人，如今没几个月，就换了身份。而且辜建功当了县委书记后，执意要在办公楼的门厅里，也设上值班员。因为那次上省里的经历，对他印象太深了。

这个海源县硫铁矿是在1958年大跃进开始采的，是个小型矿山。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市场的不断开放，竞争的加剧，企业无法适应新的情况，经营遇到了困难。

“怎么啦？南师傅，有什么要紧事吗？还这么急，先坐。”辜书记说。

南师傅没坐下，就先说上了：“辜书记啊，我们没法活了。”

“慢慢说，喝口水。”上级领导对基层群众在需要表示宽宏大量的时候，一般都是这样说的。

“你再不过问，就要乱啦。”

“出了什么事啦？”辜书记也奇怪，没听说那个硫铁矿出什么事故啊。

“三个月都没发工资啦，叫我们怎么养家糊口，老婆孩子怎么过啊？”

“哦，是这么回事啊。现在矿上还不景气么？”

“这几个月都开开停停，我们车队往外拉的货，还不到以前的一半。”

“哦，那怪不得发不出工资。你叫矿上也不好办哎。”

“那我们要过日子哎。”

“哦，我知道了。你刚才讲的情况很重要，我记住了。这两天我就找你们工业局的师局长和矿长，再进一步了解一下，看看怎么处理，尽快解决你们的困难，争取先发一部分工资。你先回去吧，见了其他工友，多劝劝他们。共产党是不会不管工人阶级的。困难是暂时的，面包会有的。”

这最后那句话是电影“列宁在十月”里的一句台词，在中国流行了很长时间，到后来也就成了调侃。辜书记讲这些话，不能说不对。在下属面前，辜书记也常常表现得蛮有水平的。

辜书记找来了师局长和阚矿长，在小会议室里商量硫铁矿的事。

师局长长叹一口气，说：“现在不止是硫铁矿，哪个企业也不行啊，好的没几个。”

“那是怎么回事呢？”辜书记问。

“大的方面，市场形势变了。一提倡搞市场经济，很多小企业、小作坊、小老板都行动起来了。咱国有企业，经营比较僵化，反应迟钝，搞不过他们。”师局长说。

“咱们国有企业家大业大，又有国家财政支持，怎么会搞不过他们呢？”辜书记又问。

阚矿长说：“人家的经营机制灵活，比如跑销售也好，跑进货也好，都是给对方一点好处费。国有企业就不行啦，财务上规定比较严格，那些关系户也就跟人家走了。有什么事，人家几分钟就搞定了。咱还得往上打报告，一级一级地向上请示。等批下来，也没用了，市场早已经变了。那种办法，也就在计划经济里行，什么都由政府管着。现在不行了，要看市场的眼色。咱还在等着看政府的脸色，那就什么也捞不着了。”

辜书记听了直点头，“嗯，嗯。”

师局长接着说：“阚矿长说得对。总的来说，现行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已经严重不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体制不适应，管理不适应，具体的经营办法更不适应。”

阚矿长说：“还不只是经营上的问题，还有思想上的问题。现在矿上的行政人员都想往政府机关跑。在机关里工作，不但旱涝保收，权力还大，事儿还少。相比之下，我们企业就差远了，都在那儿心不在焉，在那儿糊就是了。反正企业赔了，也不是赔自己，就盼着垮了才好呢。企业垮了，自己的干部身份还在，国家还得包着，还得重新安排，正好能再换个单位。”

辜书记问：“都已经到这个样啦，那怎么办？”

师局长说：“两个办法，要么退回到计划经济，一切都按老办法；要么就是往前走，深化改革，让国有企业适应市场。”

“退回去是肯定不行的。那往前得怎么走呢？”辜书记问。

师局长说：“我觉得我们胆子可以大一点，步子也可以大一点。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可以对土地实行承包，我们企业也可以这样搞么，对企业进行体制改革么。现在很多地方搞的扩大企业自主权，恐怕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我们可以往前再进一步，可以搞私有化，搞个人承包，或者干脆个人收购。”

辜书记说：“这一步还挺大，咱海源还没有试过。你们考虑过没有？”

阚矿长摇摇头，“没想过。”

师局长说：“这看起来是一个企业的改制，但绝不是一个企业所能搞起来的。这是一个全方位的改革，需要各方面的配合、支持，尤其是上级领导的配合、支持。”

辜书记听了，点点头。其实，他也想过这个问题。他在龙头看到辛狗狗的针织厂是怎么起来的，尤其是貂场是怎么搞个人承包的，就在想这些问题。虽然后来貂场的经营没有起色，但它就是把公有的、集体的财产流转给个人的一个案例。这个办法应该可以用。搞的时候，可以把财产的估值压得低一些，承包条件对承包人更优惠些。这样，个人能获大利，同时也救活了一个企业。现在，机会就出现在眼前。

“我们不妨可以试一下哎。”辜书记略微装着无意地轻声说。

“怎么试？”阚矿长问。

“如果你们两人不太方便的话，我来试一下。”辜书记说。

“哦。”两人有点吃惊。应该说，辜书记在工业局干过几年，相互间还是熟悉的，也没想到辜书记还有这个魄力。

“我想我来搞一下这个试点。搞失败了，县委愿意承担这个责任。搞得好了，为我们全县下一步全面推行企业体制改革打开了一条路。而且在我这个位置上，搞起这项改革来，协调也好，配合也好，能方便一些。”

“对，对，我赞成。”师局长很快听出了辜书记的意思，马上表示赞成。

“不过，虽然是我来搞，还是需要你们俩的全力支持。比如，这矿上实际上还是得你阚矿长来领导、管理。”

阚矿长一听，还是由他当头，那更是高兴了。“好，好，我全力支持，全力支持。”

“关键的问题有两点，一是现有的设施，厂房、机器、设备这些怎么作价；二是承包的条件，就是承包的费用，以后每年要交多少？”

师局长一听就明白，就说：“企业改制是个新生事物，应该大力加以支持，尽可能地给予优惠。这样才能鼓励一部分人敢于挑起这个重担，挽救一批濒临破产的企业。要不，这些企业破产了、倒闭了，对国家、对工人、对我们县里，损失更大。”他也能说出一套来。

“是的，是的，要减轻承包者的负担和压力，让他们闯出一条路来。”阚矿长附和着说。

他们三个人理出了一条对硫铁矿进行体制改革的思路。

“当然，这事我还要向县委、向省委汇报一下，需要他们的同意和支持。”

辜书记跟县委其他几个领导说了以后，就算是县委集体的意见了。而后，他打电话给付省长，征求他的意见。没料想，付省长在电话里大加赞赏了一番，好，好，你想得很好，这说明你对体制改革的理解很深。我也正在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你那儿可以先搞个试点，先走一步。

于是，硫铁矿的体制改革，作为全县国企改革的一个试点，开始启动。对于前面提到的两大关键问题，辜书记是亲自抓的。

他领了师局长和阚矿长，再加上财政局国有资产科的，到硫铁矿亲自进行调查和定价。

经过了绿色的田野、青色的山峦，一进矿区的大门，眼前立即变了样，山上是灰色裸露的岩石，山下也是一堆堆的石头，坑口前是几间简陋的办公室，再就是两排临时工棚，地下满是碎石砂砾，两辆积满尘土的载重汽车停在空地上，满眼是雾蒙蒙的灰尘，一片破败简陋的景象。

“你们矿上有几辆车？”辜书记问。

“四辆。”阚矿长答。

“哪年买的？”

“五、六年了吧。”

“怎么旧成那个样了？”

“你看看矿上这个样，再有什么好东西也不行啊。就是新车来了，不出三个月，就灰头土脸不像样了。”

师局长说：“这个样啊，能折个两、三千就不错了。”

财政局的那个人点点头，记下了。

到了矿井前，他们一行几人，戴上装有矿灯的安全帽，系上佩有电池的腰带，普通的矿工还没有这些，跨进竖井里的缆车就下去了。矿井深一百多米。进了坑道，就有一股硫磺味扑来，几人忙捂上嘴，那也没用。打开头上的矿灯，光线照到之处，一片雾蒙蒙的。

辜书记咳嗽了两下：“怎么这个工作条件？不得矽肺病么？”

阚矿长说：“是的。所以，除了技术工种，井下用的都是临时工，以前叫轮换工。文革以前就有这个办法，叫‘亦工亦农’。还是刘少奇提出来的，叫‘两种劳动制度’。就是从农村招收矿工，不算固定工，也不完全是临时工，干个十年、十五年，没等矽肺病严重表现出来，就让他们回家了。也没有退休，也没有公费医疗，公家省了事。”

辜书记一笑：“这倒是个好办法，单位也不用设离退休处。只管干活，不管生老病死。”又问阚矿长：“那你平常一个星期下来多长时间？”

“呵呵，呵呵……”阚矿长答不上来了。

后来因为各地矿难事故频发，于是，有关部门硬性规定各矿在工作时间必须有一个矿领导坚持在井下。可还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矿山立刻从一线工人里公布了十几个副矿长，后面括弧井下。他们没有别的权利，还是在井下干活，只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上级一来他们就说，你看我这儿有个副矿长在井下呢。

中国的矿难事故是个老大难问题。中国的矿难死亡人数不但是世界第一，而且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上级部门不得不常常来追究这个问题。辜书记一下也想到了，问：

“这个矿，还死过人么？”

“这种事，在矿上是难免的。不过我们矿还不错，好几年没出这种事了。”

“矿山工作，安全是第一位的。以后你要重点抓这个。出了事，扣掉你一年的奖金。知道啦？”辜书记很严肃地对阚矿长说。

“是，是。”阚矿长毕恭毕敬地答着。

到了工作面，尘土和噪音更是大得不得了。紧捂着耳朵，讲话还听不清。一台凿岩机，隐约在尘雾中，抖动着、吼叫着。辜书记不想再走近了，停下来问阚矿长：“这是哪年的？”

阚矿长答：“这是五十年代苏联造的。”

“多少钱？”

“知道了。”

师局长说：“这种东西反正是没值钱了。现在往外卖，谁要？”

阚矿长看着辜书记又捂耳朵又捂鼻，就说：“咱往外走吧。”

“就这些啦？”辜书记问。

“这是算好的，是机械化作业。还有几个工作面，有用风镐的，还有用镢头的、用大锤的、用钢钎的，纯体力劳动。”阚矿长答。

“那些就更没有什么好看啦。辜书记，咱上去吧。再待下去，咱就扛不了了，都喘不上气，晕倒在这儿了。这些东西不用看，就知道是不值钱的玩艺。”师局长说。

“那些镐头什么的，就更不值钱了，不值得去看。”阚矿长说。

他们往外走了。辜书记还在注意有什么值钱的，还有就是地下的轨道，和轨道上工人在使劲推的矿车。

最值钱的大概就是往上升的缆车。他们拍拍身上的灰，上来了。重新看到蓝天的时候，都深深地吐了口气，而后大口地呼吸着地面的新鲜空气。

“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噢。”辜书记说。他一直关心的是这个问题。

“是哎，这个破地方还能值什么钱。”阚矿长附和着说。

但是最值钱的是，花了大量人力挖出来的坑道，他们却没有注意到。这个在账面上还真没有。最多也就是记载了几根坑木，那真值不了什么钱。但是它们所支撑起来的是多少财富，却没有记载。

临上车往回走时，师局长对辜书记说：“辜书记啊，你真了不起啊。对你说句老实话吧，当了这么多年的工业局局长，我还是第一次下井来。”

辜书记笑笑，拍着师局长的肩膀说：“啊呀，彼此彼此，我当工业局长的时候也没下来过。现在这是要估算价钱，不来不行啊。”

“呵呵，呵呵，呵呵。”三个人都高兴地笑着。

硫铁矿改制领导小组成立，组长辜书记。下设两个小组。这会儿是财务小组在辜书记办公室边上的小会议室开会。财政局和银行的同志也都参加了。

“硫铁矿那些破玩艺啊，要是扣除折旧，那都是负资产了。”师局长说。

“是啊，我知道那些破机器都不好使，老是坏，老是修。还真不好算钱。”阚矿长还这样说。

“那总得说个具体数吧。”辜书记说。

阚矿长说：“那样吧，我是硫铁矿的，我来说个数：四辆车，二千元一辆，八千。砖房十间，一千一间，算一万。凿岩机两台，一万一台，二万。矿车二十个，五百一个，也是一万……”

财政局那个赶紧记。

阚矿长毕竟熟悉情况，说了一堆，还算挺齐全。

“大家看看还有什么？”辜书记问。

“土地是国家的，不存在买卖问题，就不用算了。”师局长说。

没挖出来的矿产资源，也是国家的，更不用算了。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劳动创造价值，土地和矿藏千万年来就在那儿，都没有经过人的劳动。只要还没有刨出来，就没有价值，更没法算钱了。资本、技术和管理，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也没有作为创造价值的因素。

“总共是多少？”辜书记问。

“总共是，是……十八万四千元。”虽说是破败简陋，也不至于就十八万吧，财政局的那个都有点不好意思说。

“十八万四就十八万四吧，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有什么不好意思。”师局长说。他是倒过来以为那人嫌十八万多了，还是他自己把这话倒过来讲，那就不得而知了。但师局长知道，以后硫铁矿能承包下来，少不了有他的好处。

“这十八万四，我都觉得有点多。”阚矿长把这话说出来了。

师局长知道这事到火候了，该收了，就说：“不过已经这样了，那就照这个数吧。凑个整数，十八万，好算点。”

“那咱就定个十八万吧。”这事最后由辜书记定了盘子。

这个定价会，既没有一个专业技术人员、也没有一个专业的财务人员参加。

会议继续讨论第二个也是挺重要的问题。

阚矿长问：“这个钱，由谁出？怎么出？”

“原则上是谁接手，谁出。我接手，那就我来出。当然，我一下子也没有那么多钱。我们可以申请银行贷款，请银行的同志支持一下。”

“可以，可以，我们可以给予长期无息全额贷款。”银行的同志爽快地答应着。县委书记的项目，岂有不答应之理。

“还有个问题，怎么上交利润。我想在企业产生利润之后，归还完银行贷款之后，在利润中上交5%给财政，算是对财政支持的感谢。”

“哦哟，这个姿态就高了。5%不少啊，到底是辜书记主持的项目，有这个魄力。”师局长说。

“当然，一开始也要请财政的同志照顾一点，头五年免除所有的税费，拉它一把。财政的同志，你看可以吗？”辜书记问。

“完全可以，完全可以。支持企业改制，扶持改制企业，作为我们财政部门责无旁贷。”财政局的同志也连忙表明态度。

其实，县财政局是无权自行调整企业赋税的。但是很多地方财政局，在地方政府的主张之下，往往不惜牺牲国家利益，自作主张，随意调整。

至此，硫铁矿的改制方案已经明确。接受人辜书记不出一分钱，就得到了企业的控制权，实际上拥有了这座矿山。这座矿山，连同土地，连同地下的矿产资源，其价值应当不下亿元。就这样，在几个地方官员的把持之下，就拱手交给了辜书记个人，这就叫“空手套白狼”。国有企业改制就这样变了味，成了新兴权贵们攫取社会财富的重要渠道。权贵阶层的形成和壮大，是在二三十年后，但他们最早的出现，他们财富的原始积累，在八十年代就开始了。当然不是所有的国企改革都是这个样。

40.2 工人下岗

第二步是处理人的问题。

先公布改制后的领导班子。法人代表、董事长为皮珊珊，总经理为阚矿长，监事会主席为师局长。按理说，硫铁矿改制后是交给了辜书记个人，不需要按照股份公司的那一套设置，用不着监事会这些。但为了好看，为了看起来规范，所以也搞起了监事会，这样也好安排一些其他领导。辜书记自己不出面，就挂了他老婆的名。

原有属于干部编制的人，国家全部包下来。这儿讲的国家，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有些人喜欢嘴上口口声声地说国家、国家，实际上讲的都是某个政府部门，以至于长期以来，社会上习惯于把政府部门与国家混为一谈。这些行政人员，新单位愿意留用就留用。不留用的，由政府重新安排。这个问题都不

大。虽然也有干部在嘀咕、在盘算，会把我弄到哪儿去啊，以至于也跑上跑下、跑里跑外，忙碌一阵，但毕竟饭碗还在。

但是，工人就不一样了。为了减少震动，矿里都没敢召开职工大会，更不用说职代会了，而是贴布告进行宣示（那种职代会开了也没用，所谓职工代表，几乎都是领导指定的单位里上下各级干部，职代会就是官代会，到哪儿几乎都是这个样）。对工人一律解聘，作退职处理。也就是先全部下岗，而后新单位需要的，在这过程中表现好的，听从领导安排的，再另行签约。即使是单位需要他继续工作的，也必须先签“自愿下岗协议”，而后等单位通知到哪个，再来签新的用工协议。退职的补偿办法是满一年工龄补一个月的工资，计件工资的，按全矿平均工资算。不服从本通告，逾期不签“自愿下岗协议”的，按自动离职处理，只发当月工资。那时一个月的工资，才一二百元。而为了闯“物价关”，那时物价的上涨速度却是惊人。靠这点补助才能吃多长时间？要想再找新的工作，小小的县城能有多少岗位？作为硫铁矿的职工，在外面也很少有对口的工作，想再就业是很难的。工人们想不开了，站在贴着通告的布告栏前议论纷纷，情绪渐渐激动起来。

首先是车队的那个南队长最激动了，他大声说着：“他妈的，是我去找的县委书记，叫他们来了解情况，解决我们的困难。弄了半天，反而把我们一脚踢开啊。我们坚决不答应！”

“是啊，我们坚决不答应！就补个一、二千元，够个屁用啊，叫我们以后怎么活啊？”一个戴着矿工帽的涂师傅举起了拳头，呼喊：“不答应，不答应，坚决不答应！”

“那我们怎么办呢？”有工友问。

“找矿长去！”南师傅说。

“对，我们找矿长去！”

十来个人过来找阚矿长，办公室的人说不在。他们找遍了几个办公室，连桌子底下也找了，都没有。到了最东头的一个办公室。矿办公室的阳副主任挡在门口不让进。

“这是档案室，里面放的是国家机密，不能进。”

涂师傅是个大嗓门，吼着：“这个破铁矿还有什么国家机密？别熊人了。”（海源话里，熊人，就是骗人的意思）

南队长更干脆一把就把阳副主任推开。阳副主任没站住，往后一仰，后脑勺还碰到了门框上，起了一个包。

那些人“噢，噢”地喊着，一涌而进。十几平方的房间，还没等后面的人进来，先到里面的人就喊起来了：“阚矿长在这儿呢，阚矿长在这儿呢。”

涂师傅质问阚矿长：“你躲在这儿干什么？我们有问题要你解释。”

南队长一把揪住阚矿长的领子：“到外面去回答大家的问题。”把阚矿长推到了门外。

阚矿长吓得连连说着：“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涂师傅问：“为什么要把我们工人全部作下岗处理？”

阚矿长连连鞠躬说：“师傅们哪，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县委辜书记的意思。这个矿，以后就是由他来接手了。我也就是个听差，跑个腿而已。”

南队长就在阚矿长的耳边大声喝道：“一年工龄就补一个月的工资，我们怎么往下生活？我们不要下岗要工作！”

其他围过来的职工也都一起呼喊：

“不要下岗要工作！”

“不要下岗要工作！”

“好，好，好，这样吧，我马上赶到县委去，直接找辜书记，反映你们的意见，按照你们的要求进行调整。好吧？”

“让你走了，我们再去找谁啊？”涂师傅问。

“嗨，我能走得了吗？我要是走了不回来，不也就下岗了吗？你们怕找不到我啊？找不到我，那你们去……去我家找我老婆。这总可以了吧？”

阚矿长就租住在旁边的老乡家，一听阚矿长说这么掉链子的话，大伙都哄笑成了一团。

“我走了，我走了。”阚矿长在大家的笑声中溜了出去，坐上车去县城找辜书记了。

辜书记正在小会议室主持一个会议，阚矿长一头就闯了进来，脸色仓惶地说：“出事了，出事了，辜书记啊，你快出来一下。”

“出什么事啊？”辜书记边起身边问。

“出大事啦，性质很严重啊。”阚矿长拉着辜书记就往门外走，辜书记都没来得及跟会议室里的人打招呼。

两人到了旁边辜书记的办公室，阚矿长也没跟况秘书打招呼，就进了里间。阚矿长说：“不好啦，不好啦，工人起来闹事啦。他们已经围攻矿上的办公室，把阳副主任都打倒在地，把我从办公室里拖出去揪斗，那些人就像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啊。”一向在领导面前不多话的阚矿长，这时说了一大套。

“是么？是这样么？那还了得。况秘书，你把堵局长喊过来。”

堵局长，是现任的县公安局局长，很快就从旁边的会议室走了过来。因为他资历不深，工作业绩也并不明显。所以这回能提拔上公安局长的位置，是很感谢辜书记的，对辜书记的什么话，都言听计从、认真执行。

“阚矿长，你把硫铁矿发生的事，再跟堵局长说一遍。”辜书记说。

阚矿长更加添枝加叶地又讲了一遍：“不得了啦，硫铁矿发生动乱啦。我是冒着生命危险，突破他们的重重包围，才跑出来的啊。现在矿上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呢，说不定整个矿山都已经被他们占领了，说不定阳副主任已经被他们打死了啊！辜书记啊，堵局长啊，赶紧派警察去吧，赶紧把他们镇压下去吧！”

堵局长听了，为之大惊：“这么严重啊。海源从解放以来，还从来没出过这种事。我马上带一个中队的武警过去，立刻把局面控制起来。”

辜书记说：“好，事不宜迟，马上行动。把为首的南队长和那个姓涂的，先带过来。”

当堵局长带着两卡车全副武装的警察赶到硫铁矿时，正是中午开饭的时候，在场的也就二、三十人，在食堂外面的空地上东一堆、西一堆地蹲着吃饭，议论着那个通告，什么情况也没有。相反，倒是大伙一看，两卡车全副武装的警察开进矿区，都惊讶得不得了，吓得连连后退，有的想躲到屋里去，有的想钻到井下去。可是那赶得上警察的动作快，很快就被包围了起来。

堵局长走到前面，极威严地大声喊着：“刚才，你们谁在冲击办公地点，谁在殴打管理人员，自己站出来！”

被围的职工中，没有一个敢吭声的。

堵局长稍等了一会，便更大声地喊：“赶快自己站起来，不要被别人指出来。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堵局长的话音刚落，那阳副主任跳了起来，指着南队长大叫：“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打得我！”

堵局长一挥手，两个警察上去就把南队长从人群中拉了出来，戴上手铐。

南队长急得又叫又跳：“我哪里打你啦，我哪里打你啦。是你自己碰到了门框上。”

堵局长一个耳光搥了上去：“闭嘴！到里面去再说。”

阳副主任一看，更来劲了，指着涂师傅叫道：“还有他，还有他！”

涂师傅也被戴上手铐，拖走了。其他人赶紧都低下了头，怕被认出来。

堵局长一看阚矿长提到的两个人都抓到了，也差不多了，便对大家说：“赶紧回去正常工作，谁要敢乱说乱动、捣乱破坏，就像这两个人一样。”又回头对那些警察说：“前面那辆车留在矿上维持秩序。后一辆车的，跟我回去。”

南队长和涂师傅也被押上了车，带回了县城。

辜书记听堵局长汇报了情况，想了想该怎么妥善处理。南队长是参与了运小汽车的事，这个人先得稳住。于是，先把南队长从看守所叫到了自己办公室，进行个别谈话。

辜书记拍了下南队长的肩膀，说：“南队长，你呀，糊涂啊。你怎么能跟他们混在一起呢？我们是老朋友啦，以后我还要用到你呢。”

“你，你都把我们下岗了，能不急吗？”南队长说。

辜书记解释道：“嗨，谁下岗也轮不到你下岗啊。这不是怕你们相互攀比，先一律平等，都下了再说。再看各人的态度表现，进行挑选么。当领导的不就得这么做么？你怎么不知道我的苦心呢？”

南队长没有话了，低着头。

辜书记接着说：“我是想让你继续当队长的。我不用你，用谁呀？可你今天这么弄，叫我难办哪。”

这下，南队长急了，“辜书记，我错了。你要我怎么做吧？”

“你们这一次，是惹了大麻烦了。我们必须公开处理，不然，全矿，甚至全县，都压不住阵脚。”

“那对我怎么处理？”南队长急切地问。

“对你呢，怎么处理，我还没想好。但是那个姓涂的必须加重处理。你要是起来揭发，整个事情都是他挑起来的，他是为首分子。必要时，你要到大会上进行检举批判。这样，事情才能好办些。对你的事情，我才能好说话一些。这就要看你的决心了。”

南队长又没有话了，显然他的内心在斗争。

“如果你能立场坚定，跟县委站在一起，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应有的态度，我们还可以考虑进一步提拔你，当个副矿长也不是不可能。”

南队长一下子抬起了头，眼睛里有了些光芒，“好的，好的，谢谢组织上的信任。我一定会跟那个姓涂的彻底划清界限，坚决揭发批判！”

辜书记的工作效率还是挺高。在师局长、阚矿长的配合下，第二天下午，矿上又贴出了三张新的布告。一张是告诫全体职工要维护正常工作秩序，抵制动乱。二是，录用第一批新职工的名单，五十余人；和部分新任领导干部，阳副主任被任命为副矿长。三是，涂师傅被开除并交公安部门处理。

工人们也都该干什么干什么，一个屁也不敢放了。有的还表现得更加积极一点，好争取能留下来续用。矿上的秩序基本稳定了。

看守所里，涂师傅被堵局长亲自审问。

“你知道你犯的是什么罪么？”

“我真不知道。”涂师傅已经完全没有了精神。之前是不是受到过什么刑罚，不得而知。但是一个天天早出晚归、在百米下的矿井里干活，半年见不到太阳，几乎一个字不识的矿工，突然被抓进了监狱，他还会有什么抵抗力，或者说是维护自己权利的能力呢？（他都不知道什么叫监狱，什么叫看守所）

“你这是明目张胆地对抗政府，是典型的反革命行为，犯了反革命罪。而且还不止一种罪，还有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罪，多啦。”

“那得判几年啊？”涂师傅的声音都发抖了。

“那得看你的态度。拒不认账，负隅顽抗，那就加重处罚，十年，二十年，甚至无期，都有可能。只要认罪态度好，我们就可以从宽处理、减轻处罚，少判点，判个三五年的。”

“啊？三年，五年？那我也受不了啊。是家里老婆、孩子受不了啊。没有我，她们吃什么？现在的日子就已经很苦了，我再进去，叫她们怎么办哟。”涂师傅的话音里都有了哭声。

“还想再减轻点？”

“嗯。”

“那你还得有立功的表现。你要承认，你们这次闹事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是受到了境外敌对势力的影响。”

“是，是，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是受到了境外敌对势力的影响。”

“你都写下来，签字画押。”

“我不会写字。”

“那就叫记录员帮你写一份，你按手印。”

“好，好。”

于是，涂师傅就在记录员打印好的“认罪书”上，看也没看，说实话也看不懂，就按上了手印。

一周以后，在硫铁矿召开全县“推进企业改革，稳定社会秩序”现场大会。全县县属企业的领导都来了。矿上的职工也在后面旁听。

大会由师局长主持，辜书记作重要讲话。辜书记说：“深化改革是当前我们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个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次硫铁矿事件，又一次说明了这一点。少数坏分子在境外敌对势力的影响煽动蛊惑之下，挑起事端，冲击管理部门，殴打管理人员，但是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之下，迅速被粉碎了，被平定了。我们的改革步伐，在更加有力地向前迈进！”讲到这儿，辜书记大手向右上方四十五度角一挥，大会掌声响起，县宣传部背照相机的干部赶紧“咔嚓”按下快门。

辜书记等他们这些工作完成后继续讲：“今天我们将公布第二批十二名同志的录用名单。我们将继续认真考核，并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还要录用第三批、第四批人员。请企业的原有职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再三讲了，不要着急。你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们都在帮你们想着呢。我有时也睡不好觉啊，上床的时候也在想，硫铁矿的同志今天过得怎么样啊。”辜书记停顿了一下，说：“即使是由于企业的困难，实在不能录用的同志，也请你们谅解企业和国家的困难，和企业、和国家一起分担困难。在关键时候，能够和国家、和企业站在一起，这是一个多么荣耀的事情啊。我相信，我们硫铁矿的工人同志，是有这个觉悟的！我们海源老解放区的乡亲们是有这个觉悟的！”在师局长的带头下，掌声又起。

“同时，我们也考虑到这些同志的实际困难，我们在全县财政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咬咬牙，在国家政策之外，再拿出一些钱补给同志们。刚才，师局长还跟我说了，局里面本来计划要添置的新桌子也不买

了，都拿来补给硫铁矿的工人同志。把原来一年工龄补一个月工资的补助办法再提高10%。同志们哪，再提高10%啊！我们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啦！我为你们有三天没睡着觉啊。我们是一家人哪。希望我们能相互理解、相互配合。我相信，我们硫铁矿的改制工作一定能搞好！下一步，我们全县的企业改制工作也一定能搞好，成为全省的先进典型。”

在一阵掌声过后，主持人师局长说：“请县公安局堵局长宣布县公安局的通告。”

堵局长上来，拿出一个文件，说：“现在，我宣布，县劳动教养委员会对原硫铁矿职工涂海宁实行劳动教养的决定。把涂海宁带上来！”

涂师傅戴着手铐，被两个警察架着，带到台前来，低头站着。

这时，全场都在看着他，尤其是坐在后面的本矿职工都想看看自己的工友。想站起来看又不敢，都前倾着胸，伸长了脖子，朝他望去。想看看进去了一个多星期的他，现在怎么样了。因为是低着头，什么也看不清楚。

堵局长接着念：“涂海宁在境外敌对势力的影响煽动下，冲击管理部门，拘禁殴打管理人员，触犯了国家法律。本应严惩，鉴于该犯认罪态度较好，能主动交代罪行，特免于刑事处罚，执行劳动教养一年，以儆后效。

涂海宁，你认不认罪！”

被架着的涂师傅弯着腰，点了点头，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

堵局长大吼一声：“带下去！”

涂师傅被狼狈地推下去了。他的内心里，不知道是在感激堵局长对他的宽大为怀，还是在怨恨对他的不公处理。

此时，全场肃静，鸦雀无声，效果好极了。本矿职工也都端坐着，大气不敢出，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被推走。

说起劳动教养制度，这是从五十年代开始实行的具有本国特色的一种对公民的惩戒制度。它是在法律制度之外，不需要通过法院审理，既没有公诉更没有辩护，而由公安部门一家就可以剥夺公民基本权利、强制进行劳动的制度。它甚至也违反了本国自己的宪法。在各界的抗议之下，这个办法在2013年开始取消。

一个月后，辜书记以同样方式拿下了织布厂，法人代表挂了他儿子辜向东的名字。由于已经有了这两个厂，那个奇芳公司法人代表的名字转给了晋秘书，这样，付省长和晋秘书都高兴。公司财务部主任的名字转给了尹会计，尹会计高兴得都合不上嘴。

辜书记还在考虑要不要拿下县针织厂。县针织厂原本还是可以的，但在整个市场竞争激烈，尤其是在辛狗狗那个厂的竞争之下，气势式微。辜书记对辛狗狗是不服气的，恨不能把他打成“不法商人”。那时还没有重庆模式的“唱红打黑”，不然辛狗狗真还跑不掉。要是能拿下针织厂，就可以跟辛狗狗斗一斗。但

是搞不好的话，也有可能斗不过人家，人家还有在美国的老爸哎，那会更生气。如果真要搞的话，那只能挂皮高深的名字。他能行吗？他还赶不上自己儿子呢。连在外面搞个小三，还弄得满城风雨，还是自己收下来才平息了。不说这些了，省得你们在边上看玩艺儿。先走这两步吧，等一等，再看下一步。

辜书记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成了海源全县的第一巨富，而且在外面，一般人还看不出来，连知道也不知道。这些财富，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下，几代人也聚集不起来。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超常的权力。超常的权力，就能以超常的速度累积起超常的财富。以辜书记为代表的新兴权贵，有他们特有的行事方式。他们是在革命的旗子下接手这些权力和财富，所以他们不会抛弃那些口号，尽管这些口号和理论已经出现了不少漏洞，不再能令人信服。但他们的行为做派，又常常与那些革命理论背道而驰。马克思理论的核心，是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号召工人起来反抗剥削。马克思讲的造反有理，是在讲造这个反。但是，新兴权贵们所做的正是在肆无忌惮地剥削工人、农民。那些黑窑洞，那些血汗工厂，那些暴力征地和强拆，不就是这些超经济剥削的有力写照么。虽然，他们打的是左的幌子。甚至如他们中的一个代表人物薄熙来还装模作样地唱红歌。但是他们敢唱真正的革命歌曲——国际歌么？他们敢唱聂耳的歌么？他们是一批新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笔者谨用聂耳“码头工人歌”里的一段歌词，作为本章的结束：

“搬哪，搬哪，

唉哟嚯，唉哟嚯，唉哟嚯，唉哟嚯……

成天流血，成天流汗，

在血和汗的上头，

他们盖起洋房来！”

是他们在工人农民的血和汗的上头，盖起洋房来！

第四十一章 反腐举报

1978年2月10日

41.1 卞书记举报

比起付省长，辜书记这点进账实在是算不上什么。付省长权力和财富的累积速度远不是辜书记所能比的。当又一次海上走私机会来临的时候，付省长已经没有多大兴趣了。海上走私毕竟涉及的环节多，要动员的人力物力多，容易出漏子、被暴露、风险大。所捞到的财富，虽然是一般人所完全不能企及，但比起他一个个大型企业的到手，整个整个行业的垄断，那又是小巫见大巫了。而且这些事也不用他去办，他只要说一声，晋秘书就全安排好了。对于现在的他，正应了那句话：有事秘书干，没事干秘书，真是快活极了。

这次英国斯汤达尔公司要来一批汽车的事，就全盘交给了晋秘书。晋秘书也是轻车熟路。联系了辜书记。辜书记一听，喜得乐不可支，又是一个大馅饼掉到头上了。马上联系相关人员。与上次一样，南队长管开车，法主任管码头，公安局管警戒，只是周局长换成了堵局长。看场地和来回骑自行车还是交给皮高深。不过这次皮高深找人费了点事，涨到了十元钱一天才找到了上次那几个人。

汽车上岸的那天，晋秘书来了，还是进了308房间。辜书记那是点头哈腰，忙进忙出。这次有机会和晋秘书单独在一起，才敢认真地看了几眼。这个女人果然气度不凡，那么地俊秀，又那么地能干，浑身散发着男人们难以抗拒的魅力。她说的什么话，别人都能很乐意地听进去。辜书记在她边上崇拜得五体投地，都有点想入非非了，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了。但心里又很明白，那不是他的。只看晋秘书会有什么反应，会给他一个恩赐么？这是他有生以来最大胆的想法。然而晋秘书在他面前表现出的却是一个女强人的面目，利索而又干练。一句句清晰而又明确的话从嘴里出来，不容人有任何的置疑。辜书记虽望眼欲穿而无计可施或不敢施，真可谓是有贼心而无贼胆。在晋秘书面前，他只有连连点头忙着去向下布置落实的份。

一切都看似很顺利地完成了。

但这一次可没那么顺利，卞书记插了一杠。

卞书记为这次班子的调整一直很不舒服，不甘心就此退出几乎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海源政治舞台。他一直没走，直到湖西地区那边催了，才很不情愿地动身。才待了两星期，推说家里还没安排好，又回来了。但就在这离开的两个星期里，海源这边把盖了两年的家属楼给分了。当然没有他的份，把他气得都发抖。这个楼是他在几年前力主要盖的，顶着上面批评的压力，才开了工，陆陆续续搞了两年，好不容易才盖起来。在最后时刻把他挤走了，连个房子也没有他的份。他去找了也没用。当年见了老远就点头哈腰的人，如今都躲得远远的，实在躲不过去，也是在敷衍而已。他也知道找了也没用。如果是

他，他也会冠冕堂皇地说，你已经不是这儿的人了，怎么能在这儿分房呢？你这不是在难为我么？相信你是有这个觉悟的，会想得通的。当然反过来，如果海源给他分房子，那别人也说不出熊话（熊话，坏话的意思。在海源话里，“熊”有多种意思。“这个人真熊”，又是无能的意思，还有“熊样”等等，又有不同的意思。其实海源没有熊，不知这些词是怎么来的？），给了也就给了。谁在里面作梗不肯给？一打听，果不其然，就是那个辜建功，占了原本已经分到他名下的房子。不仅如此，姓辜的还把分给周局长的房子也占了去，甚至还养了个二奶在里面。啧啧，太不像样了，这才几年的时间，我们的干部怎么就变成这样啦？少了毛泽东思想的教导就是不行啊。

他在自己家里，也懒得出去，坐在楼上的窗前往下看。他住的是当年全县第一幢二层的家属楼，那时全县人民是怎样地羡慕他，他就想不起来了。突然，他看见有崭新的小轿车向西驶去。他一下子想起了什么。一会儿，又接二连三地过去了几辆。难道又是这件事？他一直在窗台上趴了两天，老婆喊他也喊不动。两天当中，粗略数了一下，大约是173辆，这还仅仅是他数到的。毫无疑问，这又是一次海上走私。

太好了，太好了！他早就想抓这个辫子了，他早就想举报了，把辜建功、连同那个付局长一起打下去。他之所以一直在犹豫没有举报，是怕把自己也牵连了进去。这一次完全没有自己的事，正求之不得呢，就送到了眼前。老天开眼啊。

怎么举报？口头呢还是书面？实名呢还是匿名？卞书记着实考虑了一番。口头吧，有些事说不清楚，也说了那么多。而且，口头无疑也就是实名。用不用实名，这是最需要考虑的。用实名最大的好处是分量重。一个原县委书记、一个地区政协副主席实名举报，一定会成为轰动一方土地的大事，上级一定会很重视，但也就暴露了自己。他知道，真要搞倒付局长，哪怕是搞倒辜建功不是那么容易的。即使是能把他们搞倒，对自己即使是出了口气，别人也会说，他是有私心，是因为自己愿望没有达到而去咬别人。还是用匿名方式吧，到时候可进可退。必要时，以证人身份出现也可以。

卞书记估计这次走私跟上次情况差不多，把上次情况套在了这一次上，把付省长，把辜书记，把晋秘书都写上了。尤其是那个晋秘书，他是最讨厌最看不惯了，卞书记不近女色，这倒是官场里难得有的优点。还有那个尹会计肯定是个心腹，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信一式三份，寄给了省委和省纪委。为了掩人耳目，还是叫他老婆坐车去邻县用挂号发出去的。从挂号信发出以后，卞书记就天天等啊等啊，天天看着这个政府家属院进出的人们脸上的表情有没有变化。还隔三差五装着无意识地去找他当时最可靠的人、县委办公室的蒯主任，而今的信访办主任，关心一下现在县里最新的工作情况。

41.2 辜书记调查

省委、省纪委接到这封信，还是挺重视的，很快就开展了工作，不过这些工作在县里连蒯主任也不知道。不巧的是，卞书记的信里指名道姓直指付省长，是炮弹打歪了。省委一了解，付省长这几天一直在省政府大院里没出去过，这就举报不实了。而且说重了点，这是在捏造罪名诬告了，亏得是匿名举报，要不卞书记真要吃不了兜着走。

举报信主要讲了海源的事。省里在想，举报付省长不实，举报辜书记大概也就那么回事了。所以虽然信里涉及到海源的主要领导，但调查工作还是交给县委去办，省里可以派人在边上监督即可。于是省委、省纪委派专人赶往海源，责成以海源县委为主，组成省、县两级专案调查组开展工作。

省委来人的时候，正是午休时间。辜书记正在那套房子里跟毕丽芳一个被窝里忙活着呢。县委办公室以紧急电话打到辜书记家里，皮珊珊接的，说是省委专门来人有要紧事，叫辜书记赶紧过来。皮珊珊忙不迭地过来，走到另一单元四楼这套房子的门前。皮珊珊知道辜建功这时候是在干什么事，但为了给大家留面子，从来没来过这儿。这一次是实在没有办法，一边敲门一边喊：“老辜啊，省里来人了。老辜啊，省里来人了。”

辜书记正在干好事的关键时候，听得老婆敲门喊省里来人了，一下子泄了气软了下来，引得毕丽芳几声嗤笑。辜书记真的是觉得丢了大面子，那个恼怒啊，嘴里还在骂：省里还管我这事啊。没等穿好衣服，一脸怒气，开门就对老婆吼着：“就怕别人不知道啊？”举手要打。皮珊珊忙说：“真的是省里来人了，办公室来了紧急电话，叫你马上过去。”看到老婆这急迫、认真的样子，辜书记这回是信了，不但是信了，而且一下子人都要瘫了，瘫得比刚才那个还要快。他心里想着，这不是要查自己吧？脸都刷白了，手脚也不好使了。皮珊珊忙搀着他，帮他系扣子，他才稍微好一点，提上裤，穿上鞋。皮珊珊回头带上门，扶着辜书记往楼下走。辜书记这时像得了小儿麻痹症，歪扭着挪动着步子，心里还在盘算，他们会查我哪件事呢？包二奶、搞走私还是侵吞硫铁矿？要是叫我自己坦白，搞审查一般都是先来这一套，那我先说哪个呢？一时走神，差点踏了空，人一晃，眼看要摔倒，亏得皮珊珊在边上赶忙扶住了。心里还想了一下，还是老婆好啊。

辜书记一直叫老婆搀到办公楼门口，才颤颤巍巍地自己上了楼，不知道的还真以为这两口子感情不错哩。

上到三楼小会议室，省纪委的两个人在那儿等着。为主的是一个副科长，姓鄢，好像还有点不太高兴，看了看手表，嘴上虽然没说什么。县纪委的袁主任站在边上。

辜书记推开门，办公室的况秘书忙迎上来，见看辜书记气色不好，腿脚不便，怎么一下子好像老了十多岁，忙对鄢科长说：“鄢科长，辜书记这几天太辛苦，身体不好还天天忙到半夜，今天中午也没休息还在家里忙。辜书记，这是省纪委的两位同志，这位是鄢科长。你们慢慢谈吧。”他便带上门走了。

鄢科长先客气了下，“辜书记，耽误你休息了。看样子，你身体不好，可以谈工作么？”

辜书记看这情况，心里在想，事情可能比预想的要好一些，稍微宽松了些，说：“没事，没事，县一级工作太忙，天天都这样。请讲吧。”

鄢科长点了下头，说：“那我们就说了。省委、省纪委这次叫我们来，是因为……”鄢科长把事情讲了下，便把举报信拿给辜书记看。匿名举报信，在必要的情况下，当事人也是可以看到的。

辜书记认认真真地看完信，舒了一口气。虽然里面讲的事情也有他的份，但看来省委还是信任他，问题还有挽回的余地和处理的时间。当然，情况是十分地严重，不可掉以半点轻心。因为这封信，也是

直接冲着他来的，而且还直接点了他的名。如果有一点弄不好的话，自己将彻底翻船。不只是走私的事，所有的事，都将一股脑儿地翻出来。

他也完全明白，这封信是谁写的。这个王八蛋！他明白，他们之间已经到了有我无他的地步了。哼，谁怕谁啊，走着瞧。别看辜书记在有些地方看起来不那么干练，但要讲政治斗争却毫不怯步。

他看完信，抬起头来看鄢科长。鄢科长说：“省委对你们县委、县政府和你个人都是信任的。所以，这件事的调查处理以你们县里为主，组成两级调查组。你先提名一下，可以有哪些人？”

辜书记说：“那就是县纪委袁主任、县委办公室的况秘书、县公安局的堵局长、龙头镇的党委书记经学文，加上工业局的师局长也可以。鄢科长，你们两位担任正副组长。你们信任我的话，我参加也可以。一定要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向省委、向全县人民有个交代。”

鄢科长说：“组长还是你，我当个副组长。”

辜书记忙说：“我参加就可以了，当组长就不了吧？要不就请县纪委的袁主任当组长？”

鄢科长想了想，说：“那也行，就请袁主任当组长。”

坐在对面的袁主任也赶忙接上话：“是，是，是，我会努力按照省纪委领导的要求去做，处理好这件事。”

鄢科长对袁主任说：“这样，你通知一下，明天上午我们就开始工作。这种事情一定要抓紧。”

“是的，是的。”袁主任答道。

辜书记心里也在想，这事确实要抓紧，但他是另一种的抓紧。

辜书记从鄢科长那儿出来，刚到办公室，袁主任就进来了。袁主任忙问，辜书记您对这事有什么指示。辜书记大体讲了下，这事看起来是发生在海源，实际上还是上面的事，咱县里管不了那么多。咱们县里，主要是把那个尹会计查一下，就事论事，不要牵扯到别的问题，不然就没完没了，很难收场。袁主任连连点头说是。虽说是袁主任当的调查组组长，实际上还不是辜书记在主导，而且比辜书记自己当组长更方便。

辜书记心里踏实了，回到家，跟皮珊珊说了这事。皮珊珊很紧张，不知怎么办。辜书记说，不要紧，亏得这一次你都已经退出来了，找不到我们头上。以前的事，你就推说什么也不知道，都推到尹会计头上。

“那些记录呢？”皮珊珊问。那个奇芳公司的经济往来，也说不上是账本了，只能说是记录。

“马上转移。”辜书记立刻打电话给硫铁矿的南队长来车，在县医院的门口等着。因为在县里，医院门口的车还多一点，不那么引人注目。又叫儿子辜向东到医院门口等着上南队长的车，而后去龙头镇的家里把奇芳公司的材料全部拿出来，再放到硫铁矿档案室的保险柜里。又打电话给硫铁矿的阳主任说龙头

镇西北村有些材料，因为村里内部有不同意见，想把它们先拿出来在硫铁矿放一下，省得他们内部相互之间闹。几个电话下来，这些事也就差不多办好了。

而后就跟付省长打电话说这些。付省长在那边早已经知道了。有人告诉过他，省纪委了解过他近期的行程，没有发现问题。付省长在电话里只是说，这个晋秘书啊，太着急了，形势变了，还在用老办法。你就说，都是晋秘书安排的，具体情况不了解，别的话不用多说。辜书记又把他刚才的处理过程讲了下。付省长说可以，你们那儿的事，尹会计可以先多承担些。

第二天，调查组就抓紧时间开始工作。龙头港的法主任、龙头镇的经学文也都叫来了。经学文，既是调查组成员，又是调查了解的对象。这两位，辜书记也都事先通过气。

法主任说，这事跟码头没关系，只是借用了一下起重用的吊车，把轿车从船上卸下，连停也没停就开走了。

经学文说，这事跟镇上更没有关系了。这些车都没从镇里走，从南门外就直接开走了，他都没看见。他们也没要求镇上或者他个人为这个事做什么。

下午，喊来了南队长。南队长表现得很无辜，他们只是帮着把车从码头开到高尔夫球场，也就几百米，拿了点劳务费。那点钱，还赶不上晚上出去搞兼职的多。

“劳务费？是谁给的？”鄢科长问。

“是开了个支票，我上银行取的，发给了司机们。”

“那张支票是谁给你的？”鄢科长又问。

“不知道，那张支票是后来从邮电局寄挂号给我的。”

“汇款人写的是谁？”鄢科长追着问。

“不记得了，好像是个什么什么公司。”

“那个挂号信的信封，还在么？”

“我是个粗人，不知道还要留这些。取了钱，我就把它扔了。”

“你不要推脱哦。我们上银行是可以查出来的。”

“没有，没有，确实是这样。哪想到你们省里还要来查呢。要不，我哪敢丢，都会留着给你们看。”南队长还在啰嗦。

鄢科长连听也不想听，挥挥手表示不要再说了。

隔天，调查组又来到龙头港，还进了那个308房间看了看。辜书记指着说，那天晋秘书就是在这儿作全面指挥的，我都插不上话。她是省里来的，我也不好多问。在边上站一会儿，我就走了。

鄢科长点点头。

调查组还叫来了尹会计。

下午，粮库的尹会计被叫到了海边宾馆的会议室。叫他的时候，说是省里来了调查组专门来找他。他心里害怕了。他知道这两年他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一些违反政策的事，赚了点小钱，几千块钱吧。心里又是高兴又是害怕，整天心神不宁、提心吊胆的。不知这事到底能做到什么时候。不料，这一天这么快就来了。什么都要结束了。连省里都要查了，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尹会计心里都要乱了。从南门外的土路骑车过来，路被运来的小汽车碾得坑坑洼洼，不小心还摔了一跤，衣服破了个洞，身上粘了土，都顾不上了，跌跌撞撞地进了跟他说的二楼会议室。

当他出现在会议室的门口，里面的人都呆了。没想到尹会计是个这么土的人，这么狼狈的人，就像个在村支书面前挨训的农村老头。而尹会计看到会议室里坐了一圈的人，连县委辜书记都只能坐在边上，更是吃惊得不小，口吃着说：“我，我，我……我就是尹悦之。”说着就毕恭毕敬地站在门口，身上还有些微微发抖。

“尹会计啊，这中间有张凳子，你坐吧。”辜书记说。

“我，我就站着吧。”

“你就是奇芳公司的尹会计？”鄢科长问。

辜书记介绍说：“这位是省纪委的负责同志，你要好好回答他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就说怎么回事。”

听辜书记说这就是省纪委来的，尹会计更紧张了，怯怯地答着：“是，是，是。”

“奇芳公司的往来，有记录吗？”鄢科长问。

“有，有，有。”尹会计紧张得全身都发抖了。

“放在什么地方？”

“放，放，放……在，在，在……”尹会计望着辜书记，抖得牙齿都打架了，话都说不上来。

“你的钱都上哪儿去了？”鄢科长还在追问。

“上，上，上……”话还没说完，尹会计已经接不上气了，人也站不住了，往后一晃，靠在了门背后，才没倒下。

“看样子不行了，明天再说吧。”辜书记对鄢科长说。

“你不要装熊，我们见得多了。走吧，回去好好想想，想清楚点，明天再谈。”鄢科长瞪了尹会计一眼，很鄙视地说。

尹会计自己都走不动了，是辜书记派车把尹会计连同他的自行车拉回了粮库。

尹会计是真熊了，还是装熊？尹会计是真熊了。他还真是个胆小的人，一个唯唯诺诺的人，恐怕还真没有这个本事在这么多人面前故意装出一副熊样。

第四十二章 命案

1978年2月11日

42.1 尹会计死了

其实，在尹会计去海边宾馆接受调查的时候，有一个人比尹会计更着急，那就是宗发奋。宗发奋听说是省里来了调查组，由县委县委书记陪同，把尹会计喊去了，莫不是要查处倒卖粮食的事？

宗发奋急得一下午都没能好生坐下来，直到尹会计被调查组用汽车拉了回来。他也过去看了。尹会计是脸色发白，气若游丝，被大家抬回了宿舍里的铺上。

宗发奋把大家都劝走了，叫关秀娟去拎壶开水过来，自己留在尹会计的床边安慰他。

“嗨，你还至于吓成这样。”宗发奋说。

尹会计稍微好了些。宗发奋给了他一杯水，说：“你看，这种时候，也就我还在你边上。”

尹会计点点头。

“他们都问你什么啦？”这是宗发奋最关心的。

“他们问，钱都上哪儿了？”

宗发奋听得一惊，这可是最关键的问题，忙问：“你怎么说的？”

“我，我吓得都说不上来了。”

“唉。”

“我真是什么也说不上来了，那一下子，什么也想不起来。头疼得都炸了，脑子一片空白，我真是记不起来了。”

“他们还问什么了？”宗发奋接着问。

“他们又问到账本了。”

“那你的账本呢？”

“记不起来了，记不起来了。”尹会计又开始迷糊了。

“唉，这才是刚开始呢，你要准备吃点苦头哦。不交代，要吃苦头。交代了，还要你再交代，没个完。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究竟经手了多少，反正是要逼着你交代。”

“我是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是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尹会计嘟哝着。

“那你总得想个了结的办法。不多说了。你自己先歇息吧。”宗发奋起身走了。

“尹会计他怎么样？”关秀娟过来挺关心地问。

粮库的职工也都在尹会计的宿舍外轻声议论着，没离开。

“我也不清楚，没听说过他有什么事。”宗发奋淡淡地答着，还是第一次对他的目标物没有笑脸相迎。

第二天早晨，大家过来看尹会计，还是迷迷糊糊，神志不清，好像比昨晚更厉害了。宗发奋叫关秀娟上卫生院把叶丽娜喊了来。叶丽娜过来看了看，问了问，说是精神受刺激了，暂时不要打搅他，让他歇歇，再看看往下是怎么个情况。

等叶医生走了，宗发奋过来靠在尹会计的耳边悄悄地说，估计调查组还会来叫你去，去了还要遭罪，你就躺在床上别动。

果然，早饭后，调查组来了电话，叫尹会计过去。宗发奋说，不行了，人家医生说，快要精神病了，先让他歇几天。听说是这个样，省纪委的另外那人和袁主任，特地开了车到粮库来，看了看尹会计。尹会计还穿着破了洞的衣服，脸上的泥还在，卷缩在被窝里，嘴里反复地嘟囔着：“记不得了，记不得了。”也不理来的人。

来的那个省纪委的人叹了口气，走了。回到宾馆，跟那些人一说。鄢科长眉头一皱，说：那我们不等了，先回县城吧。他是挺烦尹会计这个人的。

调查组回县城了。然而，更大的灾难却降临到尹会计的头上。

调查组是走了，可宗发奋放不下这个心。他在想，尹会计这个人不能留。还没动棍子呢，就吓成这个样，以后调查组再施加点压力，不得像竹筒倒豆子那样一股脑儿全说出来啊？现在调查组走了，不就是留给他宗发奋下手的机会么？

宗发奋能这么狠心么？会对一个胆小如鼠的老实人，对一个唯唯诺诺、替他宗发奋办了不少事的人痛下杀手么？别小看了宗发奋，他可不讲什么“妇人之仁”，宁可我负人，决不让人负我。不用等他负我，就先除了他，也不管他是不是真的要负我。这就是宗发奋这种人的处事原则，这就是他们这种人在腥风血雨的政治搏杀中提炼出来的处事原则。别忘了，他可是把从战场上抬他下来的林海秀毫不迟疑地推上了断头台！

怎么除？又是个问题。他也分管了多年的龙头镇的政法工作，很清楚这一点。但是时间非常紧迫，省纪委的人不可能在县城一直等下去，说不定还会把尹会计带到县里去、带到省里去。到那时，他宗发奋就会鞭长莫及，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地步，只能等着束手就擒。他不能眼睁睁等到这一步而无动于衷。他要先下手为强，而且必须在今天之内就解决。

考虑到尹会计是个老职工，粮库照顾他，给了他单独的一间宿舍。从昨晚他回来后，宿舍的门一直没关。尹会计也没有力气起来关门。粮库的职工们也不时过来看看他。他们还很单纯，远没有想到事情

的严重性。关秀娟几个女职工还想到要帮尹会计换个衣服、擦把脸。

早饭后，宗发奋过来了一趟，对尹会计说：要坚持住啊，要准备遭点罪啊。你这是才开始啊，不过是问了几句话。我那时挨了多少打啊。文革一开始被红卫兵打。听毛主席话，造了反，参加了造反派。回过头来，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又挨打。政治运动啊，你是还没有吃过苦头。要有思想准备，不会轻易过去的啊。

宗发奋知道不能老是去尹会计那儿，那样会引人注意的。虽然他作为单位领导，去几次看看他也是可以的，但一定要掌握这个度。上午，他问了问关秀娟，尹会计怎么样了。关秀娟说，神志好像比昨晚清醒了点。但是情绪很低落，不愿说什么话。我们想帮他换下衣服洗洗，他不肯。

“哦。”宗发奋应了声。他希望的也就是这样。他希望尹会计在半醒不醒之中。完全不醒，就不能进行别的工作。除非真的动刀子杀了他，宗发奋不会那么笨。完全醒了，又会听不进别人的话。他需要做的，就是分步骤火上浇油，不断地施加压力。

午饭后，宗发奋又去了趟，把刚想睡午觉的尹会计推醒了。“你还睡得着啊？告诉你吧，事情不会那么简单的。你以为是个经济案件啊，查查你多拿了几个钱啊。那还用费这么大事，连省里都来了人啊？这是一场政治斗争，一场大规模的从上到下的权力斗争。前面卞书记老的那帮人不服新上来的辜书记，在进行反扑呢。要在你这儿打开缺口，非得要撬开你的嘴不可。你要有准备啊。”说完，看尹会计又有点昏昏沉沉，就不多停留，起身走了。

下午，宗发奋回到他那小楼，拿了两瓶酒，县酒厂出的“海源白干”，是当地人常喝的一种高度烈酒。请注意是两瓶，还往其中一瓶里倒了一袋“鼠药新”。早期常用的老鼠药是“毒鼠强”一类，食后造成心脏骤停，几分钟就死了。人一旦误食，几乎没有抢救时间，犯罪分子常常用这个来下毒。所以后来提倡改用中长期见效的新鼠药。长期性的，是引起溶血症，要几天后才见效。中期性的是麻痹呼吸和心血管系统，起作用要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宗发奋拿的“鼠药新”，就是属于后一类，一般家里面也都有。

宗发奋把两个酒瓶和两个小酒盅放在公文包里，和往常一样拿上包走向粮库。此时，天色微暗，并不引人注意。他先问了下别人，尹会计下午怎么样了。别人告诉他，尹会计有点烦躁，精神很低落，一天也没吃饭。还有人好心的说，就让他回家歇几天吧，他在这儿，我们大家还得替他操心。宗发奋上伙房，拿了盘炒菜、一个馒头，先跟别人说，我去劝劝尹会计。到了尹会计的宿舍，把他喊了坐起来，说：“尹会计啊，饭还是要吃的，酒还是要喝的。来，来，咱老哥俩喝一盅。”

宗发奋拿出酒瓶和酒盅，给尹会计倒上满满一盅，劝着：“喝，喝。”见尹会计没动，站起来，就给他灌下去了，再倒上一盅。“老哥啊，再没机会喝啦。到了里面，我就见不着你啦。到了那里面，就厉害啦。我们这个队伍有个不好的习惯，审查起来啊，就往死里整。揪住头发，一把一把地往下薅。你再不说，抓起你鸡巴蛋就使劲捏，捏一下就叫你疼得昏死过去。”宗发奋绘声绘色地说着。尹会计似乎听进去了一些，因为他自己端起宗发奋刚倒上的酒盅喝了下去。

宗发奋又赶紧再倒上一盅。他看了看尹会计，把酒盅递了过去，“老哥啊，你要是想休息，就回家歇两天，先躲开那个调查组吧。”尹会计似乎是在点点头，喝了下去。

宗发奋又倒上一盅，靠近尹会计说：“你回去后，先就别回来了，躲几天吧。找个别人找不到的远房亲戚家躲起来。省得他们再来，把你押到县里，押到省里，押到看守所，押到监狱里去。那就遭大罪啦。知道不？喝！”又是一盅。

“还能再喝？差不多了吧。”宗发奋在根据尹会计平时的酒量仔细地算计着。既不能没喝到份上，又不能过量。过了量，他连这个门也出不去，那也麻烦了。

宗发奋把酒瓶和酒盅收了起来，又拿出了另一个酒瓶和酒盅，轻轻地拧开瓶盖，把酒倒进酒盅，自己连喝了三杯，最后又到上一盅，放在尹会计面前说：“要想喝，就再喝一杯，不要多喝了。”又靠近尹会计耳边说：“要走，稍歇一会儿就走。要不，大门就关了，走不掉了。”

宗发奋看着尹会计又喝了一盅，便拿起装着有毒酒瓶和酒盅的公文包，起身走了，走到门口，特地提高嗓音回头对尹会计说：“不要喝多了，少喝几盅就行了。早点休息哦。”这话有几分是说给外面人听的。

第二天一早，还没到开饭的时候，有个老乡慌慌张张地跑进粮库的大院，拼命地喊着：“你们粮库死人了，你们粮库死人了！”

门卫出来拦住说：“大清早的，别吓说！”

那人依然很紧张地：“是你们粮库死人了，是你们的尹会计死了。尹会计死了啊！”

大伙都围了过来。宗发奋也赶过来。他一夜没睡，就在等消息。听着有人进来嚷嚷，心里大喜，知道大事已成，装着大惊，连忙凑过来问：“你是哪儿的？死在哪儿？死在哪儿？怎么死的？”

那人说：“我是王庄的，清早起来上路捡柴火，看见路边倒着一个骑车的人，死在那儿了。赶紧告诉村里，村里人过来一看，认出来了，是你们粮库的尹会计，就叫我赶紧过来告诉你们。”

“人呢？”宗发奋问。

“还躺在那儿呢。”

“还不赶紧报警啊。”宗发奋说。

有人拉着那老乡进办公室给县公安局打报警电话。接着宗发奋向县粮食局打电话报告了情况。按宗发奋的算计，尹会计最好是在过桥时掉进河里淹死。但现在这样也好，好在人是死了。要是不死，那才麻烦哩。

尹会计的死，在龙头镇，在海源县城，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省里来了调查组，尹会计就死了。这是畏罪自杀呢，还是杀人灭口呢？就成了最大的谜团。人们都在翘首看着县委，看着调查组。

鄢科长是最烦了，才来调查，还没有眉目呢，就死人了，你说倒不倒霉。尤其是如果尹会计的死没有结果，那就没法回去交差了。鄢科长也不敢耽搁，立即向省里作了汇报。省里也来了另一个消息，本案的关键人物晋秘书找不到了。

省纪委绝对想不到的是，此时的晋秘书已经在遥远而美丽的加勒比海上一个不起眼的岛国逍遥自在呢。晋秘书在得到付省长的通告后，马上请英国的斯汤达尔公司发个访问邀请函，邀请晋秘书和随行人员小祺来英国考察。接到电子邀请函，打印出来。她拿上两年前就准备好的祺小姐全套身份材料，立即飞赴英国。到英国后，再另换一个全套身份材料，用什么名，这儿就不说了，飞到了这个原属英国属地的岛国。晋秘书走时带了3000万元的外汇，付省长还关心地问3000万够不够。晋秘书说，去到以后，不够再说吧。按说，这些钱在那儿买别墅、过一生也足够了。晋秘书有留学英国的学历，通晓英语和英国文化。这个外逃过程，对她来说如演戏一般，小菜一碟。这个外逃方案，在几年前就已经准备好了。连付省长自己也有全套的预留方案。

42.2 堵局长破案

王庄的大道上，差不多就是当年李辰从劳改农场出来晕倒在路边遇上赵炎黄，后来又遇上宗发奋的那个地方。

现场进行了仔细勘查，看有无被车辆撞击或碾压的痕迹。这一眼就能看出，没有，可以排除交通事故的可能。再看有无搏斗的痕迹，地上有无散乱脚印和喷溅的血迹，身上有无刀伤或钝器打击的伤痕，都没有，也排除了夜间遇见歹徒被杀害的可能。在现场，也没有发现外来的异常致死、致伤的因素。案情非常简单明了。当事人就摔倒在自己的自行车旁，右腿还压在车座下，说明车速并不快，仅在右手掌和右脸颊有少许表皮擦伤。这一切都表明，就是在他自己骑车时摔倒而死。

在现场拍完照之后，遗体立即送往县医院，由法医和县医院的医生一起验尸。

县公安局为此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堵局长亲自挂帅。在他带领下，专案组紧急讨论案情。就当事人这一方的原因，已经可以初步排除交通事故的可能，也排除了在现场被人杀害的可能。再要看看是不是由于精神过于紧张而猝死。有人提出来，他在被询问前大白天从粮库到宾馆的路上都摔倒过一次。在被询问后精神更紧张，又是夜间行走，更厉害地摔一次，造成内出血的可能性很大。还有他原先是否患有致死性的严重疾病，比如心脑血管方面的。讨论了一下午，没有任何结果。

第二天，验尸报告出来了。结论又使所有的人惊呆了，尹会计是死于“鼠药新”中毒，胃里有大量毒物，这完全出乎专案组的意料。至此案情有了重大进展。或是尹会计畏罪自杀，或是真有人在杀人灭口，二者必居其一。无论是哪个结果，都将对省纪委调查组的那个走私大案有重大影响。

专案组又赶紧开会讨论。

自杀有没有可能？完全有可能。当事人在接受讯问时和讯问后都表现出精神不正常。思想压力过大，一时想不通，自杀是可能的。问题是毒药是怎么来的？是在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吃下去的？如果是他杀，是谁下的毒？为什么下毒？以及是在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下的毒？这些都要查清楚，才能向上级交代。

这一方面要从物的方面去查。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那晚上放在尹会计桌上的酒瓶和酒盅。经过勘查，酒瓶上有宗发奋的一对指纹和尹会计的几个指纹，酒盅上有宗发奋的半个指纹，淹没在尹会计十多个杂

乱的指纹里。但是，酒瓶和酒盅里都没有检验出“鼠药新”的成分，也就是说这鼠药不是喝酒时喝进去的。这就很令人费解。

另一方面，从人的方面去查。如果有人要杀人灭口，那一定是与尹会计有仇，或者是与案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人，或者是这样的人所指使。尹会计从宾馆出来后就直接回到了粮库，所接触到的都是粮库职工。而省纪委调查组要调查的案情里没有涉及到粮库里的人，案情相关人员也几乎没有机会立即指使粮库里的人对尹会计下手。

这就奇怪了？就算退一步说，就是粮库里的人下手，又会是谁呢？这就要查以前有没有跟尹会计有过尖锐矛盾的人，和当晚与尹会计有过接触的人。

专案组又马不停蹄地赶到龙头镇，对粮库里的每一个职工都进行了认真地谈话，作了笔录。连镇政府、海边宾馆，乃至尹会计工作过的原单位供销社的不少职工，专案组也都去调查了。

汇集的情况是，尹会计来粮库时间不长，平日里又非常地低调，跟别人没有什么过节。即使是在工作了几十年的供销社，也几乎没有跟别人有明显的矛盾。虽然也会有一些自己的小算盘，但没有过要损害别人的利益来为自己捞好处。给大家总的印象是，是个老实人。从作案动机看，因仇而杀他，可以排除。

那粮库里的人，谁的嫌疑会更大一些呢？排查当天所有跟尹会计有过接触的人。尹会计从宾馆回来，弄成那个样子，大家都挺关心，粮库里的每个人都来过。即使是有人在屋里开导尹会计，也还有很多人站在门外，议论着，久久没有离去。连那扇门也都一直没关过，几乎没有作案时间。要说来的次数多一点，说话时间长一点，那就是宗发奋了。但人家是领导，自然要来得多一点，多过问一些，停留时间长一点。如果来的少，漠不关心，那倒反而不正常了。而且每次来的时间也并不长，讲的话也没有背着人。据说，宗发奋过去跟尹会计的关系还不错，还是宗发奋把尹会计调来的。还有关秀娟也来过好几次，对尹会计很关心，要帮他换下衣服洗洗，问他吃不吃饭，更不像是作案人。

破案的进程似乎停下来了。关键还是尹会计的鼠药是从哪儿来的，什么时候喝下去的？后一个问题，通过进一步尸检，化验胃里的滞留物，解决了。就是在傍晚八点左右。应该就是宗发奋在屋里跟他喝酒的时候，或者是他们喝完酒、宗发奋走了之后他自己吃的。但就是这个最关键的问题，物证检验无法这么精确地确定时间点。

找来宗发奋。宗发奋说，酒是他带来的。他知道尹会计喜欢喝点酒。那天看尹会计吃不下饭，就带过去，让他喝点。宗发奋说，第一杯是他倒的，以后都是尹会计自己倒的。他自己没喝，他已经不喝酒了。尹会计好像是喝了三盅，他走了以后喝没喝，他知道了。

专案组进入尹会计住的宿舍，进行了仔细搜查，另一方面也是想找出奇芳公司的账本。结果一无所获。既没有找到账本，也没有找到老鼠药。

是谁让尹会计走的？也没有人。有职工讲过，不如让尹会计回家休息吧。但那是在大家议论时说的，不是直接跟尹会计说的。说这话的时候，宗发奋也在场，不过大家都说，宗发奋对此没有表态。宗

发奋离开尹会计房间的时候，只是叫他早点休息，没说叫他走，这是在门外的人都听见的。

堵局长重点询问了关秀娟，因为她对尹会计好像比较关心。

堵局长问：尹悦之走的时候，你看见没有？

关秀娟答：我看见的。那时我就站在他房门口，还有另外几个人。

问：那是几点了？

答：大约八点半。

问：那么晚了，为什么还在他门口？

答：看他年纪大了，老同志，摊上这样的事，不放心。

问：有什么不放心？

答：你怎么这么问？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关心一下反而有嫌疑么？

堵局长说，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要想多了。又问：他走的时候，带了什么东西？

答：就一个背包。

问：和平常一样吗？

答：比平常还少一点，那个包好些比平常空一点。

问：走的时候，神态怎么样？

答：精神很不好，很消沉，一个人低着头走。

问：你没有跟他说话？

答：我就问了句，尹会计，你回家啊？

问：他怎么答？

答：他没有回答，只是点点头。

堵局长又问粮库的门卫，尹会计是怎么走的？

回答是，出门时推着车，出门后骑上车走的。

问，当时，他表现得怎么样？

回答是，精神不太振作，低着头，走得有点慢，但也不是晃晃悠悠有危险要摔倒的样子。

问，他往外走的时候，你问过他么？

回答是，人家都摊上大事了，那个样子了，还问什么？没问。

又问，为什么让他走？

门卫很奇怪，反问道，还有谁不让他走么？没有人说不让他走呀。

是的，连省里的调查组也没有说，要对尹会计隔离审查呀，没有要求单位对他进行监视呀，那你还说什么呢？

自杀、他杀的结论，还是无法下。宗发奋身上有疑点，不能排除，但要作进一步审查也没有足够的理由。关键仍然是无法解释“鼠药新”的来源。调查组对尹会计的询问是突然的，事先没跟龙头的任何人说。难道是尹会计自己早就准备好了鼠药？如果不是这样，唯一的可能，几乎就是宗发奋了，但又没有直接的证据。酒瓶和酒盅，都不能作为宗发奋犯罪的证据。酒瓶里少了五小盅的酒，也属于正常范围。去搜查宗发奋的办公室和他家里么？谁也下不了这个决心，谁也不会做这个决定。堵局长知道辜书记的意见是案子不要扩大化，不要牵扯更多的人。他觉得辜书记的意见是对的。况且，就算是宗发奋作的案，那些酒瓶之类也早就扔了。哪个傻瓜还会留到现在呢？从逻辑推理讲，这个走私案，他宗发奋为什么要插上一杠呢？没有必要。如果要认定是宗发奋作案，从证据链到推理，不是完全沾不上边，但中间就缺少了这么关键的一环，连不起来。

堵局长左思右想而不得其解。毕竟他不是搞刑侦出身，到此，已束手无策、无计可施。他只好去向辜书记请示，这事怎么办？

辜书记说：“怎么办？好办得很。疑罪从无。连我都知道，你怎么不知道呢。没有板上钉钉的把握，你能把宗发奋怎么样？我看就是那个姓尹的畏罪自杀。证据充分，逻辑上也说得通，对整个走私案件的定性结案也有利，对省纪委也讲得过去，尤其是让省纪委调查组的那两个同志回去好交差。与其扯出宗发奋，弄不好收不了场，到最后，你弄个悬案怎么办？各方面都说不过去，而且到那个时候谁也不好过。不如就这么定了。你看呢？”

其实，辜书记以他对宗发奋的了解，完全猜到他有作案的可能，猜到了宗发奋是怕尹会计帮他搞的那些东西被翻出来。尹会计具体帮宗发奋搞的是什麼，辜书记不完全清楚，但肯定不是好东西。但辜书记希望事情到此为止。这个尹会计突然死了，那真是太好了，上天救我啊。这样把什么事情都可以往这个姓尹的身上推，不必去管他倒多少的霉，自己就可以完全脱出来而毫发无损。

堵局长自己没有别的办法，虽说对尹会计的命案有点遗憾，没有走完最后一步，但也只能照辜书记说的去做了。堵局长是几分无用又几分无奈。说无用，是他在全县的公安系统里算不上是个能干的人。那辜书记为什么要提他当局长呢？你可要知道，用无用之人，也是种用人之道。说无奈，是他也觉得这个案子没有走完，还可以再深入下去。但是辜书记已经发了话，人家省纪委的人还在那儿等着。再搞下去，那是在给自己添麻烦，不如就此了吧。

于是，县公安局专案组做出了最后结论，那就是尹悦之畏罪自杀。

这个结论一出，整个龙头走私案的调查结果和处理也就好做了。两个主要涉案人员，尹会计死了，晋秘书逃逸失踪（开始还不知道她已逃往国外）。所有的事情都往他们两个身上一推，案件就了结了。

一个月后，省有关部门在龙头港召开全省打击海上走私的现场会。全省沿海的相关口岸和企业来了一百多人。大会由付省长作主题报告。

付省长讲到：“龙头港走私案件的及时破获和得到严肃处理，表明我省打击海上走私的工作是有成效的，省委省政府的领导是得力的。我们对走私犯罪，绝不姑息，坚决打击。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省委省政府领导下，筑好海上钢铁长城，维护好我省经济运行的良好环境和良好态势。现在，我宣布，省有关部门的决定：

一，撤销奇芳公司的经营资格。

二，对奇芳公司的法人代表晋奇芳罚款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并发布全国通缉令，一定要抓捕归案，追究其刑事责任。”

付省长念到这儿时，全场哗然，啊呀，罚款一百二十万啊，不得了啊。

“请肃静！保持会场纪律！”会议主持人在一旁插话了。

会场稍安。付省长接着唸：“三，鉴于奇芳公司财务负责人尹悦之已畏罪自杀，决定罚没其个人非法所得人民币一万元，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会场上又纷纷议论起来，啊呀，都死了人啦。

辜书记领着毕丽芳，也过来开会。

会后，辜书记把付省长安排在宾馆的308房间休息，两人谈了会话。

“好险哪，我是出了一身冷汗。”辜书记说。

付省长笑笑说：“这点事算什么。不过你做的不错。”

“那里，那里，说不上不错。我是铁了心要跟您干革命，下决心跟您走到底了。”

付省长满意地点点头。

“今晚您在这儿休息吧。晋秘书走了，怕您寂寞，我安排了这儿的一位姑娘来伺候您。呵呵。”

“不会是那位林姑娘吧？”付省长笑着说。他还没忘那件事呢。

“呵呵，林姑娘算个什么，您看看这一位，包您满意。”辜书记也高兴地笑着说。他起身向门外探头，喊了声：“丽芳啊，进来。”

进来的毕丽芳，今天更是万种风情、分外妖娆，付省长看得呵呵直笑，这跟晋秘书是另一种类型的，是火辣性感型的，换个口味也好，好，好。

毕丽芳朝付省长一笑：“首长，您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我一定会做好服务工作。”

付省长连连点头，“好，好。”

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辜书记还有件很不愉快的事。就是那天中午，他正在跟毕丽芳激情的关键时候，老婆来敲门直喊省里来人了，坏了他的事。一下子泄了气，憋了回去，就再也起不来了。这之后还被毕丽芳笑话过好几次，“四十一了，四十一了”，在床上咯咯直笑。四十一，在海源话里是性功能障碍的意思。这两件事怎么会扯到一起？在海源有个不算黄的段子解释这事，这儿就不说了。

第二天，付省长对辜书记说，小毕想跟我到省城去看看。

“好，好。”辜书记也简要地说着。反正他也不行了，留不住了，不如顺水推舟。这个丫头啊，真厉害。眼看着，从村里到镇上、到县里，这回又要到省里了，四级跳啊。辜家是留不住她了，还是早点走吧。

皮高深得知毕丽芳要到省里去了，又惊讶又佩服，连连吐着舌头、自叹弗如。

最郁闷的还是杜长贵，唉，曾经的老婆啊原来是这么厉害，自己是看不住了。平近芳那儿，既没有激烈地反对，也没有半点的热情。就算是重新捏到一起，恐怕也没有意思了。像她这种敏感而低调的人，受到这种情感上的打击，内心的伤痛是最深的了。而平近芳自己的想法是，好不容易走出了那个阴影，不想再进去了。

倒霉的，除了死去的尹会计，还就是卞书记了。卞书记实在不服，不惜暴露身份亲自去了省纪委继续追究，但没有被认可，说这事已经经过很认真的调查，现在这个结论是很难被推翻的。相反，湖西方面以超期未能履行职务为由，经省里同意，罢免了他的政协副主席。这下，卞书记就很被动。工资、医疗关系在湖西，又不想去。户口关系还在海源。理论上说，海源还可以收回他的住房。当然，没有逼他到那个份上。但卞书记自己抑郁成疾，整天趴在家里也不出门，不想见到人，甚至连窗外也不再去看，哪怕再有一长串的小车经过也不想看了。没几年就去世了。在领导干部里，他算是走得比较早的。

还有皮珊珊。她在毕丽芳的事上没有嫌弃辜建功，辜建功还是心存感激之情。两年之后，皮珊珊以疏铁矿董事长的身份当选为全省十大优秀女企业家。她连疏铁矿都没去过，要上省里领奖之前，才临时上那儿去看了看。

回过头来，再看这海上走私案，和尹会计蹊跷死亡的案子，还是有很多疑点可追的。尤其是尹会计那个案子，宗发奋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留有很大的漏洞。比如真要是尹会计自己吃的毒药，他单身一个人住宿舍，哪来的老鼠药呢？那个包装纸在哪儿呢？没有人去深究。之所以这样玄的事居然被糊过去了，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无论是辜书记还是卞书记都不是真的在反腐。他们考虑的是权力的争斗，考虑的是自己利益的消长。就是那位鄢科长也是在就事论事，在办一件例行公事，能交得了差就行了。

不铲除产生腐败的土壤，不触动相应的那个体制，反腐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甚至连标也治不了。

第四十三章 台商

1978年2月12日

43.1 阿英和发仔

王立回到台湾彰化自己的家以后，本以为卸了几十年的心事，从此卸下心头的重担，可以心无旁骛地跟老婆、孩子一门心思地过起“台湾人”的日子。可是，丁妹的死讯、老母的死讯，又一次次地沉重地打在他的心上。这几十年家里为他付出了多少啊，他能丢下不管吗，他能心安理得地当他的“台湾人”吗？故乡和亲人，跟他有着怎么也割不断的血肉牵连，有着怎么也放不下的牵肠挂肚啊。虽然知道了家乡和亲人的情况，虽然知道老母亲死了，丁妹也死了，但他那种牵挂，似乎比回大陆探亲之前更强烈了，也更清晰、更具体了。

他想为家里做点事，为家乡做点事。为家里盖了房子，反而引起纷争，老母亲因此而死。唉，哪想到会这样呢？为龙头镇、为西北村做点事吧。虽然自己也只是一介农夫，没有多大能耐，但是从心里愿意出点力。尽管自己并不想以后还会去“落叶归根”，但也希望故土上有自己添的一块砖、一颗石子。

出个什么力，办个什么事呢？他也想过，去家乡办个碾米厂，自己是最熟悉不过了。可是海源不种水稻，那就办个面粉厂，倒也并不难。海源几乎村村都有磨粉坊，那个效率多低啊。

王立想到过这些，就跟儿子发仔商量。发仔也没有更多的意见，他倒并不是对去大陆有什么兴趣，只是觉得现在家里这碾米厂不会再有什么发展了。去大陆办个什么厂，或许能开一条新的路。

“开一个厂，钱够吗？机器怎么运过去？谁在那儿管事？”发仔很务实，问了一连串很具体的问题。

王立也想过，却没想到儿子会想得这么细，心里暗暗有点高兴，说：“我跟那面的村里再商量商量，看他们能帮多少忙。”

王立一直记着，回家时镇里、村里一些领导对他的嘱托。他们说，只要你对家乡有什么点子，家乡会尽力帮助你，资金、土地、劳力都不会成问题。在这儿，几十年里从没有人把他当作一个人物看。就凭这一点，他也要为家乡出点力。

跟老家一联系，那面的镇里、村里都很支持。资金不够，镇里、村里担保贷款也可以，出资入股也可以。土地，作为村里自己的厂，可以无偿给。机器，就买内地产的，既便宜，运输、安装还方便。

王立很感动，家乡的干部这么热心、这么真诚。他又去跟儿子说了。

发仔说：“最近我特地到台北的加工进口小麦的面粉厂看了，有了点想法。我想，大陆那边的面粉厂不会少，我们也搞不了大的。可以搞个专用面粉厂，专门生产糕点面包用的面粉。老家那边，是北方

人，吃面条、饺子多，也可以生产那些方面的专用粉。这样，当地别的面粉厂跟我们也不会有什么竞争啦。厂子小一点，也没关系啦。”

发仔的这番话，把王立激动得不得了。看着眼前已经成大小伙的儿子，以前总有那么多的隔阂，相互间甚至讲话都很少。他能看出来，在村里人面前，儿子总以有这个“外省人”的老爸感到自卑，事事处处要和自己保持距离，装着是个“台湾人”。今天儿子的这番话，不但说明了儿子是个好学的、能干的人，更说明了儿子也在想着老爸所想的问题。父子俩终于想到一起了。

海峡两岸还不能直接通信通话。狗狗在美国的老爸辛凯旋，成了王立和家乡之间的传话人。辛凯旋在美国的儿子来了电话，说西北村里的厂房快要盖好了，用什么设备定一下。生产专用粉主要在于研磨技术和原料、添加剂的不同，对于机器设备，尤其是小型企业没有更多的特殊要求。这在之前也已经商谈过了，按年产3万吨的规模，先上一条生产线。从清筛圆筒、打麦机、配麦器到辊式磨粉机，这一套大约要五、六十万元。王立还是个实在人，为家乡尽心尽力，拿出了他一生多半的积蓄，并没有想到以后的风险。因为台币到大陆不好使，也汇不过去。王立把这些钱换成美元之后汇给了大洋那头的辛凯旋，请辛老先生再替他转到大陆去。

辛老先生对家乡的感受也是一言难尽。家乡对于他是飘荡着老父老母幽魂的大河，是浸透着发妻血渍的黄土。可那又是故国的青山绿水，又是儿孙们繁衍着、辛劳着的家园。既是血泪斑斑，又是根脉相连。哪一面，都丢不掉、放不下。辛老先生已是七十开外、白发苍苍，心中却是热望难平。尽管有着切肤的伤痛，可他也有着千百万海外华人共同的心愿，盼着家乡好，盼着祖国好。在他心里，祖国跟政治理念没有关系，跟哪个党派、哪个政府没有关系。祖国、国家、政府、党派、领导人都是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不管国体、政体和执政党如何的变迁，祖国还是那个祖国。况且，祖国在改革开放中，事情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五年前，回到故里的探望，使他有了几分欣慰。他看到狗狗这几年办厂挺成功，觉得现在的家乡还真有发展的机会，还跟狗狗商量过。狗狗那时还没到美国，狗狗在电话中说，针织厂的事已经挺多的了，他不想搞更多的了。知道王立要回去办厂，老先生也想再出点力，又怕自己还担着“逃亡地主”的名分，也不想直接出面。给了王立两万美元，说以后能有分红的话就给点，没有也别惦记在心上，也不用跟别人讲。

王立心里自然十分地感激，辛老先生都这么大年纪了，虽然家遭坎坷，却依然爱国爱乡，不计名利，无怨无悔，真是难能可贵。

村里收到这款子，就忙开了。首先，这应该是给联合会的，不是给村委会的。村委会是管行政的，不应该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办厂还不够的款项，那就由联合会出。联合会也没有这么多钱，而是向农业银行借，银行早先也同意了。问题在于怎么给，这钱以什么方式给面粉厂。农行说应该是借款，是联合会替面粉厂借的。这样，联合会就拿佣金，银行等着收利息，不管面粉厂经营如何，他们两家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外事办说不行，应该是作为联合会向面粉厂投资，这样你村里对面粉厂才有发言权、经营权，镇里、县里也可以作为引进外资的一项成绩向上报。农行营业部的人说，不行呀，你们投资就算中外合资了，那台湾也不能算外国呀。叫中台合资就更不对了，那不就是“一中一台”了吗？这可是原则性的大问题啊！那怎么办？向上请示吧。还是县里有关部门明白，答复说：这有什么好讨论的，办起来再

说，先把外面的钱拿过来要紧，叫什么都没关系。再说这“中外合资”的外，不只是指国外，而是指境外。这个境外，还不是指国境，而是指关境。这个“关”，是海关的关。海关外面的，就是外。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港澳台也是境外。从那儿来的资金，也是外资。

一头雾水的民主村人，这才明白了点。彭小宾说：“经济事务还这么复杂。新时期里，需要学习的事情太多了。”

那时村里还不明白股份公司、资本运作这些概念，就安排王立当面粉厂的董事长，又请王董事长再回来参加开工典礼、具体指导。

王立跟阿英、发仔说：“不如我们一起回去吧。让你们也看看大陆，看看我的老家。那也是你们的老家啊。”

“也是我们的老家？”阿英自言自语地问了一句。再一想，是哎。海峡的对岸，是自己男人的老家，也就是自己儿子的老家。说起来，也应该就是自己的老家。但是，那个老家是那么的遥远，那么的模糊，那么的充满着种种叫人害怕的传闻和未知。自己还从来没有想过，那就是自己的老家。今天王立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真应该去看一看。那儿是王家的根脉所在，况且自己娘家也是从大陆过来的，只是比王立他们那批“外省人”早来了二三百年来，自己其实也是“外省人”呐。

阿英想到这儿，刚想说“那就一起回去看看吧”，另一个念头又升起来了。看自己的男人王立，虽然在这儿辛苦了一生，可还是挺壮实。虽然说不上“伟岸挺拔”，但身材长相还在中等以上。自己比王立大了几岁，却显得又老又黄，脚也不利索，回到他的老家，不是给他丢人了吗。况且，那一边的规矩，一点也不懂。去了，不是要常闹笑话吗。

所以，阿英开口说的话是：“唉哟，我都老太婆了，还去啊？人家不会笑话啊？”

“笑话什么呀？人家知道来的不是电影明星，是王立的老婆，不会挑剔的。主要是让你看看我老家的山水跟这里不一样，连大海也不一样。”

阿英知道，去一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也就答应了，只说是要去跟娘家的人讲一下。

发仔心里倒没有想这么多。小时候，因为这个村里都是客家人，常被小伙伴们欺负，所以很反感“外省人”的身份。而且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客家人。自己长的模样、穿的衣服、说的话，都跟客家人一样。除了那个常常闷头不语、整天拼命干活的父亲，自己跟“外省人”好像没有多少联系。长大之后，渐渐知道自己是“外省人”的后代，这是个无可改变、无可回避的事实。从心里又觉得，这是个无奈的事实。他不但没有想过要学几句“唐山话”，甚至都没有去问过大海那一边的情况。他不想知道那儿的情况。他没有“老家”的概念。

从一年多前，王立从老家探亲回来，讲了很多家乡的故事。讲那边几十年里的人世沧桑，讲了那么多悲壮的、惨烈的、凄苦的、连小说家们也编不出来的故事。又讲了那一边也迎来了春暖花开，不是那么整天凶神恶煞的样子。发仔是个农村的孩子。随着台湾社会的发展，村子渐渐变成了小镇的模样。在这个背景下，他又是个长大了的、还在成长中的农村孩子。他对政治没有兴趣，他在村里听到别人对国

国民党有颇多非议的时候，甚至不知道该说国民党是对还是不对。近几年，蒋经国先生大力推出新政，结束了威权主义的统治方式，解除了戒严，开放了党禁、报禁，台湾社会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些他也感受到了，但是他没有更多地去想政治上再怎么进一步享受民主。近两年又新出了个民主进步党，村里也有人去参加，说是除了国民党，我也有个党了。发仔对这些，问也没问。他想的只是家里的碾米厂。其实，想着家里的碾米厂，也是近两年的事。以前，他连这也不想，总觉得那是他老爸的事。他想出去，想进城里去。可是他没上多少学，因为他不愿去那些客家人孩子的学校，在那里，他没有多少乐趣。他对这个社会没有更多的了解，想进城，也没有适合的路径。某种意义上说，他比他父亲更是个当地社会的“边缘人”。回过头来，他才关心起家里的碾米厂，他知道他这辈子恐怕也就靠这个了。他开始感谢起他父亲来，还是他父亲的辛劳，为他挣下了这份他今后可以赖以生存的家业。所以，当他父亲说起要去大陆老家办个面粉厂时，他没有异议。他觉得是条路，可以试一下。

然而，老家在他心里，跟他母亲的感觉一样，一样的遥远，一样的模糊。去老家办个厂，只是多一条路，多挣点钱。台湾的大米业，早已经饱和了、见顶了。他并没有他父亲那种想为家乡做点事的想法。能去办个厂，是在家乡，还是不在家乡，对他来说都一样，无所谓。他对于家乡依然不在意，份量并不重。

“在那儿办了厂，我们怎么去管呢？你还能常住那儿？还是我去？”发仔的问话里还带着点担心。

王立知道儿子担心的是什麼，宽慰他说：“其实我们也不用管什麼。那个厂，我们出的资金才多少？”

“那还要我们干什么？还让你当董事长。”

“需要我们的资金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要我们的名义。有个外资的名义，有个台资的名义，他们村里办厂可以得到当地的好多优惠条件，连镇里、县里的官员，脸上都有面子。”

“喔？”发仔有点不解，他对大陆上的事，一点也不知道，“那谁来管呢？”

“具体都由他们来管。我们有时间抽空去看看，就是了。”

“那还不错。”发仔第一次觉得有个老家还真不错。

阿英跟娘家人讲了这个事。因为父母已经过世，她去了长兄家。

她大哥是个很少出村的老农民，坐在木头椅上，听他很少过来的妹妹一说，大吃一惊，好像从来没想到过会发生这样的事。他先是瞪大眼，“啊呀！”一声，又停了半天，才说：“你要去大陆啊？”

“是啊。”阿英轻轻地说。

“去那个地方啊？！”她大哥还没从惊讶中回过神来，又大声地问了一遍。

“是啊。”阿英的声音更轻了。

“你要去那个地方啊！太可怕了。那个地方，一年年地出了多少事，死了多少人。你还去啊？”她大哥对于大陆的了解，都是道听途说来的。几十年里早已塞满了耳朵。

“不是政府开放了去大陆探亲吗？有不少人要去呢。”

“那是那些外省人，被赶到台湾来了，老家还在那儿，不去看看不行。”

“发仔他爸老家也是那一边，要我一起过去看看。”

“他是家在那一边，那是没办法。你去干吗呢？”

“我的老家也算是在那一边了。”

“啊？你的老家也算那儿啦？唉……”她大哥连连叹着气。一会儿才又说：“反正祠堂里也不会有你的牌位，你这样说也行……”

她大哥再没有话说了。

阿英也就走了。

王立在回大陆之前，又去了趟台北李策的家。

李策虽已六十开外，退休多年，但依然一头黑发，精神矍铄。得知王立又要回大陆去，而且还要去办一个面粉厂，拍着坐在沙发里的王立的大腿，连说：“好，好。我真是羡慕你啊。不但能回家，而且还生下了一条根啊。”

“那你也回去吧？”

“我回去干吗？”李策低下了头，声音细微了，“一片伤心地啊。”

每当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屠美丽总是在一边睁睁地看着李策，一言不发，然而内心的翻腾是可想而知的。

“去看看你妹妹的坟，恐怕能找到的。说是在董平章家的边上。”

“唉……”李策痛苦地长叹一声，又抬起头，“我又何尝不想回去看看啊，哪怕是看一下那个发夹也好，只是伤心得太重了。”

“也可以把发夹要回来。发夹还一直在叶医生的头上。”

“不啦，不必啦。要回来，它就永远埋葬在哪个箱底黑暗的角落里了。在叶医生的头发上，它还能见着阳光。更何况这发夹，对人家叶医生也是刻着一段生死之情啊。”

屋里沉默了会。

“喔，上两个月我去美国的时候，按照你的嘱托，找到了辛凯旋。”李策接着说。

“对，对，你一回来就跟我讲了。他家里挺好？他虽然通过我入资面粉厂，可我还没见过他呢。”

“那当然挺好，比我们要强多了。他说他记得你爹，对你我也都有印象。但我是认不出他来了。呵呵。”李策挺吃力地笑了下。

“他对老家还是挺思念。”

“他毕竟还有个儿子在家乡啊。你知道我这次在美国还找到了谁？”

“谁？”

“你可能不熟悉。我找到了我们“济成号”的方茂名，方舰长。”

“喔，那是你的老上司。那他得八、九十了吧？还在啊？”

“都八十了，精神还行，身体挺好。比以前更显得温文尔雅，挺有气质的样子。过得挺滋润。”

“和他们孩子在一起？”

“不但和孩子们在一起，连章团长的夫人安晓芬也一直和他们在一起。他们是儿女亲家，两家合一家。万里之外，关起门来还是中国人的家庭气氛。”

“难得，难得。方舰长也回大陆去过？”

“他不想回去看了。他说，尽管他在大陆上留下过那么多的足迹，但都已经烟消云散了，不想再提了。他是信基督教的，在那儿比较好融合。他倒是想着，他离开大陆最后的一块土地，是我们海源，是我们龙头镇。”

“你的孩子在美国过得也不错，也已经扎根了。你不留在那儿吗？”

“我跟方舰长的感觉不一样，总觉得那不是自己的家。”

“是啊，中国毕竟是我们的祖国。”纯朴的王立依然有着纯朴的感情。

“是啊，不管政治态度有多么的不同，祖国还是祖国，所以，总还是放不下。我们也难啊。美国是异乡之地，台湾是漂泊之地，可大陆又是个伤心之地。”

“大陆现在开放了，也在发展，还是有希望的。”王立以他的感受在劝说着。

“不敢有多大的希望啊。两岸的对立，隔阂太深了，要冰释前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何况双方深层次的利益和想法还是不一样的。”

“是啊，这几年有了些变化，两边都做了些工作。尤其是大陆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像现在这几年多交往、多沟通，相互贸易，相互办厂，慢慢地，等两边的根须能长到一起了，也就水到渠成了。”王立还是用农民的思维方式打着比方。

“但是，你要注意噢，大陆最近又起了风云，有所动荡噢。”李策又严肃地说起来。

“是吗？又是什么风云？”王立对这些不了解。

“我也说不清。报上说的，有些学生、市民起来反对搞特权的叫什么‘官倒’，也不知道这些消息准不准。不过你要去，还是早去早回的好。”

“好，好。”王立点着头。

43.2 又踏回乡路

王立跟村里说了，他准备领老婆孩子一起回来看看，开工典礼就不用了，尽量简单点。

他们一家三口由香港转道，在黄港机场下机。当他们拖着旅行箱往外走向出口处的时候，发仔手指着前面，叫了起来：“老爸，你看，你看。”

王立往前一看，竟然在出口处栏杆外的人群中伸出了个写着自己名字的牌子。上面写着“热烈欢迎王立董事长回乡指导工作。”

王立心里一热，差点落下了泪。到底是家乡的人啊，把自己当个人物看。天底下，全世界，谁知道还有个叫王立的人呢？还能举着牌子来迎接他呢？只有老家，只有老家的人。

王立的表情，阿英觉察到了。她也看到了那牌子，她觉出她丈夫的呼吸在急促，脚步在加快。她搀扶着王立微微颤动的胳膊，随着他加快的步伐，虽然腿不利索，也赶紧往前走。

今天家乡来了三个人接机。举牌的是镇外办的副主任林李，她是代表镇政府来的。村里来的是鲁队长，他既是村联合会的人，又是王立当年的民兵队长、儿时的玩伴。还有一位是高秀珍。她既是王立的侄媳妇，作为家族的一员，也是作为龙头镇的兄弟单位来的。虽然针织厂事儿不少，她还是乘了厂里的一辆车赶过来。

这三位王立都熟悉。王立放下阿英挽着他的手，三步两步就跨了过去，鲁队长也赶紧迎了上来。两人久久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王立又把老婆孩子介绍给老家的三位干部，相互间好一番问候和谢意。这边说，一路辛苦啦。那边说，还麻烦你们到黄港来接啊。好不亲热，自不再言。

汽车奔驰在去龙头的公路上。公路在高低起伏的丘陵上延伸。

发仔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不断变化着的景色。一片片绿色的小麦、玉米，一个个红瓦白墙的村庄。不时有苹果园、梨园出现在眼前，又缓缓而去。田野上农人在劳作，散落着零星的手扶拖拉机，也有在台湾看不到的黄牛和毛驴。

“这也是中国啊，这就是家乡啊。”

他明显地感到家乡与台湾的不同，天气要凉爽些，不像台湾的湿热。眼前显得开阔，村庄和农人也很简朴，不像台湾的拥挤、繁忙和嘈杂，甚至有种压抑感。连天空的光线这儿也柔和些，云彩也恬淡一些。发仔不断地在想着。

高秀珍看发仔这么认真地望着窗外，便笑着说：“大兄弟啊，这就是你的家乡。你也是海源人哎。”

发仔都来不及反应，连说：“是哎，是哎。我也是海源人哎。”但还是没有体会到，这海源到底和自己有多大的联系。

车进龙头镇了。

街的两旁站了不少人。尽管村里面提前说了，大家不要都挤过来围观，亲朋好友也可以分批来见面。可乡亲们还是抑止不住的热情，都要来看看王立带回来的台湾的老婆和台湾的儿子。

车在西街停下。打开车门，阿英和发仔一看，喔哟，那么多的人。

王山、连四嫂两口和小连子，早在胡同口等着了。见车停下，忙迎上去，扶着阿英下车，嘴上“大妹，大妹”亲热得不行。

阿英和发仔也高兴地跟王山两口向胡同走去，两边真是不少的人。

阿英还从来没见过有那么多的人在看着她，那么多友好的笑脸迎着她，还有一阵阵的噤里拍拉的掌声。这一生都没有过这样的待遇，她的心里真是激动，真的有种美好人生的感觉。尽管腿脚有些不便，但她尽量往上跳一点。看起来虽然有点异样，像是跳跃着往前走，但不显得很瘸。

发仔更是高兴了，还直朝两边的人点点头。对有的特别兴奋的对方，有时还招招手。

乡亲们也在议论着王立领回来的妻儿。这可是西北村去台湾的那些人中最成功的一个，不但能够办一个厂，而且大燕子还带着小燕子回来了。对于阿英，六十多了，已经没法去议论她的美与丑，只是对阿英临行前特地去烫的发，说还挺时髦的。龙头妇女的烫发还要晚一些。对发仔，都评论说小伙长得不错。有的说个头不矮，像个海源人。有的说，脸架子像个台湾人。但是除了眼前的阿英，人们还没有见过台湾人。其实发仔与阿英长得还真不像。

到了王山家的门前，王山特地指着还是新崭崭的房子对阿英说：“这是王立兄弟给妈盖的房子，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好。”

进了院子，在新崭崭的正屋前，院子里还留着个猪圈。

王立对妻儿说：“那年我被国民党抓了以后，最后一次回家，就是把那袋面粉埋在这个猪圈里的。”

母子俩，心里一震，没想到一进门，历史和现实就不可避免地来了次撞击。

王山说：“所以，这个猪圈我一直没有拆。留着它，永远留着它。王家这四十年的变化，怎么开始的，这就是一个见证。”

进了堂屋门，正面的墙上挂着王建悟老两口的遗像。老两口一生没有照片，这是不久前找人大体上画的。

王立一进门，看见老人的遗像，“扑通”一声就两膝跪下，失声痛哭。

阿英见状，想跪下，腿又不好使，连忙跟发仔说：“扶我一下。”

发仔扶着他母亲，阿英顺势跪下，连连磕头。发仔也跟着父母并排跪下磕头。这在台湾也是常有的形式。

稍片刻，王山两口就扶了他们起来，说明天我们还要上山祭坟呢。

气氛又慢慢地缓和过来。鲁队长说，明天村里再安排接风，今天你们一家人好好叙叙吧。其他的人也都纷纷道别。

剩下王家的人在一起。连四嫂说，今晚我们包饺子。这是海源人接待贵客的传统方式。而且做的是对虾饺，这可是高档食品啊。于是全家人一起动手，剁馅的剁馅，擀面的擀面，包的包，烧水的烧水。吃饺子，不但口味好，而且是全家一起参与，满屋子的气氛能和开了锅的饺子汤一样的热气腾腾。

发仔这才明白，为什么往年他老爸过年时总是要包顿饺子，哪怕是自己一个人吃。

晚上，王山要王立他们睡在正房的一间。可王立说，他要再去住那个他当年一直睡的倒屋。这倒屋在去年翻盖新房时，王山特地留下来没动。一是想，不想让盖新房的事在村里太显眼，把靠外面沿街的倒房留了下来。再个，也是留个历史的纪念。这个想法，今天正好和王立想到了一起。

连四嫂说：“这哪好啊？多少年也没人住了，一直都没打扫，里面脏死了。”

王立说：“没关系的，现在这天也不冷。我就想再回忆回忆当年的时光。”

连四嫂见执拗不过，就说：“那好吧。我先去打扫一下。”

王立说：“我们去就行了，你忙了一天了。”

结果他们几个都去了。其实倒屋里也并不脏，擦下灰，扫个地，把铺盖卷拿来铺上，就行了。

王山两口走了，王立一家三口坐在这倒屋的炕上。天已经暗了，倒屋里的光线更不好，也没有电灯。王立点上了边上的油灯。那油灯也就是一个小玻璃瓶，瓶盖上插着一根棉线，连个灯罩也没有。灯芯上燃起了豆大的火苗。人的手一晃动，它也跟着跳跃一下。发仔从来没有见过，还好奇地用巴掌搨了两下，火苗晃动得厉害，差点都灭了。

王立说了：“都这么大了，还像个孩子。”

阿英吓嗤一笑。

王立说：“当年我在老家的最后一夜，就是在这儿过的。”

发仔听了静了下来，开始观察这倒屋的上下和四壁，心里想着这就是老爸当年的住房啊。倒房的墙是碎石垒的，外面抹着黄泥。这泥墙经受了几十年的岁月，至少有发仔三、四倍的年纪了。那墙上的黄泥十分地陈旧，十分地粗糙，而且大都已经发黑了。

发仔在认真地看着，开始用手抚摸着。

王立又说了：“这有什么好看的，上面都是灰，别去摸了。”

忽然发仔问：“这墙上的花纹，怎么也不好好地搞一下，歪歪扭扭，东一块西一块的？”

王立说：“这墙有什么花纹？”说完看儿子还在认真地看，他凑过来也看了下。这一看，他凝神了起来。一会儿，他又把油灯拿过来，紧靠着墙，细细地看着。

墙上有好几片的地方，刻着一道道指甲长短、浅浅的、歪歪扭扭的划痕。显然这些是用手指刻的。有的痕迹已经模糊了，有的被墙上糊的报纸遮住了。

撕开那些也已经贴了二十年的文革时期的报纸，底下依然也是些这样划痕。从这些划痕在墙上的位置、划的深浅和划痕的颜色看，不是一个时期划上去的，更不是盖房子当时划上去的。王立清楚地记得，他住的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些的。

那会是谁刻的呢？为什么刻的呢？

王立立刻就想起丁妹，想起和他同住这个屋、同睡这个炕的对她来说是小姐姐的而别人叫她“丁妹”的人。

只能是她，不会是别人。

王立的脸，凝重了，愣愣地看着墙，好一会都没有说话。他看着满墙的划痕，缓缓地对发仔说：“我们数一下，有多少根划痕。”

发仔愣一下，不解地看着父亲。看他父亲已经开始一行行地数了，嘴唇还在一下下地动弹，像是在心里默数，发仔也就开始数起来了。

“一百……，二百…，三百…”发仔数着，又对他妈说：“妈，你帮我记一下。”

阿英也不解，但看着王立是这样地认真，也就没多问，从箱子中抽出张纸，记了起来。

“一千……”

“二千……”

“三千……”

随着数字的增加，王立的脸色越来越沉重了。

“四千……”

王立的脸发白了。

“五千……”

王立的手发抖了。

“发仔爸，你歇一下吧。”阿英觉出来有点不对头了。

王立摇摇头，手还在颤巍巍地摸着墙数着，嘴角在蠕动着。

“六千……”

王立突然哭出了声。

阿英和发仔大惊，愣眼看着他。

“这是丁妹划的啊！她在天天划着，天天盼着我呀！”王立哭着说。

阿英愣了会，反应了过来，“她是个好人啊，你怎么忘了她呢？”泪水也流了下来。

发仔惊讶得一语不发，心中的冲击难以言状。

“我对不起她呀，我对不起她呀！”王立掩脸而泣。

阿英扶着王立的肩膀，擦着自己的泪，也擦着王立的泪。

这一夜，他们一家三口都没睡好。

第二天上午，就更沉重了。他们要上望海山坡去祭拜王建悟老两口的墓。

按说这正是莺飞草长的春天时节，望海山坡却还是海风嗖嗖、野草萋萋。王山领了王立一家往山上走去，大家的脸色都很冷峻。王立拿着个大纸袋，里面是香烛纸钱，有的还是从台湾带来的。王山夹着个布卷。面对座座坟堆，王山作了些介绍：“那大一片是1949年打国民党时解放军战士的烈士墓；前面那个最大的就是八烈士墓，那是八个侦察兵潜入到龙头镇里被国民党抓住都被活埋了。”

发仔瞪大了眼、张大了嘴听着。

“这个墓碑最高的是姜雪花烈士的墓。她是我们民主村的人。她也是潜入龙头镇侦察被国民党抓住，还乡团把她用钉子活活钉死在镇里十字街头的墙上。”

发仔禁不住“啊哟”地惊叫了一声。

没有人怪他。王山继续说着：“说是坟墓，其实里面没有尸骨，只有她的几件衣服。”

“连尸骨也没有啦？”阿英怯怯地问。

“是啊，这里还有好几座没有尸骨的坟。你们看那一座，墓碑是红花岗岩做的，那是林海秀的墓。她是因为反对文化大革命而在那时被冤杀的。听说被枪毙前还被烫瞎眼睛、缝了嘴、挖开肚皮割了肾。到黄港接你们的外事办的林李，就是她的女儿。”

阿英和发仔听得眼色惊恐，张着嘴，却一点声息也没有。

“还有，还有那一座，那是董平章和他一家。董平章当初是和我一起到台湾的，硬是想自己的老婆孩子，实在没办法当了个特务回来看看，结果被抓住送到新疆劳改。他老婆赵玫不远万里去新疆看他，又在沙漠里被狼群咬死。他出狱后，把她的几根骨头和他孩子戴的银镯又从新疆带了回来，自己吊死在老屋里。这里有他的一家三口和他的爹、他的爷爷。他的爹，1949年南下支前，死在外面没回来，也是座没有尸骨的空坟。”

听得阿英和发仔一脸惊吓，几十年里看过的恐怖片、听过的鬼故事，也没有这几分钟里的厉害。

连四嫂看阿英娘俩吓得，连忙推推王山，“别说这些了吧。”

倒是王立凄凉地说：“唉，董平章这下场，比起连二娃还不如呢。”

提起连二娃，引得连四嫂的脸上也是一脸悲怆。

“到了，这就是爹娘的坟。”王山指着一座新换了墓碑的坟说着。

王立领着妻儿跪下，点上纸钱香烛。火苗燃起，黑烟翻卷。

突然王山悲叫一声：“弟妹啊，咱爹也是一座空坟啊！”说完便泪如雨下，扑倒在地。

连四嫂过去扶，王山摆摆手。他揭开怀中的布包，拿出一件四处破洞、满是深褐色斑渍的旧衣服，哭着说：“这就是他留下的血衣！他是被人活活打死的，尸骨无存呐，尸骨无存呐！”说完，摇着这血衣，涕泪横流，脑袋连连撞地。

望海山坡哭声一片，飞鸟惊起，蓬蒿摇曳。

发仔猛然抬起头：“为什么？为什么会被打死？”

王山满脸泪水，表情痛苦。他没有说。他怎么能说呢？他能说就是因为王立去了台湾，他们家被说成是“台湾国民党”的人吗？

连四嫂在一旁哽咽无语。

发仔一脸愤怒，又追问：“谁杀的？是谁杀的？！”

“不说了，不说了。”王山双拳紧握，两眼紧闭，嘴角抽搐着。

当纸钱燃尽，王山用棍子翻拨灰烬，王立看着最后的亮点熄灭，却还是久久地久久地站着，一动也不动。

但愿，望海山上空那飘浮的白云，能够带走他们满心的哀怨。

下午，王立已是浑身发软，疲惫至极，但他还是不听劝阻，坚持要到海边去看丁妹的坟。

依旧是王山两口领着王立一家过来。本来王立劝阿英不用去了，可阿英说：“她也是我的姐姐呀。我是一定要去的，一定要去看看丁姐一眼。”

高秀珍叫针织厂的面包车带着他们过来。来到海边，阳光亮丽，景色宜人。沙滩上，游人三三两两，泳衣斑斓。沙滩后，几处售货亭，几辆小轿车。然而，就在这近旁的一道土埂边，一座孤坟赫然在目。坟堆上杂草丛生，跟周围环境很不协调。又是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又是一种强烈的心理冲击。现实与历史在这儿又一次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撞。

王立在坟前欲哭无泪，甚至已经无力支撑自己，跪躺在地上，两手匍前，手指深深地插在沙土里，脸颊紧贴在两手间，不停地哭着。

阿英跪在丈夫的身边，手扶在丈夫的背上，也是两行泪水，轻声地哭泣。

发仔无声地跪在父母的身后，一脸铁青。

丁妹在海边的幽魂如果能知道自己的死，在一年以后能唤起自己丈夫无尽的悔恨和丈夫一家深切的伤悲，会有所宽慰了。

许久，高秀珍擦着泪，才劝他们起来。

临上车时，王立对高秀珍说：“大妹啊，请你跟村里讲，我要把丁妹的坟迁到望海山上，让她跟爹娘在一起。”

村里知道后，虽然有点不合当地的旧俗，但还是同意了。

返回的路。昔日的砂土路，已是宽阔平坦漆黑的柏油路。路的西侧，耸起了一座座崭新的宾馆、招待所。路灯、广告牌、现代雕塑，一应俱全。海边度假区初具雏形。南门外，一排排白墙红瓦的新房，好几座两层的小楼房也已竖起。一眼看去，正是一个发展着的、新时期的小城镇，很有几分现代和繁荣的气氛。谁都很难把眼前的一切，跟刚才的悲凉相联系。

让过去的一页，永远过去吧。

我们说让它过去，不是说遗忘它、撕掉它，而是说决不能让它再有重现的可能。

我们有时还要翻开它，为了纪念逝者，也为了更好地珍惜和建设今天，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43.3 面粉厂

休息了一上午。第三天的下午，在彭小宾的陪同下，王立父子去了西门外的面粉厂。

齐成才领着两三个职工在厂门口迎接。他现在是面粉厂厂长，见到王立父子来了，忙带头鼓掌，跨出几步，热情地和王立握手。

“欢迎，欢迎。王董事长，早就盼着你们来啦。”

又握着发仔的手说：“欢迎你啊，王厂长。我们现在的配料、技术操作，都是按照你的要求来的。”

发仔还稍有一愣，自己怎么成了厂长啦。

彭小宾忙解释说：“发新啊，”发新是发仔的大名，二十多年里，发仔还很少听到过别人称呼他的大名，心里自是一热。

彭小宾接着说：“本来是要安排你当厂长的，考虑到厂里的杂务事挺多，你也不能老在这里，我们也不好意思事事来麻烦你，所以就叫齐成才多跑点腿，你当第一副厂长，遥控指挥就行了。你们已经启程了，来不及告诉你们，还请包涵。”

“好，好，其实我没出什么力，当副厂长也是名不符实。”发仔很谦虚，也是心里话。

“哪里，哪里。现在厂里的事，都是按你的意见，我再来叫他们去做。”齐成才也很客气。

旁边的员工也直点头。

走进厂里，厂区不大，但很规整、很干净。厂房是新盖的，机器是新进的，一片新崭崭的，很是赏心悦目。

跨进车间，机器在轰鸣，粉尘在飞扬，发仔稍稍皱了下眉。被彭小宾看在眼里，说：“齐厂长啊，没给王董和王厂长准备口罩吗？”

齐成才立马局促起来：“啊呀，真不好意思，我还真没想到这些。小鞠啊，快上镇里买几个来。”齐成才回头对一个小青年说。

那小青年一口答应，转身要走，被王立挡下了。王立说：“不用了，不用了，面粉厂哪有没有粉尘的。”

发仔也说：“现在不用去买了。以后要加一些防尘设备，国外的面粉厂是很干净的。”

“是，是。”齐成才点头答应，一边领他们到出粉口。

白白的面粉，从出粉口像小瀑布似的哗哗地流下，下面接着敞口的面粉袋。称重一旦达标，工人就关上出粉闸门，将面粉袋拎到边上封口。

齐成才舀出一小碟面粉，大家都拿过来闻闻，用手指捻捻。磨出的面粉色白味正、手感细腻，不但比乡间磨坊的要高出一筹，比起县面粉厂出的也要好。

“里面的添加剂，是按我说的吗？”发仔认真地问。

“是的，我们特地到黄港买的正宗货，严格按比例添入。”齐成才答。

发仔看着眼前的面粉，点点头。按说他也不是面粉行家，看起来还像是个不在意的人，甚至是个不用功的人，但实际上真有事的时候，却是个很用心的人。表面不起眼，实质很有潜力。这几个月他跑了不少地方，请教了不少人，也去了几个厂，所以他知道了其中的一些道道。比如，做面条专用粉，是要中等的面筋含量，可添加海藻酸钠、碳酸钾、食用盐等等。这些事，内地的面粉厂并不是不知道，而是有些厂在见利忘义、昧着良心瞎来。连质检、工商、卫生、轻工这些管理部门的一些单位，因利益所牵，意见也不一致，导致监管失察。出来的面粉白得吓人，却不敢吃。

“我们可是要以消费者利益为重，不要乱来，不要瞎加滑石粉、增白剂那些。”彭小宾语调很重地说。

王立也说：“对，做生意，一定要以诚为本。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小厂、新厂，更要规规矩矩，做出信用来。”

“是的，是的。面粉厂是我们的饭碗，我们会很慎重、很小心、很努力，不会砸自己饭碗的。”齐成才说。

“这些粉，外面用得怎么样？”王立问。

“反映挺好的。镇政府的食堂，也是用我们的面粉，说是挺好。”齐成才脸带喜色地答。

“对了，我在想，如果是本村、本镇的，我们不如在厂里再建个面条车间，直接往外卖面条就是了。”发仔说。

“好，好，发新讲得好。下个月咱们就干。”彭小宾高兴地说。

“好是好，就是人手不够哎。你看我们民主村的人，都出来工作了。连靳宝康出了院，也没歇多久，就在我们后面那个车间里干呢。”

“招，再招工。再从北山，从外县，甚至从外省招。我们的农户联合会，本来也不限于民主村。”彭小宾说。

在边上的小鞠他们几个员工兴奋地说：“那我们民主村真要大发展啦，民主村要成民主城啦。”

面粉厂因为员工少，自己没有食堂，就在边上的针织厂搭伙。

高秀珍原本想在自己厂的食堂里摆一桌招待王立一下，王立说：“不用客气啦，就跟员工一样在窗口打饭吃。我就想看看大陆的员工食堂吃得怎么样。”

高秀珍一笑说：“那怎么好？今天大食堂没准备好菜。”

“准备什么呀？碰到什么，就吃什么。吃吃大陆员工吃的菜，也不枉来大陆一趟，是吧？”王立转头跟大家说。

“好，好。”发仔也点头说。

彭小宾见状也对高秀珍说：“高总啊，那就照王董的意思吧，我也在这儿吃一回集体食堂。从1958年以后，还没吃过食堂呢。”

“好，好，你们去找个空桌子，我进去叫他们炊事员端过来。”高秀珍小跑进了伙房。

厂里为了方便员工进餐，下班时间错开成三批，这样开饭时虽然人进人出挺多，但还不是很挤。员工们看见是高总领着彭小宾他们过来，自然就让出了张空桌子。

不一会，炊事员就端了菜过来，也就是白菜粉条、土豆炖肉、蕃茄炒蛋这些，最好的也就是红烧加吉鱼，比起员工们打的菜稍好些，但决不是宴会上的那些。王立看着这些朴实的家乡菜，连说：“好，好，这比上席要好。”

高秀珍劝着菜，彭小宾问：“要不要来瓶酒？”

王立忙说：“不用，不用。我和发仔都是不喝酒的人。”

发仔看着四周的员工，大多是女孩子，或正在就餐，或端着菜往来，个个都是青春健康，脸上喜气盈盈，耳边笑语喧哗。整个餐厅，气氛平和，也很热闹。发仔相比起在台湾忙碌而孤独的生活，就说：“现在大陆上的社会，也挺好么。”

高秀珍又接着问：“你觉得大陆上，有什么好啊？”

发仔说：“好的地方多啦。比如说，那个文化大革命就挺好。当学生的，又不用上学，又能打老师，真有意思。”

高秀珍跟彭小宾两人相对看着，想笑都笑不出来。高秀珍就说：“那还是十几年以前的事啦，现在比那时变化可大啦。”

彭小宾说：“是啊，这十年变化大啦，都走上正轨啦，像个发展的样子啦。你要有兴趣，以后可以在这儿多住点时间，就更会感到我们这儿好的地方啦。”

高秀珍说话照例是直来直去：“兄弟啊，你是王家的根啊。你的根，在这儿呐。你看我们厂那么多女工，有不少好姑娘哎。你要看中哪个，我来给你介绍。”

发仔猝不及防，脸都红了。这事，自己还真没有好好地想过。

王立也没想到这一步，就说：“发仔的事，真是要考虑了。”

彭小宾笑着说：“是啊，两岸交流要是交流到这一步，那就好了。”

发仔忙说：“我还真没想这么多。我看到大陆有好的方面，但我也听说还有一些不好的方面，我怕我来了会很很不习惯的。你们这儿有那么多规矩，我都不知道。听说你们这儿，还不能随便讲话，讲得不好，还会打右派被抓起来。”

彭小宾有点尴尬了，赶紧回答说：“呵呵，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你现在可以放心大胆地说，没人会抓你的。”

齐成才毕竟是老高中生了，有点小文化，看问题也挺深远，就说：“两岸关系啊，最主要的是看我们这一边了。我们这一边的社会发展了，经济繁荣了，人民富裕了，能更多地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对那边就有吸引力。有了吸引力，才有凝聚力，那样才会顺利实现民族的和解、和平的统一。”

高秀珍也笑着说：“到那时，就真能把发新兄弟吸引过来了。”

发仔也是抿着嘴笑。他看着这些女孩子，虽说并不艳丽，却是阳光的。尽管她们衣着简朴，薪酬不高，劳动时间很长。然而她们心地单纯，写在脸上依然是满足，甚至是能有幸离开相对贫困的老家、看到一种新希望的喜悦。不像台湾女孩的那种傲然、敏捷和难以读懂。当然，这时发仔并没有想到要娶个大陆妹，至少在这时。他的内心却是在感受着美好和愉悦。

饭后，他们几人往外走。

齐成才望着彭小宾，迟疑地说：“这小麦原料的事还没解决，宗所长还不肯点头。彭主任，你去跟他再谈一下？”

彭小宾轻轻一笑，说：“这事还是你先去谈。实在不行，咱们再找另外的办法。你去可不能叫所长噢，要叫宗局长。他最烦人叫他所长，好像小瞧了他似的。”

好在粮管所就在边上。走到厂门口，齐成才跟王立父子告别就往南面去了。

高秀珍说：“彭主任，你也先回吧。我送大叔回家。”

“你这一阵不是住在厂里吗？还是我陪王董走吧。”彭小宾说。

从狗狗去了美国把厂托付给高秀珍以后，高秀珍就一直住在了厂里。

高秀珍说：“我也回家一趟看看。”

“好，那我们一起走吧。”彭小宾说。

这时天色已经暗下，路的那头走来一个妇女，步履蹒跚。他们还在疑惑，这个时候，还有谁在西门外走呢。

等走近一看，竟然是王溪。

那年因为撒泼吵架，气死了王大妈，王溪被派出所抓去了。考虑到属于家庭纠纷，派出所也没把事情闹大，所以也就没去追究刑事责任，拘留了十天，也就放了。但是，王溪从里面出来以后就完全变了，变得没言没语，神神颠颠，像是另外一个人了。有人说，王溪是真受了刺激疯了。但也不像，她还是能正常的生活，只是行动迟缓，不爱说话了。她不理别人，别人更没有理她的。常常看见她在龙头镇上游荡，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过的日子。

这时，她神色怆然，只顾自己往前走。走过王立他们面前，只是茫然地一望，似乎没有认出这位一年多前来过，却因此而掀起轩然大波的应该称作“二哥”的人。又走过十几步路之后，才回过头来再看了一眼，目光依然漠然，自顾自地往前走了。

王山见了，似乎有了点恻隐之心，深叹了一口气，“唉，她怎么弄成这个样了？”

高秀珍却依旧不饶：“活该，这种人不要可怜。这是她自己找的。没有判刑已经便宜她了。”

王立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王溪大概是又要去粮管所找宗发奋。她没法再去找秦德才父子了。秦有理从怂恿申光荣写诬告信后几个月前被调走了，不在龙头镇了，而秦德才则病得、老得轻易都下不了炕。但宗发奋可是不敢招惹她了，每次都躲得远远的。王溪就上粮管所去找，门卫当然不会让她进去。她也不再像先前那样地一蹦三尺高，而是默默无语地在门口瞎转，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地瞎转，也没人去撵。宗发奋气得要死，却也是干瞪眼，没法子。他在粮管所，已远不像当公社书记那样地风光，所里没人帮他去撵野女人。而王溪这样一个女人，在她无法驾驭的风云变幻中，人性已经扭曲了，性格、行为、生活都扭曲了，成了这样一种特定类型的变形人。

谁知道，她以后将会怎样地生活和生存下去呢？

齐成才今天来找宗发奋真不是时候。刚好他踏进粮管所，看大门口的就喊上了：“王溪又来了！王溪又来了！”王溪也出现在大门外的路上。

宗发奋在所长办公室里，一听气得扭歪了鼻子。齐成才却一头踏了进来。你说，这能有好结果吗？当然，就算是别的时候来，齐成才也不会等到好结果。因为宗发奋对民主村是恨透了。民主村办了个农户联合会，搞得红红火火，那是彭小宾的政绩，又是祖云涛一手支持、纪海洋鼎力相助。这几个正是他这几十年来在龙头镇的对手啊。他会去给面粉厂办事吗？肯定不会。何况，找他宗发奋办事，哪能是白办的呢？他宗发奋到了该退休的年龄了，手里的权再不用就过期作废了。这找上门来求他的事，正是下手的好机会。可是想叫面粉厂出点血，彭小宾那些人会甘心吗？那样不是自己往人家枪口上撞吗？白白地把把柄交给人家吗？宗发奋很明白这些道理。所以齐成才一进来，他都没抬眼。

“宗，宗局长。”齐成才嘴里磕巴了一下，差点又叫成宗所长，好不容易才转了过来。

宗发奋当然也是听得出来，嘴角闪过一丝不会被人轻易察觉的笑。

“宗局长，上次向您请示的给我们面粉厂安排点议价小麦的供应指标，不知您研究得怎样啦？”齐成才小心翼翼地问着。

“不好办呐。我问过县局，他们说是不符合相关政策，不能给。”宗发奋闭着眼、摇着头，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因为这议价虽然是计划外，但还是比市场价低，不是随便给的。所以这议价粮卖给谁、不卖给谁，也是个极好的寻租机会。而且因为是在计划外，卖给谁和不卖给谁，都有充足的理由，随自己说了算。

齐成才看着心里实在生气，正搜肠刮肚地找话，想着最后试一下，突然想起了西北村的面粉厂可是不一样，就说：“我们这个面粉厂不一般哎，是台资企业哎，县里都挂上号，面子大得很。你这儿怎么就不能通融一下呢？”

“台资企业？台资企业有什么了不起。你以为给他们这样那样的优惠，是在拍他们马屁、巴结他们啊。那是给他们一点好处，把他们栓在这儿，就把他们捏在我们手里了，以后就乖乖地听我们的啦。还用我们过去解放他们吗，这些资本家就离不开我们啦，就屁颠颠地自己跑来找我们啦。”

齐成才头回听到还有这种说法，愣了下，没等张嘴，一个女人“革登革登”穿着高跟鞋的脚步声从窗外走过。宗发奋立马睁开了眼，见到齐成才还站在前面，心里气得不打一处来，也像程贵安似的从鼻子里往外嗤了一口气，说：“你们联合会那么大的本事，把台商都请来了，还找我干什么？”

齐成才知道给宗发奋的香没烧好，现在再磕头也晚了，说了声：“那就不为难宗局长了。”转身就走。

宗发奋赶紧两眼往窗外看。宗局长已经从政治动物演化成了经济动物（不知道这是进化，还是退化）。既然是动物，也就难免有了动物的某种本性。那时虽然海源还没有“二奶”、“小秘”的说法，可是从辜书记到皮高深那小子都有艳福，我宗发奋怎么能没有呢。从搞掉尹会计之后，宗发奋紧张害怕了好一阵子，现在他既不想有事，更不想惹事，才不会去管西北村的那些事呢。心里就剩下了一件事，把老婆柏惠珠赶走了，虽然还没有正式离婚，可身边还空着缺个人。他在这上面已经费了不少心思，现在最骨鲠在喉的，莫过于那个关秀娟始终没有就范。都给她安排上化验室主任了（尽管化验室就两个人），还要怎么样？叫她把进库粮食的检测水分多写个0.1%，一年就可以多捞上十万。可她就装着听不懂，可气

不可气？再从头另找个目标？宗发奋还在闭目养神地遐想着呢，外边是王溪还在门口转，里面是那关秀娟又刚好从窗外走过，你齐成才插在这儿算什么呢？看着齐成才往外走的背影，宗发奋心里说着“你快走”，想的又是这妞会上哪儿去呢？

43.4 匆匆而去

半夜时分了。

王山的家。

王山让王立一家在倒屋睡了一晚上，就叫他们住到了正屋，免得再看着墙上的划痕触景生情。

高秀珍知道了头一晚王立的伤悲，当时就对王山说了：“爸，快把那南屋拆了吧。这么旧的房，还留着干吗？村里哪还有这样旧的房？拆了以后就算是不盖房，院子也能大一点，种上几棵月季还能好看点。”

王山听了觉得对，就把王立他们劝到了正房。

没料想到了深更半夜时分，外面的院门突然“呼呼”地敲了起来。在农村，没有十二分的大事、急事，是绝不会有这种情况。

王山赶紧从被窝里坐起，一听是高秀珍在外面大声地喊：“爸！爸！”心头一惊，知道肯定是有什不同一般的事，立马翻身下炕，出来开门。

只见高秀珍一脸紧张，就问：“有什么事呀？”

平日泼辣大方的高秀珍，没有多言，只是推着他公公：“进屋讲，进屋再讲，把王立大叔也叫起来。”

王山也就过去，把已经醒了的王立一起喊了过来。

高秀珍这时才说，“辛总从美国来了长途。”狗狗去了美国之后，隔三岔五来个越洋电话给高秀珍，问个情况，交待个事情。因为时差的关系，美国的白天，中国是在半夜。为了不多打搅，狗狗通常是让高秀珍在晚上接电话。今天是在半夜里来电话，显然是非同寻常了。

高秀珍说：“辛总说，他是转告辛老先生给王立大叔的话。”她又专门对着王立说：“大叔，辛老先生叫你务必立即回台湾，说是大陆的局势又变得紧张了。晚了，怕出什么事情，就回不去了。”

王立挺奇怪，就问：“会有什么事？”

“电话里没说有什么事。我还特地问了，辛总也没说。但是口气很坚决，又说了一遍，要你放下手里所有的事情，立即回去。”

王立和王山相视无语。

高秀珍又说了一句：“辛总说，他自己暂时也不能回来了。叫我替他多照看厂里一段时间。我问他，要晚回来多长时间，他说看不准，很难说。”

“会是什么事呢？”王山也在喃喃自语。

身在民主村的这几位，还不太知道、或者不大理会城里已经风声渐起的学生潮。

“那我们怎么办？这才来两天，面粉厂的事才刚开始。”王立说。

发仔插了一句：“我想辛总半夜来电话，讲这几句话，是有缘由的，我们不能不听。”

高秀珍也说：“我想也是。辛总从来就是很认真、很慎重的一个人，从来不随便讲话的。”

阿英看着她丈夫，等他决定。

王立就对阿英说：“要不，这样吧。你和发仔先走。我把有些事处理下，过两天再走。”

阿英突然靠过来拉着王立的胳膊，几乎是哭着说：“不能啊不能。要走，一定要一起走。不然说不一定，又要生死相隔几十年。我怕，我怕像丁姐那样。要么就都不走。”

王立没想到阿英会立刻想到这上面，也愣了。

还是高秀珍说：“你们就都听辛总的嘱咐，都回去吧。面粉厂的事，村里会搞好的，你们放心吧。你们看，现在不是搞得挺好的吗？”

王立低头想了一会，说：“那好吧，明天就跟村里讲一下。还有件事，我走之前一定要亲手办好，就是把丁妹的坟迁一下。”

高秀珍说：“这事也请大叔放心。我已经跟村里讲过了。鲁队长和彭书记都同意。你就是走了，爹和我都会办的。你尽管放心。”

“我还是想亲手来吧。明天天一亮，去过村里以后，我们就迁坟。”

天亮以后，彭小宾知道了王立一家要提前回去的事，虽然有些意外，但也理解，就安排了几个年青人去海边迁坟，还特地请皮安已过来作现场指导，有些老规矩还是要讲一些。

王山对他兄弟说：“海边你就不要去了，村里已经派人了。去了，看见了，又要伤心。”

王立几乎要哭出声了：“怎么能不去？她都为我死在那儿了，我怎么能不去。”

迁坟的悲切，就不再叙了。

晚上，镇政府由祖云涛出面招待了王立一家。因为气氛的变换，只是小范围地表示一下，村里的几位也来了。

祖云涛对王立爱国爱乡的举动一再表示感谢。他说：“这几年我们经济的发展，从大的方面说是改革开放，具体来说是得益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招商引资，外资的进入，尤其是港澳台同胞对祖国大陆的关心和支持；一个是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领域的转移。这两个方面，王董事长都对我们民主村的发展、对我们龙头镇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祖云涛又问：“面粉厂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尽量提出来，看镇里能帮上什么忙。”

齐成才说了小麦原料的事，粮管所的宗发奋不肯点头。

彭小宾立马接过去说：“不用去烦他了，我们自己能解决。我们可以自己上市场收购，现在政策也允许了。价格能贵一点，大不了我们少赚点就是了。”

发仔试探着问：“这种粉最好用软麦，不知我们这儿可不可以自己种？”

鲁队长一拍手，说：“这个主意好。软麦，我们这儿可以种。我们联合会的农户可以带头种。别的户要种，我们可以跟他们签收购合同。这样，质量、数量都有保证。”

彭小宾又说了句：“再不够的话，我们还可以上澳大利亚买嘛。经主任讲过，他们那儿种软麦多。”

祖云涛对王立笑着说：“这样你更可以放心了吧。还有，发新啊，小伙子不错。还有阿英嫂，欢迎你们常来，下一次来就多住些日子。”

“好，好。”王立一家连连点头。

祖云涛转头对林李说：“对台工作啊，主要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我们这儿对台湾同胞有更大的吸引力了，其它的工作就好办了。哪怕一时不理解，一时解决不了，也不要紧。能保持常来常往，慢慢地也就好了。用不着大嗓门、高调子、自说自话、自吹自擂，看起来力量大得很，好像是压倒一切，实际上是把人家都吓跑了。”

外办的林李代买的回程票，按照祖云涛的意思，又让他们晚走了一天。

这是安排他们有时间上县城去看看。林李开着车，陪着他们去海源县城。贝科长已经是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了。他找了一位副县长，喊上了县台办的领导，中午，挺风光地招待了一下。

前后也就是六天时间，王立一家又踏上了返程的路。是林李开车送他们上黄港机场。贝主任还特地来了电话，黄港也已经有学生上街游行，路上有些堵，就不要进市区了，直接去机场。

王立一家顺利地登上了飞机。

飞机向着云层飞去。

他们三个人，望着机窗外涌动的白云，都是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王立已经来过一次了。对于家乡，他是了解的。他特别感谢村里、镇上对他的接待、对他的期望，并且为他做了很多工作。他甚至暗暗想村里对他不用这么隆重，担心自己这点力量，搞不好会辜负了干部和乡亲们对他的厚望。他愿意以他这一生最后的年月，为家乡做点事，把面粉厂办好，不管以后是不是真的回来住。

当然对他来说，历史的伤痕永远无法磨灭。受过如此创伤的心，犹如打碎过的碗，再粘合起来，裂缝总还在。他也知道些村里、镇里人和人、人和事之间的复杂关系。他真希望再不要那么多的争斗，大家都往前发展，那多好。

阿英觉得大陆比起想象的要好。家乡的人挺热情、挺真诚。进了民主村，真有个家的感觉。就是觉得公公、婆婆，还有丁姐的遭遇，太可怕了。为这个，她到现在还觉得头晕，吃不好饭。怎么会那样呢？那时，他们是怎么过来的？真是不可思议，想不出来。不知以后的路，会怎样？还会那样吗？这是阿英最大的担忧。她想不出来，也不去想了。对她来说，大陆的老家，只是回来看一次而已。

别看发仔好像不经意，其实他想的，反而比他爹妈更多一些。

虽然只有短短的六天时间，悲喜哀乐，接踵而来，叫人都反应不过来。发仔觉得就像过了一辈子一样。他对家乡的印象还是不错的，觉得这儿是个向上的、积极的社会，是个有希望的社会。村里、镇里，也是真心地欢迎他们。老家的人，也不错，好相处，不复杂。不像台湾的一些人太精明，不好捉摸。历史事件的冲击，对发仔的内心，也是有着极大的震撼，难以忘却。但愿这些已经过去，老家还是要往前发展，也需要往前发展。不知道这些事，以后会不会再有。他看出来，老家这些年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老家无论是农户、还是企业，条件还都有限，各项设施还有些落后。你看，屋子里看着还可以，胡同里却是垃圾乱放、脏水四溢，连个下水系统也没有。据说要是下雨的话，满街上就会泥泞不堪。对于面粉厂，发仔觉得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搞成这个样，还是不容易的。不过，这儿的人和事关系复杂，外人搞不清楚。对经营环境和办事规矩也不甚了解，以后的事情恐怕不是那么简单。

发仔觉得如果搞好了，是愿意再回来的，希望家乡能更好一些，希望家乡能正常发展。对他来说，毕竟海峡两岸都是家，希望海峡之上永远都风平浪静，这样生意才能做得起来。有了生意，才谈得上别的，这是新一代还牵挂着大陆的台湾人的心愿。但是……但是，那最后突然从大洋彼岸来电的叫回，匆忙间的紧急撤离，究竟是意味着什么，他真的是搞不明白。大陆上的水太深了，他真的是搞不明白。那些事，或许自己永远也搞不明白，想牵挂也牵挂不起来。故乡，对他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还真不好说。

第四十五章 扬帆远航

1978年2月14日

45.1 济聚一堂

1989年，对于中国是不平静的一年。

五月，在北方已是晚春季节。山峦和田野都是葱浓的绿色，一片生机盎然，这本该是一年中最为欣欣向荣的时光，也是人们最为充满希望的时候。眼下却又是阵阵风云翻卷、山雨欲来的景色。

民主村、龙头镇的人们也是既充满着热望，又有着不安和担忧。

说起龙头的建设，还是挺有起色。贯穿龙头镇南北的公路修好了。北门外的后港削低了十多米，这些石头又运到海角填到海里，那龙头港的防浪堤在继续向外延伸，港口的规模又有了扩大。有了港口的依托，民主村的农户联合会就向信用社贷款五十万买了条二手铁壳渔轮，和团结村的一条配对，成立了海洋渔业公司，肖胜利任总经理兼船长。联合会已经更名为农户民主联合会，这民主既是地名，也表明了联合会的性质。

这天，联合会为肖胜利首航饯行。饭局就在那海边宾馆。这个宾馆已改为联合会入股经营，具体由鲁队长操作。鲁队长虽已六十出头，却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穿上了西服，整天笑呵呵的，似乎比前几年更有精神了。从外表来看，比起杜家骏、平金刚更像个企业家的样子，可人们依旧还是叫他鲁队长。村里的事，他也还在管。小丫丫八岁了，按说可以上小学了，但是因为前两年的耽误，也没往一年级去插，所以这几个月还在家里。这下可乐坏了小丫丫，整天脚前脚后地围着他转。哈妹一个劲地追着她：“别闹，别闹，你爸爸还有好多正事呢。”鲁队长抱起丫丫，丫丫朝他脸上亲个吻，把鲁队长喜得合不拢嘴，“玩吧，玩吧，小丫丫高兴就行。”这个举动，常常让皮安已又感动，又伤憾。皮平平一直没有消息，生死未卜。西北村的人、龙头镇的人，看到小丫丫，总要想到皮平平，那依然是无法消除的痛。

饭局已近尾声。村支书彭小宾，也是一身西服。民主村的干部们，真是当刮目相看了。他举着杯，向全场提议：“为民主村和联合会的蓬勃发展，为全村乡亲们的富裕安康，祝肖经理顺利远航、满载而归，干杯！”

“干杯”，“干杯！”来宾们纷纷拿起高脚酒杯，杯盘交错，一饮而尽。比起前些年的端着缺了口的大碗，喝着几毛钱一斤的散装白干，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今天肖胜利应该是中心人物，他穿着一身崭新的蓝色帆布工作服。没想到依傍着大海的民主村，竟然是一个外来的、往日的中先生成了它迈向海洋的领军人物。当然从外表和口音，肖胜利都已经与地道的海源人无异。以他的努力和勤奋，肖胜利不但融入了民主村，也成了民主村向前发展的一个中坚力

量。他的父亲、退休校长肖福兴，穿着已经不多见的四个兜的中山装，微笑着看着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他最大的安慰，不只是安慰自己，更是可以告慰阴阳相隔了四十多年的亡妻。

纪主任走过来羡慕地对肖胜利说：“你看我的名字叫海洋，我的父母一辈子没见过海，却向往海洋，在一个土沓见生下我，还给我取名叫海洋。当我随部队来到龙头，第一次看见大海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父母给我取的名字真好，真的取对了。从此我的人生也就跟海洋有了联系。但是我这个‘海洋’，却没有下过海。真羡慕你这个胜利，倒是一脚跨进了大海。”

肖胜利笑着说：“纪主任说他的名字叫海洋，只见过海，而没有上过海。我倒反而成了‘海洋人’。其实，开船、出海、也不是我一开始就想到的。老天没有给我选择的权利和选择的机会。是命运选择了我，是社会选择了我，是民主村选择了我。而这个选择对我来说，是幸运的。我感谢全村父老乡亲对我的厚爱，使我能在民主村的土地上成长起来。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我会为民主村和联合会的发展而尽力。等什么时候，你们有兴趣，你们都上船来，我带你们出海去转一圈。从海上看一看咱们的沙滩、看看咱们的龙头镇、看看咱们的望海山，那才漂亮呢，没见过吧？不过那个晃荡的滋味，可不好受。”

“好的，好的。”大家应声道。

“我可不怕晕，我一定要去！”叫得最响的是叶丽娜。叶丽娜依然风姿绰约、光彩照人。她来龙头镇八、九年了，一时间成了全镇，甚至全县的热点人物，到哪儿都会是人们目光的焦点。那时，她还很不习惯，常常要躲开一些。如今，她已习惯了，相互也熟悉了，年青时开朗的性格也渐渐地重新显露。对这样的新鲜事，她是不会错过的。

“一定，一定！”肖胜利说：“虽然咱沿海有个老说法，妇女不能上船。但咱把这个规矩扔到海里去！到时候请咱叶丽娜小姐第一个上船。”

大伙又是一阵鼓掌高兴。开始站起来往外走。从二楼的宴会厅，朝北看，一条崭新漆黑的沥青大道笔直地向北伸去，不时有汽车来往。远处是龙头镇南门外一排排红瓦的新房，背后是抹上了春天嫩绿的望海山，再后面是一层层色彩更浓的山峦。朝南面看，是蓝色的大海、金黄的沙滩，各式各样的小建筑，海边嬉水的人群。最显眼的是，沙滩前，那座镌刻着胡耀邦总书记题字的高大牌坊，在阳光下是那样的醒目。

龙头镇、民主村真可以说是旧貌换新颜。

杜家骏看着窗外自己熟悉而又崭新的家乡，说：“还是改革开放好啊。”

杜家骏的貂场已经稳定了些。但是因为国内养貂总量的增加，造成貂皮价格下滑，利润空间下降。杜家骏为此也挺搔头，不过总比年前要好一些。杜长贵没有来赴宴，不过情绪要稍好了些。他家里的事，别人还不好去问杜家骏，尽管大家都很关心。

鲁队长看着四处的景色说：“是啊，龙头镇、民主村真是大变样，大家的生活都好起来了。”

和平村的哈联成也来了。他还是他们和平村的书记，但具体事不再管了。不过跟民主村有那么一层亲戚关系，这样的事是不能不来的。他说：“那些年，喊着学大寨，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吃饭都在地里，天黑才回来了，出了那么多力，不少人得了病，打的粮食却还是不够吃。现在多好，也不用吆喝，却有吃不完的粮食。”

祖云涛说：“这就是那时候的体制不行，那时候的政策不行。现在，体制改变了，政策对头了，社会宽松了，把人解放了。人的积极性自觉自愿地释放出来，社会财富也就不断地涌现出来。”祖云涛在镇上的领导班子稳定以后，更多地关心起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问题来了。

潘场长定居在民主村，不到十年，体会却很深：“这几年时间，龙头镇变化真大。老了，老了，总算还赶上了这个好时候。这十年，真的是建国几十年以来，中国历史几千年以来，难得有的好时候。”

肖福兴深沉地说：“这两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像这样发展下去，我想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遗愿也快实现了。当初中山先生说过：‘我也是社会主义者’。中山先生的思想，即使拿到现在来看，大部分也是正确的。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跟中山先生的理想是很接近了。”这两年，肖福兴开始有兴趣研究起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

大伙走下台阶，出得门来，看见西面有一大块土地荒芜在那儿，枯草萋萋。在四周春意盎然的一片生机中，非常的显眼。

经大臣见了问：“你们民主村的征地，还没处理好啊？”

经大臣现在和车素花、儿子、儿媳住一起，其乐融融，相处得很好。孙子经普仁已经在黄港上大学了。老经现在直后悔那时候怎么会和老伴弄不到一起，别扭了几十年，是自己糊涂了。

经学文说：“为了缓和矛盾，去年底镇里减少了征地面积，就征了一百五十亩，又加了点补偿标准，再向群众咋唬一下。地是征下来了，可是人家韩资撤走了，不来了，说是这地方还冷清了点，来的人太少，经营会有困难。”

车素花还是个实在人，听了有点着急：“那咱们不就要赔上钱了吗？”

经学文说：“赔不了，县里的辜书记在等着土地涨价，再卖个好价钱呢。”

潘场长说：“唉，但是把地这么荒着，太可惜了。古人说：‘但留方寸地，留予子孙耕’。咱这儿毕竟不像南疆地广人稀，咱这儿是寸土寸金啊。这粮田是去掉一亩少一亩，变不回来呀。”

说到这征地，邬中和是最来气了。原先经营的地被去掉了一半，只剩下十几亩，但很多开支并不能因此减少一半，就如经济学里讲的“固定成本”减少不多，而总收入却减少一半，所以收益额和收益率都会大大降低，要减少一半以上。邬中和能不心痛吗。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他高兴了几年之后，没料想到的事情。他气愤地说：“这不但是少了地的事情，分明是不把种粮农民的利益放眼里。我们吃了这么大的亏，有话还没地方说。弄得鸡飞狗叫，最后还是这样。利益随着权力，都到了当头的手里了。我看这样下去，问题会越来越多。弄不好，有些地方，就会变成官僚垄断资本主义。”

纪海洋觉得邬中和的话，说得有点过了头了，就说：“问题是有一些。但是变成资本主义，现在还是谈不上的。”

祖云涛说：“这里还是一个地权的问题，这是中国农村最深层次的问题，这个疙瘩到现在为止还解不开。土地的权益到底归谁；在中央、地方、集体、农民之间到底怎么分配；以什么方式进行流转，既能发挥它最大效益，又能让各方面比较满意，目前都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农村的生产力将会比实行承包责任制有更大的爆发。所以现在出现这些问题不奇怪。”

赵村的赵刊新也来了。一晃眼他也往七十上数了，当了几十年的村支书，现在也退了。但是对外礼节性的事情，村里还是叫他出来。赵刊新说：“现在社会发展了，也出来一些新的问题。征地不当，损害农民的利益是个事。还有，你看这好好的大河被造纸厂污染得，上面飘着一层层的泡沫，大河眼看就成了污水沟了。再过几年，污水渗到地下，井水也就不行了。到那时，再怎么办？我正要找平金刚呢，他怎么没来？”

经学文说：“他在家肚子发胀呢。”

这半句新疆话，引得大家都发笑了。

衣春玲说：“那厂里的工人，也是够辛苦、够可怜的了。”改革以后，各村的医务室渐渐萧条，“赤脚医生”也无声无息了。民主村的医务室，因为镇上就有卫生院，虽然衣春玲热情周到，但也是没什么人来了。衣春玲这个赤脚医生也就自动下岗，在家里相夫教女、怡然自得。很有些人因为当年英姿勃发、敢说敢当的衣春玲没能在村里发挥更大的作用感到惋惜。但衣春玲自己的心态很平和，对村里的事也依然是很热情很上心。

“我也要找平金刚呢。靳宝康的医疗费、补偿金还都没有落实呢”彭小宾说。

“村里面也还有一些贫困户，我们也要关心到啊。”鲁队长看得还是比较全面。

彭小宾点点头，说是的。

肖胜利说：“造纸厂亏得停了，要不它的污染对海上渔业也会有很大影响。说实话，海洋捕捞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一个原因是污染，另一个原因是过度捕捞。”

经大臣就问：“那我们还要买船去捞啊？”

肖胜利说：“作为我，尽力而为吧。”

杜家骏说：“反正都是信用社的钱，他造纸厂花了信用社多少钱啊。”

车素花眨了眨眼，好像才明白这个道理，“弄了半天，老百姓往里存钱，你们拿出来花啊？”

鲁队长远远看见宗发奋盖的小楼，因为那楼上宗发奋特地盖了个大屋顶，挺显眼，老远就能看见，就问：“宗发奋哪来的本事，去粮库才一、二年就盖起了楼。老祖啊，你怎么没盖一幢呢？”

祖如海笑着说：“他那一套猫腻，我都知道，不就是利用了双轨制的漏洞吗。”祖如海退休以后，因为有儿子在镇里第一线工作，就不再参与什么事，免得给儿子帮倒忙，彻彻底底地退休了。

彭小宾说：“那你怎么不说？省里都来了调查组，你也没说啊？”

潘场长认真地说：“虽然我不知道龙头的一些底细，但我看尹会计的死，是有大问题的，不像是畏罪自杀那么简单。”

祖如海淡淡的说：“正因为是有大问题，所以不用我来说。时候一到，会有说法的。”

经大臣摇摇头说：“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这几年也明显滋长了。”

鲁队长说：“我看那辜书记也在变了，变得几乎都不认识了。”

杜家骏看了看经学文，他知道经学文跟辜书记关系不错，便在底下用手点了点鲁队长，意思是别说了。

祖云涛却接着说：“问题不在于搞出谁，搞出几个贪官。只要体制不变，只要产生贪腐的体制不变，只要产生贪腐的土壤不铲除，再揪出几个贪官也没用。”

彭小宾把话接了过去：“所以说，现在社会是发展了，可是还有不少问题。有些原有的矛盾没有完全解决，新的矛盾又产生了。这些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权力过于集中，缺少制衡机制，导致了缺乏有效监督，导致决策不够民主和科学，特别是造成群众利益、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缺少表达和维护的渠道。”

祖云涛颇有感受地说：“这说明改革还需要深入进行，而且是政治、经济、社会各项改革要配套、协调地进行。只搞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不但旧的矛盾解决不彻底，还会出现一些新的矛盾。”

肖福兴叹息了一声，说：“我们正谈论改革，可还有些同志思想僵化，对左倾错误有意无意地掩饰、回避，对文革中一些确凿无疑的罪行都含糊其词。好像这些事是我们干的，反而成了我们的历史包袱。”

纪海洋没有想得那么透，他说：“唉，文化大革命吧，是有不少事做得不对。但也不能全怪他老人家，他的主观愿望还是好的，只是没有搞好。”

潘场长反倒是想开了，跟纪海洋想得不一樣。他说：“我们没有必要讳疾忌医，没有必要去为所谓的尊者避讳。没有必要把左倾错误跟我们党、跟社会主义事业捆在一起。我们革命队伍应该丢掉这些包袱，轻装前进。正视和吸取这些历史教训，包袱就会变成财富。靠回避，靠掩饰，靠封锁，甚至靠说假话了维护某个人的假象，那是靠不住的。一旦真相披露，那些假象顷刻之间就会彻底崩塌。与其到那时候引起震荡，不如现在就让大家有思想准备。”

纪海洋看了看潘场长，知道他们之间的想法有了距离，也就没再多说什么。

鲁队长说：“你看像程贵安那样的人，还在露骨地鼓吹左倾错误，念念不忘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李辰痛心疾首地说：“讲这些话的人怎么对得起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死难者。还是巴金老先生说得好，应该建立一个文革纪念碑，永远纪念在那场灾难中不幸死去的人们。”在这些人里面，受伤最重的要数李辰了，虽然政策落实得已经很好了，可他怎么能忘记他的爱妻海秀呢。心口依然是常常作疼，只是苍白的脸上能平静一些。

他的女儿林李始终陪在他身边。她青春亮丽、婉约可人，既有传统气质，又有现代知识，是民主村新一代女性中渐渐升起的新星。她说了句挺有哲理性的话：“回避左倾错误的事实，就是对左倾错误的容忍。只有不忘记过去的弯路，才会走好现在的路。”

肖福兴说：“对于有些人来说，错误的理论、错误的思维，都成了个习惯，一时间是改不了的。事情是不会那么简单的。”

祖云涛说：“所以对左倾错误要保持警觉。改革开放的大业不能毁在他们手里。”

鲁队长说：“嗨，有些人钻了改革的空子，又揽到了权又揽到了钱，就满嘴的革命高调，你不用把他们当真。你别看他们对毛泽东拥护得不得了、崇拜得不得了，那都是假的。要是真的搬出毛泽东的那些话，‘走资派还在走’，能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

经学文说：“还有些底层混混，把左倾高调也喊得那么响，再来次文化大革命什么的，不过是想把社会搞乱，再浑水摸鱼，重新洗牌，捞个一星半点的好处。其实那只不过是他们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权贵集团是绝不会跟他们分享利益的。文革时那些造反派的下场，早就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这一点。”

彭小宾说：“还有些人，比如申光荣，因为自己遇到困难，没有更多地分享到改革的利益，也对改革不满。这样的同志，虽然看起来有时也讲一些左倾的话，但他们不会是左倾错误的社会基础。也需要我们去进行教育，向他们解释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不是因为改革才出现的，而正是因为改革得还不够。这些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改革不能走回头路。”

杜家骏说：“本来改革开放的形势那么好，怎么还会有这些问题呢？”

祖如海说：“这就是我们的改革进程有了问题，经济方面的改革，大步往前推。政治方面的改革，缩手缩脚，不敢往前。结果本该两条腿走路，就只剩了一条腿走，或者说是一只鞋大、一只鞋小，那就不只是走得慢了的问题，而往往就会出现走偏了、甚至摔倒了的问题。不完善的改革，滋生了权贵阶层；而权贵阶层又进一步扭曲改革，把改革推向更有利于他们的歧路。”

大伙一边说着一边走向码头。

彭小宾想起来了说：“今天要是王立和狗狗也在，就更好了。”

肖福兴说：“他们也都为西北村、为龙头镇画上了重彩浓墨的一笔。”

纪海洋问道：“老于村长怎么没来？”

鲁队长脸上掠过一层阴云，说：“他身体不行了，八十多岁了，恐怕过不了今年了。”

“那我们明天过去看看。”纪海洋关切地说。

“我也快不行啦，说不上还能再有几年啦。”车素花说。

经大臣点了她一下，“别瞎说自己啊。”

“真快啊，真快。四十年前不就是在这儿血战的吗？”潘场长说。

大家都停了下来，这儿正是海角，公路两边依然是礁石嶙峋。

“是啊，怎么能忘呢？这儿正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是顾排长、班大虎、简贵阳、郝森林他们牺牲的地方，这儿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战士的鲜血。”纪海洋指着不远处的一块大礁石说：“顾其金排长就是倒在那块礁石旁，我跑过来拖着他的时候，他已经闭上了眼。”

潘场长说：“不只是海角，从西海滩到望海山，从尖山顶到大河边，多少战士倒下了。不但有英勇牺牲的烈士，还有忍辱牺牲的小钱，还有刚解放过来的杨定神，更有的连名字也没有留下。”老潘和老叶脱下了帽子，大家也都低下了头，静默数分钟，表示哀思。

过了一会，鲁队长沉思着说：“我在想，这些年来有多少人离开了我们。拿民主村来说，从祖大爷、姜雪花开始，有赵玫、林海秀、彭会计、包金贵、迟得法、连四娃，老王头两口、丁妹。他们的事，每个人都能写本书，都是一种特有的典型，反映着我们历史进程中的不同侧面。”

彭小宾说：“是啊，说起来还有李芹、董平章，还有储小二、周新春又是另外的类型了。”

纪海洋说：“还有余校长，还有尹会计，也都是某一种的典型啊。”

潘场长说：“是啊，如果再扯远一点，还有国民党方面的章团长、呼营长、腾营长、支排长、余班长等等，还有你们民主村的大地主陶富贵，那个还乡团高增光，他们也都是这场历史的参与者。”

祖云涛说：“这四十年在历史上是很短暂的瞬间。但我想，等过了几十年、几百年以后，人们再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会发现这是一段很特殊的历史时期，会惊讶这段历史波动之大、事件之多、矛盾之尖锐、斗争之激烈、变化之迅速，以至于未来的人们会很难理解。”

经学文说：“我也在想，这将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重要的特殊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社会在苦难中孕育出了新的前程。从此开启了中国全新的历史时期。”

杜家骏说：“这四十年，真的是不一般，多少波涛啊。大的就有：互助组，合作社，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大饥荒，社教运动，更不用说文化大革命了。”

肖福兴说：“当初我们真的是真心实意地参加革命，可是革命给了我们太多的教训。”

李辰说：“这四十年，人是长大了，可身上却伤痕累累。”

鲁队长说：“唉，是啊，我们这些过来人经过了太多风雨啊。”

经学文说：“从另一方面说，这风雨也是对我们的锻炼和考验呐。”

经大臣苦笑一声：“这风雨也太大了点吧。”

林李说：“唉，有首最新的俄罗斯歌曲就是讲的这个。”

彭小宾说：“那你就唱给大家听听吧。”

林李稍有羞涩，说：“我唱得不好。”

“唱吧，唱吧。”大伙说：“以前民主村的歌声可多啦。赵玫、林海秀、衣春玲都唱得不错，到你这一辈可别停下来喔。”

林李只好清了清嗓子唱起来：

“自然界没有坏天气，

任何天气都是见面礼。

无论遇上刮风飞雪下雨，

平心静气对待莫回避。”

大家边听边走，连声说好，就得这么看问题啊，要不怎么办呢，一阵的鼓掌。

祖如海说：“现在有些人投鼠忌器，就是不愿意提那些年的事，好像是我们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完全没有必要嘛。这是极左路线欠下的帐，背在我们身上干什么呢？一是一，二是二，功是功，过是过，完全可以说清楚的嘛。这样将来才有可能不再重犯那些错误。”

祖云涛说：“马克思早就说过了：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地，应当努力地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还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后果。（请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9期）尽管文革已经结束了十几年，其实它的后果也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社会信用的缺失，社会道德的滑坡，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就是明显地起始于文革的破坏，还不认真地总结反思啊。”

肖福兴说：“要是能把这段几十年的历史写出来，就好了，能给人多少启迪啊。哪怕是把我们民主村、龙头镇的历史写出来也好。”

李辰说：“其实，我也是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是现在有关部门的忌讳也很多，怕是写了也没用，连出版出来给别人看的机会都没有。”

经学文说：“有些部门的顾虑也真是太多了。对曾经的灾难和伤痛的记忆，可以是包袱，也可以是财富。问题在于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化解。回避总不是好办法。”

祖云涛说：“这项工作总得要有人去做。李老师啊，那你也可以用文学书写历史，用虚构保留真实。这也是为社会、为后代保留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

李辰说：“啊呀，就算是写出来了，恐怕也得拿到香港、台湾去发表。”

杜家骏说：“还得那么复杂么？”

肖福兴说：“能到那儿去发表，也是个进步啊，不然连个地方也没有。”

杜家骏点点头：“这倒是。”

45.2 前程无量

前面就是港口了。

公路穿过礁石群，向南直接伸进了大海，向前延伸了一百多米，形成了防浪堤。在最前面，又向西拐了个“L”形的弯角。弯角的内侧，就成了小码头，停靠着三、两只小型船舶。

大伙站在防浪堤上，吹着微风，这是民主村人、龙头镇人第一次站在海上啊，真的是站在海上啊。以前在海边北望家乡，都是近处是黄土，北面是青山蓝天。现在的脚下可是碧浪翻卷，海浪之后是金色沙滩，而后再是黄土、青山、蓝天。就是不一样啊，看得大伙都陶醉了。

祖云涛介绍说：“现在这码头还小，只是第一期。以后还有第二期、第三期，到那时这码头还要往海里延伸二、三百米，那时世界各地的万吨巨轮都能停靠上来。咱们龙头就能和整个地球联系在一起。”

“啊！”大家一阵惊叹。

“还有呢。”纪海洋又接着说，“在小河口的东面，也就在咱这儿东面四十里的浮山卫，还要建一个核电站，那个规模可大啦。到那时，咱这儿也要建好多附属设施、附属机构，就要像城市一样了。”在纪海洋说这话的三十年后，这个项目真的建成了。

“那我们就真的成了‘城里人’啦！”大家又是一阵更大的惊叹。（说明：解放前龙头镇是海源县的老县城，所以龙头镇里的人对四周村里的人，一直以“城里人”自居。）

祖云涛说：“龙头的乡亲们真正成为说了上百年的‘城里人’，不是没有可能啊。再过两年，从龙头到黄港的高速公路就要开工了。这条路建成以后，从咱这儿开车一个小时就能进黄港市区了。说不定，咱这儿还能划给黄港市了呢。”

“哇！”惊叹已经不能说明民主村人此时的激情了。

顺便插一段民主村人不知道的事情。建港时，为清理航道，曾叫北方救捞局来打捞1949年沉没在龙头外海的那艘沉船。潜水员下去以后发现，经过几十年的冲刷，船舱里除了长满水草，鱼儿游弋，已别无它物，成了海洋生物的栖息之地。只有在一个封闭的舱房里有两具散了架的尸骨，这无疑就该是陶富贵和戚和煦了。当然对于潜水员来说，分辨他们的身份，是毫无意义的。鉴于该船整体已无打捞意义，在锯断拉倒它的桅杆以后，依然让它倾斜在海底。他们的发现也没想起来要跟龙头镇的人说。他们只是说，那个沉船与航道无碍，不动它了。然而对于陶富贵来说，他的几十年的平静却被打破。在掀开了舱门之后，不用几个月，他最后的残骸也会被海底洋流冲刷得荡然无存。

民主村的铁壳渔轮停靠在码头边上。虽然是二手船，但外表油漆一新，通体深绿，桅杆上彩旗招展，看不出是个旧船。船员们早已在上面准备好了。

肖胜利在大伙的祝福声中，踏过跳板，走上渔轮，在船舷旁向大家挥手致意。

码头的电线杆上的喇叭里放着最新的歌曲：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

伟大的祖国该是多么美。

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惹人醉，

欢歌笑语绕着彩云归……”

从那时，到本书的完稿，真的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人们，看那四十年，看又过去了的二十多年，又会是怎样的感慨呢？

回到眼前，渔轮解开缆绳，拉起铁锚，几声汽笛，离开了码头，向着大海进发。

今天的海上和风轻拂，阳光明丽，空气清新。人们舒畅地呼吸，极目远望，碧蓝的波涛翻卷着，一层层、一层层像是从天边涌来。白色的浪花晶莹剔透，在阳光下浪尖闪烁着金色的光亮，往远处那点点金光越来越密集，渐渐融成了蓝天下一片跳动的光芒。

那渔轮载着民主村人的希望，越驶越远。远远的、远远的成了绿色的圆点，渐渐地、渐渐地融进了无边无际的蔚蓝色的大海，融进了金色的光芒。

虽然还要有千万里的航程，虽然还会有颠簸的风浪，但它背负希望而去，一定会满载收获而归！

站在海边，脚下是黄色的沙滩和土地，那是我们民族的命脉；身后是绿色的原野、绿色的山峦，蓬蓬勃勃，生机无限。

往前看，海天之间一片蔚蓝，一片金色的光芒。那蓝色象征着和平、安宁、自由和辽阔，那金色象征着成功、富强和希望。

啊，民主村！

啊，黄色的土地，绿色的原野！

啊，蔚蓝色的大海和天空！

……

本书就要合上它最后的一页，民主村、龙头镇的人们还将继续书写他们的历史长卷。但愿那上面不再有悲哀和伤痛，而是永远的色彩斑斓、绚丽多彩，阳光、沙滩、海浪，还有人们灿烂的笑容。

卷尾语

本书的故事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花费了宝贵的时间看完了全书。

当我们回顾本书所叙述的从1949到1989这四十年，乃至到今天落笔时的2015年这六十多年的历史变迁，有太多太多的感慨。多少的奋斗，多少的成就，多少的挫折，多少的灾难，真的是难以言尽。即使是本书一百四十余万字的篇幅，也难以完全表达。

1949年，革命胜利了，很多旧有的问题解决了。然而，新的更多更复杂的问题出现了，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对这些问题在很多方面解决得并不好。革命容易执政难，打碎一个世界容易，建设一个世界难。当执政和建设搞不那么好的时候，就干脆来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没完没了地永远革命下去，用革命解决一切，用革命掩盖一切。为革命而革命，革命成了永无止境的目的、成了一切的一切。

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里，极左思潮在那儿反复折腾、反复干扰，严重损害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严重危害了社会主义事业，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有些人就是想要回避这些，掩盖这些，内心还在向往这些，甚至还想重演这一些。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进一步批判极左思想，彻底否定“文革”，坚决不走回头路，唤起人们的记忆，唤起人们的良知，坚决抵制左倾思想任何形式的回潮。这才是今后不再折腾的最有力的保证。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完全否定那三十年。作为由几年几十年组成的历史时期，不存在全盘肯定与否定的问题。我们只是否定那些年里的左倾错误。

眼下，我们既看到了新的希望，又失望于某些方面改革的踏步和停滞。其实这些都是源自于对曾经的历史教训的回避和纠结，不能勇敢地面对和处理。这几十年，就是希望与失望的交替。空前无比的巨大希望，接踵而来的却又是空前无比的巨大失望，如此反复。在希望中失望，在失望中盼着希望。感慨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河西又河东。

抬起头来往前看，就是一句话：面向未来，走历史必由之路，这是我们的心愿。

同时我们又在担忧，左倾灾难所造成的惨痛后果，正在被遗忘；而形成左倾灾难的社会气候却正在加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之所以左倾灾难被一些人忘却，甚至一些人敢于为之叫好；之所以在改革中时不时会出现犹豫、反复、止步不前；之所以在理论和思想上出现一些看似难以处理的纠结；就是因为在历史和文化上存在着许多亟需填补的有意无意的空白和漏洞。笔者所以在年迈之时还要奋笔疾书，就想要唤起人们的记忆，正确地面对历史。只有正确地面对历史，才能正确地面对现实、面对今天、面对未来。这个记忆，不仅是指个人经历的回忆，更是我们整个社会的记忆、我们整个民族的记忆。这些记忆的累积，才会有对历史的认识。而只有对历史有深刻的认识，我们才会有自觉的改革，才能不断保持和强化进一步改革的动力，向着现代社会可持续地稳步前进。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迷失未来。

当前的问题是，要对向前发展有信心，要对深化改革有信心，要对批判极左思潮有信心，要对人民群众有信心。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尤其是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扩大和落实人民应有的民主权力，继续深入地批判极左错误，彻底清除极左思潮的影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指出的是，极左思潮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全对立的。不清除极左思潮的影响，就不可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需要新一轮的思想解放，以现代思维和理念与现代社会接轨。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持续地、健康地向着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不断前进，才能实现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理想。能否全面、深刻地批判极左、反思历史教训，是我们民族成长、成熟、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不要让千千万万罹难者的生命毫无意义地逝去。他们始终在我们的心上。他们在看着我们前行。

尽管笔者编制过大型经济预测模型，但是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不作预言，只是充满着期待和希望。当前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让我们抛弃一切旧有观念，与极左错误彻底决裂，面向未来，高举现代民主的旗帜稳步向前，把今后的又一个革命四十年书写得更加精彩。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两岸猿声啼不住”，航船正过万重山。在风雨过后的日子里，阳光真灿烂，世界真美好。我们希望明天的阳光会更灿烂，明天的世界会更美好。

陆伟国 2015年4月

写于南京·大行宫·无阳的阳台

革命四十年

陆伟国 著

· · ·

v2026-03-28